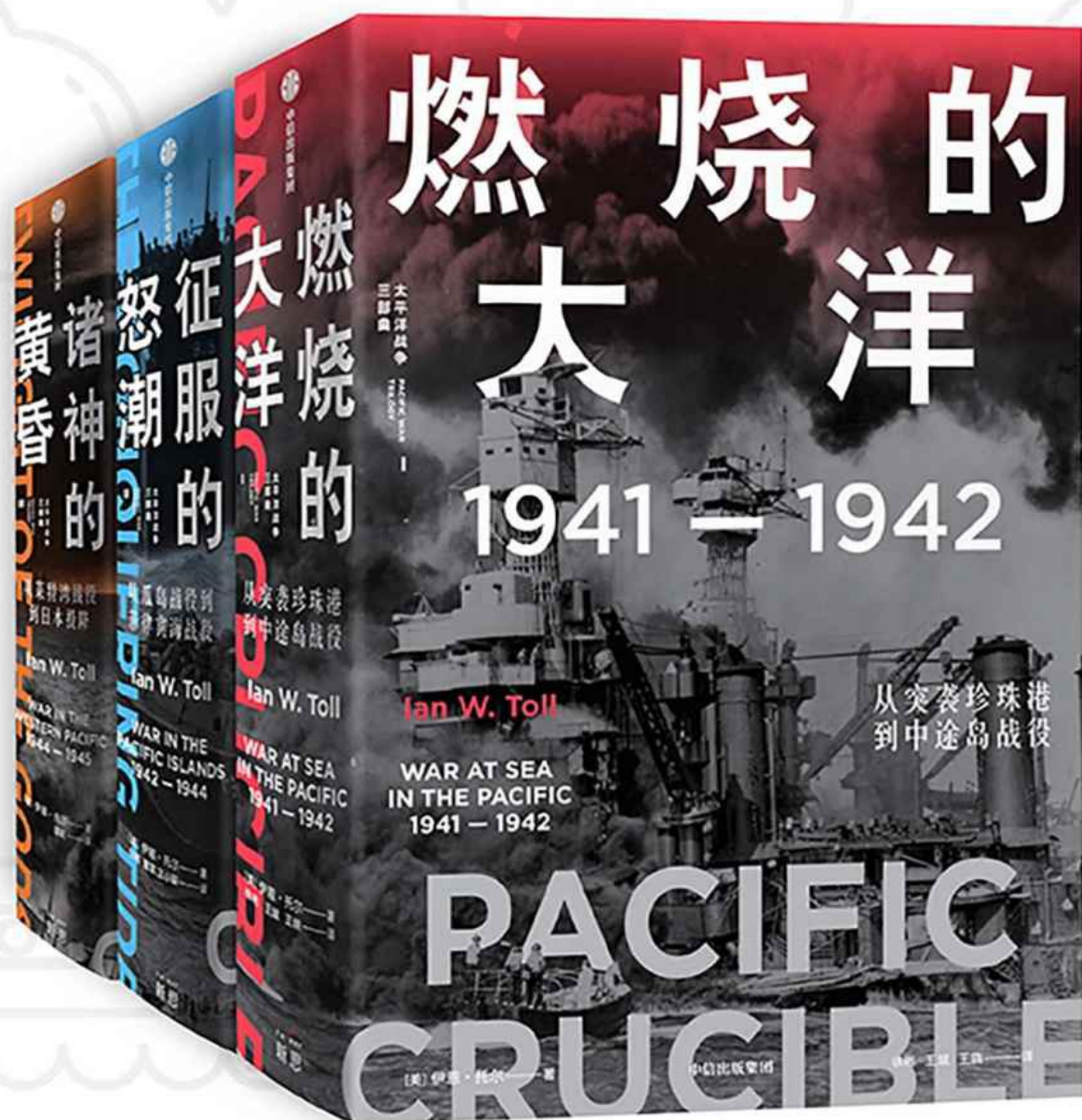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套装共3册)



中信出版集团
CITIC PRESS GROUP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套装共3册)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燃烧的 太平洋

太平洋战争
三部曲
PACIFIC WAR
TRILOGY
I

1941 — 1942

Ian W. Toll

WAR AT SEA
IN THE PACIFIC
1941 — 1942

从突袭珍珠港
到中途岛战役

PACIFIC CRUCIBLE

[美] 伊恩·托尔——著

中信出版集团

徐彬 王斌 王晓——译

燃烧的大洋

——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王斌 王晓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开战在我，终战在彼（代序）

一幅太平洋战争的全景画卷（代译序）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尾声

致谢

参考文献

开战在我，终战在彼（代序）

发生在79年前的太平洋战争，无论对于历史学界、军事界、国际政治学界，还是普通的历史、军战史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国内学者因语言与档案资料的限制，著述的太平洋战争书籍少有第一手资料，多为炒冷饭（学术论文除外）。相反，恰恰在语言与资料上少障碍，国外学者著述的太平洋战争书籍多为力作。上个世纪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就看过一些美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如约翰·科斯特洛撰写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高尔登·普朗格撰写的《我们沉睡在清晨：有关珍珠港的未告诉过人的故事》、约翰·托兰的《升起的太阳：日本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战争之神》《丑闻：珍珠港事件及其后果》、戈登·普兰奇的《中途岛奇迹》等。到了新世纪，美国学者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著作的《断剑：中途岛海战尚不为人知的真相》，更是以生动的笔法从战术、装备、军队人员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描绘了美军和日军在太平洋中途岛战役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一些战争中不为人知的细节的揭秘，读来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欲罢不能。

现今，中信出版社又将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托尔的“太平洋战争三部曲”（2020年8月出版的《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和《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还有仍在翻译的《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在这套三部曲中，作者运用了海量原始文献或第一手资料，再现了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从被打得狼狈不堪，到反攻取得节节胜利的全景。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这位历史学家

把宏观评析融入细细的资料中，文笔精湛，立场客观，既有大场面，又有小细节，上到双方最高指挥官尼米兹、山本五十六，下到尉级军官甚至是士兵，他们在战争上的每一个细节都生动地用史料再现出来。

比如，《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第七章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个驻扎在奥斯汀山山顶的中尉做了一张死亡表来预测每个饥饿的士兵剩下的寿命：

还可以站直的：30天。

还可以坐着的：3周。

总是躺着的：1周。

躺着排便的：3天。

无法言语的：2天。

眼睛也不能眨的：1天。

这个史料生动、可信，是以往战争史较少出现的细节。

日军在瓜岛的悲惨境地是为日本决策者错误的开战决策买单。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域狭窄，四面环海，海洋将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使得日本民族千百年来没有同其他民族有过更多的交融，日本文化始终在狭小的空间内萌芽、起步与发展，进而形成了日本民族与文化的单一性，导致社会长期落后于周边国家，与一直处于各种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东亚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然而，民族与文化结构的高度同一性使得日本人的心里沉淀着对外部世界浓烈的好奇，驱使其一旦接触外来异质文化，就表现出强烈的接受欲望，尤其是当自己的文化落后于外来文化时，这种欲望就更加强烈。

烈。

自身的落后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当这对矛盾交会于日本接触先进的外来文化这一点时，就呈现出铁一样的定律：其自身的文化不可能再按内在规律逐步发展完善，只能靠吸收大量的现成文明来构建自己的文化。

于是，“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是好的；是好的东西，就必须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日本民族与文化这个特点，深刻影响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历史，浸润着日本社会各个角落，特别是日本的扩张史。

然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扩张的各场战争基本得以顺利实施，这个事实进一步增大了日本人的扩张欲望，致使他们忘记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东西：“力量与目标”的平衡关系。须知，当目标大于力量时，决心与指挥技艺无能为力。

在举国“打败世界无敌手”的狂热中，日本决策层被“战狼”们裹着一步一步地把战争推向了巅峰，于1941年12月7日早上7时55分，袭击了珍珠港，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军2 403名官兵死于这场偷袭。

然而，日本人忘记了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开战在我，终战在彼”**。只要愿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发动战争。但是，退出或结束战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本决策层原来设想，通过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完全可以趁美国元气大伤，还没有来得及喘过气、回过味儿的时候，在有利的战略态势下与美国谈判，让美国回到西半球，把亚太留给日本，进而结束战争。

然而，美国人让日本人很失望。经过短暂的痛苦之后，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完成了战争动员，同时在欧亚两地作战，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后，经瓜岛作战，日本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到了1944年日本全面走向颓势。上面引述的那段日本人记录的死亡预测，只

是一个悲剧的片段。这个时候日本人大概早已没有了偷袭珍珠港胜利带来的那种狂欢与喜悦吧。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以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世人：大国之间的战争，无论取得多少战术上的胜利，只要战争无法在你的既定条件下结束，都是战略上的失败。而战略上的失败将决定战争的最后结局和历史的走向。

战术上的胜利只是政治家脸上短暂的荣光，战略上的胜利却是不显山不露水，可能沉寂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厚积薄发。太平洋战争结束了。日本战略上犯的错误给了美国走上全球权力顶峰的机会。

而在这个过程中，7 000万日本人在为他们领导人的错误买单。作者引用了日本作家竹山道雄的《缅甸的竖琴》的记述：“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一切在当时被完全隐瞒了。我们每天都因恐惧而颤抖，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态发展而目瞪口呆。”

有句名言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同样，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没有一个日本百姓是无辜的。正是他们的狂热与盲从，才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领导人为他们选择的注定毁灭的道路，无力对此做出改变。日本民众早已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权利和自由，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即将到来的1945年‘诸神的黄昏’”。（作者语）

关于这套书的特点还有许多，作者在后记里都有介绍，在此就不再评述了，相信对太平洋战争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后，会增加一些新的收获。

马骏（国防大学教授）

2020年8月2日

一幅太平洋战争的全景画卷（代译序）

托军圈好友的推荐，笔者有幸获邀翻译这套伊恩·托尔原著的“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第三卷。作为一个关注太平洋战争史二十余年的爱好者，笔者起初觉得，太平洋战争？被人写过无数次的题材，还能写出什么新意来吗？但当我收到已经译好的前两卷，打开扉页，读完第一章的时候，便忍不住一口气读了下去。

这套著作，还真的不太一样。

这是一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全景式著作。

在国家级战略的层次上，作者向我们介绍了战争双方，也就是美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沿革：这两个曾经双双被欧洲近代化文明“丢下”的国家，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雄踞太平洋两端的世界级力量的。而对于两国的海军，作者又以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他那本著名的《海权论》为开端，讲述了美日两军接纳、学习、吸收马汉的理论，又在马汉理论的基础上嬗变，发展出大舰巨炮派和航空兵派两大派别，并逐步演化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国海军装备力量格局的过程。

当第一颗炸弹在珍珠港炸响之后，日本人是怎样从开战前的小心谨慎一路打出了狂躁的“胜利病”？美国人又是怎样从措手不及中一点点稳住阵脚、逐步反击，最终扭转局势发动大反攻？当战争大势逆转之后，日本人为什么会把占领的岛屿精心打造成坚固的堡垒，死扛到底？而美军又怎样悟出了“越岛作战”的策略，一路越过那些“章鱼吸盘般锁住盟军道路”的岛屿基地，向日本本土杀将过去？当你读完这部著作

时，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对于每一场战役，作者会把战略环境、地形态势、实力背景、双方战役思路 and 计划向读者和盘托出，再随着战役的推进，双方态势的变化，把双方将领你来我往的过招过程展示在我们面前。对于双方的武器装备，作者会进行足够充分的介绍，虽然限于篇幅没法完整介绍这些战场明星的来龙去脉，却也足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战斗的结局。

最后，战场上电光石火之间的搏杀，作者也绝对不会省略。还记得当年读英国史学家道格拉斯·福特的经典著作《太平洋战争》时，对于中途岛海战中美军舰载鱼雷机部队的进攻作战，该书只是用了一句“鱼雷攻击未奏效”便一笔带过，而在这套三部曲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场舍生忘死的进攻作战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出发前的鱼雷中队长的计划，到飞行过程中怎样与友机失散，最后发动决死进攻时美军三个鱼雷中队和日军航母之间的态势、机动，不一而足，最终落水的鱼雷机飞行人员亲眼看着本方俯冲轰炸机凌空而下把日军航母变成火球的场景也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也是一部十分精彩的著作。

它绝对不会板着脸和我们画重点讲道理，而是把读者带到那个风雷激荡的年月，把我们带到当事人的身边。

阅读它的时候，笔者仿佛置身于珍珠港的烈火浓烟之中，看着一个个被原油染得漆黑的人影在火光中挣扎，体会炸弹在身边爆炸的恐惧；仿佛坐在俯冲轰炸机的座舱里，瞄准航空母舰的黄褐色甲板垂直杀下，任由飞机拉起时的加速度把自己重重按在座椅上；仿佛紧握着战斗机的操纵杆，向着敌机机翼上的红丸机徽扣动扳机扫射过去，享受把敌机凌空打爆的成就感；仿佛坐在军舰高射炮的后面，向着疯狂扑来的神风自杀机拼命开火，因为全舰战友的命运就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可以来到中途岛战役时南云忠一的身旁，如他当年那样，看

着来自前方后方的一条条情报信息，承受着心理和生理，乃至工作环境上的种种艰难，在挂鱼雷还是挂炸弹之间反复纠结；来到马里亚纳海战中斯普鲁恩斯的身后，面对着来自西边和南边模糊不清的敌情报告，担忧着登陆部队面临的危险，把强大的特混舰队紧紧留守在登陆海域而不敢轻易撤出主动歼敌。作品还会把我们带到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和日本战时大本营的会场上，各方将领的意见、思路和最终议定大政方针的讨论似乎就在我们耳畔。甚至，笔者还一度觉得自己正推着罗斯福总统的轮椅，在英美首脑会谈期间推开丘吉尔首相的房门，却不小心撞见对方洗完澡一丝不挂的样子……

最后，我们还可以来到尼米兹少年时生活的得克萨斯小镇和山本五十六宿醉的名古屋旅馆，探寻一代名将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性格和指挥风格背后的秘密，进而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决策和战局的发展。

在这套书里，太平洋战争再也不是历史书上不可置疑的叙述，或者是单纯的一连串战斗故事，而是无数军人、指挥官和将帅在战争迷雾和鲜明个性之下，用自己的抉择和行动所组成的一部极其复杂而宏伟的大戏。

当然，这还是一套严谨的史学著作，绝不是一味追求精彩的“地摊文学”。

我们随手挑几条参考资料来看看吧：

1952年1月20日斯普鲁恩斯写给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美国海军半官方权威战史的作者）的信；

波特（传记作家）与尼米兹合著的《大海战》；

斋藤少将发给守卫塞班岛日军官兵的最后一份电文；

“企业号”作战报告，1944年3—6月；

川口太郎的口述，引自布罗利等人所著《太平洋战争的另一面》；

……

如此种种，数百条之多。作为写过《六舰：美国海军的诞生与一个国家的起航》（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工作室2019年已将这本著作引进国内）这样优秀作品并荣获美国海军历史研究大奖“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的历史学者，作者伊恩·托尔在美国海军历史方面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书里看到、体会到的种种鸿篇巨制、身临其境和精彩绝伦，无一不是有据可查的。即便有一部分作者的主观判断，也都会有充分的论据来说明。

作为一名军事历史爱好者，能有幸把这样一部著作的一部分翻译成中文，引荐给国内的朋友们，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谭星（《全甲板攻击》作者）

2020年7月

序章

哦，东是东，西是西，二者绝不会相遇，
除非天和地一起出现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
但是当两个强壮的男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没有方向，没有边界，没有种族，也没有出生地，虽然他们来自大地的两极。

——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东西方民谣》

如果一名船员在1850年进入时光机，被随机送往不同的历史时期，那么他在1588年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上当一名前桅海员会很自在，要比去往距离他时间更近的1900年的任何大型钢铁战列舰上感觉更熟悉。在19世纪后半段——这段时间足以涵盖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工业革命极大地破坏并重塑了海战的硬件和技术。即便如此，变化也没有停歇，没有一息暂缓。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各国的海军在船只设计、发动机设计、武器系统、通信和军事原则等方面都处于平行革命的边缘；涡轮发动机将取代效率低下的往复式发动机；石油将取代煤炭；火力指挥仪系统使得一个士兵就能将战列舰上所有的火炮瞄准目标，并且在射击时纠正船只的俯仰与侧倾；自行鱼雷可以在吃水线的高度攻击敌船，其射程和可靠性也在一步步提高；无线电通信把海洋中航行的船只与岸上的指挥部联系在一起；多个国家成功试制出潜艇。1903年，莱特兄弟驾驶飞机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进行了历史性的首飞，具有远见卓识的军官预想到，这些新的“飞行机器”在未来将大有

可为。1906年，大不列颠下水了一艘新的战列舰——“无畏号”战列舰。“无畏号”配有12英寸^[1]口径大炮，巡航速度达21节，从它下水那一刻起，世界上其他战列舰就都过时了。

二战中所有美国海军将领的海军生涯都开始于那个技术发生巨变的时代。大约1900年至1910年间，还是青少年的他们首次离开家乡，进入位于马里兰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为了获得录取资格，他们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并且要经过残酷的选拔过程。他们是新教徒和中产阶级，即将成年。他们里面没有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的数量也很少。有一些是“海军后代”，追随父亲或者祖父的脚步加入海军。他们来自美国各地，但是在一两年内，他们的口音和方言都会消失，改说流利的标准英语，让人听不出地方口音。这些变化，会让他们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感到不可思议，惊讶于海军给他们带来的改变竟会如此之大。“现在他属于国家。”人们这样告诉他们的父母，其中的意思很清楚——父母对于他的所有影响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迈入了新生活的门槛，除非他失败或被开除，否则他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在安纳波利斯，他们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不关心外界的事情，并且遵循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与他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杂乱的平民社会迥然不同。他们早上6时30分起床，晚上9时30分熄灯，一天的时间被准确划分成精确的小份，全都有安排。在训练场上，无论天气如何他们都训练和行军好几个小时；他们还在切萨皮克的敞舱船里进行极其消耗体能的水陆两栖训练。这些平民学员学习“快步进入走廊，成直角转弯，笔直地坐在椅子沿上”。^[2]他们的一切任性行为都会受到严格的纪律和社会压力的双重限制。士兵们违反纪律就会被记录下来，而很多行为会被视作违纪——迟到、在队伍中说话、抽烟、房间不整齐或者偷偷进城逛酒吧。他们学习基本的海员技能，先是在训练大厅竖起来的索具和帆桅上练习，之后在塞文河的旧纵帆船和快艇上练习。

他们接受的专业课培训侧重于驾船、导航、射击、战术和工程。要想拿到好的分数，就必须把课堂讲座中和课本里的资料死记硬背下来，

还要奉命背诵出来。需要动脑分析或者独立思考的时候很少，学校也不鼓励学生们过度钻研当时海军技术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学校主要培养的是学生们的性格。关于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国会说过：“我们不需要这些学校培养出更多的学者。相反，我们绝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这两所学校的目标是将人首先培养成战士……这里的教育的最好之处在于高标准的性格和随之而来的职业军人的品行。”^[3]在海军生涯初期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合宜的态度、正确的气质，练就完美的体形，以得体的方式穿上蓝白军装，戴上船形的海军帽、洁白的手套，腰佩礼仪用剑。简而言之，要让人们喜欢，要符合人们的期望。

过去的永远不会陈旧。他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是骄傲的战士的后裔，他们每个人以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都要维护星条旗的荣誉。安纳波利斯的大厅里装饰着破烂的军舰旗和褪色的油画，画上描绘着1812年美英战争的场面，那是一个“木船和铁人”的时代，往昔的英雄们——琼斯^[4]、佩里^[5]、迪凯特^[6]、普雷布尔^[7]和斯图尔特^[8]——在海洋上打败敌人，捍卫了这个国家的独立。学校极其重视社交礼仪。年轻的学员们要通过学习培养良好的礼仪：在客厅里摆茶杯；练习书法，这样写出的信不会让送信人或者收信人因为字迹而难堪；还学习跳华尔兹，不踩到女士的脚。学校鼓励他们说一点法语，并且至少要对欧洲的典籍略知一二。作为海军军官，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停靠港扮演类似于外交官的角色，所以他们必须在每一个社交场合都举止优雅、自信，不能被任何人看不起，无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平民还是军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同胞。

最重要的一点，安纳波利斯有一种同化作用。那些不愿意融入或者不能融入的人会被开除。留下来和坚持下来的那些人会互相团结，忠于海军，他们有一种深深的集体感，这种感觉十分强烈而且伴其一生。

至于舰队该采取何种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那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思想在海军中极其盛行。马汉是美国海军军官，也是海军史学

家、战略大师，世界上每一个大国的海军都奉行他的原则，并将其运用到实战中。1890年和1892年，马汉最初的重要作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由此他享誉整个世界。在这本书和后续的书籍及文章中，他提出了“马汉信条”，该信条在二战爆发前一直影响着海军战略家的思想，它倡导使用大舰巨炮，将集中优势兵力奉为铁律，主张毙敌于一役，以一场决战彻底消灭敌军舰队。

从外表上看，马汉酷似人们喜欢嘲讽的书呆子学者形象——高挑瘦削，身子笔挺；面色灰黄，神情忧郁，一双淡蓝色眼睛，后缩的下巴上留着灰色的胡须，前额突出，大脑袋上已脱发变秃。他节俭，自制力强，不苟言笑，甚至有些害羞。1859年他从安纳波利斯毕业（那时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刚建立14年），然后进入了海军。当时的海军用的还是木船，总统是林肯，南方已经脱离联邦。内战期间他在南方叛军的海岸实施封锁，四年中没有经历什么大事。内战结束后，他被派往世界各地，乘坐着不同的船经过了欧洲、中东、拉丁美洲和亚洲。到1884年，马汉已经在海军光荣服役25年，不过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成就。他是一名将近45岁的上校，但几乎无望升到将军一级。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再这样混20年，然后领着可观的退休金休息。但是他已经厌倦了大海。他在海上度过了大部分的职业生涯，迫切地想要换一个方向。所以，当他有机会到罗得岛纽波特新建立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历史讲师时，他立刻同意了。

马汉认为自己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超级无知”，他这样说自己。但是他渴求知识，而且他有一种苦行僧般的气质，这很适合长时间独处做研究。他到书店买了很多书，经常去图书馆，钻研数百年的历史——古希腊和古罗马，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竞争，以及拿破仑的崛起和衰落。“我对待这项工作就像是在野外开荒的移民一样，并不为先砍倒哪棵树而踌躇，”他后来写道，“看到什么我就读什么，我在读书时注意力特别集中。”^[9]在1885年秋的一个下午，在秘鲁（他的船被派往这里）利马的英国俱乐部的图书室工作时，马汉被公元前3世纪和公

元前2世纪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历史吸引了。他脑中出现一个问题，让他得到了启发。如果汉尼拔当年入侵意大利时，从大海上进军，而不是通过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脉的漫长陆地，那么结果会怎样？罗马会不会灭亡，整个西方历史会不会被改写？“我第一次在内心有了发现，”他写道，“对于海洋的控制是一种从未被系统地重视过或者解释过的历史因素。”他抓紧这一想法不放松，并且很快开始动笔。由于时间紧迫，他在1886年秋天结束了海军战争学院的授课工作；由于需要把想法用文字写下来，他不得不厘清主要的观点。随着页数越来越多，他回忆说，“我拥有的每一种能力都被调动起来投入使用”。1886年这些讲义都写成了文字，后来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再合适不过了。工业化和技术革新使得许多国家开始整饬舰队。各国之间的竞争以及以欧洲列强为代表的帝国的野心，有可能导致所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整个世界对于制海权有了一个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制海权？制海权的价值是什么？如何取得制海权？如何运用制海权？之前也有人问过这些问题，但是马汉最先以令人信服的巧妙方式将这些问题组织到一起，并且用系统的方法回答这些问题，还附上了历史上海战的例子。

最重要的是，马汉宣扬“主力舰”的重要性。主力舰就是配备重型武器的最高级战列舰。护卫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执行必要的辅助任务，例如侦察或者护航，但是一个国家若没有配备重炮的巨舰，那么充其量只能算是有个二流海军。马汉坚持认为，战列舰构成的舰队每次都必须作为统一集中的整体，进行联合作战。将战舰分开，或是战舰过度分散，是造成海军悲剧的典型错误，也是在整个海战史上再三犯的错误；联合在一起的舰队总是能够追击并且消灭分散的舰队。马汉还加上第三条箴言：强调**进攻**。舰队不应该部署在海岸线附近，在靠近海港的地方进行防御。他宣称，海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航行于各大洋，必要时可以使用安全的海外基地；要追击并且消灭敌军舰队。“一旦宣战，

就必须主动出击，积极制敌。不是抵御敌人，而是要打垮它们。”^[10] 必须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迎击并且摧毁敌人，就像萨拉米斯海战、亚克兴之战、勒班陀战役、尼罗河战役、特拉法尔加战役那样；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一方要击沉或者俘获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敌舰，使敌人没有能力再次进行海战。配备大炮之巨舰集中编入单一的联合舰队，以让敌舰在大海上彻底消失为目的，这就是马汉海权的准则。

他的这一准则很快在全球获得了认可。赞美声一片，表达仰慕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如雪花般寄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以及马汉随后的作品被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日语、俄语和西班牙语。该书出版两年后，马汉已经被公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海权方面的学者，还被奉为外交大师，他的论述像是从奥林匹斯山传下来的神谕一样被人们解释、分析、思索。“从1892年开始，每个人都会引用马汉的主张，”一名崇拜马汉学说的法国人写道，“讨论海权的人努力证明他们和马汉的观点一致。”^[11] 据说，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每一个军官都读过马汉的书或者假装读过他的书。威廉·格莱斯顿首相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当代最优秀的书”。在议会，只要提到马汉的名字，所有的争论都会停止。1894年，马汉获得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在皇家海军俱乐部晚宴上，曾有这样一个祝酒词：“刚刚投票通过用于扩充海军的300万英镑，是我们欠[马汉上校]的债。”^[12] 在德国，德皇威廉二世跟友人说：“现在我并非只是随手翻阅马汉的书，而是在狼吞虎咽一般地阅读，而且努力把书背下来。在每个方面，这都是一本一流的书，一本经典之作。”^[13] 这位德国皇帝命令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译本放到德国海军每一艘军舰上，并且公开表示，每个军官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在马汉思想的深深影响下，“一战”前英德之间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战”就是由此引发的）。

但是受到马汉的文字影响最深、最久远的国家是日本。马汉自己也这样认为。他评论说“我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的最多，比其他任何语言

都要多”，而且说没有其他国家“比日本更关心和在意这一领域”。^[14] 1894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日本海军军官合力翻译成日语并相互传阅。日本陆海军大学校都将其作为课本。该书还被呈送给了明治天皇和嘉仁皇太子。日本海军大学校还曾试图请马汉执教（不过没成功）。马汉“决定性战役”的理念与宫本武藏的理念遥相呼应。宫本是16世纪伟大的武道家和剑术家，他宣扬“全神贯注，一击制敌”。^[15] 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有书法作品赞颂他：“所有国家的海军战略家都认为马汉的作品将永远在军事科学研究领域占据最高点，是全世界的权威。对于马汉广博的知识和敏锐的判断力，我表达深深的、真诚的尊敬。”^[16]

日本政治精英们无不叹服马汉的思想，所以日本海军不停要求增加海军在国防开支中的份额的改革运动有了动力和支持者。将军们称：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个岛国，日本和英国一样只会受到来自海洋的外敌入侵。除非陆军能够被安全运到亚洲大陆，否则即便有雄心壮志，也将一事无成。他们坚称，日本海军的地位应该和英国皇家海军一致——海军应该成为日本的主要军事力量，国家在制定政策和拨款时应首先考虑海军。

在美国本土，马汉最热烈的拥护者是泰迪·罗斯福^[17]。1890年5月刚刚阅读完《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第一卷，他就给马汉写去了祝贺信：“过去两天虽然很忙，但是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阅读阁下的书，我一拿起书便无法放下，直至读完，说明内容引人入胜。”^[18] 罗斯福在《大西洋月刊》中发表了一份充满赞赏的评论，^[19] 他特别赞扬了马汉的一个结论：美国应该打造一支由重型战列舰组成的新舰队。1897年至1898年，在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罗斯福和马汉的交情加深，两人合作规划战舰的部署，帮助美国后来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迅速取胜。在罗斯福任总统（1901—1909年）期间，马汉是罗斯福的核心集团中的一员，与海约翰、伊莱休·鲁特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亨利·卡波特·洛奇等人同为总统的顾问和盟友，而且他们都抱有大国思想。罗斯福有时候直接从马汉的书里摘出几段，然后几乎一字不差地用在他的

演讲中。对于自己的文字被这样使用，马汉感到“荣幸之至”。^[20]他跟总统说：“我们关系如此紧密，所谓的文字所有权一点也不重要。”

罗斯福是一个聪明、言辞激烈、容易激动的人，这样的人按说不容易当上总统。他的职业生涯如旋风一般，从大学毕业后他只花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就入主白宫。他有过多重身份：历史学家、律师、鸟类学家、纽约州议会少数党领袖、拳击手、农场主、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博物学家、猎人、行政机构改革家、多产的作家、忠诚的丈夫和父亲、酷爱阅读的读者、助理海军部长、战争英雄、帝国建设者、身体锻炼的积极倡导者、纽约州州长、美国副总统。他身材高大，有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膛，他的皮肤粗糙，带着日晒色。他的头发剪得很短，是棕红色的，太阳穴处的毛发开始发白；他的脖子粗壮，看上去就像是要把衣领撑破似的。他戴着夹鼻眼镜，眼镜链耷拉在左侧脸上。他在笑或者说话时会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略微发棕的脸庞显得他的牙齿更加洁白。

自约翰·亚当斯以后，没有哪个总统像罗斯福这样积极地扩大美国海军。1903年，他对5 000名芝加哥听众大声演讲：“有一句老话说，‘温言在口，大棒在手’，这样才能走得远。如果美国愿意说话温和，但同时拥有保持最高训练水准和勇敢高效的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21]门罗主义承诺阻止欧洲入侵西半球，这种主张“和美国海军一样强大，无出其右者”。^[22]美国曾经只是面对一个大洋，现在面对着两个大洋。美国在太平洋一侧海岸线很长，人口稀疏，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罗斯福那年跟旧金山的听众说，“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和控制情况将对世界史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23]罗斯福总统下定决心在中美洲地峡开凿一条运河，哪怕引发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的革命他也毫不动摇。在罗斯福心里，巴拿马运河首先是军事上的需要，它可以使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迅速调集海军。到1906年，大范围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海外有大量分散的殖民地。自从1776年以来，美国人就沉浸在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氛围中，所以美国取得这些

殖民地并没有使美国民众欣喜。但是随后的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古巴、菲律宾、夏威夷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落入美国手中的岛屿都只能派海军去保护。“我们的潜在敌人会从海上发动攻击，”罗斯福对海军军官们说，“他们可能来自欧洲，或者是亚洲。”^[24]德国想在南美洲开拓殖民地，罗斯福将德国视为美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危险竞争对手。但是德国的威胁被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遏制住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英德对峙有利于维持大西洋地区的平衡。而日本刚刚赢得了日俄战争，在西太平洋地区既有慑人的海军实力又有巨大的地缘政治优势。罗斯福在1905年预测说：“英国、美国和德国现在将彼此视为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对手，但是几十年后，这三个国家更惧怕的会是日本。”^[25]

在第一个任期，罗斯福利用总统这个“天字一号讲坛”（罗斯福创造的一个术语）说服国会建造了10艘战列舰、4艘装甲巡洋舰和17艘小型船只。海军开支增加了将近40%，超过一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大的海军开支。到1906年，美国拥有的战列舰数量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

扩大后的舰队需要人手操作，因此急需数千名新的军官。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是罗斯福的海军未来成败的关键，他对这个学院特别重视。在他的推动下，学院经历了彻底的翻新，校园成了一个庞大的施工场所。锤子、锯子和大喊大叫的施工人员的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只有周末一天休息。旧的、破烂的木头建筑和砖制建筑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用花岗岩、大理石和灰砖建立起来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厦。1908年这里将建成一个新的礼拜堂，里面有恢宏的棕红色穹顶和巨大的青铜门。罗斯福总统经常从华盛顿坐早班的火车，到这里演讲、剪彩或者为橄榄球队加油。总统还出现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会注视每一名毕业的海军学员，用坚实的右手和他们握手，给他们颁发证书。

对于海军学院的管理层来说，罗斯福对于学院这么感兴趣是一把双刃剑。罗斯福这位总司令好管闲事。由于橄榄球队员荒废了学业，学校

把学员的橄榄球队解散了；可是总统插手，要求恢复橄榄球队，并且坚持陆军和海军每年举行一次橄榄球赛。“我特别喜欢橄榄球，”他解释说，“我喜欢狂野的、男人的运动。”^[26] 1906年2月，罗斯福赦免了一个海军学院的学生，该学生被指控将橄榄球诋毁为“一种过于动物性的运动”。^[27] 罗斯福安排在学院里教授柔道，他说柔道“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自我防御和训练敏捷性和决断力的极为有效的方式”。^[28] 柔道项目后来被取消，罗斯福责备学院老一辈的这一决定，说“学院的那些老家伙总是有这种寻常思维”。

那些年间美国海军将校级的上层军官都是在内战前就开始服役的老人。他们通过一步一个台阶的升职慢慢爬到了高层，在退休前最后的几年宁静日子里，他们可不想因为指挥层那些年轻有活力的官员带来的改变而影响自己的心情。华盛顿的海军机构就是一个堡垒，里面都是些服役时间很长、思想保守的高层军官。他们一直干涉技术变革，仅仅是因为技术对他们而言是新的、不熟悉的事物。创造家、改革者和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被孤立，直到他们心灰意冷地辞职。让老军官们提前退休的议案被指责为“过河拆桥”，引起了这些人激烈的反抗。甚至到了1906年，那时海军扩张事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美国海军仍然是老人的海军。^[29] 美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要比英国海军中最年轻的上校大二十岁。英国海军中有好几位军官被破格提拔，但是在更加推崇平等主义、机会均沾的美国海军中却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30]

罗斯福看不起那些“老一派的海军军官，他们稀里糊涂地混进了华盛顿”，^[31] 他宣布打算“鼓励最优秀的军官，使他们与最差的军官形成鲜明对比”。^[32] 海军从建立起就有论资排辈这种做法，每一级的军官都强烈反对把年轻人提拔到他们上头。但是在罗斯福的海军中，海员可以根据功绩晋升，这样有功的年轻军官就可以早早地快速晋升。^[33] 懒惰、自满或者无能的人不能再在中层职位上赖上几十年——“非升即走”的原则要求他们凭借军功升职或者被迫退役。军舰指挥官总是看不

起低级的工程兵——但现在所有人都被融入一个队伍中，职级平等，军装一样，起居室和铺位也都一样。

令高级军官甚至罗斯福的海军部长气愤的是，罗斯福和“少壮派”直接通信。所谓“少壮派”，指的是支持军中职级改革的中层军官。在罗斯福掌权期间，那些自从1812年战争以后就没有出头之日的军官现在大胆地相信，自己的观点会付诸实施，出众的才华会换来晋升。不过罗斯福有些忘乎所以：他直接插手海军的指挥，干涉海军的正常课程，鼓励发明和新技术，还命令给予测试潜艇的士兵额外的抚恤金，因为他们的工作极其危险。在战列舰上，以前过分注意整洁和秩序的做法——注重战舰的壮观场面、隆重仪式以及外表展示——现在都被简化了，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射击训练。炮手练习射击目标，结果都会被仔细记录下来。舰艇之间开展的射击比赛中，成绩未达标的战舰上的军官需要为其表现做出解释。关于海军军官必需的品质，罗斯福说得很直白：“他们必须善于控制船只，精通战术和战略……有顽强的能力接受惩罚，也愿意接受惩罚，有胆识，有决心，愿意冒风险也愿意承担责任——这些是所有时期伟大的船长们都拥有的品质，没有这些品质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军队领导。”[\[34\]](#)

在1905年5月27日的下午和晚上，在日本海对马海峡灰暗的水域中，日本海军的主力遇到并且打败了俄国由海军上将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Zinovy Rozhdestvensky）指挥的舰队。对马海战在西方被认为是海军战争史上最一边倒的战役之一。人们不禁将其与正好一个世纪前发生的英国大破拿破仑海军的特拉法尔加之战相比较。俄国参战的12艘战列舰无一幸存，4艘被日本俘虏，其他8艘全部被击沉。超过4 000名俄国官兵丧生，将近6 000人被俘虏。日本舰队在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西方媒体中被赞为“日本的纳尔逊”）的指挥下仅仅损失了3艘小鱼雷艇，117人丧生，583人受伤。

对马海战结束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两国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附

近海域进行的长达两年的血腥冲突。当时，日俄战争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破坏力的战争之一，几十万名陆军士兵参战。那是20世纪的首次大战，在战争中陆军首次配备了先进的机枪和现代的火炮，士兵们挖了长长的壕沟，大批军需通过铁路运进来。在所有方面日俄战争都预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

没有人想到，日本竟然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沙皇尼古拉二世领导下的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人口是日本的3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50倍。日本只是东亚一个遥远、神秘的岛国，19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与整个世界没有联系。日本的步兵在体型上要比俄国步兵小得多，装备也不足；但是日本步兵打起仗来有技术有韧性，可以自给自足而且积极主动，他们行军速度更快，更能忍受恶劣的环境，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怕。1905年3月在奉天会战中，日军对俄军壕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俄军吃惊地看着日军挺着刺刀、面带幸福的微笑在原野上冲锋，似乎能够光荣地死去是让他们高兴的事。在近代史上，东方第一次打败了西方。

日本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就从封建和前工业化状态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明治维新”这种说法其实有一点误导[35]，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皇室稳定地延续着，不曾中断，在那之后也没有丧失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日本能回过头去，上溯本国的源头，寻找民族根本性的东西，而不是仅仅依照西方的方式治理——这一点耐人寻味。政治权力转移到了城市商人阶级和来自日本西南部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强大武士手中。管理精英出自这些阶层，他们（很有远见地）认为如果日本建立不起来能够抵御西方侵略的民族国家的机构和产业，那么日本就会慢慢失去独立地位。明治时期的武士领袖弃武从文，毫无障碍地当起了管理者、官员、政治领导人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建立了强大、集权的政府机构以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用巨款收买了封建贵族，让传统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

了原样。政党出现了，但各党派经常要反抗那些想限制它们实力和影响力的政策。日本人民投票选出了帝国议会的议员，但是立法部门的权力一直不够，不足以应对强大的官僚政治。在任何意义上讲，日本文官都从未能控制军队，军队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保持着无上的权力，并且与天皇有特殊的关系，可以直接向天皇建言。

令西方国家最震惊的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行为仁慈宽厚，让俄军颜面尽失。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强制规定禁止对平民或者犯人施暴。“如果你们无所畏惧，实施暴行，”明治天皇警告说，“那么最终世界会厌恶你们并且视你们为野兽，鄙视你们。你们应该注意这一点。”^[36] 敕谕颁布20年后，日本陆军和海军依然注意这一点。西方国家有关这场战争的报道里有很多日军善待俄国俘虏的例子，他们给俘虏充足的食物，给他们看病，给他们衣服、香烟、俄语书籍和报纸，甚至还有酒。在海上，遇到俄国将军阵亡，日本舰队会让军舰下半旗。^[37] 东乡平八郎大将亲自去探望受伤的俄国战俘，乃木希典将军则在旅顺港的俄国阵亡将士的纪念碑前表示了敬意。俄国俘虏中只有大约1%死于囚禁期间，而且日本大费周章，用军人的礼节埋葬了他们。日本红十字会在战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几万名无家可归的朝鲜和中国平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许多人逃离了之前俄国人占领的地区，俄国人占领时那里经常发生肆无忌惮的抢劫、强奸、谋杀和伤人事件。与之相对比，日本军队毫不纵容这类罪行，用最严厉的手段惩罚罪犯。

日军在陆地上大败欧洲军队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让世人惊讶，其在海上歼灭欧洲国家的海军则更令世人震惊。西方还惊讶地发现日军比俄军更加仁慈，之前欧洲一直认为东方是一个住着野蛮人的野蛮之地。就像《伦敦新闻画报》的编辑们在1905年1月14日写的那样：“日本竟然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欧洲还没有从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中缓过劲来。”^[38]

日本的胜利让罗斯福很高兴。多年来他对于日本和与日本有关的东

西都很着迷。“我对日本人很感兴趣，我喜欢日本人。”他跟他的密友、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说。^[39]在自传中，罗斯福写道：“我相信日本人，我敬佩他们伟大的品质，我希望我们美国人民也拥有这些品质。”^[40]在任职期间，罗斯福深入阅读了日本历史、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他尤其推崇《武士道：日本的灵魂》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教育家和外交家新渡户稻造。罗斯福买了六本，送给了朋友和同事。当他读到对马海战获胜后东乡平八郎大将对日本舰队的演讲时，罗斯福感动得流下眼泪，然后命令把演讲稿发给美国海军的每一艘船和每一个基地。他与哈佛校友金子坚太郎一直关系紧密且互通信件。金子坚太郎可以说流利的英语，一直致力于在美国传播日本文化，并在日本传播美国文化。1904年，罗斯福开始在大师山下义韶的指导下练习柔道。他选了十几名随从和他一起学习，每周练习两次。白宫的走廊上回荡着男人们的低吼声和将对方用力甩在地板上的声音。“我的右脚踝、左腰、一个大拇指和两个大脚趾都肿起来了，基本上不能正常动了，我身上到处都是瘀青，”罗斯福在1905年3月给儿子的信里写道，“但是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你离开后〔山下义韶〕又教了我三个新招数，简直太棒了。”^[41]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罗斯福认为日本验证了他最喜欢的一个理论：某些特定的“民族”身上有高超的“战斗能力”。这类人注定会让周围的人相形见绌，打败敌人，在各个国家传播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并且通过商业、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推动文明进步。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这样，后来的哥特人也是如此。后来几个世纪的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也都类似。更近一点，就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但是罗斯福认为，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这样快速地、迅猛地崛起。罗斯福说，自从半个世纪前佩里准将的黑船驶入东京湾，“日本的发展确实让人惊愕不已。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什么可与日本的发展相提并论，也没有类似的成就可与之相媲美”。^[42]

对于东乡平八郎的胜利马汉同样震惊。他写道，日本的胜利“极大

地震撼了整个世界”。西方亲自见证过日本明治维新的人统共不过十来个人，马汉就是其中一个。1867年他首次访问日本，那时他27岁，是美国“易洛魁人号”上的海军少校。当船在神户下锚时，一群武士跑到船上请求在此躲避岸上的敌人。武士们身上散发出强烈的尚武气息，而且一看就很有力气——他观察到武士们“肌肉非常结实”——这让马汉印象深刻，但他们同时也是无助的没出过海的人，上船之后站立不稳。^[43] 38年后，一听到对马海战的消息，马汉就想起那些站在“易洛魁人号”的甲板上的无依无靠的剑客，“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此外马汉对于日本的崛起也赞叹不已。“那天上午颤抖的武士们，与后来参加对马海战的士兵和海员不是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传统，而且只相隔一代人吗？”^[44]

对马海战之后，日本和俄国都有了足够的理由结束敌对状态。俄国即将爆发革命，尼古拉二世被迫将最精锐的部队留在圣彼得堡以镇压起义。日本的战争经费来自国外借贷，赤字多年居高不下且难以维持，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正在停止向日本发放贷款。^[45] 当罗斯福提议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进行协商和谈时，双方都欣然同意。经过漫长、焦虑的协商后，俄国同意签字将旅顺港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从中国东北退兵，默许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但是俄国坚决反对战争赔款，而这是日本很早就提出来的必备条件。日本谈判团屈服于罗斯福的个人魅力，也不想谈崩，所以最终放弃了赔款的要求；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署。

该和约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罗斯福在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和约签署几小时后，跨太平洋的电报将消息传到东京，日本民众出离愤怒，无法相信。^[46] 日本公众此前因陆军和海军的大获全胜而欣喜若狂，他们被煽动性的媒体鼓惑，期待获得大笔战争赔款和兼并整个库页岛。得知一分赔款也没有，而且只得到了库页岛的南部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西方列强团结起来夺走了日本人辛辛苦苦赢来的战争成果。在东京，美国公使馆遭到袭击，凶手是穿着黑纱、拿着日本国旗的暴

徒，他们还在那里放了火。13座基督教教堂被破坏、抢劫，有的甚至被大火夷为平地。有人公开称要暗杀签署条约的日本特使。在日比谷公园，一大群人跟在铜管乐队的后面游行示威，反复喊着：“战争必须继续！”^[47]拿着武器的暴徒冲击警察的封锁线，警察局被袭击、占领，数百人被逮捕。^[48]两天后暴乱才结束，死伤者达一千人。^[49]

公众的暴力反应直到1941年才结束。西方外交被认为是蓄谋封锁、压迫和残害日本。不仅仅是精英统治阶级，就连媒体以及大批民众都会仔细查看日本签署的国际条约。关于日本以外的世界，日本民众几乎得不到真实、有用的信息。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向外交官施压的趋向，因为外交官们周游列国、会外语而且被西方的穿衣打扮和礼仪影响——他们被认为是叛徒，他们迫于西方阴险的压力，不再是真正的日本人。东京的报道中并没有说俄国正在向中国东北调兵，也没有说俄国很明显宁愿再次开战也不想接受协约中的条款；报纸中也没有提日本就要破产了。关于日本窘境的真实报道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是导致二战的另一个悲剧性因素。

和约虽然不受欢迎，但日本确实签署了和约，整场冲突本可以就此尘埃落定，谁料想第二年就爆发了火上浇油的事件。1906年4月，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发生地震和火灾，造成约3 000人死亡，整个城市被烧得一片荒芜。灾难过去两个星期后，学校董事会宣布所有的日裔学生都只能上隔离学校，这样白种学生“就不会在青少年时期和蒙古人种的孩子接触，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50]此后，住在旧金山的日本孩子被迫穿过还在冒烟、充满流氓的街道，前往唐人街的“专收亚洲孩子”的学校。

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迫害，这是最近的一次。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当地和联邦的政客、工会领导和残忍的排外媒体——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旧金山纪事报》，该报与其劲敌《旧金山观察家报》的发行量不相上下，为了取得优势，该报抓住此次事件紧紧不放。《旧金山纪事报》的社论版几乎每天都会谈到这一事件，叫嚣“洪

水般的日本人给美国学校带来了危险，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能明显感觉到”。该报提醒说：“黄种人是公立学校的魔鬼，也威胁着美国女性。”1905年3月1日的一条新闻标题这样写道：“不干不净的东方人，不加限制的移民，带来了堕落和退化。”四天后该报一篇社论写道：“移民到美国的不是日本最好的人，而是最差的；日本国内焕然一新，却把漂在水面上的渣滓送到了美国，那些渣滓都是日本用不上的废物。”^[51]

地震过后的旧金山陷入绝望和混乱中，当局无力制止哄抢、盗窃、持枪杀人和群体暴乱。旧金山的日本城在地震中被毁坏，成千上万名无家可归的难民被迫在周围的街区寻找藏身处，他们与在大火中失去家园的白种人产生了冲突。^[52]人们怀疑旧金山的官员和警察心照不宣地鼓励美国人反对日本人。日本人在街上被追着打，他们的窗户被扔进石头，日本人经营的商店被挂满了这样的警示标语：“白人男女：请照顾自己人的店铺。”

日本已经捐赠了24.6万美元用于旧金山的灾后重建，这比所有其他国家捐款的总额还要多。^[53]日本一位知名地震专家从东京赶来帮助灾后支援重建，却在大街上被截住，被暴徒殴打。

旧金山针对日本人的这些做法得到了日本媒体的报道，一些较为引人注意的大报要求刚刚打了胜仗的日本海军前去撤侨。“很容易就可以让美国从那固执的梦中醒来，只要我们的将军突然出现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就可以了，”《报知新闻》在1906年10月22日称，“为了世界文明，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用铁锤击打恶魔的头。”^[54]日本政府向罗斯福政府表达了愤怒的抗议，称加利福尼亚发生的事情违反了1894年日美协约的规定。国务卿伊莱休·鲁特怀疑日本与哥伦比亚政府秘密会谈，谋求在南美大陆建立军事基地。^[55]《纽约太阳报》驻东京的记者告诉编辑，日本公众一般不会对离自己这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形成舆论，“但是不让日本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学使得很爱孩子的日本人迅速做出了反应”。^[56]

罗斯福总统感到愤慨，这不仅是因为加州人顽固的行为使得整个国家蒙羞，而且因为国会大部分州代表反对他的海军扩建计划。在罗斯福看来，各州的领导人正在愚蠢地向日本挑衅，“但同时又拒绝采取措施，使自己不受日本强大武力的伤害，他们对于日本的轻率和傲慢无礼会让他们吃苦头的”。^[57]罗斯福派了一名内阁成员前往旧金山，希望能劝说学校董事会撤销种族隔离的决定，结果被董事会断然否决。《哈珀斯周刊》在其封面上刊登了一张漫画，把旧金山市画成一个拿着弹弓的顽皮小男孩，并且暗示日本应该为加利福尼亚白人的孩子设立一所礼仪学校。^[58]“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看法，”罗斯福致信洛奇时写道，“就和霍屯督人的想法一样蠢。”^[59]

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罗斯福准备了1 200多字的激昂演讲，他称种族隔离令是“一小群过错方”实施的“恶劣闹剧”。他宣称：“日本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与最聪明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并驾齐驱，他们通过自己的品德和努力赢得了被公平对待的权利。”他补充道：“我们能从日本身上学到很多，日本也能从我们身上学到很多；一个国家只有乐于学习才能教导别人。”^[60]

总统坚定的外交斡旋促成了1908年的“君子协定”，旧金山市民同意废除种族隔离令，而日本则答应限制移民美国的日本人数。量。^[61]但和谈是在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伤疤中进行的。建设运河的工作正在巴拿马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直到1914年运河才完成，此前美国海军的主力舰队必须绕过合恩角，航行1.3万英里^[62]才可以到达旧金山。^[63]而横滨的日本舰队就在6 500英里之外。如果日本在运河尚未通航，美国海军无力阻止的当下就出兵该怎么办？一时间流言四起，威廉·赫斯特的报纸尤甚^[64]——有人看到一支日本舰队驶出海港；一座日本基地在阿留申群岛秘密建立；日本特使正不怀好意地与墨西哥结盟；当地的日本妇女被招来当“喂奶机器”，这是一种缓慢但是肯定会成功的人口战争，这样日本人的后裔最终将吞掉整个地区。廉价杂货店里卖的小说想象

出“黄祸”的可怕画面：亚洲部落来到美国西海岸，把白种人逼到落基山东面。

罗斯福尽最大的努力平息这场危机，他的努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毫无疑问他内心也认为日本是一种威胁。“我一直尽量对日本人客气，”他后来写道，“我最后不安地意识到，关于太平洋沿岸发生的事情，日本人的新闻中有一点点隐藏起来的野蛮性；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以为我怕他们。”^[65]岌岌可危的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离日本要比离北美洲近，那里有大批日本移民，而且移民数量还在增加。关岛没有建防御工事，毫无防守能力；那里离美国旧金山5 800英里，但离日本只有1/4的距离。菲律宾有7 000多个岛屿，整体海岸线长度与整个美国一样，就在日本的南大门外。日本海军可以轻易封锁马尼拉，消灭驻扎在那里虚弱的美国亚洲舰队。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上有一千个登陆地，日本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地点发动入侵。“菲律宾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66]罗斯福在1907年8月跟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一类比非常恰当：每一项真实的战略军事研究都表明菲律宾很快就会遭到坚定的日本海军发动的水路两栖进攻。

罗斯福被各种复杂和矛盾的事情弄迷惑了，而且他急于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前遏制来自日本的危机，所以他想出一个计划，要让美国的主力舰队做环球航行。他跟洛奇说，如果美国与日本爆发战争，那么海军“就可以更便捷地将正在航行的舰队派往太平洋地区”。^[67]真实的航行可以让海军“在和平时代而非战争时代发现所有问题、错误和缺点”。大白舰队（名字的由来是船只都被刷成了白色）有16艘战列舰、大批辅助舰船和大约1.8万名船员。这次航行对于技术和后勤的要求都很高，也是史无前例的——此前没有哪个国家将整支海军派出去环球航行。

1907年12月16日，大白舰队从汉普顿锚地出发，船员们靠在栏杆上跟送行的人道别，乐队奏起音乐，并且鸣放21响礼炮向罗斯福致敬。而罗斯福站在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观看了这一场面。“你们见过这样的舰队吗？”罗斯福问道，“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应该感到骄

傲吗？”^[68] 船只排成一长串，在海面上绵延了7英里。它们绕过合恩角，到达了包括日本横滨在内的几处太平洋停靠港。抵达东京后，美国军官在皇宫受到了天皇召见。在14个月的航程中，舰队到达了六个大洲，途经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回到美国。^[69] 在美国报纸上的一幅卡通画里，一艘战列舰被画成罗斯福的样子。罗斯福总统的脸是船首，骑兵帽的帽檐是前甲板，大张的嘴巴则在吞食大海。在罗斯福卸任之前几天，舰队结束了4.6万英里的航行，回到美国。罗斯福再一次从“五月花号”的甲板上眺望，每艘船也再一次鸣放21响礼炮向他致敬。后来他在旗舰上发表了演讲，祝贺军官和士兵们：“这是第一支环球航行的作战舰队。以后再次实现这一壮举的人，都是在追随你们的足迹。”罗斯福说，大白舰队的航行表明“太平洋和大西洋一样，都是我们的国内水域”。^[70]

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首次通航。1914年7月，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2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床上逝世，享年74岁。

那时，参与未来太平洋战争的将军们年纪在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他们已经被提升为上尉或者少校。他们已经被视为未来的高官，被送往纽波特的海军战争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们研究、讨论并规划未来海战的前景。他们利用兵棋推演战斗场景，用模型代表奋勇争先的舰队，通过扔骰子决定战争的走向。据说马汉的幽灵仍徘徊在学院当中，而且根据推演估计，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高潮将是战列舰在西太平洋的对决，那会是一场典型的马汉式“决定性战役”。

《橙色战争计划》是美国太平洋战争的计划书，该计划书预计“橙色”（日本的代称）会突然袭击并取得压倒性胜利，侵占菲律宾、关岛，此外可能还有夏威夷。^[71] 驻扎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小型美国亚洲舰队将破坏岸上的设备和所有无法带走的军需，然后逃离到安全的水域。战争爆发一周之内，美国海军主力舰队（可能驻扎在东海岸）将开

足马力，驶向大海，开启漫长的征服和解放的旅程。通过巴拿马运河后，美国海军将进一步穿过中太平洋地区广阔无边的水域，袭击并且占领日军控制的环礁。到达西太平洋之后的几个月，舰队将追捕并且歼灭日本海军的主力舰队。胜利的美国舰队将封锁日本本土，扼制日本的贸易，迫使日本投降。

这个计划的缺陷十分明显。罗斯福的大白舰队仅仅证明，在和平时期本着良好的愿望，这些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可以环球航行。在战争时期重复这一壮举，并指望在日本的本土水域打败令人畏惧的日本舰队，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最佳状况下，那个时代的战列舰在长途航行时可以维持10节或者12节的速度。航行沿线必须有储油充足且防御严密的补给站。在海上航行数周后，船员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会变差，他们的工作效率和士气也会受损。离交战区越近，舰队越要警惕突袭。在任何时刻，官兵都可能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集结并投入战斗，在经过这么远距离的航行后去打贏一场决定一切的战役。他们要面对的是敌人以逸待劳的舰队，这些舰艇可以很容易地抵达重要基地，军官和士兵们精力充沛，严阵以待，舰船也都受到了良好的维护。《橙色战争计划》似乎重述了1905年齐诺维·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指挥的俄国舰队的悲惨结局，谁又敢说结局会不一样呢？

只有少数敢于突破传统的人猜到，飞机和潜艇将改写海战的所有规则，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战列舰不仅毫无用处，甚至有还不如没有（因为战列舰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马汉的海战三原则也将迅速变得过时。“一战”已经透露出一丝未来的端倪。德国海军的U型潜艇证明潜艇可以威胁海运的补给线。欧洲战争表明航空兵可能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到“一战”结束时英国已经证明，飞机可以在船上起降。“一战”中，发生在日德兰半岛附近的最大规模的海战，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全盘否定马汉的学说。但是“一战”所带来的任何教训，都无法打破人们对于战列舰的崇拜，一直到二战爆发前，世界各国的海军高官都是战列舰的追随者。

泰迪·罗斯福在1912年没有通过第三党进步党获得足够的选票，所以未能连任总统；结束政治生涯后，他出书，做演讲，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改革事业。和往常一样，他倡导与日本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72]他又搬出了1906年加利福尼亚学校危机时他开出的那味药——对待日本人要很有礼节，要赞美，这样才能抚平日本敏感的国家荣誉感；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亚洲都要避免无意义的挑衅；要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好将美国海军的主力派往西太平洋地区。罗斯福仍然怀疑日本“一心要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力量”。^[73]战争可能无法避免，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尽可能推迟开战的时间。菲律宾在很大程度上没办法守护，除非国会能够同意给海军几千万美元的经费。制止日本侵略的唯一希望就是打造一支可靠、强大的海军。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海军准备状态”（naval preparedness）这个话题上，态度坚定到近乎顽固的地步。这是他最喜欢的口号之一，“准备状态”（preparedness）这个词是他自创的，他在演讲、书信和文章中反复使用，以示强调。海军就是国家的右臂，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还说“如果我们让这只右臂无力甚至瘫痪，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遭殃”。^[74]美国人如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就会经历一次“痛苦的苏醒；如果那痛苦的苏醒当真到来，我相信我们的民众会想起那些愚蠢的博爱者、胆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人员，他们应该为美国的悲剧负责”。^[75]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上台，他提名31岁的前纽约州州议会参议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富兰克林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亲戚，后来娶了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西奥多·罗斯福1905年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尽管富兰克林是一名民主党人士，而且要为刚刚在大选中击败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新任总统工作，但他也是一名坚定的海军至上主义者和马汉思想的推崇者。实际上，在富兰克林15岁生日时，西奥多·罗斯福送给富兰克林的礼物就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富兰克林的母亲说，富兰克林“完全能背下那本书”。^[76]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期间，富兰克林每天都对海军进行训练，就像西奥多·罗斯福在麦金莱总统任期内担任相同职务时所做的那样。

1913年5月，西奥多·罗斯福写信祝贺富兰克林担任此工作，也主动提供了一些指导。他提醒富兰克林千万不要让舰队被太平洋和大西洋分开，还说：“我不想和日本产生冲突，但是这有可能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必然是突然而至的。”^[77]

他的这番话预见到了未来，不过是28年后才应验。在1941年一个晴朗的早晨，“痛苦的苏醒”在夏威夷来临，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最悲观的人的想象。富兰克林在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和纽约州州长时一直追随着西奥多·罗斯福的脚步，而到了1941年，这将是他就任美国总统的第9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满足马汉的集中兵力的理论，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排成两列停泊在珍珠港东湖（East Loch），船首靠着船尾，横梁挨着横梁，就像驿站马车的马队一样整齐。但是这些战列舰没有做好准备。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兵者，诡道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

.....

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

.....

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

——孙武，《孙子兵法》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2] Potter, *Halsey*, p. 28.

[3]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line at www.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speeches.

[4]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60—1831），美国第4任海军部长（1813—1814），在沿海布防和打击对手航运方面相当成功，是美国赢下1812年战争的功臣之一。——编者注

[5] 奥利弗·哈泽德·佩里（Oliver Hazard Perry, 1785—1819），美国海军军官，1813年在伊利湖战役中率领舰队击败英军，扭转了1812年战争的走势，因而被誉为英雄。——编者注

[6] 斯蒂芬·迪凯特（Stephen Decatur, 1779—1820），美国海军军官，1804年与巴巴里诸国交战时因率领敢死队发动夜袭并烧毁被俘舰“费城号”而一战成名，1812年战争期间指挥“美国号”巡航舰在单挑中俘获同级别敌舰，1820年与另一名军官决斗时身亡。——编者注

[7] 爱德华·普雷布尔（Edward Preble, 1761—1807），美国海军军官，1804年的黎波里战争中任地中海特遣舰队总指挥，战果颇丰。在他手下成长起来的军官在1812年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者注

[8] 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 1778—1869），美国海军军官，1812年战争中曾指挥“宪法号”巡航舰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擒获两艘敌舰。——编者注

[9]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78, 276.

[1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8.

[11] Livezey, *Mahan on Sea Power*, pp. 72, 59.

[12] Beach,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Year History*, p. 332.

[1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3.

[14]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 303.

[15]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 79.

- [16] Tribute reproduced in Taylor, *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p. 115.
- [17] 泰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泰迪是他的昵称。——译者注
- [18] TR to Alfred Thayer Mahan, Washington, May 12, 1890,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45–46.
- [19] TR's review in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890), in *Works*, Vol. 14, pp. 306–16.
- [20] Mahan to TR, October 24, 1906, quoted in Turk,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p. 149.
- [21] Speech given in Chicago, April 2, 1903, in TR, *Presidential Addresses and State Papers*, Vol. 1, pp. 265–66.
- [22] TR (1916), Mem. Ed. XX, 261; Nat. Ed. XVIII, 225, reproduced in *TR Cyclopedia*, p. 352.
- [23] TR, “Address at Mechanics’ Pavilion,” San Francisco, May 13, 1903; “America’s Destiny on the Pacific,” *New York Times*, May 14, 1903.
- [24] “Washington’s Forgotten Maxim,” Address by TR, U.S. Naval War College, June 2, 1897.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3, p. 456.
- [25] TR to Cecil Spring-Rice, June 16, 1905,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391–92.
- [26] TR to Theodore Roosevelt, Jr., October 4, 1903, in *ibid.*, pp. 296–99.
- [27] Brands, *T.R.: The Last Romantic*, p. 554.
- [28] TR to Charles Joseph Bonaparte, February 17, 1906,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p. 448–49.
- [29]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 360.
- [30] *Ibid.*, p. 13.
- [31] TR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August 28, 1905,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 402.
- [32] Roosevelt, *America and the World War*, p. 167.
- [33] Karsten, *The Naval Aristocracy*, p. 69.
- [34] “Washington’s Forgotten Maxim,” Address by TR, U.S. Naval War College, June 2, 1897.
- [35] “明治维新”的英文译名是Meiji Restoration, restoration的另一含义是“复辟”。——编者注
- [36]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61.
- [37]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 137.

- [38]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quoted in *ibid.*, p. 223.
- [39] TR to Cecil Spring-Rice, June 13, 1904,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 336.
- [40] TR, *Autobiography*, p. 378.
- [41] TR to Theodore Roosevelt, Jr., April 9, 1904, in *Letters to His Children*, p. 31.
- [42]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 [4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p. 13, 6.
- [44] Mahan, *From Sail to Steam*, pp. 233, 244.
- [45]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p. 215–16.
- [46] *Ibid.*, p. 219.
- [47]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69.
- [48]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 54.
- [49] Edgerton,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p. 219.
- [50]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14.
- [51] “Japanese a Menace to American Women,” “Whole State Stirred by Menace of the Invasion,” and “Brown Men an Evil in the Public School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 27, 1905, March 1, 1905, and March 5, 1905.
- [52]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23.
- [53] *Ibid.*, p. 17.
- [54] *Ibid.*, p. 50.
- [55]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137.
- [56]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p. 54.
- [57]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May 15, 1905, in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4, p. 1181.
- [58] *Harper's Weekly*, Nov. 10, 1906, cover art by William A. Rogers. Captioned: “For Heaven's Sake Do Not Embarrass the Administration.”
- [59]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June 5, 1905, quoted in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24.
- [60] TR's 1906 Annu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 [61] Starr, *Embattled Dreams*, p. 44.
- [62]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 [63] *Sprout and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 250.
- [64] Starr, *Embattled Dreams*, p. 53.
- [65] TR to Sir George Otto Trevelyan, Oct. 1, 1911, in *TR Cyclopedia*, p. 36.
- [66] TR to Taft, August 21, 1907, quoted in Neu,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p. 142.
- [67] TR to Henry Cabot Lodge, July 10, 1907, in *TR Cyclopedia*, p. 35.
- [68] Brands, *T.R.: The Last Romantic*, p. 613.
- [69] *Ibid.*, pp. 636–37.
- [70] Zimmermann, *First Great Triumph*, p. 6.
- [71] Miller, *War Plan Orange*, pp. 43–46, 53–55, and 66–67.
- [72] TR, “Japan’s Part,” Japan Society, New York, 1919, p. 13; *TR Cyclopedia*, p. 275.
- [73] TR to Eugene Hale, October 27, 1906,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 505.
- [74] TR, “The Navy as a Peacemaker,” *New York Times*, Nov. 22, 1914, Magazine section, p. 5.
- [75] TR, “Problems of Power,” *New Outlook* 104, May 31, 1913.
- [7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53.
- [77] TR to FDR, May 10, 1913, in Auchinclos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p.681.

第一章

对于瓦胡岛的居民而言，被枪声、炸弹声和低空飞机的轰鸣声从睡梦中惊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瓦胡岛满是军事基地，实弹射击操练更是屡见不鲜。在1941年年初，战争的危机似乎愈演愈烈，军方开始进行“战争演习”——让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互相对抗，模拟作战。在这些日子里，由于大量弹药发射到空中，山摇地动，好似地震袭来，瓦胡岛上的简易木制房子摇摇欲坠。所以，在1941年12月第一个星期日早上临近8点钟，司空见惯的摇晃又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居民直接拽过枕头，把头蒙住；另外一些人则继续喝他们的咖啡，看四格漫画，听广播，尽力不去理睬远处炸弹造成的阵阵冲击声、高射炮的轰鸣声和机枪微弱的嗒嗒嗒的声音。

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这并不是日常的演习。地板开始摇晃，窗户乱颤，飞机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机枪的弹壳就像冰雹一样落在房顶上。在火奴鲁鲁，平民百姓从房子里走出来看个究竟，许多人还穿着睡衣。在城里就能听到爆炸声，麦卡利区的国王街上还冒起了浓烟。刺耳的警报声响起，在西面珍珠港和西卡姆机场上空，燃油着火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1]。地面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一个小俯冲轰炸机编队在高空盘旋，呈数字8的形状排列。不时有几架飞机会组合成整齐的攻击队形，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俯冲下来，开始投弹攻击。

目击者瞠目结舌：这一次，开飞机的小伙子们演得可真不赖。12岁大的孔丹还穿着睡衣，他跟他兄弟说：“哇，动作好帅啊。”^[2]为了看得更清楚，两个人爬到家里后院的鳄梨树上。“我不得不说这场演习太真实了。”另一个目击者回忆道。^[3]珍珠港的一名船员将这场轰炸称

为“陆军航空队上演的最他妈棒的演习！”。^[4]珍珠港上空的浓烟被认为是“烟幕弹”^[5]——或者，就像火奴鲁鲁的市长莱斯特·皮特里想的那样，是“演习的烟幕……我觉得这场演习简直就跟真的一样”。^[6]

上午8时4分，KGMB电台中断了平时怀基基第一浸信会的管风琴转播。播音员韦伯利·爱德华兹读了一则简讯，召集所有军事人员返回基地和岗位，然后恢复了正常的广播节目，但是每隔几分钟就会再次中断，要求消防员、医生、援助人员和救灾者各归各位。上午8时40分，爱德华兹再次广播：“现在暂停广播内容，向大家播送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本岛正在遭受攻击。再重复一遍，本岛正在遭受敌国军队攻击。”^[7]听众将信将疑，没把这个新闻当回事，他们以为广播只是一种不太常见的让演习显得逼真的做法。有些人想起了三年前奥逊·威尔斯的科幻广播剧《世界大战》造成的恐慌。接近9点时，爱德华兹再次播报。他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听众相信他：“这不是演习。日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这是真实的战争！”^[8]

就连那些富有经验的军人都难以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随着袭击的进一步展开而感到困惑和眩晕。他们慢慢地才开始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真相都有些后知后觉。一架飞机开过来了。（“那些飞机为什么飞得那么低？”^[9]）美军地面防空炮对入侵者开火。（“小伙子们为什么要朝飞机开火？”）炸弹落下来。（“飞行员太愚蠢太粗心了，连释放装置都看不好。”^[10]）爆炸了。（“这次有人玩笑开大了。他们误将实弹装在了飞机上。”^[11]）飞机开始往上飞，机翼下侧露出日军的“太阳旗”标志。（“我的天啊！他们真卖力啊！他们还把太阳旗印在飞机上！”^[12]）一艘美国军舰爆炸了。（“这是哪门子演习啊？”^[13]）即便到了那时候，还有些人不相信战争开始了。也许就像轻型巡洋舰“圣路易斯号”指挥官A.L. 西顿猜测的那样，袭击者是“一个孤独且愤怒的日本飞行员，他不知怎的开到珍珠港这里，现在给日本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惹了麻烦”。^[14]

在火奴鲁鲁市中心基督教青年会外面的街上，船员纷纷挤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军用卡车开到了主路上，街上挤满了“荷枪实弹、戴着头盔、仰望天空的士兵”。^[15]救火车、救援队还有骑着摩托车的警察迅速前往火奴鲁鲁几个着火的地区。警报声震耳欲聋，道路上满是轮胎摩擦发出的吱吱声。没有人再遵守限速规定。劳森·拉梅奇少校回忆道，在通往珍珠港的双车道柏油高速路上，“视野之内，公交车、出租车等各式各样的车子上都满载着船员，他们要赶往港口”。^[16]

对于很多亲历者来说，最早让他们相信这是真正的袭击的，是他们的车辆遭到了敌军飞机的低空扫射。“我们听到了像是打字机的声音，”与其他海员一起挤在一辆出租车上的水兵拉里·卡茨说，“我从后窗往外看……看到一架飞机朝公路俯冲下来，机翼或是引擎喷着火。它在朝路上的所有车辆射击，我们的车也受到了攻击。”^[17]电工杰克·洛厄正与其他几个人乘坐一辆敞篷卡车。每次飞机低空扫射时，这几个人都会猛敲驾驶室的顶部，司机会猛踩刹车，然后车上的人跳到路边的草丛中隐蔽。飞机飞过去之后，他们再爬回卡车里继续前进。^[18]海军上尉克拉伦斯·迪金森回忆说，他乘坐的车前方的路上有火星飞溅。没一会儿，他前面的车就被20毫米机关炮击中了。“子弹击中了那辆轿车，车子剧烈晃动，被一团黄色的烟尘裹住，”他写道，“那辆车爆胎了，我们看到它乱冲乱闯，剧烈颠簸……我甚至看到了雨点大小的洞出现在车上，就像针脚一样。”^[19]

到上午8时10分，第一批炸弹和鱼雷击中停靠在珍珠港的战舰15分钟之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被摧毁了。在福特岛东岸，在被称为“战列舰大街”的锚地，美军的战列舰被摧毁，燃起火焰，被浓烟熏黑，战列舰的桅杆和上层建筑以45度角倾斜在海港里。被击沉的战舰冒出浓浓黑烟，人们几乎无法辨别到底哪些战舰被击中。“加利福尼亚号”半沉入海，龙骨触到了海底，船体被日军的鱼雷炸开了；“西弗吉尼亚号”被摧毁，燃起熊熊火焰，涂料烧焦了，冒起泡，被击中的左舷升起巨大的烟

柱；“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情况好些，但是这两艘战舰挤在系船柱附近，无法动弹，失去了机动能力。“俄克拉何马号”被多枚鱼雷击中，已经瘫痪，倾斜了150度，长长的龙骨指向天空。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20]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亚利桑那号”的船员马丁·马修回忆道，“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甚至还有尸体残块。我记得有很多钢铁碎片和尸体碎块落下来。我看到一条大腿连着小腿，看到了手指头，看到了手，还看到了胳膊肘和胳膊。”^[21]“亚利桑那号”大部分船身已经不见了，整艘船都被掀翻了，尚存的船体沉入海港底部，只有上层的一小部分和二号炮塔的三个炮筒还露在海面上。“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中也有很多严重烧伤，其他的船员都不知该如何救治他们。“这些人看上去简直就是僵尸，”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詹姆斯·科里回忆道，他曾在“亚利桑那号”上服役并在袭击中幸存，“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用石灰水刷过那么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往外伸着。他们还在甲板上吃力地走着。”^[22]

但是，在目击了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袭击的人眼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是大量敌机俯冲而下，犹如乌云般遮天蔽日。那天上午之前，美国人一直被各种舆论误导，以为日本海军的空中力量只是个笑话而已，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是眼前这些飞机的驾驶员技术极其高超。俯冲轰炸机投放的炸弹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姿势堪称教科书级别。零式舰载战斗机紧跟在轰炸机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要是没有地面上和海港中的屠杀，空中这整个场景会是相当棒的飞行表演。目击者对于日本飞机超低的飞行高度惊讶不已

——（如一位目击者所言）低到扔一个棒球就能打到一架日本飞机，低到从海军造船厂医院的三层**往下**能看到日军的鱼雷机袭击美国的战列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驾驶舱中的日军飞行员，许多飞行员的座舱罩还是打开的；人们能看到飞行员戴的“猫眼式”飞行眼镜，他们被风吹起的围巾，棕色的飞行员头盔，以及白色的头巾——“天啊，我甚至能看到他们的金牙。”惠勒机场的一名陆军军官说。^[23]许多目击者回忆称他们甚至与敌军飞行员有过奇怪的眼神接触。一些日本飞行员惨然一笑，像是道歉一般；还有一些飞行员甚至招了招手。另一些飞行员大笑着，做出嘲弄的手势。“他们飞得很低，能看到他们咧着嘴笑，”“尼欧肖号”机械师里昂·伯纳特说，“我是说，他们真的在大笑，都在笑；他们就好像在野游，或者参加舞会。”^[24]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称看到飞机后排的一名机枪手“放下枪托，双手在头上拍掌，就像美国职业拳击手向台下的人致意那样。然后他又抓过枪，开始再次扫射”。^[25]

马汉描述的最糟情况 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



看到俯冲的飞机、扔下的炸弹和爆炸的船只，一些目击者想起了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新闻片段，或者一些大手笔的好莱坞影片的镜头。整个场面有一种不真实、梦境般的感觉。“我仍然觉得会从噩梦中醒来或是看到战争片的结局。”海军军医艾尔芬格·金德鲁上校在袭击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写道。^[26]“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西奥多·梅森也有类似的感觉：“整个场面就像B级战争片中那种摇曳的二维镜头画面一样。”^[27]很多人记忆中保持时间最长的是那些非视觉的东西，例如船

员被困在甲板下面因恐惧而尖叫的声音，燃烧的船上梯子的铁横档烫在逃跑的船员手心中的那种触觉，口里灌入机油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尸体着火发出的恶臭。这些记忆混在一起，杂乱无序，但是极为鲜活、深刻，事隔多年后依然如此。日本的袭击太过出人意料，和平突然转为战争，大屠杀骤然而至，袭击者还带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愤怒和狠毒——“感觉就像是陷入洪水、龙卷风和地震中一样，”军士长查尔斯·拉塞尔说，“袭击来得又快又猛，让你瞠目结舌，呆若木鸡。”^[28]对于“加利福尼亚号”的信号员约翰·H. 马克高兰来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的经历根本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么用什么语言都难以准确描述；如果你经历过，那么就没必要用言语来描述了。”^[29]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白宫二楼的“椭圆形书房”度过平静的周日下午。“椭圆形书房”和位于楼下的更大、更正式的“椭圆形办公室”不是一回事。“椭圆形书房”属于总统官邸的一部分，房间西面的双开门可以通往卧室和私人浴室。在过去历任总统任职期间，这间书房被称为“黄色房间”或者“椭圆形客厅”，被当作起居室、书房，同时还会存放不想要的家具和文件。哈定总统和熟人及密友在这里打过扑克，胡佛总统在这里看过无声电影。

到1941年12月，罗斯福已经在这里住了九年，这里很像他位于纽约哈得孙河河谷海蒂公园的家，有一种拥挤、舒适、微暗的感觉。墙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挂着不同形状、尺寸、主题的照片和画。总统的书太多了，书架都放不下，所以成捆的书横放在搁架上面，要不就是堆在墙边或角落。厚重的窗帘挡住了窗外的自然光，房间里有点阴暗；但正是因为房间阴暗，家具磨损的边角、轻微脱线的地毯、从落地灯到墙上插座的地板上拖着的弯弯曲曲的电线，都看不大出来。总统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总是有烟蒂，房间里有浓浓的烟味。与房间里的东西唯一格格不入的装饰就是那些和航海有关的东西。书房里放了大概二十几幅罗斯福最爱的柯里尔与艾夫斯（Currier& Ives）的版画，画着大海中航行的木船。

桌子上和书架上有六七艘舰船模型，模型外面有玻璃罩保护。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福总统母亲的照片，旁边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的画像。

对于罗斯福而言，“椭圆形书房”是灵魂的救赎地，也是内心的避难所。他经常一整天都待在这里，坐在书桌后面的轮椅上；而他身后是大大的窗户，往南可以看到椭圆形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很多总统事务都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处理的。他在这里阅读报告，口述信件和备忘录，接听电话，接见助手和拜访者。但这里也是罗斯福最放松的地方，那个周日的下午他就在这里放松自己。那天他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套头毛衣和法兰绒宽松长裤，一边修补邮票集，一边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也是好朋友哈里·霍普金斯断断续续地闲聊“与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30]两人已经在书房里用餐盘吃过午饭了。早前罗斯福曾表示无法与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和大约三十名宾客一起在白宫的蓝厅里一起用午餐。^[31]后来，埃莉诺告诉失望的宾客们（来访的有朋友、亲戚和政府官员），罗斯福是忙于应对太平洋的危机，但是这一说法严格来说并不准确：罗斯福表达歉意是在日军发动突袭之前。他是累了，想要休息。但是他没能如愿。

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40分，他桌子上的黑色电话响起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罗斯福，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发来了紧急信息：“日军空袭珍珠港。这不是演习。”诺克斯能提供的信息就这些，他承诺一有消息就打电话。

霍普金斯有些不相信。^[32]他说，日本不可能也没有实力袭击夏威夷，诺克斯的信息肯定有误。罗斯福不这么想——他说他相信这个信息“很可能是真的”，并且说“日本人就是会做这种出人意料的事情”。

几分钟后，海军作战部长“贝蒂”哈罗德·R. 斯塔克（Harold R. “Betty” Stark）将军打电话确认了这一惊人的消息。斯塔克和诺克斯一直在与海军少将克劳德·C. 布洛赫（Claude C. Bloch）通电话。布洛赫是

位于夏威夷的第14海军军区的指挥官，当日军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第二轮突袭时，他向斯塔克和诺克斯汇报了空袭的实时目击情况。几分钟后，罗斯福接到了夏威夷总督约瑟夫·B. 波因德克斯特（Joseph B. Poindexter）的电话，波因德克斯特请求在夏威夷实施戒严，罗斯福批准了这一请求。^[33]在简短的通话中，波因德克斯特的声音因惊慌而变得尖厉。罗斯福转过身来，对霍普金斯和早已挤满书房的其他助手喊道：“上帝啊，眼下又一批日本人的飞机飞到了夏威夷上空！”

很快白宫上下都得知了这一消息。埃莉诺在送午宴的宾客时，一个引宾员告诉了她。宾客们“呆若木鸡”。有人后来写道：“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宾客们似乎渐次离开了，没有彼此道别。”^[34]第一夫人上楼悄悄走进罗斯福的书房，但是里面已经挤满了助手，她很快意识到罗斯福正在“认真考虑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在最初的紧张局面结束之前不会谈论此事”。^[35]于是埃莉诺回到起居室，开始写信。

整个下午，最新的报告不断涌入白宫。罗斯福的首席秘书格雷丝·塔利接到了斯塔克将军的好几个电话。她迅速记下将军的话，然后飞快地将内容打入备忘录并交给总统。“总统看上去依然比任何人都镇定，但是他的镇定下隐藏着怒火，”塔利写道，“每次收到新的消息他都神色肃穆地摇摇头，嘴角流露出更加坚毅的表情。”^[36]助手们不时进入书房，声音越来越大，很快塔利就没法工作了。她来到走廊上，然后又来到总统卧室的私人电话旁。她打字时，参谋人员在她身后徘徊，伸头看她打的内容。她后来写道：“消息继续传来，每一个新消息都更加残酷，将军跟我打电话时我都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出难以置信的震惊。一开始总统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消息接踵而至，反复确认空袭的事实，大家开始接受传来的信息是真实的，并且对此愤怒不已。”

罗斯福坐在书桌后面，在一片混乱中仍保持着镇定和沉着。那天下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听电话，安排军事行动，为媒体口述新闻，为港口安排新的安全举措并进行战略部署，制定措施观察或扣留日本侨民。

有几十项行政命令需要启动。罗斯福吩咐助手们立即执行这些命令，稍后再拿来给他签字。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书房就座，包括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上将斯塔克、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上将。总统问的问题都很现实。日军的袭击是如何成功的？损失有多大？日军下一步可能袭击哪里？夏威夷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不清楚。瓦胡岛的广播和电话信号中断了好几次，话说一半就断了，信号一度中断了好几个小时。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吗？每个新消息都表明空袭造成的损失远超人们之前的预估。会议在下午4点半左右中止，众人决定当天晚上8点半整个内阁在白宫会面，国会领袖则要在9点出席。

罗斯福周围有很多人断定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如释重负了。等待和不确定终于结束了。关于战争的前景，美国人一直意见不一；但是现在（就像战争部长史汀生说的那样）“这场危机会把全体美国人团结起来”。^[37]埃莉诺也这样认为：“我想，富兰克林虽然焦虑不安，但是他也很久没有这样平静过了。骰子终于扔了出去，我想他可以安心了。”^[38]

日军的最后一批飞机飞回大海时，珍珠港的东湖满是各种物品的残骸，大部分都被火烧黑了，包括衣服、鞋、书、救生衣、床垫、舷梯、救生船和桶。各种难以描述的臭味混在一起——燃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味道，翻滚的黑色浓烟的刺鼻气味，还有烧焦的尸体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甜腥味。百万加仑^[39]石油从被鱼雷击中的战列舰上漏入海港。“从没有在海上看这一幕的人，无法想象出石油漏入冰冷的海水是怎样一番场景，”二等兵科里说，“石油变成了一团大约6英寸厚的胶状地毯。”^[40]从燃烧的船上跳到海里或者被炸入海里的海员发现自己要在凝结的石油中游泳。这不仅耗费体力，而且极其危险。“加利福尼亚号”的海员梅森尽量潜入水下，但是他不得不探出头来换气，“胶状的黑油堵住了我的鼻子和耳朵，烧得我眼睛疼。那东西又臭又甜，让我直想吐”。^[41]

那天风很大，大约有25节的速度；当天上午拍的照片里能看到，旗帜在旗杆上高高飘摇。所以战列舰上的火焰不可避免地向海港里蔓延。根据幸存者的描述，海面燃起熊熊大火，朝他们袭来，火焰吞噬了其他人的头部，火帘后面传来短暂、痛苦的尖叫声，接下来是死寂一片。附近的战列舰散发出的热量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但是仍然有人开动船只，向火焰径直驶去，以期拯救那些幸存者。一艘小艇上的船员试图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大火。“每次灭火后，船的两侧都会再度着起大火，然后再灭火，再着火，”以法莲·P. 霍姆斯上尉说，“温度太高了，船上的人不得不朝没有火的方向探出身子以保护自己。”^[42]小艇上的船员将撑篙的钩子搭在落水者的腰带上、领子上，把他们拖上船。被救起的人嘴里呛满了石油，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许多人浑身是油，都看不出到底受没受伤。“我记得我从海里拉上来的一个船员，我拿出手帕把他脸上的油擦掉，”海军陆战队二等兵莱斯利·勒法恩说，“我甚至都看不出他是黑人、白人还是黄种人。”^[43]海员爱德·约翰说，这些幸存者都躺在船底，最后“每艘船都挤满了伤员，挤得一动也动不了，每个人都极其痛苦”。^[44]

福特岛港口对面的10—10码头（Ten-Ten Dock）上的担架里躺满了从船上救下的伤员。场面极其混乱。头天晚上在岸上过夜的船员和军官依然在奋力奔走，希望能找到小艇将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警报声响彻云霄；救护人员大喊着，让人们为担架让路；混凝土码头上全是死伤者。大量私家车和救护车赶来，交通瘫痪。伤员们被注射了吗啡，然后又被喂了些水。他们的脸被火烧黑或被烟熏黑，眼睛也几乎睁不开了；有些伤员的头发全烧没了，大部分皮肤也已烧伤。伤员必须脱去衣服，但是衣服上浸满了油而且已经与肉粘在一起。脱下衣服时，伤员的皮肤也连带着被扯下来。“我只能给他们涂一些凡士林然后用纱布包扎上，”帮忙救治伤员的“西弗吉尼亚号”三等船体装配工路易斯·格拉宾斯基这样说，“但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我那样做就像是给他们扒皮一样。让伤员们的皮肤裸露着，而不是往上面抹东西或者缠纱布，似乎反而好

一些。他们想把纱布撕下来。如果是穿着圆领衬衫，那就要把衬衫扯下来，因为他们浑身都是水疱和灼伤。”^[45]

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都设立了几处紧急治疗中心，包括海军陆战队兵营、医务室、单身军官宿舍（BOQ）。所有的治疗中心都迅速挤满了伤员。在福特岛的食堂里，所有的餐桌上都躺满了伤员，新抬进来的担架只能放到外面的院子里。船员维克托·卡蒙特说：“有些伤员看上去已经没救了，他们的衣服上浸了石油，烧焦的肉和骨头裸露出来。有些伤员衣衫褴褛，肉就挂在骨头上。有些伤员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叽里咕噜地念着母亲、父亲或者爱人的名字。这一幕看得人无比难受。”^[46]伤势较轻者恍恍惚惚地走来走去，有人跟他们说话也不理睬，有人想领他们去治疗中心就激烈地反抗；还有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似乎毫不知晓，哪怕是在寻常女性或者红十字会的护士面前。“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卡尔森有幸从船上逃了出来，只受了轻伤，他记得在福特岛的海湾见到了一位同事。那个人“躺在我对面……用双手握着他的肠子。他抬头看着我，说：‘战争真是地狱啊，对吧，伙计？’我说：‘是的，没错。’我身上没有地方流血，所以我起身离开了那里”。^[47]

在港区和登陆处，死者的尸体被排成两排，中间是通往救治中心的过道。每排死者的头部都向内，这样可以通过脸或者身份识别牌确定死者身份。一些死者的脸奇黑无比，但是身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伤痕：这就表明他们是在某一次大爆炸中受到巨大的冲力而死的，他们的血管被震裂了，但是皮肤没有裂。美国海军舰船“雷利号”的船员尼克·库瑞塔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寻找他的兄弟：“我沿着过道奔跑。我知道我兄弟的特征，我要找到他。他喜欢咬指甲。我知道他有一颗疣，我知道他身上每一个标志。我找来找去，我会说‘这个人看上去像他’，但是看不到脸。我会握起一个死者的手，说：‘不，这个不是他。’然后接着往下找。”^[48]最后，人们拿来了床单和毯子，盖在尸体身上。“我跟你讲一件事，”“俄克拉何马号”的船员威廉·福贝说，“当你看到尸体裹着床单像

积木一样堆在一起时，战争的所有光辉都会消失。你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49\]](#)

福特岛的飞机场中遍布着扭曲的、冒烟的废墟，以及飞机的残骸。在轰炸过程中，70架飞机中有33架被炸毁。在福特岛的东南部，彻底被毁的六号机库浓烟滚滚：它被至少三颗炸弹击中。在水上飞机的停机坪，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燃烧的残骸散落在随处可见的棕榈树中间。岛上的水泥地满是榴霰弹的弹片和巨大的弹坑，这些弹坑都是550磅[\[50\]](#)重的炸弹炸出来的。奉命弃船的海员们茫然无措地乱转，船员服被鲜血和燃油浸透。“我们很多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里站着，”船员爱尔莫·拉什回忆说，“我开始回想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战栗不已。我走来走去，过了好久才平静下来。”[\[51\]](#)大家全都衣衫褴褛，有些人到废弃的兵营或者家属的房子里找衣服穿。有报道称人们的打扮极其怪异：头戴海员帽，身穿上尉的蓝色夹克；光脚穿无尾礼服；浴袍加靴子；海军粗蓝布裤子配燕尾外套，再加一顶前后有檐的将军帽子。岛上有许多船员成群地四处游走，他们肩上挂着弹药带，就像西部片里的土匪一样。副水手长霍华德·弗伦奇说，在福特岛的行政大楼里，“场面极其混乱……没有秩序，失去控制，没有管事儿的。人们就像迷途的羔羊般四处乱转”。[\[52\]](#)

海军造船厂里的海军陆战队兵营是一栋大型水泥建筑，这里被当作紧急安置中心，用来安置这些四处流荡的船员。从海港中爬出来的船员按照指示脱下浸满燃油的衣服并放到垃圾桶中，然后排队洗热水澡。在很多情况下，污泥状的燃油已经深入船员的毛孔中，要想洗干净简直不可能。“你用能找到的毛巾和碎布拼命搓洗，但就是没法把它搓掉。”“亚利桑那号”的船员吉姆·劳森说。[\[53\]](#)肥皂和水对于石油毫无作用，只能用酒精或者汽油去清洗浸满石油的皮肤。有些人甚至真的泡在汽油里，而那些想方设法清除掉石油的人后来连续抱怨了好几个星期，说他们从头到脚还是有一层薄薄的石油，说汽油弄得他们眼睛疼，要不就是说他们头疼而且视线模糊。

海军军需军士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发放干净、干爽的粗蓝布裤、内裤、袜子、牙刷、牙膏、剃须刀和垃圾袋。^[54]没有人以书面的形式走流程，谁也不需要签字。海军给养军士尽其所能地为饥饿的船员提供食物。船员们走进食堂，排队领饭的人络绎不绝——等着吃早饭的人还在排队时，已经有人来排队打午饭了。因为担心饮用水可能被破坏者投毒，所以人们喝啤酒、软饮料、酷爱（koolaid）和从游泳池抽上来的水。一个船员回忆说，他和伙伴们很感激能“吃到干爽的三明治，还喝了用氯消过毒的游泳池水冲泡的咖啡。我们饿极了，所以感觉食物十分美味”。^[55]

海军陆战队兵营一楼设立了船员登记站。一名初级军官搬来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墙上印着每一艘被放弃的舰船的名字。船员和军官们登记后被告知等待重新安排。许多人奉命参与船上和基地附近的清理工作。在福特岛上，多支由船员组成的小队将残骸从机库清理走并将被炸毁的飞机推离跑道。另一些船员用灭火器熄灭了机场周围草地里的几十处灌木丛中的火。他们拿上桶，奉命捡起榴霰弹碎片和金属碎片。地上的榴霰弹碎片太多了，“在停车场你随手一抹就能捞起来”。^[56]第14海军军区的公务人员奋力铺设一条从霍斯皮特尔角（Hospital Point）到福特岛的直径16英寸的主供水管道，其他工作人员则努力让干船坞恢复如常。船员们拿着镀锌桶回到被击伤的战列舰上，开始了一项可怕的任务——搜集已故同伴的尸体残骸。“我记得找到了几块膝关节和肩胛骨，还有几块烧焦的残缺尸骨，因为烧毁严重，所以都难以辨认身份。”“内华达号”船员查尔斯·色赫回忆说。^[57]

轰炸那可怕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幸存者们一起努力干活，提升士气。^[58]音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岛海滨，一台自动唱机大声播放着《我不想将这世界付之一炬》；在“马里兰号”战列舰上，维修队在工作的时候，乐队就在甲板上演出。“内华达号”的船员给自己的船起了一个新的绰号：“振作号”。^[59]船的甲板上写着“我们将再次战斗”，以及“振作号，振作起来”。这场危机似乎将人们最好的一面激发

了出来：那些装病的人和磨洋工的人纷纷投入工作当中，就连被关在禁闭室里的人也被放出来参加劳动。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珍珠港的情况太糟了，”船员梅森回忆说，“就连长官们也在劳作。”^[60]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上将对很多事情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敌机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敌机去了哪里。敌机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还是从福特岛西南方几千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的日本航空基地起飞的？后者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因为隔的距离太远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那么日军的航母又去了哪里呢？去了北方，南方，还是西方？日军的航母撤退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空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周日上午的空袭是否早有预谋，只是个开场，日军随后是否会进行登陆作战？瓦胡岛是不是将被入侵？

金梅尔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位于一幢三层白色建筑里，正面为装饰派风格，两旁种着椰子树，前面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从他的窗户往外可以看到海港大屠杀的整个场景。参谋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持镇定，但是整个太平洋舰队的军力都被日军的行动摧毁，这一严酷的现实使他们极为震惊，无言以对。“金梅尔表面看上去镇静泰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部的情报官、海军少校埃德温·T.莱顿回忆道，“但是他指挥的舰队遭遇的一切以及世界在他身边崩塌这一事实似乎让他十分震惊。”^[61]他看着珍贵的战列舰被烧毁，不时喃喃自语：“真是太让人哀痛了！”^[62]从沉船上逃离的军官涌入司令部，他们白色的制服染上了石油的污渍；许多军官似乎茫然无措。虽然那时谁也不愿意承认，但是司令部上空弥漫着浓浓的恐惧气氛。莱顿回忆说，文书军士双手颤颤巍巍地将情报记录交给司令官，海军上尉沃尔特·J. 伊斯特斩钉截铁地说：“大家都害怕，如果谁说自己不害怕，那就是十足的骗子。”^[63]

在空袭后最初那令人绝望的几小时里，金梅尔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有

关敌人位置的情报。他的问题是，司令部收到了大量的报告，但是里面的信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前后矛盾，要么杂乱无章，要么大错特错。他最初的直觉是，敌军的航母是从北方来的（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及时据此采取行动）。周日上午从美国本土前来的美国陆军航空中队看到，空袭后日本飞机往北飞去；而且瓦胡岛北部的奥帕纳（Opana）的雷达站也监测到有飞机朝北飞去。但是日本飞机已经摧毁了瓦胡岛上的陆军以及海军的大量巡逻机，至少让它们失去了行动能力，所以美军指挥官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空中搜寻。上午9时42分，金梅尔向位于瓦胡岛西部大约200英里的“企业号”航母发出警告，“有迹象表明”一艘日军航母在瓦胡岛的西北部。^[64]但是几分钟后，新的报告显示日军的航母在南部。（情况最终弄清楚之后，人们发现，每一次报告都把美国的战列舰误认为是日本的航母了。）有一个错误警报说两艘日本航母正朝巴伯斯角（Barbers Point）的西南方驶去。“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离报告的坐标很近（而且很可能被美军误认为是日军的军舰了），它尝试发送信息，纠正该报告。但是无线电操作员犯了错，最后发出去的信息变成了“看见两艘敌舰”而不是“没有敌舰”。^[65]“企业号”向东驶去，有15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搜寻瓦胡岛西南部海域是否有敌舰。为“企业号”护航的巡洋舰上有6架寇蒂斯SOC-3“海鸥”水上飞机升空，搜寻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两路飞机都只发现了美军的战舰，但有时候飞行员将美军战舰误认为是日军战舰，导致场面越发混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日志记录道：“一度认为瓦胡岛的北面和南面都有日军的航母。”^[66]

在福特岛上，日军空袭后未受损的几架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被派出去进行空中侦察。很快，这几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在福特岛和霍斯皮特尔角之间的海峡中轰鸣起来，相继起飞。出动这些飞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因为东湖（被用作跑道）上布满了舰艇的残骸，而且水面上还有一层油泥。29岁的海军上尉托马斯·H. 穆勒是水上飞机飞行员（也是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生动地描述过沿着海峡开飞机的感

觉：飞机翼尖离燃烧的战列舰只有咫尺之遥，飞机的浮筒在舰船搅起的尾流上颠簸，混着石油的海水拍打着飞机的挡风玻璃，“在飞离福特岛之前我什么都看不见。被石油裹了一层之后，我们只能完全依靠仪表起飞”。[\[67\]](#)

在整个海军造船厂和福特岛上，人们普遍预测日军即将入侵。失去舰艇的船员们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感，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地面战斗的训练，只能紧急组织防御。在福特岛上，成群的船员被派去挖壕沟、填沙袋，或者在三脚架上设置0.30英寸和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日军炸弹留下的弹坑外摆了一圈沙包，被用作散兵坑。军方用卡车拉来步枪，在岛上分发（基本是随机发放），包括几千支布朗宁自动步枪，还有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手动1903春田步枪。收到枪的人无须签字。“有人给我发了两颗手榴弹，”“加利福尼亚号”船员沃伦·G. 哈丁说，“我说：‘给我这个干什么啊？’他说：‘管他呢！别拉弦就行！’这就是我收到的所有指示。”[\[68\]](#)有人看到船员们拿着屠夫的杀牛刀和切肉刀。[\[69\]](#)无线电员约瑟夫·瑞安领到一把0.30英寸步枪和一些子弹，发枪的人告诉他：“你们几个就待在10—10码头这里，日本人过来的时候，就在他们放倒你们之前多撂倒几个人。”

星期天下午是广播的黄金时段，全美国的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电台都在播放收听率高的节目。下午2时30分左右，寻常的节目被新闻播音员打断，他们播报了珍珠港被日本飞机袭击的新闻。整个美国几乎出现了同样的场景：各家各户都围在大大的台式收音机旁边，全神贯注地收听最初的报道。一旦有孩子想说话，大人就会立刻制止。收音机的真空管要是烧坏了，人们就坐进车里听广播。

“我并不知道夏威夷在哪里，”平民斯科特·莱斯伯格回忆说，他是通过俄亥俄奥柏林一位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得知珍珠港的消息的，“我只

知道夏威夷在太平洋上。”^[70]他的反应很正常。珍珠港？瓦胡岛？火奴鲁鲁？这些名字对美国本土人来说都很陌生。20世纪30年代时，有几部电影在夏威夷取过景，大部分美国人至少知道夏威夷是美国的领地，位于太平洋上的某个地方。人们赶忙从书架上拿出地图集仔细研究。对于大部分住在密西西比河东部的美国人来说，夏威夷比欧洲还远，而欧洲的战火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但是夏威夷是美国的土地，日军击沉了美国的战舰，杀死了美国的士兵。民众们已经看过很多被摧毁的城市的新闻报道，包括欧洲城市和中国城市。天上扔下炸弹这个场景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梦魇，而且这进一步证实了世界的古文明所在的是无可救药的野蛮之地，美国这个新世界应该冷眼相对。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切似乎也**可能**发生在美国。全美国人都从家里走出来，望着天空，似乎觉得日军飞机会突然出现在他们上空。

儿童和青年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他们对珍珠港被袭击的新闻不当回事。一些人认为美国只需要去轰炸一下日本，让日本人得到应有的教训，他们就不会再挑衅了。周日下午早些时候有报道称，一艘日本潜艇在瓦胡岛被击沉；听到这个消息后，芝加哥的10岁孩子詹姆斯·埃里克森很高兴，他以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日本当天就会投降。芝加哥19岁大的艾丽斯·班克罗夫特承认她当时感到振奋，一想到即将有战争发生她甚至有些兴奋。“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我的未来也将是毫无新意，”她多年后回忆说，“但现在，突然之间，我知道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未来充满了新的可能性，谁也无法忽视。……我感觉自己像罗曼蒂克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而上了年纪的人则是另一番反应，尤其是那些家里或亲戚家有适龄服役者的人。帕特·万当时9岁大，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听到了广播播放这一消息。她问父亲：“有那么糟糕吗，爸爸？”她父亲回答说：“是的，宝贝，非常非常糟糕。很多好人会死去。”^[71]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正在位于白金汉郡的首相别墅里，在场的还有两位来自美国的客人——美国大使“吉尔”约翰·怀南特（John

“Gil” Winant)和《租借法案》协调人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72]那天晚上9点钟,丘吉尔首相打开便携式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音员先是播放了几条关于苏联前线以及英国军队在利比亚的几条新闻,然后就报道了日本在太平洋对美国 and 英国目标的袭击。丘吉尔从大厅大步走向办公室,命令参谋给大西洋彼岸的白宫打越洋无线电话。三分钟后电话接通,两个领导人开始通话。

“总统先生,日本到底怎么回事?”丘吉尔问。

“消息都是真的,”罗斯福回答说,“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现在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了。”

丘吉尔告诉罗斯福日军已经在马来亚登陆,并且承诺第二天去见下院的议员,要求对日宣战。“这样局势就明了了,”丘吉尔跟罗斯福说,又补充道,“上帝与你同在。”

丘吉尔首相对于这个新闻的反应毫不含糊。他很高兴。“我们终究还是赢了!”很多年后丘吉尔在他著名的二战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英格兰仍然会存在;英国仍然会存在;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也仍然会存在。……希特勒的命运已成定局。墨索里尼的命运已成定局。至于日本人,他们会被碾为齑粉。剩下的无非是恰当地使用我们压倒性的力量。”[73]当时欧洲的战况不是很好,所以丘吉尔这番预言可谓很大胆;而丘吉尔跟罗斯福说日本人突然加入这场战争会让“局势明了”,这与很多让人困惑的复杂状况是不相符的。那时法国战败已经18个月了,希特勒似乎是欧洲大陆不可撼动的统治者。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148个师越过苏联边境。到12月,他们已将莫斯科纳入了大炮的射程。英国参战已经两年多了,孤军奋战对抗德国已经一年有余。英国遭受了纳粹德国空军的炸弹袭击,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德国横穿英吉利海峡发动入侵,但是1942年德军有可能再次发起攻击,尤其是万一苏联崩溃的话。

日军会不会在东方入侵苏联,使希特勒抽出身来全力对付西线?日本会不会接管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甚至还

有印度？德意日三个轴心国会不会在中东形成可怕的联合？人口稀疏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会不会被吞并？更可怕的是，美国会不会举一国之力来对抗日本，从而无力再为英国和苏联提供坦克、飞机、运输舰、武器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

对于这些危险，丘吉尔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坚信珍珠港事件会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最终确保盟国取得胜利。他想起30年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关于美国参加“一战”的一番话。格雷曾说，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一旦熔炉里的火着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无限的力量”。丘吉尔想起这些鼓舞人心的事情，便上床“带着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入睡了”。^[74]

在华盛顿，下午4点左右，主要十字路口的交通都已瘫痪，街上都是运送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的卡车。电话都要打爆了，因为民众都想知道袭击的消息；电话系统因为人手不够，又增派了一批话务员，但是不管在哪里都很难打通电话，无论是拨打市话还是长途。公共建筑的石阶上和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掩体。海军陆战队被召集去守卫国会大厦。身穿制服且戴着“一战”时代钢盔的宪兵，突然出现在第十七街和宪法街交会处的战争部和海军部外面。

在位于马萨诸塞大街的日本大使馆门外的人行道上，愤怒的人群进行了大规模集会。一度有人从出租车上下来向大使馆扔瓶子。《费城问询报》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拿着“好几篮子文件到花园里烧掉”。^[75] 日本记者加藤纯一（Masuo Kato）^[76] 在下午4点左右离开大使馆。他抬头望向屋顶上方的天空，发现“空中都是白烟”。更多的文件是在屋顶上烧掉的。大使馆外的人群开始骚动，有几个人开始咒骂、大声威胁。加藤往外走时，人群带着恶意向他涌来。人们没有碰他，但是有个人说：“你是我们放走的最后一个浑蛋。”^[77] 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和一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派员很快赶来恢复

了秩序。

灯火管制还没有在白宫生效，照明灯将白宫和地面照得灯火通明，犹如白昼。宾夕法尼亚大街的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因为司机们都瞪着眼，翘首以盼，期待能看到总统或者他的随员。成百上千名民众已经在铁门外的人行道上聚集起来。一些人的肩上还扛着孩子。警察和特工们努力想让人群移动，但是下午晚些时候和刚入夜那几个小时一直有更多的人赶来。最终人群围了三四圈。有些人开始唱《天佑美国》和《我的祖国》。门廊下聚集了五六十名记者和摄影师。梅里曼·史密斯不知道罗斯福总统是否“能听到后草坪那里普通民众发自肺腑的、自发唱响的歌声”。^[78]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走进白宫大门时注意到人群“安静且严肃”，似乎“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想离现场更近些，即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79] 74岁高龄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从豪华轿车上下来，（目击者称）“像山羊一样跳上石阶”。《纽约太阳报》记者格伦·佩里记录道：“天很冷，薄雾使月色变得有些朦胧。国务院灯火通明，被召回工作岗位的员工穿过人行道和陈列的古代大炮，进入大楼。”^[80]

夜幕降临后不久，格雷丝·塔利走进了总统办公室。总统正一个人抽着雪茄，坐在桌前浏览文件。“请坐，格雷丝，”他说，“明天我要去见内阁成员。我口述一下消息。不会太长。”他深吸一口烟，吐出烟雾。塔利回忆说，罗斯福总统开始口述，“语气就像口述一封信一样平静。只是他的发音有所不同，他说每一个词时都很果断而缓慢，还仔细地说明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位置以及应该在哪里分段”。总统讲话的开头是这样的：“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总统讲完后，派塔利去把讲稿打出来，有大约500字。打完后，她把稿子拿给罗斯福看，罗斯福在“载入史册”上面画了条线，换成了“耻辱”。

白宫记者招待室正常情况下最多能盛二十来个人，但这次却挤进来一百多名记者、摄像师和摄影师。只有六部电话，记者们排着长队等着轮流使用。地板上都是烟蒂，还有一团黑色的电线连着摄像机和话筒。一连串弧光灯让现场的灯光极为刺眼。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

（Alistair Cooke）说，房间“充满了烟味和华盛顿恐慌的气息”。^[81] 格伦·佩里回忆说：“招待室里乱作一团，希尔默·鲍克黑奇（Hilmer Baukhage）、富尔顿·刘易斯（Fulton Lewis）、泰德·温戈（Ted Wingo）和其他播音员都在那里安好了设备，用打字机写发言稿，然后对着话筒读新闻，他们身后的人群也一直在说话和干活。”^[82] 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在下午2时30分已经发布了几条公告。招待室里灯光很强，他脸上的汗水闪闪发光，眼也被灯晃得睁不太开。他承认美国海军遭受的“无疑是重创”。每15分钟至20分钟就有最新消息传来，每次他发布新的消息时，招待室里都突然安静下来，每名记者都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对于这间屋子里的每一名记者而言，那都是他们发布的最重大的新闻。

晚上8点左右，内阁成员开始进入“椭圆形书房”。他们坐的椅子按半圆形排着，面对着总统的桌子。罗斯福就坐在桌子后面。他换了一身有些皱的深色西装，抽着烟。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坐在罗斯福前面的一张奇彭代尔式扶手椅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站在罗斯福一旁，正弯腰跟他低声说话。在场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不是内阁成员，他看上去面色苍白又憔悴。罗斯福的一名海军助理简单跟内阁各部长介绍了一下珍珠港受袭的情况。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来回跑着，说‘他们跟“某某”将军又通了电话。事态比之前报道的还严峻’”。

9点左右，该来的人都已经到齐，罗斯福开始讲话。他说，内阁现在面临的局势是自1861年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珀金斯说罗斯福的面容憔悴而阴沉，从他嘴边的肌肉能看出他紧张且愤怒。他的讲话里没有

了往常的连珠妙语，也没有半分笑意。有些内阁成员，尤其是那些任职部门与国防或外交无关的成员对于夏威夷发生的一切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只能从各处打听到零星的消息，”珀金斯写道，“我们了解的局势十分让人困惑。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日本人的飞机是从哪里飞来的。这位年轻的海军助理说日军飞机是从航母上飞来的，但他也只是猜测而已。”[\[83\]](#)

罗斯福不时接到确认美国战列舰损失程度的电话，有好几次他甚至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他的痛苦给内阁成员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为美国的总司令，无论他对陆军、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怎么看，在骨子里他都是海军的人。这种情结与他的童年有关，当时他十分钦佩的远房亲戚西奥多·罗斯福大力提倡海军建设。他勤勉地阅读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书籍，并且在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读书时，在辩论赛以及期末论文中引用过这些书里的话。他曾学习如何在浓雾笼罩的大海上从缅因州和新不伦瑞克出航，是到当时为止最会开船的美国总统。他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早期海军的印刷品、画作、文件以及模型藏品。在伍德罗·威尔逊的任期中，他担任过七八年的助理海军部长（这是除了美国总统一职外，他任期最长的工作），还直接参与了1917—1918年的海军备战工作。作为总统，他在1938年和1940年签署了重要的海军扩军法案，以打造一支有能力作战而且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同时获胜的海军。“美国海军竟然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我能明显看出罗斯福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很难受，”弗朗西丝·珀金斯回忆说，“罗斯福对于美国海军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美国的战列舰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也没办法行动，只能坐以待毙，被日本的炸弹袭击——这个事实是罗斯福难以接受的。我记得他跟诺克斯说了两次，‘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战列舰成排绑在一起’。诺克斯回答说，‘战列舰就是这样停泊的’。”

罗斯福大声读着之前他口述的那份简短讲稿，内阁成员全神贯注地安静听着；他打算第二天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他读完后，

赫尔和史汀生立刻提出反对意见：总统的演讲有局限性，（用史汀生的话来说）“仅仅表明了美国对于日本突然袭击的正当愤慨，没有完全表达出美国对于日本破坏法律以及入侵行为的不满”。^[84]演讲也没有将德国与这起袭击联系在一起。哈罗德·伊克斯在日记里写道，赫尔“十分坚持己见，到最后罗斯福总统都有点不耐烦了”。^[85]罗斯福很执着：他喜欢这个简短的演讲。他想将美国人民的愤怒力量聚集起来，这样可以团结美国人民，让人们把过去有关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激烈争执抛到身后。罗斯福总统也不想将德国牵扯进来，因为（就像孤立主义支持者肯定会指出来的那样）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和日本人有所勾结。最终罗斯福的草稿以原本的样子被接受了。

大约10点，国会领导人也加入了进来。内阁成员们起身让位，倚墙站着，此时书房里已经非常拥挤了。总统向国会议员们简单介绍了已知的袭击情况。一位国会议员问，日军为何会打得美军措手不及；罗斯福的回答表明他熟知海军战术，他解释说在夜色的掩护下，敌军的航母可以偷偷到达离瓦胡岛几百英里处，不被美军巡逻机发现，并且在黎明前发动空袭。他承认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伤亡到底有多严重，但是他总结说，“今天美国整个西海岸和美洲整个西海岸的主要防御力量已经严重受损”。^[86]

“他的话对国会成员影响很大，”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坐在那里，一片死寂；甚至在总统说完后他们也没有多少话。”^[87]有人问罗斯福总统是否有必要宣战，但是罗斯福没有直接回答，表明他还没想好。（其实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只是不想提前泄露消息。）一些国会议员因美国海军竟然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而气愤不已。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汤姆·康诺利问：“我们的战舰在珍珠港就像温顺的鸭子那样被打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日本人怎么会偷袭成功？我们的巡逻队哪去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不知道，汤姆。我不知道。”^[88]

晚上10时45分，国会议员陆续离开；罗斯福让他们心烦意乱。晚上

他们入睡时，日本、菲律宾以及整个东亚都是白天。“我们上床睡觉时，那边是白天，那里的人在采取行动，说着话，”一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床上待的时间太久了。”^[89]离开白宫时，国会领导人被等在外面门廊的记者截住了。领导人都公开表示将抛开政党成见，团结一心。国会议员约瑟夫·马丁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不存在政党纷争。领土完整和国家荣誉面前只有一个政党。”^[90]

白宫二楼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罗斯福一直在修改他的稿子。大约凌晨一点时，在儿子詹姆斯的劝说下，他才上床休息。^[91]

珍珠港位于华盛顿往西五个时区的地方，此时这里正笼罩在一片黑暗中。细雨落下。司号手吹响了就寝的号声。整个基地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站定听着，向降下的国旗敬礼。宵禁严格执行，任何建筑、船只、汽车都不得亮灯，甚至打手电也不行。但是东湖依然十分明亮，因为“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仍在熊熊燃烧，而且人们正拿着发出耀眼白光的乙炔灯，在“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船体中搜救发出击打声的幸存者。东方夜幕上挂着一轮渐满的月亮，月光足以投下阴影。人们打开探照灯搜寻敌机，照明弹和红色火箭随处可见，曳光弹时不时地在夜空中画出几何形状。

夜色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很快就有谣言传来，而且越传越严重——据说海港中就有日军的潜艇，日军已在巴伯斯角、戴蒙德角（Diamond Head）或是卡内奥赫湾（Kaneohe Bay）登陆，基地内部混入了日本人的间谍和破坏分子。有个持续时间极长的传言直到周一才被击破，该传言称日本人的伞兵部队已经降落在瓦胡岛的山区，那些伞兵穿着蓝色连体服，肩膀上有“太阳旗”的标志。穿着蓝色制服的美国人都脱下了制服，以免被误认为是日本伞兵。在夜晚，人们的想象力更是丰富，稍有风吹草动都被视为有敌情。海军陆战队兵营的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中尉回忆道，他的手下哪怕听到熟悉的声音也会受到惊吓。“一

辆洗衣车从面包房后面的沥青路上隆隆驶过。车上有很多东西而轮子又小，所以听上去就像是机枪的声音。食堂值勤的人把长条凳一端的腿搭在了水泥墩上，就被当成是步枪的声音。收音机短波频道发出的静电噪声，也被当成了机枪的声音。”^[92]

一整个晚上，各处都有人开枪。^[93]但是他们开枪射击的目标可能只是发出了一点噪声的地方，以及一根点燃了的火柴、一支点着的烟或者是远方的车打开的车灯。谨慎的哨兵听到什么动静或者看到什么动作还会喊一声：“不准动！报上名来！走近点，报上名来！”其他哨兵就直接拿枪瞄准并扣动扳机了。有的哨兵向来跟他们换班的同事开枪。“你寸步难行，因为有人会朝你开枪，”当晚被安排收发信息的无线电员瑞安说，“你要穿上白衣服，这样在晚上才能让人看见；你还要吹着《星条旗永不落》的口哨，这样大家才会知道你是美国人。天啊，真是太危险了，当时我差点就被人打中了。”^[94]防空部队的士兵看到天空中有亮光，于是开炮；炮声随即又沉寂了，因为炮手发现他们是在朝天上的星星开炮。许多射击不过是种宣泄，让士兵们的神经放松一下。海军造船厂的油罐区有一大堆钢铁油罐，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石油储备就放在这里。有人在油罐区不小心打开了探照灯，然后就有人喊道：“把灯打灭！”几十件武器同时开火。一篱之隔的西卡姆机场以为受到了敌军的攻击，于是开火反击。^[95]陆军中尉查尔斯·戴维斯回忆说那并不是一场随意的射击，而是“真正的枪战，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弹药”。^[96]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没有伤亡的报道。

“企业号”及其护航舰艇（它们合在一起被称作第8特混舰队，指挥官是海军中将威廉·F. 哈尔西）朝南方搜索了很远，但是一无所获。由于没有发现敌舰，“企业号”的飞机开始往回飞，但是燃油不多了。“企业号”上的大部分飞机都通过搜寻航母长长的尾波找到关闭了灯光的“企业号”，并且安全降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飞行员之前并没有接受过夜间降落的训练）。但是哈尔西命令弗里茨·赫布尔（Fritz Hebel）中尉所率中队的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直接返回福特岛的海军航

空兵基地。

晚上10时45分，这支中队从南方接近了瓦胡岛。赫布尔通过无线电向福特岛塔台发送降落请求，并要求给予降落指示。塔台同意飞机降落，并且明确说明，这6架飞机在接近基地时应该将夜航灯全部打开。显然，地面上每个人都明白，地面的高射炮手都神经紧张（有些还没有经验），很有可能会出现己方火力误击的情况。福特岛塔台向“在场的
所有舰船和防空部门”播放了一条通知，告知他们有6架美国飞机在进场。^[97]该广播还重复了一次——这并不常见，表明塔台十分担心这6架飞机的安全问题——不要开火的消息在防空部队各部门之间传递得很混乱。

这6架野猫式战斗机慢慢接近基地，渐渐降低高度，绿色和红色的夜航灯都打开了，从地面上很容易认出来。“阿尔贡号”的艾伦·屈恩中校明白那是美国的飞机——敌人的飞机怎么会那样低地飞临基地上空，还把夜航灯打开？——但他还是为这些飞机担心，因为那时珍珠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士兵们扣扳机的手总是痒痒。“会不会有人朝飞机开火呢？”他想。^[98]

第一架飞机盘旋最后一圈，对准跑道的时候，离地面大约1 000英尺，就在这时，炮手开始射击。舰队的旗舰“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上的一架高射炮最先开火，随后，几百门高射炮也跟着开火。“那场面就像是独立日一样，每个人都在冲着天空开炮，”“唐斯号”的枪炮军士柯蒂斯·舒尔策说，“他们发射了曳光弹。大部分人用的是轻武器。”^[99]塔台高呼停止射击，但是开火的地方太多了。地上的人们简直欣喜若狂。“上帝啊，”“加利福尼亚号”的船员梅森说，“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还击！……我们瞄准夜航灯，带着残酷的喜悦开火。……敌人那样羞辱我们，现在我们要狠狠还击。”^[100]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想过这些可能是美国自己的飞机。“白天时，只要有东西从头顶飞过我们会开火，我们已经上瘾了，应该是不假思索就射击了。”船员福贝说。^[101]

赫布尔中尉在广播里大喊：“上帝啊，发生了什么事？”^[102]有两架飞机被立即击中，一架坠落在福特岛西面的海峡里，另一架坠落在珍珠城一家名为“棕榈树”的旅馆上。海军少尉埃里克·艾伦成功跳伞，但是在降落过程中还一直被地面的机枪瞄准射击。第四名飞行员詹姆斯·丹尼尔斯突然下降，掠过跑道南头的探照灯，然后又急速左转，朝巴伯斯角飞去。赫布尔的飞机被击中了好几次——他重新拉高，试图在惠勒机场紧急降落，但是飞机滑进了艾亚（Aiea）附近的一片甘蔗地里。他伤势严重，第二天上午牺牲了。另外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跳伞，受了轻伤，但活了下来。只有丹尼尔斯没有受伤，飞机也没有受损。

防空火力太密集了，天空中的曳光弹也太多了，地上的人一度被照得什么也看不见。随着枪炮渐渐停火，炮弹爆炸声逐渐变小，“卡斯托号”的船员卡尔·施米茨回忆道：“天空一片黑暗，10英尺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103]

^[1] 1英尺≈30厘米。——编者注

^[2] Dan Kong account in Richardson and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46.

^[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 20.

^[4] Marine Major Alan Shapley of the *Arizona*, recalling an anonymous shipmate's words,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10.

^[5]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 20.

^[6] Petrie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121.

^[7] Gene White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37.

^[8] Quoted in Bailey and Farber, *The First Strange Place*, p. 2.

^[9] William Duffie Clemons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68.

^[10]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06.

^[11] Leonide (Lee) R. Soucy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6.

^[12] Kenton Nas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280.

^[13] Soucy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7.

^[14] A. L. Seto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83.

- [15] Maxwell R. Urata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50.
- [16] Lawson P. Ramag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98.
- [17] Larry Katz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97.
- [18] Lord, *Day of Infamy*, pp. 139–40.
- [1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24.
- [2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21.
- [21] Martin Matthews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30.
- [22] James Cory account in *ibid.*, p. 18.
- [23] Col. William J. Flood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23.
- [24] Leon Bennett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81.
- [25] Quoted in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39.
- [26] Elphege A. M. Gendreau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67.
- [27]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19.
- [28] CPO Charles A. Russell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77.
- [29] John H. McGora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106.
- [30] Hopkins's notes, Dec. 7, 1941, quoted in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0.
- [31]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2.
- [32]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1.
- [33] Tully, *F. D. R.: My Boss*, p. 255.
- [34] Mrs. Charles S. Hamli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50.
- [35]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3.
- [36] Tully, *F. D. R.: My Boss*, p. 255.
- [37] Stimson diary, Dec. 7, 1941, quoted in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294.
- [38]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3.
- [39] 1美制加仑≈ 3.8升。——编者注
- [40] Cor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p. 19–20.
- [41]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35.
- [42] Ephraim P. Holmes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112.
- [43] Leslie Le Fan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62.

[44] Ed Johann quoted in Van der Vat, *Pearl Harbor: The Day of Infamy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p.106.

[45] Shipfitter 3rd class Louis Grabinski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66.

[46] Victor Kamont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30.

[47] Carl Carlso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99.

[48] Seaman 1st class Nick L.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83.

[49] William W. Fomby account in *ibid.*, p. 46.

[50] 1磅≈ 0.45千克。——编者注

[51] Elmo F. Rash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25.

[52] Howard C. French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278.

[53] James Lawson in Jasper, Delgado, and Adams, *The USS Arizona*, p. 161.

[54] Clemons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70.

[55] Jack Rogo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32.

[56] Thomas H. Moorn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04.

[57] Charles T. Sehe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133.

[58] Lord, *Day of Infamy*, p. 176.

[59] Lorenzo Sherwood Sabi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46.

[6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53.

[61] Lt. Cdr. Layt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04.

[62] Brig. Gen. Howard C. Davidson quoted in *ibid.*, p. 370.

[63] Lt. (jg) Walter J. East quoted in *ibid.*, p. 356.

[64] “Running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Dec. 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

[65] “Running Summary of the Situation,” Dec. 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

[66] *Ibid.*, p. 3.

[67] Moorn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04.

[68] Warren G. Harding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90.

[69]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ibid.*, p. 183.

- [70] Scott Leesberg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67.
- [71] James Erickson, Iris Bancroft, and Pat Vang accounts in *ibid.*, pp. 55, 96, and 85.
- [7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p. 605.
- [73] *Ibid.*, pp. 666–67.
- [74] *Ibid.*, p. 608.
- [75] “Japanese Embassy Burns Papers,”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38.
- [76] 本书有一部分日语人名未查得准确汉字译法，凡加括注者均为音译。——编者注
- [77] Kato, *The Lost War*, pp. 61–62.
- [78] Smith, *Thank You, Mr. President*, p. 116.
- [79]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entry dated Dec. 14, 1941, p. 661.
- [80] Perry, “Dear Bart,” p. 22.
- [81]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8.
- [82] Perry, “Dear Bart,” p. 21.
- [83] Frances Perkin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p. 117–18.
- [84] Stim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87.
- [85]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entry dated Dec. 14, 1941, p. 665.
- [86] FDR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58.
- [87] Stimson’s diary, entry dated Dec. 7, 1941,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88.
- [88]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p. 292–93.
- [89] Morgan, *FDR: A Biography*, p. 618.
- [90] “Congress Decided,” *New York Times*,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22.
- [91] “F.D.R. Asks War Declaration at Joint Session Today,” *Washington Times Herald*, Dec. 8, 1941 in *ibid.*, p. 29.
- [92] Cornelius C. Smith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1.
- [93] Ada M. Olsson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257.
- [94] Joseph Ryan account in Nardo, ed., *Pearl Harbor*, p. 92.
- [9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5.
- [96] Army Lt. Charles W. Davis quoted in *ibid.*, p. 354.

[97] Ibid., p. 359.

[98] Allen G. Quynn quoted in *ibid.*

[99] Curtis Schulze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46.

[100]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41.

[101] Fomb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46.

[10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9.

[103] Carl Schmitz account in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 21.

第二章

那天晚上白宫外建立了新的岗亭，黎明时分到处都是便衣特工和戴着头盔的士兵。总统周一一早就起来了，他只睡了4个小时。他一边浏览报纸上的新闻，一边喝咖啡和吃早餐。在侍从的帮助下，他穿上了深色西装和蓝色的海军斗篷。那天早上8点左右，英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1]丘吉尔在BBC的报道中对英国人民说：“我们能感受到希特勒的疯狂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我们必须连根拔起罪恶之树。”

正午刚过，罗斯福坐着轮椅从白宫的主道里被推出来，而后被抬上他的高级轿车。由十辆车组成的车队，其中包括三辆与总统所乘相同的车，以限速两倍的速度行驶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拿着汤普森冲锋枪的士兵蹲在汽车的踏板上。12时20分，车队于国会大厦的南入口处停下。罗斯福面无表情地下了车。在车里他已经装上了沉重的铁托架，以使他残疾的腿能站起来。在他的儿子、海军陆战队上尉詹姆斯的搀扶下，罗斯福能够走路，只不过走起来有些费劲。罗斯福没有向人群打招呼。

《华盛顿晚星报》形容现场的人群“紧张、肃穆”。^[2]自从内战以来，这座建筑还从未如此戒备森严。据《华盛顿晚星报》报道：“入口处站着海军陆战队员，步枪上了刺刀，国会的警察也全部出动，形成第二道防线。大厦周围的小路拉上了安全网，将那些等着要看总统的人拦在外面。”一个忘记带证件的国会议员试图冲开层层防守闯进去，结果差点被枪打死。

“如猫头鹰般庄重的”内阁成员鱼贯进入众议院，后面跟着全体参议员以及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3]旁听席里挤满了记者、摄影师以及摄像师。中午12时29分，发言人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用小木槌敲

击演讲台并大声喊道：“欢迎美国总统！”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从新闻记者席报道了当时的情形，说罗斯福上台之前的漫长时间里气氛十分紧张。总统一只手挽着儿子，另一只手紧紧扶着倾斜的长扶手，缓缓走上讲台，所有人能清楚地听到他腿上的支架咔嗒作响。直到总统安全走到讲台，大家才开始拍照。他的残疾完全被隐藏起来，但是他的疼痛无法隐藏——拥挤的议院里的每个人都看出来他是竭尽全力支撑着，而且其中的象征性非常明显，谁都不会忽略。库克写道：“在听到他自信的男高音以及观众自发的真诚掌声以前，我们看着他走上去，想起了珍珠港里被摧毁的战列舰。”^[4]

埃莉诺·罗斯福身穿饰有银狐毛皮的黑衣坐在旁听席里，紧挨着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之妻伊迪丝·威尔逊。伊迪丝·威尔逊曾在23年前坐在同一个地方听她的丈夫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埃莉诺这样写道：“如今的美国总统是我的丈夫，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听到总统告诉国会美国应该参战。我极其难过。我还记得‘一战’开始时自己对丈夫和兄弟的担忧，如今我有四个儿子都到了参军的年龄。”^[5]

总统站在讲台上，腿上的支架被固定住，双手扶住演讲台的两边，撑着自己。他戴上眼镜，打开了黑色活页笔记本，而后讲道：“昨天，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耻辱的日子。美国遭到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蓄意突袭。”罗斯福称，这次攻击的时间无疑是在近期美日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时确定下来的，日本政府“以虚假的声明和佯装期盼持久和平的姿态故意欺骗美国”。他详细描述了过去24个小时里日本所发动的攻击——中途岛、威克岛、关岛、菲律宾、香港地区以及马来亚都遭到了袭击。他最后说道：“日本向整个太平洋地区都发动了突袭。昨天的事实无须多言……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来抵御这一蓄谋已久的侵略，美国人都将凭正义的力量彻底胜利。”

根据《华盛顿晚星报》的报道，总统演讲时，国会表现得“庄重又气愤”，有几排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跺脚声，表示赞同。^[6]“毫无疑问我们将取得胜利，所以请上帝帮助我们。”随着总统

说完这句总结词，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并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罗斯福挥手致意，随后再次由他的儿子护送离开演讲台。演讲仅仅持续了五分钟，大多数美国人所记住的，都是那句“一个耻辱的日子”；但这场演讲是有史以来吸引听众最多的一次：收听率显示，听众数达到6000万。演讲稿是罗斯福亲自写的，没有经过任何演讲撰稿人的帮助。剧作家和总统助理罗伯特·舍伍德这样评价罗斯福：“他这一生中恐怕再没有哪个场合像这次一样代表所有人的心声。”^[7]

一小时后，两院通过了美国的宣战书。众议院有一票反对票，参议院全票通过。

当珍珠港迎来新一天的太阳时，罗斯福还在广播中讲话。细雨落在了处于半沉状态且仍在燃烧的“西弗吉尼亚号”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救火船继续用消防水管灭火，大团油腻、恶臭的黑烟不停地翻卷腾空。福特岛上的人跌跌撞撞地到食堂里喝咖啡和吃早餐，“他们双眼浮肿，面容憔悴，胡子拉碴，浑身脏兮兮的”。他们几乎全都整夜未眠，自从前一天早上的攻击过后，许多人更是无心进食。整整一天，他们都极度紧张，受到肾上腺素的刺激，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8]

海军医院是一座美观的灰泥建筑，矗立在海军造船厂港口一侧的棕榈树丛中。从前一天早上起，人手不足的医护人员就在片刻不停地忙着救人。那是一个漫长又可怕的夜晚。轻武器和防空火力没有闲下来过，提醒着医生和护士窗外正有一场大战。外科医生俯身贴着手术台，努力稳住颤抖的手。晚上11点左右，一枚高射炮弹爆炸的冲击波震碎了上层的玻璃，医生、护士、医务兵以及病人在惊恐中齐声尖叫。护士们一直没有休息，但是并未松懈，像机器一样做着该做的工作：端着手术工具托盘，给伤员打针、输液、换绷带。为了遵守灯火管制政策，她们使用罩着蓝色复写纸以减弱光线的手电筒照明。很显然，日本人正在进攻。有人警告过她们日本人对女战俘有多么残忍，所以她们随身携带小刀，

一旦医院被攻陷，她们就割腕自杀。黎明的到来使大家如释重负。护士露丝·埃里克森说：“没人可以想象日光对于我们的意义。我们能够看清外面了，就连空气都变得干净清新了。有种终于熬过来的感觉。物质财富已经毫无意义。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我们曾无数次祈祷，现在很感激自己的祈祷得到了回应。”^[9]

白天到来后，大量伤员继续被运往医院。病房满了，医务兵就把床并到一起，腾出更多的空间。烧伤者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珍珠港周末的标准制服是短裤和短袖衬衫，手臂和双腿的皮肤都暴露在外。目击者形容烧伤人员“烧焦的皮肤像熏肉皮，乌黑并且不断有脓液渗出”。^[10]伤口上用到了各种敷料，有矿物油喷雾剂、磺胺粉、单宁酸以及硼酸。但是在烧伤患者的病房里，除了给他们使用大量麻醉剂之外，能用的治疗手段并不是很多。整个医院里都是烧焦的皮肉的气味，到了夜里，遮光布导致空气难以流通，味道更为浓烈。护士埃里克森多年后回忆道：“我至今还能闻到那种味道，恐怕永远也不会忘记。”^[11]

死者都被装在白色帆布裹尸袋里，移到医院前面的草地上。被宣布死亡的人里其实还有没死的，有目击者惊恐地听到裹尸袋里发出低沉的呻吟声。一位军人的妻子薇薇安·哈尔特格林回忆道：“我走回去想看看，然而理智告诉我：‘他们一定是伤得太重，没法治疗了。他们一定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我还能做什么？’但那一幕我永远忘不了。”^[12]海港里有许多尸体漂浮在水面上，汽艇奉命将他们带到陆地上辨认和埋葬。“田纳西号”的船员杰克·凯利说，起初船员们把尸体拉进船里，“但我们这样做，他们就会皮开肉绽，船底血肉淋漓。所以我们试着在死者的腿上、手臂上或者其他能碰到的部位上绑一根绳子，拴成一长串，将他们直接拖到岸边，而不是拉进船里”。^[13]另一位被分配做这项工作的船员回忆起这一可怕的工作经历时说：“最可怕的是尸体会散开，我们必须停下拖曳，重新把尸体绑牢。”^[14]

前一天的下午，火奴鲁鲁的木料场奉命制作尽可能多的松木棺材，

用货车把这些棺材运到珍珠港。在艾亚的码头上，医务兵戴着橡皮手套制取死者的牙齿印模，以辨别他们的身份。^[15]辨认出来的尸体被放在带有编号的大箱子里，死者的姓名也会得到记录。但是许多尸体和残肢已经无法辨认，他们会被随机装进箱子里。装有棺材的卡车开往瓦胡岛公墓，推土机正在那里挖多条150英尺长的壕沟。必须尽快将死者下葬，因为许多棺材都在往外滴血和石油，搬运棺材的人必须戴上口罩以遮挡臭味。这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曾在公墓工作过几天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勒法恩说：“有一次，一辆平板卡车到了之后突然停下来，一个箱子落下来砸到地上，裂开了。这个箱子里装有一个人的躯干，三只手臂和一条腿。”^[16]袭击后的几周里，不断有葬礼举行。如果死者无法辨认，神父、拉比和牧师有时会一起主持葬礼。仪仗队会奏响葬礼号（也是美军的熄灯号），并给每个坟墓都立一根木桩。报纸上有一张照片展现了袭击后不久举行的一场葬礼，穿着草裙的夏威夷女子一边弹着尤克里里一边唱“送别曲”，而民众和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则低头默哀。

在整个基地里，发现同伴幸存时的喜悦和确认同伴死讯时的悲伤交织在一起。幸存者描述了一系列矛盾的感受。有的人为自己的九死一生和四肢健全感到宽慰。海员西奥多·梅森记得，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行政大楼的澡堂里，许多人用力洗刷身上的油污时，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庆祝仪式。“我的内心充满了狂喜，”他回忆道，“我还活着！浴室中的人们大喊着，大笑着，唱着歌儿。我也加入了他们。”那种奇妙的愉悦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无可抵挡的内疚和羞愧。“跟我同船的人，有多少人非死即伤？”梅森问自己，“你怎么能唱得出来？很多年后，直到我有了其他的战斗经历，我才原谅自己。”^[17]

珍珠港的大多数士兵以及初级军官都很年轻，大都在20岁左右，他们承认对于战争的起因感到困惑。许多人没有看报纸的习惯，最多看看报纸上的连环画和体育版，没怎么关注战前几个月美日关系的恶化。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似乎都很遥远，对于他们的生活以及国内家人朋友的生

活不是特别重要，几乎没人真的把日本当成军事威胁。如今太平洋舰队化为废铜烂铁，无处不在的集体耻辱感笼罩着他们。“家乡的朋友曾向我问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科尼利厄斯·C. 史密斯回忆道，“[我就说]‘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三周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现在，我们毫无防备地遭到突袭，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都沉到了珍珠港东湖的海底。发生这种事，谁会不感到羞愧呢？”^[18]尼克·库瑞塔斯不知以后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人。他问自己：“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该如何解释才好？”^[19]

“亚利桑那号”的命运十分悲惨，许多目击者称“俄克拉何马号”的景象更让人震惊。被一系列空投鱼雷击中后，它向右倾斜，然后几乎垂直翻转，巨大的钢制船体直指天空，船体上部的结构则埋在港口底部的淤泥里。整整三代军官和士兵所接受的教育都是，战列舰是海上堡垒，坚不可摧。而这么一艘战列舰就像浴缸里的玩具船似的翻了，这荒唐到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马里兰号”的枪炮下士乔治·E. 沃勒回忆道：“所有人都告诉我们战列舰是打不沉的，我们却看到了一艘底朝天的战列舰……这太让人心痛了。”^[20]

但是所有的航母都幸存了下来。至少航母躲过了一劫。

袭击发生的那天上午，威廉·F. 哈尔西中将的第8特混舰队——“企业号”及其随行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出海了，所以躲过了袭击。他们原本应该在周日早上回到珍珠港，但是周六下午，一艘驱逐舰在瓦胡岛西北部落下一根缆绳，缠在了“北安普敦号”巡洋舰的螺旋桨轴上。这是一种常见的事故，经常困扰海上近距离作业的船只。船员往往会相互指责和埋怨，还会吐一连串脏话。当潜水员努力解开缠绕在螺旋桨上的烦人的缆绳时，整个特混舰队都停滞不前。第二天上午，空袭的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来后，这些军舰徒劳地向南搜索了数百英里，因此躲过了向北撤的日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的航母。如果哈尔西是向北追击的，他的两艘航母就会落入南云忠一率领的六艘航母的打击范围中。在战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久经沙场的日本飞行员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将“企业

号”和“列克星敦号”击沉。

周一傍晚，七艘驱逐舰排成一列，跟在“企业号”后面静悄悄地沿着长长的外航道进入了珍珠港。^[21]“企业号”从严重受损的“内华达号”战列舰的尾部慢慢绕了过去。“内华达号”在海峡的西边搁浅，船头扎进了一片角豆树林中。^[22]光线越来越暗，但对于站在航母的舰桥和飞行甲板上，以及舷边通道里的船员来说，眼前的场景足以让他们清楚自己不在时这里发生的事情了：福特岛上的机库和水上飞机成了烧焦的残骸；空气中弥散着燃烧的石油味和烧焦的油漆味；战舰半沉入海，火还在烧；巨大的烟柱依然直冲云霄。^[23]“企业号”上的一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前一天晚上被自己人误伤击落，现在它正躺在海峡附近的浅滩中，被海浪冲刷。经过10—10码头时，他们看到“奥格拉拉号”扫雷舰的残骸半沉在水中；三枚原本显然是给“企业号”准备的日本鱼雷击中了“奥格拉拉号”扫雷舰。港口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黑油，船从上面驶过，几乎激不起什么浪花。一名船员回忆说：“船只是让水面稍稍漾起波纹，微浪立刻回落下去，消失在覆盖海面的巨大油层中。”^[24]基地几乎一片黑暗、一片死寂，因为在开战后的第二个晚上，基地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但是，当“企业号”慢慢驶过被击沉的战列舰时，有一些人尖酸地向“企业号”上目瞪口呆的船员们大喊“打仗时**你们**在哪儿？”，“你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否则日本人也会收拾你们的”。^[25]

军械员阿尔文·柯南从飞行甲板上看到下面的杀戮场景，后来回忆说：“那场袭击用一种残忍的方式宣布战列舰的时代成了历史。”“企业号”和其他十几艘航空母舰无意中成了海战的先锋。对于那些在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舰队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这种前景让他们觉得很沉重，但是现在海战只能通过航母进行，因为“没别的可用”。^[26]哈尔西中将在“企业号”的司令舰桥上咬牙切齿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人听到他从牙缝里挤出这样的话：“在跟日本人了结这一切之前，日语只能在地狱里出现。”^[27]无论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恶念，对于复仇的迫切渴

望都会滋养和维持它们。

航母刚在福特岛停好，哈尔西就坐上小艇，到海湾另一边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去见金梅尔上将。[\[28\]](#)小艇驶向海军造船厂的码头时受到了枪击，还好夜色已深，哈尔西没有被击中。哈尔西发现金梅尔和参谋面色憔悴、胡子拉碴，穿着星期天就穿在身上的布满血渍、泥土和油污的皱巴巴的白色军装。哈尔西和金梅尔交谈时，不着边际的新流言在司令部中传开了。其中有传言称，有人看到日本军队乘滑翔机登陆。这一传言让哈尔西笑了起来。“有什么好笑的？”金梅尔质问道。哈尔西说这个传言很明显是骗人的：日本的基地离这里很远，日军滑翔机飞不过来；日军也不会浪费航母上的空间装载“这类没用的玩意儿”。他的推断无懈可击。作为航母的司令，哈尔西凭直觉意识到了金梅尔当时只是猜测的事情：日军早已离去，人们是因为太过惊慌失措才报告称日军还在与美军交战。前一天上午日军航母实施的是打完就撤的突袭，现在敌军早已朝日本撤退了。[\[29\]](#)

“企业号”停泊时，人们从等在那里的一艘油轮上拉出几条油管，插入“企业号”的油箱中加油。加油和补给的过程都很快，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人都想在第一道晨光出现前安全返回大海。船员们排成长长的一排，穿过机库甲板，沿舷梯来到弹药库和厨房中，数百双手传递着弹药和食物，为“企业号”进行补给。有新船员上船报到，其中许多人只带了身后背着的制服，因为他们的水手袋随着战列舰沉入了海底。到凌晨4点钟，“企业号”已经加满了油，也储备了足够的弹药和给养。哈尔西中将登上了船，什么仪式也没搞。“企业号”的机库甲板上满是补给品，还没来得及有序地运到船下的仓库中储存起来。这不是海军的作风，但是此刻必须争分夺秒，因为天就快亮了。[\[30\]](#)

“企业号”解下缆绳，按原路返回，驶过遍体鳞伤的战列舰、霍斯皮特尔角、水上飞机基地，然后稍微向右调整航向，朝搁浅的“内华达号”驶去，从那里前往公海。阿尔文·柯南回忆说，驶出满目疮痍的珍珠港后，“企业号”“沿着海峡南下，穿过防鱼雷网，进入大海，然后破浪

前行。太阳升起来，珍珠港的油污味、油漆的烧灼味、尸体和战败的场面被抛到了身后。后来舰载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战争开始了”。^[31]

在华盛顿，第一次战争动员在混乱中开始了。阿利斯泰尔·库克想起了轻歌曼舞年代的一部默片：“正在休息的消防队员们喝着啤酒，玩着皮纳克尔纸牌游戏，在融洽的气氛中消磨着无人打扰的时光，但警铃一响，他们立刻兴奋起来，滑下滑竿，骄傲地迈着沉稳的步子，走在城里的每一个地方。”^[32]卡车运来的一队队士兵占据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在周一和周二都引发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公共建筑的屋顶上都紧急设置了机枪或部署了防空部队。此时是12月，下午稍晚一些天就黑了。为了防止日本空袭，华盛顿的街灯和以往国会大厦穹顶上亮起的灯现在都熄灭了。民防人员让汽车停下，向骑摩托车的人和行人脸上照手电筒，问一些无礼、愚蠢的问题。华盛顿广场的四棵樱花树被一些狂热的爱国分子砍倒了，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树是日本政府馈赠的。到处都能感觉到明显的恐惧和混乱。市中心的一座大楼着火了，当消防车的警笛响起时，住户以为日本的敌机就在上空盘旋。全美国的所有社区中，人们都在惊慌失措地囤货，因为大家害怕以后会实施配给制或者出现食物短缺，所以现在要大量囤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到12月8日晚上，”记者戴维·布林克利在描述华盛顿时说，“超市就像被大风吹过一样，空无一物。”^[33]

1917年时华盛顿的政府员工只有3.8万名，但到了1941年12月，人员增加到了25万；而在整个二战期间，政府的员工数量还要增加一倍多。^[34]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美国所有的陆军士兵归队，总人数达到了160万。海军迅速决定对珍珠港进行增援，并且采用了新的空中侦察模式以应对日军新一轮的空袭。在全美国的城市中，警察都要24小时当值，保证防御设施、大桥和供水系统不被破坏。全美国的港口都禁止任何外国船只通行。无线电广播终止了所有的天气预报节目，因为这可能会向敌人提供有用的天气信息，让他们借此选择空袭的目标。工会领导人叫停了全国12.5万名焊工的罢工行动，原因是“太平洋的局

势”。[\[35\]](#)

现在回过头来看，战争初期人们的那种恐惧很难再现，当时没人觉得美国本土不会遭受日军空袭。周一的广播和报纸都是关于美国城市被空袭的报道。美联社的自动收报机报道说在长岛的蒙托克角（Montauk Point）发现了一架陌生的飞机，于是曼哈顿的街头响起了空袭警报。

《布鲁克林鹰报》报道称：“敌机逼近长岛——一些来自新英格兰，另一些来自弗吉尼亚海岸。很显然，轰炸机正飞向布鲁克林的海军造船厂、米切尔机场和其他地点。……空袭的警报声不绝于耳。学校停课。雇员停工回家。警察警告行人远离拥挤的街道。”[\[36\]](#)在西海岸，人们在车里塞满短枪和猎枪，冲向沙滩，想要与日军的登陆部队决战。在旧金山，街上和桥上的灯都熄灭了，但是山上仍旧灯火通明，跟12月6日之前一样。夜间空袭的警报响个不停，轮船也跟着响喇叭；最后，听上去好像是轮船的喇叭声先响起来，然后是空袭的警报声回应。如果有人开车灯，就会有治安员用棒球棍把车灯打碎；如果有商铺或者民宅不遵守灯火管制命令，他们就威胁要砸碎它们的窗户。

有很多报道称日本飞机正在距离美国海岸大约100英里的地方巡逻。周一晚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甚至发布自称确切的消息，称60架日本飞机出现在金门大桥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退。[\[37\]](#)有人问威廉·瑞安将军，怎么知道那些是日本飞机，他回答说：“呃，因为那不是陆航队的飞机，也不是海军的飞机，而且肯定不是民用飞机。”周二，有人怀疑海港上空根本就没有日本的飞机（后来这种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对此，约翰·德威特中将生气地回复道：

死亡和毁灭随时可能降临在这个城市。旧金山的人似乎到现在都无法认识到，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战争状态。……那些飞机肯定在我们的社区上空，已经盘旋了一段时间。那就是敌机。我是说日本人的飞机。海上已经在追踪它们了。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没有向我们投掷炸弹。

德威特将军说到这里其实就可以闭嘴了，但是他似乎非说下去不可：

日本人就應該扔下几颗炸弹，炸醒这座城市，这样更好。我们还没经历过真正的危机。只有当我们相信袭击就在眼前时，我们才会警惕。……如果我这番话依然没办法让你们接受事实，那么我就让警察把你们抓起来，用棍子打你们，让你们接受事实。

美国人通过广播和报纸了解时局，但是他们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中有很多是谣言。广播和报纸忠实且恭敬地引用军方和政客的话，但是混乱、恐慌和无序似乎越来越严重了。夏威夷的媒体不再接受军方的审查，这使得谣言愈演愈烈。日本已经控制了加利福尼亚州，加利福尼亚州毫无招架之力；陆军准备在落基山脉或者是密西西比河东岸与入侵的日军开战。12月9日，周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海军部向国会领导人做了简报。简报的内容严格保密，但是等在宪法街的记者们一看到国会议员们阴沉的脸，就能推断出事情很糟糕。“国会大厦的氛围几近集体癫狂。”记者马奎斯·蔡尔斯写道。在城市里，美军在珍珠港遭受重大损失这个事实已经不再是秘密。“到了晚上，每个参议员都跟十个人说了这件事，那十个人又告诉另外十个人，消息就这样原原本本地传开了。”[\[38\]](#)

此刻，单纯考虑某一党派利益的做法变得不受欢迎。两党的国会领导人在危机面前誓言要团结一心。但是，这对于海军来说喜忧参半。战列舰耗资巨大，花费多年才建造起来，备受海军珍惜；但是有些人却让战列舰在美国的太平洋大本营中遭到突袭，折戟沉沙，对此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致进行了鞭挞。这个问题谁应该负责呢？周一，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呼吁进行调查，说海军肯定极其无能。媒体也愤怒地呼应他，要求海军给个说法。周二，国会宣布进行正式的问询。很显然，领导者要接受处分。到了周三，要处分的人中似乎也包括了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周，诺克斯进行

了一场媒体宣传，跟美国人民保证海军对日军毫不畏惧。诺克斯那场发布会的时机真是太不凑巧了。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星期之前，他接受了《科利尔》（*Collier's*）杂志的采访，访谈文章的标题不巧命名为《海军严阵以待》。他预言说，如果美日开战，海军不到半年就可以“让日本人在大海上消失”。^[39]诺克斯还接受了《美国杂志》的采访，该杂志的1月刊在报摊发售的那天正好是日本人的炸弹袭击“战列舰大街”的同一天。袭击后第二天，诺克斯的访谈还在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

美国海军配备了敌人不知道的新型秘密武器，威力极强（日本发现时已经晚了）——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悍、最有打击性、命中率最高的海军，已经做好准备为入侵者“送终”了……让他们来吧，他们愿意的话两侧夹击也可以——“我们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战无不胜！”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美国杂志》1月刊上表示，“出海吧！”^[40]

颜面尽失的海军部长诺克斯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周没有在华盛顿露面，他正乘飞机前往珍珠港，亲自评估这场灾难。

为了缓解似乎席卷全美的集体恐慌气氛，白宫宣布罗斯福将在第二十次“炉边谈话”^[41]中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播报消息。为总统写演讲稿的舍伍德和萨姆·罗森曼从周日晚上就开始专心写稿子，写好后不停地修改，直到周二晚上10点钟总统广播之前还在改稿。^[42]这期谈话有6000多万名美国民众收听，和前一天收听国会“耻辱日”演讲的听众一样多。

罗斯福总统是公认的广播大师，他从20世纪20年代就使用广播来帮助自己发展事业、实施计划、打击对手。他那浑厚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广播中效果很好。对于节奏、停顿和重音，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最重要的是，他讲话技巧高明，平易近人，没有显露自己哈得孙河河谷上流社会的出身。他没有努力去掩饰声音中上层阶级的那种音调变化，

可能他知道如果试图掩饰的话人们就会认为他是个骗子；但是他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温暖且直率，又不让人感觉他屈尊俯就或者不真诚。他的语调悠闲、随意，在听众脑海中营造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切感。人们经常说，美国人喜欢罗斯福是因为大家感觉罗斯福就像是他们的邻居或者朋友。这一点感触最深的是美国的中老年人，对于他们来说广播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他们直到成年才听到广播，不像他们的儿孙那样，从小就听，并且觉得广播是生活中理所应当的东西。当总统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时，他们很容易有这样一种下意识的感觉——罗斯福真的就在身边，罗斯福的声音和他本人就在他们的客厅里，他不仅仅是在讲话，而且是在与他们交谈。

周二晚上的广播是在白宫一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播出的。广播技术人员把麦克风放在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一盏阅读灯、一个烟灰缸、一罐水和一个杯子。五六十个人成排坐在木制折叠椅上。9时50分左右，总统被推进房间，坐在桌子后面。他打开活页笔记本，翻动着演讲稿；抽了口烟，然后又把烟捻灭。10点钟，播报员们纷纷通过麦克风做开场白，请罗斯福总统讲话。罗斯福开口了：“美国同胞们，你们好。”

当晚的演讲和罗斯福之前的演讲一样激昂，他猛烈地抨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政体。他说：“日本对美国进行的可耻突袭是十年来国际上最大的丑闻。”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日本和其他轴心国是一群强盗，正直的、遵守法律的国家必须制止它们。“强大的、资源丰富的流氓们联手向整个人类开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打击狡猾、强大的强盗。……在一个被强盗统治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个人都毫无安全可言。”他将这场战争定义为捍卫“我们与其他国家自由、有尊严、在世界上生存下去而无须担心受到侵害的权利”。军需的生产应该大量增加，所有军工部门都应该一周七天加紧生产，来增加美国和盟军的军事力量。他说他知道美国人民和媒体想要了解太平洋的战事，但他坚持说暂时还不能把实情和盘托出，因为不能让敌人知道。提到珍珠港，他承认日军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但是没有再说别的。关岛、威克岛和中途岛正在遭受袭击，可能会沦陷；菲律宾人正在“遭受严重打击，但是他

们在积极抵抗”。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在战争时不公开信息是一种折磨；但是他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听信传言——“声称我们溃败的丑恶传言在战时会越传越多且越传越快”——他还要求媒体克制，不要刊登未经证实的报道。

他没有否认日本的偷袭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敌人狡猾地骗过了我们，时机把握完美，战术运用卓越。这是彻头彻尾的可耻行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纳粹分子发动的现代战争就是肮脏的事情。我们不喜欢战争，我们不想陷入战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被拉下水，所以必须不遗余力地参战。”^[43]

罗斯福总统讲完后被推回“椭圆形书房”，萨姆·罗森曼进去看他。他发现罗斯福只身一人在桌子后面抽着烟，端详着他钟爱的邮票藏品。在可怕的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罗斯福就发表了那样成功的演讲，然后又返回办公室研究他的集邮——世上能有这样气魄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他很平静，似乎内心很满足。他要把头脑里一天的工作清空，睡个好觉，第二天神清气爽地醒来。“这时他已经知道日本在珍珠港给美国造成的所有损失，”罗森曼写道，“但我看着他时，我感觉他坚信美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44]

对于要揪出应该为珍珠港事件负责的一干人等这样的批评声音，罗斯福闪烁其词地回答说：“面对趁着夜色偷袭，而且不宣而战的入侵者，防御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万无一失。”^[45]但是，这种说法不适用于夏威夷以西的盟军指挥官们，因为对于当天晚些时候日军发动的袭击，他们未能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抵抗。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西太平洋海岸刚刚迎来黎明时，日本海军的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整个地区的美国和英国基地发起了精心设计的空中闪电战，到战争的第三天，当地盟军的空中力量已经被彻底击垮。这一失败的后果，比珍珠港的失败还要严重，因为这直接导致了菲律宾和马来半岛的沦陷。有人

不愿意承认过去低估了日本，说珍珠港事件是日本走运，是“冷不防的一次成功”，不会再有下次了；但是第二次的失败证明那些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12月7日黎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则是12月8日），中型的G3M和G4M轰炸机，以及灵活的日本单座战斗机A6M零式舰载机从台湾岛的机场起飞，飞越南海，将美军位于菲律宾的航空基地炸成一片废墟。另一些飞机从法属印度支那新建的机场起飞，攻击了位于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国航空基地。还有更多的飞机从遥远的马绍尔群岛环礁起飞，袭击了北边的威克岛。以“龙骧号”为首的一支小型航母特混舰队从帕劳驶出，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南岸的黎牙实比实施了打击，然后往南掉头，攻击了位于棉兰老岛上的美国达沃海军基地。[46]

美国远东指挥官道格拉斯·A. 麦克阿瑟上将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就收到了警报，但是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他位于马尼拉的司令部陷入了一片混乱，结果让日本最初的空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后来，人们的主要指责对象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将军，他似乎一心想把麦克阿瑟的下属都支开，不让他们见到总司令，结果，美国的航空队因为接不到命令被日本彻底击垮。在正午，日本的轰炸机突然出现在克拉克机场（美国在菲律宾的主要航空基地，位于马尼拉西北方大约40英里）上空，从1.8万英尺的高空投掷了大量炸弹。从地面上看，那些炸弹就像是从飞机后面掉下来的一大批沿斜线均匀分布的银色闪光体。那些闪光体变得越来越大，地面上的美国士兵开始到掩蔽处躲避。整个航空基地的中心位置发生了一系列猛烈的爆炸，波及了飞机库、修理厂和停着的飞机。日军投掷的每一颗炸弹都落在基地之内，附近的每一座建筑都在劫难逃。一位美国飞行员在往下看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跑道，因为“整个地区都是浓烟、尘土和火焰。在中间位置，红色的火焰不时翻腾着，冒出的油腻浓烟形成了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47]

轰炸机刚刚过去，零式战斗机就从屋顶的高度轰鸣而来。它们保持着三机密集队形，不断射击停在跑道上的飞机。那天在克拉克机场停着

的美国飞机再也没能飞起来。战争第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保卫菲律宾的航空力量被击垮了一半。12架B-17和30架P-40被完全摧毁，还有5架B-17受损。[\[48\]](#)最初的这一灾难过后必然还会有更惨烈的失败，因为美国已经无法对日本的航空基地发起还击，也没有任何可用的战斗机去抵抗必然会紧接而至的日本空袭。

麦克阿瑟在那天究竟为何会处置失当，直至今天仍是个谜。可能他不愿意从菲律宾境内向日本发动袭击，他希望这样日本就会放过菲律宾诸岛。[\[49\]](#)他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败，和珍珠港的军官们的失败一样可耻，一样是原本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却逃脱了审查和责备，不仅如此，他还深受美国人民爱戴，被他们视为战争英雄和太平洋战争中盟军方面的名将。

在马来亚，英国皇家空军的防御也未能奏效。战争第一天上午，日军就在马来亚东北海岸的哥打巴鲁（Kota Bahru）登陆，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与日本的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结果是日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皇家空军的好几架布里斯托尔“布伦海姆”轰炸机和洛克希德“哈得孙”侦察机被击中起火坠毁。同时，日军的G3M轰炸机从600多英里外的法属印度支那基地飞来，突然出现在新加坡上空，向皇家空军的飞机跑道和基地设施投掷了大量的炸弹。日本的空袭太突然了，英国从未想过日本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发起空袭。哥打巴鲁的皇家空军机场陷入了一片恐慌，士兵们无视上级的威胁和咒骂，匆忙逃到山区；食物、燃料、武器以及马来亚北部最精良的飞机跑道都落入日本人手中。

皇家空军太过信任布鲁斯特F2A“水牛”战斗机，这是一款从美国购买的过时的战斗机。一名厌恶F2A战斗机的飞行员说，这款飞机看上去“很像20世纪30年代的比赛飞机：单引擎，桶状机身，机翼粗短，有很大的座舱罩，机尾极短”。[\[50\]](#)功率不足的F2A战斗机因为燃料输送问题，爬升能力有限；它的起落架也有问题，经常在降落时造成机身严重损坏；0.50英寸机枪很容易堵塞，尤其是在热带潮湿的天气下。[\[51\]](#)

在菲律宾和马来亚，日本的突袭迫使盟军的航空力量在尚未做好准备的状态下匆匆应战，这进一步加剧了非战斗损失。几十架美国和英国飞机由于引擎问题、飞行事故以及在半空中与自己中队的飞机相撞等坠毁。有的飞机想飞回基地，却被友军的防空火力击落；有的因为缺油进行了迫降；有的好不容易安全降落，却因为损伤严重不得不拆解。对于日军来说，坠毁一架盟军飞机就和击毁它一样好——也许还要更好一点，因为飞机坠毁的话日军就省下了弹药。如果飞行员也一同坠机身亡就更好了。

在战争之前的几年里，美国和英国坚信日本的航空部队根本构不成威胁。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们”提出了胡吹乱说的伪科学理论，助长了这种错觉。这些权威人士耐心地解释说，日本只会培养拙劣的飞行员，因为日本人有生理上的缺陷。他们是斗鸡眼而且近视，这很可能是他们“斜眼”造成的。日本人小时候被母亲背在背上，头部摇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耳的平衡。^[52]日本的文化习俗强调一致和顺从，因此，年轻的日本人没有飞行员应该具备的个性和自信心。^[53]西方的航空业记者引用（来源可疑的）数据来证明日本的飞机坠毁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他们承认日本发展了自给自足的飞机制造业，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们丝毫不相信日本人自己建造的飞机有任何的优势。

1941年12月，在经历了巨大的损失后，盟军才开始慢慢觉醒：他们看到的只是日本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孙子》中提到，对待敌人要“卑而骄之”。

其实，日本的海军飞行员的技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他们经由严格的测试选拔出来，又经过了漫长、密集的训练才获得飞行资格。总体上讲，他们的经验要远超盟军的飞行员。从1937年开始，许多日本飞行员在中国执行了100多次空中战斗任务，在座舱中平均参与了500小时至600小时的战斗。^[54]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迫切地想要纠正西方对于他们的误解。他们足智多谋且灵活多变，配合得也特别好，还会毫不留情地打击目标。

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是空战中的王牌，盟军派出的每一种战斗机都不如它旋转快、爬得高、操作灵活。A6M装备了两挺7.7毫米的机枪

（装有射击协调器，子弹可以从螺旋桨的叶片之间穿过），还有两挺从瑞士武器制造商厄利康（Oerlikon）购买的杀伤力极强、装在机翼上的20毫米机关炮。零式飞机的转弯半径小，所以它可以跟在盟军的任何战斗机后面射击，甚至可以翻转过来，从上面精准、快速地干掉敌人。在相对低速、低空的缠斗中，A6M表现十分突出。飞机的驾驶杆稍微用力就会有响应，对此日本飞行员赞不绝口。“控制它就像做梦一样，”参加了第一轮袭击菲律宾行动的飞行员坂井三郎说，“手腕只要轻轻一动，飞机就飞过去了！我进行了各种特技飞行，让飞机爬高、俯冲、侧飞等等。”^[55]凡是使用经典空战技巧攻击零式战斗机，即希望通过机动在尾部追击的盟军飞行员，都被击中坠机，最后只能弃机跳伞。有些飞行员幸运地逃到云层中，或者乘降落伞着陆，他们无不惊慌地咒骂这种神秘战斗机的恐怖性能。

零式战斗机是在1940年夏投入使用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足足服役了一年半的时间。这种飞机从位于台湾岛和中国大陆沿岸的基地起飞，为轰炸机护航，前往中国的中部地区执行远距离任务。按那个年代的标准来看，零式战斗机的航程十分突出。通过控制燃料混合物和推进器的速度，日本的这种单座飞机加满油可以飞行1 000多英里。飞行员们习惯了这样繁重的任务，有时他们甚至设定好让飞机保持水平飞行，然后在机舱里打盹。零式战斗机在1940年和1941年大败国民党的战机，在中国的空战中被击落的零式战斗机数量极少。

这种致命的飞机引起了陈纳德将军的注意。陈纳德是自愿援华的美国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飞虎队中的一位成员在1941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称，陈纳德教过P-40的飞行员如何与零式战斗机作战。他提出的技巧与后来海军飞行员领悟到的一样——从高空俯冲，和僚机驾驶员密切配合，让对方躲不开子弹，还有“绝对不要与零式战斗机缠斗，尤其是在双方不断盘旋转圈的战斗中。攻击后马上躲开。攻击，然后躲开，

俯冲，然后再拉高。当然，还要一直保持小组作战，至少要两架飞机在一起。一旦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那就在空中搜寻其他可以加入的同伴”。^[56]但是陈纳德的情报被华盛顿忽视了。美国人不愿意相信日本能够建造出每分钟可以爬升3 000英尺的飞机。于是乎，珍珠港事件前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零式战斗机对盟军的航空队来说都是完全未知的事物，美国和英国的飞行员被迫以一种惨烈的方式领教零式战斗机的致命攻击。面对日本的多种威胁时，西方总是嗤之以鼻；对待零式战斗机的态度是西方致命的自大的又一个实例。在太平洋战争最开始的几个月，这种态度使西方损失了数百架飞机和数百名空勤人员。

12月10日，星期三，50多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飞过南海，未受阻碍便来到马尼拉湾上空2万英尺的地方。此时无论做什么都阻止不了它们了——几架P-40想在吕宋岛北部海岸拦截它们，却被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击退，而美国海军的3英寸高射炮甚至打不到那个高度。轰炸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或者袭击，在高空俯视着下面密布的目标，“就像是一群老练的秃鹫打量着猎物”，一位目击者这样回忆道。^[57]日本的飞机很明显瞄准了马尼拉水域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以及美国设于甲米地的海军基地，这是美国海军在珍珠港以西的主要基地。日机投下了炸弹，整个甲米地基地的核心地带被夷为平地，维修厂、仓库、机械库、兵营和供电站都变成了废墟。几艘驳船和拖船在泊位上被炸毁，“海狮号”潜艇彻底报废。大火蔓延，失去控制。大风吹过海湾，火势越来越大；由于很多消防设施也被炸毁了，所以消防员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鱼雷艇的艇长约翰·巴克利上尉惊呆了。他说：“日本人把这里夷为了平地，只能这样来形容。除了珍珠港以外，这里是美国在东方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结果被彻底毁掉了。”^[58]

美国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托马斯·C. 哈特上将从舰队司令部的楼顶看到了这一场面。他有何反应，历史没有记载。他可能事先就有不祥的预感，知道美军的空中防御支撑不住，因此他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

在战争开始之前，他把大部分船派往了南部。现在他的主要基地连同所有辅助设施和弹药都变成了地面上一个浓烟滚滚的大洞。这里所受的最大破坏也许是损失了230颗鱼雷。事已至此，哈特只能担起可怕的责任，抛弃菲律宾，将美国亚洲舰队所有剩下的舰艇都派往南部，在那里它们可能会与英国和荷兰的舰艇会合，一起守卫荷属东印度群岛。

战争开始一周前，丘吉尔首相不顾将军们的建议，把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派往了新加坡，他希望这样可以威慑日本，让他们打消侵犯英国殖民地的念头。这支队伍被称为“Z舰队”，其中两艘核心军舰是“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它们是英国最精良、最有名的军舰。但是这两艘军舰的命运比珍珠港中的美国战舰还要惨烈，标志着海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地时间12月8日，就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几个小时，汤姆·菲利普斯上将命舰队到公海上去拦截并摧毁出现在南海地区的日军入侵舰队。英国在这个战区没有航母，而英国皇家空军已经乱作一团，所以这支舰队只得在没有飞机护航的情况下航行。菲利普斯知道这样会有很大的危险，但是他希望这一行动可以“快速结束，赶在日军向我们发起大规模攻击之前向东撤退”。[\[59\]](#)

从一开始，Z舰队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们甚至难以确定日本舰队的位置。他们朝西北驶进暹罗湾，往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的日本滩头堡航行，然后接到错误的情报，以为日军在海岸线南部的关丹登陆了，故而掉转航向。

虽然没有空军的护卫，但英国战列舰的军官和船员们很乐观。无论马来亚北部的空战结果如何，他们都充满了自信，认为日本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最佳战舰相匹敌。“反击号”的船员伯特·温回忆说，船员“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我们花多长时间就可以击沉在新加坡海岸线附近碰到的日本战列舰。我仍然记得，当时整艘战列舰上的人都有一种绝对

的自信.....认为只要与敌人接触，结果就是不言而喻的”。^[60] 12月9日下午，英国的巡逻机发现了日本的水面部队，“反击号”信号桥楼甲板上的一位军官对CBS记者塞西尔·布朗（“反击号”上的媒体观察员）说：“哦，但那些是日本人。没什么好担心的。”^[61]

当晚在军官们的餐厅里吃饭的时候，布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考虑到珍珠港发生的一切，英国人是不是太自信了？英国军官们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一位军官承认，低估对手是“错误”的。但是另一位军官道出了大部分军官的看法：“我们并不是过于自信，我们只是认为敌人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花了五年时间还没打败中国，再看看他们在这里是怎么做的：满地图跳来跳去，而不是集中攻击一两个地方。这么做表明他们不是太聪明。”^[62]

12月10日周三，上午11点刚过，日军就开始攻击Z舰队。Z舰队受到了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双引擎G3M“内尔”和G4M“贝蒂”轰炸机的三轮袭击，该小队的基地位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西贡附近。日军的飞机是跨越南海而来的，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大约5个小时，快到航程的极限了，再远就回不去了。英军瞭望员在西方地平线处发现了一群不祥的黑点，号手吹起号角，召集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G3M轰炸机在1.2万英尺的高度进入高射炮射程后，炮手向上开炮，天空布满了黑色的防空炮弹炸开的烟雾。日军的轰炸机依然保持着紧密的队形，向下投掷了数颗250千克的炸弹。“反击号”急速转弯扭动，突然右转舵，然后再左转舵；它躲过了几乎所有的炸弹，但还是有一颗炸弹击中了水上飞机的甲板，炸死了20多人，不过船只的机动性和防御能力未受损。

大约20分钟后，Z舰队的雷达探测到西面飞来9架挂载了鱼雷的G3M。飞机飞得很低，几乎贴着海浪，直奔英军旗舰“威尔士亲王号”。这些飞机两三架一组，俯冲至不到100英尺的高度，从船的两侧发射了鱼雷。“威尔士亲王号”的船尾被击中了两次，船舵被卡住，轮机舱也被淹。受到重创的巨舰无助地转着圈，船上燃起了大火，浓烟直冲云霄。

鹿屋航空队的挂载了鱼雷的G4M发起了第三次袭击，朝“反击号”俯冲过去。躲过第一轮袭击的“反击号”竭力机动，成功躲过了日军将近20颗鱼雷，但是最后它被左右夹击，几颗鱼雷同时击中船首两侧。“对我来说，”信号桥楼甲板上的目击者塞西尔·布朗在笔记本上写道，“整个画面就像一场混乱无序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4英寸大炮喷出橘红色的火焰，舰炮和维克斯机关炮喷出白色的曳光弹，敌人的灰色飞机近在咫尺，就像蓝色纸板上钉着的蝴蝶标本。”^[63]“反击号”被击中了两次（也可能多达四次），立即开始进水。“突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一名船员回忆道，“我立刻意识到‘反击号’不行了，因为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它就剧烈地向左倾斜，进水太快了，不管在另一侧怎么灌水也无法扶正它。”^[64]舰长下令弃船，大喊着：“你们已经尽力了，现在赶快逃命吧。”^[65]

船员们只得跳入海中，许多人在海里溺亡，另外一些则踩着水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脸上沾满了油污。中午12时23分，“反击号”倾覆了。船尾先沉下去，巨大的船体从海中笔直地伸出来，船头直指天际。几艘驱逐舰小心地在旁绕行，打捞幸存者。

“反击号”被击沉后，日本新一批轰炸机开始执行一项较为简单的任务：击沉已经受到重创的“威尔士亲王号”。中午12时44分，“威尔士亲王号”烟囱之间的地方被G4M轰炸机从高空投掷的一颗500千克的炸弹击中，立即开始下沉。当船只倾覆并开始下沉时，下层甲板里的很多士兵被困在内。驱逐舰绕着“威尔士亲王号”航行，尽力搜救落入大海的士兵。空中的一架日本飞机的飞行员用清晰的英语得意地讥讽说：“现在我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可以继续了。”^[66]

几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在“威尔士亲王号”下沉时刚好赶到，但是它们除了在上空盘旋旁观，什么也做不了。一名飞行员回忆士兵困于海中的场景时说：“一小时后，由于燃料不足，我只能离开；但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我看到很多人竟然在那极其危险的处境中挥手、欢呼和开玩笑，好像他们是布赖顿的度假客，在朝低飞的飞机致意。这让我很受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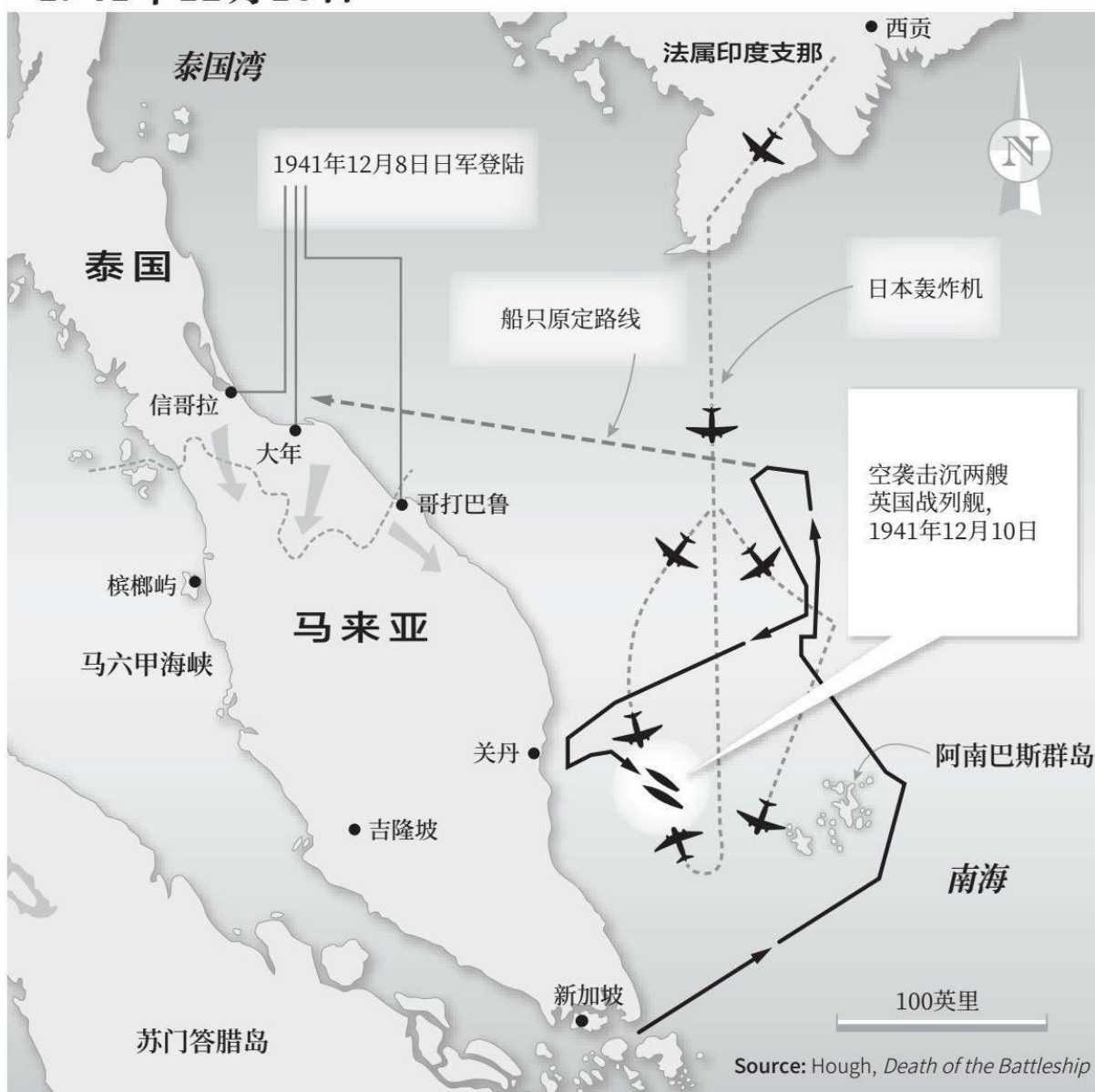
动，因为其中有种超出人的本性的东西。”[\[67\]](#)

这一役夺去了47名英国军官和793名士兵的生命，而日本在这一行动中仅仅损失了三架飞机，这着实令人惊讶。英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教科书般的攻击。“毫无疑问，敌人的攻击实施得很巧妙，时机把握得很好，”“反击号”的舰长在战役之后写道，“高空的轰炸机保持了密集的队形，没有慌忙躲闪防空炮。”[\[68\]](#)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攻击，高空轰炸机首先到达，吸引了高射炮手的注意力；紧接着鱼雷轰炸机从低空突袭，左右夹击，同时在军舰的两侧投下致命的鱼雷。

12月10日上午，丘吉尔被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的电话惊醒。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向他报告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日军的轰炸机将两艘军舰都击沉了。“你确定这是真的吗？”丘吉尔首相问。“毫无疑问。”庞德回答说。丘吉尔后来写道，放下听筒时，“我很庆幸那时我是一个人。在整场战争中，这是对我最直接的打击。……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这一可怕的消息淹没了我。……在所有广阔的海域中，日本都处于绝对优势，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处于劣势而且暴露在外”。[\[69\]](#)这意味着英国在太平洋残存的最后一道海洋防线也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印度现在也会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后来也确实马上遇到了威胁；这还意味着印度洋上的航线不堪一击。这两艘军舰对于英国海军的声誉意义重大，尤其是“威尔士亲王号”。“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舰队中最新的战列舰之一，也是最有威慑力的。当年8月，丘吉尔乘坐该军舰来到纽芬兰的普拉森舍湾与罗斯福会面——那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上台后双方第一次会面。“威尔士亲王号”上宽阔的柚木甲板为英美高层初次会晤提供了绝佳的场所。

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

1941年12月10日



三天前，日本的飞机趁着美国的战列舰停泊在港，将它们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此前还没有战列舰在完全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被空袭击沉过。Z舰队的命运在海战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结局也终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这是日本的胜利，盟军的惨败，同时也是全球海军界的制空权理念的胜利，它对马汉的“大舰巨炮”理论的动摇比珍珠

港事件更甚。舰队的信条很快就会改写：从现在起，战列舰仅应被视作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舰队中的辅助角色。战列舰上的防空武器会是原来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直到上面布满各式口径的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可以更好地保护战列舰本身和航母，抵御敌军的空袭。它们装备的14英寸和16英寸大口径主炮将主要用于炮击海岸，支援水陆两栖部队登陆。美国海军迅速接受了这些理念，英国皇家海军在接受时则打了一些折扣；但是这一信条在日本海军的高层中渗透得很慢，他们直到二战接近结束，还希望用战列舰在海上来一场决战。

日军以“蛙跳”战术往南继续发动攻击。陆基零式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从令人意想不到的远方发动突袭，清空海滩上方的空域，后续的侵略部队随之登陆。日本的大批运输舰在没有空中威胁的情况下将军队、坦克和武器运送上岸。日军从这些滩头堡向内陆进军，吞并领土，占领通常完好无损的机场。然后航空队会飞到被占领的机场，为进一步向南进军做好准备。盟军据点一个个遭到打击，速度之快令防御部队猝不及防。日本在菲律宾、关岛、香港地区和马来亚都取得了胜利，盟军节节败退。英美两国的机场中到处都是残破、冒烟的废墟，飞机的残骸随处可见。飞机技师丧命，机库受损或是被夷为平地，零部件在地面上被炸毁，或是落入敌人之手。到周四早晨，在战争开始四天后，盟军的飞行员和地面支援人员都深陷混乱、恐惧、怀疑和震惊之中。混乱的场面以及慌乱的撤退使得盟军极为狼狈，颜面大失。在菲律宾的伊巴，美国士兵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开始逃离岗位。在克拉克机场，跑道被炸毁，没办法使用，大部分建筑物和机库也被夷为平地。飞行员的尸体遍布整个基地，直到一周以后才有人来收尸，将他们埋葬。[\[70\]](#) 民众和军官被日本人入侵的速度和规模吓到了，开始严重怀疑自己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浪潮。

人们常说，美国在珍珠港遭受了日本的袭击，损失了大量船只、飞机和士兵，但这些损失是值得的，因为这一事件让面对战争时观点相

左、分歧严重，似乎不可能达成共识的美国人振作了起来。这一论断准确但不完整。希特勒在日本突袭珍珠港四天之后的周四做的事情才是让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最终原因——他在可以不行动的情况下选择向美国宣战。

罗斯福在战前与英国的秘密对话中，已经承诺美国会采取“欧洲优先”的战略。“欧洲优先”战略在军事上的逻辑性不容置疑，但是这一理念在美国民众中一直不受欢迎，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非常想找日本人报仇。周日下午，战争部长史汀生提议，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向三个轴心国宣战，但是罗斯福立刻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在美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投入战争的这一时刻，他不想让民众的观点产生分化。即使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想向德国宣战都不容易，除非国会投票时出现压倒性的赞成局面。但是，不宣战的话，美国生产的大量军需就有可能被卷入太平洋战事的旋涡中，使苏联和英国濒临崩溃。

希特勒跟所有的人一样——除了日本的统治阶层——对珍珠港事件感到非常意外。日军突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马祖里（Masurian）森林的东部总部“狼穴”（Wolf's Lair）时，他狂喜不已。“转折点！”他向参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盟友，这个盟友3 000年以来从未被征服过！”^[71]偷袭珍珠港似乎将美国的军力困在了太平洋，暂时阻止了美国向德国的敌人提供有效帮助。日本很可能会让英国失去它在东方的帝国，甚至可能失去印度。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也和希特勒一样盲目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现在，美国想向英国运送物资都不大可能了，苏联就更顾不上了。”^[72]

12月11日上午，贝尼托·墨索里尼在罗马的阳台上俯瞰着威尼斯广场，向狂热的人群宣布“《钢铁条约》的力量”将会压倒民主的力量。当天下午3点钟，希特勒在国会讲话。元首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刺耳且复杂，长达90分钟的演说里有讽刺、偏执、恶言、恐吓，他还痛心地称德国是受害者，德国是出于好意。有好几段怒气冲冲的言论矛头直接对准

苏联和英国。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德国国防军在苏德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于东线取得的胜利，但对于最近在莫斯科受到的阻碍却只字不提。[\[73\]](#)

谈到美国时，希特勒的怒火转向了罗斯福，说他是“上流社会”的成员，代表了“在民主体制内顺风顺水的上层阶级.....这个爱管闲事的绅士.....不折不扣的好战分子.....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宣称，这场战争是一小群银行家和财阀事先安排好并挑起的，这些人主要是美国人和犹太人，罗斯福是他们找的代言人。希特勒祝贺日本“率先对此人特有的扭曲历史真相的可耻行径进行反抗”，他说珍珠港事件让“德国人民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正派人深感满足”。

希特勒登台演讲一个小时后，才兜着圈子表明对美宣战。“因此我今天安排将他的中立许可证交到美国代办处，接下来.....”说到这里时，事先安排好的副手们热烈的鼓掌声淹没了元首的话，“美国总统和他的财阀集团取笑我们是穷国——这话不假，但是穷国就要确保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东西不被抢走。”希特勒宣布，轴心国已经达成协议，三个国家在打败并摧毁“盎格鲁—撒克逊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前绝对不会放下武器。[\[74\]](#)

在华盛顿，美国没有经过国会辩论就迅速通过了宣战。国会两院一致通过。在签署议案时，罗斯福说盟国在全世界的陆地和海洋的各个角落都开始了一场协同的战争。“妄图奴役全世界的力量此刻正在朝西半球推进。”这场战争需要对“野蛮和暴虐的力量”进行长期艰苦的反抗。[\[75\]](#)

轴心国的宣传者用漫画的手法诋毁美国，称美国被种族、民族、阶层和宗教信条严重分化；美国社会骄奢淫逸，唯一能激励人们的是无所不能的美元；美国充满了游手好闲的人和装病不干活的人，到处都是富得流油、好吃懒做和自由放纵的人；政客捧着帽子乞求大老板的施舍。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一个杂乱无序、个人主义盛行、贪图享乐的国家，沉迷于爵士乐、电影、棒球、漫画、赛马和广播喜剧——什么都喜欢，

就是不喜欢工作，当然更不会喜欢打仗。美国政府是分裂的，因而国家衰弱，权力由总统、国会和法院分享，政府又经常受到野蛮无礼且毫无节制的媒体的愚弄。美国人地域观念很强，而且闭塞，只关心自己，从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他们绝对不会同意为捍卫英国流一滴血，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中，英国人是邪恶的压迫者；美国也不会管苏联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以及亚洲的任何地区，那些地方对于美国来说太过遥远，就像是在另一个星系一样。

这样的批评既浅薄又虚妄，只是由一些刻板印象和半真半假的事情拼凑而成的。不过，即使在美国也有与之类似的自我批评。在1941年的时候，美国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轴心国的挑战。美国人不喜欢德国和日本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大部分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向受害国家提供弹药和物资的政策。但是美国参战的提议却非常不受民众支持。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仅有1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德开战。人们公开谈论军队中出现大批逃兵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简称为“OHIO”，也就是“Over the hill in October”（意为“10月逃离战场”）。8月，参议院对延长和平时期服役时间的法案进行投票，结果是203票比202票，以1票的微弱优势通过。孤立主义运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星期实际呈上升趋势，带头者向大批民众宣传说罗斯福正在密谋向轴心国开战。1941年，罗斯福总统已意识到战争即将到来，但是除了引导美国民众的观念之外，他什么也没法做。他只能等待某种刺激性的事件发生或者是敌国主动挑衅。

希特勒将珍珠港事件称为“转折点”，戈培尔则总结说“世界的整体格局很快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说得没错，只是事态没有按照他们的本意发展。1941年12月7日以前，美国的产业经济完全处于轴心国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打击范围之外，这是陷入战争的盟国最大的希望。只有使美国的经济军事化，完全转变为生产军需的状态，才能摧毁轴心国。但是美国这个杂乱无序的共和国，如果没有美国民众的支持，就永远无法动员起来，或是实现军事化。“他们〔日本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让罗斯福彻底从进退两难的境地中走出来，”为罗斯福撰写演

讲稿的舍伍德写道，“而他们恰恰做了这件事，用一种特别挑衅并且特别侮辱人的方式，一下子就使意见不一且迷茫混乱的美国人民变得团结一心、坚定不移。”^[76]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是不列颠之战，不是阿拉曼战役，不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也不是意大利的覆灭，而是珍珠港事件，它让罗斯福得以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同时也决定了德国和日本的命运。

-
- ^[1] Craig Thompson, “Britain Joins U.S. against Japanese,” *New York Times*, Dec. 9, 1941, p. 14.
- ^[2] “Tense Throng Fills Grounds at Capitol Awaiting President,”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44.
- ^[3] Frances Perkin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21.
- ^[4]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p. 13–14.
- ^[5]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34.
- ^[6] “Roosevelt Says Date of Attack in Pacific Will Live in Infamy,”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44.
- ^[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7.
- ^[8] Cornelius C.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2.
- ^[9] Lt. Ruth Erick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9.
- ^[10]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2.
- ^[11] Erickson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35.
- ^[12] Vivian Roberts Hultgren account in McCabe,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p. 90.
- ^[13] Jack Kelley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59.
- ^[14] Cox. Richard L. Frost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69.
- ^[15] Dan Wentrcek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76.
- ^[16] Leslie Le Fan account in *ibid.*, p. 165.
- ^[17]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 237.
- ^[18] Smith, J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20.
- ^[19] Seaman 1st class Nick L. Kouretas, *USS Raleigh*, account in LaForte and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p. 183.

- [20] George E. Waller account in *ibid.*, p. 50.
- [21]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0.
- [2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0.
- [2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25–26.
- [24]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1.
- [2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6.
- [2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6.
-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1. 见证者是道格·莫尔顿（Doug Moulton）上校。
- [2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 81. 见证者是道格·莫尔顿（Doug Moulton）上校。
- [29]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72.
- [30]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1.
- [3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27.
- [32]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18.
- [33]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 92.
- [34] See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18.
- [35] “Welders Call Off Strike,” *Philadelphia Inquirer*, Dec. 8, 194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38.
- [36] “N.Y.-Bound Enemy Planes Alarm Entire Northeast,” *Brooklyn Eagle*, Dec. 9, 1941, in *ibid.*, p. 55.
- [37] “Japs Try to Bomb Coast; Routed Off Golden Gate,” *Albany Times Union*, Dec. 9, 1941, in *ibid.*, p. 57.
- [38]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 245.
- [39] Jackson, *That Man*, p. 104.
- [40] Advertisement for *The American Magazine* i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8, 1941, p. 21.
- [41] “炉边谈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利用大众传播手段进行政治性公关活动的事例之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为了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炉边谈话”节目通过收音机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他的谈话不仅鼓舞了美国人民，坚定了人民的信心，而且也宣传了他的货币改革及社会改革的基本主张，从而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尊敬，对美国政府渡过难关、缓和危机起到了较大作用。——译者注
- [42]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2.
- [43]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War with Japan,” Dec. 9, 1941, pp. 198, 200,

and 204.

[44]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2.

[45] Buhite and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War with Japan," Dec. 9, 1941, p. 204.

[46] Peattie, *Sunburst*, pp. 166–67.

[47] Astor, *Crisis in the Pacific*, p. 61.

[48]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3: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170.

[49] See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123, and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 208.

[50]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 75.

[51]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p. 300–301.

[52] See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80.

[53] See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p. 100–105.

[54] See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xii; Peattie, *Sunburst*, pp. 172 and 174.

[55]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90.

[56] Charles Bond's diary entry, Nov. 21, 1941, in Bond and Anderson, *A Flying Tiger's Diary*, p. 46.

[57] Lt. John Buckley quoted in White, *They Were Expendable*, p. 16.

[58] *Ibid.*, p. 18.

[59] Quoted in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3.

[60] Bert Wynn account in "The Sinkin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A series of personal accounts compiled from crew members," comp. Alan Matthews; online at www.microworks.net/pacific/personal/pow_repulse.htm.

[61]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304.

[62] *Ibid.*, pp. 307–8.

[63] *Ibid.*, p. 318.

[64] Ted Matthews account in "The Sinkin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Repulse."

[65]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8.

[66]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1941–4*, p. 158.

[67] Flt. Lt. Tim Vigers, DFC, RAAF, quoted in the *London Gazette*.

[68] Peattie, *Sunburst*, p. 170.

[6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20.

[70]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150.

[71] Hitler quoted in Harvey Asher, "Hitler's Decision to Declare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ited(A Synthesis of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 September 2000; online at www.shaf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eptember-2000.

[72] Goebbels quoted in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697.

[73] "Hitler Declares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by the BBC Monitoring Service, Dec. 11,1941; online at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74] "Hitler Declares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ed by the BBC Monitoring Service, Dec. 11,1941; online at 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

[75] Frank L. Kluckhohn, "U.S. Now at War with Germany and Italy," *New York Times*, Dec. 12,1941, p. 1.

[76]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0.

第三章

在日本，广播上已经播报了有关珍珠港的消息：“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在今日尚未破晓之际，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参战。”^[1]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广播里播放《军舰进行曲》等爱国主义歌曲的时候，经常被插播战争最新进展的消息打断。商店里和各家各户的广播都开大音量，播放着新闻，只消上街听一下就可以了解最新动态。

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天崩地裂一般。就连12月8日这个日子（比美国要晚一天）似乎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力量。那一天是佛成道日，也就是佛陀大彻大悟的日子，对佛教徒来说十分特殊。几十年之后，回忆起那天时很多日本人仍有一种强烈的体验——“热血沸腾，浑身颤抖不已。”中学生板桥康正（Koshu Itabashi）说。^[2]“我感觉就像有人在我头顶倒了盆凉水，”军令部的吉田俊雄大尉回忆道，“我浑身一阵激灵。那种感觉直到现在仍然清晰。”^[3]

最初的报道中没有迹象表明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了胜利，此外播报员的声音也比较紧张，有些尖厉。两军接触，开始交战——这就是最初人们得到的消息。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美国 and 英国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都不大可能赢。现在日本竟然同时跟这两个国家交战？而且是在中国的战事尚未结束之时？“与这些国家交战没有问题吗？”横滨的学生广泽荣（Ei Hirosawa）想，“我们有可能打赢吗？胜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象不出。我17岁时就是这么想的。”^[4]但是这些疑惑很快就被确定无疑的信息消除了，因为广播传来了战果——美国的战舰被击毁、击沉或者烧毁，日军在菲律宾和马来亚

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后来日本的战争报道开始逐渐与现实不符，但是在最开始的阶段，广播内容无须欺骗：事实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比起宣传部门所能想象的大获全胜的情景一点也不逊色。

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胜利！胜利！”他们互相喊着——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可能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都悬着一颗心，他们处于与西方交战的边缘，听到的新闻涉及各种外交事务，让人迷惑。现在日本下了决心，一切明朗，大家团结一心。“我兴奋不已，”任职于东京《朝日新闻》的漫画家横山隆一说，“很高兴。所有不确定的疑云都那样消散了。”^[5]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让日本人像现在这样团结。中国是日本在亚洲一海相望的邻邦，是日本文字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东方佛教的摇篮。与英国和美国战斗是另一回事，大约容易让人这样想：这将是一场自由之战，日本将代表所有亚洲人战胜殖民统治者。这样就拔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终于有人向一直在亚洲横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宣战了。“我们日本人从未像当时那样由衷的自豪过。”文学评论家奥名孝雄（Takao Okuna）写道。^[6]

那天昭和天皇特意穿上了海军制服。（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在得知偷袭成功的消息后，昭和天皇“十分镇静，泰然自若”。^[7]他发布了《天皇诏书》，正式对英美宣战，指责两国“助长东亚之祸乱”，说日本长期以来不辞辛苦维护和平，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勃勃野心的阻碍。西方列强不仅“毫无退让之精神”，而且“愈益增大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以图使我屈从。……事既如此，帝国今为生存与自卫计，唯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8]日本首相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国民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战争将漫长且艰苦。“为了歼灭敌人并且建立不可动摇的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必须进行漫长的战争。”但是日本无疑将获胜。“自建国2 600年以来，大日本帝国从来没有战败过。”^[9]当天结束时，日本皇宫的墙外聚集了一大批人。

吉田大尉说，在东京海军省，人们“在大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摇晃着肩膀，骄傲而自豪”。^[10]军令部当天还提供了特制的红豆甜汤，以示庆贺。^[11]在日本海军的整支舰队和岸上机构中，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官兵都挤到无线电室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一听到最新的胜利报道就大声喝彩。“坦白来说，”航空兵军官奥宫正武写道，“敌人竟然这么不堪一击，我感到太意外了。我们原本的预期是经过鏖战才能取得极小的胜利，但是在发动攻击之前，没有人敢对真实的结果妄加猜测。”驻扎在日本本土各岛上的士兵担心自己还没战斗就胜利了，便以近乎威胁的方式申请分配给他们战斗任务。“这些极度狂热的年轻人认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因此他们没法在敌人面前大显身手，”奥宫正武补充道，“我们的年轻飞行员深信自己尚未出动战争就会结束。”^[12]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命令自己的旗舰“长门号”战列舰停泊于广岛湾的柱岛锚地。在偷袭珍珠港的前夜和清晨，山本五十六一直未睡。他在作战室中来回踱步，偶尔与自己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下将棋。随着攻击的展开，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直接从日本的飞机上截获情报，其他操作员则从瓦胡岛的美国人那里截获情报。“突袭成功……敌军军舰被鱼雷袭击，战绩斐然。”^[13]作为庆祝，舰员们获准去食堂买米酒喝。每传来一条消息，聚在一起的军官都会欢呼一声，但山本仍无动于衷，毫无表情。山本对于南云忠一仅仅发动两轮袭击之后就将航母撤回感到失望，他认为南云应该趁热打铁——但是山本总司令没有越级下令对美军发动第三轮袭击，他知道要是这样的话会让下属的面子受挫。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少将在日记中生气地写道，南云忠一早早撤离战场的做法如同“偷到一点东西就匆忙溜走的盗贼一样”。^[14]

偷袭珍珠港是山本五十六一直以来呕心沥血制订的计划。山本以辞职要挟，才使军令部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个行动。他原本计划的不是偷袭。实际上，日本的历史学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山本五十六对日

本不宣而战感到非常不安。^[15]山本多次要求外务省保证，“第14部分电文”^[16]将会在袭击之前交给美国国务院，并且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华盛顿的日本驻美使馆没有及时将该信息解译，因此造成了延误，不过大部分美国人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会知晓其中的曲折。

虽然军令部反对，但是这次大胆的行动大获全胜，这进一步增强了山本的实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倡导者，山本相信航母的打击能力，也相信水面舰艇面对空中攻击时会很脆弱。当他得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抵达新加坡时，他亲自命令36架装载了鱼雷的G4M轰炸机来增强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实力，并且敦促它们对这两艘英国战列舰穷追猛打。他甚至打赌说这两艘船会被击沉。Z舰队被摧毁对于山本五十六本人和日本海军航空兵来说都是一个胜利，但这也导致民族主义报刊对战争变得过分自信。“就像被咬了的流浪犬一样，”《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们写道，“英国海军只能掉头，边吠叫边逃命。”^[17]在另一些刊物中，“威尔士亲王号”沉向海底的航拍图和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中鞠躬祈祷的照片被放在一起，后者是当年8月西方媒体在普拉森舍湾英美首脑峰会上拍摄的。^[18]偷袭珍珠港以及击沉英国战列舰使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现在他可以向东京的海军将领们下命令了，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六个月后日军在中途岛被打败。

“长门号”上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Mitsuharu Noda）回忆道，在最初的几周内，山本五十六收到了数千封贺电贺信，每一封信他都一丝不苟地用漂亮的书法手写回复。“他命令我制作超大的名片，写上这些字：‘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野田满春描述道，“每张名片他都用毛笔亲自写上‘我发誓将不畏艰辛，不因初期小胜而自满’。”^[19]山本五十六把自己的职责看得无比神圣，从中可见一斑。他似乎很清楚，自己大概是日本除东条英机以外最有名的军人，也是除了东乡平八郎之外最著名的海军将领，而36年前山本曾于对马海峡在东乡平八郎手下服役。^[20]

即使在海军取得了超出日本人预期的重大胜利的战争初期，山本也是满面愁容，令人不解。他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一名军人‘趁敌人不备取胜’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那其实是一种耻辱，因为只是偷袭而已。……我更希望你在看到敌人的行动后做出评价，因为敌人肯定是怒不可遏，很快就会发起坚决的反击。”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件中，山本指出美军可能会对东京实施空袭，颇有预见性地批评了“日本国内那种疯狂的喜悦之情。……那种狂喜让我担心，因为一旦东京遭到轰炸，人们就可能会当场崩溃”。[\[21\]](#)

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作家和传记家，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将山本五十六称为“自纳尔逊勋爵之后最伟大的海军将领”。[\[22\]](#)乍一听，将山本和纳尔逊相提并论似乎是无稽之谈。英国海军中将霍拉肖·纳尔逊（1758—1805）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压倒性胜利，使英国海军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山本五十六则对于中途岛海战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而中途岛之战是全世界海军历史上负方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此外，他还要为日军重夺瓜达尔卡纳尔岛时的惨败负责，在那场长达四个月的海陆空战役中，日本付出了同样高昂的代价。由于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山本五十六受到了许多毁灭性的批评，其中很多来自他自己的军官，所以他连伟大的海军将领似乎都谈不上，何况与最伟大的纳尔逊将军相提并论呢。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对比也有道理；因为这二人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人的“仪态”都有些难以描述，他们都有一种天生的超然气质，或者叫力量，也可以称为个性；这为他们赢得了下属疯狂的忠诚和深深的爱戴。两人都没有什么背景，尤其深受“下层甲板”海员们的拥护。两人对待下属都亲切随和，竭尽全力体恤所有的船员。两人都在战争中受过伤，而且留下了伤疤——纳尔逊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山本五十六的左手掉了两根手指。两人都在婚后爱上了别的女人，两人的风流韵事在死后都造成了丑闻。两人在内心都有一种

要么不干要么大干一场的孤勇。当其他人慎重地权衡利弊，对于部分胜利感到满足时，他们却积极进攻。在战争的浪潮对日本不利之前，山本五十六的这种大胆使他获得了纳尔逊那种神圣的荣耀。两人都在战斗中丧生，死后都以隆重的葬礼下葬，被公众神化。两人的死亡都造成了公众的恐慌甚至是绝望，好像他们一死国家就会落入敌人手中。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对于日本人来说，山本五十六堪称战将中的典范，他在整个日本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美国那种大陆国家不会像日本这样将某一个人推到如此高的地位。日本民众将山本五十六推崇为国难当头时的精神捍卫者。在那个意义上，山本五十六是伟大的，也许和纳尔逊一样伟大。

即使以当时日本的标准来衡量，山本的身材也属于矮小之列，他只有一米六多一点点；作为海军大将，他养尊处优，缺少锻炼，所以老了以后腰越来越粗，算得上是肥胖了。^[23]他虽然身材不够魁梧，但是看起来很威武：脖子粗，肩膀宽，走路来充满自信，大步流星，就像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在1940年左右拍的照片中，他以标准的军姿坐得笔直，同时看上去又是完全放松的状态。那时他56岁，但是看上去至少比实际上年轻10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平静地看着照相机；皮肤黝黑光洁；短发则显出不凡的头型。他的肩膀上和胸前装饰着精致的金色穗子，还挂着好几排奖章。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出生于日本海沿岸新潟县的长冈，父亲是没落的贫穷武士。1916年32岁时，他过继到山本家族，改名为山本五十六。这种过继的方法在日本自古就有，并不少见。1904年他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次年，他未来的对手切斯特·W. 尼米兹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山本在对马海战中于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服役，后来在“日进号”巡洋舰上，他指挥的舰炮爆炸，致使他受伤。他的上腹部和腿上清理出来了约120片弹片，这些地方变得坑坑洼洼，伤痕满满。同时他还失去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24]

山本在军中升职很快，并完成了日本海军大学校的全部课程。日本

政府两度公派他赴美留学。他在哈佛学习了两年英语（1919—1921），后来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1926—1927）。他年纪轻轻就被人看好，认为他日后必定会身居高位。他智力超群且密切关注细节，所以受人尊重。讨论海军政策时，他总能打破传统思维，提出的观点有理有据，使得同事和长官都能听从他的意见。他身上有一种“不属于日本人的”特质，拥有独立思维而且敢于直面争议。日本海军历史学家麻田贞雄说山本“独特的个性在日本海军中非常罕见，以至于一位长官评论说山本就像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他大胆且富有创意，坚持原则，具备远见卓识，还有一种著名的充满魅力的领导才能”。^[25]

奉行大舰巨炮的原则在当时仍是最安全的晋升之道，山本却早已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海军航空兵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海军大佐，他申请成为霞浦航空队的副队长并获得批准，随后还在海军航空部门担任了重要职位。^[26]他还首度设立机构招募并训练日本最杰出的飞行员，同时亲自监督，使日本发展起独立、自足且先进的军用飞机工业。十五年来，他被视为日本海军空战力量的首要推崇者，他也是最早指出战列舰不过是“昂贵而无用之物”这一异端观点的海军将领之一。^[27]

他是一名国际人士，到世界各地访问，代表日本海军出席各种裁军会议。他的英语水平足以进行基本的谈话和轻松的阅读：他称自己经常会每天扫视四十份美国报纸的新闻标题。^[28]在哈佛上学时，山本五十六几乎没有待在教室里上过课，有限的经费基本都用来在美国旅行了，而且为了省钱，他经常连饭都不吃。他刻意不和其他日本学生待在一起，以逼着自己掌握英语。他去了美国很多地方，细心观察，所以对于美国产业基地的规模和军事潜力，他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只要看到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山本评论说，“一个人就会清楚日本以其国力没办法与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29]他喜欢赌博和博弈游戏。他通过打扑克、二十一点和双骰子赢了不少钱，他开玩笑说日本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把他送到蒙特卡洛，可以平衡国家预算。

山本五十六通过旅游开阔了眼界，他可以站在远处审视日本，冷静理智地评判日本的优势和弱点。这种能力是日本海军里（甚至是陆军里）其他很多人所没有的，那些人甚至把这种思想视为精神堕落。也许，山本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的海军经历，而是在战前日本难以驾驭的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山本五十六坚信指挥日本陆军的都是些笨蛋和疯子，看不起那些将军。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陆军掌控国家的形势很明朗了。文职政治家和经选举而任职的官员被边缘化，军方派系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占据了支配地位，此时山本成了温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他还成了海军“条约派”的引路人，该派别支持十分不受欢迎的裁军条约，同意限制日本舰队的发展。他坚持不懈，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破坏了与纳粹德国的联盟，并且竭力避免日本走上与美国交战的灾难之路。当战争的走向与他的愿望相违时，他不断地敦促政府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也恪守职责，带领着日本海军取得了多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最后如武士般死去。1945年之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所以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之前坚持阻止日本陷入战争的行为提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日本战败证明了山本是正确的。

日本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经常被诠释为“建前”和“本音”。建前指的是人们向世界展现的面貌，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或者是迫于阶级或职位必须扮演的角色。本音指的是“真实”或者“真情实感”，只有在亲朋好友面前才会表现出来。摘下面具，向另一个人表现出本音，象征着亲密或者信任，等同于把另一个人视为知己。这些观念很难说是日本人特有的，类似的观念在西方也存在。但在日本人的思维中，建前和本音很自然地是一对矛盾体，对于人前人后的不一致，没有人感到纠结，也没有人会费心让这二者一致。

与其他恪守职责的日本人一样，山本五十六将军也恪尽职守。在新闻片段里，你能看到山本登上战列舰的甲板，穿着洁白无瑕的白色制服，佩戴着菊花纹饰的肩章，胖胖的右手拿着海军帽的帽舌向船员们挥

动；或者站在东京的阳台上，以日本传统的方式向人群挥帽致意。在这些场景中，他神色肃穆坚毅，面无表情。就连那些十分了解的人也强调说他有的时候“沉默寡言并且相当不苟言笑”，或者说他具有“男人严峻的，几乎是令人畏惧的一面”。1939年他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时，东京一份报纸的标题就这样写道：“山本五十六，严厉寡言的海军大将。”^[30]

在旗舰上，这位指挥官的生活方式正是人们料想的那样——极其奢华，巨大的军官起居室里摆着一张昂贵的餐桌，一顿饭有好多道菜，后甲板上还有一个40人的乐队以供娱乐。“山本五十六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完美的军人，”一位军官评论道，“在每一个场合，他都表现出缄默谨慎、泰然自若的军人形象。甚至在拉包尔和特鲁克，在那种热带烈日下，他依然身着洁白无瑕的海军制服。山本总司令无惧烈日、潮湿、昆虫的形象，给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本不仅仅是一名海军大将，他就是海军的化身。”^[31]

但是山本有时也会表现出近乎顽皮的喜悦，让自己隐藏的一面暴露出来。他喜欢开诚布公地待人。长冈山本老家的一位禅师说：“如果你坐在他对面，你会感到他把内心的想法都摆在你面前并告诉你，‘给，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32] 东京的各个报社都很喜欢采访山本，这不仅是因为他愿意提供一些不能公开的幕后消息，还因为他会邀请记者们到他家里，给他们倒上威士忌，点上雪茄。一家报纸称高官中很少有人会像山本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不会装腔作势”，还说山本“就连相当古怪的观点也会开诚布公地说出来”。^[33]（当然，山本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的公共形象——就像纳尔逊那样，山本十分重视公共形象。）山本的坦率连外国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我认为他很通人情，十分真实，也十分真诚，”战前美国驻日本海军武官埃德温·莱顿说，“许多日本人很难‘接触’。他们相当寡言少语，有时甚至是到了冷漠的程度。有时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戏剧里的演员，戴着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和山本接触时，我感觉在社交场合他并没有戴着虚假的面

具。”^[34]山本有意远离“建前”，尽情展示他的“本音”。

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乐于打破职务带来的各种规矩。他性格中有孩子气的痕迹，还有一种顽皮的冷幽默感，一名军衔更高的海军将领称他为“顽皮的恶魔”。在岸上的时候，他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他脱下制服跟艺伎们表演一番的时候，他很受艺伎的欢迎。他会从街上小贩那里买一袋烤豆子，一边走一边吃，把豆子抛在空中再张开嘴巴去接住。他还会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倒立。他会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打出租车，司机以为这个手势表明他会很大方地给50钱的路费，但是到达目的地后他只给30钱。司机抱怨时，他会说：“别傻了——看！”然后脱掉手套，让司机看他缺了两根手指的手。^[35]他像杂耍演员那样有一种喜剧天赋，可以装傻充愣或者表演肢体喜剧。1941年年初，舰队在佐世保港停泊时，山本和一位艺伎女友在岸上的一家餐厅吃饭。为了博女友一笑，他模仿查尔斯·卓别林的罗圈腿、企鹅脚，像卓别林那样夹紧屁股、转动手杖踱步。他就那样在军官和船员们面前走了好几百米远。那个艺伎无意中听到对此错愕不已的两名船员的对话。“看，那是总司令啊！”一个船员说。“别瞎说，”另一个船员回答，“你觉得总司令会那样走路吗？”^[36]

山本滴酒不沾，他的嗜好是赌博和女人。野田满春回忆道，山本玩纸牌或者其他赌博游戏时，“有时把整套军装都输掉了”，但是似乎他赢多输少。^[37]他是玩将棋（日本象棋）的行家，鲜有对手。他会审视对手的面庞，对方脸上哪怕只闪过一丝犹豫，他也会全力进攻，宁愿舍弃很多子来迅速取胜。在欧洲和美国时，他学习了桥牌和扑克，并且都打得很好。每去一个国家他都会去赌场，他使用搏头尾^[38]的下注法，觉得这样可以赢过庄家。他赌得似乎很不错，甚至说要辞去军职，移居海外，做一名专业的赌徒。他什么都赌。当海军次官的时候，他打赌说可以把一根燃烧的火柴穿过一个10钱硬币的孔。在舰队做炮击演习时，他曾经一把豪赌3 000日元，说靶舰不会被击沉。他赌输了，而且好几年后还在为这个赌约分期还款。^[39]历史学家经常把山本赌博的爱好和他

身为舰队司令所执行的冒险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确，山本本人在谈到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时，也经常拿将棋做类比。

山本34岁时结婚，但是他好像从未爱过他的妻子；他说，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妻子“和马一样强壮”，似乎可以应对艰难困苦。山本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东京赤坂区，但是上岸的时候，山本大部分时间和新桥区的艺伎待在一起，艺伎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80钱”。^[40]（修指甲的价钱是1日元，相当于100钱；因为山本只有8根手指，所以他就要求打折。）时间一长，他跟其中的几个艺伎关系变得很近，但不是情人；到中老年时，他似乎把她们视为了家人的替代者。

西方没有类似艺伎的职业。也许应该把她们称为妓女，因为每一位艺伎的身子早晚都会卖给某个顾客；但是艺伎提供的不仅仅是性，艺伎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后，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和别人发生关系，以及和谁发生关系。无论把她们看作什么，艺伎都是美丽而优雅的尤物：她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不惜下血本让自己成为艺术家、表演家、音乐家、时尚人士，而且能说会道。她们不是活在阴暗的角落，最成功的艺伎会成为名人，她们的照片会出现在海报和杂志封面上。就像现代的明星一样，她们的名号很响。她们主要靠陪客人挣钱，按小时收费。在茶房或者私人住宅里，她们面对一群男人，给他们倒酒，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唱歌跳舞。一些艺伎通过结交有权势的男人，以及控制年轻学徒，会变得很有钱，她们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女性。

作为军官，山本没有足够的财力与贵族和商界精英抗衡，去争抢头牌艺伎的服务。但是艺伎们似乎很喜欢他，愿意关照他。在外旅行时他会买香水、化妆品和衣服，送给艺伎当礼物。艺伎馆打烊之后山本也可以光顾。工作日的下午山本有时会出现新桥的艺伎馆里，穿着军装在空房间的榻榻米上小憩一会儿。艺伎会照顾他，给他缝袜子、洗内裤。他的传记作家猜想：“艺伎们这样做是因为母性被激发了。”^[41]

20世纪30年代中期，山本爱上著名的美人河合千代子，她的艺名是“梅龙”。山本明显没办法给梅龙足够的钱，但是她却在山本身上花了

很多时间，这令新桥艺伎馆的其他艺伎大惑不解。^[42]山本与这名艺伎之间最初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他经常称她为“小妹妹”。山本追了她很久，她才让山本（用老话说）“亲手把她的头发解开”。到1935年，她已成为山本最亲近的红颜知己。他会给她打电话，给她唱歌听。有时他会把她约到一家乡村旅馆中，用假名登记入住。他给她写信表明心迹，说每当想起她时，自己总是感到“难过”和“无用”，因为“得到了你的爱。你是那样美丽和有趣，我越看你，就越感到痛苦。请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在理论上，其实是我想要帮助你，让你不要那样孤独；但有时我又分明感到，我堂堂一个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想在你的胸口哭泣，未免有些难为情。……以上肺腑之言，我还是第一次向人吐露”。^[43]

山本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后，包括千代子在内的很多艺伎参观了停泊在东京港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长门号”旗舰。^[44]战列舰上一切井然有序，军官们站得整整齐齐，一看到总司令就立刻敬礼——这让艺伎们似乎有些“拘束”，但是山本却怡然自得。他们在军官起居室里吃了一顿大餐，乐队在一旁演奏流行音乐助兴。“如果陆军见了那个场面，肯定会出大事情的！”山本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说。他还说，这个场面让他感觉山本将军“真的是一个平常人，处事灵活，易于亲近”。^[45]

对于这样做是否会成为公开的丑闻，山本一笑置之。有些年轻的军官提醒他这样与艺伎调情不大得体，他回答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从不放屁也不拉屎，也不睡女人，那么我就听你们的！”待在美国时，山本读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几本传记。他很佩服林肯这个家境贫寒却成了“人类自由”领袖的人。^[46]1927年，山本跟手下的军官三和义勇说，林肯的缺点让他更加有魅力：

一个真正有目标的男人总是对自己很有信心。这种人甚至有时候连神都不信。所以，他时不时地会犯错。林肯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形象。人不是神。犯错是人类魅力的一部分，

这会激发一种人情的温暖，进一步激发敬意和热爱。[\[47\]](#)

山本五十六也是如此。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慢慢掌权的过程很难概述。德国和意大利纳粹主义兴起是因为有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做后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取得了绝对权力，但是日本并不是这种模式。日本极右翼是一个派系众多、权力分散的群体，是由持有相同观念且不断变化的秘密民族主义团体形成的松散联盟，这些团体刚有一些声望就分裂或者瓦解了。它们的意识形态侧重点各有不同，不过普遍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其中一些团体要求将所有私人财产“还给”天皇。许多人想要彻底废除西方的民主形式，还有人想与西方国家较量一番，扩大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如果说这个团体有核心的话，那就是日本陆军，更准确地说主要是陆军内部的中层军官圈子。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许多阶层的支持，包括学者、艺术家、作家、学生、神职人员、政客、官员、殖民地探险家、武道家、海军军官、商人和法院中的精英等。欧洲在大萧条初期有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声音。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大正民主”的时代，那时主流的政治气氛比较温和包容。那时实行议会制民主，对于文职人员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员来说是最好的时期；那些文职人员和外交官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愿意签署抑制日本吞并亚洲之野心的协约。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想让日本变得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东京市中心很快就变得像现代的西方城市了，有高高的办公楼、有轨电车、汽车和霓虹牌——把广告牌上的字改成英语，你可能就会以为自己身在芝加哥或费城。人们狂热地追求西方的一切，尤其是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大学生们。年轻人（令人愕然的是竟然还有女人）穿着西式衣服，留着西式发型，抽西式香烟，喝西式的鸡尾酒。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打发时间，听爵士乐并学着跳舞，看

查尔斯·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讨论外来思想的优点，譬如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城市和乡村里都有暴动，暴动的原因通常与工资、物价或者租金有关。地主和雇主经常受到死亡威胁，他们的对策就是雇一群恶棍打压罢工并强制执行合同。自命不凡的商业大亨炫耀刚刚取得的财富，用金钱暗中操控选举。日本在国际上受挫使得国家自尊受到伤害。在凡尔赛会议上，日本没有取得种族平等条款（该条款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反对）。美国国会于1924年通过《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裁军协议使得日本陆军和海军裁员，年轻军官们的野心受挫，他们的怨气迅速变成了暴力革命。

大正民主时期的混乱、纷争和无礼使许多日本人遭到丑化，而且以下行为也丑化了日本国民：贪污腐败、选举交易、强词夺理、喜欢炫富、受西式文化影响而变得堕落，以及故意将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48]那些趋势似乎违背了“日本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以和为贵、重视人伦等备受推崇的儒家原则。不，众生并非生而平等；不，政治合法性并非来自民众；不，普通民众并不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有异议，那就是离经叛道。明治天皇是把准民主宪法当作“礼物”赐予日本民众的。但他也对以民族和谐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加以强调，而这种秩序建立于社会固定阶层间的稳定互动之上。明治天皇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49]中写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50]在这片土地上，民主制度成长并繁荣起来并不容易。专制政府更容易在这里生发，在形势变糟时，只有少数日本人愿意倾其一切捍卫民主实践。

另一种选择是神权政治，也就是“皇道”。该理念将日本设想为一个大家庭，天皇扮演父亲、神明和支配者的角色。这一理念的支持者称日本可利用天皇的力量治疗社会顽疾，包括抑制资本家的野心，防止民主政治动乱，不受外国列强的侮辱和践踏等，这样的话，日本就能复兴。

这是一种净化，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种必须被清除的污垢”。^[51]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他们向天皇臣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崇高的义务；就像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北一辉说的那样，所有的“小我”日本民众都要融入天皇的“大我”中。^[52]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杉本五郎（Goro Sugimoto）中佐在战前写了很多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写道，天皇是“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唯一神明，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宇宙的一切都是天皇的显灵……甚至包括篱笆里昆虫的叫声或者是春日的微风”。^[53]当天地初次分开时，天皇就被赋予了皇权，第一个天皇亦于此时从天上下凡。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并且“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54]天皇身上具备所有日本民众的优点，但没有缺点；天皇绝对不会失败或者履行不好职责。天皇完美无瑕，也就是说不会犯错：世间存在的一切美德都来自天皇的皇权。

天皇是日本唯一的君主，也是神明。实际上，天皇就是终极的神。天皇的子民，血统纯净的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神圣的民族。皇道蔑视所有其他民族，认为他们是贱民。征服其他民族就是使他们神圣化，让他们也能沐浴在神圣天皇的光辉中。

1926年昭和天皇裕仁继位，他原本很难成为日本“现人神”的候选人。裕仁出生于1901年，是皇太子嘉仁的大儿子、明治天皇睦仁的孙子。出生后不久裕仁就离开了父母，被细心地保护起来，与外界隔绝，受到的影响都来自朝臣和军官。孩提时代的裕仁害羞、好学，下巴干瘪，近视，体格瘦小，声音虚弱尖细。他十分敏感，迫切地想要讨别人喜欢——这对于抚养他长大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他掌权后就很容易受别人操控。他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陆军军官的控制，其中包括日俄战争中两位最有名的英雄——先是乃木希典将军，后来是东乡平八郎将军。童年时，裕仁就接受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他深信自己是神的后裔，浸润于国家神道的教义之中，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神圣身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所在的皇宫位于东京中心，占地约100

公顷，十分雄伟壮观，他很少被允许走出皇宫的护城河和高墙，而一旦有机会离开皇宫，他会穿上军装。

裕仁长大后，一些朝臣认为童年时他被保护得太过头了，所以缺乏君主必备的性格或者说领导技巧。他依然害羞，不善社交，上朝时往往沉默不语。他喜欢自言自语，这个习惯很令人担忧。有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观察他是否显露出心理问题的迹象；因为他的父亲、1912年继位的大正天皇曾经在公共场合将一份公文卷成筒状，放在眼上当望远镜；后来他被送到寺院里隐退，以免他的行为给公众造成困惑。上初中后，裕仁对博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海洋生物。他崇拜达尔文，书房里有一个达尔文的半身像，皇宫里有一个私人实验室。在那里研究标本并将其分类最让他快乐。他在科学中找到了慰藉，这证明他有好奇心和实验精神。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说：“搜集标本和研究分类学无疑符合昭和天皇那种追求条理的天性。在他最活泼好动的年纪，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巨大的动荡，以及一些难以找到答案、不确定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在他生命中是一种稳定且让他感到宽慰的不变的事物。”^[55]

青年时期的裕仁皇太子倾向于相对自由而温和的政策。他支持议会制政府，限制军队发展，与西方殖民列强维持外交合作。裕仁的这些政治倾向得到了元老和皇室主要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西园寺公望、大部分随从、内大臣和侍从长。^[56]1921年，20岁的裕仁皇太子到欧洲旅行。这种做法没有先例，引发了右倾日本人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太子的安全感到担忧，而且害怕皇太子会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裕仁皇太子在多个国家受到了王室的接见，包括英国伦敦的温莎家族。英国王室与仆人及朋友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亲切，对此裕仁很是羡慕。在法国，他参观了不久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惨烈战役的遗址，对伤亡的规模感到惊骇不已。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维持亚洲和平的决心。

他回到日本后，与谋臣商谈时变得更加自信了，并且开始维护自己的自由。他开始在本州北部的山区滑雪，打高尔夫球，和学校的密友一

起出城。^[57]所有这一切在1923年戛然而止：裕仁皇太子乘坐的车在东京市中心的街道上遇到了刺客。刺客的子弹没有打穿汽车，但是朝臣突然团结起来，不再允许裕仁出行。他完全成了皇宫里的囚徒，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彻底剥夺了。这起刺杀事件被称为“虎门事件”，它极大地增强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因为它使很快即将继位的神明一般的天皇与臣民分离，年轻的裕仁没有办法获得信息、开阔眼界，也就没办法壮大力量去冲破古板而保守的朝臣和军事顾问的阻力。色川大吉写道：“裕仁皇太子从欧洲回来后被灌输了自由的思想，他就像笼中鸟获得了自由，远离了他日常的生活。”^[58]

1926年，裕仁在父亲过世后继位。规模堪比现代奥运会的登基典礼持续了1928年一整年。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日本上上下下都在进行大规模施工和公共建设。宴会、大尝祭、神道教仪式、持旗游行和灯会似乎没有尽头。日本人得到了贵重的礼物、奖励或者贵族头衔，据说是天皇本人赏赐的。天皇还进行大赦，很多犯人被释放。裕仁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秘密仪式，从头到脚都穿着白丝衣服，还有神道教的祠官协助。所有这些都在报纸上和新兴媒体广播里向日本民众宣传。学者和神官则解释日本国体的本质。整整一年，日本人的耳朵里都回响着无所不在的仁慈天皇的声音。到了12月皇权交给裕仁时，整个国家都被灌输了天皇是“现人神”这一信念，其程度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据说所有日本人已经融入“上下一致的思想中”。^[59]随后不久，海军在东京湾为新天皇举行了一场大型露天表演。裕仁站在高高的平台上，检阅200多艘军舰和130多架海军飞机。其年号定为昭和，意为“光明”、“和谐”或“辉煌的和平”。裕仁现在成了昭和天皇，从此很少有日本人再听到他出生时所用的名字。

他在位的时代，恰恰也是异议思想遭到镇压的时代。1925年《治安维持法》打压了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激进分子的人。让人畏惧的宪兵队以及隶属于刑事局的“思想部门”开始监视媒体、学术界以及可疑政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宪兵队的人员、资源和权力稳步增加。随着二战

来临，宪兵队及其间谍网几乎覆盖了所有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通过“邻组”这种地方特殊机构来实施控制。宪兵队的特务特别喜欢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关押或者动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也经常进行温和的劝说；似乎，宪兵队更喜欢治愈、说服、转化和改造思想有问题的日本人，而不是仅仅压迫或惩罚他们。据《日本时报》称，从1933年到1936年，有59 013人被逮捕，被控告有“危险的思想”。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接受了审判，受审判的人中只有一半被判监禁。成功的特务不会因为抓到大量被定罪的人而感到自豪，而是更看重将多少受到外国或者激进思想影响的日本人用“手段和技巧”带回正轨。[\[60\]](#)

就像古罗马一样，日本是慢慢地把帝国建立起来的。和罗马帝国一样，其国外势力区是靠机会用不同方式取得的——有些是赤裸裸的侵略，有些通过创造性的外交手段，有些利用了周围国家的内乱，以“恢复秩序”为由强行占领。和罗马一样，每一场战争都扩大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每一次扩大都让日本的胃口变得更大。

日本举世瞩目的崛起据说是一种天命，是神明的旨意。罗马崛起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但是，与罗马不同，日本从未失败过。

1875年，日本吞并了北海道北方荒凉的千岛群岛；1876年，吞并了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岛；1879年，吞并了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1894年至1895年，日本与中国交战并取得胜利；1904年至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些胜利使得日本控制了台湾，1910年又使朝鲜成为附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得到的奖赏是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些原属于德国的殖民地，包括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那是美国的领土）。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坚信美国和英国秘密结盟对抗日本，其他西方列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他们的愤怒与几十年来积压的怨气使他们一致认定，西方列强密谋要统治亚洲。西方强迫日本签署耻辱性

的“不平等条约”，掌管了日本的外贸，后来治外法权又扩大到日本的领土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反日情绪被认为用来蓄意煽动全美国的民众，让美国与日本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凡尔赛拒绝了日本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的请求。美国在1924年实施了移民法案，限制日本移民并且（更糟糕的是）把日本与其他“低等国家”相提并论。极端民族主义者十分怀疑美国及其欧洲同盟正密谋损害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和推翻日本在中国部分领土上的统治。

有一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美国是一个贪婪、奸诈且恶毒的国家，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和自决都是个幌子，其实美国会不遗余力地镇压和掠夺所有亚洲国家。美国的这种虚伪性最赤裸裸的例子就是“门罗主义”，这种主张宣称美国可以影响相邻的大洲，同时强烈要求中国“开放门户”，其实这不过是为美国人及其好兄弟英国人考虑，以便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又不允许别国染指。他们认为，美国在日本崛起的每一个阶段都密谋要抑制日本的雄心，企图以恶毒的手段抢走日本的军事成果，在幕后瓦解了1902年英日同盟，以军备限制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发展海洋力量。

最刺激极端民族主义者神经的就是限制日本海军的发展。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日本同意将其战列舰的合计吨位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总数的60%，实现5：5：3的比例。该条约折射出了“一战”后西方列强的共识，即列强之间不能再度出现劳民伤财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日本对太平洋以外的海域少有军事投入，所以降低其上限也在情理之中。日本可以将所有舰队停靠在本国周边，而美国和英国则还需要担心大西洋海域。5：5：3的比例得到了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协议的认定，并且也适用于辅助舰。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大部分日本精英——包括昭和天皇、皇室随从、文官大臣，甚至大部分海军高级将领——支持这一协约体系，认为它可以限制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和造船业的潜力。就连那些想要征服亚洲的人也认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慢慢地增强日本的实力。日本海军可以遵守协约规定的上限，同时通过募兵和积极训练加强海军人才的实力；而且削减战列舰的规模可以使日本将重

点放在协约国未加限制的其他舰艇上，包括航母和潜艇。最重要的是，当时日本的工业经济仍然脆弱，刚刚起步，裁军协议免去了日本参加军备竞赛承受的经济负担。海军开支在1921年已增长至日本财政预算的31%左右，裁军协议使海军开支在1923年降到了财政预算的21%。^[61]在签署协议之前，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军事限制和海军裁军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让急需缓解财政压力的日本松了一口气。

日本的强硬派并不关注经济问题，认为这与他们无关，而裁军协议的支持者很晚才意识到裁军激怒了强硬派。人们对国会的不满日益严重，被诟病最多的是经济问题以及强行通过裁军协议的决定，在批评者看来，这降低了日本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能力。1 700名准士官、少尉及以上的军官和5 800名士官被从海军中裁撤。每十名海军中将里有九名被迫退役。1922年，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学员人数只有前一年的1/5。^[62]之前海军一直是日本最有前途的行业之一，但那时突然变成了死路。裁军协议终止了日本海军最为珍视的“8—8舰队”的计划——8艘战列舰和8艘重型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舰队。这对于日本的造船业是个重创。造船业是日本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业产业之一，海军订单骤减和私人订单数量下降导致造船厂只能关门并辞退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辞退的工人数可能达到了雇工人数峰值的2/3。日本的主要造船中心，例如长崎等，都遭受了重创。全新的4万吨战列舰“土佐号”造到半途就得自沉。5万名长崎造船厂的工人和长崎市民看着十几艘拖船拉着新建的巨大船体驶向大海。它被运到吴港当作实弹射击的靶子，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羞辱：这艘弃船的残骸沉于土佐湾，它正是以这里命名的。整整一代日本人将“土佐号”的命运视为一个闹剧、一场暴行、一种不公平的背叛，他们认为它是日本外交失败和腐败的牺牲品。^[63]

然而1930年4月22日，在圣詹姆斯宫签署的《伦敦海军条约》又将5：5：3这一比例限制延长了6年。日本反对者抗议批准这个条约。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称：“日本就像被英美列强捆绑了手脚，扔进了监狱！”^[64]这并不是一场日本民众无法理解的深奥争论——从1930年开

始，5：5：3的比例变成了一种煽动性诱因，能够轻易把日本人动员到街头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极端民族主义记者、学者和军官造成的。他们拿起笔和话筒，痛骂遭人痛恨的海军条约，称其为西方列强迫害日本的标志。自从佩里1853年叩开日本国门，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以赢得国际尊重为目标，从而最终得到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对待。日本人并非仅仅把各种条约视为外交政策的权宜之计，也将其视为衡量日本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这种态度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有的。百分之六十？日本就值这个数？

1930年10月1日，天皇的枢密院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对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付出很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那一天成了日本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天释放的邪恶力量，直到1945年才被完全驱散。在海军内部，该条约使得一直支持协约规定的限额的高级军官（“条约派”）和正在兴起的强硬势力（“战列舰派”）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山本五十六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但他在政治上足够精明，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不时出现的党同伐异事件中免于被罢黜。）加藤大将抗议美国在伦敦的提议：“这项提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霸道，它就像是一个没有馅儿的馅饼皮。”受人敬重的东乡平八郎将军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他认为伦敦的条约将给日本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65]海军和陆军中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文官和外交家正在插手本该由军方负责的领域。批评者指责那些支持条约的人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已经私下被西方收买。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文官回到自己该待的位置，让军方重新控制日本的命运。这无疑是天皇的意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起帝国主义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后来很快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那里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煤炭、钢铁和铜矿。日本方面称有一些与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土匪”发动了起义，破坏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段的铁路线，“九一八事变”是对此所做的回应。但实际上，整个事变都是日本陆军参谋部的中层军官密谋发动的（铁路也是日军自行炸毁，栽赃给

中国的），东京的几十名甚至几百名高层军官和文官对此毫不知情。1932年，中国的东北地区被重组成名为“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国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选为傀儡皇帝，执行的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

国际联盟谴责这一行为，日本代表抗议退席。这导致日本在国际外交领域受到孤立，而这正中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下怀，因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执行侵略和征服的政策了。对于军方的行为昭和天皇可能很震惊，但是他不愿意惩罚那些凶手；只要军队能够取胜，裕仁就默许军队占领中国东北的行为。内阁和元老建议天皇把“九一八事变”当成既定事实，裕仁听从了这一建议。^[66]这是稳定国内形势的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看，裕仁对此无所作为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因为这壮大了军方在国内外进一步采取侵略行为的胆量。色川大吉令人信服地写道：“如果昭和天皇真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渴望在那个时代当一个爱好和平的立宪君主，那么在1933年军方开始大肆侵略别国的时候，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表明立场。在那以后再想对付军国主义者就很难了。”^[67]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在政治不稳定的封地中，低层武士就曾用类似的方式操控上级。）20世纪30年代，这些造反的军人做起事来就像恶棍一样，是穿着军装的流氓，他们提起天皇的时候似乎很尊敬，但用天皇的名义威胁别人，然后打着“借贷”的旗号索要贿赂，要想不受伤害就得按他们说的去做。三井、三菱、住友等主要财阀资助这些团体，很难说是为了在一个受军方控制的国家拓展公司的利益，还是为了保护主要的企业家不被暗杀。也许这两种动机都有。在伪满洲国，与军方有关的帮派实施勒索、敲诈、诈骗和绑架：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但有时候他们也向日本同胞下手。^[68]1929年，大臣滨口雄幸得到昭和天皇的支持上台，他因田中义

一将军没能控制住军队而恼怒，并且实行文官统治；但是次年年底滨口雄幸遭人枪击。^[69] 1931年，有两起政变被镇压，但是真凶仅仅受到了象征性的谴责。没有任何人被以叛国罪起诉，领头者依然逍遥自得，甚至在东京的茶馆里与艺伎厮混，毫无忌惮地吹嘘他们的所作所为。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用华丽的辞藻和观点宣扬自己，广播、电影和报纸全都大肆捍卫和赞扬他们。

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任何阻挡他们的人都会被暗杀，包括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别的文职大臣。1932年5月15日，一群海军军官穿着军装闯入了77岁的犬养毅首相家中，把他枪杀了。他之所以遭到枪杀，是因为他曾提醒天皇，现在军方几乎是无人节制，为所欲为。（当然，刺杀首相证明他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裕仁没有办法惩罚那些凶手。）那些人的同伙还袭击并占领了其他私人住宅，以及东京警察总部、立宪政友会的总部，还有几家银行。他们希望罢免文官政府，大谈“昭和维新”，即天皇掌管所有的权力和财产，同时执行偏向军方的政策。^[70] 海军高官察觉到了一些风吹草动，但和往常一样，并未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

5月15日首相遇刺后，事情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肆意妄为的暗杀行为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军方控制政府的时期。造反者称议会政党民主制在本质上“不符合日本国情”。被暗杀的首相的政党就此消失。从那时起，日本政府不再是议会制政府。国会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不再担任首相。首相和其他内阁领导人通常不再从国会中选出，而是从军方或皇室贵族中选出。^[71] 1933年12月，国会领导人公开质疑1934年的军费预算，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利用媒体斥责其批评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谋。对于政客来说，那样批评军队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一份声明说：“这一运动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军队上转移开，企图打乱公众的和谐统一，而这恰巧是国防必要的基础，所以军方领袖不能忽视这一点。”^[72] 所有反对伪满洲国的军事行动以及更高的军费开支的文职政治家、官员、贵族和商业大亨都被列入“死亡名单”。通常只需口头威胁就会让他们闭嘴，如果威胁不够的话，那就用子弹。

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可以行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他们能做的不过是想方设法平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使用的都是由来已久的方法，比如委曲求全和绥靖，他们希望暴风雨会过去，军方的民族主义者会慢慢衰弱。等待，想办法活下来，避免把事态扩大，寄希望于未来——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者选择的道路。他们认为，假以时日，钟摆迟早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并没有。最终，他们被迫放弃过去坚持的不同意见，转而高呼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皇道神官的口号。奇怪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压制，还是一种精神的劝诫。迫害是有选择性的。退休的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经（在一篇20年前的法学文章中）错把天皇称为“国家机关”。这个老人被公开抨击，被迫从贵族院辞职。美浓部达吉所有过去的书和文章都被找了出来并被烧毁。同行纷纷对此保持沉默。有人请冈田启介首相为美浓部达吉辩护，首相的回答反映了当时的潮流：“我们承担不起犯错的代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顺从的态度。”[\[73\]](#)

有时也不需要采取高压的手段。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很多支持者。年轻的军官们沉浸在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中。他们被誉为“浪人”的精神后裔。浪人是幕府时代没有主人的武士，幕藩体制瓦解后，这些骄傲的战士就像流浪汉一样从一个城镇游荡到另一个城镇，身无分文、忍饥挨饿、遭受羞辱。“日本有个传统，就是同情那些逆流而上的人，哪怕他们的理想或追求是不合时宜的，”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后来创立了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解释说，“日本有许多民间英雄是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为此献身的人。”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都被视为“忠臣”，“对天皇忠诚无比”，是最纯洁、最高贵的人。他们可能违犯了法律，可能杀害了内阁大臣，可能未经批准就在海外展开冒险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前日本的逻辑中，只要他们是为了天皇，那么他们就不算是大错特错。[\[74\]](#)

和欧洲一样，大萧条在日本也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压力，并且将日本社会转化成一个受压迫者和赤贫者的大熔炉。日本一片混乱，到处

都是贫穷、饥荒、极高的失业率、地主和佃户的争端、产业工人的罢工，一大批银行破产，银行遭到挤兑，曾经雇用大量日本人的许多地方小公司和小工厂破产倒闭。1930年，大约就是《伦敦海军条约》签署的时候，大米和丝绸价格降到最低点，在本州遥远的北部，全家人都要出去流浪。他们瘦得不成人样，衣衫褴褛，处于饿死的边缘，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沿路村庄里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冲他们破口大骂。无力喂养孩子的父母只能把孩子以几千日元的价格卖去为奴。根据日本政府搜集的统计数据，1932年至1934年间，在经济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北部几个县中，被卖掉的女孩多达58 173人。她们会成为仆人、女佣、服务员和妓女，还有一些会成为艺伎。^[75]成千上万名年轻男子参军入伍。

日本当时的人口是7 0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当时日本的出生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每平方英里适宜耕种的土地上有2 900名居民。很多人认为，如果人口再增长，日本人只能移民海外。日本自然资源稀缺，石油、橡胶和矿产都需要进口，日本生产的商品则需要进入国外市场。^[76]在亚洲夺取领土是一种对策，其思路类似于希特勒说的德国人需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77]数百万日本人，尤其是来自内陆农村小地方的人为了更好的生活移民到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78]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日本急需对外殖民，建立海外的帝国。反对他们就无异于与国外势力勾结，想把大量日本民众困在岛上，让他们饿死、挤死。

1936年2月26日，驻扎在东京的陆军第一师的一群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原因是他们要奉命前往伪满洲国。黎明之前，大约有1 400名军人离开基地，分散到东京各地。他们控制或者说包围了东京市中心的主要政府大楼，包括国会、陆军省和警视厅。《朝日新闻》的主要建筑遭到袭击，印刷设备被砸。他们侵入了首相和几名政府首脑的住宅，暗杀了几名官员，包括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在刊于报纸上的宣言中，起事者称他们的目的是打破商业巨头、政党官僚和老年文职政治家的控制，还宣称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宪法的约束——用一

个术语说就是要实行“昭和维新”。他们宣称“日本现在面临着危机”，“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恰当的方式，杀掉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在去往满洲的前一夜，我们想通过直接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79\]](#)

他们希望引发一场广泛的革命，希望至少能得到陆军和海军的支持。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有很多支持者，许多日本人似乎将他们视为英雄。[\[80\]](#)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东京的局势悬而未决：将军们没有镇压叛乱，也许是想看看它的规模是否会扩大。昭和天皇很是愤怒，而且很显然，整个东京只有他一个人将这次事件称为兵变。当内阁想辞职时，他拒绝了，他跟大臣们说，他们的义务就是待在办公室里处理难题，哪怕要冒生命危险。最后昭和天皇发布了强制命令，要求军队回到兵营，使这场运动失去了动力，随后海军被派去恢复秩序。2月29日，起事者本来想进入皇宫，向天皇直接请愿，但是失败了，动乱也随之结束。几名领头者被逮捕，另有数人自杀。两名被捕的领头者被秘密审判，后来被枪决，死的时候向天皇大喊“万岁！”。[\[81\]](#)

这场短暂的危机过去了，但就像1932年一样，天皇总是很快就让能过去的事情都过去，结果只是增强了军方的力量并且使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更加胆大妄为。新政府同意了右翼势力的要求，即所有内阁成员的任命都要通过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批准。政党现在完全失势。后来发现，那场行动就像当时的很多行动一样，在陆军上层已经是尽人皆知。就连皇室成员似乎也提前知道了消息，并且对起事者怀有同情之心。起事的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军衔在大尉以上，更高级别的军官提前得知了消息，但按兵不动。的确，有理由推测，如果天皇支持的话，许多人都会支持这场行动。但是，表示了同情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广田政府的陆军大臣寺内将军后来这样评论1936年的事件：“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当中，有些人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知道这个计划。然而他们保持了沉默。有些人直接怂恿他们采取行动，另一些人保持了沉默。一群可耻的人聚在了一起。但是如果让所有参与其中

的人都辞职的话，很难找到接替者。”^[82]

这群密谋者就算没有得到公众明确的支持，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在宣言中为贫穷的农村争取经济利益，要求制止政治腐败，这在形式上和观点上都是令人敬佩的。在事件过去一年后，几名幸存的刺客接受审判时，媒体呼吁实行赦免。这场失败的行动的领导者被歌颂成国家的良心，正直的爱国者，忠臣的守护者，意在打击腐败而胆小的政府高层。^[83]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和入侵中国东北一样，“七七事变”的诱因也是一件“小事”——这次是中日军队在北京城西的卢沟桥地区发生了交火事件。战斗很快升级，日军部队大规模从关外进入华北。日本陆军作战效率高，节节取胜，另外日军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无论日军占领了多少土地，中国军队都顽强抵抗，而且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也在敌后坚持抗日。日军迅速调集大批部队，而这些行动都没有经过东京方面的批准。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12月日军占领南京，犯下了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之一。日军杀害了30万以上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受害人数可能更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在鲁莽的将领的纵容下，日本士兵实施强奸、迫害和大规模屠杀。对于日军的罪行，就连希特勒派驻南京的外交官都大皱眉头。

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想当然地将日本的航空队想象成只有几架欧洲淘汰下来的过时飞机，而飞行员比碰撞测试用的假人好不到哪里去。但实际上日本海军秘密发展了本土的飞机工业，并且训练了大批精英飞行员。日本海军领导人没有忽视潜在的对手。日本驻美国和欧洲的海军武官参加航空展，阅读航空杂志，并且与欧美的飞行员和工兵攀谈。只要有可能，日本政府就会购买西方的飞机并且运回日本。他们制造经过授权的欧式飞机，稳步提高其制造能力。1935年，日本海军照着美国航母“萨拉托加号”仿造了一艘同等大小的航母，并且将其当作靶子练习空袭。多年来，日本一直学习并借鉴西方的技术，但到了20世纪30

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工业已经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新的飞机；到1936年，三菱、爱知、中岛和川西四家公司已在秘密制造世界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轰炸机和水上飞机。但是日本的工业基地仍然规模较小且刚刚起步，只能仰仗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机械师，靠分散的分包商手工制造元件，依赖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太田、吴港和川西的一些大型研究中心和装配工厂。日本能制造出如此精良的飞机是了不起的成就，证明日本有创造天赋、有野心，但是日本的工业并不是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一年，这一问题变得越发突出。有人说一幅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就设想这样一幅画面：一架造型美观的崭新战斗机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一群牛在印有车辙的土路上拉着它，慢慢经过水稻田和破败不堪的村庄，从名古屋飞机制造厂把它拖到各务原市机场接受飞行测试。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海军基本上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飞行技术了。此外，海军又启用了两种三菱公司制造的飞机，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A5M九六式舰载机（盟军代号“克劳德”）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使用的单翼舰载战斗机。该战斗机有着光滑的铝制机身，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50英里，爬升速度快，是空战的冠军，轻易地打败了中国军队使用的苏联产I-16战斗机。第二种飞机是双引擎陆基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可以运载重达1 764磅的鱼雷或者炸弹，飞行里程可达2 365海里。G3M后来升级为G4M（“贝蒂”），荷载量一样但是战斗范围增加到了3 000海里以上。这两种舰载攻击轰炸机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为日本海军研制出来的。1939年12月，爱知D3A1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瓦尔”）投产。它有固定的起落架，所以即便距离很远也能很容易地认出来（1941年时日本使用这种设计是让它具有一种过时的假象，因为那时在航空领域收放式起落架已经成了标配）。但“瓦尔”是一种完美的俯冲轰炸机，作战范围超过900英里，以80度角俯冲攻击时仍非常稳定，可以进行准确的轰炸。在经验丰富的日本航母飞行员手下，“瓦尔”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武器。中岛B5N2九七式舰载机（“凯特”）是高空飞行的水平轰炸机

或鱼雷轰炸机，担任后一个角色时杀伤力往往更强。“凯特”是一种下单翼大型轰炸机，配有长长的玻璃座舱，作战范围超过600英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35英里。在1941年，“凯特”无疑是太平洋地区最强的鱼雷机，远胜美国的对应机型——道格拉斯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它还配有800千克级的91型空投鱼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最可靠的鱼雷。

A5M九六式（“克劳德”）的后续机型是零式战斗机，它的发展过程是日本航空史上的一个传奇。日本海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它要能与中型轰炸机一起深入中国腹地执行远距离任务，所以海军要求三菱制造一种在速度、机动性、航程和爬升率方面都无与伦比的飞机。刚开始人们怀疑日本造不出如此完美的飞机，后来聪明的航空设计师堀越二郎及其团队成功找到了一种方法，制造出了这种在每个方面都超过原先预期的飞机。^[84]零式战斗机的操纵面非常灵敏。飞行员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飞机，因为它极易操控，对指尖的动作非常敏感，飞行员经常说，它就像是自己身体的延伸。1940年，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的空战，在空中所向披靡。在空中缠斗时这些飞机几乎总是占上风。它们能把敌机击落，又不会被敌人的火力击中。在这种情况下，零式战斗机缺少装甲以及自动封闭油箱的缺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零式战斗机机体轻，速度快，续航力强，极易操作，且载弹量大，也就是说零式战斗机极适合中国的空战。^[85]

日本取得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本五十六。1924年，他在海军举步维艰的时代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了日本航空业的未来上面，那时他40岁，是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大佐，他申请担任霞浦航空队总教官并得到了批准，那里是“日本的彭萨科拉^[86]”，位于东京北边大约50英里的土浦市附近。后来他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航空职务，有的要出海，有的坐办公室：1928—1929年，“赤城号”航母舰长；1930—1933年，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1933—1934年，第一航空战队司令；1935—1936年，海军航空本部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即使官至海军中将，山本仍坚持

亲自乘坐每一种海军飞机，哪怕是在执行最危险的训练任务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航空事业刚刚起步时的艰难，他和日本海军的飞行员建立了一种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一直维持到1943年山本死去（似乎是天意，山本是乘坐飞机时死去的）。

山本要求进行高强度的日常训练，他清楚许多飞行员的生命可能很短，但是又坚定地认为这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赤城号”的舰长，他下令将“赤城号”上死去的飞行员的名字刻在他舱室的墙上。船员们有时看到他满含泪水地念着那些名字。但是他没有因为安全问题而降低要求。“海军的航空部队要想真正变得强大，我的舱室里可能必须刻满名字，”他跟飞行员们说，“我想要你们在飞行中记住这一点。今天我提议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飞机上和教官们飞上五六圈，飞完后你们就可以来找我报告了。”^[87]

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有时会直接进行飞行训练，就像美国那样；但是在日本，很多飞行员是从已经在舰队服役的士兵以及士官中招募的。在海军航空兵中，少尉及以上的军官成为飞行员的人一直很少，毕业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的人成为飞行员的更是寥寥无几。日本的大部分王牌飞行员是士官，就像多贺谷修牟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承担了大部分飞行任务，进行战斗，最终付出了生命。”^[88]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15岁至17岁的青少年从学校直接应征进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这个项目被称为“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为了激发学生对该项目的兴趣，海军在学校进行了飞行表演。学生们（甚至包括年龄最小的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立正站好，看着飞机从屋顶上轰鸣而过，通过倾斜机翼致意。佐藤秀夫（Hideo Sato）记得在东京郊区的学校里看过这种表演。飞行员扔下小降落伞，上面挂着橡胶球。那时他8岁。“我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孩子吸引到战争中，”他说，“无论事实如何，我只知道轮到我上前领球时我超级兴奋。”^[89]

战前的日本海军痴迷于打造一群人员较少但是素质极高的飞行精英，选拔的标准相当严苛。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中只有不到1%的

申请者通过最初的笔试，有幸通过的少数人在后来严格的体测中又被刷下来很多。被选出来的可谓凤毛麟角。他们被送去进行基础训练，每天早晨都要5点起床，然后被迫泡在冷水中。学员们冲向练兵场，向皇宫的方向弯腰致敬，向天皇效忠发誓，然后进行艰苦的训练。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能跑不能走，而且每时每刻都要如此。三餐都很清淡，米饭混着大麦，配味噌汤和腌咸菜，偶尔有鱼或肉。学员们到练兵场操练，进行基础战斗训练，或者在教室里学习数学、科学、工程、阅读和写作。一张当时的照片拍下了学员们坐在长桌旁的条凳上认真听教员讲课的场景。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整洁白色军装，佩戴着椭圆形的姓名牌。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面容专注、坚毅。^[90]每名学员都必须达到最低平均分，否则就会被开除，班级的名次总是根据学习成绩决定。他们睡在兵营墙上挂着的吊床里，就像是18世纪下甲板上的水手。

在中途岛之战中驾驶鱼雷轰炸机的前田武（Takeshi Maeda）曾在东京湾横须贺海军基地接受基础训练。每天他和其他学员都要在东京湾度过好几个小时，无论天气如何都要划着敞篷的小船训练。“由于身体和座位之间的摩擦，我的裤子上布满血渍，”他回忆说，“然后你的皮肤会感染，开始流黄脓。……我去医务室看病，医务人员在伤口上抹点药膏，绑上纱布。第二天，当我在小型武装艇上训练时，类似的事情会再次发生，旧伤口会裂开，特别疼。”^[91]

学员们还会受到高年级学员、教官和军官不断欺凌。学员们只要不听话、犯错、回答有误或者抱怨，就会马上受到惩罚，有的被扇耳光，有的被一拳打在脸上，还有的甚至被棒球棍猛打。^[92]学员可能要被迫踮着脚站立一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或是立正站好然后让士官不断扇耳光，或是弯下腰让施虐者用棍棒不断击打臀部。学员支撑不住倒地后，仍会受到拳打脚踢。就算再疼也不准哭喊。一个学员被无端认定犯了错，整个小队的人都会遭到残忍的虐待。如果骨折了，那么学员就会被送进医院，伤愈后则会被编入后来的班中。

坂井三郎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曾

经在深夜时分被从吊床中拖出，同伴们睡眠惺忪，震惊地看着他被打。士官逼他弯下腰，“让我臀部朝上，然后他拿出一根大木棍，使尽全力打在我的臀部。打得特别疼，疼了很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一边挨打一边数数儿，有时能数到四十下。我经常在疼痛中晕死过去。但是就算失去意识，也逃脱不掉折磨。我倒在地上后，士官会把一桶凉水泼在我身上，大叫着让我醒过来，然后继续他的‘惩戒’，直到我改正错误他才住手”。^[93]前田武看到一位同伴受到类似的暴打后感到一阵苦涩：“一个人怎么能用棒球棍去打另一个人？”^[94]

那种殴打是日本军中的事实。事实上，暴力殴打在陆军中更加猖獗。胆大妄为的施虐狂是罪魁祸首，这毫无疑问；但是暴力还与一种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在陆军中很普遍，在海军中则相对没那么流行，它认为殴打对人有好处，可以让人更刚毅、更坚强，能让人做好战斗准备。陆军士兵渡边胜美（Katsumi Watanabe）曾被殴打，他说军人坚信“殴打是一种教育”——的确，殴打经常被称为“教训”。^[95]坂井三郎说，持续的暴力将招募的士兵转化成“人畜”，他们“从来不敢质疑命令或怀疑权威，除了立刻执行长官的命令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机器人，只会执行命令，不会思考”。^[96]对于这种暴行，海军的政策似乎不仅是容忍，而且还鼓励；前田武说最暴力的教官会晋升。^[97]学员们不能反抗，也不能提出正式的抗议；他们不能退出，也不敢冒被开除的风险。他们一旦被军队开除，就会给家庭带来耻辱——这种耻辱与西方人所说的耻辱不是一回事。^[98]被开除者的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社会排斥，甚至是迫害。那种压力是极其巨大的，很多年轻人进退两难，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也在情理之中。

从基础训练中挺过来的学员被派往霞浦参加飞行训练。霞浦基地有两个长长的跑道，分别是3 000码^[99]和2 200码，还有一个巨大的机库，里面有数百架飞机。通往大门的主干道两旁是盛开的樱花树，机场

外是霞浦湖。第一年飞行学员每天的行动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偶尔仍会被扇耳光或者吃上几拳——但是在这里至少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抽烟、喝酒，周六下午甚至还可以去土浦。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理由就会被开除。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学员们一整天都在教室里上课，课程内容强调水上飞行、机械维修、无线通信等实用技能。学员们每晚熄灯前都会埋头苦读两小时，许多人还在简易的小床上偷偷地打着手电筒再学几个小时。这样的课程，其设计目的就是无情地筛掉那些表现不好的学员。就连那些在课堂上和战场上表现都很好的学员也经常因为一些小的冒犯行为而被开除。坂井三郎的班里有70名学生，在为期十个月的初期训练结束前，有45人被开除，而且他说，“人们担心被开除甚于担心被殴打”。[\[100\]](#)

霞浦旨在打造超级飞行员骨干队伍，用严格的训练机制培养一批有优良身体素质的飞行员。学员们要进行体操和杂技的训练，以提高力量、平衡感、协调性和反应速度。他们要倒立用手走路五分钟；在夏日热浪中穿着一身华达呢战斗服跑好几英里；从塔上跳下，在空中翻跟头然后双脚落地。他们被要求用一只胳膊夹住铁杆，吊着身体，在上面坚持十分钟。不会游泳的学员腰上绑着绳子，被扔进湖中，如果他们沉进水里，就会被拖到水面上。每个学员最后都会被要求在30秒内游50米远，潜水至少50米深，并且在水下憋气至少90秒。[\[101\]](#)

学员们还被要求进行激烈的摔跤比赛。每一轮结束后，获胜方可以离开，而疲惫不堪的败者则必须待在场上进行下一轮比赛。虚弱的或者是身材瘦小的学员在连续输掉三四次比赛后，可能就完全没有了力气，可是，他仍然要比赛，直到他把另一个人摔倒，否则他就会被班上的所有学员挨个摔倒一次。如果那个一直失败的人运气不好，没有站起来，那么他就会被开除。“每一个受训的学员都绝不想被开除，所以摔跤比赛的竞争特别激烈，”坂井三郎回忆说，“经常有学员被打晕……他们被水泼醒或者被其他方式叫醒，然后被重新送上赛场。”[\[102\]](#)

他们还要进行视力方面的训练。他们被要求认出从眼前一闪而过的

物体或者标识。他们学着用眼睛最外围的余光发现和识别物体。坂井三郎说，教官让他和其他学员在大白天找到并且识别星星。“经过越来越多的训练，我们在找星星时逐渐变得越来越灵敏。然后我们的训练更进了一步。看到某颗星星并且将其定位后，我们会转过头去再转回来，看看能不能立刻找到它。那些都是飞行员必备的素质。”那里还有一些练习来缩短人的反应时间：有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作响时，学员们要坐着一动不动，学着用手抓住苍蝇。坂井三郎回忆说，一开始很少有人做得到，“但是几个月后，在我们面前飞过的苍蝇几乎都会被我们抓住”。[\[103\]](#)

教官使用古老的剑道理念来教育学员如何攻击并打败对手。飞行员们要跟着禅师一起长时间静坐，禅师会教他们气沉丹田，排空思绪，把战斗看成是轻松的体验，让手和脚在驾驶舱里的行动不受意识干扰。[\[104\]](#)

经过了一年的初级训练之后，学员们会到达一个终生难忘的里程碑——首次飞行。他们第一次起飞开的是T3型初级教练机——双座、双重控制、敞开式座舱双翼机，马力130，五缸发动机。教官坐在前面的机舱里，学员坐在后面。前面椅子后有一个话筒，连接在学员的飞行帽上，可以进行单向通话。飞机一飞上天，教官就会考察学员的基本飞行能力。他的手眼协调能力怎么样？控制飞机是否从容？能否保持直线和水平飞行？表现最从容的学员可以控制飞机的起降，少数人甚至第一次就获准单独飞行。根据最初的这些评估，整个班会进一步细分，并且决定每个人未来的飞行课程。有些人会成为飞行员，有些人是空勤人员，有些人开陆基飞机，有些人则开水上飞机。

掌握了基础之后，学员们会接触更强大的中级教练机，即九三式“红蜻蜓”双翼机。这种飞机用的是九缸星型发动机，有300马力。学员们坐在机头座舱里，前面的视野一览无余，同时教官可以在身后敲打他们。[\[105\]](#)（前田武回忆说，他的教官经常用话筒大喊“你太蠢了！”，并且用木棍敲他。为了保护头部，他在皮质的飞行帽里面缠了

一层毛巾。教官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等到飞机落地后，他命令前田武摘下帽子立正站好，把他未完成的惩罚宣泄出来。）[\[106\]](#)通过“红蜻蜓”，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飞行技术：翻转、旋转、翻筋斗、悬停。学员首次单独进行陆上长距离飞行，是在敞开式座舱里飞行在1.5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往往通过富士山雄伟的圆锥轮廓指引自己找到返程的方向。学员会进行编队飞行，先是三架飞机的小“品”字形编队，再是九架飞机的大“品”字形编队。他们还要在机舱外覆盖一层帆布的情况下，学会使用仪表飞行。

在中级训练结束时，学员们要经过严格的综合测试。如果通过测试，学员就会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翅膀”，即飞行资格，标志是缝在左袖上的荣誉徽章：一双翅膀在樱花下叠于锚上。虽然训练还远未完成，但是现在这名学员可以自称海军飞行员了。

为期五六个月的“扩展教育”是在可作战的飞机上进行的，这些飞机通常是从前线退下来的淘汰机型。（令人欣慰的是，赢得飞行员资格的人很少会被殴打。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飞行员有权力殴打比自己资历浅的人，而且他们经常这么做。）飞行员或是被分到航母上，或是被分到双发陆基机部队中，航母飞行员又细分为战斗机飞行员、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和鱼雷轰炸机飞行员。现在他们的训练开始侧重于射击、轰炸、空中缠斗、编队飞行和水上飞行。战斗机飞行员的射击目标是绑在另一架飞机上的拖靶，射靶记录相机会记录他们的射击成绩。轰炸机要练习攻击地面目标，结果会被仔细地测量和评分。进入航母飞行中队的飞行员是一步步训练的，先是在很短的跑道上降落，再练习低速、低空接近航母，接着练习“连续起落”（触碰甲板，然后不熄火重新飞起来）。最后，他们被允许放下尾钩，第一次将飞机降落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

平均飞行了大约500小时后，他们会被派往前线，进入海军基地或者在航母上服役。[\[107\]](#)士官和招募的飞行员会成为航空一等兵，军官则会获得尉官军衔。他们与老飞行员一起完成最后的飞行训练。训练日程安排得很紧密。新来的飞行员要经常训练飞行：早上飞，下午飞，有

时晚上也要飞行。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的就是在与美英开战之前日本海军高强度的训练。周末成了过去时，现在一周变成了“月月水火木金金”[\[108\]](#)。[\[109\]](#)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托马斯·沃尔夫曾如此写道，他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日本海军新培养出来的飞行员身上。那些穿着蓝色和黄色军装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在训练完成后回家看望亲人，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当然特别高兴，他们自己也是。他们给亲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提高了整个家族在邻居、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地位。他们变得更壮、更强、更坚毅、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他们回家后注定会感到痛苦，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离家的日子里，他们可能每一天都在想家。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那里没有折磨殴打，也没有严格的训练。但是，回到家后，他们震惊于家乡的舒适、安逸、混乱和迷茫。家乡的现实与他脑海中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残酷但有目标的生活，而家乡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和以前一样爱家人，家人们也和以前一样爱他们；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隔阂竟是如此之大，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亲人没办法完全理解他们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也难以理解他们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个秘密只有他们的同学、那些被选出的寥寥几个人知道；他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磨炼，共同体验了疲惫、羞辱、殴打、剥削、对于被开除的恐惧、飞行的喜悦还有获得飞行员资格时的狂喜。他们可能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但飞行员同伴对他们来说确实比亲人还要亲。飞行员才是一家人。他们没办法再回家了，因为现在海军就是家。

1937年至1941年间，日本的海军航空兵控制的中国领空范围越来越广，控制力也越来越强。这四年间，日军对中国南方的广阔地域享有制空权。航空队的军官们越来越自信，认为日本海军应该减少对战列舰的倚重，将大部分资源用来制造更多飞机和航空母舰。源田实是一个表现很抢眼的飞行员，以率队进行精彩的飞行表演而闻名，他一直抨击“大

舰巨炮集团”。在模拟空战中，源田实和队友总是能大败日本陆军的飞机和飞行员。由于陆军向来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所以源田实的成功极为令人骄傲。他帮助完善了日本零式战斗机杀伤力极大的“向里拐弯”招式，日机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用这一招式杀死了许多敌军。[\[110\]](#)

1936年，源田实少佐在东京军令部任职期间写了一份文件，强硬地宣称：“一场决定性战役的主要力量在于航空队，不应该再造战列舰了。”[\[111\]](#)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停止制造新的战列舰，而且还提出处理掉现有的战列舰。他激进地提出战列舰“应该要么报废要么用作防波堤的骨架”。[\[112\]](#)这简直是亵渎神圣的异端，与战略大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相悖。这是公然藐视海军的基本战斗原则：“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是主力舰队，它的目标是攻击敌军的主力舰队。”[\[113\]](#)源田实的对手散布谣言，说他已经疯了。

公然的批评在日本很少见，但这种做法确实又是日本航空队的典型文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军指挥中枢里有空军思想的军官屈指可数，没有任何一个飞行员得到过将官军衔。空军的主要提倡者是年轻人和初级军官，他们只有使用“非日本式的”强有力的表达和坦率才能让其他人理解他们的想法。（也许，所有国家的海军航空兵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特点：坦白地批评上级军官。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比船员们更需要尽早地完全依靠自己。）源田实得到了山本五十六的赞助和支持。山本让年轻的源田实得到了想要的职位，1940年时将他调入联合舰队，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谋。山本也参与了反对战列舰的活动。他拒绝接受所谓的“永不沉没的战舰”的说法，并且认为随着飞机的作战距离不断增加，攻击力不断增强，飞机迟早会结束战列舰独霸海面的局面。[\[114\]](#)“我不想泼冷水，我也知道你们都很用心，”他对战列舰上的海军少将福田启二说，“但是恐怕你们很快就会失业。从现在开始，飞机将成为海军中最重要的东西，大舰巨炮将被淘汰。”[\[115\]](#)

“大舰巨炮集团”当然不会让一群无礼的飞行员掌控日本海军。军令部料想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一过期，日本就会废除该条约，于是计划打造一支“超级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庞然大物每艘将重达6.4万吨，比最大的美国战列舰大50%左右。船上将配置18.1英寸巨炮。军令部认为，配备了如此火力和射程的武器后，无论敌人派出多少艘战舰，这种超级战列舰都会获胜。如果条约一到期就开始制造龙骨，然后以高度保密的状态造船，那么日本海军也许会比美国和英国海军领先四五年。此外，就算美国制造了同样重量级的战列舰，船体也会过宽，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人会再次面临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遇到的两难处境。从横须贺或吴港出发，日本的超级战列舰可能在美国海军尚未绕过合恩角时就已到达旧金山湾。

1936年，日本海军为建造两艘超级战列舰下了最初的订单，这两艘巨舰将在吴港和长崎建造；后来又订了两艘，在佐世保和横须贺建造。造船厂拿到舰船的要求后大为吃惊。“我们必须达到要求”，长崎的一名造船师说，“海军是信任我们的造船技术才给我们这个订单的。”^[116]这些船有263米长，38.9米宽，满载时排水量超过7.2万吨。640平方米的锅炉房里安放巨大的蒸汽涡轮机，马力可达15万，航速可达27节。有效航程7 200海里，需要携载燃料6 300吨。船员数量达到2 500名。^[117]这些船是“永不沉没”的（至少在1944年和1945年它们被击沉之前人们经常这样说）。敌舰射来的炮弹或者是空中扔下的炸弹对于这些船上40厘米厚的“蜂巢式”钢甲根本构不成威胁。船体有1 147个独立的防水隔间，每一个都可以密闭起来防止进水。即使该舰被10枚、20枚甚至30枚鱼雷击中，船体受到的破坏也能被控制住，能够通过人工控制进水使船体保持平稳。^[118]

理论上是这样。

这些超级战列舰后来被命名为“大和号”（在吴港建造）和“武藏号”（在长崎建造），它们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建造的，因为日本人担心，如果美国人知道此事，他们会立即开工建造类似的船。但是另一

方面，想在吴港和长崎拥挤的城市海滨隐藏这样巨大的项目绝非易事。造船厂周围建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新设的远远高过附近屋顶的高架移动起重机却没办法遮盖。海军高度注意安全保密工作，绝不允许任何计划或者文件从办公室里泄露出去。工兵不得看蓝图，合同必须当面握手达成，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讨论造船计划。工程师如果问了太多的问题，就会被叫出来接受警察的质询。长崎多山，整个造船厂从任何角度看都一览无余。但是满大街都是警察，谁要是敢朝巨大的“武藏号”瞥一眼，警察就会威胁逮捕这个人。造船厂里面设立了哨所，上面的哨兵用高倍望远镜不断扫视周围的山头。轮渡的窗户都涂上了漆，这样坐船往返的乘客就没办法往造船厂里看。最后，为了让人们看不到巨舰，造船厂挂起了足足有7.5万平方米的麻绳帘幕。

“武藏号”的内部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似乎有走不完的走廊、梯子、舱室，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船里面的路。设计师出于安全考虑，不给工人蓝图，工人们只能自己手绘粗糙的蓝图，而且这些图在每天工作结束后也必须销毁。许多工人不愿意在这黑色的大迷宫中走得太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再也上不来了。他们的这种担心也是合理的，因为造船厂的工人们确实经常迷路。有些工人会带几只粉笔沿路留记号，作业队会在下班时间点名，确保没有工人走丢。电气工程师在船上安装了8台600千瓦的发电机，以及密集的电缆网络，这些电能和电缆足够给日本很大一块农村地区供电。

1940年8月8日，“大和号”顺利下水。但是三个月后下水的“武藏号”情况复杂和危险得多。长崎港又小又窄，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坡。“武藏号”下水后，必须以大约15节的速度前进，如果速度控制不住，就会径直驶向只有740码远的对岸，摧毁那里的一大片房子，很可能把自己也毁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用钢索从港口停泊处连到船体上，一旦船进入港口，就使劲拉船体一侧的沉重链条。“武藏号”的下水工作非常注意保密，只有30人受邀观看，他们都是海军和政府中的高官。长崎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直到听到警报解除的声音。所有面朝海港的窗户都要拉上窗帘。“武藏号”下水时，就连被派往街上巡逻的警察也被要求

转过身来背对港口。

船体沿着下水滑道移动时，混凝土滑道上跳动着蓝色的火星，船下面的轨道冒出了白烟。观看的人们大喊：“万岁！万岁！”船只接触水的一刹那，激起的水浪涌遍了整个海港，撞向对岸，海滨的几幢建筑被水淹没，几十艘船被掀翻。但是“武藏号”成功下水了，巨大的战列舰漂在海面上，完好无损。工程师和工人们跌倒在地，有的大笑，有的大哭，大喊着感谢上天。[\[119\]](#)

在柱岛海军的主要锚地，“大和号”和“武藏号”使得日本的其他战列舰相形见绌。“长门号”、“陆奥号”和“雾岛号”都是传统的战列舰，大小和美国、英国的战列舰差不多，现在和巨大的“大和号”与“武藏号”停泊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巡洋舰一样。这些超级战列舰虽然庞大，但是船体非常漂亮，构造合理，船身宽敞，船头又尖又长，线条流畅。甲板上是平滑的柏木船壳板，没有上漆；配件则被巧妙地涂成黑色、白色、黄色和棕色；船尾上的名字是很漂亮耀眼的金色汉字；船首饰有精心装饰的菊花花环。[\[120\]](#)船的上层建筑有几百英尺高，甲板、阳台、梯子、高射炮以及各种尺寸、各种功能的升降架错落其间。舰桥高高耸立，军官们透过舰桥宽敞的玻璃窗能够俯瞰阅兵场大小的前甲板，站在那里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从一幢高层办公楼的楼顶看到的街上的行人那么小。就连重达15吨的主锚看上去肯定也没有袖口大。每天早晨都在船尾升起的“太阳旗”有将近25英尺长。[\[121\]](#)

“大和号”初次试航是在1941年10月20日，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六周之前。从每一个方面衡量，“大和号”都堪称完美。巨大的引擎运行顺畅，可以轻松达到27节的最大航速。[\[122\]](#)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它航行起来也十分平稳，船首能轻易地拨开巨浪。几个星期后，“武藏号”首次出海航行，其18.1英寸巨炮也首次进行了实弹射击。这些巨型武器装载的是每枚重达1.5吨的穿甲弹，比美国战舰发射的最大炮弹还重50%。这种舰炮的最大射程是42千米。将炮口仰角调到45度，以最大射程发炮，炮弹会从海平面高度飞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然后再回到海平面，总共需要

飞一分半钟。[\[123\]](#)从这一射程开炮命中率很低，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艘战列舰可以隐藏在地平线以下攻击敌舰。只要被它的炮弹击中一次，世界上任何一艘战列舰都将丧失战斗力，而其他等级的战舰则会被直接炸飞。

18.1英寸巨炮开火时冲击力太大，任何能直接看到炮口的人都会有危险。实弹射击的时候，“武藏号”上的船员要躲在舰桥或者下甲板上，或者在战舰另一侧的炮塔后面蹲着。他们必须戴上耳塞，并且找一个扶手抓着——即便如此，发炮的冲击力还是让他们感到“内脏好像突然跳到了嗓子眼”。甲板上靠近炮台的地方放了一笼子豚鼠，冲击力把它们震得“血肉模糊”。[\[124\]](#)炮弹发射出去之后，船员们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往外看，但炮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长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们看到远方的海面上溅起一个水柱，有好几百英尺高，但是从战列舰上看过去，那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白点。又过了很久，他们才听到远方传来的沉重爆炸声。

两年中，陆军（或者应该说是陆军里的一些小团体）有两次挑战过天皇的权威，还打着天皇的名义。“皇道派”意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统制派”在1937年策划了“七七事变”。这两次事件中，天皇半推半就的反抗姿态都使得军方更加猖狂，更加强大。1937年以后，军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上层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迅速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征募劳工来支持国防和军需产业。国家规定对食物和基本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农民被要求按照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将收获的稻米全部卖给国家。早就变得弱势的国会现已完全瘫痪。

每一种获得信息的途径都被牢牢控制了，包括广播、报纸、新闻短片、电影、海报、音乐和动画片，于是日本人民只能以规定的方式思考限定的内容。反对意见都被抨击为“极端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那些在过去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被迫离开政治生活，身陷囹圄，甚至更

惨。官方用各种口号将其认为正确的思想和信念强行灌输给日本人民：“战胜之前我什么都不渴求”……“一亿国民，一种思想”……“支持大东亚共荣”……“警惕间谍”……“敌军不停火我们绝不停火！”^[125]广播里日日夜夜放着悲伤的民谣，歌颂海外的战争，这些歌曲有《离港的船》《日本武士》《候鸟的眼泪和飞行》等。^[126]

西方电影在电影院里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在中国作战的专题片。影片中常有日本兵把敌人消灭，然后看着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伤心不已的场面，这时就会响起日本国歌《君之代》。这些专题片之间还会点缀一些新闻短片，开头是军乐，还有一个连续动画镜头——日本金色雄鹰张开翅膀覆盖了世界地图。战争新闻描述日本在海外取得了哪些新胜利。后方报道则描述日本普通民众是如何为战争做贡献的。如果有关于“皇室新闻”的报道，那么银幕上会出现一行大字：“脱帽！”观众们必须站直，脱帽，面向银幕（否则会被逮捕）。接下来播放的画面可能是皇宫的城墙或者天皇的车队，旁白使用的是只有在皇家典礼上采用的古典日语——但是天皇本人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127]

仇恨西方的情绪被用来激发民族精神。在政府批准的全方位宣传中，美国和英国经常被说成是密谋否定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神圣权利，和这两个国家开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西方的文化影响被诋毁为精神腐败，当局的目的就是“净化”或者“清理”日本，使日本不受那些外国思想的荼毒。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贝比·鲁斯^[128]去死吧！”，棒球也被批评为“腐化的贵族运动”。^[129]在一个流行的新闻短片中，一个柔道大师击败了美国的拳击手，观众们一片欢呼时，镜头突然切换成日军在中国东北取胜的画面。^[130]在东京的俱乐部里演奏爵士乐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最后连在家里演奏任何西洋音乐都不再安全。在一场名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全国性反奢华运动中，日本妇女被迫摘下珠宝，不再化妆，也不能穿西式服装和留西式发型。男人们被迫剪短头发，甚至剃成光头。脾气暴躁的官员来到东京的热门西式舞厅，

宣称“这种舞不能跳”“那种舞也不能跳”。^[131] 1940年10月，一项政府法令要求所有的舞厅都关门大吉。原清回忆道，东京有家舞厅在最后一晚演奏的最后一支音乐是《美好往昔》（《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光临的客人们听到后满眼泪水。^[132]

学校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的儿子，他的神圣血脉流淌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体里。^[133] 天皇的画像张贴在每一所学校中，是学生每天朝拜的对象。老师经常向学生大声朗读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教师或者校长在朗读这份神圣的文件时哪怕有轻微的错误，也要被迫辞职。佐藤秀夫记得有位老师解释说“神圣的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儿子，老师“讲的故事特别生动逼真，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那里，惊奇地瞪着圆圆的眼睛，心里感到这肯定是真的”。学校教育孩子们在用报纸包食物之前一定要确认报纸上没有印天皇的照片，否则油脂或者食物会弄脏天皇的形象。教室里也会密切关注战争动态。学生们有时会把日本国旗贴在地图上，标记进展和胜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痴迷地理，”佐藤秀夫回忆说，“我能记得远至印度的亚洲地图是什么样子。‘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名都有深层意义。那时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这些地方的形状。”^[134]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有些可悲，但是帝国主义者推行的计划中包含了一种衷心的、救世主般的理想主义。征服海外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目的是拯救亚洲（甚至亚洲以外）所有在黑暗中深受迫害的人。日本的目的和命运就是走出日本各岛，实现“八纮一字”，让天皇“一统天下”。^[135]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将宗教、政治、道德、爱国主义和家庭领域分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就是日本的国体显然要比其他文明高级。日本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强调人伦纲常，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关系。弱者会受到天皇的照顾和指引。天皇是统治者中唯一的神，也是神明中唯一的统治者：“天上仅一日，地上唯一君。”^[136] 日本为整个人类带来的最后的希望，是这个动荡而不幸的世界唯一的救赎。它给了日本人民一个理由，去相信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日本国的强

盛。战争开始时还是学生的板桥康正说：“如果日本宣布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日本的国土面积，我认为我们绝不会打到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137\]](#)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当局的支持下大肆宣扬歪理，称日本在很久以前曾经统治过世界，现在是要恢复那古老的世界秩序。“世界多地发掘的古代遗迹证明了日本编年史的真实性，”藤泽亲雄教授写道，“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在史前时代，全球人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日本天皇是领导者。日本作为母邦，深受大家爱戴，其他地区被称为属地或者是藩邦。……杰出的学者们一致得出结论，称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而是日本主岛中间的山区。”[\[138\]](#)古代日本人遍布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带去了日本文明的果实，他们甚至来到了欧洲，被称为“匈人”。[\[139\]](#)但是古代日本人乌托邦式的全球秩序理念在一系列自然灾害过后瓦解了，世界陷入了黑暗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地理位置上和精神上与母国日本脱离了，这破坏了世界的和平”。[\[140\]](#)由于反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只要支持这种论调，再离谱的话也不会有人认为愚蠢或者幼稚。京都帝国大学的小牧实繁教授称，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那就是日本统治的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被认为是独立的海洋，但这仅仅是欧洲人的观点。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七个海洋，只有一个，并且这个海洋与太阳升起之地日本相连。所有的水域都与日本相连。所有的海洋都是伟大的日本海。”[\[141\]](#)

日本会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殖民者永远赶出亚洲，带领贫穷的亚洲兄弟重返佛教和儒家学说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理念下，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因为这指向了来自西方的漫长压迫、贪婪、掠夺和虚伪。西方从亚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一点回报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说西方把工资压得很低，阻止工业发展，就是为了利用亚洲市场并且偷走亚洲的自然资源。而日本人却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其理念是“各国共存，谁也不会去掠夺另一个国

家”。^[142]日本宣称，“有色人种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却仅仅控制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一”，^[143]还说在有色人种当中，日本单靠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然而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野心，证明所谓解放亚洲人的理想不过是个谎言，他们的种种恶行经常让占领区的人民怀念西方殖民者。但是在战争初期，日本辉煌的胜利无疑激发了亚洲人民的自觉意识并且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独立的渴望。

如果日本是一个本质上道德高尚的国家，有神圣的使命，那么日本发动的战争就完全是纯洁、高贵、公正的。阻挡日本的敌人是“不守规矩的粗野人”或者匪徒，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恶魔。无论他们是什么，为了和平都必须把这些敌人杀掉。佛教宣扬怜悯与和平，但是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净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禅宗信徒却给日本的战争提供了道德支柱。佛教学者铃木大拙（本名贞太郎）称，当日本战斗时，这就是“佛陀怜悯之心的表现”。^[144]至于日本与东方佛教摇篮中国开战，他在1937年出版的《佛教与战争》中这样解释：中国的“污秽”给自己招来了战争，“改正不合理之处并且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才能最终受益。^[145]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让人满意，但是足以让人摆脱罪恶感。禅宗倡导“仁爱和慈悲”，铃木大拙说真正的禅宗信徒参与战争的原因与自我意识无关，不为手中之剑造成的后果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杀戮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把剑。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敌人出现了，让他成为受害者。剑就像是自动伸张正义一样，大发慈悲。”^[146]

一年又一年，日本在中国接连取胜，却始终不能赢下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大河的河谷地带和多座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南京。但是日本人发现，就算在他们兵力最强的地方，他们也没办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中国人，贫穷的中国农村地区是法外之地，难以治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几大地区的军阀分割，但是外国军队侵入中国，大肆劫掠，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毛泽东率领的游击队将枪口转向了侵略者，国共双方承诺停止内战，要

团结一心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1939年，一场战斗在苏联和中国东北边境处的诺门坎爆发。当地的日本将军（和往常一样）在没有得到东京许可的情况下调集大批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是日军遭到了苏军的有力反击。日军的失败令日本人相当震惊，尽管这场战斗基本上算是个秘密：双方都没有宣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安全地撤退到中国内陆的重庆，日本军队无法深入那里。蒋介石坚决拒绝投降，也不和谈。最终，日本38个步兵师，总共占日军整体兵力3/4的约75万名士兵被陷在中国战场。

中国的顽强抵抗以及后方的游击队让日军焦头烂额，恼羞成怒，于是日军在中国对普通百姓实施了大规模暴行。扫荡农村时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士兵们奉命“烧光、杀光、抢光”。^[147]在那可怕的几年里，日军发动了生化武器袭击；在中国人身上进行骇人的医学实验；凌辱大量妇女和女童，将她们当成性奴；抓捕大量男人和男孩并逼迫他们当苦力，一直干到累死为止；将俘虏斩首或刺死。日本人总共杀害了3 120万余中国平民百姓。“我已经没有了同情心，”筱冢良雄说，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成员，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毕竟，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相信所谓的‘大和民族’更高级。我们蔑视所有其他民族。……如果没有那种民族优越感，我们就不会那样做。”^[148]1941年被派往中国的年轻少尉富永正三回忆说，见到自己即将指挥的老兵时：“我看着那队士兵，非常震惊。他们的眼神是邪恶的。那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豹子或老虎的眼睛。……士兵们在前线的时间越长，眼神就越邪恶。”刚被派往中国的日本新兵被迫用刺刀刺杀中国人。受害者被蒙上眼，绑在木桩上。有时受害者的心脏周围会画上一个圈，士兵要**避免**刺这个地方，这样就会延长受害者的痛苦。如果有士兵因为这个可怕的入会仪式而退缩，那么他们就会被长官踢、被打、被刺。“来这里三个月之后，每个人都会变成魔鬼，”富永正三说，“只有当人性被压抑的时候士兵们才会英勇地作战。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我们在日本所受训练的一种自然延伸。这就是天皇的军队。”^[149]

西方国家很同情中国人民，新闻片段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苦难。罗斯福总统的医生回忆说，看到这些情景，总统从个人角度厌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并且“严厉谴责日军的非人道行为”。[\[150\]](#)还有一个事实：在日军占领区，有很多美国企业被破坏或者被迫关门，美国的企业利益受到了日军侵华的直接影响。英国和美国经过滇缅公路给国民党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1937年12月，美国炮艇“班乃号”在长江被日军飞机击沉。日美关系恶化，开战的前景赫然显现。脑子灵活的日本宣传家效仿他们以后的盟友德国人，把罗斯福描述为犹太资本家财阀统治的傀儡。他们说那些犹太人还编造了反日本的谎言，在美国媒体上散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害怕日本这个亚洲国家崛起而且憎恨日本，正在密谋打压它。日本媒体经常抱怨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包围孤立”。

但是，这种鲁莽的野蛮好斗什么时候结束，外交从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作用呢？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一个特殊的心理上的悲剧情结：最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的人却没有实权。日本并不缺有经验、懂世故的外交家，这些外交家毕业于哈佛、普林斯顿、牛津，会说流利的英语，能够与外国友人交好并且熟知外交礼仪。霞关的外务省有很多这样高素质的外交官。许多外交官对于日本滑向战争深渊这件事感到困惑和悲痛。但是他们无力改变什么，因为军方控制了日本，并把他们贬为叛徒。一些外交官直接遭到了暗杀。其他人被迫辞职，或者被流放到外国使馆中，对日本国内的事务一无所知。军方纵容政府把将军任命为外交大使，（在1941年和1942年）甚至任命为外务大臣。军方设立了一个内部办公室，直接跟外国政府打交道，完全绕过了霞关的外务省。[\[151\]](#)“实际上外交官已经变成了一支精锐部队，独立于政府，或者悲观点说，把政府变成了金笼子里的孔雀。”二战时日本外务大臣的秘书加濑俊一写道。[\[152\]](#)在日本动荡的“幽谷”中，左手从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不过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因为根本就没有正常运作的大脑来协调左右手。专业的外交官意识到日本即将和美国开战，但是又无力阻止。“发生的事情有时会压垮你，像巨浪般在你身边汹涌澎湃，并且将你卷走，”加

濂写道，“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不够。战争有它自己的走势。”[\[153\]](#)

山本五十六不想采用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他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自己蔑视极端民族主义右翼那尖刻、喧嚣的风格，以及他们死板的教条主义和一味对抗的政治理念。他也不支持右翼分子对日本人民服装、品味、观点、思想和日常生活的管制。他公开抨击“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些目标，例如男人都要剃头。有记者询问他的看法，他回答说：“那有什么重要的？我多年来都是留短发。……另一方面，懒汉就是懒汉，跟他把头发剃多短无关。所以，怎么样都行吧？”他认为陆军高官是一群“该死的傻瓜”，他从来都不喜欢对中国的战争，认为对中国开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兵力和军事资源。阿川弘之说，有一次开会时，一名陆军军官坐在山本旁边，站起来“开始高谈阔论，讲一些废话，滔滔不绝”。[\[154\]](#)山本悄悄把这人的椅子往后拉了一下。那人讲完坐下时，一下子坐空了，跌在地上。而山本面无表情，直视前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接着开会。1939年4月在家乡演讲时，山本说“日本处于紧急状态”的论调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低调一些。“是否日本的每个人，无论高的矮的、老的小的，都应该一直受那种论调左右，我深感怀疑。如果你把橡皮圈使劲拉，拉到再也不能再往外拉，那么橡皮圈就没有弹力了。”[\[155\]](#)

1937年，山本被任命为海军次官。他的上司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米内是联合舰队的前总司令，在政治上比较温和，支持条约派。山本和他都决心打击那些持有顽固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海军军官，阻止日本陷入与美国的灾难性战争。“命令必须从高层下达……”山本写道，“下级人员只能就实施命令的方式提出建议。”[\[156\]](#)山本在海军省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那个昏暗的房间里有好几排书架。1937年陆军提议解散日本国会，山本极力反对，并且通过幕后操作努力让那些文职政治家和学者重新掌权。[\[157\]](#)米内光政与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私交甚密，想要就军备限制一事与西方列强重新对话，以避免耗资巨大的新一轮军备竞

赛。1937年“班乃号”被日军击沉后，山本亲自来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以很低的姿态（有些报道称之“满含热泪地”）道歉，并且提出愿意赔偿220万美元现金。^[158]但是东京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日本再次裁军。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暴徒的刺杀目标，很多暴徒公开威胁他们，毫不畏惧会被逮捕。1939年，陆军和海军的分歧加大，似乎即将开始内战。那些有性命之忧的高级军官的住宅和办公室周围都有海军警察保卫。米内光政命令舰队驶入东京湾，并且准备派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到东京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暴动。^[159]

当时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是《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意日形成同盟标志着轴心国的正式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意识到雅利安人的种族意识形态令人不安，但是他们刻意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们十分钦佩纳粹主义的军事威权模式。德国对日本陆军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陆军大学以德国的军事课本为教材，许多中层军官在德国履职多次。希特勒在日本新闻中被描述成英雄人物。《我的奋斗》的日语译本（书中对于亚洲不好的描述被删掉了）十分畅销。^[160]“那时的日本年轻人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渴望日本政界能出现一个类似的人物，”日本大学的学生野木春道（Harumichi Nogi）回忆说，“我们想要果断的行动。”^[161]1939年和1940年纳粹德国的军事胜利对于日本国内提倡实行谨慎外交政策的人来说非常不利。在希特勒的强大破坏力面前，欧洲的民主制国家似乎不堪一击。在英国战败之前（人们认为英国很快就会被打败）与德国达成同盟，这让日本陆军方面十分兴奋。因为达成同盟后，日本就很有可能得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162]

日本驻柏林的右翼大使越过了外务省的高层，与日本陆军的参谋积极合作，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起草了一份条约，送到东京等待批准。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以整个海军的力量为筹码反对批准这一条约，但是1940年5月，法国迅速陷落，抽去了山本两人的根基。山本警告称，一旦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就很有可能陷入与美国的毁灭性战争，还说“考虑到海军武器的现状，尤其是海军

的空中实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美国开战绝无胜利的可能”。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而向其出口石油和钢铁的地区中有4/5被美国 and 英国控制。^[163] 1940年，在一次海军会议上，山本直接向支持条约的人喊话：“我想让你们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弥补短缺而发起的物资调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但支持者拒绝回答。山本经常说，日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美国开战。但日本政府却偏偏走向了战争，而且拒绝认真处理战争带来的基本战略问题。他评论说，批准条约的首相近卫文磨终有一天会“被愤怒的日本人民撕成碎片”。^[164]

每天都有人穿着正式的和服在海军省红砖房大楼前求见山本。他们拿着手工羊皮纸，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写着抗议内容，说上苍即将带来惩罚：“我们准备采取其他措施，你做好心理准备吧。”奇怪的是，山本好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打击这些威胁他的人。山本有时会认真阅读这些威胁信，还用红色墨水在旁边做批注——“蠢货！”“一群傻瓜！”“耻辱！”——不过，鉴于日本近代史上发生过多高次高官被暗杀的事件，所以这些威胁不能轻视。^[165] 1939年8月，首相近卫文磨领导的内阁垮台，米内光政被提名为新首相（他的政府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政府，毫无实权）。山本被认为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被送回联合舰队担任总司令，一直担任到他生命的终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

就像山本之前预料的那样，罗斯福政府开始加紧经济制裁。1940年1月，一项石油贸易协议到期，而美国拒绝续约。之前日本进口的石油中有80%来自美国或者美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的整个石油链似乎都有可能被切断。同月，美国不再向日本销售任何航空燃料和废金属。美国的经济封锁逐渐加紧，禁运单上的资源越来越多。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进行了磋商。1941年7月，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自由法国、英国和荷兰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被冻结。事态就此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虽然日本储存

了足够两年使用的石油，但是这些石油既不够陆军使用，也不够工业部门使用，另外单单日本海军每天就消耗大约400吨石油。

1936年3月，56岁的海军大将永野修身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战争虽然不好，但是不可避免。他也没有真正地去努力避免战争。他容许年轻的军官向自己施压、操控自己。海军中将泽本赖雄反思了为什么海军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却容许自己陷入战争中。原因是“这都是些庸才之间的竞争，没有能力超群的优秀领导人。下属们向上级施压是常事。年轻的军官不尊重上级，这使得事情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愿意为了职责牺牲自己……当时的氛围就是如此，陆军和海军都很狭隘、自私；日本和世界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166\]](#)

山本的旗舰通常停泊在柱岛，在这里，他继续游说，希望日本与美国和解。他预言：太平洋地区的海战不会像对马海战那样经过一次“决定性战役”就分出胜负，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要求那些好斗的同事意识到美国产业经济的规模和潜力，还预见到日本人口稠密的城市经不起美军的空袭。日本传统的作战计划是实施“截断行动”，当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中部的广阔海域航行时，“截断行动”可以削减美军的力量，但是山本对于这一计划没有信心。他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不会落入日本的圈套，不会在战争第一阶段派舰队去营救菲律宾，而是会拿出足够的时间打造出足以压制对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然后通过系统的跳岛战术重返这些地区。

山本五十六一次又一次地向东京表达他的观点。1940年12月10日他表示：“现在才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感到惊讶、愤怒和悲伤为时已晚。就像是一个贪玩的学童，办事不动脑子。”他写道，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10月14日，他给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写信道：“对抗美国就像是对抗整个世界。但是事已至此。我将拼尽全力。毫无疑问我将死在‘长门号’[他的旗舰]上。同时东京将被大火至少三次烧为平地。”为了能与美国维持和平，山本做了很多

的努力：他支持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甚至支持从中国完全撤军。近卫文磨直接问他日本有哪些选择，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受命与美国开战，那么在战争刚开始的半年或一年我可以给美国带去些破坏，但如果再打两三年，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167\]](#)

在1940年舰队训练时，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表现优异，山本向参谋长打趣说：“我开始想这些武器能不能用来攻击珍珠港。”[\[168\]](#)这就是山本偷袭美国大本营计划的萌芽。山本的一生中有很多充满讽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一方面他反对与美国开战，为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另一方面，他坚持袭击珍珠港，哪怕冒着放弃指挥权的风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奇怪，”1941年10月11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被任命去担任一个与我个人意愿完全相反的职位，我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完成那个使命。唉，这就是我的命运吗？”[\[169\]](#)当时在海军第一航空舰队担任参谋的源田实中佐之前看过关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短片，研究过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影片中四艘航空母舰排成一行航行。源田实意识到，如果将多艘航母编入一个特混舰队，那么在一次袭击中就可以发起大型的协同空中袭击。[\[170\]](#)

珍珠港空袭是在最后一刻颠覆30多年来的作战计划的一场行动，在原本的计划里，双方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一场决定性战役。在过去设想的战争场景中，潜艇、飞机和驱逐舰要在美国舰队跨洋行进的过程中不断袭扰（“渐减作战”），但是真正的致命一击需要等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域后，由以逸待劳的战列舰发动，这正是马汉所设想的正统海战方式。但是现在山本问道：如果美国舰队并不按照设想的那样出招怎么办？在对马海战中，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不远万里，劳师远征，绕过大半个地球与日本作战，结果惨败。如果美国舰队不想重蹈他的覆辙怎么办？如果美国行动谨慎，争取时间壮大实力，然后再去救助菲律宾，日本又该怎么办？日本将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决定性胜利？

山本命令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彻底研究一下袭击方案。大西泷治郎得出结论说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让鱼雷在较浅的珍珠港水域前

进；第二，如何确保是突然袭击。让鱼雷在浅水中正常前进的对策是给它安装上木制的鳍板。至于偷袭，大西泷治郎估计成功率大约有六成。^[171]其他人，包括源田实在内，估计胜算更高。（为了维护海军的荣誉，山本要求日本至少在袭击前一小时向美国宣战。）山本手下有人说这项计划太冒险，山本回答道：“不要因为我本人喜欢玩桥牌和将棋就一直说‘这个赌注太大’。……珍珠港行动是我的主意，我需要你们的支持。”^[172]

数百名精挑细选的飞行员被派往鹿儿岛湾，那里的地形地貌都跟珍珠港相似。飞行员们在那里训练在浅水区施放短程鱼雷，这是这次偷袭所需的技术。偷袭珍珠港的任务将由一支含有23艘舰艇的特混舰队实施，其中包括6艘航母，由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指挥。美日在华盛顿的谈判一直拖延未决，山本要求军令部批准他的计划。被拒绝后，他回复说：“如果该计划不能通过，那么我作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没有信心完成所有职责。”最后这句话是以辞职相威胁，永野修身让步了，说：“既然山本对他的计划这么有信心，那么就让他去做吧。”^[173]山本早已制定了战争的策略，但是仍然坚信更明智的做法是不开战。1941年9月29日，日本联合舰队驶向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山本坦率地告诉永野修身，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会是一场灾难。他把整体局势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说得明明白白。他说：“显然日美战争将是一场拉锯战。”他还说：

只要战争局势对我们有利，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战斗。后果就是，日美战争将持续好几年，这期间我们的资源会耗竭，战舰和武器将用光，而且补充起来非常困难。最终我们将无力 [与美国] 竞争。因为战争，人们将变得贫穷……而且不难想象，事态最终会失控。这场战争我们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完全不应贸然挑起。^[174]

很显然，海军高层中的所有人都抱持这一观点，至少绝大部分人是

如此，但是他们大多不愿意说出来。他们能感到来自下属、中层鲁莽者和强硬者的压力——他们很清楚，激进右翼特务会枪杀任何阻挡“帝国命运”的人。但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海陆两军一直彼此争夺资金、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军方不同部门的竞争在日本并不少见，但是《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陆军和海军与天皇是直接的顾问关系，不受国会和内阁控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陆军和海军实际上都可以否决国家预算案和罢免首相。在理论上天皇可以出面解决双方的僵局，但是只要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达成协议，天皇就不应干涉。换句话说，当陆军和海军的制度性优先权与国家政策不符时，没有人能够推翻它们——任何政府、机构、法律、官员和总司令都办不到。可想而知的结局是陆军和海军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从1923年开始，日本海军就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假想敌”。这意味着舰队扩张计划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做好与美国海军开战并打败对手的准备。无论这么做实际上有什么好处，这种概念框架至少给海军将领们提供了筹码，使其可以争取到预算。将近二十年来，海军在争取预算时一直占优势。只要能让海军在预算中占得上风，这就没什么坏处。但是1940年，美国的经济制裁使得“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不再是长期的考量对象，而是变成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海军将领不想与美国开战，但是又不能杀掉下蛋的母鸡。“我们心里觉得不能与英美开战，但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来，”海军省的一名参谋说，“我们一直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也跟陆军说可以拿下美国。……所以，现在我们绝不可说没有信心。我们害怕陆军会说，‘如果海军打不了仗，那就把资源和预算还回来’。”另一名军官补充说：“如果我们一直不与美国开战，那么陆军就会控制整个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满足其自己的目的。”陆军经常说“不能打仗的海军一无是处”，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受不了这种言论。[\[175\]](#)

1941年11月1日，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与东条英机会面，表达了他

的“战争决心”，同时坚决要求增加海军1942年的钢铁资源分配。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为了弄清楚问道：“海军得到了所需的钢铁就会宣战吗？”岛田点点头：这30万吨钢铁会让海军支持这场自己并不想打的战争。陆军参谋部的军官在《二战机密日志》中对于此事的看法再恰当不过：“海军多么可悲啊！”[\[176\]](#)

日本的主要港口和海军基地



整个1941年，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的谈判僵持不下，距离达成正式的结果遥遥无期。国务卿赫尔态度坚决：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军，否则经济制裁绝不停止。昭和天皇及其亲信反对战争，但是他做的不过是经常劝告内阁“尽最大努力达成和解”。[\[177\]](#) 外务省继续谈判，但是外交官被蒙在鼓里——华盛顿的日本特使并不知道一旦和谈失败，日本就会立刻

开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明确表示撤出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不能让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控制远东地区。所以，日本做了一次让步就会有另一次。”[\[178\]](#)

1941年9月6日，日本在帝国会议上决定，如果华盛顿谈判如预料的那样没有结果，那么日本将在10月宣战。[\[179\]](#)10月，东条英机迫使近卫文磨下台，自己担任首相（同时依然担任陆军大臣）。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日本绝不会从中国撤军”。[\[180\]](#)11月5日，山本制定的珍珠港行动令《大海令第一号》下发至联合舰队的每一名指挥官。11月26日，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的6艘大型航空母舰实施无线电静默，在遥远的北方千岛群岛驶出单冠湾，前往夏威夷北面的集结地。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封信，重申美国立场：日本一旦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美国就会解除对日本的制裁。双方的僵局很显然没办法解决。虽然信里既没有最后期限也没有发出威胁，但是东条英机将赫尔的信形容为最后通牒。东条英机现在是日本政坛中的风云人物，他一心要将日本引入战争：“有时候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冒险行动。”[\[181\]](#)

日本民众的耳中回响着让他们参战的宣传口号，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反对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日本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国度，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解放亚洲。有人告诉他们，当充分动员起来时，日本人民的精神力量将克服传统军事力量中任何资源短缺带来的困难。他们确信西方的民主制已经因为生活安逸、不思进取而变得软弱、腐化。在这种不停的宣传攻势下，就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也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有时候确实产生过怀疑，”野木春道回忆战前那几年时说道，“但是在产生怀疑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脑子里之所以有那些想法，就是因为我缺少爱国的情感和精神。我感觉我必须努力奋进。如果国家决定采取行动，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采取行动支持国家的决定！”[\[182\]](#)是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领导人。领导阶级虽然很想拖延时间，看一看局势走向，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了。美国对于向日本出口石油的限制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的石油储备每一天都在减少。

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日本等待出击的时间越长，美国的力量就越强。日本的纳粹同盟正在欧洲展开行动，如果日本没有抓住时机，那是不是就永远失去了分一杯羹的机会？

到1941年秋，除了天皇外，整个日本或许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日本走向战争，但是天皇总是默许实际控制国家的一小圈人呈给他的一切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有多么勉强。内阁虽有疑惑和担忧，但是没人有勇气面对说真话的后果。他们一致建议开战。1945年以后，昭和天皇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立宪制国家的元首，我不得不批准政府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一致提议。如果我不批准，东条英机就会辞职，日本将发生大型政变，鲁莽的主战派将会控制日本。”^[183]这番论调虽然是在自我开脱，但是裕仁的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东条英机说过军队“早已按捺不住”，^[184]海军领导人认为日本不与他国开战可能会爆发内战。日本领导人都感觉即将到来的危机来自外部，超出他们的控制，就像一场地震或海啸。危机正**降临**在日本。“箭已离弦。”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们对彼此说道。现在是时候把各自在军中的位置摆正了。统治阶层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再去寻求外交上的对策，而是屈从于他们更加熟悉的战争之路，好像这是派给他们的任务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1]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7.

^[2]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7.

^[3] Toshio Yoshida account in *ibid.*, p. 80.

^[4] Ei Hirosawa account in *ibid.*, p. 244.

^[5] Ryuichi Yokoyama account in *ibid.*, p. 96.

^[6] Quoted i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111.

^[7] Diary of Marquis Koichi Kido, entry dated Dec. 8, 1941,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 p. 135.

^[8] Emperor's rescript printed in Cook and Cook, *Japan at War*, p. 72.

^[9] Prime Minister Hideki Tojo, in an address in Tokyo carried by radio, trans. in the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Dec. 8, 1941.

- [10] Yoshi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0.
- [11] Harumichi Nogi account in *ibid.*, p. 55.
- [12]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43.
- [13]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59.
- [14] Entry dated Dec. 9, 1941, Ugaki, *Fading Victory*, p. 49.
- [15] See Mitsuharu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and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255–57.
- [16] 此处指日本发给美国的“最后通牒”的最后一部分，可理解为宣战书。——编者注
- [17]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2.
- [18]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 [19]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2.
- [2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60.
- [21] *Ibid.*, pp. 285–86.
- [22] Quoted on the jacket of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 [23] *Ibid.*, p. 2.
- [24] *Ibid.*, pp. 64–65.
- [25]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5.
- [26]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76.
- [27] *Ibid.*, p. 91.
- [2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3.
- [29]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3.
- [3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78, 54, and 5.
- [31]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76.
- [32]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54.
- [33] *Ibid.*, p. 139.
- [34] Edwin T. Layto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76.
- [3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63.
- [36] *Ibid.*, p. 207.
- [37]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38] 搏头尾，持最大牌与最小牌者平分全部赌注的赌法。——编者注

[3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51, 54, 164, and 84.

[40] Ibid., pp. 67, 2.

[41] Ibid., pp. 53, 147, and 64.

[42] Ibid., p. 65.

[43] Ibid., pp. 63, 161, 242, and 58–59.

[44] Ibid., p. 178.

[45] No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3.

[46]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47, 85.

[47] Ibid., p. 85.

[4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4.

[49] 《教育敕语》（日语：教育ニ関スル勅语 / 教育勅语）是日本明治天皇1890年10月颁发的关于教育方针的诏书，以儒家纲常伦理思想为指导，把对天皇效忠、对父母尽孝作为国民道德的根本原则。——译者注

[50] “The Rescript on Education of the Meiji Emperor,” online at www.danzan.com/HTML/ESSAYS/meiji.html.

[51] Baron Kichiro Hiranuma, Dec. 28, 1940,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67.

[52] Ikki Kita quoted i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78.

[53] Goro Sugimoto, “The Emperor,”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 117.

[54] The Meiji Constitution (1889) can be found online at the Hanover Historical Texts Project, <http://history.hanover.edu/texts/1889con.html>.

[55]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60.

[56]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52.

[5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0.

[58]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0.

[59]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95.

[60] Deacon, *Kempei Tai*, pp. 160–61.

[61] See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able 1, for summary of costs, pp. 99–102.

[62] Ibid., p. 100.

[63]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12.

- [64]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57.
- [65] Ibid., p. 143.
- [66]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269.
- [6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3.
- [6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94.
- [69]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8.
- [70]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103.
- [71]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5.
- [72]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142.
- [73] Quoted in *ibid.*, p. 168.
- [74] Morita, Reingold, and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p. 27.
- [75]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
- [7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 25.
- [77]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 256.
- [78]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7.
- [79]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5–87.
- [80]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5–87.
- [81]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206.
- [82]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p. 183–84.
- [83] See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p. 203.
- [84] Yoshimura, *Zero Fighter*, p. 47.
- [85] Yoshimura, *Zero Fighter*, p. 47.
- [86] 彭萨科拉，是美国海军第一个航空兵基地和飞行人员训练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摇篮。——编者注
- [87]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09–10.
- [88]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4.
- [89] Hideo Sat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33.
- [90] Photo reproduced in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7.
- [91]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0.

- [92] Description of beatings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 136.
- [93]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8.
- [94]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0.
- [95] Quoted in Gibney, ed., *Senso*, p. 28.
- [9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9.
- [97]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01.
- [98] Tetsu Shimojo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 31.
- [99] 1码 $\approx$ 0.9米。——编者注
- [100]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23.
- [101] Ibid., pp. 23–24.
- [102] Ibid., p. 22.
- [103] Ibid., p. 25.
- [104] See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 118.
- [105]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11.
- [106]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p. 100–101.
- [107] Peattie, *Sunburst*, p. 31.
- [108] “月月水火木金金”是当时日本军队的著名口号，意为将周日当作周一来训练，周六当作周五来训练。——编者注
- [109]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45*, p. 45.
- [110] Peattie, *Sunburst*, pp. 44, 43.
- [111]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86.
- [112] Peattie, *Sunburst*, p. 83.
- [11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163.
- [114] See *ibid.*, pp. 164–66, 182–84.
- [11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93
- [116]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33.
- [117] Skulski, *The Battleship Yamato*, pp. 10, 17.
- [118]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p. 18, 77.
- [119] Ibid., p. 114.

- [120] Skulski, *The Battleship Yamato*, p. 22.
- [121] Ibid., p. 182.
- [122] Ibid., p. 25.
- [123] See *ibid.*, p. 19, Tables 10 and 12.
- [124]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27.
- [125] Slogans ci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169; see also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215; Shigeru Sato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 288.
- [126]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138.
- [127] Ei Hirosaw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242–43.
- [128] 贝比·鲁斯，美国著名职业棒球运动员，被称为“棒球之神”。——译者注
- [129]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p. 210, 140.
- [130] Atsuo Furusawa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 15.
- [131] Shigeko Arak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320.
- [132] Kiyoshi Hara account in *ibid.*, p. 63.
- [133] Chigaku Tanaka, “What Is Nippon Kokutai?” (1935–36),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
- [134] Hideo Sat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232, 236.
- [135]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1.
- [136]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
- [137] Koshu Itabash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8.
- [138] Chikao Fujisawa, “The Great Shinto Purification Ritual and the Divine Nation of Nippon,” February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7.
- [139] *Shinajin wa Nipponjin nari (The Chinese Are Japanese)*, Asiatic Problems Society (June 1939), cited in *ibid.*, p. 18.
- [140] Fujisawa, “The Great Shinto Purification Ritual,” cited in *ibid.*
- [141] Professor T. Komaki on Japanese radio, Feb. 22–27, 1942, cited in *ibid.*, p. 19.
- [142] Matsuo, *How Japan Plans to Win*, p. 13.
- [143] Hidejiro Nagata, *Nippon no Senshin (The Advance of Japan)*, Tokyo, 1939,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83.
- [144] Daisetz T. Suzuki’s principles explain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 30.

- [145] Hayashiya and Shimakage, *The Buddhist View of War*, quoted in *ibid.*, p. 90.
- [146] Suzuki, *Zen and Japanese Culture*, quoted in *ibid.*, p. 110.
- [147]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75.
- [148] Yoshiro Tamura account in *ibid.*, p. 164.
- [149] Shozo Tominaga account in *ibid.*, pp. 40, 42–43.
- [150]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 198.
- [151]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6.
- [152]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 16.
- [153] Toshikazu Kase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95.
- [15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p. 10, 125, and 128.
- [155] *Ibid.*, p. 168.
- [156]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2.
- [157]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20.
- [15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7.
- [159]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46.
- [16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p. 162–72.
- [161] Harumichi Nog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51.
- [162] Kase account in *ibid.*, p. 92; see also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6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28.
- [16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17.
- [164] *Ibid.*, pp. 225–26.
- [16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159.
- [166] Quoted in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96.
- [167] *Ibid.*, p. 276.
- [168]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00.
- [169]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8.
- [170] Minoru Genda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4.
- [171] Shigeru Fukudome account in *ibid.*, pp. 60–61.
- [172] Lord, *Day of Infamy*, p. 11.

- [173] Fukudom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63.
- [174]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 277.
- [175] Ibid., pp. 239, 216, and 271.
- [176] Ibid., p. 273.
- [177]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9.
- [178] Storry, *The Double Patriots*, p. 288.
- [179] Fukudom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63.
- [180]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118.
- [181] Ibid., p. 119.
- [182] Nogi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54.
- [183] Hirohito's postwar "monologue" quoted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 89.
- [184] Browne, *Tojo: The Last Banzai*, p. 100.

第四章

美国海军司令部位于华盛顿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石棉混凝土大厦里。这个三层楼高的建筑群被一道道污垢覆盖，通过一条走廊与结构类似的“军火大楼”相连。^[1]^[2]这些建筑在倒影池北侧沿宪法街延伸，总长达1/3英里，排成九列往南伸向倒影池的边缘。海军司令部是十来栋“临时建筑”中的一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18年匆忙建造的，造价低廉。这些巨大的丑八怪被随意地堆在华盛顿广场上，介于国会山和林肯纪念堂之间。人们都知道，当紧急时期过去之后，它们就会被拆除。“一战”结束后，政治阻力和官僚阻力最小的选择是让它们保留下来。在这些建筑里办公的人对这个位置很满意，这里离白宫和国会山都很近，而国会也不愿意出钱去拆除这些建筑再盖新楼。

一名军官回忆说，战前的海军部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地方，“标准尺寸的未装修办公室在沉闷的走廊上绵延不绝”。^[3]地上铺着褪色的油毡，头顶上的灯暗淡昏黄，没有窗户的木门上只标了用模子印出来的缩写或数字。12月7日之后，这里的生活节奏突然加快了：一名军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天后赶到了司令部，形容这里是“一座顶部被踢掉的蚁丘”。^[4]军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灯光彻夜通明。许多人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甚至没有离开过大楼。婴儿床被推进办公室里，食物也放在托盘上送进来。所有的军官都接到命令，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要穿制服上班。在战前，许多在行政岗位上工作的军官经常穿便装，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许多高级军官穿着上下不搭、过时或不合身的制服。一名年轻的上尉回忆说，他看到几名军官穿着制服扣不上扣子，因为自从上次穿过制服之后，他们的体重增加了。“海军少将约翰·温赖特（John

Wainwright)是我非常喜欢的将军，他显然是找不到军用雨衣和大衣了。他戴着将军的制服帽，身上穿着一件非常花哨的苏格兰花呢大衣。”^[5]

头戴钢盔、枪装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要求每一个进出的人出示身份证明，就连身穿制服的高级军官也不例外。珍珠港事件发生了几天之后，BBC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穿过一扇侧门进入了海军部，没有警卫拦他。他拜访了预约要拜见的军官，但当他试图离开大楼时，“一个卫兵拿枪挡住了去路”。库克陷入了明显的军队官僚主义困境，约瑟夫·海勒后来将其描述为“第22条军规”。^[6]库克找附近一间办公室的将军求情，才获准出去。

大萧条时代的军官所受的教育是，做事要节俭，循规蹈矩，对待文书工作要严谨，对于管理海军资金、设备和物资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他们不能解释每一笔支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业生涯就会受到影响。但在12月8日，整个海军系统都有了一种新的集体意识，那就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改变。速度至关重要。“在袭击发生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就像捕鸟的猎犬一样忙碌，”一名射击训练教官说，“很难描述我们的效率提高了多少。”^[7]上层军官忙得焦头烂额，难以回复每一条指示，所以各级军官和士兵都得行使更大的权力。他们在没有接到确切通知的情况下便意识到，即使上层态度不明确，他们也没有时间犹豫。这种新的意识使他们做起事来干脆果断，文书工作以及合法授权问题可以等日后有时间了再处理。当海军少将兼码头管理局局长本·莫雷尔（Ben Moreell）被要求拨款建造一个新的防空炮训练中心时，他的回答非常符合新精神。“见鬼”，他说，“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我才不管该死的法律怎么规定的。”

飞到珍珠港亲自评估损失状况的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12月14日周日晚上回到华盛顿。周一上午，他在海军部第二层“甲板”（楼层）的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写道：“出席发布会的人非常多，头一次有这么多人聚在他这里。他的办公室里挤满了

人，检查证件花了很长时间。他等着，镇定地抽着烟斗。”^[8] 弗兰克·诺克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老门徒，美西战争中曾在“莽骑兵”军团（第一合众国义勇骑兵团）服役。1930年，他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

（*Chicago Daily News*）的出版商和共有者。虽然诺克斯个人是效忠于罗斯福的，但是他的报纸却强烈抨击罗斯福新政，而且他本身是1936年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1940年，诺克斯接管了海军部。与此同时，另一位杰出的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出任战争部长一职。由于反对共和党在1940年竞选活动中的孤立主义施政纲领，他们两人接受了罗斯福的邀请，加入了内阁。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报纸编辑，诺克斯知道如何让记者言听计从，而且表现得游刃有余。诺克斯透露了许多出乎他们意料的消息，让他们惊讶不已，这也减弱了他们刨根问底的劲头。他承认，“亚利桑那号”和“犹他号”战列舰，以及三艘驱逐舰和一艘布雷艇都被炸毁；他还承认“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倾覆，但预计它能够被扶正并重新服役。^[9] 他称其他军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有的即刻就能修好，有的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维修”。^[10] 谈及伤亡人数，他用“惨重”来形容。记者们刨根问底时，他承认大约有3 000人死亡。诺克斯认为日本军队的袭击“计划十分周密而且实施起来游刃有余”，但是他坚称珍珠港海军的士气十分高涨（事实并不完全如此），还补充说，“我希望那群浑蛋还会再来”。^[11] 他高度评价了海员们在这场突袭事件中的英勇壮举，致悼词颂赞了将生命奉献给崇高事业的烈士们。他的这番话时机很好，媒体根据他的发言争相报道，而且都采纳了他的主旨。

不过，令人不快的问题仍然存在：美国海军怎么对偷袭一点防备都没有呢？这是谁的错？接下来又会让谁来为这场灾难负责呢？国会中一直回荡着愤怒而不满的声音，有人要求把当地指挥官送上军事法庭，有人甚至要求海军部长诺克斯本人引咎辞职。^[12] 在对夏威夷进行短暂访问时，诺克斯对金梅尔将军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已经不可避免地被选为了替罪羊。诺克斯对前来参加记者会

的记者表示，他们即将启动一项“正式调查”，确认是否存在“玩忽职守”的情况。^[13]但他也明确表示“海陆军没有保持备战状态”，因此加深了大家先入为主的想法，即当地的指挥官应承担主要责任。^[14]金梅尔及当地陆军指挥官沃尔特·肖特被解除了职务，媒体对他们进行了有失公正的嘲弄。接下来的战争期间，他们被迫接受了诸多难以忍受的调查，而这些调查旨在将众矢之的从华盛顿的上级部门身上引开。

金梅尔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他当时56岁，此前任航海局局长。这一决定是罗斯福做出的，而且在做此决定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星期二早上，他对诺克斯说：“通知尼米兹即刻出发去珍珠港，等打赢战争再回来！”^[15]很快，尼米兹将军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接电话的是尼米兹尽职尽责的司令秘书H. 阿瑟·拉马尔上尉。来电者要求让“切斯特”听电话。拉马尔上尉没有听出电话另一端那低沉、洪亮的声音是谁，而且觉得“备受冒犯，竟然有人对我们将军直呼其名”。他询问来电者叫什么名字。“我是总统，”回答简短而生硬，“让他接电话。”^[16]

尼米兹和总统进行了简短的通话，然后匆匆走出去，上车前往三个街区外的白宫。两小时后，他回来告诉拉马尔：“我要去太平洋了。”

人们描述切斯特·尼米兹时通常会用到“银发”这个词，因为他一头银发，与他那锐利的蓝眼睛和红润的肤色形成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他的眉毛同他的头发一样是银白的，两者赋予他一种庄严感，让他看起来如同一位年长的智者。他的眼睛极具表现力，能在脸上没有其他表情的情况下传达出温暖、怀疑、遗憾、欢乐或愤怒的情绪。参谋给他起了个绰号：“蓝眼睛男人”。他身体很强健，年轻时帅气十足，堪比电影明星——体格健壮，身形完美，下巴结实，棱角分明的脸上正气凛然。56岁的他依然相貌堂堂。通过长距离的散步和高强度的网球锻炼，他身体一直很健康。

这是尼米兹第二次获得指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机会。在1941年初，

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觉得自己资历太浅，还不能跻身上将的行列。如果当时接受了任命，他会连升几级，越过职级表上高于他的五十多位将军。尼米兹说，接受这一任命会激起他们的不满，导致他难以顺利地执行这项工作。现在，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没有人那么在意海军等级排序的细节，而且无论如何，这项任命已经以命令的形式传达了下来。

尼米兹像海军部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一直在连轴转。在战争爆发后的三天三夜里，他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除了喝点儿妻子用保温瓶给他带来的汤以外什么都没有吃。度过第三天后，他过了午夜才回到家中，爬到床上睡了三四个小时，然后在黎明起床，继续回去工作。^[17]航海局虚有其名，它其实是海军的人事部门。随着战争爆发，尼米兹和手下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电话铃声几乎不间断地响着，每天的电报穿过尼米兹办公室套房的清漆木门，如潮水般涌入。丧生的军官必须有人顶替，失去作战能力的战舰上的军官必须重新安排，快速动员起来的舰队必须马上派出军官去管理。航海局还接到了一项残酷而必须执行的任务：统计出准确的伤亡人员的名单并通知遇难人员的家属。在战争早期的那些日子里，尼米兹有时要被绝望压垮了，因为上上下下都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对航海局的一位上校说：“我们这次真是惨败。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恢复元气。”^[18]后来他还向一个朋友吐露心声：“从12月7日日本投下炸弹那天起，一直到至少两个月以后，几乎每天情况都会变得更加混乱无序，也显得更加无望。”^[19]

尼米兹将军走回Q街2222号的家，发现妻子凯瑟琳受了风寒，病倒在床。他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你一直都想去指挥太平洋舰队，”她说，“你一直把这看作至高无上的荣耀。”“亲爱的，”他回应道，“太平洋舰队此刻在海底。这里没有人必须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20]她帮他收拾了两箱行李，里面装着白色和卡其色制服。他没有带蓝色制服，因为夏威夷是热带气候，一般不会穿到。

12月18日的报纸报道了金梅尔被解职与尼米兹上任的消息。报道中

刊登了尼米兹身穿海军戎装的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面颊瘦削的将军，嘴角平直，神情冷峻，眼睛深邃。就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尼米兹连升两级，从海军少将（二星）直接晋升为海军上将（四星）。

《纽约时报》形容他是一个“满头银发、皮肤黝黑的得克萨斯人”，并详细介绍了其海军生涯，着重描述了他的英雄事迹——1912年时身为海军上尉的他曾救起一名溺水的海员。^[21]《纽约太阳报》的格伦·佩里在日记中写道：“华盛顿当局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公众信心必将高涨。”^[22]尼米兹在海军界外几乎无人知晓，似乎天生不事张扬的他，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一个“严格要求属下日落而归”的人——作风严谨，毫不通融，且不苟言笑。这种印象大错特错，但是对于当前的局势而言，公众有这种印象倒没什么坏处。这个形象与其军衔与职务是相称的，尤其是在战时。实际上，尽管他严格遵守海军规章，只消一个眼神或低沉的嗓音便可震慑他人，但他与生俱来的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本人的温情。

珍珠港事件虽然才过去一个半星期，但战争似乎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那么漫长。尼米兹已经没日没夜地操劳了整整十天，身心俱疲。海军部长诺克斯已安排好飞机，准备将新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送往西海岸，再让他在那里换乘飞机前往夏威夷。但是尼米兹没有登机——用他的话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补充睡眠，整理思绪”。^[23]他想的是乘坐火车，花三天时间到达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他可以在舒适的普尔曼式列车里养精蓄锐，处理堆积在文件箱里的简报。他将于12月19日星期五离开，三日后抵达加利福尼亚。

直到星期四他仍工作到深夜，不过星期五早上的时间他留出来陪伴家人，去学校观看了女儿玛丽的圣诞表演。他的妻子、儿子及另一个女儿不知道他此行会离开多久，但作为一个海军家庭，他们早已学会了接受长期分离的考验。谁都没有流泪。“我一点都没有失控，”尼米兹夫人后来回忆道，“我母亲教育我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不去无谓地哭泣。你必须经历风雨。”^[24]到了联邦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军人和游客，

尼米兹登上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上的“国会专用”列车，赶往芝加哥。忠诚的副官拉马尔上尉与他同行，奉命保障尼米兹饮食正常，睡眠充分。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O. 理查森将军给了拉马尔两瓶“老祖父”波本威士忌，叮嘱他每日晚饭前为尼米兹倒满“两小杯”。^[25]为安全起见，两人此番出行全程都身着便衣，使用化名。尼米兹的车票上用的名字是“弗里曼先生”——他妻子的娘家姓氏。

火车驶出了华盛顿，扎进了马里兰州乡下错落有致的玉米地里。傍晚时分，夜幕降临，拉马尔打开了威士忌。一两杯酒下肚后，尼米兹向拉马尔展示了自己平时在办公室从不示人的另一面。他乐呵呵地说起了笑话，甚至讲起了黄段子。他还教这位上尉玩克里比奇牌戏，然而拉马尔无法将精力集中在纸牌上，尼米兹最后放弃了，自己玩起了接龙。后来他们去吃了晚饭。当晚，他们在摇摇晃晃的床铺上酣睡如泥，火车驶过了上中西部的工业中心——匹兹堡、扬斯敦、阿克伦、加里——次日清晨，当远处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映入眼帘时，睡醒的尼米兹“心旷神怡，感觉自己能应付眼前的局面了”。^[26]

这名未来的舰队司令1885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弗雷德里克斯堡一个用石灰岩建造的小房子里。这座城市位于奥斯汀西部山区，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地。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主干道上的尼米兹旅馆的红瓦下长大，该旅馆为其祖父所建，由他父亲和叔叔经营（后者在尼米兹父亲过世后娶了他母亲，成了尼米兹的继父）。他的祖先是萨克森日耳曼人，属于有头衔的武士贵族阶级：冯·尼米兹家族的世系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他们曾获得过盾徽。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他曾祖父一辈时，家道中落。他的曾祖父被迫变卖家产，外出谋生，成为商船船长。1840年，他的曾祖父移民至美国。

在孩提时代，家里不允许切斯特抛弃德国的传统：在家里和镇子上，他既讲德语又讲英文。为纪念其曾祖父的航海生涯，尼米兹旅馆的外观像一艘汽船，而内部细节尽是航海主题。在切斯特6岁的时候，他

们全家搬到了克尔维尔，他们在那里开了另一家旅馆，名叫圣查尔斯，这是一个简陋的乡村旅馆，生意惨淡，一家人苦苦经营着。切斯特早已习惯于做苦力活。尚为孩童时，他便在黎明前起床做家务——清扫、拖地、除尘、砍柴、生火、倒垃圾。从12岁起，他为当地的屠夫跑腿送肉，每周赚一美元。在天气暖和的几个里，他不穿鞋。在旅馆前台干活干到晚上十点钟是家常便饭。然后他会上床睡觉，黎明前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

尼米兹没有奢望过读大学，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但是1900年夏天，他15岁的时候，两名美国陆军中尉下榻在尼米兹家的旅店。他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西点军校对符合入学条件者免除学费。他写信给当地国会议员，得知该地区当年的西点名额已满，但仍剩有一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名额。该名额将在第二年春天举行的竞争激烈的考试中决出。他是在中学提前一年申请的，因此还没有学完所有相关课程。尼米兹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在破晓前的黑暗里静心读书。镇上的人都很喜欢他，管他叫“棉花头”，因此，当他宣布要参加这次考试时，许多邻里都乐意为他提供帮助。当地一位教师帮他补习代数、几何、历史、地理和语法，他的中学校长也为他补习数学。1901年春天，尼米兹以该地区考生中的最高成绩顺利过关，获得了成为1905届海军学院学员的机会。

从一开始，事实就表明尼米兹选对了职业。日常训练虽然艰苦又紧张，但与他在得克萨斯的生活比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海军学院学员起得再早，也没尼米兹在家里起得早。他们住在一个不避风雨的小破屋里，但尼米兹从未有过奢华的生活，也从未期望过别的什么。虽然他很穷，但在学院里这对他没什么影响——他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学习上从没有什么能难住他。数学是唯一一门让他觉得有些吃力的科目，但即便如此，他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他戴上了三道杠，并且被任命为第8连连长，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毕业时，全班114人中，尼米兹名列第7。

“他似乎是一个笑对过往，对未来满怀信心的人。……他做事像德国人一样沉着稳重，能够探知事情的真相。”^[27]这是1905年《海军学院年鉴》的编辑们对20岁的切斯特·尼米兹的评价。这段引自华兹华斯的《远游》（*Excursion*）的诗句十分贴切，道出了尼米兹的安静、谦逊和友善的品质。他面色和蔼，举止大方，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满足。他拥有那种罕见的灵魂，既高度自信，又质朴谦逊。

在早期的海军生涯中，尼米兹在许多部门干过——在海上和岸上都待过，上过炮艇、潜艇、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做过征兵、人事管理以及制订作战计划等工作。年轻时，他在位于东亚的美国亚洲舰队服役。1905年，他被安排在“俄亥俄号”战列舰上服役，随船前往东京湾。在那里，他遇到了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从1909年起，尼米兹在海军新建的潜艇部队服役。1912年，尼米兹因挽救了二等司炉W.J. 沃尔什的生命而被授予银质救生勋章。当时，这名司炉被一股巨浪冲下E-1潜艇的甲板，并被卷走。26岁的尼米兹上尉纵身跳入大海，朝着那个不会游泳的司炉游去。他帮沃尔什一直漂在海面上，直到救生船赶到。同年年底，尼米兹被授权指挥大西洋潜艇部队，当时他仍然是上尉军衔。1912年，他在海军军官团的行业刊物《海军学院学报》（*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潜艇战术的文章，成了公认的潜艇战术专家。他还成了海军柴油内燃机潜艇的一流专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华盛顿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工作，后来担任“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的副舰长。他还前往海军战争学院进修，这是每个军官晋升将级军衔之前都必经的过程。在这里，他学习了《橙色战争计划》，推演在太平洋上抗击日本的方案。后来他说过这样的话：“有人曾问我太平洋战争应该怎么打，我说就像在海军战争学院我们在纸上演练的一样打。1923年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就打了一整场太平洋战争。”^[28]

1912年，尼米兹上尉向马萨诸塞州一名船舶经纪人的女儿凯瑟琳·万斯·弗里曼（Catherine Vance Freeman）求婚。“如果您真的爱我，”他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我希望您祝贺我与凯瑟琳订婚。……您也许会指责我还不够了解自己，因为两年前我还想和别人结婚。好吧，但两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再是当初那个稀里糊涂的人了。……现在，如果您想让我开心，请给这位小姐写一封友好的信，就当是为了我吧。”^[29]他们于1913年4月结了婚，之后一起回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家里。尼米兹的母亲很友好，但其他长辈却不是很高兴。他们用德语在背后窃窃私语，这让凯瑟琳觉得，他们不太想让一个来自北方的非日耳曼人加入这个家族。南方人的身份意识在得克萨斯州仍然很强，内战的阴影还存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一天晚上吃饭时，尼米兹的一个长辈问道：“切斯特，如果南北之间再战，你帮哪边？”他回答说：“我当然站在联邦一边。”^[30]凯瑟琳将这视为一个忠诚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忠诚，也是对她忠诚。

他们生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凯瑟琳·万斯；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小切斯特（和父亲同名），他将子承父业，进入海军学院，然后在潜艇上服役。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安妮·伊丽莎白和玛丽·曼森。切斯特是一个尽责的父亲，在工作之余，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孩子。在婚后的头十年中，尼米兹一家先后住在康涅狄格州、德国、比利时、布鲁克林、华盛顿特区、珍珠港以及罗得岛。凯瑟琳似乎不介意不断地打包行李，从一个地方搬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居无定所地生活。她和孩子们能够接受以海军为家。

在芝加哥停留期间，尼米兹上将乘坐出租车前往老海军码头和海军预备役学校，在那里与老熟人小谈了一会儿，并坐下来理了个发。在那里他了解到威克岛正在全力抵抗日军的新一轮空袭。那天下午，他和拉马尔上尉回到迪尔伯恩站，去赶开往洛杉矶的圣菲铁路公司头号列车“超级酋长号”，这是长途铁路旅行盛期中最负盛名的客运列车之一。在行李搬运员的帮助下，他们住进了舒适的普尔曼式车厢。在下午渐暗的日光中，“超级酋长号”驶出了芝加哥，经过石头路堤、桥梁、涵洞、

天桥、屋顶，一路上满是冬日荒凉之景。紧接着，城市依稀隐去，列车来到郊区，进入了伊利诺伊西部的大平原。“穿过地势平缓的乡间，美丽的农场，视野开阔，地平线在很远的远方。”尼米兹上将在寄给凯瑟琳的信中这样写道。^[31]拉马尔倒了两杯烈性威士忌，喝完两个人就睡了。

睡醒后，尼米兹打起精神，再次写道：“随着我得到更多睡眠和休息，我开始觉得情况好转起来。我相信，到达珍珠港时，我一定能应对那里的局势。”^[32]尼米兹长时间注视着窗外的大平原，这是一片农牧区，有水泥厂、面粉厂、谷仓，还有完全为运输牲畜、粮食、玉米以及家禽而建立的小镇。^[33]列车驶过堪萨斯城，这是一座繁荣的大都市和十几条铁路干线的枢纽；接下来穿过一片广袤的平原，景色没有明显的变化，平原上的玉米田一直延伸到天际；后来火车通过道奇市，这是旧边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城镇之一，过去西部的执法者怀亚特·厄普（Wyatt Earp）和比尔·蒂尔曼（Bill Tilghman）就是在此地出名的，不法之徒的尸骨依旧埋在布特山（Boot Hill）上。进入科罗拉多东南部以奶业和苜蓿种植为主的农业地区时，列车会建议乘客们将手表时间往回调一小时。然后是更多的农田，数英里的路上全是洋葱、甜瓜、甜菜和其他作物；随着“超级酋长号”轰鸣着穿越平原，顶部覆着白雪的落基山脉从遥远的西北方映入眼帘。列车驶进这片干旱的地区，经过灌溉渠，这些灌溉渠将珍贵的水送到向日葵田和苜蓿田里，送到种植扁豆和甜菜的广阔田野上；再往后，沿途的小镇里，目光所及处均是晒干的砖坯砌成的民居和楼房。

上车前有人将一个装有高度机密的照片以及珍珠港详细情况报告的帆布包交给拉马尔。“你要片刻不离身地带着这个包，”那人说，“离开芝加哥后再打开，然后把里边的东西给尼米兹上将看。”看到里边的东西后，尼米兹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尽管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已经有所耳闻，但他从未想到过这场屠杀的规模有这么大。拉马尔回忆说，战列舰现场的照片“惨不忍睹”，比文字更能展现“珍珠港血流成河的局

面”。^[34]美国本土很少有人看过这些照片，连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些照片的也没有几个。场面最惨烈的是“亚利桑那号”的一张照片，整个船体都沉到了水下，船体的上层结构露在水面上，被炸得面目全非，恐怖的黑色浓烟从船体中冒出。尼米兹在一级级晋升的过程中指挥过战列舰。三年前他指挥战列舰分队时，“亚利桑那号”曾是他的旗舰。他很了解它。尼米兹想到了金梅尔。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差点得到金梅尔的职位，但幸运的是他拒绝了。“这原本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对拉马尔说，“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指挥官身上。”^[35]

对于尼米兹这样的已经将40年时间贡献给海军的人来说，珍珠港的失败就像自己的耻辱一样。他信任海军，将在海军服役视为毕生的事业，并且从未想过美国海军会被日本或其他国家如此轻易地、毫无防备地袭击。他一直忠诚于“海军之路”——海军的繁文缛节、守时精神、固执的做事节奏、不可违背的原则等——因为他认为这些要求都是特意设计出来的。1930年，他在1905届海军学院学员毕业25周年的纪念册上写道：“我在海军的生活非常开心，没有任何其他职业能让我甘愿放弃目前的职业。”^[36]那并不是空话：尼米兹本来可以离开海军，去个私人企业成为富豪的。1915年，圣路易斯的一家柴油发动机公司曾经以2.5万美元的年薪聘请他。那时他是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的一名上尉，与妻子和两名襁褓中的孩子居住在弗拉特布什街的一个狭小公寓中，海军每月给他的工资是288美元。他告诉招聘人员：“我不去，谢谢。我不想离开海军。”“钱不是问题，”公司的招聘人员坚持不懈，“你开个价吧。”“不，”尼米兹说，“我不想离开海军。”^[37]

小切斯特记得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和父亲有过一次谈话。他父亲说，自己希望有一天能获得最高职务，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小切斯特问他要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尼米兹说，他会像之前那样竭尽全力，并且“他坚信，每个人在海军都能得到应得的东西”。^[38]

小切斯特跟他父亲的传记作家说：“我父亲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

他其实对海军的大炮和技术不感兴趣。”这个判断有点不合理，因为尼米兹曾经是海军中最优秀的柴油机专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当他为更高的职位做准备时，他关注的是领导的总体原则。他密切观察指挥官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并且有意识地模仿他们。如果说他有专长的话，那就是擅长培养和管理海军的人力资本。他作为领导者、管理者、裁决者和激励者时最能发挥天赋。20世纪20年代末，他被派往伯克利任海军科学和战术方面的教授。在那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将学生招进海军预备役项目，这是他一直都非常在意的一个项目。他非常喜欢跟“极具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年轻人一同工作，试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39\]](#)

1935年，他开始在航海局也就是海军的人事部门任职。他在这个部门担任过两个职务，其中的第一个职务要负责海军“采购、培训、人员晋升、任务分派、掌管军纪”的工作。他善于选贤任能，把他们安排在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部门。航海局命他掌管两个主要的海军军官培养单位，一个是海军学院，一个是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Naval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缩写为ROTC）。此外，所有的新兵训练营和其他特殊训练学校和项目也归他管理。他推出了一项有争议的政策，去掉了预备役制服和正规海军军官制服的所有差异。这个旨在提高预备役人员权威的政策在“安纳波利斯集团”中不受欢迎。但是，它避免了像在英国海军中存在的那种差异。在英国海军中，预备役军官身穿波浪金条纹制服（贬义的绰号“波浪海军”就是因为这身制服得来的）。[\[40\]](#)当上航海局局长后，尼米兹向所有舰船和基地的将级军官发出了一则消息，让他们都用预备役人员作为个人助理，并让海军学院毕业生去执行海上任务。尼米兹心里一直铭记着马汉的信条：好船员加上坏舰艇比坏船员加上好舰艇更能打造一支好海军。他本人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的，但是如果这个小圈子里有谁伤害海军的利益，他绝不姑息。

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海军建设有了长足进展。1934年、1938年和1940年制定的几个重要海军支出法案导致海军急需招募各级军官和士

兵。（1940年的《两洋海军法案》旨在建设两支可以独立作战，同时又不违背马汉集中优势兵力原则的大型舰队。它授权海军舰队的规模扩张70%，为此拨款了4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当时急缺人手，而尼米兹是整个海军中提供人手最多的。他通过在报刊上打广告为海军募兵。新兵的基本训练期从8周缩短至6周。海军学院的班级增设了25%，学术课程从四年缩短到三年。新的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在全美国的大学里设立。为了应对海军不断增加的行政工作和文职工作，他还开始雇用成千上万的女性担任海军文书军士。

他不是飞行员，也从来没有在航空母舰上工作过，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度过的——这是所有海军军官都应当做的——他还分别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战列舰上任过职。他做过一系列重要的参谋工作，制订过作战计划，指挥过巡洋舰分队，也指挥过战列舰分队。在海上，他始终相信下属知道各自的职责所在，相信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们不知道。他没有采用暴力的指挥风格，给了下属很多施展的空间，只有当他们显露出自满或无能为力时，他才插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以低沉的声音礼貌而直率地告诉那个人，他的表现不够好。拉马尔说：“尼米兹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而且在我和他一起服役的这么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脏话。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平静而沉着地使某个海军少尉甚至使哈尔西将军镇定下来。他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不满，只有看到他咬着嘴唇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不高兴了。此时他蓝色的眼睛里会闪出冷冷的光。”他不是苛刻的上司，很关心下属的福利问题。拉马尔回忆说：“不论何时，在我们外出工作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问我，后勤兵或驾驶员是否都有吃的。”^[41]但是他也不缺乏军事指挥官在战时所需的冷酷和无情。后来，到了1943—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不断增加，他说：“这是指挥官的责任。你必须派人去牺牲。”^[42]

尼米兹在“超级酋长号”上研究了图片和简报后，开始全方位地深思这个摆在他面前的挑战。他要接管的是一个散乱的指挥体系、一支瘫痪

的舰队和一群士气低落的士兵。他到达夏威夷的时候，正是人们普遍担心这座岛会被敌人占领之际。他要负责指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而且他指挥的战区的面积，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指挥的战区。他掌管的舰队最终将摧毁日本海军，并将战争引入西太平洋地区，其规模与以往的任何一支舰队都有根本的不同。它需要调动整个美国的经济和全体美国人。周日，尼米兹再一次写信给凯瑟琳，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加谨慎：“我睡了个好觉，醒来时神清气爽。但是今天在看了报告和评估后，我很难保持乐观。也许在我真正抵达并从第一眼的震惊中缓过劲来后，情况会好一些。”^[43]

火车继续前进，穿越了多彩的荒漠，这是平顶山和红色砂岩峭壁组成的壮丽景观。^[44]纳瓦霍部落的妇女在沿途小镇的车站售卖毯子和珠宝。尼米兹又试着教拉马尔玩克里比奇牌戏，但仍以失败告终。进入亚利桑那州后，窗外的景色依旧，从火车的窗户向外可以看到霍皮人废弃的村庄，孤独的仙人掌零星地散布在丘陵上。到了塞利格曼，他们的手表又往回拨了一小时。他们跨过科罗拉多河，进入加利福尼亚的尼德尔镇，进而穿越莫哈韦沙漠那人迹罕至的平原，远处是烈日炙烤下荒凉的群山。随着他们进入加利福尼亚的中心地带，土地渐渐变得肥沃起来。他们很快便看到了苹果园、桃园和樱桃园，接着是成片的柑橘园和柠檬园。他们穿过了丰塔纳，亨利·凯泽会在那里于两年之内建成落基山脉以西第一座综合钢厂。继续向西行进，路旁排列着棕榈树的平房社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广告牌林立的公路从铁道两侧延伸向远方；接着，建有篱笆的生菜田旁边突然出现了仓库、罐头工棚、冷冻厂房等建筑，田间遍布着用于引水灌溉的管道和沟渠。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一座又一座桥梁，途径帕萨迪纳后，“超级酋长号”于周一早晨驶入了洛杉矶。

尼米兹与即将飞回华盛顿的拉马尔握手告别，随后乘坐联运火车前往圣迭戈，在12月22日下午抵达。在那里，他作为当地海军航空站指挥官的客人过了一晚。他计划乘坐PB2Y-2“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前往瓦胡岛，但是由于12月23日遭遇狂风暴雨，起飞碰到了很多困难。飞机的一

个翼尖老是在水中拖行，于是飞机滑行回了基地，起飞失败。第二天是圣诞节前一天，天气好了一些。尼米兹上将对飞行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在节日期间无法跟家人团聚表示了遗憾。临行前，尼米兹写信给妻子，在结尾处表达了下面的想法：“我只希望不辜负你、总统以及海军部对我的期望。我发誓竭尽所能。”^[45]下午四点，这架大型水上飞机满载着为长途飞行而准备的燃料，从水道上呼啸滑过，摇摇晃晃地升上天空，飞往了珍珠港。

在绝望的两个星期中，威克岛上的小规模守卫部队一直在顽强抵抗日军海空两路的袭击。这片环礁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它是由泥沙、灌木和珊瑚岩组成的V形珊瑚礁，距离瓦胡岛2 300英里，离东京2 000英里，向南600英里是马绍尔群岛北部的偏远程度略逊于此的环礁；从马绍尔群岛的日本机场出发的飞机每天都对这里进行轰炸。威克岛以及威尔克斯和皮尔这两个姊妹岛，总共加起来约有三平方英里，是古火山被淹没后剩下的一部分。它们中间是一个鲨鱼经常出没的、钴蓝色的潟湖，这里面水位太浅，布满密密麻麻的珊瑚岬，无法让任何船只停泊。这三座岛的海拔最高处只有20英尺，离海平面太近了，船只有时候从离它们只有十几英里的地方经过，也看不见它们。岛上没有棕榈树，没有淡水水源，除了鱼以外没有任何食物，只有不会飞的鸟、寄居蟹和那些几十年前甚至可能几个世纪以前从到访的船只上留下来的老鼠。珊瑚上长着一片原始的灌木丛。海浪拍打着岸礁，海涛声是威克岛永恒的背景音乐。这声音虽然说不上是让人不悦，但浪声很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必须提高音量。接近小岛的飞机的引擎声，直至出现于头顶上方才能听到——这有点危险。

威克岛唯一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中途站，是岛链中的一环，这条岛链由瓦胡岛、中途岛、关岛和菲律宾群岛等岛屿组成，将美国与亚洲相连。该岛于1899年并入美国，最初作为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中继站，后来成为泛美航空公司中国特快班机的装煤站和加油站，该公司的四引擎

水上飞机一周两次在这里的潟湖上降落。1941年1月，海军建造了一条4500英尺长的碎珊瑚跑道，并一直努力利用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飞机改善防御设施和地面支援设施。为了给大型船舶建立锚地，他们疏浚潟湖的水道，并用炸药炸掉露出的珊瑚礁。约有1 000名平民建筑工人正在将皮尔岛上的泛美公司的设施改建为扩大的飞机场。这里设有两个军营，每个军营都有营房、办公室和仓库，位于威克岛的两端。第一海防营的450名官兵驻守在威克岛和威尔克斯岛南部岸边的炮台和防御工事中，其中许多人都住在帐篷里。这片环礁的全部航空力量由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VMF-211）的12架F4F-3野猫式战斗机组成，它们是战前四天从“企业号”上飞来的。

12月8日中午（当地时间），在珍珠港遇袭数小时后，威克岛便遭到了34架G3M中型轰炸机的袭击，这些轰炸机来自马绍尔群岛的罗伊岛。云层下的轰炸机从海拔1 500英尺的空中由南面滑翔俯冲。直到第一颗炸弹爆炸前一分钟，才有人看到它们或听到它们的声音。^[46]4架野猫式战斗机正在1.2万英尺的高空中巡逻，但并没有察觉到1万英尺下的日本轰炸机。还有两架飞机已经接到命令升空，但还没有起飞。8架新的蓝灰色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占了威克岛2/3的空中力量）几乎机翼并着机翼，停放在跑道边缘。由于这个狭小的机场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所以它们没法隔出适当的距离。G3M轰炸机排成紧密的“品”字形编队从人们头顶呼啸而过，极其精准地投下了60千克的杀伤炸弹，这些炸弹径直落在停放的飞机之间和邻近的机械库上。与此同时，日本的机枪手也在扫射外面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在机场上四散奔逃，有几十个人在跑道上被射倒。这场袭击进行得很快，轰炸机突然出现，又迅速离去了。它们向左转弯，前去袭击2号营地和皮尔岛上的泛美航站楼，摧毁了那里的好几座建筑物和设施，并且打死了10名泛美的员工。接着它们再次左转，向南迅速撤离。无论是高射炮手还是正在空中巡逻的4架飞机都没能及时做出反应，攻击者逃得无影无踪。

当2号营地指挥部的天花板上出现一连串弹孔时，威克岛的高级军

官温菲尔德·斯科特·坎宁安（Winfield Scott Cunningham）中校才知道他们遭到袭击了。他跳进皮卡，然后沿着主路前往机场。在那里，透过闪烁的火光，他看到了8架珍贵的野猫式战斗机烧焦的残骸，“机身从一头到另一头都冒着火舌”。两个大型航空燃油罐被直接击中并且爆炸，机场周边的汽油桶也在燃烧。黑色的油烟从火焰里翻滚而出，往下风方向吹去。帐篷被机枪打得粉碎：空中的日本机枪手没有错过任何目标。飞机跑道坚硬的珊瑚表面上“密密麻麻地散落着尸体碎块”。[\[47\]](#)

与菲律宾和马来亚的情况一样，日本最初的空袭来得快，跨越距离惊人地长，而且攻击水平超过了盟军飞行员的预估。“我们地面上的飞机就像嘉年华射击馆里的目标，固定在那里，无法还击。”幸存的飞行员约翰·金尼上尉写道。机场上的8架野猫式战斗机中，有7架被摧毁，第8架严重受损，不过经过大修之后还能升空。这样就只剩下5架战斗机来对抗接下来的一次次空袭。扫射和轰炸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亡。VMF-211的55名地面工作人员中，有23人身亡，11人受伤。[\[48\]](#)所有的机械师都受了伤。在战斗的最初几分钟里，这个中队就有超过一半的人伤亡。

坎宁安和他的军官正确地猜测出这次袭击来自罗伊岛或者马绍尔群岛北部某个简易机场。他们推断日本的轰炸机不会在夜间飞行，所以倒推出来，日军的下一次空袭将在第二天中午到来。飞行员和机械师，包括几名可以行走的伤员，一起维修5架可用的飞机。他们从民用承包商那里借来推土机，挖了粗糙的护墙，来安置那些幸存者。剩余的航空燃油罐被分散到了远离机场的地方。[\[49\]](#)卡车把伤员运到了2号营地的医院。停泊在潟湖上的泛美水上飞机被击中了几次，万幸的是其关键的系统都能够修复。公司请求让这架飞机飞往夏威夷，并且尽可能多带一些雇员，坎宁安批准了这一请求。（让坎宁安感到气愤的是，公司将所有的非白人员工都留下了。）[\[50\]](#)为了鼓舞士气，保持最起码的体面，死者的尸体必须要在被岛上贪婪的螃蟹包围之前转移。葬礼勤务队一直在努力赶走大群的螃蟹，直到一辆自卸卡车到达并将尸体运送到2号营

地。在那里，尸体被放置在营地中的一个冷藏库里，和火腿以及牛肉放在一起。

正如估计的那样，第二天的空袭在正午前不久到达了，但这次27架G3M轰炸机是从大约1.2万英尺的高空投下的炸弹。这一次投弹的准确性也令人震惊，2号营地剩余的建筑大多也变成了冒烟的废墟。皮科克角上的一架高射炮被摧毁，一架5英寸岸炮的火力控制设备也有所损坏。所有幸存的野猫式战斗机都在空中迎敌，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的高射炮也开火了，击落了一架敌机，还有一架在向南逃窜时尾部冒烟了。简易机场没有严重损坏，但是正如金尼上尉说的那样，“2号营地附近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平民和海军的棚屋被打得千疮百孔，机械库和仓库都被夷为平地。然而，这天遇袭最严重的是2号营地的平民医院。当炸弹再次落下的时候，头一天袭击中受伤的人们都在医院里。医院遭到了至少一次直接的轰炸，甚至被炸了好几次，迅速燃起大火”。^[51]病人和医务人员被转移到两个空的弹药库里，这里黑暗而不透气，但是在抵御炸弹弹片时至少能起到一点作用。

被包围的守军开始挖掘堑壕，准备迎接持久战，对海军赶来救援不抱什么期待。空袭几乎每天都在持续，通常在中午到达。飞行员和机械师缺少维护手册、零部件和工具，他们拆卸机场上被炸毁的飞机上的零件，尽最大的努力让所剩无几的野猫式战斗机保持飞行能力。从每天早上10点左右，4架战斗机就开始在环礁上空巡逻。12月10日，它们击落了两架敌方轰炸机，高射炮的炮火也很猛烈，似乎击伤了另外两架。但是，日军的双引擎三菱轰炸机投放的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了威尔克斯岛的一个仓库棚子里，这里存放了125吨炸药（平民工程师用它们来疏浚通往潟湖的水道）。巨大的爆炸摧毁了一架高射炮以及半英里外的一辆探照灯卡车，并且引爆了0.25英里内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弹药（3英寸和5英寸的炮弹）。一个岸炮的测距仪被摧毁。令人惊讶的是，只有1人死亡，4人受伤；但是岛上的驻军人数已经少之又少，损失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承受的。

12月11日凌晨3点，海军陆战队瞭望员在南方地平线上发现有模糊的轮廓在移动。“它们就像在海上缓慢移动的黑色幽灵一样。”查尔斯·霍姆斯中士回忆道。^[52]观察员们借着弦月的光亮仔细观察那些移动的轮廓，很快就得出了结论——那是一列舰船。坎宁安中校警觉起来。一些人希望那是友军，是来自珍珠港的救援部队，有些平民承包商甚至带着大包小包跑到海滩上，希望成为第一批上船的人。无论是坎宁安还是海军陆战队驻军指挥官詹姆斯·德弗罗少校都决定暂不开启探照灯，在舰船进入近距离之前不开火。（两人都宣称这个决定是自己做出的，导致战后两人之间有点龃龉。）^[53]如果这一列舰船里有巡洋舰（确实有），那么上面的舰炮可能比威克岛上的5英寸岸炮更大，射程更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敌人可能会选择远程火炮对射，美方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德弗罗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许开火，要求手下“保持安静，直到接到我的命令”。^[54]随着舰船越来越近，海军陆战队员越来越紧张：黎明前的这种紧张状态比实际战斗更加让人难耐。下士伯纳德·理查森后来承认：“我们吓得要死。我们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似乎被包围了……心里很清楚我们会落入敌手。”^[55]

威克岛，1941年12月11日

北太平洋

500 英里

中途岛 珀尔礁与埃尔姆礁

夏威夷群岛

莱松岛 加德纳海山 内克岛 尼华岛 瓦胡岛 莫洛凯岛 毛伊岛 夏威夷

利相斯基岛 拉彼鲁兹海山 法兰西护卫舰暗沙 考爱岛 考拉岛 珍珠港

威克岛

威尔克斯岛 皮尔岛 潟湖 威克岛

坎宁安的指挥所

简易机场

炮兵A连

炮兵B连

炮兵L连

“弥生号”中弹

“睦月号”

“如月号”

“天龙号”

“龙田号”

“疾风号”沉没

“夕张号”

“夕张号”开火

2艘运输舰

炮击线路

烟幕

疏散航道

“如月号”爆炸

北太平洋

Source: Morison,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这支入侵部队是两天前由海军少将梶冈定道指挥从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礁出发前来的。这列纵队中有13艘军舰：6艘驱逐舰、3艘轻型巡洋舰，还有4艘载有450名士兵的运输舰。梶冈率领舰队直接向南部的海滩靠了过来，他显然认为美军的岸炮在过去三天的空袭中都被摧毁了，完全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被发现，而且进了埋伏圈。凌晨5时，东方

出现了黎明的一抹蓝光，舰队距离皮科克角还有4英里——梶冈的旗舰“夕张号”巡洋舰向左转，与威克岛的南部海滩呈平行状态。其他军舰也开始随着转向。几分钟后，“夕张号”开火了。从这个范围开火，炮弹是以较低的弹道飞来，不断从美军士兵的耳畔轰鸣飞过。没有一发炮弹命中海滩上的岸炮，这些岸炮仍用迷彩网遮着，海军陆战队员也仍然坚守在掩体和散兵坑中，但是1号营地附近的两个油罐被击中并燃烧起来。日本的运输舰拖在后面，开始把登陆部队换到小船上。

清晨6时15分，海军陆战队员们感觉仿佛已经等了几个小时。德弗罗少校下令开炮，海滩上的5英寸岸炮纷纷开火。驻守皮科克角的炮兵A连对准“夕张号”开火。第一轮齐射角度偏高，击中了偏南的一艘驱逐舰；炮手们压低角度，在5 700码左右的距离有4发炮弹接连命中“夕张号”。“夕张号”的右舷被炸出了一排洞，冒出浓烟；但是它很幸运，所有的炮弹都打到了水线以上，虽然速度受到了影响，但仍然能逃离战场。它掉转船头，向南逃窜。威尔克斯岛的炮兵L连由约翰·A. 麦卡利斯特上尉指挥，他们的射击范围能够覆盖整个敌舰纵队，但是他们的第一轮射击对准的是三艘驱逐舰中最近的一艘。这三艘军舰在7 000码范围内排成一行。被击中的是“疾风号”，它很快就沉没了。

在前一天的轰炸中，L连的瞄准设备已经被毁，麦卡利斯特不得不借助一种历史悠久的技术，通过试射并观察弹着点来确定有效射程。凭借跟另一个阵地通话获得的援助，L连的弹着点慢慢接近了目标。“疾风号”朝数轮齐射的火力网冲过来并左转，把整个侧面朝向海滩。“疾风号”这一斗志昂扬的举动只是让这个勇敢的“罐头”^[56]完全暴露在炮兵L连的下一轮齐射之中而已。炮弹击中了船身中部，并引爆了弹药库。一阵剧烈的摇晃过后，一道白光闪过，“疾风号”断成了两截儿——船头漂往一边，船尾漂往另一边，在海上可怜巴巴地浮动了一小会儿之后，迅速沉没了，船上的168人葬身大海。炮手们禁不住欢呼雀跃。L连的副排长亨利·比德尔厉声喝道：“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蠢货！快回到炮位上。你们当这是什么？一场球赛吗？”^[57]

麦卡利斯特调整炮位，瞄准日军的另一艘驱逐舰“追风号”，此舰已掉头向南逃窜。“追风号”释放烟幕弹来掩护自己撤退，但是L连两次成功击中其船舷水上部分。麦卡利斯特向东边更远处的两艘运输舰发射了几颗炮弹。虽然距离接近两英里，有一颗炮弹还是击中了“金刚丸”。最后，麦卡利斯特对准一艘轻型巡洋舰，击中其后炮；该舰尾部冒烟，仓皇逃窜。坎宁安中校后来激动地写道：“今日清晨，什么也无法阻挡炮兵L连取得辉煌战绩。”[\[58\]](#)

在皮尔岛，炮兵B连瞄准的是第二列驱逐舰纵队，这列纵队向北行驶，经过环礁西侧时，一颗炮弹击中了“弥生号”船尾附近的水线以上部分。日本炮手迅速反击，准确性很高，炮弹落在B连四周，炸断了连接附近瞭望塔的火力控制电缆。伍德罗·M. 凯斯勒上尉解释说：“他们一开始的方向修正量很完美，但是由于他们也是水平射击，弹道很低，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太低，难以击中。起初，他们的炮弹直接落进我方阵地前的潟湖里，湖面翻滚着黄绿色的苦味酸水花。然后炮弹又越过我们，在北部海滩落下。紧接着他们交叉射击，将我们笼罩在其火力范围中。看到这么多的炮弹在我方炮兵连阵地上爆炸，我们却没有人受伤，真是难以置信。”[\[59\]](#) B连操作阵地中的大炮，又打了几轮齐射，最终又有一颗炮弹击中“弥生号”，而且可能也击中了“睦月号”。这两艘驱逐舰掉头向南驶去，冒出了浓烟。现在整支舰队都在撤退。早晨7时，梶冈少将取消登陆行动，以信号示意全体撤退至夸贾林环礁。

很快，撤退的舰船消失在了南方的地平线以下，但是海军陆战队的反击还没有结束。剩下的4架可飞的F4F野猫式战斗机一直在环礁上空盘旋，保持高度，如果日本航空兵前来与入侵舰队协同作战，它们就可以迅速迎敌。VMF-211的队长保罗·A. 帕特南少校在无线电里说：“好吧，空中好像没有日本人。咱们也冲下去，加入这场派对吧。”[\[60\]](#)

野猫式战斗机纷纷向南追击。这些是战斗机而非轰炸机，不是为了炸沉舰艇而设计的，但是它们都临时挂载了两枚小型的100磅炸弹，还能用0.50英寸机枪扫射敌人的甲板。这4架飞机连续攻击了9次，狠狠打

击了正在撤退的日军入侵部队，然后返回离得越来越远的威克岛，去补充炸弹和机枪的弹药。该战斗机中队的空中攻击破坏了日军巡洋舰“天龙号”的一根鱼雷发射管，摧毁了巡洋舰“龙田号”的无线电室，扫射了运输舰“金刚丸”并使其中弹起火，引爆了“如月号”驱逐舰上的深水炸弹舱，致使该舰沉没。这几架飞机都遭到了高射炮和机枪的射击，虽然没有被击落，但是都弹痕累累。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的引擎被射得千疮百孔，在返航途中严重漏油，飞行员被迫紧急降落在海滩上；他离开了，可是他的飞机不能再飞了。

炮手和飞行员击伤了来自夸贾林环礁的日军入侵部队的13艘军舰中的9艘，并击沉2艘。日本方面从未报告这一战的损失，但很可能有500人丧生，受伤人数是其两倍。出人意料的是，美军只有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场仅靠岸炮就击退了两栖入侵部队的战役。海军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炮兵L连的一名炮手说：“当日本人撤退时，你甚至会以为我们已经赢了这场战争。”^[61]在经历了三天破坏性的狂轰滥炸之后，这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胜利，也是盟军在日本进攻初期所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我非常确定，岛上每个人都士气昂扬，”德弗罗手下的一名中士写道，“有几个路过的士兵停下来祝贺德弗罗。我们又有了某种希望。我们感觉很好。我们是海军陆战队，不是吗？”^[62]

然而，威克岛坚持不了多久了。目前只剩两架飞机还能飞。岛上急缺重要的装备、弹药和人力。这里需要增兵，增加军备和物资，否则就要撤离，把这座岛让给敌人。“对于未来，他们不抱任何幻想，也预料到了敌人会加派兵力，卷土重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写道，“但他们认为，海军会认真考虑派兵前来解救他们。”^[63]

12月7日下午，波因德克斯特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夏威夷开始实行戒严。肖特将军在被解职之前，发布了一则声明，警告当地居民对

所有命令“立刻绝对服从。……不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不得有丝毫违抗。……所有人都要留意自己的举动，因为任何违犯军令的人都会立刻受到严厉惩罚”。[\[64\]](#)

岛上严格执行灯火管制和宵禁政策：晚上6点钟熄灯，6点半街上不得有人。有意违犯宵禁的人在夜间玩儿起了“躲警察”的游戏：他们跑步穿过空地，躲进灌木丛，或者藏到停放的车辆下面。有一些冒险者因此遭到射杀。巡逻的警察整夜都在昏暗的街道上走动，他们的警告声响彻四周：“灯！灯！关上灯！”[\[65\]](#)不遵守灯火管制的人会被逮捕，带到火奴鲁鲁的宪兵司令面前。他们会抗辩并简短地陈述，之后法院会做出裁决。违犯禁令者一般会被罚100美元（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月的工资）或处以100天监禁。行为较轻者，例如在后院点烟的人，有时会被判献出1品脱（约500毫升）的血。

当地居民必须在脖子或手腕处佩戴标识牌，还要时刻戴着笨重的防毒面具。所有人都必须录入指纹，还必须注射疫苗。每天下午3点半店铺就暂停营业。由于禁止卖酒，所有酒吧和酒馆都关了门。食品、药品和香烟一时间变得稀缺。每天杂货店前都会排起长龙，货架也会被清扫一空。汽油实行配给制，每辆汽车每月仅限10加仑。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必须上交所有设备。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冲洗照片。当地政府通过电话公司总机监听拨往本土的电话，如果来电者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使用除英文之外的语言，聊起瓦胡岛的天气，监听人员就会切断通信，甚至（采用更可怕的方式）直接打断通话，厉声警告。“监听人员基本上不会问候你，”当地的一名新闻记者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言语简直就是粗俗无礼。人们认为，这是战争带来的一种罪恶。”[\[66\]](#)

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重要建筑物门前堆放着一排排沙袋。屋顶、公共汽车，甚至包括火奴鲁鲁滨海地区的地标性建筑阿罗哈塔（Aloha Tower）都被漆上了迷彩图案。编花环的手艺人被征去制作迷彩伪装网，以遮蔽炮台、卡车和飞机。“夏威夷”这个词被套印在所有纸币上——如果遭到入侵，美国财政部可以宣布这些纸币作废。国民警卫队成

员手持装了刺刀的步枪，在交叉路口和桥梁驻守。然而，他们身边的许多民防志愿者只拿着从家中带来的武器，包括匕首、木棍和砍刀。部队用战壕、碉堡和铁丝网封锁了海滩。人们在公园绿地和私人庭院内挖了简易的防空洞，这些防空洞大多只是一些深沟，里面垫着硬纸板，上面盖着锡板。在频繁拉响的防空警报声中，所有居民按命令躲进防空洞，直至警报解除。佩吉·休斯·瑞安丈夫是驻扎在珍珠港的潜艇军官。她回忆称，自家后院的防空洞里挤满了蟾蜍和蝎子。“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我们拒绝躲到那里，我们宁愿被炸死，也不愿意跟那些爬着的、蹦着的东西待在一起。”^[67]

夏威夷居住着大量的日裔，其中既有入籍的公民，也包括外籍侨民。他们总数约为15.8万，占当地人口的37%。仅在瓦胡岛，就有8.2万日本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空袭之前就已知情，向敌人提供了情报，或者进行了蓄意破坏。海军部长诺克斯也这样说过，他的言论还被当作事实引述。（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这种说法。）夏威夷没有真正考虑过大规模拘捕日裔，因为日裔人数太多了，也是各岛的主要劳动力。事实上，许多夏威夷的国民警卫队成员都有日本血统，他们沿路驻守，遍布整个夏威夷群岛。空袭结束后不久，新来的一批海员搭乘顺风车进入火奴鲁鲁。“我能看到乘客脸上震惊的神情，”司机回忆道，“戴着四道金杠的军士长竟然说：‘天哪，日本鬼子赢了吗？’”^[68]夏威夷的日裔虽然从未被关进拘留营，却生活在美国人的怀疑之下。“日裔是善良、守法的公民，”火奴鲁鲁的警察局局长告诉记者，“但是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了，我半分钟也不相信他们。”^[69]

军人的家属接到命令，要撤回本土。统帅部希望更多的人撤回本土，这不仅是为了节约粮食，也是在担心，一旦夏威夷遭到入侵，无法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安全。由于只能提前24小时通知，因此军人的家属需要打包好行囊，随时准备登船，“每天都要从行李箱里取衣物，不知何时就会接到出发的通知”。^[70]他们不得不把宠物留下，将家具和其他物件搬到人行道上出售，但卖的人比买的人要多得多。驻守在珍珠港或

岛上其他基地的男子，即便距离家人只有几英里远，也往往没法跟家人联系。妻子们都希望从收音机中听到有关各自丈夫所在舰船或单位的消息，但在军事审查之下，她们在电台报道中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谣言反倒是接连不断。“没有什么比那些糟糕、可怕的谣言更加伤害这些女性了，”一位驱逐舰舰长的妻子回忆说，“好多人会因为听信这些谣言而尖叫！”^[71]“布里斯号”驱逐舰上的军医霍勒斯·D. 沃登上尉回忆说，他和其余船员都渴望出海，“但是我的家人在瓦胡岛的另一端，所以我首先想做的是回到岸上，让家人知道我很好，我也想知道他们都没事”。在所有的事情中，无法得知家人的消息是最折磨人的。沃登说：“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糟糕的一周。”^[72]

在12月7日之前，即将被尼米兹取代的金梅尔将军就仔细考虑过威克岛的事情。4月的时候他猜想可以用威克岛作为诱饵，将日本海军引入公海，“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进行海军之间的对决了”。^[73]金梅尔在12月10日星期三批准了一项大胆的计划，将其麾下的所有三支航母特混舰队都派往西部，运气好的话，它们在那里或许能伏击前往威克岛的日本舰队及运输部队。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的“萨拉托加号”航母由海军少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指挥。“萨拉托加号”将作为第14特混舰队的核心，用来增援威克岛并帮助伤员和民工撤离。第4海防营的一支分遣队将携带武器弹药和补给品，乘坐“丹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舰。（尽管最初的计划并未主张放弃威克岛，将其拱手让于敌军，但是这个选项是存在的；金梅尔的作战计划处处长查尔斯·H. 麦克莫里斯上校在12月11日写道，“丹吉尔号”可以容纳全岛的所有1 500人：“船上将会十分拥挤，但我相信它能够承受。”^[74]）“列克星敦号”航母（隶属于第11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小威尔逊·布朗指挥）将会对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环礁上的敌军机场进行牵制性空袭，之后如果军情紧急，“列克星敦号”也会往西北掉头，加入弗莱彻少将的部队。“企业号”航母（隶属于第8特混舰队，仍由海军中将哈尔西指挥）将在约翰斯顿岛以西巡航，如果与日军的战斗升级为大规模战役，“企业号”可以随时开足马力驰援。^[75]这次

远征调用了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金梅尔手头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潜艇除外），包括分配给三艘航母的各式巡洋舰、驱逐舰，以及辅助舰艇。

从一开始，救援行动就被一系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延误而耽搁，这些原因包括恶劣的天气、加油事故和对潜艇的恐惧等。其实，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国的航母作战群还不习惯战时的海上行动，正在攀爬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海上风急浪高，减缓了护航舰船的速度；无论在何种天气条件下，海上加油作业都是一项尚待完善的技艺；敌军潜艇来袭的误报频频发出。（在“企业号”一次早期的战斗巡航中，哈尔西曾对他的特混舰队做出如下指示：“我们在完全无害的鱼类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深水炸弹。是时候采取相应的行动了。”^[76]）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战争日志中详细记录了整个12月遇到的那些问题。12月12日：“由于第11特混舰队仍无法完成海上加油作业，决定让‘列克星敦号’分队回珍珠港加油。”还是12月12日：“由于三艘1 200吨的护航驱逐舰受恶劣天气影响，‘萨拉托加号’被迫延误。”^[77] 12月13日：“因仍受恶劣天气所困，‘萨拉托加号’会进一步延误。”^[78]“萨拉托加号”距离珍珠港还有4小时航程时接到了一份误报，说一艘日军小型潜艇在珍珠港潜伏，它被迫留在原处，直到12月15日早晨才入港。

弗莱彻少将派出了“丹吉尔号”水上飞机供应舰、“内奇斯号”油轮以及一个驱逐舰分队，打算在“萨拉托加号”补充燃料的时候超过它们。“萨拉托加号”于12月16日出海，然后开足马力向西北方向前进，并于次日下午把同行的舰船甩在了身后。特混舰队以13节的速度缓慢前进，这是“内奇斯号”的最大速度。晴朗的天气持续了好几天，但到了12月22日，海上突然刮起了时速达20海里的大风，巨浪滔天，当时特混舰队距威克岛仍有600海里的距离。弗莱彻收到了珍珠港方面要求其舰队在指定坐标点补充燃料的指令，以便“列克星敦号”作战分队在必要时前去会合。加油作业的过程是漫长且痛苦的，船员们不时因为两舰差点相撞、油管破裂等原因相互指责谩骂，这种情形在驱逐舰和起伏不定

的“内奇斯号”并排的时候尤为严重。10个小时过去了，特混舰队几乎一点都没有向西挪动，而那时威克岛上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世界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威克岛上的顽强防御对于精神上已经饱受摧残的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慰藉，在经过审查的官方新闻中，哪怕有一点点关于这个被包围的小岛的消息，他们都不放过。罗斯福总统称赞了他们的顽强抵抗。多家报社及无线广播电台满意地报道（并渲染）了“太平洋阿拉莫^[79]”的英勇立场。“在成功击退了另外两次日军的猛攻之后，驻扎在威克岛上的小规模海军陆战队在周五晚上依然坚守在这片满目疮痍的环礁上。”美联社12月19日如此报道。^[80]据说珍珠港方面问威克岛需要哪些补给品时，坎宁安中校回答说：“给我们派来更多的日本鬼子！”^[81]他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里引用的话其实是对无线电通信中一种误导敌方破译员的无意义的“电文中的填凑部分”的误读（可能是故意的）。当威克岛上的短波电台收听到这份报道时，岛上的守军并不觉得有趣。“我们最不想要的就是更多的日本人。”金尼上尉评论说。^[82]坎宁安认为国内的调子完全是错误的，它以一种好莱坞式的骗局来掩盖这片环礁上极端悲惨的困境。这名中校后来写道：“广播电台的报道极大偏离了真相，其偏离程度就像威克岛距珍珠港一般遥远。我们正竭尽所能，并且因此而自豪，但是我们的努力不像他们的英雄故事那样，过于浪漫而无视常理。……我们想要的是活下去。”^[83]

12月17日，金梅尔被正式解除了指挥权，当天尼米兹被任命为其继位者。但尼米兹赶到赴任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权力交接的短暂过程中，战斗部队（即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现在基本上已失去作用）司令威廉·S. 派伊中将暂行代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之职。与金梅尔相比，派伊对于威克岛的救援任务缺乏信心，对日军更是十分谨慎。现如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指挥情况一片混乱。派伊一方面心不在焉地听着金梅尔原班人马的汇报，一方面继续依赖原来的战斗部队的参谋，那些人因为他的旗舰“加利福尼亚号”严重损毁而无处可去。派伊将

驱逐舰分舰队的司令米洛·S.德拉梅尔（Milo S. Draemel）少将任命为临时参谋长，而德拉梅尔将数名驱逐舰中的亲信带入了司令部。其结果是，拿一名无线电情报官的话说，“本来就糟糕的情形变得更加混乱了”。^[84]整个威克岛（以及集结在威克岛附近的航母）的命运成了派伊关心的头等大事；但他心里清楚，自己只是在给尼米兹守着位置。他似乎有个沉重的负担，就是要将这些航母安然无恙地交给它们的新长官。

此外，华盛顿司令部那边急切地提醒过派伊，整个夏威夷都身处险境，在主要的据点仍有可能遭受攻击的情况下，派一支舰队劳师远征，去支援一个几乎没有军事价值的偏远基地有什么必要呢？^[85]派伊、金梅尔和华盛顿的各位将军早就达成了共识，目前残酷的现实是，威克岛是个“累赘”。^[86]日本迟早会攻下它。表面上，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加强威克岛的守备部队和航空部队的力量，备用计划其实是撤离岛上的人员，伺机从空中对日本侵略部队施加惩罚。最重要的是，不能损失剩余的任何一艘宝贵航母，即便代价是抛弃威克岛上的1 500名士兵。这就是派伊的底线，他很快就会露出这一底线。

派伊感到毫无头绪。他对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日本大型航母舰队的位置一无所知，因此担心这支舰队正埋伏在某个地方等待着美国航母。所以，原本准备伏击日军的美军，很可能正在钻入日军的埋伏圈。派伊的情报人员估计日军的大部分军舰已经返回日本本土补给燃料和装备了，6艘航母中很可能有4艘已经撤退，但这仅仅是猜测。此外，马绍尔群岛的陆基轰炸机也随时可能带来威胁。人们还担心美军航母准备不足：“列克星敦号”上的防空射击演习一直糟糕得让人吃惊。就算有充足的应对时间，美国的航母能否成功抵御空袭呢？12月20日，派伊和德拉梅尔认真考虑了一下是否要命令第14特混舰队撤回珍珠港。但是由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作战计划处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强烈反对，他们只能作罢。根据那天的会议记录，派伊为即将放弃威克岛的决定做了准备工作。^[87]他还用无线电联系了布朗将军和“列克星敦号”分队，指示他放

弃袭击马绍尔群岛，转而向北行进，去和弗莱彻会合。布朗的参谋对这一命令感到很愤怒，还有人在舰桥上说要坚决抗命，把命令撕了扔进海里；但是布朗将军还是依令行事了。12月21日，派伊通知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威克岛的行动按原计划进行，但是美军航母会留在距离该岛200海里的地方。[\[88\]](#)

派伊向第14特混舰队发出的无线电报透露了他的犹豫不决。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命令反复无常，蚕食着弗莱彻将军的信心。12月21日，弗莱彻将军接到命令，要全速驶向威克岛，并在距离该岛200海里的地方出动飞机。然而这个命令很快就被上级收回了。取而代之的新命令是派“丹吉尔号”全速前往，接守军上船并撤离。还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命令也取消了。

威克岛的情况越来越让人绝望。在当地时间12月20日（夏威夷时间12月19日），坎宁安报告说，他目前仅存的战斗机已经“千疮百孔”，而且这些战斗机在空战中至今仍未被打下来只能说是“奇迹”。岛上缺乏关键的设备和补给，包括雷达装置、火力控制设备、粮食供应，以及各种口径的弹药。对于高空攻击，3英寸口径的高射炮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3英寸高射炮的弹药最多只能再维持一到两天。[\[89\]](#)空袭几乎每天都在持续。岛内的电缆被炸弹破坏，电话通信一团糟。从早到晚，战士们马不停蹄地加强岛内的防御——挖散兵坑和地下掩体，填沙袋，分发弹药，筑炮位，但是伤亡人员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伤员被安置在弹药库里搭建的临时医院内。在这种劳动强度下，即使所谓“健康”的士兵也疲惫不堪，睡眠不足，患痢疾的人越来越多。12月17日，珍珠港传来一条可笑的消息，内容是询问疏浚潟湖水道的进度。这让战士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了。难道上级完全不了解威克岛的实际情况吗？

为了让战斗机能继续进行空战，士兵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任何替换的飞机，至少是额外的零件，威克岛很快就会彻底失去防空能力，这是不可避免的。12月14日，一枚炸弹击中了藏在护墙后的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炸毁了它的尾翼，但是没有让它的引擎损坏。约翰·金

尼上尉想把这架报废飞机的引擎拆下来安装到另一架引擎性能很差的飞机上。但是由于没有引擎起重机和飞机维修库，整个过程异常艰辛，耗费了9个小时。祸不单行，当晚又有另一架飞机在降落时由于紧急避让一群平民而急速转向，导致坠毁。最后，只剩下了三架适航的战斗机。战斗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物资短缺的问题更加明显，能飞的飞机都像是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发出各种怪声，机身布满弹痕，到处都是用从机场散落的残骸上取下的零件打的补丁。到了12月20日，还剩两架飞机能够升空。

那一天，以及12月21日，威克岛遭到日本爱知九九式单引擎俯冲轰炸机（“瓦尔”）的攻击，这种飞机是一种航母舰载机。第二天，“瓦尔”轰炸机还有零式战斗机护航。在空中混战时，威克岛剩余的两架野猫式战斗机中有一架被击落，另一架降落时坠毁，无法再起飞。此时，威克岛已经完全失去了防空能力。

坎宁安报告说出现了航母舰载机，派伊担心有一支日本航母特混舰队正在为日本新来的入侵舰队做掩护。实际上，这些俯冲轰炸机是从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撤退的六艘航母中的两艘上飞来的，这些航母正在返回日本。这是一种重视战机、打完就跑的策略，这种攻击不会重复。但是日军的第二批侵略部队的确已经在路上了，这次是由4艘重型巡洋舰护航。这些战舰小心地待在美军射程外，派了1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搭乘驳船登岸。登陆作战在当地时间12月23日凌晨2时35分（珍珠港时间为22日）开始。当晚，入侵部队迅速占领了整个岛屿，把守岛部队打散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打死了700到900个入侵者，但据点还是一个个被攻下。当地时间12月23日凌晨2时50分，坎宁安中校向派伊汇报称：“敌军显然正在登陆。”^[90]凭借人数优势，日军逐步在岛上推进，到早上5点的时候，坎宁安发出信号：“敌人已经到了岛上。能否守住未可知。”^[91]

收到这些信息后，派伊和参谋聚在一起商量对策。他咨询了作战计划处处长麦克莫里斯上校，还咨询了临时参谋长德拉梅尔将军，让他们

把建议都写成文字。两个人都同意，不管是增援还是撤离，解救威克岛都为时已晚。但是对于是否要出动美国航母去攻击敌舰，他们的分歧很大。此时，弗莱彻的“萨拉托加号”分队距离威克岛还有425海里，而且舰队中的驱逐舰仍然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艰难地补充着燃料，但是如果“萨拉托加号”全速驶向威克岛，还是有可能在次日早晨派出舰载机攻击的。布朗率领的“列克星敦号”分队离得足够近，可以从南方参与进攻，而哈尔西的分队可以安排在合适的位置掩护此后的撤退。

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中，麦克莫里斯建议派伊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美军在周边的力量很有可能比敌人强，而不接敌就撤退会显得“过分谨慎”。虽然日方舰队（尤其是航母）的确切位置是未知的，但是在战斗中往往就是要敢下赌注，而且“敌人不可能在每个方向上都有优势兵力”。直接撤退还会“挫败军队和公众的信心”。他总结道：“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们急需一场胜利。”^[92]

德拉梅尔对战场形势的评估则强化了派伊谨小慎微的心态。“萨拉托加号”特混舰队的加油是个大问题，这有可能让美军的舰队处于优势敌人的打击范围内且无法撤退。“在距离基地这么远并且燃料补给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如此重大的交战？”他的回答是不行，“我们没有任何预备队——我们**所有的**部队都位于可能开战的区域。……总体情况要求我们谨慎行事——特别谨慎。”^[93]

派伊已经听够大家的意见了。12月22日上午9时11分，他命令三个航母编队返回珍珠港。^[94]这一命令遭到了前线官兵的反感。特混舰队中有很多士兵当众哭泣。布朗将军旗舰的副舰长乔治·C.戴尔后来指责“派伊将军吓破了胆，很显然，他觉得在太平洋上，到处都是日本舰队”。^[95]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埃德温·莱顿中校也有类似的看法：“跟敌人大战一场然后输掉是一回事，如果输掉战役是因为自己的将领胆小畏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96]在“萨拉托加号”的司令舰桥上，有人说应该无视撤退的命令，也有人觉得弗莱彻应该模仿霍拉肖·纳尔逊在哥本

哈根战役中著名的做法，那时纳尔逊把单筒望远镜架在自己瞎了的那只眼上，说他看不到命令他停止与敌舰作战的信号。那些准备起飞去威克岛拯救战友的“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员威胁要抗命飞过去。海军少将“杰克”奥布里·菲奇的战旗在“萨拉托加号”上飘扬，他不得不离开舰桥，躲回舱室，好让自己听不到那些有关抗令的谈话。而在珍珠港，约瑟夫·M. 里弗斯将军惊呼道：“天哪！人们过去常说，男人应该也是战士，知道如何战斗。现在我只需要一个会战斗的人。”^[97]

对于夏威夷的许多人来说，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那天都是战争中最糟糕的一天。取消威克岛救援行动的同时，从菲律宾又传来了不祥的消息：日本运输舰将大量士兵运到吕宋岛和莱特岛，丝毫未遇到抵抗；麦克阿瑟已经逃离了马尼拉。美国目前没有任何希望向菲律宾增兵或者提供物资援助，菲律宾很可能被抛弃，落入敌人手中，就像威克岛那样。

在夏威夷，平民和军人都切实感到了入侵的阴云。火奴鲁鲁的7岁大的卡罗尔·罗宾斯·琼斯听到她妈妈哭喊道，火奴鲁鲁就要被“占领”了。卡罗尔跪在地上，“向上帝坦白我的所有罪恶，祈求上帝让我变好，觉得我的忏悔和向善的承诺有助于结束战争”。^[98]《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罗伯特·凯西一年半之前在纳粹发动闪电战时于巴黎工作过，他在看到火奴鲁鲁当地人的表情之后，回想起了1940年5月在法国见到的人们的表情。他写道：“这种相似性让人难过。”^[99]失败的创伤让很多军官，包括那些很优秀的人，变得迟钝麻木。舰队的医生面对着太多几近精神崩溃的士兵，会给士兵们“任何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的药物”，^[100]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尼米兹的飞机在早上7点到达珍珠港，那天是圣诞节，潮湿、灰暗、阴郁。飞机从圣迭戈开过来花了17个小时。在一架战斗机的陪伴下，巨大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开始盘旋，准备在东湖降落。尼米兹在飞机上坐在左边的驾驶员位置，第一次亲眼看到战列舰的惨状。飞行员

回忆说，尼米兹上将“只是不断摇头，啧啧感叹”。^[101]飞机在泛着浮油的港口水面着陆，滑行经过了“俄克拉何马号”倾覆的巨大船体。飞机门打开后，尼米兹闻到了弥漫在港口的混合了燃油味和船只烧焦味的恶臭。这种臭味无处不在，珍珠港的人都意识不到了。

一艘摩托艇开过来，载着参谋人员前来接机。尼米兹此刻仍然穿着便装，他向机组人员道别后踏上了小艇。这艘小艇上到处都是油污，乘客都站着保持平衡，不愿触碰舷缘或抓住把手，生怕弄脏自己的衣服。尼米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威克岛救援行动有什么消息？”^[102]听说威克岛已落入日本手中，救援行动也被撤回后，他陷入了沉默。船朝着码头驶去，经过的水面上依然覆盖着燃油和船只的残骸。港口附近有其他船在工作。一名军官告诉他，这些船是在打捞尸体。袭击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星期，现在仍然有尸体从水里冒上来。“这真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尼米兹说，“有这么多舰船沉没。”^[103]

派伊和金梅尔在码头上迎接了他。“我对你深表同情，”尼米兹对金梅尔说，他们两人私交甚密，“这种事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汽车拉着三位将军来到尼米兹的住所，那是马卡拉帕山上的一座建得很凌乱的房子，有四间卧室。马卡拉帕山是一个古老的死火山的山锥，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海港。瓦胡岛上缺乏住处，就连舰队高层人员也面临这一困境。金梅尔已经搬去和派伊将军夫妇同住，那是一个小一些但很气派的白房子，就在街对面。尼米兹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吃早餐，说：“看过港口的那一切之后实在没办法一个人吃饭。”^[104]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派伊夫妇和金梅尔每天晚上都来到尼米兹的房子里，几乎每顿饭都在那儿吃。每天晚饭过后，他们或是听古典音乐广播，或是玩克里比奇牌戏。说来也怪，四个人的情谊似乎并没受到当时大局的影响。虽然他们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内心肯定波涛汹涌：金梅尔已经开始接受珍珠港事件后对他的调查，而派伊则毁掉了金梅尔计划周详的在威克岛伏击日本海军的行动。但对于这些在海军服役了40多年的男人，或与这些男人结婚的女人来说，在海军服役跟参加一个小型私人俱乐部差不多。政

治和职业上的分歧被暂且搁置。他们是高级军官，有一场战争要打赢。他们肩负着众人的希望，需要表现出团结的一面。

尼米兹没有立即接管舰队。头一个星期，他了解了一下周边的地形，而且派伊往往会陪同。尼米兹每天早上6时30分起床，做一些锻炼，穿好衣服，吃早餐，并在8点前抵达舰队司令部。各部门长官和下属指挥官会向他做简要的汇报。尼米兹能迅速记住别人的长相，他的老同事和下属经常因为尼米兹能记住他们的名字感到十分惊讶。海军少校贾斯珀·霍姆斯曾在尼米兹指挥的潜艇部队当初级工程师，没什么人认识。“他没有什么理由记住我。”霍姆斯说，但是当两个人在走廊迎面相遇时，新任的总司令不仅向他打了招呼，叫出了他的名字，而且显然还知道他后来的服役记录。[\[105\]](#)

《火奴鲁鲁明星公报》（*Honolulu Star-Bulletin*）的记者威廉·尤因认为，尼米兹似乎太过“亲切”，也太过“慈祥”，而且他的卡其色制服似乎至少大了一个号。“我认为，尼米兹上将看起来更像一名退休的银行家，而不是那种能把我们国家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的雷厉风行的领袖。”[\[106\]](#)这种观点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评论不谋而合：“战地记者希望将军们能像电影里一样拍桌子怒吼，他们特别想知道，尼米兹是‘那样的人’吗？”[\[107\]](#)尼米兹并不是纳尔逊、迪凯特或琼斯那种适合当电影男主角的海军英雄。和那一代的大多数美国军官一样，他没有战斗经验。他从未亲眼见过射击手愤怒地开枪。但是在遭受袭击后，舰队不需要过多情绪上的展示；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做。尼米兹是一名执行官、战略家、领导人。他是老派的绅士，不是那种大喊大叫、乱砸家具或口吐秽语的人。霍姆斯欣慰于尼米兹“冷静自信的气场”，[\[108\]](#)而埃德温·莱顿则认为“他提的问题一针见血……这清楚地表明他具备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钢铁意志”。[\[109\]](#)

尼米兹在巡视过受损船只和岸上设施后得出结论：日本的攻击虽然破坏力惊人，“但完全有可能造成更具毁灭性的后果”。[\[110\]](#)的确，这

次袭击共造成美国海军1 999人死亡，710人受伤，是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伤亡人员总数的3倍。（包括所有的现役军人和平民在内，这次袭击共造成2 403人死亡，1 178人受伤。^[111]）的确，一共大约有排水量30万吨的船只损毁，无法作战，其中包括8艘战列舰（有6艘经过修理后重新服役）。的确，有188架飞机被炸毁，其中大部分是在地面被炸毁的，这大约占到了瓦胡岛军用飞机的九成。^[112]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击中码头上的修理厂，特别是那个储存着450万桶燃油的场区。“这是最严重的失误，”尼米兹后来说，“这些油罐用0.50英寸机枪就能摧毁。……如果我们无法供应石油，那么考虑到欧洲燃料和石油生产的巨额短缺，我们需要多年才能恢复这样的供应量，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也会相应延长。”幸运的是，日本人是在港口袭击的美国战列舰，而不是在海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尼米兹在战争之后说，“如果敌人的6艘航母的飞机攻击我们这些战列舰，而我们的舰队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如果我们的战舰是沉没于深海中，那么我们就可能有将近两万人淹死或被俘虏。”^[113]最后，整个潜艇舰队幸免于难，所以海面下的行动可以立即展开。

听到这样的说法，马汉也许会从棺材里跳出来，但战列舰的损失对于美军来说并不是灾难。计算总账时，甚至可以把它算作净收益，因为战列舰上的数千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员被解放出来，转而在其他地方服役。战列舰速度太慢，无法与航母协同作战，自身也无力防御空中打击。正如一名军官所说，日本人将美国舰队从“一支17节的舰队转变成了25节的舰队”。^[114]从战争伊始，美军就失去了这些战列舰，这迫使美国海军高层认识到飞机和潜艇的优势。而日本海军由于战列舰完好无损，调整 and 适应就非常缓慢。

元旦前夜，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上，尼米兹接替派伊的职务，正式担任舰队的总司令。海军的传统要求新任的总司令把四星旗挂在旗舰上，但由于尼米兹在整场战争中都在岸上指挥，所以这仅仅是一种仪式性的做法，是对传统的致敬。潜艇“茴鱼号”被选为旗舰，此时停泊在太平洋

舰队总司令部的码头上。这个选择再合适不过。“一战”之前，尼米兹曾是一名潜艇兵，一直以佩戴海豚徽章为荣。（他后来也自嘲说，他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115]）此次仪式允许小部分记者和摄影师参加。仪式的最后，尼米兹与他们进行了交流。关于战争如何展开的问题，尼米兹表示自己还不清楚——《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西写道，他“坦言自己讲不了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尼米兹上将确实预测说，敌方潜艇很有可能会炮击西海岸（实际上确实如此），但是海军新闻检查官后来将“很有可能”改为了“有可能”。^[116]

随后，尼米兹穿过码头，走进司令部，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他把高级参谋人员叫了进来。这些军官在日本袭击前就驻在珍珠港，目睹了威克岛救援部队撤回的怯懦表现，这让他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内疚感，就像个人的耻辱一样。他们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被派到凶多吉少的地方，而且许多人渴望被派到海上，以期在战斗中救赎自己。尼米兹清楚地看到了问题所在，也明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些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他后来说，“但他们刚刚遭受了可怕的打击，我的首要责任就是恢复士气，挽救这些优秀的军官，以期他们能在将来发挥作用，这就是我当时着手要做的事情。”^[117]他言语简洁，声音低沉。“我认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判断力深信不疑。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我对最终的结果从未有过怀疑。”^[118]他不会拿12月7日的事件苛责他们，他们可以忘记灾难，重新投入战斗。战争需要他们，他们需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人请求执行海上任务，他会认真考虑，但是“我坚持要留下一些骨干参谋人员”。^[119]

“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尼米兹将军语调轻柔地跟我们谈话，”一名军官回忆说，“他让我们相信，他能带领我们摆脱这种局面。”^[120]

^[1] *Main Navy Building: Its Construction and Original Occupants*. Washington, DC: A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Publication, series 2, no. 14, Aug. 1, 1970.

^[2] 这些建筑在1970年被拆除，这片土地被改建成漂亮的公园，今天是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

的所在地。——作者注

[3]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47.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52.

[5] H. Arthur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6]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 27.

[7] James L. Holloway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107.

[8] Diary entry for Dec. 15, 1941, Perry, “*Dear Bart*,” p. 27.

[9] “Heroic Acts Cited,”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41.

[10]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11] “Heroic Acts Cited,” *New York Times*, Dec. 15, 1941.

[12]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 247.

[1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36.

[14]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15] Potter, *Nimitz*, p. 11.

[16]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17]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18] Potter, *Nimitz*, p. 8.

[19] Nimitz letter to William H. Ewing, in Ewing,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p. 11.

[20] Potter, *Nimitz*, p. 12.

[21] “Careers of Men Shifted in Service,”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41.

[22] Diary entry for Dec. 17, 1941, Perry, “*Dear Bart*,” p. 28.

[23] Nimitz letter to William H. Ewing, in Ewing, “Nimitz,” p. 9.

[24] Potter, *Nimitz*, p. 14.

[25]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26]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46.

[27] *Lucky Bag*, 1905—entry on passed midshipman Chester W. Nimitz, Naval Historical Collection,Washington, DC.

[2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43.

[29] Chester Nimitz to Mrs. Anna Nimitz, Aug. 18, 1912, in Potter, *Nimitz*, p. 118.

[30] *Ibid.*, p. 120.

[31] *Ibid.*, p. 13.

[32]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47.

[33] Details of Nimitz's rail journey drawn from "Along Your Way: Facts about stations and scenes on the Santa Fe," pamphlet distributed to passengers on the Santa Fe Super Chief, 1946; online at www.titchenal.com/atsf/ayw1946.

[34] Lama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9.

[35] *Ibid.* See also Lama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Foreword, p. 2.

[36] Potter, *Nimitz*, p. 185.

[37] *Ibid.*, p. 126.

[38] *Ibid.*, pp. 1–2.

[39]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43.

[40] Potter, *Nimitz*, p. 3.

[41] Lamar, "I Saw Stars," p. 43.

[42] *Ibid.*, p. 16.

[43] Potter, *Nimitz*, p. 17.

[44] Details of Nimitz's rail journey from "Along Your Way."

[45]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47.

[46]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30.

[47]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60.

[48]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p. 57–58.

[49] Commander NAS Wake to Commandant, 14th Naval District, Dec. 20, 1941.

[50]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63.

[51]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 61.

[52]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20.

[53]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86.

[54]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16.

[55] *Ibid.*, p. 320.

- [56] “罐头”是驱逐舰在美军中的外号。——编者注
- [5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32.
- [58]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89.
- [59]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0.
- [60]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1.
- [61]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4.
- [62] Urwin, *Facing Fearful Odds*, p. 334.
- [63]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35.
- [64] “Martial Law Declared,” *Honolulu Star-Bulletin*, 3rd extra, Dec. 7, 1941, p. 1,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17.
- [6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1.
- [66]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November 1942), quo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I*, p. 9.
- [67] Peggy Hughes Rya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34.
- [68] Evelyn W. Guthrie account in *ibid.*, p. 241.
- [6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61.
- [70] Ryan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35.
- [71] “Soldier” Burford quoted in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December 7, 1941*, p. 349.
- [72] Excerpt from Oral History of Lt. Horace D. Warden, MC (Medical Corps), USN, Medical Officer aboard USS Breese (DM-18) on Dec. 7, 1941; “Overview of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www.history.navy.mil.
- [73] CINCPAC to OPNAV, April 18, 1941, quoted in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27.
- [74] C. H. McMorris recommendation to CINCPAC for action against Wake, Dec. 11,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75.
- [75]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p. 235–37.
- [76] Potter, *Bull Halsey*, p. 16.
- [77]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Dec. 12 entry;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5.
- [78]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Dec. 13 entry; *ibid.*, p. 46.
- [79] 阿拉莫（Alamo），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处教堂纪念地。1836年数千名墨西哥士兵包围此地，只有200人左右的守军顽强抵抗，全部阵亡。后来得克萨斯人在“牢记阿拉莫”的口号声中继续作战，最终击败墨西哥军。——编者注

- [80] AP story quoted in Sloan, *Given Up for Dead*, p. 192.
- [81]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109.
- [82] Kinney, *Wake Island Pilot*, p. 69.
- [83] Cunningham, *Wake Island Command*, p. 110.
- [84]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42.
- [85] “OPNAV to CINCPAC,” Dec. 17,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70.
- [86] “OPNAV to CINCPAC,” Dec. 22, 1941; *ibid.*, p. 72.
- [87] “Estimate by Admiral Pye on 20 December”; *ibid.*, p. 76.
- [88] “CINCPAC to OPNAV,” Dec. 21, 1941; *ibid.*, p. 72.
- [89] Commander NAS Wake to Commandant, 14th Naval District, Dec. 20, 1941.
- [90]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48.
- [91] *Ibid.* (有些史料误认为此话是德弗罗少校所言。)
- [92] “Estimate by Captain McMorris as to action regarding enemy investing Wake 0800 December 22,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p. 80–81.
- [93] “Decision by Admiral Draemel as to action regarding enemy investing Wake—0700—22 December”;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82 (加粗部分为原文所加)。
- [9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52.
- [95] George C. Dyer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46.
- [96] Layton account in *ibid.*, p. 283.
- [9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p. 252, 254.
- [98] Jones and Jones, *Hawaii Goes to War*, p. 38.
- [9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3.
- [100]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42.
- [101] Frank L. DeLorenzo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
- [10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3.
- [103] Potter, *Nimitz*, p. 20.
- [104] *Ibid.*, p. 17.
- [105] Wilfred Jay Holme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5.
- [106] Ewing, “Nimitz,” pp. 1–2.
- [107]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56.

- [108] Holmes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55.
- [10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4.
- [110] Nimitz, “God’s Divine Will,”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1.
- [111]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p. 539.
- [112] Lord, *Day of Infamy*, p. 212.
- [113] Ewing, “Nimitz,” p. 11.
- [11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32.
- [115] Potter, *Nimitz*, p. 23.
- [11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59.
- [117] Ewing, “Nimitz,” p. 5.
- [118] William Waldo Drak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9.
- [119] Potter, *Nimitz*, p. 25.
- [120] Drake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69.

第五章

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J. 金上将不苟言笑，为人桀骜不驯，面带不屑的表情。他身材瘦高，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健康状况。1901年，泰迪·罗斯福向他颁发海军学院毕业文凭时，金身高6英尺，体重165磅。^[1] 1941年，63岁的金身高不变，体重只增加了10磅。他很少笑，（为了拍照）他也试过让嘴角线条柔和点儿，结果只是显得痛苦不堪。海军官方肖像中的金将军有着瘦长的脸庞、棱角分明的欧米伽下巴、一头深色的短发，一双不大却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据说他对自己的外貌有些自负，对头顶上不断扩大的秃发面积有点儿敏感。他总是衣着整洁，穿着从纽约布克兄弟公司购买的制服，这衣服裁剪得体，正合他瘦削的身材；在他的官方照片中，制服夹克的前胸口袋里整整齐齐地别着一条白色手帕，上方是一排令人望而生畏的彩带和奖章。^[2]

二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中，金一直最被忽视也最不为人所理解。这正是他对自己最满意之处。他不想出名，尽管最终情势所致还是出了名。他讨厌记者，一开始根本就拒绝和他们打交道。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战争结束前，金什么都不会说，战争结束后也只会发表两个字的公报：“赢了。”^[3]（后来，他意识到媒体报道陆军多于海军，就开始跟记者讲话了，但也是非公开的形式。）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得力顾问，几乎每天都在白宫与总统私下会面，战争中每一个重要的军事决定，总统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和支持。但是金从不炫耀他对总统的影响，有时反而会刻意掩饰。如果有事要跟罗斯福据理力争，或者加以强调，他们会关起门来一对一谈话，或是屋里除了哈里·霍普金斯别无他人。

而在大型白宫会议上，他寡言少语，发言也是简短几句。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有时会向金投去疑问的一瞥，征求他的意见。金会几乎不为人所察觉地点点头或摇摇头作答，而且，除了总统，别人一般看不到他发出的信号。

战后，金丝毫不去努力保住自己的历史地位。他写了本平淡无奇的回忆录，行文生硬得如同战斗报告，只字不提自己在二战中的角色。历史上只出版过一本金的传记。战后，他的同僚陆军上将马歇尔担任了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金本来也不适合这个职位，要是当了才可笑）。欧洲战后重建的计划以马歇尔的名字命名，而金却把自己的名字贡献给了家乡俄亥俄州洛雷恩市的一所公立高中。金与昔日的对手，那位讲出有关老兵不死的著名格言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同，这位海军老将真的渐渐隐去了光芒。

但是，历史跟大自然一样，憎恶真空。这位几乎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任何痕迹的二战海军五星上将到底是谁？在有关的文献中，他往往被一带而过，总体形象令人不敢恭维。金的身上背负着四个指责，在历史的回声里，指责声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没道理。首先，有人指责他脾气暴躁，冷酷无情，像蛇一般卑鄙。其次，有人指责他心胸狭隘，偏袒海军，只在乎他所指挥的军队的利益。再次，据说他不支持“欧洲优先”政策，并且力图使太平洋成为主要战场。最后，有人称他对英国人怀有强烈的敌意，不遗余力地破坏盟国的团结。这四个指责中，第一个还算有些道理，不过它夸大了金的粗鲁无情，这只是他复杂个性的一个方面。至于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指责，就站不住脚了。

1878年，金出生于俄亥俄州洛雷恩市的一间工人小屋。洛雷恩是伊利湖南岸的一座工业城镇，金的父亲是一家铁路维修店的工长。孩提时起，金便长期待在父亲的店铺里，后来一生都喜欢机械和工程。他禀赋聪慧，幼年便可见端倪；尽管出身卑微，但这不妨碍他在1897年被海军学院录取。在学院里，他成绩优异，第二年便获得营长职位，这是学生

所能获得的最高领导职位，此后可以戴实习海军少校的臂章。1901年毕业时，他在班上排名第四。

金素来极有抱负。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他便公开宣称自己要成为海军中的佼佼者。他对同事说，总有一天自己会当上海军作战部长。“他告诉我要往顶层努力，”一名下属军官回忆说，“这不是吹牛，只是极端自信而已。”他精明地规划自己的晋升之路，结交那些似乎注定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海军将领。他把“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通过幕后渠道把自己安排到可能会促进职业生涯发展的岗位上。遇到想要的工作，他会毫不犹豫地去游说争取。在海上，他在巡洋舰、驱逐舰、战列舰、航空母舰和潜艇上都待过。他担任过一系列级别很高的参谋和行政工作，而且每一项都做得相当出色。驾驶船舶和导航对他来说就像与生俱来的本领一样，不过他也是一位高效的管理者，处理文件大胆高效，沟通时用语简明清晰。他敏锐地认识到，自己的简历上得有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工作，要去做些海军的“苦力活儿”，真正“在军中吃点儿苦”。^[4]他来到炎热、黑暗、狭窄、危险的轮机舱里，与发动机打交道，精心定做的制服沾上了油污，溅满了机油。他全身心地投入每一份工作，总是比别人努力，直到军医命令他放松才肯休息。

金虽然雄心勃勃，却不是一味追求晋升的人。与人打交道时，即便对方是上级军官，可能威胁他的职业前景，他也往往会表现出傲慢与不屑的态度。他从不向自己不尊重的军官献殷勤，从不努力取悦于人，哪怕这只是一种策略。他一生都态度高傲，感觉四面八方净是些蠢材。他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即使对上司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顶撞长官和不服从命令。涉及原则问题时，他断然拒绝玩政治手腕，这显示出他的正直。即便还是人微言轻的海军少尉时，但凡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也会坚持不懈地与上级理论。“金会引经据典，用规定和详尽的资料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的传记作者写道，“这是典型的金式强辩策略。金曾经援引一条对他有利的规定，迫使旗舰长官承认他们错了，这令他非常开

心。”^[5]正因如此，金早年的一些适任报告比较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些报告似乎从来没影响过他的晋升。

金对军事史有浓厚的兴趣，读起书来孜孜不倦。他啃完了马汉的全部作品，这是当然的；他还深入阅读了拿破仑战争和美国内战方面的书籍。在职业生涯早期，金极具改革精神，1909年在《海军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题目是《关于舰船组织机构的一些想法》。在这篇获奖文章中，31岁的金上尉对海军保守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直指海军“惰性大，懒于变革”，一直“因循守旧，以为旧的就是好的。当然必须承认，守旧对很多事情来说确实是种保障，但对同样多的另一些事情来说却是拖后腿的”。^[6]金在新伦敦管理潜艇基地时，参加了战争学院的函授课程，短短三个月内就通过了全部12门课的考试，无人能与之匹敌。他大力倡导研究生教育，40岁时以上校军衔担任安纳波利斯海军研究生院院长。他推动扩大海军战争学院的规模，要求所有想晋升的军官都通过该学院的考试。

1928年，50岁的金上校投身于海军航空事业。他参加飞行员训练，获得了飞行资格，为日后指挥航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只完成了获得飞行资格所需的最低要求，除基本飞行技能外，没学别的，但由于资历较深，他成了首批将军级别的海军合格飞行员之一，这对他后期的职业生涯是一大优势。他在陆上和海上都做过一系列重要的航空工作。他曾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局助理局长，后来指挥位于弗吉尼亚州汉普顿锚地的海军航空站，然后（1930年）被任命为“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1933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后，他回到了华盛顿的海军航空局，这次担任局长一职。金深度参与了海军水上侦察飞机的研制工作。他让飞行员长时间在危险状况下飞行，他们要是辞职不干，金会让他们趁早走人，同时宣称他在做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将弱者剔除出军队。

当“列克星敦号”舰长期间，金坐实了自己专横苛责、过于严厉的名声。他会在舰桥上来回走动，盯着下面飞行甲板上的人的一举一动。要是哪名飞行员降落时手忙脚乱或者机头俯冲过度，那就等着被叫到舰桥

上吧，扩音器里会大声广播他的名字，船上所有人都听得到，很是丢脸。金训人的时候，双手会举过头顶狂舞，长篇大论夹杂着冷嘲热讽脱口而出。要是哪名“列克星敦号”飞行员因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航母尾部的水面上，金会把他召到舰桥上，告诉他：“下次你决定降落在水里的话，就落到船头，省得我还要转身去捞你。”金往往懒得把违规的人叫到舰桥上来训话。“他不需要扩音器，”在“列克星敦号”上服役的一名下属军官说，“他只要往舰桥边上一站，就算刮大风，整个飞行甲板上的人也都能听见他的话，因为他生起气来，真的是在怒吼啊。”^[7]金**为什么**这么生气不得而知，他往往毫无原因就大为光火。突然间，他会把一摞文件从桌上掀到地板上，什么明显的理由和解释都没有，然后一言不发，气冲冲地离开舰桥。

金工作起来比手下都卖力，会因为他们跟不上他的步伐而大加责怪。他说自己每晚只需要五小时的睡眠，而且就这五小时也经常不回船舱，“在旗舰指挥室的小床上蜷着瘦长的身躯将就一晚”。他的职位有特权也有束缚，他全盘接受。他与下属交流并不多。在狭窄的舰桥上与下级军官相遇时，他可能会粗暴地命令对方“别挡我的路”。要是有人正爬梯子上来，都快到顶了，而这时金想顺着梯子下去，他才不会等那人爬到顶；他会直接登上梯子，迫使下级军官下退到甲板上，闪到一边给他让路。一名军官回忆说，在船上的理发室里：“有时候你理发理到一半，金想刮脸了。你就得离开理发椅，一直等到他刮完胡子才能坐回去。”^[8]机库甲板上给船员放电影时，金不来就座，电影就不能开始。

作风强硬，冷酷无情，铁腕治军，金的这些名声对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可能功大于过。罗斯福本人就津津乐道于有关金的道听途说的故事，跟他的客人说，这位将军“用喷灯‘刮’胡子”，“用鱼雷网切刀剪脚指甲”。^[9]金到底喜不喜欢冲下属大嚷大叫尚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他认为大吼是一个原则问题。金**选择**被人害怕而不是被爱。“我不在乎他们有多好，”他说过，“非得每一个半月踢他们屁股一脚，要不他们就松松垮垮的。”^[10]他不相信把安纳波利斯毕业生联结在一起的校友文

化，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往往会让一些懒惰无能的军官钻空子生存下来，升官发财。金把从海军剔除这些人视为己任，一路上得罪了不少人，树敌众多。不过他也很公平——他尊重那些把本职工作做好的人，不管他个人是否喜欢他们，都会在适任报告中表扬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他们得到晋升。“如果一个人精通业务的话，”J.J. 克拉克将军说，“那么与厄尼·金相处起来就很容易。不过谁要是做了错事，那就只能指望上帝帮忙了；金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的。”^[11]

金将军在工作中或者在海上不苟言笑，专横跋扈，但是对于豪饮、赌博、跳舞和打情骂俏，他样样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称之为他的“游戏时间”。上岸的夜晚，人们常常在军官俱乐部看见他干了一杯又一杯酒，粗声大气地说话，痛快淋漓地大笑，为酒吧里的人挨个买酒喝，玩扑克玩到深夜，踉踉跄跄地跟比他年轻许多的女性跳舞。他发明了一种自己调的鸡尾酒，将白兰地和香槟混合在一起，浇在高脚杯里的冰块上，他称之为“金酒”。下级军官们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场合，他颇为平易近人，甚至有些顽皮。他们有时鼓起勇气称呼他“厄尼大叔”。他喜欢女人，对妻子向来不忠。金和他的许多同事似乎都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酗酒和追女人是受压抑的能量或焦虑的天然出口，不仅应该容忍，而且还要鼓励。他说：“要是谁不喝酒，也不喜欢女人，那就很值得怀疑了。”^[12]但是翌日，金总是早早起床，头脑极为清醒，胡子刮得干净利索，穿着熨烫一新的制服，丝毫看不出宿醉的痕迹。他要求那些与他一起混到酒吧关门的军官也做到这样。

他的家庭生活很紧张。他与妻子玛莎（“玛蒂”）没多少共同之处：在他离家的漫长时日里，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但他们仍在一起，这似乎是出于共同的责任感。他家里一屋子女人。他们夫妻二人先是生了六个女儿——克莱尔、伊丽莎白、弗洛伦丝、玛莎、埃莉诺和米尔德丽德——最后一个是儿子，1922年出生的小欧内斯特·约瑟夫·金。他的孩子个个都很漂亮。金还是驻扎在安纳波利斯的上校时就沮丧地发现，自己竟无法阻止十几岁的女儿与海军见习军官交往。身为父亲，金看起来比

较冷漠，但令人惊讶的是（有时）也相当温情。他的一个女儿对他的一句评价尽人皆知，称他为“海军中脾气最稳定的人。他总是怒气冲冲”。[\[13\]](#)这句话经常被人当作证据引用，说明金天生就爱盛气凌人，但它也可以看作家人间充满爱意的玩笑话。金有温暖善良的一面，但他似乎觉得最好把性格中的这一面尽量隐藏起来。1943年1月，战事正酣之际，金给布鲁克林一个八年级学生回了封信。金将军喝酒吗，吸烟吗？谁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他最喜欢的爱好和运动是什么？

他回信说：

亲爱的哈丽雅特，你一月六日的来信我收到了——很有意思，你的语文作业是写我的传记。

现在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我偶尔喝点儿葡萄酒。

每天吸一包烟。

我喜欢斯宾塞·屈塞，其实任何电影明星我都喜欢。

我的爱好是填字游戏——难度大的那种。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高尔夫——要是有时间玩的话——不能打高尔夫的话，我喜欢散散步。

希望你的语文作业顺利完成。

非常诚挚的，
E. J. 金
美国海军上将[\[14\]](#)

1938年，身为海军中将的金没有掩饰自己的野心。他公开竞选自己一直想要的工作——美国舰队总司令，或者海军作战部长。他相信自己的服役记录足以胜任这些领导岗位，而他这样想没有错。他再合适不过

了。经验多，履历丰富，工作表现一直极其出色。金恰好在海军的每个领域都工作过：在水面舰艇、潜艇和航空母舰上都待过，在各个参谋和计划岗位上工作业绩极佳，曾任海军航空局局长，与外国政府和国会打过交道。他的人事档案里满是表扬信。

但在1939年，温文尔雅、个头不高的海军上将“贝蒂”哈罗德·斯塔克被任命为海军作战部长，金却被安置到海军事务委员会。这是一个顾问小组，传统上来说，是与海军最高职位失之交臂的高级将领被强制退役前的最后一站。他的军衔将恢复为海军少将。失望排山倒海般压过来——一位朋友说，实际上，金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为什么不选他不得而知：自始至终没有人给过他任何解释。似乎海军部长克劳德·A. 斯旺森和即将离任的海军作战部长威廉·D. 莱希上将支持斯塔克。金是海军74名将军中仅有的3名飞行员之一，“大舰巨炮集团”的人可能想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位战列舰将军吧。彼时，金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还不密切，而罗斯福是老海军了，他更喜欢与他了解并喜欢的将军打交道。最后一个原因是，金性格中不招人待见的一面——行事风格粗暴生硬——令他在海军中树敌不少，酗酒则让他雪上加霜，到处招惹别人妻子也给他的名声抹了不少黑。

但是山雨欲来的战争很快就会重新燃起金的希望。他没把海军事务委员会这份任命当成退役前的闲差过渡，而是把它当成传声筒，炮轰海军缺乏战争准备，他认为这不亚于犯罪。他从国会要来3亿美元拨款，亲自监督升级海军的防空系统。1940年年底，金被提拔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这时，罗斯福总统对金的了解也增多了，欣然批准任命。1940年7月弗兰克·诺克斯担任海军部长后，还是在金的帮助下才“摸清了门道”。1941年8月，金将军负责安排运送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前往纽芬兰普拉森舍湾，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举行第一次战时峰会。随着德国U型潜艇攻势加剧，金也出了名——11月，他严峻的面孔出现在《生活》杂志上，标题为“大西洋之王”。^[15]他的旗舰停泊在罗得岛州的纽波特，但他发现有必要每隔一周就坐夜班火车去一趟华盛顿。他会告诉

参谋：“嗯，我必须再去趟华盛顿，给那些蠢货浑蛋解决些问题。”[\[16\]](#)

“我们生活在一个愚人的乐园。”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传来时金如是说。[\[17\]](#)十天后，诺克斯部长和总统齐聚白宫。他们决定起用尼米兹，换下金梅尔，同时，他们一致同意将金调到华盛顿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眼下，海军作战部长一职仍由斯塔克担任，该职位职责范围很广，包括长期战争规划、海军整体行政管理等等。但到了来年3月，斯塔克就会逐渐淡出，金会身兼两项海军最高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海军将领。

金当上舰队总司令后的第一个举动是改掉代表他职位的首字母缩写（CINCUS），这个缩写在他对外签发的所有命令和通信中都会出现在名字落款下方。“CINCUS”字面上看不错，但是大声读出来的话，有点像“击沉我们”（sink us）的谐音——听起来像极了鲍勃·霍普惯用的妙语。金对此无法忍受，珍珠港事件后更是绝对不会容忍。他下令把它改为“COMINCH”。接任斯塔克的职务后，这个缩写变成了“COMINCH-CNO”（总司令兼作战部长）。

以往，CINCUS（或COMINCH）在战列舰上办公，但金将司令部迁到了华盛顿宪法街海军部办公楼里的一套办公室。他倾向于离白宫近一些，离海军部长近一些，离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军事首脑以及国会近一些。他说：“权力在哪里，司令部就要在哪儿。”眼下总司令没有参谋——这个职务最近曾由金梅尔上将担任，金梅尔同时还担任珍珠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什么准备都没做好，”他后来回忆说，“我都得从头开始。”[\[18\]](#)

金从纽波特带来几名大西洋舰队的参谋，让参谋部有了个雏形。他还从斯塔克的团队中挑了几名关键人员，让斯塔克的作战计划处处长“凯利”里奇蒙·K. 特纳担任自己的助理参谋长。他又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中抽调了十多名军官，尽管没人来得心甘情愿。一般来说，担任海军参谋的军官都争相要求被派往海上，而海上军官则强烈反

对被召回华盛顿。所有人都想有机会参加战斗。在珍珠港指挥“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精灵”小查尔斯·M.库克舰长，一点儿也不稀罕金给他的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职务。金直截了当地回复他说，应该将海军的需求置于个人喜好之前。“我完全理解你想留在海上的意愿，”他在信中告诉库克，“但我也要讲，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被派到别人认为你能共同事业发挥最大作用的岗位上去——我相信你会同意的。”^[19]整个战争期间，金的政策是军官轮岗进出华盛顿；他坚持要“不断轮岗”，派参谋到战场上去，把其他人从海上调回司令部。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那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经验和视角会改善整个部队的表现。

圣诞节前一周，金抵达华盛顿，搭建自己的办公室。那时，局面一片混乱。“金将军就职的办公室是我见过的最脏、最烂的一间，”一位即将上任的参谋回忆说，“有人匆忙间搬走，带走了家具，留下了灰垢。金将军不知从哪儿找了张桌子，还有几把椅子。……这就是全部家当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司令部啊，总觉得少了点儿威严。”^[20]金和办事员在海军大楼三层的两个房间里办公。房间装饰朴素，以实用为主：白色灰泥墙面一片空白，只挂了个时钟；白色软百叶帘遮挡住窗户；木制书桌和椅子毫无特色；绿色钢制文件柜放在铺着油毡的地板上。金需要参谋的时候，就按下办公室里的按钮。隔壁房间会响起尖厉的铃声，文书军士和秘书则应声而动。^[21]

这项工作也有丰厚的福利。供金使用的有一辆凯迪拉克汽车和一名专职司机，一架带机组人员的双引擎洛克希德“北极星”飞机，还有一艘旗舰。他选择以前由道奇家族拥有的排水1 200吨、257英尺长的“无畏号”私人游艇作为旗舰。战争期间，它大部分时间都停泊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的泊位。担任作战部长后，金在华盛顿西北部的马萨诸塞大街的海军天文台（1974年后成为美国副总统的官邸）也有一处官邸。整个战争期间，金的妻子玛莎住在海军天文台，金则在“无畏号”上度过大部分夜晚。国会里有人对于花钱为一个人维护两处居所颇有微词，背后悄悄说他把游艇当作私人幽会场所——但是，跟战争总动员相比，这笔开支

微不足道，所以也没人拿它小题大做。

珍珠港遇袭的第二天早晨，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内阁，一旦罗斯福有空接待，他就马上去华盛顿访问。他要确定英国的新盟友不会以错误的方式参与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他担心美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会把优势兵力从欧洲抽调到太平洋。前一天晚上罗斯福发来一封电报，向丘吉尔保证，美国现在“和您以及大英帝国的人民同在一条船上，这艘船不会沉，也不能沉”。^[22]首相立即作答，并问道：“正如您所说的，现在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是不是应该再举行一次会议呢？我们可以根据最新情况，评估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同时讨论一下生产和分配的问题。有些问题令我忧心忡忡，我认为最好能够在最高执行层面上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也很盼望再次见到您，越早越好。”^[23]

罗斯福想推迟一段时间，说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担心丘吉尔穿越大西洋时会遭到德军U型潜艇攻击。然而，他真正担心的是丘吉尔现身华盛顿产生的政治反响。美国和英国在对日战争中是同盟，但（周四之前）在对德国和对意大利的战争中还没有结为同盟。大家都心知肚明，丘吉尔会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丘吉尔12月10日给罗斯福发电报，对他关于安全问题的担忧做出了回复：“我们认为海上往返没什么严重的危险。但是，假如我们没有在最高层面充分讨论海军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不讨论与生产和分配相关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问题，那就真的很危险了。”^[24]罗斯福默许了。“很高兴邀请您来白宫。”他答复道。他还提到在马来亚附近沉没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悲惨消息，补充了一句：“现在消息不利，但一定会好起来。向您致以问候。”^[25]

在那周英国战时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对首相最近表现出的坚定自信表示惊讶。以前丘吉尔与美国人打交道时很注意用恭敬的语气。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说，首相眼中掠过一丝“狡黠的笑意”，回

答说：“哦！追求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那样说话；现在这个人成了家里的女眷，我们的讲话方式就大不一样了！”^[26]

丘吉尔率顾问与参谋组成浩浩荡荡的使团，带上除布鲁克（留在伦敦处理日常事务）之外的所有参谋长，于12月12日登上“约克公爵号”战列舰，启程前往美国参加阿卡迪亚会议。在航行过程中，丘吉尔起草了三份重要文件，论述英国对战争的看法。不工作的时候，他就睡觉，躺床上看小说，或看看电影。冬天里的这次航行十分颠簸，所有舱口都封上了板条，严禁乘客在甲板上行走。丘吉尔告诉妻子，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我度过的最漫长的一周。大风几乎没停过”。他模仿塞缪尔·约翰逊的文字评论道：“这种天气待在船上就像坐牢，还有可能淹死。……谁都不能到甲板上，船上还有两个伤员断了胳膊和腿。”^[27]

12月22日晚上，“约克公爵号”泊入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外的汉普顿锚地。它本该继续沿波托马克河向北前往华盛顿，但丘吉尔急于赶过去，要求乘飞机到国家机场。夜晚从空中俯瞰，华盛顿呈现出非常壮观的景象，流光溢彩。此时距珍珠港事件已过去两周，灯火管制只是偶尔为之。丘吉尔的副官汤米·汤普森中校颇为动容。“华盛顿体现了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他写道，“自由，希望，力量。我们已经有五年没见过灯火通明的城市了。我非常感动。”^[28]

在停机坪上，他们发现总统已经靠在轿车上等候他们一行。“我紧紧握住他的手，颇感安慰和愉快。”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29]首相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对罗斯福的大脑袋印象深刻。“我想这就是温斯顿觉得他像雕像一般伟岸庄严的原因吧，因为你几乎看不见他的腿。”^[30]总统记得丘吉尔一行中许多成员的面孔和姓名，当年8月份他在普拉森舍湾的船上参加首脑会议时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外交礼仪并不要求他驱车到机场迎接来访者，英国人没有忽视他这一主动的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丘吉尔原计划住在英国大使馆，但是当罗斯福邀请他入住白宫时，

这位英国领导人立刻接受了邀约。五位助手陪同他前往，代表团其他人住在附近的五月花酒店。这个邀请显然没有提前通知第一夫人，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准备房间。虽然这位女主人（一如既往地）温和而优雅，但后来她非同寻常地在全国性报纸专栏中发泄了不满。“他都没有想过，”她写道，“我们可能需要挪一些家具来调整房间布局，布置成首相希望的样式。”[\[31\]](#)

丘吉尔住进了白宫二楼的玫瑰套房，仆从住在隔壁房间。走廊对面的林肯书房住进了他的两位秘书。哈里·霍普金斯的卧室位于走廊的尽头，他的卧室旁边是门罗室，丘吉尔的工作人员把它设置成了地图室。将所有房间串联起来的走廊上光线暗淡，摆满了罗斯福大家族的圣诞礼物。

第一晚的晚宴上，话题围绕着战争的各个方面展开。罗斯福还没来得及阅读丘吉尔起草的文件，因此首相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他讲啊，讲啊，讲啊，谈到了冲突的方方面面——法国在北非的战局，利比亚的战事，苏联的战线，海上的战争，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猛攻。当晚，罗斯福总统致祝酒词：“让我们一起举杯——有句话在我脑海里很久了，现在是时候说出口了——‘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干杯’。”[\[32\]](#)

“我向国内汇报时说，到达的当晚，我们就有了深入的交流。”丘吉尔在战后写道。[\[33\]](#)罗斯福很快就让人们不再担心美国会将战争重心从欧洲移走，令首相大大松了口气。他表示，尽管太平洋地区战事紧急，弹药和物资不仅会继续输送给英国和苏联，而且还会加大运输量。丘吉尔在发给布鲁克和伦敦战时内阁的第一封电报中写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执行，而是如何执行”欧洲优先的原则。

长住期间，丘吉尔感觉简直宾至如归。他就像梅·韦斯特一般，许多最棒的工作都是在床上完成的，只不过丘吉尔做的是阅读报告，向秘书口授信函或演讲稿。直到中午，他还靠在一堆枕头上，鼻梁上架着眼镜，穿着睡衣或花里胡哨的及膝睡袍，床上和地板上散落着备忘录、报

纸和衣服。丘吉尔在他待在华盛顿的第一天上午向总统的管家阿隆佐·菲尔兹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简直可以视为简洁的典范。“好，菲尔兹，”他慢条斯理地说，“昨天的晚餐很棒，但我有几条命令给你。我们都想以朋友的身份告别，对吧？所以你要听好。一，我不喜欢有人在我房间外面说话；二，我讨厌走廊里吹口哨；三，早餐前必须给我的房间端来一杯雪利酒，午餐前我要喝几杯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晚上睡觉前要喝法国香槟和窖藏九十年的白兰地。”菲尔兹不动声色地答道：“好的，先生。”然后他为英美联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确保丘吉尔的要求得到满足。[\[34\]](#)

等到丘吉尔终于起床穿戴妥当后，他的行头在白宫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一阵热评。这位英国领导人经常穿一件及膝的双排扣大衣，扣子一直系到脖子底下，拄着根木制手杖，上面镶着手电筒。（这是英王爱德华七世送他的结婚礼物。）罗斯福的秘书格雷丝·塔利在他到达后的第二天早晨第一次见到丘吉尔，当时丘吉尔看上去“胖乎乎的，面色红润，这位秃顶绅士身穿一件蓝色牛仔布料的连身服，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懒洋洋地拖着脚朝我办公室走来”。[\[35\]](#)

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罗斯福和丘吉尔常常在霍普金斯的陪伴下一同起居，几乎像大家庭的成员一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抽烟。他们闯进对方的私人卧室畅谈到深夜，坐在一起看私人影院放映的亨弗莱·鲍嘉演的电影《马耳他之鹰》。他们在总统书房里共进午餐，盘子会对称地摆在书桌上。[\[36\]](#)有几次，罗斯福的轮椅推进丘吉尔的卧室时，首相大人还堂而皇之地赖在床上——丘吉尔也会不分白天夜晚，随时毫无顾忌地敲开霍普金斯的卧室房门。（他们两位在1941年1月就成了知心朋友，彼时霍普金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出访伦敦。）有一次，凌晨两点，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顾问激烈地争论起来。丘吉尔坐在霍普金斯的床边，两人压低了声音，以免吵醒其他人。

霍普金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罗斯福的轮椅推进丘吉尔的卧室时，正赶上首相大人出浴，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总统慌忙命人将他推出

房间，但丘吉尔却像演戏似的宣告：“大英帝国的首相对合众国的总统没有丝毫可隐瞒的。”这个故事很可能有些添油加醋，增加了戏剧效果——后来，丘吉尔告诉罗伯特·舍伍德，“他从来没有在连件浴巾都不裹的情况下会见过总统”，并且补充了一句，他绝不会对罗斯福说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因为“总统本人会很清楚这并不完全是实情”。[\[37\]](#)

尽管如此，丘吉尔在白宫住了一周以后，感觉舒适得好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在1942年1月3日写给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信中说：“我们住在这里像个大家庭，亲密无间，不拘小节，我无比敬仰和钦佩总统先生。他视野宽广，心意坚定，最值得赞扬的是，他忠诚于我们的共同事业。”[\[38\]](#)

两位领导人经常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丘吉尔在来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就和罗斯福一起参加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定期新闻发布会。简短的开场白过后，罗斯福把英国领导人介绍给大家，并邀请围成半圆形挤在总统办公桌前的记者向他提问。丘吉尔身穿黑色西装，打着蓝白圆点的领结，抽着超大的古巴雪茄。即便站着，拥挤的房间后面的记者也看不到他。他索性站到椅子上，这一举动引起了在场新闻记者的欢呼和掌声。丘吉尔幽默风趣，应对自如，坦率地对记者们说，尽管战争会漫长而艰难，但是“一觉醒来，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敌人数量在减少”。有人问新加坡是不是亚洲“整个局势的关键”，丘吉尔不假思索地答道：“整个局势的关键是英美两个民主国家前赴后继投入战斗的坚定态度。”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多长时间？“指挥得当的话，”首相回答说，“我们只需花费指挥不当所需时间的一半。”有人问他是否怀疑过盟国无法取胜，他回答说：“我没有任何怀疑。”[\[39\]](#)《华盛顿晚星报》认为，首相的表现“令人兴奋”，“场面活泼而独特”。《新闻周刊》报道说，罗斯福“就像一个成名已久的老戏骨转行当制片人，有人说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对这个至少能与他相提并论之人的崇拜之情”。[\[40\]](#)

1941年平安夜，丘吉尔参加了白宫草坪上的圣诞树点灯仪式。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一轮新月低垂在天边。罗斯福和英国领导人一起站在

南门廊上，按下一个按钮，点亮了树上的彩灯。人群中的掌声平息下来后，总统开始介绍客人，说这是“我的同僚，我的老友”。^[41]丘吉尔向大西洋两岸的无数广播听众发表了讲话。或许因为血缘的关系，或许因为共同的事业，或许因为共同的语言，他说：“我在美国的中心、首脑云集之地过节，却没有丝毫陌生感。”然后他继续说：“让我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圣诞夜……然后我们肩负起艰巨的职责，直面今后的艰难岁月。让我们同仇敌忾，以我们的牺牲与勇气，确保这些孩子应得的产业不被掠夺，保护他们在自由体面的社会生活的权利。”^[42]“那晚冷极了，”埃莉诺回忆道，“谁都高兴不起来。彻骨的寒冷让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大家都很想回屋喝杯热茶。”^[43]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温斯顿·丘吉尔乘车来到国会山，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通过密密匝匝的麦克风，他在国会大厦进行了演讲，眼镜架在鼻梁上，裤兜上挂着一条很显眼的金色表链，双手插在衣服翻领下面的兜里。他讲了35分钟，听众屏气凝神，聆听他的每一句话。这是一场伟大的演讲，展现了典型的丘吉尔风格；为了这一刻，他在圣诞节精心准备了一整天。他知道国会中仍然存在不少的反英情绪，美国人民反日本的情绪比反德国的情绪更为强烈。“我忍不住会这样想，”他开场时说，“如果我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相反的话，我可能已经靠自己的本事进入国会了。”^[44]

这句话惹得听众开心大笑，为下面即将涉及的一些敏感话题奠定了友好的基调。这位英国领导人委婉地批评了孤立主义者，暗示孤立主义政策的过失给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机会，而且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英美的疏远。说到这些时，大厅里鸦雀无声。但是，当丘吉尔谈到日本人时，议员们马上站了起来。他用雷霆般的声音大声说道：“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我看他们可能还不清楚吧，我们会不屈不挠地跟他们战斗到底，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和全世界永远忘不了！”^[45]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丘吉尔心想：“还有谁会怀疑一切不会变好呢？”^[46]离开讲台时，他做了个标志性的挥手动

作，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形成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手势瞬间引起了“震撼的效果。……如雷的欢呼声响彻大厅”。[\[47\]](#)

回到白宫后，（通过收音机收听演讲的）罗斯福告诉他，演讲太棒了。首相感到欢欣鼓舞——他的演讲能力再一次成全了他。“我回回都能正中目标。”他得意地对莫兰说。[\[48\]](#)

每天晚餐前，两位领导人、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内阁都会在红厅聚会，喝杯鸡尾酒。罗斯福坐在酒瓶托盘旁边，亲自调制鸡尾酒。这是总统平时无比珍惜的时刻，他有时称之为“孩提时光”。他会趁此时释放一天的紧张与压力。“他喜欢调制饮品的仪式，”丘吉尔的女儿玛丽·索姆斯说，“就像是说：‘瞧，我可以的。’大家都很敬佩他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只需把玻璃杯递到他手里就行，不用再做其他事情。看他调酒很有趣。”[\[49\]](#)罗斯福不按客人的要求调酒，而是兴之所至，自己随意调制些新奇古怪的混合酒，在柠檬威士忌酒、汤姆·柯林斯酒或是古典鸡尾酒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他调出来的“马提尼”里面加了太多苦艾酒，有时候还掺杂些果汁或者朗姆酒一类的成分。丘吉尔喜欢纯威士忌或白兰地，但还是会优雅地接受罗斯福的神秘药水，往往还会一饮而下，丝毫没有怨言，不过据阿利斯泰尔·库克说，首相有时会把它们带进洗手间，倒进水池。

这位英国领导人就寝很晚，下午会打个盹儿（有时候，要是他自己的卧室离得太远，就随便钻进一间卧室），喜欢晚上聊到深夜。一整天下来，他喝了不少酒，却一直保持清醒敏锐的头脑，表达清晰，就像他喝进去的高度数酒一样清冽明晰。他早晨喝雪利酒，中午喝威士忌，晚上喝葡萄酒，抽古巴雪茄，一杯杯的白兰地伴着他直到凌晨时分。罗斯福的助手们很惊奇。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说，丘吉尔“吃得比两三个外交官加起来都多，吃得还特别香；而且，他饮用白兰地和苏格兰威士忌时的优雅与热情令我们咂舌”。他还补充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他喝了多少（尽管他的酒量确实了得），而是他喝了这么多酒还能完全保

持清醒。”[\[50\]](#)

丘吉尔在白宫的几周时间里，罗斯福比惯常休息得晚，酒也喝得更多，下午也没空打盹。有一次，圣诞节过后几天，总统与丘吉尔一起抽烟、喝酒、交谈到凌晨3点。负责照顾总统健康的罗斯·T.麦金太尔医生把这位英国领导人当成了“头号公敌”。他尽量安排总统晚上11点上床休息，却发现“总统很少遵守”。[\[51\]](#)埃莉诺大为震惊。“毫无疑问，”她说，“当你对一件事十分感兴趣的时候，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那些不得不候在一边，直到你做完的人来说，这挺让人受不了的。”埃莉诺的父亲酗酒，所以她很反感饮酒过度，不喜欢丘吉尔对丈夫和儿子的影响。她越来越担心，晚上熬夜，喝白兰地，抽雪茄烟，会严重影响罗斯福本已不佳的健康状态。“母亲会非常生气，”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道，“进进出出房间好几次，暗示该休息了，可是丘吉尔依然故我，在那儿坐着。”埃莉诺跟丈夫说了自己的担忧，他却反驳称“不必担心，我家这边的人没有酗酒的问题”。[\[52\]](#)

罗斯福由衷地尊重丘吉尔。1942年1月与总统一起就餐后，萨姆·罗森曼回忆道：“我们的谈话主要是关于丘吉尔的——罗斯福满腔热情地提到他，称赞他在战争问题上采取坚定果敢的做法。”[\[53\]](#)两人的私人友谊成了两国联盟的核心。他们的共同语言自然是拉近两人关系的纽带，不过两人上流社会的家庭背景，所受的精英教育，对历史文学的共同兴趣，还有两个海军老兵的自我认同，以及都在各自国家的海军担任过文职或非正式顾问的经历，也是两人颇为投缘的原因。霍普金斯认为，在为期不短的访问期间，罗斯福“真正喜欢上了丘吉尔，我相信丘吉尔也是一样喜欢总统”。[\[54\]](#)

丘吉尔本来只打算待一个星期，但是在白宫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后，便应罗斯福邀请延长了访问期限。他这次出访一共持续了三个星期，中间他抽空去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州，1942年1月15日才辞别罗斯福回国。

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参谋都对两位领导人在白宫抱成一团感到有些不快。他们相信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背着他们制订什么计划，趁夜晚饮酒的时候就解决了重大问题，而不让各自的军事顾问参与讨论，他们为此感到恼火。双方都怀疑自己的领导人遇到了老谋深算的骗子，在一对一谈判时泄露了过多的秘密。他们的亲密关系固然可能会加强两国联盟，但也可能导致内阁与参谋长们无法正常尽职。英国外交官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他担心丘吉尔将美国总统当成“英雄般崇拜”。^[55]美国将军“醋酸乔”约瑟夫·W.史迪威则发泄道：“英国佬霸占了〔罗斯福的〕耳朵，我们到最后才能得知情况。”^[56]

军方领导人在美联储大厦豪华的董事会议室召开了阿卡迪亚会议，这座只有四年历史的大理石建筑坐落在宪法街海军部的正对面。第一次会议在1941年12月24日上午召开，议题是“联合战略的根基”。^[57]接下来的几周内还将举行另外11场会议。英方代表是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布鲁克不久前接替他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和空军上将查尔斯·波特尔爵士。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被非正式认可为美方代表团负责人。与他一同出席的美国代表还有金和斯塔克将军以及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亨利·H. 阿诺德将军。

经过近两年半战争的锤炼，英国军事领导人之间已经非常习惯彼此合作。他们有备而来，参谋们为各种论点准备了充分的论据。“他们很在行，”美国海军参谋约翰·L. 麦克雷上校说，“都极其善于表达，讲话很有道理。参谋组织工作也井井有条。三位准将承担了大部分工作，他们的会议报告堪称杰作。”^[58]

与英国最高司令部运转良好的体系相比，美方参谋部实际不过是个草台班子。陆军和海军向来各自为政，处于平等状态，各由两名内阁级别的部长坐镇，所有把军事计划融合在一起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因

此，美方将领必须学会如何与彼此相处，与此同时学着与英方打交道。阿诺德将军是马歇尔的下级，往往会听从他的命令。金和斯塔克都代表美国海军，英国人一时也搞不清楚哪位将军是主事的。自12月7日以来的两个星期里，美国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没多少时间为会议做准备。他们张口就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没有提前在内部做过计划和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显得糊涂和业余。他们短时间内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马歇尔代表美方讲话，开门见山且毫不动摇地重申了欧洲优先原则。该政策在给罗斯福的一项秘密备忘录（金将军和其他军队高官也签了字）中有详尽说明，承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即便日本加入战争，“我们的观点也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击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指日可待。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根本原则是……只能从对德军事行动中抽调尽可能少的必要兵力来保障其他战区的重要利益”。[\[59\]](#)

金将军和任何其他盟军最高统帅都从未怀疑过“欧洲优先”的原则。轴心国当中，只有德国可以同时遭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打击。德国拥有比日本更强的科学和更多的工业资源，而且假以时日有可能会开发出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苏联陷落，希特勒的重兵可以集结在单一的战线上；而如果德国和意大利被击败，则会解放出盟军大部分海军和其他军事力量，使之投入太平洋战场。最近升职担任陆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艾森豪威尔准将写道：“这项计划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我们的核心力量集中起来对付欧洲的敌人，然后再全力以赴打击日本。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战略的人对此提出质疑。”[\[60\]](#)即使是跟日本人打得不可开交的尼米兹将军也表示，“我们在太平洋作战的所有人都完全理解”德国优先的原则。[\[61\]](#)

然而，这项战略说得比较抽象，解释的空间很大，容易引起争论。现有部队、舰船和军需到底有多大比例派往太平洋？百分之十？二十？三十？要是太平洋战局不稳定（事实也是如此），该战区是否应该在短期紧急情况下获得更多的资源？应该退让多少领土给大举进攻的日本

人？要不要牺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是仅仅为了保持对敌军外围施加压力，盟军应该在太平洋集结多少进攻力量？打败德国之前，可不可以太平洋发动反攻？军方领导人在写给总统的联合备忘录中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以《保障东部战区重要利益》为标题的备忘录中只称“达到上述目的所需的最小兵力将由双方共同讨论决定”。^[62]艾森豪威尔评论说，德国优先的原则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落实这一构想，并且得到两国军事参谋的批准，可不是件容易事儿”。^[63]

即使在仔细权衡战略的紧要关头，两国的参谋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太平洋和东亚的坏消息。日本的海陆空部队威胁的区域西起缅甸，东至新几内亚西部，北起菲律宾，南抵澳大利亚，这片范围内的美军、英军以及荷兰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都有可能被摧毁。12月24日，美英第一次会议当天，全世界都知道了香港和威克岛的沦陷。马来亚还有更多坏消息：法属印度支那中部的防御力量正在崩溃，英军正逃往新加坡。日本人似乎有可能夺取婆罗洲和苏门答腊油田的控制权。相比之下，欧洲战场传来的消息较为令人振奋：英军在非洲把隆美尔从图卜鲁格赶了回去；德军被拦在莫斯科大门口，随着苏联严冬来临，遭受了重创。眼下看来，欧洲战局至少稳定住了，而太平洋战场却风起云涌。

金将军头脑非常清晰。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整个战略取决于两个基本点：夏威夷绝不能沦陷，澳大利亚绝不能沦陷。为此，金（在担任美国舰队总司令后）命令新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确保中途岛、夏威夷和北美大陆之间的航路安全。那是他的首要任务。“在重要程度上只稍逊一点”的第二项工作重点是保护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主要是“掩护、守卫并控制夏威夷—萨摩亚航线，尽早将斐济纳入其中”。^[64]再往南一些（尼米兹还指挥不到的地方），还要把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汤加群岛等更多“据点”也包括在内。这条长长的补给线必须安全运送不断增多的大量物资。这样一来，盟军就可以在“澳大拉西亚”（根据金的定义，新西兰包括在内）设立战斗指挥部，最终从那里发动反攻，向西北直击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新几内

亚、婆罗洲以及菲律宾。[\[65\]](#)

其他所有的相关事务都必须无条件服从金所谓的“两项生死攸关的太平洋任务”。[\[66\]](#) 尽管华盛顿还没承认，但菲律宾将要沦陷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伦敦尚未承认，但马来亚和新加坡即将沦陷也是不争的事实。缅甸会沦陷，荷属东印度群岛会沦陷，东南太平洋上的英军、荷军和美军将会土崩瓦解。美国的亚洲舰队由一群老旧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可能会被敌舰和敌机歼灭。它对战争的主要贡献将是拖慢日本的进攻速度，为保护从旧金山、圣迭戈、巴拿马到布里斯班、奥克兰、悉尼的航道赢得宝贵的几周时间。

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会试着利用盟军暂时的弱势来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盟国只能猜测日本的意图，每一个新动向都可能拉开向东进攻的序幕。[\[67\]](#) 日本潜艇在萨摩亚地区开炮，似乎预示着将要有一场两栖进攻（最后没发动）。连接北美和澳大利亚的航线擦着吉尔伯特群岛经过，这很危险，因为该群岛已被日本人占领，正在建造恐怖的航空基地，而且已经有空袭是从那里发起的。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距坎顿岛仅960英里，那里有一条5 000英尺长的简易飞机跑道，但是没有盟军的飞机。这个岛可能会被轻而易举地占领，导致航线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日军飞机从那里起飞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从空中屠杀盟军的船队。

美国—澳大利亚的生命线，1942年



当务之急是立即派兵驻扎受到威胁的岛屿。盟军在社会群岛的博拉博拉岛上设立了一个新的加油站，为从巴拿马运河向西航行的船只加油。金请求罗斯福总统把稀缺的盟军资源投入“守岛建岛”的紧急项目，用于建设基地、机场、海军防空营、陆军驻地，提供飞机及其配套设施、港口及加油设备等，所涉岛屿包括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苏瓦（斐济）、汤加塔布（汤加群岛）、埃法特（新赫布里底群岛）和富纳富提（埃利斯群岛）。[68]

但是，金所想的并不完全是采取守势。他经常谈到“防御性进攻”的优点，（在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一封备忘录中）他通俗易懂地将这种策略定义为“守住已有的，再伺机打击”。[69]挖掘工事并守株待兔在陆地上可能是明智的策略，但是在海战中，主动权往往掌握在进攻的一方。即便美国人攻击力量严重不足，也应该用仅有的力量来打击敌人，逼敌人考虑暴露外围的代价。要实施有效的防御措施，就必须从航空母舰上对日本的岛屿基地进行空中打击，对日本的内部海运补给线开展潜艇战。“没有哪个战士藏起来就能获胜——仅仅被动抵挡对方的攻击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海军作战部长打比方说，“胜利属于实施打击的一方，即便他不得不结结实实地吃几拳头，也要一直打下去，这样才能持续打击对方。”[70]

鉴于战局风云突变，金力争近期为太平洋战区多分配些稀缺的军事资源。他一如既往地据理力争，铿锵有力，但不讲究策略，丝毫不掩饰对反对者的蔑视。英国人错误地以为登上美国海军最高职位的军官在同自己同胞打交道时一定更加和蔼可亲，所以他们以为金是坚定的反英者。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金天生就对英国人有偏见，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想破坏“欧洲优先”原则。相反，他似乎有意选择当太平洋战场的特别代言人，因为他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其他军事部门负责人（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充分考虑这一战区的需要。

在军事领导人的小圈子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人与金的观点相同。后

来在解放欧洲时担任盟军总司令的大名鼎鼎的艾森豪威尔就有这种担忧，他担心指挥官们忽视了阻断日本攻势的必要性。“我一直坚持认为远东地区至关重要。”1942年1月1日，他在办公桌的备忘录上写下了这句话。他认为“在空中和地面的军备状态令人满意之前，不应开展次要的活动。然而，我们正进行‘磁铁’（调运美军到北爱尔兰）和‘体育家’（登陆北非的作战计划，后改为‘火炬’）等行动”。^[71] 菲律宾的命运令人揪心：已经被美国媒体捧为超级明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为他饱受打击的美国和菲律宾部队提供救援物资，罗斯福为此公开表示：“我向你们郑重承诺，你们将重获自由和独立，并且受到保护。”总统1941年12月30日写信给史汀生部长，“希望作战计划处研究研究救援菲律宾的方法。我知道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但这个目标非常重要”。^[72] 亚太地区的盟国对其美国和英国盟友始终抱有信心，希望英美盟友能够使其免受打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派出许多精锐跨越半个地球去与德军作战，现在急于保家卫国。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在墨尔本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明确表示澳大利亚期待美国的援助，我这样说没有任何顾忌，对我们与英国亲人般的传统关系也没有任何不敬。我们知道分散力量很危险，但也知道没有澳大利亚英国照样可以坚持下去。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不能让澳大利亚失守。”^[73]

人们还担心盟军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崩溃会促使日本入侵西伯利亚，这样就会把苏联踢出战局。众所周知，日本军队中的铁腕人物渴望着进攻苏联，希特勒肯定也在向日本盟友施压，让其进攻苏联。1942年1月下旬，斯坦利·邓巴·恩比克中将告诉陆军作战计划处，“立即增加对太平洋战区的援助”将起到“阻止日本向西攻打西伯利亚的威慑作用”。1942年3月发布的计划书则称：“对苏联来说，最有价值的援助就是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力量，我们越早向苏联明确表示将这么做，苏联从这种援助中获得的益处就越多。”^[74]

在1月11日举行的第九次会议上，金要求派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驻扎在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该群岛横跨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

线上，也是日本人觊觎已久的镍矿产地。如果新喀里多尼亚被敌人占领，美国船队就不得不改道，从新西兰南部绕行。金坚持认为应该立即派一万名士兵夺取该群岛，即便以分散向欧洲进军的兵力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两个战区的资源争夺从高高在上的理论层面落到了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的实际层面。

要想实施金的计划，似乎只能转移原定派往冰岛和北爱尔兰的部队，英国坚决反对这种改变。其他美军长官也没给金多少帮助。阿诺德将军说，他的陆军轰炸机可以直接飞过这些岛屿，但这样说起不到什么帮助作用，金反击称在南太平洋组建舰队需要的是船，而船是不会飞的。陆军本能地抵制将部队部署到海军主导的战区。艾森豪威尔听说这一建议后，尖刻地指出：“海军这是想占住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啊——陆军守住这些岛，把它们当成陆军的追击据点和轰炸机基地。然后海军就有安全的港口了。”^[75]（人们指责金偏袒海军，但其他军种领导的偏袒之心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丘吉尔亲自出面请求罗斯福总统派“三到四支”美军步兵师前往北爱尔兰，换防驻扎在那里的英军，同时对爱尔兰的政界施加政治影响。丘吉尔写道，这将“表明美国决定直接干预欧洲的战事”。^[76]面对金的据理力争，英国首相似乎愿意接受延迟向北爱尔兰派遣部队。原定派往冰岛的约8 000名士兵将减少到2 500人；原定派往北爱尔兰的16 000人将减至4 000人。^[77]但是除非能找到舰船，否则所需的这些部队没法派往太平洋，而舰船是稀缺资源。能不能从《租借法案》规定派往苏联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的船队中抽调舰船？金说，他觉得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冬天已经冰封了，即便海面没冻住，苏联的港口设施也没法卸载货物。罗斯福持不同意见，他说苏联人说过该港口仍在开放，而且曾经要求供应物资。总统显然不想做出尴尬的决定，便问道，日本人侵入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后，是否很难重新将其夺回来。金答复说，非常困难。

哈里·霍普金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计算，只需7艘船就足以将承诺提供的物资交付给苏联。这样一来，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不同

了。即便在船只短缺的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应该也能搞到7艘船。霍普金斯自告奋勇去找船。僵局就此打破。〔霍普金斯经常会做出这样的贡献：他往往能适时地就某项议题发表深刻见解，或者将辩论引向实际的解决方案。丘吉尔送给这个高个子顾问一个绰号——“一针见血勋爵”（Lord Root of the matter）。^[78]〕最后各方一致同意派21 800名美国士兵从东海岸出发，乘船穿越巴拿马运河，于1942年2月中旬抵达南太平洋。其中一部分士兵将与澳大利亚军队一同被派往新喀里多尼亚——盟军驻军总共将达一个师的兵力。另外，应金的恳求，各方一致同意在1942年初派20艘货轮向南太平洋运送250架战斗机、143架轰炸机、220吨货物和450万加仑汽油。^[79]

丘吉尔声称，战争刚开始几个星期他就知道亚洲盟国会遭受“灭顶之灾”。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首相以照片般写实的风格阐明他的观点：“即便讲话时语气自信，我也预感到很快会有鞭子抽打我们裸露的肉体。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以及被它们波涛汹涌的海浪拍打的亚洲陆地和岛屿上，我们怕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英国如此，荷兰如此，美国也是如此。一场军事上的灾难确切无疑地摆在我们面前，何时结束却遥遥无期。重见光明之前，我们必须忍受许多个黑暗与疲惫相随的日夜，忍受无数的失败和损失。”^[80]

源源不断的坏消息引发了盟军指挥分散的问题。日本人遇到了五个国家来自地面、空中和海上的虚弱无力、毫不协调、混乱不堪的抵抗，这五个国家是英国、美国、荷兰流亡政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每个盟国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局限。航运是个关键性瓶颈，但航运资源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进行过协调。乔治·马歇尔将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盟军需要一位有权调动战区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他在1941年圣诞节当天上午举行的第二次军事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确信，整个战区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无论是空中、地面还是海上，”他说，“合作是行不通的。人性的弱点是，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另一个军种指

挥。如果我们现在制订由一个人来指挥的计划，那就能解决十分之九的问题。”^[81]他谈到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在座的所有人都经历过。“实现统一指挥有些难度，但是比我们不这么做面对的难题要容易得多。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桌子这边和桌子那边的人各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超越自身局限，实现这一目标。”^[82]

冲突刚一显露苗头，马歇尔就勇于直面难题，这显示出为什么他是二战期间真正不可或缺的美军领导人。统一指挥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敏感话题，直指英美联盟的核心，同时也暴露了双方都存在的兵种间的对立。尽管马歇尔的本意可能是将统一指挥权视为纯粹的军事问题，但它也涉及棘手的外交和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所有盟国的文职领导人都必须面对的。马歇尔似乎看透了，如果在冲突的一开始没有处理好统一指挥的问题，那它就可能永远也处理不好了。

这项提案像是一颗重磅炸弹：马歇尔事先没有通报金，也没有通知其他美军或英军将领。一开始，它遭到强烈抵制。英国人近两年半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一个刚卷入战争、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国家统率。英国皇家空军总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争论道，盟军首先应该确定战区的总体军力部署，然后再谈统一指挥的问题。金起初很谨慎。会上有个军官认为他的态度“不温不火”。^[83]他深知美国海军官兵会对把舰船交给美国陆军将领或外国海军将领指挥这件事感到震惊。金的助理参谋长“凯利”里奇蒙·特纳将军强烈反对让美国海军部队脱离海军系统的指挥，而且对金或其他任何人都敢这么说。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金被马歇尔的理由说服了，并且在随后的会议上宣布支持这一提议。斯塔克、特纳和其他海军将领极不情愿地与他保持了一致的立场。这是个令人惊讶也非常幸运的进展。它巩固了马歇尔和金之间的伙伴关系，预示着美国海军将要接受军种协调和联合作战的行动。

英国的反对派更加顽固。这个问题在12月26日的白宫会议上提出

时，丘吉尔就明确反对。他似乎得到了军官们的预警，发言时小心翼翼的。他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统一指挥是项重要原则，但眼下这场战争战线拉得很长，“战斗随处打响”。亚洲战场幅员辽阔，岛屿和陆地被海洋隔开，许多不同国家的部队驻扎于此，在本国国土或在自己的殖民地上作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指挥只会令局势变得混乱。盟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有充足的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场。各国部队都由自己的军官指挥，但是直接对华盛顿或伦敦的总参谋长负责，这样战争可以更有效地进行。讨论过程中，英国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给霍普金斯递了张纸条：“你要做丘吉尔的工作。他正在听取意见。他思想开明，需要讨论。”^[84]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霍普金斯对他说：“在我们说出心目中的人选之前，请不要急于拒绝总统将要向您提出的建议。”^[85]随后，马歇尔提名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P. 韦维尔爵士担任首任“ABDACOM”（“美英荷澳司令部”的缩写）最高盟军指挥官。美英荷澳司令部的战区涵盖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西部、澳大利亚西北部四分之一的领土、菲律宾，以及所有相邻海域。韦维尔将统率“海、陆、空”的全部军事力量。^[86]

丘吉尔回忆说：“选择英国指挥官让我觉得受到了恭维，但在我看来，他要指挥的这片战场很快就会遭到蹂躏，他要统率的部队会被日军的铁蹄摧毁。”^[87]首相公开声明，他宁愿看到英国舰船由美国海军将领而不是英国陆军将领来指挥，这表明他是根深蒂固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他建议由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统率四国的全部海军力量，只需“符合”陆军上将韦维尔的计划和战略即可。美国人觉得这有些含糊不清，拒绝了这一提议。^[88]金自己拿起钢笔，重写了命令，写明海军将归韦维尔指挥。

丘吉尔的抵制在罗斯福、马歇尔和霍普金斯联合施加的强大压力下瓦解了，尤其是金的坚定支持加剧了天平的倾斜。丘吉尔本来指望金将

军出面反对外国陆军将领指挥海军的，不过金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毫不含糊地支持韦维尔。面对这条统一战线，丘吉尔最后说：“很明显我们必须与美国人的观点保持一致。”他没有请求伦敦的战时内阁批准，而是发了一封电报，宣布该决定已经做出。美国海军将“继续负责菲律宾群岛和澳大拉西亚以东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对澳大拉西亚战场采取的对策”。他总结道：“我没去争辩我们接受美国这一大度无私提案的对与错，作为战胜方，我深信这一决定功不可没。”^[89]

伦敦方面通过电报接到消息，布鲁克将军十分沮丧。他在日记中写道：“整个计划是疯狂而又不成熟的。它只顾及一个行动区域，西太平洋；只考虑一个敌人，日本，并且没有集中的控制。”然而，“内阁不得不接受首相的新计划，因为它几乎是既成事实了！”^[90]到了12月29日，距马歇尔第一次提起这个话题仅四天，四国中的三个国家就同意了韦维尔的任命，这位不走运的将军也已经收到了命令。尽管金最初是反对的，而且英国人发起了更为强烈和持久的抵制，马歇尔还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他的设想。韦维尔1942年1月10日抵达爪哇岛巴达维亚。彼时，日本人在那片战场的猛攻正在接近成功的高潮。

美英荷澳司令部的指挥模式其实寿命不长，却迫使盟军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联盟要如何运作。韦维尔上将听从谁的命令？美军和英军高级指挥部怎样融合到一起？最关键的是，最高司令部设在哪里？华盛顿还是伦敦？还是横跨大西洋？联盟中那些小国是否也有席位？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够在多国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吗？那些问题都很棘手，想要解决好又不在盟军阵营内引起异议和怨恨是不可能的，但是金坚持要求立即做出决定。

韦维尔的任命状说，他将从一个对总统和首相负责的“适当的联合机构”接受命令。^[91]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将军提议，盟军应该“利用现有的组织机构”。换言之，盟军最高指挥部由英军和美军将领组成，亦即围坐在美联储董事会议室的各位，再加上留在伦敦的艾伦·布鲁克将军。他们共同组建成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COS），直接向美国总统

和英国首相负责。他们负责指导战争的总体战略方向，制定生产目标，分配军需，向全球所有盟军司令部发号施令，控制所有盟军的航运（这至关重要）。1941年12月29日，在白宫私人午宴上，罗斯福告诉金将军，他不相信最高司令部中加入美国人和英国人以外的人以后还能保持一致性。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荷兰人、中国人、自由法国人和其他所有盟友不得被排除在决策者之外，他们的任务是接受并执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命令。金意识到这些国家会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认为这是确保指挥机构正常运转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总统授权金在第二天的参谋长会议上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转达他的观点，金照做了。“很明显，战争的参与者太多了，不能通过举手表决来进行决策，”后来金对战地记者如是说，“这种强硬的办法注定会导致小国产生抵触和不满.....但这是有效行使职能的唯一途径。”^[92]

这个“联合机构”安放在哪里合适？美国人坚持设在华盛顿，由一名英国代表担任伦敦联络员。对于已经从伦敦指挥了近两年半战争的英国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提议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华盛顿；他们还提议建立一个体系，通过两国首都间的电报通信制定重大决策。罗斯福、金、马歇尔和美国人回答说，这是不切实际的，会严重影响由统一的指挥打一场全球战争的原则。这是会上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美国人指出，美国将生产绝大多数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而且北美在地理上更靠近欧洲和太平洋战区的中心。罗斯福谨慎地预测“这个问题可能会讨论相当长一段时间”，霍普金斯则指出，“‘适当的联合机构’的建议引发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93]

英国人转而建议成立两个“平权的”军需配给小组委员会，设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由比弗布鲁克和霍普金斯领导，从而将一部分权力留在伦敦。马歇尔强烈反对，威胁说宁肯辞职也不接受，英国人遂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一个痛点。据总统的演说撰稿人舍伍德判断，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论比阿卡迪亚会议上的任何其他议题都要多。.....这是让英美之间出现民族主义路线分歧的少有几个议题之一，而且相关讨论从

未完全终结”。丘吉尔没有轻易接受失败，他不厌其烦地据理力争。但是，当罗斯福明确表示支持马歇尔，英国人要么默许，要么就要冒公开决裂的风险时，丘吉尔放弃了，提了一个保留面子的建议，“那就建立这个体系，先试行一个月”。罗斯福满怀感激地表示同意：“我们应该称其为初步协议，照此试行。”最终这一安排会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94]

布鲁克将军在伦敦收到电报时颇为震惊：“现阶段，美国军队完全没有准备好扮演重要角色，我看不出任何理由同意由华盛顿实行集中控制。”^[95]后来，英国军方首脑返回英国，布鲁克责备波特尔和庞德“为了一碗粥出卖自己的名分”。^[96]但丘吉尔没有上当受骗。虽然有点儿不情愿，但他头脑是清醒的。首相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评论道，“有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头脑，与其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算不了什么”，那就是“让美国总统带着必胜的信念加入战争。要是做到这一点，别的都不重要”。^[97]在12月7日之前，英国一直是追求者的角色；而在那以后，正如首相向国王乔治六世汇报时所言：“英国和美国经过几个月的约会，现在已经共结连理啦。”^[98]

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奉命率领驻华盛顿的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安慰。丘吉尔已经解除了迪尔的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由布鲁克取而代之。他此行的目的是协助交接，让他留在华盛顿的决定是后来做出的。迪尔与美国军方所有领导人关系都很好，1944年去世之前一直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重要联络人。美方参谋也会不时前往伦敦和世界其他地方参加战时会议。1941年至1945年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共召开了89次会议，制定了许多实质性的战争决策和妥协对策。丘吉尔后来写道：“从没发生过不能达成有效行动意见的事，向每一个战区指挥官发出的指令都清晰无比。每一个执行军官都知道，他所接到的命令是两国政府的共同意见，具有两国专家的权威性。”^[99]

英国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认为美国的生产目标“过低”，12月29

日他直接向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100\]](#)他劝美国将1942年的生产目标上调为4.5万辆坦克，1.77万门防空炮，2.4万架战斗机。[\[101\]](#)海军方面，斯塔克将军已经提议扩大现有的建造计划（根据1940年扩建法案），增建8艘航空母舰、24艘巡洋舰、102艘驱逐舰和54艘潜艇，总排水量90万吨。1944年龙骨将全部铺设完成。即便如此，这些计划也不够宏大。1942年1月，海军事务委员会设想建立一支由34艘战列舰、24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巡洋舰、104艘其他巡洋舰、379艘驱逐舰和207艘潜艇组成的舰队。这些数字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军方开始重视航空母舰。还有人呼吁增加护航舰，最终打造了许多专为护航设计的护航驱逐舰。[\[102\]](#)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必要指令已经大范围下达到政府各有关部门。

总统在1942年1月6日向国会递交的国情咨文中展示了他的巨无霸生产目标。“我们必须把目光集中在生产线上。谁都不许说做不到。”1942年，美国要制造4.5万辆坦克、2万件防空武器、6万架飞机和净重600万吨的货物。罗斯福补充说，这些目标“要让日本人和纳粹尝尝偷袭珍珠港的滋味”。[\[103\]](#)这些数字是罗斯福本人修改过的，在提交给他的估算数据中似乎找不到事实依据——他在演讲前一晚划掉了他收到的估算数据，重写了一些数字。霍普金斯担心这些随意估算的数字不可行，总统平静地回答说：“哦，生产工人当真努力的话，可以做到。”舍伍德说：“罗斯福从来不怕四舍五入把数字写大。”[\[104\]](#)

这些数字相当惊人。莫兰勋爵称，丘吉尔比任何同僚都明白，这种生产规模对战争进程意味着什么。“他沉醉在这些数字里了。”[\[105\]](#)

很多人觉得这些目标不切实际。据说，战争部的一名军官评论道，罗斯福“在狂玩数字游戏”。[\[106\]](#)在多年的大萧条时期无法全力生产的工业领袖此时也纷纷产生了怀疑——许多人说，是哈里·霍普金斯误导了总统。1月13日，总统回应了这些批评，召来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高管唐纳德·纳尔逊，成立了一家新机构来协调全部工业组织，取名为战

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霍普金斯强烈推荐纳尔逊，他认为有纳尔逊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什么三人委员会。在他的推荐下，纳尔逊走马上任。总统接受了霍普金斯的观点，认为纳尔逊“是最棒的”。[\[107\]](#)他将成为“战争统帅”。在他的监督下，美国的工业基地重整旗鼓，加大产能，实现每周七天连轴转生产。装配线实行三班倒。政府下令关闭和平时期生产汽车等产品的广大行业，不允许继续向平民销售汽车或轻型卡车。所有已经进入零售渠道、停在经销商处的汽车都要服从配额管理。大部分车卖给了政府，还有一些卖给了从事必要工作的专业人士。

自1775年以来，英美之间的关系一直饱受对抗、不信任和嫉妒的困扰。即便在珍珠港事件以后，许多美国人仍在怀疑英国人，因为他们连续愚弄两代美国人，让他们卷进欧战的泥潭，抛洒热血，散尽家财。他们担心英国人会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力量挽救他们的全球帝国，种下未来战争的种子。

虽然盟军的谈判笼罩在这些陈旧的嫌隙中，但是阿卡迪亚会议堪称战时外交的胜利。盟国重申了“欧洲优先”政策。双方一致同意，战争的主要问题将由驻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他们建立了美英荷澳司令部，由陆军上将韦维尔担任总司令。为韦维尔起草规章制度时，盟军一直针对的是太平洋地区迫在眉睫的危机——但他们为此专门付出的努力缔造了多国跨兵种战区统一指挥官的先例，甚至开创了融合型高级指挥部的制度。他们编写了《联合国宪章》，这是一份联合意向声明，后来促成了总部位于纽约、至今仍然存在的多边组织联合国的建立。他们设定了极高的战时生产目标，而且最终实现了。他们缔造了一个真正的联合阵线，与轴心国只是名义上的联合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扮演重要辅助角色的霍普金斯）巩固了私人层面上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建立在真正互有好感的基础之上。他们一

起坐镇整个机构，做出军队长官无法确定的重大决策。（1942年中期以后担任罗斯福参谋长的莱希将军斩钉截铁地说，“真正指挥这场战争的”是这两位领导人。[\[108\]](#)）英国温和地施加影响，以免刺激美国人脆弱的自尊心——丘吉尔对他的战时内阁说，美国人“不介意向我们学习，但是我们不要主动提出教他们”。[\[109\]](#)

二战史学家对乔治·马歇尔的领导才能都不吝赞美之词。相比之下，金往往扮演马歇尔的反派、对手或搅局者的角色。不可否认，二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实质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往往被夸大了。在阿卡迪亚会议上，金支持马歇尔的统一指挥论。他同意将美国的亚洲舰队归英国陆军将领指挥。他主张多分配一些稀缺的军需来支撑美国—澳大利亚的生命线，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金的观点极富远见。在创建最高盟军指挥部的谈判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些棘手而富有洞见的问题，迫使参与者厘清思路。但是在讨论结束时，他和马歇尔持相同观点。

最重要的是，马歇尔和金是合作伙伴。他们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两位主导成员，因此他们始终认为，两人的合作关系是美国战备的核心所在。他们在战争的任何实质性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都必须由罗斯福本人来裁决。僵局会降低他们的可信度，威胁高级指挥部的凝聚力。本着这种看法，马歇尔和金几乎总能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金知道他俩必须和睦相处，”他的一位下属参谋回忆道，“这会对所有人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两人清楚，他们必须和睦相处。”[\[110\]](#)

但是，有一个问题，金永远不会退让。“要是统一指挥部的方案依据的并不是特定时间、特定区域的具体情况，没有设置特定期限，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意的，”金在会议期间给同事写信说道，“我发现有必要抽时间向高层一些‘业余战略家’指出来，统一指挥并不是解决所有军事难题的万能药——我会不断提醒他们的。”[\[111\]](#)更直接点来说，金绝不会同意以救世主自居、好大喜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来指挥太平洋舰队。

1月13日是丘吉尔华盛顿之行的倒数第二晚。晚餐前，总统、首相、第一夫人还有另一些宾客和工作人员聚在“椭圆形书房”喝鸡尾酒。当晚应邀出席晚宴的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回忆说，丘吉尔迟到了。他“半皱着眉头走进房间，胖乎乎的大脸上有双浅蓝色眼睛，面色白里透红”，而且“走起路来就像没有关节一样，浑身是一体的：迈着坚定的脚步，不慌不忙，不为障碍所阻，像坦克或推土机一样。……他那张大大的圆脸十分光滑，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和嘴巴极有特色，透着一股精明、冷酷、不择手段的劲儿”。阿达米克在那之前不久出版了一本书，提倡战后美国在欧洲推动民主；埃莉诺·罗斯福读过这本书，推荐给了总统、首相和其他许多人。阿达米克是个反帝国主义自由派，并非完全不带偏见——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信任丘吉尔和英国保守党——但是他对当晚经历的描述十分生动，令人信服。目睹两位盟军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后，他感觉到两人是真正的朋友，彼此熟悉，有情有义——但是他也察觉到一丝紧张气氛，似乎他们最近吵过架。“他们注视着彼此，似笑而非笑，似乎在试探对方的尺度，揣摩着，质疑着。……似乎都在向对方无声地问：今晚我该如何对待你呢？你又会对我的策略做出怎样的反应呢？”[\[112\]](#)

1月15日一早，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驱车欢送首相，将他带到六街的私人专线乘坐火车。总统在汽车里与他道别，霍普金斯则陪同丘吉尔一行走到火车旁。霍普金斯递给丘吉尔一张纸条和一份送给丘吉尔夫人（“克莱米”）的礼物，纸条上写道：“您会为您丈夫此行感到无比骄傲的。……”[\[113\]](#)

丘吉尔乘水上飞机在百慕大加油后穿越大西洋，经过马拉松般的飞行，终于返回了伦敦。他发现政治局面非常糟糕。东亚和北非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议会威胁要赶他下台，他的领导能力也饱受批评。首相也许从1月30日便60岁的罗斯福热情洋溢的便签中获得了一些安慰。罗斯福写道：“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是件有趣的事。”[\[114\]](#) 丘吉尔在下院进行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并要求进行信任投票。结果，1月27日，丘吉尔以464票对1票赢得下院的信任。 [\[115\]](#)

[\[1\]](#)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0.

[\[2\]](#) Photo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 207.

[\[3\]](#)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52.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p. 64, 39, and 71.

[\[5\]](#) Ibid., p. 57.

[\[6\]](#) Quoted in *ibid.*, p. 28.

[\[7\]](#) Ibid., pp. 91, 86.

[\[8\]](#) Ibid., pp. 115, 91, and 111.

[\[9\]](#) Tully, *F. D. R.: My Boss*, p. 263.

[\[10\]](#)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87.

[\[11\]](#)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 95.

[\[1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89.

[\[13\]](#)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 69.

[\[14\]](#)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651.

[\[15\]](#) *Life* magazine, Nov. 24, 1941, p. 92.

[\[16\]](#)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50.

[\[17\]](#) Ibid., p. 152.

[\[18\]](#) Ibid., pp. 153–54.

[\[19\]](#) Ibid., p. 156.

[\[20\]](#) Rr. Adm. Richard S. Edwards quoted in *ibid.*, pp. 155–56.

[\[21\]](#)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description from photograph; illustrations after p. 368.

[\[22\]](#) FDR to WC, Dec. 8, 1941,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 169.

[\[23\]](#) WC to FDR, Dec. 9, 1941, in *ibid.*

- [24] WC to FDR, Dec. 10, 1941, in *ibid.*, p. 170.
- [25] FDR to WC, Dec. 10, 1941, in *ibid.*, p. 171.
- [26]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09.
- [27] Churchill to Clementine Churchill, Dec. 21, 1941, in Soames, ed., *Winston and Clementine: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the Churchills*, pp. 459–60.
- [28]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1.
- [2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87.
- [30]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5.
- [31] Chadakoff, ed., *Eleanor Roosevelt's My Day: Her Acclaimed Columns, 1936–1945*, p. 227.
- [32] Bear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 p. 555.
- [33]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58.
- [34]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2.
- [35] Tully, *F. D. R.: My Boss*, p. 300.
- [36] Tully, *F. D. R.: My Boss*, p. 300.
- [3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42.
- [38]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86.
- [39]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941), pp. 588, 589, and 591.
- [40]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p. 142, 144.
- [41]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705.
- [42]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4.
- [43] Eleanor Roosevelt, *This I Remember*, p. 243.
- [44]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Dec. 26, 1941, in Gilbert, ed.,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The Ever-Widening War*, Vol. 3: 1941, p. 1685.
- [45] “Winston Churchill, Speech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Dec. 26, 1941, in Gilbert, ed.,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The Ever-Widening War*, Vol. 3: 1941, p. 1685.
- [46]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5.
- [47]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 154.
- [48]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16.
- [49]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 p. 144.
- [5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 125.

- [51]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 132.
- [52]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p. 303.
- [53]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 319.
- [5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8.
- [55]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695.
- [56] Stilwell and White, eds., *The Stilwell Papers*, p. 16.
- [57]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45.
- [58]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3.
- [59] Marshall, Stark, Arnold, and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 14, 1942. Folder:American-British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dex;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hereafter PSF), Safe Files,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Y.
- [60]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8.
- [61] Ewing, "Nimitz," p. 11.
- [62] Marshall, Stark, Arnold, and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 14, 1942.
- [63]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8.
- [64] "COMINCH to CINCPAC," Dec. 30,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1.
- [65] Adm.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 384–85.
- [66] Glen Perry to Edmund P. Bartnett, Nov. 7, 1942, regarding King's off-the-record press conference, in Perry, "Dear Bart," pp. 88–89.
- [67] "COMINCH to CINCAF, INFO CINCPAC," Dec. 31, 1941;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122.
- [68] See King'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 384–85.
- [69] King to Navy Secretary Frank Knox, Feb. 8, 1942, quoted in *ibid.*, p. 373.
- [70]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21.
- [71]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2.
- [72]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54.
- [73]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5.
- [74]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p. 73–74.
- [75] Morton, *U.S. Army in World War II*, p. 218.

[76]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06.

[77]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between Hawaii and Australia,” Jan. 13, 1942. Folder: Arcadia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78] Kimball, e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Vol. 1, p. 87n.

[79]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between Hawaii and Australia,” Jan. 13, 1942.

[80]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80.

[81] Ambrose, *The Supreme Commander: The War Years of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p. 26.

[82]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p. 46.

[83]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4.

[8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57.

[85]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7.

[86]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Directive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in the ABDA Area,” Jan. 2, 1942. Folder: ABCD Powers II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87]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597.

[88]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6.

[8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p. 597, 599.

[90] Entry for Dec. 29, 1941,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15.

[91] “Minutes,” United States–British Chiefs of Staff Conference, Dec. 29, 1941. Folder: Arcadia Index, 1941–42;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9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9.

[93]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69.

[94] Ibid., pp. 470–71, 472.

[95]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16.

[96] Ibid., entry dated Feb. 9, 1942, p. 228.

[97]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0.

[98] Gilbert, *Churchill and America*, p. 254.

[99] Churchill, *The Grand Alliance*, p. 609.

[100] Letter, Beaverbrook to FDR, Dec. 29, 1941. Folder: Beaverbrook, Lord, Index;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101] "U.S. production goals for 1942" ...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Lord Beaverbrook, Dec. 29, 1941. Folder: Beaverbrook, Lord, Index.

[102] See Davidson, *The Unsinkable Fleet*, pp. 32–33.

[103]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 6, 194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Santa Barbara, CA, online at www.presidency.ucsb.edu.

[10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4.

[105] Moran,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1965*, p. 22.

[106]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3.

[107] *Ibid.*, p. 475.

[108] Leahy, *I Was There*, p. 106.

[109] Gelb, *Desperate Venture*, p. 47.

[110] Spector, *Eagle Against the Sun*, p. 125.

[111]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66.

[112] Adamic,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pp. 25–27.

[113]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78.

[114] *Ibid.*, p. 494.

[115] "I Demand a Vote of Confidence," Jan. 27, 1942, in Churchill, ed., *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pp. 324–25.

第六章

在1942年的美国海军中，每一位海军将领都认识其他将军，至少相互知道姓名，也都见过面。不过金和尼米兹无论私下里还是工作上关系都不亲密。两人对比鲜明；金骄横跋扈，尼米兹轻言细语，学究气十足。如果是由新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来选择金梅尔的接替者，金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人。尼米兹明白，他还在试用期内。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位得克萨斯人透露他和金相互并不信任，而且还没有什么关系。他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当美国舰队总司令对一个人失去信心时，后果很快就会来临。

在1942年1月2日的一封作战电报中，金表明他对于美国航空母舰1941年12月7日以来迟缓的反应和随意的部署极为不满。他希望对日本的“固定航空母舰”——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环礁以及马绍尔群岛中的一系列航空基地——进行突袭，然后迅速撤退。他要求尼米兹派航空母舰快速闯入敌方水域，趁日本人还没起床时轰炸敌方岛屿，在敌机起飞前将其摧毁，破坏机场，将敌军的飞机库、机械库和兵营夷为平地，消灭敌人的飞行员和检修人员，炸毁其燃料箱，并用鱼雷炸毁停泊在潟湖中的军舰。^[1]

尼米兹与参谋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反对意见非常理性，而且理由充分，不能斥之为因胆怯懦弱而置之不理。第14海军军区的指挥官克劳德·C. 布洛赫将军对夏威夷的防卫负有直接责任，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损失航空母舰，夏威夷将遭受敌人的入侵。海军历来认为派遣航空母舰进入陆基轰炸机的范围内是战术上的失败，除非攻击者确信突袭一定能成功。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随着

战争的进行，他们难道不会在其帝国的东侧预防类似的突袭？如果敌人早有准备，这样做就有非常大的风险。日本的双引擎陆基轰炸机会对美国的航母发动毁灭性的反击，因为这种轰炸机的航程超过了美国的舰载机。

而且，这种风险值得吗？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在此期间制订的作战计划表明，几乎没有人知道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偏远环礁的任何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它们笼罩了一层神秘的气息。但那些地方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较高的目标。在珊瑚礁跑道上炸出一些很快就能修复的坑有什么好处呢？敌人重要的主力舰根本不可能停靠在那些偏远的海岛上，而且岸上的军事设施并非特别重要或很有价值。在战争的早期，审慎的行动应该是争取时间来建造更多舰艇，此时为什么要孤注一掷，冒损失更多舰艇的危险？可以等到1943年再执行冒险行动，那时候美国经济会完全动员起来，一支全新的舰队会交付到尼米兹手中。敌人对航空母舰造成的危险在1942年1月11日有了生动的证明，那一天“萨拉托加号”在瓦胡岛以南约500英里的地方被日本鱼雷击中。它凭借自己的动力回到了珍珠港，但是损伤迫使它返回皮吉特湾（Puget Sound）维修。“萨拉托加号”是太平洋战区美国总共拥有的四艘航母之一，埃德温·莱顿写道：“失去它让我们的进攻力量减少了25%。”^[2]

1月7日，以“企业号”为中心建立的第8特混舰队进入珍珠港加油和加载补给。在战争开始之前，海军中将哈尔西就在指挥这支特混舰队，以“企业号”为旗舰。1月8日早上8点，他来参加例会，坐在了尼米兹的会议桌前。和他一起的还有巡洋舰指挥官，海军少将雷蒙德·A. 斯普鲁恩斯，他是个值得信赖的替补人员，最终取代哈尔西，成了一名优秀的舰队司令。一个星期前，哈尔西被传唤到罗伯茨委员会（对珍珠港事件的多次调查中的第一次）面前做证，委员会问到他对如何正确使用航空母舰的看法。哈尔西回答说，航母相当于海军中的骑兵，他还引用了南方邦联骑兵将军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的话说：“福里斯特将军的说法我觉得是最好的：用你所拥有的一切尽快接近对方，全力发起打击。你

必须侦察并且找到对方，一旦找到，派出一切可以派遣的力量去打击对方。”^[3]

哈尔西全力赞成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突袭。这有可能会吸引走日本南下威胁珊瑚海甚至澳大利亚的军力。对日本势力范围的前哨施以沉重打击可以降低其航空基地的效能，从而保护萨摩亚和澳大利亚生命线上的其他地方。哈尔西夸张地宣称他愿意带领“企业号”前往马绍尔群岛亲自执行这一行动。他发表见解时神采飞扬，语气坚定。在某地打击敌人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只是为了挽回海军的自尊。他承认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是什么样的战役没有风险？与持怀疑态度的人相反，他似乎并没有被战争进行一个月以来的失败和挫折击垮。

哈尔西还没有扬名四海，而且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象征，但与金或尼米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愿意扮演饱经风霜的海军斗士这一角色。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后来说，新闻界“希望将军们能像电影里一样拍桌子怒吼”。^[4]哈尔西正是会拍桌子怒吼的那种人。他的表现刚好适合这一角色。他方正的脸庞饱经海风、太阳和海盐的侵袭，稀疏的头发从宽敞的额头直直地梳向后面，两只眼睛分得很开，上方是一对苏格兰人的眉毛，显得威武而桀骜不驯。他微笑时像是在斜视。像乔治·巴顿将军一样（人们难免拿他和巴顿比较），他似乎喜欢战争。他是水手中的水手，在下甲板颇受欢迎。他宣称：“一般而言，我从不信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船员。”^[5]1942年1月，他急不可耐地要采取行动。“企业号”上的一名军械员回忆说，他从哈尔西的住所附近经过时，听到这位将军“雷鸣般地怒吼，咒骂华盛顿和在岸上办公的将军们，说他们胆小如鼠”。^[6]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尔西整整一生都是在海军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就是海军军官，从童年起他就生活在世界各地。15岁时，他直接写信给麦金莱总统，请求进入海军学院学习。这封信有许多拼写错误和事实错误，抬头也有违礼仪，写成了“威廉·麦金莱少校”，这是麦金莱总统以前在陆军服役时的军衔。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的母亲帮了他，联

系到了一些对这件事能说上话的人，于是哈尔西在1900年7月被录取为海军学院的学生。据说他在海军学院被记过的次数非常之多，然而他一直很受同龄人欢迎。他带着强烈的自嘲吹嘘自己是海军历史上最糟糕的橄榄球队中的明星后卫。（1903年，这支球队以5：40的分数败给了陆军。）他毕业于1904年，比尼米兹早毕业一年，在班上62名学生中排名第43。^[7]《海军学院年鉴》称他为“每个人的朋友”和“真正的高手。长得像海神尼普顿的舰首像”。^[8]

哈尔西早年主要在驱逐舰上服役。1909年他第一次获得舰艇指挥权（“杜邦号”），1920年开始指挥一个驱逐舰分队。他曾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情报局任职，还在美国驻德国、挪威、丹麦和瑞典的大使馆担任过海军武官。他曾在战列舰上服役（所有渴望晋升高级军衔的军官都要达到这一要求），并在大萧条初期学完了海军战争学院的课程。1934年，作为52岁的上校，他通过侧面渠道进入了海军航空领域，到彭萨科拉报到进行飞行训练。这个年纪学习飞行有些晚了，而且他没有开飞机的天赋，但他在第二年就获得了飞行资格，从而得到了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他指挥了“萨拉托加号”两年时间，然后返回彭萨科拉担任海军航空站的指挥官。1938年他升任为海军少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海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经验最丰富的司令之一。

得到作战行动指挥官的大力支持让尼米兹非常欣慰。而且，他逐渐收到了一些无线电情报，似乎能够对行动的风险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敌方的无线电通信量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群岛急剧上升，但在马绍尔群岛仍然保持稳定，表明舰队有向南运动的趋势。更具体地说，破译的零散无线电情报提到了一支“占领军”，目的地是新不列颠的拉包尔。^[9]如果日本舰队正在朝拉包尔的方向前进，那么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中部距日军舰队数千英里的地方就不会撞上任何危险。空中侦察和潜艇的侦察也表明对马绍尔群岛进行突袭应该不会发生不愉快的突发情况。

1942年1月9日，尼米兹同意执行突袭，并让哈尔西指挥这次行动。这场行动会成为一场以防御为主的任务的一部分。增援萨摩亚的海军陆

战旅两天前已经从圣迭戈乘四艘缓慢的运输舰出发了。运输舰队由第17特混舰队护航，该舰队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中心，由弗莱彻将军指挥，刚刚从大西洋到达。哈尔西和第8特混舰队将向南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反潜警戒，直到运输舰队安全到达目的地。“企业号”将与“约克城号”会合，然后向西北方向航行，前往马绍尔群岛。它们将偷偷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全速开往日军基地。“企业号”将攻击马绍尔群岛中心的夸贾林环礁、马洛埃拉普环礁和沃杰环礁，而“约克城号”向南进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南部的马金环礁、米利环礁和贾卢伊特环礁。

“企业号”停泊在珍珠港，船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燃料、淡水、补给和弹药搬到船上。流言像往常一样没完没了，虽然船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企业号”很快就会投入激烈的战斗。在如此紧的时间内大规模装载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装弹作战。”航空大队日志中的一条记录这样写道。[\[10\]](#)

1月11日上午，尼米兹和哈尔西从司令部一起走到码头，在舷梯下面握手。尼米兹说：“祝你好运，比尔！”[\[11\]](#)中午，航空母舰以及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警戒舰群起锚出航。到了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它们已经把巴伯斯角干燥且满是尘土的树林甩在身后，以超过25节的速度驶入大海。安全出海后，哈尔西向航空大队简要布置了任务，要求飞行员们在舰队抵达萨摩亚附近海面上的会合点后，向北“在吉尔伯特群岛或马绍尔群岛搞点乱子”。[\[12\]](#)此时哈尔西还没有向全体船员通告，但是大家已经能感觉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士气明显高涨起来。

向南朝赤道航行，每天都比前一天热一点，很快甲板以下就变得非常不舒服了。海平面在任何地方都是海平面，但在赤道处，海平面会稍微向外凸出一些，所以从北向南穿过赤道，就得先爬过一座“水山”。“企业号”的内部是通过舱口连接的金属走廊组成的迷宫般的地方，亮着刺眼的顶灯，到处排列着电缆、风道和管道。在1941年12月7

日之前，大部分的内部空间都被漆成了白色或灰色，但是日本的突袭让人们意识到油漆易燃，于是工作人员又用铁刮刀将油漆一块一块地刮掉，整个工作单调乏味。他们撕开亚麻油地毡，将下面的钢板刮得非常光滑。他们在酷热难耐、通风不良的环境中干活——更糟糕的是战争期间要求水密门和舱门都紧紧关闭——因此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制服。他们发现不如干脆脱掉制服，穿着内衣干活。这项工作十分艰苦，让人心烦，无人感激，有人说这是“地狱中的工作”。^[13]飞行员在白天巡逻的时候，会把舱盖打开让自己凉爽一些，但即使是外面吹来的风都热到让人难忍的地步。飞过暴风雨区时，他们心里会充满感激之情，把脖子伸到挡风玻璃外边，让上天赐予的凉水浇到自己的身上和飞机上——然而这种冒险也会增加迷失航向的风险。

意外事故和导航失误经常出现。第6侦察机中队的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差点击落一架水上飞机，后来发现这架飞机属于新西兰。^[14]1942年1月13日，同一个中队的另一位飞行员打破了无线电静默，不仅违反了命令，而且还使整个特混舰队处于危险之中。1月16日，一架俯冲轰炸机在“企业号”上降落时撞断了阻拦索，冲出甲板，撞进了舷边通道，使一位军士长严重受伤。那天晚些时候，第6鱼雷机中队的一架轰炸机迫降到海上，机组人员借助一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泊，结果这一漂就是24天。后来他们被冲到了750英里外的一座岛上，在烈日的炙烤下饥肠辘辘。执行巡逻任务的飞行员有时会在阴云中迷失，远远偏离航向。有一次，“企业号”不得不打破无线电静默，好把一架迷失航向的飞机引回来，这一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使得哈尔西和参谋大发雷霆。

飞行员人手不足。虽然会有飞行员从美国本土赶来，但是直到4月或5月才能到。在1940年至1941年舰队规模猛增的时期，许多新的飞行员进入了航空大队。在这次巡航中，“企业号”上有些飞行员会首次在航母上降落。新手还在学习如何攻击。一切都要学习、练习并加以临场发挥。随着练习的增加，他们的水平不断提高，但这是战争，而战争是一

所不允许出错的学校。缺乏经验的飞行员犯了太多的错误。他们必须提高技术，而且要尽快提高。

负责警戒的舰艇也被事故和霉运困扰。一名水手从“布卢号”驱逐舰上坠海失踪。“盐湖城号”巡洋舰上的一名士兵在炮塔上被挤死。整个特混舰队的防空射击训练的效果一点也无法让人振奋。即使是经过了战争准备阶段艰苦的训练之后，对于如何在海上的实战情形下操作，航母群仍然有许多要学的。他们发现所有的方面都有欠缺，需要更多的训练，更多的射击演习，更多的高射炮（每一种口径都要），更多的弹药，更多的补给，以及更多的备件。^[15]0.50英寸的弹药极度缺乏，飞机装载的某些弹药也储量不足。在这次巡航中，他们切实面临着鱼雷用完的危险。无论是岛上还是重型巡洋舰上，都没有足够的水上飞机来执行侦察。目前，航空母舰上尚有足够的飞机，但备用飞机很少，一旦损失就很难补充。他们还急需更好的通信技术：更好的无线电、更好的雷达、新的信标和导航设备，而且所有人都认为急需新兴的敌我识别（IFF）技术，以帮助炮手辨认美国飞机，从而避免向友军射击。

在萨摩亚北部，“企业号”向西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空中搜索，与此同时，5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帕果帕果安全上岸。飞行甲板上的士兵可以看到英属萨摩亚群岛上的青山。“企业号”航空母舰先在东边，然后在西边停靠了五天，等待姊妹舰“约克城号”。它们于1月23日会合，两天后，舰队向西北方进发，驶向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另一侧约1 600英里远的马绍尔群岛。“约克城号”舰群在哈尔西和“企业号”舰群后面大约150英里处航行，计划抄近道直接往南，对马绍尔群岛南部的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发动袭击。

1月的最后几天天气晴朗，特混舰队在浅蓝色天空下前行，下方的海浪轻轻涌动。但是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时，风力逐渐加大。当时记者罗伯特·凯西站在“盐湖城号”的甲板上，看到了一幅“极度夸张的”景象——“灰蓝色的海洋，处处是白灰色的波峰——灰色的天空布满乌云，天顶几乎是黑色的，地平线上的天空则在落日的反射下显露出淡紫

色”。特混舰队保持着圆形队形，航空母舰总是位于中心。从“企业号”的飞行甲板上，人们可以看到警戒舰船在各个方向上散布在地平线附近。航空母舰的两边各有两艘重型巡洋舰奋力前进，外圈的驱逐舰在海上颠簸着破浪前行。在凯西看来，地平线上的舰船就像“剪影”一般，“以天空为背景的灰色亚光剪影一动不动，只有环绕在船头的巨大白色海浪表明它们正在移动。我们划开波涛，周围是高高的、滋滋作响的泡沫”。[\[16\]](#)

他们以“之”字形前行，以应对敌军的潜艇，但这要求大规模编队统一行动，很容易失误。有一艘巡洋舰转弯不及，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船长就通过哈尔西将军的闪光信号灯收到一条带有讥笑意味的信息：“如果方便的话，我建议你回到你应在的位置，好吗？”不久之后，他收到了另一条信息：“你的舰上有没有能够准确判断6000码内距离的军官？”[\[17\]](#)

1月28日，特混舰队通过“普拉特号”油轮加油。巡洋舰和驱逐舰在白天完成了加油，但是“企业号”由于夜幕降临，晚上8点之前一直没能调整好与油轮并排行驶。海上加油一直是早期航空母舰操作的烦恼，而哈尔西坚持让“企业号”当晚加完油。即使在白昼，加油也很困难，特别是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因为舰船有随时相撞的危险。这是航空母舰第一次在晚上加油。这是对两艘舰艇的船员航海技术的终极考验。两艘舰上都没有灯光，加油工作必须在黑暗中完成。

航母和油轮在接近平行的航道上彼此靠近，相距大约不足70英尺。两艘船以完全相同的10节的速度同时行进。转向和油门控制必须完全遵从船长的命令。引缆绳被抛过来，接住，然后系牢。船员不得不快速工作，完全一致。连接软管的人员一直有掉入两船之间的危险，因此安排了驱逐舰在后面随时准备营救他们。引缆绳和软管必须在水手长下令时立刻抛下，其他人则手拿斧子，准备在必要时将它们砍断，以便随时驶离油轮。加油时显然不能被敌军发现。如果加油时敌人的轰炸机出现在头顶，有大量的燃油在甲板上，问题就大了。“企业号”在凌晨1时30分

完成了这一艰巨的行动。加油似乎总是结束不了，就连凯西都等得不耐烦了。他沮丧地写道：“昨天夜里有人说，现在的备战时间和1812年时一样漫长。”[\[18\]](#)

舰艇能够捕捉到来自珍珠港的加密无线电信息。尼米兹由于获得了新的无线电情报，敦促哈尔西加快速度，对马绍尔群岛发动打击。1月27日，总司令向哈尔西发出了一系列新命令，授权他扩大打击面积，延长打击时间。尼米兹要求袭击必须“直中要害”，对主要目标进行多轮空袭，必要时通过舰炮还击。哈尔西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主张采用更冒险的攻击计划，让整个航母战斗群向西直插群岛中心地带，袭击马绍尔群岛最大的基地夸贾林环礁。这个计划有很大风险：美国舰队将会处在空中反击的范围以内。哈尔西赌美国轰炸机的首轮攻击会实现完全出人意料的突袭，批准了该计划。他在表示许可时说：“这一计划如果成功了，就可以说是一项‘聪明’的计划；而一旦失败，就是‘蛮干’。”[\[19\]](#)“企业号”上的飞行员兴奋异常。“这一次不是打完就跑，而是要进行一整天的长时间攻击，”一个飞行员写道，“哈尔西将军决定让航空母舰开到距离两个日本大型航空基地二三十英里的地方。由于是近距离作战，我们的油量绝对够用。我们很喜欢这样。”[\[20\]](#)

1月31日，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企业号”的雷达捕捉到了一个光点。这是一架日本巡逻机，似乎是在美国军舰西方（船后）不到34英里的地方飞行，但它没有发现目标，也没有发出无线电信息。哈尔西看着光点在屏幕上划过。虽然日军飞行员并没有看到舰队，哈尔西还是特别担心敌人发现特混舰队的航行痕迹。但是美军没有在日军的无线电频段截获报告。光点划过雷达屏幕，向南逐渐消失。随着侦察机越来越远，特混舰队这一次显然是很幸运。海军陆战队上尉小班克森·T. 霍尔库姆是从珍珠港密码破解分队派来的一名日语军官，他截获了日本的一个巡逻机飞行员发送的信息（可能是航空母舰上的雷达侦察到的同一个人）。这架飞机已经到达了巡逻路线的尽头，飞行员“没有消息汇报”。[\[21\]](#)

哈尔西说：“那个胆小鬼刚才满脑子想着鱼和米饭。”他让霍尔库姆准备一份日文传单，在第二天投放到岛上：“非常高兴，感谢你们的巡逻飞机没有发现我的部队。”[\[22\]](#)

1月31日下午6时30分，特混舰队分开前进——斯普鲁恩斯的巡洋舰队向南方航行，去轰炸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企业号”和3艘驱逐舰向北行驶，对夸贾林环礁以及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进行攻击。尼米兹发来了一条无线电信息：“攻击务必直捣敌人心脏。在战况有利和后勤保障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扩大作战行动，让两个特混舰队反复空袭和炮击，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如果切实可行，攻击行动可以超过一天。”[\[23\]](#)

最后一晚，舰队以30节的速度全速前进，迅速进入战场。发动机轰鸣，船身颤动。“企业号”四个巨大的螺旋桨深入大海，转速达到每分钟275转。整支舰队里都弥漫着战前的担心和激动。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甲板下方非常热，所有人的床单都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翻来覆去，直到破晓。“盐湖城号”舰长将军官们召集到军官室检查第二天的时间安排——凌晨3时45分吹起床号，4时15分吃早餐，5时15分进入一级战备状态，6时15分进入战斗，那时刚好破晓。在战斗的问题上，舰长和军官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极其关注细节——“军舰的部署、目标的特性、开火的速度、侦察过程、侦察飞机报告的频率、食物、水、厕所、弹药分配、通风、炸弹、深水炸弹、飞机燃料”。这艘舰上没有任何人有实战经验，他们却泰然自若，这给罗伯特·凯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舰长兴致很高，做事有条不紊。军官们严肃认真，全神贯注，但是并不激动，对于战斗的兴奋程度还比不上参加一场有希望达成目标的竞赛。”[\[24\]](#)

“企业号”飞行员英勇果敢，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对于将要轰炸的群岛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这些是日本的“神秘岛屿”，美国舰队甚至没有它们的准确地图。美国人用的是古老的粗略航海图放大后的副本，其中许多图是早在1838年到1842年间查尔斯·威尔克斯尉官进行“美国探险远征”时绘制的。[\[25\]](#)他们在为任务做准备时一直带着不祥之

感。

让那种不安和担心得以缓解的是强烈的复仇渴望。飞行员想要为珍珠港和威克岛报仇，凯西写道，他们“似乎觉得个人有责任一雪前耻，证明美军的实力”。在战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谈论飞行和空战、日本飞机的优缺点，不断地将头脑中那些可能有用的知识梳理出来，好在战斗来临时让它们派上用场。^[26]他们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低估了日本的飞行员，但现在，七八个星期后，那一切都成了过去。战前的时代似乎已经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了。阿尔文·柯南回忆说，对于骄傲的海军官兵而言，虽然承认这一点比较艰难，但他们现在逐渐明白了：“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好的海军：更好的飞机、更训练有素的人员、更好的夜间训练，以及到目前为止更好的鱼雷。”^[27]这个事实难以让人接受，但奇怪的是，它也提高了士气，因为它让舰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坚定地意识到，他必须做好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来提高整个海军的作战能力。

直到开战的前夜，“企业号”的飞行员和船员才获知，攻击夸贾林环礁的时候没有战斗机护航。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航空母舰上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来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并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机飞行员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震惊。轰炸机飞行员克拉伦斯·迪金森写道：“没有战斗机！突袭时你希望能有战斗机护航。无论它们能否帮上忙，知道有它们与你同行，在心理上就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你知道有战斗机保护，你会更急切地飞向目标。毕竟，最重要的是投下炸弹，而不是与零式战斗机进行空战。”那天晚上，甲板和舱口仅开着小蓝灯，投下的光线只够用来引导眼睛已经适应黑暗的士兵的脚步。正是在这个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刻，人们才感到自己与舰艇紧密联系在一起。迪金森写道：“无论当时多么可怕，你都能打心底里产生一种踏实的感觉，并且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强大整体的一部分。这里有上千甚至更多的人，有大炮、弹药库、可以支撑一个城市的发电厂、机械库、床和厨房；所有这一切都紧密地组织在一个巨大的钢铁舰体内，这是你的星球。”^[28]

这是属于哈尔西的时刻。战争的头几个星期对他来说非常令人沮

丧，在战争开始的前48小时内，他一直在寻找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但毫无结果。他无法入睡，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喝咖啡，或者读平装小说。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一直醒着，时不时地起身回到旗舰指挥室。凌晨2时20分，在外边的司令舰桥上，他感觉到沙子吹打到脸上。这可能表明已经接近岛屿，所以他立刻下令检查所在的位置。有关这片水域的航海图资料很少，有搁浅的危险。事后证明，哈尔西将军感觉到的不是沙子，而是从雷达平台上掉下来的砂糖，当时有一个水手正在那里往咖啡里放糖。哈尔西回到了船舱。他此刻没什么好做的。骰子已经掷出，只能等待结果。到那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或是要庆祝此次战争中的首场重大胜利，或是“企业号”沉入了海底。在下面的机库甲板上，军械员正将炸弹挂在攻击机的机翼和腹部下面。他们的工作紧张而复杂。武器从下面的弹药库里被小心翼翼地吊起，用手推车推过甲板，然后锁扣在飞机底部的装弹架上。引信要插入炸弹，并连接到解除保险的插座上。其间不能出任何差错。所有一切都要反复检查。

起床号凌晨3点响起，此时距后方的地平线上露出第一缕曙光还有很长时间。飞行员前往大型军官室吃早餐。他们坐在长桌子边上，身穿相同的卡其布制服，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吃了丰盛的早餐，其中有鸡蛋、腌肉、烤面包和罐装果汁。他们大多在21岁到24岁之间。迪金森记录了他们不同的气质：“许多人沉默不语，陷入深思；有几个人兴奋地唠叨着，但不怎么提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我没听到有谁提起此刻心里在想什么。这些年轻飞行员的举止好像表明，此时不该谈论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后来，他们进入了待命室，按中队分开。在那里，飞行员会得到指示，彼此之间可以自由交谈。大多数人几乎没有睡觉，靠肾上腺素和咖啡保持精力。但是他们的思想非常集中，而且非常注意细节。每个待命室里都有一位文书军士通过电话收听报告，然后把信息传递给飞行员。飞行员会修改导航图，校正航空母舰的位置、航线和速度等数据，并进一步根据风向和风力进行微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来，他们知道这一点。“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灵魂，告诉自己如何在战斗中表现，”迪金森写道，“没有人能提前知道谁会活下来。”[\[29\]](#)

关键时刻到了。文书军士传来上级的命令：“飞行员，上飞机！”飞行员们走出待命室，来到飞机甲板上。他们将护目镜推到额头上，腰带和肩带上挂满了工具，降落伞则在屁股后面晃悠。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顺着舰船散开的尾流望去，一轮满月挂在西方的地平线上。舱面船员引导各个飞行员穿过船尾迷宫一样的机群来到自己的飞机前，然后站在一旁注视飞行员爬上机翼进入驾驶舱，扣紧肩带，踩上踏板。甲板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命令：“发动！”

点火之后，发动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轰鸣声中转动起来；排气装置喷出的蓝色烟雾迅速被风吹走，向船后飘去；螺旋桨旋转、静止、再次旋转，然后迅速变成模糊的轮盘。机械员侧头听着发动机的声音，满意后就发出信号；飞行员把节流阀往前一下子推到底，同时脚底死死踩住刹车。准许起飞之后（凌晨4时43分），第一个飞行员松开了刹车，飞机向前猛地一倾，沿着柚木甲板冲了出去。逆风加速的飞行员平衡了一下方向舵踏板，在跑道两侧遮罩黄灯的指引下，保持在跑道的中心。航空母舰上层结构在月光中的影子从他右边闪过。在飞机马上就要跌入翻滚的大海之前，机头抬高，起落架离开了甲板。他升空了。

首先进入空中的是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任务是战斗空中巡逻。紧随其后的是两支空袭队，朝着最远的目标夸贾林巨型环礁进发，那里位于航母西方大约155英里处。37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将会袭击环礁北端的罗伊岛上的航空基地，而9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是停泊在夸贾林环礁南端附近的潟湖中的军舰。升空后，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立刻集结成环形编队，努力以有序的队形朝目标飞行。起飞不是什么大问题（尽管装满了炸弹和燃料），但是在夜晚结队飞行对飞行员来说比较生疏，有一定的危险。每隔15秒钟就有一架飞机升空。每个飞行员都必须跟着前面的飞机，眼睛紧盯着前面飞机的白色尾灯，在星光下这个白色尾灯很容易跟丢。如果飞行员的视力很好，而且足够走运，他还可能会分辨出机身两侧排气孔外的两团微弱的蓝色火焰。同时他还要保持速度稳定，以便让身后的飞行员跟上。

在高空中，整个编队里的飞机都在盘旋寻找自己的指定位置；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交织在一起，没有撞上简直是太幸运了。两个飞往夸贾林环礁的攻击队伍设法排成了队形，向目标飞去，没有损失。然而一个小时之后，当一群载有100磅炸弹的野猫式战斗机起飞前往更近的目标马洛埃拉普环礁时，有一架飞机落入大海，飞行员也掉进海中。

夸贾林环礁攻击队向西爬升，一轮满月挂在飞机引擎罩上面，几乎就位于挡风玻璃的正中间。飞机到达1.4万英尺的高度后，组成了平飞队形——两个V形编队紧紧相扣，在高空中稍稍呈阶梯状——月光很亮，机组人员可以用眼神交流并用手势传递信号。在他们下方舒展的积云好像轻柔的毯子，通过云间的缝隙，他们能看到月光映照的海面，偶尔还会看到海浪拍打着沙滩。他们现在已经进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看到了很多岛屿。率领机群的飞行员仔细查看这些岛屿的海岸线，试着将它们与自己大腿上放的19世纪绘制的粗略地图相匹配。凭借着猜测和航位推算法，他们提前15分钟到达了环礁北部，此时黎明刚刚来临，但是早晨的薄雾遮住了罗伊岛。起初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无法辨认出指定的目标。他们盘旋着，伸长脖子，在下方寻找任何类似珊瑚礁铺成的飞机跑道的东西。发动机的嗡嗡声惊动了日本守军，他们匆匆跑向高射炮，爬上战斗机。此时已经做不到偷袭了。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罗伊岛上的机场和机库。第6侦察机中队的霍尔斯特德·L. 霍平（Halstead L. Hopping）少校调整机头，开始俯冲。他带领的第一分队其他成员紧随其后。他们打算进行滑翔轰炸，攻击角度为45度，因为这样他们在到达目标上空时可以保持一定的高度，继续俯冲一段，加速飞过敌人的防空炮火。霍平显然在到达机场上空之前降落的高度太多，因此飞过来的时候较低且较慢，飞行速度可能不足200节。他投下了500磅重的炸弹，这是开战以来美国的第一枚投放在日本领土上的炸弹，然而一架中岛九七式战斗机瞄准了他的飞机尾部并用曳光弹击中了他，同时他的飞机受到近距离爆炸的高射炮弹的冲击，解体并落入了潟湖。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第一分队在敌军高射炮和战斗机

的反击中又损失了三架飞机，但它们也非常精准地击中了地面上的目标。几栋建筑被摧毁，两三架日本战斗机被击落。

第二分队投下的炸弹落在了机库和飞机跑道之间。他们接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霍平的分队，大约为300节——尽管日本的炮手现在已经完全清醒而且在等着他们，但是他们能够飞过高射炮的弹幕，来回躲闪两边爆炸的高射炮弹。往下望去，他们看见日本战斗机在跑道上加速，离地升空。迪金森上尉俯冲到机场上空，高度非常低，向跑道附近的一片建筑群投下了两枚100磅重的炸弹。他的僚机飞行员诺曼·韦斯特上尉投下的一枚炸弹击中了军火库，引发了二次爆炸，将附近的所有建筑都夷为了平地。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了数千英尺的高空。迪金森猛拉操纵杆，让飞机偏转，趁机回头查看结果。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壮观的一次焰火表演。……整个岛上都出现了盛大的焰火。巨大的白色和粉红色条纹形状的焰火尽情地绽放，每个只有一瞬间。然而这不重要，因为在巨大的蓝色闪光中，每一次飞机俯冲下来，都有两颗、两颗又两颗炸弹爆炸”。^[30]投下炸弹之后，无畏式轰炸机立即掉过头来，再次飞到机场上方，进行低空扫射。“古怪的暗红色斜线落雨般”将一排停放的飞机切成条状，击倒了奔跑着穿过机场的人。迪金森看见一个人在连接那慕尔岛和罗伊岛的堤道上骑自行车：他可能是一名飞行员，试图赶到一架日本飞机那里。一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俯冲到堤道的上空向他扫射。迪金森写道：“也许在自行车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辆自行车能比那一辆自行车更为疯狂。他想在美国的子弹像鞭子一样打过来之前骑过栈桥。但是随即他像青蛙一样纵身一跃，跳进了水里，逃离了这场竞赛。”^[31]

已经完成投弹的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掉头撤离。日本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紧追不舍，这些战斗机现在大多飞到了他们上方，伺机从侧方发动攻击。飞行员将节流阀推到了底。机尾的炮手朝追击的日本战斗机开炮，将它们打跑。这些战斗机不是可怕的零式战斗机，而是较老、较慢、机动性较差的中岛Ki-27九七式战斗机（盟军代号为“奈特”）。至少有一

架日本飞机被机尾射手击落。

美国飞行员报告时称对罗伊岛的袭击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击落三架战斗机，炸毁七架轰炸机、两个机库、一个油罐、一个弹药库、一座无线电台站。美军损失了四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所有机组人员全部丧生。

与此同时，鱼雷轰炸机在南方44英里的地方攻击了停靠在夸贾林环礁附近的舰船。到达泊地时，尤金·林赛少校通过无线电报告说在夸贾林环礁有“合适的目标”。正在罗伊岛上空盘旋的航空队指挥官霍华德·L. 杨向几架只投下了较小的翼挂炸弹、还留着500磅炸弹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传递了这份报告，命令它们向南与泊地上空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会合。^[32]“企业号”收到了杨的消息，于是哈尔西命令预备队中的9架鱼雷机也立即升空。

无畏式轰炸机向南飞越巨大的潟湖的过程比较缓慢，因为它们在罗伊岛降低了高度，现在需要重新爬升才能抵达适当的攻击位置。飞行员们很快就看到了环礁中巨大的泊地，这片环礁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平整的大海滩，绣着花边一样的海浪，而且到处都点缀着绿色”。^[33]约有20艘日本舰船停泊在那里，包括两艘重型巡洋舰和三四艘潜艇。鱼雷轰炸机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几艘军舰冒出了一股股的黑烟，而其他舰船明显倾斜了。所有舰船的防空武器都开始开火，炮弹的痕迹交织成复杂的几何形状，向天上的美国飞机延伸。但环礁的这一侧没有日军战斗机，高射炮的准确性也很差。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70度的角度俯冲攻击，大量高射炮弹在其周围开花，但没有飞机被击落。炸弹在舰船的周围爆炸，在甲板附近激起了高高的水柱。大约一个小时候，9架鱼雷轰炸机的预备队赶到了，它们低空飞行，径直穿过基本没有效果的防空炮火，朝两艘油轮和一艘已被击中的由1.7万吨远洋客轮改装的舰船发射了鱼雷。一艘巡洋舰试图朝外海逃跑，但被两枚鱼雷击中，停下不动了。另外也有几艘舰艇被鱼雷击中。这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在攻击之后严重高估了它们在

夸贾林环礁潟湖对日军舰只造成的破坏，但成绩仍然不错。袭击者击沉了一艘6 500吨的运输舰和一艘猎潜艇，击伤了9艘军舰，其中包括轻型巡洋舰“香取号”。当地的海岸支援设施非常有限，所以这些损伤不容易修复。18架飞机遭到破坏或被击毁。这次袭击还打死了大约90个日本兵，其中包括马绍尔群岛的指挥官海军少将八代祐吉。

投放完炸弹和鱼雷之后，无畏式轰炸机和“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向东转弯，开始了返回航空母舰的长途飞行。它们燃料充足，而且身后没有敌机追赶。太阳已经高悬于地平线之上，满天乌云也开始散开。当导航仪表盘表明航母近在眼前时，他们朝下看向海面，立即就发现了“企业号”的长方形甲板。它们有序地依次进场，上午9点刚过就安全降落了，没遇到什么困难。

每个飞行员从飞机上爬下来，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中队其他伙伴的状况。哪架飞机没有返回？中队待命室里哪些椅子会变成空的？他们极度饥饿、疲倦，头发凌乱，飞行服上沾满了汗水。他们走下甲板，进入军官室，从托盘中拿起三明治。飞行员们吃得很快，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接到命令重新升空。舱面船员和军械员正忙着给飞机加油和重新装弹。当天的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更多的攻击需要执行，而且未被摧毁的日本飞机随时可能发现“企业号”并对其发动袭击。哈尔西后来说：“这些年轻飞行员的行为就像是在玩橄榄球。他们玩儿命打了一仗，然后短暂休息一下，重新投入战斗。”^[34]

马洛埃拉普环礁附近的沃杰环礁和塔罗亚岛上空的战斗机上的实时无线电通信接入了航空中队的待命室，飞行员们用专业的耳朵认真听着连续不断的声音。迪金森上尉回忆说：“在混乱的作战噪声的背景中，我可以听到发动攻击的飞机上传来的声音。你可以辨认出大队长划分攻击区域时的声音，然后辨别出中队长分配目标的声音。……我们会不时听到兴奋的声音甚至欢呼声，那是有人击中目标了。”^[35]这不仅仅是肾上腺素带来的空中战斗的兴奋感，更是珍珠港事件过去将近两个月后，终于与敌人交战时所释放出来的压抑已久的紧张情绪。“打中

了！……打中了！……我打中了一架！……往右让一下。……那个家伙是我的。……去攻击那艘向右边跑的巡洋舰！……打死它们，伙计们，打死它们！……我的弹药打光了。……谁那里还有足够的燃油和弹药？……布鲁有。……好，我过去。……我去把那家伙收拾了。……长官，咱们把那个浑蛋击落了吧？”^[36]

发动这些攻击的是第6战斗机中队的12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这些战斗机被临时用作了短程轰炸机，每个机翼下都挂载了100磅重的炸弹。^[37]其中6架飞机由该中队的队长韦德·麦克拉斯基少校指挥，前去攻击沃杰环礁；另外6架飞机由詹姆斯·格雷上尉指挥，被派往南部袭击塔罗亚岛。沃杰环礁在“企业号”以南不到30英里处，从这个距离，航母甲板上的人可以看到遇袭的机场上起的烟雾，黑色的高射炮弹，甚至能看到银色亮点般的飞机。

麦克拉斯基的分队短距离飞行后到达目标，此时他们已经爬升到1万英尺的高度，开始高速朝下方的沃杰环礁俯冲袭击。他们的第一批100磅炸弹的目标是用珊瑚碎渣铺成的小型飞机跑道边上的一群支援建筑物。第一轮空袭时下面的基地非常安静，但是当他们转过头扫射时，岛上的炮台和潟湖的军舰上的防空炮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不过没有战斗机反击，这些野猫式战斗机一架也没损失。麦克拉斯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评估效果，数了数有几座燃烧的建筑物，然后返回了航空母舰。

有三艘军舰正按计划全速从东边赶来，包括斯普鲁恩斯将军指挥的“北安普敦号”和“盐湖城号”巡洋舰，以及“邓拉普号”驱逐舰。这三艘军舰组成了战斗队形，于早上7时15分对停泊在沃杰环礁潟湖中的两艘商船开了火。本来这次攻击很有希望击沉对方，但是战斗中有士兵发现附近出现了潜望镜，于是斯普鲁恩斯下令立即改变航线。潟湖中的日本船只连忙起锚逃跑了。“然后我们掉转方向，沿着环礁寻找目标和机场。”斯普鲁恩斯后来写道。日本的岸炮开火了，炮弹在美国舰船周围激起水柱。“很快，飞溅的水花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船体周围满是水柱。”^[38]这场火炮的对决是斯普鲁恩斯的第一次作战经历，这位沉着

冷静的将军站在舰桥上观察敌人炮弹的降落地点，当参谋们纷纷低头寻找掩护时，他都没有退缩。他的巡洋舰对岸上的目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使沃杰环礁上的一些建筑物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瞭望员不断报告说在每一侧都看到了潜望镜（所有这些目视的发现都可能是错误的），于是舰船紧急调整航向，干扰了炮兵的准确性。斯普鲁恩斯持续攻击了接近三个小时，手下的舰船没有任何损伤。将近上午十点钟时，他命令自己的小型中队脱离战斗，向东进发，根据安排和“企业号”会合。

格雷上尉的分队被派往南方寻找马洛埃拉普环礁南端神秘的塔罗亚岛，他们起先攻击错了目标。在1.5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将无人居住的特坚岛误认作了塔罗亚岛。格雷上尉及其僚机飞行员威尔默·拉维中尉低空俯冲，各自将机翼上携带的两枚炸弹中的一枚，投到了无辜的狭窄海滩和一小丛棕榈树上。意识到错误之后，他们重新爬升到5 000英尺的高度，带领6架野猫式战斗机继续向东南方飞行。当塔罗亚岛进入视线时，这下不会有错了：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航空基地，比他们根据情报所预料的要坚固得多。这里有两条长长的珊瑚碎渣铺成的跑道，其中一条长度超过一英里，还有6座大型机库和支援建筑物。几架G3M双引擎中型轰炸机（盟军代号“内尔”）停在跑道上。托马斯·M. 肖克上校指挥的军舰被派来从海上炮击该岛，此时他的舰船已经被海岸警戒哨看到，目前整个基地就像是大黄蜂的巢穴一样骚动不安。

有三架日本战斗机在野猫式战斗机到来之前便升空了，它们要拦截入侵者。^[39]格雷降低机头，带领由临时改装的轰炸机组成的中型中队俯冲攻击跑道上停放的G3M轰炸机。他知道，这些轰炸机会对北边100英里外的“企业号”构成切实的威胁——如果它们装载好了弹药，加上油起飞，可以很容易地赶上这艘航母并将它击沉。最好趁它们还在地面上就消灭掉。野猫式战斗机俯冲得很低，对轰炸机进行了扫射，但是飞机上没有装载最适合这种目的的燃烧弹，而且它们的0.50英寸机枪总是卡壳。有6枚100磅重的炸弹落到了跑道上，在珊瑚碎渣上炸出了一个个弹

坑。

日本的战斗机——并非零式战斗机，而是上一代的A5M4型九六式战斗机（盟军代号“克劳德”）——进行了疯狂的追击。拉维中尉绕到其中一架战斗机的下面，近距离开火，把这架战斗机的机腹撕开了。“切斯特号”上的士兵目击了日本战斗机坠落的场景，发出一片欢呼：“像斑点一样的飞机神奇地变成了一个火球，栽进棕榈树中，在空中留下一道高温的红色痕迹。”这是美国海军战斗机飞行员自战争开始以来首次击落敌机。拉维继续战斗，猛地向左转弯，返回来向另一架日本飞机迎面冲过去。此时，两名飞行员的航线正对着对方，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准备躲闪的迹象。拉维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近敌机，我错过了机会，操作杆推得太深，机身下部撞上了日机机翼。”在这次擦边的相撞中，两架飞机都受损了，但是坚固的格鲁曼飞机仍能正常飞行，而更轻也更脆弱的三菱飞机被迫转弯返回跑道并紧急着陆。[\[40\]](#)那时，第三架日本战斗机追上了拉维。拉维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炮弹向他射来，于是把节流阀推到底，在潟湖上空急转弯进入了云层。他安全地返回了“企业号”。

哈尔西攻击马绍尔群岛，1942年2月1日



日本的地勤人员始终勇敢地作战，把战斗机和轰炸机推到起飞位置；上方的激战未完，又有敌机从跑道上空了。几架日本飞机从岛上飞出来攻击“切斯特号”和岸边两艘护航的驱逐舰，这三艘军舰已经持续炮击岛上的航空基地25分钟了，在跑道上炸出来多个大坑，还让一些建筑物燃烧起来。“切斯特号”急忙躲避空中的打击，但它没能逃过一架从8 000英尺高度俯冲而下的九六式战斗机的攻击，这架战斗机投下的一颗30千克的炸弹在它的甲板上炸出来一个洞，造成8名船员丧生。它仍

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动力以正常速度航行，不过肖克上校向它发出信号，示意它向东撤退。

由于机枪反复卡壳，野猫式战斗机的飞行员们沮丧得几乎流下眼泪，不过他们都安全返回了。格雷驾驶的飞机是附近留到最后的美国飞机，他不断地摆动俯冲，才甩开一群复仇心切的日本战斗机。他的飞机被严重打伤，但是他飞进了低垂的云层中，摆脱了追击者。当他在“企业号”上面降落时，对于这架满是弹眼的飞机竟然能成功返航，舱面船员都非常惊奇。“企业号”上的补给军官认为它“看起来就像在阁楼中让蛾子咬了一个夏天的衣物”。^[41]前一天才临时配备的装甲此时被打得到处是伤痕，很可能还救了格雷一命。^[42]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表明，尽管有人批评F4F野猫式战斗机性能欠佳，但它可以抵御重创。

美国飞行员报告说，塔罗亚岛上的G3M双引擎轰炸机中只有1架（总共有9架）在地面上被击中起火。哈尔西希望击毁所有的轰炸机：必须再次袭击该基地。哈尔西将军命令从夸贾林环礁返回的无畏式轰炸机进行第二轮攻击。本轮攻击由第6轰炸机中队队长比尔·霍林斯沃思少校指挥。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机腹上携带的500磅炸弹无须直接击中停放的轰炸机，只需在近处爆炸，就足以彻底破坏这些飞机。日本的战斗机都降落了，显然是需要补充燃料并且重新装弹。“企业号”的战后报告中写道：“这一轮攻击没有遇到空中反击，但是防空火力很猛烈。这次袭击确认摧毁的有一个油罐、两座飞机库、一个无线电台站、四五架双引擎轰炸机和数架战斗机。”美国没有损失一架飞机。理查德·贝斯特上尉指挥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第三轮轰炸造成了更多的破坏。一套无线电设备和几个油罐被点燃，一座新砌成的石制行政建筑被炸成瓦砾。^[43]上午11时22分，第四支攻击队伍从“企业号”上起飞，这一次目标是沃杰环礁，出动的飞机为8架无畏式轰炸机和9架“蹂躏者”鱼雷轰炸机，指挥官是霍华德·杨。午后不久，他们到达沃杰环礁上空，发现没有战斗机拦截，于是从容不迫地轰炸了机场设施、建筑物和港湾中的船只。

“企业号”从黎明之前就是一片繁忙的景象，飞行甲板上不断有飞机起落。原计划是进行一次迅速打击然后立即撤离的突袭，结果突袭变成了连续9小时的穿梭轰炸行动，返回的飞机降落、加油、重新装弹，然后回到天空，重访敌人的基地。“企业号”还一直让F4F战斗机在自己上方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上午有一段时间，它的每一架舰载机都在空中。从始至终，它一直待在马绍尔群岛北部的一个5英里×25英里的矩形区域内。它已经重创马绍尔群岛各处的日本航空基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舱面船员既热又累，蓝色的钱布雷绸衬衫染上了汗水和油脂；他们兴趣盎然地听着舰上扬声器播放的飞行员通过无线电传来的声音。航空母舰上的人一直盯着飞回来的飞机，防空炮组在武器旁随时保持警惕。当绿色的信号在“企业号”原始的雷达屏幕上出现时，战斗机指挥官会判断其为身份不明的“可疑飞机”。他会用无线电跟巡逻的战斗机联系，引导其进行拦截。南部或西部的地平线上只要一出现亮点，野猫式战斗机就会飞过去观察一段时间，直到确认它们是自己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企业号”迎风而行，让发动机全速运转，将速度提高到几乎最大，以便飞机降落。在飞行甲板上，阻拦索被拉紧，防撞路障也已经摆好。甲板上的所有人都退到安全区域。

飞机进入着舰航线时，会先从右舷附近经过，接着绕过舰首，顺风飞向左舷，在舰尾进行最后一次转弯，刚好处于舰后尾流的上方。一名观察员会确认起落架、襟翼和尾钩全部落下来了。降落信号官会站在左舷船尾明显的位置，并将两根黄色的发光导航棒高举在头顶。在关键时刻，他或者在头顶挥舞两根导航棒——“复飞”，要求飞行员推动节流阀，从甲板上方飞过，然后重新进入着舰航线，以重新降落——或者将右手的指挥棒从脖子前划过——“停”，要求飞行员减速，让飞机降落到甲板上。飞机尾钩会钩住一根缆绳，让飞机在嘎嘎声中急速停下来。舱面船员冲过来从尾钩上取下缆绳；液压防撞路障收回到甲板内部；飞行员轻推一下节流阀，让飞机滑行通过路障。之后路障重新弹起来，阻拦索拉紧，甲板清空，等待下一架飞机进入着舰航线。军械员柯南写

道：“这是一项棘手且危险的工作。一切都取决于能否做得干净麻利。”[\[44\]](#)

哈尔西将军从司令舰桥上观察着，穿着皮夹克，头戴一顶有点过大的白色硬壳太阳帽。他热切地听着无线电传来的美军飞行员的通话，这些通话清晰地展示了这次行动的画面：“杰克，离那艘巡洋舰远点！它是我的！……打中了！……看哪，那个臭家伙着火了！”[\[45\]](#)他经常让中队长向他亲自汇报。在行动的间隙中，他有时会返回船舱，在那里抽根烟，或者试着读一部平装本小说，要不就是索性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在作战区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在这样的大白天，有好几个日本航空基地都能轻易够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么做有点得寸进尺，他也知道这一点。虽然驱逐舰高度警戒，但是“企业号”在附近逗留的时间越长，遭到潜艇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特混舰队就在沃杰环礁的附近，有时候甚至近到能看见岛上的空中行动。至今没有敌机接近，这令人感到惊讶。

是美军的空袭非常有效，日本人无法反击吗？还是说他们只是不知道“企业号”就在那里？当天下午1点，第6轰炸机中队的霍林斯沃思少校在完成个人的第三轮攻击后问：“将军，你不觉得咱们该离开这儿了吗？”哈尔西回答说：“我一直在想同样的事情。”[\[46\]](#)最后一队舰载机在下午1时22分降落在母舰上，整个特混舰队向东北掉头，全速撤离。

日本人的确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后来对这一天的袭击进行了痛苦的反省。事后回想时，他们意识到，此前他们已经发现了袭击的迹象。1月初的时候，I-23潜艇已经在海上看到了哈尔西的特混舰队，而且给马绍尔群岛的所有基地都发出了警报。在1月11日“萨拉托加号”遭到鱼雷袭击之后，他们得出结论，美国人会尽量保证剩余的航空母舰不受伤害；由于附近没有进一步的无线电侦听报告和目视发现，他们有点放松警惕。马绍尔群岛的对空防御交给了第二十四航空战队，由海军少将后藤英次指挥。当地航空队共有33架舰载战斗机，9架G3M中型轰炸机和9架水上飞机。他没有足够的飞机，也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无法在岛屿周

围实施持续不断的空中侦察。海军少将八代祐吉从夸贾林环礁上用石头砌成的司令部指挥马绍尔群岛的防空部队，在轰炸的前一夜他举行了一场宴会，款待参谋人员，显然他们喝多了清酒。第二天早上，他的指挥部被一颗500磅重的炸弹夷为平地，他被埋在了瓦砾下面。八代祐吉是第一个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的日本海军将领。

塔罗亚岛重整旗鼓，派五架未受损的G3M中型轰炸机从满是坑洼的跑道上起飞，向北寻找美国入侵者。攻击队伍在午时前后升空，由中井一雄（Kazuo Nakai）大尉指挥。他们在云层上方搜索了90分钟，毫无结果，但到了下午1时30分，通过积云的空隙，他们看到了疾驰而去的“企业号”。中井开始小角度俯冲，让飞机加速；他的四名同伴紧随其后，组成一个松散的“品”字形编队。在“企业号”的雷达屏幕上，他们显示为一群光点，战斗机指挥官命令正在巡逻的野猫式战斗机进行拦截。这一次，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敌机，因为美国的攻击机都已经着舰。四架野猫式战斗机在1万英尺的高度看到了敌机。那时候，日本轰炸机距离“企业号”只有15英里远，尽力隐藏在云层中。美国战斗机还没有进入适当的攻击位置，日本飞机就进入了警戒舰的防空火力的射程以内，F4F战斗机被迫（按军事原则）转向避开。

五架入侵的敌机在6 000英尺的高度从云层中飞下来，以250节的速度直奔“企业号”的右舷尾部飞去。^[47]连续不断的嘟嘟的刺耳紧急警报声在特混舰队中的每一艘舰上响起。迪金森回忆说：“铃声持续不断，那是电铃发出的一连串信号。即使聋子也能听见那刺耳的响声。”^[48]“企业号”上的高射炮开火了，“在待命室的钢墙内这种噪声听起来非常可怕，就好像处在雷鸣电闪的中心一样。每次大型防空炮发射时，舰身都在颤抖。小型炮发出噼噼啪啪的连射声，而炮火声留下的空隙被密集的机枪声填补上了”。在下层甲板上，阿尔文·柯南正和同伴给一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装鱼雷，他们听到那些5英寸大型防空炮在头顶开火，扬声器中传出声音：“所有人待命，击退敌方空袭。”“企业号”为了让敌方轰炸机找不准目标，猛地向右转，使甲板急

剧地向左舷倾斜，柯南正在装载的鱼雷从平滑的甲板上滚了过去。军械员在后面紧紧追赶，一下子扑在上面，把它固定在了一颗带环螺栓上。柯南说：“我真想离开那个鬼地方，但是我们不能把鱼雷和没有装进去但是仍然危险的炸药留在那里，因为它可能会滑脱，撞上舱壁爆炸。”^[49]

“企业号”及其护航舰艇的防空火力十分惊人，但基本没有效果：高射炮弹往往是在高速飞来的飞机身后爆炸。哈尔西哀叹道：“我们的防空炮跟喷水枪没什么两样。”^[50]“企业号”的舰长乔治·D.莫里认为防空炮缺乏效能是“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51]随着敌机越来越近，舷边通道上的1.1英寸舰炮开火了，柯南无法从机库甲板上看到日本飞机，但他知道，“当小口径火炮加入战斗，就该趴下身子隐蔽了”。^[52]

所有五架日本飞机继续沿着固定的轰炸轨迹冲锋。在3 000英尺的高度，它们的炸弹舱门打开，100千克重的炸弹在它们后面落下，形成一条斜线。莫里舰长看着那些精准投掷的炸弹变得越来越大，命令开足马力，使速度达到30节，而且向左急转。但他又下令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机动，要求向相反的方向打满舵：“这个操作对航母产生的作用，是减慢了向前的速度，同时舰体突然向一侧移动，偏离原先的航行线路。”^[53]“企业号”灵活地“斜行”或者叫“侧移”，躲过了炸弹。这些炸弹密集地落在它的右舷外面，有些距离不到10米。近失弹激起了60米高的水柱。罗伯特·凯西在附近的“盐湖城号”甲板上观望，他以为“企业号”已经炸飞了——炸弹激起的水柱完全挡住了航母。他写道：“但是当水落下，雾气散开，我们看到航空母舰躲开了。炸弹正好落在了飞机从云层中出来时航母所在的地方。但是炸弹落下来爆炸的时候，航母已经到了别的地方。”^[54]

其中一颗近失弹的弹片飞进了航空母舰的左舷，切断了一根汽油管，并在飞行甲板上引燃了大火。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音：“着火了！在飞行甲板上，舰尾。”^[55]一名高射炮手腿部被击中，伤势非常严

重，下肢几乎从大腿处被切断了。他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很快就因失血而阵亡。

轰炸机俯冲后重新拉高，在海面以上大约1 500英尺的时候，有一架飞机向左转弯，轰鸣着重新冲向“企业号”。那是队长中井大尉的飞机，他的飞机被击中了（可能是被高射炮弹的爆炸击中的，也可能是被战斗机击中的）。飞机的两个引擎的后面都喷出了浓烟，中井可能判断他的飞机已经严重受损，无法飞回到塔罗亚岛，于是下定决心要对这艘航母进行自杀式攻击。他从航母的后方接近，与己方飞机正常着舰时的进场方式一样。二等航空机械师布鲁诺·P.加伊多离开了左舷通道上的作战岗位，钻到了停泊在甲板上的一架俯冲轰炸机的座舱里。他抓起机枪，开始向飞来的G3M开火。莫里舰长知道中井的意图，下令向右急转弯。加伊多连续不断地射击，还站起身来压住机枪；一串子弹打入了这架大型轰炸机的机首和驾驶舱，当时它已进入近距离平射的射程内。中井大尉有可能已经被那一连串子弹打死了，因为在他进攻的最后阶段，飞机似乎并没有任何动作。滑行的G3M的机翼从飞行甲板的左侧划过，将一架停放在那里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撞成了两半，在甲板上落下了碎片和汽油。中井的飞机落入了海里。加伊多继续朝正在沉没的飞机射击，直到海水吞噬了它。

迪金森上尉和他中队的几名同僚从待命室出来观察结果。他们首先注意到，整个飞行甲板上都有浓烈的汽油味，看来有大量的汽油泼溅到了甲板上。消防队员身穿隔热垫制服，头戴方形头盔和矩形面罩，朝整个甲板喷消防泡沫，这是一种“像蛋清一样白的发泡的东西”。^[56]在司令舰桥上观察的哈尔西非常紧张——他告诉参谋：“我的双膝紧紧并在一起。”^[57]敌人的轰炸极为准确，而且即使没有击中，其落点也让人觉得近得可怕。哈尔西将军无疑同意莫里舰长的判断（在战后报告中所说的），“企业号”能够逃脱“只能说是非常神奇”。^[58]

“企业号”及其特混舰队开始重新高速撤离。舰队以30节的速度在海面上行进，在身后留下长长的尾流。在“盐湖城号”上，凯西反复在甲板

上摔倒。他写道：“巡洋舰猛烈地摇晃，而且上下颠簸，我很难站起身来。我的头碰到钟上，骨头撞到栏杆上，膝盖上的皮也磨掉了。……我们的舰首伸进大海里，把大量的水花溅到舰桥上。我们的尾流看起来像蓝色地板上的一块舞动着的绿色楼梯地毯，有白色花边，但没有什么特定图案。”^[59]有人发明了一句俏皮话：“与哈尔西一起开溜。”特混舰队的人员都宣称自己拥有“与哈尔西一起开溜”俱乐部的创始会员资格。

“企业号”保留着一支比平时更大的战斗机巡逻队，所有的高射炮都有人值班，装满了炮弹。航母一直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防止空袭，舰上人员认为还会有更多的轰炸机来袭。他们没有错。下午4点，雷达屏幕上显示有另外两架G3M正在飞来，这次高度约为1.4万英尺。它们很快就遭到了9架正在进行战斗空中巡逻的野猫式战斗机的攻击。当敌机进入军舰上的5英寸高射炮的射程范围内时，美国战斗机马上转向，躲开己方火力。战斗空中巡逻的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担任高射炮的弹着观察员。“你的射击低了，”他通过无线电说，“射高一些。好一些了。现在又有点高了。再稍稍低一点。这下你打中了！你打中了！你打中他了！”其中一架轰炸机摇摇晃晃，冒出了浓烟。有两架飞机从高空投下了500千克的炸弹，但是“企业号”向左急转弯，炸弹在右舷外面落入了海中，没有造成伤害。麦克拉斯基用无线电指挥道：“暂停防空火力。我们来干掉它们。”^[60]战斗机再次出击，并且多次命中。一架G3M起火并滑翔坠海，另一架引擎冒着烟逃脱了。

现在太阳已经西下，距离天黑还有两小时多一点，到时候就有夜色的保护了。特混舰队的雷达仍然不断发现目标。夜晚来临时，野猫式战斗机追赶并击落了一架日本的水上飞机（爱知零式水上侦察机E13A1，盟军代号“乡下佬”）。太阳在下午6时35分落下，10分钟后一轮黄色的明月升了起来。^[61]到7点的时候，“企业号”已经让所有的战斗机降落下来，引擎轰鸣，高速前进，向东北方向航行。这是满月的第二天，月光明亮，甲板上的人甚至可以在月光下看书。舰队拖着长长的明亮的尾流，痕迹可以清楚地从空中看到，但是那天晚上没再有陌生的飞机接

近。哈尔西下令调整航向，朝向西北，希望这个出乎意料的路线能够甩掉所有的追击者。黎明时，美国人欣慰地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一个潮湿的冷锋，完全被雨和雾遮盖住了。特混舰队又转向东北，朝着瓦胡岛进发。迪金森说这天气是一个“不错的防空掩体”，凯西表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雾反而是个好东西”。^[62]在这种条件下，没有飞机升空，飞行员也享受到了一个应得的休息日。第8特混舰队回家的旅程非常平静，令人高兴。

“约克城号”和第17特混舰队同时攻击了马绍尔群岛南部的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以及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这艘航空母舰在黎明时分发起了对三个环礁协调一致的空袭。空袭行动受到了阴沉天气以及时断时续的暴风雨的阻碍，但没有遇到任何类似“企业号”在北部的岛屿上所遇到的那种坚决抵抗。空袭的成效很小。在贾卢伊特环礁，11架鱼雷轰炸机和17架俯冲轰炸机穿过层层浓雾，攻击了停泊在潟湖中的辅助舰船。两艘船被击中，但是都没有沉没。恶劣的天气，而不是敌方的反击，使6架美国飞机于返程时在海上坠毁。在马金环礁，9架俯冲轰炸机在黎明时对潟湖进行攻击，可能击中了一艘停泊在那里的布雷艇（但没有将其击沉），并点燃了两艘同样停泊于此的川西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对米利环礁的攻击徒劳无功，因为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并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攻击的目标。

早晨渐渐过去，天气越来越糟。风力加大了，“约克城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上下下颠簸，可见度几乎降到了零。飞行行动暂停了一段时间。但是，持续的雷达捕捉表明附近有日本飞机。上午11点之后不久，一艘驱逐舰在“约克城号”以西看到一架陌生的飞机。当时条件已经不那么恶劣，可以出动飞机，于是舰长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派一个野猫式战斗机分队升空追击入侵者。他们在雨中和厚厚的云层中搜索了一通，结果空手而归。当天下午1点刚过，航空母舰的雷达图显示34英里外有另一架侦察机。野猫式战斗机前往拦截。在云层中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猫捉老鼠式的游戏之后，两架F4F飞机在一片晴朗的空域将敌机包围。这是

一架川西九七式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与当天早上停在马金环礁并被击毁的两架飞机相同。它被击中了好几次，随后爆炸了；燃烧着的碎片落入海中，在“约克城号”上就能看到。巴克马斯特风趣的副指挥“约科”J.J. 克拉克刚刚晋升为上校（不久之后他就会独立指挥自己的舰艇），他通过“约克城号”的公共广播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解说。他兴高采烈地说：“烧死吧，你个兔崽子，烧死吧！”^[63]

弗莱彻将军本来计划下午进行另一轮攻击，但是天气不允许。进一步的行动可能会失去更多的美国飞机，却不能保证有多少战果。弗莱彻似乎运气永远都不好。那天夜幕降临后不久，哈尔西用无线电向他发出命令，让他们脱离战斗，返回珍珠港。

2月5日黎明，“企业号”的瞭望员透过雾气瞥见了瓦胡岛上的绿山。它和第8特混舰队的其他舰船以“之”字形路线驶近珍珠港——这是对付敌人潜艇的一种措施——然后从两行驱逐舰组成的保护通道中间进入入口航道。哈尔西已经命令所有人在到达港口时都穿上白色制服，并且站在自己的作战位置上。“企业号”升起了巨大的战旗。海港中的军舰响起了嘟嘟嘟的汽笛声欢迎他们归来，舱面船员也穿上了白色的制服来表示庆祝，他们一边欢呼一边挥手。一群群水手和文职人员停止了工作，挤到福特岛和海军造船厂的码头上。哈尔西站在“企业号”高高的司令舰桥上，在他敬礼和挥手时，即使离得很远也可以看到他的白色军帽和白色制服。尼米兹将军带着一大群参谋和随从等待在码头上，他同意坐着高空作业坐板升到机库甲板上。他在飞行甲板上与哈尔西见面后，抓住后者的手说：“比尔，太好了，干得漂亮。”^[64]哈尔西情绪激动，禁不住泪流满面。

特混舰队的每艘舰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都大声播报了这条信息：“第8特混舰队司令官向第8特混舰队致辞：干得好！你们在马绍尔群岛的行动彪炳史册。能够指挥大家是我的荣耀。上帝祝福大家！哈尔

西。”[\[65\]](#)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哈尔西再也没有像这次行动这样，和他指挥的下属关系如此亲密。他们送给他一个绰号：“蛮牛”哈尔西。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们还送给他另一个绰号——“疯狂比尔”。有传言称“与哈尔西一起开溜”俱乐部的下一个使命将会让他们深入西太平洋的中心，去解救麦克阿瑟被困在菲律宾的部队，甚至直接去东京，因为“疯狂比尔会将任何事情都尝试一遍”。[\[66\]](#)

金曾经几乎毫不掩饰他对报刊和广播电台的记者的蔑视，而尼米兹也曾和媒体保持距离，所以这些记者对于在海军上层军官中找到一位明星人物几乎感到绝望了。现在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人。美国的报纸将此次航母袭击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同时还刊登了几张哈尔西中将微笑的照片。为了宣传效果，报纸夸大了这些袭击的意义，甚至将其与12月7日的突袭相提并论——有报道说，珍珠港之仇已经“报了”。由于来自太平洋战区的坏消息接二连三，人们急需一针强心剂，而这些胜利正好提振了人们的精神。它们使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变得稍微容易接受了：英国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新加坡已经向日本投降。

“企业号”飞行员对于在马绍尔群岛摧毁的敌舰和敌机的估计，事后证明是夸大其词。第8特混舰队总共击沉了两艘运输舰和一艘小型舰艇，击伤了一艘运输舰和一艘小型舰艇。敌方有9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在地面或空中被击毁。多栋建筑物被破坏或摧毁。日军死亡90人，其中包括海军将领八代祐吉。美国人削弱了日本的马绍尔群岛基地在近期的作用，但并没有使它们失去战斗力。被破坏的跑道可以修复，设备可以重建，人员可以补充，而航空部队可以通过西边特鲁克群岛的基地的第四舰队进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袭击只是美国需要在浩瀚海域内进行的空中消耗战的一部分。至少还需要两年的时间，盟军才能永久摧毁那些外围基地。

但这是太平洋舰队的首次攻击行动，单凭这一点，这次行动就对鼓舞士气和增加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当时人们恰恰非常需要士气和自

信。它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海军正在通过打仗来学习如何打仗。“企业号”航空大队的77名飞行员总共飞行了158架次，少数人创造了在一天内飞行5次，在驾驶舱内连续待10小时的纪录。“企业号”消耗了148 043加仑燃料，在袭击之前的24小时内，它连续高速航行了超过560英里，创造了航母的纪录。^[67]阿尔文·柯南写道，这些早期的航空母舰攻击行动使得舰队成员学会了后来赢下中途岛战役所必需的技能。他说：“要想了解战争的诀窍，以及知道如何迅速反应，所需的时间之长令人惊讶。我们逐渐意识到，战争首先是一种心态，然后才是其他。”^[68]

军官们聚在一起做简报时，所有人都认为作战技巧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些任务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缺陷：高速航行时难以保持特混舰队的队形；中途加油，以及使用雷达和通信设备指挥航空母舰上方的战斗机等方面也有缺陷。人们重新注意到，F4F野猫式战斗机在爬升时机动性较差而且速度不足，另外，其0.50英寸机枪总是卡壳被认为是一种耻辱。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速度缓慢，这很危险。“企业号”上的鱼雷轰炸机一架都没有损失简直是一个奇迹。大家都感慨高射炮未能发挥效果，包括炮手自己——船员急需更好的武器和更多的训练（特别是在以25节以上的速度航行的军舰上命中目标的训练）。由于在雷达屏幕上不能区分己方和敌方飞机，防空工作受到阻碍。瞭望员有点杯弓蛇影，总是报告说发现了潜艇。至于巡洋舰和驱逐舰，它们的射击一直很差，如果水面舰艇希望在战争中有良好的表现，就必须改进射击精度。航空母舰上需要更多的战斗机——应该有足够的战斗机为外出空袭的轰炸机进行护航，同时也留下一些保护航空母舰。这种真诚的自我拷问让罗伯特·凯西感到好笑，这些自责让人们觉得，“这场行动昨天看起来似乎还是现代最辉煌、最大胆和最有效的海军表演，实际上却是应该让人愧疚的行动”。^[69]

2月和3月美军将对日本前哨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2月20日，“列克星敦号”和一支特混舰队大胆闯入了日本南方势力范围的中心，准备打

击日本人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的位于新不列颠拉包尔的大型基地。

（“列克星敦号”接近时被敌方侦察机发现，所以不得不迅速向东撤离。）哈尔西和“企业号”在2月24日来到了威克岛，然后在3月4日向北进发，攻击了马库斯岛。后者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基地，但它离东京只有1 000英里。3月10日，海军中将小威尔逊·布朗率领以“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为中心组建的特混舰队，派遣航母轰炸机袭击了新几内亚北海岸的萨拉马瓦和莱城的日军简陋机场。

这些早期美国航母袭击行动的价值往往被历史学家低估。即使在战争期间，许多美国人显然也持相同观点；莫里森引用过一个军官的话，他说：“日本人对此并不在乎，就像狗不在乎一只跳蚤一样。”^[70]对于随同航母作战的人来说，任务留下的印象主要是高速航行在无边无际的太平洋上，高潮是几个小时没有抵抗的空袭。凯西和其中一些人待在一起，他说：“我们在两个月内行进了大约2万英里，总共只有约5个小时的紧张行动。”^[71]当哈尔西2月1日的袭击事件在东京报道时，广播和报纸均嗤之以鼻。此外，日本人在报道战况时的夸大其词，与美国人相比毫不逊色，他们认为守军对攻方造成了重创。千岁航空队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给美军飞机造成的破坏乐观过头了——他们说在塔罗亚岛击落了17架美国飞机，而罗伊岛的飞行员则声称他们让5架美国轰炸机着了火。^[72]

但是仔细看看日本海军指挥官的个人反应，人们就会有明显不同的印象。哈尔西的突袭令日军措手不及。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写下了他的印象：“他们最终还是来了。有两下子！”^[73]这些袭击是“令人痛心的耻辱”——“让我们看起来非常可笑”。^[74]宇垣对于日军没能发现美国人的到来感到很气愤，他说马绍尔群岛应该比两个月前的美国更能应对突袭，因为两个月前美日两国还没有开战。“体会到我们自己防守上的弱点之后，我们不能再嘲笑突袭珍珠港时敌人的慌乱状态了。”^[75]他为八代祐吉将军之死而哀悼，他们在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中曾经是同班同学。联合舰队作战行动指挥官三和义勇大佐报告

说，山本的所有参谋都被激怒了，但是他们“只能咬牙切齿，沮丧地跺脚”。^[76]

袭击的第一批消息到来后，日本海军派出了特鲁克基地的轰炸机向东追击；特鲁克基地的几艘潜艇也被派出去进入阵位，以防美国特混舰队继续向西进犯。日本无线电情报站仔细监听违反无线电静默的行为，好确定哈尔西的位置，但除了夏威夷的商业广播报道美国特混舰队的胜利以外，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更多舰队被派出到海上拦截剩余的美国船只。美军的袭击时间安排得很好，恰好与日本在南方的行动时间一致，宇垣为此而感慨。当日本的主要舰队在其他地方发动攻击时，敌人正前去打击其薄弱的侧翼。他写道：“敌人的攻击时间选择极佳，因为我们的作战行动集中在西南太平洋，而马绍尔群岛的防御力量薄弱。除了相当辉煌的战果之外，他们还实现了转移我们力量的目的。航空母舰逼近，重型巡洋舰的炮击也非常大胆。看起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耍了。……敌人第二天早上重新进攻的可能性很小。总之，这局我们输了。”^[77]根据航空队军官渊田美津雄的说法，在太平洋上派出如此多的海军力量四处追击是徒劳无功的，“毫无意义”而且“意气用事”。^[78]特鲁克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之间有1 200英里的距离，等日军驶过这段距离，美国的特混舰队肯定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军港。即使知道美国人已经安全撤退之后，南云忠一舰队的6艘航母中的“翔鹤号”和“瑞鹤号”还是被派去在日本附近的海域巡逻。这减少了令人生畏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打击力量。

也许哈尔西的突袭最深远的后果是让日本海军将领们深刻意识到，日本的首都可能会受到攻击。即使这样的袭击不会造成巨大破坏，海军的“面子”也会极不好看。宇垣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人很快将试图直接打击东京。他在2月2日写道：“他们将来还会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是空袭我们的首都。……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敌人这一次只是抓了我们一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而没有直接攻击东京。”^[79]三和义勇大佐也表示同意：“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防

止东京遭到空袭。”^[80]由于没有预防航母突袭的简单方法，所以他们产生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必须找到办法彻底消灭美国的航空母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山本计划调动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进攻中途岛，以迫使美国航空母舰从珍珠港出击并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惨败。

-
- [1] “COMINCH to CINCPAC,” Jan. 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2.
- [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6.
- [3] Potter, *Bull Halsey*, p. 37.
- [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56.
- [5]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36.
- [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6.
- [7] 哈尔西早期职业生涯的细节来自Potter, *Bull Halsey*, pp. 23–31。
- [8] *Ibid.*, p. 32.
- [9] See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59–60.
- [10] Stafford, *The Big E*, p. 41.
- [11] Potter, *Bull Halsey*, p. 39.
- [1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58.
- [1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8.
- [14] Stafford, *The Big E*, p. 44.
- [15] “Running Summary of Situation,” Jan. 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121.
- [1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04.
- [17] *Ibid.*, p. 105.
- [18] *Ibid.*, p. 135.
- [19] Potter, *Bull Halsey*, p. 41.
- [2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70.
- [2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62.
- [22] Potter, *Bull Halsey*, p. 42.
- [23] Potter, *Nimitz*, p. 37.
- [2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41–42.

- [25] Jones and Jones, *Hawaii Goes to War*, p. 39.
- [2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01–2.
- [27]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6.
- [2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69–92, 72.
- [2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71–72.
- [3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87.
- [31]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87.
- [32]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online at www.cv6.org/ship/logs/action19420201.htm.
- [33]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91.
- [34] Potter, *Bull Halsey*, p. 47.
- [35]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0.
- [36] Pilot chatter recorded by Layton, listening from Pearl Harbor, in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362.
- [3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38] Raymond Spruance to Saavy Cooke, Feb. 9, 1963,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6,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
- [39]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40] Rawie’s account in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68.
- [41] Potter, *Bull Halsey*, p. 46.
- [42]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43]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44]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1.
- [45] Potter, *Bull Halsey*, p. 44.
- [46] *Ibid.*, p. 47.
- [4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4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1.
- [49]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41–42.
- [50] Stafford, *The Big E*, p. 57.
- [51]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52]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2.
- [53]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5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54.
- [55]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1.
- [56] *Ibid.*, p. 103.
- [57] Potter, *Bull Halsey*, p. 48.
- [58]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5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154–56.
- [60] Stafford, *The Big E*, p. 59.
- [61]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6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03;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58.
- [63] Lundstrum,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p. 69.
- [6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4.
- [6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61.
- [66]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13.
- [67] CO of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on February 1, 1942 against Marshall Island Group,” Feb. 7, 1942.
- [68] Kernan, *The Unknown Battle of Midway*, p. 3.
- [6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64.
- [70]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68.
- [71]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275.
- [72] See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77.

- [73] Entry dated Feb. 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81.
- [74] Entry dated Feb. 2, 1942, *ibid.*, pp. 83–84.
- [75] Entry dated Feb. 1, 1942, *ibid.*, p. 81.
- [7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3.
- [77] Entry dated Feb. 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82.
- [7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62.
- [79] Entry dated Feb. 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p. 83–84.
- [8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63.

第七章

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是第一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作战行动的历史学家，也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者。他将日本向南的进攻比喻为“阴险而又难以抵抗的多触角钳制”。这是一场范围极广的海陆空闪电战，精心策划，有如芭蕾舞表演一般。这些攻击落在一个又一个的盟军目标上，像急促的音乐一样迅速，战线长达6 000英里。莫里森写道，日本的进攻“像一些巨大的章鱼，依靠的是绞杀许多小点，而不是集中于一个致命的器官。没有任何一个腕足试图挑战四国联合舰队的整体实力。每一个腕足都死死缠住敌人的一小部分，并通过使其局部失去功能而最终杀死整个动物”。[\[1\]](#)

日本的矛尖是陆基中型轰炸机，经常由无处不在的零式战斗机护航。这些飞机航程长，“蛙跳”战术的攻击范围可达方圆500英里甚至更大。此后不久，运输舰队就会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保护下到达。小股精干的日本士兵被投放到丛林密布的小岛上，盟国在那里没有多少甚至根本没有内部通信设施。他们很快就会突破当地薄弱的防御。他们一次又一次完整地占领盟军机场，或者只给机场造成轻微破坏。日本飞机进入机场后，便开始准备继续向南发动一系列进攻。日本水陆两栖部队控制了霍洛岛的航空基地后，台南航空队的24架零式战斗机飞行了1 200海里，降落在新的机场上。对于单引擎独座飞机来说，这可算是超长距离飞行了，但所有的飞机都安全到达。[\[2\]](#)

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周后，盟军的抵抗力量迅速瓦解，东京陆军大本营的规划者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作战计划，那就是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夺取令人垂涎的油田，这是日本向南进攻的主要作战意图。这些资产能

够使日本的战时经济实现自给自足，而直到现在日本经济还过于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石油。日本需要尽早占领荷兰油田，因为日本那时已经开始动用有限的石油储备。日本人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被困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盟军。日本人将利用从美国人和英国人手中抢到的机场向南进攻，在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新组建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做好防御之前，直捣其中心。

日军在菲律宾的主岛吕宋岛迅速推进，为早日入侵南部的棉兰老岛和夺取达沃的美国水上飞机基地开辟了道路，这个基地能够为望加锡海峡、马鲁古海等浅水区以及大洋洲南部地形复杂的岛屿的作战行动提供良好的中途补给。登陆部队在人口稀少的岛屿上登陆，盟军在岛上很少抵抗，甚至根本没有抵抗。由于望加锡海峡落入日本人手中，通往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水道突然变得无人守卫，直接暴露在外。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在沙捞越的古晋登陆，接着在棉兰老岛和婆罗洲之间的苏禄海中的霍洛岛上登陆。日军还在法属印度支那通过暹罗的克拉地峡或跨越暹罗湾，继续在马来亚登陆。位于新加坡的英国大型海军基地以“东方直布罗陀”而闻名，本应是抵御日本进攻马来亚南部岛屿的重要堡垒。但由于日本人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新加坡被孤立，失去了战斗力。守军虽然还是很强大，却无法阻挡绕过其东侧的日本运输舰队。1942年1月，一支运输舰队穿过南海登陆苏门答腊岛东部，从望加锡海峡登陆荷属婆罗洲，并在文莱（1月6日）和亚庇（1月11日）建立了新的滩头堡。从达沃起航的部队在婆罗洲东部的打拉根岛（1月12日）和巴厘巴板（1月24日）以及西里伯斯岛的万鸦老半岛（1月11日）和肯达里（1月24日）登陆。小小的安汶岛及其精致的机场于1月31日被占领。帝汶岛是葡萄牙殖民地，位于安汶岛南部，很容易就能攻占。占领那里后，澳大利亚北部漫长而毫无防御的海岸线就暴露在了征服者的面前。

婆罗洲由英国人和荷兰人共同占领，他们在重要的位置上都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由于这个岛上的殖民者的力量过于分散，日本军队迅速

占了上风。荷兰人炸毁或烧毁了石油钻塔，以防日本人使用。80到100名荷兰平民因为实行“焦土策略”而遭到报复，被日本人杀害。^[3]每次日本工程师都很快就让石油再次流了出来。到2月中旬的时候，岛上的抵抗力量被彻底消灭了。

1月10日，新任美英荷澳司令部最高司令官韦维尔上将到达爪哇，并在巴达维亚东南部75英里处的伦邦建立了司令部。他的大量参谋不缺乏才能——他手下有四个国家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但是这位总司令统一指挥四国联军的实验明显没有成效且无法长久。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特将军于1月1日乘潜艇抵达泗水港。他将指挥四国的海军部队，也就官方所谓的“ABDAFLOAT”（在当时悲惨的情况下，这个首字母缩略词也许有点过于耍小聪明了）。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之后，日本轰炸机对甲米地的主要基地狂轰滥炸，使其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哈特命令亚洲舰队剩余的水面舰艇撤离菲律宾。舰队中最大的战舰是美国的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号”，它原来是哈特的旗舰，还载过罗斯福总统。另外2艘巡洋舰和13艘古老的四烟囱驱逐舰为它护航。

有一种不得人心的观点认为，菲律宾难以防守，因此注定会失陷，托马斯·哈特是第一位表达这种观点的重要军事指挥官。他撤退得比较早，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十分不满，认为海军的失误是无法有效地抵抗日本运输舰队在吕宋岛登陆的原因。但是，把舰队从菲律宾撤出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舰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想让这支舰队在战争中起作用的话，它就必须向南撤退。

尽管日本的快速推进似乎会让人对盟军战前的基本假设产生怀疑，但四国联军的几个指挥官还是比较乐观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通常要提振下属的士气，他们的虚张声势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韦维尔在知道新加坡北部面向陆地的防御力量不足之后，似乎仍坚定不移地相信日本席卷马来半岛的攻势会在新加坡完全停止。甚至到了1月31日，也就是在6万多人的英军向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军队投降的两周之前，韦维尔还表示自己相信该岛可以守住。^[4]缅甸的英国指挥官也

认为他们可以守住战线。荷兰海军中将康拉德·E.H. 赫尔弗里赫承诺，他的部队将挫败在东印度群岛登陆的日本军队。这些乐观的预期都没有实现。

日本人明确打算占领东印度群岛最富有的爪哇岛。他们准备了两支大型入侵部队，沿着婆罗洲的东西海岸进军，两面夹击。四国海军最大的希望似乎是拦截和摧毁（或至少削弱）这些舰队，也许能击沉运输舰，在日军上岸前消灭大批有生力量。然而，1月的时候，四国海军正忙于给南行的货轮护航，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正如当时多国舰员已在怀疑的那样，四国联合舰队面对即将到来的杀戮几乎毫无准备。他们也无法选择逃到更安全的水域，择日再战。他们的责任就是面对可能被全歼的局面。他们的使命就是争取时间，拖延日本人，等待盟军将增援部队投放到这一战区。这支四国组成的小型舰队本身就非常弱小，舰队里大多是过时的巡洋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驱逐舰。连舰队指挥官自己都说这只是一支二流军队。该战区盟军空中力量的持续减少意味着他们经常要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战斗。

哈特将水面舰艇组织成一支“突击部队”，基地设在泗水港，由海军少将W.A. 格拉斯福德指挥。格拉斯福德1月中旬多次出战，但由于缺乏空中侦察而陷于困境，经常无法发现进犯的敌方舰队。他撤退到东帝汶的古邦湾加油。1月20日上午收到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的目击报告时，他仍然在古邦湾。报告说在巴厘巴板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敌人的进攻部队，而巴厘巴板是婆罗洲东海岸重要的荷兰石油生产基地。他派四艘“四烟囱”的驱逐舰去阻止日军登陆。它们开进望加锡海峡，呈“之”字形前进，以干扰敌人空中巡逻队的侦察。1月24日午夜后不久，他们到达巴厘巴板湾。哈特将军通过加密无线电信号发出了只有一个词的命令：“攻击！”“约翰·福特号”上的保罗·塔尔博特准将向其他舰长下令：“先用鱼雷攻击，等鱼雷发射出去再开炮；最大限度地主动出击，用最猛烈的炮火打击对手。”^[5]

这些驱逐舰以27节的速度接近敌军。它们很幸运，日本舰队在离海

岸很近的地方下锚了，而石油设施已经被撤退的荷兰人点燃，提供了良好的背景照明。鱼雷发射员可以根据锚定的运输舰的清晰轮廓确定目标。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中，塔尔博特的驱逐舰几次近距离接触敌舰，发射了所有的鱼雷，击沉了三艘运输舰和一艘鱼雷艇。

巴厘巴板附近海面上的这次行动对于盟军来说是一次战术上的胜利，然而12艘日本运输舰中有9艘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这一结果十分令人失望。美军既然已经完全实现突袭，就应该做得更好。许多鱼雷都没有击中目标，还有更多的鱼雷可能击中了目标却没有爆炸。这次袭击并没有阻止巴厘巴板重要的港口和油田落入敌方手中。在如潮水般涌来的坏消息中，这场胜利是段小小的间奏，让人听了之后为之振奋，但是它并没有遏制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攻势，同时也是四国联合舰队的最后一个重要战果。

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在经历了战争头几天的混乱之后已经恢复到平稳状态，那时候吕宋岛的海军和航空基地已经被日本的空袭摧毁。这位傲慢专横的将军希望集结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队，在滩头堡上迎击进攻马尼拉的日本入侵部队。

麦克阿瑟有四十年的作战计划经验，能够预见到守军将撤到巴丹半岛最北部的防线之后进行防御，而巴丹半岛控制着海上通向马尼拉湾的咽喉。在那里，他们将深沟高垒，严防死守，等待运输舰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下跨过太平洋来拯救他们。但是，麦克阿瑟因为负责让菲律宾的部队在1946年之后承担起本国的全部防御责任，不能忍受让菲律宾向外国入侵者屈服的计划。他希望能在滩头堡迎击并消灭日本军队。这样的策略要求（至少）有空中优势、机动性良好的步兵，以及一支完整的太平洋舰队，而且舰队要全力支援菲律宾的战事。事实上，上述条件都不存在。在战争的第三天之后，吕宋岛上空就很难看到美国飞机了。即使美国和菲律宾的部队接受过训练，并且有适当的装备，能够迅速地抢夺敌军的滩头堡（实际上并非如此），吕宋岛原始的道路状况也使得这样的

行动无法实现。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艇在1941年12月7日已经被击垮，但即使情况并不是这样，“欧洲优先”的战略也会让在1943年以前对菲律宾进行大规模救援变得不可能。把军队撤回巴丹半岛的防线是唯一符合逻辑的行动，而麦克阿瑟应该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就采取这一行动。

12月10日，日本的首批军队在吕宋岛北部登陆。一支规模更大的入侵部队——约5万名士兵，还有武器、轻型坦克及大炮——乘坐大约84艘运输舰和伪装的运兵船从台湾岛驶来，并于12月22日在马尼拉以北的林加延湾登陆。益田令治（Reiji Masuda）是“亚利桑那丸号”运输舰的高级船员，他回忆说这支入侵的船队“排成两行，不见头尾”。^[6]美国潜艇部队在早期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人们期待它们能沉重打击接近菲律宾的入侵船队，但是它们的表现让人失望。由于目视发现目标太晚，潜艇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攻击阵位，而且它们也无法在林加延湾内陆浅水区域灵活机动。

几架美国陆军B-17飞机和海军PBY水上飞机在敌兵下船时飞到上空，进行了攻击，但是造成的伤亡很少。反而是狂风巨浪对日本军队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几艘舰船在海滩附近被大浪掀翻了。益田回忆道：“海浪非常高，很难把士兵和补给品送上摆渡船。黎明时敌机袭击了我们，目标主要针对滩头堡。飞机扫射我们的船，一直追到海滩上。‘亚利桑那丸号’向天空开火。我们看到敌机旋转着下坠，拖着浓烟。我们的船被炸弹的爆炸和击打船舷的水墙冲击得摇摆不定。然而，大多数船成功地卸下了士兵和装备，登陆部队开始朝马尼拉进攻。”^[7]

这是到当时为止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成功的两栖部队登陆行动。这支部队将大部分大炮和物资，以及大约一半的坦克带上了岸。沿着3号公路前进就可以抵达马尼拉，这条路铺砌过，是菲律宾最好的道路之一。日本军队迅速进军，驱散毫无经验、装备不佳的菲律宾军队。菲军四散而逃，溃不成军。由美军部队指挥的炮兵分队直接面对着日军令人畏惧的正面冲锋。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断请求麦克阿瑟允许后撤。

12月24日，第二支日本军队在吕宋岛东海岸登陆，登陆地点为马尼拉东南60英里处的拉蒙湾。这是一个使局面恶化的突发事件。现在有两支日本军队从两个方向像巨大的铁钳一样向菲律宾首都进攻。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司令部感觉到大事不妙。他向华盛顿发了一系列紧急的公函。^[8]他能得到增援吗？他迫切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飞机可以从澳大利亚运来吗？航空母舰能否来到菲律宾附近？马歇尔将军答复说，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支援。麦克阿瑟被迫依照已有几十年之久的《橙色战争计划》，放弃马尼拉，向巴丹边打边撤。在那里，部队将深沟高垒，在防御线后面长期坚守。他宣布马尼拉将成为“不设防城市”，并下令“实施第3号橙色战争计划”。^[9]麦克阿瑟让航空队司令刘易斯·布里尔顿将军把剩下的B-17飞机派到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你往南走。你用剩下的轰炸机以及你很快就会得到的轰炸机能帮我更多，远远超过你留下来所能做到的。”^[10]

麦克阿瑟及其参谋收起手头的工作，坐着烧煤的老式汽船穿过港湾，到达距离巴丹半岛不远的科雷希多岛。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患有结核病，他做出了和麦克阿瑟一起撤走的痛苦决定——他担心菲律宾人的命运，但又不能留下被敌人抓住。军队沿着3号公路向北进发，卡车、公共汽车、吉普车甚至牛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车队，秩序混乱。马和驴被征用来拉重炮。军队和数万徒步的难民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上。垂死的首都上空升起了浓烟，那是抢劫者或第五纵队干的。这一天是圣诞前夕。在圣费尔南多，从城市中撤退的平民、军队和车辆，遇到了向南撤退的军队以及难民组成的洪流，他们慌不择路，试图躲开不断前进的日本军队。这两群人相遇后，合并在一起向巴丹半岛撤退。盟军的防线坚持了很长时间，足以让大部分军队撤到巴丹半岛。

日本人似乎没想到美军会撤退，也没有出动航空兵，这很奇怪。前往巴丹半岛的人群都挤在路上，对他们进行扫射会造成毁灭性的伤亡，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日军一架战机都没有出现。日本人哪怕炸掉几个关键的桥梁，麦克阿瑟的相当一部分军队可能都永远无法到达相对安全的

巴丹半岛。许多菲律宾人当了逃兵，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顽强而勇敢地投入了战斗，所以失去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同志反倒提高了到达巴丹半岛的军队的整体素质。

1942年1月2日，第一批日本军队进入马尼拉。店面都钉上了木板；一群群当地人在被遗弃的仓库里抢劫；众多平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默然无语。在美国高级专员的家中，日本人举行了军事仪式，降下了美国国旗，一名日本水兵还踩在美国国旗上。军乐队演奏日本国歌，在原来美国国旗的位置上升起了日本的太阳旗。日本陆军司令本间雅晴将军错误地认为，占领了马尼拉，菲律宾的战斗就等于取得了胜利。他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真正的大战将在整个海湾进行。

麦克阿瑟的部队在阿布凯—毛班一线后方坚守，这条战线穿过巴丹半岛北端，并且穿过死火山纳提布山的一侧。许多前线部队是菲律宾的精英部队，决心为他们的同胞在林加延湾的不良表现进行补救。麦克阿瑟已经从华盛顿得到了明确通知，让他不要指望得到及时的援助，但是他在1月15日告诉部队：“美国已经派兵增援了，派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和数百架飞机。……我们已经不能再退了。我们在巴丹的兵力超出了日本进攻的兵力，我们有足够的补给，只要坚决防守就可以击退敌人的攻击。我呼吁巴丹的每一名士兵都守在自己的位置上，抵挡住每一次攻击。这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战斗则生，撤退则亡。”^[11]

1月9日，日本对战线东端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引发了激烈的战斗。守卫者顽强战斗，击退了最初的攻击。在这些作战行动中，一些菲律宾部队异常英勇。然而，随后的几天，日本对西线发动攻击，菲律宾陆军第51师猛烈反击，防御阵地上出现了一个缺口。由武智渐大佐指挥的部队突破了阿布凯的防线，深入阿伯阿伯河谷。守军英勇的反击没能打退日本人。视察了战线上的情形后，理查德·萨瑟兰将军建议部队撤到巴格科—俄里翁一线，这条防线的两端正是这两个城镇。麦克阿瑟很快批准，下令撤退。

1月24日，盟军大批向南撤退。这是一次混乱的撤退，成千上万的

士兵脱离了自己的部队，杂乱无章地到达了防线后方。敌方似乎没有派出轰炸机或战斗机，它们本来可以对完全暴露在道路上的军队造成严重打击。到1月26日，这些人已经安全地部署在了巴格科—俄里翁防线的碉堡、壕沟和地堡中，并重新通过丛林中的小路从后方得到了有效的补给。美菲联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赶到了半岛地带，这里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死亡陷阱。麦克阿瑟之前坚持在海滩上阻击入侵者，结果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由于没有及时实施第3号橙色战争计划，军队没有将所有可用的弹药、食品和医疗用品转移到巴丹半岛。部队的口粮几乎立即就减少了一半。但是他们暂时安全了——比在北部的防线更安全——只要他们一伸手，大型的岸炮就能控制马尼拉湾的入口，防止敌人战舰进入。

在1月下旬和2月，日军对美菲联军防线的反复攻击使自己遭受了重大损失，在半岛西海岸发动的两栖登陆也被血腥地击退。日本人最初低估了巴丹半岛上的美菲联军的人数，他们估计人数不超过2.5万，但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3倍多。而且他们打得非常顽强。他们没有像在早先吕宋岛的小规模战斗中一样一触即溃，纷纷逃窜，而是缩在防线之后，用重型火炮的密集射击对付日本步兵的冲锋。到2月中旬，本间将军在夺取巴丹半岛的战役中已损失了7 000名士兵。他向东京提出的增援要求被拒绝了。本间需要尽快消灭抵抗军，宣布整个菲律宾的战事结束，否则军队的“面子”可能就保不住了。而且要求迅速消灭抵抗军的就是昭和天皇本人。2月中旬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急迫。本间的参谋长前田正实中将认为，正确的策略是围困半岛，等待困在那里的几万人耗尽给养，那时他们就会不战而降。但是，东条英机不能接受长时间围困的办法，他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本间要么进攻，要么撤职。

奎松总统在科雷希多岛地堡通过短波收音机可以轻易收到各种报道，这些报道表明盟国致力于“欧洲优先”的战略，这让他非常恼怒。他在2月初听到这样一条广播后喊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后房被强奸，却为一位远亲的命运而感到痛

苦！”^[12]他听报告说巴丹半岛上的菲律宾部队比美国同伴得到的粮食配给还要少，就更加恼怒了，但是麦克阿瑟并不承认这一点。奎松在内阁的一致支持下，提出将自己作为战俘送给日本人，同时宣布菲律宾保持中立并且独立。那样他或许可以在日本的长期占领下为人民争取一些福利。麦克阿瑟与奎松私交很好，他将提案（日期为1942年2月8日）转交给了华盛顿，并以自己的资格担保，指出这“或许可以为将要发生的灾难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13]

然而，在白宫收到电报时，罗斯福总统毫不犹豫就下了决定。他告诉马歇尔和史汀生：“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任何国家都不能单方面与日本人讲和。总统坚持认为，巴丹必须守卫到最后一个人，菲律宾必须在被占领的状态下忍受煎熬，直到通过武力获得解放。那一天之前，马歇尔私下曾经怀疑这位坐着轮椅的友善的新政执行者是否有能力面对世界大战，但是现在他知道了，罗斯福能够做到冷酷绝情。他说：“我立刻丢掉了我的大脑中对于他的一切怀疑。我确定他是一位伟人。”^[14]

在给奎松回电时，罗斯福回避了增援菲律宾的问题，而是强调有很大一部分美军飞机、部队和其他战争资源正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分派到太平洋战区。这是千真万确的。到3月中旬，将有7.9万名士兵按计划乘船前往太平洋地区，人数是派驻到欧洲的4倍以上。罗斯福虽然没有给出增援巴丹半岛的具体承诺，但他毫不含糊地向奎松承诺会解放菲律宾。“只要美国的旗帜飘在菲律宾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的人就会誓死捍卫它。无论现在的美国驻军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直到目前正在菲律宾境外集结待发的部队返回菲律宾，把你们土地上最后残余的侵略者赶出去。”^[15]这个消息显然对奎松产生了罗斯福所期待的影响，他发誓会站在美国一方，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

菲律宾大势已去，但没有人愿意明确说出来。盟军希望麦克阿瑟在巴丹半岛的部队尽可能坚守，也许要守到被彻底击溃为止。他们的牺牲将为南部和东部战区的稳定赢得时间。麦克阿瑟本人将从澳大利亚领导最终的反攻。3月11日，按照总统的命令，麦克阿瑟带着高级参谋、妻

子和4岁的儿子离开了科雷希多岛。他们在黑暗的掩护下乘坐鱼雷快艇到了棉兰老岛，在那里登上了一架破旧的B-17飞机，长途飞往澳大利亚。

麦克阿瑟在被困于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部队中可不像在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中那么受欢迎，后者欣然接受了他在媒体公报中说的每一句大言不惭的话。在他离开之前，士兵们就把他称为“防空洞道格”，意思是他习惯躲藏在科雷希多岛的地堡里，从来没有在士兵中间出现过。麦克阿瑟前往澳大利亚之后，谣言四起，说他带走了大量行李，里面塞满了钱、食物和数不清的奢侈品，而不是在飞机上腾出更多空间让别人逃跑。这些谣言很大程度上是添油加醋，有失公允。然而，麦克阿瑟的确根据奎松总统1942年1月3日的命令收到了菲律宾财政部门的50万美元的酬劳。^[16]他的三名高级参谋接受了小额酬金，总共达14万美元。有证据表明罗斯福和史汀生知道这些交易但并没有反对。

乔纳森·温赖特将军留在了科雷希多岛上，他被迅速提拔为中将，并且名义上得到了菲律宾所有盟军的指挥权。但是温赖特对长期坚守没有信心——他对美国战争部发电报说，如果巴丹半岛的部队在4月中旬前得不到补给，那么他们就有饿死的危险，而且很可能别无选择，只有投降。在整个2月和3月，巴丹半岛上的士兵情况越来越糟。口粮配给从一半减少到三分之一。骡马都被杀了吃掉了。除了营养不良，疾病也使士兵的力量枯竭：巴丹到处都是疟疾肆虐的沼泽，痢疾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奎宁的供给逐渐减少，到了3月底就完全用光了。病人因缺少药物、无法医治而死在病床上。记者弗兰克·休利特写了一首诗，很快被当成讽刺诗在士兵中传开：

我们是巴丹半岛上搏杀的杂种：

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内亲，没有外亲，

没有药品，没有飞机，也没有重炮，

而且没有人放在心里。[\[17\]](#)

在马来半岛，英国人过于自信了。战争的前几个星期，英军在陆上、海上和空中都遭遇了一系列突发的灾难性失败。说英联邦军队士气低落，对他们来说有失公允；从战争开始到十周后新加坡投降，他们经历了类似于集体心理崩溃的事情。人们会觉得，足够的时间、良好的指挥能力和一两次及时的胜利，也许会让局势变得不那么难看。但时间不够，指挥不力，所有的胜利都属于入侵者。

听说日本在战争第一天进攻马来亚东北部的哥打巴鲁之后，殖民地的文职总督立刻对阿瑟·E. 珀西瓦尔将军说：“嗯，我想你会把那些小日本儿赶走的。”[\[18\]](#)新加坡没有下令实行灯火管制，城市的灯光为那天晚上的日本轰炸机提供了良好的目标。英国制空力量的突然减少，迫使英国皇家空军放弃了马来亚北部的制空权，日本的两栖部队因而得以毫不费力地登陆。日本军队占领滩头堡以后，行动速度惊人。步兵骑自行车前进。他们在西边与印度第11师相遇并将其击溃，还迫使马来半岛东部的印度第10师迅速向南撤退。日本人紧追不舍。如果入侵者遇到抵抗，他们就将侧翼打击与猛烈的正面冲锋相结合，将守卫赶走，迫使他们仓皇逃命。日本海军与陆军有效合作，在登陆时为陆军提供掩护，而在其沿着半岛前进时则提供了良好的海上补给。后撤的英国军队炸毁了数百座桥梁，但是日本陆军的工程师们迅速用从周围森林中砍伐的木头进行了重建。

现在，在无情的战斗考验中，英国人才认识到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最好的飞机和飞行员已经撤回欧洲，应付纳粹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这种政策来自对日本航空兵根深蒂固的蔑视，美国人也有相同的毛病。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由于战斗、机械故障和事故，英军损失了很多飞机；几个英国机场被入侵部队夺取后，这场灾难变得更加糟糕。有时候，这些机场没有经过战斗就让给了日本人。英国远东军总司令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将军哀叹称“有时候机场似乎是在近

乎恐慌的状态下被放弃的。商店被放弃，迫切需要的物资被放弃，很明显到处都一片混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机场遭受的轰炸规模，远小于英国伦敦和其他城镇的妇女和儿童所冷静面对的轰炸，通常在敌人的地面部队距离尚远的时候，机场上的人员就撤退了”。[\[19\]](#)

英国皇家空军的指挥官把剩下的飞机撤回新加坡，留着这些飞机来防守这座城市。但日军的夜间空袭仍然很少遇到抵抗，甚至没有遇到抵抗。1942年1月13日，当地一家报纸骄傲地吹嘘：“新加坡击退了125架来袭敌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战地记者塞西尔·布朗在日记中满怀讥讽地指出：“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投下炸弹后就返回了。”[\[20\]](#)更要命的是，马来亚北部的天空中几乎完全没有友军的飞机掩护在地面上作战的英联邦部队，导致地面部队连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他们曾经指望着己方的空中优势，但现在敌机在他们头顶上自由行动，毫无顾忌。

英国指挥官一直将防御集中在主要道路上，基本忽视了半岛上的丛林和红树林中的沼泽，认为这些地方无法穿越。但事实证明日本士兵在丛林战中非常狡诈和灵活。英国士兵穿着靴子，背着40磅重的背包；而日本步兵穿着轻便的棉衣和软底鞋，只带一支步枪、一条子弹带和一袋大米，有时还在肩上扛一个轻型迫击炮。五至十人的小分队排成一路纵队，沿着原始的丛林小径迅速而安静地行进。他们轻轻地从一个树根跳到另一个树根，就这样穿过沼泽地；匍匐绕过英国的阵地，从侧翼和后方用步枪和迫击炮射击；用伪装面彩和穿过头盔网眼的草茎让自己与丛林混在一起；藏在灌木丛中或树枝后面，如果有必要，能连续等待几天，直到敌方士兵中埋伏；化装成本地工作人员，渗透进英国阵营，然后用匕首或刺刀一个一个暗杀敌人。他们能躺在水蛭滋生的沼泽地里，用树枝遮盖头部，接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当敌方士兵进入射程以内时，他们会突然跳起来开火。英国人痛恨那些“狡猾的东方人的伎俩”，但是未能及时调整战术来应对。[\[21\]](#)

布鲁克-波帕姆将军在战争前一年曾到中国观察过日本军队，将他们描述为“穿着肮脏灰色制服的各种不配称为人的生物，有人告诉我他

他们是日本士兵。.....如果日军都是这种人，那他们的食宿问题就会很好解决，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形成一支聪明的作战部队”。^[22]而现在，在马来亚、菲律宾、缅甸和东印度群岛的丛林中，一个不同的神话正在迅速流传。日本步兵是“超级战士”，是一种适应丛林战争的独特生物，让人畏惧又尊敬。有人让布鲁克-波帕姆解释为什么英国军队在马来亚北部表现如此糟糕，他的观察与一年前相同，但是关注的角度不同了。他说：“日本人具有在乡间生存的能力。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少很少，而他們能找到的食物，也正是他们习惯吃的东西。英国人做不到这一点。”^[23]

1941年的“非人”突变成了1942年的“超人”。许多盟军士兵显然相信日本人拥有超自然的感官和能力。他们像蝙蝠一样，能在夜间行动；像豹子一样，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灌木丛；像蚂蚁一样，可以通过一些无言的脑电波与同类交流。他们不像人，从不怕死亡。参加过南太平洋战争的美国陆军军官弗洛伊德·W. 拉迪克写道：“人们认为日本军人是无畏的，他们蔑视美国士兵，没有踪迹，是超级狙击手，宁愿战斗至死也不放弃岗位。当然，其中一些纯粹是无稽之谈，但不幸的是，美国的将军和上校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如何对付这样一种生物。”^[24]这个新的神话，就像它代替的那些神话一样，建立在荒谬的种族传说之上。不得不面对这些有名的超级战士的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而越是这样，这种神话就越有可能实现。

这种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面对侧翼或正面攻击，英国防线迅速瓦解。军官们试图拦下四散逃跑的士兵，重整军队，却无法成功，于是他们自己也开始一起逃跑。马来亚西海岸的岛屿城市槟榔屿于1941年12月17日匆忙疏散。英军曾接到命令，要摧毁军事资源和商店，但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很多有用的武器、补给和船运设备都留给了敌人。军队仅仅从槟榔屿撤走了白人平民，这种做法遭到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痛恨，其中许多人还曾提出要和英军并肩战斗。英国指挥官宣布要执行“焦土”政策，但很多撤退的部队未能执行这个命令，也许

是因为他们依然抱有希望，认为很快便能夺回失去的土地。结果，日本人控制了马来亚重要的橡胶种植园和锡矿，矿上的建筑物、设备和配套设施等大多完好无损。

在新加坡，塞西尔·布朗在日记里吐露：“可以看到，士气几乎如同扎了孔的轮胎，越来越低落。”没有人知道真相，而且几乎无人相信当地文职官员和军事长官的报告。“人们相信最糟糕的消息。因为他们只知道日本人已经到新加坡城外了。”官方公报充满了空洞的乐观情绪和笨拙的委婉说法。英国军队在吉辇河附近被迫撤离后，报道中称他们已经“成功地摆脱敌人”。即使坏消息已经广为人知，审查员还是企图压住消息。城市上方的空袭是一次夜间考验，居民可以看到探照灯照出的日本轰炸机，它们以完美的编队飞行，似乎对防空炮火无动于衷。日军经常在白天空袭，而就算在白天也没有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升空对抗。日军飞机有时会空投传单，有些是用马来文写的，有些是用中文写的，例如：“在神圣的白色胜利火光中烧掉所有白人鬼子。”[\[25\]](#)

当地人不想工作，士兵也不想战斗。根据布朗的记载，一名英国陆军少校和他谈话时坦承他对日本人“产生不了任何怨恨”，因为他们（与德国人相比）是“并不重要的家伙”。这种与现实极为不符的认知让布朗大吃一惊：“英国人被打得狼狈不堪，而这位陆军少校却认为日本并不足虑。”当地的重要文官在恐惧和拒绝现实之间徘徊。布鲁克-波帕姆夫人后来说：“直到最后英国人还忙着开派对，打桥牌，跳舞。……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新加坡会卷入战争。……我曾请求某位女士每天帮我两个小时〔来做一些民防措施〕。她说这会妨碍她打网球。”[\[26\]](#)

1942年1月17日，有消息称日本人到达了柔佛州，在新加坡城北边仅110英里处。从北方撤退来的英国军队将失败的梦魇带给了他们。这种情绪传播开来。海军已经让他们失望，空军也已经让他们失望，事实还证明领导十分无能。城里的居民顾不上体面，争相逃跑。船费飞涨。很多人都找关系争抢民航班机上的座位。参谋被重新分配到韦维尔上将新设于爪哇岛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当地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其他

亚裔民族都知道自己会遭到遗弃，因此通过拒绝工作来表示不满。在被日本空袭炸毁的街区，死尸横陈街头；当地找不到工作队来运走并埋葬尸体。到了1月下旬，死尸发出的恶臭笼罩了整座城市。

这座岛上堡垒做好了被围困的准备。1月31日，所有剩下的英国军队都撤到了柔佛海峡对面，并且炸毁了身后的长堤。但是，英军在注意让新加坡免遭海上攻击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如何防止日军通过海峡入侵。面向陆地的防守一片混乱。直到这时候，英军还没有任何计划来击退近在咫尺的攻击。守卫新加坡港口的重炮炮位无法移动，甚至无法转动，不能朝即将到来的攻击的方向开火。新加坡几乎没有设防，没有海军力量，没有飞机掩护，而且增援的希望越来越小。食物储备养活不了城里人太长时间。现在有6万多名士兵驻扎在城里，但其中最好的也士气低落，而最差的干脆拒绝打仗。

丘吉尔对此极为恼火。人们一直让他相信新加坡岛是一座堡垒，于是他开始质疑手下军事指挥官的能力。在参加战时内阁会议时，首相变得异常暴躁。布鲁克将军说，丘吉尔经常突然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你们的军队中连一个能打胜仗的将军都没有吗？难道任何一位都没有办法？难道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输掉一场又一场战役吗？”^[27]他对海军元帅庞德抱怨说，敌人的小艇自由自在地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附近行动，这种状况“必须看作英国海军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过失”。^[28]在收到韦维尔关于新加坡陆上防御的悲观报告后，他变得怒不可遏。他在1月19日告诉英国的参谋长们：“我必须承认韦维尔的电报让我感到震惊。我从没有片刻的光景想到……新加坡这座堡垒，加上半英里至一英里宽的坚固护城河，竟然不能完全抵挡住来自北面的攻击。如果要拿一座岛屿当作堡垒，却没有把它建得固若金汤，那还有什么用呢？……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当中怎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向我指出这一点呢？……我警告诸位，这可能会成为曝光的最大丑闻之一。”他要求这座岛城“变成一座堡垒，死守到底。不要有投降的幻想”。^[29]

日军司令山下奉文将军准备强攻新加坡。部队、登陆艇和重炮被部

署到了海峡北岸的重要位置上。2月7日夜晚，日军在最近被毁的主要堤道的左侧发动了一次牵制性进攻；第二天夜晚，日本第五师和第十八师乘小船从岛的西侧穿过海峡，这才是主要的进攻。他们冒着澳大利亚第24机枪营的猛烈射击冲上了岸。澳大利亚士兵顽强抵抗，但无法阻止入侵者占领据点。到凌晨的时候，守军开始后退。柔佛海峡很浅，低潮时，日本士兵头顶步枪就可以轻易涉过。小股日本步兵在岛屿西部的几个地方上岸，迎着初升的阳光和不断瓦解的守军冲进了这座城市。他们遇到的英联邦军队四散而逃，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日军的杰出工程师在柔佛海峡上重建了堤道，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成群结队的坦克、卡车和重型火炮就开了过来。

韦维尔于2月9日飞到新加坡城，与当地的指挥官珀西瓦尔将军视察了防线。他当场提醒指挥官，城里的英军人数远超敌人。他在2月10日写道：“我们必须打败他们。我们所有的战斗声誉以及大英帝国的荣耀都押在了这里。尽管局面更加不利，可美国人在巴丹半岛一直坚守着，苏联人正在抵挡德军精锐，几乎完全缺乏现代化装备的中国人则已经与日本人相持了四年。如果我们自夸为堡垒的新加坡向兵力少于自己的敌人投降，我们将颜面尽失。”^[30]他下令死守到底，哪怕军队和民众会遭到屠杀。他于2月11日飞回爪哇，当天晚上向丘吉尔汇报：“新加坡战役进展并不顺利。……一些部队士气低落，没有一支队伍的士气达到我想要看到的水平。”^[31]他说守军有一种“自卑情结，这种情结是由日本人大胆而熟练的战术以及他们的制空权造成的”。^[32]

失败的情绪到处蔓延。有人听到澳大利亚士兵说：“伙计，让马来亚和新加坡见鬼去吧。海军丢下了我们，空军丢下了我们。如果那些棒子〔本地人〕都不为自己的土地而战，咱们为什么要上？”^[33]这是大多数一线战斗人员持有的态度。在士兵看来，这里远离家乡，目标又注定要失败，为什么要无谓地舍去自己的生命？

日本人不断向新加坡市中心进军，控制了向新加坡提供饮用水的淡水水库。仅剩的一点长期坚守的希望也破灭了——如果不采取其他措

施，那么这座大城市里的人会在几天内渴死。全城都可以听到日本大炮不祥的重击声和炮弹的呼啸声。黑色油烟从炸毁的石油储罐的烧焦外壳上升起。惊慌失措的人群冲向码头，努力争取登上或乞求乘上最后一批离开的船。在港口里，有艘船上的一位美国水兵回忆说：“轰炸时许多人死在了码头上，一片混乱。所望之处全是死人。水中甚至有鲨鱼和人的死尸四处漂流。”^[34]

当山下得知这座城市里的英军人数是先前情报估测人数的两倍时，他大吃一惊，甚至产生了动摇。但他决定虚张声势，通过谈判迫使对手投降。2月14日，山下让一架飞机飞到英国防线后面，给珀西瓦尔空投了最后通牒。“根据骑士精神，我们有幸劝阁下投降。……从现在开始，抵抗毫无益处，只能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增加上百万平民的危险，使他们遭受枪炮和刀剑的痛苦。”^[35]同一天，韦维尔禁止珀西瓦尔考虑投降的提议，他敦促说：“你必须继续对敌人造成最大的伤害，时间越长越好。有必要的话，要组织巷战。你牵制敌人并造成伤亡的行动可能会对其他战区产生重大影响。”^[36]然而，与此同时，韦维尔向丘吉尔发电报说，新加坡已经完了；当晚和英国参谋长们商议后，首相同意新加坡投降。

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星期日早上，珀西瓦尔打着休战旗与一位日本大佐一起去见山下。这次会面被一群日本记者、摄影师和摄制组记录下来，大肆渲染。山下要求无条件投降，并拒绝在对方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之前停火。山下承诺妥善对待平民并且尊重战俘的权利（这两个承诺都没有兑现）。珀西瓦尔签署了投降书。当天晚上8时30分，敌对行动停止了。

“东方直布罗陀”陷落了。经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战斗，守军就向兵力不足自己一半的敌人投降了。即使在当时，它也被认为是英国军事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幕。《每日镜报》的一篇社论总结了英国人的感受：“日本人摧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的基石，并把它竖起来作为一块嘲笑勇敢者的纪念碑，这些勇士是为那些良心有愧之人的愚蠢行为而

死的。”[\[37\]](#)

输掉押在新加坡身上的赌注以后，看到从桌子上扫过的大块筹码，韦维尔没有假装东印度群岛可以幸免于难。事实上，他甚至不想增援那里，以免增援的人员和物资拱手让给敌人。爪哇岛是仍然掌握在盟军手中的唯一的大岛，该岛有500英里长，东西两翼都受到入侵的威胁。珀西瓦尔投降后的第二天，韦维尔告诉丘吉尔：“敌人很快就会进攻爪哇岛，只有当地的海空力量占据优势，才能防止敌军登陆。现有事实表明，这种优势是绝不可能得到的。”[\[38\]](#) 1942年2月21日，他又强调了这一观点：

恐怕四国联军的防守区域已经崩溃，爪哇岛现在不可能防御很长时间。……局面总是取决于空战。……我看这个司令部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我不想抛弃这些坚强的荷兰人，我将在这里一直和他们并肩战斗到底，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有效果的话。[\[39\]](#)

1942年1月—2月，日军进军东印度群岛



得到这个暗示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解散了美英荷澳司令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地面部队和航空兵向南撤到澳大利亚或向西撤到缅甸，在那里保存有生力量，为日后的战斗做准备。韦维尔奉命飞往印度，重新担任驻印度英军总司令。

决定撤出陷入困境的东印度群岛虽然无情却合乎逻辑——在菲律宾和马来亚，盟国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士兵，却几乎没有任何战果。然而，荷兰人仍然因为英美决定将他们排除在盟军高层指挥部以外而生气，因此不打算加入总撤退。在欧洲，他们的祖国早已被纳粹占领，荷兰的流亡政府要拼死捍卫剩余的海外领土。荷兰人已经来到这些炎热肥沃的岛屿上300多年。许多荷兰军官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东印度群岛度过的。无论当地人的感受如何，荷兰人为爪哇岛而战斗的热情，都丝毫不亚于为了自己的国土而战斗的热情。

由于韦维尔及其参谋离开爪哇岛去了印度，荷兰指挥官控制了所有剩余的陆海空部队。哈特将军已自荐返回美国并得到许可，海军中将赫尔弗里赫开始指挥四国舰队的剩余力量，包括留下来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舰船，尽可能打击入侵的舰队。大多数舰船被组建成“联合突击部队”，基地位于爪哇东部北海岸的泗水。这支多国小型舰队大部分由年代久远的老式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听从海军中将卡雷尔·W.F.M. 多尔曼的指挥。

联合突击部队的官兵目睹过日本占有制空权后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的致命打击。在2月份，盟军舰队多次遭到空袭。2月4日，日本轰炸机袭击了巴厘岛北部的盟军特混舰队，重创美国巡洋舰“休斯敦号”和“马布尔黑德号”。“休斯敦号”的尾部炮塔被炸毁，“马布尔黑德号”则勉强开往锡兰进行大修。2月15日，在苏门答腊岛东部的巴邻旁附近，日本G3M轰炸机连续攻击这支舰队，从高空投下大批炸弹。凭借高水平的掌舵和大幅度的机动，多尔曼的舰队设法躲开了大部分炸弹，但是澳大利亚的轻型巡洋舰“霍巴特号”和两艘美国驱逐舰被炸伤，多尔曼被迫发出信号，命令舰队穿过加斯帕海峡，向巴达维亚撤退。2月中旬，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指挥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周围游弋，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盟军舰队发动突然的、压倒性的航母空中打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比盟国在太平洋所拥有的任何舰队都要强大，在东印度群岛这些受困岛屿的周围更是无可匹敌。2月19日，航母舰载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由肯达里和安汶的陆基轰炸机配合）

把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变成了废墟，居民逃进了广阔的红色内陆。那天晚些时候，一群零式战斗机出现在泗水上空，在一场大规模的空中混战中，40架盟军战斗机着火坠落。

盟军空中力量的迅速减少使多尔曼难以判断局势，而日本海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则在稳步提升。盟军的小舰队一直在行动，因为相互矛盾且往往有错的情报而四处奔走。他们很少在天上看到友军飞机。到2月底，军官和船员都疲惫不堪，焦虑不安。一名美国舰长称船员“心里异常紧张”。^[40]通信不畅、设备故障、技术倒退和港口设施不足困扰着他们。加油是一个反复令人头痛的问题——泗水和巴达维亚的储油罐总是处于耗竭的边缘，那些本来可以帮忙的石油工人已经逃离了现场。军舰经常被迫在只装了半箱燃料，或只储备了部分弹药和鱼雷的情况下出海。东京广播电台中传出的阴险女声用带有加利福尼亚州口音的英语嘲弄着美国人。她用嘲弄的语气哀叹：“可怜的美国男孩，你们的舰艇很快就要被击沉了。你们没有机会。为什么要捍卫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荷兰和英国的外国土地？”^[41]

即使在新加坡战役的高潮阶段，日本进军东印度群岛的行动也没有片刻停歇。山本五十六在停泊于柱岛的旗舰“长门号”上指挥战役，他决心不给盟军片刻休息的时间，也不给他们任何喘气的空间。他坚持夺取爪哇岛，因为爪哇岛是该地区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岛屿。在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两支入侵舰队以巨大的钳形攻势进军爪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两栖入侵。东部攻击舰队19日从苏禄海的霍洛岛起航，包括41艘运输舰和货船，以及1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组成的警戒队。西部攻击舰队由56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组成，由3艘巡洋舰、1艘轻型航母以及至少25艘驱逐舰护航。这支舰队2月18日从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起航。那两支排成长列的舰队将分别到达婆罗洲的东部和西部，并在500英里长的爪哇岛两边卸下部队。还有3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支援部队”被派往附近，如有需要可以随时行动。山本正确地推断出，盟军剩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太弱，不会对这次大规模的军事

行动造成威胁，所以他命令南云忠一的航母舰队前往印度洋，在那里拦截和消灭所有往西逃窜的盟军舰只。

东部舰队排成两列纵队航行，彼此相距1英里，每列纵队长约20英里。运输舰行动迟缓，由技术不熟练的民事船员掌控——他们“态度散漫”，动辄违反无线电静默的规定，或者在夜里让舰艇露出光亮，这让“天津风号”驱逐舰舰长原为一非常恼怒。舰队前进的速度不超过10节。空袭和潜艇袭击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在舰队上空出现的零星几架盟军轰炸机并没有击中目标，位于泗水外海的美国潜艇没有任何行动。2月初，日本运输舰“亚利桑那丸号”被一枚哑火的鱼雷击中。舰上的一名军官回忆说：“那颗鱼雷似乎是沿着船体滑过，擦过龙骨，并在另一边继续前进，冒出一串串气泡，最后在左舷外沉到了水底。”^[42]这是在整场战争的第一年里持续困扰美国潜艇的一个问题。

空中和潜艇的目视发现报告了东部攻击舰队接近的消息。2月24日，赫尔弗里赫中将命令几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从爪哇西部的丹戎不碌港向泗水进发，在那里和多尔曼的舰队会合。26日晚上，联合突击部队从泗水出击，在南太平洋典型的壮丽落日景象中向北全速前进。尽管派出了额外的瞭望员，但是多尔曼的舰队并没有发现敌人的痕迹。当黎明来临时，多尔曼决定回港口加燃料。在后撤时，他收到了赫尔弗里赫命令他回到海上的短讯。他回答：“这一天所有人员已经达到了耐力极限。明天会突破极限。”^[43]但是在2月27日下午2时27分，当舰队进入泗水外围的水道时，新的敌情报告说，日本舰队在北方仅90英里处。多尔曼的旗舰掉转方向，用清晰的英国旗语向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伴发出信号：“我前去拦截敌方船只，跟着我，稍后详细说明。”^[44]

联合突击部队现在有2艘重型巡洋舰，3艘轻型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在多尔曼的旗舰“德·鲁伊特号”巡洋舰的带领下，整个部队排成一系列纵队离开了泗水港。船员们在危险的条件下连续数周在海上作业，没有多少喘息的时间，身体上的疲惫已开始对他们的表现产生负面影响。但现在他们众志成城。他们排成三列纵队航行，“德·鲁伊特号”带着三

个国家的另外四艘巡洋舰——“埃克塞特号”“休斯敦号”“珀斯号”，以及“爪哇号”。这天天气很好，能见度较高，风力不大，海浪不高。英国的驱逐舰作为警戒舰在前面航行，美国和荷兰的驱逐舰则紧跟在巡洋舰的正后方和左后方。老式的四烟囱驱逐舰喷出黑色的烟雾，在大型军舰的尾流中颠簸前行。一艘荷兰驱逐舰出现发动机故障，将整支舰队的速度限制在了26节。

多尔曼难以让说英语的下属理解自己的意图，这凸显了这支舰队的多国特点，也体现了它临时统一指挥的特性。一艘美国驱逐舰的舰长形容这种交流障碍是“荒唐可笑的”。^[45]联合突击部队没有下发过旗语通信手册，也没有通用代码。多尔曼的旗舰通过闪光信号灯，用清晰的英国旗语来交流，但在烟雾弥漫的情况下，以及海军近战造成的混乱中，这种做法根本不实用。在某些情况下，这位将军的命令会通过荷兰式高频无线电信号发送给“休斯敦号”，然后“休斯敦号”通过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美国船只使用的短距离语音线路）将其转发给其他舰艇。在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多尔曼的命令有时会以错误的顺序到达其他舰艇，让舰长们疑惑不解。

日本巡逻机跟踪着多尔曼的舰队，并通过无线电向东部攻击舰队掩护部队的指挥官高木武雄中将报告。在还没有目视发现的时候，高木就知道多尔曼的速度和航线了，而且对其舰队的构成非常了解。他让运输舰向北方行驶，离开危险地带，并带领巡洋舰和驱逐舰向南高速驶向敌人。下午4点，日本巡洋舰“神通号”的瞭望员报告说东南方发现了几艘舰艇的船体以上部分。地平线上的一片桅顶表明那里有一支大型盟军舰队。日本人可以看到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旗在风中飘动。“天津风号”驱逐舰的原为一少佐用双筒望远镜察看敌情，并将所见与舰艇识别图进行比较，在“德·鲁伊特号”的船体还没有进入其视野时就辨认出了它是旗舰。

两支舰队以45度角相互接近。在相距2.8万码时，日本重型巡洋舰“羽黑号”和“那智号”的8英寸火炮开火了。色彩鲜艳的水柱在盟军舰

队的一侧升起——炮弹注入了彩色染料标记，用于射击校准——但是射程太远，没有一发落到附近。在双方距离缩小的过程中，日本的水上飞机在上空盘旋，通过无线电将弹着信息反馈给高木的巡洋舰。敌人的弹着点逐渐逼近。为了避免遭到纵射，多尔曼下令向左转20度，这样的机动可以使他和敌舰更加平行，让巡洋舰发动舷炮齐射。航线改变几分钟后，“休斯敦号”和“埃克塞特号”开火了。红色水柱在日本纵队后方升起，但没有一发炮弹射中。

5点刚过没几分钟，“埃克塞特号”中部被“羽黑号”发射的穿甲弹击中。炮弹飞进锅炉房爆炸，摧毁了这艘英国巡洋舰的几个锅炉。它马上失去了大约一半的动力，掉头离开战线，低速向洒水艰难驶去。“休斯敦号”跟在它的后面，为了避免碰撞也跟着掉头，结果使盟军的纵队出现了混乱。“休斯敦号”的TBS电台被一颗哑弹击中，失去了作用，切断了与多尔曼旗舰的无线电通信联系。美国驱逐舰“约翰·D. 爱德华兹号”的舰长埃克尔斯中校写道：“从那时起，所有的通信都只能靠闪光灯传递，烟雾、烟幕和快速机动对这些灯光信号造成了很多干扰。”^[46]似乎谁都接不到或是理解不了多尔曼的命令。

下午5时15分，几分钟前发射的一枚远程日本鱼雷击中了荷兰驱逐舰“科顿艾尔号”，在一阵强烈的闪光和巨响中，这艘驱逐舰被掀出海面，断为两截，折叠起来沉了下去。美国驱逐舰发射了40枚鱼雷进行反击，但是它们或者没有击中目标，或者击中了敌舰但并没有爆炸。日本93型鱼雷从美国舰艇周围的海面上滑过，并且有几枚在到达射程尽头后自动爆炸了。美国舰船上的瞭望员不知道敌人的鱼雷射程有这么远，误认为联合突击部队一定是受到了潜艇的攻击。局势非常混乱。埃克尔斯中校在行动报告中写道：“我们只能靠水晶球来预测联合突击部队指挥官的意图。接下来的命令是‘反击’‘停止反击’‘放烟’‘掩护我撤退’等。”^[47]下午5时25分，多尔曼下令释放的烟幕使得巡洋舰不再与敌军纠缠，向东南方的爪哇岛海岸撤去。荷兰人希望能够摆脱日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因为这些舰艇已经远远胜过了他们。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当

天夜里晚些时候或第二天黎明突袭并击沉日本的运输舰。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联合突击部队向南逃跑，但是后来又在黑暗的包围下原路返回，高速向西北方向行进。多尔曼希望躲开高木的军舰，直接攻击运输舰，但由于没有空中侦察，他只能碰运气。日本巡洋舰派出的侦察机在盟军舰队上空轰鸣，投下照明弹，希望能照亮盟军舰队，让日本的军舰开炮攻击。日本的巡洋舰也发射了照明弹，并用探照灯四处搜寻，但是无法使敌人进入夜间战斗的有效范围。晚上8点前不久，多尔曼再次改变航线，向南疾驶，直到看见月光照耀下的爪哇岛。美国驱逐舰的燃油已经所剩不多，而且用光了鱼雷，被派回泗水进行补给。晚上9时25分，英国驱逐舰“朱庇特号”撞上了一枚荷兰水雷并爆炸，几分钟后沉入水中。现在多尔曼希望冲破重重的困难，绕过日本的警戒舰群，攻击运输舰群。剩下的四艘盟军巡洋舰掉头向北，独自航行，驱逐舰则因为燃油不足、鱼雷耗尽或者运气不佳而逐渐减少。

日本巡洋舰的侦察机继续秘密跟踪它们。晚上9时50分，一颗降落伞照明弹从盟军舰队上方落下来。水兵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己已经暴露了——照明弹不断从天空落下，表明敌军已经发现他们。高木将军带领舰队逼近，准备攻击。“那智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用日本海军性能良好的夜视镜扫视着地平线，晚上11点报告目视发现了多尔曼的舰队。双方都开火了，夜空中闪过重型舰炮和照明弹的火光。“亚利桑那丸号”的高级船员益田令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他说当时“枪炮雷鸣，火光闪烁，黑暗的天空中升起照明弹，炮火成排”。^[48]两艘巡洋舰“羽黑号”和“那智号”向北转向，拉近了距离。晚上11时53分，当距离缩小到8000码时，两艘巡洋舰分散发射了12枚鱼雷。13分钟后，“德·鲁伊特号”在雷霆般的响声中爆炸，断成两半。大火迅速蔓延到了弹药库，引发了二次爆炸，爆炸的火光很快照亮了周围数英里的海面。“德·鲁伊特号”的两截船体，连同367名水兵，包括多尔曼将军在内，迅速沉到波浪以下。几乎就在同时，“爪哇号”也发生爆炸，舰首迅速下沉。这艘英国巡洋舰连同上面的大多数水手也沉没了，只有少数水兵设法跳入了大

海。日本巡洋舰甲板上的水兵们欢呼雀跃，高喊：“万岁！”^[49]

多尔曼对幸存的舰只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脱离战斗并撤退到丹戎不碌（巴达维亚的港口）。在黑暗中，“珀斯号”和“休斯敦号”逃脱了。爪哇海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内湖，盟国任何进一步的抵抗都只能导致全军覆没。剩下的选择只能是让四国舰队分散的残余舰艇在没有被发现和摧毁之前逃跑，寄希望于日后再战。撤退的出路很少。北边，日本已经完全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巴厘海峡位于爪哇岛东面，是从泗水向南撤退的最快路线，但这里太浅，巡洋舰难以通过。已经撤退到泗水的四艘美国四烟囱驱逐舰设法在2月份的最后一个夜晚偷偷穿过了这个海峡。它们与前来拦截的日本特混舰队远距离交过火，但还是在黑暗中设法逃脱了。一周后，它们到达了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

已经受伤的英国巡洋舰“埃克塞特号”在皇家海军“英康特号”驱逐舰和美国的“波普号”驱逐舰的护航下，当天晚上从泗水向北溜了出来。它们希望能够冲破重重险阻，在第二天躲开侦察，紧靠婆罗洲南海岸航行，然后在第二天夜里高速航行到爪哇西面的巽他海峡。^[50]起初，在战斗中受损的“埃克塞特号”速度只能达到16节，不过机械师最终使它慢慢达到了23节。3月1日破晓，能见度非常好，这让人觉得不安。三艘舰艇很快同时被飞机以及正在巡逻的日本舰艇发现。高木将军带领舰艇逼近，准备以强击弱。两支独立的日本特混舰队，包括4艘重型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从两个方向逼近。上午9时40分，一场激烈的远距离炮火对决开始了，三艘盟军舰艇都被多次击中。大约上午11点时，日本人发动了一次有效的鱼雷散射，其中一枚鱼雷撞上了已经受损的“埃克塞特号”。“埃克塞特号”船身倾覆，于11时30分沉没。“英康特号”被数枚鱼雷击中，并在5分钟后沉没。“波普号”是盟军在爪哇海海域剩余的最后一艘战舰，遭到了轻型航母“龙骧号”上的飞机不慌不忙的轰炸，午后不久就沉没了。舰上的幸存者被日本驱逐舰打捞起来，接下来三年半的时间他们像是在地狱中度过的。

2月28日中午时分，“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将前一夜的完败抛在脑

后，驶进了丹戎不碌。当天晚上7点，两艘巡洋舰匆忙加完油，开始突围，希望快速溜过巽他海峡。晚上10时15分，在爪哇岛最西端的万丹湾附近，它们偶然发现了一群停泊着的日本运输舰。这是西部攻击舰队的分队，被派往岛的西端进行登陆。一轮满月照亮了整个场景。这些运输舰正在海滩上卸载士兵和补给，缺乏保护，此时正是千载难逢的进攻机会。日本人在附近有压倒性的海军力量——7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还有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不过这些舰艇大部分还在北边较远的地方。“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对运输舰队开了火。起初只有一艘日本驱逐舰可以还击，但其他日本水面舰艇全速冲入战场，力量迅速超过了盟军的两艘巡洋舰。3艘日本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加入战斗，向它们发射了至少87枚鱼雷。局势发展为一场混战，而由于日本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以及舰艇作战位置的关系，从几个方向同时开来的十几艘日本舰艇挤在了一起，使场面更加混乱。

几枚鱼雷越过了两艘盟军舰艇，击中了战场外没有防备的运输舰。面对这种压倒性的力量，“休斯敦号”和“珀斯号”不可能坚持太久。离海的每个方向都被敌舰堵住了，所有敌舰都在猛攻这两艘巡洋舰。日本飞机在空中盘旋。最后的时刻非常混乱，完全没有了希望。“休斯敦号”的A.L. 马厄中校后来写道：“所有仍能运转的通信系统接收到的都是各种毫无希望的报告：损失报告、鱼雷接近的报告、新战舰加入攻击的报告，或是攻击目标发生改变的报告。”[\[51\]](#)这两艘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舰也回敬了摧残它们的日舰，但是它们在交火中受到的损失更大。

在这场大混战中，5艘日舰被己方炮火击中。两艘舰艇沉没，一艘是扫雷艇，一艘是运输舰。在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对盟军两艘巡洋舰发射如此多的鱼雷，击中停泊着的运输舰也许在所难免。由于舰艇距离海岸很近，大部分舰上的水兵安全上岸。陆军第十六军司令今村均将军游上了岸，摇摇晃晃地爬上海滩，从头到脚都浸满了燃油。

在午夜，“珀斯号”被一枚8英寸的炮弹击中，不久之后又在水线下被一枚鱼雷击中，无力回天，很快便沉没了。“休斯敦号”也被猛烈的炮

火和三枚鱼雷连续击中。午夜刚过，一枚炮弹穿透了轮机舱，打破了蒸汽主管，烫死了轮机舱中的所有水兵。蒸汽从甲板上窜出来，导致“休斯敦号”严重地向右倾斜。3月1日0时25分，舰长鲁克斯下令弃船。不久之后，“休斯敦号”舰桥被击中，舰长身亡。“休斯敦号”呈侧倾状态，0时45分沉入海中。只有大约一半的水兵幸存了下来。“珀斯号”的307名水兵和“休斯敦号”的368名水兵被日本舰艇打捞起来，并在战俘营中被迫劳动，一直到战争结束。

3月1日，赫尔弗里赫将军命令爪哇岛南岸芝拉扎港的盟军剩余舰艇全部开走。有些舰艇逃脱了，而其他舰艇则被南云忠一的舰载机拦截并击沉。“艾德索号”驱逐舰和“佩科斯号”加油船于第二天在爪哇岛南方被击沉。



1.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



2. 生来就被养育要从容面对战争之苦的一代人。阿肯色州一家康复诊所外的两个儿童，约20世纪30年代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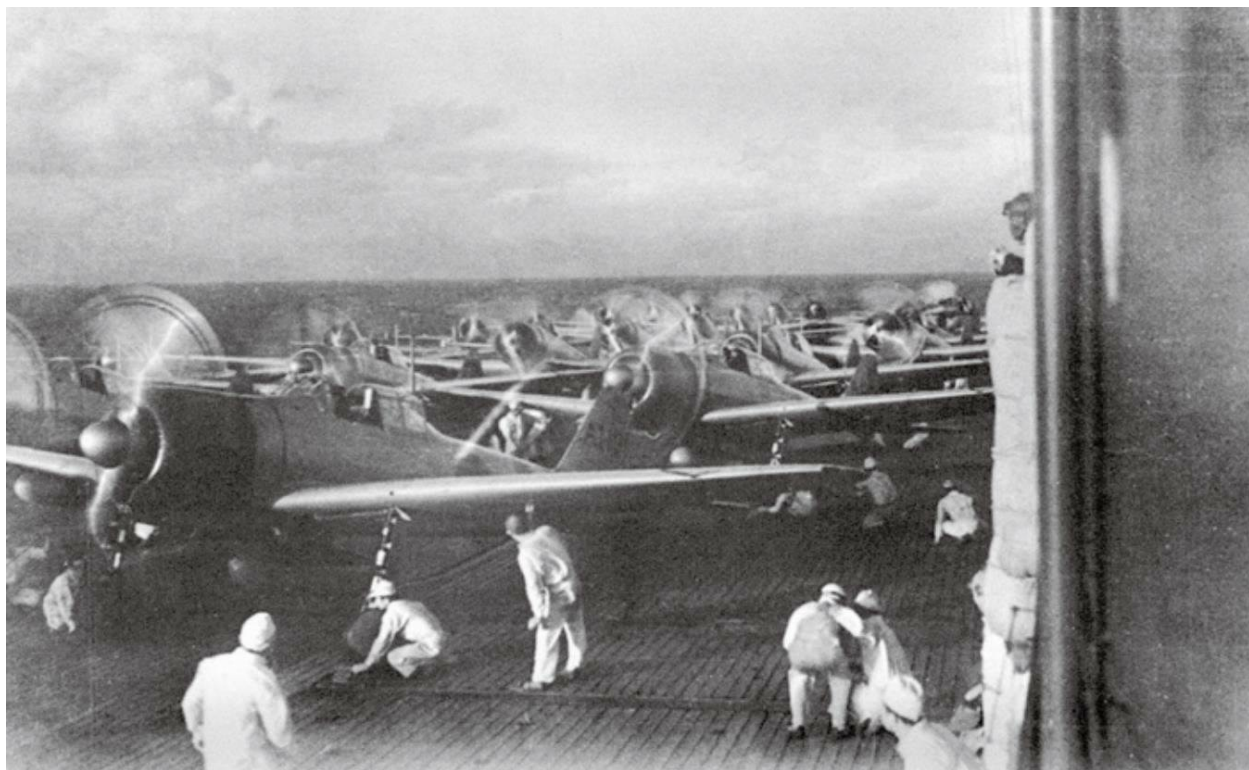
3. 1941年12月7日，“肖号”驱逐舰被击中后弹药库发生猛烈爆炸



4. “战列舰大街”，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从左至右，分别是被击中的“西弗吉尼亚号”、“田纳西号”和“亚利桑那号”战列舰



5. 美国“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前弹药库爆炸后不久



6. 1941年12月7日，“赤城号”上的轰炸机正在准备对珍珠港的第二轮空袭



7. 一群人聚集在白宫外，1941年12月7日

Honolulu Star-Bulletin 1st EXTRA

Published by the Honolulu Star-Bulletin Co., Inc.

8 PAGES—HONOLULU, TERRITORY OF HAWAII, U. S. A., SUNDAY, DECEMBER 7, 1941—8 PAGES

★ PRICE FIVE CENTS

WAR!

(Associated Press by Transpacific Telephone)

SAN FRANCISCO, Dec. 7.—President Roosevelt announced this morning that Japanese planes had attacked Manila and Pearl Harbor.

OAHU BOMBED BY JAPANESE PLANES

SIX KNOWN DEAD, 21 INJURED, AT EMERGENCY HOSPITAL

Attack Made On Island's Defense Areas

WASHINGTON, Dec. 7.—Text of a 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detailing the attack on the Hawaiian islands is:

"The Japanese attacked Pearl Harbor from the air and all naval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on the island of Oahu, principal American base in the Hawaiian islands."

Oahu was attacked at 7:55 this morning by Japanese planes.

The Rising Sun, emblem of Japan, was seen on plane wing tips.

Wave after wave of bombers streamed through the clouded morning sky from the southwest and flung their missiles on a city resting in peaceful Sabbath calm.

According to an unconfirmed report received at the governor's office, the Japanese force that attacked Oahu reached island waters aboard two small airplane carriers.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at the governor's office either an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bomb the USS Lexington, or that it had been bombed.

CITY IN UPROAR

Within 10 minutes the city was in an uproar. As bombs f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and in defense areas the defenders of the islands went into quick action.

Army intelligence officers at Ft. Shafter announced officially shortly after 9 a. m. the fact of the bombardment by an enemy but long previous army and navy had taken immediate measures in defense.

"Oahu is under a sporadic air raid," the announcement said.

"Citizens are ordered to stay off the streets until further notice."

CIVILIANS ORDERED OFF STREETS

The army has ordered that all civilians stay off the streets and highways and not use telephones.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attack has registered some hits was shown by three billowing pillars of smoke in the Pearl Harbor and Hickam field area.

All navy personnel and civilian defense worke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women, have been ordered to duty at Pearl Harbor.

The Pearl Harbor highway was immediately a mass of racing cars.

A trickling stream of injured people began pouring into the city emergency hospital a few minutes after the bombardment started.

Thousands of telephone calls almost swamped the Mutual Telephone Co., which put extra operators on duty.

At The Star-Bulletin office the phone calls deluged the single operator and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is newspaper, for sometime, to handle the flood of calls. Here also an emergency operator was called.

HOURLY ATTACK—7:55 A. M.

An official army report from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made public shortly before 11, is that the first attack was at 7:55 a. m. Witnesses said they saw at least 50 airplanes over Pearl Harbor.

The attack centered in the Pearl Harbor. Army authorities said:

"The rising sun was seen on the wing tips of the airplanes."

Although martial law has not been declared officially, the city of Honolulu was operating under M. Day conditions.

It is reliably reported that enemy objectives under attack were Wheeler field, Hickam field, Kaneohe bay and naval air station and Pearl Harbor.

Some enemy planes were reported shot down.

The body of the pilot was seen in a plane burning at Wahiawa.

Oahu appeared to be taking calmly after the first uproar of queries.

ANTI-AIRCRAFT GUNS IN ACTION

First indication of the raid came shortly before 8 this morning when anti-aircraft guns around Pearl Harbor began sending up a thunderous barrage.

At the same time a vast cloud of black smoke arose from the naval base and also from Hickam field where flames could be seen.

BOMB NEAR GOVERNOR'S MANSION

Shortly before 9:30 a bomb fell near Washington Place, the residence of the governor, Governor Poindexter and Secretary Charles M. Hite were ther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bomb killed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man across the street in front of the Schuman Carriage Co. where windows were broken.

C. J. Daniels, a welder, found a fragment of shell or bomb at South and Queen Sts. which he brought into the City Hall. This fragment weighed about a pound.

At 10:05 a. m. today Governor Poindexter telephoned to The Star-Bulletin announcing he has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the entire territory.

He announced that Edward L. Dwyer,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major disaster council, has been appointed director under the M-Day law's provisions.

Governor Poindexter urged all residents of Honolulu to remain off the street, and the people of the territory to remain calm.

Mr. Dwyer reported that all major disaster council wardens and medical units were on duty within a half hour of the time the alarm was given.

Workers employed at Pearl Harbor were ordered at 10:10 a. m. not to report at Pearl Harbor.

The mayor's major disaster council was to meet at the city hall at about 10:30 this morning.

At least two Japanese planes were reported at Hawaii department headquarters to have been shot down.

One of the planes was shot down at Ft. Kamehameha and the other back of the Wa-

Hundreds See City Bombed

Names of Dead and Injured

Hundreds of Honolulu who crowded to the top of Punchbowl mountain after bombs began to fall, saw spread out before them the whole panorama of surprise attack and defense.

Far off over Pearl Harbor the white city was brilliant in the sun.

The sunburst was still in the sky when the sunburst was reported at 7:55 a. m. to be the surprise attack from the Japanes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Japanese force that attacked Oahu reached island waters aboard two small airplane carriers.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at the governor's office either an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bomb the USS Lexington, or that it had been bombed.

Within 10 minutes the city was in an uproar. As bombs f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and in defense areas the defenders of the islands went into quick action.

Army intelligence officers at Ft. Shafter announced officially shortly after 9 a. m. the fact of the bombardment by an enemy but long previous army and navy had taken immediate measures in defense.

"Oahu is under a sporadic air raid," the announcement said.

"Citizens are ordered to stay off the stree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ithin 10 minutes the city was in an uproar. As bombs f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and in defense areas the defenders of the islands went into quick action.

Army intelligence officers at Ft. Shafter announced officially shortly after 9 a. m. the fact of the bombardment by an enemy but long previous army and navy had taken immediate measures in defense.

"Oahu is under a sporadic air raid," the announcement said.

"Citizens are ordered to stay off the stree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ithin 10 minutes the city was in an uproar. As bombs f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and in defense areas the defenders of the islands went into quick action.

Army intelligence officers at Ft. Shafter announced officially shortly after 9 a. m. the fact of the bombardment by an enemy but long previous army and navy had taken immediate measures in defense.

"Oahu is under a sporadic air raid," the announcement said.

"Citizens are ordered to stay off the stree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ithin 10 minutes the city was in an uproar. As bombs fell in many parts of the city, and in defense areas the defenders of the islands went into quick action.

Army intelligence officers at Ft. Shafter announced officially shortly after 9 a. m. the fact of the bombardment by an enemy but long previous army and navy had taken immediate measures in def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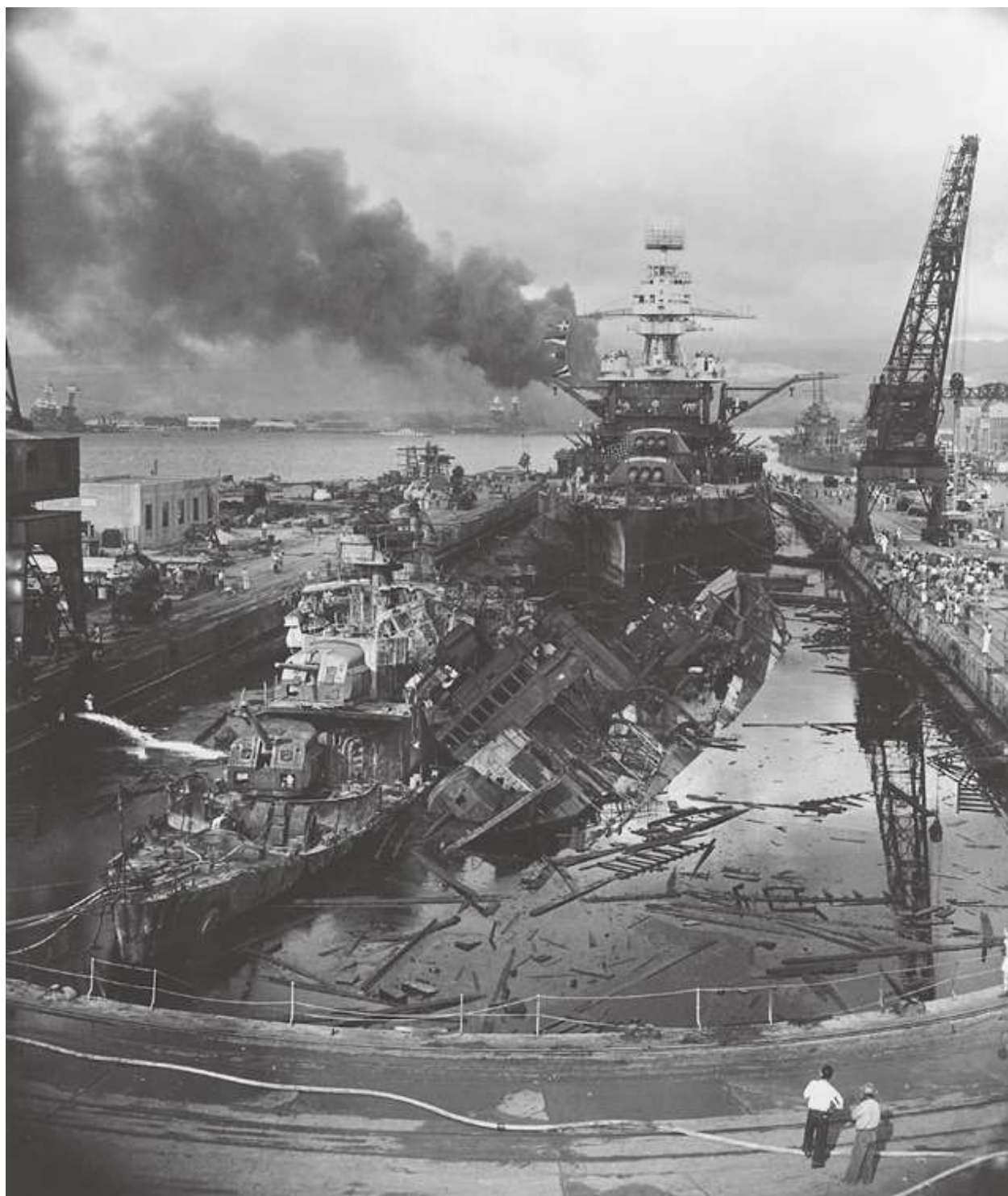
"Oahu is under a sporadic air raid," the announcement said.

"Citizens are ordered to stay off the streets until further notice."

8. 1941年12月7日，《火奴鲁鲁明星公报》报道珍珠港遇袭的号外



9. 罗斯福要求宣战，1941年12月8日



10. 1941年12月7日，在干船坞中被炸毁的“唐斯号”、“卡辛号”和“宾夕法尼亚号”

Declassified per NND 868129



11. 1941年12月10日，沉没的“亚利桑那号”



12. 身着外交官制服的山本五十六，1934年



13. 20世纪40年代初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



14. 尼米兹和他的儿子小切特，20世纪20年代初摄于得克萨斯州，右边男子身份不明



15. 山本五十六，1940年或1941年拍摄的官方肖像



16. “蓝眼睛男人”切斯特·W. 尼米兹，摄于1940年前后



17. 尼米兹将军的官方肖像，可能摄于1940年或1941年，当时他是航海局局长



18. 欧内斯特·J. 金将军的官方肖像，摄于1945年



19.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中将。肖像照，摄于1941—1942年前后



20. 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对媒体，1942年初



21. 国际主义者。这张照片在1942年初摄于白宫



22. 1942年4月，“巴丹死亡行军”开始前，日军在看守被俘的美军



23. 1942年2月15日，珀西瓦尔将军（最右者）前去向日军投降



24. 1942年4月，日军攻克美军在巴丹半岛最后一个据点后庆祝胜利



25.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大黄蜂号”舰长马克·米彻尔与其他执行空袭的机组成员合影



26. 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CV—8），摄于1941年末



27. 杜立德突袭，1942年4月18日。一架陆军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升空



28.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空袭14号机组成员降落在中国江西上饶附近，得到当地军民救援



29. 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CV—5）在南太平洋，摄于1942年4月前后。一架飞机起飞后不久，机组人员拍下了这张照片



30. 道格拉斯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1942年，这种飞机是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武器



31. 美国“尼欧肖号”油轮。在海上加油是美国航母在太平洋战争早期最头疼的事



32. 在珊瑚海战役中，从“约克城号”上面看到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CV—2），1942年5月



33. 1942年5月8日，“列克星敦号”被击中起火后，部分船员开始撤离



34. 珊瑚海战役：“列克星敦号”的终结。就在最后一名船员弃船后不久，一场爆炸将一架飞机炸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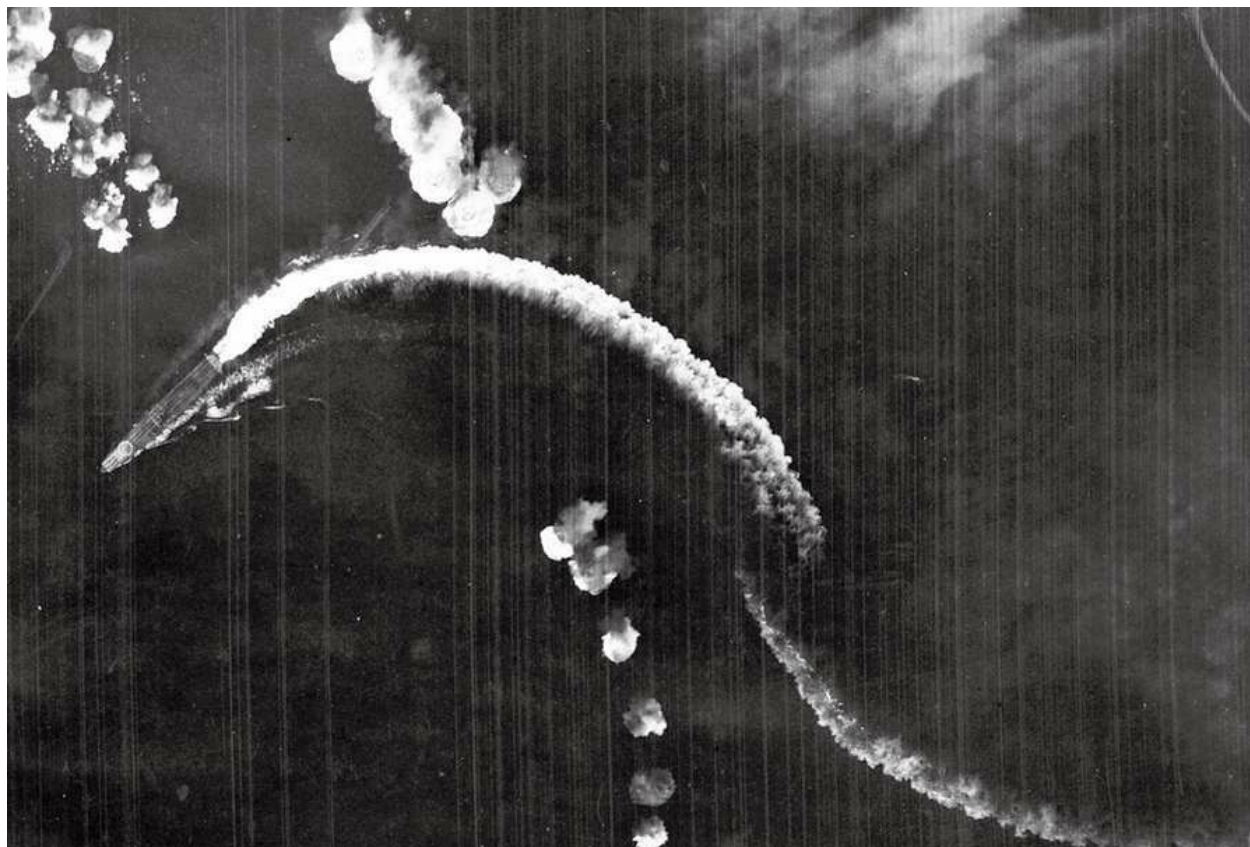
35. 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鱼雷轰炸机准备从“企业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



36. 中途岛战役。一架格鲁曼F4F野猫式战斗机从“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1942年6月4日早晨



37. 道格拉斯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到1942年时，这种飞机已经完全过时了



38. 中途島战役。日本航空母舰“飞龙号”躲避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17轰炸机投下的炸弹，1942年6月4日上午



39. “企业号”上的一名降落信号官引导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降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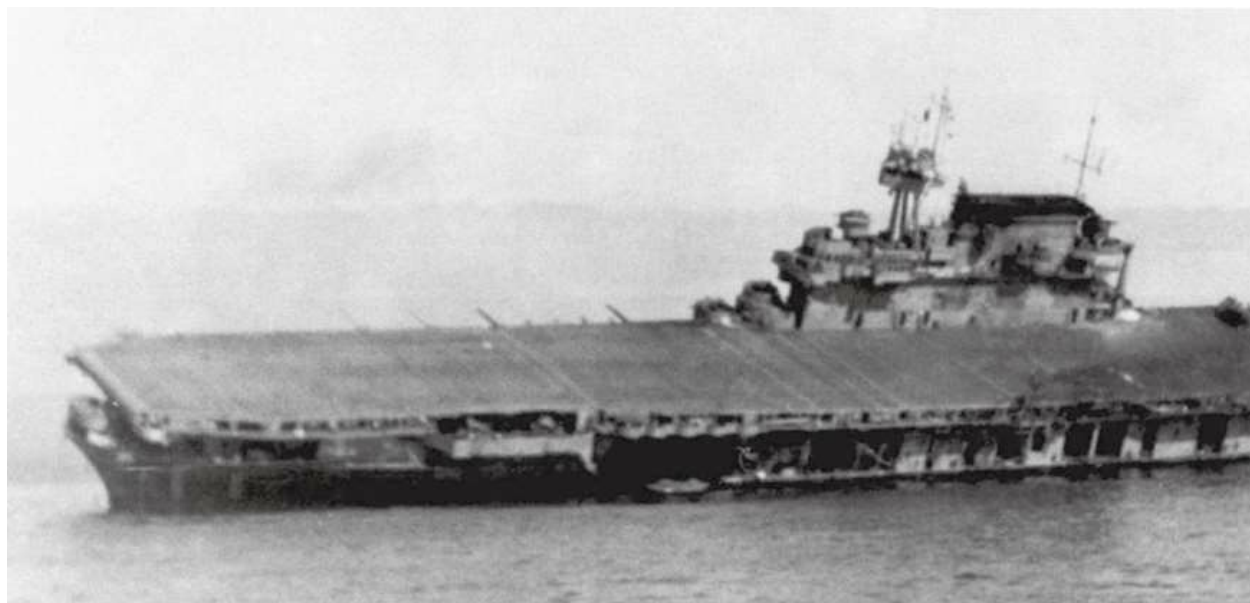
40. 对“约克城号”的空袭，1942年6月4日下午。日本九七式鱼雷轰炸机在发射鱼雷后飞过这艘航母



41. 中途島戰役。1942年6月4日，“約克城號”被三顆炸彈擊中後



42. 1942年6月4日，“约克城号”损管人员正在修复被250千克炸弹炸开的甲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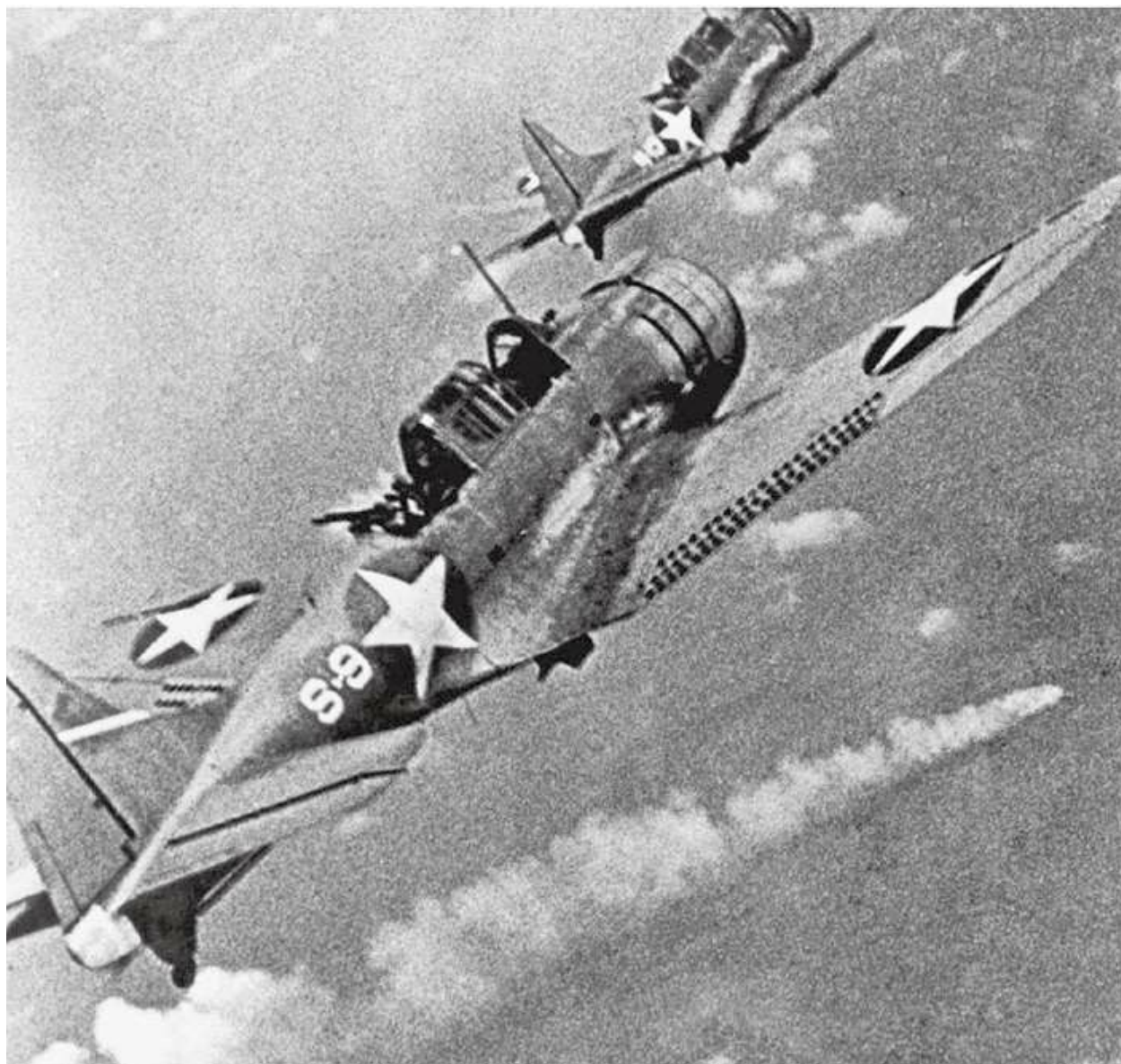
43. 中途島战役。1942年6月6日，被击毁的“三隈号”巡洋舰



44. “约克城号”遭到炸弹和鱼雷袭击，向左严重倾斜，1942年6月4日傍晚



45. 1942年6月6日下午，日本潜艇I-168用鱼雷击沉“哈曼号”和“约克城号”



46. 来自“大黄蜂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准备攻击日本“三隈号”巡洋舰，1942年6月6日

在这些战斗中，四国舰队几乎被全歼，损失10艘舰艇和大约2 173名水兵。在守卫马来屏障的过程中，没有一艘日本战舰被击沉，而此时，马来屏障已经彻底被打破了。战役刚结束的时候，有人批评荷兰指挥官，不过批评中也总是对他们的勇气表示钦佩。逃到澳大利亚的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认为，多尔曼将军没有完全掌控战术和通信，但他补充说，“这位荷兰人带着坚定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参加战斗”并且“在知其

不可而为之的情况下英勇赴死”。^[52]金将军回应了这些观点，称爪哇海的海军行动“展现了极差的战略”，但这种判断可能有失公允。^[53]这一战区的盟军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素质上都与敌人差距太大。美国的亚洲舰队战舰过时，装备落后。马汉的正统观点实际上解释了这些缺点：马汉指出，作战舰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原则来看，那亚洲舰队最多只能说是一个残缺的整体。日本人取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制空权。在空中支援如此不力的情况下，四国舰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有几艘舰艇逃到了澳大利亚，但日本人只是短暂地推迟了2月28日对爪哇的入侵。入侵部队从分布广泛的滩头堡向岛内推进。赫尔弗里赫得到下属军官们的报告，他们断定拯救爪哇的努力注定会失败，并且已收到各自国家要求他们撤退的命令。赫尔弗里赫起初要求四国舰队的剩余舰艇继续抵抗，但是面对英国下属军官的反对，他最终还是承认了不可避免的局面，并同意剩余的英国舰艇撤出。剩余的盟军飞机挤满了乘客，在仓促之间成功从岛上撤离。3月5日，西部中心城市巴达维亚和万隆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爪哇岛上剩下的荷兰部队和英国部队英勇战斗，但所有剩下的抵抗力量都在一个星期内被消灭了。许多爪哇当地人似乎很高兴摆脱荷兰主人。3月9日，日本完全控制了全岛，剩下的盟军部队投降了。

1941—1942年冬季和1942年春季盟军遭受的重大失败一直在各自国家的政府大厅里反复回响，令人难堪。日本的进攻嘲讽了盟军的预测，扼杀了盟军的计划，降低了盟军的士气，破坏了盟军领导者的声誉，动摇了盟军完整的全球联盟。许多英国领袖都认为新加坡固若金汤，丘吉尔也一样——认为这个伟大的“堡垒”绝不会落入日本人手中，觉得那些相信新加坡会陷落的想法是“无稽之谈”和“危言耸听”。^[54]现在议会和新闻界的对手把这些轻率的定论甩到了他的脸上。在回忆录中，丘吉尔挖苦说，美英荷澳宪章是六个政府通过艰辛的谈判而创立的，消耗掉了

数百名文官和军官的宝贵时间和注意力，使用了“最可靠的电码”，向全世界发送了“数万字的电报”，并且保证“依照陆海空三军的要求，其人员代表有着严格的比例”。^[55]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工作刚刚完成，日本的攻击就使所有计划付诸东流了。美英荷澳司令部就是一个死胎。

马来屏障被击得粉碎。日军无论向东、向西还是向南，都不会受到任何阻拦。它甚至可以立即向所有这些方向推进，因为日本人已经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也做好了大范围多战线进攻的准备。3月8日，也就是爪哇岛的盟军投降的前一天，日本第十五军进军缅甸首府仰光。作为英国部队主要补给来源的港口已经被切断，英军士气低落，向北方和西方撤退。英国人现在不得不自问，印度人是否将不断接近的日本人看成入侵者还是救星。

此外，3月8日，日本的侵略部队在新几内亚沿岸的莱城和萨拉马瓦登陆，并开始清理地面，准备建设新机场。这意味着日本将沿着荷属东印度群岛东部的南太平洋岛屿——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北部——继续推进，并直接威胁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交通。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卡廷在与丘吉尔的紧张交流中要求将澳大利亚的几个师从中东撤回，并且拒绝了丘吉尔让这些部队转道去守卫缅甸的恳求——在评论新加坡的守卫战时他甚至用到了“难以饶恕的背叛”这种措辞。^[56]辽阔的南方大陆及其基本无人定居的1.6万英里海岸线毫无防备——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内陆的红色沙漠才是其唯一的真正防御。

南云忠一可怕的第一航空舰队再次消失在浩瀚的大海上。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这支舰队出现在印度洋。4月5日上午，许多军人和平民正在宗教仪式上庆祝复活节，日本的舰载机突然向锡兰西海岸的科伦坡港口发起俯冲。它们只击沉了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商船，但对码头和港口设施造成了重大破坏，还击落了24架起飞拦截的英国飞机。同一天早些时候，南云忠一派更多的飞机，发现并击沉了两艘英国巡洋舰——“多塞特郡号”和“康沃尔号”。4月9日上午，一群日本舰载机出现在锡兰的第二个重要基地亭可马里。与在科伦坡一样，袭击者对岸上支援设施造

成了重大破坏。英国皇家空军的9架“布伦海姆”轰炸机对撤退的“赤城号”进行反击，但没有命中。5架“布伦海姆”轰炸机被击落，还有一些被击伤。当天晚些时候，南云忠一的机群在海上发现了英国航空母舰“赫耳墨斯号”，将它连同护航的一艘驱逐舰一起送入了海底。由于燃料不足，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经马六甲海峡离开印度洋，向北返回。

日本人的航母和潜艇总共摧毁了23艘商船和5艘皇家海军军舰，其中包括“赫尔墨斯号”。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缅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但在英国人看来更糟糕的是，日本人可能会带着运输舰返回，入侵锡兰甚至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缘政治中，印度洋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全球盟军补给线的主动脉，对中国、北非甚至苏联至关重要。它是控制波斯湾的关键，而波斯湾在那时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地。4月初，英国人请求美国人派海军增援印度洋，被金将军拒绝。到4月下旬，美国通信情报部门已经确认，日本人在印度洋没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是盟国仍然害怕德日在波斯湾联合起来，担心轴心国会牢牢控制住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区。

从其他战区也没有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夺取了班加西港，迫使英国人向图卜鲁格撤退。隆美尔将军似乎准备派坦克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发动致命一击，这次战役可能会切断大英帝国的主动脉。在地中海，英国努力向被围困的断粮岛屿马耳他运送补给，但是被敌人的战机和潜艇击退。2月11日和12日，德国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突破法国港口布雷斯特港，溜过英军的封锁，穿越英吉利海峡，从多佛尔海峡巨大的海岸炮台前驶过，完好无损地到达德国。这起被英国媒体刻薄地称为“海峡冲刺”的事件让英国皇家海军气愤不已。德国潜艇不断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击沉商船和油轮，而且这种场面经常在陆地上就能看到，而美国海军显然无力阻止它们。在加利福尼亚，2月23日，一艘日本潜艇在海滩上浮出水面，炮轰了一座炼油厂，这一发生在圣巴巴拉市北部的事件再次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对入侵的恐惧。第二天晚上，洛杉矶的防空炮误以为有日本飞机空袭，万炮齐鸣，导致全城陷入大规模恐慌之中。

在这不祥的几个星期中，最大的折磨就是苏联将要失败的前景。据说希特勒正准备在高加索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春季攻势。红军抵挡得住吗？日本是否会进攻西伯利亚，迫使斯大林在东西两条战线上战斗？

在与罗斯福的通信中，丘吉尔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苦恼。他相当直言不讳，甚至暗示自己的压力不断增大。他在1942年2月19日吐露：“我不喜欢这些天的个人压力，我现在很难集中注意力。”^[57]3月7日他又吐露：“战争的压力现在非常沉重，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局势肯定会更加严峻。”^[58]罗斯福先天的乐观精神在战争的黑暗时期展现了价值。他承认新加坡的陷落会让“那些喜好指点江山又不用负责的人得意一时”，^[59]但他劝这位英国领袖“保持好心情”而且“保持乐观情绪以及巨大的驱动力”。^[60]他劝丘吉尔放下工作，花时间放松一下：“我每个月都要去海德公园玩四天，钻进一个洞，然后向里面挖。只有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才允许别人给我打电话。我希望你也尝试一下，垒几块砖或者画一幅画。”^[61]

但是总统还强调，盟军最好“不断向前看，研究下一步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打击敌人”。^[62]的确，太平洋上的失败损失惨重而且令人震惊，但一味为之痛苦没有任何裨益。“我这个业余战略家有这样一个想法，”他在3月18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再去想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徒劳无益了。它们已经丢了。”^[63]应该立即关注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战区指挥系统来代替已经解散的美英荷澳司令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澳大利亚，将其作为盟军最终反攻的发起地。英国人可能无法保卫澳大利亚，而美国人可能也无法阻止日本进攻印度洋或印度次大陆。因此，总统问，为什么不索性把日本帝国的东西两翼的指挥责任分开，由美国人主导太平洋地区，而英国人主导印度洋和东南亚地区？他在1942年3月7日和9日的两封长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建议。布鲁克将军起初有些怀疑，他在日记中说这个建议“有些可取之处，但是想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赶进美国的怀抱，从而促使大英帝国分

裂”。^[64]但是，目前手头上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英国军队面临的压力使其不可能对太平洋或大洋洲增兵。英国人还能提出什么合理的异议呢？经过短暂而急躁的讨论之后，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勉强同意了。

金将军注意到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命运迅速恶化之后，主张增强这一战区的军事力量，哪怕这意味着撤出一部分等待投放在欧洲的军队。罗斯福总统支持他的观点。总统3月7日直接向丘吉尔指出：“日本进攻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现在非常不妙，如果要稳定下来，需要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即付出协调一致的努力。”^[65]航运是瓶颈。以前准备驶向英国的运输舰将不得不重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除了推迟执行代号为“波列罗”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推迟增加美国驻英国的军队之外，别无选择。总统写道，这也意味着“在1942年对德国发起的空中进攻中，美国的贡献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当时日本正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横冲直撞，丘吉尔认识到了“欧洲优先”政策的局限性，所以同意了这些调整。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独自承担了盟军的指挥责任，负责的范围包括大洋洲和澳大拉西亚南部的岛群。在华盛顿，人们自然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将被任命为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已经到了澳大利亚，而且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中也没有其他人能达到他的名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但是金将军坚决反对让麦克阿瑟指挥太平洋舰队，如果僵局无法打破，他将向总统当面提出诉求。金和马歇尔显然私下里单独会过面，也可能是在有助手陪同的情况下秘密会过面，商讨过这个问题。这些会议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肯定有过激烈的话语交锋。

最后，他们仿效了所罗门国王的智慧，把战区在陆军和海军之间分开。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总司令，负责区域包括澳大利亚、菲律宾、前荷属东印度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尼米兹保留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称号，同时增加了“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的称号，负责区域包括整个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以及东经160°以东的南太平洋岛群。（尼米兹获得了新的呼号，并将在战争剩下的时间中一直保留这一

呼号——“CINCPAC-CINCPOA”。) 在各自划定的战区内，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将指挥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所有盟军部队。这个方法解决了华盛顿的僵局，但只要军事行动跨越两个战区，陆海军之间就会出现摩擦，1942年下半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便是如此。毕竟，华盛顿划定的边界，日本人是不会遵守的。

[1]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92.

[2]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60.

[3] McDonald and Swack-Goldman, eds.,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p. 782.

[4]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296.

[5] *Ibid.*, p. 285.

[6]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6.

[7] *Ibid.*, p. 87.

[8] Radiogram, MacArthur to the Adj. General, Dec. 23, 1941; PSF, Safe File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Y.

[9]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287.

[10]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278.

[11] MacArthur's "Order of the Day," Jan. 15, 1942, quoted in Costello, *The Pacific War*, p. 193.

[12] Kratoska, ed.,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5, p. 413.

[13] Quoted in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s in Peace and War*, p. 398.

[14] Black,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p. 717.

[15] Quoted in Stimson, *On Active Services in Peace and War*, p. 403.

[16] Carol M. Petillo,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 A Note on an Imperial Bon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8, no. 1 (February 1979), pp. 107–17.

[17] Douglas A. MacArthur, "MacArthur's Reminiscences: Part 5," *Life* magazine, July 10, 1964, p.72.

[18]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11.

[19] Burton, *Fortnight of Infamy*, p. 289.

[20]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411.

- [21] Ibid., p. 365.
- [22] Quoted in Allen, *Singapore 1941–1942*, p. 54.
- [23] Brooke-Popham at a public meeting in Singapore, Dec. 22, 1942, quoted in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360.
- [24]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 132.
- [25]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p. 349–50, 378.
- [26] Ibid., pp. 392, 529.
- [27]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26.
- [28] “Prime Minister to First Sea Lord,” Jan. 22, 1942, quoted i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The Hinge of Fate*, pp. 39–40.
- [29] “Prime Minister to C.O.S. Committee,” Jan. 19, 1942, in *ibid.*, p. 44.
- [30] Wigmore, *The Japanese Thrust*, p. 341.
- [31]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1,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88.
- [32]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1,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88.
- [33] Hack and Blackburn, *Did Singapore Have to Fall?*, p. 263.
- [34]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online at 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 [3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274.
- [36] “Wavell to Percival,” Feb. 14,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91.
- [37] *Daily Mirror* (London) quoted in Brown, *Suez to Singapore*, p. 499.
- [38] “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16, 1942, in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141.
- [39] “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Feb. 21, 1942, in *ibid.*, p. 144.
- [40] “Action Report—USS Pope (DD-225), 1 March 1942,” by Welford C. Blinn, Former Commanding Officer;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25-Java.html.
- [41] Radio Tokyo quoted in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58.
- [42]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 88–89.
- [43] Hornfischer, *Ship of Ghosts*, p. 70.
- [44]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 [45]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6]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7]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Commanding Officer, USS *John D. Edwards* (DD-216) to Commander, U.S. Naval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March 4, 1942;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USN/ships/logs/DD/dd216-Bawean.html.

[48]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89.

[49]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76.

[50] "Action Report—USS *Pope* (DD-225), 1 March 1942," by Welford C. Blinn, Former Commanding Officer.

[51] Cdr. A. L. Maher, Report on loss of *Houston*, Nov. 13, 1945, quoted in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368.

[52] "Battle of Bawean Islands—Report of action;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

[53]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 380.

[54]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p. 3.

[55] Churchill, *The Hinge of Fate*, p. 132.

[56] *Ibid.*, pp. 15–19, 57–59, and 155–58.

[57] "WC to FDR," Doc. 97, Feb. 19,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 181.

[58] "WC to FDR," Doc. 103, March 7, 1942, in *ibid.*, pp. 186–87.

[59] "FDR to WC," Doc. 96, Feb. 18, 1942, in *ibid.*, p. 179.

[60]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6.

[61]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6.

[62] "FDR to WC," Doc. 96, Feb. 18, 1942, in *ibid.*, p. 179.

[63] "FDR to WC," Doc. 110, March 18, 1942, in *ibid.*, p. 195.

[64] Entry dated March 10, 1942,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1945*, p. 238.

[65] "FDR to WC," Doc. 104, March 7,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pp. 188–89.

第八章

对于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官岛田而言，日军战前制订的南方作战计划类似于“列车时刻表”。这个时刻表有数千页长，细节详尽，精确至以小时为单位。他怀疑过，到底有没有可能如此按部就班地作战，“完全按照一方的意志”。^[1]

到了1942年4月，战争进程令岛田终感释然。南进作战非但如列车时刻表般进展有序，而且列车还比计划提前到达。日本仅历时四个月，便攻占大片土地，吞并疆土之广，前所罕有。其边界之广，北起千岛群岛，向南越过帝汶，东自吉尔伯特群岛，西至印度西部疆界。盟军尚存少许抵抗力量，尤其是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但亦难以持久。日本尽管自然资源匮乏，但已获得丰富的石油、橡胶、锡和铝土矿资源，于其战争机器不啻平添生力，几乎用之不竭。更超乎寻常的是，赢得新疆土的代价微乎其微。伤亡人数仅约1万。商船运输总损失仅为2.5万吨。日本海军几乎毫发无损，迄今仅沉了区区一艘驱逐舰而已。

日本境内，欣喜转为狂喜。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天后，天皇现身于皇宫宫墙之外，令民众痴狂。天皇身着戎装，端坐于白马之上，自护城河的桥上骑行而过。数以千计的人高呼：“万岁！”那日，东条英机在日比谷公园宣布新加坡已经改名为昭南岛^[2]。此时大约有3万人大声欢呼着，在空中挥舞着帽子和旗帜。^[3]极大的爱国热情通过音乐表达传递，声音大到路边的扬声器都变调了。此一时期创作的战争歌曲数不胜数，人们耳熟能详。《杀敌》《至敌竖降旗》《神兵天降》《樱花相伴》《当为好男儿》，此外，最重要的一首是《军舰进行曲》。^[4]在

海军之城吴港，所有餐厅及茶馆皆为欢庆聚会和宴会而预订一空，连艺伎也加班加点。率舰自爪哇海得胜而归的驱逐舰舰长原为一回忆时说，当时由于舰上酒会无法找艺伎助兴，一些水兵借着酒意载歌载舞。“我不知喝了多少，”他写道，“多亏体格强健，才能长饮不辍，宴罢方休。”^[5]

除极少数人之外，日本民众都已经完全认可了这场战争。一般民众在珍珠港之役前私底下曾不乏疑虑及恐惧，而一切担忧均已随此后事件发展而烟消云散。显然，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上天选择让日本来统治亚洲。在国内，军国主义政权的暴政更是肆无忌惮。选举虽未废止，但政党均已解散，而由超级政党“大政翼赞会”取而代之，官员选举皆由该会把持。日本民众的生活由内务省监督下的邻组严格控制。邻组的大部分成员是女性，负责分发口粮、宣传口号、组织防空演习、消防执勤，以及向警方汇报有谁的行为或观点有违当前政策。基本用品的配给越来越严格。自1940年以来，城市里的大米一直定量分配，但现在酱油和味噌也被列入清单，随后又添加了鸡蛋、鱼、豆腐和其他谷物。

从表面看去，日本民众似乎完全愿意忍受这些物资的匮乏。他们自己用啤酒瓶给稻谷去壳。这是一件艰苦的脏活儿。他们的衣服磨破了，手也起了水疱；他们四处搜寻微薄的口粮，同时高兴地吟诵口号和唱歌。他们还参加节日的花灯游行，以纪念在海外获得的每一次新胜利。新兵们在家属和邻居的祝贺和欢送中离开家乡，奔赴战场。他们的胸前挎着画有红太阳的白色饰带。他们去神社参拜，净化自己的心灵。之后，他们在一片致辞和歌声中举行了动员大会，受到民众的追捧。“我大哥去的时候，”沼津的一个女学生回忆说，“街坊们走到车站，挥舞着太阳旗，肩上挂着白色的饰带，上面写着‘恭喜入伍’这几个醒目的大字。……过去邻里间有其他人被征入军队时，我们都会挥旗送别。这次终于轮到我哥哥了。我感到特别骄傲。”^[6]没有人在现场流下泪水，任何人都不准因为这些新兵可能再也回不来而流露出恐惧之情。不管是父母、妻子还是兄弟姐妹，都要显得喜出望外。“没有人可以袒露内心深

处的情绪，”战争期间在砺波分发征召令的一个军人如是说，“群众欢呼着把他们送走。‘万岁！万岁！’你必须这样喊。”^[7]

日本民众正迅速屈服于所谓的“胜利病”——坚信日本战无不胜，并且完全可以藐视敌人。其主要表现为过度自信，不能正确衡量风险，对敌人缺乏基本的判断。这种现象在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煽动下越来越普遍。但日本人的吹嘘和嘲讽难以辩驳：事实本身已经很明显了，无须添油加醋。日本民众在照片中亲眼看到美国战列舰在珍珠港燃烧，英国战列舰在马来亚海岸外下沉。他们看到了新加坡投降的新闻片段，看到一位英国将军苦苦哀求日本军官放自己一条生路，一大群英国战俘在日本征服者的枪口下行进。《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扬言，珍珠港的“耻辱”将“永远被世界铭记”，^[8]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日军已经在太平洋地区试探了盟军的实力，发现对手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这似乎只能解释为敌人天生欠缺战斗意志。盟军陆海军因疲弱、怯懦及贪生怕死而溃退。“许多美国军人害怕炸弹，”《日本时报与广知报》在1942年4月17日的报道中称，“他们为日本人钢铁般的意志所震惊。”^[9]早在1月份，编辑们就曾断言英国是一种“寄生虫，靠攫取他国的命脉而苟延残喘。但问题是，他国尚能驯顺于这个江河日下的吸血鬼国家多久”。^[10]演讲和社论宣称，这场战争即将胜利，因为日军已经夺取并固守一条稳固战线，而且敌人未有大举反攻的迹象。2月份，

《国际写真情报》杂志向读者保证，东京已经没有遭受轰炸的危险，因为作战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航空基地都在日军掌控之中。^[11]也许盟军已经在准备投降了，一位将军在电台演讲中自言自语般地说道：“现在他们看到了帝国军队的实力。”^[12]无论是否求和，《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补充说，美英两国都会逐渐衰退为“二流或三流国家，甚至走向彻底的瓦解和崩溃”。^[13]

1942年2月12日，山本五十六将军的旗舰从“长门号”战列舰改为新入役的“大和号”超级战列舰。他的新舰长室也许是世界上所有海军军官

的舱室中最大、最豪华的一个——总司令住在“大和号”上层甲板右舷的一套巨大的空调房里，待遇如皇室成员一般。他在通风良好的军官起居舱内的一张打磨精致的长木桌边进餐，舱壁上高挂昭和天皇御照，照片中的天皇目光严峻，具有皇室气度。山本似乎有大量空余时间。即使在战时，他每天大部分时间也是惬意地待在与寝室相邻且陈设考究的舱室内。与往常一样，他沉浸在阅读和回信之中。来信中不仅有朋友和同事的信件，还有陌生人写的恭喜和鼓励他的信件。处理邮件的人按照指示，将他的艺伎情人河合千代子的信件放在顶上。（1941年12月下旬，山本告诉千代子他收到大量的信件，“但是我一直热切等待着你的来信”。^[14]）他长时间趴在将棋盘上，和手下的将士对弈。一般他们会玩带钱的。他招待的客人包括他手下的指挥官和皇室成员。通常他会做寿喜烧款待大家。当他在甲板上展示厨艺时，他总是穿着一身精心裁剪、浆熨平整的白色制服。他肤色黝黑，与洁白的牙齿和纯白的崭新外套形成鲜明对比。他衣服上的黄铜纽扣被乘务员磨得像镜子一样光亮。带有菊花纹饰的黄金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山本五十六将军看上去很适合这个角色。

日本的新闻界和公众都认为山本是民族英雄，但是山本却在民众的称赞下退避了。他感到“区区数战，些许战绩……虚传大名，实愧于心”。在海军省授予他两枚新勋章时，他说戴上之后感到“羞愧”。他说自己未见敌人一艘战舰一架飞机即享此殊荣，而其他将士浴血奋战却未被授勋。他拒绝了给他绘制肖像的邀请。他向一位朋友倾诉道：“若论俗不可耐，肖像仅较青铜像略次，然亦未能免俗。”^[15]

山本被官方公报的自吹自擂和夸夸其谈困扰着。他认为这是一种幼稚而短视的亢奋，并警告说，日本军队还未遇大敌。日本海军向来不爱自我吹嘘，因此一度被戏称为“沉默的海军”。而现在，“无敌舰队”这一称号已经在现役各级官兵中广为流传。伴随着激越的管弦乐（如《军舰进行曲》），东京海军司令部通过电台发布胜利公告。山本五十六却对这些广播避之唯恐不及。此前使海军完全不同于陆军的谦逊特质如今何

在？他正告一群收听此类通告的军官：“真正需要做的是平静地告知民众真相，没有必要大事张扬。官方报告应坚持实事求是，一旦开始传播谎言，战争不啻已经失败。”[\[16\]](#)

山本对于日本在战争初期多次轻易取胜并没有感到意外。他在战前的一封信中写过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预测：“我们马上就会凭借自己的方式获得一切，如章鱼伸出触角一般，将势力延伸至世界各个角落。但是这种情形最多也就坚持一年半时间。”战争或许仅凭停战协定才能结束，继之以谈判与妥协。攻陷新加坡将开启停战谈判的良机，而山本原以为于开战约六个月后方能达成此目的。他认为，正如“老人”无法容忍“失去脚炉”，英国为保有印度殖民地，必将与日本达成协议。[\[17\]](#)美国也同样会做出让步，比如归还占领的地区。西方国家一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地位，就可能也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统治地位。战争、征服、磋商、妥协——山本曾多次敦促东条英机领导的内阁制定新的对策，但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重视。

山本厌憎此类扬扬自得的宣传，因为任何此类“群情汹涌”均会终结停战的可能性。[\[18\]](#)他认为社会舆论应该做好回归外交解决的准备。相反，政府鼓励日本民众相信日本是无敌的，相信敌人不堪一击，相信日本注定要统治亚洲。“在战争于己方有利时结束战争绝非易事。”他说。在联合舰队数万官兵中，山本是仅剩的日俄战争的参战老兵。他回忆说，在这场冲突中，日本在摧毁俄国海军后同意停战，并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进行和谈。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必须做出十分不得民心的让步，包括放弃库页岛的部分领土，才能达成终战条约（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在1942年早期，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日本民众的骄矜和好战之情愈加明显。他们被告知日本人是一个神圣的民族。上天选中他们，让他们将西方的入侵者赶出亚洲。他们最终将取得胜利。没有什么比彻底的胜利更能令他们感到满足了。但是如果结果是全盘皆输呢？

日军完成进攻任务的速度让大本营大吃一惊。1942年3月初，日军就占领了爪哇岛，并且南进的时间也比战前设计的时间表提前了至少三个月。也许这是任何一个征服者都乐于看到的局面，但这也让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参谋们不知所措。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还没来得及制订下一阶段的详细作战计划。说实话，针对当时已经占领的地区，日本军方领导人还没有决定最基本的战略方向。在许多情况下，陆军和海军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而日本的体制缺乏解决这些分歧的机制。海军内部还存在一些分歧，东京的军令部（主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和山本联合舰队的参谋意见尤其不合。达成共识的过程混乱而艰难，但这样制定出的决策往往能让各方至少得到一部分自己想要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想法认为日本应该掘壕固守，采取守势。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是这一战略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日本应该节约资源，巩固内部补给线，集中力量进行训练和生产。在东翼的太平洋地区，日本已将广布的岛屿连成网络，其中许多是未设防的原始地区。战前计划已预料到要为边境岛屿提供物资装备和人力，还要在海滩上建立起强大的防御工事，修建机场。日军通过环环相扣、相互支援的航空基地网络可以维持外线空中优势，还可以迅速增援，击退盟军在任意攻击点上发动的攻势。

但是单纯的防守策略在军队高层并不占主导地位。这可能和文化因素有关：武士传统喜欢主动而富有侵略性的进攻战术，而非防守策略。对进攻战的偏爱渗入了陆军和海军的文化，并深刻影响了其战术学说、武器系统和训练计划。“我们非常不喜欢被动，”宇垣缠将军（山本的参谋长）3月11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的确，争取主动，战争便轻而易举。”^[19]自从1941年12月7日主动进攻之后，日本就绝不愿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了。海军的规划者们还沉浸在马汉的“决战”原则中，并且宣扬一种坚定的信仰，即只有一举击沉美国舰队才能够赢得战争，就像在对马海战中对俄国舰队做的那样。不管怎样，美国的航母空袭已经完美展示出了强大的“防御边界”概念。美军只要航母完好无损，就能深

入日本的太平洋战区中心，肆意进攻，然后安然离开。

1942年4月，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力量已经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占优势地位，但是仍不能寄希望于长期维持这种状态。美国强大的作战能力没有被完全摧毁，甚至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许再过一年，甚至一年都不到——敌人新组建的海陆空部队就会在日本周边持续发动大规模攻击。日本根本没有可能与一个潜在军事工业实力十倍于己的国家进行长期消耗战。日本必须尽可能跑赢时间，找到一种对盟军施加毁灭性打击的方法，迫使对方于1942年年底前求和。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令部的一些军官提议对澳大利亚发动进攻。五个师的日军就可以轻易登陆这个岛洲毫无防备的北部海岸。这样的入侵不一定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前，但至少能扫除美国人实施最终反攻的南部大跳板。第二个建议是，军队从锡兰甚至从南亚次大陆登陆，袭击印度。日本希望这能引发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将英国人赶出去。轴心国盟友可能会在中东会师。

但日本陆军坚决反对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入侵澳大利亚或锡兰需要从中国东北调动部分关东军，但陆军领导并不赞成挪用关东军，因为他们要时刻关注西伯利亚，把握好入侵西伯利亚的时机，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春季攻势有可能让苏联崩溃的情况下。陆军代表团3月7日在陆海军联络会上呼吁海军不要操之过急。宇垣将军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当海军准备大展身手时，“陆军的态度和往常一样，二话不说就拒绝了……陆军自己却提不出任何建议”。^[20]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有100万人的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有40万军人，居然不能从中分出两个师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军事行动中。联合舰队航空队军官三和义勇大佐难掩沮丧之情：“我们要进攻锡兰，但是上级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想要进攻澳大利亚，但是我们不能去！我们想要袭击夏威夷，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这一切都是因为陆军不愿意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兵力。”^[21]

陆军会谈代表们坚持认为，南太平洋未来行动的重点应为巩固现有

外围边界，切断敌方海上交通。为此，他们提出了在新几内亚南部海岸占领莫尔斯比港的计划。这个澳大利亚占据的港口距离澳大利亚东北角的约克角半岛仅有300英里，可以成为威胁盟军在珊瑚海的航运的绝佳基地。3月初，针对新几内亚东北沿岸的莱城和萨拉马瓦的入侵已经开始了。海军同意将澳大利亚与美国隔绝开来，但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建议继续向东推进，一路经过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最终夺取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和斐济。（这恰好是金将军最担心的一条进攻路线。）这两条进攻路线并非互不相容。两者都旨在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联系，都可以从拉包尔出发，这座新不列颠岛上的城市是日本重要的航海和航空基地。争议最小的方案是两个计划都执行——首先占领莫尔斯比港，然后是新喀里多尼亚，随后可能会进攻萨摩亚和斐济。

这次会谈似乎使日本陆海军草草达成了共识，但在3月中旬，山本将军建议停止这项计划。他坚持认为，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都应当投入太平洋中部的一次重大进攻，以夺取美国的小环礁中途岛。

这个提议体现了攻占夏威夷的宏伟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渴望攻下夏威夷了。1942年3月，兵力与后勤供给是日军进攻夏威夷无法克服的障碍。瓦胡岛实在太难攻下了，并且距离日本太远——光是有限的航行能力和运兵能力就导致无法实现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另外，陆军方面断然拒绝了提供更多兵力的请求。但夏威夷群岛西北方的中途岛较易攻克。它可以成为海空基地，威胁东南方1 149英里处的珍珠港，甚至可以作为未来入侵瓦胡岛的跳板。

自1942年第一周以来，在宇垣缠将军的监督下，联合舰队的参谋们一直在分析和完善这一计划。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参谋们在“大和号”宽阔的军官舱里进行了大量兵棋推演。山本想必对这些研究也有所了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但直到3月中旬，在陆军不再提议入侵澳大利亚和锡兰之后，总司令才将自己全部的声望和权力都押在中途岛的计划中。他这样做的真正目标不是中途岛本身，因为

其本身的价值尚不明确。他的真正目的是将太平洋舰队赶出珍珠港，发动一场激烈的海战，彻底摧毁它。最重要的是，山本想要烧毁、击沉或俘获美国航空母舰。这些航空母舰自1941年12月7日躲过灭顶之灾后就一直被日本视为眼中钉。敌人的舰载机袭击了赤道以北和以南的马绍尔群岛（1942年2月1日）、威克岛（2月24日）、拉包尔东部海域（2月20日）、马库斯岛（3月4日）和新几内亚的莱城和萨拉马瓦（3月10日）。这些袭击都没有对日军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没有延缓日军进攻的速度。但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航母是一个永远的威胁。哈尔西于3月4日袭击了距离日本本土仅有1 000英里的一个小孤岛——马库斯岛。这使日本的海军领导层感到十分恐惧——美军可能会对东京发动进攻。

首都东京上方可能会出现敌方轰炸机的想法像幽灵一般萦绕在山本和海军同僚的心头。这样讲一点都不夸张。自古以来，日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园不会受侵犯，但是其密集的木制建筑的防空能力非常弱。日本中老年人可能还记得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和火灾，东京和横滨受灾严重，约14万人死亡。在干燥、多风的日子，几枚燃烧弹就可能重演当年的惨象。最重要的是，东京是日本首都，如果这座城市遭遇空袭，那么皇宫也有可能被击中。海军飞行员渊田美津雄写道，人们对于天皇生命的担忧“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心头。……军方尤其担心，因为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天皇免受危险。军方自然会认为，哪怕东京只遭到一次空袭，导致天皇的安全受到威胁，这都是严重失职”。[\[22\]](#)

在山本的私人书信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个话题。他建议新桥的一个艺伎带上财产离开东京，因为海军没有可靠的措施阻止敌人空袭这座城市。他强烈谴责电台和新闻报道向日本人民保证空袭并不可怕。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总司令会询问东京每日的天气状况，每次听到城市上空乌云密布时，都会大松一口气。他指示宇垣在东部海域安排远程侦察巡逻，并征用一批渔船，部署在离海岸600—700英里的警戒线上。在2月和3月，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力量还陷于南方战事，有些情报误称日本以东出现敌舰或敌机，引发了许多超乎想象的“恐慌”。一直待在

内海的联合舰队战列舰主力被派去洋面上追逐那些“幻影”（并不真正存在的敌方舰船）足足三次。3月12日，日本的城市举行集会，庆祝荷属东印度群岛投降，宇垣将军在其日记中吐露：“如果敌机在庆祝活动中真的突然来袭了，我只是设想一下结果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在欢腾的人群之中发生空袭！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进行这种庆祝活动。”^[23]

联合舰队的参谋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在3月下旬完成了中途岛行动的计划草案。3月30日，该草案得到了山本的批准。这项行动还需要东京大本营批准，但和之前突袭珍珠港时一样，大本营不愿意批准。于是六个月来山本五十六将军第二次故意越过军令部应有的计划职能和决策职能行事。他这么做的动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解决先前遗留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他为促进海军航空领域发展所做的努力，经常遭到军令部保守的战列舰制胜派官员的抵制。1941年秋天，军令部一直反对其袭击珍珠港的计划，直至他以辞职要挟才不得不同意。偷袭珍珠港沉重打击了美国战列舰之后，军令部的主要军官试图隐瞒自己对偷袭行动的阻挠，以分享这份荣誉。作为海军政界宿将，山本不介意与总部玩弄权术，迫其就范。他正处于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似乎决心不让这一时刻就这样过去——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夺过军令部的计划职能和决策职能，交给自己的参谋。

这个问题在4月2日至5日的大本营计划会议上解决了。山本派渡边安次中佐前往东京转达舰队的意见。渡边安次是炮兵指挥官，也是山本平时下将棋的对手。他胳膊下夹着刚成形一半的计划，与军令部的一群参谋开会商议。他遇到了强硬的反对。那些参谋早已将进攻新喀里多尼亚视为陆军放弃进攻澳大利亚后的备选方案，任何与此背离或者推延其进行的打算都会惹恼他们。

军令部第一处航空参谋三代辰吉明确而激烈地反对中途岛行动。他的反对意见和那些反对在夏威夷开展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的意见是类似的。三代辰吉说，要想在遥远的中太平洋地区行动，需要一定规模的后勤保障，而这将会增加日本航运资源的压力。航母编队已不堪重负，不

可能按照激进的作战时间表南北两线作战。日本海军将不再拥有陆基空中掩护或侦察的力量，而敌方在这一方面则有着相当充分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日本舰队将完全依赖舰载航空兵的空中力量。即使成功占领了中途岛，其价值也没有那么明显。夏威夷的主要岛屿会发动无休无止的空袭，珍珠港的潜艇舰队则会沉重打击日军的运输线。中途岛对侦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美国特混舰队可以轻松地在以夏威夷为中心的600英里甚至700英里飞行半径内进行侦察。至于将太平洋舰队的残余部队从珍珠港中引出去参加决战的想法，三代辰吉提出了一个令人恐慌的可能性：美国人可能不会中计。如果他们没有阻止登陆，而是把中途岛拱手相让，那么事情又会怎样呢？军令部将山本的计划与南进计划进行了比较，认为其计划在各方面都逊色不少。

战后，三代辰吉写道，他和同事对总司令制订的漏洞百出的中途岛攻击计划感到震惊。“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山本司令是否意识到，将中途岛作为空中侦察基地简直得不偿失。他是否真的考虑过这样一个隔绝的孤岛对战争资源的消耗，补给的困难，对其他地区航空力量的消减，以及对舰队作战行动的影响？”[\[24\]](#)

但是，渡边中佐被派往东京的目的并非是回应参谋们中肯的批评，而是去执行山本的命令。经过三天徒劳的讨价还价，渡边以密电联系“大和号”，说讨论陷入了僵局。现在山本只能打出王牌，他几个月前曾经使用这张王牌强制军令部批准他对珍珠港的袭击。山本告诉渡边，孤立澳大利亚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美军航空母舰，而如果太平洋舰队没有阻挡日军抢滩登陆的话，那么日本将占据太平洋中部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位置。总司令已经是“下定决心了”。如果计划未得到批准，山本将以辞去总司令职务威胁，届时军令部不得不妥协。福留繁将军看三代辰吉一边重述论点，一边变得越来越激动，便对他说：“冷静，沉住气。既然联合舰队这样制订计划，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接受？”[\[25\]](#)

4月5日，军令部暂时批准了山本进攻中途岛的计划。但是一些重要

的细节似乎并没有解决，包括（最重要的）行动时间。反对者仍然抱有一丝希望，想通过拖延战术使这次行动流产。严格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勉为其难的共识只不过是一种保全脸面的妥协。这种决策体制不是简单地选择一个行动方针，果断否决其他方案，而是让各方，包括军令部和陆军，得到自己想要的一部分。在军令部的坚持下，袭击中途岛的计划中加入了第二个行动，目标是阿留申群岛，日军要占领两个岛屿，还要袭击位于乌纳拉斯卡岛的荷兰港。

4月16日，大本营发布了第86号军令，规定了未来三个月的进攻目标顺序：5月占领莫尔斯比港，6月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7月攻占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一些重要的细节仍有待完善，但是海战的下一步已经决定如何走了。

4月的第一天，在旧金山湾的阿拉梅达海军飞机场，16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从机库滑行至码头。每一架飞机都缓缓移动到美国军舰“大黄蜂号”起重机下方某处。“大黄蜂号”航母是一艘约克城级航空母舰，身上喷着显眼的蓝灰色迷彩图案。在地面机组成员的信号指引下，飞机关闭引擎，一对螺旋桨也停止了旋转。钩子降了下来并固定在机身顶部的环形螺栓上。每架飞机都被小心翼翼地吊起来放到“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然后推到指定的标记区域，并用结实的麻绳快速拖到甲板上。这一过程将会重复16次，直到这些B-25全部摆成交错的两列，挤满整个飞行甲板的后段。

第二天，也就是4月2日，“大黄蜂号”在护航舰船的陪同下出海了。随行舰船包括两艘重型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轮。它们被命名为第18特混舰队。特混舰队在金门大桥的红色桥体下经过。尽管晨雾弥漫，但是从旧金山或马林的山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艘航空母舰。[\[26\]](#)在战时，每一天都会有各种大小和不同类型的军舰经由这一航道驶往太平洋，目的地不会公开。但在1942年4月，航空母舰仍然相对罕见，所以那些淳朴的老百姓自然会驻足观察一阵儿。像这样装载着双引擎陆军

轰炸机的航空母舰是很少见到的，因为（任何熟悉航空业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飞机是无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B-25比当时标准的航母舰载机（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和野猫式战斗机）要大得多。它们有两个发动机和两个尾翼，高度约为18英尺，翼展长度为67英尺6英寸，翼尖从飞行甲板的边缘上突出来，像是挂在海面上的跳水板。一直没有人告知“大黄蜂号”的舰员他们的使命或目标。据传，这艘航母会将B-25运送到珍珠港，然后通过起重机吊离甲板。这为这一神秘事件提供了最合理的解释，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没有双引擎的陆军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过。

在阿拉梅达，陆军航空队的一大群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登上“大黄蜂号”，包括70名军官和130名士兵。军官们与航母飞行员在“大黄蜂号”上住在一起，为增加额外铺位，船舱内放置了行军床。尽管陆海军的飞行员已经习惯于把对方当作外人和对手一样看待，但是他们相处得还不错。他们互相参观停在飞行甲板上的B-25轰炸机和机库甲板上机翼折叠竖立的舰载机。海军少校小斯蒂芬·朱里卡是船上的情报官和作战参谋。他认为陆军飞行员回到了原来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他们对自己的制服毫不在意，戴着压得变形的帽子，衣领大敞，穿着“破烂的旧鞋子”。^[27]当海军问这些客人执行什么任务时，他们只是耸耸肩，移开视线。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能透露只言片语。^[28]在“大黄蜂号”向西航行期间，他们经常睡懒觉，不吃早餐，还在8点半的晨报中迟到。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扑克桌上度过的。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在珍珠港遭突袭几小时后，罗斯福总统要求军事长官们找到一个反击日本的方法。在战争的头三个月，随着美国的士气逐渐降到最低点，罗斯福反复强调这一要求。这位三军总司令问了一遍又一遍——有没有轰炸日本本土的机会？

金将军指派了两名高级参谋，“弗洛格”F.S. 洛（F. S.“Frog”Low）

上校和唐纳德·B. 邓肯（Donald B. Duncan）上校，来调查轰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29]当时没有现成的方案。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日本和美国任何陆地机场都隔得很远，无法进行远程轰炸。美方考虑过在中国、苏联和阿留申群岛起飞，但是后来全都放弃了。航母特混舰队有可能隐蔽前进到打击范围内，但是舰载机必须从离日本海岸不到200英里的地方起飞。航母在这样一个极易遭受攻击的位置上，就像在钩子上扭动的蠕虫那样痛苦，因为它必须等待飞机返航。在反击日军的过程中，损失一艘甚至多艘宝贵的航母的风险是美国无法承受的。

“弗洛格”洛在前往诺福克视察新落成的“大黄蜂号”航母时注意到海军基地跑道上画着飞行甲板的轮廓。他突然灵光一现，有了个想法。这一轮廓线是供飞行员使用的，以磨炼他们在航母上的飞行作业技能。其长度比实际的飞行甲板要长，以反映出视风^[30]带来的好处。在实际的海上航母飞行作业中，航母会迎风而行，并用引擎加速来增强飞行甲板上的风速。即使在罕见的风平浪静的情况下，航母也可以产生明显的逆风效果——相当于其最大速度（“大黄蜂号”的最大航速是32节）。在北太平洋，通常至少有10节的微风。这样，在飞行作业中就可以有超过40节的视风。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尝试在航母上降落一架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但这种飞机却有可能顶着狂风从航母上**起飞**。如果轰炸机的配置适用于极长距离的飞行，一个轰炸机中队可以在离日本海岸500英里远的地方起飞，在日本指定目标投弹后飞往东海沿岸的秘密机场。这一行动对于航母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还会对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构成威胁，但日本绝对无法料到他们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幸运并且出其不意的话，这个行动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金将军向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阐述了这一想法。阿诺德愿意甚至渴望将其付诸行动。阿诺德将军任命詹姆斯·H. 杜立德中校为行动指挥官。他是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之一，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翻“外筋斗”的特技飞行者（他还有很多飞行特技）。^[31]整个计划都是秘密进行的。杜立德认为B-25“米切尔”轰炸机最适合这项工作。经过一些巧妙

的改装后，B-25可以携带1吨重的炸弹，飞行范围可以达到2 400海里。在弹药舱、机组人员通道和腹部炮塔等地方加装补充燃料罐，会使改装后的B-25的燃料装载量比正常配置多出一倍。去掉对任务没有重要作用的设备可以大大减轻飞机的重量。其中包括无线电、底部炮塔和诺登轰炸瞄准器。

杜立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7轰炸机大队中招募了一批志愿飞行员。海军飞行教官亨利·米勒上尉分配到的任务是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基地训练B-25机组人员的短距起飞技术。米勒上尉刚到基地就被问到是否驾驶过B-25。“没驾驶过，”他回答道，“我连见都没见过。”^[32]陆军飞行员告诉他，B-25需要每小时110英里的空速才能离开地面，但在第一天的训练中，米勒就驾驶着一架B-25，以每小时只有65英里到70英里的速度用全襟翼起飞了。这个速度在航母的甲板上很容易达到。

米勒让陆军飞行员一直踩着刹车踏板，同时把引擎油门加到最大。^[33]在引擎发出尖叫声，歧管压力设置正确，升降舵向后拉四分之三的情况下，他们要突然松开刹车，让飞机加速冲到（想象中的）甲板边缘。沿着跑道边缘插的白旗分别标记了200英尺、300英尺和500英尺的距离。当飞机达到起飞速度时，飞行员轻拉控制杆，机头上升，起落架的轮子便会离开甲板。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儿。航母飞机作业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不是起飞，而是着舰。但是这些陆军飞行员从来没有踏上过航空母舰。他们沿着潮湿、倾斜的短甲板看到下方迎面而来的海洋时，怎么可能做到处事不惊？即使是杜立德中校这种见多识广的老兵，在爬进“大黄蜂号”上的B-25的驾驶舱后，看到这么短的飞行甲板也是大吃一惊。米勒上尉坐在他旁边的驾驶座上，向杜立德保证，他在比这更短的甲板上都成功起飞过。“亨利，”杜立德回复道，“海军一般怎么形容胡说八道？”^[34]

在离开旧金山湾11天后，“大黄蜂号”来到北纬38°，东经180°的地方——正好处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上，位于瓦胡岛西北约1 700英里处。^[35]

太阳在一片白浪翻滚的绿色海面上升起。厚厚的云层在低处徘徊。16架B-25轰炸机在系留装置上起伏着，就像是在风中紧紧抱着树叶的蝴蝶一样。

随着天越来越亮，“大黄蜂号”的左舷外出现了第二艘航空母舰。这就是“企业号”航母。“企业号”于4月8日从珍珠港出发，按照命令来到预定的地点与“大黄蜂号”会合。“企业号”和其警戒舰船（重型巡洋舰“北安普敦号”和“盐湖城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和一艘油轮）被编为第16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哈尔西指挥。“大黄蜂号”所在的第18特混舰队并入第16特混舰队，一同归哈尔西将军管辖。由于“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已经被清理出来腾给杜立德的轰炸机，其自己的飞机被困在机库甲板上，所以“企业号”的航空部队将负责保护和侦察活动。

“企业号”上的船员对于这项任务一无所知，好奇地研究起“大黄蜂号”来。B-25轰炸机有方形机鼻和双方向舵，一眼就能从其他飞机中辨别出来。有几架“企业号”的战斗机于清晨时起飞，一直在空中盘旋着。“飞过‘大黄蜂号’上空时，我发现那些B-25轰炸机已经在甲板上蓄势待发了，”机械师汤姆·F. 奇克回忆道，“不必说，我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一直在想我们的目的地到底是哪儿。我根本没有想到过会是东京。”^[36]最可信的说法是，他们要把轰炸机运到阿留申群岛，或者是堪察加半岛的苏联基地。

那日上午早些时候，哈尔西批准发布了一则振奋人心的公告。这一消息是从“企业号”的喇叭里播发出来的：“我们这支舰队进攻的目标是东京。”^[37]船员们不禁欢呼雀跃，大声鼓掌，高兴地拍打同伴的后背。

规模扩大的第16特混舰队将航向设定为265度，几乎朝着正西方向，以16节的速度前进。^[38]在接下来的几天，两艘航母及其护航舰队奋力横跨荒凉而浩瀚的海洋。四个月前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正是从这片海域往相反的方向航行，进攻珍珠港的。在这些纬度相对较高的地区，

每年这个季节，大海和天空都是青灰色调。“盐湖城号”上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凯西看到先导舰以纵队航行。在这种“灰色雾霭”中，他写道，它们看起来就像“一系列哥特式大教堂”。^[39]刺骨的寒风吹着在甲板上站岗的人。他们穿着厚重的冬季制服和值班外套，戴着羊毛手套和帽子，裸露的皮肤很快就变得又红又粗糙。“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天气了，”“企业号”上的降落信号官罗宾·林赛上尉如是说，“这三天的海浪奇高，甲板上摇晃得厉害，必须有一个人站在我身后，在降落信号台上抱着我，我才不会摔倒。我跌倒了好几次，你都能想象出飞行员从旁经过却没有看到信号官时脸上惊讶的表情。”^[40]

朱里卡少校在“大黄蜂号”上向B-25轰炸机飞行员做了任务简报。他曾在东京担任海军武官，十分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他们仔细研究了地图和情报，确定了几个可用于低空导航的地标。朱里卡把自己了解的关于日本防空力量的情况全都告诉了飞行员。杜立德中校还在改进计划，分配日本境内的轰炸目标。他的飞机会第一个起飞。他会带领其他飞行员，在黄昏时抵达日本。这16架B-25轰炸机将会呈扇形出击，轰炸位于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之后他们会飞越日本诸岛，一直飞到中国海岸上新建的专用机场。他们会在这里着陆，用装有手泵的油桶费力地加油，然后再次起飞，飞到中国内陆更安全的机场。这些B-25轰炸机将转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机组人员将以其他方式悄悄回国。“我们要是全都抵达了重庆，”杜立德告诉手下的飞行员，“我会给大家举办一场你们之前绝对没见过的最盛大的宴会。”^[41]

朱里卡和飞行员大致讲解了一下在中国降落后如何避免被日本兵俘虏。如果他們要迫降或跳伞，朱里卡说，他们应该向中国平民寻求帮助。这些平民可能会联系当地游击队，游击队员会将他们偷偷送出中国。他们练着用极不标准的汉语说“我是美国人”。朱里卡感觉这些陆军飞行员似乎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話当回事儿，于是警告说，一旦俘虏后他们可能会被斩首。“飞行员们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老实了许多。”^[42]

四天之后，当特混舰队来到东京东方约1000英里处时，天气突变。从西南方向刮来了七级以上的大风，能见度不到一英里，阵阵寒风夹杂着冰冷的浪花，猛烈地吹过“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甲板。^[43]“企业号”取消了飞行作业。B-25轰炸机的一名飞行员注意到，随着“大黄蜂号”的起伏，B-25轰炸机的座舱高度计显示，上下浮动的高度差足有200英尺。^[44]这导致油轮给两艘航母和四艘巡洋舰加油的过程变得既困难又危险，这期间有两个人被卷入水中（均获救）。那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摇晃的驱逐舰和油轮奉命留在后面。航母和巡洋舰以20—22节的速度继续向西航行。随着发动机的奋力转动，整个船身都颤抖起来，在巨浪中起伏，翻滚的浪花拍打着甲板。他们在这种狂暴的天气里又向敌方的水域推进了400英里。

4月18日，特混舰队越过了山本五十六的小艇警戒线。按计划，杜立德的轰炸机要在这一天从“大黄蜂号”上起飞。凌晨3时10分，“企业号”的雷达屏幕上显示出了两个小点，大致位于西南方向4英里处。哈尔西下令向西北航行，以避开这些陌生的船只。^[45]一个小时后，特混舰队重返向西的航线。天亮后不久，“企业号”发起了一次空中侦察和战斗空中巡逻。早上7时15分，太阳早已高悬于地平线之上，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返回航母并扔下一个情报囊。情报立即转给了哈尔西。“敌方水面舰艇位于北纬36°04′，东经153°10′，方位为276度，直线距离42英里。应该已经被敌方发现了。”^[46]

特混舰队继续向西前行。哈尔西想让杜立德尽可能靠近目标。上午7时44分，“企业号”的瞭望员清晰地观察到西南方约2英里处的一艘小船。从航母的飞行甲板上看，那艘小船在惊涛骇浪里不停地起伏，时隐时现。当时天空乌云密布，但是云层之下的可见度还是极佳的。哈尔西命令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去击毁这艘船。但是几乎不可能在这艘船把电报发回本土之前就将其击沉。

这艘船是“新田丸”，一艘钢壳渔船，约90英尺长，为日本海军监视从海上接近日本的所有船只。一个日本船员告诉船长，有“两艘漂亮的

日本航母经过”。船长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两艘奇怪的船，回答道：“是的，确实不错，但这不是我们的船。”^[47]他马上把这一情况通过无线电发了出去。他的通信内容被美方舰船截获了，哈尔西发现这一无线电报告已经发出。第16特混舰队的行踪暴露了。他希望能将杜立德向西多送150英里，但是他知道现在没得选了，只能下令立即起飞。他向“大黄蜂号”发出信号：“飞机出发。杜立德中校和他带领的英勇士兵们，祝你们好运，愿上帝保佑你们。哈尔西。”^[48]

“大黄蜂号”逆风转向，以便B-25轰炸机从甲板上起飞；与此同时，“纳什维尔号”以35节的速度向“新田丸”驶去，灵巧地向左转舵，用其6英寸主炮开火。炮弹落在渔船旁边，在其四周掀起了巨大的水花。但每次喷起的水花都朝下风方向落去，“新田丸”依然平稳地航行着，毫发无伤。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像软木塞一样摆动，每次滑到波谷时，都会完全看不见。因此炮弹很难击中它。“纳什维尔号”上的炮手随着海浪的起伏计算齐射时机。尽管他们十分努力，但还是没有一次命中。“炮弹就像机枪里的子弹一样，劈头盖脸地落下，”凯西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他从“盐湖城号”的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切，“船只周围炮火闪耀，就像电子标牌上的灯一样。”^[49]这条小舢板用自带的小口径舰炮勇敢地回击“纳什维尔号”，但是炮弹连一半的距离都飞不到。

“企业号”上的第6战斗机中队凭借“纳什维尔号”弹着点的指引，前来帮忙。这些战斗机低空飞过“新田丸”，打算用0.50英寸机枪扫射，但它们也很难瞄准在海上不断起伏的小目标。奇克准尉回忆说：“它就像溜溜球一样。”^[50]“纳什维尔号”射出的炮弹激起的水柱实际上已经超过飞机在扫射时的飞行高度。从上方飞过几次后，野猫式战斗机的飞行员报告说，该船已被严重击伤，上面恐怕没有还活着的船员了。不一会儿，这艘船就沉没了。

“企业号”的船员饶有兴趣地参与了整个过程（不时也会说些风凉话），他们很少有机会见证海军的海上行动。在这场行动中，无论是“纳什维尔号”还是“企业号”上的航空大队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的。“纳什维尔号”朝这艘渔船发射了不少于928枚6英寸的炮弹，其消耗弹药之多，舰长认为“荒唐”而且“浪费”。^[51]（可能有些炮弹击中了船体，但未引爆，而是贯穿。）有一架野猫式战斗机向船上发射了全部1200发0.50英寸的子弹。在上交给尼米兹的战后报告中，哈尔西称这些战斗机的表现“十分令人失望”。他补充道：“这再次表明，航空大队待在岸上基地时，必须训练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任务也越来越迫在眉睫。”^[52]“新田丸”上的小口径机枪甚至干掉了一架“企业号”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在海上迫降了，他和后座人员在沉没之前离开了飞机，被救了上来。

与此同时，“大黄蜂号”忙着让杜立德的轰炸机编队起飞。舰岛上的大型扬声器里传出命令后，舱面船员将B-25轰炸机推到起飞位置。“在大约半小时的时间里，”泰德·W. 劳森中尉回忆说，“海军让我们的飞机在飞行甲板的后端排成两列，16架飞机的大双舵尾翼斜着伸出船尾的边缘。”^[53]机翼主油箱里之前已经加满了500加仑，现在又往里加了一些，好补充已经蒸发掉的几品脱油。舱面船员轻轻摇晃飞机，把管线及油箱内可能产生的燃料气泡晃掉。底部炮塔的防弹燃料舱和弹药舱顶部的燃料舱等应急后备燃料箱都已加满燃油。军械员用升降机把运弹车运到上层甲板上，然后在起伏的甲板上把它们一直推到飞机的下面。每一架飞机弹舱内都装载着3枚500磅的常规炸弹和一枚500磅的燃烧弹。有些炸弹上挂着日本政府战前向美国军人颁发的勋章，还有些炸弹上则潦草地写着“我不想烧掉世界，只要烧了东京就行”，以及“你们将被炸上天”。

“大黄蜂号”的舰长马克·米彻尔来到飞行甲板上给飞行员送行。他和杜立德握手的一幕正好被摄影师拍下。然后杜立德把头探进“大黄蜂号”的待命室，机组人员正在那里进行准备。他喊道：“快点，伙计们。行动吧。”^[54]扬声器里传来命令：“陆军飞行员，登机！”飞行员们在飞机间穿梭，找到并登上自己的飞机。

引擎逐渐发动起来，低速运转暖机。舱面船员绕着每架飞机走了一

圈，然后开始一个个地解开固定索具。另一些海军船员将大白板举过头顶，穿过飞行甲板，让主控室看到他们。白板上写着罗盘读数和记录风的强度和方向的符号。^[55]燃油软管继续给油箱加油，把之前发动机预热时消耗的少量燃油补上。在封闭舱门之前的最后一分钟，还有几个额外的5加仑燃油罐被交给机组人员。他们将油罐放在脚下。从来没有哪架B-25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装载过哪怕只有这次任务一半的燃油。

扬声器里再次传来声音：“准备起飞。”“大黄蜂号”迎风调向，把航速提到了将近30节。^[56]甲板上的相对风速现在上升到了75节，甲板上的船员不得不趴下，肚子紧贴着甲板，挂在系留装置上，以免被吹入高速旋转的螺旋桨之中。阿尔文·柯南从附近的“企业号”上目睹了整个过程。他回忆说：“大海里的滔天巨浪裹着绿色泡沫，带着一股太平洋北部的味道和气味。”^[57]“大黄蜂号”的船头一会儿上扬一会儿下探，不停地上下摆动。激起的浪花冲上飞行甲板，拍打在人脸上。“就像那些老兵说的，”无畏式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回忆道，“在船头上下颠簸的时候，一些‘绿波’溅到了飞行甲板上。我在飞行甲板前方的右舷走道观察着一切，溅出的水花让我浑身都湿透了。”^[58]

B-25的飞行员接受过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训练，并且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简要学习过如何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但即使是在风平浪静的状况下也没有人亲自尝试过这样的事情，更何况现在的风浪这么大。劳森从驾驶舱往下看“湿漉漉又不停晃动的甲板”时，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场景看起来实在是太吓人了。“‘大黄蜂号’深陷巨浪之中，上下起伏，整个甲板就像是一个疯狂的跷跷板，”他后来这样写道，“有些海浪冲到了甲板上。甲板似乎每分钟都在变小。有那么一阵子，我感到有些恐惧。我担心在起飞时被波浪击中，在甲板的末端坠毁，掉落在前倾的航母的航道上。”^[59]要想在剧烈颠簸的“大黄蜂号”上起飞，需要把握好时机。朱里卡少校指出，飞行甲板控制官必须在船头下降时向每架飞机发出“出发”的信号，这样“起码你能以一个与地平线平行又略微向上倾斜的角度起飞，事实上，这样会给他们一个向上的力”。^[60]每架重载的B-25都

必须先全速“下坡”，看上去就像是冲向下一个即将到来的大浪中。这对于航母上的飞行员来说是一件轻车熟路的事，但对于以前从未做过这件事的飞行员而言，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经历。他必须抑制住自己过早拉操纵杆的本能冲动，因为这可能会妨碍起飞。

“大黄蜂号”上的每条通道、每个军械库和侧翼平台上都挤满了水手和军官。他们站在那里看着，手心里捏了一把汗，紧咬牙关。以好莱坞导演约翰·福特为首的摄制人员从“大黄蜂号”舰岛的高处记录下了这一切。在半英里外的“企业号”上，许多观察者仍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坚持认为根本不可能按照原计划起飞。他们说，如果不在最后一刻取消计划，那么这一切都将会以灾难结束。柯南写道，有人开始为此设赌局，而且“双方都很快就投入了重金：他们到底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61]柯南自己是悲观派的，他用辛辛苦苦赚来的10美元赌杜立德率领的飞机中只有不到一半能顺利起飞。

海军控制官站在“大黄蜂号”的船头，背对着风，以环形挥舞格子旗。这是示意队列中的第一架B-25，也就是杜立德驾驶的飞机在加大油门的同时踩住刹车。双引擎发出尖厉的声音，旁观者担心引擎可能会自燃。整个机身都在木制轮挡上颤动。格子旗落了下来，示意“出发”。轮挡撤掉的同时，杜立德也松开了刹车。飞机沿飞行甲板的左半部分倾斜着向前冲去。随着“大黄蜂号”的船首抬起，75节的逆风速为飞机提供了强大的升力，飞机的起落架离开了甲板。

“我觉得他距离船首还剩50英尺的时候，就升到了大约50英尺的空中，”在舰桥上观察的朱里卡说，“他只用了最短的距离滑行，就飞上了天。”^[62]起初，飞机只比航母快30节，所以它看上去像是悬在空中，向前移动的速度很慢，就像巨大的风筝上升似的。劳森中尉写道，杜立德“凭螺旋桨使飞机竖了起来，几乎垂直向上，我们可以看到B-25的整个顶部”。^[63]在快要失速的时候，他强行降下机头，往回沿着航母的左舷飞行，再向左转，绕过“大黄蜂号”的尾流。他踏上了飞往东京的征程。

杜立德成功的起飞极大地鼓舞了剩下的15名飞行员。现在他们满怀信心，准备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他。但是由特拉维斯·胡佛中尉驾驶的第二架B-25轰炸机还没升到应有的高度就飞离了船头。从“大黄蜂号”船尾的角度看过去，这架轰炸机就像马上要掉进大海里一样。胡佛将机头抬起，猛推了一下节流阀，试着留在空中，飞机几乎处于失速的边缘。“飞行员将机头抬得高高的，像拖着机尾滑行，”费希尔回忆道，“飞机弹跳着，几乎要失速了，然后离开了飞行甲板。此时船头升高，他就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当时我以为他坠毁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在距离水面很近的地方飞着。他的螺旋桨竟然在海面上溅起了水花！”^[64]他摇摇晃晃地将飞机升到空中，向左转弯后，跟在了杜立德后面。

每架B-25在颠簸中前行起飞时，它的推力都要加上实际风力以及“大黄蜂号”在水面航行产生的视风的力量。“那一天的风确实很大！”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乔治·伯恩斯坦回忆道，他经常被安排去推飞机，“我们不得不趴到甲板上，在B-25准备发动引擎时，用手指紧紧抓住系留装置。我和队里的人都用绳子系在一起，以防被飞机的螺旋桨卷进去。”^[65]航空机械师助理罗伯特·W. 沃尔就没抓紧。他被吹到空中，然后被抛到另一架飞机旋转的螺旋桨上。他的胳膊从肩膀处被切断了。^[66]夺去罗伯特手臂的飞机是由比尔·法罗中尉驾驶的。他目睹了事故发生后，吓得心惊肉跳，差点使飞机坠毁，但还是像胡佛那样挣扎着飞到了空中。

终于，15架飞机全部飞上了天，跟在杜立德之后。他们没有充足的燃料在空中集结，就一个接一个地排着不规则的长队飞走了，队伍一直延伸到西方灰色的地平线上。水手们兴高采烈地大喊叫好，就连刚刚还在为陆军飞行员没有把水平尾翼保持在中间位置而生气的米勒上尉也被他们的勇气打动了：“毫无疑问，‘大黄蜂号’上的每个军官和士兵都认为，驾驶那些飞机离开甲板的人，应该别上全世界所有的勋章。”^[67]在“企业号”上，柯南写道：“我们都大声欢呼着，甚至还满怀爱国之心

地流下了眼泪。我觉得，我那10块钱输得值，就好像我这10块钱真的有助于赢下战争一样。”^[68]

刚吃过早餐，“大和号”就收到了发自“新田丸”的敌情报告。渔船上传来的报告称，他们看到了三艘而并非两艘美国航母。这一细节对于联合舰队参谋来说肯定特别不可思议。他们以为美国在整个太平洋上只有三艘航母。难道现在这三艘航母全都朝东京扑过来了？而且距离目标只剩下几百英里了？但是“新田丸”并没有发出后续的报告，这似乎也证实了报告的准确性。宇垣将军记录称，舰队的参谋“立刻行动起来”。^[69]“大和号”发出信号：“今天早晨6时30分在东京以东730英里处发现包括三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敌方特混舰队主力。……准备迎击美国舰队。”^[70]山本五十六下令采用三号战术，包括派遣第一和第二舰队迎敌。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正从印度洋返回，此刻已经过了台湾岛，奉命加速赶往日本的东部海域。

然而致命的是，“新田丸”的船员并没有注意到其中一艘航母上装载着双引擎轰炸机。如果他们注意到了，联合舰队的情报人员就有可能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并得出结论：敌人的空袭部队已经朝东京进发了。航母的空袭半径通常不超过200英里，所以如果美国航母刚刚越过外围警戒线，那么完全可以推想，它们距离起飞地点还有400英里或500英里。这就意味着到第二天早上东京才会有危险。上午9时45分，一架日本巡逻机在沿日本东海岸飞行的过程中，报告发现了一架奇怪的双引擎轰炸机。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众所周知）这样的飞机是不可能从航母上起飞的。一艘日本巡逻船也发现了B-25轰炸机，并且电告“三架敌机向西南方向飞行”，但该报告也被视为明显的误报，没有引起重视。

4月18日刚过中午，第一批轰炸机就来到了东京湾上空。它们以非常低的飞行高度靠近海岸，这样既可以避开空中和地面的侦察，又可以

有效躲避防空炮群的集火射击。整个过程像极了珍珠港事件，船上和地上的日本观察哨以为入侵者是友机，并对它们欢快地挥手。“大家知道，”劳森写道，“我们飞机上用的都是老式符号：蓝色圆圈里有一颗白色的星星，一个红球位于白色星星的中间。可能这就是让他们迷惑的原因。我们肯定不是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的。”^[71] B-25轰炸机近距离经过了好几架日本飞机，但是它们都没有试图拦截或追踪。载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一架日本飞机当时也飞过东京湾，这架飞机离轰炸机很近，一个乘客甚至看出来对方的飞行员是白种人。

海湾上的一个海军机场的目击者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些都是敌机，然而为时已晚。“海军机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他说，“但是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所有的飞机都在机场上整齐地排成直线。但是敌机甚至看都没看一眼。相反，来袭的敌机消失了，向横滨的方向飞去。”^[72]

横须贺海军武器库有一名文职人员当时正在打电话，突然空袭警报大作，接着窗外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回忆说，向外看时，“天上全都是低空飞行的黑色美国军机。防空炮弹在远高于飞机的地方爆炸”。在他办公室前的干船坞里，“大丰号”军舰遭到了轰炸，“冒出阵阵浓烟。……大批的伤员躺在担架上，被抬到干船坞旁边的医务室里”。他正看着，当地指挥官都筑伊七中将也过来了。后者惨笑着说：“敌人还真有两下子。”^[73]

第一批B-25轰炸机，包括杜立德中校驾驶的那一架，从航母甲板上起飞后一路爬升，飞到东京上空时已经升至1 500英尺。它们击中了东京的几个目标，包括一个油罐、一家钢铁厂和一家发电厂。还有一些B-25轰炸机直接飞过了皇宫上空。虽然这些目标非常容易攻击，但是杜立德收到了明确的指令，不允许轰炸这些建筑群。第二批轰炸机保持在树梢高度上飞行，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开已经接到警报的巡逻战斗机和防空炮火。劳森写道，他曾在飞往东京的路上经过一座山谷。他的飞机“甚至比两侧的丘陵还要低”。^[74] 还有一名B-25轰炸机飞行员报告说，他

为了摆脱身后的战斗机，甚至从输电线下钻了过去。[75]

山本五十六接到东京遭受空袭的报告后，身体立马就垮了。他的总干事证实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将军如此绝望的样子。[76]他回到休息室，关上门，几个小时都没有再露面。这期间由宇垣缠负责指挥整个舰队。32架中型轰炸机在护航战斗机的陪伴下从横须贺的海军基地起飞，朝东飞行，执行搜寻和歼灭任务。被派往特鲁克的潜艇中队接到无线电命令，潜回北方搜寻敌人。南云忠一舰队的三艘航母——“赤城号”“飞龙号”“苍龙号”——都奉命全速追踪并且歼灭这些进攻日本本土的不明入侵者。（这三艘航母在印度洋上作战后，刚刚穿过巴士海峡返航，急需维修。自从12月7日开始，它们已经在海上待了很久，航行了大概有5万英里；装备的磨损和消耗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船员们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即便在那时，开战仅四个月，日军就已开始尝到罔顾疲劳对舰员作战效率的影响而酿下的恶果。）但是，日军没有任何舰船和飞机的行动范围或速度能够让其赶上美军航母，美军航母正以近乎峰值的速度向正东方向驶离。夜幕降临后，美军航母编队已安全隐没于寒波浩渺的北太平洋中。

最后一架B-25轰炸机起飞之后，特混舰队就立即转向东方返航。这是自离开旧金山后，“大黄蜂号”的甲板上第一次全部清空。船员连忙用升降机将战斗机运送到飞行甲板上。那天早上稍晚一些，有几架战斗机起飞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和“企业号”的航空大队一起进行大面积空中搜索。特混舰队在撤退的时候，又遇到了几艘巡逻船，空中盘旋的美军飞机将它们都击沉了（当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特混舰队的无线电操作员截获了日本海军的明语电报讯息。很明显，敌军已经陷入了慌乱之中。这些消息非常混乱，证明日本人对于自己是如何遭受攻击的一无所知。远距离无线电方位表明，在日本东部海域，有很多船只高速航行。但是没有一架陆基飞机可以威胁到撤退中的特混舰队。除非碰巧附近有敌方潜艇，否则舰队已经全身而退了，美方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特混舰队中每一艘战舰上的人都在收听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希望可以通过日本人的报道了解杜立德带领下的轰炸机是否抵达了目标。在美军舰艇所在位置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东京的中午），英语播报员突然终止了播报。中间出现了几秒钟用日语说的难以听懂的嘟囔声，接着整个频道就寂静无声了。很显然，第一批B-25轰炸机已经到达了东京上空。这个消息从“大黄蜂号”的喇叭里传了出来，在船员之中又激起了一阵欢呼。大约沉默了30分钟之后，广播员又开始播报，但是这次传来的却是刺耳的连珠炮般的日语播报。整个特混舰队的军官和船员全都冲到无线电室里去听。虽然基本上没人能听懂日语，但大家还是能从背景音中听到呼啸的空袭警报声，都能感觉到播音员的声音中夹带着紧张与不安的情绪。懂日语的给那些不懂日语的人充当了翻译。

暴行已经犯下，播音员报道说——炸弹落在寺庙、学校、火车站、医院，30名学生遭到空中扫射死亡。很显然，这是把传言当成事实播报的。这期间好几次插进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祈求大家速去献血。“前线的战士在挥洒着鲜血，请您也献出一点鲜血，贡献一份爱心吧，”她在广播里绝望地喊道，“您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您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明天——甚至是今晚——您的孩子就可能被炸得血肉模糊。献出您的鲜血吧。救救他们。救救您自己。也救救日本。”罗伯特·凯西坐在“盐湖城号”的无线电室里听着广播，评论道：“我们还以为整个日本都变成灰烬了。”[\[77\]](#)

过了几小时，无线电里颤抖的声音才逐渐平静下来。显然，他们接到了新的新闻稿。现在他们淡定地播报，称军队和民防人员已经控制住了局势。空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敌机不是被射下来了就是被赶走了。虽然不知道它们是哪种飞机，也不知道它们属于哪个国家，但是有人说有9架轰炸机被击落了。另一篇报道声称，是“中国、美国和苏联联合袭击了他们的首都”。随后播音员抛开新闻稿，开始讨论这些飞机是从南方（中国和菲律宾）、北方（阿留申群岛或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是从一些秘密隐藏在日本的机场出发的。然后第四种可能性被提了出

来：或许美国人已经建成了一艘“超级航母”，其飞行甲板有1/4英里长，能够起降大型轰炸机。“你可以看出来，日本广播电台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飞机到底是哪国的，”“盐湖城号”上的一名军官评论道，“这些猜测使他们露了馅儿。”^[78]

4月19日早上，美国航母及巡洋舰与驱逐舰及加油船会合，整个第16特混舰队都转向了南方，朝珍珠港进发。在狂风巨浪中，发生了一些事故，美军损失了几架飞机。“大黄蜂号”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船上存储的容易腐烂的食物基本上都不能吃了。“他们在尾舱里贮存了一箱子一箱子的土豆，”斯蒂芬·朱里卡回忆道，“土豆全都发芽了。没有一样不发芽的东西。”^[79]在看到瓦胡岛的青山之前的最后半个星期里，船员们一直靠吃午餐肉罐头充饥。

杜立德的B-25轰炸机全都毫发无伤地离开了日本领土。在飞过东海上空时，这16架飞机的燃油几乎耗尽，天色也逐渐变暗。它们在空中很分散。杜立德爬升至云层上方，在夜空里完全靠航位推算飞行。他无法找到引导他降落到中国衢州机场的无线电信标。随着引擎逐渐耗尽所剩无几的燃油，他和其他机组成员系好降落伞，打开舱门，纵身一跃，跳进了茫茫夜色中。另外还有14位空勤人员在中国被救了起来。其中一架B-25向北飞到了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一个简易机场降落。机组人员后来被苏联拘禁了一年之久。80位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勤人员中，只有4位在行动中牺牲。剩下的76人中有8人被日本俘虏。

美国国内的报纸明确报道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虽然美国数月之后才公布关于这场空袭的更多细节，但是新闻标题已足以在民众之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10岁小男孩詹姆斯·科弗特回忆道，当时他把床单缠在身上，拿着手电，像擎着火炬一样举过头顶，“我假装自己是自由女神，全家人都围着我跳舞”。^[80]在华盛顿，一位记者问罗斯福美国神秘的轰炸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总统面无表情地回答

道：“是从我们最新的秘密基地香格里拉起飞的。”^[81]

这些新闻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发生在巴丹半岛的7.8万美军和菲律宾部队投降的一周之后。这些“搏杀的杂种”已经坚持了3个月之久，但他们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疾病肆虐，缺乏药物治疗，实力和士气都大幅降低。他们已经不再对美国承诺派“一英里长”的船队运送的食物、弹药和补给抱有任何希望了。巴丹半岛在4月9日投降时，日本人显然没有做好处理这么多囚犯的准备，结果发生了巴丹的“死亡行军”事件，约有1万名盟军战俘遭到杀害。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虽然一些事件的细节要到很晚之后才会公布，但是那些发生在1942年4月的惨烈事件——战俘在离开巴丹半岛的路上被杀，杜立德的B-25轰炸日本城市，3名被俘的美国空勤人员被处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怨恨，并使战争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到了杜立德偷袭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日本国有媒体已经恢复了其应有的沉着冷静。最新的官方说法强调此次轰炸的效果简直小得滑稽，只不过造成一点小麻烦而已。有个播音员还说了个双关语，但是大部分听众肯定没有听懂：他说这次空袭不是“杜立德”（“do-little”，音译杜立德，字面意思是“做一点”），而是“杜无能”（do-noting，把little改为了nothing，字面意思是“没作用”）。但就像渊田美津雄事后记录的那样，这场空袭其实应该称为“杜很行”（do-much）。^[82]虽然这场空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但许多日本人将其解读为一种噩兆。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中，甚至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日本没有遭受外国入侵的经历；他们从来不敢想象他们的家园会以这种方式受到侵犯。驻扎在南太平洋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收到了一封来自东京家中同辈女性的信。在信中，她告诉他，这场空袭“使全国上下的民众对于战争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事情已经大不相同了，炸弹直接落在了我们家里。战火似乎已经从前线蔓延到家门口了”。坂井补充道，这一消息让他的飞行员战友“备受打击”：“得知敌人的实力强大到足以摧毁我们的家园后，即使这只是一次惩罚性袭击，我们依然对未来

和更严重的袭击产生了深深的恐惧。”^[83]

日军简直是受了奇耻大辱，尤其是日本海军。美国战机肆意玷污了天皇宫殿之上的神圣天空，却没有一个入侵者被击落。“我们的国土遭遇了空袭，但是我们甚至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击落，”宇垣将军在4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这让我们充满了懊悔。”^[84]山本懊恼地评论道：“这场空袭令人遗憾地阐明了一个说法——拙劣的进攻胜过精妙的防守。”^[85]总司令已经命令所有可用的海军部队出海，但这完全是竹篮打水。这样做除了白白消耗燃料，使船员越发精疲力竭，还表明日本对这类空袭毫无招架之力。直到20日，山本五十六才意识到美军早已远去。他怒气冲冲地通过无线电发布了命令：“停止对美国舰队的行动。”^[86]

在经历了最开始的困惑之后，日军的领导者们很快搞清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天下午洗出来的通信兵拍摄的空袭照片进一步证实进攻者是B-25轰炸机。4月18日午夜，中国的日军报告了发生在浙江省和江西省的几起迫降事件。最早被捕的美国飞行员供出的都是虚假情报，有的声称他们来自阿留申群岛，有的说是来自传说中的超级航母。“他们一直在撒谎，”宇垣缠在4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加快调查，这样才能为未来做好准备。”两天后，他冷静地写道：“在南昌被捕的美国战俘被送到南京，最后他们在那里说了实话。”4月22日：“战俘的供述补充了更多事实……”^[87]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杜立德的B-25轰炸机是从一艘该死的美国航母上起飞的。

在中国，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目的是占领那些用来接收杜立德轰炸机的机场。日本人清楚，B-25的空勤人员被当地的平民或游击队员保护了起来，所以日军的进攻已经沦为对浙江省和江西省人民的大规模报复。日本军队席卷了这片地区，按照命令屠杀被怀疑协助美国空勤人员的全镇居民。细菌部队在当地开始散布霍乱、伤寒还有痢疾病菌。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的电报中称：“日军屠杀了那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

人和孩子——我再重申一下——日军屠杀了那些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88] 中国有20余万平民和士兵惨遭杀害。

山本五十六将军在东京的官员面前重拾傲慢的态度。他说，这场空袭的基地很有可能就是中途岛（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说，中途岛是美国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的关键地点。如果不迅速夺取该岛，势必要大幅增加国土防务力量，影响今后的南方战事。他无法容忍任何犹疑。

军令部和陆军中的反对派原本希望通过一系列拖延战术来扼杀中途岛行动，现在他们的抵抗已经彻底瓦解了。4月20日，在会议上，陆军和海军的决策者同意推迟对新喀里多尼亚、萨摩亚和斐济的进攻，优先完成中途岛行动。军令部的永野修身大将也支持山本五十六的计划。陆军的田中将军得到保证，中途岛行动不会是夏威夷进攻计划的第一步，于是他同意派遣一个歩兵团。之前隐瞒的重要细节——日期、命令、派遣的舰队——也逐渐明了。进攻中途岛的行动定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待舰队主力占领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澳大利亚基地莫尔斯比港，也就是完成海陆空联合的“MO行动”的目标并回归后，中途岛行动便会立即实施。

^[1] Koichi Shimada, “The Opening Air Offensive Against the Philippines,”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 89.

^[2] 昭南岛意指南方光明之岛，或昭和天皇在南洋获取的领土。——译者注

^[3]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4] Song titles cited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p. 231–32.

^[5]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86.

^[6] Wakana Nishihar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328.

^[7] Shigenobu Debun account in *ibid.*, p. 124.

^[8]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9.

^[9]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April 17, 1942, in *ibid.*, p. 112.

^[10] *Japan Times & Advertiser*, Jan. 2, 1942, in Caren, ed., *Pearl Harbor Extra*, p. 77.

- [1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21, no. 12, Feb. 1, 1942.
- [12] General Hatta over the radio, Jan. 9, 1942, quo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47.
- [13] *New Order in Greater East Asia* (April 1942), in *ibid.*, p. 112.
- [1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87.
- [15] *Ibid.*, pp. 284, 297, and 287.
- [16] *Ibid.*, p. 288.
- [17] *Ibid.*, p. 292.
- [18] *Ibid.*, p. 286.
- [19]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1,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3.
- [20]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4, 1942, *ibid.*, p. 104.
- [21] Miwa quoted in Willmott, *The Barrier and the Javelin*, p. 79.
- [2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1.
- [23]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1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4.
- [24]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296.
- [25] *Ibid.*, p. 297.
- [26] Capt. Marc Mitscher to Adm. Nimitz, “Report of Action, April 18, 1942, with notable events prior and subsequent thereto,” April 28, 1942.
- [27] Stephen Jurika, Jr.,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26.
- [28]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35.
- [29] King related the details in an off-the-record press interview dated June 8, 1943, in Perry, “Dear Bart,” p. 171.
- [30] 视风（apparent wind），乘船时感受到的风，是自然风与船行风的合成风。——编者注
- [31] “Doolittle Performs ‘Outside Loop’ Feat,”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27.
- [32]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73, p. 32.
- [33] Details of training the B-25 aircrews in *ibid.*, p. 33; see also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26.
- [34]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p. 38.
- [35]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1.

[36] Cheek’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5.

[37] Stafford, *The Big E*, p. 77.

[38]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2.

[3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00.

[40]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48.

[41]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37.

[42]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27.

[43]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3.

[44]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42.

[45] Capt. Murray, USS *Enterprise*, to CINCPAC,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5.

[46] Ibid., item 6. See also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350.

[47]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63.

[48] Stafford, *The Big E*, p. 78.

[4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26.

[50] Cheek’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6.

[51] Commanding Officer, USS *Nashville*, to Admiral Nimitz, “Report of sinking of two enemy patrol boats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1, 1942.

[52] Admiral Halsey to Admiral Nimitz, “Report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ombing of Tokyo on April 18, 1942,” April 23, 1942, item 2(d).

[53]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2.

[54] Stafford, *The Big E*, p. 78.

[55]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3.

[56]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0.

[57]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9.

[58] Fisher’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4.

[59]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p. 52–53.

- [60]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1.
- [6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8.
- [62]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1.
- [63]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55.
- [64] Fisher's recollections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4.
- [65] Bernstein's recollections in *ibid.*, p. 18.
- [66] Rose,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p. 70.
- [67]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p. 44.
- [6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0.
- [69]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11.
- [7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6.
- [71]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61.
- [72]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6.
- [73] Koiwa Kazuei letter in Gibney, ed., *Senso*, p. 203.
- [74] Lawson,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p. 62.
- [75] War Department communiqué, April 20, 1943, in *ibid.*, p. 194.
- [7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309.
- [7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308, 307.
- [78] *Ibid.*, p. 309.
- [79] Jurika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4.
- [80]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 73.
- [81]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p. 334.
- [8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7.
- [83]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 104.
- [84]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20,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15.
- [85]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0.
- [8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7.
- [87] Diary entries dated April 19, 1942, April 21, 1942, and April 22,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p. 113, 115.

[\[88\]](#) Chiang Kai-shek to FDR, April 28, 1942, quoted in Gruhl,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Two, 1931–1945*, p. 79.

第九章

美国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靠近珍珠港海军造船厂的10—10码头，一扇不起眼的门从棕榈成行的人行道开向楼梯井顶端。进门来到地下室，迎面是一扇由海军陆战队员守卫的厚重铁门。出示有效证件后，便可以进入一个无窗大间，里面白灯通明，制式桌椅成列。一群文书军士将穿孔卡输入两台汽车大小的机器内，这种机器叫“制表机”，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早期的计算机，用以检索及分析含有字母和数字的数据。穿孔卡昼夜不停地穿梭于机器中，地下室里充满了金属碰撞发出的刺耳的咔嗒声。

这一神秘地下掩体是夏威夷的密码破译机构，负责抽丝剥茧，一层层解开日军的电码。该地下建筑门外并无标牌，其正式名称是作战情报站。工作人员私下称其为“地堡”。^[1]战争开始后，这里进行了改组，改名为太平洋舰队无线电站，一般情况下（在当时的文件及历史文献中）叫“海波站”（Station Hypo，也叫夏威夷情报站）——“海波”（Hypo之音译）是字母H的语音代码，指代的就是夏威夷监听站。

夏威夷情报站的负责人为约瑟夫·罗奇福特（Joseph Rochefort），一位41岁的海军中校。他身材高大，具有贵族气质，深色头发，面容英俊而友善。20世纪20年代他曾被派驻东京做翻译官，学习过日语口语及阅读，此后加入了通信情报领域新兴的秘密军官小团体。罗奇福特发现密码分析工作会影响个人生活，妨碍职业前景，并使其罹患溃疡，因而对此并无好感。他后来说，“我认为自己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极力逃避通信情报任务。某些早期二战史作品将罗奇福特描述为一位天才怪人，说他穿着艳丽的红色吸烟装，趿拉着拖鞋，到处招摇。在1969年为海军

学会口述自己的经历时，罗奇福特虽对此直言不讳，但坚决否认其本人或其装束是怪异的。的确，他在卡其布制服衬衫外套了件吸烟装，但只为有口袋可装烟斗及烟袋。的确，他趿拉着拖鞋随处晃荡，但只因双脚在水泥地板上走得太多，脚疼不已。然而在地下严密守卫的密室之外，他从不如此穿着，并且“本人并非怪异或者怎么样”。^[2]

或许如此。但毫无疑问，在地堡这样的地方是不必遵循通常行为准则的。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组织，充满团队精神，既不拘一格，又重视集体合作。这一团队由少数天才破译人员和翻译官组成，在此他们可以肆意凭直觉行事。军衔高低在此无关紧要。“没有多少人在意制服和军内仪节，”海波站资深成员贾斯珀·霍姆斯写道，“不过谁是老大是确定无疑的，个人地位取决于军衔以外的因素。”^[3]这里尊重天马行空的直觉推测，也尊重步步为营、抽丝剥茧的战术。有的人桌面整洁有序，埋头苦思，一次处理一份截获的情报；而其邻桌或许堆满了糖纸，玉照高挂，深埋于过往截获的情报之中。只要能取得成果，罗奇福特可以容忍任何手段和风格。

在二战之前的时代，密码破译领域战果未经检验，无人理解，同时又高度保密，甚至被谴责为不道德的。最著名的一例发生在192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拒绝翻阅解密的别国电文，因为“绅士不私阅彼此函电”。^[4]（罗奇福特团队最有天赋的成员之一托马斯·戴尔少校笑称史汀生的观点不适用于密码破译员，“因为根本没人拿我们当绅士”。^[5]）罗奇福特评论说，最有经验的顶尖密码破译员大多仕途不顺，因其军旅生涯所从事的任务大多不便透露^[6]：“无论身在何处，华盛顿抑或此间，我等所作所为无人知晓，因而某种程度上成为怪人。某些人也就的确如此。”^[7]能取得成功之人皆为痴迷、执着、专一之人——“游走于辉煌与疯狂的边缘”。戴尔的桌上有个座右铭：“不疯魔，不成活。”^[8]

珍珠港之役后，罗奇福特及其助手们昼夜工作。罗奇福特三四天才

回次家。他大多数夜晚都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靠咖啡和三明治度日，每日工作20小时或22小时是常态。戴尔有时连续工作两三天，靠吞服大把苯丙胺药片保持清醒。药片就放在他桌上的小桶内，同事们可随意取用。^[9]（后来被问及此事时，戴尔解释道：“我想总有人因此中过彩。就算长期服药最终会伤害健康，那又如何？”^[10]）大部分军人及文员每12小时轮班，每周工作7天，或者用霍姆斯的话来说，每周“正常”工作84小时。

战争头六个月，情报站人数增加了四倍。罗奇福特1941年5月接手情报站时得到承诺：可以自己挑选人员，并会得到基地人事主管批准。每当有新人来珍珠港报到，便有军士长令其列队，端详其面容，挑出看上去足够聪明，适合密码破译工作的人。^[11]“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于1941年12月7日失去作战能力，该舰的整支军乐队都被选中去从事将截获的原始无线电代码组转换为IBM穿孔卡的工作。他们很快就达到每周都能制作无数穿孔卡的地步，并且可以不经指导就运行大型IBM计算机。音乐家们对这份工作上手之快，令霍姆斯感叹：“有一种理论就此提出：音乐与密码破译定然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12]

夏威夷情报站战前被分派的大多为次要任务，主要集中在破译日本外交密码、舰队司令部密码以及气象密码等方面。日本海军最重要的行动密码“JN-25”含有敌军最关键的机密，一直由华盛顿海军司令部进行破译。该密码已使用一年，仅有个别片段得以破译。但是，一套被美方称为“JN-25-B”^[13]的新密码于1941年12月4日投入使用。其第二层密码算法是全新加密算法，即“附加乱码加密算法”。如此一来，所有以往成就均被抹杀，新情报一个词都无法破译。罗奇福特说，他们（华盛顿那帮人）“两眼一抹黑”。^[14]

罗奇福特得到许可，着手破译新密码。珍珠港之役后一周，夏威夷情报站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无休止奋战，破译5万组5位数密码。^[15]一开始，这项工作似乎是大海捞针，甚至无法办成。与之相比，二战前

密码破译的辉煌成就简直是小儿科；这种突破性进展（霍姆斯写道）“从来没人实现过，除非运气足够好，又有罕见的天才不懈努力”。^[16]霍姆斯环顾同僚，颇感英才乏人：此辈皆凡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截获的情报密码中，任何一组密码均无法破译。那简直度日如年，罗奇福特说，“看到大堆字母和数字，或许有上千甚至上百万之多，而且你知道其中自有体系，只要获知解密的钥匙，破译起来就会非常简单”。^[17]日军1941年12月中旬的一次通信误报证明五位附加乱码已经变更，但底层密码未变。

1941年年底，尼米兹接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职位时，罗奇福特及其团队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尽管成果微乎其微，但终究是有些成果，而且未来会有更多成果。戴尔有一种特异本领，能够看出众多冗长字母及数字的组合规律，他说“观察得足够久，就能看到特别之处；如果长时间观察仍无法看出特别之处，这本身便很特别。然后你会尝试解释这一特别之处”。于是乎，他反复盯着代码看，直至一个想法在脑海中成形。如果这一想法可以检验，他便去检验。如果检验失败，他便回过头来继续盯着代码。戴尔说：

我相信，许多此类想法源于潜意识。有时人们问我，为何我能够破译情报，我说：“嗯，你就盯着它，直到发现它到底在说什么，然后把内容写下来。”你要盯着它看——这取决于你对付的是怎样一种东西——直到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引起了你的好奇。也许这什么也说明不了。那么便另辟蹊径，去观察另一个点。第二天从头再来，重新盯着它看。^[18]

罗奇福特认为，“坚持不懈胜于一切，必须日日执着于此”。^[19]

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罗奇福特团队能够读懂的代码组少之又少，而且无法相互联系，但大量信息仍可从原始截获电文中推断出来。“通信量分析法”仅靠分析敌方特定地点通信量的增减即可获取有用的情报。

罗奇福特说：“实际上，这是常识。这并非真正的情报，只是常识而已。”^[20]例如，如果日本位于加罗林群岛的大本营特鲁克发出的无线电通信量激增，同时濑户内海的无线电通信量减少，这可能意味着主力舰队在向南运动。通信量分析法与破译工作初步成果结合更具威力，比较典型的是和“电报外码”结合在一起。“电报外码”中含有地理代码（发往何处，发自何处）或者收发人（发自何人，发往何人）的信息。^[21]舰船、部队以及指挥官的无线电呼号经常出现在可预知的电文内容中，并且有时可以根据目击报告或无线电测向数据验证，借以判定敌军信息发出的地点。监听者熟悉发报员的癖好——他们称其为“击键方式”，追踪特定发报员的动向可以推测特定舰船的方位。因此，“外码”相对容易破译。

贾斯珀·霍姆斯说，战前数月，他对通信量分析法尚未完全确信，觉得报告中“混杂着啰唆的废话与模糊的暗示，可靠信息甚少”。^[22]然而战争期间整个太平洋敌占区通信量猛增，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的数据。1942年1月初，每日敌情通报显示特鲁克地区的无线电通信量激增，这说明南方有战事。罗奇福特还综合几段可以解读的破译电文和大量有根据的推测，正确地预测出日军将夺取南太平洋新不列颠的拉包尔。盟军是否有余力保卫拉包尔尚无定论，但如果日本海军舰队主力南进，日本就会在如此绵长而广阔的战线上出现大量防御漏洞，美军即可策划航母打击而不必担心落入陷阱。

然而，此类情报在海军最高层决策者审阅和相信之前，其实还起不了什么作用。二战时期的海军将领们在无线电通信刚启用时即已纵横海上。密码破译尚属无人了解与相信的黑箱。如果密码破译者已挖掘出日军核心密码，并且能提供完全解密的敌方通信情报，海军司令官必然重视。但此时距夏威夷情报站能够提供无懈可击的情报之日尚有数月之久。通信量分析法具有指示性，但不具确证性。正如贾斯珀·霍姆斯所言，它只能依靠“一连串推断”。^[23]海军将领们对其不予置信也自有其原因。

然而，夏威夷情报站、美国海军，乃至美利坚合众国，幸好拥有切斯特·尼米兹这样的将军。每天早晨8点，他都要听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的军情简报。如有重要军情禀报，莱顿可以随时出入尼米兹的办公室。^[24]（除了他，或许还有舰队参谋长，参谋人员中无人有此特权。）夏威夷情报站每日会向莱顿做简报，随后莱顿会综合其他情报资源，再向尼米兹汇报。莱顿和罗奇福特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派驻东京之时。他们曾长时间共同学习日语。^[25]他们视彼此为挚友，这有助于让他们之间的专业合作关系顺畅，否则这一合作关系可能会因第14海军军区（海波站也是其一部分）与太平洋舰队参谋部之间的部门竞争而趋于复杂化。尼米兹对于送至他案头的全部情报都予以重视。出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第一天，他就告诉莱顿：“我希望你成为我身边的南云忠一。我要求你像南云那样思考、判断。你必须从日军的立场去看待这场战争，看待他们的行动和目标，并且告诉我你的所思、所为，行动的目的和战略等。如此，你便赋予我赢得战争所必需的情报。”^[26]

基于先前的情报，尼米兹于1942年2月1日放胆派遣哈尔西将军及其航母编队突袭马绍尔群岛。正如预测的那样，那里并无敌方主力舰队。这是夏威夷情报站在这场战争中的首次重大成果。但对密码破译者而言，哈尔西的突袭行动最大的收获是随之涌出的日军通信量。整个太平洋战区的盟军监听站截获了数百份电报，这些电报均迅速被送往夏威夷情报站破译。任何类型的原始截获电文对于密码破译者都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关于已知事件和地理方位的通信情报更是无价之宝。此类电报中能发现重复出现的相同“外码”：马绍尔群岛的地理代码，突袭行动中发现的日军舰船、部队以及指挥官无线电呼号，指明敌方航母的代码组。

夏威夷情报站渐入佳境。尼米兹受日渐具体的敌情报告鼓舞，命令向日军海域采取更冒险和更有雄心的航母攻击行动。每次进攻都逼出巨量日军无线电通信，大大加快了夏威夷情报站的破译工作。至2月末，密码破译者们工作起来已经完全得心应手了。罗奇福特团队已正确地判

断出，所有“A”开头的双字母地理代码代表中太平洋的美据（或者前美据）岛屿，“P”代表中太平洋日据岛屿，“R”为南太平洋英据岛屿，“M”为菲律宾。第二个字母代表这些范围内的特定地点。3月，一份发往“AA”的电报要求侦察当前“AK”港舰船情况。这串截获电文佐以可证实信息，可以确定这两个代码分别代表威克岛和珍珠港。

3月9日，日军中太平洋航空队指挥官收到一份关于“AF”风力及风向的例行气象预报。^[27]按照气象模型，罗奇福特推测“AF”可能是中途岛。

正如莱顿所说，情报是“容易变质的东西”，对此罗奇福特表示赞同：“获得情报而不运用等于无用。”^[28]情报破译领域尚未经实战检验，并且珍珠港的灾难并未提高密码破译工作在舰队高层心目中的地位。电信情报工作是全新而未获成果的领域，众多军官对此并不熟悉。根据情报做出的预测而采取行动看上去甚至与马汉的军事理论相违背，马汉认为司令应当根据敌方作战能力而非对其意图的推测来排兵布阵。^[29]这对于正确运用情报产生了巨大的阻碍。莱顿和罗奇福特都知道需要向决策者和可以依据情报及时采取行动的军队高层“推销”其成果。但是，如何做才能够既传播他们的发现，又不会惊动日军，让其察觉电码已被破译呢？

通信情报工作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一定要尽量让敌方“感觉安全”，绝不能使其有理由怀疑己方电讯已被破译。战争期间，美国人破译日本海军电码属于绝密信息。夏威夷情报站破译的情报被命名为Ultra，仅有小范围高级军官可以获知这些情报。Ultra提供的信息如果要向保密范围之外分发，便要进行加工。例如，关于日军舰队行动的电讯破译情报可能会描述为潜艇或飞机的侦察报告。^[30]这样处理是为了保证既使有权采取行动的指挥官得到最新情报，又能保守重要机密。“所以，这种保密工作，其实也要骗自己人，”罗奇福特后来说，“如果谁都不告诉，如何为人所用？”^[31]夏威夷情报站的神秘色彩在海军内部引发了一些敌

对情绪。当罗奇福特需要更多人员、装备或者工作场地时，他难免要详尽解释其需求细节。但他又不能这么做。因此，他直接向第14海军军区的布洛赫将军求助；并且，无论罗奇福特想得到什么，布洛赫总是批准，不问任何问题。军需官不大习惯被一个小小的神秘部门的负责人指使，尤其是还不准问他问题，但他们很快就知道不能拒绝罗奇福特的要求。

夏威夷情报站是受华盛顿美国海军司令部领导的分布在各地的通信情报机构之一。该系统最大的通信情报机构是OP-20-G，即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通信情报科。在战前，菲律宾科雷希多（卡斯特站）、关岛、皮吉特湾的班布里奇岛都设有额外的监听站。英军在新加坡有个优秀的破译小组。（日军的突袭破坏了关岛情报站。此后，新加坡站撤退至锡兰，卡斯特站通过潜艇逃至墨尔本。）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小型附属侦听站都会监听敌军情报，进行无线电测向。^[32]当这一系统正常运转时，信息基本能够顺畅地传播。不受阻碍的合作至关重要，因为一个部门的突破可以直接促成另一个部门的突破。这些都是基于合作的力量。

然而，竞争与不和亦不期而至。日军对珍珠港的突袭成为通信情报部门的灾难性失败。这场灾难给整个情报搜集部门投下了长久的阴影。因处于事发之地，夏威夷情报站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历史终将证明最具破坏性的因素来自华盛顿，源于海军情报局（ONI）与海军通信局

（ONC）激烈的官僚之争。^[33]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海军高层均认为变革势在必行。金将军及其主要部下，包括作战计划处处长特纳将军，相信通信情报工作应当由华盛顿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美国舰队总司令应当牢牢掌控夏威夷及太平洋战区各情报部门。

1942年2月，战前的海军通信情报科主管劳伦斯·萨福德中校被解职，取代他的是约翰·R. 雷德曼上校。此人是海军学院1919届毕业生，并无任何密码破译和通信情报方面的经验。此人之兄约瑟夫·R. 雷德曼少将于同月被任命为海军通信局局长。此兄弟二人加上雷德曼将军的副手约瑟夫·N. 温格中校，在华盛顿形成了强大的权力轴心。萨福德与罗

奇福特拥有彼此信任的良好私人关系，二人都认为不同部门之间不可争权夺利。随着萨福德被解职，信任与融洽的关系不复存在，夏威夷情报站与华盛顿的关系迅速恶化。温格坚称华盛顿应当“对于所有监听站、侦测网络和破译机构行使有效的统筹控制权”，并且应在司令部设立“所有通信情报活动的统筹管理中枢”。^[34]

金将军正欲巩固和整合司令部的权力，于是在2月6日批准了这一计划。金大笔一挥，将夏威夷情报站划为了次要角色。但桀骜不驯的罗奇福特决定保留自己部门的独立性，他认为自己的部门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不止于此，他还说：“谦虚地说，我部门确为电信情报组织之翘楚，世所罕有。”^[35]）罗奇福特与雷德曼始于竞争，终于敌对——他们的不和差点毁了美军在中途岛的胜利。^[36]

雷德曼2月于华盛顿刚一履职，罗奇福特与其新领导之间便开始出现紧张关系。他们能接触到相同的破译情报及通信量报告，但他们观点各异，结论相反。尽管当时JN-25密码已逐步得到破译，但破译的电文内容仍支离破碎，其中有少量破译的片段似乎隐藏着丰富的信息，但更多还是一连串空白。而通信量方面的信息又有相互矛盾的解释。而且，现有的证据很少能指向某种确定的解释。它们大多是只会将人引上歧途的信息，因此密码破译者必须筛选巨量数据，靠演绎和推理提出看法。他们的推测通常只不过是复杂的猜测，他们出于礼貌称之为“估计”。罗奇福特认为，华盛顿的分析工作是粗陋的，其结论经常有悖于常识。他从不掩饰对雷德曼兄弟的蔑视。他认为，此二者皆权欲熏心之人，为个人目的而玩忽职守。此辈已预见通信情报领域之蓬勃兴起，希图借此飞黄腾达，获取“个人荣耀”。^[37]

自2月至3月，金将军反复发出预警，称日军航母编队将进攻夏威夷、中途岛、美国西海岸、巴拿马运河以及夏威夷—澳大利亚一线盟军占领的岛屿。2月6日，在给尼米兹及其数名副手的电报中，他说日军将于四国联军的战区展开行动，“并且将伴随对中途岛、瓦胡岛以及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猛烈进攻，还有可能攻击美国西海岸或者巴拿马运

河”。^[38]同日晚些时候，金又预测日军航母将对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发动袭击。还有哪儿呢？罗奇福特对此深表怀疑，回应称日军进攻的目标应为爪哇和苏门答腊（确实如此）。3月11日，美国舰队总司令警告称：“最近敌方空袭及潜艇活动充分预示另一次针对夏威夷——中途岛的全面进攻，主要目的旨在削弱或摧毁我军位于珍珠港的重要基地。”^[39]夏威夷情报站反驳道，日军正在南进，缺乏对中太平洋发动大规模行动的条件。1942年3月18日，尼米兹肯定了莱顿的报告，断言：“马来亚区域外，没有迹象表明会有即将到来的重大进攻行动。”^[40]

海军通信情报科似乎助长了金将军的焦虑情绪，因为它拣选出来并交给金的数据容易让人相信敌军会发动那样的袭击。金左近之辈皆危言耸听之徒，他们的肆意妄言或许将使舰队陷于徒劳无功的奔波。最乐观的情况下，这将导致浪费时间及燃料；最糟糕的情况下，舰队将因部署失当而无法击退敌方组织的进攻。罗奇福特及其情报团队已经挺过夏威夷遭袭之后传出的流言蜚语，并且学会了遇事先大胆怀疑，再小心求证。罗奇福特断定，华盛顿已迷失于战争迷雾之中，而且他不惮于表达自己的判断。尽管事后总是证明罗奇福特是正确的，但他仍不见容于温格和雷德曼兄弟。

夏威夷情报站规模稳步扩大，4月时地下室里已挤满了人。办公桌纵横抵墙而列，桌旁坐满了戴着绿色眼罩的人，他们戴眼罩是因为头顶的荧光灯有损视力。他们专注于手头的笔记和破解工作，无暇他顾。数名重要密码破译者很少离开地下室，睡觉时躺在可以推上墙的折叠床上或者直接趴在桌上。托马斯·戴尔是情报团队不可或缺之人，罗奇福特越来越担心他会被压力压垮。3月，他开始催促戴尔每隔数日走出门去，回自己家睡个好觉。罗奇福特自己却经常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四周的破译电文堆积如山，烟斗中喷出的青烟缭绕其间。一位军官估计，夏威夷情报站在战争头三个月完成了和平时期一整年的工作

量，而且此种工作节奏至少一直持续至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之后。[\[41\]](#)

贾斯珀·霍姆斯在地下室墙上的巨大的描绘板上更新了战舰、运输舰和潜艇等已知美军、盟军以及日军舰船的方位。成堆的破译电文和一盒一盒的IBM穿孔卡铺满地面，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它们环桌沿墙堆叠起来。文档管理都是临时凑合的。罗奇福特及其主要分析专家知道他们应该设计出良好的文件管理系统，以交叉检索破译的情报，但又根本没时间去做这些。尽管破译的电文和IBM卡片如雪片般堆积，地下室里还是秩序大于混乱。“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疯狂”，罗奇福特后来回忆道，“有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么搞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能提到了什么，忽然你说，“等一下。日军位于哈马黑拉附近，预备在某港口登陆时，有份电报和这个类似。咱们得找到它”。然后，他们便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翻找，最终总能找到。……然后，你从这儿又会找到一条线索，引向另一份情报，然后又和另一件事情联系上，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穿起来，整个工作就完成了。一个字母破译后，促成另一个字母的破译，如此类推。然后，在某个时刻，你的记忆就会帮上忙。[\[42\]](#)

霍姆斯还说，破译专家“需要的只是时间、耐心、无穷的工作能力、心无旁骛的执着、过目不忘的记忆、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大量的通信情报”。[\[43\]](#)

起初，解密的外码就像未破译密码大海中的明码岛屿，但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岛屿也会为演绎推理提供立足点。过一段时间，海水退去，各个邻近岛屿之间便开始有了联系。推论会佐以通信量分析及目击报告的检验，未解之处渐少，可解之处渐多。仅剩个别顽固的未破译片段夹杂在近乎破译完成的通信情报中。新破译的代码组确认之前的演绎推理结果时，密码破译者会欣喜不已。每次新的成功都让他们对仍无法求证的

演绎推理更有信心。戴尔将在经过数周挫折而最终成功破译日军代码组的感觉比喻为性高潮。“在生理上，它们并不相同，”他马上补了一句，“但心理上的感觉是一样的。”[\[44\]](#)

并非每次突破都能立竿见影。日语的细微差别及隐含意义相当丰富。即便是完全破解的情报，破译专家有时也无法确定其含义，因为他们无法正确翻译日文词语。甚至最有能力和经验的日语翻译官对如何翻译可能都达不成一致。日本海军习语更是五花八门，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演化。此外，太平洋地区的地名也给夏威夷情报站的分析专家们带来了困惑。几个世纪以来，此区域数不胜数的岛屿、城镇、海湾和浅滩已积累出本地名称、欧洲名称和日语名称等不同叫法。许多地点具有众多名称，甚至同一名称拼法不一。分析专家只好埋首于以不同语言和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海图、导航图和地名词典之中。他们将海图摊在桌上，用放大镜埋头搜索。即便日军用的是过去的海图上能够找到的西方地名，也是用片假名标注的，而且日语音节的发音与本来的发音不同。贾斯珀·霍姆斯费了些时间才明白“沃多拉库”是指“伍德拉克岛”。[\[45\]](#)

关于日军即将进攻南太平洋莫尔斯比港的模糊情报首次出现于1942年3月最后一周。当时截获的电文显示，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接到命令，进攻名为“RZP”的目标。起初这一地理代码悬而未解，但日军巨大的通信量以及该代码的反复出现让人们毫不怀疑日军将有重大行动。进一步分析所有监听站的相关情报后，人们发现这次行动的代号为“MO”，不过其含义尚不明了。因此，破译这些代码马上成了首要任务。

从不同渠道汇总及筛选的情报表明，该行动的目标指向珊瑚海。4月初，日本驻所罗门的航空部队得到增援。澳大利亚海岸的观察哨确认，日军在此区域巡逻的距离和密度均已增加。特鲁克群岛的动向则表明敌军已向南太平洋调动。英国密码破译人员证实了罗奇福特的预感，南云忠一突入印度洋只是一次突袭而非某个持久行动的开始。日军航母正返回特鲁克，然后会离开那里，驶往南太平洋。罗奇福特告诉尼米

兹：“针对西南太平洋的攻势即将形成。”^[46]4月3日，他预测此次进攻将始于拉包尔，目标是新几内亚的东南角。但是，何时开始呢？墨尔本的贝尔康宁情报站（从科雷希多撤退的情报组）预测是4月21日，但罗奇福特认为估计早了。5月第一周似乎可能性更大。

金将军亲自询问此事，并且鼓励了罗奇福特。在发给夏威夷情报站负责人的电报中，美国舰队总司令要求提供一份日军作战意图的全面评估。这次问询越过了正常的指挥链，让人惊讶。“我们有些惊讶，他竟然会直接问我们的想法，”罗奇福特坦言，“我个人原以为他甚至不知我们的存在。”罗奇福特及助手们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心无旁骛地斟酌如何答复，不到六小时便回复金将军。报告包括四项实质性要点。一、日军目前已完成印度洋的行动任务，其航母战斗群正处于返航途中；二、日军对珊瑚海的进攻迫在眉睫，旨在占领新几内亚东南端；三、无证据表明日军有意入侵澳大利亚；四、另一项重大行动已纳入日程，将于珊瑚海战役后不久进行。该作战行动的时间及地点等细节尚未明了，但规模宏大，将动员“日军舰队大部分舰船”。^[47]这一报告恰到好处地平衡了演绎推理与已知的不确定情况。罗奇福特那时已经在怀疑此次尚不确定的军事行动的目标为中途岛，但他做出此预判时仍缺乏充分证据支持。

1942年4月18日，杜立德空袭东京的行动导致日军通信量暴涨，流量之多堪称前所未有，美军破译密码方面的收获也是空前的。即将进行的南太平洋上的作战行动细节立刻显现出来。“MO”被确定为莫尔斯比港的代码。4月24日，尼米兹和金手头已有一份有关“MO舰队”、“MO驻军”和“MO进攻部队”的截获情报。^[48]大股日军将涌入珊瑚海，包括航空队和航母编队，掩护一支独立的两栖部队登陆莫尔斯比港。通过分析截获信息和破译情报中暴露的舰船离港时间，情报分析专家们预计这一行动的时间应在1942年5月的第一周。

尼米兹开始意识到夏威夷情报站在JN-25密码的破译工作中厥功至伟，而且他应采取行动，保证罗奇福特不被华盛顿的官僚拖后腿。4月

中旬，他请求金重新划分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部门职责。分配给夏威夷情报站的任务是“解读对于海上军事力量有益的现时日军通信情报”，而海军通信情报科则负责过往日军通信情报分析。^[49]金强行批准了这一请求，似乎都没有征求下属的意见。他们如此行事难免令人心存芥蒂，因此罗奇福特与雷德曼之间的纷争升级为势不两立的地步。罗奇福特暂时占据上风，但雷德曼兄弟不会放过任何使绊的机会。从此，毫无阻碍的交流在部门间绝迹了。暗中较劲成了工作的常态，任何错误的推断都会招致对方的抨击，被指责为行事鲁莽。

4月22日清晨，莱顿向尼米兹提供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情报总结，其中给出了与珊瑚海行动有关的最为准确及时的证据。其要点为：“众多迹象表明，敌方将对新几内亚—新不列颠—所罗门地区发动进攻……

〔进攻〕很快就会开始。”^[50]但在开战的两周之前，仍有一系列情况是未知的，这很危险。他推测敌方兵力可能包括“5艘航母，1艘战列舰，5艘重型巡洋舰，至少4艘轻型巡洋舰，12艘驱逐舰，12艘以上潜艇”，还有大约135架陆基海军轰炸机和100架以上零式战斗机，以及相同数量的侦察机。敌军调动的部队可达2万人以上。然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难以确定。华盛顿仍在喋喋不休地警告说，敌人会对夏威夷发动牵制性进攻。某位军阶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不相上下的军队高官警告当地军队首脑提防即将到来的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51]莱顿判断，“无迹象显示日军向夏威夷群岛运动”，而且“无证据表明附近日军占领地的轰炸机数量增长，因此上述进攻几无可能”。^[52]

尼米兹感到了压力。无论情报人员的工作多么出色，依据他们的推断采取行动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们从不讳言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令人不安的是，日军可能正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电信欺骗，旨在引诱美国舰队南下，从而使瓦胡岛这一坚固要塞在面临真正的日军空袭时脆弱不堪，或许后果更糟。尼米兹获取的情报尚不足以让他据此做出决策。他必须检验情报的准确度，探寻其逻辑上的不足，进而完善从诸多不相关

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相信直觉，即哪些情报人员是正确的。他也确实这样做了。此时战争前景不明，在这一重要关头，尼米兹决定放手一搏，相信情报的准确性。4月下旬，尼米兹的参谋们发布研究报告，认定在战争的那一阶段，情报工作是美军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优势。日军在航母、战列舰及岸基空中力量方面占据优势，但这份报告断言，美军可以“对敌军的进攻方向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并且“查明敌军部署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因而能够克服这一不足。^[53]尼米兹认定（如其所言）“必要时可以接受战役失利的结局”，^[54]决心投入能够动员的两艘航母对决日军舰队，并希望夺取胜利。然而，他必须说服金将军同意该计划，后者仍对两艘航母和珍珠港的安全念念不忘。

1942年4月24日，尼米兹登上大型水上飞机“科罗纳多”并飞往旧金山，与美国舰队总司令面谈。旧金山位于华盛顿与夏威夷航线的中点，是理想的会面地点。（战争期间金与尼米兹会面过18次，这是其中的第一次。两人基本都是在旧金山会面的。）尼米兹及其随员下榻于联合广场的圣弗朗西斯饭店，住在顶楼的套间。此后三天，他们在旧金山联邦大厦的会议室内与金及其随员终日会谈。

他们的紧迫任务是确定战略，应对即将到来的MO攻势，但议程中也有其他项目。金劝尼米兹以更大的格局来看待战争，要考虑到生产的增长、与英国及苏联的磋商、欧洲的进攻计划以及太平洋战区与盟军全球战略的关联性。金怀疑尼米兹对其副手及下属过于温和。他希望太平洋舰队清理“悲观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将汰换人员调整至次要岗位。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曾提议让许多海军高阶将领退役，而让年轻将官指挥海上作战，金支持此项政策。尼米兹对此并不反对，但建议通过他原来所在的华盛顿航海局的正常程序进行。他相信美国海军的人事体系，希望它能不受干扰地运作。

金特别对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中将心怀不满。人们对这位“黑鞋”（水面舰艇）将军在战争初期数月的表现可谓莫衷一是。他似乎表现得缺乏进攻性，并且他的特混舰队因为不合理的长时间加油而延误了

行动。金对弗莱彻的信任摇摇欲坠，但尼米兹坚称所有美军航母特混舰队都在攀爬陡峭的学习曲线，在此情形下弗莱彻的表现不能说不够好。金认同了此说，弗莱彻得以留任。最杰出的美国航母特混舰队司令是哈尔西，但哈尔西刚执行完护送杜立德空袭东京的任务，正在返回珍珠港的途中，无法将“企业号”航母部署到南太平洋，参加即将到来的战斗。金坦承，他派出四艘现有航母中的两艘执行轰炸东京的任务也许过于夸张了，而目前正急需这两艘航母迟滞敌军在南太平洋的全面进攻，但如今言之已晚。

第三个重要议题与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人选有关。4月14日，尼米兹直接指挥着这一战区，但其地域广阔，需要另设指挥人员。罗伯特·L. 戈姆利海军中将将出任此职，他此前一直担任派驻伦敦的海军联络员。金认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尼米兹表示赞同。[\[55\]](#) 戈姆利将在新西兰建立司令部。51岁时赢得飞行资格的海军少将J.S.麦凯恩被任命为南太平洋战区航空队司令。

尽管尼米兹在谈及自己有意与进攻莫尔斯比港的日军一决高下的决定时，说“必要时可以接受战役失利的结局”，但事实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正积极准备珊瑚海战役。莫尔斯比港十分重要，不容沦于敌手，否则日军会获得向澳大利亚昆士兰的航空基地和港口设施发动空袭的起飞平台，扩大珊瑚海地区的搜索半径，预计进一步向东进攻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的力量将会增强。即便可以确定日军无意入侵澳大利亚，占领莫尔斯比港还是能让日军达成同样的战果——切断澳大利亚与外界的联系，进而扼其咽喉。另一方面，莫尔斯比港位于南太平洋东部，遥远的距离将使日军在该区域内的补给线变得脆弱。它位于拉包尔及其他航空基地的作战半径之外。莫尔斯比港不被占领，可以消除盟军遭受该区域日本海空两路优势进攻的风险，使马来亚及荷属东印度的挫败不再重演。珍珠港之战以来，与日军舰队海上决战首次被视为可以接受的冒险。

在金的许可下，尼米兹于1942年4月28日返回珍珠港部署即将来临

的珊瑚海海战。弗莱彻率领的“约克城号”航母编队（第17特混舰队）和海军少将“杰克”奥布里·菲奇率领的“列克星敦号”航母编队（第11特混舰队）组建的航母战斗群将前往珊瑚海阻击日本入侵舰队。他们将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与海军少将约翰·C. 克雷斯（John C. Crace）指挥的澳新联军巡洋舰编队会合。弗莱彻负责指挥当地盟军所有的海军力量。他于4月29日接到的命令是“遏制敌军对新几内亚—所罗门区域的进攻，摧毁敌军舰船、运输线及飞机”。[\[56\]](#)

护送杜立德空袭东京后返航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母将驶往珍珠港补充燃料和给养。然后它们将急速南下，于5月中旬抵达珊瑚海。它们无法在日军进攻初期抵达并投入作战——这是美军轰炸东京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当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它们至少可以提供支援。

自先前突袭拉包尔（1月23日）以来，日军已在此区域集结了10周有余。以此为基地，他们得以向外辐射，夺取周边岛屿群。他们的作战方式为派小股部队抢滩登陆，通常不会遇到什么抵抗，然后开辟出一块空旷地域作为机场。工兵清除树木，平整出一条简易的泥土跑道。机械、配件、油罐以及武器弹药通过货船运来。飞机及机组人员随后而至。5月1日，日军已在新爱尔兰岛的卡维恩、新几内亚北部沿海的萨拉马瓦和莱城、布干维尔岛的布因和布卡岛建立起巨大而不断完善的小型辅助机场网络。单个机场本身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它们都可与拉包尔互相支援。所有迹象均表明，此类机场建设仍在继续。日军潜艇亦频繁出没在这一水域，并呈增长趋势。日军护航舰船自西而来，护送运输舰、布雷艇、炮艇、潜艇、水上飞机和部队。川西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装有四个引擎，航程接近3 000英里，能在非常广阔的区域里巡逻。东京关注的是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以及珊瑚海的广大区域。

“MO行动”动员了各式各样的水面舰艇、航母战斗群、两栖登陆部队和超过150架陆基飞机，兵种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第四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留守拉包尔指挥行动，但至少有6位海军将领随舰队出战。瓜哇海海战的获胜者高木武雄中将指挥由“翔鹤号”“瑞鹤号”航母以及护

航巡洋舰、驱逐舰组建的航母突击部队。他的下属，第5航空战队司令原忠一少将，将在作战时决定这两艘航母的战术。进攻将由莫尔斯比港的入侵部队从海滩发动，兵力包括12艘运输舰运载的1万陆海军部队。其他水面舰艇部队以及一支轻型航母编队（围绕1.2万吨轻型航母“祥凤号”组建）负责掩护登陆。日军虽然以莫尔斯比港为主要目标，但也想占领热带小岛图拉吉，建立小型水上飞机基地，以便向南和向东侦察——该岛附近水域将于此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以“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而闻名。图拉吉岛将于1942年5月3日攻占，莫尔斯比港是5月10日。

井上将军不安地意识到，所有军事部署都准备仓促，缺乏应有的精细筹划。他被迫执行时间紧迫、缺乏弹性的作战计划。进攻珊瑚海的计划已被迫推迟两次，因为附近海域有美军航母出没。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已明确定于5月最后一周执行，刻不容缓。日军航母刚从突袭印度洋的行动中返航，便再次驶向遥远战场。MO计划和众多日本海军战役一样，似乎过于复杂了。如此分散兵力违背了马汉的军事原则。日军战略家们却认为，马汉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航空兵和无线电通信这两大要素，他们这样部署没有问题。然而，复杂的军事部署依赖于密切的统筹协调和时间安排，敌方如若坚决进攻，己方便较易失败。

开战以来，源田实的集中航母空中力量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其体现就是含有6艘航母的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南云的航母战斗群4个月内已航行5万英里，东起夏威夷，西至锡兰，在环绕地球三分之一的路途中散布恐惧与毁灭。然而其势已疲。这些舰船及其官兵已被派遣到如此多的方向上执行如此多的任务，航行了如此远的距离却得不到休整，已被指挥官驱使到忍耐的极限，而指挥官却不承认存在这一极限。3艘航母——第一航空舰队半数力量——准备遂行MO行动，但是“加贺号”航母在最后时刻退出了行动。它急需修整，因此将停泊在港内，准备中途岛的行动。高木将军的航母突击部队1942年5月1日从特鲁克出发时，仅包括“翔鹤号”和“瑞鹤号”航母编队。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一直作为整体舰队行动的第一航空舰队首次被分散使用。海战史上首次航母舰队对

决即将开始，在偶然因素的影响下，两支舰队将以势均力敌的态势投入战场。

“MO行动” 日军攻占莫尔斯比港的计划



[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8.

[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3, pp. 45, 125, 126.

[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6.

[4] *Ibid.*, p. 44.

[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6, p. 140.

[6] 原文left black holes，双关语，既指工作不便透露，又指以打孔为工作。——译者注

[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32–33.

[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28.

[9]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24.

[10]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49.

[11] Ibid., p. 273.

[12]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38.

[13] * JN-25-B，日本海军舰队密码，J代表日本，N代表海军，25代表识别编号，B代表升级编号。——译者注

[14]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13.

[1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 234.

[16]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21.

[1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34.

[1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pp. 227, 278.

[19]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35.

[20] Ibid., p. 190.

[21]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see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27; see also Henry F.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Department of the Navy monograph, online at NHC Web site; and Holmes, *Double Edged Secrets*, pp. 18, 59.

[22]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8.

[23] Ibid., p. 24.

[2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56–57.

[2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45–46.

[2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57.

[27] Ibid., p. 373.

[28]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5.

[29]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30]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23, 63.

- [31]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5.
- [32]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 [3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20.
- [34] Ibid., p. 368.
- [35]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105.
- [36]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4.
- [3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15, 100.
- [38] “COMINCH to CINCPAC” and others, Feb. 6,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20.
- [39] “COMINCH to CINCPAC,” March 11,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285; and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78.
- [4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0.
- [4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9.
- [4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32–34.
- [4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53–54.
- [44] Holland, ed., *The Navy*, p. 103.
- [45]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17, 65.
- [4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82.
- [47]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177, 174–75.
- [48]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 [4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4.
- [50] Ibid., p. 390.
- [51]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April 23,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09.
- [5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0.
- [53]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April 22,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384.
- [5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1.
- [55]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98.
- [56] Schorreck, “Battle of Midway: 4–7 June 1942: The Role of COMINT in the Battle of Midway”(SRH-230).

第十章

“列克星敦号”是世界上服役最早、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之一，舰员们亲切地称呼它为“列夫人”（Lady Lex）。它于1925年开始服役，此时航空母舰技术尚不成熟，仍处于起步阶段。同其“孪生姐妹”“萨拉托加号”一样，“列克星敦号”原本是要设计为战列巡洋舰的，但其巨大的船体建成后，立刻被改建为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的排水量为3.6万吨，而“企业号”“约克城号”“大黄蜂号”的排水量都小于2万吨，和“列克星敦号”一比相形见绌。“列克星敦号”比同级航母长六七十英尺，舰岛稍小，有着像阅兵场般宽阔的飞行甲板。

20世纪中期，关于航海的迷信说法已经成为历史，但即便如此，船员们还是对舰队里各种各样的船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列夫人”总是最受人喜爱。阿尔文·柯南曾在“企业号”上任职，他回忆道：“海军中有传言说‘列克星敦号’是艘‘好船’。但出于一些未知原因，她的‘姐妹’‘萨拉托加号’并不在此之列。”^[1]

4月15日，“列克星敦号”沿着“之”字形路线驶出珍珠港，奉命将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的14架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运送至巴尔米拉岛，同行的护航舰船包括重型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以及7艘驱逐舰。每个黎明，舰船上都有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起飞，为特混舰队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不久之后，几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飞往南边和西边进行空中搜寻，飞行范围为200—250英里。“列夫人”在珍珠港逗留期间，先在干船坞待了一个多星期，又在维修区停泊了一个星期，还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装置。一根新装的“床垫弹簧形”巨型天线在其前桅上方旋转着。由于安装了雷达，船员们感觉安全多了，

起码不那么容易遭到突袭了，这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信号员弗洛伊德·比弗在海军少将奥布里·菲奇的部队中任旗号兵，他写道：“雷达能监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没有雷达的航母战，想想都觉得可怕。”^[2]

再往南就进入了赤道无风带，那里的大海像浴场一样温暖。太阳把热量释放到舰船上。白天船舱的温度会一直保持在将近40℃，即使在晚上，也不会低于30℃。“列克星敦号”的船体内部有一座巨型发电站，配有16个巨大的蒸汽锅炉和4个33 200千瓦的涡轮发动机。这些大机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热量，而大部分热量都被困在航母内部的钢铁结构里。到了中午，这些热量同赤道的太阳产生的热量都汇聚到飞行甲板上，导致钢铁甲板烫得像煎锅一样。在这样的高温下，舰员们裸露在外的身体被烫伤，橡胶鞋底也熔化了。船员们有时会试着在甲板上煎蛋，以此取乐。《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说，在像桑拿房一样的下层甲板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有水珠，导致这艘航母看上去像人一样汗流不止：“在这个漂浮着的巨大城市里，水珠像小溪一样顺着舱壁、甲板和托盘流下来。”^[3]在舰船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轮机舱更热。轮机师在严酷的环境中工作，那里的温度从未低于过40℃，有时甚至超过50℃，这已经是人类所能忍受的温度上限了。那些在食堂或甲板上抱怨太热的舰员会被叫去拜会这些轮机师，这也是让他们停止抱怨的最好方式。罗伯特·凯西拜访另一艘船的轮机师时，感觉“眼珠变得像煮老的鸡蛋一样硬”。^[4]在那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逃向“凉爽的上层世界”，尽管那里也有将近40℃，但相比之下还是好得多。

“列夫人”在珍珠港卸掉了8英寸舰炮，这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遗物，当时人们认为，航空母舰应当具备和敌方水面舰艇交火的能力。两门沉重的舰炮分别位于舰岛的前方与后方，并且只能朝右舷开火，如果转向左舷开火，炮口风可以震碎飞行甲板。即使在眼下，也就是战争的早期阶段，各级航母最需要的也明显是防空武器。海军造船厂在“列夫人”的舰首和舰尾安装了几门新型的5英寸/ 38倍径的高平两用炮。如果

能熟练使用这些强大的武器，就有可能击落航母上方1万英尺高空的重型轰炸机。飞行甲板周围放置了100多门1.1英寸和20毫米的厄利康短程机关炮。这些机关炮虽然射程短，但射速高，也可以单人抵肩射击，非常适合作为抵御来袭飞机的最后一道防线。[5]

从“列克星敦号”的战斗经历来看，机关炮的表现并不理想，于是弗雷德里克·C. 谢尔曼舰长下令强化训练。炮台从早到晚总有人在练习。炮手们头上戴着钢盔，穿着紧身救生衣，无论是站是坐，全都待在炮台旁边。一旦航母上的飞机升空，炮手就会用5英寸的炮口对着它们，练习测距与瞄准。轮休的炮手则每天额外花一个小时待在炮台甲板上，用模拟装弹机练习发射步骤：将60磅重的炮弹推入弹膛、安装引信、瞄准、模拟射击。舰员们学会了通力合作，积极应对，变得头脑灵活，手脚麻利。经过持续的重复练习，他们出错越来越少，开火成功率不断提高。在“列夫人”上，一部分5英寸舰炮由舰员操作，另一些则由海军陆战队操作；正如约翰斯顿所说：“大家能看到，这两支队伍在练习射击时是良性竞争。”[6]

在海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列克星敦号”都在进行实弹演习。有一门5英寸舰炮发射了一枚定时靶弹，它能够弹出带降落伞的照明弹。其他舰炮开始射击。红色曳光弹纵横交错，射向靶弹。[7]其中的窍门是准确估计目标高度，快速射击，并且赶在另一个炮台之前摧毁目标。“离开珍珠港后不到两周，”约翰斯顿写道，“这些炮手便能几下子就将小型降落伞击成碎片，或者把目标打成筛子。”[8]当目标快速移动时，射击难度较大。在谢尔曼指挥的一场演习中，一架巡航侦察机飞过航母，用4 000英尺长的缆绳拉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筒形拖靶。首先由5英寸舰炮练习高空射击，然后飞机降低飞行高度，让厄利康炮练习射击。在战斗和实弹射击演习中，防空火力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炮手往往因瞄准太低而未能准确掌握目标的“提前量”。每次爆炸不是太低就是在目标后方，从来没有在高空或在目标前方爆炸过。为了能精准无误地瞄准目标，“列克星敦号”上的炮手们在舰尾轮流用霰弹枪射击陶土飞靶。经过

长时间的努力练习，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船员对炮手们的练习十分好奇，他们知道全体船员的安全都仰仗于炮手高超的技能。

当“列夫人”接近赤道时，船员举行了传统的“越线”仪式：船员分成两派——跨越过赤道是老船员（“贝壳”）和没跨越过赤道的人（“蝌蚪”）。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贝壳”会让“蝌蚪”完成各种羞辱性的仪式。直到完全臣服于“海神尼普顿”的神威之下，“蝌蚪”才能成为“贝壳”。也许有一天，会有学术论文记录下这个特殊的航海习俗，并研究它上百年的历史，及其背后隐含的异教偶像崇拜。“海神的审判”是要把军衔等级放在一边的，船上会暂时无尊卑之分，所以只有当船经过赤道时，你才能看到海军司令在船员面前手脚并用地爬行。这是狂欢的时刻，一直以来的紧张气氛得以缓解。“贝壳”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想要给“蝌蚪”点儿颜色看看。“列克星敦号”上大约有500名船员从未出过海。舰只的戒备也丝毫没有放松。空中巡逻照常进行，有一半船员随时待命。事实上，船上的几位重要军官都积极参与了这个仪式，其中包括几名航空兵指挥官。就连负责决定仪式中每个人地位的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Mort Seligman）中校也要接受“惩罚”。^[9]长官们让老船员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而不给新船员安排工作，这不是巧合，而是防止新船员以工作为由回避即将到来的考验的一种手段。

“审判”在飞行甲板往下两层的食堂进行。“最高检察官”会在“书记员”和“帮衬者”的帮助下审讯“蝌蚪”，提出一些荒谬的和带有侮辱性的问题，“蝌蚪”无论如何回答，都可能被控“藐视法庭”。^[10]有的“蝌蚪”奋起反抗，有的则十分顺从；尽管可以买些可口可乐、冰激凌或香烟贿赂法庭，得到宽恕，“蝌蚪”还是都被欺负了一番。一名军官证明自己曾在海军情报部门效力，结果被判犯伪证罪，理由是这样的事情是不曾存在的。新手飞行员需要全天戴着头盔和手套，穿着毛皮衬里的冬季飞行服，用可乐瓶制作的“双筒望远镜”扫视地平线。

下午“审判”结束，仪式在飞行甲板上举行，海神尼普顿（通常由服役时间较长的军士长担任）戴着王冠，握着三叉戟坐在王位上，旁边站

着他的“王后”和“王室子孙”。“蝌蚪”们只穿着内衣，身上涂满了蛋黄、香蕉油、鱼雷润滑油的混合物（“涂油”），这些都是从厨房和机械库中搜刮的。接受了海神的赐福之后，这些身上抹得脏兮兮的可怜人被迫在一条800英尺的跑道上接受“围攻”，“贝壳”们位列两旁，用帆布软管抽打他们的屁股。等这一切结束，“蝌蚪”们获颁证书，证明其已进入海神的领地，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水手了。约翰斯顿在“列克星敦号”的舰桥上目睹了这一切，当他望向巡洋舰和驱逐舰时，他发现这些船上也进行着同样的仪式。

“列克星敦号”的水手早已习惯大汗淋漓，甚至已经很难回忆起凉爽的天气是怎样一种感觉了。他们的蓝衬衫和工作服没穿几分钟就会湿透。令船员们困扰的不仅仅是令人窒息的闷热和流个不停的汗水，还有身上浓重的汗臭味。一位航母舰员回忆道：“当时除臭剂尚未普及。”^[11]他们可以随时冲澡，不过是用海水淋浴，然后用淡水快速冲洗一下。信号员比弗记录道，“列克星敦号”的浴室堆积起了三四英寸深的“混着肥皂油污和秽物的脏水，随着船的晃动从一侧冲向另一侧，有时会溢到外面的通道上”。^[12]船员们用海水剃须，忍受着咸水带来的疼痛。而海水里的盐分使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痱子都更加严重。腰部的情况最为严重，因为汗湿的内衣和衣服不停摩擦腰部的皮肤，擦出的红印有1/4英寸高。^[13]船舱内有强力风扇不停吹着，让通道和舱室隔间里的空气得以循环，但排出来的风还是像吹风机吹出来的一样热。在高温下，没几个人能睡得着。柯南回忆道：“我们在床铺上辗转反侧，夜灯发出的炫目红光让人难以入眠。”^[14]有的船员跑到飞行甲板的弹网上睡觉，在金属网上铺一层毯子，这儿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午夜过后，舰船前进产生的微风会使空气凉爽一些。

尼米兹的新命令于4月19日抵达。“列克星敦号”及其警戒舰以“省油的速度”前行到“橡子点”——新喀里多尼亚西北约300海里处，在那里与第17特混舰队的“约克城号”，以及皇家海军克雷斯少将指挥的盟军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第44特混舰队）会合。^[15]在那里它们继续向南行

进，长长的尾流指向北方的地平线；它们越过赤道隆起区，向着南太平洋熟悉的水域驶去。无论在何处，海洋看起来都如此相似：都是深蓝色的，“深海的那种蓝色”。^[16]中太平洋是世界上最荒僻和最人迹罕至的地区之一。“列夫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航行，偶尔能从望远镜中看到长着棕榈树的环礁，但从未靠近过。在海上日复一日，感觉不出变化，只有观察夜空，才能让人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前进。每天晚上，北极星都越发靠近北方的地平线，而南十字座开始从南方升起。在“列克星敦号”穿越赤道那晚，水手们在甲板上能看到南十字座和北极星同时位于南北地平线上。

这个区域的日落十分辉煌壮观，广阔的西方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火红的天空上散落着残云，呈现出淡紫色、薰衣草色、绿松石色和玫瑰色，凯西回忆道，“彩霞漫天，地平线上泛着奇异的绿光”。越向南，便越接近赤道无风带的边缘，天气似乎凉爽了一些，但其差别恐怕也就是（如凯西所说）“熔化铅的温度相比于熔化黄铜的温度”。^[17]很快舰队就来到了南半球信风带。信风是一种稳定的微风，它在南半球不像在赤道北边那样从东北方吹来，而是从东南方吹来。4月29日，阴沉的天空带来狂风暴雨，舰队从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之间进入珊瑚海北部，那里（驻扎在埃法特岛附近的海军上尉詹姆斯·米切纳记录道）“洋面宽阔，天气晴好，阳光明媚。这里有从澳大利亚吹来的微风，仿佛那座巨岛始终在运动似的；还有从塔斯曼海奔腾而来的巨浪，它们来自极地冰盖，北上至此，使得大海波涛汹涌”。^[18]

5月1日，天光放亮时，舰队所在方位为南纬16°16′，东经162°20′，“约克城号”从远方便能看到。弗莱彻将军1906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是一个冷若冰霜的艾奥瓦州人，此次担任这两支舰队的总指挥。他最关心的是燃料，他希望每一次战斗打响时，所有船的燃料都能接近满载。但是特混舰队的燃料由珍珠港加油船队长途补给，而且在航行过程中加油仍然是一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而“列夫人”及其护航舰船刚刚经

历长途航行，需要更多的燃料，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加油。于是弗莱彻通过可视信号命令第11特混舰队向南方行驶，与重型巡洋舰“芝加哥号”会合，用“蒂珀卡努号”油轮加油。“约克城号”舰队则用“尼欧肖号”油轮加油，之后往北驶向路易西亚德群岛。船上进入了二十四小时全员戒备的状态。弗莱彻为了隐藏舰船的存在，保持绝对无线电静默状态，并躲在日本巡逻飞机的侦察范围之外。[\[19\]](#)

澳大利亚汤斯维尔的陆军空中巡逻报告说，日本军队正从俾斯麦群岛驶向所罗门群岛东部，这些报告也得到了夏威夷情报站最新情报的证实。这表明日本人想要占领位于佛罗里达群岛南部的热带小岛图拉吉。弗莱彻计划趁日军登陆时发动攻击，此时敌军最为脆弱。日军于5月3日登陆图拉吉岛时并没有遭到抵抗，因为澳大利亚驻军已于一周前撤离。日军施工队立即开始构筑水上飞机跑道，而此时大部分日本海军护航舰艇已北撤。当晚7点，弗莱彻从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陆航巡逻队处获悉日军已经登陆，日军舰船停泊在岛外。在夜色的掩护下，“约克城号”及其护航舰船以27节的速度向北疾驰，并于4日黎明向日舰发起进攻。“列克星敦号”由于仍在补充燃料，位于南方100多英里外，落在了后面。时不我待，弗莱彻严令继续保持无线电静默，以“约克城号”一舰之力展开前哨战。他派遣“尼欧肖号”和一艘名为“拉塞尔号”的驱逐舰去联络菲奇，令其于次日清早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300英里处的集合点。

当夜，“约克城号”以将近最高航速行驶，航母上的航空大队聚集在备战室中研究地图和预定攻击目标的照片。大家对整个攻击区域都不了解，唯一可供使用的地图是缺乏细节的模糊照片。[\[20\]](#)次日清晨，飞机从“约克城号”上起飞后，将直接飞越70英里长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此时，这个岛名对他们而言还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东西向轴线是一系列陡峭的山峰，其中一些高度达到6 000英尺。这一天然的地理优势使美军舰载机可以隐身接近此岛，达成奇袭之效果。飞越这些山峰后，飞机距离图拉吉就只有12英里的距离了，它们可以全速前进，穿过当时尚未被命名为铁底湾的水域，摧毁停在图拉吉和旁边吉沃

图（Gavutu）港的日本船只。

5月4日拂晓，“约克城号”行驶至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100英里处。一股冷空气突然造访，天气变得十分恶劣，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风速高达35节，还不时下着雨。这对于船舰上的军官和船员来说是件好事：当船上的飞机已经飞入天气良好的海域时，对航母而言最理想的便是始终隐藏在黑暗之中，这可以有效地防止敌方的空袭反击。它们在黎明之前就通过扬声器吹响了集结号——“上马号”（boots and saddles）。作战队伍包括28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早上6时31分，6架F4F战斗机率先起飞，它们将为特混舰队进行战斗空中巡逻。7时1分，第一架轰炸机起飞。每架俯冲轰炸机都携带了一枚1 000磅重的大型炸弹，鱼雷轰炸机则载有马克13型鱼雷。

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1日—4日



轰炸机迅速朝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空爬升，在朦胧的晨光中飞越岛上高耸的山峰。随着北部青翠的山坡坡度下降，天气逐渐晴朗。此时，铁底湾的景象一览无余，佛罗里达群岛和图拉吉岛清晰地展现在飞行员面前，显现的轮廓与他们研究的地图是吻合的。他们开始俯冲加速。海军少校小威廉·O. 伯奇 (William O. Burch, Jr.) 是第5侦察机中队的队

长，上午8点他率先抵达了吉沃图港。他和飞行员在1.9万英尺的高度观察下方情况时，以为有一个强大的日本舰队散布在下面，但事实证明他们此前的船舶识别训练失败了。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1艘轻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舰、5艘运输舰，以及各种炮艇和小艇。但后来查明的真实情况是，下方仅有1艘扫雷舰、2艘小型扫雷舰、1艘小型运输船、2艘驱逐舰，以及一些登陆船。

大多数战争史学家把这类错误归结于可视度低或飞行员经验不足，但其中一位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不太同意这一点。他指出，飞行员普遍倾向于高估敌船的规模和级别，这种情况并不会随着飞行时间的增加而消失：“在战争中，有个普遍情况是，飞行员总会高估自己看到的东西。他们眼中的天鹅其实只是普通的鹅，而他们眼中的普通鹅，往往只是鸭子或小鹅。”^[21]

这次空袭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他们没有空中掩护，几乎毫无防备。日舰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发射了一些防空炮弹，但因缺乏训练，很难命中。第一轮战斗结束时，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坠落。随后加入战斗的鱼雷轰炸机虽然没有命中日本船只，但同样轻松躲过了日军发射的防空炮。在把炸弹和鱼雷消耗殆尽后，“约克城号”上的所有飞机都向南返回到等候已久的航母上，此时航母也已向前行进了20英里。伯奇少校曾打趣说他们重新装备和补充燃料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机组人员甚至来不及喝杯咖啡就重新回到了驾驶室。上午11点，他们再次飞往图拉吉和吉沃图，开始了新一轮轰炸。由于“约克城号”离轰炸地点非常近，飞机跨越瓜达尔卡纳尔岛仅需半个多小时，于是这一天总共发动了3次袭击，派出了将近60架飞机投入战斗，仅有3架被击落。

获得胜利的机组人员相信（在向弗莱彻将军报告时，他们提供了十分丰富且令人信服的细节），他们已经摧毁了日本整支水面舰队。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在采访“约克城号”的飞行员之后推断，美军在港口击沉或重创了14艘或15艘日本舰船，其中包括3艘巡洋舰，并补充说：“我们的飞行员再一次证明，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相结合是到目前为止

攻击船只最有效、最具破坏性和最致命的方法。”[\[22\]](#)

但后来证实这些言论被夸大了。当时，战场上并没有日本巡洋舰，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只有一艘名为“菊月号”的驱逐舰，以及大部队登陆后留下的一艘小型运输船，还有两艘巡逻艇。鱼雷攻击基本上徒劳无功。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并没有很好地协同作战，因为中队没有同时到达目标。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抱怨说，在俯冲到7 000英尺的高度时，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上产生了雾气，限制了视野，干扰了投弹。（解决方法之一是从较低的高度俯冲。不过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重新设计了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23\]](#)美军在日本的这支小型舰队身上浪费了大量弹药：22枚鱼雷、76枚1 000磅重的炸弹，以及12 570发0.50英寸的子弹和7 095发0.30英寸的子弹。尼米兹向金报告时说：“考虑到敌方几乎没有航空兵，而且仅有极少的防空火力，我方弹药耗费如此巨大，实在令人失望。”他补充说，这一行动表明，“飞行员必须在空战的各个阶段接受全方位训练，把握每一个机会练习射击”。[\[24\]](#)

如果弗莱彻相信了飞行员关于海军大决战的叙述，他可能就会赌一把，在该海域驻泊一夜，到天亮时把日方残余舰只全部歼灭。不过，他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方案，在黑夜的掩护下迅速向东南撤退，离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日本陆基飞机的搜索范围。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或许，“约克城号”此次行动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提醒了日军附近至少有一艘美国航母，因为单引擎轰炸机和鱼雷机在图拉吉岛上空呼啸而过时已经被准确识别为舰载机。第一轮打击过后，几艘日本舰船立即起锚向北疾驰，奔向拉包尔附近的安全地带。它们已经将部队送到岛上，水上飞机基地两天后才能建立和运转，因此没有理由待在这儿反复遭受空袭。

此时，原忠一将军的两艘大型航母正在北方350英里处的布干维尔岛以北补充燃料。他得知图拉吉岛遇袭后，下令停止补充燃油，把加油的软管断开，扔在一边，让“翔鹤号”和“瑞鹤号”猛冲到所罗门群岛东部

海域。这一天，五藤存知将军率领部队从拉包尔起航，准备进攻莫尔斯比港，他命令1.2万吨的护航航母“祥凤号”与进攻莫尔斯比港的部队分开行动，兵分两路搜寻敌舰。但是还没等他们赶到那儿，幸运的“约克城号”就在4日天黑之前逃脱了，撤退到了南方天气恶劣的海域。

第二天早上8时16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320海里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相遇了。两艘航母一边向西南方匀速行驶，一边通过“尼欧肖号”油轮加油。这项工作十分枯燥，还有危险。“列克星敦号”之前已抽光了“蒂珀卡努号”的最后一加仑燃油，现在几艘护航驱逐舰通过这艘航母巨大的油箱补充燃油。弗莱彻下达了242号作战命令，将第11特混舰队归入第17特混舰队，让整支舰队在海面上分散开来，形成一个防御圈，航母在中间位置，巡洋舰和驱逐舰分别位列防御圈的内环和外环。尽管弗莱彻仍担任总指挥，但他有意让菲奇将军在空中作战时担任两艘航母的战术指挥官。菲奇将军曾是飞行员，也是老资格的航母军官，经验十分丰富。弗莱彻的命令于6日开始执行，贯彻的是尼米兹的指示——所有作战单位都要“抓住有利机会，摧毁敌舰和敌机，切断敌军运输路线，以协助探察敌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地区采取的进一步行动”。[\[25\]](#)

如今美日都想找到对方，但都不知道敌人的确切位置。5月5日、6日和7日是混乱的几天，在这段时间里，敌对的两支航母舰队相互搜寻着，却徒劳无功。天气变化多端，有时晴朗平静，有时乌云密布，狂风卷起巨浪，波涛汹涌。这几天里出现了许多猜测、莫名其妙而不准确的情报、矛盾有误的侦察报告，以及无效或被误导的攻击。在为期五天的战斗中，大部分时间美军在混乱中四处摸索，庆幸的是，日本军队也同样困惑。莱顿中校称这“就像性命攸关的蒙眼捉人”。[\[26\]](#)就像是上天故意不让他们相遇一样。

他们都知道，航母适合打完就跑，船只本身非常脆弱，但是如果航母能找到敌船并率先进攻，那么即使相隔很远也可以对敌人施以沉重的打击。战术的关键在于不断移动位置；战机要持续进行空中侦察，扩大

飞行范围，加强搜索；让敌人保持在明处，自己的飞行甲板则尽量隐藏在昏暗的天气中。正如“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所说：“他们找不到你，也就无法攻击你。航母是一种可以冲锋陷阵、沉重打击敌人，之后全身而退的武器。”^[27]

侦察机将搜寻范围扩大到了175英里至200英里。“我们在关注区域的方向上框定一个范围，然后派飞机前去巡逻，飞到最外圈的时候，两架飞机的侦察范围应该刚好相接而不重叠，”菲奇将军的司令秘书保罗·D. 斯特鲁普少校解释道，“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完全覆盖最外圈，完全覆盖搜索区域。”^[28]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在指定区域能够看到每一寸海面，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能做到。即使天气像5月5日清晨那样晴朗，到了下午，云层还是会越积越厚，天空也变得越发阴沉。海军为空中搜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飞机需要在炎热的环境中长途飞行，这对于飞机和飞行员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座舱罩需要打开，好让驾驶舱的空气得到循环。由于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飞行员的脖子和脸都晒成了古铜色，他们摘下护目镜时，模样有点像浣熊，晒过的皮肤颜色和原本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努美阿的水上飞机基地承担了一部分空中搜索任务。努美阿是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与所罗门群岛相距很远，而且只有12架正在服役的PBY飞机，因此无法进行有效的侦察。陆军轰炸机从汤斯维尔起飞，飞到拉包尔和珊瑚海，但并没有提供多少可靠的侦察情报。谢尔曼舰长承认飞机深受恶劣天气的困扰，他遗憾地表示：“无论看到什么，不管是运输船、拖船还是驱逐舰，飞行员都可能将其当成战列舰或航母。”^[29]此外，飞行员报告的位置通常离标记地点很远，因为他们的飞行方向有误。

日本十分依赖水上飞机，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东部的几个基地都有部署。美国人很快就意识到日本的川西九七式四引擎水上飞机非常先进，这种飞机的飞行范围可达惊人的3 000英里，有效搜索半径可达1 000英里。“列克星敦号”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中校指出，SBD轰炸机的搜寻范围太过有限，将美国人“置于不利的境地。……如果我们想知道

敌人的行动，那就需要扩大飞机的搜寻范围。……这也使得我们只能在夜间快速接近敌人，在清晨发起进攻。因此我们很难发动突袭，而突袭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30\]](#)

这个观点听上去不无道理，但日本人自身也遇到了侦察上的难题。他们的侦察机即使发现了美国舰队，也会因害怕被野猫式战斗机打下来而忙于寻找藏身的云层，从而误判舰船的类别。由于他们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始终存在问题，所以侦察报告经常无法传给高木将军或原忠一将军。远距离发现目标后，即使判断可靠，也往往不能据此采取行动——美国航母当时如果处于舰载机的攻击范围之外，以“之”字形航行几小时之后便可能跑得无影无踪。塞利格曼后来才知道，在那5天的对抗中，日本舰队和他们一样迷茫。

美国的舰载机，包括侦察机和盘旋巡逻的战斗机，在执行任务时会不时撞上敌军的巡逻飞机。“列克星敦号”上的参谋都挤在无线电控制室收听飞行员发回的信号：“阿格尼丝向莉莉汇报。一架飞机，高度17000，方位130，距离5英里。瞧一下。”“莉莉收到。会派人过去的。”[\[31\]](#)

5月5日下午，小詹姆斯·H. 弗拉特利（James H. Flatley, Jr.）少校，“约克城号”第42战斗机中队的副队长，二战中美国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传回信号说他在云层上看到了一架川西水上飞机，距“约克城号”约27英里，距“列克星敦号”约15英里。“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回复说：“川西飞机在哪里？”弗拉特利以战斗机飞行员特有的骄傲口吻慢悠悠地答道：“等一下，我让它在你们面前现身。”[\[32\]](#)大约一分钟过后，一架飞机冒着黑烟从空中掉了下来，落入东北方向的海域，一掉到海里就爆炸了。这一景象在“列克星敦号”上看得一清二楚。

弗拉特利又在无线电中开口了，这次是跟“列克星敦号”的战斗空中巡逻人员说的：“我们到这儿来把这些家伙从你们头顶上打下来，这倒是不错。你们就不能有所行动吗？”

“列克星敦号”的F4F飞行员诺埃尔·A.M. 盖勒（Noel A. M. Gayler）上尉插话道：“吉米，刚刚那架飞机差点儿就砸到我了。我正在云层里往上爬升，一个火球突然和我擦身而过，我当时压根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

“这就是告诉你不要飞在我下面。”弗拉特利回复道。[\[33\]](#)

在与日本飞行员对决时，美国航母飞行员有顾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战争的前5个月，日本的航母舰队多次沉重打击了美军，而从未遭到反击。1942年5月4日，美国海军飞行员宣称，他们累计击落了24架日本飞机。当时海军只有一个王牌飞行员——布奇·奥黑尔。后来，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34\]](#)美国的飞行员虽然感到不安、紧张，但同时又斗志昂扬。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等到夜幕降临，飞机入库，他们会在吃过晚饭后聚集在休息室，一边抽烟一边仔细研究战区地图。他们无休止地谈论飞行和战斗，用双手比画战术动作，在黑板上画出图解——这些交流确实很有用，因为这是飞行员互相分享经验和学习知识的方式。

近期与迅疾敏捷的零式战斗机交手后，野猫式战斗机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但是积累了几个月的经验之后，飞行员也开始认识到不够灵活但是更坚固的野猫式战斗机的一些优点。“大家都别忘了，不能跟零式战斗机缠斗。”“列克星敦号”上的一位战斗机飞行员说。另一个回答说：“我想，如果我们能坚持双机配合，就能对付它们。”[\[35\]](#)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通信情报涌入，通过远程加密无线电传输，这些情报从罗奇福特的地下室传到莱顿手中，再呈递给尼米兹，然后由“约克城号”的报务员办公室接收并解密，交到司令舰桥上的弗莱彻将军手中。但5月6日以前，日本舰队的移动时间和方向美军都无从得知。“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后来回忆道，关于日本舰队位置的情报十分“粗略”，几乎毫无价值。珍珠港的报告表明，许多日本作战单位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出没，但是这些报告五花八门，混乱

不清。在战役初期，无线电侦听的效果极小，这或许是因为日军保持无线电静默，难以捕捉，也可能是因为与日舰相距太远，不能很好地侦听信号。弗莱彻是一位老派的军官，在处理通信情报方面没有太多经验，所以不大相信无线电情报。福里斯特·R. 比亚尔（Forrest R. Biard）上尉离开了夏威夷情报站，与“约克城号”同行，但当弗莱彻邀请他向旗舰上的全体参谋介绍他的工作性质时，他谢绝了，与弗莱彻产生了一点冲突。比亚尔如果介绍自己的工作，就会违反为保护Ultra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尽管比亚尔显然是对的，弗莱彻依然对这个小小的上尉公然反抗他感到十分不满，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未发展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海波站的情报在这场战役中仍为弗莱彻和菲奇带来了关键的优势。盟军舰队比日军联合舰队在此海域集结的力量要弱一些（只不过日军分属于多支舰队，组织协调更加复杂）。尽管力量悬殊，但盟军具备一个优势，那便是提前得知日军进攻莫尔斯比港的意图，还知道日军会从拉包尔调来易受攻击的运输舰队。5月3日，海波站成功破译了日军发给高木的大部分命令，并且发送给了关键的参战单位。四天后，破译员截取并破译了莫尔斯比港驻军发出的几条信息，显示出了日军的方位及计划。5月5日，弗莱彻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当天上午10点，日军计划在莫尔斯比港登陆，而日本航母将在这天到达指定位置。这意味着他必须向南方行驶才能躲过高木的空中搜索。

到了5月6日，很明显，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将通过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的乔马德航道，在5月7日或8日到达新几内亚东端。有了这一确凿的信息后，弗莱彻指挥舰队朝西北方向行驶，在匀速行驶的过程中通过“尼欧肖号”加满了油。他希望能够获得攻击日本航母的有利位置。据他判断，日本航母应该是要为日军入侵莫尔斯比港提供掩护。弗莱彻下令进入临战状态，一旦收到发现敌情的报告，就全面发起进攻。完成加油后，他派驱逐舰“西姆斯号”为“尼欧肖号”护航，向南行驶；“尼欧肖号”上有仅剩的燃油储备，不能受到任何破坏。他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派出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作为第3特混大队，由克雷斯将军指挥，在日军侵略部队进入乔马德航道时对其发起进攻。这个决定即使在

当时也备受争议，因为盟军已经通过实战的教训认识到，缺乏空中保护的水面舰艇不应进入敌军占主导地位的海域中。这一决定还使航母失去了大部分的警戒舰船。显然，弗莱彻宁可冒这些风险，也要在第17特混舰队与日军激战的同时，阻止日军在莫尔斯比港登陆。

弗莱彻以为日军航母仍在北方几百英里外。如果他知道日军航母实际上就在他东边，在他右方不远处，已经进入了珊瑚海，他肯定会大吃一惊。^[36]根据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一份侦察报告，高木命令原忠一从所罗门群岛南部迂回，向南前进，找到并摧毁美国航母。在这一时刻，第17特混舰队完全暴露于敌军面前，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如果日军更走运一些的话，他们本可以取得这场战役的完胜，甚至可以在“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加油时将它们全部击沉。（这一打击可能还会改变中途岛战役的结果，从而改变整场战争的进程。）但是日本的侦察报告误把美国航母的方位定在了190度左右，几乎是正南方向。高木对这一报告的解读，也与自己已有的想法相吻合——美国航母深入了珊瑚海内部，距离日军的进攻路线比较远。5月6日到7日的夜晚，这两支舰队原本相隔不到70海里，结果却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寻找对手。

黎明时分，厚厚的积云聚集在天空。一股来自南方的冷锋席卷了第17特混舰队，登时气温骤降，狂风大作，海面波涛汹涌，还伴随着时强时弱的暴风雨。能见度仅有10英里到15英里。“列克星敦号”的气象官G.L. 莱英（Raring）上尉推测锋面仅延伸到航母以北几英里的距离。而在塔古拉岛的北方，也就是他们设想的敌军潜伏地，天气应该十分晴朗，能见度极佳。这让他们感到安心，因为此时恶劣的天气很好地掩护了美军特混舰队，而敌军却暴露在外，一场空袭或许就可以将其歼灭。

克雷斯的第3特混大队在前一天下午与主力舰队分开后，此时已经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东部以南115英里处的晴朗天空下。结果，这支美澳联合舰队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并没有遇到日军的入侵舰队，日军的入侵舰队是在第二天返回拉包尔的；而这支美澳联合舰队却在5月7日下

午遭受了多轮高空的炸弹的袭击和一轮空投鱼雷的袭击。日军飞行员显然认为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声称击沉了一艘加利福尼亚级战列舰，击伤了一艘英国厌战级战列舰及一艘巡洋舰。这些话被日本媒体当作事实报道出来。实际上，克雷斯的舰队精于掌舵，巧妙地躲过了上百枚炸弹和鱼雷的袭击，穿过枪林弹雨而未被任何一枚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

（美国“芝加哥号”巡洋舰遭到敌机扫射，7人伤亡。）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第3特混大队还被盟军误认为是敌人，被麦克阿瑟的3架B-26轰炸了一番。“幸运的是，”克雷斯说，“他们的轰炸技术和几分钟前轰炸我们的日军相比非常丢人现眼。”[\[37\]](#)

天亮后不久，SBD侦察轰炸机从“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起飞，很快便传回了发现敌情的报告。上午8时15分，第5轰炸机中队的约翰·尼尔森上尉在路易西亚德群岛北部的米西马岛的东北方向临近乔马德航道的地方发现了“2艘航母和4艘重型巡洋舰”。[\[38\]](#)根据航海图，报告的敌舰位于西北偏西约175英里处，处于空袭范围内。弗莱彻推断尼尔森发现了日军航母主力，没有过多犹豫。他立即下令精锐尽出，两艘航母派出了8架战斗机、53架俯冲轰炸机和22架鱼雷轰炸机，组成联合攻击群。“列克星敦号”的战机于上午9时25分率先升空，“约克城号”的战机在约20分钟后起飞。机群迅速爬升，很快便飞出锋面，进入了晴朗的天空。此时能见度极高，四周景象一览无余。路易西亚德群岛就在飞机下方，这是一个珊瑚礁环绕的绿色热带群岛。一排排浪花拍打着海滩。飞行员可以透过清澈的蔚蓝色海水，直接看到浅浅的沙滩底部。

在空袭队伍升空并飞往目标后，尼尔森上尉返回并降落在“约克城号”上。他刚一从驾驶舱出来，就否认自己看到过任何航母——他看到的只是两艘巡洋舰及两艘驱逐舰。别人拿来他的敌情报告跟他对证，这位飞行员脸红了，他意识到自己在汇报时输错了编码。这是一次无心之过，却可能导致美军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日本航母仍在附近游弋，但不知道其确切位置，而此时“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的舰载机却全体出动，去攻击一支无足轻重的水面舰艇分队。弗莱彻被彻底激怒

了。“年轻人，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他怒吼道，“你毁了美国的两艘航母！”尼尔森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的错误很容易导致弗莱彻所说的严重后果；但是此时此刻，让舰员们看到司令失去冷静，绝望地大喊大叫（比亚尔上尉回忆时如此说道），说“战斗还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输了”，这对于鼓舞士气可绝无好处。[\[39\]](#)

弗莱彻短暂地考虑过召回空袭队伍，但是考虑到入侵部队或许刚好也在同一区域，于是决定按原计划执行，以期一举歼灭敌军。这一积极的决定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上午10时22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传来一份新的侦察报告——一架陆军B-17飞机发现一艘日军航母和几艘护航舰，位于第一份目击报告地点的东南方仅35英里处。“约克城号”立即向领头的飞行员发送了纠正路线的信号。“列克星敦号”第2轰炸机中队的韦尔登·L. 汉密尔顿少校其实已经发现了附近这艘唯一的日军航母。他当时位于塔古拉岛北方几英里处，在1.5万英尺的高度飞行，用望远镜观察下方时，他发现东部大约40英里的海面上有一条白色细线。这是一道尾流，说明这里有船驶过。他立即通知了其他队长，众人一起右转追踪。随着距离渐渐拉近，汉密尔顿认出了绝不会看错的航母的飞行甲板。他立即传回无线电信息：“我看到了一艘浑蛋航母。”[\[40\]](#)

这是日本1.2万吨的“祥凤号”护航航母，它周围有4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这是由五藤存知指挥的掩护舰队，是进攻莫尔斯比港的舰队的前锋，舰队主力就在后面不远处。五藤存知的瞭望员看到美军飞机正在从右方靠近，“祥凤号”的舰长伊泽石之介于上午11时7分下令向左急转。这艘航母上空仅有3架战斗机，而美军派遣的大批战机足以毁掉“祥凤号”，相比之下力量实在悬殊。更重要的是，仅有的三架飞机中有两架还不是零式战斗机，而是上一代的A5M九六式战斗机（“克劳德”），并没有很强的杀伤力。

“列克星敦号”的航空大队队长威廉·B. 奥尔特中校率先发起了进攻。他同两架僚机协同作战，它们都是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装备了500磅的炸弹，于上午11点向日军航母俯冲投下了炸弹。航母向左急

转弯躲过了，三枚炸弹都差一点命中，落入水中，不过其中一枚近失弹将“祥凤号”上的5架飞机震入了水中。几分钟后，罗伯特·E. 狄克逊少校指挥的第2侦察机中队的10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12 500英尺的高空俯冲下来加入战斗。日军两架九六式战斗机原本紧随其后，但美军的俯冲轰炸机进行了空中制动，日军战斗机来不及制动，冲到了SBD的前面。此时“祥凤号”继续左转，几乎转了一个圈；唯一的零式战斗机在SBD后面紧追不舍，打乱了它们的俯冲；它们投下的10枚500磅炸弹也都没有命中。到目前为止，“祥凤号”可以说是十分幸运了。它疯狂躲避着袭击，并成功避开了13枚炸弹；三架战斗机也在敌众我寡的境地中表现非凡，很好地干扰了进攻的美军飞机。此时伊泽舰长抓住时机，快速起飞了三架零式战斗机。

第2轰炸机中队的汉密尔顿少校命令中队在高空与“列克星敦号”的鱼雷轰炸机协同作战。狄克逊指挥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投放完炸弹，汉密尔顿中队的15架携带了1 000磅炸弹的轰炸机就开始俯冲。“我开始俯冲的时候日军航母正好在我的下风向，这让轰炸变得容易多了，”汉密尔顿说，“我投下的那枚1 000磅的炸弹是第一个命中目标的，刚好击中飞行甲板的中央。我回头看时，飞行甲板的后半部分着火了，冒出了滚滚浓烟。”狄克逊投完炸弹重新爬升时听到了雷鸣般的爆炸声，回头看到一个火球升到400英尺的高度。他通过无线电向汉密尔顿表示祝贺：“太漂亮了，太漂亮了。”^[41]接着第二枚炸弹击中了“祥凤号”船尾升降机附近，在机库甲板引发了二次爆炸。汉密尔顿飞走之后，又飞回来查看情况。“巨大的爆炸使这艘船成了一具燃烧的残骸，它行进速度放缓，几乎停了下来——毁灭的景象相当壮观。”^[42]

在遭受这两次重击后，“祥凤号”已经奄奄一息，但是美国人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小詹姆斯·H. 布雷特少校指挥的“列克星敦号”的第2鱼雷机中队从西南方向直朝日军航母的侧面飞来。他们在警戒舰中间找到了一个空隙，这里防空火力相对弱一些。飞行缓慢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准备左右夹击，同时从舰首两侧投放鱼雷，让“祥凤号”无法靠机动躲

过任何一侧的攻击。浓烟和俯冲轰炸机的近失弹激起的水花掩护了鱼雷轰炸机，尽管有日军战斗机的追击，它们还是完美地施放了鱼雷。这些“飞鱼”在100英尺的高度与机腹分离，雷头先进入海水，然后浮上来，径直朝“祥凤号”冲去；鱼雷引爆后，在其水线以下炸开了巨大的裂口。有5枚鱼雷明显击中了航母，2枚在右舷，3枚在左舷。当鱼雷轰炸机撤离时，“祥凤号”已经命丧大海。“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尽管飞行速度很慢，但美军在进攻和撤退时一架都没有损失。

11时25分，“约克城号”的航空大队抵达战场，小威廉·伯奇少校从1.8万英尺的高度看下去，并没有意识到“祥凤号”已经被打废了。于是他带领17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又在“祥凤号”身上投下了五六枚1 000磅的炸弹。5分钟后，“约克城号”的鱼雷轰炸机抵达战场，又让2枚到5枚鱼雷命中其船身。这最后的一击完全是多余的。这么多枚炸弹落在船上，又有这么多枚鱼雷撕开船体，“祥凤号”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沉入了水中。伯奇回忆说，它“径直沉到了海底”。^[43]野猫式战斗机飞行员弗拉特利在5 000英尺的高空中看到这一幕，深受震动。“那些重型轰炸机摧毁航母的景象太可怕了，我都看得不舒服了，”他说，“它们每隔三四秒就把炸弹投在它身上，几乎将这艘大船炸成了碎片。”^[44]

让弗拉特利失望的是，无畏式轰炸机和“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在一艘已经被摧毁的航母身上浪费了大量的炸弹和鱼雷，却任由4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完好无损地逃脱了。本该有个战术协调员在高空观察行动，并指挥进攻的飞机及时对其他目标开展攻击的。菲奇将军的司令秘书斯特鲁普少校也认为，“约克城号”飞行员的行为就像鞭打一匹死马。“这是一次成功的攻击，”他说，“只不过我们对航母的攻击有点过头。……回顾此次行动，我们的协作不够好，也没有分出一些兵力来攻击其他舰船。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攻击航母，每位士兵都想立下头功，而且他们确实很快就把敌军的这艘轻型航母击沉了。”^[45]

伊泽舰长于上午11时31分下令弃船，在航母沉没前的最后时刻，有1/4的船员跳入大海。有203人幸存，631人死于爆炸或被困在船上，随

船沉没。“祥凤号”上的所有21架飞机也全部被毁。尽管它只是一艘小型航母，其价值和危险程度远不及“翔鹤号”和“瑞鹤号”，这仍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被击沉的第一艘主力舰艇。狄克逊将事先编好的无线电信息传回“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时，赢得了一片掌声：“击沉一艘航母！狄克逊报告，我们击沉了一艘航母！”[\[46\]](#)

在拉包尔的司令部，井上将军密切关注着部队的一举一动。“祥凤号”被击沉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使他开始担心莫尔斯比港进攻船队的安危。他命令舰队掉头，向北匆忙撤退，（至少暂时）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在歼灭美国航母之前，他不想让自己的部队和其他水面舰艇再冒风险。事实证明，它们再也没有回来。日军彻底放弃了由海路夺取莫尔斯比港的计划，盟军取得了战略性胜利，使澳大利亚彻底摆脱了遭到侵略的威胁。

在东部200英里处，日本的两艘大型航母也犯了和弗莱彻一样的错误——基于存在误差的侦察情报，它们对一个次要目标发起了全面进攻。当天上午7时22分，一艘巡洋舰派出的水上飞机的飞行员报告称，他在“翔鹤号”和“瑞鹤号”以南163英里处发现了一艘航母和一艘护航的巡洋舰。上午7时45分，这位飞行员确认了自己的敌情报告，而且另一架侦察机也报告称看到了航母。于是高木和原忠一上钩了。他们以为这是美军的“萨拉托加号”航母，而且以为美军在这片海域只有这一艘航母，于是两名指挥官下令从两艘航母上出动飞机，发动大规模空袭。上午8点，飞机呼啸着冲上天空；30分钟后，空袭大军向南方行进。日军共出动了78架飞机：36架爱知D3A2俯冲轰炸机（“瓦尔”）、24架中岛B5N2鱼雷轰炸机（“凯特”），以及18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

但是日军的侦察员搞砸了这一切。他们遇到的是弗莱彻前一天送走的“尼欧肖号”油轮和“西姆斯号”驱逐舰。在空袭大军出发之后，“翔鹤号”收到了一份新的侦察报告，原忠一震惊地发现，有两艘美国航母在西北方向288英里处，这与第一次报告传回的位置几乎完全相反。由于

日军的舰空无线电通信不稳定，原忠一担心无法变更进攻路线——传输一旦出错，风险就太大了。于是他决定让攻击队继续按原计划飞行，与此同时，他让航母转而向西北方向航行，希望在飞机返回后航母能够进入攻击范围。“在南方的攻击结束后，我们要立即与西边的敌人作战。”^[47]但是，在得知南边的“航母”仅仅是一艘油轮和一艘驱逐舰后，他立即发了紧急召回令。原忠一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来回收战机，重新加油，然后派它们前往西北方向攻击更大的目标。

2.5万吨的“尼欧肖号”和仅仅1 570吨的“西姆斯号”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直到上午10时38分，敌人的大批空袭队伍出现在空中，船上的军官和船员才意识到情况是多么危急，此时这两艘船完全没有空中掩护，防空火力同在上空盘旋的敌机数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日军并没有立即进攻。早晨的低空侦察之后，能见度已大大提升，空袭指挥官立即意识到他们被误导了。在这两艘小船上倾尽全部兵力实在是没有必要，于是中队长派出几架飞机分头搜寻更好的攻击目标。搜寻了一圈并无所获，鱼雷轰炸机和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就先朝航母返回，只留下俯冲轰炸机攻击“尼欧肖号”和“西姆斯号”。

它们悠闲地发动了进攻，先是像空中表演一样转几个圈儿，然后给这两艘倒霉的船丢下一连串炸弹。“尼欧肖号”被7枚250千克的炸弹击得粉碎，“西姆斯号”被3枚炸弹击中，断成两截沉入海底，船上的192名船员中有178人丧生。“尼欧肖号”燃起大火，失去了动力，似乎完全损毁了。见此情景，日军飞机离开这里，向北方飞去。有些船员还没收到弃船的命令就惊慌失措地跳入水中，舰长派小艇把他们救回船上，剩下的船员则按规程，有步骤地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本。但“尼欧肖号”没有沉没，它的船体燃烧着，漂在水面上，只剩备用的无线电发射器有微弱的信号。所有小艇都被放到了海里，与拼命撑下去的母船紧紧靠着。

在接下来的4天里，“尼欧肖号”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求生。它失去了动力，严重向右舷倾斜，船上三分之二的船员失踪或可能已经死亡。5月11日，驱逐舰“亨利号”赶来，结束了它所受的煎熬。“亨利号”把幸存

者接走，又用2枚鱼雷把“尼欧肖号”击沉。

在接到“尼欧肖号”的紧急求救信号时，弗莱彻十分震惊。“约克城号”司令舰桥上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上的战机正在朝西北方向飞，弗莱彻认为在那儿能找到日本的两艘大型航母。如果“尼欧肖号”传回的报告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敌军航母在相反的方向，也有可能（更令人不安的一种可能）是他被敌舰从两侧包抄了。另一方面，这份报告也意味着，这两艘日本航母也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动了进攻，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到当天晚些时候，才能对“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造成威胁。双方都攻错了目标，这两个错误两相抵消了。实际上，击沉“祥凤号”，美国人获得了更大的心理安慰。无论如何，双方都清楚一场航母大战即将爆发——不是下午，就是第二天一早。

中午12时45分到1时15分，美军轰炸机陆续回到航母上。美军在刚刚的攻击中仅失去了3架无畏式轰炸机。机组人员涌入餐室吃午饭，每个人都情绪复杂，既有击沉敌舰的喜悦，也有失去战友的悲伤。有几架飞机受损严重，“列克星敦号”的舱面船员聚在受损的飞机旁，看得目瞪口呆。这有力地证明了坚固机体的价值。斯坦利·约翰斯顿写道，其中一架受损严重的无畏式轰炸机使他想起了“漏勺”。^[48]机翼、机身、尾翼和挡风玻璃上满是子弹孔。

下午2时20分，航空大队补充好了燃料，重新加载了武器，完全能够对入侵莫尔斯比港的日军舰队发动另一场攻击，因为对方仍在打击范围内。但是保守的弗莱彻选择不发动第二轮攻击，因为他还不清楚日本航母的位置，不希望在自己的飞机不在场的情况下撞上日军。战后的分析表明，他船上的无线电情报专家福里斯特·比亚尔上尉发现了敌军的归航信标，标明了日本航母的航线和行驶速度：“方位280度，速度20节。”^[49]有了这部分信息，弗莱彻本可以准确地推测出日本航母的位置，但船上的一位翻译官起初将这一信息翻译错了，以为是日军对美国航母航向和速度的侦察报告。这个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但弗莱彻已经

对这一情报失去信心，不愿冒险。在战争的后期，他的这一行为在军事法庭上被指控为面对有利情报不作为，但是就目前而言，弗莱彻有权选择不听从情报官的意见，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整个下午，第17特混舰队都按兵不动。

到了晚些时候，天气开始变得糟糕：云层低垂，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风速达到了30节，一时间骤雨倾盆。美国飞行员并没有接受过夜间作业训练，他们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执行任务可能无法返回航母。于是弗莱彻让舰队在天气的掩护下转向西南方行进，等到早上再发动下一次攻击。他后来解释称，他判断“白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足以让我们在在大范围搜寻后发动袭击”。^[50]“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战斗空中巡逻队伍，但是轰炸机和鱼雷机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会重返空中。

相比之下，日本人更为大胆。下午4时15分，日军收到一份新的侦察报告，原忠一决定赌一把，在天色已晚时发动攻击。这就意味着他的飞行员需要在夜间返回，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降落，而且他肯定很清楚损失战机的风险很高。所以他挑选了经验最为丰富的飞行员执行这次任务。其中几位飞行员刚刚结束长途奔袭，执行完轰炸“尼欧肖号”和“西姆斯号”的任务，他们疲惫不堪，但此时依然斗志昂扬。原忠一派出了“翔鹤号”上的12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命令它们向277度的方向飞行280海里，搜寻并攻击美国航母。如果它们空袭成功，日本就能彻底赢得珊瑚海战役，甚至当天还来得及开一场庆功宴。

美国舰队就在西边约170英里处，日军飞机似乎已从美军航母和护航舰船上空飞过，但由于天气阴沉，云层较厚，没有发现它们。下午6点，空袭的指挥官通过无线电交谈后决定掉头。他们丢弃了炸弹和鱼雷，开始返航，希望能捕捉到航母的归航信标。美国航母新安装的雷达装置追踪到了云层上方的轰炸机，于是航母派出了一队F4F战斗机前去拦截返航的日军飞机。它们于下午6时15分接近日机，此时太阳正好落下，从青灰色的天空中消失。美国战斗机跟在几架日本战机后面，从云

层中钻了出来。接下来的空战中，日本损失惨重，3架美国野猫式战斗机击落了9架敌机（8架“凯特”和1架“瓦尔”）。这是雷达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展现其扭转战局的潜力。

入夜后，大部分美军飞机已经返回航母降落了，又有一支新的飞行编队来到了特混舰队上空。起初，能清楚地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从云层中传来，接着这些飞机出现在视野中，在“列克星敦号”桅杆的高度上盘旋。“这些飞机保持着很好的编队。”斯特鲁普少校回忆道。^[51]它们还打开了夜航灯，表明它们打算着舰。但是两艘航母和几艘护航舰艇上的观察者觉得其中有怪异之处。“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谢尔曼数了数，一共有9架飞机，多于还没有降落的美军飞机。^[52]它们都在“约克城号”的左舷降低高度，从逆时针方向进场，与美军降落惯例相反。它们闪烁着指示灯，但是美国士兵都看不懂这个信号的含义。电工助理彼得·纽伯格的岗位在“约克城号”的飞行甲板上，他注意到这些飞机排气筒的形状和颜色都很奇怪，斯特鲁普也注意到它们的夜航灯闪着奇怪的红蓝色。^[53]

TBS开始传出说话声。旁边一艘驱逐舰上的人问道：“咱们的哪一款飞机的翼尖是圆形的？”另一个声音答道：“如果这是咱们的飞机，那可真是见了鬼。”^[54]当第一架飞机完成最后的转弯，开始降落的时候，它的飞行高度太低，“约克城号”的降落信号官疯狂示意他加速复飞。“在最后的几秒里，”纽伯格回忆道，“飞行员差一点就要撞到飞行甲板下方的船尾了，就在这时，他推下节流阀，开始复飞，来到了左舷。信号灯的光短暂地照亮了他飞机机翼上喷涂的红色圆圈。”^[55]

一艘负责警戒的驱逐舰开始射击，防空炮火飞向领头的飞机。“列克星敦号”通过无线电命令特混舰队的所有舰艇停止射击，但是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回复道：“我确定这就是日本的飞机，我认得出来。”^[56]于是乎，整支特混舰队的防空武器纷纷开火，火光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场面就像独立日一样。但空中盘旋的飞机中也有自己人，“约克城号”的

一位战斗机飞行员抱怨道：“为什么要朝我开火？我做错了什么？”^[57]“约克城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哈罗德·比尔来到左舷通道查看情况。“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炮手射击时不分敌我，有的舰员还兴奋地掏出0.45英寸自动步枪，朝掠过舰船的红色‘肉丸’开枪——这么做就跟拿石头砸的效果没什么两样。”^[58]入侵飞机和美国飞机都快速飞到云层里躲避炮火，没有一架飞机被击落。这也不是糊涂的日军飞行员最后一次企图降落在美国航母上。

那天晚上，“列克星敦号”的雷达操作员探测到东部有一队敌机，距离仅30英里。日军航母已经距离这么近了吗？似乎的确如此。情报部门把电台调到日军飞行员的频率时，能听到日军航母同飞行员未加密的对话，告诉他们如何飞回来。（战争结束后，人们才确定，日军在更往东的地方，距离可能是60英里到100英里。）美军讨论过是否派驱逐舰进行夜间鱼雷袭击，但弗莱彻决定不冒这个险。

原忠一的冒险成了一场溃败。航母打开探照灯来引导战机返回，但下午派出的27架飞机中有21架没能返回。9架飞机在空战中被击落，12架坠毁在大海上，而且失踪的飞行员无一获救。回到航母的飞行员称，美国航母在东边五六十英里处。夜幕降临，双方的指挥官都在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弗莱彻命令航母转向西南方行驶，准备在黎明时分开始大范围的搜寻行动。高木将军则接受了原忠一的建议，命令航母向北行驶，早上向南方进行大规模的搜寻。

美国飞行员早早吃完晚饭，在待命室了解任务情况。现在双方都知道了各自的存在，所以任何一方都无法实现突袭。天亮时甚至有可能看到日本航母就在地平线上。“我们面对的敌人十分顽强、狂热，既有勇气又狡猾，不容小觑，”约翰斯顿写道，“我们的实力不分上下，就看谁先击中对方的要害。头一天我们已经看到飞机是怎么毁掉一艘航母的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第二天可能出现的结果。”^[59]在“约克城号”上，第

二天的“作战计划”已经印好张贴在待命室里。早上5时40分，飞行员要抵达飞行甲板。6时20分，侦察轰炸机的飞行员要准备就绪。他们要坐进驾驶舱，启动引擎，等待飞行指挥官的起飞信号。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他们要按计划好的侦察模式开始搜寻。战斗机会紧随其后起飞，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也将立即从机库甲板上升到飞行甲板上，一旦收到敌情报告就立即起飞。^[60]

了解计划之后，飞行员回到自己的舱室，很快就进入了深度的、无意识的睡眠，就算精神紧张也敌不过身心的劳累。（飞行时虽然基本是坐着不动的，但是比开车费力得多，尤其是在紧张的战斗状态中。）舰员蹑手蹑脚地从走廊昏暗的蓝色灯光下走过，小心地经过飞行员开着门的隔间，担心吵醒他们。除了呼呼作响的风扇和稳定运转着的引擎，船上很安静。特混舰队向着西方行进，半圆的月亮照亮了寂静的夜。甲板上，炮兵依然在炮台旁保持着警戒，戴着钢盔，穿着笨重的填充了木棉的救生背心。救生背心用阻燃剂处理过，味道很浓。^[61]警戒舰船慢慢靠近，与航母保持同样的速度和航向。船首激起的白色浪花——舰员形象地称之为“嘴里的骨头”——与黑色的船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往常一样，舰队呈“之”字形前进，以摆脱敌人的潜艇，经常转向，而且所有的船协调一致，就好像是由一条看不见的线连在一起。除了偶尔微微闪动的灯光信号，这些军舰之间似乎毫无交流。从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螺旋桨激起的磷光，如果有人站在船尾向下看，可以看到这些蓝绿色的水光延伸到水下三四十英尺处。

耀眼的太阳升起后，整个天空几乎万里无云。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没有雾、阵雨或者风暴的迹象，这几天来为舰队提供掩护的恶劣天气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人倒是更希望天气一直恶劣，因为好天气会暴露他们的行踪，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攻击——就像信号员比弗说的那样：“没地方躲了。”^[62]更糟糕的是，锋区已经掠过他们，前进到了北方大约175英里外的敌军所在处。“翔鹤号”和“瑞鹤号”可以借助恶劣的天气来躲过空中的侦察机和攻击机。这成了接下来的行动中至关重要的

因素。

天空刚刚亮到可以飞行，“列克星敦号”就派出了18架侦察机，以搜索队形飞行，像轮辐一样以舰队为中心四散开来。负责向北搜寻的飞行员要飞到200英里外侦察，这几乎是SBD轰炸机的极限了。随后不久，F4F野猫式战斗机升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毫无疑问，日本的侦察机很快就会出现上空。

直到早上8时20分，敌情报告才传过来。向东北方向飞行的约瑟夫·史密斯中尉在飞完去程，并在回程中飞了50英里后，传回报告说他发现了日本舰队：“2艘航母，4艘重型巡洋舰，多艘驱逐舰，120度方向，速度20节。”^[63]这个位置离美国舰队175英里，方位为028度。“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谢尔曼舰长写道，“这是陆基飞机或舰载机第一次发现日本大型航母。”^[64]

奥布里·菲奇接管了两艘美国航母的指挥权，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向北方全速前进，缩短攻击距离。目前他们与报告的目标之间的距离刚好够“蹂躏者”鱼雷轰炸机携足够的燃料安全来回。但菲奇将军也痛苦地意识到，根据近来的经验，第一次目击报告并不总是可信的。机组人员从黑板上抄下了最后一刻的航行数据，然后鱼贯而出，离开了待命室。他们穿上作战服，把护目镜推到额头上，由戴着彩色风帽的引导员带领穿过停放的飞机交织而成的迷宫。两艘航母全部进入了“Z状态”（一级战备状态），内部舱门和舱口紧紧关闭并锁死，把船体变成了多个水密舱。暂时用不到的工具都放在了不碍事的地方。燃料管排空了，消防设备也被拿了出来，以备使用。舱面船员穿上了救生背心，戴上头盔，走向各自的战斗岗位。^[65]舰桥上，包围操舵室的玻璃窗也收了起来，让操舵室直接跟外面相通。

上午9时7分，两艘航母调整为逆风方向，第一架战机离开了飞行甲板。半小时之后，75架飞机组成的大型编队飞向日军舰队，其中包括39架俯冲轰炸机（全部装载了1 000磅的炸弹）、21架鱼雷轰炸机，以及

15架战斗机。

第2侦察机中队的队长狄克逊少校的侦察区域与之前向舰队报告发现目标的史密斯中尉相邻。收到报告后，狄克逊放弃搜寻自己的区域，径直前往报告中的地点。他在狂风中盘旋，起初未能发现敌军的舰队，但他继续侦察，终于在乌云的缝隙间发现了几条船。他跟踪了敌人两个多小时，通过无线电发出了十多个修正方位，为即将到来的袭击大队指引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此时零式战斗机正在他上空，时刻准备击落他。他在云层中上下翻飞，就像猫和老鼠之间的致命追逐一样躲避敌人，同时用自己飞机上强大的0.50英寸和0.30英寸布朗宁机枪进行回击。零式战斗机对其佯攻，意图引诱狄克逊和他的机枪手浪费弹药，但是美国飞行员并没有上钩。“如果他们离得再近一点，”狄克逊回忆道，“我会做大幅度转弯，一边的机翼朝下，机头对准敌机开过去。这样我就可以用正面的机枪射击，机枪手也可以向前射击。”^[66]

美军的航空大队向北扑去，但队形不好。“约克城号”的机群和“列克星敦号”的机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相互看不见了。不同类型的战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战斗机——以不同的速度和高度飞行，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俯冲轰炸机必须爬到大约1.5万英尺的高度，以到达可以俯冲攻击的位置；鱼雷轰炸机拖着沉重的鱼雷，没有多余燃料爬到那么高，也没必要这么做，它们将从低空接近敌人。^[67]战斗机为了高效使用燃料，不得不调小油门，但是这会让它们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俯冲攻击。飞至目标区域后，飞行员们伸长了脖子，在潮湿阴暗的云层中寻找缝隙，他们经常找不到自己的僚机。

上午10时32分，“约克城号”的SBD俯冲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首先发现了日军舰队。日军航母距离它们大约5英里，正以25节的速度向正南方行进。小威廉·伯奇少校负责对“约克城号”的两个SBD俯冲轰炸机中队进行战术指挥，他让俯冲轰炸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鱼雷轰炸机赶到，好进行协同攻击。这个决定符合战术原则，但这20分钟的等待是不值得

的。日军航母抓住时机，使更多零式战斗机升空进行空中防御，“翔鹤号”也得以溜到南方，找到了一片风暴区做掩护。“约克城号”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评价道：“丢失先发制人的机会所付出的代价，比任何由协同攻击得到的优势都要大。”^[68]上午10时57分，“约克城号”笨重的鱼雷轰炸机才到达现场。它们分散开来，对“翔鹤号”进行左右夹击。

由于缺少战斗机的掩护，它们投放鱼雷时距离敌舰有1/4英里到1/3英里，没有一枚鱼雷命中。在高空，伯奇及其带领的第5侦察机中队的7架飞机开始俯冲攻击。他们俯冲到8 000英尺的高度时，轰炸瞄准器和挡风玻璃起雾了（4天之前他们在图拉吉岛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问题非常严重，他们就像瞎了一样。伯奇估算说，起雾问题使他们的投弹命中率下降了75%，并称他们不得不“凭记忆投弹”。^[69]他们的7枚炸弹全部丢进了海里。

3分钟后，之前盘旋在上空，获得了更好的俯冲位置的海军上尉沃利·肖特的第5轰炸机中队的17架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攻击。它们呈70度角向“翔鹤号”俯冲，也遇到了零式战斗机和玻璃起雾的困扰。然而，它们还是设法在飞行甲板上投下了两枚1 000磅的炸弹，一枚在船首，一枚在船尾。第二枚炸弹是海军上尉约翰·J.鲍尔斯投下的，他下降到1 000英尺以内才投下炸弹。这种低空投弹使他自己也不可能活下来——他投下的炸弹在“翔鹤号”右舷舰岛后面爆炸，把自己的飞机也炸毁了。这从本质上讲是一次自杀式的攻击，鲍尔斯用他（和后座机组成员）的生命保证了成功命中目标。他被追授了荣誉勋章^[70]。

“翔鹤号”的维护官宫下八郎（Hachiro Miyashita）正在下方机库甲板上的一个机械库中。第一次爆炸引发了二次爆炸，摧毁了机库甲板上的机器，并炸毁了所有的维修设备。数十人当场死亡，更多的人在逃跑时吸入了浓烟。宫下沿着梯子爬上了飞行甲板，刚一爬上去，刚好看到鲍尔斯的炸弹击中这块甲板。这两枚炸弹在“翔鹤号”的飞行甲板上炸出了许多大洞，引发的大火疯狂地燃烧了几个小时。有108人死亡，40人受伤。^[71]在返回港口修理之前，“翔鹤号”不能再执行起降任务了，于

是它的航空大队不得不降落在“瑞鹤号”上。但是“翔鹤号”的伤并不致命。它的损管队最终控制住了火势。它没有被鱼雷击中，船体完好无损，可以依靠自己的动力以30节的速度行驶。它的舰长要求撤离战斗，并获得了许可。12时10分，“翔鹤号”在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下退往特鲁克群岛。

这是让“列克星敦号”的航空大队感到沮丧的一天。“列克星敦号”的战机出战时混乱而脱节，大多以零散的编队抵达战场，而且相隔时间达到了5分钟到10分钟。3架野猫式战斗机和9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没有发现敌方舰队，于是返航了。“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的队长奥尔特透过雨雾看到了两艘日军航母，但是他只集结到4架俯冲轰炸机、11架鱼雷轰炸机和6架战斗机。“能看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飞行员盖勒上尉回忆道，“高耸的雨云就像一根根柱子。你得绕过它们，然后突然间你就看见了航母。它就在那儿，但是随即又不见了。……场面之混乱令人难以置信。能见度很差，人们在无线电里大喊大叫。”^[72]零式战斗机无处不在，看起来像是从四面八方朝他们发起攻击。野猫式战斗机击退了它们，而迟缓的鱼雷机试图以云雾作为掩护。“总有战斗机在追我，”盖勒说，“刚交手时，我躲开了一架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并咬住了它的尾巴。它立即采用了零式的惯用伎俩，快速拉升。要知道这些家伙能在1分钟之内拉升4 000英尺。它们就是喜欢你跟在后面一起拉升。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它们会升到超出你射程的高度，然后在最高点突然掉头向下，这时你会发现它们在你几乎失速的时候朝你俯冲下来。”^[73]

在“列克星敦号”的战机组织起来之前，乌云又飘了过来，遮蔽了视野中的敌方舰队。奥尔特开始进行“矩形”搜索，不久之后就在西边大约20英里处发现了受伤的“翔鹤号”。他与3架僚机立即发动了攻击。这4架SBD轰炸机俯冲下去，投下炸弹，有一颗命中了飞行甲板的右侧。“列克星敦号”的所有12架鱼雷轰炸机也攻击了这艘航母，而且飞行员离开的时候乐观地相信，至少有5枚鱼雷击中了该航母。然而事实证明，那

天没有任何一枚鱼雷击中“翔鹤号”，或者是虽然击中了，但是没有引爆。

在晴朗的天空下，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里，第17特混舰队就像一只在钓钩上扭动的虫子。美国航母上的军官和船员们都知道，他们那天一定会受到大规模的空袭，时间很可能在中午之前。所以，早上8时28分，史密斯中尉发现日军航母几分钟后，“约克城号”的无线电室侦听到中岛九七式战斗机驾驶员的敌情报告时，他们并不惊讶。“看见敌方航母。敌方航母方位205度，距离你235英里，航向170度，航速16节。”[\[74\]](#)

“这是一份美妙的报告。”“瑞鹤号”航母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回忆道。[\[75\]](#)这是一份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完美报告，与头一天的极度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忠一很快派出了69架战机，命令它们保持编队，跟随攻击的指挥官高桥赫一少佐。

美国特混舰队以两艘航母为中心，构成环形的编队。两艘航母会不时左转，逆风航行，以起降战机——但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艇会继续向东北方以20节的速度朝敌人前进。由于长时间在太阳下曝晒，谢尔曼舰长有着古铜色的肤色。他整整一个早晨都在离甲板25英尺的舰桥上的信号台里待着。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战斗制服，一件帆布风衣，头戴一顶钢盔，系绳系在下巴上。尽管这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航母相互进行空中打击，但是这位舰长对战役会如何展开有着自己的直觉。他断定日方航母几乎与美方同一时间派出了战机（确实如此）；双方的战机编队已经擦肩而过（确实如此）；敌军会在11点左右攻击第17特混舰队（确实会如此）。[\[76\]](#)他认为双方的空袭都会击沉对方的航母，而所有幸存的战机都会困在空中无处降落。舰长允许斯坦利·约翰斯顿在舰桥上观察这场战役，并打了个比方，用拳击赛来向约翰斯顿简要解释他的推理。航母是一个臂展长，力道足，但是长着玻璃般脆弱下巴的拳

手。“我感到，此刻正在赶来的空中攻击无法阻挡，”他评论道，“这情形就好像两个拳击手同时出拳，打出了足以击倒对方的一拳，而且都打中了。”^[77]

返回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很快重新加满了燃料，然后起飞进行低空反潜巡逻，它们巡逻时还可以拦截来袭的鱼雷轰炸机。轮机舱提高了动力，以使“列克星敦号”加速到30节。高速规避机动依然是军舰对抗空袭的最佳防御手段。

10时55分，美军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敌军战机的踪迹，当时它们在68英里外，但是原始的雷达系统还无法准确测定目标的高度。“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指挥官（负责指挥空中所有的17架战斗机，包括“约克城号”的）估计它们大约在1万英尺的高度。^[78]菲奇的航空参谋不愿意派野猫式战斗机到太远的地方拦截，以防它们错过来犯的敌机，使航母变得毫无保护。战斗机要留在航母附近，在1万英尺的空中盘旋。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被派去低空巡逻，在2 000英尺的高度侦察潜艇，并拦截敌人的鱼雷轰炸机。这种将俯冲轰炸机当作临时战斗机的做法让机组人员感到不快，他们认为自己处在完全不利的地位，简直是送给零式战斗机的一盘冷餐肉。这次战役暴露的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美国的航母需要更多的战斗机，而海军航空兵的圈子里也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

“列克星敦号”的5架战斗机在20英里外与敌机编队发生了接触，发现它们分别位于1 000英尺至13 000英尺的高度。这5架飞机试图爬升，但是失去了速度优势，于是不得不掉头追逐日本飞机。“列克星敦号”上的喇叭广播着战斗机指挥官和战机之间的无线电通信：“诺尔玛呼叫航母。敌方鱼雷轰炸机，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从8英里外的云里蜂拥而出。它们在6 000英尺的高度上，正在快速俯冲。我们正过去拦截。”^[79]高桥的攻击就像精妙的舞蹈动作，与毫无章法的美国战机群形成鲜明对比。距离目标还有15英里时，它们分开并形成了两个鱼雷轰炸机群和一个庞大的俯冲轰炸机群。“列克星敦号”第2战斗机中队的海军上尉威拉德·埃德是拦截队伍中的一员：“我和僚机朝两架日本飞机飞

过去，它们冲进了云里。在云里我们跟丢了。然后我和僚机分头搜寻。我转出来后，在下方看到了敌军的战斗机。它立刻转弯向上，机头对着我。我也俯冲向下，机头对着它，迎面冲了过去。我用0.50英寸机枪向下打了4连发，它则朝上打。对方20毫米的子弹打不着我，7.7毫米的子弹显然更有效，不过那时我的0.50英寸机枪已经击中它了。那架飞机几乎立刻快速翻滚起来，然后不受控制地向下落去。”[\[80\]](#)

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7日—8日



“列克星敦号”的瞭望员最早看见敌机是在上午11时13分。^[81]它们如同“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一样，出现在东北方的地平线上，看起来几乎一动不动。^[82]每一个小黑点逐渐变成了可识别的形状——机身、水平的机翼、螺旋桨盘、机身下挂载的鱼雷或炸弹。鱼雷轰炸机在空中掠过，从两个方向接近，而俯冲轰炸机在高空呼啸着进入了俯冲状

态。“它们来了！”烟囱旁边的通道中有人喊道。^[83]“列克星敦号”的引擎猛烈运转，使船加速，随后谢尔曼舰长下令向右闪避，甲板向左猛烈倾斜。“列克星敦号”和附近的巡洋舰以及驱逐舰上的防空武器开火了，天空中充满了高射炮弹爆炸的灰黑色烟雾。垂直的羽毛一样的烟雾，表明刚才这里有美国战机或者日本战机在空中被击落。

“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想象过能有这样的阵势！”岛崎重和少佐说，他是两个鱼雷机编队的领队，“我们在攻击敌方航母的时候，简直是闯进了防空火力构成的一堵墙里，这艘航母及其护航舰船发射的高射炮弹和曳光弹熏黑了天空。在冲进这么恐怖的防御火力网之后，我们的鱼雷机和轰炸机似乎很难幸存。我方的零式战斗机和敌人的野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编队之中互相追击，爬升又下降。双方解体的战机燃烧着从空中坠落。”^[84]

从“列克星敦号”的角度看去，一大群敌机是从各个角度展开的攻击。这场混战让人肾上腺素飙升，没有人能对发生的事情形成完整的印象——完整事件只有在事后才能拼凑出来。

岛崎重和的中岛鱼雷轰炸机从4 000英尺的高度做了一次小角度俯冲，接近“列克星敦号”的左舷。6架敌机冲破了防御，在航母右舷舰首上空盘旋，形成了典型的夹击队形，谢尔曼舰长此时没有多少选择了。（岛崎重和后来称这次攻击“协作很完美”。^[85]）飞往航母的左舷时，岛崎的机群低空飞过“明尼阿波利斯号”的船头，这艘巡洋舰防空火力全开，击落了第一架飞机，但是其他的战机继续向“列克星敦号”飞去，看起来不为所动。它们在距离航母大约1 000码，在100英尺左右的高度上保持平飞时，发射了800千克的91型空投鱼雷。鱼雷落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钻进海里，然后浮上来，贴着海面，凭自身的动力以50节的速度直奔“列克星敦号”而去。

日本战机线路不变，降到与“列克星敦号”的飞行甲板一样甚至更低的高度，飞过去的时候甚至差点擦到舰首。防空炮兵以近距离平射击落

了一架敌机——飞机爆炸时离航母非常近，烧红的铝片甚至掠过了航母的飞行甲板。“我不得不贴着海面飞行，以此逃脱敌人的炮弹和曳光弹，”岛崎重和说，“事实上，我飞得太低了，掉头离开航母的时候差点撞上舰首，因为我比飞行甲板还低。我飞过去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船员盯着我的飞机。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次经历这种可怕的瞬间。”^[86]

两舷均有鱼雷从水中接近，轰炸机正在天上俯冲，但是谢尔曼舰长显得镇定自若，就好像“列克星敦号”每天都会击退这样的攻击一样。“从舰桥上，我看到空中有许多轰炸机从各个位置呼啸而下，还有鱼雷轰炸机几乎同时从两侧飞来，”他写道，“对于轰炸机我无计可施，但是我可以做点什么去避开鱼雷。”^[87]他以平静的声音告诉舵手：“右满舵。”^[88]“列克星敦号”船体很长，尽管它当时的速度已超过30节，反应还是慢到让人苦恼的地步。舰长回忆说它的转向“威严而迟缓”，那一刻“就像永恒”。^[89]

泡沫尾迹显示着每一枚鱼雷接近航母时的轨迹。有一些做着“海豚式运动”——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沉下去。约翰斯顿焦虑地看着水中的鱼雷，他意识到“列克星敦号”不可能全部躲开。“它们邪恶的头部对我来说就像死亡的化身。我有个幻觉，感觉它们是活的。它们破开水面，瞥了我们一眼，确认完前进的路线后便重新潜了下去。”^[90]

俯冲轰炸机发出越来越尖厉的声音，表明上方马上有炸弹要落下来了。爱知D3A1九九式轰炸机带有独特的固定起落架，它们以固定的间隔，近乎垂直地俯冲下来。在1500英尺的高度上，它们轮番扔出炸弹。炸弹从机体上分离出来后，飞机开始拉高，而炸弹则成为一个不祥的黑点，沿着另一道轨迹落下来。一开始的几枚炸弹落到了“列克星敦号”的尾流里，还有几枚落在了船体中部的侧面。每一颗近失弹都会引发剧烈的震动，就好像爆炸来自船体内部一样；每一次爆炸都会激起和航母最高的桅杆一样高的水柱，把通道上的人淋湿。一枚242千克重的高爆炸弹击中了船体前端，在左舷舰首的5英寸舰炮附近爆炸，发出了

耀眼的红光，冒起十几米高的火焰。旁边的所有炮手都被震飞了，消防小组急忙赶来灭火。另一枚炸弹只差几英尺就能命中舰岛，但是它稍稍偏离，掉进了海里。第三枚炸弹击中了“列克星敦号”左舷高处的巨大烟囱，炸死了附近通道上的几名炮手。一颗近失弹击断了汽笛的操纵杆，让汽笛在打开的状态下卡住了，以至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它一直在尖啸。

第二批鱼雷轰炸机穿过了猛烈的防空火力，以小角度俯冲接近了“列克星敦号”的左舷舰尾。鱼雷轰炸机在距离“列克星敦号”1 000码时丢下鱼雷，并继续朝航母飞去，飞过时用机枪扫射航母的甲板。“列克星敦号”紧急规避，并大幅曲折运动。被敌机完全忽视的警戒巡洋舰和驱逐舰此时无法再继续保持环形编队了。

看到有十几枚鱼雷向“列克星敦号”袭来，谢尔曼舰长意识到他无法避开全部鱼雷。不过不是所有鱼雷都能正常工作——两枚看起来必中无疑的鱼雷，结果钻入了龙骨以下，然后出现在了船的另一边。另外有一对鱼雷平行着冲过来，在船体两边各约50码之外，驾驶台有个军官喊道：“舰长！不要改变航向！我们两侧都有鱼雷，它们是平行的！”^[91]谢尔曼保持住航向，直到鱼雷越过并消失。不过在上午11时20分，“列克星敦号”的运气用完了。它连续被两枚鱼雷击中左舷的中部和前部。^[92]与炸弹的爆炸不同，这些水中的爆炸声音沉闷，但是庞大的航母船体会突然倾斜，发出的强烈震颤足以将人震离地面。比弗记录说，那两次爆炸“像是要把航母从水里举起来再任其落回海里，接着是上下的颠簸，桅杆猛烈摇动，索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一片片老旧的涂料和积攒了14年的灰尘从航母暗藏的开口和裂隙中被震了出来”。^[93]第一次爆炸炸穿了左舷的航空燃油罐，释放出了汽油蒸气，稍后油气又被点燃，造成了严重的内部爆炸。第二次爆炸毁坏了总水管，切断了消防软管和几个蒸汽引擎的供水，对航母造成了双重伤害。船向左舷倾斜了7度，尾流上浮着重重的油迹。

最后一架日本战机从航母的舰首低空飞过，追踪它的防空火力基本

是无效的。“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露出藐视的神情，”斯特鲁普如此形容日本飞行员，“我们用新的20毫米防空武器打他们，但是完全打不到。20毫米的曳光弹都落在这些鱼雷轰炸机的身后。”^[94]几架日本飞机在飞过航母时还用机枪扫射。它们飞走后，很快就在地平线上缩成了黑点，高射炮也静默下来。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12分钟。

航母周围的海面上杂乱地散布着燃烧的碎片和被击落的战机。从两英里外就能看到“约克城号”冒着黑烟。它的飞行甲板似乎被击中了，受损处靠近船身中间位置。

“列克星敦号”的损管队似乎很好地控制住了局势。在上午11时45分到中午的这段时间里，谢尔曼船长收到了一系列来自H.R.希利中校的乐观报告。希利是损管队队长，在机库甲板下方的指挥中心监督着几百人的工作。两枚日军的鱼雷击穿了“列克星敦号”的船体，几千吨海水灌进来，导致它倾斜了7度，但是损管队通过焊死被水灌满的隔间和加固隔间的方式处理了危险，他们把左舷的燃料和净水抽出来，灌进右舷的空罐子里，以扶正船体。军医清点伤员，然后用担架把他们转移到船上的医务室。消防队员用泡沫灭火器灭火，到了上午11时45分，飞行甲板上已经看不到烟了。船员用新的钢板修复了左舷前部炮台附近的损伤。船头和船尾的升降机都卡在了靠上的位置，不能把飞机送上或者送下甲板，但是甲板还能起降飞机。“列克星敦号”的引擎完好无损，尽管船体受伤了，它依然能以25节的速度迅速行驶。^[95]

返回的机组人员从空中看向航母，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从空中看它还挺好的，”海军上尉盖勒之后回忆说，“着舰以后……我向周围看去，才发觉周围有人脸色有些奇怪。然后我看到甲板上到处都是消防泡沫的斑点，我才意识到航母被击中了。”^[96]

菲奇将军和谢尔曼舰长有理由相信“列克星敦号”能承受住两枚鱼雷和两枚炸弹的攻击。因为从设计上来说它可以承受更多的打击。损管队受过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也有好的装备和领导者。这次战斗结束后一

个小时，“列克星敦号”似乎就恢复平衡了。如果再有敌人来犯，它看起来也有能力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终于对攻击之后的处境感到如释重负，”谢尔曼写道，“但这种轻松感很快就会变成恐惧。”^[97]

航母的航空汽油燃料罐放在左舷紧靠船体内侧的地方，它被两枚鱼雷击破了。虽然没有明显的燃油泄漏痕迹，但是隔壁的内燃发电机室里到处都是燃油气味。高度易燃的蒸气像致命的病毒一样蔓延到了整个船体的底部，由于找不到准确的泄漏位置，因此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中午12时47分，船上发生了巨大的爆炸。舰长位于舰桥上，感觉爆炸来自航母的“底部”，大概是龙骨上方不远处。^[98]几乎在同时，油腻的黑烟从飞行甲板上的升降机边缘冒了出来。内部电话被切断了，通信员奉命前去接收希利的口头报告。他们走下钢梯，来到一个充满浓烟的阴森地方，这里只有战斗照明灯，挤满了严重负伤、大声呼救的人。希利的损管指挥中心所在的总发电站已经完全被炸平，25人丧生，周围的隔间已经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在通往舰首医务室的300英尺长的走廊里，钢门都从铰链上被撕了下来。一名上尉描述道：“我被一阵如飓风般猛烈的风吹起，抛到了墙壁上。……那阵风看起来好像是由一股股火焰和无数的火花组成的。……火焰的颜色介于樱桃红和白色之间，火花是深红色的。这阵风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就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浓雾了。周围的舱室里传出呼救声，于是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道：‘放松，屏住呼吸，我们会出去的。’”^[99]

消防队拖着长长的软管来到这个“地狱”。他们戴着防毒面具，靠氧气罐呼吸，用手电筒照明，当水管中的水压下降时，他们会转而使用手提式化学灭火器。他们眼中流进了汗水，头也变得昏沉，但是他们继续战斗，对抗着熔炉般的高温、令人窒息的烟雾，以及进一步爆炸的威胁。他们把伤员拉上梯子，抬到机库甲板上，在那里医务人员已征用飞机的推车，可以把担架推到医务室。

当时谢尔曼和菲奇还不知道，“列克星敦号”已经陷入最终走向毁灭

的恶性循环。第一次的汽油爆炸撕开了防水门和墙壁，让易爆的烟雾散布到了整艘航母里，导致损管队无法封锁危险区域。每隔10分钟到15分钟，航母就会因为新的爆炸而颤抖一次。燃料罐被进一步破坏，更多易燃液体流进了火海。总水管被压坏或者破裂了，这导致消防水管中的水压下降，最后完全失去了压力。总电缆也被不断蔓延的大火烧坏了，电源被切断，下层甲板陷入了黑暗。化学灭火器和氧气罐逐渐减少。消防队员不断受伤，不得被同伴带离现场。虽然有些地方水密门被关好并锁死了，但大火把舱壁烧得非常热，点燃了另一面的油漆，于是火焰穿墙而过。[\[100\]](#)第二次毁灭性的爆炸发生在下午2时42分，第三次是3时25分。至此，火势已明显失控了。

舰长从舰桥上俯视着飞行甲板，下方受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第一次大爆炸之后，战机依然在航母上起落，但是2时42分的爆炸彻底终止了飞行作业。航母前方的升降机被烧成了橘红色，火舌吞没了旁边的一切。机库甲板已经因火焰和烟雾而不适合停留了，于是那里的伤员被带到上层。斯特鲁普回忆说，爆炸“听起来像货运列车从机库甲板上开过。那其实是一堵火墙，后来从升降机周围往上冒。火墙蹿到两三英尺高，而且爆炸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101\]](#)浓烟和炽焰导致损管队被迫向船尾撤退，他们一边后撤，一边拼命用消防软管灭火。他们在弹药升降机里放了一根软管，想把疯狂燃烧的隔间灌满水。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大火的前进。副舰长塞利格曼中校写道：“航母前部大火熊熊，装甲甲板的上面和下面都没有任何灭火工具，此时大火已朝后面的飞行甲板蔓延，机库甲板夹层中存放的20多枚鱼雷必然会被引爆。”[\[102\]](#)

航母内部的联络很快瘫痪了，谢尔曼和菲奇越来越难获得受损的航母下层的准确报告。通往舰桥的主电话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失效了，舰长和损管队之间的大多数通信是靠人员来回跑动解决的。船舵的电力系统被切断了，转向装置进入应急模式，改变航向只能靠口头通知。随着水泵失灵，船体又开始倾斜，吃水更深了。菲奇下令让护航船只不要靠近，因为“列克星敦号”变得非常难控制。通往轮机舱的传声筒（不需要

电)在一段时间内仍能发挥作用,但是音质在不断下降。谢尔曼舰长意识到,如果他不命令工程师撤离,当剩下的通信联系全部被切断时,那里的人会坚守岗位,直到被大火吞噬。下午4点,他命令他们关闭引擎,排出锅炉里的蒸汽,撤退至飞行甲板。多余的蒸汽冲进了烟囱里,发出低沉的呼呼声。引擎不再发出声响,四个巨大的螺旋桨停止了工作。“列克星敦号”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忠诚的护航舰——驱逐舰“安德森号”、“哈曼号”和“莫里斯号”,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来到这艘即将沉没的航母旁边,等待指示。

下午4时30分,谢尔曼派通信员找到损管队临时指挥塞利格曼中校,让他带着剩下的所有船员到飞行甲板上集合。到下层甲板去找人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必须这样做——广播系统早就坏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舰长命令他们离开岗位。受伤的船员不断被带到飞行甲板上,许多人被烧伤,吸入了浓烟,但总有志愿者愿意到底下去帮助其他船员。弃船时用的救生艇和其他漂浮设备已经准备好了。驱逐舰的船首紧靠在航母左舷后方,让人们把担架降到其甲板上。

时间紧迫。船上的每个人都知道,随着大火蔓延,机库甲板里的炸弹和鱼雷正在被火慢慢烘烤着。有人测量过,鱼雷周围的金属外壳温度在60℃左右。最终,它们会被引爆,把航母彻底炸毁。到了5点钟,保船显然没有希望了,弃船的准备也一直在进行,但舰长还没有下达命令。菲奇可能认为谢尔曼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有些危险,所以下午5时7分,将军在舰桥上俯身对信号台上的舰长说:“让这些孩子下船吧。”[\[103\]](#)

他们把打了节的绳索固定在船的两侧,将几十个救生圈放进了海里。人们开始沿着绳子下降,有的直接降到筏子上,有的来到驱逐舰的甲板上,有的到了小船上,有的直接滑进了50英尺以下的海里。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太阳在一片壮丽的光辉中落下。这次撤离十分从容,从容得有点奇怪。没有慌张,没有恐惧,甚至有些人看起来并不着急离去。有人从船上的商店里拿出来了一桶冰激凌,装在杯子里分给大家。

高射炮手们将20毫米机关炮的炮管和弹夹带到了驱逐舰的甲板上，以免随航母一同沉入水中。人们在绳索后面排成几条直线，把鞋子脱下，整齐地摆在飞行甲板的边缘。他们向舰长欢呼了三声。海军上尉盖勒直接从飞行甲板上跳到海里，游了大约100码，然后游了回来，顺着一条绳索重新爬上了飞行甲板。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回答说：“哦，在那里我觉得有点孤单。我不认识那些人。你们什么时候过来？”[\[104\]](#)

菲奇将军离开了此时已经空无一人的舰岛，跟在一小队参谋的后面。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依然遵守着规矩，把将军的外套整齐地叠好，放在他的胳膊上，紧跟在他身后。“我记得我走过飞行甲板时，感到非常热，很快这些都将被烧毁，”斯特鲁普回忆说，“左舷前方吹来了一点点风，让船的这个位置稍微凉快了一点。”作为菲奇的司令秘书，斯特鲁普举起双臂，朝一艘巡洋舰发出信号：“派一艘小船来接将军。”[\[105\]](#)一艘汽艇很快就停在了下面，菲奇迅速爬下绳索，来到汽艇上。

6点钟时，只有几个人还留在“列克星敦号”上。飞行甲板热得烫脚。“飘忽不定的小火舌互相追逐着穿过大片木制的区域，前面的火焰很快就被后面的取代了，”信号员比弗回忆说，他是最后离开几个人之一，“除了火和烟什么都看不到。船头依然很干净，但是填充木板缝隙的焦油开始沸腾了。我们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浪。”[\[106\]](#)

舰长和副舰长是最后走的人。他们在甲板上最后走了一圈，看看有没有人落下。没有船员落下，于是他们来到“列克星敦号”船尾打结的绳索旁，看起来都不愿迈出最后的一步。谢尔曼命令塞利格曼先下去，因为舰长有“义务和特权”最后一个离开。[\[107\]](#)塞利格曼刚一下去，船腹就发生了爆炸，火焰伴着飞机的碎片冲上半空，谢尔曼在飞行甲板的边缘下躲开了坠落的碎片。塞利格曼呼喊着重，让舰长赶紧从绳子上下来。“我刚才在想，”谢尔曼回应说，“会不会我刚离开船，火就熄灭了，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很傻？”[\[108\]](#)舰长在后来写道，放弃“列克星敦号”“令人心碎”，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109\]](#)但是这艘可敬的老航

母已经完成了使命，谢尔曼有义务把自己完好无损地带回去，继续为美国海军服务。他顺着绳子坠入温暖而又黑暗的珊瑚海中。

在燃烧的航母周围，海水里有数百个等待救援的人。许多人后来回忆说那片海水让人感觉很舒服，不热也不冷，还能感受到燃烧的“列克星敦号”发出的热量。身上的救生衣使他们浮在水面上。他们可以抓住筏子上丢下来的绳子，舒舒服服地漂在海里，等着被救上小船或者驱逐舰。有些人手里还举着几包香烟。健康的人选择多等一会，让那些虚弱的同伴先上船。“莫里斯号”和“哈曼号”驱逐舰小心地在落水者之间穿行，不断有人爬上吊货网。那些虚弱得爬不动的人被起重机吊了上来。

夜幕降临后，燃烧的航母构成了一幅美丽而又可怕景象。在夜幕的映衬下，熊熊燃烧的“列克星敦号”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庞大。甲板上的每一个孔洞都透出内部橘红色的火焰旋涡，一部分船体被烧红了，像熔化的铅那样发光。比弗回忆说：“它倾斜得很厉害，停在上面的飞机挂载的炸弹以及飞机本身的爆炸，让飞行甲板上不时冒出脏兮兮的红色火焰。黑暗的水面映衬出的火光，让这场面变得更可怕了。”[\[110\]](#)

此时，机库甲板中的鱼雷弹头和炸弹已经接近引爆温度。晚上6时30分，它们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飞行甲板上的十几架战机像儿童玩具一样被抛到了海里。航母中部的二号升降机从飞行甲板上被炸飞了，像瓶盖一样飞了出去，缺口中冒出了一大团火焰。从附近的一艘巡洋舰上，斯坦利·约翰斯顿看到“碎片和颗粒、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钢板和木板都伴随着刺目的白光在火焰和烟雾中飞上了天。我们的身子紧紧贴着巡洋舰起伏的边缘，过了好几秒，碎片才在周围几百英尺的范围内坠入大海”。[\[111\]](#)

弗莱彻将军已经决定当天不再发动攻击，命令整支舰队向南撤退，脱离敌人。有人建议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尾随日本舰队，吸引敌人参与水面作战，他考虑之后拒绝了，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遇到大规模空袭。这个决定很有可能拯救了大多数“列克星敦号”船员的性命，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船只接纳幸存者。这些船员被救起并分散到舰队中的驱逐舰和巡

洋舰上，这些船上一下子变得人员过剩。但是船员们都全力招待“列克星敦号”上的这些无船可归的人，拿出多余的衣服来，还跟他们分享床铺，让大家都可以轮流睡觉。

弗莱彻下令击沉“列克星敦号”，这一方面是防止它落入敌手，另一方面是防止其成为敌军飞机的路标。“费尔普斯号”驱逐舰行驶到距离它大约1 500码的位置去执行这个糟糕的任务。谢尔曼舰长有些哽咽，站在“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看着这一切。“费尔普斯号”朝“列克星敦号”的右舷发射了8枚鱼雷，看起来有4枚引爆了。谢尔曼回忆说：“那艘被击中的船吃水越来越深，慢慢地沉了下去，就好像它也不愿放弃战斗一样。旗杆上的国旗和最后挂上去的信号旗都自豪地飘扬着，旗语是‘我是弃船’。它是以水平的姿态沉下去的，跟以往一样端庄。”^[112]晚上7时52分，“列克星敦号”在一片蒸汽的滋滋声中沉没了，随它一同沉没的，有100多具船员的尸体。大约一分钟后，方圆几英里内都能听到一声巨大的、可怕的水下爆炸声，就连整整10英里外的美国特混舰队的船上也听得见。那是“列夫人”最后的怒吼。它沉向了深渊。

“约克城号”航母比“列克星敦号”更小更灵活，它躲过了8枚甚至10多枚鱼雷。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舰长在信号台上指挥舵手，喊着“右满舵！”“左满舵！”^[113]借助回转半径小的优势，巴克马斯特用“船首正对”的方法来对付鱼雷，也就是说，他直接让“约克城号”朝鱼雷来袭的方向开去，灵巧地穿过它们，其中最近的鱼雷离“约克城号”不超过50英尺。“航母转向时，尾流拧成了一道巨大的白色弧线。”摄影师威廉·G.罗伊回忆说，他当时也站在舰桥上，就在巴克马斯特身旁。^[114]航母在超过30节的航速下急转弯，大幅度摇摆，船员们不得不紧紧抓住身边可以抓住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从甲板上滑下去。

“约克城号”被俯冲轰炸机投放的一枚500磅的炸弹击中了，这枚炸弹落在舰岛附近，径直穿过甲板，在钢板上留下了一个直径14英寸的洞；炸弹还穿过了待命室、机库甲板、第二甲板和第三甲板，最后在船体深处的第四层甲板上的航空设备储藏室里爆炸了。这枚炸弹穿过六层

甲板才爆炸，它的力道可想而知——速度可能达到了每小时500英里。机库甲板后部的一个船员估计爆炸使“船尾至少上升了10英尺”^[115]——这一高度足以把航母的螺旋桨完全抬出水面，使人们在战斗的喧嚣声中都能听见引擎飞转的声音。因为这次爆炸，内部的甲板和舱壁明显变形了。37人当场死亡，还有更多的人受伤。海员奥蒂斯·凯特被派去清理现场，多年后他回忆说：“到处都是碎片和颗粒，有些是航母的，有些是海员的。……我们要把航母的碎片拣出来，把海员的肢体装进裹尸袋，把其他的垃圾丢进垃圾袋，直到现场可以用铲子和消防水管进行清理，然后再用消毒剂和抹布清理。这里总是有一股‘死亡的芬芳’。当时和之后，一直有个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我的号码在哪里？”^[116]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这最初的破坏，这艘船可能没有太多损伤；火势得到了控制，飞行甲板继续作业，甚至还能保持24节的速度。舰长询问轮机长是否需要降低航速，轮机长回复道：“不需要。我们能挺过去！”^[117]

“列夫人”燃烧时，“约克城号”一刻不停地行进，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被日本潜艇跟踪，也是为了回收战机。在“列克星敦号”明显无可挽救之时，菲奇将军深谋远虑，把“列克星敦号”上未受损的飞机尽可能多地转移到了仍能起降飞机的“约克城号”上。在接收了“列夫人”的超过1/4的飞机后，“约克城号”的航空力量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强。然而弗莱彻的选择十分有限。美国飞行员声称已经击中了日本的两艘航母，并确信击沉了其中一艘。但下午的目击报告证实，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仍漂浮在水面上，而且看上去并没有起火，机动能力似乎也没有降低。美国人已经损失了“列克星敦号”，不能再失去“约克城号”。此外，燃料储备低得令人担忧，而且特混舰队的护航舰船在接收了2 700名“列克星敦号”幸存船员后，已经严重超载。弗莱彻一开始打算留在珊瑚海海域，不过5月8日下午早些时候，他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信息。后者要求弗莱彻撤出攻击区域。于是第17特混舰队朝南方驶去。

在几艘驱逐舰上，“列克星敦号”的船员们挤在甲板上的狭小区域

里，很难在船上走动。食堂里不供应食物，三明治和黑咖啡都是直接递到人们坐的地方。那天晚上有上百人睡在甲板上，疲惫使他们忽视了不舒适的环境，甚至船头溅起的水花也无法把他们吵醒。医生和医务兵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烧伤者数不胜数，医务人员将单宁酸直接涂在伤口上，并给伤员注射大量吗啡。绷带缠了又拆，断骨打上石膏。烧伤最严重的病人得到输血治疗。几艘驱逐舰缓慢地朝南方行驶：这些军舰比较小，增加的人员重量明显影响了它们的航行能力。随着燃油的减少，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每艘驱逐舰的重心都升高了。弗莱彻下令将“列克星敦号”的幸存海员重新安置到巡洋舰上。

“约克城号”的速度还可以，但是它的内部损伤很严重，身后拖了数英里长的光滑的燃油痕迹。这很危险，因为留下的尾迹容易被敌机发现。弗莱彻命令一条驱逐舰紧紧跟在航母后方，希望可以把浮油打散。船上没人知道敌人的下落，大家都以为日军正在穷追不舍。海军上尉沃利·肖特坦言：“老实说，我们在撤退的路上很害怕。”[\[118\]](#)

5月9日凌晨，第17特混舰队向东转向，然后通过新喀里多尼亚南边的航道偷偷溜出了珊瑚海。因为燃料不足，“约克城号”在汤加群岛的汤加塔布岛停留，等待油轮赶到。有几艘水面舰艇进入了努美阿，这是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整支舰队中都有流言称北太平洋即将开战。

日军也在快速撤退。5月8日下午，井上成美将军断定，除了取消登陆莫尔斯比港的行动并让两艘航母返回特鲁克群岛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推迟对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他发电报给山本，“请您批准。”[\[119\]](#)他做出这个决定，有多条充足的理由，包括目前燃料不足，以及派舰队继续进攻莫尔斯比港可能会遭到毁灭性空袭等等。即使两艘美国航母都被击沉了——如日本飞行员希望他相信的那样——驻扎在澳大利亚的陆基轰炸机也令他不得不慎重行事。为运输舰提供空中掩护的“祥凤号”已经沉没了。虽然“瑞鹤号”还完好，但是经过5月7日和8日的战斗，日本航母的舰载机损失惨重。第二天结束时，航母上只剩39架飞机，包括24

架零式战斗机、9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鱼雷轰炸机。许多成熟老练的飞行员已经被击落或在海上失踪。

山本将军被井上的请求激怒了，认为他懦弱消极。午夜时，总司令断然拒绝了撤离请求，命令高木继续搜寻并歼灭附近的盟国海军。高木没有足够的燃料去追击美国人——一些驱逐舰燃料只剩20%，巡洋舰还有50%——不过为了做出点样子，他还是向美国舰队离去的方向派出了一些侦察机。5月9日和10日，他一直在通过油轮给舰船加油，到那时，弗莱彻的舰队明显已经逃走了。

日本人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莫尔斯比港，不会遇到太多抵抗，很多人都好奇他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对于一个到当时为止在战争中不顾一切的国家来说，这次失去胆量的行为十分奇怪。珊瑚海战役也就此作为盟军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而载入史册。

5月11日，山本取消了早先的命令，让高木将“瑞鹤号”带回日本。它需要进攻中途岛。

为了避免有人忘记战争的代价，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无论是“翔鹤号”还是“约克城号”，撤出战斗时都要将大批死去的船员进行海葬。“翔鹤号”的维护官宫下八郎说，船上回荡着伤员的号哭声，但是这些声音最后都沉寂了，因为这些人后来伤重而死。一个海军大尉的遭遇让他深受触动，这个大尉的身体完全被弹片炸烂了，医生处理时就像“从地里挖土豆”。5月9日，“翔鹤号”将107具尸体沉入大海。“我们用纱布覆盖住他们的脸，然后用毯子裹住尸体，”宫下八郎说，“接着在他们两腿之间绑上一颗30千克的哑弹，好让他们沉入海底。但是入水后，水压使棺材碎开，尸体重新浮回了水面。”[\[120\]](#)

“约克城号”的一级准尉弗兰克·博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的白色水手袋上的“血手印”，那是被炸伤的人尝试站起来时在印在上面的。[\[121\]](#)医疗兵把逝者放在金属丝网担架上，并用被单盖住他们的脸。5月8日晚

上，在准备好海葬之前，很多担架放置在军官休息室（靠近船上的医务室）里。“约克城号”的SBD飞行员比尔少尉因为太劳累，进入了一个摆满死去船员的房间，爬到了床上。凌晨时分他被弄醒了，因为“有人把我从床上抬了下去。屋里很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大声问怎么回事。刚一出声，我就被松开扔到了地上，一个受到惊吓的声音说：‘我的天啊，医生，这人没死！’”^[122]

^[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43.

^[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2.

^[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

^[4]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91.

^[5] Lt. Cdr. Paul D.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6.

^[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

^[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189.

^[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42.

^[9] Ibid., pp. 4–9.

^[10] Ibid., p. 30.

^[11] Otis Kight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70.

^[1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55.

^[13]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p. 40–41.

^[14] Ibid., and p. 32.

^[15] War Diary, USS *Lexington*, Flagship of Commander, Task Force 11; entry for April 19, 1942.

^[1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

^[17]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p. 328, 331.

^[18] Michener, *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 p. 27.

^[19]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167.

^[20] Ibid., p. 168.

^[21]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4: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 26.

- [22]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23.
- [23] 关于SBD轰炸机的雾气问题，见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p. 57–58。
- [24] Nimitz to King, “Naval Action in Coral Sea Area, 4–8 May 1942” (CINCPAC endorsement of Fletcher’s after-action report), p. 3.
- [25]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Chap. 4,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1946);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AAF/USSBS.
- [2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8.
- [27]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3.
- [28]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7.
- [2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98.
- [3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30.
- [31] *Ibid.*, pp. 110–11.
- [32] *Ibid.*, p. 128.
- [33] *Ibid.*, p. 129.
- [34] 此处指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译者注
- [35] *Ibid.*, p. 135.
- [3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389–404.
- [37] *Ibid.*, p. 400.
- [3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99.
- [3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9.
- [4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42.
- [41] *Ibid.*, p. 143.
- [42] Hamilton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5.
- [43]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7.
- [44] Flatley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6.
- [45]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8.
- [46]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p. 41–42.
- [4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399.
- [4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3.
- [4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0.

- [50] Ibid., p. 401.
- [51]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9.
- [5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2.
- [53] Peter Newberg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1.
- [54] Astor, *Wings of Gold*, p. 67.
- [55] Newberg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1.
- [56]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39.
- [57] Dick Wright quoted in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16.
- [5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9.
- [59]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57.
- [60]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69.
- [6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32.
- [6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4.
- [63] War Diary, USS *Lexington*, Flagship of Commander, Task Force 11; entry for May 8, 1942.
- [6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3.
- [65] Ibid., p. 107.
- [66]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64.
- [6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4.
- [6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1.
- [69] Ibid., and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30.
- [70] 荣誉勋章，美国授予英勇军人的最高奖章。——译者注
- [71] Maintenance Warrant Officer Hachiro Miyash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81.
- [72] Gayl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9.
- [7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66.
- [74]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223.
- [75] Ens. Kenji Hori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67.
- [76]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4.
- [77]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75.

- [78]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6.
- [79]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0.
- [80] Willard Ed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69.
- [81]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5.
- [82]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6.
- [83]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2.
- [84] Lt. Cdr. Shigekazu Shimazaki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04.
- [85]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 [86] Shimazaki quoted in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 104–5.
- [8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 [8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2.
- [8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09.
- [90]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184.
- [91]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0.
- [92]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 18.
- [93]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 167.
- [94]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42.
- [95] Details of damage control efforts drawn from Sherman's action report,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7 and 8 May 1942," items 19, 20.
- [96] Gayler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70.
- [9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2.
- [9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2.
- [99] Lt. H. E. Williamson quoted in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03.
- [100] See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69–70.
- [101]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44.
- [102] Executive Officer to Commanding Officer, USS *Lexington*, May 14, 1942. "Action in the Coral Sea, May 8, 1942—report of" (A16-3/CV-2), item 27.
- [103]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4. Also see Johnston and Stroop.
- [104]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17.
- [105] Stroop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p. 45–46.

- [106]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70–71.
- [107]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5.
- [108]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0.
- [109]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4.
- [110]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p. 170–71.
- [111] Johnston, *Queen of the Flat-Tops*, p. 224.
- [11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116.
- [113] William G.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0.
- [114] William G.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0.
- [115] Warren Willenburg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p. 55.
- [116] Kight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72.
- [117]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Chap. 4,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 “Attack on the Yorktown,” p. 29. Onlin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AAF/USSBS.
- [118] Short quoted in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5.
- [119]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3.
- [120] Miyash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81.
- [121] Frank Boo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7.
- [12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77.

第十一章

弗莱彻将军的第一批乐观报告已经发送给珍珠港和华盛顿了，此时“列克星敦号”仍在为生存而奋战，似乎能够保存下来。“敌人发动了第一轮全面攻击，我方舰队没有遭到重大损失。”他向尼米兹发送无线电报时这样说。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松了一口气，回答说：“祝贺你们取得辉煌战果。”弗莱彻后续的电报报告了“列克星敦号”不断恶化的情况。最后发出的是“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噩耗。莱顿在记录中称尼米兹“身子明显晃了一下，还好几次喃喃低语，说原本可以拯救‘列克星敦号’的”。^[1]

现在太平洋上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约克城号”）作战受损，也许需要返回美国本土维修，也许不需要。当天晚上，尼米兹尽力提振参谋的士气，提醒他们日方无疑也受到了重创。他说：“我们不知道敌方具体的损失情况。但是他们肯定也有重大损失！你们要记住——一定要让敌方有损失，让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2]然而在5月10日写给金将军的私信中，他完全是另一种语气。“鉴于我们现在的航空母舰建设进度，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战损率。”^[3]

金将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中密切关注着战役的进展，但他忍住冲动，没有介入尼米兹和弗莱彻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他的考虑是“他们需要所有能用的通信手段来有效协调工作”。^[4]得知“列克星敦号”沉没的噩耗时，这位美国舰队总司令深受打击。他曾是“列克星敦号”的舰长，他了解这艘军舰，也了解上面的每一名士兵。他发布命令，向公众隐瞒“列克星敦号”沉没一事。他对英国皇家海军元帅达德利·庞德爵士

说，这“仅仅是第一轮战役，敌人的力量还在增强，我们将难以与之抗衡”。[\[5\]](#)

人们常说珊瑚海战役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敌对双方的舰船第一次在视距外交战。这也是海战史上最混乱且最令人困惑的战役之一，这场海战在通信、判断、解读和计算方面都出现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失误。从直接的战果来看，日本取得了胜利，但是取胜的程度并不像他们宣称的以及他们自以为是的那样大。除了“列克星敦号”之外，日方还击沉了宝贵的油轮“尼欧肖号”和驱逐舰“西姆斯号”，重创了“约克城号”，摧毁了“列克星敦号”上的50架飞机（包括与航母一同沉没的飞机）和“约克城号”上的16架飞机。盟军击沉了日方的轻型航母“祥凤号”、1艘轻型巡洋舰、2艘驱逐舰、1艘运输舰和4艘炮艇，还击伤了“翔鹤号”和一艘飞机供应舰。尽管从击沉的舰只吨位上看日方领先，但是日军损失的飞机数量和伤亡人数都是美方的两倍多。在空战中，日方损失了33架战斗机、3架四引擎巡逻轰炸机、5架水上飞机、16架俯冲轰炸机和17架鱼雷机。另有30架飞机与“祥凤号”航母一起沉没。日方有90个机组人员殒命，相比之下，美方只损失了35名机组人员，因为美方救援坠海飞行员的工作做得更好。

日方战术上略胜一筹，而盟国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对珊瑚海战役结果的这一判断，已经过时间的检验。后半句是确定无疑的。日方的目标是夺取莫尔斯比港，但是他们失败了；对于美方来说，这是太平洋战争开始5个月以来的首次重大逆转。如果井上成美更果敢些，那么日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夺取莫尔斯比港。5月8日的战役过后，盟军除了陆基轰炸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阻挡日军登陆莫尔斯比港，而盟军的陆基轰炸机从未对行驶中的舰船构成过太大威胁。谢尔曼曾认为莫尔斯比港会在48小时之内陷落。[\[6\]](#)

珊瑚海战役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则是极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莫尔斯比港，澳大利亚北部的城市和军事基地将受到严重威胁。麦克阿瑟将军不常表扬海军，但他说这场战役“保障了澳

大利亚的独立”。^[7]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澳大利亚的“特拉法尔加战役”——这场海战的胜利打破了入侵者原本坚不可摧的形象。太平洋战争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澳大利亚人都把这场战役的纪念日当成准国庆节来庆祝。

然而，对于日方来说，珊瑚海战役能算是战术上的成功吗？“翔鹤号”被美军击伤，需要修理；“瑞鹤号”虽然没有受损，但是其舰载机损失惨重。更为关键的是，这两艘航母都没能及时返回，参与中途岛海战，而它们如果在场，完全有可能改变那场战役的结果。“约克城号”虽然受损，但它是唯一一艘既参加了珊瑚海战役，又参加了中途岛战役的航空母舰，而且其航空大队将在第二场战役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妨冒一下掉书袋的风险，引用一下韦伯斯特词典对“战术”的定义：“在军事行动中部署和调动海陆军力的技术，尤其针对近程目标或短期目标（与战略不同）。”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相距不到一个月。把这两场战役结合起来看，盟军在5月8日的珊瑚海战役中，使两艘日本大型航母未能参加6月4日的战役，这不应该视作战术上的胜利吗？

战争是一所严苛而无情的学校，但是美国海军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如果说美方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大败之后有哪件事做对了，那就是美军全体都开始重视吸取教训和改进自身。他们认真分析与敌方的每一次交锋，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每次作战行动后的汇报都包括战术分析和建议，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与经验影响了之后的指挥决策、纪律原则、作战计划和日常训练。美方从珊瑚海战役中获益良多。这场战役暴露了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瞄准器起雾的问题，尼米兹认为这是“三天的战役中最突出的设备问题”。^[8]同时，这场战役也表明防空炮兵需要更好的训练。还有很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应该大大增加航母上的F4F战斗机的数量，这既是为了给空袭的轰炸机护航，也是为了给特混舰队提供战斗空中巡逻。战斗空中巡逻机应该部署在距离航空母舰更远的地方，这样才有时间拦截敌机；这些飞机的高度也应该提升，这样在拦截敌机时可以利用高度获得速度优势。道格拉斯“蹂躏者”鱼雷轰炸

机已经严重过时，必须尽快更换。[\[9\]](#)美军的航空大队必须学会在出击的时候保持队形，让俯冲轰炸和空投鱼雷攻击良好协作。在这一方面，日军做得很出色，这是“列克星敦号”上的官兵实际体验过的。

也许这场战役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美国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打了个平手。日本的飞行员和飞机不再拥有神秘的光环。F4F的飞行员逐渐学会了利用更快的俯冲速度和飞机自身坚固的结构来对付更轻也更易损的零式战斗机。这些由弗拉特利少校改进的战术对于重创日方航空部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军的中队长们在纸上总结战斗经验，分发给队员。弗拉特利这样建议野猫式战斗机飞行员：

获得足够的高度优势再与敌方战斗机接触。俯冲时可加快速度，爬升时就很难跟上敌机的速度了。实施打了就跑的战术，俯冲攻击，然后拉升撤离。如果在接近敌机时对方逃出你的视野，就立刻撤离，让后面的飞机继续追击。你如果转身掉头，就会处于与敌方平行甚至更低的位置，这样一来就很难重新获得高度优势了。如果遇到危险状况，立刻逃跑，大幅移动，钻进云层。要和同伴待在一起。日方的空中纪律执行得非常好，如果单独行动，你会发现对方至少有三架飞机对付你。尽管敌机更为灵活，但是如果操作得当，你的飞机性能更好，可以在自身损失程度最低的情况下将其击毁。[\[10\]](#)

东京的大本营宣称美国的“萨拉托加号”和“约克城号”航母已经被击沉。之所以宣称击沉“约克城号”，是因为飞行员乐观地判断他们发射的3枚鱼雷和8至10枚55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它，这样沉重的打击，应该足以击沉世界上任何一艘航母了。海军少将原忠一在战后报告中推测“约克城号”已经沉没，但是也承认他无法证实这一点。东京方面还宣布日方击沉了美国的一艘战列舰，使一艘英国重型巡洋舰丧失作战能力，重创了英国的一艘厌战级战列舰。[\[11\]](#)这些说法毫无根据——该海域没有其他盟国战舰，也没有巡洋舰被击中。

昭和天皇发布了一份诏书，赞扬日本舰队取得辉煌胜利。连阿道夫·希特勒也送上了称赞。元首（希特勒）预言：“经过最新的这一次失利，美军战舰几乎不敢再面对日本舰队了，因为所有与日军对抗的美国舰船都等于沉没了。”^[12]

然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参谋们却高兴不起来。即便两艘敌方航空母舰已经沉入珊瑚海的报告是真的，日本付出的代价也非常惨重：“祥凤号”是日本在战争中被毁的第一艘主要舰船，损失了这么多的飞机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让他们极为震惊。此外，日方的高级军官都知道，官方公告中有一点没有告知公众——MO行动的主要目标，莫尔斯比港，仍然在盟军的手中。联合舰队的参谋们责备高木和原忠一在追击美国舰队时不够主动，并且指责井上有畏敌思想，提前撤兵。

航空参谋奥宫正武总结了参谋们的观点：“事实就是，珊瑚海区域的我方高级指挥官缺少对敌所需的战斗精神。”^[13]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世之功恍如梦中，消散无踪。战争是双方的事情，很难按照某一方的意愿进行下去。敌方来袭时，我们难道不能更团结地一致对外吗？”^[14]

这场战役印证了日本海军飞行员普遍的共识：原忠一将军率领的第五航空战队的两艘航空母舰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相比，只是“小兄弟”而已。原忠一的战队被视作“B”级战队，其飞行员的经验和技能比日本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加贺号”）以及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飞龙号”）的飞行员差一截。然而，就连“B”级战队都在珊瑚海战役中击沉了两艘美国航母——如果“B”级战队都能给势均力敌的敌方施加如此沉重的打击，那么在中途岛，“A”级战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这种观点一传十，十传百，逐渐被编成了一句俏皮话，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传开了：“如果连嫔妃的儿子[“翔鹤号”和“瑞鹤号”]都能打胜仗，那么正室所生的儿子就更能独霸天下了。”^[15]

指责日方指挥官和第五航空战队的飞行员的言论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些言论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严峻的问题上转移开了。日方低估了对手吗？无论双方牌面上的损失情况如何，南方发生的这场战役都表明美军飞行员不是好惹的；F4F野猫式战斗机如果操作得当，完全可以对抗日方的零式战斗机；而美国的俯冲轰炸机对舰艇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军是在处于日本舰队打击范围内的不利时刻突然出现的。美军并非无能或士气低下。他们显然有意愿，也有能力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但是山本五十六和他的主要部下不愿意这样来解释珊瑚海战役——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意味着中途岛战役的作战计划其实蕴含着更严重的风险，而他们不愿意承认。

5月5日，在珊瑚海主要战斗的两天之前，中途岛战役和阿留申群岛战役的作战命令便已下达至整支日本舰队。永野修身签署了第18号海军战令，指示山本“与陆军联合行动，执行占领中途岛以及阿留申群岛西部重要据点的任务”。^[16]这将是海军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海陆两栖作战。这一作战计划将日军分成五个基本独立的战术集群，在广阔的北太平洋战区执行任务，范围从阿留申群岛寒冷的外岛延伸到南方2 000英里外的中途岛。近200艘日军舰艇、700多架飞机将参与进攻行动。乔恩·帕歇尔和托尼·塔利在以日方视角研究中途岛海战的专著《断剑》中这样写道：“综合来看，日本海军在阿留申群岛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几乎调遣了所有兵力。日方派出了所有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没有参战的只有4艘重型巡洋舰及其为数不多的作战人员。有28名将军率领部队作战，部队在这次行动中跨越的海域以及消耗燃料的总量比平时一整年还多。”^[17]

日军作战计划中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精心安排的进攻，进攻时间要准确无误，还要严格保持无线电静默。6月3日，北方的一支日军会对位于乌纳拉斯卡岛荷兰港的美军基地——这是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主要基地——进行突袭，随后攻击并占领阿留申群岛的三个外岛。6月4日清晨，日本航空母舰会在中途岛西北部发动空袭，目的是摧毁停留在地面上的飞机，为入侵部队清理海滩，登陆部队预计于6月5日晚在环礁上登

陆。一旦占领环礁，日军的两个工兵营就将登陆，升级并扩充岛上的航空设施。任何从珍珠港出击拦截的美军都将被击溃。

中途岛战役并不是周密计划的产物。日方为了平息内部异议，平衡联合舰队和军令部的需求，经过很多妥协，才制订出这个作战计划。因此毫不奇怪，这个妥协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还存在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它暴露了日方的傲慢和轻敌，最终导致了致命的失误。日军的作战计划使其军力在广阔的北太平洋地区过于分散，并且过于依赖对美方如何应对的不可靠的猜测。作战计划对日军人数有限的精英飞行员的要求也过高了，这些飞行员自12月7日战争开始以来几乎都在连轴转，根本没有休整的时间。虽然日方不愿意承认，但是日本航母上有经验的飞行人员已经疲惫不堪、近乎透支了，而新手又缺乏训练和经验，无法与老兵的技术相比。南云忠一将军在战后报告中指出：“必须大幅调整人员安排。……欠缺经验的飞行员甚至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白天着舰。我们甚至发现，有些老练飞行员的技术也大不如前。”^[18]

阿留申群岛战役是在军令部的坚持下进行的，与中途岛战役并没有明确的战略关系。在阿留申群岛参与行动的舰队，距离中途岛十分遥远，不可能及时赶到这里给主力提供支援。日军可以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占领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但是占领这里毫无意义。这些岛屿对日方和美方都没有太大价值。因为附近没有军事基地增援，所以占领者面对敌军的反攻时往往软弱无力。

日本之所以要发动中途岛战役，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要将日本的战列舰投入战斗，这些舰艇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静静地停驻在广岛湾的柱岛锚地。“柱岛舰队”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在日军的航母特混舰队中逐渐传开。^[19]此外，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按兵不动的战舰上的舰员越来越焦躁不安。宇垣缠将军表示：“在本国水域长期停留后，军队主力的士气已经大不如前。我鼓励了他们，不过我们必须探索新的训练方法，还要让他们参加实战。”^[20]

既然日方的舰队如此强大，在航空母舰和水面舰艇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为什么山本将军不集中兵力来击败美军呢？为什么不利用数量优势来对抗和战胜敌方呢？糟糕的阿留申群岛行动是为保全军令部的面子而做出的让步，除了这个行动，中途岛的作战计划似乎试图平衡马汉的集中优势兵力原则与隐藏日军真正进攻规模的需求。山本五十六进攻中途岛的主要目的是引诱美方的航空母舰加入战斗。如果尼米兹能发现日方所有军队都在中途岛附近，他便会让舰队在珍珠港待命，即便这样做意味着将中途岛拱手相让。山本打算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在以中途岛为基地的侦察范围之外，这样一来尼米兹便会失去戒心，派太平洋舰队出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方分散的兵力能否及时赶到战场发挥作用呢？

帕歇尔和塔利在书中写道，日方一直没有找到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方案。“如果假设美军会从珍珠港被引诱出来，那么就没有办法制订一个既让战舰的位置能够迷惑对手，同时又能让战舰相互协助的计划。这两个目的是自相矛盾的。山本将军知道不能两全其美，他愿意牺牲相互支持，来达到秘密行动的目的。”^[21]

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建立在一个含有隐患的大意假设之上，即日军注定会不断取得胜利。后来日本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称之为“胜利病”。^[22]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山本和整支舰队的高级军官聚集在“大和号”上，一连召开了几天的作战计划会议。山本的日本传记作家这样写道：“整艘船将星闪耀，到了就餐时间，高级军官云集；资历最低的中将被请出司令舱，在普通的餐厅里将就用餐，而少将只能去尉官的食堂，区区大佐就不得不站在甲板上用餐了。”^[23] 战舰前部的餐厅里也摆满了会议桌和折叠椅，以举行更大规模的会议。将军们在“大和号”宽敞的议事厅和餐厅中进行了兵棋推演，北太平洋的地图上摆满了舰艇模型，双方的机会和运气以骰子来代表。这些推演本来是要检验作战计划，发现不足之处，但大家很快就发现，山本及其主要的参谋对检查计

划没有兴趣，更不用说批评意见了。简单来说，这些推演的目的在于证明山本的计划是可行的。他是个赌徒，喜欢冒险。

在会议第二天的一次兵棋推演中，“红队”（代表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突然出现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左翼，发动了令日方损失巨大的突袭。裁判行使了神一般的权力，裁定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并宣布结果无效。裁判自负地断言，如果推演发生了这种结果，那么推演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因为直到南云忠一将军对中途岛发动第一轮空袭，美国航母才会加入战斗。

在另一次推演中，中途岛的美军陆基轰炸机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发动了反击。骰子让美国飞机9次击中日本航母舰队，击沉了“赤城号”和“加贺号”。山本专横的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在这次推演中担任监督者和裁判长。他说：“稍等一下，我们把击中的次数减到3次。”^[24]之后，他又武断地判定这次推演只击沉了“加贺号”，而“赤城号”只是轻度受损。在推演下一阶段进攻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战役时，宇垣缠还设法“复活”了“加贺号”，让其参加推演。^[25]为偏向日方而更改规则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举出的只是最令人吃惊的几例而已。“如此裁判，”渊田美津雄说，“连我们当中最麻木的航空队军官都极为反感。”^[26]

山本亲自提出了一个问题，直指要害——如果美国航空母舰突然出现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攻击范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源田实少佐立刻应道：“铠袖一触！”这是一个成语，意思是“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打败敌人！”^[27]山本对兵棋推演结果做出的妥协，是要求南云忠一在中途岛战役开始之后在航母上保留一支后备打击力量，以防美国航母突然出现。

这次兵棋推演暴露了作战计划的弱点，以及日本舰队面临的威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这场推演从一开始就没有被认真对待，最终顶多起到一点象征性作用。这些推演只是做做样子，对于推演暴露出来的弱点，他们置之不理。虽然舰队中有军官私下里批评这种做法，但几

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渊田美津雄参与了作战计划会议，他说大家普遍过度自信。他和其他航空母舰飞行员都“对自己的攻击力很有信心，我们认为即使战列舰不帮忙，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能击垮敌方舰队”。[\[28\]](#)

对于这个作战计划，最有力的反对者是第二舰队司令近藤信竹中将。他在5月1日私下与山本会面，并提出了反对意见。近藤信竹劝山本推迟进攻中途岛，加强向东进攻的力量，通过所罗门群岛攻占新喀里多尼亚。在那边，舰队可以依靠南方的岸基空中支援，而进攻中途岛则得不到任何岸基空中支援。即使日本成功占领中途岛，为了补给该岛，日方也将面临严峻的后勤和军事问题。近藤信竹后来写道，他认为占领中途岛是死路一条，因为“补给线太长，日本不易在该地维持强大的空中力量”。[\[29\]](#)

山本寸步不让。近藤信竹提议推迟一个月进攻中途岛，以便进一步研究和准备，然而山本并没有理会。6月初的天气情况很有利于作战。（据推测）只有那时才会在黎明之后不久涨潮，使日军得以利用这个时机，让运送部队的两栖舰船穿过中途岛周围的岸礁。到7月份，阿留申群岛将被大雾笼罩。此外，要想推迟中途岛的行动，实际上为时已晚——日本海军的几乎全部资源都已经调动了起来。

六个月前，山本不顾军中审慎的异议，强令突袭珍珠港，最终在战术上大获全胜。他预测日方的空中力量面对盟军海军的水面力量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后来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从来没有失败过，总能凯旋，他头上有着不败的光环。他是全国上下的名人，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仰和信任。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以击退反对者。他会毫不犹豫地再次这样做的。

在日记里宇垣缠这样写道：“在战争总结会、兵棋推演和战况报告会等一周不间断的会议之后，难免感觉有点累。”另一方面，春天已经到来，天气晴朗，濑户内海岸边鲜花盛开。5月5日是日本的“鲤鱼节”，虽然宇垣看不到岸上的鲤鱼旗，但看到舰队锚地旁岛屿的陡坡上翠绿的

叶子时，他还是欣喜万分。那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两行诗：

翠屿晴苍终在望，
飘摇环峙碧海间。[\[30\]](#)

美方海军无线电监听站设在瓦胡岛中部的偏远多山地区，隐藏在甘蔗地和郁郁葱葱的树丛之中，可以截获日方的编码信息。当时监听站和珍珠港的海军造船厂之间没有安全稳定的通信联系，所以截获的原始密码信息要用打字机打下来，由信使开吉普车下山交给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室，即罗奇福特的密码破译单位的所在地。

MO行动和珊瑚海战役像日军其他大规模海战一样，让美方获取了大量无线电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和已知的作战地点、事件和作战单位联系起来。换句话说，这些都是密码破译员的富矿。1942年5月，盟军能够截获大约60%的日本海军无线电通信，试图破解大约40%的截获信息，其中能够成功破译的代码组为10%至15%。

但是，除了极少数情况，他们根本无法解读完整的信息，只能读懂其中几个短语，剩下的看起来完全像是胡言乱语。罗奇福特每天都要花18个小时埋头研究这些信息，它们都是零碎的片段，片段之间都是空白。“我的工作是在填空，”他如此说，而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要依靠自己超群的记忆力，“我可以回想起三四个月前哪条命令发出过类似的信息。”[\[31\]](#)之前破解的短语有助于猜测空白处的信息，尤其是当相同的短语反复出现在同样的空白旁边时。在IBM计算机的帮助下，合理的猜测可以跟所有出现过某个代码组的信息进行比对验证。这样一来，破解JN-25（当时的日本海军使用的主要密码）的进程就有了几何级数的进展——随着破译人员发现越来越多代码组的含义，剩余的空白信息也就更好推测了。

在珊瑚海战役之前，罗奇福特就开始怀疑日本人计划在太平洋中心

开展另一场大规模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可能是中途岛，甚至是夏威夷。5月初，盟军的监听站发现，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的无线电通信量大幅增加，但南太平洋的日本主要海军基地特鲁克群岛的通信量并没有相应上涨，说明这是一次针对赤道以北地区的进攻，而不是向南展开的新攻势。日方要求向塞班岛运送大量加油软管，这似乎表明舰队作战的地点离日军基地较远。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侦察机出动的频次和距离都增加了。其起落航线预示着这场“即将到来的行动”规模很大，日本第一、第二和第五舰队都有可能加入进来。显而易见，太平洋中部地区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5月12日，罗奇福特给莱顿打了电话。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的。你最好亲自过来看看，就会明白了。虽然还没发生，但已经迫在眉睫！‘蓝眼睛男人’会问你有什么看法的。”^[32]有一条信息提到了日方“占领军”的代码组，还有个片段暂时确定为“即将打响的战役”，与地理标志“AF”有关。第二天，5月13日，美方截获两条重要信息，并破译了一部分内容。在其中一条信息里，一艘日本舰艇要求获得夏威夷群岛地区的海图。在另一条信息中，一艘供应船的预定航行方向表明“AF”是第三航空队未来的基地，这条信息还讨论了如何运送基地设备、弹药、备件和地勤人员等后勤问题。

早在3月份，罗奇福特就推测“AF”指代的是中途岛。以A字母开头的地理标志都被证实是太平洋中部的岛屿，可能属于夏威夷群岛，也可能是其他美属岛屿。然而，罗奇福特相信日方既没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也没有相应的航运能力来入侵瓦胡岛或夏威夷群岛的其他主要岛屿。该地区还有哪些可能的备选目标？中途岛是唯一一个足够大的环礁，可以允许航空队驻扎；而像巴尔米拉或约翰斯顿岛这样的岛屿，面积太小，不值得投入太多成本去占领。因此，经过简单的排除法，就只剩中途岛了。到了5月12日，罗奇福特心里已经毫无怀疑，认定中途岛是待定攻击的目标。莱顿赞成他的观点：“我们知道AH指的是瓦胡岛，AK指的是法兰西护卫舰暗沙。现在对方准备好了航空作战

单位的基地补给物资，将其与入侵军力一起运送到‘AF’，那么它就只能是处于珍珠港打击范围内的我们的某个岛上基地。显然，中途岛是日军的目标，因为相比于备选的约翰斯顿岛，它距离有日军驻守的威克岛要近150英里。”[\[33\]](#)

这一推测合情合理，结论也是正确的，但是除非尼米兹上将能被说服，否则这些都不算数。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AF”指的就是中途岛。这只是个假设罢了，依据的是许多零散的线索拼成的一张像马赛克一样的照片。但是，由于莱顿和罗奇福特曾正确地预测日军针对莫尔斯比港的行动，所以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全面关注。在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之间的这一个月里，尼米兹必须做出其四十年海军生涯中风险最大的决定，而他愿意根据情报官的最佳推测来赌上一切。

但是，尼米兹并不是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尼米兹身后，在华盛顿，还有一位盛气凌人的海军上将，他就是欧内斯特·金，他不想再损失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他想亲自决定航空母舰的部署地点和部署方式。在珊瑚海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担心敌方会抢先攻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其他处于美国—澳大利亚航线上的岛屿。华盛顿的海军通信情报科的情报分析人员强化了金原有的看法，认为日方将把主要的攻击力量投入南太平洋地区。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破解的一系列情报，这些情报提到日军舰队会在特鲁克群岛会合，所以他们认为日本海军舰队正在向南移动。罗奇福特同意日本舰队有可能在特鲁克群岛会合，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只有在成功占领中途岛后才会采取这一行动。后来，罗奇福特说：“整个这件事情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人不接受我的推理过程。华盛顿不同意我们的解释，这让我们这些夏威夷情报站的人相当恼火，因为他们有同样的情报，如果不是脑袋出了问题，应该得出同样的推论。”[\[34\]](#)

有些人甚至怀疑情报的真实性，他们认为日方无线电通信故意指向中途岛，这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罗什福特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5月13日截获的消息，第三航空队在其中说自己未来的基地就是“AF”。

对于那些反对者来说，这样的情况太完美，不可能是真的。就连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都评论道：“一支日军部队把中途岛当作邮寄地址一样说出来，这似乎有点夸张了。”^[35]陆军指挥官担心瓦胡岛的安全问题，害怕尼米兹的部署会削弱该岛的防空力量。在接到请求后，陆军航空队指挥官迪洛斯·C. 埃蒙斯（Delos C.Emmons）将军不同意派遣B-17轰炸机增援中途岛。他警告尼米兹说：“我们截获的日方无线电信息可能是蒙骗我们的障眼法。我们需要估计的应该是对方的能力，而不是对方可能有哪种目的。〔敌军〕如果目的是破坏珍珠港和火奴鲁鲁的设施，就有足够的军力对瓦胡岛进行破坏性袭击。”^[36]

这些相互抵触的观点使得华盛顿与夏威夷情报站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甚至掺入了私人恩怨。在部队之间的安全无线电传输中，侮辱性言语也夹杂在“电文的填凑部分”中，这是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性而添加的随机成分。莱顿怀疑，雷德曼的阵营中甚至有人破坏内部消息记录，如果仔细审查这些记录，海军通信情报科的错误就会曝光。哈姆·赖特少校是海波站的高级密码破解员，他回忆说：“整个事件混乱不堪。我们一直都在和海军通信情报科争斗，我们根本没法合作。”^[37]夏威夷的人指责华盛顿的人喜欢捕风捉影——他们做了很多无用功，破译的都是零散的片段，而且在预测信息时，总是忽视基本的常识。海波站的团队经历过珍珠港袭击之后的混乱局面，当时他们要面对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耸人听闻的谣言，从中认识到了辨别真假情报的重要性。他们相信华盛顿的同行没有吸取同样的教训。正如贾斯珀·霍姆斯所说的：“没经历过战争的人，意识不到在战争迷雾中追寻真相的影子有多难。”^[38]

罗奇福特和他的部下确信“AF”是中途岛，而且确信日军的攻击将发生在6月的第一周。他们让尼米兹相信了他们的推理。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推翻华盛顿固执的相反观点。对于这一点，罗奇福特及时地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使用了一个诡计。他让中途岛的指挥官给珍珠港发送一则明文电报，报告中途岛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出现故障，因此整个岛上急缺淡水。对方照做了。威克岛上的一个日军监听站截获了这条电

报，并立即将其转送至东京大本营，后者提醒了联合舰队，说“AF”淡水短缺。后面的这条电报被海波站以及墨尔本的密码专家截获并破译了。

这个计谋大获成功，确定无疑地证明了“AF”确实是指中途岛。但不可思议的是，海军通信情报科依旧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日方或许试图用无线电信息误导盟军。退一步说，就算日军是在计划攻击中途岛，那也要等到6月的下半月，等他们在南太平洋的另一场大规模进攻结束之后，才会开始这一行动。

尼米兹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哈尔西率领的第16特混舰队是围绕“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组建的，该特混舰队被派到了赤道以南，为参加珊瑚海战役的姊妹舰“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提供增援。这支舰队已经到达了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埃法特岛以东水域。如果罗奇福特和莱顿的判断无误，日军计划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对中途岛展开大规模进攻，那么尼米兹就需要马上从南太平洋召回哈尔西。但是金将军看着他的一言一行。金还没有完全相信日军将要进攻中途岛的说法，所以尼米兹无法自由地命令这两艘航母回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怎么能直接无视独断的美国舰队总司令的看法呢？

5月16日，尼米兹下达了作战命令。他给哈尔西发去无线电消息：“你部应向夏威夷海域前进。”^[39] 同一天，他给金发电报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理由。日军将对“中途岛—瓦胡岛一线展开进攻，而且可能会尝试在中途岛登陆，据推测日方会在此次行动中投入主力部队”。^[40] 此外，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还在日记里指出：“除非敌方实施大规模无线电欺骗，否则我们很好地掌握了他们的意图。”^[41]

尼米兹的命令促使金将军立刻召集参谋来到他的办公室，全面分析最新的情报。当天快结束时，他终于得出结论：尼米兹是对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一份“紧急 / 绝密”的电报中说：“我稍微修正了我的看法，现在基本同意你的观点。”占领中途岛是日方新的进攻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海军将试图“引诱并消灭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金同意美国的

航空母舰应该时刻准备参加战役，但是补充说，尼米兹必须“在不会遭遇重大损失的前提下让我们的部队参加这种决定性战役”。[\[42\]](#)

但是，即使到了现在，一些关键性信息仍然缺乏。攻击何时发生？哪些舰队会参加？整个进攻的顺序如何？5月18日，尼米兹把压力转移给了莱顿和罗奇福特，让他们给这些问题提供答案。通信情报此刻对于美军来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那一刻，整个舰队的命运都寄托在一系列截获的信息和复杂的推断上。

5月20日，海波站截获了一则长电文——其长度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密码破译专家全力以赴，开始破译这条电文。IBM计算机剥掉了附加的成分，将80%多的内容转成了明文。这则电文的内容是中途岛行动的完整作战命令，包括参战部队的详细信息。但是，电文中高度加密的多字母时间密码仍然无法破解，所以夏威夷这边的密码破译员还不能证明日军会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发动进攻。罗奇福特和莱顿一点一点地排查，对日期的判断越来越接近。零星的破解内容提到了5月27日是从塞班岛起航的日子，而6月6日，一支驱逐舰分队会抵达，为运送进攻部队的舰艇护航。莱顿回忆说，他当时采用的办法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尝试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看眼前的问题。基于起航日期，以及6月6日入侵部队的运输舰抵达等破解的消息，我倒着推算，大致推测出了一个可能的计划，足以相对准确地预测出中途岛的侦察机大约在何时何地能发现载有入侵部队的运输舰”。[\[43\]](#)

5月27日早上，罗奇福特和莱顿在舰队司令部的会议室中和尼米兹及其他几位高级参谋人员一起会面。即将被任命为第16特混舰队司令的海军少将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与当地陆军指挥官埃蒙斯将军以及罗伯特·C. 理查森中将一起出席了会议，理查森是作为马歇尔将军的私人密使被派来夏威夷的。罗奇福特迟到了半个小时，因为他直到最后还在整理需要通报的信息。（他也许是太平洋战区唯一可以迟到而不受处罚的海军军官。）莱顿回忆说，那天罗奇福特“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会议上，因缺乏睡眠而目光呆滞”，他为迟到道歉，尼米兹“冷冷地瞪了他一

眼”。[\[44\]](#)

罗奇福特预计，日军会在6月3日凌晨对荷兰港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对中途岛发动另一场空袭。这一预测简直是太具体了，尼米兹的几名参谋觉得难以置信。美军真的已经能看到日军的作战计划了？有些人仍然怀疑这是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当然这可能是日方的‘障眼法’，大规模地使用无线电信息欺骗我们。”[\[45\]](#)另外一些人则提出疑问，说为什么日方在明知占领中途岛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还要集中全部舰队力量攻打那片环礁。（他们的反对意见与近藤将军和日本军令部向山本提出的反对意见基本相同。）有这么多人不赞成他的推测，让罗奇福特非常惊讶。在他看来，在这件事情上，他的预测即使不是完全严丝合缝，至少也是没有多少理由怀疑了。他后来说：“我在超过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逐渐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当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还会有人有这么多的疑虑。”[\[46\]](#)

尼米兹指出了罗奇福特推理中的缺陷，罗奇福特也坦承，有一些情况他还不了解，这些不了解的地方是通过推理填充起来的。罗奇福特说：“对于类似目前的情况，我所能做的就是解释我的立场，并希望将军接受我的观点。”最终决策这一“可怕”的重担，是压在尼米兹一个人肩上的：“讨论到此为止，没有人能把压力从他肩上拿走，也没有人能帮助他。”[\[47\]](#)

尼米兹又要求莱顿准确地预测一下即将到来的战役会如何展开。莱顿回答说：“我很难做出具体的预测。”

尼米兹盯着他不放。他说：“我希望你能说得具体些。毕竟，这是我给你的工作——假设自己是日军舰队司令，从这一角度告诉我你会有怎样的计划。”[\[48\]](#)

“那好吧，将军，”莱顿回答道，“我之前给过您一份情报，那份情报表明日军航母可能会在6月4日上午对中途岛发动攻击，所以我们就将

6月4日视为开战日。日军将从西北325度的方位进军中途岛，在距离中途岛约175英里处，我们的侦察机可以发现他们，那时中途岛当地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钟左右。”[\[49\]](#)

那天下午，尼米兹发布了“29—42号作战计划”，计划中指出日军将“在近期试图攻占中途岛”。“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组成的第16特混舰队将行进到中途岛东北方向约350英里处，该地点的代号为“好运”。他们将与弗莱彻将军的第17特混舰队会合，后者由修复好的“约克城号”以及8艘警戒舰组成。[\[50\]](#)美方的3艘航母会在这一区域待命，等空中侦察发现日军航母后，便对南云忠一的侧翼发动突袭。这两个舰队的司令要“通过消耗战术对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但是“如为达此目的有可能对我方航母和巡洋舰造成重大损失，则不应采取此类行动”。

莱顿写道，尼米兹已经“跨越了卢比孔河”。[\[51\]](#)整场战争的走向都取决于这场战役。当天晚上，莱顿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海波站的员工知道整场战争的胜败都押在了他们的预测之上。中途岛海战之前的一个星期，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判断对了吗？罗奇福特告诉手下不必担心。战役即将打响——日本舰队估计已经起航，尼米兹也已经部署好兵力。日军即便没有在6月3日或4日发动袭击，也必将在6月中旬出击。罗奇福特对莱顿说：“如果我们针对6月3日的攻击做好了准备，而袭击并没有来，我们可能会显得挺傻的，但是我们还有时间给船加油并重新回到待命地点。但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而日军发动了袭击，那么珍珠港那样的情况就会重演——海军也将难辞其咎。”[\[52\]](#)

海波站还能在自己的记录中再加一项胜利的冠冕。日方在通信中使用了高度加密的时间和日期代码，山本五十六5月20日发送给舰队的长篇作战计划中的日期就是这样加密的。罗奇福特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破解新的信息，没有时间来关注这个问题。5月26日晚上，哈姆·赖特刚刚值完12小时的班，正要离开，约瑟夫·芬尼根上尉突然跟他说：“哈姆，我

们破解不了日期和时间。”赖特回到办公桌前，收拾了一下桌子，集中精力对付这个问题。他把每条含有这种密码的截获信息收集整理了一遍，开始研究各种可能性，把旧的密码和已知的日期联系起来，因为旧的密码所提到的作战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一条一条地分析，谨慎地做出假设，反复验证，然后抛弃不成功的假设。深夜时，赖特和芬尼根把托马斯·戴尔和罗奇福特本人这种经验丰富的密码破译员都号召起来投入这项工作。

到5月27日的上午10点左右，他们终于找到了破译的办法。他们发现，时间和日期的密码是一套简单的替代密码，使用的是12行（月）31列（天）的日语假名表。破解结果证实日军将于6月3日进攻阿留申群岛，一天后进攻中途岛。这和海波站的预测完全一致，也跟尼米兹向舰队发布的命令中的日期一致。

成功之后，贾斯珀·霍姆斯上楼去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在行政大楼的阳台上，他碰到了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当时是“约克城号”上的一名军官。他们聊天时，戴尔走出地下室，准备回家，胳膊下夹着破旧的午餐盒。他已经连轴转好几天了。霍姆斯写道：

他身上的制服看上去像是三天以来他都是和衣而睡的。事实的确如此。他没刮胡子，头发看起来好像一个月没有理了。的确如此。他因睡眠不足，眼睛里布满血丝，脚步沉重，可以看出他差不多耗尽了精力。船上的人总是瞧不起在陆地上工作的人，我的这位航母上的朋友便说：“瞧这位老兄，真该派他出海，让他知道什么叫作累。”一瞬间，我浑身的血往头上涌，差点就说出实情。戴尔属于一小拨堪称顶梁柱的军官，正是他们的天赋和多年以来的奉献精神使我们终于能有机会赢得一场战役。他要是把时间浪费在个人仪表上，那么这场战争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也会造成更多的牺牲。好在我及时控制住了情绪，咕哝了一句：“哦，他挺好的。”心里觉得就像彼得背叛了耶稣一样。如果我说出秘密，表示我们的价值超过了任何荣誉和奖赏，戴尔肯定会第一个责备我。[53]

哈尔西率领的第16特混舰队到达南方海域时太晚了，没能参加珊瑚海战役。两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无线电操作员通过收听弗莱彻的战舰和飞行员之间的通信，了解了战役的进展。“列克星敦号”的沉没让他们非常震惊。它是第一艘在海战中被击沉的美国航母。阿尔文·柯南写道，“企业号”上许多经验丰富的水手都在“列克星敦号”上待过，“列克星敦号”的沉没尤其让他们感到悲痛，“就像自己的损失一样”。^[54]

官兵们都誓言复仇，最初他们也确实有希望追上从珊瑚海撤退的日军舰队。5月11日将一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送到埃法特岛后，第16特混舰队便腾出手来，可以与日军交战。据推测，日军计划对所罗门群岛以东的一些岛屿发动新一轮攻击。航空母舰沿着170°经线向北巡航，并向西展开了长距离的搜索，希望能找到正在撤退的日本舰队。

在尼米兹5月16日发出的召回令中，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附文。在一份发给哈尔西本人的绝密消息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指示这支特混舰队在向北返回珍珠港之前，故意引起日军巡逻机的注意。这条计策的目的是让日方相信，通往中途岛的道路上没有美军舰船，同时吓阻日军近期在南太平洋区域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哈尔西于是指挥特混舰队向西航行，清楚地知道朝这一方向航行会将自己的舰艇暴露在川西水上飞机无处不在的侦察之下。驻扎在图拉吉岛的日军远程巡逻队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以东几百英里处的美军特混舰队，因此井上将军决定在7月之前不再对莫尔斯比港发动任何攻击。在这之后，哈尔西指挥舰队向北转向，加速朝瓦胡岛行进。

只有哈尔西和其他几名高级军官知道事情的内幕。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对这些令人费解的机动感到困惑和气愤。“盐湖城号”上的罗伯特·凯西觉得这很奇怪，因为舰队如果朝东行驶的话，很容易隐匿自己的踪迹，他说：“其中肯定有蹊跷。”^[55]特混舰队以20节的速度向北高速行进，显然是要匆忙返回珍珠港，这让士兵们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么做等于撤军。“我们似乎像懦夫似的，”柯南回忆说，“.....许多人都窃窃私

语，议论这件事儿。”[\[56\]](#)

5月26日，在热带烈日的炙烤下，第16特混舰队的21艘舰艇缓慢地驶入珍珠港。尽管“约克城号”和它的护航舰还没有到达，但是东湖早已停满了战舰，在它们之间穿行十分困难。“企业号”安全地进入泊位几分钟后，哈尔西及其副官坐上小船，前往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57\]](#)

尼米兹和哈尔西见面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吓了一跳。这位特混舰队的指挥官看起来状态不佳。他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他近来瘦了20磅，皮肤上起满了红色和白色的鳞状斑块，后来被诊断为“普通皮炎”，这肯定是跟压力过大有关系。在海上的最后几天，为了减缓皮炎的发展，他只穿着内衣站在舰桥上，让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和空气中，但是毫无效果。[\[58\]](#)皮炎带来的痛苦使得他越来越难以入睡，而一位无法入睡的将军不适合率领美国海军所剩无几的航母投入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哈尔西担任指挥官的时间太长了，而且中间没有休息过，尼米兹命令他立即住进海军医院。他无法参加中途岛战役，必须躺在病床上，身体涂满药膏。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59\]](#)

尼米兹在向美国舰队总司令报告时没有把哈尔西的情况说得那么严重。“他精神头儿十足，积极求战，”5月29日，他在报告中告诉金，“但他确实需要休息一小段时间。他没有大病，也不在病员名单里。”[\[60\]](#)

5月28日，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将军得到通知，他将继续担任第17特混舰队的司令。由于哈尔西生病卧床，弗莱彻成了舰队中军衔最高之人。但是还需要另外一名将军接管哈尔西的工作，指挥第16特混舰队。哈尔西推荐了斯普鲁恩斯少将，他是特混舰队中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尼米兹跟哈尔西一样，对斯普鲁恩斯评价颇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斯普鲁恩斯是一个“黑鞋”将军，但他一直是哈尔西眼中的一流干将，而且他对航空母舰的作战方式非常熟悉。实际上，尼米兹已经选定斯普鲁恩斯作为他的下一任参谋长，而且计划在这场战役之后立即提拔他到这个位置上来。

斯普鲁恩斯与哈尔西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斯普鲁恩斯审慎且温和，总是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从不好大喜功。他通过树立榜样以及自信和出色的工作能力领导别人。他从不让任何个人情绪影响自己的决策。他总是回避记者，实在回避不了时，他就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哈尔西是个直率、傲慢的人，但是当他面对媒体或者属下时，他总是愿意听些恭维之词。不过，斯普鲁恩斯与哈尔西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他们一起在太平洋驱逐舰部队服役。他们的妻子范妮和玛格丽特在此期间也成了好朋友，当时他们都把家安在圣迭戈。他们的儿子比利和爱德华年龄相仿，从小就是密友。

斯普鲁恩斯出生在巴尔的摩一个富有的家庭，小时候住在一所豪宅里面。但是，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家道没落，他被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两个女性长辈住在一起。由于家人无法承担他的大学学费，他就申请了海军学院。他根本不喜欢海军学院，因为那里思想保守且顽固，敷衍了事的教官总是强调机械地记忆技术细节，而粗暴的恶作剧被认为是培养性格的训练。他毕业于1906年，在209人中排第26名。《海军学院年鉴》中说他是一个“害羞且冷静的人，认真热情又带有少女般的天真。……他不会伤害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除非是出于职责”。

年轻时的斯普鲁恩斯略显羞涩，身材瘦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很魁梧。他是个内向的人，很少微笑，但他并不（像欧内斯特·金那样）冷漠傲慢。他每天都步行很长的距离来保持健康，步伐很快。即便是出海的时候他也坚持健走，围着甲板一圈一圈地走。大家都说斯普鲁恩斯“充满智慧”，这个词形容他十分合适，因为他熟读海军的兵法，是个知识渊博的海军军官。他思路清晰，无论是讲话还是写作都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他广采众意，无论被分配到何种任务，都能迅速抓住要点。一名海军医生在初次见到斯普鲁恩斯时，“向这位中等身材的瘦削军官敬礼……他面色黝黑，表情平静，略显冷酷。他的蓝眼睛特别犀利，似乎能读透别人内心的想法”。那个医生还补充说：“他方方面面都像斯巴达人。”[\[61\]](#)

像许多名垂青史的海上勇士一样，斯普鲁恩斯也晕船。但他从来没有把这种不适当成一种困扰。舰艇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行驶时，站在舰桥上的他可能会突然走到栏杆旁呕吐，之后重新回来干自己的工作，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从来都不会像其他指挥官一样被疾病或者精力消耗过度（这一点刚刚让哈尔西住进了医院）打垮。像每个达到他这种地位的军官一样，斯普鲁恩斯在海上和陆上都工作过，但他更喜欢海上。他后来接受了尼米兹给他的差使，回到陆上工作，做尼米兹的参谋长。对这份工作，他既不充满热情，也没有任何抱怨。

在太平洋战争后来的过程中，斯普鲁恩斯和哈尔西的职业生涯交织得很紧密。1944年和1945年，这两位将军会轮番指挥太平洋最高级别的舰队，成为第三舰队的指挥官（斯普鲁恩斯任职时，该舰队为第五舰队）。哈尔西后来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获得了“五星上将”称号；斯普鲁恩斯也配得上同样的荣誉，却并未获得。但是舰队的军官和士兵都认为斯普鲁恩斯更可靠，领导力更强，研究太平洋战争的史学家也认同这一点。

不过，在1942年5月的时候，斯普鲁恩斯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将领。“企业号”的舰员失去了敬爱的哈尔西将军，他们不仅感到难过，还很担心。这位瘦削的巡洋舰指挥官既未驾驶过战斗机也未指挥过航母，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很自然地，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拉伦斯·迪金森这样记录道：“舰员们把大家收集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拼凑在一起，试图更好地认识这位领子上有两颗星的将军。他有没有像哈尔西将军一样做好带领我们作战的准备？”每天人们都看到斯普鲁恩斯在甲板上步行几小时锻炼身体。他一边走，还一边招呼其他人跟着他走。斯普鲁恩斯走起来“能把舰上所有人的腿都累断”，他边走路边跟大家聊天，了解情况。迪金森写道：“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司令爱问问题，并且虚心聆听大家的意见。”[\[62\]](#)

“约克城号”奉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珍珠港，于5月27日下午驶进了

珍珠港的航道。它能长时间保持20节的速度，在起降飞机时速度可以增加至30节。它的升降机一切正常，起降飞机没有任何障碍。飞行甲板上的洞已经完全修补好了，从空中往下看，谁都不会想到它的飞行甲板被日军炸弹击中过。尾流中长长的油迹是唯一显示它受过伤的痕迹，这是日军俯冲轰炸机投放的近失弹爆炸导致油箱破裂造成的。当它驶入拥挤的港口时，整个舰队都用口哨声和汽笛声欢迎它回家。

根据命令，“约克城号”直接驶入一号干船坞。随着巨大的坞门渐渐关闭，水泵开始抽水，把水排到港口里。这艘航母固定在混凝土块上，水位线渐渐下降，船体上因铆钉被炸掉而形成的裂口露了出来。尼米兹穿上一双高筒防水靴，来到干船坞的最下面，很多随行人员跟在他身后。他们在齐膝深的水里艰难走过去，航母粘着油污的巨大船体展现在面前。他仔细检查了船体的损伤，听取了工程师的汇报。

在有关中途岛海战的众多传奇故事中，有一则传闻说工程师请尼米兹给三个月的时间修复“约克城号”，尼米兹大手一挥，说他们必须在三天内完成这项工作。事实和传闻有些许出入，没那么有戏剧性。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所有人就全力以赴，达到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要求这些人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不是尼米兹的风格。他只需表明哪些事情需要优先对待就足够了。其实，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通知维修小组“我们必须要在三天内让这艘船重返战场”的时候，他已经事先听取了意见，知道能够把它派出去。维修负责人和一小队工程师在“约克城号”抵达的前一天，就已经乘飞机到了这艘航母上，进行了评估。维修“约克城号”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菲奇将军也是这么预测的）。它甚至不需要返回美国本土维修。在珍珠港，只需一个月就可以让它焕然一新——而在紧急情况下，三天之内是能维修好它，并让它投入战斗的。工程师们之所以能按时完成维修任务，并不是因为他们速度快，而是他们省去了部分步骤。他们不需要挨个修补每道裂缝，只需将一整块钢板焊接到它破损的船体上就行。对于弯曲变形的内部舱壁，维修人员用结实的木梁进行加固。这只是临时打一些补丁，不是对航母进行大修，但是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约克城号”还是可以出战的。

船厂安排了1 400人进行维修。这些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夜间工作时也不顾灯火管制了，使用探照灯照明。有些人会连续48小时不眠不休。有好几百名舰员也被派来参加维修，没有休假。在维修的同时，航母的补给工作也在进行，“约克城号”上除了还有少量蛋白粉、奶粉和意大利面之外，其他食物都消耗掉了。奥蒂斯·凯特回忆说，这三天时间里“约克城号”进行了“极大规模的补给工作”。^[63] 5月29日清晨，一号干船坞开始注水，打完补丁的航母浮在了水面上。上午11时，坞门打开，“约克城号”被拖到泊位上，不再漏油了。

在短暂停泊期间，“企业号”的船员没有得到上岸的自由。所有人都为航母搬运补给。食物和其他供应品通过驳船运上“约克城号”。弹药被吊到航母上，并安全地存放在弹药库中。输油管灌满了油箱。人们分组从木箱里取出机枪子弹，将其装入子弹带。夜间工作也不停，探照灯把整艘航母都照亮了。5月27日，尼米兹将军登舰，向几名身穿白色制服的飞行员和舰员颁发了奖章，“企业号”上的船员全体立正，海军陆战队员举枪致敬。

虽然所有航母和警戒舰都在海上行驶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停靠珍珠港的短暂期间，只有极少军官和士兵休假上岸。即使那些获准上岸的人也被限制在基地内活动，许多飞行员被隔离在瓦胡岛的其他基地中。“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埃瓦机场。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就收到命令，停留期间只能在基地内活动。“大黄蜂号”上的其他舰员在抵达火奴鲁鲁后放了假，但第二天的晚上就接到命令，都被召了回去：“取消所有自由活动。立刻回舰报到。”^[64]“企业号”的飞行员来到怀基基海滩的夏威夷皇家酒店，在纵情狂饮之后，也接到命令提前返回了基地。

这些奇怪的限制无疑都是由于担心走漏消息。对于即将开展的作战行动，舰队中有很多传闻，而且这些传闻大多八九不离十。军舰都紧急装载了物资和装备，所以肯定会有一场大战。军械员柯南回忆说，“企业号”的所有舰员都知道一支大型日本舰队要攻击中途岛，“对于这场战

役的策略和战术，下级军官们讨论得很热烈。总的来说，大家都跟以前一样，认为上级会把这场战役搞砸”。^[65] 罗伯特·凯西作为平民，获准下船搭便车进入火奴鲁鲁。在火奴鲁鲁，他跟一名陆军上校聊了聊，那个人告诉他，陆军飞行员一直处于待命状态，而且瓦胡岛随时可能遭到空袭。上校说“据可靠消息，日本海军的一支先遣舰队，包含航母、战列舰和运输舰，在距离中途岛不远的海上被发现了”。凯西认为这份报告不切实际，不值得相信——日本舰队还要过几天才可能被发现——但是说日军的目标是中途岛却分毫不差。^[66]

谣言逐渐散布开来。美国太平洋舰队普遍有不祥的预感。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役一无所知，许多人推测会出现敌众我寡的局面。凯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似乎和往常一样处境不利，甚至更糟糕。我们集结了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六七艘驱逐舰，与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舰队之一对抗。我们的舰队规模只有日本的一半，而我们却跟往常一样拿着苍蝇拍和祈祷书来面对对手。”^[67]

在珊瑚海战役中遭受重创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航空大队是在战前一周重组起来的。这个航空大队由各型飞机以及刚刚训练的新飞行员组成，这些飞行员恰好在珍珠港，就被派来了。“萨拉托加号”上的第3轰炸机中队取代了“约克城号”的第5侦察机中队，因为第5侦察机中队损失了许多飞机，也牺牲了不少机组人员，无法形成中队了。新组建的第3战斗机中队接收了自1941年底以来一直在“约克城号”上服役的第42战斗机中队的好几架战斗机，以及好些飞行员和机械师。新组建的第3鱼雷机中队取代了第5鱼雷机中队，后者被派上岸休整和训练。

吉米·萨奇是新的第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也是F4F野猫式战斗机为数不多的支持者。美军只有几个战斗机飞行员断言，如果操作得当，F4F比零式战斗机更优越，他就是其中之一（除他之外还有弗拉特利）。关键是要利用F4F野猫式战斗机的优点对抗零式战斗机的缺点。他认为美军的机枪手水平更高，而且飞机上配备的机枪也更好。为了确保在空战中机枪能够瞄准并打中零式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必须在接敌之

前保持一定高度，并且必须保持团队作战，依靠僚机击退侧翼来袭的敌机。他的作战队形“萨奇穿插”（萨奇剪）被证明在空战中非常有效。

萨奇的中队装备了新型的野猫式战斗机——F4F-4，这种机型是折叠翼的。因为它的体积小，在机库甲板上占用面积小，每个航空母舰可以承载27架战斗机，比以前多了9架。但是使用新型战斗机是有代价的——F4F-4战斗机的0.50英寸机枪开火22秒就会耗光弹药，而之前的机枪可以持续发射40秒。在决战前夕牺牲宝贵的火力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埃尔伯特·斯科特·麦卡斯基中尉是第42战斗机中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记得当时大家“心里觉得注定要失败。整个情况看起来很让人绝望。尼米兹将军集中了手头的所有力量来对抗进犯中途岛的强大日军，甚至包括在作战时负伤的‘约克城号’”。麦卡斯基预计自己接到的命令会是掩护老旧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而他不喜欢用野猫式战斗机在低空对抗零式战斗机。他说：“珊瑚海战役中零式战斗机的表现让我感到震惊。它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在我身边上下翻飞。”^[68]

一些新手飞行员几乎刚刚结束飞行训练，只飞过分配给他们的飞机几个小时。“大黄蜂号”上的第8轰炸机中队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第一次飞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3月下旬，仅仅两个月前。他22岁。他说：“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难以用语言描述。你知道你要参加的战斗双方兵力悬殊。……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幸存下来？”第8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被隔离在埃瓦机场上，在喝了几瓶威士忌后，醉酒的人玩起了摔跤比赛，结果玩着玩着打了起来。跟所有人一样，费希尔也写了封家信。他仔细地分析了大战的前景，认为这是自己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大家也都这么想的。他坦言：“我很担心，简直害怕死了，没有人想死。”^[69]

但是，对于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最该担心害怕的是鱼雷机中队。他们很清楚，自己驾驶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已经非常老旧了。他们要以100节的速度飞入敌方特混舰队的中心，距离海平面只有几百英尺，简直是零式战斗机嘴边的肉。接替“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是格鲁曼

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刚刚在舰队中服役，有些甚至要从中途岛飞来加入战斗。但是，航母的舰载机还是旧式的鱼雷机。有强大的战斗机护航或许能给人一些希望，但是珊瑚海战役表明，美军飞机升空后，在保持队形方面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大黄蜂号”上的第8鱼雷机中队的队长是约翰·C. 沃尔德伦少校，他身材瘦削，长着尖下巴，是南达科他州人。因为长期受到热带太阳的炙烤，皮肤是古铜色的。他41岁，是航母中队里的老飞行员了，但他一直以来身体素质极好，每天都坚持健身。出海的时候，沃尔德伦经常领着大家一起在飞行甲板上练习健身操，“大黄蜂号”上的船员经常饶有兴致地旁观。第8鱼雷机中队的许多飞行员刚刚完成飞行训练。乔治·盖伊少尉和其他新来的飞行员在中途岛战役之前不久才加入中队，此前他们从未携带鱼雷飞行过，更不用说朝目标投掷鱼雷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中有不少人心存疑虑，”盖伊后来回忆说，“但是我们都看到了杜立德和那批飞行员的壮举，他们在没有见过航空母舰的情况下，成功地驾驶B-25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我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做到，那我们也可以。”^[70]

第8鱼雷机中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很少，而大战迫在眉睫，很少有机会训练，所以沃尔德伦在战前的课程中尽可能多地把知识传授给飞行员们。他在黑板上画图，然后提问。弗雷德·米尔斯少尉也是第8鱼雷机中队的新飞行员，他回忆道：“提完问题之后，队长喜欢巡视一番。他的头微微翘起，嘴巴咧着，看上去有点傻，甚至很蠢。突然之间，他会像吃到苍蝇的鳟鱼一样闭上嘴，伸直头，开始轻揉下巴。他浓密的眉毛下的双眼紧盯着飞行员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答案。”^[71]机组人员讨论了投弹提前量、攻击角度、战斗机躲避技术、闪避防空炮火等细节，还研究了投放鱼雷后逃离敌方特混舰队的方法。沃尔德伦还要求他们把自己想象成敌方，以便找出他设想的计划中的缺陷。“然后，”米尔斯回忆道，“他会用精辟的话语证明只有自己的方案能够奏效。这个过程使飞行员时刻保持警觉，聚精会神地思考他要解决的问题。”^[72]

沃尔德伦特别注意给飞行员加油鼓劲，说他们是舰队中最好的鱼雷机中队，甚至保证第8鱼雷机中队会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多次击中日军航母。但他也强调，大家要安排好个人事务，并给家人写信，“万一有人回不来呢”。[\[73\]](#)

尼米兹向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发出的命令有段著名的开场白：“在执行指定的任务时……大家要遵循的原则是时刻判断风险，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重创敌人，就不要让自己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暴露。”[\[74\]](#) 尼米兹的命令中附有日军作战计划的详细信息，军官们读到这些命令时对这些情报的来源做了很多猜测。有人认为美国人肯定在日方内部藏有内奸。“企业号”上的一名军官对莱顿说：“我们在东京的内奸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太值了。”[\[75\]](#)

5月28日凌晨，第16特混舰队起航了。港口航道的反潜网打开了，一艘艘军舰经过狭窄的航道驶入大海。首先是驱逐舰，接下来是巡洋舰，最后是“企业号”和“大黄蜂号”。韦弗尔堡的炮手正在进行防空演习，特混舰队驶出的时候，天上都是高射炮弹的烟雾。哈尔西将军在医院透过窗子看到军舰陆续驶过霍斯皮特尔角。据米尔斯回忆，他在“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目睹“巡洋舰和驱逐舰从四面八方破浪驶来，为己方舰队的规模而感叹。‘大黄蜂号’大幅度转了一两次方向，飞行甲板与地平线形成巨大的角度”。米尔斯发现从瓦胡岛起飞的飞机数量众多，“整个天空似乎都是飞机”。[\[76\]](#)

特混舰队向西北驶去，每艘军舰都向舰员广播了通知。“大黄蜂号”上传来扬声器的声音：“我们将前往中途岛拦截日方的进攻。”[\[77\]](#) 特混舰队将在北纬32°、西经173°的“好运”点会合，这里距离6月4日白天南云忠一计划发动进攻的地方大约有300英里。跟往常一样，斯普鲁恩斯的讲话不像演讲那样慷慨激昂。他陈述的都是冷酷的事实：

预计敌军计划攻占中途岛。攻击部队可能由各种舰艇组成，其中包括四五艘航空母舰，外加运输舰和供应舰。如果敌方不知道我们〔第16和第17特混舰队〕的存在，那么我们应该能够从中途岛东北部对敌方航空母舰的侧面发动突袭。下一步的行动将取决于这些攻击的结果、中途岛军队对敌人造成的损伤，以及敌方行动的信息。

他还加上了一句大家都很清楚的话，像是后来才想到似的：“此刻开始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将有重大意义。”^[78]

^[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p. 402–3.

^[2] Ibid., p. 403.

^[3] “CINCPAC to COMINCH,” May 10,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463.

^[4]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 199.

^[5]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 378.

^[6]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 387.

^[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4.

^[8] Nimitz to King, “Naval Action in Coral Sea Area, 4–8 May 1942” (CINCPAC endorsement of Fletcher’s after-action report), p. 5.

^[9] 不过“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在珊瑚海战役中发挥出色，数次击中“祥凤号”。Nimitz concluded, “Obsolescent torpedo planes reduce effectiveness of VT squadrons” — Ibid., p. 7.

^[10] Flatley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72.

^[1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June 1, 1942.

^[12] Morison,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p. 62.

^[13]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 148.

^[14] Entry for May 7,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22.

^[15]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64.

^[1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8.

^[1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51.

[18] Nagumo's Midway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 Sec. 3, "Prepar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in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OPNAV P32-100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June 1947.

[1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1.

[20] Entry for March 3,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00.

[21]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55.

[22]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06.

[23]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2.

[24] Ibid., p. 303.

[25] 审阅原稿时，艾伦·齐姆（Alan Zimm）指出，如果兵棋推演的是独立事件，那么“加贺号”随后的复活可能没什么好指责的。他会在新书《袭击珍珠港：战略、战斗、神话与欺骗》（*Attack on Pearl Harbor: Strategy, Combat, Myths, Deceptions*）中探讨这个问题。——作者注

[26] Quoted in *ibid.*

[2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63.

[2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28.

[29] Adm. Nobutake Kondo, "Some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 p. 312.

[30] Entries for May 4 and May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20.

[3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3.

[32] Ibid., p. 411.

[33] Ibid., p. 412.

[34]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3, p. 203.

[3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6.

[36]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6.

[37] Ibid., p. 413.

[38]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5.

[39] "CINCPAC TO CTF 16 INFO COMINCH," May 16,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469.

[40] "CINCPAC TO COMINCH," May 16, 1942; *ibid.*, p. 471.

[41] CINCPAC War Diary, May 16, 1942; *ibid.*, p. 482.

- [42] "COMINCH TO CINCPAC," May 17, 1942; *ibid.*, pp. 489–90.
- [43]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9.
- [44]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29.
- [45] CINCPAC War Diary, May 27, 1942; CINCPAC Grey Book, Bk. 1, p. 545.
- [46]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 220.
- [47] *Ibid.*, p. 221.
- [48]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0.
- [49] Layton quoted in Potter, *Nimitz*, pp. 102–3.
- [50]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 [51]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0.
- [52] *Ibid.*, p. 431.
- [53]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p. 95–96.
- [54]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2.
- [5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51.
- [5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2.
- [57] Potter, *Bull Halsey*, p. 77.
- [5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5.
- [59] Potter, *Nimitz*, p. 84.
- [60]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 93.
- [61]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as related by Dr. David Willcutts, Fifth Fleet Medical Officer." MS item 297, U.S.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Newport, RI, pp. 3–4.
- [6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37.
- [63]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43.
- [64] Rose,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p. 109.
- [6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3.
- [66]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61.
- [67] *Ibid.*, p. 365.
- [68] Scott McCuskey account in Hammel, *Aces Against Japan*, pp. 38–39.
- [69] Fisher, *Hooked*, pp. 73, 76.

[70]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debrief recorded October 12, 1943, at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Washington, DC, p. 1.

[71] Mears, *Carrier Combat*, p. 59.

[72] *Ibid.*, pp. 60–61.

[73] *Ibid.*, p. 61.

[74] “Letter of Instructions,” covering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7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2.

[76] Mears, *Carrier Combat*, pp. 54–55.

[77] *Ibid.*, p. 54.

[78]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69.

第十二章

5月的第二周，“大和号”驶入了吴港装载物资并修理，做好向中途岛发起最终进攻的准备。山本五十六全然不顾爆出丑闻的危险，邀请著名的艺伎，同时也是他情人的河合千代子，乘火车离开东京前来吴港。他们化名住到了市里的一家小旅馆里。四天后，山本回到了舰上，写信给千代子：“我山本五十六，将会竭尽全力来完成祖国赋予我的使命，直到最后一刻；之后我们抛弃所有，共同漂泊，远离这个世界。”他用几句诗作为结尾：

我是如此渴望见到你

呼喊着你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深情地亲吻着

照片上的你。[\[1\]](#)

吴港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行船不断。黄色的拖船冒出浓重的黑烟，驳船载着板条箱和木桶运往战舰。似乎整个吴港，甚至是整个日本沿海地区的居民都知道这即将到来的行动。一名军官就被理发的问及此事。“加贺号”海军少尉前田武说：“我感到非常气愤，我们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竟然跟红灯区的妓女们谈起中途岛的秘密作战计划。在我们出发之前，所有人都在谈论我们的中途岛计划，导致这一计划不再像珍珠港偷袭那样是秘密行动了……这真是坏兆头。”[\[2\]](#)“加贺号”为起航做

准备时，妇女们挤到基地入口的围栏边，呼喊着她们认识的士兵的名字，跟他们告别。

5月21日，主要战舰出海进行为期两天的对抗演习，于25日返回柱岛停泊。舰队获知了进攻的最终细节。根据一份详细的时间表，战术群会分别从三个不同的集结地出发：柱岛、本州岛北部的大凑港，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南云忠一告诉山本，第一航空舰队无法按计划于5月26日出发。船员们拼尽全力往船上搬运食品和其他补给，但他们需要额外的一天才能完成。山本同意他们晚出发一天，但是不愿意改变作战时间表——如果航母不得不推迟一天出发，那就推迟吧；它们可以加快航速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指挥官和参谋举办晚宴，大家端起热米酒来向天皇致敬。^[3]

许多船员都感到，他们被迫按照十分仓促且不容变更的计划行事。船上的各种修理和维护工作都被忽略了，船员们的训练时间缩短了，最终命令下达时也是草率和混乱的。被派去护送中途岛攻击部队的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后来写道：“我本能地感觉这次行动会出问题，我的心里感到十分不安。”^[4]士兵急需进行飞行训练，而且并非仅是刚编入现役的飞行员需要训练。在5月18日举行的空投鱼雷演习中，就连驾驶中岛九七式鱼雷机的老兵也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飞行员往返的路程过长，因此在濑户内海西部举行的俯冲轰炸演习时间也大大缩短。由于时间不足，空中射击、编队飞行、舰上飞机起落的练习同样被忽略了。“由于航母正在修理和维护，”南云忠一后来在战后报告中说，“唯一能用来进行起降练习的只有‘加贺号’。这艘航母从日出到日落一直忙个不停，但即使是这样，年轻的飞行员也只能将掌握如何在航母上降落的初级知识。而那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则只能在黄昏得到一次练习降落的机会。”^[5]

5月27日上午，南云忠一的旗舰“赤城号”的信号旗桁上挂出了信号：“如期出港！”^[6]航母和警戒舰从柱岛起锚，朝丰后水道进军。港内停泊的船只上的船员沿着围栏站成一排，挥舞着帽子，据前田回忆，

大喇叭还高声播放着“行军进行曲”。^[7]吴港海军航空兵的反潜飞机在空中盘旋并侦察，除去几次误报之外，没发现敌人的潜艇。“阳光透过片片白云，照亮平静的海面，”渊田美津雄写道，“几天来濑户内海西部的天气都是多云闷热，但是现在微风拂过‘赤城号’的甲板，十分舒适。”^[8]到了晚上，第一航空舰队通过丰后水道来到外海，“赤城号”发出信号，指挥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环形警戒幕，彼此相隔1 000码。航母在环形的中心排成两列航行。

一夜无事。5月28日清晨，太阳出来了，天空湛蓝澄澈。航母上的船员都很放松，精神十足。他们在港口一心盼望着航母赶快出海，如今在漫长的航海路途中，能有机会松一口气让他们非常舒畅。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打扑克、抽烟，还有的在读书、写信。他们每天下午在甲板上集合，高唱爱国歌曲和伤感的歌曲。他们吃的东西比平时好，不久前厨房里增添了新鲜的食材；按照传统，在战役打响的前夜，他们要吃汁粉（年糕红豆汤）。军官们享受更丰盛的美味佳肴，比如烤鲷鱼配味噌。^[9]第一航空舰队以14节的速度穿越北太平洋的灰色海域，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省燃料。途中不断地通过油轮加油，几乎没有停下来过：大部分舰船在行程中至少加了两次油。巡洋舰和航母派出侦察队。整个白天，战斗空中巡逻队都在前方飞行侦察。“白云朵朵，慵懒地在天上飘着，”文书军士野田满春回忆道，“烟囱中涌出的稀薄烟雾悬在空中，就像五月笼罩田野的朵朵夏季白云。”^[10]

6月1日，第一航空舰队驶离了天气晴朗的区域，进入了一片乌云密布、阵雨连连、雾气弥漫的区域。到了傍晚，能见度下降到了几百英尺。在这样的雾气中，这么大一支舰队时时刻刻都存在碰撞的风险，每艘舰艇都加设了瞭望员，凝视着这黑曜岩般的黑暗。探照灯光穿过灰暗，所有船的尾部都拖着雾标，用来警示后方同伴前方不远处有船。南云认为，不再按照反潜路线曲折前进会更安全，舰队的速度也降到了12节。

次日拂晓时分，透过“赤城号”舰桥的树脂玻璃，南云和军官们看到

四面八方洁白一片，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就好像舰艇被四面石膏墙包围了一样。即使是在能见度稍好的间歇，舰队中离得最近的船也只能看到彼此幽灵般的轮廓。作战计划要求在6月2日改变航线，“赤城号”必须使用闪光信号灯来发出改变航线的命令，然而在浓雾中无法发出信号。海军方面要求南云严格遵守命令，保持无线电静默。但是他决定采用低功率的语音广播来传递命令，希望命令只能传播几英里的范围。上午10时30分，“赤城号”向舰队广播了命令：“12点整，航向转为100度。”^[11]中午时分，舰队朝东南转向，前往最终的目的地中途岛。

关于美国航母的位置，甚至美国海军在珍珠港的军备部署情况，日本人都没有可靠的近期情报。山本五十六依靠马绍尔群岛附近的川西水上飞机组成的远程侦察队来获得相关情报。但尼米兹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和水上飞机供应舰来阻止川西飞机在法兰西护卫舰暗沙加油，迫使山本在5月31日取消了这些侦察行动。山本的第二个情报来源是设置在瓦胡岛和中途岛之间的潜艇构成的警戒线，但是美国的两支特混舰队在日本潜艇到达指定地点前便穿过了这里。因此，日方丝毫没有察觉美军航母已来到赤道以北，更不知道它们正准备伏击南云的东翼。

6月3日，在第一航空舰队以北1 000多英里的地方，轻型航母“龙骧号”和“隼鹰号”于黎明前对荷兰港发起了进攻。尽管守军知道袭击即将到来，而且使用重型防空火力还击，但是轰炸机仍然对港口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并炸死约25人。4天后，日军又偷袭了雾霭笼罩的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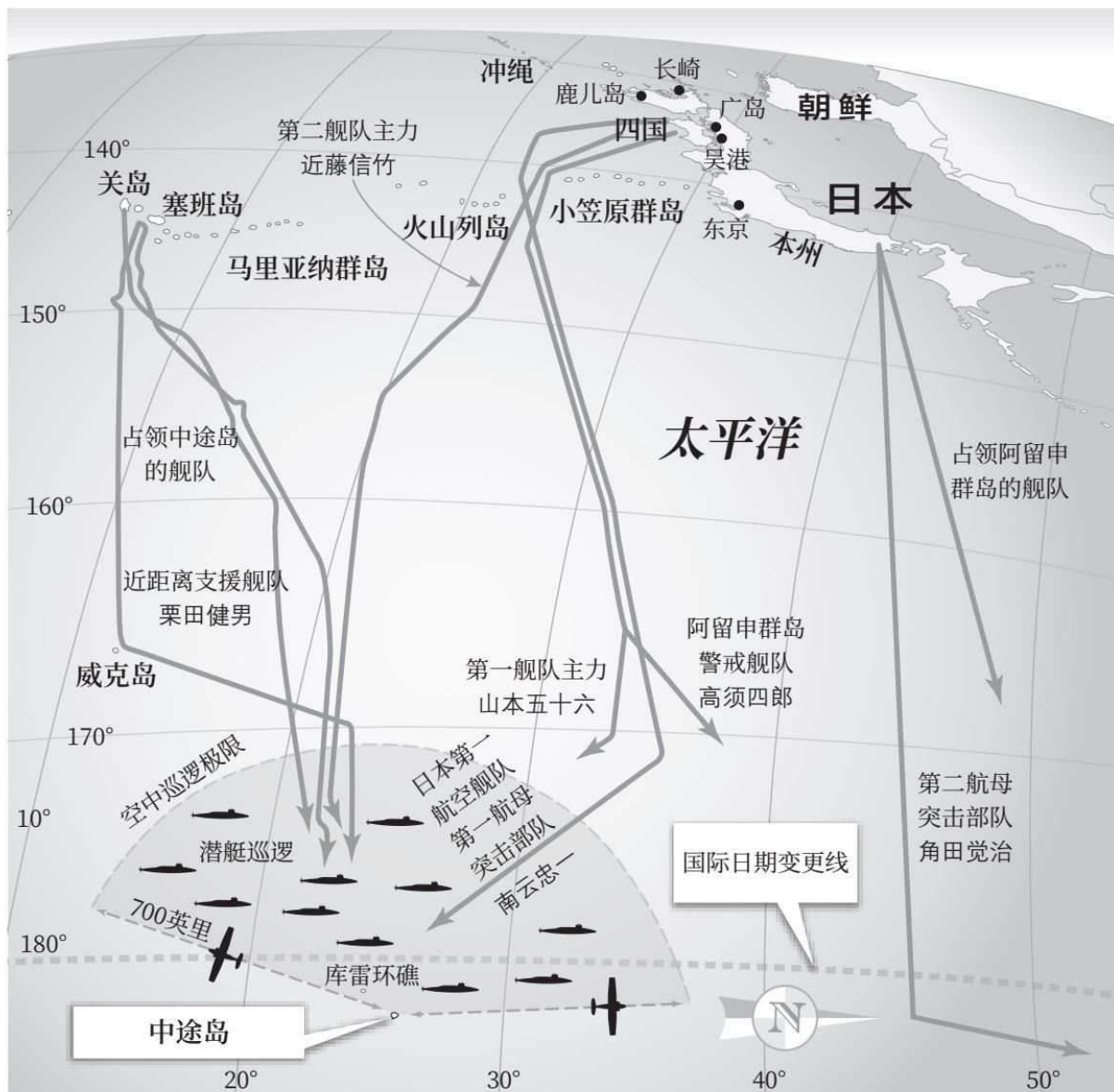
6月3日，前往中途岛的日军舰队和美军飞机还进行了第一次正面交锋。海军少将田中赖三指挥的运输舰队从西南方接近中途岛，驶入了中途岛远距离空中侦察的范围内。中午12时40分，沃尔特·C.斯威尼中校命令陆军9架B-17战机从中途岛起飞，向西进攻运输舰队。下午4时23分，飞行员找到了田中的运输队，在8 000英尺到12 000英尺的高空投下了多枚600磅的炸弹。六个月的战争已充分证明对海上航船进行高空轰

炸是无效的，这次也不例外。日本船员看到炸弹从高空落下，便实行规避运动。斯威尼派出的轰炸机投下的所有炸弹都落入了海里，有的距离目标甚至有半英里之远。^[12]日军驱逐舰用高射炮还击，但是斯威尼的飞机太高，日军无法精确瞄准。投完炸弹后，B-17飞机返回了中途岛。

这次交锋徒增了日军的士气。“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正在朝准备充分的敌人进攻，”其中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原为一少佐写道，“但是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迄今为止他们对我方运输队的攻击徒劳无功，虚弱无力。”^[13]4日凌晨1时30分，美军4架载有鱼雷的PBY水上飞机对田中的运输舰队发起了进攻。一枚鱼雷击中了“曙丸”油轮，造成几十名水手死亡。但是该油轮还能继续向东行驶，速度没有受到影响。此时，日军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不过令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美军的进攻基本没有效果。

日本海军舰队

向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推进，1942年5月24日—6月3日



6月3日中午，第一航空舰队将航速提升到了24节。像往常一样，强大的战斗空中巡逻队在上空盘旋，额外的零式战斗机也已加好燃料，做足准备，一旦遭遇空袭便立即起飞。4日拂晓，舰队为出动飞机改变了航行队形。四艘航母分散排成菱形，彼此相距几英里。航母上增加了额外的瞭望员，出现了一些错误的敌情报告，其中有一份报告把星星当成

了敌人。

水上飞机借助“筑摩号”和“利根号”巡洋舰上的弹射器起飞侦察。被困了三天之后，舰队终于驶出了天气恶劣的区域，但是东北方向天气依旧阴沉，侦察队应该会直接飞入这片能见度较低的区域。断断续续的暴风，再加上高度只有1 000英尺到3 000英尺的漫天积云，让人很难看清任何物体。可以想象，有时就算他们飞到敌舰的正上方，可能也什么都看不见。

机组人员在凌晨2时30分就被人从铺位上叫醒了，天亮之前他们一直在辛苦备战，给攻击机添加燃料，为起飞做准备。然后他们把飞机推上升降机，布置在飞行甲板上。这些工作在第一缕晨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就完成了。每架飞机都用钢缆拴在指定的位置，机翼展开并固定好。一个飞行员爬入驾驶舱，发动引擎，排气管吐出蓝色的火舌。发动机以每分钟1 000转到1 500转的转数预热，机械师要留心观察并仔细听其声音，确保发动机运转顺畅。飞行员推动节流阀，发动机接近最大转速，发出了轰鸣声。渊田美津雄写道：“发动机的声音在嗡嗡声和轰鸣声之间交替变化，飞行甲板很快就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噪声里。”[\[14\]](#)

凌晨4时15分，舰船仍处在黑暗中，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召集待命室内的所有飞行员：“飞行员，列队！”身着棕色飞行服、戴着头盔的飞行员们出现在飞行甲板上，聚集在舰岛周围，在这里接收中队长的指令。然后，他们在纵横交错的飞机中间分散开来，爬上机翼，滑进驾驶舱。黑暗之中，飞行甲板中间和边缘的照明灯为飞机指出了起飞线路。每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无线电天线都会降下来，给机翼留下足够空间。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微风从东南方拂来，月光照耀在海面上，能见度很好。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四艘航空母舰转为迎风方向，南云忠一下令“发动空袭”。源田实通过扬声器传达了命令，同时旗舰的信号灯开始给“赤城号”的三艘姊妹舰发出信号。船头烟囱升出的白色烟雾显示了风向。航空平台上有一名军官挥舞着一面白旗，飞行甲板前端有人以环形

挥动绿色的信号灯，舱面船员抽开轮挡，领头的飞行员向前推节流阀，把脚从刹车上移开。第一架飞机沿着柚木甲板咔嗒咔嗒地滑行，起飞升空，翼尖上闪烁着红色和绿色的灯光。它机身倾斜，向左转弯，按照熟练的集合流程在上空盘旋，等待其他飞机升空，形成大规模的飞行编队，这种技巧美国人还未掌握。到凌晨4时45分，整支航空舰队的108架飞机都已经升空——它们围绕舰队，逆时针绕着大圈，然后以125节的速度朝东南方向飞去。

中途岛的地形主要是沙地和灌木丛，是一个海拔很低的环形岛礁，此时已经武装到了牙齿，准备迎敌。清晨5时53分，雷达发现了来袭的敌机。空袭警报骤然响起，不过守军早就瞪大了眼睛，守在岗位上。早上6时15分，中途岛上的每一架能飞的飞机都已经升空，所以没有一架飞机会在地面上遭到攻击。海军上尉威廉·A. 蔡斯驾驶着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侦察时看见了来袭的庞大机群，立即进行了口头报告：“许多飞机朝中途岛进发，方位320度，距离150英里。”[\[15\]](#)

日军飞机从北边的地平线露出影子时，躲在伪装网下的海军陆战队高射炮手早已严阵以待。入侵飞机进入射程范围后，炮手一阵齐射，形成了一面高射炮弹墙。行动刚开始几分钟，就有好几架日军轰炸机遭受重创，拖着浓烟和火焰坠入大海。防空炮火非常猛烈，而且密集地分布在中途岛四周，看起来像是形成了一堵圆柱形的墙。“飞龙号”的战斗报告特别提到了这些武器：“准确性极高，防空火力猛烈。”[\[16\]](#)

不过，中途岛的战斗机拦截防御时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海军陆战队第211战斗机中队配备的是20架过时的布鲁斯特“水牛”战斗机，同样型号的飞机在马来亚遭到了零式战斗机的毁灭性打击。岛上仅有4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空中的混战中，零式战斗机几乎摧毁了中途岛上的所有战斗机，自身却一架都没有损失。由于美军一架战斗机也不剩了，日军的轰炸机组成编队，开始轮番进攻。它们集中火力攻击建筑物、机库、燃料桶和弹药坑，给岛上的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通往东岛的电力

线路和输气线路也遭到破坏。食堂、机库和油罐都被炸成了废墟。不过，日军航空兵对高射炮阵地没有造成多大破坏，也没有轰炸跑道，因为他们想在占领中途岛后让飞机跑道处在能用的状态。地面上大多数人躲进了混凝土防空洞和狭长掩壕里。高射炮部队基本没有受损，另外除了时运不济的战斗机，中途岛的空中力量也基本完好。

这次战斗中，袭击者损失了11架飞机，而受损的飞机是这个数字的两倍；20名飞行员死亡或沉入海底，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这些损失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如果日军接到命令继续对中途岛发动攻击，那么累积的损失将会成倍增加。日军飞机投掷完炸弹之后，前往中途岛西部会合。6时45分，这些飞机开始返回航空母舰，并尽可能编队飞行。攻击部队的指挥官友永丈市海军大尉通过无线电联系南云忠一，建议进行第二轮攻击。[\[17\]](#)

“赤城号”此时开始进行战斗空中巡逻的轮班，让执行防御任务的零式战斗机降落，加注燃料，并让新的飞机代替它们巡逻。南云忠一希望在友永丈市回来之前完成这项常规任务，好腾出飞行甲板，让返航的飞机降落。

7点过后刚几分钟，从中途岛起飞的机型混杂的第一批美军飞机到达日军舰队的位置，开始攻击日军航母。这些攻击都很英勇，但是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没有击中任何一艘日舰。新的空袭就算无效，也在不断施加压力，使日军失去平衡。山本五十六苦心经营的计划开始走形。美军最初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发动的空袭限制了南云忠一面对这天早晨各种波折命运的应变能力，并且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这一过程将在三小时后整场太平洋战争最具决定性的五分钟里达到高潮。

第一批飞机从南面低空飞来，直奔日本航母的舰首而去。这是6架新型海军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它们是第一次参加战斗。此外还有来自中途岛的4架陆军的B-26中型轰炸机。这两种飞机都装有鱼雷。日本舰艇上警报声大作，提醒船员多加警惕。大约有30架零式战斗机降低高度前来拦截，用20毫米机关炮攻击进犯的轰炸机。除了一架之外，其

他几架“复仇者”都翻滚着坠入大海。唯一的幸存者艾伯特·K. 欧内斯特（Albert K. Earnest）少尉谈了他对零式战斗机的看法：“它们太多了，都互相挡住路了。它们十分灵敏，令人不得不佩服。”^[18] B-26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因为它们机体很结实，能承受更多打击。4架中有3架发射出了鱼雷，但是投掷地点不好，离目标太远，提前量不够，日本的航母通过机动轻松躲开了来袭的鱼雷。有一架B-26似乎是直冲着“赤城号”的舰桥飞过去的——很显然飞行员知道他的飞机不行了，试图跟敌人拼个同归于尽。南云忠一和他的参谋被这种自杀式的突袭吓坏了，赶紧躲避。但是在撞击前的最后一刻，这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偏离了路线，擦着日军旗舰飞了过去，坠入海中。

为防止敌军的航母突然出现并攻击第一航空舰队完全暴露的左翼，山本五十六要求甲板上保留后备攻击力量，但是南云忠一没有收到任何发现目标的报告，而且他觉得敌方航母不会出现。他派出的侦察机已经在空中盘旋了近3个小时。这些侦察机像车轮的辐条一样朝北和朝东飞去，抵达最远处后返回。目前大部分飞机应该都在返回的路上了。理论上它们有可能在返航途中发现敌军舰队，但实际上不太可能。因此，南云忠一没有理由认为附近有美国的军舰。然而，坠落的B-26差一点撞到旗舰，这让他觉得需要彻底歼灭中途岛的航空力量。第二轮攻击派出的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凯特”）挂载的是反舰鱼雷。如果派遣它们攻击中途岛，就必须重新挂载80型对地炸弹。7时15分，南云忠一下达命令：“预备第二轮攻击的待命飞机今天要出动。换成炸弹。”^[19]

机库甲板上，已经忙了半天的军械士立即行动，开始移除鱼雷的复杂过程，把炸弹挂在飞机的腹部。这项任务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

这条命令刚一下达，一架侦察机就报告发现了敌情。巡洋舰“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从日军舰队所在处朝100度方向飞行，于7时28分发报说：“疑似目击敌船，有10艘，方位10度，距离中途岛约240英里，航向150度，航速20节。”这架侦察机的飞行员甘利浩（Hiroshi Amari）曹长

没有提到航空母舰，他发现的可能是水面舰艇，不会在那个距离对他们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从另一方面说，“利根号”4号侦察机也可能是撞上了航母特混舰队的外围警戒舰，这种可能性不容忽略。7时58分，甘利浩报告说，敌军舰队已把航向调至80度。南云忠一回复说：“报告船只类型。”[\[20\]](#)

对于南云忠一来说，最初的敌情报告太模糊了，基本没有用处，而且还很有可能是错误的。“10艘敌军水面舰艇”究竟是什么意思？里面有敌军的航空母舰吗？报告的位置偏离了给甘利浩指定的侦察路线。经过六个月的海战，尤其是在珊瑚海战役后，他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最初的敌情报告。尽管如此，南云忠一还是命令机组人员停止给预备队重新装载武器。如果后续的报告能够让他确认有美国的航母处在攻击范围内，那么他就需要给这些飞机装载反舰武器。所以南云忠一犹豫了一番，等待进一步的情报。

暂停重新装载武器是一回事，逆转重新装载武器的过程，火速用升降机把预备队送上甲板，起飞去袭击东北方出现的可疑船只又是另一回事了。南云忠一没有选择后一个更主动的作战方案，为此，他后来遭到了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日双方的几代历史学家的公开批评。当然，事后看来，应该如何行动是很清楚的：南云忠一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手头上的无论哪种飞机，立即发动袭击——尽管这意味着要派装载了对地炸弹的鱼雷轰炸机去攻击，甚至是让从中途岛返回的飞机因飞行甲板拥挤不堪而迫降在海上。但是在6月4日早上7时45分，南云忠一不可能有这种事后的洞察力。他只能依靠已知的情报来行动。他知道中途岛上的机场对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是个威胁，只要不把机场炸毁，它就会持续形成威胁。他也知道友永丈市的航空队即将返回，燃油即将耗尽，需要清空甲板让那些飞机降落。在7时40分的时候，他还知道，日本舰队目前仅剩14架战斗机在进行战斗空中巡逻，而之前则是31架——“复仇者”和B-26“劫掠者”的袭击虽然无效，但仍然带来了麻烦，迫使零式战斗机消耗了燃料和弹药，必须降落加油。而从另一个他需要权衡的方面看，“利

根号”的4号侦察机的敌情报告很模糊，无法确定船只的类型，而且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不到一个月前，在珊瑚海战役中，另一名日本航母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就曾被错误的敌情报告误导，朝错误的方向派出了大规模空袭部队。基于他能够掌握的信息，南云忠一选择等待更多确定的情报，而不是彻底推翻作战计划，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南云忠一的行动范围受到时间和环境的严格限制。他的四个飞行甲板都是紧缺的资源，起降的需求很多，而且没有一个飞行甲板能同时起降飞机。飞机升降机是个瓶颈，在机库甲板上给预备队重新挂弹是个瓶颈，循环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也是个瓶颈。而敌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进一步收窄了这些瓶颈，因为空袭迫使日本的航母采取回避行动，关闭飞行甲板，而且还迫使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频繁返回航母，补充燃料和弹药。

南云忠一的整个海军生涯使他走到了这一步——他拥有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之高位，得不到山本五十六热情的支持，因珍珠港所谓的失败而饱受批评；他需要在攻击和保存力量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他还深信有必要进一步空袭中途岛，以彻底停止敌方对日本舰队的空袭。南云忠一有很多高风险的决策要做，而他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做这些决策。他和手下的军官都在“赤城号”拥挤的舰桥上，凑在小海图桌旁，被储物柜和带支架的双筒望远镜包围着。即使在敌机尚未来袭，旗舰以及其他舰船无须大幅度机动躲避的情况下，发现敌机和潜望镜的消息也如洪水般涌来，而且真真假假，掺杂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一丝的平静，也不可能不受打扰，南云忠一肯定很难思考。

7时53分，日本瞭望员发现有1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来袭。这是驻扎在中途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由洛夫顿·R. 亨德森少校率领。在战役爆发的一周之前，亨德森手下的大部分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还没见过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内部，而且没有人接受过俯冲轰炸技术的训练，因此亨德森带领他们从9 500英尺的高度进行小角度俯冲。他们迎着猛烈的高射炮火勇敢地前进，但是零式战斗机从身后猛扑过来，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并且最先击中了亨德森的飞机。

有几枚炸弹差点命中“飞龙号”，这些炸弹在海面上爆炸后，激起的水花遮住了“飞龙号”，但是它并未受损。无畏式轰炸机开始撤退，零式战斗机紧追不舍，又击落了几架。

幸存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离开战场时，斯威尼中校指挥的14架B-17飞机正在2万英尺的高度飞行。这些飞机本来是奉命去轰炸前一天攻击过的同一批运输舰，但是后来又接到命令，转而向东攻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零式战斗机飞行员藤田怡与藏少佐急剧爬升，去拦截高空中的美国陆军轰炸机，但是他发现“敌机的飞行高度对我来说太高了”。^[21]日本的防空炮火也无法够到这一高度。未受阻拦的B-17朝“苍龙号”航母投下炸弹。这次的瞄准显然比前一天好多了，因为好几枚炸弹落在了距离航母很近的地方，只不过一颗都没有命中。“水如喷泉般吞没了‘苍龙号’，”“赤城号”的铃木宏（Hiroshi Suzuki）大尉回忆说，“我看不见‘苍龙号’，觉得它肯定受了重伤。然而，水柱落下去后，它看起来还好。”^[22]

运气不佳的B-17脱离战场后，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的11架SB2U“守护者”侦察轰炸机攻击了“榛名号”战列舰。没有一颗炸弹命中，而且还有三架美国飞机被击落。让场面更加热闹的是，8时24分，美国潜艇“鹦鹉螺号”的潜望镜在日本舰队的中心冒出了水面。好几艘日舰上的瞭望员发现了它，日军通过短程无线电发出了明码警报。一艘驱逐舰赶过来，向它投下深水炸弹，还有一架零式战斗机扑过来低空扫射。于是它赶紧下潜了。

到此时为止，日军似乎轻轻松松就抵挡住了连续几轮攻击，美军没有一枚炸弹或鱼雷击中日军舰船。渊田美津雄说：“坦白讲，我判断敌人的飞行员没有表现出多么强的能力，而且南云忠一将军和他的参谋也是这么评价的。我们的结论是，敌人的进攻战术没什么好怕的。”^[23]而“加贺号”上的前田武则说：“敌军飞行员前赴后继地发动攻击，他们的作战意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没有一个中队是在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参战的。那么，万一哪个中队有战斗机护航呢？另外，

日军还没有见到过任何一次像样的俯冲轰炸攻击，而俯冲轰炸攻击是美国所掌握的最厉害的反舰战术——但是这种攻击随时都会出现。前田武也意识到，美军持续施加的压力阻碍了日军的飞行作业，而且在友永丈市的部队返航之前，很难让预备队起飞。他说：“在我看来，情况相当不妙。”^[24]

即使在混乱的空战中，日本航空母舰也必须循环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好让原来的飞机补充燃料和弹药。B-17开始攻击时，“加贺号”还设法让一些飞机降落下来，尽管这要求它逆风而行。友永丈市的第一批飞机开始抵达，此时美国飞机仍在这一区域，而航空母舰也仍然在转向避让。它们只能低空盘旋，等待美军攻击结束。由于燃料不足，返航的飞机无法在高空中停留很长时间，而且有些飞机和机组成员还受伤了。要想让飞机安全降落，航母需要至少迎风行驶15分钟，另外还要花30分钟把飞机移动到机库甲板上。

这就是8时20分的情况，而就在此时，“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来情报：“敌军后方看起来有一艘航空母舰随行。”^[25]这份情报让南云忠一的血液都凝固了。战争的前六个月，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总是战场的主导，迫使敌人做出反应，对敌施以猛攻，在真正的危险形成之前就撤离战场。在印度洋上也出现过紧急时刻，不过这一次是极其危险的全新局面。在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光辉的作战史上，它第一次被迫对手主导的行动做出回应。

航空母舰作战的首要原则是先发制人，这一原则高于其他一切原则。但是友永丈市的飞机一直在耐心地盘旋，飞机的引擎开始冒烟了，如果不立即降落，它们就会坠入大海。日本航母的作战原则不允许一组飞机于另一组飞机降落的时候在防撞路障前预热发动机。南云忠一现在被迫从两个都不合意的方案中做出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命令友永丈市的所有飞机在水上迫降（在海上紧急降落，有望得到救援）。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或许可以在9时15分起飞，但是这会使正在盘旋的飞机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一部分飞行员身亡。南云选择了第二个方

案：接收早上派出去的飞机，并把它们转移到机库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预备队可以在10点之后不久起飞，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空袭。幸运的话，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之内会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

在下面的机库甲板上，预备队重新装载武器的工作还在继续。疲惫不堪的机械师接到了南云忠一的命令，要把炸弹换回反舰武器，维修工下山要（Kaname Shimoyama）回忆道：“‘赤城号’完全陷入了混乱。……机库里面空间很小，因此更换武器很困难。我们的鱼雷也非常重，而且需要手动装载到飞机上。一般来说，有两组人员做这个工作：一组搬运鱼雷，另一组把鱼雷装载到飞机上。尽管我的级别不高，但看到现场一片混乱时，我心里想，这么做是否明智？”^[26]“赤城号”的铃木大尉说：“我们的舰艇正遭受攻击，周围充满噪声，因此更换武器的工作很困难。”^[27]前田少尉回忆道，“加贺号”遭到空袭，甲板突然倾斜，他们不得不停下工作。往飞机上装载鱼雷的步骤很复杂，需要小心翼翼地进行，但是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加速装载鱼雷！”^[28]为了赶紧完成这项工作，从飞机上卸下来的炸弹直接堆放在机库甲板的架子上，而不是用升降机放入弹药库。如果敌人恰好在此时发动空袭，击中这艘船，那么这一疏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早上8时45分，“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来了一份新的敌情报告：“似乎有2艘额外的敌方巡洋舰，方位8度，距离中途岛250英里。”甘利的飞机当时正位于美国第二支航母特混舰队——第16特混舰队——的边缘。尽管南云忠一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些零散的报告表明，对方有两支独立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而且它们都处在攻击范围之内，因此日本航空母舰有可能会连续遭受大规模的空袭。尽管甘利的小飞机的燃料已经所剩不多，他还是接到命令，继续留在美国舰队上方，收集更多有关舰队构成的情报。为了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无线电接收机利用他的机载电台判断方位，他让无线电发射机一直开着。这样做会让“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很容易被美国飞机拦截，但是在一场重

大的作战行动中，一架水上飞机的存亡无关紧要。

甘利按照南云忠一的命令去做了。8时55分，他更新了情报。他看到了10架美军鱼雷轰炸机，应该是直接飞向日本舰队的。[\[29\]](#)

美国特混舰队顶着刺骨的寒风，劈波斩浪，从瓦胡岛一路向北。六月份的头三天，一直寒冷潮湿，阴云密布。在漫长的白天里，舰艇采取了曲折前进的路线，这是为了防止敌军潜艇攻击。舰队以20节的速度破浪前行，每过几英里都会大幅度转弯。6月3日，星期三，有消息传来，日本的舰载机攻击了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斯普鲁恩斯将军在向第16特混舰队讲话时就预测，这场海战中会有“四五艘”敌军航母对阵“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航母。特混舰队中一艘巡洋舰上的乘客罗伯特·凯西表示他不希望发生这种以弱敌强的局面。他在日记里吐露说：“几天之前我就知道我们有哪些缺陷，但是那时不像是要对付敌人三艘以上航母的样子。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是有趣，但是毫无希望。”[\[30\]](#)

这天晚上，在“大黄蜂号”上，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列队走进待命室并坐下，等待沃尔德伦少校下达最后的指令。他说：“即将到来的战役将会是整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也很可能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这场战役将会被称作中途岛海战。它将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这是一起荣耀的事件。”[\[31\]](#)沃尔德伦少校展现出的是一种放松自信的态度，但是米尔斯少尉觉察到他的语气中含有严峻的现实意味。沃尔德伦队长知道，他的中队缺乏经验，训练不足，而且只能驾驶速度缓慢的老式飞机前往战场。他们极有可能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到达敌军舰队上空，任由大批致命的零式战斗机摆布。沃尔德伦的最后一段话听起来就像告别演说一样，令人感到不安。他说：“我们训练的时间很短，而且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做到最好了。我相信，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最大的希

望，是能够遇到有利的战况；但是如果战况不利，甚至糟糕至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摧毁敌人。哪怕只剩下一架飞机，也要战斗到底，我希望这个人能冲向敌人，并且击中他们。愿上帝与我们同在。祝你们好运，顺利返回降落，让敌人下地狱吧。”^[32]

沃尔德伦劝大家好好休息，但是当天晚上没有几个飞行员睡得安稳。盖伊少尉回忆说，他感觉“有点紧张，就跟橄榄球比赛前的那种感觉一样”。^[33]“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飞行员汤姆·奇克准尉在铺位上睡不着，听着通过船身传来的“微弱的机器震动声”，还有“航船拨开水面的哗哗声”。^[34]“大黄蜂号”上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克莱顿·费希尔在上床睡觉之前给妻子和母亲写了信，提到“面对日本航空母舰和上面那些有经验的飞行员，即便是能按计划实现突袭，在第二天战斗中幸存的可能性也极小”。^[35]

凌晨时分，飞行员们被摇醒，然后进入飞行区域。鱼雷机飞行员的起床号在凌晨3点响起。他们穿上飞行服，列队进入餐厅吃早餐，喝咖啡。在“约克城号”上，飞行员吃到了牛排和鸡蛋，这比平常的伙食好得多。有人听到一名鱼雷机飞行员开玩笑说，这简直是“死刑犯的宴席”。^[36]饭后，他们回到待命室，在那里，飞行名册用“油性铅笔写在树脂玻璃的班次表上”。^[37]每个飞行员都研究着自己的标图板，把电传打字机传来的空情标图的新数据填进去。飞行员要不断检查敌军舰队和自己船只的位置、航向和航速，还要考虑风力和风向，以及罗盘读数的磁偏角，进行修正。飞行员要估算飞行时间、燃料消耗量，制定飞往“预定位置”的返航路线，他们最后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航母。

几个小时过去了。电传打字机不断传出新的数据，包括一份PBY水上飞机在中途岛的西南方向攻击日军运输舰的报告。克拉伦斯·迪金森是“企业号”第6侦察机中队的副队长，他回忆说，在准备作战的时候，飞行员的情绪各不相同：“有些人很安静，回话很简短，甚至所有问题都不想回答。也有一些人在闲聊。另一些人的表现就好像是这一天只不

过是海上的又一天似的，而且不是装出来的。”一些人在舒适的皮革躺椅上打盹，另一些人在那里喝着咖啡，不断修改飞行方案。等待似乎没有尽头，气氛越来越紧张。“5点，6点，7点，”迪金森写道，“这七排座椅上的人，还从来没有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么安静过。然而，大家能感受到飞行员们的信心。大家相信，只要发现日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飞行队就一定能干掉它们。”^[38]

黎明之前，战斗空中巡逻队的F4F便起飞了，10架侦察轰炸机也从“约克城号”上起飞，排成搜索队形向北飞去。不过主要的空中打击力量仍然在甲板上——弗莱彻决定继续拉近与敌军的距离，等敌情报告准确无误后，再派出攻击机。早上5时45分，特混舰队收到情报，从中途岛起飞的PBY水上飞机看到一个日本小型飞机编队从东北方向朝中途岛飞去。第8鱼雷机中队的米尔斯写道：“从那一刻到爬进驾驶舱，电传打字机的每一条消息飞行员都没有放过。”^[39]他们个个坐立不安，等待着能确定日本航空母舰位置的敌情报告。最终，命令来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扩音器中传出指令：“飞行员，登机！”^[40]

早上天气很好，空气清新，碧蓝的天空上点缀着一朵朵的白云。能见度极佳。

第16特混舰队转向东南方向，迎着清晨柔和的微风，开始加速，让风猛烈地吹过甲板。身着飞行服的机组成员从待命室列队而出——戴着飞行手套，护目镜推到额头上方，降落伞在身后晃动——走向排列得跟迷宫似的灰蓝色机群，每个人都来到指定的“甲板位置”。“企业号”上推飞机的士兵帮助10架F4F起飞进行战斗空中巡逻，又帮助22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去攻击敌军。机械师把电爆管塞进野猫式战斗机的启动系统。飞行员按下启动开关，引燃电爆管，发动了普惠星形引擎。他们让引擎以每分钟1 000转的转速怠速运行几分钟，来进行预热。飞行员戴上氧气面罩，听从甲板上的指挥向前滑行。收到“起飞”信号后，每架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把节流阀向前推到头，同时踩住刹车，让飞机停在原位。一片蓝色的尾气向船尾飘去。甲板上的指挥员落旗后，飞行员松

开刹车，飞机猛地前倾，加速冲向船首，轮胎在柚木跑道上咔嗒作响。先是飞机的尾部升起，接着是机头，然后整个飞机升入空中。

掩护航母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随着航空母舰转向，与航母保持同样的速度，劈开迎面打来的波浪，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栏杆被浪花淹没，船尾也溅上海水。舰船的尾流相互交织，在海面上留下了复杂的图案。凯西从附近一艘巡洋舰的甲板上看着此情此景，他写道：“航空母舰似乎把所有的飞机都派出去了。右舷地平线上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小十字。……场面壮观，令人兴奋不已。毕竟，很少有人有机会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当然，也很少有人能再次看到这种场面。”[\[41\]](#)

“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很快就升空了，但是不知为何，航母上推飞机的人在移动下一批飞机的时候很慢，这批飞机包括鱼雷轰炸机和10架野猫式战斗机。战斗机是为执行攻击任务的其他飞机护航的。每延误一分钟，正在盘旋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会消耗宝贵的燃料，缩短飞行半径。其间，“企业号”的报务员办公室截获了“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发给日本舰队的消息，表明敌军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美国特混舰队的存在。斯普鲁恩斯明智地选择将作战规则抛开，让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直接出发，不用再等其余的攻击机升空。“企业号”通过桅顶闪光信号灯示意航空大队队长小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少校：“执行分派的任务。”[\[42\]](#)

俯冲轰炸机联合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编队——第6轰炸机中队和第6侦察机中队，总计33架飞机——开始朝231度方向前进，麦克拉斯基预计在这个方向的142英里外能发现敌人。每三架飞机形成小“品”字形编队，然后再和其余编队形成大“品”字形编队。这些俯冲轰炸机不断爬升，一直爬升到巡航高度，编队中飞得最高的飞机高度约2万英尺。迪金森上尉写道：“那天能见度很好，几乎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天气。天空中除了大朵大朵的白云，澄澈无物。我们在100英里外看到了中途岛。我们飞到了将近4英里高的地方，一眼望去都是大海。湛蓝的大海就像靛蓝染料那般蓝。”[\[43\]](#)

“大黄蜂号”的起飞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在斯坦诺普·C. 林（Stanhope C. Ring）中校的指挥下，整支航空大队在早上7时40分左右都已在空中待命。传统的说法称林带领“大黄蜂号”的59架飞机朝240度方向飞去，因为那是敌人特混舰队的主要航线。但是一条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是朝265度方向飞行的，几乎是正西方向，而这条航线将使“大黄蜂号”的攻击群来到最后报告的日本舰队位置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或许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是什么。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当天“大黄蜂号”只有一个中队发现了敌人——而那个中队，即第8鱼雷机中队，全军覆灭了。林违反了规定，没有提交任何作战报告。未交报告可能是故意的，林不想承认他飞到了离最后报告的敌军舰队位置以北那么远的地方。

当天上午早些时候，“约克城号”与两艘姊妹舰分开，到东北方的“预定位置”回收返航的侦察机。这一行动使它脱离了攻击敌人的范围，它必须以25节的速度去与第16特混舰队会合。结果，弗莱彻直到8时38分才出动飞机，此时“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飞机早已上路。“约克城号”上有35架飞机升空，其中包括6架战斗机、17架俯冲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第3轰炸机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首先起飞，紧接着是“蹂躏者”鱼雷轰炸机，这种飞机需要滑过整个甲板才能带着马克13型鱼雷飞到空中。鱼雷轰炸机接到的命令是立刻朝敌人所在位置出击，它们后面跟着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起飞很顺利，9点过后几分钟，所有的飞机都已升空。“约克城号”的航空大队接到的命令是朝240度方向飞行150英里。如果没能找到敌人，就向北往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已知的朝中途岛前进的交会方向飞行。一切顺利的话，速度较快的SBD无畏式轰炸机和战斗机能够赶上鱼雷轰炸机，它们或许可以同时赶到敌军舰队上空，这样就能进行协同攻击。

无论怎样，美军的攻击力量都已升空。相比当天早上日本航空母舰上的行动，美军的起飞更加混乱。友永丈市大尉的108架直指中途岛的攻击机仅花15分钟就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四个飞行甲板上起飞，而且升空后迅速集合编队，以巨大且统一的队形朝中途岛进发。在1942年6

月，这一壮举是超出美军的能力的。“大黄蜂号”和“企业号”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才能让所有进攻的飞机升空。而且升空后，它们也没有集合，甚至不是朝同一方向飞的。每个航空大队都按照自己的队长独立制定的航行方案飞行，这些方案差异很大。让情形更加混乱的是，飞出去的机群无法保持在一起。许多美国飞机后来根本没有找到敌人，而另一些飞机以小而分散的队形抵达日本舰队上空，因此很容易被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集中攻击。

尽管如此，美军的飞机已经升空，而且正在朝敌军进发。敌军还未做出回应。结果证明，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大黄蜂号”上的无畏式轰炸机携带着1 000磅和500磅的炸弹，竭力缓慢爬升。驾驶舱内温度下降，身着轻薄夏季飞行服的机组人员冻得直发抖。氧气面罩上都结了冰霜。沃尔德伦少校的第8鱼雷机中队的15架“蹂躏者”在下面低空飞行，高度为1 500英尺。它们装载的马克13型鱼雷比炸弹还重，携带的燃料无法让它们爬升得更高，而且它们本来就要在低空攻击敌方舰队。整个航空大队已经离开“大黄蜂号”，最初是朝265度方向飞行，但沃尔德伦不同意林的航行方案，离开航母后不久，他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劝林朝南调整方向，朝240度方向飞行。林可能是拒绝了这个请求，也可能是没有收到信息，总之沃尔德伦朝左前方调整航向，向自己凭本能认定的敌军舰队所在处飞去。他的中队也一同转向。他们结队飞行了100英里。沃尔德伦给中队发出信号，示意展开队形，形成一条搜索线，以增加发现敌军舰队的可能性。9时15分左右，几个飞行员看到地平线上的天空中有一些黑点。几秒钟后，远方显现出了日本舰船灰色的轮廓。沃尔德伦调整航向，从低空接近日本舰队。[\[44\]](#)

盖伊少尉回忆道，当天早上进入驾驶舱之前，沃尔德伦跟手下的飞行员说，“大家不要担心航向问题，只要跟着他就好，他知道要往哪儿飞。而事实的确如此，他找对了方向。仿佛有一根线牵着他一样，他径直飞到了日本舰队上空”。[\[45\]](#)

对日本瞭望员来说，这支中队最先显示为一群黑点，在东北方地平线上很低的位置，偶尔会有机翼反射的阳光照过来。它们的飞行高度很低，表明它们是鱼雷轰炸机。根据渊田美津雄的回忆，同船船员的情绪低落起来——尽管此前日本舰队已经击退了很多不同类型飞机的一系列攻击，但那是因为走运，而好运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过日军的几艘航母已经回收完了袭击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因此可以自由机动，展开规避运动。它们开始躲避速度缓慢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延长了攻击者需要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零式战斗机从头顶和四面八方逼近，通过横转和翻筋斗调整位置，对来犯的美国飞机发出致命的射击。

沃尔德伦在林率领“大黄蜂号”航空大队其余的飞机糊里糊涂地朝西北飞去时，带领自己的中队直扑日本舰队，展现了他的鲁莽和技术。但是第8鱼雷机中队发现自己目前处境危急。能见度好，没有战斗机掩护，没有俯冲轰炸机来转移一大群灵活的零式战斗机的注意力，这群由缺乏准备的飞行员驾驶的老式飞机正在接近强大的敌军舰队。第8鱼雷机中队的行动，让我们想起艾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在他著名的诗歌里对克里米亚战争中轻骑兵的描述。两者都展示了绝境中迸发出来的无可匹敌的勇气。两者都采用鲁莽的战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白白丢掉了年轻的生命。两者都应归咎于指挥官糟糕的决策。（“可有一人惊慌失措？/ 哪怕战士知道 / 有人犯错了。”）盖伊少尉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沃尔德伦前一晚在“大黄蜂号”待命室的临别致辞。“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遇到有利的战况；但是如果战况不利，甚至糟糕至极，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摧毁敌人。哪怕只剩下一架飞机，也要战斗到底，我希望这个人能冲向敌人，并且击中他们。”^[46]不利的战况大多会发展成糟糕至极的局面，但是像丁尼生笔下的轻骑兵一样，“他们不问为什么 / 只知奉命行事 / 六百名轻骑兵进入了死亡之谷”。

零式战斗机用20毫米机关炮瞄准射击，美军动力不足的“蹂躏者”飞机的座舱顶篷上、机身上和机翼上被打出了许多洞。这些飞机一架接一架地起火、解体、爆炸，或者打着旋落到海里。后来，盖伊少尉在任务

报告里说：“那天，零式战斗机让我们无法招架。我们完全处于劣势。”^[47]沃尔德伦的飞机燃料箱被击中，燃烧起来。盖伊瞥见了队长从驾驶座上站起来，试图爬出来，但是时间不够，飞机直接坠入海中。盖伊的飞机被击中了几次，他自己也被机枪打中了胳膊，但他还是设法飞到了防空火力的范围之内，追击他的零式战斗机撤离了。渊田美津雄回忆道，在“赤城号”的飞行甲板上，“所有人都盯着眼前的戏剧性场面，当袭击者被陆续打下来的时候，甲板上到处都是疯狂的欢呼声和口哨声”。^[48]

盖伊逼近了“苍龙号”，从800码外发射了鱼雷，然后朝航母的尾部飞去，进入了重型防空火力的攻击范围。高射炮弹从他旁边飞过，但是他相信自己的飞机没有被击中。他诅咒着飞机上威力极弱的0.30英寸机枪——称这是一把“玩具枪”——接着他拉升飞机，高过航母，紧贴着上层建筑飞了过去。后来他说，从舰桥旁一闪而过时，他“看到一个小个子日本舰长边跳边喊”。他越过航母后降低高度，低空飞行，希望自己走运，能够返回，但是另一群零式战斗机从上方朝他射击，“射中了我的方向舵，打坏了副翼，我不得不在海上平降。引擎盖突然合上，我无法抬升右翼。右翼最先接触到水面，把飞机猛地拽了进去，机身整个卷起来，折断了。引擎盖关闭了，机翼戳进受损的机身里。我几乎无法打开座舱。这时我害怕起来。我害怕我会溺死在飞机中”。^[49]盖伊挣扎着爬到残存的机翼上面，抓紧了橡皮救生筏和气垫。他试着拉出后座的机枪手，但是没能成功，海水淹没了飞机；他也落入水中，尽可能让气垫挡住自己。

很快，眼尖的日本瞭望员发现南方出现了另一片黑点，位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正左方。这是“企业号”的第6鱼雷机中队，由尤金·林赛少校指挥。这群飞机进入日本舰队的外围防御圈时，分成了两组，从两边朝最近的航母“加贺号”的舰首飞去。四艘航母一致右转（向北转），使舰尾朝向缓慢接近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

“从后面追逐，过程会很长”，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海军格言，而且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句格言也是成立的——尽管最慢的飞机速度也能超过最快的船，但是这种飞机的速度仅比日本航母快四倍左右。要想对逃跑的航母实施左右夹击，仅仅赶上它们是不够的；鱼雷轰炸机必须飞到它们前面，然后兜一个圈，从两舷发动攻击。这种船尾追逐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而这是致命的，不过第6鱼雷机中队的老式鱼雷轰炸机追逐时可能会比第8鱼雷机中队容易一些，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零式战斗机已经聚集到了舰艇防御圈的北面，因为第8鱼雷机中队从那里发动了攻击，要想拦截第6鱼雷机中队，它们就得向南飞行约30英里；第二，一些日本战斗机在攻击沃尔德伦的中队时显然已经消耗掉了大部分20毫米弹药，因此在这一轮战斗中需要更加谨慎地射击。即便如此，第6鱼雷机中队也只有少数几架“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幸存下来。有两架飞机向“加贺号”的右舷发射了鱼雷，但是这艘航母轻松避开了来袭的鱼雷。第二批飞机由林赛少校亲自率领，碰上了9架零式战斗机，这些零式战斗机俯冲下来，击中了4架鱼雷轰炸机，其中就包括林赛少校自己的那一架。最后，第6鱼雷机中队有5架飞机成功撤退，其中4架安全降落在“企业号”上，有一架迫降在海上——几天之后，机组成员被PBY水上飞机营救了上来。

第6鱼雷机中队的少数幸存者离开时，日本军官和船员必然松了一口气，至少是有些信心了。从早上7点开始，他们相当于目睹了美国战机的航空表演——六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轮番上场，包括四种不同的单引擎舰载机、一种双引擎中型轰炸机、一种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不过当时日本人并不知道，攻击他们的飞行员分别来自美国的三个军种——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们经受了水平轰炸、滑翔轰炸和鱼雷的攻击。他们还第一次见到格鲁曼公司制造的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尽管这种新型的鱼雷轰炸机在战场上的首次亮相不那么精彩，但是在未来的三年里，它们将会给日本海军带来很多伤痛。日军没有一艘舰船受损，而且零式战斗机也轻松击退了几轮攻击，只损失了几架。

尽管如此，连续不断的空袭带来的压力，迫使日军中断飞行作业，加快战斗空中巡逻的循环频次，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始终处于守势。再

有20分钟左右，第一批日军轰炸机就能通过升降机抬到飞行甲板上，如果甲板能在大约45分钟内不受侵扰，那么日军就很可能在11点之前对美军舰队发动强有力的反击。但是在那之前，日本航母会处在极易遭受攻击的危险状态，因为它们的攻击机正在机库甲板上添加燃料，重装武器。

南云忠一将军和他手下的军官最担心的，也许是日本第一航空舰队还没有遭到过像样的俯冲轰炸。他们知道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美军最致命的航母舰载机。不到一个月之前，在珊瑚海战役中，俯冲轰炸机重创了“翔鹤号”，击沉了“祥凤号”轻型航母。因此，日本指挥官的心里肯定会问，美国无畏式轰炸机中队在哪儿？如果它们突然出现在空中，会发生什么？

“企业号”的第6侦察机中队（由威尔默·厄尔·加拉赫上尉指挥）和第6轰炸机中队（由理查德·哈尔西·贝斯特上尉指挥）组成的联合攻击群中的32架SBD无畏式轰炸机从特混舰队所在地朝西南231度方向驶去。飞行约100英里之后，航空大队的队长麦克拉斯基少校推断他已经穿过南云忠一进军中途岛的路线。麦克拉斯基猜测最有可能在西北方向发现敌人，于是两个中队向右转弯。半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日本舰队的迹象。此时燃料不足，没有飞机能返回美国特混舰队的危险在增加。快到10点的时候，两个中队再一次转弯，这次是朝东方飞行。目光敏锐的飞行员和机枪手透过云层的缝隙搜寻着舰船或尾流，任何能够发现日本舰队的迹象都不放过。[\[50\]](#) 他们的高度是1.9万英尺。“大黄蜂号”上的弗雷德·米尔斯少尉后来描述了在一望无垠、毫无变化的海上追踪敌军舰队的技巧：

有时航母舰队只是地平线上极小的点。有时大型船只的尾流或多条尾流形成的数条白色直线十分显眼。反射的阳光有可能显露舰队的位置，舰只也可能作为灰色的小长条突然出现在海面上。只要水面上出现了直线或其他规则的形状，都可以视作海水以外的东

西。[\[51\]](#)

9时55分，麦克拉斯基看到了一艘驱逐舰，后来确认是“岚号”驱逐舰。它位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南面，一直在追赶并用深水炸弹攻击美国潜艇“鹦鹉螺号”。它正朝北面急速航行，舰首激起了巨浪，长长的尾流泡沫翻滚。显然，“岚号”上的瞭望员并没有发现高空中的轰炸机。麦克拉斯基开始沿着“岚号”的行进路线追踪。5分钟之后，一些飞行员在前方约40英里的海上发现尾流——“几条细细的白线，只是细线，像粉笔画的。”他们在积云的上方飞行了几分钟。接近云层的缝隙时，下方整支敌军舰队都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看过去就像水池里的玩具船。克拉伦斯·迪金森写道：“在这些船中，我能看到两个狭长的黄色矩形，那是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很显然他们是让铺设甲板的木材保留了天然的颜色，或是涂成了淡黄色。但是，在这深蓝色的海洋中，那种黄色十分显眼，你以前从未见过。然后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我看见了第三艘航母。”[\[52\]](#)每一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都标有一个红色的太阳旗标志。迪金森记住了这一点，要把这里当作靶心。

麦克拉斯基向“企业号”汇报：“我是麦克拉斯基。已发现敌军。”[\[53\]](#)麦克拉斯基并没有径直朝敌军航母飞去，而是带领机群绕舰队迂回前进，向其东北方向飞去。他打算背对太阳发动攻击，希望这样能够隐藏他们的踪迹，并且使高射炮不易瞄准。他稍微降低机头，以加快速度，编队中的其他人也照做了——他们的速度越快，在遇到日本战斗机的时候就越有优势。他们直接飞越了外围的几艘警戒驱逐舰，但是这几艘舰艇上没有一个瞭望员发出警报，可能是天上的云彩遮挡住了他们的踪迹，也可能是从东南方向飞来的第三批鱼雷机分散了日本人的注意力，那些鱼雷机就在他们下方1.5万英尺的地方。

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是兰斯·E. 马西（Lance E. Massey）少校率领的“约克城号”的第3鱼雷机中队。马西率领的12架行动迟缓的飞机，跟第6和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机一样差劲，但是第3鱼雷机中队的优势在于

有战斗机护航——吉米·萨奇少校率领的6架F4F野猫式战斗机。萨奇是美国海军中最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发明了一组作战队形，称之为“追击防御”机动，后来更常见的名称是“萨奇穿插”战法。[\[54\]](#)这种战法是第一次在战争中投入实践，其结果对于经验丰富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来说，肯定是个令人不悦的意外，因为这些飞行员已经习惯于对美国的各种飞机为所欲为。这种战法需要长机和僚机之间密切配合。飞行员发现后半球有零式战斗机以其惯用的方式倾斜接近时，只要向内侧逃离即可。僚机看到相邻的野猫式战斗机朝自己驶来后，便朝其转向，两机穿插而过。这样一来，僚机便可直面零式战斗机，发动正面射击。

萨奇的F4F战斗机在大约2 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位于马西的TBD鱼雷轰炸机后方不远处。萨奇的6架战斗机被大约15架零式战斗机包围了。萨奇事后回想说，他当时觉得自己这边的飞机估计没有一架会在这场空战中幸存。但是他们的萨奇穿插战法似乎出乎日本飞行员的意料，于是头一次有零式战斗机拖着火舌翻滚着坠入大海。萨奇说：“好多零式战斗机成串朝我们扑过来，整个天空就跟蜂巢一样。刚开始我设计的穿插战法似乎没起作用，但是后来有效果了。我射中了两架零式战斗机，使它们燃烧起来。另外一架从我的僚机旁边飞过，转到了右侧，然后绕了回来。我们继续穿插，最后我从正面击中了它。”[\[55\]](#)

第3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汤姆·奇克回忆说他对零式战斗机的性能感到十分惊讶。当他对两架零式战斗机开火时，它们做出翻滚动作，脱离了他的视线，接着爬升躲开了。“它们的爬升能力让人极为震惊，我向右侧翻滚转弯时，它们几秒钟内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忽然想到，在近距离空战中不能跟这种飞机纠缠，至少不能驾驶笨重的F4F-4跟它们缠斗。”[\[56\]](#)

马西的“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勇敢地飞向“飞龙号”，这是四艘航母中最近的一艘，而且是唯一在射程范围内的一艘。尽管萨奇跟零式战斗机勇敢搏斗，但是他无法把所有的零式战斗机都从第3鱼雷机中队旁边引走。可能有十来架零式战斗机涌向鱼雷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将其击落

到大海中。第3鱼雷机中队的鱼雷全都没有击中目标，12架飞机中却有10架被击落。萨奇事后说：“日本人对我们和鱼雷轰炸机的第一轮攻击配合得非常漂亮。我不得不感到佩服。执行得非常漂亮。这是他们的第一梯队飞行员，他们非常专业。”[\[57\]](#)

高空中的“企业号”俯冲轰炸机中队正在接近投弹地点。麦克拉斯基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非常幸运的是，同一时间“约克城号”的第3轰炸机中队的17架SBD俯冲轰炸机也抵达了战场，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过来的：东边。日本舰队被对手两批俯冲轰炸机同时发现，完全没做好抵抗的准备。此时高空没有一架零式战斗机，因为所有的零式战斗机刚才都降低高度去击退鱼雷轰炸机了。而日本的四艘航母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为躲避连续的攻击不断机动，打乱了习惯的菱形编队，现在拉长成了不规则的长线，保护它们的零式战斗机因此分散开来，周边的警戒舰的防空火力也无法集中起来。[\[58\]](#)不管怎样，直到轰炸机呼啸着俯冲下来，日本特混舰队中才有人注意到它们，不过为时已晚。

麦克拉斯基的分队队长通过来回转动方向舵，让机尾“摇摆”，发出信号表示准备投弹。领头的无畏式轰炸机抬高机头，降低速度，打开襟翼，然后转向一边，以70度角高速俯冲，同时用光学瞄准器对准所选目标的飞行甲板。此时是10时20分。来自“企业号”的轰炸机冲向“加贺号”和“赤城号”；来自“约克城号”的马克斯韦尔·F. 莱斯利少校指挥的飞机则攻击“苍龙号”。攻击“加贺号”的迪金森上尉回忆说：“那是我最好的一次俯冲。回来的人也都说，这是他们最好的一次俯冲。我们从航空母舰的四面八方飞来，冲向它的左舷，间隔完美。”[\[59\]](#)“加贺号”正以28节的速度在海里疾驰，但是飞向它的炸弹数不胜数，而且是以理想的角度向下坠落。萨奇一边竭力跟零式战斗机缠斗，一边努力掩护第3鱼雷机中队剩下的两架飞机到安全地带，此时他瞥见“太阳冒出了一束闪光，看起来就像一道漂亮的银色瀑布，是俯冲轰炸机冲下来了……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俯冲轰炸”。[\[60\]](#)

“加贺号”飞行甲板上的船员还在为把鱼雷轰炸机打得七零八落的零

式战斗机欢呼。高射炮手把炮筒都调成了水平的，为的是打退低空的袭击。航母上有个站在舷边通道上的飞行员回忆道：“一位机关炮指挥官把指挥杖指向天空，大声喊着什么。我赶紧抬头，发现好几架俯冲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云间，朝我们冲过来。”^[61]好几个人大喊：“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第一组无畏式轰炸机朝“加贺号”的左舷舰尾冲过来，舰长冈田次作下令向右急转弯，让航母沿顺时针转向。但是“加贺号”对舵轮的反应比较慢，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稍做调整，仍然让飞行甲板处于瞄准范围内。日本船员惊恐地看着炸弹从轰炸机腹中径直朝他们落下来。前三枚险些击中，在“加贺号”的两侧溅起了巨大的水柱。但是紧接着又有四枚炸弹落下，两枚落向中部，两枚落向舰首。结果带来了一场灾难。^[62]“加贺号”的小型上层建筑几乎全部被毁，大部分军官被炸死，其中包括舰长冈田次作。舰岛的窗户被炸飞，外壳脱落，内部到处都是浓烟，幸存者被迫转移到甲板上。没有人掌管舰桥，也没有人留下掌舵。前部的升降机被直接炸到，塌了下去，再也无法运行。一枚炸弹炸穿了船体中部的飞行甲板，在靠近机库的船员舱爆炸，在几秒内就炸死了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船员。机库甲板上的燃料罐和军火也被引爆了。前田少尉在飞行甲板下方靠近舰尾处寻找掩护。炸弹落下时，他朝船舱里的其他飞行员大喊：“这里很危险，赶紧离开！”^[63]沿着梯子往上爬时，他注意到“加贺号”发生了危险的倾斜；紧接着一次爆炸把他震到甲板上，弹片刺穿了他的一条腿。

迪金森上尉投下的炸弹落在了升降机附近，他看到“甲板猛地裂开，朝四周卷起来，露出了下方一大块机库。我知道那艘航空母舰上已经很久没有飞机起飞或降落了”。^[64]萨奇一直在野猫式战斗机的座舱中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到“加贺号”飞行甲板上冒出了粉色和蓝色的火焰：“我记得自己看到那艘航母冒出了火焰，高度差不多赶上它的长度了——真是熊熊大火，当然，还有很多浓烟。”^[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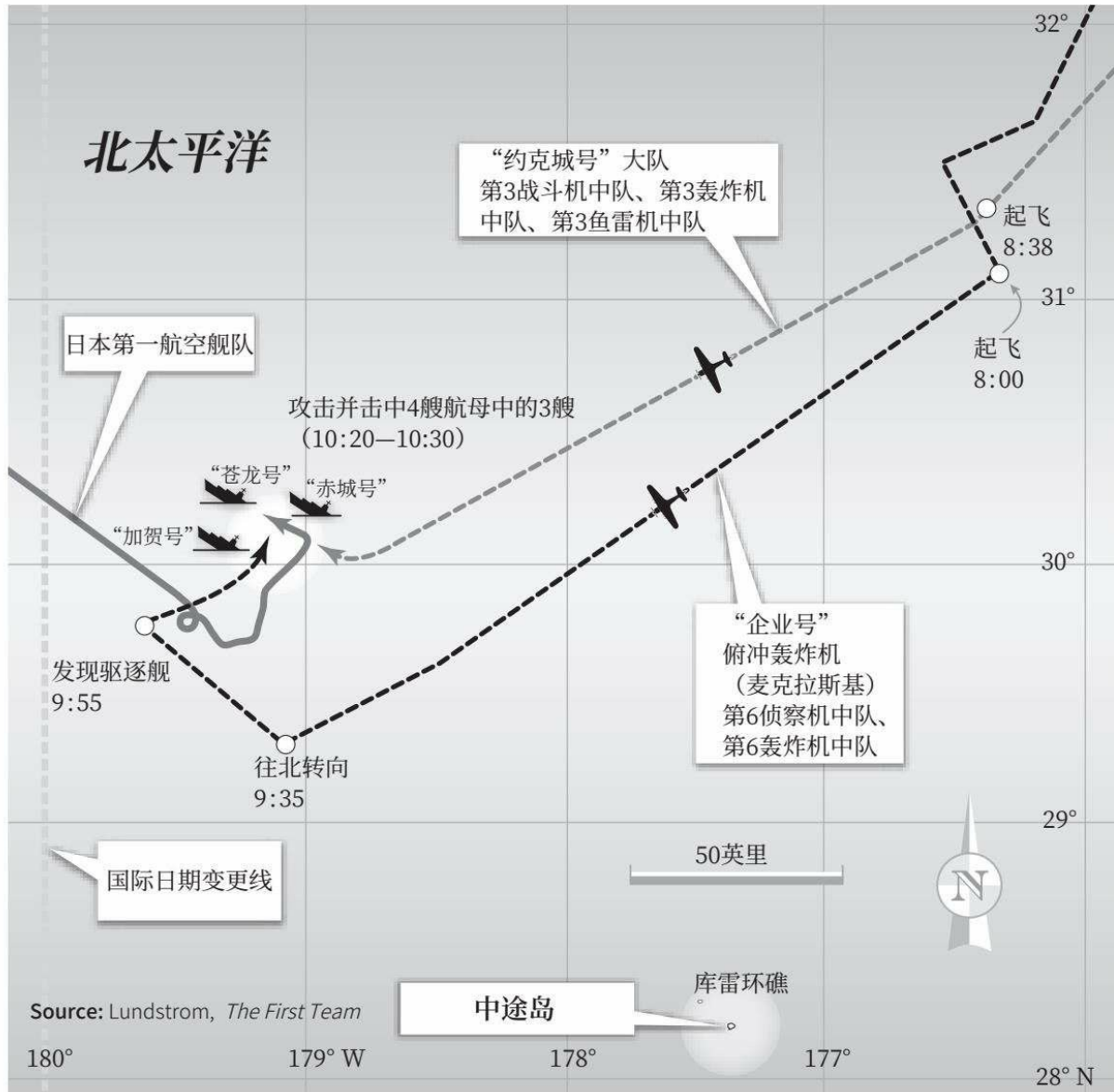
“苍龙号”刚刚开始迎风转向，准备让零式战斗机起飞，而且大部分的船员都在观察鱼雷轰炸机进攻的方向，就在这时，瞭望员大喊说“加贺号”遭到了攻击。船员们转过头来，看见“加贺号”的飞行甲板在一连串的爆炸中被掀了起来，都惊呆了。空中的一朵朵云彩显然是挡住了莱斯利率领的“约克城号”的轰炸机的最后一段行动，但是现在，它们从云层的缝隙中露出来了——轰炸机彼此之间的距离相等，显然是要俯冲了。“苍龙号”的高射炮很快调整好了炮筒，紧张忙碌的射击指挥官试图布置射击方案，但是跟“加贺号”上的情况一样，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这一切。“苍龙号”急速左转，但是俯冲下来的飞机也随着一起转，片刻之后，它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编队，大角度俯冲。

第一枚炸弹落在了右舷靠前的位置，冲击力让整个船身向左晃动。另一枚炸弹落在了船体几乎正中间的飞行甲板上，击穿了木板和钢壳，在机库甲板上爆炸了。第三枚炸弹落在了舰尾的飞行甲板上，发出刺眼的火光。甲板上很多人一下子就被炸死了，或是被炸飞了。副舰长小原尚中佐感到一股热浪袭来，不是特别疼，但是看到船员急忙拿来湿毛巾捂在他脸上，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严重烧伤了。[66]

“苍龙号”的引擎停了下来，完全不动了。飞行甲板被炸开的口子上冒出了一股浓烟。解体的零式战斗机烧焦的残片和尸体碎块七零八落地散落在整个甲板上。幸存者透过热浪看见了这些可怕的场景。

南云忠一将军的旗舰“赤城号”差一点就被美军的俯冲轰炸机盯上了。这是由于麦克拉斯基的战术出现了失误，他刚从战斗机中队转到俯冲轰炸机中队。按照作战原则，当俯冲轰炸机的两个编队到达多个目标附近时，前面的编队应该选择两个目标中较远的那个。但是麦克拉斯基带着他的编队前去攻击“加贺号”，两个中较近的那个。结果，这个由32架飞机组成的机群几乎集中全部火力攻击“加贺号”，而忽略了“赤城号”。

“企业号”和“约克城号”上的俯冲轰炸机 伏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1942年6月4日



第6轰炸机中队的队长迪克·贝斯特上尉见此情景，带领两架僚机去攻击“赤城号”。由于没有时间调整好角度攻击，他们的俯冲角度比攻击“加贺号”的飞机角度要小，所以这三架飞机面临的危险更大。他们并没有按照规定的动作，以均匀的间隔依次发动攻击，而是在整个俯冲过程中都保持着“品”字形编队。

“赤城号”甲板上的瞭望员惊恐地大喊，喇叭中传出刺耳的警报声，但是高射炮反应迟缓，而且发射出的少量炮弹也大大偏离了目标。几个自我保护意识强、警惕性高的船员赶紧趴到甲板上。舰长青木泰二郎赶紧调整航向，猛烈右转，但是这样做无非是让左舷正对着攻击者而已，攻击者做出必要的调整，便锁定了目标。第一枚炸弹紧贴着船身落入水中，激起高高的水柱，水花落下来的时候打在舰岛上，把这里的军官全身都打湿了。尽管没有命中，这枚炸弹爆炸时还是把甲板上的人都震倒了，而且其掀起的热浪足以灼伤他们的皮肤。

只有一枚炸弹命中了“赤城号”，落在飞行甲板靠近中间的位置。那很可能是贝斯特投下的1 00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中间的升降机。如果这枚炸弹没有击中，那么整场战役的进程都可能会改变，因为那样的话日本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发动凶狠得多的报复。但是贝斯特投放的炸弹不仅击中了目标，而且还穿透“赤城号”的飞行甲板，到达了上层机库甲板，炸弹的破坏力大大增加，因为机库甲板上有加好燃料的攻击机、燃油管里的燃料、仓促堆放的炸弹和鱼雷，这些东西产生了二次爆炸。渊田美津雄看到“飞行甲板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就在船体中部升降机的后边。升降机自身就像熔化了的玻璃一般弯曲变形，化为液体流到机库甲板上。钢板以奇怪的形状向上卷曲起来。飞机机尾朝上，喷射出青灰色的火焰和乌黑的浓烟”。[\[67\]](#)

“赤城号”机库甲板上的下山要描述了这一连串的灾难性爆炸。“爆炸发生得太快了，”他回忆说，“机库甲板上很黑，但是很快淹没在一片火海中……我觉得我们的航母随时可能下沉。我看到一些人无法保持镇静，很快失去了自制力。他们像疯了一般想逃出去。”[\[68\]](#)飞行甲板上有几架零式战斗机被炸得飞了起来，落入大海。铃木宏记得，大火引爆了一些停着的零式战斗机的油箱，还点燃了飞机上的20毫米机关炮，导致它们开始射击。他回忆说：“由于热度太高了，钢板上的铆钉就像子弹一样开始弹出。我有个同伴就被空中乱飞的致命铆钉击中而受伤了。”[\[69\]](#)第三枚炸弹差点击中“赤城号”的船尾，不过也在边上爆炸了，

这次爆炸导致飞行甲板猛地向上掀起来，而且还使方向舵卡在了左舷20度的方向上，使这艘旗舰无助地在海上转起了圈子，直到完全停下来。[\[70\]](#)

萨奇中队的F4F飞行员汤姆·奇克为了甩开身后的零式战斗机，俯冲到了海平面上。他紧贴着浪尖水平飞行，机头正好对着航空母舰群。奇克看到“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分布在发动机罩上方的地平线上，而且通过船头激起的波浪判断出它们正在全速前进。几乎就在同时，他看到“赤城号”的甲板上发出一束“明亮的橘黄色闪光”，紧接着还有激起的水柱，表明有近失弹紧贴着“赤城号”落入海里。几秒钟之后，一个“滚动的、发绿的黄色火球”像是“掀开了那艘航母内部的最深处”。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一系列爆炸似乎笼罩了“加贺号”的整个飞行甲板，甲板“在爆炸时随着火焰被掀起来了”。[\[71\]](#)在“赤城号”的右前方，“苍龙号”喷出了一股油乎乎的黑烟。他也注意到，三艘航母舰首的激波大大减少了，表明它们已经失去了推动力。

到10时26分，三艘航母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都不能再让飞机起降了。第二天早上，幸存的船员不得不遗弃这三艘航母，让其残骸沉入海底。

这三艘遇袭的航母熊熊燃烧的时候，美军的航空大队迅速脱离了试图报复的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火。所有往回撤的飞机都在低空飞行——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刚从低空发射了鱼雷，野猫式战斗机则一直在掩护鱼雷轰炸机，而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刚刚进行完俯冲轰炸，已拉升至海面上方几百英尺的空中。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已经完成了投弹，油量也减少了，因此更轻、更快，也更容易操纵了。许多飞机从警戒舰之间穿过，安全逃脱。迪金森上尉完成对“加贺号”的俯冲轰炸并重新拉升的时候，距离海面不到100英尺。他回了一下头，发现有三架零式战斗机跟在后面。一艘驱逐舰就横在他前面，上面的高射炮开始朝他射击。高射炮弹在他的上方和下方炸开；他一会儿俯冲，一会儿爬升，

躲避按着提前量开火的炮弹。飞了两三英里之后，他摆脱了零式战斗机，也飞出了高射炮的射程，这时他又回头看了一下，看见三根火柱和烟雾，标明了“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的位置。

第3战斗机中队的汤姆·奇克在一场激烈的空中混战中与僚机分开了，此时他听到了无线电传来命令——“全队集合！集合！”——但是透过挡风玻璃，他没有看到中队的任何伙伴，也没有看到任何友机。事先安排的集合点位于日本特混舰队以北20英里的地方，但是那个方向上敌舰更多，而且奇克的燃料不够了，只能直线返回。他选择了一个似乎有可能带他回到“预定位置”的航向，最终，他看到了自己的航母“约克城号”。[\[72\]](#)

美军的航空大队分散在天上，有的单独飞行，有的组成小编队飞行。有些飞行员被射中，或是被弹片划伤，在他们的飞行服下，伤口在流血。驾驶舱内的环境越来越难以忍受。飞行员忍耐着高温，忍受着流入眼睛里的汗水，以及心理和生理上的疲惫，还有难受的飞行面罩。没有一架飞机有多出的燃油，很多飞机所剩的燃油甚至不够返程。从离开战场的那一刻起，这些美国飞行员就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用有限的燃料储备返回航空母舰。每一位飞行员都需要根据众多变量不断修正航线，这些变量包括自己的位置、航速、航向、风向和风速，还有估算的航母的速度和航向。他要密切注视六个仪器的读数，包括燃料、时间、转数、航速、进气管压力，还有针球仪。风速的计算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飞行员要研究下方的海面，判断风对波浪的影响，注意浪花上是否吹起了泡沫。[\[73\]](#)

理论上讲，美国飞机能够追踪“YE-ZB”无线电归航信标，这是各艘航空母舰发射的加密信号，飞机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所在的舱内有个接收机可以收到。如果飞行员接收到清晰的信号，他就能沿着信号的方向直接飞回航母。但是此时许多美国飞机都是低空返回的，低于航母顶端天线的信号波束。燃料箱里的油量已经低到了危险的程度，它们不能爬升到航母天线的信号波束上方寻找归航信标，只能通过估算找到

返航的路线。

迪金森上尉的燃料不够了，不能搜寻同伴，所以他驾驶着无畏式轰炸机独自往回飞。即使把燃油用到最大限度，他也基本无法到达预定位置；而且即使他能抵达舰队，他也拿不准能否有充足的燃料着舰。此时能见度极好，他一路向东飞行，看到前面很远的海上出现了船只的尾流。大约还剩20英里的时候，迪金森飞机燃油表上的箭头归零了，引擎“开始发出噼啪声，间歇性停转”。[\[74\]](#)他开始下降。他解开降落伞，清理了一下上面的绳子，切断头盔上的无线电线，清除了可能阻碍他离开驾驶舱的所有装置。借助最后一点点燃油，他把飞机调为逆风而行，放下襟翼，落到距离浪尖只有几英尺的高度，机头朝上，最后猛地推了一下节流阀，然后停下来。飞机的螺旋桨在风的作用下转动着，让这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迫降在了海上。

出乎意料的是，碰撞非常猛烈，迪金森用手按住仪表盘来保护头部。几秒之后，他解开安全带，爬出了驾驶舱。他站在飞机的右翼上，拉下二氧化碳气瓶的牵索，给救生服充气。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爬到了另一侧的机翼上。他们没有费心去给橡皮筏充气，因为距离舰队很近，他们觉得很快就能被救起。他们走入了大海。螺旋桨和引擎罩被引擎的重量拖进海里，湿淋淋的机尾翘起来，然后飞机就从视线里消失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一艘美军驱逐舰已经在朝他们靠近，船员们惊奇地看着他们。

奇克返航的高度是1 500英尺，刚好处在云层下方，他希望能看到美军特混舰队的船只。他没有尝试通过无线电跟中队的同伴联系。他找不到“约克城号”的归航信标。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能看到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北太平洋。最后，他在右翼梢外看到了“灰蓝色的海面上有一道浅浅的白色条纹”。那是一艘“真正的美国造的驱逐舰”。他转向紧跟着它，高度降为500英尺，最终赶上了“约克城号”。他进入了着舰航线，放下起落架，第一次进场时，降落信号官亮出了许可的手势。他的尾钩没有钩住阻拦索，飞机越过防撞路障，翻了个跟头，倒在甲板上。奇克

将身体抱成一团，护住头部，碰撞过程中没有受伤。船员跑过来检查状况，他大喊道：“快把这个该死的东西从我身上挪开！”^[75] 船员们抬起飞机的尾部，奇克才得以爬出来，来到甲板上。

由于航母上的船员没有看见战斗场面，他们自然很想听归来的飞行员讲一讲都发生了什么。当飞行员从座舱里爬出来时，穿着肥大的帆布救生衣的船员围拢在飞行员身边问这问那。为了鼓舞船员们的士气，舰桥上的军官之前一直通过扬声器定期播报最新战况，船员们都高度关注这些公告。阿尔文·柯南回忆说，在战役中的某一时刻，“‘企业号’上的一个情报官用粉笔在烟囱的深灰色外壳上画了一幅地图，好让甲板上的所有人能及时了解战况，我们觉得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很有意思；不过每隔15分钟，烟囱垂下来的平台上的那个人都要修改舰队的位置和规模”。^[76] 然而真实情况是，没有一个人能准确了解战斗是如何展开的，即使是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两位将军也不例外。战场太大，太分散；同一时刻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且能够搜集起来的那一点数据，拼起来之后可能可靠，也可能不可靠。他们都在战争迷雾中摸索着。

对于那些安全归来的飞行员来说，幸存以后的感受苦乐参半。他们失去了很多战友。在“大黄蜂号”上着舰后，费希尔少尉非常震惊地获悉，到当时为止，他是第8轰炸机中队唯一返回的飞行员，而这艘航母的其他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也下落不明。^[77] （之后没多久，林和第8侦察机中队的大部分飞行员也安全着舰了。）第8轰炸机中队的另一位安全返回的飞行员罗伊·P. 吉（Roy P. Gee）少尉得知这艘航母的航空大队遭到的损失后，同样很震惊。他说：“当我进入第8轰炸机中队的待命室时，我得知第8鱼雷机中队的15架TBD和第8战斗机中队的10架F4F都没有返回，而且所有的船员都被宣布在战斗中失踪，我简直是太震惊了。我去军官餐厅找了些吃的，平时第8战斗机中队和第8鱼雷机中队的的朋友都坐在这里，而此时座椅上空无一人，我不禁怔住了。”^[78] 迪金森上尉被驱逐舰救上来后，通过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降落在“企业号”上的飞机，试着看到飞机上的编号，好知道同伴里有谁活下来了。在“企

业号”上，战斗机率先返回，全部着舰，完好无损。不久之后，4架鱼雷轰炸机着舰，它们身上都是弹孔，严重受损。这个中队只有这4架鱼雷轰炸机幸存。对于没有战斗机护航这件事，有个返回的TBD飞行员非常愤怒，竟然从座舱里跳出来，拔出手枪，威胁说要打死F4F中队的队长詹姆斯·格雷上尉。周围的人赶紧按住他，夺走他的武器。^[79]

飞行员又累又饿，身上满是汗水。他们径直走向“将军的食品储藏室”，去找咖啡和三明治。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作所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飞行员来到船上，情况渐渐清晰起来：他们给了日本舰队致命的打击。“企业号”的SBD俯冲轰炸机中队着舰后，机组成员都欣喜若狂。飞行员们叙说刚刚的经历时，柯南越来越兴奋，他回忆说：“他们跳出驾驶舱的那一刻，高兴地大喊大叫。就在片刻之前，船上的气氛还很沉郁，鱼雷轰炸机返回后，阴霾一扫而空。这些英雄身着卡其色和绿色尼龙飞行服，黄色救生衣上插着手枪和短刀。他们快速地比画着，兴奋地说着如何俯冲，投下炸弹，并且亲眼看到下方的日本航母的飞行甲板在火焰中炸毁。”^[80]随着越来越多的飞机着舰，一个接一个的目击者证实了这些说法。奇克告诉中队的队长：“一共有三艘航空母舰。我看见三艘航母都被炸弹击中，我想有枚鱼雷也击中了其中一艘。我离开时，三艘航母全都在猛烈地燃烧。”^[81]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黄蜂号”的鱼雷轰炸机一架都没有出现，这艘航母上的气氛变得低沉起来。有人说沃尔德伦的中队或许已经在中途岛着陆了，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所有人都知道“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缺陷。但是“大黄蜂号”的战斗机又遭遇了什么？没人说得上来，而且一连好几天都没人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当天早上“大黄蜂号”的航空大队损失惨重。所有的鱼雷轰炸机都被击落；战斗机迷失了方向，被迫在海上紧急降落；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未能找到敌军舰队，不过大部分幸存了下来，要么在中途岛着陆了，要么安全返回了航母。总而言之，“大黄蜂号”上所有的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都被击落，战斗机损失了1/3，有1/3的俯冲轰炸机在中途岛着陆，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返回

了航母。除了沃尔德伦的第8鱼雷机中队里的15架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之外，“大黄蜂号”上没有一架飞机与敌军交战，而全军覆没的第8鱼雷机中队没有一枚鱼雷击中敌军航空母舰。

在三艘遭到轰炸的日军航母的甲板下面，船员正同猛烈的大火进行殊死搏斗。即使机库甲板上没有停满加满了油、装载了炸弹和鱼雷的飞机，每艘航母上也都有其他易燃品，让大火难以熄灭。航空加油系统有一个充满燃油的管线网络，可燃性极高，这套管线把大火传遍了整艘航母。大火不仅向前后蔓延，还烧向更低层的甲板，一直烧到主储油箱。炸弹、鱼雷和其他弹药被堆放在机库甲板的架子上，甚至被随意地堆放在甲板上，其中许多都在船身内部发生了爆炸。日本海军过于重视进攻战，忽视了消防和损管的训练和准备。舰艇内部的物品给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烧物——木质地板和缆具、支撑用的木梁、棉质的管道绝缘材料，以及棉被。厨房和烤炉里覆盖着厚厚的油脂。机库甲板上安装着防水带和泡沫喷射系统，但是它们都由总水管供水，而总水管很容易在爆炸或火灾中损坏。[\[82\]](#)

“加贺号”被4枚（也可能是5枚）炸弹击中，是三艘航母中受损最严重的。火焰的旋涡吞没了机库甲板，引爆了飞机上和储藏室里的炸弹和鱼雷。烧焦的、残缺的、扭曲的肢体散落在整个甲板上。遭到攻击时，机库甲板上的船员中仅有几个幸存下来。消防主水管损坏，驱动消防泵的发电机也坏了。封闭的空间内满是烟雾，灯也灭了。主燃料管爆裂，航空汽油喷洒到火焰里，引起了一场炼狱般的烈火。一些严重烧伤的幸存者在同伴的遗体之间爬过。

“加贺号”上的火势蔓延太快，根本就无法控制。许多接受过消防训练的人已经被炸死，剩下的也受伤严重，无法有效灭火。森永隆吉（Takayoshi Morinaga）大尉是中岛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回忆道，他和其他的幸存者还曾英勇地用传递水桶的老办法控制火势，但是“水蒸发得很快，不起任何作用”。[\[83\]](#)攻击发生两三分钟后，机库甲板上

的弹药被引爆，翻滚的火球和蘑菇云升到航母上方几千英尺的高度。两舷因爆炸而裂开，产生一股往外的力道，把尸体、碎片和飞机的零部件都抛入了大海。另一名中岛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吉野治男少尉说：“数不清的爆炸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晃动着‘加贺号’。我恢复意识之后，再次环顾四周，片刻之前还在这里的人全都消失了。”^[84]

“苍龙号”上的状况跟“加贺号”很相似。三枚炸弹穿透了机库甲板，机库甲板上的船员大都毙命，燃料和弹药的二次爆炸也很快就不受控制了。不知是偶然还是运气，这三枚炸弹各自击中了机库甲板的三个单独的舱室，把整个机库甲板都破坏了。在航母下方很深的轮机舱里，船员们听到了上方巨大的爆炸声，意识到他们与露天甲板之间已经是一片火海，他们出不去了。长沼道太郎（Michitaro Naganuma）大尉回忆说，爆炸使得上方的甲板向下弯曲，炽热的火舌从通风管道里喷出来。温度迅速攀升，能够呼吸的空气突然减少。^[85]遇袭后不到15分钟，“苍龙号”上的军官就断定这艘航母基本没救了，柳本柳作舰长下令弃船。^[86]很多船员都预计到了会有这道命令——或者说，在还没有收到命令的时候，船员就弃船了。由于无法忍受火焰的温度，船员们从甲板上跳向大海。还有一些人是在被爆炸的冲击波直接炸到海里的。

“赤城号”只遭到了一枚炸弹的直接攻击，所以起初看起来不像其他的两艘航母那样损坏严重。但是这枚炸弹引发了机库甲板上一系列威力强大的二次爆炸，它便在劫难逃了。火势迅速蔓延，消防队根本无法控制，被逼后退。大火切断了总水管，也破坏了水泵的电力系统。^[87]青木舰长下令往弹药库里灌水，但是水无法流入舰尾的弹药库，可能是因为近失弹把阀门炸坏了。大火开始向下蔓延，进入下层的机库甲板，那里有更多的燃料，加剧了火势。船员只能用手泵压水。没有足够的水扑灭火焰。渊田回忆说：“戴着防毒面具的消防队携带着笨重的设备，勇敢地与火焰战斗。但是上方的每次爆炸都会波及下层甲板，造成人员伤亡，阻碍消防队的救援。一组战友倒下后，另一组会冲上去继续战斗，但是他们又会被另一场爆炸炸死。”^[88]九九式轰炸机飞行员古田清人

中尉回忆说船上的发电机坏了，“我们的消防泵不起作用，而且即使能用，也不可能扑灭这场大火。因此我们放弃了灭火的想法”。^[89]

很显然，“赤城号”不能再作为南云忠一的旗舰了。飞行甲板上的大火有烧毁舰岛的危险。南云忠一不愿意离开，他坚持认为“还不到离开的时候”。但是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强烈建议他把司令旗转移到轻型巡洋舰“长良号”上：“将军，我们的大部分船只仍完好无损。你必须指挥它们。”青木舰长补充道：“将军，我会照看好这艘船的。我们都请求你把司令旗转移到‘长良号’上，继续指挥舰队。”^[90]南云忠一含泪同意了。舰桥里充满了烟雾，下半部已经燃起了大火。唯一的逃生路线是从舰桥前面的窗户顺着绳索降到甲板上。南云忠一和草鹿龙之介就是这样下去的。10时46分，两名将军又沿着绳梯从锚机甲板进入等候室，等着被护送到“长良号”上。^[91]

在第二航空战队的旗舰“飞龙号”的舰桥上，山口多闻及其参谋惊恐地看着三艘燃烧的航空母舰，感到难以置信。第二航空战队的另一艘航母“苍龙号”就在附近，它在毁灭之前的痛苦挣扎历历在目。目击者把它比作“一个大白萝卜被劈成两半。现在都能透过它看到另一边的情景”。山口发出了一条完全无用的消息：“尝试拯救你们的航母！”^[92]（山口没有收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这本身可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答复了。）在其舰尾几英里外，第一航空战队的两艘航母也浓烟滚滚。“飞龙号”是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仅剩的能够执行飞行任务的航空母舰，现在日本海军的整个希望都寄托在它的航空大队身上。

山口多闻做出了当天上午早些时候南云忠一始终未能下决心做出的决定，他选择把手头的一切力量都用上，尽快对敌人发动攻击，不再等飞机装好弹药，也不去管弹药类型是否均衡。让飞机赶快升空，既是一种防守措施，也是攻击措施——“飞龙号”姊妹舰的命运很好地诠释了，如果着舰的飞机加满了燃料，挂满了弹药，未能起飞就遭到袭击，会有多么惨痛的下场。他的航母有18架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瓦尔”），已经加满油，装好了武器，他命令这些飞机立即升空。“飞龙号”上的中岛九

七式鱼雷轰炸机准备好之后，也会立即起飞。如果它们能发现并消灭美国的所有三艘航母，那么袭击中途岛的行动还有可能继续。哪怕只消灭两艘，如果“赤城号”能从火灾中抢救过来，这场战役也能打成平局。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军已经有三个飞行甲板着火了，因此“飞龙号”的航空大队安全返航变得倍加重要。山口告诫飞行员不要无谓地冒险，要尽最大努力把飞机带回航母。

快到11点时，18架“瓦尔”和6架零式战斗机起飞并开始爬升。此次攻击由小林道雄大尉指挥，飞机一直在云层下飞行，确保一直能看到大海。此时他们距美国的航母不到100英里。他们出发后不久，“筑摩号”上的5号水上飞机报告说：“敌军位于70度方位，离我们的舰队约90英里。”^[93]小林略微向南调整了一下航向。一些飞行员发现低空有一队俯冲轰炸机，这是查尔斯·韦尔（Charles Ware）上尉指挥的“企业号”机群。6架零式战斗机离开编队，俯冲去攻击这些轰炸机。韦尔指挥的无畏式轰炸机表现得很好，一边保持密集队形，一边向零式战斗机开火反击，击伤了其中的两架。（这两架零式战斗机都返回了“飞龙号”，不过其中一架迫降在海上。）这次交火削弱了小林的攻击力量，使其损失了1/3的护航战斗机。

第17特混舰队的雷达探测到了来袭的日军飞机，距离为32英里，方位255度。“约克城号”上的雷达还探测出敌机正在爬升，这样似乎可以确认是敌军的俯冲轰炸机。“约克城号”上的战斗机指挥官奥斯卡·佩德森少校指示野猫式战斗机在“10级”（1万英尺）的高度进行拦截。无线电通信中传递着兴奋的声音，说的都是行话。高度以“级”为单位，1 000英尺为1级。方位用“航向”或“箭头”表示。身份不明的飞机为“可疑飞机”。一旦被确认为敌机，则改称为“匪徒”。“约克城号”被称作“红色基地”。F4F巡逻分队分别是“红”（“约克城号”上的）、“蓝”（“大黄蜂号”上的）和“深红”（“企业号”上的）。飞行员确认战斗机指挥官的指令时会说Roger（“收到”）或Wilco（“遵命”）。美国飞行员发现敌机时会大喊：“发现目标！”从后来根据录音整理的6月4日“约克城号”战斗机

通话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场战役的早期，混乱和误报无处不在：

“红17，从你当前位置看265箭头。告知收到与否。”

“红17。遵命。”

“红17，在你前面不远处有匪徒，密切关注。”

“红17。收到。”

“这里是深红17。一架可疑飞机，4级，距离20。”

“这里是深红17。等一下。是友机。”

“深红17。重新在上空巡逻，就位后回复。”

“这里是深红17，已就位。”

“红26，红23。箭头295，20英里，5 000英尺。确认。”

“这里是红23。遵命。”

“这里是红26。遵命。”

“红26，红23。最好升高到约8 000，有不明身份的可疑飞机。”

“这里是红23。遵命。”

“红26，红23。箭头180。确认。”

“这里是红23。遵命。”

“这里是红26。重复一遍。”

“红26，红23。箭头180。快一点。确认。”

“这里是红26。遵命。”

“红26，红23。云层中有匪徒。快一点。”

“红21270。。告知云层高度。”

“这里是红21。遵命。”

“红13和红11。匪徒在你们附近，注意云层上下。”

“这里是红13。已确认是友机。”

“收到。返回战斗位置。”

“这里是红13。遵命。”

“所有深红飞机，密切监视来自255的可疑机群。”

“深红9，带领分队寻找255的可疑飞机。看起来是一大群。”

“这里是深红9。收到。”

“深红19到23。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深红23。多架可疑飞机，10级，箭头305。快一点。”

“20个匪徒正在从305接近。30英里，一大群匪徒。”

“深红19。关于匪徒有何情报？”

“我头顶有匪徒正在朝船前进。看起来有18架。”

“离船约12英里，255。”

“所有深红飞机，匪徒8英里，255，10级。”

“匪徒方位255，距离8。”

“这里是深红19。编队似乎散开了。飞机仍朝相同路线飞行。”

“好的，分开它们。”

“深红19，准备攻击约5英里外的3架敌军轰炸机。”

“发现目标！” [\[94\]](#)

正午时刻，“约克城号”战斗空中巡逻的指挥官埃尔伯特·麦卡斯基中尉在7 000—8 000英尺的高度发现了小林的攻击队。他迎面飞向敌军编队，同时开火迫使日机紧急向左右分散，以免碰撞。后来他说：“我

的6挺0.50英寸机枪猛烈射击，直接从对方编队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没有使用瞄准器，而是在近距离射击的。”^[95]他身后的两架飞机也是边飞边开火，命中了好几下。在接下来的空战中，美军战斗机击落了7架敌军轰炸机，击伤3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对野猫式战斗机发动攻击，结果非常糟糕——三架坠落，只有一架美军飞机被击落。

“约克城号”上的船员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空战，看见多架起火的飞机旋转着落入海中。每一架飞机都在海面上留下一道燃油起火的耀眼痕迹，几秒钟之后变成黑烟。但是从“约克城号”的位置看过去，无法判断哪一方占优。当高射炮弹爆炸的黑烟开始出现在迎面而来的飞机旁边时，吉米·萨奇朝第3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大喊：“回到待命室！山姆大叔花了那么多钱才让你们来到这里！”在没有窗户的封闭待命室里，飞行员看不到空战的情况，但是通过防空火力的声音，他们能判断出敌机在接近。汤姆·奇克说：“5英寸高射炮的声音，表明有攻击者接近；接下来响起的是1.1英寸火炮的砰砰声，然后是20毫米机关炮的突突声，最后是0.30英寸和0.50英寸机枪的嗒嗒声。”随着敌机越来越近，开火的频率和强度都会上升，“直到防空火力变成连续不断的隆隆声”。^[96]

只有7架俯冲轰炸机穿过了美军战斗机的防线，对“约克城号”展开进攻，但这7个飞行员是日本航母的第一梯队，而且他们非常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他们从几个不同的方向飞来，然后脱离编队，大幅度俯冲，似乎完全不受防空炮火的干扰。“约克城号”猛地向左转以躲避飞速降临的攻击者，船体向右舷方向剧烈倾斜。第一架俯冲的爱知九九式轰炸机刚投下炸弹就被高射炮击中，爆炸后裂成三块燃烧的碎片，落入“约克城号”的尾流中。但是它投下的剧烈旋转的炸弹不偏不斜地飞向目标，击中了“约克城号”舰岛后方不远处的甲板，炸死了1.1英寸高射炮炮台上的所有人，也正是这些炮手击落了投弹的飞机。这次爆炸在飞行甲板上炸开了一个洞，在机库甲板上引发了大火。第二架飞机也被防空炮击中并解体，它投下的近失弹在舰尾后面爆炸了。第三架飞机以75度角呼啸着俯冲过来，它的炸弹也差点命中，在“约克城号”舰尾旁边溅起一束高

高的水柱。

几秒钟后，第二群“品”字形编队的飞机呼啸着向右舷俯冲过来。第一架飞机的炸弹也是落在舰尾附近，差一点命中。第二架飞机投下的炸弹落在了接近航母中心的位置，这枚炸弹重250千克，在飞行甲板上面炸开了一个大洞。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命中的炸弹，是一架飞行角度较低的飞机投掷的，这架飞机从“约克城号”右前方飞过来，击中并炸毁了前部的升降机。机库甲板上的熊熊烈火有引燃航空汽油罐的危险，甚至有可能蔓延到弹药库，那样的话，“约克城号”将和当天早上被击中的三艘日本航母遭受一样的命运。但是“约克城号”的机库甲板比日本航母的机库甲板防火性要好得多。尤其重要的是，燃料管已经排空，充满了二氧化碳。

第一次爆炸穿透了通风设备，舰桥和舰岛上的其他地方都充斥着有毒的刺激性烟雾。弗莱彻将军和参谋人员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去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而且弗莱彻马上就考虑转移旗舰。他说：“我不能在一艘废船上指挥作战。”他把一些参谋转移到了“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上。^[97]奇克和第3战斗机中队的其他飞行员被迫跑出待命室：“我们大口喘着气，满是眼泪，在露天的飞行甲板上环顾四周，呼吸着新鲜空气。”锅炉停了，航母也随即停在海上。一大团黑烟从飞行甲板的裂口中喷涌出来。海员们有的咳嗽不止，有的在流血，有的脸上乌黑，所有人都顺着钢梯往上爬，来到露天的甲板上。舰岛后面的1.1英寸高射炮炮台遭到了直接袭击，状况惨不忍睹。奇克看到“上层建筑的灰色墙面上有一些血斑”，还有“许多血淋淋的粗棉布包裹着残肢”。在舷边通道上的20毫米机关炮旁边，炮手的头已经被炸飞，但是他的身体仍然牢牢地系在椅子上。^[98]

山本五十六的“主力”在西面约600英里外，跟第一航空舰队三天前经历的一样，也在浓雾中穿行。在有雾的条件下行驶，而且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就需要舰只放慢速度，并且派目光敏锐的瞭望员放哨，以防碰

撞。雾号一直在响。过去几天来，山本五十六像往常一样，坚忍沉默，站在“大和号”宽敞的舰桥上，凝视着外面湿乎乎、灰蒙蒙的大海。他一直有胃溃疡，脸色苍白，恶心欲吐。

由于无线电静默，山本五十六和参谋能够了解的战况有限，但是他们一直在监听日本飞行员的无线电通信。即使看到了美国航母，“大和号”舰桥上的日本人仍然充满信心。但是在早上10时50分，信号官递给总司令一张纸条，这是警戒舰指挥官阿部弘毅少将传来的无线电信息：“受到敌人航母舰载机和陆基飞机攻击，‘加贺号’、‘苍龙号’和‘赤城号’起火。我们计划让‘飞龙号’与敌军航母开战。暂时向北撤退，重新集结部队。”一名军官回忆道，当山本五十六读到这一消息时，他“叹息”了一声，然后一言不发地把纸条递了回去。^[99]他和其他军官都惊呆了，情绪一时变得“晦暗失落”。

山本将军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回忆说，军官们“感到迷茫，全都耷拉着脑袋”，面面相觑，“嘴巴紧闭。……无法言说的死寂、阴郁和恼恨没有让他们落泪”。^[100]南云忠一没有发来任何消息，他那时正在把司令旗从“赤城号”上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他死了吗？参谋人员都不愿承认这场战役已经失败，开始集体讨论对策。一些人提出的策略不切实际，另一些人则鲁莽冒进；所有人都想孤注一掷。

主力部队距离太远，无法及时提供直接的援助。此外，由于主力部队缺少空中掩护，即使援助可能也起不了作用。但是舰队把航速提高到了20节，开始全速向东行驶。“大和号”高耸的天线向日本舰队的不同作战单位发送了新的命令。远在北方负责掩护阿留申群岛登陆部队的小型航母舰队接到的命令是迅速向南行驶，加入日本第一航空舰队。运兵船奉命脱离舰队，向北行驶，离开中途岛飞机的攻击范围。掩护运输舰的水面舰艇向中途岛快速前进，轰炸这片环礁。当天晚上，主力部队和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水面舰艇要伺机同美国航空母舰作战。

驱逐舰“天津风号”的舰长原为一得知三艘航空母舰被击中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我看到了什么消息？”他惊诧道，“我在做梦吗？我摇了摇

头。不，我非常清醒！……可怕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再也无法怀疑其准确性。”对原为来说，没有航空母舰提供空中掩护，这次军事行动显然就无法继续了；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他的舰队就只能继续朝中途岛进军，不断深入这片环礁的空袭范围。“我们的长官究竟在做什么？”原为一琢磨着，“损失航母带来的哀痛突然变成了愤怒。我们会不会跟特混舰队主力一样，落入敌人圈套？该死！该死！”[\[101\]](#)直到（他的钟表显示为）早上9时20分，他们才收到山本五十六的命令，要求运输舰“暂时向西北”撤退，而驱逐舰前去攻击中途岛。

5架幸存的俯冲轰炸机回到了“飞龙号”上。“飞龙号”上的机库船员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正忙着为鱼雷轰炸机做准备，计划对美军舰队发动另一次攻击。山口将军走下舰桥，来到飞行甲板上，在飞行员登机前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到大约下午1点的时候，侦察报告已经确认美军有3艘而不是2艘航母，而且侦察员正确地判断出它们是“大黄蜂号”、“约克城号”和“企业号”。山口告诉他们：“敌军有三艘航母，你们要知道。我军的俯冲轰炸机击中了其中一艘，因此还剩下两艘。如果能做到，就尝试炸沉一艘还未受损的航母，把它作为首要攻击对象。如果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对一了。”[\[102\]](#)

新的攻击编队从飞行甲板上起飞了：10架中岛九七式“凯特”鱼雷轰炸机以及6架零式战斗机，由当天早上指挥轰炸中途岛的友永丈市率领。友永丈市的飞机在轰炸中途岛时被击中，左翼油箱在漏油。他知道这架受损的飞机可能无法再次返回“飞龙号”，但他还是勇敢地坚持再度出击，并且拒绝了和下属交换飞机的建议。“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在地平线上一字排开，清晰可见。这是打击美国航母、给“飞龙号”的三艘遭受重创的姊妹舰复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友永丈市带领的飞行员也都清楚，此刻日本海军的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他们肩上。一架受损飞机的空勤组成员丸山大辅记得当时有一种“绝望感”。[\[103\]](#)

16架飞机的编队经过漫长的爬升过程，最终到达海拔13 500英尺的高度。它们不用飞很远——美国舰队距离“飞龙号”只有90英里。下午2

点半，一直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海面情况的桥本俊雄（Toshio Hashimoto）大尉发现前方海上有尾流的痕迹。通过手势信号，他给友永丈市传递了一份敌情报告，然后一个驾驶舱接一个驾驶舱地传递过去。队长向南调整航向，直接闯入敌军航母群的中心。也许是命运使然，他们撞上的是已经受损的“约克城号”，而不是“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它的火势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不再冒烟，所以看不出来实际的情况。它在以正常的速度航行。日本飞行员们没有发现它有任何受损的痕迹，因此认定它是未受攻击的两艘航母中的一艘。在云层下看见散布在海面上的整支美国特混舰队后，友永丈市用无线电下达命令：“全军突击！”——两架鱼雷轰炸机奉命分开，联手向“约克城号”的舰首发动攻击。

早在日军飞机出现在视野里以前，美军航母的雷达就检测到了来袭的可疑飞机。尽管“约克城号”受到了破坏，它仍然能够作战。它的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而且飞行甲板上的裂洞也已经补上。它仍然能实施空中作业。当友永丈市的飞机距离“约克城号”45英里时，机库甲板上的加油系统停止运作，管道里充上了二氧化碳。特混舰队上方只有6架野猫式战斗机前去拦截进犯的敌机。麦卡斯基中尉拦截了迎面而来的飞机，但是他又不得不转向，从高处俯冲下来。中岛鱼雷机挂载了800千克的鱼雷，因此飞行速度缓慢，只能压低机头进行小角度俯冲，利用高度换取速度，穿过航母周围警戒舰艇的防空火力网。它们俯冲到200英尺的高度并开始平飞的时候，速度达到了200节，几乎是美国“蹂躏者”鱼雷轰炸机速度的两倍。

“约克城号”上又有5架野猫式战斗机起飞加入空战。第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吉米·萨奇少校向右转弯，让其格鲁曼飞机的机头直指友永丈市编队的第一架飞机。他按下0.50英寸机枪的开火按钮，朝友永丈市飞机的左翼进行了几轮射击，使敌机起了火。后来，萨奇说他不由得赞赏友永丈市的决心：

整个左翼都在燃烧，透过火焰我都看到了翼肋，但是那个鬼子

仍然飞到足够近的地方投下了鱼雷，那颗鱼雷差点击中“约克城号”。他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日本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尽管已经被击落，他仍然继续向前，投下鱼雷。那时，整个飞机看上去都在燃烧，飞机两翼的上层都已被烧尽，只剩下了翼肋。机翼下方肯定还有翼面来支撑他，但是很明显他一直在下坠。投下鱼雷飞机就落入水中了。他们的战术和决心都很棒。……他们如果心意已决，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104\]](#)

友永丈市编队中的第二架飞机也起火了，它投下鱼雷后，试图直接撞击“约克城号”，但是曳光弹不断击中来袭的飞机，使它在离左舷不远的地方翻转着落到了海里。

特混舰队其他舰船甲板上的人在远处观看这场激烈的空战时，很难看清发生了什么，也很难判断哪一方有可能取胜。天空中不断出现高射炮弹的烟幕；飞机爆炸并从空中坠落；“约克城号”急速转弯，先向右转，然后向左转舵，甲板倾斜得厉害。通过双筒望远镜观望局势的罗伯特·凯西写道：“高射炮不停开火，高射炮弹炸开形成的烟幕染黑了整片天空。”[\[105\]](#)“波特兰号”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飞行员弗雷德·戴尔说他感到了“一股爱国主义豪情”。他说：“所有船的桅顶都飘扬着巨大的美国国旗。舰艇劈波斩浪，高速行驶的船只激起强烈的尾流，旗帜迎风飞舞。……此情此景，永生难忘。”[\[106\]](#)

第二支编队从“约克城号”左前方逼近，发射了4枚鱼雷。这些飞机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打击，既有来自野猫式战斗机的，也有来自高射炮的。桥本大尉把高射炮弹片撞击飞机的声音比作冰雹掉落在金属屋顶上的声音。[\[107\]](#)丸山少尉后座的机组成员被击中了腿部，而且“我们飞机的尾部看起来像个蜂巢，上面都是洞”。[\[108\]](#)有一架飞机在投下鱼雷后飞过了“约克城号”的舰首。它飞得很低，离飞行甲板上的美国船员很近，双方都能看见彼此的眼神。机械师比尔·苏尔吉说：“我能看到驾驶舱前排的飞行员低下头。第二排的那个家伙正拿着相机给我们这艘航母

拍照。后座上的第三个人没有开炮。他扬起了手，这使我想起了自己读过的骑士小说。我想他是在向我们致意。”[\[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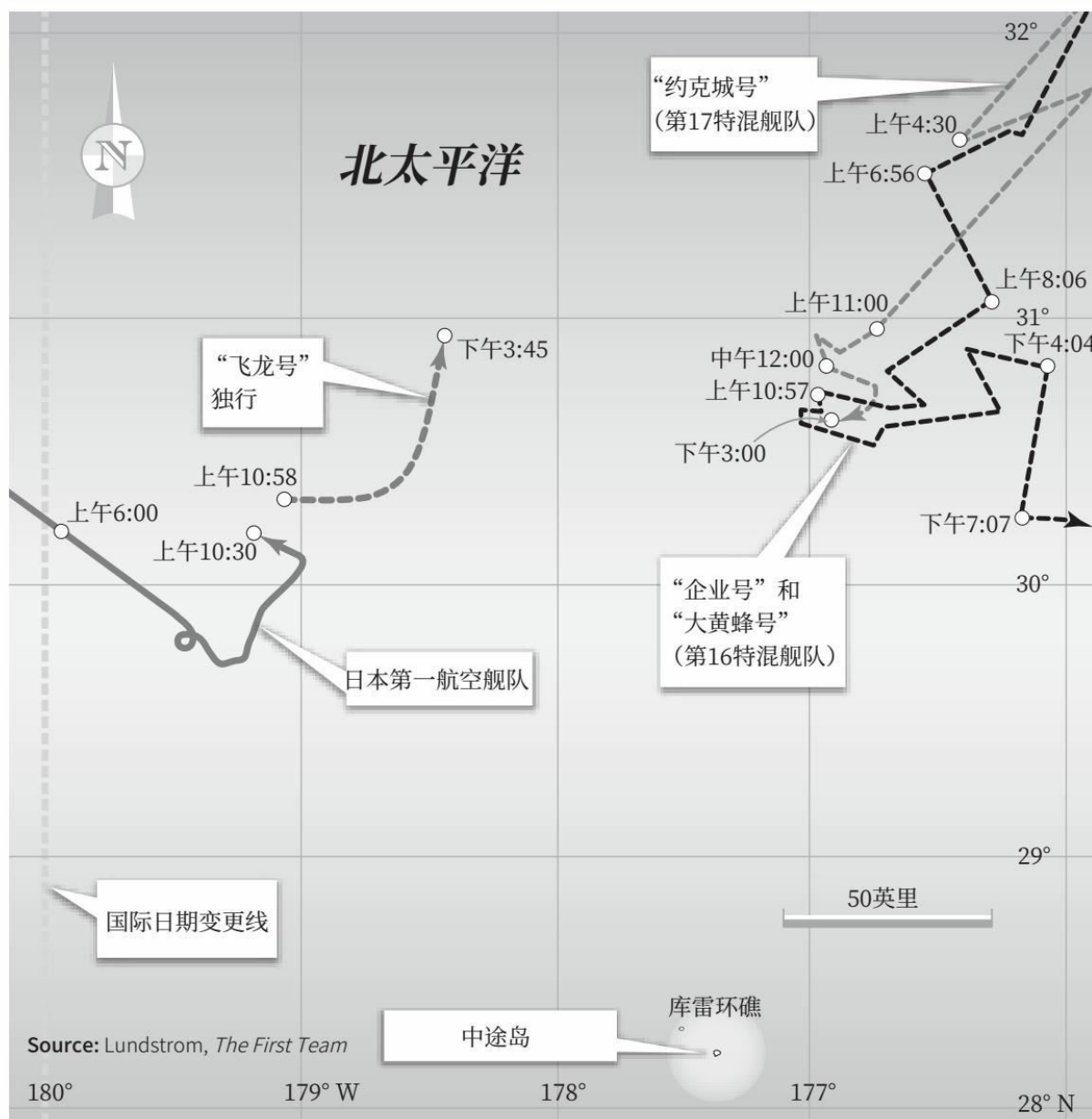
两枚鱼雷击中了“约克城号”的左舷，靠近船体中部。约瑟夫·波拉德上尉回忆道，第一枚鱼雷发出了“一声可怕的闷响，整艘船都被轰隆隆的声音笼罩，我脚下的甲板先是上升、震动，然后裂成两半……接着另一枚鱼雷也发出一声闷响，‘约克城号’开始剧烈地震动，猛地向左倾斜”。[\[110\]](#)奇克受命隐蔽在第3战斗机中队的待命室，连续不断的爆炸两次将他震离座位。他说：“尽管我只从椅子上被震起一英寸，可我感觉飞了很高。整艘船像一只被小猎狗逗弄的老鼠一样，剧烈地扭曲抖动。”第二次爆炸后，灯都灭了，舰身大幅度倾斜，待命室的椅子沿着甲板滑动，将人连同椅子一起牢牢定在左舷舱壁上，让人动弹不得。奇克说：“一时间，机舱里只能听到身体的扭动声和沉重的呼吸声。而在随后的一片黑暗中，只能听见靠近出口的人试图打开舱盖时的呼喊声和咒骂声。”[\[111\]](#)突然，舱盖猛地被拉开，人们镇定有序地快速离开待命室。

下层船舱内，海军医护兵们正忙着医治伤员。由于灯都灭了，他们只得拿着手电筒工作；条件有限，他们无法进行救治，只能给饱受折磨的伤员盖上毯子，注射吗啡止痛，喂水，然后用绷带或止血带包扎伤口。一位军医回忆说：“有人被炸掉了一只脚或一条腿，有人双脚或双腿都被炸没了；有人在死亡边缘徘徊，有人已经死去。”[\[112\]](#)士兵们不停地把伤员抬到包扎处和医务室，但很快这两个地方就挤满了人，于是伤员便被留在担架上，放在通道里。

这两枚鱼雷重创了“约克城号”。第一枚鱼雷落在第90根肋骨处，炸毁了三个锅炉，并摧毁了引擎。第二枚落在第75根肋骨处，炸掉了前部的发电机舱，切断了电源。船员们启动了应急柴油发电机，但是很快便短路了。没有了电，水泵不能工作，就无法通过向右舷注水来阻止船向左舷倾斜，因此船体很快就倾斜到了30度。[\[113\]](#)飞行甲板上的船员不

得不抓着把手，以免滑入海中。“约克城号”极有可能倾覆，将几百个人一起带入海里。下午3点，巴克马斯特舰长下令弃船。

航母特混舰队：航迹图 1942年6月4日



对甲板下方的数百名“约克城号”船员来说，从损坏的航空母舰上逃离令人痛心不已。发电机已经失灵了，船上大部分地方已完全陷入黑暗，还有的地方被燃烧着的火焰照亮。甲板倾斜得如房子的屋顶一般陡峭，船员们仿佛是登山运动员，不得不寻找手脚的支撑点；但是钢铁的表面有好几处非常热，不能直接用皮肤接触，因此船员们的手上都裹着

衣服或破布。黑暗中，他们走在迷宫似的舷窗和梯子间，同船水手用呼喊声指引着他们。所有人都说船员表现得非常勇敢、泰然自若，不慌不忙地一同前进。他们给医务员让路，并用金属丝网做担架把伤员运出去。登上大幅倾斜的机库甲板后，他们透过闪动的热气看清了眼前的景象——扭曲的飞机残骸焦黑一片，丧生海员血淋淋的残肢触目惊心。他们有序地排成一排，沿着打结的绳索滑到海上。他们脱下的鞋子也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行，似乎他们还打算再回来。甲板的急剧倾斜令人紧张不安。奇克说：“每隔一会儿，这艘船都会慢慢地向左晃，但至多几度；每次晃动后，船身似乎都更加倾斜了。我扫了一眼周围的人，很明显，每个人都觉得这艘船会倾覆。”[\[114\]](#)

有几百人需要从两舷撤离“约克城号”，但是仅有六条打结的绳索。有些人直接跳下去了。许多人跳到吊货网上，然后缓缓滚入海中。担架由绞车吊起，放入救生艇中，再送到警戒舰上。鱼雷击穿了“约克城号”的燃料罐，旁边的海面上覆盖着一层4英寸厚的船用燃油。海上的风浪把船员往回推向“约克城号”的船身。摄影助理比尔·罗伊回忆说：“海浪每次溅到我的头上，石油和油气都会灼伤我的眼睛和鼻子，让我呼吸困难。我身上沾满了船用燃油。一些船员灌了几口水和油，立即就呕吐起来，试着坚持下去。风浪使我们都紧靠着船体粗糙的一面，我们的皮肤被划破了。想从这里游开非常困难。我们都非常担心‘约克城号’会倾覆，下沉，把我们都卷入海中。”[\[115\]](#)

为营救海里的船员，救生艇和驱逐舰都行动起来。船上的人满了之后，船后又拴上一段绳索，每隔一段距离就系上救生衣，将几十个漂着的船员拖到救援船旁边。船员们争相爬上吊货网。[\[116\]](#)获救的船员都湿淋淋的，疲惫不堪，被救上来后就倒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甲板上，每个人都得到了简单的检查。如果不需要药物治疗，他们就会得到一杯咖啡和一句命令：“喝了它！”[\[117\]](#)一级消防员赫尔曼·A. 凯利被拖上了驱逐舰“贝纳姆号”。来到甲板上后，有人递给他一瓶威士忌，吩咐他喝一大口，再传给下一个人。他回忆说，这“就是医嘱”。[\[118\]](#)

尽管“约克城号”遭受重创，美国至此仍占有优势。“飞龙号”的两支飞机编队袭击的都是同一个目标“约克城号”，因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没有受损，完全处于正常状态。美国的鱼雷机中队在此次交战中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但是俯冲轰炸机中队基本是完整的——正是这些俯冲轰炸机击毁了日本三艘航母，对第四艘航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到天黑还有五个多小时。“飞龙号”完全处于攻击范围内，而且在夜幕降临前它没法逃出去，另外它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飞机，只剩下了几架。如果它被摧毁，日本舰队里的每一架舰载机都会随之被一起摧毁，因为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所说的：“如果四艘航空母舰都被击毁了，日军的飞机想要找到一个降落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容易了。”^[119]

弗莱彻来到一艘救生艇上，驶往新的旗舰——“阿斯托里亚号”巡洋舰。在此期间，“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在无指挥的状态下独立行动。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大黄蜂号”的舰长马克·米彻尔正准备向“飞龙号”的甲板发动两轮攻击。“约克城号”的侦察轰炸机在下午2时45分发现了“飞龙号”，当时该航母位于美军西面110英里远的地方。

“企业号”的飞机开始升空。25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由8架F4F野猫式战斗机护航。这支攻击队由第6侦察机中队队长加拉赫上尉领导。飞机升空后迎着风迅速爬升了400码，然后向左转，低空掠过警戒舰船。不到20分钟后，整个攻击队都已经升空。他们不必飞很远。离开“企业号”40分钟后，在1.9万英尺的高度，加拉赫看到日本舰队在他们前方大约30英里处。

“飞龙号”剩下的飞机——4架俯冲轰炸机、5架鱼雷轰炸机，还有来自“苍龙号”的1架试验型俯冲轰炸机——正在机库中加注燃料，因此它们都成了装满燃料和弹药的火药桶，导致“飞龙号”跟当天早晨的其他日本航母一样极易被毁。日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已经艰苦地战斗了很长时间，身体的负荷已接近极限。山口下令给飞行员提供酒和饭团，飞行员们狼吞虎咽，很快就吃了下去。

加拉赫带领机群向北绕了一大圈。透过散开的云朵，他看到三个被炸毁的日军飞行甲板仍在剧烈燃烧。最后，他发现了目标“飞龙号”。他又向西绕了一下，以便从背对太阳的方向发动攻击，让舰艇上的高射炮手不易瞄准。由于编队中有许多俯冲轰炸机，加拉赫认为不需要全体攻击“飞龙号”，就命令“约克城号”的第3轰炸机中队的15架飞机去攻击“榛名号”战列舰。“筑摩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下午5点发现有飞机接近，此时加拉赫马上就要抵达投弹点了。“飞龙号”拼命左转，迫使第一批俯冲轰炸机加大俯冲角度。天空中不断有高射炮弹爆炸，零式战斗机紧追着第一批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用20毫米机关炮击落了几架。战斗机、高射炮和航空母舰的闪避动作合在一起，让第一批俯冲轰炸机未能击中目标，炸弹直接落入海中，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德威特·W. 沙姆韦上尉被派去攻击“榛名号”，他看到攻击“飞龙号”的行动未能奏效后，立刻决定掉头去攻击“飞龙号”。

“飞龙号”的防御很好，但是在三组轰炸机的轮番攻击下，它很快就无力应付了。4枚1 000磅的炸弹落在飞行甲板前端，击穿了甲板，直达机库甲板，在下层引发了大火。前方的升降机被炸飞，在空中飞行了一段，撞上了舰岛的一侧。^[120] 航母上的电源断了，飞行员待命室里到处都是烟雾，迫使里面的人来到飞行甲板上。丸山大辅感到“强烈的震动，听起来像是航母裂成了两半。这些剧烈的震动持续不停”。舰尾基本上没有受损，消防员和损管队把它作为大本营——但是总水管已经破裂，消防软管的压力降低，喷到火焰上的一点水还没起什么作用就蒸发殆尽了。“飞龙号”仍能以30节的速度前进，但是急速行驶产生的气流使火燃烧得更旺，而且让火向船尾蔓延。丸山说：“当我在甲板上透过烟雾看到太阳时，太阳是红色的，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我感觉那场景就像是武士时代，一场战役失败后，一座城堡在燃烧。”^[121]

“大黄蜂号”的最后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抵达战场的时间较晚，意识到“飞龙号”已被击毁，于是它们集中攻击附近的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令场面更加混乱的是，斯威尼中校的B-17轰炸机已经

添加完燃料，加挂了武器，从中途岛返回来了，它们从更高的空中朝特混舰队投下了炸弹。像往常一样，这些高空投放的炸弹并未击中敌舰，但是是一些炸弹正好从SBD的编队中穿过，这就让海军飞行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有人在从上面向他们投炸弹。

只需看一眼“飞龙号”，就能知道它的飞行甲板已经彻底完蛋了，仍在空中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们知道，他们被困在空中了，因为几千英里之内没有他们可用的飞机场。他们不得不在空中盘旋，直到燃油耗尽，然后采取所谓的“水上迫降”。

下午5时55分，山本五十六收到了南云忠一发来的他不想听到的报告：“17时30分，‘飞龙号’被炸弹击中起火。”[\[122\]](#)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四艘航母的飞行甲板尽数被毁，但是总司令和其参谋尚未考虑撤退；实际上，他们仍然相信局势可以挽回。宇垣将军询问南云忠一的参谋：“明天上午，友军部队能否使用中途岛的岸上基地？”就好像他们仍有可能入侵中途岛似的！帕歇尔和塔利写道，这种想法“证明了山本和他的参谋是多么脱离实际。……他们对不幸毫无察觉，也可能是不愿意承认真正的战况，而且他们所处的位置又太远，对正在进行的战役无能为力，山本和他的参谋显然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随着天色渐暗，这种趋势只会越发糟糕”。[\[123\]](#)

晚上7时15分，山本向指挥部传达了他乐观的看法：“敌军的特混舰队已经向东撤退。其航空母舰的打击力量基本被摧毁了。”他命令手下集中火力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南云忠一舰队的水面舰艇应重点搜索美国航母，并采取夜间行动，将其摧毁。其他舰船应攻击并占领中途岛。主力部队提速到20节，穿过浓雾向东疾驰，好让船上的巨炮也派上用处。[\[124\]](#)

渊田和奥宫估计，这道命令“乐观得如此异常，应该是联合舰队总司令故意为之，为的是防止部队士气瓦解”。[\[125\]](#)驱逐舰舰长原为一也是这种看法：“尽管我对这场战役的局面了解有限，但我也明白山本

为何要发布这一命令。现在看起来他是试图防止军队士气瓦解，但当时我觉得他肯定是失去理智了。”^[126]山本的参谋也有点焦躁，他们“神经紧张，眼中布满血丝”，^[127]而且明显谁都不想第一个警告统帅，美军现在可以利用空中的绝对优势，彻底消灭日本舰队的幸存舰只。

第8鱼雷机中队唯一的幸存者乔治·盖伊少尉在日本特混舰队的舰船之间踩着水。只要有船过来，他就把头藏在气垫下面。他看到敌军航空母舰着火时异常兴奋。盖伊是得克萨斯人，他把“苍龙号”比作“油田大火，如果你见过油田大火的话，你也会这样类比。航母前端和尾端喷出的火焰就像喷灯一样，白色的火舌呼呼燃烧……巨大的红色火苗从黑烟中喷出，直冲天空，也不知道有多高”。被击中的航母“燃烧了一会儿后爆炸了，我就在水中喊‘好哇，好哇’”。^[128]

四艘航母上的消防人员还在以不同的程度坚持灭火，但是不论在哪艘航母上，大火都肆虐不停，完全失控。日军损管的设备和训练不足，无法胜任当前的任务——日本海军过于强调进攻性作战，从未重视过损管。即使消防人员能把水管铺设到火点，水压也太弱，产生不了多少效果；在某些情况下，这反而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消防水龙喷出的水把航空燃料冲到了尚未受损的部分。此时最好用泡沫灭火剂，但是日军舰艇都没有配备。消防人员来到了下层部分，那里的通道中满是烟雾，热得就像烤炉里一样。由于没有防毒面罩，他们拿湿布捂住嘴，或是在钢板上面爬行，以靠近甲板，在稍微好一点的空气中呼吸，但他们的手和膝盖都烧伤了。但是，无论四艘航空母舰上的消防员多么英勇无畏，他们还是无法扑灭大火。他们唯一真正的希望就是硬撑下去，直到大火燃尽。只要有燃料，火灾就会持续下去；而堆满了航空燃油、船用燃油以及弹药的航空母舰根本不缺燃料。

军医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伤员，但是由于火灾肆虐，许多地方都过不去，所以他们手头往往没有什么医疗用品。烧伤者非常多，而能给他

们提供的帮助却不是很多，就连缓解他们的痛苦都做不到。有报告说，一些严重烧伤的人甚至踉跄地走入火中结束自己的生命。燃烧的油漆和其他材料释放的有毒烟雾吸入肺中，会使人患病，甚至死亡。在所有被轰炸的航空母舰上，士兵都很口渴，但很多人没有水喝。他们精疲力竭，却无法休息；饥肠辘辘，却得不到食物。火舌驱赶着他们，无情地把他们逼到甲板的边缘，逼到船身的舷边通道和防雷护体上。

在四艘航空母舰中，第一艘放弃的是“苍龙号”。上午10时45分，弃船命令下达，这距离第3轰炸机中队的毁灭性袭击只过了20分钟。几百个船员被火势驱赶到了舰首和舰尾的边缘或通道上，这些地方变得异常拥挤，船员们必须把武器举过头顶才能走动。当弃船的命令传来时，许多船员都不愿意执行，长官不得不催促他们。最后，在三声“‘苍龙号’万岁”的呼喊声中，他们跳入大海。下落的距离很长，约有35英尺，下落过程中他们仍能感到火焰放射出的热量，还有身后伙伴的推挤。每个船员都是猛地撞进海里，脚先落水，接着被身上的救生衣拉回水面。为了避免被后面跳下来的船员砸中，他们必须尽快游开。

“加贺号”上猛烈燃烧的大火已经失去控制，幸存的船员撤到了飞行甲板的边缘。机库完全被火焰吞没了，里面很热，到处都是烟雾，连消防员也无法下去灭火。通向机库甲板的梯子横档发出亮橙色光芒，飞行甲板的钢面把行走在上面的橡胶鞋底都给熔化了。“加贺号”的飞行员吉野治男说：“机库内部是鲜红色的。里面仍在不断爆炸。每次爆炸都伴随着特别明亮的火焰。”下午1点，“加贺号”上最后的电力供应也中断了。到下午4时40分，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拯救这艘航母了，于是天谷孝久中佐——幸存者里的高级军官——命令所有人全部跳入海中。大部分人从30英尺甚至更高的地方跳入一片油污的大海，紧紧抓住油浸的残骸，直到被围绕航母行驶的驱逐舰救起。[\[129\]](#)

“赤城号”上的状况似乎较为可控，船员拼尽全力，希望能够拯救它。正午时分，大火仍在猛烈燃烧，但是“赤城号”的引擎竟然重新启动了，于是它开始低速前进。但是由于一枚近失弹让其舵轮向右卡住了，

它只能顺时针打转。损管队设法在舰首架起一台抽水机，但是水压小得可怜，几乎不起作用。到下午1时50分，引擎又失效了，“赤城号”再次停在海中。一个小时后，机库甲板上又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整艘航母剧烈抖动，仿佛要被撕裂一样。古田清人中尉回忆道，“赤城号”看起来不像是死期将至，但是中部的飞行甲板一片火红。^[130]船员们继续英勇灭火。但是下午6点，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青木舰长断定无法扑灭大火，下令弃船。担架被吊起放入驱逐舰派来的小船里，为躲避高温和爆炸而撤退到舰首和舰尾的船员也借助绳索滑了下来。

当天晚上7点，随着夜幕逐渐降临，“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人都准备休息了。他们已经让所有攻击机都降落到船上，并且开始让最后一轮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飞机降落。此时斯普鲁恩斯给弗莱彻发了份无线电报，询问是否有进一步的指示，弗莱彻回道：“没有。遵照你自己的计划行动即可。”^[131]实际上，弗莱彻等于是慷慨地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了下属。由于“约克城号”已弃船，第17特混舰队没有空袭能力，弗莱彻似乎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在一艘巡洋舰上指挥两艘航母。另外，斯普鲁恩斯可以咨询哈尔西的参谋，而这些人是美国舰队里最有经验的航空参谋。在战役中间转移作战指挥权很少见，但是这样做让弗莱彻赢得了很好的名声。

斯普鲁恩斯决定在午夜之前向东行驶，跟日本的水面舰艇保持安全的距离。到了6月5日清晨，他们会向北转，然后向西南航行，在黎明之前把自己置于中途岛的空中掩护之下。撤退的决定相对来说是保守的，因为在深夜时分，日本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找到美国航空母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斯普鲁恩斯的谨慎符合尼米兹的要求：“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重创敌人，就不要让自己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暴露。”^[132]往东撤退能确保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作战效果最佳的白天应战，还可以防止日本利用擅长夜战的优势攻击航空母舰。

这一决定是有争议的，即便在当时也是如此。斯普鲁恩斯是学军事史的，他完全清楚，自己可能会犯一种经常发生的典型战术错误，也就

是“放弃追击”。在6月4日指挥了一场漂亮战斗的萨奇少校劝斯普鲁恩斯追击日本舰队，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一整个晚上都要全速向西行驶。

在“企业号”的司令舰桥上，他跟斯普鲁恩斯说：“我亲眼看见三艘大型航空母舰猛烈燃烧，它们绝不可能再派出任何飞机。”斯普鲁恩斯回答道（据萨奇的描述，谈话时，这位将军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嗯，你知道咱们一艘战列舰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有的只是巡洋舰。如果追击敌人，在我们进入夜间射程之前，他们就能消灭我们。我们没有多少在夜晚发动攻击的能力。”[\[133\]](#)

刚刚过去的一天很漫长，斯普鲁恩斯知道自己需要睡眠，好在6月5日保持清醒。凌晨1点，他下令改变航向，向西南方行驶，航速仅定为15节，之后他便上床睡觉了。后来，他解释说：“我身边都是优秀的军官，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能做好的。我为什么不好好地睡一觉呢？除此之外，缺少睡眠可能会导致脑子不清醒，无法做出好的判断。所以我必须好好睡一觉。”[\[134\]](#)

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一直燃烧到晚上，不过它们都没有被鱼雷击中，吃水线以下的船身仍是完好无损的。如果对它们放任不管，它们可能不会下沉，而是一直燃烧，直到可燃物燃尽，最后只留下四个漂浮的烧焦船身。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被美国军队捕获，拖到珍珠港。作为军事资产，除了废铜烂铁之外，它们可能一文不值；但是作为战利品，在新闻短片和报纸上面展现出来，却可能产生极大的宣传效果。日军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日军留下了几艘驱逐舰来营救幸存者，同时保护这几个还在燃烧的漂浮的炼狱，但是火焰和烟雾可能成为吸引敌军舰队和飞机的信号灯，让驱逐舰陷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此外，根据山本之前所下的命令，这些驱逐舰需要在晚上发动水面袭击。尽管这个想法令人痛苦，但是日军已经认识到现在需要炸沉受损的航空母舰。

6月4日晚上7时15分到7时30分之间，“加贺号”和“苍龙号”被日本驱

逐舰发射的鱼雷击沉，不过南云忠一在战后报告中对此含糊其词，仅称它们“沉没”了。[\[135\]](#)大约同一时间，“赤城号”的青木舰长给南云忠一发来电报，请求批准炸沉他原来的旗舰，但是这条消息被“大和号”监听到了，山本出面干预，拒绝了这一请求。之后青木独自返回“赤城号”，把自己捆绑在一个锚上，要跟他的船同归于尽。[\[136\]](#)

尽管受命搜寻美国航母并与之交战，但南云忠一还是继续向北撤退，仍在燃烧的“飞龙号”也一同撤退了。根据一艘巡洋舰上的水上飞机发来的误导性侦察报告，他相信美国有四艘功能正常的航空母舰，而且正朝西直奔他们而来。晚上9时30分，他向山本五十六如实报告了这一信息。然而在“大和号”的舰桥上，收到消息的山本既惊讶又气愤。另一些侦察报告已经正确地报告说美军正向东撤离，不过南云忠一本人并不知情。尽管南云忠一始终是根据作战计划行动的，但山本的参谋还是立即将日军损失航母的责任推到了南云忠一头上。宇垣缠认为南云忠一撤退的决定“消极透顶”，应该由“最高指挥部强硬的命令”予以纠正。[\[137\]](#)

山本改派近藤信竹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这对南云忠一来说是终身无法洗脱的奇耻大辱。近藤接到的指令是，召集所有可用的水面舰艇，形成战线，向东追击美国航母。幸运的话，5日凌晨1点之后，他们将与敌人发生激战。南云忠一似乎完全无视这一命令，让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残余舰只继续朝西北方行驶。

然而，此后不到两个小时，山本就开始产生疑虑。黎明越来越近，剩余舰只遭遇毁灭性空袭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没有任何新的目击报告。他是在把舰队往陷阱里送吗？所有高级参谋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基本上都没有睡觉，疲惫和压力已经开始影响日本最高指挥部的决策能力。没有人愿意承认战败，但是随着夜晚慢慢过去，遭受更惨重损失的风险使他们愈加焦虑。宇垣断定“在黎明之前与敌人进行夜战几乎没有可能”，并且他担心，在晨曦中继续追击会导致“天亮后局面失控”。[\[138\]](#)他们已经命令栗田健男的巡洋舰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炮击中途岛，但是很明显，巡洋舰在距目的地200多英里时就不得不面对

中途岛上力量仍然很强大的航空力量。狩猎者将会成为猎杀对象。

6月5日0时15分，山本命令栗田的巡洋舰掉头，向西撤退；同时指示近藤信竹和南云忠一掉转航向，与主力部队会合。很明显，这些命令等于是宣告失败，紧接着，肯定就是全体撤回日本。但是参谋们在经历几个痛苦的阶段之后，没有勇气让自己或是相互之间承认这一点。渊田和奥宫写道：“每个人心里都意识到我们失败了，然而没有一个参谋建议停止行动。相反，他们想方设法来挽回败局。他们就像渴望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一样。”^[139]渡边安次中佐建议从阿留申群岛调几艘轻型航母过来，并用巡洋舰和战列舰的水上飞机来充实空中力量。他说，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够减少水面交战的危险，给予美国航母足够大的打击。黑岛大佐建议把所有可用的水面舰艇都派去攻击中途岛，希望能炸毁飞机跑道，破坏岛上的防御。

山本和宇垣听完了这些孤注一掷的策略，但是拒绝采纳，而且越来越没好气。这些建议可能只会让联合舰队受到加倍的损失。军官们开始用将棋来打比方，这并不让人意外。山本责骂渡边说：“你应该知道，在所有的海军战术中，向岛屿开炮是最愚蠢的。”^[140]他补充道：“在下将棋的时候，耽于作战只会引起全面溃败。我们可能会失去一切。”^[141]宇垣同意这一说法，他说参谋“应该知道让舰队攻击堡垒有多么荒谬！”^[142]

山本用一句简单的声明表达了撤退的决定：“这场战役差不多要结束了。”^[143]

渡边非常懊恼，他离开舰桥，回来时带着一份起草好的命令，要求舰队全面撤退。山本瞥了一眼，同意了这份命令。6月5日凌晨2时55分，所有的指挥官都收到了一份无线电信息“DesOpOrd#161”：

(1) 中途岛行动取消。

(2) 主力部队将召集中途岛的进攻部队和第一航空舰队

(除“飞龙号”及其护航舰)，联合舰队将于6月6日早晨在北纬33°、东经170°加注燃料。

(3) 警戒舰、“飞龙号”及其护航舰，还有“日进号”将前往上述位置。

(4) 运输大队将向西航行，离开中途岛的飞机攻击范围。[\[144\]](#)

“大和号”的舰桥上有一名军官涕泪交集，询问“赤城号”会怎样。它失去动力，仍在燃烧，无法被拖走，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进。此时，“大和号”上还没有人意识到，“加贺号”和“苍龙号”已经被击沉。对他们来说，向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旗舰发射日本自己的鱼雷是不可想象的。黑岛大佐高呼：“我们不能用天皇的鱼雷击沉天皇的战舰！”他激动的喊声让舰桥一下子沉寂下来。渡边回忆道，当时“山本手下的几乎所有参谋都哽咽了，并且屏住了呼吸”。作为“赤城号”原来的舰长，山本也不免动容，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平静地答道，让“赤城号”落入敌军的手中，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他补充道：“我曾经是‘赤城号’的舰长，如今必须下令将它击沉，我由衷地感到遗憾。对于使用我们自己的鱼雷击沉‘赤城号’，我会向天皇请罪。”[\[145\]](#)

凌晨3时50分，南云忠一收到命令，并将其转发给了“赤城号”附近待命的驱逐舰。鱼雷专家看到这道命令，都痛哭流涕，但是仍然执行了。四艘驱逐舰朝“赤城号”发射了鱼雷，炸碎了它的内部，与此同时，船员们大喊：“‘赤城号’万岁！”[\[146\]](#)凌晨4时55分，就在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露出的时候，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原来的旗舰沉入了海中。铃木宏大尉回忆说：“渐渐地，这艘雄伟的巨舰开始倾斜，然后慢慢下沉。它完全沉入海中后，水下发生了一场大爆炸，‘赤城号’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147\]](#)

“飞龙号”与南云忠一的剩余舰只继续一同前行。到了4日晚上10点

左右，它就再也不动了。它还在剧烈燃烧，多艘驱逐舰围着它喷水，但是水龙喷到火上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午夜时分，一场巨大的爆炸使“飞龙号”猛烈晃动，机库甲板上重新燃起了火。丸山少尉说：“有一半甲板完全烧毁了。因为边缘依然完好，所以整条船看起来像是一口巨大的棺材。而且，沿着飞行甲板排列的小舱室里，有一些烧焦的尸体，他们都是机枪手，是被炸弹炸死的。我周围充斥着尸体烧焦的味道。然而，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竖立在舰桥前方的一大堵墙。我细看时才意识到，这堵墙实际上是前部升降机的一部分。”[\[148\]](#)

午夜之后不久，加来止男舰长下令弃船，但整个过程是以庄重的仪式性步骤展开的。800人在航母中部集合后，山口将军向立正的官兵动情地发表了讲话。船员向西面朝日本皇宫的方向高呼三声“万岁”。随着日本国歌《君之代》响起，战旗和将旗都降了下来。接着人们开始沿绳索降到海里，“卷云号”驱逐舰会救起他们。

山口和加来决定陪“飞龙号”一起沉没。还有一些军官想加入他们，但是山口命令他们离开。他大喊：“年轻人必须离开这艘船。这是命令。”[\[149\]](#)山口将军对加来舰长说：“今晚的月亮很美。咱们就看着它沉到水里吧？”[\[150\]](#)其他人陆续下船时，他们摘下军帽挥手告别。“卷云号”驱逐舰向“飞龙号”发射了两枚鱼雷，接着便离开了那里。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飞龙号”仍没有沉没。5日早上，它仍在漂浮，而且还冒出高耸的烟柱。“飞龙号”上还有几十个幸存者，其中包括轮机房的成员，他们从这艘燃烧着的航母的低层区域，一直逃到了飞行甲板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后，上午9点过后不久，“飞龙号”沉了下去，茫茫大海吞没了它。后来，美国人救起了用小艇逃生的34名幸存者。

山本在“大和号”舰桥上发出的悲观论断——“这场战役差不多要结束了”——表明他对无可避免的结局已经听天由命了。整支联合舰队分

成了六个战术分队，每个相隔数百英里甚至数千英里，它们开始加速向西航行，紧急撤退。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逃跑的日本舰队作战单位可能会被敌机追踪并攻击，所以日方首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没有进一步损失的情况下逃脱。最易受攻击的是栗田将军第七巡洋舰战队的4艘巡洋舰，因为在收到山本掉转航向并逃离的命令之前，它们已经行进至距离中途岛不到50海里的地方。6月5日凌晨2时15分，美国潜艇“坦博尔号”发现它们并开始跟踪。之后没多久，“熊野号”巡洋舰上的瞭望员也发现了美国潜艇。发现目标的情报使得日本纵队陷入了混乱。为避免鱼雷袭击，“熊野号”发出右转的信号，但是纵队里面的第三艘巡洋舰“三隈号”转向过急，撞上了队友“最上号”。

两艘船都超过1.3万吨，而且都以超过25节的航速行驶，因此撞击非常严重，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最上号”的舰首陷进去了，呈直角折向了左舷，一直弯到1号炮塔。这次碰撞使其舰身整整缩短了40英尺。但船上的工兵设法让它在速度大大降低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航行。“三隈号”的一个燃料箱破裂，燃油泄漏，但是它受到的破坏要好处理得多。栗田留下两艘驱逐舰“荒潮号”和“朝潮号”守卫这两艘受损的巡洋舰，其他舰艇继续快速撤退。

5日黎明，两艘受损的舰船仍旧处在中途岛的空中打击范围内。一艘PBY水上飞机在其上空飞过，报告说在264度方向发现“两艘战列舰”。这两艘巡洋舰受到了中途岛剩下的美国航空中队的猛烈空袭，攻击者包括6架SBD俯冲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第241侦察轰炸机中队的6架SB2U“守护者”飞机，以及后来赶到的陆军的8架B-17。它们都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其中一架“守护者”被防空炮火击中，撞到“三隈号”上，使舰尾炮塔发生了爆炸。“三隈号”幸存了下来，向西缓慢行进。

6月5日，第16特混舰队接近中途岛，以防日本对这片环礁发起新一轮攻击。快到中午时，斯普鲁恩斯才得到确切消息，得知日本舰队已全面撤退，而那个时候“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正困在浓雾中，飞机暂停起

降。下午3点刚过，两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共有50多架SBD俯冲轰炸机起飞，对逃跑的日军掉队舰只进行远程袭击，攻击范围超过250英里。它们飞过一大片浮油的海面，这是“飞龙号”下沉的地点，此后很快又看见一艘落单的日本驱逐舰。这艘驱逐舰是只有2 000吨的“谷风号”，已经遭到来自中途岛基地的4架B-17的攻击，但是它们投放的炸弹（像往常一样）没有击中。此刻，它被四个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盯上了，这四个中队分别是第3轰炸机中队、第6轰炸机中队、第6侦察机中队和第5侦察机中队。“谷风号”的速度提高到30节，以“蛇舞”的模式前进——向右急转舵，向左急转舵，再向右急转舵——近失弹激起的水柱不断在其侧面升起。20岁的信号员柴田将司（Masashi Shibata）在舰桥上向外探出身子，观察前来攻击的俯冲轰炸机。他大喊着：“敌军轰炸机在右！”或“敌军轰炸机在左！”舰长胜见基中佐把指令转达给舵手。[\[151\]](#)近失弹炸死了好几个船员，但是“谷风号”一直没有被直接击中。日落之后，来自中途岛的另外5架B-17加入了袭击的队伍。“谷风号”总共避开了近90枚炸弹，是整场战役中闪躲技术最高超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上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返回，去找寻航空母舰的“YE”无线电归航信标。

6月6日，中途岛战役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斯普鲁恩斯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全面进攻，击沉“最上号”和“三隈号”。破晓时分，18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从第16特混舰队的航母上起飞，向西执行长途搜索任务；早上6时45分，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了两艘受损的巡洋舰和两艘护卫的驱逐舰。在斯坦诺普·林的指挥下，美国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动了一大批飞机。早上9时30分，它们追上了敌军四艘水面舰艇，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俯冲轰炸攻击。此时空中没有零式战斗机来阻挠，于是它们不慌不忙地盘旋着，精心调整俯冲角度，以小编队行动。“最上号”被两枚500磅的炸弹击中，主炮塔陷进了侦察机的机库甲板上。“三隈号”至少被击中5次，此外还遭到两枚近失弹的攻击，失去了机动能力。它燃起了大火，并被下层甲板的二次爆炸彻底摧毁。从空中往下看，美国“蹂躏者”鱼雷轰炸机的一名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把它比作“里面到

处是废铁和垃圾的大浴缸”。[\[152\]](#)“最上号”与注定要沉没的姊妹舰分开了，最后独自返回了日本。6月6日黄昏时刻，“三隈号”沉没了，随它一同沉下去的，还有888名船员中的绝大多数人。

由于返航的路程很长，许多美国飞行员要在夜色渐浓、燃料快要耗尽的情况下摇摇晃晃地返回第16特混舰队。按照斯普鲁恩斯的命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打开探照灯，指引返航的飞机着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而且引起了争论。因为探照灯可能会引来敌军的潜艇。对此，斯普鲁恩斯将军以平和而克制的态度解释了自己的决定：“如果要在很晚的时候出动飞机，它们便很可能在夜晚返回，若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指挥官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飞机安全返回，那么他就不该发动攻击。”[\[153\]](#)

当组成小型编队的飞机陆续返航，向下穿过厚厚的云层，进入着舰航线的时候，西方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没入了黑暗。米尔斯少尉写道：“这一景象让我回想起夏季湖面上的风暴，暖风轻拂，乌云渐黑，闪电刺向夜空。”[\[154\]](#)“大黄蜂号”上的罗伊·吉少尉从来没受过夜晚着舰的训练，他怀疑自己无法安全降落。他从远处看见了航空母舰的灯光，跟随领队飞机的尾灯进入了着舰航线。罗伊·吉不慌不忙，一遍一遍地检查清单：“放下起落架，锁定，放下襟翼，伸出尾钩。”[\[155\]](#)飞到顺风航段时，他能看到降落信号官发光的导航棒，但是看不到降落信号官本人。最后一次转弯时，他看到了许可的手势，在第三条阻拦索处停了下来。从驾驶舱里爬出来后，他才意识到自己降落在了“企业号”上，把它误认作了“大黄蜂号”。

被舍弃的“约克城号”漂浮着燃烧了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弗莱彻将军和第17特混舰队的剩余作战单位已经跟着斯普鲁恩斯先向东，接着向西航行了，只留下驱逐舰“休斯号”在这艘无法行动的航母旁待命。“休斯号”舰长接到的命令是，倘若日本舰队出现在海平线上，就朝“约克城

号”发射鱼雷；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它落入敌军手中。但是弗莱彻对他以前指挥过的这艘航母仍抱有希望。只要它漂浮着，就有希望把它带回珍珠港，而且弗莱彻将军还为此调集了拖船。现在日本舰队撤退了，“约克城号”似乎确实有可能得救。

6月6日早上，巴克马斯特舰长集合了170人的救援小组，重新登上了这艘完全停电的航母。“约克城号”大幅向左倾斜，巴克马斯特带的人能够直接从摩托艇爬到机库甲板上，正常情况下，机库甲板要高出海平面25英尺。一名船员回忆道：“看到那么多双鞋子整整齐齐地排在机库甲板上，真是非常奇怪，有些鞋子上还放着香烟和火柴，甚至还有一块手表，仿佛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似的。”^[156]满是油污的甲板倾斜得如同陡峭的屋顶一般。由于没有电力，“约克城号”下层区域只能靠火光照亮。人们一节一节地沿梯子下行，借助手电筒的光向前探测，仿佛是在进入一个洞穴。他们朝里面大喊，但是没人回应；显然两天前弃船的时候，没有幸存者留在那里。

船员们开始动手灭火，并恢复电力供应。上层甲板能移动的东西都被堆到了一边——5英寸舰炮堆在了飞行甲板上，剩下的飞机都堆在机库甲板的顶层。驱逐舰“哈曼号”停在旁边，提供水、电力和泡沫灭火剂。按照巴克马斯特的命令，“哈曼号”用灭火水龙把水注入“约克城号”右舷的燃料箱内。渐渐地，“约克城号”的倾斜度变小了，龙骨几乎恢复为水平状态。巴克马斯特为6月4日牺牲后尸体留在甲板上、用防水布盖着的35人主持了海葬仪式。

截至下午1点钟，余火都被扑灭了。扫雷艇“绿鹃号”设法把拖绳牢牢地拴在舰首，以3节的速度牵引着“约克城号”。突然之间有了一丝希望——或许它可以完整地拖回珍珠港。几艘护航的驱逐舰在约2 000米外游弋。

但是受损的航母冒出的黑烟引来了追踪者——日本潜艇I-168，艇长是田边弥八少佐。田边凭借熟练的技术大胆接近，从警戒的驱逐舰的中间溜了进来。升起潜望镜后，他发现自己正处在对“约克城号”的正右舷

进行近距离攻击的绝佳位置。下午1时36分，I-168发射了四枚鱼雷。在如此近的距离朝水面上几乎一动不动的目标开火，不太可能失手。一枚鱼雷击中了“哈曼号”；两枚鱼雷从“哈曼号”的龙骨下方通过，在倒霉的“约克城号”的船体上爆炸。第四枚鱼雷从这两艘船的后面擦了过去。

“哈曼号”上的瞭望员发现了鱼雷的痕迹。驱逐舰上的20毫米机关炮立即响了起来，警报也响了起来，甲板上的船员赶紧切断所有与“约克城号”相连的管道、缆绳和水龙带。海军机械军士德怀特·G. 德黑文当时站在“约克城号”的舰尾，他回忆道，“哈曼号”的涡轮机发出刺耳的声音，左舷的螺旋桨紧靠着“约克城号”的船身，叮当作响，每次桨叶打到船身，“都像发出钟声一样”。但是在这个距离上，根本没有时间避开来袭的鱼雷。“哈曼号”的船体中部受到攻击，100多名海员被震出甲板，落入海中；驱逐舰自身则裂成两半。前半段瞬间就沉没了。德黑文回忆道，后半段“竖了起来，船员们由于惯性仍然站在甲板上。我能够看到受损的锚爪在阳光下闪光”。[\[157\]](#)

似乎是命运使然，“哈曼号”上装满了深水炸弹，而且安装好了引信，它们达到设定的深度时将会引爆。海员很快反应过来，冲过去拆除引信，但是没有时间了。舰尾沉了下去，没了踪影。几秒钟以后，弹药架上的所有深水炸弹都在水中引爆，把“约克城号”上的人震离甲板。许多人的腿和脚都骨折了。被最开始的鱼雷震落到海里的船员一直在踩水。一级消防员埃尔默·琼斯回忆说：“水和燃油像一面巨大的墙朝我们压过来，你刚抹去眼前的油迹，喘一口气，另一波浪又拍过来了。”通信官克拉伦斯·雷记得“当‘哈曼号’下沉时，可能有一百个人浮在水面上”。这些人大多是“哈曼号”上的船员，在最初的鱼雷袭击中，他们就从驱逐舰上落到了海里。“就在那时，深水炸弹全部爆炸了。之前水面上的所有人都突然消失了，这就像是下雨时，雨刷一下子抹去挡风玻璃上的水珠一样。他们全都消失不见了。”“哈曼号”的251名船员中有81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158\]](#)

另外两枚鱼雷从“哈曼号”下方经过，在“约克城号”右舷的第84根和

第95根肋骨处爆炸了。比尔·罗伊说，当它们撞上“约克城号”时，这艘航母“猛烈晃动。两艘舰艇之间炸起了一大片火、油、水和金属的混合物”。[\[159\]](#)

日本潜艇下潜到最大深度，直接从“约克城号”的下方钻了过去。复仇的美国驱逐舰追了它两天，并用深水炸弹发动猛烈的攻击，差点把它逼入绝境。它的蓄电池几乎电量耗尽，有毒的酸性气体弥漫了整艘潜艇。但它最终还是跑掉了，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吴港。它发射的鱼雷是太平洋战争进行到此时为止破坏最大的鱼雷。

起初，“约克城号”似乎能够挺过新的攻击。I-168的鱼雷击中了“约克城号”右舷，而6月4日它是左舷受到了袭击。这种自然的防倾覆注水的效果使得“约克城号”的船身恢复了平衡，但是此时已经不可能把它拖回去了。救援小组关死了所有能封闭的防水门，但是水仍在继续往里灌，“约克城号”吃水越来越深。随着傍晚来临，巴克马斯特经过慎重考虑，命令所有人撤离该舰。他们将在“绿鹃号”上度过一晚，希望第二天早晨能够返回，继续拯救这艘航母。

但是7日黎明，“约克城号”吃水更深了，并且重新朝左舷倾斜。渐渐地，船身彻底横倒，飞行甲板变得垂直于海面。“约克城号”上的幸存船员在其周围的驱逐舰上难过地看着这一幕。I-168的鱼雷在其船身上撕开的两处巨大的创口暴露在船员眼前。德黑文说：“我们能听到重型机械松脱的声音，它们猛地撞上舱壁，把内部撞得四分五裂。”早上7点，这艘巨舰的船尾开始下沉，“舰首则慢慢地从水中升起来，有三分之一的长度露出了水面，大量的水从浸满水的舱内流出来。它来回地摇晃着，直到整个舰首立起来。它来回晃动时，看起来就像是朝人们挥手告别。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大男人哭泣；我们的眼中都涌满了泪水”。[\[160\]](#)有片刻的光景，舰首在海面上直立着，像是一块墓碑。接着，“约克城号”被海水淹没，缓缓沉入三英里深的海底。

巴克马斯特舰长在一艘驱逐舰上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让舵手将

船驶过泡沫和残骸。这一切都是在默哀中完成的。[\[161\]](#)接着驱逐舰排成纵队，朝珍珠港撤退了。

[\[1\]](#)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09.

[\[2\]](#) Ens.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7.

[\[3\]](#)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40.

[\[4\]](#)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90.

[\[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 Sec. 3, "Prepar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in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OPNAV P32-100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C, June 1947.

[\[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

[\[7\]](#)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8.

[\[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6.

[\[9\]](#)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10.

[\[10\]](#) "Prisoner statement," in NHC, Morison Papers, b. 22, "No. 4, Action at Midway," cited in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0.

[\[11\]](#)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106.

[\[1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 90–91.

[\[13\]](#) *Ibid.*, p. 91.

[\[14\]](#)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83.

[\[15\]](#) Astor, *Wings of Gold*, p. 90.

[\[16\]](#)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02.

[\[17\]](#)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in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18\]](#) Astor, *Wings of Gold*, p. 91.

[\[19\]](#) Smith, *Carrier Battles*, p. 116.

[\[20\]](#)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21\]](#) Lt. Cdr. Iyozo Fuj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237.

[\[22\]](#) Hiroshi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23\]](#)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96.

- [24]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9.
- [2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 [26] Kaname Shimo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94.
- [27]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 [28] Maeda account in *ibid.*, p. 119.
- [29]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198.
- [30]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70.
- [31] Gay, *Sole Survivor*, p. 108.
- [32] Astor, *Wings of Gold*, p. 96.
- [33]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debrief recorded Oct. 12, 1943, at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Washington, DC, p. 2.
- [34] Tom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93.
- [35] Clayton Fish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12.
- [36] Lloyd Childers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p. 11.
- [37]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95.
- [38]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0–41.
- [39] Mears, *Carrier Combat*, p. 52.
- [40]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42.
- [41]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77.
- [42]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335.
- [43]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45.
- [4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9.
- [45]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2.
- [46] Astor, *Wings of Gold*, p. 96.
- [47]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3.
- [4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09.
- [49]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p. 5, 7.
- [50] See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3–46.
- [51] Mears, *Carrier Combat*, p. 93.

[52]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48–49.

[53] Smith, *Midway: Dauntless Victory*, p. 140.

[54] 追击防御（beam defense），国内资料未见相关译法。Beam在此指舰船和飞机两边与其头尾连线呈直角向外的延长线之后的空间，一般可以称作飞机的“后半球”空间；因此，beam defense，就是防御身后追击的飞机的意思。萨奇穿插战法（Thach weave），有资料翻译为萨奇剪战法，但是这会让人跟剪刀战法（the scissors）混淆。剪刀战法是一对一情况下的一种防御战法。其单机的飞行路线与萨奇穿插类似，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最初的误译。根据其实际战法，还是译作“萨奇穿插”更合适。——译者注

[55] John S.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56.

[56]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0.

[57] Thach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 97.

[58] 相关示意图及说明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18–21.

[59]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53.

[60]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58.

[61] Ens. Haruo Yoshino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42.

[62] See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34–36.

[63]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20.

[64]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 155.

[65]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60.

[66] 关于这次攻击的描述，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37–38。

[67]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3.

[68] Shimo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94.

[69] Suzuki account in *ibid.*, p. 92.

[70] Lt. (jg) Kiyoto Furuta account in *ibid.*, p. 24.

[7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2.

[72] *Ibid.*, p. 103.

[73]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18.

[74] Dickinson, *The Flying Guns*, pp. 164–66.

[75]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05–6.

[76]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8.

- [77] Fisher, *Hooked*, p. 81.
- [78] Roy Gee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16.
- [79] See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50.
- [80] *Ibid.*, p. 64.
- [8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06.
- [82] 关于日本航母难以抵御火灾的情况，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244–47。
- [83] Lt. Takayoshi Morinag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63.
- [84] Yoshino account in *ibid.*, p. 142.
- [85]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52.
- [86]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 [87]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 [88]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6.
- [89] Furu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24.
- [90]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4.
- [91]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 [92]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264.
- [93]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277.
- [94] Commanding Officer, USS *Yorktown*, to CINCPAC. Battle of Midway after-action report, June 18, 1942. Enclosure: fighter control transcript.
- [95] Scott McCuskey account in Hammel, *Aces Against Japan*, p. 62.
- [96]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80–81.
- [97] Chief Radioman Richard Brow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9.
- [98]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1.
- [99]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3.
- [100]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1.
- [10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 91–92.
- [102] Ens. Taisuke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 [103] Ens. Taisuke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 [104]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62.

- [105]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81.
- [106] Fred Dyer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18.
- [107]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15.
- [108]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2.
- [109] Bill Surgi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239.
- [110] Oral history: Lt. Joseph P. Pollard, medical officer; online at www.history.navy.mil/faqs/faq81-8.htm.
- [111]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2.
- [112] Oral history: Lt. Joseph P. Pollard.
- [113] Commanding Officer, USS *Yorktown*, to CINCPAC. Battle of Midway after-action report, June 18, 1942. Enclosure C: Engineering.
- [114]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3.
- [115] Bill Roy account in *ibid.*, p. 86.
- [116] Otis G. Kight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33.
- [117] Cheek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5.
- [118] Herman A. Kelley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 32.
- [11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83.
- [120] 关于这次攻击的描述，见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326–27。
- [121] Maruyam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86.
- [12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8.
- [123]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20.
- [124]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 [125]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8.
- [12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 92.
- [127]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49.
- [128]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p. 10.
- [129] Yoshino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142.
- [130] Furuta account in *ibid.*, p. 24.
- [131]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p. 417.
- [132] “Letter of Instructions,” covering “Operation Plan 29-42,”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File A16-3/(16); 27 May 1942.

[133]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 64.

[134]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33.

[135] Nagumo's action report, June 15, 1942. Part III, "Description of the Operation." See also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p. 334–35.

[136]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17.

[137] Entry for June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p. 145–46.

[138] Ibid., p. 145.

[139]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0.

[14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0.

[141]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9.

[142] Entry for June 5,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47.

[143]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9.

[144]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253.

[14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0.

[146] Ibid., p. 321.

[147] Suzuki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 92.

[148] Maruyama account in ibid., p. 186.

[149]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13.

[150] Thomas, *Sea of Thunder*, p. 84.

[151] Masashi Shibata's account, "The Destroyer *Tanikaze* Returns from 'The Sea of Death,'" in Fisher, *Hooked*, pp. 95–98.

[152] ARM3/c Ronald W. Graetz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4.

[15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 158.

[15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3.

[155] Gee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1.

[156] Navy chief machinist's mate Dwight G.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p.15–16.

[157] Navy chief machinist's mate Dwight G.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p.15–16.

[\[158\]](#) Nesmith, *No Higher Honor*, p. 253.

[\[159\]](#)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7.

[\[160\]](#) DeHaven accou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pp. 15–16.

[\[161\]](#) Roy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88.

尾声

第16特混舰队（“企业号”“大黄蜂号”和为它们护航的水面舰艇）原本有可能向西追击撤退的日本舰队，但是这样做有多种风险。斯普鲁恩斯将军谨慎地把舰队撤回了威克岛陆基轰炸机的空中打击范围内。他不想冒险去面对“大和号”的18英寸巨炮，或是其他强大的日本战列舰的16英寸大炮。后来，他写道，他有“一种感觉，或许是直觉，我们的好运气已经用到头了，继续西进会对我方不利”。^[1]驱逐舰已经急速航行了好几天，现在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除非出现不太可能发生的戏剧性逆转，否则美方已在中途岛战役中赢得决定性胜利。6月6日，夜色降临的时候，斯普鲁恩斯决定见好就收。特混舰队掉转方向，朝瓦胡岛折回。

弗莱彻将军指挥的第17特混舰队的剩余舰船上塞满了幸存者，以及后来在“约克城号”和“哈曼号”上受伤的船员。这些舰艇高速朝珍珠港撤退，以免遭到日军潜艇的攻击——但是当引擎的仪表盘显示航速达到25节时，驱逐舰不断剧烈抖动，使得伤员非常痛苦。受伤最严重的是“哈曼号”的深水炸弹爆炸时处在水中的伤员。返回瓦胡岛的三天航程期间，有许多人死去，被施以海葬。在“贝纳姆号”驱逐舰上，一名受伤的海员回忆道：“他们实施海葬时会鸣笛，此时每个人都要立正。给我抬担架的人把我和尸体放在了同一排。我得跟他们说，我还活着！”医生解剖了部分尸体，“以看清他们遭的罪”，他们发现这些死者的肠子上布满了小洞，像是铅弹击穿造成的。^[2]

他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役——美军的军官和船员都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场胜利的意义。而且不管他们为胜利感到多么兴奋，这种情绪都被不确定性、迷失感、哀痛的心情和身心的疲惫抵消掉了一

些。罗伯特·凯西在日记中写道，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途岛战役的整体情况都将不为世人所知：“成千上万的人目睹了这场大灾难，但是没人见过这场战役的全景。有成百上千的人带回了自已的一小部分故事——这些小故事有时能拼合起来，有时不能——这些小故事像马赛克一样，在未来某一天，通过它们，我们或许能了解中途岛战役的全貌。”^[3]米尔斯少尉是第8鱼雷机中队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他没有分配到飞行任务），他回忆说，“大黄蜂号”的飞行员曾试着把各自的经历整合成一份连贯的报告，但是仍存在许多没人能回答的问题。“一点一点地，就像把一块块碎片嵌入拼图一般，我们打听一个又一个参与者的故事，通过谣言和传闻，了解各中队的攻击目标和他们的战果。”^[4]

他们不知道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上的守军怎么样了，也不知道陆军飞行员战绩如何。这场战役的整体意义是什么？哪些事件比较重要，哪些事件没那么重要？没有人能说明白。

每一艘航母的飞行员都知道，冷冰冰的统计数据显示了一个事实，他们的职业是海军之中最危险的。从飞行训练的早期阶段起，他们就反复被警告，他们可能会失去朋友和战友。但是正如一位年轻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所说的，“无法改变的死亡结局”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怕的冲击。^[5]没有尸体需要掩埋。阵亡的飞行员只是永远地消失了。他们已故的明显标志是航空母舰待命室里空荡荡的椅子。米尔斯写道：“飞行员听说战友牺牲后，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牺牲了。死者只是不见了，而其他人很难接受那个人永远不会回来了。”^[6]克莱顿·费希尔少尉回忆道，他进入第8鱼雷机中队的待命室后，发现“除了飞行员换上飞行服之后挂在吊钩上的制服外，待命室内空空荡荡”。^[7]两位年轻的少尉——米尔斯和费希尔——被派去整理阵亡战友的私人物品，然后寄给他们的亲属。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心情沉重。米尔斯说：“整理大家的私人物品时，我们看到一顶明显破旧的帽子、一张女孩子的照片、一本卷了角的祈祷书，还有塞着各种各样卡片的钱包——所有这些使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家人得有多么怀念他们。”^[8]

从另一方面说，日本海军派出了强大的舰队投入这场战役，并且失去了四艘一线的航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美国的旗帜仍在中途岛上空飘扬，敌军的残余舰队则凄惨地向日本撤退。凯西说：“事实证明，我们参与了一场大决战——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我们能赢得这场战役。我们因为紧张不安而精疲力竭，相互咕哝着无意义的音节，喝着咖啡都能睡着，此时回味这场战争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过于兴奋了。”^[9]

尼米兹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室里密切关注着战役的进展。根据莱顿的描述，作战计划室是“一个相当简陋的房间，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海图铺在两个木板凳架起来的胶合板上”。^[10]海图上放着一大张描图纸，一名参谋不停地用蓝色蜡笔描画着美军以及日军舰队已知的位置和踪迹。截获的零星无线电信息得以让他们了解这场战役的进展。随着战役的发展，尼米兹和参谋的心情时起时落。6月4日早上，尼米兹了解到第8鱼雷机中队全军覆灭的消息。莱顿记录说：“我从未见过他那么狂躁。他看起来躁动不安，叫来通信官柯蒂斯中校，询问为什么没有得到或是侦听到任何相关消息。尽管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必然已经知道此刻可以打破无线电静默了，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向尼米兹汇报战役的进展。”^[11]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斯普鲁恩斯打破了无线电静默，报告说有四艘日本航母被击中，已经燃烧起来了。如释重负的尼米兹给所有作战单位发送了一封快信：“所有参加中途岛战役的士兵都在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能与你们并肩作战，我深感自豪。我相信，我们再全力作战一天，定能完败敌军。”6月6日，他发表了一份官方通告，第二天这份通告就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现在珍珠港之仇已经部分得报。但是，直到日本海军削弱到无法再战的地步，这场复仇计划才算完成。”^[12]然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说了一段话，措辞不再像往常那样一板一眼：“如果我们声称在实现目标之路上已达中途，这或许不为过。”^[13]

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残余舰船向西缓慢行进，去与主力部队会合。南云忠一的司令旗现在悬挂在轻型巡洋舰“长良号”上，他告诉参谋，他想要自裁，一些人发誓跟随他。但是南云忠一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将军拒绝自杀，因为他认为自杀是懦夫的逃避行为。他跟那些要自杀谢罪的人说：“你们就像一群歇斯底里的女人，先是小胜则喜，而后又因大败要自杀！对于日本和你们来说，都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为什么不想办法把灾祸变成好事呢？”南云忠一听完了他的这番话，但是没有立即被说服，他低声回答道：“你一定知道，总司令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全都是理性的。”进一步沟通之后，南云忠一终于答应了：“好吧。我绝不再鲁莽行事。”^[14]

水面舰艇上挤满了沉没航母的幸存者，许多人在拥挤的甲板上露天而眠。^[15]“千岁号”上的良人宫里（Miyasato Yoshihito）回忆了船上阵亡士兵的海葬过程。当海军军歌《海行兮》通过扬声器响起时，所有船员立正站好。仪仗兵发射礼炮以示敬意。棺木落入大海。他回忆道：“棺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下沉，我们看着它越漂越远，在海浪里时隐时现。”^[16]

每天破晓时，巡洋舰和战列舰都会派水上飞机向东侦察，但是这些飞机在空战中起不到什么作用。整支舰队完全没有战斗机的保护，如果被美国航母发现，他们就会成为敌人手到擒来的目标，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美国航母可能会被诱入威克岛的陆基轰炸机打击范围内，甚至是日本战列舰的巨炮之下。到了8日早上，很显然，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追击。宇垣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派整支联合舰队全面反击的打算。”^[17]燃料所剩不多，日军只好踏上令人沮丧的漫长回程。

联合舰队的参谋在“大和号”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朝外凝望着大海，既震惊又沮丧。他们很少说话。说什么都没大用了。山本的文书军士野田

满春回忆说，航空队军官佐佐木“胡子拉碴，双目凹陷，一脸倦容，好像觉得他个人应该对这次战败负责”。^[18]山本自己也生病了，他脸色蜡黄，看起来无精打采。野田说，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舱房里，有时会在罗经台旁站一小会儿，小口喝点稀饭。宇垣提到，总司令“患有胃病，舰队上的医生给他治疗后，仍旧没什么起色。在这样严峻的时刻，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19]医生诊断山本是受蛔虫困扰，需要用“驱虫药”来治疗。到了6月9日，他看起来好多了，不过军官们注意到他“恢复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蛔虫病患者恢复的时间要长”。^[20]

6月10日，南云忠一的舰队与主力部队会合。山本的参谋显得很友好。他们谁都没有责备，因为实际上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战败的最大责任在于山本。山本也承认这一点，他宣称这次战败“都是他的责任，他们不应指责南云忠一的部队”。^[21]源田实、大西泷治郎和草鹿龙之介看起来疲惫不堪，登上“大和号”时穿着救生裤。进入山本的私人舱室后，草鹿龙之介说：“无可否认，在犯了这样的错误后，我们不应不知羞耻地活着回来，我们回来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做出补偿，因此我发自内心地请求您以后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山本简短地回道：“好吧。”^[22]宇垣试着安抚草鹿龙之介，给了他一些礼物和金钱，并且第一次听目击者讲述四艘航母沉没的经过。当天下午三人返回了“长良号”。^[23]

自从1941年12月7日以来，瓦胡岛上的人一直在入侵的威胁下生活。现在，美国太平洋舰队回到珍珠港，他们可以喘口气了——夏威夷群岛看起来安全了，这可以说是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尼米兹经常去码头迎接归来的舰艇。“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缓缓驶入泊地后，航母上的机组人员下船住进了夏威夷皇家酒店或莫阿纳酒店，两家酒店都位于怀基基海滩上，被征用来让军官休养与恢复。这些军官照例整夜狂欢，但他们痛饮时心中更多的不是欢乐，而是悲痛。一些年轻的军官为死去的朋友而喝得烂醉，痛哭流涕；也有人打架闹事，或是破坏酒店的财物。

宪兵队、海岸巡逻队和酒店侦探苦不堪言。米尔斯回忆道：“按照惯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返航的飞行员会醉醺醺地挨个房间找酒喝、聊天、争论、打架、破坏家具。一些人感到非常脆弱，想找个女孩子陪伴，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发泄情绪的方式是作恶使坏。有两个小伙子，他们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互相用拳头殴打对方，还都不躲闪，最后都成了黑眼圈，身上到处都是血。还有个飞行员试图把身材比他小的朋友扔到窗外去。”^[24]新闻报道误把击沉日本航母的功劳算在陆军航空队身上，这惹怒了他们。当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在火奴鲁鲁相遇时，他们互相口出恶语，有时还动起了拳头。直到整场战争过后，才最终证实日本舰队所有的损失都是海军俯冲轰炸机造成的。

6月7日，在华盛顿，记者鱼贯进入海军总部会议室，金将军简短地介绍了战役的状况。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金将军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与敌军的损失相比，美国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他承认，目前还不清楚阿留申群岛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浓雾限制了与敌军的接触。有记者问道，日本将全部海军力量都投入这场战役，该情况是否属实。“或许没有全部出动，而是出动大部分军力。他们有个行事风格，那就是不会派孩子来做成人的事。”当媒体追问他美国太平洋舰队是否会追击撤退的日军舰队时，他变得有些暴躁。他指出，日军在威克岛上驻扎着强大的陆基航空力量。“咱们国家有1.3亿业余战略家，其中无疑有很多人会支持采取后续行动，”他说，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急于剿灭残敌可能是不明智的。”^[25]

日本4艘最好的航母和1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1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受损，292架飞机被毁，3 000多名日本士兵丧生。美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代价是“约克城号”和“哈曼号”被击沉，145架飞机被毁，307人在战斗中阵亡。尼米兹发现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是二战中美国最出众的海上指挥官（不过当时他已被指派上岸去当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长）。斯普鲁恩斯依着自己的本性，根本没去屈尊回应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有些人指责他缺乏进攻性，因为他在4日到5日的晚上没有追击敌

军舰。尽管他完全能以“大黄蜂号”的航空大队表现不佳为由批评米彻尔舰长，或是批评哈尔西的参谋（尤其是他的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但他把这些话都忍住了。在6月8日写给弗莱彻的信中，他不吝赞美之词：“如果没有你们的行动，以及‘约克城号’承担的一切，我确信我们已经惨败，日军也已经占领中途岛了。照目前情况来看，我想将来某个时候一定能打败他们。”^[26]

预先了解日军的动机后，尼米兹的应对手段非常果断。另外，他的手段也极其巧妙，可以说是完美。在进行军事部署时，尼米兹排除了其他一切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在首要目标上：伏击并摧毁日军航母。山本的计划庞大而又复杂，而尼米兹的计划则直截了当，瞄准了敌军最薄弱的环节。他把所有能凑起来的空中力量都提供给了中途岛，驳回了当地的陆航指挥官希望在瓦胡岛保留更多飞机的请求。他把三艘航母置于南云忠一的左侧，相隔的距离既可以避免被提前侦察到，又足以发起有效的攻击。尽管他知道日军将会攻击阿留申群岛，他还是拒绝了从中途岛主战场分兵支援的请求。他愿意接受失去阿留申群岛最西端岛屿的损失，知道这些岛屿作为战争资产所能提供的价值有限，而且假以时日，可以重新夺回来。这种看法与17世纪著名日本剑客宫本武藏的学说是一致的。宫本武藏曾建议：“若想发动攻击，应任凭对手做无用之事，同时阻止其做有用之事。这是兵法的精髓所在。”^[27]

南云忠一派出的袭击中途岛的飞机出动之前，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一直没有被侦察到；他们在南云忠一来不及做出反应时便派出了飞机，还指挥军舰躲过了日军主力舰队的巨炮。放弃“约克城号”之后，弗莱彻慷慨地把剩余美国军舰的战术指挥权移交给了斯普鲁恩斯。在对整场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天过后，斯普鲁恩斯抵制住了向西追击的冲动（以及一些军官的建议），谨慎行事，这符合尼米兹“判断风险”的要求，也加大了美军的胜算。

即便如此，美国人仍然需要非常走运，才能赢下这场战役。这场战役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很可能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日军巡洋舰侦察队

原本可能提前一小时发现美国航母，那样的话，南云忠一就能获得宝贵的时间，在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冲向日本第一航空舰队之前让日军舰载机起飞。俯冲轰炸机是美军最有力的武器，它们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顺序抵达了敌军上空，而当时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正处于低空，位置分散。美军另外一件幸运的事是“企业号”和“约克城号”的无畏式轰炸机虽然起飞时间不同，飞行路线不同，却几乎同时从不同方向集结在敌军舰队上方。运气（以及第6轰炸机中队队长迪克·贝斯特上尉的随机应变）让SBD俯冲轰炸机分头攻击并击中了三艘不同的日本航母，而实际上他们很容易只顾攻击其中的一两艘，而漏掉其余的。相比之下，“飞龙号”的两批舰载机攻击的都是“约克城号”，尽管“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也在攻击范围内，结果就是，三艘美国航母中，有两艘在战役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

在斯普鲁恩斯看来，他仅仅是按照尼米兹写好的剧本出演了一个角色而已。他没有做任何了不起的事情，只是非常幸运罢了。他后来写道：“6月4日早上，我们被幸运女神射中。这场战役的命运在那时便已决定。”^[28]至于他自己在行动中的角色：“唯一可以归功于我自己的，就是我能敏锐地意识到发动突袭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强烈渴望一发现敌人就全力打击其航母。”^[29]

虽然中途岛战役影响重大，但是这场战役本身并不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美国的战时动员工作正在快速推进，但要想在太平洋战区的遥远地带奏效，还需半年的时间。对于日本海军而言，四艘航母及其所有飞机的毁灭显然是极大的打击，大量训练有素的机械师和船员阵亡也是重大损失。但是在这次行动中，大多数日本飞行员幸存了下来。据某位历史学家估计，有110名日本航母飞行员在中途岛丧生——只是分派到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飞行员的1/4左右。^[30]在战争的这一阶段，那些幸存的老兵是日本海军航空兵里最有价值的资产。

即使如此，中途岛还是使日本的矛尖变钝了。山本原本是要豪赌一把，一举打败美国海军，结果自己却大败而归。此后他再也没有集结过

规模如此大的兵力，再也没有对盟国的领土发起过持续的进攻。中途岛战役证明，太平洋战争的确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山本告诫手下要避免的恰恰是消耗战。日本海军保留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飞行员骨干，但无法培养足够的新飞行员，以补充战斗必然会带来的减员。由于飞机、燃料和弹药短缺，经验丰富的教官太少，很明显，日本没有什么扩大飞行训练规模的途径。在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日本海军将通过放宽标准来加快飞行训练流程，而且是严重放宽标准，减少每名受训人员上前线服役之前的飞行小时数。上战场的日本飞行员中新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他们甚至没有接受过实弹射击训练。余下的日本老飞行员基本没有解脱的希望，注定要一直作战到死，他们对此也心知肚明。那些老兵中有许多人会在1942年下半年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中丧生。

从美国的角度看，中途岛战役消除了日本袭击夏威夷和北美西海岸的风险。同样重要的是，它减轻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上的政治压力，使他无须再考虑将更多部队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因此得以腾出时间来处理需要优先关注的事情，即确保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途岛战役承认并确认了“欧洲优先”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因此，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仅影响了太平洋地区的战事，而且影响了纳粹德国的命运。

罗奇福特和他的密码破译团队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没有人觉得品尝胜利的果实是件容易事。在中途岛战役爆发的一个星期前，就在日本舰队出海的时候，日本海军为其主要作战密码JN-25采用了新的密码本。从“JN-25-B”到“JN-25—C”的转换，使过去半年来破解者累积的努力毁于一旦。截获的日本无线电情报再次变得无法破译。在疲惫的密码破译专家振作精神，恢复精力，将密码从头破译一遍之前，美方无法知晓日军电报的内容。贾斯珀·霍姆斯说，同事们的心情都很糟糕。“也许是太疲惫了。即使是长跑运动员，在漫长而艰难的比赛结束

时，冲线之后都可以瘫倒在地，而密码破译者却要永远面对这种令人郁闷的事。……面对破解新密码这样漫长而艰巨的任务时，每个人都打心底里担心，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取得成功。”^[31]

罗奇福特允许他的团队休息一阵，于是有人在戴蒙德角的一户私人住宅里组织了一场派对。“这是一场盛大而热闹的宴会，大家喝得不省人事，大喊大叫，”罗奇福特后来回忆说，“就是这样一场宴会……一场喧闹无比的宴会。”但一两天后，他们就全部回到了地下室，继续他们早已习惯的日夜不停的工作，“因为那时我们遇到了这个新版本[日本密码]，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满怀希望地解读这些新密码”。^[32]

尼米兹将军断定，中途岛之战“从根本上来讲是情报工作的胜利”。^[33]他提前获知了日本的作战计划，这从价值上来说或许相当于额外获得两艘航母。尼米兹知道日本军队何时出击，从哪里出击；知道攻击在哪里进行，何时进行；知道日本人会在战前派水上飞机侦察珍珠港，并部署潜艇警戒线来观察和拦截美国太平洋舰队；还知道敌方在行动之后会在何时何地集合。美军的密码破译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巩固了美国海军的通信情报部门的地位。中途岛的胜利为情报部门在上级决策层中赢得了支持者，这些在无线电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时进入海军服役的将领会确保通信情报部门不再遇到资金、人力等问题，也不再受人轻视。

许多人都为破译日军的密码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其中包括那些驻扎在墨尔本和华盛顿的人；但是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合成准确图案的人，是罗奇福特。在对大量迥然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数据进行筛选方面，罗奇福特有着罕见的天赋。作为一名在海上工作多年的海军军官，他能自如地运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以及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理解。他依靠逻辑推理，充分利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提出理论并反复检验，直到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同样重要的是，即使他缺乏确凿的证据，他也知道如何说服上司（尤其是尼米兹）相信他的结论是合理的。托马斯·戴尔说过，罗奇福特的特长是“变废为宝”。早期截获的涉及中途岛的讯

息，“完全能够以跟正确方式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对日本人性格的了解……使他能猜出他们真正的意图”。[\[34\]](#)

虽然罗奇福特的历史成就后来才得到承认，但他终究获得了应得的认可。曾在美国海军担任潜艇艇长，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爱德华·L. 比奇在回忆录中总结道：“罗奇福特中校在一个无比重要的时刻做出的贡献，比史上其他所有海军军官都要大，人们将永远因此而赞赏他。”[\[35\]](#) 2003年，由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组成的网络社区“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发起投票，请参与者提名中途岛战役中“最重要的战士”。调查结果显示，尼米兹和罗奇福特得票相同，这是合情合理的。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对罗奇福特的支持尤为突出。[\[36\]](#)

但是在1942年6月，除了高层人士，没有人知道日本的密码已经被破译了——即使在高层，也很少有人知道，罗奇福特在其华盛顿的上司顽固地坚持错误结论的时候，便已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证明了罗奇福特的价值，但他也成了众矢之的。由于证明对手是错误的，他付出了职业生涯的代价。他在华盛顿的敌人——雷德曼兄弟、温格中校以及金将军的若干身份未明的参谋——显然曾经密谋争功，同时贬低夏威夷情报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密谋者非常清楚，战时严格的保密政策有助于他们隐瞒自己的不当行为，所以他们不仅仅掩盖事实，而且还捏造事实。雷德曼兄弟坚称，将6月3日确定为日军攻击日期的是海军通信情报科的密码破译人员，而不是夏威夷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他们声称罗奇福特没有资格掌管夏威夷情报站，应该解除他的职务，因为他“没有在海军通信局接受过技术训练，只是学过日语而已”；[\[37\]](#)他们还试图让人相信，“珍珠港没有发觉敌军进攻中途岛，好在海军部出手相救”。[\[38\]](#)有人无意中把密码破译成功的消息泄露给了《芝加哥论坛报》，雷德曼兄弟恶意地暗示是罗奇福特泄露的信息。[\[39\]](#)

他们的阴谋成功了。这两兄弟很快升职，哥哥约瑟夫·雷德曼少将被授予战时优异服务勋章。罗奇福特也得到该勋章的提名，而且得到了

尼米兹的强烈支持，但他的申请被拒绝了。罗奇福特被召回华盛顿，转至其他部门工作，他的才华被浪费了。托马斯·戴尔后来写道：“对罗奇福特的事情我思考良久。虽然不情愿，但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罗奇福特犯下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对于某些心眼极小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来说，被人指出错误是对他最大的侮辱。”^[40] 贾斯珀·霍姆斯以更加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丧钟不是为罗奇福特个人而鸣，整支海军也有一小部分死去了。”^[41]

多年后，罗奇福特从海军退役，有人请他就此事发表看法。然而他绝口不提。他说，他的努力是否应该获得勋章，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酬，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原本更愿意待在船上，但这是分配给我们的工作，而且似乎也是最适合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尽力去做好。”当采访者不依不饶，继续追问的时候，他拒绝置评：“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和失望的故事，我认为时至今日再去追究它，什么好处也没有。”被进一步逼问时，罗奇福特开始变得暴躁：“这就是历史。我不会再和你讨论这件事了。”^[42]

惨败的消息传到了日本。在东京的大本营，一名亲历者回忆道，参谋人员互相嘀咕：“这太可怕了。这就是一场灾难。”^[43] 在长崎，也就是“武藏号”的建造地，海军人员“看起来异常困惑，他们抱着胳膊，默然地站住了”。^[44] 军令部向天皇报告损失了四艘航母。天皇剧烈地颤抖着，但还是强打精神站直身子。内大臣木户幸一6月8日写道：“我曾以为海军航空兵的可怕损失将给天皇带来难以形容的焦虑，但是当我看到他时，他像往常一样冷静，面色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说，他告诉军令部总长，这次的损失令人遗憾，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让海军失去斗志。他命令军令部总长保证在未来仍然大胆行动，勇于进攻。”^[45]

6月10日，在联络会议上，海军军官讨论了这场战役，却避而不谈日本有多少损失。按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应该能及时获得来自前线的报

告，但事实是，直到一个礼拜之后，他才了解到海军的全部损失。在掩盖事实的过程中，天皇裕仁亲自插手。他派一名陆军将领专门监督向作战计划制订者传播真相的过程，希望将事情的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天皇还指示将返回的伤员隔离在医院和海军基地，直到他们可以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舰船上或是送往前线的战区。

与大本营后来公布的官方结果相比，日本最初的新闻战报更加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可笑。6月6日，东京广播电台的英文广播宣称：“美国海军有6艘航母在一次毁灭性的攻击中被击沉，而这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少航母。我们的舰队击溃了美国舰队微弱的抵抗，轰炸了中途岛的守军，并占领了这些岛屿，而我方的损失微不足道。对珍珠港和火奴鲁鲁的袭击已经开始。火奴鲁鲁一直在坚守。”[\[46\]](#)

日本后续的新闻报道强调了日军对中途岛和荷兰港的空袭、日军成功占领了阿留申群岛上的两个岛屿，以及一艘日本潜艇炮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这是在同一周发生的事件）。媒体上刊登了大幅的照片，似乎是为了佐证大获全胜的头条新闻。人们能看到基斯卡岛上升起了日本国旗，战士们立正敬礼。在从中途岛和荷兰港上空拍摄的照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仓库、飞机库和油罐正在猛烈燃烧。阿图岛上的一队战士朝相机咧嘴笑着，他们正在雪原上用雪橇运送重机枪；在旁边的照片中，他们正坐着从冰山上滑下来。他们高兴地大笑，好像在过寒假一样。[\[47\]](#)

大本营的发言人平出英夫大佐说：“真奇怪，敌方没能阻止我方陆军和海军部队登陆并占领.....他们的领土。海军作战行动已经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东太平洋地区，而占领阿留申群岛的西部，则是将剑指向了敌人的喉咙。”[\[48\]](#)

曾佐种次少将在《日日》一书中称，在战争的下一阶段，日本海军将进攻加利福尼亚。他写道：“美国通向我国的北方攻击路线，以及其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基地已经在最近的荷兰港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被帝国海军粉碎，日本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攻击美国本土了。由于其东海岸不

断受德国和意大利军舰的威胁，而西海岸完全暴露在日本的攻击之下，因此美国现在腹背受敌。”[\[49\]](#)

对日本损失的报道模糊而且前后不一，引人生疑。6月10日，海军省通知所有军区，官方统计的损失数据是1艘航母沉没，1艘航母和1艘巡洋舰受损，并损失35架飞机。第二天，一位著名的平民海军专家在广播中说有两艘日本航母沉没了。直到6月21日，海军才公布关于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结局的官方说法。两艘航母，“加贺号”和“苍龙号”，将“择机从编制中注销”——海军等于默认这两艘航母已经没有了，但是要尽量保持低调和神秘。“赤城号”和“飞龙号”仍将在册，“但不会配备人员”——换句话说，海军承认它们已经损坏，但要保持一种假象，即它们已经安全返回日本，正在维修。“保守秘密……而且勇敢坚定地谨慎执行”，这是极其重要的。[\[50\]](#)

如果这些描述是为了误导美国人，那么它们可能还有符合逻辑的军事目的。（事实上，在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人也隐瞒了“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但是日本人也声称，美国海军失去了1艘旧金山级巡洋舰、1艘潜艇，还有150架飞机——他们并不指望敌人相信这种断言。渊田美津雄说，美国人“立即向全世界宣布了对日本人造成的重创，准确地报出了击伤和击沉的军舰的名称。所以很明显，我们努力掩盖真相是为了保持国内的士气，而不是为了防止敌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51\]](#)

日本舰队于6月14日驶入柱岛锚地，穿过被一片灰蒙蒙的雾遮蔽的丰后水道。返程船员被派往船上、基地和海外据点，在那些地方，亲历者的描述无法渗透进平民社会。许多人被封闭在基地里，也有人获得短暂的自由通行证，但被警告不要前往东京，违者将被逮捕。伤者在夜深人静时从船上被抬下去，他们的脸上盖着床单，仿佛他们是阵亡者一样，然后他们会被限制在隔离的病房内。虽然渊田受伤不重，但是他被安置在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一个把守严密的病房里。他记录说：“我的房间被安置在一个完全隔离的地方。护士和医务人员都不允许进入，我也

不能与外界沟通。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些在中途岛受伤的人与外界隔绝。这实际上是以治疗为幌子的监禁，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是一名战俘。”^[52]

南云忠一和第一航空舰队幸存的高级军官在战列舰“雾岛号”上会面。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要做哪些改变——飞机要更容易操纵，飞行甲板要装上护甲，损管和消防措施要改善，在航母上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零式战斗机数量要增加。许多日本军官把这次战败归因于侦察机的数量不足。航空队军官源田实后来提出，对巡逻机和侦察不够重视是“战败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充分意识到了”侦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太过重视攻击部队了”。^[53]近藤信竹将军同意他的说法：“我们遭遇了惨败，因为我们没有发现中途岛附近有美国特混舰队存在的迹象。我们急需高速远程侦察机。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未能采用有效的措施，借助潜艇在舰队前方和两侧建立起护卫屏障。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没有预先派潜艇到中途岛去获取情报。”^[54]

日本剩下的两艘航母“翔鹤号”和“瑞鹤号”组成了第一航空战队。它们仍然受南云忠一的指挥。（舰队中有许多人因南云忠一在6月4日上午无比危急的几个小时内决策迟缓而责怪他，但山本拒绝让他的下属承担责任。）日本海军终于承认航母的地位高于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不过为时已晚。最初被作为战列舰建造的船将改为新航母。

由于日本民众得到反复的保证，相信海军已经赢得另一场惊人的胜利，他们没有理由要求指挥官下台，也没有任何高级军官被撤职。山本仍然是日本公众生活中最出名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但是，对于日本的战败，他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他的计划使得舰队过度分散，因此失去了相互支援的可能性。这一作战计划违背了马汉最根本的宗旨——集中兵力，而且缺乏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因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得以在日本舰队的其他部队提供支援之前，孤立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并将其歼灭。

6月10日，《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个匿名的日本海军将领对中途岛战役结果的评论，这条评论最初发表于东京的报纸上。虽然这个将军没有透露日本损失的详情，但他暗示日本海军现在预计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他坚信，在这样的斗争中，日本高人一等的耐力和作战意志将压倒一切。他说：“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双方都会筋疲力尽。因此，从长远来看，率先对战争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感到厌烦的一方将会失败。”^[55]两天前，《纽约时报》引用了金将军的话，他强调美国物质优势的重要性。金说，在这场消耗战中，日本人将处于严重的劣势，因为“他们补充损耗的能力显然不能与我们相比”。^[56]

这两段话简要地说明了两个对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各自的策略是什么。日本卓越的“斗志”将与美国压倒性的军工力量相对抗。

在未来三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夸耀自己独特的“大和精神”，并且相信这种精神一定能带领日本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民族，是一个有1亿人的大家庭（比当时日本实际的人口多说了3000万）；他们都有纯正的血统，同根同源；他们是神的后裔，在天皇的仁慈指导下团结一致。官方的口号加强并传播了这种想法——“一亿人像一团火焰一样前进”“思想一致，行动统一”“以奢侈为敌”。^[57]在压倒一切的精神鼓舞下，日本士兵在国内和前线将忍受敌人绝对不能承受的匮乏和艰辛——他们会更加努力，吃的食物更少，但他们仍像武士般视死如归。这种新的道德标准来自传统的武士道和禅宗思想，同时也是对这些理念严重的歪曲。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军工生产和美国、日本经济体的相对规模都不值一提，因为“真正的战斗力等于武器乘以斗志。如果其中一项无比强大，那你就会胜利”。^[58]这个方程推导出的必然结果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每一次失败本质上都是毅力的失败。解决任何军事问题的方案都是力劝士兵、水兵和飞行员更加努力，找到克服一切困难的动力。他们必须痛恨撤退和投降。1944年至1945年，随着战事吃紧，许多日本军人决心为战死而战死，“为天皇而

死”——因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种净化仪式，喷洒自己的鲜血就像是神道教“斋戒沐浴”一样。[\[59\]](#)

尽管美国有强大的军工业力量，日本军国主义者仍然冷静地断言，美国缺乏必要的无形精神特质来战胜日本。这个混杂的民族处于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徒劳地信奉个人主义和民主，所以美国人很快就会厌倦战斗，想要回国。美国女性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过大，埃莉诺·罗斯福的重要地位就是其体现，她们不会容忍丈夫、儿子和兄弟在战争中死亡。在战争抵达日本海岸之前，她们就会要求结束这种流血冲突。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越猛烈，越残酷，美国的决心就会更快地消失。他们确实是这样说的。

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日本的“斗志”范式无疑将赢得这场战争。如果美国人民不愿意参战，其潜在的军工实力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但是自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袭击珍珠港的那天起，美国就必然能在任何现实的情况中占领并征服日本。美国人对“斗志”的理解与日本人截然不同，而且美国人的斗志一旦被完全激发出来，对于这项任务来说不仅足够强大，而且绰绰有余。原来当过剧作家，后来成为总统演讲稿撰稿人的舍伍德对这个话题有一段非常精辟又有争议的评论。在战后不久，他写道，美国人的集体士气“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军的士气从来都不是特别好，但也没有糟得令人惊慌。人们很少挥着国旗游行。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人们在开火之前便普遍感到幻灭的战争。在美国看来，这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战争’；但是这也可以证明，这一次，美国人对于自己所面对的任务的可怕性质及其可怕程度有相对清醒的认识”。[\[60\]](#)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大体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民主制的美国内部依然麻烦不断。这里的党派纷争、诽谤、竞选、劳资纠纷、暴力犯罪、投机倒把、串通投标、逃票、种族骚乱、黑市交易和官僚主义的小冲突并没有突然减少。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在战争开始后不再兴风作浪，但是他们对总统及其顾问团的恨意与珍珠港事件之前相比并未减少。国会和

新闻界中有影响力的呼声仍然要求美国将主力从欧洲转向太平洋。罗斯福的反对者认为，总统应该放弃宪法赋予他的作为总司令的权力，将这种权力移交给称职的军事专家，麦克阿瑟将军或许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尔默·戴维斯有句著名的妙语：“有一些爱国公民真诚地希望美国能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苏联失败；另一些人希望美国能够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英国失败；还有一些人希望美国能赢下这场战争，同时盼着罗斯福失败！”^[61]

即使如此，美国经济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为战争而重组了。1942年4月，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宣布，美国的军工产量已经超越了轴心国。迅速的动员工作是由一堆新成立的首字母简写的联邦机构监管的——OPA、OPM、DPC、WPB、WRB和SPAB。^[62]仅由联邦签署定购船舶、飞机和坦克的新合同是不够的。为了一夜之间实现美国经济的军事化，人们认为有必要控制重要物资的分配，甚至禁止私营企业面向消费者市场服务。生产管理局局长威廉·克努森拒绝将稀少的原材料分给底特律的汽车装配线。他说，由于制造轮胎的橡胶不够用，国家不能再制造非军事用途的汽车。^[63]工厂要么为战争制造武器，要么什么也不造。联邦政权介入私人经济在此前的美国历史中是从未出现过的，但这种努力以惊人的方式取得了成功。

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英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倍，德国和苏联增加了1倍，日本增加了4倍。而在这三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5倍。^[64] 1939年，美国的飞机产量为5 856架；到1942年，美国的飞机产量达到了25 436架。仅在1944年一年，美国就将生产96 318架飞机，超过日本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总产量。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罗斯福批准了一项提案，为1940年的海军扩建草案补充条款，以增加8艘航空母舰、24艘巡洋舰、102艘驱逐舰和54艘潜艇，排水量共计90万吨。1944年，龙骨将全部铺设完毕。但即使是这样的计划，也还不够庞大。1942年1月，海军事务委员会打算建立一支舰队，由34艘战列舰、24艘航空母舰、12艘战列巡洋舰、104艘其他巡洋舰、379艘驱逐舰和

207艘潜艇组成。由于全国的造船厂早已在满负荷生产，所以只能铺设这么多新的龙骨。然而到1945年，美国海军的规模将比其他各国的海军加起来都大（按船舶数量或吨位计算）。

新招募来的人不断涌入海军新兵训练营，他们在那里要剪掉头发——“头顶上只有一英寸，两边都被剃光了”。他们被分配到两层的军营里，（有人明确地告诉他们）那里没有地板，没有楼梯，没有电梯，没有墙壁，没有床，没有浴室。（这就是海军新兵训练营，里面有的是甲板、梯子、起重机、舱壁、铺位和厕所。）他们穿着军裤，打着绑腿，戴着白色的圆帽，每天在阅兵场的柏油地面上训练并行军几个小时，“端着枪，前后走，上下爬，斜线跑，向后踢”。^[65]每天破晓，他们都会被大声的命令突然唤醒：“赶紧起床，穿好袜子。”^[66]然后，他们会乘坐火车和公交车前往偏僻的乡下，如果是水手，则可能会前往西部的圣迭戈或旧金山，抑或是皮吉特湾，那里是太平洋战争的集结和转运中心。

火车不胜负荷。回忆起这段时期，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如果有平板车，枪就装在平板车上；如果有敞篷货车，就装在敞篷货车上；如果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就装在货运车厢里。士兵们或是乘坐豪华的普尔曼式列车、部队的卧铺列车、长途公共汽车，或是乘坐已经放在院子里几十年的过时马车，这些交通工具都被征召来参加紧急的部队调动工作。”^[67]已经停用的19世纪的燃煤蒸汽机也被重新启用。一缕缕脏乎乎的黑烟掠过后面柳条外壳的客车车厢，熏黑了军人的制服。人们在车厢里打牌，抽烟，看书，朝女性吹口哨，看着乡村从眼前掠过。当火车上缺乏食物时，饥饿的人们向车门拥去，跳下车厢，来到站台上，冲入拥挤的站台商店和餐厅里哄抢。

1942年，似乎整个美国都行动了起来——不仅是部队和水手，还有在战时寻找工作的平民。由于军人享有优先乘坐汽车和火车的权利，平民（有时是一大家子人）往往在车站蹲着，睡在长凳或地板上，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分配到座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写道：

〔美国的火车站和汽车站〕是战争的悲伤地，是灵魂的迷失地。所有这些远离家乡的军人，以及看上去很可怜的新穿上军装的人，还有悲伤的乡村女孩，有的怀了孕，有的抱着婴儿，他们不是在环顾四周，只是站着、等着。到处都是排队的人。不管去哪儿，都得先排队。行李袋堆积如山。打着白色绑腿、佩带着警棍的宪兵正在巡逻，他们代表着秩序，而其僵硬的姿势和笔挺的制服**就是**秩序。对于平民来说，这在战争中已经算不太糟糕的境遇了，但是由于战时国家民众的生活常常受到侵犯，所以车站挤满了人。[\[68\]](#)

到达加利福尼亚后，许多去往太平洋地区的军人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必须等待登船，但他们并不介意。通往东京的道路是漫长而血腥的，无人怀疑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急着行进。南太平洋疟疾肆虐的潮湿丛林，中太平洋的微小环礁，所有那些名字陌生且鲜为人知的岛屿——埃法特岛、圣埃斯皮里图岛、马莱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埃米劳岛（Emirau）、塔拉瓦环礁、马朱罗环礁、夸贾林环礁、埃尼威托克环礁、乌利西环礁、帕劳群岛、塞班岛、莫罗泰岛、棉兰老岛、硫黄岛、冲绳岛——他们都会很快见到。

“48年在金门大桥，49年领救济。”这种1942年开始流传的悲观论调揭示了太平洋战场的许多美军士兵的看法。他们以为这场战争会比实际的时间长一倍，而且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长期的战争将会耗尽美国的财力，使美国破产。但这句话也体现了他们坚定不移的决心。不过，日本人对美国人的判断产生了致命的偏差。美国人并没有因为战争遥遥无期和归国无望而受挫。他们会继续战斗，灭敌，身亡，克服恐惧、疲劳和悲伤，直到踏上那个可憎国家的海滩。1945年，美国不可抵挡的战争机器将在那里与不可撼动的“大和精神”相遇，那时两朵蘑菇云将升起，天皇也将决定结束侵略的恶行。

[\[1\]](#) Spruance's Foreword in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9.

[\[2\]](#) Fireman 1st class Elmer Jones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53–54.

- [3]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96.
- [4]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6.
- [5]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 83.
- [6]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6.
- [7] Ens. Clay Fish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 125.
- [8] Mears, *Carrier Combat*, p. 77.
- [9]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395.
- [10]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34.
- [11] Ibid., p. 441.
- [12] Potter, *Nimitz*, pp. 99, 107.
- [13] "Midway' Spurs Pun by Admiral Nimitz," Associated Press, June 7, 1942.
- [14]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8.
- [15] Prange, Goldstein, and Dillon, *Miracle at Midway*, p. 328.
- [16] Navy seaman 3rd class Miyasato Yoshihito letter, in Gibney, ed., *Senso*, p. 130.
- [17] Entry for June 8,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58.
- [18] Prados, *Combined Fleet Decoded*, p. 335.
- [19] Entry for June 7,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57.
- [20]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1.
- [21] Agawa, *The Reluctant Admiral*, p. 321.
- [22] Entry for June 10, 1942, Ugaki, *Fading Victory*, p. 160.
- [23] Ibid., p. 162.
- [24] Mears, *Carrier Combat*, pp. 77–78.
- [25] C. Brooks Peters, "Report by Admiral 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42, p. 1.
- [26] Spruance to Fletcher, June 8, 1942,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U.S. Naval War College(USNWC) Archives.
- [27]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 79.
- [28] Fragment of undated and unaddressed correspondence, signed by Spruance, in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USNWC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 [29] Spruance's Foreword in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8.

- [30] Peattie, *Sunburst*, p. 174.
- [3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00.
- [3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3, p. 266.
- [33] Kahn, *The Codebreakers*, p. 573.
- [34]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6, p. 247.
- [35] Beach,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Year History*, p. 450.
- [36]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p. 170–73.
- [37]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 451.
- [38] *Ibid.*, p. 450.
- [39] 事后查明，“列克星敦号”副舰长莫特·塞利格曼曾不慎向《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透露机密信息。——作者注
- [40] *Ibid.*, p. 452.
- [41] Holmes, *Double-Edged Secrets*, p. 117.
- [42]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pp. 238, 254.
- [43] Asai Tatsuzo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06.
- [44]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 128.
- [45] Kido’s diary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450.
- [46] Notes taken by Robert Casey, June 6, 1942,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 404.
- [47]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June 1, 1942.
- [48] “Only One Carrier Lost, Says Tokyo,” *New York Times*, June 11, 1942, p. 4.
- [49] Rr. Adm. Tanetsugu Sosa, “Plans for Invading America,” *Nichi Nichi*, June 11, 1942, ci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 154.
- [50] Parshall and Tully, *Shattered Sword*, p. 388.
- [51]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6.
- [52] Fuchida and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p. 16.
- [53] Minoru Genda account in Stillwel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p. 27.
- [54]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 p. 313.
- [55] “Tokyo Press Hints at Midway Defeat,”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42, p. 1.

[56] C. Brooks Peters, “Report by Admiral 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8, 1942, p. 1.

[57]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 215.

[58] Hata Shoryu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 210.

[59] Hirosawa Ei account in *ibid.*, p. 247.

[60]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438.

[61] Elmer Davis quoted in *ibid.*, p. 437.

[62] 这些机构分别为：物价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生产管理局（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国防工厂公司（Defense Plant Corporation）、战时生产委员会、战争资源委员会（War Resources Board）、优先供应与分配委员会（Supply, Priorities, and Allocations Board）。——作者注

[63]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 173.

[64]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 354.

[65]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 7.

[66]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 49.

[67]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14.

[68]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p. 109–10.

致谢

感谢海军历史和文化遗产司令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独立海港博物馆、沃尔夫森—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博物馆、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学校和横须贺的日本国防大学的工作人员。

特别感谢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道格拉斯·V. 史密斯（Douglas V. Smith）教授和蒂莫西·H. 杰克逊（Timothy H. Jackson）教授，以及该机构的首席档案保管员、特色馆藏保管员伊夫林·M. 切尔帕克（Evelyn M. Cherpak）。（似乎）每个星期，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可以获得的在线资源都在增加。我发现最有用的网站是 www.history.navy.mil、CombinedFleet.com 和 ibiblio.org/hyperwar。“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www.midway42.org）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网站可以为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提供虚拟的论坛，拓展历史知识的边界。“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几个长帖讨论的内容已经收入罗纳德·拉塞尔（Ronald Russell）编的《无权取胜》（No Right to Win）。

感谢戴维·豪厄尔（David Howell）、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罗纳德·拉塞尔、弗洛伊德·比弗、乔恩·帕歇尔、文森特·安德森（Vincent Anderson）、弗吉尼亚发现博物馆的乔治·埃默里（George Emery，美国海军退伍军人）、佐藤由纪夫（Yukio Sato）、古森义久、半田浩二（Koji Handa）和荒船清彦，他们审阅了一部分手稿并提供了专业的评论。拉塞尔和比弗通读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从拼写错误、语法到专业的历史见解，我还根据比弗的回

忆修改了一些记载。在阅读本书关于日本的章节后，荒船大使以无懈可击的英语撰写了一份长达30页且行距很密的评论，不仅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还提起了他关于战争的童年记忆。像往常一样，本书的任何事实错误和解释错误都为作者一人之过。

在日本为我提供指导和其他宝贵帮助的人有：荒船清彦、佐藤由纪夫、香田洋二（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伍军人）、吉田正纪（Masanori Yoshida）、高久浩（Hiroshi Takaku）、石井精一、中谷良江（Yoshie Nakatani）、大冢海夫、山中邦明（Kuniaki Yamanaka）中校、阿川尚之教授以及等松春夫教授。

感谢我的制图师洛伦·多彭博格（Loren Doppenberg）为本书提供地图。感谢苏珊·布施霍恩（Susan Buschhorn）为了查找照片出处和为获得授权而做的工作。

塞缪尔·约翰逊有一句名言：“只有傻子才会写作，除非为了金钱。”本着这句名言的精神，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埃里克·西蒙诺夫（Eric Simonoff）。

我也对诺顿的整个团队感激不尽。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Starling Lawrence）一直鼓励我，给我建议，并带给我友谊。

参考文献

政府报告，总统文件，通信，日记，口述史

Alanbrooke, Lord. War Diaries, 1939 – 1945, ed.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Auchincloss, Louis, ed. Theodore Roosevelt: Letters and Speeche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Bond, Charles R., and Terry Anderson. A Flying Tiger's Diary.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1.

Buhite, Russell D., and David W. Levy, eds. FDR's Fireside Chat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Carroll, Andrew, ed. War Letters: Extraordinary Correspondence from American War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Carter, Worrall Reed. Beans, Bullets, and Black Oil: The Story of Fleet Logistics Afloat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Churchill, Winston S., ed. Never Give In!: The Best of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New York: Hyperion, 2003.

Churchill, Winston, and Martin Gilbert, ed. 3 vols.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93.

Churchill, Winston, Clementine Churchill, and Mary Soames. Winston and Clementine: The Personal Letters of the Churchill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Commander-in-chief,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Grey Book: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for the Pacific War." [War diary] Book 1, December 1941 to June 1942.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on CD).

Cook, Haruko Taya, and Theodore F.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2.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Japanese Monograph No. 1, Philippine Operation Record, Phase 1, Nov. 1941 - Jul. 1942. "

———. "Japanese Monograph No. 101, Naval Operations in the Invasion of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Dec. 1941 - Mar. 1942. "

———. "Japanese Monograph No. 107, Malaya Invasion Naval Operations (Revised), Dec. 1941 - Feb. 1942. "

Dyer, George C.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Evans, David C.,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In the Words of Former Japanese Naval Offi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Fahey, James J. Pacific War Diary, 1942 - 19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Forrestal, James.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1. Gibney, Frank, ed.

Senso: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ic W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Goldstein, Donald M., and Kathryn V.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s: Japanese Document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6.

Hammel, Eric. Aces Against Japan: The American Aces Speak.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2.

Harris, Mark Jonathan, Franklin D. Mitchell, and Steven J.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84.

Heimdahl, William C., and Edward J. Marolda, eds. Guide to United States Naval 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y Division, Dept. of the Navy, 1976.

Ickes, Harold.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4. Kiyosawa, Kiyoshi. A Diary of Darkness: The Wartime Diary of Kiyosawa Kiyoshi, trans.

Eugene Sowiak and Kamiyama Tami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Forte, Robert S., and Ronald E. Marcello, eds.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Eyewitness Accounts by U.S. Military Men and Wome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1.

Litoff, Judy Barrett, and David C. Smith, eds. Since You Went Away: World War II Letters from American Women on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American Women in a World at War: Contemporary

Accounts from World War II.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7.

Loewenheim, Francis L., Harold D. Langley, and Manfre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Saturday Review Press / E. P. Dutton, 1975.

Matloff, Maurice,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 - 1942.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53 - 59.

Moran, Charles. Winston Churchill: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0 - 1965: Taken from the Diaries of Lord Moran. London: Sphere, 1968.

"Narrative by Lt. George Gay." Debrief recorded October 12, 1943, at U.S. Navy Department;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U.S. Naval Administration in World War II [microfilm]. Washington, DC: Dept. of the Navy,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1976.

Perry, Glen C. H. "Dear Bart" : 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2.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as related by Dr. David Willcutts, Fifth Fleet Medical Officer." Ms. Item 297, U.S.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Newport, RI.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Thomas H. Dy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6.

"The Reminiscences of Rear Admiral Henry L. Miller,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73.

“The Reminiscences of Captain Joseph J. Rochefort, U.S. Navy (Retired).” U.S. 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D, 1983.

Richardson, K. D., and Paul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An Oral History of December 7, 1941.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2005.

Roosevelt, Eleanor, Rochelle Chadakoff, and Martha Gelhorn. Eleanor Roosevelt’s My Day: Her Acclaimed Columns, 1936 – 1945. New York: Pharos, 1989.

Roosevelt, Theodore. Letters to His Childre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9.

——, Albert Bushnell Hart, and Herbert Ronald Ferleger. Theodore Roosevelt Cyclopedia. New York: Roosevelt Memorial Association, 1941.

——, and Elting Elmore Morison.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8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54.

Rosenman, Samuel I.,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3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50 (1941 – 45 vols.).

Russell, Ronald W., ed. No Right to W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Veterans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iUniverse, 2006.

Shenk, Robert, ed. Authors at Se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Stillwell, Paul, ed. Air Raid—Pearl Harbor! Recollections

of a Day of Infam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Stimson, Henry L. Henry Lewis Stimson Diaries. XV, 20 (microfilm ed., reel 3),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T.

U.S. Army. Far East Comm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A Graphic Pres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Naval Organization and List of Combatant and Non Combatant Vessels Lost or Damaged in the War. 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 116. 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1952.

U.S. Civilian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for War: History of the War Production Board and Predecessor Agencies, 1940 - 1945. Vol. I: Program and Administration.

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The Japanese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Nagumo Report].

U.S. 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s. U.S. Naval Aviation in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Air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Military Analysis Division, 1947.

———.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 Japanese Merchant Shipping.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Pacific),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reprinted 1969 by Greenwood).

Ugaki, Matome. Fading Victory: The Diary of Admiral Matome Ugaki, 1941 – 1945, trans. Masataka Chihay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General of the Army H. H. Arnold, Commanding General, Army Air Forces [and]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Commander-in-Chief, United States Fleet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7.

Werneth, Ron, ed. Beyond Pearl Harbor: The Untold Stories of Japan’s Naval Airmen.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8.

Wooldridge, E. T.,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3.

Yamashita, Samuel Hideo,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Selections from the Wartime Diaries of Ordinary Japa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图书

Adamic, Louis. Dinner at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Harper, 1946.

Agawa, Hiroyuki. The Reluctant Admiral: Yamamoto and the Imperial Navy.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

Albion, Robert G. Makers of Naval Policy, 1798 - 1947.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Allyn, John. The 47 Ronin Story.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70.

Ambrose, Stephen E. The Supreme Commander: The War Years of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9.

Asada,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Astor, Gerald. Crisis in the Pacific: The Battles for the Philippine Islands by the Men Who Fought Them. New York: Donald I. Fine Books, 1996.

———. Wings of Gold: The U.S. Naval Air Campaig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4.

Bailey, Beth, and David Farber. The First Strange Place: Race and Sex in World War II Hawa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Bailey, Thomas Andrew.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Beach, Edward L.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Year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Beard, Charles A.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 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

Beasley, W. G.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aver, Floyd. Sailor from Oklahoma: One Man's Two-Ocean War. 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Belote, James H., and William M. Titans of the Seas: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arrier Task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per &Row, 1975.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54.

Bercuson, David J., and Holger H. Herwig. One Christmas in Washington: The Secret Meeting Between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at Changed the World. Woodstock, NY:Overlook Press, 2005.

Bergamini, 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71.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Black, Conrad.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Blum, John Morton. V 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76.

Bradlee, Benjamin C. *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Brands, H. W. T. R.: *The Last Romantic*.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Brinkley, David. *Washington Goes to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ity and a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Brown, Cecil B. *Suez to Singapo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Brown, DeSoto. *Hawaii Goes to War: Life in Hawaii from Pearl Harbor to Peace*. Honolulu, HI: Editions Limited, 1989.

Browne, Courtney. *Tojo: The Last Banzai*.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7.

Budiansky, Stephen. *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Buell, Harold L. *Dauntless Helldivers: A Dive-bomber Pilot's Epic Story of the Carrier Battles*. New York: Orion, 1991.

Buell, Thomas B. *Master of Sea Power: 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 *The Quiet Warrior: A Biography of Admiral Raymond A. Spruan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7.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Burton, John. *Fortnight of Infamy: The Collapse of Allied Airpower West of Pearl Harbo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Buruma, Ian. *Inventing Japan, 1853 – 1964*.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Caren, Eric, ed. *Pearl Harbor Extra: A Newspaper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Edison, NJ: Castle, 2001.

Casey, Robert J. *Torpedo Junction: With the Pacific Fleet from Pearl Harbor to Midwa*. Indianapolis, IN: Bobbs-Merrill, 1942.

Childs, Marquis W.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New York: Harper, 1942.

———. *This Is Your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The Hinge of F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Cleary, Thomas.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Strategy*. Boston: Shambhala Classics, 2005.

Coletta, Paolo E. *Admiral Marc A. Mitscher and U.S. Naval Aviation: Bald Eagle*.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Colman, Penny. *Rosie the Riveter: Women Working on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95.

Cooke, Alistair.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 1942*.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Cooper, Page. Navy Nurs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McGraw-Hill, 1946.

Costello, Joh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Rawson, Wade, 1981.

Cressman, Robert J. "A Glorious Page in Our History" : The Battle of Midway, 4 - 6 June 1942. Missoula, MT: Pictorial Histories, 2001.

Cross, Robert F. Sailor in the White House: The Seafaring Life of FDR. 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Cunningham, Winfield Scott. Wake Island Command. Boston: Little, Brown, 1961.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 - 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son, Joel R. The Unsinkable Fleet: The Politics of U.S. Navy Expansion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Davis, Kenneth S. FDR: The War President, 1940 - 1943: A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Davis, William E. Sinking the Rising Sun: Dog Fighting and Dive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A Navy Fighter Pilot' s Story.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7.

Deacon, Richard. Kempei Tai: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Then and Now. Tokyo:Charles E. Tuttle Co., 1982.

Dickinson, Clarence Earle. The Flying Guns: Cockpit Record of a Naval Pilot from Pearl Harbor Through Midway. New York: Scribner, 1942.

Dower, John W.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86.

———.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 W. Norton & Company, 1993.

Dull, Paul S. A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1 – 1945. Annapolis, MD: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8.

Dunnigan, James F., and Albert A. Nofi. Victory at Sea: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5.

Duus, Masayo. Tokyo Rose: Orphan of the Pacific.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

Dye, Bob. Hawaii' i Chronicles III: World War Two in Hawaii' i, from the Pages of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i Press, 2000.

Dyer, George C.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Edgerton, Robert B.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Eiler, Keith E. Mobilizing America: Robert P. Patterson and the War Effort, 1940 – 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isenhower, Dwight D. Crusade in Europ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48.

Ellis, John. World War II, a Statistical Survey: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ant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5.

Elphick, Peter. *Liberty: The Ships That Won the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Evans, David, and Mark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 - 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Ewing, Steve. *Reaper Leader: The Life of Jimmy Flatl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2.

———. *Thach Weave: The Life of Jimmie Thach*.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 and John B. Lundstrom. *Fateful Rendezvous: The Life of Butch O' Har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Feiss, Herbert.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Fisher, Clayton E. *Hooked: Tales and Adventures of a Tailhook Warrior*. Denver, CO:Outskirts, 2009.

Fuchida, Mitsuo, and Masatake Okumiya. *Midway: The Battle That Doomed Japan, The Japanese Navy's Sto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55.

Fussell, Paul. *Wartim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ay, George H. *Sole Survivor: The Battle of Midway and Its Effects on His Life* Naples, FL: Midway Publishers, 1980.

Gelb, Norman. *Desperate Venture: The Story of Operation Torch, the Allied Invasion of North Af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2.

Gilbert, Alton. *A Leader Born: The Life of Admiral John Sidney McCain, Pacific Carrier Commander*.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06.

Gilbert, Martin. *Churchill and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5.

Gluck, Carol.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Showa: The Japan of Hirohito*.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2.

Goodwin, Doris Kearns. *No Ordinary Tim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Grew, Joseph C. *Report from Tokyo: A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2.

Gruhl, Werner.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Two, 1931 - 1945*.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7.

Halsey, William Frederick. *Admiral Halsey's Story*.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47. Hara, Tameichi, Fred Saito, and Roger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earl Harbor, Guadalcanal, Midway — The Great Naval Battles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Harper, John A. *Paddles!: The Foibles and Finesse of One*

World War II Landing Signal Office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0.

Harries, Meirion, and Susie Harries. *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Hayes, Grace P.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Holland, W. J., ed. *The Navy*.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2000.

Holmes, W. J. *Double-Edged Secrets: U.S. 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9.

Hoopes, Townsend, and Douglas Brinkley. *Driven Patri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Forresta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Hopkins, June. *Harry Hopkins: Sudden Hero, Brash Reform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Hornfischer, James D. *Ship of Ghosts: The Story of the USS Houston, FDR's Legendary Lost Cruiser, and the Epic Saga of Her Survivo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6.

Hough, Richard Alexander. *Death of the Battleship*.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Howard, Clive. *One Damned Island After Another: The Saga of the Seventh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6.

Hoyt, Edwin Palmer.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imitz and His Admirals* New York: Weybright & Talley, 1970.

———. *Now Hear This: The Story of American Sailor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3.

Hynes, Samuel Lynn. *Flights of Passage: Reflections of a World War II Aviato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Irokawa, Daikichi. *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Isom, Dallas Woodbury. *Midway Inquest: Why the Japanese Lost the Battle of Midwa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ckson, Robert H. *That Man: An Insider's Portrai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sper, Joy Waldron, James P. Delgado, and Jim Adams. *The USS Arizona: The Ship, the Men,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and the Symbol That Aroused America*.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3.

Jenkins, Roy. *Churchill: A Bi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1.

Johnston, Stanley. *Queen of the Flat-Tops: The U.S.S. Lexington and the Coral Sea Battle*.New York: E. P. Dutton, 1942.

Jones, Wilbur D., Jr., and Carroll Robbins Jones. *Hawaii Goes to War: The Aftermath of Pearl Harbor*. Shippensburg, PA: White Mane, 2001.

Kahn, David. *The Codebreakers: The Story of Secret Writing*.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3.

Karig, Walter, ed. *Battle Report*. 6 vols.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on Books in Wartime by Farrar & Rinehart, 1944 - 52.

Karsten, Peter. *The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Kase, Toshikazu.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Kato, Masuo. *The Lost War: A Japanese Reporter's Inside 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6.

Kawahara, Toshiaki. *Hirohito and His Times: A Japanese Perspective*.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0.

Keegan, Joh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89.

———. *The Price of Admiral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0.

Kennedy, David M.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Freedom from Fear, Part Two: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Vintage, 1989.

Kenney, George C. *General Kenney Report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9.

Kernan, Alvin B. Crossing the Line: A Bluejacket's World War II Odyss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 The Unknown Battle of Midwa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Torpedo Squadron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Kimball, Warren F. Forged in War: Roosevelt, Churchill,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7.

Kimmett, Larry, and Margaret Regis.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An Illustrated History. Seattle, WA: Navigator Publishers, 1991.

King, Ernest J., and Walter Muir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A Naval Recor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52.

Kinney, John F., and James M. McCaffrey. Wake Island Pilot: A World War II Memoir.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5.

Kratoska, Paul H. South East Asia: Colonial History. Vol. 5. London: Routledge, 2001.

Kriloff, Herbert. Officer of the Deck: 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 and the . Pacifica, CA: Pacifica, 2000.

Lawson, Robert. U.S. Navy Dive and Torpedo Bombers of World War II.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1.

———, and Barrett Tillman. U.S. Navy Air Combat, 1939 - 46. Osceola, WI: MBI Publishing, 2000.

Lawson, Ted W. 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3.

Layton, Edwin T., with Roger Pineau and John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earl Harbor and Midway — Breaking the Secret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Leach, Douglas Edward. Now Hear This: The Memoir of a Junior Naval Officer in the Great Pacific Wa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Leahy, William D. I Was Ther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50.

Leckie, Robert. Helmet for My Pillow.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0.

Lee, Clark. They Call It the Pacific: An Eye-Witness Story of Our War Against Japan from Bataan to the Solom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3.

Lee, Robert Edson. To the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Lingeman, Richard. Don't You Know There's a War On?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 45.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0.

Lipsitz, George. Rainbow at Midnight: Labor and Culture in the 1940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Livezey, William Edmund. Mahan on Sea Powe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47.

Lord, Walter. Incredible Victory: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 Day of Infamy.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Lotchin, Roger W. *The Bad City in the Good War: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Oakland, and San Dieg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Lundstrom, John B. *The First South Pacific Campaign: Pacific Fleet Strategy, December 1941 – June 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 *The First Team: Pacific Naval Air Combat from Pearl Harbor to Midwa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4.

Madsen, Daniel. *Resurrection: Salvaging the Battle Fleet at Pearl Harbo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Mahan, Alfred Thayer. *From Sail to Steam, Recollections of Naval Life*, by Capt. A. T. Mahan.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07.

———, ed. Allan Westcott.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99 (Little, Brown, 1941).

Manchester, William Raymond.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 – 1964*.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 *Goodbye, Darkness: 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Marder, Arthur J. *Old Friends, New Enemies: 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36 – 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90. Vols. 1 – 2.

Mason, Theodore C. *Battleship Sailo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Sailor's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Matsuo, Kinoaki. *How Japan Plans to Win*, trans. Kilsoo K. Haan (published in Japan as *The Three-Power Alliance and a United States - Japanese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42.

McCabe, Larry. *Pearl Harbor and the American Spirit: The World War II Generation Remembers the Tragic Event That Transformed a Nation*. Bloomington, IN: Xlibris Corp., 2004.

McIntire, Vice-Admiral Ross T. *White House Physic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6.

McJimsey, George T. *Harry Hopkins: Ally of the Poor and Defender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eacham, Jon. *Franklin and Winston: An Intimate Portrait of an Epic Friendship*.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Mears, Frederick. *Carrier Combat: A Young Pilot's Story of Action Aboard the Horne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7.

Michener, James A. *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 Greenwich, CT: Fawcett, 1947.

———. *The World Is My Home: A Memoi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Middlebrook, Martin, and Patrick Mahoney. *Battleship: The Sinkin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and the Repuls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9.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 - 1945.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Millot, Bernard A. The Battle of the Coral Sea: Sea Battles in Close Up, No. 12, trans. S. V. Whitl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4.

Morgan, Ted. FD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Morison, Samuel Elio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3: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Boston: Little, Brown, 1948.

———.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 4: Coral Sea, Midway and Submarine Actions: May 1942 - August 1942. Boston: Little, Brown, 1949.

Morita, Akio, Edwin M. Reingold, and Mitsuko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87.

Morris, Ivan.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82.

Nardo, Don. Pearl Harbor. San Diego, CA: Greenhaven, 2003.

Nesmith, Jeff. No Higher Honor: The USS Yorktown at the Battle of Midway. Atlanta, GA: Longstreet, 1999.

Neu, Charles E. An Uncertain Friend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1906 - 190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Nitobe, Inazo.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69.

Okumiya, Masatake, Jiro Horikoshi, and Martin Caidin. Zero!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6.

Overy, Richard. Why the Allies W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Parshall, Jonathan, and Anthony P. Tully. Shattered Swor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5.

Peattie, Mark R. Sunburst: The Rise of Japanese Naval Air Power, 1909 – 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erkins, Francis. The Roosevelt I Knew.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6.

Perrett, Geoffrey.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The American People, 1939 – 1945. Baltimore, MD: Penguin Books, 1973.

Potter, E. B. Nimitz.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 Bull Hals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Prados, John. Combined Fleet Decoded: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an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Prange, Gordon W. God's Samurai: Lead Pilot at Pearl Harbor.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 Donald M. Goldstein, and Katherine V. Dillon. At Dawn We Slept: 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 *Miracle at Midwa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 *December 7, 1941: The Day the Japanese Attacked Pearl Harb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Radike, Floyd W.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Presidio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3.

Regan, Stephen D. *In Bitter Tempest: The Biography of Admiral Frank Jack Fletch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Reilly, Michael F., and William J.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7.

Reischauer, Edwin O. *The Japanes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1.

———. *Japan: The Story of a N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 and Albert M. Craig. *Japan: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78.

Reynolds, Clark G.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Admiral Jocko Clark and the Fast Carrier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Roosevelt, Eleanor. *This I Remember*.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9.

Roosevelt, Theodore. *Theodore Roosevelt;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 *America and the World War*, by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Rose, Lisle A.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The USS Hornet and the First Year of the Pacific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Rosenman, Samuel Irving. *Working with Roosevelt*. New York: Harper, 1952.

Russell, Ronald W. *No Right to W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Veterans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iUniverse, 2006.

Sakai, Saburo, with Martin Caidin and Fred Saito. *Samurai!*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6.

Sakaida, Henry.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ces, 1937 - 45*. Oxford: Osprey Aerospace, 1998.

Shenk, Robert, ed. *Authors At Sea*.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Sherman, Frederick C. *Combat Command: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0.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8.

Shillony, Ben-Ami. *Revolt in Japan: 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 1936 Inc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kulski, Janusz. *The Battleship Yamato*.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Sloan, Bill. Given Up for Dead: America's Heroic Stand at Wake Island.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3.

Smith, Douglas V. Carrier Battles: Command Decision in Harm's Wa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Smith, Holland M., and Percy Finch. Coral and Bras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 White House Notebook.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6.

Smith, Peter C. Midway: Dauntless Victory. Barnsley, UK: Pen and Sword Books, 2007. Smyth, Robert T. Sea Stories. New York: iUniverse, 2004.

Spector, Ronald H.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Sprout,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 - 1918.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39.

Stafford, Edward Peary. The Big E: The Story of the USS Enterpri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Starr, Kevin. Embattled Dreams: California in War and Peace, 1940 - 1950.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imson, Henry L.,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s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Stoler, Mark A.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Storry, Richard. *The Double Patriots: A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Tagaya, Osamu.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 - 45*. Oxford: Osprey Aerospace, 2003.

Taylor, Charles Carlisle. *The Life of Admiral Mahan*.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0.

Taylor, Theodore. *Magnificent Mitsch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Thomas, Evan. *Sea of Thunder: Four Commanders and the Last Great Naval Campaign: 1941 - 194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6.

Thomas, Jane. *My Hawaii, 1938 - 1962*. Bloomington, IN: Xlibris Corp., 2002.

Thorne, Christopher.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 -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Toland, John. *But Not in Shame: The Six Months After Pearl Harb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 - 19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Tolischus, Otto David. *Through Japanese Eye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5.

Tuchman, Barbara.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 - 1945*.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0.

Tully, Grace. F. D. R.: My Bos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Turk, Richard W.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Urwin, Gregory. Facing Fearful Odds: The Siege of Wake Islan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7.

Van der Vat, Dan. The Pacific Campaign: World War II, the U.S.-Japanese Naval War, 1941-194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 Pearl Harbor: The Day of Infamy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Victoria, Brian Daizen. Zen at Wa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7.

Weinberg, Gerhard L.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Visions of Victory: The Hopes of Eight World War II Leader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Weintraub, Stanley. Long Day's Journey into War: December 7, 1941. New York: Truman Tally Books, 1991.

Wenger, J. Michael, Katherine V. Dillon, and Donald M. Goldstein. The Way It Was: Pearl Harbor: The Original Photographs.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1995.

Wheeler, Post. Dragon in the Dust. Hollywood, CA: Marcel Rodd, 1946.

White, William Lindsay. They Were Expendab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Wigmore, Lionel. *The Japanese Thrust*. Canberra: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957.

Willmott, H. P. *The Barrier and the Javelin: Japanese and Allied Pacific Strategies, February to June 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3.

Winkler, Allan M. *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1986.

Yoshimura, Akira. *Zero Fighter*. Westport, CT: Frederick A. Praeger, 1996.

———. *Battleship Musashi: The Making and Sinking of the World's Biggest Battleship*, trans. Vincent Murphy. Tokyo and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9.

Zich, Arthur,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Rising Sun*. Alexandria, VA: Time Life Books, 1977.

Zimmermann, Warren. *First Great Triumph: How Five Americans Made Their Country a World Pow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2.

文章

Asher, Harvey. "Hitler's Decision to Declare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Revisited (A Synthesis of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HAFR)*, September 2000. Online at www.shafr.org/publications/newsletter/september-2000.

Eller, Ernest M. "Swords into Plowshares: Some of Fleet Admiral Nimitz's Contributions to Peace."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6.

Ewing, William H.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Goldsmith, Raymond W. "The Power of Victory: Munitions Output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Affairs*, vol. 10, no. 1 (Spring 1946), pp. 69 - 80.

Graybar, Lloyd J. "American Pacific Strategy After Pearl Harbor: The Relief of Wake Island," *Prologue* (Fall 1980), pp. 134 - 50.

Herbig, Katherine L. "American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Pacific: 1942 - 1944," in Michael I. Handel, ed.,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 1987.

Lamar, H. Arthu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Layton, Edwin T. "Early Carrier Raid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Daniel M. Masterson, ed., *Naval History: The Sixth Symposium of the U.S. Naval Academy*.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87.

MacArthur, Douglas A. "MacArthur's Reminiscences: Part 5," *Life*, vol. 57, no. 2 (July 10, 1964), p. 72.

Petillo, Carol M.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 A Note on an Imperial Bon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8, no. 1 (February 1979), pp. 107 - 17.

Roosevelt, Theodore. "Washington's Forgotten Maxim." Address at U.S. Naval War College, June 2, 1897.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 23 (1897), p. 456.

Santa Fe Railway. "Along Your Way: Facts about stations and scenes on the Santa Fe," (pamphlet distributed to passengers on the Santa Fe Super Chief), 1946. Online at www.titchenal.com/atsf/ayw194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 （美）伊恩·托尔著；徐彬，王斌，王晓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9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Pacific Crucible：WAR AT SEA IN THE PACIFIC, 1941—1942

ISBN 978-7-5217-0968-1

I . ①燃... II . ①伊... ②徐... ③王... ④王... III . ①太平洋战争 IV . 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 第034464号

Pacific Crucible：WAR AT SEA IN THE PACIFIC, 1941—1942 by Ian W. Toll

Copyright © 2012 by Ian W. To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著者：〔美〕伊恩·托尔

译者：徐彬 王斌 王晓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插页：16

字数：52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9—4158

审图号：GS（2020）1716号

书号：ISBN 978-7-5217-0968-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征服的 怒潮

太平洋战争
三部曲
PACIFIC WAR
TRILOGY
II

1942 — 1944

Ian W. Toll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 — 1944

从瓜岛战役到
菲律宾海战役

THE
CONQUERING
TIDE

[美] 伊恩·托尔——著

中信出版集团

徐彬 曹军 王小琛——译

征服的怒潮

——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美]伊恩·托尔 著

徐彬 曹军 王小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尾声

作者说明及致谢

参考文献

序章

蔚蓝色的南太平洋浩瀚无边，航行中常常难以确定哪里可以登陆。这时，航海员会特别留意洋面上漂浮的树叶或椰子；会驾船跟随海鸟航行；会观察远处大团大团的雷暴云，那里的地平线下方可能有岛屿；甚至会仰起头来，闻闻海风的味道，因为在看到陆地之前，经常能先闻到陆地特有的气息，特别是夜间和阴天时。没有哪个地方比所罗门群岛更适合这样的描述。所罗门群岛位于赤道以南几个纬度，沿珊瑚海和布干维尔岛之间500英里^[1]的轴线斜向分布，岛上丛林密布，臭气熏天。其中较大的岛屿会发出混合了潮湿土壤和腐烂植被的气味，离岛十几二十英里远都可以闻到。

船只驶近这种特殊气味的源头时，水手可以观察到山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而山巅依然隐藏在密密的云盖中。平原和山谷上，深浅不一的绿地向山脚下延伸。棕榈树林和红树林沼泽沿海岸分布。最后，他们会发现海滩。海滩像一条横卧的白色边界线，一侧是岛上郁郁葱葱的植被，另一侧是温暖的蔚蓝色海洋。

所罗门群岛主要由十几个多山的大岛组成，它们呈双链条状分布。其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的小岛和环礁，大多无人居住，有些海拔不到10英尺^[2]。该地区跨越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南弧，历史上这里地壳运动活跃且剧烈。板块移动形成的俯冲带，以及深达2万英尺以上的海沟，沿群岛南北两侧并行分布。这种地壳构造和火山力量从海底拱起了这些岛屿，使岛上的山峰高达5 000英尺到7 000英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波波马纳休山海拔7 661英尺，距离该岛南部海岸的直线距离只有7英里。从海岸再向前10英里，就是深达17 500英尺的南所罗门海

沟。只有在火山带，才会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同时存在海洋深渊和陆地高峰这样的极端地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罗门群岛上居住着大约10万名肤色黝黑的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的祖先是古老的游牧民族，通过更新世的大陆桥从亚洲迁徙到此，或是划着手工打造的独木舟跨海来到此地。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基本未变，以小村庄、孤立的部族和家庭为单位，穿着很少的衣服或不穿衣服，通过狩猎、捕鱼、觅食、养猪以及在小块农田上种植芋头和山药等勉强维持生计，生活水平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他们讲大约100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相邻部落之间也无法互相理解。他们的通用语是一种从英语演化出的现成的“皮钦语”，这是一种简化的混杂语，大约只有600个词。他们没有共同的民族感，只忠诚于自己的部族、祖先和圣地。

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述说曾经发生过的野蛮战争。经过几代人之后，历史就会成为传奇；再经过几代人，传奇就成了神话。年轻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会拿起武器去解决传奇和神话中流传下来的世仇。他们突袭敌对的部落和村庄，杀人、斩首，吃掉敌人。在19世纪，当地土著人最初与欧洲船员频繁接触的时期，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有些白人不择手段，开展非法贩卖奴隶的贸易。这种贸易被称作“捉乌鸦”——将当地人骗上或赶上船，运到澳大利亚，逼迫他们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耕作。于是受害者部落的成员会对任何看起来像从事贩奴贸易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白人上岸就有被斩首和变成烤肉的风险。之后，杀手可能会风干他的头颅，留作纪念。所罗门群岛在1893年被英国人掌管之前（英国人发誓要结束奴隶贸易，并要禁止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暂且不提自决权、经济剥削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话，历史将显示，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所罗门群岛进入了“不列颠治世”。英国政府将这些岛屿划为“受保护领地”，而不是直辖殖民地，对当地土著人的事务行使相对有限的权力。岛上居民基本像过去一样生活，认可村庄里部落酋

长（“头领”或“大人物”）的权威，并按照传承下来的习俗和规则生活。岛民之间如果出现争端，酋长们不是诉诸武力，而是请求殖民地官员进行调解，他们一般愿意接受判决。缺乏食物的部落可以请求救济，会得到食物或被重新安置到可以耕地或捕鱼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无法得知当时有多少土著人真正欢迎英国的治理，但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因憎恨而彻底反对英国的统治。即使在接受殖民统治的早年，抗议英国当权者的有组织的行动也是零星而短暂的。到1941年，已没有任何抗议，大多数岛屿已不再需要常备军来维持秩序。所罗门群岛的土著人直接被白人的武器、船只和技术吓倒了，飞机可能是最让他们震惊的东西。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超出了当地人的理解能力。反抗是荒谬的，最好默认并充分利用这种力量。许多岛民狂热地忠于英国人，他们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战争中证明这一点。

殖民政府的所在地位于恩格拉群岛（又称佛罗里达群岛）中迷人的小岛图拉吉上，大得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往北20英里就是该群岛。图拉吉岛长3英里，形状像沙漏，英国人在这里集中修建了殖民地生活所必需的设施，包括军官俱乐部、兵营、酒店、富丽堂皇的官邸、小型高尔夫球场、板球场、无线电站，以及配备基本海港设施的码头。边远的大岛划分成一个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区长（district officer，缩写为DO）管理，这名官员一般是年轻的未婚男子，属于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初等阶层。区长不得不忍受原始的生活条件、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反复出现的疟疾。他会独自住在海边的一座普通房子里，靠近当地最好的天然港口。他的住所往往也用作当地政府的总部。他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但是除了自己招募、培训和雇用的本地人以外，手下没有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区长兼任总督、法官、警察局长、法医、收税官、土木工程师、记录员、港务长、出纳和邮政局长。所有的公共资金都经他的手，他的官方记账簿要记录每一分钱的走向。他要在泥泞的丛林小径上从一个村庄跋涉到另一个村庄，或驾驶小型木制帆船沿大多数人聚居的海岸航行。

区长像其他典型的白人岛民一样，完全相信自己天生有权管理土著

人，他们（毕竟）“刚刚从树上下来”。（这种令人生厌的说法经常可以在大英帝国较为原始的边疆领地上听到，一句话概括了他们殖民统治的逻辑依据。）但是英国人对殖民压迫驾轻就熟，精明地**通过**既有的社会秩序维持其统治，而非凌驾于其上。老练的区长与村里的大人物商讨事务时，特意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在当地的规则习俗与英国当局不冲突时，总是遵从当地做法。

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但也足够了。在大英帝国的宏伟蓝图中，所罗门群岛以前一直无足轻重。这片群岛地处偏远，难以到达，哪怕与太平洋的其他岛屿相比亦是如此。它们对贸易几乎没有贡献，也没什么自然资源。欧洲人很少造访此地，愿意留下来的就更少了。1941年，整个群岛上共有五六百名白人，他们是种植园管理人员、船务代理人、贸易商、探矿者、店主、医生、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大多数人期待着自己事业发达或是发财致富，早日离开这里。所罗门群岛是个艰苦的所在，这里气候闷热，季风盛行。被雨水浸透的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催生出种种奇怪的热病和皮肤病——疟疾、登革热、黑尿热、痢疾、丝虫病、细菌性痢疾、麻风病、象皮肿、痒子和壕沟足。鳄鱼和水蛭在河流和沼泽里潜伏着；凶猛的鲨鱼时常出没于岛屿周围的礁石附近；蝎子、蜘蛛、蜈蚣和蛇会咬人；锋利的茅草像刀片，会割伤从旁边走过的人；猫一样大小的老鼠在灌木丛中窜来窜去。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说，离开这里时从船尾望去，岛上的风景才显得最美。

这就是1941年的所罗门群岛：大英帝国的边缘领地，经济和政治一潭死水，是个战略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方。然而，这一切都将于1942年以一种突然、猛烈的方式发生改变。

珍珠港战役后六个星期，1942年1月22日早上，战争降临此地。日本第一次在图拉吉岛扔下了炸弹。空袭就像个晴天霹雳。英国人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往南和往东打这么远，一直打到所罗门群岛南部的中心地带，当时盟军舰队和陆军还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比所

罗门群岛距离日本近数千英里的地方鏖战，所以日军的进攻尤为令人惊讶。第二天，日军一支水陆两栖部队登陆拉包尔，这座海港城市由澳大利亚控制，有先进的航空基地，坐落于新不列颠岛，该岛位于图拉吉岛西北650英里处。日军迅速控制了那里1 500人的驻军。英国人在所罗门群岛几乎没有任何军事部署，很明显日本人随时可以吞并整个群岛。

日本正在以这种征服方式席卷整个太平洋地区。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广阔的阵线上发起了海陆空闪电战，盟军无力抵抗，日军一路向前推进。在夏威夷、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新不列颠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日军每次进攻都以空袭开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和陆地上起飞，发动突然袭击，飞行距离之远出人意料。它们摧毁盟军的机场和海军基地，为登陆扫除滩头上空的障碍。运兵舰队随后跟进，步兵队伍冲上岸，经常一弹未发就迅速拿下防守不力、完好无损的盟军机场。日本战机飞到占领的机场，准备下一轮进攻，进一步往南往东进军。少量盟军筑起防御线抵抗，尤其是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美菲联合部队，但日军切断了盟军的退路，从侧翼围攻。靠着这种快速、连续、蛙跳式的作战模式，日军在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筑起了一个巨大的太平洋帝国，而且只遭受了轻微的损失。

在1941年12月之前，傲慢的美英航空专家坚持认为日本飞机是西方技术的低劣仿制品，而日本飞行员简直就等同于测试碰撞用的假人，笨拙又可笑。但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种错觉被打破了，日军有效地摧毁了大部分战区的盟军空中力量。直到征服的浪潮漫过它们，盟国才开始明白自己被愚弄了。日本人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对手的傲慢与种族沙文主义，掩饰了其航空队和飞行员的强大力量。

日本海军配备了两种非常精良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和G4M（“贝蒂”）。每架可携带有效载荷超过1 700磅^[3]的鱼雷或炸弹，飞行范围超过2 000海里。轰炸机经常由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护航。零式单座战斗机性能卓越，在爬升速度、转弯灵活性和机动

性方面超出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战斗机。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手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盟军飞行员对其卓越的转向能力和爬升速度感到惊愕不已。虽然到轰炸珍珠港时，零式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在中国战场的空战中一次又一次地轻松获胜，但这种飞机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事先没有人提醒盟军飞行员注意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也没人给出与之作战的建议，因此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空战中去了解这种奇特的“杂技式”战斗机。

英国人将其亚太帝国的命运寄托在了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上面。然而，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局面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一支日本侵略部队在马来半岛东北海岸登陆，日本轰炸机在整个地区轮番轰炸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无论在空中、陆上还是海上，日军都节节获胜。轰炸珍珠港三天后，日本战机在马来亚附近海域炸沉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这是海军历史上大型军舰第一次在海上被空袭击沉。英国指挥官将幸存的飞机撤回新加坡，把马来亚北部领空让给敌人。日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南开进，突破英联邦军队的阵地并迫使他们溃退。入侵者开展猛烈的正面进攻，辅以侧翼攻击，并结合渗透战术，派轻装小分队深入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地，从背后袭击英国军队。日军沿海岸线不断向南推进，小艇往来穿梭，运送部队。面对诡计多端、灵活机动的敌人，加上连续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但又无力报复，防线上的英军迅速放弃了阵地，四处逃散。

南下与其他部队会合，或进入新加坡这个岛屿城市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敌人恐怖行为的消息：日本人是超级战士，战斗力不可思议，能够忍受海上的艰苦生活；无法在丛林中击败他们，显然在空中和海上也无法击败他们；日本人肯定是战无不胜的，他们要来了。在英国和英联邦的许多部队中，沮丧消极的态度扎下了根。士兵们悲愤不已，鄙视自己的军官——他们前不久还表现出轻敌和傲慢，现在面对敌人却束手无措。于是，士气从内部瓦解了。在新加坡的码头上，惊慌失措的百姓开始大逃难，争先恐后地挤上离港船只。有军官用不当手段获得转移到爪

哇岛或其他地方的调令。日本军队穿越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一个星期后，阿瑟·珀西瓦尔将军带领约8万人的军队向人数不及他们一半的日军投降。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命运也已注定。2月底，在海战中处于弱势的盟军多国舰队很快被击败，爪哇岛上剩余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撤到了澳大利亚。

此时，所罗门群岛上恐慌的白人难民纷纷涌向南部和东部，希望能找到前往澳大利亚的船。殖民地官员也面临着同样无法控制的局面：与马来亚不同，所罗门群岛上仅有少量的英国军队，抵抗入侵的能力极其微弱。领地官员并未假装有任何希望可以阻止日本人的下一步进攻。敌人会占领所罗门群岛，赶走英国人，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盟军才可能有机会打回来。图拉吉和邻近岛屿的百姓收拾物品逃离了。当地的常驻行政长官是所罗门群岛的英国高级官员，他搬到了东部较大的马莱塔岛上。一般靠风帆航行的单桅纵帆船和多桅纵帆船从西北部顺着盛行风带走了撤离人员。破旧的燃煤蒸汽船“莫林达号”在1月份最后一次离开了所罗门群岛。在图拉吉岛附近的吉沃图岛（Gavutu）的码头上，一群难民要求上船，造成一名医生受伤，险些引起一场骚乱。船长收留了惊恐的逃难人员，把他们带到了澳大利亚。^[4]

到1942年3月，大多数白人已从所罗门群岛撤离，社会秩序也在崩溃。但是，殖民服务局的年轻区长被告知要留下来继续工作。英国政府甚至婉拒了他们的服役申请。

马丁·克莱门斯就是其中一员。他26岁，苏格兰人，是阿伯丁市一名唱诗班指挥的儿子，拿奖学金读完名校，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克莱门斯于1937年进入殖民服务局，1938年被派往所罗门地区，在所罗门群岛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和马莱塔这两个丛林密布的大岛上服务过。他是一名健壮的男子，留八字胡，方下巴，他也是自己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产物。他忠诚的伴侣是一条品种不详的小黑狗，名叫岁闹。克莱门斯对服饰仪表十分讲究，严于律己，面临危险时坚韧不拔。他的私人日记记录详细，也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他会在日记中

引用莎士比亚，并不时加入流行的感叹词，比如“太赞了！”和“绝了！”。在日军占领的那些艰苦岁月中，他将会证明自己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百折不挠。

当殖民政府从图拉吉岛撤出时，克莱门斯奉命接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区长职务。岛上的行政部门坐落于北岸的奥拉，位于图拉吉岛东南方向约20英里处，两岛之间的水域后来被称作“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此时还叫萨沃湾（Savo Sound）。在这里，克莱门斯搬进了一座建在木桩上的普通白色房子里，屋顶覆盖着棕榈叶。他在一棵大榕树的顶部建了瞭望台，四周围绕着鸡蛋花、木槿，还有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山药和芋头。一个土著人整个白天都在这儿站岗，以防敌机来袭。

图拉吉岛和附近的吉沃图岛、塔纳姆博格岛（Tanambogo）上的皇家空军设施每天早上被轰炸，时间甚至规律到可以预测，就像东京的火车时刻一样准。川西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几乎每天都从高空飞过，返回时往往会降到树梢的高度，与克莱门斯的房子擦身而过。

克莱门斯的职责之一是通过被称为“海岸警卫服务”的无线电网络发送观察报告，这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预警体系。海岸警卫队起初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敌方海上行动和空中行动的预警。警卫队员会将观察报告传送到澳大利亚北岸汤斯维尔市的接收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台3B型“远程无线电台”，这种装置可将语音信息发送到大约400英里远的地方，用莫尔斯电码则可发送到大约600英里远的地方。这种设备里有一块经过特别切割的晶体，能够以很少有人用的6兆赫频率进行传输。使用它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监听，但实际上未能成功。这种设备最大的缺点是体积庞大，里面包含了十几个单独的元件，有接收器、发射器、扬声器、一组天线和大量备件。它由一对笨重的6伏汽车电池供电，必须经常充电，需要用到汽油发电机和燃油。

克莱门斯每天都发送信息。他也会收听所罗门群岛北部各岛上其他海岸警卫队员的广播，他们的报告表明日军正节节进逼，从西北方向不断向南扫荡。日军攻陷据点、击溃守军，海岸警卫队员潜入丛林内部。

日本人进入布干维尔岛北部的布卡通道（Buka Passage），驻扎在那里的皇家空军分队四散逃入灌木丛。4月5日，日军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康古海滩突然登陆，迫使布因的海岸警卫站停止广播。^[5]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日本人占领了布因周围的地区，并拿下了附近的肖特兰岛。

克莱门斯竭力维持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治安，但他分身乏术，无法阻止土著人和白人难民抢劫、破坏被遗弃的种植园。他逮捕抢劫者，让证人出庭做证，并把被遗弃的物资挪到安全的政府仓库。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为难民安排食物、住所和船只，或者遣返由于种植园被遗弃而无事可做的来自其他岛屿的土著人。

岛上的白人在恐慌地逃离，这对土著人可无法隐瞒。他们议论纷纷：“大批日本人来了。”^[6]全岛各个村落的酋长纷纷前往奥拉质问克莱门斯。为什么大部分白人都在慌乱地逃离？日本占领下的村庄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回忆录中，克莱门斯记录了1942年3月他向一个酋长代表团所讲的话（用的是皮钦语）：“No matter altogether Japan’e come, me stop long youfella.Business belong youfella boil’m, all’e way, bymbye altogether b’long mefella come save’m youme.Me no savvy who, me no savvy when, but bymbye everyt’ing’e alright.”^[7]（“即使大批日本人来了，我也会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跟着我，最终盟军将会打回来，从敌人手中拯救我们。我不知道谁会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最终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克莱门斯回忆说，他做出这个承诺时“心情沉重”，但酋长们似乎接受了他的承诺。

4月初，克莱门斯乘帆船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角，拜访种植园经理“大雪”F.阿什顿·罗兹（F.Ashton “Snowy” Rhoades）。罗兹是一个强壮、倔强、很有主见的澳大利亚人，看到岛上大多数白人居民纷纷逃离，他嗤之以鼻并拒绝加入他们。他还十分蔑视英国殖民政府，（根据他的日记）认为政府简直“崩溃了”。^[8]他的房子建在拉沃罗（Lavoro）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向西望去，海天一览无余，来袭的日军舰只和飞机必然躲不过他的观察。克莱门斯说服罗兹加入海岸警卫网络，并为他安

装了一台远程无线电台。

4月29日，盟军巡逻机发现一支日本舰队从所罗门群岛北部南下。两天后，克莱门斯看到了到当时为止日军对图拉吉岛最猛烈的一次轰炸。5月2日，圣伊莎贝尔岛上的海岸警卫队员报告，在岛屿西北部海湾观察到一艘日本航母，距离图拉吉岛仅150英里。这是敌军即将入侵的明确证据。塔纳姆博格岛上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只有4架水上飞机和一支小型驻军，在敌军登陆之前便宣布撤离了。他们乘一艘老旧的汽船穿过萨沃湾，抵达奥拉，还拖来一架损坏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让克莱门斯看管。克莱门斯招募了几百名土著人将这架飞机拖上岸，藏起来后盖上棕榈叶作为掩护。

5月3日凌晨，一支小型日本舰队驶入图拉吉港。部队上岸后发现英国政府的人已经撤走，该岛基本已被遗弃。克莱门斯立即派人将损坏的“卡特琳娜”飞机拖入海湾，沉到海底。

5月4日早上，情况突变。8点时，一大群陌生飞机组成的编队出现在上空。它们不是来自拉包尔和布卡岛上的敌方航空基地所在的西北方，而是来自南部。这些陌生飞机是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次对停泊在图拉吉岛附近的日本舰只的突袭是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的开场。罗兹表示，听到“头顶上巨大的轰鸣声”，他吓了一跳，“看到二三十架单引擎飞机直接飞往图拉吉岛，我惊讶不已。这些飞机只有几百英尺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翼上的星形图案”。^[9]看到“12架俯冲轰炸机从图拉吉岛上空云端冲下来的壮观景象”让克莱门斯很激动，“真是天降甘霖”。^[10]扔完炸弹和鱼雷后，飞机越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山脊，消失在南方。

克莱门斯的位置很危险。美国飞机来了又走，还没有把日军赶出图拉吉岛。他的房子离海滩很近，日本人随时可能来袭击他。5月5日，克莱门斯在奥拉的海滩上，三架川西飞机突然从他的头顶上低空飞过。几天后，布干维尔岛上的的一名澳大利亚海岸警卫队员报告说，一支大型日本舰队正在布卡岛的卡罗拉港口集结。“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很清

楚，”克莱门斯评论道，“我们在奥拉，日本军队在图拉吉岛，相距不到20英里。”^[11]敌人很有可能会来到奥拉，而不是沿岸的其他地方，因为他们从审问的土著人口中获知，这是整个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英国行政总部。如果被俘，克莱门斯会备受折磨，被迫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罗兹在岛上最西北端的拉沃罗也处于同样令人担忧的境地。日本的巡逻机几乎每天都低空掠过他的房子。他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鱼缸中的金鱼一样透明”，每当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时，他都会藏在覆盖着棕榈叶的一个洞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意识到，现在这场战争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就是个平民间谍，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当作间谍对待。”^[12]

与所罗门群岛的所有大陆岛一样，瓜达尔卡纳尔岛也很大，几乎完全未开发。种植园之外的其他地方没有道路，内陆旅行靠徒步走泥泞的丛林小路或河床。沿海平原的另一边，是地势起伏的丛林山区，当时的地图尚未绘制出这片广阔的土地。深深的山谷两侧是刀刃般的山脊，通往山脊的林中小径在其间依稀可见。阴暗的丛林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藏身，一队敌军士兵经过都不会发现有人存在。

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很少。物资、食品、武器、弹药和燃料罐必须包起来，搬到丛林中的隐秘地点。任何对敌人可能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该留下来，必须带走或者销毁。克莱门斯说：“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思考。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形势十分严峻。远程无线电台把我拴在了海滩上，但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东西都藏在丛林中，因为敌军如果发动快速进攻，从图拉吉岛来到这里只需要两个小时。”^[13]

克莱门斯手里有一支由土著人组成的警察部队，成员均非常可靠。但他还需要雇用数百名工人和搬运工，而他雇用的每个土著人的行踪和作为都可能有另外十个人知道。他能相信他们吗？即使没有被直接出卖给日本人，他能信任土著搬运工不会抢劫秘密储存的物资吗？克莱门斯和罗兹在5月下旬获悉，曾在萨沃岛工作过的土著医生乔治·柏格兹正在

与日本人合作。由于柏格兹认识他们，可以给敌方大量信息，这个消息吓得他们脊背发凉。

5月19日，克莱门斯感到自己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便带领一大队搬运工背负沉重的物资离开了奥拉。远程无线电台及其众多部件总重量近300磅，需要16名男子搬运。其他人搬运重要的政府记录、武器、食物、燃料甚至他的办公保险柜，里面放有约800英镑银币。他们穿过绿草如茵的平原，到达地势陡峭的红土丘陵地区。

黄昏时分，他们在一个名叫帕拉坡（Palapao）的小村庄里停了下来。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克莱门斯搬进了一个小茅屋，把这里当作办公室和住所，并立即开始重新组装远程无线电台。他把天线拴在两棵树中间，并且用葡萄藤加以伪装，这样从空中就看不见天线了。工人们在村里最高的树上建起了瞭望台。一名土著哨兵会在整个白天站岗放哨，如果日本人在山下几英里外的海滩上登陆，他就按事先的约定吹响海螺，发出通知。

克莱门斯撤退得很及时。一个星期后，日本第一批小型侦察队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被问及白人的下落时，土著人表示一无所知，回答“我不知道”，或“都走了”。^[14] 6月8日，规模更大的一支日本军队上岸，在隆加河附近的平原上搭建了一个帐篷营地。十天后，一艘日本驱逐舰停泊在隆加河河口几百英尺外，并开始往海滩上卸载物资。克莱门斯在6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日本佬要在这里待着不走了。”克莱门斯让他信任的警员去隆加收集信息。日本人似乎在建造一个码头，并且在焚烧隆加种植园的农田。^[15] 这表明他们可能在为建飞机跑道做准备，于是克莱门斯迅速将情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这条情报在那里被转交到墨尔本的海军办公室，然后又传给华盛顿和伦敦的盟军高层指挥。

7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支12艘船组成的舰队驶进萨沃湾，停泊在新码头。上岸的除重型建筑设备和卡车外，还有数百名军人和工人。这就确定无疑了，日本人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造一条飞机跑道，如果任由

他们完工，日军的空中搜索范围将能涵盖珊瑚海中心地带。克莱门斯还从侦察员处了解到，日本人点名询问了他的动向。显然他们侦听了他发送的一些信息。他们的无线电测向装置有可能确定他的位置吗？土著人也报告说，日本人正计划用猎犬追查他的行踪。“这消息可真让人高兴。”克莱门斯苦涩地说。

尽管帕拉坡位置偏远，但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了。7月4日，克莱门斯再次起身，去往更高更远的山区，搬到温加纳（Vungana）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小路沿泥泞的山脊蜿蜒上行，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在凶险的路段，克莱门斯不得不用一只胳膊夹着他的小狗岁闹爬过去。搬运工背着沉重的设备赤脚爬山的景象让他胆战心惊：“电池搬运工不得不放弃爬山杆和吊带，一只手抓住肩上沉重的电池，另一只手拼命稳住身子，不让自己摔下去。看到他们这样，我害怕得要死。”

温加纳村只有几间茅屋，建在山麓高处一段狭窄的山坡上。或许日本人不会到达这里，至少目前此地是安全的。这里海拔超过1500英尺，山下的隆加机场和整片水域一览无余，克莱门斯可以仔细观察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航运。他再次装上远程无线电台，在两根粗大的竹子之间拴上了天线。但是这个设备越来越难用。它不适合搬来搬去，并且湿气似乎已经损坏了它的内部电路。克莱门斯发现，每天下午都必须打开电台外壳，让它在太阳下晒一个下午，这样傍晚时才能用它传送信息。

7月对克莱门斯来说是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那个海拔高度上，夜晚很冷，他几乎睡不着觉。食物、金钱、燃料和备件都快用完了，甚至淡水都得从村子下方几百英尺的溪流里打上来。土著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正沿着海岸和河流扩大搜索范围，盘问留下来的传教士。7月8日，克莱门斯向汤斯维尔报告，有700名日军在下面的平原上搭帐篷露营。这个苏格兰人补充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无线电的充电设备越来越难启动，永久罢工看来只是早晚的问题。土著工人在饿肚子，如果他不能提供食物，就不能指望他们留下来。

7月26日上午，克莱门斯惊讶地发现，一架川西飞机突然出现在温加纳村上空几百英尺处。当飞机急速倾斜，准备掉头看个究竟时，他急忙卧倒，躲藏起来。他认为自己肯定被发现了。克莱门斯认真考虑是否要冒险从难走的陆路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向风一侧）海岸，他期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藏起来的船，渡海到澳大利亚。

来自汤斯维尔的密电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日本人的无线电台的确切位置在哪里？部队的种类和人数如何？大炮的位置和口径如何？岛上有飞机吗？这些问题燃起了克莱门斯的希望，因为这似乎预示着某种行动，可能是一场空袭。无线电另一头的人自然不能告诉他什么，但暗示救援即将到来：“不会太久了。”于是，他在痛苦中等待着，日渐消瘦。“我看到的東西越多，情况似乎就越不妙。我的充电设备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把信息传送出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咨询他人应该做什么就更难办到了。”

8月6日，一名侦察兵从海岸返回，报告说隆加的机场已经铺上砾石和泥土，看起来已经做好接收飞机的准备了；跑道附近正在建造一个飞机库；岛上的日本军队现在接近4 000人。克莱门斯发送了新情报，询问盟军是否打算摧毁机场。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写道：“我所尝到的尽是失败的苦涩。”^[16]他饿着肚子早早上床，沉沉地睡去。

轰隆隆的大炮声把克莱门斯震醒时，他看了下时间：早上6时13分，天还未亮。海军重炮在萨沃湾开火了。什么船？谁的船？一名情绪激动的侦察员报告说，整支日本海军都在隆加下锚了。克莱门斯回忆说，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脏静止不动了”。又过了几分钟，头顶上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他竖起耳朵听着。他打开无线电，尝试了几种不同的频率，最终听见有人用美式口音描述着沿海岸线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他听到有人提起了“橙色基地”“黑色基地”“红色基地”。三艘航空母舰！“太赞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绝了，多么伟大的一天！！！”^[17]

天亮后，克莱门斯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山下的水域。他数了数，有50

艘以上的舰船，其中包括几艘正在开火的重型巡洋舰，8英寸^[18]的炮弹密如急雨，落在隆加角附近的日本军事设施上。建筑物和临时燃料库燃起了熊熊烈火，升起滚滚的黑色油烟。身着绿色军服的部队下了运输舰，乘着登陆艇，迅速向隆加以西的海滩开进。这是克莱门斯和其他所有人见过的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他的远程无线电台在迅速地失灵，这是粗暴搬运和潮湿的必然结果。但是，马丁·克莱门斯已不需要无线电来告诉自己美国人到来了。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此图与《燃烧的大洋》卷首地图为同一张

走向大海，尸随浪花浮海面；
踏过高山，身自凋零没野草。
吾为君亡，
死而无憾！

——《海行兮》
日本海军军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圣经·诗篇》第23章

-
- [1]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 [2] 1英尺≈30.5厘米。——编者注
- [3] 1磅≈0.45千克。——编者注
- [4]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57.
- [5]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59.
- [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49.
- [7] Ibid., p.32.
- [8] Rhoades, “Secret Diary,” p.1.
- [9] Ibid., p.4.
- [10]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06.
- [11] Ibid., p.110.
- [12] Entry dated May 4, 1942, in Rhoades, “Secret Diary,” p.4.
- [1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05.
- [14] Ibid., p.147.
- [15] Rhoades, “Secret Diary,” p.7.
- [1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87.
- [17] Ibid., p.188.
- [18]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第一章

资深共和党政治家亨利·史汀生担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内阁的战争部长。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话中带刺，讲到陆军与海军之间势不两立，称双方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为影响力和资源而竞争。史汀生认为，这个麻烦“主要来自海军部特殊的心理，这种心理似乎经常让人从逻辑领域倒退到昏暗的宗教世界，以尼普顿为神，以马汉为先知，认为美国海军是唯一真正的教会”。^[1]

海军派并不缺乏反击之词，他们马上可以指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抱有救世主式的幻想，但是不能太轻易地否定史汀生的描述。在以往的和平时期，海军总是固执己见，封闭且狭隘。每位海军将官都经历了相同的职业路线：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海军战争学院、陆上和海上的一系列指挥职务。陆军战时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而不是西点军校，而海军将官无一不是毕业于海军学院。每位高级海军指挥官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加入海军，成年后也一直生活在海军中。他们深受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的影响，被教导要尊重海军的传统和惯例，永远忠于海军：“海军：不忘初心，坚持到底，矢志不渝。”^[2]

军种间的敌意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困境。事实上，日本军种间的敌意更加强烈，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几乎视对方为敌人，这种对峙是日本草率地发动灾难性战争的关键原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层在1941年被意外推入战争时，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在联合指挥的情况下应战。和平时期陆军和海军很少互动，忽视了联合作战行动的计划 and 执行所带来的挑战。1947年以前，美国没有国防部和国防部长，海军和陆军彼此独立平等，

各由一位直接向总统报告的文官内阁部长领导。在1941年12月以前，美国也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该机构是为与英国召开第一次战时会议而临时召集的委员会。由于没有其他机制来协调跨军种合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争期间继续定期开会，但没有正式获得法定的权力，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海军最高将领欧内斯特·J.金级别不低于陆军的马歇尔，反之亦然。军方首脑或者在混乱中达成共识，或者被迫让罗斯福总统来解决争议。^[3]

这种敌意在每个等级中都可见到。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街头，海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之间每晚都发生激烈争吵。海军士兵和陆军士兵相互嘲笑对方为“小兵”和“水鬼”，用拳头解决问题。步兵们嫉妒水兵有热餐和干净的床铺，与陆战中的肮脏和物资匮乏的处境相比，海军的条件几乎好到了罪恶般的奢侈地步。自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成立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来，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之间的不和便众所周知。侮辱性语言会悄然进入加密无线电消息开头和结尾的“填凑部分”，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海上门童，呀呀呀”。^[4]在世界各地海军基地的警卫室和大门口，怒气冲冲的海军陆战队员见到所有海军士兵时，习惯性的问话都是：“你他妈以为这是哪儿？”

高级陆军军官将整个海军陆战队视为海军策划的阴谋，意在夺取陆军的正当职能，因此尽最大努力阻挠其发展，至少要将其作战单位限制在团级规模之内。海军飞行员抱怨说，陆军航空队发放奖章就像发餐后薄荷糖一样随意。一方飞行员会故意低空掠过另一方的机场和飞机，或者（在地面上时）在刹车的同时故意发动引擎，把滚滚尘土吹到对方飞机上面，这时飞行员心里会一阵窃喜。

太平洋战争早期的每一次主要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军种间的积怨。在珍珠港遇袭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经常强调，瓦胡岛的防空任务主要是由陆军负责的。在顽强地防卫威克岛（最终没有成功）之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公关部门争先寻求公众的称赞。麦克阿瑟宣称，菲律宾的沦陷“根本上是由于在太平洋上缺乏制海权”。^[5] 1942年4

月，在杜立德率领的空袭行动中，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日本，这是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成功合作的罕见例子。但是詹姆斯·杜立德中校的飞行员后来指责哈尔西将军太早下达起飞命令，当时特混舰队距离日本还有将近700英里。在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中，麦克阿瑟手下的澳大利亚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被指责观察报告不准确，还将盟军舰队误作日军舰船并投下炸弹。（好在炸弹全部掉入大海，没有造成损失。）

在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4日至6日）中，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俯冲轰炸机袭击并摧毁了日本最好、最大的4艘航空母舰。但最初的新闻报道误认为建功的是从中途岛机场起飞的陆军B-17轰炸机。194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大型轰炸机赢了”。陆军准将威利斯·H.黑尔宣称：“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于6月4日上午B-17轰炸机在岛外投下炸弹，摧毁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日本海军特混舰队。”^[6]历史最终证明，陆军飞机扔下的炸弹没有一颗击中日本军舰。但是在胜利之后，B-17机组人员首先回到了火奴鲁鲁，并对新闻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投下的炸弹纷纷击中敌方军舰的壮观景象。了解战役实际情况的海军飞行员被激怒了。战役结束一周后，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在火奴鲁鲁的莫阿纳酒店碰面时，争论升级为斗殴。“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弗雷德·米尔斯少尉指出，海军飞行员“看到他们的朋友冒着危险，甚至失去了生命，俯冲到1000英尺以下的高度，去轰炸敌舰、投放鱼雷，最终击沉日本军舰，而陆军飞行员停留在2万英尺的安全高度，不仅没投中，有时甚至击中自己人。所以他们才对陆军这么生气”。^[7]

海军陆战队将军“疯子”霍兰·M.史密斯在秋后算账式的战后回忆录中指责海军患有“精神动脉硬化症”。^[8]他列举了海军的一系列过失行为。海军在两栖作战中没有提供足够的炮火和空中支援，这迫使海军陆战队员用早该淘汰的过时装备和次等武器去应对敌军。离岸特混舰队的海军司令干扰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对抢滩登陆的指挥。下级军人也像史密

斯一样，满是抱怨。陆战队员由海军运输舰运到敌方海滩，他们为了大大小小的不公平事情感到生气。不满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中随处可见：用餐和铺位安排不平等；船上的商店不允许他们购买糖果和香烟；私人用品由海军看管，结果再也见不到踪影；挤在下层甲板上，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见不到阳光；“为安全起见”而被迫遵守荒谬的规则。佩莱利乌岛是二战中最血腥的两栖作战行动之一的发生地，海军陆战队员给运送他们到那里的海军运输舰员留下了一张充满讽刺意味的纸条：

此时此刻，我们非常高兴地向船上所有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航行期间对海军陆战队员友好而周到的照顾。我们非战斗人员意识到，勇敢坚定的船员正在赢得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你们海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离日方岛屿10英里以内的区域。哦，你们多勇敢啊！[\[9\]](#)

与其他类型的军事行动相比，通过海路进攻陆上敌军这种两栖作战方式更能暴露、加剧军种间的摩擦。太平洋战争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代价最高、技术最新、后勤最复杂的两栖作战。为了击退日本征服的浪潮，盟军必须攻下一个个岛屿，在赤道两侧数千英里的海域中沿两条并行的战线不断推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在持续而复杂的合作中携手作战。他们会犯下很多错误，也会尽力从错误中学习，总结经验。但即使作战成功时，军种间的长期不和留下的伤疤也难以因胜利而愈合。

6月13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获悉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取胜后，发送电报给罗斯福总统：“这一刻我最衷心地祝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巨大胜利，这场胜利非常明显地改变了海战的平衡。祝你们和朋友们好运。”[\[10\]](#)

甚至在这封例行的贺电中，丘吉尔也用词谨慎。这场战役已经“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平衡”，但还未扭转整场战争的走势。日本海军失去了“飞龙号”、“苍龙号”、“加贺号”和“赤城号”航空母舰，3 000多名资深军官、海兵和飞行员在战斗中丧生。即便如此，日军可部署的大多数类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在数量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日军联合舰队仍然可以召集5艘航空母舰，还有几艘在建，而美军只有4艘航母。除了“三隈号”巡洋舰在4艘航空母舰下沉两天后的扫尾行动中被毁坏外，日本海军的水面力量没有其他损失。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没有失去哪怕一艘强大的战列舰、潜艇、驱逐舰、运输舰，水上飞机以及威猛的陆基中型轰炸机也毫发无损。日军资深航母飞行员除了大约110名外都得以生还，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和吴港的工厂装配线也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足够数量的新飞机。中途岛战役几乎没有削弱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日军部署在新不列颠岛拉包尔港的海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不断向南和向东推进，而当地的盟军部队只能予以微弱的抵抗。

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星期，金将军从华盛顿前往安纳波利斯，向海军学院1942届的611名学员发表演讲。他们是海军学院97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课程从四年减至三年，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舰队对新军官的需求。金将军站在达尔格伦厅的讲台后面警告这些年轻人，说他们即将投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这项工作需要“不懈的努力，它带来的痛楚和牺牲，会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1\]](#)

金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海军将领，是首位同时担任海军两个最高职务的人：美国舰队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金个头高大，有着深色头发，脸形瘦长，下巴中间有道缝，他出身于工薪阶层，这在同事中并不寻常。他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出生长大，父亲在铁路机械车间担任工头。

同事们尊敬他甚于喜欢他。他鄙视海军学院毕业生抱团掌权的传统，将除掉好逸恶劳、不称职的人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按一名副官的

说法，这位将军“几乎可以容忍军官的任何事情，但无能、懒惰和唠叨除外”。^[12]金讲话直接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也不掩饰对看不顺眼的人的蔑视。战争结束后马歇尔将军说：“我和金合不来，因为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发火。他永远都很刻薄。”^[13]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私人战时日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一点也不客气：“有一件事可能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就是找人把金给崩了。这个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合作，故意行为粗鲁，这意味着他喜欢欺凌别人。”^[14]

英国军方高层总是怀疑金谋划把军队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1943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写道：

金……为人精明，还有点傲慢。他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太平洋战区，任何估计会分散太平洋战区可用武力的行动都得不到他的支持或批准。他不从全球战争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完全偏向于太平洋战区。虽然他对我们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日本的根本方针口头表示支持，但他在处理与战争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未执行此方针。^[15]

真相其实与此略有差别。金从来没有质疑过“欧洲优先”的明智战略。盟国计划（1941年初达成一致，珍珠港遇袭后再次确定）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打击德国。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作战行动是史上发动过的最具灾难性的地面战争。如果德军胜利，苏联将被迫投降或瓦解，希特勒可能会将100多个师重新部署到西欧。相反，如果能够制服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就注定会随之失败。

但是“欧洲优先”（或“德国优先”）方针表述得很抽象，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附带问题。如果太平洋战区只能分得较少的盟军力量，这个比例具体应该是多少？百分之十？还是接近百分之三十？敌人可能会袭击广阔海域里的任何地方，怎么“牵制”敌军？海上没有掩体，也没有战

壕和防御工事。即使在中途岛战役中失败后，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国领土仍然构成威胁，在战区局势稳定下来之前，盟军作战计划文件中假设的牵制行动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危险迫在眉睫，局势亟待扭转。

在1942年春天，金向同事施压，要求巩固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金承认盟军部队力量不足，也缺乏各种航运工具和军事装备，他的计划难免会阻碍对德国的作战行动。他告诉其他参谋长，南太平洋的局势“当然更急迫，必须现在就处理。将来在这个战区如何推进暂且不提，我们先得确保有能力稳住现在的局势”。^[16]他反复将讨论拉回到需要“坚固的据点”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汤加。^[17]要想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增加驻军部队、飞机和机场施工所需的劳力和设备。5月12日，金请求马歇尔至少将陆军三个轰炸机大队以及地勤人员、备件、燃料和弹药从澳大利亚和夏威夷转移到新喀里多尼亚、埃法特和斐济。^[18]

然而，一如往常，金不会对一味固守感到满意。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坚固据点网络里集中了足够兵力之后，盟军应该发起更有雄心的行动：从新赫布里底基地开始向西北方向反攻，进军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就像日本在南海采用的步步为营的方式那样”。^[19]经过深思熟虑，他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并于6月24日发报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向他预告这一计划。尼米兹应该为“夺取和初步占领图拉吉岛及其邻近岛屿”召集海军和航空力量。^[20]第二天，金补充说，进攻将“在8月1日左右”开始。^[21]

5周后就开始自加利波利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进攻，还是在条件最艰苦、最不易展开行动的战区之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金一直在游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进攻所罗门群岛，但他从未暗示在8月初就要发动进攻。这种时间安排似乎仓促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指挥的责任将落到新任命的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身上。但是戈姆利5个星期前才抵达战区，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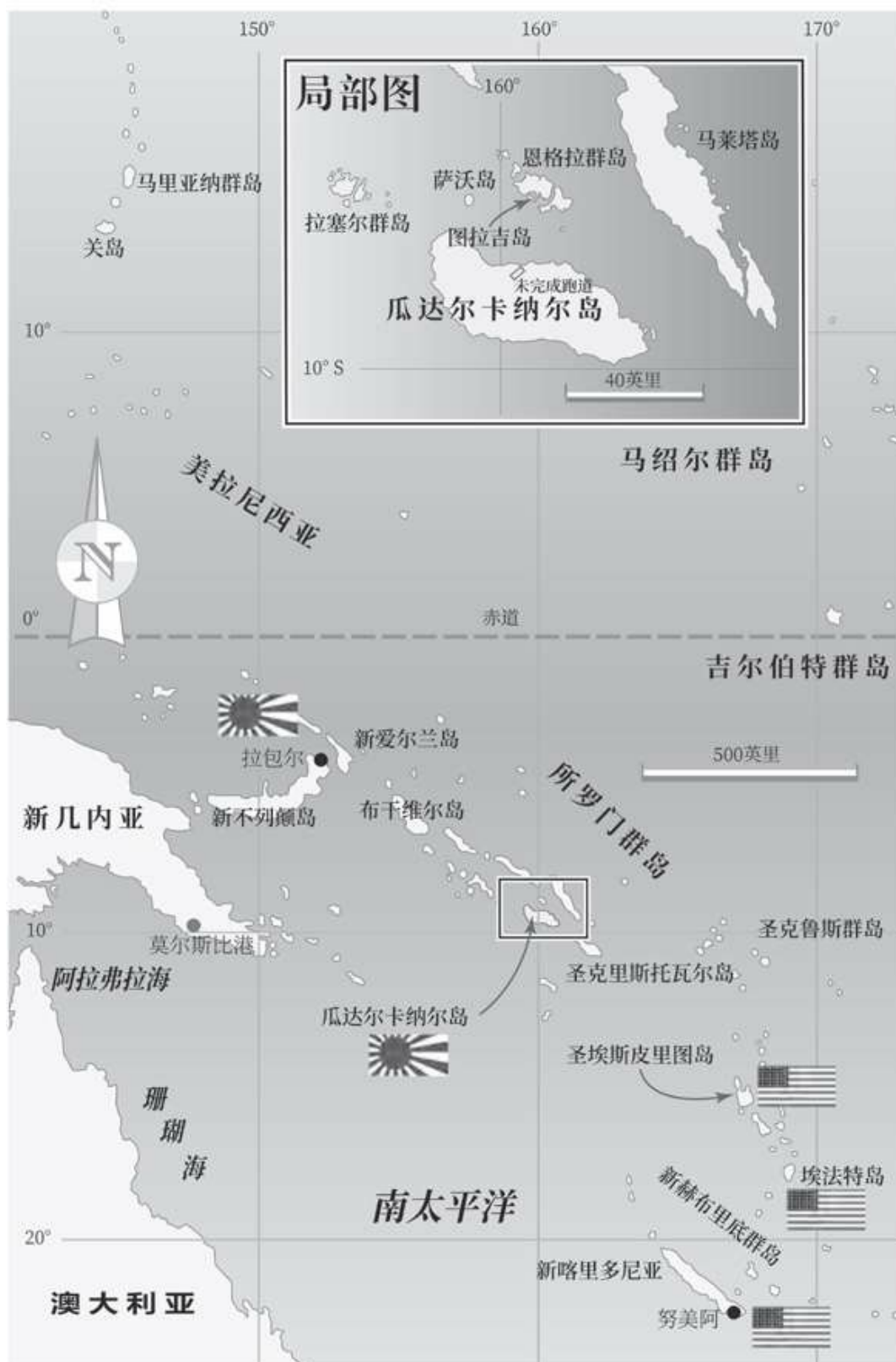
指挥职位。他暂时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扎营，但还没有组建起参谋团队，也未建立常设司令部。后勤事务杂乱无序，而由于“无线电员和转码人员经验不足”，戈姆利甚至无法及时收到消息。[\[22\]](#)

在戈姆利的眼中，头等大事是燃油问题。包租的油轮已装着50万桶石油从北美启程，还有3艘加油船负责在途中加油。他在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和惠灵顿有小型干船坞，但大型舰只如果要大修就必须返回珍珠港或美国本土。他在新西兰以北没有大型燃料储存设施。每种类别和口径的弹药都供应短缺。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旋风”约翰·S.麦凯恩少将在偏远的热带岛屿上指挥建造机场跑道，岛上能提供的原材料仅有椰树和原木，这项工作似乎永无尽头。真正要在所罗门群岛登陆的海军第1陆战师由亚历山大·阿彻·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这支部队不到一个月前才离开北卡罗来纳州纽河的训练基地。2/3的部队仍然在前往新西兰的航行途中。他们得到的承诺是投入现役作战之前再接受6个月的训练。水陆两栖登陆战所需的大量后勤工作也还未启动。[\[23\]](#)

“瘟疫”（Pestilence）是首次尝试从日军手中夺取领土的作战行动的代号。除非所罗门群岛以东最近的岛群有配备齐全的海空基地提供支持，否则这次行动很快就会失败。5个星期后就是金设定的最后期限，而那些基地还根本不存在。自由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努美阿可以提供一个能用的机场和一个配备基本港口设施的宽敞海港。但是它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986英里处，距离太远，无法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援。往北一些，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南部，埃法特岛曾被一个海军陆战营占领，目前正在建设一个战斗机用的简易机场。但是，埃法特岛位于瓜达尔卡纳尔东南方向800英里处，仍然太远。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最北端需要有一个海上基地和简易机场，这里处于瓜达尔卡纳尔岛650英里的飞行半径之内。在从空中侦察该区域的过程中，麦凯恩将军向下盯着岛群中最大的圣埃斯皮里图岛，发现丛林密布的丘陵之间藏着一块树木覆盖的平原，而且离天然良港塞贡海峡（Segond Channel）不远。也就只能用这儿了。

麦凯恩的参谋长M.B.加德纳上校后来在华盛顿对一群军官说：“谁要是想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建立一块先进的基地，就应该好好读读《鲁滨孙漂流记》。除了丛林之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24]接下来的一个月，需要在“纽扣”（圣埃斯皮里图岛的代号）的丛林中开辟一条6 000英尺长的轰炸机用跑道。时间如此之短，可见南太平洋地区的工程营队员遇到的挑战有多大。所有必需的设备用品都通过船舶运到塞贡海峡，但由于港口没有码头、仓库和起重机，所有重型设备都必须用驳船拖到海滩上。燃油桶从甲板上被推下，“游”到海滩，然后人工装到卡车上，分散运到20多个隐藏的燃料仓库。用于铺设跑道的穿孔钢板马斯顿垫（Marston mat）在运输时被捆成一团一团的，每团重达两吨半，必须用油驳才能拖上岸。当“戴尔号”驱逐舰于7月28日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岛时，船员原本以为会有一个正规的海军基地，结果连锚地都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绕着岛慢慢巡航。最后，瞭望员发现一些桅顶耸立在棕榈树上方。我们绕过去，才找到一个小海湾的入口。”^[25]

南太平洋，1942年7月



这种原始的环境需要人力，而且是大量人力，但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大量后勤问题。所有物资、服装和医疗用品都必须直接从美国运来。由于疟疾流行，匡西特活动房屋[26]也很重要，或者至少要有带纱网的篷屋。

35名工程营设备操作员和一支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劳工队与丛林搏斗了一个月。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晚上在探照灯下赶工。工程营队员使用拖拉机、推土机和压路机，步兵则使用斧头和铁铲。卡车和土方工程设备常常由于缺少一个小零件而停工，然后必须派水上飞机到埃法特或努美阿去取。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头，他们终于在7月28日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是麦凯恩规定的最后期限。第一个B-17轰炸机中队在第二天飞来，但是只能手动加油。这些四引擎大型轰炸机每架都灌了50桶油。

（将近一年后，该基地才有大型航空汽油储存罐和连到港口的输油管道。）水上飞机可以在塞贡海峡外起降，但直到7月底才有水上飞机供应舰。海港没有水雷或鱼雷网的保护。工兵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很多人“得了疟疾，需要休息”。[27]

“韦克菲尔德号”曾是一艘豪华邮船，现在为军方提供运输服务，变得肮脏而又拥挤不堪。它于6月14日穿过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驶出了新西兰惠灵顿港口。船上载着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手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以及第1陆战师的第一队士兵。这次航行使船上的人筋疲力尽。“韦克菲尔德号”携带的物资不足，实行粮食配给制。许多人在海上瘦了15磅到20磅。

范德格里夫特本来以为能够休息调整一段时间，然后在新西兰加练6个月。但6月26日在奥克兰与戈姆利将军会面时，戈姆利一言不发地递给他金于6月24日发给尼米兹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表明，向所罗门群岛发动两栖进攻的命令即将下达，登陆时间定在8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目瞪口呆。“我不敢相信，”他回忆说，“我又读了一遍电文，确认没有

误解其内容。”[\[28\]](#)

第1陆战师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是在珍珠港遇袭后立即入伍的，他们在两栖作战方面接受的训练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训练。而且这个师的人有2/3仍在萨摩亚或海上。“瞭望塔”行动（“瘟疫”行动的第一阶段：夺取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将在短短5个星期后就派这些新兵去攻取敌军占领的岛屿，把他们投入一场进攻战。就范德格里夫特所知，防守敌方海滩的都是些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打败英国和荷兰军队的就是这群人。他的设备、武器和物资都成箱装在7艘运输舰的货舱里。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和重新分类，然后根据战斗需要装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光这一项规模宏大的后勤任务可能就需要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完成。[\[29\]](#) 范德格里夫特不相信这个计划真正可行，至少8月1日肯定不行。戈姆利甚至更加悲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登陆，我要和麦克阿瑟讲一下这件事。”[\[30\]](#)

金将军在电文里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命令，而是说“考虑了以下安排”，尼米兹应该相应地“准备”。[\[31\]](#) 金正在设法强迫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这个计划，不顾想亲自指挥行动的麦克阿瑟的反对。经过几轮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谈判后，马歇尔同意实施三个阶段的进攻：攻占所罗门群岛，拿下新几内亚，最后以夺取拉包尔收尾。命令于7月2日发布，任务一是“夺取和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相邻要地”，该行动将由尼米兹及其附属战区司令官戈姆利将军指挥。[\[32\]](#)（金后来将“相邻要地”改为瓜达尔卡纳尔岛。）任务二和任务三为攻占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日军机场，随后夺取和占领拉包尔，这将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为了将“任务一”完全置于戈姆利的指挥下，划分SOPAC（南太平洋）和SOUWESTPAC（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界线将向西挪一度，改为东经159°，避开瓜达尔卡纳尔岛西端。

戈姆利的本能反应是阻挠“瘟疫”行动实施，或至少推迟实施。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是他的临时盟友。一个月前，这位傲慢专横的将军提

出要直接攻占拉包尔，要求将两支航母特混舰队从太平洋舰队转移到他的指挥下。（金否决了这个提案。）现在，一个月后，戈姆利发现麦克阿瑟愿意和他一起反对“瘟疫”行动中的间接进攻路线。

在墨尔本召开了一次仓促的会议之后，麦克阿瑟和戈姆利联合发送了一封长长的加急电报给华盛顿，提出“延期”行动。他们提出的理由包括缺乏训练有素的两栖部队、足够的运输资源以及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力量。日本的侦察机很可能会发现进攻部队，所以“现在发动突袭是不太可能的”。舰队和支援的航母编队将被迫在该地区逗留一天到四天，在这段时间内，它们“有可能遭到敌方持续的空袭、水面袭击和潜艇袭击”，有“被敌方优势兵力围歼的危险”。他们的共同建议是，在该地区积累一定的海陆空力量之前，先不执行“瘟疫”行动。^[33]

金对戈姆利感到失望，对麦克阿瑟感到愤怒。“我注意到，”他向马歇尔抱怨说，“大约三个星期前麦克阿瑟说.....他可以直接推进到拉包尔。真到面对这项任务的具体问题时，他又觉得不但无法实现这个长远目标，连攻占图拉吉岛的行动也无法完成。”^[34]

金拒绝推迟“瘟疫”行动，但为避免尴尬，他承诺提供额外的海军和后勤部队来支持这一行动，派出围绕“企业号”“胡蜂号”“萨拉托加号”组建的特混舰队，以及包括油轮和运输舰在内的后勤船只。“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取消为执行任务一而开展的行动。”^[35]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搬到了惠灵顿市中心破旧不堪的塞西尔酒店，这里曾经非常雅致讲究，现在归他们专用。他们将要在这里完成制订作战计划这一艰巨任务。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军事组织相比，海军陆战队在研究和规划两栖战争方面都要更有经验。他们非常清楚其中的风险。在敌方海岸登陆是所有重要军事行动中最危险的。为了确保胜利，进攻方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要控制周边海域，拿下制空权，

登陆前要猛烈轰炸敌方阵地，随后迅速将地面部队和重型武器运上海滩。如果能实现突袭，初期的风险将大大减少。但是，即使最初的攻击成功了，接下来还必须持续从海上补给，给予可靠的空中保护。戈姆利和麦克阿瑟怀疑这些条件得不到保证，并将自己的疑虑记录在案。金在距离作战现场半个地球远的地方就把行动锁定在一种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时间安排上。

海军陆战队面临的严重问题很容易催生绝望的悲观主义。范德格里夫特意识到军中士气非常低落，但不会容忍手下喋喋不休地发出负面言论。他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中等身材，头发渐稀，长着双下巴。他为人友好温和，沉着镇静，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也能保持如此。这个特质使他在海军陆战队中赢得了一个昵称“阳光吉姆”。一名参谋回忆说，一旦明确“瞭望塔”行动不可避免，范德格里夫特就“拒绝参与任何论其是非的闲谈。他会断然制止人们发表质疑行动的言论.....范德格里夫特不允许我们对奉命执行的行动有任何怀疑和挑战，还会毫不留情地向这样做的人投以他们应得的蔑视”。[\[36\]](#)

他们对所罗门群岛几乎一无所知。麦克阿瑟在墨尔本的总部发来了该地区的航拍照片，但收件地址有误，结果装着照片的文件夹在戈姆利的总部丢失了。他们把仅有的几张地图和图纸都铺在桌子上，但是这些图太旧，或者比例尺过小，并无大用。其中一张还将瓜达尔卡纳尔写成了“瓜达尔卡纳”。[\[37\]](#)河流标错了名字或方位。海军发来的海图是几十年前绘成的，关于珊瑚岬的细节极少。

海军陆战队表示，他们想向亲身了解岛屿情况的人咨询。新西兰人设法找到了日军入侵之前在所罗门群岛生活和工作过的一些难民。利华兄弟种植园前主管查尔斯·威迪（Charles Widdy）画了一张粗略的草图，凭记忆画出了沟渠、沼泽、丘陵、铁丝网、草原、椰子树和河流的位置。但是，像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威迪主要在沿岸区域活动，对该岛的内陆了解甚少。即使他对位置的记忆是可靠的，距离和比例也基本只能靠猜测。

这显然需要进行空中侦察，梅里尔·B.特文宁上校受命驾驶陆军航空队B-17轰炸机飞过萨沃湾。从3 000英尺的高度向下看，特文宁注意到图拉吉岛南部的蔚蓝色水域分布着大片珊瑚礁，便拍照记录下来。当飞机往南转向，侦察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北部海岸时，特文宁发现情况要好很多，于是松了口气。深蓝色的海水几乎达到海岸线，海滩上没有可见的日本防御工事。三架零式水上飞机追了上来，但这架坚实的轰炸机躲进云层逃开了，安全返回了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

金设立的严格期限要求后勤准备工作24小时持续不断地进行。从诺福克、新奥尔良、旧金山和圣迭戈开来的舰船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第1陆战师的物资、弹药和重型装备。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到惠灵顿的码头上，然后重新分类、打包，装载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这项工作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惠灵顿这座景色优美的英式城市被绿色丘陵环绕，拥有南太平洋战区最好的港口设施。港口里最大的奥特亚码头可以同时停泊5艘大型舰船。滨水区足够广阔，可以将板条箱堆放起来，隐藏在油布下。新西兰的初冬处于凄风冷雨中，纸板箱在暴风雨的肆虐下分解了，干燥食品不可挽回地泡成了糊状物。第1陆战师的很多新鲜蛋肉和乳制品因为无法冷藏而坏掉了。

惠灵顿的装卸工被组织成一个半武装的团体，由港口负责人统管，他几乎毫不掩饰对美国人的敌意。码头工人总是处于罢工的边缘，经常因为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拒绝工作。对于要以战时节奏工作的建议，他们置若罔闻，而提及日本人带来的危险，他们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喝早茶要休息，喝下午茶要休息，抽根烟也要休息，还嘲笑在惯常的下班时间后仍然工作的想法。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就会走开，有时候解释说没有带雨衣。停工时间一般比较短，通常不到一个小时，但是频繁得让人发狂。有一次，码头工人在24小时之内停工多达14次。大部分装卸工作是由海军陆战队员自己完成的，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夜晚开着探照灯，即使下大暴雨也照常工作。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极其赞同在惠灵顿一

面墙上看到的涂鸦所言：“所有码头工人都是浑蛋。”^[38]

从一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制订计划的工作就受到了复杂又别扭的指挥系统的妨碍。金指派戈姆利将军担任“瞭望塔”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但戈姆利要留在努美阿还未完全建设好的司令部里。戈姆利将整支远征军的海上行动指挥权交给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中将。弗莱彻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司令，已随“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南下。（第三艘航母“胡蜂号”在从美国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但需要在汤加塔布进行数天的修理。）^[39]弗莱彻的航母编队（第61特混舰队）将以密集的空袭和低空扫射削弱敌方在海滩上的抵抗力量，并派战斗机拦截日军来袭飞机，掩护登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维克托·A.C.克拉奇利少将指挥的第62特混舰队第6特混大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在军队登陆前对海滩进行炮击。麦克阿瑟的航空部队将从莫尔斯比港展开行动，袭击拉包尔的日军机场和该地区的其他辅助机场，以压制日军势必将对盟军进攻部队展开的空袭。舰队在开往所罗门群岛之前，将在斐济集结，并在斐济南部的科罗岛进行登陆演习。登陆日定于8月7日，比金最初设定的日子大约晚一周。

金派自己的参谋里奇蒙·特纳将军指挥“瞭望塔”行动的两栖部队（第62特混舰队）。特纳从1940年以来一直领导海军的作战计划处。他像金一样，杰出而又易怒。他身材矮小，头顶渐秃，戴着钢框眼镜，长着黑色浓眉，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提高嗓门。“胡说！”是他最爱用的感叹词。他无情地鞭策自己，也期待同事和下属们赶上他的步调。他思维敏锐，擅长分析——即使他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即使是善意地向他提出批评，他的态度也并不友好。特纳极少对优异的工作表现给予赞美，指责别人却毫不迟疑，特别是过错可能在他自己时。他经常虚张声势、好为人师，更像法庭上的律师而不是海军将领。这些特点使他得到了“特凶特纳”的绰号。

在准备“瞭望塔”行动时，特纳本来希望从头开始，但直到7月中旬

他才抵达新西兰，而一周后舰队就得出航，这样才能赶上金定下的最后期限。因此，他不得不从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团队准备的计划草案入手。

7月22日，特混舰队从惠灵顿出港，运输舰和货轮排成长长的纵队，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经过四天平静的海上航行，它们到达了斐济以南367英里处的约定集结点。舰船随着海浪颠簸，减速行驶。随着下午时间慢慢过去，新的桅杆和甲板上层建筑从各个方向的地平线上冒出来。海军老兵按类型或名称指认舰船：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货轮、扫雷艇、加油船，以及（最令海军陆战队激动的）有着大型箱式轮廓的航空母舰。格鲁曼战机在头顶上空巡逻。“企业号”航空母舰附近有一艘比较罕见的战舰——“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第1突击营的贾斯蒂斯·钱伯斯少校回忆说：“当我们开始认出地平线上出现的航空母舰以及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建的特混舰队时，心里涌起的那种感觉以后再也不会有了。”那是离开美国以来，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意识到无论要做什么，我们都会和很多朋友在一起”。[\[40\]](#)

为了让行动保密，任何没有直接参与规划“瞭望塔”行动的人员都无权得知作战准备情况。有传言称第1陆战师将援救斐济的一支新西兰驻军。[\[41\]](#)但是，实际出现的是巨大而雄伟的海上力量——舰队里有82艘船，这是太平洋战争到当时为止集结起来的最大舰队。这只能意味着一场大战即将展开。“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舰船铺满了海面。美国似乎要进行开战以来首次大规模进攻，参与其中让舰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比兴奋。”[\[42\]](#)

舰队围绕科罗这座小岛聚集，特纳安排在这里进行演习。巡洋舰炮击科罗岛的南部海滩；格鲁曼F4F战斗机在头顶上方轰鸣，模拟与敌军作战、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舰载俯冲轰炸机从高空猛冲下来，向指定为敌方阵地的地方投放百磅重的炸弹。他们很快发现，科罗岛在一个关键的方面与瓜达尔卡纳尔岛不一样。低潮时，浅珊瑚岬阻挡了希金斯登陆艇，使其无法靠近。满载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第一批船搁浅

了，螺旋桨也被卡住。因为没有备用船只，特纳取消了登陆演习。

7月26日下午，舰队司令弗莱彻召集特混舰队指挥官到他的旗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会面。海浪太大，靠小艇或救生裤登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非常危险。“杜威号”驱逐舰载着特纳，慢慢靠近庞大的航空母舰。范德格里夫特在第1陆战师几名军官的陪同下，乘坐“赫尔号”驱逐舰来到航空母舰上。麦凯恩将军抓着来回晃动的梯子往上爬时，废物槽里倾倒下来的大量变质牛奶和垃圾淋了他一身。将领们在弗莱彻的军官起居室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戈姆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位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派参谋长丹尼尔·J.卡拉汉少将代表他出席。

据多名与会者所述，弗莱彻将军心情很不好，开场的语气明显不对劲。他要求所有将官军衔以下的军官离场。范德格里夫特认为弗莱彻“不安又疲惫”，而且对“瞭望塔”行动的细节了解得并不全面。弗莱彻将军似乎认为整个行动就是一场灾难，“很快告诉我们他认为不会成功”。^[43]所有人都认为行动仓促，感叹时间不足，无法开展仔细周密的准备。弗莱彻和特纳的作战指令和附录甚至没有足够的副本，许多舰队参谋和舰长不得不亲自做笔记。

讨论涉及诸多细节，包括后勤、燃料补给，以及空袭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和派陆军驻军部队救援海军陆战队的时间安排。当会议主题转到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保护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时，讨论氛围立即变糟了。特纳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将设备、弹药和物资卸载上岸。弗莱彻直接回答说，他只打算让航空母舰在附近停留两天。经过一阵紧张的辩论后，弗莱彻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航空母舰将停留三天。“D+2日”后，特纳的两栖部队将不得不在没有空中保护的情况下作战。讨论完毕后，弗莱彻宣布散会，指挥官们离开时都郁郁寡欢。海军陆战队军官登上小艇，准备回到自己的船上时，一名参谋发觉范德格里夫特“心烦意乱，没有心情说话”。^[44]

去往所罗门群岛的航程中太平无事。[\[45\]](#)联合特混舰队蜿蜒前行，以避开敌方潜艇。沿新喀里多尼亚北部海域向西进入珊瑚海后，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舰队右侧远方。平静的洋面上微风习习，舰队因一大片低云的遮蔽，躲过了日军侦察机的视线。“刚开始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是在参战，”“蒙森号”驱逐舰舰长罗兰·斯穆特说，“我们巡游在美丽的南太平洋水域，就像要去参加主日学校的野餐一样随意而无忧无虑。”[\[46\]](#)

在运输舰上，海军陆战队员擦拭步枪、机枪和弹药筒并上油保养，装满弹药带，调好步枪瞄准器，磨快刺刀和匕首。他们将装备摊在甲板上，清点并重新包装。他们准备好随身背包，把睡袋仔细捆好放在背包上面，沿着舱壁排列成行。私人物品装入水手袋，委托船员照管。每个人都要携带六罐口粮，够吃两天；一百发弹药装在一个子弹带里，另一百发装在弹囊里；两颗手榴弹；一把丁字镐或铁铲（二选一）；两个水壶、一个防毒面具、一个急救箱、一个睡袋、一件雨披、一顶蚊帐、一套野战炊具。[\[47\]](#)他们靠唱歌、抽烟、打牌或写家书来打发时间。晚上，他们睡在又热又脏的船舱里，床铺有四五层高。为了逃避高温，一些人蜷缩在甲板上或在救生艇里席地而睡。

8月5日，在三个航母编队的带领下，舰队向北转，进入行程的最后一段。那天下午天气晴朗，太阳照晒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舰队的好运持续了下去，没有日军侦察机出现在头顶。下午3点左右，舰队进入了另一个锋面，浓密的云层和断断续续的暴风雨掩盖了舰队的踪迹。第二天，也就是“D-1日”的下午，弗莱彻的三个航母编队调整方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以南占定位置。特纳的水陆两栖部队继续北上，开往猎豹浅滩（Cheetah Shoals），也就是这座多山岛屿最西端以外的海域。

晚上11时5分，北上舰队分为两列纵队，相距1 000码[\[48\]](#)。第一列（运输大队XRAY）向东紧靠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海岸航行，第二列（运输大队YOKE）向萨沃岛层状火山锥北部前进，然后向东开往图拉吉岛和恩格拉群岛。黑夜里海面一片平静。甲板上一根烟也不允许点。

一弯新月升起在东面的地平线上。^[49]赫伯特·L.梅里拉特上尉回忆说：“气氛十分紧张，四周特别安静，只能听到发动机稳定的颤动声、舰首拨开水面的声音和士兵们在露天甲板上蹑手蹑脚地走动的声音。”^[50]巡洋舰和驱逐舰以27节的航速高速前进，飞溅的海浪拍打着舰船的栏杆。在这样的速度下，军舰将露出“嘴里的骨头”，也就是舰首两侧长长的白浪，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看到。日军瞭望员会发现它们并提高警惕吗？岸上没有开枪，也没有其他动静。“敌方没有任何反应，”斯穆特舰长说，“我们已经彻底做到了突袭。”^[51]

海军陆战队员贴着运输舰的栏杆研究起了越来越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状。天还没亮，岛屿轮廓看不真切，只呈现出高耸的黑色锯齿状形影。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看到的东西很少，但是已经闻到了潮湿植被发出的浓烈的恶臭味。随着黎明第一道曙光的到来，他们渐渐地看到了崎岖的蓝绿色山脉、森林茂密的山脊、点缀其中的片片浅色的开阔平原，以及沿着蜿蜒入海的河流两岸生长的树木植被。用双筒望远镜扫过紧邻海滩的村庄时，可以看见一簇簇茅草屋顶和菜园。沿岸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三角洲突出形成一处入海口。其中一处是“红滩”西面的隆加河河口，海军陆战队将在这里上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近完工的日军机场，位于海岸往内陆几英里的地方。

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收到警告，做好了在“红滩”上进行一场血战的准备。那些在最初的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必须向内陆挺进，跨过可能充作战壕的排水沟，冒着炮火蹚过河流，穿过遍地都是的刀刃般锋利的茅草。在每个阶段，他们都会遇到成千上万武装精良、作战狂热的日本人。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尉告诉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他预计有1/4的人会在第一轮攻击中死亡。^[52]即使如此，士气仍然很高。二等兵威廉·罗加尔感到“心都揪紧了，但没有什么比胆怯更让人不安了”。比死亡或受伤更让罗加尔担心的是丢人或“临阵退缩”。^[53]战后作为回忆录作家和传记作家获得文学声誉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威廉·曼彻斯特写道：“尽管死亡的想法对你没有吸引力，但你却像服了一剂猛药，浑身

充满了活力。”^[54]他最想要的就是马上离开肮脏、拥挤的运输舰。一个多月来，这就是他生活的宇宙。战前在波士顿做食品批发商的一名预备役上尉说，他觉得“并不比平时被派去做某种棘手的工作更紧张——比如在人们反感推销时尝试卖出大订单”。^[55]

清晨6时13分，乌云中从东向西透出缕缕灰光，“昆西号”重型巡洋舰的主炮台瞄准了隆加河河口并开火。8英寸大炮发出的强烈气流在舰船旁的海水中留下一个个水坑。隆隆的震荡声回响在萨沃湾，并从周围群岛的山间传来回声。对于特文宁上校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这是盟军的第一场反击战，通往空袭东京的漫长血路上的第一步。^[56]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也开了火，炮口喷出的黄绿色火焰照亮了海面、舰船和周围岛屿上的丘陵和山脊。曳光弹划出的一道道红色弧线抛向海岸，猛烈的爆炸从背面照亮了海滩上的棕榈树。一枚炸弹落到隆加河河口西面库库姆村（Kukum）的一个临时燃料库中，结果引起巨大的爆炸，百尺高的火墙和黑色的油烟直冲云霄。北线火力支援大队的“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上的瞭望员向图拉吉岛、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开炮，射程达2 000码。不到两分钟，海滨地区就只剩下一堆堆冒烟的残骸。

第一轮炮击进行了5分钟后，火炮突然安静下来。那是在提示格鲁曼F4F野猫式战斗机开始对未完工的机场跑道进行首轮低空扫射，这些战斗机在黎明前便已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红色曳光弹从0.50英寸机枪中射出，落下后又反弹回空中，形成发光的浅“V”形。^[57]“胡蜂号”第71战斗机中队的16架格鲁曼战斗机从恩格拉南部的海湾上低空飞过，用0.50英寸机枪把停泊在图拉吉岛和塔纳姆博格岛旁的水上飞机打得满是弹孔并燃烧起来。^[58]敌方的几架川西水上飞机和水上战斗机变成了水上地狱。^[59]掉头进行第二轮扫射时，第71战斗机中队摧毁了敌军的登陆艇、燃料驳船和机关炮台。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岸线上的指定目标投下了1 000磅重的炸弹。轰炸机俯冲投弹后重新拉升，向西返回航空母舰，此时巡洋舰和驱逐舰再次开火。

范德格里夫特和特纳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现场。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彩色发烟罐标出了登陆海滩的位置。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隆加河与特纳鲁河（Tenaru River）之间3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冒着一缕缕黑烟。舰炮和舰载机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任务：日军建筑物、兵营、无线电站、码头、营地、仓库和防空炮正在熊熊燃烧。岸上没有炮口在闪光，也看不见任何敌军部队。在空中侦察岛屿的巡航飞机报告敌方没有行动。连当地人似乎都逃到丛林里了。范德格里夫特及其参谋注意到了距离隆加河河口几英里远的高耸的奥斯汀山。他们手中的地图将它标记为海拔不确定的“草丘”。但是，它显然高出周围平原1 000多英尺。他们不得不收缩战线，将其排除在外。

登陆图拉吉岛的“H时”定在早晨8点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零时”定在其半小时后。6时30分，特纳传令放下登陆艇。伴随着穿过吊艇柱的链条刺耳的当啷声，登陆艇被放入海中。舵手们谨慎地驾船绕过战舰，等待着信号旗召唤他们返回来载人。低速运转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排放的尾气飘荡在海面上。还差几分钟到7点时，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沿吊货网下船。他们小心翼翼地抓住垂直的绳索（而不是水平的绳索，否则手指可能会被另一个人的靴子踩碎）。重型装备用快拆带捆绑，万一落水也不会沉下去。海军陆战队员踏上希金斯登陆艇平平的船底后会找地方坐下来。一旦满员，舵手就会驾船掉头离开。情况接近完美，水平如镜。运输舰两侧的吊货网都被放下，左右舷可以同时下船。没有翻船，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延误。在经过科罗岛犯错的闹剧之后，登陆作战的顺利程度令人惊喜——唐纳德·迪克森少校称之为“我见过的最熟练的行动之一”。[\[60\]](#)

上午7时41分，第一批登陆艇越过了出发线（位于两艘驱逐舰之间），全力前行。海军陆战队员蹲伏着，头低于船体边缘。激起的海水飞过两侧，也打到他们脸上。登陆艇尾部的美国小国旗在风中轻快地舞动着，噼啪作响。“文森斯号”重型巡洋舰上的一名海军士兵表示：“这看起来像是在纽波特举办的一场赛船比赛，我们的旗帜在冲向海滩的小

艇尾部飘扬着。这样的场面很激动人心，但敌人还是没有开炮或者用其他武器开火，我们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迟早敌人会反击的。”[\[61\]](#)驱逐舰继续用5英寸舰炮轰击海岸。随着第一批登陆艇冲上沙滩，炮火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从两舷下船，踏着海浪上了岸。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从库库姆村到特纳鲁河河口，海滩上和相邻的椰林中显然空无一人。一颗白色信号弹发射上天，表示登陆未遇抵抗。

当天早上的第三批和第四批登陆部队到达时，滩头平静得有些怪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枪响，但没有那种交战式的密集而持续的枪声。在后来抵达的船上，海军陆战队员悠闲地排成队，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船头，跃过拍岸的海浪，避免靴子被泡。士兵们在阴凉处休息、吸烟，或尝试用匕首、刺刀打开椰子。有几个人甚至脱掉外衣，只穿内衣跳入海浪里游泳。当地的小茅屋被海军后勤工作队征用，变成指挥所，钉在棕榈树上的指示牌告知货物处理人员应在何处堆放运来的设备和物资并加以分类。医疗帐篷支了起来，上面插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但到上午10时30分，唯一的伤员是一名年轻人，他在用大砍刀打开椰子时割到了手。[\[62\]](#)

“瞭望塔”行动登陆战，1942年8月7日



这似乎太容易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祥。日本人想把他们引入埋伏吗？

[1] 这段话可能是邦迪（Bundy）说的，见Stimson and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506。

- [2] Karsten, *Naval Aristocracy*, p.xiv.
- [3] 可以参见鲁思文·E.利比（Ruthven E.Libby）对此的精辟评论。Vice Admiral Ruthven E.Libby, USN,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4, pp.56-62.
- [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29.
- [5] MacArthur to Army Chief of Staff, May 23,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Box 38.
- [6] Trumbull, “Big Bombers Won.”
- [7] Mears, *Carrier Combat*, p.78.
- [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8.
- [9] Tom Lea, “Peleliu Landing,”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Vol.2: *Part II*, p.500.
- [10] Churchill to Roosevelt, June 13,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220.
- [11] “Sacrifice Will Win, Says Admiral King.”
- [12] Walter Muir Whitehill, “A Note on the Making of This Book,” in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649-50.
- [13]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p.69.
- [14] Ambrose, *Eisenhower*, p.141.
- [15] Entry dated January 20,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64.
- [16] Admiral Ernest J.King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 Defense of Island Bases in the Pacific,”April 6, 1942, FDR Safe Files, Box 4, George C.Marshall file.
- [17]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 18, 1942,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FDR correspondence file.
- [18] “Situation in South Pacific and Southwest Pacific Areas as of the end of May, 1942,”Commander in Chief, U.S.Fleet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memorandum dated May 12,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 [19] King,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arch 5, 1942,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FDR correspondence file.
- [20] COMINCH to CINCPAC 2303-2306, June 24,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602-3.
- [21] COMINCH to CINCPAC 1840, June 25, 1942, in *ibid.*, p.603.
- [22] COMSOPAC to CINCPAC 0015, June 26, 1942, in *ibid.*, p.604.
- [23] PESTILENCE Operation Plan, COMSOPAC File No.A 4-3/A16-3, Serial 0017,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July 1942,” Box 173; and COMSOPAC dispatches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487-596.

[24] “Interview of Captain M.B.Gardner, USN, Chief of Staff, ComAirSoPac,” January 13, 1943, Bureau of Aeronautics, pp.2-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4.

[25] D.J.Vellis, oral history, 记载于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89; and Huie, *Can Do!*, pp.93-95.

[26] 匡西特活动房屋（Quonset hut），用金属材料建造的小型建筑物，顶部呈圆拱形，一般用作兵营，得名于最初的建造地。——编者注

[27] “Callaghan’s Report of Conference” on *Saratoga*, July 28,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4.

[2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05.

[29]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p.2-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30]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11.

[31] COMINCH to CINCPAC 2303-2306, June 24,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602-3.

[32] “Joint Directive for Offensive Operations in the Southwest Pacific Area,” July 2,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folder labeled “Memos to Gen.Marshall, 15 Jan.42-1 Sept.44.”

[33] “COMSWPACFOR to COMINCH, etc., July 9, 1942,” in COMSOPAC, “Top Secret Incoming and Outgoing Dispatches, 1942-45,” in NARA, RG 38: 0313, Container 1.

[34] COMINCH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July 10,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folder labeled “Memos to Gen.Marshall, 15 Jan.42-1 Sept.44.”

[35] COMINCH to COMSOPAC 2100, July 10,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616.

[36]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30.

[37]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21.

[38]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27.

[39] Lt.Chester M.Stearns, interview in November 1943 on board *Baltimore*, in Morison’s Notebook, Pacific XII 194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40]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41]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 oral history, in *ibid*.

- [42] Mears, *Carrier Combat*, p.100.
- [4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0.
- [4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45.
- [45] Details to follow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August 1942," Box 173.
- [46] Roland N.Smoo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92.
- [47] "Annex King to Operation Plan No.A3-42," p.3,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July 1942," Box 173; also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p.51-52.
- [48] 1码≈0.9米。——编者注
- [49] "Vice Admiral Crutchley's Report on Operation Watchtower," September 3,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50] Merillat, *Island*, p.28.
- [51] Roland N.Smoo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93.
- [52]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15.
- [53]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2.
- [54]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162.
- [55]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31.
- [56]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3.
- [57]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also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36.
- [58] 很多历史作品将摧毁川西水上飞机的成就归功于“圣胡安号”的炮击，然而指挥火力支援大队的克拉奇利将军认为这应归功于F4F战斗机的扫射。“Vice Admiral Crutchley's Report on Operation Watchtower,” September 3, 1942, pp.9-10,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59] “大黄蜂号”航空大队队长的飞机拍摄的底片证实了第71战斗机中队的说法。Wasp Action Report, "Capture of the Tulagi-Guadalcanal Area, 7-8 August 1942," dated August 14, 1942,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78.
- [60]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 [61] Pharmacist Frederick A.Moody, USN, oral history, recorded at the Navy Department, April 21, 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 [62]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44.

第二章

图拉吉岛上的日军部队在舰炮的轰鸣声中惊醒，完全猝不及防。水上飞机基地的指挥官宫崎重敏大佐向拉包尔发出了第一封告急电报。第一批美军登陆艇在代号为“蓝滩”的地方登陆时，他已率领自己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撤入岛中央的深山密林里。在此之前，他发送了最后一条表露决心的消息：“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陛下保佑。”^[1]

位于西北方向650英里处的拉包尔，是日军第八舰队的总部，由新上任的海军中将三川军一指挥。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也驻扎在此。这个陆基航空指挥部拥有约90架作战飞机，包括轰炸机、侦察机和零式战斗机。拉包尔有两个现役机场以及两个备用机场，它是日本在该地区的航空力量中心，是卡维恩、莱城、萨拉马瓦、布因、布卡等地的小型辅助机场的屏障。这里有一个绝佳的天然海港，以及一个活跃的火山口，直径超过1英里。然而，日本守军并不喜欢这里。这个小城天气酷热，空中到处布满灰尘，发展水平落后，频受地震困扰，空中弥漫着从塔乌鲁火山口喷出的浮石和浅黑色灰烬。灰烬堆积形成壮观的黑色锥体，成为该地南部的特色景观。三川中将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狭小破旧的殖民建筑中。参加此次作战的军人驻扎在简陋的营房里，每天几乎只能吃大米，喝味噌汤，在露天采矿场解决大小便。据一名驻地军官所说，拉包尔最好的地方是日本人在塔乌鲁火山底部的温泉上建起的澡堂。没有什么比洗个热水澡更能让日本军人精神抖擞了。

一收到美军进攻所罗门群岛的消息，山田定义少将就下令袭击美国舰队。27架双引擎G4M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本来已加满燃油，挂好武器，准备袭击盟军在新几内亚岛的拉比机场，山田少将却改派这些战

机前往图拉吉岛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空域，而且要马上起飞，不得延误。由于战机有可能在陆地上遇袭被毁，他甚至不允许轰炸机重新挂载空投鱼雷，尽管这种鱼雷对付军舰比地面炸弹更有效。

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看到作战指令时，心里没底，犯起了嘀咕。他们的单座战斗机还从来没有执行过距离如此长的作战任务，飞行650英里之后返程。飞行队的队长告诉队员们，必须把节省燃料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他们会携带机腹副油箱，而这样会削弱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的战斗力，所以遇到敌人后绝不可恋战。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

上午10点（瓜达尔卡纳尔岛时间）前不久，G4M大型轰炸机轰鸣着从甲板跑道上起飞，几分钟后零式战斗机也全部升空。45架战机排成“箭头”队形，轰炸机叠成3个“品”字形编队，两侧紧贴着零式机群。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它们来到布干维尔岛上空。这里有两个勇敢的海岸警卫队员，他们早已安全撤入丛林深处。杰克·里德隐蔽在北部丛林山丘事先准备好的观测点中。保罗·梅森则按命令驻扎在布干维尔岛最南端附近一个名叫马拉比塔山（Malabita Hill）的偏远隐蔽处。为“瞭望塔”行动做准备时，为避免使用暗码造成延误，他们两个人得到指示，一看到敌机的影子就马上用明文语音告知对方。

上午11点前不久，梅森听到头顶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透过树丛缝隙往上看，他发现了一队日军轰炸机。他数了一下，一共24架。于是他立即报告：“来自STO，有24架轰炸机朝你们的方向去了。”^[2]这个报告在莫尔斯比港被记录下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然后迅速传往珍珠港，最后转发给了执行“瞭望塔”行动的特混舰队。

尽管消息传播路线迂回复杂，梅森的消息还是只花了30分钟就传到了“萨拉托加号”和“麦考利号”上。从布干维尔岛飞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程达到两个小时以上，所以弗莱彻和特纳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安排和部署。特纳指挥舰队四下散开，规避敌机，同时命令舰载机冲出甲板，起飞迎敌。

即使得到了充分的预警，弗莱彻也面临着艰巨的后勤方面的问题。他的战斗机必须保护两个相隔60英里到75英里的特混舰队，这段距离需要花费它们3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空战会消耗大量燃料，迫使它们尽早返回母舰。但是一旦飞机返航，清理飞行甲板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必须保证飞机能够安全降落和补充燃料。当日高强度的飞行任务给三个飞行甲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日军败于中途岛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下午1时15分，当日本机群靠近萨沃湾时，进入战斗位置来保护两栖舰队的只有8架野猫式战斗机。它们在不透明的云层之下，距离地面1.2万英尺。日方的G4M轰炸机已从1.6万英尺的高度接近美军，处于云层上方，因此没法看见野猫式战斗机。而美军的野猫式战斗机却收到了雷达发来的警告。

突然，轰炸机进行小角度俯冲，穿过云层。“萨拉托加号”的一支F4F战斗机分队的指挥官詹姆斯·J.萨瑟兰上尉在发现敌军后，用无线电广播下令出击：“有3队水平轰炸机，每队9架，前往运输舰方向，正在经过萨沃湾。……小伙子们，干掉它们。”^[3]萨瑟兰降低左侧机翼，在距敌500码时向最近的日军战机射出几梭子弹。他加大攻击力度，让一架G4M轰炸机起火并坠落。但几秒之后，零式战斗机穿过云层，透过瞄准镜看到三架野猫式战斗机。两架野猫式战斗机旋转着掉入海中，其他战斗机被迫俯冲逃命。

在云层下方看到美军舰队的阵容后，日本飞行员大吃一惊。轰炸机继续向东行进，下降到1万英尺的高空，在高速驶离隆加角的XRAY运输大队上方投放了炸弹。高射炮弹喷出的黑烟让天空乌黑一片，日机队形却丝毫未乱。炸弹倾泻而下，形成一道斜向的轨迹。美舰舵手冷静地让战舰避开了它们。每颗炸弹都沉入了隆加角附近的海域，没有伤到任何舰船。G4M编队向西折返，长途飞行回到了拉包尔。^[4]

激烈的空战继续在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西部的上空进行。在这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有两人是日本海军里最强悍的王牌飞行员：一个是西泽广义，他最终被认定击落敌机87架，这样的成就让他位居日本

王牌飞行员之首；另一个是坂井三郎，他在恶战中幸存，并声称击落敌机60架左右。（坂井写过一本引人入胜且可信的战后回忆录《天空的武士》，并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成英文。）萨瑟兰将其中一架G4M轰炸机击落后，开始螺旋式俯冲，来避开两架零式战斗机的追击。约瑟夫·戴利上尉驾驶的飞机被7.7毫米口径的机枪扫成了筛子，失去控制，开始翻转并向海面坠落。他的油箱起火了，火苗蹿进驾驶舱里。“我的衣服烧着了，裤子和上衣都起火了。除了熊熊大火，我什么都看不见。”^[5]戴利打开座舱盖，跳了下去。他在穿过7 000英尺高的云层后打开了降落伞。

直到这时坂井三郎才第一次见到F4F战斗机。他朝下方搜索僚机行踪，发现在1 500英尺下三架零式战斗机正在对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穷追不舍。萨瑟兰上尉做了一系列向左的翻滚动作，躲过了身后战机的一通射击。他不断迫使零式战斗机飞到他前面，然后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的机翼。坂井三郎俯冲下来加入战斗，当即发觉对手技术可畏：“我从来没见过哪架敌机行动如此迅速而优雅。”^[6]两个人都通过迅速的滚转和突然的减速来获得有利的攻击位置，两架飞机开始垂直旋转，一侧机翼指向大海，另一侧指向天空。强烈的重力作用把两个人牢牢钉在座位上，他们必须使劲伸着脖子，才能把头抬起来。在第五次垂直旋转后，萨瑟兰的飞机转了个弯，坂井抓住机会瞄准了他的翼尾。他写道：“我击中了他。进行这种机动时，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战斗机。”^[7]

坂井用7.7毫米机枪向萨瑟兰的座舱打了一长串子弹，但坚固的格鲁曼飞机仍然保持水平飞行，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坂井加大油门，跟野猫式战斗机并肩飞行。两人四目相对。坂井看到萨瑟兰伤势严重，肩膀和胸部血迹斑斑。萨瑟兰挥了挥手，坂井攥了攥拳头，示意对方继续战斗，“别像个活靶子似的”。^[8]但是萨瑟兰的机枪卡住了。他的战斗机有几百处中弹，机身和机翼上的铝皮已严重受损，坂井都能看到这架飞机的框架。萨瑟兰的仪表盘已完全损坏，座舱盖已裂开，无线电系统故

障，襟翼失灵，燃油倒灌入驾驶舱内。他受了11处伤，别无选择，只能弃机跳伞。坂井向他的机翼根部射了几发20毫米的子弹，飞机中弹起火。萨瑟兰解开安全带，打开座舱盖并跳了出来。他此时的高度刚好够他在撞到树梢之前打开降落伞。虽然受了重伤，脚面被7.7毫米的子弹打穿，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美军的防线之内。

随后坂井开始追击美军8架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编队，这些飞机来自“企业号”的第6轰炸机中队和第5侦察机中队。俯冲轰炸机保持队形，后座的机枪手集中火力，向从后方来袭的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和座舱射击。一串0.30英寸的子弹擦过坂井的头部，打瞎了他的右眼。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忍痛飞行了650英里，返回了拉包尔的机场并且安全着陆。坂井失去了右眼，但是在1944年返回了部队，继续作战。

9架爱知D3A2（盟军代号“瓦尔”）俯冲轰炸机组成的机队携带着60千克的炸弹，朝隆加角外的XRAY运输大队进行俯冲轰炸。一枚炸弹击中了“马格福德号”驱逐舰的上层建筑，造成舰上21人死亡，但对驱逐舰的损伤极小。野猫式战斗机追击撤退的俯冲轰炸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在经过激烈的空战和海上迫降后，“瓦尔”均受重创。18名机组成员中有12人战死。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的外面，第61特混舰队的士气无疑很高。一个驱逐舰上的军官看到第一批战机返回了“胡蜂号”：“兴奋的飞行员绕着我们盘旋，上下摆动机翼，从我们头顶上方驶过时挥手致意。”^[9]飞机回收之后，消息迅速传开——最初的轰炸和扫射已经让日军飞机在升空之前就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是航空母舰的空中行动才刚刚开始。在黎明与黄昏之间，3艘航母共出动了704架次的飞机，回收了686架次，这相当了不起。天亮之前很久战士们就起床了，睡眠惺忪地吃过早饭后，5点整便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此时所有人都快累瘫了。每个飞行细节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分钟。托马斯·C.金凯德将军是第16特混舰队的指挥官，他把那天的任务比作“铁路调度”。^[10]

飞机以破纪录的速度降落、添加燃料、补充弹药、填充氧气、重新排队和重新起飞。“胡蜂号”曾在16分钟内回收并重新出动一支由8架飞机组成的中队。^[11]意外也是难免的。有的战机坠入大海，有的战机冲出防撞路障，只能被推到海里。有的战机返回后找不到航母，只能迫降到海上。

航空大队成功守护了特纳的舰队，但这一天战斗机损失惨重，令人不免焦虑。有15架格鲁曼战斗机被击毁或坠海，此外还有5架严重受损。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锋的过程中（有些零式战斗机由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驾驶），野猫式战斗机的战损率达到了50%。卓越的速度和良好的机动性让零式战斗机锐不可当，这让美军忧心忡忡。格鲁曼战斗机需要在航母上方提供空中保护，还需要保卫特纳在萨沃湾的舰队；如果日本航母现身，它们还要为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护航。金凯德将军判断，每艘航母仅有18架战斗机是“远远不够的”，到1942年底，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数量将增加一倍。然而当时弗莱彻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量做到最好，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登陆后的第二天是否有足够的战斗机来保护舰队。

当天下午快到3点时，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来到岸上。希金斯登陆艇在翻滚的海浪里行进，满载着第1陆战师的高级军官，在下锚的运输舰、货船和穿梭其间的几十艘小船当中向“红滩”驶去。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后，注意到物资开始堆放在沙滩上。这里缺乏人手，无法妥当地安置这些物资。不过这个问题此时还不能解决，因为他最担心的是防御带的情况。部队正在沿海岸以及朝岛内推进，但敌人不知去向。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表示：“我甚至开始怀疑，在这个可恶的岛上，到底有没有日军。”^[12]

在西面，第5陆战团的先头部队第1营的士兵已经推进到伊鲁河畔，在河边停了下来。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乘坐吉普车从后面赶来，发现他

们“就像马上要遭遇整个日本国的军队一样谨慎前行”。^[13]他下令让士兵立即渡河。工兵临时搭起一座桥。他们利用一辆两栖装甲车把备用的木材堆放在河床上。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它完全可以承载吉普车和火炮的重量。

渡过伊鲁河之后，地形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士兵们手持弯刀，开出一条4英尺宽的路，足够让弹药车跟在后面，但他们很快又陷入一片巨大的红树林沼泽中。在东面，先遣部队沿着落满椰子的海滩行进，穿过废弃的当地村庄，向特纳鲁河进发。到了河边，他们也踟蹰不前。一直没有敌人抵抗，这十分蹊跷，甚至不是好兆头。迪克森少校觉得，士兵们“以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日本兵，而至今没有遇到，这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在给我们设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钻进去。’那种感觉很不舒服”。^[14]

敌人抛下了大量一流资产——两个发电站，装备有新的发电机以及充足的燃料；存有配件和零件的无线电站；五六万加仑^[15]汽油和柴油；一队军用卡车；两个能用的水泵；九台压路机；还有几吨水泥。^[16]各式各样不同口径的武器落入美军手中，包括两架能用的防空火炮。海军医疗兵缴获了一顶医疗帐篷，里面有优质的医疗用品包和净水药片。

在伊鲁河对岸的一个工人营地，詹姆斯·赫尔伯特中士看到一个熨斗落在一条军官的裤子上。衣服已经被熨斗烧透，粘在熨衣板上。吃了一半的饭菜被搁在餐桌上，“筷子或是撂在盘子旁边，或是在匆忙中掉在地毯上”。^[17]营地周围散落的东西是那天早上可怕炮击的明证——椰子树被炸成碎片，帐篷被高爆弹的碎片扯成碎布。

迪克森少校的部队率先到达机场附近的日军司令部。^[18]在军官们的所有物中，他们发现了一堆东西，简直是纪念品搜集者的宝藏——有军官的佩剑、奖章、斗篷和叠放整齐的白色制服。在附近的军需补给仓库里，有大量大米、鱼干、蟹肉罐头、啤酒、清酒、糖果和香烟。那里

部署了一名警卫，以防止抢劫。

位于库库姆的日本主港口由海岸警卫队的一个支队看管，后方梯队——工兵、汽车运输兵、无线电发报员——开始占领日军留下的棚屋和帐篷。到了8月7日黄昏，这个小村庄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寻常的岸边仓库。

在萨沃湾对面的图拉吉岛，海军陆战队也没遇到抵抗，顺利登陆。海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登陆前，“圣胡安号”巡洋舰向“蓝滩”的高地发射了大约800发5英寸的炮弹，在第一批登陆艇到达海滩的3分钟前才停止炮击。“蓝滩”完全没有日军守卫，日军似乎认为近岸的珊瑚礁足以让人放弃在此登陆的尝试。进攻者没费什么力气就越过了小岛狭长的中部地带，占领了小村落萨萨皮——但当他们转而向东前进时，抵抗变得猛烈起来。日军狙击手藏匿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海边能清晰地听到机枪的嗒嗒声，甚至在20英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也能听到。特文宁上校回忆说：“我们感觉被晾在一边了。”[\[19\]](#)

剩余的日军被困在该岛的东南角上，躲在隐蔽的防空洞和山洞里。爆破队奉命来摧毁这些阵地，但很多洞都由地下通道连接起来。图拉吉岛上的战斗残酷而血腥。钱伯斯少校回忆道：“你找到一个洞，想把日本人从里面炸出来，结果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里面的人已经爬到了另一个地方。”当晚，日本士兵“不断放冷枪，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向我们扔手榴弹，吹口哨，用的都是我们在小册子中读到过的手段，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没人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倒”。[\[20\]](#)

图拉吉岛以东是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这两个小岛由一条木堤道相连。大约有500名日本海军步兵（有时被称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些岛上，他们挖掘壕沟，布置炮兵阵地，展开了一场比其图拉吉岛上的战友遇到的更加惨烈的战斗。登陆前，海军舰炮夷平了大部分植被和建筑，但当海军陆战队在吉沃图岛东北海岸登陆时，守军突然现身，把入侵者困在红树林沼泽里。

海军陆战队在塔纳姆博格岛的海岸上部署了两辆坦克，其中一辆立刻就被摧毁了。乔治·基特里奇是“芝加哥号”上的一名炮长，他通过炮塔上的瞄准镜，看到一队日军爬上坦克，浇满汽油，然后点了火。舱门打开，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钻了出来。他立即被击倒了，死在敌人的枪托下。一名日本士兵向坦克里掷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了其余的士兵。基特里奇8英寸口径的舰炮开火了，顷刻之间，整个画面都不见了——坦克和敌军士兵都消失了，“只剩一层白烟和地上一个很大的洞”。^[21]有7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牺牲，直到8月8日中午美军才把这些岛屿完全拿下。

第一个晚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相对平静。四周零星的枪声使海军陆战队处于警备状态，但敌人未发动反攻。8日黎明时分，他们越来越确信日军根本没打算抵抗，于是大举向隆加平原挺进，占领了尚未完工的飞机跑道。部队一路没遇到什么人，除了几名手无寸铁的朝鲜工人，他们一看到海军陆战队就立马逃跑了。投降的人也交代了同样的事实：日军已经逃到西部。机场已将近完工，只剩中间几百英尺的地方还需要填平压实，再有一个星期就可以修好了。

日出时分，第61特混舰队以8节的速度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巡航。这一天又是刮着微弱的东风，这就要求特混舰队必须高速行进，以便在甲板上制造足够的风力，保证飞行作业进行。“胡蜂号”上的航空大队以搜索队形向北和向西飞行，而“萨拉托加号”的战机在甲板上待命，以防敌方航母战斗群在打击范围内出现。在遭受前一天的损失之后，弗莱彻将在战斗机数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作战。燃料限制迫使飞机频繁返回航母。防空计划开始出现问题，而无论如何，来自拉包尔的新一轮空袭都会出现。

海岸警卫队员杰克·里德藏在布干维尔岛北部的丛林山丘中，此刻正密切监视着布卡通道，这是布干维尔岛和布卡岛之间一条狭窄的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里德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尉，皮肤

黝黑，肌肉发达，胡须浓密，曾在南太平洋担任十多年的巡察官。他的观察哨就设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飞行路线上，仅此一点就使他成为海岸警卫网络的关键节点。日本兵正在大举追捕他。为了防止被抓，他不停地更换位置。8月8日，里德准备转移到一个叫波拉波拉（Porapora）的偏远村庄。在定期与VIG无线电站（位于莫尔斯比港）进行无线电登记后，他调到7兆周频率，希望能接收到零散的航空通信讯息。他立即就听到了美国航母飞行员喋喋不休的声音。没过多久，里德就推测出了大致的情况：美军已大举进攻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的岛屿。

他还在思考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当地侦察员听到头顶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通过丛林树冠的缝隙，他们看到一群挂载了鱼雷的G4M飞机就在上方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里德数了一下，一共24架。他立即返回远程无线电台，用英语明文向VIG发报：“轰炸机正朝东南方向飞去。”[\[22\]](#)

这是海岸警卫队员连续第二天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极为重要的预警。这种模式在所罗门群岛的战役中会不断出现。几乎每一天，日军都会从拉包尔向南发动空袭；而杰克·里德和保罗·梅森也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现空中南下的编队，并发出警报。里德所在的地点尤其适合这项工作，因为他在波拉波拉的有利位置可以将北边的布卡岛的全貌尽收眼底，东侧伸入“槽海”（所罗门群岛两排岛屿之间的水域）的航道和日军飞机必经的空域也一览无余。他在1943年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整个场景都展现在你面前，如同一幅巨大的镶嵌画，充满细节和壮丽的热带图景。”[\[23\]](#)此外，里德驻扎在波拉波拉的瞭望哨很难从陆地上接近，他还赢得了当地部落成员的信任，他们会提前提醒他有关日军搜索队的消息。他从未被日本人抓到过。

珍珠港收到里德的信息后转发给了美军指挥官，此时距离里德发出报告过了25分钟。这为特纳的运输舰和警戒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采取规避行动，也让航母舰载机有时间爬升至合适的高度，以便在敌机到达

时处于最佳攻击位置。

绿色机身上画着红太阳的日军双引擎轰炸机巧妙地接近了目标。这支轰炸机编队低空飞行，从北方逼近，穿过“必经水道”上空，隐藏在恩格拉群岛的雷达盲区中，然后在锡拉克海峡掉头，从东面发起攻击。美军的战斗机都在萨沃岛上空2.7万英尺处，距离太远，无法赶来反击。正午时分，“澳大利亚号”巡洋舰上的炮手发现了敌机。它们轰鸣着飞过来，只稍稍高出礁石一点，距离海面也就二三十英尺。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看到“扁平而不祥的形状潜行在水面上，从运输舰之间飞掠而过”。^[24]舰队转向调整，等待敌机到来。当敌机足够接近时，大型防空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中间夹杂着近距离武器的嗒嗒声。

除了五架飞机外，所有的日军飞机都爆炸、解体、侧翻或坠入海中。只有三架成功发射出鱼雷，其中只有一枚击中了目标——“贾维斯号”驱逐舰舰首附近被击中。（它勉强开走了，后来在第二次空袭中被击沉，全体船员遇难。）美军的格鲁曼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追击向西撤退的残余日机。一架受伤的G4M轰炸机撞上了运输舰“埃利奥特号”的上层甲板。这艘运输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已经下船，因此伤亡人数有限，但它整个舰身猛烈地燃烧起来，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两小时后，日军残余的战机飞过布干维尔岛北部。杰克·里德数了一下，只剩下8架。

大量的军火、设备和物资还没运到岸上。航空汽油要运给吉沃图岛1 000桶，运给瓜达尔卡纳尔岛1 500桶，还有小型武器、机枪弹药、航空润滑油、发动机零件、无线电设备、淡水过滤装置、蓄水罐、信号旗、手提信号灯、烟雾信号装置、双筒望远镜、打字机、铅笔和通信用纸。总共是所有部队60天的给养。^[25]板条箱和木桶随意堆在“红滩”上，海岸线上堆满了还未分类的补给品。无奈之下，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要求特纳暂停卸货行动。没有先进的港口设施可用，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先转移到小船上，由人徒手搬到海滩上，再分类转储。两天的空袭

几乎没对舰队造成任何损失，但不断出现的威胁迫使特纳的船队连续闪避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任何物资都无法卸载。

指挥官们已经预料到海滩上会出现物品堆积的状况，但是在匆忙规划和执行“瞭望塔”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用登陆艇代替货运驳船效果很差。海军的海滩勤务队队长既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经验——就算有经验，这里的劳动力也不够。特纳的作战计划明确规定“海滩勤务队队长要让附近的部队指挥官帮忙将补给从登陆地运到卸货地点，也要让战俘和掉队士兵来协助这项任务”。^[26]但是，没有人提前指定哪支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来执行这项任务，海军的船员人数也不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海滩上需要更多人手。

混乱引发了内部的争吵。根据原则和先例，海军陆战队坚持认为，如果滩头阵地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补给，应授权岸上部队指挥官立即停止卸货。特纳指责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阻碍”，而且没能为卸货提供劳动力。“海军陆战队必须执行这项工作，”他在写给指挥第7陆战团的上校的信中说，“船员不能既要驾驶小艇，操作绞盘，负责开船和管理枪炮，派人在海滩上指挥船舶交通，处理维修和疏散的任务，同时还要干卸货这样的琐事。”^[27]登陆艇上的海军船员对一些在“红滩”上既没参加战斗也没参与卸货工作的海军陆战队员冷嘲热讽。

范德格里夫特不愿将作战部队撤出防线，但特纳（计划让部队在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登陆）拒绝了他提出的由一个预备营来担任海滩苦力的请求。直到8月9日上午，这个问题才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补给物资卸到更远的海滩上。弹药、板条箱、炮弹和其他物资都堆放在棕榈树中间，等待海军陆战队方便时再整理。

三川将军是新任命的第八舰队司令，他在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多星期之前就已抵达拉包尔。日军在该战区的指挥安排不成体系，缺乏条理。海军第八基地部队负责新不列颠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守备

工作，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则负责所有的空中作业，但双方之间出现了分歧，基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力的合作。同样设在拉包尔的第十七军参谋部也深度参与了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作战行动。

似乎没人欢迎三川的第八舰队，因为拉包尔所有能用的行政大楼和兵营都已被占用。三川决定将大多数巡洋舰部署在新爱尔兰岛卡维恩的后方基地，因为那里不太容易受到盟军的空袭。三川头脑清晰，说话温和，在开战后的半年里，他一直是南云忠一的副手。他指挥过第一航空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见证了中途岛的悲剧，这让他以后的行动中心始终有个包袱。7月30日，他在拉包尔一所破败不堪的房屋上空升起军旗。这里连厕所都没有，距离他的驻地也很远，但是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8月7日，一听说美国进攻了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岛屿，三川立即召集海军水面部队进行反击。第十七军不愿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增援，因为陆军参谋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美军，所以三川召集了一支由315名步枪手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规模极小的部队，准备用运输舰将他们拉过去。（该船后来在新爱尔兰岛圣乔治角附近被美国S-38号潜艇击沉。）“鸟海号”驶入拉包尔，三川及其参谋上了船。下午2时30分，“鸟海号”与“天龙号”、“夕张号”以及驱逐舰“夕止号”一同出发。夜幕降临前不久，它们在圣乔治角与第六巡洋舰战队的“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和“古鹰号”会合了。[\[28\]](#)

三川打算在夜间突袭萨沃湾，摧毁美军抵抗力较弱的运输舰和货船。虽然三川手下的8艘船此前从未协同作战过，但每艘都装备精良，受过夜战训练。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就相信与美国交战需要采用“渐减作战”的方式。[\[29\]](#)他们认为，海战的胜负将取决于在日本南部海域发生的一场马汉式战列舰决战，所以在他们计划的“渐减作战”——包括潜艇攻击、空中攻击和夜间鱼雷攻击——行动中，日军要在美军战列舰向西跨越太平洋的途中击沉它们。高速的巡洋舰——驱逐舰部队（先遣部队）发动的夜间鱼雷攻击是“渐减作战”行

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施夜间鱼雷作战，日军花费了大量心血，研发武器装备，制定作战原则，并训练先遣部队。^[30]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日军拥有了一流的夜用光学测距仪和瞄准器，可以熟练地运用夜间照明战术（包括使用照明弹、探照灯和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信号弹），还招募了非常杰出的瞭望员，他们个个视力出众。此外，24英尺长、超过1吨重的93型“长矛”氧气鱼雷带有1 100磅重的高爆弹头，能以50节的速度行进2.4万码，以较慢的速度则可行进4.8万码。这些鱼雷会在即将到来的夜间作战行动中对盟军舰队造成可怕的威胁，并在随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给盟军舰队带来更多的损失。

三川认为简单的队形可以降低碰撞和混乱等风险，于是将7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排成两列。他把重型巡洋舰（包括旗舰“鸟海号”）置于队前，让驱逐舰处于队尾。

两个月前，三川目睹了四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遭到空袭而被全歼的场景，他知道自己突入萨沃岛至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的计划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军已知附近有两艘甚至更多的美军航空母舰，如果它们的机群在白天发现日军，就可能会轻松地摧毁日军战舰。三川要在夜幕的掩护下行驶最后200英里，然后在拂晓前向西逃跑，这样才能保证计划成功。但他无法保证不在“槽海”以北的地方被人发现。8月8日上午，盟军侦察机从其上空掠过，包括一架B-17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美国S-38号潜艇已经侦察到了三川的舰队，不过他对此一无所知。

下午4点经过舒瓦瑟尔岛后，三川向舰队发出信号，在最后一段距离内提速至24节。他计划经过萨沃岛南部，用舰炮和鱼雷攻击隆加角附近的运输舰，然后往北转向，攻击图拉吉岛附近的船只，最后撤往萨沃岛北部。^[31]他希望在日出以前至少撤退到“槽海”以北120英里的地方。

黄昏时分，克拉奇利将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进入萨沃岛北部和南部的夜间部署阵地。根据特纳的行动计划，它们分成了两队，每队以3艘

重型巡洋舰为主要力量，来守卫萨沃湾西侧的两个入口。“布卢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驱逐舰作为雷达哨舰，被部署在西部更远处。美军认为萨沃湾东侧的主要入口，即锡拉克海峡，不太可能是日军的袭击路线。那里由“霍巴特号”和“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守卫。

当晚8点，特纳将海上和岸上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召集到旗舰“麦考利号”上，召开深夜会议。克拉奇利将军本可以乘坐小船前往“麦考利号”，但他选择乘“澳大利亚号”旗舰驶出南部防线。离开时，他让“芝加哥号”的霍华德·D.博德舰长指挥南部分队。没有人通知北部分队的指挥官克拉奇利将军已经离开。

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特纳宣布了一些坏消息。他抄下了弗莱彻发给戈姆利的无线电报的内容，电文请求准许把航母撤回东部战区。戈姆利同意了。弗莱彻之前承诺在此停留两天（不到特纳认为的所需卸货时间的一半），现在又要提前8小时撤离。特纳心中不快，平日温文尔雅的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是如此。没有空中保护，特纳的运输舰和货船在8月9日极易受到日军战机的袭击。他深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在第二天日出时把剩下的舰船撤走。范德格里夫特坚称需要更多补给，特纳同意把货船留下来，再卸一天的货。但运输舰和军舰必须在黎明时分离开。

在会议上，特纳一直没有提及一支日本舰队正在逼近。他虽然收到了一些零零散散、前后矛盾的观察报告，但显然没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当天早上，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米尔恩湾起飞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发现了三川的部队，却报告了不同的航向。其中一人在航向100度的一支舰队里认出了两艘水上飞机供应舰。但他认错了，这误导了特纳。特纳以为敌舰会在西北方向约200英里远的圣伊莎贝尔岛外的瑞卡塔湾（Rekata Bay）抛锚，并在第二天发起水上飞机鱼雷攻击。他还错误地以为，圣埃斯皮里图岛基地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已经在当天下午彻底侦察了整个“槽海”。其实，由于天气恶劣，侦察飞行任务推迟了，而麦凯恩将军没有通知特纳侦察工作尚未完成。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特纳并未下令派克拉奇利的巡航水上飞机到该地区侦察。

由于缺少充分的沟通，侦察报告相互矛盾而且有错，特纳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应该出现的感觉，以为美军的防备工作已经安排妥当了，至少在敌军于次日黎明时分发动空袭之前是这样。

当晚漆黑无月，空气温暖潮湿，海上薄雾弥漫。萨沃岛的北部下着阵雨，所以北部和南部的警戒舰基本看不到对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中流传的消息称，一场大规模的海军反攻即将到来。凌晨1时40分左右，人们对此愈加深信不疑了。他们听到隆加角上空的片片云朵里传来小型飞机的嗡嗡声。第1陆战师指挥所的一名航空队军官正确地推断出这是一架巡航水上飞机，“而且不是自己人”。^[32]站在“昆西号”甲板上的查尔斯·P.克拉克上尉警告副舰长，这些身份不明的飞机一定是敌方派来的，因为盟军所有的巡航水上飞机都在傍晚时就回收了。但副舰长不同意他的看法，拒绝叫醒舰长塞缪尔·N.穆尔。克拉克后来表示，这种粗鲁的驳回行为“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紧张兮兮的小学生”。^[33]（根据后来海军瞭望员传来的报告，有人看到一架巡航机亮着航行灯，因此认定它并无敌意。）只有一艘船发出了警报，但显然没有传到特纳那里。

侦察机在隆加锚地上空发射了几枚带伞照明弹。它们慢慢地从云层中穿过，发出刺眼的黄绿色光，照亮了整支运输舰队。海军的无线电路中立即涌现出大量有误的敌情报告。有些人相信敌人正在登陆，不时还用轻型武器向美军巡逻艇开火。随后，飞机向西飞去，引擎声越来越微弱，照明弹缓缓落入海中。

警戒舰上的船员已经在一级警戒状态中待命48小时，全体都疲惫不已，这渐渐对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各种谣言和捕风捉影的敌情报告不断传播，相互矛盾且无中生有的目视消息逐渐消磨了士兵们的警惕性。巡洋舰一直排成固定的椭圆形，在萨沃岛南北的航道上往返。8月8日夜，警戒级别降至二级，上级允许撤掉一半人手，轮流值勤，让极度疲惫的士兵回去休息。盟军一艘巡洋舰的舰长写道：“在午夜班时段，敌

人随时都会到达这里。”然后就去睡了。^[34]整支舰队身心俱疲，对三川准备发动的奇袭毫无防备。

9日0时44分至0时54分之间，日军瞭望员首次报告说，目视观察到大约5英里外的“布卢号”驱逐舰。三川下令稍微向北改变航向，并降低纵队航速，以减少船头激起的波浪。几分钟后，瞭望员发现了“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这两艘军舰（它们本来应起到盟军舰队的“眼睛”的作用）正好到达各自巡逻线路的南北两端，与正在接近的敌人几乎处于最远的距离。它们的瞭望员没有发现三川的舰队，而船上的雷达装置显然被萨沃岛火山锥的雷达盲区干扰了。至少有十几门日军舰炮对准了“布卢号”驱逐舰，如果这艘小驱逐舰表露出任何发现敌人的迹象，它就会被炸飞。但头脑冷静的三川为了实现奇袭的效果，没有管它，任由它继续前行。

当日军的纵队进入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海峡时，三川下令将速度恢复为30节。“埃利奥特号”运输舰仍在燃烧，照亮了南方的地平线——火光虽然微弱，但足以暴露出南部分队的“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这两艘巡洋舰的轮廓。“乌海号”的瞭望员很快就能同时分辨出北部分队和南部分队的舰船。日本军舰仍未被发现。三川大胆的战术得到了显著的回报。1时31分，他发出信号：“所有军舰开火。”^[35]

“帕特森号”驱逐舰第一个发出警报。它通过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一种用于沟通战术的短程语音无线电通话）发出信号：“警告，警告，不明船只进入港口。”^[36]但是“长矛”鱼雷已经发射，在美军上空盘旋的日本巡航水上飞机直接向两艘巡洋舰投下照明弹，为炮手照明。1时44分，三川的军舰舷炮齐射，发出一轮8英寸和6英寸的毁灭性穿甲弹。“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当时航向310度、航速13节，完全被打蒙了。“堪培拉号”至少被20发炮弹和2枚鱼雷击中，整个船体都猛烈燃烧起来。船上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包括弗兰克·格廷舰长，都被直接落在舰桥和上层建筑上的炮弹击中身亡。“堪培拉号”失去了所有动力和电力，向右舷倾斜了10度，摇晃着停了下来。^[37]

“芝加哥号”紧挨着“堪培拉号”的船尾，赶紧转舵躲避。博德舰长下令向敌人的攻击方向发射照明弹，但炮弹不是发射失败就是哑弹。两枚鱼雷与“芝加哥号”擦身而过，但第三枚鱼雷击中了它，将它的右舷舰首炸裂了。一名枪炮长回忆道：“下层的甲板鼓到我脚下，通往军官舱室的炮塔门被炸飞了。……透过敞开的炮塔门，我看见水面上有两条与船身平行的铅笔线条状的磷光条纹。那是两枚未命中目标的鱼雷留下的尾迹。”^[38]“芝加哥号”丧失了战斗力。船体失去动力，巡航机上燃烧着的航空燃料溅满了干舷，前部舱室则在迅速淹没。博德舰长似乎没有尝试用无线电向特混舰队的其他舰船发出警报，这一过错使他后来备受谴责。

萨沃岛以南的战斗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三川的纵队以30节的速度向东疾驰，往北转向。在执行转弯的指令时，巡洋舰“天龙号”、“夕张号”和“古鹰号”驶离纵队，往偏西方向行进。虽然三川原本没有这么计划，但这个机动将日军舰队大致分成了两个平行的纵队，包围了美军北部分队的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当时它们正在“文森斯号”的率领下以315度的航向和10节的速度航行。这些舰艇上已经听到了南边传来的炮声，但船上的军官显然以为是友军的火力。“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和“文森斯号”的无线电室都抄录了“帕特森号”传出的警报，但“文森斯号”收到的消息没有传达到舰长那里，因为当时舰长正在驾驶室附近的应急舱里熟睡。士兵们跑向战斗岗位，但加速赶来的偷袭者的动作远远快于他们。

日本巡航机投下的照明弹穿过云层，让三艘美国巡洋舰在黄绿色的光芒中暴露无遗。几秒钟后，“鸟海号”的探照灯打在了这几艘巡洋舰的舰尾上。日军再一次发射了鱼雷，然后在第一枚鱼雷到达目标之前发射出一轮精准的毁灭性炮弹。三川手下的军官大前敏一注意到，“鸟海号”的探照灯具有指引纵队和发现目标的双重功能。他写道，旗舰就像是在用海员无声的语言“向随行的舰船高呼：‘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标！……再打击那个目标！……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

标！”[39]



“阿斯托里亚号”的舰长威廉·G.格林曼被叫醒了，可是他到达舰桥后的第一个命令是停火。他睡眠惺忪，以为是南部分队不知怎么撞上了北部分队，慌乱间开火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斯托里亚号”的后

部被两边发射的5英寸和8英寸的炮弹击中，从头到尾都受到了敌方25毫米机关炮的猛烈扫射。一枚重型炮弹击中了一号炮塔的炮座，炸毁了舰炮，还炸死了周围所有的士兵。另一枚炮弹击中了一号锅炉舱，还有一枚打中了舰船中部右舷的一个煤油箱，把燃烧的燃料溅到了井甲板上。根据损失报告，这艘船很快便“从前桅到机库后舱壁都陷入了熊熊火海。由于高温和浓烟，士兵们最终不得不放弃锅炉舱和轮机舱”。[\[40\]](#)舰桥上的转向控制失灵了，而且就算能转向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艘船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前部所有总水管都已破裂，无法向软管注水。

“昆西号”的水手正赶往自己的岗位，该舰后部两侧都遭到了严重的炮击。舰尾主甲板上的1.1英寸高射炮的炮座被击中数次。“昆西号”勇敢地还击，把一枚8英寸的炮弹打进了“乌海号”舰桥后面的作战指挥室。“乌海号”的一号炮塔被击中失效，固定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燃起大火。“昆西号”的舰长穆尔下令往右转向，避免与“文森斯号”相撞。但是，另一串毁灭性的炮击打断了传动索具，导致船舵卡住，因此这艘船只能原地打转，直到左舷锅炉舱附近被两枚鱼雷击中，完全失去推力。2时10分，“昆西号”的舰桥被两枚炮弹击中，穆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丧生。一名副枪炮长赶过来，“发现现场横尸遍地，只有三四个人还站着”。[\[41\]](#)

“昆西号”严重向左倾斜。海水透过弹孔灌入船内，船身倾侧，上层甲板很快就被海水淹没。幸存者将小艇和其他可漂浮物扔进海里，随后跳了下去。海军少校拜昂·比勒是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他跳入海中，游到百米开外，然后踩着水，转身去看最后一眼：“舰首几乎垂直着沉了下去，舰尾的螺旋桨和舵在火光照耀的天空中映出清晰的轮廓。”[\[42\]](#)

“文森斯号”的弗雷德里克·洛伊斯·里夫科尔舰长也被一名水手叫醒了，他同样犹豫是否要开火，生怕对方是友舰。在这艘船的信号员发出识别信号之前，已有无数炮弹击中舰体，可能多达74枚，由四五艘日本巡洋舰发出。最初的炮弹击中了舰桥、木工站、机库和天线箱。“文森斯号”的所有炮塔都被直接击中，或是被落在附近的炮弹炸毁，失去作

用。这些地方都燃起大火，机库里的飞机像火药桶一样着了起来。敌人的火力一刻也没有停歇。从舰首到舰尾，炮弹接连命中舰体。雪上加霜的是，“文森斯号”的左舷靠近前方弹药库的地方被两枚鱼雷击中。火势失去控制，沿着舰体蔓延，连环爆炸使大团大团的火焰冲向天空。美国海军船务局在后来发表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任何轻甲舰船〔战列舰之外的舰船〕都不可能经受得住这等打击。”^[43]里夫科尔在2时14分命令水手弃船，“文森斯号”在30分钟后沉没。

2时16分，日军舰队仍然以30节的速度航行，离开萨沃湾，沿“槽海”向西北方驶去。“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试图前来支援，却径直撞上了三川的舰队。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它遭到了五轮炮击，雷达、无线电设备和消防设备都被击毁了。^[44]舰体在吃水线附近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向右倾斜了20度。一场及时雨从天而降，把它遮挡在敌人的视线之外，否则它很可能已经被完全炸飞。

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萨沃湾里的XRAY和YOKE运输大队的船员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也透过薄雾看到了远方不断发出的闪光。探照灯光偶尔刺破夜空，到处都是曳光弹红色的痕迹，但他们无法根据所见所闻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我们能清楚地听到炮声，看到爆炸后天空中出现的亮光，”图拉吉岛上的一名目击者说，“但我们只从登陆艇上的水手那里听说海上正在激战。”^[45]在“麦考利号”上，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走到甲板上观战。旗舰上的水手们疯狂地欢呼，以为美国军舰正在给敌人好看。一切很快重归平静。只见远方有几个地方着火了，明显是几艘船正在燃烧。目前还不清楚受损的是盟友还是敌军。

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隆加角看到了这一幕。他知道敌军很可能会从海上反攻，但规模惊人的炮击还是让他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即使在陆地行动中，我们也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舰队……那些人造的电闪雷鸣般的动静，其恐怖性、威力和气势都让这一点变得无比

清晰而真实。这让人感到自己正听凭一种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力量摆布。我们只是众神之战中的走卒，而且我们清楚这一点。”^[46]

海中到处都是残骸和尸体。数百名弃船跳水的船员紧紧抓住小艇或漂浮物，挣扎求生。在里夫科尔下令弃船大约15分钟后，“文森斯号”的哈里·文森特上尉跳入海中，发现自己落在16名正在踩水的水手之间。身体好一些的水手解下救生带，把它们递给最需要的士兵。文森特回忆说：“我们可以先在不系救生带的情况下踩水30分钟，再用30分钟救生带，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循环。”^[47]炮击和沉船搅起海里的磷光物质，士兵们可以向下看到15英尺甚至20英尺深的地方。鲨鱼偶尔在他们脚下打转，但没人受到攻击。同样来自“文森斯号”的弗雷德·穆迪也为同船的伙伴感到自豪。“那些孩子即使受伤了，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为自己呼救。每个人似乎都想帮助别人。在我印象里就是这样。那晚剩下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48]他们以这种方式浮在水面上，直到天亮以后“钱伯斯号”驱逐舰来到附近，放下吊货网救起他们。

三川选择高速向西北撤退，而不是返回萨沃湾与XRAY和YOKE运输大队交战。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对美国舰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还好这个将军没有如一些军官敦促的那样采取更激进的作战方案，否则特纳的舰队可能会被全歼。万一发生了那种情况，整个“瞭望塔”行动就会彻底失败，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也只能面临极其悲惨的后果。

三川的谨慎行事遭到了批评，尤其是遭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他后来为自己的决定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之前的错误报告使他相信，日军在8月7日和8日的空袭中摧毁了美军的大部分运输舰队，所以他没想到能再遇到大量的作战目标。他的纵队一直高速行进，编队早已混乱。把它们重新编队然后冲入萨沃湾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知道弗莱彻的航母已经向东撤退，从而不会构成威

胁。

到当时为止，他的赌博已经赢了。他认为，如果再次发动攻击，他的舰队将面临航空母舰发起的空袭，而除了高射炮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防御措施，这会给他招致不久之前在中途岛目睹的同样灾难。二战结束后，这名将军承认，如果他选择不同的做法，可能会取得惊人的胜利，但他坚称，他只能根据当时所知的信息采取行动：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运输舰对于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立足至关重要，知道我们的陆军无法将美军赶出所罗门群岛，知道美军的航母特混舰队并未处于能够攻击我方舰队的位置上，自然可以轻巧地说，有些选择是更明智的。但我今天仍然跟当时一样认为，根据当时所知道的信息，我的决定并无错误。 [\[49\]](#)

“堪培拉号”燃烧着，严重倾斜，随浪颠簸。幸存的船员仍在英勇地抢救那艘船，但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帕特森号”来到近旁，船员们拿着水管冲过去协助灭火，但“堪培拉号”甲板上成箱的弹药不时发生爆炸，这艘驱逐舰不得不避开。“堪培拉号”的燃料倾倒在甲板上，舰上剩余的鱼雷都被丢入海中，弹药库也进水了。船体向右倾斜得越来越严重，火势越来越大。早上5点半，特纳发出消息说，舰队正准备从锡拉克海峡出发，如果“堪培拉号”无法安全航行，就必须炸毁它。船员们有序地弃船而去，他们或是直接跳到旁边驱逐舰的甲板上，或是跳进海里，随后通过吊货网爬上去。熊熊燃烧的“堪培拉号”并没有轻易地沉没。在“帕特森号”和“埃利奥特号”发射了263发5英寸的炮弹和4枚鱼雷后，它才在海浪中缓缓沉入海底。

“阿斯托里亚号”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凌晨2点刚过，船中部的上层甲板火势失控，格林曼舰长命令幸存者离开舰桥和艏楼，来到前甲板上。但舰长还不知道，副舰长已经把另一组幸存者安置在了船尾。两组船员都手拿水桶，设法阻止火势蔓延，但他们之间的甲板、机库和上层

建筑都在燃烧。水上飞机、救生艇、油漆间、军官起居室的床垫和家具，以及安装间的弹药和5英寸及1.1英寸炮弹起重机上的弹药，等等，都成了助燃物。凌晨3点半，一场受人欢迎的暴雨不期而至，但它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雨停后，火焰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拂晓前不久，“巴格利号”驱逐舰驶来，开始把人从舰首接过去。大火烧个不停，直到上午11点半一场爆炸在左舷吃水线的位置上撕开口子。海水涌进了“阿斯托里亚号”，它迅速朝左倒去。官兵们纵身跃入水中逃命。“阿斯托里亚号”翻了个底朝天，舰尾先沉了下去。正午刚过一刻钟，它就完全沉没了。[\[50\]](#)

在运输舰队这边，人们还不知道自己幸免于难，仍在欢呼雀跃。在日军舰队离开后，敌机继续在上空盘旋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图拉吉岛和邻近岛屿上投放了照明弹。显而易见，这些照明弹预示着将会有新一轮的攻击，至少看起来是如此。阵雨和薄雾导致能见度很低，难以认出识别信号。登陆艇和巡逻艇来来往往，情况显然不妙。很多船都险些发生碰撞。谣言和似是而非的敌情报告数量激增。瞭望员相信他们看到了潜望镜以及鱼雷的尾迹，发出警报，驱逐舰在萨沃湾（此时已被称为“铁底湾”）的中心处投放了成片的深水炸弹。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友军交火事件，但零星的开火一直持续到黎明。上一年12月7日经历过珍珠港一役的人，对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糟糕感受。

在海军陆战队中，人们纷纷传言说海军遭遇了一场惨败。随着黎明到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敌军已经脱离了战场，而美国舰队正仓促地通过锡拉克海峡。在西边，“堪培拉号”和“阿斯托里亚号”燃烧的船体仍在漂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站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滩上，看着混乱的场面，大声问道：“海军那边出什么事了？”一名参谋回答说：“将军，我相信海军的主力应该还没有上阵。”[\[51\]](#)

海军陆战队急需运输舰向海滩运送至关重要的物资和给养，但特纳决定让舰船从该地区撤离。他同意把几艘货船留到下午，但由于缺乏空中保护，其他舰船必须撤离。“红滩”仍堆满了没有分类的板条箱。舰队

的混乱状态——错误的敌情报告、得到空袭警报后的高速闪避、四处寻找母船的小艇——多次中断卸货任务。破晓后一个小时，隆加锚地上没有驳船闲着。必须把受伤的水手从受损的巡洋舰中抢救出来。在塔纳姆博格岛上，日军仍在顽强抵抗，必须把增援部队送到那里。“参宿四号”货船的航海日志中有如下记录：“成功抢滩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登陆的命令，因接到海滩上的命令而停止卸货，起航落锚，出海以避开敌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分散和召回船只，派小艇协助其他舰船卸货。”^[52]

与此同时，范德格里夫特不得不加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以抵御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攻。一份情报警告说，日军侵略部队正在拉包尔集结，预计将在4天内到达。修建防御工事需要人力，于是又抽走了一些卸货人员。特纳拒绝了范德格里夫特让第2陆战团增援1 400名官兵的请求，他坚持让这支部队继续作为预备队，认为有可能要将其部署到恩代尼岛。

舰队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排成纵队驶出了锡拉克海峡。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垂头丧气地看着遭受重创的“芝加哥号”，它还在冒烟，舰首大部也被炸掉，最后驶过泰武角（Taivu Point）并消失了。到日落时，海面上已空无一物。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估计，在新西兰装载到运输舰上的所有板条箱中，只有不到一半被卸上岸。现在，岛上只剩下了这支海军陆战队，他们严重缺乏食品、弹药、重炮、高射炮、通信设备、铁丝网、燃料和备件等必需品。而他们仍然不知道日军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现身。

^[1]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38.

^[2] Lindsay, *Coast Watchers*, p.197.

^[3]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48.

^[4] Entry dated August 8, 1942, p.6, Commander Amphibious Force, Task Force 62, War Diary, August 1942,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173.

^[5] 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52.

- [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51.
- [7]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51.
- [8] Ibid., p.152.
- [9]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53.
- [10]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186.
- [11] Wasp Action Report, "Capture of the Tulagi-Guadalcanal Area, 7-8 August, 1942," p.5, dated August 14, 1942,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78.
- [12] Merillat, *Island*, p.33.
- [1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7.
- [14]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p.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8.
- [15] 1美制加仑≈3.8升。——编者注
- [16]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 pp.2-5,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also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8.
- [17]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56.
- [18] Donald Dickson,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pp.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8.
- [19]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73.
- [20] Justice Chambers, Major, USMC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p.11.
- [21] Kittredge, "Savo Island."
- [22] Lord, *Lonely Vigil*, p.41.
- [23]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22.
- [24]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52.
- [25] Operation Plan No.A3-42, Annex KING, in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July 1942," Box 173.
- [26] 1st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Order 2a-42, July 22, 1942, in *ibid.*
- [27] Turner to Colonel James W.Webb, August 20, 1942, Richmond K.Turner Papers,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Box 1.
- [28] "CruDiv 16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6098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29] Koda,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30] Koda,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31] "CruDiv 16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6098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32]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4.

[33] Charles Clark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January 13, 194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7.

[34] Smith, *Battle of Savo*, p.118.

[35] Dull,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87.

[36]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37.

[37] "To CTF-44, From Executive Officer, HMAS Canberra," CINCPAC File A16/Solomon Serial 62636,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38] Kittredge, "Savo Island."

[39] Toshikazu Ohmae, "The Battle of Savo Island,"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36.

[40]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1]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2] Lt.Cmdr.Bion B.Bierer to Mary Bierer, October 16, 1942, letter in possession of Bob Begin,quoted here with his permission.

[43]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44] "To CTF-62, From Comdesron 4," TOR 0610z, appended to Crutchley's report to Turner,CINCPAC File A16/Solomon Serial 62636,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45]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6.

[46]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62.

[47] Harry L.Vincent in "Veterans' Biographies," p.52.

[48] Pharmacist Frederick A.Moody, USN, p.15, oral history, recorded at the Navy Department, April 21,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20.

[49] Mikawa's remarks are excerpted in Toshikazu Ohmae, "Battle of Savo Island,"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44.

[50]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S.Navy,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U.S.S.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51]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69.

[52]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Battle of Savo Island," pp.43-44.

第三章

8月12日凌晨，金将军正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停驻的“无畏号”旗舰上熟睡，忽然被推醒了。此前从未打扰过长官睡觉的值勤官说：“将军，您必须看一下这个。情况不大妙。”^[1]

金将军带着难以置信的眼光，阅读了特纳的电报，了解到盟军损失了4艘巡洋舰，人员伤亡惨重，此外运输舰和货船已匆忙从铁底湾撤退。他要求将电文重译，徒劳地希望是译解电文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然而并没有差错。

这个消息让金备受打击。他多次说过，“瞭望塔”行动是他的计划，他也要对此负责。他完全清楚盟军的航运资源和空中力量都已经用到了极限，但他仍然坚持冒险进行这场远征。他此前否决了两位战区司令理由充分的反对意见。他后来说：“在我看来，那是太平洋战争最黑暗的一天。整场战争的前景变得难以预料了。”^[2]

第二天早晨，在海军部（位于宪法街）二层楼的办公室里，他仔细研究了特纳发来的进军路线图，试图搞清楚日本舰队为何能悄无声息地摸进铁底湾。他对前来拜访的哈里·W.希尔将军坦诚相告：“我实在是不明白。”^[3]人们难免会将这次失利和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珍珠港一役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但萨沃岛战役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后，是在己方控制的海域进行的，盟军官兵应该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都保持高度警惕。海军的荣誉、声望和尊严都有严重受损的风险。

罗斯福从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处得知了此事，他当时正在马里兰州的总统乡村度假地香格里拉（后更名为戴维营）休假。麦克雷驱

车把这份急件从华盛顿送到了这里。他回忆道：“总统闷闷不乐。对此他束手无策。”^[4]

金严令对新闻界封锁失败的消息。他派两名心腹军官阿瑟·J.赫伯恩将军和德威特·C.拉姆齐上校飞抵努美阿，调查失败的原因。然而，他并不打算缩小“瞭望塔”行动的规模。事实上，他立即着手加强戈姆利的力量。在8月13日呈交给总统的备忘录中，金概述了他的计划。他准备派“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和“华盛顿号”战列舰经巴拿马运河前往努美阿，另有一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护航。另外两艘巡洋舰将从英国前往美国东海岸，随时准备转移到太平洋。^[5]同一天，金请求马歇尔将军向该地区派遣更多的陆军航空部队，“不管其他地方有什么作战任务。……在我看来，驻扎在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地区的陆军航空兵必须立即得到大力增援”。^[6]尽管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亨利·阿诺德坚决反对将部下从欧洲或计划进攻北非的行动中调出，但马歇尔还是默许了。马歇尔很清楚，罗斯福总统愿意听取金的建议，而且总统本人也是希望这样做的。

当特纳的船尽力赶往努美阿时，被击沉的巡洋舰上的幸存者开始尝试还原整个事件的经过。每艘船上幸存的高级军官都必须提交一份行动报告，但是由于很多记录丢失，许多关键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不是阵亡就是伤残，他们不得不凭借记忆来撰写报告。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将受到严格的审查。值得称赞的是，克拉奇利将军没有遮遮掩掩，推卸责任。8月10日早晨，他写信给特纳：“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我们部署的军力足以击退敌军的水面攻击，而敌军发动水面攻击时，摧毁了我们的部队。”^[7]这是如何发生的？

赫伯恩和拉姆齐的调查将矛头对准了侦察机和侦察潜艇，因为它们未能发现三川军一的部队并提醒特混舰队有日军舰队靠近。盟军把该地区划分为两个战区，一个由戈姆利负责，另一个由麦克阿瑟负责。双方在两个战区的交界处存在通信障碍，三川军一8月8日至9日夜间的偷袭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几架盟军飞机在“槽海”北方很远处发现了日本舰

船，但是一些观察报告未能及时送到特纳手中，另一些报告则既不准确又不完整。一份报告称，日军舰队中有“水上飞机供应舰”，这干扰了特纳的判断——他以为日军肯定是前往圣伊莎贝尔岛的瑞卡塔湾，而且会在8月9日通过水上飞机发动鱼雷袭击。麦凯恩将军的PBY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延迟起飞，但是他没有及时通知特纳。特纳本可以派出特混舰队的巡逻机进行空中搜索，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致命的错误和坏运气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这场败局。“瞭望塔”行动中的任何一名海军高级指挥官都难辞其咎。赫伯恩的报告认为，此次战败不能归咎于单一的原因。“芝加哥号”舰长博德因为没有在遇袭时发出警报，成了唯一一个被正式处分的军官。在这场战役的五周之后，金将军在提交给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的报告中强调：“参与行动的大部分舰船和大多数海军将领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故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处于‘杀人或被杀’的境地。……他们只是还没学会如何保持警惕，以及应在何时保持警惕。”^[8]官兵们一直处于一级警戒状态，几乎全员值班了48个多小时。他们都是人，无法在不眠不休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履行职责。身心的疲惫击垮了特混舰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突袭。

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是，弗莱彻突然决定于8月8日下午撤回航母。赫伯恩的报告称这是导致灾难的“原因之一”。如果按照以前的计划，他一直待到8月9日上午，那么即使无法阻止萨沃岛的灾难，他的航空大队至少有可能发动反攻，追击三川军一撤退的纵队。弗莱彻的提前撤军一直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充满争议的决定之一，招致了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猛烈的批评，两个人似乎都把此事视为个人的叛变。一向性格温和的范德格里夫特在回忆录中用“逃跑”这种狠话来形容弗莱彻的撤军，直言不讳地讽刺了他的怯懦。^[9]颇具影响力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半官方的二战美国海军史中也抨击了弗莱彻的决定。

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不断地分析、审视和讨论这个话题。在此，我只能指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点，除此之外多说无益。与特纳完全相反，弗莱彻似乎愿意接受历史对他的评判。他不像特纳那样，对莫里森

撰写的关于“瞭望塔”行动的手稿加以评论并仔细地批注。他从未出版过任何回忆录。1947年退役后，弗莱彻回到了马里兰州一座农场，基本从历史争论的腥风血雨中抽身而出了。他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故意否认在7月26日“萨拉托加号”的作战计划会议上曾与特纳就航空母舰需要在作战区域停留多长时间的问题有过冲突。1947年，弗莱彻告诉《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对于会议上所做的各项安排，“特纳和他的参谋都很满意”，还说“我当时绝对没有和特纳发生任何冲突”。^[10]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的叙述，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在8月8日晚发给戈姆利的电报中，弗莱彻为他提出的撤退计划给出了两个理由：特混舰队燃油不足，而且在8月7日和8日，F4F战斗机严重受损。莫里森在撰写战史的第5卷，也就是讲述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取得了弗莱彻特混舰队每艘舰艇实际燃油状况的记录，这些记录表明弗莱彻的燃料状况远远谈不上不足。所有巡洋舰的燃料箱都至少是半满的。驱逐舰的燃料状况各不相同，但没有任何一艘燃油不足4万加仑，而驱逐舰每日消耗的燃油量为1.2万加仑到2.4万加仑。莫里森毫不客气地得出结论：“因此，假装这支部队燃料严重短缺是没用的……弗莱彻的撤军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他的部队完全可以留在原地，除了被晒伤，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11]约翰·B.伦德斯特罗姆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弗莱彻收到的关于警戒舰燃料状态的信息可能不完整或不准确。^[12]他只能依据彼时他了解的信息采取行动。不过话又说回来，特混舰队的司令有责任从手下那里获得正确的报告。

弗莱彻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战斗机在8月7日和8日的空战中严重受损，不能随意地无视。在登陆日当天，有一半的美国飞机被击毁。两天总共损失的战机达到21架，3艘航空母舰上还剩下78架野猫式战斗机。数量充裕的战斗机是弗莱彻军中最有价值的武器。只有它们能够稳妥地保卫特纳的舰队免遭敌军的空袭，但航母特混舰队还需要它们在整个白天执行巡逻任务。弗莱彻在“瞭望塔”行动的头两天指挥的空中作业是航空母舰战史上最繁忙的。设备严重损耗，机组人员精疲力竭，对于

这些情况，任何一个负责的特混舰队司令都不能无视。

争论的焦点在于航空母舰自身的价值。对于航母来说，最好的保护措施就是不断地移动，并随时借助天气来隐藏行踪。连续几天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的固定位置上，“被拴在同一个地方”，极易遭受空袭和潜艇的灾难性反击。挂载鱼雷的日本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能从拉包尔起飞，对弗莱彻的特混舰队实施有效的打击。如果弗莱彻的舰艇只能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活动，来自潜艇的威胁也会日益增加。三个月前，就在同一片水域，弗莱彻在珊瑚海战役中因空袭失去了“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他此前的旗舰“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战役中被击沉。1月份，他目前的旗舰“萨拉托加号”被日本潜艇的鱼雷击中，有四个月不能执行任务。弗莱彻当时还不知道，“萨拉托加号”将于8月31日再次被鱼雷击中，而刚刚进入这一战区的航空母舰“胡蜂号”将于9月中旬被潜艇击沉。“大黄蜂号”将于10月（在圣克鲁斯群岛战役）因空袭而沉没，到那时美国在太平洋上将只剩下一艘航空母舰（“企业号”）。

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瞭望塔”行动中，美国有可能损失一艘甚至多艘航空母舰，这一风险绝不可无视。但是，在规避这一风险，以及满足特纳所需的持续空中掩护之间，该如何平衡呢？自从1941年12月7日免于毁灭以来，这些航空母舰一直是美国海军进攻部队的主力。此时航空母舰非常稀缺，是贵重的资产（直到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建造完毕并列入舰队，此局面才得到改观）。弗莱彻正确地预见到，日本航空母舰迟早会来到所罗门群岛以南的海域。那时弗莱彻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航母之间的对决，就像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那样。我们必须在考虑所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来重新审视弗莱彻的撤军行动。

在“瞭望塔”行动期间，如何合理使用航空母舰是第一等的战略问题，应该提前予以解决。鉴于“瞭望塔”行动之计划和执行都如此匆忙，战前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也并不奇怪。特纳曾经希望用五天的时间卸下第1陆战师的物资，但是这次行动的计划明确规定，运输舰队将在三天内撤出，没人向特纳和海军陆战队承诺过航母的空中掩护会延长“两三

天”。金、尼米兹和戈姆利都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来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做出决定的责任落到了弗莱彻身上，戈姆利赋予了他行动的指挥权。7月26日来到“萨拉托加号”上参加会议的许多军官被弗莱彻和特纳之间明显的敌意吓了一跳。弗莱彻给他们的印象是，他对于这场战役缺乏信心。这次会议其实非常需要戈姆利出席，他假如当时在场，就能拍板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要想合理地认定责任，就必须考虑到“瞭望塔”行动的复杂性，以及不够明确的指挥安排，因此金本人要负一定的责任。

8月10日，日出时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努美阿中间的位置附近，第62特混舰队以“之”字形向东驶去，受损的“芝加哥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也努力跟着队伍。特纳的舰队中带着数百名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员，共有831人需要住院治疗。从黎明到黄昏，舰队共接到四次发现潜艇的报告，还有一起报告说有鱼雷的尾迹经过“麦考利号”的舰尾。驱逐舰在周围水域发动了深水炸弹攻击，整支特混舰队做了好几次急转弯。受损的“芝加哥号”落在后面，奉命在驱逐舰的保护下前往埃法特岛。没有任何舰艇遭受鱼雷攻击。8月15日，第62特混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安全抵达努美阿。伤员被用担架抬至医疗船上。所有伤员都会被送回澳大利亚或是美国本土。[\[13\]](#)

现在，第1陆战师只能寄希望于从海上持续获得充足的补给。8月15日，四艘老旧的平甲板“四烟囱”运输舰在隆加锚地下锚，开始卸载补给——航空燃油（400桶）、空投炸弹（300枚）、0.50英寸口径弹药、润滑油——还有海军陆战队第21航空大队的地勤人员。一旦跑道条件允许飞机降落，该大队就会飞过来。第二天下午，满载重型施工设备的“北落师门号”在三艘驱逐舰的保护下离开努美阿，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同一天，特纳命令麦凯恩“让所有快速运输舰都装满物资，派一个师去瓜达尔卡纳尔岛，另一个师去图拉吉岛”。[\[14\]](#)

有1.6万张嘴等着吃饭，范德格里夫特越来越关心食物储备。特纳

在8月9日的战时日志里写道：“运送了大量食物，够图拉吉岛用11天左右，够瓜达尔卡纳尔岛用36天左右。”^[15]然而，海军陆战队员并不认同那些数字——范德格里夫特8月15日在无线电报告中表示：“从目前的口粮和消耗情况来看，运到的口粮估计够瓜达尔卡纳尔岛用12天。恶劣的天气和装卸不当导致总量减少，实际大概只够10天用的。要把握一切机会向我部运输补给。”^[16]第1陆战师1943年提交的总报告表明，8月15日剩余的给养包括17天的常规口粮，3天的C型口粮^[17]，还有10天日军留下的口粮。这些数字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纸箱在雨中容易淋湿，里面的口粮很快就会变质，而且敌人留下的食物数量难以确定。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在所罗门群岛上的最初几个星期，海军陆战队员们一直饿着肚子。范德格里夫特于8月12日下令减少口粮分配，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图拉吉岛的散兵坑中的二等兵威廉·罗加尔每天得到一份C型口粮，“有时甚至没有”。他和战友在图拉吉岛海滨的仓库里搜寻日军的物资时，发现了几袋大麦。做成粥以后，看上去难吃极了，但他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光了。罗加尔回忆道，在运输舰上，百无聊赖的陆战队员总会聊到性，而此时大家的话题都和吃的有关，因为“待在这片丛林的几个星期里，饥饿压倒了一切！”^[18]

特纳继续请求弗莱彻为运输舰提供掩护，但是弗莱彻只顾保持特混舰队的队形，不停地移动。他预料到日本会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击战，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做此判断。情报图片一直很模糊，但是辅以海岸警卫队员的报告、空中侦察以及Ultra（侦听敌方无线电后破译出的情报）的片段，似乎可以确定日本的一支主力舰队将运动至所罗门群岛南部的海域。从布干维尔岛北部上空飞过的飞机证实，日军正在布卡机场以南修建新的飞机跑道。^[19]麦克阿瑟的B-17轰炸机几乎每天都飞过拉包尔和卡维恩并拍摄航空照片。8月12日至16日拍摄的照片显示，日本海军正在大规模增兵，而拉包尔的机场上似乎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日本人似乎还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建造了另一个机场，此地处于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方向约400英里处，因而可以从近得多的地方发

动空袭。新几内亚北海岸的莱城据报也有相当规模的空中活动。8月15日，日本飞机向分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端的部队空投了六包弹药和食物（四包落在了海军陆战队巡逻线内或附近，被盟军截获）。美国人仍然没有确定日本航母舰队的位置，但它们可能已经出海，正前往所罗门群岛。8月21日，弗莱彻告诉戈姆利，他认为“每晚派巡洋舰和驱逐舰去‘仙人掌’[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不明智的”，因为容易遭受潜艇攻击。^[20]最好是让它们留在海上，持续运动，为击退敌人海军的进攻做准备。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此时已经形成固定的日常模式。每天午后不久，日本轰炸机会飞过上空，轰炸岛屿，炸弹集中落在军事设施、防线、飞机跑道等上面。机场边缘的四架90毫米高射炮组成的炮台通常能阻止日军飞机降至2万英尺以下。不过，这些轰炸使得建设工程停滞，迫使驻扎在机场周围的各单位每天花数小时躲在紧急挖掘的狭长战壕和散兵坑内。零式战斗机时不时地进行低空扫射。即使在完成轰炸之后，双引擎轰炸机仍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上空慢悠悠地飞行。范德格里夫特麾下的军官正确地推断，这些日本飞机是在拍摄机场和海军陆战队防线里的武器设施。

这些空袭并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头顶上总是没有友军飞机出现，导致士气低落。既然日本能从拉包尔出动零式战斗机，那么美国战机为什么不能从更近的圣埃斯皮里图岛上赶来呢？对此，飞行员可以给出的解释是，较重的野猫式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够不到这里。瓜达尔卡纳尔岛需要有自己的空中力量，亨德森机场需要尽快建设完成。岛上尚未建成的这条飞机跑道取名为亨德森机场，是为了纪念洛夫顿·R.亨德森少校，他在中途岛带领海军轰炸机中队攻击敌方舰队时不幸阵亡。

8月18日上午11点，8架G4M“贝蒂”轰炸机突然出现在亨德森机场上空5000英尺处。雷达未能检测到它们。站在机场周围的士兵赶紧散开，躲进散兵坑和战壕。500磅的炸弹密集落在防空炮台周围，并沿着跑道落下，留下了17个需要由工兵填补的弹坑。由于飞行高度较低，这

些G4M轰炸机把自己暴露在防空炮台的火力范围内，有人看到其中一些轰炸机在朝西北方向返航时尾部冒烟了。

日军每天中午几乎都会发起空袭，入夜之后则会炮击——最初是潜艇发炮，后来（在8月16日）是天黑之后潜入铁底湾的驱逐舰开火。这些舰船通常会将日军的增援部队和物资运送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北部海岸。由于缺乏重型岸炮和空中掩护，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海军陆战队也无法对日本船只的行动进行干预。16日下午，在库库姆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数十名海军陆战队员眼睁睁地看着日本的驱逐舰在西边的海滩上卸下了约200名士兵。

几乎每晚都有一架水上飞机在海军陆战队营地上空盘旋，偶尔扔下几颗炸弹。美军士兵通常称其为“洗衣机查理”或“虱子路易”，这些夜间访客一般不会造成多大破坏。但是它们让海军陆战队员彻夜难眠，而这恐怕才是它们的目的。海军陆战队员说他们整晚都在“穿鞋”和“脱鞋”之间重复。^[21]第1陆战师的大部分人都把雨披铺在湿地上，和衣而眠。有些人试图搞个简陋的吊床，但每个睡觉的人都必须紧挨自己的散兵坑，这样一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只要翻个身就可以藏起来，他们管这种动作叫“瓜达尔卡纳尔抽搐”。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在踏上这座荒岛之前，几乎无人有过战斗经历，此时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们看来，丛林中防线以外的任何噪声都可能是敌人开始进攻的信号。在最初的一周里，位于防线附近的士兵浪费了很多弹药。第四天晚上，散兵坑位于机场两侧的海军陆战队员发生了一次“火拼”，双方互射了大量弹药，直到被军官制止。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天气潮湿闷热，蚊虫肆虐，士兵们饥肠辘辘，彻夜难眠，简直是疲惫不堪。最初的两周像两个月一样难熬。很快，疾病开始导致部队减员。第1陆战师的大部分士兵在这场行动中都感受过痢疾和疟疾之苦。海军陆战队员因疟疾病倒时，会被送到隆加角附近的医疗帐篷里，在那里和上百名患者躺在病床上，从头到脚都是大汗淋漓，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24小时或48小时后一般就退烧了，此时士兵就得穿上靴子回

到散兵坑里。慢性痢疾简直太普遍了，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住院治疗。罗加尔回忆说：“这太普遍、太糟糕了。如果谁大便比较干燥，简直可喜可贺。”^[22]

海军陆战队营地呈半圆形，北边是铁底湾，南边是丛林山麓。它大约5英里长（从东到西），2英里宽（从北到南）。这片区域基本上覆盖了战前利华兄弟公司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拥有的面积最大且最繁盛的三个椰子种植园（分别是库库姆、隆加和特纳鲁）。因此，这里是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发最好的部分——这倒不是说它已经发展得很好，但至少这里有一条尚可通行的泥路，连接着海滩、隆加角和亨德森机场。大部分土地上整整齐齐地种满了椰子树，为躲避白天敌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不得不考虑一些不太好的可能性。他认为最大的危险是，敌军可能会从海军陆战队8月7日占领的同一个海滩上发动大规模反登陆作战。他在隆加角后面布置了面向沙滩的防御圈，从特纳鲁河一直延伸到库库姆西南方的一个山丘上，约1 000米长。在令人透不过气的闷热中，士兵们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了散兵坑和战壕。起初他们没有沙袋和铁丝网，因为这些物品在8月9日海军撤退之前没能从船上卸下来。^[23]他们在这条防线上布置了机枪，可以扫射整个滩头。各作战单位开始派人将成包的物资运离海滩，转移到安全的补给仓库中。范德格里夫特还得考虑到，周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协同攻击；敌人可能会从东西方同时发起攻击。这种危险促使范德格里夫特将东翼从伊鲁河撤到了特纳鲁河。这缩小了营地的面积，使之更便于防御，不久之后事实就证明他的决定非常明智。

每天早晨，连长们都要聚在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开会。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深受炎热和压力的折磨，晚上还没法好好地睡觉。在回忆录中，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详细描绘了手下军官们的样子：他们坐在湿地上，啜着锡杯里的凉咖啡，听着“雨滴落在微弱的火苗上发出的滋滋声”。^[24]他们胡子拉碴，面容憔悴，浑身脏兮兮的。所有人的表情都

很坚毅，但是范德格里夫特能觉察到士气很低落。他们不知道海军是不是把他们抛在这里不管不问。有一次电台广播提到海军获颁勋章，大家都暗地里咒骂起来。

范德格里夫特赶紧发布了一系列乐观的声明来鼓舞士气。日本人在图拉吉岛负隅顽抗，被彻底击溃；巡逻队在防线之外没有遇到任何强大的敌军；机场修建工作进展迅速，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很快就会赶到。范德格里夫特每天中午巡视防线，把巡视工作安排在日军每日的空袭之前。他经常与部下一起拍照：“这是鼓舞士气的好办法，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嫌麻烦去拍这些照片，那么我显然就是准备在未来的岁月中好好欣赏它们。”^[25]

在海军陆战队面临的诸多困难中，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岛上敌军的情报。除了在营地外巡逻时与日军发生几次小规模遭遇战外，敌人至今没有露面。范德格里夫特并不知道“外面”有多少日军，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驻扎，装备如何，有无给养，以及他们预备用何种方式发起攻击。丛林的寂静给这些受过训练、适应快节奏和艰苦的两栖突击战的士兵带来了微妙的心理压力。在防线外巡逻时抓获的几名俘虏看起来像劳工而非士兵（陆战队员们称之为“白蚁”），关于岛上的日军，他们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

8月12日，一名日本海军准尉在马塔尼科河附近被抓获。该军官由第1陆战师的情报官弗兰克·盖特吉（Frank Goettge）中校审问。据他透露，河西岸日本军营的几百名掉队的士兵很可能愿意投降。另一份报告则提到一个敌军据点附近树起了“白旗”。盖特吉请求带领一组战斗巡逻队乘希金斯登陆艇沿海岸南下，在克鲁斯角附近登陆，寻找这些潜在的俘虏。范德格里夫特犹豫了一番，最后同意了。当晚，巡逻队在夜幕降临后登陆，立即遭到了伏击。这场伏击很快就变成了屠杀，而盖特吉是第一个送命的人。只有三名幸存者成功逃脱，回到了海军陆战队营地。一个增援连奉命外出寻找失踪的巡逻队，但是既没找到人也没找到尸体。此后，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报道，暗指日本人诈降，盖特吉受

了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件事是日本人的诡计，事发前一天看到的“白旗”可能是日军的“太阳旗”，只不过旗子上的太阳被遮住了。

8月14日，仿佛是为了回应海军陆战队对当地情报的迫切需求一般，海岸警卫队员兼前殖民地区长马丁·克莱门斯出现了。与海军陆战队员一起登陆的利华兄弟种植园主管查尔斯·威迪托当地人给住在山上的克莱门斯送去了亲笔信，力邀其出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成功登陆。在白天，重复一遍——白天，取道沃拉纳乌，沿着海滩到达伊鲁，进入营区。请岗哨直接带你到隆加的第1陆战师指挥所来找我。祝好。”^[26]黎明时分，克莱门斯便收拾好无线电设备，和当地的一队搬运工一起下山了。他迂回行进，小心躲避潜伏在丛林里的敌兵，在沃拉纳乌东部一个哨位与海军陆战队员接头了。海军陆战队员举起步枪，但是没有开火，之后他们拿出了香烟和巧克力棒热烈欢迎克莱门斯。这是几个月来这位苏格兰人头一次和人面对面讲英语，而非通过电台交流。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傍晚，克莱门斯洗完澡后被带到第1陆战师总部，引荐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他在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找了个箱子坐下来，讲述了三个月前日军登陆图拉吉岛以后他的活动情况。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描述，这名访客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棒小伙，体格健壮，似乎没有因自己选择的丛林流亡生活而受到任何坏的影响”。^[27]他穿着短裤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牛津便鞋。他显然很了解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当地人，还雇用当地人组建了一支巡逻队。范德格里夫特让他负责“本地管理和营外情报等所有事项”。这名苏格兰人将通过他雇用的本地侦察员给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提供重要的情报。那些当地人都是勇敢坚定的战士，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脱掉军装，混入当地人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交锋，岛上的人对这样的作战方式非常了解。他们能在丛林秘径上安静地快速前进，是令人生畏的游击战士。

日本海军似乎认为自己真的打垮了铁底湾的美军舰队。根据三川军

一的第八舰队战争日志可知，8月7日至9日，盟军在海战和空战中的损失总计为12艘巡洋舰（8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28]日军第五航空队估计的数字则提高到“20多艘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和其他类型的”舰船。^[29]然而，当这份浮夸的报告到达东京时，日本大本营显然认为估计的数字过于保守，于是一份新闻公报声称，盟军至少有28艘军舰和30艘运输舰被击沉。一个匿名的消息人士声称：“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实力已经被削弱为三流水平。”^[30]

过分夸大空战和海战的结果是太平洋战争中十分流行的现象。举个例子，在整场战争中，美国飞行员和潜艇乘员始终高估击沉敌军的舰只数量和总吨数。（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公布基于日军记录修订的数据时，与此前数据的差异引发了尴尬。）但是这些极不可信的估计常常误导日本军方领导人。如果日本海军和航空队已经彻底歼灭了入侵舰队，那么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部队一定装备不足，而且缺乏给养。要想除掉他们肯定毫不费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将军赶去日光的避暑行宫抚慰天皇，消其忧虑。他说，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被美军夺取“根本不值得陛下关注”。^[31]

拉包尔的日军司令部并不十分在意美国人进入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东部的战役更为重要，至少看起来是如此。第二十五航空战队正在那里忙着遏制拉比机场的盟军空中力量的发展，日本陆军则决心跨过欧文斯坦利岭，拿下莫尔斯比港这个尘土飞扬的殖民地前哨。^[32]日本的战前评估强调了莫尔斯比港作为“跳板”的重要性。那里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将确保日本“取得西南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33]从内陆进攻莫尔斯比的部队最终被英勇的澳大利亚军队借助天时地利打败了。但目前，这里仍然是日本地面部队的首要目标。

从一开始，日本人就严重低估了所罗门群岛南部岛屿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他们似乎被莫斯科的一名日本情报人员提交的报告误导了，那个情报人员与身份不明的苏联人交谈时听说了一些传言，将这些

传言整理成了报告。根据这名情报人员的报告，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是一次突击行动而不是长期的进攻，美军在该岛的兵力仅有2 000人左右。^[34]（范德格里夫特手下的实际人数是这一数字的5倍，而且铁底湾的其他各岛上还驻有6 000人。）8月中旬的航拍侦察也未能纠正这种错误的判断。美国人可能会炸毁机场及其配套设施，随后撤退。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关系。日军可以重新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及时建好机场。

不管怎样，日本联合舰队职位最高的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计划将大部分可用的海军部队投入一场代号为KA的反击行动。山本将军的主要目标——自从两个月前的中途岛战役大败之后毫无动摇——是引出并击毁美国的航空母舰。他知道美方的航空母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南部和东部海域。^[35] KA行动包含四个部分。4艘运兵船负责运送陆军和海军特别陆战队。运兵船将在海军少将田中赖三的指挥下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田中赖三的旗舰是轻型巡洋舰“神通号”。这些部队首先从日本的濑户内海起航，前往特鲁克群岛，然后于8月16日从那里出发。以“瑞鹤号”和“翔鹤号”航空母舰（外加“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航母特混舰队，将由经验丰富的南云忠一指挥，从北面前往所罗门群岛。这两艘大型航空母舰会留在队伍后面，等美国航空母舰现身才会发动攻击。南云忠一的航母由多艘水面舰艇层层护卫，包括装备先进的“比睿号”和“雾岛号”战列舰，还有“利根号”和“筑摩号”重型巡洋舰。另外两支主要由水面舰艇组成的舰队将作为特混舰队的后援部队：一支由海军少将阿部弘毅率领，包括2艘战列舰、3艘重型巡洋舰和1艘轻型巡洋舰；另一支是海军中将近藤信竹的先遣部队，包括6艘巡洋舰、水上飞机供应舰“千岁号”和各式驱逐舰。如果南云忠一将军能找到弗莱彻的航母，发动决战并摧毁之，整支日本舰队就可以进驻铁底湾，荡平美国海军所剩无几的抵抗部队，然后地面部队便可登陆该岛并重新占领机场。

范德格里夫特的第1工程营利用缴获的日本建筑设备和材料，加快

亨德森机场的施工，这些设备包括6辆压路机、2辆拖拉机和50辆手推车。跑道中间有一道约180英尺长的大沟有待填平。第1陆战师的一份报告的草稿写道：“用日本人的设备，像日本人那样在工地上工作。没有推土机、挖掘机和翻斗车。这工作看起来总也干不完。”^[36]

8月12日，海军PBY水陆两栖巡逻机在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欢呼声中降落于2 600英尺长的跑道上。乘客中有威廉·桑普森上尉，他是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麦凯恩将军亲自派来评估机场条件的。桑普森认为跑道足以起降战斗机，但对于轰炸机来说太短，地面也太软。一些高大的树木阻挡了东侧进场的线路，必须砍掉。泥泞的路面仍然没有铺上穿孔钢板，机场也没有滑行道和护坡（使停放的飞机免受爆炸波及的土墙）。亨德森机场从南方一眼就能让人发现，西侧距离营地只有300码，因而极易受到轻型火炮和狙击手的偷袭以及大规模的攻击。但是麦凯恩将尽快调配飞机入驻瓜达尔卡纳尔岛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即使这意味着要调拨圣埃斯皮里图岛和埃法特岛航空基地的飞机。他在一封经由桑普森送交范德格里夫特的亲笔信中写道：“最佳解决方案是让更多战斗机和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进驻机场。”^[37]他承诺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将于8月18日或8月19日到来。三天以后，第一批美国海军工程营队员带着一台“全功能挖掘机”抵达，这个大家伙可以一次从地上挖出大约10立方米的土。机场施工进度迅速加快，8月18日亨德森机场就可以接收所有类型的飞机了。

麦凯恩许诺的飞机归海军陆战队第23航空大队所有，包括两个F4F野猫式战斗机中队和两个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中队。^[38]他们从5月起就一直在瓦胡岛的埃瓦机场上训练。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队长是约翰·L.史密斯上尉，他刚从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调过来。他手下的大部分飞行员是少尉，近期没有接受飞行训练；有几个人还是6月中途岛战役的幸存者。截至当时的战斗经历给不了他们多少信心。海军陆战队第232轰炸机中队由刚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组成，其中很多人从未用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投掷过实弹。各中队里都是新手，这很危险，但是环境

不允许他们进行更多的训练。瓜达尔卡纳尔岛急需他们投入作战。尼米兹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在8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总司令部认为没有哪支中队是在经过充分训练的情况下上阵的。……但飞行员们接受的训练已足以让他们随时南下作战。”[\[39\]](#)

8月20日下午，海军陆战队的F4F战斗机和SBD轰炸机通过“长岛号”护航航空母舰的弹射器起飞。这艘航母是从珍珠港带着它们南下的，停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190英里处的海域，距离亨德森机场约有1小时的航程。起飞后15分钟左右，岛上的青山便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

“医生”洛伦·D.埃弗顿是大队中最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北方的平原在他眼前展开时，他被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静谧和美丽震撼到了。但是当他们抵达隆加上空时，他和僚机驾驶员都不喜欢亨德森机场的模样。这个机场已将高大的椰子树尽数除去，草地上只散落着一些树桩和数不尽的枯枝烂叶。此时跑道长度已有3 600英尺，足够用了，但是太过粗糙不平，碎石路上还有成片的泥浆。戴维·加尔万是海军陆战队一架SBD轰炸机上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他说当时看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草场，上面有很多的坑。……而且非常窄。飞入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后，你会看见一片椰子林，大概有四分之三英里长，随后你会看到一片开阔地：这是一小块草地，顺着从东南方向东流的特纳鲁河延伸。对面是丛林——浓密的丛林，挤满了大树和灌木”。[\[40\]](#)

下午4点左右，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人第一次听见远处嗡嗡作响的飞机发动机声。很多人凭直觉跑向战壕和散兵坑，但这些飞机是从东边飞过来的，而不是西边（敌军飞机经常从西边飞来）。防空炮手立刻紧张起来，但是没有开火。接着，嗡嗡声变成了轰鸣声，31架蓝色的舰载机从机场上方低空飞过，然后盘旋着等待降落。营地涌起喜悦的欢呼声，人们高举头盔，使劲挥舞。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一直抬着头笑，直到发现自己胡子上粘了干泥巴。看到美国的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就打心眼里觉得好。这就像一直独自待在屋里，

突然灯一下子亮了，家乡的朋友来了。”[\[41\]](#)

19架野猫式战斗机和12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依次降落。在停稳之前，大部分战机颠了几下。31架飞机的螺旋桨扬起阵阵沙砾，直到关闭发动机之后，尘土还在空中弥漫。随着飞机滑行停下，人们争着爬上机翼与飞行员握手拥抱，热情地问候他们。范德格里夫特激动不已，抓住海军陆战队第232轰炸机中队队长迪克·曼格鲁姆少校的手说：“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42\]](#)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没有任何事能像第一批飞机的到来一样鼓舞士气。人们将其称作“仙人掌航空队”，它们将保护部队免遭来自空中、海上和陆上的攻击。范德格里夫特从此可以侦察通往西北方向的航道。马丁·克莱门斯认为飞机的到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让我高兴不已”。[\[43\]](#)梅里尔·特文宁上校则认为，这是战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44\]](#)

爬出飞机后，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们得到了新配备的地勤人员的问候，他们是海军高级移动基地施工队的成员。这支队伍没有受过任何特殊训练就同飞机打交道，但他们是机械天才，很快就学会了必备的知识。他们的工作因亨德森机场简陋的条件变得更加复杂了。所有加油工作都是通过固定在汽油桶上的手动泵完成的。炸弹由卡车从椰子林中的弹药库运到机场，而SBD轰炸机的装弹工作必须手动完成。这项工作非常费力，让人疲惫不已。亨德森机场没有滑行道，没有护坡，也没有排水系统。砾石路面仍然没有铺好，跑道中段还是不平坦的绵软路面。舰载机的设计使它们能够承受在飞行甲板上降落时的严重冲击，它们也能承受在亨德森机场着陆的冲击。但是更精密的机型可能会遭受相当大的损耗。

有迹象表明，下午美军防线东翼会遭到袭击。前一天晚上，有人听到船只从西向东驶过铁底湾。几分钟后，有几道大浪卷到海岸上来。三个小时后，又有几道波浪袭来，还有人听见船只朝西返航的声音。不需

要进行严谨的推断就可以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可能已经在海军陆战队防线以东的某个地方登陆了。（一木清直大佐指挥的916人的支队在当晚11点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8月20日，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一整天都在铁底湾内自由航行，没有遇到麻烦，也没受到任何限制。克莱门斯早就收到当地人的报告，说东方有一支“规模不明”的日本军队正沿海岸行进。8月19日下午，他派当地警察雅各布·C.乌扎率领巡逻队悄悄越过美军防线，爬上亨德森机场南侧树木茂密的山脊，以期获得日军在该地区活动的情报。

范德格里夫特从战斗已经结束的图拉吉岛召唤援军，加强特纳鲁河右岸的守备工作。夜幕降临，海军陆战队员们紧张起来。防线外围丛林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当成敌军进攻的信号。午夜时分，水上飞机“洗衣机查理”照例到来，扔下了一枚炸弹，然后一直在高空嗡嗡地盘旋。凌晨2点，这架飞机在特纳鲁河河口的沙洲上方扔下一枚明亮的绿色照明弹。哨兵看到矮树丛中有人影移动。海军陆战队部署在河对岸的岗哨被撤回右岸的防线之内。

凌晨2点半，日军发起了第一轮“自杀式冲锋”——几百名日本兵呐喊着冲过沙嘴，攻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两军交火的前线响起了机枪、步枪和迫击炮的声音。这次冲锋被无情地击退了，大约有200名日军士兵挂在铁丝网上，被机枪活活射死。随后日军再次发起冲锋，这一次是冲向河北边的沙嘴，然而又被击退了，冲锋士兵伤亡惨重。日军河东的据点集中轻型迫击炮和步枪的火力，对着他们第一次发起冲锋的位置猛烈开火，但是美军预备队上来了，守住了防线。

日军阵地上不断呼喊的“万岁”声，与机枪开火以及迫击炮和大炮火力渐增的声音混杂在一起。0.50英寸口径的机枪不停地发射子弹。0.30英寸口径的步枪则发出尖厉的点射声。美军迫击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日军所用的25毫米机关炮声音更急促，音调也更高。对于可以通过声音辨别不同武器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美军的火力完全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克莱门斯在半英里外的机场旁边的情报部门观察

到了战况：“日军各队攻击时，曳光弹在空中乱飞，还有红色和白色的燃烧弹。我们能在粉红色的闪光中看到椰子树的轮廓。在那怪异的光下，弹壳在空中乱飞。一切看起来都还顺利，就是距离太近了，让人觉得非常危险。而且随着噪声越来越大，我有种诡异的感觉，觉得战斗越来越近。”^[45]刚刚赶到的飞行员还未适应新住所，就经历了这场让他们大开眼界的战斗。“医生”埃弗顿已经搬进一顶日式帐篷，用编织的稻草袋搭了一张床，有两层厚。他明明知道自己需要睡觉，却还是整夜坐着，一只手抓着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另一只手抓着头盔。他一直穿着鞋子。

在黎明前不久，第1陆战团第1营在L.B.克雷斯韦尔中校的带领下，奉命过河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该营过河后，在距河口1英里左右的地方将日军全部包围，切断了其退路。此时日军还剩下约500人。这些人被困在椰树林里，在8月21日上午被逐个击毙了。破晓时，F4F战斗机顺利升空，低空扫射敌军阵地。到傍晚时，过河作战的美军似乎很快就能彻底歼灭日军余部了。

当特纳鲁河之战接近尾声时，雅各布·C.乌扎爬回了美军的防线。他几乎因失血而死。他的巡逻队碰上了日军的一支侦察部队。乌扎受到严刑逼供，被吊到树上，受尽折磨。日军不断地用枪托打他的脸，他整个脸都肿了起来，满是血污；他被刺刀刺伤喉咙和胸膛，血流如注。但神奇的是，施刑者竟然没有捅破任何致命的血管。后来他设法咬断绳索，爬回了美军的防线。他被送到了机场医院，接受缝合治疗和静脉输血。12天后，乌扎康复出院，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他因表现英勇，受到两个国家的表彰：美国授予他银星勋章和功勋勋章，英国则授之以爵位并颁发大英帝国员佐勋章。

打完这场仗之后，海军陆战队员们很快了解到，敌人不会遵守“文明战争”的规则。受伤的日本士兵假装请求医疗救护，然后用枪打死闻声前来的医务兵。还有人装死，抓着手榴弹，希望和海军陆战队员同归于尽。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在写给海军陆战队司令的信中说：“我从未

听说过或目睹过这样的战斗，他们拒绝投降。伤者会一直等着，直到有人来检查战场，然后他会拉响手榴弹，跟过来的人同归于尽。接下来我们会怎样做你就可想而知了。”[\[46\]](#)

海军陆战队派了一个轻型坦克排来解决剩下的幸存者。他们用榴霰弹轰击成堆的死人和伤者，然后开着坦克车碾过尸体。傍晚，范德格里夫特在视察现场时说：“坦克后面看起来像绞肉机。”[\[47\]](#) 另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后来回忆说：“臭气熏天的日军尸体铺在地上——有烧死的，压死的，还有被碎尸的。不等这些尸体被埋葬，潮水便涌了上来，然后又退下去，于是这里露出一条胳膊，那里露出一个头，残肢断体散布在潮水重新冲洗过的沙滩上。”[\[48\]](#) 海军陆战队员以43人阵亡和57人受伤的代价，彻底歼灭了一本率领的800人的攻击部队。（该支队还剩下120人左右，作为后卫部队留在了东部。）

特纳鲁河之战带来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这场胜利以及两周前在图拉吉岛和吉沃图岛上发生的战斗终结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军的狂热战法的确让人紧张，但这鼓动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愚蠢的战术作战。

范德格里夫特不失时机地宣传了这场胜利。在遭受大规模攻击的情况下，驻守特纳鲁河的海军陆战队员“坚定而果敢地守住了自己的岗位。敌人攻击了一整夜，也未能突破防线。破晓时，第1陆战团从后方和侧翼包抄了敌人，切断其退路，将其从内陆赶向海洋，几乎全歼敌军，取得了可与陆战队悠久的军事传统相媲美的胜利”。[\[49\]](#)

在前两次航空母舰的对决中，弗兰克·杰克·弗莱彻都因及时获知了敌方的作战计划而占得先机。但此时他掌握的信息就没有那么多了。8月13日，日军再次更新海军密码，导致密码破译专家的进度倒退了好几周。无线电通信量分析表明，日本海军正从国内水域南下，朝特鲁克群岛的方向行进，这可能表明日军要前往所罗门群岛的南部。但是美军无

法确切掌握日本航空母舰的行踪。约瑟夫·罗奇福特中校是珍珠港密码破译部门的负责人，在美军取得中途岛战役胜利的行动中厥功至伟，他认为日军航空母舰停泊在濑户内海。[\[50\]](#)此时还没有数据能推翻这个推论，但如果南云忠一的舰队能好好地遵守无线电静默的纪律，那日军航母也可能已经南下到了特鲁克群岛，甚至进入了所罗门群岛海域。8月22日，戈姆利给弗莱彻发来电报：“有明显迹象表明，8月23日至26日，敌军将大举进攻‘仙人掌’。”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认为敌军舰队可能包括一两艘战列舰，15艘巡洋舰和大量驱逐舰：“可能有航空母舰，但并不确定。”[\[51\]](#)

8月9日撤军之后，弗莱彻受命为新喀里多尼亚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到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上航线提供空中掩护，并且帮忙向亨德森机场转运飞机。他平时很注意保持舰船燃油充足，以防发生紧急情况。得知日军在特纳鲁河发动了地面进攻后，弗莱彻在8月19日至20日晚间转而向北航行，赶往西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位于马莱塔岛的东侧。但是无线电情报反复断定日本航空母舰还在特鲁克群岛西北方1000多英里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日军最早可能会在8月25日发动进攻。弗莱彻以为自己有两天的加油时间，于是派“胡蜂号”及其警戒舰往南与加油船会合。结果“胡蜂号”没有及时赶回来参加即将到来的战役。

8月22日至23日，每个作战单位都试图找到对方，天上挤满了侦察机。麦凯恩将军的PBY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和B-17轰炸机从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执行长途侦察任务；来自亨德森机场的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也遍布空中；另有6架PBYPBY水上飞机从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出发。日军从拉包尔起飞的川西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则向南部和东部进行搜索。[\[52\]](#) 8月22日快到上午11点时，“企业号”雷达屏幕的西南方向上出现了光点。4架战斗机被派去查明情况。它们发现了一架川西飞机并迅速将其击落。

翌日清晨，一堆令人困惑的敌情报告扑面而来。来自恩代尼的PBYPBY水上飞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约300英里的布干维尔岛东部发现了由4

艘运输舰和4艘护航的驱逐舰组成的纵队。这是田中赖三的部队。田中意识到自己被侦察到了，担心自己的运输舰遭到毁灭性空袭，于是掉头向北航行。山本司令在“大和号”旗舰上通过无线电命令南云忠一派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重型巡洋舰“利根号”、驱逐舰“天津风号”和“时津风号”组成的“牵制部队”火速南下，并在次日凌晨攻击亨德森机场。田中部队登陆的预定日期推迟至8月25日。

得到PBY水上飞机的侦察报告后，弗莱彻让“萨拉托加号”出动了强大的攻击部队，派31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一起攻击田中的舰队，由“萨拉托加号”航空大队的队长哈里·D.费尔特中校领航。在途中，从亨德森机场赶来的另外9架SBD、1架TBF和13架战斗机加入了编队。飞行队钻进了能见度极低的白色浓雾中。费尔特让手下一字排开，在离海面仅有50英尺的高度上并肩飞行。除了下面的海和两边的飞机，大家什么也看不见。费尔特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这片浓雾中至少飞了一个小时，然后突然冲了出去，四下一看，大家竟然都在。真是守纪律！”[\[53\]](#)

田中为了躲开这次袭击，早就向北逃窜了，费尔特及其中队没有发现敌军舰队的任何踪迹。“萨拉托加号”上的舰载机跟随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返回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设法在微光中降落在了泥泞的跑道上。“萨拉托加号”上筋疲力尽的飞行员在座舱里过夜，准备黎明时起飞。

双方的航母舰队都找不到对方。它们相隔仅有300英里，只差一点就可进入空袭范围，但是谁也未能确定对方的位置。8月24日，从早上5时55分到6时30分，“企业号”上有23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当时这艘航母位于马莱塔岛以东200英里处，这些轰炸机以120度角呈扇形向西方和北方展开。恩代尼的PBY水上飞机也在天亮之前升空。从西方向瓜达尔卡纳尔岛集中的日军舰队仍然处在美军晨间搜索范围之外不远处，“企业号”上的舰载机无一报告发现目标。但是麦凯恩手下有一架PBY水上飞机于上午9时5分发现“龙骧号”航母舰队正朝南疾驶，半小时后另一架飞机发现了近藤信竹的重型水面舰船和阿部弘毅的舰队。

弗莱彻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局面。他是应该扑向“龙骧号”，还是应该做好准备，等待发现更大的航母？PBY提交的报告表明“龙骧号”位于图拉吉岛以北275英里处，从“萨拉托加号”所处的位置要长途飞行250英里左右——但是如果目标继续往南航行，它就会变得更近。费尔特的飞机于上午11点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返回母舰。他告诉弗莱彻，飞行员们累坏了，需要休息一下。他指出：“您继续接收情报，一旦那些家伙进入我们的有效打击范围，我们就出动。”^[54]弗莱彻同意了。上午11时38分，另一架PBY报告发现了“龙骧号”的舰队，这次更往南了。

面对着一堆相互矛盾而又不确定的信息，加之风险极高，弗莱彻犹豫了，不想在仓促之间做出决定。中午刚过，他派“企业号”的航空大队向西北方搜索250英里。下午1时15分，16架SBD和7架TBF飞离了航空母舰。第3鱼雷机中队的查理·杰特发现了“龙骧号”并立即发回敌情报告。杰特和僚机试图在1.2万英尺的高度进行水平轰炸攻击。从高空向高速移动的舰船投掷炸弹往往是白费力气，这次也没有例外。他们失手了，掉头返回美军特混舰队。

弗莱彻仍然没有得到关于敌军大型航空母舰的任何消息，他选择派预备队去干掉轻型航母“龙骧号”。费尔特中校带领28架SBD和8架TBF朝320度方位飞行。那时“龙骧号”已经派6架中岛B5N鱼雷轰炸机和15架零式战斗机前去攻击亨德森机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在该岛上空的混战中保住了机场，击落3架中岛B5N鱼雷机和3架零式战斗机，己方仅损失3架飞机。（拉包尔的轰炸机按计划应在同一时间到达目标位置，但是大雾天气迫使其返回了基地。）重要的是，“龙骧号”上的舰载机没有对亨德森机场周围的设施或机场本身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55]

下午3时36分，“萨拉托加号”的攻击部队迫近了“龙骧号”。“龙骧号”急忙右转，在整个攻击过程中不断地绕圈。轰炸机接连俯冲，对准“龙骧号”投放炸弹。有几枚炸弹与之擦身而过，但费尔特亲自投掷的三枚500磅炸弹中的第一枚落在了其飞行甲板上，一架TBF发射的鱼雷则击中了“龙骧号”的右舷。费尔特说：“这次打击行动就像一次演

习。”^[56]“龙骧号”很快就燃起大火，失去控制，同时仍在顺时针转圈。费尔特从空中看到它“喷出了黑烟，熄灭之后又冒出更大团的烟”。^[57]“龙骧号”的船员开始弃船，大部分人直接从两侧跳到海里。“天津风号”驱逐舰的舰长通过双筒望远镜看着燃烧的残骸。他回忆说：“它严重向右倾斜，露出红色的底部。海浪冲到了飞行甲板上。这一景象真是让人神伤。此时的‘龙骧号’看起来不再像一艘船，倒像个大火炉，被烧得千疮百孔，喷着可怕的红色火舌。”^[58]4个小时后，它沉入了海底。返航的舰载机无处降落，也只能坠入大海。

下午2时30分，来自“筑摩号”的侦察机也发现了美军的航空母舰。这架速度缓慢的水上飞机被“企业号”的战斗机击落了，但是在坠毁之前，飞行员已经设法将消息发给了南云忠一。“翔鹤号”航空母舰上的无线电测向装置精确测出了这架倒霉飞机的方位，也因此判断出了美军特混舰队的位置。此时，南云忠一占据了优势。对手尚未发现他，他却已经掌握了弗莱彻的确切位置，而且这个位置就在他的打击范围之内。下午2时55分，两轮大规模打击中的第一轮由“翔鹤号”和“瑞鹤号”发起，出动了27架爱知D3A2“瓦尔”轰炸机，由15架零式战斗机护航。

当这些飞机从航母甲板上起飞时，两架来自“企业号”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发现了日本航母，立即给弗莱彻发了电报。然而，美军的通信情况很糟糕：电波因静电干扰和飞行员的交谈而严重受阻，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弗莱彻才收到发现目标的报告。那两架SBD轰炸机俯冲下去，勇敢地轰击“翔鹤号”，但是没有击中。第一轮攻击的飞机起飞后约1小时，南云忠一发动了第二轮攻击，派出了27架爱知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

此时，弗莱彻面临着敌人的两轮俯冲轰炸机攻击，但他还没有做出回应。当敌情报告终于呈交给他时，他意识到他重复了三个半月前在珊瑚海战役中所犯的错误——集中力量攻打小型航空母舰，而敌人的大型航空母舰就在附近。他试图给已经起飞的飞机发出新的命令，但是再次因糟糕的通信失败了。“企业号”上的一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愁苦地

说：“战术上的较量还未开始，我们已在战略上输给敌人——珊瑚海的一幕再次上演了。”^[59]

下午4时32分，“企业号”上的雷达探测到了第一轮进犯的飞机，当时它们在西北方向88英里处。^[60]两个飞行甲板上的F4F战斗机迅速起飞，以最大速度攀升，1 200马力的普惠发动机全力运转。日军此时在战术方面处于上风。天空中云朵很多，给了日军飞机很好的掩护。^[61]进攻者知道F4F的爬升速度很慢，所以它们是从极高的高度接近的，距离海面1.8万英尺至2.4万英尺之间。在最初的雷达报告之后，美军的雷达屏幕足有17分钟毫无动静。4时49分，雷达屏幕上再次出现亮点。此时敌人的先锋离美军仅有44英里远了。美军战斗机被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引走，结果大多数日军俯冲轰炸机未受干扰就越过了警戒舰队。“企业号”的战斗机指挥官努力联系飞行员，而飞行员正在用无线电七嘴八舌地讲话：“看那个下去的家伙！”“比尔，你在哪里？”^[62]（“企业号”的舰长阿瑟·C.戴维斯后来说：“空中都是这些不必要的信息。尽管我无数次尝试让飞行员们安静下来，但没有几条消息能传递给战斗机，战斗机指挥官也收不到什么消息。”）^[63]

两艘航空母舰都全速航行，进行机动规避，并且朝东南方向迎风行驶，以便飞机起飞。甲板上所有的战斗机都奉命出击。飞行员得到的指示是，只要离开原地，空出场地，敌军的俯冲轰炸机从高空冲下来时不在甲板上就行，具体飞去哪里不重要。如果两艘航空母舰都被击沉，或是受损导致无法让飞机降落，他们可以飞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一升空，“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战斗机就接到了无线电指示，奉命向西北飞行，寻找敌军的两艘大型航空母“瑞鹤号”和“翔鹤号”。再过两个小时就天黑了，它们攻击敌人后安全返航的机会不是很大。

5时9分，“企业号”上的雷达图警告舰长：“敌方飞机就在我们上空！”^[64]防空炮手把头盔推到脑后，将木棉救生衣紧紧地系在脖子

上，仔细观察着天空。一开始，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那天下午安静得有点不可思议。一些黑色的斑点在高而稀薄的云层间移动。然后，一些斑点不动了，似乎固定在一个地方。渐渐地，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较大的斑点开始显露出形状——一个模糊的光斑，长着一对翅膀，翅膀下有固定起落架。太阳照得座舱顶盖闪闪发光，机身下面则还有一个较小的斑点（炸弹）。从未见识过俯冲式轰炸的亲历者对于敌人的飞机竟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俯冲下来感到很惊讶。这些轰炸机以70度角或更大的角度俯冲，大多数是冲着“企业号”的正左侧及其尾部而来的。用戴维斯舰长的话说：“这次袭击执行得很好，非常坚决。”[\[65\]](#)

东所罗门群岛战役，1942年8月24日



此时“企业号”正以27节的速度在大海上疾驶，戴维斯先是命令右满舵，然后左满舵，船先是急剧地向左倾斜，随即猛烈地向右倾斜。航母后面是延伸开来的长蛇形浪花，泛着泡沫。炮手们一齐开火，5英寸、1.1英寸和20毫米的炮弹形成了防空弹幕。黑色、棕色和白色的烟云在天上弥漫。一名亲历者说，“南达科他号”“像圣诞树一样被照亮了”，到

处都是火焰和浓烟，仿佛这艘战列舰自己在燃烧一般。周围的海里都是落下的防空炮弹碎片，海面上仿佛在下暴雨。几架俯冲轰炸机被击中解体。弗雷德·米尔斯少尉看到一架爱知轰炸机燃烧的残骸“像蝴蝶般飘落，轻轻降到水面上”。^[66]还有几架从5英寸炮弹的弹幕中穿过，机身后拖带着浓烟。但这是一次大规模攻击——戴维斯估计在连续4分钟的时间内，每7秒钟就有一架飞机飞来——许多飞机毫发无损地穿过了弹幕。

爱知轰炸机在“企业号”上空约1 000英尺处投放了炸弹。当飞行员从俯冲状态中拉起时，每一枚与机身分离的炸弹都以更大的角度落下。一些炸弹笔直地落下，就像导弹一样；也有一些翻滚着下落。有9枚炸弹落在左右舷外，接触到海面时引爆，激起的白色水柱砸在了飞行甲板上。两侧通道上的人都被海水浇透了。

下午5时14分，“企业号”第一次被击中。一枚1 000磅重的定时穿甲弹在舰尾升降机前方穿过飞行甲板，并继续穿过四层钢板和两层舱壁，在船体深处爆炸。这次爆炸导致升降机泵房和附近的军士长营房中的35人丧生，70多人受伤。一连串的爆炸使该区域所有的舱壁都被炸毁，右舷水线处被炸出了一个洞。^[67]爆炸的冲力导致机库甲板的后部向上凸起，形成了两英尺高的“驼峰”。舰尾的3号升降机被卡住，无法运转。但“企业号”一直在前进，速度不减。

在接下来的3分钟里，又出现了几枚近失弹，之后另一枚1 000磅的炸弹击中了右舷舰尾存放5英寸口径炮弹的弹药库。38人立刻毙命。爆炸引燃了军火库，火势在整个区域蔓延开来。“企业号”还在以27节的速度前进，却拖着一股不祥的黑烟。消防水龙朝着火焰喷水，受伤的人被带到了甲板上。船上的通风装置被打开，将所有易燃气体都释放了出来。不到两分钟后，第三枚炸弹落在2号升降机的前方。飞行甲板被炸出一个10英尺深的洞，2号升降机也无法使用了。摄影师助理马里昂·赖利当时站在舰岛上，在爆炸的那一刻按下了快门。这张“企业号”飞行甲板的中间冒出火焰和烟雾的照片将成为二战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在中途岛战役中，4艘日本航空母舰遭受了类似的攻击，并因二次爆炸和不可控制的火灾被毁。而在“企业号”上，损管措施迅速控制住了大火。这艘航母继续快速前进，跟上了特混舰队。防倾覆注水使其不再向右倾斜。士兵用木板修补飞行甲板上的洞。他们把身边所有能用的东西通通拿来，堵住了右舷的裂缝，使用的东西包括床垫、木条、铁丝网和木塞。在日军袭击之前起飞的“企业号”上的俯冲轰炸机大多飞到了亨德森机场。它们由于“企业号”受损而暂时无法返回。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它们将跟随“仙人掌航空队”作战。

日军返航的俯冲轰炸机机组成员报告称，他们已经摧毁了一艘美国航母，南云忠一开始庆祝这一战术上的胜利。失去小小的“龙骧号”没什么大不了的。“龙骧号”是联合舰队中最小的一艘航空母舰，它（按照安排）牺牲了自己，吸引了大部分美国航母舰载机的注意，从而保全了“翔鹤号”和“瑞鹤号”。然而，有关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的消息逐渐传来后，日军的情况又显得不妙了。他的舰队遭遇空袭，损失惨重。从瓜达尔卡纳尔岛飞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将一枚炸弹投到了他的旗舰“神通号”巡洋舰上，还击沉了“金龙丸”运输舰。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的B-17轰炸机击沉了驱逐舰“睦月号”。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能压制亨德森机场的空中力量，就无法在“槽海”内安全航行。就像发生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航母大战一样，这场战役以日本人被迫中止计划好的入侵而告终。第二天，也就是8月25日，山本将军取消了KA行动，召回了舰队。

东所罗门群岛战役，即太平洋战争中的第三次航母对决，就此结束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三个月前发生的珊瑚海之战，是一场混乱的、没有章法的遭遇战。弗莱彻一直被糟糕的无线电通信和相互矛盾的敌情报告干扰。不过，摧毁了“龙骧号”，救下了“企业号”，以仅仅损失25架飞机为代价击毁了敌人75架飞机，他仍然赢得了不大不小的战术性胜利。由于迫使日军运输舰队返航，从这一点来看美军还赢得了战略上

的胜利。“企业号”暂时的损失（要在珍珠港进行大修）因“大黄蜂号”赶到了南太平洋地区而得到了弥补。可能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给戈姆利赢得了时间——他得以扩大支援基地，加强空中力量，从北美运来更多的物资，改善范德格里夫特的补给状况。

“企业号”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2名军官和72名士兵丧生，6名军官和89名士兵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船体内部爆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多数死者当场毙命，但他们的尸体随后遭到了大火焚烧，无法确定个人身份。8月26日，随着“企业号”及其警戒舰南行至努美阿，人们将尸体集中起来，准备海葬。弗雷德·米尔斯对当时的情景久久难以忘怀：

大部分尸体是完整的。他们变黑了，但没有被烧焦或萎缩，它们看起来像人形铁质雕像，四肢光滑完整，头顶无发。他们的面目无法分辨，但他们的嘴几乎都呈现出一种干瘪的笑容，看起来像啮齿动物的表情。

他们的姿势看起来要么不可思议地正常，要么极其怪异。一个持枪者仍然坐在椅子上，用一条胳膊保持瞄准姿势。他看起来就像雕刻家做的雕像。他身材匀称，身上没有任何毛发。另一些人趴着或躺着。有两三个人脸朝上躺着，胳膊弯着，双手挡在脸前。有个人烧得不是很严重，但胸膛腐烂了，头向后仰，双手叠放在一起。[\[68\]](#)

这艘受损的航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不可能挨个给尸体执行海葬。在随军牧师的监督下，一位无法确定身份的海员按照传统接受了光荣的海葬。尸体被放在一块由美国国旗覆盖的木板上。一位号手吹起了“葬礼号”。海军陆战队员持枪敬礼。四名水手抬起木板，尸骨被投入浪涛。剩下的七十几个死者的遗骨被装进帆布袋里，配上金属零件以增加重量，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从船尾扔进了大海。

-
- [1]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221.
- [2]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221.
- [3]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2, p.267.
- [4] John L.McCrea,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0, pp.169-70.
- [5]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Via Admiral Leahy,” August 13, 1942, COMINCH File A163(1), FDR Map Room Papers.
- [6] “Reinforcement of Hawaii and South Pacific Areas,” Commander in Chief, U.S.Fleet to Chief of Staff, U.S.Army, memorandum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 [7] Crutchley to Turner, August 10, 1942, letter enclosure in COMSOPAC to CINCPAC, “Preliminary Report Watchtown Operation,” dated August 16,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8] COMINCH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4, 1942, “Investigation of the Loss of the U.S.S.VINCENNES, U.S.S.QUINCY, U.S.S.ASTORIA, and HMAS CANBERRA,” Richmond K.Turner Papers, Series 1, correspondence, Box 1.
- [9]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29.
- [10] Fletcher to Hanson Baldwin, July 9, 194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6.
- [11]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p.29-30, including footnote on p.30.
- [12] 伦德斯特罗姆展开分析了这一话题，谨慎地为弗莱彻进行了辩护，见Lundstrom,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pp.368-83。
- [13] NARA, RG 38, “SOPAC Amphibious Force Diary,” August 15, 1942, Box 173.
- [14] “War Diary, Amphibious Force SOPAC,” August 16, 1942 entry, in *ibid*.
- [15] “War Diary, Amphibious Force SOPAC,” August 9, 1942 entry, in *ibid*.
- [16] Vandegrift to Turner, 151015, COMSOPAC War Diary, quoted in Mer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source note, p.307.
- [17] C型口粮，美军的罐装战地口粮，一般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编者注
- [18]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58.
- [19] “MR 203, Japanese Naval Activities,”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64.
- [20] Fletcher to COMSOPAC to CTF-61, 211120,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807.
- [21] Mer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52.

- [22]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61.
- [23]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I, p.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 [24]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2.
- [25] *Ibid.*, p.134.
- [26]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196.
- [27]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6.
- [28] "8th Fleet War Diary," p.1, extracted from WDC 161259/397/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29] "Detailed Battle Report No.6 of the Fifth Air Attack Force," issued at Rabaul, September 10, 1942,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30] "Staggering Blow," *Domei News Broadcast*,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31]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5.
- [32]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pp.3-4,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33] "Military Value of British New Guinea," in Japanese Demobilization Bureau Records,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p.24.
- [3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5.
- [35]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p.2,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36] "Division Commander's Final Report on Guadalcanal Operations," May 24, 1943, Phase III, p.6,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5.
- [37] Miller, *Cactus Air Force*, p.24.
- [38] "COMAIRSOPAC War Diary for August 1942," August 13, 1942, entry,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7.
- [39] Entry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825.
- [40] David Galvan quoted in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79.
- [41] Brand, *Fighter Squadron at Guadalcanal*, p.67.
- [42]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39.
- [4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08.
- [44]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84.

- [45]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09.
- [4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2.
- [47]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2.
- [48] Merillat, *Island*, p.75.
- [49]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4.
- [50] "Japanese Naval Operations; Estimate of," Intelligence Center, Pacific Ocean Areas, July 24,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p.841-43.
- [51] COMSOPAC to CTF-61, 220910, in *ibid.*, p.808.
- [52] "Diary, No.25 Air Flotilla," extracted from WDC 161012/399.90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 [53] Harry D.Fel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Vol.2, p.109.
- [54] *Ibid.*, p.110.
- [55] "COMAIRSOPAC War Diary for August 1942," August 24, 1942, entry,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7.
- [56] Harry D.Fel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Vol.2, p.112.
- [57] "Narrative Report of Action with Enemy on August 24, 1942," Commander, *Saratoga* Air Group, enclosure (e) to *Saratoga*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58]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p.100-101.
- [5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22.
- [60]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p.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61] Lt.Cmdr.Keiichi Arima,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30.
- [62]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63]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64]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65]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September 5, 1942, enclosure (b), "Report of Fighter Director,"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6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17.

[\[67\]](#)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198.

[\[68\]](#) Mears, *Carrier Combat*, p.121.

第四章

在过去的十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批评者不断抨击其混乱无序的领导风格。他逆转了许多重大决策，却不承认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无论某个人的表现多么令人讨厌，他都不愿意将其解雇。他还草率地在原有政府机构之上建立新的机构，却不规定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无论建言者提出什么样的新建议，罗斯福似乎都颇为认同。连他最忠实的拥护者也不会认为他有管理的天赋。“他不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行政首脑，”担任过罗斯福的总检察长，1941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H.杰克逊评价说，“他当然不是一个擅长管理的人，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否成为一位杰出的总统也值得怀疑。”^[1]杰克逊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为特定的政策感到犹豫不决时，想要让他拿定主意是不可能的。他会耗上好几个月，暂停、拖延、阻挠并且最终拒绝采取行动。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会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冷静沉着，有时甚至会让他的顾问们感到惊讶”。^[2]白宫预算主管哈罗德·史密斯承认，罗斯福的许多国内规划不尽如人意，但他认为总统是一个天生拥有远见卓识的人，“是政府里真正的艺术家”。^[3]

杰克逊·波洛克^[4]的画派和马克斯兄弟^[5]可能会立刻反驳。“大胆实验”一直是新政的指导原则，但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能否承担未经验证的方法带来的风险？如果不能，失败的代价会以美国人的血来偿还吗？

为了战胜大萧条，总统及其手下创建了一大堆新的联邦机构，相应地也造了一堆“缩写词”；为了打败轴心国，他们又造出了一堆，如OPA、OPM、DPC、WPB、OWI、WRB和SPAB——为了不让本页看起

来太过杂乱，这里就不多引了。^[6]资深的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虽然不是罗斯福政府的反对党的批评家，但是对这些机构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评论。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写道：

由于一个人无论多么无能，表现多么糟糕，都保得住饭碗和工资，我们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先生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展示了纪律可以被破坏到何种地步。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某个官员不能胜任其职务，那么他的职务可能会取消，但这个人不会被解雇。因此，颠倒是非、阳奉阴违和摇唇鼓舌成了办事的常态，无论是干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一切都要转弯抹角才能办到，人们就不会直截了当地行事了。

当有能力的人在无能但又不会被解雇的人中间办事时，他们的能量会消耗殆尽。如果罗斯福先生早期的政治承诺和过去的政治错误所遗留的问题集中爆发，整场战争的走向都会受到影响。^[7]

虽然罗斯福的党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占绝大多数，但其1942年中期选举的前景却不乐观。一度无懈可击的民主党新政联盟——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居民、工会、自由派、少数族裔和天主教徒与可靠的南方诸州组成的联盟——已经因战争的破坏而分崩离析。数百万军人和战时工人被迫背井离乡，因此离开了世居的投票区。选民投票率预计将创下历史新低，剩下的选民都是倾向于共和党的老年人、农民和富人。

那年初夏，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两党团结一心的局面不复存在，钩心斗角的党派纷争重现政坛，激烈程度不输过往。所有人都重复着团结爱国的陈词滥调，但反罗斯福的媒体和议员对政府的批评更加随意和激进。同时，共和党人愤怒地扼杀了在战争期间暂停政治活动的所有建议。盟国捍卫的难道不是民主党的反对派主张的权利吗？1942年4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承诺为“彻底战胜”轴心国而努力，还补充发表了“庄严声明”，称共和党将“维护美国的政体……和两党制”。当总统提议将

党组织重组为民防联盟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对记者说：“要是我像戴着钢盔、拿着手电筒和一桶沙子的防空队员一样站在街角向罗斯福鞠躬，我会觉得恶心。”[\[8\]](#)

报业大亨们曾经用整版报纸反对新政提案，领导战前的孤立主义，最突出的是罗伯特·麦考密克、锡西·帕特森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们声称支持这场战争，但谴责总统愚蠢的指挥。罗斯福在国会中的敌人，包括1940年和1941年的孤立主义领导者，此时正鼓动人们集中资源攻打日本而不是德国，而且对美国在作战中的损失抱怨连连。他们似乎决定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破坏政府的管理，但这可能仅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许多观察家怀疑他们并非真正关心战争。《圣路易斯邮报》驻华盛顿的记者马奎斯·蔡尔兹严厉指责道：“不管官方在12月8日怎么解释，最盲目和最顽固的人都会继续相信，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自找的，因为美国没有像那些聪明人建议的那样保持纯净和孤立。”[\[9\]](#)

批评者的立场摇摆不定。他们一边抨击当局，一边宣称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搁置争议，团结一致，赢得战争。民主党人愤怒地指责那些在战争期间批评总统的人，说他们等于是给轴心国做政治宣传。国会辩论中的用词变得越来越恶毒。6月25日，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哈里·施瓦茨发言时猛烈地抨击了那些“挑拨阶级冲突，灌输种族仇恨和宗教仇恨的搬弄是非者。他们无意间使用了希特勒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这种纳粹宣传机器吸引的是为个人的野心和隐秘的仇恨所蒙蔽的追随者，他们一心要为自己谋利。他们并非故意要这场战争或民主失败，但他们的做法却有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危险”。[\[10\]](#)

这场战争难免会让联邦和总统的权力增加，两党保守人士都对此感到绝望。华盛顿的商业靠的是政府，而此时商业正前所未有地繁荣，连新政的巅峰时期都比不了。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场战争会使美国形成巨大的官僚政府。总统在国会的敌人默许了拨巨款来动员和武装部队的提案，但是共和党和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否决了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政方案，或是拒绝为其拨款，这些方案涉及的机构包括民间资

源保护队、工程振兴局和国家青年管理局。罗斯福甚至没有试着挽救它们。战争本身就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来抵消损失，他的核心立法成果（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集体谈判和银行监管法）将会继续存在。

国会决心发挥更大作用，而非只是贯彻总统的意志，但两党的成员都意识到，建设性的监督和横加阻挠是截然不同的。共和党传统的孤立主义领导层和日益壮大的国际主义集团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后者的领袖是1940年落选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全面战争只能由一个协调的、集中的行政权力机构来应对，因而国会不可避免地沦为了决策的旁观者。人们希望国会能及时为军事预算提供充分的资金，反对意见只要象征性地提出一点就可以了。议员可以拿充分的证据来指责政府无能、浪费、超支、腐败、内斗和垄断，但任何一种监督职能都不允许减缓战争动员的进程。

截至1942年闷热的夏天，联邦政府雇用了华盛顿的大约25万平民，但是对于一场全球性战争来说，这种规模和人力依旧不足。从珍珠港遇袭到打败日本，华盛顿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每月都有大约1万人来到这座城市，因为这里工资很高，而且似乎永远都在招文员、秘书、速记员、统计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当时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是电动打字机、复写纸和钢制档案柜。华盛顿的行政指挥部就是个打字机营。在长长的大厅中，日光灯下放置着一排排的木桌，上面摆放着备忘录、授权书和申请信。这些文件一式八份打印出来后，要分发到全城的互见索引档案中。自1940年至1945年，光是物价管理局用的纸就比整个联邦政府自1789年以来用的还要多。[\[11\]](#)

新到华盛顿定居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年轻女子，她们是因为招聘者承诺给所有能打字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丰厚的薪水才来的。她们的工作地点位于华盛顿广场各处的“临时建筑”里，这些建筑是预制的水泥石棉建造的办公楼，之所以被称为“临时建筑”，是因为它们在战争结束后将被拆除。这些单调的灰色建筑物矗立在倒影池的两边，通过跨越水池的长

廊相连。另外，华盛顿纪念碑周围，以及直至国会山脚下的整条宪法街两边，也都是这些建筑。从地基里挖出的泥土用推土机堆成巨大的土堆，直接留在了旁边。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年之前，有27栋这种临时的巨型建筑建了起来。其中有一栋从动工到剪彩只用了5个星期。这27座建筑物共提供了330万平方英尺[\[12\]](#)的办公空间。[\[13\]](#)里面夏热冬冷，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恐怖地咔咔作响。管道和电气系统容易发生慢性故障。每个工作日的早晨，这些建筑物外面都有长长的队伍沿着人行道等候，员工要等着向武装警卫出示证件，因公事来访的人也要得到许可才能进入大楼。每个建筑物平均容纳4万名员工，人数再多就会超出健康和安全的最低要求。许多机构采用八小时轮班制，上一班次的人刚一离开办公桌，下一班次的人就坐下来了。面对汹涌的人潮，清洁工疲于奔命，建筑内逐渐变得污秽不堪。

战争部找了一个更长久的解决方案，在波托马克河对面建造了巨型的战争部大楼。这座巨大的五角建筑占地42英亩[\[14\]](#)，建筑面积500多万平方英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彼时还未被称为“五角大楼”。1942年9月，五角大楼尚未竣工，而其建设费用可能会超过原本的预算一倍，这引起了国会的抗议，但是此时已有1.7万人在已经竣工的部分上班了。[\[15\]](#)

1942年，华盛顿仍然是一个缺乏活力的中等城市——文化上它更像南方，缺乏私营企业，而且完全没有准备好接纳激增的人口。与其他城市一样，业主压榨租户，轻而易举就赚到了钱。政府负责招聘的人员提醒已婚申请人，因为没有住房，他们无法把家搬到首都。年轻的女打字员挤进小公寓蜗居，每个房间有四张床，十分拥挤。空置的停车场上建起了临时的拖车营地。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郊区的农田里到处都是批量建造的式样相同的住房。破旧的船屋外挂着晾晒的衣服，停泊在波托马克河中。当局禁止私人业主出租空房。“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比较长，”1943年1月《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评论说，“华盛顿这座城市就要撑爆了。”[\[16\]](#)

公共服务在高压下瘫痪了。电车和公共汽车仅能容纳每天三分之一的通勤人口。在高峰时段，联合车站挤满了人，水泄不通。人行道两边垃圾遍地。电话系统过载，电话公司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求公众除紧急情况外不要打电话。人行道两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店铺——餐馆、杂货店、干洗店、电影院、报摊。医院拥挤不堪，以至于偶尔出现空位时会安排孕妇引产。公立学校报名人数超额；教堂在周日只提供站席；军人贿赂门卫，才能进入拥挤的夜总会。犯罪、卖淫和性病十分普遍，警察不堪重负，监狱人满为患。

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穿过制服，但他完全适应了总司令的角色，会见将领的时候一点也不打怵。如果考虑政治或外交方面的因素后，需要推翻参谋长的决定，总统从不犹豫。“我是一个固执的荷兰人，”他可能会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必须按这个决定执行。你们改变不了我的主意。”^[17]马歇尔和金很快便开始以向白宫提交联合决议的方式来减少总统影响作战计划的机会。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统几乎总是会爽快地同意。

总统骨子里是海军的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包括马歇尔和史汀生，但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控制的。而对于海军将领来说，他对海军的偏爱就是让人喜忧参半的。罗斯福喜欢插手海军事务，他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1913年，当时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让这个31岁的前纽约州参议员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在低调的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的手下，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负责监督海军的日常运作，并亲自指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工作。他和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大部分中级海军军官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包括金、尼米兹、哈尔西、斯塔克、莱希、托尔斯、斯普鲁恩斯、弗莱彻、特纳等，那时他们还是上尉和少校。

罗斯福总统长期以来有个习惯，要求海军提供给他某些军舰和军官的信息——总司令一般不会关注这些信息。当他为新的舰艇设计或武器

系统提出即兴的想法时，海军部就得去研究这些建议，并（委婉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罗斯福会若无其事地跨级指挥，例如直接命令某艘舰艇去特定的战区，或者派遣军官进行实地调查，命令他们直接向自己报告。^[18]而另一方面，罗斯福又有一种天赋，善于把合适的将领在合适的时机派到合适的岗位上。他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完美，但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做出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决策，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两个决策无比正确。他将金召回华盛顿管理海军，并且将尼米兹派到夏威夷去指挥太平洋舰队。

媒体和国会中有人建议总统将最高指挥权移交给能够胜任的军事权威，比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斯福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们。罗斯福对他的私人医生罗斯·麦金太尔说：“我的罪行是我读过宪法，并且支持它。制定宪法的人要求总统在和平时代做**最高行政官**，战争时代做**最高指挥官**，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吗？”^[19]

对于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来说，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是混在一起的，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白宫的“椭圆形书房”（白宫寓所内）甚至卧室里做的。面见总统时，军事首脑自然愿意和他的私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很得体的做法。（例如，要求欧内斯特·金和乔治·马歇尔在总统端着托盘在床上吃早餐的时候，坐在这位总司令的床尾汇报工作，是在为难他们。）但是，如果有问题需要总统及时关注，礼仪就成了次要的问题。马歇尔和金是白宫的常客，这两个人已经习惯了在向总统做简报的时候，看他拿着放大镜盯着集邮册出神。在夏季的周末，高级军官经常开车60多英里来到香格里拉，与罗斯福坐在装了帘子的门廊里，俯瞰凯托克廷峡谷的田园景色。收到总统手写的信件时，这些军事首脑别无选择，只能默许他以亲切的口吻称呼自己（“亲爱的欧尼”），然后在回信的时候坚决采用恰当的称呼（“致总统先生的备忘”）。

许多工作可以通过哈里·霍普金斯来完成，他是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其密友。“瘾君子哈里”（他就住在白宫总统房间另一头的卧室里）的地位超过了罗斯福内阁中的所有成员，他会在紧要关头引导总统做出

理性的决策。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所有的军事首脑都非常尊重霍普金斯。但是霍普金斯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他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1942年6月，马歇尔提议将一名新人安排进白宫，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联络员。这个“军事参谋长”应该是某个兵种的幕后掌控者，与罗斯福共事过，并且熟悉他的怪异处事方式。

金最初的直觉是抵制这个提议，这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另一个军官插在自己和总统之间，也或许是因为他认为马歇尔会推荐一位陆军将领。马歇尔化解了金的第二个疑虑，因为他推荐的是海军上将威廉·D. 莱希，一位已经退役的海军作战部长。莱希自1915年就认识罗斯福，当时莱希负责指挥“多尔芬号”海军通信船。他和他妻子都是罗斯福的密友，同时也是海德公园的常客。1939年，莱希从海军退役后，总统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1941年，莱希被派往法国担任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的大使。1942年7月7日，罗斯福与莱希在白宫共进午餐，并为他提供了这份工作。莱希接受了。

恢复现役后，作为四星上将，莱希成了美军所有武装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从第一次获得军衔的日期算起）。考虑到他的资历，他被推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临时主席。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十分理解海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担忧，但是，他在维希政府任职的经历也让他更加认可欧洲优先的原则。人们希望温和的外交官莱希能稍微调和一下金的火爆脾气。

在大多数早晨，莱希会径直走向总统的居室，罗斯福往往正躺在四柱床上，睡衣上搭着一件印有花押字的海军披风，行动不便的腿上搭着毯子，边看报纸边吃托盘里的早餐，也有可能正在浴室里刮胡子。这位海军上将会在角落里坐下来，开始总结战地指挥官发来的报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最新发出的命令，或者是总结参谋人员发布的重要研究报告。

听说丘吉尔在伦敦的地下掩体中有个精美的“地图室”后，罗斯福认

定白宫也应该建立一个类似的指挥中心。为此，罗斯福让人腾空了一楼的一个大房间，由海军上校约翰·L.麦克雷负责管理。^[20]欧洲和太平洋的大型地图挂在相对的墙壁上。东南亚、地中海和北非的地图较小，挂在欧洲和太平洋的地图之间。这些地图挂得都比较低，好让总统能坐在轮椅上查看。旗帜和彩钉标记出盟军和轴心国已知的海军、陆军和航空部队的位置。“三巨头”（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目前的位置用特殊的钉子表示——雪茄代表丘吉尔，烟斗代表斯大林，香烟代表罗斯福。通过安全的专用电话线路，海军部和战争部每个小时都会汇报最新的消息。

地图室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最终海军和陆军在这里各有六名军官。一名警卫负责站岗，只有六名白宫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埃莉诺·罗斯福在得知每天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儿子的位置后，随时都可能会来看看，卫兵没有勇气阻止她。）麦金太尔医生的办公室位于隔壁，罗斯福每天下午都在他那里接受鼻窦治疗。莱希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总统。丘吉尔在来访期间几乎总是待在这里。从各个方面看，这里都是二战盟军的指挥中心。“麦克雷，”莱希说，“我认为你的地图室里集中的战争信息超过了华盛顿任何别的地方。”^[21]

罗斯福承诺不会为了国内政治稳定而牺牲任何军事决定。但是，他为业余的“键盘侠”所包围，他们会不请自来，在公共场合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反复警告说，这场战争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来进行。即使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公众舆论强烈要求增加对日本的打击力度，他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要求美国重新平衡军事力量，将主力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因为“太平洋战争才是世界大战，是东方为主导世界向西方发动的战争”。^[22]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国会代表团对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外岛出现了约1万名日本兵感到不安。他们警告说，必须立即把日本人赶走，免得他们冲进阿拉斯加，从而危及整个西海岸。（专业的战略家知道，鉴于日本在军事和航运上的限制，这种情

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能这样说，因为一旦这么说，就会让敌人察觉出他们对此毫不在乎。）另外一些人心系欧洲，特别是苏联南部。红军正在斯大林格勒郊外与德国国防军进行殊死搏斗。盟军已经同意了“欧洲优先”的政策，但美国尚未直接与第三帝国的部队交战。温德尔·威尔基强烈要求开辟打击希特勒的第二战线，以缓解苏联的压力。在同一个星期内，威尔基还呼吁立刻增加对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白宫里的人翻了翻白眼——威尔基是不是觉得船和武器都是从树上长出来的，说有就有？

然而，对苏联的担忧是有根据的。红军如果溃败，这绝对会是一场灾难。斯大林曾请求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到当时为止，盟军一直未能开辟这一战场。25年前，俄国共产党曾请求与德国和平共处。如果1942年再搞出一个类似的停战协议，希特勒就能将100多个师重新部署到西欧。“1942年下半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莱希写道，“是苏联人能否挡住以及何时挡住德国人。”^[23]在白宫地图室的墙上悬挂的大幅大西洋地图上，从左到右插满了黑色的钉子。这些钉子的位置每小时更新一次，标记着前往摩尔曼斯克的重要盟军护航舰队的位置，它们会受到德国潜艇的围追堵截。哈里·霍普金斯经常冲进来查看舰队的状况，麦克雷后来回忆说，总统这位瘦削的顾问似乎总能知道每艘船上装有什么武器装备。红军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全体盟军的事业，似乎都取决于船队能否进入摩尔曼斯克。

他们对欧洲的情况非常担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及其顾问不但同意实施“瞭望塔”行动，还在1942年关键的8月和9月继续向南太平洋地区派遣增援部队，这就非比寻常了。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盟军高层指挥官在怎样以及何时反攻德国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美国人已在英国投入大量陆军和航空部队（“波莱罗”行动）。在那年春天的谈判中，美国的将军们迫使丘吉尔同意在1943年中期越过英吉利海峡发动攻击（“围歼”行动）。马歇尔还提出，万一苏联濒于崩溃，盟军应该有紧急措施——于1942年9月在法国海岸登陆6个师（主要是英国士兵），代

号为“大锤”行动。

英国人最初同意了“围歼”行动，口头上也同意了“大锤”行动，但无意提供具体的支持。在接连召开的盟军会议（6月份在华盛顿，7月份在伦敦）上，英国人强硬地反对“大锤”行动，并对“围歼”行动越来越怀疑。一向言语刻薄的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精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于4月15日问过马歇尔，就算盟国远征军能够安全上岸，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是去勒图凯玩百家乐或者十一点，还是去巴黎沙滩洗个澡？！我是今天下午问他的——登陆后我们是往东、往南，还是往西去？他还没有开始思考这个问题！”^[24]这次远征几乎注定会失败，而一次失败的进攻对苏联人不会有任何帮助。德国国防军正在东线流尽鲜血，而美国的战争动员还没有达到高潮，为什么要在此时发起风险这样高的行动呢？布鲁克后来评论道：“马歇尔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到底是怎样的局面。”^[25]

7月8日，丘吉尔发电报给罗斯福，告诉他英国不同意当年在法国登陆：“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中没有任何负责的将领认为‘大锤’行动在1942年是切实可行的。”^[26]

“大锤”行动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妄想，英国人的论点有效地推翻了美方指出的该方案的优点。然而，马歇尔得到了金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的大力支持，坚持要实施这个不现实的行动，始终不肯妥协，甚至以美国取消“欧洲优先”的承诺作为威胁。1942年7月10日，马歇尔和金向罗斯福发送了一份联合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场战争中最特别的插曲之一：

如果美国准备采取其他计划，而不是强有力地、坚定不移地执行“波莱罗”行动，那么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我们应该转向太平洋战场，对日本予以坚决的打击。换句话说，除空中作战外，对德国采取防御态度，而在太平洋战场使用所有可用的战争手段。这样的行动不仅能够坚决而果断地打击我们的主要敌人，还能为防止日本

攻击苏联提供具体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越早做出最终决定越好。[\[27\]](#)

然而，罗斯福对于将全球战争的重心重新定位在太平洋地区并不感兴趣，否决了他们的建议：“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打败日本并不能打败德国，而美国今年或1943年集中力量打击日本，会增加德国控制欧洲和非洲的机会。”[\[28\]](#)

在酝酿攻击德军的计划时，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立，陆军航空部队和陆军地面部队对立，而麦克阿瑟和所有不同意他应立即获得更多舰船、部队和飞机的人对立。金将军则在推进“瞭望塔”行动的同时，一直忠实地支持马歇尔进军欧洲的决定。

在经过严格的审议之后，他们制订了“火炬”行动计划，即进军北非的行动。这个方案是丘吉尔提出的，他很清楚美国盟友已经下定决心要在1942年设法与德国交战，所以必须找到具体实施方案。英军与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的战斗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初夏，这使英国元气大伤。这场战事以6月21日3.3万名英军士兵在图卜鲁格投降而告终。丘吉尔认为，除非阻止德军继续突破，否则盟军在该战区还会有进一步的损失。罗斯福深表同意。总统已经下达命令，要求美军必须于1942年与德国在某个地方开战。英国取消了在法国登陆的计划。登陆北非的行动是唯一一个正在讨论且满足双方条件的行动。马歇尔提出了反对意见，但罗斯福在听了他的意见之后还是同意实施这场行动。首次登陆将在11月8日进行。

这场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罗斯福在国内的批评者呼吁展开行动，但是没有人能够得知（即使通过小道消息）此次进军计划。11月8日恰好是中期选举后的第5天。直到投票之后（共和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人才得知针对第三帝国的首次重大反击已经发动。

在1942年政治选举的日子里，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与轴心国部队交战的地方。这座岛屿和第1陆战师的地位在美国人的想象中难免会被夸大。由于岛上有六七位优秀的战地记者和平民记者，这次行动得到了全面的报道。特里加斯基斯发回的报道在国际新闻社发表，详细介绍了战况，而1943年出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日记》也成了畅销书，让他一举成名。海军记者汉森·鲍德温为《纽约时报》报道，汤姆·亚伯勒为美联社供稿，鲍勃·米勒为合众国际社供稿，约翰·赫西为《时代》和《生活》撰文，艾拉·沃尔弗特为北美报业联盟撰稿，詹姆斯·赫尔伯特中士为海军陆战队撰稿，麦克·莫里斯为《美国人》（*Yank*）杂志撰文。范德格里夫特没有发表过公报，但他鼓励记者去他们喜欢的地方，写下任何他们想写的东西。第1陆战师的公关人员赫伯特·梅里拉特上尉为这一系列有意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同时自己也写稿，其中很多稿子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新闻。

1942年9月27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是《所罗门群岛的行动发展为南太平洋战役》。这篇5 000英文单词的报道称：“经历过无数次丛林交火、数次大型行动以及持续的轰炸和炮击后，强壮而黝黑的海军陆战队老兵仍然顽强地坚守在六周前夺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滩头阵地上。”^[29]不确定能否守住该岛时，鲍德温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您还要死守这个滩头阵地吗？”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回答说：“当然了，为什么不？”^[30]鲍德温报道的这一对话激发了美国人的斗志。“强壮而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几个月后才会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已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美国国内的人热切地盼望着、祈祷着被围困的第1陆战师生存下来，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2年的秋天，亨德森机场一直处于战火之中。日本的步兵分队隐藏在丘陵和森林里，有些距离跑道的西端仅有300码。狙击手悄悄潜入射程范围内，向那些把头抬起来的人射击。日本炮兵把75毫米炮弹射入露营地和停机场。“你会时不时地听到远处传来沉闷的轰隆声，”一个鱼

雷机飞行员回忆说，“接着是一阵尖叫声，然后炸弹就在机场爆炸了。这让大家都很烦。”^[31]来自拉包尔的G4M轰炸机几乎每天都在中午抵达，并将炸弹投放在海军陆战队的中心地带。而且夜间，日本的驱逐舰或潜艇经常会从铁底湾向机场开炮。所有人都缺乏睡眠，敌人想达到的也正是这一目的。大部分夜晚，到了午夜之后，被称为“洗衣机查理”的日本巡航水上飞机都会在美国人头顶上盘旋。这架飞机嘎嘎作响的单发动机会惊醒所有的海军陆战队员，并让他们一直都睡不着。“查理”通常只会投放一两枚小型炸弹，很少夺人性命，也很少造成任何明显的伤害，但它会让美国士兵紧张不安，使他们得不到休息。晚上只要一听到发动机的声响，所有人便会醒来，拿起步枪，躲到藏身处或散兵坑里。罗伯特·巴兰坦说：“你永远不知道‘查理’会在哪里投放炸弹。有时你甚至可以听到炸弹舱打开的声音。你一定能听见炸弹落下的声音。如果它发出一种嗖嗖的、打转的噪声，那颗炸弹不会落在近旁，伤不着你。如果是发出啾啾声，它会离你很近，你可能就需要换套内衣了。”^[32]

每天都这么单调乏味地循环度过，让人毫无喘息之机：漫长的不眠之夜让人在清晨昏昏欲睡，每天中午都会有大规模的空袭，整日都是枪炮声——这种致命的狙击、扫射、轰炸和炮击，无休无止。一旦下雨，就会大雨滂沱，雨水会灌满散兵坑和战壕，搞得每个人都很难受。雨一停，地面被晒干，机场上就会扬起脏兮兮的灰尘，进入人们的眼睛里和肺里，也搞得人很难受。士兵们一天吃两顿饭，总是饿着肚子。食物非常糟糕：未经加热的C型口粮、过期的饼干、鸡蛋粉、脱水土豆、没煮熟的鱼和罐装的澳大利亚羊舌。他们饮用一种绿色的苦咖啡，这种咖啡是用洗过的燃料桶煮的。每个人的体重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往往令人担心。飞行员要一直守在飞机附近，因此他们尝试着在机翼下方拴个吊床。中午，飞机在烈日下暴晒，如果触摸一下飞机的铝制表面，就可能灼伤。由于地勤人员短缺，飞行员不得不学习一些飞机维修技术。但是，一个中队长回忆说，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如何给飞机加油”。^[33]

来自拉包尔的远程空袭每天都在进行，但美国士兵通常会提前两个小时收到来自布干维尔的海岸警卫队员的预警。从波拉波拉视野良好的观察点，杰克·里德在这些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可以仔细观察日军的编队。他会直接向休·麦肯齐的肯恩电台发送无线电消息，这个电台位于亨德森机场边上的一个地堡里。例如，8月29日上午8时25分的报文是这样的：“18架双引擎轰炸机和22架战斗机正朝东南方向前进。”^[34]麦肯齐通过野战电话报告给机场以北几百英尺宝塔风格建筑里的空中管制部门，同时报告给范德格里夫特的情报人员“D-2”。基地会竖起一面白旗，表示“黄色警告”。野猫式战斗机通常会在敌人预计到达的大约50分钟之前起飞，这样它们能够爬升到3万英尺的高度，而从这个高度，这种重型战斗机可以对入侵者进行俯冲攻击。在日本人来了又去两个小时后，里德的消息会又一次通过无线电传来，通报有多少架飞机幸存，正在返回拉包尔的途中。9月的第二个星期，海军陆战队终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安装了一个对空搜索雷达。但它的有效搜索距离只有80英里，无法为F4F战斗机提供充足的预警时间，使其爬升到战斗高度。事实上，杰克·里德的海岸警卫报告对美军赢得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大部分拦截行动是由约翰·L.史密斯上尉指挥的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完成的。史密斯的F4F战斗机会飞到亨德森机场西北几英里非常高的位置。G4M“贝蒂”轰炸机的大型编队到达时的高度通常为2.5万英尺。野猫式战斗机会两两结伴，以G4M的机枪打不着的角度从高空俯冲攻击。日本人的G4M并不像B-17“飞行堡垒”或其他美国重型轰炸机那么坚固。美国飞行员很快就学会了用0.50英寸机枪瞄准其引擎或机翼根部。只需一串连射，就足以让这些部位起火，甚至让飞机爆炸解体。

零式战斗机的高度在G4M轰炸机之上，但它们通常是远远跟在轰炸机的后面，来不及干扰野猫式战斗机最初的俯冲攻击。零式战斗机每天都是在美国人已经把数架轰炸机击落后才进入战场。乔·福斯是海军陆战队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他对日本同行的战术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大

多技术高超，但是战术一成不变，于是其行动也就变得可以预测了：“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35]美国人早就学会了避免与速度快、机动性高的零式战斗机追逐缠斗。如果敌人获得了优势，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混战中逃出来。福斯对F4F坚固的结构赞不绝口，他指出，好多美国飞行员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打得浑身弹孔，但是仍然赢得了胜利。“我们会被日本的机关炮和机枪击中，”他说，“但除非对方碰巧击中机油冷却器、油线或汽油管道，否则就不会把我们打下来。正面交锋时，我们通常能把对手直接从空中打下来，而对手追击我们时，我们的装甲可以保护飞行员不受伤害，而且从来没有格鲁曼飞机在被击中后爆炸过。”相比之下，零式战斗机则很容易被摧毁：“只要直接击中对方的机翼底部，他们的飞机就会像玩具气球一样爆炸。”^[36]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6个月的空袭中，日军都是从拉包尔飞过来的，单程长达600多英里。日本飞行员待在驾驶舱里的时间太长，这对他们来说太消耗体力了。“我的上帝！”第6战斗机中队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亚历克斯·弗拉丘惊叹道，“那来回就是1 200英里啊，还要在目标区域进行空中作战。这时间可够长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不喜欢久坐。三个小时的战斗空中巡逻就够长的了。”^[37]一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的行为很奇怪，他们甚至似乎在避免战斗。他们莫名其妙地玩起了特技，好像是在试着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福斯说：“哦，他们玩了很多杂技，比如飘移、翻跟头等。对于他们搞的这些花招，我们唯一想到的原因是他们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技术有多牛。于是乎，我们也向他们展示了我们有多牛，把他们打下来。”^[38]一天下午，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杰克·康格在铁底湾的上空飞行，被一架零式战斗机尾随，他觉得自己可能要完蛋了。但是接下来：

他做了你绝对没见过的惊人举动。他从我后上方追过来，但是非但没有紧跟机尾，向我射击，还因为速度太快，飞到了我前面。此时他本应该闪到一边，脱离战斗，但那个傻瓜在我的机头下面拉

升起来，做了个翻滚。他想干什么呢？用这种体操式动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知道。很显然，这些人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所以他们就像有玩具的小孩子一样，一旦有观众，就忍不住要炫耀一下。要不然，就是他以为如果一直让飞机那样翻滚，我就打不中他。实际上，他只是让自己成为更大的目标罢了。我打了三秒的连发，我还没停止射击，他就已经完蛋了。……他溅起的水花还不如一只海豚大。然后他就成了大海的一部分。[39]

零式战斗机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在亨德森机场上空贴着树梢飞行。人们四处逃窜，跳进最近的散兵坑；有些人难免会在逃窜时被打倒。空中的扫射还损坏甚至摧毁了停放的飞机。8月23日，8架零式战斗机突然低空飞过来扫射亨德森机场，人们四散奔逃，寻找掩体。最终，这些攻击被陆军航空兵第67战斗机中队的P-400有效地遏制了。P-400是P-39“空中眼镜蛇”战斗机的轻微改进版，在高空中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但在近地飞行时，它们速度快，机动性好。海军陆战队的克利福德·福克斯被扫射的零式战斗机逼进了战壕里。与此同时，一架P-400突然在树梢上方出现：“它的机关炮击中了日本飞机，那架零式战斗机在空中解体了。它坠落到我们前方丛林的山沟里。你可以看到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和引擎一同落下来。这两者是最重的，所以落下来的速度最快。飞机的其余部分都被射成了碎片，朝地面散落。我们欢呼雀跃。”[40]

范德格里夫特和海军陆战队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约翰·麦凯恩将军，麦凯恩决心不断提供空中增援，让亨德森机场绝对不缺飞机。在第1陆战师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星期后，他成了来到该岛的第一个高级军官。他的胳膊下夹着一瓶波旁威士忌，在此过了一夜。那天晚上，一艘敌方的驱逐舰从铁底湾向美军营地发射了5英寸口径的炮弹，迫使两个将军（两人都穿着内衣）钻进了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空洞。“上帝，范德格里夫特，这是你的战争，你肯定会放手去打的，”麦凯恩说，“但是，我明天回去后，会尽力为你们航空队提供所需的东西。”[41]

在第二天早上离开之前，麦凯恩告诉特文宁上校，第1陆战师的战斗不是只为了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用特文宁的话来说，这并非“衣衫褴褛的海军陆战队员和日本人之间的宿敌之战。……在将军看来，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个堡垒，而不是前哨。成功守卫该岛或许能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全军覆灭”。^[42]麦凯恩在返回圣埃斯皮里图岛后不久写给尼米兹和金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给予瓜达尔卡纳尔岛充分的补给，它可能会成为“敌人空中力量的一个天坑”。^[43]只要自大的日本人坚持跨越600英里的大海进行空袭，那么光是这种长途飞行就会削减其飞行员的人数。始于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的一个过程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结束——日本仅存的不可替代的资深飞行员将逐渐全部阵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麦凯恩一直在积极游说，呼吁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空部队。他请求得到更多的陆军飞机，特别是P-38（在更高的地方比P-39和P-400战斗力更强）。他从自己的南太平洋航空队召集了空中增援力量，并向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提出了更多的请求。航空汽油、炸弹、弹药、备用零件、工具和地勤人员都急需补充。在来到岛上三天之后，海军陆战队第223战斗机中队的氧气罐就用完了。“威廉·沃德·伯罗斯号”运输舰将会把大量的物资和地勤人员带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中间的过渡期，海军陆战队的野猫式战斗机是由高级移动基地施工队的水手们来维护的。特纳派另一个工程营来到岛上，升级并延长亨德森机场的跑道，使其能够起降B-17轰炸机。亨德森机场东北方向的土地被清理和平整成一条较短的备用草坪跑道，被称为“战斗机一号”。航空汽油的库存低到危险的状态时，B-17装载着燃料飞到岛上。“大黄蜂号”已南行至附近水域，机库甲板上放了大量的战斗机零件，足够装配一支战斗机中队。这些飞机被组装起来，飞到了亨德森机场。从8月到11月，“仙人掌航空队”接收了3个军种的8个战斗机中队、12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和2个鱼雷轰炸机中队。

由于舰艇受损，“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上的飞行中队也被派往瓜

达尔卡纳尔岛，奉命在接到通知之前从亨德森机场起飞作战。海军少校“瑞典人”哈罗德·H.拉森在9月中旬带领第8鱼雷机中队的TBF“复仇者”鱼雷机进驻亨德森机场。麦凯恩敦促轰炸机在傍晚和晚上起飞，炸毁“槽海”里的日本军舰，不让这些船把人员和补给运上岸。“你们在这里能否坚持下去，”他在9月14日写给范德格里夫特和罗伊·盖格将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空兵司令）的信中称，“取决于你们能否在日本军舰到达那里之前、之时和之后持续地打击它们。”^[44]四天后，他又补充道：“飞机必须找到那些夜袭的舰船，而且必须在天黑前袭击它们。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你们会发现这些话刻在我心里。”^[45]

每天早上，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都会执行一次例行飞行任务，对“槽海”进行侦察巡逻。而且，亨德森机场的每架飞机在中午都会飞向高空，哪怕只是为了避免在地面遭到空袭。到了傍晚的时候，会有6架到8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再次离开瓜达尔卡纳尔岛，去搜寻前来的日本舰船。这些傍晚的飞行很有效果，因为敌舰直到天黑都被迫在西北方向龟缩着，因而减速少了在铁底湾停留的时间。“仙人掌航空队”还开始借着月光执行夜间飞行任务。然而，夜间执行俯冲轰炸成功率极低，而且损失也很大。拉森的鱼雷轰炸机执行侦察和攻击任务时很少能与俯冲轰炸机进行协同攻击，整个9月的命中率都低得令人沮丧。1943年1月，在海军部的一份简报中，拉森建议“打一场主动进攻的战争。……如果你可以发起攻击，而且是持续的攻击——这意味连续不断地供应兵员、飞机和给养——你当然应该这样做。让日本舰船安然无恙地离开那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但我们确实无能为力”。^[46]

在一木清直的部队在特纳鲁河河口被歼灭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询问他的智囊团——特文宁上校和杰拉尔德·C.托马斯上校——日本人下一次攻击的地点可能是哪里。此前，两位上校曾担心日本人会在隆加角附近的海滩登陆。但日本人没有顶着炮火强攻登陆的两栖作战装备，而

且任何规模大到足以发动此类攻击的舰队都无法避免从空中被发现。此外，隆加角周围道路平坦，增援部队可以迅速来到该地区。

更令人担忧的是亨德森机场以南暴露的山脊。在这个方向上，丛林可以为敌人的潜行提供掩护。如果发动协同攻击，日本人可能会突然冲进机场，而再往南几百米就是美军的营地。

这道山脊——后来被称为“埃德森岭”，或者叫“血腥岭”——从西北往东南方向延伸，长度大约1 000米，是一系列隆起的山头，距离丛林只有几百米。范德格里夫特派梅里特·埃德森上校的突袭营和伞兵在山坡前挖了防御阵地，又从隆加角调来一个炮兵连提供火力支援，另有两个营作为预备队。

田中赖三的“老鼠特快”几乎每天夜里都向岛上供应补给和增援部队。丰富的经验告诉田中，他不应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空袭范围内于白天行动。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在该地区的指挥安排明显很混乱，田中会收到彼此矛盾的指令，一半来自联合舰队，一半来自拉包尔的两个相互敌对的次级海军司令部：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八舰队。8月29日，在川口清健少将的领导下，一支新的入侵部队通过“佐渡丸”运输舰抵达肖特兰岛。两天后，川口将军及其大部分兵力（约有3 000人）通过8艘驱逐舰在海军陆战队东边的泰武角附近的海滩上成功登陆。其余部队试图从吉佐港靠驳船登陆。田中已经警告他不要使用这种战术，但是他没有听。结果十几艘满载的驳船在大海上被逮个正着，被“企业号”第5侦察机中队的1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击沉。但是，田中部队驱逐舰的持续行动逐渐增加了川口的兵力。到9月12日，士兵人数已逾6 000。他们在美国滩头阵地以东约12英里处的科库姆博纳和塔西姆博科附近露营。

9月11日和12日的连续两日的战斗是海军陆战队员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日军G4M的空中袭击于中午时分开始，在机场南方人员密集的地区投放了炸弹。升空的战斗机数量不足，无法阻止攻击者。那天下午，由于“萨拉托加号”被鱼雷击中而无家可归的第5战斗机中队的24架

野猫式战斗机降落到了亨德森机场。人们欢迎它们到来，但燃油储备本来就很少，此时供应燃油的压力更大了。那天晚上，海军陆战队受到铁底湾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更为猛烈的炮击。9月12日，日军的空袭持续了很久，许多海军陆战队员一整天都待在防空洞里。当天晚上9点，日舰又对美国人进行了3个小时的炮击。哈罗德·比尔回忆说：“炮击规模巨大，超过以往。……炮弹在我们头顶上把树炸断，弹片像冰雹一样落在我们周围。我们战壕里的所有人都幸存了下来，但是附近的第232侦察轰炸机中队的海军陆战队员却没有那么幸运。一枚炮弹落在他们的避难所正上方，炸死了罗斯和巴尔得内斯中尉，并炸伤两人。这是一场噩梦。”[\[47\]](#)

川口清健对山脊的攻击始于13日晚上7时30分。一枚红色的照明弹从丛林里升起来，一批日本士兵开始冲击埃德森的防线。战斗很快就变成了残酷的短兵相接。攻击一轮接着一轮，反复的攻击迫使海军陆战队退到距离机场不足1/4英里的地方。经过重整的伞兵营向川口东侧发动反击，迫使日本兵撤回到丛林里。持续发射的105毫米榴弹炮似乎让日本人伤亡惨重。“那天晚上是地狱：双方都成了野蛮人，”一架轰炸机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戴维·加尔万回忆道，“那天晚上，到处都在开火，双方把所有武器都用上了。炮弹就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离战场很近，炮火声、枪声、尖叫声不绝于耳。”[\[48\]](#)

在战斗的高潮，一小股日本士兵冲破了埃德森的防线，甚至有好几个人冲到了机场的边缘，不过马上被打死了。有几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来到合适的位置，使机尾的0.30英寸口径的机枪得以朝山脊扫射。一名受命保护飞机的海军陆战队员杀死了一个试图往机翼上爬的日本兵。他说：“我知道，任何闯入这里的日本兵都想把手榴弹扔进驾驶舱，炸毁飞机。所以我就坐在那里等着，果然，有个日本人爬到了机翼上。我用自动步枪对着他胸前猛地开了一枪——这个浑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49\]](#) 范德格里夫特的指挥所位于山脊以南约300码的地方，在黎明时分遭到了直接攻击，但攻击者——两名士兵和一名挥舞着武士刀

的军官——在范德格里夫特的眼皮底下被打死了。

到了清晨，日本人开始撤退，埃德森的部队占领了山脊。盖格将军派了几架P-400来扫射其余的敌人。巡逻队进入丛林，打死了几个掉队的人，但川口于乱军之中逃掉了。800多个日本兵在山脊或其附近丧命。日军总共伤亡约1 200人，其中大多数人当场战死，或后来死于枪伤。海军陆战队损失了143名士兵，包括阵亡的和负伤的。

日本步兵正在迅速失去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神秘色彩。20多年来，日本军队不断强调“战斗意志”而非战术和技术，并将冲锋作为主要的进攻手段。当对方是纪律严明的部队，事先挖好了防御工事，并且还有炮火支援的时候，这种战术是毁灭性的。三周内，有两次狂热的刺刀冲锋被击退，日美两方伤亡人数的比例约为10：1。海军陆战队士气大振。他们带着讽刺和不屑的态度收听东京广播电台的节目。在库库姆村，一个巨大的广告牌竖立在所谓的“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这上面展示着当天所有的新闻，包括空战中敌人被击落了多少飞机，以及来自国内的最新的棒球赛比分。

9月18日，一支大型运输舰队出乎意料地驶来，停泊在隆加角，开始卸载物资和海军陆战队的4 000名增援者（第7陆战团），这进一步鼓舞了士气。新来的部队受到热烈欢迎，大量的食物、医疗用品、弹药和施工设备被卸在“红滩”上。马丁·克莱门斯后来回忆说：“我们非常兴奋，一边啃着排骨，一边期待下一顿丰盛的大餐。”[\[50\]](#)

在东所罗门群岛战役中受损的“企业号”航母不得不与“萨拉托加号”分开，撤回珍珠港进行大修。弗莱彻的第61特混舰队的实力很快因为另外两个航母群（第17和18特混舰队）的到来而得到了加强，这两支舰队是围绕“大黄蜂号”和“胡蜂号”建立的。

戈姆利将这支强大的特混舰队部署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圣克鲁斯群岛之间。这片区域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60英里，南北长约60英里。在

这个“中心”的位置上，弗莱彻不但可以迅速采取行动，打击所有进入所罗门群岛海域的日军，而且可以在特纳的运输舰队向铁底湾运送补给和增援时提供空中掩护。但是，戈姆利的命令把弗莱彻限制在了特定的地方，这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航空母舰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来回行驶于同一片水域，在夜间往东南方向航行，然后在清晨掉转方向，往西北方向航行。敌人的空中侦察和潜艇侦察迟早会发现这种模式并做出相应的行动。在抵达珍珠港后，“企业号”的戴维斯舰长向尼米兹报告了他左右为难的处境：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战略形势要求航母特混舰队长期在有限的区域内行动，而且这片区域处于敌人能够接近的范围内。我们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但是，风险应该尽可能降到最低。我们应该不断权衡利弊。在符合战略要求的情况下，每天的大体位置必须尽量变化。我们应该提高速度，即使这样做要增加燃料消耗。在任何日子里，我们都不应在同一地区停留。……每当战略情况允许时，我们都应彻底远离该地区，让敌人猜测我们的去向以及下次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51\]](#)

不幸的是，这些精辟的言论也是具有预见性的。山本五十六十分清楚，美国人必须在努美阿、圣埃斯皮里图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进行护航，他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东南方150英里的地方部署了潜艇搜索线。需要在潜艇出没的地方航行的盟军水手给它起了个绰号——“鱼雷会合点”。8月的最后一天，早上7时48分，“萨拉托加号”舰岛后面的右舷遭到一枚鱼雷攻击。爆炸掀开了它的外壳钢板，破坏了推进系统的电力控制，迫使它猝然停下，造成12人受伤（包括弗莱彻），但无人死亡。驱逐舰在特混舰队周围投放了深水炸弹，但攻击者（日本潜艇伊-26）紧急下潜逃脱了。“萨拉托加号”损管得力，尚能以自己的动力蹒跚而行，但它也必须像“企业号”一样返回珍珠港的干船坞进行维修，直到11月才能再次投入战斗。 [\[52\]](#)

接下来的两周里，几乎每天都有发现潜艇的报告，有的是通过声呐装置发现的，有的是通过空中侦察发现的。9月6日，“大黄蜂号”上的一架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在第61特混舰队上空进行反潜巡逻飞行时发现了一道鱼雷的轨迹，朝它投放了一枚深水炸弹。鱼雷偏离了航线，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另一枚鱼雷在几秒后没有到达目标就爆炸了。第三枚鱼雷与“大黄蜂号”擦身而过后继续前进，差一点击中“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大黄蜂号”的一架远程侦察机看到敌方一艘潜艇位于水面上，向其投放了深水炸弹，结果未知。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汇报：“四次发现目标，可能是虚假情报，也可能不是，特混舰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躲避。”[\[53\]](#)

9月中旬，戈姆利派剩下的两个航母群为运送第7陆战团的运输舰队提供远程的掩护。增援部队成功登陆，但是第61特混舰队再次试图在“鱼雷会合点”这一危险水域侥幸通过，而这次它的运气很差。9月14日下午，在熟悉的西北航道上，“胡蜂号”航母、“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和10多艘警戒舰正以16节的速度航行。下午2时15分，“胡蜂号”开始迎风航行，让飞机起飞，然后在2时42分回到280度的航向。转向还没完成，瞭望员便发出警报，有三枚鱼雷正在逼近右舷。鱼雷锁定了目标，并且快击中了，“胡蜂号”一枚也躲不开。

第一枚鱼雷击中了舰岛前方。威力巨大的爆炸使整艘航母弹了起来并向前倾，两架F4F战斗机被抛入大海，数百名船员被甩向空中。海军少尉约翰·詹克斯·米切尔是一名22岁的海军学院毕业生，他被抛到了30英尺高的空中，并在60英尺外落了下来。他回忆道，第一枚鱼雷撞击时发出“一种巨大的可怕噪声，就像火车在爬楼梯。我再睁眼就是十天以后了，我当时就想要根烟”。（受伤两周后，他在努美阿医院的病床上对记者开玩笑说：“我正考虑要求他们承认我的着舰是合格的。”）[\[54\]](#)第二枚和第三枚鱼雷也击中了这艘航母，每一次都将整艘船掀起。在机库甲板上，飞机被这样的力量抛起然后落下，起落架被压碎了，有两架吊在上方的战斗机落在下方的飞机上。

美国海军可以感到自豪的，是其损管的设施和训练都很到位。要是再幸运一点，“胡蜂号”完全有可能幸存下来。尽管二次爆炸的碎片在舰桥周围横飞，舰长福里斯特·P.谢尔曼仍然沉着稳定地操舵。他让“胡蜂号”向右迎风转向，好让风把火焰向左舷吹。[\[55\]](#)数百名船员因此可以到舰尾避难。威廉·C.钱布利斯中校指出，船上的人应对这种局面时冷静而高效，“用他们一贯的劲头处理眼前的危机”。[\[56\]](#)

但“胡蜂号”在最糟糕的时刻被击中了船体最脆弱的航空汽油箱附近。这里发生了爆炸，冒出炽热的火焰。由于刚刚发射了飞机，“胡蜂号”的燃料管里还充满了燃油，大火顺着软管蔓延到了机库甲板前部。

（这一致命的困境与日本航空母舰在6月4日上午中途岛战役中遇到的困境相似。）二次爆炸迅速发生，并产生了毁灭性的效应。在机库中，地狱之火包围了充满燃料的飞机。机翼油箱爆炸了，炸弹和鱼雷爆炸了，飞机上的0.30英寸和0.50英寸的机枪也开始自动开火。机械师切斯特·M.斯特恩斯上尉好不容易来到机库甲板上，却发现有一颗鱼雷正在一架起火的TBF“复仇者”飞机下面燃烧。他迅速卧倒在甲板上，躲避威力巨大的爆炸。他抬起头时，“既没有看到飞机，也没有看到鱼雷和甲板”。挂弹点旁边的架子上留下的几枚炸弹显然已经引爆，留下了一个“贯穿升降井的大坑”，里面“烈火熊熊燃烧”。[\[57\]](#)

“胡蜂号”朝右舷倾斜了15度。前端的所有电线和总水管都被切断了。铆钉从装甲钢板里跳出来，像子弹一样在空中乱飞。大部分通信线路瘫痪，导致舰桥无法与甲板下方的电台通信。右舷前部高射炮附近准备就绪的弹药被引爆，碎片在整艘“胡蜂号”上坠落如雨。[\[58\]](#)

这次毁灭性的攻击是由日本潜艇伊-19发起的。它发射了六枚鱼雷，其中五枚击中了美国舰艇。三枚击中了“胡蜂号”，一枚击中了驱逐舰“奥布赖恩号”，另一枚鱼雷从“戴尔号”驱逐舰的龙骨下滑过去，差一点击中“马斯廷号”驱逐舰，最后击中了“北卡罗来纳号”，喷薄而出的水和燃油飞溅到战舰桅杆那么高。“奥布赖恩号”的舰首从第10根肋骨处被炸断，但是它踉踉跄跄地开走了。（它在返回美国本土的途中沉

没。)“北卡罗来纳号”的右舷被炸开，但是它设法凭借自己的动力开走了。在那之后不久，伊-19又从尾管处发射了另一批鱼雷，但它们都未击中目标。警戒舰开始以“之”字形大幅度机动，并在整个区域内投放了深水炸弹，赶走了敌方潜艇，但是一艘潜艇也没有摧毁。

下午3时5分，汽油蒸气引发猛烈的爆炸，撕裂了“胡蜂号”。火焰蹿升到150英尺高。舰岛前面的四架1.1英寸高射炮被连根拔起，抛向空中。高射炮周围的全体成员都瞬间丧生。两周前开始指挥第61特混舰队的利·诺伊斯将军被抛到信号台的甲板上。他的脸、头皮和耳朵三度烧伤。整个舰岛内部浓烟密布，迫使所有人都撤退到舰尾。人们聚集在飞行甲板上，燃烧着的碎片不断落在他们头上。一名盘旋在上空的飞行员说，“胡蜂号”的“整个舰岛变成了白色，就像肌肉上的皮肤被烧掉一样”。[\[59\]](#)

在袭击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后，谢尔曼意识到一切已不可挽回，便命令全体弃船。人们开始顺着绳索往下爬，或者干脆跳进海里。大爆炸仍在继续，碎片落在“胡蜂号”周围约200码的区域内。巡洋舰和驱逐舰放下救生艇，在落水者中来回穿梭，把他们救上来。[\[60\]](#)

整个下午“胡蜂号”都在熊熊燃烧，直到燃烧到舰首时，火势才渐渐弱了下来。钱布利斯回忆说，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时，这艘航母“完全被火焰包围，呈现出一幅奇特而迷人的画面。在热带夜空的映衬下，它看起来就像装饰了奇幻的霓虹灯”。[\[61\]](#)上层的钢板闪耀着明亮的橙色。由于油箱破损，燃油和航空汽油泄漏到海里，大火向四周蔓延了几百英尺。8点过后不久，几艘驱逐舰向燃烧的船体发射了几枚鱼雷，以确保其沉没。9点，它向右一歪，舰首沉了下去；随后它慢慢滑进海里，只剩下舰尾；最终，它完全沉没了。

此时，“大黄蜂号”成了南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最后一艘能投入战斗的航母。它接收了“胡蜂号”遭到袭击时正在飞行的26架飞机。有45架飞机随“胡蜂号”沉到了海底。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屠杀中，“胡蜂号”只

有173名军官和士兵阵亡，这要归功于谢尔曼优秀的掌舵技术以及护航驱逐舰的快速搭救。

特混舰队不断受到潜艇攻击的威胁，而此时“胡蜂号”又突然沉没，这沉重的打击最终促使尼米兹发布了命令。“在长达三个星期的时间里，第61特混舰队一直游弋在临近供应航线的海域，这片海域有敌方潜艇出没。任务没有规定特混舰队必须在该地区行动，”因此，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写道，“我方特混舰队的作战区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彻底更换一次。”^[62]

^[1] Jackson, *That Man*, p.111.

^[2] Jackson, *That Man*, p.111.

^[3] Harold Smith account in Rosenau, ed., *Roosevelt Treasury*, p.323.

^[4] 杰克逊·波洛克，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斯福新政时期曾为联邦艺术计划工作。由于该计划要求艺术家创作写实主义作品，不合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宗旨，波洛克在那段时期没有取得太大成就。——编者注

^[5] 马克斯兄弟，美国知名喜剧演员，拍摄的电影旨在使观众忘却现实中的烦恼，沉醉于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注重改造现实的罗斯福新政理念不符。——编者注

^[6] 这些机构分别为：物价管理局、生产管理局、国防工厂公司、战时生产委员会、战时情报局、战争资源委员会、优先供应与分配委员会。——作者注

^[7] Lippmann, “Awkward Giant,” p.9.

^[8]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202.

^[9]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242.

^[10]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 2nd sess., Vol.88, Part 6, pp.5538-41.

^[11]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111.

^[12] 1平方英尺≈929平方厘米。——编者注

^[13]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312.

^[14]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15]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 2nd sess., Vol.88, Part 6, p.7691.

^[16] “Washington in Wartime.”

- [17] Leahy, *I Was There*, p.136.
- [18]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380.
- [19]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41.
- [20] John L.McCrea, "Setting Up Map Room in White House and Other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Service There," interview by W.W.Moss, March 19, 1973, p.4, FDR Map Room Papers,Box 178.
- [21] *Ibid.*, p.6.
- [22]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161.
- [23] Leahy, *I Was There*, p.122.
- [24] Entry dated April 15, 1942,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249.
- [25] *Ibid.*, p.246.
- [26] Churchill to Roosevelt, July 9, 1942, in Loewenheim, Langley, an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222.
- [27]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398-99.
- [28]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p.398-99.
- [29] Baldwin, "Solomons Action Develops into Battle for South Pacific."
- [30] Baldwin, "U.S.Hold in Solomons Bolstered."
- [31]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1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 [32]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p.79-80.
- [33]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3,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 [34]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p.81-82.
- [35]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5.
- [36] *Ibid.*, p.6.
- [37] Astor, *Wings of Gold*, p.155.
- [38]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5.
- [39] Brand, *Fighter Squadron at Guadalcanal*, pp.95-96.
- [40]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0.
- [41]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7.

[42]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89.

[4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48.

[4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McCain to Vandegrift and Geiger, September 14, 1942, p.1, Alexander Vandegrift Collection, Coll/3166, Box 2, folder "Correspondence Jan-Sept 1942."

[45] McCain to Vandegrift, September 20, 1942, p.1, *ibid*.

[46] Harold H. 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47]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25.

[48]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1.

[4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47.

[50]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30.

[51] C.O. *Enterprise* to CINCPAC, "Action of August 24, 1942, Report of," September 5, 1942, CV6/A16-3/(10-My), Serial 008, p.2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52]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enclosure "Hull Damage and Damage Control Measures,"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53]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in *ibid*.

[54]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40.

[55] Cmdr. William C. 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56] Cmdr. William C. 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57] Lt. Chester M. Stearns, interview in November 1943 on board *Baltimore*, Morison's Notebook, Pacific XII 194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8]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enclosure "Captain Forest Sherma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59] Hersey, "Sinking of the Wasp."

[60] Cmdr. William C. 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61\]](#) Cmdr. William C. Chambliss, USNR, oral history,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6.

[\[62\]](#) CINCPAC Report, "Solomons Island Campaign—Torpedoing of SARATOGA, WASP, and NORTH CAROLINA," Serial 03168, October 12,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7.

第五章

秋天的东京，公园里似油画一般五彩缤纷，色彩斑斓，仿佛是用画笔涂上了金黄、橙红的色彩。空气并不算潮湿，透着沁人心脾的清凉。在晴朗的早晨，从山顶上眺望，可以看到富士山。在日本人的心中，没有什么比看一眼富士山那白雪皑皑的峰顶更令人心满意足的了。

不同于日本的其他城市，东京是研究新旧日本的一个范本。整座城市蓬勃发展，古代与现代元素并存。随处可见穿着定制三件套西服、戴着呢帽的绅士与身着鲜艳和服的女士一起散步。汽车、有轨电车、自行车、人力车与牛车来来往往，竞相争道。新颖的广告牌和绚烂的霓虹灯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使人们不再只关注悬挂在木杆上的灯笼和随风飘扬的旗子。输电线、工程起重机、高架铁路在青黑色的瓦屋上建起。这座大都市最近几年才开始飞速发展，大型办公楼和公寓楼在中心金融区、商业区和政府区拔地而起。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狭小的木制房屋里，挤在微型社区中。屋舍之间仅由一条条比小巷稍宽一点的鹅卵石小路连接起来。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房子在城里大片崛起，但建房子的工人依旧穿着忍者鞋和缠腰布，就像几十年前甚至几个世纪前一样。

在和平时期，人们很少能见到裕仁天皇。但现在，作为战时的精神领袖和国家主权的象征，人民给予了他更多的关注。1942年10月，随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天皇两次坐着红色的劳斯莱斯进入了灰色石墙后的帝国大院。10月15日，他在靖国神社主持了悼念15021名战争死难者的仪式。3万人前去参拜、致敬。一名新闻摄影师在神社巨大的鸟居下捕捉到了许许多多悲伤而又虔诚的面孔。29日，天皇出席了第13届明治神宫体育大会，运动会中的“拼刺刀大赛”深受欢迎。当月还有公众举办仪式纪念一名牺牲的船员，该船员曾随微型潜艇炮击澳

大利亚的悉尼市。一艘休战船带着四名海员的骨灰从悉尼出海，于1942年10月9日抵达日本。^[1]报刊只颂扬了几名牺牲的海员献出生命的壮举（他们进攻澳大利亚死敌的任务其实无异于自杀），却没人敢赞扬敌人送还他们遗体的骑士精神。

此时，日本民众允许知道的是，日军还在陆海空三大战场持续攻打盟国。在国家的严格管控下，报纸和广播中净是对胜利的宣传和对敌国的轻蔑。《国际写真情报》的编辑们对美军的口号“牢记珍珠港”嗤之以鼻。（“是的，日本也记得，”他们写道，“记得同一天，同一个港口。”）^[2]日本首相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掌握着政权，他在陆军省的公开演讲上声称：“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负隅顽抗。但是利用丰富的物质资源，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消灭他们。”^[3]日本已在“太阳旗”下建立起了庞大的太平洋帝国。它的统治范围北起阿留申群岛西部，南至东印度；西起缅印边界，东至所罗门群岛。曾任驻华盛顿大使的日本将军野村吉三郎说，在太平洋地区，盟国的处境很不乐观，因为日本“只需守住占领的地区就可以了”。^[4]如果战争贩子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个大反派被本国人民推倒下台，和平也许就会到来。直到那时，盟国才会采取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承认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日本人上街集会，高喊口号，挥舞着帽子、提着灯笼列队游行，祭拜靖国神社里的亡灵。显然，他们仍然支持这场战争，并且热情并不比刚开始的几个月少，当时日军在短期之内收获了一连串胜利。然而，表面之下也隐藏着诸多不满的迹象。为了这场战争，日本人顺从地接受了物资严重匮乏的处境，忍受严格的配给、劳动力征召、新闻审查制度、对政党活动的压制，以及“邻组”颁布的民防法规。但生活水平正在恶化，日常生活所受的严格控制正在失去其曾有的魅力。餐馆因食物短缺而倒闭。城际火车票十分紧俏，售价往往会超出其应有的价格。12月，为了遏制股价下跌，政府直接控制了股市。^[5]这一代日本人习惯于把战争作为准永久性条件，因为日本自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来，一直在

发动战争。过去，与所有敌人无限期战斗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到了1942年的秋天，人们开始明白这是一场全面战争，必然会以完全胜利或完全失败的方式结束。

女性们在街角一起缝制深红色的千针带，这是一种传统的护身符，人们相信它能让佩戴者免受敌人子弹的伤害。数百万士兵和水手把这种护身符藏在制服里面。此时的日本民众完全无法想到，他们的士兵会在1944年到1945年间伤亡惨重。但死亡人数在1942年底就已急剧上升，征兵人数也已经开始逐渐增加，征兵年龄却逐渐下降。东京的面包师荒川裕代（Hiroyo Arakawa）^[6]说：“人人都担心征兵令会落到自己头上。”^[7]没有什么比富人和有关系的人免除兵役更能激起日本人的仇富心理了。有谣言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上流家庭的年轻男子免服兵役，那些儿子被派驻到海外的父母听说后被激怒了。荒川说她丈夫有个堂弟，出身显赫，在鹤见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工作，曾经几次收到入伍通知，但每次家里都能安排他免于服役：“大人物总能得到最好的东西。”^[8]军人和警察可以不付钱就取用食品或其他商品，这也让她感到愤怒。

随着军人们因伤或休假回国，他们总会带来一些和国内的报道不一样的战争消息，这些消息日本国内从来没有提到过。8月7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受伤的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于秋天返回东京休假。他被国内铺天盖地的自负宣传震惊了——传单满天飞，满大街的喇叭不停放着军乐，厚颜无耻地保证日本仍会实现压倒性的胜利。他写道：“整个日本都沉浸在虚假胜利的泡影之中。很难相信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正在进行。”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后方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报纸和广播中所发布的消息。他母亲就悄悄地问过他，日本是否真的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赢。”他回答道。失败带来的后果太可怕了，没人敢去想。^[9]

山本五十六住在超级战列舰“大和号”的装有空调的豪华套间里，这

艘战列舰此时正位于日本以南约1 600英里处的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停泊在巨型钴蓝色潟湖中，周围安放了防鱼雷网。作为联合舰队总司令，他工作没有特别努力，而且工作时，注意力也并不总是在战争的问题上。他常和朋友及笔友互通信件。他会和军官们玩玩将棋，而且常常以钱做赌注。他写诗很快，而且（据他的日本传记作家的说法）写得并不是很好，但他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崇拜者向他求字，他也有求必应。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山本从不痴迷于工作，对他来说这一评价并不是贬低他，至少在他忠实的参谋长宇垣缠看来是这样。宇垣缠总是批评那些拿琐碎的小事给总司令带来压力的指挥官。他认为应该让总司令保存精力，关注最高级的战略决策。

按传统来说，山本这个级别的高官生活就应该奢华一些，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在军官室里吃饭，餐桌是抛光的柚木桌子，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饭菜精美，完全可以和东京餐馆里价格昂贵的菜肴相媲美。海军请来了专业的厨师来给他主厨。午餐是西式的，搭配银制餐具和洗手碗；晚饭通常是日本料理，有烤海鲷、鸡蛋羹和寿司等佳肴。山本偏爱的食物，例如沙丁鱼，都是从日本远道空运或海运过来的。船上的面包房会供应新鲜的面包和其他烘焙食品。船员们被派去潟湖钓鱼，为他的寿司供应最新鲜的食材。

山本非常享受美食，并且吃得非常开心。他很少有机会锻炼，以至于渐渐发福，身体超重。他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但是他体格强健，脖颈粗壮，还有像运动员一样的强大信心。山本式的敬礼在日本非常出名，常常会出现在战争时期的纪录片中。这是一个随意的姿势，堪称点到为止——他举起胖乎乎的右手，抵在帽檐的右缘，肘部伸得直直的。他的勤务兵总是很小心地保管他的制服：在热带地区，他总是穿着纯白、挺括、熨得平整的制服露面，黄金纽扣和菊花肩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并不是特别注重形象的人，但他的形象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山本是一个温和的人，对军官总是很善良和周到。但他与旗舰上的船员们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船员们一看到他就会立刻敬礼，直到他走远后才敢走动。通常，山本只有在舰只离开或是飞机飞过时才会在甲板上露面

敬礼。

在西方人的眼里，山本是偷袭珍珠港和六个月后灾难性的中途岛海战的首要推动者。在日本人的眼里，山本的形象更多面一些。这些形象主要是他在战前作为内阁次官和外交官给公众留下的。在日本的“幽谷”时期（1930—1945年），军国主义分子执掌了政权。平民政府无法控制军方，军方却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职能，包括内政、经济和国际职能。军方领导人压制政党，剥夺了日本议会的权力，把媒体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并控制了内阁大臣的任命。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陆军和海军将领都成了政治家、文职大臣和外交家。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美国或英国评价海军军官的标准来评估山本的职业生涯。其实这样做有点不得要领。除了海军事业，山本五十六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太平洋战争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也是日本政坛的关键人物，而且他可能还是除了天皇之外日本最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山本蔑视陆军和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一向反对日本激进分子用暴力革命和暗杀来实现目标。他是海军中温和的“条约派”的领导者，以支持不受欢迎的裁军条约而闻名。他的竞争对手指责他追求名利，培养记者以确保新闻报道对自己有利，为自己在政治上制造优势。毫无疑问，这些指控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果山本不是如此擅长玩政治手腕，那他在20世纪30年代内阁反复洗牌的过程中不可能幸存下来。但他也的确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去阻止日本与英美开战。

山本代表日本参加了1935年的伦敦海军会议，支持日本批准在政治方面不得人心的军备限制。这些做法以及其他方面的立场，使他有了生命危险，因为右翼狂热分子扬言要暗杀他，并至少尝试过一次刺杀行动。1939年8月，他从东京的海军省调到联合舰队担任总司令；这一调动是有意安排的，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他远离那些意欲谋杀他的人。他的旗舰通常停泊在广岛湾，他在这里仍然对国策发表意见。他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使日本与纳粹德国及意大利结盟），并呼吁日本军队撤出中国。

山本是那个时代少数有勇气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日本人之一。他年轻的时候曾两次被派驻美国（一次是在哈佛学习英语，另一次是在华盛顿担任海军武官），其间他对美国规模庞大的经济资源和工业基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只要看到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一个人就会清楚日本以其国力没办法与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10]他预言太平洋战争很可能会成为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美国无比强大的生产能力将让日本规模小又不够先进的战争工业相形见绌。无论如何，日本都没有希望彻底击败美国。只有与美国谈判，获得有利于日方的条件，日本才有可能“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考虑到这些因素，山本认为“任何普通的战略都无法让日本人看到成功的希望”。^[11]然而，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战争都注定要来临，于是他开始摸索速战速决的手段。他承认，袭击珍珠港是个“孤注一掷的想法”。^[12]偷袭可能会一击制胜，也可能一败涂地，但他们必须搏一把，为的是让华盛顿政界认识到与日本开战得不偿失：“吾辈应尽最大之努力，于开战首日决定战争命运。”^[13]

这场袭击在战术上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8艘战列舰全部被炸毁，180多架美军飞机大部分还未起飞就被摧毁。日军航母成功逃脱，仅仅损失29架飞机。这场胜利，以及战争初期日本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迅速征服，使山本的人气和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借助这种威望，山本迫使军令部听从他的意愿，强制通过了一项计划，准备集中日本全部的海军力量，于1942年6月进攻中途岛。和袭击珍珠港一样，中途岛行动也是为了提前结束战争而向美国海军发起的出其不意的袭击，旨在毕其功于一役。然而这场赌博以日本损失4艘航母和所有的飞机结束，成了海战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失败之一。虽然高层小心翼翼地对本国民众隐瞒了这场惨败，但是山本失去了对军令部的影响力。东京方面的将军夺回了战略决策权。

中途岛的惨败让山本无法释怀，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的看法变得灰暗、冷漠，开始听天由命。山本警告过不要打消耗战，而日本现在却

深陷其中；除了投降，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从中脱身。到了1942年中期，虽然他绝口不提，但他一定已经知道，整个日本正在走向最终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最终的失败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这绝不会给他带来安慰。他再也不能影响东京方面的决策了；此时，他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做出海的总司令。与日本的敌人作战是他的职责。在最终的痛苦结果到来之前，他都要这样做，无论结局是怎样的，也无论它什么时候来临。他不指望自己熬过这场战争。他在1942年9月预言：“不出百日，我将耗尽生命。”^[14]

在外出作战的海军官兵中，关于“大和号”长期驻港这件事，有很多愤怒的说法和传闻。“大和号”和与其吨位一样大的姊妹舰“武藏号”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列舰。这两艘战列舰满载的时候都可达到7万吨，可装载2 700人，而且都装有9门18.1英寸口径的巨炮。它们是由笃信战列舰之威力的海军将领们斥巨资建造的，在这些人心目中，“大和号”和“武藏号”是在传统海军的炮战对决中摧毁美国战列舰的关键，因此也是赢得海战的关键。但是到当时为止，这两艘战列舰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而且直到1944年它们才会参战。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锚地，一开始是停泊在濑户内海的柱岛，此时是停驻于特鲁克群岛南部的舰队基地。“大和号”被人戏称为“大和饭店”。后来，一个货船上的军官评论说：“我们一直被派往最前线，而那些战列舰却一场战斗都没有参加过。像我们这样的人……会被派往最前线，而来自海军兵学校的那些浑蛋则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和饭店’和‘武藏饭店’里无所事事。”^[15]事实上，作为作战舰艇，这两艘超级战列舰没什么大用。不论在哪个战区，它们都会在离敌人很远的时候就遭到空袭，根本没机会用巨炮轰击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两艘超级战列舰实在是太耗油了（每艘都配有6 300吨的油罐），让它们在海上行动，会给海军带来巨大的资源压力，尤其是在美军潜艇已经开始干扰日军石油供给线的情况下。

宇垣将军每天都会在个人日记中评价战事的进程。他的日记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这一宝贵的文献是从旗舰指挥官的角度观察瓜达尔卡纳

尔岛战役的真实的一手资料。日记的开头记录了战争爆发至中途岛行动的情况，这一阶段宇垣经常会记录山本的决策和命令。然而，到了1942年夏天，总司令似乎不再管理日常的行动了，留下他的参谋长收拾烂摊子。宇垣开始以第一人称记叙（“我决定……”“我命令……”），并经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指令，不再用山本的。

8月7日，宇垣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消息表示担忧，并在日记中提到应该立刻把他们赶走。一个月之后他才认识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这里的行动必须优先考虑，哪怕需要暂停对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进攻。他抱怨无线电通信不畅，导致“大和号”发送命令和接收消息总是出现延迟。与此同时，他深受牙痛的困扰，这似乎使他在夺回亨德森机场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备感绝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关键是什么？地面战，海战，还是空战？宇垣在分析的过程中一直摇摆不定。美军登陆六天后，即8月13日，他写道：“目前最紧急的事情是派一支部队清除敌军的残余，营救驻军，修好机场。”^[16]一周后，8月20日，他确信“最迫切的事情”是“通过空袭和夜间轰炸破坏飞机跑道”。^[17]四天后，他又得出结论，认为对拉包尔进行航空增援和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陆地增援一样迫在眉睫，因为日方必须“尽早摧毁敌人在岛上的空中力量”。^[18]他意识到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漫长的距离非常妨碍航空行动，但他愿意接受沉重的空战损失。然而，到了9月1日，他的结论又变成必须在地面上击败美军：“最终，瓜达尔卡纳尔岛必须以地面战来夺回，即便是以较大的牺牲为代价，此外没有别的办法。”^[19]

8月25日那场不具决定性意义的航母战斗之后，宇垣希望日本舰队继续留在前线，这样当美军试图通过海上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补给时，就可以跟美军战斗。他提到东京方面终于意识到了事态有多么严峻，开始紧急向该战区运送舰船、飞机和增援部队。但供给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石油供应——油轮极为短缺，而主力舰队进入所罗门群岛

消耗了大量的燃料。特鲁克群岛目前还没有在岸上储存燃料的能力。舰船有时会靠在“大和号”旁边，通过“大和号”的巨型油箱加油。

宇垣缠认为，陆军始终无法突破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是因为陆军作战不够勇猛，这里他流露出了海军军官对陆军典型的蔑视。8月20日至21日，一本清直的部队被消灭后，他以为那些士兵是在滩头被打死的，他们本应该“勇敢地冲锋”，尽快越过滩头阵地。^[20]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猜错了。一本清直确实是发动了无畏的冲锋，但是是冲向火力强大的河岸，他和手下的800名士兵被美军海军陆战队猛烈的防御炮火彻底消灭了。9月中旬，在海军陆战队所谓的“血腥岭战役”中，川口将军的部队被击退，并且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被迫朝西撤退，在此之后，宇垣的陆军联络官似乎“不知所措”。宇垣猜测陆军方面可能“过于轻敌”了，这么想倒是完全正确。^[21]但他和陆军方面的指挥官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否低估了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兵力。他们认为岛上有7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实际上有超过11 000人，另有4 000人于9月18日抵达。

随着可调遣的海陆军部队越来越多，日本的海陆军指挥官准备用一场全面的进攻来打破持续六周的僵局，并抢占机场。日本需要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这种压力来自天皇本人。战后，裕仁天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无权的傀儡，但在1942年9月和10月，他曾不断鼓动陆相和海相主动进攻，把美国人赶出瓜达尔卡纳尔岛。裕仁天皇的要求就相当于从天上传下来的命令。但是，陆军和海军都不需要太多的鼓励。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已经上升为民族意志之战。日本陆军尤其感觉遭受了奇耻大辱。日本陆军一向看不起对手，结果两个精锐的支队都被敌军击败。10月初，大本营将第十七军一个整编师的约两万名士兵派来参战。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得到了大力增援；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布因，一条新的战斗机跑道投入使用；还有一名新的指挥官，海军中将草鹿任一，被派遣到拉包尔负责指挥。海军将行动次数加倍，加强了夜间轰炸，派遣战列舰“金刚号”和“榛名号”在大批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用14英寸的杀伤

性炮弹猛烈地轰击亨德森机场。

10月11日，山本五十六和宇垣缠在“大和号”的露天甲板上看着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特鲁克群岛的航道快速驶出，其中包括4艘航母、4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这些航母将从所罗门群岛的北部横扫过去，在亨德森机场被占领之前待命，占领机场后开赴南部或东部地区搜寻并摧毁敌方舰队。宇垣缠在日记中透露，即将到来的进攻将会动用“联合舰队的大多数战舰”。失败是难以想象的：“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在即将到来的行动中取得成功，不惜任何代价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22\]](#)

时年57岁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是一名老派的绅士。他的性格跟他的上级欧内斯特·金大为不同。尼米兹从来不对下属大喊大叫，从不酗酒，不接近女色，也不说脏话。1941年12月7日之后，他接手了一个支离破碎、意志消沉的司令部，但在他的领导下，这里的人很快恢复了信心和士气。他是那一代人最尊敬的海军军官，如今他被尊为美国海军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与一对白眉和一头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来自一个地位卑微的德裔美国家庭，家里是开小旅馆的。他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封闭的内陆地区，并在那里长大。他从小既说英语也说德语。长期的远足、游泳和网球运动使他体格健壮。闲暇时候，他喜欢瞄靶射击，掷马蹄铁，玩克里比奇牌戏，以及用留声机听古典音乐。

他职位很高，这对他有一些约束，但是，他本人性格温和且外向。他喜欢与人交往，并且总能跟人推心置腹。他让所有舰艇的指挥官都知道，只要他们来到珍珠港，就欢迎他们前来会面。他的办公室每天从上午11点就处于“开放状态”。他有很大的指挥权——250万人和1 000多艘军舰皆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些日常的会面对他来说很耗时间，但是这也让他与舰队的每一层都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尼米兹是一个天生的战士，他总是坚持让战火烧到敌人的土地上。他拥有祖先日耳曼人天生

的军事能力。他的祖先是萨克森日耳曼人，拥有过贵族的头衔，并且曾被授予盾徽。他的参谋长雷蒙德·埃姆斯·斯普鲁恩斯少将后来跟大家说，尼米兹是他见过的人里唯一完全无所畏惧的，并补充说：“他的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时刻都能战斗。……他希望手下的军官能够主动进攻日本。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被派往别处。”^[23]

当金将军首次宣布他野心勃勃、充满风险的“瞭望塔”行动计划时，尼米兹完全不发表意见，藏而不露。历史记录中几乎找不到线索表明他是否赞同金的想法。当戈姆利和麦克阿瑟建议推迟进攻时，尼米兹仍然保持沉默，既不支持也不质疑他们的观点。但是当金否决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确定要进行“瞭望塔”行动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就全神贯注地投入在了行动上。虽然他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情况还很危险，但他认为戈姆利的报告未免太过悲观、保守。尼米兹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经历过几周险恶的日子，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期间则像是走在刀尖上，他的想法不会轻易地被南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出现的挫折动摇。在萨沃岛战役中，四艘盟军巡洋舰的沉没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胡蜂号”的毁灭更是如此。但是，就算不能保住瓜达尔卡纳尔岛，盟军也在一点点削弱日本人的力量。从长远来看，日军会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的重压下举步维艰。“记住这一点，”尼米兹在得知“列克星敦号”在珊瑚海战役中被击沉后告诉下属，“我们不知道敌人的损失有多严重。但是大家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也遭受了损失。他们的处境同样不轻松。”^[24]他在谈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时也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9月24日，尼米兹离开了珍珠港，在六名参谋的陪同下进行了大范围的视察。一架PB2Y“科罗纳多”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从东湖摇摇晃晃地冲向天空，然后向南转弯，朝着960英里外的小岛帕尔迈拉飞去。帕尔迈拉是中太平洋上的偏远小岛，建有补给站和紧急跑道，是通往南太平洋的空中航线中的一站。飞行员根据指南针指示的方向，一直在单调的蓝色海洋上空飞行，目标是一个呈马蹄形的有着沙滩和矮树的小岛，这些特征很容易被云层遮蔽起来。他们有时会飞过雷暴云，飞机不停颠

簸，让人很难受。导航员希望能接收到无线电信号，没有信号时，就只能靠航位推算飞行了——看指南针，保持航线和速度，遇到侧向风的时候还要根据对风速的猜测来修正航线，而风速大体可以通过观察海浪猜测出来。没有什么比坐在一架二战时期的飞机上飞越太平洋更能感受到太平洋的浩瀚无垠了。

“科罗纳多”鼻锥特别大，是上单翼飞机，高高的驾驶舱在机身的前方。它的飞行里程只有大约1 000英里，但是武器比较强大，所以在遇到敌军战斗机的时候，比PB4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更能击退对手。在距离帕尔迈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尼米兹飞机上的一个引擎失灵了。飞机安全着陆，但是替换的飞机需要从珍珠港调过来，会耽误很长的时间。下一站是坎顿岛，在帕尔迈拉岛西南方向800英里处。这段路途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尼米兹与麦凯恩将军会了面，此时麦凯恩已经被解除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的职务，正在北上的路上。麦凯恩跟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谈了自己对于瓜达尔卡纳尔岛空战的看法。他比戈姆利乐观一些，但是他劝尼米兹赶紧将后备飞机派往圣埃斯皮里图岛，做好准备，支援这个双方激烈争夺的岛屿。麦凯恩还强调了航空燃料供应和飞行疲劳症这两个关键问题。

第二天，飞机前往遥远的斐济加油。机上的乘客于9月28日下午抵达努美阿，随后直奔戈姆利的旗舰（“阿尔贡号”运输舰），参加下午4时30分的会议。

戈姆利看起来状态不太好。此前，尼米兹在其他人身上也看到过这种指挥官的疲劳症。^[25]其典型表现就是体重减轻，目光显示出焦躁的情绪。戈姆利看起来很憔悴，心神不宁。他的处境加剧了他的焦躁情绪。戈姆利未能从岛上的法国殖民者那里征到可用的营房和指挥部，于是选择在停泊于敦比亚湾（Dumbea Bay）码头的旗舰上设立指挥部。这里十分拥挤，异常闷热。尼米兹得知，戈姆利已经一个月没有下船了。每当有参谋递给戈姆利一封急件时，这位指挥官似乎都会为自己看到的東西而吃惊，并且会喃喃自语：“天哪，我们该怎么办呢？”^[26]这

位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神经非常脆弱，他没有照看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9月28日在“阿尔贡号”运输舰的军官起居室召开的会议是太平洋战区高级指挥官集体参与的最大规模会议之一。麦克阿瑟将军拒绝前往他指挥的战区以外的地区（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坚持这一点，直到1944年7月他接到命令去夏威夷面见总统），派参谋长理查德·K.萨瑟兰少将以及航空队司令乔治·C.肯尼中将代替他前来开会。南太平洋战区的参会代表有戈姆利、特纳以及负责指挥该战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米勒德·F.哈蒙少将。此外还有美国陆军航空队高级指挥官“福将”亨利·阿诺德，他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四位成员之一，视察战况时正好经过这里。

尼米兹先是跟大家寒暄了一下，作为开场白，紧接着让戈姆利做一下简报。戈姆利表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主要问题，是为海军陆战队员提供后勤支援比较困难。目前只剩下两艘快速运输舰；航空汽油储备仅有5000加仑；而从美国国内运输额外补给和物资的船只装船不够仔细，所以货船清单没法提供所携带货物的准确记录，也无法指出货物存放的位置。努美阿以及新西兰以北的其他所有地方都缺乏先进的港口设施，因此重新装载这些货物到攻击作战运输舰上再运至瓜达尔卡纳尔岛几乎是不可能的。尼米兹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表示理解，说：“我们所去之处，货物处理、住宿安排以及油料储备的情况都十分糟糕。”^[27]特纳预测，日军随时都可能派遣一支精良的登陆作战部队、三四艘航母，以及其他适合登陆战的军舰，以重新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就算岛上的日军在埃德森岭战役之后一直没有动静，那也只是“小憩片刻”。^[28]

这次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暴露出了南太平洋战区内部的紧张形势，这种紧张形势在所有跨兵种、跨战区的协作中都存在，而且其实在全世界所有战场上都存在。麦克阿瑟的代表萨瑟兰将军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并不像对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和米尔恩湾的防卫那样重要，因为那些地方的5.5万人容易受到攻击。他说，戈姆利的海军应该向西作

战，以阻挡日军朝这些地方进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的笔记总结了这次交流：

尼米兹：不能肯定日本“即将进攻莫尔斯比港”。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更容易阻止我们。

萨瑟兰：麦克阿瑟将军希望戈姆利的舰队可以保护整片海域……舰队不应该被限制在一条战线上。应该往澳大利亚派驻更多军舰，包括TF-1〔战列舰〕。从战略上说，这将比驻扎在珍珠港更好一些。

尼米兹：TF-1必须留在夏威夷。

肯尼：日军占领了很多铝土矿，可以制造出更多的飞机。

尼米兹：日本人并不开心。他们损失了100万吨舰船……还有从日本运来的航空汽油。

肯尼：日本利用占领的铝土矿，每月可以增产2 000架飞机。

尼米兹：我不相信日本每月可以建造2 000架飞机。

肯尼：我们应该拿下拉包尔。

特纳：我们现在还拿不下来。我们必须继续从外围推进。在此地拥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之前……就贸然进攻，我们只能白白消耗实力。

萨瑟兰：我们想建立一个两栖作战军校。

特纳：我们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我们的学校是“仙人掌”。

尼米兹：关于戈姆利将军为麦克阿瑟提供掩护的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航母来对抗日本的空中力量，但航母不能固定在一个位置。我们现在只有一艘“大黄蜂号”；“企业号”到10月6日会赶过来。

萨瑟兰：一旦占领了巴布亚的北部海岸，我们就能把战斗机部署在那儿，把轰炸机部署在莫尔斯比。

肯尼：日军如果拿下米尔恩，就能轻松攻击莫尔斯比。

尼米兹：我仍然要说，日军不会马上就到。

肯尼：日军如果来了，就会斩断我们的补给线，我们在莫尔斯比的5.5万名将士就会饿死。

尼米兹：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已经有什么就给他什么了。[\[29\]](#)

两个战区的问题都十分明显，而且来自华盛顿的“福将”阿诺德还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他的信息会让毛呢桌布旁的所有人都无比困扰。这位未来的五星上将认为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军航空部队“过多了”。他提醒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盟军的全球战略目标是优先打败德国。他们不能让美国的航空力量深陷于太平洋战争中无法脱身，而与此同时更危险的敌人还在欧洲肆虐。他计算了一下，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指挥的飞机加在一起有1 314架，此外还有302架在运输途中，总计是1 616架战机。而他估计这一战区内日军的飞机顶多有554架。海军要求获得更多的飞机，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抽调。阿诺德反对这么做。给太平洋战区增强航空力量的做法应当立刻停止，甚至要反过来——盟军应当从太平洋战区向欧洲转移航空力量。他很清楚，这些观点绝不会“让海军的高级军官或麦克阿瑟将军满意”。[\[30\]](#)

阿诺德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更加支持和维护“德国优先”的原则。根据此前跟英国达成的协议，美国陆军航空兵将在英国南部机场集结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从那里与英国皇家空军一起对德国发动大规模的轰炸。集结空中力量的计划因为“瞭望塔”行动和“火炬”行动而被迫推迟。1942年7月，9支强大的航空大队前往太平洋战区，另有11支前往非洲。在1942年9月3日交给哈里·霍普金斯的备忘录中，阿诺德以强硬的措辞表达了自己对于美国航空力量分散到边缘战区的担忧，并提醒霍普金斯，战争必须按照“德国优先”的战略进行。他既不能指望马歇尔也不能指望金支持这一战略：“在我写下此备忘录的时候，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从西南太平洋到西北太平洋抵抗日军。……而陆军则出于这

样那样的原因，不断因形势、政策和政治目的而更改主要目标。”而“这些将战力在全球范围内零星分布的做法和小规模行动”所带来的代价，是让空袭德国工业核心地带的行动濒于失败：[\[31\]](#)

〔海军的〕主要目标在南太平洋。海军部队正在慢慢壮大实力，索要更多的空中支援和地面支援。每次海军为太平洋的行动增加力量，都会从其他战区抽走一些作战资源。这些增援也许会拯救我们的海军，或者防止已经被我们占领的岛屿被夺回，但另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即使海军从这个战区完全撤出，我们也不会输掉整场战争。更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夺取所有的岛屿，包括新不列颠岛，我们也不一定赢得整场战争。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击败德国，我们就必将获胜。[\[32\]](#) [\[33\]](#)

这种太平洋地方主义并非海军独有的态度。次日阿诺德与麦克阿瑟在布里斯班会见时，专横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提出要500架战机，什么种类都行。当阿诺德提到对于欧洲的承诺时，麦克阿瑟给出的专业意见是：“英国永远建立不起来足够的为第二战场提供空中支援的航空基地。”[\[34\]](#)阿诺德大为惊诧，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德国优先”原则是盟军全球战略的基点，而这里竟然有一位盟军战区总司令从理论上都不接受这一原则。阿诺德的结论是，所有的下级司令部都“应当认可这一点，那便是为了赢得战争，美国只有一个计划，而且这也是盟军的计划，所有人都要遵守执行”。[\[35\]](#)

9月29日的下午，尼米兹乘坐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航程前往圣埃斯皮里图岛。这里是为瓜达尔卡纳尔岛守军提供直接援助的前沿航空基地和后勤基地。在那里，麦凯恩的继任者，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杰克”奥布里·菲奇将军迎接了他。

尼米兹为圣埃斯皮里图岛恶劣的境况感到震惊。该岛两个月前才砍

掉丛林并开辟出机场，从那时起他就得到了有关这里的详细报告。尽管如此，尼米兹亲眼看到当地的景象时，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循环的跑道，没有交通管制，甚至连控制塔都没有。机组人员住在很原始的茅屋和帐篷里，极少得到娱乐或者休息。他们身心疲惫到了极点，许多士兵都染上了疾病。在塞贡海峡，他看着燃料桶一个个从运输舰上被卸下来投到海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游”到岸边，然后被搬到卡车上，再被分散卸装到燃料桶存放处。每天都会有两万加仑的航空燃料靠这种使人极其疲惫的方式运到这座岛上。

尼米兹向几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颁发了荣誉勋章，并向菲奇颁发了优异服务勋章。之后他和随员登上了菲奇提供的陆军B-17飞机，前往620英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B-17的航程足够长，并且这个空中堡垒外壳结实、火力强大，足以应对埋伏。但是年轻的飞行员飞进了锋面，很快就汇报说无法确定自己的方位，这等于是在委婉地表示他在白雾中迷失了方向。飞机上所有的人都扫视着下面的大海。阿瑟·拉马尔上尉从背包里掏出《国家地理》的南太平洋地图，试着把经过的岛屿的轮廓与地图上的位置对应起来。他们找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随后飞到了其北边的海岸。终于，他们看到了那放满破旧的战机、随处可见弹坑以及一个个帐篷营地的窄小泥泞的机场。飞机在大雨中一直滑到跑道的边缘才停下来。尼米兹冒雨走下了飞机，范德格里夫特前来迎接。

下午放晴之后，范德格里夫特带领尼米兹巡视防线。尼米兹会见了几名团长，团长们低声向他汇报了他们所观察到的战况以及战备情况。他看到了成百上千尚未埋葬的日本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分布在埃德森岭南边的丘陵上。盖格将军在“宝塔”里向尼米兹做了空战的简报，尼米兹也注意到了在岛上征战了一个多月的机组成员疲惫的表情。在战地医院，他向那些伤员以及因为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而病倒的士兵发表了讲话。“我所指挥的战场的严峻形势让他印象深刻，”范德格里夫特在回忆录中提到来访的总司令时写道，“对此我其实并不感到抱歉，因为我想

让尼米兹亲眼看看我们究竟在和什么样的人作战。”[\[36\]](#)

第二天早上，尼米兹要颁发勋章，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为了写颁奖词，当天夜里一直忙活到很晚才睡。赫伯特·L.梅里拉特上尉觉得整个过程特别随意。颁发勋章的数量并不是由关于英勇行为的公正标准决定的，而是由“将军携带的勋章的数量和种类”决定的。不少军官为自己的作战单位游说，讨价还价，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嘉奖。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添油加醋地夸大，而很多战功卓著、真正有资格获颁勋章的将士则无疑被忽略了。梅里拉特在日记中坦承，自己因无须决定谁能获得奖章而感到释然，因为“这里有太多真正的英雄了”。[\[37\]](#)

表彰仪式在早上6点半举行，地点是范德格里夫特的棚屋门前的竹林。拉马尔上尉宣读颁奖词，尼米兹将军则走向那一列海军陆战队员，将勋章别在他们胸前。这一庄严场面被山丘上的一些海军陆战队员的歌声和叫嚷声打破了，他们不知道这边正在举行仪式，直到得到警告，他们才安静下来。当尼米兹走向一个中士并向他授予勋章时，这名中士突然昏倒在地。他醒来之后向尼米兹道歉，解释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四星将军，吓得要死”。[\[38\]](#) 范德格里夫特获颁海军十字勋章，这让他十分惊讶，同时也十分感动。

由于头一天的倾盆大雨让亨德森机场一片泥泞，返回圣埃斯皮里图的航程被迫推迟。有1 000英尺的跑道仍未铺设钢板。两架飞机准备起飞，其中的第一架（搭载着尼米兹）未能升空。飞机滑出最后一段没有铺设钢板的跑道，失控地旋转起来，最终在山沟的边缘停了下来。尼米兹从飞机上下来，然后和范德格里夫特去吃午餐。他们要等太阳把跑道晒干。到了正午，他们再次尝试起飞，这一次B-17摇摇晃晃地冲上天空，向东飞去了。

海军陆战队还在忍耐。他们忍受着让人萎靡不振的湿热。蚊虫的骚扰永无休止，而经常一下数小时的大雨让他们的散兵坑和兵营帐篷里灌

满了水。患上疟疾后，他们时而浑身冒汗，时而浑身颤抖。每当有个把小时的放松时间，他们就会拿上肥皂冲进隆加河。冲进河里的士兵擦洗着身子和军装，尽可能地在棕色的水中洗得彻底些，而他们的战友则守着机枪放哨，以防有敌人或鳄鱼出现。但是不论他们怎么搓洗也没法洗干净“热带皮肤病”，水肿和开放性伤口在士兵的手腕、胳肢窝以及胯间不断增加。伤口越挠越严重，士兵们互相提醒着千万不能去挠伤口，但还是迟早忍不住挠起来。痱子是这座散发着恶臭、神也抛弃的岛上另一个无法逃避的困扰。海军陆战队员把战友的尸体抬走，怀着敬意将他们掩埋，将木制十字架或木棍插在坟前，上面悬挂一顶头盔。对于打死的日本兵，海军陆战队员会拿走他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作为纪念品，甚至会敲掉他们的金牙当作战利品。日本兵腐烂尸体的恶臭在微风中飘散。没有掩埋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蚂蚁，没过多久就被啃得只剩下光滑的白骨。

自8月9日起，他们就一直在问：“该死的海军到底在哪里？”显然，这是明知故问。他们是海军陆战队员，没有别人好依靠，只能靠自己。第1陆战师沦为了“第1流放师”。“U.S.M.C.”（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解释成了“山姆大叔可怜的孩子”（Uncle Sam's Miserable Children）。他们被人耍了。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教导，是做精锐的冲锋部队，他们是两栖作战专家，是专门突击敌人的海滩，并建立滩头阵地的。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应该留下来连续几个月保护这个滩头堡。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一直以为，原本的作战计划是要陆军前来接替他们的位置，海军陆战队员则撤回后方休整，做一些补充训练，接下来前往离东京更近的某座岛屿执行两栖攻击任务。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个个月后，每一个海军陆战队员都会问：“该死的陆军到底在哪里？”无疑，这又是明知故问。被留下是他们的宿命，就像在威克岛上那样。他们是“乔治”，而姊妹部队都商量好“让乔治去做”^[39]。他们在散兵坑里不约而同地唱起悲伤的歌曲。他们唱的歌词不登大雅之堂，是根据英国远征军的歌曲《保佑他们》改编的：

他们派海军来到图拉吉，
勇敢的海军同意了；
他们分成了一千个小队，
朝着不同的方向进军。
我的天哪！多么混乱的集结！

（合唱）

队伍如此杂乱！队伍如此杂乱！
队伍高矮不均，杂乱无章；
再见！该死的水军和陆军。
再见！该死的将军和所有人。
所以我们向他们说再见，
让我们回到藏身的散兵坑；
麦克阿瑟的大海中不再有晋升。

所以，加油吧，海军陆战队员们，去他妈的所有人。[\[40\]](#)

特纳掌管的几艘攻击作战运输舰在努美阿、维拉港（埃法特岛）、圣埃斯皮里图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不定期航行，但供应短缺的问题难以彻底解决。食物储备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尽管海军陆战队从未真的到了快饿死的境地，但是他们需要减少口粮来维持生存，这削弱了他们的精力和体力。每个人的体重都轻了二三十磅。弹药会卸在隆加角，随即会按照军需官的指挥分发到各地储存起来。弹药储备量通常很低，以至于海军陆战队员常常被提醒，除非他们确定能击中敌方士兵，否则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运输舰安全抵达铁底湾后，人们固然很高兴，但是在隆加角简陋的港口卸货需要异常细致的操作，此外也需要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果日本的空袭不期而至，运输舰就得赶紧起锚，在海湾里

快速机动，这样会进一步减少卸货的时间。10月初，最短缺的物资当属航空汽油。航空汽油后来过于稀缺，不得不靠DC-3运输机携带55加仑的燃料桶运往亨德森机场。

被海军陆战队称作“仙人掌特快”或是“东条英机特快”的“东京特快”夜复一夜地将小批量的日本士兵运到美军士兵所在位置西边的海滩上。田中的快速驱逐舰继续作为运输舰执行双重任务。由于速度快，它们可以在夜幕降临之前逗留在“槽海”里，超出亨德森机场的轰炸机的飞行范围，等天一黑，就在黑暗的掩护下快速开过来。如果卸运速度够快，这些驱逐舰还能朝海军陆战队的营地发射几枚炮弹，然后重新向西疾驰，于黎明前跑出飞机的攻击范围。

但是田中的驱逐舰无法将整个师都运送过去，至少无法按照日本雄心勃勃的计划设定的时间表完成这一工作。陆军第十七军司令百武晴吉中将需要真正的运输舰来执行这一任务。日本人从痛苦的经验中已经领悟到，只要亨德森机场存在，美军飞机就能在他们接近的时候发动攻击，让他们的运输舰无法驶进铁底湾。因此，日方必须找出办法，让亨德森机场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作用，好让一个陆军师登陆。他们一直试图做到这一点，尝试了两个月，但到当时为止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不会失败——更准确地说，他们**不能**失败，因为天皇本人坚持要他们成功。

范德格里夫特反复请求增加士兵。但是他的上级领导特纳对地面部队的部署有非常不同的想法。两个指挥官发现他们两人总是意见相左。特纳倾向于让地面部队分散在许多岛屿或滩头，而范德格里夫特和他的参谋则倾向于集中兵力。特纳将军坚决要让第2陆战团（原本要替换已被部署在萨摩亚的第7陆战团）按兵不动，稍后登陆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此地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东300英里。范德格里夫特的手下认为恩代尼岛并不重要，他们劝特纳将这支部队留作预备队，以便在战斗变得比预计情况更激烈的时候加强隆加的防守。直到特纳将军在9月11日亲自见证了日军对亨德森机场凶猛的地面攻击和海军炮击（一个海

军陆战队的参谋说，特纳揣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跳进了散兵坑），他才同意将这支部队派到隆加。

至于已经在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员，特纳认为他们应该积极进攻。9月28日，他催促范德格里夫特越过马塔尼科河，将沿着海岸向西排布的“敌军掩体”一网打尽：“我相信你以此时的实力完全可以追击并歼灭他们。”^[41]处境艰难的海军陆战队员听出他话里有话，知道他是在暗示他们作战有些消极被动，当然对此感到愤怒。此外，在战役的这个阶段采取地面攻势既不可行也不明智。第1陆战师缺乏沿着海岸追击日本人的装备、武器和弹药。海军陆战队控制了岛上唯一的机场，因此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守卫好这一宝贵财富，让这里拥有足够的空中力量。日军会一如既往地守备森严的美军防线进行猛攻，而美军只要守住防线，进攻者就会像此前一样，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但特纳就是听不进去。10月初，两位长官就美国陆军亚美利加师第164步兵团的部署问题再次发生了争论。范德格里夫特要求将这个团作为增援部队驻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特纳则想让该部在恩代尼岛登陆。一开始，戈姆利暂时批准了特纳的计划。但是哈蒙将军在10月6日十分强势地介入，主张将该部派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他告诉戈姆利，恩代尼岛会是“分散兵力和精力的地方”。他警告说：“除非驻岛力量能够得到加强，否则日军有能力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至图拉吉岛一线，并且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就会这样做。”^[42]戈姆利否决了特纳的命令，于是第164团在10月13日于隆加角登陆。

美军的登陆还导致了另一场萨沃岛附近的海军行动——跟两个月前的萨沃岛战役惊人地相似，但是这次的结局让美国人比较欣慰。运送美军的运输舰有四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护航，由海军少将诺曼·斯科特指挥。10月11日至12日晚间，斯科特的军舰伏击了日军前往铁底湾轰炸亨德森机场的纵队，该纵队由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这次突袭击毁了日军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并且重创了另外一艘巡洋舰。日军指挥官五藤存知少将受了重伤，不治身亡。斯科特损失了“邓肯号”驱

驱逐舰，“博伊西号”巡洋舰和“盐湖城号”巡洋舰也有所损伤。这场短暂却激烈的交火在史书中被称作“埃斯佩兰斯角之战”^[43]，美军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实际上双方的损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悬殊。（斯科特的报告说击毁了三艘日本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这一夸大的战果被美国媒体当作事实报道。）虽然这是一场胜利，但它没为海军陆战队员带来多少好处。同一天夜里的早些时候，田中的另一支船队成功地让增援部队和补给（包括野战炮）在隆加角附近登陆。两天后的夜里，日军一支规模较大的水面舰艇部队对亨德森机场发起了这场战役中最猛烈的炮击。

白天的轰炸加上夜晚的炮击，让亨德森机场变得千疮百孔。但是多亏工程营队员的辛勤劳作，机场还处于可用的状态。只要一出现弹坑，工程营就会修补好。每一个维修分队都直接管理机场旁的一个维修站。如果有炸弹落到跑道上，距离最近的维修分队就会冲向仍在冒烟的弹坑，把炸毁的钢板拖到一边，然后将卡车里的泥土和碎石倒入弹坑中，把替换的钢板拖过来铺在上面。“我们发现一颗500磅的炸弹会撕开1 500平方英尺的穿孔钢板，”一个工程营队员说，“所以我们就在跑道旁边放好相应数量的穿孔钢板，就像在铁路边提前放置额外的铁轨一样。”^[44]维修过程中，如果遇到敌人的零式战斗机低空扫射，他们就跳入沿着机场挖好的战壕寻求掩护——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直接跳进弹坑里面。

每隔几天，都会有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陆军的飞机飞过来，替换被毁的战机，或者受损过于严重以致无法修好的战机。此时，“仙人掌航空队”已经拥有了十来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驱逐机，但是这里的主力战机还是舰载机——F4F野猫式战斗机、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以及TBF“复仇者”鱼雷机，由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或是海军飞行员操作。舰载机都装有特殊的起落装置，能够承受起降的冲击，因此能很好地适应坑坑洼洼的亨德森机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月里，海军飞行员的战斗时间比航母日常作业半年的战斗时间还要长。

轰炸机和鱼雷机每天都朝西北方向飞行，执行日常的侦察任务。傍

晚，它们可能会发现日本舰船朝瓜达尔卡纳尔岛驶来——“东京特快前往百老汇”——而一旦发现敌军，盖格将军就会集合手头的飞机发动空袭。每日进行的长时间飞行十分考验人的意志，危险重重，而且这不仅是因为日军会发动反击。在所罗门群岛，能见度随时都可能急剧下降。拉森反复命令第8鱼雷机中队的飞行员记下导航检查点。记忆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战斗飞行的压力之下：“在低可见度下，拉塞尔群岛或新乔治亚群岛的南端看起来就像是埃斯佩兰斯角。如果你没有随时看清自己的速度、时间和距离，就很容易迷路，等你意识到就晚了。非常容易迷路。”^[45]

当积雨云贴近海平面的时候，飞行员需要完全依赖仪器编队飞行，整个编队都隐没在迷雾和阵雨中。他们想尽办法与僚机飞行员保持联系，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机尾喷出的蓝色火焰。如果哪个年轻的TBF飞行员看不到前面的飞机了，他就会“上下摆动，直到我感受到气流变化，随后我会慢慢地照直往前飞，直到我重新让排气管喷出火焰”。^[46]编队飞行的飞机如果散开，失去联系，会独自飞回来。一道道闪光时不时冲破黑暗。那是炮火的闪光吗？还是闪电？或是火光？难道是一架友军飞机闪着航行灯在联系僚机，指引他飞回来？这都很难说。在如此大的飞行压力下，飞行员常常会因误读高度表数据而冲进海里。

连续进行四五个星期的战斗飞行差不多已让飞行员达到耐力的极限。这项日复一日的工作会带来身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三重折磨。六周后，哪怕其中最强大的人似乎都快被这巨大的压力压垮了。航空和医疗方面的权威人士逐渐意识到“飞行疲劳症”是一种切实存在而且不可避免的综合征，必须通过每四周到六周轮换战区的飞行员来防治。飞行员超越极限后，会变得无精打采，面容憔悴，眼神空洞；就算吃得很好，体重也会急剧下降；他们经常情绪崩溃，或在导航时出错以致迷失方向；他们反应速度变慢，攻击性减弱。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会爬到机翼下面，像个胎儿那样蜷缩起来，哭得像个孩子。如果哄骗和威胁不

起作用，就必须踢他们，直到他们踉踉跄跄地爬回驾驶舱。

特纳将军曾经否认飞行员会过度疲劳，这听起来太像娇生惯养的毛病了，但此时他称自己完全信了：“过去，每当医生跟我说起飞行疲劳症时，我都觉得是未经证实的说辞。但现在我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了。人都有个临界点，过了这一点，你就变得毫无用处；你感觉筋疲力尽，而且你对于这种状况基本上束手无策。”[\[47\]](#)

乔·福斯是南太平洋战区意志力最强的飞行员之一，他告诉一个海军调查团，战斗机飞行员最长能坚持作战六周。他说：“第四个星期你的精力就开始走下坡路。等到了第五个星期，你会发现身边好多战友都战死了，他们的技术都很好，只是因为有点疲惫或者困意，就在战斗中被击落了。”此外，福斯补充道，当飞行员休养一段时间再轮换回来，“你会发现这些飞行员特别容易疲惫。……我们休养回来后，我发现有些飞行员似乎到了第二周就不行了”。[\[48\]](#)

但是性格坚毅的拉森似乎不太接受这种观点。他坚信这些问题是平时训练不足以及领导力不足造成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克服它。如果飞行员能理解自己的恐惧并能预知恐惧的产生，他们就能更好地管控它。谈起自己，拉森说：“我知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之后缓了好几天；你会很紧张，而且这种紧张感是逐渐消失的。然而，在我们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了几轮攻击之后，你只会在降落后的10分钟到15分钟里有紧张反应。也就是说，你会感到兴奋和情绪激动。随后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且你不会觉得特别累。”[\[49\]](#)拉森建议每次飞行结束后给每个飞行员发一些威士忌：“我知道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是如果你让一个人在进攻后喝杯威士忌，他会觉得一切都还好。……这一点点特权会让飞行员感到好受许多。”[\[50\]](#)

事后提起时，海军陆战队员只把那次战斗称为“那一夜”。[\[51\]](#)10月13日至14日夜里，“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进入铁底湾，用14英寸口径的舰炮对亨德森机场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击。长期以来，海军陆战

队已经习惯了夜间的轰炸，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巨大的炮弹的轰击，相比之下，以前的每一次袭击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两艘战列舰都装载了500枚新型炮弹，旨在对停在地面的飞机和坚固的堡垒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在特鲁克潟湖进行的射击测试表明，这些炮弹（装有燃烧物和碎弹片，外壳较薄，会瞬间引爆）以25度角击中目标效果最佳。^[52]这就推算出了“金刚号”和“榛名号”的最佳射程：1.6万米。在这个距离，美国的岸炮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

在当天下午，日军已经进行了异常猛烈的空袭。不知为何，海岸警卫队员的警报没有及时发出，几架F4F野猫式战斗机在地面上遭到了攻击并被摧毁。空中轰炸在亨德森机场和“战斗机一号”备用草坪跑道上留下了弹坑。一个堆放燃料的地点被直接击中，蓝橙色的蘑菇云直冲天空。当西方的天空呈现出典型的热带日落时分的壮丽色彩时，西方传来了一种新的声音。日本的150毫米火炮正从美军看不到的奥斯汀山基地对机场进行炮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给这种火炮起了个外号，叫“手枪皮特”（Pistol Pete）。盖格将军命令已经落地的飞机滑行到“战斗机一号”，躲到射程之外。

夜幕降临时，日本的水上飞机在上空盘旋，随意地投下几枚炸弹，跟平常一样讨厌。11点过后不久，美军营地发出了“绿色情况”（一切正常）的信号，士兵们走出散兵坑和防空洞，回到睡觉的地方。“手枪皮特”整夜都在不时发射炮弹。士兵们会趁着二三十分钟的间歇稍微眯一会儿。大约凌晨1点钟的时候，“红色警报”响起，人们疲惫地回到隐蔽处。凌晨1点半，巡航机投下一颗照明弹，海上的舰艇也发射了一枚照明弹，直接在机场上空爆炸。

接着传来一声越来越尖厉的声音，有些像货运火车的汽笛声，之后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梅里拉特上尉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猛烈的爆炸声。”^[53]每次爆炸都会把一卡车的泥土炸到空中。整条战壕都被阵阵落下的泥土和岩石掩埋了。空气中充满了灰尘和烟雾，钻进了士兵的鼻子、耳朵、眼睛和喉咙里。米尔

斯少尉和另外几名飞行员一起躲在一个散兵坑里：

我们先是看到天空被炮火的闪光照亮，听到警报声，然后听到炮弹飞来的呼啸声，最后是爆炸发出的可怕轰鸣声。椰子树被震裂，倒在地上；弹片在空中呼啸；有几枚哑弹落入丛林，蹦跳几下后没有爆炸。我们闻到了炮弹爆炸的味道。天空时而阴森森的，时而被照明弹闪烁的火光照亮。有些炮弹落在离我们的防空洞只有二三十英尺远的地方。有大家伙落地时，洞壁就像有人用勺子把巧克力布丁往外舀一样震动起来。^[54]

即使在最深、结构最坚固的防空洞里，巨大的震动也会把人抛向空中，甩向墙壁。此时，拥挤的防空洞比空的要好。如果防空洞里的人够多，他们就可以互相依靠，互相支撑；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就像一名工程营队员所说的，“你会像乒乓球一样在散兵坑里乒乒乓乓地乱撞”。^[55]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几名参谋在指挥所的防空洞里躲避时，外面有一枚炮弹爆炸了，“把我们像一排保龄球的球瓶一样击倒在地”。将军站了起来，“只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并没有受伤”。^[56]每一声炮声都会把椰木屋顶上的泥土抖落下来。特文宁上校回忆说：“地面似乎变成了像果冻一样的东西，让人很难移动，甚至很难站直。”^[57]

在炮火最猛烈的时候，米尔斯藏身的地方有几个人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一名飞行员浑身上下剧烈地颤抖。还有一个人挣扎着钻到另外一个人身子下面。附近一棵树的顶部被炸断了，整个落在散兵坑上面。

大约凌晨3点，炮击停止了。趴在地上的人又听到了头顶上传来熟悉的“洗衣机查理”的嗡鸣声。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炸弹仍旧不时落下。与战列舰的炮弹相比，这些炸弹微不足道，但它们会冷不丁地袭来，仍然非常危险。没有人能睡着。范德格里夫特发誓，再有人跟他抱怨自己有战斗疲劳症或炮弹休克，他肯定不会说那个人胆小了。他表示，没有遭受过这种轰炸的人，无法“体会那种挫败、无助与恐惧交织

的感受，以及炮弹落在附近时所感受到的冲击”。[\[58\]](#)

黎明时分，这场轰击的结果展现在众人眼前。睡眠惺忪的人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战壕和防空洞，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赤脚，还有的在流血。他们心怀感激地小口喝着用空燃料桶煮的咖啡，那苦涩的棕色液体抚慰着他们紧张的神经。人们在残骸中仔细搜寻，发现了比餐盘还大的钢垫板，以及14英寸口径炮弹的一部分残余，有些重近20磅。[\[59\]](#) 机场附近的防空洞完全被泥土以及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掩埋，仍被困在里面的人必须靠外面的人给挖出来。[\[60\]](#) 马丁·克莱门斯在他所处位置的百米之内发现了“六个巨大的弹坑，其中任何一个都能放下一辆吉普车”。[\[61\]](#)

亨德森机场周围的停机坪上，到处都是烧焦、冒烟、变形的铝制飞机残骸。“仙人掌航空队”的一份清单显示，只有五架SBD俯冲轰炸机和七八架野猫式战斗机仍然可以飞行。所有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都必须进行大修才能重新飞行。第8鱼雷机中队的首席机修工认为，“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几乎都已彻底损坏，只剩三架可以修理，而其中只有一架能在一周内修好。幸存的飞机必须分散到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避开敌人。损毁的飞机排成整齐的一排，翼梢对翼梢，希望能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防线东端附近建了一个新的停机坪，由一支强大的海军陆战队守卫。

几个“复仇者”的飞行员由于失去了战机，暂时没有事情做；他们走回营地，发现这里几乎完全被毁了。帐篷要么消失了，要么成了一堆碎片；他们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蚊帐、行军床、桌子、文件和行李，都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乱作一团，散落一地”。幸存者都很紧张，但也有点激动。海军少尉小罗伯特·E.里斯的一个举动把战友都给逗乐了：他“把两个眼角往耳朵方向扯，说了句：‘真是抱歉，请问去亨德森机场怎么走？’”[\[62\]](#)

数百桶珍贵的航空汽油被烧掉了。人们向军需官和补给官发出紧急

请求，希望能找到后备的燃料。许多小油箱被分散并隐藏在田野和树林中的小型贮藏处。人们找到了几百桶燃料，另有200桶从图拉吉岛转运了过来。后来盖格报告说，所有的剩余燃料都被加注到了岛上尚能升空的飞机的油箱中。他警告说，再来一晚类似的轰炸，可能会让整个航空队失去战斗力。

共有41人死亡。这个数字比原本可能出现的数字要低，这证明防空洞的深度和强度都达到了标准，另外所有人在轰炸期间都做到了低头隐蔽。一处防空洞被直接命中，九人当场死亡。一个新抵达的海军陆战队轰炸机中队同时失去了队长和副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猛烈的空袭、炮击和夜间的舰炮轰击（虽然不是战列舰发出的）持续不断。10月15日上午，美国人站在库库姆上方的断崖上，眼睁睁地看着6艘日军运输舰在塔沙法隆加

（Tassafaronga）以西约10英里处“肆无忌惮地卸载”。日本驱逐舰在离岸1英里多一点的海湾里巡逻，以保护运输舰。克莱门斯透过野战望远镜观察运送来的部队，看到他们整齐地排列成行。他说不清有多少人，但肯定有好几千。盖格试着让几架还能飞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日本运输舰发动进攻，有两艘运输舰中弹着火，可惜是在它们卸下货物和增援部队之后。

10月中旬是整场战役最惨淡的时刻。巴丹半岛和威克岛长长的阴影笼罩着隆加岛的防区。许多人似乎都头昏眼花，无精打采，茫然地望着远方。海军陆战队员将这种神情戏称为“千里眼的目光”。失去飞机的飞行员搜集能找到的任何武器，跃入战壕当起了步兵。自8月7日以来，被围困的海军陆战队员都是以辛辣的幽默和可靠的团队精神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此刻，他们之间的火气越来越大，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激烈地争吵起来。“每个人都犯了错误，”特文宁上校写道，“命令被错误地执行。通信失败。行动缓慢。”[\[63\]](#)

日军在西侧的兵力大大加强，开始沿着马塔尼科河展开试探性的进攻。范德格里夫特巩固了防线，但他并不完全相信美军的防线能经受住

协同攻击。撤退甚至投降成了可以想象的前景。第1陆战师的情报人员D-2开始销毁机密记录。各个作战单位开始制订计划，准备藏到群山和丛林之中，有什么吃什么，尽可能长时间地打游击战。“我想，我们都害怕失败和被俘，”F4F战斗机的地勤组长托尼·贝切克回忆说，“我们担心他们会把我们扔在那里不管。”^[64]海军航空兵少校约翰·E.劳伦斯回忆绝望带来的潜在影响时说：“无论我们是生是死，连骂我们的人都没有。绝望会渗入你的内心，让你无法相信自己的想法。”^[65]

根据特文宁战后的回忆录，戈姆利曾授权范德格里夫特在形势变得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带领部队投降。（没有相关的文件流传下来，但这样的文件也恰恰是人们期待被遗忘的那种文件。）第1陆战师的参谋当中，有人在暗中商量最后一搏。范德格里夫特下令执行应急计划，准备向隆加河上游撤退。特文宁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推荐了另一种选择——让海军陆战队沿海岸转移到东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每条河上建立临时防线，而且还有可能从海上撤离。

这种绝望的情绪一直蔓延到美国本土。《纽约时报》以告别的口吻报道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诺克斯部长在华盛顿对记者发表讲话时，拒绝保证这座岛屿能守住。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他曾表现出过分的自信，导致他陷入尴尬的境地，现在他决心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仿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传来的消息还不够严峻一样，10月16日的一份空中观察报告说有一艘日本航母出现在恩代尼岛以西的地方，而该岛位于亨德森机场**东方**330英里处，距离圣埃斯皮里图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补给线近得可怕，这让戈姆利的信心大大地动摇了。那份报告是错误的，不久就纠正过来了，但在那之前，戈姆利已经发出了可怜的哀求。他给尼米兹和金发去电报：“这似乎表明敌人要倾尽全力进攻‘仙人掌’，可能还有其他阵地。我的部队完全无法应付这一形势。紧急请求所有可派的空中支援。”^[66]

这位身陷重围的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从未将“瞭望塔”行动转入进攻。在他还没有建立起初步的指挥体系，没有召集到足够的参谋人员，甚至还没有建立固定的指挥部之时，金将军就把所有的任务都扔给了他。毫无疑问，他面临的后勤保障问题比任何其他盟军战区指挥官所面临的问题都要严重，但戈姆利养成了一个坏习惯，那就是在明知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请求增援。从行动一开始，他和他的参谋就显得神经紧张，拿不准主意。当努美阿的法国殖民者拒绝提供办公楼时，他以天生的外交官般的冷静心态接受了对方的拒绝，在又挤又臭的旗舰上办公。他没有出席至关重要的战区司令会议，特别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之前于“萨拉托加号”上举行的作战计划会议（7月26日）。与麦凯恩、特纳、哈蒙和尼米兹不同，他从未踏足瓜达尔卡纳尔岛。

尼米兹在视察过程中仔细观察了他这个老朋友。他肯定已经从许多来源获知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的观察证实了这些报告中的描述。戈姆利不胜任这项工作；必须将他解职，另换他人。

对于这一问题，负最大责任的应该是罗斯福。戈姆利曾是派驻伦敦的海军特别观察员，直到哈罗德·斯塔克将军接替他的职位，而斯塔克海军作战部长的职位又给了金。1942年4月，斯塔克被调到伦敦，这其实是一次保全面子的降职，好让金可以同时担任海军中最有权力的两个指挥职务（海军作战部长和美国舰队总司令）。但戈姆利由此失去了一份工作，这让总统很不舒服，因为他认识这位将军已经超过25年了。罗斯福问他的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戈姆利该怎么安排呢？”麦克雷不知道，他也是这么跟总统说的。他还说，戈姆利很可能会失去临时的中将军衔，恢复到少将的永久军衔。罗斯福回答说：“好吧，替我告诉金，由于我们必须给斯塔克找个职位，就让戈姆利失去中将军衔，我认为这不公平。”^[67]这话既然是从海陆军总司令嘴里说出来的，就等于是命令他给戈姆利再找一个中将军衔的职务。

事后来看，尼米兹本应在9月视察南太平洋战区期间或之后就解除戈姆利的职务。有证据表明，早在9月7日金和尼米兹在旧金山会面时，

两人就讨论了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更换人选问题。^[68]但戈姆利是一位可敬的军官，为军队奉献了40年的时间。他是同届毕业生中的明星，（像尼米兹和金一样）他的才华、奉献精神和勤奋工作使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迅速获得了晋升。解除他的职务将给他的职业生涯和后世的评价留下失败的污点，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向兄弟军官打这样一拳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责任，这让尼米兹感到犹豫。

10月15日，在珍珠港的一次会议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高级参谋们以一种强硬而坦率的态度向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已经到了近乎抗令的程度。舰队情报官埃德温·莱顿说，他们劝总司令“不要再考虑个人品格的问题，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应该被工作更有效的人取代”。^[69]无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海军当中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尼米兹激烈地批评他们的做法近乎“叛变”。但是这些人不屈不挠。当夜晚些时候，几名军官代表前往马卡拉帕司令部，拜访了尼米兹，重申了他们的理由，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穿着睡衣接见了他们。当时哈尔西已接管航母特混舰队的指挥权，正在前往南太平洋的途中。此时让哈尔西前往努美阿，然后命令他接替戈姆利担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尼米兹被说服了，但没有明确答复。

第二天早上，戈姆利哀叹“完全无法应付”的电报（160440号）就到了。尼米兹向金本人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鉴于戈姆利的160440号报文以及其他迹象，包括我在视察期间注意到的一些情况，我考虑尽早解除他的职务，让哈尔西代替。请指示。”^[70]金简短地做了答复：“批准。”^[71]

哈尔西在坎顿岛过夜的时候被指示直接飞往努美阿。10月18日下午2点，他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降落于努美阿港。戈姆利的副官乘一艘小船前来迎接，他递给哈尔西一个密封的信封，里面还有一个密封的信封，上面写着“机密”。这是尼米兹发出的一份急件，命令哈尔西立即接替戈姆利担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

哈尔西的一名参谋记下了哈尔西将军当时的原话：“耶稣基督呀！杰克逊将军呀！这是他们递给我的最烫手的山芋啦！”^[72]

^[1]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Vol.21, No.12, December 1, 2602(1942).

^[2] *Ibid.*, Vol.21, No.10, September 1, 2602 (1942).

^[3] Hideki Tojo, speech at the War Ministry, December 8, 1942, excerp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5.

^[4]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former ambassador to Washington, January 22, 1943, in *ibid.*, p.154.

^[5] 有日记表明此事发生于1942年12月17日，见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6。

^[6] 本书有一部分日语人名未查得准确汉字译法，凡加括注者均为音译。——编者注

^[7]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8]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9]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84.

^[10]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183.

^[11] *Ibid.*, p.281.

^[12] *Ibid.*, p.280.

^[13] *Ibid.*, p.279.

^[14] Junichiro Watanabe, “Isoroku Yamamoto and the Sword-smith Sadayoshi Amada,” Hisato Takeuchi, trans., Nihontocraft.com, online at <http://www.nihontocraft.com/YamamotoNBTHK.html> (accessed November 2014).

^[15] Reiji Masud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1.

^[16] Entry dated August 13,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183.

^[17] Entry dated August 20, 1942, in *ibid.*, p.186.

^[18] Entry dated August 24, 1942, in *ibid.*, p.193.

^[19] Entry dated September 1, 1942, in *ibid.*, pp.202-3.

^[20] Entry dated August 24, 1942, in *ibid.*, p.193.

^[21] Entry dated September 13, 1942, in *ibid.*, p.214.

^[22] Entry dated October 7, 1942, in *ibid.*, p.228.

[23] Astor, *Wings of Gold*, p.62.

[24] Potter, *Nimitz*, p.76.

[25] 5月份，哈尔西将军在连续指挥了几个月的航母战斗群后，因皮肤病而卧床休养。——作者注

[26] Ibid., p.236.

[27]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4.

[28]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4.

[29] Ibid., pp.1-3.

[30] Arnold, *Global Mission*, pp.360-61.

[31] Arnold to Hopkins, “Plans fo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September 3,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

[32] 丘吉尔也从皇家空军指挥官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悲叹，见“Air Marshal A.T.Harris to Prime Minister, Personal and Secret,” June 17,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作者注

[33] Arnold to Hopkins, “Plans fo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Enemy,” September 3, 1942, Harry L.Hopkins Papers, Book 5: The Air Offensive, Box 313.

[34] Arnold, *Global Mission*, p.344.

[35] Ibid., p.342.

[3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p.171-72.

[37] Entry dated September 30, 1942, excerpted in Mer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59.

[38] Arthur Lamar,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3.

[39] “让乔治去做”是一句成语，意为“让别人去做”。——译者注

[40] Les Cleveland, “Soldiers’ Songs: The Folklore of the Powerless,” *New York Folklore*, Vol.11,1985, online at <http://faculty.buffalostate.edu/fishlm/folksongs/les01.htm>.

[41] Turner to Vandegrift, September 28, 1942, quoted in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69.

[42] Mer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p.177-78.

[43] 在日本被称为“第二次萨沃岛战役”。——作者注

[44] Huie, *Can Do!*, p.41.

[45]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7,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4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36.

[47] Tregaskis, *Guadalcanal Diary*, p.250.

[48] Joseph J.Foss, USMCR,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April 28, 1943,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p.11.

[49] Harold H.Larsen, interview in Navy Department Bureau of Aeronautics, January 18, 1943, p.7,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6.

[50] Ibid., p.11

[51]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80.

[52]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November 12-13, 1942, p.60, item 300,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3.该报告对10月13日至14日夜间日军轰击时使用的炮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可参见Admiral T.Koyanagi,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Box 3, “Guadalcanal”。

[53] Entry dated October 14, 1942, in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79.

[54] Mears, *Carrier Combat*, p.145.

[55] Huie, *Can Do!*, p.46.

[5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76.

[57]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121.

[5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76.

[59] Merillat, *Guadalcanal Remembered*, p.180.

[60] Huie, *Can Do!*, p.46.

[61]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57.

[62] Mears, *Carrier Combat*, p.146.

[63]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157.

[64] Bergerud, *Fire in the Sky*, p.82.

[65] Lt.Cmdr.John E.Lawrence’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6.

[66] COMSOPAC to CINCPAC, Info COMINCH, 160440,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2, p.950.

[67] John L.McCrea,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0, pp.170-71.

[68] 参见Col.Brown’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1。

[69] Layton, Pineau, and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p.461-62.

[70] CINCPAC TO COMINCH, 160937,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2, p.895.

[71] COMINCH TO CINCPAC, 160245, in *ibid*.

[72] Col.Julian Brown’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09.

第六章

回忆录、日记还有口述史中对此事的记载是一致的。听闻哈尔西接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的消息后，整个战区突然变得士气昂扬。“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一个海军航空兵军官回想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经历时说，“前一秒，我们还患着疟疾，一瘸一拐地爬出散兵坑；下一秒，我们就像孩子一样，边跑边叫。……只要士气够足，我们就能赢得这场战争。”^[1]大家都知道哈尔西是一个好斗、容易激动、爱冒险的人，他最爱的就是进攻。海军陆战队员都叫他“硬毛刷子”^[2]——意思是，他是一个挥毫泼墨的艺术家，而不是精描细画的绘图员。他不会因为战略和战术上的一些分歧而退却，他会动用手头的一切资源，全力打击敌人，一决胜负，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美国海军指挥官中向来不缺“硬毛刷子”式的人物，比如“还没动真格的呢！”的约翰·保罗·琼斯，“绝不弃船！”的詹姆斯·劳伦斯，还有“去他妈的鱼雷，全速前进！”的戴维·法格拉特。1942年10月，南太平洋的战场上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态度。它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给了他们胜利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盟军在所罗门群岛也曾到过溃败的边缘。在10月末至11月海战的高潮阶段，运气稍有变化，战争的走势可能会大为不同。美国的海上力量可能会遭到绞杀，海军陆战队则会被截断退路，并最终全军覆没。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哈尔西勇往直前、崇尚进攻的性格就会遭到人们的谴责，人们会认为他缺乏理性，鲁莽冒进（两年后的莱特湾战役的确让他招致了这样的批评）。

从接过指挥权之初，新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他可以把所有的筹码都拿出来，也可先收起来，等下一手好牌。

尽管第二种选择会影响士气，但是作为司令官，他必须要仔细考虑这一选项。长期担任其参谋长的罗伯特·卡尼将军坚称，哈尔西并不像报纸上描述的那样狂妄和冲动。他夸张的吹牛以及在演讲中提到的“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让他们去死！”都旨在和战士们拉近距离，鼓舞士气。范德格里夫特于10月23日飞往努美阿参加指挥官会议时，哈尔西更多是在听别人说话，而不是自己讲话。他先是听了范德格里夫特的发言，然后又听了特纳的发言。接着他让军官室里安静下来，叼着烟，手指不断敲打着桌子，脑子里不断地掂量着。最后，他平静地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你能守住吗？”^[3]

“没问题，我可以守住，”范德格里夫特答道，“但我需要更多的物资支持，现在的远远不够。”^[4]哈尔西承诺会提供范德格里夫特所需的一切。

很明显，一支规模庞大的日本海军进攻部队正在赶来。此时的情报还远远谈不上完善，但是新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知道，日本的舰队至少有2艘航母（可能多达4艘），还有许多水面舰艇，包括至少4艘战列舰。哈尔西有两个航母特混舰队，分别以“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为中心。后者在8月受损，返回珍珠港进行了修理。10月24日下午3时45分，“企业号”在圣埃斯皮里图岛与“大黄蜂号”会合。这两支舰队合并成了第61特混舰队，由海军少将托马斯·金凯德指挥，包括2艘航母、“南达科他号”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这支舰队的规模，只有此时正在南下的日本舰队的一半多一点。哈尔西真的是把他拥有的一切都投入了这场战斗，可以说这是一次十分危险的行动。金凯德接到命令，直奔圣克鲁斯群岛北部，寻机与敌交战。

日本“大和号”上的无线电监听员监听到了夏威夷广播的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报道中提到美军近日在所罗门群岛附近将进行“一场大规模海空作战”。^[5]美国很快就会进行国会中期选举，宇垣将军注意到了这一

点。罗斯福总统是否会下令在美国海军日（10月27日）采取重大行动，来为自己的党派赢得选票？这种推理方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日本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正确地推断出，哈尔西会派所有可用的海军力量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防御战中。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集中在一起，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海陆空进攻战，目标是抢占亨德森机场，同时歼灭美国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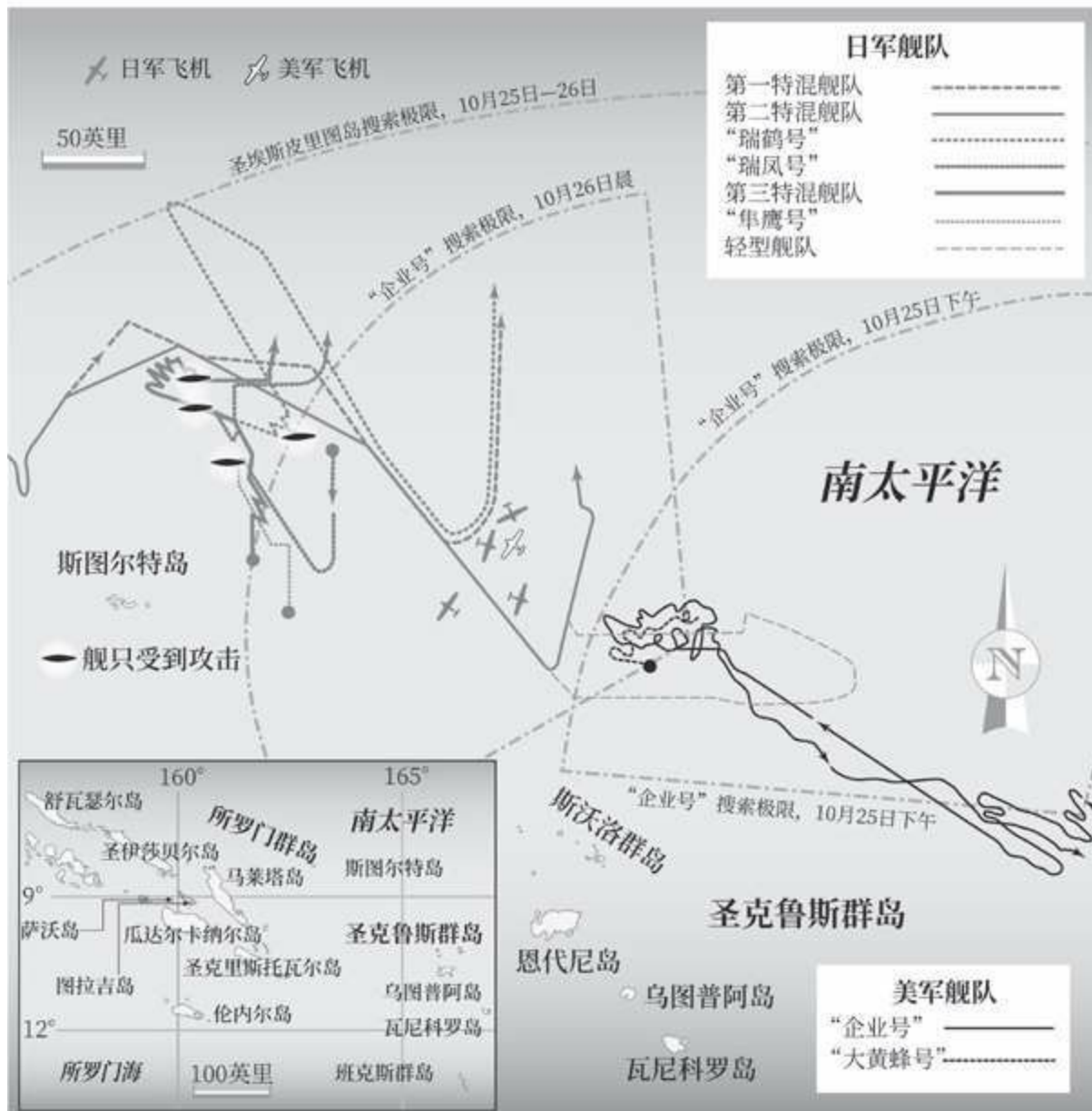
日方舰队的规模是自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2艘大型航母、2艘轻型航母、4艘战列舰，此外还有许多巡洋舰、驱逐舰和辅助舰艇，共61艘。正如中途岛战役那样，日方的计划是将海军分成若干位置分散的支队。日本舰队的先遣部队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他的旗舰是“爱宕号”巡洋舰，此外还包括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和“隼鹰号”轻型航母。由一些水面舰艇外加一艘轻型航母组成的侦察线将在“翔鹤号”和“瑞鹤号”这两艘大型航母前方约100英里处充当诱饵。和8月份进行的战役一样，日本的指挥官希望美国航母最初发动的空袭以侦察线为目标。日本陆军突破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并占领机场之后，各作战单位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集结。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日本陆军的人数已经很多，但是由于通信不畅，而且丛林地形险峻，部队行进受阻。对范德格里夫特防线的进攻比预期时间推迟了两天（从当地时间10月22日推迟到10月24日）。而这场进攻开始后不久就变成了小规模混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坚守阵线，给攻击者带来了极大的伤亡，日军和美军的伤亡比例大约为7：1。然而，10月25日清晨，一个日本士兵以为自己看到了亨德森机场发射的绿白色信号弹，这是事先约定的已经占领机场的信号，因此日军把这一有误的情报通过无线电发给了拉包尔。这一信息又被一级级呈交给宇垣和山本五十六，后者通过“大和号”上高高的信号天线，命令近藤信竹和南云忠一指挥舰队向南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寻机与美军舰队交战。先遣部队穿过了马莱塔岛北部的“必经水道”，遇到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派来的五架SBD俯冲轰炸机的拦截。这五架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击中了一艘驱逐舰和“由良号”轻型巡航舰。舰队在此掉头，仓皇而逃，丢下了被击中的“由良

号”，任其沉没。

与此同时，第61特混舰队正沿着圣克鲁斯群岛的北部浅滩前进，然后往西南方转向，朝着圣克里斯托瓦尔东部某处前进。在10月25日漫长的白天，两支舰队相向而行，都派出了空中巡逻队向前侦察。一架PBY水上飞机在上午11时3分发现两艘日本大型航母，但当时它们距离第61特混舰队355海里，大大超出了攻击范围。下午12时50分，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转发了一条其水上飞机的报告，称两艘日本航母正在西北方360英里处。金凯德下令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敌人，并决定出动29架飞机，实施联合空中攻击。飞机一直飞到搜索航线的尽头，又向西北方飞行了80英里，一无所获，最后于暮色中返回。第10战斗机中队的F4F飞行员在1.7万英尺的高空中飞了三个半小时，精疲力竭，氧气和燃料都快耗尽了。^[6]他们盘旋着降到云层之下时，根本就看不到“企业号”。由于燃料即将耗尽，他们只得降到离海面15英尺至20英尺的高度飞行，直到韦塔萨借着航行灯发出的光亮发现海面上的一道浮油痕迹。野猫式战斗机沿着油迹在海面上飞行了45英里才发现“企业号”。^[7]由于燃油耗尽，几架战机在海上迫降，还有几架在黑暗中尝试着舰时坠毁。^[8]

圣克鲁斯群岛战役，1942年10月25日—26日



一轮圆月在东方升起，海面上月光皎洁，亮度正适合进行空中搜索。PBY仍在侦察这片区域。凌晨3时10分，其中一架PBY发现了“瑞鹤号”长长的黑漆漆的甲板。金凯德一直准备让航空大队进行夜间轰炸，机组人员整夜都留在待命室里。但是因为还没有进一步确认敌军舰队的位置，他谨慎地选择将攻击部队留在甲板上，直至黎明。

10月26日破晓时分，两军相距仅200英里。天气晴朗，2 000英尺高的地方有朵朵积云与层积云，云层上下的可见度都很好。海面很平静，西北风的风速不到10节。^[9]这天一整天都有阵雨。上午7时40分，金凯德派出的侦察机中的两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发现了“瑞凤号”，并直接对其发动了攻击。两架轰炸机投下的500磅炸弹都命中了目标，击中了“瑞凤号”的飞行甲板中部。这艘小型航母没有沉没，但是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无法起降飞机了。^[10]

大约十分钟后，再往北几英里处，另外两架SBD俯冲轰炸机发现了“翔鹤号”和“瑞鹤号”。它们发出了敌情报告，并准备俯冲攻击，但是零式战斗机阻止了它们。这两架飞机躲进了云层，甩开了零式战斗机的追击。

此时，南云忠一和金凯德都开始向对方发起空袭。美军飞机分成三个小分队，分散在五六十英里的范围内，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正准备迎头截击它们。9架零式战斗机背对阳光向“企业号”的第10鱼雷机中队发动了俯冲攻击，美国机组人员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三架“复仇者”起火坠落了。^[11]无线电中充斥着混乱的对话，误导了追击的中队。“企业号”幸存下来的“复仇者”飞机在和零式战斗机交战的时候降低了高度，视野变窄了。它们没有找到日本航母，便转而攻击“筑摩号”，重创这艘日本巡洋舰，但是没能击沉它。^[12]10时50分，“大黄蜂号”派出的第一批战机在“翔鹤号”上空集合。“大黄蜂号”第8侦察机中队的队长“格斯”威廉·J.魏德海姆少校将曳光弹对准了迎面飞来的一架零式战斗机，将对手直接打得解体，然后他紧急俯冲，躲开敌人飞机的残骸。第二架零式战斗机从高处冲下来，算好了提前量，向他的飞机引擎发射了两三梭子20毫米的子弹。魏德海姆飞机的引擎冒出了黑烟，继而失灵。他开始坠落，退出这场战斗。（他安全地落入海里，不久，他和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乔治·斯托克利一起获救。）尽管受到零式战斗机的猛烈攻击，但是魏德海姆决心以战斗机而非俯冲轰炸机的方式应战，这转移了敌人对其余SBD俯冲轰炸机的注意，因而它们得以到达攻击位置并开始俯冲

轰炸。[\[13\]](#)

根据第8侦察机中队一名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的说法，“翔鹤号”防空火力全开，“就像圣诞树一样”明亮，[\[14\]](#)但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穿过高射炮密集的炮火，投下了1 000磅的穿甲炸弹。三枚炸弹贯穿了飞行甲板，在船舱内爆炸，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5\]](#)原为一大佐在一艘负责警戒工作的驱逐舰的舰桥上看到了“两三道银色的条纹，像闪电一样，延伸至航空母舰巨大的船体上。……整个甲板无声无息地隆起，然后爆裂开来。火焰从裂缝中冒了出来，越来越高，甲板上冒出白色和黑色的滚滚浓烟。看到这个景象，我开始呻吟”。[\[16\]](#)

上午刚到10点半，美军便已使两艘日本航母失去战斗力。尽管两艘船都没有沉没，这个战绩仍然很振奋人心。然而，与此同时，100多架日军飞机正在“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上空集结。上午9时5分，美军的雷达首次探测到来袭的敌机，特混舰队提高了速度，进行机动规避。9时59分，在1.7万英尺的高空中，执行战斗空中巡逻的飞机在特混舰队西北方大约40英里处第一次与敌军接触。“企业号”设法驶入暴风雨中寻求掩护，这样一来敌军就将空袭的重心转移到了“大黄蜂号”上。

9时9分，“大黄蜂号”上的高音喇叭发出警报：“敌人进行俯冲轰炸，全体戒备。”不久之后，一大队爱知“瓦尔”俯冲轰炸机大角度俯冲下来。这艘航母此时的航速是28节，正以“之”字形前进。高射炮发射出密集的炮火，但是仍有几架飞机在800英尺这个近乎自杀的高度精准地投放了炸弹。三枚250千克重的炸弹接连落在“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并在下层甲板爆炸。一架受损的爱知轰炸机径直朝舰岛俯冲下来，很明显，它的飞行员决定拼上性命，毁掉这艘航母的中枢。这架燃烧的飞机擦过烟囱和信号台，撞到中部的飞行甲板上。[\[17\]](#)飞机的燃油洒在“大黄蜂号”的上层建筑上，使其陷入一片火海。在舰岛下方的维修棚中工作的阿尔文·柯南说：“一道亮红色的火焰就像铁路上驶来的一趟特快，把周围的一切东西和人都撞倒在地。”[\[18\]](#)

几乎在同一时间，低空飞来的日军鱼雷机也从左右两侧同时靠近。它们试图越过或绕过警戒舰，接近“大黄蜂号”。“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的40毫米四联炮打下来一架中岛鱼雷机，当时这架飞机距离“南达科他号”只有30码。一名亲历者回忆说：“直接把它的机翼给锯了下来。”^[19]另一架敌机越过“南达科他号”，直接撞上了“大黄蜂号”的左舷，很明显飞行员是故意这么做的。燃烧着的飞机残骸滑过飞行甲板，落入了1号升降井。^[20]两枚空投鱼雷击中已经受损的航空母舰的右舷，掀起整个船体并使其剧烈摇晃。“大黄蜂号”失去了动力和电力，总水管被切断，内部通信系统也失灵了，而且船体向右倾斜了10度。^[21]

9时50分，“企业号”的CXAM雷达监测到了敌军第二轮俯冲轰炸机的攻击。“企业号”及其附近的护航舰船发动了猛烈的齐射，摧毁了第一批俯冲下来的爱知轰炸机中的一半，但是幸存下来的飞机继续坚定地发动攻击，将三颗炸弹投在了飞行甲板上。第一颗炸弹击中了“企业号”的舰首，摧毁了一架飞机，还把另一架甩了出去，然后穿过四层钢板，在舰首外面爆炸了。^[22]第二颗炸弹击中了前部升降机的后方飞行甲板中线处，在机库甲板下方爆炸了。第三颗是近失弹，紧挨着右舷爆炸，使整个船身都产生了晃动，把另一架飞机甩入了水中。

这些猛烈的爆炸丝毫没有减缓“企业号”的速度。即使在快速变向机动的情况下，它仍然设法回收了几架返回的飞机。但是第二次爆炸使它的前部升降机卡在了上升的位置，导致它处置飞机的能力至少降低了一半。损管队把消防水龙拉过来朝着起火的地方喷，用钢板盖住飞行甲板上的洞。然而，机库内变得一团糟，甲板整体凸起，到处都是尸体碎片，飞机的残骸则在冒火。

11时35分，15架深绿色的“凯特”鱼雷轰炸机到达“企业号”上空。它们兵分两路，在航母的两侧形成左右夹击之势。奥斯本·哈迪森舰长下令右满舵，让“企业号”舰首朝向一队飞机，舰尾朝向另一队飞机。弗洛伊德·比弗在信号台上看到第二队飞机试图赶到航母前头，在1 500码外

跟“企业号”并排前进，“就像射击场里的一排铁皮鸭子”。^[23]40毫米博福斯式高射炮把它们一一打了下来。第二队飞机发射了鱼雷，但是哈迪森迅速调整方向，正对冲过来的鱼雷，从它们中间穿了过去。左舷军械库的士兵看到一个加速前进的黑色长条状物体贴着水面从相反的方向与航母擦身而过。12时20分，受伤的“企业号”躲进另一场暴风雨中，得到了掩护。^[24]

此时“企业号”受损严重，“大黄蜂号”已经瘫痪，而每30分钟至60分钟就有一轮日军空袭到来。在这种情况下，金凯德将军明智地做出决定，让第61特混舰队与敌军保持距离。除了“大黄蜂号”以及一队负责护卫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之外，其他所有舰船朝东南方向驶去，消失在地平线上。

“大黄蜂号”此刻正在熊熊燃烧，严重倾斜，已经成为一具即将沉没的残骸。它的机舱已经被水淹没，完全失去了动力。中午12点半，“北安普敦号”巡洋舰接到命令，负责拖回“大黄蜂号”。在这艘巡洋舰与航母的锚链之间连起来的钢缆立刻就绷断了。两小时后，士兵们尝试用“大黄蜂号”上两英寸粗的钢缆来拖船，500多名士兵用尽力气才把钢缆拉到航母的舰首。一位军官回忆道：“当时‘大黄蜂号’已经呈15度角倾斜，在上面活动实在是太困难了。机库甲板上到处都是泡沫，所以非常滑。”^[25]“北安普敦号”渐渐拖动了这个倾斜的庞然大物，以三四节的速度前进，但是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大黄蜂号”遭受了一连串无情的空袭。^[26]

下午6时15分，“大黄蜂号”被最后一颗鱼雷击中，当时柯林汉中校正在下层的一个维修棚中：“左舷甲板似乎裂开了，燃油涌出，很快就两英尺深，5号维修棚里的所有人都摔倒了，滑到了右舷。大家在燃油中挣扎了一番之后，想办法恢复了平衡，然后手牵着手走到一个双向梯子前面，在那里可以从第三层甲板上到第二层甲板。”^[27]

护航的驱逐舰靠过来，开始从舰尾转移甲板上的伤员。小船在波浪

中起伏颠簸，猛烈地撞向航母，船上的索具缠在“大黄蜂号”的舷边通道上，扯掉了雷达和消防设备。

此时“大黄蜂号”已经倾斜到了25度，航母随时有倾覆的危险，舰长下令弃船。很多人是从两舷下去的，或者顺着打结的绳子爬下去，或者索性从机库甲板游过去，此时整个右舷的机库甲板都浸没在海水里。游泳的人在水中紧紧地聚在一起，很有纪律。一名军官清楚地记得他看到的情景：30个士兵在一个小救生筏上，一边朝驱逐舰划去，一边声嘶力竭地唱着《纽约的人行道》，尽管他们根本不在调上。[\[28\]](#)

“马斯廷号”和“安德森号”驱逐舰奉命击沉这艘航母。但是，想要一艘航空母舰沉没并不容易，哪怕是像“大黄蜂号”那样已经严重受损的航母。这两艘驱逐舰至少朝它发射了16枚鱼雷，其中9枚引爆。然后它们又发射了数百发5英寸弹药、高射炮弹，甚至为了点燃油箱里的汽油，还发射了照明弹。这番努力让“大黄蜂号”燃起了熊熊大火，但似乎也让海水涌入了它的左舷，因为船体现在又恢复了平衡，只不过吃水更深了。最后，这两艘驱逐舰接到命令向南撤退，以免成为次日清晨日本空袭的目标。日军的“卷云号”和“秋云号”驱逐舰最终发动了致命攻击。10月27日凌晨1时25分，它们朝这艘燃烧的鬼船发射了四枚鱼雷。在敌军水手的观望中，它钻入海浪之下，坠入了深渊。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作圣克鲁斯群岛战役，是太平洋战争中的第四次航母对决，也是1944年6月菲律宾海战役之前的最后一场。与珊瑚海战役一样，史书中称这场对决的结果是日军取得战术性胜利，美军取得战略性胜利。“大黄蜂号”被击沉后，盟军在这个战区只剩下一艘航母了。同时，美军也击伤了日军的两艘航母，但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双方的飞机损失大致相同，美军损失了81架飞机，日军损失了99架。但是，和往常一样，美军在营救坠机的飞行员方面做得更好。他们只失去了26名飞行员，而日军失去了148名，而且日军失去的飞行员中，有23名是队长或领队，都是不易顶替的老牌飞行员。

日本人宣称他们给美军舰队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这一说法。南云忠一在战后呈报给山本五十六的报告中说，四艘美军航母被“攻击且沉没”。^[29]第八巡洋舰分队的指挥官报告说有三艘航母沉没，其中包括“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第三艘可能是‘萨拉托加号’”。^[30]这份报告还声称击沉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实际上，美军损失了“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和“波特号”驱逐舰，另外有“企业号”航空母舰、“南达科他号”战列舰、“圣胡安号”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受损。）

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方又取得了一场大捷，普通民众和士兵纷纷庆祝日方再次获得惊人的胜利。但是，日军海军的高层指挥官私下里承认，这场战役往最好里说，也只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胜利。总体来说，从珊瑚海战役到圣克鲁斯群岛战役，在五个月内发生的四场航母对决中，日本失去了400多名航母飞行员，比刚开战时现役飞行员的一半还要多。南云忠一清楚地认识到，反复发生的航母对决将会耗尽日本海军的力量。他告诉原为一：“考虑到敌人在工业上的巨大优势，我们必须在每一场战役中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可惜，刚刚打完的这场战役算不上压倒性的胜利。”^[31]南云忠一被解除了指挥权，调回日本，在那里他将指挥九州岛南部的佐世保镇守府。

美日之间的这次遭遇战的结局，跟之前所有航母对决的结局一样，那就是双方舰队都从交战海域撤回。“企业号”尽管严重受损，但是在努美阿就得到了维修，不到三周，它就重新投入战斗，赶上了铁底湾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海战。两艘受损的日军航母“翔鹤号”和“隼鹰号”被迫返回日本修理。这两艘航母中价值较大的“翔鹤号”直到1943年6月才能重返战场，这是日军放弃收复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半年之后。战后回顾这场战役时，哈尔西总结说：“从战术上来说，我们吃了亏；但是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又找补回去了。”^[32]这一评价似乎无可辩驳。

田中赖三不屈不挠的“东京特快”设法在10月中旬以及11月的第一个星期将两万多名士兵运送上岸。这些增援使得日军和美军在军力上几乎持平，但日军总是低估范德格里夫特的军队规模。到了11月份，他们相信己方兵力占优了。但是，兵力的迅速增加使得日军更容易受到空袭和海上的炮击，因为要想在丛林和山谷里隐藏两万多名士兵以及物资可不容易。“仙人掌航空队”日复一日地攻击他们的营地、据点以及补给点，朝那些地方投放炸弹，或者进行致命的扫射。

自9月以来，日军经常把军舰开入铁底湾，用舰炮轰击亨德森机场以及美军在隆加平原上的据点。10月29日至30日晚，美军也让敌军尝了尝舰炮轰击的滋味。“亚特兰大号”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对克鲁斯角上的日军营地进行了长达八个小时的炮轰。五天后，“旧金山号”和“海伦娜号”巡洋舰向科里角的日军据点开炮，把新堆放在那里的物资全部炸毁了。在那里临时露营的日军被迫撤入丛林。由于饥饿和疾病，丛林里的部队人数会逐渐减少。此时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人数大大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是后勤没有跟上。一个男子如果每天摄入的能量不足500卡路里，可能根本没法干活或是行军，更别提打仗了。

11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下令向西进攻，旨在攻占第十七军的指挥部（靠近海岸，位于克鲁斯角），缴获敌军最近在萨沃岛卸下来的物资。第5陆战团的6个营在梅里特·埃德森上校的率领下，在马塔尼科河上架设浮桥，跨河袭击了日本的第四歩兵团。在克鲁斯角附近的两天艰苦战斗中，约有400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其余的人撤退到波哈河对岸。这次突击使得亨德森机场不再受敌军野战炮的袭扰。但田中赖三的驱逐舰仍在向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海岸运送士兵，而这些还没有遭受饥饿和疾病折磨的新士兵都被部署到了波哈河河口附近的阵地。此刻，这些士兵阻碍了美军朝那一方向的推进。

在海军陆战队员的记忆中，10月25日是“防空洞里的星期日”。警报每小时会响两三次，发出的都是“红色警报”（敌机来袭）。大多数时间，日军的轰炸机都在头顶盘旋，零式战斗机也发动了无休止的攻击，

那些停在机场的飞机、防空洞和野战装置都燃烧了起来。连下了几天的暴雨使机场的地面泥泞不堪，直到过了中午，太阳把地面晒干，飞机才得以升空。野猫式战斗机最终起飞后，狠狠地教训了对手一番，陆军的P-400在1万英尺的高空中与零式战斗机作战时也占了上风。想起零式战斗机在亨德森机场的上空裂成碎片的情形时，克莱门斯感慨万千：“它们的尾翼飘落下来，不停地在空中翻转，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一整天都是这样的情景。”^[33]

空战的力量此消彼长，优势已逐渐不可逆转地偏向美国一侧。日本的战机要从拉包尔飞过来，漫长的航程耗尽了飞行员的体力，也降低了他们返回基地的可能性。他们肯定跟美国人一样容易感到疲劳，但是日本海军没有轮换制度，老兵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在日本海军的航空兵中，私底下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除非你死了，不然上级不会让你回家的。”^[34]大和精神是一种植根于天皇神权信念之上的民族主义信条，它能够激发每一个战士的斗志和决心。人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笃信的。由于战斗的消耗，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数量减少，他们的位置由仅仅经过短期飞行训练的新人接替。面对高射炮火，新手们无法实现攻击目标，也更容易被击落。在南下的漫长途中，他们的队形更容易分散，而当能见度降低时，他们也更容易迷路。返回拉包尔的路途过于遥远，这对日军来说是致命的劣势。

日军很晚才决定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新建或扩建机场，机场分别建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卡西里（Kahili）、巴拉莱岛（Ballale Island，属于肖特兰群岛）、布卡岛（位于布干维尔岛北部）和新几内亚的莱城等地。但这些机场中没有一个能够承担主要航空基地的重任，大多只能作为临时的跑道，供那些摇晃着返回拉包尔的飞机紧急降落。日军的工程营装备不够，而且成员大多是从朝鲜、冲绳和台湾征召的劳役，缺乏相应的技术。海军少佐藤田怡与藏是拉包尔基地的一名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他回忆说，在极端情况下，飞行员接到的命令是在日军占领的岛屿附近的海上迫降。“不幸的是，没人敢保证你能从迫降地点返

回基地。”[\[35\]](#)

以布干维尔岛为基地的海岸警卫队员不断向外发送极其珍贵的情报，汇报南下的敌人编队的情况。杰克·里德的胡子几乎要长到领口了，他非常享受每天下午看着日军的残兵败将从头顶三三两两地往回飞。[\[36\]](#)日军很清楚，盟军有两个海岸警卫队员隐藏在布干维尔岛南北两端的灌木丛中，也决心除掉这两个人。保罗·梅森从负责打探消息的当地人那里得知，日军已经在布因集合了数百名士兵和追踪犬，不久就会来搜寻他。因此他叫来了一场空袭，将追踪犬杀死在了笼子里。当地村民对他们两人都非常忠诚。尽管附近十几个村庄里有几百号人知道他们在这里，但是没有一个人向日军出卖他们的行踪。

在华盛顿，“福将”阿诺德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告诉同事，南太平洋地区的空中力量供应过剩。他视察归来时带回了一些地区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在其战区占据了绝对的兵力优势（在飞机数量方面）。他的说法基本属实，但是鉴于双方的消耗都很快，因此需要不断增援。约翰·S.麦凯恩将军表示，瓜达尔卡纳尔岛正逐渐成为日本空中力量的“天坑”，但是要维持南太平洋空战的规模及其猛烈程度，就只能通过减少对欧洲的支援——尤其是对英国的支援——来实现。作为华盛顿最坚定的“德国优先”原则的拥护者，阿诺德急于扩大对第三帝国的轰炸行动。他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北非登陆战（“火炬”行动）。

奥布里·菲奇接替麦凯恩将军担任驻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而麦凯恩将军则回到华盛顿担任海军航空局局长。在华盛顿，他暗中策划解除阿诺德的职务。麦凯恩告诉所有肯听他说话的人，美国陆军航空队“根本不懂得如何在海上作战，他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只会一味地抹黑海军航空兵的表现”。[\[37\]](#)在讨论1944年的预算分配时，双方就海军岸基航空兵的扩张问题发生了争执。麦凯恩认定，陆军可以容忍航空母舰，却偏要自己控制所有的陆基飞

机，甚至包括那些攻击敌人海军的战机。美国陆军航空队总是夸大自己的轰炸成果，这也让海军将领们感到恼火。十个月的战事已经清楚地表明，从高空投下的炸弹几乎从未击中过海上的舰船。陆军的公报无视这些证据，反而宣称在陆军的B-17轰炸机或其他轰炸机的攻击之下，大批日本舰船已被击沉，或“很可能已被击沉”。所以当这些舰船后来出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时，美国海军很不高兴。

但政治风向对阿诺德不利。金将军和莱希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名成员，美国总统愿意听取他俩的意见。在“火炬”行动的准备工作秘密进行时，南太平洋战区是美军深入参与的唯一战场。所罗门群岛是盟军从所有战区中选择的第一次发起进攻的地点，因此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美国终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战中报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此次战役也得到了广大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0月23日，罗斯福批准了莱希将军的请求，同意向南太平洋战区增派20艘7 000吨的货船，以进行补给。同日，“大黄蜂号”沉没的消息传到白宫，总司令给参谋长们写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便函：

我所担心的是，我们能否确保每一件武器都运到西南太平洋战区，用来守住瓜达尔卡纳尔岛；此外，身处这个决定性时刻的我们，还要确保我们的每一份弹药，每一架飞机，以及每一个士兵，都能在我们当前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已同时参与到两条活跃的战线中，而且我们必须为这两处同时提供充足的空中支援，即使这意味着我们要推迟履行其他承诺，特别是对英国的承诺。但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战斗中，如果我们没有拼尽全力，那么我们的长期计划可能会因此延迟几个月。[38]

战后，阿诺德不悦地抱怨道，总统竟然就这么大笔一挥，推翻了“欧洲优先”战略。但是阿诺德除了忍气吞声，服从命令，还能有什么选择？

哈尔西在努美阿担任司令后不久便写信给尼米兹，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立刻展开打击行动。”^[39]哈尔西没有过渡期，更无暇顾及设立司令部以及参谋部等事宜。时间紧迫，他必须马上做出多个决断。

戈姆利从未去过瓜达尔卡纳尔岛，而哈尔西不会犯同样的错误。11月8日，哈尔西飞到了亨德森机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与他在机场相见，并开吉普车带他视察前线。哈尔西将军的制服是不起眼的卡其色，因此直到他下车走到士兵中间，战壕里的海军陆战队员才认出他。

为了安全起见，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这种高级军官的行踪是不会提前通知下面的。因此这里没有虚伪矫饰的“波将金村”——没有造型悦目的房子，没有精心装扮的士兵，也没有阅兵场式的检阅。参谋长曾建议哈尔西站在吉普车里冲士兵们挥手致意，但被哈尔西拒绝了：“这样未免太做作了，算了吧！”^[40]刚开始，士兵们都被哈尔西肩章上的三颗星惊呆了，但这位海军中将迅速使大家放松了下来。他不时询问大家问题，并耐心倾听。哈尔西注意到士兵们因患疟疾而日渐消瘦，也目睹了士兵们艰苦的生活和作战环境。他同意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的建议，认为需要尽快派陆军将这些士兵替换回来。在向岛上的媒体代表发表临时讲话时，哈尔西首次提出那个著名的血腥口号：“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41]有人问道，如果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怎么办，哈尔西表示他倒是希望如此，并且十分期待这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屠杀。^[42]

尽管哈尔西的演讲激情四射，但他并不介意承认自己的恐惧。当日军的一艘驱逐舰在铁底湾同海军陆战队相互炮击时，哈尔西也辗转难眠。他写道：“让我无法入睡的不是轰隆隆的炮火声，而是恐惧。我称自己是个胆小鬼——甚至是个懦夫——并且不断命令自己：‘赶紧睡觉，你这个该死的懦夫！’但还是无济于事，我无法执行自己的命令。”^[43]

11月8日到10日，特纳将军率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的快速运输舰编队从努美阿赶到了圣埃斯皮里图岛。根据侦察报告和情报分析，美方估计日方的另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将于11月12日至13日晚突袭铁底湾，因此特纳希望他的舰船在敌军抵达之前完全撤离该地区。特纳的计划依赖于运输舰和货船的快速卸载——无论如何，部队和供给都必须在11月12日星期四晚间送到海滩上。海军少将丹尼尔·卡拉汉和诺曼·斯科特指挥的两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中队负责为货船与运输舰护航。为了躲避日军的空中侦察，他们决定绕路，经圣克里斯托瓦尔岛南部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第一支分队于11月11日凌晨抵达铁底湾。

当天上午，“企业号”穿过努美阿港复杂的航道，驶入大海。这艘航母曾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被击伤，一些旧伤仍然存在。它的前部升降机被卡在高处，船体不断向里漏水，而拥挤的走廊上和被称为“军官地盘”的特等舱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布满了残骸。^[44]与之相伴的是海军少将威利斯·A.李率领的第64特混舰队。这支舰队中有两艘快速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以及几艘护航的驱逐舰。哈尔西下令将这支联合特混舰队（总司令仍是金凯德将军）称为金特混舰队。他们没有走北部常用的航道，而是选择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就位，希望能躲开敌军的潜艇和侦察机。

11月11日和12日，运输队停靠在隆加角，开始争分夺秒地卸货。12日下午，几架三菱一型鱼雷轰炸机从恩格拉群岛的绿色山丘上方低空飞过。它们呈扇形分成两组，从三四十英尺的高度掠过水面，显然是打算从北部和南部同时发起攻击。^[45]舰队的防空火力十分密集，一时间黑烟四起，形成了一堵浓重的黑色幕墙。“旧金山号”上的5英寸火炮几乎火力全开，在第一次齐射中就击落了两架飞机。三菱鱼雷机被迫向左右闪躲，以免被击中。“波尼号”的弗莱维厄斯·J.乔治中尉在日记中留下了对这次突袭的描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被击中，有的在一片火焰中爆炸，有的翻滚着坠入海中，激起巨大的水花。不出几秒钟，敌军飞机就

只剩下四架了。这幸存的四架飞机疯狂地向我们发射鱼雷，然后从这片致命的炮火中仓皇而逃。”[\[46\]](#)

敌军投下的四枚鱼雷全都没有击中美军舰船。一枚鱼雷先是蹿出水面，然后似乎沉了下去；另一枚鱼雷绕了个圈，没有引爆；还有一枚鱼雷从海面上弹起，差点击中投弹的飞机。船上的防空火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机几乎击毁了所有的敌军飞机，只有一架飞机躲进了一堆较低的乌云里，逃过一劫。但是其中一架受损的飞机自杀般冲向“旧金山号”的上层建筑，并在一团火球中爆炸。这次袭击造成15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人严重烧伤。[\[47\]](#)

侦察机在“槽海”发现了几艘返航的敌舰，其中包括金刚级战列舰。日落时分，特纳让舰队从锡拉克海峡全部撤出。他将自己的巡洋舰和大部分驱逐舰交给卡拉汉将军指挥，留下来与即将到来的日本军队作战。在没有战列舰的情况下，卡拉汉手下的13艘军舰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但是它们如果能对敌军施加足够的打击，那至少可以让海军陆战队不用再受一次14英寸火炮的虐待。金凯德率领的舰队将于次日抵达，摧毁敌军计划登陆的部队。

知道日军有战列舰的美军军官无不面色凝重。“弗莱彻号”驱逐舰舰长讽刺道：“用几艘驱逐舰和巡洋舰与战列舰作战，似乎有点滑稽。”[\[48\]](#)卡辛·杨是卡拉汉的旗舰“旧金山号”的舰长，有人听到他告诉将军，此次任务无异于自杀。[\[49\]](#)

午夜时分，卡拉汉的舰队悄悄潜回铁底湾。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阴云密布，没有月亮。海上无风，海面水平如镜。虽然舰船间相隔不过500码，但在如墨的夜色中，士兵们几乎无法辨认出舰队中的其他舰船。船尾激起的绿色磷光闪烁着朝南方散去，最终消失在夜色里。这一天是11月13日，星期五。

敌军渐渐显露出行踪。雷达上的光点显示，敌军位于西北方向，距离在2.7万码到3.2万码之间。日军似乎将舰队分为两个平行纵队，分别

由四艘和六艘舰艇组成，而卡拉汉正率领手下朝着两支舰队之间的缝隙驶去。当雷达的探测距离降至1 100码左右时，美军的瞭望员首次发现有模糊的轮廓在北部岛屿之间移动。[\[50\]](#)

一束强探照灯光突然照在“旧金山号”的舰桥上，随即战斗打响。双方同时开火。这场战斗迅速演变成一场混战，舰船偏离位置，无差别地冲着敌军开火。卡拉汉命令“单数军舰向右开火，双数军舰向左开火”，但当时往往敌我难分。战场不时被探照灯、闪光弹、炮口的火光、照明弹、曳光弹和舰船爆炸产生的黄色闪光照亮。此时的场景使“斯特雷特号”舰长C.雷蒙德·卡尔霍恩想起“一场收不住手的酒吧斗殴，有人突然把灯关了，于是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各个方向挥舞拳头——只不过这场景要比酒吧斗殴糟糕上万倍。炮弹一个接一个落在我们周围，照明弹和闪光弹从头顶飞过，曳光弹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过，目之所及，都是在夜幕下燃烧和爆炸的舰船”。[\[51\]](#)

美军的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已过载且出现了混乱，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战舰都接收到了战术指挥官下达的指令。驱逐舰们改变航向，以两舷对着敌舰，扰乱了美军的阵型。“欧班农号”驱逐舰不得不猛地调整方向来避开友舰“斯特雷特号”，但是这一系列调整使它跑到了“亚特兰大号”巡洋舰的航线上，导致后者也要紧急转向。结果“亚特兰大号”因友舰“旧金山号”的猛烈射击而遭受重创。凌晨1时51分，卡拉汉下令暂时停火，以认清哪几艘是己方的舰艇。卡拉汉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下达了命令：“把灯打开三秒钟。”[\[52\]](#)但是由于通话线路严重过载，极度混乱中，大多数美军舰船没有接收到这一命令。

总的来说，所有战舰当时都在各自为战。乔治中尉在日记中写道：“偶尔会有一阵刺目的闪光和隆隆的爆炸声表明某艘船爆炸了，就着这一瞬间的光亮，我们会瞥见黑色烟雾笼罩的火焰。”[\[53\]](#)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滩上的一位观察员说，这一场景“就像通往地狱的门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开启、关闭”。[\[54\]](#)

“旧金山号”往右转向，与友舰分开了，结果发现自己正对着“比睿号”战列舰巨大的14英寸口径的炮筒。它率先开火并击中了对方，而“比睿号”的反应却很迟钝，可能是因为无法快速填弹。随后，美军的几艘驱逐舰也与这个庞然大物遭遇了。“库欣号”在距离“比睿号”1 200码的位置发射了六枚鱼雷，或许有三枚命中。“欧班农号”也向其发射了三枚鱼雷。“拉菲号”与“比睿号”高耸的舰首相距不过几百码，差点被这艘巨舰撞翻。它发射了两枚鱼雷，但是击中“比睿号”的船体时未能引爆，紧接着它又向“比睿号”的舰桥射出几发5英寸的炮弹。

“斯特雷特号”在距离“比睿号”1 000码的地方向其舰桥发射了9轮5英寸的炮弹——总共36颗炮弹——颗颗命中。“斯特雷特号”从“比睿号”舰首前面仅500码的地方驶过，近到足以清楚地看到衣服着火的日本水手在甲板上奔跑。整艘“比睿号”变成了一片火海，爆炸声此起彼伏，许多船员都从甲板上跳入海中，燃烧的残骸纷纷落到周围的船上。

被遗弃的“库欣号”燃烧着漂在海面上，失去了控制。“拉菲号”已遭受重创，“欧班农号”猛地转向以躲避这艘友舰。“巴顿号”驱逐舰被一颗鱼雷击中，裂成两半，两截船体朝不同的方向漂了一会儿，不出几秒就都沉没了。大约有40名船员幸存下来，在它的残骸和海面的浮油间奋力游动。其中有些人被其他舰船碾过并淹死，有些人被附近的深水炸弹炸死或炸伤。

“波特兰号”和“朱诺号”都被鱼雷击中，正竭尽所能驶离战场。“波特兰号”的舵和螺旋桨都已损坏，胡乱地转着圈，但它还是设法向萨沃岛南部受损的时雨级驱逐舰发射了几枚炮弹。“海伦娜号”比多数友舰受损程度轻，向右舷外的所有陌生舰船开着火。

“旧金山号”在战场中心漂着，它已伤痕累累，但并没有被击沉，于是将船上所剩的所有弹药一股脑地射向“比睿号”。但是，“比睿号”又向“旧金山号”发射了几枚大口径的炮弹作为反击，其中一枚击中右舷的舰桥，炸死了卡拉汉将军和他的大部分参谋。杨舰长和副舰长都身负重伤，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一名幸存的高级军官来到驾驶室，发现一个

活着的人都没有，便开始寻找卡拉汉将军和他的参谋，结果“发现他们都在信号台右侧的一堆尸体中，显然都死了”。^[55]海军少校布鲁斯·麦坎德利斯是舰上总值日军官，他开始驾船前往埃斯佩兰斯角，将这艘遭受重创的巡洋舰带离战场。“旧金山号”的主炮一轮又一轮地射击，直到“比睿号”使它再也无法开炮。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第一阶段， 1942年11月13日



黎明时分，晨光里呈现出一片骇人的场面。铁底湾里到处都是燃烧的舰艇残骸、石油和漂浮的尸体。一艘艘废船燃烧着漂浮在水面上，损毁的上层建筑东倒西歪地斜插在海面上。很多舰艇的炮塔倒了，悬挂在船身上。几百名幸存者身上浸满了油污，紧紧抓住水面上的残骸，大声呼救。小船在其中来回穿梭，将他们一一救起。除了极少数例外，水中的日本水手都拒绝接受救援，还有一些人宁愿溺死，也不愿被俘。有人看到“比睿号”冒着明亮的火焰，在几艘小型舰船的看护下缓慢地朝萨沃岛北部驶去，它的船舵显然失灵了。“波尼号”的乔治中尉被派去搭救“亚特兰大号”附近的幸存者。他是这么描述这艘遭受重创的巡洋舰的：“它的整个上层建筑都被炸没了，而且前部的三个炮塔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就像破碎的鸡蛋箱，其中夹杂着扭曲变形的炮管。它的主甲板几乎被水淹没，船员们都茫然地挤在肮脏的残骸中。”^[56] 幸存者被登陆艇带走了。一个爆破队登上船，在轮机舱安放了炸药。上午8点后不久，“亚特兰大号”就沉没了。

“海伦娜号”是美方所有参战巡洋舰中受损程度最轻的，带领6艘遭受重创的舰艇朝锡拉克海峡驶去。“旧金山号”严重受损，大家都认为它再也无法行驶了——有人从另一艘船上数了一下，它的船体上有26个弹孔。^[57] 幸存者举行了仓促的仪式，为阵亡者施以海葬。船员们都筋疲力尽，随便找到一个能躺开的地方就会赶紧补一会儿觉。

“朱诺号”船体已有一部分沉入水中，甲板上几乎全是水。它只能以13节的速度前进，并且船舵反应迟缓。^[58] 11时1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东部几英里处，日本伊-26潜艇发射了一颗鱼雷，击中它的左舷，并引爆了它弹药库内的鱼雷弹头。爆炸的威力十分巨大，连站在“旧金山号”甲板上的人都被震倒了。^[59] 其他船上的人看到5英寸火炮的整个炮筒连同“朱诺号”大部分上层建筑都被炸到了空中。一团巨大的黄色烟雾弥漫在周围，有几分钟人们甚至看不清它的位置。渐渐地，烟雾从海面上散去，其他船上的人再扫视海面，却再也不见“朱诺号”的任何踪迹。“没有一根棍子、一根桅杆、一艘船或一个救生圈，也看不见一个

人，”“斯特雷特号”的一名军官回忆道，“我紧张地张望着，想看到一个脑袋，或者一具尸体；但随着烟雾消散，我什么也没有看到。”^[60]“旧金山号”上的格雷厄姆·C.邦内尔上尉也认同这个说法：“我朝‘朱诺号’所在的地方望去，只看到一大团烟雾。……不一会儿烟雾就完全消散了，你只能看到水面上有一条尾迹，但那也马上就消失了。”^[61]

驱逐舰通过声呐没有查到潜艇的踪迹，也看不到任何潜艇的踪影。“海伦娜号”舰长吉尔伯特·胡佛眼见其他舰船身处险境，冷静地决定让特混舰队的残余部队继续沿航线航行。后来军官们说，他们不相信“朱诺号”上有人幸存，而且这种想法得到了数十名目击者的认同。事实上，“朱诺号”虽然沉没了，但当时有120人没有随着船沉下去。他们依靠三条由救生绳连接起来的木筏，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11月18日，十名幸存者被冲到圣卡塔利娜岛的沙滩上。

黎明时分，金凯德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约270英里的“企业号”上下令向西北方展开一次大范围的搜索，同时命令飞机在200英里的范围内巡逻。受损的“企业号”的飞行甲板时刻准备着，一旦发现敌军航母，就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但是这次搜索一无所获。那天上午晚些时候，金凯德决定派自己的鱼雷轰炸机进攻“槽海”，并命令飞行员随后将飞机降落于亨德森机场，听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的调遣。

实力得到加强的“仙人掌航空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漂在萨沃岛北面的燃烧着的“比睿号”身上。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列舰被85颗炮弹击中，还遭受了六七枚鱼雷的攻击。后部的炮塔已经被炸得粉碎，无力地悬挂在船的一侧。烟雾从它损毁的上层建筑和前部炮塔中涌出。“企业号”上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向“比睿号”投下若干鱼雷，一颗击中了左舷，一颗击中右舷。还有几架来自亨德森机场的战机也袭击了这艘冒着浓烟的废船。但它是一艘非常顽强的战列舰。到日落时分，“比睿号”不仅仍漂浮在海面上，而且还在前进。然而11月14日拂晓，海上却不见了“比睿号”的影子，只有一片直径将近两英里的巨大油迹残留在海面

上。[\[62\]](#)

亨德森机场当晚遭到了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炮击，但是对于那里遭受过更残酷的摧残的人们来说，这场炮击并没有让人感到特别不安。从图拉吉岛赶来的鱼雷快艇向敌方舰队发射了几枚鱼雷，将它们赶跑了。次日清晨，“企业号”和亨德森机场的战机对日军舰队展开追击，并可能多次击中其中一艘巡洋舰。但最重要的是当天上午9时49分的一份敌情报告。“企业号”的一架侦察机在新乔治亚岛北部发现了一支大规模的日本舰队，这支舰队正以14节的速度朝瓜达尔卡纳尔岛行驶。飞行员看到了驱逐舰和“多艘敌方运输舰”。[\[63\]](#)

这是田中将军最新一次尝试大规模增援。这支舰队中有11艘满载士兵的运输舰和11艘护航的驱逐舰，航向为140度。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下令将运输舰作为盟军的首要攻击目标。当天下午，亨德森机场每一架能够起飞的战机都加满了油，装满了弹药，飞往“槽海”进行攻击。飞行员们没有管驱逐舰，将火力都集中在了运输舰上。“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认为，那天下午是“亨德森机场最忙碌、最疯狂的一个下午。海军飞行员和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兄弟共同奋战，地勤人员也做出超人的贡献，使得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能够连续不断地携带着炸弹和鱼雷在机场和攻击目标之间来回穿梭”。[\[64\]](#)

这是一场赶尽杀绝的冷酷屠杀。吉米·弗拉特利带领的第10战斗机中队以60度角俯冲而下，同时用0.50英寸口径的机枪扫射满载士兵的运输舰。船上的日军纷纷跳入海里，以躲避美方战机的猛烈攻击。[\[65\]](#)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从圣埃斯皮里图岛赶来的一队B-17轰炸机也加入了战斗。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投下的鱼雷击中了一艘1万吨级的运输舰。鱼雷炸开这艘运输舰的中部并将其掀翻，没过几分钟这艘船就沉没了。盘旋在上空的飞机从残骸上方低空飞过，向那些挣扎求生的日本士兵扫射。一架“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回忆说：“海面上到处都是筏子和小船漂浮在油渣、浮木和其他东西之间。我们开枪扫射时，有三艘运输舰还在海面上漂着。我们和那些战斗机一起，朝着这几艘运输

舰、水里的小船和其他一切能看到的東西扫射。”^[66]就像一位飞行员说的，这种行为简直太可怕了，甚至“令人厌恶”。^[67]但并不是所有的飞行员都对此反感，有些人甚至骄傲地自称“秃鹰军团”。“企业号”的战斗报告指出，这场战斗中出现了“井然有序的毁灭”。^[68]到当天结束时，四艘运兵舰已经沉没，还有另外三艘燃烧着，摇摇晃晃地从“槽海”驶回拉包尔。当晚，其中两艘也沉没了。田中将军后来报告说，日方仅有400名士兵阵亡，但这个数字太小了，不太可能是实情。

哈尔西将军的行事方式与前任指挥官截然不同，他选择主动出击，而不是受人牵制。根据他之前的指示，受损的“企业号”及其警戒舰仍然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很远的地方，以免遭遇敌机或潜艇。^[69]11月14日下午3时42分，哈尔西派“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北上，绕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侧，前往萨沃岛南部。这两艘巨大的战舰由四艘驱逐舰护航，组成“爱”特混舰队，由李将军指挥。它们预计在当晚进入铁底湾，以拦截敌军的水面舰艇。

李率领部队以23节的速度呈“之”字形北上，绕过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西部浅滩，于午夜时分抵达萨沃岛。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了敌军的踪迹。西边地平线上的天空中出现了奇怪的光。军官们推测那是拉塞尔群岛附近燃烧的船只发出的火光。无线电监听员将无线电调到敌人的低功率舰间通信频率，监听到一些愤怒的日本人在喋喋不休。图拉吉岛基地派出鱼雷快艇在铁底湾来回搜寻。李的参谋用无线电发出紧急识别信息，以免鱼雷快艇误伤友军。这又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一阵微风从南方吹来。天上，一弯残月正缓缓西沉，海面能见度很高。

午夜时分，新装配的SG雷达的光点显示，西北方向有敌军出现。敌军沿着“槽海”南下后，便进入了周围岛屿构成的雷达盲区。不久，美军弹着观察员通过光学瞄准镜辨认出远处地平线上敌军移动的身影。李将军将航向改为300度，同时命令“南达科他号”找到时机便立即开火。

15日0时16分，敌军纵队的第一艘舰船距离美军18 500码时，“华盛

顿号”上的16英寸火炮开始疯狂地射击。它第一轮发射的16英寸穿甲弹都没有击中目标。炮弹激起的水柱通过雷达显示器都能看出来，炮口的高度随之进行了调整。第二轮（最晚不会超过第三轮）攻击命中了目标。“南达科他号”在友舰开火之后没过多久便跟着开始射击。在雷达火力控制系统的帮助下，它的第一轮或第二轮齐射就击中了15 700码外的日军纵队中较近的一艘军舰。被击中的军舰猛烈地燃烧起来，方便了美军弹着观察员。“南达科他号”将炮筒对准了纵队中的第二艘舰艇，并击中了好几次。日军特混舰队迟迟没有做出反击，而且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日军没有一发炮弹命中。

由于敌军舰艇的位置已经接近舰载5英寸火炮射程的极限，美军的四艘驱逐舰暂时停火。0时20分，一列日军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从萨沃岛的西南部出现。“沃克号”是美军编队的第一艘驱逐舰，它率先开了火，“贝纳姆号”、“格温号”和“普雷斯顿号”紧随其后。一艘或多艘敌方军舰瞬间被击中，着起火来。但是，美军这四艘驱逐舰很快就遭受了猛烈的反击。数枚6英寸炮弹击中了“普雷斯顿号”，击毁了它的锅炉房，还炸死了几十名船员。锅炉倒塌，又压碎了船上的探照灯。日军的一艘重型巡洋舰悄悄溜到美军四艘驱逐舰的左侧，向“普雷斯顿号”发射了几枚8英寸的炮弹，给了它致命一击。这艘小驱逐舰燃烧起来，猛地向右倾斜，接着从舰尾开始下沉。“普雷斯顿号”舰长下令弃舰。船员们往两舷跑时，火势蔓延到了船上的弹药库。在一阵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普雷斯顿号”冒着黄烟被炸到了天上。残骸像雨点般落在四周。

大约同一时间，“贝纳姆号”的右舷被鱼雷击中。这艘快被击沉的驱逐舰艰难地往右转向，摇摇晃晃地驶离战场。“沃克号”仍在顽强作战，朝着萨沃岛南部的敌军发射一轮又一轮的5英寸炮弹，直到一艘身份不明的巡洋舰向它发射一连串重型炮弹，使它彻底停止运转。猛烈的爆炸把它的上层建筑的厚钢板炸进了海里，熊熊大火笼罩着整艘船。船上的20毫米弹药开始爆燃，甲板也被炙烤得弯曲变形。舰长托马斯·E.弗雷泽一边往下走一边下令弃船。“沃克号”于0时42分沉没。船上的深水炸弹已经上了保险，但有几枚显然在下沉的时候爆炸了，在幸存船员当

中造成了一些伤亡。

“格温号”的轮机舱遭受重创。损管队奋力抢修时，“格温号”的舰长下令紧急右转，以避免“普雷斯顿号”下沉的残骸。摇晃着驶离战场的时候，它遭受了更多炮火的打击。

“华盛顿号”的弹着观察员被船上16英寸火炮炮口的火光遮蔽了视线，因此无法观察到敌军的位置。他们也像驱逐舰上的弹着观察员一样，通过扫视地平线来寻找敌人炮口的火光，从而确定对方的位置，再将炮口对准敌人。日军舰船似乎撤到了萨沃岛的黑色锥形阴影中，也许是为了躲开“华盛顿号”威力巨大的16英寸炮弹。

短暂停火期间，“华盛顿号”上的维修队开始手忙脚乱地修理由于“华盛顿号”自己的舰炮震荡而引起的电力故障，而弹着观察员则徒劳地搜寻着攻击目标。日本的战列舰到底藏到哪儿去了？

“华盛顿号”将航速提高到26节，航向转至282度。它的雷达发现敌军有四艘大型军舰正在驶入萨沃岛南部海域。“华盛顿号”在几艘被炸毁的美军驱逐舰的残骸中穿行，向落水的人抛出救生筏。这几艘驱逐舰已不具备继续作战的能力，战术指挥官便命令它们尽量撤回瓜达尔卡纳尔岛。

“南达科他号”在290度的航向上以26节的速度疾驶，朝1.4万码外的萨沃岛附近的敌舰开火。巨型武器强大的冲击力引燃了自己船上的水上飞机，把它们从弹射器上炸出船外。断路器跳闸了，船上大部分地方的电力都被切断了。0时45分左右，“南达科他号”躲开美方驱逐舰的残骸，向“华盛顿号”的右后方驶去。

这两艘战列舰结伴向西北方航行，没有任何舰船护航。但是“南达科他号”的航线向北偏离了一些，这使它驶入了日军探照灯的照明范围中。这是一个战术失误，因为它会使美军在雷达火力控制方面的优势变得毫无意义。“华盛顿号”上的主炮向敌军纵队中排在最前面的“雾岛号”开火，“雾岛号”也开火反击。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两个庞

然大物以口径相近的火炮疯狂地朝对方射击。

日军探照灯照到了“南达科他号”的上层建筑，随即不同口径的炮弹一起朝“南达科他号”射去。这些炮弹击毁了“南达科他号”的大部分雷达和通信设备。它无法跟旗舰通信，甚至看不到旗舰。它的船舱开始不停地进水。3号炮塔已无法使用，火力控制系统严重受损，燃料也开始泄漏。^[70]一名水手回忆说：“甲板上堆满了死人，到处都是撕裂的钢板，锯齿状的边缘极其锋利。”^[71]

凌晨1时10分左右，日军停止了射击，还能行驶的舰船开始仓皇向北逃去。在“雾岛号”及其警戒舰撤退的过程中，“华盛顿号”不断射击。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李将军对敌军展开追逐，并持续向敌军发射炮弹。但同时，他也谨慎地提防着敌军的鱼雷攻击。1时33分，他下令向南掉头。“华盛顿号”与“南达科他号”及幸存的美国驱逐舰恢复了雷达联系，行驶过程中还要偶尔避开鱼雷（由撤退的日本舰船甚至美国的鱼雷快艇发射）。李将军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引导它们与自己会合。6时49分，破晓之后，李收到了哈尔西的电报。哈尔西命令他将受损舰船集中到一起，带回圣埃斯皮里图岛。

李击溃了敌军。日军在这场战斗中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却被美军出其不意的攻击和更加高超的射击技术击败。美军在雷达火力控制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日军的雷达系统至少落后一年。这次战斗中，日方损失了六艘军舰，其中包括于凌晨3时25分沉没的“雾岛号”，还有五艘军舰遭受重创，幸存舰船全线溃退。而“华盛顿号”经历一场大战后没有受到任何严重的损伤。“南达科他号”虽遭受重创，但很快修复，重返战场。美方的四艘驱逐舰损失惨重——三艘沉没，伤亡无数——但它们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引了敌军大部分炮火和鱼雷，使战列舰能将火力集中到日军更大的舰船上。亨德森机场又逃过了一场炮轰。田中将军的四艘幸存的运输舰将被迫在没有海军掩护的情况下尝试登陆。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第二阶段， 1942年11月14日—15日



田中判断，唯一能让这四艘船卸运的方法是让它们在塔沙法隆加角附近搁浅。他向拉包尔基地请示，获得了肯定的答复。于是在11月15日的晨光中，美军清楚地看到四艘船冲到了岛屿西侧的沙滩上。大约2000名士兵在天亮前上了岸，他们将一大堆板条箱和米袋留在了离海滩不远的棕榈林中。^[72]亨德森机场中的飞机一上午都在运输舰与增援部

队之间不停地攻击。除了几架零式水上飞机进行了短暂而无效的抵抗外，日军没有其他空中力量来保护自己。海军陆战队155毫米的火炮甚至击中了四艘船里最近的一艘，这艘船搁浅在波哈河河口。截止到上午10点左右，四艘船都被炮弹击中并猛烈地燃烧；而到了下午2点左右，海滩上就只剩烧焦的船壳还在冒黑色的油烟了。

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用燃烧弹袭击了日军放在海滩上的补给，这种武器被戏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73]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发现了一条从海滩通往岛内一片圆形空地的小路。他猜测这片空地应该是一个临时军火库，于是将1 000磅的炸弹投到了空地中央。事实证明他猜对了。一场巨大的爆炸吸引了几英里外的海军陆战队的注意。一条烟柱直冲云霄，一直升到了2 000英尺的高空，引得士兵们纷纷抬头观望。大火烧了整整一夜，16个小时后仍在燃烧。^[74]

^[1] Lt.Comdr.Roger Kent quoted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16.

^[2]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99.

^[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85.

^[4]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185.

^[5]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16.

^[6]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enclosure: Fighting Squadron 10 Report on Flight of October 25,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7] Edward L.Feichtner, “The *Enterprise* and Guadalcanal,”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82.

^[8] C.O., *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9] C.O., *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0]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7,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11]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enclosure B: “Comments, Action by the Task

Force on October 26, 1942,” by Lt.Cmdr.James H.Flatley,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2] “CruDiv 8 Combat Report No.5,” WDC 161270, November, 18, 1942, item 3,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13] VS-8 and VB-8 Reports to CO, U.S.S.*Hornet*, November 2,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4] Author’s interview with Oral L.“Slim” Moore, Berkeley, CA, February 27, 2013.

[15]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7,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1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21.

[17] *Hornet* Action Report,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18]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63.

[19] Interview with Cmdr.F.Monroe, Morison’s Notebook, Pacific XII 1943, p.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20] *Hornet* Action Report, Executive Officer to CO,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1] *Hornet* Action Report,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2] “War Damage Report,” enclosure to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in *ibid*.

[23]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184.

[24] C.O.*Enterprise* to CINCPAC (via etc.),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November 1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5] Francis Foley, “The *Hornet* and the Santa Cruz Islands,”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73.

[26] *Hornet* CO to CINCPAC, et al., October 30,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1.

[27] Report of Cmdr.E.P.Creehan, enclosure B, *Hornet* Action Report,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8] Report of C.H.Dodson, Communications Officer, *Hornet* Action Report, October 30, 1942, in *ibid*.

[29] “CO, Striking Fleet to CinC, Combined Fleet,” October 27, 1942, item 4,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Folder “CruDiv 8 Combat Report.”

[30] “CruDiv 8 Combat Report No.5,” WDC 161270, November 18, 1942, item 7,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Box 25.

[31]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25.

[3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2.

[33] Clemens, *Alone on Guadalcanal*, p.267.

[34] Peattie, *Sunburst*, p.184.

[35] Lt.Cmdr.Iyozo Fujita,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1.

[36] Read, "Report by Lieut.W.J.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p.78.

[37] Leahy, *I Was There*, p.118.

[38] FDR to Joint Chiefs, October 23, 1942, holograph of memorandum reproduced in 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 pp.622-23.

[39]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31, 1942, 引用自Lundstrom,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p.337。

[40] Cmdr.William J.Kitchell's notes,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3.

[41] Trumbull, "All Out with Halsey!"

[42]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27.

[43]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3.

[44] C.O., U.S.S.*Enterprise*,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45] C.O., U.S.S.*San Francisco*, "Air Attack, November 12, 1942," report dated November 16,1942,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46]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47] C.O., U.S.S.*San Francisco*, "Air Attack, November 12, 1942," report dated November 16,1942,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48] Sullivan, "Ship Ahead Just Disappeared."

[49]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p.254.

[50] "Narrative by L.E.Zook, Signalman First Class, U.S.Navy," recorded May 27, 1943,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1]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77.

[52]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of November 12-13, 1942," item 300

in“Chronological Log,”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53]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54]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60.

[55] Action Report, U.S.S.*San Francisco*, “Night Action of November 12-13, 1942,” item 300 in“Chronological Log,” in NARA, RG 38, “CINCPAC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9.

[56] Entry dated November 18, 1942, “War Diary,” 1942-44,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George,USNR.

[57]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84.

[58] “Narrative by L.E.Zook, Signalman First Class, U.S.Navy,” recorded May 27, 1943,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59]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60] Calhoun, *Tin Can Sailor*, p.92.

[61]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62] Cmdr., Torpedo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3-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3]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4]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183.

[65] Edward L.Feighner, “The *Enterprise* and Guadalcanal,”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85.

[66] Mears, *Carrier Combat*, p.155.

[67] Wolfert,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p.169.

[68] “Action Against Japanese Forces Attempting the Recapture of Guadalcanal, November 1314, 1942—Report of,” November 19,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69]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209.

[70] Paul H.Backus, U.S.Navy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71] Earl Hicks quoted in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02.

[72] Entry dated Monday, November 16,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76.

[73] Cmdr., Torpedo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3-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8.

[74] Cmdr., Bombing Squadron 10, "Action of November 14-15, 1942," submitted to the CO, U.S.S.*Enterprise*, in *ibid.*

第七章

在史称“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的三天战斗中，日本海军一败涂地，退入绝境。但田中赖三派出的“东京特快”，也就是在夜幕的掩盖下冲破重重险阻驶进铁底湾的快速驱逐舰，成功地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输送了超过一个师的增援部队。加上川口清健的残余兵力，日军11月中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兵力达到了约3万人。大本营没有料到，如此多的“天孙”竟然都没有打垮美国军队，而且对范德格里夫特的防线连续发动的几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伤亡惨重。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日本海军为了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部队，已经使出浑身解数，再要运载补给去养活这么多的士兵就办不到了。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早在9月，岛上的日军就因缺少粮食、药品和其他供给而日渐瘦弱。到12月的第一周，已经有大批士兵死于瘟疫和饥饿。对岛上的日本士兵来说，瓜达尔卡纳尔岛变成了“饿岛”。^[1]

刚登陆塔沙法隆加角的新兵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瘦骨嶙峋的士兵们走上前来乞讨食物，挂在他们瘦弱的肢体上的破烂军装比碎布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披头散发，头发里爬满了虱子；身上脏兮兮的，浑身坑坑洼洼的开放性伤口，伤口上还有苍蝇。^[2]很多士兵已经扔掉了步枪，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扛枪，就是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但驻扎在海岸的日军已经是岛上物资最充足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在岸边捕鱼、找椰子，或是抢占驱逐舰运上岸的少量粮食。驻扎在丛林深处的军队已经沦落到靠蜥蜴、蛇、树根、草皮和昆虫维持生命的地步。上山的路上到处都是死人的尸体或垂死之人。那些因疟疾、登革热或脚气而无法行走的人经常被遗弃在倒下的地方自生自灭。正如一名军官所

说，对忍饥挨饿的人而言，对食物的渴望凌驾于一切之上：“所有感觉都消失了，只剩下饥饿。士兵们不再欢笑，不再生气，不再哭泣。”^[3]

日本士兵们的日记中记录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和战后的情形，这是一个士气低落、希望落空的悲惨故事。营养不良的士兵们不断激励自己更加勇猛地战斗：“我们必须用最勇猛、果敢、敏捷和自信的行动来抵抗敌人的毁灭性攻击，彻底打乱他们的计划……激发军官和士兵们的斗志是很有必要的。”^[4]但长官们许下了太多无法兑现的诺言：装满食物和其他物资的运输舰马上就会在地平线上出现，日本的战机很快就会遮天蔽日地飞来，敢死队的下一次进攻会使胆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扔掉武器仓皇逃命。但是一连数天甚至数周，空中都没有出现日本飞机，也没有见到日本舰艇从海上驶来。一个日记作者在12月23日写道：“每天只有敌机在空中盘旋、低飞、扫射、投弹，数不清的军官和士兵因此丧命。”三天后，他又写道：“我们的战机啊！祈求你们快些过来吧，让我们振作起来！”^[5]

纪律土崩瓦解。士兵们因为微薄的粮食配给争吵不已。食物被人偷走藏起来。士兵们控告军官克扣食物。士兵们表示，除非填饱肚子，不然他们不工作，不战斗，不行军。一个约450人的日军支队在奥斯汀山山顶密切注意着亨德森机场。瞭望员痛苦地看着美国货船在隆加角停船靠岸，向美军防线运送数不尽的供给、武器和增援军队。一个驻扎在奥斯汀山山顶的中尉做了一张死亡表来预测每个饥饿的士兵剩下的寿命：

还可以站直的：30天。

还可以坐着的：3周。

总是躺着的：1周。

躺着排便的：3天。

无法言语的：2天。

眼也不能眨的：1天。[\[6\]](#)

12月8日，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第十七军司令部报告称仅有4 200名士兵（岛上士兵总数的15%）足够健康和强壮，可以进行战斗。每天的战斗死亡率为40%~50%，其中大多数人死于空袭，但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人数约为空袭致死人数的三倍。[\[7\]](#)

田中12月中旬再次尝试补给，结果一败涂地。他在三天内损失了11艘宝贵的运输舰。奉命冲上沙滩搁浅的4艘运输舰向岛上运送了2 000名士兵、360箱野战炮弹药和1 500袋大米。[\[8\]](#)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牺牲了如此多的稀缺货船，这可能会使整个日本的战时经济受到重创，因为没有原材料进口到日本本土，战时经济便无法正常运作。

此时迫切需要制定一个新的供给策略。田中手下疲于奔命的驱逐舰将再一次被当作运输舰部署，这次使用的是“桶式法”。把空油桶消毒后，装进弹药和供给。用绳索把这些桶连接起来，拴在驱逐舰的外侧栏杆上。一队驱逐舰高速驶近瓜达尔卡纳尔岛后解下油桶，岸上的小船（甚至是游泳者）拉住这些油桶然后拖到岸上。所有的补给都在夜间投放，因为田中不敢让他的船暴露在空袭之下。

第一次投放计划在1942年11月30日进行。当天晚上10点过后不久，8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以近30节的速度快速驶入铁底湾。田中知道在空中可以发现他的军舰，但他仍希望可以把油桶放到水里并在天亮前撤回原位置。那时天气晴朗，微风阵阵，海面能见度良好。在8艘驱逐舰中，有6艘载有供给油桶，每艘200~240个。那6艘驱逐舰仅载有8枚鱼雷（每管一枚）和相当于平常一半的主炮炮弹，以抵消船上的额外重量。[\[9\]](#)

美国的侦察机已经察觉了田中的行动。田中曾在拉包尔、布因和肖特兰停留过，那些地方在当月最后一周的运输量大幅增加，这清楚地表明日军会进行第二轮补给。为阻止日军的增援，哈尔西将军派遣卡尔顿

·赖特少将率领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第67特混舰队）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出发。赖特少将于晚上9时45分穿过伦戈海峡（Lengo Channel），并恰好在田中从北侧接近时到达塔沙法隆加角的北侧海域。

晚上11时6分，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的SG雷达发现2.3万码外有两艘船。雷达后来又相继发现了七八艘船向东南方航行。同时，日本瞭望员凭借天上的巡逻机投下的照明弹，看到“疑似敌舰，位于100度方位”。[\[10\]](#)带头的驱逐舰“高波号”不等田中下令就发射鱼雷，火力全开。

美方为这次行动投入的战力更强——5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来对抗田中的8艘驱逐舰，其中的6艘缺乏弹药，却满载供给。但是赖特将军很晚才下令开火，他的拖延对战况影响甚大。美方的鱼雷发射角度十分糟糕，无一击中日舰要害。5英寸或8英寸的炮弹命中率高一些，但它们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带头的“高波号”上。“高波号”很快便开始全舰起火，从舰首处沉没了。但它的牺牲为日军带来了好处，它吸引了美军的全部火力，掩护了其余7艘军舰。在这场战斗中，其余日舰都没有被直接命中，连造成破坏的近失弹都没有。[\[11\]](#)

田中下令向左急转弯，使他的舰队同赖特的舰队处于平行状态。当它们的左舷朝向敌方时，毫发无损的日军驱逐舰发射了致命的“长矛”鱼雷。鱼雷准确地朝目标前进。11时27分左右，随着弹头逐渐接近目标，赖特将军舰队中心的大型巡洋舰向上颠了一下，然后陷入火海。“明尼阿波利斯号”的左舷受到两个致命伤。第一枚鱼雷炸掉了其舰首并引燃了储油罐，第二枚鱼雷击中船体中部并导致进水，淹了机炉舱。不到一分钟，“新奥尔良号”的左舷舰首也遭一击。鱼雷爆炸时点燃了弹药库，炸掉了一大部分舰首和整个2号炮塔。[\[12\]](#)“彭萨科拉号”的油箱被一枚鱼雷击中后起火，后来燃烧了一整夜。“北安普敦号”是赖特纵队中的最后一艘巡洋舰，它一路追踪撤退的日舰，并向其连续发射了多轮8英寸口径的炮弹。结果它遭到了两枚鱼雷的致命攻击，结束了战斗生涯。它最终被弃，第二天早上沉没了。

这已经不是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夜间的鱼雷战中惨败了。15分钟内，以损失一艘驱逐舰为代价，田中将一艘重型巡洋舰击沉，并重创了另外三艘巡洋舰。海军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评论历史人物的时候，总是不吝批评之词，却极少夸奖人，但是他称赞田中的表现“极好”。^[13]尼米兹将军沮丧地说：“通过日间和晚上的作战，我们痛苦地了解了日军使用大炮和鱼雷的能力。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日军仍然精力充沛、耐心十足而且不乏勇气。”^[14]

赖特将军判断他的舰队击沉四艘并重创两艘日军驱逐舰。然而他自己船上的人员都对这一乐观的断言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第二天黎明未看到敌舰残骸的时候。唯一能让美军安心的，便是舰艇损管队非凡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他们拯救了“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彭萨科拉号”。这场战斗使得三艘巡洋舰起火，几乎要沉没，但是最终三艘军舰上的火都被扑灭了。它们会踉跄地驶入图拉吉港，在战争后期重新投入战场。

田中将军下令停止投放供给，退回肖特兰。这一命令的理由十分充分——日方的驱逐舰已经发射完所有鱼雷，如果在黎明前往西逃得不够远，他可能还会遭到空袭。但这个决定使得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军队供给不足的问题更加严峻，而且这一决定显然也激怒了他在拉包尔和特鲁克群岛的长官。他必须立刻进行第二次尝试。在12月3日的晚上，10艘驱逐舰在埃斯佩兰斯角成功投放了1 500个补给桶。但是日军只拿到了一小部分，可能只有1/5的油桶。被分配去接收它们的军队人手不够，也没有体力。第二天早上，来自亨德森机场的美军战斗机扫射并摧毁了几百个漂浮在铁底湾海面上的油桶。田中在12月7日再一次尝试运输补给，但日舰频繁遭受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并在萨沃岛西部受到了6艘鱼雷快艇的攻击和驱逐。^[15]

日军即便在肖特兰锚地也无法休息。每天都有B-17轰炸机和战斗机空袭此处。12月10日，两艘油轮遭到攻击，燃起熊熊大火，损失惨重。第二天下午，田中出动9艘驱逐舰，成功投放1 200个补给桶。美军的鱼

雷快艇从图拉吉港开过来，发射了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刚投入现役的“照月号”，这是田中的旗舰。他写道：“船开始起火，当即就几乎无法继续航行了，泄漏的燃料在海面上燃烧，把海水变成了一片火海。火势蔓延到弹药库，发生了大爆炸，船体开始下沉。”^[16]“照月号”于次日凌晨4点沉没，与它一同沉没的还有船上一半多的船员。8艘幸存的驱逐舰撤到肖特兰。在作战时受伤的田中被迫留在布因的医院里治疗，在了解到那晚投放的1 200个补给桶只有220个被岛上的士兵拿到后，他非常气愤。

随着月光越来越弱，鱼雷快艇晚上的进攻也越来越致命。三川军一将军下令暂时停止供给运输。田中私下提醒过他，战斗已经结束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必须放弃。因为说了这话，田中被调去新加坡担任一个行政职位。这名卓越的军官，曾竭尽全力利用手中有限的条件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运送补给，曾在不到一个月前赢得一次海战的辉煌胜利，但他此后再也不能在海上叱咤风云了。

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一话题是绝对不能讨论的。不仅仅是海军，陆军也将夺回亨德森机场看作争回荣誉和名声之举，他们这种情绪甚至比海军更强烈。陆军中将今村均近日刚刚到达拉包尔，负责指挥第八方面军。他想从中国调来第六师团和第五十一师团，让他们在年底之前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17]海军高级指挥官们认为这一计划不可行，但他们不愿表态。就算5万多名士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运送上岛（考虑到11月发生的事件，这其实不太可能），他们如何得到补给？目前岛上有3万士兵都在挨饿，到时候有了8万士兵该怎么办？

宇垣将军在私人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军种间的政治十分微妙，“面子”问题也会产生影响。但不应该为了维持海陆军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坚持一场毫无意义的行动。在12月7日，他写道：“错的就是错的，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的，不应因为怕丢面子而冥顽不化，我们在处理问题时应当绝对诚实。”陆军方面应该也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情况是无可避免的，这是很重要的。”^[18]然而

无论如何，情况都将超出他的控制。这种政策上的重大改变，只能是由东京的最高指挥层来做出。

在日本和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其他地方，12月8日是偷袭珍珠港一周年的纪念日。日军用一贯自我吹捧的胡话来庆贺这个日子。海军省公布了极其夸张的统计数据，列出了“大东亚战争”第一年盟军损失的舰船数量：11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46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和93艘潜艇。（它还汇报了日军在战争中阵亡的海军官兵总数：14 802。这个数字相对准确一些。）[\[19\]](#)

报刊都做了年度回顾，以宣扬日军取得的瞩目成就。《国际写真情报》刊登了照相枪拍摄的一组照片，照片上是燃烧的敌军军舰和飞机。[\[20\]](#)在一次电视广播的演讲中，外相谷正之宣称美国领导人“正在以荒唐的方式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可能生产力高，但他们缺少更加重要的品质，如高尚的战争理想，所以美国人是无法赢过我们的”。[\[21\]](#)

从南太平洋归来的日军士兵看到家乡的热烈欢呼非常困惑。在东京，似乎没人明白日本的处境已经变得多么危险。政府可能确实有一些充分的理由要振作公众的精神，但即便在权力高层内部，事实和幻想的界限也开始模糊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2月8日向陆军省的军事领袖发表的演讲中宣称，盟军“固执地想要继续进攻，但我们可以利用充足的物质资源，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消灭他们”。[\[22\]](#)然而东条英机必然知道，就在同一周，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举行了海陆联合作战会议，会上讨论了日军的损失，以及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可能性。在特鲁克，宇垣将军认为，到访的陆军参谋代表团“似乎对美军高昂的战斗意志了解不够充分。另外他们对敌我双方军力的强弱也没有兴趣”。[\[23\]](#)因舰艇维修返回日本的原为一曾在12月中旬同一群海军参谋一起用餐。他对参谋们说：“我不知道驻扎在此地的你们从家乡的角度是如何看待战事的，但前线就是一个地狱。作为专家，你们都知道不应该根据东京

总部官方发布的虚张声势的宣传来做决定。我们取得过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我们正在经历战略上的失败。”^[24]参谋们的情绪逐渐紧张起来，其中一名参谋提醒原为一，在这样的社交场合，气氛应该轻松愉快点。

在12月中旬，大本营参谋本部的真田穰一郎大佐被派到南太平洋调查实情。他在特鲁克和拉包尔询问并记录了海陆军高级军官的观点。即便考虑到翻译过程中一些信息的丢失，这些军官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的。不止一个官员称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很困难”。几名军官把责任推给“最高长官”。所有人都提到了海陆军之间的敏感关系。陆军呼吁得到更多的船舰，海军急需更多的陆军航空力量。哪一方都不想第一个提出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但也没有哪一方愿意将兵力投入新一轮的进攻中。山本的一名高级参谋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如果陆军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海军也会竭尽全力。”今村将军不久前还谈到运送两支部队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此时对真田说的话就要模棱两可多了，而且极其高明：“现在，我们正探讨能让我们走出困境的计划，但光凭我们不能说指挥政策应该改变。我希望高层能在认真思考和海军的关系后，从大局出发做决定。”^[25]

在大本营的会议上，海陆军的长官通常相对而坐，这样的座位安排只会加剧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会相互责难，直到所有的观点都说尽。陆军指责海军没能维持足够的补给线，海军则批评陆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采取的地面战术，并要求获得更多的航空支援。佐藤贤了将军回忆称：“海军和陆军领导人握紧拳头，隔着桌子激烈讨论。”^[26]可是哪一方都不想闹僵，而这不单单是因为双方在所罗门群岛都损失惨重。天皇也对两个军种之间的争执很不耐烦，为此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陆海军的将领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达成某种面子上的一致。后来事实逐渐明朗：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解决瓜达尔卡纳尔岛问题的出路。随着讨论一轮接一轮地进行，政府艰难地寻求一致，而此时岛上每天都有200名左右的日军丧命。

真田大佐在12月29日回到东京当天就向东条英机做了汇报。他的正式提议同他在拉包尔和特鲁克听到的观点相比，只是稍微委婉一点。他说的是：“急着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是不明智的。”^[27]他本以为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东英条机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他如释重负。真田大佐的报告和建议“被欣然接受了，不像我之前担心的那样”。^[28]

根据宇垣缠的记述，陆军与海军之间在1942年12月16日便已达成“共识”，但这撤军提议过了两周才交给天皇。年底最后一天，在皇宫举行的会议上，最高指挥部提出了一致的提议——应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将尽量撤出存活的陆军士兵。天皇很不高兴，他问了永野修身很多问题，追问南太平洋建造机场的缓慢进展。^[29]裕仁天皇同意了这项建议——大臣们能够达成统一意见时，他总是持同意态度。但他补充说如果在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同时没有对新几内亚展开新一轮的进攻，那是“无法接受的”。^[30]日军不能只保持防御姿态。几天后，天皇通过侍卫长向最高指挥部传达了旨意：“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很令人遗憾。为达到作战目标，此后海陆军需要进一步合作。”^[31]

虽然遮遮掩掩的，但新的政策终究是让日军撤到了南北向贯穿所罗门群岛中部的新防线上。陆军将会在新乔治亚岛和圣伊莎贝尔岛的北部构筑防御工事并派兵驻扎在岛上。海军将会加快新乔治亚蒙达岛的简易机场的建造工程，使其成为该地区主要的前线战斗机基地。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陆军的残余部队，海军将继续向其运输补给，但补给量顶多算是施舍——对美军的防线则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小柳富次将军指挥10艘巡洋舰于1943年1月2日和10日运送并投放了补给。和之前几个月一样，补给都装在油桶里，投放在塔沙法隆加角海域。^[32]有大半油桶都被拖上了岸，为岛上已不足1.5万人的日军提供了救命物资。

此次撤退和掩护撤退的行动被称为“KE”行动。1月14日，一队精力充沛的步兵和炮兵大队（“矢野大队”）作为后卫部队登陆上岛。大规模海军和航空部队也向所罗门群岛进发。然而这些部队被盟军的侦察机发

现了，日军也早已料到会是如此。对亨德森机场的昼夜空袭急剧增加。美军情报员分析通信量后，误以为日军正在发动新一轮海上进攻和登陆行动，美军指挥官对此做出相应指示。亚历山大·帕奇少将（12月7日，他接替范德格里夫特成为美军地面部队指挥官）指挥着5万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帕奇开始向日本第十七军司令部所在地，也就是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海岸上的科库姆博纳南方的山区进发。美军发现日军的抵抗出奇地软弱。1月23日，第25步兵师的士兵无人阻挡，顺利进山。日军显然在匆忙向西撤退，但帕奇没有大举追击，因为他仍认为将有一场大规模的登陆战。哈尔西派剩余的巡洋舰和航母特混舰队进入铁底湾内部和西部。1月30日，日军的空袭炸毁了“芝加哥号”巡洋舰。

2月1日，在日军撤退行动开展之时，美军收到了海岸警卫队员和巡逻机传来的一系列敌情报告。大约有20艘日军驱逐舰沿着“槽海”航行。一队规模较小的日军步兵已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西侧约30英里的拉塞尔群岛登陆（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岸的高崖上可以看见这里，传奇的澳大利亚海岸警卫队员罗兹也曾在此地的一处四面透风的小屋内居住）。从日军停泊处布因上方飞过的盟军飞机观察到日军军舰的数量在急剧增加。日军的空中行动增加到了12月以来不曾有过的程度。哈尔西请求麦克阿瑟“将所有可用的航空力量都用来抵抗可能会马上到来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应该会与11月中旬的进攻很相似”。^[33]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将现有的大部分海军力量调到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防备即将到来的突袭。

考虑到日军士兵贫病交加的处境，日军向西北角撤退的速度可以说是快到了出人意料的地步。撤退命令一开始只下达给几位长官，他们的士兵都被蒙在鼓里。大多数日本兵都在期盼支援，结果突然被告知要撤退。（日军将领认为这样的隐瞒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可以让士兵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第三十八师团在第二步兵师团和矢野大队的掩护下撤向埃斯佩兰斯角。一旦跟美军脱离战斗，后卫部队也会撤到西部。因疾病或营养不良而丧失行动能力的士兵则在别人的劝说下自行了断。

第一次撤退行动于2月1日晚间完成。在桥本信太郎少将的指挥下，21艘日军驱逐舰载着4 935名士兵驶离瓜达尔卡纳尔岛，这些士兵将近剩余士兵人数的一半。2月4日到5日的晚上，桥本率领20艘驱逐舰归来。在击退空袭和鱼雷快艇的袭击后，他将第二师团的3 921名士兵接上船，并于次日成功将他们送到布干维尔岛。在2月7日到8日实行的第三次撤退中，1 796名日本兵被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拉塞尔群岛。

16 800名士兵的尸体被遗弃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其中许多还未埋葬。被救出来的士兵比稻草人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的膝盖和手肘在干瘪的身体上十分突出，头发和指甲都已经停止生长，屁股已经瘦到肛门外露的程度，并且一直在腹泻。有些士兵带上了已故战友的骨灰。[\[34\]](#)布干维尔岛上的年轻士兵石田雄救助了许多登陆艇上快要饿死的人：

我们守在岸边，轻轻地将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抬到岸上，放到沙滩上。他们此刻的景象真是悲哀又可怜。他们几乎算不上人，瘦若竹竿，军装下的简直是皮包骨头。他们体重轻得像婴儿一样，只有眼睛是明亮的。他们肯定是单单依靠强大的意志才活下来的。当我用勺子把一些温热的米粥送到他们嘴里时，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们的脸上滚落，他们还用微若蚊蝇的声音说着谢谢。我感到我的眼睛里也有温热的液体在流动。当初那些命令他们采取登陆行动的长官让我怒不可遏。[\[35\]](#)

帕奇按兵未动，觉得对手随时可能会全力抵抗。他和参谋仍然相信，敌军在过去的一周里一直在将新的增援部队送到岛上来。美军沿着北海岸和西海岸前进时，在路上仍没有碰到大批日军军队，只有零散的几个日兵，大多重病垂危，此外还有几个困惑的当地人。美军在塔沙法隆加缴获了一些日军基地的遗留物资，包括十台大炮，一个军火库，药品库和一个无线电台。2月9日的下午，两支军队在西岸的村庄腾奈罗会合。帕奇终于明白他被骗了。他向哈尔西发电报说：“今天16时25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被正式击败……东京特快已经不再将瓜达尔卡纳

尔岛视作终点站。”[\[36\]](#)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以日军的惨败结束。不过日军的3.6万名登陆上岛的士兵中，至少还有10 652人活了下来。此次撤退可以看作一次小型的敦刻尔克撤退，是一场看似不可能的战术撤退，在装备更精良的盟军海陆空部队的眼皮底下发生了。日军完成了一次果敢的营救行动，代价仅为一艘驱逐舰沉没，三艘受创。一直在揣摩日军意图的美军无线电情报员没能预见到此次撤退。山本五十六祝贺了小柳富次，并补充道：“你做得非常出色。……陆军知道我们将他们的大批士兵安全送返后，会非常高兴的。”[\[37\]](#)

山本的对手尼米兹将军对这一行动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在写给金将军的信中说道：“直到几乎最后一刻，日军依然显得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增援。他们技巧高超，很好地藏匿了把士兵运出该岛的意图，行动迅速果敢，才使得日军成功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驻守部队的剩余兵力。直到2月8日日军有组织的兵力全部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我们才了解到对手的意图；不然我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强大军队和南太平洋上的舰队可能会使这次撤退变成一场灾难。”[\[38\]](#)

金将军不能因为这件事怪罪尼米兹、哈尔西或任何一位现场的美军将领。他也预计日军会向瓜达尔卡纳尔岛发起一场大规模进攻，并且在1942年12月2日面对一群记者的非公开采访的时候，说出了这一判断。美国舰队总司令告诉记者，日军“已经颜面尽失，正千方百计地要夺回瓜达尔卡纳尔岛”。[\[39\]](#)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为期六个月的战役中，双方的海空兵力损失大致相当。在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过程中，共有67艘军舰沉没——盟军损失29艘，日军损失38艘。日军击沉两艘、重创一艘美军宝贵的航空母舰，这使得“企业号”成为战场上美军仅存的航空母舰，但美军也击沉日军两艘轻型航母和两艘战列舰。双方都损失了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非

战斗型运输舰和货船，短时间内很难补上。有几次，日本海军展示了其卓越的夜间水面战斗力，但随着美军日趋熟练地使用雷达来发现对手并且进行火力控制，日军的优势逐渐丧失。到1942年秋，美军军舰可以不借助探照灯和照明弹便击中尚未看到的敌军。这是同日军作战时一个重要的科技优势，并且大大抵消了日军水面舰队凭出色的技术、训练和鱼雷武器所获得的优势。

在这场战役中，双方各损失了六七百架飞机，但被击落后重新救起的飞行员人数则完全不同。盟军在所罗门群岛损失了约420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而日军损失的人数是美军的三倍还多。从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以后，日军的机组损失人数就一直远超盟军。环境是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一部分原因——在整场战争，尤其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期间，空战主要发生于靠近盟军的区域，而非日本的航空基地及海军基地附近。另外，日军也没有花费太大力气开展搜索救援活动，这样的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武士道精神，这是一种崇尚在战争中有尊严地死去的传统尚武精神。

通过战时训练培养的后备飞行员缺乏战斗的技能和信心。早在1942年11月21日，山本将军便向一名到访的陆军军官坦承，日军正在输掉所罗门群岛的空战。“在海军中，人们过去爱说，一架零式战斗机可以同时对抗五架到十架美军战机，但这种情况仅仅发生在刚开战的时候。我们在中途岛战役中损失了许多优秀的飞行员，此后很难有人顶替他们。即使到现在，他们仍在说一架零式战斗机可以对抗两架敌军战机，但敌军的替换率是我们的三倍；两军的兵力差异日渐悬殊。说实话，如今的战况对我们十分不利。”^[40]实际情况甚至比他了解或愿意承认的更为严重，因为美军的战斗机飞行员已经学会如何抵消零式战斗机在灵活性和爬升速度上的优势。

最惊人的是两军人员伤亡方面的差异。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共有5 875名伤亡人员，其中有1 592人在战斗中阵亡。日军在岛上损失了整整两个师，其中大多数人是阵亡（或死于其他原因），而不是受伤或撤

离——有14 700人在战斗中被打死或失踪，据估计另有9 000人死于饥饿或疾病，还有4 300人在撤离或前往该岛时死于海上。这种悬殊的伤亡结果，破除了日军狂热的“战斗精神”不可战胜的神话。田中将军总结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只是一个岛屿的名字，“它也是日本陆军墓地的名字”。^[41]

日本民众允许了解的情况是，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行动是战略性的调遣。大本营使用的委婉说法是“转出”。日本的海陆空攻击部队只是“转”向了新的战场，在那里他们无疑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胜利。由国家控制的日本新闻媒体长久以来一直默许日本奥威尔式的捏造事实的做法，而且必须采用兴高采烈和义正词严的口吻。但是很多刚从战场回到家乡的军人悄悄说出的情况，跟官方说法完全不一样。

几个在战争中幸存的日本军官后来进行了坦率的分析。虽说是后见之明，而且这些分析的英语译文可能带有选择性，目的是满足胜利者先入为主的想法，但参与这次行动的日军军官对他们国家的战略失败终究是提出了恳切而又直接的批判。原为一认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是“中途岛战役后山本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和战术失误”导致的。联合舰队总司令没有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的第一时间里投入大规模的海军，而是“向海里扔进一个又一个小型舰队。事后看来，他当时做的决定真是愚不可及”。^[42]近藤信竹是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司令，他认为山本在8月份就应该倾其所有，将手头全部兵力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即便需要放弃进攻新几内亚岛的东南部。他引用了一句日本的谚语：“搏二兔，不得一兔。”^[43] 17世纪的剑道家宫本武藏所著的《五轮书》是日本海陆军将领的必读书，书中提到了“压”的概念。为了在面对弱小的对手时保持心理优势，作战时必须“将敌人的行动扼杀在摇篮中”。也就是说，敌人必须要立刻明白，他的攻击会受到阻挠和挫败；绝不能让他产生他会夺得先机的想法：“如果你向对手明确展示出你是如何握有优势的，他们就会改变想法，被你的优势震慑住。”^[44]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暴露出日本军种之间的分歧和不和，二者分裂

了军事集团，还使其无法做出合理决策。很多重大决定，尤其是需要海陆军联合作战的决定，都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做出。共识的达成也需要时间。“面子”一直是个重要因素。日本陆军刚开始没有正确认识到盟军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进军的意义，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和海军一起可以将盟军随时驱赶出岛。随后他们派了小规模且效率低下的军队登陆上岛。刚开始，一个轻装联队登陆上岸并被消灭了；接着是一个轻装旅团；最后是一整个师团，但是这个师团没有足够的弹药、装备和补给。向严防死守的海岸发起的正面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死伤惨重。即便是在海军内部，指挥权之间的纷争也影响了作战。田中将军不止一次地收到第十一航空舰队和第八舰队截然相反的命令。一个司令部负责指挥整个地区，而另一个司令部则是田中的直接上级。双方都视对方为干预者，对大小事务都争论不休。田中认为双方无法有效协作简直“难以想象”，因为他们（通常）都在拉包尔进行指挥。“当他们的命令互相冲突、难以调和时，至少会让人非常尴尬；而最糟的是，这样的命令让人无所适从。”[\[45\]](#)

日军一旦采用某种作战方案，在普遍的惰性心理的驱使下，便极少对方案进行修正。日军战略中固有的僵化特性使得盟军可以分析并预测出日军重复再三的模式。即便通信情报员无法侦听出日军的意图，美军长官往往也能预测出日军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动下一次进攻。宫本武藏曾写道：“重复某种战斗模式风险极大，若重复第三次，便更是风险重重。若某个策略尝试失败后，可以进行第二次尝试。若再次失败，这一策略必须要大幅度修改。若依旧失败，那么必须要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敌人思高则击低。敌人思低则击高。这便是剑法的奥秘所在。”[\[46\]](#)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遍布着长时间、大范围激战留下的创痕。隆加平原上弹坑遍布，到处可见棕榈树的残枝断叶。遍地的残骸堆在道路和机场跑道的边上，或是半掩在沙滩上。毁坏的坦克和飞机的残骸已经生

锈，上面爬满了枝叶。铜制电话线杂乱地挂在没有倒下的棕榈树上。田中的4艘报废的运输舰的舰首还立在克鲁斯角西边的海岸上。即便在最后一场海战结束的数月之后，铁底湾上还漂着残骸和棕色的浮油，标记着沉船的地点。

大炮和机枪把亨德森机场南部山上的树木都摧毁了。美军防线围栏铁网外的淤泥里半埋着日军肿胀发臭的尸体。恶臭令人发呕，但美军丝毫不急于掩埋敌军的尸体。因为他们知道，日军会将阵亡战友的尸体用作饵雷。蚂蚁和其他食腐动物会把他们的尸体分解为白骨。

在过去的屠杀遗址当中，宏伟的新建筑工程已经启动。人们已经敏锐地注意到，推土机是太平洋战争中最重要武器之一，这一点在1943年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体现得最为明显。10个工程营的1 100名士兵被派遣至此，加入（在1942年11月的炮火中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第6营和第14营这两个先头部队，然后被重编进海军第18建设团。飞机场得到了扩建和升级，路面以珊瑚或红火山岩制成的混凝土重新铺设。滑行道网络将护墙、军火库、兵营、仓库和伪装的弹药储存地连接起来。科里角内陆的山头被削平，被用作美国陆军航空队轰炸机的新基地，称作“卡尼机场”。隆加角和亨德森机场附近的油库迅速增加，并以几英里长的管道同机场和码头连接起来。科里角、隆加角和克鲁斯角周围的树木被推土机连根拔起，这些海角的混凝土码头、起重机、管道和通向仓库的窄轨铁路等现代化港口设施，可以接纳源源不断的运输舰和油船。每天都有增援部队、飞行员、维修人员和平民乘船或乘坐南太平洋战斗空运司令部的道格拉斯C-47运输机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难以穿越的丛林里铺砌了道路，河面上立起了钢架桥，电线杆之间架起了电线，棕榈林和荒原上突然涌现出一批帐篷城市。不断扩张的居住区的社交中心是“怪人酒店”，一种为暂住的飞行员和其他参观者提供的一系列活动营房。宽敞的大餐厅则全天候供应咖啡和热餐。

随着所罗门群岛的反攻行动日渐增多，南边和东边的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圣克鲁斯、萨摩亚和斐济——都变成了临时居

住区、休息区和中途站。战争没有在这些群岛上打响，但这些岛屿上还是有大量盟军人员，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很多太平洋战争的回忆录都对这些免于战事的热带乐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年轻士兵（和女性，尤其是护士）会在这里住上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詹姆斯·米切纳曾是一名海军预备役上尉，驻扎在圣埃斯皮里图和所罗门群岛东部的其他岛上，他战后出版的小说《南太平洋的故事》（*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是将他的经历稍加虚构写成的，其中就有对上述岛屿的描写。^[47]这些和平的岛屿上的生活在历史作品或战争影片中出现得很少，却成为曾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初登这些人迹罕至的海岸上的旅客无疑会为此地的异国风情所吸引——蔚蓝的潟湖、洁白的沙滩、五彩斑斓的花鸟鱼虫、棕榈叶的沙沙声、波浪规律的撞击声，无不令人陶醉。岸边长着繁茂的酸橙树和柠檬树。驶过的小船留下的尾流中不时跃起鱼儿。这里的日落与他们以往见过的都不同，宛如一个绝妙的调色盘，从蓝到黄到绿到红再到紫。星星的位置好像都是错的，至少在天空的南半部分是这样。有人可能会在北部天空发现熟悉的星座，但形状颠倒。战时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都载有此类的观察。

这些岛屿也有危险的一面。有观察者描写过雾气笼罩下的黑漆漆的火山。餐盘大小的陆蟹一到傍晚便在他们帐篷边上爬来爬去。翼展有4英尺宽的果蝠会在黄昏时飞来飞去。昆虫不计其数，蚊子还会传染疟疾。当地人的缠腰带和裸露的胸膛，尖利而发红的门牙，说的让人似懂非懂的英语，让美国和其他西方人对他们又感兴趣又有些害怕。有谣言称这些部落仍保持着砍头和吃人肉的习俗，这真是既让人好奇又让人觉得可怕。他们将人肉称为“长猪”。哈罗德·比尔回忆称圣埃斯皮里图岛上的人喜欢拿吃人这件事开玩笑。“当地最受欢迎的一个玩笑是拧着你的胳膊或肚子，一本正经地说：‘这只长猪不错。’然后他们会使劲把门牙齙出来。”^[48]美国人会慷慨地用东西交换缩小的头颅，而且至少有些人偷偷将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纪念品带回了美国。

在后方各岛待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军队都会觉得无聊透顶。正如他们在太平洋其他地区那样，他们会玩扑克，一玩就是好几天。士兵们会玩跳棋、双陆棋、克里比奇牌戏，阅读几个月前的老杂志、漫画书和报纸。不同船上不和的士兵或水手之间玩起了血淋淋的“竞技比赛”，其他人则对“战果”下注。人人盼着收信和读信，而随着战事的进行，邮船来得越来越有规律。然而读信只能占很小一部分时间，并且因为战时的审查制度，信上能写的东西也受到限制。每晚临时的室外剧场都会放电影，士兵们坐在地上或者椰树桩上看，但因为新的胶片稀少，他们经常要把一部电影看上二三十遍。他们经常能不假思索地跟演员同步讲出电影对白。最后，在设施比较齐全的岛上，士兵们还建起了网球场、投马蹄铁的运动场和棒球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慰问团）会来到大一些的岛上，使得这些岛上的表演规模更加丰富多样。在小一些的岛上，能得到一点娱乐就很幸运了。海军陆战队二等兵约翰·弗林格曾在萨摩亚的一个小岛上驻扎八个月，他“只看到一场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这场演出只有两个杂技演员，一边表演杂耍一边讲黄色笑话。这要是美国本土，他们可能早就被赶下舞台了，但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我们都需要”。[\[49\]](#)

酗酒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发泄方法。每个岛上都有一个军官俱乐部，不过在比较小的岛上，它可能仅是一个茅草棚，下面放一张木头桌子。阿龙·斯坦顿·梅里尔将军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能找到一棵棕榈树和一个杯子，我们就可以搞起来一个军官俱乐部。”[\[50\]](#)士兵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才能换来一杯酒。在整个太平洋战区都有所谓的“鱼雷汁”（torpedo juice）——鱼雷用的高酒精含量燃油——的非法交易。啤酒通常是定量的，每周两罐。如果有人用某些手段搞到了更多的酒，就会找人把酒带去高空冷却30分钟。帮忙完成这件事的飞行员能分得一份作为报酬。威士忌更稀缺也更昂贵，但在黑市上所有的东西都有标价。

战地记者厄尼·派尔在战争末段来到战场后写道：“可怕的战争在哪里都差不多。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就连生活的乐趣也变得如此单调。

.....日子在无止境的重复中一天天过去，这样的生活要把人们逼疯了。人们有时候把这种状态称为‘菠萝疯’。”^[51]1943年，人们越来越担心南太平洋偏僻地区军队的士气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马歇尔将军为后方岛屿基地上驻军的心理状况感到担忧，他认为一旦可以，军队应立即转移到前方作战区。他对此事的观点，可能是他经常支持金将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攻势的一个原因。

哈尔西将军从努美阿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向遥远的岛屿发号施令，他是少有的不在乎自己颜面的军队领袖，他可以被嘲弄自己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穿的卡其短裤在他苍白瘦弱的腿上晃晃荡荡的。他从不自傲，乐于承认自己是海军学院1904届的倒数第三名，而且他被记过的次数很多，差点断送自己的事业。他常说，他曾在海军史上最烂的橄榄球队里当明星后卫。（他当后卫每一年所参加的比赛，海军队都会输给陆军队，而且比分悬殊。）哈尔西十分认同欧内斯特·金的座右铭：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的海员是不可以完全信任的。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总是掐着一根烟。有一次，他在圣埃斯皮里图岛下飞机时亲了他的女朋友（一名陆军护士）一下，而此时一排军官正立正站着。他时常一直喝到天亮，只睡四个小时，然后在上午9点的参谋会议上抱怨自己宿醉未醒：“昨晚喝的时候可没想到会这么难受。”^[52]哈尔西一直以来的参谋长说，和哈尔西一起无拘无束地行事，“比马戏团表演有意思多了”。^[53]

哈尔西很有幽默感。他有时说的俏皮话就是放在鲍勃·霍普的独白中也不会显得不合适。哈尔西曾无意中听到一个海员对另一个海员说：“我会为这个老王八蛋赴汤蹈火。”哈尔西走上前去跟这两个船员搭腔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反对别人说我‘老’。”^[54]1945年，在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向所有的舰载机大队发出了如下指令：“找到并干掉所有的雷达侦察机——别太狠毒，要友好点。”^[55]他愿意接受

别人对他在战火中勇气不足的取笑。1942年2月“企业号”在马绍尔群岛附近遭到日军战机袭击时，哈尔西不顾自己的中将身份，趴到了甲板上。站起来以后，他发现一名年轻的信号员正抑制不住地大笑。他问道：“你在笑什么？以你的军衔没资格嘲笑一名将军。”这个信号员生怕自己惹上大麻烦，赶紧开口道歉，哈尔西打断他，说道：“现在你是军士长了——这样还差不多。”[\[56\]](#)

哈尔西非常清楚，这些趣事很快就会被添油加醋，在士兵之间传遍。他们一起把哈尔西塑造为这样一种形象：喜欢打仗，并且希望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是一名乐观的勇士，好战的士兵。这样的描述里有很多真实的成分，但不全是真的。不同于太平洋战争中任何其他的重要军事指挥官，他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会毫不掩饰地当众哭泣，而且很频繁。视察作战归来的战船、去病房看望伤员、把奖牌别在士兵的胸前，或是走到麦克风前对全体船员发表讲话时，他都有可能落泪。因率领航空母舰突袭马绍尔群岛而获得优异服务勋章时，哈尔西抽泣着对“企业号”的官兵说，这个奖离不开他们所有人的努力。他独特的领导方式可谓自相矛盾：既冷血又温柔，既言过其实又思维缜密，既专横又谦虚，既多愁善感又荒唐可笑。无论这到底是怎样的领导方式，其产生的影响都非常明显。“蒙彼利埃号”的海员詹姆斯·费伊在1943年11月的日记中写的话无疑道出了舰队的心声：“我们可以为他做任何事。”[\[57\]](#)

他比一般人要高，肩膀很宽，头很大。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眉毛灰白而凌乱。他拥有老水手的皮肤，饱经风霜，斑点重重。姿态不是他最大的优点；相机经常拍到他把手放在肥大的臀部，头向前伸出去很远。不同于金、尼米兹、特纳或斯普鲁恩斯——事实上，不同于美国海军中任何一位高层人物——哈尔西在拍照时总是强调要笑。他是一个温暖又积极的人，他爱所有人，包括记者。在对待记者方面，他比金和尼米兹要热心得多，而且经常说出金句来。记者们很感激他这份热情，对他做了很多积极的报道。媒体（也可能是所有美国人）都很想塑造一个好莱坞式的海军将领的形象。哈尔西从没有争取过这个角色，但当这个

角色落到他身上时，他也没有退缩。

如今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敌军的深恶痛绝。他的标志性口号总结了他的态度：“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日本鬼子！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58]他对舰队说的话常常以这样一句话结尾：“让他们不断死去。”他在接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后不久，给尼米兹写了一封私信，信中哈尔西发誓，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杀掉这些黄种浑蛋，我们一定要做到”。在这封信里他还提出将潜艇战作为“搞到更多罐头牛肉”的方法。^[59]杀掉敌军的士兵和海员是每一个军人的责任，哈尔西不是唯一一个把此种战时极端民族主义话语挂在嘴边的盟军高级领导人。但哈尔西比同时期的其他所有军官都要激进，他没有将日本军队和日本民众加以区分，似乎还主张在战后占据日本以作为报复，这些言辞使他很出名（或者说让他获得了恶名）。“当我们教训完日本人的时候，我们就让说日语的人下地狱。”这话是他在12月7日偷袭发生后的第二天返回珍珠港时所说的话（可能是谣传）。在1944年初，他告诉记者：“我们一定要去东京，到了东京之后，我们将会在日本的旧址上搞个小小的庆祝。”^[60]哈尔西曾在私下里说（可能是开玩笑），应该阉割所有的日本男人，并切了所有日本女人的卵巢。他曾告诉特纳，他希望能把山本五十六用铁链子拴着在华盛顿游街示众，“你们其余的人就去尽情嘲笑他”。^[61]在几次公开演讲中，他似乎暗示，被日本民众奉为仁爱父神的裕仁天皇在日军战败后会被处决。1943年1月2日，哈尔西说出了他对战后占据日本的设想：“我们将会跨过日本所有的小村庄，在东京〔让占领军〕放纵一下。他们在那个城市里可以为所欲为。”^[62]

语言不等同于行动，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如果哈尔西真有这样的机会，他会下令摧毁一个城市，阉割居民，把人们都弄成阶下囚，并肆意违反《日内瓦公约》。哈尔西对敌人的恨是十分真切的，盟国的军人和民众也深有同感。考虑到这场野蛮战争的特殊背景，最好将他的标志性口号理解成愤怒的表达而非真正的威胁。在这个怒吼的演员背后，实

际上是一个细致入微、性格复杂的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讽刺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哈尔西竟然公开谴责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

更有意义的是现实问题。哈尔西在战时发表的愤怒讲话，如果说对盟军有鼓舞士气的作用的话，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些话有什么坏处吗？战后他解释道，他是想通过破除日军“超级战士”的神话来激励战斗部队，而这一神话是日军在战争初期胜仗不断制造出来的。但更有可能的是（通过他的战时信件和与他工作关系密切的人的观点来判断），哈尔西盛气凌人的演说根本没有预先设定的目的。他仅仅是发泄自己的感情，却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做的后果。很明显他没有想到过，他可能直接给了日本的鼓吹者可乘之机，这些人在报道的时候完全可以罔顾事实，宣称美军有一名战区司令威胁要屠杀整个日本民族。

不把敌人视为人是战争不可避免的罪恶之一，但是每个指挥官都有责任控制军队的兽性。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有极少数美国步兵干过切掉敌人头颅的事情。最普遍的做法是摘走日本兵的金牙，但是也有士兵把割下来的耳朵挂在腰带上，把牙齿做成项链，把敌人的头颅穿在杆子上，把头骨放到坦克上。早在1942年9月，尼米兹就下令“禁止将敌军的身体部位当作战利品”，并警告说违反者将会面临“严厉的军纪处罚”。^[63]后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多命令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将敌人的身体部位当作战利品拿走的行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存在，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中也有所报道。1944年5月，《生活》杂志《本周照片》栏目刊登的图片，是一个女人在欣赏一个日本人的头骨，这个头骨是她当海军上尉的男朋友送给她的。一个月后，罗斯福收到了一把由日军士兵胳膊上的骨头雕刻成的开信刀。（总统刚开始收下了它，但后来退回并下令埋了它。）

日本的新闻媒体很快就开始利用这样的报道。他们截取出哈尔西的演讲中对他们不利的部分，断章取义，从而为日本战时宣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真相和假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美国人被看作野兽、野蛮人

和恶魔的化身。向这样的敌人投降简直不可想象。因此，全民都必须参加保护家园的战斗，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要奋战到底。1944年至1945年，日军战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美国人也要像日本人一样付出性命的代价。

1942年新年的前夜，哈尔西在努美阿港的旗舰“阿尔贡号”运输舰上与一群记者会面。有人问1943年的战争前景如何，哈尔西高声宣布：“胜利。轴心国势力将全面而彻底地战败。”^[64] 记者们请他说得更详细些，他坚定地声称，年底美军将会占领东京。记者们想必是被自己的幸运惊呆了，提交了他们的采访，这一草率的预言很快便登上了全美国报纸的头版。两天后在新西兰，哈尔西仍然坚持己见。他对《新西兰先驱报》说：“我们还有363天来实现我的诺言，我们一定要实现。”^[65]

在战后的自传中，哈尔西坦陈他知道自己许下的承诺是无法实现的。战争不可能在1943年结束，甚至1944年都不会结束。他说出这个不切实际的预言是为了提升军队的士气，巩固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的政治地位。几周之后，他就开始意识到，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征兵局叫苦连连。制造业领袖害怕工人们会辞职。有谣言称哈尔西接受媒体采访时喝醉了，诺克斯部长和金将军不得不出面澄清。哈尔西的这段不切实际的言论此后还会一遍一遍地打他自己的耳光。最后他不得不抵赖，拒绝承认自己说过这话，这让他非常没面子，也让日本的撰稿人高兴不已。

德威特·佩克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曾在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任职，他说哈尔西的多嘴和志在必得的气势只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已。“公众对他的印象来自报纸和其他东西，以为他是一个‘去他妈的鱼雷，全速前进！’这种鲁莽的人。事实上他并非如此。……我从没有见他做出过任何一个鲁莽的决定。他是一个很有头脑、聪明、强有力的领导者。”^[66] 哈尔西主张在做决定前对全局有个把握。他想倾听每一条

反对意见、每一条论据，他还鼓励下级军官和士兵畅所欲言。他是一位果敢又不盲目的战略家。他对细节有着很好的把握，能看到事情的方方面面，能正确地预测风险。一位在努美阿拜访过哈尔西的英国军官认为，这位将军的外貌和举止十分有意思——他不拘礼节，友善而幽默，穿着短裤，浅卡其色衣服上没佩戴徽章。“我记得我当时想过，他可以当一位牧师，一个快活的人，一个旧时的农民，或者像朗·约翰·西尔弗那样的大盗。但在和他分别后，重新思考他说过的话时，我意识到，说出这些话的，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海军将领之一。”^[67]

哈尔西把自己的航母特混舰队中的几位核心成员带到了南太平洋。迈尔斯·布朗宁给他当过一年多参谋长，此时在南太平洋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一同前来的还有朱利安·布朗（负责情报）、道格·莫尔顿（负责空中作业）和比尔·阿什福德（副官）。海军陆战队的德威特·佩克将军在1942年8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战之前，曾是一名出色的作战计划员，如今恢复了这一职务。前明尼苏达州州长哈罗德·史塔生1943年3月上船担任参谋长助理。尼米兹勤务部队的指挥官威廉·卡尔霍恩少将来接管南太平洋的后勤工作。约翰·雷德曼上校担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通信官。即便拥有这样精干的队伍，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在1943年年末之前仍是人手不足，负担过重。尼米兹不止一次地催促哈尔西及时提供作战报告。^[68]以斯普鲁恩斯的恰当评价来讲，“哈尔西是一位极好的战士和领导者，但他不适合做一名管理者”。^[69]

哈尔西决心避免重蹈戈姆利的覆辙，不因琐事而陷入困境。他把职权尽可能分给其他人，给自己留出时间和精力去做更重要的决定。接管努美阿后不久，他就晋升为海军上将，成为第六位拥有这一卓越军衔的海军将领。他的意见在华盛顿变得更有分量，他也借助这一点拒绝了将他的几位重要军官调回首都的决定，同时他还要求调来更多的人。他为这些军官争取升职，并威胁称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会自己给他们升职。南太平洋战区的组织稳步扩大，最后达到了300多人，包括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军官和士兵。哈尔西有一项过人的本领，能

记住别人的名字和相貌。他对士兵直呼其名，还能回忆起他们过去服役时的细节。他拥有极为开放的态度。一名军官回忆道：“哪怕一个看门的想见哈尔西，他也不拒绝。”^[70]

南太平洋战区的参谋人员形成了重要的团体精神，代表作风是不系领带（哈尔西规定的）。一个海员在日记中写道：“他想让士兵舒服一点。他不喜欢这些规章制度。”^[71]这个“不系领带”的规定不单单是为了让士兵在闷热的环境里舒服一点。陆军军官平时就不系领带，哈尔西不想让这成为一个军种的象征。他对军官们说：“我不想让任何人从陆军、海军或海军陆战队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如果我要他脱下军装，再给他发一套后面印着‘南太平洋战斗部队’的制服，每个人都必须理解。大家会理解的。”^[72]

努美阿是一个缺乏生气的小殖民地首府，虽然有些破败，但同南太平洋的绝大多数海港相比，这里还是很不错的。范德格里夫特回忆它时，称“这里尽管破败，却朴素得令人愉悦，房子的二楼都有环廊，百叶窗的旁边满是盛开的花朵”。^[73]这座城市是法国殖民地，只要有钱，就能在这里买到美食和美酒。种植园的大人物住在山上通风透气的豪宅里，房子侧面是一排排优美的椰子树。他们的女儿是当地人的偶像，经常穿着洁白无瑕的丝质裙子。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没见过她们，但是知道她们的长相和名字，只有军官才能一睹她们的芳容，而且只能是相亲的时候才行。法国的殖民者没有因为美军的涌入而欣喜不已，但他们觉得，如果一定得有盟军涌入，那美国兵总比英国兵好。

随着哈尔西部下的增加和南半球夏季的来临，人们逐渐意识到，“阿尔贡号”无法容纳巨大的司令部。当地的法国官僚过去一直不配合，不同意戈姆利征用岸上的房子安置司令部，但哈尔西下定决心，要办成前任没有办成的事。他派朱利安·布朗上校作为使者去见法国总督马里·亨利·费迪南德·奥古斯特·蒙特尚阁下。布朗在法军服役过，曾被授予绶带和法国十字勋章，他去见总督的时候戴上了这些。布朗请求在城里或岛上的其他地方为士兵准备合适的住所。蒙特尚问他：“这样我

们能得到什么？”布朗回答他说：“我们会继续保护你们，就像以前一样。”在随后的会议上布朗补充说：“我们要准备战斗，不能再花时间在這些小事上了。我冒昧地提醒一下閣下，如果美军不在这里，来到这里的就昰日本人了。”^[74]

值得称赞的是，哈尔西没有表现出征服者的盛气凌人之势。他个人很喜欢蒙特尚总督，他评价这位总督是“一位很好的老先生，一个久经考验的好士兵——不过有点不中用了”。^[75]但戴高乐派来管辖南太平洋的是乔治·蒂埃里·阿让利厄，他是“自由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高级专员，想法经常同美军背道而驰，或者说经常无视美军提出的要求。当地的殖民者心怀鬼胎，哈尔西和他的军官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对维希政府心怀同情的人和忠于戴高乐“自由法国”的人之间的紧张局势使得政治十分复杂。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有大约2 000名士兵，哈尔西认为很容易把他们合并到一两个兵营里。哈尔西提出，他可以为岛上的所有法国军队提供粮食，作为回报，美军要获得一些营房。但是这件事直接汇报给戴高乐时，他给的答复是否定的。哈尔西在1943年1月8日写给尼米兹的信中说：“这里的整体情况真的十分棘手。好在我们同他们的来往很少，但每次来往，他们都想给我们添麻烦。……情况通常是这样的：所有活昰我们干的，他们负责把我们的成果都拿走。”^[76]

法国后来做出了很多承诺和小小的让步。最终，法国人同意让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搬到努美阿附近一个旧兵营里。哈尔西和他的高级参谋搬到了前日本领事馆去住，这是一个不太大但很舒服的砖房，建在山上，可以俯视海港。日本领事此时被拘禁在澳大利亚，他的家具、艺术品和生活用品都留了下来。领事馆里的画上和刺绣上绘着艺伎、鲤鱼和富士山，能在这里生活，哈尔西非常享受，尤其是在每天早上护旗队升起美国国旗的时候。他告诉尼米兹：“我们很喜欢他的银器、瓷器和很多其他的器具。糟糕的是，这些家具（椅子、沙发之类的）都是为那些罗圈短腿的杂种设计的。我们的脖子后面靠不着东西。”^[77]一个菲佣打碎了领事的一件瓷器，哈尔西对他说：“让它见鬼去吧。反正是日本

人的东西。”[\[78\]](#)

参谋长迈尔斯·布朗宁上校从1938年就跟随哈尔西。他是海军早期的飞行员之一，在1924年获得飞行资格，为发展航空母舰的原则和战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布朗宁向来性格暴躁，爱发脾气，但在1943年初，他似乎要在长期服役的压力下崩溃了。他开始酗酒，和多位军官发生冲突，并且不让别人接触哈尔西。有传言称他和另一名海军军官的妻子有染，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1943年1月诺克斯部长访问努美阿时，对布朗宁寡言无礼的行为感到十分吃惊。对布朗宁的抱怨传遍了华盛顿的海军部，金将军不顾哈尔西的强烈反对，把布朗宁召回美国，让他指挥新的“大黄蜂号”（CV-12）。南太平洋战区的新参谋长是罗伯特·卡尼，在此后的战争中他一直辅佐着哈尔西。

新的超级战列舰“武藏号”在1月23日泊入特鲁克潟湖，这艘战舰的大小和“大和号”差不多。[\[79\]](#)它在退潮时从北海峡进入，和联合舰队的其他船停在一起，离它的姊妹舰不远。和“大和号”一样，“武藏号”的船员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主要的武器是18.1英寸口径的巨炮（这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海上武器），并且据说它“不会沉没”。和它的姊妹舰一样，“武藏号”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在停泊状态，周围挂着防雷网。如果以海战所需的高速巡航，这两艘巨船都需要大量的燃油——而在1943年，石油供给对日军而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最后一批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天之后，山本把司令旗从“大和号”移到了“武藏号”上，后者本来就是以联合舰队旗舰的标准打造的。伴着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小船把他带到了“武藏号”上。他穿着崭新的金边白制服，戴着白手套检阅部队，然后搬到了带有空调的新套间里，这个套间和“大和号”上的一样高级和宽敞。宇垣当天下午也跟着搬了过去。

在偷袭珍珠港以后的14个月里，山本五十六老得很快。他的短发几

乎都变白了，眼睛也很无神。他很少从房间里出来，偶尔出来一下，往往是跟出航的舰船或飞行中队打招呼（挥帽致意）。有时他会加入参谋们玩的在桌子上掷杯具的游戏。在一封1943年1月底写的信里，他声称从前一年8月开始只上岸了四次，上岸也仅仅是为了去医院看望生病或受伤的士兵或是参加丧葬仪式。还有些消息称，山本五十六是潟湖岸上一家“海军餐厅”的常客。这个场所实际上是东京湾横须贺镇守府旁边一个出名的妓院建的。

联合舰队总司令看起来已经屈服于他的命运。有人在1942年10月问他战后想做什么，他回答道：“我认为我要么被送上断头台，要么被送到圣赫勒拿岛。”^[80]还有几次他说自己不指望活到战后。他为舰队损失了如此多军官和士兵而悲叹，尤其为那些坚决不离开沉船的指挥官叹息。日本人有个信条，认为对于船长来说，应该是船在人在，船亡人亡。山本五十六主张改变这种信条，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在日本海军军官的脑海里。他喜欢对人类的存在进行反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想知道天堂如何看待地球这一宇宙小黑点上的人们，因为他们关于过去几年的所有讨论与永恒相比都不过是一刹那，只是‘紧急时刻’而已。这真是荒谬。”^[81]

尽管山本五十六不能公开这么说，但他肯定已经知道日本正在走向灾难性的失败。他曾动用他全部的政治影响力阻止和美国开战。他已经警告过日本人，美国以其强大的工业力量最终一定会打败日本。他于1942年6月向中途岛发动的进攻旨在让战争速战速决。进攻中途岛失败后，这场战争便注定变成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日军不可能获胜。他经常批评日本海军指挥官以及陆军指挥官（尤其是后者）向美军开战时“盲目乐观”。

在1943年4月3日的早上，山本和宇垣在十几个联合舰队参谋的陪同下，登上了两架川西水上飞机，前往拉包尔。从那里他们可以监督I行动——向所罗门群岛南部和新几内亚的盟军舰船和基地发起空中反击的行动。山本五十六住在拉包尔后面山上的一个小屋里。在那一周剩下的

时间里，他视察了飞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还同集中在新不列颠岛的各个指挥所的海陆军指挥官见了面。他像往常一样，站在某个明显的位置挥帽致意，祝起飞的航空中队好运。

在接下来的连续十天里，得到大力增援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莫尔斯比港、米尔恩湾和拉塞尔群岛的盟军舰船和基地发起进攻。4月7日，有200多架飞机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这场突袭比日军为夺下瓜达尔卡纳尔岛而进攻的那五个月里发起的任何一次袭击都要猛烈。日军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和往常一样，回去之后夸大其词，大肆宣扬自己的战果，说他们摧毁了美军几十艘船，上百架飞机。（事实上，I行动只摧毁了盟军25架飞机、1艘驱逐舰、1艘护卫舰、1艘油轮和2艘运输舰。而日本在战斗中损失了40架飞机。）山本五十六因表面的胜利振奋起来，下令缩小行动规模。他宣称自己将在18日对布因、巴拉莱和肖特兰岛的前线基地进行为期一天的视察。总司令的行程在4月13日从拉包尔通过无线电传送到各个司令部。

这一无线电信号也被盟军的监听站侦听到了。珍珠港的密码分析专家们立刻着手破解，很快就破译了它的内容。阿尔瓦·拉斯韦尔少校是约瑟夫·罗奇福特的作战情报站（“海波站”）的值勤官，他首先破译了密文并称之为“头奖”。^[82]关于山本五十六的密文很容易推断出来，这样一来拉包尔、巴拉莱和布因的地理代号也就很容易获得了。不止如此，这条信息还包含了一个特殊内容——山本五十六将会乘坐一架中型轰炸机，在六架战斗机的护送下，“8点整到达RYZ位置”。这就意味着山本的飞机将在18日早上出现于布干维尔岛的南端。这个位置恰好位于亨德森机场的战斗机攻击范围内。拉斯韦尔和情报分析师贾斯珀·霍姆斯将密文带到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并把它交给了舰队情报官莱顿，莱顿在4月14日早上8点刚过就把密文放在了尼米兹的桌子上。

尼米兹仔细看了看墙上的地图，确定山本五十六的飞机进入的空域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起飞的战斗机也可以到达。他问莱顿：“我们要试试干掉他吗？”^[83]

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依据军队骑士精神的传统观念，是否可以将联合舰队的总司令作为攻击目标？就像当时的大多数海军军官一样，尼米兹在战前和日本海军军官有过交往。他不是一个复仇心重或是血腥成性的人。在过去的时代，美军司令或将领绝不会专门挑敌方的同级别军官作为刺杀目标。乔治·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下令刺杀威廉·豪，罗伯特·李也不可能派人刺杀尤利塞斯·格兰特。但20世纪的战争不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战争。即便是以整个二战的标准来看，太平洋战争的暴行也是从未间断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发动的不是有限战争，它也没有要求过进行有限战争。在此前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日本的地面部队和海军严格遵守战争的准则。关押俄军囚犯的地方很舒服，伙食不错，战俘也得到了良好的医疗护理。他们对香烟、烈酒和读物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在关押过程中去世的战俘都以军礼埋葬。如果日军在这次战争中也实行这样的骑士做法，尼米兹可能会犹豫是否下令。但日军在中国、菲律宾、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暴行让这个事情变得很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是战略方面的。打死山本五十六是否明智？正是这个人策划并实行了灾难性的中途岛行动，正是他让日本在中途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上面的所有飞机。山本五十六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也出现了失误，他不应该派零散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增援驻岛部队。日军逐渐走向失败，他显然“功不可没”。难道不该让他继续犯错吗？但是私下里认识山本五十六的莱顿认为，他是日本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他的死会对军队的士气造成“极大的打击”。他说：“尼米兹将军，这就像对手把你射杀后的影响一样。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你。”尼米兹被说服了，他向哈尔西发去一封“收件人亲启”的信，让哈尔西暂停行动，并派出战斗机进行拦截。他在信末写道：“祝好运，狩猎成功。”^[84]

哈尔西收到这封密信时，已经因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偶然遇到的事而提前知道了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哈尔西当时正在视察海军设施，顺便

去了趟通信情报处。文书军士肯尼思·A.布利耶正在处理一份解密的草稿，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站在桌边问他：“你忙什么呢，孩子？”布利耶解释过后，哈尔西提高了嗓门，跟整个情报处的人说：“该死，你们不要再管山本五十六的事了。我自己去干掉那个狗娘养的！”^[85]

布干维尔岛南部离亨德森机场400多英里，但飞机会绕路飞行，以免被发现。这项任务需要飞行大约1 000英里，这对于飞行距离最长的战斗机也是个考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指挥官把这项任务派给了陆军第339战斗机中队，他们的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斗机的作战距离可以和更轻的零式战斗机相媲美。P-38配有贫燃料复合物和可弃油箱，飞行距离很长（恰好够长）。但是时机的选择需要非常准确，因为飞机没有多余的燃料等待敌机出现。第339战斗机中队的约翰·米切尔少校被派去率领由他亲自挑选的飞行员驾驶的18架P-38战斗机。其中四架战斗机被指派为“杀手”，负责攻击山本五十六及其他高级军官所乘的中型轰炸机；其余的战斗机专门对付护航的零式战斗机，为杀手提供掩护。米切尔的飞行计划是让中队在早上9时35分直接飞抵巴拉莱机场的进场航段上。

山本五十六一行人于早上快到6点时抵达拉包尔的拉库纳依机场。他们登上两架等候已久的G4M“贝蒂”中型轰炸机——山本五十六上了一架，宇垣上了另一架。两人都穿着绿色卡其布军装和飞行员的长靴。（人们认为山本五十六平时穿的白礼服对前线而言过于正式了。）飞机呼啸着从跑道上起飞，飞过守卫着海港入口的灰色破火山口。天气晴朗，能见度高，天上偶尔会有几片云彩。两架轰炸机在6 500英尺的高空排成密集队形飞行，以便宇垣从另一架飞机的窗户上清楚地看到山本五十六，距离近到两架飞机的翼梢差点碰到。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在两侧飞行，时远时近。它们呼啸着向东南方飞行了一个半小时，紧贴着布干维尔岛南端。^[86]

在机群开始朝巴拉莱降低高度时，宇垣打起了瞌睡。9时43分，他醒了过来，发现他的飞机正在大角度俯冲。飞行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突然的躲避动作让他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丛林密布的山上的墨绿树冠离他们越来越近。机枪手打开炮门准备开火，风声、机枪声夹杂在了一起。宇垣告诉飞行员要尽量靠近山本的飞机，但为时已晚；在他的飞机转弯向南飞时，他瞥到长官的飞机正在“摇晃着向南，减速飞过丛林的顶端，冒出黑烟和火焰”。他的视线被挡住了，下一次望过去时，只能看到丛林里冒出一股浓烟。[\[87\]](#)

宇垣的飞机飞过莫伊拉海角，飞到海面上空，平稳下降并加速。然而，两架P-38追得很紧，0.50英寸的子弹开始猛击到他所乘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飞行员想拉升，但螺旋桨浸在了海水里，飞机猛地朝左翻滚。宇垣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撞到了飞机内部的舱壁上。海水开始往飞机里灌，他想：“这就是我宇垣的末日了。”[\[88\]](#)然而，不知怎的，他和三名同行者成功脱身，游向海滩。岸上的日本兵帮他们登陆上岸，并把他们送往布因。

山本的飞机在坠落的过程中向内陆飞行了大约4英里，坠进了原始丛林里。搜救队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找到飞机坠落的地方。飞机上没有幸存者。据目击者说，山本直身坐着，仍然紧紧捆在他的座位上，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还放在佩剑上。他的下颌中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太阳穴里射出；另一发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胛骨。人们把他的尸体用榕树叶包起来，沿着小路带到瓦马伊河河口，用船运往布因，在那里把他放在一个填满枯树枝和汽油的坑里火化了。他的骨灰被带去特鲁克，存放在“武藏号”作战指挥室的一个祭坛里。

山本的死讯一开始仅为一些高级军官所知，作战指挥室和总司令房间的走廊都不许普通人接近。但这一消息还是很快就传到了“武藏号”的船员耳中。有人看见宇垣将军身上包满了绷带；装着山本骨灰的白盒子被带上船时，有人瞥见了一眼；熏香的味道从他的房间里飘出来。古贺峰一大将很快就被任命为新的总司令，并在4月25日从日本飞到这里。最后，山本的死讯通报给了全体士兵。在日本，这一消息被封锁了一个多月。

5月22日，山本去世的消息登上了日本国家广播网NHK（日本放送协会）的新闻。主持人在宣读这个消息时放声大哭。一辆专车把山本的骨灰从横须贺运到了东京。包括皇室家族在内的人在上野车站等候他的骨灰到来。日记作家清泽冽写道：“人们心里都在因未来战争的黑暗前景而伤感不已。”[\[89\]](#)

在1943年6月5日，中途岛战役一周年时，日比谷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成千上万的人来此致敬。从“武藏号”的下级军佐里选出的护柩者抬着他的棺木，披着白衣，穿过日本国会和皇宫。海军军乐队演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山本的棺木被放到灵车上，带到郊区的多磨墓地，安放在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陵墓旁边的一个刚挖好的墓穴里。

山本五十六被杀，1943年4月18日



山本生前的老朋友和同事拒绝了建立“山本神社”的提议。米内光政将军还记得，山本将军一直都不喜欢对军官进行神化。米内光政说：“山本将军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们将他神化，他会比所有人都难堪。”[\[90\]](#)

[1] 这个名字是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玩的一个文字游戏：日语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简称 Gato 与“饿岛”谐音。——作者注

[2]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28,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3] Ibid., p.46.

[4] “Address or Message of Jap Detachment C.O.in Solomons,”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6.

[5] “Diary Taken at Kokumbona,” entries dated December 23 and 26, 1942,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Coll/606, Box 26.

[6] Lt.Ko-o’s diary excerpted in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51,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7] Entry dated December 8,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01.

[8] Entry dated Monday, November 16, 1942, in *ibid.*, p.276.

[9]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pp.198-99.

[10] Ibid., p.200.

[11]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12]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ibid.*

[1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5, p.315.

[14]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 Fifth Battle of Savo, 30 November 1942,”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15]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04.

[16] Ibid., p.206.

[17] Hitoshi Imamura, oral history,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 p.108.

[18] Entry dated December 7,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97.

[19] Entry dated December 8, 1942, in *ibid.*, p.299.

[20] *Kokusai Shashin Joho (International Graphic Magazine)*, Vol.21, No.12, December 1, 2602(1942).

- [21] Foreign Minister Tani quoted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13.
- [22] Tojo speech excerpted in *ibid.*, p.155.
- [23]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2,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283.
- [24]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57.
- [25]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 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26] Gen.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s," p.1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6.
- [27]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 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28]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 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29] Masanobu Tsuji, "Guadalcanal," p.57, unpublished memoir dated May 3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17.
- [30]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1.
- [31] Joichiro Sanada, "Statement Concerning Particulars of Evacuation from Guadalcanal Island," January 20, 1950,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32]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33]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64, p.13.
- [34]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pp.6-8.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35] Yahachi Ishida letter (undated) in Gibney, ed., *Senso*, p.132.
- [36]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64, p.14.
- [37] Adm.T.Koyanagi, memorandum entitled "The Retreat from Guadalcanal," dated May 1, 1967, p.6, John Toland Papers, Box 3, "Guadalcanal."
- [38] CINCPAC to COMINCH, "Solomon Islands Campaign—Fall of Guadalcanal, period 25 January to 10 February, 1943," April 17,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20, item 81.
- [39] Glen C.H.Perry's notes, December 2, 1942, in Perry, *Dear Bart*, p.114.

- [4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42.
- [41] Twining and Carey, *No Bended Knee*, p.ix.
- [4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93.
- [43] Nobutake Kondo, "Some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War,"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p.313.
- [44]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引用自Cleary, *Japanese Art of War*, p.81。
- [45] Raizo Tanaka,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09.
- [46]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64.
- [47] 米切纳的书于1948年获得普利策奖，这部获奖作品与同名音乐剧以及电影有很大不同。《南太平洋的故事》是他写的第一本书，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这本书出版的那年他正好满40岁，但他到1997年去世前一直笔耕不辍，竟然写完了超过50本书。——作者注
- [4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08.
- [49] Vollinger,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 [5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289.
- [51] Pyle, *Last Chapter*, p.5.
- [52] Potter, *Bull Halsey*, p.245.
- [53] Ibid., p.247.
- [54] Capt.C.W.Fox, Supply Corps, USN, oral history, p.10, recorded July 9, 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 [55]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72.
- [56] Capt.C.W.Fox, Supply Corps, USN, oral history, p.10, recorded July 9, 1943,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9.
- [57]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71.
- [58] "Bull's-Eye."
- [59]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31, 1942, 引用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p.172-73。
- [60]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79.
- [61]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37.
- [62] Lodge,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 [63] Fussell, *Wartime*, p.117.

- [64] Lodge,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 [65] *New Zealand Herald*, January 7, 1943, excerpted in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43.
- [66] DeWitt Peck, CCOH Marine Corps Project, No.701, p.121.
- [67] Capt.Harold Hopkins, RN, to Edwin Hoyt, June 8, 1969, 引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169。
- [68] Halsey to Nimitz, December 11, 1942,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 [69] Spruance to Nimitz, February 18, 1960,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Folder 5.
- [7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293.
- [71] Entry dated November 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p.71.
- [7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9.
- [73]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17.
- [74]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7.
- [75] Halsey to Nimitz, January 8, 1943, p.6,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 [76] Halsey to Nimitz, January 8, 1943, p.6,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 [77] Halsey to Nimitz, November 29, 1942, p.1,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 [78]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38.
- [79] 这艘战舰是以武藏省（旧地名，范围包括东京的一部分及其南部的几个地方）命名的，而非得名于著名的武士宫本武藏。——作者注
- [8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31.
- [81] Ibid., p.336.
- [82] Layton, Pineau, and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474.
- [83] Ibid., p.475.
- [84] Edwin T.Layton, oral history, in Stillwell, *Air Raid, Pearl Harbor!*, p.276.
- [85] Kenneth A.Boulier account in Russell, ed., *No Right to Win*, p.236.
- [86]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p.330, 353.
- [87]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ibid.*, p.354.
- [88] Ibid., p.355.
- [89] Entry dated May 22,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9.

[\[90\]](#)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392.

第八章

1942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第1陆战师的老兵们离开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他们疲惫不堪，浑身是泥水，胡子拉碴，一道道的裂纹快要把靴子撑开，枯瘦的双腿拖着磨破的工装裤。许多人已经非常憔悴，疾病缠身，根本没有力气从小船上爬到停泊在隆加角的运输舰上。敏捷又健壮的水手们得把货网扔进海里，把绳子绑在老兵们的腋窝下，然后把他们拉过栏杆，拖到甲板上来。老兵们四仰八叉地躺在甲板上，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要远离那令他们厌恶的小岛了。至少有八成士兵反复因疟疾而发烧，靠着常规剂量的疟涤平勉强遏制病情发展。他们最初被送到凯布尔营地，这里距澳大利亚布里斯班40英里，是一个帐篷搭建的简陋营地，后来他们又乘船转移到墨尔本。这座维多利亚州的城市景色优美，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气候温和。他们将在这里度过数月，休养身体，并为下次作战任务进行训练。

同年，美国战争部出版了一本手册，名叫《驻澳美军指南》。这本手册提供了在任何民用旅行指南上都能看到的一些信息摘要，介绍了当地的人口（少于纽约市）、地理状况（和美国面积差不多大）、自然史（是最古老的一个大洲）和历史（回避了大量像“最初这个国家只是个流放地”这样的敏感话题）。手册的作者竭力强调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相似之处。两国人民都说英语，都具备开拓进取精神，都有自由选举领导者的权利，都追求人身自由，都爱好体育运动，并且都在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每一个战区中抛头颅洒热血。当然两个国家也有很多不同，如传统、礼仪、思维方式等。手册中提示：“你个浑蛋”（bahstud）没有诋毁的意思，反而可以表达“喜爱”之情——“但重点是他们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他们。……澳大利亚人民给了我们最热烈、最真诚的欢迎，

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失望。”^[1]

这最后一点显然是从海军陆战队士兵走下舷梯、来到墨尔本码头上那一刻就能感受到的，因为有一个铜管乐队正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以迎接他们。他们集体乘火车去往市中心，到了车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这么好的运气。铁路边竟有一排为他们加油欢呼的女人。女人们向他们飞吻，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伸手去够海军陆战队员伸出的手。几个陆战团被派往各个郊区——巴尔科姆、玛莎山、巴拉腊特——第1陆战师最幸运，因为他们被派到了墨尔本板球场，靠近市中心，为他们准备的一层层铺位已经安装在巨大的看台上。在那个半露天的营房里，老兵们解下行囊。由于空间狭小，行囊部分暴露在风雨中。但没有人抱怨。罗伯特·莱基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聚集在球场外的女人们。这些女人“尖叫着，咯咯笑着，挥动着手绢，使劲把手伸过围栏来，想跟我们接触”。^[2]她们告诉陆战队员自己的电话号码，以换取他们的签名。

军队纪律涣散了。士兵们每天都擅离职守。女人们天天来找值日军官，请求“让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陪她们散步”。^[3]晚上，卫兵们把步枪靠在篱笆上，然后人就消失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丛里了。一名中士嘲讽道，海军陆战队有史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多人志愿站岗。

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年轻男性去了海外，造成国内男女比例失调。战争和侵略带来的威胁已经颠覆了传统的道德束缚——明天和死亡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还是及时行乐为上策。许多澳大利亚女性大方地承认她们觉得这群新来的美国大兵魅力四射，让人着迷。战前，她们只在收音机或电影里听到过美式口音的英语，多出自银幕偶像之口，比如克拉克·盖博和加里·库珀。听到美国大兵亲口说的美式英语，她们感觉很有异国风情，极富魅力。1942年年初和年中，她们担心受到侵略，害怕经历残酷的战争，现在大量盟军的到来给了她们渴望已久的安全感。

与澳大利亚那些“挖煤的”相比，美国人穿着做工精细又合身的制

服，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骑士风范。美国人兜里有钱，又舍得为她们花钱。美国人踩着稀奇古怪的爵士舞步，跳着吉特巴舞、查尔斯顿舞或摇摆舞（Shim Sham）。女士进门时，房间里的美国人会站起来，帮忙扶门，挪出椅子，然后会主动斟酒、点烟、买花、买礼物。这里的女人从未期待过男人会为她们做这些事，乍一接触还真有些不习惯。新奇的事物总是令人陶醉。

亚历克斯·黑利曾是弹药运输船“姆齐姆号”上的一个年轻食堂服务员，后来成了小说《根》（*Roots*）的作者。黑利一直在向纽约的杂志投爱情小说，但都遭到拒稿。1942年舰船驶离布里斯班后，黑利发挥写作才华，帮船员们给他们在澳大利亚闲暇时光里遇到的女人们写信。黑利从自己未出版的小说中摘抄段落，写入信里。他抄了几个副本，以便书信循环利用，后来甚至还建立了归档系统——最后有300封信被归到12个活页夹里——以确保同一个女人不会收到两封同样的情书。黑利回忆道，舰船返回布里斯班时，一个又一个同伴在镇上度过自由之夜后得意地回来，“讲述自己那美妙而浪漫的辉煌‘战绩’”。^[4]

澳大利亚男子绝不缺少得体的礼仪意识。他们和蔼可亲，讲话直率，诚实正直。他们也没有什么心计，乐于交友。他们经常和美国人这样打招呼：“不错呀，美国兵！”要是美国人在弗林德斯街向他们问路，他们不会只是指指方向，而是会领着问路人走出八九百米甚至更远，确保问路人能找到要去的地方。但是这些澳大利亚“挖煤的”可不会把他的女人当公主或瓷娃娃一样宠爱。澳大利亚男人会和哥们儿一起喝酒，但不会男女打成一片。美国人可不知道有这样的约束，也不觉得应该受这些限制。女人一出现，本来坐着的美国人就会立刻起身，然后开始他那一套在澳大利亚男人眼里优柔寡断、没男子气概的求爱套路。在澳大利亚，一个男人嘴边若是老挂着“夫人”、“请”或“您先请”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娘娘腔。深夜，女人们都出去找美国人后，矿工们会嘲笑一番美国人缺乏男子气概的样子和娘娘腔的行事方式。

詹姆斯·费伊是“蒙彼利埃号”上的一名水手，曾于1944年初在船上

发起一次投票：要是可以自由选择前往太平洋的任何港口，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悉尼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完胜火奴鲁鲁、旧金山和圣迭戈。看来大家都一样。所罗门群岛的一个鱼雷艇艇长写道：“去澳大利亚是每个人的梦想。”^[5]如果以为他们仅仅是因为那里的姑娘，那就过于阴暗了。澳大利亚是人间天堂，是一个更公平、更友好、更诚实、更开放的美国。在电影和其他演出开始之前，当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或英国国歌《天佑吾王》响起，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会起立脱帽致敬。这里气候宜人，景色优美，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澳大利亚人会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儿子一样为美国人敞开家门。来自堪萨斯州或阿肯色州农场的男孩，思乡情重，会乘火车到乡下，自愿在小牧场工作几天。“到了澳大利亚就像到了家，”费伊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惜，我们的国家离这儿太远了。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澳大利亚人，我们永远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放过任何帮助他们机会。”^[6]即使打起架来，澳大利亚人也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既不会拔刀子，也不会出阴拳。像美国人一样，他们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从不惧怕权威。美国大兵和澳大利亚矿工们常常聚众跟挥舞警棍的警察和宪兵打起来，两边都有国际友人撑腰。收音机已经出现了十来年的时间，澳大利亚早已受到美国文化的吸引，不过现在反倒是美国人用澳大利亚俚语“哥们儿”（mate）、“家伙”（bloke）或“伙计”（cobber）称呼彼此了。第1陆战师声嘶力竭地演唱澳大利亚歌曲《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并把英国老军歌也加入酒后高歌的曲目中，特别是《保佑他们》。市民们不在场、无须顾及礼仪时，副歌部分会被改成玩世不恭的歌词。通婚虽受到政府和军方的劝阻，但仍然比较普遍。成百上千的美国人战后就在墨尔本和悉尼定居了。

就连那些差异都会让他们感到似曾相识。美国人发现澳大利亚人对体育很痴迷，他们对此极为赞赏，哪怕他们私下认为澳大利亚棒球和橄榄球的玩儿法与美国截然不同，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明显比不了美国。澳大利亚的跑道看起来跟美国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马匹是跑顺时针，还有赌客背地里嘀咕着传奇赛驹“菲尔·莱普”被害之事。这里啤酒价格便宜，品种丰富，就是酒吧关门时间太不合理，竟然下午6点卷帘门就

会“哐啷哐啷”地落下来。当地人喜欢热气腾腾的含咖啡因的饮料，不过他们杯子里往往盛的是茶而不是咖啡。美国人对羊肉并不感冒，但澳大利亚肉馅饼和“煎蛋牛排”却怎么都吃不够。货币简直可以说是深奥莫测。澳大利亚镑的纸币很简单，但硬币由铜银铸成，面值奇多，上面刻着袋鼠和鸸鹋，除以二、三、四、十二和二十，就有了先令、弗罗林、六便士、一便士、半便士和三便士，还有五便士、铜币、锌合金、英镑和几尼等等。（关于货币，《指南》建议：“不用担心。”）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澳大利亚人没有趁美国人初来乍到而骗他们或少找他们钱。

随着新鲜劲的消退和“友好入侵”的美国军人增加到近100万人，澳大利亚人的好客天性难免会受到极大的考验。城市里全是说着甜言蜜语，花钱大手大脚的美国人，当地经济是上来了，可当地人依然手头拮据。酒吧偷偷以高价卖酒给美国人，然后告诉普通顾客酒已售罄。一些轻率的美国人无意间会冒犯当地人，高谈阔论地说他们是来“拯救澳大利亚”的，把澳大利亚叫作“殖民地”，或是说板球比不上棒球，还说“羊肉难吃死了”这样的话。一连串出人命的交通事故都是美国大兵醉酒靠右行驶（错误的一侧）造成的。1942年春天，一起连环杀人案震惊墨尔本：三名妇女被勒死，死者下体裸露。凶手是美国陆军士兵爱德华·约瑟夫·列翁斯基，此人后来被逮捕，判处绞刑。一些澳大利亚的评论员称，这样的恐怖犯罪似乎表明美国人在性方面存在劣根性。

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抢着划船来到悉尼港的美国海军舰艇附近。一些女孩学会了旗语，通过向来船发送信号捷足先登。丈夫们在海外打仗的妻子跟美国人出双入对，夫妻在公园和海滩上扭打在一起，城里蔓延着梅毒和淋病。数百名妇女因在不正规的医院做流产手术失败而丧命。父亲们吃惊地听着女儿们的争吵：“是我先看见他的，而且维拉都订婚了。”^[7]主教、编辑和政客们冲出来捍卫道德的底线。墨尔本市市长弗兰克·博勒佩尔爵士敦促家长们“严格管束自己的女儿”，而且“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想做什么就有权去做的大姑娘也要严加管教”。^[8]报纸媒体参加了管制女性性行为的运动，发表了《女孩的行为引起关注》《街

头亲热问题》《女孩们向往美国佬》等苛刻的社论。^[9]昆士兰的卫理公会牧师W.J.汤姆林森在写给《信使邮报》的文章中哀叹布里斯班比所多玛和蛾摩拉还要邪恶。^[10]一份落在新几内亚的日本传单上画了一个美国士兵抱着一个女人。“在前线好好享受吧，澳大利亚人，”梳着中分大背头的美国人虚情假意地说，“我正在家忙着跟你的小甜妞快活呢。”^[11]每个宣传者都知道最佳的攻心之术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

美澳军队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集结，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民房、商店和做买卖的地方，到处都是大兵的身影。不到一年时间，该地区人口翻倍，达到了约60万人。没有太多的地方可逛，但高收入的美国人通常会设法在商店、酒吧和餐馆得到最优质的服务。美军禁止澳大利亚人在美国军人服务社购物，这种服务社对香烟、剃须刀、零食、糖果、白酒和尼龙长袜之类的紧俏商品有补贴（这些都被当作非常珍贵的礼物）。可想而知，澳大利亚人痛恨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免不了会发怒。

1942年10月至11月，天天晚上有街头暴力事件发生。11月26日，市中心爆发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大骚乱，这场暴乱被写进历史，称为“布里斯班战役”。刚过中午，整个市区便开始断断续续地爆发打斗，后来掺和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醉得越来越厉害，所以械斗时间越来越长，场面也越来越暴力。夜幕降临时，小溪街和阿德莱德街拐角处的一个美国军人服务社外面爆发了一场混战。起因是一群挥舞着警棍的美国骑警骚扰一名美国士兵，一群澳大利亚矿工毅然挺身帮助这个士兵。随着数百名愤怒的士兵和平民涌向十字路口，美国人退回到建筑物内，战斗升级。一场围攻随之而来。暴怒的平民拿瓶子和石头砸向窗户，试图用从人行道上拔出的路标把门打烂。美国人冒失地闯入军人服务社的武器仓库，在愤怒的暴民面前挥舞霰弹枪。众人争抢枪支时，一支枪走了火。一名澳大利亚士兵死于枪口之下，还有几个人受了伤。混战继续并蔓延至整个城市，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几百个美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女王

街和爱德华街相交处的盟军总部附近的美国人更是遍体鳞伤。

除了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发表了一份经过严格审查的简报外，其他媒体并没有报道该事件。这种掩盖消息的尝试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有太多的目击者目睹了这场骚乱。没有官方的声明和更正，这场骚乱在街谈巷议中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有人说美国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人群，尸体在布里斯班的街头堆积成山。（事实上，确实有很多人因此受伤，但只有一人死亡。）接下来的几周，在布里斯班和其他地区，包括汤斯维尔、罗克汉普顿、墨尔本和悉尼的邦迪海滩，都发生了小型骚乱。

澳大利亚文化中的“同伴之谊”是对英国等级制度的有意抵抗和拒绝。他们本能地不信任权威，同时又同情弱者。这个国家忠于英国的传统，如果说它是保王派，也就仅仅在这一点上成立而已。在澳大利亚，有钱人可能过得比他的邻居们好，但他得记住一点：过得好并不意味着他比别人好。权力、特权和个人成就只有在谦卑诚恳的态度下才能得到容忍。用当地的俗话说，就是“高大的罍粟是第一个被砍的”（树大招风）。也许世界上有别的国家是倾向个人崇拜的，但澳大利亚绝不会这样。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可能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挑战这种态度的人。在1942年国难当头的时刻，澳大利亚人敞开双臂欢迎他，推崇他为救世主。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聚集在墨尔本的孟席斯酒店外，四个月前他和家人来到这个国家后，就一直住在这个酒店。他来澳大利亚那天成了“麦克阿瑟日”。当时美国出版了众多描述麦克阿瑟的英雄事迹的作品，澳大利亚的报纸连载了其中之一。“道格拉斯”也成了1942年到1945年间澳大利亚新生男婴最常用的名字。商店橱窗里挂着麦克阿瑟的亲笔签名照，因为司令部总会满足人们请他在照片上签名的请求。布里斯班的一家名为《真相》的报纸告诉读者：“麦克阿瑟是代表文明世界来赶日本鬼子回他们垃圾老窝的。”^[12] 1942年5月，麦克阿瑟到访堪培

拉，众议院邀请他旁听。总理约翰·柯廷马上废除了军事委员会，并将原军事委员会的权力赋予麦克阿瑟，此决定无一人反对，这样麦克阿瑟就成了澳大利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说，占据议会大多数席位的工党的领袖柯廷是“澳大利亚的灵魂和心脏”，从此麦克阿瑟开始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13\]](#)

麦克阿瑟没有吸纳任何澳籍军官进入司令部担任参谋，后来华盛顿对他施压也没能让他改变这一决定。他的参谋部由时任参谋长、霸道又反复无常的理查德·K.萨瑟兰将军以及其他“巴丹帮”的成员领导，这些人曾和他一起趁着夜色乘鱼雷艇逃离科雷希多岛。后来他任命澳大利亚的将军托马斯·布莱米爵士作为盟军地面部队在该战区的司令，才使用人方面的风波缓和了一些。他和柯廷一起游说丘吉尔，想让他派英国海军来太平洋战区，但遭到拒绝。

他在新闻公报中装腔作势，对澳军的功劳半点不愿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澳大利亚人开始对麦克阿瑟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位将军在涌入澳大利亚的数十万美军士兵之中总体上也不受欢迎。美国军队中不断传出麦克阿瑟的坏话，说他是“埋坑阿瑟”；说他是一个傲慢的人，让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住在科雷希多岛华丽的地堡里，而他的军队却在巴丹半岛挨饿；说他带着手提箱、衣服、家具和贵重物品逃离战场，丢下生病的护士，任由她们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污蹂躏；说他一路逃到墨尔本，想离敌人越远越好，却不继续南下，前往塔斯马尼亚岛或南极洲；说他独揽所有的荣誉，却抹杀真正参加战斗和战死的人的名誉和荣耀。驻澳的美国军人开始厌倦吃这么多的羊肉时，有传言说麦克阿瑟拥有一个牧羊场，他们吃羊肉花的钱都流入了他一人的口袋。

这些指控大多是假的，有些还是违背常理的。不管外界怎么说他，麦克阿瑟可绝不是一个懦夫。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充分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后来他又在科雷希多岛上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日本飞机在低空盘旋，炸弹就在附近一颗颗爆炸，参谋们都急忙找地方躲避，而他却昂首挺立，毫不畏惧。他之所以带着家属和一些心

腹逃离科雷希多岛，是因为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必须服从。他和手下一人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麦克阿瑟是一个有严重性格缺陷的人，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又有很强的虚荣心，这些都扭曲了他对世界的看法，甚至有损他的人格。作为陆军的指挥官，假如生在18世纪，他可能会感到更自在。但麦克阿瑟还是个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能以发散思维看问题，而且有超常的记忆力，可以快速理解各种细节。

比起其他盟军领导人，麦克阿瑟更能凭直觉把握太平洋战争的总体局势。日本曾扬言要把西方侵略者赶出亚洲，这对亚洲人民必然是充满诱惑的。但侵略就是侵略，任何说辞都不足以改变日本侵略的本质。所以他认为必须摧毁日本的泛亚洲帝国意识形态，以更好的意识形态取代它。麦克阿瑟是伟大的，而且他的伟大是无可争辩的，他的伟大之处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那时他将充当幕府将军般的角色，管理日本，将日本重建为民主化国家。

1942年7月，麦克阿瑟把家人和司令部向北迁到了更加靠近战区的布里斯班。司令部的参谋搬到了已经撤至南方的保险公司安保集团留下的办公室里。麦克阿瑟要了九楼的大会议室当作私人办公室。在这里他有一部机密电话，直通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战争部。麦克阿瑟一家住在伦诺斯奇夫利酒店顶层的三个相邻的套房，这家酒店位于乔治大街，非常高档。每个清晨都有人群聚集在酒店外，盼望着当他从酒店大堂走进车牌为“USA-1”（美国一号）的沃尔斯利黑色豪华轿车时，能一睹这位最高指挥官的尊容。每天上午11点，大批警察会疏散人群，清出街道，麦克阿瑟4岁的儿子要在华裔菲律宾家教的陪同下穿过人群去州议会大厦。高高的铁门缓缓打开，男孩和他的保姆走进来，随即门又关上。男孩在院子里玩耍，警察站在旁边守着他。

麦克阿瑟喜欢一边踱步一边工作。他不知疲倦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只要能走到官员的办公室，靠在办公桌上与之面对面交流，他就绝不会通过电话来交流。交谈时他标准的开场语是：“记一下。”1942年8月，乔治·C.肯尼将军接替乔治·布雷特担任该战区盟军航空兵司令。刚

一上任，他就暗下决心，绝不畏惧麦克阿瑟专制跋扈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萨瑟兰对航空兵发号施令时，肯尼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职责范围，他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个点，告诉萨瑟兰：“这个点代表你对空战的了解，而这张纸剩下的部分，都是我对空战的了解！”^[14]肯尼要求和萨瑟兰一起去让麦克阿瑟阐明他们各自的权责边界。肯尼说，萨瑟兰道了歉，以后再也没有找过他的麻烦。

1943年11月，托马斯·C.金凯德将军接任了阿瑟·S.卡本德尔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海军司令一职，他也设法不跟萨瑟兰打交道。麦克阿瑟并不像传言中那样孤傲和高高在上。他尊敬的高级军官们只要想和他说话，随时都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根据金凯德的叙述，他经常走进麦克阿瑟的办公室说：“将军，我只是来抽支烟。”

他会说“行啊”，接着递给我烟盒，让我取一根。“坐会儿吧？”然后说，“你不介意我走来走去吧。”然后他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这是我们交谈时他的老习惯。

有时我知道自己要汇报的事情将军可能会不赞成或者反对，我会说：“将军，有件事，今天早上我刚知道，我觉得你会不赞成。”

“是吗？说来听听。”

然后我就在他走来走去时跟他说。说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打断。我说完以后，他会开始讲话。我知道将军说着说着就会跑题。如果我提到的这件事有道理，我就由着他一直说，直到他说跑了题，然后我会说：“将军，你很清楚你说的并不在理吧。”

他会扭过头来看看我，说：“嗯，也许吧。”然后继续吸着烟斗走来走去。^[15]

美国第7舰队被称为“麦克阿瑟的海军”。作为其指挥官，金凯德的地位有些尴尬，他必须同时听命于麦克阿瑟和金。但他成功地完成了这

项工作，这多亏了他的机智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本领。跟肯尼一样，金凯德也是一个外人，并不是对麦克阿瑟绝对忠诚的幕僚圈里的一员。小圈子里的这些人不仅也有其上级所有的偏执和偏见，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算上级显然有错也不愿质疑他的观点。肯尼和金凯德两人都惊讶地发现，麦克阿瑟那群胆小的幕僚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本人很容易接受异议。“谁都无法把麦克阿瑟当普通人，”金凯德说，“他们要么把他当神一样，要么就诅咒他，但这两种态度都不对。”^[16]

没有任何军事领导人像麦克阿瑟那样对媒体抱有那么大的兴趣。对于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来说，麦克阿瑟那令人瞩目的公报给大家提供了有关南太平洋战争的基本报道。萨瑟兰招来的“皮克”勒格朗德·迪勒（LeGrande “Pick” Diller）上校负责掌管麦克阿瑟的宣传部门，享有审查战时新闻的权力。不管是否牵扯到军事机密，所有对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有隐含或明显批评的新闻稿，一概被他毙掉。而那些大力歌颂的记者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和访问的机会。肯尼曾刻薄地说，除了“为将军戴上光环，把他捧上宇宙中最高神坛”的新闻，其他的新闻都不可能面世。^[17]

麦克阿瑟总是能成功地镇住一屋子的资深记者——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不去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不带重复地即席讲上一个多小时。他能“出口成章”——用结构严谨而完美的复杂句进行交流。记者们离开的时候都感到备受启迪，虽然并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麦克阿瑟情绪激动时，会使用很多华丽的辞藻。他在为战死在巴丹半岛上的美军士兵致悼词时说：“因儿子战死沙场而哭泣的母亲们啊，拿撒勒人耶稣的奉献和荣耀同样降临到你们的儿子身上。神会把他们带往自己身边。”^[18]

下级军官的名字如果出现在新闻稿里，会让麦克阿瑟大发雷霆。他喜欢运用一种古老的修辞手法，用单数的代词“我”代替他指挥的军队。从巴丹半岛抵达澳大利亚时，他坚持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我走了，我还会回来的。”战时新闻局要求他改成“我们会回来的”，麦克阿瑟拒绝了。“我还会回来的”有一种恺撒式的光环，是整场太平洋战争中最令人

难忘的一句话。对于领土被侵占、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菲律宾人来说，这份第一人称的宣告是饱含希望和鼓舞的一声春雷。但是，单数代词在部队中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部队的人觉得这个词言过其实，虚情假意。随着战事向北转移，听到“麦克阿瑟”从位于布里斯班的司令部轰炸了敌方的一个机场，或者是拿下了一个新的滩头阵地这样的说法时，身在前线的将士们异常恼火。1942年5月，麦克阿瑟巧妙地攫取了赢得珊瑚海战役的荣誉，而实际上，这场战役是海军在尼米兹的指挥下在尼米兹负责的战区取得的胜利。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曾指挥部队在新几内亚东南部的布纳与日军作战，那场战役十分残酷和血腥。他认为麦克阿瑟密谋让媒体和公众相信他个人就是整个盟军战斗部队的最高统帅。艾克尔伯格曾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发泄不满。麦克阿瑟到莫尔斯比港做短暂访问后，艾克尔伯格写道：“这个大英雄在战斗之前、之中或之后都没去过布纳，直接回了家，而他却授意总司令部发布新闻，说他正在领导部队进行战斗。麦克阿瑟.....就在莫尔斯比港停留了40分钟，而且在此期间一直在踱步。我知道这才是事实。”[\[19\]](#)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结束后，战事推进到东经159°以西，进入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战区。根据一年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确定的指挥责任分工，哈尔西仍然在尼米兹的指挥链中，他的部队将继续“属于”尼米兹。但是，由于南太平洋战区的舰船、飞机和部队部署到了所罗门群岛的中部和北部，它们将落入麦克阿瑟的管辖范围内。海军一般不把船派往澳大利亚，因为担心会被麦克阿瑟收入麾下控制起来。比如1942年3月，金就曾要求弗莱彻将军的特混舰队尽量避开悉尼，因为美国航空母舰出现在那个港口可能会“引发政治诉求，让它留驻在澳大利亚水域”。[\[20\]](#)更糟糕的是，这种尴尬的安排使得哈尔西和麦克阿瑟无法直接讨论战略。如果严格遵守协议，哈尔西想在东经159°以西采取任何大型作战行动，都必须先上报尼米兹，由尼米兹上报金，由金来咨询马歇尔的意见，最后马歇尔传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回应会不厌其烦地再兜一圈，经华盛顿到珍珠港，再到努美阿。

用哈尔西的话来说，这种指挥体系是为了“维持各军种的平衡”。但这种安排缺乏效率，并且隐患重重。1943年2月21日，哈尔西部署1万名士兵和陆战队员在拉塞尔群岛登陆。登陆后，哈尔西在各岛投放工程营部队，建设了两个储有弹药和航空燃料的简易机场，以应对日后所罗门群岛中心地带可能会遭到的猛烈空袭。但是拉塞尔群岛处于给哈尔西划定的边界上（实际上已经稍微有些越界了），没有麦克阿瑟的支持，就不可能继续向西推进了。哈尔西想拿下蒙达角，这里位于边界以西120英里处的新乔治亚岛上，日本在此建了一个新的简易机场，而那里的地形适合建造大型轰炸机机场。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明智地决定，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一次面对面的高级会议解决这一问题。1943年4月初，他跨越珊瑚海，出现在布里斯班安保集团的大厦里。

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不太可能成为亲近的好友。哈尔西一点也不喜欢麦克阿瑟那沽名钓誉的公报，并且一名副官记得哈尔西曾把这位将军称为“自吹自擂的贱人”。1942年9月，尼米兹曾邀请麦克阿瑟参加在努美阿举行的作战指挥会议，麦克阿瑟傲慢地拒绝了，派萨瑟兰和肯尼替他去参加。（尼米兹手下一名参谋所做的会议记录是以如下带有讽刺意味的话开头的：“麦克阿瑟发现自己无法出席会议。”^[21]）令他惊讶的是，哈尔西立刻喜欢上了麦克阿瑟。哈尔西后来写道，见面没超过五分钟，“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很少见到哪个人能以这么快的速度给人留下如此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时年六十三岁，但看起来也就五十出头。他头发乌黑发亮，目光炯炯，身板笔直。就算他身着便服，我还是会一眼看出他是一名军人”。^[22]而麦克阿瑟也对哈尔西印象深刻：“他跟约翰·保罗·琼斯、戴维·法拉格特和乔治·杜威一样，是个崇尚进攻之人。他的想法是接近敌人，然后与敌人决一死战.....我对他一见面便颇有好感，时间越长，我对他越崇敬和仰慕。”^[23]

哪怕是出于各军种和各战区之间的礼貌友好，两人才对对方有如此美言，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言论是不真诚的。在随后的一年里，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将有效地协调他们在南太平洋的行动。正如肯尼和金凯德所

了解的，哈尔西后来也发现的那样，麦克阿瑟习惯让手下服从命令，但是对于合情合理的异议他绝不会动怒。他会采纳合理的观点。陆军和海军之间的摩擦常常是由下属们引起的，但可以通过两个战区司令之间的直接通信得到解决。他们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即使在有争执时，这种相互的敬慕也没有消失。1943年末，跟随哈尔西已久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目睹了两个战区司令之间发生的一场激烈的争论。海军上将指责麦克阿瑟“把个人荣誉.....放在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最终的战争结果之上！”在卡尼的记忆中，这段指责让麦克阿瑟一时语塞。他说：“蛮牛，这指控太可怕了。你竟然这样说我！但是，我想我之前是忽略了一些事情。.....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我承诺的我会做到。”[\[24\]](#)

哈尔西攻击新乔治亚的敌军的提议跟麦克阿瑟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场批准了这项行动。这个行动可以和麦克阿瑟已有的进攻新几内亚北部海岸的计划以及占领伍德拉克岛和特罗布里恩群岛的计划完美结合起来。马里兰州的闪婚胜地“埃尔克顿”（Elkton）是此次双战线进攻的代号。新乔治亚的登陆日原定于5月15日，后来推迟至6月30日。

1943年的这场战役开始得异常平静。1941年12月以来，盟军第一次处于全面攻势，但是他们仍不够强大，不足以对新不列颠岛拉包尔的日本据点发动全面进攻。这场战役需要“爬梯子”，这个“梯子”是由所罗门群岛的岛链形成的。日本缩短并巩固了其新的防御线，从新乔治亚岛的蒙达至新几内亚岛的萨拉马瓦。这场战役以空战为主。新的滩头阵地和快速建立的航空基地将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范围向西北延伸到了敌人位于拉包尔的堡垒。

“仙人掌航空队”进行了重组，并且扩建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它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的组合，并且加入了新西兰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的第一任司令是海军少将查尔斯·P. 梅森，他的多军种和多国部队驻扎在亨德森机场。大多数空袭的有效半径为二三百英里，而拉包尔位于600多英里以外。盟军需要在所罗门群岛更靠北的区域拿下新的机场，像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行动一样，通

过海军和两栖作战占领新的岛屿。1943年3月，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可以在作战中投入300架飞机；到年中时，可以投入的飞机总数超过了450架。久经战阵的F4F野猫式战斗机、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复仇者”鱼雷轰炸机、B-17轰炸机和P-38“闪电”战斗机不断在南太平洋执行艰巨而致命的飞行任务，蚕食日本的空中力量，其中陆军的P-38远程战斗机大多是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不情愿地派来的。航空队中还加入了快速而强大的新型战机，包括格鲁曼公司生产的新一代舰载战斗机F6F“地狱猫”，还有配发给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战斗机中队的沃特F4U“海盗”鸥形翼战斗轰炸机。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会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机场起飞，为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提供支援。肯尼获得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大力增援，其中包括第475战斗机大队（全部配备P-38战斗机和训练有素的精锐飞行员）和新组建的第345中型轰炸机大队。久经沙场的老旧而残破的B-17轰炸机替换成了新投产的B-24“解放者”轰炸机。

哈尔西和麦克阿瑟仍然按照1942年7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行事，该指令把当年9月定为攻克拉包尔的最后期限。南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部对这个截止日期嗤之以鼻，因为这显然不切实际，荒谬至极。1943年2月，第一阶段任务完成，把日军驱逐出了瓜达尔卡纳尔岛。第二阶段任务和第三阶段任务要求在削弱拉包尔的实力后，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协同推进。此时有必要发布新的命令，设定新的最后期限，但金将军提出了另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体现了他典型的大胆风格。为什么不绕过所罗门群岛和新不列颠的所有岛屿，让一支部队直接登陆拉包尔以西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呢？拉包尔只要通过空袭压制即可，无须真正占领。

尼米兹、哈尔西和麦克阿瑟都反对这个想法，他们认为那些被绕过的日本据点，会成为漫长的供应线上的刺，让盟军一方很难受。麦克阿瑟告诉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他需要将拉包尔作为前沿海军基地，越过它“将会带来危险，使成功难以保证”。^[25]美国的航母在1942年的海战

中严重削弱，无法弥补陆基航空支援力量的不足。太平洋战区的指挥官们倾向于逐步推进，通过新建一系列机场，为每一次新的登陆提供支持。由于各方一致反对，金不得不妥协，但最终哈尔西和麦克阿瑟会采纳他的“绕过”思想，以其作为南太平洋反攻的关键战术。

1943年3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向拉包尔前进的新指令。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要横穿所罗门群岛，登上新几内亚海岸，然后向北和向西同时推进，最终麦克阿瑟将在新不列颠西部登陆，哈尔西则会在布干维尔登陆。这次双管齐下的行动被称为“车轮”行动。

日本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的跨兵种合作是间歇式的，并且多是临时组织的。今村均的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在拉包尔的地位高于百武晴吉的第十七军，包含了所罗门群岛和新不列颠岛的三个师，以及安达二十三将军在新几内亚的另外三个师。增援部队正在赶往拉包尔，其驻军将很快超过9万人。海军中将草鹿任一仍然在拉包尔指挥海军部队，负责防卫所罗门群岛中部区域。海军大将古贺峰一接替被打死的山本五十六出任驻扎在特鲁克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在这个战区中，日军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将指挥权合并；陆军和海军必须通过“根回”（疏通）的烦琐过程来协调行动。日军把更多的航空部队调到了战区，包括更多在战前就参加训练，并且磨炼过空中作战技术的精英飞行员——但是在1943年，日本的空战损失率仍然很高。

盟军轰炸日军舰船的效率和信心都不断提高，因此日本的海运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由于距离的限制，新几内亚的日本陆军只能通过白天的运输得到增援。1943年3月，驻于莫尔斯比和米尔恩湾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飞机使一批试图在莱城—萨拉马瓦地区投放登陆部队的运输舰全军覆没。陆军轰炸机采用了新技术“跳弹轰炸”，从桅顶的高度低空飞行并投掷炸弹，炸弹会在海面上跳跃，然后跳到船舷里爆炸。肯尼的第5航空队轰炸机使用了延时炸弹，这样飞行员就有时间将飞机拉起升空，脱离爆炸区域。“荒潮号”驱逐舰的船员增田礼二

（Reiji Masuda）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恐怖的袭击：

它们会低空靠近你，然后就像打水漂一样，让炸弹在水面跳跃。这就是它们轰炸我们的方式。所有七艘运输舰全都被火焰吞没了。桅杆倒了，舰桥炸成了碎片，船上携带的弹药被击中，所有的舰船都被炸毁……它们击中了我们的船体中部。空中盘旋着B-17轰炸机、战斗机、跳弹轰炸机，还有鱼雷轰炸机。我们疯狂射击，但根本不可能将它们击退。两枚500磅重的炸弹击中了我们的舰桥。没人能幸免于难。船长、领航长、炮长、鱼雷长以及首席军医都在作战中遇难。领航长烧焦的尸体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然后第二轮空袭来了。从左舷到右舷，三十枚炸弹击中了我们的船。船体剧烈晃动。子弹碎片和榴霰弹片让它看上去就像是马蜂窝。所有的蒸汽管道都爆裂了。船体变得滚烫。我们准备弃船逃生，但飞机就在桅杆的高度盘旋，用机枪向我们疯狂扫射。士兵的手被射掉，腹部被打穿。船员们死的死，伤的伤，没有几个安然无恙的。还有成百上千的士兵跳进了海里。但没有人救他们上来。不久他们就被大海吞噬，时速四五海里的洋流迅速将他们卷走了。[\[26\]](#)

在这场“俾斯麦海战役”中，至少有3 600名日军官兵丧生。麦克阿瑟在美国广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之为“历史上歼灭敌人最为彻底的战斗之一”。[\[27\]](#)他把这次战役视为军事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它标志着空中力量终于永远地取代了海军，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力量。

在遥远的北方，阿留申群岛的西部，日本军队仍然占据着基斯卡岛和阿图岛。1942年6月，在中途岛行动期间，由细萱戊子郎将军指挥的航母编队占领了这两个荒凉的、雾霭笼罩的岛屿。由于无线电情报人员孜孜不倦的努力，尼米兹在日军进攻阿留申群岛之前就知道了这次行动

（就像他知道日本准备袭击中途岛一样）。考虑到阿留申群岛对日本人没多大用处，而且等时机合适可以重新夺回，所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没有采取抵抗措施。

双方都曾将阿留申群岛视为经千岛群岛和北海道进攻日本北部的潜在途径。但是，美国最终放弃了这条北方的进攻路线，主要是因为这些高纬度地区天气恶劣，会给海上作战和空中作战带来严峻挑战。由于这些岛屿位于“大圆”航线附近，日军以为它们可以作为观察海军入侵的有用的观察哨，但这个理论上的优势却受到周围海域持续的低能见度的限制，完全没有实现。美国在战争期间唯一落入敌手的建制领地就是这两个岛屿，占据这两个岛屿让日本人在宣传上过了一把胜利瘾。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惨败之后，东京大肆欢呼，说占领了美国领土，并暗示将继续进攻阿拉斯加及更远的地区。然而，在军事方面，阿图岛和基斯卡岛只意味着负担。岛上驻军需要频繁运送物资和补给，这会消耗掉许多日本在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资源。

不管是生活、打仗还是做其他任何事，阿留申群岛都是个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士兵、飞行员和水手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北方。这里的飞行环境也是战争中最不利的，双方作战时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夏天，时常有浓雾笼罩着周围的大海和岛屿。飞机在空中迷失方向，被迫在海上紧急降落，或者穿过低矮的云层，直接冲到地面上。9月至次年5月之间，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夜晚使恶劣的飞行条件雪上加霜。飞机离开地面之前，必须用喷灯将发动机加热，还得把机翼上的冰铲下来。这里距离日本和美国基地都很遥远，这为双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A.西奥博尔德驻扎在基斯卡岛以东1 000英里的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可以从乌纳拉斯卡岛荷兰港的航空基地出发，抵达基斯卡岛，但飞行距离太远（约500英里），战斗机无法护航。距基斯卡岛190英里远的阿图岛则完全超出空袭覆盖的范围。

细萱戊子郎没有任何向东进攻的兵力，他主要关注的仍是抵御空

袭，并确保他的海运供应线经受住美国潜艇的袭扰。在基斯卡建造机场的工作遭遇到了天气恶劣、土质松软、设备不足、材料匮乏、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空中防御主要由零式水上飞机来负责，但这种水上飞机比较笨重，在空战中容易被击毁；空中侦察是由飞艇负责的，但是这些大个头的飞行器因事故或导航错误已经损失了大半。

1942年9月，随着白昼的缩短和气温的急剧下降，局势逐渐明了：美军最早也得在1943年春天才能将日本人驱逐出阿留申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况越来越激烈，把双方的海军和航空力量都拖到了南方。美国潜艇仍然不时有所斩获，巡洋舰和驱逐舰定期在近海炮击日本驻军，西奥博尔德的航空队继续骚扰基斯卡岛，经常对其进行空袭。

1942年秋天，在科迪亚克，海军和陆军航空兵之间的摩擦越发恶化。西奥博尔德将军给陆军航空队的下属施压，让他们降低轰炸高度——为了准确命中目标降到云层之下超低空轰炸——但这大大增加了作战损失。美军需要更靠西的机场，更接近敌人。但是对于新航空基地的位置，海陆军无法达成一致——海军希望是在阿达克，陆军则坚持选择附近的塔纳加。他们把这个问题上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裁决，参谋长们选择了阿达克。但这个岛屿经常雾霭笼罩，所以另一个岛上也要建一条应急跑道。1943年1月，先遣部队降落在基斯卡岛以东仅90英里的阿姆奇特卡岛上。

东京的大本营在了解到美军在阿达克和阿姆奇特卡岛上建了新跑道之后，才决定将资源投入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希望能够加强防御能力，抵御已预见到的反攻，但为时已晚。但冬天环境严酷，加上供应线有些不济，日本的机场建设计划很不顺利。基斯卡岛和阿图岛上的海岸防御有所加强，后者略弱于前者，但是日本人加强防守的行动已经晚了，只能加班加点赶进度。春末，天气转好，利于空中行动和海上行动。

华盛顿和俄勒冈两州的议员警告说，日军可能会在阿拉斯加登陆，并一路南下入侵西雅图。美国政府下定决心，在1943年重新夺回阿留申群岛，哪怕只是为了让那些抗议不断的议员闭嘴。议员们描述的情形并

不可信，但没人敢在公开场合这样说，那会让敌人以为美国人对战事漠不关心。此外，如果苏联参与到对日战争中来，阿留申群岛就可以成为飞往西伯利亚的飞机有用的中转站。尼米兹的参谋估计，5月份可以集结足够的力量在阿图岛登陆，但是直到仲夏才能在基斯卡岛登陆。3月，尼米兹请求首先登陆阿图而不是基斯卡，尽管前者在后者往西190英里处。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了尼米兹的提议。

那个月的一次无线电侦听显示，日本有一支供给船队正准备驶向阿留申群岛。海军少将查尔斯·麦克莫里斯（他未来将出任尼米兹的参谋长）带领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中队从珍珠港向北驶去，希望能拦截并摧毁敌方货船。3月26日凌晨，双方相遇。海风轻抚，大海异常平静。在2 500英尺高的云层下，能见度异乎寻常地高。麦克莫里斯的旗舰是“盐湖城号”巡洋舰，它捕捉到了北方几英里处的五艘船的雷达信号。天色越来越亮，瞭望员慢慢地看出有几艘驱逐舰和至少一艘巡洋舰。日本海军舰队往东南方转向迎敌，麦克莫里斯坚定地驶入交战区域。敌军有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是麦克莫里斯这边总火力的两倍。麦克莫里斯没想到会碰上敌军战舰，更没想到会遇到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

上午8时40分，日本巡洋舰“摩耶号”从2万码外远程开火。第二轮齐射命中了“盐湖城号”。射击精度极高，令美军惶恐不安。“盐湖城号”进行还击，两枚炮弹命中了“那智号”巡洋舰。为避免被击中，麦克莫里斯转舵向左，开始“追逐弹着点”，也就是不断调整航线，驶向最后一枚炮弹落入海中的地方，来扰乱敌方炮手的瞄准校正。战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盐湖城号”被“那智号”和“摩耶号”的6英寸口径炮弹击中，在上午9点到11点之间遭受了几次猛击。海水漫进锅炉，导致锅炉停烧，于是“盐湖城号”船体以5度倾斜在水里，动弹不得。几艘美国驱逐舰急忙赶过来施放烟幕。

打到这个程度，麦克莫里斯意识到战况很严峻。两艘日本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逐渐向“盐湖城号”的左后舷靠拢。毫无疑问，进入最佳射程

后，它们会向一动不动的旗舰发射鱼雷。将军命令三艘驱逐舰猛攻逼近的敌人，同时发射了多枚鱼雷。然而，没等美国驱逐舰进入射程，日本舰船就脱离了战场，掉头往西驶去。美国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敌人消失在地平线上。到中午时分，“盐湖城号”的锅炉恢复正常，该船的速度又能达到30节了。麦克莫里斯的中队撤回了荷兰港。

“科曼多尔群岛海战”因战场以北几英里处一个苏联的群岛而得名，此次海战历时六个小时，差点以美国大败告终。如果细萱戊子郎将军（他当时就在旗舰“那智号”上坐镇指挥）乘胜追击，他可能会摧毁“盐湖城号”，甚至还会击沉它的几艘警戒舰。细萱戊子郎后来解释道，他撤离的原因是他推测随时会遭到美军的空袭。他的一些船员误以为“盐湖城号”发射的高爆炸弹是从云层上面投下来的炸弹。此外，日方的舰艇快没油了，弹药也有些吃紧。然而，细萱戊子郎的保守决策遭到了上级的斥责，这名将军被迫退役。

麦克莫里斯这边有3艘舰艇受损，7名士兵阵亡。日本有2艘巡洋舰受损，后修复；14人死亡，26人受伤。科曼多尔群岛海战标志着日本人最后一次尝试用水面舰艇为阿图岛和基斯卡岛驻地进行补给，此后所有的补给都将由潜艇来完成。

阿图岛，地球上最偏远荒凉的地方之一，是一块没有树木的沼泽平原。有的地方地势逐渐升高，变成约2 500英尺高的光秃秃的荒凉山峰。虽然是美国领土，但美国人对该岛内部的地形几乎一无所知。最完整且最新的地图里也只画出了该岛的一部分，只描绘了离海岸1 000码以内的地方。近岸的水路也没有很好地绘制出来。

奉命夺取阿图岛的部队抽调自陆军第7步兵师，所有人都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将军“疯子”霍兰·史密斯负责的两栖作战训练。由50多艘舰船组成的第51特混舰队（其中的运输舰搭载了3.4万人）于5月11日黎明前逼近阿图岛。一支侦察兵小队搭乘潜艇和一艘运输驱逐舰在北边海岸靠近霍尔兹湾（Holtz Bay）的地方登陆。随后主力部队将在南边的“大屠杀湾”登陆，但从南边登陆的部队必须等上大半天的时间，等岛上的雾

散开。第一支登陆部队在下午3点半左右才到达岸边，但他们没怎么遇到抵抗。到夜幕降临时，北岸有1 500名士兵登陆，另有3 500人从南边登陆。

日军没有对美军的登陆进行任何抵抗，只是在有利位置保持着防御态势。日军的指挥官山崎保代大佐将2 650名士兵集中在两个登陆点之间的山丘上。他知道自己无力击退美军，也指望不上日本海军和航空兵的支持，于是烧掉了所有的敏感文件。美国海军特混舰队在近海炮击该岛，但山崎的士兵都在深沟高垒之中。岛上雾气连绵不散，日本人的据点掩藏在大雾中。从5月11日下午到翌日晚上，日本炮兵大规模地炮击登陆阿图岛南部的美国军队。美军朝岛内稳步行进，但由于地形复杂，障碍重重。岛上土壤松软，而卡车和装甲车太重，不易前行。5月17日，霍尔兹湾的敌军被清空，最初登陆的两支先遣部队会合了。

日军残余部队撤退到奇恰戈夫港的一道山脊上。29日黎明，日军冲下山脊，气势汹汹地高呼“万岁！”大批日军穿过美军防线，深入美军后方。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几乎所有冲过来的日本兵都被消灭了。

美军还没有掌握两栖作战能力，阿图岛一战暴露出种种不足，比如部队没有足够的登陆艇，也没有足够的应变措施来应对恶劣天气和低能见度。突击部队没有充分准备好御寒的制服和装备。还有，重要物资迟迟才运到或根本没有运到海滩上。美军在战斗中死亡580人，受伤1 148人，另有1 200人冻伤或遭受其他寒冷所致的伤病。

十周之后的基斯卡登陆可谓两栖作战史上最败兴的战例之一。8月里整整一周的时间，基斯卡岛都遭到轰炸和猛烈的炮火袭击。8月15日，一支庞大的运输舰队抵达，将3.4万名加拿大士兵和美国兵送上岸。（此次的进攻人数是上一年针对所罗门群岛的“瞭望塔”登陆行动参战人数的两倍。）登陆部队悄悄进入岛内，但岛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也没有遭到敌方的反击。早在两周前，日本驻军就在浓雾的掩护之下撤退了。

考虑到海军军需和空中轰炸弹药上的花费，再想想运输和人员方面

的巨额投入，在敌军留下的空空如也的海岛上来这样一次不流血的入侵，基斯卡行动真有些荒唐。在珍珠港，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倒是觉得挺有趣的。尼米兹会向访客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下场景：强大的先头登陆部队悄悄潜入岛内，武器就位，结果只有一只小狗殷勤地跑过来乞求食物，热情地欢迎他们到来。

在南太平洋战区，针对蒙达的行动始于1943年6月30日。特纳将军的第3两栖编队在距新乔治亚登陆海滩以南5英里的伦多瓦岛登陆。把火炮布置在这里朝登陆点发炮再理想不过了，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守住这里，他们的驻军被迅速击溃。

在新部署的火炮的掩护下，登陆艇载着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穿过海湾来到新乔治亚岛。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派了几百架飞机来支援这次登陆。日本的空中进攻很快就被击退了，但美军的地面部队在包围蒙达机场的过程中遇到了猛烈的反击。这里驻扎的4 500名日本兵深沟高垒，全力坚守，而且这里的地理环境很不利于进攻。蒙达行动就好像是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负片一样，日军和盟军的位置调了个个儿。这一次，是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深陷沼泽和灌木丛中，艰难求生，既联系不上邻近部队，又在敌方的骚扰攻击之下损兵折将。日本部队在夜间实行敢死队式进攻，士兵们还用蹩脚的英语大声辱骂和诅咒。美国陆军两个团的士兵丢弃武器，溃散奔逃；有几个士兵被其他美国士兵误以为是敌军而遭射杀；还有几十人因“神经官能症”被强制撤离。一名军官回忆说，恐惧像疾病一样在士兵中蔓延，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恐慌。军纪败坏，军心涣散。“到了早上，情况更是不可控制，大批士兵成群结队地沿着小径逃向后方，敌人疯狂地紧追不舍。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赶尽杀绝。”[\[28\]](#)

最终，所有可用的预备队都投入了占领蒙达的行动中。三个陆军师花了五个星期才彻底拿下机场，1 195名盟军士兵在此次行动中阵亡。大部分守军战死或自杀。但有一小部分人得以从海上撤到附近的科隆邦

阿拉岛的维拉机场。

这一次，盟军士兵又要对工事坚固、坚守不退的敌军发动正面进攻，就好像上次的教训还不够似的。去往拉包尔的路还是没有打通。日军在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岛屿上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机场。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几个机场尤其需要付出更长时间、牺牲更多人才能占领。华盛顿、珍珠港、努美阿和布里斯班的指挥官们开始探讨绕过或“跳过”有重兵防守的据点是否可行，希望借此加速战役进程，减少盟军伤亡。

（1943年3月）欧内斯特·金曾经建议越过拉包尔，直取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这个建议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但是后来很快就被采纳了，成了盟军太平洋大战略的核心战略。

《麦克阿瑟回忆录》拥有大量读者，在这本回忆录里，麦克阿瑟称自己为“蛙跳”战术的创造者。他写道：“我打算把他们包围起来，使其丧失作战能力，采取‘出其不意，置之死地’的原则。没有必要猛攻敌人占领的岛屿。”^[29]事实上，麦克阿瑟很晚才采纳这种战术。哈尔西的“坏点子部”（内部人士为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起的昵称）的参谋长罗伯特·卡尼回忆称，这一战术曾遭到麦克阿瑟顽固的反对。“麦克阿瑟觉得你不能就这么撒手不管，把敌人强大的军队……留在你的侧翼或是后方。他们那边的想法与我们的想法截然不同。”^[30]显然，麦克阿瑟是在1943年8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美英最高司令部）下令绕过拉包尔后，才接受“蛙跳”战术的。即便到了那时，一开始他也对好几次“蛙跳”行动提出了反对意见，尤其是1944年3月哈尔西领导的跨过卡维恩的行动。

新乔治亚岛西北方向紧挨着的是科隆邦阿拉岛，这个岛是一个正圆形的成层火山锥，最高处海拔5 800英尺，从海中高耸而出。在该岛的南岸，日本驻军在维拉机场挖掘了战壕。草鹿任一预计盟军下一次两栖登陆的目标会是维拉机场，所以几周以来一直在加固这个据点的防守。日军部署在防区的兵力已经达到约1万人，是盟军在蒙达遭遇的日军人数的两倍多。8月15日，第3两栖编队绕过科隆邦阿拉，在其北方约50英

里处的韦拉拉韦拉岛占领了一个海滩，这个海滩的敌方驻军仅有250人。进攻部队伤亡很少，而且工程营队员在三个星期内就建成了一个新的机场。草鹿任一意识到敌人绕过了科隆邦阿拉岛之后，下令在夜晚用潜艇和驱逐舰将这里的驻军撤到布干维尔。

为了增援在新乔治亚群岛被围困的部队，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中队与盟军特混舰队发生过几次小规模海战。日本人的夜间鱼雷行动一贯表现卓越，93型“长矛”鱼雷仍是他们在该战区最好的武器，但美国人正学着用先进的雷达系统来取得优势。每艘船都将雷达和其他来源提供的信息集中到雷达图上，后来将其发展为战斗情报中心。在这个时期，美国还因一些海军指挥官出众的领导能力而获益匪浅，这些指挥官包括沃尔登·李·安斯沃思少将、阿龙·斯坦顿·梅里尔少将、弗雷德里克·穆斯布鲁格中校和“31节”阿利·伯克上校等等。在进攻蒙达期间，安斯沃思将军在庫拉灣（7月6日）和科隆邦阿拉（7月13日）的战斗中两次拦截了日本军队。在这两次交战过程中，美军都以巡洋舰居中的单列纵队靠近敌军，朝日军领头的舰船开火，然后转身开走，避开日军必会发射的鱼雷。这两次战斗中盟军和日军的损失相当。日本军队两次都被击退，未能增援蒙达。

8月6日至7日夜间，穆斯布鲁格中校带领六艘驱逐舰，分两列纵队行进（这一战术是伯克设计的，不久前他接到命令，担任更高级的指挥官），迎击前来的日本中队。其中一列纵队发射多枚鱼雷后转身撤离。趁日军向撤离的舰只开火的时机，第二列纵队占领T字横头阵位，对日军发动了一轮毁灭性的炮击。三艘满载士兵、开往科隆邦阿拉岛的日军驱逐舰被炸毁并下沉。根据美国一份作战报告的描述，其中一艘驱逐舰爆炸时，“冲天的水浪形成巨大的半圆形，有六七百英尺高”。^[31]

一千来个日本士兵和水兵或丧生于爆炸，或随后葬身大海。原为一指挥的一艘驱逐舰逃出重围。后来他总结说：“敌军的伏击战法无懈可击。”^[32]此次“韦拉湾之战”美军采用的战术，由穆斯布鲁格贯彻执行，后来成为1943年秋季进行的几次海面作战的样板。

南太平洋的战局已经发生决定性的转向。日本看到无望保住据点，其海军的行动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将守军撤走。从科隆邦阿拉岛撤退时，日军已经在韦拉拉韦拉岛东北海岸的霍腊纽（Horaniu）建立一个驳船和登陆艇的中途补给基地。9月14日盟军军队登陆霍腊纽，赶跑了600名日本驻军。日军溃不成军，经陆路撤退到西北岸的马夸纳湾。草鹿任一下令进行救援。伊集院松治少将带领六艘驱逐舰、两队运输舰（包括三艘运输驱逐舰）从拉包尔出发。在布干维尔岛南部的布因，大约又有20艘小型舰艇加入进来。

10月6日，美国空中侦察机发现了这支小型舰队，这支舰队的规模看起来承担不了其作战任务。这个区域有六艘美国驱逐舰，它们前去拦截，但分成了两队，相距约20英里。弗兰克·沃克上校率领的北边一队（“塞尔弗里奇号”、“希瓦利埃号”和“欧班农号”驱逐舰）没有等待哈罗德·拉森上校率领的南边一队（“拉尔夫·塔尔博特号”“泰勒号”“拉瓦莱特号”），率先发起了行动。自从约翰·保罗·琼斯以来，遭遇优势敌军时勇于出击，在美国海军中就备受推崇和尊敬。然而，这一次，沃克的大胆行为太过鲁莽。他的三艘驱逐舰朝伊集院附近的四艘驱逐舰发起进攻，发射了炮弹和鱼雷。伊集院掉转船身，施放烟幕来掩护撤离，但“夕云号”驱逐舰继续朝美舰开过去，靠近后开始交火。它至少被五枚5英寸炮弹击中，之后迅速燃烧爆炸，被火焰吞没。几分钟后，沃克的船队遭到了日军鱼雷的扇形攻击。“希瓦利埃号”和“塞尔弗里奇号”的舰首被炸毁，“欧班农号”躲避不及，撞上了受损的“希瓦利埃号”。“塞尔弗里奇号”继续射击敌舰的第二分队，在离敌军约1.1万码的地方纵向穿过，11时6分其左舷被鱼雷击中。“希瓦利埃号”已经被毁，严重受损的“欧班农号”和“塞尔弗里奇号”颤颤巍巍地驶回珀维斯湾。美军忙于清剿之时，日本的小型舰只完成了马夸纳湾驻军的撤离工作。日军在这场“韦拉拉韦拉海战”中赢得了战术和战略两方面的胜利。这也是他们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

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代号为“四分仪”，于1943年8月举行）上，英国的几位参谋长虽然偏向于将更多兵力投入反抗纳粹德国的行动中，

但也支持了金的提议，认为应该集结进攻资源，在太平洋中部统一行动，展开攻势。这意味着南太平洋的行动要为其他行动让路，麦克阿瑟将处于战略死角的地位。马歇尔坚持从南方向菲律宾推进，罗斯福被说服了。麦克阿瑟极具政治影响力，他还暗示将接受共和党的提名，参加1944年美国总统的竞选。这些都有可能左右了总统的决策。

根据会议指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颁布了一项修订后的计划，称为“里诺三号”，这项计划命令麦克阿瑟“夺取或是压制新几内亚东部，西至韦瓦克，包括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和俾斯麦群岛。拉包尔要牵制而不是占领”。^[33]该计划认为“直接攻占拉包尔代价大，耗时长。卡维恩和阿德默勒尔蒂群岛都有锚地，可能还有航空基地和海军基地。占领并发展这些基地，可以让拉包尔与东北方隔绝开来”。^[34]

哈尔西去往拉包尔之路的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必经之地是布干维尔岛。在这里，绕道原则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既节省了时间，又减少了伤亡。日本已将增援部队投放到布干维尔岛及其周围的基地中，包括南部的布因和肖特兰，以及北部的布卡和波尼斯（Bonis）。到10月中旬，这些地区的日军总人数超过了4万。哈尔西和他的“坏点子部”选择在西海岸奥古斯塔皇后湾的托罗基纳角登陆，这里的敌人实力薄弱。此时，大家对这种模式已经非常熟悉了。突击部队突袭海岸，大量装备和弹药紧随其后，建立一片坚固的阵地，而后工程营队员抓紧时间建造一个可运作的机场。日军自然会反击，但攻打美军稳固的防线之前，他们必须千辛万苦地穿越原始丛林，饥饿和疾病会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为了执行这次行动（“樱花”行动），哈尔西可以从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中抽调约3.4万名士兵——他们来自第3陆战师和陆军第37步兵师，组成海军陆战队第1两栖军。新西兰第8步兵旅占领了较小的特雷热里群岛，为登陆吹响了前奏。11月1日黎明前，第3陆战师的海军陆战队员乘十几艘运输舰在托罗基纳角突袭上岸，并迅速打败了该地区日益疲弱的日本部队。激烈的空战一整天都在持续，但所罗门群岛航空队的战斗机没有让滩头部队遭受任何持续的攻击。肯尼的第5航空队向拉

包尔机场投入空前的兵力，以压制日本的空中反击。至夜幕降临时，已经有1.4万名士兵和6 000吨装备、弹药和物资安全上岸。

日本海军下定决心阻止这次行动。草鹿任一在拉包尔组织起了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在海军少将大森仙太郎的指挥下向南进发。这支舰队在穿越“槽海”时被美国的侦察机发现。哈尔西命令该区域的唯一一支海军部队，即梅里尔将军的第39特混舰队负责保卫滩头堡。梅里尔的四艘轻型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已经坚持战斗了一天一夜，船员们精疲力竭，但是哈尔西没有其他兵力可用。梅里尔的策略是将驱逐舰单独编队，对敌方侧翼发动偷袭。他的巡洋舰则守卫着通往海滩的必经之路，用6英寸口径的舰炮不断射击，并且协调行动，以“8”字形的阵式来迷惑敌人，躲避鱼雷。刚刚提升为上校的阿利·伯克指挥第45驱逐舰分队。大家早已精心演练过这一战术，指挥官们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

詹姆斯·费伊是梅里尔的旗舰“蒙彼利埃号”上的一名水手，他描述了那个被闪电、火光、照明弹和炮口的光焰照亮的漫漫长夜。他在日记中写道：“8英寸口径炮弹的齐射激起海中巨浪，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我们往日本军舰前方发射照明弹，好让驱逐舰用鱼雷攻击敌方。那就像黑暗中在你面前放了一盏耀眼的灯。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我们军舰上大炮的声音震耳欲聋。”^[35]梅里尔的舰队摧毁了日本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将入侵者赶走，保住了滩头堡。两艘美军舰船受创并失去动力，但无一沉没。

海军大将古贺峰一从特鲁克群岛派了另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由海军中将栗田健男指挥。11月4日，在拉包尔北部，“仙人掌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栗田的船队，哈尔西决定派手头的两艘航母迎击，一艘是“萨拉托加号”，另一艘是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由于美军对拉包尔及其周围机场的猛烈袭击使日本的航空兵一直处于防御态势，所以两艘航母驶入了所罗门海。11月5日上午，97架飞机撒下炸弹雨，并投下空投鱼雷，对七艘日军巡洋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一个星期之后，三艘从第5舰队（当时正朝吉尔伯特群岛开进，准备拉开中太平洋进攻的序幕）借来的美国航母往南迂回，向停泊在拉包尔辛普森港锚地的日本舰队再次发动攻击。这三艘航母中有一艘是刚刚投入使用的“埃塞克斯号”，“埃塞克斯”也是一个新的航母级别，这种航母将于1944年和1945年战事转入西太平洋时，主导整个空战的局面。日军派出了100多架飞机来攻击这些航母。“埃塞克斯号”的副舰长菲茨休·李回忆在船上的战斗情报中心度过紧张的夜晚时说：“我们正在学习使用新型雷达，它们在战斗早期阶段的远程交火中表现优秀，但很快场面演变为混战，我们不知道是在瞄准本方的飞机还是在瞄准对方的飞机。”^[36]让李又惊讶又感到欣慰的是，“埃塞克斯号”在行动中几乎毫发无损，没有被任何炸弹和鱼雷击中，只被一些扫射的子弹刮伤了几下而已。日本在此轮攻击中损失41架飞机。尼米兹认为，1943年11月航母攻击拉包尔的战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有关航母是否应该冒险攻击强大的敌方基地的问题”。^[37]古贺大将命令幸存下来的舰队回到特鲁克群岛。

从12月开始，拉包尔上空从早到晚都是盟军的轰炸机，遮天蔽日。对岛上的日本守军来说，面对持续不断的空中威胁，只有天气恶劣，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时候，才有喘息的机会。肯尼的第5航空队摧毁了日军的机场以及配套设施。海军陆战队少将拉尔夫·J.米切尔接任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司令，但是大部分参谋还是原班人马。（所罗门群岛航空队或许已经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多兵种完美融合的部队。）米切尔开始将部队从新乔治亚和韦拉拉韦拉刚建造几个月的机场向西北方特雷热里群岛和布干维尔岛托罗基纳的新机场转移。航程较短的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此时可以轻松抵达拉包尔，开始每日数百次地轰炸俾斯麦群岛。古贺大将继续从特鲁克群岛抽调兵力，实施空中增援，把最后一批训练有素的航母舰载航空兵也派上了阵。南太平洋已成为日本空中力量的绞肉机。

1月20日从布因抵达拉包尔的航空兵军官奥宫正武表示，从将军到

士兵，每个人的心里都蔓延着疲惫和绝望。地勤人员处于崩溃的边缘，飞机也渐渐因机械故障而报废。夜间轰炸将他们从睡眠中惊醒。在草鹿任一的第二十六航空战队的总部，军官和飞行员们“脾气火爆，眉头紧皱，神色凝重……士兵们垂头丧气，看上去又迟钝又冷漠……他们的表情和行为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放弃拉包尔，越早越好”。^[38]能力较差的飞行员的加入，降低了过去一起编队的航空中队的素质。无论从飞机的数量还是从机组成员的能力来看，日军的空中抵抗力都在日渐减弱。无数精英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日复一日，整个航空兵部队陷入瘫痪状态，到处充斥着莫名的不安。奥宫正武还记得1942年初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日本的海军飞行员在空中横扫敌军，游刃有余。而此时，他“震惊地确信，日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在拉包尔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失败终会到来”。^[39]日本海军不承认士兵最终将对战争感到疲惫，所以不管是飞行员还是参谋都没有被轮换过：

美军施加的空中压力越来越大；防空工作中哪怕出现一个暂时的疏忽，也可能会使我们失去拉包尔和附近的机场。那些无尽的日日夜夜，成了一场场噩梦。刚刚熟悉一些年轻士兵的面孔，他们就永远消失在美军炮火形成的无底深渊中。我方的一些高级参谋最后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精神涣散，体力不支。在整个战争期间，海军会尽快填补必要的飞行人员，但从没考虑过指挥官的需求。这一失误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因为指挥官若是没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海军也从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基地维护人员面临的问题，这些人会一连几个月像奴隶一样地工作。一周七天，一天12到20个小时，任劳任怨。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没点像样的食物，也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他们牺牲了这么多，却得不到政府丝毫的肯定。^[40]

从1943年年中开始，麦克阿瑟的部队一直在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推进。丹尼尔·E.巴比将军的第7两栖编队（属于所谓的“麦克阿瑟海军”）

派遣突击队登陆了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以及萨拉马瓦的日本据点以南几英里的拿骚湾附近。盟军从米尔恩湾登上小型运输艇，这样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安全前进，而如果用较大的舰队转移，经过这片遍布日本潜艇的海域就比较冒险了。萨拉马瓦的日军获得了从莱城南下的部队的增援，但是麦克阿瑟计划只对萨拉马瓦进行一次牵制性进攻，他的主要目标在休恩湾的另一边。9月3日至4日夜，巴比的两栖部队发动袭击，8 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莱城以东登陆；第二天，1 700名美国伞兵从运输机中跳出，占领了莱城西边的一个简易机场。盟军包围了莱城，白天轰炸，晚上炮击。幸存的日本驻军放弃了这座城市，躲进丛林，但丛林条件恶劣，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9月下旬，盟军再次通过海上运输艇出其不意地将一支澳大利亚部队送到芬什港的北岸，并于10月2日拿下了这个小镇。借助稳定的海上补给，澳军从海岸朝锡奥和马当推进。在三个月的行动中，麦克阿瑟巧妙地拿下休恩半岛的控制权，将日军主力甩在身后，或是让日军像逃犯一样四散到险恶的丛林中。

从芬什港经勇士号海峡到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洛斯特角，距离不到50英里。虽然参谋长们已经指示绕过拉包尔（在新不列颠岛的东端），但麦克阿瑟想在该岛西端占领敌军一个小型机场。12月15日，沃尔特·克鲁格中将的阿拉莫部队派了一个团在南海岸的阿拉维村登陆。这次登陆是一个假动作，目的是将敌人的注意力从格洛斯特角转移开。来自瓜达尔卡纳尔岛第1陆战师的自豪的老兵们在墨尔本补足装备，休整完毕，于1943年12月26日攻占了格洛斯特角的海滩。新不列颠岛西端敌军守卫力量薄弱的机场也很快被攻占。剩下的日本军队撤往拉包尔，为他们认为的南太平洋战役中最大规模的陆地战做准备。

残酷的空袭已经快把拉包尔这个航空基地毁得没个基地样了。但从西面涌入了大批部队后，日方兵力达到了10万人。投降是绝对不在考虑范围内的，所以日本驻军开始为死战到底做准备。失败可能在所难免，但败也要败得光荣。天堂在向他们招手——他们会拼死一搏，但不会便

宜了美军，就算死也要让众多美国兵陪着一起死。近两年来，日军一直在建设和改进防御工事，加固复杂的地下掩体和隧道，还为应对长期的围攻备足了粮食和弹药。

他们等待着美军的到来。等啊，等啊，但美军没来。这些日本守军连为天皇献身的安慰都没能得到。战后接受采访的一名日本情报官承认，日本人“痛恨”蛙跳战术，也许是因为这侵犯了他们的荣誉感；但他又说，他们尊重这个战术，理解其中的智慧。“日军更喜欢德国式的直接攻击，但美军冲进我方力量薄弱的地点，将我方吞没，就像海水要淹没一条船，会先找最容易进水的地方一样。”^[41]

在这场战争中，日军最弱的地区就是新不列颠岛北部和西部那些驻兵很少的地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占领并守住了拉包尔周围的一圈基地，使这座一度坚不可摧的堡垒变得毫无用处。新爱尔兰岛上的卡维恩，也就是拉包尔的主要卫星海军基地，同样未能幸免，被直接攻陷了。1944年2月，哈尔西的第3两栖编队将新西兰的部队送上了布干维尔岛和新爱尔兰岛中间的格林群岛。接下来，在3月中旬，第3两栖编队直奔卡维恩西北方70英里处的俾斯麦群岛的埃米劳岛（Emirau Island）。卡尼说：“我们唯一的伤员是从船上跳出来时扭伤脚踝的。这次行动使我们横跨在敌军由特鲁克群岛或由西方而来的交通线上。从那时起，卡维恩就死定了。日军会在那里待到毁灭。”^[42]卡尼还补充说，“蛙跳”战术从心理和士气上摧毁了日军。他表示：“日军每次实施某个计划，似乎都没有备用计划，因为从心态上和心理上来说，在日本人那里，从来就没有失败这个词。任何事一旦开始，就决不回头。”美军围着日本的据点转，而不是直接发动攻击，“日本全军的士气都崩溃了”。^[43]

麦克阿瑟拿下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洛斯内格罗斯岛，离卡维恩岛有220英里。那里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马努斯岛，岛上的席亚德勒港（Seeadler Harbor）是一个极好的自然锚地。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第7舰

队会为麦克阿瑟西进的下一步——“无畏”行动——积聚力量，他在这次行动中将打到荷兰迪亚。俾斯麦群岛的屏障已被打破，返回菲律宾的道路大开。

南太平洋反攻

1943—1944年麦克阿瑟和哈尔西的进攻态势



古贺大将终于明白过来，拉包尔已经成为一个大麻烦，于是命令剩余的航空部队飞回特鲁克群岛。1944年2月16日至17日，第5舰队的航母舰载机对特鲁克群岛发动了毁灭性的突袭，这无疑更加印证了他的分析。

1943年末，盟军在南太平洋的胜利似乎是板上钉钉了。唯一不确定的是还将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以及还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盟军的绕道战略，使12.5万日军兵力无法发挥作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的精英都已牺牲，接班的新兵缺乏训练，对战争准备也不充分。日本人在南太平洋的历次战役中损失了2 000多架飞机，而且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无望弥补这些损失。剩下的日本航母已被撤回本土，大概是因为日军知道如果继续将它们投入大型战役，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毁灭。随着美国战时经济进入巅峰期，更先进的新型舰艇、飞机和武器陆续抵达太平洋地区。

美军从上到下士气高涨。在1943年的最后一个月，太平洋地区的一名军官写道：“现在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装备太多了，就像在自家客厅玩打鸭子游戏一样。”^[44]经历过铁底湾几场恐怖海战的邦内尔上尉说，1942年最绝望的几个月中普遍存在的“愤世嫉俗”被无处不在的信心和乐观取代了。舰队迅速扩张，并在训练水平、作战经验、信念和技术等方面也都有了质的改进。军官和水手知道各自的职责所在，也知道如何去做。“换句话说，”邦内尔说，“过去是生手来做老手的工作，现在则是熟练工做学徒的工作。”^[45]

^[1] Special Service Division, *Instructions fo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Australia*.

^[2] Leckie, *Helmet for My Pillow*, p.140.

^[3] *Ibid.*, p.144.

^[4] Alex Haley, “The Most Unforgettable Character I’ve Ever Me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War*, p.127.

^[5] Keresey, *PT 105*, p.131.

- [6] Entry dated October 24,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58.
- [7] Ralph, *They Passed This Way*, p.158.
- [8] “‘Shocking’ Street Scenes at Night.”
- [9] Lake, “Desire for a Yank,” p.623.
- [10] *Courier-Mail*, October 29, 1942, p.4.
- [11] “Hey! You Diggers! He Came, He Saw, He Conquered,” Wolfson Collection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
- [12] *Truth* (Brisbane), June 14, 1942.
- [13]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286.
- [14] Perry,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 p.192.
- [15] Thomas C.Kinkaid,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29, Vol.1, pp.250-51.
- [16] *Ibid.*, p.254.
- [17] Schaller, *Douglas MacArthur*, p.72.
- [18] Childs,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p.251.
- [19]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27.
- [20] COMINCH to CINCPAC, March 27,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534.
- [21] “CINCPAC Conference in Argonne,” September 28, 1942, p.1, i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 [22] Halsey and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pp.154-55.
- [2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73-74.
-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29.
- [25]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38.
- [26]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2.
- [27]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206.
- [28]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135.
- [2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69.
- [3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15.
- [31] U.S.S.*Dunlap* Action Report, August 18, 1943, enclosure (A), 18: DD384/A16-3 Serial 012, in NARA, RG 38.
- [32]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179.

[33] Mimeo Secret Outline Plan, pp.241-43, "Outline Plan for Opns of the SWPA, 1944," Reno III: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October 20, 1943, online at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A/USA-P-Strategy/Strategy-W.html> (accessed November 3, 2014).

[34] Mimeo Secret Outline Plan, pp.241-43, "Outline Plan for Opns of the SWPA, 1944," Reno III: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October 20, 1943, online at <http://www.ibiblio.org/hyperwar/USA/USA-P-Strategy/Strategy-W.html> (accessed November 3, 2014).

[35] Entry dated November 2, 1943,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65.

[36] Fitzhugh Lee, oral history, in Wooldb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11.

[37] Potter and Nimitz, *Great Sea War*, p.301.

[38]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222-23.

[39] *Ibid.*, p.225.

[40] *Ibid.*, p.224.

[41]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38.

[42] Robert Bostwick Carne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315.

[43] *Ibid.*, pp.313-14.

[44]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45] "Narrative by Lieut.Graham C.Bonnell, US Navy," recorded January 25,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1.

第九章

旧金山的山丘使战时保密成了笑话。除了起雾的时候——这里多雾，一年四季都不例外——任何市民、观光客或者间谍都能将城市景观尽收眼底，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十分显眼，让人一览无余。战舰、运兵船、货船、油轮、潜艇——有史以来，还从没有过这么多的船从金门桥下驶过。旧金山及其子宫形状的港湾曾经是美洲的“后门”，此时却是太平洋战争中重要的物资补给中心和转运中心。

从梅森堡到猎人角，大小码头无不停泊着各类船只。码头装运工轮班上岗，夜里也要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工作。零售商贩和土地所有者保持了淘金热时代流传下来的抬价传统，致使商品和房租价格虚高。影院里全天都有电影上映，但仍是场场爆满。饭店门外，饥饿的市民和军人们沿着马路排起了道道长龙，一直延伸到街角。饭店里，服务生不耐烦地催促客人们赶紧吃完走人。住房管理政策要求住酒店最多不超过两晚。（但陆军和海军的将领通常能享受例外。）

在城市东北角的山下，田德隆区、唐人街和北岸区的街道肮脏不堪，却人山人海。身着绿色、白色或者卡其色衣服的人们，准备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港口之一尽情挥霍一番。他们兜里有钱，心里却门儿清，自己不定啥时候就没机会花这些钱了。大街上，霓虹灯闪烁着。人们三五成群，摩肩接踵，在脏乱不堪的夜总会、脱衣舞俱乐部或者通宵营业的刺青店进进出出。宪兵队和海岸巡逻队为保证治安而坚守岗位，两人一组巡逻，随身只配备一根警棍。这份差使挺危险，因为不管想逮捕谁，闹事者的同伴都不会坐视不管。若大家决意群起反抗，解救滋事者，两个人仅凭警棍断然是应付不了的。一晚上至少一两次，需要出动防暴队和警车，押送一伙人到卡尼大街和华盛顿大街上的审判大厅

去，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临时关押犯人的军事监狱。

店铺11点打烊，大家尽兴而归，狭窄的人行道上就会突然挤满了人。这会儿是一天中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要不就是陆军和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发生口角再常见不过了，而且不同舰艇上的士兵，也往往为各自的舰艇而混战起来。1942年年初，轮渡大厦以北海滨沿线的码头都被改造成了主力舰碇泊区，因为这些巨型舰船在珍珠港遭受过鱼雷袭击，需要在此接受漫长的修理。长期停泊于此的战舰上的海军士兵被戏称为“市场街敢死队”，但谁要是敢当面喊出这个绰号，还是要做好用拳头保护自己的准备。“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的弗洛伊德·比弗说：“那样很容易就会打起来的。”^[1]

随着战事越来越激烈，旧金山（以及其他所有被军人占据的美国城镇，比如火奴鲁鲁和圣迭戈）人变得精疲力竭，人情也更加淡漠。这是悉尼、布里斯班以及墨尔本的人没有经历过的。西奥多·C.梅森是一艘战列舰上的水手，也是个传记作家，战争时期的市场街给他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

从轮渡大厦到市政中心，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这段旧金山最宽阔、最肮脏、最吵闹的主干道上总是遍布大城市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跛足者、残疾人、穷人、盲人，还有自封的灵魂救赎者。现在一批身着蓝色海军服、卡其色陆军服和绿色海军陆战队军服的士兵蜂拥而来，和流浪汉们抢占人行道上有限的空间。那些身着军装的人大多是新的水手或二等兵，刚从海军训练营或新兵训练中心受训完，身无分文，懵懵懂懂地来到充满罪孽的旧金山。他们大多年龄还小，酒都不能买。

他们心神不定地在美妙的浮华街道上转来转去，街上遍布酒吧、当铺、电影院、戏院、酒店、办公楼和饭店。每个年轻人都奢希望能遇到一个女子，和远在家乡的她一样可人（又或是截然不同）。除非他能在西班牙餐厅舞池里连哄带骗，侥幸掳获姑娘的芳心，否则他唯一能遇到的女子便是街头女郎，有人叫她们“女列车

长”。熙熙攘攘的大批顾客里，这位“女列车长”也只能挑一个，收十美分“车票”，带走。

咖啡馆灯光昏暗，小伙子们想在这里抓住最后的机会，来一段风流韵事。然而服务员们早就腻了，和整条街一样怠倦。这些来自丘陵、农场和城镇的年轻士兵调情的话，她们听得太多了。又一次被拒绝后，这些受挫的海军新兵只能聚集在游乐中心。这里是个低俗的游乐场，在这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发泄郁闷，比如射击日本零式战斗机、战舰还有希特勒，或者和哥们儿在硬纸板做的战列舰前摆拍。我才意识到，旧金山，可以变得如此冷漠。[\[2\]](#)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人心惶惶的几个星期里，美国第12海军军区先下手为强，迅速抢占一切想要和需要的地盘，以便应对紧急状况。还没有和旧金山市和旧金山县商定好租约的细节，海军部就在1942年4月占领了金银岛。矛盾逐渐升温。旧金山政界精英中的显贵们原本打算用这300英亩地建机场，海军方面答应拿出44 801美元补偿他们，但他们对此很不满意。同一天，联邦法官签署了“占有和使用声明”，平息了一场法律诉讼。通过强硬的法律手段，使用权判给了海军部。被以这样的形式耍弄，平民官员们可受不了。第12海军军区还要占领猎人角的船坞，不但要使用该地的码头和空地设施，还要吞并附近的整个社区。一百多户平民家庭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准备，在48小时内撤离。在东岸区，海军买下了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个老旧的船坞，还在浅滩区填海，以扩建阿拉梅达海军航空站。

北岸区是大量造船厂聚集的地方，主要是索萨利托（船务公司）和里士满（凯泽造船厂）。福特汽车公司1/4英里长的工厂迅速改建，用来装配吉普车和坦克，它们将会从500英尺长的混凝土码头装载到运输舰上。红酒码头集合了优良的石质酒窖和世纪之交建起来的港口设施，此时被改造成了海军的燃料补给站，输油管从这里一直通到里士满山丘上的棕色油罐，这些油罐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这些大型的工厂和船坞围在带刺铁丝编成的栅栏里，而且有军人看守。他们的日常节奏是

永恒不变的，每天都是八小时换班，届时一大队人会从一个门进来，另一队从另一个门出去。在第一个门口，吐着尾气的巴士上会下来一队人，车继续向前开，再带走另一队人。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直到轴心国被击败。

跟所有在战争时期繁荣起来的城镇一样，这里是劳动力的卖方市场。大字不识，原来只能当一辈子农民的大老粗，来城里的第二天就能找到生产线上的活儿。追求高额报酬的人，或坐火车巴士，或开车，或搭便车，纷纷涌入城镇，能拿到的工资是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这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人们住的棚屋拥挤而简陋，是十多年前的。有些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里的“热床”上，在这里舍友们尽量把工作安排在不同时间，这样就能轮流睡同一张床。还有人把车停在路边或空地上，然后就住在车里面。亨利·凯泽疯狂地投入资金，建造新型战时住宅项目，例如里士满的艾奇逊村里的双联或四联房屋，总共有450套。

十年前，土生土长的加州人最瞧不上的是来自干旱尘暴区的“俄克移民”和“阿肯移民”。现在，他们对这些在战时工业里寻求机会挣大钱的乡下佬同样一脸不屑。他们用类似的侮辱性叫法来称呼这些乡下人，不管这些人来自爱达荷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还是北卡罗来纳州。刚刚从内陆平原来的家庭，孩子光着脚，梳着辫子，大人小孩都张大着嘴，吃惊地环顾周围的一切。他们从没见过这么拥堵的大街，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也没见过人情这么淡薄而冷漠。劳拉·布里格斯是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小女孩，初来乍到，看到城市里的邻居之间从不主动打招呼，感到分外吃惊。“早上路人就从你旁边走过——‘就从旁边走过啊！’我父亲的原话——却不跟遇到的人打招呼，甚至完全无视你的存在。”^[3]

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少数种族，都被赶到一块儿，被迫挨得很近，一起工作。西海岸对少数种族的包容和温和态度像灯塔一样吸引着非裔美国人，因此他们在美国参战的这几年间大量移民到加州。行政命令下达后，船坞和工厂合并了。在拍摄于军需工厂餐厅的照片里，不同肤色

的男男女女并肩坐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恶意在这里是不存在的。但黑人还是会遭到侮辱和不公的待遇，事情有大有小，这主要是和20世纪40年代普遍存在的种族态度有关。整体上讲，他们觉得自己是“船坞最底层的员工”。海湾区的造船厂和工厂还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女工。在凯泽造船厂里，“焊接工温蒂”这个称号曾经特别火，比现在人们熟悉的“铆钉工罗西”还要火。^[4]最初，船坞工会的老板们坚持让女性的工资待遇低于男性，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别反而会刺激管理者雇用更多的女性。对女性的厌恶总是毫无缘由地突然爆发，这是个社会顽疾，还具有传染性。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堪入耳，到处传播，说在工厂幽暗的休息区或内部隔间里以及正在修建的船上，有人对女性做见不得人的勾当。造船厂的女工们都要戴头巾，还不准戴首饰、涂口红和涂指甲油。着装标准由男性间接监督，直接的监督则由自封为监工的女性完成。凯瑟琳·阿奇博尔德曾经在奥克兰的摩尔干船坞公司工作过，她在战后写了一本犀利的回忆录。“就像士兵潜入敌军防线一样，”她写道，“造船厂的女性必须伪装自己，以防性别特点被别人注意或夸大。”^[5]

由于工作提速，1942年到1943年间的船运危机有所缓解。有越来越多的船一下水就立即派上用场。质量控制以及产品使用年限此时都不重要。是否经济适用也不重要。对于造船业来说，新常规要求人们的文化和态度发生深远的变化。造船厂过去一直是技能娴熟的工匠们的领地，他们在这里维护自己的特权和优厚的待遇，一致排外。焊工、电工、管道工和车床操作工都是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沿着职业阶梯熬上来的，以自己的工作为傲。厂主和经理们是工人們的宿敌，也是给他们发工资的人。但是通过组织集体维权活动，工人们为自己争得了更高的工资，让自己不受他们的压迫。亨利·凯泽没有任何造船业的经验，却挤进这种囿于传统的行业里。他带来一种极端的想法，就是船完全可以通过装配线生产，工人们可以不经培训，毫无技能，也可以来自任何阶层，任何偏远地区。船体的预制构件会运到造船厂，每个船体上都标有很多数字编号，表明需要用铆钉固定的部位。凯泽不想和工会作对，他的造船厂薪水也不低，但是那些老造船工对工会的突然扩张怀有不满，毕竟最

初工会只是为有特权的人而设置的保护屏。战时的造船厂几乎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作坊，当然工会依然存在。这个古老的行业的管理者变成了不受欢迎的外来者——妇女、少数种族以及没文化的农民。更加让人难以容忍的是，有些闯入者竟然受到提拔，担任要职，这要放在战前，他们得花十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可能爬上去。

山姆大叔努力劝服人数不断增加而又浮躁不安的工人们，说他们是“生产线上的战士”，从事的是崇高的爱国事业。这番说教产生的结果很复杂。凯瑟琳·阿奇博尔德断言，她的工人朋友们没有一个是出于爱国热情而做这份工作的。许多青壮年坦言，在造船厂工作比上战场安全，挣得还多，他们都打算将自己“重要的战时工人”的身份延期，以躲过政府征兵。谁要是告诉别人想去前线服役，那他“准会被嘲笑是个疯子，因为带不好的头而被嫌弃”。^[6] 20世纪30年代便参与过工人反抗运动的工会左派分子，坚持认为战争是个幌子，目的是让政客们大捞一笔，以填满那些后台资本家的小金库。阿奇博尔德写道，一种“懒散的氛围”“像浓浓的蒸汽一样充斥着造船厂，每一个角落都见证着对时间的极大浪费”。^[7] 游手好闲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是组织好的。有人把报纸偷偷带进来，大家相互传看。在船上以及机器车间里，有些偏僻难寻的角落。这里总有些人在打扑克、掷骰子或嚼舌根，男女都有。有人在门口放哨，还有约定好的暗号，一旦主管来了就发出警示提醒。装病开小差的认为管理部门才不会在乎工人们是否努力干活，因为无论船厂能造出多少艘船，他们都能稳稳地赚钱。

马雷岛虽然名字叫岛，但其实是被一块泥泞不堪、充满香蒲味的沼泽从大陆上隔开的河口半岛。它位于纳帕河河口附近，对面是阳光普照的瓦列霍镇，在旧金山东北方约25英里处。自1854年以来，这里一直是马雷岛海军造船厂所在地，这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海军设施，在众多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有几座红砖建筑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它也是密西西比河以西最大的综合工业厂房，

造船和修理设备的总投入资本约为1亿美元。到1942年底，厂里雇用了超过4.5万名工人，大批移民涌入瓦列霍，艰难地寻找栖身之地，令这座小镇不堪重负。由于没有足够的住房来为暴增的劳动力提供住所，一支由300辆租来的灰狗巴士组成的车队每周7天都会接送工人，在方圆75英里的范围内往返。

马雷岛的河滨坐落着一排拥挤的建筑，分别是机器车间、管道车间、仓库、装配工的阁楼、弹药库、行政大楼、下水滑道、突堤码头和干船坞。在探照灯的照明下，拥挤不堪的车间里，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发动机车床、刨床和轴承边忙碌。有专门的团队为几十艘在造船厂建造或检修的潜艇校准潜望镜。一个油漆厂每个月都要调大约20万加仑的油漆。十几个大型自助餐厅时刻都在供应食物，一长串的小吃车在厂子里穿梭，工人们站着就能狼吞虎咽地吃完。战争期间，马雷岛建造了100多艘新船，修理或检修了1 000多艘，太平洋战争中部署的登陆艇也有一半左右是这里制造的。它是美国两个主要的潜艇建造和修理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东海岸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

194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一艘崭新的小鲨鱼级潜艇在造船厂成型，长长的钢制船体被夹在高耸的钢架之间，周身漆黑，只在上层建筑上有一个朴素的白色数字——“238”。它的名字只有那些守口如瓶的神秘军官和潜艇部队的人知道。就像同级别的其他潜艇一样，SS-238也是以鱼的名字命名的——“刺鲅号”。1942年2月14日，在以马雷岛的标准来看算是低调的小型仪式中，它船尾朝前，正式下水了。

所有的潜艇兵都是志愿兵。潜艇部队不想要那些并非热切渴望佩戴双海豚标志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想要离开潜艇的军官或海员都会获得批准，立即转回水面舰队。许多“刺鲅号”的士兵都直接来自潜艇学校，也有一些人是在其他学校学习过特殊技能。潜艇上的几名士官在制造厂里受过训练，从滚珠轴承开始学习整个系统的运作。艇长“粉红”马文·G.肯尼迪身材高挑，一头红发，有着红润的爱尔兰肤色（这就是他的绰号“粉红”的由来）。他是一个强硬的监工，有点书呆子气，却

是一个高效的管理者。副艇长是理查德·H.奥凯恩，在一些船员眼中，这个人有点容易紧张，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却极为受人敬重，因为他早在1942年年初就参加过战时巡航，这种经历是十分罕见的。奥凯恩曾作为一名低级军官随“阿尔戈号”执行沿中途岛布雷的任务，在12月7日的晚上跟踪过两艘日本驱逐舰。

潜艇均独立于舰队，远离适合停靠的港口，必须自给自足。理所应当，军官和船员们必须对潜艇的每个角落都了然于心。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需要抢修，即便潜艇上缺少相应的零部件，没有称手的工具，也要尽力修好。每一个潜艇兵都得经历一番严酷的考验——首先是笔试，然后是口试，从船头到船尾——证明他知道每个阀门和电气面板的功能。考试失败者或被送回舰队，或被派到岸上的救援队工作。另一艘潜艇上的一名进行资格评审的军官告诉手下：“了解这个老姑娘的里里外外，了解使她正常运转的方方面面，这样你才可以悉心呵护她。她能正常运转，我们才能活命；而能不能让她正常运转，取决于我们所有人。”^[8]

由于没有比直接组装舰艇更好的方法来了解它的整个系统，因此海军指派了军官和船员来监督后期的建造和调试工作。“刺鲅号”的船员们从一个破败的木制建筑上做监督工作，就在潜艇的泊位对面。其中一名军官回忆时，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混合着柴油味和疲倦水手的体味”。^[9]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私人定制”，以满足艇长、下属军官以及资深士官（所谓的“船上的老大”）的强烈喜好。这样一来，尽管在外观上与同级别的潜艇几乎没有区别，但每一艘潜艇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怪癖。

船坞的工人和船员为了能按时完成“刺鲅号”的建造工作，身心俱疲，处在崩溃的边缘。潜艇上的18枚鱼雷（每枚重量相当于一辆四门轿车）用滑轮装置推到舱口，这种滑轮装置非常古老陈旧，要是放在18世纪的战舰上，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了。没有上过潜艇学校的水手需要进行深水逃生演习。他们从水塔底部进入高压室，然后在一个可

怕的逃生设备的帮助下升到顶部，这个装置其实就是一个装满二氧化碳吸收剂的安全气囊，叫作莫姆森肺。有时从水里钻出来后，有人耳朵里会淌血。

6月15日，肯尼迪少校下达指令，主桅上升起三角旗，“刺鲅号”正式下水，编入太平洋舰队。7月16日黎明时分，潜艇鸣笛，倒退着进入了纳帕河。它由两个引擎驱动，以14节的速度航行，沿着航标进入萨克拉门托河，在圣巴勃罗湾疏浚出来的狭长航道里航行。在水面航行的时候，这艘美军小鲨鱼级潜艇船身漆黑，不易被发现，悄无声息但威力无穷。东兄弟岛车站和圣巴勃罗湾西面的一个古老的木制灯塔，是旧金山湾入口的标志。旧金山的摩天大楼隐隐出现在正前方，“刺鲅号”转入主航道，调整航向，朝长长的红色大桥驶去。它在那里将做最后一次小心的导航，来避开反潜网。然后“刺鲅号”会进入公海，投入战斗。

潜艇的实际作战方式，与船员们训练时的作战方式不一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战理论受到英德日德兰海战（1916年）相关研究的影响，认为潜艇附属于海军主力舰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它会在舰队前方大约100英里的地方，用潜望镜观察敌人，通过无线电发送敌情报告。进攻不是潜艇的首要任务，但有机会时也可发动进攻。鱼雷攻击或许可以骚扰敌军舰队的外围，但致命的打击还是得靠大炮。因此，小鲨鱼级潜艇被错误地称为“舰队小艇”，而且之前和之后的潜艇也被如此看待。二战时的潜艇比足球场还长，实际上是大船，而不是小艇，很少与舰队协同作战。然而海军的传统很难打破，所以潜艇一直是唯一一种被称作“小艇”的舰艇。

从潜艇的角度来看，在己方舰队附近作业是十分危险的。在整场战争中，尤其是在其早期阶段，美国潜艇曾多次被己方舰队和飞机无情地炮击、扫射、俯冲轰炸，还曾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1941年12月7日和8日，坦博尔级潜艇“长尾鲨号”（SS-200）试图进入珍珠港，遭到美国舰队两次深水炸弹的攻击，几乎被彻底摧毁。潜艇遭遇大型特混舰队时，

情形会万分紧张。任何错误或延迟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所有的潜艇都会及时提供正确的识别讯号，但美军飞行员和驱逐舰往往会忽视或误解讯号。此种情形下，是重复发送被误解的讯号，还是下令紧急下潜？许多艇长不得不迅速做出生死攸关的选择。1944年10月，在菲律宾群岛沿岸，“飞鱼号”潜艇被“科格斯韦尔号”驱逐舰攻击，即便已经发出了正确的识别讯号也未能幸免。艇长不得不下令紧急下潜，躲入深海。同时，“科格斯韦尔号”驱逐舰发射了几颗深水炸弹。当“飞鱼号”设法通过声呐发射讯号给“科格斯韦尔号”时，后者发来讯号问：“对不起，没伤着你们吧？”“飞鱼号”：“没受伤。”“科格斯韦尔号”：“那上来吧。”“飞鱼号”：“去你妈的。我们还是等你们走了再上去吧。”^[10]

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曾公开谴责动用潜艇对付商船的行为。正是德国在大西洋无限制的潜艇袭击，导致美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美国是缔约国）禁止对商船滥用潜艇作战。

（第22条要求潜艇遵循老式的“战利品原则”，可以拦截并搜查非武装的商船，但必须在船只沉没之前，将全体船员撤离到安全地带。）美国人认为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犯战争罪，甚至海军军官也有这种想法。如果大家都遵守詹姆斯·麦迪逊要求乔治三世的皇家海军遵守的原则，那20世纪的海战就不会发生了。《伦敦海军条约》既不切实际又毫无限制作用。在珍珠港突袭后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就无视一切条款，命令全体舰队“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空战和潜艇战”。

从战争一开始，潜艇就是经过漫长而孤独的航行进入日本的内海航线最能发挥作用。“我相信，敌人的运输线是其维持整个作战行动的诸多环节中最脆弱的部分，”金将军在1942年2月22日对尼米兹写道，“我认为任何一艘可以用的潜艇……都应派遣到太平洋西岸，去攻击敌人的交通线。”^[11]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等原材料，日本就无法维持战时经济；没有可靠的航运线路，日本也无法供应它的海外部队。美国潜艇设计的初衷，是侦察并攻击敌人的舰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它们的作战任务改变了，反而取得了出奇理想的效果。它们自给自足，自力

更生，在海面上速度很快，在海上可停留六至十个星期。货船、油轮和运兵舰比军舰航行速度慢，更容易受到鱼雷攻击。战后的统计发现，美国潜艇给日本海军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几乎相当于美国航母空中力量对日本海军造成的重创。它们为盟军的胜利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是消灭了日本的“丸”。^[12]到1945年8月，潜艇部队击沉的舰船吨位比日本在战争初期所拥有的舰船总吨位还多。

战前的作战条例和训练都提倡谨慎行事。战前的培训告诉潜艇军官，在白天升高潜望镜观察会招来攻击，是极其危险的。最好只把潜望镜调到海浪高度，快速一瞥，然后迅速收回。在战争初期，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如果白天是在日本航空基地500英里以内，上级会命令它们潜在水下。这道禁令大大降低了它们的有效巡航半径。小托马斯·威瑟斯将军是战争初期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一直是水下声呐测距的支持者，这一方法是指潜艇只靠声音定位来确定鱼雷攻击的方向。艇长得到的指示是优先保护潜艇，击中目标是次要的。当时认为，日本的驱逐舰如果在海面上搜寻，很有可能会用声呐探测到深潜的潜艇，军官们接到指令，要利用海水的温度梯度^[13]作为缓冲。战争时期的经验很快就证明，敌人的反制措施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致命，因此美军需要一种更加主动的进攻态度。

1942年对潜艇部队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驻扎于马尼拉湾甲米地海军基地的亚洲潜艇舰队未能击退，也未能严重干扰日本对菲律宾的入侵。战役失败后所做的分析暴露出许多问题。托马斯·C.哈特将军的S型潜艇又过时又破旧，无法为战时巡航做好准备；船员的训练不切实际；他们一直严格强调声呐法及基于声呐法的攻击，并且过分担心敌人的空中攻击。亚洲舰队的潜艇兵在长距离巡逻方面没有什么经验。甲米地基地也很容易受到空袭。在战争的第三天，日本在一次轰炸中就毁坏了该基地的233枚鱼雷。没有任何潜艇部署在林加延湾危险的浅水水域，这里是日本主要的两栖登陆地点。残余舰队撤退到弗里曼特尔，成为西澳大利亚司令部的核心战力。在这里，超负荷工作且航程较短的S型潜艇

在不利的条件下挣扎。它们长期供应不足，距离东印度群岛和南海的巡逻区域太远，不能有效完成任务。

和平时期经培训提拔上来的第一批艇长一般无法胜任其任务。因为和平时期要想获得提拔，谨慎和对组织政治的认同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此外，对潜艇军官的职业前景至关重要的和平时期的演练，也是惩戒冒险战术的。战争逐渐暴露出“艇长问题”。必须找出那些过分谨慎的艇长，解除他们的职务，以便更年轻、更大胆的人能够接替他们行使指挥权。这一过程历时一年半。

在高级职位上，同样需要不断挑选最合适的人。1942年3月，尼米兹解除了威瑟斯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职务，并将这份工作交给了海军少将罗伯特·亨利·英格利希，他曾是一名潜艇兵，不久前担任轻型巡洋舰“海伦娜号”的舰长。（他还担任过原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曾在华盛顿的海军部“潜艇组”任职。）英格利希要求艇长们采取进攻战术，而且他一旦认定某个人作战时胆小懦弱，便不会给那人好脸色，即使那人只是运气不好，或是遇到了设备故障。

在太平洋战争的前半段，潜艇部队的作战效能因鱼雷质量不佳而严重受限。这些鱼雷要么定深过大，从目标的龙骨下通过，目标毫发无损，要么电磁雷管没有引爆或过早引爆。鱼雷还经常可怜兮兮地从日本船的船体上弹回来。这些缺陷直到开战很久后才被发现，部分原因是和平时期的经济使得实弹检验未能进行，另一部分原因是当时军械局那些趋炎附势之人冷漠地拒绝了针对研究和改进提出的所有合理要求。最终，人们发现（而且军械局也承认），鱼雷的实际爆炸深度比预定爆炸深度平均深了10英尺。而保密的马克六代电磁引爆装置的问题花了更长时间才得到解决。这个爆炸装置的作用原理是，先检测到上方存在船体，然后定时在龙骨的正下方爆炸，爆炸力量向正上方走。越来越多的潜艇军官确信这种电磁引爆装置不可靠，他们开始游说指挥官，希望得到许可，拆除这个装置，并给鱼雷设置更浅的爆炸深度。威瑟斯将军拒绝了这些提议，部分原因是拆除该装置后再实施鱼雷进攻需要进行“三

鱼雷扇面攻击”，而在1942年的时候，珍珠港的鱼雷供应极为不足。在许多情况下，艇长们会自行停用这种装置，然后捏造巡逻报告，掩盖他们的行为。但这样做反而使问题无法及时得到适当的反馈。而且，依赖于接触爆炸的旧式鱼雷也有缺陷，因为设计拙劣的撞针经常在撞击后变形，无法引爆弹头。

艇长过于谨慎，鱼雷糟糕透顶，这容易让人忽略一种有利的事实：潜艇部队从军官到普通士兵，往往人才济济。副艇长和三副大多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们恰好在1943年到1945年间成长为艇长。“船上的老大”（士官中级别最高的人）通常是船上最年长的人，可能已经在潜艇上服役了二十多年。在潜艇部队服役的人数量很少，但他们非常自豪。这是一个自觉的精英团体，非常珍视潜艇上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为了彼此的生存和成功，艇员们互相依赖；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兴趣，而且幽默十足，互敬互爱。一个拥挤而阴暗的小隔间里住着七八十个人，那些令人压抑的等级差别在这些人心目中逐渐淡化了。没有人敬礼，也没有人仗着高军衔摆架子。军官和士兵们以名字互称。“说到纪律，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曾在一艘柴油动力潜艇上工作十多年的艾伦·波尔希默斯说，“一切都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比如说用‘你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会狠狠地踢你屁股’这种话来说服别人。潜艇乘员之所以如此有凝聚力，原因之一是每天频繁地接触。在潜艇上一个人每天至少会和所有人接触一次。”^[14]没有人办事拖拉，没有人装病开小差，因为潜艇上没有地方藏匿，而且任何人的失误都会危及船上所有人的生命。私人恩怨、小小的特权、部门间的不满、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矛盾、预备役人员与海军学院毕业生之间的相互反感——这些海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病态现象，在生活于海底的“长钢管”里的潜水兵身上完全看不到。

1942年7月，为了支持即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展的“瞭望塔”行动，尼米兹派遣了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前往特鲁克群岛的日本舰队基

地。这些潜艇要巡逻并监视敌方的航线，及时发现敌人在海上的动向，并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将敌方船只击沉。7月到9月间，英格利希将军派了11艘潜艇前往特鲁克群岛，其中就有“刺鲅号”，这是它的第一次战时巡航。

“刺鲅号”于8月23日离开珍珠港。白天，它在水中潜行，偶尔用潜望镜观察一下；夜晚，它在水面上行驶，给电池充电，并通过天体观测来确认方位。两个星期过去了，“刺鲅号”发现了一艘敌舰，这是一艘小型的兵库丸级油轮。肯尼迪跟踪目标，在1 430码外发射了三枚鱼雷，但所有鱼雷都没命中。艇长下令潜到目标下方去。肯尼迪觉得敌方的空中巡逻对“刺鲅号”造成了威胁，于是没有发动第二次袭击。其他军官对这一决定不太乐意。三副乔治·W.格赖德上尉回忆说：“潜到第一个目标下面溜走让官兵非常泄气。”[\[15\]](#)

两个多星期之后，“刺鲅号”才再次尝试攻击，这次目标是一艘6 500吨的货船。在水下谨慎地逼近之后，“刺鲅号”发射了四枚鱼雷，似乎只有一枚击中目标。肯尼迪观察到那艘船向左倾斜并且船尾开始下沉。

（战后资料显示，当时该地没有任何船只下沉的记录。）随后“刺鲅号”和一艘护航的驱逐舰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躲进一场狂风暴雨中才得以脱身。

9月30日，“刺鲅号”与敌军的水上飞机供应舰“千代田号”狭路相逢，却错失击沉敌舰的时机，这也是它第一次航行中最遗憾的事情。“千代田号”是个有价值的目标，当时潜望镜发现它在1.2万码以外，而且似乎没有护航舰艇。肯尼迪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方式，拒绝全速前进，因为担心会耗尽电池。“千代田号”以“之”字形曲折运动，很快就跑出了射程范围。错过这次机会更多是由于运气不好，而不是疏忽大意，但它彻底耗尽了艇员的士气。格赖德写道，这一事件让士兵们“闷闷不乐，灰心丧气。这件事沉重打击了我们的自信，在整体上削弱了我们对这艘潜艇的信心和我们的进取精神”。[\[16\]](#)

10月5日，肯尼迪发现了一个更加有价值的目标——一艘轻型航

母。它有两艘驱逐舰护航。肯尼迪选择了另一种保守的做法，将“刺鲀号”的速度控制在全速的三分之一，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目标溜走了。

肯尼迪承认是自己的失误导致这一次未能做出完美的攻击。他在报告中写道，他的做法“缺乏攻击性和技巧。……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目标在早上8点毫发无损地迅速离开”。^[17]英格利希将军非常赞同肯尼迪的自我批评，并在签批时强调了这一点。

这次巡航遇到了几次机械事故，有些事故极其严重。SJ对海雷达轴部错位，不能正常转动。两名士兵不得不用力转动手轮，第三名士兵用滑脂枪分别润滑两个轴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艇首浮力舱的排气口卡住了，使得“刺鲀号”在一次下潜时停止不动。一次常规测试搞砸了，一枚鱼雷半卡在艇首鱼雷管的管口上，黄铜弹头突出艇身。这枚鱼雷既无法从管中取出，也无法拉回来。它会自己打开保险吗？不大可能，但万一打开了保险，它就可能会引爆，把整个潜艇轰到天国去。

除了听天由命，潜艇上的士兵什么也做不了，于是他们都搞起了黑色幽默。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后，有人说：“嗯，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那枚鱼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18]

10月15日和16日，在返回珍珠港的时候，“刺鲀号”发现了3架PBY水上飞机，并于10月17日星期六在正前方遇到了它们的护航舰艇。潜艇准备好浮上水面，顺着航道悄悄驶进珍珠港，一部分艇员也来到甲板上。潜艇兵从10—10码头附近把船驶进了东湖，接近潜艇基地。官兵代表团聚集在码头欢迎潜艇回归，还伴有海军乐队的演奏。肯尼迪已经提前用无线电申请预约了一个左舷泊位，然而空出的是一个右舷泊位，不知他们是没有抄下来，还是忽略了。潜艇在航道里等着，柴油引擎隆隆作响，一个信号员通过闪光信号灯再次发送了信息。“有一枚可能已经装上引信的鱼雷在潜艇右舷突出。仍然建议停入左舷泊位。”^[19]代表团和乐队赶紧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同时按潜艇的要求空出了左舷泊位。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分析家曾经假定，潜艇上条件恶劣，生活

艰苦，美国人文化上不适合潜艇战。他们喜欢奢华的生活，好吃懒做，喜欢睡柔软的床，无法承受长期作战的压力，完全经受不住潜艇上的精神折磨和生理煎熬。话是这么说的，日本人似乎也信以为真了。这种对美国人高度简化的漫画般夸张的描述，很好地解释了日本海军为何对反潜战漠不关心。确实，美国人强调了他们新型柴油潜艇的舒适性和宜居性。长期服役的老兵认为，与此前的潜艇相比，小鲨鱼级潜艇奢华至极，有空调，照明良好，配有洗衣机，能用淡水淋浴。精心布置的厨房里有海军中最好和最新鲜的食物，还有冰激凌和烤面包。几乎所有的艇员都有一个单独的铺位。军官室里，靠着舱壁有一排包着皮质软垫的长凳。潜艇上还有电唱机和电影放映机，供官兵们娱乐。时间将证明这些为艇员提供安逸环境的设计，无论大小，都是明智的，因为无论航行多么艰苦，艇员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即便有的航期长达两个半月。

进入港口后，潜艇上的全体乘员都会立即重获自由，备勤组员会接管这艘潜艇。怀基基海滩的“女王”，也就是豪华的夏威夷皇家酒店，已经被海军预订下来，专门供潜艇乘员“休养和恢复”。整整两周，这里的一切都在帮助潜艇乘员忘记最近的巡航，忘记潜艇，甚至忘记战争。他们什么都不做，彻底沉浸在放松之中。每条潜艇上的人都有一个指定的专用“茶点室”，每个军官和士兵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个房间里有一个装满了冰的浴缸，里面啤酒、香槟和软饮料应有尽有。“开创这个传统的人实在是太明智了，”格赖德说，“我花了大约两周时间就彻底疏解了压力。”^[20]回到潜艇上，准备下一次出海巡航时，他们发现潜艇已经被擦洗干净，重新喷漆，并且物资齐全，连床垫套都换了。一名艇员说，里面就像女佣刚刚打扫过的旅馆房间一样。所有的“家务”都已经做完了，“就差摆上浴巾了”。^[21]

使奥凯恩感到意外的是，尽管肯尼迪少校在第一次巡航中的表现让人不敢恭维，这次仍然由他来指挥“刺鲅号”。肯尼迪的巡航报告全是自我检讨，而英格利希将军则直言不讳地认可了这些批评。但他后来又缓和了语气，说肯尼迪似乎从他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将击沉一艘6

441吨货船的成果归功于“刺鲅号”（战后分析报告否定了击沉该货船的说法）。尽管“刺鲅号”第一次巡航的失败令人无比懊丧，但在所有被派往特鲁克群岛的潜艇中，这算是再正常不过的战绩了。

奥凯恩通过特殊渠道不动声色地调来一个候选指挥官，参加“刺鲅号”的第二次出航。这名候选指挥官也是一个高级军官，通常和艇长一个级别，原本他是要去指挥另一艘潜艇的。他将以旁观者的身份登船，没有任何职责，只是在自己履任指挥官之前熟悉潜艇，积累经验。海军将这种略显笨拙的安排称为“岗前培训”。

这名新人是达德利·W.莫顿少校，他在海军学院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叨叨嘴”这个绰号，后来被简称为“叨叨”。他肩膀宽阔，双手宽大，握手有力。他也很合群，总是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常常放声大笑。“他像熊一样强壮，”格赖德说，“像熊崽一样活泼好动。”^[22]

莫顿出生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刚来海军学院时带着浓重的肯塔基口音。在安纳波利斯过了四年后，他的口音已经不太明显了，但一张嘴别人还是能听出他是南方人。有些人说，莫顿被冠上“叨叨嘴”这个绰号，主要就是因为他那浓重的乡音；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绰号来自一个流行漫画里的同名人物，据说和莫顿很像。不管怎么说，反正莫顿喜欢他的绰号，并让他的船友、军官和士兵们都这样叫他。他在海军学院玩过橄榄球，并且喜欢摔跤。即使在巡航的时候，他也喜欢狂欢作乐，玩儿一些粗鲁的恶作剧。“刺鲅号”的艇员很快就发现，这个候选指挥官会夹住战友的脖子，一下把他们撂倒在甲板上。他从来不会装出一副高级军官的冷漠样儿，无论艇员级别高低，他都会毫无预警地来个粗暴的恶作剧。潜艇上的文书军士福雷斯特·斯特林正准备在工作间里忙活起来，这时“一道快如闪电的力量落在我的背上，把我打趴在打字机上”。他转过身来，握紧拳头准备反击时，第一次和莫顿正脸相对，莫顿站在过道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这个少校指着他的徽章，咧嘴笑着说：“来啊，来打我！”^[23]

1942年11月8日，“刺鲅号”开始了第二次巡航。隆隆作响的柴油机

喷出蓝色的废气，缆绳被解开，扔回到甲板上，潜艇小心翼翼地泊位后退。刺耳的哨声响起。主桅上升起军旗。在一艘护卫舰的陪伴下，它沿着航道出发，喷着股股蒸汽向远海驶去。“刺鲅号”利落地潜到水下，收到了一个“预防深水炸弹训练”的指令，发射了甲板火炮，然后把它们收回炮舱。^[24]黑暗中，护卫舰和这艘潜艇分离了。“刺鲅号”将航向定为230度。它要航行3 000英里才能到达自己的巡航区域，也就是布干维尔北部的所罗门群岛中心地带。它的任务是寻找并摧毁向南驶往铁底湾的日本舰船，那里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为守卫瓜达尔卡纳尔岛而拼死战斗。穿过北纬7°50′之后，这艘潜艇进入了哈尔西将军负责的南太平洋战区。

第二次巡航过程中，将士们的士气明显提高了一些。肯尼迪已经同意关上让人感觉像是身处炼狱的红色室内灯，上一次巡航时这种灯光让艇员感到情绪压抑。这次没有重大的机械问题困扰机械师。有些士兵开始编辑出版“船报”——《刺鲅日报》。他们一本正经地把从东京广播电台收集的新闻简要复述，其中穿插充满讽刺意味的打油诗，甚至还有连载的漫画。军官的留声机有时会放很大的音量，爵士乐队演奏的旋律响彻全艇。

莫顿总是情绪很好，又喜欢瞎胡闹，他在船上让大家都很开心。他还不太喜欢穿制服，经常穿着一件红色的浴衣在潜艇上走来走去。因为没有特别的职责在身，所以他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军官们一起在军官室里玩闹。他也很乐意与下级军官和士兵聊天。奥凯恩写道：“对他最贴切的形容是一个肯塔基大男孩，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大人不该笑。”^[25]经常有人发现莫顿在轮机舱里一边和战友们聊天，一边在水桶里搓洗衣服。他让福雷斯特·斯特林不要称呼他为“长官”，这样做可是公然违背海军规章和传统的。^[26]莫顿轻松自在，不拘礼节，和士兵们亲密无间，即便在潜艇上，这也是不常见的，他可以称得上是所有海军舰艇中最民主的领导了。他这样做可能有一个潜在的目的：莫顿正在悄悄收集船上的信息和内部人员的想法。因为不久后在布里斯

班，他会力主解除肯尼迪的指挥权。

在讨论战术的漫长过程中，奥凯恩和莫顿发现他们的想法非常一致：只有采取更具进攻性和更果敢的战术，小鲨鱼级潜艇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力。艇长可以为了击沉敌舰而冒更大风险，而且应该这样做。肯尼迪迟迟不愿放弃战前的理论和想法，将潜艇的作用限制在“保持潜势，伺机而动”上。虽然习俗和礼仪要求军官们不得抨击艇长，但他们背地里对艇长有些许怨言也是可以理解的。潜艇可以在水面上停留更长时间，可以用潜望镜做出更高、更频繁的观察，可以于夜间在水面上快速行驶，也可以在白天以最快潜航速度在即将到来的敌舰的航道上占据攻击位置。^[27]军官们欣赏积极求战的态度，不过格赖德有点拿不准莫顿是不是过于冒险了。“富有侵略性是一回事，鲁莽是另一回事……”他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计算风险时脑子里都在想，我们活着对海军的价值比死了要大……但是当‘叨叨’就战术发表意见时，他认为唯一的风险就是没有击沉敌舰。”^[28]

1942年11月下旬至12月，当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处于高潮的时候，“刺鲅号”在布干维尔岛外被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困住了。瞭望员在舰桥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闪电偶尔会照亮整个海面。“刺鲅号”发现了几个目标，但每次都未能占据合适的攻击位置。

12月10日，“刺鲅号”向有一艘驱逐舰护航的三艘货船发射了三枚鱼雷。一艘货船被击中并迅速沉没。艇员们欢呼雀跃，奥凯恩立刻让他们安静了下来：“注意躲避深水炸弹！注意躲避深水炸弹！”^[29]驱逐舰向下潜中的潜艇施放了一片深水炸弹。潜艇上有的灯泡爆炸了，舱室里一片漆黑，艇员们被抛向舱壁，软木屑从头顶上如雨般落下。但整艘潜艇受到的伤害微乎其微，也没有出现裂缝。

这艘货船是“刺鲅号”击沉的第一艘敌船，但这次战斗似乎使肯尼迪精疲力竭，每用潜望镜观察一次，他的神经都愈加紧张。

几天后，“刺鲅号”收到了一个带有“绝密”标志的消息，这意味着其

中包含了关于敌人航运信息的情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一艘油轮正从特鲁克群岛驶往肖特兰群岛，预计将于12月8日抵达。油轮本来就是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目标之一，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至关重要的最后几周里，油轮的重要性更是突出。当时击沉一艘油轮可能会对日本的航运活动造成致命的影响。^[30]

肯尼迪指挥“刺鲅号”进入了目标的预期航道，并以全部三种方式进行了搜索——声呐、雷达，以及瞭望员在舰桥上通过高倍数双筒望远镜在黑暗中进行的观察。被动式声呐搜索到了“微弱的回声，来自北部广阔的区域”。SJ雷达显示，62度方向的1.8万码外发现了目标。这艘油轮正向布干维尔海峡驶去，而“刺鲅号”正好处在拦截的最佳位置。但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失误，这个绝佳机会又一次错过了。声呐兵大声喊道：“回声在我们的右舷！”他读错了方位。莫顿喊道：“反向！”但为时已晚——肯尼迪已经下令：“灌水，下潜。”^[31]从水下几百英尺处，船员们听着油轮的螺旋桨从头顶经过。目标继续前行，驶出了攻击范围。

在又一次错失良机之后，“刺鲅号”终于迎来一个极其珍贵的“猎物”。12月14日中午过后不久，斯特林正在操作声呐装置。他发现有螺旋桨的噪声。用潜望镜迅速观察后发现，3 000码外有一艘巨大的敌军潜艇正在向他们驶来。“刺鲅号”恰好有足够的时间转向，从尾管发射出三枚鱼雷。他们离敌人的航道只有800码远。距离预计的爆炸时间还有十秒时，肯尼迪升起了潜望镜。正当他描述看到的東西时，整个潜艇里都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第一枚鱼雷似乎击中了敌人指挥塔的前方，喷出了一股水和碎片。肯尼迪证实他看到指挥塔上涂着“I-2”的编号，当潜艇下沉时，舰桥上的艇员纷纷跳入大海。尽管没有发现其他敌人，“刺鲅号”仍急速下潜。“刺鲅号”的好几名艇员相信，潜艇下潜到极限深度时，他们听到了敌人潜艇的舱室被压碎瓦解的声音。他们自己也是潜艇兵，所以听到这些声音时，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但是，战后没有发现日本潜艇在这个地点和日期沉没的任何证据。“I-2”是一年半之后在俾斯麦海被击沉的。鱼雷可能过早地爆炸了，

而肯尼迪对他在潜望镜内所看到的一切的解释可能有误。至于艇员们听到的声音，可能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了。

在巡航的最后一周，又有两次错失良机。两天后，艇员通过潜望镜发现一艘大型船只，在1万码的雷达范围内。目标舷角[32]很大，但奥凯恩坚定地认为，如果在水面上快速行驶4个小时，“刺鲀号”有可能追上目标。船长拒绝这样做，反驳道：“别傻了，从这里不可能攻击到它！”[33]这样的回答使得奥凯恩气愤而又无语。这次对话恰好被几名艇员听到了。

12月21日，在“刺鲀号”驶出巡航区，前往布里斯班的路上，舰桥上有人发现远处地平线上有烟雾。奥凯恩想要追击它，但肯尼迪拒绝了，理由是这艘船正在进入另一艘潜艇的巡航区域。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艇首右舷方向飘来一股植物的气息，表明接近澳大利亚了。哨兵看到了莫顿莱特角，它在悬崖上高高耸立，50英里外的海面上就可以看到。经过一片控制雷区和反潜网后，“刺鲀号”停靠在莫顿湾，一名当地领航员登上潜艇。那人令人难忘的装束吸引了所有的船员——他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戴着圆顶礼帽，胳膊下夹着一把折叠雨伞。在这位烟瘾极大的领航员的指引下，“刺鲀号”沿着充满淤泥、蜿蜒曲折的棕色布里斯班河行进。田园般的昆士兰州景色展现在河两岸，采捕牡蛎的渔夫和游泳者朝着驶过的潜艇挥手致意。

这座城市的郊区渐渐映入眼帘，相互紧邻的红砖屋顶的小房子优雅雅致。向左转过最后一个弯后，前方出现一座钢桥，右岸坐落着布里斯班市中心的办公楼。“刺鲀号”缓缓驶进新农场码头的泊位，紧邻“斯佩里号”潜艇供应船。舷梯搭起，备勤组的军官和水手都上了船。来访者中有小詹姆斯·法伊夫将军，他是第42特混舰队的新任指挥官。

新农场码头正在迅速扩张，很快就会像珍珠港一样，成为太平洋上最大的潜艇基地。第8中队和第10中队分别由“富尔顿号”和“斯佩里

号”潜艇供应船提供检修服务，这两艘船都是9 734吨的排水量，都配备了起重机、机械库和足够的备件，设备齐全，可以为一个大型潜艇中队提供维修。该基地已经接管了布里斯班装卸公司的海滨设施，那里的羊毛棚曾经堆满澳大利亚最好的出口商品，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仓库。一个兵营和一个新的总部大楼正在建设中。

这座城市的紧张局势在一个月前的“布里斯班战役”时达到顶峰，当地的美军指挥官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休息和消遣的场所。黄金海岸那些沿海的小社区里有不少适合这一目的的地方。然而，就目前而言，潜艇乘员仍然驻扎在市里及附近。布里斯班的房屋和公寓租给了来到此地的军官，士兵则大多住在市中心的堪培拉酒店。大部分艇员在停泊后两小时内就下船了。他们要去享受额外的福利和自由——吃冰激凌，领取信件，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

除肯尼迪之外的大多数军官挤进了一个舒适的海滨小屋，离城约15英里。那里没有食堂服务员，所以他们得自己做饭，他们也很乐意这样做。第二天晚上，他们惬意地“忍受”了奥凯恩的“金枪鱼之欢”。下了船，肯尼迪不在，有关最近巡航的谈话变得轻松起来，军官们各抒己见。大家都相信“刺鲅号”击沉了两艘船，其中还包括一艘敌方潜艇，因此，此次归来，“刺鲅号”成为几个月来回到布里斯班的战绩最好的潜艇。肯尼迪将会被授予一枚银星勋章。但是，良好的结果和喝彩往往掩盖了巡航中的诸多失望——故障不断、错过的机会和失败的攻击等等。格赖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刺鲅号’.....并没有创造什么纪录，这一点我们都清楚。我们.....像那些不幸的渔民一样，在错误的时间等在了错误的地点。.....我们还是感到非常沮丧。”[\[34\]](#)

第二天，莫顿和奥凯恩在乡间小路上走了很远，进行了一场关于潜艇战术的长谈。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必须让肯尼迪走。奥凯恩在回忆录中谨慎地回避了这个话题，但他很可能直接地或通过其他官员间接地将自己的批评传达给了法伊夫。莫顿曾发誓要向上级报告肯尼迪懦弱消极，但那是随便说说而已，可能并不是认真的。几名军官和士兵已要求

调离“刺鲅号”。不管法伊夫对肯尼迪的表现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他显然搜集了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决定。在对“刺鲅号”巡航报告的简短评论中，法伊夫指出，这艘潜艇和敌人有八次接触，但只进行了两次攻击，而且“至少”另有三次应该出击。^[35]他解除了肯尼迪的职务，把他派回了美国。

肯尼迪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但后来他也表示，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像许多和平时期的艇长一样，他需要很长时间调整自己，去适应潜艇实战所需的更大胆、更危险的战术。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懦夫——后来由于在莱特湾战役中作为驱逐舰舰长表现出色，他获得了第二枚银星勋章。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叨叨嘴”莫顿接任“刺鲅号”的艇长。出航的前一天，人们聚集在艇上，他简短地说了几句。“我们可以牺牲‘刺鲅号’，”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但我们的任务是击沉敌人的舰船。”这意味着，下一次巡航将更加危险。任何一个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都被要求去文书军士那里申请调离，申请会自动被批准，而且“对于那些愿意留在布里斯班的人，不会有任何人说闲言碎语的”。^[36]斯特林在文书室等候，但没有人来申请。相反，全体官兵都信心十足。艇员们曾按照肯尼迪的指示把日本船的模糊图片贴到舱壁上，现在莫顿要求把它们全都撕下来，换上这位新艇长收藏的美女图片，这是他在好莱坞的摄影棚搞到的。他让斯特林打出了一堆标语，上面写着“射杀狗娘养的”。^[37]这些标语和美女图片贴满了潜艇的整个内舱。莫顿把瞭望员的数量从四个减少到了两个，两人都驻留在舰桥上。为了使值班不那么单调，同时让大家时刻保持警惕，值班人员每小时会在放哨、雷达监测、声呐搜索、掌舵和调度室传令兵的岗位上轮岗。任何发现敌情的瞭望员，只要那艘船随后被击沉，都会迅速得到提拔。莫顿还装模作样地以“清洁潜望镜镜头”为借口，悄悄地索取了额外的药用白兰地和酒精。他相信在偶尔遭受一轮射击后，尤其是遭到深水炸弹攻击之后，有必要搞个仪式，鼓舞一下士气。

莫顿还有一些大胆的创举。指挥攻击时用潜望镜随时观察一直是艇长的职责和特权。莫顿却选择让奥凯恩成为“协同指挥官”，让他负责用潜望镜观察，而莫顿则利用手头所有其他数据来指挥“刺鲅号”进入最佳攻击位置。艇长需要强大的自制力才能忍住不去碰潜望镜。在万分紧张的时刻，他的本能反应是推开副艇长，亲自操作。在实施鱼雷攻击时，最关键的信息是“目标舷角”。在莫顿的作战方案里，奥凯恩被委以重任，负责精确地完成所有重要的观测。

一些艇员一直担心新艇长太鲁莽，担心不明智的攻击会让他们把命搭上。斯特林后来说，艇员们经常互相询问，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不是疯了？你们觉得呢？”^[38]他是个性格古怪的人，即使当上了艇长，仍然穿着红色的浴衣和拖鞋在潜艇内走来走去，用他那黏糊糊的肯塔基口音讲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而他自己讲完笑话，几乎总是会近乎疯狂地大笑一阵。格赖德担心新艇长会觉得从“同事到领导”的转变过程很艰难，而且令人尴尬，但莫顿的情况不是这样，他的权威“与生俱来，从不依赖于突如其来的强硬语气和态度”。^[39]

1月16日，“刺鲅号”开始了第三次巡航。测试过声呐，并用护航的驱逐舰练习发射鱼雷后，“刺鲅号”启动双引擎，朝着新几内亚岛东端全速开进。它接到的命令是前往新几内亚岛北岸，穿过这座岛屿和新不列颠岛中间的勇士号海峡，去侦察鲜为人知的日本海港韦瓦克。

“刺鲅号”不仅在夜间浮上水面，只要艇长有胆量下令，每天黎明后和黄昏前的一个小时，它都在水面上航行，让新几内亚的褐色山丘和青山从左侧经过。莫顿和奥凯恩一致认为，在那些时候，确实有让敌人从空中发现的风险，但是为了每天多行驶40英里，这个风险值得去冒。甚至当舰桥上的瞭望员发现远处有飞机时，莫顿都拒绝下潜。他选择等待，这个决定在不明飞机掉头飞走后被证明是正确的：机组人员显然没有注意到“刺鲅号”。新艇长使用潜望镜的方法也更大胆。肯尼迪在白天只愿意将潜望镜升到海平面以上3英尺进行观察，莫顿却愿意在正午时

分将潜望镜升得很高并长时间观察，甚至有好几次使用了第二个潜望镜。

海军缺乏关于所罗门群岛的像样的航海图，而在“刺鲅号”的数据库中也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定神秘的韦瓦克港的位置。办法是偶然在布里斯班购买的25美分一本的澳大利亚学校地图册里发现的，这是一名艇员购买的纪念品。地图册上的一幅地图标出了之前一直未被标出的韦瓦克港，位于新几内亚北岸的中部。通过将海岸线与现有的航拍照片进行对比，以及将海岸线和岛屿的形状与近海区域进行对比，格赖德和奥凯恩终于确定了该港的位置。但是由于没有关于暗礁和浅滩位置的可靠信息，“刺鲅号”不得不小心前行。莫顿宣布他打算让潜艇开进韦瓦克港的内锚地，而不是仅仅从近海洋面侦察，这让艇员们大吃一惊。此次行动仅仅命令“刺鲅号”“调整速度，如果可能的话，对韦瓦克港附近区域进行日间侦察”。^[40]莫顿选择将“日间侦察”解释为“进港和攻击敌军船只”。

在格赖德看来，艇长已经“从单纯的鲁莽发展到彻底的蛮勇”。^[41]潜入未知的敌港似乎疯到家了，这是无异于集体自杀的冒险策略。但是莫顿满不在乎，嘴里冒出一堆一堆的俏皮话，把指挥塔里的军官们逗得很开心。

破晓时分，“刺鲅号”悄悄行进到韦瓦克港入口周围的岛屿附近。奥凯恩看到了巨大的无线电天线的顶部，可能是敌舰上面的。但由于前方刚好有一艘巡逻艇或拖船经过，潜艇无法进入航道。莫顿探察了另一些外岛的海岸，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直接看到锚地的缺口。但是这片区域礁石密集，“刺鲅号”必须十分小心，避免搁浅。

经过几个小时的谨慎探测，潜艇终于进入主航道，距内港仅9英里。它开始以3节的速度潜行。奥凯恩不顾海水对镜片的不停拍打，进行了几次快速的低位潜望镜观察。下午1时18分，他认出一艘大船的舰桥。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艘货船或水上飞机供应舰，经过更仔细的观察之后，发现它是一艘吹雪级驱逐舰。几艘小型日本潜艇停泊在它旁

边。“刺鲛号”完全有理由掉头逃跑。艇员们不确定珊瑚礁的位置和水深，潮汐也不可预测。但是莫顿宣布，“刺鲛号”将会对锚定的驱逐舰发起鱼雷突袭：“我们的进攻将出其不意。他们想不到这里会有敌人的潜艇。”[\[42\]](#)

“刺鲛号”全体进入战斗岗位，并继续以3节的速度进入港口。前部的鱼雷管口打开，准备发射。预定的射程是3 000码。奥凯恩做了最后一次观察，急切地低声说：“艇长，它在航行，驶出了港口。目标舷角为左舷10度。”[\[43\]](#) 目标舷角为10度意味着驱逐舰几乎朝着“刺鲛号”迎面驶来，只不过“刺鲛号”在下面。莫顿立刻改变了计划：“右满舵。”他会从敌舰下穿过，然后通过机动用尾管发射鱼雷。另一次快速的潜望镜观察显示，那艘驱逐舰正在以“之”字形前行，目标舷角已经变成右舷40度。但是奥凯恩没有时间来准确地估计它的速度。莫顿猜测是15节，把这个数字输入鱼雷数据计算机，计算机提供了一个自动转角。

三枚鱼雷从前部的鱼雷管中发射出去，“刺鲛号”感到了剧烈的震动。所有三枚鱼雷都猛烈、准确、正常地射出，但是当奥凯恩再一次通过潜望镜观察，发现所有的鱼雷都从船尾穿过，未中目标。他们低估了驱逐舰的速度。于是他在鱼雷数据计算机中输入了18节的速度，接着发射了第四枚鱼雷。但日本的瞭望员似乎发现了鱼雷的尾流，也可能看到了潜望镜。敌人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突然转向，避开了第四枚鱼雷。这艘驱逐舰旋转了270度，然后快速逼近鱼雷的扇形痕迹的顶端。

从潜望镜里观察，奥凯恩现在看到的是最可怕景象——高耸的船头在圆形区域内看起来巨大无比，船头激起巨浪，表示它在高速前进。福雷斯特·斯特林“几乎要尿裤子了”。[\[44\]](#) 但是莫顿似乎并不担心。“没关系，”他说，“继续用潜望镜观察，我们用‘深喉战术’，干掉那狗娘养的。”[\[45\]](#)

“深喉战术”是潜艇能够采取的最大胆和最孤注一掷的战术。一直以来，人们对它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从未付诸过实践。奥凯恩后来写

道：“‘深喉战术’当然不是一个可取的战术。这简直是孤注一掷。”^[46]“刺鲅号”当时的情况当然是令人绝望的。它被困在一个没有可靠的航海图的港口，一艘装备精良的驱逐舰很快就会抛下深水炸弹，让它彻底消失。前部的发射管里只剩下两枚鱼雷，而且几乎没有希望通过机动用尾管发射。

奥凯恩看着敌舰开过来，在圆形镜片里显得越来越大。从潜望镜中他可以看到日本水手的脸直视着他。船头激起的巨浪打在船身上，比锚还要高。奥凯恩将潜望镜的倍率调小，他说这样看过去情形“不那么令人不安”。^[47]

“刺鲅号”不能浪费任何一枚鱼雷。如果发射过早，目标就会有时间转身逃跑；如果发射太晚，鱼雷没有爆炸就会从船体上弹回来，敌舰会毫发无损。有效的发射距离在大约1 200码到700码的范围内。敌舰正以大约30节的最高时速冲过来，在大约30秒的时间内就可以到达这个距离。

当距离接近1 250码时，莫顿下令：“迪克，准备开火。”当十字瞄准线对准船头时，奥凯恩说：“开火！”^[48]潜望镜里，奥凯恩注视着向前延伸的鱼雷轨迹。驱逐舰转弯避开了鱼雷。斯特林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异常平静，确信自己即将死去”。^[49]

奥凯恩在750码外发射了最后一枚鱼雷，而莫顿则下令急速下潜。船员们准备接受深水炸弹的攻击，却听到一声巨响——雷鸣般的巨大撕裂声。“爆裂声随后变成噼里啪啦的声音，”奥凯恩回忆道，“潜艇上的每一个老兵都熟悉这种声音——蒸汽碰上一大桶水的声音，只不过再放大一百万倍。驱逐舰的锅炉正在向海里喷射蒸汽。”^[50]潜艇里从头到尾都爆发出欢呼声。

莫顿将潜艇升回潜望深度，下令升起潜望镜。奥凯恩先看了一眼，然后让给了艇长。只见驱逐舰的舰首从烟囱前方不远处被炸开，正在迅速下沉。水手们有的爬上桅杆，有的跳入海中。潜艇上有人用柯达照相

机拍了几张照片。艇长通过扬声器描述着看到的景象：“索具里得有几百个斜眼睛的魔鬼……你们不在岗的人，赶快来指挥塔上看看。”^[51]许多人挤进小小的空间，轮流等在潜望镜前，有几个人还拿自己的相机拍照留念。

现在莫顿终于愿意从港口撤走了。这条航道能让潜艇利用航位推算和声呐导航从水下100英尺的深度安全撤退。“刺鲀号”以3节的速度缓慢移动，这样做可以留存电量，还能避免灾难性的搁浅。声呐操作员听着“海滩噪声”——海浪打在海滩和珊瑚礁上的声音——进行细微的转向调整，使这些预警声与左舷和右舷保持大致相等的距离。当所有的噪声都是从潜艇的正后方传来的时候，莫顿和艇员们知道，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

黄昏时，“刺鲀号”又回到了潜望深度。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远处岸上的灯光。“刺鲀号”浮出水面，让清新的空气在潜艇内流动。它四个引擎全开，向正北全速行驶了30分钟，直到确认没有敌舰追击。

船员们头晕目眩，精疲力竭，紧张不安。直到这会儿奥凯恩才意识到他已经3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韦瓦克港的漫长时间里，是肾上腺素一直支撑着他。莫顿同意，任何人都可以洗个澡（在潜艇上这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因为需要用到蒸馏器）。后来，这位艇长允许药剂师的助手向每人发一份“深水炸弹药”——一口三星轩尼诗白兰地。

莫顿的冒险精神得到了回报，但韦瓦克之战的成功会让艇长更大胆，承担更多不寻常的风险吗？“刺鲀号”的好运会持续吗？那些不在岗的艇员洗得干干净净，喝得微醺，回到床铺上后，有些人开始担心“叨叨嘴”莫顿不够理智。沉默寡言的奥凯恩是这样说的：“有些人可能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以理解。”^[52]

莫顿让潜艇向西北方航行，进入一片水域，在这里遇见日本船只的可能性很大，这些船大都从帕劳向东南方驶去。“刺鲀号”在主航道上来

回航行时，瞭望员们仔细观察着地平线上是否有任何桅杆或烟柱的迹象。艇长匆匆拟就了关于韦瓦克港行动的报告，并在晚上11时45分发给了法伊夫。次日早上10点，“刺鲛号”返回了尼米兹的辖区，接下来它会把所有后续报告发送给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

那天下午，“刺鲛号”穿过了赤道（下潜穿过），莫顿坚持要举办古老的“越线”仪式。长期以来的海军传统要求所有的“蝌蚪”，即以前没有跨越过赤道的军官和士兵，都要被带到“海神尼普顿的神殿”上。前炮台上举行了一场狂欢仪式。“船上的老大”劳尔大叔，一名服役二十多年的老兵，打扮成“海神尼普顿”。他穿着莫顿的红色浴袍，戴着金色纸板做的皇冠，贴上假胡须，手里拿着一根木扫帚柄做成的三叉戟。另一名水手扮演“王室婴儿”的角色，只穿着一件大“尿布”，实际上是一条用安全别针别起来的浴巾。从格赖德上尉开始，被带到海神面前的人得回答一系列荒谬而无礼的问题，然后被迫吞下从后部瞭望台上弄来的一种恶心的药水，并被电击一下。格赖德的头发被剃掉了，这使他懊恼不已。他被迫低头亲吻劳尔的肚子，上面提前抹了猪油和油烟。仪式过后，他可以称自己为“贝壳”了。他还得知这种侮辱不会再有第二次，因此释然了。

第二天早上7时57分，这位被剃了秃头的三副站在舰桥上，发现左舷两点方位的地平线上有一缕烟。莫顿走上前去看了看，然后让“刺鲛号”来到拦截的航道上。“刺鲛号”逐渐靠近船队前方的最佳进攻位置。两艘货船的顶桅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莫顿立刻命令“刺鲛号”下潜。奥凯恩从潜望镜里望去，在船体进入视线后仔细观察了一下，估计目标舷角为50度，可以发动攻击。不久，又有两艘船过来了。船队在95度的航线上以10节的速度前行，似乎没有护航舰船。这样的局面简直完美。将攻击角度输入鱼雷数据计算机后，距离接近1 300码时，“刺鲛号”瞄准最近的两艘船，从尾管发射了四枚鱼雷。所有鱼雷都“猛烈、准确、正常”地射出，四个中有三个正中目标，两艘船均被击中。

莫顿调整潜艇角度，将前管对准第三艘船，这艘船比两艘受伤的货

船大得多。它直接转向“刺鲃号”，似乎是想撞沉它。“我们用‘深喉战术’击沉这狗娘养的！”莫顿说。奥凯恩皱起了眉头：“我曾希望再也不会听到这句话，没想到还不到三天就又听到了。”^[53]鱼雷远远偏离了目标，但货船偏转，露出了侧面。奥凯恩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它是一艘巨大的运兵舰。“刺鲃号”又发射了两枚鱼雷，随后下潜；当它下降了200英尺时，船员们听到爆炸声，表示有两次命中。

“刺鲃号”8分钟后回到潜望深度，用潜望镜快速地观察后发现，运输舰已经一动不动了。“刺鲃号”从容地发射了另一枚鱼雷，击中了烟囱和舰桥中间的部分。从潜望镜里，奥凯恩看到“猛烈的爆炸把舰桥后部的船体炸上了天，比最高的帆还要高。我们顿时看到一个比大型卡车还要大的洞，船体向我们这边倾斜”。^[54]船上的士兵开始跳进海里，船慢慢下沉，救生船被放了下来。

下午1时10分，莫顿下令让“刺鲃号”浮上水面。附近没有发现驱逐舰，潜艇可以泰然自若地在水面上行驶。莫顿让“刺鲃号”来到沉没的运兵舰残骸附近，那里大约有1 000名弃船逃生者，挤在救生船、木筏或小艇上。莫顿平静地下令：“两个炮台都准备战斗。”^[55]奥凯恩疑惑地瞥了他一眼，莫顿严肃地说明了他要做的事情。“迪克，”这话是奥凯恩后来转述的，“不管是陆军轰炸战略地区，还是飞行队进行区域轰炸，以保证地面部队的进攻，都会带来平民的伤亡。现在，在没有其他伤亡的情形下，我将阻止这些士兵上岸，因为任何人上岸都意味着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可能会终结。”^[56]奥凯恩接受了这一理由，“刺鲃号”行动起来，去完成令人不快的任务。



1. 午餐会上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摄于1943年年中。由左至右：陆军航空队司令“福将”阿诺德，海军上将威廉·莱希，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 金，陆军上将乔治·马歇尔



2. “瞭望塔”行动中的美国海军少将里奇蒙·特纳（左）和海军陆战队少将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摄于“麦考利号”运输舰的司令舰桥上



3. 1942年8月8日，装备了空投鱼雷的日本G4M飞机冒着高射炮的火力攻击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的美军舰队。注意技术高超的飞行员是贴着海面靠近美舰的



4. 1942年8月下旬，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这幅鸟瞰图是朝西北方向拍下来的，背景是隆加河和铁底湾。整片区域布满了弹坑



5. 瓜达尔卡纳尔岛，一架SBD侦察轰炸机的残骸。这架飞机被日军的空袭摧毁，此时仍在燃烧



6. 东所罗门群岛战役，1942年8月24日。这张照片摄于“企业号”的舰岛走廊上，拍下了日军在一次大规模俯冲轰炸中攻击该航母的三枚炸弹中的第三枚



7. 1942年9月28日，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阿尔贡号”上召开的南太平洋司令部会议。由左至右：麦克阿瑟将军的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少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上将，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L. 戈姆利中将，陆军航空队的米勒德·哈蒙少将



8. 塔沙法隆加战役，1942年11月30日。一名伤者从被鱼雷击中的“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上撤离，这艘巡洋舰是海军少将卡尔顿·赖特的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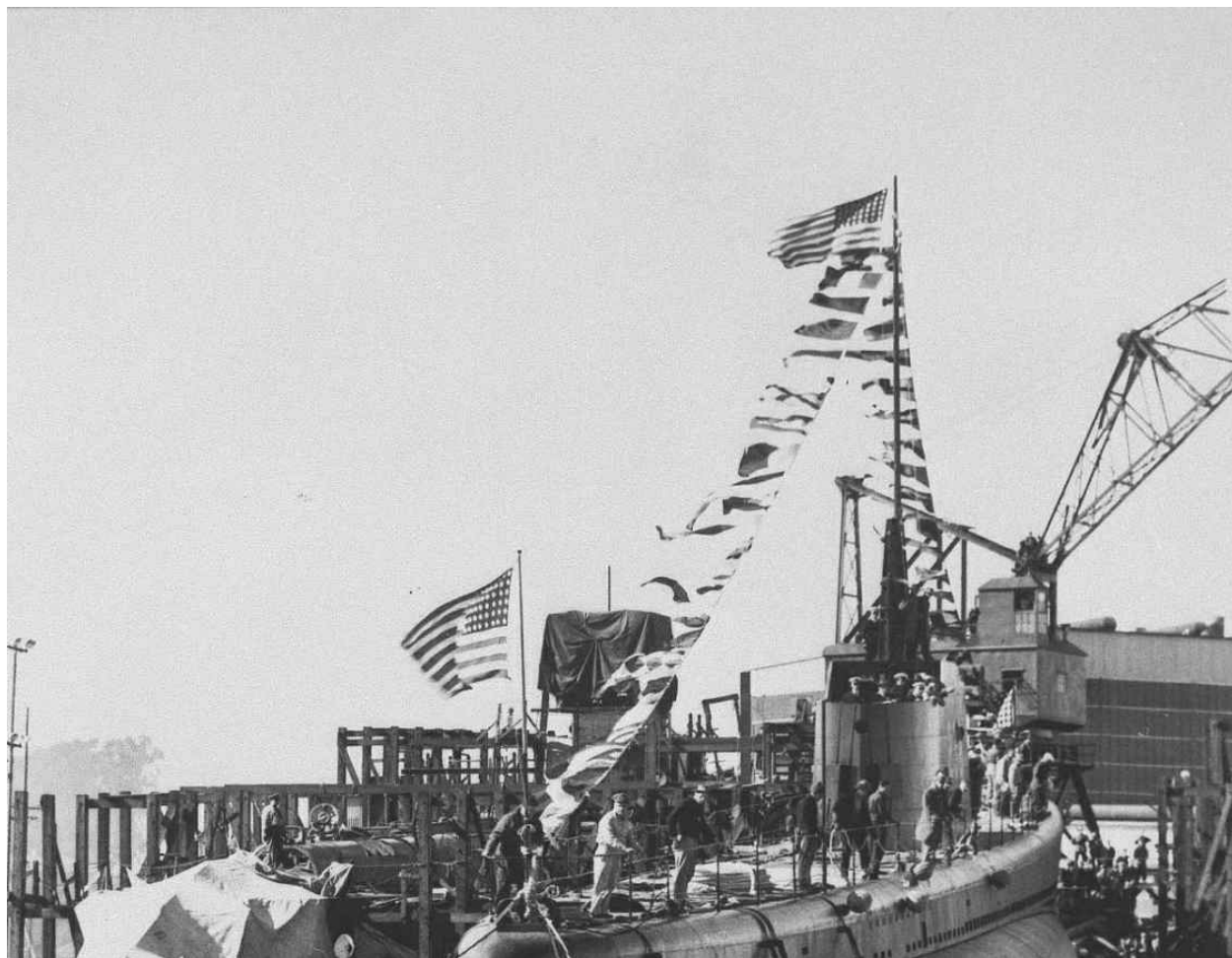
9. 1943年11月，美国两栖部队进入登陆艇，在布干维尔的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



10. 1943年12月，第1陆战师的一艘登陆艇准备在新不列颠岛西端的格洛斯特角登陆。注意卡车和吉普车上的大量物资和弹药



11. 1943年12月26日，在格洛斯特角，海军陆战队员涉水上岸时遇到汹涌的海浪，但没有遭到抵抗



12. 1942年2月，小鲨鱼级潜艇“刺鲅号”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下水



13. “刺鲛号”在加利福尼亚的马雷岛外航行



14. “刺鲛号”副艇长理查德·奥凯恩和艇长达德利·莫顿



15. 日本驱逐舰“春雨号”在新几内亚北部的韦瓦克港被大胆采用“深喉战术”的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1943年1月24日，通过“刺鲛号”潜望镜拍摄的照片



16. 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初步设计方案



17. “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1943年5月下水。它是新一代强大航空母舰中的第一艘，这些航空母舰将成为西太平洋的先头部队。一个中队的SBD侦察轰炸机（没有折叠翼）停在飞行甲板的尾部。在航母的中部，机翼折叠起来的是F6F“地狱猫”战斗机和TBF鱼雷轰炸机



18. 1943年11月，海军陆战队员在塔拉瓦环礁的比休岛的废墟上前进



19. 约1943年10月至12月，“约克城号”的机库甲板。军械员正在为几架停放的F6F“地狱猫”战斗机加装炸弹。背景中，他们的船友正在看电影



20. 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一架“地狱猫”战斗机准备从“约克城号”上起飞



21. 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一架“地狱猫”迫降在“企业号”航母上



22. 1943年11月，在航母突袭太平洋中部的日本基地的过程中，“列克星敦号”战斗情报中心的样子



23. 1943年11月，在“电流”行动中，第16战斗机中队的“地狱猫”飞行员听中队长保罗·D. 布伊少校布置任务



24. 1943年11月23日，第16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在击落了一队前往塔拉瓦的敌机后兴高采烈。从右数第四位是拉尔夫·汉克斯中尉，他刚刚成为“一日王牌”，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五架零式战斗机



25. 船员们在行动间隙补觉。1943年11月，摄于“电流”行动中的“列克星敦号”飞行甲板



26. 1943年11月，袭击拉包尔后返回“萨拉托加号”的一名受伤的飞行员被抬离飞机



27. 1944年2月4日，陆军第7步兵师的士兵在夸贾林岛攻击日军的碉堡



28. 1944年2月5日，海军中将雷蒙德·A. 斯普鲁恩斯（中）和海军上将尼米兹（右）视察夸贾林岛。陪同他们的是一位海军陆战队准将（左）



29. 《茫然的遥望》。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潟湖，一名战斗后疲惫不堪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吊上一艘运输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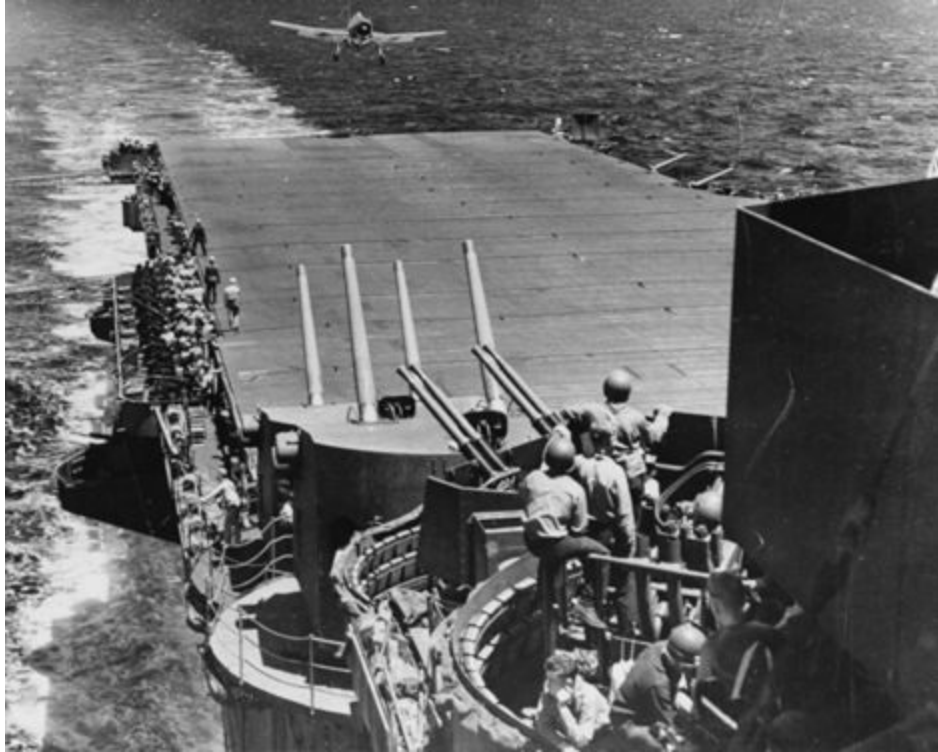
30. 第163步兵团的部队猛攻荷属新几内亚的瓦德克岛海滩



31. 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A. 米彻尔中将和他的参谋长阿利·伯克准将。摄于1945年春



32. 一场篮球赛在“蒙特雷号”航空母舰的前升降机里进行。左边起跳的运动员是杰拉尔德·福特上尉，他是一名擅长体育运动的军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摄于1944年6月或7月



33. 菲律宾海海战，1944年6月19日。一架“地狱猫”在“列克星敦号”上降落



34. 1944年6月或7月，一架寇蒂斯SB2C“地狱俯冲者”进入“约克城号”的着舰航线



35. 1944年6月或7月，援军在塞班岛登陆



36. 1944年6月21日，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塞班岛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家日本人



37. 1944年7月初，在对马里亚纳群岛进行一次突袭之后，SB2C“地狱俯冲者”返回“约克城号”航母



38. 1944年7月10日，斯普鲁恩斯和霍兰·史密斯在后者位于塞班岛的指挥部参加升旗仪式，标志着日本在塞班岛上有组织的抵抗行动已经结束

莫顿打算来一场彻头彻尾的屠杀吗？对一些关键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出入的。在奥凯恩的描述中，莫顿命令炮手“把敌人赶下船”——换句话说，这些船将被摧毁，但除非对方向“刺鲅号”开火，否则不会有人故意开枪射杀水里的人。格赖德的描述没有太多细节，意味深长的暗示却很多。他说艇长“对敌人怀有强烈的生理上的憎恨”，但没有展开叙述，只是说这件事发生在“噩梦般的几分钟”里。^[57]福雷斯特·斯特林记得看到了几百个人。有些在游泳，有些在救生艇上，还有一些“在木板或其他漂浮的残骸上。……他们都面无表情地盯着‘刺鲅号’”。^[58]奥凯恩写道，甲板炮手“有条不紊地用小口径舰炮向前方扫射，就像用消防水带清理街面一样”。^[59]莫顿的巡航报告称，直到“我们的火力受到小口径机枪反击，炮手才朝救生艇射击。然后我们就全面开火了”。^[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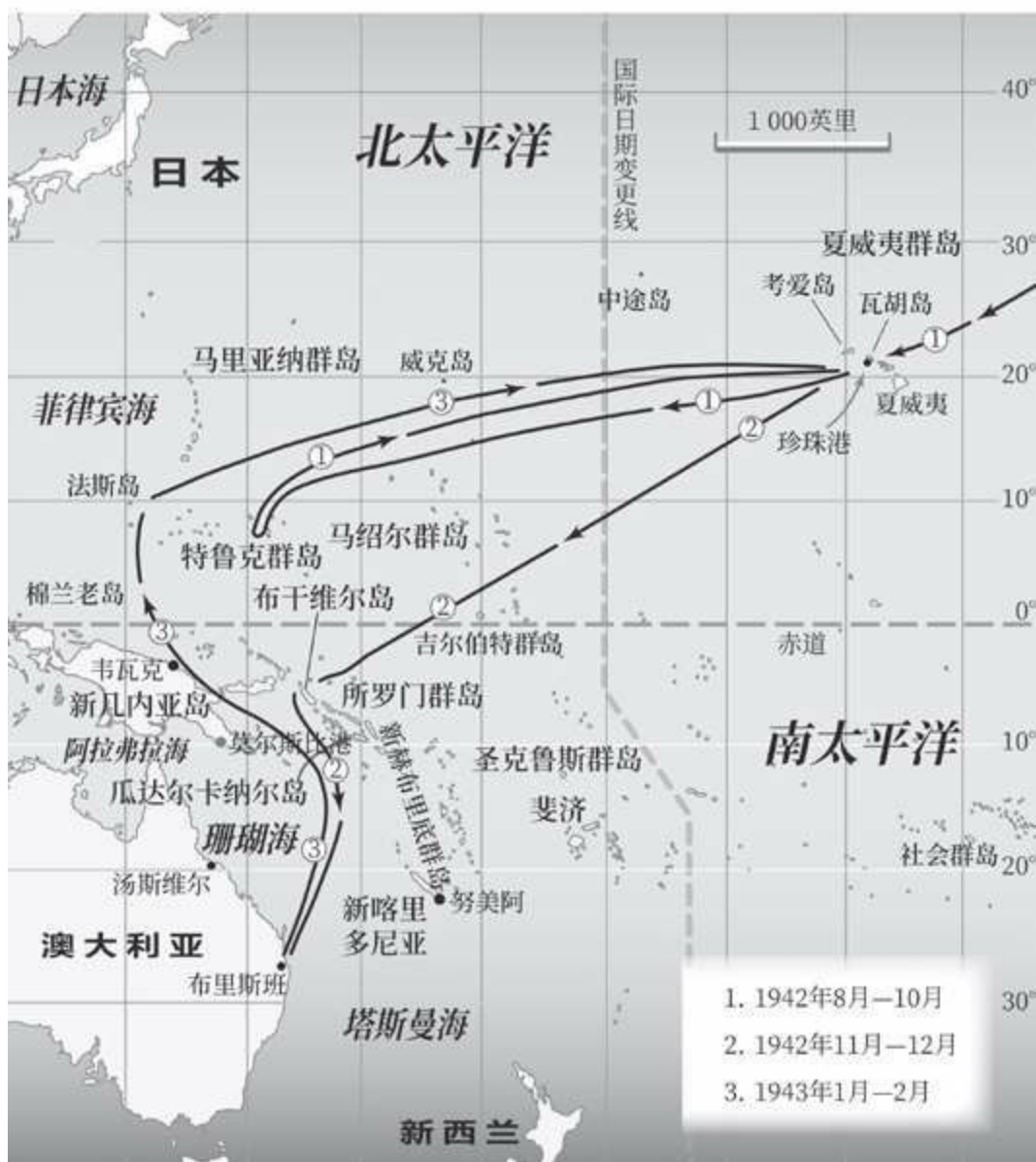
“刺鲅号”在85度方位的航线上追捕另外两艘船，其中一艘已经受损。“刺鲅号”在水面上全速航行，所有的四个引擎都在轰鸣。它采用常规的“迂回”策略来追踪猎物。这艘浮出水面的潜艇在一条平行的航线上

高速行驶，距离目标足够远，让对方的船体始终处于地平线以下，因此不会被敌人发现，而自己却能用高位潜望镜定时观测，追踪敌人的桅杆顶部或从烟囱冒出的烟。尽管这两艘船以“之”字形高速前进，但“刺鲅号”逐渐超过了它们，占据了良好的进攻位置。下午5时21分，莫顿终于让“刺鲅号”下潜。当第四艘船的船体上升到地平线上时，潜望镜观察显示这是一艘油轮，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先攻击目标。6时29分，“刺鲅号”在2 300码外向它发射了三枚前管鱼雷。一枚鱼雷击中目标，使其减速。“刺鲅号”又花了两个小时调整位置，发动了一次尾管射击，有一枚鱼雷命中了船体中部。几分钟内那艘船便沉没了。

对船队最后一艘幸存货轮的追击一直持续到黑夜。莫顿决心全速前进，一心想全歼敌军。已经受损的货轮用甲板炮还击，大多是在胡乱发射，但有一发炮弹落在了“刺鲅号”的正前方，弹起后从潜望镜上方越过。莫顿命令再次下潜。他们在90英尺深的地方行进了15分钟，单靠声呐跟踪敌船。炮弹飞溅的声音越来越远，于是“刺鲅号”回到了水面上。

一名瞭望员几乎立刻喊道：“探照灯在我们的左舷艇首！”^[61]光束是从地平线处刚刚出现的一艘船上射出来的。莫顿准确地推断出这是一艘护航的战舰，很可能是一艘派出来搜寻船队的驱逐舰。莫顿一边驶近探照灯所在处，一边让“刺鲅号”调整位置，以便发射鱼雷摧毁货船。晚上9时10分，当雷达显示射程为2 900码时，“刺鲅号”发射了最后两枚鱼雷。这是一次长距离发射，没有分散角度，这样的尝试成功率不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鱼雷跑了大约一英里半的距离。不可思议的是，两枚鱼雷都命中了目标，巨大的爆炸使“刺鲅号”的舰桥都摇晃起来。15分钟后，这艘9 500吨的亚利桑那级货船沉没了，留给苦苦搜寻的驱逐舰的探照灯一片空白的地平线。

“刺鲅号”（SS-238）的最初三任巡航 1942—1943年



官兵们对这样的战绩感到惊讶。奥凯恩回忆道：“从没有人听说过哪艘潜艇在到达巡航区域之前便击沉了第一艘敌船，更不用说击沉有四艘船的船队了。这是潜艇兵们梦寐以求但从没想到过真的会发生的事情。”^[62]莫顿用无线电向珍珠港报告了这一消息，让用完了所有鱼雷的“刺鲅号”“驶向仓房”。

返航过程本应该是平安无事的，但是当第二天早上“刺鲛号”和另一支船队相遇的时候，莫顿改变了航线，准备截击。潜望镜显示一艘小型货船落后于其他船只。莫顿想出一个计划。“迪克，”他对奥凯恩说，“只有咱们自己知道咱没有任何鱼雷了，敌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假设我们在海面上战斗，并向他们冲去，他们极有可能落荒而逃，等那艘小型货船在后面落了单，我们的甲板炮不就可以朝它射击了吗？”^[63]由于没有看到落后的小型货船上配备任何武器，奥凯恩认为值得一试。

“刺鲛号”浮出水面，开始追赶船队。日本船只开始加速，以“之”字形曲折前进。这些操作让奥凯恩感觉“敌人陷入了全面混乱的状态”。^[64]然而船队中间的一艘油轮前面出现了另一组桅杆。这艘先前看不见的船很快就被确认为一艘驱逐舰，而它正直接驶向“刺鲛号”。莫顿下令在海面上开足马力，高速撤退，并逐渐将距离拉大到1.4万码。

莫顿以为这艘驱逐舰不想把船队远远甩在后面，很快就会放弃追击。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瞭望员在舰桥上通过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这艘船。驱逐舰船首激起的白色浪花——“嘴里的骨头”——形成白色的“V”形图案。当“V”明显越来越深的时候，瞭望员知道敌人正在逼近。然后，它侧身转向“刺鲛号”，开火了。莫顿预计炮弹会落空，但大约三秒钟后，听到了“雷鸣般的巨响”，“刺鲛号”两侧150英尺外的地方都升起了水柱。太近了。

根据奥凯恩的说法，“刺鲛号”以最快的速度下潜。潜至250英尺深时，莫顿让潜水舵操作员继续往下。“刺鲛号”潜到测试深度以下，等待不可避免的深水炸弹。“现在我们要撞上它了。”莫顿说，因为在头顶上听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声音。它扔了6个深水炸弹，奥凯恩记得它们发出嚼碎饼干一样的声音，“噼啪作响，仿佛成吨的螺栓掉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上”。^[65]然而，那艘驱逐舰没有停留太久。它不得不回到40英里外的运输舰、货船和油轮组成的船队里。莫顿下令向艇员们分发了一批“深水炸弹药”。

两小时后，“刺鲅号”返回了海面，莫顿用无线电向珍珠港发出消息：“今天又是一场激战……‘刺鲅号’跑，驱逐舰追。”^[66]

1943年2月7日，“刺鲅号”回到珍珠港，信号旗索上飘着八面太阳旗，潜望镜上绑着一把竖起来的扫帚，象征着“全歼敌军”。“刺鲅号”的巡航取得的战绩远远超过其他潜艇，是这场战争中最非凡的潜艇战绩。它在到达10—10码头时，受到了一大群军官及其他人的欢迎，（奇怪的是）还有不少新闻记者守在那里。长期以来，“默默服役”的潜艇从没有宣传过自己，媒体对它们几乎没有做过任何报道。但太平洋舰队中有人认定是时候宣传宣传潜艇战了，而且“刺鲅号”的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审查机构通过，可以公开。查理·洛克伍德将军给莫顿起了个绰号叫“单人狼群”。一群摄影师拍到了“刺鲅号”上倒挂的扫帚，照片后来刊登在美国各地的报纸上。一上岸，“刺鲅号”的艇员们就看到了当天的《夏威夷广告报》。头版头条的新闻为《“刺鲅号”全歼日军》。^[67]

莫顿声称击沉五艘日船，均被证实，总计32 000吨。不过“刺鲅号”第三次巡航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敌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莫顿的战术翻开了新的一页，将被所有在潜艇上服役的官兵研究。此后，莫顿的表现将成为所有人的标杆。艇长们要仿效他的大胆战术，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奥凯恩后来说，莫顿“无视了效果未经证实的战前观念和禁忌”。^[68]未来，潜艇将在水面上行动，只有绝对必要时才下潜。它们将会与日本舰船进行更持久、更大胆的战斗。

“刺鲅号”的胜利虽然振奋人心，却无法驱散太平洋潜艇部队中挥之不去的挫败感和失望情绪。1942年，潜艇已击沉了180艘敌船，总计72.5万吨，比日本当年能建造的总吨位还要多，但大家还是普遍感到舰队没有完全发挥出潜力。太多的艇长还抱着战前那种战术不放。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马克14型鱼雷就是个蹩脚货，但海军军械局对批评

者进行了反击，还断然拒绝了全面、公正地重新评估的建议。

1942年下半年，英格利希将军共发起61次巡航，27次空手而归。在特鲁克群岛（日本主要的南部海军基地）进行的巡航效率远低于在日本领海进行的巡航。尽管击沉敌军的一支重要舰队无比荣耀，但击沉主力舰（战列舰、巡洋舰和航母）的成功率很低。攻击敌人的货船和油轮则回报比较高——它们速度慢，防御薄弱，因此更容易被跟踪和击沉。在大西洋，德军的“狼群”表明，少量的潜艇就能威胁到重要的经济和军事交通线。日本至少和英国一样容易受到商业战的影响，而且很明显，太平洋潜艇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就是攻击使日本与其主要资源生产地相连的海上航线。但是，潜艇部队领导层尚未制定这样一条原则，即相较于其他一切要务，切断日本内部供应线才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潜艇部队的将军们——英格利希、法伊夫、威瑟斯和洛克伍德——已经同意将潜艇派到这里或那里，执行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侦察任务，或者支援各种战役，即便派给它们的任务考虑欠周。

现役潜艇军官对英格利希及其参谋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加，但即使批评有失公正，英格里希也并不在意。很多艇长空手而归不全是因为他们胆子小。有些人仅仅是因为运气太差，有些人是因为被派往希望渺茫的巡逻区，还有些人是因为眼睁睁看着鱼雷过早地爆炸，或者没有爆炸，或者从目标下方冲过，或者兜了一个圈子，或者是从敌人的船体上反弹回来，船体毫发无损。像拉尔夫·克里斯蒂将军（法伊夫在布里斯班的前任）一样，英格利希对那些提及鱼雷故障的报告嗤之以鼻。他曾经对一个上报这类问题的艇长可笑地宣称：“我们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从来没遇到过提前爆炸的鱼雷。”^[69]

军械局不能容忍这些批评，并试图将错误归咎于舰队，指责艇长、艇员和鱼雷操作员。克莱·布莱尔是一位性情平和的学者，对太平洋潜艇战的历史进行过最详尽的叙述。根据他的说法，“二战期间美国潜艇部队的鱼雷丑闻放在任何战争史里都是最糟糕的事件之一”。^[70]内德·比奇当过潜艇的指挥官，后来成为作家和历史学家，他说鱼雷“表现太

糟糕，就算是遭到过蓄意破坏，也不可能更糟了”，并补充说，他认识的每个潜艇兵都同意负责该事的人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71\]](#)

从长远来看，如果鱼雷在1942年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话，情况反而可能会更好。彻底的失败将迫使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找出和改正各种机械缺陷。然而，这些武器有时能正常发挥作用，有时虽然过早地爆炸，或在没有对敌方产生任何伤害的情形下爆炸，但是任务竟然完成了。发生的频次和表面上的成功导致这些缺陷没有被尽快发现。鱼雷问题是在两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解决的，其间不断有华盛顿和纽波特的官僚和工程师顽固地提出反对。与此同时，潜艇乘员冒着生命危险，有时是付出生命代价，携带着不可靠的武器进入敌方水域，却完全不确定自己的怀疑是不是有道理。1942年10月20日，在100英尺深的水下潜行时，“特里杰号”朝一艘无人护航的油轮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的舵卡住了，开始向回转。这个意外本足以摧毁“特里杰号”，但这枚回旋鱼雷的第二个故障挽救了它。引爆器本应该探测到“特里杰号”的磁场，并在其到达最强值时激活弹头，然而它在距离“特里杰号”很远的地方就爆炸了，潜艇完好无损。这枚鱼雷出现了两个互不相干的故障，然而第二个故障竟天意般地化解了第一个故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敌人的油轮仍在前进，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它曾被攻击过。要不是差点造成致命的危险，这个意外还挺可笑的。

第一个被找出来解决的问题是马克14型鱼雷发射后，往往比设定的深度要深大约10英尺。驻扎在西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的查理·洛克伍德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信给华盛顿的军械局，结果对方态度强硬，回信中布满了各种技术数据，以表明军方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1942年6月，洛克伍德亲自动手设计了一系列测试。测试结果表明，这些鱼雷行进时比设定深度要深11英尺左右。金将军不断施压，最终纽波特的工程师们自己进行了测试，结论是马克14型鱼雷行进时确实比设定深度深10英尺。这很容易通过改变深度设置来纠正，在大多数情况下设为零即可。

1943年1月21日，一个狂风暴雨的早晨，一架名为“菲律宾快艇”的水上飞机下降到2500英尺的高度，从加州门多西诺县的山区上空驶过。这架大型飞机曾属于泛美航空公司，被海军征来，用于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之间运送高级军官。飞行员在浓浓的白雾中迷了路。它的目标是旧金山湾，但偏离了航线60多英里，直接撞上山体，无人幸存。死者中有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

尼米兹任命查理·洛克伍德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新任司令。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洛克伍德比潜艇部队中的其他任何将军都更加主张重新考虑战前的理论和战术。1943年初，他来到珍珠港履职。他发现潜艇基地扩建了，设施也改进了，感到很满意。新建筑随处可见。尼米兹的司令部已经搬出潜艇基地，进入新的司令部大楼，为洛克伍德腾出了操作的空间。新的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搬进了马卡拉帕山上的白色大房子。

1942年12月，克里斯蒂将军在布里斯班被解除了第42特混舰队的指挥权，被派往纽波特掌管海军鱼雷站。克里斯蒂强烈反对这项任命，却无能为力。他曾为鱼雷辩护，并固执地反驳不断升级的抱怨。现在，他被迫要彻底改革。抵达纽波特后，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他就接到命令，要求他返回澳大利亚，指挥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潜艇。他会作为洛克伍德的下级担任此职到1944年11月。

关于鱼雷过早爆炸的报告反复出现，洛克伍德不禁怀疑日本人已经制定出一些对策。是不是敌人想出了什么花招让鱼雷提前爆炸呢？许多艇长已经对鱼雷引爆装置极度不信任，他们主张禁用它，改用接触式引爆器。洛克伍德虽然同意艇长们的意见，但还是不愿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磁性引爆装置是美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受重视的技术创新之一，支持这项技术创新的人里面有不少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叨叨嘴”莫顿。虽然它可能不是完全可靠，但它也没有在每次作战时都彻底失败。直到1943年年底，接触引爆装置才取代这种有问题的引爆装置（而之前，除非是在个别艇长的坚持下）。不管怎样，接触引爆装置也

并不可靠。

在澳大利亚，克里斯蒂没有接受人们对鱼雷的满腹牢骚。在他看来，那些指责武器不行的艇长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错误。他说，对鱼雷的抱怨将危及潜艇部队的集体士气和自信。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是不偏不倚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克里斯蒂就亲自参与过磁性引爆装置和其他鱼雷技术的研发，那已经是20多年之前的事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负责军械局的鱼雷所，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马克14型鱼雷上。战争结束后，他告诉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鱼雷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维修和操作人员对它的维护保养上。……我一直都认为，如果有更加小心谨慎并且经验丰富的鱼雷部队，1942年的所有糟糕表现都能避免”。^[72]“长尾鲨号”的威廉·米利肯在报告中提到，他曾向日本潜艇开火，却“只是发出了叮当一声响”（意思是说鱼雷未爆炸），此后克里斯蒂下令，在巡航报告或签批中，不得书面提及此事。^[73]讨论不断升级，双方陷入激烈的争吵。

克里斯蒂在那年秋天给洛克伍德的信中说，“鱼雷在这里的表现正在稳步提升”，对报告中提到的鱼雷过早爆炸和不爆炸的事表示怀疑。他补充说，艇长们描述了鱼雷发射失败的情况，“但这些事情发生的具体情况他们根本无从了解”。^[74]这样说明显是在暗示艇长们在故意撒谎，洛克伍德对此无法忍受。他给克里斯蒂写了一封带有讽刺意味的信。“谢谢你的来信，”他写道，“满篇都是抱怨，我觉得你肯定是早餐咖啡没冲好，或者吃了个臭鸡蛋。……事实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六个有价值的目标，因为鱼雷在离敌舰非常近的地方提前爆炸，艇长们还以为击中了目标。……至于你认为操作人员总是没有看清战况，或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感到万分遗憾。你们部门的训练没有白费。”^[75]克里斯蒂被吓到了，赶忙道歉，但他最终也没有完全承认马克14型鱼雷的惊人缺陷。

1943年初洛克伍德到华盛顿短暂访问，其间他发起了挑战，把海军部上上下下批了个遍，语气辛辣，一针见血。他说：“如果军械局不能

为我们提供会爆炸的鱼雷，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让造船局设计一个船钩，让我们可以把敌舰一侧的钢板撕下来。”^[76]这句话引起了军械局局长“钢钉”威廉·H.P.布兰迪的激烈反驳。布兰迪承认，海军鱼雷站的工程师们在发现问题和纠正问题方面确实行动迟缓，但反过来又抱怨说，舰队拒绝指派优秀的人员参与武器研发。“很遗憾我们的研发队伍里没有潜艇军官，”布兰迪写道，“除非你派过来一些，否则鱼雷的表现不会尽如人意。……你自己清楚，每次我需要一些了解鱼雷的潜艇军官时，你都总是派来一些在艇上表现不怎么样的人。我请求你派来优秀的人才，却总是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极其重要的指挥官，艇上没他不行。”^[77]

日本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主要是希望拥有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井，以及马来亚和被荷兰或英国控制的其他地方的橡胶种植园和锡矿。如果日本不能控制将它们与日本本土联系起来的海上航道，那么它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将毫无用处。由于自然资源严重匮乏，日本的经济和作战能力严重依赖进口的铁矿石、铝矾土、橡胶、铜、锌，尤其是石油。日本整个地区的部队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这只能由海路提供。派一支主动出击且装备精良的潜艇舰队攻击日本重要的内海航道，就可以威胁它的整个海上运输系统。日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定期在海上行驶的货船和油轮，否则日本的整个帝国大计就会像海浪中的沙堡一样崩塌。1944年和1945年发生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事。

所有这一切在战前都已经预见到，但日本海军领导人从未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反潜战中也只是具备了最低级的应战能力。日本人以前参与的海战是相对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他们从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商船的问题。武士精神崇尚进攻，而进攻性的战争较少考虑防御的问题，没有哪个拥有雄心壮志的军官会把时间浪费在保护商船上，这活儿太枯燥乏味了。但凡那样，会绝无晋升希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日本的精锐驱逐舰舰队为了在夜间向敌舰发动鱼雷攻击受过专门的训练，但

护送商船是后来才想到的事情。反潜战从来没有在海军省或军令部获得过强有力的支持。战争开始几个月后，才有舰艇开始承担专职护航任务。1944年，随着损失的商船越来越多，越发必要的护航工作与剩余船只繁忙的运输任务起了冲突。即使整支船队在海上被屠杀，日本海军也不愿意派有才能的军官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导层不愿承认反潜战的专业性，不认为反潜战还需要参谋的分析、武器的开发和训练。大井笃是为数不多的负责反潜战的参谋之一，对他的工作持怀疑态度的同事常常对他说：“护航对海军军官来说是常识。”^[78]

有效的护航至少需要护航舰和货船之间有个合作方案。但日本海军对商人的蔑视由来已久。有个商船上的老水手回忆说，在海军的等级制度中，他和他的船友“级别比战马都低，还没军犬重要，地位比军用信鸽还不如”。^[79]当商船船员和海军船员同处一船时，所有商船船员都得待在底舱，只有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才可以在甲板上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对我们就是这种态度。根本感觉不到大家是在并肩战斗。这样不可能取胜。”^[80] 1943年下半年，日本让重型货船在护送下来到特鲁克群岛，然后将货物分散到粗制滥造的小型木制驳船上。这种小船被称为“海运卡车”，用来向岛上的驻地运送货物。随着1944年至1945年日本损失的舰船越来越多，搁置了几十年的旧船被拖了出来。许多船年久失修，船员们认为即使它们没有受到攻击，也不适航。日本人卑劣地强征红十字会的救援船运送军队和战争物资。^[81]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美国的潜艇要让它们不受干扰地通过。

1943年底，日本发现美国鱼雷的性能有了改善，开始感到不安。被击沉的商船迅速增加，仅1943年11月一个月就有超过30万吨商船被毁。^[82]改良后的马克14型鱼雷是战争中期击沉船只数量激增的最重要的因素。但也有其他几个因素。那些大胆而经验丰富的副艇长和三副被提拔上来，担任了艇长。潜艇部队装备了更好的水面搜索雷达系统，更好的声呐系统，更好的潜望镜，还有发射后不留尾迹的马克18型电动鱼雷。珍珠港通信情报中心（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的密码破译成果被

用于帮助潜艇通过远程无线电追踪即将通过的船队。太平洋舰队无线电小队的商船分队每日绘制日本航运活动图，并能提供及时、可靠的情报，给出敌军离港、目的地、正午船位和水雷区位置等信息。1943年12月，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可以自信地报告说：“敌人的海上航线正在不断遭受猛烈攻击。……我们的潜艇在‘大东亚’的重要航线上穿行无阻。一年半以来，它们摧毁的日本船只远远超出了日本船厂造出的商船总吨位。”^[83] 尽管早期的潜艇战有许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报告中所说的是事实，而且从此时开始，日方的沉船数量还会激增。1944年初，日本每个月的航运损失都超过了20万吨。

在最后一年半的战争里，美国的潜艇部队终于投入了全面封锁日本本土的战斗中。美国的艇长对日本海岸的每一个海湾和入口都了如指掌，甚至比日本人对他们本国海岸还要熟悉。绝望中，日本商船只能进行港到港的短程运输，甲板上提前放好长木板和木筏，以便在船只沉没时漂浮逃生。它们采取了越来越迂回的路线，以避免潜艇频繁出没的水域。日本商船不是穿过黄海，而是沿着朝鲜海岸和中国海岸南下，躲在浅水区或沿海岛屿后面行进。黑夜无法再为它们提供庇护。美国潜艇装备的雷达系统不断改进，可以在半径40英里的范围内识别和跟踪看不见的敌舰。潜艇四引擎全开在水面上高速航行，速度可接近甚至超过20节，由于不用担心空中侦察，潜艇甚至能攻击由最强大的护航舰护卫的船队，而且自己毫发无损。随着新的声呐探测系统的出现，潜艇穿过雷区，进入日本海域，切断了日本本土和资源丰富的朝鲜与中国东北的最后联系。

海上运输不畅，这本身就足以摧毁日本的作战能力，关于石油的几个数据可以使这一点暴露无遗。由于国内石油产量微不足道，如果没有来自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等被征服的领土的稳定供应，日本的帝国大计根本无法维持。日本海军的规划者们预测，一旦被占领的油田完全投产，他们就能自给自足。但重要的运输动脉是由少数行动缓慢（因而易受攻击）的油轮支撑的。1942年（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年对美国潜艇部队

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日本只损失了4艘油轮；194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艘；1944年，上升到132艘；1945年的头8个月里，盟军摧毁了103艘日本油轮。1942年，40%的东印度群岛生产的原油安全抵达日本；194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5%；1944年，下降到5%；1945年3月之后，没有一滴油到达过日本的海岸。1941年初，日本原油储量达到了2 000万桶的峰值，1944年第四季度减少到不足100万桶。^[84]日本人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启动了紧急的油轮建造项目，同时护送普通商船运油。但造船需要钢铁，而反过来也一样——炼钢厂需要炼焦煤和铁矿石，这些煤和铁矿石必须从海上进口。钢锭产量从1943年的峰值780万吨，骤降至1945年的约150万吨，仅为该行业产能的15%。随着空袭在1945年达到顶峰，摧毁了日本的运输系统和工业区，日本的战时生产已经因为海上交通的封锁和破坏沦为一张空谈。

到战争结束时，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总共击沉1 100多艘商船，比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拥有的总吨位还要多。所有的美国潜艇兵加起来不到美国海军总数的2%，却在战争中击沉了一半以上的日本船只，占总吨位的60%。虽然它们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摧毁敌人的海运，但潜艇也将201艘日本军舰送至海底，总计540 192吨。^[85]

胜利来之不易。借用潜艇兵们的委婉说法，二战时期有52艘潜艇“仍在巡逻”。已知有41艘被敌人摧毁。潜艇部队与海军的其他部队相比规模是非常小的——战时潜艇部队平均只有14 750名官兵。大约有1.6万人至少参加过一次战时巡航，其中375名军官和3 131名士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亡率为22%，高于任何一支武装部队。因此，潜艇部队要求大家认可其对打败日本的巨大贡献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人们也承认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战争结束后，查理·洛克伍德告诉一位前艇长，他接受了海军学院教官的职位：“现在不要告诉那些海军学校的学生是潜艇兵赢得了战争。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兵种在那里作战。但是，如果他们把地面部队和航空兵调出我们的巡逻区域，我们就能提前半年赢得战争。”^[86]

[1]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16.

[2] Mason,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p.93.

[3]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Homefront*, p.35.

[4] 英语中在给人起绰号以及给宠物起名字的时候，喜欢用“押头韵”的形式。如“鹦鹉”（parrot）经常叫“波利”（Polly）。这里，“焊工”（welder）叫“温蒂”（Wendy），“铆钉工”（riveter）叫“罗西”（Rosie），也是如此。——译者注

[5] Archibald, *Wartime Shipyard*, p.17.

[6] Ibid., p.192.

[7] Ibid., p.193.

[8]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39.

[9]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22.

[10]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74.

[11] COMINCH to CINCPAC, February 22, 1942,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1, p.252.

[12] “丸”（maru）是日本货船、运兵舰和油轮常用的名称后缀。美国的潜艇兵用maru来指代上述任一船只。——作者注

[13] 海水中的各种物理性质参数，包括温度、盐度、密度等，都随着深度的不同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通常并不是逐渐出现的，而是在某一个很薄的特定的深度范围内急剧发生的，这个特定的深度范围就被称为跃变层，根据物理特性的不同，可以分为温度跃变层、盐度跃变层和密度跃变层等。通常海水的密度由温度和深度决定，在海水盐度垂直梯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其密度梯度常常与温度梯度规律一致，也就是说，温度跃变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多数跃变层。水中的声波信号往往会在跃变层上发生反射和折射。因此，潜艇可以利用温层，在温层间升降，迷惑敌人的声呐及鱼雷等。——译者注

[14] Alan Polhemus, interview at the Independence Seaport Museum, Philadelphia, PA, October 17, 2000. Transcript in the museum archives.

[15]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3.

[16] Ibid., p.43.

[17] U.S.S. *Wahoo*, “Report of First War Patrol,” entry dated October 5, 1942, in McDaniel, ed., *U.S.S. Wahoo (SS-238)*, p.9.

[18]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1.

[19] O’Kane, *Wahoo*, p.61.

[20]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5.

[21]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185.

[22]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1.

[23]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7.

[24] U.S.S.*Wahoo*, “Report of First War Patrol,” entry dated November 8, 1942, in McDaniel, ed., U.S.S.*Wahoo* (SS-238), p.27.

[25] O’Kane, *Wahoo*, p.76.

[26]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7.

[27] O’Kane, *Wahoo*, p.81.

[28]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2.

[29]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26.

[30] O’Kane, *Wahoo*, p.82.

[31] Ibid., p.83.

[32] 目标舷角（angle on the bow），目标航向与目标和潜艇位置连线形成的夹角。——编者注

[33] Ibid., p.94.

[34]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49.

[35] Admiral James Fife Jr., “U.S.S.*Wahoo*, Second War Patrol, Comments on,” December 28, 1942, in McDaniel, ed., U.S.S.*Wahoo* (SS-238), p.43.

[36]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72.

[37] O’Kane, *Wahoo*, p.117.

[38]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76.

[39]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1.

[40] Quoted in O’Kane, *Wahoo*, p.121.

[41]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54.

[42] Ibid., p.59.

[43] Ibid., p.60.

[44]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1.

[45] O’Kane, *Wahoo*, p.138.

[46] Ibid., p.177.

[47] Ibid., p.138.

[48] Ibid., p.139.

- [49]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1.
- [50] O’Kane, *Wahoo*, p.139.
- [51]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82.
- [52] O’Kane, *Wahoo*, p.143.
- [53] *Ibid.*, p.148.
- [54] *Ibid.*, p.150.
- [55] *Ibid.*, p.153.
- [56] *Ibid.*, p.153.
- [57] Grider and Sims, *War Fish*, p.73.
- [58]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00.
- [59] O’Kane, *Wahoo*, p.154.
- [60] U.S.S.*Wahoo*, “Report of Third War Patrol,” entry dated January 26, 1943, in McDaniel, ed., *U.S.S. Wahoo (SS-238)*, p.51.
- [61] O’Kane, *Wahoo*, p.160.
- [62] *Ibid.*, pp.161-62.
- [63] *Ibid.*, p.163.
- [64] *Ibid.*, p.164.
- [65] *Ibid.*, p.166.
- [66] *Ibid.*, p.168.
- [67] Sterling, *Wake of the Wahoo*, p.119.
- [68] O’Kane, *Wahoo*, pp.161-62.
- [69] Blair, *Silent Victory*, p.341.
- [70] *Ibid.*, p.879.
- [71] Edward L.Beach, “Culpable Negligence,”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70.
- [72] R.W.Christi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February 11, 1949,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Coll/606, Box 24.
- [73] Blair, *Silent Victory*, p.391.
- [74] *Ibid.*, p.414.
- [75] *Ibid.*, p.414.
- [76] *Ibid.*, p.403.

[77] Ibid., p.404.

[78] Atsushi Oi, “Why Japan’s Antisubmarine Warfare Failed,”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10.

[79] Reiji Masuda account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04.

[80] Ibid., p.303.

[81] 例如，可参见Yuji Nishihama’s letter (undated) to the editor of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ed., *Senso*, pp.139-40。

[82]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February 1947, Chronological List of Japanese Merchant Vessel Losses, pp.29-99.1943年11月共有70艘船被毁，总计320 807吨，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潜艇击沉的。

[83] Navy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Report, “Japan Merchant Marine Losses,” December 15, 1943,Serial P1 23-41,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60, MR 400, “Jap Reference Folder, 19421945.”

[84] USSBS,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 Appendix Table C-50, “Japanese Imports, Production, and Inventories of Crude Oil,” p.135

[85]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February 1947, Table 1: “Summaries of Japanese Shipping Losses,” p.vi.

[86]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5.

第十章

有一艘船正驶向珍珠港，从甲板上望去，一眼便可以看出瓦胡岛与一望无际、单调乏味的太平洋截然不同。岛上的绿褐色斜坡极其陡峭，耸立在地平线之上，时而受阳光照耀，时而躲在浮云的阴影之中。戴蒙德角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岬角，颜色和纹理与瓦楞纸板相似，从海上耸起，渐渐向东延伸，长弧形的怀基基海滩和火奴鲁鲁市慢慢显现在眼前。经过戴蒙德角时，舵手要向右转舵：夏威夷皇家酒店的粉色大厦、阿罗哈塔（塔身为战时用的伪装色）、庞奇鲍尔火山口以及阿华角等都映入眼帘。巡逻机在低空盘旋，巡逻艇越来越近，它们警惕地监视着每一艘即将到达的船。位于卡米哈米哈堡的信号塔发出识别要求，并收到了识别信号。拖船将外面入口处的反潜网先拖入珍珠港的水道中，再穿过到港船只的尾流，将网拖回来。这条笔直的水道又长又窄，海浪不断拍打紧挨着两舷的珊瑚礁，但它的深度为40英尺，还有浮标的提示，足够安全。

绕过霍斯皮特尔角，可以看到珍珠港全景：中央的洼地、福特岛、码头上一堆堆的货物和东湖岸边的一些办公楼。第一次从美国本土出海至此的人对它如此袖珍而完善感到惊讶。与圣迭戈或旧金山湾相比，强大的太平洋舰队的母港珍珠港简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这里宏伟壮丽的自然环境着实令人惊叹。珍珠港的北部和西部生长的不是灌木丛和棕榈林，而是随风优雅起伏的甘蔗地和延伸至绿色山麓的大草原。向内陆的每个方向望去，地平线上都是绵延的怀厄奈岭和科奥劳岭的山脊线。

战争早期的珍珠港看上去比现在宽敞。但到了1943年夏天，太平洋舰队不断扩张，占用了所有可用的锚位和停泊区。新到港的船只能勉强挤进拥挤不堪的海港。驱逐舰和其他较小的船只经常三三两两地横着停

在海面上，中间由跳板连接。要想驾驶战列舰或航母穿过拥挤的水道和锚地，需要用到一切掌舵的技巧，绕过其他船只（无论是航行中的还是已停泊的），包括维修驳船、燃料驳船、浮式干船坞、沉没的战列舰以及穿过水道时一直发出叮当响声的小艇。潮汐、雾、浅滩、风以及尾流都是干扰因素。一旦发生碰撞或搁浅，指挥官必须立刻报告给上级，而且他的职业前景会受到影响。

时至1943年年中，经过18个月的不懈努力，珍珠港已经基本从引发了太平洋战争的突袭中恢复过来。老兵说，为了腾出地方来建造新的码头、商店、铸造厂、仓库、飞机库、军营、油库、弹药库、防空炮塔、办公楼和无窗防弹电厂，人们拔掉原地生长的植物，铺设道路，海港周围的绿地明显比1941年少了。机器一天到晚连轴运转，叮当声和轰隆声响个不停。海军造船厂正在建设两个新的干船坞，巨大的4号干船坞就是其中一个，它的长度超过1 000英尺，配以重达50吨的龙门起重机。这台起重机会在很宽的轨道上往返于相邻的码头之间。挖泥船正在不断拓宽和加深福特岛和西湖周围的水道和锚地。1941年到1945年间，人们从海港底部挖出了约1 000万立方米的淤泥。

西边，施工队正在珍珠城半岛建设长长的仓库、铁路支线以及现代化的海滨码头。珍珠港的大部分燃油和柴油储备已被输送到基地北部混凝土建造的地下油库中。地下油库由管道连接，通往新建的巨型混凝土供油码头。基地周围的交通运输全靠58英里长的公路和一条窄轨停船滑道。牵引车在常规路线上拖着客车，类似于市政公共交通系统；通常车上会坐满军人和平民雇员。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受损的八艘战列舰里，有五艘已经得以修复归队。但“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和“犹他号”的修复工作还在继续。修复这些损毁的巨型战列舰是工程兵们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与修建大桥、水坝和运河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战列舰的船体被日军鱼雷炸开，有好几艘都沉到了港口的水底。为了让这些战列舰浮起来，将其拖到干船坞进行修复和重建，打捞

队首先得给舰体上的漏洞打上补丁，然后从内部抽出足够的水，扶正它们，使其以35英尺的吃水深度浮在水面上。扶正舰体之前，必须卸下数千吨的军需、武器和装备，同时清理舰体的碎片。封闭的船舱内会聚集有毒气体和易爆气体，可能会引发火灾或使人中毒，这是一个时刻存在的威胁。

进入受损战列舰内部的工人穿着橡胶靴和工作服，戴着便携式呼吸器。他们用沉重的战斗照明灯来提供光亮，通过连接在通气管上的电话线与地面保持联系。人们用强力抽风机给战列舰通风，但每当打开新的舱门时，扑面而来的硫化氢都能将人吹倒。战列舰中堆满了由海水和燃油混合而成的难以名状的黑色淤泥。遇到严重腐烂的尸体，人们就在水里将其收进帆布袋，拖到水面上，然后由戴着面罩的医务人员把它们转运到小船上。打捞队在一个冷藏室中发现了数吨腐烂的猪肘子和一拿就碎的成片牛肉。参与打捞的一名军官回忆说，清除腐肉是整个过程中“最让人恶心的工作之一”。最终他们发现，高压水龙能将腐肉粉碎成小肉块，而这些小肉块可以用汽油驱动的抽吸泵抽到船外，“这对夏威夷的海洋生物来说，绝对是极大的享受”。^[1]打捞队检查完后返回水面，发现自己浑身上下沾满了黑色黏液，只有用柴油才能洗掉。

战舰中的水被抽干后，内部的甲板和舱壁上还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清洗这些油腻的内壁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人们在旁边驳船的高压水枪中装上盐水和各种热的腐蚀性溶液，不断冲刷舱壁和甲板。这项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有时要持续数周才能将表面清洗干净。珍珠港的水不可避免地会因此受到严重污染。后来海水淡化厂无法再使用这些受到污染的水，只能从瓦胡岛的其他地方调水。

打捞工作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源，平民也加入了海军造船厂的队伍。工人几乎都是年轻的未婚男子，他们渴望接近前线，并希望得到较好的工资待遇，于是来到了夏威夷。很多人挤在海军造船厂那些匆匆搭建起来的房子里。“三号民房区”具备小城市中所有的基本设施，包括警察局、邮局、报社、棒球场、电影院和零售店。其战时人口高峰时达到

1.2万人，是当时夏威夷的第三大城市（继火奴鲁鲁和希洛之后）。[2]

包括海军和平民在内的专业潜水员，从事的是艰巨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检查、测量和修复水下部分的舰体损伤。他们要先了解被海水淹没的战舰内部的情况，然后打开防水门并进去，再将门关上，取出未爆炸弹药的引信，清理舰体碎片和士兵的尸体。在漆黑的环境里工作，只能凭感觉在沉没的战列舰内部行走。战列舰内满是淤泥，电灯也不管用，因为灯光只会反射回他们笨重的铜制头盔的小玻璃口上。这活儿太恐怖了。爱德华·C.雷默是一名海军潜水员，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自己在沉没的战列舰里工作的情形。他最害怕的就是在浸满水的舱室中碰到漂浮的水手尸体。他说在与这些尸体接触之前就能感觉到他们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将这种直觉形容为“一种总觉得周围有人的奇怪感觉”。[3] 1942年初，在沉没的“亚利桑那号”里寻找未爆炸的日本鱼雷弹头时：

我伸出手来探路，摸到了漂浮在头顶上的东西，似乎是个充气的大塑料袋。我把它推开时，感觉我赤裸的双手像穿过了一堆腐烂的海绵。我意识到这个“袋子”其实就是一具无头尸，顿时感到毛骨悚然。我紧咬牙关，用力将它推到了一边。这具尸体漂走时，它那干瘪的手指擦过我的橡胶工作服，那感觉就像死去的水手正在无声地哭泣，伸手向我求救。[4]

潜水员要对舰体水下部分的裂缝做精确的测量。岸上的人会根据尺寸制作合适的木材补丁，然后由潜水员返回舰内将其补在裂缝上。这些补丁无法做到完全挡水，但是潜水员会找木屑、麻絮、木塞子和沉船中能找到的所有其他能用的东西（床垫、枕头、衣服等）来填补缝隙。然后他们会用抽吸泵将水从打好补丁的战舰中抽出来。但海水还是会从临时修补的缝隙中漏进来，所以需要数百台抽吸泵同时工作，才能使舰中水位不再上升。

对于“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这些受损更为严重的战列舰来说，必须在周围修建围堰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围堰是一种围栏式的防水建筑。人们用8英寸厚的木板做墙，再用深嵌在港口混凝土地基中的钢板桩加固。负责监督工作的军官霍默·沃林说，这项工作相当于是沉没的战列舰周围建造一个“临时干船坞”。这是一项“艰巨且危险的工作”。^[5]数百吨的混凝土被浇筑到了港口底部。围堰靠近舰体两侧架设，留下两三英尺的间隙。先把围堰中的水抽干，然后修复舰体损坏部分，再把舰中的积水抽出，此时再拆掉围堰，就能把笨重的战列舰拖动，穿过东湖进入干船坞。

“俄克拉何马号”的问题更大，它翻转了150度，导致上层建筑插入了港口底部的淤泥中。只有龙骨和右舷底舱的一部分露在外面。工人和潜水员穿过战列舰底部的气闸室，进入战列舰内部，如同走进了幽暗的迷宫，上成了下，下成了上，甲板在头顶上，而舰体上部却被踩在脚下，所有的东西都上下颠倒。1942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特朗布尔戴上呼吸器，参观了“倾覆的战列舰中又黑又臭的锅炉间”。^[6]除了还有点废料价值，“俄克拉何马号”可以说已经彻底没用了，但为了让它占据的宝贵泊位重新为舰队所用，必须将这艘重达2.9万吨的战列舰扶正并移走。这艘战列舰先得翻转过来，才能漂浮起来，这个过程需要巨大的扭力。21台大传动比牵引绞车固定在福特岛的巨型混凝土地基上。重型钢缆通过牵引滑轮将绞车和焊在战列舰底部的垫板连接起来。每辆绞车能提供20吨牵引力，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人们又把潜艇式浮筒连接在沉没的战列舰顶部，利用压缩空气将埋在泥土里的上层建筑挖出来。1943年3月8日上午，绞车开始对钢缆施力。“俄克拉何马号”嘎吱作响，逐渐开始转动。绞车以每小时约3英尺的速度将战列舰往回拉。拉动扶正的工作持续了三个多月。1943年6月16日，“俄克拉何马号”已经基本扶正，只剩3度的倾斜。还要再花5个月的时间，才能将其打好补丁，让它重新浮在海面上。12月28日，这艘战列舰终于被拖入了新建成的4号干船坞。^[7]

海军少将威廉·R.弗朗是珍珠港海军造船厂的指挥官，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向参观者们介绍说，其实工人们并非只是修好了“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和“内华达号”等战列舰，而是几乎完全重建了龙骨以上的部分。这些翻新的战列舰变得现代化，并配上了新的装备，与1941年12月7日被炸弹和鱼雷炸沉的那些战列舰相比，在各方面都更高级了。提到“西弗吉尼亚号”时，弗朗将军自豪地说：“我们让它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就像牙医给病人拔蛀牙一样，我们也是从战列舰的底部彻底重建的。”^[8]

珍珠港遇袭两周年时，只有“亚利桑那号”还没有维修。因为潜水员证实它的龙骨已经破裂，工程师认为这艘巨大的战列舰不可能完好无损地浮起来。理论上来说，把它切割成几部分带上来还是有可能的，但这项任务会十分艰巨，花费也将远远超出它的废料价值。于是人们决定将它留在原地。如今它仍然安静地躺在那里。

1943年，火奴鲁鲁脏乱的旅馆街地区几乎每天都驻守着3万名军人和民防人员。夏威夷人向来乐善好施、热情待客，但是现在，他们的热情和善心快被耗尽了。中途岛战役后，这个阳光普照的小城市已不再受敌人攻击，开始有了安全感，军方的灯火管制和其他规定让火奴鲁鲁人感到越来越厌烦。防空人员不再每晚巡逻，海滩上的带刺铁丝网也已生锈，国民警卫队执勤时经常打瞌睡。

来访的军人中没有几个对这个城市有好感的。水手西奥多·C.梅森在传记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厌恶火奴鲁鲁，没有例外。”^[9]这个城市令人疲惫不堪，物价昂贵，异常拥挤。海军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说这里“跟彭萨科拉或圣迭戈一样，也是一个拥挤的海军城，阳光普照，到处都是水手和劣质酒”。他的一个飞行员同事是得克萨斯人，称火奴鲁鲁“跟阿马里洛^[10]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多了个海滩而已”。^[11]瓦胡岛还被戏称为“岩石”，人们一致认为（据当地流行月刊《太平洋天堂》

报道)“在这块该死的岩石上,人太他妈多了,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2\]](#)

成群结队的人身着白色和卡其色制服,乘坐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和高价出租车,在海陆军基督教青年会一站下车,涌上街头,寻欢作乐。这个破落街区的中心地带从“Y”形路口沿旅馆街伸到河边,霓虹闪烁,音乐喧腾,到处都是剥落的油漆,肮脏的人行道两旁布满生意惨淡的酒吧、灯火通明的游乐场和廉价的纪念品商店。大街上飘着一股走气啤酒和臭鱼的味道。啤酒很凉,鸡尾酒不但掺了水,卖得还贵,无礼的酒保一直在催男人们大口喝酒、续杯,否则,他会让你赶紧给其他顾客腾地儿。魁梧的夏威夷保镖负责治安,但是一旦碰上真正的麻烦,海岸巡逻队和宪兵们就会被喊来调解纠纷,将闹事的人拖走。人们排长队买热狗、爆米花、冰激凌和可口可乐,排长队文身,按摩,理发,玩弹球机,去射击场射击,去棒球练习场打棒球,打台球,或是竞相和草裙舞演员合影。15美分能买一碗日式猪肉面条,但顾客只能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边走边吃,一些人坚称所谓的“猪肉”其实是狗肉。6岁到12岁的亚裔小男孩赤着脚给人擦鞋,一次15分钟,他们在街上高声喊着:“嗨,哥们儿!”或者是“来擦鞋吧,伙计!”[\[13\]](#)一名军官回忆道,下午的旅馆街一般到处都能见到“休假中的戴白帽子的水手”。[\[14\]](#)

对夏威夷的零售业和商业地段来说,这场战争是赚钱的好时机。1941年到1943年间,岛上新开了8 000家企业,零售额增长了2 200万美元,增长率超过75%。租金暴涨,房地产价格飙升,银行存款增加了五倍。《太平洋天堂》的编辑在1944年5月写道:“1939年有288家餐馆,现在则有630家,但想要吃饭的话还是得排长队。”[\[15\]](#)当地经济一直以来都受外来白人精英支配,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却是零售商和餐馆老板,其中包括许多华裔、日裔、朝鲜裔和菲律宾裔商人。

当地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达成一致,战争期间允许有监管的性交易存在。1943年,火奴鲁鲁红灯区的15家妓院共雇用了260个妓女。[\[16\]](#)

这些妓院又称“猫屋”或“铃铛屋”（“按一下铃”），它们坐落在酒店街、河流路以及北贝雷塔尼亚大街上。妓院的名字起得很谨慎，例如“平房”“雷克斯”“利兹”“船锚”“布朗克斯”“彩虹酒店”等。一般下午舰队进港后，军人从楼梯处就开始排队，一直排到外面的人行道上，通常一等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每个顾客付费3美元，然后会被领进一间有单人床的小屋子。一个去过的男人回忆说，他一进去就有华裔老鸨催促道，“快点快点快点”；他最好快点脱衣服，因为3美元只够女人为他服务3分钟。女人一进门，就开始倒计时。3分钟后响铃，无论男人是否完事儿，女人都会站起身来径直走出房间，结束这次服务。

这种体验，既不愉快又有点侮辱人。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后来说：“男人与其去妓院，还不如用条死鱼对付一下。”^[17]但火奴鲁鲁的妓院从来都是门庭若市。据统计，战争时期，妓院平均每月顾客达25万之多。每个女人一天要接待50到100个客人，一年能赚2.5万美元。而妓院鸨母一年的收入能达到15万美元。地方官员对这行保持着密切的关注，这既是为了保证卫生状况，也是为了捞点油水。火奴鲁鲁的警察局将这些妓女以“艺人”的名义登记在册，还要从她们挣的钱中抽一部分据为己有；据说，每个女人每月要上交50美元来贿赂这些官员。^[18]若是她们拒交，警察缉捕队就会行使执法者的权力，替老鸨们恐吓、殴打或放逐不听话的姑娘。陆军和海军的医生每周都会检查这些女人的身体状况，还要求寻花问柳的军人去邻近的“防疫站”进行检查和治疗。^[19]

劳军联合组织在岛上设有51个俱乐部，为人们提供更健康的娱乐活动。鲍勃·霍普和阿蒂·肖等名人名流举办盛大的音乐表演，大乐队由受邀歌手组成，歌曲中间穿插着单人表演或舞蹈表演。劳军联合组织还会举办盛大的舞会，舞会上的男女比例一般能达到25：1。“劳军女孩”是“备受尊敬的”，因为她们很多是夏威夷的名门之后，陪同她们前来的女伴时刻瞪着一双警惕的眼睛。这些女孩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不在乎军衔、相貌和舞蹈技巧，对所有男士保持微笑，予以称赞。她们每晚要跳三四个小时舞，几乎不休息。每过两分半钟扬声器

中都会传出哨声，这时就可以交换舞伴了。

民防人员不得参与劳军联合组织的活动，而且不能享受只有那些穿军装的人享有的其他福利。年轻未婚男性的数量在1944年增加到了8.2万人，他们住在拥挤不堪的劣质住宅里，被牢牢地困在瓦胡岛的社会最底层。虽然工资比美国本土做同类工作的人高30%，但他们发现夏威夷的生活成本要比美国本土高60%左右。很多人身穿印着“aloha”（夏威夷问候语）字样的衬衫，不塞进裤子里，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外来的，但白人通常极其鄙视这种穿衣方式。无论公平与否，这些战时的工人被称作“流动雇农、入侵者和逃避兵役者”^[20]——他们是出了名的恶棍、赌徒、酒鬼，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军人看不起他们，房东不肯租给他们房子，警察时不时骚扰他们，任何种族的女人都不会给他们相处的机会。当地的卫生部门在报告中写道：“很显然，这个社区的战时工人中有一大批人情绪反复无常、嗜酒、患有精神病，或有变态人格。”^[21]

很多初次从美国本土过来的白人，尤其是那些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白人，会因为夏威夷普遍的种族宽容态度而一时感到无所适从。岛上的许多亚裔和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平共处。基地外的住宅区、公共交通和大多数零售店基本取消了种族隔离（尽管非裔美国军人住的还是隔离营房）。日裔夏威夷人是当地最大的族群，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们一直担心受到迫害，甚至担心情况可能会更糟糕，但到了1943年年中，很明显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忠于美国的。第442团全部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成，他们在意大利的表现英勇非凡，得到了夏威夷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和赞扬。

来自美国本土的白人原本以为来到这里以后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尊重和重视，结果却并非如此，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他从未感到如此震惊，”《太平洋天堂》的一位专栏作家评论道，“当他搬进他们的社区时，其他种族的人成了强势一方，他们盯着他上下打量，估摸他的社会地位，对他不屑一顾。”^[22]

由于战时夏威夷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跨种族的恋爱和婚姻得到社会认可，而在美国本土，两三代以后种族通婚才被接受。据当地统计，1943年和1944年，夏威夷32%的婚姻是种族通婚。华人、朝鲜人、日本人、夏威夷人、波多黎各人和菲律宾人之间通婚相当常见。几乎一半的白人男性娶了其他种族的女性，而9%的白人女性嫁给了其他种族的男性。白人男性和日本女性组成的家庭共有189个。^[23]然而，夏威夷的战时离婚率高达48%，几乎比美国本土高了三倍。^[24]

对于成千上万的美国军人来说，在战时的夏威夷待着的那段悠长时光，让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重新投入战争中去。海军战斗机飞行员比尔·戴维斯在毛伊岛滞留了好几个月，他说这段时间就像在休长假。整天就是打打网球，悠闲地开开飞机，练习一下飞行技能，中午去军官俱乐部吃顿午饭。“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太棒了，但我们开始怀念约翰·保罗·琼斯的座右铭：‘还没动真格的呢！’”^[25]夏威夷绝美的自然风光都开始让人感到乏味和压抑了。人们把那些长时间待在岛上的人称为“傻乐”或“菠萝疯”。最好的解药就是把他们派到西方去参加战斗。一名海军预备役上尉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调侃道：“97磅重的二等文书军士，在坐过三次火奴鲁鲁的公交车之后，哪怕随身武器只有一份卷起来的《广告报》，都会欢天喜地地跳到日本人的碉堡中去。”^[26]

夏威夷的核心人物尼米兹将军住在马卡拉帕山顶部那座气派的白房子里，他那赫赫有名的盟军战区司令部占据了山顶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地方。马卡拉帕山实际上是一座死火山的火山锥，山上绿草如茵，安静祥和，最近才建起了一些房屋。日本园丁负责照顾那些新种植的树木和原生植被，它们还未长得很高，不会影响观赏西边珍珠港的全景。马卡拉帕山为海军及陆战队提供了住处，将军们住独栋，校官住平房。预制装配式房屋在山上均匀分布，建筑设计千篇一律。街道以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海战命名，一些太平洋战争早期的战役也被拿来命名了。为了防止敌人直捣最高指挥部，这个街区对外一直是严格保密的，“马卡拉帕”这个

名字在整个战争期间从未获准在公文或公报中出现。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离尼米兹的住处约1/4英里。那是一座普通的二层办公楼，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样设计是为了不引人注目。早上，尼米兹和他的参谋长雷蒙德·埃姆斯·斯普鲁恩斯会步行去上班，8点之前抵达二层（被他们叫作二层“甲板”）西南角的两间相邻的办公室。

早上9点，参谋们会挤在尼米兹的办公室里，坐在折叠椅上参加每日的晨会。他们会听简报，分析刚刚了解到的前一天晚上的战况，然后讨论接下来的行动和其他重要事务。1943年，随着太平洋舰队不断壮大，在尼米兹每天迎接新到港军官的“开放”时间里，前来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尼米兹似乎很喜欢跟这些人会面，他在和舰长们随心所欲地交谈时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尼米兹的副官阿瑟·拉马尔这样评价他：“他喜欢跟这些人见面，不论是指挥坦克登陆舰的年轻中尉，还是指挥全新战列舰的资深舰长，他都一视同仁。他爱跟人交流！”[\[27\]](#)

在这方面，尼米兹和罗斯福很像。1940年至1941年尼米兹在华盛顿担任航海局局长时，罗斯福对这位将军有了很深的了解，后来任命尼米兹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在跟各级下属互动时，这个满头白发的得克萨斯人备受欢迎，他自己也因此充满干劲。作为领导人，他待人和蔼，充满人情味。敬礼后，他会习惯性主动握手并自我介绍：“我是尼米兹。”他喜欢那些略显低俗的故事，有趣但从不鄙俗；他经常用这些故事来消除人们意见不一致所产生的紧张气氛。尼米兹能记住老熟人、同船水手、军官和士兵的情况——他很少有记不住的面孔，而且在提到某个人的时候经常能列举这个人入伍后的一些细节，这种能力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他能做到这一点可不仅仅是因为他记忆力好。尼米兹从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存有一份索引卡片，卡片上整理了许多人名和相关信息。他的参谋负责不断更新这些卡片。“视察舰船和岛屿时，”拉马尔上尉回忆说，“他喜欢叫出那些军官的名字。他之所以能叫出这些名字，是因为每次访问之前，我们都会准备好卡片，而且通常我会站在将军身后给他提示。所有人都喜欢他表现出的这种人情味。”[\[28\]](#)

拉尔夫·帕克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另一名参谋，他回忆说司令的工作日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同程度和级别的会议”。^[29]来开会的可能是一个人，刚刚从作战区回来；也可能是一群人，挤满整个房间，椅子不够用，低级军官只能靠墙站着。尼米兹很乐意倾听，并且不介意有人提出异议。他没有效仿金的铁腕管理风格，也不像麦克阿瑟那样喜欢与阿谀奉承的人待在一起。即使争论越发激烈，尼米兹也泰然自若。直到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提出来并被记录下来，他才会做决定。正如拉尔夫·帕克所说：“拿破仑式专制是让自己凌驾于所有下属之上，没人敢发表任何意见，只能随声应和‘是，是，司令’——这种专制观念不再可行了。听取下属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去执行命令的下属的意见是非常必要的。”^[30]

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离下班的时间还早，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通常就离开办公室了。他们两人都非常喜欢剧烈的户外运动，登山时经常会轻松甩下那些加入他们的年轻军官，率先爬上马卡拉帕山的山顶。尼米兹好胜的性格还表现在网球场上，他和拉马尔打，从没让这个比他年轻的人赢过一局；而在营地外掷马蹄铁时，他用哪只手投掷都能赢过斯普鲁恩斯。舰队的军医告诉他，射击打靶可以有效缓解压力，于是尼米兹就在办公室外面建了一个射击场，并邀请军官们跟他一起射击。他们用的是0.22英寸和0.45英寸口径的打靶手枪，要是打赌的话赌注不超过10美分。“他很快就成了一名狂热的神射手，”拉马尔说，“我们每天都会射击数百发子弹。估计等到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至少会打完50万发子弹！”^[31]

星期日下午，尼米兹、斯普鲁恩斯和一群军官会翻过山峰，来到一处僻静的海滩。这个海滩位于瓦胡岛北岸，他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绰号，叫“前列腺休息区”。他们通常会在海滩上徒步走两英里，然后在水里游上很长一段距离。1943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尼米兹邀请了几个重要的情报人员参加这里的“远征”。汤姆·戴尔是一名密码分析专家，曾在中途岛战役开始前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他得知尼米兹也邀请了自己

时，觉得受宠若惊。他特地为这次旅行借了条泳裤。去的时候，他坐在后座上，挤在两位将军中间。尼米兹之前受了伤，他说自己不想登山和游泳了，只想坐在海滩上。“我非常愿意和他坐在一起晒太阳，”天天在无窗的地下室工作的戴尔可不是什么运动健将，“但斯普鲁恩斯建议我们沿沙滩散散步……那哪是散步，简直是一场马拉松。他健步如飞。”游泳返回时，戴尔坚持游了大约1/4英里。他摇摇晃晃地回到海滩，皮肤严重晒伤，泳裤磨破了他的大腿，他声称“受了工伤”。[32]

尼米兹不喜欢张扬，但作为战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是一个公众人物，需要承担类似民选官员一样的责任。他经常身穿白色制服、戴着白色手套出席各种公共场合和招待会。他常常出席总督府的晚宴。他在巡视战列舰、给人戴勋章、在士兵娱乐中心和草裙舞女孩跳舞、戴着“用小蔬菜编的”花环在火奴鲁鲁的胜利菜园展览中检查胡萝卜时，被新闻摄影师抓拍过一些照片。[33] 他会参加夏威夷上流社会举办的宴会，宴会上女人们穿着晚装，穿白衣服的侍者端着托盘为客人提供酒水。尼米兹身后总是跟着戎装笔挺的海军警卫员，这些人都是根据身高和相貌严格挑选出来的。他有一辆灰色轿车，上面飘着四星司令旗，车身打了蜡，闪闪发光。1944年1月，他作为贵宾参加了在莫阿纳公园举办的“得克萨斯圆桌”野餐活动，另外有4万名得克萨斯士兵也参加了此次野餐。有人拍到微笑的将军和水手投马蹄铁，以及手握得克萨斯州旗一角的画面。[34]

晚上回到家后，他会和斯普鲁恩斯喝几杯稀释的鸡尾酒来放松一下。这种酒又称老式鸡尾酒，由威士忌和苏打混合而成，装在高脚杯里，杯中加少量酒和大量冰块。在马卡拉帕大道37号的寓所里，两位将军经常会坐在扶手椅上，让留声机里缓缓流淌出的古典交响乐陪伴他们度过漫长的夜晚。菲律宾裔管家会关掉灯，拉开遮光帘，让夜晚的空气进入室内。他们偶尔会讨论战争的话题，但更多的时候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到1943年夏天，斯普鲁恩斯作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参谋长的14个月任期即将结束，这段时间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相邻的办

公室里工作，下午经常一起徒步走上几英里——他们对彼此的想法一清二楚。他们肩负重任，要保卫数十万士兵的生命，但随着战事不断向敌方的家园逼近，伤亡人数将不可避免地上升。作为尼米兹最信任的下属，斯普鲁恩斯很快就会得到海军最高远洋指挥权，让战火跨越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向西蔓延。

二十多年后尼米兹去世时，斯普鲁恩斯告诉记者，恐惧是人的本性，即使是最勇敢的人，想克服恐惧也得费点力气。但尼米兹却是个例外：“我认识的无所畏惧的人没有几个，他是其中之一。”[\[35\]](#)

1943年6月1日，重达27 100吨的新一代航空母舰静悄悄地驶入珍珠港，逐渐接近福特岛北部的锚地，从倾覆的“犹他号”战列舰旁边驶过。人们一直迫切盼望着“埃塞克斯号”（CV-9）的到来。一支海军乐队和一个规模比往常更大的草裙舞团在码头上等待着。马卡拉帕山太平洋舰队总部的顶层“甲板”上，一群军官轮流拿双筒望远镜向远处眺望。

与旧式的舰队航母相比，“埃塞克斯号”的操控性要好得多，但唐纳德·邓肯舰长看到有领航员指挥这艘巨舰驶入拥挤的珍珠港，还是松了一口气。[\[36\]](#)“埃塞克斯号”长872英尺，飞行甲板的宽度为147英尺。舰体的大小是专为通过巴拿马运河而设计的，但也只能勉强通过而已——两周前，为了能使它顺利通过，船闸顶部的好几个探照灯塔和操舵室被拆除或是缩小了体积。“这样做很有必要，”邓肯说，“因为我清楚地记得，穿过运河的船闸时，从驾驶室的一侧稍微往外探一下身子就能摸到闸墙上部的边缘，另一侧的情况也是如此。”[\[37\]](#)

邓肯上一次见到珍珠港是在1942年3月，当时日本的偷袭所造成的破坏景象在港上随处可见。15个月后，“为了扶正、清理和重建战列舰，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海军也日益壮大，所有的损伤都已得到修复；港上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忙碌又自信，兢兢业业地工作着”。[\[38\]](#)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更多大型和小型航空母舰将进入珍珠港入港航道。新的“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以前几年在珊瑚海战役和中途岛战役中战毁的航空母舰而得名，它们与“埃塞克斯号”是以同样的规格修建的，分别于7月和8月到达珍珠港。第四艘同级航母是新的“大黄蜂号”，它会在当年年底到港。海军计划在1945年之前造出24艘这样的一线航母，让它们下水服役。1.1万吨的轻型航母“独立号”（CVL-22）由原本打算作为轻型巡洋舰的舰体改装而成，于7月抵达珍珠港，不久之后其姊妹舰“普林斯顿号”和“贝劳伍德号”也将陆续抵港。几艘更小的护航航母也于那个秋天加入了太平洋舰队。尽管速度太慢，无法与新型的快速航空母舰协作，护航航母在飞机运输补给以及为两栖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方面还是很有价值的。

新型的艾奥瓦级快速战列舰将于1944年抵达太平洋地区，但配有16英寸口径舰炮的两艘科罗拉多级战列舰，即“科罗拉多号”和“马里兰州”，已到达珍珠港，装上了新型雷达系统和额外的高射炮架。巡洋舰、驱逐舰、护航驱逐舰、运输舰、加油船、扫雷舰、布雷舰、移动干船坞、医疗舰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战斗舰艇和辅助舰艇都涌入了珍珠港。1942年，美国政府启动了一项价值十亿美元的紧急造船计划，这个计划建造了超过25万吨的两栖登陆舰，种类多样，小到希金斯登陆艇，大到300英尺长的坦克登陆舰。随着舰队的壮大，珍珠港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一轮大规模进攻正在酝酿之中。

埃塞克斯级航母在设计时避免了以往舰队航母所有的缺点，在各个方面都优于先前的航母。这种航母可装载96架舰载机，速度可达33节。大部分设计工作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吉姆·拉塞尔（他最终成了一名四星上将）于战前在海军航空局任职期间完成。拉塞尔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航母方面的经验，他要求制造出新的弹射器和制动装置，更多更好的消防设备，以及新的维护器械和储存设施。他把三台升降机设置在了离航母中心线尽可能远的地方，这样飞机在机库里就拥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能够更迅速、更灵活地起飞降落。较具争议的是，拉塞尔设计了一个超大的矩形飞行甲板，一直延伸到艏楼。工程师们警告说，飞行甲板

向前突出的各角由工字形钢梁无力地支撑着，很容易在恶劣天气中垮塌。拉塞尔承认这一点，但他认为只要能建造“像样的跑道”，冒这样的风险就是值得的。^[39]（这两种观点都是对的：在极端天气下，埃塞克斯级航母飞行甲板的某些部分确实有所损坏，但这种损坏很容易修复，所以总体来说这种设计还是合算的。）

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设计理念是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轻巧。邓肯舰长说，这一设计的结果是它们能非常灵活地随舵转向。“当你加速时，这些大船会像飞起来一样，与一些笨重的老式航母完全不同。我认为这体现了设计足够上心时所能取得的成果。”^[40]

为了强调飞行员待命室的重要性，拉塞尔跟上级“据理力争”，坚持把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的待命室建得比老式航空母舰上的更舒适。里面要有空调，光线要好，并且要尽量靠近每个中队的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处。拉塞尔想在待命室里装上真皮大躺椅，正对着导航板和连接空情标图的电传打字机，这样每位领航员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工作了。他认为，只有在“平静和舒适的环境中，而不是警觉地站在老式航母那种光线不好、通风不良的待命室中”，人们才能更有精力，更高效地工作。^[41]他的观点在“埃塞克斯号”及其姊妹舰下水服役后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新的航空母舰配备了新一代的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到1943年6月，格鲁曼F6F“地狱猫”战斗机已经取代了过时的F4F野猫式战斗机。“地狱猫”战斗机非常大，光战斗机的重量就达1 200磅，但它使用的是普惠公司的高达2 000马力的引擎，爬升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3 500英尺，最大航程接近1 000英里。驾驶舱与机身巧妙贴合，配有重型装甲。F6F配置了6门0.50英寸口径的电动机枪，载弹量是F4F的两倍左右。

野猫式战斗机在爬升速度和机动性方面落后于日本零式舰载战斗机。在1.4万英尺以下，“地狱猫”战斗机的爬升速度与零式战斗机不相上

下，而在更高的地方，它的速度超过了零式战斗机。“地狱猫”的水平速度和俯冲速度在任何高度都优于零式战斗机。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它时，以为这种巨型蓝色飞机是轰炸机。事实上，这款新的格鲁曼飞机确实可以携带4 000磅的炸弹或火箭，有时也确实被当成战斗轰炸机来使用。比尔·戴维斯在1943年8月首次目睹了“地狱猫”战斗机的真容，他写道：“这架战斗机就是个怪物。”他的第19战斗机中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斯阿拉米托斯海军航空站对F6F进行了测试。战斗机引擎一发动，就把戴维斯吓到了，他觉得这很不可思议。“火焰从排气管中喷出来时，逆火如雷鸣般作响。一个水手拿起灭火器跑向战斗机，但是很快引擎就转了起来，发出巨大的轰鸣声，火焰随之消失。通过油门以及我的耳朵和身上每一根战栗的神经，我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戴维斯让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检查磁电机的情况，并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他有点担心，然后鼓足勇气，推下了节流阀。在此值得引用一下他对第一次试飞的描述：

声音美妙极了。反应非常灵敏。调整大马力引擎的扭矩后，我开往跑道尽头。我瞥了一眼仪表，不敢相信我只使用了发动机一半的功率。我猛加油门，功率和速度飙升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把操纵杆轻轻往前一推，尾翼立即就抬了起来。稍微往后一拉，战斗机便起飞了。我立即按下开关，把轮子收起来，所有看着的人都觉得我酷极了。飞到机场尽头时，我已经身处500英尺的高空了。这东西真的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我真的飞起来了，而且我驾驶的飞机上有六架0.50英寸机枪，此刻没有装弹药，不过我知道我已经做好了与日本人作战的准备。我一定会一雪前耻。

我把自己会的所有操作都在飞机上尝试了一遍，然后又试了几个新动作。这架飞机体形这么大，反应却能如此灵敏，着实令人吃惊。驾驶它的感觉就像驾驶一架小型战斗机。在进场时，我来了个急转弯才降落，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看。飞回来后，我从跑道的起点上开始减速。我拉起襟翼，让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上滑行，这一刻

我知道我到家了。我一直都在接受这样的训练，现在我已准备就绪。[\[42\]](#)

为了让野猫式战斗机退役，并为迅速壮大的航母舰队配备新战斗机，海军航空局给格鲁曼公司施压，要求加快生产速度。1943年7月，位于纽约长岛贝思佩奇的格鲁曼工厂生产出250架“地狱猫”战斗机；到1944年，产量达到每月500架。[\[43\]](#)但是格鲁曼公司在生产备用零件方面比较落后，当1943年秋季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时，海军航空局采取了极端措施，那就是在积压的订单完成之前不再接收新送来的飞机。[\[44\]](#)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是道格拉斯公司开发的，战绩显赫，曾在中途岛战役中击沉四艘日本航空母舰，也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充当主力，但它早该退役了。颇受大家喜爱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60英里，低于TBF“复仇者”鱼雷轰炸机和新型“地狱猫”战斗机，载弹量（最多配备1 200磅弹药）也远远不够。但下一代轰炸机，也就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SB2C“地狱俯冲者”（SB2C是“Scout Bomber, Design Number 2, Curtiss”的缩写，意为“寇蒂斯2号设计侦察轰炸机”），在刚开始服役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一年多后才被编入太平洋舰队。早期的SB2C纵向不稳定，结构脆弱，尤其表现在尾翼和主翼上，最初的几次试飞也都以坠毁告终。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调整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航空母舰上试飞时，SB2C的起落装置经常失灵，尾钩也经常钩不住阻拦索（或者更糟：钩住了阻拦索，尾钩却从机身中被拔了出来）。这种飞机很容易出现熄火、燃料泄漏、液压故障、电气短路和轮胎漏气等问题。

驾驶杆不易操控，副翼反应迟钝，这款飞机对驾驶技术要求很高。飞行员不信任它的俯冲能力，他们更倾向于以牺牲准确性为代价直接在高空投弹。“地狱俯冲者”在低速飞行以及在航母上着舰时尤其不好操纵。飞行员给这种飞机起了各种各样的有损形象的外号，如“膀胱”、“大尾巴怪兽”、“少尉终结者”和“二级王八蛋”（Son of a Bitch 2nd

Class)。无畏式轰炸机的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厌恶SB2C的一切，甚至包括它的名字。在他看来，这种飞机绝对是被那些“公关人员”选中的。海因斯写道：“‘地狱俯冲者’名号挺响亮，却没有真本事，就像沙滩上的肌肉男，空有一身肌肉却没胆量。这就是一台又长又丑的机器，侧面平平的，尾翼又圆又大。……我们都对SB2C心怀畏惧，驾驶时总觉得它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炸。”[\[45\]](#)

哈罗德·比尔是一名资深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刚刚奉命指挥第2轰炸机中队，他在1944年初对“地狱俯冲者”进行了试飞。他喜欢这款载弹量大、速度快的飞机，而且自信能驾驭它，但他为中队里那些经验不足的飞行员感到担心：“我的第一反应是，寇蒂斯公司生产的‘怪物’会给我的中队带来麻烦。与性能稳定、要求相对较低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相比，这种飞机对飞行员的操纵能力以及俯冲轰炸的能力要求很高。”[\[46\]](#)

但是，航空局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在1943年底决定不顾风险，将SB2C投入使用，并向航空母舰和中队施压，让他们配合。这种飞机虽然不被看好，驾驶过程中没有丝毫乐趣可言，但它确实有一些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不具备的优点。它的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295英里，因此能够与其他舰载机协同作战，它还拥有大得多的载弹量（飞机内部炸弹仓可配备2 000磅炸弹，两侧机翼各可挂载一枚500磅炸弹）。与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不同，“地狱俯冲者”拥有可折叠机翼，这是新一代航母舰载机必不可少的特征。尽管早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SB2C很快被制造出来，而且产量能够满足需求。海军少校赫伯特·赖利是海军航空局的一名规划师，他说：“这种飞机很复杂，保养也很麻烦，但是工厂有能力把它给大批量‘弄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制造能力。钱从来不是问题，那时我们总能弄到钱的。问题是美国工业生产飞机的能力。”[\[47\]](#)

1944年年初，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寇蒂斯公司每月能生产出300多架“地狱俯冲者”，而到了1944年晚些时候，阿克伦的古德伊尔公司也

开始拿寇蒂斯的设计图生产该飞机。^[48]最终一共有7 140架“地狱俯冲者”生产出来。随着俯冲轰炸机中队对“地狱俯冲者”的操纵越来越熟练，他们渐渐熟悉了它的特性，甚至开始反感那些针对“地狱俯冲者”的批评。尽管有缺点，但1944年和1945年SB2C确实对敌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近40年来，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当政起，纽波特海军战争学院的分析专家就一直在为有可能爆发的对日战争进行研究与准备。“橙色”和“彩虹”作战计划接连实施，海军打算穿过太平洋中心地带，朝西发动海陆两栖进攻。美国太平洋舰队将从珍珠港出发，在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不断进行突击。突破日本的“外围防线”后，舰队将遭遇并需要摧毁日本的主要战线。海军的决定性胜利会让这场战争走向终点。日本在亚洲大陆和南太平洋侵占的领土也将被夺回。由于无法进口原材料，日本的经济将会崩溃。最终可能需要入侵日本，也可能不必，但无论如何，美军都将取得胜利。

进攻计划的几个版本都在华盛顿海军部的架子上静静放着。很显然，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海军和其他军种暂时缺乏必要的海陆空力量，无法于1942年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到1943年甚至1944年，所需的军事力量也不一定能集结起来。但海军始终抱有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欧内斯特·J.金的观点）：实行“橙色”作战计划中的战略，才能最终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美军需要从夏威夷向西进攻，直击日本在中太平洋占领的岛屿。这次攻击将以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为主力，陆军和陆军航空队负责辅助。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海军将领享有指挥权，麦克阿瑟不参与指挥。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场攻击应在**何时**发起。

很明显，金想尽快开始行动。他竭尽所能，将所需的兵力都交给了尼米兹。像往常一样，他的做法遭到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英国人想要集中所有可用的盟军兵力击败德国。麦克阿瑟也不同意，他想经菲律宾进攻东京，而不是从北方发起攻势。但最终，金成功说服了参谋长

联席会议的同僚们，并赢得了他们统一的支持。威廉·莱希在漫长的海军生涯中直接参与过“橙色”和“彩虹”计划的制订工作，他是金坚定的盟友。乔治·马歇尔很担心南太平洋的局势，决心让日本一直处于守势。1942年年底，金暗中说服马歇尔，让他认识到了马里亚纳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马里亚纳群岛正好跨在连接日本本土和资源丰富的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上，而且可以为陆军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提供合适的机场，这种轰炸机将于1944年入役，能携带1万磅的炸弹，作战半径为1 600英里。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关岛和天宁岛，重型轰炸机能够袭击日本的重要人口中心和工业区。“我最终成功地让马歇尔明白了我的苦心。”战后金这样写道。[\[49\]](#)

1942年年初和年中的盟国军事会议上，英国军方领导人曾希望马歇尔和美国陆军同意他们的观点，在太平洋地区实施最低限度的纯防御性战争，直到最终打败德国。但最高指挥官于1943年1月在法国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进行会晤时，马歇尔和金明显已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往太平洋增派兵力。

1月14日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安发营（Anfa Camp）举行第一次会谈，马歇尔提议将“盟军的部队、舰船以及军火的70%分配给大西洋战区，30%分配给太平洋战区”。[\[50\]](#)马歇尔讲完后，金也立即这样提议，两人无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金说，据他估计，盟国当时只投入了“相当于我们总资源的15%来抵抗太平洋战区的日军”，他们投入资源的比例“甚至阻止不了日军巩固其防线，最终只会造成难以解决的问题”。[\[51\]](#)

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不同意金的看法。他早就给金贴上了“不可挽救的反英者”和“太平洋优先倡导者”的标签，而这个粗鲁的将军显然把乔治·马歇尔吸引住了。布鲁克想知道，美国人是根据什么计算出这30%的比例的？金的回答有些站不住脚，他说这“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确切的计算”，但无论如何，15%的资源只够勉强守住盟军在太平洋的战线，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布鲁克当时保持了沉默，但随后

在日记中写道，以这样的数字解决战区间分配问题“根本不科学”。^[52]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有正式会议记录的，但官方的措辞平淡而谨慎，不痛不痒，以掩饰激烈辩论中的潜台词。英国人已经丧失了太多亚太地区的领土，他们想要夺回所有权。在马来亚战役中，他们遭受了尤为惨痛的羞辱；为了赢回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声望，英国人必须在击败日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在打败德国之前，英国对太平洋战区难以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贡献。如果美国过早包围并逼近日本本土，那么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就没什么战略意义了，这不利于大英帝国未来的发展。但欧内斯特·金对大英帝国的未来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甚至对英国海军力量的衰落表现出了一点不合时宜的兴奋。

布鲁克爵士在日记中吐露心声，说他很厌恶“精明又有些傲慢的”金将军，因为他的目标似乎是“全力以赴对抗日军，而不是按照计划行动”。^[53]那天晚上吃饭时，布鲁克饶有兴趣地看着金一杯一杯地干下去，直到“红光满面”。金开始变得口齿不清，一边做手势，一边向丘吉尔尖声抗议，弄得首相很尴尬。^[54]两天后，新一轮艰难的谈判结束了，此时布鲁克已非常疲惫，他总结道：“这场谈判既缓慢又令人心生疲倦，需要极大的耐心。我们不能着急，不能催促他们，要让他们接受我们提出的策略，得慢慢来。”^[55]

投入太平洋战区的兵力只是他们争论的问题之一。马歇尔的看法与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一致，其他参谋长也多多少少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只有采取“围歼”行动，跨过英吉利海峡，直接向欧洲大陆进军，才能打败德国。英国担心在法国北部受挫，于是想在地中海地区采取新的军事行动。1942年，丘吉尔和他的将领们曾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强烈反对，成功说服罗斯福总统支持他们进攻北非（“火炬”行动）的提议。马歇尔仍为那次逆转感到闷闷不乐，现在他想让他们坚定不移地承诺，于1943年夏天执行“围歼”行动。英国人拒绝对“围歼”行动的具体日期做出承诺，并对该行动是否适合在1944年以前实施表示怀疑。但是，他们

还是要求立即在英国集结力量，以便抓住机会，在东线的红军占据上风、德军即将失败之际，立即执行“围歼”行动。与此同时，他们想在地中海地区继续开展行动，也许会进攻意大利。马歇尔不太赞成向南方进攻的提议，他认为这会造成“主战场”的转移，并会像“抽水机”一样将兵力从“围歼”行动中调走。 [56]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记录片段展示了双方观点分歧的实质，还表明金和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区重要性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金将军表示，日本正在补充原材料，巩固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沿线一带的内部防御圈。

艾伦·布鲁克爵士想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做到何种程度才能阻止日本挖壕固守。他担心，如果扩大行动，就难免会与日本全面交战，而我们肯定没有足够的资源这样做，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和德国死战。

马歇尔将军解释说，为了阻止日军侵略的脚步，必须先发制人。例如，有必要在新几内亚地区将日军击退，防止他们攻下莫尔斯比港。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动用一切手段，增强岛上的兵力。瓜达尔卡纳尔岛也是一样。必须采取攻势，夺取该岛。否则，就只能靠消耗战来阻止并拖垮日本了。这个过程很难暂停下来，必须持续不断地削弱日本。

查尔斯·波特尔爵士 [英国皇家空军总参谋长] 问道，难道不可以守住目前的战线，然后在日军试图突破防线时给予其沉重的打击吗？日军仍在持续进攻，由此可以看出，盟军已经将日军往后推了很多，不然的话他们会侵占更远的地方。

马歇尔将军提到了美方对太平洋地区的承诺和责任，特别提到各个海岛上的驻军，并说绝不能扔下他们中的任何人不管。他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允许其他岛屿像巴丹半岛一样沦陷。

艾伦·布鲁克爵士表示，战争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必须重新意识到“德国优先”这一基本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他坚信盟国无法同时击败德国和日本。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已经得出结论，应集中兵力进攻德国。他认为，考虑到距离问题，首先打败日本是不可能的，如果试图那样做，结果将是输掉这场战争。

马歇尔将军表示，在他看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是想要我们确保把敌军拖在地中海地区，同时保证英国有足够的兵力，利用德军从法国撤兵或是士气低沉的机会攻打德国。他推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更希望将军队留在英国，等待机会出击，而不是利用这股力量在其他地方持续展开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这些兵力可用于太平洋战区的进攻。

艾伦·布鲁克爵士表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肯定不想让军队困守欧洲，不去执行任何任务。然而，在准备期，第一批由美国抵达的军队无法用来有效对抗敌军；必须先集结一定数量的兵力才能投入战斗。他的观点是，我们首先应该将所有力量用在打败德国上。这一战略观点集中体现在英国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文件

(C. C. S. 153/1) 的第二段(2c)中，它指出我们原则上同意美国在太平洋实行的战略，“前提是这个战略的实行不会妨碍我们尽早打败德国”。

金将军指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述表达：无论在太平洋采取何种行动，都会影响到我们尽早打败德国的步伐，因此在太平洋战区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查尔斯·波特爵士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英国一致赞同持续对日本施加压力。他们可能误会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思，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应该将主力留在太平洋还是英国。英国认为要想在不久的将来打败德国，在地中海地区开战比在法国北部开战更有胜算。

马歇尔将军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在地中海地区陷入遥遥无期的战事。他希望法国北部能成为对抗德国的主战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

金将军说，我们在太平洋多次身处险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保持对德和对日兵力的平衡。我们必须在太平洋留有足够的兵力，以便能对日本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势。……他十分确信……这种军事行动的细节必须留给在战略上对太平洋战区负责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他认为不该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做此决定。

布鲁克想要了解太平洋地区的最新西进动向，因为他害怕地中海的舰船和其他资源会被调走。他请求“推迟”任何绕过拉包尔并直接进攻特鲁克群岛的决定。拉包尔落入盟军手中以后，布鲁克想将南太平洋的剩余兵力转移到地中海地区。金回答道，麦克阿瑟所在战区的所有可用的兵力都需要交给尼米兹，好占领马绍尔群岛。此外，他补充道：“单从后勤上来说，要将兵力从太平洋战区转移到欧洲战区也是不可能的。”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提出的最终建议，采取了稍微偏向美方的折中方案。盟国的目标是在1943年年底之前夺取缅甸和拉包尔，但条件是“相应的行动不能……让同盟国错过在1943年对德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任何机会”。只有在利用原先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兵力占领拉包尔以后，美军才能对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在同样的问题上分歧依旧。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布鲁克在日记中透露，他很害怕重新提起争论已久的问题。“我在卡萨布兰卡得到了太多教训。协议可以写在纸上作为保障，但如果内心对此并不赞同，他们很快就会再一次违反协议内容！”[\[57\]](#)

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不打算就太平洋战争的规模做出任何让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5月13日在铺着华丽大理石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的董事会议室召开，会议伊始，美国人就语气强硬。莱希将军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主席，直截了当地向英国宣称：任何限制美军在太平洋战区自由行动的规定“都不会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接

受”。他补充道，如果美国在对日战争中局势意外逆转，他们将把兵力调往太平洋战区，“即便以推迟打败德国为代价”。[\[58\]](#)

5月21日星期五上午，金花了很长时间介绍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最后分析了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管采取哪条路线，”他总结说，“马里亚纳群岛都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处于日本的交通线上。”[\[59\]](#)

布鲁克压制住内心的愤怒，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论点。后来他在日记中抱怨金想方设法“钻空子，尽一切可能往太平洋战区转移军队！”[\[60\]](#)但是英国真正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很少，所以在太平洋战区不具备调整战略的资格。虽然没有明说，但莱希、金和马歇尔都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太平洋战区现在由美国负责。毫无疑问，他们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以及行事作风来对抗日军。在“三叉戟”会议的最终文件中，美国的战略建议大多获批，其中包括“占领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的建议，但里面并未提到麦克阿瑟攻击拉包尔的确切时间。[\[61\]](#)

现在盟军最高指挥部已经正式批准在太平洋地区发动两场战役，这两场战役将在赤道南北两侧同时进行。但是，现在尼米兹的手头上缺少能够在太平洋中部作战的海军航空兵或者说航母空中力量，而该战区的陆军部队还需要额外数月的两栖训练才可以满足进攻要求。哈尔西在其南太平洋司令部要求获得援军，以开展在所罗门群岛中部实施的作战行动。即便如此，金依然希望这场太平洋战役能够有一个确定的截止日期。6月10日他告诉其他参谋长：“为了让我们的进攻行动取得良好的势头并保持下去，所有的区域都必须把时间安排定下来。”[\[62\]](#)四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尼米兹做好进攻马绍尔群岛的准备，出航日期暂定为1943年11月15日。麦克阿瑟将适时地派第1陆战师加入作战行动中，与此同时，哈尔西手下的绝大多数海军和两栖部队也将转移到珍珠港。参谋长们一反常态，开诚布公地承认确定出战日期的做法有些专断——

但是不设置最终期限，“就无法对整个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行动做出安排”。[\[63\]](#)

不出所料，麦克阿瑟非常愤怒，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要执行“车轮”行动，任何部队和舰船都不能从他的战区转移到尼米兹的战区。事实上，在突袭拉包尔、特鲁克群岛和其他南线日本基地的过程中，麦克阿瑟想要得到（后来也确实得到了）太平洋舰队的新型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全面支援。同样，哈尔西也急于从南太平洋地区撤出飞机，用来支援赤道以北的军事行动。6月25日，麦克阿瑟警告尼米兹，将航空队主力从拉包尔调走，“会让我们在这场战役可能最关键的阶段错失获胜机会”。[\[64\]](#)

如果得不到南太平洋战区部队的支援，1944年初之前尼米兹就无法真正解决马绍尔群岛的问题，为此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作战计划参谋建议他对此事要有耐心。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应该等一支大型埃塞克斯级航母舰队到来以后再发动新的进攻，这支舰队作为先头部队，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洋，击退敌军陆基轰炸机的空袭。等到了1944年2月或3月的时候，规模大幅增加的第5舰队便可轻而易举地驶入马绍尔群岛，同时进攻该群岛中的四五个规模最大的日军基地。如果日本舰队出来对战，快速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将会信心满满地迎战，并且乐意奉陪到底。

但是金想要在1943年就采取行动。他坚持认为在最后进攻拉包尔**之前**，需要在北线发动攻势，这样敌人就无法集中兵力防御西进先头部队任何一侧的进攻。年底之前，中太平洋的某些敌占区必须收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对两个相互冲突的建议进行了讨论。约翰·亨利·托尔斯中将（太平洋舰队航空队司令）的参谋长福里斯特·P.谢尔曼上校具有一定影响力，他提出的方案建议重新夺回威克岛，之后以威克岛作为跳板，攻击其南方约500英里处的马绍尔群岛。斯普鲁恩斯认为应该在更往南和往东的地区发动这场新的战役，因为舰队在那里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南太平洋后方基地的空中支援。他想要在吉尔伯特群岛发起新的进攻，该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方约600英里的地方。参谋长的理由动摇了尼

米兹的想法，回过头来他又说服了金。1943年7月20日，美国舰队总司令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了必要的指示。这场代号为“电流”的行动，要求在当年的11月15日之前，同时占领埃利斯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瑙鲁等目标。

自从一年前从中途岛战役中凯旋之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一直期盼着能够担任另外一次重要的海上行动的指挥官。但是，靠耍嘴皮子去讨要任务，不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将军行事的风格。1943年5月的一个清晨，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两人走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时候，尼米兹告诉斯普鲁恩斯：“舰队的最高指挥部会有一些调整。我也想放你走，但不幸的是，此时我需要你留在这里。”听到这番话，斯普鲁恩斯既没有觉得出乎意料，也没有心乱如麻。

多年以后，回忆起这番对话时，他记得自己是这么回答的：“是啊，这场战争非常重要。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能有机会再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留下来，我就应该留下来。”

第二天早上，当两个人再次从住所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尼米兹再次提起了这个话题。“这件事我想了一晚上，”他说，“斯普鲁恩斯，你很幸运。因为最后我还是决定放你走。”[\[65\]](#)

尼米兹在月末参加旧金山的会议期间向金推荐了斯普鲁恩斯。5月30日，华盛顿海军部擢升斯普鲁恩斯为海军中将。不久之后，他不再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参谋长，转而指挥中太平洋部队，后来又成为第5舰队司令。他指挥的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海上司令部。

中太平洋战区



时间仓促，斯普鲁恩斯总共只有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来规划这场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且最复杂的两栖作战行动。海军和登陆部队必须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和美国本土召来。他手下的指挥官还没有任命，甚至还没有挑好人。制订作战计划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费心劳力的工作。斯普鲁恩斯立刻行动，调来了一名经验丰富、积极主动的参谋长。他选择的是

和他在同一艘船上服役过的老朋友查理·穆尔上校，这名上校当时正在华盛顿担任金的作战计划参谋。斯普鲁恩斯要求穆尔帮他组织参谋班子，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从海军部挖走一些精英，但他必须将挑选的总人数控制到最少。8月5日，穆尔抵达珍珠港，搬进了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在马卡拉帕山上的住处，住进了其中的一间卧室。^[66]

斯普鲁恩斯的指挥哲学是把这些不必亲自做的任务委派给别人去做。后来，他开诚布公地说：“客观地来说，我觉得自己看人很准；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我懒得去做，因此如果有人比我做得更好的话，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插手，而是将任务派下去，交给他们去做。”^[67]穆尔完全认同他的这一判断。斯普鲁恩斯对自己的属下管得不是太严，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亲自插手过问；他挑了一些有才干的人，赋予他们职权，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他总能及时掌握做出重大决定所需的信息，只是一旦做出决定，具体怎么执行他就不管了。忽略这些零零碎碎的细节，他才可以集中精力去思考战略和组织层面的最宏观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斯普鲁恩斯用不着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工作，因为他那聪明的脑袋拥有比常人更快地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欧内斯特·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连他都承认斯普鲁恩斯“拥有的智力在美国海军将领中属于卓越超群的”。^[68]斯普鲁恩斯作为出海舰队的司令，在1942年的中途岛战役中战绩卓著，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指挥第5舰队的行动中也表现出色，这似乎证明他那种放手让下属去做的方法是明智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普鲁恩斯确实有点儿懒。他似乎很容易感到厌倦，甚至非常抵触与他人讨论战事。他散步成瘾，无论工作是否完成，都随时想走出办公的地方。他经常叫上参谋同行。穆尔在夏威夷整顿了三天之后，在信中跟妻子提到这样一件事：“雷蒙德又玩起了他的老把戏，昨天带我在山脚下徒步走了八英里。当时天气很热，走路很费力，我们还一路说话，这让我完全喘不过气来。”^[69]穆尔试图与上司讨论即将到来的行动，斯普鲁恩斯却聊起了无关紧要的话题，大谈特谈保持好体格的重要性。几天后，穆尔再次写信给妻子：“昨天雷蒙德加

快速度，我们走得也更远了，三个小时走了十多英里。我两条腿不停地捣腾，等到回来的时候，我感觉两条腿都走废了。……我看非得等烈日把我烤焦了，或是我的两条腿都走瘫痪了，他才会心满意足。”^[70]

斯普鲁恩斯想让特纳成为两栖舰队的指挥官。这件事无须多想。特纳在南太平洋经过一年艰苦的磨炼，已经成为海军中最优秀的两栖作战专家。斯普鲁恩斯与他熟悉得很，二人曾经共同在海上服役，也一同上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如果可以的话，我很乐意从哈尔西将军那里把特纳将军挖过来。”6月份他曾对尼米兹这样说。^[71]在所罗门群岛北部，“蛙跳”进攻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哈尔西可不想放特纳离开，所以尼米兹插手了。在6月26日写给“亲爱的比尔”的私人信件中，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解释说，他已经接到命令，要在中太平洋发动一场新的攻势：“这意味着特纳必须尽快来我这里报到。”^[72]特纳调往北部战区时，还带走了几名最杰出的参谋，这让哈尔西更加心疼了。

海军陆战队的霍兰·M.史密斯少将负责指挥第5两栖军。史密斯是两栖作战的先驱之一。他曾说服海军采用安德鲁·希金斯的浅水小艇作为登陆艇，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埃利奥特营地和彭德尔顿营地中对几个师进行了成功的两栖作战训练。为了得到太平洋战区的作战指挥权，他曾四处游说，得到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和金将军的支持。尼米兹不太了解他，但是斯普鲁恩斯与他很熟，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就一起共事过，那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在加勒比海地区工作。尼米兹在视察南太平洋战区期间给了他这份工作，史密斯当然欣然接受。

特纳和史密斯共同组成了“燃爆二人组”。他们的个性如出一辙，都是一副咄咄逼人、雄心勃勃、盛气凌人的样子。在两栖作战方面，他们两个人都是受人尊重的权威，但是二人之间不争不抢，不会干扰日常工作。他们两人都动不动就发脾气，因此各自获得了绰号：一个是“特凶特纳”，另一个是“疯子”史密斯。史密斯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指挥关系特别敏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时候，特纳因侵犯了海军陆战队的指挥权而冒犯了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电流”行动尚在规划的时候，

斯普鲁恩斯的心里就会偶尔犯嘀咕：“不知道在他们发生冲突之前，计划好的行动能否实施。”^[73]

9月的第一周，霍兰·史密斯抵达珍珠港，被安排住进马卡拉帕山脚下的一个平房里。这个小房子配不上他的军衔，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对任何看不起海军陆战队的迹象都异常敏感，于是冷冷地提醒负责分配房子的海军军官，他是一名少将，军衔比珍珠港的大多数海军军官要高，所以他要求分配到更合适的住所去。海军方面解释说，他们是一时大意，但是史密斯并不信。海军向他道了歉，然后重新分给他一个位置更好、规格更高的房子。

史密斯在华盛顿遇见过特纳，当时特纳是海军的作战计划处处长。他发现特纳像“严格的校长”，严谨有礼，有“学者气”。^[74]但他也亲身体会到了特纳那出了名的坏脾气。“他真的很难对付。他绝对当得起‘特凶特纳’这个称呼。”^[75]

特纳希望自己在“电流”行动中的指挥级别高于史密斯。这样的指挥模式与之前的“瞭望塔”行动是一致的。但史密斯希望在行动的整个过程中（开始、当中和结束）直接指挥所有的两栖部队。他还希望能直接向斯普鲁恩斯报告。

这件事对于特纳而言没有什么好说的。现有的模式在南太平洋已经接受过检验。一个初到太平洋战区的新人——史密斯，有什么权利提议改变这种模式呢？对史密斯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这件事与海军陆战队的地位和荣誉息息相关。史密斯担心海军会照顾自己人，而且他知道，在珍珠港他得不到公平申诉的机会。这个问题一直反映到了华盛顿，甚至反映到了海军部长那里，诺克斯不得不亲自处理这件事。他没有直接裁决，而是希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可以继续保持有效的合作，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斯普鲁恩斯不想参与这场争论，干脆置之不理。“好了，卡尔，别担心，”他对穆尔说，“他们知道我想怎么做，不会横生事端的。”结果

却并非如此。经过一番长期的辩论，仍然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出现，于是穆尔再次向斯普鲁恩斯提出了这件事，得到的答复却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76\]](#)

舰队司令自由放任的态度，让穆尔这个海军上校在海军将领与海军陆战队将领之间的这场硬仗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都在互相指责对方”，他回忆道：

霍兰·史密斯强烈指责特纳。史密斯是那种爱发牢骚，又爱抱怨的人。平生喜好诉苦。他喜欢说闲话，又爱抱怨，来了就会坐在我的桌子上，咆哮着控诉特纳。“我想做的，无非就是多杀几个小日本。给我一把步枪就行了。我不想成为发号施令的将军。给我一把步枪就行了，我会立刻冲出去打死几个小鬼子……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理睬。”瞧，他一张嘴就是这些话。我刚平复完他的心情，特纳就会来接他的班，抱怨该死的史密斯事事不与他合作，等等。[\[77\]](#)

最后双方终于各退了一步，这桩事才算了结。穆尔起草了一份行动指令，确定登陆部队在登陆之前都归特纳管，在登陆之后由登陆部队指挥官接管。特纳接到部队成功登陆的报告以后，岸上所有的部队都将归第5两栖军管，并向霍兰·史密斯报告。大家接受了这种指挥模式，而且这一模式会在太平洋战争剩下的时间里一直采用。

在另外一件事上，特纳和史密斯立即达成了一致。两个人都不想去攻占瑙鲁那个一片荒芜的磷酸盐岩岛，但该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定要攻占的众多目标之一。瑙鲁多山的地形让攻占变得异常艰难，它坐落于“电流”行动的主要目标塔拉瓦环礁西南方380英里的地方。无论对敌国还是对盟国来说，瑙鲁的价值都微乎其微，岛上的小型机场只要靠持续的轰炸压制就行。

9月24日，金将军飞往珍珠港会见尼米兹，进行两月一次的例行会

谈。第二天早上，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斯普鲁恩斯交给金一封霍兰·史密斯写的信，信中列举了应该把瑙鲁从“电流”行动的目标中去掉的理由。金问：“你觉得什么目标可以取代瑙鲁？”斯普鲁恩斯认为可以考虑塔拉瓦北部的马金环礁，因为它的战略位置更为重要，而且更容易拿下。“金将军阴沉沉地看了我一眼，”斯普鲁恩斯回忆说，“但他同意了把这个提议递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78\]](#)

吉尔伯特群岛由16个被棕榈树覆盖的环礁组成，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约400英里的地方跨在赤道上。每个环礁都由狭长的沙洲组成，环绕着一汪璀璨的蓝宝石色潟湖，最高海拔约为10英尺。虽然这些岛屿都位于赤道附近，但是这里四季都有清凉的海风吹拂，空气清爽，非常怡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9世纪80年代来到过吉尔伯特群岛，发现那里有“舒适的海洋气候。白天阳光灿烂，海风吹拂；夜晚星空璀璨，耀眼夺目”。[\[79\]](#)

马金环礁三面是陆地，中间有一个8英里宽、16英里长的潟湖。由13英里长的沙石组成的布塔里塔里岛是马金环礁中唯一可以建设机场的岛屿。日军把马金环礁作为水上飞机基地，但除此之外那里就没什么了，而且岛上日军的防御力量不强。航拍照片中没有大口径岸炮，只有几个海岸防御工事，而且驻军人数可能在500到800之间，其中一部分人是劳工，而非训练有素的战士。

塔拉瓦环礁位于马金环礁以南约83英里，夏威夷西南方约2 500英里，看起来比较难以攻克。这片环礁中面积最大的是位置最靠南的比休岛，东西略长于两英里，南北约宽半英里，其走向与盛行风的风向是一致的。美军知道，比休岛是太平洋战区防御最坚固的岛屿之一。在沙子和棕榈木覆盖的混凝土掩体、碉堡以及壕沟组成的网络后面，隐藏着一个长约4 000英尺的简易机场。南北西三个方向都架着5英寸到8英寸口径的岸炮。在潟湖岸边，约有1 200码的珊瑚礁包围着比休岛，让它易守难攻。根据空中侦察，驻军似乎在2 500人至3 100人之间。

攻击塔拉瓦的任务分配给了第2陆战师，这支部队参加过瓜达尔卡

纳尔岛战役后期的战斗，之后撤回新西兰休整，并在那里接受了进一步的训练。该师由朱利安·C.史密斯少将指挥，他是在8月中旬初次获悉这个行动马上就要展开的。当时，他得知斯普鲁恩斯将军即将飞往惠灵顿，走之前想要与他见一面。斯普鲁恩斯在穆尔上校的陪同下，走进史密斯的办公室，把一堆文件放在桌子上。史密斯将军认为他的第2陆战师可以拿下塔拉瓦吗？史密斯从未听说过塔拉瓦，于是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岛。”^[80]史密斯说他会看一下这些文件。斯普鲁恩斯希望在什么时候得到答复呢？“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斯普鲁恩斯说。史密斯说第2陆战师可以拿下这个岛。

在金将军的设想中，“电流”行动是一场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施展拳脚的作战行动，但乔治·马歇尔却热切地希望陆军部队也加入中太平洋的行动中去，并且提出让当时在夏威夷的第27步兵师参加。尼米兹派该师的第165步兵团去攻打马金环礁。拉尔夫·C.史密斯少将负责指挥这个步兵团，于是，“电流”行动的进攻部队有了三大（没有血缘关系的）史密斯指挥官。让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的职级高于陆军的拉尔夫·史密斯，这种安排肯定会制造些许不愉快。太平洋战区的陆军首长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对是否有必要把这支陆军部队整编进第5两栖军存在疑虑，他建议拉尔夫·史密斯直接向特纳将军报告。尼米兹拒绝了这个提议。“电流”行动需要各军种以空前的规模合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能容忍军队中有任何形式的内部争斗。这种跨军种的指挥结构固有的敏感问题会于次年在马里亚纳群岛公开爆发。

陆军的突击团需要强化两栖训练，霍兰·史密斯在夏威夷群岛的几个小岛上监督了登陆演习。迫于恶劣的天气条件，演习不得不多次取消，并且海滩的条件也不完全与实际目标匹配。霍兰·史密斯关心军团的备战状态，尤其是士气。不过，空中侦察和潜艇侦察累积的信息给了他些许安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起码与攻打塔拉瓦相比，拿下马金环礁简直是轻而易举。

就像当初攻打所罗门群岛一样，美军缺少吉尔伯特群岛的精确海图

和水文表。他们所依靠的信息，有相当一部分是19世纪甚至18世纪遗留下来的。总结了这些图表的情况后，特纳告诉尼米兹：“这些图表上的陆地轮廓不准确，水深的相关信息基本没有，有也不可信，陆地的方位频繁出错，甚至岛屿的位置也有很多问题。”^[81]之前的计划考虑过在行动前先让侦察队上岸，但是由于害怕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于是该计划就取消了。“鹦鹉螺号”潜艇配有特殊的装备，可以通过潜望镜摄影，8月份该潜艇回到珍珠港，带回了一些宝贵的数据。舰载机和B-24轰炸机在9月和10月进行的航拍侦察，提供了更多关于比休岛沿海防御工事的情报。照片中清楚地显示出了那些安装在高强度混凝土炮台上的大炮的位置。这些照片还显示，整座岛屿上都遍布障碍物：椰木海堤、铁丝网挡板、反坦克壕沟和海浪中的混凝土四面体。

分析员通过厕所数量和每个厕所使用的人数估算出了敌方驻军的人数。（这些厕所都是在海滩的木桩上建造的，这样海浪就能够冲走粪便，因此这些厕所在航拍照片中可以看得很清晰。）低空斜拍沙滩防御工事的照片可以获得很有价值的信息，让人确定碉堡和地下掩体的精确位置，但是进攻行动眼看就要展开了，没有时间安排这样的航拍任务。^[82]

战争刚一打响，吉尔伯特群岛上的几十名英国居民就逃到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些逃跑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中有16个人被美军统称为“外籍军团”，美军仔细咨询了他们有关塔拉瓦潟湖的情况。他们最关心的是潟湖入口和比休岛北侧的珊瑚礁上面的水有多深。有些人认定高潮时珊瑚礁离水面至少有5英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的登陆艇从珊瑚礁上方通过的时候就没有任何搁浅的危险。但进攻的预定时间恰好是低潮时期，那个时候水位会降到最低。新西兰的F.L.G.霍兰少校似乎是最了解塔拉瓦的人，他告诫美军，珊瑚礁距离水面可能不超过3英尺。此外，低潮可能还会造成“躲闪潮”，进而使登陆艇偏离航线。朱利安·史密斯在仔细盘问过霍兰少校之后断定，霍兰不是信口开河，于是他告诫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海军陆战队员也许不得不在礁石边缘或

在距离比休岛北岸半英里的地方下船上岸。

近20年来，海军陆战队一直在为直接进攻防守严密的岛屿进行规划和训练。为了筹备这样一项行动，海军陆战队研发了一种专门的登陆艇，优化了协调海军火力支援、空中支援和后勤的专业化战术。但是，海军陆战队至今尚未有机会向自己证明，也向敌人证明，两栖部队的正面攻击可以将固若金汤的小岛拿下。攻打塔拉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任何直接的办法实现纵深部署；登陆部队最初肯定会被困在一条狭长的海滩上。这座低平的小岛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登陆部队向敌军的侧翼移动。由于战场非常狭窄，海军的炮火和空中支援似乎不可能不给岸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带来危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攻击塔拉瓦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行动，而且付出的代价也可能非常高昂。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海军飞行员的正式军装便是卡其色制服加一双棕色皮鞋，而海军水面舰艇军官的皮鞋按规定必须是黑色的。当飞行员们开始把自己叫作“棕鞋族”，而称那些囿于传统的同僚为“黑鞋族”的时候，这种制服上的微不足道的区别就拥有了象征意义。飞行员总是想打破着装规定：要么趿拉着鞋走，也不擦鞋；要么让头发稍微超过规定长度；要么头戴破烂不堪的帽子，包括马克·米彻尔发扬光大的那种独具特色的“鸭舌”帽。“棕鞋族”喜欢挑战海军的守则和礼仪。“待在战列舰上，就相当于待在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约瑟夫·布赖恩三世在“约克城号”上担任情报官的时候写道：

但是如果待在航空母舰上，你就属于时刻准备战斗的海军。一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操纵着你的战舰，他们如果不想系鞋带，就趿拉着鞋。他们很快就会亲切地称金将军为“厄尼”，除非这样做了之后将军不再用他们，不让他们参与任何作战任务。[\[83\]](#)

托尔斯中将曾在华盛顿担任航空局局长，1942年10月成为太平洋舰

队航空队司令，他是海军现役的高级飞行员，也是公认的“棕鞋族”领袖。1906年，也就是尼米兹在海军学院毕业的一年后，托尔斯也在此毕业，他与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是同期学员。他出色的职业生涯与海军航空兵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1911年就学会了飞行，当时驾驶的是较为原始的双翼飞机，框架是木制的，机翼用织物覆盖，靠钢线支撑，最高空速60节。托尔斯是飞行员兼飞机设计师格伦·寇蒂斯的门徒。他曾打破航程和航行时间的各项纪录，在彭萨科拉创办第一个飞行训练项目，第一个完成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分阶段），指挥过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兰利号”（CV-1）。他经历过多次空难并幸存下来。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可就没那么幸运了。20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海军航母部队的拨款、职业飞行员的晋升等问题与金和尼米兹纠缠。他获得了这两个同僚的些许无可奈何的敬意，让他们在海军航空兵和航空母舰船员的培训、选拔和军官晋升方面做出了一些妥协。不过他跟那些“战列舰派”军官一直都不亲近。他认为，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和空袭马来亚时击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这两起事件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性质。

“棕鞋族”既是精英又是反叛分子。他们蔑视海军陈旧的教条，决心将其颠覆。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多多益善——更多的指挥权、晋升机会、勋章、影响力和可用资源等。他们甚至想要在战略规划中拥有更多话语权。他们认为，仅仅依靠“有空战思维”的传统战舰军官的领导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快速航母特混舰队是向西太平洋推进的先锋。因此，舰队应该由从“棕鞋族”中选拔出来的人率领。连欧内斯特·金和比尔·哈尔西这种40多岁还以上校的身份获得飞行资格的人，都算不上真正的飞行会成员——他们是后来者，学习飞行的目的是获得航母指挥官资格。大部分有“正牌”资格的“棕鞋族”是年轻人，其中包括一群雄心勃勃、富有才干的“少壮派”。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拿到飞行资格了。他们带领过美国航空中队，当过航空母舰的舰长，参与研发过新型飞机。他们正在向海军将级军衔的门槛迈进。

新一代的飞行员意识到陆军航空队中的竞争对手晋升的速度更快，

心里不太舒服。陆军飞行员还在获得勋章和其他荣誉方面享受到了更慷慨的政策。海军领导人怀疑“福将”阿诺德的陆军航空队意图巩固其在航空军事方面的指挥地位，陆军航空队也确有此意。政界关于战后军种统一的问题正争吵不断，这对海军机构利益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托尔斯告知华盛顿的一位同僚：“最高指挥部没有让具备长期作战经验和可靠专业能力的航空队军官在战略计划中有真正的话语权。”^[84]

随着“电流”行动计划逐步成形，托尔斯建议尼米兹派遣新的航母特混舰队来执行远程进攻的任务，袭击日本机场，并且（条件允许的话）攻击日本舰队。他告诫部队不要只在防区内行动，因为这样会限制部队的行动自由。斯普鲁恩斯和特纳希望部队登陆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时，航母能够进行空中掩护；托尔斯更想将航母派往西北方600英里外的马绍尔群岛，在那里它们可以对日军机场进行猛烈的轰炸，从源头上切断敌军的空中支援。托尔斯与他的参谋长福里斯特·谢尔曼想法一致，认为攻打吉尔伯特群岛就是浪费时间，而且对“电流”行动的规模之大感到不解。心直口快的太平洋舰队航空队司令抱怨道：“斯普鲁恩斯简直就是用大锤钉图钉。”^[85]

托尔斯跑到尼米兹那里，请求他向金和华盛顿的其他高层阐明自己的观点。8月18日，他给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写信，信中内容如下：“我们这些人所处的位置，让我们既能对局势也能对计划做出良好的判断，我必须坦承，我们这些人有一种越来越无望的感受。我这样说，主要指的是重要的计划和政策。”^[86]“黑鞋族”斯普鲁恩斯得到晋升，成为第5舰队的指挥官，托尔斯私下对这件事提出了批评。当这些言论传到斯普鲁恩斯的耳朵里时，他们之间就有了嫌隙。斯普鲁恩斯后来告诉“精灵”小查尔斯·M.库克：“你若不是托尔斯的崇拜者，那么只要他能插上手，你的晋升道路注定不会平坦。……托尔斯这个人野心很大。”^[87]这或许是斯普鲁恩斯对同僚的最严重的控诉。

由于身处高位，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认为他们比这些飞行员“造反派”更能看清楚大局。航空母舰可以跨越很远的距离狠狠打击敌人，但

单靠它们，很难完全取得跨太平洋战役的胜利。无论这些航空母舰的能力和愿望如何，飞行员们和飞机必须跟两栖进攻部队协同作战，借助经过精心安排的后勤实现更大的战略目标。攻打吉尔伯特群岛的武装力量包括191艘战舰，3.5万名士兵和11.7万吨军用物资。协调和掩护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至关重要，这支舰队的每一个单独组成部分都要顾全大局，不能擅自行动。尼米兹一贯容忍大度，但最终这种怨言和不满让他身心俱疲，于是他让托尔斯收敛一些。托尔斯回忆道，在一场会议的激烈讨论中，尼米兹的反应“让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了”。^[88]

“少壮派”中的代表当属约瑟夫·J.克拉克上校，他的朋友和水手伙伴们称他为“乔克”或“约科”。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老“约克城号”（CV-5）上的副舰长。1942年2月，他晋升为上校，回到华盛顿等待重新分配。他提出了一个看似荒谬的计划——建造150艘新的航空母舰，这个提议让他一下子出了名。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个数字并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得来的。他认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海军需要一支庞大的航母舰队来击溃日军，他只是“随口说出”了一个大整数。时任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的特纳给他的计划泼了一盆冷水，说：“你造不出那么多的航空母舰。”但是托尔斯将军十分认同克拉克的计划，认为他的计划“完全正确”，并安排这名年轻的上校在多个城市大力宣讲他的想法。^[89]^[90]

克拉克在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出生长大，是苏格兰—爱尔兰裔和印第安切罗基族混血。他在正式证件上的身份是切罗基族，他也是从海军学院毕业的第一个印第安人（1917届）。就克拉克自身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俄克拉何马州牛仔”，但他为身体里流淌的切罗基血液而感到骄傲，甚至强调这种血统。他的出生登记证明（由其父母登记）上说他有八分之一切罗基血统。^[91]媒体上有许多对克拉克相貌的描述，譬如“拥有印第安人的深褐色皮肤以及高颧骨”（《火奴鲁鲁明星公报》，1944年），或是“肉鼻像驼峰一样隆起，稀疏的头发剪得很短，留着类似于印第安人的独特发髻，就像草一样随风飘动”（《生活》杂志，1945年）。^[92]对于这样的描述，他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甚

至鼓励人们如此评价他的外貌。每当他头戴壮丽的羽毛头饰拍照时，他都冲着摄影师咧嘴大笑。军舰上的报纸和书里的漫画把他刻画成这样一种形象：挥舞着一把印第安战斧，剥下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或裕仁天皇的头皮。克拉克还邀请切罗基族的族长出席新“约克城号”（CV-10）编入现役的仪式。

克拉克具备比尔·哈尔西的风范——他感情外露，个性鲜明且丰富，而且毫不介意让自己在他人眼中略显荒唐。他虽然一直在减肥，肚子还是大得令人印象深刻。卡其色制服的衬衫经常不塞进裤子里。在他的适任报告中，上级除了注意到他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缺乏体育锻炼之外，在其他方面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克拉克任凭自己成为开心果，也可能他是故意减少自己的权威感，让自己更加亲民。一名领航员将他的船在异常拥挤的百慕大锚地上搁浅之后，这位舰长开始操舵并且咒骂道：“去你妈的，现在轮到我搁浅了！”^[93]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一个在他手下服役过的军士长对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约科”克拉克继承了部分印第安人的血统。他的下唇突出，经常被骄阳晒伤。最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医生只好给他戴上4厘米见方的纱布，将纱布上面的细绳挂在他的耳朵两侧，以保护他的嘴唇不受伤害。他虽然戴上了护罩，但这种做法让他异常生气。我看到他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就抓掉了三四个护罩。通常他会把护罩扯下来，然后扔掉。但随即就会有一个医生出现在他面前，给他做一个新护罩。……无论战舰处于备战状态还是在平时，他只要来到舰桥上，一般就会穿着病号服。有时候，他那毛茸茸的肚子会露出来，但他不会注意自己的仪表是否得体。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他广受爱戴，备受尊重和仰慕。他对飞行员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有很多次，当某个飞行员降落时浑身负伤或是有别的情况，医生、急救队员和“约科”会在同一时间来到飞行员的身边。“约科”会弯下腰给担架上的家伙别一枚勋章。大家都知道，飞行员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感激涕零。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94]

克拉克晋升迅速，于1925年获得金翼奖章。他驾驶过不同类型的飞机，最终专门驾驶波音F3B双翼战斗机。1933年到1934年间，他在“列克星敦号”上担任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当时的舰长是欧内斯特·J.金。克拉克与金关系很好，金晋升为美国舰队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后，这段渊源也让克拉克颇为受益。克拉克指挥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萨旺尼号”，这是一艘由油轮的船体改造的1.8万吨护航航空母舰。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市，克拉克负责监督这艘护航航空母舰的整备工作，驱使民用船坞工人和船员赶在看似不可能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并设法让它如期编入现役，参加了1942年11月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在这段飞速赶工的时期里，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今日事昨日毕，明日补已太迟！”^[95]“萨旺尼号”在“火炬”行动期间表现突出，因此克拉克在适任报告中得到了好评。

他于1943年1月接到命令，回到纽波特纽斯担任第二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新“约克城号”——的下一任舰长。克拉克后来才知道，是金将军亲自挑选他担任这个荣耀的职务的。

1943年1月21日，也就是克拉克抵达目的地的三周之前，“约克城号”就下水了，埃莉诺·罗斯福是“约克城号”下水的见证人。在原定下水时间的几分钟前，演讲还没结束，这艘大型航空母舰就开始摇摇晃晃地移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在滑道上滑行。第一夫人参加过多次新船下水典礼，她抓住等待开封的酒瓶，往移动的船体上一挥，瓶子碎了，香槟酒溅了她一身。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表明“约克城号”已经急不可耐，准备投入战争中去了。船员给这艘航母取了好多绰号，第一个是“着急的大船”。^[96]

尚未竣工的“约克城号”停泊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和干船坞公司的码头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将在那里配备物资，编入现役。2月15日，克拉克到达目的地后，沿着码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这艘战舰。它那宽阔的飞行甲板高高耸立在他面前。要知道，他刚刚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俄克拉何马州的阿鲁威赶来。“站在它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

人生中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97]

为了让“约克城号”按期编入现役，船员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每个人都疲惫到了极点。而克拉克就是残酷的监工，这一点，他丝毫不去否认。其他三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都比这一艘开工要早，但是克拉克非常想让“约克城号”最先开到珍珠港。然而这个想法实现的希望不大，因为早在1942年的最后一天，第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就已经编入现役，并且很快就会离岗试航。克拉克还关注着另一艘姊妹舰——“列克星敦号”（CV-16），这艘战舰正在费利克斯·B.斯顿普舰长的监督下，在波士顿的福尔里弗公司编入现役。第四艘埃塞克斯级航母是“邦克山号”（CV-17），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伯利恒钢铁造船厂建造，舰长是约翰·J.巴伦坦。克拉克公开宣称，他想击败“埃塞克斯号”航母，率先进入太平洋，于是“击败‘埃塞克斯号’”成了这艘航母的口号。

克拉克与“埃塞克斯号”的唐纳德·邓肯舰长既是朋友又是海军学院的同学，两位舰长私交甚密，互相学习。两人约好，所有关于舰船装备的外发信件都要留下副本，彼此分享，同时与斯顿普和巴伦坦两位舰长分享。^[98]克拉克乐于分享这些情报，但他那争强好胜的本性也显露无遗；他想要“约克城号”在所有可衡量的方面都优于姊妹舰。

造船厂计划于4月15日竣工，但也警告他工程有可能会延期。但克拉克宣布，他想让工程按期完成。于是，造船厂里的3.1万名工人中有4000人被派去建造“约克城号”，而且克拉克通过游说，又从其他在建船只那里调来了建造所需的材料。他保证，尽管时间仓促，但无论如何，至少在设备的细节和质量方面，他不会“偷工减料”。然而，他总是耍些小手段来骗取材料，而且喜欢作假以通过安全检查。竞争对手“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名航空兵军官怀疑“克拉克私下里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为了给‘约克城号’供应所需材料，挪用本来用于建造‘埃塞克斯号’的材料，好让我们不能及时竣工，但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99]克拉克的弹药都是直接用平板货车运到船上的，这是违反规定的。造船厂无法按期为船体上漆，他就让船员去做这件事。他甚至指

派下级军官加入船体切割和涂装的工作中去，这触犯了历史悠久的海军禁忌，至少有一个年轻中尉忍受不住这种折磨，最终申请调动工作。“‘约科’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新航母的领航员（此人后来成为海军作战部长）乔治·W.安德森回忆道，“什么事他都想要一马当先，而且争强好胜。……他就这样一直往前冲、冲、冲。”[\[100\]](#)

克拉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征募军官，为此他经常到华盛顿的海军人事局转悠，看看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他想让特定的人从事特定的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拉乌尔·沃勒，克拉克想让他做自己的副舰长。但他也察觉到了把太多“朋友”调到身边的危险。他还喜欢让预备役军人担当军队里的重要角色，在众多同时代的海军学院毕业生中，这种做法并不常见。[\[101\]](#)整备期间，他还要进行军事强化训练。克拉克故意缩短了“弃船”的演练时间，他告诉船员，他更喜欢将时间花在“绝不弃船”的演练上。他较为看重的反而是损管和消防程序。

在正式竣工之前，“约克城号”需要经过海军检查委员会里里外外、彻头彻尾的检查，检查人员会在4月的第二个星期抵达。他们测试了船上所有机器和设施的运转状况，包括主推进系统、辅助机械、制动装置、发射装置、弹射器、军火库和弹药输送机。船上的航海图和其他所需的文件和印刷物均被找出来编目。检查委员会发现一切都已就绪，于是准许“约克城号”于预定时间4月15日出航。早上7点，“约克城号”渐渐驶离泊位，进入航道。这段航程很短。“约克城号”经过汉普顿锚地，在诺福克海军造船厂的新泊位抛锚，并在那里正式编入现役。

4月和5月，“约克城号”经历了一段紧张艰苦的训练、装配和适应期，随后开始试航，在切萨皮克湾来来回回地巡航测试。船上的炮手练习射击飞机上的拖靶。5月5日，“约克城号”上的第一架飞机着舰了，这是一架新型F6F舰载战斗机，由传奇战斗机飞行员吉米·弗拉特利驾驶，他是新组建的第5航空大队的队长。其他登船者包括36架老是出毛病的SB2C“地狱俯冲者”轰炸机，以及刚刚训练好的机组人员，加上一群来

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机械师。“约克城号”是第一艘接受大家都不喜欢的“怪兽”的航母。

5月21日，“约克城号”在三艘驱逐舰的护送下出航，随后转弯南下。它的目的地是帕里亚湾，那是一个由特立尼达岛和委内瑞拉海岸线环绕的内陆浅海。特立尼达岛上建有一个重要的海军供应站和航空站。帕里亚湾长70多英里，为高速演习和空中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反潜网封锁了唯一的深水入口通道，使帕里亚湾不会受到德军U型潜艇的入侵，因此这个地方成了海军视若珍宝的试航区域。

第5航空大队在特立尼达岛航空站着陆，并且每天都飞到“约克城号”上。到了这个紧要关头，克拉克脾气差到了极点，经常手持扩音器，冲着船员大吼大叫。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他会立即施以关禁闭的处罚，不过有人表现出特别的能力或积极性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提拔。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克拉克尤其关注飞机操作程序的速度和效率。他从不厌倦地为地勤人员计时，这些地勤人员负责将机库中的飞机推到飞行甲板的指定位置上。克拉克要求这些飞机尽量排列紧密，好给前飞行甲板的跑道尽量留出空间。任何航空母舰的首要目标都是让挂好武器、加满燃料的战机迅速升空。飞机回收（着舰）和排布下一组准备发射的飞机之间的这段时间，是航空母舰最易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告诉船员，与敌人接触的机会稍纵即逝，机会难得：“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发现合适的打击目标，我们就要充分利用机会，尽量发动攻击。”[\[102\]](#)

大型战机和重型战机的到来消耗了甲板人员的精力和耐力，但航空部门的乔·塔克上尉手头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他在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发现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小型拖拉机停靠在码头附近，决定征用它们。他用起重机把它们吊到了“约克城号”上，存放在机库内。（他们提前用烈酒收买了海军陆战队的警卫，所以他们对这件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塔克手下的机械师设计了一个临时牵引杆挂在飞机前轮上。他们反复练习用这些运载工具拉着飞机移动，学会了更快地循环使用飞机和重新安排

位置。这些被塔克称为“骡子”的吉普车和拖拉机，经事实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创新，所以所有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都开始采用这种办法。[\[103\]](#)

克拉克此前曾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寇蒂斯公司担任过飞机检查员，所以他非常熟悉新型的SB2C俯冲轰炸机，知道它遭遇的各种麻烦。在帕里亚湾进行训练的时候，寇蒂斯公司生产的这种飞机就被各种机械故障困扰。其中一架飞机起飞后，在空中突然失去动力，迫使飞行员在航母前方的水面上迫降。另一架飞机硬着舰，尾轮压坏。还有十几架飞机的尾钩被硬生生地拽了出来。“约克城号”上的机械师和来访的寇蒂斯方面的工程师试图修复不断增加的损伤，但经常找不到零部件，而且在出海的航母机库甲板上可做的事情较为有限。到6月中旬，有超过一半的飞机必须停飞，而且塔克上尉估计“地狱俯冲者”大概需要200处调整才能服役。他建议将整个中队的“地狱俯冲者”退回寇蒂斯公司，申请调来一个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中队，然后“约克城号”再向太平洋第一次进发。经过漫长的讨论，克拉克舰长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命令损坏的SB2C俯冲轰炸机降落在特立尼达岛上。他写了一个七页的备忘录，详细列举了这些轰炸机的缺陷。一周后“约克城号”返回诺福克，克拉克开车来到华盛顿，向金将军解释了这一问题。金同意让“约克城号”搭载一支由36架新型SBD-5俯冲轰炸机组成的中队。

克拉克这样写道：“这场战争取得胜利大多是格鲁曼和道格拉斯的功劳。这是一场属于格鲁曼和道格拉斯的海战。”1943年，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的速度太慢了，很难与TBF鱼雷机和F6F舰载战斗机协同攻击，所以它们“在作战时其实成了障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用它们，因为它们海军中唯一可以依赖的俯冲轰炸机，也是手头上唯一可以担此大任的俯冲轰炸机。在SB2C俯冲轰炸机的缺点被改正之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无畏式仍旧是海军的俯冲轰炸机”。[\[104\]](#)

7月6日，“约克城号”在警戒驱逐舰的陪同下开启了前往太平洋的旅程。它快速地前往巴拿马，以30节的速度沿“之”字形路线穿过向风海峡，目的是摆脱德国潜艇的攻击。10日上午，它在巴拿马的科隆下锚停

泊。第二天早上，舰长和船员们从自由的狂欢中平静下来的时候，“约克城号”缓慢地进入了加通湖的水闸，两侧与岸边的距离不到一英尺，连缓冲垫都塞不进去。两旁的混凝土船闸把船体刮得嘎嘎直响。克拉克不断冲舵手大叫。副舰长拉乌尔·沃勒则在左右舷之间慌慌张张地来回飞奔，“活像一个对着猫大呼小叫的老女仆”。[\[105\]](#)

7月24日清晨，“约克城号”上已经能看到瓦胡岛。中午时分，它缓缓驶入了入口航道。尼米兹将军通过信号灯表示了欢迎：“‘约克城号’在太平洋战区早已声名显赫，欢迎你们到来，希望你们能延续老‘约克城号’卓著的声誉。”克拉克回复道：“万分感谢您的问候。这正是我们来此的目的。”[\[106\]](#)

太平洋战争逐步向西推进，这就意味着美军距离敌方的主要供应基地越来越近，这种曾经让日本人在所罗门群岛败北的距离上的劣势将会落在美军的头上。美军给“电流”行动调拨的武装力量包括116艘战斗舰艇和75艘辅助舰艇。它们将从整个太平洋上的港口直接出击，这些港口分布在新西兰、萨摩亚、埃法特岛、所罗门群岛、斐济、夏威夷以及美国西海岸。让这么大一支舰队横跨太平洋，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一长列辅助舰艇（包括15艘加油船）将从富纳富提、圣埃斯皮里图岛、斐济和珍珠港等基地出发，在途中给舰队补充燃料和物资。越过吉尔伯特群岛，进入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后，勤务部队和供应部队必须迅速进入新占领的地区，并将它们转变成前沿的后方基地，为下一次的西进提供支援。时机必须把握得非常仔细，准确无误。斯普鲁恩斯将军在战后接受历史学家的采访时，经常表示，在这场跨太平洋的战役中，战略和战术永远没有后勤重要。

后勤属于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的工作，由海军中将威廉·L.卡尔霍恩负责。1943年9月，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只有324艘舰艇，而中太平洋的攻势需要该部队在半年内将舰艇数量增加两倍，也就是在1944年3月的时候，要有990艘舰艇。自1942年年初以来，卡尔霍恩一直是在马卡拉

帕山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进行指挥，但是后勤部队不断扩张，迫使这位太平洋舰队勤务部队司令搬到与总司令部仅一墙之隔的专门地点办公。1943年10月，卡尔霍恩派新编的第4勤务中队为“电流”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该中队从吉尔伯特群岛南边的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执行任务——这里是距离盟军即将进攻的环礁最近的盟军占领地。富纳富提非常适合作为向前推进的供应基地和修理基地。这里的潟湖面积很大，容纳几百艘战舰不在话下，但是入口狭窄，而且仅有一个，因此比较容易防御敌军潜艇的入侵。同时，富纳富提也是被派来实施“电流”行动的陆基飞行队的总部，这支部队由海军少将约翰·H.胡佛（中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指挥，旗舰是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

虽然“电流”行动的计划不像上一年的“瞭望塔”行动那样仓促，但是这个计划的时间安排似乎给主要的参与者和指挥官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其中的许多人直到8月或9月才被分配到岗位上。哈里·W.希尔将军负责指挥南部登陆编队夺取塔拉瓦环礁。他的上级，也就是两栖部队的司令特纳将军，将会随北部登陆编队一起攻占马金环礁。直到9月18日在埃法特岛见到特纳，希尔才知道自己的职责。距离预定的时间只剩下周五了，特纳还说不准派哪支舰队去塔拉瓦，甚至说不准该指派哪艘舰艇作为希尔的旗舰。^[107] 希尔回忆说当时的情形“就是一个字‘忙’，简直忙到昏天黑地”。^[108] 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负责空中支援的指挥官，而且直到出海作战前夕的实战彩排时，他才见到绝大多数重要指挥官。通信计划很晚才传到埃法特岛。离舰队出击还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才搬上旗舰“马里兰号”战列舰。

朱利安·C.史密斯将军计划派三个营登陆比休岛的北部滩头，滩头地点分别称为“红一”滩、“红二”滩和“红三”滩。对于敌军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他不抱任何幻想。侦察照片显示，原木防波堤建于高潮之上约20英尺的地方，高度大约介于3英尺至6英尺之间。防波堤的正后方是一连串散兵坑和隐蔽的碉堡，由壕沟连接在一起。这些碉堡从所在的位置可以对海滩和潟湖上的目标形成交叉火力网。防波堤和碉堡之间堆积了

大量的珊瑚沙和岩石，以阻碍海滩上的视线。混凝土障碍物和铁钉用于阻止装甲车前进，而坦克陷阱一般有6英尺深。[\[109\]](#)

特纳将军想让第2陆战师的一个团（第6团）留作预备队，但这一决定遭到了朱利安·史密斯的反对。特纳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动用预备队，但是在下命令之前，他应该跟霍兰·史密斯商讨一下，后者会来到旗舰上。就像上一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那样，特纳决定保留一支地面部队作为预备队，这一做法迫使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改变进攻计划。朱利安·史密斯将军的反对意见被草率地否决之后，他坚决要求这些命令以书面的形式写下来：“我觉得这项计划不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110\]](#)

攻击塔拉瓦环礁，最让美军头疼的还是潟湖里的珊瑚礁。幸好金将军推动了生产工作，此时新的登陆艇和水陆两用车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些运输工具型号繁多，缩写词的首字母都是“L”（Landing，意为“登陆”）：LCVP（车辆人员登陆艇）、LCV（车辆登陆艇）、LCM（机械化登陆艇）、LCI（步兵登陆艇）、LST（坦克登陆舰）、LVT（履带式登陆车）、LCT（坦克登陆艇）等等。它们并非都适用于这次任务。训练演习经常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和机械故障。长期缺少配件则会使受损的运输工具停在海滩上。[\[111\]](#)操作登陆艇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但在美国本土接受的训练就已经让这些人吃不消了。两栖部队的一名军官回忆道，在实施“电流”行动之前，“有几艘坦克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上的所有军官和船员都从没出过海，这次跨太平洋的航行是他们第一次出航”。[\[112\]](#)

为了对付塔拉瓦环礁的珊瑚礁，美军决定使用履带式登陆车，这是一种水陆两用车，常被称为“鳄鱼”。这些灵巧的小车可以驶过浅珊瑚礁，冲上海滩。在霍兰·史密斯监督的测试过程中，一辆“鳄鱼”冲上夏威夷的海滩，它的履带压烂了一个原木路障，并“轻松闯过了七道铁丝网”。[\[113\]](#)它们可以用坦克登陆舰运送，能够在离岸两三英里的地方直接入海。

1943年9月，第2陆战师本来可以使用100辆履带式登陆车，但其中很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损耗巨大，难以修复。朱利安·史密斯将军估计，他可以让75辆车下海，但剩下的25辆车就只能废弃了，要拆下零部件供其他车辆使用。人们在萨摩亚群岛发现了50辆新的履带式登陆车，第2陆战师从惠灵顿出航后，坦克登陆舰就把它运来了。每辆履带式登陆车可以搭载约一个排的士兵，并且需要多次往返。往返途中难免会有一些登陆车出现故障或损毁。在发动第二轮和第三轮攻击时，基本没有多少履带式登陆车可以用了，此时美军就会遇到麻烦。后面几轮登陆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士兵很可能只能乘坐普通的希金斯登陆艇，而这些登陆艇可能无法越过珊瑚礁。如果登陆艇无法越过珊瑚礁的话，那么这些士兵就只能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涉水登岛。

最初，三个“红滩”将分别由一个营负责占领。预计日军兵力多达4000人，所以在人数上，攻守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在早期制订的攻占塔拉瓦环礁的作战计划设想过夺取毗邻比休岛的某个岛屿，并将该岛用作炮台。但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部队在两个岛屿之间的浅滩中长时间停留，这个计划最终被舍弃了。如果三个“红滩”上的海军陆战队无法直接攻入岛内，朱利安·史密斯就会将兵力转移到该岛的西端，“夺取那里，然后从侧翼攻击”。[\[114\]](#)

在兵力上没有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海军陆战队需要依靠空中力量和舰炮的火力支援占得上风。在海军陆战队登陆之前的约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美军会用舰载机进行全面的轰炸，并且让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炮轰敌军阵地。火力支援部队会来到距离海滩只有1000码的地方。第一阶段，他们将集中火力，猛击8英寸口径大炮的炮台，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他们会用高爆炸弹全面轰炸这个300英亩的小岛。关于登陆前的轰炸对敌人造成的破坏程度，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并不像海军指挥官们那样乐观。海军陆战队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经历中认识到，即使海军持续不断地炮击，敌军也能够藏在地堡和壕沟里挨过去。

海军陆战队夺取滩头阵地之后，海军的火力支援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座岛屿面积很小，因此敌我双方可能会距离太近，几乎可以说是面对面。但是即便攻击目标距离本方很近，海军陆战队也必须得到舰炮支援和空中支援。攻击部队在海滩上初步建立据点之后，就要进行第三阶段的火力支援。此时应该攻击什么目标，就由海滩上的作战单位来决定了。“电流”行动的计划强调，海军陆战队员上岸后，“不仅要发现敌军，而且要控制火力”。^[115]海军陆战队员们要锁定目标，召唤舰炮打击，并且适时下令停火。空中支援也是一样。海军陆战队要在地面上安装反射板或发烟罐，用来标记前沿阵地。飞行员预先得到通知：“必须仔细观察这些标记，在不危及我方地面部队的同时，为其提供直接的支援攻击。”^[116]

为了完成作战计划，让参加“电流”行动的舰船能够按期出发，卡尔·穆尔每天工作15个小时。单是基本计划就占了满满的三页，其后还有不下17个“计划附件”。里面包含了交通计划、情报计划、天气预报计划、空中侦察计划、后勤计划以及重大行动应急计划。这些计划为各舰队单位的行动与会合提供了指引。^[117]任何计划附件出现细微的改变，往往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10月13日，距离起航日期还有三周的时候，穆尔提醒斯普鲁恩斯，计划工作还是一团乱麻，很多重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含蓄地提醒上司，他应该把更多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让自己更加投入到重要的工作当中。但是斯普鲁恩斯完全没听进去，一副镇静轻松的样子，还是经常在司令部所在的小山上一消失就是几个小时。“雷蒙德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穆尔在给妻子写信时提到：

他一旦有了想要锻炼的冲动，任何事都无法阻止他。他不会因为任何事耽搁锻炼，我则要及时抓住他的上衣后摆，逼着他签一些文件，或是让他帮我做一些决定，好在他回来之前能够推进工作。他总是拉我跟他一块儿去，当然他很清楚我是不会去的，如果我和他一块儿去了，那工作就没人做了。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了，他往往马上就想上床睡觉，想让他多集中一会儿精力来批阅和签署文件

都很难。你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118]

10月29日，穆尔和第5舰队的参谋为了完成最终的作战计划，一直忙到深夜。“电流”行动作战计划足足有324页，重达3磅。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员被召集起来，去完成300份计划副本的油印、整理和装订的细致工作。早晨5点钟，他们终于干完了。传令兵开始将副本分发到整个海军造船厂的司令部和舰船上。一些副本被送上飞机，空运到新西兰、努美阿、埃法特岛、富纳富提和萨摩亚群岛。穆尔累得精疲力竭。30日上午，他给妻子写信说：“这场令人心力衰竭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119] 但正如多年后他在回忆往事时所说的，真正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还在塔拉瓦潟湖等着他呢。

[1] Wallin, “Rejuvenation at Pearl Harbor,” p.1536.

[2] Downes, “How a War Was Won and a City Vanished at Pearl Harbor.”

[3] Raymer, *Descent into Darkness*, p.4.

[4] *Ibid.*, 4.

[5] Wallin, “Rejuvenation at Pearl Harbor,” p.1535.

[6] Trumbull, “Repair: VI.”

[7]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Vol.2, p.130.

[8] Trumbull, “Repair: IV.”

[9] Mason, *Battleship Sailor*, p.21.

[10] 阿马里洛，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11]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160.

[12] Wilson, “Soldier and a Jukebox.”

[1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92.

[14] Richardson,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 p.41.

[15]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16]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 [17]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105.
- [18] Jean O'Hara's unpublished memoir, cited in *ibid.*, p.112.
- [19]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 [20]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55.
- [21] *Ibid.*, p.33.
- [22] Wilson, "War Workers as a Social Group."
- [23]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 [24]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 [25]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149.
- [26] Lt.Robert C.Ruark, USNR, "Ho-Hum in Hawaii," *Liberty*, April 21, 1945, quoted in Bailey and Farber, *First Strange Place*, p.59.
- [27] Lamar, "I Saw Stars," p.16.
- [28] *Ibid.*, p.43.
- [29] Ralph C.Parker,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07, p.128.
- [30] *Ibid.*, p.131.
- [31] Lamar, "I Saw Stars," p.11.
- [32] Thomas H.Dye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6, pp.282-84.
- [33] Brown, *Hawaii Goes to War*, p.97.
- [34] Arlen, "Year in Retrospect."
- [3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 [36]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15.
- [37] *Ibid.*, p.399.
- [38] *Ibid.*, pp.418-19.
- [39] James S.Russell, CCOH Aviation Project, 1960, Part 4, Part 1.
- [40]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16.
- [41] James S.Russell, CCOH Aviation Project, 1960, Part 4, Part 1, p.21.
- [42]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107-8.
- [43] War Production Board, "Official Munitions Report of the U.S.," No.21, December 1, 1943, "Airplanes by Plants," Harry L.Hopkins Papers.

- [44] Herbert D.Riley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03.
- [45]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p.142-43.
- [46]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15.
- [47] Herbert D.Riley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02.
- [48] War Production Board, "Official Munitions Report of the U.S.," No.21, December 1, 1943, "Airplanes by Plants," p.28, Harry L.Hopkins Papers.
- [49] "Extract of Notes by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for the J.C.S.Historical Section," p.2, Ernest J.King Papers.
- [50]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III.The Casablanca Conference*, p.549.
- [51] Ibid., p.536.
- [52] Entry dated January 16,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59.
- [53] Entry dated January 14, 1943, in *ibid.*, p.356.
- [54] Entry dated January 16, 1943, in *ibid.*, p.359.
- [55] Ibid., p.360.
- [56] 下面的引文摘自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记录。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1942, and Casablanca, 1943.III.The Casablanca Conference*, pp.560-775.
- [57] Entry dated May 4,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398.
- [58]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Vol.1*, p.93.
- [59] Ibid., p.146.
- [60] Entry dated May 17, 1943, in Alanbrooke, *War Diaries*, p.405.
- [61]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Vol.1*, p.369.
- [62] "Memorandum fo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ne 10, 1943, in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38, in file "Memos to General Marshall, 1942-1944."
- [63] "War Department 4952-15," June 14,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3, p.1604.
- [64] COMSOPAC to CINCPAC, June 25, 1943, in *ibid.*, p.1611.
- [6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p.3-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 [6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03.
- [67] Spruance to RADM E.M.Eller, July 22, 196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7.
- [68] King and Whitehall, *Fleet Admiral King*, p.491 (footnote).
- [6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03.
- [70] Ibid., p.805.
- [71]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 [72] CINCPAC to COMSOPAC, June 26, 1943,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Box 15.
- [73]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p.6-7,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 [7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09.
- [75] Ibid., p.110.
- [7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27.
- [77] Ibid., pp.825-26.
- [78] Dyer,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618.
- [79] Stevenson and Calder, *Island Landfalls*, p.47.
- [80]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p.275-76.
- [81] "Report of Amphibious Operations for the Capture of the Gilbert Islands, from Cmdr.Fifth Amphibious Force to COMINCH," December 4, 1943, Serial 00165, enclosure C, in USMC Archives, "WWII, Tarawa and Makin, 1943," Box 6.
- [82] Ibid., p.2.
- [83]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9.
- [84]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56.
- [85]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5,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 [86] Towers to Forrestal, August 18, 1943, Spruance Papers, 引自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55。
- [87] Spruance to Savvy Cooke, February 9, 196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6.

[8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57.

[89]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有119艘现役航空母舰。如果根据战争早期的合理预测，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947年或1948年的话，航母的数量可能会超过克拉克说的数字。——作者注

[90]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90.

[91] 后来的家谱研究显示，克拉克的切罗基血统比他宣称的要少得多，实际上他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切罗基血统。——作者注

[9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1.

[93] *Ibid.*, p.163.

[94] Chief Petty Officer C.S.King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79.

[95]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161.

[96]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97] Clark, *Carrier Admiral*, p.108.

[98] 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99] Fitzhugh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07.

[100]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p.112-13.

[101]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p.112-13.

[10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21.

[10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17.

[104] *Ibid.*, pp.412-13.

[105]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15.

[10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23.

[107]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290.

[108] *Ibid.*, p.297.

[109] “Report of Operations, Galvanic,” Commanding General, 2nd Mar Div, from CO, CT-6.Ref: (a) Ltr CG, 2nd Mar Div, RMC CT/541, serial 002ND2 (Secret), dated November 11, 1943, in USMC Archives: “WWII, Tarawa and Makin, 1943,” Box 6.

[110]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6.

[111] CINCPAC to COMINCH, June 20,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3, p.1607.

[\[112\]](#) Dyer,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608.

[\[11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0.

[\[114\]](#)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7.

[\[115\]](#) “Corps Operation Plan Number 1-43,” Annex Baker, p.14,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116\]](#) “Corps Operation Plan Number 1-43,” Annex Able, p.4,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117\]](#)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30.

[\[118\]](#) Ibid., p.836.

[\[119\]](#) Ibid., p.834.

第十一章

按照惯例，为了保密起见，士兵们在航行开始前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11月7日清晨，第2陆战师运输舰队驶离惠灵顿港口，大多数士兵以为他们要前往位于北岛东海岸的霍克湾，进行更多的登陆演习。士兵们甚至还以为他们在当天早些时候会驶回惠灵顿港，刚好能赶上之前计划好的舞会。

然而，上午10点左右，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否定了士兵们的猜想。他宣布，这支舰队将要参与一场大规模作战。但是目的地仍旧不能公布。士兵们纷纷猜测他们要前往威克岛，甚至是攻打特鲁克群岛的日军堡垒。在与哈里·希尔将军率领的来自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南部登陆编队进行数日的对抗演习之后，海军陆战队和船员们才得知，他们要去的是塔拉瓦，此前几乎无人听说过这个地方。在路上，他们才知道此次作战的目标是什么。军官起居室的桌子上摆着航拍照片和等高线地图。“谢里登号”运输舰的甲板上放着一个比休岛的石膏模型，军官利用这模型向士兵们简要说明登陆计划。弗兰克·W.J.普兰特上尉记得在“谢里登号”运输舰的会议室中听到了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向第2陆战师致敬，”东京玫瑰说，“与陆地告别吧，你们再也看不到它了。我们知道你们将前往何处——吉尔伯特群岛！”^[1]

运输舰上又热又挤。但凡能睡觉，士兵们就赶紧睡觉。不睡觉的时候，他们就翻看旧杂志，玩牌，抽烟，擦擦枪杆子或是磨磨刺刀。即便是对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士兵来说，这段航程也是令人疲惫不堪的。G.D.利布里吉上尉与八九个军官共用一间船舱。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床，一张张床占满了船舱里每一平方英尺的空间，因此进进出出都得踩着床

过。每次有人出去上厕所时，都不可避免地会弄醒船舱里的其他人。船舱里总是极度闷热，让人难以入眠，于是利布里吉换到了甲板上去睡，那里的空气清爽多了。然而，他还是会被周围蹑手蹑脚的船员以及频繁到来的雨水惊醒。随着舰队逼近赤道，由于长期睡眠不足，疲劳不断积累，舰艇上的所有人都深受折磨。

第5舰队的大部队于11月10日自珍珠港出动。浩浩荡荡的舰队沿水道行进了一整个早上——驱逐舰和巡洋舰队打头，每5分钟驶来一艘；随后是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每艘相隔15分钟；最后是运输舰和辅助舰艇。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场面。灰色的战舰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地平线的各个方向上，多到数不过来。“约克城号”的雷·加德回忆起那“壮丽的场面”时惊叹道：“在其他地方恐怕没有这样的舰队了！”^[2]“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飘扬着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司令旗。斯普鲁恩斯将军每天都在甲板上来回走几个小时，锻炼身体。眼下还没有什么任务，他的生活便是在船舱里睡觉、读书或是听音乐。在前往东京的路上，卡尔·穆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占领位于吉尔伯特群岛西北方向的马绍尔群岛。根据最近的经验，他知道行动方案必定会由他来制定——他的同事和上司对于方案细节没什么兴趣。

舰队的作战控制由特纳负责，他的旗舰是“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他昔日的对手霍兰·史密斯同他在一艘船上，二人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一起。他们已决心将往日的怨怼留在过去，成为彼此可靠的朋友，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根据“电流”行动的初步计划，史密斯将继续留在珍珠港，与他的第5两栖军指挥部一起留在岸上。史密斯十分恼火，准备向华盛顿总部就此计划提起申诉——但后来特纳介入并对计划做出修改，邀请史密斯及其参谋一同登上特纳的旗舰。“像他俩这样亲近的朋友不常见，”穆尔回忆道，“他们在所有方面都很投缘，相处得非常好，会一起用餐。两人惺惺相惜。只要还在作战，他们就是配合最紧密的搭档。”^[3]

前往吉尔伯特群岛的路上基本平静无事。雷达屏幕上偶尔会出现敌

机，但这些敌机都未进入视距。美军舰载机在天上巡逻，偶尔会对下方友军军舰和运输舰进行模拟俯冲和模拟鱼雷轰炸。除非有紧急情况发生，否则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禁止使用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因此，舰艇之间通过闪光信号灯交流。一艘运输舰上随行的记者回忆道，11月17日“舰艇到达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因此没有人能够确定日期了；通常来说，应该是同一个24小时周期中的周一或周二”。^[4]新的部队不断在预定坐标上出现，舰队规模越来越大；这势不可当的海军力量让每个见证者都感到震撼。“萨拉托加号”的军需官罗杰·邦德在一天里看到了13艘航空母舰。要知道，不到一年前，“萨拉托加号”和“企业号”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仅剩的两艘航空母舰。在日出和日落之间，看到13艘友军航空母舰，邦德说：“那天真是太棒了。”^[5]

美国航母特混舰队真的极其令人震撼。不同种类的17艘航空母舰参与了“电流”行动。弗兰克·普兰特回忆说，当他看到这么多舰船，尤其是那些巨型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时，他感到“震惊”：“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支舰队是要去保护一支小小的海军陆战师。这让我深感骄傲。”^[6]

据情报，日军可能会从马绍尔基地空袭第5舰队。11月15日，尼米兹的司令部日志记录道：“在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发现大量飞机活动。”^[7]“约克城号”的一名航空兵军官判断日军在吉尔伯特群岛附近有250架陆基飞机，并预计“约克城号”在作战时至少会被一颗炸弹或鱼雷击中。^[8]在预定登陆日之前的一周里，海上已到处都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哈尔西已请求支援所罗门群岛北部，因为日军威胁要阻碍哈尔西的两栖部队从奥古斯塔皇后湾登陆布干维尔岛。尼米兹派4个航母特混大队中的2个绕到南边袭击拉包尔，并约定于11月12日之前尽早折回北部参加“电流”行动。

由海军少将查尔斯·A.波纳尔率领的第50特混舰队被划分为4组特混大队，拥有6艘大型航母和5艘轻型航母。秃顶的波纳尔被人亲切地称

为“光头”，他在“约克城号”上悬挂起了自己的司令旗。秋季率领航母袭击马库斯岛和威克岛时，他表现得犹豫不决，因此受到指责。对他指责最激烈的正是他的旗舰舰长“乔克”克拉克。“我觉得我们的少将不够精明，”克拉克后来说道，可以看出他措辞谨慎，这次的批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委婉，“如果处在和平时期，他一定是个好人，是个好领袖，但他似乎不太适合战争。”^[9]克拉克在特混舰队紧密编队中的激进掌舵法让波纳尔感到不安。在袭击距东京仅有1 000多英里的马库斯岛时，克拉克曾提出要继续轰炸日军机场，以确保机场彻底被毁。波纳尔不同意，他更想尽快撤离危险区域。他反对克拉克情绪化的提议，认为不能为了营救被击落的“复仇者”鱼雷机的机组人员而展开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机组人员后来被日军俘虏。）基于如此种种，克拉克认为波纳尔过于懦弱，其他许多舰长很明显也同意这一点。^[10]

航空母舰是全新的，许多护航舰艇是全新的，大多数飞机也是全新的。一整套全新的作战理论也正在形成。作战指南同样被修改过了。杜鲁门·J.赫丁上校是波纳尔非常得力的参谋长，曾经领导一个航空军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为航母特混舰队制定新的战术教范。赫丁喜欢环形编队：一艘或两艘航空母舰位于中间，围绕航母的内环是战列舰或巡洋舰，最外一环是驱逐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主要负责防空，驱逐舰负责反潜。^[11]飞机起飞或着舰时，所有舰艇会同时逆风转向。环形编队并不是一个新战术，但随着新型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速度提升，特混舰队规模扩大，环形编队的执行难度大大增加。斯普鲁恩斯后来写道：“问题.....有许多，但是我们逐渐解决了。”^[12]（他用这番话去总结整场战争也未尝不可。）

飞行员们不接受斯普鲁恩斯让航空母舰在吉尔伯特群岛外面保持防守态势的决定。争议一直持续到“电流”行动的前夜。托尔斯将军提出，8月和9月航母袭击威克岛和马库斯岛的行动证明保持机动性和进攻战术更为有利。10月9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托尔斯展示了那些航母袭击结果的彩色照片。他认为，让航空母舰西进，可以更有利

地摧毁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基地，并从根源上解除日军航空部队带来的威胁。斯普鲁恩斯反驳道，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他们必须要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的环礁；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去摧毁敌人在马绍尔群岛的航空基地，或是找到并摧毁日军舰队。这些目标虽然重要，但并非当务之急。在接下来的行动中，航母空中部队的任务是保护舰队、运输舰以及登陆部队占领的海滩。然而，一旦日本舰队忽然向东进攻，行动将随即改变。“如果日军舰队主力试图干扰‘电流’行动，”斯普鲁恩斯在写给各指挥官的信中指示，“那么，很明显，击退日军舰队将立刻成为当务之急。”[\[13\]](#)

在“电流”行动准备期间，该区域的日军基地频繁遭到猛烈空袭。自9月中旬开始，美国航空母舰轰炸机就轰炸了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以及阿贝马马和瑙鲁的次要机场。为了发动进攻，美军在吉尔伯特群岛南方的众多岛屿上建造了新的军用机场，包括埃利斯群岛（富纳富提、纳努梅阿环礁、努库费陶环礁）以及贝克岛。这些机场全都在吉尔伯特群岛的空袭范围内。美国第7航空队的B-24“解放者”轰炸机每天都会从坎顿岛和富纳富提的机场飞到遍布太平洋中部的敌军机场上空发动例行的轰炸。波纳尔的航空母舰最终出动了超过2 200架次飞机，执行的任务包括轰炸、扫射、照相侦察飞行以及对两栖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等。

考虑到开往吉尔伯特群岛的舰队规模庞大，日军空中巡逻队或潜艇有可能会发现并发出警报。然而，当11月19日夜美军舰队悄然从东方的地平线逼近，瞭望员第一次看到月光下的棕榈树林时，那里并没有人的迹象。难道敌人完全没有察觉到美军舰队吗？晚上10时45分，一束探照灯光划破天空，似乎是在向友机发出信号。这束光线没有扫过海平面。否则，美军的进攻舰队就很可能暴露。令美军惊奇又高兴的是，他们明显取得了奇袭的效果。

一切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军舰和运输舰向环礁南部和西部的指定战

位前进。20日凌晨3点一过，舰队士兵们就被叫醒了，他们匆匆吃下登陆日的传统早餐——牛排加鸡蛋。（在一艘部队运输舰上，一名医务兵冷漠地提醒说，这样一顿丰盛的早饭会让那些腹部受伤的人伤口一团糟，晚些时候，他免不了要治疗一些这样的伤员。）士兵们带齐了装备，准备登上登陆艇。早已有人向士兵们保证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大炮会在进攻开始前把比休岛夷为平地，他们都饶有兴致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场面。

凌晨4时41分，岛上还是一片沉寂，忽然一颗照明弹蹿到机场上空，红色的强光将棕榈树林照得通明。几分钟后，小岛西南角的一架8英寸口径的火炮向“马里兰号”战列舰开火。“马里兰号”战列舰随即以16英寸的火炮回击。5轮齐射之后，对面小岛就安静了下来。但是，日军在比休岛其他几个地区还设有三架8英寸的维克斯机关炮。很快，运输舰队附近的海面上便升起白色水柱。这支浩浩荡荡的运兵舰队必须争分夺秒，西进到日军射程以外的区域。

这场火炮对战持续了一个小时。“马里兰号”和“科罗拉多号”在距海岸约2英里处用16英寸的大型多破片炮弹对小岛进行全覆盖式的轰击。希尔将军命令“马里兰号”向海岸靠近，以吸引火力，找到日军大型炮台的位置。斯普鲁恩斯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沿环礁的东海岸和南海岸行驶，朝瞭望塔、炮位以及潟湖里的驳船开火。大型岸炮多次暂时沉寂，几分钟后再度开火。^[14]朱利安·史密斯推测，岸炮短暂停火那几次，应该是海军火力网造成炮手死伤，对方需要更换炮手。他说，不用太费事就能打掉大型火炮，因为16英寸的舰炮可以直接对准开放的炮台射击。^[15]事实证明，要让日军火炮失去战斗力没那么容易，有些火炮在登陆日第二天上午还在向美军舰队开火。

两艘扫雷舰开路，驶入了塔拉瓦潟湖。它们清扫了进港航道，检查水雷（一枚都没有发现），并为驱逐舰和运输舰做好标记。“灵高尔德号”和“达歇尔号”两艘驱逐舰紧随扫雷舰之后，与小型岸炮对射。“灵高尔德号”被击中了，使它负伤的可能是一枚5英寸的炮弹，不过损伤被控

制住了。

美军舰队甲板炮对比休岛的轰炸令人目眩。橘红色的炮口焰照亮了小岛西南方四分之一的海域。炮弹发出了货运列车那样的尖厉呼啸声，在夜空中划出一道道明亮的弧线。整个比休岛像火葬堆似的燃烧着。熊熊的火焰蹿上天空，足有几百英尺高。《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在一艘运输舰的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幕。“那时的天空一度比赤道正午时分还要明亮，”他写道，“高爆炸弹的弹壳在空中四散飞舞，就像小岛的四面都有人用猎枪射击一样。”^[16]每一次连射都伴随着海军陆战队员的热烈欢呼。就算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老兵威廉·罗加尔也说“棒极了”。不过经验告诉他，藏在掩体下的军队应该能顶住这样的炮火。^[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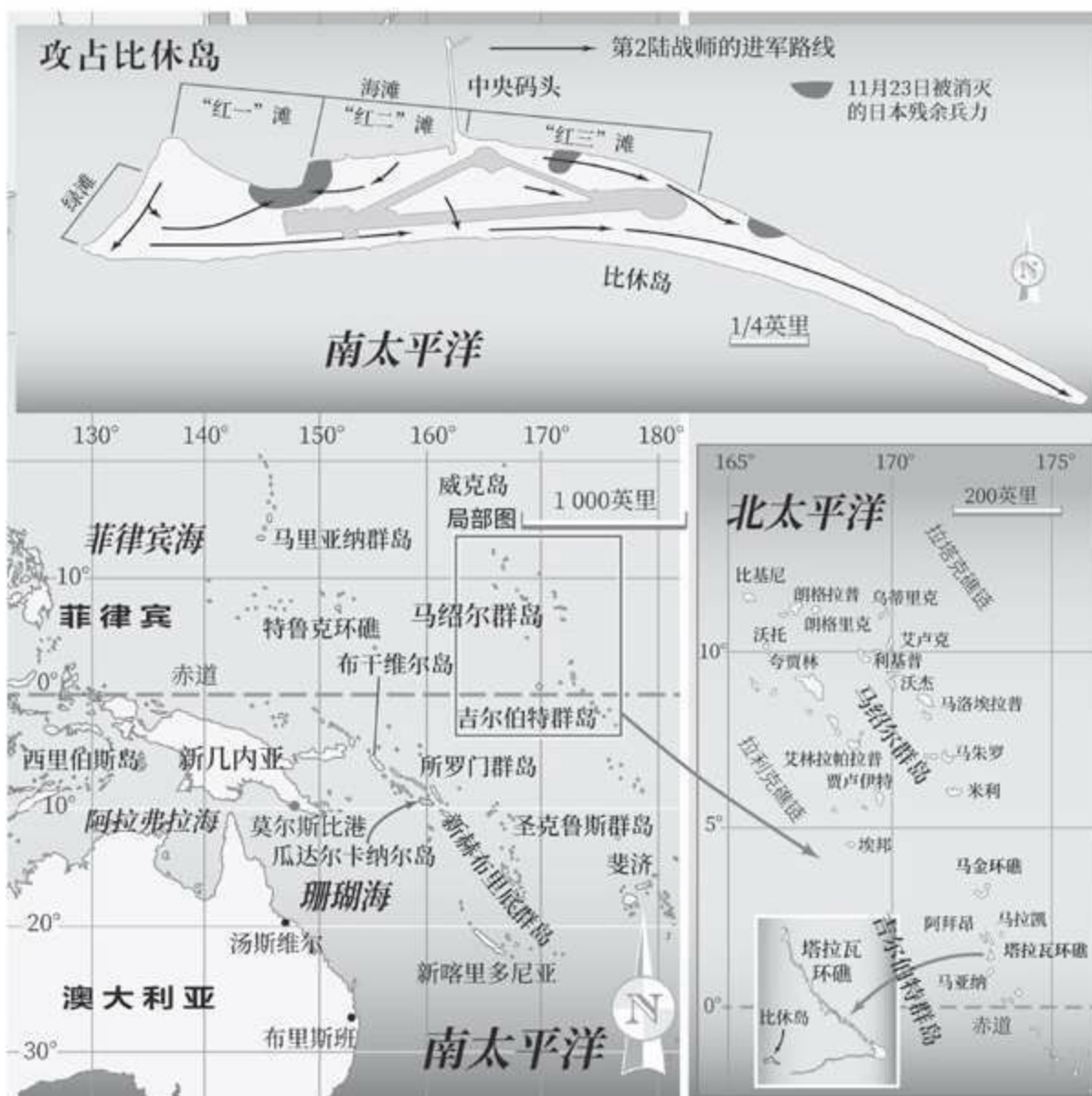
6点刚过，旭日东升，海军的炮火突然停止，第一批舰载机从南方嗡嗡地飞来。接下来的20分钟里，100多架TBF鱼雷轰炸机、SBD俯冲轰炸机和寇蒂斯SB2C轰炸机用高爆炸弹以及燃烧弹对这座小岛狂轰滥炸。日本高射炮大多没有动静，这意味着炮手或是被打死了，或是躲进了防空洞。一支长长的“地狱猫”战斗机编队从潟湖上方低空飞过，对海滩防御力量进行低空扫射。炮火产生的巨大烟柱盘旋升起，并向东蔓延。借着火光，能够看到炮火已经毁掉岛上大部分椰子树，留下光秃秃的、烧焦的土地，布满炸裂的树桩。谢罗德感到振奋。“我们都认为，肯定没有人能在这样的毁灭性力量中幸存。很显然，我认为，如果真的有几个小日本留在岛上（对于这一点我非常怀疑），他们现在也已经死光了。”^[18]卡尔·穆尔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桥上，通过望远镜看到了岛上的一切，他认为“岛上应该不会有活人了……这场登陆战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19]

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日军在岛上的防守力量不容小觑——这是一支由2 600名训练有素的老兵组成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时被称为“日本海军陆战队”。这支精英部队的成员是从两支最强的海军部队——第三特别警备队（前横须贺第六海军特别陆战队）以及佐世保第七海军特别

陆战队——中遴选的。这些人个顶个都是日本武装部队的精英。他们百里挑一，身材比普通日本人魁梧，其中很多士兵身高超过了6英尺。此外，当地还有一支2 200人的劳工队伍，其中大多是朝鲜人。指挥官柴崎惠次少将监督建设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防御工事。据报道，他曾向部队说“就算敌人有百万之众，打上一百年也夺不走塔拉瓦”。[\[20\]](#)

早上海军炮击和空中轰炸最猛烈的时候，守军都躲进了地堡和防空洞。这些防空设施以椰木建造，用水泥加固，上面又覆盖了几吨沙子。这样的构造，即使是被一颗重型炮弹直接击中，洞里的人也能安然无恙，而且防空洞足够容纳几乎所有驻军。这些大型地下防空设施由壕沟和隧道交织而成的地下网络连接起来，因此日本兵可以在掩护中快速到达射击位置。当瞭望塔上的日本兵发现进入塔拉瓦潟湖的扫雷舰和驱逐舰时，柴崎惠次开始让南岸（面向太平洋的海岸）士兵转移到北岸（面向潟湖的海岸）的作战位置。不论美军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登陆，他都决心迎战。他别无选择，因为机场几乎占据了小岛整个中部地区。坚固的堡垒沿着海滩等距排列，两边都布置了纵射火炮。其间坐落着步兵战壕、机枪掩体、带刺铁丝网、雷区以及火炮掩体。约有40架不同口径的火炮守卫着这座岛。美国人一旦登陆，就会立刻被困在海浪和木制海堤之间的一条狭长海滩中。随后，柴崎惠次会集结火力猛烈反击。有14辆轻型坦克专门用于这种反击。

“电流”行动，1943年11月20日—23日



大本营还曾提出“Z计划”，想派联合舰队大部向东出击，拦截所有打算袭击吉尔伯特—马绍尔群岛区域的盟军。然而，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地区遭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古贺峰一将军被迫放弃了该计划。太平洋中部不会出现海上决战。日本方面对“电流”行动采取的应对措施仅限于派潜艇巡逻，以及从马绍尔群岛基地发动空袭。比休岛上有重兵防

守，弹药和其他必需品供给充足，但是不会得到营救。柴崎惠次及其驻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对此非常清楚。

第一轮登陆行动预定于早上8点进行。但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小问题，希尔将军下令延迟一小时进攻。运输舰不得不从敌人的炮火范围内撤退出来，花费一些时间离开潟湖的进港航道，返回指定作战位置。到达指定位置后，由于来自南部的洋流比预想的更猛烈，它们努力地保持着战位。让情况更不利的是，希尔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马里兰号”的大炮所产生的冲击波破坏了司令舰桥上位置突出的通信中心。旗舰在黎明前第一次齐射时电路就短路了，无线电通信彻底中断。于是接下来的整个早上，希尔的信号员不得不用闪光信号灯传递命令。延迟和混乱难免由此产生。

破晓前，原定第一批登陆的大部分海军士兵就“装船”了（登上了希金斯登陆艇和履带式登陆车），拥挤的小船在巨浪中颠簸，他们便这样度过了紧张又难受的几个小时。涌起的海浪高过船头，士兵们的身体和武器都湿透了。晕船厉害的士兵抱着水桶呕吐。日方8英寸的炮弹不时落在附近，激起瀑布一般的海水，一股脑地浇在他们头上。这些小船先是接到撤退的命令，然后又奉命返回原处。几个小时过去了，不安的感觉浮上士兵的心头。“整个晚上我们都在该死的海里上下颠簸，”普兰特上尉回忆道，“我靠着牧师的肩膀，好能睡一会儿。”[\[21\]](#)

早上9点，第一批船驶离出发线。它们马上被炮火包围了，这是比休岛潟湖岸上位置十分隐蔽的火炮发出的。在离海滩大约半英里的地方，这些船不得不减速行驶，以防在珊瑚岬上搁浅。履带式登陆车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设计的，因此大多可以顺利地通过暗礁。它们的履带压入珊瑚，引擎快速运转，车头斜对天空，然后缓慢有力地通过障碍。坐在里面的士兵会忽然从长椅上弹起来，只能赶紧抓住把手或旁边的其他人，以防滚到甲板上去。暗礁近岸一侧的海水如果足够深，履带式登陆车就滑回海水中，再次发挥船的功能。

随着这些船向登陆滩头移动，炮火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猛烈。柴崎惠次的守军配备了75毫米的野战炮和37毫米的反坦克炮，而且设在敌人最有可能采用的进攻路线上。履带式登陆车和希金斯登陆艇的防弹钢板都不足以抵挡这些炮弹。威廉·罗加尔船上的一名士兵在船首探头望了一下，但选择的时机太糟糕了。他刚一伸头，一颗37毫米的炮弹就击中了船头。罗加尔回忆道：“爆炸的冲击力把他整个人甩到了船尾，他的鲜血和脑浆洒了左舷其他人一身。”^[22]利布里吉上尉的船也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打击，炮弹同时打穿了左舷和右舷。士兵们迅速趴下。^[23]轻型迫击炮弹在船身周围和上方爆炸，其中一颗榴霰弹在登陆艇的正上方爆炸，炸伤了几个士兵。

第一批船大都朝着“红一”滩前进，位于码头与岛屿西北角之间的海湾里。由于海岸线参差不齐，它们在前往“红一”滩的路上遭遇了口径不同的各种武器的密集射击。在登陆部队距离海滩约150码时，战壕和碉堡中的机枪手和步枪手开火了，不断向履带式登陆车射击。领头的船长们下意识地让船转向，远离致命的枪林弹雨——要么向右，前往岛屿最西边的绿滩；要么向左，前往“红二”滩和长码头。许多船在“红一”滩和绿滩交界的海岸上登陆，这片海岸本来规定是仅供紧急情况下登陆用的；但是，次日的战况证明了在这里登陆的重要意义。

罗加尔乘坐的履带式登陆车向“红二”滩前进时，迫击炮弹在头顶爆炸，全船的人都处在榴霰弹片的阵雨中。停靠在海滩上之后，罗加尔高喊“出发”，然后跳下船，幸存的士兵们紧紧跟在他身后。他看到左侧海堤上方有一个机枪掩体——这是潟湖海滩上最重要的“据点”之一，那天射杀了大约3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

履带式登陆车直接开上了海滩，并放下了吊门。第一批部队大多到达了海堤，海堤的掩护使他们不会直接受到炮火的攻击；但是，他们意识到，要继续前进，就必然会立即遭到岛内敌军的猛攻。起初，几个勇敢的士兵爬上海堤，但是都被射死或射伤，剩下的不得不退回海滩。孤立的小部队伏在海堤之下，士兵们低着头，等待着坦克、空中支援和救

兵。

天渐渐亮了起来，日军迫击炮、火炮和自动武器的火力似乎在不断加强。美军第一轮进攻是由履带式登陆车发起的，但后来的士兵搭乘的大部分希金斯登陆艇被暗礁困住了。弗兰克·普兰特所在的那艘船重重地触礁，一下子把船上的人甩到了船头。排长大喊：“下船！”船上的吊门“咔嗒咔嗒”地降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们排队蹚着海水上岸。但有几个人刚下船就被击中，其他人将他们拉回船上，等待撤离。普兰特位于船尾附近，是最后一批从船上下来的：“当我们到达船的前部时，周围的海水全都被血染成了紫色。”^[24]他们本以为一伸脚就能够着水底，结果海水漫过了他们的肩膀。机枪和步枪子弹如雨点般落入他们周围的海水中。迫击炮弹激起阵阵水柱。“地狱猫”在头顶上空不到100英尺高的地方来回扫射，普兰特忽然感觉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头顶上这些飞机似乎直接瞄准了他。随后，他意识到，这些飞机正在对海滩稍微往里一点的日军据点进行扫射。

第一批战地记者本来预定在第五轮攻击中登陆，但是到早上10点时，登陆行动已经混乱到分不清前后的轮次了。只有一轮持续不断的攻击正在进行，希金斯登陆艇不断从出发线向“红一”滩和“红二”滩前进。触礁搁浅的船只越来越多，只能寄望于数量越来越少的能够正常运转的履带式登陆车将士兵送到滩头。后面几拨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员被迫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迎难而上。记者谢罗德所在登陆艇的全排士兵都在距离滩头约700码的地方落入齐脖子深的海水里。他们向滩头前进时，密集的火炮持续不断地朝他们射来。到达浅水区，失去海水的掩护后，他们更容易受到猛烈炮火的攻击。在五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谢罗德眼前被炸死。“不得不提的是，”谢罗德说，“虽然士兵们只能在浅水区缓慢前行，因此更容易被炮火击中，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这是可怕的一幕，然而更是壮观的一幕，令人终身难忘。”这位记者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安然无恙地到达码头下方——与他一同前进的士兵似乎都被击中了。他还说：“我敢说，我当时只要一伸手，就能碰到一百发

子弹。”^[25]渐渐地，登上滩头的海军陆战队员越来越多，足以在海堤和大海之间勉强有个立足点了。

上午11点，戴维·M.舒普上校踉踉跄跄地在同一地点上岸了。他的双腿都被榴霰弹击中，脖子也被子弹擦伤；好在伤势还应付得了，他决心继续前进。舒普是第2陆战师原作战和训练指挥官，在策划“电流”行动的过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此前并没有实战经验。运输舰驶离惠灵顿之后，第2陆战团的前任团长由于神经衰弱离队休养，舒普接任团长一职。

因此，作为比休岛上级别最高的美军军官，舒普掌握了所有岸上军队的指挥权。他在码头正下方设立了第一个指挥所，里面的海水齐膝深。一名中士把电台捆在后背上，借着微弱的信号与沙滩上的部队保持联系。传来的消息并不乐观。海军陆战队没能突破到海堤的另一侧。舒普召集士兵清空了码头，将指挥所转移到了海滩上一处有掩护的地点，紧挨着日军地堡靠海的一侧。敌军就在双层椰木墙的另一侧。“碉堡里还有日军，”上校后来说，“但若要把他们炸出来，我方也会受损。因此，我们派哨兵守在他们碉堡的所有入口处，把日军困在里面。”^[26]舒普一条腿不停地流血，医务兵用绷带将伤口包扎起来。

他的通信情况很糟糕。在海水里艰难地向滩头挺进时，他的随身无线电系统进了水，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在枪炮声中，他只能靠喊话来下达命令。情报员在海滩上来回传递急报，其中许多人在没有掩护的地点被射杀。舒普最终通过无线电联系到了仍在潟湖运输舰上的第3营营长，他劝援军从码头东部登陆，因为那边敌人的火力相对没有那么猛烈，援军可以从那里沿海滩西进，或者直接进攻岛内的日军。

普兰特上尉一瘸一拐地上岸后，舒普命令他待在指挥所里临时担任空中协调员。在一名技术娴熟的无线电兵的协助下，普兰特与“马里兰号”战列舰取得了联系，他请求获得“一切可以提供的支援”。“马里兰号”的航空兵军官担心误伤友军。“目标离海滩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他说，“你们的前线在哪里？”普兰特答道：“前线在海滩上。”停顿了一会

儿，对方才弄明白他的话，然后通过无线电传来了回复：“照办。”[\[27\]](#)

基于军事演习的经验和直觉判断，海军陆战队员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步兵战术。必须要从正面和侧翼展开进攻，快速夺取敌方阵地。采取这种激进的战术需要士兵一鼓作气向前冲，而且必须保持住这种势头，哪怕一开始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因为进攻时的迟疑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危险的泥潭。但是，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比休岛上的士兵们根本无法跨过海堤获得立足点。在海堤与日军开火阵地之间的珊瑚礁附近，是一片布满了尸体的“无人地带”。为了把伤员带到安全区域，医务兵在炮火中穿行，随时都可能被打死。攻击部队急需装甲车帮助他们挺进内陆。几辆履带式登陆车轰鸣着开上了海滩，收起吊门，试图爬上海堤。但是，它们最终遭到敌军近距离平射的反坦克武器攻击。上午10点左右，海滩和浅滩上到处都是被毁坏的、燃烧着的登陆车残骸。当天结束时，登陆比休岛的履带式登陆车中将近一半都损坏了。

约正午时，坦克驳船将7辆中型谢尔曼坦克运上“红三”滩，这几辆坦克对防守严密的敌方阵地展开了首次有效的直接进攻。许多坦克被敌方炮火破坏了，也有一些落入了坦克陷阱，或是碰到了地雷。但是，这些不能动弹的谢尔曼坦克依旧可以为紧随其后的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和步枪手提供掩护，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临时的碉堡。午后不久，“红三”滩上的海军陆战队终于冒着巨大伤亡的风险，开始朝内陆缓慢逼近。他们从侧翼进攻，摧毁了敌方的暗堡，不过他们经常要反复清理同一个阵地，因为敌方士兵会通过隐蔽的壕沟回到暗堡中。一名上尉在战后报告说：“事实证明，坦克、火焰喷射器和步兵三者结合，可以在损失最低的情况下有效地摧毁敌人。”[\[28\]](#)

谢罗德紧跟在不断前进的步兵之后，只要找到掩护，他就赶紧记录下当时的情况：“陆战队员向椰木地堡里扔炸药后，一个日本兵从中跑了出来。他刚出来，就被陆战队员的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焰吞噬了。这个日本兵像一张电影胶片一样燃烧着。他身上的弹药带开始爆炸，60秒后才停止，而他早就没命了。”[\[29\]](#)

利布里吉上尉带领一排士兵与一队海军陆战队员挤在“红二”滩的海堤下面。“当时场面之诡异，甚于约翰·韦恩拍过的一些非常糟糕的电影，”他写道，“我快速走向上校，后面紧跟着我们排的士兵。我脱口而出：‘你知道A连在哪儿吗？’他指向海堤上方，说：‘应该在那边吧。’我想都没想就说：‘出发吧！’然后我纵身一跃，翻过海堤，头也不回地向前冲去。所有士兵都跟在我后面。我那时绝对是疯了，甚至都没考虑能不能做到就行动了。我当时头脑已经不清楚了。”[\[30\]](#)

在离岸一英里处巡航的“马里兰号”与舒普和其他部队指挥官的无线电联系断断续续，史密斯和希尔为此非常苦恼。来自滩头的消息零零碎碎，令人茫然。海军陆战队要求获得一切援助，包括援军、弹药、空中支援、半履带战车、坦克、饮用水、医务兵和补给品。指挥官们及其参谋努力了解岸上的准确情况。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情报来自“马里兰号”的“翠鸟”侦察机，这些侦察机当天大部分时候都在比休岛上空盘旋。飞行员罗伯特·麦克弗森少校对日军阵地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一有机会便对日方阵地进行低空扫射或扔下手榴弹。在登陆日的下午，朱利安·史密斯还派一名参谋随水上飞机去了解战况。[\[31\]](#)

史密斯已经派出了预备队，也就是第8陆战团的第1营和第3营，但是到下午3点左右，滩头堡仍旧不稳固。他给霍兰·史密斯发无线电称：“成功登陆‘红二’和‘红三’滩。‘红一’滩已有立足点。正从预备队中派一支LT [登陆小队] 参战。反击依然猛烈。”他还补充说，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局势尚不明朗。”[\[32\]](#)

进攻马金环礁（位于塔拉瓦北方83英里）的行动进展顺利，但是陆军推进速度缓慢，这让霍兰·史密斯感到很苦恼。他现在意识到，比休岛（塔拉瓦环礁）上的行动正在变成一场血战。与特纳将军简单商议后，他同意派预备队——第6陆战团——登陆比休岛。

海军陆战队目前暂时控制住了比休岛西部以及从舒普的指挥所探向岛内的一个突出部，但阵地还不稳固。要保住这些阵地，海军炮火和空

中支援的紧密合作是关键。两艘驱逐舰靠近比休岛后，在无线电的指引下，向目标发射了5英寸炮弹。

几个小时连续不停的轰炸破坏了柴崎惠次的电话通信。电话线就埋在浅沟里，甚至直接露在沙滩上，因此大多被炸碎，无法使用了。苦于无法用野战电话与其他部队取得联系，柴崎惠次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岛屿南侧。他让出了用作司令部的大型混凝土碉堡，将其作为治疗伤员的场所。但是柴崎惠次刚刚带领一群参谋徒步离开碉堡，美方的一艘驱逐舰发射的炮弹就幸运地落在了合适的地点。一颗5英寸的炮弹直接落在这群人中，炸死了柴崎惠次和另外几名高级军官。指挥官的突然死亡让日本守军陷入了混乱，这也许可以解释日方为何没能早点组织敢死队发动反攻。这一关键的进展可能让许多美国兵免于死亡。由于美军阵地缺乏纵深，一旦日军朝美军战线某一点发起大规模的反攻，美军就很难将其击退。

夜幕降临，战火暂时停息，海军陆战队员开始为过夜做准备。罗加尔德记得在比休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异常平静，“几乎是风平浪静”。^[33] 双方都不想暴露自己的位置，因此没有人开火。一架日军飞机飞到头顶上空盘旋，从地面上看不见它。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老兵立即将其称作“洗衣机查理”，并开玩笑说，他们在亨德森机场熟悉的那位执着的夜间访客，如今跟着他们一路向北来到了这里。日军发动刺刀冲锋的可能性一直让他们战战兢兢。因此，众人接到指令，1/3的士兵休息时，另外2/3的士兵要保持清醒，负责警戒。已有5 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上岸，但是他们被困在三片狭窄的海滩和两个角落里，在任何地点，他们推进的距离都不超过70码。他们的弹药堆放点暴露在外，毫无防护，一颗手榴弹就能轻松摧毁。弗兰克·普兰特根本睡不着：“我们这样不堪一击，而日军恰好善于在夜间偷袭，尤其是发动自杀式进攻，这种可能性非常之高，想起来就让人心惊胆战。”^[34]

登陆日第二天的破晓时是低潮，海水落潮后显现出了可怕的一幕。海滩上躺满了死去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尸体，还有一些尸体浮在水面上。

50多辆被毁的履带式登陆车和希金斯登陆艇面目全非，烧得焦黑，或是半埋在浅滩里，或是搁浅在珊瑚礁上。一股腐肉散发出来的甜丝丝的恶臭弥漫在整座岛上。太阳出来后，这种臭味会变得更重。海军陆战队员在死去的伙伴的背包和口袋中翻来翻去，试图找到弹药、水壶、香烟和食物。

被困在狭窄海滩的三个突击营都松了一口气，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竟能活过那一夜。万幸的是，敌人没有发起他们所担心的刺刀冲锋，但是他们的处境依旧危险。他们分散成小部队，彼此相隔很远。如果不能进一步夺取岛屿的控制权，他们很有可能会被赶回海里。准确的伤亡人数无法确定，但在登陆日上岸的部队中，似乎有超过1/3的士兵已经伤亡。军官以及士官的死伤比例更高。“我们的处境可谓是千钧一发，”舒普上校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军。”^[35]事实上，海军陆战队需要补充一切——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弹药、更多的装甲车和火炮。在炎热天气中作战，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饮用水和盐片。医生和医务兵整夜地治疗伤员，并将他们运回舰艇上；然而，急救用品即将耗尽。首席药剂师的助理马歇尔·拉尔夫·多克负责将伤员撤到一艘临时改造成医务船的坦克登陆舰上。他回忆说，海滩附近的海水被血液染成了红色。^[36]

朱利安·史密斯将军从“马里兰号”的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告知舒普，他将派预备队，即第8陆战团的第1营和第3营于早上6点登陆。天还没亮，预备队就全部登上了希金斯登陆艇，其中很多登陆艇已经在潟湖里转了大半夜。第一拨突击队逼近“红二”滩时，日方的机枪和轻型火炮开火了；很快人们便意识到，此次登陆的伤亡人数不会比前一天低。日军显然给“红一”和“红二”滩相交处的小股部队增加了武器。车辆人员登陆艇触礁了，海军陆战队员在齐腰深的海水里迎着敌军的炮火涉水前进。他们利用日军在近岸处设置的混凝土障碍物作为掩护，或是躲在搁浅的登陆艇后面。然而，他们距离海滩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是一场可怕的大屠杀！”罗加尔写道，“我面前的海水很快就满是漂浮的尸体或是伤员。〔那个营的〕大多数人已经被打死了——至少伤亡了300人。”^[37]

有一群日本兵似乎游到了搁浅在礁石上的一艘被破坏的小型运输船上。他们从那里用步枪和机枪射击因登陆艇搁浅而弃船的陆战队员。舰载俯冲轰炸机试图毁掉那艘船，但总是击不中。^[38]“从滩头堡看过去，这一幕让人太难受了，”谢罗德记录道，“预备队士兵还没有从希金斯登陆艇中出来时，日军便开始用机枪射击他们。许多人在海里前进时被杀死，也有一些溺死了。士兵们尖叫着，呻吟着。一艘船24个人中，最终只有3个人上岸。”^[39]

海滩上的可怕景象让已经上岸的士兵恢复了斗志。那天早上的计划很简单。舒普计划将岛屿一分为二——他将带领军队直接向南前进，穿过飞机场，一直到达海岸。亨利·P.克罗少校从“红三”滩带领士兵穿过敌军严密的防守，到达飞机场。迈克尔·P.瑞恩少校则从岛屿西北角一个突出部沿绿滩向南进攻，占领这里，作为后续登陆部队的桥头堡。

海军陆战队员在海滩上架起了75毫米的榴弹炮，开始炮轰更靠近岛屿内部的敌军射击点；海军应岸上请求，提供火力支援，轰炸敌军据点；“地狱猫”在低空盘旋扫射，俯冲轰炸机则根据无线电坐标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猛烈的攻击逐渐瓦解了敌军的防守，但是日本兵非常顽强，只有派步兵直接突击才能彻底毁掉敌人的地堡。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最值得骄傲也是最恐怖的一天。士兵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气，哪怕是受伤了，也多次重新返回战场。“他们带着残缺的胳膊、枪伤和榴霰弹留下的伤口继续战斗，”“约克城号”的药剂师助理维恩·加勒特回忆道，“我给他们包扎伤口，让他们回到船上，他们却说‘我没事’，然后继续作战。”^[40]威廉·D.霍金斯上尉是得克萨斯人，他属于那种不多见的面对危险毫不畏惧的人。他瞪着眼睛，勇往直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疾速奔跑；他独自打掉了一个又一个碉堡和机枪掩体，往射击孔中扔手榴弹；哪怕是多次被榴霰弹击中，严重受伤，他仍旧不愿意让人救下去。霍金斯指挥一辆履带式登陆车，搭载着所在排剩余的士兵，冲进了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中。目睹此景的人告诉谢罗德：“我永远忘不了他站在登陆车上的样子。无数子弹从他耳

边擦过，他却只顾着杀日本兵。这样的人我此生再也没有见过。”^[41]午后不久，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部，打破了动脉。几分钟后，他就死去了。后来，美军把在比休岛上占领的飞机场命名为霍金斯机场，罗斯福总统亲自将追授的荣誉勋章颁发给这位上尉的母亲。

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如此无畏。有些人会畏缩不前，躲在散兵坑里一动不动，只有逼着他们，他们才会行动。舒普发现一名下士藏在一堆碎石下面，舒普不停打他的腿，他才肯出来。舒普命令他说出他母亲的名字，然后训斥他说：“你觉得你像个废物一样蜷缩在洞里，她会为你感到自豪吗？”下士说她一定不会，同时说，他所在班里的所有人都死了，他没有接到命令。舒普指了指蹲伏在海堤下的几个海军陆战队员，说：“你去那边挑几个人。对他们说，‘跟着我’。组织好队伍后，向我汇报。”^[42]那名下士照做了，带着他新组建的班开始战斗。舒普再也没有得知他的下落。

恐惧是人的天性，是普遍存在的。哪怕是后来因在塔拉瓦表现卓越而获得荣誉勋章的舒普，也要拼命压制自己的恐惧。整个战斗中都在舒普身边的弗兰克·普兰特说，他并非好莱坞银幕上的那种战场指挥官——“他不是典型的英雄，甚至不是典型的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很胖，行动非常笨拙。我记得，他艰难地爬到某处时，我心想，这对一个老家伙来说真够不容易的；但事实上，他还不到40岁。”这名上校偶尔还会表现出“近乎绝望的恐惧”。^[43]谢罗德说，舒普拿着野战电话时，手是颤抖的，嗓音因为在战斗中嘶喊而沙哑。“我的上帝啊！”他在指挥所里面对着一群军官感叹道，“这么嘈杂，让人怎么思考啊？”^[44]当一个年轻的少校抱怨说手下不肯跟随自己前往机场时，舒普用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应该问：‘谁想跟我去？’就算只有10个人，你也尽力了，总比没有强。”^[45]

从破晓到傍晚，美国舰载机都在岛屿上空飞行，普兰特不停请求飞行员空袭目标。营长们通过无线电向舒普转达请求，以加密的区域编号

定位，舒普再将这些信息转发给普兰特。“航空联络官！”舒普可能会说，“告诉他们在西南角229号和东南角231号区域投掷炸弹。那边有些日本兵正在让我们的人受罪。”^[46]普兰特会用无线电传递指示，大约10分钟后，俯冲轰炸机将从空中向目标扔下1 000磅的炮弹。

他们都认为，陆空合作还有改进的空间。有时候，比休岛上的飞机太多了。长长的“地狱猫”战斗机编队扫射敌方阵地时，螺旋桨扬起的尘土会模糊步兵的视线。普兰特要求空袭“拉长间隔时间，保证能见度”。^[47]飞机没有出现空中相撞事故，不过有几次差点儿就撞上了。“我们以为自己投弹和射击的技术已经够完美了，”参与过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老兵亚历克斯·弗拉丘说，“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48]投向敌人碉堡的炸弹，如果只是落在附近，基本上不会对敌人造成损失；只有精准地直接命中才能把碉堡里的人炸死。另一名飞行员说，大多数情况下，“你根本看不清外面，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射击或是投弹”。^[49]

事实证明，海军炮火对岛屿西侧绿滩上的敌军炮台和碉堡十分有效。弹着观察员与舰队通过无线电联络，请求舰队用5英寸的火炮轰击敌人的据点。炮弹有时会落在距离美军只有50码的地方。舰炮刚一停下来，坦克和步兵便立即发动攻击。在许多情况下，海军的炮击会给美军带来一些优势，帮助海军陆战队减少人员伤亡。到正午时，瑞恩少校率领的部队便控制了岛屿的整个西部，控制纵深达到了绿滩以内200码的区域。此时援军登陆就不会遭到抵抗了。史密斯将军收到旗语发来的消息后，命令第6陆战团第1营上岸。他们要在天黑前登陆，夜里在散兵坑中躲好，然后穿过瑞恩的部队所在的位置，并在次日破晓时到达南部海滩。更多的预备队将登陆拜里基，也就是紧挨着比休岛东部的岛屿，目的是防止日军逃到那里。

在“红二”滩，韦恩·桑福德中尉带领着F连穿过交火激烈的地区，到达简易机场的南部。机枪手和步枪手轮流互相掩护。士兵们在距离南部海滩只有数米远的地方进入反坦克壕。这次进攻达到了舒普将岛屿一分

为二的目标，但是，美军扩大的防线内仍然有许多敌人，要把他们都消灭掉，还得经历几次恶战。一直有日军狙击手在射击——有的从碉堡里，有的从壕沟里，也有的从棕榈树顶上的叶子下面。弹药补给一直让美军感到担忧，运送弹药的士兵在岛屿北部到南部之间的枪林弹雨中不停地穿梭。

在“红一”和“红二”滩的相交处，日军还有一处坚固的据点。战役的第一天晚上，日军在此增设了机枪，对两个登陆滩头进行扫射。直到作战的第三天，这个据点才被彻底拔掉。

11月20日，罗伯特·麦克弗森一整天都驾驶着水上飞机在岛屿上空盘旋，为人们了解整场战役的进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普兰特上尉与他直接用无线电通信，然后将最新消息传递给舒普，这些第一手的俯瞰侦察信息让舒普松了口气。[\[50\]](#)跟前一天一样，麦克弗森偶尔还能够找到机会低空扫射日军阵地，或是从驾驶舱往日军阵地扔手榴弹。

“红三”滩的守军是整座岛屿上最顽强的。被美军手榴弹或是火焰喷射器清理过的碉堡还会反复威胁美军。这些碉堡内部坚固的墙壁将其分为了几个小隔间，因此，一颗手榴弹也许只能炸死一两个人，而其他人员则不会受伤。此外，日军的援兵也不断地通过隧道和壕沟进入碉堡。克罗少校大声惊呼：“他们的隧道难道是通到了东京吗？”[\[51\]](#)有时海军陆战队员不得不进入一些日军隧道，与敌人拼刺刀。坦克开到前线，近距离射击地堡口。美军还用推土机把珊瑚礁和沙子推到射击孔上，将其盖住，把里面的日本兵给闷死。

11月21日，也就是第二天午后不久，局势已经很明朗了：美军最终将夺取该岛，只是还不确定完全占领岛屿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士兵将为此丧生。中午12时18分海水满潮，前后几个小时潟湖的航行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希金斯登陆艇和坦克驳船将大量补给、坦克、半履带战车和重型施工设备运上了码头。担架上的伤员被运回舰艇，随后将被转移到医务船上。一辆吉普车把一架37毫米的火炮拖上了码头，谢罗德认为这一幕很有意义，他写道：“这就是我们必胜的信号。吉普车

来了。”^[52]

日军狙击手还在岛屿各处进行战斗。子弹擦过耳际的声音是如此熟悉，海军陆战队员们甚至忽略这种声音了。他们毫不畏惧地前进。“子弹在身边穿梭时，在海滩上前进本应该让人感到害怕，”一名上尉后来说，“但是，很快你就会认识到，你对此无能为力，因此干脆就不去担心了。”^[53]美军士兵不愿意让日本狙击手觉得自己有本事，远距离射击的时候，他们也的确打不准，所以美国士兵展现了对敌人的鄙夷。“你倒是打到我啊，浑蛋。”一个普通士兵在“红二”滩上喊道，当时一颗子弹恰好从他身边飞过。^[54]另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手被射中，失去了一截大拇指，而他“大笑着继续前进”。^[55]一名上尉在舒普的指挥所站着说话时，“屁股被子弹擦了一下”。“我真够倒霉的，”他说，“在前线打了四个小时都没有受伤，回到指挥所却被子弹伤到了。”^[56]

舒普上校跟岛上的其他士兵一样，满脸的尘土。他当日下午对战况进行了总结：“在我看来，咱们就要胜利了，但是，那些狗崽子手里还有许多子弹。咱们明天把他们收拾干净吧。”^[57]他已经疲惫至极，前一夜几乎没有睡，裹着绷带的伤口还在流血。他发给朱利安·史密斯将军的报告将载入海军陆战队的史册：“伤亡很多；阵亡率不明；作战成效：我们要赢了。”^[58]晚上8时30分，第2陆战师的参谋长、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经历许多恶战的老兵梅里特·埃德森上校上岸，接替舒普担任指挥官。

战役第三天，日军的抵抗越发无力了。第6陆战团抵达南部海滩，与其他部队会合，夺取了飞机场。比休岛中部残存的有组织的抵抗部队被包围在了一个钢筋加固的双层混凝土碉堡里，这座碉堡经受住了各种炮弹和炸弹的打击。美军叫推土机来完成了最后的任务。推土机前进时以推铲作为装甲抵挡子弹，推起沙土和礁石，堆成一座山，掩埋了碉堡的入口和射击口。几个海军陆战队员爬到碉堡上方，往通风口中倒入汽

油，然后一颗手榴弹就让这个碉堡瞬间变成了窑炉。后来，人们从碉堡里挖出来了300具日本兵的尸体。

除了几个独自行动的狙击手和掉队者，所有剩余的日本兵都被围在了岛屿东部一条狭窄的海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小心地进入碉堡和掩体，发现许多日本兵都自杀了。战地记者吉姆·卢卡斯发现了一个地堡，里面有许多自杀的日本兵，他们都是脱掉鞋子，把步枪塞进嘴里，然后用脚趾扳动扳机的。被困在岛屿东部的约300个日本兵在破晓时开始了敢死队的自杀式冲锋。美军守住了阵地，把这些日本兵彻底消灭掉了。扫荡行动又持续了三天，不过首次登陆的76个小时后，美军就宣布占领比休岛了。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带着参谋上岸，于11月23日正午接过指挥权。

战斗还没结束，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开始进行埋葬战友这项令人悲伤又可怕的工作了。他们必须争分夺秒。热带的高温导致尸体迅速腐烂，恶臭很快就弥漫了全岛。士兵们几乎是本能地在做这件事，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蹚进浅海，带回海上漂浮着的战友的尸体，把他们拖上海滩排列好，收集他们的身份识别牌。推土机挖出一条长长的壕沟，随军牧师主持下葬仪式，白色的十字架插成了长长的一列。约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战死，另有两倍于此的人受伤。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很不正常，原因在于许多伤员被困在了潟湖里或是海滩上，因此无法得到救护，而且经常被后来的炮火击中。

岛上的日本驻军基本上都被消灭了，共计有超过4000名士兵和劳工。海军陆战队还俘虏了146个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朝鲜的劳工。只有17个日本兵允许自己被活捉，其中只有一名军官，是一名少尉。朝鲜人很快就让美军知道他们不是日本人，许多朝鲜人自发地帮助埋葬美军士兵的尸体。海军陆战队员并不急着把死在地堡里的敌人弄上来，但是为了卫生的原因，必须这么做。埋葬地点上空有大群的热带绿蝇嗡嗡飞着。“整个比休岛都飘着死尸的腐臭味，”卢卡斯写道，“我们屠杀了4000多名日本兵。他们烧焦的尸体散布在环礁的各个角落，其中很多人

三天前就死了，尸体已经浮肿并腐烂了。一连几周的时间，我们都不得不闻着这腐败的气味。”^[59]尸体掩埋队把敌人的尸体扔进弹坑，然后用推土机把珊瑚礁盖在上面。

战役的最后一天早上，医务船“慰藉号”驶入潟湖。船一靠岸，登陆艇和游艇就跟了上来。通常来说，伤员只从一侧上船；但是这次，船两侧的梯板同时降了下来。正午时，医务兵搭起床单，让伤员免于被热带的太阳炙烤。“慰藉号”上的医生和护士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忙得不可开交。^[60]

“波尔克总统号”运输舰带来了重建机场所需的重型设备和补给品，以将这个千疮百孔的岛屿转变为现代化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在潟湖浅滩中卸载重型设备又出现了常见的问题。希尔将军希望运输舰能在24小时内离开这片区域，但是在登陆日的一个星期后，海军陆战队员仍旧在费力地将所需的货物从船上运到海滩上。只有坦克登陆艇足够大，可以运输最重的设备，比如蒸汽挖土机和起重机，但是只有三艘坦克登陆艇能正常工作。“用诗人的话来说，这个地方是卸货的地狱，”希尔对斯普鲁恩斯说，“我担心我们的进展达不到预期。”马金环礁上的特纳也报告了同样的问题。“就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总是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很难找到足够的人手把船上的东西卸下来，哪怕速度慢一些，”11月30日他对斯普鲁恩斯报告时说，“士兵们一从坦克登陆舰和装甲车上下下来，就像蒸发了一样。这些船有时在码头上停泊数小时，结果船上的东西一磅都没有卸下来，那些士兵只顾着去观光了。”^[61]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推土机就在比休岛上了岸，清除了简易机场上的尸体和残骸，还用珊瑚礁填平了弹坑。登陆四日后，第一批美军战斗机在比休岛上着陆。建筑队清理了道路，开始组装净水设备。路边和滑行道上成堆的废墟之中有被连根拔起的棕榈树、打得稀巴烂的坦克和装甲车、炸毁的碉堡中的钢板以及数百辆自行车扭曲的残骸。

霍兰·史密斯在塔拉瓦以北83英里的马金环礁外围的旗舰上关注着

比休岛的战斗。第165步兵团面对马金环礁上为数不多的敌军（只有600人，其中仅有半数是在作战人员）时不紧不慢地缓缓推进，这让他很不耐烦。在史密斯看来，他们在登陆当天就该完成任务。但是在登陆马金环礁的主岛布塔里塔里岛东岸后，面对迫击炮和机枪断断续续的射击，这支陆军部队立即转入了防守状态。当天早上早些时候，第二支美军从布塔里塔里北侧（潟湖一侧）登陆。伤亡人员很少，但是11月20日黑夜降临时，美军只控制了岛上一半的地方。

陆军的战术思想是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前进，以此来降低伤亡率，但是这延长了布塔里塔里战斗的时间。收到比休岛已经肃清日军的报告后，霍兰·史密斯急切地想让旗舰南行，但是按照作战计划，他和（“宾夕法尼亚号”上的）特纳在拿下布塔里塔里岛之前，要一直在马金环礁外的海面上等候。拉尔夫·史密斯将军直到11月23日凌晨1时40分才宣布控制该岛。^[62]在“电流”行动当中和之后，“史密斯听命于史密斯”的指挥结构中暗含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对立情绪，暂时没有爆发出来。但是，这两位将军8个月后将在塞班岛上重起争端，这次争端公开的影响更大。

11月24日早上，霍兰·史密斯乘坐一架“卡特琳娜”水上巡逻飞机在塔拉瓦降落。水上飞机绕着潟湖飞行时，他从空中俯瞰比休岛，感到震惊和悲伤：“我们阵亡的士兵浮在海上，或是躺在浸透鲜血的海滩上，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千疮百孔的岛上弥漫着珊瑚礁的灰尘和死亡的恶臭，令人作呕，令人恐惧。”^[63]他当日下午上了岸。岛上的士兵三天没有刮胡子了，整座岛上满是尘垢和珊瑚礁的碎渣。士兵们又饿又渴，也很疲惫。许多人独自坐着，似乎是在打盹，脸上带着麻木而恍惚的神情。史密斯和一些高级军官在简易机场附近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升旗仪式。因为这些岛屿曾是英国的保护地，所以英国国旗也与星条旗一起升起。

在这场战争之前，美国海军大多数将领没有亲身的作战经验。塔拉瓦的突击可以作为两栖作战的研究案例，而且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所有

参与策划此次进攻的高级军官都有必要亲眼看一下作战结果。战役结束后的两周时间里，高级军官先后参观了这座满目疮痍的岛屿。11月25日，希尔将军上了岸。他次日给斯普鲁恩斯写信，劝他也来看一看。仔细观察日军坚固的防御工事之后，他说：“这给我们都上了一课。”^[64]最初的进攻过去一周后，尼米兹上将以及一队来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乘坐一架DC-3飞到塔拉瓦。尼米兹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告诉副官阿瑟·拉马尔：“这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亡的气息。”^[65]朱利安·史密斯将军在帐篷里举办了一场颇显不合时宜的奢华晚宴，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棕榈心沙拉。拉马尔注意到，阵亡士兵的尸体仍旧不断地冲到海滩上。

霍兰·史密斯观察日军残留的防御工事后认为，空中轰炸和海军的火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一些地方，碉堡几乎毫发无损，就像从没遭受过攻击一样。许多地下工事上方覆盖着混凝土、棕榈木、钢梁和珊瑚沙。人们发现，有一个地堡上覆盖着“6英尺厚的加固混凝土，其上有两层纵横交错的铁轨，再往上是3英尺厚的沙土，两排椰木，最顶上是6英尺厚的沙子”。^[66]史密斯在战后回忆录中写下了尖刻的观点：“海军往往会夸大火炮的破坏力，这个缺点导致他们没能圆满完成任务。”^[67]他告诉海军将领们，海军应该对塔拉瓦进行三天连续不断的轰击。至于海军陆战队员涉水上岸时大规模伤亡，海军本应想尽一切办法将更多坦克登陆舰和履带式登陆车运到太平洋参与“电流”行动的。

特纳将军当时就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战后再次进行了回应。一个人但凡目睹过塔拉瓦环礁上的情形，就会为美军的伤亡规模所震撼；所有人都想从这次军事行动中学习，并将这次的经验应用于未来的两栖进攻任务中。但是，让舰队在行动开始的一周前甚至更早之前就在塔拉瓦这样的环礁附近驻扎是不明智的，因为潜艇袭击带来的危险太大了。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的观点，11月24日，在一次极其可怕的潜艇袭击中，美国海军损失了一艘护航航空母舰。

第50特混舰队第2特混大队的“利斯康湾号”（CVE-56）正在马金环

礁东南方约20英里的地方作战，其航空大队已经执行了空中侦察、炮台定位、低空扫射和轰炸潟湖等任务。24日黎明到来之前，该舰处于一级警戒状态，在270度的航线上以15节的速度航行。当晚频繁有报告称声呐探测到信号，舰上派出了更多的瞭望员。早上5时9分，一名军官在右舷舰尾瞭望台的走道上发现了鱼雷逼近的航迹。他用电话警告舰桥，但是已经来不及躲开了。5时10分，鱼雷击中了舰身中部，这是舰体最脆弱的部分。这艘航空母舰的主弹药库立即被引爆，所有的飞机炸弹瞬间爆炸。

爆炸的气浪上升到了1 000英尺的高空。有人在飞行控制站目睹了这一幕，将其形容为“一团明亮的橙色火焰，其中夹杂着白热金属一般的白色亮点”。^[68]碎片落在了2英里外的舰艇上。迈克尔·巴克是“弗兰克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名水手，他记得自己当时惊恐地看着那颗巨大的火球蹿上了黎明前的天空。“我们目睹了全过程，”他说，“那艘航母竟然被炸掉了，我们都惊呆了。”^[69]

“利斯康湾号”的后半部分直接炸没了。从第118根肋骨往后无一人幸存。飞机库里大火熊熊燃烧，舰首残留的区域都断了电。23分钟后，这艘航母就沉没了。“外面很黑，但我记得当时就像出现了蜡烛一样，”巴克说，“航母沉没时，火球一下子就消失了。”^[70]驱逐舰靠近那片海域打捞幸存者，飞机也在上空搜寻。到上午10点左右，海面上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残骸和空无一人的救生筏”。^[71]

“利斯康湾号”带着船上的687名船员沉入了海底，牺牲的人中有护航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亨利·M.穆林尼斯（Henry M.Mullinnix）少将。此次丧生的人员数量占到了美军在“电流”行动中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拉尔夫·史密斯的部队能够早一点占领马金环礁，也许这艘航母一两天之前就归航了，也就不会遭受这一厄运。考虑到全军种的伤亡人数，军方认为应该采取海军陆战队那种积极进攻的战术，而不是陆军稳扎稳打的战术。尼米兹后来总结说：“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证明海军

对于两栖突击速度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72\]](#)

在策划未来的两栖登陆战时，塔拉瓦的经验将被仔细研究并应用到作战计划中。海军陆战队事后反思时意识到，突击队抢滩时带的装备太多了。如果要在比休岛这种面积很小的岛屿上登陆，最好是轻装上阵，靠稳定的海运获得补给。许多军官都建议士兵把背包留在运输舰上，只带上子弹带。登陆部队应该少带一些口粮和水，而应多带一些手榴弹，其他像铺盖卷、沙袋、防毒面具、带刺铁丝网和炊具等都不应该带。无线电应该防水，或许应该放在可以漂浮的盒子里运上岸。弹药也应该包裹起来保持干燥。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登陆艇要穿过礁石，就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此外，空中支援和海军火力支援的舰岸协调工作也需要改进。

后来，很多士兵都认为，海军指挥官夸大了舰炮轰击的破坏力。霍华德·F.金曼少将是火力支援部队的指挥官，据说他在介绍任务时曾信誓旦旦地说：“毁灭这座岛并非我们的意图。我们不是想毁掉它。先生们，我们是要让它彻底从地球上消失。”[\[73\]](#) 希尔将军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以想象，这些话更多是激励性的，而非预言性的，其目的是鼓舞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的士气，因为他们即将对敌人严密防守的海滩展开一场尚无先例的进攻。（后来，许多海军陆战队员都证实，这一大串说辞恐怕只是用来鼓舞士气的。）美国海军研究过舰炮轰击对敌方防御工事可能产生的效果，非常了解其局限性。战列舰16英寸的高爆弹落在比休岛地面上的时候，速度是每秒1 500英尺。它们足以把地面上的建筑物连根拔起，但是根据希尔将军的说法，他们一直都知道，这种炮弹“穿透力不够”。[\[74\]](#) 的确，在轰炸的第一天早上，许多舰炮的射击角度过低——有一些炮弹触地后反弹，跳进了海里。

但这并不是说舰炮轰击一点儿作用都没有。1944年1月，（刚刚晋升的）埃德森将军在美国本土发表演讲，列举了这次战斗的结果。“在

登陆开始前的两个半小时里，海军的炮击毁掉了海岸防御大炮，”他说，“也毁掉了所有的高射炮，还除掉了一些反舰炮，但是几乎没有敲掉海滩上的任何放置了机枪、37毫米火炮、反舰炮和步枪的防御设施和掩体。炮击也彻底摧毁了岛上的通信系统。”^[75]

塔拉瓦的人员伤亡消息传到美国，引起国内短暂的公众议论。新任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做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允许媒体将阵亡战士陈尸“红二”滩的照片公开。美国报刊上此前从未公开刊登过这类照片。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屠杀相比，三天内死伤3 000人并不算是极大的损失。但是美国民众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还是感到震惊。美国媒体和国会对此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塔拉瓦的战略重要性在哪儿？这些士兵的死亡是否值得？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是不是把事情搞砸了？霍兰·史密斯向记者说了一些批评的言论，而且允许报道出来，犹如火上浇油。他说，海军没有携带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在登陆前发动的炮火轰击也不足。他将塔拉瓦战役与葛底斯堡战役中的皮克特冲锋相提并论。麦克阿瑟常常参与国内政治讨论，他拐弯抹角地指出，优秀的指挥官不应该让自己的士兵无谓地牺牲。如往常一样，这些批评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全国性报纸中反复出现，并被放大。

这场骚动很快就从华盛顿传回了珍珠港。12月14日，金给尼米兹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表达自己的愤怒，责怪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没有及时公布与他的报告相关的信息。金不得不回应“报纸、无线电广播以及国会的种种言论”，这些言论都认为海军没有对海军陆战队给予足够的支持。让尼米兹感到愤怒的是，霍兰·史密斯竟公开声称，他没有得到要求获得的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将塔拉瓦和皮克特冲锋进行对比是愚蠢的，毕竟前者是一场胜仗，后者是一场溃败。金也在抱怨尼米兹的新闻审查员对外报道了美军伤亡惨重的消息，“却几乎没有提及美军实际上打赢了这场战役”。^[76]

尼米兹也直接收到了一些阵亡战士的父母和妻子的来信。“你在塔拉瓦杀了我的儿子。”来自阿肯色州的一位母亲这样写道。太平洋舰队

总司令坚持亲自阅读并回复这些信件。他告诉拉马尔：“这是作为指挥官的责任。你不得不让一些士兵去赴死。”^[77]

除了霍兰·史密斯之外，其他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都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为“电流”行动的整体执行情况进行辩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坚持认为美国民众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直面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他说，塔拉瓦是“第一次真正的两栖突击作战”，这次行动“证明了两栖突击作战原则的可行性，此前许多军事专家都认为这一战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至于伤亡情况，他说：“的确，这是惨痛的代价——我们都知会是如此，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代价高昂的。”^[78]塔拉瓦真正的意义在于，日本军队的命运就此注定，因为不管在哪个岛上，不管岛上的防御工事有多么坚固，防守有多么严密，他们都不会再感到安全。

朱利安·史密斯断言，没有任何损失可以归咎于能够避免的问题或者战术失误。“这场战役规模宏大，经过精心策划，战斗艰苦。就算要我再来一次，结果也不会比这次更好了。”^[79]史密斯给美国国内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的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都非常厉害，情报工作也比在大多数战役中表现得好。在我看来，这场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80]圣诞节时，史密斯又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说，塔拉瓦行动中的伤亡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81]斯普鲁恩斯将军曾为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的决定辩护，他一直坚持认为，夺取塔拉瓦是绝对必要的，哪怕要付出代价。^[82]随着整体形势越来越清晰，美国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开始拥护这一观点。《纽约时报》1943年12月27日的社论提醒读者，塔拉瓦行动只是这种岛屿作战行动的首次，以后还会有许多：“我们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决心付出这样的代价。”^[83]

霍兰·史密斯是“电流”行动的主要指挥官中唯一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塔拉瓦行动是一场灾难，而吉尔伯特群岛也根本不应该攻打。他是唯一坦言“攻打塔拉瓦是个错误”的人。^[84]史密斯说出这话，犯了一个严重的禁忌，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的美国士兵为毫

无意义的事情丧生。虽然批评“电流”行动的观点不占主流，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随便对待这样的观点。如果军力进一步增加，太平洋舰队是可以绕过吉尔伯特群岛，直接挺进马绍尔群岛的。这种作战行动在1944年2月即可实施，只比“电流”行动晚三个月而已。比休岛的飞机场是否会威胁海上交通仍旧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失去了对马绍尔群岛的控制权之后，日军将很难为比休岛提供补给，也很难向那里运送飞机、零件、燃油以及其他必需品。欧内斯特·金决意在1943年年底之前对太平洋中部发起攻势，这一决定肯定对发动吉尔伯特群岛战役起到了重要影响。

许多年后，有人问朱利安·史密斯这个问题时，他的回答非常有哲理：“我觉得这种事是不该问的。战争就是战争。”不管美军本来是否可以安全绕过塔拉瓦，这场战役总归是场胜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中获得了无价的经验，这将使日后的行动受益。如果美军没有在塔拉瓦犯下那些错误，他们也许会在马绍尔群岛上犯下同样的错误，造成更严重的人员伤亡。美军经过血战夺下了塔拉瓦，让美日双方都明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日方的战略基于这样一种推测：美国民众无法忍受长期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但是塔拉瓦战役让日本人意识到，在美国人心目中，没有任何代价会高到不可承受，“他们巩固防御的每一座岛屿，都将成为我们轰炸日本和推进战线的基地”。[\[85\]](#)

根据斯普鲁恩斯的计划，“光头”波纳尔将他的航空母舰（第50特混舰队）停在了吉尔伯特群岛西北方的防区内。出乎意料的是，这支庞大的航母舰队及其警戒舰竟然能够避开潜艇和空中巡逻队的侦察，顺利潜入敌军控制的海域。[\[86\]](#)从11月19日破晓开始，空袭如暴雨袭来一般，打击日军机场以及整个地区的军事设施。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返回塔拉瓦和马金环礁汇报战况时有些言过其实了。得知比休岛上的血战后，他们觉得有些灰心。他们意识到，自己先前的印象过于乐观了。

波纳尔的旗舰“约克城号”现在的舰长是往日贬低过他的“乔克”克拉

克。这艘航母是第50特混舰队第1特混大队的核心，该特混大队中还有其姐妹舰“列克星敦号”以及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塔拉瓦和马金环礁登陆战的当天早上，三支航空大队将精力集中在了马绍尔群岛东部的两个最大的机场上，这两个机场分别位于贾卢伊特环礁和米利环礁。“复仇者”鱼雷轰炸机被用作滑翔轰炸机，配备了1 000磅的炸弹。其中一颗炸弹正中米利环礁的一处弹药库，炸出了令人惊叹的蘑菇云。“我们摧毁了那块地方，”“列克星敦号”战斗机中队的拉尔夫·汉克斯说，“敌人的飞机基本都被消灭了，没有遇到什么空中抵抗。”^[87]“约克城号”勤奋的“地狱猫”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在航空母舰上空负责战斗空中巡逻和反潜巡逻。在登陆日夜幕降临之前，许多飞行员完成了三四轮飞行任务。

古贺峰一大将的Z计划设想对“电流”这样的行动进行猛烈的海军反击和空中反击，但是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状况不允许其调动联合舰队的大部去防守吉尔伯特群岛。古贺峰一也担心盟军会从两个方向对拉包尔构成威胁。美国的情报表明，有舰队从特鲁克群岛驶出，后来证明这支舰队只是用来转移美军注意力的。不过夸贾林环礁上的大型机场有充足的中型轰炸机，潜艇的威胁也让美军非常担心。登陆日当天下午，“约克城号”的无线电侦听员截获了一段日方发送的无线电——命令更多潜艇到达该区域，并且（根据“约克城号”一名军官的日记）“让夸贾林环礁上的陆基轰炸机尽早发现我们并发动攻击”。^[88]三菱G4M轰炸机（盟军代号“贝蒂”）迅速向东和向南展开蛙跳进攻，沿着日本的航空基地所在岛屿前进。波纳尔和他的指挥官预计敌人会让配备了空投鱼雷的G4M轰炸机在夜间发动攻击，还猜测敌军的轰炸机将会在浪尖的高度飞行，以免被雷达发现。正如他们所料，傍晚过后不久，雷达屏幕上就开始出现信号。

自战争开始以来，在夜间作战方面，不论是海战还是空战，日军的表现都更胜一筹。那时候，甚至很少有美军飞行员会尝试在日落后着舰。让舰艇防御夜间空袭对美军来说是个相对较新的问题，美军是通过

战术创新来应对这一威胁的。波纳尔的每个特混大队都派一艘驱逐舰在编队中心以西15英里至20英里处作为雷达哨。每个特混大队的航母旗舰上都有战斗情报中心，负责追踪可疑飞机并引导战斗机拦截。但是，在黑夜中发现敌机是非常困难的，“地狱猫”战斗机往往没有机会与它们交战。后来，配备雷达系统的防空武器越来越先进，舰艇在无须看到攻击者的情况下就可以将其击落。1943年11月，该技术尚处于初期。“那时，我们还没有夜间战斗机，”杜鲁门·赫丁说，“傍晚刚过，天色一暗，日军的‘贝蒂’就会立即飞过来，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它们在我们周围飞行并扔下鱼雷，有时我们会被击中。”^[89]

三菱G4M轰炸机会从海上低空接近，通常是“朝月亮的方向飞”，赫丁回忆说，这样的话，目标船只就会在月光中显现出轮廓。^[90]在这种情况下，航空母舰长方形的轮廓立刻就能够被敌军分辨出来。如果舰艇正以大于10节的速度航行，它们就会留下长长的发亮尾流，这尾流就像发光的箭头，指向了舰艇所在的方位。11月20日晚，波纳尔命令第1特混大队降速到8节，希望这样做能够避免被空中的敌人侦察到。这种计策也是有代价的——如果敌军飞行员发现了缓慢前行的舰队，航母会更容易被击中。

南方40英里处的第3特混大队遭遇了最糟糕的夜袭。约有14架G4M突破了警戒舰的防守，近距离投放了鱼雷。其中一颗击中了轻型航母“独立号”的右后部。航母上人员伤亡惨重，舰体也严重损坏，需要返航维修。船员们设法让它保持一定的航行能力，驶回了富纳富提。从那里，它被送回旧金山进行大修。直到次年7月，这艘航母才重回战场。

21日黎明时，“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返回了米利环礁，像前一天一样轰炸了那里的简易机场和其他军用设施。日军的航空部队部署在整个环礁上，每一次美军返回时都发现地面上和空中盘旋的日军飞机似乎又多了一些。下午，赫丁上校（波纳尔的参谋长）命令“约克城号”的战斗机中队在米利环礁上空执行一次侦察任务，确定对手还有多少轰炸机。第5战斗机中队的队长查理·克罗姆林中校自愿带领

八架“地狱猫”战斗机执行任务。

赫丁的命令是侦察并报告，而不是攻击——但是克罗姆林选择在日军机场上空低空飞行，假装要近距离看一看。当一架G4M在跑道上滑行时，他进行低空扫射，使其燃烧起来。他转弯绕了回来，然后又进行了一轮低空扫射。不等克罗姆林到达机场的边缘，他的座舱就被20毫米的高射炮弹击中。爆炸破坏了仪表盘和普列克斯有机玻璃。榴霰弹使得克罗姆林的面部、颈部、胸部和右臂严重受伤。他的左眼完全看不见了，只能勉强通过右眼来看。挡风玻璃还是完整的，但是上面蜘蛛网似的裂痕模糊了他的视野。克罗姆林头上鲜血直流，几乎挡住视线，他设法打开座舱盖，以看到驾驶舱右侧的情况。他在300英尺高的空中水平飞行。一架僚机护送他飞行了120英里，最终返回到“约克城号”上空。克罗姆林成功降落的概率不高，但是他的进场很完美，钩住了阻拦索，然后滑行到停机区，关闭了引擎。他试图跳出驾驶舱，却瘫倒在地。“乔克”克拉克在作战报告中记录道：“他从驾驶舱中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失血过多，严重休克。”^[91] 克罗姆林被担架抬到了医务室。他的左眼保住了。在美国休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他领到了新的任务，重新飞上天空。

几乎每晚都会有空投鱼雷袭击，这让船员们几乎无法休息。在“约克城号”上，克拉克告诉值勤军官，每次雷达上出现可疑飞机时，都一定要叫醒他。克拉克会根据可疑飞机的位置、航线和速度来决定是否需要穿着睡衣回到舰桥指挥。

第50特混舰队频频遭遇夜袭，各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情报中心一直在紧张地工作，始终处于神经紧绷的状态。绿色信号在雷达屏幕上移动，有时会转向并接近屏幕的中心点。投掷鱼雷的敌机会以极快的速度移动，然后猛地转弯离开。当这一幕出现时，雷达操作员就可以认为有颗鱼雷已经在海里了。“当你坐在那里，不知道究竟会不会被鱼雷击中，那几分钟就像是几年，”“列克星敦号”的军官菲茨休·李回忆说，“战斗情报中心可不是个让人轻松的地方。”大多数年轻的雷达操作员工作

时都是面无表情，技巧娴熟。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神经绷得太紧而崩溃。“有几个人已经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抽泣、大哭、祈祷等等。”^[92]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李都会立刻换人值班，以免这种歇斯底里在中心蔓延，导致集体恐慌。

尽管航空部队已经连着两天遭遇了严重的损失，日军仍旧顽强地派剩余的陆基轰炸机攻击第50特混舰队。11月23日发生了激烈的空战，这又是漫长的一天。“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第16战斗机中队）在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时，拦截了一支前来空袭的队伍，击落了19架入侵者中的17架。次日，同一支中队又报告发现了一群敌机。拉尔夫·汉克斯中尉在战前是艾奥瓦州的养猪农户，他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击落了5架零式战斗机，因此被称为“一日王牌”。在15分钟的空战中，他的节流阀始终处于推到底的状态，他的“地狱猫”战斗机则以超过400节的速度进行俯冲攻击。汉克斯必须踩住方向舵脚蹬，用整个上半身的力量才能控制住操纵杆。强大的地心引力让他多次眼前发黑。零式战斗机和“地狱猫”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决，对于目前已经过时的日本战斗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

“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大队会本能地产生竞争。“约克城号”的飞行员觉得“列克星敦号”的飞行员总是很幸运，敌人出现时总能让他们赶上，这种想法使两者之间的较量更加激烈了。“被击败”的第5战斗机中队面对第16战斗机中队的表现，只能望天长叹。克拉克舰长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给“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费利克斯·斯顿普发出了友好的信号：“到目前为止，你们一直干得比我们好。希望我们下次运气能好一点儿。”^[93]

傍晚出动的飞机往往需要在夜间回收。在这种情况下，归航的飞行员往往一找到友军航母就会降落。埃塞克斯级航母的中队经常发生误认的情况，因为同级别航母都是在相同的生产线上制造的，就连在白天也很难区分。11月22日和23日，都有“约克城号”的飞机降落在“列克星敦号”上，每次飞行员都是跳出驾驶舱才知道自己弄混了。

傍晚时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移入该海域，波纳尔命令所有还在空中的飞机降落并停好。5架来自“利斯康湾号”（次日早上被摧毁）的FM-1野猫式战斗机在暴风雨中迷失了方向，无法捕捉到母舰发射的无线电归航信标。它们向西飞行，给“约克城号”发送无线电，请求允许着舰，次日再返回所属的航母。克拉克在与波纳尔商议之后同意了。

随着西方天空最后一缕光线慢慢消失，这几架飞机进入了着舰航线。前三架都安全降落了。第四架的飞行员忘了降下尾钩，因此降落信号官发出了复飞的信号。飞行员没有理会或是没有注意到，重重地降落下来。战斗机弹了起来，于是他猛推节流阀，明显是打算再次升空并重新降落，然而战斗机又落了下来，翻倒在防撞墙上。几架停在那里的飞机被撞坏了，4名推飞机的士兵当场死亡。撞毁的飞机熊熊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吞噬了航母中部的飞行甲板。不到20秒，就有船员拿来软管灭火，但是停在那里的飞机已经为早上的任务加满了油，挂好了炸弹，油箱和弹药开始连续爆炸。镁燃烧时的火焰明晃晃的，点亮了整艘航母，周围的海水变成一片刺眼的亮黄色。停在甲板上的F6F的翼炮开始开火，射出0.50英寸的子弹，消防队不得不躲起来寻求掩护。^[94]

克拉克让航母继续迎风行驶，以防火势蔓延，保护那些停在较远处的尚未损坏的飞机。“船上的高温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后来写道，“如果舰岛着火，导航和驾船就近乎不可能了。”^[95]船上噪声很大，克拉克大声喊叫，亲自指挥消防队灭火。“我记得克拉克舰长靠在驾驶台上，指挥消防队完成了拯救航母的壮举。”杜鲁门·赫丁后来回忆说。^[96]穿着石棉防火服的人拿着软管直接进入燃烧的中心区域，在着火的地方喷了足足3英寸的泡沫灭火剂。牵引车将燃烧的飞机拖到飞行甲板边上，然后把它们推下海。这场火烧了半个小时，晚上7时5分被完全扑灭。出乎意料的是，“约克城号”在此次事件中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并于次日早上恢复了正常的飞行作业。^[97]几名消防员因为积极英勇的表现获得了嘉奖。

第50特混舰队已经狠狠地打击了马绍尔群岛东部的日军航空部队，

但是飞行员们认为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棕鞋族”越来越相信，航空母舰的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拥有更新、更好的飞机和舰艇之后，航母舰队能够也应该接受更大的挑战。几年后，赫丁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当时有一种相当保守的倾向，对于可能发生的状况过于谨慎了。我们不想让舰艇受损。”^[98] 克拉克的说法较为直接：“只让航空母舰在防区活动是大错特错的，这让我们付出了代价：一艘航空母舰被击沉，另一艘失去战斗力，许多士兵丧生。”^[99] 在克拉克看来，掌握最高指挥权的“黑鞋族”将军没能及时了解新型快速航母的真正实力，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提拔飞行员进入华盛顿和珍珠港的决策层。

11月26日，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塔拉瓦，第5舰队的大部队开始向珍珠港返航。尼米兹让航空母舰离开防守位置，提议让它们去袭击夸贾林环礁（那里应该有约60架鱼雷轰炸机）以及马绍尔群岛北部的其他敌军基地。4艘重型巡洋舰加入了波纳尔的部队，离开的护航航母上的飞机则填补了大型航母飞机的损失。“雷吉”J.L.考夫曼少将被派往“约克城号”担任观察员，他的任务是监督波纳尔并将他的行动报告给尼米兹。

那晚日落后不久，敌人对向北行驶的特混舰队又展开了一轮空袭。两架G4M来到距离“约克城号”不到1英里的地方，向海水中投掷了照明弹，很明显这是在为其他的攻击机提供标志。波纳尔再次命令特混大队放慢速度，降低尾流的能见度。于是，敌人的主攻目标变成了西侧约20英里的“企业号”及其护航舰（第2特混大队）。

“企业号”的大队长布奇·奥黑尔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1942年2月他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摧毁了5架日军飞机，因此成了美国海军的第一位王牌飞行员。他还因该壮举获得了荣誉勋章。奥黑尔和同伴临时组织了夜间出击的“蝙蝠队”，由两架“地狱猫”战斗机和一架装载了空中雷达的“复仇者”鱼雷机组成。他们的战术是让三架飞机根据战斗机指挥官提供的航向信息出击。“复仇者”将凭借雷达提供的方位接近入侵者。两架战斗机会作为这架大型飞机的僚机，透过黑暗努力寻找敌机排气管的火焰。战斗机飞行员发现目标后，会离开鱼雷机，发动进攻。

“蝙蝠队”是为了应对夜袭的威胁，临时想出来的措施，更好的战术要等技术进步以及加强训练之后才能实现。然而，在1943年11月的时候，这是美军唯一可以采用的策略。

11月26日快到下午6点时，“企业号”战斗情报中心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几架逼近的可疑飞机，两架“地狱猫”（一架由奥黑尔驾驶，一架由安迪·斯康少尉驾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迎头截击。装载了雷达的“复仇者”鱼雷机几分钟后也起飞了，它将跟在两架战斗机后面，尽量在它们接近敌人编队时与它们会合。这是“蝙蝠队”战术的第一次实战尝试。这架TBF由“企业号”鱼雷机中队（第6鱼雷机中队）队长约翰·C.菲利普斯少校驾驶。鱼雷机上还有雷达专家黑曾·兰德上尉，以及机枪手阿尔文·B.柯南，他在战后回忆录《穿越火线》中描述了这次战斗。

这次战斗从头至尾都处于失控状态。“企业号”的战斗机指挥官尽了全力，引导三架飞机会合，然后根据航母雷达上时隐时现的信号，指挥它们朝目标飞过去。奥黑尔离开航母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斗机指挥官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他正处于“许多可疑飞机”之中，但是奥黑尔和斯康都没有发现附近有任何可疑飞机。“企业号”的雷达还显示菲利普斯与两架“地狱猫”之间的距离不到1英里，但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复仇者”的飞行员根本看不到彼此。他们和日军飞行员都像是在蒙眼玩致命的游戏。

柯南从TBF鱼雷机的机枪塔里向外望去，完全看不到地平线。“外面只能看到一片漆黑，再过一会儿，你连上下都分不出来了。转前几个弯时还好，但后来就开始迷失方向了。偶尔闪现的一个光点可能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也可能是海里的一艘船，还可能是一架快速向你飞来的飞机。”^[100]他不时看到远方出现火焰，可能是敌机扔了一颗照明弹，也可能是某一艘美国舰艇上的防空炮在开火。战斗机指挥官继续给菲利普斯指示航向，兰德从雷达显示屏上时断时续地获得返回的信号。7点刚过，兰德报告说雷达显示前方3英里处出现了6个光点。菲利普斯开始追踪，兰德则把不断缩短的距离报告给他——3英里、2英里、1英里、1000码。400码时，菲利普斯看到了清晰的蓝色火苗，他通过无线电

说：“我已经看到他们了。发动进攻。”[\[101\]](#)

菲利普斯的攻击决定与“蝙蝠队”的作战原则并不一致。TBF鱼雷机既没有机动能力，也不具备足够的火力来攻击强大的轰炸机编队。但是菲利普斯享有突袭的优势——日本飞行员从未在夜间遭到过美军飞机的攻击，所以他们不会预料到发生这样的事情。TBF鱼雷机追上了敌机编队，菲利普斯在黑暗中已经能够分辨出敌机长长的雪茄形状的轮廓。他首先用两架固定的0.50英寸机枪对最右边的G4M射击，明显打到了脆弱的翼根区域的油箱，因为飞机立即起火了。菲利普斯向左上方拉起，以防其他的飞机立即反击；随后柯南的机枪瞄准了目标，对着起火的位置再次开火。“那家伙一下子爆炸了，”柯南写道，“一道长长的火焰向下落去，坠入漆黑的大海，然后在海面上继续燃烧，成为黑暗中一处红色的亮点。”[\[102\]](#)日军惊慌失措，胡乱朝自己人开了火。他们的机枪发出的曳光弹朝彼此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靠近“复仇者”，因为它已经飞离，到了安全区域。

奥黑尔和斯康看到那架G4M被击落，也赶过来加入战斗。他们进入了TBF鱼雷机以及敌军剩余轰炸机的视距范围。奥黑尔担心误伤友军飞机，要求菲利普斯打开识别灯。菲利普斯快速地向识别灯闪现了一下。日军飞机显然看到了亮光并开火，击中了“复仇者”的机腹并打伤了兰德；与此同时，菲利普斯开始还击。他再次击中了对方，而柯南则再次向日军燃烧的机翼开炮。那架G4M并未失控，向下扎去，似乎是想在水上迫降。它在海面上留下了很长的燃烧痕迹。

在这场混战中，两架“地狱猫”和TBF鱼雷机再次失去了联络，但是它们在“企业号”战斗机指挥官的引导下重新会合。三架飞机都将识别灯打开了一会儿，直至形成编队，两架战斗机在“复仇者”两翼的侧后方。这是当天晚上三架美国飞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按计划编队飞行。柯南瞥见了布奇·奥黑尔被座舱盖灯光照亮的脸。他的座舱盖开着，护目镜推到了头上。

三架美国飞机亮过识别灯大约一分钟后，第四架飞机从右后侧靠近

了它们。那是一架偏离了路线的G4M飞机，与其编队分开，误把美军飞机当作了友军。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飞行员开火击中了奥黑尔的战斗机。柯南进行还击，可能击中了敌机，也可能没击中，那架飞机急转弯朝右飞走了。

奥黑尔的战斗机消失了，也不再回应无线电呼叫。“远方出现了一些灰白色的东西，”柯南写道，“可能是他的降落伞，也可能是战斗机坠海时溅起的水花。”^[103]斯康费了一番力气，重新回到编队。这两架美国飞机在低空盘旋，根本看不到奥黑尔的踪迹。大约9点钟的时候，它们掉头返航，通过航母后面长长的发光尾流寻找“企业号”。“企业号”打开了带遮罩的飞行甲板灯，这灯光只能从船尾和上方看到。出乎意料的是，菲利普斯和斯康都安全降落了，而且在降落时也没有磕磕碰碰。黎明时，多架舰载机、一架“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外加一艘驱逐舰，展开了海上搜索，但最终没有找到奥黑尔及其战斗机的踪迹。

奥黑尔的阵亡在美国上了头条新闻。他是美国武装部队中最有名的飞行员之一，是爱尔兰裔美国人英雄的杰出代表，也是航母舰队中最受尊敬和喜爱的人之一。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大教堂响起了庄严的大礼弥撒安魂曲。奥黑尔被追授了海军十字勋章，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机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悲伤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军首次尝试用舰载战斗机对抗夜间空袭取得了成功。美国人以一架战斗机为代价，击落了两架甚至三架双发中型轰炸机。菲利普斯击毁了两架G4M，而柯南很有可能击落了第三架。（没有人看到击中奥黑尔的“贝蒂”轰炸机的状况，但日方的记录的确显示损失了三架飞机。）没有一艘美国舰船被鱼雷击中。

第1和第2两个特混大队开始冒着暴风雨向北疾速前进，攻击目标是发动夜袭的飞机的基地——敌人设在夸贾林环礁上的大型机场。“乔克”克拉克与杜鲁门·赫丁和“约克城号”的中队长商议了防御夜间袭击的新对策，并向战斗机飞行员承诺，如果他们夜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他肯定会去海里打捞他们。两组新的“蝙蝠队”在白天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训

练。

发射并回收三机编队，往往会扰乱特混舰队的巡航队形；重新让航母回到护航舰艇的中心位置也让克拉克（还有波纳尔）非常头疼。克拉克不情愿地意识到，他的航空大队还没有做好执行夜间任务的准备。如果遭到袭击，“约克城号”仍须依靠高射炮和舵柄（机动规避）。

日夜不断的袭击对美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这有可能会耗尽几艘航母和护航舰艇上士兵们的精力。飞机管理员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机库周围通道的甲板上蜷缩起来睡一会儿。

两个特混大队于12月1日在马绍尔群岛东北方数百英里的地方会合。在“约克城号”的一次船上会议中，有人建议波纳尔在12月3日让战斗机发动攻击，扫荡夸贾林，12月4日再对那里进行全面空袭，波纳尔拒绝了。他决定采取风险较小的策略，在12月4日黎明时让所有飞机起飞，攻击该环礁，并在当天下午快速撤退。特混舰队开始朝马绍尔群岛的中心高速驶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12月4日黎明到达飞机起飞位置的时候，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被敌方从空中侦察到的迹象。

早上6时30分，6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纷纷起飞。大约90分钟后，奉克拉克之命接替奥黑尔担任“约克城号”大队长的埃德加·E.斯特宾斯少校第一个飞抵环礁上空。他数了一下，潟湖中有30艘船，其中包括2艘巡洋舰。这次攻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只有少数几架零式战斗机在空中，而且它们很快就被F6F中队摧毁了。约翰·C.菲利普斯驾驶着一周前成功执行夜间行动的那架“复仇者”，在环礁之上2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柯南回忆说，从那里向下望去，夸贾林环礁“展现在我们眼前，有好几座被白色沙滩围绕的小岛，中间有一个潟湖，蓝色的湖面深浅不一”。^[104] 菲利普斯清点岸上和潟湖中的目标，指挥中队里的轰炸机轮流攻击它们。“我们在飞机中能感受到黑色的高射炮弹的爆炸带来的震动，”柯南写道，“而从远处的罗伊——那慕尔起飞的战斗机与其说让我们感到不祥，不如说让我们感到有趣。”^[105]

“复仇者”鱼雷机对停泊的舰艇进行滑翔轰炸，击沉了三艘运输舰。高射炮击中了許多架飞机，但是这些坚固的飞机一架也没有被摧毁。“地狱猫”扫射了埃贝耶的水上飞机基地，10多架川西水上飞机起火。自进攻开始后，至少有20多架零式战斗机紧急起飞，向北追赶撤退的轰炸机。在飞回航空母舰的过程中，机枪手又击落了几架零式战斗机。

参与早上的作战行动的战机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返回了特混舰队。波纳尔的航母迎风行驶了一个小时，让战机着舰。美军几乎全部平安返回了特混舰队。只有少数几架没有回来。早上的作战中，只有两架F6F被击落。大约有10架零式战斗机扑向了第5战斗机中队的队长埃德·欧文，他的飞机在俯冲逃脱时几乎被打成了筛子。欧文向北飞行，但是他的仪表盘已被打坏，高度开始下降。发动机熄火了，于是他朝海面滑翔，试图在水上迫降。但是海面翻滚着巨浪，欧文觉得不可能成功迫降。他解开安全带扣，从驾驶舱中爬出来，拉开降落伞，然后落在了海里。他独自浮在海面上，觉得自己这下子要完了，但是很快就有一艘驱逐舰从地平线上出现，将他救了起来。他被送到“约克城号”上的时候，甚至还赶上了午餐。

夸贾林环礁上的日军航空大队遭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们以一贯的决心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完全有理由推测第50特混舰队会遭到猛烈的反击。斯特宾斯侦察时拍摄到了罗伊岛上的一个大型机场，该机场似乎完全没有受到过攻击。他数了一下，发现那里有大约60架无明显损坏痕迹的G4M轰炸机。斯特宾斯估计这些长程轰炸机可能会在当天下午或天黑后攻击美军特混舰队，便通过无线电劝“约克城号”对这个机场展开攻击，希望能够摧毁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战斗情报中心的一名军官将信息交给了舰桥上的波纳尔。

与考夫曼将军商议后，波纳尔做出了决定——他不会下令再次进攻夸贾林环礁。根据几天前商定的行动计划，美军下午将对东方约150英里的沃杰环礁发动攻击。特混舰队将以最高的有效巡航速度向北行驶，

同时回收所有的飞机。如果再次进攻夸贾林，航母就要在该环礁的空袭范围内再停留24小时。波纳尔不想再冒险，他认为没有理由推翻现有的计划。

根据“乔克”克拉克的说法，他当时“傻眼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约克城号”的中队长们降落到甲板上之后，向舰桥的指挥部报告时都请求带领中队再次攻击夸贾林环礁。克拉克恳求波纳尔：“你最好派他们回去把那些‘贝蒂’都干掉，否则它们会来找你报仇的！”^[106]波纳尔听着这些话，心里很不耐烦。在计划中，对夸贾林环礁的攻击原本就是速战速决，打完就撤的。克拉克和他的飞行员更关注“打”，而波纳尔更关心“撤”。最终，波纳尔命令旗舰舰长按原计划行动，准备攻击沃杰环礁。特混舰队将撤出这个区域，并且要防范好敌人必然会发动的反击。

正午刚过，第一拨攻击者就到达了——这是一队中岛单发B5N鱼雷机（“凯特”）。这些飞机低空接近舰队，以避免美军的雷达以及在高空飞行的F6F战斗机。等它们进入射程后，警戒舰纷纷开火，空中满是高射炮弹爆炸的烟雾。一架飞机落在“约克城号”右后方不远处。“列克星敦号”的舰长费利克斯·斯顿普紧急右转，以躲避一枚鱼雷，这枚鱼雷差点儿就碰到了左舷舰首。剩下的轰炸机转身飞走了，高射炮也停了火。不到一个多小时后，另外一批“凯特”从南边逼近。防空炮再次开火，为抵御第一轮攻击从高空飞下来的F6F战斗机也大展身手，击落了几乎所有的敌机，只剩下四架。一架敌机向“列克星敦号”投掷了一枚鱼雷，但是偏离得很远。另外三架敌机绕过或越过“旧金山号”巡洋舰，朝着“约克城号”冲了过去。“约克城号”的短程高射炮开火，险些击中“旧金山号”。一架“凯特”被击落了，另一架也被击落；第三架朝着“约克城号”飞来，翼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进行低空扫射，尾炮则对“旧金山号”开火。克拉克站在舰桥上朝炮手喊话，让他们摧毁那架飞机。其实无须催这些炮手。三架不同口径的火炮（40毫米、20毫米和5英寸）把火力都集中在了这架飞机上，此时飞机的高度与“约克城号”的舷边通道

齐平。当炮弹的线路穿过“旧金山号”时，波纳尔将军从舰桥上俯身喊道：“停火！停火！你们正在朝那艘巡洋舰开火！”[\[107\]](#)

克拉克又一次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位将军难道没有看到敌方的鱼雷机正在向“约克城号”发动攻击吗？他假装没有听到这个命令。“我其实听到了，但是我没有服从，因为我不希望自己被那架飞机击中。”[\[108\]](#)“凯特”距离航母只有不到150码了，此时一颗40毫米的炮弹击中其左翼根部，整个飞机左翼被炸掉了。这架敌机擦着“约克城号”的舰尾坠海了。降落信号官之前一直趴在甲板上，以躲避扫射，此时他站了起来，面带嘲讽地举起指挥棒，摆出了一个“完美着陆”的信号。

站在通道上的摄影助理阿尔·库珀曼拍下了敌机被40毫米炮弹击中的瞬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展示了这架飞机在空中解体的景象。克拉克命令他把这张照片发给航母上的每一个人。《生活》杂志后来将这张照片作为“本周最佳摄影”刊登出来。[\[109\]](#)

第50特混舰队没有严重损失，运气实在是不错，所有人都对在光天化日下突然出现两拨攻击者感到不安。“约克城号”的炮手向“旧金山号”猛烈射击，造成一人死亡，二十二人受伤。“旧金山号”舰长小芬利·弗朗斯明白友军的误伤是不可避免的，再考虑到克拉克可能会被提拔为将军，就没有报告这次事故。波纳尔显然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从未提出过克拉克不服从他的停火命令的问题。

特混舰队发起了大规模的战斗空中巡逻，为应对更多的袭击做好了准备。克拉克还是希望掉转方向，对夸贾林环礁进行另一次打击，但是波纳尔坚持要让舰队离开那里。下午3点，进攻沃杰环礁的飞机返航降落。特混舰队的速度提高到25节，向北疾速前进。现在天气对美军不利。驱逐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艰难行驶，波纳尔不得不让整支特混舰队减速到18节。此外，天空晴朗，能见度很好，因此舰艇根本无法躲避敌机的侦察。

克拉克对波纳尔撤退的决定非常不满。他认为，中午的空袭证明了

他的观点，特混舰队应该留在夸贾林环礁，与日本军队一决雌雄。他不停地用拳头砸桌子，并大声咒骂：“该死的，一个舰队怎么可能甩掉飞机呢！”[\[110\]](#)

罗伊岛上的60多架G4M还没有出现，它们可能会在夜间展开攻击。果然，雷达屏幕在日落前不久收到了信号。雷达上的大批光点表明，敌机正在进行大范围搜索。晚上7时45分，“贝蒂”和“凯特”与埃塞克斯级航母战斗群相遇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拨又一拨敌机追上舰队，投下降落伞照明弹并发射鱼雷。接下来发生的，正如航母日志所写的那样，是“迄今为止这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夜间鱼雷攻击。在七个半小时里，敌机不断发动攻击，埃塞克斯级航母上的士兵们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还在岗位上作战——此时距离最初进攻夸贾林环礁已经过去了将近24小时”。[\[111\]](#)天空被高射炮火一次次点亮，场面令人震撼。高射炮击落了几十架敌机。凸月从东方升起，照亮了特混舰队及其长长的白色尾流。许多鱼雷险些命中，但是没有舰船被击中。

“新奥尔良号”和“奥克兰号”巡洋舰在“约克城号”正前方和正后方行驶。敌机突破外围的防御后，总是以中间高高的长方形轮廓的大型航母为目标，航母编队不得不统一且快速地来回转向。“约克城号”险些被两颗鱼雷击中，这两颗鱼雷分别贴着舰首和舰尾擦了过去。雷达又侦测到一批飞机从南边接近时，“奥克兰号”的索尔·菲利普斯舰长主动申请断后，打开了船上的灯光，转移攻击者的注意力。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后，“奥克兰号”用强大的高射炮顽强地击落了十几架G4M轰炸机。晚上11时23分过后不久，左舷附近有几颗照明弹出现，又一架G4M从东北方向穿过警戒网。飞机离海面只有15英尺，呼啸而来，大型高射炮因担心误伤友军，没有开火。克拉克命令舰队紧急右转，正面迎接攻击。敌机在距离右舷舰首大约1 000码处投放了鱼雷，然后从“约克城号”的飞行甲板上方低空掠过。鱼雷直冲航母而来，但克拉克有时间改变航母的方向，最终鱼雷从舰首前方较远处穿了过去。准备撤退的敌机被航母左舷的火炮击落了。另一架敌机紧接而来，也从“约克城号”上方飞过，机关

炮的曳光弹在飞行甲板上划过，飞向“列克星敦号”。这架敌机准确地扔下了一枚炸弹，然后转向离开。约20秒后，猛烈的爆炸使得“列克星敦号”的舰尾燃起了熊熊烈火。这艘航母的方向操控失灵了，被迫减速。波纳尔立即命令整支特混舰队放慢速度，警戒舰也朝受损的航母围了过来，给予支援。

进攻者继续单独来袭或成对出现，每隔几分钟都会有敌机出现在外围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在“列克星敦号”的外围，高射炮弹形成了一堵幕墙，使任何敌机都无法接近2 000码内。美军防空火力的密度和准确性似乎瓦解了敌军飞行员的斗志，许多G4M过早地转弯，或者匆匆投下鱼雷，没有瞄准目标。“列克星敦号”的机组人员安装了应急操舵装置，午夜后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对它的控制。

凌晨1时27分，月亮落了下去，敌人的攻击逐渐停止。2点后，美军在视野范围内和雷达屏幕上都看不到敌机的任何踪迹了。特混舰队暂时安全了，继续高速向北航行。炮手蜷缩在甲板上，贴着武器入睡。黎明时，舰队派出了一支大型战斗空中巡逻队，特混舰队也为新一轮空袭做好了准备，但没有敌机到来。最终，他们脱离了敌机的攻击范围。

克拉克感到既疲惫又烦躁。舰队避开了鱼雷的致命打击，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但他对特混舰队未能摧毁马绍尔群岛的敌方空中力量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如果当初采取了更积极的战术，这一目标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舰队抵达珍珠港需要航行三天的时间，其间，克拉克为了让“光头”波纳尔卸职，不再担任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想了个点子。他和几名参谋写了一份报告，列举了一些不利于波纳尔的情况，提到了波纳尔的一些具体决策，显示出他在战略和战术上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这份不具名的文件将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当中传阅。克拉克还收集了罗伊岛机场上停放着G4M飞机的航拍照片。在看过照片后，波纳尔仍旧不同意大家急切的请求，不肯在这些敌机攻击舰队之前，返回战场并粉碎它们。这份报告并没有直接提及波纳尔的胆量问题，但是在

与同事的谈话中，克拉克曾经指责这名将军是一个“孬种”。[\[112\]](#)

克拉克甚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他的参谋中有一名航空情报官，赫尔曼·罗森布拉特上尉，在华盛顿颇有人脉。在加入海军之前，罗森布拉特担任过律师，并为罗斯福家族提供过法律服务。他认识总统和第一夫人，并与他们的两个儿子私交甚好。罗森布拉特的舅舅萨姆·罗森曼是罗斯福德最信赖的助手和讲稿撰写人之一。经过克拉克的批准，罗森布拉特从珍珠港打电话给白宫，提出了将波纳尔从现在的指挥岗位上调离的请求。随后他飞回华盛顿，在政府中传播众人对波纳尔的抱怨。

这一做法差点儿变成以下犯上的叛变行为。而且这可能会害了克拉克，甚至可能会毁掉他升为将军的希望。在背后批评自己的上级军官已然违反了“海军之道”，而通过后门直接联系美国的总统兼总司令，更是做过头了。然而，在战后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克拉克并没有表现出后悔的意思。他说：“能够有一条通往总统的渠道，这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波纳尔〕曾有机会大获全胜，但是他没有抓住机会。我认为很多指挥官都会犯错误，也许我自己也犯过一些，但如果你没有夺取胜利的意志，你就不应该成为一名军人。”[\[113\]](#)

克拉克对波纳尔的攻击其实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尼米兹一直在密切关注这名将军的表现。他派考夫曼少将参与了任务，以亲自考察波纳尔；考夫曼提供的秘密建议认为，应该找人接替波纳尔的职位。珍珠港的几名重要的“棕鞋族”将领，特别是约翰·托尔斯和福里斯特·谢尔曼，也认定应委派另一个人担任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波纳尔于1944年1月3日被解职，接替者马克·米彻尔少将是海军中最受欢迎和最受尊敬的资深飞行员之一。

“乔克”克拉克的小动作也没有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任何影响。他因在“约克城号”舰长任上的表现而获得银星勋章。1944年的第一天，他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一个星期后，他获得了米彻尔的一支航母分队的指挥权，旗舰是重新建造的“大黄蜂号”航母。

-
- [1]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 [2] Ray Gard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74.
- [3]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31.
- [4]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175.
- [5] Roger Bond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32.
- [6]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 [7] CINCPAC War Diary, November 15, 1943, Vol.4, p.1686.
- [8]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74.
- [9]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38.
- [10] 例如，可参见Donald Duncan,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78, Vol.7, p.426。
- [11] Truman J.Hedding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p.117-18.
- [12] Spruance to Professor Potter, March 3, 1955, on Naval Task Force organization in World War II,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4.
- [13]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80.
- [14] “Colonel Weller’s Report of NGF at Tarawa,” (undated),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 Series 4, Tarawa.
- [15]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281.
- [16] Sherrod, *Tarawa*, p.61.
- [1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2.
- [18] Sherrod, *Tarawa*, p.62.
- [1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855.
- [20]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23.
- [21]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p.
- [22] , USMC Archives.22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4.
- [23] Lt.G.D.Lillibridge, 1967, PC No.1342, USMC Archives.
- [24]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p.23, USMC Archives.
- [25] Sherrod, *Tarawa*, p.68.
- [26] David M.Shoup, oral history, p.2,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 [27]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28] CO, LT 1/6 to C.G., 2nd Mar Div, December, 6, 1943, "Report of Operations, GALVANIC,"USMC Archives.

[29] Sherrod, "Marines' Show."

[30] Lt.G.D.Lillibridge, 1967, PC No.1342, USMC Archives.

[31] Julian C.Smith, oral history, p.293,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Washington, DC.

[32]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2.

[33]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7.

[34]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35] Sherrod, "Marines' Show."

[36]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online at <http://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4).

[3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28.

[38] Ibid., pp.128-29.

[39] Sherrod, "Marines' Show."

[40] Vern Garrett,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59.

[41] Sherrod, *Tarawa*, p.96.

[42]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65.

[43]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44] Robert B.Sheeks,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88.

[45] Sherrod, *Tarawa*, p.97.

[46] Ibid., p.93.

[47]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48]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09.

[49] Jim Pearce quoted in *ibid.*

[50] Frank W.J.Plant, personal account, No.1024, USMC Archives.

[51]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83.

[52] Sherrod, *Tarawa*, p.101.

[53] Lt.Melvin A.Traylor Jr.quoted in Wukovits,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p.187.

[54] Sherrod, *Tarawa*, p.95.

- [55] Ibid., p.77.
- [56] Ibid., p.96.
- [57] Sherrod, "Marines' Show."
- [5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5.
- [59]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200.
- [60] Cooper, *Navy Nurse*, p.87.
- [61] R.K.Turner to Spruance, November 30, 194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 [62] "Commander of Central Pacific Force, War Diary," November 23, 1943, entry, p.20,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 [6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29.
- [64] H.W.Hill to Spruance, November 25, 1943, p.2,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 correspondence.
- [65] Arthur Lamar,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40.
- [66]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36.
- [67]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32.
- [68]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regarding the loss of U.S.S.*Liscome Bay* (CVE-56), December 30, 1943, Serial 002903, in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NO, Box 36.
- [69]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 [70] Michael Bak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8.
- [71]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regarding the loss of U.S.S.*Liscome Bay* (CVE-56), December 30, 1943, Serial 002903, in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NO, Box 36.
- [72] Potter and Nimitz, *Great Sea War*, p.323.
- [73] Major J.F.Mills quoted by Lucas, *Combat Correspondent*, p.170.
- [74]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305.
- [75] Edson's remarks excerpted in "Colonel Weller's Report of NGF at Tarawa" (undated),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 Series 4, Tarawa.
- [76] Memorandum King to Nimitz, December 16, 1943, Serial: 04258,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 COLL/2949, Box 1.
- [77] Lamar, "I Saw Stars," p.16.

- [78] Vandegrift and Asprey, *Once a Marine*, p.232.
- [79] Julian Smith to Willie Llew, December 20, 1943, Julian C.Smith Papers, COLL/202, Box 8, Series 7, Correspondence, December 1943.
- [80] Julian Smith to Warren W.Brown, December 25, 1943, *ibid.*
- [81] Julian Smith to Islar Simms, December 25, 1943, *ibid.*
- [82] 例如, 可参见Spruanc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March 19, 1963,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6。
- [83] “Mid-Pacific Stronghold,” p.19.
- [8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34.
- [85]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309.
- [86]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87] Lt.(jg) Ralph Hanks, oral history, in Hammel, ed., *Aces Against Japan*, p.170.
- [88] Diary of Alexander Wilding Jr.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76.
- [89]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 [90]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 [91]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92] Fitzhugh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12.
- [93]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82.
- [94]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95]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34.
- [96]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 [97] C.O.Yorktown, “Report on Operation Galvanic, 19 November to 27 November, 1943,”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14.
- [98]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 [99]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p.136-37.
- [100]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99.
- [101] Kernan, *Crossing the Line*, p.99.

- [\[102\]](#) Ibid., p.100.
- [\[103\]](#) Ibid., p.102.
- [\[104\]](#) Ibid., p.106.
- [\[105\]](#) Ibid., p.106.
- [\[106\]](#)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38.
- [\[107\]](#) Ibid., p.139.
- [\[108\]](#)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32.
- [\[109\]](#)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92.
- [\[110\]](#) *Honolulu Star-Bulletin*, January 27, 1944, quoted in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40.
- [\[111\]](#) U.S.S.Essex Cruise Book, 1944 (unpaginated).
- [\[112\]](#) George W.Anderson Jr.,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20.
- [\[11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44.

第十二章

切斯特·尼米兹不是那种爱摆架子的人。在主持司令部的讨论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通常希望大家多说一些，他则耐心倾听。他会引导决策者和指挥官得出合理意见。他允许全面的反对和批评，不因军衔和资历强求下级服从；在签署作战命令之前，先让他的下属达成共识。他很少强行驳回顾问的意见，也不会在他们一致反对时固执己见。

但是在1943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日——从“电流”行动中返回的指挥官聚集在司令部开会时，尼米兹宣布，他决定在下一阶段的中太平洋战役中采取大胆的绕道策略。第5舰队将直接挺进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两栖部队将在巨大的夸贾林环礁上登陆。日军控制的南部和东部的环礁和机场——包括马洛埃拉普环礁、沃杰环礁、米利环礁和贾卢伊特环礁——将被轰炸和炮击，但美军不会马上控制这些岛屿，如果要控制的话，也要在晚些时候。

这一计划比斯普鲁恩斯、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所设想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遭到三人的一致反对。斯普鲁恩斯担心被绕过的岛屿会威胁到夏威夷和吉尔伯特群岛之间的海上交通。日本人可能会将飞机派到这些岛屿上的机场，干扰美军运输舰和辅助舰艇，进而影响美军舰队的供给和新的前进基地的建设。此外，快速航空母舰已经被派往南部袭击日军基地，一旦这些航母离开，斯普鲁恩斯的空中力量就不足以持续地压制这些被绕过的机场上的敌军。刚刚从塔拉瓦的血雨腥风中回来的霍兰·史密斯也提出了明确的意见，他希望把整支两栖部队集中在马绍尔东南部的一个目标上。他将派两个分队参与下一次的进攻任务，不希望它们分开。

尼米兹一直在密切关注侦察飞行和无线电侦听所得的情报。日本人已经以牺牲夸贾林环礁为代价，向马绍尔群岛的外部（东部）增援。拿下夸贾林环礁对美军来说相对容易。此外，持续的空中压制加上美军对那片海域的控制，可以将这些绕过的岛屿基本置于美军可以容忍的状态下。“我们将进攻夸贾林环礁，”尼米兹说，“日本人想不到我们会进攻那里的。”^[1]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坚决反对下属的意见。争议公开后，他暗示说，如果现有舰队司令和两栖部队司令不想拿下夸贾林环礁，他会把任务分配给其他人。

后续事件证明尼米兹大胆的做法是正确的，日本海军没有预料到美军会进攻夸贾林环礁。联合舰队参谋中岛亲孝中佐在战后告诉美国审讯人员：“关于你们会在贾卢伊特环礁还是米利环礁登陆，我们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你们会在沃杰环礁登陆，但很少有人想到你们会直接进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心地带，夺取夸贾林环礁。马绍尔群岛可能遭到进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分散自己的力量。”^[2]

前进的舰队基地将设在马绍尔群岛。该地区广阔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受保护的锚地，足以容纳整支太平洋舰队。夏威夷距离前线数千英里，美军每次向西推进，这段距离都会变得更长。快速航母特混舰队具有非凡的机动性和远洋航程，但折回珍珠港补给和维修所需的长途航行会限制其进攻的时间，也会占用其出海的时间。“乔克”克拉克回忆说，在珍珠港西方远处作战时，“你最多可以打三天，然后就得回去，每个月甚至每六周至多能执行一次任务”。^[3]考虑到这些因素，斯普鲁恩斯请求夺取夸贾林环礁东南方向270英里处的马朱罗环礁。马朱罗环礁拥有广阔而平静的潟湖，可以为第10勤务中队的机动后勤部队提供有掩护的加油区和一流的前进基地。尼米兹同意了。

霍兰·史密斯认为日军在马朱罗环礁的防御会非常严密，决定不让登陆部队过于分散。但根据最新最可靠的情报，日本人已将大部分部队从该环礁中撤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12月的一次会议上，尼米兹对舰队情报官莱顿说：“告诉史密斯将军那里有多少日本人，就是你今天

早上告诉我的那个数字。”

“6个。”莱顿回答。

“6个？”史密斯问，“你是说6 000吧。”

“不，只有6个。”莱顿说。无线电侦听员截获了一份配给报告，表明马朱罗的剩余驻军每天消耗6份口粮。基于这一情报和其他情报，史密斯将军被说服了，认为派一个营夺取马朱罗就绰绰有余了。^[4]

尼米兹于12月14日向金将军提出了他的计划。这项任务的代号是“燧发枪”行动，夸贾林环礁和马朱罗环礁的预定登陆日都是1944年1月31日。斯普鲁恩斯将继续担任第5舰队司令，特纳担任两栖部队司令，霍兰·史密斯负责指挥突击部队。第58特混舰队现在由12艘运载着700多架飞机的航空母舰组成，将在整个地区拥有临时的压倒性空中优势。预定登陆日的两天之前，这些航母舰载机会对夸贾林环礁的机场和马绍尔群岛东南部的机场进行轰炸。

与不到两个月前在同一个环礁执行任务的部队相比，为“燧发枪”行动出海的第58特混舰队的规模几乎是其两倍。航母和警戒舰的规模忽然间如此庞大，总共有217艘，使得这支舰队看起来完全像是另外一支舰队，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资深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哈罗德·比尔驾驶着寇蒂斯SB2C轰炸机在上空盘旋，“俯瞰这支规模巨大的舰队，一眼望不到头，目之所及都是舰艇，这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5]

第58特混舰队现在被分成四个特混大队。每个特混大队都是一支小型舰队，以半独立行动的环形编队航行，并由一位海军少将指挥。特混大队仍然彼此相邻，距离较近，能够相互提供支援；但也不能太近，以免在飞行作业或躲避空袭时相撞。艾奥瓦级战列舰开始服役，它们被部署在编队中心的航空母舰的前后，为易受攻击的航空母舰提供了强大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指挥战列舰的将军资历要高于掌管航母的将军，在看重资历的传统观念下，前者应该掌控全局——但是尼米兹和金很早就宣

布，每个航母特混大队都应该由“棕鞋族”将领来指挥，而且大家接受了这个规定，没有提出异议。

“我认为对于任何参与这场战争的人来说，实际上都有两场战争，”“萨拉托加号”的资深军需官罗杰·邦德说，“比如说，如果你是1944年1月之后去的太平洋，你的经历和观点会与在此之前参战的人完全不同，因为那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军事行动。”^[6]1942年的航母对决像是一次紧张的击剑比赛，运气的眷顾往往无法预料。无常的天气变化捉弄着特混舰队的指挥官，迫使他们不停地调动舰队，好在接敌时处于最有利的战术位置。舰艇一直保持移动，进出战场，打完就跑。1944年，第58特混舰队可以轻易夺取敌人控制的岛屿上的基地，并将上面的机场夷为平地，彻底消除敌人反击的风险。特混舰队庞大的规模使得它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海洋任何地方都所向无敌。数百架F6F在白天的行动中可以赢得并保持巨大的空中优势。改进的雷达系统和日益高效的战斗情报中心可以探测到任何来袭的敌机并发出预警。警戒舰艇上安装了更多更先进的防空武器，并且开始使用近炸引信（检测到有敌机接近时会引爆炮弹），使得这些武器更加致命。在特混大队外围航行的驱逐舰采用了更好的声呐系统，并且改进了对付敌方潜艇的战术。第10勤务中队卓越的后勤能力使得航母部队能够在海上停留六周至八周而无须进入任何港口或锚地，从而增加了其航程和机动性。大型舰船可以在海上加油，在海上补充弹药，在海上补充物资。护航航空母舰负责把替补飞机运到西太平洋，在有需要时交给大型航母。C.S.金是“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文书军士长，他在船上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其间从未上过岸。他本可以在任何一个环礁的休闲区自由活动，但他从未感受到过这种需要：“在太平洋上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没有离开过这艘船。我其实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海上就好像在家里。这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海军。”^[7]

空袭敌军机场的行动总是以战斗机的扫射为开端。几支“地狱猫”战斗机中队会聚合成一个巨大的空中编队，通常包含六七十架飞机。飞行

编队靠得非常紧密，翼尖之间的距离通常也就三四英尺。它们在高空飞过目标，一旦有敌机爬升迎击，它们就会俯冲下去收拾对手。由于在速度、护甲和火力方面都具备决定性的优势，F6F很快就能把敌人解决掉。戴维·S.麦克坎贝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最好的美国海军王牌飞行员。1944年，他带领“埃塞克斯号”航母上的“地狱猫”中队执行了许多次重要的空中作战任务。他总是强调，要瞄准领头的敌机射击——“这可能会让其余的飞行员不知所措，并破坏对方的阵型。”麦克坎贝尔说，“地狱猫”中队没有使用“萨奇穿插”（萨奇剪）战法，这种战术可以弥补F4F野猫式战斗机对抗零式战斗机时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的劣势。F6F在各方面都比零式战斗机更好，因此适合更积极的战术。用0.50英寸机枪瞄准零式战斗机脆弱的翼根，一阵快速连发，“它们就会在你面前爆炸”。^[8]到1944年初，这些战斗机往往会将天空中的日本战斗机全部击落；几分钟后，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抵达时，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来自空中敌军的干扰。

将“约克城号”作为旗舰的海军少将米彻尔强调说，整支航母特混舰队都只是飞行员的复杂支持系统。“飞行员才是这支部队的武器，”他告诉手下，“飞行员是需要培养的。你必须训练飞行员，也必须训练其他人来辅助飞行员。”^[9]米彻尔个子不高，精瘦结实，面容憔悴，饱经风霜。他头上几乎没有头发，于是他用“白头鹰”作为呼号。米彻尔几乎很少离开“约克城号”的舰桥。他总是坐在一张凳子上，身着皱巴巴的卡其布衣服，头戴一顶褪色的鸭舌帽，脖子上挂着一个双筒望远镜。他通常很少说话，但善于倾听别人讲话，能记住飞行员告诉他的一切。当他说话的时候，那是一种微弱而刺耳的声音，而且有时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他的第一任旗舰舰长“乔克”克拉克说，他必须自学唇语才能破译这位将军的话。

阿利·伯克在第58特混舰队长期担任米彻尔的参谋长，他发现，米彻尔对敌人的动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直觉，而且他通常是对的。伯克说，他没有千里眼，只是拥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的直觉。他的舰载

机飞行经验不逊于海军中的任何一名飞行员。他对士兵的期望很高，因此会毫不犹豫地吧没有达到要求的人解职。“他有点像个小小个子伙伴，是个伟大的指挥官，”伯克说，“他了解自己的飞行员，了解他们的工作；他自己就是一个技术娴熟的飞行员.....他聪明、简单、直率，而且无情。”[\[10\]](#)

早在“燧发枪”行动之前，中太平洋地区日军的空中力量就在不可遏止地消耗了。1943年12月底，美国人在吉尔伯特群岛已经有了四个正常运作的机场，其中三个可以容纳重型轰炸机。约翰·H.胡佛少将的陆基航空指挥部派出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对抗马绍尔群岛东部的敌军，这些轰炸机来自坎顿岛和埃利斯群岛的后方基地，以及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的新基地。这次战役的主力是联合B-24“解放者”轰炸机，经常由F6F或P-39“空中眼镜蛇”护航。袭击者注意到起飞迎战的敌军战斗机的数量在持续下降。PB4Y是海军版B-24，负责在岛屿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水道中布设水雷。据尼米兹的司令部日志记载，“燧发枪”行动开始之前，飞机几乎每天都会发动例行的攻击。1月21日，15架B-24轰炸机在罗伊—那慕尔和夸贾林环礁投下30吨炸弹；次日，10架B-24向罗伊岛投掷了20吨炸弹；1月29日，5架B-24投掷了13吨炸弹；1月30日，7架B-24又投掷了21吨炸弹。米利环礁、贾卢伊特环礁、马洛埃拉普环礁、塔罗亚岛和沃杰环礁也在同样的日子里遭到了集中轰炸。[\[11\]](#)

1月28日（预定登陆日前三天）上午，弗雷德里克·C.谢尔曼将军指挥的第3特混大队对夸贾林环礁的机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F6F于黎明出击时，根本没有遇到日本战斗机，随后的轰炸机中队则确保了敌人在两栖舰队到达之前无法使用该机场。次日，谢尔曼的航空大队袭击了日军在马绍尔群岛建有防御工事的环礁中最西端的埃尼威托克，同样使其失去了作战能力。谢尔曼的航母舰队在埃尼威托克附近海面停留了三天，其间，他的航空大队将机场和地面设施炸得一干二净。第三天，那里只剩下了一堆堆废墟和几棵光秃秃的棕榈树。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地面

上和潟湖中找不到任何值得轰炸的目标了，“岛上看起来像是一片荒原”。[\[12\]](#)

1月31日黎明前，负责轰击登陆海滩的军舰出现在东边的地平线上。早上6时51分，理查德·L.康诺利将军让旗舰“马里兰号”来到距离罗伊岛北部海滩2 000码的位置。这是16英寸舰炮近距离平射的距离——用霍兰·史密斯的话来说：“近在咫尺，几乎是把炮口戳进日军阵地。”[\[13\]](#)上午7时15分，海军的炮火声突然全部停了下来，舰载机嗡嗡的飞行声立即填补了空白。紧随其后的是精准的空袭。飞机飞走后，大炮再次开火。罗伊岛上的一架隐藏在掩体中的127毫米火炮向海上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开炮，但很快就遭到回击，被敲掉了。杜鲁门·赫丁回忆说：“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要在派海军陆战队员登陆之前削弱岛上敌军的力量。我们把那里彻底地轰炸了一遍。他们管这种战术叫作‘斯普鲁恩斯剃头法’。我们把一切都炸倒了，连一棵棕榈树都没有留下。”[\[14\]](#)在登陆之前的72小时内，夸贾林环礁一共遭受了1.5万吨炸弹和海军炮弹的轰击，相当于驻守的日军人均1吨以上的弹药。特纳的指挥舰上流传着一个玩笑，是根据温斯顿·丘吉尔对不列颠之战的评价改编的：“在人类的冲突史中，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将如此多的东西投给如此少的对手。”[\[15\]](#)

运输舰载着第4陆战师和陆军第7步兵师，共计近6.4万人，准备发动攻击。第一批部队将在罗伊—那慕尔附近的几个小岛上登陆，这些岛屿分别被命名为“伊凡”“雅各布”“艾伦”“安德鲁”“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航拍照片显示，这些岛屿要么是被敌军舍弃，要么防守非常薄弱，然而一旦这些岛上有任何敌方火炮，它们就可能会对登陆艇构成威胁。在控制这些岛屿后，海军陆战队会布置炮兵阵地，将炮弹打到罗伊—那慕尔岛设防的海滩上。

“伊凡”和“雅各布”的登陆时间被定为上午9点，但波涛汹涌的海浪和强风让士兵难以转移进入履带式登陆车。一进入登陆车，海军陆战队员就会遭到猛烈的海浪拍击，浑身湿透。缺乏经验的海军船员拼尽全力

才能地保持登陆车的队形。无线电设备被海水浸透，无法使用，命令必须一辆车一辆车地口头传递。如此一来，延迟就不可避免了。9时30分，第一批登陆车驶向海滩。舰载机俯冲轰炸并扫射日军射击点。奉命占领“伊凡”的登陆车迎着强烈的风浪，不得不放慢速度，以避免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暗礁。第一批登陆车中，有几辆没有在指定的临海滩头登陆，而是绕着岛屿开到了潟湖岸边登陆。临时改变的登陆计划成功了，因为那一小群日本守军无法及时赶到新的登陆点来防御。登陆后，海军陆战队员从滩头堡迅速横扫了该岛，并在11点宣布控制全岛。

下午2点左右，美军登陆了罗伊—那慕尔以东的“艾伦”“阿尔伯特”“亚伯拉罕”等小岛。当他们冲上海滩时，希金斯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上的机枪和火箭炮同时开火，摧毁了日军许多火炮。在绕着岸边航行数小时后，许多海军陆战队员浑身湿透了，还有一些人晕船，因此即使上岸后会遭遇敌人的炮火，他们还是愿意踉踉跄跄地上岸。大多数情况下，在这些次要的岛屿上，有效的火力支援、空中支援以及登陆艇上不可小觑的火力让规模较小的日本驻军不敢露头反击，因此登陆时没有人员伤亡。3时42分，“阿尔伯特”被控制；3时45分，“安德鲁”（根本没有守军）被控制；4时28分，“艾伦”也被美军占领。美军在“亚伯拉罕”上只发现了六名日本士兵，在夜幕降临时控制了该岛。美军的伤亡很少。那天晚上，榴弹炮被拖上岸并被固定好，对敌人防御严密的罗伊—那慕尔的海滩开火。

登陆日的混乱局面都是可控的，而且没有一件事情超出预期。“北部登陆部队司令部早已预料到，登陆日当天的事情可能不会完全按计划进行。”施密特将军的参谋长后来说。^[16]但是，早晨的时候，登陆艇的指挥和控制完全乱套了。康诺利将军将这个问题归因于船员经验不足、缺乏登陆演习、天气恶劣以及无线电设备进水损坏。尽管如此，这位将军仍自豪地说：“我们最终成功执行了计划，这是对一支部队的指挥和组织性的终极考验。”^[17]

2月1日黎明时分，第4陆战师的大部队本来要在2月1日黎明时分从

罗伊—那慕尔的潟湖一侧上岸。所有部队都将乘履带式登陆车登陆。为了避免像登陆塔拉瓦一样混乱和无序，前两批士兵进入履带式登陆车之后，登陆车才从坦克登陆舰上移动下来。根据作战计划，这些登陆车将会在离岸几英里的地方从吊门上下来，开始启动。然后，它们将通过那慕尔东部的水道进入潟湖，并在预定登陆地点外会合。但是在登陆日，这种小型登陆车在近岸的海浪中剧烈颠簸，苦不堪言，因此康诺利决定让坦克登陆舰在黎明前驶入潟湖，在离岸更近的地方放下登陆车。

在“田纳西号”战列舰和其他火力支援舰船大炮的掩护下，坦克登陆舰在黎明时进入了潟湖。毗邻的岛屿上，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让日军生不如死。与前一日相比，罗伊—那慕尔的日本阵地的炮火规模明显缩小。由于坦克登陆舰在支援部队和罗伊岛之间经过，因此，美军将轰炸罗伊岛的时间推迟至上午7时10分。代号为“W时”的预定登陆时间定于10点。

将履带式登陆车从坦克登陆舰上卸下来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停放于上层甲板的登陆车必须通过升降机移到下层的坦克甲板上，糟糕的是，第二代履带式登陆车太长，不太适合坦克登陆舰的升降机。士兵不得不先把登陆车放在倾斜的吊门上，然后才能将其放入升降机，而且即使这样，也只有几英寸的富余空间而已。每辆登陆车都必须这样慢慢地转移，难免会造成延误。一艘坦克登陆舰上，由于升降机发生故障，9辆登陆车滞留在露天甲板上。8时53分，延误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康诺利将“W时”推迟到上午11点。

11时12分，驱逐舰“菲尔普斯号”发出信号，第一批登陆车扑向罗伊岛。要到达红滩，登陆车需要行驶30分钟。军舰的炮击达到了高潮，空中协调员让驾驶“复仇者”和“地狱猫”的飞行员保持在2 000英尺以上的空中，这样在军舰炮击岛屿的同时，飞机也能进行轰炸。后来人们认为，第一批登陆车驶近海滩时进行的海空联合轰击取得了成功，类似的战术在后来的两栖作战中得到了沿用。

第一批登陆车上岸后，飞机的轰炸和海军的炮火就立即中止了。登

陆车的履带紧紧地咬住沙滩，在海滩上加速前进，同时用机枪和火箭炮对敌方阵地进行攻击。约15分钟后，第一批部队登陆了那慕尔。在中午以前，有四个营登上了这两个相连的岛屿。



罗伊岛相对比较容易拿下。岛屿最西部的温迪角被履带式登陆车迅

速占领。海军陆战队员发现，许多碉堡和防御性壕沟已经被猛烈的轰击炸成了废墟。日本的驻军似乎被猛烈的炮击吓坏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激烈地反抗。海军的狂轰滥炸让整座岛屿面目全非，以至于地图上确定的许多地标不复存在。步兵无法再确定他们相对于指定目标的位置了，因此只能凭直觉一直向北部海滩前进。一些情绪高涨的连队不得不返回岛屿中间地带，好保证整体推进有序进行。

当第一批坦克在中午上岸时，日军所有剩余的抵抗都瓦解了。罗伊岛的平坦地形非常适合坦克行驶，这些坦克直接冲入岛屿的中心，并对敌人的碉堡近距离射击。到下午3点的时候，友军的火力比敌方火力对海军陆战队员造成的危险还要大。观察员从空中看到，海军陆战队员都是站着走来走去，没有采取措施去防范敌人的射击。傍晚时分，罗伊岛上仅剩的有组织的反抗力量藏身于岛上东北端的一个地堡群中。美军对那里进行了协调一致的大规模进攻，将剩余敌军逼回沙滩上。敌军或是死于炮火，或是自杀。下午6时2分，路易斯·R.琼斯上校报告说岛屿北部已经拿下。

海军陆战队在那慕尔的作战艰苦得多，该岛潟湖一侧的沙岬连接着罗伊岛。那里的地形不利于坦克和装甲车行驶。大部分重型装甲车停在了绿滩的尖端，只能从后方为进攻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坦克或是陷入软沙，或是落入弹坑和坦克陷阱之中，或是无法爬过被炸毁的守军炮台废墟中的瓦砾。和罗伊岛的情况一样，舰炮的轰击彻底改变了那慕尔的面貌，海军陆战队员无法识别地图上的地标。浓密的草丛和浓重的烟雾降低了能见度。在岛屿中心，日本狙击手隐藏在灌木林里，有好几个海军陆战队员进入射程后被打倒。敌军大规模反击的危险似乎微乎其微，但美军必须要派遣步兵队彻底扫荡日军步枪手藏身的巢穴。

岛屿正中心矗立着一座大型混凝土碉堡。碉堡中有钢筋加固，因此经受住了过去7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目前有几十名日本士兵藏身其中。下午1时5分，一排海军陆战队员将碉堡包围起来，准备将其摧毁。他们将炸药和手榴弹从几个小孔扔了进去。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碉

堡被炸开，四散的碎片从天空中飞落下来。当时位于潟湖海滩的一名军官报告说：“棕榈树的树干和包装箱一样大的混凝土块像火柴棍一样在空中飞落……碉堡被炸飞后，原地留下的那个洞跟游泳池一样大。”^[18]巨大的爆炸夺走了大约2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并造成大约100人受伤。后来经检查发现，手榴弹和炸药包引爆了一个装有鱼雷弹头的弹药库。前线请求海滩上的部队来增援，填补了海军陆战队防线上的空白。

在下午3点左右，海军陆战队员为坦克清理出道路，好让它们能够到达灌木林的边缘，因为仍有日军狙击手藏身在那里放冷枪。坦克朝那个方向发射了一通37毫米的榴霰弹，直到没有反击才停止。2月1日夜幕降临时，美军已经牢牢控制了该岛三分之二的区域。岛屿东北角仍然有小股日军抵抗，但对他们的最后一击必须等到2月2日白天进行。

早上的进攻由中型谢尔曼坦克打头阵，它们是沿着海军陆战队清理出的坦克通道前进的。坦克后面跟着携带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的步兵。一小群日本士兵躲在海滩后面的反坦克壕沟里负隅顽抗。坦克绕到了战壕两旁，朝战壕内打了一通榴霰弹。

零星的交火一直持续到中午。下午2时18分，美军宣布控制该岛，一面美国国旗在烧焦的土地上升起。2月2日夜幕降临时，罗伊—那慕尔恢复了平静。

陆军第7步兵师被分配到环礁东南角去夺取香蕉形的夸贾林岛。与夺取罗伊—那慕尔时一样，突击部队首先在较小的相邻岛屿上登陆，安放好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扫雷舰扫清了进入潟湖最好的深水入口。南部攻击部队的火力支援舰开到了2 000码范围内，将突击海滩上的一道防波堤摧毁。2月1日上午9时30分，两个团（第32团和第184团）从夸贾林岛潟湖一侧登陆。起初，敌军的反抗微弱且断断续续，因此这两个团迅速占领了该岛的东半部。空中和海上对岛上驻军的打击非常猛烈且有效。但陆军的进攻慢慢吞吞，有条不紊，严格按照作战条令和训练时的做法，朝着敌人的固定阵地谨慎前进。登陆日第二天，敌军的反

击战线后退到了岛屿西部三分之一的地区。余下的日本驻军获得了挖掘新阵地的时间。查尔斯·H.科利特少将的部队请求对敌方阵地进行猛烈的空袭和舰炮轰击，敌人的掩体和碉堡逐渐被炸成了瓦砾。

就像三个月前在马金环礁执行任务时一样，霍兰·史密斯将军对陆军的缓慢推进感到不满：“这支陆军师拥有强大的陆地武装力量，得到了陆上炮火的掩护，还有强大的海军支援和空中支援，却无法迅速拿下这个岛，我真是不明白原因何在。”^[19]

夸贾林岛的战斗拖拖拉拉地进行了四天。科利特将军反复被催促赶紧完成夺取该岛的任务，因为敌方的飞机和潜艇对停靠在海岸边的舰队的威胁与日俱增。在战斗的第四天，他终于下令向西进行总攻。进攻时，坦克开路，对一个接一个的碉堡进行近距离平射，后面跟着携带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的步兵。一艘运输舰上的海军军官肯·多德森回忆说：“汽油、石油和弹药库有时会爆炸。我所在的舰艇都会感到震动。轰隆隆的爆炸声一刻不曾停止。后来，岛上满是烟雾和恶臭，一天一天变得浓重。我们终于能够离开的时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20]和其他所有此类战斗一样，零零散散的日本兵会悄悄溜进美军战线，藏身在坑道以及美军忘记检查的地堡中，偷袭美国士兵。很快，美国士兵就学会了留心自己的身后。战场翻译（第二代日裔美国人）通过扬声器广播了劝降书，但愿意投降的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朝鲜劳工。

2月4日晚上7时20分，美军宣布控制了夸贾林岛。肯·多德森第二天早上登岸。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描述了一片荒芜的土地，满是“弹坑和炸起的珊瑚堆成的小丘”。看到大堆敌人的尸体，多德森感到很恶心，另外他还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会对他们心生怜悯：

有些日本兵在第一轮轰炸中就丧生了。他们的身体烧焦了，肿胀并散发着恶臭，令人恶心。我看到有个日本兵半个身子埋在碉堡里。你判断不出他是否穿着衣服。他背上的皮肤都烧没了，头在离他的身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另一具尸体像是金门公园的一尊铜像。

他蹲伏的身体向前倾着，钢盔还戴在头上，双手扒着碉堡的椰木。还有许许多多具尸体。晚上我躺在床上，会回想起它们的样子，还会想起火药、煤油和人肉腐烂的臭味，这些可怕的气味甜丝丝的，又让人恶心。此时我就会想，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为那些日本兵感到难过。他们在绝望之中顽强抵抗，勇敢地死去。他们为他们被灌输的信仰而战斗，把妻子和年幼孩子的照片绑在腰带上……看到他们，我无法相信战争是一件高尚的事。[\[21\]](#)

在“燧发枪”行动结束一周后，一大批高级军官来到满目疮痍的夸贾林环礁。尼米兹带领一批人从珍珠港飞了过来。2月5日，夸贾林环礁上的火还在燃烧，他与斯普鲁恩斯、特纳、史密斯以及舰队和两栖部队的其他重要指挥官一起巡视了这片被烧焦的废墟。

三周前，尼米兹曾作为贵宾出席在火奴鲁鲁的公园里举行的规模巨大的“得克萨斯圆桌”野餐活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4万名水手、士兵和平民中漫步，偶尔投一下马蹄铁，或者是摆个姿势拍照，或是给人签名。活动结束后，公园看起来好像被飓风扫过了一样——清理人员清扫出了超过50卡车的垃圾。估计有12万个啤酒瓶被扔在草地上。此刻，当他走在夸贾林环礁的潟湖岸边时，一群记者围住了他。

“您怎么看待这个岛？”一个记者问道。

这位海军上将回答说：“先生们，除了‘得克萨斯圆桌’之外，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大破坏场面。”他的回答引起了一阵大笑。[\[22\]](#)

一艘驱逐舰载着一行人穿过巨大的潟湖，前往罗伊—那慕尔岛。驱逐舰以20节的速度高速行驶，仍然在潟湖中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这些军官要对这两个经历了猛烈炮火的岛屿进行简短的巡视。不管是谁，看到眼前的一幕之后，都禁不住称赞“斯普鲁恩斯剃头法”和“米彻尔洗发水”战术实在是高效。一名海军飞行员驾驶着F6F飞机从空中俯视罗伊和那慕尔，觉得它们看起来像“月球”或“犁过的地面”。海滩和道路上散落着烧焦的、扭曲的装备，以及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我觉得下面已

经没有一个立着的东西了，”他说，“这里看起来完全就是一片废墟。”^[23]一名水手在参观了一个占领的环礁之后说：“炸弹直接击中的棕榈树的叶子被炸得粉碎，留下的树桩看起来像老式剃须刀的刀柄戳在沙子里。”^[24]

霍兰·史密斯对这群观光客感到不耐烦。他说，夸贾林环礁已经成为一个“热门景点。……从珍珠港来的那些陆海军高级军官就像苍蝇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穿着一件朴素的卡其色衬衫和一条裤子，没有佩戴徽章，搭乘一辆吉普车穿过罗伊和那慕尔的废墟。后座上斯普鲁恩斯和施密特将军。岛上驻军为了接待这些访客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原本应该抓紧时间清理机场，设立营房，埋葬战友，并建立新的防空炮台。于是，史密斯下令，不再派海军陆战队员给这些游客开吉普车，这一决定导致了不寻常的一幕，那便是很多将军自己驾车视察。“这一天是摄影师的盛会，他们忙着拍摄轰炸过后的场面，”他回忆说，“那一群到访的高官则忙不迭地搜寻日本武士刀和其他纪念品。”^[25]

奉命夺取马朱罗环礁的那个营顺顺当当地就走上了海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岛上的日本驻军已于一周前撤出。登陆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希尔将军就宣布控制了该环礁。这个环礁巨大的锚地放得下第10勤务中队的所有机动浮式后勤设备，（暂时）成了第5舰队最重要的前进基地。

米彻尔的航母舰队于2月4日开始进入潟湖。在每艘舰艇上，瞭望员都会探出舰桥的两侧，来确定滩涂和礁石的位置。在浅色的海水中，瞭望员很容易发现它们。所有的舰艇都不再需要穿越太平洋返回珍珠港了，除了少数需要大修的舰艇。通过供应船、加油船和驳船，舰艇在潟湖中就能加油以及补充弹药和食品。这些优势显著扩大了舰队的作战范围，而且让舰艇能够在海上待更长的时间。

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指挥官认为，此次胜利迅速获得，代价相对较

低，他们选择加快推进该地区的作战行动。根据计划，埃尼威托克是下一个要夺取的重要环礁，计划占领时间为5月。但日本在马绍尔群岛的军事力量显然比预期瓦解得还要快。谢尔曼所率领的第3特混大队已经把埃尼威托克的恩格比岛上的机场炸成了一堆废墟。根据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日志记载，航拍照片已经“显示日军的防御力量很薄弱，而且该环礁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开发。有条能用的简易跑道，但目前似乎只是用作中途机场”。^[26]根据早些时候与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达成的计划，第58特混舰队的快速航母将向南出击，支援哈尔西对卡维恩的袭击。后来麦克阿瑟允许哈尔西绕过卡维恩，这支航母舰队就摆脱了这项任务的负担，可以前往太平洋中部。最后，美军还在罗伊—那慕尔的日军地堡中发现了有关埃尼威托克的珍贵地图、图表和文件。这些文件表明那里的日军有2 700人到4 000人，他们正争分夺秒地在主岛恩格比上修建更坚固的防御工事。时间至关重要。此时，埃尼威托克是个“容易摘到的果子”，现有的海军舰队和两栖部队就可以把这个岛占领，似乎没有必要先返回珍珠港再展开进攻，为什么不直接拿下这个岛呢？

有多位指挥官支持修订进攻计划，不是等到5月份，而是在2月份就发动进攻。这些指挥官包括史密斯、谢尔曼、特纳、希尔和斯普鲁恩斯等。这些人似乎是同时产生这一想法的。尼米兹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该行动由一支匆忙组建的特混舰队执行，由希尔将军指挥。第22陆战团和第106步兵师的两个营作为突击部队。第58特混舰队将对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的日本舰队和航空基地进行袭击，支援登陆。这两项行动的日期定在了2月17日。夺取埃尼威托克的行动代号为“法警”，航母袭击特鲁克群岛的行动代号为“冰雹”。

2月5日，希尔向位于夸贾林环礁的斯普鲁恩斯汇报时，得知自己将指挥埃尼威托克远征大队（第51特混舰队第11特混大队），并且必须在两周内完成主要作战任务。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远征部队将由海军陆战队准将托马斯·E.沃森指挥，这支9 300人的部队在攻占马朱罗和夸贾林

的任务中担任预备队，没有上阵。海军少将塞缪尔·P.金德指挥的第58特混舰队第4特混大队以“萨拉托加号”“普林斯顿号”“兰利号”为核心。这支特混大队将对恩格比剩余的敌军进行打击，并对登陆舰进行空中掩护。美军将高角度和低角度拍摄的航拍照片与发现的日军地图和文件结合起来分析，以获取关于目标的准确情况。最重要的是，日军的地图提供了关于进入埃尼威托克潟湖最好的深水通道的准确信息。

要加速夺取埃尼威托克，美军就需要抽调新派往夸贾林环礁和罗伊—那慕尔的部队以及物资。登陆艇上的船员都是新手，没有和部队协同训练过。沃森将军报告说：“步兵、两栖牵引车、两栖坦克、普通坦克、飞机、支援舰艇和大多数参战人员在此之前从未一起执行过任务。”^[27]尽管如此，此次行动兵力充足且装备精良。与塔拉瓦伤亡巨大的行动相比，希尔将军此次拥有了足够数量的履带式登陆车，因此比较放心。119艘坦克登陆舰搭载着陆军第708临时两栖牵引车营在海上航行，这些坦克登陆舰大部分是新型号的重型装甲舰。“在埃尼威托克，我觉得自己像个百万富翁，”希尔后来说，“但在塔拉瓦，我是一个穷光蛋。”^[28]

与“燧发枪”行动时一样，“法警”行动计划要求美军率先占领附近的岛屿作为火炮平台，对恩格比的海滩进行轰击。2月17日上午6时59分，负责海军火力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开始炮击该岛的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炮兵登陆较小的相邻岛屿，在这些岛屿上搭建炮台，打击恩格比的海滩。行动进行24小时后，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登陆该岛，并迅速控制住了各个地区。第二天早上，岛上扬起美国国旗。接下来的三天里，美军控制了埃尼威托克和帕里岛。

海军陆战队有254人阵亡，555人受伤；陆军有94人阵亡，311人受伤。日军2 700名士兵中，只有66名被俘。第5舰队将埃尼威托克广阔的潟湖作为最西端的舰队锚地，从此就有了一块位置极佳的跳板，可以打击1 000英里之外的马里亚纳群岛。

美国的指挥官在对马绍尔群岛取得的战绩进行评估之后，他们的信心达到了新的高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总结了塔拉瓦行动代价高昂的教训，将改良的方法融入两栖作战计划中，结果令人非常满意。至于说还需要进一步改进，那也是在执行的细节方面，而不是说计划本身有任何缺陷。霍兰·史密斯在最终报告中总结道：“在对珊瑚环礁的进攻中，‘燧发枪’行动中所采取的战术已经几乎没有可以提高的空间了。”[\[29\]](#)

此次行动中，进攻前的炮击和空中轰炸比此前在太平洋战区任何地方的作战行动都有成效。施密特将军估计，在第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登陆罗伊—那慕尔之前，就已经有50%至75%的日本驻军丧命。那些从火力网中幸存下来的日本兵则似乎已经神志不清。因此，毫无疑问，与比休岛和其他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相比，他们的抵御没有那么激烈。登陆之前的三天内，航空母舰发动的空袭基本上摧毁了整个群岛中所有的日本飞机。飞行员在离开目标时注意到“地面设施变成了瓦砾堆；几乎没有一棵树还直立着，剩下的那些树则在巨大的爆炸中掉光了叶子”。[\[30\]](#)

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突击部队在“燧发枪”行动或“法警”行动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但训练和演习使他们拿出了一流的表现。唯一的失误发生在罗伊岛上。当时有几个分队有些冒进，快速冲过了机场，向北岸前进。不过在敌人攻击他们暴露的侧翼之前，美军重整了战线。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个地面指挥官，都不会认为在进攻中表现得过于勇猛的部队有什么错。跟在其他类似的行动中一样，日本的散兵和偷偷潜入美军后方的士兵对美军战线的后方造成了一些威胁，因此，步兵不得不一个一个地排查地堡、掩体和坑道，并用炸药包、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将其摧毁。不过，到了1944年，即使是新兵对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也了如指掌了，不再疏忽大意。

事实证明，尼米兹决定跳过敌军驻扎的外岛，直接对夸贾林环礁进行攻击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策略。美军的登陆作战起到了奇袭的效果，日本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加强海滩上的防御。此时，只剩下马绍尔群岛东

南部的几个环礁还在日本驻军的控制下，但尼米兹并不急于夺取它们。那几个环礁上的机场每天都会遭到空袭，每当有新飞机从特鲁克或拉包尔飞过来，它们都会被迅速摧毁。吉尔伯特群岛和埃利斯群岛每天都会发动例行轰炸，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常的轰炸主要由陆军中型轰炸机在F4U“海盗”战斗机的护航下进行。这些飞机几乎从未在空中遇到过敌机的反抗。由于缺乏供应和食物，岛上驻军的力量慢慢被削弱。许多日本兵在无情的空袭中丧生，还有许多人在绝望中自杀。

东京方面把守卫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两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希望寄托于相互支持的地面机场网络上。该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半径范围相互重叠，在此区域内，有大片海洋和地势低平的珊瑚环礁。日本方面希望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能够对如此广阔的区域保持局部的制空权。空中力量能够在节点之间自由而迅速地移动，因此利用空中增援可以驱逐任何协同的海上攻击或两栖攻击。这种战略观念是日本的全部希望所在，但是，美国航空母舰空中力量在规模和质量上的提升，使这一策略完全变成了空想。日本守军散布在数十个环礁上，面对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枪林弹雨完全无能为力，甚至无法减缓美军的进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军的“燧发枪”行动和“法警”行动就相对轻松地摧毁了日本在太平洋中部设置的屏障。

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马绍尔群岛西部在战略上也带来了一大批意外收获。在控制了广阔的潟湖锚地和条件较好的机场后，美国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可以建在日本新设立的“绝对防线”的门槛上，这条防线贯穿了附近的马里亚纳群岛。这样，洛克伍德将军所指挥的潜艇就可以更迅速地返回巡逻区域，等于是把日本南部海上通道的潜艇巡逻天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古贺峰一将军还没有决定是否动用主力舰队进行决战，但是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也是他无法承受的。强大的第5舰队现在准备攻击日本的内部防御圈，并有信心在西进的下一阶段强制发起双方海军的对决。由于在航母舰载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美国人有理由期望取得类似对马海战或特拉法尔加海战那样的决定性胜利，这一胜利将保证美国最终打败日本。

航母空袭特鲁克群岛的行动代号为“冰雹”，美军对此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1943年12月26日，尼米兹告诉金，他认为这一作战计划在次年的4月就可以实施了，但他也保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会提早实施：“这取决于未来两个月里能否在所有区域重创敌人。”^[31]日本在马绍尔群岛的空中力量摇摇欲坠，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利的发展趋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也一直在考虑夺取特鲁克群岛的计划，准备派出五个师和一个团，使该计划成为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两栖作战行动。“冰雹”行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消除美军占领特鲁克群岛的需要——这一作战行动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军是否有可能跳过特鲁克群岛。

特鲁克位于埃尼威托克西南669英里处，也是一个巨型的环礁，潟湖面积大约为30英里乘以40英里。它的地形和外观跟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不同。潟湖中心附近有十几个岛屿簇拥在一起，最高处是1500英尺高的火山，在其高耸的斜坡上，裸露的岩石和茂密的森林交替出现。岛上约有2 000个密克罗尼西亚人，大部分居住在海滩草原上的茅草屋里。自1942年中期以来，特鲁克广阔的潟湖就一直是日本联合舰队主要的南方舰队锚地。它的面积简直是太大了，在其珊瑚礁保护范围内，甚至可以进行高速舰队演习。在太平洋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为了节省燃油，都在防鱼雷网的后面下锚停泊。舰队的司令部位于温诺岛南边的托诺阿斯岛上的一片木屋中，从外面看上去很普通。

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和船员对即将发动的攻击感到担忧。敌人在特鲁克群岛的“神秘基地”被誉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过去，由于敌方可以利用远程轰炸机对易受攻击的航母进行毁灭性的反击，所以航母特混舰队的司令一直对攻击敌军重要的陆地机场十分谨慎。这种攻击一般是速战速决，打完就撤。但是，“冰雹”行动将深入敌军海域，展开持续进攻。第58特混舰队将在特鲁克群岛停留整整两天，完全处于空中反击的范围内。这次行动似乎比快速航空母舰以前参加过的任何行动都要危险得多。

关于特鲁克的情报十分稀少，这增强了它的神秘感。1944年以前，因为该环礁距离盟军基地很远，所以无法对它进行空中侦察。该地被认为是日本空中力量的枢纽，由数百名驾驶零式战斗机的精锐飞行员守卫。高耸的山峰上布满了高射炮。通往该地的水道极为隐蔽和危险，布设了很多水雷，并有很多岸炮防守。美国报纸将特鲁克称为“日本的直布罗陀”或“日本的珍珠港”。

“企业号”第10轰炸机中队飞行员詹姆斯·D.拉梅奇上尉记得，当他得知舰队要前往特鲁克时，自己一下子瞠目结舌，脱口而出：“天啊！”拉梅奇的无线电通信员兼机枪手戴维·考利补充说，第58特混舰队进入敌人水域时，该中队“紧张且忧虑”——“在战争的前两年，”他说，“接近特鲁克群岛似乎就等于有去无回。”^[32]根据在“约克城号”船员中流传的一个故事，米彻尔将军曾说：“我们对特鲁克群岛仅有的了解是通过《国家地理》杂志获得的。”^[33]“埃塞克斯号”航母的巡航刊物上刊登过一则讽刺漫画，描绘的是舰长在舰桥上通过扩音器讲话，他宣布“埃塞克斯号”将前往特鲁克群岛。在接下来的那一刻，全体船员都跳进了大海，只剩下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舰长。

特鲁克群岛的骇人声誉不过是浪得虚名。特鲁克潟湖为日本联合舰队提供了一个防护极佳的锚地，并且，它正好位于日本在南方占领的土地与其本国海岛之间的海路上——但日本海军从未投入太多精力或资源建设这里的机场、港口设施、海岸防御工事或修理车间。这里与珍珠港比起来，简陋得不可思议。1944年时，这个环礁有一个中型浮式干船坞。但是这里没有大型发电站，没有能够让大型船只装卸的码头，也没有地下的燃料储存库。受损的船只通常需要向北长途回到日本修理。舰船上的补给和部队是由轻型舰艇和其他小艇转移到岸上的。特鲁克群岛的四个机场缺乏先进的地面设施，而且太小，无法让飞机适当地分散停放。直到1943年底，日本海军才开始急匆匆地扩大机场规模。这里劳动力不足，所以日军从锚泊的军舰上抽调了一批人作为劳工。“水手们实际上喜欢这项工作，因为干这个活能够上岸。”“瑞鹤号”航母的一名航

空队军官回忆说。[\[34\]](#)

1944年2月，这个环礁上有大约7 500名陆军士兵和另外3 000名水手和支援部队驻守。固定的防空炮台至多有40个。在联合舰队中负责多项重要工作的福留繁将军在战后告诉审讯者，特鲁克群岛只是日本和南太平洋之间船只和飞机的集结待命区而已，只是一个停靠站。直到1943年底，日军才开始在该岛上加固防御工事，防备可能的攻击。在他看来，如果美国人使用攻占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时所采取的方法，这个环礁很容易被拿下。

古贺峰一明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夸贾林和马朱罗陷落后，他将大部分主要作战舰艇都从特鲁克群岛撤走了。2月4日，他意识到美军可能很快就会进攻这里，因为有两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PB4Y在环礁上空飞行侦察，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的参谋根据侦听的无线电判断，美国航母特混舰队正朝着该岛前进。发现美军的侦察机后，日军派出零式水上飞机进行拦截，但是美军飞机很快就摆脱了。古贺下令将大部分大型军舰转移到帕劳，再由那里转移到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的塔威塔威。大批舰船起锚并加速驶出水道。2月10日，古贺峰一乘旗舰“武藏号”前往东京湾，带着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他决心保持主力舰队完好无损，以便在未来某个时候进行决战。潟湖中只留下了少量轻型巡洋舰、驱逐舰、辅助舰艇，以及大约20艘货船和5艘油轮。包括小艇在内，2月中旬时这里有大约50艘船。

美国舰队在马朱罗环礁会合，补充燃料和给养之后，于2月12日出动，向西开进。进攻部队当中含有米彻尔中将率领的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的大部队，也就是第58特混舰队的大部队，包括5艘大型航母（“企业号”“约克城号”“埃塞克斯号”“无畏号”“邦克山号”）和4艘轻型航母（“贝劳伍德号”“卡伯特号”“蒙特雷号”“考彭斯号”）。这9艘航母上拥有超过560架飞机。参加“冰雹”行动的部队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包括7艘战列舰。海上总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在“新泽西号”上。9艘潜艇已奉命守住环礁外面的主要水道，它们将伺机击沉目标，并且随时待命，营

救被击落的飞行员。

美军预定发动空袭的地点位于特鲁克群岛东北偏东不到100英里处，舰队在前往该地的途中竟然没有碰到日军侦察机，再次实现了突袭的效果。2月17日黎明前，5艘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让72架“地狱猫”战斗机起飞。这些战斗机组成一个巨大的编队，朝西方爬升。不到30分钟后，它们就飞到了特鲁克环礁的东部海湾上空，高度在1.6万英尺到2.2万英尺之间。这个清晨“晴朗、清爽而美丽”。[\[35\]](#)特鲁克群岛的空战几乎尚未开始就等于结束了。“地狱猫”战斗机占据了数量和高度上的优势，轻松摧毁了几乎所有起飞拦截它们的日本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击落了56架日军飞机，然后通过轰炸和扫射，击毁了地面上的另外72架。防空火力非常猛烈，但射击不准，美国飞行员已经历过多次类似的航母进攻，因此在飞越浓密的防空炮火时仍旧可以保持冷静。

在最初的混战中，有四架F6F被击落，而且（根据第6战斗机中队飞行员亚历克斯·弗拉丘的说法）至少有一架是被友军火力误伤的。“岛屿上空都是近距离的混战，”他后来说，“我甚至看到我们的一架‘地狱猫’将另一架‘地狱猫’击落。那是一次算准提前量的射击，但是.....我们这个飞行员还没看清敌我就开火了，而另外那个可怜飞行员则被迫跳伞。在行动中，我也看到空中有一些跳伞的日本飞行员。”[\[36\]](#)

美国飞行员原本预计会遭到更猛烈的抵抗。他们被告知，他们可能会在特鲁克群岛遇到多达200架敌机。事实证明，在特鲁克的四个机场上，所有处于可飞行状态的各类飞机加在一起也不到200架。根据战后审讯估计，日军在莫恩机场有68架作战飞机，杜布隆机场有27架，埃腾机场有20架，帕拉姆机场有46架，总数为161架。埃腾机场的大片场地上停放着大约180架被毁的飞机，它们是由于缺少配件或机组人员而停飞的。其中大部分飞机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

尽管古贺将军正确地预测到敌人会对特鲁克群岛发动攻击，但当美国飞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时，日本航空部队和海军都没有处于警戒状态。第四舰队的参谋千早正隆说，自两周前两架PB4Y从上空飞过之

后，飞行员、地勤人员和舰员就一直保持全天24小时的备战状态，全体都很疲惫。^[37]更糟糕的是，自重型战舰撤出后，军队士气低落，纪律松弛。飞行员反抗军令，拒绝进入驾驶舱，许多人不请假就离开岗位。特鲁克环礁的指挥官小林仁中将似乎认为美国舰队仍在马绍尔群岛作战，于是授权降低警戒级别。2月16日，许多飞行员和其他人员离开军营去休闲娱乐。美军在早晨突击时，特鲁克群岛的许多飞行员还在杜布隆岛最大的城里大睡，因为这些人头一天整晚都在当地的饮酒场所寻欢作乐。要想回到埃腾机场，唯一的途径是乘渡船，但是渡船无法一次搭载所有人。埃腾机场、莫恩机场和帕拉姆机场上有许多飞机都卸掉了武器，并且排干了燃料。小林未能让军队保持警惕，这一耻辱的渎职行为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他被解除了指挥权，然后被迫退出现役。

“地狱猫”战斗机仍在扫射时，美军的第一批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就抵达了目标区域。特混舰队通过无线电将俯冲轰炸机的注意力引到了锚泊在潟湖里的约30艘舰艇上。第10轰炸机中队的詹姆斯·D.拉梅奇驾驶着无畏式轰炸机，注意到有几架零式战斗机从他身旁飞过，却没有发动攻击。他猜测这些飞行员可能是因为空战一边倒的结果而感到沮丧，因此决定自保。这是南太平洋空战进行到后期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状况。

“企业号”的俯冲轰炸机朝目标扔下了1 000磅重的穿甲炸弹，这些目标是根据之前拍摄的航拍照片挑选出来的。拉梅奇的部队奉命攻击的舰艇停泊在特鲁克群岛的重要锚地杜布隆岛的避风处。飞机穿过高射炮的炮火，轰炸停泊的舰艇。拉梅奇朝着1.3万吨的“丰洋丸”的船尾扔下了一枚炸弹。另一个SBD分队瞄准了7 000吨的“清澄丸”，使其燃起了大火，该船立即开始下沉。第6鱼雷机中队一架“复仇者”在弹药船“爱国丸”上方低空飞行，向船体正中扔下一枚炸弹。这艘船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滚动的巨大火球，火焰甚至将上空的飞机吞没并摧毁了。冲击波非常猛烈，在上方2 000英尺以外飞行的拉梅奇上尉都感受到了震动。“我认为，除了原子弹爆炸之外，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爆炸，”拉梅奇说，“这

真的是一场超级巨大的爆炸。”[\[38\]](#)

“爸比”格雷戈里·博英顿少校是著名的黑羊中队（海军陆战队第214战斗机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一周前被击落并在拉包尔附近被日军俘虏。美军发动空袭时，他和其他几名战俘正在被押往特鲁克群岛的路上。押运他们的G4M轰炸机停下来以后，博英顿和其他战俘被推出去，倒在机场上。他们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架F6F“地狱猫”正低空掠过机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飞机。他们刚从轰炸机上下来，那架轰炸机就被火焰吞没了。这几个美国战俘被推进了机场边上的一个坑中，从这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他们看到了头顶的战况，并为攻击者加油。博英顿说：

我特别兴奋，真是太兴奋了。我看着那些日本飞机，其中包括轻型的零式战斗机，被我们扔下的炸弹给炸得从地面上弹起来，然后“哐当”地落地，就像一麻袋螺栓和螺母落地一样。这些飞机起火后，它们携带的弹药开始爆炸。这个坑的周围飞溅着20毫米的炮弹和7.7毫米的子弹。有时我们会用手将一些灼热的弹片从坑里扔出去。[\[39\]](#)

后来，在行动暂停期间，日本人在坑中找到这些俘虏，把他们押送到岛上的另一个地区。博英顿说：“大块的混凝土倒在地上，飞机零件四处散落，整个地方成了一片废墟。”[\[40\]](#)

一拨又一拨的美国的舰载机飞抵特鲁克环礁上空。大队长上方盘旋并指挥进攻。机场、机库和机械车间都遭到了破坏。负责攻击舰船的中队装备的是穿甲弹，而负责轰炸机场和岸上设施的飞机则携带了燃烧弹和杀伤弹。停泊在潟湖中的以及逃向出口水道的舰艇遭到了鱼雷攻击。停在地面的飞机悉数被毁。下午美军有几次攻击根本没有遭遇任何日本飞机的反击。

盘旋于潟湖东部的日本战斗机在几架“地狱猫”朝特混舰队返航的时

候，对其发动了攻击。伍德沃德·M.汉普顿驾驶F6F扫射一个机场时方向舵被击中。当他飞越东北部的珊瑚礁时，他的“地狱猫”战机遭到两架零式战斗机的伏击。他企图飞进云里逃脱。后来他在行动报告中写道：“我当时正朝偏北的方向飞，在遭受攻击后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无法转向，也无法还击。我的飞机不断受到敌人射击，逐渐被打烂了。”^[41]汉普顿的驾驶舱满是20毫米炮弹的弹孔，大部分飞行仪表都被打坏了。他的护目镜从头上被打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希望逃脱了，决定要拉一架敌机陪葬。当一架敌机从高处斜向飞到他前面时，“我把机头拉了起来，对准他，然后打了一串子弹，他的飞机一下子起火了”。第二架飞机见状转弯逃掉了。汉普顿继续向东飞。看到美国特混舰队的外围警戒舰后，他进行了猛烈的水上迫降，并在“飞机沉到了相当深的海水中后”，设法逃出了驾驶舱。终于浮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看到友军的驱逐舰正在开过来，顿时放心了。^[42]

袭击特鲁克群岛 1944年2月17日



有几名被击落的飞行员是以相似的方式获救的。驱逐舰和潜艇一直守在环礁周围，负责救生。“绒杜父鱼号”潜艇在环礁往北数英里的地方救出了“约克城号”的三名飞行员。“埃塞克斯号”上的F6F飞行员乔治·M. 布莱尔跳伞落到了特鲁克潟湖中。由于美国船只无法通过水道入口（那里布有水雷），布莱尔觉得他基本上是跑不掉了。一艘日本驱逐舰开始

朝他逼近，但是他所在中队的几架飞机将其赶走了。布莱尔被“巴尔的摩号”巡洋舰的OS2U“翠鸟”救出。这架水上飞机在潟湖上冒险降落，最终安然无恙地飞回了特混舰队。在为期两天的行动中，被击落的美国机组人员有一半以上获救。有很多次，友军飞机在救生筏上方低空盘旋，直到水上飞机或驱逐舰抵达现场。

在无情的空袭中，一些日本舰艇仓促起锚，高速逃离。轻型巡洋舰“香取号”和驱逐舰“舞风号”通过北部水道逃离潟湖，但被一队TBF赶上了，遭到数枚500磅炸弹的袭击。到了中午，“香取号”从船尾开始下沉，而“舞风号”则燃起了大火。仍在空中盘旋的拉梅奇上尉已经用光炸弹，他试图指挥新到达的轰炸机给这两艘敌舰最后的致命一击。但是，以呼号“白头鹰”表明身份的米彻尔将军切入无线电通话中，要求所有飞机退开。“不要击沉那艘船，重复一遍，不要击沉那艘船。收到请回复。”^[43]队长们都感到很疑惑。敌军的舰艇已经受伤，为什么要放过它们呢？

理由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一列水面舰艇来到了环礁以北的水域。这支小舰队里有“新泽西号”和“艾奥瓦号”战列舰，“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巡洋舰，还有四艘驱逐舰。米彻尔是担心误伤友军。此外，斯普鲁恩斯显然也想用他的巨炮来了结所有被他碰到的已经苟延残喘的敌军舰艇。“明尼阿波利斯号”和“新奥尔良号”齐射了三四轮，就击沉了这两艘失去行动能力的敌军舰艇。“新泽西号”差点儿被正在沉没的敌军驱逐舰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美国舰艇前去打捞日军幸存者，但几乎所有的日本水手都不愿意被俘，而是选择自杀。战舰继续沿着环礁逆时针航行，夜幕降临后开始向东撤去。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它们与米彻尔的航母会合了。

对于斯普鲁恩斯将一支水面特混大队带入战斗区域这个决定，飞行员们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水面部队不需要参加进攻特鲁克的行动，它们只会成为飞机的障碍。米彻尔不得不派10架“考彭斯号”上的F6F在斯普鲁恩斯的舰队上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那几架“地狱猫”如果去进行

扫射，会有更好的作战效果，而且为了掩护行驶缓慢的军舰撤离，好几名飞行员还被迫冒险在夜间着舰。“艾奥瓦号”遭到一架日本飞机的轰炸，不过几乎没有受损。炮手射击并摧毁了另一架飞机，结果发现击中的是一架美国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而且机组成员都丧生了。如果运气再糟一些，斯普鲁恩斯率领的舰队中可能会有一艘或多艘舰船被鱼雷击中，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他就可能会失去指挥权。这一次，这位一贯保守的舰队司令做的事有些冲动，而且除了“黑鞋族”骨子里就有的以巨炮击沉敌舰的情结之外，恐怕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对此，谢尔曼将军措辞谨慎：“这次司令亲征战绩甚少，反而让舰载机的进攻任务变得更复杂了。”^[44]拉梅奇上尉说话就没那么客气了：“大个儿战列舰终于把一艘快要沉没的巡洋舰给打趴下了。这肯定能算了不起的胜利吧。”^[45]

第5舰队参谋长卡尔·穆尔后来被要求解释斯普鲁恩斯这么做的理由。穆尔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说长官正在观光。“嗯，我认为这主要是出于好奇心……我认为斯普鲁恩斯将军很想看看特鲁克群岛，也很想追击日军舰艇。”^[46]穆尔还推测说，这位长官乘坐旗舰大摇大摆地来到日本在本岛之外最大的海军基地，可能是想要借此嘲弄日本人。

那天晚上，一小队中岛B5N“凯特”鱼雷机盯上了美国特混舰队。这些飞机不是从特鲁克群岛起飞的——没人知道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很有可能是从拉包尔或塞班岛起飞的。夜间巡逻的战斗机企图拦截，但在黑暗中找不到它们。午夜过后几分钟，其中一架偷袭的敌机低空掠过“无畏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船员们吓了一跳，第2特混大队的阿尔弗雷德·E.蒙哥马利将军下令紧急左转，甩开袭击者，但是B5N已经释放了鱼雷。“无畏号”转向时舰尾被击中，爆炸让整个舰身都剧烈地颤动。鱼雷击中了航母易损的右舷。11名船员在爆炸中遇难，另有17人受伤。损管队封住了进水的舱室，这艘航母还能靠自己的动力前进，但是方向舵卡住了，因此一直无助地打转，差一点与“埃塞克斯号”相撞。它没有沉没的危险，但是无法跟上特混舰队的步伐。它后来撤回马朱

罗，然后从那里回到了珍珠港和旧金山维修。

2月18日凌晨2点，12架配备雷达的TBF“复仇者”从“企业号”上起飞，攻击特鲁克潟湖中幸存的日军舰艇。每架飞机都挂载了4枚500磅的炸弹。单纯通过雷达引导飞机抵达目标，从而实施低空夜间攻击，这种想法此前曾被讨论和研究过，但是还从未尝试过。这要求飞行员完全依据飞行仪表的导航到达特鲁克上空。到达潟湖上方后，他们要在锚地上空盘旋，直到雷达回波显示出目标的图像。该任务是一项战术上的突破，在航空史和海军史上尚无先例。威廉·I.马丁少校负责训练这些飞行员，称这一战术为“真正的经典”。他回忆说：

当时的雷达显示器需要操作员进行大量的解读工作。这就像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它不是看上去像地图一样的极坐标图。阴极射线管上只是大致地提示出某个地方有一个物体。经过相当多的练习后，雷达操作员才能确定那里有一艘船，并且能判断出它的大致尺寸。他必须将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与船的图像联系起来。 [\[47\]](#)

飞行员从250英尺甚至更低的高度接近目标，并单纯根据雷达读数释放炸弹。在桅杆的高度低速飞行，这种轰炸方法被证明是极其准确致命的。这批“复仇者”总共13次直接命中目标，击沉了8艘日本舰船。防空火力很猛烈，但是瞄准很差，12架飞机中只有1架被击落。

2月18日天刚放亮，第58特混舰队就又派出了200架飞机进行攻击。它们在环礁上空遇到的空中反击微不足道，所以轻轻松松地把剩下的目标一个个解决掉了。数百颗燃烧弹投向了浓烟滚滚的跑道、停机坪以及机库。此外，轰炸机还特别关注了油罐区。第一天的时候，为了防止烟雾降低能见度，美军没有轰炸那个区域。

两天前，日本的“阿贺野号”巡洋舰在特鲁克北部被美国潜艇“灰鲭号”击沉。“追风号”驱逐舰被派去打捞幸存者，总共有约400名军官和水手。这艘驱逐舰本来已经开始向塞班岛行驶，但是在袭击开始后接到命

令，返回了特鲁克群岛。“追风号”上挤满了沉没的“阿贺野号”幸存的船员。2月18日早上，这艘命运乖蹇的驱逐舰进入了潟湖，迅速遭到“邦克山号”一架“复仇者”的袭击。一颗鱼雷击中舰身的正中间，“追风号”断成两半，开始下沉。船上有500多人一起沉入海底，只有20人幸免于难。

队长们报告说，此时已经无法找到有价值的目标了。斯普鲁恩斯意识到再打下去已没有意义，于是命令所有飞机回到各自的航母上，第58特混舰队也撤向了马朱罗环礁。

对于美国人来说，特鲁克群岛素来所享有的名气，让这场胜利更具象征意义。不过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冰雹”行动也是整场战争中空袭最猛烈的航母作战行动之一。虽然日本的大部分重型海军舰船此前已经逃离了特鲁克，但是美军仍然击沉了3艘轻型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辅助巡洋舰或训练巡洋舰，还有6艘其他海军辅助舰艇。此外，他们还击沉了约30艘商船，其中包括5艘宝贵的油轮。击沉的船只总吨位接近20万吨。其中许多船上装满了无法抢救的弹药和其他物资。此外，在日军本来就缺乏燃料的情况下，这次攻击还让他们损失了1.7万吨燃料。^[48]日军损失了249架飞机，大部分是在地面被摧毁的。相比之下，美军特混舰队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米彻尔的航空母舰损失了25架飞机，其中包括意外被友军火力击毁的飞机；除了9名机组人员之外，其他所有被击落飞机上的人都被救了回来，并且会再次参与飞行任务。唯一严重受损的舰船是“无畏号”航母，但没过多久它就归队了。

海军的公报宣布：“太平洋舰队在特鲁克群岛回敬了日军舰队1941年12月7日的所作所为，让敌人偿还了一部分债务。”^[49]《时代》杂志的评价非常准确：“人们历来所畏惧的陆基空中力量，如今已经被来自海洋的更强大的空中力量超越。”^[50]

此次行动过后，特鲁克群岛作为舰队基地已经变得毫无用处，而且它再也没有被用作舰队基地。特鲁克的机场后来得到了清理和修复，当

古贺峰一命令拉包尔的航空部队撤离时，大多数飞机飞到了特鲁克群岛。但是，这个环礁在1944年2月的时候就无力抵抗米彻尔的攻击，到了当年春天，它就更加没有招架之力了。4月的时候，第58特混舰队故地重游，那时特鲁克潟湖内已经没有任何舰船了。在这次重复的攻击行动中，美军航空大队将精力集中在了日军这座昔日堡垒的机场和飞机上，让那里再次成为一片浓烟滚滚的废墟。

[1] Edwin T.Layto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90.

[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o.139, Interrogation Nav No.34, Interrogation of Commander Nakajima, Chikataka, Imperial Japanese Navy, October 21, 1945, p.143.

[3] Joseph J.Clark,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art 2, Vol.2, p.445.

[4] Edwin T.Layto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Nimitz,"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0, p.91.

[5]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p.215-35.

[6] Roger Bond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32.

[7] C.S.King account in *ibid.*, p.285.

[8]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ibid.*, p.196.

[9] Mitscher quoted by Arleigh A.Burke in *ibid.*, p.167.

[10] Arleigh A.Burke account in *ibid.*, pp.167-68.

[11]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p.1834-47.

[1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26.

[13]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5.

[14]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15]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4.

[16] Shaw et al., *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p.152.

[17] Richard L.Conolly to Commandant of Marine Corps, November 26, 1952, in *ibid.*

[18] 1st Lt.Samuel H.Zutty quoted in *ibid.*, p.171.

[19]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6.

[20] Kenneth Dodson letter dated February 9, 1944,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93.

- [21] Ibid., pp.294-96.
- [22] Potter, *Nimitz*, p.334.
- [23] Astor, *Wings of Gold*, p.224.
- [24]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83.
- [25]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48.
- [26] Entry dated January 6, 1944,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1833.
- [27] "Special Report of flintlock and catchpole Operations," March 1, 1944, p.7, USMC Archives.
- [28] Harry W.Hill,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85, Vol.3, p.297.
- [29] Shaw et al., *History of U.S.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p.227.
- [30]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26.
- [31] CINCPAC to COMINCH, December 26, 1943,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4, p.1830.
- [32] Ramage, "Raid on Truk."
- [33] Astor, *Wings of Gold*, p.227.
- [34]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91.
- [35] Ramage, "Raid on Truk."
- [36] Astor, *Wings of Gold*, p.229.
- [37] Masataka Chihaya, "Account of the Fiasco of Truk,"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p.279.
- [38] Astor, *Wings of Gold*, p.223.
- [39] Boyington, *Baa Baa Black Sheep*, p.250.
- [40] Ibid., p.252.
- [41] Statement of Lt.(jg) Woodward M.Hampton, VF-1,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 [42] Statement of Lt.(jg) Woodward M.Hampton, VF-1, Ernest J.King Papers, Box 9.
- [43] Ramage, "Raid on Truk."
- [4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30.
- [45] Astor, *Wings of Gold*, p.235.
- [46]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p.896-97.
- [47] William I.Martin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49.
- [48] Masataka Chihaya, "Account of the Fiasco of Truk,"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s, p.282.

[\[49\]](#) “Return Visit.”

[\[50\]](#) “Return Visit.”

第十三章

不苟言笑的联合舰队总司令古贺峰一大将与其前任山本五十六私下曾经是密友。然而，与后者相比，古贺峰一在战略决策和政治方面更为谨慎。他从来不敢质疑军令部或是领导层做出的任何一意孤行的决定，尽管这些决定关乎“舰队决战”的命运——战前和战时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和战略思想都是围绕“决战”这个概念展开的。敌我双方舰队的大对决将会在西太平洋海域内某个地方打响。美方和日方都将派遣主力舰作战。日方或许会拥有战术条件上的优势（他们希望如此），可以利用美军被重要两栖作战行动牵制住的时机，首先通过强大的陆基航空兵以及航母舰载机对美军舰队展开空袭。日本战列舰上的巨炮将会给予美军最终的致命一击。日军的攻击将会令人震撼、摧枯拉朽，最终将逼迫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求和。接下来美日将展开外交谈判，日本会成功地取得和平，捍卫自己的主权、荣耀以及帝国的一部分领土。

毫不夸张地说，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希望展开这种一场决胜负的海上战役的执念达到了着魔的程度。通过美国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这种观念根植在了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每一代学生的心中。历史上有许多可以佐证这种观点的战例，但是，在所有这些战例中，没有一场能比1905年发生在对马海峡的战役更有说服力，当时东乡平八郎大将率领日本舰队彻底歼灭了俄国舰队。海军大学校对1916年英德日德兰海战的详细研究，更是让他们对这种决战的思想深信不疑，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在那场战役中，英国本来有机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却错失了良机。“条约派”将军堀悌吉在1933年被日本海军清洗，他认为，日本海军战略在极端民族主义发酵的那几年里严重僵化：“这种形式主义缓慢加剧，不断蔓延，直至后来成为战略正统观念；而〔日本海军〕最终也成

为一个狂妄自大的小团体，固执地认为所有的战略都必须服从这一正统观念。”^[1]

事实上，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战争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就表明，飞机和潜艇已经取代战列舰，成为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日本海军军官仍固执地相信巨炮的威力。虽然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高层中对空中力量最为重视的将军，但是他决定进行中途岛战役，也是出于想在战争早期迫使对手进行一场大决战的考虑。他曾打算让战列舰，包括他的旗舰“大和号”，在中途岛战役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日本海军中，不像在美国海军中那样，飞行员得不到快速晋升，也没有被安置到重要的海上指挥岗位和作战计划岗位上。直到1944年，航母特混舰队才被整合进入联合舰队的核心。日军的作战计划是在一种正统的假设下构想的，这种正统的假设认为战列舰（尤其是巨型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发挥主导作用。

所以，联合舰队迟早会去迎头截击敌人，古贺峰一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自1942年以来，重型战舰（战列舰和航母）一直藏在远离敌人的地方。自1942年10月圣克鲁斯群岛战役以来，日本航母一直没有现身战场。而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损失了“比睿号”和“雾岛号”两艘战列舰之后，日本海军基本上只靠驱逐舰和陆基空中力量在南太平洋作战。古贺峰一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舰队处于己方的航空基地的作战范围内。他需要时间重建航母战斗群。随着燃料的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他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这场战役在地理位置上尽可能接近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油田。

另一方面，古贺峰一不得不承认他的时间不多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敌方工厂生产的大量武器和物资被一批一批地送抵太平洋前线。美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帮助美军在空中作战效率方面与日军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雷达、无线电通信和防空等重要领域。潜艇每个月都会击沉20万吨日本的运输船，这很快就会让日本的军事工业瘫痪。敌人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展开的双线进攻不断抢走战略要地。考虑到

所有这些因素，在战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早将联合舰队投入决战越好。

任何一名军事指挥官都不能对天皇直接发出的咄咄逼人的指令视而不见。裕仁天皇正给联络会议施压，敦促日军更积极地作战，直面美国舰队并粉碎它。裕仁过去做皇太子的时候，教育他的任务主要交给了日俄战争中的陆海军英雄东乡平八郎以及乃木希典大将。这个男孩一直沉浸在马汉的教条之中，而且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的信条：要想赢得海战的胜利，就必须发动一场类似对马海战那样的决战。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军方丢掉瓜达尔卡纳尔岛深感失望。1943年5月，阿图岛被美军占领后，他严厉斥责了陆军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天皇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衰落及其对日本亚太帝国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担忧。他的质疑之声变得越来越尖锐刺耳，甚至语含讽刺。他以前只要了解大致情况就满意了，现在他要求下级向他详细通报情况，并要直接参与重大战略决策。8月5日，随着盟军挺进所罗门群岛中部，天皇斥责了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

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战斗，那结果将会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它只会提高敌人的斗志，然后中立的国家会开始动摇，中国将会变得自以为是，这对大东亚共荣圈国家的影响将是不可想象的。难道你们不能在某条战线上设法击败美国军队吗？所有的战线看起来都是一团糟。你们难道不能让美军惨败吗？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一步步后退，这不仅会鼓舞敌人的士气，还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跟我说，你们准备在哪里打一场胜仗？你们要在哪里展开决战？ [\[2\]](#)

9月中旬，天皇在皇宫与军事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议程包括对战争策略的彻底修改。在同时担任首相和陆相的东条英机的支持下，联络会议同意制定一项“新的行动政策”，该政策要求日本的西部防线大大收缩至离前线很远的后方岛屿上。新的“绝对防线”将从千岛群岛向南

经过马利亚纳、特鲁克、帕劳、新不列颠、新几内亚西部、东印度群岛和缅甸。日本将从中国东北调遣陆基航空部队和陆军，对这个内层防御圈的阵地严防死守。防线以外的驻军，包括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上的驻军，不会再得到增援。如果受到攻击，他们必须重创敌人，直至全部战死。

加强内层防御圈的力量需要时间——需要从本土调动军队，建立新的岸边防御工事，制造飞机并训练新的航空大队——因此，该政策将“1944年年中”作为“我方完全做好准备的大致预期时间”。^[3]但是，如果有机会，新政策也不拒绝与美国舰队在更早的时间对决：“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应捕获和摧毁敌人的进攻力量。”^[4]

古贺峰一希望及早来一场类似对马海战那样的决战。自1943年5月以来，这名总司令及其参谋一直在研究和修订Z计划，该计划设想让联合舰队大举出动，在中太平洋正面迎击美国舰队，如果有可能的话，趁敌人进行两栖作战，舰队被牵制住时开战。波纳尔将军在1943年9月和10月发动的航母攻击，两次把强大的日本舰队骗离特鲁克群岛。古贺峰一亲自指挥了其中的第二次舰队集结，于10月将舰船停泊在埃尼威托克环礁整整四天。在这两次攻击中，日本人都很快发现，美军航母的作战方式是“打完就撤”，而不是持续作战，于是舰队返回了特鲁克群岛。

日方持续损失舰船，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则不断朝拉包尔挺进，在此形势下，Z计划不得不持续修改。10月下旬，日方决定不让舰队在密克罗尼西亚和保卫俾斯麦群岛的战斗中出动。决战需要推迟，直到敌人试图闯入内层防御圈。古贺峰一将坚守菲律宾海，根据美国舰队的动向，保卫马利亚纳或帕劳。根据这些决定，当美国第5舰队向中太平洋发起进攻时，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日本驻军只得到了有限的空中支援，除了潜艇巡逻，根本没有其他的海军支援。

在圣克鲁斯群岛战役（1942年10月）中，日军空中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日本航母特混舰队撤退到了濑户内海进行维修、改装，重建航空大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曾在珍珠港突袭、中途岛战役以及瓜达尔

卡纳尔岛战役中指挥航空母舰突击部队）被解职，回到日本本土担任佐世保镇守府司令。他的继任者是小泽治三郎中将，一个身材高大、粗鲁、丑陋的家伙，被称为“石像鬼”。^[5]小泽将大型航母“瑞鹤号”作为旗舰。该部队进行了改组，更名为第三舰队，包括三个航母战队、两艘战列舰、六艘巡洋舰和十几艘驱逐舰。第三舰队的大部分空中力量集中于第一航空战队（“一航战”，包括老牌的“瑞鹤号”和“翔鹤号”，以及轻型航母“瑞凤号”）和第二航空战队（“二航战”，重型姊妹航母“飞鹰号”和“隼鹰号”，这两艘航母都是在客轮船体的基础上改造的，1942年中期开始服役）。

在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航空母舰在特鲁克群岛或本国水域中闲置。但是航母上的航空大队却不是这样。小泽的舰载机被反复派往南方，以加强拉包尔的陆基海军航空力量以及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辅助机场上不断被削弱的力量。1943年7月，第二航空战队的大部分飞机（大约150架）飞入拉包尔，被编入第二十六航空战队。这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为学习航母起降技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在与敌人武器精良的B-24和B-25进行日常空战时损失惨重。

在8月和9月，几支日本战斗机部队奉命飞到布因的原始简易机场，那里位于布干维尔南部，地面条件和空中条件比拉包尔还糟。哈尔西指挥的所罗门群岛航空队以瓜达尔卡纳尔岛为基地，实力得到了补强，每天都进攻这个简易机场，许多在此幸存一周以上的日本航母飞行员，都会因疲惫和疾病而倒下。1943年10月，布因残余的日军航空部队开始撤回拉包尔。

接下来的一个月，古贺峰一命令第一航空战队的200架飞机从特鲁克群岛飞往拉包尔（RO行动）。第三舰队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资深飞行员，包括所有的中队长，参与了此次行动。但是不到一周，这些飞机就有一半以上被击落，并且坠机飞行员几乎没有获救的。小泽的一名参谋还记得几名幸存者11月13日到达特鲁克群岛的斯普林机场时的情景：

返回的飞机数量如此之少，这让我感到震惊。几乎看不到战斗机了。但是，鱼雷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的情况更糟。没有一人生还。……飞机场上，小泽按照惯例向官兵发表行动结束之后的讲话。后来，我从一些飞行员那里得知了这次讲话的情况。小泽登上演讲台，准备开口时，因为仅有几个人幸免于难，他无法抑制住悲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沉默地站在台上很长一段时间，痛哭流涕。[\[6\]](#)

1944年1月25日，当所罗门群岛航空队和第5航空队对拉包尔联合发动的攻击达到高潮，古贺峰一又命令第二航空战队的150架飞机前去参战，卷进这个绞肉机。没有几个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在此次任务前参加过实战。他们得到的指令是，除非“战斗条件显得特别有利”，否则就要避免与美国的轰炸机和战斗机作战。[\[7\]](#)第二航空战队的中岛鱼雷机被派出去执行危险的夜间任务，对布干维尔岛附近哈尔西的舰队和新几内亚附近麦克阿瑟的运输舰展开攻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这些任务不仅没有伤到美国舰船，反而因为防空火力和操作事故损失了数十架宝贵的轰炸机。航空参谋奥宫正武回忆拉包尔最后几天的可怕情况时说：

日子稀里糊涂地就过去了。我们每天都会让零式战斗机紧急升空，进行截击。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新手飞行员，已经变成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的脸上会忽然浮现出对于死亡的理解。美国人不停地向他们施压，一刻也不停息。轰炸机日夜不停地轰炸拉包尔，目标包括机场以及海港里的船只；战斗机则低空掠过，进行扫射，朝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开火。敌人的袭击简直是太猛烈了，我们根本就无暇攻击他们的基地。我们的损失不断增加，死亡和失踪的飞行员的名单也越来越长。[\[8\]](#)

在拉包尔的最后一次作战行动中，第二航空战队总共损失约90架飞

机。在2月下旬返回特鲁克群岛的少数飞行员中，又有许多人因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而死亡。他们还带来了失败主义和绝望的梦魇，这些想法与感受不可避免地在第三舰队航空大队的幸存者中传播开来。

在日本，1944年2月的新闻以不寻常的坦率报道了美军对特鲁克群岛的攻击。一些新闻报道错误地断言美国人曾试图进行两栖登陆并被击退，但在2月18日，大本营发布了准确而无情的报道：

周三早上，一支强大的美国特混舰队突然闯入我们的加罗林群岛，反复以大量舰载机袭击我们重要的战略基地特鲁克群岛。敌人派数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断施以猛烈的空袭，来回攻击我们。战争形势前所未有地严峻，而且空前恶化。敌人作战行动的节奏表明，进攻的军队已经逼近我们的国土了。[\[9\]](#)

和往常一样，这篇言辞严肃的新闻稿的目的是让日本人更加努力，更加勇于牺牲，但是当权者绝对不会承认日本有战败的危险。发行量很大的《每日新闻》的编辑们肯定是没有领悟这次发布的通稿中的微妙语气。2月23日，该报发表的头版评论文章警告说：“太平洋地区的攻防决战不会在美国和日本本土海域进行。这些战役将在.....数千英里外的岛屿基地上发生。如果敌人真的打到我们家门口了，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10\]](#)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训练平民用竹矛战斗的做法，并补充说，阻止美军进攻的唯一真正希望是生产更多的战机和航空母舰。东条英机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大为震怒。信息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控制这篇文章的传播，但由于已经有超过10万份报纸发出，文章造成的影响（虽然不大）已经无法消除。陆军省严厉训斥了该报，迫使总编辑辞职，并召集其他重要报纸的编辑，警告他们不要写这样的评论。陆军强制征召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参军，这是惩罚“任性”作家的常用方法。

东条英机不受日本人的欢迎，而且被海军的大多数将领鄙视。他自负而尖刻，热衷于发号施令，还常常用空泛的口号和花言巧语压制理性的讨论。即使在高级内阁和军官的闭门会议上，他也总是暴躁易怒。1943年10月，当一名大臣提到令人失望的收成时，东条英机起身厉声吼道：“即使什么也不吃，我们内阁成员也要准备好把生命献给国家！”^[11]他的荒唐举动有时似乎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但是日本文化对于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不太赞成的。天皇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象征性首脑，人民期待他手下的大臣们能以谦虚谨慎的态度执政。

天皇是东条英机在统治集团里长期占有优势的最终保障。近三年来，裕仁天皇对东条英机言听计从，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天皇也为他的做法和领导行为辩护。特鲁克群岛遭到攻击后，东条英机采取行动，紧紧抓住陆海军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大权。自明治时代以来，两个军种的权力都是在一个省和一个总参谋部之间分配的。但是现在，在天皇的支持下，东条英机迫使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辞职，然后在保留陆相和首相职位的同时，推荐自己接任了该职务。永野修身辞去军令部总长一职，接任者为海相岛田繁太郎，后者也保留了他原有的职位。这次重组后，陆海军的参谋均由内阁控制。东条英机向来知道岛田易于妥协，因此更加稳固地把握了整个政权。当参谋们得知天皇也支持这个计划时，所有反对声都烟消云散了。

自1943年11月至来年2月，大多数航空母舰再次回到日本本土进行维修，替换飞机和机组人员。“瑞鹤号”进入吴港的干船坞，“翔鹤号”则来到东京湾的横须贺。航空母舰配备了新的雷达系统和防空武器。新的飞机从广岛湾的岩国海军航空基地飞来。由于新训练的机组人员尚未获准在舰上降落，因此飞机是用起重机吊上航母的，而不是在舰队出海后降落于航母上。

培训新的航空大队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美国人不会等，所以所有人都明白，第三舰队可能会在准备就绪之前就要投入战斗。小泽的航

空参谋乐观地将4月1日定为训练完成日，到那时，新的舰载飞行队应该已经接受充分的训练，而且装备精良，准备好打击敌人。第三舰队的9艘航母（5艘重型航母和4艘轻型航母）上有500架飞机。另有四五百架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将部署在简易的岛屿机场上，能够轻松覆盖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的空域。

日本的作战计划负责人曾希望在1944年生产4万架新型军用飞机，但在1943年秋季，实际生产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飞机工厂面临着材料短缺、后勤不畅以及缺乏熟练机械师和工程师的压力。运输船的损失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和雅加达的铝土矿的交付，而这些铝土矿是飞机制造业铝合金的主要来源。位于名古屋的三菱工厂稳步扩大规模，到1943年底雇用了4.3万名工人，但在1943年仅生产了1 029架新的零式战斗机，不到军方要求的数量的一半。日本的飞机制造业过度依赖少数有才能的工匠和技术人员，这些人过度疲劳，难以应付。这个行业从未针对大规模生产进行过优化。尽管较晚引进的标准生产线技术带来了技术改进，但三菱和其他主要飞机供应商（中岛、爱知、川崎、立川、横须贺）均未能成功提高产量，仍旧无法满足军队不断增长的战时订单。

1943年底，一名政府检查员视察名古屋的车间时，惊讶地发现新制造出的零式战斗机仍然由牛群从工厂里拖出。三菱车间附近没有机场。新一批战斗机必须运输到24英里外的各务原，在那里交给海军。飞机极易受损，因此不能用卡车运输，铁路运输也不方便。当时已经累死了20头牛，其余30头牛也累垮了。牛饲料是从黑市上买的，但是供应没有保证。战时至关重要的替补飞机的交付，竟全然寄托于一群数量不断减少且吃不饱的牲畜身上。过了很长时间，三菱的工程师才想到，佩尔什马可以更快地将飞机拖到各务原，并且用不着那么多饲料。与波音、道格拉斯或格鲁曼公司的安排相比，日本公司所做的这些荒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日本最终为何会失败。

过去一段时间日本飞机与新型美国战斗机“地狱猫”“海盗”“闪电”的交火，已经让所有人都承认三菱零式战斗机不行了，已经过时了。堀越

二郎的飞机曾经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的意义，永远是航空史上的里程碑。然而，从其卓越的服役生涯一开始，三菱零式战斗机就体现了一系列设计上的折中选择。堀越二郎的团队把飞机上每一盎司可有可无的重量都减去，并且相对于飞机的大小，其翼展和操纵面大得几乎不成比例。这些特点使得三菱零式战斗机可以远距离飞行，爬升速度快，灵活性高，但也使它们在高空动作迟缓，俯冲速度慢，敌人的炮火轻易就能将其摧毁。三菱公司将其有限的设计资源和开发资源投入到了两款新型截击机中，即J2M“雷电”和A7M“烈风”战斗机。与零式战斗机相比，这两种飞机性能更佳，但早期的机型常常遭遇机械故障和设计缺陷的困扰。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工程人员，所有这些问题或许都可以克服（例如，在投入使用时，美方寇蒂斯SB2C和B-29的各种缺陷都得到了补救）。但时间很短，工程人员极其有限。零式战斗机的继任者中，只有一小部分开始服役，而且飞行员和航空参谋从来都不喜欢它们。

由于没有可行的替代者，日本海军只能转而致力于改进三菱零式战斗机。三菱在整场战争期间不断对零式进行改装，总的来说，增加了马力、火力和护甲，同时缩小了翼展——II型、21型、22型和52丙型的生产数量比其他型号多一些。性能改进一般非常细微，因此与之作战的美国飞行员根本注意不到。零式战斗机驾驶员藤田怡与藏少佐是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兵，他发现，与旧机型相比，52型在速度和敏捷性方面均显不足。“只能说，飞行体验更差了，”他说，“机头抬高速度不够快，所以机枪很难瞄准目标。我觉得我因此失去了许多击中敌机的机会。”^[12]日本海军还尝试将550磅重的炸弹固定在机身下方，将零式战斗机改造为战斗轰炸机，但是这种由1 000马力发动机驱动飞机并不适合担此重任。各种型号的零式战斗机均为轻型机体结构，因此一旦遭到猛烈的攻击，就很容易解体或是着火。调整这些设计消耗了三菱工程师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们无法将注意力放在开发下一代飞机上。这些设计上的改变也让公司的生产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从1940年到1945年，名古屋工厂的产量每年都低于海军的需求目标。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进口过美国和欧洲的精密机床，用它们来研磨高性能金属并进行抛光。战前的禁运切断了这些关键货物的进口。到1942年，工厂的设备已经老化，而且无法更换或升级了。日本本土缺乏自然资源和矿藏，无法获得制造美国大型战斗机上的那种2 000马力发动机所需的高性能轻质金属。日本航空业一直尝试生产可靠的新型飞机发动机，希望能在预期的重量限制内，达到更高的额定功率，但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海军人事局军官大井笃甚至开始打日本的小规模的所谓影子产业的主意，“例如可以相对容易地转而生产飞机发动机的汽车工业”。[\[13\]](#)

前线战况的恶化加剧了国内生产方面的严重缺陷。在军事土木工程方面，日本人根本无法与美国海军工程营相比。岛上的简易机场是用轻型施工设备和脊梁都快累断了的劳工建造的。在战争的早期阶段，日本人占领了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许多最好的盟军机场。随着这些基地陆续被盟军夺回，日本人被迫撤退到地面支援设施不足且生活条件恶劣的基地。飞行员和机械师住在帐篷里，在篝火上做饭，在燃料桶中洗澡。厕所是散发着恶臭的露天粪坑。医疗人员不足，药品短缺，做手术时通常没法打麻药。替换飞机和飞行员的需求一直很迫切，但这只是后勤问题的一个方面。前线战区的机场需要航空燃料、备件、润滑油、军械和弹药的不断补给，需要不断空运来大量地勤人员，来替代那些生病、受伤或被炸死的人。新培训的机械师不如老手熟练。日本运送物资的飞机数量本就有限，许多飞机还因操作事故和盟军的攻击而损毁。日本海上运输遇到的钳制逐月强化，渐渐被卡死。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前线的飞机都严重失修。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告诉上级，每架零式战斗机在飞行150个小时后都应该进行彻底的检修。然而，在南太平洋，大多数零式战斗机服役超过了200小时，发动机开始出现运转问题。[\[14\]](#)到1944年，大多数一线战斗机还没来得及维护检修就被击落了。

堀越二郎在战争结束数年之后提到，他的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拥有数

不清的工程人员和技术专家。美国有遍布全国的大学、研究所、实验室、设计公司和重工业企业，相比之下，日本什么也没有。日本有一小批天才工程师，他们在海军、陆军和大约十几家工业公司里工作。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以及公司和日本财阀之间的竞争，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和浪费的。他们的才华常常被浪费在不切实际、奢侈浪费、走走停停，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有“腾飞”的项目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如字面意思一样）。他们足智多谋又尽心尽力，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堀越二郎和他的同事工作特别拼命，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完全崩溃的边缘，医生和上级命令他们休息。“如此糟糕的技术政策管理造成了我们别无选择的局面。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们只能依靠零式战斗机，”堀越二郎写道，“这加速了日本的失败。”^[15]

最新加入小泽部队的是“大风号”，这是一艘重达29 300吨的大型航母，飞行甲板安装了护甲，能够抵御在中途岛战役中被摧毁的四艘航母所经受的俯冲轰炸攻击。这是第一艘拥有此类装甲的日本航空母舰。为了使用重型钢甲板，这艘航母在其他方面做了重要的妥协。相比巨大的船体，该航母的两个机库显得很小时，并且仅有两部升降机。航母上只能搭载75架飞机，比新型美国航母少20架。“大风号”在1944年3月开始服役，并于当月驶往新加坡，成为小泽的旗舰。

两种新舰载轰炸机逐渐取代了过时的机型。一种是中岛B6N“天山”鱼雷机，比其前身B5N“凯特”速度更快，航程更远。由于中岛公司自己制造的发动机难以启动，导致该飞机服役时间推迟，海军最终坚持将其更换为更可靠的三菱发动机。被盟军称作“吉尔”的“天山”鱼雷机可乘坐三名机组人员，并可携带一枚鱼雷或一颗重达1 754磅的炸弹，航程为2 000海里。它于1943年投入生产；到了1944年初，中岛每月大约生产100架这种新飞机。

长期服役的爱知D3A俯冲轰炸机（“瓦尔”）则逐渐让位于德国制造商汉高设计的、速度快且机动性强的横须贺D4Y“彗星”，这种飞机的发

动机有1 400马力，是由戴姆勒——奔驰授权爱知制造的径向活塞发动机。盟军将其称为“朱蒂”。和“吉尔”一样，“朱蒂”的服役时间也由于早期型号的各种问题而推迟，尤其是机翼在俯冲时会出现颤动。这个问题最终通过强化翼梁和改进俯冲减速板得到了解决。“彗星”水平飞行的最高时速为342海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战国家使用的速度最快的俯冲轰炸机。它是由隶属于日本海军的横须贺海军航空技术兵工厂的工程师研发的，但大部分投入战斗的飞机是由爱知公司在名古屋制造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缺乏装甲和自封油箱，在飞行甲板上起飞和降落时速度过快。像所有的日本航母舰载机一样，它相对容易被击落。“彗星”也没有折叠机翼，而折叠机翼已经是美国舰载机的标准设计了。固定机翼的飞机需要更大的机库，因此会限制航空大队的规模，并且从机库调到飞行甲板上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和航母上的飞机管理员在搬运飞机效率方面取得了巨大飞跃，但是小泽的手下甚至难以达到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在1941年和1942年制定的标准。

如果操纵得当，“天山”和“彗星”的性能比前任飞机好得多。它们飞得更快、更高、更久、更远。将这些舰载机引入舰队的过程非常艰难，但其他国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战时日本拥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制造出一支更庞大、更先进的航母舰队，实力可以与埃塞克斯级航母的舰队相媲美，同时能够培养出新一代的飞行员，具备1942年的“第一梯队”那样娴熟的技能，那么“天山”和“彗星”可能会对美国舰队构成致命威胁。但是小泽的第三舰队里的大部分航母都过时了（“大风号”除外），船体太小，无法与更强大的新型舰载机适配。重型姊妹航母“飞鹰号”和“隼鹰号”的最高速度约为24节，除非有强风，否则这两艘航母无法发射或回收这些舰载机。“彗星”需要一整条甲板跑道来达到起飞速度，因此必须放置在船尾。这限制了航母在一个周期内可以起飞的轰炸机的数量。为了能让新型俯冲轰炸机安全起飞，航空参谋们试验了新的弹射器，甚至尝试在机身上安装火箭。

着舰始终是让人心惊肉跳的过程。“彗星”降落时速度快，高度低，经常无法抓住阻拦索。“瑞鹤号”的一名航空兵军官回忆说，每当这种新

型俯冲轰炸机进入着舰航线时，“舰桥上的人都非常紧张。我们特别尊重这些飞机上的机组人员”。[\[16\]](#)

日本海军过了很久才认识到其飞行训练渠道过于狭窄了。1944年春天登上小泽航空母舰的替补机组人员中，大多数人在驾驶舱内的训练时间不足150小时，只掌握了基本的飞行技能。几乎没有人练过机炮射击，也几乎没有人有能力在航母上起降。战争之前，日本飞行员就估计飞行训练可能不足，也讨论过此事，但直到1941年，日本仍然没有齐心协力地增加合格飞行员的数量，而即便那时采取措施，其实也已经晚了。拉包尔战役中飞行员灾难性的损失使得日本人别无选择，只能让飞行学员在经过短暂的培训后就进入舰队。小泽现在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让那些训练不足的年轻人准备好应对不久的将来就要发生的海上决战。

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精英曾在霞浦海军航空训练中心接受小规模定制训练，这里位于东京以北约50英里的土浦市附近，相当于“日本的彭萨科拉”。受训人员需要先接受两年课堂教学、飞行训练和射击训练，然后在前方作战部队接受一年的额外训练。新兵是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最新几届的毕业生、舰队的士官以及16岁至19岁的平民学生中选出来的。筛选标准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过分严格。即使如此，被录取的人中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完成训练。1937年坂井三郎准尉申请参加飞行训练，后来成为从1 500名申请人中选出的70人中的一员。在初级飞行训练中，每个教练只负责三名学生。训练的每个阶段都会淘汰一些人。坂井三郎所在的班有70个人，其中45个人被淘汰，没有获得飞行资格。[\[17\]](#)大多数飞行学员必须累计驾驶500小时以上，才会获准尝试着舰。

这种筛选严格的小规模训练计划中产生了一些世界顶级的飞行员，但是培养的数量太少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海军每年只能培训出大约100名新飞行员。这个数字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所增长，但增速还无法满足海军的内部目标。在太平洋战争的早期阶段，日本海

军航空兵拥有整个战区的制空权时，高级航空兵军官就开始担心飞行员的储备问题。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海军约有3 500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在前线服役，人员储备很少，一旦打起消耗战，整个系统就会立刻感受到压力。珍珠港事件前三个月，日本海军乐观地提出一项计划，准备培养1.5万名新飞行员。在霞浦担任航空参谋的奥宫正武指出，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没有足够的战机像和平时那样训练飞行员，也就是把霞浦的毕业生派到前线部队进行额外一年的“实战”训练。而且，即使大大拓宽训练渠道，“至少也要再过两年到四年，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大规模训练计划的作用”。[\[18\]](#)

日本的飞行训练体系在设计时就没有考虑是否便于扩张。有限的航空业规模和现有的飞行员储备都是无法改变的限制因素。90%的日本飞行员是入伍士兵或准尉。海军赞助的平民飞行训练计划于1934年成立，从大学生中挑选人才。然而1943年以后，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个计划才受到重视。海军军官团队的敏感和特权对新的招募渠道来说是一种阻碍——江田岛的毕业生们坚决抵制预备役飞行员的涌入，对待被分配到前线的飞行员态度非常恶劣。从中学直接征召青少年的“预科练”（海军飞行员预备课程）计划迅速扩大，在日本各岛建立了新的培训中心。但这些年轻人往往没有上过科学课程，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机械设备，他们在开始初级飞行训练之前需要长达两年半的地面指导。

缺乏富有经验的合格教官是一个瓶颈。战前学生与教官的比例为三比一，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1941年，每名教官带8个学生；到了1942年，则是12个。超过12个被认为是不可行的。前线部队迫切需要海军资深飞行员，因此他们很少被派回日本担任教官。日本海军并不承认存在“飞行疲劳症”，宁愿相信所有这些弱点都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士精神来解决，并且总体上从未采取战斗区飞行员轮换政策。“除非你死了，否则他们不会让你回家。”日本飞行员都会这样哀叹。但是如果不把老兵派来担任教官，等待接受培训的人就不能从他们来之不易的专业知识中受益。

坂井三郎是少数被派回日本担任战时教官的王牌飞行员之一（他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中受了伤），但是他负责训练的年轻少尉和中尉的态度让他感到失望。坂井三郎和其他士官被要求称呼江田岛毕业生为“尊贵的少尉”或“尊贵的中尉”。军官们极度自负，对已经入伍的老兵不屑一顾，甚至瞧不起击落数十架敌机的负伤英雄和王牌飞行员。“嘿，你！”他们会粗鲁地喊，“我的技术怎么样？”^[19]入伍飞行员在训练之余会被分配去做些琐事，比如做饭或削土豆皮，军官们则在餐厅和茶馆里吃喝玩乐。即使在前线作战的中队里，军官对待那些技术比他们熟练、经验也更加丰富的僚机资深飞行员，也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这对军队凝聚力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战后过了很久，坂井三郎对此依旧耿耿于怀：

那些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军官从来没有教过我任何关于搜寻和发现敌人，或者如何机动，将他们击落的知识。相反，我们从同级军士那里学到了很多，这些军士是从他们的前辈军士那里学习的，那些前辈军士是从准尉那里学习的，而准尉则是从军官阶级最底层的特勤人员那里学习的。我们像兄弟一样，互相关照。然而那些军官，那些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没有技术，任何技能都乏善可陈，却是我们的上级。整个国家对此一无所知。有多少难得的人才因为这些人做出错误的判断、缺乏军人的敏锐感而丧命！我跟你
说，这很可怕！^[20]

1943年，由于日本海军航空兵在南太平洋地区损兵折将，日本海军竭力同时扩大所有飞行训练招募渠道。预科训练的筛选标准放宽了，建立了十几个新的区域培训中心。例如，1942年12月，大津预科练第19期录取了1 500名新兵。1943年5月，第20期录取了2 951名年轻人。^[21]最聪明、最有能力的候选人将进入加速通道，很快就接受初级飞行训练。他们的培训时间难免会减少，训练质量也不免会降低。毕业所需的飞行时间越来越少。到1944年初，平均所需时间少于150小时。枪炮训练和目

标射击从训练项目中移除了，飞行学员不得不在到达前方战区后再学习如何射击。回想起来，日本人忽然意识到，海军战前过分严格的征兵标准，以及从霞浦淘汰了这么多明显合格的学生的做法，其实是目光短浅、弄巧成拙。坂井三郎说：“我那届在土浦市被淘汰的45名飞行员比那些完成战时训练的人要优秀得多。”^[22]他这么说无疑是正确的。

海军还开始招募大批大学生进入飞行学校。学生们最初对此满腔热忱。1943年中期，海军接到了2万份这样的申请，好像顶尖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所有年轻人都吵着要当海军飞行员。学者、日记作家清泽冽担心海军空战将吞噬掉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日本期待着这些年轻人在未来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年轻人会被毁掉的。……在目前的战争中，这是最令人担忧的一点。”^[23]

清泽冽听说许多年轻人在加入海军后遭到殴打和虐待，对此感到不安。入伍者被迫踮脚站立一小时或更长时间。他们如果做不到，就会被人用竹棒、鞋子和皮质剑带残暴地殴打。1944年5月，他写道：“有报道说，在海军中，年轻新兵被打的现象很普遍。应征入伍的学生挨的打尤其严重。我听说老兵用棍子殴打他们，许多人因此髌骨骨折。”^[24]当年下半年，他又为横须贺镇守府新入伍者的命运悲叹道：“有朋友说，新兵被棍棒和其他东西打得很惨，许多人因此骨骼变形。哪怕只有一个人说错了一句话，这个人所在的全班都会挨打。世界上还有如此野蛮的地方吗？”^[25]

作为原海军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尼米兹将军就人员管理和人员配置问题持有坚定的态度。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任由司令部的员工队伍发展，人员规模就会不可遏制地扩大，导致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新的分支机构和子部门会像雨后春笋一般长出来。一个部门规模扩大之后，其他部门也要相应增加人手。新的行政管理层会渐渐渗入组织结构之中，各个部门会从原来指定的办公空间中冲出来，涌入附属建筑。在

激烈的内部竞争中，各部门会针锋相对，竞争对手则相互攻讦。尼米兹此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决心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珍珠港。他让手下所有人都清楚，各部门的人数应该保持在可控的最低限度。如有必要，他会亲自执行该规定，将部门负责人带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要让某个军官或士兵来司令部工作。

但是由于大量新的舰船、武器装备和人员从美国本土来到战区，尼米兹的战区司令部的规模迅速扩大。小规模团队虽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无法应对极其复杂的规划、指挥和管理等工作。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容纳了后勤管理和舰队维护的工作人员职能。不断延展出来的下级指挥部纷纷建立自己的工作班子。只要有可能，这些机构就会从军队任何分支抽调人员。

对尼米兹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管理和控制多兵种战区司令部固有的内部斗争和紧张局面。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领导者。他反对兵种之间公开争吵，而且在听取各方观点时极为公正。在他的引导下，即使最激烈的讨论最终也能得到建设性结论。人们无论争吵时多么恶语相向，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都总是能够友好相待。许多与尼米兹一起工作过的人，后来都回忆说他特别善于用笑话化解冲突。1944年春季，在一场计划会议即将结束，所有人都变得极度不耐烦时，尼米兹说他想起了挪亚进行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两栖作战”。“当动物们从方舟上下来时，他看到两只猫出来，后面跟着六只小猫。‘这是怎么回事？’挪亚问道。‘哈哈，’虎斑猫说，‘你一直认为我们俩在打架吗？’”^[26]

兵种间的敌对可以缓和，但是无法完全消除。有几个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几乎要爆发冲突了。特纳和霍兰·史密斯有时表现得像最好的朋友，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全身心投入于行动细节的决策时，总会有爆发争吵的风险。1944年2月，特纳晋升为海军中将，斯普鲁恩斯晋升为海军上将，但是霍兰·史密斯仍然是海军陆战队少将。他们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的成功行动中是协同指挥作战的。史密斯本来就怀疑海军只会照顾自己人，对海军陆战队不理不睬，这件事更是让他确认

了这一点。“你们总是不断地加星，真是值得自豪啊，”他朝特纳吐了一口唾沫，“你们这些人来回走一圈就能得到一颗星。……每次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你们都有可能得到一颗星。”特纳回答说：“是的，我很荣幸能因为指挥海军陆战队而晋升。”^[27]在华盛顿，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敦促金将军批准晋升那些当之无愧的人。1944年5月，史密斯被升为中将。

对于让史密斯担任第5两栖军的军长这件事，陆军一直不满意。“电流”行动前，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试图把第27步兵师的指挥权从霍兰·史密斯的手里收回来，却没能如愿。此时，他更是下定决心要做到这一点。塞班岛和关岛是通往东京的下一站，这两座岛屿与太平洋中部的环礁不同，不是珊瑚礁连在一起形成的，而是面积巨大、地形崎岖的多山岛屿。在陆军看来，海军陆战队员是训练有素的突击部队，擅长夺取滩头堡。但是在更大面积的陆地上作战，陆军更为擅长。因此，应该由一名陆军将领来指挥第5两栖军，至少是指挥其中的陆军部队。尼米兹有礼貌地听完了理查森的意见，然后拒绝了他的提议，理由是目前的安排并没有出现问题，因此不需要去解决。但是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必须让金将军密切注意这些争端，因为他们有可能会争斗到马歇尔将军、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甚至罗斯福总统的面前。

陆军航空兵对于其在尼米兹战区内的境况也不满意，因为他们必须听命于约翰·H.胡佛海军少将，也就是尼米兹岸基航空部队的司令。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威利斯·黑尔将军是胡佛将军的重要下属，两人就同时涉及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基地办事步骤的各种问题存在争议。理查森也主动参与到这场争论中，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这种争论带来的影响。据说胡佛和黑尔互相憎恨，但是在尼米兹问起时，二人都否认这一点。黑尔甚至在经过胡佛司令部所在的富纳富提时没有造访胡佛，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军队礼仪。后来，阿诺德将军要求当地司令部主要作为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尼米兹拒绝了。阿诺德对此意见很大，将此问题提交给联席会议的其他参谋长，但他们

不愿意介入局部的指挥关系问题。史汀生直言劝告阿诺德不要惹是生非。

尼米兹和他的副手——飞行员出身的约翰·托尔斯——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托尔斯和“棕鞋族”继续就他们的诉求施加压力，希望增加舰载航空兵出身的军官的指挥权。托尔斯希望军方能采取行动，取消向陆军和海军飞行员颁发勋章时所采取的标准之间的差别，他希望飞行员出身的人能够在参谋中有更多的代表，并且他希望允许媒体更多地报道美国航母深入敌方水域发动攻击的情况。珍珠港的战地记者也趁机尽其所能地煽风点火。受战时审查制度的限制，对于这些内部纷争，他们实际上能够写的东西很有限，但他们喜欢怂恿飞行员抱怨水面舰艇上的军官。尼米兹后来得知他的一名参谋被人问及“你属于哪个阵营？”，这让他意识到飞行员在向新闻记者宣扬海军的家丑。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严厉警告托尔斯不要再这样做。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发出这种警告。

但托尔斯提出的问题有其实际根源，而且需要得到解决。金将军（他自己是一名飞行员）曾请求已退役的海军中将、海军中的传奇人物哈里·E.亚内尔进行彻底的调查，并就未来的人事政策提出建议。亚内尔征集了太平洋战区大多数海军重要指挥官的书面证词和口头证词，并撰写了一份报告，于1943年秋季交给了金。他的主要建议是让飞行员出身的军官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因为这意味着要解除尼米兹的指挥权，这一建议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但他收集到的将军们的意见的确有利于飞行员。一些野心勃勃的“棕鞋族”甚至要求把所有不是飞行员出身的人——包括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从职位上赶走。但是大多数高层领袖（包括哈尔西、斯普鲁恩斯、金凯德、特纳、卡尔霍恩和菲奇）都强调航空兵必须融入舰队，处于海军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成为其有效的组成部分。所有作战计划部门以及所有重要指挥部中都应该有足够的飞行员代表，而且飞行员应在部署航母特混舰队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根据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判断，不能大范围更换“黑鞋族”指挥官。而且事实上，一些高级军官已经开始担心，海军在提拔年轻飞行员方面是操之

过急了。这些人不可能突然之间就获得指挥大型舰艇所需的技能和经验。“黑鞋族”卡尔·穆尔说，飞行员总是匆匆完成出航命令，唯一的目的是让他们获得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让他们在油轮上干一年，就交给他们一艘5万吨航母的指挥权，这简直吓坏了同一片海域的其他所有人。”^[28]

1944年4月28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死于心脏病。1940年在华尔街公司狄龙瑞德当过债券推销员的海军部副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福里斯特尔曾为飞行员的诉求出过力。他经常与欧内斯特·金争吵，金对任何文职人员积极参与决策所表现出的兴趣都感到愤慨。二人完全无法相处。但在诺克斯去世前，福里斯特尔和金已经就一项新的重大人事政策达成一致。所有重要指挥部的非航空兵军官都必须选择一名飞行员出身的人作为参谋长，而所有担任重要指挥官的飞行员也必须选择“黑鞋族”作为参谋长。这是一种折中策略，旨在让飞行员的意见和专业知识能传递到每个指挥部，但同时也不忽视水面舰艇军官的不同意见。

这一决定引发了许多满足于现状的人的抗议。被新政策硬生生拆散的两对高级组合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和卡尔·穆尔（第5舰队），以及马克·米彻尔和杜鲁门·赫丁（第58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都不想换掉在任的参谋长，他们都请求破例通融。两个人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但是直到1944年夏天，穆尔才被迫离职。米彻尔的新任参谋长是阿利·伯克，伯克因为在所罗门群岛指挥一个驱逐舰中队而赢得了声誉。1944年3月，伯克登上了米彻尔的旗舰“列克星敦号”。

战前美国针对日本制订的作战计划（“橙色”和“彩虹”计划）中，并未重视马里亚纳群岛，主要因为这些岛屿位于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的直接航线以北很远的地方。但金将军深信马里亚纳群岛是这场战争的战略要地，因为这些岛屿处于连接日本与其南太平洋资源产地及其特鲁克群岛舰队基地的航线上。它们还可以为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提供令人满意

的作战基地，因为它们位于潜艇部队狩猎场的门槛上。天宁岛的地形适合建造机场，新型B-29轰炸机从那里起飞可以抵达日本本土。

在华盛顿（1943年5月）和魁北克（1943年8月）相继召开的两次盟军会议中，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刻意将有关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推迟到1944年再决定，因为他们意识到，进攻下一个目标的方向和时间将由战场的实际情况和时机来决定。金设法让盟军会议文件中提及了马里亚纳群岛，但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直到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才正式下令夺取这些岛屿。开罗会议的最终文件批准了一系列“1944年打败日本的具体行动”，其中包括“在关岛、天宁岛和塞班岛建立一支战略轰炸部队，对日本本土实施战略轰炸”。[\[29\]](#)

尽管海军和陆军航空队之间存在摩擦，但金和阿诺德现在成了相互提防的盟友。阿诺德认为，这些岛屿上的机场可以为B-29“超级堡垒”实现目标提供最好的条件。这种大型飞机的挂弹量是B-17的两倍，作战半径约为1 600英里。它配备了加压舱，因此能够在敌方战斗机无法飞到的高空中作战，更为安全。由于大大小小的问题，特别是其2 200马力的莱特“双旋风”发动机的缺陷，B-29入役的时间反复推迟。阿诺德在谈及B-29的优势时滔滔不绝，他一再向马歇尔、史汀生、国会和总统保证，它将在1944年初投入使用，并且数百架B-29从中国机场起飞可以定期对日本进行轰炸。国会一直对B-29保有信心，到1943年底为此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但只生产了97架，其中只有16架可以飞行。阿诺德告诉总统：“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发动机生产已经陷入延误。现在看来，要想在3月1日之前将所需数量的B-29在中国集结并开始对日轰炸，好像是不可能了，而且在4月1日之前恐怕也做不到。在写下这封信时，我希望在3月1日之前能有150架B-29部署在中国，其中100架用于对日作战。”[\[30\]](#)

罗斯福曾亲自向中国政府保证，B-29即将到来并将从中国的机场起飞轰炸日本。在他的战略中，这是让中国坚持对日作战的主要动力。他担心，万一陆军航空队无法兑现他反复做出的承诺，后果将很严重。与

此同时，阿诺德越来越不确定B-29的基地是否最适合建在中国。蒋介石已经同意扩大现有的机场，以保证这种大型轰炸机的起降，但是建设进度落后于计划，并且日军攻势正猛，中国军队可能无法保护这些基地不受破坏。在1944年初，B-29似乎不得不从中国内陆的成都和重庆的基地起飞作战。沿海的小型机场可用作加油站，但它们不够安全，无法成为主要的作战基地。1944年4月，第一批B-29飞机从印度飞入中国，飞行员驾驶着它们穿越了“驼峰航线”——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燃料，这条航线非常危险。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作战计划人员对马里亚纳群岛的兴趣越来越大。关岛、塞班岛和天宁岛是美国建设大型机场以轰炸日本的最佳选址。这几个岛足够容纳1 000架B-29的机队。这种轰炸机的有效半径为1 600英里，东京和关东平原的工业区都在此范围内。一旦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岛上的基地就可用于打击敌人，并可通过海运得到充足的供应。1943年10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作战计划人员正式建议第5舰队和中太平洋的两栖部队向马里亚纳群岛进攻。两个月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开罗接受并通过了这项建议。

B-29拥有惊人的打击范围和强大的载重能力，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武器，太平洋各区域的指挥官都很想拥有这种飞机。麦克阿瑟主张把大部分B-29分配给肯尼将军所率领的第5航空队，尼米兹和他的下属则对B-29执行远程反潜巡逻和布雷任务的能力感兴趣。但阿诺德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集中空中力量，常常对分散轰炸机力量的想法表示遗憾和不满。他决心将几乎所有可用的B-29都部署到轰炸日本的行动中，并将这些战斗机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在马歇尔的支持下，他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创建了第20航空队，下辖第20和第21轰炸机大队，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控制。麦克阿瑟和肯尼反对此决定，但无力扭转既成事实。

将日本人从马绍尔群岛上赶走之后，麦克阿瑟马上决定改变尼米兹的前进路线，使其向南进军。事实上，麦克阿瑟希望集合所有可用的力量，好实施他对菲律宾南端的棉兰老岛的进攻计划。太平洋舰队夺取特

鲁克群岛和帕劳后，可以为他的北翼提供保护。不仅如此，盟军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消除指挥权的分裂，任命麦克阿瑟为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如此一来，太平洋舰队和强大的第5两栖军将由他直接指挥。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并不符合他的这种总体设想。

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少将在华盛顿正式提交了反对马里亚纳群岛行动的意见。他指出，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在海上相隔1 000英里。要跨越这样的距离，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将会耗尽盟军的航运资源，并且需要数月的准备。这次进攻将得不到任何陆基飞机的支持，第58特混舰队的航母无法在确保登陆海滩制空权的同时击溃可能出战的日本舰队。

麦克阿瑟也毫不犹豫地绕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诉诸史汀生部长和罗斯福。他预言类似塔拉瓦的血战将会重演，并且规模将大得多。麦克阿瑟主张绕过敌军强大的据点，迅速占领敌人根基不稳的领土，以此控制美军的伤亡。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非常清楚，国会和赫斯特的新闻媒体中支持麦克阿瑟的人会赞同和宣扬最后这个论点的。1944年1月中旬，麦克阿瑟（通过弗雷德里克·H.奥斯本准将）向史汀生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海军的这种正面攻击，正如在塔拉瓦行动中一样，是任由美军官兵遭到悲惨的、不必要的屠杀。……海军没有正确理解太平洋的战略，没有认识到第一阶段应该是由陆军确立陆基空中保护，然后海军再行动。……罗斯福先生的出发点总是海军。史汀生先生必须跟他汇报，一定要说服他。只要交给我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权，我将在十个月内拿下菲律宾。……不要再让海军的傲慢立场和无知继续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悲剧了。[\[31\]](#)

在盟军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拿下马绍尔群岛之前，就连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也对马里亚纳群岛行动可能带来的代价和风险存有疑

虑。1944年1月27日，来自太平洋战区各地的高级指挥官在珍珠港参加会议。代表麦克阿瑟出席的是萨瑟兰以及他的航空兵参谋长肯尼和海军参谋长金凯德。哈尔西仍然留在南太平洋，但是派来他的参谋长卡尼参会。尼米兹的所有重要参谋都参会了，此外还有海军航空兵司令约翰·托尔斯、勤务部队司令威廉·L.卡尔霍恩以及陆军的理查森将军。

从会议一开始，明显就很少有人支持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行动。肯尼说，唯一支持这一行动的是尼米兹的参谋长麦克莫里斯。舰队和两栖部队得不到陆基空中支援被认为是这个作战行动不可行的重要原因。许多人担心战斗中步兵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塔拉瓦行动。托尔斯担心日本人会从硫黄岛和父岛的基地发动猛烈的空袭。金凯德指出，马里亚纳群岛缺乏条件良好的天然港口，并说：“任何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基地的想法都会让我不寒而栗。”^[32] 卡尔霍恩认为，让辅助舰队以及支援部队沿着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前进是更简单的方案。肯尼对从马里亚纳群岛基地派遣B-29轰炸日本的整个行动计划提出了质疑，他还得到了托尔斯的大力支持。在这些远距离飞行任务中，战斗机的飞行距离不足，无法对轰炸机实施护航，因此“超级堡垒”不得不从高空实施轰炸，这样的话精度会很差。他说，这样的轰炸袭击顶多算是“特技表演”。他们反对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一致看法被写入了备忘录，经尼米兹签署后递交给了金将军。肯尼将军后来写道：“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感觉良好，准备共同努力结束战争。”^[33] 在1月28日的闭幕午餐会上，尼米兹对参会人员说他们胜利在望。

萨瑟兰向麦克阿瑟汇报了会议结果。麦克阿瑟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有反对他提出的攻击线路的意见均已消失，尼米兹至少也同意派遣强大的舰队去进攻菲律宾了。麦克阿瑟联系了马歇尔，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后续指令。他提出的战略明显超过了珍珠港参会者讨论的内容。他准备将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海军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让哈尔西担任他的舰队司令，另外他还想要B-29轰炸机。

这突如其来的“造反”让金吃惊不小，他迅速采取行动予以压制。他

给尼米兹写信说：“我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的会议记录，结果却不得不带着愤怒和失望加以批注。”^[34]对那些反对马里亚纳群岛作战的主要论点，他一一予以驳斥，并在结尾处直言不讳地说，与南方的麦克阿瑟合兵一处的提议“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35]马歇尔和阿诺德也不为会议记录上的意见所动。

无论如何，太平洋战区后续发生的情况，证明了反对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意见是错误的。强大的太平洋舰队有能力扫荡敌军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这样的实力使得人们战前对大型两栖作战行动的担心变得不再重要。在“燧发枪”、“法警”和“冰雹”行动中，第58特混舰队开始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米彻尔深入敌方水域，所向披靡，表明陆基空中掩护不再是两栖进攻和其他重大海军作战行动的必要条件。特鲁克群岛已经被牢牢压制，可以安全绕过。日本航空部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不如前，因此美军可以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更加大胆的攻势。许多美国军官都心心念念地要解放关岛，这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就被日本占领的美国领土。有人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南线替代方案提出了新的质疑。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南部之间的封闭水域中，快速航空母舰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面对太平洋战区提出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表示支持继续以双线平行的攻势进军，并强调北线的攻击将开辟通往东京的较短路线。尼米兹和他手下的指挥官重新考虑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并最终承认马里亚纳群岛行动是可行的。2月29日，该行动被命名为“征粮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立即开始制订作战计划。

3月1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针对日本的最新作战日程表。麦克阿瑟要向位于新几内亚中北部海岸的荷兰迪亚进行远距离蛙跳式作战，将于4月15日完成。特鲁克群岛要定期空袭，进行压制，直接绕过。6月15日将夺取马里亚纳群岛，9月15日夺取帕劳。进攻棉兰老岛的最后期限是11月15日，不过那只是一个暂定的日期。战况有利的话，美军或许可以提前重返菲律宾。这就是1944年一整年美军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还从来没有在指挥官会议上当面见过。后者对于需要离开自己战区的邀请，一直都是拒绝的。而尼米兹很注重军中礼仪，不能不请自来地前往澳大利亚。论资历，麦克阿瑟比他高很多。

（当尼米兹还是中校时，麦克阿瑟就晋升为准将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请求准许巡视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各海军司令部，很快获得批准，于是尼米兹获邀访问布里斯班。3月25日，他乘水上飞机抵达，发现麦克阿瑟和一队随员正在码头等候。

尼米兹和他的副官阿瑟·拉马尔与麦克阿瑟的家人相谈甚欢。他们从珍珠港带来了糖果和兰花，还为麦克阿瑟六岁的儿子带了一件丝绸外套。金凯德将军回忆说，第二天他们的会议极其正式，也很有建设性。会议中只出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是在尼米兹让麦克阿瑟关注参谋长联席会议最新指令中的一项细则时出现的。两名战区指挥官需要考虑一项应变计划，在日本的抵抗突然减弱时启动这项计划，直接向台湾岛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军。麦克阿瑟对于任何绕过菲律宾的想法都从不容忍，于是怒不可遏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尼米兹在给金的一份私人报告中重述了当时两人的交谈：

然后，他爆发了，大谈特谈绕过菲律宾为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对那里负有神圣的义务——救赎1 700万人——他的灵魂上的鲜血——被美国人抛弃——等等——然后批评“华盛顿的那些先生，远离现场，从未听过枪炮声，却试图制定太平洋战争的战略”——等等。当我终于能插话时，我回答说，虽然我相信自己能理解他的观点，但我不能认同，然后——不管你信不信——我开始为“华盛顿的那些先生”辩护，并告诉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人就像他和我一样，正在努力为这个国家做出最大的努力，他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在我看来，他们正在取得令人钦佩的成功。[36]

许多普通的日本人开始怀疑他们被骗了，认识到他们在太平洋的军队已经处于不利的局面。官方发布的新闻总是违背逻辑和常识。官方宣

传中提及的光辉胜利以及战略撤退，听起来令人困惑。新的“防线”越来越接近本土，还需要全体日本人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军事专家在报纸上的文章或电台讲话中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日本的大战略是“诱敌深入”——引诱敌人接近日本本土，最终一举击溃敌人。勇敢的日本军队在前线作战，即使“玉碎”也在所不惜。每当一个新的据点被敌人占领，他们就会自信地解释说，他们早已预见到这次失败，并且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一个在日本度过战争年代的日裔美国女性写道，有关战争形势的官方报道“存在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是那些头脑简单的听众也变得怀疑起来”。

任何能够思考的日本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越来越令人绝望的状态，快走投无路了。再也无法隐瞒真相时，广播上就只是说又打了败仗，或是又有岛屿失守，每次刚一说完，就开始播音乐，而且总是播一样的音乐——受人喜爱的老歌《海行兮》，曲调悲伤动人。在日本全国，每当响起这首音乐，都会有人悄悄关掉收音机，其他人则会低下头。终将失败的想法已经浮上了每个人的心头，但是大家都很谨慎，绝不说出口；每个人都沉默着，以免自己的疑虑导致别人不再拼尽全力。^[37]

但他们总是在怀疑和担心。住在东京的年轻女子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沉思：“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像在黑暗中挑选颜色，而且不管好坏，都没有人批评政府。这只会让我们感到更加不安。”^[38]日本政府通常允许对欧洲的战况进行准确报道，显然，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在抵抗盟国方面进展不顺利。日本报道25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同一周，日本人也了解到，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放弃瓜达尔卡纳尔岛。有关欧洲的直截了当的报道，与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含糊不清而且常常自相矛盾的报道形成了鲜明对照。1943年9月传来消息，彼得罗·巴多利奥将军领导的意大利政府向盟国投降。自从7月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被罢免和逮捕后，新闻报道一直向日本民众保证，意大利的新政府将继续

与轴心国并肩战斗。现在盟军正涌入意大利南部，而德军正在撤退。日记作家清泽冽说，在日本东京闹市区的一家报摊前，“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急切地想购买报纸。看起来他们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39]日本军事当局的官员在电台和报纸社论里发声，充满信心地断言意大利的沦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第三帝国终于“摆脱了意大利这个负担，可以发起不可战胜的抵抗了”。^[40]清泽冽对官方宣传的愚蠢和短视失望不已。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正在迅速消磨其仅剩的权威和可信度。“日本的报纸似乎连小学生的常识和逻辑都没有。”^[41]

政府认可的口号和主题歌颂的都是“大和魂”——日本集体的战斗精神——不可磨灭的力量。即使敌人拥有物质优势——在1943年，新闻报道中开始暗示美国有巨大的工业产出——日本的工人和战士们也有能力将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推向新的高峰。最后，不管代价如何，日本人的伟大精神必然会胜利。1943年5月美军攻打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时，2 650名日本守军进行了殊死抵抗，最终几乎全军阵亡。他们的抵抗完全是徒劳的——约翰·L.德威特将军的第7步兵师突击部队的士兵数量是日军的5倍——但他们没有缴械投降，而是选择集体死亡。在日本，阿图岛上的驻军被全歼一事被描述为伟大的精神胜利。这一事件证明，日本的战士愿意为他的国家奉献出一切。“玉碎”这个词是在描述阿图岛的大规模死战和自杀时第一次提出来的，随着一个又一个日本岛屿上的驻军以类似的方式死亡，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为公众所熟悉。日本的重要报纸报道说，“阿图驻军的英雄气概”死而复生，重新具有了肉体形态，并在三个月后与登陆基斯卡岛的美军重新展开对抗。《日本时报与广告报》在1943年8月24日报道称：“国外的报道显示，在三周的战斗里，被这种精神附体的军队向美军发动了猛烈而坚决的攻击。日本军队的战魂在南太平洋也与敌人进行了搏斗，导致许多美国兵精神错乱，因精神崩溃和极度的恐惧而自杀。”^[42]

日本评论员指出，相比之下，崇尚个人主义和奢侈享乐的美国人永远无法效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对胜利的狂热追求。他们只想活下去，只

想活着回家。在到达日本海岸之前，美国人就会厌倦这场战争，请求讲和。反正报纸上是这么说的。1943年5月，新闻局局长在横滨发表讲话：“士兵不是工具，是精神！他们是灵魂！美国士兵的灵魂是粗制滥造的。”^[43] 1943年8月，乔治·S.巴顿将军在西西里掌掴一名美国士兵，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媒体的热议。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敌人的斗志正在崩溃！由于美国是民主国家，它的人民迟早会对其领导人施加压力，与日本媾和。日本拥有时间上的优势，因为“美国国内的环境不允许他们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44]

政府一直在鼓励后方民众付出更大的努力，团结一致，凝聚他们的集体精神力量，为即将与敌人发生的决定性战役做好准备。1943年10月26日，日本国会在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之前宣读了天皇诏书，诏书中写道：“目前之时局实乃严峻至极。大日本国民必须充分发挥全部力量，摧毁敌国之邪恶野心。”^[45] 日本国民也以极大的热情做出了回应。那年秋天，日本政府废除了假期和周末，但似乎没有任何人表达不满。再也没有休息日了，国民“把他们的假期还给了天皇”。^[46] 征募劳工的标准逐渐放宽。未婚女性和大学生应征入伍，参与民防工作，从事军工业。被征召者的年龄也越来越小：1943年9月，所有年龄在14岁以上的女孩都被征召；次年4月，所有10岁以上的儿童，无论男女，都被征召。尽管距离美国开始空袭日本本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在1943年10月，日本就开始让儿童撤离城市。征兵规模也扩大了。1943年秋，19岁及以上的大学生（科学专业或工程专业除外）被要求服兵役。45岁以下的中年男子也要入伍。送别仪式与1941年的仪式一样经过精心布置，也仍然有许多人参加，但气氛明显变得较为阴郁。人们看到了太多用白布包裹的木盒，里面装着从战区运回的阵亡士兵和水手的骨灰。东京的年轻女子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送别队伍“相当伤感。……看到他们，我有一种痛苦的想法：今天又进行了一场活人的葬礼，那些卷起袖子的年轻人是去送死”。^[47]

山本五十六的飞机在布干维尔上空被击落的整整一年后，联合舰队总司令的继任者遭受了相同的命运。出于对米彻尔强大的航母特混舰队的警惕，古贺峰一决定将司令部转移上岸，从“武藏号”战列舰（当时停泊在帕劳）转移到棉兰老岛的达沃。3月31日晚上，古贺和他的大多数高级参谋和密码专家登上了三架飞离巴伯尔达奥布岛的川西水上飞机，开始了650英里的飞行。这三架四引擎大型飞机驶入了宿务附近的“热带女巫药水”（浓雾）中，两架飞机坠落了。古贺峰一的飞机彻底消失了，机组人员和其乘客再也没有被发现过。另一架飞机载着古贺的参谋长福留繁中将迫降在离海岸约六英里的海上。福留繁幸存下来并设法上岸，但是当即就被菲律宾的游击队俘虏了。游击队从他身上发现了一批高度机密的文件，其中包括一本信号手册、一本更新的密码本和一份Z计划的副本，而Z计划是联合舰队为西太平洋的舰队行动制订的主要作战计划。福留繁被毫发无伤地送回日本陆军，具体情况和原因不明，但是缴获的文件被转交给美军。一艘潜艇悄悄地将这份宝贵的情报带给了位于布里斯班的麦克阿瑟司令部。

日本海军意识到本方机密已经落入敌人的手中，于是迅速推出了新一版密码本，并为即将到来的战役编写了新的作战计划。古贺峰一的死讯直至5月才公开，随后日军任命了一位新的总司令。这位新司令是1905年毕业于江田岛的鱼雷专家——海军大将丰田副武。丰田副武在停泊于东京湾的旗舰（“大淀号”轻型巡洋舰）上建立了司令部。军令部在东京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命名为“阿号”作战计划，并在同一周下发到各部门。

一个月前，东京已经下令重组舰队，这是袭击珍珠港以来的第四次重组。日本海军的主力被重新命名为“第一机动舰队”。它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个是第三舰队，其中包括九艘航空母舰，分为三个特混大队；另外一个第二舰队，由海军的大部分重要水面舰艇组成，包括战列舰和重型巡洋舰。小泽治三郎中将得到晋升，指挥整个舰队，同时保留第三舰队的直接指挥权，旗舰是“大凤号”。第二舰队由栗田健男中将指挥，行使附属的警戒舰队的职能，但是如果战机允许，小泽可能会派

遣它与敌人进行传统的海上炮击战。联合舰队之前已经进行过多次改组，但是第一机动舰队的设立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做法，将航母置于舰队的核心，将战列舰降级为辅助舰艇。日本海军第一次出现由航母上的将军指挥战列舰的情况。

传统、教条和文化规范一直阻碍着这一必要的改革。除了战列舰拥护者的固执观念作梗之外，让低级将领指挥高级将领的做法也不是日本海军的作风。1943年8月栗田健男接替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二舰队之前，小泽（江田岛1909届）的职位不能高于近藤（1907届），因为那将对后者的“颜面”造成严重损害。在小泽接手特混舰队之前，必须安排近藤退役或接任其他职位。近藤后来成为中国方面舰队的司令，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到1945年5月。

整个1944年春天，小泽的舰队都在新加坡和苏禄海（菲律宾和婆罗洲之间）西南部的锚地之间移动。他的行动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这三个因素都反映出日本海军日益恶化的处境。首先，他需要让飞行甲板靠近地面机场，因为他的飞行员经验不足，无法保证安全地降落在航空母舰上。其次，由于越来越多的油轮被击沉，燃油越发短缺，舰队被迫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石油产地附近运动。最后，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将小泽的舰队围困在了浅水区和封闭水域。

3月初，日本的航空母舰停靠在新加坡，航空大队分散到该地区的各个机场进行训练。早期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许多新飞行员不到半年前才首次进入教练机的驾驶舱。强大的新型轰炸机“彗星”和“天山”对于许多新飞行员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即使在陆地机场上操作也是如此。他们很少接受射击训练和导航训练，甚至从没接受过相关训练，所以必须跟着了解航向的中队长或大队长飞行。“训练很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意外，”“瑞鹤号”的维护官铃木宏说，“由于飞行员和机械师大多是新手，并且驾驶的是新型飞机，所以出现了很多坠毁事故。除此之外，新加坡的天气大多数时候也非常糟糕，经常下雨。”[\[48\]](#)

在3月下半月，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舰队的两个分队向南行驶了大

约100英里，到达了苏门答腊海岸外的林加锚地。靠近巴邻旁油田的这块锚地足够宽阔，可以让航空母舰进行基本的飞行作业。狭窄的入口航道可以防止潜艇溜进来。新手飞行员在这里练习着舰，但是当飞机从机场降落到飞行甲板上时，操作失误造成的损失比例高得可怕。“瑞鹤号”的航空兵军官野村淳回忆说，一架“天山”在模拟投掷了一枚假鱼雷之后低空飞行，从航母的舰首上空飞过去，差一点就撞上了。大家刚松了一口气，“飞行员开始右转弯，右翼尖突然接触到水面。飞机立即解体了。一瞬间，一切都结束了”。[\[49\]](#)在低速飞行时，强大的新式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都非常难以操控，许多飞机在降落的最后阶段坠入航空母舰后方的海水里，还经常有飞机未能钩住阻拦索，斜着冲向舰岛或是翻落海中。撞机事件就在头顶上发生。“这简直是自我毁灭的空战。”“隼鹰号”的一名飞行员痛心地说道。[\[50\]](#)

5月3日，岛田繁太郎将军在第373号指令中发布了修订后的“阿号”作战计划。该计划设想在帕劳附近海域或加罗林群岛西部海域这两个“决战区”之一进行舰队对决。第一机动舰队将得到附近海岸上的第一航空舰队的支援。如果美国人进攻马里亚纳群岛，小泽将留在本地水域，希望能“引诱”敌方舰队向南移动，因此，该计划取决于美国人是否会咬饵上钩。岛田写道：“决战的作战地点将尽可能接近我们的机动舰队的前沿基地。”[\[51\]](#)

这场战役**必须**在这些南部水域进行，因为燃料的短缺迫使小泽留在便于抵达荷属东印度油田的地方。日本的油轮被大量击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潜艇及其越来越可靠的鱼雷），其舰队被困在了打拉根岛、巴厘巴板和巴邻旁的炼油厂附近。直接加注未经加工的婆罗洲石油倒是可以缓解燃料不足的情况，这里产的石油纯度较高，足以驱动发动机，但缺点是挥发性强，且产生的污垢多。船上的工程师非常讨厌这种油垢，因为它们会在锅炉中留下层层肮脏的沉积物，并且极大地增加爆炸和火灾的风险。

因此，直到1944年5月中旬，丰田副武将军根据“阿号”作战计划下

达的命令才允许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作战。如果美国人袭击塞班岛及其邻近岛屿，岛上的陆基海军航空兵必须攻击并摧毁敌方舰队。日本本土可以派飞机逐次飞过小笠原群岛，对这些岛屿上的航空部队进行增援。与此同时，塞班岛的地面部队也会得到增援，陆军中将斋藤义次自信地承诺将击退任何两栖入侵。尽管如此，日军心头还有一个不安的疑问：如果第5舰队没有向西南方进军怎么办？不派舰队守卫如此接近本岛的领土，日本能冒这个险吗？

5月11日，答案揭晓。军令部撤销了不准直接向日本舰艇加注原油的禁令。5月的第三周，第一机动舰队的大多数舰艇停泊在苏禄群岛的塔威塔威岛附近，这座岛位于棉兰老岛和婆罗洲之间，从打拉根岛不断往返的油轮将每艘舰艇都装满了原油。但塔威塔威岛不适合进行飞行训练，因为该地区没有合适的机场。小泽对航母飞行作业过程中的致命损失感到震惊，决定不再继续这种训练：“我无法再忍受任何一位士兵在这些事故中失去生命。”^[52]虽然急需更多的准备，但是在日本舰队被迫出击之前的那个月里，航空大队大部分时间都无事可干。根据“隼鹰号”大队长阿部善次少佐的说法，盛行的微风风力太弱，因此即使航母以最高速度前进，“彗星”轰炸机也无法升空。“所以我们无法起飞，”阿部善次说，“从5月初我们离开日本，到6月19日美国大型特混舰队来到马里亚纳群岛，开始攻击关岛和塞班岛，这期间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训练。……我们在四五十天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飞行训练。”^[53]

1943年4月，曾经担任山本五十六的得力助手，并在前任总司令殒命的空中伏击中幸存下来的前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将军养好了伤，重新回到舰队中。他被任命为第二舰队第一战列舰分队的司令，指挥“大和号”和“武藏号”。他很高兴回到海上，但不管是自己的战列舰，还是整个舰队的训练状态都让他感到灰心。在个人日记中，宇垣缠在武士精神的感召与沮丧的心情之间摇摆不定。他认为战略计划总体上可行，但是怀疑第一机动舰队并不具备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他对于在海上遭遇敌人感到担心，因为“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被敌方飞机和潜艇轻松

击败。我们越是冒险前往外海，越可能被打败。这就像一个人在雨中没有穿雨衣也没有打雨伞，他一定会浑身湿透”。^[54]几天后，他又写道，由于美国人的力量时刻都在变强，舰队不能再拖延了。^[55] 4月27日，他登上小泽的旗舰“大风号”，参与兵棋推演。在宇垣缠看来，负责推演的人对日本做出了不切实际的有利假设。他觉得海军对于决战的痴迷近乎失去了理性，并且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考虑攻击敌人较为薄弱的地方”。^[56]

宇垣缠在1944年4月和5月所写的日记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判断和感受。他日记中的语气无疑表明他知道日本将会战败，但即使在日记中，他也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这么说。4月24日：“敌人现在的力量就像熊熊烈火，不可阻挡，一点点水根本无法将其扑灭。”^[57]他的悲观想法听上去很真实，而他唤起自己斗志的努力则显得虚弱而苍白：“但是，与此同时，敌人也可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如果我们与之交战，情况可能会变得有利于我们。”^[58]

打拉根岛的原油使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附近展开决战成为可能，而如果决战真的在此打响，小泽就要从敌人以西300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发动远距离攻击。日军飞机在攻击美国舰队后可以在关岛的机场上降落。它们可以在那里补充燃料和弹药，并继续出动，直到歼灭敌方舰队。利用海岸基地进行“穿梭轰炸”是“阿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来自小泽的航母和马里亚纳群岛机场的飞机将对美国舰队进行连续的空袭。然后小泽将集中他所有的力量，包括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追击残兵并将其彻底消灭。岛田的指令表明东京对该计划取得成功深信不疑：“预计会大获全胜。”^[59]

让第一机动舰队的位置保持在敌人的打击范围之外，依据的是“超距作战”（outranging）的逻辑——这是日本作战计划和武器体系的指导性战术原则。超距作战的思想在日本海军许多远程飞机的设计中都有体现，其中包括零式战斗机以及G3M和G4M中型轰炸机。虽然战时日本

的飞机制造业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但是新一代舰载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航程都远远高于美国同类飞机。（到当时为止，“彗星”经常被用作侦察机，而且从1942年以来，一直用于超远程任务。）93型“长矛”鱼雷在海面作战行动中也具有超距作战的优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日本的超级战列舰配备了18.1英寸的火炮，可以在对手尚未进入有效射程时就发动攻击。超距作战和穿梭轰炸从理论上说能够缩小日军与敌军舰队实力上的差距。此时日本人很清楚己方与美军相比实力悬殊。5月9日军令部的情报估计美国舰队中有16艘战列舰，其中有8艘是新型的快速战列舰。至于航空母舰，估计有8艘大型舰队航母、10艘轻型航母和约20艘护航航母。[\[60\]](#)这些判断非常接近实际的数字。

“阿号”作战计划中的穿梭轰炸战术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为的是避免让飞行员在飞行甲板上降落。选择这个战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航母飞行员技能方面的不足，因此也就凸显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终将决定即将到来的战役的结果。日本飞行员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在对等条件下与敌人作战。

军官和飞行员彼此安慰说“阿号”是一个很好的作战计划，它将帮助日本获得急需的胜利。据报道，日本军官和船员在起航前一周信心满满。他们对陆基第一航空舰队寄予厚望，该部队此时由海军中将角田觉治指挥，司令部设在天宁岛。岸基海军航空兵一直与海军舰队的指挥结构高度契合。尽管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海军高层仍然保留着一种由来已久的信念，即他们的陆基轰炸机可以对敌方海上舰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名义上，第一航空舰队拥有大约1 750架飞机，但这一数字至少将角田觉治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实力夸大了三倍多。他面临的问题包括地面支援设施不足，缺少合格的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备件、弹药和燃料也处于短缺状态。在日本本土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海域内，美国潜艇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日方无法将飞机装入货箱，再通过海运送到岛上。大多数飞机是由缺乏训练的不成熟飞行员经由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机

场开过来的。坠毁和导航失败等操作事故，导致飞机和飞行员损失惨重。在美军发动进攻的前夕，角田这里估计只有大约435架飞机处于可飞行状态。

除了两栖作战和快速航空母舰造成的破坏之外，美国潜艇也让日本的战争努力越发难以为继。自1943年年中以来，潜艇从海面以下发动的攻击越来越有效。6月7日，军令部宣布5月损失了21万吨航运船只。自4月初以来，日本已经失去了5艘驱逐舰、6艘油轮、4艘运兵舰和14艘货轮。日本舰队遭到持续不断的追踪、侦察、骚扰，从珍珠港和澳大利亚派出的潜艇也在伺机奇袭。日本的两艘超级战列舰都遭到过美国潜艇的鱼雷攻击。1943年圣诞节当天，“灰鳐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大和号”；3月29日离开帕劳的时候，“武藏号”被“鲐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虽然这种巨型战列舰承受一颗鱼雷的攻击毫无问题，但是这些破坏都需要其返回日本本土水域才能修复，而这样做需要长途航行，导致战列舰缺席重要的战斗，消耗本就稀少的燃料，并且打乱日本指挥官的编队和计划。

1944年的4月和5月，小泽舰队的所有重要行动都被美军潜艇追踪并汇报给上级。这些美国潜艇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锚地巡逻，观察并报告日本舰船的进出港情况。它们还会袭击穿梭于婆罗洲东北海岸外的塔威塔威岛和打拉根岛之间的油轮。上海和马尼拉之间的货船和运兵船从中国带来增援部队。4月26日，久经战场的轻型巡洋舰“夕张号”在哈马黑拉岛附近被“蓝鳃太阳鱼号”击中并被摧毁。5月6日，“竹筴鱼号”在婆罗洲附近将大型油轮“日进丸”击沉。

随着5月中旬第一机动舰队聚集在塔威塔威岛，“黑鲛号”和“北梭鱼号”潜艇侦察到了它们。5月15日，“北梭鱼号”（艇长为托马斯·W.霍根）击伤一艘油轮，还击沉了护航驱逐舰“电号”。该潜艇的敌情报告确认，敌军主力舰队正在塔威塔威岛附近集结，另外两艘潜艇“刺豚号”和“青鱼号”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跟踪了日本舰队。5月22日，“刺豚号”袭击了水上飞机供应舰“千岁号”，两颗鱼雷命中，但似乎都是哑

弹。6月5日，它击沉了两艘价值很高的货轮，“高崎号”和“足褶号”。6月6日至9日，“鲐鱼号”潜艇（艇长为塞缪尔·D.迪利）在塔威塔威岛附近活动了三天，获得了潜艇战史上最优异的成绩。6日，在塔威塔威岛南部，“鲐鱼号”迎面射击，击沉了正在疾驰的“水无月号”驱逐舰。第二天，它又一次采用迎面射击，重复了前一日的表演，击沉了“早波号”驱逐舰。8日，迪利发现驱逐舰“谷风号”在视线范围内，用四枚鱼雷齐射击沉了它。

驱逐舰原本是用来对付潜艇的，是潜艇的天敌。日军的许多驱逐舰被潜艇击沉，让美军艇员非常满意。这也削弱了小泽的反潜警戒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因素在即将到来的航母战役中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日本陆军和海军一方面对第5舰队的位置和意图感到苦恼，一方面被迫对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北海岸的攻势做出反应。在精心编排的海上行动中，金凯德的海军部队将陆军两栖部队送上了荷兰迪亚（4月21日）和瓦克德岛（5月17日）。在这两地，进攻者都在几天之内就控制了简易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已经开始向更往西的日本驻军施加压力。5月，麦克阿瑟朝新几内亚西北部的“鸟头”状半岛前进。5月20日，海军和两栖部队开始进入作战位置，对比亚克岛发动攻击。大约有1万名日军驻扎在这个岛上，其中包括在中国久经沙场的精锐222师团。最初的登陆战起到了突袭的目的，但是夺取比亚克岛的三个机场的战斗陷入僵局，双方都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本人认为比亚克岛是防守南部的内圈防线的关键前哨。该岛的机场是即将进行的“阿号”作战计划中的重要节点。如果这座岛陷落，美军就能用它来对付日军，其B-24轰炸机就能对新几内亚西部、帕劳和菲律宾南部发动致命的轰炸。美军将会控制棉兰老岛以东的海上航道。因此，宇垣缠在日记中写道：“比亚克岛是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要地。”^[61]他怀疑日本陆军没有太大希望守住比亚克岛，因此可能会考虑放弃驻军，就像其他许多岛屿的情况那样。但是海军无法容忍这样的

撤退，宇垣缠敦促小泽朝东京施压，向该地区派出所有可用的空中增援和陆地增援。

5月29日，联合舰队的丰田副武将军下令展开“浑号”作战行动。“浑号”作战行动要求动用陆基航空部队和后方部队，计划迅速将部队派往作战地区，在敌人发动攻击时做出反击。日军认为，美国第5舰队甚至可能被引到南方作战，这将激活“阿号”作战计划，有可能引发海上决战并让日军取得胜利。角田奉命将480架飞机派到索龙和哈马黑拉岛的机场，从那里它们可以攻击比亚克岛的美国两栖舰队。岛上的日本驻军多次击退美军，大本营在相关报告的鼓舞下决定派出陆上增援部队。在运输舰不足的情况下，海军又采用了老办法，用驱逐舰和巡洋舰作为临时运兵舰。左近允尚正中将指挥的一支小型舰队于5月31日从棉兰老岛三宝颜市带上第二两栖旅团的2 500名士兵，计划三天后将他们带到比亚克岛登陆。他们的大部分武器和物资将由驳船来运输。

6月3日，盟军侦察机发现了左近允尚正的行动，这支小型舰队遭到了维克托·克拉奇利将军指挥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拦截。6月8日的猛烈空袭击沉了左近允尚正的一艘舰船，击伤另一艘。日本的军舰上挤满了士兵，不适合进行战斗，于是赶紧突围撤退。

第一次增援的失败反而让小泽更加下定决心守住比亚克岛。在塔威塔威岛，从林加锚地出发的船只陆续到来，参谋打开地图研究比亚克岛和新几内亚西部，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他们一致认为，美国舰队将穿过帕劳群岛，可以尝试将其各个击破。宇垣缠急切地希望派他的重型战舰参与作战，但又不愿意冒险用它们来增援比亚克岛。6月10日，丰田副武将军命令“大和号”和“武藏号”战列舰带领“能代号”轻型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再次尝试让增援士兵登陆。宇垣缠将军在前一天早上的日记中承认：“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比亚克岛。”他将指挥联合部队作战。他于当天下午从塔威塔威岛起航，并于6月11日在巴占岛与其他部队会合。[\[62\]](#)

由于不具备美国那样复杂的两栖装备和登陆艇，日本军舰不得不采

取权宜之计，将陆军登陆艇放在军舰的甲板上，每艘驱逐舰上放一艘，巡洋舰和战列舰上放两艘。这就把甲板搞得很笨重，舰艇既无法参与作战，也无法使用舰炮轰击岸上的敌军。日军必须在敌方中队开始行动之前登陆；如果美军进行干扰，这次增援任务也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在途中，宇垣缠在日记中承认他“担心”己方薄弱的空中掩护能力，并认为在部队上岸之前，或是在舰炮对准敌方目标之前，他的舰队就会遭到敌人猛烈的空袭。“我认为，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到达前线非常困难，但我现在不会抱怨。我将竭尽全力。”^[63]

由于一系列迹象表明美国人正准备在赤道以北展开一项重大行动，目标可能是马利亚纳，比亚克岛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了。从瑙鲁起飞的远程侦察机拍摄到一支规模庞大的美国舰队停靠在夸贾林环礁和马朱罗环礁。几天后，6月9日，另一架侦察机证实，早先看到的航母和战列舰已经离开了。它们在哪里？它们要去哪里？丰田副武的旗舰仍然停泊在东京湾，参谋仍然认为太平洋舰队的下一个目标将指向帕劳和菲律宾南部。只有情报官中岛亲孝中佐预测敌人是要前往塞班岛。6月10日，美国的航空母舰出现在关岛以东300英里处。第二天，强大的战斗机攻击了塞班岛和关岛。在6月12日晚上，角田的司令部用无线电通告了马利亚纳群岛的情况，做出了最佳估计，判断敌军有11艘航空母舰。^[64]

角田早期关于马利亚纳群岛空战的报告基本上是乐观的。虽然他损失了很多飞机，但他相信（或者据说他相信）他的部队给美国航母也造成了差不多的损失。空中侦察还没有发现特纳的两栖舰队，所以日本人猜测，马利亚纳群岛行动可能不过是一场突袭或佯攻。另外有空中侦察机看到麦克阿瑟的运输舰驶过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表明南部可能会有一场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这一刻，美国人的双线进攻的战略优势就变得很明显了。日本最高司令部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原地，必须弄清楚第5舰队的位置和目标才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6月13日，扫雷舰在塞班岛的背风侧海滩外扫雷，战列舰则轰击海

岸。很明显，美军准备登陆该岛。宇垣不等接到命令，就暂停了比亚克岛的军事行动，并开始将登陆艇从甲板上移下来。他等不及与小泽会合的命令，主动权衡了向北进军的利弊。两个小时后，丰田副武暂停了“浑号”作战行动，并发布了新的命令：“启动‘阿号’作战计划，进行决战。”^[65]第一机动舰队从塔威塔威岛航道鱼贯驶出。小泽带领舰队快速地驶向菲律宾西米沙鄢区的吉马拉斯海峡，舰队将在那里带上10 800吨燃料，然后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宇垣缠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部队中断了比亚克岛的任务，以20节的速度向北疾行，始终让棉兰老岛位于左侧，打算在菲律宾海上与小泽会合。比亚克岛的驻军被抛弃了，像之前许多岛屿的情况一样，战斗到了最后一人。

^[1] Agawa, *Reluctant Admiral*, pp.196-97.

^[2] Entry dated August 5, 1943, *Sugiyama Memo*, 2 vols.(Tokyo: Hara Shobso, 1967), 引用自 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1。

^[3] “New Operational Policy” document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8.

^[4] “New Operational Policy” document quoted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68.

^[5] 这个绰号用日语来说叫“鬼瓦”。在职业生涯早期，小泽在一艘驱逐舰上服役时面部受过伤，面部肌肉无法再活动，因此他无法笑，也没有其他表情。——作者注

^[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295.

^[7]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228.

^[8] Ibid., p.227.

^[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7, p.331.

^[10] *Mainichi Shinbun*, February 23, 1944, quoted in entry dated March 16,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60.

^[11] Entry dated October 5, 1943, in *ibid.*, p.91.

^[12] Lt.Cmdr.Iyozo Fujita,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1.

^[13] Atsushi Oi, “The Japanese Navy in 1941,” in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Pacific War Paper*, p.23.

- [14]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185.
- [15] Horikoshi, Shindo, and Wanteiz, *Eagles of Mitsubishi*, p.141.
- [1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0.
- [17]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7.
- [18]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36-37.
- [19] Saburo Saka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39.
- [20] *Ibid.*, p.140.
- [21] Tagaya,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p.9.
- [22]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7.
- [23] Entry dated March 12,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54.
- [24] Entry dated May 30, 1944, in *ibid.*, p.202.
- [25] Entry dated September 30, 1944, in *ibid.*, p.259.
- [26] Potter, Nimitz, p.358.
- [27] Julian C.Smith, Lt.Gen., US Marine Corps, (ret.), Mr.Benis M.Frank, interviewer, Historical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Washington, DC, p.307.
- [28] Hoyt,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371.
- [29] U.S.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3,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Vol.4, p.780.
- [30] Coffey, *Hap*, p.334.
- [31] Potter, *Nimitz*, p.340.
- [32] *Ibid.*, p.342.
- [33]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348.
- [34] Potter, *Nimitz*, p.343.
- [35] *Ibid.*, p.344.
- [36] *Ibid.*, p.354.
- [37] Terasaki and Miller, *Bridge to the Sun*, p.134.
- [38]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April 21,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69.
- [39] Entry dated September 9,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76.
- [40] Entry dated December 9, 1943, in *ibid.*, p.117.

- [41] Entry dated September 11, 1943, in *ibid.*, p.77.
- [42] "Battle of the Spirits," *Japan Times and Advertiser*, August 24, 1943.
- [43] Entry dated May 26,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31.
- [44] Entry dated September 5, 1943, in *ibid.*, p.75.
- [45] "Position Truly Grave," *Advertiser* (Adelaide, Australia), October 27, 1943, p.1.
- [46]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3.
- [47]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ne 10,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0.
- [48] Maintenance Lt.Hiroshi Suzuki,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93.
- [49]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6.
- [50] Entry dated May 31,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80.
- [51] Navy Directive No.373 quoted in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10.
- [52]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02.
- [53] Lt.Cmdr.Zenji Abe,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55.
- [54] Entry dated April 16,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49.
- [55]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4, in *ibid.*, p.361.
- [56] Entry dated April 27, 1944, in *ibid.*, p.365.
- [57] Entry dated April 24, 1944, in *ibid.*, p.363.
- [58] Entry dated May 9, 1944, in *ibid.*, p.368.
- [5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8, p.215.
- [60] Entry dated May 8,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368.
- [61] Entry dated May 25, 1944, in *ibid.*, p.376.
- [62] Entry dated June 9, 1944, in *ibid.*, p.391.
- [63] Entry dated June 10, 1944, in *ibid.*, p.393.
- [64] Entry dated June 13, 1944, in *ibid.*, pp.395-96.
- [65]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13.

第十四章

1944年6月6日，盟军部队迅速攻占了法国北部的海滩，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广播做了简单的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子民，国家的骄傲，如今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他们正努力维护我们的合众国、我们的宗教以及我们的文化，并给予受苦受难的人类以自由。……拥有了您的恩宠，我们必将战胜敌人那邪恶的力量。”^[1]

罗斯福总统当时已经知道，另一支大型水陆两栖舰队已经在太平洋中破浪前行，但他还不能透露这个消息。除了这次法国北部的登陆行动（“霸王”行动）之外，太平洋地区正在进行的作战计划（“征粮者”行动）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复杂度上都超越了此前所有的两栖登陆行动。这两次大型的突击行动都以敌方堡垒密布的海岸为攻击对象，在同一个月展开，行动地点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这两场行动彰显了美国军工业的霸主地位。驶向马里亚纳群岛的海军部队中有600多艘船，共搭载了30多万名士兵。马克·米彻尔将军率领的第58特混舰队拥有的15艘航空母舰被划分为4支特混大队。第51特混舰队，即联合远征军，拥有12.7万两栖突击队士兵，其中包括第2、第3和第4陆战师以及陆军第27步兵师。根据记录，运输舰当时装载着4万种补给和弹药。这些东西都是按战斗需要包装的，可以快速地卸下并运往滩头堡，还可以保证运送的数量刚好满足岸上部队的需要。运输舰队为登陆部队的每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都准备了1吨多重的补给和装备。一艘补给舰就能为9万士兵带去1个月所需的食物。米彻尔率领的特混舰队带着800万加仑的航空燃料，在作战期间将消耗400多万桶船用油。^[2]

一个F6F飞行员在第58特混舰队从埃尼威托克前往塞班岛的5天中经

常盘旋于上空，舰队迎风转向，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时，眼前的宏大场面让他感到无比震撼。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一齐转向，并始终保持在同样的航线上。“这些舰队所产生的尾波形成了完美的对称图，像一支顶级的芭蕾舞团；要知道，其中有一些船的重量可是达到了3.5万吨。我俯瞰这支强大的军队，不禁感叹日本人是多么愚蠢。他们做出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误判，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3]

最高层的指挥官与此前的行动一致，没有变动。斯普鲁恩斯将从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上指挥整支舰队，但是航空母舰的战术指挥由米彻尔负责。特纳指挥第51特混舰队，其中含有486艘舰船，大到战列舰（速度较慢的老型号，在炮击海岸时可得到充分利用），小到登陆艇，样样俱全。海军陆战队的霍兰·史密斯仍旧担任第5两栖军的军长。拉尔夫·史密斯将军仍旧是他的下属，是第27步兵师的师长。第51特混舰队被分为两支部队，北线攻击部队负责夺取塞班岛（由特纳直接指挥），南线攻击部队负责进攻关岛。南线攻击部队的司令为理查德·L.康诺利将军，其突击队由罗伊·盖格指挥，这名海军陆战队的将军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灵活调度“仙人掌航空队”。

两周前，停泊于珍珠港西湖的一排坦克登陆舰在一次大爆炸中炸成了碎片。美军无法确定爆炸发生的原因，因为所有的目击者都在一瞬间消失了。后续调查结果显示，起因很可能是一次装弹事故，爆炸可能是由一颗掉落的迫击炮弹引发的。这次爆炸迅速引爆了周围船只上的军火。爆炸后的碎片和尸体如雨水一般落在福特岛上，以及半英里开外的船只的甲板上。那日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早上火势才得到控制。这次灾难彻底摧毁了6艘本要参与“征粮者”行动的坦克登陆舰。事故伤亡惨重：163人死亡，396人受伤。但是媒体不得对这次事故进行报道。

如果珍珠港西湖的事故早6个月发生，即在“燧发枪”行动之前发生，尼米兹会因此被迫推迟行动。但是事故发生在1944年春末，太平洋舰队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哪怕是失去了6艘坦克登陆舰也没有大碍。事故发生两天后，尼米兹告诉金，营救和清理行动正在进行，““征

粮者’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将稍微推迟，但推迟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4\]](#)

与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中地势低洼的珊瑚环礁比起来，马利亚纳群岛非常不同。马利亚纳群岛中的岛屿面积很大且地势崎岖，岛上主要是陡峭的山峰、大峡谷、起伏的高地以及大片的甘蔗地。岛上的低地被茂盛的植被覆盖。塞班岛、关岛和天宁岛是马利亚纳群岛南部的三大岛屿，也是“征粮者”行动的主要目标，三大岛屿总面积近300平方英里。塞班岛全长12英里，一条位于岛屿中部的火山脊几乎纵贯全岛。岛上最高峰塔波查山高达1 554英尺。岛的西侧（背风面）海拔高度逐渐下降，从丘陵上的梯田和甘蔗地，直至人口密集的沿海平原。西海岸有三座城镇。塞班岛上居住着约3万人，其中约5/6是日本人和琉球人，其他的以查莫罗人和朝鲜人为主。第5两栖军的士兵曾在平坦狭窄的地形作战，而在塞班岛，他们将在城镇、甘蔗地以及偏远山区里作战。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作战，他们要承担所有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美军情报部门通过航拍照片和无线电侦听做出分析，估计日本守军为1.5万至1.7万名士兵。这一估算远远低于实际情况。4月和5月自日本和中国出发的援兵使得岛上军队人数达到了近3万。守军中有22 702人的陆军部队（第四十三师团以及混编的第四十七独立旅团）以及6 690个海军人员，其中大部分来自精英战队——海军特别陆战队，这支部队曾在塔拉瓦作战。马利亚纳群岛和帕劳的总指挥为南云忠一中将。美军对他非常了解，因为他曾作为指挥官率领日本第一航空舰队攻击珍珠港，并在6个月后的中途岛战役中被击溃。南云忠一的指挥中心在塞班岛上。地面部队的战术指挥以及该岛的固定防御工事准备工作由斋藤义次中将负责。

如果不是因为太平洋舰队的潜艇对日军进行了有效打击，日本在塞班岛上的部队人数还会更多。日本陆军的第四十三师团已经在两支运输大队的帮助下自日本出发。5月14日，由6艘破旧的运输舰组成的第一支运输大队在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航下自东京湾出发。一名军曹回忆

说，5天的海上航行非常痛苦，船上挤满了人，令人窒息，“就像躺在烤架上的烤鸡一样”。

士兵们必须随身带着自己的行李、步枪以及所有装备。大家都蹲在那里，蜷着身体。由于一直穿着胶底工作鞋，士兵们的脚都汗渍渍的，很潮湿。水珠落在你的脸上，那是附近的人呼吸的水汽凝结而成的。整个船舱因为人太多而散发出臭味。几根绳梯和一段狭窄的、匆忙搭起来的阶梯是进进出出的唯一通道。我们觉得这船随时都可能会沉。[\[5\]](#)

5月19日，第一支船队安然无恙地到达塞班岛。但是第二支船队遭到了美国潜艇的袭击。这支船队中有7艘运输舰，搭载了7 000名士兵，以及第四十三师团的大部分重型武器、补给以及粮食。7艘运输舰中，有5艘被鱼雷击中摧毁。大多数士兵被救了上来，但是沉船导致斋藤义次的部队损失了大量的装备、粮食以及其他重要的补给。日军原本要开展一个速建项目，目的是让塞班岛“坚不可摧”，但是5月份时，将军向大本营抱怨说，由于缺乏必需的建筑材料和设备，士兵们只能“叉着胳膊，站在那里无事可做”。沿海防御工事和防空炮台都是匆忙搭建起来的，有很多处都没有完工。防御工事的建筑材料是泥土和木头，而不是塔拉瓦环礁上使用的加固钢筋混凝土。成箱的弹药、火炮、带刺铁丝网以及其他军需都存放在靠近西侧登陆地点的海军仓库里。后来美军把其中的大部分物资都给夺取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在后来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估计，那座岛上的重型火炮只有1/3安装在了炮台上。登陆地点的防御工事和射击点的数量“远远少于此前战役中我们面对的；此外，沿岸的混凝土碉堡的数量也惊人地少”。[\[6\]](#)

塞班岛距埃尼威托克1 000多英里，后者是美军占领的最西端的环礁。特纳所率领的两栖舰队需要在海上作战，留在登陆海滩附近，可能要持续数周之久。若想抵达一处安全的锚地，要在海上航行数日。特纳

率领的运输舰易受攻击，完全依赖于第58特混舰队的空中保护。美军认为，塞班岛、关岛和罗塔岛的日军机场上有大量的陆基战斗机和轰炸机；此外，北方的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的机场也可以派飞机迅速支援。从米彻尔近期在整个战区对敌人展开的航母空袭的情况来看，美军有理由相信第58特混舰队可以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制空权。但是，如果小泽的第一机动舰队出现在那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米彻尔可以转而对付小泽的舰队吗？还是说他仍然必须留在滩头堡和突击部队的附近？关于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论是斯普鲁恩斯的命令还是“征粮者”的作战计划都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整个春天，这个问题都悬在欧内斯特·金的心中。虽然他的天性与直觉是崇尚进攻的，但是美国舰队总司令仍然对即将到来的美日舰队交锋怀有不安的感觉。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兵棋推演就暴露了太平洋舰队在军事后勤方面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会随着太平洋舰队深入敌军海域而越发明显。金以为日本海军一直留着一批杰出的骨干飞行员。美国人以前轻视过日本。这一次，美国人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吗？1944年2月，在一次非公开的采访中，美国舰队总司令承认了他内心的不安：“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是很有耐心的，如果有必要，他们可能会用几年的时间来给我们挖个陷阱。我们担心，可能哪天早上我们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满脸是血。”^[7]金说，从东京的角度来看，“等到我们快要到达他们老巢的时候再来攻击我们，或许是更好的策略。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在远离基地的中间地带与我们交战呢？我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的，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因此，他们一定会尽可能给我们制造麻烦”。^[8]

尼米兹向美国舰队总司令保证，斯普鲁恩斯已经为舰队决战做好了准备。第58特混舰队具备数量上的绝对优势：15艘航空母舰对小泽的9艘，7艘战列舰对小泽的5艘，950架舰载机对小泽的450架。不过，斯普鲁恩斯确信日军不会冒险派舰队来正面阻止美国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他认为，敌人一定会等待对他们最有利的战略时机。由于麦克阿瑟

登陆比亚克岛时，本可在海军力量上占尽优势的日本舰队主力没有出动，因此斯普鲁恩斯推断，日军也不会来到2 000多英里外的马里亚纳群岛：“我一直认为，日本舰队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够让他们利用强大的岸基空中力量助其作战的时机。在马里亚纳群岛等边远的岛屿群上，日军无法调动岸基空中力量；他们知道，美军强大的航母足以在这些地方摧毁他们。”[\[9\]](#)

为美军打头阵的第58特混舰队在6月8日和9日这两天加满了燃料。天气晴朗，风平浪静。东方刮来稳定的微风。雷达不时提示西方有可疑目标，但是直到6月10日下午，特混舰队及其飞机才发现敌情：几架F6F接到指示，奉命拦截并摧毁两架日本巡逻机。次日早上，几架G4M轰炸机从西北方向接近，也被美军拦截并摧毁了。看起来，日本现在已经知道了，美国一支强大的航母舰队正在到来。

特混舰队此时距离塞班岛只有不到200英里了，完全处于陆基飞机空袭的范围之内。米彻尔的舰队已经暴露在日军面前，他预料到舰队又会迎来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要不停地躲避日军低空飞来的G4M投下的鱼雷。即便来袭者没能命中，美军舰队也会始终处于防御状态，一整夜反复机动，躲避攻击，这会在漫长而严峻的作战行动前夕大大消耗美军的精力和体力。他的判断是，美军最好立即派战斗机发动常规的扫描，而不是等待次日黎明的到来。[\[10\]](#)下午1点，第58特混舰队开始迎风转向，为飞机起飞做准备——每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上都有16架“地狱猫”起飞，每艘轻型航母则各自起飞了12架，总计208架战斗机。每一架战斗机都加挂了副油箱，其中一半战斗机上还挂载了500磅的炸弹。

下午3点刚过，这些战斗机到达了塞班岛、关岛和罗塔岛的上空，让日军措手不及。“地狱猫”打下了大约30架零式战斗机，还击毁了一些（数量未知）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攻击者遭到了日军防空火力的猛烈反击，尤其是在关岛的奥罗特半岛机场附近。日本的防空火力击毁了11架

F6F（跳伞的11名飞行员中有3人获救）。此时已编入“列克星敦号”第16战斗机中队的亚历克斯·弗拉丘在塞班岛上空扫射了水上飞机的下水坡道。一枚高射炮弹险些将他击落，但他设法稳住飞机，回到了“列克星敦号”上，一路上引擎都不稳定：“这时就得感谢F6F‘地狱猫’战斗机的坚固性了。”[\[11\]](#)

当晚，米彻尔派出了小规模“蝙蝠队”去骚扰日军的机场——在机场上空盘旋并偶尔进行低空扫射，这一战术的目的是让日军不得安宁、无法休息，让他们在次日早上精疲力竭。

头一天战斗开始之前，角田的第一航空舰队有大约435架可用的飞机。在6月11日遭受美军战斗机白天的攻击后，日军有三分之一的飞机被摧毁；此外，美军还在日军机场跑道上留下了许多弹坑，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地面支援设施。在经历了第一周的空战和航空母舰的打击之后，角田可用的飞机减少到100余架。这些飞机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它们一直在棕榈叶和灌木丛下伪装并隐藏，并且分散在远离机场的区域。日本本土和特鲁克群岛派来了小规模空中支援队伍。但是，一直备受日本人期待的第一航空舰队却没能给美军带来丝毫损失。

斯普鲁恩斯命令两支特混大队（米彻尔一半的兵力）向北方移动，对硫黄岛和父岛的日军机场发动袭击。米彻尔将此任务交给了第1和第4特混大队，分别由“乔克”克拉克少将和威廉·K.哈里尔少将指挥。6月15日下午，第1特混大队到达指定位置并对硫黄岛和父岛展开大规模的混合攻击。“地狱猫”击落了20多架日本战斗机，一同出战的轰炸机则对机场、军火库、燃料罐以及地面建筑进行攻击。装载了小型杀伤炸弹的F6F战斗机在日军的跑道上留下弹坑，然后掉过头来进行低空扫射。美军飞机的坚固设计再次展现了优势，许多被击伤的飞机最终都安全返回了航空母舰。

一场小型台风正在这片海域生成。傍晚时分，翻涌的海浪狠狠地拍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贝劳伍德号”上的一架飞机冲向防撞墙，引发了大火。那一夜海风呼啸，巨浪滔天。在这样恶劣的天气状况下，飞

行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拉克指挥航空母舰向东行驶到相对平静的海域。6月16日中午，暴风雨已经减弱，天气情况允许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击。第2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哈罗德·比尔驾驶着一架寇蒂斯SB2C俯冲轰炸机自“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出发，他的任务是袭击父岛上一个被称为“大酒杯”的小型港口中停泊的舰船。要俯冲进这样一个被陡峭山坡环绕、只能从西侧撤离的避风港湾在技术上是很难的。这里的防空火力非常猛烈。比尔多次返回这个小港湾进行攻击，他后来写道：“父岛是个棘手的目标，每次执行任务我都担惊受怕；每一次安全地飞到港口以外的時候，我都觉得除了让自己活着出来了之外，并没有完成什么任务。”^[12]

6月13日早上，距离第一轮登陆还有48小时，第一批舰炮支援队到达了塞班岛和天宁岛。这支队伍中有7艘新型“快速”战列舰，由海军中将威利斯·A.李指挥。这7艘战列舰与第58特混舰队分开，在10多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率先开始对塞班岛海滩的防御工事展开攻击。这些舰船发射出去的16英寸和5英寸高爆弹如雨点一般落在紧靠登陆滩头的地方。炮击过后，整座岛看起来就像一个硝烟弥漫的废墟。由于担心大陆架上布设了水雷，李率领的战列舰队一直与海岸保持着1万码到1.6万码的距离。驱逐舰逐渐靠近海岸，将火力集中在岛上的营房和军事露营区。^[13]在火力网的掩护下，6艘扫雷舰探察了登陆滩头外面的水域，结果没有发现水雷。6月14日，两支由96个士兵组成的水下爆破队被运送到岸礁附近地区。潜水员游到日军岸炮附近，绘制珊瑚礁的地图，确定登陆艇次日可以采取的线路。潜水员没有发现人造的海滩障碍物。他们炸掉了珊瑚岬，为登陆艇清理出通道。由于遭到了岸炮的攻击，爆破队有4人死亡，5人受伤。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得炫目，风持续地刮着，而且空气很干燥，让人感到舒适。登陆部队乘着运输舰从东边朝目标开进，士兵们发现此时可以睡得比在南太平洋上更踏实一些。人们在甲板上打盹，有些人在太阳底下，有些人在阴凉处；有些士兵在写信、打牌、下棋，或是扔健身

球锻炼身体。整个白天，舰载机都在空中巡逻。舰队的规模本身就足以让士兵们感到镇定。很多舰艇都把塞班岛上空的飞机与战列舰之间的无线电通话通过扬声器放大，让船上的人对行动有所了解。军官起居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座塞班岛的等比例石膏模型，登陆滩头、飞机场、城镇以及已知的岸炮位置都用彩色墨水标记了出来。

预定登陆日前夜，第2陆战师的士兵们沐浴并洗衣。他们在黎明到来之前起床，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岛屿逐渐出现在了右前方。天空只是微亮，士兵们还很难看清塔波查山那扁平的峰顶，但是炮口喷出的火光和照明弹不时会照亮岛屿的某个区域。金曼少将指挥的火力支援队与特纳将军的两栖突击队会合了。天刚亮，这支包含了数百艘舰艇的庞大舰队就到达了指定的作战位置。舰炮轰击海岸防御工事的场面极其壮观。水手们开始放下登陆艇。战地记者皮特·左林顿记录说，海军陆战队员们看起来很放松，甚至有些无聊，他们一直看着海军大炮和舰载轰炸机沿着整条海岸轰炸。他们最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备，端起步枪瞄了一眼。几乎所有的士官都是参加过两栖突击的老兵。“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左林顿写道，“这是司空见惯的场面。……他们非常安静，说话很简洁。”^[14]这样的事情，他们早就见过也做过了。

特纳将军从旗舰“落基山城号”上发出了“登陆部队登陆”的信号。早上8时13分，军队指挥官示意第一批登陆舰在出发线后方集合，这条线距岸边4 000码。目标海滩从嘉兰卡诺亚向南北延展4英里。嘉兰卡诺亚是背风海岸南部的一个炼糖厂和村庄。登陆舰并排向海岸前进，满载着士兵的履带式登陆车由配备武器和装甲的小型水陆两用登陆车、炮舰以及两栖运兵车护航。第一批到岸的登陆舰上只有很少的伤亡，不到8分钟，海军陆战队员就在每个登陆滩头上都有了立足点。第二批和第三批登陆舰紧随其后。登陆滩头最南端的“黄一”和“黄二”滩上方有猛烈的机枪扫射。在那里，海军陆战队员被压制了一个多小时，只能在沙滩上挖散兵坑躲避炮火。来自西边的意外巨浪冲上礁石，掀翻了装满弹药、机枪、轻型火炮和饮用水的船只。

第四批和第五批登陆舰到达礁石附近，距海岸约1 000码时，遭到了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攻击。那些火炮布置在海滩后面的山脊上，经过精确测量，瞄准了礁石区域；开火后，礁石一线似乎掀起一面白色浪花和火焰组成的高墙。第一轮齐射的时间算得非常准，在离岸有一定距离的人看来就像是一排地雷被同时引爆了一样。几艘船被直接击中，船上人员全部阵亡。但是，美军舰队的登陆艇数量极多，共有800多艘，并且在头20分钟里，就已经将8 000名士兵送上了登陆海滩。

在至关重要的第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守住登陆滩头，让更多的士兵、装备和武器登陆。7个炮兵营（装备75毫米和105毫米的榴弹炮）以及2个坦克连于下午登陆。第一天结束前，有2万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的势头始终不减。海军陆战队员将弹坑作为临时散兵坑，并不断向下挖，因为日军的火力在继续加强。很多人被炮弹直接击中而丧生。有5个营长受伤并撤离，其中1个营有3个营长接连丧生。罗伯特·B.希克斯上尉在向海滩爬的时候，一颗迫击炮炮弹击中了紧靠他左边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爆炸后两个战士瞬间蒸发了。我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一丝踪影。他们被炸碎了，跟沙子和植被混在了一起。”[\[15\]](#)

美军的舰炮轰击成功地敲掉了日军大部分重型岸炮，也粉碎了一些能从海面和飞机上看到的大型固定防御工事。但是，斋藤义次的部队在海滩向内的高地隐藏了一些小型移动火炮和迫击炮。霍兰·史密斯逐渐判断出，日军在岛上的军事力量比情报估计的高40%至50%。到傍晚时，海军陆战队员突破的最远处已经深入岛屿内部约1 500码。他们的火炮仍旧无法有效打击敌人，因为敌人都躲在了山脊后面，不过舰载轰炸机瞄准了有炮弹和机枪闪光的地方，在水上侦察机的帮助下，舰炮也开始有效地确定射程。6月16日早上，激烈的战斗沿着岛屿边缘持续着。美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2 500人。史密斯要求调动所有可用的援兵，并提出无限期推迟原定于6月18日对关岛的进攻。

进攻塞班岛 1944年6月15日



史密斯催促师长和营长继续向岛内前进，但是过了沙滩之后地形复杂，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难以行进，也几乎没有合适的小径能让步兵快速移动。6月16日下午，第27师大部已经登陆。史密斯打算让士兵从相对好走的地形前进，到达小岛的东南部，在那里他们可以占领阿斯里托机场。

6月16日，斋藤义次决定派出后备队，对第2陆战师的北翼，也就是美军登陆部队的最北端展开夜袭。日军没有刻意隐藏这一企图。在离海岸不远的舰艇上，水手们看到日军部队在加拉潘集合，并且通过“游行、爱国演说和挥舞国旗”来鼓舞士气。^[16]晚上8点，约40辆轻型坦克和2队步兵顺着沿岸公路向南部前进。近岸舰艇很容易跟踪他们。不断发射的照明弹让这支队伍清晰可见。当坦克经过一处无掩蔽的地点时，舰炮瞄准了坦克，摧毁了大概20辆。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和75毫米榴弹炮对日军进行攻击，随后又发生了一场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尤其是日军。次日凌晨，日军集合之后，多次尝试进攻，但是海军陆战队稳稳地守住了据点，并用野战炮、步兵反坦克武器和火箭炮摧毁了剩余的坦克。

医务兵在海滩上设立医务站治疗伤员。但是要掩护他们，让他们不受迫击炮的持续攻击是不可能的。二等兵理查德·金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恐怖场面：“整个海滩上躺满了伤亡的士兵。也许你们会觉得这很残忍，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迫击炮炮弹直接砸在人头上，人的身体被炸碎。飞来的子弹和珊瑚碎片把人脸炸开。场面太恐怖了，我永远都无法忘记这片海滩有多可怕，这是地狱。整夜都在下雨，淤泥漫过了脚踝。”^[17]

斋藤义次的全力反击失败后，战场的主动权就转移到了进攻方手里。6月17日，海军陆战队继续向岛内推进，夺取了许多炮位，正是这些大炮让他们在三天来吃尽了苦头。第4陆战师以及第27师的士兵突破了南部防线，向麦吉森湾（Magicienne Bay）前进，将岛屿一分为二，切断了岛屿南部剩余的日军与大部队的联系。6月18日，美军占领了阿斯里托机场。第4陆战师转而向北攻击，开始将剩余的日军驱逐至岛屿北部。

6月18日上午10点，史密斯上岸，在嘉兰卡诺亚的废墟上建立了第5两栖军指挥部。这座城镇中最大的炼糖厂现在已经是一片硝烟弥漫的废墟，只有那根黑色的大烟囱不知为何还耸立着。有轨电车零星地停在轨

道上。日本军队的抵抗力正在减弱，至少阵地后面山脊上的日军是如此；但是，其他日军都撤向了岛屿北部。史密斯站在岸上，看着海上的舰队，意识到舰队的规模比之前小了很多。斯普鲁恩斯预计在马里亚纳群岛西部会有一场大型的舰队决战，于是派出了大多数军舰，其中包括两支巡洋舰分队和几支驱逐舰分队，与米彻尔和第58特混舰队会合。为了避免空袭带来的损失，运输舰已经向东撤退。

史密斯知道，他们必须截击并摧毁敌人的舰队；他也知道，哪怕是消失在了地平线的另一边，美国的军舰也一直保护着他所占领的滩头阵地。但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停在海岸附近，是对敌人心理的施压。史密斯坦率地告诉参谋，他担心舰队的突然消失，会让敌人的地面部队士气猛增。

第一机动舰队在吉马拉斯海峡停靠，装载了10 800吨燃油，然后穿过米沙鄢海，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位于吕宋岛和萨马岛之间）。6月15日，夜幕降临，这支庞大的舰队渐渐驶入菲律宾海。

小泽正确地判断出，自从他离开塔威塔威岛，美军潜艇一直在跟踪他。他侦听到了加密的无线电信号，似乎是在向珍珠港报告他的行踪。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部海岸的山峰上有大量的烽火，那里的亲美游击队会定期向美军报告日本舰队的动向。宇垣所率领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已经停止执行比亚克岛的任务，向北驶过哈马黑拉岛，一直都有敌人的长程轰炸机跟随。日本舰队无法实现对美军的突袭。

燃料不足是日本舰队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配备了7艘宝贵的供油舰，第一机动舰队才得以航行这样长的距离。它们装满了婆罗洲产的原油，这种石油不仅降低了舰艇锅炉的性能，而且挥发性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即便有这么多制约因素，小泽还是设法出色地解决了供油问题；但是，要取得什么出人意料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他可以让航空母舰进入马里亚纳群岛的空袭范围内，但是战役一结束，舰队就必须立刻撤退到濑户内海。

6月16日，宇垣的军舰与小泽的舰队相遇。加油过程持续了一整晚。装满油后，舰队开始向东行驶。第一机动舰队的官兵预感到他们将要创造历史。“这次行动对帝国的命运有着巨大影响，”小泽对舰队表示，“希望所有人都能尽最大的努力，取得我们在对马海战中那样辉煌的战果。”[\[18\]](#)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后半部分则只是他的愿望，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根据战后讯问和宇垣的日记，高级指挥官们当时对于舰队的备战情况无疑非常担忧，此外，飞行员数量也大大少于对手。他们寄希望于本方还算明显的战术优势。战时的日本飞机制造业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新一代舰载轰炸机的飞行距离比美国的对应机型能多出约200英里。由于日本依旧控制着关岛和其他岛屿上的机场，因此（理论上说）他们的舰载机可以在攻击美军舰队后，飞回机场补充燃料和弹药，然后对美军实行第二次打击，再返回航空母舰。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那么，小泽军队利用这种“穿梭轰炸”的战术，可以在保证本方航空母舰位于敌方攻击范围之外的前提下，对敌人进行两次打击。这一次，日方对于美军舰队的规模和位置了如指掌，所以，他们不会再遭到中途岛那样的突袭。从东边刮来的信风为日军制造了有利条件，因为美军不得不向东行驶，才能让舰载机起飞。处于下风方向的位置优势可以让小泽掌控作战时机，同时也可以严重地制约美军向西追击的能力。特纳率领的两栖作战舰队仍旧被牵制在塞班岛的滩头堡，失去了战术机动性。马里亚纳群岛上的陆基航空部队或许还有能力向美军舰队复仇，至少小泽希望如此——他显然还不知道角田的航空部队已经被重创，这也许是因为角田不肯承认此事。目前小泽知道的情况是，角田的航空部队已经和美军舰队及其舰载航空部队激战一周，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他以为，关岛和罗塔岛上的机场已经按照计划准备好接收和维护他们的舰载机了。

第一机动舰队除了在物资上无法与第5舰队媲美，从其他所有方面而言都是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这支舰队拥有日本海军组建过的最

庞大的舰载航空部队，其规模比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大出约50%。“大凤号”的飞行甲板配有装甲，还增加了防雷隔舱，因此被认为是最坚不可摧的航空母舰，在双方舰队中都是最出色的。庞然大物“大和号”和“武藏号”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艘水面舰艇。日本普通士兵似乎士气高涨。奥宫正武记录说，许多同僚军官都认为日军必胜：“我们的飞行员无比确信，他们将彻底击溃进攻的美国舰队。”^[19]宇垣从舰桥上看到本方的大型舰队后，在日记中写道：“拥有如此强大的舰队，我们难道会赢不了这次战役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20]

如往常一样，斯普鲁恩斯将军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艏楼附近来回踱步了几个小时，通常由第5舰队的情报官吉尔·斯洛宁陪着。从日军离开塔威塔威岛时起，美军就掌握着日本舰队的行踪；6月15日，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员报告“一大群航空母舰和战列舰”正在经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几个小时后，“飞鱼号”潜艇发现了敌军的一支大规模特混舰队，其中包括了“至少3艘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以及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21]而不久之后，在其南边很远处的“海马号”潜艇也报告称有一大群敌军舰艇正向北行驶，目前正位于苏里高海峡以东200英里左右的位置。这正是宇垣所率领的水面舰艇编队。

斯普鲁恩斯从埃尼威托克召来了一支配备雷达的PBM长程水上飞机中队。这支中队将向西飞行，远距离搜索、定位日本舰队。日军这两支相隔很远的特混舰队很可能正要前往某处会合，但是美军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斯普鲁恩斯警觉地意识到，敌军可能要对塞班岛附近的两栖舰队展开迂回攻击。分散兵力，然后从侧翼进攻，这是日本海军在此前多次交战中惯用的策略。

6月16日清晨，“棘鳍号”潜艇在第一次战斗巡逻中找到了几艘此前美军没有发现的油船和补给船。当日晚上9时15分，在距离塞班岛西南方向800英里左右的区域，“棘鳍号”的雷达侦察到有许多大型船只正以19节的速度向东行驶。赫尔曼·J.科斯勒艇长通过无线电向珍珠港的洛克伍德将军发送了敌情报告：“出现了15艘甚至更多的大型战舰。”^[22]

几个小时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接收到这一信息，穆尔叫醒了熟睡中的斯普鲁恩斯。在审阅了过去24小时内收到的所有敌情报告后，他们认为，敌军舰队是刻意在美军航空母舰打击范围之外巡弋。斯普鲁恩斯认为，小泽只是在试探，也许是想把美国舰队引到西边去。日本舰队一离开塔威塔威岛的锚地，斯普鲁恩斯就推测敌人会直扑过来，展开一场激烈的水面决战。“事实证明，我们又想错了，”他对尼米兹说，“他们的态度没有变，仍旧愿意拿舰队冒险。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变了，因为他们又开始使用航空母舰了。他们打算利用舰队为舰载机创造优势。他们没打算快速驶向塞班岛，倾尽全力与我们决一死战。”[\[23\]](#)

斯普鲁恩斯的底线是，在他完全掌握日本舰队每艘舰艇的精确位置之前，绝对不能让两栖舰队、运输舰和滩头堡处于无防卫的状态下。东风会一直影响第58特混舰队西进的能力，尽管如此，斯普鲁恩斯还是禁止航母离开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空袭范围。斯普鲁恩斯和他同事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仔细研究过对马海战，在该战役中，东乡平八郎大将一直在等待俄国舰队自己上门。他心里一直记着那种“等待”的策略，后来他写道：“我们的境况与当时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双方都投入了可以进行远距离打击的航空母舰。”[\[24\]](#)他也打算等待，让小泽往东边来。他从小笠原群岛召回了两支特混大队（由克拉克和哈里尔指挥）。米彻尔请求继续担任第5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得到了斯普鲁恩斯的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斯普鲁恩斯将“在必要时发布总命令”。[\[25\]](#)同时，斯普鲁恩斯还要求米彻尔提前告知他作战计划。航空母舰牢牢地掌控在斯普鲁恩斯手里。

6月17日，克拉克带着特混大队向南前进时，派出远距离的侦察机向西南方向搜索，但是未发现敌军。考虑到日本舰队也许就在飞机最大搜索半径350英里之外的不远处，克拉克认为应该趁夜间快速向西行驶，让舰队横插在小泽和日本本土之间。克拉克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向哈里尔提出了这一冒险的作战计划，但是遭到了坚定的回绝。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第58特混舰队。克

拉克考虑过率领着第1特混大队孤身前行，但是他意识到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我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到了某个风大的地方，头顶上盘旋着许多日军飞机，我却无法把它们都击落。”^[26]克拉克和哈里尔都返回了南部，并于6月18日中午与米彻尔会合。

小泽将舰队分为两支大型编队。前卫编队包括第三航空战队和宇垣指挥的第一战列舰分队，位于主力编队前方（东）约100英里处，由栗田健男中将指挥。后卫编队被分为两支航母战队，其中第一航空战队实力最为强大，拥有第一机动舰队大约一半的空中力量，包括“大风号”、“翔鹤号”和“瑞鹤号”。小泽从旗舰“大风号”上直接指挥该战队。

6月18日早上，收到“棘鳍号”的最新敌情报告后，米彻尔和参谋开始从小泽的立场考虑一切可能性。小泽好像正面临燃油不足的情况。他可能会试着利用舰载机航程较长的优势，从西边300英里外的地方派大量舰载机对美国舰队展开攻击。因此，他可能将向东行驶，并且在当天傍晚时分或是19日黎明前让飞机起飞。不久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些推断是正确的。（米彻尔和参谋还考虑到，小泽可能会派遣水面部队打头阵，展开夜间袭击，但是这一点，他们不是特别肯定。）为了接近敌人，并让第58特混舰队能够利用持续不断的东风，米彻尔请求斯普鲁恩斯批准航空母舰往西行驶。斯普鲁恩斯仍在担心特纳的两栖舰队会遭到侧翼攻击，否定了米彻尔的提议。第5舰队的作战日志记载，斯普鲁恩斯“通知第58特混舰队，在他看来，敌军将主要从西方进攻，但是也有可能分散兵力，派一支部队从西南方向攻击，而牵制性进攻则可能从任何一侧发起，此外日本也可能派出援兵”。^[27]如果早上的搜索行动无果，斯普鲁恩斯建议米彻尔对关岛和罗塔岛的机场再展开一轮轰炸。

这些指令让米彻尔进退维谷。与舰队中其他所有飞行员一样，米彻尔很想攻击敌军的航空母舰。让他感到不安的是，第58特混舰队可能要面对一次大规模的航母舰载机的空袭，却没有任何回击的能力。斯普鲁恩斯提出的空袭关岛和罗塔岛的建议有些不明智，因为上一周的作战几

乎耗尽了所有执行这种任务所需的航空弹药（接触引信对地炸弹）；目前储备充足的是穿甲炸弹，这种炸弹是专门用来炸船的。米彻尔展开了搜索，但他没指望能在飞机的有限侦察范围内搜索到敌军的船舰。它们果然没有搜索到，不过有几次，美国侦察机在侦察范围的边缘发现了日军的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在搜索范围的尽头击落了一架爱知水上飞机（“杰克”）。下午的搜索（在195度和315度之间，最远325英里）没有任何发现。很明显，小泽一直在与美国军队保持距离。这种情况与米彻尔的设想一致：小泽将在19日凌晨派出飞机，同时让本方航母小心翼翼地处于美军打击范围之外。

米彻尔尊重斯普鲁恩斯，也不打算缠着总指挥，让他更改决定。特混大队的司令和他们的航空参谋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更加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对“黑鞋族”上司及其缩手缩脚的作风的蔑视。那天早上，“乔克”克拉克从北方的突袭行动中返回，在得知斯普鲁恩斯命令第58特混舰队逗留在塞班岛滩头堡附近后，他大吃一惊。所谓的日军迂回战术不过是个空想，他坚持说——即便是再往西250英里，特混舰队也完全能够保护塞班岛，“通过我们的雷达、侦察机和潜艇，我们可以得知日本舰队的一举一动”。^[28]与其他大多数航空母舰指挥官一样，克拉克也将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归因于“黑鞋族”指挥官的一个典型特点，那就是不了解“快速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29]特德·谢尔曼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航母指挥官，他写道，斯普鲁恩斯一辈子都是水面舰艇的指挥官，他“还在从水面舰只的角度思考问题。……空战中是没有‘迂回’的”。^[30]

毫无疑问，在“征粮者”行动中，斯普鲁恩斯采取了保守的战术。他当时就承认这一点，事后也表示自己不曾后悔。他比舰队里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尼米兹心里在想什么，什么对他来说更重要。他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掩护滩头堡和运输舰队。特纳已经警告过他，美军只要在6月18日和19日撤走运输舰，就会让岸上的部队面临危险。塞班岛上有7万美国士兵，他们正在进行惨烈程度超出预料的血战——已经有1 500人阵亡，4 000多人受伤，而伤亡人数仍在快速攀升。霍兰·史密斯已经说

过，强大的舰队守在岸边可以给敌军的士气带来沉重的打击。他的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需要通过滩头堡源源不断地获取补给、援兵和弹药。他需要把不断增多的伤员运出战场。每天太阳一落山，日军就会对近岸舰队展开空袭。史密斯和特纳知道第58特混舰队必须与敌军舰队作战，他们也接受这一点，但是他们也有理由期望舰队保护登陆作战队伍，让他们不受到任何意外的袭击。海军部曾向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做出庄严的承诺，而军种之间的纷争正处于紧要关头。

6月18日夜幕降临时，发自珍珠港的急件带来消息，说在敌人可能出现的位置侦听到了一条无线电消息。（小泽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利用无线电与马里亚纳群岛的航空基地进行了联络。）测向设备已经确定了无线电发出的位置，在美国舰队西南方向355英里的一片区域内。这与“棘鳍号”早些时候提供的敌情报告一致。在“列克星敦号”的编队指挥官作战控制中心看来，这条消息似乎可以结束争执了，至少可以为采取更主动的进攻战术提供足够的证据。晚上11时30分左右，米彻尔提出了最后一次请求。他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告诉“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斯普鲁恩斯，他打算在凌晨1时30分向西航行，目的是让第58特混舰队做好准备，在次日凌晨展开对小泽舰队的空袭。这样，航空母舰在6月19日一整天都可以向东行驶，一直处于逆风航行的状态，为持续的空中作战做好准备。

斯普鲁恩斯和穆尔以及其他参谋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来商讨当前的形势以及米彻尔的提议。“刺鱼号”潜艇发来了一条信息，但是传输受阻，信息不全，于是局面变得更混乱了。这则无线电消息是从更偏东和偏南的地方发来的，可能是敌情报告，被正要进行侧面攻击的敌军给干扰了，这支敌军也许正在前往塞班岛，展开他们所担心的迂回攻击。斯普鲁恩斯还进一步推测，测向设备所做的定位只是一个估计，也许与实际位置相距甚远。被截获的无线电消息可能是从任何一艘日本舰船上发出的，并不一定是主力舰队；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圈套，是日方为了引诱美军而特意派一艘驱逐舰发出的。所以，测向定位什么都证明不了。凌晨0时30分，斯普鲁恩斯回复米彻尔说：“你提出的战术调整并不可取。

.....其他敌军航母舰队仍旧有可能会采用迂回战术，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风险。”^[31]斯普鲁恩斯的舰队日志以略带辩解的态度记录道：“保障塞班岛以及附近的我方军队和运输舰的安全，防御敌军快速机动舰队可能采取的迂回战术，是至关重要的。”^[32]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告诫说，占有明显优势的海军指挥官一定要追赶、进攻并毁灭敌人，“如果他有得分的希望，却失掉一分，这是找什么借口都不能原谅的”。^[33]霍拉肖·纳尔逊有个同僚曾经评论说，英国在最近一次战斗中表现得“相当好”，对此，纳尔逊做出了著名的回应：“如果敌人有11艘舰艇，我们本有能力全部摧毁，却只摧毁了10艘，我认为这算不得相当好。”^[34]在整个（短暂的）航母作战史上，先发制人都是基本原则。斯普鲁恩斯保守的战术牢牢地限制住了第58特混舰队，这无异于做出了一个经过无情权衡的选择：让小泽能够先发制人。这甚至可以说是让小泽先发制**胜**，因为美军无法确定第58特混舰队能否向西航行足够远的距离以进行反击。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可谓前所未见，而且似乎违背了最基本的作战原则。飞行员们对此难以置信。这位中途岛的胜利者是不是昏了头了？还是他的神经出了问题？

“列克星敦号”收到答复的时候，舰上的人很失望，还表示出十足的厌恶。杜鲁门·赫丁说，米彻尔“非常沮丧”。赫丁和伯克一致同意他们要将永远纪念6月19日这一天，到时候他们一起“痛饮啤酒并痛哭”。^[35]“约克城号”的一名军官在日记中抱怨道：“戴着勋章的将军胆怯了——不去开战——没胆量。.....今晚，斯普鲁恩斯给第58特混舰队所有的海军官兵都戴上了懦夫的徽章。我希望历史学家能够对他大加挞伐。”^[36]立即有人建议米彻尔反驳这一决定，详细地指出向西行驶的所有好处，以及停留在塞班岛可能面临的危险，但是，米彻尔否定了这些提议，坚定地支持总司令的决定。第58特混舰队的作战参谋是传奇战斗机飞行员吉米·萨奇，他曾经发明让爬升速度缓慢的F4F野猫式战斗机打败零式战斗机的“萨奇穿插”战术。“我非常着急，跟阿利·伯克说，不

主动出击，我们就永远无法追上他们。”^[37]参谋拟定了多份米彻尔可以发给斯普鲁恩斯的消息草稿，希望能够挽回局面。据萨奇说，他和伯克甚至建议特混舰队司令以辞职相威胁。米彻尔在舰桥上听到了下属的窃窃私语，他似乎对此非常生气，当他听到第3特混大队的“黑杰克”约翰·里夫斯发出无线电，敦促舰队向西行进时，米彻尔用极其罕见的愤怒言辞指责了他：“你的提议是好的，但是令人生气。我无意把这个建议提交给高层。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自然要比我们全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待在这里，等待关岛登陆日，并且协助地面部队。……我希望，你并不是要我们放弃首要任务。”^[38]

卡尔·穆尔已经猜到，斯普鲁恩斯的决定将会导致“珍珠港和华盛顿的旁观者乱出主意，他们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也不会去查明情况”。^[39]他说的话没错。胡思乱想其实立刻就出现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参谋一直关注着战况，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标记着敌军的位置。一直想替代斯普鲁恩斯位置的约翰·托尔斯督促尼米兹下令让斯普鲁恩斯向西出击。据一位参谋人员说，尼米兹拒绝了，但并不是因为他不同意托尔斯的看法，而是因为“一旦下令，就意味着我开始在岸上干预舰队的战术指挥”。^[40]

斯普鲁恩斯依旧是老脾气，从不会怀疑自己。在下达命令之后，他就去睡觉了。但是1/4英里之外的“列克星敦号”上，米彻尔和他的参谋却没有休息。他们在准备次日的作战计划。因为不需要派出轰炸机，他们会让轰炸机停在机库中，或者派它们去攻击关岛和罗塔岛。飞行甲板要保持畅通，随时保证战斗机起飞。“骰子已经掷出，”伯克说，“我们知道我们将要在早上经历一场恶战。我们也知道，我们够不着对手。我们还知道，他们够得着我们。”^[41]

6月19日黎明时分，持续的微风从东方刮来，海面风平浪静，这又是一个好天气。晴朗的蓝天并不很受欢迎，因为这样的天空无法在日军

战机攻击的时候为舰队提供掩护。凌晨3点，战斗警报就拉响了，舰队完全做好了作战准备——舱门已经关闭，护窗板拉下保护舷窗，救生衣和钢盔也拿了出来，供全体船员使用。

第58特混舰队此时位于塞班岛西南方向约150英里处。三支特混大队（分别由里夫斯、蒙哥马利和克拉克指挥）自北向南排成一行。威利斯·李所率领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第7特混大队）位于往西35英里处，离敌人较近，作为防空屏障。哈里尔率领的第4特混大队是四支特混大队中实力最弱的，紧挨着李的部队，位于其北边。“南达科他号”上的军官保罗·巴克斯回忆道，战列舰的士兵得知被安排在打头阵的位置，都激动不已；水手们迫不及待地观察着西面的地平线，希望能够看到日本舰队。他们都在期待一场海上炮火对决，这种期待“极大地提升了舰艇上的士气。……也许，小日本想尝一尝我们这几艘新型战列舰的滋味，就当是给他们换换花样，我们要追着他们打。我们把国旗都挂在了前桅平台上”。[\[42\]](#)

侦察机始终没有任何发现。凌晨2点从“企业号”上起飞的配备雷达的飞机一无所获。清晨5时30分，美军开始了更大范围的空中搜索，覆盖了罗盘几乎一半的范围，航程也增加到了325英里，但仍旧没有发现。海军陆战队的远程水上飞机自塞班岛附近海域起飞，在凌晨1时15分发现了雷达信号，也许来自栗田健男所率领的先头部队。该报告将日军舰队定位于方位258度，330英里外。但是，直到上午8时50分，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才收到这一情报，此时的距离已经远远超出了空袭的范围。

第一批执行战斗空中巡逻和反潜巡逻的飞机升空后，特混舰队掉头向西行驶，为下一轮空中作业准备足够的行船空间。敌军的几个“探子”从东南方闯入防御圈，被击落或是被赶跑了。防空火力摧毁了一架孤零零的零式战斗机。执行战斗空中巡逻的战斗机接到命令，爬升到2.5万英尺。

早上7时30分，雷达操作员注意到附近的关岛上空出现一串雷达信

号。从“贝劳伍德号”上起飞的“地狱猫”战斗机赶到奥罗特机场上空，冲进了一群日军飞机当中。很快，来自“约克城号”、“大黄蜂号”和“卡伯特号”的战斗机就赶来支援。空战持续了一个小时，大约30架日本飞机着火坠落，美军只损失了一架F6F。关岛上空的这种大屠杀在当天又出现了几次，被击落的飞机都是从小泽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准备到奥罗特机场寻求庇护的。

上午10时5分，“亚拉巴马号”的雷达屏幕上显示西方125英里、海拔2.4万英尺或更高的区域有许多可疑的飞机。这是小泽第一轮空袭的先导部队，这些飞机按照预定的时间准确到达了作战位置。阿利·伯克代表米彻尔向所有的航空母舰发出指令，派所有停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地狱猫”战斗机起飞——“于是，我们所有的战斗机陆续起飞，全体出动。”^[43]战斗机指挥官召回了关岛上空的所有飞机，以保护特混舰队，他发出的指令只有两个字：“来啊！”

整个特混舰队的轰炸机和鱼雷机都起飞了，根据指示向东飞行。因为对目前的局面而言，它们都是累赘，如果停留在甲板上，只会堵塞甲板、机库和升降机。它们要在马里亚纳群岛南部上空盘旋，远离正在逼近的敌军飞机，同时避免干扰雷达或是被美军误判为敌机。

由于要尽快起飞，“地狱猫”的飞行员并没有为寻找各自的战斗机而浪费时间。每个人都进入了面前第一个空出来的驾驶舱，并依次等待起飞信号。由于不必等待形成编队，这些战斗机升空后只要掉头向西爬升即可。第25战斗机中队（属于“考彭斯号”）的唐·麦金利上尉并不记得当时收到过任何航向指示或是海拔指示。他知道日军的飞机正在从西边飞来，就朝那个方向全速飞了过去。亚历克斯·弗拉丘从“列克星敦号”上起飞后，按照战斗机指挥官的指示，全力向250度方位爬升。大幅度爬升考验了F6F普惠R-2800发动机的极限能力，一些型号较老或是损耗严重的飞机落在了后面。弗拉丘的引擎把机油甩到了挡风玻璃上，阻碍了他的视线。他所在的机组编队混乱，他也无法与自己的中队取得联系，因为无线电被飞行员的聊天占满了。（在战后提交的书面总结中，

另一名中队长抱怨道：“有一些中队始终在‘霸占天空’，他们竟然在聊起飞之前就该讲清楚并解决的问题。”）[\[44\]](#)

弗拉丘勉强从满是油污的挡风玻璃的空隙中看出去，发现对面出现了许多敌机，大概在他下方几千英尺处。当天的视野出奇地好——这种罕见的天气状况使得海拔2万英尺甚至更低的地方可以形成凝结尾流。在空战最激烈的时刻，天空中满是互相交织的白色的网。“我们能看到尾迹的前端有一个微小的黑点，”“列克星敦号”的大队长欧内斯特·斯诺登说，“就像我们在战前见到过的空中文字一样。”[\[45\]](#)

麦金利在7 500英尺的高空爬升时，发现了一个“吉尔”鱼雷机的三机编队在他下方大约1 500英尺处，棕灰色的机身和机翼上印着红色的太阳旗。他突然横转，绕到它们后方。当第一架飞机冲进他的视野，他快速地发射了一串子弹。那架飞机开始小角度俯冲，尾部拖着烟。麦金利继续追赶第二架“吉尔”，一直追到海平面上方。在他赶上那架飞机并击落它之前，两架飞机都接近了李指挥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特混大队的外缘，周围的空中布满了高射炮炮火。麦金利最后发射了一串子弹，然后迅速拉高，日军飞机则冲向海面爆炸了。

这第一轮共69架日军飞机都是从栗田健男率领的前卫编队的轻型航母上起飞的。在长途飞行期间，有五六架飞机直接坠海。还有些飞机路线偏南，来到了关岛的友军机场。那些保持航向，前去攻击美国舰队的飞机则遭到了一群“地狱猫”战斗机的攻击，大多都在交战开始的最初几分钟内就着火坠毁。少数入侵者为了速度而降低了高度，并对李的舰队进行鱼雷攻击和俯冲轰炸。一架飞机将一枚250千克的炸弹投在了“南达科他号”上，对船体造成的损伤不大，但是导致50名船员死伤。还有一架飞机坠毁时撞上“印第安纳号”的一侧，只造成了轻微的损伤。“明尼阿波利斯号”巡洋舰报告了一次近失弹造成的轻微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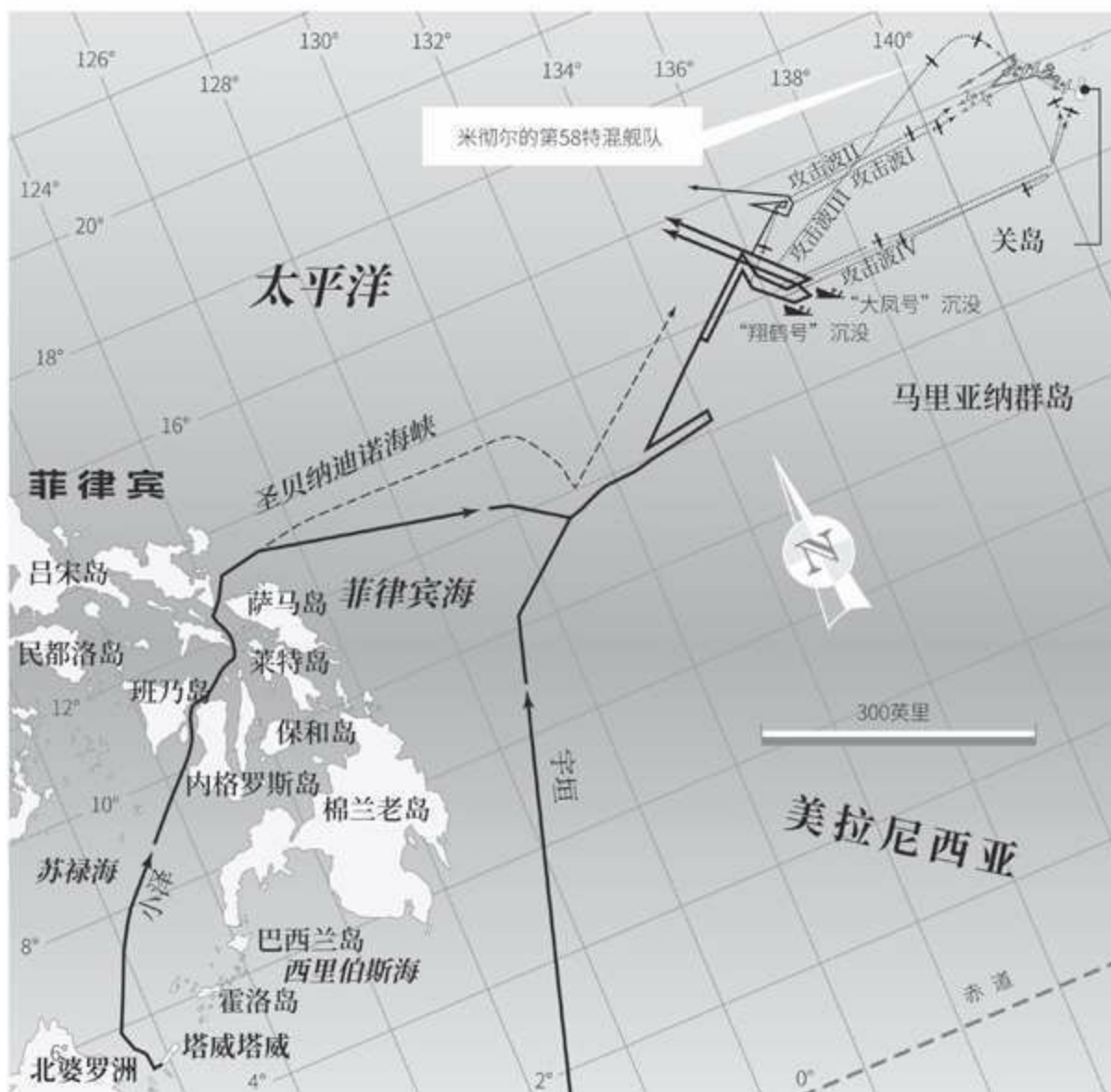
日记作家、水手詹姆斯·费伊在南太平洋目睹了许多海军作战行动，但他还从未近距离看到过空战。眼前的奇观让他充满惊叹和敬畏：“日本飞机在我们周围坠落，天空中到处都是炮弹在爆炸，处处弥

漫着浓重的烟雾。……炸弹落在非常靠近舰船的地方，可以看到大片水花。不时有日本飞机坠海。”^[46]李的防线完美地发挥了斯普鲁恩斯交给它的任务。它提供了一个预警雷达机制，转移了空袭的注意力，首当其冲，另外它用高射炮摧毁了大部分敌机。第一拨攻击者中没有一架进入攻击美国航母的范围。

在狭窄而昏暗的战斗情报中心，大家信心倍增。自从1942年相对黑暗的年代以来，雷达和战斗机指挥引导的结合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早上的拦截几乎完美无瑕。在大多数航母上，战斗情报中心都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大型无窗隔间里，位于飞行甲板中部的下一层。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会通过扬声器传送到房间里。一块透明有机玻璃的纵向屏幕放在一个角落里。该船的位置被固定在屏幕中心，一系列同心圆用于测量各个方向的距离。一排雷达屏幕位于大屏幕的一侧。战斗机指挥官及其助手坐在对面的桌子上，面向玻璃屏幕。当雷达操作员大声读数时，拿着油性铅笔的水手们用红色和白色的“X”在屏幕上标记。红色的X表示可疑飞机，或没有经过敌我识别的飞机，白色的X代表美军飞机。雷达每扫描一次，水手都会用湿布擦干净屏幕，画上新的X。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红色标记稳步向屏幕中心靠近，白色的标记则向外移动，表示美军飞机前去拦截。战斗情报中心的人员看着红白标记越来越近，直到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确认屏幕标记的重合：“发现目标！”

“打火鸡”

菲律宾海海战 1944年6月19日



在空战中，雷达屏幕能提供的有用数据很少。红色和白色的X会挤在屏幕的同一个角落。无线电里充斥着混乱的交谈。然而，在6月19日，无线电里混乱的声音无疑表明美军正在成批地屠戮他们的敌人。雷达每扫描一次，红色标记都会变少。一两个红色的X可能会继续朝屏幕的中心移动，白色的X紧随其后。每次都以屏幕上红色的X全部消失而

结束。水手会把敌机被“击落”的时间和数量记录下来。“考彭斯号”的萨姆·萨默斯在6月19日下午进入战斗情报中心瞥了一眼，注意到“从仪表盘中心附近位置出发的一系列白色X标记形成了一条条射线，这些射线的末端是一英尺长的擦除的红色痕迹”。[\[47\]](#)

小泽将军在当日派出的第二支大型混编空袭队由35架俯冲轰炸机、27架鱼雷机和48架战斗机组成，在上午8点之后不久就离开了第一航空战队。但这是一次命运多舛的飞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和困难。8架飞机被迫立即掉头回去，要么是因为引擎不正常，要么是因为无法收回起落架。当向东前进的飞机驶过栗田健男的前卫编队时，紧张不安的高射炮手误认为它们是敌军并开火。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8架受损并被迫撤回去。由于不同的飞机以不同的速度飞行，这些中队逐渐分散成较小的单位，许多飞行员与队长失去了联系；他们一直试图跟上队长，因为他们缺乏水上导航的经验。

阿部善次少佐是其中为数不多的老兵之一，他驾驶的是旧式爱知D3A“瓦尔”俯冲轰炸机。这是一次长途飞行，他感到身心俱疲。“长期疲劳导致我的身体状况异常糟糕，”他回忆说，“我感觉这架飞机是在被别人驾驶。”每次环顾四周，他都发现编队中剩下的飞机又少了一些。阿部认为，那些飞行员不是掉头飞走了，就是“因精神错乱冲进了大海”。[\[48\]](#)

上午11时7分，美军雷达屏幕上出现了这一轮攻击中的第一批敌机，它们是从西南方接近的。第一批升空迎击入侵者的飞机中包括了戴维·麦克坎贝尔中校率领的十几架从“埃塞克斯号”上起飞的“地狱猫”战斗机。能见度一直很好，麦克坎贝尔可以轻易地发现下方几千英尺处的凝结尾迹。这些负责防御的飞机从空中小角度俯冲，向入侵者发动了猛攻。这次短暂的交火可能是空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15分钟内，大约60架日本飞机被击落。

“列克星敦号”的亚历克斯·弗拉丘在拦截了第一批敌军之后，飞机仍然有足够的燃料和弹药，于是他就根据战斗机指挥官的指示，飞到了位于特混舰队以西35英里的地方。“我仔细地搜寻着，突然发现我下面2000英尺处出现了一大片敌机，至少有50架，他们在我的左侧，正在朝我靠近，”他回忆说，“我的肾上腺素猛地上升。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可能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毕生梦寐以求的机会。’”^[49]弗拉丘没有看到任何零式战斗机在空中为轰炸机和鱼雷机护航。他朝一架“朱蒂”俯冲轰炸机倾斜着俯冲过去，躲开了机枪手射出的子弹，然后进行了一次短促的射击。目标翻了个身，朝着大海俯冲下去，火焰从机翼油箱中冒出。弗拉丘前方又出现了两架飞机，他降低了飞行高度以提升速度，死死咬住它们，然后从距离目标约1000码的地方向两架飞机各打了一次连发。像往常一样，几发0.50英寸的子弹就足以击落轻型的日本战机。那两架飞机拖着火焰和浓烟坠向了蓝色的海面。

弗拉丘此刻变成了向东飞行。他跟着冲向美国航空母舰的敌方轰炸机，又击毁了两架。当他出现在最外围的警戒舰艇的上空时，防空火力让他的F6F也感到震动。在7分钟内，他击落了5架日本飞机，他本可以让高射炮干掉剩余的敌机，但他又盯上了第6架飞机，而且不想放过它。他赶上这架飞机，对准了它，扣动扳机，结果让他感到惊讶。“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这架飞机在我面前炸得粉碎。我一定是正好打在了他的炸弹上。我以前看到过飞机爆炸，但从来没有像这样炸的！我猛地拉升，避开飞溅的碎片，然后通过无线电报告说：‘第六架粉碎！’”^[50]

阿部善次的俯冲轰炸机是少数闯过美军战斗机的防御网并冲入美国舰队中心地带的日本战机之一。在1.3万英尺高的地方，他看见前方、下方和发动机罩左侧的海面上有白色的尾流。他知道在后方和上方有一群“地狱猫”战斗机在跟着。他的僚机不见了踪影。他已经没有时间执行完美的俯冲轰炸，于是降低机头，朝距离他最近的航母飞了过去。这架飞机飞入高射炮火中，摇摇晃晃地颤抖着。他在“胡蜂号”上空投下了炸弹。炸弹没有击中目标，但是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引爆了，造成了轻微的

损伤，还有两名船员受伤。神奇的是，阿部善次竟然逃过了重重追击，成功逃脱并返回日本特混舰队，在“隼鹰号”航空母舰上降落。他是当天唯一一名朝美国航母投下炸弹后还能活着回来的日本飞行员。

四架日本鱼雷机来到了“企业号”和“普林斯顿号”上方，但是都被美军的防空炮火击落了。“至少有一次，”其中一艘大型航母舰桥上的上尉写道，“多架日本飞机几乎被同时击落——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火球，当时尽管阳光很强烈，它们仍旧在天空中发出耀眼的红光，或是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径直冲向大海——被击落的飞机数量一时都数不过来。飞机俯冲和爬升的过程中留下的尾迹在天空中形成交错的白色美丽圆弧，能够停留几分钟之久。”[\[51\]](#)

亚历克斯·弗拉丘的油量快耗尽了，于是他进入了“列克星敦号”的着舰航线，并且顺利着舰。当他驾驶的“地狱猫”战斗机停稳在舰岛旁边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司令舰桥，然后举起戴着手套的双手，伸出了六根手指。几名战地记者（驻扎在“列克星敦号”上，因为这是米彻尔的旗舰）看到了这个动作，并撰文进行了报道，使弗拉丘戴手套的六根手指成了菲律宾海战役持久的标志性影像。

在派出了第二批攻击队后，小泽的旗舰遭到了美国潜艇“大青花鱼号”的袭击。该潜艇距离小泽的旗舰5 300码时，艇长J.W.布兰查德下令向“大风号”发射了6枚鱼雷，进行扇形攻击。当时小松幸男准尉刚刚驾驶一架飞机起飞，突然发现了正在驶来的鱼雷的尾流，异常敏捷而勇敢地做出了反应。他猛地转弯，朝着那条尾流的轨迹俯冲过去。飞机、飞行员和鱼雷在爆炸中同时消失了。另外有4枚鱼雷从船尾附近擦身而过，但是第6枚鱼雷击中了“大风号”船体的一个特别脆弱的部位，靠近航空油箱。发射鱼雷后“大青花鱼号”迅速下潜，经受了长时间的深水炸弹攻击，但是船员们听到了爆炸声，并正确地判断出至少有一枚鱼雷击中了目标。

“大风号”的船员最初有信心控制住损伤，小泽在攻击发生后也并未特别担心。日本这艘最新的航母在设计上可以承受一枚到多枚鱼雷打击，因此它应该没有危险。但是当受损的航空油箱散发出易燃气体，并充满了整个下层甲板，损管队的一名军官做出了致命的决定——通风换气。“大风号”的空气管道和鼓风机使得可燃气体在舰内弥散开来，一连串巨大的爆炸撕裂了全舰，装有护甲的飞行甲板也开始膨胀并最终爆裂，火焰从机库呼啸着冒出来。上午11点之后不久，小泽从舱房中取出了天皇的肖像，并将司令旗从这艘航母上移走。他先是换乘了“若月号”驱逐舰，后来又转移到“羽黑号”巡洋舰，最后登上“瑞鹤号”航母。

“大风号”显然已经无可救药，但是舰长仍旧犹豫着，没有命令船员弃船。那天晚上，6点钟过后不久，这艘烈火熊熊的巨舰最终沉入海中，同时带走了1 500多名船员的生命。“大风号”的首次战斗巡航就此终结。

“大青花鱼号”的姐妹舰艇“棘鳍号”一直在追踪日本舰队，已经连续一周准确地汇报了其动向。艇长赫尔曼·科斯勒的坚持终于获得回报，得到了近距离攻击“翔鹤号”的绝佳机会。正午前几分钟，他升起潜望镜，看到这艘日本航母赫然显现在附近的地平线上。他可以把这艘航母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它的“床垫弹簧”雷达，巨大的太阳旗，甚至还有驾驶舱里每个船员的面孔。“棘鳍号”在1 200码外发射了6枚鱼雷，其中有3枚击中，这艘日本航母立即开始从舰首处下沉。

“棘鳍号”紧急下潜，以躲避必然到来的深水炸弹攻击。海水灌进了潜艇的主进气系统，使其处于危险的超重状态。潜艇下潜的深度超过了测试深度100多英尺。在接近三个小时的磨难中，船员总共数到了106次深水炸弹攻击，其中半数距离他们很近。但“棘鳍号”还是逃脱了，只受到了一些表面伤。

“翔鹤号”的轮机舱迅速被海水淹没，航母上彻底断电。它在水里完全动不了了，无助地燃烧着。没有电力，消防队员无法给消防水龙加压。他们组成水桶传递队向火焰泼水，但是无济于事。下层甲板和机库

的爆炸开始将航母撕开。舰长下令弃船。下午2时10分，航母上的弹药库引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这艘巨大的航母向右倾覆，舰首从水中抬起，然后整艘航母滑进了海里。

在1941年12月参与袭击珍珠港的6艘航母中，“翔鹤号”是第5艘堕入深渊的。现在只剩下了“瑞鹤号”。

在两艘受到攻击的航母仍在为生存而战的时候，小泽派剩余的大多数战机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其中包括30架战斗机、46架零式战斗轰炸机和6架来自第二航空战队的鱼雷轰炸机。小泽当时还不知道，前两批攻击部队已经在空战中被消灭，而攻击者没有对任何美国舰艇造成严重伤害。如果他知道这些结果，他可能会犹豫是否要动用所有力量对美国舰队再进行一次攻击。

在离开日本航母后不久，攻击编队就分为三个彼此相隔很远的小分队。最大的分队偏离航线向北飞行，然后修改航线向南，从西北方接近美国舰队。快到下午1点的时候，美国的战斗机指挥官引导“地狱猫”战斗机对方位338度、距离70英里的可疑飞机进行拦截。所有的入侵者，大约47架飞机，在9分钟的混战中不是被赶走了，就是被击落了。美军注意到有几架敌机突然改变了方向，显然不愿意冒险进入防空火力网。下午2点刚过几分钟，在方位205度、距离100英里的位置，雷达探测到了另一群可疑飞机。外出的侦察机与新来的敌机发生了小规模战斗，随后无处不在的有雷达引导的F6F战斗机大批赶到增援。与先前的几批飞机一样，少数几架日本飞机穿过“地狱猫”的防御网，斗志高昂地冲向美国特混舰队的中心，然后在密集的防空炮火中化为灰烬。

最后一批飞机中还有一些向南飞去，它们根本没有找到美国舰队（也可能是为了躲避战斗），然后飞向关岛或罗塔岛的机场。它们也被雷达追踪到了。战斗机指挥官开始将“地狱猫”战斗机引导到这些岛上，当天的空中屠杀的高潮就此来临。来自“考彭斯号”航母的十几架F6F抵达奥罗特机场上空，当时约有40架日本飞机正在准备降落。来自“埃塞克斯号”航母的7架F6F和来自“大黄蜂号”航母的8架F6F会合起来，加入

了攻击。

在奥罗特半岛，美军飞机拥有无可超越的战术优势。日军的飞机正在准备着陆，处于低空低速状态。它们的燃油即将耗尽，别无选择，只能降落。经过一周的轰炸和扫射攻击后，奥罗特周围的大部分日本防空炮台都哑了火。跑道上坑坑洼洼的，满是弹坑。F6F追踪日本飞机，直到树梢高度。第2战斗机中队的“蜘蛛”W.B.韦布少尉也进入盘旋状态，好像打算着陆一样，让他的“地狱猫”绕到了3架日本飞机的后面。他的拇指扣住扳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3架敌机全部被击落。随后韦布往左转向，击落了另一架敌机，这架敌机上的日本飞行员设法逃离了驾驶舱并打开了降落伞。在转弯过程中，韦布的飞机高度降低。他拉起时，又看见一架日本飞机，于是迅速射出一串子弹，然后从爆炸的敌机碎片中钻了过去。到此时为止，他已经击落5架敌机了。这时，韦布发现一架零式战斗机正迎头飞过来。距离缩小到F6F的机枪的最佳射击距离1 000码时，他开火了。敌机从中间裂成两半。此时他的弹药已经不足，但是他仍然通过短促的连发击毁了另外两架轰炸机，然后脱离现场，返回到航母上。飞机上的照相枪记录下了韦布了不起的功绩。

奥罗特机场下午的空中屠杀摧毁了试图降落的49架飞机中的大约30架。约19架飞机设法成功地降落在这个坑坑洼洼的机场，但其中大多数没能再次飞起来。

随着航空大队不断向米彻尔报告战况，当天飞行员声称击落敌机的数量攀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即使其中有一贯的夸大和重复计算，第58特混舰队显然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大胜。从小泽的航母上起飞的373架飞机中，只有130架完好无损地返航。还有从关岛或罗塔岛起飞的50多架飞机被击落。美国方面仅损失了25架“地狱猫”，其中4架是由于操作事故造成的。^[52]日军和美军的飞机战损比例约为11：1。在第58特混舰队的待命室中，飞行员们已经开始庆祝了，好像他们已经赢得了整场战争。他们得到了“药用”白兰地，大家举杯庆祝。在“列克星敦号”上，一名欣喜若狂的战斗机飞行员说：“棒极了，这简直就像是以前

去林子里打火鸡。”^[53]大家经常重复这句话，然后“打火鸡”这个说法就流传了下来。历史学家会将这一天称作菲律宾海海战的第一天，但是对飞行员来说，这一天永远是“马里亚纳打火鸡”。

在当天长时间的空中作战过程中，15节的东风一直稳定地刮着，迫使美国舰队向东航行，朝着关岛的方向，逐渐远离敌人。^[54]此时，日本舰队处在反击范围之外很远的位置。斯普鲁恩斯知道有一两艘日本航母被鱼雷击中，但他还不知道它们都已经沉没了。它们很可能只是失去行动能力，仍然漂浮在海上，美军或许可以彻底击沉它们。考虑到这些因素，斯普鲁恩斯批准了米彻尔向西追击敌人的计划。

6月19日下午的情况非常混乱，小泽与联合舰队总司令之间的无线电信号断断续续。丰田副武已经下令暂时向西北方撤退。舰队将补充燃料，然后“与陆基航空队合作，前进并攻击敌方特混舰队”。^[55]

虽然他的航母舰队中只剩下102架战机，其中约40架在“瑞鹤号”上，但小泽认为那些失踪的飞机可能大多降落在了关岛上。他还认为，或者说是希望，美国的舰队和飞机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小泽依然错误地以为角田的陆基航空部队已经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特混舰队。极少数返航的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得四艘航母冒起黑烟”。^[56]

但是在日本本土水域停泊的丰田副武的旗舰“大淀号”上，联合舰队的参谋正在逐渐意识到日本失败的严重程度。必须赶紧让幸存的舰船转移到安全位置。晚上9点，丰田副武大将发出信号：“特混舰队要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撤退，并以其司令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57]

6月20日，美军的空中搜索没有发现小泽撤退的舰队的任何痕迹，直到下午3时42分，“企业号”的R.S.纳尔逊上尉驾驶的一架TBF“复仇者”通过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混乱不清的敌情报告。根据时间和距离估计，敌军舰队在西北方约270英里处。米彻尔向特混舰队发出信号：“所

有飞机起飞，可能要在晚上回收。”[\[58\]](#)

在待命室中，有人小声吹着口哨，飞行员正在研究图表，将数据填写在标图板上。满载燃料、炸弹和鱼雷的美国战机将在燃料允许的程度内飞到最大范围的边缘。下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所以他们会在夜幕降临后返回特混舰队。这是一个冒险的任务。只有极少数美军飞行员有能力在夜间着舰。很多人会不得不在海上迫降。但这是米彻尔最后一次打击小泽的机会，至少在这一轮战斗中是如此，因为第58特混舰队的驱逐舰没有足够的燃料再追赶敌人一天。他发出了命令：“甲板上的飞机起飞，准备第二批飞机。”杜鲁门·赫丁对此提出了异议，委婉地提到了距离和风险的问题，但米彻尔只回答说：“我明白，但还是要让甲板上的飞机起飞。”[\[59\]](#)

米彻尔说：“首要任务是击沉敌人的航空母舰。”待命室的黑板上写着四个字的指令，下面还画了线，以示强调：“击沉航母。”[\[60\]](#)

下午4时21分，第58特混舰队往东转向，朝驶离敌人的方向逆风前进，舰载机开始起飞。只花了11分钟，就有216架飞机升空：85架“地狱猫”，有些在高空掩护，有些则载有500磅的炸弹；54架“复仇者”，除了个别几架之外，绝大多数都挂载了炸弹，而不是沉重的空投鱼雷；51架寇蒂斯SB2C“地狱俯冲者”，挂载了1 500磅的复合炸弹；还有26架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很快就要被取代，这次行动将成为其传奇的职业生涯中执行的最后一次航母作战任务。）

飞机起飞时，纳尔逊发送了一份更正后的敌情报告。敌舰分成了三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远，其实际位置比米彻尔以为的要偏西60英里。米彻尔考虑了一下，没有取消攻击，也没有召回飞机，但是决定将第二批飞机留到次日早上派出。

下午4时36分，这支216架飞机组成的编队上路了。由于燃料的限制，它们不能在空中集结，形成标准的中队或编队。飞机会根据具体情况随机组成编队，詹姆斯·拉梅奇将这一做法称为“移动编队”。[\[61\]](#)为了

充分使用燃料，节流阀调到了水平飞行所需的最低能耗位置上。第10轰炸机中队的唐·刘易斯少尉说，最大限度地利用飞机的燃料储备不仅是科学，更是艺术。这意味着要“温和地”飞，一点一点爬升，还要适时切换辅助油箱，让飞机保持平衡。[\[62\]](#)

参与任务的编队以130节至140节的速度飞行。许多飞行员后来承认，经过一周半的密集战斗飞行后，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俯冲轰炸机爬升到2万英尺的高度后，机组人员的身体会承受很大的压力——驾驶舱极为寒冷，飞行员戴着手套，还要不停地搓手以保持温暖，氧气面罩上都结了冰晶。

没有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都知道自己执行的任务会让燃料耗尽，并且在任务结束时可能会在海上迫降。米彻尔和其他特混舰队指挥官表示，他们将竭尽全力营救在海上迫降的飞行员。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赢来了回报。

下午6时25分，离日落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最前面的飞机追上了日本舰队的后部。飞行员看到长长的白色尾流，这表明敌舰正在高速行驶。第一支（最西端的）舰队中有6艘大型供油舰和6艘驱逐舰。中队长们告诉队员，要忽视目标的诱惑，继续向西北方向飞行，因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攻击“查理·维克托”（航母）。大约10分钟后，最前面的几架飞机报告前方有许多舰艇，包括航空母舰。

小泽已经成功地让大约80架飞机起飞迎敌，其大部分是零式战斗机——考虑到他的航空大队在前一天所遭受的打击，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高空掩护轰炸机中队的F6F迎上去，与敌方战斗机开始交战。空战不过几分钟，就有大约20架零式战斗机被击落。“大黄蜂号”航空大队的杰克逊·D.阿诺德中校命令所有飞机攻击“瑞鹤号”。阿诺德告诉飞行员们，把敌人的这艘大型航母击沉，“就能回家了”。[\[63\]](#)时间和燃料都不足以进行协同攻击了，于是他们直接降低机头，冲向敌方舰队的中心。

哈罗德·比尔带领“大黄蜂号”上的“地狱俯冲者”朝着目标小角度俯

冲，希望能实现奇袭的效果。防空炮火向他们袭来，但第一轮炮弹爆炸的高度较低。“地狱俯冲者”转而大角度俯冲，穿过五颜六色的浓密火力网。这是老兵比尔遇到过的最猛烈的防空火力。“我驾驶着领头的飞机，因此成了焦点。大量的炮弹从我周围飞过，我感觉自己正在冲入艾奥瓦州平原上的一场冰雹。……有些炮弹发出触手一般的白色磷光火焰，我从来都没见过。”^[64]“约克城号”第1轰炸机中队的“地狱俯冲者”跟在“大黄蜂号”飞机的后面，向日本的大型航母投下了十几枚炸弹。一些炸弹没有命中，落在航母两侧，激起了高高的白色水柱，但有两三颗命中了目标。“瑞鹤号”猛烈地燃烧起来，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F6F在“瑞鹤号”的飞行甲板上方低空扫射，打死了数十名船员。

第10轰炸机中队的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在15 500英尺的高度抵达舰队上空，开始高速俯冲。在以200节的速度小角度俯冲时，唐·刘易斯进行了所有的检查，然后压低机首，全力加速。他对“飞鹰号”发起了攻击。“飞鹰号”不断剧烈转向，刘易斯也多次转弯，将目标锁定在视野当中。刘易斯说，这次俯冲“似乎永远都完成不了。从来没有哪次俯冲用过这么长的时间”。穿越猛烈的防空火力时，下方的飞行甲板看上去“无比巨大”，他在1 500英尺高的地方投下炸弹，随后拉升并飞离。^[65]

一群来自“胡蜂号”的俯冲轰炸机前去攻击主战场以东30英里外的供油舰。其中两艘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凿船自沉。其他攻击者投放的炸弹分别击中了轻型航母“隼鹰号”、此前作为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千代田号”的尾部，以及战列舰“榛名号”。“贝劳伍德号”的4架挂载了鱼雷的“复仇者”飞机从云中出現，快速俯冲，直奔重型航母“飞鹰号”，发射的鱼雷中至少有一枚甚至两枚命中目标。“飞鹰号”的船员无法控制火势，不得不于当晚弃船。晚上快到10点时，这艘航母从舰首处下沉，于是两天战斗中被摧毁的日本航空母舰增至三艘。“瑞鹤号”严重受损，舰长下令弃船；但火势最终得到了控制，于是弃船命令被撤回。这一次，日军的损管措施终于成功了，让这艘严重受损的航母最终回到了濑户内海。

投掷炸弹之后，减轻了重量的飞机开始穿过致命的高射炮火，脱离战场。日军的舰艇编队在海上拉得很开，所以这些飞机要飞行很长时间才能离开高射炮的范围。防空炮弹在附近爆炸，让撤离的飞机剧烈震动，而且由于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主炮也朝着飞机撤离的路线开火，这些飞机的前方和两边也会溅起巨大的水花。飞行员时而贴着海面，时而拉起飞机，左右摆动，不让炮手瞄准射击。

比尔的飞机被直接击中，差点坠落。一枚防空炮弹穿透了他飞机的右翼，还有一枚榴霰弹的弹片穿透了驾驶舱，在他的背上划了一道伤口。机翼上着火了，铝皮被烧穿，露出内部的框架。受伤的比尔将操纵杆使劲向左推，让这架变得很难控制的俯冲轰炸机保持水平飞行。（这架严重受损的“地狱俯冲者”不仅仍然能飞行，还返回了第58特混舰队，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结构有多么坚固。）

宇垣缠记录说，防空火力过于猛烈，以致几近失控。在美国飞机离开战场后，高射炮还会不时开火，直至深夜。“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着星星开火的，”他写道，“即使在一艘舰艇内部，命令也很难传达下去。让人们停止开火不是件容易事。”[\[66\]](#)

在漫长的回程中，随着夜色渐浓，美国飞机逐渐凑成小型编队。飞行员调整节流阀，进行“慢速巡航”，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的每一加仑汽油。有一名飞行员非常疲劳，尽管他的飞行高度仅为2 000英尺，但他仍然透过面罩呼吸氧气，好有力气撑下去，最终完成任务。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讨论他们的困境，信道中的说话声一直没有停。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些飞机的油表指针指向了零。整个编队或中队都决定让飞机迫降在同一个地点，理由是，如果把救生筏捆在一起，会比单一的救生筏更容易被发现。弗拉丘回忆道，大多数飞行员都能保持冷静，但是“有些飞行员崩溃了，一边飞一边号啕大哭。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大海。我能理解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太崩溃了，我不得不暂时关闭无线电”。[\[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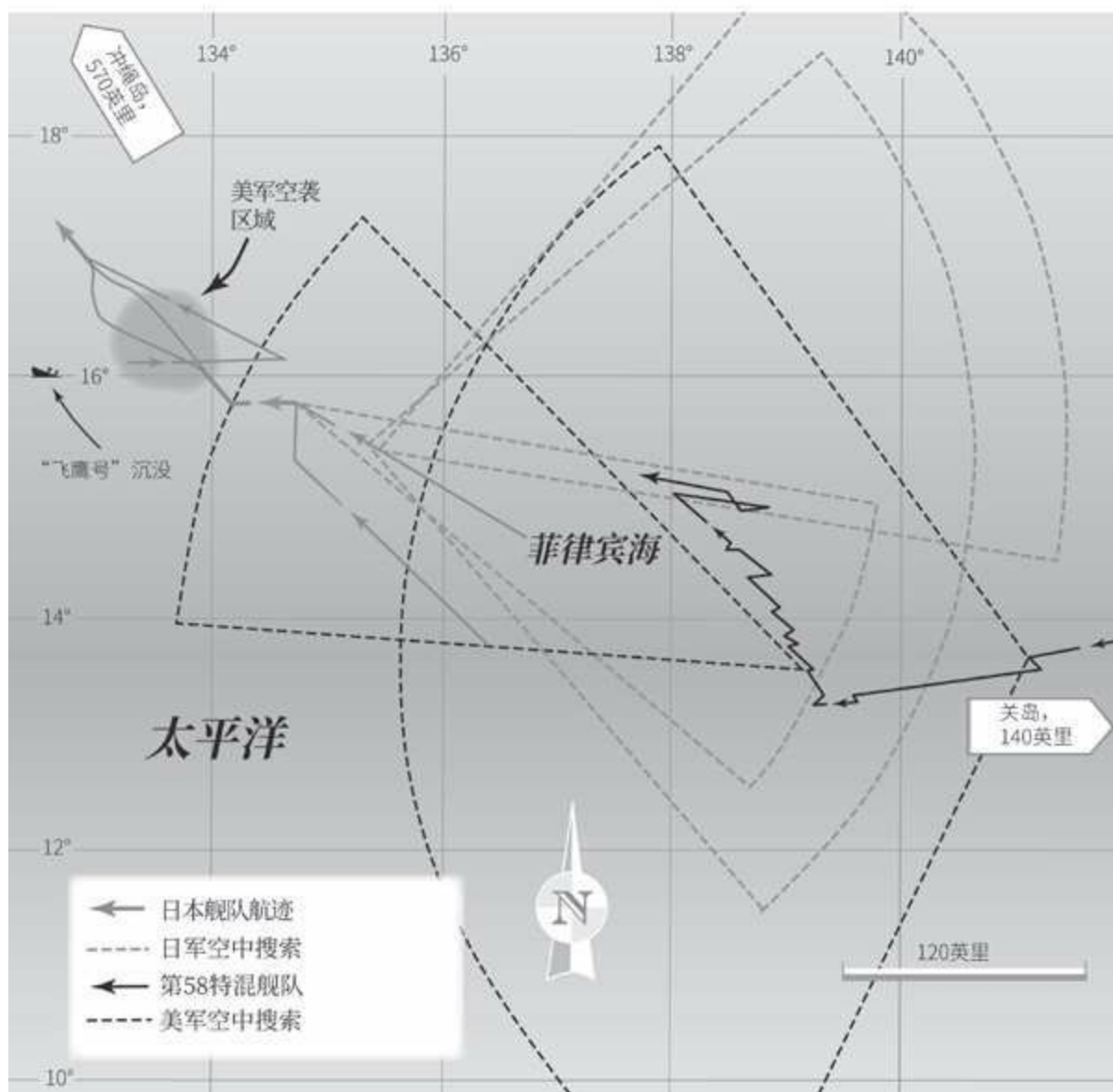
即使对于有足够燃料飞回舰队的飞行员来说，找到舰队也不容易。

在黑暗中飞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有些飞行员被南方地平线上的闪电给带偏了。在经过漫长的飞行后，飞机也许会捕捉到无线电归航信标——通过耳机接收到的微弱信号——跟着信号可以回到舰队。

米彻尔将军先前已通知第58特混舰队的所有舰艇，在接到命令后，它们需要打开探照灯，垂直射向天空。在敌军水域照明舰艇违反了平时的军规，一旦附近有日本潜艇，这一举动就可能是致命的，但是米彻尔觉得他有义务承担这一风险。打开探照灯的决定成了米彻尔的传奇军事生涯中的重要经历，也表明了他个人对飞行员的尊重。但是这个决定并非首例，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的争议。此前一周的行动减轻了美军对敌方空中威胁的担忧，而反潜部队则减少了敌方潜艇的威胁，它们在过去十天内摧毁了六七艘日本潜艇。在两年前的中途岛战役中，斯普鲁恩斯曾命令“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打开探照灯，以便当天晚上追击撤退中的日本舰队的飞机着舰。一名历史学家后来称赞这是个勇敢的决定，对此，斯普鲁恩斯这样评论：

米彻尔的追击

菲律宾海海战第二阶段，1944年6月20日



我的确下令在夜间开灯，好让飞机安全返回并降落，但我认为你过分强调了这件事的重要性。如果一艘航空母舰失去了其航空大队，那它就是一艘被解除武装的船，成为累赘，而不再是有价值的东西。是否开灯以便飞机夜间着舰，应该在发起攻击之前就考虑好，而不是之后。如果飞机必须要在下午起飞，因此很可能在夜间着舰，而你在当时的战况中不愿意去做让飞机安全返回所需的事

情，那么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让这些飞机发动攻击。[\[68\]](#)

在历史文献中，米彻尔的命令经常被描述为像电影台词一般简明：“打开灯。”但是，这样的命令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根据阿利·伯克的说法，第58特混舰队的参谋之前已经为照明舰队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打开灯”也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母特混舰队司令会给出的命令。它太模糊了。哪些灯？红色的灯还是绿色的灯？是信号灯、桅顶灯，还是飞行甲板上的灯？是只有飞行员进入着舰航线，从航母正后方才能看到的有遮光罩的灯吗？

在战前的演习中，人们发现垂直指向天空的探照灯能让一艘船在很远的地方被人看到。晚上8点半左右，雷达屏幕亮起，飞机从西北方接近，特混舰队开始逆风行驶，准备回收飞机，整支特混舰队都亮起了垂直的光柱。大多数航母也打开了其他外部照明灯，还有一些航母在舰岛的上层建筑上安放了探照灯，以照亮飞行甲板。许多战列舰和巡洋舰也灯火通明。驱逐舰还用5英寸舰炮发射了照明弹。

目睹了这一幕的人将永生难忘。这支巨大的舰队在地平线上散布开来，目之所及，一眼望不到头，这是一场梦幻般的奇观。“贝劳伍德号”的降落信号官约翰·A.哈珀上尉认为那看起来像是“大都市的夜景”。[\[69\]](#)哈罗德·比尔驾驶着受损的寇蒂斯SB2C轰炸机从西边接近，眼前的情景让他想到了“7月4日的科尼岛游乐场”。[\[70\]](#)“企业号”的“复仇者”飞行员E.J.劳顿将其比作“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狂欢节场景，华丽得不合时宜”。[\[71\]](#)警戒舰艇也与航空母舰一起亮起灯——这是一种善意的团结姿态，但这么做更有可能带来危害而不是好处。“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的军官保罗·巴克斯回忆说，有一两架飞机从战列舰上方经过的时候似乎要降落，最后才意识到搞错了，重新扎入黑暗中。[\[72\]](#)

米彻尔命令燃料不足的飞机降落在任何可降落的航空母舰上。他之

前便已告知所有航母，任何进入着舰航线的飞机都要接收。在毫无组织的飞机回收过程中，有近一半飞机降落在错误的航空母舰上。而且飞机接近航母的时候也没有秩序，彼此之间没有保留足够的间隔。“这就像是人人为己。”拉梅奇说。^[73]飞行员之间还相互较劲。许多人“擅做主张”（即使在降落信号官挥手示意不允许降落时，他们也降落）。有些飞机在飞行甲板正后方耗尽了燃料，坠落在航母的尾流中。急着降落的飞行员拒绝相互让步。一名降落信号官向两架同时靠近的飞机发出信号，让它们不要着舰，然后猛地趴在甲板上，因为这两架飞机“紧贴着我们上方飞了过去，尽管我们整个人都趴下了，还是差一点擦到我们”。^[74]疲惫、困惑和受伤的飞行员们忘记进行着舰前的检查，没有降下起落架或尾钩，以机腹着舰，导致坠毁。比尔无视了降落信号官最后挥手让他复飞的指示，受损的“地狱俯冲者”撞到了“列克星敦号”上。飞机弹起，未能钩住阻拦索，然后又越过防撞路障。残骸滑向了停在舰首的飞机。2名水手遇难，6架停放的飞机被撞毁。

每当有失事的飞机撞上飞行甲板，船员都会迅速出动，把飞行员从驾驶舱中救出来，并将飞机残骸从船舷处推入大海。由于上空还盘旋着数十架飞机，因此保持甲板通畅是首要任务。在混乱中，“企业号”同时成功回收了两架飞机，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简直是太幸运了——两架飞机并排接近，翼尖相对，各钩住了一根阻拦索。有一架严重受损的“地狱猫”战斗机准备降落在“考彭斯号”航母上，这让舰上的萨姆·萨默斯感到惊奇不已。飞机的一半方向舵已被打掉，飞行员只能渐渐地试探性转弯。由于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沿着舰航线降落，他直接从正后方飞了过来，一点一点地降低高度，然后完美降落，“就像一只蜻蜓落在睡莲上一样轻盈。……他驾驶的飞机没有弹跳，甚至轮胎都没有发出刺耳的声音。在方向舵本该待的地方，顶部和底部有大约四英寸成了平的”。^[75]

至少有一名日本飞行员被灯光吸引，犯了糊涂，差点儿驾驶着爱知俯冲轰炸机降落在“贝劳伍德号”上。它的速度和高度都很合适，襟翼打

开，准备着舰。哈珀上尉以为这是架美国飞机，用信号棒发出了“太高”的信号。但是飞机却飞得更高了，这表明飞行员没有正确解读信号。当探照灯照亮机身上的红色“肉丸”时，它转弯飞走了。“贝劳伍德号”突然熄灭了灯光，但是高射炮手没有时间做出反应。（回想起来，哈珀很遗憾他没能诱骗那架飞机着舰：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将是航空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俘虏行为。）后来，“奥克兰号”巡洋舰在报告中提到，一架日本飞机已经明显准备降落，后来转身离开，消失在黑暗中。

由于缺少燃料或可用的飞行甲板，许多飞机被迫在特混舰队周围进行水上迫降。缺乏燃油的发动机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液压油燃烧发出的辛辣气味渗入驾驶舱，戴着手套的飞行员握住的操纵杆已经失灵。由于失去动力的水上迫降比有动力时风险更高，许多飞行员在仍旧有剩余燃料时也选择了水上迫降。如果一名飞行员能够熟练地进行紧急迫降检查，他会从头盔上取下无线电接线，拉紧肩带，确认座舱盖已盖好并锁上，转向逆风，打开襟翼，让飞机处于机首向上的着陆姿势，并缓慢下降，直到离海面仅有10英尺到15英尺。然后关掉油门，并准备好接受冲击。在平静的海面上，这种冲击可能不会比硬着陆冲击力更大，而幸运的是，那天晚上这片海面无比平静。他有一分钟甚至两分钟的时间解开安全带并爬上机翼。降落伞会保持几分钟的浮力，在它变沉的过程中，飞行员可以给救生衣充气。

第58特混舰队的船员们四下望去，到处都能看到在水上迫降的飞机以及围在飞机附近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路过的航空母舰会扔下漂浮物。浮在海上的飞行员会打开防水灯并吹响哨子。有些人还发射了照明弹。驱逐舰用探照灯扫过海面。发现漂浮人员后，它们会靠近，放下吊货网并将他拖上船。

晚上10时15分，最后一架飞机着舰成功。特混舰队向西北方转弯，并以16节的速度前进。探照灯扫过前方的海面。每支特混大队都留下一艘驱逐舰来继续搜索和营救坠海的飞行员。天一亮，天空中就会满是飞机，它们将在最有希望找到飞行员的区域搜寻。

在参加作战行动的216架飞机中，有80架在海上迫降或在着舰时撞上甲板，另有20架失踪，可能是在日本舰队上方的空战中被击落了。损失的飞机上的人员总数为209人（100名飞行员，109名机组人员），但当晚有100人从水中被救出，另外60人在随后几天里被救起。于是人员损失降低到了16名飞行员和33名机组人员。第58特混舰队完全能够承受100架飞机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塞班岛附近的护航航空母舰可以提供后备飞机。

对于日本人来说，夜间着舰增加了新一轮空战带来的严重损失，而且比第58特混舰队的着舰损失要大得多。据小泽记述，6月20日晚，他只剩下35架适航的舰载机。自一周前离开塔威塔威岛以来，他损失的飞机超过了400架。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他感到一丝凄凉的慰藉，那就是他没有任何一艘船处于失去行动能力的状态——在两天的战役中，被炸弹或鱼雷击中的日本舰艇不是沉没了，就是设法控制住了损伤，所以第一机动舰队仍然能够以20节的速度前进。在赶往日本本土的路上，小泽的舰队有300英里的领先优势。第58特混舰队无法全力追击，这一方面是因为燃料限制（驱逐舰剩余的燃料很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营救坠海的飞行员耽误了时间。日本战败的舰队在冲绳的中城湾补充燃油，然后返回了濑户内海。

6月23日，斯普鲁恩斯将军在返回塞班岛海域的路上，被迫回应来自珍珠港的急切询问。最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是，尼米兹想要为进攻关岛确定一个日期。（“征粮者”行动计划已将此日期定为6月18日，仅在塞班岛登陆后三天，但该日程表是不现实的，已于6月16日被取消。）塞班岛上的地面行动已进入第九天，美军在内陆高地停滞不前，因为日军充分利用了这里复杂的地形，拼命抵抗。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与史密斯和特纳磋商后，斯普鲁恩斯不情愿地承认，他无法确定关岛行动的日期。在美军打破岛上山脊处的僵局之前，没有任何部队能够从塞班岛撤出，并且运兵船上的所有预备队都要留在原有位置上，直到塞班岛

的问题解决。这是史密斯、特纳和罗伊·盖格将军（他将在关岛行动中指挥美军地面部队）的一致意见。“我没有拖延，也不喜欢拖延，”他对尼米兹说，“但我觉得自己必须接受即将执行这项任务的将军们的判断。”[\[76\]](#)

美军控制了塞班岛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其中几乎包括东部登陆海滩至麦吉森湾一线以南的所有地区。在该岛南部海岸的纳夫坦角（Nafutan Point），约有1 500名日军躲在坚固的据点里，被强大的美军包围。（纳夫坦角的日军曾经几次尝试突围，6月26日发动了自杀式冲锋——这次冲锋让日军暂时占据了邻近的阿斯里托机场，但此时他们已经陷入重围，并且弹尽粮绝。）6月22日，第一批美国飞机抵达阿斯里托，这是陆军航空队的一支P-47中队，来自岸边不远处的护航航空母舰。到了6月24日，已有74架P-47从该机场加入战斗。在塞班岛的东岸，第2陆战师正将拼死反抗的敌人向北赶，赶往加拉潘和坦纳帕格港。第4陆战师清除了山脊与西岸之间的日军。霍兰·史密斯命令第27步兵师来到前线中间部分，这是两个陆战师之间的高地。

6月23日，三个师在整条战斗前线展开协同攻击。霍兰·史密斯曾打算让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混合的部队齐头并进，迅速向北进军。但是拉尔·史密斯的陆军师行动迟缓，发动攻击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岛屿中部陡峭而危险的多岩石地带藏有打游击的日军，进攻这些敌军时，陆军士兵躲在散兵坑里，等待密集的炮火支援为他们扫清前进的道路。但是这么做就让敌人有了足够的时间将增援部队转移到岛上的最高点——塔波查山周围的悬崖和洞穴中。他们在那里有掩护的高地据点中架起了机枪和迫击炮。

海军陆战队处于停滞不前的陆军第27师的右侧和左侧，这两侧的沿海地形更平坦，易于发动攻击，因此海军陆战队一直保持着前进的势头。遇到坚固的据点，他们会从侧翼发动攻击，或者直接断其退路并绕过去，留给预备队收拾。推进速度的差异导致美军战线略呈U形，这种阵线可能会让两个海军陆战师的内侧暴露出来，遭到猛烈的反击。陆军

必须加快步伐，否则整条阵线都可能会陷入血腥的拉锯战。

与“电流”行动和“燧发枪”行动中一样，第27步兵师的表现不如海军陆战队。但是，这一次，他们之间的差距似乎会危及整场行动。霍兰·史密斯非常了解塞班岛上各军种之间的敏感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会在国内制造出怎样的麻烦。但是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快速平定塞班岛，因此他需要整条战线协同推进。在送往拉尔夫·史密斯指挥所的一系列急件中，霍兰·史密斯敦促他展开更加勇猛的攻击。但在6月24日，“U”形越发明显了。史密斯派遣桑德福德·贾曼（Sanderford Jarman）少将前往第27步兵师指挥所讨论这个问题。按计划，在夺取塞班岛后，贾曼会担任岛上驻军的指挥官。他返回嘉兰卡诺亚的第5两栖军指挥部以后报告说，拉尔夫·史密斯已承诺在第二天取得进展。如果他无法让陆军部队前进，拉尔夫·史密斯告诉贾曼，“他就会被解职”。[\[77\]](#)

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各军种持有不同的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基于本能和训练，海军陆战队坚持积极而富有侵略性的快速攻击。为了争取速战速决，他们愿意承受更高的伤亡率。而陆军的理念是稳扎稳打，在集中的炮火支援下展开进攻。所有营形成广阔的战线，同步推进，而且只要有机会，就尽可能占据侧翼位置。到了夜晚，他们倾向于后撤一定距离，退到前线后方的安全位置。这些原则适合陆地战场上两军大规模对阵的情况，但是在珊瑚岛上岩石遍布的高地，面对分布没有规律的据点里的小股敌军，这一原则就没那么有效了。在两栖作战行动中，离岸不远的大规模舰队可能会受到敌人的攻击或变幻无常的天气的影响，所以时间是一个压倒性的因素，必须速战速决。陆军僵化的节奏让敌人有时间改进其防守安排，无论是在塞班岛上，还是在战斗尚未开始的毗邻岛屿上。而且，那些光秃秃的珊瑚山上的恶劣环境有可能导致整支作战部队士气低落。后方梯队很难将足够的食物、水和弹药运送到前线。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二等兵理查德·金描述了高温和口渴对他的折磨：“气温有将近50℃，我们整天待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在珊瑚上慢慢

地疯掉。我根本张不开嘴，舌头肿成正常大小的五倍，嗓子干得要冒烟，说话声音都变细了，鼻子和嘴里不停地流血。”[\[78\]](#)

6月24日，霍兰·史密斯乘小船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请求斯普鲁恩斯授权解除拉尔夫·史密斯的指挥职务。特纳强烈支持这一要求。卡尔·穆尔则提出警告，称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之间可能面临关系破裂的风险，但斯普鲁恩斯认为他必须支持地面指挥官的意愿。穆尔拟好了命令，斯普鲁恩斯签了字。拉尔夫·史密斯被解除指挥权并返回珍珠港，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法抹去的耻辱。贾曼将军接管了他的部队。斯普鲁恩斯告诉尼米兹，解除史密斯的职务“令人遗憾，却是必须要做的。他长期担任该师师长，因此必然要对其作战效率低下负责”。[\[79\]](#)

在苦战了一周后，陆军终于突破了敌军阻碍其前进的据点。塔波查山的总攻任务落到了第2陆战师的肩上，该师在山脊以西的甘蔗田里击退了几次坦克的攻击后，发动了总攻。最后，在第8陆战团第2营和第29陆战团第1营的共同努力下，美军夺下了山头。在西海岸，第2陆战师的其他部队在加拉潘烧焦的废墟中苦战，于7月3日突破并夺取了坦纳帕格港。

现在，塞班岛战役进入了最后阶段，剩下的日军部队和掉队士兵退到了岛上的北部高地，战斗变成了“敌人孤立、零星而绝望的抵抗。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了”。[\[80\]](#)小股的敌人躲在一个个石灰石洞穴中。美军经常绕过这些阵地，留待特种部队携带火焰喷射器和手榴弹到来，将其清理干净。日本人常常尖叫着发起最后的刺刀冲锋，此时美军不得不用步枪射击，甚至要进行白刃战。

岛上的步兵对于海岸外不远处发生的宏大海战毫不知情。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对其有多高的评价。曾在塞班岛上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威廉·曼彻斯特后来成为著名的传记作家，他写道：“我们对战争的看法，基本就是一孔之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散兵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双线进攻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大多数海

军陆战队员对太平洋地区的地理一无所知，就像他们在国内的家人一样。”^[81] 登陆塞班岛一周后，曼彻斯特和其他海军陆战队员看起来非常像两年前征服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那群人——憔悴、胡子拉碴、满身泥土和烟灰，而且总会带着茫然而疲惫的表情凝视远方。他们排成长队行进，紧挨着路边的壕沟，敌人一旦开火，他们就立刻跳进去。他们从来不向军官敬礼，因为这样做会让军官成为敌方狙击手的首选目标。黄昏时分，他们会挖一个深深的散兵坑，挖完才会休息吃饭。夜晚既不黑暗，也不安静。弹痕累累的大地被信号弹和长时间燃烧的降落伞照明弹照得通明。坦克行进时发动机的声音、机枪的连发声和炮弹的呼啸声不断打破寂静。老兵知道如何通过声音判断每颗飞来的炮弹或子弹的口径：“有些炮弹会像烟花一样发出咝咝声，有些炮弹则会发出嘶鸣声、尖叫声、口哨声，或者像冬天的大风猛地关上谷仓门的声音，”曼彻斯特写道，“所有这些声音发出的原理都是一样的：炮弹经过时会形成真空，而空气会挤进真空。”^[82]

日军剩下的战斗人员被困在了塞班岛北部的一个不断缩小的范围内，而美军的攻势是无情且致命的。海军陆战队员通过野战炮和车载火箭发射器持续打击他们。凭借彻底的空中优势，美军的陆基战斗机和航母舰载机不断地向日军战线倾泻炸弹、火箭并进行低空扫射。此外还有近海战舰的巨炮轰击，这些巨炮在白天不断地开火，并且经常持续到夜晚。日记作家詹姆斯·费伊（他所在的“蒙彼利埃号”在塞班岛附近停留了好几个星期）发现船上按部就班的生活与岸上的屠杀之间形成了离奇的反差。“一些船员在两舷钓鱼，另一些人享受着日光浴，舰首则有一些军官在打拳击；而沙滩上的人正在互相残杀，有些人因受伤而痛苦不堪；这种对比非常耐人寻味。我们的飞机在低空扫射和轰炸敌人，我们的舰艇也在轰击日军。这两个场景如此接近，却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两个不同的世界。”^[83]

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主编的本·布拉德利上尉当时在“菲利普号”驱逐舰上参与了塞班岛的行动。布拉德利连续几天通过无线电与一

名“请求火力支援”的岸上协调员联系。这名协调员是海军陆战队一名中尉，布拉德利从未见过他；他与敌人距离非常近，常常希望炮弹能直接落在紧挨着自己的目标上。布拉德利发誓他有时可以从无线电里听到背景中有日本士兵的喊叫声：

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但这个家伙真是太勇敢了。他会要求炮手对准某个地方（往往离他的散兵坑也就几米），然后我会把他给我的坐标转给炮手。先是听到“开火”，然后是震耳欲聋的发炮声。57磅的炮弹向目标飞去时会有片刻的安静，紧接着是我们看不见的朋友的回应。“真他妈的棒”，或者是“正中目标”。经常是这样。有时候则是：“这次有点儿太靠近我了，伙计。稍微远点。” [\[84\]](#)

在长达一个月的塞班岛战役期间，约有14万发5英寸炮弹射向岸上的目标。这还不包括巡洋舰和战列舰的大口径火炮发射的炮弹。根据后来提交给海军部的记录，如果全都加起来，海军总共向塞班岛发射了1.1万吨弹药。由于火力充足，请求火力支援的协调员并不总是将目标限定在已知的敌方地点。尼米兹在交给金的“征粮者”行动报告中说：“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怀疑某个地方有敌军设施，不确定是否真的存在，就请求对那里进行打击。” [\[85\]](#) 既然补给船队能够从埃尼威托克源源不断地把弹药运过来，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就像在塔拉瓦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上一样，炮弹始终未能钻透加固过的碉堡或防空洞，但是在坦克或步兵突击之前进行猛烈的炮火打击，的确能有效地压制敌军火力。岸上的士兵有时会请求在夜间照亮敌人的战线，然后关上无线电睡一会儿。根据这最新的请求，离岸不远的军舰要不停发射照明弹，让作战区域保持照明状态。彻夜照亮“无人地带”能够防止日军步兵采用过去的战役中使用过的夜袭战术。

在陆海空的协同打击之下，日本守军被逼进了绝境。洞穴和壕沟提

供了一定程度的身体保护，但任何运输队或部队在开阔地带移动都会遭到迅速、准确而强大的炮火打击。即使炮火没有杀死或伤到这些日军，持续的轰炸也把他们逼到了失去理智的边缘。军曹山内武男是在塞班岛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少数日本士兵之一，后来他描述了这场噩梦：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一发接一发的照明弹和炽热的烟雾。它们直接蹿上60米高的空中！巨大的炮弹！战列舰上发出来的。所有军舰都在炮击。我所在的地区布满了弹坑，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我们藏在浅浅的壕沟中，紧紧地贴着地面。我们半个身体被土掩埋了。我有好几次满嘴都是土。泥土使我睁不开眼睛。烟雾和飞溅的尘土几乎让人窒息。可能下一秒我就会被炸死！[\[86\]](#)

分散的战斗小队躲进了洞穴或是植被茂盛的沟壑。掉队的士兵与长官失去联系，于是加入了其他编队，等待着永远都等不到的命令。内部通信彻底中断了。食物和饮水短缺。他们挣扎着进入北部的山地，碰到推进的敌军就撤退。可怜的平民难民，有时是整个家庭忍饥挨饿，遇到士兵后会祈求他们给予食物、水和保护。在7月初的几天里，山内武男和其所在排的其他少数幸存者躲进了一个深谷。他们的军官失踪了。他们隐藏在丛林中，避开低飞的“地狱猫”战斗机，等待着命令。他们周围都是死去的同伴腐败的尸体：“尸体烧成黑色，挂在树枝上，然后重重地掉到地上。蛆虫爬满了尸体。”当山内提出投降的建议时，其他人坚定地拒绝了：“班长，你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卖国贼。拿出军人该有的样子来！”[\[87\]](#)

在西北部海岸附近的一个加固防空洞里，斋藤义次将军越来越难与残余部队保持联系。他不得不五次转移战地司令部，他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司令部位于被日军称为“地狱谷”的地方。他的战地电话毫无用处，因为地面上的电缆在数周的轰炸中被完全炸碎了。派去给战地指挥官送信的通信员经常在路上被打死。7月6日上午，他向东京的大本营发

出电报，报告说塞班岛失守。他向留在岛上的所有日军发出最后一道命令：

上天并没有给我们机会。我们无法充分利用地形。我们一直共同战斗到了现在，但此刻我们已没有任何武器可以用来作战，我们进攻用的火炮已经被彻底摧毁。我们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尽管失败是痛苦的，但我们承诺“一命换七命，报效国家”……

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坐以待毙，都是一死。然而，我们可以向死而生。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展现真正的日本男儿气概。我会与剩下的人一起前进，向美国鬼子再次发起冲击。我将把自己的白骨留在塞班岛，作为太平洋堡垒的一部分。[\[88\]](#)

斋藤义次宣称他会“与剩下的人一起前进”，这显然要理解为一种比喻。这名将军已经精疲力竭。他的胡子长长的，（据他手下一位军官说）“其状惨不忍睹”。[\[89\]](#)他和军官们合用最后一顿晚餐，吃了蟹肉罐头，喝了清酒。然后他离开防空洞，坐在一块岩石上，面向东方，双手握住切腹用的匕首，刺入自己的身体。完整的切腹方式要求自杀的武士用刀横着切开腹部，再斜向上提，让自己的内脏露出来。没人知道在他的副官向他的右太阳穴开枪之前，斋藤义次的刀划到哪里。司令部设于另一个地堡中的南云忠一将军据说也采用同样的方式自杀了。但是目睹南云忠一自杀的人一个都没有幸存下来，大概是因为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轮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者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打死。根据二手报告，两名司令的尸体都被火化，骨灰撒在了当地。

“一命换七命，报效国家”是召集日本士兵进行自杀式袭击时常用的口号，通常以刺刀冲锋的形式进行。每一个上天之子都要在被杀死之前尽力干掉七个“鬼子”。充满大和精神的日本武士（据说如此，有时甚至被信以为真）即使在受到致命伤后仍能继续战斗。根据一个古老的武士神话，被对手斩首的剑客（如果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可以凝聚濒死时所

有的力量，再一次用剑刺向对手，与对手同归于尽。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加拉潘差点被一名瞎了的日本士兵打死，他对这个日本兵的“战斗意志”感到惊叹：“他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没有寻求援助，而是要决一死战，杀死最后一个敌人。”[\[90\]](#)

斋藤义次最后的命令是让所有剩余的日本兵（包括所有还能走路的伤员）在7月6日夜幕降临后前往西北部海岸附近的坦纳帕格平原上的马昆沙村会合。他们要从那里对美军战线发起全面的“总攻”。无法行动的伤者将在床上自杀或被别人杀死。通信员分散开来，传递命令；范围不断缩小的防御圈里的所有士兵都尽力来此地会合。二等兵川口太郎

（Taro Kawaguchi）也听从了命令，尽管他已没有武器。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日记中记载，他面向北方，向天皇鞠躬，并向父母和亲属默默告别，承诺要在反击的高潮中竭尽所能。“回首过往，我不过26岁而已。多亏有天皇，还有我的父母和姨妈，我一直活到了今天，我充满感激。同时，我非常遗憾，我的生命即将像花瓣一样凋零，化为泥土，此时我却没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迹。……我与我牺牲的身体将成为太平洋的白浪，留在这个岛上，直到友军重返此地，夺回天皇的领土。”[\[91\]](#)

大约有3 000名日军听从命令的召唤，在持续的炮火轰击中设法到达会合点。没有受伤的和拿着最好武器的士兵列于最前排，四人一行并排前进。仍然有枪的人上好了刺刀，没有枪的则在长棍末端绑上刀或刺刀，制成长矛。队伍的末尾是一群可怜的伤员，有的仍在流血，有的包扎着绷带，一些人拄着拐棍，许多人都是赤手空拳。

凌晨4时45分，天快亮的时候，这支队伍的前锋沿着临海的窄轨铁道冲了下去，闯进了美国陆军第27步兵师的两个营所在的防区。他们像往常一样，一边冲锋一边高呼：“万岁！”

凭借人数的优势，他们从美军第106步兵团的第1营和第3营之间的缝隙中冲了过去。这两个营很快被隔断，然后又被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小队。大批日军继续往南冲，闯入了更多的美军阵地，直到顺着沿海公路冲到一英里外的海军陆战队炮兵阵地。攻击者逐渐接近，美军炮手则

不停地射击，造成对方伤亡惨重——但是日本兵不屈不挠，他们爬过死去战友的尸体，继续往前冲，逼得海军陆战队几乎改为水平射击，而且把炮弹引信缩短到了0.4秒。最后，炮手被迫放弃开炮，拔掉了炮闩，使火炮无法使用，然后向南边打边撤。

目睹了这次殊死搏斗的美国士兵心里充满了恐惧、惊奇、蔑视和钦佩交织的复杂感受。威廉·曼彻斯特说：“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壮观的自杀式攻击。”^[92]约400名美国陆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混战中阵亡，其中许多人因刺伤身亡。随着敌人数量越来越少，力气用尽，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小队开始与敌人短兵相接。后来，坦克和步兵增援部队赶来，对敌人进行猛烈的反击。留在曼彻斯特记忆中的是自己“艰难地踏过内脏、瘀血、骨头碎片、撕裂的肉体和大脑的黏液及碎屑”。^[93]到了早上9点，美军已经通过反击恢复了阵线。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小队开始系统地摧毁留在后方的许多孤立的敌人。清点日军的尸体后，美国指挥官估计在早晨的行动中有4 311名日本兵被打死。下午，岛上逐渐热了起来，美军用推土机把日军尸体推进了大坑。但是薄薄的一层土难以盖住污浊难闻的臭气，杀戮场上聚集着一团团黑色的苍蝇，像瘟疫一样在整座岛上蔓延。

塞班岛上原本居住着约2.5万日本平民和冲绳平民，其中许多人是在1919年后不久从日本和冲绳移民过去的。根据《凡尔赛和约》，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这里是美西战争中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被委托给日本管辖。在塞班岛战役的后期阶段，这些平民中有许多人跟随日军撤退到北部山区。7月8日，随着美军开始最后的攻势，大约有8 000名平民分散在日军战线中。在切腹之前，斋藤义次将军断言他们有责任避免成为俘虏，换句话说，他们要采取与斋藤义次将军相同的方式自杀。家庭受到亲子死亡协议的约束。他们有义务通过任何可用的手段剥夺他们自己及其亲属的生命。日军发放了氰化物胶囊，直到全部发完。士兵提出要挨个射击平民，而且往往不等对方开口就这么做了。

在拥挤的洞穴里，一颗手榴弹能抵上二十发子弹。还有军官持刀斩杀了数十名甘心赴死的人。也有报道说，一些孩子会围成一个圈，然后传递拉了引信的手榴弹，直到手榴弹爆炸，将他们全部炸死。山内武男回忆说，在一个挤满了日军士兵和平民的山洞里，一名军曹命令母亲们让其婴儿保持安静，她们做不到，他就说：“自己杀死他们，否则我会命令我的人动手。”几个母亲服从了。^[94]日军的防线退到岛上的马尔皮角（Marpi Point）的北端时，一直拒不自杀的平民被迫来到悬崖边上，这个悬崖有几百英尺高，下面是布满礁石的海岸。恐怖的结局到来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有大人有孩子，最终从这里跳了下去。

这种集体自杀，并不能通过日本人习惯服从命令，或者是武士道对死亡的崇拜来解释。塞班岛上的日本人笃定地认为，相比于生不如死，自杀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美国人不是人类——他们有点像恶魔或野兽。他们是“毛子”，或者“盎格鲁—美利坚恶魔”。他们会强奸妇女和幼女。他们会用坦克把被俘的平民轧成肉酱。他们尤其害怕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在塞班岛上的日本人中间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所有海军陆战队新兵在被征召入伍前都要被迫杀害自己的父母。据说日本军人被俘后会遭受可怕的折磨——他们会被割掉耳朵、鼻子和四肢，会被弄瞎和阉割，会被煮熟喂狗。真相和片面的事实被精心地跟更为离谱和牵强的说法掺杂在一起。日本报纸刊载了美国坦克上挂着日本人头骨的照片。美国军队杂志中的一幅漫画，后来被日本媒体翻译成日文转载，漫画中暗示海军陆战队员会获得“狩猎日本人许可证”，许可证承诺会有“狩猎开放季”，并承诺提供“免费弹药和装备——而且发薪水！”^[95]另外一些漫画将日本人刻画为猴子、老鼠、蟑螂或虱子，也被日本转载。约翰·道尔的研究专著《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强权》探讨了美国和日本的宣传手段，指出双方都倾向于将敌人描绘为毫无人性的民族。日本人读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信息，对美国人战时行径的描述和想象，使他们相信痛快地自杀是受苦最少的解脱方式。

塞班岛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人第一次在战场上遇到大量平民。没有

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妇女和儿童会拿起武器跟美国人拼命吗？在登陆前分发给第2陆战师的一本小册子警告说，士兵们将接触到大量敌方平民：“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日本**平民**会主动攻击我们。……这些妇女和儿童，和我们自己的母亲、姐妹或兄弟处于类似情况中的危险程度差不多。”这本小册子警告说，在有平民的场合，他们需要密切关注战争法：

我们必须……在开枪前十分确定平民正在与我们作战，或破坏我们的军事设施。国际法明确要求，没有反击我们的平民——无论他们是以劳工或军事专家的身份工作的日本平民或朝鲜平民，是武装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如医生和护士，还是与军队无关的普通平民——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活着俘虏，而且除非经过有法定资格的权威机构的公平审判，否则不得伤害他们或剥夺他们的财产。俘虏及其财产不属于俘虏他们的人。在战斗中杀死日本士兵是一回事，杀死没有与我们作战的平民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无论他们是不是日本人。后者是谋杀。[96]

即使是熟悉岛上作战的最铁石心肠的老兵，也不愿意冷血地杀死妇女和儿童，而且，看到平民深陷战火，他们感到难过。登陆日过后的第三天，威廉·罗加尔所在的排开始清理登陆海滩后面山上的一个个地堡和掩体。有一次，有个士兵将一枚手榴弹投入这样一个防御工事，“令我们惊恐的是，爆炸后我们听到了孩子的尖叫声和哭声。原来有六七名穿着校服的查莫罗小女孩躲在洞里。我们的医护兵尽可能地帮她们包扎伤口，但其中一些孩子看起来已经没气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斗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流泪”。[97]

在马尔皮角附近的水域，巡洋舰和驱逐舰继续向地面士兵所报告的日军目标提供炮火支援。船员们看着数百名平民从“万岁崖”上跃下，坠入下方的岩石和海浪中。潮水将他们卷到海上。詹姆斯·费伊在日记中说，海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尸体，他所在的船根本无法避开。“我从来

没有看到过这么多尸体漂浮在海上，”他在7月13日写道，“海里满是尸体，鱼会吃得很好。”^[98]尸体有时会缠在螺旋桨上，潜水员不得不从船尾下海，把尸体拉开。1944年7月16日星期日，费伊在甲板上参加了一场弥撒，但他无法将视线从眼前的景象上挪开。“舰艇从尸体上开过去。你根本躲不了，水中浮满了死亡的日本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你旁边漂浮着，有大人，也有孩子。北边的海域满是漂浮的尸体。”^[99]

一支会说日语的特别分队被派往前线向敌军士兵和平民播送劝降通告。吉普车上和岸边的船上安装了大喇叭，会讲日语的人（包括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向马尔皮角周围的敌人说了一套固定的劝降言论。如“别害怕！”“举起你们的手！”^[100]他们说，美军保证向俘虏提供食物和水，并说其他许多人已经投降了；还向那些勇敢地战斗过的日本士兵保证，投降无损于他们的荣誉。美国的水上飞机投放了“投降通行证”，上面写着指示，告诉愿意投降的人如何接近美国军队——双臂高举，一手抓着一片白布。

组织此类劝降行动的日语翻译官罗伯特·B.希克斯中尉说，有时很难说服海军陆战队相信劝降的努力是值得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似乎觉得劝降这个想法很奇怪，”他回忆道，“因为每个人都坚信，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投降。”他的上司起初对劝降行动没有提供什么鼓励或资助。夏威夷的一份报社承担了印刷投降传单的费用，因为军方不愿意为此拨款。希克斯的分队甚至将自己的娱乐资金用于购买大喇叭等设备。经过多次申请后，他们才获准将大喇叭安放在沙滩上。希克斯跑遍了整个塞班岛，劝说各处的指挥官改变对劝降行为的看法。他们的怀疑逐渐消失了，因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劝降显然是有效的。没有人喜欢眼睁睁地看着妇女和儿童从北边的悬崖上跳下来摔死。最后，军官和士官都同意优先考虑广播劝降，还提供了人力和保护，以帮助装有大喇叭的吉普车到达前线。希克斯说：“尽管嘴上说得很难听，但很多海军陆战队员十分配合，甚至对战俘很友善，无论他们是平民还是军人。他们看到

难民的悲惨境遇，会尝试帮助他们，给他们水并帮他们包扎伤口。大部分海军陆战队员都是善良的人。”[\[101\]](#)

对马尔皮角的最后一击有点像赛跑，因为第2陆战师和第4陆战师的各支分队都在竞争，想成为第一个占领岛上最后这块领土的部队。霍兰·史密斯把第27步兵师撤回后方，并将其作为预备队。7月9日下午4时15分，第4陆战师报告说已经控制了马尔皮角，于是特纳将军宣布成功夺取塞班岛。霍兰·史密斯位于嘉兰卡诺亚的指挥部举行了正式的升旗仪式。对岛上许多仍在激战的海军陆战队分队来说，这则消息令人惊讶。所谓成功夺取塞班岛，只是意味着岛上已经没有任何部分仍然处于有组织的敌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兵隐藏在岛屿北部丘陵的洞穴中，或是植被茂密的沟壑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还会时不时地有孤立无援的日本兵小队向美军发动自杀式冲锋。

夺取塞班岛是太平洋战争到当时为止代价最大的作战行动。美国地面部队中有2 949人丧生，10 464人受伤。在最后的统计中，大约有2.7万名日本兵——基本上是所有的日本驻军——在战役中丧生或自杀。美军俘虏了736名战俘，其中大多数人是朝鲜劳工。在宣布成功夺取该岛之前，施工队就开始将坦纳帕格港改建为现代化的补给站了。水雷和损毁的小型飞机被清除，开出了一条150英尺宽的水道，直通码头区，重型掘土设备开始改良和延伸码头，建造新的水上飞机坡道。

在东京，大本营的高级军官已经在地图上划掉了关岛和天宁岛。小泽在海上溃败之后，日本海军无法再对美军的行动形成任何干扰，而且美军连塞班岛都攻占了，自然更不会担心南方岛屿上的小规模守军。塞班岛上的顽强防守迫使美国人推迟了对天宁岛和关岛的进攻——原定是在登陆塞班岛后的一周内进攻。尼米兹不喜欢一直拖延下去，于是给斯普鲁恩斯和特纳施压，让他们确定后续行动的时间。但是霍兰·史密斯坚持将进攻关岛的部队用作塞班岛的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并且鉴于该岛战斗的激烈程度超过预期，另一支预备队——陆军第77步兵师——

也被认定应该从夏威夷出发，加入罗伊·盖格将军旗下的第3两栖军（由第3陆战师和第1临时陆战旅组成）。7月7日，随着塞班岛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斯普鲁恩斯将军终于有信心确定登陆关岛（7月21日）和天宁岛（7月24日）的日期了。

自从在塞班岛登陆以来，美军一直对这两个岛屿进行间歇性的空中轰炸，岛上的日本空中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康诺利少将的南线攻击部队于7月8日开始对关岛进行连续的海上炮击。在登陆之前的13天时间里，日军设于西部海滩的防御工事连续遭受了5英寸和16英寸炮弹的打击。这是整场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登陆前海军炮击。

关岛长30英里，面积210平方英里，是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最有可能用作前进基地的岛屿。岛上的阿普拉拥有该群岛中最好的深水港。位于奥罗特的大型机场是该地区最好的机场，而岛上广阔的高原和坚硬的珊瑚土可以建设更多的机场。令关岛更为独特的，是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之前的40多年里，这里是美国的领土。美国海军的大部分乘务员和食堂服务员都是关岛上的查莫罗人，这让他们感觉关岛人是“海军家族”的成员。在日本的统治下，关岛人被迫劳动，农作物都被没收，被迫接受日语教育，还会因被怀疑有不忠行为而随时受到惩罚。

关岛由珊瑚礁和岩石峭壁环绕，任何两栖攻击都很难实施。该岛最不可缺少的军事资产是阿普拉港和奥罗特机场，它们位于西海岸的中段附近，直接相连。该地区北侧和南侧的海滩是两栖登陆的绝佳位置。康诺利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将炮口对准了这些海滩及其上方的地面，包括北边的阿桑角和阿加尼亚附近，以及南边的江恩角和阿加特。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日军很清楚美军将会在哪些地方登陆。岛上的司令高品彪中将在海滩上监督建造了众多壕沟和固定的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在后来确定的登陆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里，这些防御工事遭到了长时间的重炮轰击。

7月21日上午，第3陆战师和第1临时陆战旅同时进攻，分别在阿桑

和阿加特海滩登陆。登陆行动遭到岸炮的猛烈反击，尤其是在南部海滩。南部的登陆部队迅速前进，拿下了阿加特村；这片区域的海军陆战队员顶着枪林弹雨向北推进，将奥罗特半岛与该岛其他区域切断。在北部，第3陆战师在7月22日黎明抵挡住了日军的反击，然后跟在坦克后面，一直推进到丘陵地带，损失惨重，最终控制了琼尼托悬崖

（Chonito Cliff）和安德尔乐普角（Adelup Point）到阿桑角之间的所有地区，深入内陆约一英里。日本人采用了夜间渗透战术和大规模刺刀冲锋，但是像在塞班岛上一样，这种攻击总是让他们伤亡惨重。7月25日晚上，第22陆战团第3营遭遇了凶猛的反击——一群由舞刀的军官指挥的醉酒士兵从红树林沼泽边缘冒了出来，穿过美军战线，进入了指挥所和野战医院。这次进攻被美军用重机枪、大炮和迫击炮击退。日军在这次袭击中遭受重创，许多高级军官阵亡。7月25日，美国陆军第77步兵师除了一个团留作预备队，其他人都在阿加特上岸，接过了防卫滩头阵地的的工作。

7月26日上午到7月30日，第4陆战团经过5天激战，占领了奥罗特半岛。7月28日，第3陆战师在天上山与第77步兵师会合，将两个独立的滩头阵地连为一条完整的战线。7月30日，在占领了奥罗特半岛和阿普拉港之后，情况对美军有利起来。奥罗特机场被占领之后不到6个小时就修复了，第一架美国飞机（一架海军TBF鱼雷轰炸机）降落下来。

7月28日晚，高品彪将军在从指挥所撤退时被机枪击毙。他的继任者小畑英良中将命令部队在对手无情的炮火攻击下进行战术撤退，藏入该岛北部丛林密布的山丘。由于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很快就开始挨饿。8月8日和9日，盖格将军下令“把所有日本人从关岛赶出去”，美军开始向北发起最后的进攻。8月10日，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力量被歼灭，不过成千上万的日本兵仍然躲在山上，或是独自一人，或是聚成小股。斯普鲁恩斯乘坐“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阿普拉港靠岸，尼米兹将军和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则乘飞机降落在奥罗特机场。小畑英良追随斋藤义次和南云忠一，也自杀了。在夺取关岛的行动中，美军有1 214人丧生，近6 000人受伤。

攻占距离塞班岛仅3.5英里的天宁岛相对简单。美军先是在天宁镇附近佯装登陆，然后第2陆战师和第4陆战师在北部海滩大举进攻。补给品和援军可以从附近的塞班岛快速运过来。天宁岛上地形平坦，美军可以迅速推进。日军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防御陷入了混乱。在9天的战斗中，日军被逼到了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7月31日晚间，敌人的最后一次自杀式冲锋被击溃，美军宣布占领该岛。霍兰·史密斯将天宁岛之战评为“同类作战的典范”，其“结果极好地反映了作战计划和作战表现之完美”。[\[102\]](#)该岛后来成为第20航空队的主要航空基地，最终成为马里亚纳群岛1 000多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基地。

美军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不过美国人慢慢才意识到这场胜利的意义。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同时摧毁日本的航母，是对日本的帝国计划不可逆转的致命一击。东京的军国主义政府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仍然死死抱着那种荒谬的期冀，觉得继续狂热地抵抗，仍有可能迫使征服者坐到谈判桌前。但是，通过“征粮者”行动，美军获得了可以起降新式大型轰炸机的机场，可以袭击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平原地区的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这一行动还在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为美军提供了一个潜艇作战基地，敌方的多条重要海上通道都近在咫尺。美国人已经证明，仅凭航母舰载机的空中力量，就可以在太平洋的任何地方获得制空权；他们可以在海上跨越漫长的距离，进攻并占领防御坚固的岛屿陆地；而且其海空并用的两栖大军可以移动得比敌人想象的更快更远。日本海军把赌注押在了西太平洋的决定性海战上，但是这场决战在小泽的飞行员还没准备好时就开打了，结果日本的航母部队被无可挽回地彻底摧毁了。失去马里亚纳群岛还让当时的日本政府倒台，产生了新首相和新内阁，新政府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方式来摆脱战争（不过没能成功）。

两年前，欧内斯特·金坚持要求尽早在所罗门群岛发起太平洋战区的反击。他能够影响心系海军的罗斯福，与马歇尔将军也关系很好，因此他的“瞭望塔”行动获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当地的海军司令戈

姆利将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表示反对，认为该行动没有保障。金驳回了他们的意见，而且冒犯了麦克阿瑟，因为麦克阿瑟希望这场行动能在他的单一指挥下进行。虽然有人警告金，美军在南太平洋地区还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空中力量和后勤保障能力来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金仍然相信自己崇尚进攻的直觉。他指出，日本人也有类似的劣势。假以时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确可以扩大优势，但是那样也会使不断在所占领土上挖沟筑垒的守军有更多时间加固防御工事。

如果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被击退——在1942年9月和10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金可能会失去指挥权，而太平洋战争的进程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执行“瞭望塔”行动的人带着沮丧的情绪，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鞋带”行动，但是行动的结果证实了金的早期反击战略的正确性。在随后的1942年和1943年赤道南北两边的行动中，作战计划者必须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抓紧决策，指挥官则不得不面对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但是美军总是在日军预料的时间之前出现，而日军不得不匆忙应战。“我认为，在任何地方，你们都是在我们防守准备好之前展开的进攻，”野村吉三郎将军在战后告诉审讯者，“你们来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快得多。”^[103] 日军也有许多防守条件成熟的岛屿，但是美军直接绕过了这些岛屿，让防御者的计划胎死腹中。

到了1944年初，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时经济使物资不再短缺。此时，两栖作战达到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在塞班岛上，美国地面部队时常抱怨说需要某件物品，但得不到。例如，他们的便携式无线电台由于缺少备用电池而经常无法使用。电池是有的，在特纳的运输舰上，数量充足。但是它们没有及时送到无线电报务员的手中，这可以归咎于惯常发生且不可避免的混乱局面。物资要经过复杂的步骤才能从近岸的船舶转移到滩头供应处，最后再转交给前沿阵地的步兵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这只需改善文书工作和记录工作就行——如果海滩勤务队队长不知道滩头有什么，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他们就不能及时地把它送到前线。效率低下的问题被一一记录下来并得到纠正；所有人都从经验中不

断学习，程序稳步改善。

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在战后讨论这场战争时，常常会提到：在重大战役中，美军一流的后勤甚至比战术决策更重要。^[104]斯普鲁恩斯决定让他的航母舰队在1944年6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停留在塞班岛附近，这一争议性决定让后人大费笔墨。而在莱特湾海战期间，1944年10月24日至25日夜间哈尔西决定向北追逐日本航母的决定，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上述两个情况中，不同的战术可能会改变当时战役的结果，但是都不会对整场战争的进程产生持久的影响。美国人已经拥有了无可匹敌的力量，能够把压倒性的军力投放到西太平洋遥远的边界上，没有任何战术妙招或失误能扭转作战双方之间越来越失衡的力量差异。

7月17日，尼米兹和金乘飞机在新平定的塞班岛降落后，两名将军都极力赞扬斯普鲁恩斯，说他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的表现完全令人满意。“斯普鲁恩斯，你在那里做得真是太棒了，”金下飞机时说道，“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你的决定是正确的。”^[105]他果断地执行了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滩头堡。美军拥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每个月都会更明显——最高指挥部并不需要任何自以为是的战术，让人以为如若不然日方还有可能获胜。美国舰队总司令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从高处审视整体的战略，凭直觉认识到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将会“以数量取胜”。

第10勤务中队能够在缺少必要海岸设施的情况下提供后勤支援，这确保了第5舰队能够在荒无人烟的中太平洋环礁上展开军事行动。现在，马里亚纳群岛上建立了一个永久的高级前进基地，该基地将为美军对菲律宾和日本本土的最后攻击提供支撑。关岛位于从美国本土延伸至瓦胡岛、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的5 800英里供应线的末端。这是一个面积210平方英里的大陆岛，拥有大片的陆地，可以建设机场、军营、仓库、港口设施、燃料库、训练场地、娱乐设施以及新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它横跨在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要海上航线上，地理位置适合为下一次进攻提供支撑。这座岛屿上居住着友善而忠诚的土著居民，它曾经

是美国的领土，以后也是美国的领土，在日本战败之后很久仍是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力量的基石。

在关岛的战役仍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美军就开始改造这里了。当时驻军和港口负责人冒着炮火上了岸，指挥船只登陆海滩。每天都有数千吨材料运到岛上。经历了前两周的空中轰炸和舰炮轰击后，岛上只有极少数仓库幸免于难，因此大多数补给和装备露天堆在一起。在小阿道夫·E.贝克尔上尉的指挥下，前沿海军基地建设部队“狮子六号”开始清理阿普拉港，让这个港口做好接收大型货船的准备。他们延长了码头，支起反潜网，并用碎珊瑚填充建造了一条堤道，将临时的浮码头与岸边连接起来。海军第5工程旅是第一批到达该岛的海军工程部队，升级并扩建了机场，铺平且拓宽了道路。曾经担任尼米兹陆基航空兵司令的低调将领约翰·胡佛担任马里亚纳群岛的总司令，并在关岛建立了新的司令部。大部分运输舰和许多军舰撤离并驶向珍珠港。

在基地建设的早期，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很糟糕。士兵被安置在帐篷里，但他们的露营区频繁遭遇暴雨带来的洪水，因此需要建造平台帐篷，用于住宿和办公。大家吃的是罐头口粮，直到他们在匡西特活动房屋里搭建临时厨房。岛屿内部有个水库，可以给沿海城镇供水，但是管道已被海军的炮击摧毁，因此所有淡水都必须装在5加仑的容器里用船队运过来。日本兵的尸体埋得很浅，因此埋尸体的地方聚集了大量的苍蝇并飘散出恶臭，美方必须把这些尸体挖出来火化。携带着热带疾病的蚊子造成了紧急的卫生问题，工程队不得不排干沼泽和其他地方的积水并喷洒消毒剂。燃料装在55加仑的桶中运上岸，露天存放。有一些燃料堆起了火，由此引发的大爆炸和火灾会持续数日。日军埋下的无数地雷散落在海滩和小路周围，有几个人走到了尚未被扫雷队清理的地方，触雷遇难。

美军作战部队和工程队有上万人需要吃饭。海军预备队有一名上尉在旅馆和饭店工作过，开办了第一个大型食堂，厨房占用了一整座小型匡西特活动房屋，食物通过小窗口直接盛到士兵的饭盒里，要想打上饭

常常要排两个小时的队。美军还承担了为该岛2.4万查莫罗原住民提供食物和庇护的责任。其中许多人的家园和村庄已经被摧毁，或者还有敌人骚扰他们，因而不安全。8月初，约有1.8万平民居住在海岸附近的三个难民营里。

岛上未铺装的道路被坦克、吉普车和卡车反复碾过，雨季到来后，变成了无法通行的泥潭。许多车辆陷在淤泥里动弹不得，最终被遗弃。原始的牛车道和人行小道必须加宽、延长并铺装。但是把珊瑚岩运送到原始的水泥搅拌区需要大批卡车，卡车的数量却始终不足，也没有足够的机修工和零件维修卡车。这些卡车每天24小时不停运行，司机轮班工作。通往珊瑚坑的道路是最先要改善的，因为在能够生产大量的珊瑚水泥之前，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道路要建得坚固耐用，建筑商会遵照他们在美国建造道路时所使用的标准。外露的岩石和山脊被炸开，斜坡被重整坡度。在美军宣布占领该岛之前，苏迈和阿加尼亚之间的一条四车道公路就在建设了。在战争结束之前，关岛铺设了超过103英里的新道路。

在敌人两年半的占领期间，劳工部队在奥罗特半岛建造了一个4500英尺长的简易跑道，表面铺着碎珊瑚。工程营队员清理了飞机残骸，将它们推到跑道两侧，跟泥土混在一起，堆成了高高的土丘。水手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惊叹于这些残骸能立得如此之高：“这些扭曲的铝和钢的残骸，看起来像是垃圾堆。”^[106]该岛的北部三分之一主要是石灰岩高原，适合修建B-29的机场，每块机场长8500英尺，宽200英尺。1945年初，施工队开始砍伐丛林，建设两条大跑道。

一名基地施工军官后来回忆了在关岛遭遇的困境：“岛上的人太多了也太少了——人太多了，是因为已经建成的住房总是不够用；人太少了，是因为要做的工作太多了。”^[107]住帐篷的人往往因为疲惫和热带疾病而病倒。预制的匡西特活动房屋是一种解决方案，成千上万的波纹钢套件从阿普拉港的新浮码头运上岸。施工队已经被大型工程项目搞得精疲力竭，匡西特活动房屋又不需要特殊机械来建造，因此许多美国海

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被告知：“这就是你们的房子——自己动手搭起来吧。”^[108]各种构件都有明显的标签，而且很容易用螺丝固定在一起。住宿条件逐渐改善，所有营房都配上了淋浴池和洗漱台。到1945年初，阿普拉港和奥罗特半岛附近的整片区域都是对称排列的匡西特活动房屋、大型预制办公建筑、仓库和飞机库。来访的军官及文职人员住的是布置得令人舒适的单身军官宿舍，屋里是双层床，由海军勤务兵打扫。

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战争留下的废墟被推到了道路两旁和丛林边缘，关岛开始有点基地的模样了。巨大的油罐区和管道系统中储存了50万桶燃料油，另有32.8万桶航空汽油。^[109]数百个大型钢拱仓库里装满了弹药和装备。新鲜食品储存在6.8万立方英尺的冷库中。海军航空运输处（NATS）的大型客机按钟点到达和离开，这让奥罗特机场看起来跟美国国内的重要商业机场没有两样。在“征粮者”行动之前，有人曾预测阿普拉港顶多容纳十几二十艘大型舰船，但经过大规模的改建，延长了码头后，它可容纳多达231艘现役舰艇。^[110]复杂的供水系统从67处泉水和水库中汲水，经过处理后，每天提供1 200万加仑饮用淡水。5家医院配备的床位足够9 000人使用。有一座匡西特活动房屋内入驻了设施先进的传染病研究实验室，配备了该领域的顶尖医生。血液和粪便样本从其他太平洋岛屿空运到关岛。医生们用小白鼠来观察疾病，识别病毒，研发疫苗。

1945年春，在欧洲战区成名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来到关岛。沿海的老城仍然是一片废墟，堆积如山的烧焦瓦砾让他想起了西欧。然而，在道路的尽头，一转弯，他就看见了一片白色的混凝土和一排长长的小屋，这个场景就是放在瓦胡岛上，也不会让人觉得不搭调。派尔对这个偏远太平洋前哨基地的仓库中储备的物资、补给和弹药的数量之多感到惊叹。“你可以任意选择K型口粮^[111]、木材或炸弹，”他写道，“你会发现那里的粮食足够供养一座城市，木材足够建立一座城市，炸弹足够炸掉一座城市。”^[112]

尼米兹和他的一小部分参谋于1945年1月搬到了关岛上。新的前沿司令部和他的住所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山”上，那是一个山崖，可以俯瞰阿加尼亚的废墟。他的副官阿瑟·拉马尔将新建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住宅描述为“美丽的白色隔板小屋，四间卧室加四间浴室，通向一个方形庭院，庭院里种植了花草。我们有一个大大的客厅兼餐厅，还有一个长长的凉亭，就在悬崖边上，可以俯瞰海港”。[\[113\]](#)同珍珠港一样，院子里建了一个马蹄铁场和射击场。作战计划部门和作战活动部门的核心成员陪同总司令来到了关岛，但大部分成员仍然留在珍珠港。尼米兹总是喜欢小规模的工作班子，一直在努力控制手下的人数，他对这一新的环境感到满意。他采纳了在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盛行的“无领带”政策，但这个政策从未在珍珠港流行过。在瓦胡岛不允许穿卡其色制服短裤，但在关岛是可以穿的；让其他人感到惊讶又有趣的是，尼米兹自己经常穿着这种短裤。

不断扩张的营地最终容纳了16.5万多人的部队，包括好几个陆战师和陆军师。在日本投降日之前，关岛总共有20多万美国人。由于交通不便，大多数部队从未离开过自己的营地。他们也没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每个营地都配备了许多像家里一样舒适而便利的设施，还提供了许多娱乐项目。来自美国的平民参观者惊讶地发现，这里平均每晚放映200多场电影。几乎所有电影都是露天放映，放映场所一般是山坡上自然形成的圆形剧场，人们坐在板条箱、原木或老旧的燃料桶上观看。营地之间会交换电影片盘，但大家难免会观看同一部电影二三十次，到最后，他们甚至可以对着演员的口型背诵对白。在刚刚排完地雷的地方，人们建起了棒球场、橄榄球场和篮球场等，还设立了运动局，负责组织大型的体育联赛。拳击场有35个，有一场宣传得很好的拳击赛竟然吸引了1.8万名观众。

成千上万台收音机被分发到营地。“太平洋美国远征军电台”会播送新闻和娱乐节目，但许多听众仍然喜欢东京广播电台的流行爵士乐和滑稽的政治宣传。日军纪念品的交易相当活跃，某些物品（特别是敌方的

战旗和武士刀）的价格最终涨得非常高。巡演的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会在户外舞台上表演，周围摆满长椅。勤奋的演艺人员每天通常会进行四五次相同的演出，乘着大巴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海军给关岛运来了40架钢琴。军队内部也开始进行演出，好多节目是拿自己的指挥官开玩笑。几十家商店或陆军消费合作社提供了香烟、糖果、杂志、苏打粉、冰激凌、洗漱用品和土特产。货架每天都会被席卷一空，往往不到中午就没有东西了。而在一些较大的营地中，人们认为有必要在一个地方建两个相同的商店，这样一家补货的时候，另一家就可以营业。啤酒实行配给制，每人两罐，可以在大型休闲场所和啤酒花园里领到。现金流通起来，军需官把钱发给军人，军人在商店里消费，最后现金又回到军需官那里。平均每天有3万美元被送回美国。[114]

日军有些散兵游勇仍然隐藏在植被茂密的山上，他们俯瞰着超级现代化、全能和繁荣的军事文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忍饥挨饿，思考自己还有什么出路。偶尔有美国兵遇到伏击，或被狙击手打倒，但大多数幸存的日本人似乎只是专注于搞到吃的，生存下去。岛上的美军指挥官意识到，那些拒不投降的日本人在遭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因而其造成的威胁会越来越小，他们对其围而不攻，耐心等待时机。带着大喇叭的卡车在北部山地土路上慢慢地开，广播劝降通告，告诉日军可以体面地投降。他们还用飞机散发传单。一些日本战俘被送回丛林，劝说他们的战友放弃抵抗。

许多日本兵饿到绝望的地步，偷偷溜到美军营地附近窃取食物。哨兵经常在粮库、仓库或食堂附近打死或俘获这些消瘦的入侵者。还有一件经常被人提到的趣事：有人发现一名日本士兵坐在一群看露天电影的海军陆战队员中间。被发现后，他咧嘴大笑，举起了双手。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如厕时遇到了一个日本兵过来投降，后来这个日本人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打死的可能性最低。有一天晚上，有人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住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掉队的日本兵，尼米兹的海军陆战队警卫把他赶回了丛林，此时穿着睡衣的尼米兹也提着一把手枪从房

子里出来了。

即使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仍有数百名日本人在关岛的丛林中，拒不投降。他们组成小群体，生活在洞穴中，通过捕猎蜥蜴、蟾蜍和老鼠，捕鱼，或是从当地农场和村庄偷窃食物而存活下来。查莫罗人在1941年至1944年日本占领期间受尽折磨，因此一旦发现日本人，就会攻击他们。后来日本政府派出了使者。自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每年都会有一队誓死不从的日本人从丛林里走出来。

关岛的最后一个坚守丛林的日本人是横井庄一军曹。他是爱知县人，在塔洛福福河谷的一个偏远地区一直住到1972年。这个现代翻版的鲁滨孙在丛林中生存了近28年，靠吃水果、坚果、蜗牛、老鼠、鸽子、虾、鳗鱼和当地植物维生。他的故事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了熟练的荒野生存技能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横井庄一用野生芦苇和帕果纤维织物制作陷阱。他经常洗澡，只喝烧过的水，以避免生病。他挖了一个地下防空洞，并在洞内安装了竹墙和地板。直到1964年，他仍然偶尔与其他拒不投降的日本人保持联系，但在最后8年的痛苦时光里，他是孤身一人度过的。1972年1月，他被两名查莫罗当地人抓获，这时横井庄一竟然能准确地说出当时是何年何月。医生诊断后认为这个56岁的男子身体健康，心智正常。

他回到日本后，举国轰动。横井庄一说，他1952年的时候就知道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投降的耻辱令他感到恐惧。“我很惭愧，我活着回来了。”他告诉记者。在前往皇宫拜会天皇时，他对天皇和皇后说：“天皇陛下，我已经回到家了。未能报效陛下，我非常遗憾。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我为您效劳的决心永不改变。”[\[115\]](#)

这种情感总是能够激发日本人的想象力。他的许多同胞称赞横井庄一是真正的武士，是武士道和奉献精神的典范。也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故事是个悲剧，令人心酸。只有极度狂热的人才会在得知战争失败后选择在丛林中独自生活20年。难道不正是这样狂热的情感导致了日本1945年的惨败吗？

-
- [1]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434.
- [2] "Commander Joint Expeditionary Force, Marianas Operations, to CINCPAC," August 25,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August-September 1944," Box 185.
- [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197.
- [4] CINCPAC to COMINCH, May 23, 1944, in CINCPAC War Diary, Book 5, p.220.
- [5]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2.
- [6]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9.
- [7] Notes by Glen C.H.Perry, King's meeting with reporters, February 18, 1944, in Perry, "Dear Bart," p.248.
- [8] Buell, *Master of Seapower*, p.439.
- [9] Spruance to Samuel Eliot Morison, January 20, 1952,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 [10] Narrative by Arleigh Burke,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recorded August 20, 19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4.
- [11] Astor, *Wings of Gold*, p.257.
- [1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89.
- [13]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30.
- [14] Zurlinden, "Prelude to Saipan, 15 June, 1944," p.582.
- [15] Robert B.Sheeks, oral history,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92.
- [16]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40.
- [17] Richard King, letter to his parents, September 8,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p.300-2.
- [18] Hopkins, *Nice to Have You Aboard*, p.138.
- [19]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234.
- [20] Entry dated June 17,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07.
- [21]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5,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10.
- [22] Blair, *Silent Victory*, p.653.

[23]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Series I,correspondence, Box 2, Folder 1.

[24] Spruance to E.B.Potter, February 21, 1955,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3.

[25]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80.

[26]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195.

[27]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5, 1944,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18.

[28]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197.

[29] Ibid., p.195.

[30]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43.

[31]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p.81.

[32]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20,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33] Westcott,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p.80.

[34] Ibid., p.82.

[35]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p.77-78.

[3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 p.354.

[37] Thach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73.

[38] Taylor, *Magnificent Mitsche*, p.215.

[39] Charles Moore,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655, Vol.5, p.1021.

[40] George W.Anderson Jr.(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83, p.140.

[41] Narrative by Arleigh Burke, Office of Naval Records and Library, recorded August 20, 1945,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4.

[42] Paul H.Backus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43] Arleigh A.Burk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63.

[44] "Com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Operations from 11 July 1944 to 3 July 1944,"Commander, VF-15, p.3, CINCPAC Serial 003607, in NARA, RG 38,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Box 36.

- [45] Cmdr.Ernest Snowden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82.
- [46] Entry dated June 19,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71.
- [47]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p.91.
- [48] Lt.Cmdr.Zenji Abe, oral history,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55.
- [49]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277.
- [50] Ibid., p.279.
- [51] Danton, "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 p.1025.
- [52]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9,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23.
- [53] Taylor, *Magnificent Mitsche*, p.227.
- [54]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for June 1944, A12/1, Serial 00398, entry dated June 19,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July to August 1944," Box 184, p.23.
- [55] Entry dated June 19,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11.
- [56] Ibid., p.409.
- [57] Telegram No.2220, cited in *ibid.*, p.412.
- [58]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再版于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200。
- [59] Truman J.Hedding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72, p.79.
- [60] Clark, "Marianas Turkey Shoot,"再版于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p.200。
- [61]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3.
- [62] Don Lewis account (excerpted in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3.
- [63]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97.
- [64] Ibid., p.298.
- [65] Don Lewis account (excerpted in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 p.177.
- [66] Entry dated June 20,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14.
- [67] Alex Vraciu quoted in Astor, *Wings of Gold*, p.307.
- [68] Spruance to E.B.Potter, January 2, 1960,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3.
- [69] Harper, *Paddles!*, p.222.
- [70]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05.

[71] *Enterprise* Action Report, VT-10 enclosure.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72] Paul H.Backus (ret.), USNI Oral History Program, 1995, p.195.

[73] James D.Ramag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184.

[74] Excerpt from the *Ottumwa Courier*, 引用自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15。

[75]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p.90.

[76]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77]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Maj.Gen.Jarmon, 23 June 1944,”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Coll/2949, Box 1.

[78] Richard King, letter to his parents, September 8,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p.300-2.

[79] Spruance to Nimitz, July 4, 1944,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80]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81]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1.

[82]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1.

[83] Entry dated June 25,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76.

[84] Bradlee, *Good Life*, p.78.

[85] CINCPAC to COMINCH,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 June 1944,” dated November 7, 1944, A16-3/Sum, Serial 003623, FDR Map Room Papers, “U.S.Navy Action Reports, March to June 1944,” Box 183.

[86]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3.

[87] *Ibid.*, p.289.

[88] “Lieutenant General Saito’s Last Message to Japanese Officers and Men Defending Saipan,”translation of D-2 section of 4th Marine Division, captured July 9, 1944, Ernest J.King Papers.

[89] From a captured Japanese officer’s personal account, cited in Appendix IX, “Saipa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y Major Carl W.Hoffman, USMC, Historical Branch, G-3 Division,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1950, p.284, USMC Archives.

[90]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65.

[91] Taro Kawaguchi diary excerpted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 p.126.

[92]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269.

- [93] Ibid., p.270.
- [94] Takeo Yamau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89.
- [95]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249.
- [96] “Saipan,” HM9-16, p.6, published by the 2d Marine Division, 1944, USMC Archives.
- [97] Rogal,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p.156.
- [98] Entry for Thursday, July 13,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 p.190.
- [99] Entry for Sunday, July 16, 1944, in *ibid.*, p.191.
- [100] Robert B. Sheeks account in Smith and Meehl, eds., *Pacific War Storie*, p.193.
- [101] Ibid., p.192.
- [102]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01.
- [10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 Vol.2, p.387.
- [104] 参见，比如，Spruance’s commencement speech at Brown University, June 1946, Raymond A. 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 Folder 4。
- [105] Buell, *Quiet Warrior*, p.320.
- [106]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November 2, 1944, in Raines, *Good Night Official*, p.114.
- [107]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08.
- [108] Lewis Thomas accoun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37.
- [109]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p.353.
- [110]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07.
- [111] K型口粮，美军三包一天份的口粮，里面有肉、饼干、香肠等。——译者注
- [112] Pyle, *Last Chapter*, p.19.
- [113] Lamar, “I Saw Stars,” p.26.
- [114] Hammer, “Organized Confusion,” p.417.
- [115] Kristof, “Shoichi Yokoi, 82, Is Dead.”

尾声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会尽可能地将阵亡战士的骨灰带回国内。尸体掩埋队会挖个坑，在坑中填上枯树枝，将遗体堆叠在树枝上，倒上汽油，然后点火。野原挺进（Teishin Nohara）是一名士兵，来自栃木县，曾在中国作战。他回忆说，火葬一定要尽快完成，但有时也会做不好。“就像烤沙丁鱼一样”，他回忆道：

只要点着火，等火烧光木柴就可以了。接下来把燃烧后留下的骨头捡起来放进袋子里，然后在标签上写下死者的名字。当然，你会默默地祈祷，但是并不会有任何“仪式”。毕竟是战争时期，谁也无能为力。如果下雨了，都没法彻底火化。假如说营长死了，恐怕也只能把他的肉体烧一烧，捡一点骨头带回去给他的家人。这些事实是绝对不能告诉死者家属的！所以，火化的时候一定要快。不停地点火，不要停下来。十个。二十个。必须要快。[\[1\]](#)

这些装着死者的袋子随船运回故土，送到各个地区的分配中心。每个死者的骨灰都会重新放到一个小木盒子里，用干净的白色棉布仔细地包裹起来。这些骨灰盒将按照死者的家乡所在地区和乡镇进行分类，然后由一列特殊的殡仪火车送到家里。地方的军务处会提前得知火车的抵达时间，以便安排仪式来纪念“战死沙场者归来的灵魂”。

随着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家属代表会上前鞠躬。一扇窗户会打开，一名戴着面罩和白色手套的士兵会将骨灰盒递出来。家属收下骨灰盒后，这名士兵会鞠躬并关上窗户。木村文雄（Fumio Kimura）是在滋贺县负责这一任务的士兵，他回忆这种熟悉的情景时说：“年迈的父母和

年轻的妻子或是拉着孩子的手，或是将婴儿抱在怀里，紧紧抱住骨灰盒痛哭。‘这是你的父亲。’一想到**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明天**，我们这些士兵也就会跟着落泪，但我们只能安静地站在窗户边上。”^[2]

死者家属将骨灰盒带回村里，整个过程气氛凝重。通常，死者家属的邻居、朋友，还有当地官员、僧人、老兵以及当地爱国协会的代表会在一旁陪伴。此时，学生往往也会由人带着走出校门，在死者回村的路上排队鞠躬。

若是遗体没有找到，比如说海员死在了海里，那他的家属可能会收到一只空盒子。生活在东京的男孩安西均（Hitoshi Anzai）发现，每当他摇晃那据说装有他哥哥骨灰的盒子，盒子里都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他为此很好奇。他哥哥随着沉没的舰船葬身海底了，那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他祈祷后打开了盒子，发现了一小块木片，上面写着哥哥的名字。这木片钉在了盒子底部，但是没有钉得很牢，因此“摇晃的时候，听起来好像真的放着逝者的骨头”。^[3]这男孩很生气，觉得自己被骗了。更令他愤怒的是，他发现哥哥的名字写错了。

驻守松山的士兵和泉彻（Toru Izumi）奉命接收并发放在南太平洋战死的数百个士兵的骨灰。和泉彻以及他的战友向那些只能领回空盒子的家属表达了遗憾之情。40多年过去后，他痛苦地坦承：

我们一想到死者家属的心情，就不忍心将空盒子交到他们的手上。讨论过后，我们认为，既然这些士兵是一起去世的，那么，为任何一个逝者的骨灰祈祷都是一样的。我们无法面对那些拿不到死者骨灰的家属的巨大悲伤，我们也认为这些战死沙场的英雄应该更好地安息，于是决定从其他盒子中取出一部分骨灰。我们始终都感到不安，或许这样欺骗死者亲属是错误的。我们将骨灰分开装进不同的盒子里，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双手一直在颤抖。至今，我也不能确定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件事一直是我内心的创伤，永远都不会愈合。^[4]

日本报纸整版都在报道阵亡士兵的故事。军务处一公布死者的姓名，当地的记者和摄影师就会赶到死者家里。死者的直系家属往往是通过记者了解到亲人死讯的。“你以为他们知道了，但其实他们往往什么都不知道，”日本《读卖新闻》的河内卯一郎说，“他们会号啕大哭。这让人痛彻心扉。”^[5]记者通常会向家属要一张死者的照片——如果能把照片带回编辑部，河内卯一郎说，这次的报道肯定会“登在报纸上。……每家报社都争着要照片”。^[6]

编辑和军队的审查员不喜欢那些过分渲染死者亲属悲伤情绪的报道。报道应该突出死者“值得称颂的美德”以及家属对于将生命献给国家和君主的儿子、丈夫或是父亲的自豪。在太平洋战争的中期，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记者们开始反复使用固定的说法：“他们说话时没有掉一滴眼泪。”（河内卯一郎说，他经常使用这句话，“不管他们实际上流了多少眼泪”。）时间久了，编辑和记者就整理出来几套故事模板，可以一直反复使用：

准备在报纸上刊登一连十篇文章时，所有参与的记者会一起商讨主题以及各自的语言风格。“我将采用‘年轻母亲’的口吻。”“我要写成‘内心挣扎但勇敢的母亲’那种类型。”就像这样，我们会确定这一连串报道的主题。语言风格有许多种。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写你想要的故事。你可以写这样一位母亲，她为自己的儿子哀悼、痛哭，她哭得太久、太激动，脸因此肿胀起来，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死去的儿子将出现在她面前，乞求母亲：“别哭了，妈妈。当你哭泣和悲伤的时候，我也感到痛苦。”于是母亲停止了哭泣。这就是我们写的故事。我们不能每次都写一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主要参战国都实行了新闻审查，但是日本对战时新闻的奥威尔式控制的意图和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珍珠港袭击后的次日早上，主要媒体的编辑被叫到内阁新闻局参与一场会议。会

上，编辑们被告知这场战争的原因是“敌人想要控制整个世界的巨大野心”，而日本媒体有义务“向日本民众的头脑中灌输仇恨美国和英国的情绪”。^[8]除了对战时新闻的日常控制，媒体代表也被强制要求参加会议，接受指导，学习如何塑造日本民众的态度和看法。媒体有义务协助宣传政府的口号：“我们必须要提高作战能力。”^[9]“我们的大后方必须承担起责任。”“奢侈是敌人。”“反对奢侈，提倡节约。”“以己之躯，尽忠报国。”编辑们还要被迫参加令人失去颜面的小组会谈，会谈中，他们关于时事的报道会被大声读出来，或是得到赞扬，或是遭到批评。新闻报道与评论文章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了。一些报道会严肃而庄重地宣扬“国体”——一种建立在对昭和天皇的崇拜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这样的报道会受到赞扬，被奉为模仿和学习的样本。

执行审查制度的从来不局限于某一个政府机构。一篇报道若是没有惹怒陆军的话，可能会惹怒海军；编辑们有时也会在两个兵种对立的要求之间无助地挣扎。地方警察局的高级军官会把“违规”的编辑或记者叫来批判，或是以牢狱惩罚相威胁。军方的媒体每个月会定期在东京一家饭店开会，所有重要媒体的记者都将“获邀前往”。（每次出席都有记录。）军方会对各个媒体近期的报道做出评论，并对后续报道的内容和主题提出“建议”（发布命令）。

这种指导通常是专制而且无意义的。军方无须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就可以判定某个用词或者表达方式是越界的。失宠的独立作家会被“封杀”：编辑不会再接其电话，也不会再接受其投稿。反复违规的人会被关进监狱，忍受毒打、折磨和饥饿，无限期监禁起来。如果某位记者的名字出现在了违规的报道上，次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他就会被征召入伍，遣送到前线去。违规的报刊会被迫暂停出版，时长为几天到几周不等，但已经足够让这家报社破产。必要时，违规的文章会被“召回”，报亭尚未售出的报纸上的违规页面会让人撕掉，报纸的首页还会盖上“修订版”的印戳。

随着各类商品越发短缺，军人集团又获得了一种有力的施压手段

——通过控制新闻纸原材料来奖励顺从者，惩罚反抗者。1942年12月，新闻局副局长告知各媒体主编，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中，新闻纸的市场供应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新闻纸将根据出版社与政府导向的一致程度进行分配。主编迫于压力，将重要记者派出去“在各个行政区里为宣扬新闻局的圣战言论而演讲”。[\[10\]](#)

日本的识字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的水平，报刊业无疑是有利可图的一大行业。一些野心勃勃的报刊负责人迅速意识到，战争及其带来的压力为提高发行量创造了机会，因为有一些竞争对手因拒绝过分宣扬极端爱国主义言论而被迫关门了。新政权的主要受益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是日本最大的日报社，发行量超过了200万。

《朝日新闻》的规模足以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的内部“稽查组”，即内部的审查制度，以最大程度上避免任何一篇文章出现与官方不符的言论。主要的几家报刊为争取读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据《朝日新闻》的记者秦正流后来描述，竞争焦点并不是“终将留给历史的报道的质量和准确性，而是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民众的情绪。面对这样的压力和竞争，有些记者在报道中谎话连篇”。[\[11\]](#)

一些明星记者会被派去对东京的大本营进行报道。在日本新闻界，成为总司令部的记者属于最荣耀的事情——然而在这份工作中，河内卯一郎回忆道，记者不过是一个地位显赫的速记员而已。所有对大本营进行报道的记者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下工作，必须穿上没有徽章的军服。刊载文章时，这些记者的名字后面经常写着位于某某前线，这当然是假的，因为他们从未离开过东京大本营的大楼。官方消息一经公布，记者们就要逐字复制，不能出现任何不一致或是错别字。官方的措辞必须完全照搬，哪怕只动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都将导致出版社被撤销营业资质。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错误，记者首先会致电新闻编辑部，在电话中读出官方消息，然后亲自将复印件送到等在门外的骑摩托车的快递员手中。快递员火速赶到新闻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把文件交给编辑，好赶在最新一期刊登之前再对文稿进行两三次检查。

河内卯一郎是《读卖新闻》派出的对大本营进行报道的记者，他说大本营的官方消息拥有近乎神圣的地位，因为是以昭和天皇的名义发布的消息，加盖了天皇的玉玺。誊抄中出现的任何错误都相当于亵渎神明。报纸上引用天皇的任何言论都必须严格依照规定。“昭和天皇”四个字必须与前后的文字用一个空格隔开，而且绝对不能出现在某一页的最后一行中——正确的做法是，将末行空出来，将天皇的名字写在下一页开头的一行中。河内卯一郎说，大本营在战争后期日益明目张胆地散布谎言，背后的原因是对天皇的崇拜。由于天皇永无过失，过去的种种声明无疑都是正确的。那么按逻辑推断，一切新的官方消息和命令都必然与此前的一致，因而也一定是正确的。“那时，要说天皇会犯错误，是不可想象的，”河内卯一郎说，“他是个神。他说过的话不容更改，也不容任何人指出其错误。”^[12]因此，为了掩盖过去的谎言和错误，新的谎言不断编织出来，直到这个政权在重压之下失去权威性和可信度。

日本战时媒体中的输家主要是以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为读者群体的小型周刊和月刊。在战前几年，这类出版物大多提倡“自由主义”或是支持民主，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较为宽容，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异见。

《中央公论》自19世纪起就开始连续发行，属于日本最具权威性的公共事务杂志，一直反对军阀对国内政治的干预，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过去的种种足以让《中央公论》及其员工遭受严厉的审查，然而，该杂志设法调整定位，与右翼相一致，于是凭10万的发行量维持了下去。畑中繁雄是《中央公论》的主编，1943年被剥夺主编位子之前曾雇军官撰文，保证其主题满足军方要求。他把这样一群投稿人称为他的“魔法盾”。与此同时，畑中繁雄说，该杂志也在以“阳奉阴违”的写作方式尽其所能地传递自由主义的火炬——“听上去我们是顺从右翼的，但这只是社论或风格在表面上的顺从。”^[13]

编辑们每个月定期与军方会面，他们会勇敢地声称《中央公论》的任务是劝服知识分子支持战争。他们指出，《中央公论》的读者非常聪明，因此很难被表现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和机械的标语口号说服，要靠

讲道理才能劝服他们。但是，这样的说法得不到军方的认可。“在一次会议上，”畑中繁雄回忆说，“他们公然说我们《中央公论》的人都该剖腹自尽。”

他们说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必须全心投入战争”是他们的口号。对他们而言，这就意味着升起日本的国旗，唱响军歌并且大声欢呼！对战争持虚无态度也是错误的。他们说，只要看看我们的脸色，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顺从。[\[14\]](#)

畑中繁雄若是希望从编辑同行那里得到支持，那这种希望只会落空。当《中央公论》受到惩罚时，他的同行都冷眼旁观。他想，或许那时他们心中想的是“这是他们活该！”[\[15\]](#)若是当权者要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赶出出版界，那再好不过了。若是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求情，那自己的出版物也会受到关注，遭到更多审查。1943年3月，军方命令所有日本杂志都印上这样一句口号：“我们永不停火，一直打到我们的敌人停火。”按照指令，这句话要印在封面上，但是《中央公论》却将其印在了杂志的内页上，位于社论后面。这一拒绝服从的举动终结了这家杂志社的命运。几天后，军方下达了停业的命令。畑中繁雄被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度过的9个月中，他几乎天天都遭受毒打和折磨。

1943年11月，所有报刊都禁止展开新的订阅业务。自那以后，只有先前订阅过的读者可以继续收到报纸。小型的报社开始合并。报界两大巨头《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奉行激进的民族主义路线，先后吞并了许多小型的竞争对手。到1944年，更多一度蓬勃发展的报刊停业关门，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几家巨头。这些报刊服从军方，垄断了新闻的采集和报道，由此极大地简化了官方审查工作。读者们私下里抱怨，报亭里每一种报纸上刊载的都是毫无区别的政府核准的废话。

1944年6月20日下午，战败的第一机动舰队向北撤回日本，大本营的参谋很想搞清楚小泽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通信往往不完整也不清楚，但是仅有的那一点信息已足够让人判断出情况不容乐观。确定无疑的是，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被击沉，而且6月19日出击的飞机中只有少数返回。但是日方尚存希望，他们认为在此前的行动中，日军或许也血洗了敌方舰队，另外小泽的一部分飞机也许飞到了关岛。日军侦听到的一段美方无线电广播中提到了“邦克山号”的“幸存者”，这让日方进一步相信该航母已被击沉——但是接下来侦听到的信息提到的是被击落的飞行员，而没有提到船员。^[16]6月20日，美方的舰载机对小泽发起攻击，击沉了第三艘日本航母（“飞鹰号”），此时大本营的参谋都意识到了危机迫在眉睫。如果说斯普鲁恩斯能够横跨菲律宾海，对小泽紧追不舍，那么斯普鲁恩斯的舰队一定是完好无损的。日本海军大败的局面也就变得一目了然了。当日晚上，斋藤义次将军位于塞班岛的司令部发来消息，称美军已经夺取了该岛的南半部。如果得不到海军支援或空中支援，斋藤义次的军队从战术上来说就没有希望了，美军彻底夺取塞班岛只是时间问题。

军方高层私底下表示：“我们对于战争胜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17]在欧洲，盟国从诺曼底滩头堡向东推进，苏联则向西攻入波兰。裕仁天皇的军事顾问曾私下告知天皇，日本必然会丢掉塞班岛。但是天皇不愿意接受这一判断。他向军方高层施压，让他们想尽一切方法来扭转局面。“我们若是失去塞班岛，接下来，东京就会遭受持续的空袭，”裕仁天皇对东条英机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必须守住那里。”^[18]6月20日傍晚，在皇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裕仁天皇命令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集合一切可动用的海空力量，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再次发动决战，然后派军队登陆双方正在争夺的岛屿。

军令部非常清楚，天皇的提议在战术上是愚蠢的，但还是连夜设计出了作战计划草案，6月21日的时候在军中传阅。海军中将志摩清英所率领的第五舰队将会从本州岛北部的大凑警备府召回。志摩清英的舰队

将与两艘供油舰以及一艘搭载着一整个团的运兵舰会合，然后于7月2日从横须贺向马里亚纳群岛出发。另一个陆军师将会登上总吨位8万吨的运输舰，在7月的第一周出海。小泽舰队中的幸存舰船将得到“海鹰号”、“大鹰号”以及“神鹰号”三艘护航航母的支援。小泽在近期的作战中几乎失去了所有飞机，因此将让海军飞行训练中队和陆军战斗机投入使用。栗田健男将军的第二舰队此前接到的命令是前往新加坡地区，现在将在濑户内海西部补充燃料，重整军备，然后直接返回马里亚纳群岛。所有可以动用的陆基飞机都要借道硫黄岛，重新对美军航母舰队发动空战。要及时摧毁美军舰队，好让增援部队登陆塞班岛。

这个夺回塞班岛的计划是在现人神（天皇）的命令下，并且是在绝望的深渊中制订的，看上去就非常荒谬。日本人甚至不知道能否提供足够的燃料，让各支舰队到达作战地点。美军潜艇将会摧毁更多的日军舰船。美军水上飞机会及时发现正在逼近的日军。陆军方面坚决反对让陆基战斗机中队登上航空母舰，他们甚至不知道陆军飞行员能否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运兵舰要想接近塞班岛，就需要难得的好运气；哪怕陆军真的登陆了，也会在海滩上被消灭。然而，昭和天皇早已对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失去了信心，不想听他们的反对意见。连续三天，日军各军种都在忙不迭地制订并执行一项无异于自杀的作战计划。6月24日，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将军正式提出反对。同一天，东条英机和岛田繁太郎告知天皇，夺回塞班岛无望，他们已经下令取消了这次行动。即便如此，裕仁天皇仍旧拒绝接受这样的判断，并于6月25日召见了许多军事顾问。所有的军事顾问都认为，塞班岛败局已定。裕仁天皇让他们将此意见用笔写下，然后离开皇宫。

与往常一样，日本民众只能对整个事实进行猜测。6月和7月的数周内，关于塞班岛战役的新闻报道自相矛盾，令人困惑。显然，新闻局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民众日本已经丢掉了塞班岛？7月1日发行的《东洋经济》大胆宣称：“可以确认的是，这块岛屿非常重要，我方将拼尽全力保卫它。”^[19] 在美军进攻行

动开始之前，这一立场当然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引起了警方的“建议性警告”。在没有得到政府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各大报纸只能以“一亿人斗志昂扬”或是“铜墙铁壁警戒线，顽强作战日本兵”等为标题，在报道中喊一些空洞的口号。[\[20\]](#) [\[21\]](#)

虽然无法从新闻中得到可靠的消息，但日本民众可以预料到塞班岛的失败会让战争进入令人绝望的新阶段。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偷偷展开地图进行分析。塞班岛位于日本以南不远的地方。20多年来，塞班岛一直是日本的领土，岛上居住着大批日本公民。如果美军能够在塞班岛登陆，来到可以轰炸日本本土的范围内，那么日本政府过去宣称的不可思议的辉煌胜利无疑就是编造出来的谎言。1944年7月18日，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明显又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溃败，但是“报纸和杂志上的报道却声称日本放弃该岛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正如日本所愿”。[\[22\]](#) 她不相信这些话，其他普通日本民众也不相信。但是，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很危险的。来自川越的男孩有山幸（Sachi Ariyama）回忆说他的父亲曾因一句无心的言论而被逮捕，当时他父亲说的是塞班岛失守意味着“形势严峻”。很多个小时的审讯后，他父亲被释放了；然而，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一家人都处于军方的监控下。[\[23\]](#)

马里亚纳群岛的灾难必然会动摇东条英机的权力。2月，为了强化对内阁的控制，已经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又拿下了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同时安排比较好控制的岛田大将担任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东条英机既然全面地控制了政务和军务，就无法推卸自己在塞班岛大败中的责任。6月下旬，他发表公开声明，提到自己在天皇面前“深感羞愧”。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措辞。

自1943年初瓜达尔卡纳尔岛失守后，反东条英机同盟就一直在暗地里活动，准备把东条英机逐出政坛。该同盟中有几位日本前首相、军事领导人、外交官、国会议员以及皇室的几位成员。该同盟的主要推动人是近卫文麿，他在战前几年曾两度担任首相；珍珠港袭击前6周时，他

被东条英机赶出内阁。近卫文麿与米内光政将军率领的一个海军团体有合作关系。米内光政也是日本的前首相，在反对《三国同盟条约》的过程中，他是山本五十六的主要盟友。近卫文麿和米内光政试图获得日本历任前首相的支持，其形成的小团体被称为“重臣”集团。近卫文麿向内大臣、天皇的私人参谋及首席顾问木户幸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东条英机极不愿意放权。1944年6月底至7月初的几周里，反对东条英机的派系占据上风。有谣言说，虽然东条英机想让宪兵队逮捕反对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指控近卫文麿和米内光政这样有势力的人物。他提出改组内阁，改组后他将至少保留自己现有的一个职位，比如陆军大臣。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大将则表示，如果岛田繁太郎同时保留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两个职务，他将辞职。重臣们则一致拒绝接受东条英机继续担任任何内阁职务。

近卫文麿担心战争及其带来的影响会导致社会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就是先例。但他最担心的是日本国体的存亡。20世纪30年代，陆军的“皇道派”在右翼思想的伪装下宣扬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比如主张将所有产业和私有财产“归还”皇室，或是威胁直接通过武力手段调节经济失衡。据说，近卫文麿曾向其他重臣承认，比起战败，他更害怕发生革命：“即使战败，国家结构和皇室也不会受到影响，但若左派发动革命，国家结构和皇室将不保。”^[24]空中轰炸和外敌入侵造成的骚乱将威胁甚至摧毁军队纪律，导致日本重现派系斗争和暗杀行动，使日本脆弱的政治秩序彻底瓦解。

重臣决心除掉东条英机，他们还劝说木户幸一利用他的巨大影响力推进这一行动。但是，谁能替代东条英机担任他现在的职位呢？厘清现有的权力关系不是一件易事。尽管东条英机暴露出了明显的缺点，但是他能够统一陆军方面。他迫使“皇道派”就范，将该派许多领袖送往前线，以压制他们。在东条英机担任首相期间，具有反叛精神的年轻军官没有公然挑战过他，然而他们过去经常这样做。陆军和海军依然深陷地位和权力之争，但是东条英机能控制住局面，不致发生公开的冲突。两

年半以来，他在统治集团里维持住了脆弱的共识。继任者能否继续巧妙地平衡各方的权益？这是他们的顾虑。

近卫文磨力主让米内光政再次担任首相，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米内光政认为，陆军方面只会接受其内部的人。基于相同的理由，重臣们认为该职位不能由文官担任。他们需要找一位将军。他们考虑了一些人，但是最终都不合适。由于实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小矶国昭被选了出来。他是一名退役的陆军将领，曾在战争年代担任朝鲜总督。他将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只是用来稳住军心的手段。米内光政将担任副相及海军大臣，新的内阁将作为联合政府出现，国家权力由陆军和海军共同执掌。

7月15日，东条英机职位不保；同日，岛田也从其双重职务上被赶下台。7月17日，东条英机最后的希望——重组后的内阁也被解散，重臣们签署了一份联合备忘录，声称“内阁只是部分重组起不到作用”。^[25] 7月18日，东条英机辞职。当晚，东条英机在全国广播上发表演说，他对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民族大危机。我们的敌人，美国和英国，已经逐步增加反攻力度，并最终入侵了马里亚纳群岛”。同时，他还预言说，一场难以取得的胜利将拯救日本：“时机将会出现，把握住它，一举消灭敌人，取得胜利。”^[26]

同一天，日本民众得知，前一周塞班岛上出现了日本民众大规模自杀的情况。《朝日新闻》刊载了翻译自《纽约时报》的关于死者的报道。《朝日新闻》及其他报刊在对此事的评论中既表现出悲伤，又表达了自豪。自杀事件被称颂为一种希望和激励。杀害了孩子然后自杀的那些母亲是“日本女性的骄傲”。清泽冽还收集了另一些过度做作、煽情的类似言论：“百倍乃至千倍的勇气激发出来，荣耀的光辉，史无前例。……生命的最后一刻，伟大民族的精神闪烁耀人。……这是真正的日本，我们因此而强大。”^[27] 宇垣将军深感“耻辱”，但他也认为，塞班岛上的民众为整个日本树立了榜样：“只有大和民族才会做出如此壮举。我认为，如果日本一亿民众都能够拥有这些人面对危机时的这种决心，

日本要取得胜利绝非难事。”^[28] 东京日记作家高桥爱子与清泽冽持有相同观点，她觉得空洞的宣传让人难以接受，她拒绝将其称为“勇气”：“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有放弃战斗的勇气。”^[29]

1944年7月22日，天皇委任小矶国昭和米内光政为首相和副相。二人一同发布声明，强调他们决心推动海军和陆军密切合作。私下里，他们讨论了采取措施以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但是在公开言论中，他们态度坚决，表示决不退缩，继续作战。“政府将严格遵循已有的外交政策，”小矶国昭在就任时说，“并为彻底实现大东亚计划努力，因此一定要取得圣战的胜利，让天皇放心。”^[30]

小矶国昭的政府从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它的每个行动都经过慎重考量，以打消陆军强硬派的顾虑。内部人将小矶国昭的内阁比作“烧炭的汽车”——战时东京大街上翻新改造后的汽车，十分难开，经常抛锚。^[31] 小矶国昭没能获得军事参议院中的职位，因此也就无权对战略发表意见。米内光政将军发现自己也遭到了排挤。东条英机的盟友仍旧控制着宪兵队，并通过内部镇压的手段干预政治。小矶国昭顺从地表达了好战的态度，也预言最终会取得胜利，像东条英机的标志性做法一样。9月16日，新领袖通过国家广播向民众保证：“日本准备在近期发动强势攻击，歼灭英军和美军。”^[32]

统治集团里的许多高层人物（包括近卫文麿、木户幸一、米内光政，或许还有天皇）都明显只将小矶国昭的内阁视作过渡政府。将东条英机逐出政坛是争取和平的第一步，但是在条件成熟之前，任何进一步的举动都是有风险的。关于日本此时需要怎样做，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取得压倒性胜利，也有人说是经历灾难性挫败。6月末，木户幸一要求外相重光葵准备一份与美国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方案。最有可能的途径是请斯大林政府作为斡旋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木户幸一告诫小矶国昭要谨慎，不要做出任何激怒苏联的举动。但是，所有的政府高级官员一致认为，除非日本溃不成军，否则陆军自上至下绝不会接受和平政

策。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必须由天皇颁布圣旨来终结战争。^[33]

裕仁天皇显然希望能够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但他同时也坚信，只有在日军取得一场重要的胜利后，才能考虑和接受和平的选择。“我希望在某个地方给敌人致命一击之后，抓住机会，经过协商迅速达成和平局面，”他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说，“那时，美军将举步维艰，我们就能够提出和解的条件。”^[34]日本天皇仍旧沉浸在日俄战争的历史中，不惜一切要赢下他自己的对马海战；他无法面对现实，承认日本此时已经战败了。

批评者指责裕仁天皇没有及时干预并制止战争，但战争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和平谈判的实际可能性。除非日方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盟国不会满意；然而，哪怕是日本最温和的领导人 also 认为外交解决方案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日本的亚洲帝国地位。至于军国主义政治集团，在美军登陆塞班岛的三个星期之前，日本同盟通讯社的广播中就有两个军事“专家”提到了“和平”的条件：

彻底摧毁美国海军力量及海上贸易；废止私人银行机构和工会；限制美国的钢铁生产和石油生产；摧毁所有制造内河船舶和海上船舶的造船厂；建立新政权，让新政权不受“经济利益的干预”并完全以“日本主权”为模板，对美国实行长达十年甚至无限期的严密监控。^[35]

这些条件简直就是个笑话。这些条件从没有被日本外务省或其他任何日本政府的代表公开提出来过。但是，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认真地思考过此事，这意味着他仍旧没有正视和承认日本面临的困境。他想象日本可以离间盟国，从而继续拥有亚洲帝国的一部分。3月31日的日记中，他想象日本可以与英国政府联络，主动出面调停英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欧洲恢复和平之后，英国政府也许会愿意协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协商。木户幸一推测，英国的领导人会采取一些手段，防止美国在太平洋

地区称霸。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也可能会选择支持日本保留在该地区的地位，作为苏联对抗英美联盟的堡垒。[\[36\]](#)

1944年初，德国和日本败局已定，木户幸一草拟了和平条约，其中，日本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他设想建立一个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日本组成的五国委员会。而该地区的其他独立国家将会是“永久中立的政权，如瑞士那样”。日本承诺不再加强其殖民地和所占岛屿的军事力量。这五个国家将达成一致，保证区域内部的自由贸易。日本将继续拥有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

这样的提议，在1941年12月7日以后的任何时间提出来都会被盟国拒绝。到1944年的时候，美国和英国更是决意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木户幸一却还在担心日本的强硬派“马上会认定他的想法过于温和软弱”。[\[37\]](#)

以日本民众允许知道的“事实”来看，签署停战协议是不可能的。右翼学者通过无线电广播宣扬日本传统的自杀仪式，奉其为美德，“四十七浪人”的传奇故事便是这种美德的体现：这四十七个浪人通过献出自己的生命向被杀害的主人表示忠诚。民众从广播中第一次听说“粉身碎骨”和“精准打击”武器等说法——这是飞机、潜艇和快艇采取自杀式攻击的委婉措辞。新口号“一亿人玉碎”暗示着整个日本都会面临塞班岛民众那样的命运。《大乘禅》的7月刊中，刊登了一个和尚写的文章，名为《准备好，一亿人，为荣誉而亡！》。[\[38\]](#)历史学家则提到将近700年前打败元朝的舰队、带有宗教色彩的“神风”。小矶国昭政府早期提出的一个方案是武装训练平民，包括女人，教普通人使用竹枪抵抗入侵者。

将美国人描述为“野兽”“魔鬼”“屠夫”的日本大众媒体言论越来越多。日本媒体报道说，美国要杀光日本的成人和孩子。当权者也提醒民众，敌人已经准备好了数千桶毒气，准备在日本投放。日本的报纸整版整版地描述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残暴以及日本兵尸体有多么残缺不全，

遭到何种侮辱。（这些报道并非全部是捏造的。在《生活》杂志刊登的一张照片上，一个美国女人正在欣赏一颗日本人的头颅。那年夏天有无数日本人见到了这张照片。）9月日本国会开会时，裕仁天皇颁布了诏书：“今天，我们的帝国在赢得压倒性胜利这个方面的确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人民的领导者，大家必须重新坚定信念，下定决心，联合起来，粉碎敌人的邪恶阴谋，让帝国永存。”[\[39\]](#)

武道家宫本武藏写到过这样的挑战，敌人“虽然表面上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剑客一定要采取“丧其斗志”的战术。

这意味着突然改变自己的态度，从而让敌人放弃现有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让敌人从内心认为自己被打败了。你可以用武器、身体或是你的意念让敌人丧失斗志。这个策略不能单从某一个方面理解。当你的敌人彻底丧失斗志，你就不必再对其有任何顾虑了。否则，你要一直小心地对付他。如果敌人仍旧怀有野心，那他们就不会轻易崩溃。[\[40\]](#)

太平洋战争已经进入尾声。然而，在日本统治者丧失斗志之前，还有150万日本军人和平民会丧命。

由于日本的海运受到美军空袭和潜艇的破坏，日本经济也土崩瓦解。配给越来越紧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日本政府开始控制物价，黑市发展起来，食物和日用商品也更加短缺。所有人都吃不饱，除了农民，他们将粮食贩卖到黑市上，大发横财。精米自古以来是日本人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但是如今，日本城镇居民已经吃不到精米了。他们不得不吃未去壳的糙米，或是其他较差的替代品，如红薯和大麦。女人们用自己的婚礼和服交换食物，平时只能穿着土里土气的卡其布“灯笼裤”。街上和公园里的树木被砍倒，路灯和铁栏杆被拆掉当成废铁，寺庙和神

社的钟也被人拿走了。断水时常发生，公共澡堂一般是关闭的。一向重视个人卫生的日本民众现在每个月只能洗两三次澡。日本民众对于彻底除掉虱子已经不抱希望，只能努力忽略虱子的存在。结核病的暴发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人们吃得越来越少，却要做更重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民众都营养不良、疲惫不堪，但是当权者给出的答案——永远都是那一个答案——是民众必须激励自己，做出更大的努力和牺牲。如果累了，就做团体操，运动可以振奋精神，虽然运动会消耗掉本就不够的热量，不过不必在意。军事当局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陆军大佐会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当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内容包含五块部分。所有问题、不足和绝境都被归因于“规定的不完善”——然而，尽管新的规定层出不穷，这些新规定本身的逻辑就是僵化的。清泽冽阅读范围广泛，他做过一本详尽的笔记，记录了政府的政治宣传要点。他意识到日本政府越来越喜欢将日本产量的下降归咎于民众：“政府中逐渐有观点认为，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大后方生产能力的不足。”[\[41\]](#)

战时的日本，很少有人公开发表异议。然而，随着冲突的加剧，仇恨和骚乱的暗潮不断涌动，越发明显。地方官员和社区委员会代表往往表现得像小气的专制君主，日本民众怀疑他们将多出来的配给食物带回了自家。高桥爱子在日记中写道，她受够了被迫参与没完没了的民防会议：“社区委员会的大人物穿上华丽的衣服，摆出浮夸的表情，身后跟着一大群人大摇大摆地四处巡视。”[\[42\]](#)宪兵队的军官为了寻找国外势力或左派人士的蛛丝马迹，在深夜闯进私人住宅。他们清空书架，把桌子的抽屉翻个底朝天，把照片从墙上拆下来，甚至不脱鞋就踩上榻榻米。有这样一个战时谣言流传很广：有一个老人决定遵守所有的规则和制度，只吃政府配给的口粮，拒绝亲戚从黑市上购买的食物，最终因为老实听话而饿死了。

普通民众已经做好了受难和贫困的准备，但是这苦难必须让所有人来承担，不能有例外。许多人都在讽刺和挖苦有钱的家庭，这些家庭的

仆人都忙于做自家的工作，而没有为战争出力。有钱的女人想方设法不参加防空演习，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低贱的事情，会派女仆代替自己参加。阶级对立引发了故意毁坏他人财产的行为。私家车的轮胎被割开；有人往窗户上扔石头；有人潜入有钱人的家里，肆意破坏家具和家居用品。有谣言称官员中饱私囊，富人和走后门的人享受着特殊待遇，人人心中都是一腔怒火。所有人都知道，黑市的背后有军队撑腰。平民在黑市上违法交易食品和其他商品，警察和军事当局会进行处罚，但是他们自己人这样做却会得到包庇。法庭和检方受到恐吓，因而无法干预。根据政令，由于食物短缺，高档餐厅都要停业，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接下来，高档餐厅实际上会作为军事“俱乐部”重新开放，军官们在那里大吃大喝，观看艺伎表演。荒川裕代一家人在东京的深川区经营着一个面包店，她回忆说士兵和警察经常擅自拿走店里的商品，并且拒绝付钱。^[43]在战时日本，这句话流传得很广：“目前的社会，是陆军、海军、大人物和黑市的天下。排队等待的都是傻瓜。”^[44]

匿名的反抗活动掀起一阵镇压。石田澄夫（Sumio Ishida）是静冈县的一名警察，他记得该地区曾有人给重要的政治人物寄过多封匿名信，信中全部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请尽快停止这场战争。……日本败局已定。……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日本民众的生活已经多么艰难了吗？”^[45]石田澄夫所在的整个警区都发动起来，要抓到那个人。便衣警察每天24小时监视着邮箱。警察采集了几百个公民的笔迹样本。长达数月的调查后，警方终于抓住了那个人。那是个53岁的妇女，她的儿子战死在南太平洋上。然而在她接受审判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撕破了传统而神圣的社会契约。那些曾经让日本凝聚在一起的超越家族的纽带也断裂开来。日本一直以低犯罪率为豪，但是战争导致日本小额偷窃案的数量急剧上升。在拥挤的火车上，人们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常常被抢。放在酒店门厅或是私人住宅前庭的鞋子会不翼而飞。小偷还会从厨房窗户中入室，把炉灶上正在烹饪的食物拿走。1944年4月，《每日新闻》上的文章《世界第一小偷之国》

谴责了这一现象。^[46]当局决定要管理青少年犯罪、不敬老人的现象，挽回沦丧的儒家孝道思想。1944年1月，高桥爱子评论道，农民获得对城里人的控制权后，似乎感到了充满恶意的快乐——他们“掌握着我们生存的关键——食物——他们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通过在黑市上交易，他们获取了巨额财富”。^[47]来自城镇的避难者在农村家庭里往往会遭到虐待。来自城里的孩子被迫住在棚屋里，以寄宿主人的剩菜剩饭为食。这样的一系列行为使得新潟县的一个年轻女孩“对日本同胞可耻的品质感到失望。他们已经变成畜生，战争夺走了他们的人性”。^[48]

公然违抗当局是不可能的。处处都有监控，一旦怀疑某人持有左翼政见或是“反国体”的思想，宪兵队就会立刻抓人。到处都在鼓励孩子们监督和告发家长和老师。图书馆被迫列出每个客人所借之书的名称，交由警察从中寻找蛛丝马迹，看看有谁对别国表现出同情，或是表现出令人无法接受的自由主义倾向。日本政府在整個社会营造了一种偏执和妄想的气氛。他们声称，卖国贼和间谍无处不在。“那几年，所有事情都被政府隐瞒起来，我们无从知晓，”小说家竹山道雄（《缅甸的竖琴》的作者）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一切在当时被完全隐瞒了。我们每天都因恐惧而颤抖，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态发展而目瞪口呆。”^[49]日本民众普遍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像牲口一样被逼劳作，行为和思想都受到控制，得不到任何可以做出理性判断的信息；一旦被发现与当局思想有任何偏离，就可能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他们不得不接受领导人为他们选择的注定毁灭的道路，无力对此做出改变。日本民众早已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权利和自由，然而等待他们的，还有即将到来的1945年“诸神的黄昏”。

^[1] Teishin Nohar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3-34.

^[2] Fumio Kimura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09.

^[3] Hitoshi Anzai account in *ibid.*, p.119.

- [4] Toru Izumi account in *ibid.*, p.34.
- [5]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 [6]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 [7] *Ibid.*, pp.214-15.
- [8]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66.
- [9] Entry dated December 11,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22;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4.
- [10] Entry dated December 19, 1942,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5.
- [11] Shoryu Hat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2.
- [12]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ibid.*, p.217.
- [13]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ibid.*, p.64.
- [14]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ibid.*, p.64.
- [15] *Ibid.*, p.67.
- [16] Minoru Nomura, "Ozawa in the Pacific," in Evans, ed.,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27.
- [17] 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2.
- [18]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476.
- [19] Entry dated July 17,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26.
- [20] 战时政治宣传经常称日本民众有“一亿”。这其实夸大了日本人口数量，比真实人口多了约3 000万。——作者注
- [21] *Ibid.*, p.225.
- [22]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174.
- [23] Sachi Ariyama letter, undated, in Gibney, ed., *Senso*, p.178.
- [24]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Kido, *Diary of Marquis Kido*, p.394.
- [25] Entry dated July 17, 1944, in *ibid.*, p.389.
- [26] Tojo radio broadcast, July 18,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 [27] Entry dated July 20,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p.228-29.
- [28] Entry dated July 29,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37.
- [29]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uly 18,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4.

[30] Premier Kuniaki Koiso, July 22,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31]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85.

[32] Koiso address, September 16,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9.

[33]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75.

[34] Irokawa, *Age of Hirohito*, p.92.

[35] 同盟通讯社广播中提出的日本和平条件。May 23,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9.

[36] Entry dated March 31, 1944, in Kido, *Diary of Marquis Kido*, p.382.

[37] Entry dated January 6, 1944, in *ibid.*, p.374.

[38] Victoria, *Zen at War*, p.138.

[39] Rescript dated September 7, 1944, in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p.472-80.

[40]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引自Cleary, *Japanese Art of War*, p.84。

[41] Entries dated August 26, 1943, March 15, 1944, and April 7,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p.69, 157, 174.

[42]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March 27, 1943,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68.

[43] Hiroyo Arakaw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9.

[44] Quoted in entry dated April 30, 1943,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25.

[45] Sumio Ishida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76.

[46] Entry dated April 24, 1944, in Kiyosawa, *Diary of Darkness*, p.183.

[47] Aiko Takahashi diary, entry dated January 4, 1944, in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73.

[48] Kii Aoki account in Gibney, ed., *Senso*, p.172.

[49] Takeyama, *Scars of War*, p.140.

作者说明及致谢

十年前，当我开始为撰写多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搜集研究资料时，我不得不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疑虑。在任何大型书店或图书馆浏览几分钟，都足以让人意识到，关于二战的历史文献已经汗牛充栋。即使只考虑最近的出版周期——比方说，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书籍——架上的书似乎也足够最贪婪的历史发烧友阅读一辈子了。鉴于此，我不禁自问，还有哪位作家能在有关二战的文献中再添上一些有用的东西吗？

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与著作中，我的疑虑很快就消失了，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做这件事情。有关二战的文献尽管数量众多，但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这场大战的某些方面已经被研究得非常彻底，但是另一些方面却出人意料地被忽视了。有关盟军最高指挥部的研究从来没有成功地汇集成一份令人信服的全面论述，解释其思考和决策到底是如何影响太平洋战区的。盟军将“欧洲优先”作为其全球战略的基础，一致同意将纳粹德国视为头号敌人，第一个要击败的敌人，但美国人无法忍受等德国人战败之后再解决太平洋战区的问题。欧内斯特·金是美国海军在战争时期相对默默无闻的领导人，他不顾几乎所有其他重要人物的反对，坚持及早在太平洋战区发动反攻。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重要作用被忽视或低估了。有一种倾向（可以说，这种倾向在所有军事史中都是不言自明的）是把陆地战役当作“主要情节”，把海军行动留给专门研究海军史的人去处理。就太平洋战争而言，这种倾向确实带来了负面作用。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会明白这一点：对日战争主要是海战和空战，摧毁日本舰队是最基本的战略问题。征服岛屿本身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目标，敌人盘踞的某个岛屿没有攻占的意义时，美军会直接绕过去，任由其占领者自生自灭。只有需要将一座岛屿作为新的海军基

地或航空基地时，美军才会派专业的两栖部队将其拿下，在丛林中开辟一条简易跑道，在珊瑚礁中炸出一个港口，为舰队和轰炸机的西进奠定基础，为下一次进攻集结力量。海战是太平洋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工作的。

《征服的怒潮》是三卷本太平洋战争史的第二卷，紧接着《燃烧的大洋》叙述。《燃烧的大洋》讲述的是这场战争头六个月的故事，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到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发动致命反击。当前这卷讲述的则是太平洋战争的核心时期，即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的事件。当时盟军在赤道以北和以南的双线反攻像“征服的怒潮”一般席卷了日本辽阔的岛屿帝国，以日本在马里亚纳群岛不可逆转的战略失败告终。与上一本书一样，我的目的是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融合到统一的叙事中，这些观点来自交战的盟军和日军、大后方和最前线、最高级别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导，也来自甲板、战壕和飞机座舱等。我已经决定完整呈现太平洋战争的始末。这当然是一项令人生畏的计划，哪怕要分成三卷，累计篇幅将超过1 500页。我相信，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三部曲是至少25年来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太平洋战争史，也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15卷海战编年史出版以来，第一部多卷本海战编年史。自那时以来，这一领域已得到极大的拓展。新的档案得以公开，新的口述历史被记录下来，新的回忆录得以出版，新老日语资料被翻译过来，而且太平洋两岸的天才作家和学者已经对这场战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但是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司机们普遍存在一种“待在自己的车道上”的心态。随着相关文献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相关叙述也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我们明显缺乏对整场太平洋战争的完整叙述。

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都面临着一个明显的挑战，那就是要正确对待其主题的广度、深度和复杂性。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研究、最容易写的方法）是采用极其宏观的教科书式概述，按时间顺序逐一叙述每个重大事件。但是，这么做几乎没有任何新意，也没有强烈的故事性，缺少直击人心的力量，无法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和张力。另一种选择是片段式叙述，对选定的事件或主题进行“深度挖掘”，用这些事件

或主题阐明更大主题的其他层面。片段式叙事十分依赖直接的个人叙述、目击者的描述、生动的细节，以及观察者和亲历者当时的感受和敏锐的洞察力。它利用了小说甚至（恕我直言）电影中的叙事技巧。它需要慎重地决定在哪些方面投入大量注意力，在哪些方面减少关注甚至根本不关注，因此可能会因略过或忽视某些角度而招来指责。这种片段式叙述，正如我以前的读者可以证明的那样，也有一种不可救药的倾向，那就是偏离军事史的常规路线，甚至将叙事线交织在一起，失去主线。对此指责我并不否认，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回到法庭，用同样的答辩来回答同样的指控。

在这种叙事的第一手资料中，档案和出版资料的比例大致相同。我十分依赖美国海军学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记录和转录的口述历史。在分析战略和战术决策时，我会回顾行动报告、信件、战争日志或当时简报中指挥官的直接证词。重要行动报告结尾的详细附录有时会提供比历史文献更深入的分析（一场战役胜利或失败的方式和原因）。就像在《燃烧的大洋》一书中那样，我经常从已出版的口述历史、日记或信件中摘录文字，并不是因为这些已出版的重要记述比从档案中挖掘出来的更有趣，而是因为它们碰巧最先出现在我的手中。我特别重视那些默默无闻的、已经绝版的战争回忆录，其中很多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版的，当时作者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们的记忆依然鲜活。回忆录作家往往是自己主动选择写下回忆的。他们往往是有写作天赋的人，有尖锐的观点，无所畏惧，坦诚且机智。他们不仅告诉我们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还告诉我们人们在战争中有何经历。他们的自传体叙述在历史记录中应该占有特殊的位置，但是其中许多作品被忽视了。

任何这种规模的历史作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必须综合该领域最好和最新的学术成果。书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所列的是我认为对本书贡献最大的资料。在有争议的地方，我已经尽量公平地表达那些存在分歧的观点，然后再给出自己的结论。

我要感谢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海军历史和文化遗产司令部以及海军战争学院的工作人员。罗纳德·拉塞尔，“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www.midway42.org）的前编辑和网站管理员，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帮我审阅原稿，在历史内容和行文方面都给出了慷慨的建议。在这一点上，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弗洛伊德·比弗，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兼作家，也是本书所描述的几起事件的直接目击者。吉姆·霍恩费舍尔（Jim Hornfischer）阅读了原稿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他的下一本有关马里亚纳海战的书会成为所有对太平洋战争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书。我的朋友达米安·史密斯、露西·沃克、安德鲁·马洛尼、费伊·阿金多耶尼（Feyi Akindoyeni）和凯特·德弗罗尔在我去澳大利亚研究期间招待了我。罗宾·米德尔顿慷慨地向我提供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资料。史密斯和马洛尼陪我去了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这一切都是出于友情，而非职责。我特别要感谢日本的荒船清彦、佐藤由纪夫、下山进、渡边由布子、阿川尚之、香田洋二（日本海上自卫队退伍军人）等的帮助。感谢克里斯托弗·凯尔曼（Christopher Keilman）在照片和参考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再次感谢天才而敬业的制图师多彭博格。

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在图书业工作最努力的埃里克·西蒙诺夫仍然是我的经纪人。

我要感谢诺顿的整个团队。瑞安·哈林顿和玛丽·巴布科克在成书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我有拖稿的不光彩记录，但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对此很宽容。他一直都是我的重要支持者、顾问和朋友。

参考文献

档案馆藏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USMC Archives), Library
of the Marine Corps, Quantico, Virginia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Holland M. Smith Collection

Julian C. Smith Papers

Alexander Vandegrift Collection

Franklin D. Roosevelt (FDR)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FDR Safe Files

Harry L. Hopkins Papers

Map Room Papers, 1941 – 1945

John Toland Papers, 1949 – 1991

Naval Historical Foundation Collection,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Papers

Ernest J. King Papers

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NHHC) Archives, Washington, DC

Papers of Captain Flavius J. George, USNR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Raymond A. Spruance Papers

Richmond K. Turner Papers

口述史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CCOH),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Robert Bostwick Carney

Joseph J. Clark

Donald Duncan

Harry W. Hill

Thomas C. Kinkaid

Charles Moore

Ralph C. Parker

DeWitt Peck

James S. Russell

Oral History Program, U. S. Naval Institute (USNI),
Annapolis, MD, 1969 - 2005

George W. Anderson Jr.

Paul H. Backus

Michael Bak Jr.

Thomas H. Dyer

Harry D. Felt

Truman J. Hedding

Ruthven E. Libby

John L. McGrea

Henry L. Miller

Joseph J. Rochefort

Roland N. Smoot

行动报告，政府出版物，军方出版物，纪实文献，未出版的日记与信件

Bierer, Bion B. (Lt. Cmdr.), to Mary Bierer, October 16, 1942. Letter in the possession of Bob Begin.

Chief of the Bureau of Ships, U. S. Navy. "U. S. S. QUINCY, U. S. S. ASTORIA and U. S. S.

VINCENNES, Report of Loss in Action," September 2, 1943. Online at <http://blog.usni.org/wp-content/uploads/2009/03/savo-battle-damagereports.pdf>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4).

Commander in Chief, U.S. Pacific Fleet. "CINCPAC Grey Book: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for the Pacific War." [Cited as CINCPAC War Diary.]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History of the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and the Civil Engineer Corps, 1940 - 1946.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Dyer, George C.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Genda, Minoru. VR 519. "Tactical Planning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rch 7, 1969.

Heimdahl, William C., and Edward J. Marolda, eds. Guide to United States Naval 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y Division,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76.

Japanese Demobilization Bureau Records.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 2, Part 1. Washington, DC, 1966.

Joint Army Navy Assessment Committee (JANAC). "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Koda, Yoji, Vice Admiral, JMSDF (ret.).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 January 6, 2011.

Matloff, Maurice, and Edwin M. Snel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 - 1942.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 1959.

McDaniel, J. T., ed. U. S. S. 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Riverdale, GA: Riverdale Books, 2005.

Morton, Louis. Strategy and Command: The First Two Years / U. S.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ecord Group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 2006: CNO Dispatches, 1942 - 1947. [Cited as "CNO Zero-Zero Files. "]

_____. Record Group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 2006: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ca. 04/1942 - ca. 12/1946. [Cited as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 - 1946. "]

_____. Record Group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 2006: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_____. Record Group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 2006: WW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Nimitz, Catherine Freeman, and John T. Mason. Recollections of the Fleet Admiral Chester W. Nimitz. Annapolis, MD: U. S. Naval Institute, 1970.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Combat Narratives. "The Battle of Savo Island."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Read, W. J. "Report by Lieut. W. J. Read on Coastwatching Activity: Bougainville Island, 1942 - 43."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 Canberra, ACT, Australia.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 Nimitz. Annapolis, MD: U. S. Naval Institute, 1970.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as related by Dr. David Willcutts, Fifth Fleet Medical Officer Ms. Item 297, U. S.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Newport, RI.

Rhoades, Lt. Cmdr. F. A. "Secret Diary of a Coastwatcher in the Solomons."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Rosenman, Samuel I.,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1941 - 1945 vols.).

Shaw, Nalty, et al. History of U. 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Central Pacific Div. Historical Branch, G-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 S. Marine Corps, 1958.

Special Service Division, Services of Supply, U. S. Army. Instructions for American Servicemen in Australia. Washington, DC: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1942.

Stimson, Henry L. Henry Lewis Stimson Diaries. (Microfilm edition, reel 3.)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U. S. Army, Far East Comm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A Graphic Pres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Naval

Organization and List of Combatant and NonCombatant Vessels Lost or Damaged in the War. 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 116.

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1952.

U. S. Civilian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for War: History of the War Production Board and Predecessor Agencies, 1940 - 1945. Vol. 1: Program and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ited as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1941 - 1942, and Casablanca,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8.

The Conferences at Washington and Quebec, 194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U. S. Naval Administration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1976.

U. S. 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s. U. S. Naval Aviation in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Air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Military Analysis Division, 1947.

_____.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 Washington:

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Pacific)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_____.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 s War Econom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_____.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_____. Japanese Merchant Shipping.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_____.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U. S. S. Essex Cruise Book, 1944. Navy Department Library,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Washington, DC.

“Veterans’ Biographies,” published for the Battle of Midway Celebration. Marines’ Memorial Club, San Francisco, 2009.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General of the Army H. H. Arnold, Commanding General, Army Air Forces [and]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Commander-in-Chief, United States Fleet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7.

Wolfson Collection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 Wolfsonian Library, Miami Beach, FL.

图书

Agawa, Hiroyuki. *The Reluctant Admiral: Yamamoto and the Imperial Navy*.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

Alanbrooke, Lord. *War Diaries, 1939 - 1945*, ed. Alex Danchev and Daniel Tod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Ambrose, Stephen E. *Eisenhower: Soldier, General of the Army, President-Elect, 1890 - 1952*.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Archibald, Katherine. *Wartime Shipyard*. New York: Arno Press, 1977.

Arnold, Henry Harley. *Global Mission*. 1st ed. New York: Harper, 1949.

Asada, Sadao.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Astor, Gerald. *Wings of Gold: The U. S. Naval Air Campaig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4.

Bailey, Beth, and David Farber. *The First Strange Place: Race and Sex in World War II Hawa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Beach, Edward L.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 200 Year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Beaver, Floyd. *Sailor from Oklahoma: One Man's Two-Oc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54.

Bergerud, Eric M. *Fire in the Sky: The Air War in the South Pacific*.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0.

Blair, Clay.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1st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5.

Boyington, Gregory. *Baa Baa, Black Sheep*. New York: Putnam, 1958.

Bradlee, Benjamin C. *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Brand, Max. *Fighter Squadron at Guadalcanal*.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6.

Brawley, Sean, Chris Dixon, and Beatrice Trefalt.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Fighting Word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ABC-CLIO, 2009.

Brinkley, David. *Washington Goes to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ity and a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Brown, DeSoto. *Hawaii Goes to War: Life in Hawaii from Pearl Harbor to Peace*. Honolulu: Editions Limited, 1989.

Bryan, J. *Aircraft Carri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54.

Buell, Harold L. *Dauntless Helldivers: A Dive-Bomber Pilot's Epic Story of the Carrier Battles*. New York: Orion, 1991.

Buell, Thomas B. *Master of Seapower: 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

K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_____. *The Quiet Warrior: A Biography of Admiral Raymond A. Spruan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7.

Calhoun, C. Raymond. *Tin Can Sailor: Life Aboard the USS Sterett, 1939 - 1945*.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Carroll, Andrew, ed. *War Letters: Extraordinary Correspondence from American Wars*. New York: Scribner, 2001.

Carter, Worrall Reed. *Beans, Bullets, and Black Oil: The Story of Fleet Logistics Afloat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Childs, Marquis W.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New York: Harper, 1942.

Churchill, Winston, and Martin Gilbert.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London: W. Heinemann, 1993.

Clark, J. J., and Clark G.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New York: D. McKay, 1967.

Cleary, Thomas.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Strategy*. Boston: Shambhala Classics, 2005.

Clemens, Martin. *Alone on Guadalcanal: A Coastwatcher's Stor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8.

Coffey, Thomas M. *Hap: The Story of the U.S. Air Force and the Man Who Built It*, General Henry H. "Hap" Arnol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2.

Coletta, Paolo E. Admiral Marc A. Mitscher and U.S. Naval Aviation: Bald Eagle.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Colman, Penny. Rosie the Riveter: Women Working on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rown, 1995.

Cook, Haruko Taya, and Theodore F.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Cooke, Alistair.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 1942.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Cooper, Page. Navy Nurs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McGraw-Hill, 1946.

Costello, Joh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Rawson, Wade, 1981.

Davis, William E. Sinking the Rising Sun: Dog Fighting and Dive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A Navy Fighter Pilot's Story. 1st ed. St. Paul, MN: Zenith Press, 2007.

Dower, John W.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W. Norton, 1993.

_____.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Dull, Paul S. A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1 - 1945.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8.

Dye, Bob,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Contemporary Island History from the Pages of Honolulu Magazin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Evans, David C.,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In the Words of Former Japanese Naval Officer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Fahey, James J. Pacific War Diary, 1942 – 194.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3.

Forrestal, James.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1. Fussell, Paul. Wartim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ibny, Frank, ed. Senso: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ic Wa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Goldstein, Donald M., and Kathryn V.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s: Japanese Document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6.

Grider, George, and Lydel Sims. War Fish.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58.

Halsey, William F., and J. Bryan. Admiral Halsey's Story.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1947.

Hammel, Eric, ed. Aces Against Japan: The American Aces Speak.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92.

Hara, Tameichi, with Fred Saito and Roger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earl Harbor, Guadalcanal, Midway — The Great Naval Battles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1.

Harper, John A. Paddles! The Foibles and Finesse of One World War II Landing Signal Office. Atglen, PA: Schiffer, 1996.

Harris, Mark Jonathan, Franklin D. Mitchell, and Steven J.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Putnam, 1984.

Hopkins, Harold. *Nice to Have You Aboard*. London: Allen & Unwin, 1964.

Horikoshi, Jiro, Shojiro Shindo, and Harold N. Wanteiz. *Eagles of Mitsubishi: The Story of the Zero Fight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Hornfischer, James D. *Neptune's Inferno: The U.S. Navy at Guadalcanal*.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1.

Hoyt, Edwin.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imitz and His Admiral*. New York: Weybright & Talley, 1970.

Huie, William Bradford. *Can Do! The Story of the Seabees*. New York: E. P. Dutton, 1944.

Hynes, Samuel. *Flights of Passage: Recollections of a World War II Aviator*. London: Bloomsbury, 2005.

Ickes, Harold.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4.

Irokawa, Daikichi. *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Jackson, Robert H. *That Man: An Insider's Portrai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arsten, Peter. *The Naval Aristocracy: The Golden Age of Annapoli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n Nav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Kase, Toshikazu.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Kennedy, David M. *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Freedom from Fear, Part Tw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enney, George C. *General Kenney Report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9.

Keresey, Dick. *PT 105*.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Kernan, Alvin B. *Crossing the Line: A Bluejacket's World War II Odyss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Kido, Koichi. *The Diary of Marquis Kido, 1931 - 45: Selected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4.

King, Ernest J., and Walter Muir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A Naval Record*. New York: W.W. Norton, 1952.

Kiyosawa, Kiyoshi. *A Diary of Darkness: The Wartime Diary of Kiyosawa Kiyoshi*, trans. Eugene Soviak and Kamiyama Tam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Lawson, Robert. *U.S. Navy Dive and Torpedo Bombers of World War II*. St. Paul, MN: Zenith Press, 2001.

Layton, Edwin T., with Roger Pineau and John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Pearl Harbor and Midway—Breaking the Secret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5.

Leach, Douglas Edward. *Now Hear This: The Memoir of a Junior Naval Officer in the Great Pacific Wa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Leahy, William D. *I Was There*. New York: Whittlesey, 1950.

Leckie, Robert. *Helmet for My Pillow*. New York: Bantam, 2010.

Lee, Clark. *They Call It the Pacific: An Eye-Witness Story of Our War Against Japan from Bataan to the Solom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3.

Lee, Robert Edson. *To the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Lindsay, Patrick. *The Coast Watchers: The Men Behind Enemy Lines Who Saved the Pacific*. North Sydney, NSW, Australia: William Heinemann, 2010.

Litoff, Judy Barrett, and David C. Smith, eds. *American Women in a World at War*:

Contemporary Accounts from World War II.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7.

_____, eds. *Since You Went Away: World War II Letters from American Women on the Home Fro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oewenheim, Francis L., Harold D. Langley, and Manfred Jonas, eds.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Saturday Review Press / E. P. Dutton, 1975.

Lord, Walter. *Lonely Vigil: Coastwatchers of the Solomon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Lotchin, Roger W. *The Bad City in the Good War*: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Oakland and San Dieg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Lucas, Jim Griffing. *Combat Correspondent*.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4.

Lundstrom, John B. *Black Shoe Carrier Admiral*.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_____. *The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Naval Fighter Combat from August to November 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MacArthur, Douglas. *Reminiscences*. 1st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Madsen, Daniel. *Resurrection: Salvaging the Battle Fleet at Pearl Harbo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Manchester, William Raymond.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 - 1964*.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_____. *Goodbye, Darkness: 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Mason, Theodore C. *Battleship Sailo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_____.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Sailor's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McIntire, Vice-Admiral Ross T. *White House Physicia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6.

Mears, Frederick. *Carrier Combat: A Young Pilot's Story of Action Aboard the Horne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7.

Merillat, Herbert Christian Laing. Guadalcanal Remembered. New York: Dodd, Mead, 1982.

_____. The Island: A History of the First Marine Division on Guadalcanal. Yardley, PA: Westholme, 2010.

Michener, James A. 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 Greenwich, CT: Fawcett, 1947.

Miller, Thomas Guy. The Cactus Air Force. 1st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Morison, Samuel Elio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Boston: Little, Brown, 1947 - 1962.

Vol. 5: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August 1942 - February 1943.

Vol. 6: Breaking the Bismarcks Barrier: July 22, 1942 - May 1, 1944.

Vol. 7: Aleutians, Gilberts, and Marshalls: June 1942 - April 1944.

Vol. 8: New Guinea and the Marianas: March 1944 - August 1944.

Morris, Ivan.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82.

Newcomb, Richard F. The Battle of Savo Island. New York: H. Holt, 2002.

Nitobe, Inazo.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69.

O' Kane, Richard H. Clear the Bridge! The War Patrols of

the U. S. S. Tang.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_____. Wahoo: The Patrols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World War II Submarine.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7.

Okumiya, Masatake, Jiro Horikoshi, and Martin Caidin. Zero! New York: E. P. Dutton, 1956.

Olson, Michael Keith. Tales from a Tin Can: The USS Dale from Pearl Harbor to Tokyo Bay. St. Paul, MN: Zenith Press, 2007.

Parshall, Jonathan, and Anthony P. Tully. Shattered Swor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5.

Peattie, Mark R. Sunburst: The Rise of Japanese Naval Air Power: 1909 - 1941.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erry, Glen C. H. "Dear Bart": 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2.

Perry, Mark. 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 The Making of Douglas MacArthu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Potter, E. B. Bull Halse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_____. Nimitz.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Potter, E. B., and Chester W. Nimitz. The Great Sea War: The Story of Naval Action in World War II.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0.

Pyle, Ernie. Last Chapter. New York: H. Holt, 1946.

Radike, Floyd W.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Presidio Press / Ballantine, 2003.

Raines, James Orvill. Good Night Officially: The Pacific War Letters of a Destroyer Sailor: The Letters of Yeoman James Orvill Raines, ed. William M. McBrid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4.

Ralph, Barry. They Passed This Wa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States of Australia, and World War II. East Roseville, NSW, Australia: Kangaroo Press, 2000.

Raymer, Edward C. Descent into Darkness: Pearl Harbor, 1941: A Navy Diver's Memoir. Novato, CA: Presidio, 1996.

Reporting World War II. 2 vol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Reynolds, Clark G.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Admiral Jocko Clark and the Fast Carriers.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Richardson, K. D., and Paul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An Oral History of December 7, 1941.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5.

Rogal, William W. Guadalcanal, Tarawa and Beyond: A Mud Marine's Memoir of the Pacific Island War.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0.

Rose, Lisle A. The Ship That Held the Line: The USS Hornet and the First Year of the Pacific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Rosenau, James N., ed. *The Roosevelt Treasury*. 1st e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1.

Rosenman, Samuel Irving. *Working with Roosevelt*. New York: Harper, 1952.

Russell, Dale.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Tillamook, OR: Bayocean Enterprises, 1995.

Russell, Ronald W. *No Right to W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Veterans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iUniverse, 2006.

Sakai, Saburo, with Martin Caidin and Fred Saito. *Samurai*. New York: E. P. Dutton, 1956.

Schaller, Michael.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ears, Stephen W.,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The Best of American Heritag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1.

Shenk, Robert, ed. *Authors at Sea: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Remember Their Naval*

Servic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Sherman, Frederick C. *Combat Command: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E. P. Dutton, 1950.

Sherrod, Robert. *Tarawa: The Story of a Battle*.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4.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Shillony, Ben-Ami.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mith, Douglas V. *Carrier Battles: Command Decision in Harm's Wa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Smith, Holland M., and Percy Finch. *Coral and Brass*. New York: Scribner, 1949.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 White House Notebook*.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6.

Smith, Rex Alan, and Gerald A. Meehl. *Pacific War Stories: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Survived*. New York: Abbeville Press, 2011.

Smith, S. E. *The Battle of Savo*. New York: Macfadden-Bartell, 1962.

Smyth, Robert T. *Sea Stories*. New York: iUniverse, 2004.

Solberg, Carl. *Decision and Dissent: With Halsey at Leyte Gulf*.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Sommers, Sam.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World War II, 1939 - 1946*. Montgomery, AL: Black Belt, 1997.

Spector, Ronald H.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Stafford, Edward Peary. *The Big E: The Story of the USS Enterpri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Starr, Kevin. *Embattled Dreams: California in War and Peace, 1940 - 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rling, Forest. *Wake of the Wahoo*. Riverside, CA: R. A. Cline, 1999.

Stevenson, Robert Louis, and Jenni Calder. *Island Landfalls: Reflections from the South Seas*. Edinburgh: Canongate, 1987.

Stillwell, Paul, ed. *Air Raid, Pearl Harbor! Recollections of a Day of Infam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Stimson, Henry L.,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7.

Stoler, Mark A.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Tagaya, Osamu.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viator 1937 - 45*. Oxford: Osprey, 2003.

Takeyama, Michio. *The Scars of War: Tokyo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Writings of Takeyama Michio*, ed. Richard H. Mine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Taylor, Theodore. *The Magnificent Mitsch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Terasaki, Gwen. *Bridge to the Sun: A Memoir of Love an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Tillman, Barrett. *Clash of the Carriers: The True Story of the Marianas Turkey Shoo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5.

Toland, John.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 - 19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Tolischus, Otto David. *Through Japanese Eye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5.

Tregaskis, Richard. Guadalcanal Di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3.

Twining, Merrill B., and Neil G. Carey. No Bended Knee: The Battle for Guadalcanal:

The Memoir of Gen. Merrill B. Twining USMC (Ret.). Novato, CA: Presidio, 1996.

Ugaki, Matome. Fading Victory: The Diary of Admiral Matome Ugaki, 1941 – 1945, trans. Masataka Chihay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Vandegrift, A. A., and Robert B. Asprey. Once a Marine: The Memoirs of General A.

A. Vandegrift,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1st.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64.

Victoria, Brian Daizen. Zen at War.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7.

Weinberg, Gerhard L. Visions of Victory: The Hopes of Eight World War II Lea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_____.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erneth, Ron, ed. Beyond Pearl Harbor: The Untold Stories of Japan's Naval Airmen. Atglen, PA: Schiffer, 2008.

Westcott, Allan, ed.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 Mineola, NY:

Dover, 1999.

White, William Lindsay. *They Were Expendab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Wolfert, Ira. *Battle for the Solomon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3.

Wooldridge, E.T.,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1993.

Wukovits, John F. *One Square Mile of Hell: The Battle for Tarawa*. New York: NALCaliber, 2006.

Yamashita, Samuel Hideo,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Selections from the Wartime Diaries of Ordinary Japa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Yoshimura, Akira. *Battleship Musashi: The Making and Sinking of the World's Biggest Battleship*, trans. Vincent Murphy.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9.

_____. *Zero Fighte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6.

Zich, Arthur, and 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 *The Rising Sun*. Alexandria, VA: Time Life Books, 1977.

文章

Arlen, Lorna. "The Year in Retrospect."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December 1944.

(Reprin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p.217.)

Baldwin, Hanson W. "Solomons Action Develops into Battle for South Pacific."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1942.

_____. "U.S. Hold in Solomons Bolstered; Damage to Japanese Fleet in Stewart Islands Battle Strengthens Guadalcanal's 'Hell, Yes, We' ll Stay' Stan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 1942.

Beach, Edward L. "Culpable Negligence." American Heritage, December 1980. (Reprinted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Bull's-Eye." Time, July 23, 1945.

Danton, Lt. J. Periam. "The Battle of the Philippine Sea."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Vol. 71, Part 2, September 1945.

Downes, Lawrence. "How a War Was Won and a City Vanished at Pearl Harbo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06.

Clark, J. J. "The Marianas Turkey Shoot." American Heritage, October 1967. (Reprinted in Sears, ed.,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Hammer, Captain Harry D. "Organized Confusion."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Vol. 73, Part 1, April 1947.

Hersey, John. "The Sinking of the Wasp." Time, November 2, 1942.

"Honolulu: Island Boomtown."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May 1944. (Reprin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pp. 186-89.)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Hawaii."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October 1944. (Reprin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p.212.)

Kittredge, George William. "Savo Island: The Worst Defeat." Naval History, August 2002.

Kristof, Nicholas D. "Shoichi Yokoi, 82, Is Dead; Japan Soldier Hid 27 Yea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1997.

Lake, M. "The Desire for a Yank: 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Australian Women and American Servicemen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2, No.4, 1992, p.623.

Lamar, H.Arthu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exas: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Lippmann, Walter. "The Awkward Giant."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5, 1942.

Lodge, J.Norman.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Associated Press. (Reprinted 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3.)

"Mid-Pacific Stronghol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43.

Ramage, James D. "Raid on Truk." Online at <http://www.cv6.org/1944/truk/> (accessed October 4, 2014).

"Return Visit." Time, February 28, 1944.

"Sacrifice Will Win, Says Admiral King."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42.

Sherrod, Robert. "Marines' Show." Time, December 6, 1943.

“ ‘Shocking’ Street Scenes at Night: Lord Mayor Disgusted.” Herald, June 3, 1942.

Sullivan, Walter. “The Ship Ahead Just Disappeare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7, 1995.

Trumbull, Robert. “All Out with Halse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6, 1942.

_____. “Big Bombers Won.”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42.

_____. “Repair: VI.” December 19, 1942, 1. Unpublished dispatch (rejected by navy censor). Online at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opinion/20061207_pearl (accessed April 4, 2013).

Vollinger, John.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Online at http://www.janesoceania.com/ww2_johann_memoirs (September 12, 2012).

Wallin, Homer N. “Rejuvenation at Pearl Harbor.”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Vol. 2, No. 526, December 1946.

“Washington in Wartime.” Life, Vol. 14, No. 1, January 4, 1943.

Wilson, Cory. “War Workers as a Social Group.”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August 1944. (Reprin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p. 201.)

Wilson, Willard. “Soldier and a Jukebox.” Paradise of the Pacific, December 1944.

(Reprinted in Dye, ed., Hawaii Chronicles II, p. 215.)

Zurlinden, Pete. "Prelude to Saipan, 15 June, 1944."
Proceedings (U.S. Naval Institute), Vol. 73, Part 1, May 19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 （美）伊恩·托尔著；徐彬，曹军，王小琛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9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The Conquering Tide: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1944

ISBN 978-7-5217-1935-2

I .①征... II .①伊... ②徐... ③曹... ④王... III .①太平洋战争 IV.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 第098679号

The Conquering Tide : WA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42–1944 by Ian W.Toll
Copyright © 2016 by Ian W.To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

著者：〔美〕伊恩·托尔

译者：徐彬 曹军 王小琛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插页：16

字数：57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4239

书号：ISBN 978-7-5217-1935-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诸神的黄昏

太平洋战争
三部曲
PACIFIC WAR
TRILOGY
III

1944 — 1945

Ian W. Toll

WA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944 — 1945

从莱特湾战役
到日本投降

TWILIGHT OF THE GODS

[美] 伊恩·托尔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谭星 译

诸神的黄昏

——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美]伊恩·托尔 著

谭星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推荐赞誉	
作者自述和致谢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尾声	
参考文献	

推荐赞誉

海洋是连通世界的贸易通道，是现代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因此，海战不仅仅关涉到海上的战略战术，它从根本上关涉到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以及对自身国际定位的理解与把握。太平洋战争包含了多场非常重要的海洋对决，也是两种海洋观的命运对决，其中的启示极为深远。托尔此书因此非常值得一读。

——施展，外交学院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的始末，没有人比伊恩·托尔讲述得更出色。《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给“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精彩纷呈，令人百读不厌——不要错过这部无与伦比的军事史。

——亚历克斯·克肖（Alex Kershaw），二战史学家，《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从伊恩·托尔的第一本书《六舰》开始，我就一直是他的粉丝，但“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末卷把他带到了另一个高度。《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从头到尾吸引着你——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军事史巨著。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Nathaniel Philbrick），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作品曾入围普利策奖

托尔把控叙事的能力是专家级的，而且叙述过程中洞见迭出……这是一部全面而可靠的著作，如实展现了二战时期的海军，并未掩盖其缺点。

——马克·佩里（Mark Perry），
《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年的壮丽史诗……像前两卷《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那般扣人心弦……托尔不仅是优秀的战史讲述者，也是敏锐的文化观察家。

——埃文·托马斯（Evan Thomas），
著有《雷霆之海》（Sea of Thunder）和
《艾森豪威尔的虚张声势》（Ike's Bluff）等

托尔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包括使用尚未被人挖掘过的一手资料，以轻快的叙述将战略、军事行动和个人视角融合在一起，对战争尾声阶段双方的关键决定和行动进行了非常平衡的呈现。

——杰里·莱纳伯格（Jerry Lenaburg），
《纽约图书杂志》（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伊恩·托尔以精湛的叙事，清晰而直观地讲述了美军沿岛屿组成的阶梯向日本进军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通过巧妙而深入的人物刻画，托尔还原了军政高层充满争论的生活：他们为下一步该怎样行动而争执，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反败为胜，或是痛失好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通俗海战史。

——理查德·斯诺（Richard Snow），历史学家，
著有《铁黎明》（Iron Dawn）和《无边的危险》（A Measureless Peril）等

托尔有高超的叙事本领，将海陆空战斗的经过和华盛顿与东京幕后的角力巧妙融合在一起。“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末卷以娴熟的文笔描写了跳岛战略执行过程中残酷而血腥的现实。学者和军迷期待已久了。

——克莱尔·巴雷特（Claire Barrett），
《军事史季刊》（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副主编，二战史研究

者

托尔为人类一场史诗般的悲剧刻画的终幕令人叹为观止。这本书和“太平洋战争三部曲”的前两卷对于其他太平洋战争史家来说是难以超越的。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作者才华横溢，书中丰富的故事让人既熟悉又感到新鲜。这部里程碑式的历史作品弥足珍贵，二战迷会爱不释手的。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星级评论

令人受益匪浅的历史作品。

——《柯克斯评论》（Kirkus）

作者自述和致谢

真的很不想回忆这件事。2007年，我开始撰写一部单卷本的太平洋战争史。我前一本著作《六舰》的出版商为此和我签了协议，还预付了部分酬劳。两年半后，当距离交稿期限还有6个月时，我给我的编辑斯塔林·劳伦斯打了个电话。我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写了快800页了。还有一个坏消息，说的时候我连听筒都不敢放在耳朵旁，就是我才刚刚写到中途岛战役。这场44个月的战争，我才写了6个月，而且篇幅已经超过计划300页了。

就在这通电话里，斯塔林甚至都没有找我要那800页作品，就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何不干脆把这部作品改成三部曲呢？于是协议改了，交稿时限延长了，预付款也增加了（可是没到三倍，唉）。第一卷《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于2011年出版，第二卷《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2015年出版。第一卷写的是战争的最初6个月，从日本突袭珍珠港到美军在中途岛毁灭性地反手一击。第二卷写的是战争中的两年，从1942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主要是盟军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上的反攻。这一卷，也就是第三卷，从马里亚纳海战（又称菲律宾海战役）之后写起，讲的是战争最后一年的事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卷比此前两卷更长。我也没想这样。我原本预计第三卷会是三部曲中最容易写，或许也是最短的。因为大部分研究成果已经“摆在那里”，而且要写的内容只有1年，而《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却覆盖了2年。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地预计说这最后一卷2018年就能写完。发现这一点已不可

能做到后，我又在推特上赌咒说这一卷2019年无论如何都得写出来，“除非它先杀了我”。然后，当这一卷刚刚写完而未及印刷时，2020年就来了。万幸，推特可以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还活着，不过《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却已成了三部曲中最难写的一卷。原因很多。1944年末到1945年，战争在所有维度上都变得更宏大，我发现若不给予这卷书更多必不可少的时间和篇幅，就对不起这些主题。那几年里我收集了诸多处于历史主轴外围的研究结果——例如，美国军队与媒体的关系，海军飞行员的训练，盟军用无线电和传单进行的宣传，以及疏散到乡下的日本学童的生活——我决定把它们全都放到这一卷里。（写前两卷时，我还能说“下一卷再写这些”，但写第三卷的时候就不行了。）结果，我写这三卷本太平洋战争史耗费的时间够打三次太平洋战争了。

在《征服的怒潮：1942—1944，从瓜岛战役到菲律宾海战役》的作者自述中，我解释了一种发散的片段式讲述方式，这在传统的军事专著中是不常见的。这里我不想重复了。可以说，当时适用的话现在更适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里，与此前数年及其他战争相比，单纯的军事考量与政治、外交诉求在整体战略决策中的关系甚至更紧密了。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人们都意识到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时间、规模和范围会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连带影响。更有甚者，在美国，1944年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决策要在众目睽睽的总统大选过程中确定下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是在宪政民主国家里，选举周期是固定的，因此这句格言或许可以颠倒一下：“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本着这种精神，我选择了1944年7月的檀香山（火奴鲁鲁）战略会议作为本卷的开篇，在这篇幅较长的第一章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他在太平洋上的战区司令们为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制订了计划。这一段历史极其重要，无论对太平洋战争还是对战后的亚洲都是如此，但是历史和传记著作却常常会忽略它。我觉得它值得花上更多的篇幅，进行更为详尽的讲述，尤其是在最近刚刚发现重要新史料的情况下——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将军的日记。理查德森是夏威夷

方面美国陆军总司令，在会议期间接待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第一手记录下了他和罗斯福之间的谈话内容。

向在各个方面帮助我进行研究的所有人致谢：感谢小阿道弗斯·安德鲁斯最近向我分享他关于硫黄岛和战后日本的收藏；感谢比尔·贝尔将其父亲威廉·贝尔关于第38特混舰队空中作战的日记给了我；感谢弗兰克·邓利维提供了其岳父关于在驱逐舰“约翰斯顿号”上服役经历的口述历史；感谢罗纳德·努涅斯向我提供了约翰·亨利·托尔斯将军的日记；感谢切特·莱和迈克尔·A.利里退役海军上校，他们分享了切斯特·尼米兹和好友沃克一家在瓦胡岛上的有趣细节（这些内容已在利里的《放松的尼米兹》中出版）；感谢罗伯特·C.理查德森四世退役空军上校提供了前文所述的其祖父的日记，理查德森将军曾希望后人在2015年之前不要公开这份日记；感谢罗纳德·拉塞尔，“中途岛战役圆桌会议”的原编辑和站长，他审阅了本书手稿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就像他为前两卷所做的那样；几位日本朋友在不同方面协助了我，他们是下山进、村上和久、渡边由布子、荒船清彦，以及佐藤由纪夫；感谢埃里克·西蒙诺夫，我18年的经纪人，尽管我拖延了很长时间，交稿期限也反复推迟，但他对我保持了充分的信任；我对W.W.诺顿公司的整个团队致以谢意，包括诺玛·阿玛迪-奥比、瑞贝卡·霍梅斯基、比尔·拉辛，尤其是斯塔林·劳伦斯，他容忍了我总是离题的习惯，而且会在我离题太远时提醒我。

序章

不要和用桶装墨水的人争辩。

——美国警句，出处不详

自从第一个总统任期以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与媒体的关系就开始每况愈下。在1933年那段蜜月期里，这位刚刚宣誓上任的总统凭借着一套友善而亲切的举动，成功获得了记者们的信任——他对记者们直呼其名，拿些琐碎小事插科打诨，给他们写生日贺卡，还会邀请他们的全家人来白宫做客。他每周两次的新闻发布会也充满了畅所欲言和宽松随意的氛围。记者们如果来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则会受到那个热情而不失庄重，穿着略有褶皱的整齐西装，坐在大办公桌后轮椅里的总统先生的热情欢迎。他常常会抽着一根烟，袖子上有时还会沾上一点烟灰。对于记者们的提问，他一直是有问必答，而且是脱口而出，不拘一格。和他在一起，气氛总是轻松而愉快。比如有时候罗斯福总统会指出某位记者貌似宿醉未醒，还问屋里的其他人怎么看；他还可能会向管安保的人详细询问某位记者是否接受过搜身检查。有时候总统还会以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差生的口吻对记者说：“不，我亲爱的孩子，你全错了。”^[1]听问题时，他滑稽地半张着嘴，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脸上则带着卓别林式的夸张，惊喜，困惑，继而警觉。然后他就紧盯着头顶天花板上的石膏总统纹章，深吸一口气，胸部挺起，再长长呼出，琢磨该怎么回答。他的搞笑样子令记者们忍俊不禁。

总统也不总是直面问题——有时拐弯抹角，有时避而不谈。但他对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提问和不按规矩的往来交锋却也并不介意。白宫的速

记员们记录了他在998次发布会上说的每一个字，包括每次开场时的寒暄和玩笑。这些记录多达数千页，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档案馆里占据了超过11万立方厘米的空间。

然而到了1941年，也就是他第三任期的第一年，虽然那些热情和智慧的光芒仍会不时闪现，但是出入白宫的记者们却比数年前更强烈地觉得罗斯福反复无常、易怒，甚至有些难以捉摸，认为他现在成了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有一次他刚刚用他那著名的笑容活跃了屋里的气氛，下个瞬间便又回到了沉闷和攻讦的泥潭。罗斯福总统本身并不喜欢吼叫，甚至也不喜欢大声说话，但他即便是在开玩笑和打趣时也无不透露着怨妇式的情绪。如果他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感到反感，则随时会恶语相向。根据美联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的说法，总统“时而如同第三大街的流浪画家那样粗鲁凶暴，时而又变得极富魅力、和善，讨人喜欢。这仅仅取决于问题，提出问题的人，以及罗斯福先生当天早晨起床时的心情”。^[2]

为了反驳独立撰稿人写的“报道”，他会拿出律师参加庭审时的劲头来吹毛求疵。罗斯福绝不会忍受那些诸如“谬误”或者“不准确”之类委婉的提法，而是直接指责那些独立撰稿人是在“胡扯”——如果这还不够到位的话，那就改成“显然胡扯”或者“绝对胡扯”。^[3]这“胡扯”（lie）一词直指撰稿人属于动机恶劣而绝对不是无心之失，这也正是总统想要的效果。为了打压报界向“评论性刊物”转型的趋势，他武断地声称报纸不应当承担新闻解读和批评的职责，即便是社论也不行。至于那些不隶属于报社的自由专栏作家，罗斯福总统则说他们是“社会上的毒瘤”。这些人总是追逐各种小道消息——罗斯福形容这都是“捕风捉影”——而且把那些小道消息当成新闻四处乱发。当时读者最广泛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被罗斯福称为“老骗子”。^[4]

在1939年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有人提及罗斯福总统试图绕过国会的限制将武器运往欧洲时，他立即长篇大论回骂了开来：“美国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读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是胡说，胡——说，胡说；这些人利用了美国人的无知、偏见和恐惧，他们这样做，根本不

配称为美国人。”

当被问到他是否相信那些反对派的报刊是在蓄意误导读者时，罗斯福反问道：

“我该怎么说呢？是委婉地说还是直截了当？”

“直截了当。”一个记者答道。

“他们是故意胡扯。”^[5]

他每天早上会阅读四五份报纸，通常是躺在床上读。罗斯福其实是个很虔诚的人，很少说粗话，但是这些早报常常会让他心生怒火，骂一句“见鬼”（damn），严重时候则是“活见鬼”（goddamn）。当他读报的时候，他的脸色会变得阴沉，下巴会僵直，眼中闪出愤怒的火花。他有时会把冒犯他的文章从报纸上撕下来，带到椭圆形办公室，再扔到新闻秘书史蒂夫·T.厄尔利的手里，然后抱怨道：“见鬼，这从头到尾都是在胡扯。”^[6]他开始确信绝大部分美国报刊——他常常说这个比例是85%——都只是寡头政治斗争的喉舌。罗斯福曾说“保守派报社”奸诈、邪恶、无良。它们的老板和实际控制人是一群保守派富豪，他们个人对罗斯福充满憎恨，每天都会来指责罗斯福本人、他的政治盟友、参谋甚至是他的家人，给他添点堵。

在与罗斯福总统对阵的一众媒体大鳄中，有四个报界巨头最为强大。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全国报业联盟经常专门发布社论抨击罗斯福和他的政策。对此，媒体分析家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些恶言恶语都来自“老大”本人，他从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圣西米恩的豪华别墅里直接连线他的编辑部，发出指示。《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人“伯蒂”罗伯特·R.麦考密克会公开攻击罗斯福和他所支持的任何事，他的报纸——这是美国第二大城市里最大的日报，也是美国阅读量最高的报纸之一——即便找不到借口，也会肆无忌惮地贬损政府。麦考密克的表兄约瑟夫·M.帕特森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创始人兼老板，这是美国第一份小报。凭借着大幅照片的排版风格，以及靠犯罪新闻、体育新闻、两

性丑闻来吸引眼球的套路，《纽约每日新闻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突飞猛进，印数甚至超过了《纽约时报》。帕特森一度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起初曾是罗斯福新政的拥趸，但是到了1940年，他却站到了孤立主义运动的一边，他的报纸也转而激烈反对罗斯福总统。“锡西”埃莉诺·帕特森是约瑟夫·帕特森的妹妹，也是“伯蒂”麦考密克的表妹，她是个古怪而且粗俗的人，有厌世情绪。她从赫斯特手里买下了两份华盛顿的报纸，把它们合并成一份：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时代先驱报》打赢了美国首都的发行量之战，成了全美国最赚钱的报纸之一。这份报纸极度充满偏见，几乎每天都会攻击政府，甚至有时会在每天的四个版面上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政府，而署名“锡西·帕特森”的对罗斯福极尽辱骂的文章，则都会出现在头版上。报童们每天都会把这些报纸送到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甚至常常会有一两个报童在白宫大门外的人行道上读着这些报纸的头条标题大声叫卖。

这四个大鳄对于罗斯福来说都不陌生。麦考密克和约瑟夫·帕特森是他在格罗顿学校的同学；“锡西”帕特森在刚刚走进社会，加入上流社交圈时曾和罗斯福十分友好。至于赫斯特，罗斯福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曾将他视为盟友，甚至说他是自己的“朋友”。罗斯福和这些人彼此间的厌恶已经很深，而且发自内心。由于这四个人中的三个都是亲戚，第四个人（赫斯特）也在长期的相处和业务往来中与其他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将赫斯特-麦考密克-帕特森的一系列报刊视为一个联盟。1940年，当罗斯福试图走进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时，全美国所有报刊中的四分之三都反对他这场竞选连任的豪赌，罗斯福与报界的关系也跌到了谷底。这场斗争似乎永无尽头，罗斯福还特地指责报界没能扮演好它们在美国民主中的重要角色。他说这些报社已经沦为了唯利是图的赚钱机器，它们发现追逐热点和流言蜚语比严谨、准确的报道更能赚钱，于是开始向舆论放毒。同年秋天，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总统决心“鼓励大众抵制报界”，以及“坚定认为报纸媒体不可信，唯利是图”。[\[7\]](#)

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后，一众记者、编辑、无线电播音员和专栏作家便坚定地站到了总统的对立面上。罗斯福打破了美国此前150年的规则，第三次竞选并且赢得了总统大选，入主白宫。现在，新闻人感受到了一种超乎以往的重任，他们一定要抵制这个强势的总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罗斯福早已是个毋庸置疑的伟大人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他自己的那个年代是怎样的褒贬对立并且充满了争议。在媒体圈，即便在那些本身喜欢罗斯福或者是支持他政策的人眼里，罗斯福也理所当然是个无可救药的骗子。他常常显示出一种暗中掌控或绕过报界的能力。他通过无线电直接向美国人民讲话，此举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无线电广播此时仍然是种新的媒体，而且许多人担心它会成为政治煽动的工具。在关于美国是否要卷入欧洲战事的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辩论中，罗斯福总统好几次指责批评他的人卖国。而批评者们则担心，一旦美国加入对抗希特勒的战争，总统的权力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张。所有中年以上的美国人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记忆犹新。当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权威”完全是不可触碰的，任何对总统或者其政策的批评，无论多么柔和或者善意，都会遭到起诉，连报纸都会被查封。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在威尔逊的政府中供职，时任助理海军部长，因此也需要对那时候的权力滥用承担一部分责任。H.L. 门肯在回忆1917—1918年那段特殊经历时警告他的同行，“要紧紧盯住那些操纵这个伟大国家的人，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国家的”，这是媒体人的义务，战时尤甚于平时。报界的抵抗如果不够坚决，就会在“政客们自从共和制的襁褓时代便乐此不疲的强压战术之下”败下阵来。^[8]当1941年12月7日，20世纪美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在珍珠港的天空中突然炸响时，新闻界的态度便是这样的。

珍珠港遭袭两天后，罗斯福总统举办了他例行的周二记者会，这也是美国参战后的第一场记者会。记者们都被告知要提前来到白宫，因为新的战时安全措施会耗费很多时间。白宫周围到处都建起了新的警卫室

和岗亭，每个入口都架起了钢制路障和10英尺^[9]高的沙包壁垒。屋顶上架起了机枪。戴着平碟式钢盔的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穿着便衣的特工们则拿着汤姆森冲锋枪。

这将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总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为容纳大批与会者，发布会的地点特地从椭圆形办公室改到了白宫东厅。总统的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细心地数出在大厅的警戒线后面居然挤着超过600名记者，“他们互相推挤、挪动，就像关在畜栏里的大群野马一般。我们每次只允许一个人通过警戒线，验明正身，并要求他们在进入总统办公室时丢掉点燃的香烟”。^[10]

在刚刚过去的48小时里，媒体都在争先恐后地报道夏威夷发生的事情。然而，除了少数通晓陆海两军的专业人士之外，大部分记者对军事几乎是一无所知，甚至连陆海两军最高将领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从周日开始就在不停地发布例行新闻简报，但他有太多事情不能说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真相从珍珠港穿过谣言的海洋回流到美国本土：人们知道了有战列舰被击沉，许多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数千军人或死或伤。空气中充满了惊慌和恐惧，而第十四大街的媒体俱乐部则始终想方设法从流言中探寻真相。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第一步。美国陆军警告报界不准刊登关于部队调动的消息，海军则接管了国际电话电报局。然而，在开战之初的一片忙乱中，美国政府却还没有告诉报界应该何时、如何把大洋彼岸战场上的新闻告诉美国人民。

由于赖利的安检员要对来者证件做两次检查，发布会不得不推迟了一段时间。当记者和摄影师鱼贯而入时，罗斯福就坐在大厅尽头的办公桌后面，厄尔利站在他身旁。白宫的速记员记下了他二人之间的一个小对白：

“太挤了。”厄尔利说。

“他们大概会自来。”总统答道。^[11]

发布会伊始，罗斯福总统宣读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动员的声明，发布了一些关于政府各个部门组织战时配给制，安排民用工业转产军需的消息。关于战况报告和新闻审查制度的内容则直到半个小时后才被提及。真正提到这些内容时的情况表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还没怎么开始考虑这些事。

“所有信息在发布之前都必须遵守两条显而易见的规则，”总统说道，“首先是准确，嗯，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发布出来的新闻绝不能资敌，不能让敌人如愿。”

显然，记者们并不愿意受审查规则的束缚。尽管珍珠港的悲剧凸显了保守军事机密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确实渴望着从漫天谣言中发掘出真相。一个记者问道，如果自己从非官方渠道得到了消息，该怎么办？总统告诉他，压手里，直到军事审查官检查过为止：“战争靠的是陆军和海军，而不是报纸。”

总统还被问到了一些关于珍珠港的杂七杂八的事情，他的解答也只是点到为止。有人要他证实在空袭当天早晨，有数千名水兵获准离开基地到檀香山休假，罗斯福总统立刻回击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这事的？他又怎么知道的？”^[12]流言这种东西，在平时已然很坏，到了战时，更是可能会给战争努力带来致命危害。

当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向全美国发表了开战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听众达到了破纪录的6 000万人。总统在讲话里重申并强调了几个小时前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过的事情。他说，这种时候出现一些谣言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这却会给美国人民的士气带来沉重打击。“我诚挚地希望我们的人民向所有谣言说不。这些关于大灾难的小道消息会在战时漫天乱飞，必须把它们揪出来扔掉。”敌人将会散布谎言和假消息，以图迷惑和恐吓美国人民，勇敢面对这种宣传战是美国人民共同的责任。任何非官方来源的报道都不足为信。他还向新闻媒体提出了直接的要求：

致所有报纸和广播电台——所有能够触及美国人民眼与耳的人——我要对你们说：从现在起，在接下来这场战争中，你们为这个国家肩负着最神圣的使命。

如果你们觉得政府没有公布足够的真相，你们随时有权提出来。但是如果官方渠道没有给出所有的真相，你们无权打着爱国的名号去擅自揣测，发布未经证实的报道，让人民信以为真。[\[13\]](#)

战争爆发之初，当珍珠港的爆炸声似乎还在人们耳边回响时，新闻媒体的领袖们接受了新闻审查并报以积极态度。没有任何一个编辑、记者或者广播员愿意被指责危害了盟军，无论说其是有意还是无心。所有人都至少在道理上意识到，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绝不应该经由公开发行的报刊落入敌手。一本流行的商业杂志告诉读者：“在记者寻根究底的职业素养和不能向军人背后开枪的爱国道义之间，我们无可犹豫。出版界的自由，并不能允许我们把关于我们优势和弱点的秘密暴露给敌人。”[\[14\]](#)

要知道，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闻管制做得过了头，因此罗斯福的措施很谨慎。他曾表达过他本人对新闻管制的 unwilling。“美国人都 不喜欢新闻管制，就像他们不喜欢战争一样，”他在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过，“但是我们和其他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适度的新闻管制在战时是十分关键的，而我们现在正处于战时。”[\[15\]](#)

1942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确立了这方面的基本政策。只有经过美国陆海两军认证的“战争通讯员”才能撰写关于海外战况的报道，他们的文章也必须先提交军事审查部门，得到批准后才能发表。而美国本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则要严格遵守自主审核制度，因为它们得不到政府的优先审查，也没有什么新机制能强制它们执行。它们被要求遵守“美国媒体战时执行守则”，其中列出了一系列在战争期间不准发表的消息种类，包括部队调动、船只离港、军用品统计数据、天气状况、敏感军事设施或军火工厂的位置。不得提及来自情报渠道的消息，不得报

道敌人防御措施的效果，也不得介绍新型武器或技术的开发。由于担心敌国间谍或者破坏分子会通过美国媒体相互联系，报纸被禁止刊登招聘类广告。出于同样的理由，商业广播电台也取消了即兴发挥型和热线型节目，以及“街拍式”访谈。听众们再也不能点歌，也不能广播诸如寻找宠物、俱乐部声明或会议通知之类的消息了。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新闻审查局，来负责相关工作。不久前来到美联社担任执行编辑的资深新闻人拜伦·普莱斯被任命为局长。上任伊始，普莱斯就发誓绝不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用一些诸如“公共利益”或者“国民士气”之类含糊不清、前后矛盾的概念来限制新闻自由，否则就辞职。根据1917年的间谍法案——这个法案在1942年初仍然有效，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总检察长保留了一定的执行权力，但是普莱斯的审查局不会直接惩罚或者起诉报刊，而是代之以聘请一批职业记者来充当“传教士”——这个词是普莱斯本人选的——周游全国，劝说编辑和播音员们遵守守则。普莱斯说，这套自主审查的模式“维护了报纸和其他出版物的尊严，让每一位作者和每一位编辑都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员”。[\[16\]](#)

珍珠港的惨剧到底有多惨，美国公众还不太清楚，但是各种报道和流言已经使人们确信，太平洋上的这座堡垒遭到了日本人毁灭性的一击。在珍珠港遭袭一周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向媒体发表了谈话，承认有多艘战列舰被摧毁，其余遭到重创；他还指出大约有3 000名水兵和其他军人遇难。相关调查正在国会和军队内部同时展开。诺克斯还说“陆海军部队未能保持戒备”，这就意味着当地指挥官失职。[\[17\]](#)于是，夏威夷海陆两军的最高指挥官，海军上将赫斯本德·E.金梅尔和陆军上将沃尔特·C.肖特被解除了指挥权。他们将会被降职降级，被迫退休，并经受九轮无甚意义的质询的折磨，而这只是为了方便华盛顿方面推卸责任。

与此同时，从太平洋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混乱而令人不安。就在珍

珍珠港遇袭几个小时后，日本人在长达3 000英里^[18]的战线上向密克罗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和香港地区的英美两国目标发动了空中闪电战。开战第三天，日本鱼雷机在马来亚外海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日军进攻部队则已经在吕宋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岛屿的多个滩头上岸。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率领着他的部队与优势敌军进行着绝望而英勇的战斗——至少，那些从地球另一端传来的简略而且有些混乱的早期战报是让人这样觉得的。

虽然真相还要到多年后才会为人所知，但麦克阿瑟在战争第一天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比金梅尔、肖特完全好不到哪里去。珍珠港遭袭的消息给了他9个小时的预警时间，可麦克阿瑟却依旧躲在他的指挥部里，拒绝和自己的航空兵指挥官联系，尽管后者多次试图联系他。结果，他手下的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的主力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而排列在机场上，日军对菲律宾周围的第一轮空袭就把它们大部分摧毁在了地面上。华盛顿的头头脑脑对这场比前一次只晚了几个小时的“第二次珍珠港偷袭”沮丧不已，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对此却一无所知。12月7日的媒体报道只是说发现日军飞机出现在菲律宾空域。三天后，白宫宣布日军攻击了马尼拉北面的航空兵基地克拉克机场，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迄今仍无法报告战斗的详情。”^[19]

从那以后，华盛顿对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双重标准就一直困扰着历史学者们。菲律宾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正式调查过，麦克阿瑟也从未为自己的错误和玩忽职守给出过解释，他的错误至少和夏威夷方面同样值得被追责，而且原本更加能够避免。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这种差异是美国国内对太平洋战争开局阶段一连串事件的报道方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要解除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那就要立即执行，否则就晚了——而当时并没有立即这样做。到了战争的第二个星期，美国民众的态度已彻底转变。现在他们渴望看到一个血战救赎的故事，来洗刷珍珠港的创伤和耻辱。而远在半个地球之外，麦克阿瑟那支被围攻的军队在既无援军也无

补给的情况下与占据巨大优势的敌人苦战，这恰恰满足了民众的渴望。这样一支军队的将领自然也就成了勇敢而高尚的象征，一个顶着主角光环的美式英雄。他的每日战报惊悚而花哨，牢牢攫住了美国人民的情绪。“他穿着时尚，风度翩翩，能言善辩，”一位媒体评论员后来如此评价麦克阿瑟，“在62年的人生中，他一直像推炮弹的推杆那样身形笔挺，双眼清澈，面颊红润，只有一点秃顶。他面容平静，言语霸气，软顶帽的前沿给他优雅的外形平添了一抹浪漫。”^[20]

就这样，麦克阿瑟的人气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突然就如同坐了火箭一般扶摇直上，他成了美国媒体口中的超级明星，声誉鹊起，人望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肩。他的这枚火箭尖啸着从高空划出一条壮丽的弹道，飞过太平洋，直到十年后被哈里·杜鲁门打了下来。

菲律宾战役从一开始便毫无胜算，即便日本人不去偷袭珍珠港，结果或许也一样。日军向菲律宾群岛和其他盟军控制区发动的进攻十分熟练，而且占据了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但是麦克阿瑟仍然愿意去打，也希望人们看到他在打仗，美国人则因此对他无比敬仰。从1941年12月8日到1942年3月11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签发了142份媒体公报，其中109份只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麦克阿瑟。很少有某支部队被点名表扬或者嘉奖，这些公报里写的通常只是“麦克阿瑟的部队”，或者“麦克阿瑟的人”。^[21]公报常常暗示他正亲赴前线率领部队，但实际上他只是待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

这位精通公关的将军清楚一句简短却足以上头条的言论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会拼尽全力。”战争爆发第五天，他如此告诉记者。^[22]当有人提出应该把他马尼拉司令部屋顶的美国国旗撤下以免招来日本轰炸机时，他来了一句：“让国旗飘起来。”^[23]这些“金句”都被写进了他的战报，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他太知道该怎样摆姿势照相了：身体立正，头略偏向一边，就像竖立在底座上的汉白玉雕像那样。在1941年12月29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麦克阿瑟骄傲而坚定地站在那里，目视远方。新闻短片的制作者们纷纷把当年麦克阿瑟

检阅部队、向西点军校的学员们讲话，抑或是被法国将领亲吻双颊的纪录片片段翻出来再次播放。美国国会投票同意将哥伦比亚特区乔治敦区西边的一条主干道更名为“麦克阿瑟大街”。红十字会组织了一场“麦克阿瑟周”活动以募集资金。多所大学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授予麦克阿瑟荣誉学位。纽约的一个舞蹈协会把新发明的舞步命名为“麦克阿瑟步法”。^[24]黑脚族印第安人把麦克阿瑟“请”进了自己的部落，尊他为“Mo Kahki-Peta”，意即“圣鹰酋长”。纽约的几家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麦克阿瑟的“速成”传记——实际上都是极尽吹捧之能事的那种——这些书虽然都是粗制滥造的，但卖得都不错，包括《伟大的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平生精彩》，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自由而战》。

在1942年1月26日麦克阿瑟62周岁生日这天，国会山上的参众两院议员扯开嗓门，集体给他送上了生日颂词，每个发言者都争先恐后地高调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25]第二天，《费城纪事》告诉读者们：“他是这场战争乃至整个战争史中最伟大的战将之一。这可是一段传子传孙的历史。”^[26]1942年2月12日在波士顿的林肯诞辰纪念日演讲上，曾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提出要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让他来指挥这场全球战争。“让麦克阿瑟回国来，”威尔基喊道，“让他登上最高宝座。不要让那些官僚和政客阻碍他……让他成为总统麾下所有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美国人民就可以让这位能人而非愚蠢无知的人来指导他们奋战了。”^[27]

对于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来说，整个国家都全神贯注地屏息盯着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一个十分让人头痛的难题：事情该怎么收场？有可能去增援麦克阿瑟，或者哪怕只是给他提供一些补给吗？乔治·C.马歇尔上将要求他新上任的副参谋长，最近刚刚晋升准将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全面考察这个问题，给出个解决方案。艾森豪威尔在1935—1939年曾于菲律宾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他比华盛顿的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当地的情况。他注意到马歇尔完全没有提到菲律宾对美国

人民的“精神影响”，但他也认为这一点是不可能忽视的：“很明显，他觉得任何蠢到会忽略这个问题的家伙都不配当上准将。”^[28]

简而言之，菲律宾既无可挽救，也不能立即放弃，这就是难题所在。菲律宾的守军无法获救，因为盟军手里的船舶、海军力量和空中力量远远不足以打过太平洋，连一丁点这样的力量都使不出来。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是徒增这场败仗的规模而已：任何想要突破日军封锁，前往麦克阿瑟部队被困的巴丹半岛的船只，其结果都只能是要么被击沉，要么被俘虏。无论怎么算，巴丹半岛的军火和其他所需的补给品都不可能撑到盟军集结起足够规模的部队并打回菲律宾的那个时候。但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也告诉马歇尔，被围困的守军不应该被“冷血地”丢给敌人。即便军事逻辑决定现在需要止损，美国也毕竟是个大国，需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必须努力通过潜艇、飞机和渗透人员把至少一部分补给送进巴丹半岛。即便这只是杯水车薪，至多也不过把不可避免的最终投降的命运推迟几个星期而已，但“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竭尽所能”。^[29]马歇尔同意了，他授权艾森豪威尔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这些象征性的运输做起来。

麦克阿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抛弃自己军队的意思。他随身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短枪，发誓绝不会被活捉。但是他年轻的妻子和四岁大的儿子也和他一起待在巴丹半岛外科雷吉多尔岛（又译科雷希多岛）上的地洞里。若是把这位将军和他的家人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公众会起来造罗斯福的反的。绰号“老爹”的沃森将军是罗斯福总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助手，他急切地请求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还声称他“值得上五个军”。他建议，把这位将军秘密接回澳大利亚，之后让他去指挥最后的反攻。

2月23日的日记里，艾森豪威尔在深思熟虑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关于麦克阿瑟的极富预见性的评价：“他在现在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但我怀疑他在更复杂的环境下是否还能如此。巴丹半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地方：这是公众眼中的焦点，也让他成了公众眼里的英雄；这里具有

所有的舞台元素，他则是这里毋庸置疑的统治者。然而一旦离开那里，民意就会把他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而在那时，他对聚光灯的热爱就会毁了他。”^[30]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决定命令麦克阿瑟撤出菲律宾，并任命他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时，艾森豪威尔失望地写道：“我忍不住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了报界的干扰和‘民意’的裹挟，而不是出于军事逻辑。”艾森豪威尔的角色不在太平洋上——他另有舞台——但是在1942年初，他就预见到了麦克阿瑟将会带给华盛顿领导层的所有麻烦。麦克阿瑟将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在美国媒体上无与伦比的发言权来索要更多的部队、舰船和飞机。他将会拒绝把“欧洲优先”理念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他将会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他将会坚持由自己主导太平洋上的海上战争。他将会要求先解放全部菲律宾再向日本发动最后的总攻。艾森豪威尔预见到，在随后战争中的所有阶段，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将不得不去对付麦克阿瑟的个人影响力，因为“公众已经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超出他自己想象的大英雄”。^[31]

欧内斯特·J.金，这个领导着美国海军的板着脸的老水手，决意不沾媒体的边。当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遇袭一周后任命他为美国舰队总司令（COMINCH）时，他是出席任何新闻发布会为条件才接受任命的。他说自己此举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他的幕僚在拒绝采访请求时也会解释说金不希望做“有利或有助于敌人的事情”。^[32]但是华盛顿的记者们却正确地猜到金上将对媒体深深的敌意——他认为这些记者只会追逐流言蜚语，是些不请自来的卑鄙小人。根据一位记者的说法，金看起来对记者“如同对待鼠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33]

这种想法在海军高层中很普遍。海军军官总是将记者们视为害虫——危险的害虫，他们随时会偷走海军的机密。他们对报界以某些个人为中心，尤其是以那些个性鲜明且强势的个人为中心的宣传习惯很反感。这类个人聚焦大部分都给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海军军官们相信，这和海军中“集体大于个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金他们这一代海军将领都是在20世纪初美西战争结束后这一阶段开始海军生涯的。在那些年里，威廉·T.桑普森和温菲尔德·斯科特·谢利二人在媒体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在1898年7月3日的古巴圣地亚哥海战中各率领着一支海军舰队。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赢了这场海战并且贬低对方的贡献。两名将领及其拥趸想尽办法在媒体上争宠，并相互指责和辱骂。1901年9月，一个针对此事的调查庭成了媒体关注的头条，尤其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旗下的报纸，但问题是庭审给出了一个完全不着调的结论，结果便是火上浇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试图压灭关于此事的公开讨论，担心这会辱没美国海军对西班牙的胜利，但这件糗事还是在报纸上被持续议论了数年之久，甚至还被拍成了电影。美国最早那批无声电影中就有这么一部《桑普森-谢利之争》（1901）。

对于那几年进入海军学院的学员们而言，这一糟糕的公众事件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使得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力量。他们此时本应享受公众的欢呼，规划自己的未来，巩固这个军种在华盛顿的地位。然而，桑普森和谢利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却只为了自己的那点私利，而把海军的家丑公之于众。那一代年轻的海军军官发誓决不让此事重演，其中包括金（1901届）、威廉·莱希（1897届）、威廉·哈尔西（1904届）、切斯特·尼米兹（1905届），以及雷蒙德·斯普鲁恩斯（1906届）。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即便听说过桑普森-谢利这档子事也记不清楚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将领们却对此记忆犹新。他们以团队协作、冷静专业、谦虚谨慎为荣，对于报社记者，则是能躲则躲。

然而，严酷的战争很快就让美国海军感受到了轻视宣传带来的风险和困难。由于没有及时发布关于海上战事的确切消息，公众对此的了解便出现了真空——于是，各种流言和揣测便如同物理定律一般不可避免地填满了这一真空。没人会质疑保守军事机密的必要性，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当日军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之时，华盛顿有些有话语权的人便开始指责海军利用对战况信息的控制权来掩盖自己的惨败。更糟的是，共和党的首领们还指责海军成了罗斯福总统和民主党的

爪牙，利用公布新闻的权力来影响194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这当然是污蔑，但破坏性也毋庸置疑。金上将最终意识到，他必须对这些污蔑予以反驳，否则就会在政治与战事之间的非军事地带备受指责。

同样重大的压力，来自海军在战后国防体系中的地位问题。珍珠港一战之后，美国国会两党的领袖们都决意要优化军队组织架构的运作效率。美国的战争部^[34]和海军部，从约翰·亚当斯时代起就一直彼此独立，平起平坐，现在，这两个部门将要被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防部，由一位文职内阁官员掌管。虽然具体措施还有待磋商，但将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整合入一套统一的指挥架构，这将是大势所趋。罗斯福总统成功说服国会将这一改组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但所有人都能看出，这次军种融合将必定是一场百年难遇的政治恶斗，而海军的独立指挥权和影响力都会受到重创。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他的次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又译福里斯特尔）都有媒体背景，他们警告金和海军将领们，这场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海军最好去向美国人民“讲自己的故事”。福莱斯特发现陆军已经通过私下渠道把自己的整合方案提交给了国会领袖们，“据我判断，从现在起，海军已经输了，无论是在国会还是在公众眼中，陆军的观点都将占据统治地位”。^[35]1944年8月，福莱斯特告诉金：“现在，宣传已经和后勤或训练一样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36]

珍珠港事件之后数个星期的时间里，数百名在职记者向战争部和海军部申请成为战争通讯员，也就是今天“战地记者”的前身。根据军方的《通讯员战地基本守则》，这些前线报道员将要接受军队的领导，而且要“把所有用于公开出版发行的声明、文字材料和照片提交审查”。^[37]他们虽然仍是平民，但也必须穿着卡其色军装，并佩戴表明其身份为“通讯员”“摄影师”“无线电解说员”的铜制肩章。到战争结束，总共有1600名战争通讯员获得了军方的认证。

那些作为战争通讯员随船出海的记者都被告知要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在十个小时内离开本土。和陆海军军人们一样，他们也禁止泄露有关出海日期和目的地的消息，即便是对他们的编辑和爱人也不行。他们将要通过空运或海运与部队一同行动。虽然没有军衔，但他们却可以享受军官待遇，也就是可以在军官餐厅吃饭，享受军官的住宿和起居标准。作为民间人士，他们按说既不用敬军礼，也不该有别人向他们敬军礼——但是他们毕竟都穿着卡其色军装，因此经常会有军官或士兵向他们敬礼。这就难办了。严格说来，按照礼仪规范，他们不该回礼，但另一方面，谁也不想因为未回礼而冒犯别人。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说法。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驻澳大利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无线电通讯员威廉·J·邓恩说，他的大部分同僚的做法都是：不首先敬礼，但是会“仅仅出于礼貌”向别人回礼。然而，当与那些戴着“一排将星”的高级将领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会立刻情不自禁地把手举到额前。礼仪规范？见鬼去吧。[\[38\]](#)

战争通讯员和军队媒体联络官是天然的“敌人”。在军队的大部分海外司令部里，他们的工作关系难免由于误解和缺乏好感而变得紧张。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双方的职业习惯和态度不同导致的。无论什么军衔的军人，都习惯于服从上级指示。如果一道命令看起来前后矛盾或者不合逻辑，军人们的第一本能也不会是要求得到解释或者纠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传很广的一句俗语“SNAFU”（“Situation normal, all fouled up”），意即“一切正常，全部搞砸”，就体现了军人们对看似不合情理的规则和流程的淡然接受。身为平民的记者显然不会认同这种隐忍态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错的，就毫不介意找他们的编辑辩个明白。

在有些海外司令部里，媒体部门采取的是一种“盲审”制度，尤以战争第一年为甚。审查官们拿着红色铅笔阅读每一篇报道，把任何他们觉得不合适的语句或段落删掉，然后直接把删改后的版本发回美国本土。作者本人则既不知道作品受到了怎样的编辑和修订，也没有进行解释的机会，更不可能获准重新撰写提交。有时候，报道会湮灭在审查官

的“枪毙文件”里，而撰稿作者则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他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自己的报道是否通过审核，又被审查官的红铅笔改掉了多少。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作者肯定会暴怒，接下来的火星撞地球便是躲不掉的了。而那些新闻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出于保守机密的职责，自然是不会妥协。在新西兰司令部，五名战争通讯员向他们的媒体审查官列数不满事项，结果后者答复道：“我不怕你们，我更怕来五个日本鬼子。”^[39]另一位新闻官则油印了一封信件并分发出去，以回应这些抗议：

我的朋友：

当我听到你的忧愁苦恼时，我眼含泪水，喉咙哽咽。请允许我致以我最深切、最诚挚的慰问。但是，我不是牧师，也没有教堂。还请找你们船上的老大^[40]要东西擦干泪水吧。

祝平安，我的朋友。

审查长^[41]

但是对于新闻官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对手是一群不惧权威的人，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全世界最能言善辩、赤口毒舌的人。《纽约客》通讯员A.J.李布林曾描述自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里遇到的那些新闻官。李布林留意到，参军之前他们原本都是些公司里的宣传干事，或者是“芝加哥改写员”——但是战争让这些从来没进过训练营，也没见过战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军队里的少校和上校。他们只是些没用的“花边”，依附在合身、笔挺的军服上，带着刻意练习过的奉承和谄媚为军队说话。战前，没人拿他们当记者；现在，也没人拿他们当军官。凭借着在诡辩和敷衍方面的天赋，他们“蹚进了这一摊污臭的泥潭，如鱼得水”。1945年5月欧洲胜利日后不久，由于不必再担心失去媒体资格证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李布林在自己的杂志上撰文，向新闻官开了炮。他宣称新闻审查只是出于“政治、个人，或者仅仅是任性的目的”，

他还说，现在是时候来曝光“以军队公共关系为名所掩藏的数不清的蝇营狗苟之举了”。[\[42\]](#)

在夏威夷，也就是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CINCPAC）的地方，通讯员们很快郁闷地发现，这个冷漠的白头发得州佬决意不向他们提供任何有趣或值得一写的东西。新闻人们似乎都以为这个被派去给珍珠港报仇的人，看起来或者聊起来会像男孩子们的冒险小说里的炫酷游侠那样。但是据一位记者观察，尼米兹更像是“退休的银行家”。[\[43\]](#)根据《时代》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的说法，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是公关人员的绝境，他根本不想发布大范围的讲话，或者提供精彩的受访内容”。[\[44\]](#)

尼米兹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42年1月29日，也就是他接管珍珠港后一个月，还是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逼着他举办的。战争通讯员们被带进了他位于海军码头潜艇基地内司令部里的办公室。他们看见尼米兹坐在一张普通的木质办公桌后，穿着卡其色常服，没有打领带。他没有站起来迎接访客。办公室的墙壁没有粉刷，只是挂着一个时钟、一份日历和一张太平洋地图。记者们坐在专为这场发布会而布置的折叠椅子上。尼米兹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介绍了美国陆军与海军之间已经建立起的指挥协同关系。不过这所有的信息，华盛顿方面此前都已经发布过了，所以不算新闻。之后他开始接受提问。是的，他预计能够守住并保护夏威夷群岛。不，他不能提供更多细节。《纽约时报》通讯员福斯特·希利请求他“就12月7日以来海军的作战情况，向国内的民众做一些介绍，好让民众放心”。他得到的答复是：“尼米兹将军说，关于舰队作战的任何声明都必须通过华盛顿发布，这是战争总体战略的一部分。”[\[45\]](#)全场人的失望可想而知。

同一个月，同样是在诺克斯部长的逼迫之下，尼米兹引进了一个全职公共关系专员。这个人就是沃尔多·德雷克，一个海军预备役中校，他原来是《洛杉矶时报》的海运新闻记者。这种任命民间记者担任新闻

官的做法是出于“河马内部好交流”^[46]的考虑。他刚一上任，就向战争通讯员们表示，自己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的办公室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因而赢得了不错的第一印象。但他的工作基本上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他的上司还是一直把和媒体打交道视为需要去解决的麻烦，而不是和公众沟通的机会。德雷克的地盘从没有超出过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范围，但是瓦胡岛上还有很多其他军事单位，包括美国陆军、陆军航空兵和第14海军军区的单位，这所有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新闻审查人员和公共关系策略。^[47]

通讯员们日复一日地敲开德雷克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给出的新闻都是些已经众所周知的事情；德雷克拖沓迟缓的审查流程，意味着记者们的报道发回本土时已经成了旧闻；还有就是获准随舰队出海的记者太少了。记者们要抱怨的事情太多了。当威克岛被日军占领时，审查官们去掉了报道中的“威克岛”一词，代之以“一个岛屿”。于是一位通讯员问：“海军里是否有人意识到，这会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攻占的是另一个岛屿？”^[48]有一次，由于管理混乱，通讯员们获邀参加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罗伯特·英格利希将军的一次新闻简报会，问题是，尼米兹已经明令禁止潜艇部队发布新闻，于是德雷克只好临危受命，跑到会场上宣布简报会取消，而且他还收走了所有记者的记录本才允许他们离开。^[49]还有一次，约瑟夫·海勒写的广受期待的新作，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原本已经通过了陆军和海军的审核，但是海军的审查官窜改了其中一段。结果陆军发现海军改过的版本不合自己的胃口，于是吊销了作者的战争通讯员认证，但实际上这个可怜的作者在新书付印上市之前，都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改成了什么样子。

随着珍珠港里通讯员的数量逐步超过了100人，大家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响，经久不息，德雷克的“开门政策”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变成了“有时候开门政策”，继而又成了“通常关门政策”。《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鲍勃·凯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德雷克，他说：“这里的宣传办公室应该交给那些军衔更合适、处事更老练、经验更丰富的人来管理，最

重要的是，这些人得能看懂表上显示的时间。”[\[50\]](#)

尼米兹基本没什么时间来考虑公关问题，战争最初几个月尤其如此。他有比这重要得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作为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OA），他要担负起他这块巨大战场上所有军兵种的指挥之责。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的竞争是个老大难问题，尼米兹必须把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和领导艺术全部发挥出来，才能缓解这种绵延不绝的摩擦争斗。在这一方面，战争通讯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些人的天性就是深挖矛盾，就像路灯旁的飞虫那样群集、环绕在各种矛盾的聚合点周围。对于瓦胡岛上的这种内部竞争，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手的报道。他们挑动陆战队去抱怨海军，挑动陆军去鄙视陆战队，还挑动海军航空兵军官去和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吐槽。他们在军官俱乐部里守株待兔，等到军官们酒后吐真言的时候，就变着法子旁敲侧击，来问出真实的情况。这种话题，审查官们当然一个字都不会让它们发出去，但是他们的观点很快就会经由口耳相传回到本土，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新闻编辑部或者政府部门的大厅里自由谈论这些事。美国本土作者撰写的新闻报道不必被人拿着红铅笔去审核。报社虽然会受到自主审查守则的限制，有些硬性的事实不能公布，但发表一些观点还是没问题的。许多关于战争的新闻报道和社论正是靠那些从前线通过非法渠道传回来的消息编写的，而提供消息的正是这些通讯员和他们毫无顾忌的议论。

到1942年春，在华盛顿和许多其他地方，珍珠港事件之后媒体和军队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报纸在社论版上指责陆军和海军在信息管制方面做错了太多。许多天天搞新闻审查的军官资历太浅，无论年龄还是军衔都不够，还成天担心惹怒上级。一个25岁的年轻中尉，不会因为封杀了一条可能有些毛病的报道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如果这篇报道被他通过了，而偏偏又被某位上校或者将军看到还认为有害，那就只有上帝能救他了。“陆军和海军觉得自己掌控着新闻，其行事风格就好像在整个战争中从头到尾都掌控着它们，”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当实习记者的戴维·布林克利说，“就像历史上政府官员们常干的

那样，他们随意利用这一点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对于胜利则是大吹大擂。”^[51]

为了应对这日益升高的批评声浪，罗斯福总统创立了一个新的部门来协调整个联邦政府战争相关消息的发布。1942年6月13日，政令生效，成立“战争消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缩写OWI），“承认美国人民和所有其他反轴心国侵略的人民有权获知真相”。^[52]总统任命资深报界人士和无线电广播员埃尔默·戴维斯来负责这个办公室。战争消息办公室由四个已有的联邦政府部门合并而成，戴维斯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男人娶了死过四任丈夫的寡妇，还要把她前夫们留下的孩子抚养长大”。^[53]戴维斯知道自己将会遭到战争部和海军部的抵制，于是请求政府特许战争消息办公室评估所有来自前线的军事行动报道，并且独立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发布。“但问题是，”布林克利写道，“其他部门，尤其是陆军和海军，不会去阅读罗斯福的声明，即便读了也会装不知道。事实正是如此。”^[54]

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喜欢这个主意，不想去对付这个新的非军方宣传机构。当被问及战争消息办公室是否会指导战争部的新闻工作时，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反问了一个问题：“戴维斯先生是受过训练的军官吗？”^[55]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自己也是个媒体人——他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合伙人和股东——不过戴维斯后来说，虽然诺克斯总是很礼貌，“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被很礼貌地拒之门外”。^[56]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每天的例行晨会上，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会呈上此前24小时里从前线传来的报告综述。戴维斯和他的同僚们就会将这些报告和官方公报做对比。如果他们认为有些消息受到了不恰当的封锁，他们就会要求军队部门把它们放出来。如戴维斯一位下属所说，在有些极端情况下，战争消息办公室会请求得到授权去“直接决定某一消息可以被写入公报，除非军队能够拿出铁证证明这些消息事关安全，不得不删除”。^[57]

戴维斯和金上将的沟通毫无进展。他很快得出结论，在公共关系领

域，海军是各军种中的“问题儿童”。戴维斯有个评论在华盛顿流传甚广，他说金关于媒体政策的想法是，在战争结束前什么都不说，之后发布一份只有几个字的公报：“我们赢了。”金对戴维斯很热情，这可能是因为总统要他这么做，但是在1942年的整个夏季，他还是能不配合尽量不配合。这一时期，金认为宣传和媒体工作顶多是第二等的问题，或者是第三等，他可以甩给下级去处理，自己则不闻不问。

就在战争消息办公室成立的同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几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媒体泄密事件，这证明金对于媒体的看法是对的，他的态度由此也更坚定了。6月7日，就在中途岛战役结束次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海军得知了日本的海上进攻计划》。文中写道，海军在“战役开始几天前”就掌握了中途岛作战的关键细节。^[58]这篇报道对美军获知日军计划的手段讳莫如深，但是读者稍加思索就会得出结论，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无线电密码。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可是整个战争中保密程度最高的机密之一，现在这样一份美国大报把此事捅出来，很可能会惊动敌人，让他们采取反制措施。金暴跳如雷，下令彻查此事，最后很快查出捅篓子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个战争通讯员，名叫斯坦利·约翰斯顿，5月8日珊瑚海海战中“列克星敦号”航母沉没时，他就在舰上。后来他被护航驱逐舰救起，和一群“列克星敦号”上的军官一起搭乘运输船“巴奈特号”返回美国本土。航行途中，约翰斯顿看到了一份尼米兹上将于1942年5月31日签发的绝密电文，提到了即将开始的中途岛作战的细节。最终，“列克星敦号”的副舰长莫尔顿·塞利格曼中校被认定为泄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59]

关于是否要以叛国和间谍罪的罪名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的问题被拖到了8月，原因是担心大动干戈反而会让日本人更容易注意到这条新闻。美国政府将联邦大陪审团召集到了芝加哥，但是海军不愿提供有关其绝密电报破译项目的详细证词，陪审团也拒绝宣布起诉《芝加哥论坛报》。美国海军最终得出结论，日本人没有注意到这条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战后的审讯也没有发现什么与此结论相悖的证

据。[\[60\]](#)

随着海军的坏消息越来越多，金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根据华盛顿一位记者的说法，在国会山上，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海军在公报中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他们隐瞒了一些严重的损失。看起来大家都认为金上将觉得公众无法接受这些损失”。[\[61\]](#)1942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美军军舰在战斗中被击沉，而公众往往要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才知晓此事。当然每次都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隐瞒——要么是由于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些军舰已被击沉，要么是需要时间来通知伤亡人员亲属——但批评者们依旧怀疑海军在操控消息的传递，以保住颜面，以及保护金本人。

1942年5月的珊瑚海战役之后，美国的报纸在第一时间刊登了关于这次惊人胜利的报道。报道夸大了日本的损失——实际上日军只损失了一艘小型“婴儿航母”，即“祥凤号”——却对“列克星敦号”的毁灭只字未提，这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仅有的四艘航母之一。金曾亲自要求不允许让公众知道这艘航母战沉的消息，原因是它沉没时周围并未出现日本的飞机，因此敌人应当不知道此事。“列克星敦号”沉没的消息被封锁了超过1个月，直到6月12日才发布出来，而此时美国已经在庆祝中途岛的胜利了。“不公开这一消息是出于海军的安全因素，”公报里如此写道，这当然也是为了辩解，“这也是赢得中途岛胜利的一块基石。”[\[62\]](#)

2个月后的8月8日夜间——美第1陆战师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次日——四艘盟军巡洋舰在萨沃岛海战中被击沉。金下令严格禁止公布关于此次惨败的消息。他的分析是明智的：战斗是在夜间发生的，而且日军舰队很快就撤回了拉包尔的基地，因此可以想见，敌人并不知道自已给美军带来了何种损失。一周后发布的一份海军公报重点介绍了美军在地面和空中的胜利，但是对于盟国海军的损失却未做更多说明，“因为这些消息对敌人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63\]](#)

但对于萨沃岛这样的大灾难，总会有一些信息通过流言蜚语零零散

散地传回美国本土。到10月初——灾难发生2个月后——这在华盛顿官方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质疑者们认为金如此保密主要是为了自保。瓜岛作战是他的主意，他是强压着具体执行军官的反对发起这场行动的。根据《纽约时报》通讯员汉森·鲍德温的说法，金现在“如坐针毡，因为瓜岛作战是他一意孤行发动的。他就是那个拍板要干的人，虽然目的只是搞些小动作，但现在这些恶果、这些损失，以及海军所表现出的无能，美国人民都不会泰然处之，这对于金的名望和前景也没什么好处”。^[64]

埃尔默·戴维斯急切地要求金把萨沃岛的损失情况告诉公众，还有9月“黄蜂号”（又译“胡蜂号”）航母被潜艇击沉的事情也是一样。10月初，戴维斯来到金的办公室，与后者促膝长谈之后，他告诉妻子，这场会商“激烈却不失友善”。^[65]这位海军上将看起来意识到他的位置开始摇摇欲坠了。军舰沉没后短期内保持新闻封锁是说得通的，但是要压住消息足足两个月不让见报，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在数以百计的幸存者已经回到国内的情况下。而随着权威报道的缺失，难免流言四起。有些人就说大半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所罗门群岛丢掉了，还说日本人即将打过瓜岛。这里还有个政治原因——1942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3日开始——有人就怀疑金上将和海军之所以掩盖损失，是为了保护罗斯福在国会里的盟友。在如山的重压之下，金觉得是时候澄清萨沃岛惨败的真相了，于是10月12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份公报：“所罗门群岛战役初期的一些情况，之前由于军事原因没有公布，现在可以报道了。”^[66]于是，那四艘战沉巡洋舰的悲惨故事便被毫不保留地讲述了出来。

就在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惊喜突然到来。就在前一场海战发生的同一片水域，又发生了一次海上夜战，这一次——埃斯佩兰斯角海战——美军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于是海军又发布了另一份公报，原原本本地报道了这场战斗的结果。^[67]时间完全是巧合，但是新闻界和共和党国会议员们愤怒地指责海军就像在中途岛战役之后再发布“列克星敦号”沉没

的声明一样，又一次把坏消息（萨沃岛）压到后面与好消息（埃斯佩兰斯角）一并发出来。这时候恰好是瓜岛战役最危急的阶段，许多人怀疑海军和陆战队守不住这个岛屿，而战争新闻方面的处理不当进一步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气氛。国会议员梅尔文·马斯最近刚刚到过南太平洋，他在议院里站起身来，宣称日本人正在赢得所罗门群岛的战事，并指责政府试图掩盖真相。现在，媒体开始怀疑和蔑视海军的公报了，他们猜测海军还有巨大的损失没有公布出来。

金虽然固执己见，但他来到华盛顿多年，其经验足以告诉他，无论是猜疑还是真相，结果都是差不多的。他有太多的敌人想把他赶走——陆军、海军、媒体、国会，无处不在——敌人们已经蠢蠢欲动了。举国上下团结应战是攸关生死的事情，在政治斗争中引火烧身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如果他真让自己成为替罪羊，那他就要走人了。现在到了战术撤退的时候了。于是金接受了戴维斯的建议，把仍然没有公开的军舰沉没事件悉数公布出来。

10月26日，海军宣布“黄蜂号”航空母舰已于超过5个星期前在瓜岛以东遭到潜艇攻击而损失。^[68]当天晚些时候，海军又报告了后来被称为圣克鲁兹（又译圣克鲁斯）海战的航母会战的第一批结果，承认美军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以及“我方有一艘航母遭到重创”。^[69]确实如此，这艘未被点名的航母是“大黄蜂号”。但是第二天，后续消息传来，“大黄蜂号”火灾严重，已经失控，不得不自沉。金犹豫了，他不确定是否应该发布这一消息。日本人或许还不知道它已经沉没，这条消息可能会被日本人利用。埃尔默·戴维斯警告说，如果这个消息压到选举日之后再发，共和党人会起来闹事的。戴维斯坚决要求立即把消息发出来，他觉得这十分重要，于是直接把要求提到了诺克斯部长甚至是总统那里。但另一方面，尼米兹将军也同样坚定地认为这条消息绝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于是也写了一份语气坚定的提案，从夏威夷发了上去。

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主任威胁说若不公布消息就辞职，这就把金逼到了墙角，他判断自己已经别无选择。10月31日，就在中期选举的3天

前，海军发布公报，承认“大黄蜂号”“后来沉没了”。^[70]第二天，尼米兹向金提出抗议，称这次消息的公开“在关键时刻害了我们”。^[71]

金有一个极信任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律师，“内利”科尼利厄斯·布尔，他常常称金上将为“船长”。布尔在职业生涯初期曾是一个报社记者，至今仍在华盛顿的媒体圈里有很多朋友。眼见争议四起，布尔开始担心金的脑袋不开窍，于是决定做些什么来帮帮他。10月一个周五的傍晚，他在华盛顿第十四大街媒体俱乐部拥挤的吧台旁找到了《纽约太阳报》的助理总编格伦·佩里。两个人靠在吧台上，一边抿着汤姆·柯林斯鸡尾酒，一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准备挑选出十几个经验丰富、以“绝对诚实可靠”著称的大报记者。^[72]他们会邀请这些人与金进行一番非官方的私下交流，最好是在周末。接下来，这些新闻人将要遵守严格的基本原则，经过类似现代的“深度背景调研”——他们都需要同意，金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得见报，只是用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海军公报。他们不会引用将军的话，无论是署名引用还是匿名引用；也不会把金和自己交流过这件事告诉编辑部以外的任何人。布尔把这场会面的地点选在自己家里，这里可以令金感到舒适和放松。啤酒和小点心也是不会少的。记者们不会对将军说的话做任何记录。布尔和他的夫人将尽力创造一个放松和熟悉的氛围，让所有人（尤其是金）不要把这和官方发布会联想到一起。

布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令他惊喜的是，后者立刻就同意了。金知道陆军中和自己职务对等的马歇尔将军在战争部他的办公室里也做过这种非正式的战况介绍，后来也没有发生泄密的事。可以相信，知名的记者是可靠的，他们不会违背基本原则（布尔、诺克斯、戴维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这么对他说的）。由于会面地点是在布尔家里，金完全可以把这当成是一次偶遇，只是随便聊聊，这样就可以合理地绕过海军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也就不会受到诺克斯部长的监管。

11月1日星期天晚8点，金的黑色轿车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公主街“内利”布尔的家门口。这座房子不大，最初还是美国独立战

争时建造的，房子正对着马路另一侧粉刷成白色的19世纪的旧监狱，这所监狱曾经因关押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而闻名。金离开了他的司机和陆战队卫兵，按响了门铃。此时记者们都已经到齐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于是，一个“穿着标准海军蓝制服，步态悠闲的高个子”走了进来，把他的大衣和军帽递给了布尔。格伦·佩里在写给编辑的一份备忘录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他安静地走进房间，我立刻注意到，他居然是独自一人！没有烦人的助手，也没有过度谨慎的公关专员来防止他掉进别人设的陷阱。他就是欧内斯特·J. 金，美国海军上将，他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要把命运交到不太熟悉的人手里。然而他已经做足了准备，带着权威的、指示的姿态，一切都是如此自然，毫无做作。伟人们或许会享受号角齐鸣的礼遇，但他们并不需要靠此来获得身边人的敬重。

内利带着将军在屋里走了一圈，向他逐个介绍在座的通讯员。他和每个人都握了手，握得很快而且很紧，他会复述对方的名字，同时还满含热情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但是不难想象，假如不是在这种合适的环境下，这对眼睛就会变得如同用战列舰装甲钢打造的那般冷酷。[\[73\]](#)

介绍完后，宾主落座——金坐在屋角的一把安乐椅上，记者们在他周围大致围成一个圈。啤酒装在一个盛满冰块的洗手盆里，大家都是拿起瓶子直接喝。

金开始即兴发言。在最初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没有打断他。他按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这场世界大战，从1941年时他所面对的将护航船队送过大西洋的问题说起，继而是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危机、中途岛大捷，以及当下瓜岛战事的艰难。

记者们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宏观战略和复杂的后勤突然在

他们面前清晰起来。金对于战争重大问题的专业总结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知识培训——而当他转向具体问题时，则又展现出了对细节，包括对技术数据惊人的了解。他喝了第二瓶啤酒，接着是第三瓶；他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点燃一支烟。在记者们看来，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述海军所犯的错误时也同样直言不讳，完全不像是为了自保而隐藏了什么的樣子。“他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常常还有即将会发生什么，”有人回忆道，“他说的坏消息和好消息一样详尽，许多时候还会一边介绍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一边介绍哪些策略、武器或者二者的结合取得了成功。从头到尾，他都是完全放松的，而且总是很耐心，欢迎大家插话提问，他的回答也直白而轻松。”^[74]

许多问题都是关于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周边形势的，美国在那里的空战和海战中遭到了沉重的损失。美国能否守住这个岛屿？或者是否有必要进行战术撤退？

“我们会坚守。”金说道。他说所罗门群岛的战斗残酷而艰难，并承认美国海军遭到了惨重损失。但是在那里狠狠打一仗的理由也很充分。日本人也同样困难，而且他们无法轻易弥补所遭受的损失。当地地理条件也对盟军有利，因为日本在那附近没有航空兵基地。金解释了海军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公布损失的決定，并且提醒记者们，日军宣布的战果通常会夸张10倍以上。他提到“公牛”哈尔西最近刚被任命为南太平洋司令，还预告了即将于下个星期打响的大规模海战。^[75]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正在承担失去舰队的风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问道。

“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呢？”金答道。^[76]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金离开之前和每一位记者握了手。有些记者会后留了下来继续讨论，其他人则匆忙离开，他们要把自己能够记住的所有讨论内容写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感到惊讶，觉得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解比之前深刻多了。有人回忆道：“金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沉湎于自己的一

厢情愿，也没有对那些头痛的难题视而不见，希望它们能自己消失。”^[77]对于海军延迟发布军舰战沉的消息引发的争议，记者们接受了金的解释，并觉得他和海军受到了不公正的污蔑。

令金意外的是，他自己也很享受这个晚上的每时每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和自己说话，向自己讲述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这甚至也帮他自己厘清了一些思路。第二天早晨他一起来到办公室，就给“内利”布尔打电话，问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78]

金的亚历山德里亚秘密媒体简报会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平均下来大约是每6个星期开一次。后来还有更多的通讯员获邀参加，数量最终接近30人。这些记者笑称自己是“阿灵顿游击队员”，他们还像正式的秘密行动一样给金安了个代号——“瘦子”。当诺克斯部长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由衷地给予了赞许，虽然金将军事先没有打招呼就擅自办了此事，对部长的权威似有侵犯。而且，金说出来的那些秘密，最终也从未在报纸上出现过。

金很快意识到自己获得了华盛顿媒体圈的一股善意。这笔资产看不见摸不着，但金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它的价值。国会议员马斯曾经在国会和媒体上大肆宣称美军最高指挥层内部不和，同时推动立法把各军种合并入一个统一的指挥架构。金相信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形式已经足够顺畅，军种合并应当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于是金小心地约见了几个“阿灵顿游击队员”。不到24小时，全美各大报刊便充满了声讨马斯言论的文章和社论，对金却只字未提。不久后，在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支持下，军种合并的事情被束之高阁，留待战后再议。

1941年，金刚刚到达华盛顿时，曾决心不和媒体发生任何瓜葛。而到了珍珠港事件即将满一周年之时，他已经能够如同华盛顿那些老练的幕后玩家那样暗中操控媒体了。猛一看，这似乎是个突然的逆转，但是若深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毫不意外，因为没人会误以为欧内斯特·J.金是个不善学习的人。

在麦克阿瑟将军设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新闻处的负责人是“皮克”勒格朗德·迪勒上校，他是个职业陆军军官，后来正是在此新闻处处长任上官至准将。迪勒是“巴丹帮”的元老，他们是麦克阿瑟最忠实的部下，战争爆发前就在菲律宾服役，1942年3月又和麦克阿瑟一起从科雷吉多尔出逃。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新闻工作从来不缺人手：迪勒下辖的官兵数量最后超过了100人，里面不乏校级军官，其中许多人到战争结束时都晋升为上校。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和他的幕僚们对于从本土汹涌而来的记者们感到很头疼，迪勒却恰恰相反，他对记者们持“越多越好”的态度，而且总是乐于签发更多的媒体许可证。在布里斯班，获得认证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广播员最终超过了400人。

迪勒和他的团队将通讯员们视为尊贵的客人。他们对所有问题都是有问必答，提供了最先进的通信和广播设施，在记者们即将奔赴前线时还会好好招待他们。他们会安排记者们直接面见麦克阿瑟本人，虽然那都是在精心安排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几乎每天一份的新闻公报都是由迪勒撰写初稿，再交给麦克阿瑟审核，常常还会被他重写。通讯员们很快发现，没有任何或明或暗的批评能够逃过迪勒的红铅笔，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赞扬和吹捧越多，就越能得到独家消息或其他令人羡慕的特殊待遇。

新闻界给迪勒和他团队的配合力度打了高分。和夏威夷的情况截然相反，新的报道提交给麦克阿瑟的新闻处之后，会在24小时内得到阅读、审核、批准，并传回美国国内，发表到报刊上时还是热乎的。这种新鲜出炉的新闻更容易登上头版头条，而来自尼米兹战区的那些相对过时的新闻就只好敬陪末座。就这样，1942年到1943年间，美国公众中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太平洋上的大部分仗都是麦克阿瑟打的。

麦克阿瑟比二战美军其他将帅更能理解视觉印象的重要性。他时刻关注自己的衣着和装饰，也就是反对者们口中他的“道具”——旧巴巴的

菲律宾元帅软顶帽，整洁的飞行皮夹克，飞行太阳镜，还有他那看起来越来越大的玉米芯烟斗。他对自己头顶上的秃斑十分介意，如果不得不拍摄免冠照片，他就会找没人的地方花点时间，把头顶上的头发从一边梳到另一边，在双耳5厘米以上的地方留出完美的直发——今天人们常说的“遮秃发型”（combover）。这些照片和媒体文稿一样，也是迪勒的审查对象——麦克阿瑟登出来的大部分战时照片都是从下往上拍的，这样能让他看起来显得更高一些。

布里斯班的宣传机器常常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麦克阿瑟是在亲自率领部队冲锋陷阵。作为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角色并不是亲自上战场打仗，而且他在“一战”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须再去证明什么。然而在前线拼杀的将士们从未在战场上见过麦克阿瑟，却听美国报纸上说他正在一线和将士们同甘共苦，这就难免令他们愤愤不平了。1942年10月，他飞往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盟军基地莫尔斯比港做了短暂的视察，布里斯班的战争通讯员们就报道说麦克阿瑟视察了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布纳附近的战场。这样的报道都被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审查官审查通过了。有一张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罗克汉普顿观看部队演习的照片，发表到了媒体上就被误写成了“视察前线”。有一段记录麦克阿瑟坐在吉普车后排，在泥泞的林间小道上颠簸开进的新闻短片，解说员告诉观众，将军正乘车前往前线阵地。但实际上，在他整个视察期间，他和最近的日军部队之间始终隔着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79]

这样明目张胆的胡编乱造令第8集团军司令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十分愤怒，他认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新闻处是在滥用自己的战时新闻审查权来放纵麦克阿瑟个人的虚荣心。艾克尔伯格将军体验到了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同僚此前已经吃过的亏——如果一位下级军官想要和麦克阿瑟共事，那么他最好不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艾克尔伯格在几份关于布纳战役的媒体报道上露了脸讲了话，于是便被召回布里斯班，被麦克阿瑟一顿臭骂：“你知不知道我明天就能把你降成上校，让你滚回家去？”^[80]艾克尔伯格知道厉害了，他在战争余下的过程中对媒体一律拒

之门外。有一次，他对一位来访的公共关系官员说：“我宁愿你往我口袋里放一条毒蛇，也不希望你去宣传我。”^[81]

从战争一开始，麦克阿瑟就一直坚持发布他自己的新闻公报，华盛顿要他低调一些，他也置若罔闻。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都不喜欢布里斯班发出的这些哗众取宠的声明，于是他们开始质疑麦克阿瑟所宣称的战果的准确性。对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宣传机器来说，真相常常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们的战报写得天花乱坠，以便看起来显得更精彩和戏剧性，许多时候他们不仅舞文弄墨，甚至会随意捏造“事实”。有些时候，关于敌方损失的数据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不仅如此，许多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公报看起来并不怎么掩饰对海军或者尼米兹战区作战行动的贬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3年3月。当时麦克阿瑟对新几内亚以北海岸外的日本运兵船队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空袭，史称俾斯麦海海战。此战，乔治·C.肯尼中将第5航空队的轰炸机群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跳弹轰炸”的新的低空轰炸战术，击沉了12艘敌军舰船，包括8艘运输船和4艘护航驱逐舰。P-38战斗机群击落了大约20架在船队上空掩护的日军战斗机，赶走了其余20来架。这些运输船搭载了大约8 000名日军，其中至少3 000人被炸死或淹死。（准确数字从来都没有被统计出来过，有不少人趴在碎片上游到了附近的岸边，或者被小艇救起。）

这一杰出表现是美国陆军航空队一次战术上的突破，此前他们一直为怎样命中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苦恼不已。但是，西南太平洋战区随后发布的公报却极尽夸大之能事：12艘运输船、3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被击沉，102架日军飞机“目视确认已被摧毁”。不仅如此，公报声称船队搭载了大约1.5万名日军，“全部被消灭”。^[82]在同期发布给媒体的另一份声明中，麦克阿瑟似乎光从这一场战斗中就得出了一个实际上还遥遥无期的结论，说空中力量已经从根本上压倒了制海权，也就是说陆军航空队已经赢得了和海军之间持续已久的那场论战。他宣称，未来的制海权将由陆基航空兵而不是海上力量来决定：“盟军的海军部队完全可以打出自己的精彩，但是西太平洋上战争的胜负将由对空地联合部队的合

理运用来决定。”^[83]此话令海军将领们大吃一惊，于是他们找到马歇尔和史汀生，要他们把自己的人管紧点。

麦克阿瑟和肯尼的牛皮吹得太大了，根本架不住深究。当飞行员的作战报告和对海上救起的俘虏进行审讯的结果显示，他们宣称的击沉数比整个日军船队的规模还要大时，他们开始想办法澄清。但是，当马歇尔将军把订正后的战果评估发到布里斯班，要求西南太平洋战区发布一份修订公报时，麦克阿瑟爆发了。他向后方发了一份长得令人不敢相信的有线电报，列出了他宣称击沉的22艘舰船中21艘的名称，信誓旦旦地保证他的战果统计已经得到了缴获的日方文件和俘虏审讯记录的充分证实，并要求华盛顿方面修改统计数字，与自己先前发出的报告保持一致。他还说，他已准备好为自己公布的战果做辩护，“无论在官方内部还是通过公开的形式”。不仅如此，如果战争部执意要公开文件“质疑我作战报告的真实性”，那就要告诉他这幕后的黑手是谁，“这样我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在环境允许时收拾这个应该负责的人”。^[84]

其实麦克阿瑟在媒体公报上的这些瞎吹乱捧既无价值也没必要，因为在1943—1944年，他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是实打实的。他沿着新几内亚海岸推进，在新不列颠岛登陆，向洛斯内格罗斯-马努斯岛发动了大胆的两栖突袭，在新几内亚北部沿岸长距离跃进至荷兰迪亚——所有这些行动的计划和执行都很完善。肯尼的轰炸机确实将一支重要的日军船队大部歼灭；他们真的首创了一种全新的致命战术以击沉海上航行的舰船，而这种打法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麦克阿瑟的部队有充分的理由毫无顾虑地为自己的成就而自豪，他在南太平洋的反攻本来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这些公报带来的争议反而是在给这场胜利抹黑。

这些批评让麦克阿瑟在世人眼中成了一个沉醉在自我幻想中的自大狂，但是他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自有其目的。他是在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影响力下注。迪勒后来说，麦克阿瑟将军“是努力在自己所处的层级上最大限度地为太平洋战区 and 我们的部队争取援助，因此他尝试把故事讲得更加精彩，这样人们就会出于同情而支持他”。^[85]在麦克阿瑟眼

里，他这是在与华盛顿的一众敌人坚持斗争。他最大的敌人是罗斯福。他很熟悉，但又十分瞧不起这个人。他不止一次对拥趸们说，总统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背叛”了自己，没有派部队到菲律宾去解救他。他对于把太平洋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战区，并把北边部分交给尼米兹指挥很不满。他觉得海军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狗腿子——这倒也不算全错——他对所有海军军官都不怎么信任，觉得他们都是间谍或者是搞破坏的。但是，麦克阿瑟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给陆军带来的麻烦比海军更甚。马歇尔、史汀生和华盛顿的其他陆军高层想尽了办法让西南太平洋战区守规矩。麦克阿瑟总是在抗命犯上的边缘反复试探，常常或明或暗地威胁说要让更多大众给自己的事情评评理，而任何内部的矛盾捅到报纸和国会都可能会引发巨大反响。

麦克阿瑟发自内心地相信战争部辜负了他在菲律宾的军队。他愤怒地控诉那些身份不明的坏东西——“他们”——“他们”操控了军队，暗地里密谋削弱他。“他们”把“欧洲优先”作为盟国全球战略的基石，他痛恨这个政策，总是宣称这是个历史的谬误。“他们”拒绝向他提供遏制日本在南太平洋的进攻和发动反击所需的部队。“他们”是一群坐办公室的官僚，“政治将军”，这些人妒忌他的公众声望，因此想尽办法打压他。“他们”把持着华盛顿，而他却在距离权力中心半个地球远的澳大利亚。自从1935年离开以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华盛顿和美国本土；在罗斯福1941年7月任命他为远东美军总司令之前，他甚至已经从美国陆军退役，转而当上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长时间的两地分离，令他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必须用尽所需的手段来让华盛顿感受到他的影响力。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获得他需要的部队、武器、军舰和飞机去打赢太平洋战争，并且是根据他自己的计划表去打赢。他必须在“他们”自己的游戏里打垮“他们”——他在华盛顿的敌手，这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对手更能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86\]](#)他想要统治整场战争，想要把尼米兹的部队纳入自己麾下；这既然做不到，他就想要让自己的战区得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绝大部分资源。他想要让自己的战略主张压倒海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乃至同盟国的主张，

这意味着他应当首先尽快解放菲律宾群岛（尤其是北边的主岛吕宋岛）。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容许菲律宾被绕过，让位于那些能够更直接通往日本本土的路线。

在私下的谈话里，麦克阿瑟毫不隐讳地承认他积极的媒体关系策略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选择的手段。“他们怕我，鲍勃，”他在1944年初这样对艾克尔伯格说道，“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在报纸上和他们斗。”^[87]一位在他司令部工作的通讯员观察到，麦克阿瑟必须“每天早晨在他的公报里赢得这场战争，他要向公众证明，是罗斯福和邪恶的参谋长们扣住了那些原本应该属于他的武器”。^[88]

在他1964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始终说自己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获得共和党1944年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真实情况却是，他与一个所谓的“厨房内阁”积极合作，这是一群有实力的共和党人、商界领袖和媒体老板，他们都想要把罗斯福总统赶下台。这些人觉得，想要在一次战时选举中击败广受民众认可的现任总统，麦克阿瑟是最佳选择，也是唯一的希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们也和诸多亲朋好友及下属谈到了这件事，包括艾克尔伯格将军，他在1943年6月对夫人说：“我们首长谈起了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事——我看得出他想要得到提名，我想就是这样的。”^[89]麦克阿瑟可能参加竞选的第一个蛛丝马迹在当年4月露出了眉目，当时战争部长史汀生宣布，在职军官不允许一边穿着军装，一边参加国内竞选。共和党领袖，包括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和国会议员汉密尔顿·菲什将此解读为对麦克阿瑟的先发制人。这两人都跳出来指责史汀生干预政治，随后他们都收到了麦克阿瑟的感谢信，谢谢他们在危难时帮助自己。

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员范登堡是这个私下小团体的头儿，他警告麦克阿瑟，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想获得总统提名。他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1944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集会，届时共和党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托马斯·杜威和温德尔·威尔基将会僵持不下。到那个时候，这个小团体就会在万众欢呼之下提名麦克阿瑟成为总统候选人。这

个策略是范登堡和其他一些精英人物一起商议出来的，包括报社老板赫斯特和麦考密克，退役陆军将领及西尔斯百货执行官罗伯特·E.伍德，国会议员卡尔·文森，《时代》《生活》杂志出版商亨利·卢斯及其夫人，女国会议员克莱尔·布斯·卢斯。麦克阿瑟在国内的支持者会定期在其高级幕僚回国时与他们见面。（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许多高级幕僚在搭乘军用飞机往来于澳大利亚和华盛顿之间处理政治事务时一点也不谨慎。）初选季开始的时候，麦克阿瑟写信联系了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信件的用词都是格外谨慎，以防万一落入外人之手。例如，他给范登堡的信是这么写的：“为了您全心全意的友谊，我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唯愿终有一日能给予回报。我还有很多话，受限于环境不方便说。另外我想要您知道，我对您的经验和您睿智的伙伴们怀有绝对的信心。”^[90]

传记作家和历史学者们一直在为麦克阿瑟是否真的想要登上总统宝座而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他的目的只是想要向罗斯福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施压，让他来负责整个太平洋战争，并给他打赢这场战争所需的资源。他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内心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在聚光灯下自我膨胀。麦克阿瑟十分渴望打回菲律宾，拯救他那些被敌人囚禁并饱受折磨的队伍，并让星条旗在巴丹再次升起。若成为总统，他将会看到这一切成为现实，但同时也就不能亲手将其实现了。作为美国历史专业的毕业生，他一定知道自己这样做将会承担成为第二个麦克莱伦而毁掉职业生涯的风险——麦克莱伦是南北战争时北方联邦军的将领，在1864年总统大选中挑战亚伯拉罕·林肯失败。或许麦克阿瑟更喜欢去响应万众的欢呼，这对他来说完全不需要靠什么竞选。而在总统选举中击败罗斯福的前景也确实令他沉醉。这两人相识已久，他们曾是同僚、竞争对手，甚至是“朋友”，当然这只是面子上的，在华盛顿，点头之交有时也算朋友。在罗斯福刚刚当上美国总统时，麦克阿瑟是陆军参谋长。他对罗斯福在1934年缩减国防预算极为反对，甚至差点违抗这位新总统（连他自己都这么说）。和许多政治保守派一样，麦克阿瑟将罗斯福的新政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在美国国内的渗透。他私下里带着蔑视称罗斯福为“弗兰克表兄”，或者带着那个时代政治右翼普遍怀有的反犹情绪，不客气地

以犹太名字“罗森菲尔德”来称呼他。^[91]根据艾克尔伯格的说法，麦克阿瑟好几次说过，“若不是因为憎恨罗斯福，甚至达到了仇视的程度”，他才不想去争那个共和党总统的提名。^[92]

1944年初，当共和党正式启动初选工作时，有媒体引用匿名来源的消息称，麦克阿瑟正准备返回美国国内，全职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范登堡在《科利尔》发表了文章《为什么我选择麦克阿瑟》，公开了此事。^[93]还有一份经迪勒审查批准后发布的报道，总结了据说是在布里斯班盛行的观点：“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还有此地的其他许多人——认为获得胜利的最短路径是让一位有经验的军人入主白宫，那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在摄像机前被问及关于此事的想法时，麦克阿瑟身边的所有人却又异口同声地避而不谈：“我们还是谈谈打仗吧。”^[94]独立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拉珀曾多次直接问麦克阿瑟是否有意于共和党总统提名，却从未得到正面回答：“每次他都装作没听见我说话。”^[95]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已经出现在了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两个州的共和党初选选票上，他从未要求这两个州把自己的名字删掉。

但是有些反对偶像崇拜的记者提出了问题。一位正在与敌人血战的战区司令与国内的政治竞选眉来眼去，这样是否妥当？考虑到麦克阿瑟的公众形象是通过他自己的新闻审查官包装后由战时媒体折射出来的，让他和那些没有这一有利条件的候选人同台竞技，是否公平？美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麦克阿瑟在他自己这支军队的官兵中是多么不受待见。在竞选的聚光灯下，难免有人会强烈反对。1944年1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就是个例子。原先在亨利·卢斯手下供职的编辑约翰·麦卡登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然后回了国，因此绕开了迪勒的审查。在一篇毫不留情的人物概评里，他批评麦克阿瑟作为将领的表现被大大高估了，他醉心于高大的公众形象，但实际表现却无法与之相配，而且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肆无忌惮的新闻审查是对政治进程不可容忍的粗暴操控。麦卡登还重点指出了那些反对罗斯福的媒体对于塑造和维系“麦克阿瑟狂热”所起到的作用。他提出，麦克阿瑟无法胜任他自己所追求的角色，也就是

太平洋战场总司令，因为“在一片由天空和海洋主导的战场上……他是个陆地上的将领”。^[96]麦卡登写道，麦克阿瑟关于其并未参选总统的声明是不可信的，如果他真想消除外界的猜疑，就应当仿效谢尔曼将军在1884年的名言：“提名我，我不会接受；被选中了我也不会上任。”^[97]

《美国信使》的文章令麦克阿瑟暴跳如雷，尤为甚者，这本期刊可是列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图书馆分发给海外军人的读物之中。在一封发给马歇尔的长电报中，他说这篇文章“行文可耻，可以说是诽谤”，还发牢骚说这是跟在日本人的煽动文章后面鹦鹉学舌。^[98]但是他没有直接反驳，因为（按他告诉艾克尔伯格的说法）它包含了“一丝令他无法作答的事实”。遭此一击令他备感失望，“越过这道坎，是他必须去承受的”，^[99]他说。麦克阿瑟假若能够看到未来，想必会更加懊恼，因为从那以后，类似麦卡登这样的“恶毒攻击”将会在历史学家中变得十分普遍。

无论如何，这位黑马候选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最后冲刺的时刻摔了一跤。而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却在共和党选民和政治掮客中展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实力。到3月下旬，事情已经很明朗，杜威将会战胜威尔基，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芝加哥将不会出现僵局，麦克阿瑟也就彻底失去了这张总统竞选的入场券。麦克阿瑟的参选之路最终因他写给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阿瑟·L.米勒的信件被擅自公开而以一团糟的状态收场。米勒急着要让麦克阿瑟接受本党派的邀请：“为了国民和尚未出生的孩子们，你必须接受”，因为“除非能够制止这种‘新政’，否则我们美国的生活方式将会注定毁灭”。麦克阿瑟将军误以为国会议员都是很稳重的，于是在回信里直接写道，他“毫无保留地”肯定“您的评论充满智慧和政治家风度”。^[100]谁知道米勒没有经过麦克阿瑟的同意，就在4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这封信立刻全文出现在了全美各大报刊上。如果说米勒相信媒体将会拿这封信来鼓吹麦克阿瑟参选，他就大错特错了。范登堡将这次曝光视为“巨大的乌龙”和“悲剧性的错误”。I.F.斯通在《国家》杂志上撰文，结论是这封信令麦克阿瑟展露

出“军人不应有的形象——对自己的总司令不忠，是个浮夸而且无知的浑蛋”。[\[101\]](#)

麦克阿瑟在他1964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正是这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作为共和党提名人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他突然对这件荒唐而且丢人的事情警觉起来，迅速而且坚定地制止了这一切。他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自己没有竞选总统的野心，并将所有对米勒信件的此类解读斥为“用心险恶”。[\[102\]](#)大家都觉得他这声明过于可疑，于是他在1944年4月30日又发表了第二份声明，说道：“请不要把我的名字和总统提名联系在一起，任何形式都不要。对此我既不曾觊觎，也不会接受。”[\[103\]](#)

如此，麦克阿瑟关于总统政治的尝试便告一段落，至少在1944年这一届总统大选中是如此。这段丢人现眼的插曲将成为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小注脚。然而从更大的方面说，这一场闹剧却给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留下了一段抹不掉的印记。至关重要的全球战略居然受到了个人政治的拖累，并且在整个大选期间都将如此。杜威州长接受了所在党派的总统提名，他在1944年9月14日的演说中说道：“现在麦克阿瑟将军不会再从政治上威胁罗斯福先生了，他了不起的天才理应得到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瞩目……麦克阿瑟将军在补给不足、空中力量不足、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104\]](#)虽然此番发言语气平和，但杜威的评论却暗含了对总统的严厉指责，他暗暗指责参谋长联席会议纵容政治因素来左右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分配。杜威并没有继续深挖此事，或许是因为他知道参联会会来反驳他，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罗斯福从未原谅杜威，1944年的总统竞选将成为杜威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经历。

关于太平洋战争大战略的基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麦克阿瑟是否应当获准收复整个菲律宾群岛，包括北方主岛吕宋岛？欧内斯特·金关于攻打台湾的方案能否获得通过？美军是否应当在中国大陆沿岸登陆？若如此，这是否意味着美军将会大规模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更远一些看，对日本的最后一战将会是什么样子？日本能否在血腥惨烈的登陆之

前接受投降条件？昭和天皇裕仁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会扮演何种角色？这都是些复杂而且无比重要的抉择，而且不可能无限期拖而不决。总统选举的时间安排是不可更改的，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选民们都会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走进投票站。现在，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在大选季对太平洋上的重大战略问题做出决定了——人们必定会带上政治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些决策，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历史学者，都将如此。

[1] FDR Press Conference #676, August 30, 1940, p.2.

[2] 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p.22.

[3] For example, FDR Press Conference #389, August 9, 1937, pp.5, 17; and #523, February 3,1939, p.8.

[4] White, *FDR and the Press*, p.31; FDR Press Conference #389, August 9, 1937, p.23; and #915,August 31, 1943, p.7.

[5] FDR Press Conference #523, February 3, 1939, pp.6—8.

[6] Tully, *F.D.R.: My Boss*, p.87.

[7] Arthur Krock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1940, quoted in *White, FDR and the Press*, p.122.

[8] Rodgers, ed., *The Impossible H.L.Mencken*, pp.liv—lv.

[9] 1英尺≈30.5厘米。——编者注

[1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91.

[11] FDR Press Conference #790, December 9, 1941, pp.1—2.

[12] *Ibid*, pp.6—9.

[13] Fireside Chat No.19, “On the Declaration of War with Japan,” Radio Address from Washington,December 9, 1941, FDR Library.

[14] *Whaley—Eaton American Letter*, December 26, 1942, quoted in Parker, *A Priceless Advantage*, p.70.

[15] FDR, Statement to the Press, December 16, 1941, quoted in Price,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in War—T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 No.5, October 1942, p.841.

[16] Address by Byron Price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April 16, 1942, reprinted in Summers, ed., *Wartime Censorship of Press and Radio*, p.30.

[17] “Defense Shake—Up,”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41.

- [18]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 [19] “Washington News on Fighting Sca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1941.
- [20] McCarte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 [21] Davis, *The U.S. Army and the Media in the 20th Century*, p.51.
- [22] “We Shall Do Our Best, General MacArthur Stat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41.
- [23] “Keep Flag Flying, MacArthur Ord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41.
- [24] “MacArthur Glide Is New Dan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6, 1942.
- [25] “MacArthur Works On Birthda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1942.
- [26] *Philadelphia Record*, January 27, 1942, quoted in Borneman, *MacArthur at War*, p.125.
- [27]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1942, p.17.
- [28]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18.
- [29] Ibid, p.22.
- [30]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February 23, 1942, in Ferrell, e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p.49.
- [31]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February 23, 1942, Ibid, p.49.
- [32]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49.
- [33] Perry, “Dear Bart,” p.79.
- [34] 美国的战争部相当于陆军部。——译者注
- [35] Forrestal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53.
- [36] Forrestal recounted the quote in a letter to Carl Vinson dated August 30, 1944.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9.
- [37] *Basic Field Manual, Regulations for Correspondents Accompanying U.S. Army Forces in the Field*, War Department, January 21, 1942, p.4.
- [3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149.
- [39] Driscoll, *Pacific Victory 1945*, p.226.
- [40] 原文为Captain of the Head, 指厕所勤务兵。——编者注
- [41] Ibid.
- [42] Liebling, “The A.P. Surrender,” *New Yorker*, May 12, 1945.
- [43] Ewing,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pp.1—2.

[4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4.

[45] “Girding of Pacific Speeded by Nimitz,”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1942.

[4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362.

[47] Waldo Drake,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9.

[48]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234.

[49] Waldo Drake, oral history,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14.

[50] Casey, *Torpedo Junction*, p.278.

[51]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p.190—91.

[52] Davis and Price, *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 p.13.

[53] Ritchie, *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p.62.

[54] Brinkley, *Washington Goes to War*, p.190.

[55] Current, *Secretary Stimson*, p.201.

[56] Burlingame, *Don't Let Them Scare You*, p.195.

[57] Healy and Catledge, *A Lifetime on Deadline*, p.109.

[58] “Navy Had Word of Jap Plan to Strike at Sea,” *Chicago Sunday Tribune*, June 7, 1942, p.1.

[59] COMINCH to CINCPAC, June 8, 1942, Message 205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1,p.559.

根据菲奇将军司令部的通讯员弗洛伊德·比弗的说法，约翰斯顿和塞利格曼是“好兄弟”，两人在船上一同散步，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本书作者于2014年1月17日对弗洛伊德·比弗的访问，以及约翰斯顿的著作《航母女王》都确证了这一情况。——作者注

[60] 罗奇福特在海波站的一个副手托马斯·戴尔注意到，日本人在中途岛战役的同一周采用了新的密码本，早于《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时间，因此不可能是其导致的。Thomas H.Dyer, oral history, pp.270—71.

[61] Glen Perry to Edmond Barnett, October 22, 1942; full text of letter in Perry, *Dear Bart*, p.70.

[62]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88, June 12, 1942.

[63]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07, August 17, 1942.

[64] Hanson Baldwin, oral history, p.359.

[65] Burlingame, *Don't Let Them Scare You*, p.201.

[66]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47, October 12, 1942.

[67]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49, October 13, 1942.

[68]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68, October 26, 1942.

- [69]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69, October 26, 1942.
- [70] Navy Department communiqué No.175, October 31, 1942.
- [71] CINCPAC to COMINCH, November 1, 1942,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2, p.970.
- [72] Perry, *Dear Bart*, p.84.
- [73]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1, 1942, in Perry, *Dear Bart*, p.85.
- [74] Phelps H.Adams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p.260—61.
- [75] 瓜岛海战于1942年11月12日至15日进行，此战奠定了盟军在瓜岛战役中的胜局。——作者注
- [76]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7, 1942, Perry, *Dear Bart*, p.91.
- [77] Phelps H.Adams quoted in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261.
- [78] Glen Perry's memorandum to editors, November 30, 1942, Perry, *Dear Bart*, p.107.
- [7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undated,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64—65.
- [80]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65.
- [81] Ibid.
- [82] SWPA Communiqué No.326, March 4, 1943; SWPA Communiqué No.329, March 7, 1943;RG,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83] Press release, SWPA headquarters, April 14, 1943,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84] MacArthur to Chief of Staf, War Department, September 7, 1943, RG—4, Reel 593,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85] LeGrande Diller, oral history, September 26, 1982,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p.13.
- [86] 麦克阿瑟使用代词“他们”来指代其在华盛顿的无名敌人，他的这种偏执倾向是威廉·曼彻斯特注意到的。*American Caesar*, p.273.
- [87]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anuary 29,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pp.90—91.
- [88]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p.280—81.
- [8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une 13, 1943,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71.
- [90] Meijer, *Arthur Vandenberg*, p.218.
- [91] This according to Faubion Bowers, an interpreter and loyal aide—de—camp, in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92] “Eichelberger Dictations,” November 12, 1953,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77.

[93] Arthur Vandenberg, “Why I Am for MacArthur,” *Collier’s Weekly*, February 12, 1944, p.14.

[94]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423.

[95] 克拉珀于1944年1月向前白宫海军助理约翰·L.麦克雷上校描述了这次谈话。见McCrea, *Captain McCrea’s War*, p.210。次月，克拉珀在报道登陆马绍尔群岛的“燧发枪”行动时，因其乘坐的海军轰炸机与另一架美国飞机相撞而遇难。

[96] John McCarte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97] Ibid.

[98] MacArthur to Marshall, cable in the clear, March 11,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9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January 28,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90.

[100]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435.

[101] Ibid., p.436.

[10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85.

[103] Press release, SWPA headquarters, Statement of Douglas MacArthur, April 30, 1944, RG—4, Reel 611,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04] “Dewey Refuses to Say Directly That Roosevelt Withheld Pacific Supplies,” *Courier —Journal*(Louisville, KY), September 15, 1944, p.6.

第一章

1944年7月13日日落后，罗斯福总统及其随从驱车开到了华盛顿第十四大街的地下铁道岔线处，登上了一趟专车——“总统专列”。在车站和特勤局人员的帮助下，罗斯福进入了被称为“普尔曼1号”，也就是专列最后一节车厢里的一间豪华包房。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走进了同一节车厢的另一间豪华包房。白宫参谋长兼罗斯福的老友，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走进了第三间包房。列车向北穿过马里兰州的麦田，一行人在微微摇晃的卧铺上酣然入睡。

“普尔曼1号”的陈设精致而奢华，墙上是橡木壁板，地上铺着绿色长毛绒地毯，还有桃花心木的家具和又软又厚的椅子。然而，它还是一艘车轮上的战列舰。车厢的底盘装有12英寸厚的装甲钢板，足以抵御埋在铁路路基下的大型炸弹。树脂玻璃车窗厚达3英寸，足以挡住直接命中的.50口径^[1]子弹。车体侧面装甲则能够承受中口径炮弹的打击。“普尔曼1号”重达142吨，几乎是普通车厢重量的2倍，但设计师并不希望它特别引人注目，因此其外观和普通的普尔曼式专车别无二致。

这趟旅程中，总统将乘坐专列经过芝加哥和圣迭戈，然后乘船前往夏威夷、阿拉斯加、皮吉特湾，最后再次乘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返回。全程将为期35天，是罗斯福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行程之一。其中的高潮部分将是总统对夏威夷瓦胡岛为期4天的视察，其间罗斯福将视察各军事设施，并和他在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将领——陆军上将麦克阿瑟和海军上将尼米兹会面，商讨下一步对日作战行动。

就在两天前，罗斯福毫不意外地发布了公众期待已久的声明，宣布自己将史无前例地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他对媒体说，自己别无选择，

因为“如果人民希望我继续作为总统领导这场战争，我就无权退缩，就像前线的战士无权丢弃阵地一样”。^[2]总统的列车将在芝加哥短暂停留，那里正在举行民主党全国大会。同样是在芝加哥，共和党两周前刚刚举行过同样的大会，提名杜威州长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由于选情，总统的这次旅行难免被其政治对手指为给竞选造势之举。

在和平时期，总统专列会搭乘最多四十名媒体记者随行。但这次则只有三位记者，分别代表三家重要通讯社获准同行——他们的报道只有在获得白宫授权之后才能发出，这通常要耽搁一个星期时间。战时安全需求使得这样的措施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媒体对于无法了解总统的行踪十分恼火，尤其是当他在数万人前出现而媒体却一无所知时。对于媒体的抱怨，罗斯福总统不为所动，甚至看起来还很乐意以此为借口让媒体离自己远远的。“坦率地说，”他对史蒂夫·厄尔利说，“我觉得新闻自由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问题之一。”^[3]当白宫记者要求了解他的行程安排时，罗斯福通过厄尔利挖苦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偷看我洗澡还是跟我上厕所？”^[4]

从1944年春开始，罗斯福和他的团队有了个无法抗拒的理由来对付媒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华盛顿谣言满天飞，说他已无力继续执政了。他的面色变得灰白，眼睛显得凹陷和无神，声音也已沙哑而无力。他还开始严重地咳嗽，嘴唇和指甲出现了一抹不祥的蓝色。被问及感觉如何时，总统回答道：“太痛苦了”或者是“完了”。^[5]1944年3月，海军心脏病专家霍华德·布鲁恩医生发现他的血压严重升高，并精确地诊断出总统患有充血性心力衰竭。根据20世纪40年代的治疗手段，病人再活过四年总统任期的概率并不太大。患有此病者确诊后存活时间的中位数不足两年。布鲁恩后来说，如果他的病人不是国家的战时总司令，他一定会坚持要求病人离任，立即入院治疗。但是有权向公众介绍总统健康状况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私人医生——海军军医处处长罗斯·T.麦金太尔中将，他告诉媒体，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比他1933年入主白宫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6]麦金太尔看似轻松的保证，实际上是一种掩

饰，这种掩饰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总统去世之后。

布鲁恩后来承认，他和他的同伴们已经将医生的道德规范让位于更高的国家利益了。罗斯福总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他在引领全球盟军协同作战方面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他是计划、商谈建立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关键人物。轴心国的宣传机构将强健的体魄塑造为力量的象征，并把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视为西方制度衰落的标志。他国内的政治对手们也四处散布流言，说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糟，并四处寻找能证明这些流言的证据。这样，布鲁恩医生的诊断书就成了国家机密，记者和摄影师也难以获准见到罗斯福总统。在总统专列上，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总统毫不客气地把他们骂作“杀人凶手”“趁火打劫者”“食尸鬼”）不允许进入距离“普尔曼1号”三节车厢以内的地方。于是人们总是会看见这几位在俱乐部车厢的酒吧和牌桌旁消磨时间。

总统一家在哈得孙河河谷短暂停留，回到他们在海德公园的家里待了一天，之后在14日晚回到总统专列上。当晚，列车从纽约中央铁路驶过，第二天中午来到芝加哥55街的客车编组站暂歇，他们将在此停留两个小时，好让罗斯福面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

大部分民主党成员都决意赶走现有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罗斯福遵从了他们的意愿。关于哈里·S.杜鲁门参议员是怎样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其他地方已经讲过，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说这个结果很诡异，就连罗斯福最亲近的圈子都对此感到意外。与汉尼根短暂会面后，罗斯福总统签发了一封函件，同意让两名潜在竞选搭档中的任何一人与自己一同参选：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或者杜鲁门。这封函件中两人名字的顺序起初是道格拉斯在前，杜鲁门在后。但就在总统专列启程离开芝加哥前的最后一刻，汉尼根走出总统的私人包房，告诉总统的秘书格雷丝·塔利，把函件重新打印一遍，把两个人的名字顺序颠倒过来。就这样，罗斯福在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场看起来似乎很随意的会面后，似乎是心血来潮地就正式指定了自己的继承人，即便此时他的医生

已经有理由担忧他能否活到下一个总统任期结束。^[7]

罗斯福在芝加哥这次历史性的停留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前，总统专列再一次启动，开往堪萨斯州的托皮卡，继而沿着罗克城铁路向西进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火车缓缓穿过大平原和美国西南部的沙漠。火车开得很慢，速度很少超过每小时35英里，这一方面是由于总统发觉这样的缓慢节奏会让旅行更加舒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希望在圣迭戈海军基地发表他关于接受本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讲话，而具体的提名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在这种速度下，火车的电池续航力就成了问题，因此他们常常在沿途小站停车充电。罗斯福每晚睡得都很好，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这是至关重要的。旅行总是能让他难得地容光焕发。平静地坐在那里，一边看着田野从窗外滑过，一边对照着窗外的小镇或者其他地标用膝盖上的地图查找当前的位置，这让他的精神振奋了起来。他会讲述那些只有专业人士才知道的当地历史逸事，还如数家珍般回忆起自己在途经的每个选区的竞选往事，这给他的幕僚和随从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总统出行线路沿线，警察和当地驻军重兵布防，把守着所有的大小桥梁、岔路口和隧道。凡是高速公路和火车道近距离平行的地方，陆军的吉普和卡车都会陪同护送。不难想见，士兵们都会好奇地朝总统车厢的窗户张望，希望能看一眼他们的总司令、第一夫人，或者是他们那条名叫法拉的著名黑色小苏格兰犬。火车即将到达的消息都会提前口头传递到下一个站点。7月16日那个炎热的下午，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埃尔里诺火车站，有人看见埃莉诺·罗斯福用绳子牵着法拉在月台上来回溜达。消息立刻传遍了全镇，立刻有差不多500名好奇的人赶来把车站围得水泄不通。直到一个小时后火车启程离开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往这里赶来。^[8]

除了第一夫人和莱希上将，与总统同行的还有一大群军事助理；一个医疗组，包括麦金太尔、布鲁恩和另两名医生；负责撰写演讲稿的萨姆·罗森曼；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绰号“老爹”的沃森陆

军少将；威尔逊·布朗海军少将；以及格雷丝·塔利。此外还有战时常见的大量特勤局人员，海军港务人员，铁路人员，以及通讯社派来的那“三个食尸鬼”。

在火车的前部，紧跟在火车头和行李车后面的，是一节由陆军通信部队掌管的没有窗户的通信车——一个挤满了电线、真空管、电子设备面板以及解码机的兔子窝。从这里，通信兵们通过短波无线电及无线电传打字机和白宫地图室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初级海军助理威廉·里格登上尉，在这次横穿大陆的旅行中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通信车和总统车厢之间的15节车厢里来回奔走，这段距离差不多有1/4英里。他要带着电文穿过一连串车厢，包括上下铺的普尔曼式卧铺车、俱乐部车、餐车，以及更多的卧铺车厢，最后从守卫着总统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的武装便衣旁经过。[\[9\]](#)

7月19日凌晨2点，总统专列停靠上了圣迭戈海军陆战队基地的一处火车站台。一行人将在这座美国西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停留三天，视察当地的各处军事设施。罗斯福夫妇见到了他们的儿子詹姆斯一家，他们就住在科罗纳多湾对面。罗斯福总统及随从前往圣迭戈以北4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港，视察了第5海军陆战师两个团级战斗队举行的两栖作战训练演习。这是一场高度拟真的实弹登陆演习，有很多重型装甲车辆和先进的登陆艇都参与其中。对于总统和他的高级军事幕僚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学习过程。太平洋上的越岛作战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他们在欧申赛德见到的这种大规模两栖机动是在和平时期从未见过的。海军舰炮火力、空中支援和登陆部队的密切协作给莱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7月20日，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提名罗斯福第四次参选美国总统。此时，总统专列正停在海军陆战队的火车站台旁，罗斯福于是发表了接受提名的15分钟感言，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回了民主党大会会场上。之后，他又为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师重读了发言的高潮部分。距离9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埃莉诺·罗斯福和一行人挥手告别，搭乘一架军用飞

机返回了华盛顿。总统、莱希和小狗法拉则乘车前往不远处的百老汇码头，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正停靠在那里。这艘军舰的舰员们事先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将会搭乘此舰，但是当舰长住舱旁的走廊上搭建起轮椅专用的斜坡时，有些人就已经猜到这一点了。罗斯福住进了舰长住舱，莱希则住进了舰队司令住舱。

总统能理解老水手们不愿在星期五起航的迷信，军舰便一直等到这一天午夜才解缆起锚。它沿着一条扫清了水雷的安全水道开向外海，5艘驱逐舰紧跟在黑暗中的巡洋舰身后。舰队随后转向243°航向（西南偏西），航速22节，消失在海平线上。

1944年3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力夺取帕劳，即密克罗尼西亚南部的一个日占岛群，任务完成时限是9月15日；然后是棉兰老，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大岛，完成时限为11月15日。但是对于接下来1945年初的主要作战行动，参联会尚未做出决定。一如既往，菲律宾是麦克阿瑟的战略焦点，他一直在不停地向华盛顿施压，以求支持他所倾向的南线进攻。他主张在向菲律宾以北区域发动任何两栖进攻之前，应当先集中所有可用的美军兵力（包括太平洋舰队）拿下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以及首都马尼拉。而金上将和参联会内部的大部分计划制订者都希望越过吕宋岛，直接将下一轮主要进攻指向台湾。3月12日参联会发给太平洋上两个战区司令部的电文将这一矛盾摊在了台面上。电文指示两个司令部准备可行性方案，目标是“占领台湾，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或者攻占吕宋，如果此行动先于进攻台湾的必要性得到证明的话，时间期限为1945年2月15日”。[\[11\]](#)

当“巴尔的摩号”搭载着美国总统开往夏威夷之时，美军进攻部队正在准备攻取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又译天宁岛）。在1944年6月19日至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也就是发生在马里亚纳群岛西方海域的一场海空大战中，日军损失了差不多300架飞机和3艘航母。同时，日本本土通往南方资源产区的海运线也开始遭到越来越多

的打击，日本帝国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已然开始崩塌。虽然东京的统治高层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但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遭受的损失及其舰载航空兵的毁灭却标志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现在，最后阶段的战役已经开始，最大的那个问题也凸显了出来：如何迫使日本的领导层认输，并接受盟军给出的投降条件——无条件投降？美军知道，在眼下这个岔路口，两个选项——吕宋或者台湾——都是走得通的，而且一定能够打赢。显而易见，这是个高阶难题，需要战争计划制订者们综合考虑战略和技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华盛顿和太平洋战区里已经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多种不同观点。总而言之，现在到了一策定乾坤的时候了。

早在1943年初，参联会的计划制订部门就开始讨论一份“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这份文件预期中国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发挥关键作用。中国既可以成为对日空中轰炸的基地，也可以提供大量兵员以消灭亚洲大陆上的日本陆军，如有必要，那就连日本本土的日本陆军也一起收拾了。为了实现这一方案，盟军将需要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而如此一来，台湾就成了打开大陆之门的钥匙。这一以中国为核心的太平洋决战方案在华盛顿获得了有力支持，因为海军正是希望从中太平洋线路进攻，沿密克罗尼西亚前进，然后是马里亚纳群岛，继而前往台湾。

参联会内部最有影响力的计划制订机构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Joint Strategic Survey Committee，缩写JSSC），该机构由一群幕后人员组成，直接向各军种总司令汇报。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主席是斯坦利·D.恩比克陆军中将，西点军校1899届毕业生。参联会的四大巨头对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里这位受人敬重的老兵始终青眼有加，他提出的建议完全不会受到军种竞争或者各机构之间的偏见影响。1943年11月，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内部达成了一致而且明确的判断，即中太平洋的进攻比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战役更加重要，因为从这里打到日本的路径更短，因此“早日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全力从中太平洋进攻，同时在南北两翼进行策应行动——使用所有能够在这些区域

维持运转并有效使用的力量，包括海上力量、航空兵和地面部队”。^[12] 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以及他关于将重心转向南线和菲律宾的要求，一直未能影响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所有新的研究结果都进一步确认了这个幕后团队先前的结论——麦克阿瑟的南太平洋作战并不必要，在太平洋上分散兵力可能会导致战争延长，而此时日本败象已露，美军理应对敌人的内层防御圈展开更直接的进攻。根据委员会的判断，这个进攻的目的地就是台湾。

麦克阿瑟面临着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无法指望乔治·马歇尔来帮助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获得足够的关注，或者为他所主张的南太平洋—菲律宾进攻路线赋予更高的优先级。前一年，他曾对自己的副手理查德·萨瑟兰将军赤裸裸地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萨瑟兰正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要向马歇尔强调，他可以通过分配太平洋作战所需的空中力量和地面力量来控制局势。没有这些陆军的力量，海军就会孤立无援。如果他能把空中力量和地面补充力量投入这里，而不是把这些人派到海军的战区，他就能间接实现他想要的目标。”^[13] 没人知道萨瑟兰是怎样向马歇尔灌输这一观点的，但是这位陆军参谋长生来就不喜欢“间接”地做事，韦氏词典将这个词定义为“不直接，不坦率”。马歇尔对于太平洋上的军种竞争自然心中有数，但他从来不会把这种竞争视为陆海两军抑或是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零和博弈，而且他一直乐于思考以更直接的方式攻至日本本土所能带来的益处。至于让海军“孤立无援”之说，只要看一眼太平洋的地图，就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944年6月，眼见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的论据是多么有力，马歇尔劝麦克阿瑟丢弃不合时宜的成见，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太平洋全局。现在日军已经出现衰败的迹象，这难道不是加快战役节奏的时机吗？越岛战术，也就是绕过敌军坚固防守的岛屿，已经成了麦克阿瑟南太平洋胜利进攻的招牌动作——那为什么不能也越过吕宋？如果盟军最终是要在中国大陆沿岸获得一个港口，那或许攻占台湾就宜早不宜迟。马歇尔甚至在考虑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参联会的计划制订者们已经在传阅这

个方案了——对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岛直接发动登陆突袭。马歇尔告诉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个人情感和对菲律宾的政治考虑凌驾于我们的总体目标之上，那就是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我看来，‘越过’和‘抛弃’完全不是一回事。恰恰相反，在最短的时间内打败日本，才是最迅速、最彻底收复菲律宾的有效方式”。^[14]但是麦克阿瑟对此完全不买账，他声称必须收复吕宋，这既是出于战略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项重大义务要去履行”。^[15]

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的愿望是真诚的、可敬的，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了把这方面的历史说透彻，下面的这些事实也不能不提。1942年2月13日，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指挥地堡里，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签发了一道指令，要求从菲律宾联邦财政资金里向麦克阿瑟划拨50万美元，向萨瑟兰划拨7.5万美元，向麦克阿瑟参谋部的另外两名高级军官也划拨了数额稍低的钱款。这笔钱据说是为了感谢美国军队过去为菲律宾做出的贡献。付给麦克阿瑟的金额可以折合成今天的800万美元。由于菲律宾联邦财政的钱储存在纽约，名义上要部分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因此这笔费用需要获得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批准。马歇尔和史汀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既然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举措来制止这一交易。同样，根据现存的文件记录，罗斯福总统也知道此事。^[16]后来，奎松总统逃到美国后，在华盛顿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想要“孝敬”他——具体金额不详——以感谢他此前在菲律宾的服务。艾森豪威尔谢绝了，他给出的解释很靠谱：“误读和误解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掉我在这场战争中为盟军所做的一切努力。”^[17]这位未来的欧洲战场总司令判定这种“献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适当的，长远来看也将会遭到民意的挞伐。这两个判断都是准确的。

1944年夏季，金上将私下里直截了当地对麦克阿瑟作为军事战略家是否称职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对于两栖作战方面的新进展知之甚少（或者不感兴趣），这些进展后来被证明足以

让美军长距离跨越大洋，攻占敌人坚固设防的岛屿。麦克阿瑟原先关于中太平洋灾难的预言早已破产，但他又做出了类似的预言，宣称台湾作战计划必定会失败。金在1942年曾经提倡南太平洋的反攻——实际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始于金发动的瓜岛战役，当时麦克阿瑟还是反对这一行动的。但是在金看来，南线进攻只适用于战争初期，当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打过太平洋的中央海域。而此时，澳大利亚已经安全，盟军已经碾过了日军的俾斯麦海防线，现在是时候停止南线进攻了。麦克阿瑟作战行动的终点理应是棉兰老岛。金在一次例行的亚历山德里亚非正式媒体见面会上告诉记者们，夺回菲律宾“情感上很需要”但“实际上行不通”，这很可能会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推迟3到6个月。^[18]他还对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司令丹尼尔·E.巴比海军少将尖刻地说道：“看起来麦克阿瑟更在乎的是他重返菲律宾的承诺，而不是打赢这场战争。”^[19]

7月13日，金上将带着一大群随行幕僚，乘坐他专用的“科罗纳多”水上飞机飞赴珍珠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开了两天会之后，金和尼米兹搭乘一架双垂尾的洛克希德“北极星”飞机，在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间跳跃前行，短暂停留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和埃尼威托克（又译恩尼威托克）后，于7月17日飞抵塞班岛。在仅仅两个星期前还在激战的关岛阿斯里托机场，他们在停机坪上会见了一群高级将领，包括第5两栖军军长“疯子”霍兰·史密斯将军和第5舰队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当然还有媒体记者和摄影师。此时距离美军宣布占领该岛刚刚过去了一个星期，小规模交火仍然在偏远区域接连不断，被困岛上顽固抵抗的日军还有数百人，甚至可能上千人。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太平洋前线是什么样，他急着想上岛看看。史密斯担心日军狙击手的威胁，但金执意要来，于是史密斯只好派了三个连的海军陆战队来保护这两位四星将军。金和尼米兹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沿着岛屿西岸的主要道路，穿过已经化为瓦砾的加拉潘、坦纳帕格和嘉兰卡诺亚驱车前行。虽然负责掩埋尸体的卫生队已经两班倒连轴转，但空气中还是弥漫着腐烂尸体的恶臭，令人无处可躲。不过史密斯和他的部队已经来到塞班一个

月了，早已对此习以为常。

当天下午，金、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搭乘一艘汽艇前往停泊在海岸外大约1英里处的第5舰队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三人在军舰的8英寸^[20]主炮前合影之后，便前往舰队司令部餐厅提前吃晚饭。进了餐厅，斯普鲁恩斯坐在条桌的一端，金坐在他的右手边，尼米兹坐在左手边，还有十来名军官按军衔、年资的顺序在条桌旁依序而坐。就在甜点端上来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群苍蝇通过开着的舷窗蜂拥进了舱内。这些苍蝇都是从塞班岛数以千计的腐尸烂肉上生出来的，乘着海风飘到了海上。它们困扰舰员们一个星期了，但这天傍晚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苍蝇之多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这些家伙爬在桌子上、饭菜上，还有人们的脸上和手上。它们四处肆虐，有些甚至接近一英寸长。根据斯普鲁恩斯的参谋长“卡尔”穆尔的说法，这些东西用手赶都赶不走。如果它们落在你的鼻子上，你得把它们弹开或者用手拎走才行，“它们会爬在你的饭菜上，你的眼镜里面，飞进你的耳朵，无处不在，你会忍不住去想，它们都是吃惯了日本鬼子的尸体，现在想来到船上呼吸一点新鲜空气”。^[21]餐厅服务员赶紧关上了舷窗，但太晚了。毛手毛脚的军官们在挥手赶苍蝇时打碎了好几个玻璃杯，他们站起来和坐回去的时候，椅子在地面上刺耳地刮擦着，让接待四星上将来访时所应有的庄重体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天，金向斯普鲁恩斯询问“堤道”行动，也就是未来的进攻台湾战役的准备情况。这位第5舰队司令回答得倒也爽快：“我不喜欢台湾。”^[22]他提出可以攻取硫黄岛和冲绳岛来代替台湾，达到相同的目的。硫黄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和东京之间的飞行线路上，占领这里可以削弱日军航空兵的反击。冲绳岛比台湾小，因此战役规模更加可控。斯普鲁恩斯说，对于盟军的目的而言，冲绳岛的大小刚刚好——足够小，只要几个星期就能拿下；但又足够大，足以成为对日本本土作战的基地。它坐落在连接日本及其南方资源产区的航运线上，战略位置重要。冲绳还有许多可以登陆的地点，这样守军就无法集中其所有火力于一个

滩头。这个岛屿既能够成为进军中国大陆海岸的垫脚石，也能成为进攻九州的跳板。

然而，冲绳距离九州仅有330英里，可以想见，两栖舰队将会遭到持续的大规模空袭。最近的盟军基地都远在1 000英里之外，因此航母特混舰队就必须在这片海域不间断停留数个星期，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掩护。鉴于这些挑战，金问斯普鲁恩斯：“你能做到吗？”斯普鲁恩斯回答说没问题，只要后勤部队能完善其海上弹药补给技术就行。这是当时所剩不多的能够拖慢第5舰队脚步而又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斯普鲁恩斯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一如既往，他又判断对了。^[23]

既然斯普鲁恩斯是负责台湾进攻战的舰队司令，那么他的观点自然非同小可。而且持相似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反对“堤道”计划的人中包括了舰队、两栖部队和尼米兹司令部中多位有影响力的人物。许多人怀疑台湾不值得如此努力去攻占，毕竟这场登陆战的规模堪与诺曼底登陆比肩。这些人告诉金，如果台湾真的非打不可，那他们就要首先获得吕宋岛的机场和马尼拉湾的海军基地，这样也就无法越过菲律宾了。在7月19日返回夏威夷的飞机上，哈尔西将军的参谋长“米克”罗伯特·卡尼向金抱怨，说打台湾就是“浪费时间”。^[24]卡尼给出的替代方案是：“部队不如集结在吕宋，我们可以炸平台湾，然后绕过它。”^[25]

金问：“你想把马尼拉变成伦敦吗？”

“不，将军，”卡尼答道，“我想的是把吕宋变成另一个英格兰。”^[26]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7月20日的最后一场会议上，当舰队的计划制订者们一条一条地列举反对进攻台湾的理由时，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约翰·H.托尔斯将军着重提出，无论是关岛还是塞班岛，其港口设施都不足以支撑一支大到足以打下这个中国第一大岛的登陆部队。而陆军航空队打算在马里亚纳群岛部署至少12支B-29轰炸机大队，这就令情况更加雪上加霜了。托尔斯警告说，正在筹备的“堤

道”行动，可能会“削弱VLR [B-29轰炸机] 计划”。^[27]这样就可能会激怒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金仍然坚持“堤道”计划。但是他不打算利用自己的舰队总司令身份来压制同僚的不同意见。和他在许多历史著作中的形象相反，这位海军作战部长并不是个独裁者。他坚持维护自由发表观点的氛围，对相反意见满怀善意。当尼米兹开始总结讨论内容时，金特地要求卡尼把所有反对打台湾的意见复述一遍，以便记录，确保这些意见都被写入会议纪要。很难想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会如此欢迎来自下属的反对意见。^[28]

金没有受邀在总统访问夏威夷时留下来。实际上他和马歇尔都特地被排除在外。据说这是因为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不受拘束地畅所欲言，而且他们早就对参联会的观点烂熟于心。但是金对于未能参加太平洋方面这次指挥层峰会十分不满。在他战后的回忆录中，他提到罗斯福此前刚刚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据此得出结论，现在他“想要让选民们看到，他才是总司令”。^[29]

金不在，尼米兹便应该要为“堤道”行动辩护。但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尼米兹并不真的想打这一仗。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和他在司令部、舰队里的同僚们一样对这场行动充满疑虑。7月24日，尼米兹警告金，除非能首先消灭附近吕宋岛上的日本空中力量，否则派兵登陆这个中国第一大岛并不明智：“若不能有效削弱或压制石灰水 [吕宋的代号] 的敌人航空兵，则‘堤道’行动胜负难料。”^[30]不仅如此，尼米兹还补充道，届时有可能会需要占领台湾全岛，而不仅仅是北部和南部的沿岸地区。若果真如此，他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要加码——更多部队，更多航空兵大队，更多运输船和更多的海军力量。而且，如果要扩大台湾之战的规模，美军就需要更大而且更近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这就又得回头先打吕宋。

金也没有坚持太平洋舰队司令一定要附和自己对台湾的态度。他知

道罗斯福和莱希想要听太平洋舰队司令阐述自己的想法。“我尽量不给他施加太大压力，”金说，“因为我接受的训练是让人们独立思考。”但是金担心尼米兹说不过“那两个世界上最精明最老练的辩手。尼米兹是个不错的人，但他在这方面完全不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手。当然，罗斯福先生则是‘前辈大师’”。[\[31\]](#)

7月24日，距离计划中罗斯福总统到达珍珠港的日期还有两天，金一行登上了那架洛克希德水上飞机飞返本土。途中，他们从迎面开往瓦胡岛的“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舰队上空飞掠而过。

开往瓦胡岛途中，“巴尔的摩号”进入了战时航行状态，这就意味着要走之字形航线以规避敌方潜艇，并在黄昏后到黎明前进行灯火管制。此时天气凉爽，海波不兴，轻风拂面。海军的战斗机和巡逻机常常在军舰上方巡逻。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总统都待在自己的住舱里，要么睡觉，要么阅读，养精蓄锐以应对接下来那令人筋疲力尽的行程。莱希将军每天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大部分下午，他和莱希都会在指挥舰桥里坐一两个小时，享受阳光和海风。莱希的住舱里每晚都会放电影。一如往常，小狗法拉是所有人的好朋友，舰员们常常会给它喂一点狗粮，或者剪走一撮狗毛当作纪念品，直到舰长勒令他们住手为止。假如总统的爱犬在到达夏威夷时变得肥胖或者成了秃毛，那对于“巴尔的摩号”的名誉显然没什么好处。

比尔·莱希面容尊贵，黑眼睛炯炯有神，眉毛粗重，额头紧蹙，有点秃头。他的言谈举止谨慎、庄重而得体。虽然穿着军装，但他仍然时时透着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质。他在1939年退役之前，曾官至海军作战部长，海军的最高将领。后来罗斯福先后任命他为波多黎各总督和驻维希法国大使。1942年，罗斯福总统曾认真考虑过让莱希担任太平洋战场最高司令，统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这虽未成为现实，但他还是以四星海军上将的军衔被召回现役，担任总统的“军队总参谋长”，并位列参谋长联席会议四大员之一。

军衔和服役年限决定了莱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获五星上将军衔的陆海军将领，并影响了二战中所有主要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决策。莱希还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最老且最信赖的好友之一，亲信圈的一员，他的办公室位于白宫东边，只要不是睡觉时间，他大部分时候都和总统在一起。他作为总统日常伙伴的角色最近又扩大了，因为白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其职责相当于民事方面的莱希，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也一样亲密）不幸罹患晚期胃癌，不得不退休。

在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生效之前，参联会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没有提名流程，也不需要参议院同意。莱希的角色有时候会被称为参联会主席的“前身”，因为他并没有今天美国参联会主席所拥有的权力。看起来莱希仅仅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和各军种参谋长的一致同意而被拉进参联会的。其他各位参谋长都说莱希是他们实际上的主席，这才确定了他的老大身份。当然这个决定是自发而且临时的。

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澄清了一直以来历史著作里关于莱希在二战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这位将军会被称为“白宫参谋长”或者“参联会主席”。这两个职位在今天都是存在的，但二者大相径庭，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那么，莱希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个幕僚？一个可靠的追随者？老练的传信者？罗斯福最好的朋友？或者实际上是全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答案似乎是，比尔·莱希这些都是。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挚友，尤其是在总统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但他同样深受各军种参谋长的敬重，他们尊他为战略家、前任海军作战部长，以及全球性的政治家。参联会做决定靠的是达成共识，而非少数服从多数。因此，莱希最少也是这强大四人组里的成员。任何时候，只要参谋长们凑不出一致决议，这个官司就要打到总司令也就是总统那里，而莱希正是参联会和总统间的主要桥梁。

罗斯福和莱希之间的大部分交流都是关门进行的，他们直接面对面交流，因此没有形成文字记录。这样，人们并不总能知道他们的思想是

怎样互动的。这个难题由于莱希性格上的谦虚和内敛而愈加严重。他不愿抛头露面，也不在意自己能否名垂青史。在学术著作和传记里，他更倾向于躲在罗斯福总统的影子里。毫无疑问，他对此一定是会满意的。[\[32\]](#)

7月26日上午，瞭望哨看到军舰左前方50英里外出现了一条褐色细长条的陆地，那是莫洛凯岛。很快，一队由18架海军飞机组成的护航机群从西边飞来，在“巴尔的摩号”上方低空盘旋。此时天气晴朗，海面平静，海风一阵一阵地轻轻吹来。崎岖不平的戴蒙德角（又译钻石角）从前方海平线上升起，一步步向东逼近，渐渐带出了长弧状的怀基基白沙海滩和檀香山的风景。在这一幕景色中，瓦胡岛陡峭的青山显得巍峨而端庄。在珍珠港的入口水道外，“巴尔的摩号”停了下来，一艘拖轮带来了港口引水员和前来迎接的军民两界高官，包括尼米兹海军上将、小罗伯特·C.理查德森陆军中将（尼米兹战区的陆军部队司令），以及夏威夷总督英格拉姆·M.斯坦巴克。

当“巴尔的摩号”缓缓滑进拥挤的锚地，舰员们发现珍珠港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欢迎这位总司令了。数百架海军舰载机翼尖挨着翼尖排成密集队形，遮天蔽日地飞过。港内的战舰都穿上了盛装——从舰首到桅顶再向后到舰尾拉上了绳索，挂满了三角彩旗。舰员们都在栏杆旁就位——穿着白色军服，彼此相隔两三米立正，面向舷外，双手交叉背在身后。没有人正式通知总统要来，但流言和猜测向来都是不胫而走的。既然秘密已经保不住了，“巴尔的摩号”的主桅顶上便干脆升起了总统旗。

下午3点，一艘港务拖轮把“巴尔的摩号”推到了混凝土防波堤旁的泊位上，这个泊位就位于闻名遐迩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后方。码头上，一组大约24名陆海军将领在舷梯旁列队迎候。海军将领穿着白色军服，陆战队将领穿绿色，陆军将领穿卡其色。如此之多的将军集中在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可是罕见的，甚至堪称前所未有。在将军们身后，栏杆和路障之外是人山人海，都是前来围观的军人和百姓，大约有2万人。

将领们登上了舷梯，没有什么迎接仪式。（这些礼仪都免了，因为

这会浪费太多时间，耽误下午的行程。）访客在众人护卫下来到了舰桥甲板的走廊上，罗斯福和莱希在那里与尼米兹、理查德森做了短暂的交流。相互介绍、握手，然后寒暄几句。与此同时，在露天甲板上，海军摄影师和一个电影摄制组架好了长枪短炮，准备按计划在4点进行摄影。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阿瑟没来。他的飞机一小时前就到达了附近的西卡姆机场。尼米兹的副司令托尔斯将军在赶往“巴尔的摩号”之前先迎接了他的飞机。但是麦克阿瑟拒绝和托尔斯一同直接前往海军码头，他选择前往理查德森将军在沙夫特堡的住所，这是他在会议期间的住处。这就有些失礼了。在“巴尔的摩号”的舰桥上，托尔斯小心翼翼地^[33]向尼米兹和理查德森转达了麦克阿瑟的口信：“告诉总统，他在理查德森的寓所，等候关于何时应该向总统致敬的进一步指示。”^[33]这个口信被带给了莱希和总统。一群人等了大约20分钟，气氛开始尴尬起来。罗斯福转向理查德森将军问：“你能联系上他吗？”^[34]理查德森点了点头，接着离开军舰去找那个失踪了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根据麦克阿瑟的飞行员“土佬”惠尔顿·罗兹的说法，在从澳大利亚飞来的28小时的航程中，麦克阿瑟一直没怎么睡觉。他的专机，一架新型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运输机上装有一个舒服的大床，但麦克阿瑟都没用上它。他当时紧张而暴躁，但看不出疲劳的样子。他在机舱的过道里不停地来回踱步，一次能走好几个小时。在新喀里多尼亚降落加油时，麦克阿瑟发现这还是他自开战以来第一次踏上自己战区以外的土地。话虽如此，但其实这不过是因为他此前拒绝了所有赴努美阿或者珍珠港参加作战计划会议的邀请罢了。

当C-54飞机在墨色的夜空中飞行时，罗兹把飞机交给副驾驶，自己离开了驾驶舱，走进主机舱坐到将军旁边，将军于是开始了“一场麦克阿瑟式的独白，他也没指望我回答什么”。麦克阿瑟告诉飞行员，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召去会见总统，但是“接下来这次会议可能会出

现任何结果，从他被解除指挥权，到把他的指挥权限制到仅仅防守新几内亚，再到给他大开绿灯，给他足够的人员装备去进攻菲律宾，都有可能”。想到罗斯福要拿他作为竞选的道具，麦克阿瑟发牢骚说他将不得不摆出“宣传姿态”，他还说他希望“既然他被命令跑这么大老远，说不定还会受辱，那他们的目的最好有足够的价值”。^[35]

天亮前，飞机在坎顿岛第二次加油后再次起飞，接下来的目的地就是最后一站了——西卡姆机场。飞机在下午2时30分抵达瓦胡岛，此时“巴尔的摩号”正在准备进港。这整个高规格迎接的场景在他们下方一览无余。罗兹说他们“能看到空中满是刚刚起飞的飞机，正在机动、编队，准备让戴蒙德角外那艘驶来的巡洋舰上的总统检阅”。^[36]

在西卡姆机场的柏油路面上，托尔斯将军迎接了麦克阿瑟的飞机，他提议二人立刻前往海军码头迎接总司令。麦克阿瑟拒绝了，他说自己刚刚长途旅行，想要洗个澡，换一身干净的军服。他告诉托尔斯：“我要到住所去了！待会儿总统想见我的时候，他会派人来喊我的。”^[37]之后他快步登上了一旁等候的汽车，开往沙夫特堡。

迟到的麦克阿瑟带来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常见的一幕场景。长期给罗斯福当助理和讲稿主笔的萨姆·罗森曼回忆道，麦克阿瑟到达之前喇叭齐鸣，“之后，一辆护卫摩托车和我见过的最长的敞篷车来到码头，尖啸着开到了停车点。敞篷车前排是一位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司机，后排则是一个高个子——麦克阿瑟。没有助手或者随从。敞篷车在开阔地又开了一段，停在了舷梯旁”。^[38]

出席仪式的所有陆海军将领全都穿着整洁的军装，唯独麦克阿瑟，在这个夏威夷夏天下午的热浪中，在卡其色军服外还套着他那件著名的棕色飞行皮夹克。这次他没有衔他的玉米芯烟斗，但是常戴的飞行员太阳镜和那顶帽檐上带着“一堆鸡蛋”（实际上是金穗饰件）的破旧菲律宾元帅帽却并未缺席。“在一众人员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他每次都故意这么安排，”一位在附近军官俱乐部的阳台上观看这一仪式的海军军官如

此说道，“他真的是那种漫画主角式的人物，但他同时也是个将军和人气旺盛的大英雄，所以没人管得了他。”[\[39\]](#)

麦克阿瑟出现在了栏杆后的人山人海面前，顿时掌声雷动。他朝人群挥手，登上“巴尔的摩号”的舷梯，停留了片刻，好让人群能更好地看到他。之后他在水手长的号声中登上了军舰，向甲板上列队的军官回礼，继而去面见总统。

在舰桥甲板上，罗斯福握住麦克阿瑟的手，称他为“道格拉斯”。后来这位将军说这种亲热的动作让他很恼火。[\[40\]](#)或许是离开华盛顿太久了，麦克阿瑟已经忘了总统通常对所有人都直呼其名，包括他属下所有的军队首脑，同时希望别人称他为“总统先生”。不过就算麦克阿瑟真的感到被冒犯，他看起来也掩藏得不错：舰桥上当时挤满了人，但并没有谁感到气氛紧张。不仅如此，他还回称总统为“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冒犯自然也不是软柿子，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们二人一直以“道格拉斯”和“富兰克林”互称。

眼见麦克阿瑟裹在厚实的皮夹克里，莱希将军问他：“道格拉斯，你来这里见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不换上合适的衣服呢？”

“唉，”麦克阿瑟回答道，“你是没去过我那里，那儿的天现在还很冷。”[\[41\]](#)这话纯属瞎扯，他已经回了宿舍，说是要洗澡，换一身新衣服。不过这也没什么，莱希只是打个趣，麦克阿瑟也是。[\[42\]](#)

现在，合影的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30分钟了，于是一行人下来前往“巴尔的摩号”的露天甲板，海军的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架好了设备。摄影人员早已习惯等罗斯福的轮椅摆放到位后再拍照或者启动摄影机，但是这一次，一小段16mm胶片记录下了罗斯福坐在轮椅里被推动的影像。（据信，这个小片段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这一场面的动态影像。）[\[43\]](#)

麦克阿瑟坐在罗斯福的右边，尼米兹坐在他左边，莱希坐在尼米兹

的左边。四个人摆好姿势，拍了一轮照片。之后莱希离开，总统和太平洋战场的两位战区司令单独合了影，拍摄了一段纪录片。在这段无声的电影片段里，罗斯福亲切地对麦克阿瑟的左耳低语，后者则面无表情地盯着摄影机镜头。有一个瞬间他看起来好像很难受，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罗斯福说的一句话看起来逗乐了麦克阿瑟，后者报之以热情一笑。这时候，一个像是条小猎犬的黑色影子从麦克阿瑟的右边溜达进了画面，从几个人的椅子下穿过，最后从尼米兹的左边跑出了画面。[\[44\]](#)

轮到斯坦巴克总督和总统合影的时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接下来有一段影片拍到麦克阿瑟在画面一旁和理查德森将军说话。他拿出手帕，擦拭着脸和脖子上的汗水。他看起来热得难受，但就是不肯脱皮夹克。每个好演员都知道着装的重要性。

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收工后，军官们开始下船。罗斯福总统的轮椅则被推到了一个环绕着护栏的小木板平台上。整个平台被“巴尔的摩号”上的起重机从甲板上吊起，缓缓放到码头上。一名观看了全过程的海军军官猜想那个起重机操作员“肯定浑身冒汗”。[\[45\]](#)罗斯福被搀扶着坐进了一辆红色敞篷车的后座，一名陆战队卫兵和一众将军举手行礼。莱希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们在大群警察的护送下开出基地，“穿过列队守卫的士兵和欢呼的人群”，开往檀香山市。[\[46\]](#)

总统一行人住在怀基基海滩一栋被高大椰子树环绕的乳白色别墅里。这座豪华宫殿原本属于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继承人克里斯·霍尔姆斯，二战期间被租给军方专用于接待贵宾和来访的将军们。别墅戒备森严。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守卫着别墅的大门和围墙，巡逻艇在海岸边往来巡游。接下来三天的日程漫长而耗时，因此医生坚持要求总统晚上早睡。在与助手们晚餐之后，罗斯福在微风吹拂沙滩的美妙声响中进入了梦乡，睡了九个小时。

麦克阿瑟和理查德森在后者的沙夫特堡寓所中共进晚餐，之后各自回到卧室。但是晚上11时45分，麦克阿瑟叫人给已经上床的理查德森带

话，说自己还想接着聊。“我们坐在那里一直聊到凌晨4点，”理查德森在日记里写道，“大部分都是他在说，我则累得要死。”^[47]

有必要停下来提一点，根据罗兹和理查德森两个人同期的日记，看来麦克阿瑟在战争中最重要指挥层会议前夕接连两个晚上都没怎么睡。

谈到最近在总统竞选中的不幸遭遇时，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抱怨说“他这个已经无欲无求的人还如此屡受打压；他没有一丝一毫的野心，只是想做事做好”。他还说到了自己的私事，他哀伤地聊到他的第一次婚姻——“注定要失败”——他说现在他只剩下了他的现任妻子，“一个南方姑娘”，还有他的“小男孩”，听上去很伤感。^[48]

想来麦克阿瑟在星期二上午来到霍尔姆斯的别墅之前还是至少睡了几个小时的。他将陪同总统、莱希和尼米兹从那里出发，花上一整天来视察瓦胡岛各处。一行人登上了一辆大型黑色硬顶轿车——莱希坐在前排，尼米兹坐在后排中间，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坐在他两边——在11点差一刻时动身出发。他们向西进发，一路穿过埃瓦陆战队航空站，巴伯斯角周围的海军设施，以及卢阿卢阿莱的弹药库。他们经过了一处战俘营，日本俘虏们透过铁丝网好奇地看着他们。在补给站，他们驾车从堆成三四十英尺高的板条箱中间穿过。板条箱里装着弹药、补给品和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正等着被运到西太平洋新的前进基地去。瓦胡岛现在成了美国军事机器巨大力量和规模的大秀场。

总统对于岛上自他1934年上次来到这里之后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他后来告诉记者，“任何地方要如同瓦胡岛这般变化巨大”都是不太可能的。^[49]十年前，即便是在珍珠港和檀香山市周围也满是空地和农田。而现在，新建成的军事基地和居住区已然连绵不断，仅以铁链相隔。

在绵延四分之一英里的摩托车和吉普车队的护卫下，载着总统和三位将军的汽车穿过绿油油的甘蔗田和叫不上名字的野花，开到了人烟稀少的怀厄奈海岸。即便是在瓦胡岛西部这最与世隔绝的乡间道路上，他

们还是遇见了一队在路边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的哨兵。中午时分，车队沿着一处陡峭、曲折的柏油碎石路面开到了怀厄奈山高处的科勒科勒山口，珍珠港和东南方平原上散布的多个航空兵基地在他们面前一览无余。在那里，乘坐红色帕卡德旅行车的理查德森将军迎了上来，此时，所有照相机和摄像机都关闭了镜头，特勤局局长迈克·赖利把罗斯福抱到了理查德森的车上。下午，他们将前往瓦胡岛最大的陆军基地——舒菲尔德兵营。

罗斯福对兵营的访问原本是要保密的，但消息早就不胫而走。通往舒菲尔德的道路已经被军人列队保护起来——但是就在这些军人身后，欢呼的老百姓已经围了三四层。看起来似乎整个瓦胡岛上的所有人不光知道总统在岛上，还不知怎么都知道了他车队的路线，然后就像观看花车巡游一样兴高采烈地围了上来——一家人带着野餐篮子和折叠椅，小宝宝骑在爸爸的肩膀上，小学生们纷纷爬上榕树并坐在树枝上，免得被前面的人挡住视线。夏威夷是个融合了诸多亚洲民族和太平洋民族以及白种人的大熔炉，但此刻，他们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想要看一眼那辆前挡泥板上飘着两面美国国旗的红色加长车，以及后座上那个穿着发皱的乳白色亚麻套装、戴着巴拿马帽子的人。

赖利说这次访问“是我见过的保密最差的一次”，就差没派一架战机到天上去写“欢迎富兰克林·D.罗斯福”了。^[50]他不喜欢这种敞篷旅行车，他知道车子每开三四十英尺，就会途经几千名围观者。罗斯福坐在几个穿军服的人中间，老远就能认出来。要知道，夏威夷最大的族群是日裔美国人，差不多有15万人。就算其中绝大多数都忠于美国——到1944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但只要冒出一个杀手从路边扔过来一枚手榴弹，就能把太平洋上的两位战区司令、参联会主席和美国总统一网打尽。于是，身材魁梧的赖利只好站在帕卡德车的脚踏板上，斜着身子准备随时保护罗斯福，眼睛也警惕地盯着人群——不过并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那些日裔美国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兴高采烈。

不管二人之间过去发生了什么，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看起来都很高兴

彼此同行。和在国内声望、人气上唯一能与自己比肩的人一起待一天，两个人一定都很高兴。目击者的描述和当时的纪录片片段更印证了这一点。里格登写道，罗斯福“特别喜欢麦克阿瑟将军，七年后第一次重逢，他看起来真心高兴”。^[51]麦金太尔医生常常听罗斯福带着“真挚的仰慕”谈论麦克阿瑟，说他是“朋友”和“军事天才”。^[52]麦克阿瑟这边则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聊了除了战争以外的所有事——聊当年简单愉快年岁里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聊那些早已被时间埋没的事情”。^[53]多年未见到总统，麦克阿瑟被他衰弱的样子吓了一跳。他预言说罗斯福总统活不过下一个总统任期，他说对了。但是看到总统像小孩一样在轮椅和汽车之间被抱来抱去，他“对罗斯福身上无可掩藏的精神力量仰慕不已，这种力量使得他在脸上印着身体的衰弱时，思维仍然保持着敏锐”。^[54]

在无声的纪录片片段中，这两个人看起来是彼此真心认可的。在舒菲尔德兵营的阅兵场上，两人坐在车后座上，看起来像是沉浸在彼此的对话中，他们脸贴着脸，咧着嘴笑，就像两个正在想办法恶作剧的小皮孩子。有时候总统不知道说了什么段子，两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或许（人们只能猜测）麦克阿瑟就是在那时问到了即将开始的大选，罗斯福装出一副正经脸，回答说 he 一刻都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我仰头大笑，”麦克阿瑟后来告诉艾克尔伯格，“他看着我，自己也笑了，他说：‘如果对德战争在选举前结束，我就选不上咯。’”^[55]

这一天，麦克阿瑟说罗斯福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军人中拥有压倒性的人气，这显然是对的。罗斯福则对麦克阿瑟说，如果事情不是现在这样，那么他（麦克阿瑟）将会是个好总统。反正现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杜威，罗斯福给他这么个夸奖也是无关痛痒。

可以推想，两人的感觉其实都很复杂。或许因为他们都是政治家，这仅仅是在镜头前演戏。但是他们可能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在美国这个太平洋重要支撑点的中央，在成千上万欢呼的民众面前，在一群知道

自己即将统治太平洋的将军中间创造历史。

中午12时35分，一行人从正门进入了舒菲尔德兵营，车队从一眼望不到头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旁开过，穿过惠勒机场的机库和旁边排列着飞机的滑行道，穿过战地医院，医院中在意大利战场上负伤的日裔美军伤员从三楼向车队敬礼。道路两旁，士兵们列成一排立正，手举过钢盔敬礼。第7步兵师的1.4万名精壮军人在舒菲尔德的阅兵场上列好了队形。红色旅行车开上了一个专门为罗斯福此行搭建的木制平台，总统就坐在车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罗斯福戴不上麦克风，于是叫技术人员过来帮忙——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克风已经打开了，于是罗斯福这个稀里糊涂的请求便向数千排队形齐整的军人广播了出去。麦克阿瑟、尼米兹和莱希继续面无表情地和总统一起坐在车里。[56]

瓦胡岛, 1944年



注：书中地图均系原书地图

这一天的公开行程到下午4时30分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不过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后来又被喊回怀基基海滩的霍尔姆斯别墅共进晚餐。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公牛”哈尔西（他正准备在下个月接管舰队），以及威尔逊·布朗，他和哈尔西一样也是个老资格的航母特混舰队指挥官。六个人在别墅的大餐厅里吃晚饭，服务员是几个菲律

宾人。餐后，哈尔西和布朗先走了，其余四个人继续不设主题地讨论这场战争，又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午夜，人各散去。正式的会谈就在第二天上午（7月28日星期五），还在同一地点举行——这样，一夜之后，麦克阿瑟、尼米兹、莱希和总统又都回到了别墅的露天大厅，此番一同前来的还有一群陆海军摄影记者和纪录片摄制组。

太平洋舰队情报部门已经提前在大厅的墙上挂出了菲律宾和西太平洋的大幅地图。议程开始后，先是15分钟的照片摆拍，尼米兹和麦克阿瑟手持竹鞭指着地图，罗斯福和莱希则摆出观众的姿势。闪光灯噼啪作响，电影摄制组在四周来回移动，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摄影人员忙碌时，四个人就很耐心地在那里配合着摆出各种动作。这些都是公众形象，都是精心修饰过以合乎礼仪的。尼米兹执鞭时，指向了塞班，然后是关岛、东京、濑户内海南部。但是轮到麦克阿瑟时，他的竹鞭一动不动地放在吕宋岛上，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菲律宾。[\[57\]](#)

怀基基海滩这次历史性的辩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摄像师和摄影师完成工作离开房间后，所有参谋人员也都未获准留下。这样，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便只能仰仗那四个参与者第一手或是第二手的回忆来复原这次会议了。罗斯福在会议几个月后向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做了一次简述。莱希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些简要总结，并将其写在了发给参联会同僚的备忘录里。尼米兹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说明，但他的观点仍可从会前和会后发给金的有线电报里找到端倪。

麦克阿瑟是四个人中唯一给这次会议留下详尽第一手叙述的。他在196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完整复现了当时的场景，当然，重头戏是他自己。这本书出版时，罗斯福已经去世十九年，莱希去世已五年，尼米兹还剩下两年的生命，此时也已老态龙钟。书中记载的对话似乎完全是靠记忆写下来的。关于讨论后得出的战略结论，麦克阿瑟的讲述自然是可信的。但是具体内容则难免带有自私的成分，而且书中有些重要的细节和麦克阿瑟自己后来在私人谈话里的说法还相互矛盾。

举几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麦克阿瑟六个星期后告诉鲍勃·艾

克尔伯格，几年后告诉雷德·布莱克，他被召到夏威夷时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就连总统要来也是到达后才知道的。他还进一步对布莱克说，乔治·马歇尔故意不让他知道这些消息，所以他才“掉进了这么个坑里”。^[58]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阿瑟知道总统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会面上，他在从澳大利亚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上还花了很多时间来与他的幕僚和飞行人员谈论此事。在他战后给一位军事部长讲的故事中，麦克阿瑟声称罗斯福起初邀请他到华盛顿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我要他越洋来到夏威夷。那是我离开工作岗位所能去的最远地方了”。^[59]还有一个说法也只不过是胡扯：麦克阿瑟到会议日程全部排定之后，才知道总统要来。按他对布莱克的说法，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内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罗斯福的文官行政助手，包括萨姆·罗森曼和埃尔默·戴维斯也都参加了会议。但是“密苏里号”此时刚刚下水，还没有来到太平洋，而且这种正式的战略讨论也不会允许文官或幕僚人员参加。在提出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的问题时，麦克阿瑟诚心发誓，如果罗斯福“想要让一名海军人士来担任最高指挥官，我将心甘情愿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战争的胜利需要这样的决定”——虽然他是太平洋上最高衔级的将领，“我也将会乐于接受从属的位置，为了大局”。^[60]然而他又私下里对理查德森将军说，他“绝对不会在海军手下做事”。^[61]

不仅如此，麦克阿瑟回忆录里各个章节之间也常常自相矛盾。他书中称赞罗斯福“在组织讨论时完全是中立的”，但是在四个章节之后，他又引用总统的话说登陆吕宋“会招致我们承受不起的惨重损失”。^[62]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可以，说多了就没人信了。麦克阿瑟本就大话连篇，他关于1944年7月这次峰会的叙述也得有取有舍地看，尤其是那些找不到旁证的自吹自擂的说法。可是他的叙述总是被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传记和历史著作不加甄别地随意长篇引用。其原因不难想见。麦克阿瑟给我们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故事大大超脱于太平洋缜密而复杂的军事计划之上，而麦克阿瑟就是故事的主角，他面对着一众联合起来的反派——最后英雄靠着天才的灵性和人格的力量，打败了

海军和白宫里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是麦克阿瑟的讲述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才是那个当之无愧的最老到的军事战略家；对尼米兹也不公平，据记载，他已经开始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吕宋岛的优先级高于台湾的意见；对莱希也一样，他的眼光越过了这所有的中间环节，直盯着那个终极问题：怎样才能兵不血刃地征服日本？

罗斯福后来对莫里森的简述向我们展示了麦克阿瑟的真实观点。27日晚餐后，罗斯福看着墙上地图中的菲律宾，指向其南部的岛屿棉兰老，问道：“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

麦克阿瑟答道：“莱特岛，总统，然后是吕宋！”^[63]

莫里森在这里添加了一个谨慎的脚注，说总统把这一幕场景的发生地点搞错了，他说是在“巴尔的摩号”上，但实际上是在怀基基的别墅里。但是关于总统是否有可能记错这次对话准确内容的任何疑问，都在2015年烟消云散了，当时笔者拿到了理查德森将军的私人日记。当天晚上晚些时候，被麦克阿瑟耳提面命了一番之后，理查德森记下了当天的日记：

晚餐后，总统指着棉兰老开启了一番会商，他对麦克阿瑟将军说：“现在，道格拉斯，从这里我们还能上哪儿去？”这就成了引发一场讨论的导火索，麦克阿瑟随即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以及他认为应当采取的战略，那就是无论最终目的是攻打台湾、中国大陆还是日本本土，都得先拿下吕宋再说。^[64]

麦克阿瑟进攻吕宋的方案已经打磨了两年半，它仍是基于后勤保障和空中支援的传统理念制定的。他坚持这种较为保守的“连续多次”两栖进攻，每一次新的进攻都要得到陆基航空兵的掩护，登陆舰队也要从相对较近的港口出发。他坚持认为南方大洋洲附近海域岛屿密布的地理环境比北部海域更为有利，后者的岛屿之间动辄相距数千英里，只有通过航母特混舰队才能予以轰炸。和尼米兹的战区不同，麦克阿瑟战区里的

地面部队、海上力量和陆基航空兵能够相互支援，共同推进。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吕宋拥有大量可用于登陆的海滩，这样敌人就无法集中兵力应对第一轮登陆——他在1941年12月极其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当地地形也适合大规模机动作战，这样就有可能降低地面作战中的伤亡。麦克阿瑟可以通过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岛屿上的友方游击队来获得情报和其他支援，而台湾从19世纪末就被日军占领，美军无法预计当地百姓的态度。一旦夺取菲律宾的机场，美军航空兵就可以迅速赢得南海上空的制空权，进而在连接日本本土及其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区的海运线上展开巡猎。

在麦克阿瑟二十年后凭记忆重现的当年场景中，他声如洪钟，口若悬河地抛出了他掷地有声的意见，其他人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但是根据莱希不久之后日记里的记述，罗斯福才是主导会议的大师，他向两位战区司令提的问题十分合宜，而且很专业地试探着两人的底线：“罗斯福完美地掌控着讨论，从一个议题转向另一个，并且缩小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之间的分歧，他的状态非常好。”^[65]总统向麦克阿瑟仔细询问了菲律宾的敌军兵力，好确定他对伤亡数据的预判。根据麦克阿瑟告诉理查德森的说法，罗斯福问道：“菲律宾群岛上有多少日本鬼子？”

“大约10万，”麦克阿瑟答道，“散布在整个群岛上。”

罗斯福说自己听说日军数量比这“多得多”。

“我是那儿的指挥官，”麦克阿瑟说，“我想请问你的信息从何而来？”

总统并未正面回答，而是提出了他的意见：“夺取吕宋的战斗会非常血腥。”^[66]

在这段对话中，罗斯福显然十分顾虑伤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吕宋作战。他可能只是在转述最近马歇尔将军向他汇报的情况，后者的战争部情报部门相信菲律宾群岛上有着17.6万名日军。^[67]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这一次总统的顾虑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即便是战争部也低估

了日军的数量。在1944年7月时，菲律宾至少有25万日军，随着更多运兵船队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缅甸开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68]

罗斯福是否在来到夏威夷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想要越过吕宋？根据麦克阿瑟在会谈几个小时后复述给理查德森的情况，罗斯福只是顾虑这场战斗会“非常血腥”。但在20年后麦克阿瑟那本畅销而且广为引用的回忆录里，罗斯福说的话成了：“但是道格拉斯，夺取吕宋会招致**我们承受不起的惨重损失**。”（黑体为笔者所加）个中差异，值得细品。后者暗指罗斯福反对攻占吕宋，但这一点在任何历史记录中都找不到旁证。总统此前已经为预计会带来惨重伤亡的多次登陆或作战背过书，包括7个星期前的诺曼底登陆。关于罗斯福提出这个国家无法“承受”重大部队伤亡的说法，有鉴于世界其余各地血流成河的战场现状，他似乎不太可能说出这样的话。仔细询问麦克阿瑟关于伤亡的预期仅仅是出于尽职，他也就台湾向尼米兹问了相同的问题。

无论如何，面对总统的询问，麦克阿瑟来了一番长篇大论，攻击尼米兹战区里那不必要而且不合理的重大伤亡。自从1943年11月中太平洋反攻的第一步，即塔拉瓦环礁登陆战里战死了1 000人之后，尼米兹一直采用那种有争议的战术。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和媒体的盟友也在煽风点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报上经常表扬麦克阿瑟能够保持战场伤亡数量合理。在他的回忆录里，麦克阿瑟称自己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我的伤亡不会太重，不会比过去更多。正面进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步兵武器十分致命，只有不怎么样的指挥官才会去正面突击。好的指挥官不会招来沉重损失。”^[69]根据理查德森的日记，麦克阿瑟预言说台湾战役至少会和吕宋之战一样血腥残酷，他还补充道“他战区里的所有战役伤亡都比较少——死的人比任何其他战区都要少”。^[70]

凭借着德裔得克萨斯人骨子里的冷静，尼米兹承受了这一切而未予反驳。但是其中暗含的批评必然也令他耿耿于怀，尤其是此刻他的部队正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遭受惨重伤亡，每一个小时都会有运载着美国

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伤员的道格拉斯C-54“空中救护车”飞机降落在瓦胡岛上。在战后的一次分析中，尼米兹承认他中太平洋战区付出的人命代价比南太平洋更高，但他也提出人们“常会犯一个错误”，以为“即便盟军变招，日本人也会按兵不动”。赤道以北的战斗已经迫使敌军从南线分兵——如果他们不分兵，“西南太平洋部队就会在新几内亚地区遇到强大得多的抵抗”。^[71]若真想抬杠，尼米兹也可以指出麦克阿瑟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攻打自己战区里最坚固的日军据点拉包尔，直到参联会下令绕过这里才罢手。他还可以说仅仅比较两个战区的伤亡数字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伤亡代价与所打下的地盘潜在战略价值的对比——夺占赤道以北那些距离日本更近的岛屿，对最终的胜利更有决定性意义。

7月28日上午，尼米兹开始发言，提出了金关于绕过吕宋直取台湾的方案。毫无疑问这是个有吸引力的方案，但看起来他提出这个方案只是走个过场。在罗斯福的仔细询问之下，尼米兹并不掩盖他对于这个方案的保留态度。莱希和麦克阿瑟都注意到他其实并不完全赞同“堤道”计划。

尼米兹特地从两个方面认可了进攻吕宋的方案。首先，他表明自己现有的兵力能够支援吕宋作战，而若是攻打台湾，就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增援。其次，根据莱希日记里的记录：“他承认战局的发展可能会凸显出攻占马尼拉区域的必要性。”^[72]

这样，即便不考虑士气、政治和心理等因素，吕宋也是攻打台湾之前的良好落脚点。而麦克阿瑟则拿出了自己自从1942年3月逃离科雷吉多尔起就反复排练过的演讲，最终一锤定音：解救“1 700万忠诚的菲律宾基督徒”是美国的责任，这是血誓。“我认为从敌人手中解救这些自己人并非仅仅是个士气问题，现在机会来了，而如果我们不去这么做，那么东方人将不会理解我们……我觉得第二次牺牲菲律宾是不可接受、不

可原谅的。”^[73]

麦克阿瑟提出，越过吕宋将会成为日本煽动宣传的话柄，他们总是说白种人不会为亚洲人流血。吕宋还关押着大约7 000名美国战俘和数千盟国平民。每过一个月，都会有数百人死在战俘营里，越过这个岛屿意味着要冷血地决定让许多人命丧残酷的拘禁之下。对于越过吕宋可以使这个岛屿免于血战和毁灭的观点，麦克阿瑟不为所动：“我们曾经被刺刀指着赶出了吕宋，现在我们要用刺刀指着日本人把他们赶出去，夺回我们的尊严。”^[74]

麦克阿瑟在1942年3月逃离菲律宾后发出的声明——“我还要回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言论之一。但除此之外，罗斯福总统的承诺也同样掷地有声，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绝对不会让他忘掉这一点。1942年初，日军正横扫菲律宾，在如此危机之下，奎松总统一度考虑过要向日本人投降以换取和平。麦克阿瑟出于减轻菲律宾人民所遭受灾难的考虑，几乎就要同意这个做法。但罗斯福坚定地拒绝了。在写给奎松总统的一封信里，他恳求道：“无论现在的美国守军遭遇到了什么，我们都不会放弃努力，直到我们现在正在菲律宾以外组建的部队打回来，把最后一个侵略者从您的土地上赶出去为止。”^[75]这份誓言看起来也没什么可以回旋的余地。

金上将后来听说麦克阿瑟偏了题，没有专注讨论军事战略，便火冒三丈。他似乎觉得战略决策中民心士气或者外交政策这样更广的因素完全不是职业军人该考虑的事情。在战后的一些文字中，他抱怨说麦克阿瑟“在讨论时对太平洋上的军事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去谈那些美国承诺要把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可怜的菲律宾人”。^[76]金这么说难免有袖手旁观之嫌。如果说有哪个军事将领有权参与这方面的决策，那就只有麦克阿瑟了。从1941年12月起，甚至是从美西战争时起，人们可以说，美国在菲律宾的荣誉、声望和可信度已然岌岌可危。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当地人建立一个能够击退入侵者的有效的民选政府。美国曾承诺菲律宾在1946年

独立，这一承诺仍然有效。而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来说，若能成功在菲律宾实现去殖民化，便能给全世界尤其是英国人树立一个美式的标杆。在这样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重要战略决策能够与其远期的政治后果或外交政策后果脱离干系。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对轴心国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战后新秩序已然呼之欲出。

根据另一段常被提起、广为人知的野史，麦克阿瑟当时把罗斯福拉到一边，直截了当地警告说越过菲律宾将会危及他本次竞选。这一风传的源头是一个叫考特尼·惠特尼的人，他是一名律师，战时和战后作为预备役军官在麦克阿瑟手下任职。1956年，也就是夏威夷会议12年后，惠特尼出版了一本遍布虚构内容和伪造对白的满是马屁味的麦克阿瑟传记。在其中一章里，他让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总统先生，如果你决定绕过菲律宾，而将那里的数百万美国追随者和数千美国侨民、战俘继续置于痛苦和绝望中——我敢说美国人民会起来造反的，他们会在今年秋季的大选投票中表达出对你最大限度的愤怒。”^[77]这种啰唆的教训再怎么说是很失礼的。考虑到麦克阿瑟不久前刚刚卷入党派政治，这种话更容易被解读为一种威胁。这件事显然没有旁证，惠特尼的野史最好还是当作一个讲故事的人的捕风捉影，仅此而已。

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妄称夏威夷会议上发生了一起内幕交易，说罗斯福为吕宋战役开了绿灯，以回报麦克阿瑟保证在选举前给罗斯福送几条有利头条新闻的承诺。支持这一“秘密交易”说法的人自己也承认，这种事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可以证实。^[78]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麦克阿瑟对罗斯福唠叨了一大堆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了。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说法，罗斯福当时对他说：“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不对，再给我一片，我早上吃。我这一辈子还没有遇到谁像麦克阿瑟这样对我说过话。”^[79]

28日午餐后，罗斯福、莱希和尼米兹一起把麦克阿瑟送到了西卡姆机场，他的C-54专机已经在那里加足燃油准备起飞了。看起来无论他们

在送行的车里说了什么，麦克阿瑟最终都是觉得自己赢了。分别时，莱希对他说：“我会一直支持你，道格拉斯。”^[80]

麦克阿瑟大步踏上飞机的舷梯时，飞行员“土佬”罗兹也跟他一起走了上去。他问上司会议开得成不成功。麦克阿瑟向周围看了一圈，确保没人旁听，随后低声答道：“是的，大获全胜。我们要开干了。”

“去打菲律宾？”罗兹问。

“是的，我这几天还不会宣布这事，但我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9个小时后，当这架“空中霸王”在塔拉瓦机场降落加油时，罗兹把这段对话记在了他的日记中。他说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81]

麦克阿瑟回了澳大利亚，人们一般会觉得罗斯福应该回到怀基基别墅的床上或者“巴尔的摩号”的住舱里休息了。但实际上他在夏威夷又多待了一天半，他决心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看看这个瓦胡岛。作为一个患有致命心脏病的人，罗斯福似乎表现出了惊人的复原力。他此前一直是这样：深度休息一段时间（就像在从本土开来的“巴尔的摩号”上那样），之后爆发出惊人的活力。“在这一段极其繁忙的时期，”布鲁恩医生在他的医学记录中记载道，“总统在活动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劳或者任何形式的困难。”^[82]纪录片片段也确证了这一印象。他看起来憔悴而瘦弱，眼袋很深，但是在迎接成群的将领、政要和军人时却仍然显得兴高采烈、生气勃勃。周五下午，总统车队向东越过崎岖的科奥劳山脉，前往岛屿迎风一侧的卡哈纳湾海滩周围，视察一场在荒野中进行的丛林战训练。罗斯福还是坐在红色旅行车的后座上，帽子向后推过额头，举着望远镜观看持续了一个小时的实弹演习。穿着绿色军装的步兵们从铁丝网下方爬过，然后站立起来，肩并肩排成散兵线穿越一片空地，间或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开火。最后他们向一个用胶合板搭建的“日本村庄”演练了协同进攻。之后，车队沿海岸公路向南，在卡内奥

赫湾的海军航空站短暂停留后，继续（根据白宫日志的记录）穿过“凯卢阿、位于威玛纳诺的两栖部队基地、科科角、位于威卢比的海岸警卫队基地，以及戴蒙德角”，回到怀基基。[\[83\]](#)

总统在夏威夷最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慰问那些刚刚从马里亚纳群岛战场撤回来的伤员了。车队开进檀香山城区，狭窄的街道旁挤满了人山人海的围观群众，要靠国民警卫队才能拦住。总统的车开到陆军第147综合医院外的一个车站停了下来，医生和护士在医院大门前的台阶上站好了队。伤员们要么拄着拐杖，要么坐在轮椅上，一台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一个急不可耐的军人举起还打着石膏的手向总统敬礼。总统在病房里巡视了一个小时，之后乘车离开，前往檀香山海军航空站——今天的檀香山国际机场——之后前往西卡姆机场，在那里，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道格拉斯“空中救护车”刚刚落地，滑行到停机坪上。担架从飞机上被抬下来，伤员们被直接放置到了总统座车的旁边。这些刚刚从关岛撤下来的伤员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正面对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令他们惊喜万分。总统日志记载道：“与罗斯福不期而遇，这些孩子显得多么惊喜和兴奋。”[\[84\]](#)

太平洋战场的军人们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家里的老百姓”已经把他们忘了。与纳粹德国的战斗占据了各大报刊、无线电和新闻影片——当1944年夏季，盟军部队正涌入法国，奔向巴黎时，就更是如此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看到罗斯福总统走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和军用设施，也看到他离开本土出现在国外各处，譬如摩洛哥、埃及和伊朗。在这一刻之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指望美国总统会出现在太平洋上。总统的到来告诉军人们，他们没有被忘记。这一点尤为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的夏威夷之行常常被认为是他为了选举连任而进行的宣传举措。

在海军造船厂，水兵们在道路两旁列队迎候，当车队开进视野时便一齐举手敬礼。列队的军人们接到命令，要两眼直视前方——但是当总统的座车开过的时候，许多人还是忍不住往前挪动，瞪大眼睛，想仔细

看清楚。数千名造船厂工人在道路两旁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许多人还从办公楼二层和三层的窗户里探出头来。车队穿过了几个巨大的工厂车间，之后在潜艇码头短暂停留，潜艇艇员们在那里一齐立正敬礼。车队接下来开到了正停在干船坞里的战列舰“马里兰号”旁，总统在那里听取了关于其正在进行的舰体维修情况的简报，五个星期前，这艘战列舰在塞班岛外海被一枚空投鱼雷击伤。^[85]

这一天视察工作的最后一站是坐落在珍珠港以东一座山顶上的艾亚海军医院。下午3点刚过，车队开到了这里，人们早已挤在了大门前的台阶上翘首以待。医院工作人员和大概50名还能走路或者是坐在轮椅上的伤员排好队形向总统敬礼，楼上的窗户里更是挤满了争先恐后想观看这一场面的医生、护士和伤员。一排拄着拐杖的人一齐举手敬礼。和此前三天一样，总统将要坐在敞篷旅行车的后座上直接发表讲话，通信组立刻上前架起了两个麦克风。他们告诉总统，这两个麦克风一个是连接广播系统，另一个是电影摄制组的。就像两天前在舒菲尔德兵营一样，罗斯福搞不清状况的问题又一次被扩音器广播了出去：“哪个是哪个？这个还是那个？”众人不禁掩口偷笑，护士们看起来好像格外开心。坐在罗斯福身旁的尼米兹莞尔笑道：“我也从来都搞不定这些新玩意儿。”总统对听众说：“这事我做了两次，一次是在影片里，一次是在你们这些优秀的人面前。”

根据接下来三分钟散漫、没有草稿的讲话来看，罗斯福事先一点都没有去考虑该说什么。他用放松、闲聊的口气和人群交谈。他说自己很高兴见到他们，他还带来了家乡亲人的问候（“至少理论上如此”）。他说到了自己和麦金太尔医生两个人当年在规划和设计艾亚医院时扮演的角色，称赞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场伤员救治技术取得的长足进展，还向听众保证“整个国家都为他们而感到非常非常骄傲”。^[86]无论健康状况如何，总统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令人熟悉的优美音色还是那样完美无瑕。他热情地笑着，甩了甩头，推开了麦克风。人群爆发出了一阵真挚的掌声。

一如往常，迈克·赖利在把总统从车上抱下来放到轮椅上时，所有摄像机都是关闭的。当总统走进这座拥有5 000个床位的医院时，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是不允许跟进去的，但是有几位目击者记录下了自己看到的场景。大厅里都是在塞班岛和关岛的战斗中落下残疾的年轻人。许多人都被截了肢，或者装上了假肢，或者遭受了其他不可能完全复原的重伤。对他们来说，同样残疾的罗斯福代表了获得成功而充实的一生的可能性。麦金太尔医生回忆道，总统“坐在轮椅上穿过了每一间大厅，时不时在病床旁停下来和伤员交谈，或许是在表扬这些人，他的声音充满了热烈的情感，就好像这些受伤的陆海军士兵是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些灰暗、绝望的眼睛里燃起了新的光芒”。^[87]在一间大厅里，麦金太尔走在总统前面，和一名“看起来已经一块完整的骨头都没有了”的陆战队员交谈。

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写满了沮丧和惆怅。但是当他望向四周，看到是谁在向他靠过来时，这个年轻人张大了嘴，脸上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开心的笑容。

“嘿！”他叫道，“总统！”每个大厅里，每一长列病床旁都是这样的场面。这些落下残疾的人看到的并非只是美国总统，而是一个曾像他们一样被残疾打倒，继而又凭借意志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打败了身体上的残疾，走上人生巅峰的人。一股希望的热潮在医院里瞬间涌起，你我虽不在其中，却也感同身受。^[88]

麦金太尔、莱希和罗森曼都说自己被艾亚医院里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总统肯定也是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罗斯福眼里有过泪水，”罗森曼回忆道，“那天他坐着轮椅被推出医院时，他和他们的心已然在一起。”^[89]

一行人当晚就要登上“巴尔的摩号”离开珍珠港了，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在等着总统。那三个“食尸鬼”，大通讯社派来的三个记者，一直没

有获邀参加任何视察行程——他们甚至不被允许靠近总统——于是他们向尼米兹的新闻官沃尔多·德雷克使劲抱怨，怒火越来越旺。最后，史蒂夫·厄尔利（从他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同意安排一次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地点选在怀基基海滩霍尔姆斯别墅的精修草坪上，罗斯福坐在花园里一个柳条椅子上，记者们则在他周围围成半个圈。除了那三个大通讯社的记者外，参加发布会的还有常驻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大约24个战争通讯员。他们头上椰子树结的椰子都被摘掉了，免得掉下来砸到总统。

在纪录片里，罗斯福看起来很疲劳。他的肩膀耷拉着，说话时低着头。但他在迎接记者并和其中几个人握手时，脸上仍然洋溢着友善的笑容。莱希和尼米兹分别站在长椅两端，其中后者两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两位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90\]](#)

总统开始即兴发言，说到了他对瓦胡岛军民的赞赏，说他们从1941年12月7日的大灾难里恢复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这次与麦克阿瑟、尼米兹的会面是“近期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时隔七年之后再次见到麦克阿瑟将军，他本人十分高兴。为了推动下一步重大战略决策，听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第一手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罗斯福说，这次会议太重要了，“没有它，事情就会格外艰难”。[\[91\]](#)

接下来是提问环节，但是总统没有向记者们透露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太平洋方面计划再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吗？是的，他答道，不过仗打到现在，大家都能看出这一点，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新闻。

太平洋进攻有没有什么新的“重点或需要加速的事项”？

“都没有。”

麦克阿瑟将军会像他发誓的那样收复菲律宾吗？

“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

新闻发布会的后半场致力于宣示盟军的“无条件投降”原则。一名记

者（身份不详）问：“我们要在这里敲定太平洋战场的目标吗？”^[92]

自从罗斯福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出“无条件投降”这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以来——当时似乎很多人都觉得猝不及防——人们就在不停询问它的定义。虽然同盟国在会议上讨论过这个原则，但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一直不同意这一点，直到罗斯福当着各国记者的面直接把这个词说出来。总统的公开讲话把“无条件投降”原则变成了既成事实，丘吉尔别无选择，只好表态英国对此予以支持。罗斯福决意避免重演“一战”后的那种和平，当时德国人中间流行的“背后捅刀子”的传说促成了纳粹党的崛起。但是同盟国的许多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私下里都相信把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公布出去是个代价沉重的错误——轴心国会利用这一声明，将其作为盟国想要消灭和奴役本国人民的证据，强化其军民战斗到底的决心。有些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学者认为，罗斯福的声明削弱了德国军队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势力，可能延长了欧洲的战事。

除了让纳粹和日本抓到国内宣传的把柄之外，“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还因为太不明确而带来了麻烦。定义这个抽象的概念容易，阐释如何将其付诸实施就难多了。尝试澄清这一点，反而会带来更多问题。无论公开出来的答案是什么样，都会被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利用并曲解（事实正是如此）。

关于这个词，罗斯福的灵感来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北军统帅尤利西斯·S.格兰特和南军统帅罗伯特·E.李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那次会面^[93]时的一段野史。由于这个词在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十分重要，因此应该完整介绍罗斯福对于记者提问的回答。

“1865年，”他对记者们说，“李被赶进了里士满一角的阿波马托克斯法庭里。他的军队饿着肚子，接连两三天没睡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弹尽粮绝。”

因此他打着一面停战旗去找格兰特。为了让手下活下去，他询问格兰特投降的条件是什么。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说这样不行，他总得得到些东西。就举个例子，他手里的粮食只够部队再吃一顿的了。

格兰特说：“那这是很麻烦。”

李接着说：“我们骑兵的马不属于我们，它们属于我们的军官个人，他们还得骑马回家。”

格兰特说：“无条件投降。”

李只好说：“好吧，我投降。”之后把佩剑交给了格兰特。

格兰特说：“鲍勃，把它收回去。现在你打算无条件投降吗？”

李说：“是的。”

格兰特接着说：“现在你们是我的俘虏了。你的人需要粮食吗？”

李说：“是的，我们现在只够吃一顿饭的了。”

格兰特又说：“现在，那些邦联军军官的马，你们要它们干什么用？”

李说：“我们需要它们去春耕。”

格兰特说：“告诉你的军官们，把马带回家春耕去吧。”

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并不是我发明的。我们都是人类——通常来说，都会替同类着想。这就是我们无条件投降的含义。

从美国南北战争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讲述可谓错得离谱。格兰特要求叛军“无条件投降”是在西部战线此前的两次战役中，不是在阿波马托克斯。而每一次（分别在道内森要塞和维克斯堡）格兰特提出如此要

求后，都会和对方指挥官当面谈判，并接受对方有条件的投降。在阿波马托克斯，格兰特**并没有**坚持要李无条件投降，即便是做个样子都没有，他已准备把邦联军将领的条件写入投降协议中。

但是，对于罗斯福想借用格兰特和李的故事来表达的含义来说，历史事实错误与否并不重要。他已经决意要让轴心国势力认识到自己将会被彻底打败，永不翻身。这一点绝不允许有任何疑虑和妥协，无论是在投降时还是长远来看，都是如此。因此必须坚持**名义上的**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个名义背后，似乎也有着关于缴枪不杀的承诺。或许甚至可以认为总统举的这个例子想要表达的是，只要德国和日本先同意无条件投降，那之后所有的合理诉求都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什么样的诉求才算是合理的？而且既然不接受讨价还价，那战败国怎样才能提前知道自己的待遇？这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原则的难解之惑。人们不难察觉到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字面上看，这是说胜利者可以任意处置战败者，而不用考虑后者的愿望和利益。但是根据罗斯福的说法，其真实含义恰恰与其相反。

在怀基基，一名记者的提问点破了这个难题：盟军会像格兰特将军那样供养被打败的轴心国军队吗？罗斯福回避了这个问题——从记录下来的文字上看，他的答复很草率。但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其答案也令同盟国领袖们挠头不已。每次想要阐明这个原则的尝试都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这个烦人的死循环即便在罗斯福去世后仍然不得解，它将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刻。

当晚，“巴尔的摩号”驶出了珍珠港，莱希整理了自己的想法，写到了日记里。在他看来，麦克阿瑟将军“似乎关注的主要是收复菲律宾”，对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还没怎么考虑。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表达了一个共识，“运用海空力量就能够迫使日本接受我们的投降条件，而无须登陆日本本土”。^[94]莱希相信，从长远来看，两大战区司令的这一共识——应当避免登陆日本——其重要程度远高于先打吕宋还是先打台湾的当前问题。

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还没有被纳入考虑。全盘知晓“曼哈顿计划”的盟军领导人为数不多，罗斯福和莱希就是其中两人。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则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要到第二年才会获知此事。在1944年夏季时，人们连原子弹到底能不能造出来都不知道，更不用谈能否赶上战争的最后阶段了。莱希将军曾经是海军炸药专家，他怀疑这个新玩意儿恐怕不管用。但无论如何，他十分确信战争能够（也必须要）通过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取得胜利，接下来盟军便可在停战后和平进占日本。

但是，如果太平洋战争要以不流血的投降告终，那就总要有个人出来代表日本政府和盟国谈判。这个人会是谁？陆军将领出身的日本首相？还是据说是神圣化身的昭和天皇裕仁？胜利已然在望，“原班人马”在盟国控制的日本政府中将要扮演何种角色，这还是个争议颇大的未知数。裕仁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他是个被军方控制的傀儡、橡皮图章，还是真正握有实权？他能不能扮演好李，来和罗斯福扮演的格兰特演对手戏？答案将主要取决于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盟军领袖们所面临的战略决定和外交抉择。

罗斯福及其代表已多次要求约瑟夫·斯大林保证苏联将会在击败纳粹德国后加入对日作战。1944年中期时，这已成为美国政府和莫斯科之间最重要的外交议题。但是，是否真的需要苏联红军来对付日本呢？这显然取决于太平洋战争会比欧洲战事长多久。然而，即便抛开这个问题不谈，盟国还面临着另一个关键的不确定问题。一旦日本政府真的投降了，大量被派到海外的日本陆军——在中国、朝鲜还有其他各处——是否也会放下武器？或者就像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继续打到最后一个人？许多盟军将领坦言，日本地面部队从来没人愿意投降，即便东京政府放弃抵抗也是一样——他们预言到时将不得不斩草除根，把日军所占土地上的每个日本人都剿灭才行。若确实如此，那美国人就迫切希望苏军能进攻中国东北，消灭百万关东军。同样，他们也希望蒋介石的军队能承担中国大陆的大部分战斗（以及相应的牺牲）。另一方面，如果裕仁天皇真的能同意命令他散布各处的军队投降，而且那些军队也遵守这个“现人神”的命令，太平洋战争可能就会赢得更快，死

伤代价也会比悲观者预计的更低。若如此，或许就不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这意味着美国人不必为此去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如果美国寻求苏联的帮助，那么复杂的战后全球斗争（此时“冷战”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中的权力平衡也会随之改变。这些纷繁复杂的考量将会在下一年的关键决策中体现出来。

“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驱逐舰离开瓦胡岛后向北航行，开到足够远的安全距离后（也就是远到陆地上看不见为止）便转向353°航向（北略偏西），航速22节。罗斯福躲进了自己的住舱，他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很少露面，睡觉很多，也不怎么工作。他们的目的地是阿留申群岛，总统将要去视察那一地区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兵基地。

此时在美国国内，选战从声势和激烈程度上说已经白热化，共和党和反对罗斯福的报纸抨击罗斯福此番行程，称他和他的狗都是在花纳税人的钱到太平洋上旅游度假。莱希将军在日记里称，夏威夷会议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他对此番阿拉斯加之行的价值却心存疑虑。作为前海军作战部长，他对于有人批评总统仅仅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休闲而动用美国军舰十分敏感，尤其是在战时。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向任何朋友或罗斯福提过此事。

8月9日，当军舰开进浓雾弥漫的阿拉斯加内部水道时，罗斯福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声称“再次见到你令我格外高兴”。关于菲律宾问题，总统写道：“回去后我会推动这个计划，我确信这在总体上合乎逻辑，而且能够实现……总有一天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毫无疑问我希望这由你来完成。”^[95]

鉴于这封信的力度，以及第二个月又一封写给“亲爱的道格拉斯”的信，许多学者和传记作者断言总统认可了麦克阿瑟关于收复菲律宾的意愿。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关于送麦克阿瑟重返吕宋岛的最终决定要迟至9月底才敲定下来，此时距离檀香山会议已经过

去两个多月了。其间，吕宋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完全可能被绕过，至少是暂时绕过，而让位于全力攻打台湾。

8月1日，也就是离开珍珠港两天后，菲律宾总统奎松在纽约萨拉纳克湖的一所医院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巴尔的摩号”上。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两个人都对奎松和他的国民许下了诸多承诺。麦克阿瑟的许诺流传更广，但罗斯福的承诺也毫不含糊，同样必须兑现。两个人都知道，从长远来看，历史记录可能会更加关注罗斯福的许诺。在麦克阿瑟看来，绕过吕宋的决定是可耻的背叛，他将会想方设法在后代面前把这个责任甩到罗斯福身上。可以想见，作为历史学霸的罗斯福同样能够认识到这对他未来历史声望的潜在影响。在写信承诺“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时，罗斯福就知道他的秘书格雷丝·塔利会把这封信的复印件放到他的对外联系档案里，最终存入他在海德公园的总统档案馆并列入“麦克阿瑟”类目之下，像霓虹灯广告那样招来一拨接一拨的未来历史学者。

那么，罗斯福到底向麦克阿瑟承诺了些什么？就像他此前写给奎松的信一样，总统的用词十分谨慎，应当仔细解读——既要看到他说了什么，也要看到他没说什么。“我会**推动这个计划**。”作为总司令，罗斯福拥有无可辩驳的权力去命令麦克阿瑟进攻吕宋，无论是作为进攻台湾的前奏还是干脆完全替代之，都不是问题，无须顾虑参联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但他并没有行使这一权力。“**总有一天**马尼拉将再次升起我们的旗帜。”但总统并没有说具体什么时间，即便是等到战争结束再办这么个仪式也不算失约。在怀基基，他对通讯员们说：“我们会去夺回菲律宾，麦克阿瑟将军毫无疑问将会参与其中。但是他会不会直接夺取，我不能说。”^[96]这句话被禁止见报，但这为所有正在考虑的选项都打开了大门。他将“菲律宾”和其北方主岛吕宋笼统地并在一起，精明地含混过关。实际上，参联会已经（在1944年3月）授权夺取位于菲律宾群岛南端的大岛棉兰老，因此麦克阿瑟可以算是已经接到命令去收复菲律宾的主要部分。^[97]

没人准确知道罗斯福和莱希在夏威夷的最后一天对麦克阿瑟说了些

什么，但是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告诉他C-54飞机的飞行员，自己得到了三个值得一提的口头承诺。他的部队将得到来自美国本土的新锐部队补充，达到齐装满员的状态；他的第5航空队将得到新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特混舰队将被用来支援他在菲律宾的两栖登陆（无论这场登陆战在何时何地打响）。[98]从瓦胡岛飞往布里斯班的航程中，他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状态。这样，当他来到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看到一封来自华盛顿的有线电报，确定想要越过吕宋并“在可行的最早日期”登陆台湾时，人们便不难想象他的暴怒了。这份电报来自参联会的作战计划部门，发送日期是7月27日，也就是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刚见面的那天。华盛顿的计划制订者们警告说“‘堤道’计划（进攻台湾的战役）将会需要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空中、地面和后勤部队”——他们还说这些兵力其后也不会归还给麦克阿瑟，而要被留给尼米兹用于“之后的作战”。麦克阿瑟应当制订计划以“最终完全夺回”吕宋岛和菲律宾其他部分，但是——要命的是——“这些作战将不会得到太平洋舰队的直接支援”。[99]

这只是一份计划层面上的电文，也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参联会主要负责人的批准。但它却和麦克阿瑟从夏威夷带回来的结论直接冲突，他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耍了。他立刻直接给马歇尔将军写信，对参联会计划人员的设想表达“最强烈的反对”，并坚称从“国家政策的最高角度来看”收复整个菲律宾是至关重要的。他指责进攻台湾的方案“要冒险面对最危险的灾难”，还指出罗斯福总统已经说了菲律宾将会被收复。麦克阿瑟写道，更糟糕的事情是，越过菲律宾的方案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前景”——这需要对菲律宾进行彻底的海上封锁，这会导致饥荒，会有数百万无辜的菲律宾人和盟军战俘、侨民饿死，这样的结果“比我们的敌人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更凶残”。[100]

但是，如此恳切的言辞却未能给华盛顿的作战计划制订人员带来什么影响。他们接到指示，完全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政治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争论不在他们的权责范围之内。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没怎么关注参

联会内部的作战计划部门，绝大部分罗斯福和麦克阿瑟的传记对此更是只字未提，但是它却对太平洋上的战略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个课题比较沉闷，需要研究者沉下心来，在计划委员会备忘录和计划研究的迷宫中深入探索。许多相关材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密，此时有不少最广为流传的太平洋战争历史著作已经面世。因此有一点格外需要强调：无论罗斯福和麦克阿瑟在夏威夷说了些什么，参联会的计划制订系统都仍然在华盛顿按自己的逻辑运转，而且有影响力的声音（尤其是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仍然认为太平洋上的作战应当集中在北方进攻路线上。令麦克阿瑟愤恨和沮丧的是，即便在夏威夷会议之后，这仍然是美军太平洋战略设想的主流。

假如罗斯福总统一意孤行，越过他的军队司令们插手指挥，那么这些参联会的内部机制便全都归于无效，这种事罗斯福此前已经干过不下十余次了。美国宪法赋予他的权力，使他可以命令陆海军将领攻打任何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总统顶着所有军种司令的一致反对，下达了执行“火炬”行动的命令，也就是1942年11月的登陆北非之战。不过，这种总统越级指挥的事情绝大部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1944年的情况和1942年已经大不相同。参联会辖下的内部计划和研究委员会在1942年时才刚刚建立，到1944年时则已人员齐备，军队中一些最好的战略专家也都被纳入其中。在战争后期，罗斯福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多地投向战后的规划和策略方面，对于战略和作战行动方面的重要事项则关注得比较少。他放手把参联会交给莱希去代管，而莱希虽然支持麦克阿瑟的“吕宋优先”策略，却也没有去打断正在进行的“堤道”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在8月22日参联会的一次专题会议上，这位海军上将提出，和其他选项相比，攻打吕宋“付出的人命代价和耗费的资源会更少，花费的时间也不会更多”，但他并没有说要放弃台湾，也没有要求立即做出决定。^[101]这就很难被看成是对麦克阿瑟立场的坚定背书。如果此时莱希和罗斯福像往常一样心意相通，那么罗斯福似乎是选择了让参联会继续自己的计划而不加干扰。^[102]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前线，那些将要去执行“堤道”行动的海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官仍然对这次行动将信将疑。他们对台湾的研究越深，就越不喜欢这里。福里斯特·谢尔曼将军，一位47岁的老神童，是尼米兹的副参谋长——1949年，他将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作战部长——他对同僚们说，要对台湾发动两栖登陆而“把吕宋及其机场、可用的补给物资和所有东西留在侧翼不动”是“荒唐”的。^[103]谢尔曼说他想要写一份“烂到一眼便知，好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的作战计划草案，好把“堤道”计划搅黄。^[104]太平洋舰队中的顶级两栖战专家，将要在这次作战中指挥两栖舰队的里奇蒙·特纳，也基于相似的原因而施加影响，以反对“堤道”计划。

部队的每一份“堤道”计划新草案都要投入更多兵力。参联会的计划人员预计美军部队将能够在台湾沿岸夺取并守住若干战略性的港口，但太平洋上各位指挥官的结论则是，他们可能需要打下并守住整个岛屿才行。台湾是个大岛，地形复杂，当地人可能会忠于日本，因此这一任务将会漫长而血腥。1944年8月18日，尼米兹估计这场战役将需要投入50.5万名陆军，15.4万名海军陆战队，以及6.1万名海军岸上人员。^[105]这是个大数，很难拿得出来，尤其是在此时欧洲战争已经很清楚将会拖到1945年的情况下。“堤道”行动的规模可与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比肩，但是后者的进攻部队只需跨越一条英吉利海峡，而进攻台湾的舰队和两栖部队却要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跨越一千英里洋面才能抵达目的地。艰巨的运输和后勤压力将难免和其他同样高优先级的事项争抢紧缺的资源，例如在塞班岛和关岛建设B-29轰炸机基地的计划。托尔斯将军指出，在机场建设计划方面“陆军航空队将与任何变化死磕到底”，他提醒金注意这个问题。^[106]这样，到1944年8月下旬时，台湾战役计划在参联会内部又招来了另一个劲敌——陆军航空队的“福将”亨利·阿诺德将军，他预见到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主要出发阵地将会是马里亚纳群岛（而不是中国）。

或许更重要的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仍然坚决反对台湾作战计划，并

决心用自己更倾向的硫黄岛—冲绳岛二级跳取而代之。1944年8月回到珍珠港后，斯普鲁恩斯便开始构建一套反对“堤道”计划的提案。和谢尔曼一样，他认为台湾的不利条件过于明显，这个计划应当被取消，因此他告诉手下人不必关注此事。

在9月上旬的一次计划讨论会上，陆军的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尔将军向尼米兹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人员报告他的“堤道”计划准备情况。斯普鲁恩斯显然认定巴克纳尔的发言是在浪费时间。他站了起来，获准打断讲话后走到尼米兹办公室后部，拉下一张西太平洋挂图开始发言。其他军官都把椅子转向斯普鲁恩斯，听这位海军将领阐述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最后阶段的整体见解，无人理会的巴克纳尔则怒火中烧。海军陆战队的格雷夫斯·B.厄斯金少将称这是“我所听过的关于某场作战行动的态势的最专业的即兴评论之一”。[\[107\]](#)斯普鲁恩斯推翻了“堤道”计划的基础构想，提出冲绳在所有方面都是更理想的进攻目标。冲绳无法在次年春季之前拿下——海军还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来组建所需的舰队、航空兵和后勤部队——他预计自己可以在1945年3月到4月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时间表给麦克阿瑟留下了充分的时间去夺取菲律宾，包括吕宋。台湾则可以被安全地绕过。

斯普鲁恩斯是个内敛的人，一般不会用如此强硬的口气和尼米兹说话，尤其是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此番他完全甩掉了惯常的冷静做派，必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米兹对斯普鲁恩斯的信任超过他指挥系统内的任何其他人，而且既然是要由他来执行这次作战，那么他的意见自然非同小可。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堤道”计划仍然没有彻底取消。1944年9月9日，参联会命令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协同夺取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计划完成日期是12月20日。但是两位司令还被指示要继续制订接下来在吕宋和台湾两处登陆的计划，“关于是否要在占领台湾前先占领吕宋的最终决定将稍后做出”。[\[108\]](#)

在三天后布里斯班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告诉艾克尔伯格

将军：“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赢到手的只是同意我们向前打到莱特。关于进攻路线要通过吕宋还是台湾，华盛顿还没有定下来。”^[109]六个星期前从夏威夷回来时，麦克阿瑟已经让幕僚们相信他成功让总统决定收复整个菲律宾。显然，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总统打算把这个事情交到参联会手里。这个星期，麦克阿瑟收到了一封总统从魁北克同盟国圆桌会议上写来的信。罗斯福告诉他：“情况和我们离开夏威夷时并无变化，虽然还需要一些努力来避免你可能不喜欢的事情。我仍然控制着局面。”^[110]这闪烁其词的表述再次引出了那个问题：如果罗斯福已经决定支持麦克阿瑟，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下令进攻吕宋呢？

与此同时，太平洋上新的战况令先前的计划构想迅速过时。9月中旬，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在空袭菲律宾时发现，敌人在这整个区域的航空兵力量出人意料地薄弱。9月12日，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宿务岛附近被击落。飞行员在海上迫降后游到岸上，当地人告诉他，宿务岛上只有大约1.5万名日军，莱特岛上一个都没有。哈尔西将军把这个情报通过无线电发给了尼米兹，建议美军尽快在莱特岛登陆。尼米兹把这个消息沿着指挥层级发给了正随同总统在魁北克开会的金，然后是参联会。到9月16日日终时，军事首脑们已经将莱特岛的登陆日期提前了足足两个月，改为1944年10月20日。

5天后，在一份发给参联会的长篇有线电报中，麦克阿瑟阐述了他关于太平洋战争未来路线的总体观点。他提出可以从莱特岛直接跃进吕宋岛，12月20日出动四个两栖战师在林加延湾登陆。这次作战将需要“美国太平洋舰队全部力量的支援”，但是一旦登上吕宋，麦克阿瑟就将在2月底前收复马尼拉和马尼拉湾。“这将会使得我们在按照当前计划向更北方发动进攻时，享有〔吕宋岛〕基地和陆基航空兵支援带来的巨大优势。之后，〔台湾〕战役将不再必要，或可直接攻击〔九州〕，尤其是在先攻打〔硫黄岛〕的情况下。”^[111]

麦克阿瑟的观点显然是不错的。他提出的作战安排可以依托太平洋上已有的兵力来实现，不需要从欧洲调兵增援。它可以保证麦克阿瑟和

尼米兹的部队持续与敌作战，同时避免了那场在两个战区里几乎没一个人喜欢的作战（“堤道”行动）。后来的事实将会显示，这一观点和战争的实际进程十分接近，只是漏掉了进攻冲绳的战役。甚至连麦克阿瑟计划的时间进度都很符合事实：最终他在1945年1月9日登陆林加延湾，3月初拿下了马尼拉。可以这么说，在1944年9月，麦克阿瑟和斯普鲁恩斯——两个人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计划，也很少直接联系——不谋而合地拿出了打赢太平洋战争的最后蓝图。

金上将现在只能认输。他将于9月底在旧金山的美国舰队总司令与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阶段性会议上与尼米兹会面。“堤道”计划在珍珠港的反对派们已经准备好要会见他们的总司令了。计划中的“堤道”行动的地面总指挥巴克纳尔将军签发了一封函件，声称分配给这场战役的可用部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他还补充说陆军可以用现有资源拿下冲绳。^[112]福里斯特·谢尔曼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参联会批准麦克阿瑟关于进攻菲律宾的建议和斯普鲁恩斯进攻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建议。花了三分钟浏览一通之后，斯普鲁恩斯把这份文件递回给谢尔曼，他说：“我一个字也不想改。”^[113]

斯普鲁恩斯后来回忆道，在旧金山，金起初一直坚持他的“堤道”计划方案，“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他将会把这个方案〔吕宋岛—硫黄岛—冲绳岛方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也是这么做的”。^[114]10月3日，参联会下达了新的指示，命令麦克阿瑟在1944年12月进攻吕宋岛，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1月进攻硫黄岛，一支大规模的海军—陆军—陆战队联合部队将在1945年3月进攻冲绳岛。这样，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年的主要作战次序就这么敲定了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金已经习惯于对太平洋上的事情顺其自然了。1942年4月时，他成功与马歇尔将军达成协议，实现双战区指挥，把整个太平洋北半部变成了海军的地盘。他坚决地抵制住了英国人想要把太平洋战争降格为单纯的防御作战以便集中力量击败德国的主张。他压制了负责实施战役的南太平洋司令的反对，强行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并赢得了

最初的胜利。后来金又迎着麦克阿瑟的激烈反对，争取到参联会的批准，于1943年占领吉尔伯特群岛，1944年初占领马绍尔群岛，在1944年中期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他击碎了麦克阿瑟抢夺太平洋舰队指挥权并统治整个太平洋战场的野心。但是在讨论对台湾的进攻时，他最终遇到了对手。

[1] .50口径，即口径为0.50英寸，合12.7毫米。——译者注

[2] Press and radio conference No.961, July 11, 1944, FDR Library.

[3] FDR to Stephen T.Early, October 24, 1944, in Stephen T.Early Papers, “Memoranda, FDR,1944,” Box 24, FDR Library.

[4] 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Life* magazine, August 19, 1946, p.49.

[5] William D.Hassett diary, March 6, 1944, in Hassett, *Of the Record with FDR*, p.239.

[6]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p.52.

[7] 副总统是在任总统一旦无法任职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在美国总统健康堪忧的情况下，副总统的人选就变得格外重要。——译者注

[8]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16, 1944, FDR Library.

[9]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p.19.

[10]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1, 1944, p.61,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11] “JCS to CINCPOA and CINCSOWESPAC,” March 12,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12]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p.503.

[13] MacArthur to Sutherland, March 8, 1943, RG—30, Reel 1007, Signal Corps No.Q4371,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14] Marshall to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June 24, 1944, Radio No.WAR—55718, George C.Marshall Papers, Pentagon Office Collection, Selected Materials, George C.Marshall Research Library, Lexington, Virginia.

[15] MacArthur to Marshall, Radio No.CX—13891, June 18, 1944, in Marshall,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ed.Bland and Stevens.

[16] 文件证据是由卡罗尔·M.佩蒂洛在1979年发现并发表的。见Petillo,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保罗·P.罗杰斯是麦克阿瑟的手下，他目睹了奎松、麦克阿瑟和萨瑟兰在科雷吉多尔岛的对话，并打出了该指令。Rogers, *The Good Years: MacArthur and Sutherland*,

pp.165—66.

[17] Dwight D.Eisenhower diary, June 20, 1942, in *The Eisenhower Diaries*, p.63.

[18] Press conference, April 17, 1944, in Perry, *Dear Bart*, p.270.

[19]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183.

[20] 1英寸 = 2.54厘米。——编者注

[21]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63.

[22] Interview with Raymond A.Spruance by Philippe de Baussel for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2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1, Folder 1.

[23] Spruance to Professor E.B.Potter, March 28, 1960, p.1,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Collection 707, Box 3, NHHC Archives.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435.

[25] Ibid.

[26] Ibid., p.438.

[27]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0,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2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p.440.

[29] Buell, *Master of Sea Power*, p.467.

[30] CINCPAC to COMINCH, July 24,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34.

[31] “Notes, 1950—1952,” pp.5—6, Ernest J.King Papers, LCMD.

[32] 例如，马克斯·黑斯廷斯在2008年出版的《惩罚》（*Retribution*）一书中花了半章的篇幅来介绍这次夏威夷会议，但对莱希的名字却只字未提。——作者注

[33]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34]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 Robert C.Richardson Jr.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5]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257.

[36] Ibid., p.258.

[37]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需要注意，惠尔顿·罗兹把托尔斯误当成了尼米兹，并在他的日记中错误地记录成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来接机。Rhoades diary, July 26,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258.

[38]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pp.456—57.理查德森将军把他的车从“巴尔的摩号”开到沙夫特堡去接麦克阿瑟，所以两位将军可能是一起回来的。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7, 1944.7月26日，这辆敞篷车确实出现在海军基地，因为录像显示，罗斯福和莱希是在车

里离开的。“FDR’s Tour of Inspection to the Pacific July—Aug, 1944,” 16mm film footage, MP71—8:63—6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39]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pp.97—99.

[40]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41] Leahy, *I Was There*, p.250.

[42] 据罗森曼回忆，是罗斯福先拿麦克阿瑟的夹克开玩笑，他说：“今天真是太热了。”西南太平洋司令答道：“唉，我刚从澳大利亚飞来。那地方还冷着呢。”（*Working with Roosevelt*, p.457）罗森曼的说法更加广为流传，但还是莱希更可信一些。他是麦克阿瑟的老友，开这种玩笑很正常。他还是麦克阿瑟的同僚和上级，提醒他注意着装也属合理。不爱吹牛的莱希说这话是自己说的，这样罗森曼的讲述就有可能是记错了；他听到了这一对话，但后来记错了话是谁说的了。——作者注

[43] “FDR’s Tour of Inspection to the Pacific July—Aug, 1944,” 16mm film footage, MP71—8:63—6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44] Ibid.

[45] Sommers,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pp.97—99.

[46] William D. Leahy diary, July 26, 1944, William D. Leahy Papers, LCMD.

[47]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July 27,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8] Ibid.

[49] FDR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50] Reilly and 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p.191.

[51] Rigdon, *White House Sailor*, p.116.

[52]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99.

[53] James,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2, p.529.

[54]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61.

[55] Robert L. 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56]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 35mm film footage, FDR2757—28—2 and FDR2757—28—3,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57] Ibid.

[58]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pp.501—2;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65.

[59] Faubion Bowers, “The Late General MacArthur,” in Leary, ed., *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p.254.

[60] Blaik, *The Red Blaik Story*, p.500;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72.

[61]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anuary 19, 1945,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97—98.

[6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9.

[64]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5] Leahy, *I Was There*, p.251.

[66]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67] Drea,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p.129.

[68] 麦克阿瑟的G-2部门（情报部门）总是低估菲律宾群岛的敌人兵力，而且低得离谱。这一差距在1945年1月进攻吕宋战役打响时尤为惊人。当时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长查尔斯·A.威洛比将军说吕宋岛上有152 500名日军。沃尔特·克鲁格将军麾下第6集团军的G-2部门估计当地日军数量为234 500人。实际数量是27万。——作者注

[6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198.

[70] Robert C.Richardson Jr.diary, July 28, 1944,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71] Nimitz et al., *The Great Sea War*, pp.370—73.

[72] William D.Leahy diary, July 28, 1944, William D.Leahy Papers, LCMD.

[7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197—98.

[74]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75]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 in World War II*, p.92.

[76] 强调处为原文所加。“Notes, 1950—1952,” p.3, Ernest J.King Papers.

[77]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p.125.

[78] D.克莱顿·詹姆斯（D.Clayton James）是首先提出此说之人，他的多卷本传记 *The Years of MacArthur* 除了有这个问题外还是很出色的。后来沿用此说者极多。

[79]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200.

[80]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370.

[81]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

61.

[82] Howard G. Bruenn, M.D., "Clinical Notes," in Evans, *The Hidden Campaign*, Appendix B, p.149.

[83] William D. Leahy diary, July 29, 1944;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29, 1944;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2 and FDR 2757—28—3,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4] FDR daily log,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also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5] White House daily log,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86]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87] McIntire, *White House Physician*, p.11.

[88] Ibid., p.13.

[89] Rosenman quoted in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p.568.

[90]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in Hawaii—July 1944," 35mm film footage, FDR 2757—28—4,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FDR Library.

[91]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92] Ibid.

[93] 当时美国南方在此地向北方投降。——译者注

[94] William D. Leahy diary, July 29, 1944, William D. Leahy Papers, LCMD.

[95] Letter, FDR to MacArthur, August 9, 1944, FDR Library.

[96] Press Conference #962, July 29, 1944, FDR Library.

[97] "JCS to CINCPAC and CINCSOWESPAC," March 12, 1944, FDR Map Room Papers, Box 182.

[98] Whelton Rhoades diary, July 29, 1944, in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p.260—61.

[99] Joint Staff Planners, Washington, to Staff Planners of CINCPAC, CINCSWPA, July 2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36.

[100] Hayes,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p.612.

[101] Leahy memorandum to JCS, "Discussion of Pacific Strategy," September 5, 1944. Includes summary of past meetings. Inserted into William D. Leahy diary after entry for August 3, 1944, William D. Leahy Papers, LCMD.

[102] 曾经直接接触过几位参联会巨头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对这次檀香山会议总结道：“实际上并未做出明确决定——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但是在主要战略方面达成了一致……既然参联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继续问那个问题：‘吕宋、台湾，还是哪里？’那么其看起来并没有受到这一高层共识的特别影响。” Morison, *Leyte*, vol.12, pp.10–11.——作者注

[103]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73.

[104] Ibid.

[105] CINCPAC to COMINCH, August 18,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42.

[106]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July 20,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107] Graves B.Erskine, oral history, CCOH Marine Corps Project, p.379.

[108] Joint Chiefs of Staf to Nimitz, MacArthur, September 9,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0.

[109] Robert L.Eichelberger to Emma Eichelberger, September 12, 1944, in Luvaas, ed., *Dear Miss Em*, pp.155—56.

[110] Letter, FDR to MacArthur, September 15, 1944, FDR Library.

[111] 地理代号已改为相应的地名。MacArthur to Chief of Staf, War Department, September 21,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362—63.

[112] John Henry Towers diary, September 26, 1944, John H.Towers Papers, LCMD.

[113]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 interview in *Paris Match*, July 6, 1965, p.21, Spruance Paper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114] Ibid.

第二章

1942年初，当美国举国忙于战争动员时，亚历山大·P.德·塞维爾斯基发表了一份题为《空中制胜》的宣言。塞维爾斯基宣称，战略轰炸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最大的贡献，这让美国人眼前一亮，他们对在欧洲重演血腥地面战忧惧不已。这本书自然也就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单之首，卖出去500万本。第二年，沃尔特·迪士尼公司把它拍成了一部动画纪实电影，创作了小飞象邓波和小鹿斑比的制作团队拿出了他们的天才，用手绘彩色动画展现出了燃烧而绝望的轴心国城市。

塞维爾斯基是个宗教般信仰航空并四处布道的人。他还是个顶尖的飞机制造商，一个已经向美国陆军航空队出售了数千架飞机的企业家，他希望能在战争胜利之前再卖出几万架飞机。他的书大大地讨了其客户的欢心，被奉为圣经。但是塞维爾斯基的公司和美国海军并无往来，作者的这样一番评述或许能解释他对航空母舰的态度：“舰载航空兵在敌方的陆基航空兵面前必然是无力的，它们的‘基地’本身就极其脆弱。对敌人的海岸发动进攻曾是海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海军已经不再胜任这样的任务了。”^[1]

到1944年，塞维爾斯基的这一部分观点已经被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航母打击力量，即第58特混舰队的实战表现推翻了。这样的一支舰队在大洋上从未出现过，1945年之后则再未出现过，未来的作战舰队也很难再达到这样的规模。这支强大的无敌舰队通常拥有12~16艘航空母舰，以及为航母提供屏护的大批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其庞大的规模令其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方大洋的霸主。第58特混舰队可以在30分钟内放飞超过1 000架飞机，前去攻击200英里以外的敌人，之后在飞机返航

时安全回收。这些飞机可以用炸弹、鱼雷、火箭弹、.50口径机枪的燃烧弹以及凝固汽油弹打击敌人。它们在跑道上炸开弹坑，把敌人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消灭在宿舍里，对停放着的飞机轰炸扫射，把机场上的机库和维修车间化为燃烧的废墟。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中将曾如此对一位同僚说：“所有岛上都有这么多鬼子飞机。我们要打过去，直面他们，和他们一较高下。我知道我们会遭到损失，但我们比他们更强.....现在即便他们找到我们，我也无所谓。我们可以去到任何地方，没有人能阻挡我。如果我杀过去消灭了他们所有的飞机，那些见鬼的岛就帮不了他们了。”^[2]

这一时期，美军标准的舰载战斗机是格鲁曼F6F“地狱猫”，这种飞机空重9 000磅^[3]，由一台强有力的2 000马力普拉特&惠特尼发动机驱动。“地狱猫”的飞行性能和战斗力都优于它的主要对手，重量轻得多的三菱零式战斗机。“地狱猫”的爬升率在1.4万英尺以下高度和零式战斗机相当，在高空则具有优势；在平飞和俯冲时，其速度同样能**远超**对手。“发动机的强大动力令我惊喜，”一位曾经驾驶过前一代F4F野猫式战斗机的老飞行员说，“飞机看起来就像是从甲板上一跃而起，它的起飞滑跑距离比‘野猫’短得多。一旦升空，这只‘地狱猫’仿佛就想要不停地爬高爬高爬高。”^[4]机上的6挺.50口径机枪能够有效撕开零战的机翼。而得益于装甲钢板和自封闭油箱的保护，这种粗壮的格鲁曼战斗机能够在空战中承受相当程度的打击。经常有机翼和机身被子弹和炮弹破片打得满是伤痕的“地狱猫”回到航母上安全降落。

在一个典型的“进攻日”里，起床号在凌晨3点吹响。一名号兵吹出代表今日要起飞执行任务的号声，通过舰上各处的大喇叭传出去，帆缆士官们随即吼起来：“起床号！起床号！起床号！所有人！起床！”^[5]于是，全舰立刻会响起一片开闭舱盖、关舱门，以及数百双脚从钢质甲板上走过的声响。机库甲板上又闷又热，到处弥漫着航空汽油和舰用重油的气味，弹药组在那里把炸弹和鱼雷搬起来，挂到轰炸机的机腹下方。随后飞机会被推上升降机抬升到飞行甲板上。所有飞机的机轮前方都放

置了木头轮挡。之后，飞机发动机启动，炸弹也装上了引信。快到起飞时间时，大喇叭里就会传出命令：“飞行员，上飞机！”

一声令下，飞行人员们立刻从自己中队的待命室里蜂拥爬上楼梯，一边穿戴飞行装具和降落伞，一边把风镜戴到额头上。戴着风帽的甲板人员领着飞行员们穿过密密麻麻排列在甲板上的机群，找到自己的飞机。飞行员们爬上机翼，跃进座舱，系上安全带。在破晓前的黑暗中，座舱是个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洞，只有仪表的指示灯发出微弱的光芒，飞行员只能摸索着把手脚放到操纵杆和踏板上。随着“发动飞机！”命令的下达，启动器点火，飞机发动机开始喘振着噼啪作响，之后轰鸣着转动了起来。与此同时，螺旋桨开始旋转，越转越快，随即在飞行员面前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圆盘；发动机则有节奏地低吼着，蓝色的废气被向下排到了甲板上。随着航母转向迎风航向，巨大的舰体剧烈倾斜。随后，桅杆上升起红白两色的“F”字旗，表示飞行任务开始。当航母完成转弯，自然风向和航母全速航行的航向重合之时，一股狂风就会从头到尾横扫飞行甲板。拿着发光棒的甲板人员要站稳扶牢，保护自己不致被吹到旋转的螺旋桨上。他们还要把每一架飞机向前推动到起飞位置上。

随着地勤人员挥动发光棒，飞行员一边踩住刹车一边向前推动节流阀，发动机的吼声变得狂暴而震颤。飞行员此时要检查磁发电机、发动机汽缸里的混合气体状态，以及螺旋桨桨距；他要扫一眼发动机仪表，确定油温和油压正常；然后把发动机转速提到2 700转/分钟，并看着进排气管的压力。接着，蓝色的火舌会从发动机排气管喷出，在引擎罩上发出黯淡的闪光。飞行甲板军官若觉得发动机的声音没问题，就会放下发光棒，指向甲板。飞行员便会松开刹车踏板，一股向前的冲量便立刻把他重重按在座椅靠背上。航母舰岛的暗影从他的右边闪过。飞机的尾轮首先离开甲板，之后是主起落架，“地狱猫”就此跃入空中，开始爬高。飞行员随后会拉动液压杆收起起落架并向左压坡度转弯，一只眼还要盯住俯仰角指示器，免得栽进下方黛色的大海里。

空袭作战以数十架甚至数百架“地狱猫”的战斗机扫荡拉开序幕，它

们将在SB2C“地狱潜鸟”（又译“地狱俯冲者”）俯冲轰炸机和TBM“复仇者”鱼雷机到达之前把空中的敌机消灭干净。战斗机升空后会去“拧队形”（group grope），即在飞行过程中集结成编队。目光锐利的飞行员们寻找着飞机排气管发出的微弱蓝光，那是前一架飞机唯一可循的踪迹。在黑暗中编队飞行需要飞行员们持续调整速度、航向和高度，并始终注意防止眩晕或者迷失方向，这样极易导致坠机。他们戴上氧气面罩爬升到2万或3万英尺的高度，很快座舱里就会变得如同冻肉冷库那样寒冷，于是飞行员只能拍击戴着手套的双手，在座位上晃动身子，好让自己暖和一点。到了曙光初露时，海平线和周围的飞机出现在眼前，飞行员们才会稍稍感到轻松一些。自从参加飞行训练的第一天起，飞行员们就被告知“要经常转转脑袋”，因此他们一直瞪大眼睛，在天空各处搜寻敌机的踪影——前方、上方、下方、左边、右边，然后回到前方，再来一次。

接近目标时，他们会压低机头，加速冲过高炮弹幕。如果空中有敌机，那它们通常会出现在更低的高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最高的“地狱猫”飞行员之一戴维·麦克坎贝尔说过，他们几乎总是在自己下方看到日本对手，这样便可以发动俯冲攻击。“地狱猫”战斗机解散队形，“冲下去就能击中一两架敌机……我们发动攻击，再拉起，保持我们的高度优势和速度，然后再来一次。如此反复，一轮接一轮”。[\[6\]](#)

1944年，“地狱猫”是太平洋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但这种飞机用途多样，充当轰炸机也没问题。试验很快证明，F6F在挂载和投掷炸弹时几乎和专门制造的俯冲轰炸机同样有效——但和俯冲轰炸机不同的是，一旦投掉炸弹，“地狱猫”就可以在空对空的较量中打败任何对手。这种飞机有时会挂载6枚HVAR-高速航空火箭弹（high-velocity aerial rocket），昵称“圣摩西”（Holy Moses）——这种武器在攻击某些地面目标时被证明比炸弹更管用。每一枚HVAR都装有5英寸战斗部，威力可与5英寸舰炮比肩。如此，“地狱猫”在一次齐射6枚火箭弹时，其打击力可达到驱逐舰一轮侧舷齐射的水平。有时候“地狱猫”还会使用另一种

火箭——10英尺长的“小蒂姆”，威力与一枚12英寸舰炮的炮弹相当。到战争后期，随着飞行员们的使用经验愈加丰富，这些空对地武器也愈加有效。

随着战火燃烧到西太平洋，F6F越来越多地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日本地面工事。凝固汽油弹是一种简单的燃烧武器，它在汽油里增加了胶状化合物，变得黏稠。它会附着在落地时遇到的任何表面上——碉堡、高射炮、停放的飞机，或者是人的皮肤——然后剧烈燃烧直至燃油耗尽。一枚在混凝土堡垒顶上燃烧的凝固汽油弹足以把守军逼出来，赶到开阔地上，紧跟在投弹长机后方的“地狱猫”就可以用机枪把他们扫倒。

F6F的多用途特性使其成为航母特混舰队中最有价值的飞机，指挥官们也纷纷要求提高航母上“地狱猫”的搭载比例。如此一来，轰炸机中队的规模就要相应缩小了。到战争结束时，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的典型载机方案为96架飞机，包括12架SB2C、12架TBM和72架“地狱猫”。

一个长期以来的战术思想是，航空母舰无法与岸基航空兵匹敌——塞维尔斯基的畅销书里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和众多过时的理论一样，这一点也被雷达、防空火力和通信技术方面的同时进步推翻了。现在，航母特混舰队可以充满信心地击退哪怕是最猛烈的空袭，米彻尔这样的指挥官也越来越敢于在敌占岛屿附近巡游。根据一直给米彻尔当参谋长的阿利·伯克的说法，作战“逐步从‘打了就跑’的打法转变为‘留下来决一雌雄’。这种战术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敌人的航空兵彻底消灭”。^[7]如此，特混舰队便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敌人航空兵的反击，但是得到大幅改进的雷达系统能在100英里外发现来袭敌机，并准确读出其高度、速度和航向。IFF（敌我识别，“Identification, friend or foe”）技术此时也已能够在雷达屏幕上可靠地区分敌我。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被输送到每一艘航母上的CIC（战斗情报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在那里，一名战斗机引导官（FDO）及其助手将会通过无线电呼叫在上空巡逻的“地狱猫”，引导其前去截击来袭的敌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这些战斗情报中心和防空战斗机已经能够熟练组织起几乎完美无瑕的防空截击。舰

员们常常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如果某一架敌机设法突破了“地狱猫”防空战斗机群的铜墙铁壁，来到特混舰队的中心区域，它就会落入高射炮火的狂风暴雨之中。护航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高射炮会火力全开，从威力强大的远程5英寸/38倍径高炮，到新型的40mm四联装博福斯高炮，再到作为最后防线，只需要一个人就能瞄准开火的20mm厄利孔高炮，全都会加入这场合唱。VT引信或者叫“近炸引信”的装备大大提升了高炮炮弹的杀伤力，引信上装有一台微型多普勒雷达，用以探测目标位置，一旦接近到足够距离便引爆。在1942年的航母对决中，舰艇需要依赖高速剧烈机动以躲避空袭——所谓的“蛇舞”动作——但是在1944年，特混舰队已经变得更大，碰撞的危险也激增，于是新的战术条令便降低了对操舵的关注度，转而更倚重炮火。人们开始认为，还是让军舰保持航向，由炮手们用致命的防空炮火把军舰保护起来更好些。

第58特混舰队是以高速为目的建起来的。它尽可以穿上童话里的“七联靴”^[8]，在敌人觉察到其动向之前向任意方向前进数千英里。大型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CV）和小型的“独立级”轻型航母（CVL）能够一连数天在大洋上破浪而行，航速始终不低于23节，一旦开战则可以提速至超过30节。1943年“约克城号”航母在试航时，其航速峰值达到了34.9节——这是个惊人的速度，在航母史上前无古人。为航母护航的有新型艾奥瓦级（又译衣阿华级）“快速战列舰”，这一型4.5万吨的巨大海怪可以毫无压力地跟上节奏。米彻尔的“骑兵团”里没有“弩马”，所有老旧缓慢的舰艇都被甩给了两栖舰队或后勤舰队。第58特混舰队的高速度令其具备了良好的机动性和作战范围，这在一望无际的蓝色太平洋上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个巨大的游动航空兵基地，可以在大洋上尽情驰骋，在赤道两侧来回往复，在高低纬度之间任意游走。水兵们可能前一两天还戴着羊绒帽子和皮手套，穿着厚重的风衣，接着就在赤道骄阳的无情炙烤下，穿着半身被汗水湿透的工装背带裤赤膊工作。这支庞大的舰队可以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敌方海域。它们可

以躲在锋面之下，跟随热带风暴北上，也可以藏身于昼夜分界线的夜暗一侧，在敌人未察觉的情况下突然打出雷霆万钧的一击。它们可能留在那里和敌人打上一阵，也可能退回大洋深处，在一千英里以外再次突然出现，对另一个敌方目标施以毁灭性打击。它们到底会怎么做？日本人只能靠猜。

舰队在航行时会组成轮形阵，三四艘航母布置在中央，护航舰艇从大到小由内而外依次组成同心圆阵形。在一个典型的阵形中，两艘重型航母和两艘轻型航母在编队中央组成菱形队形，战列舰在航母左右两侧近距离贴身护卫，巡洋舰则位于东南西北四角。最外层是驱逐舰，这些多用途的小“铁皮罐头”可以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例如充当雷达哨舰、传令兵、防空火力平台、飞行员捞救者和潜艇杀手。为了迷惑和干扰敌方潜艇，舰队会走“之”字形航线，精确根据事先规定的时间间隔突然急转。所有军舰同时转弯，它们白色的尾迹会在大海上留出一片整齐的曲线。只需要一分半钟的时间，它们就可以完成90°转弯，稳定朝新的航向航行。这种协调一致的机动若要做得好，就需要每艘船都具有过硬的操舰技术，即便是最小的驱逐舰和辅助船也不例外。操舰军官要不停地微调航向和航速以保持军舰的阵位，他要随时紧紧盯住前方、两侧和后方的军舰。

白天，这样的转弯可以通过肉眼来掌控——但是在暗夜或者是恶劣天气下，能见度降为零，这时候再要确定友邻舰艇的位置，就只能靠盯住雷达室里的圆形显示器了。显示器上会有一条半径线像钟表的分针那样沿着圆周反复扫动，扫过回波信号时会留下逐步消散的浅绿色“雪花”和暗绿色“光点”。军舰转弯时，雷达兵必须盯住这些邻近的光点，并不断向舰桥发出修正航向和航速的信息，严防这些光点挪动到显示屏的中央位置。这种时候，雷达室简直就成了一个高压锅。夜晚，舷窗和舱盖都得关紧，免得灯光漏出去暴露自身的位置，这里就成了汗流浹背、密不透风的闷罐。空气中弥漫着烟味，人们的军服全都被汗水湿透。尤其是在出击前的夜晚，特混舰队会在夜色中以30节的高速航行，此时雷达显示器的操作员更是一刻也不敢把眼睛从显示器上挪开。许多

人需要很努力才能保持冷静。驱逐舰“戴尔号”上的一名水兵回忆过一次在这样的夜色里与灾难擦肩而过的经历。当时另一艘驱逐舰出人意料地突然转弯，眼见高速碰撞几乎不可避免，“戴尔号”的操舰军官下令让两台发动机以1/3动力倒退，以避免那艘舰。舰上的螺旋桨猛烈击打着海水，舰体不住地震动和颤抖，仿佛所有的铆接处都要解体一样；它的舰尾冲进了自己的尾流，在海面上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拼命晃动。最后，那艘撞过来的友舰从它前方300英尺处开了过去，有惊无险。[\[9\]](#)

第58特混舰队规模太庞大了，而且随着新服役的舰艇陆续来到太平洋，它的规模还在不断膨胀，这支舰队已经无法组成单一的轮形阵执行任务了。于是这支舰队被拆分为若干个“特混大队”，大队本身就是一个小些的轮形阵舰队。每支特混大队集中编组，统一行动，在一名少将的指挥下半独立作战。这些大队可以脱离主队独自加油或者执行航空兵作战任务，也可以被米彻尔将军指派去攻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各特混大队中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能被抽调出来组成传统的水面作战舰队，派往舰队主力前方去和日军舰队打一场传统的水面炮战，或者轰击敌人的岸上工事。不过，更多的情况下，这些特混大队（3~5支不等）会以15~20英里的间距集中行动，以发挥最大的力量，同时又能够相互支援。

当这支庞大的“舰队集群”集中行动时，那就一眼望不到边了，即便是从高空飞行的飞机上也看不到尽头。若有人从环形队形中一艘航母的舰桥上往外看，他会发现自己周围目力所及之处，满眼都是大小不一、类型各异的灰色钢铁战舰，延伸至海平线之外。位于邻近特混大队队形中央的航空母舰那极富特色的舰影已然在极远处，或许只有上层建筑还显露在海平线以上。侦察机会在200英里或250英里半径的区域里按楔形航线飞行，这样舰队就能“看到”各个方向海平面以外的情况。在晴朗的白天，方圆500英里范围内蓝色洋面上的任何东西都将无所遁形。夜晚，动力强劲的涡轮机会在各个方向上搅起数英里大海中的浮游生物，大海便会被绿莹莹的磷光点亮——有人说这些磷光的亮度足以让人看报

纸。高射炮手一直驻守在炮位旁，他们把钢盔推到脑后，救生衣挂在脖子上，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搜索着敌机。海面上间或闪出一阵光，那是有军舰在向友舰发出灯光信号。

这支舰队可以在海上一连航行数周乃至数月，这令其原本已前所未有的机动能力如虎添翼。第58特混舰队的支援和补给任务由太平洋舰队后勤司令部承担，这支后勤部队的规模是先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就和当年的战争通讯员们一样，后世的历史学者也没能激起读者们对后勤的兴趣。但后勤实际上却是驱动这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到西太平洋深处的火车头，是盟军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正如海军专业人士在战时一直提醒战争通讯员，战后一直提醒历史学者的那样）后勤是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基石。

到1944年春，太平洋上的战线已经推进到夏威夷以西很远距离之外，珍珠港已经太远，无法再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作战基地。舰队只能栖身于距离美国海军现有任何岸基设施都有数千英里的中太平洋上的偏僻环礁群。马绍尔群岛中的埃尼威托克、夸贾林和马朱罗，都是这种巨大的环形礁盘，其周围是低矮的珊瑚沙，也就是千万年来珊瑚们留下的遗骸。这些珊瑚沙围成了很浅但是巨大的潟湖，足以容纳数百艘舰船停泊。这些高出水面10~15英尺的细长岛礁成了天然的防波堤，保护舰队免受太平洋上持续涌浪的侵扰。但是其陆地面积太小，无法挡住狂风的侵袭，因此这些潟湖在风暴来临时也很难维持平静，停泊其中的军舰常常被吹离锚地，搁浅到附近的浅滩上。

这些岛屿本身提供不了食物、淡水和其他原材料，岛上有的只有珊瑚礁，它们可以被砸碎，做成高标准的混凝土，用以建造机场、道路和码头。但岸上实际上并没有太多这种建设需求，因为“浮动的后勤队”足以满足一个前进舰队基地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支由油迹斑斑的运输船、油轮和辅助船组成的看似不起眼的船队会在简陋的锚地下锚列队，为作战舰队提供所有必需的维修和补给勤务。除了最严重的战斗毁伤之外，所有的损伤都可以在移动浮船坞内完成维修。一支源源不断的航运大军

将这些前哨基地和珍珠港乃至北美洲西海岸联结在了一起。这往来穿梭的“舰队尾巴”包括货轮、民用油轮、运兵船、舰队油轮、弹药船、医院船、布雷舰、扫雷舰、冷藏船、潜艇支援舰、水上飞机支援舰，以及护航航母或者说是“吉普”航母（CVE）。它们满载着燃油、弹药、补给物资、零备件、补充飞机，以及刚刚完成训练、准备接替老兵们上阵打仗的新兵。

第58特混舰队惊人的作战距离和机动性很大程度上要仰仗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这些锚地的战略位置，但或许更要归功于一套被称为“海上补给”的技术。舰队可以在海上加油、装载补给物资，最后还能补充弹药。1944年4月，“海上后勤大队”在太平洋美军最西边的埃尼威托克基地开张，这支大队拥有34艘2.5万吨舰队油轮，11艘护航航母，19艘驱逐舰，以及26艘护航驱逐舰。一支由12艘以上油轮组成的纵队在驱逐舰的护航下从埃尼威托克井然有序地开出，去与第58特混舰队会合。一名驱逐舰上的水兵回忆过一系列油轮从海平线上开来，准备为舰队加油的场面，它们在舰队旁排成一列，如同“桥头排成一排的收费站”一般。^[10]空气中飘来一股重油的恶臭，下风一英里外都能闻到。1942年时，在恶劣海况下加油曾是航母作战的禁忌，这常常会导致严重的延误——但是现在，经过了超过两年的实战经验和训练，舰员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需要加油的舰船会从油轮后方开来靠到其侧舷，以9节或10节的航速平行行驶，彼此保持30英尺的间距。之后，钩爪和电话线会被抛到对面船上，接着输油管被拖过去，绑扎在加油口的阀门上，之后油轮开动油泵，燃油便源源涌入。然而当涌浪袭来，两艘舰船都会剧烈摇摆，此时输油管就会被甩来甩去，随时可能被甩脱。“把油管从一艘船拖到另一艘船，就像是从树上拖下来一条大蛇，”一位目击者如此写道，“它翻滚、扭动、挣扎，玩命抵抗，即便被绑到了受油管上，也拼命想要挣脱。”^[11]两艘舰船上的舵手都在不停调整航向，以保证彼此精准地平行前进。两艘船的船头并肩向前，就如同漏斗一般，令汹涌的海水在其间归于平和。当受油舰的油槽装满之后，它就会解开输油管，逐步加速脱离，另一艘军舰则从后方靠上来。流程如此往复，直至舰队所有的舰艇

都加满了油为止。

1943年秋到1944年春之间，随着新服役的快速航母和护航舰艇从美国本土不断来到太平洋，第58特混舰队的实力与日俱增。这支快速壮大的力量向世人证明，原来一支舰队也能具有如此空前的战术机动性，在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东征西讨，在长达5 000英里的战线上攻击各处日军目标。这一时期，舰载战斗机和轰炸机会为所有的主要两栖进攻作战提供空中掩护，无论是尼米兹的战区还是麦克阿瑟的战区皆如此，有时它们还会一个星期里在赤道南北接连发动打击。1943年11月，一支特混大队被派往南线打击新不列颠岛上的拉包尔，其余部队则掩护对吉尔伯特群岛中塔拉瓦、马金两个环礁的登陆。之后，航母特混舰队重新集合，杀入马绍尔群岛的中央，发动了一连串猛烈空袭，直至1944年2月美军完成“燧发枪”登陆战役才告结束。当月晚些时候，第58特混舰队发动了截至当时最大胆的一次冒险——“冰雹”作战，突袭日本设在本土之外最大的海军基地，特鲁克环礁。在两天的空袭中，美军舰载机摧毁了249架日军飞机（大部分是在地面上摧毁的），击沉船舶20万吨。北返途中，舰队顺道空袭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罗塔岛，之后再次南下，空袭了东距特鲁克1 200英里，西距菲律宾仅仅575英里的帕劳群岛。4月，第58特混舰队各部深入赤道以南，支援麦克阿瑟将军向新几内亚北部海岸荷兰迪亚的推进，空袭并摧毁了这一区域所有的日军机场。向北返航途中，舰队仿佛是突发奇想，再次向西拐了一道弯，花了两天时间，把特鲁克和帕劳群岛彻底炸成了废墟。

舰队的指挥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性格沉静，还有些腼腆。他中等身高，身形健硕，穿着合身的卡其色军装和油光锃亮的鞋子。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金色短发已经开始变白。他的皮肤由于长期阳光照射而显出了一副古铜色。他已经57岁了，但看起来却像是47岁。有人觉得他长得很像已故的喜剧演员威尔·罗杰斯。[\[12\]](#)

战争爆发时，斯普鲁恩斯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少将，在哈尔西的航母特混舰队里指挥一支巡洋舰分队。但在1942年6月，两件意外令他的职

业生涯扶摇直上。先是哈尔西被严重的皮炎放倒，他便临时接掌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为核心的第16特混舰队。在此任上，斯普鲁恩斯打赢了1942年6月4日至6日的中途岛海战，成为这场不朽胜利的主要功臣。紧接着，他又被尼米兹召回岸上，担任其参谋长，他将在这个实权职位上供职超过一年。1942年6月到1943年7月担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期间，他一直住在珍珠港马卡拉帕山尼米兹寓所二楼的一间简单的小卧室里。这令两位将领越走越近，无论是专业协作还是个人关系皆如此。当斯普鲁恩斯在司令部的任期结束时，尼米兹选择了他作为第5舰队司令，这是美国海军最庞大也最重要的海上作战部队。（从更大范围看，这还是世界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支舰队。）尼米兹相信斯普鲁恩斯，把他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也是为什么尼米兹决定把这支出海作战的舰队交给他来指挥。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参谋军官评论道：“将军觉得现在可以把雷蒙德派出去了。他俩已经到了言谈举止都相像的地步了。”^[13]

斯普鲁恩斯虽然是米彻尔将军的上级，但是他常常放手把第58特混舰队的战术指挥权交给这位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的旗舰，不起眼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被编入米彻尔麾下以埃塞克斯级重型航母“列克星敦号”（CV-16）为核心的第58.3特混大队里，只是其环形护航舰队中的一员。有时候，当第58特混舰队一连数天在辽阔的太平洋上高速行进时，斯普鲁恩斯根本不操什么心，甚至什么事都不做，不下任何重要决定，甚至完全不和米彻尔联系，即便两艘旗舰相距仅仅1/4英里而已。

第5舰队参谋长“卡尔”查尔斯·穆尔后来对自己上司古怪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进行了坦率的描述。斯普鲁恩斯完全不是那种传统的战时舰队司令。他冷漠、内向而淡泊。他常说太平洋战争“很有趣”。作为一个健身狂，斯普鲁恩斯说自己要是每天不步行个5英里，就脑子想不清，晚上睡不着。在海上的平常日子里，斯普鲁恩斯每天都要围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艏楼来回走上三四个小时，穿着印有夏威夷大花的浴袍，不

穿衬衫，白袜子和平时常穿的黑皮鞋也不见踪影。

斯普鲁恩斯不怎么关注管理细节，把这些事交给下属去操心就好了。有时候穆尔想要找斯普鲁恩斯商讨一些事项，但斯普鲁恩斯又不想关注它，于是他就干脆不搭理。他会走出司令部舰桥到甲板上例行散步，抑或回到自己的舱室里闭门读书。“他从来不会激动或者兴奋，当我发脾气时，他也从来不以为意，”穆尔在1944年初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写道，“当他不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就假装没听见，回房睡觉或者出去走路，就是不答复你。”^[14]

斯普鲁恩斯对待睡眠是毫不含糊。他每晚都想要睡八九个小时，常常早晨8点还没起床。即便当“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30节高速驶入敌方水域，舰员们都紧张得睡不着的时候，这位将军仍然睡得很香。有一天晚上，穆尔把他摇醒，告诉他雷达发现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

“好吧，”斯普鲁恩斯躺在床上问道，“这事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没有。”穆尔答道。

“那为什么要把我喊醒？你知道我不喜欢半夜被人喊醒。”他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了。^[15]

第5舰队的幕僚们都喜欢对别人讲他们司令官每天的饮食，他对这方面的关注可是事无巨细。斯普鲁恩斯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先洗个冷水澡。他在喝完早晨的咖啡之前一言不发，不过他对食堂里那些被称为海军“乔”的焦糖咖啡嗤之以鼻。他只喝用高等级夏威夷科纳咖啡豆煮出来的新鲜咖啡。这位将军不相信食堂的勤务人员能煮得好，于是干脆自己动手，用他自己的手摇咖啡研磨机磨咖啡豆，然后放在桌上的茶炉里煮。他早餐要喝三小杯咖啡，之后就不再喝了。他在饮食方面自律而有节制。“他〔早餐〕要吃几片烤面包，有的话还吃点葡萄干，”他的副官查尔斯·F.巴伯说，“午餐是一碗汤和一大盘沙拉。我常常在午餐前提醒访客，他们能吃到的东西只有这些。”^[16]晚餐很用心，因为斯普鲁恩斯习惯于每晚在军舰上绕圈子散步。晚餐他会吃牛排和简单切片的洋葱，

他觉得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

斯普鲁恩斯严格要求周围的人服装整洁，尤其是在他的个人空间里。有一次穆尔把脚放在他指挥舱的椅子上，被他训了一顿。

“甲板很干净，”穆尔回应道，“就和这椅子一样干净。”

斯普鲁恩斯在坐下来之前特地用手擦了擦椅子，说：“我可不想让你脚上的脏东西弄到我的裤子上。”^[17]

在一些私下的交流中，斯普鲁恩斯批评他的老朋友比尔·哈尔西对新闻记者说话时太随意了。他相信哈尔西这样会让自己被媒体“利用”，于是决定不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1943年秋刚刚被任命为第5舰队司令时，他不允许任何战争通讯员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但他到任时，恰逢华盛顿方面开始提升海军的公共形象。海军部次长吉姆·福莱斯特尤其重视此事，他要求海军所有主要将领提高与媒体交流的质量、数量和及时性。珍珠港的记者们对这位神秘的四星上将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采访申请纷至沓来。“他拒绝和任何战争通讯员见面，”穆尔说，“直到我成功让他认识到这是他的职责。”^[18]

到了最后面见记者的时候，他的表现冷峻而一板一眼。他讲的都是些后勤方面的细枝末节，这个话题根本激不起记者们的兴趣。他的发言不带任何情绪，这样记者们便无从勾勒他的性格和指挥风格。问题是有些记者会发挥想象力来填补这些空白。1944年1月号的《科利尔》说斯普鲁恩斯是个努力拼命的工作狂：“斯普鲁恩斯将军只要不在步行，就在拼命——他自己拼命，要他的下级拼命，要他的军舰拼命，敌人也拼命。他是个工作的魔鬼。”^[19]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舰桥上，穆尔一次次重复这句话，来逗这位上将：工作的魔鬼！数年后，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穆尔重读《科利尔》的这篇报道时大笑了起来：“他是你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才不想工作。他讨厌写任何东西。他也不拼命——你能看出来，他没有要我拼命，他想要我什么都不做，对其他所有人也都一样。他没有让他的船去拼命。不过接敌的时候，他确实会逼着敌人拼

命。这个家伙让你们觉得这里有个吃苦耐劳，热情满满，要所有人拼命的人，但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20\]](#)

1944年6月，当第5舰队奔赴马里亚纳群岛，准备发动登陆进攻时，斯普鲁恩斯古铜色的脸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标题是《机械人》。《时代》杂志称他是“冷峻而精于计算的机械人”，更像是个技术人员而非勇士。当这本杂志被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指挥舰桥上时，斯普鲁恩斯把它藏了起来。但这个小伎俩没能成功，穆尔又从别处搞到了一本，而且通过军舰上的广播系统把这一段文字大声读了出去。后来，穆尔给他的妻子（她和丈夫一样是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的老友）写信，用更严肃的语气指出，《时代》杂志简明扼要地点出了这位第5舰队司令的特点。“如果他们来找我，我会给出一个更好的对他的描述，但是我觉得公众和这个舰队里的几万人像《时代》形容的这样看待他也挺好。《时代》给他安的这些军事才能并非虚言，只不过他并非冷峻无情，而是腼腆害羞。”[\[21\]](#)

假如斯普鲁恩斯真的是为了逃避工作，就像他至少在战后的一封信件里随口自称的那样，那他真是把懒惰变成美德了。[\[22\]](#)他坚持向下授权，倾向于让下属尽可能发挥所长。他让自己的思维摆脱细节的困扰，聚焦于宏观的视角之上；他不愿为小事费神，因为要把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他每天5英里的甲板散步令他保持着良好的健康和精气神。锻炼身体有助于保持良好睡眠，即便是在敌方水域连续作战的重压之下也是如此。当舰队的其他人已经筋疲力尽，濒临崩溃时，斯普鲁恩斯仍能保持精神抖擞、睡眠充足。他在海上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表示：“如果我不锻炼，感觉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我会感到紧张，精神会压抑.....我现在处于巅峰状态，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以做好我的工作，毕竟，这是个重要的工作。”[\[23\]](#)

随着新的海上补给能力大大延长了舰队远洋巡航的时间，这种哲学中的智慧不言而喻。军事和医疗方面的专家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指挥人员疲劳”带来的难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随时关注

出海作战的指挥官的精神和身体状况。1944年夏季时有一名访客来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他说第5舰队的参谋军官们“一眼看去累得像狗”。他们似乎早就该回到陆地上休个长假了。但是年龄比指挥部里任何其他人都大的斯普鲁恩斯，反而显得睡眠充足，健康而敏锐。[\[24\]](#)

在马里亚纳战役开始的时候，一位同僚提醒斯普鲁恩斯：“每个指挥官都必须是个赌徒。”若真如此，那斯普鲁恩斯就是个反例，他想要当个“专业型”的赌徒，因为他想让“我下注的所有赔率都要对我有利”。[\[25\]](#)他不相信那种不必要的冒险，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已进入后期，美军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且优势还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因此，他最想做的是保护塞班岛的滩头，以及外海上那些脆弱的两栖舰队。1944年6月18日夜间，当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向美军逼近时，米彻尔将军请求准许他率领第58特混舰队西进截击。由于担心日军向美军滩头发动决死攻击（虽然这个风险还很遥远），斯普鲁恩斯拒绝了这一请求。6月19日上午，日军航母舰队向第5舰队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空袭。在持续了几乎一整个白天的被称为“马里亚纳猎火鸡”的空战中，F6F“地狱猫”机群迎战了来袭日机并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将超过300架日本飞机打成了火球。但是此时第58特混舰队的位置过于偏东，无法向日军舰队发动反击。后来经过了长达24小时的追击，米彻尔航母上的飞行员们最终还是在6月20日傍晚击沉了敌方两艘舰队油轮和一艘航空母舰，但日军的大部分舰队还是逃出生天，得以另候时机杀回再战。

在这场两天的“马里亚纳海战”之后，斯普鲁恩斯保守的战术指挥饱受争议。批评者指责他忘记或者忽略了航母作战的首要原则——**先下手为强**。而根据海军航空兵军官们的看法，这次战役中6月18日晚间能否西进加倍重要，因为这一水域的贸易风主要来自东边，航母在昼间常常需要转向东方航行以收放飞机，故而难以西进。斯普鲁恩斯精密算计之后做出的决定竟是把第58特混舰队拴在塞班岛近旁，让日军首先发动空中打击，同时把自己的航母部队布置在反击距离之外。在航母作战的历

史上（当然，这个历史也不长），这样的决定还从来没见过。

在批评斯普鲁恩斯的人眼里，他的战术不仅错误，而且错得离谱，不可原谅。米彻尔的参谋长阿利·伯克后来回忆说，这个决定令他和他的战友们“心碎”。美国人原本已经抓住了彻底消灭日本海军全部进攻力量的机会，却让煮熟的鸭子飞了。这一争议在美国海军各个层级上给传统战列线军官（主要在战列舰和其他水面舰艇上服役，被称为“黑鞋族”）和新兴的专业航空兵军官队伍（被称为“棕鞋族”）之间带来了裂痕。“棕鞋族”声称像斯普鲁恩斯这样的“黑鞋族”没有资格去指挥快速航母特混舰队，因为他对于舰载航空兵带来的新能力缺乏天然的感觉。这一争议掺杂了兵种偏见，又被个人的野心所扭曲，变得格外尖锐。“棕鞋族”中越来越多的上校和少将坚持认为斯普鲁恩斯必须走人，他们想要去试探合理批评自己上级指挥官的界限，或者说是兵变的界限。次月，金和尼米兹造访了马里亚纳群岛，二人明确表态支持斯普鲁恩斯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从而平息了要赶他下台的议论。但这种争论还将在珍珠港和华盛顿不停歇地持续下去。

1944年8月发生了重要的指挥层调整。从1942年10月起就一直在南太平洋担任小战区司令（南太平洋战区司令）的哈尔西将军，被调到北边来接替斯普鲁恩斯。交接工作将在马里亚纳战役结束后开始。斯普鲁恩斯和他的幕僚团队将要满载荣誉离开战场，然后返回珍珠港去规划未来的作战行动。哈尔西将要指挥这支舰队直至1945年1月，之后再次由斯普鲁恩斯接掌指挥权。这一变更将每隔五六个月重复一次，直至战争结束。一位将领带着幕僚班子在海上指挥作战，另一位则在岸上规划下一轮登陆作战和航母进攻。多少有些迷惑性的是，哈尔西接手指挥时，第5舰队将改称为第3舰队，第58特混舰队也同步改称为第38特混舰队。斯普鲁恩斯回来后，舰队就又会改回第5舰队和第58特混舰队。虽然编号来回变动，但实际上却还是同一支舰队。这个策略也是为了诱导日本人相信美军有两支独立的舰队在太平洋轮番作战。事实证明这一点成功了，至少初期是如此。日本的民用无线电广播有时会同时提到第5舰队

和第3舰队，谈论它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26\]](#)

这种“两套班子”指挥模式的优点很明显。斯普鲁恩斯或许具有格外突出的耐受力，但也不能指望他和他的团队一刻不停地无限期待在海上。战线已经向西推进了如此之远，想让舰队每打赢一场战斗就回到珍珠港也是不现实的。随着美军突入日本的内层防御圈，让太平洋舰队保持与敌不间断作战便十分重要了。航空兵作战将会无休无止，一轮接着一轮。但舰队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直接参与制订新一轮的作战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舰队确实需要有一个班子在岸上司令部工作，另一个班子在海上作战。[\[27\]](#)

但也有人质疑这套舰队轮流指挥的体系是否明智。他们用了两个类比来形容这一安排，这两个类比在当时和战后的相关叙述中都被广为使用。第一个类比是：“两个车夫，同一群马。”第二个则难免和橄榄球有关：“两个后卫，一个前锋。”在两个比喻中，马或者是前锋确实值得担心，因为没有机会休息。根据曾在1945年指挥一支航母特混大队的阿瑟·拉福德少将的说法：“马儿们有时会想，这辛苦一阵就能休息的车夫，是否真的能够理解这些船上一连数月天天在海上不换班的舰员的精神崩溃。”[\[28\]](#)

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哈尔西的团队是否已经准备就绪？斯普鲁恩斯和他的团队有了一年难得的实战经验，已经达到了精熟状态。而哈尔西和他默契的幕僚班子则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岸上司令部里干了近两年。哈尔西自从1942年的晦暗时代以来再也没有出海指挥过。而就在这一段空白期里，技术和战术条令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和他的团队有太多东西要去学习，而海战这所学校却严酷而毫无宽容。

指挥南太平洋战区期间，哈尔西为自己赢得了富有感召力，行事高调，是个喜欢聚光灯的勇士的名声，他就是海军的乔治·S.巴顿。他在军人们和内部文件中的绰号“公牛”很快被报界广为传播。他对记者们充满热情，而且总是金句频出。他那段对日本人的血淋淋的狠话受到了热烈

的追捧，不光是太平洋上的盟军官兵如此，美国国内的民众也是一样。和许多名角儿一样，他也有一句名言。“赢得战争的方式，”他说，“就是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杀死更多的日本鬼。”^[29]他发过这样一封电报：“让他们去死。”提到日本人对美国战俘的暴行时，他恶狠狠地宣布：“他们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他告诉媒体，他想要骑上裕仁天皇那匹著名的白马，穿上和天皇一样的服装，走上东京街头，亲口宣布：“你们已时日无多。”^[30]哈尔西先说后想的作风过去也给他制造了一些麻烦，最有名的是他曾经草率地预言盟军将在1943年底彻底赢得太平洋战争，三个月后他又不得不撤回这个敏感的预言，而他的撤回反而被日本官方新闻媒体抓住，大加利用。他后悔自己在报纸上“许多次把自己搞得跟猴子一样”^[31]，发誓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32]但是斯普鲁恩斯私下里却忧心“对哈尔西的宣传报道已经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而且怀疑（不幸被他说中了）他这位将军僚友是否会在此压力之下“把自己变成光芒万丈的公众人物，而不再听从他那绝佳的军事判断力”。^[33]

有一位战争通讯员在1944年中期结识了哈尔西核心幕僚圈子里的军官，他说这些人总是精神亢奋。“哈尔西一直不停地逗趣，哈尔西手下的所有人看起来都总是很开心。”^[34]这个调子是他们的老大定下来的。他是个粗俗、大嗓门、爱开玩笑的四星上将。人家拿他开玩笑，他开怀大笑；对于敌人他则唇枪舌剑，火力全开。他的幕僚班子以“米克”罗伯特·卡尼为首，他们自称为“阴谋诡计部”。他们对哈尔西高度忠诚，哈尔西对他们也是一样。自然，他们都想跟随自己的“比尔将军”去进行下一场远征，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第3舰队司令部里的岗位对于任何有雄心的军官来说都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而哈尔西也不想在这个时候遣散自己的左膀右臂。如上这些，毫无疑问促使他下定决心，1944年6月16日启程离开努美阿前往夏威夷时也带来了原来南太平洋司令部的一大群幕僚。当他们来到设在珍珠港海军造船厂里的第3舰队临时司令部时，其军官和士兵的数量超过了100人，还有更多的人将在8月指挥权交接之前陆续从南太平洋赶来。但是自从前一年埃塞克斯级快速航母加入

以来，这些人中却没几个在舰队里服役过。哈尔西第3舰队司令部的规模几乎是斯普鲁恩斯团队的两倍，若不是尼米兹坚持要限制人数，这个数量还会更大。

在特混大队的层面上同样会进行人事变更。米彻尔在清除表现不佳的指挥官时毫不手软，自从1944年1月开始掌管第58特混舰队以来，他已经赶走了三位特混大队指挥官。那些刚刚晋升上来的新一代航空兵将领都在盯着这些海军中最具声望的职位。于是，当他们想尽办法争夺这些职位的时候，雄心壮志、个人竞争，以及“棕鞋族”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便纷纷掺杂了进来。大部分新的特混大队指挥官都是1916—1919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资历比那些在舰队里指挥战列舰和巡洋舰的“黑鞋族”将领低得多。统领战列舰部队的“大下巴”威利斯·李中将1908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比斯普鲁恩斯只低了两届。他的年资比指挥各个特混大队的人高了10年，可他和他的战列舰舰长却不得不听命于这些人。这样的指挥结构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黑鞋族”指挥官已经接受了航空母舰快速崛起的事实，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他们也不再坚持那种按毕业年份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金上将决意要把太平洋方面最高层级的人事任命抓在自己手里。他的做法是人员轮替：把舰队的将领调回华盛顿负责行政管理和计划制订工作，并把总部的其他人派到舰队去。这一政策是明智而且公正的，但也意味着那些先前还在华盛顿当“飞行办公桌”的人突然就被甩到了重要的海上指挥岗位上，即便他们近期没有在舰队任职的经验。有鉴于技术和战术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向前演进，他们将会有许多东西要去学习和掌握。8月10日，第5舰队在一连两个月马不停蹄地支援马里亚纳群岛进攻作战之后，回到了埃尼威托克环礁，几位新任命的特混大队司令也飞抵此地，从其前任手中把指挥权接了过来。最近在金手下担任分管航空的副海军作战部长的“旋风”约翰·S.麦凯恩中将，接替“乔克”约瑟夫·克拉克担任第58.1特混大队司令。他的旗舰是“黄蜂号”。“泰德”弗雷德里克·谢尔曼接替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指挥第58.3特混大队，他在“埃塞克斯号”上升起了将旗。杰拉尔德·博根继续指挥第58.2特混大队，他的

旗舰是“邦克山号”；拉尔夫·戴维森则坐镇“富兰克林号”，他是第58.4特混大队司令。他们都被告知舰队指挥权将在8月26日中午进行交接。斯普鲁恩斯将会带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返回珍珠港，“新泽西号”战列舰则会在9月第一周里带着哈尔西来到西太平洋。

米彻尔将军迟早也需要休息。舰队的随军医生已经从他身上发现了不少精神疲劳的迹象：米彻尔在6个月里瘦了15磅，由于他本来就和赛马骑手差不多瘦，这样的体重下降是他无法承受的。但是要替换米彻尔却会带来一个难题。在华盛顿和珍珠港，都有不少野心勃勃的“棕鞋族”将领对这个职位垂涎欲滴。但是具有米彻尔的军衔和年资的在役海军航空兵将领本来就没几个，这些人中指挥过新型航母出海作战的更是一个都没有。米彻尔倾向于从现有的特混大队指挥官中提拔一人来担当此职：他推荐了“泰德”谢尔曼。但是谢尔曼在开战时还只是个上校，将如此低年资的将领晋升至高级指挥岗位，将会引发妒忌和抵制。

金最终选择了约翰·麦凯恩来担任这一职务。麦凯恩是个年资很高的中将，他1906年就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在华盛顿，他是金最信任的副作战部长之一。瓜岛战役时，他曾是南太平洋航空兵司令，后来又担任海军部下属的航空局局长。与金和哈尔西一样，他也是航空兵的后来者——所有这三位将领都是在50岁以后担任上校时接受的飞行训练，目的仅仅是获得指挥航空母舰的资格。而那些“真正的棕鞋族”从一开始就是飞行员，然后一路晋升，这些人并不把那些“新来的乔尼”真正视为自己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麦凯恩接替米彻尔担任第38特混舰队司令的消息感到迷惑和不安。

按计划，米彻尔还将在舰队里继续待到11月，在这期间麦凯恩将作为其下属的特混大队司令获得三个月的适应期。第38特混舰队下辖4个特混大队，麦凯恩指挥其中之一。他的前任指挥官，“乔克”克拉克将留在“大黄蜂号”上，一旦有需要，他将从“大黄蜂号”上飞行一小段路来到“黄蜂号”，给新上司出谋划策。混杂英语中有个词叫“Makee-learner”（实习生），现在美国海军就用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在职训练的

做法。麦凯恩无法继承米彻尔那经验丰富的幕僚班子，因此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任务：从零开始组建新团队。但是许多拥有关键实战知识的军官即将休假，或者被调往其他将领帐下，或者二者兼有。这令他的人员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要知道，麦凯恩的年资比米彻尔高4年，他对约翰·托尔斯说，自己觉得似乎是有人想要“割断他的喉咙”。^[35]在先前美国海军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高出来的4年年资都足以让所有这样的争议结果对麦凯恩有利。但是在这场宏大而残酷的战争的重压之下，诸多旧传统都已被抛诸一旁。现在需要的是务实的解决办法。尼米兹在礼貌地倾听了麦凯恩的讲述之后，告诉他，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好就行了。

舰队在埃尼威托克休整时，水兵和军官们就要上岸“解放”一阵了。于是两个小岛被指定成了休闲区，一个服务军官，另一个服务士兵。岛上发啤酒，每人两听，不过黑市上的酒类供应也很充足，军官休闲区那个小岛更是如此。8月中旬的一天，“大黄蜂号”上一队吃饱喝足的飞行人员站在码头上，等候一条汽艇来把他们送回母舰。然后这群人就打闹起来了。一个少尉被推进了潟湖里。他游回岸上，沿着码头冲了回来，想要“报仇”，结果又有几十个人掉进了水里。很快，凡是卡其色军装没有湿的人都成了靶子。即便是“大黄蜂号”的舰载机大队长“哈尔”哈罗德·L.比尔中校也被抓住双手双脚扔进了潟湖里。不过他一点都不介意。“不管怎么说，”他写道，“这就是找乐子，而且掉进水里能让喝一下午的酒清醒过来。”^[36]

浑身滴着水回到码头后，比尔看到一个白头发的小个子被径直丢进了潟湖。比尔认出他是麦凯恩将军的时候，他已经被扔出去了。海军的礼仪规范在有些环境下可以不那么严格，但总的来说，喝醉的航空兵对一位三星中将动手，还把他扔进海里，这是不允许的。比尔大声喝止，但太晚了。他和其他几个人立刻跟着麦凯恩跳了下去：

我们抓住他并扶他站起来时，他气喘吁吁地说：“找我的帽

子，孩子们，找我的帽子。”他这顶帽子是特殊款的野战软帽，镶有金色饰带和金穗纹章，几乎已被海上咸涩的空气变成绿色，这是他的幸运帽，在舰队飞行员中间很有名。我们找回了帽子，带将军回到了码头，并为我们的行为向他表达了最深刻的歉意……他是个小个子，弱不禁风的样子，看起来一阵狂风就能把他吹走。他身上还在滴着海水，挂着海藻和珊瑚沙，他咧嘴笑着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而我们还在不停向他道歉。他要了一根没被浸湿的香烟，点着，对我们说能回到他的“斗士们”身边真是太好了。他蓝色的眼睛在满是皱纹的脸上闪闪发光，鼻子和耳朵透着一股英雄气，他看起来整个就像是魔法小精灵。

小艇开过来时，第一批小艇中有一艘是麦凯恩的摩托汽艇。这艘艇通体雪白，一尘不染，黄铜将星闪着光芒，蓝色三星旗在艇上飘扬，这场面真漂亮。将军和他的小伙子们聊得正欢，还不想散场。于是他要我们和他一起上船，他可以把我们带到自己船上。这艘干净的汽艇的艇员们一定很失望，将军带着十几个湿漉漉、脏兮兮的飞行员一起上了艇。之后我们在港内的大群战舰中转了一圈，把所有飞行员都送到了舰上。[\[37\]](#)

8月28日，已经完成改编的第38特混舰队从埃尼威托克出击。一如往常，舰队的离港是个漫长而复杂，需要事先编排妥当的过程：驱逐舰和巡洋舰在航母之前穿过出口处的深水水道离港，之后立即打开声呐搜索敌人潜艇。所有舰艇全部高速行驶——越快越好，离开日本潜艇出没的危险的出入口水域——并不改变行进速度的情况下集结成巡航队形。米彻尔的舰队现已齐装满员，拥有8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和8艘轻型航母，编成四支特混大队，搭载飞机总数超过1 000架。这次出击将会是快速航母特混舰队长达一年的历史上最持久、最富野心的一次。

打开太平洋的地图，可以看到一条长达3 000英里的岛群组成的弧线从日本本土，到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帕劳群岛，一路延伸到菲律宾群岛南部。现在美军已经拿下了马里亚纳群岛，

其控制范围扩展到了这条弧形岛链的整个南半部。第38特混舰队将为在加罗林和帕劳群岛诸岛登陆的“僵局”作战提供掩护。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到11月时，美军就将占领或压制北至马里亚纳，南至棉兰老的所有重要岛屿。在接下来的巡航中，美军航母部队将直逼菲律宾的大门，在11月15日麦克阿瑟计划登陆棉兰老的日期之前打击日军在这一区域的航空兵力量。照相侦察机已经在菲律宾群岛上识别出至少63座日军机场，根据最出色的情报部门估测，这些机场上将有650架各型飞机。

在这道新月形岛链的上半段，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是一连串小岛组成的小笠原群岛和火山列岛，日本人称其为“南部诸岛”。美国人俗称其为“诸岛”（Jimas）。[38]自从10个星期前美军登陆塞班岛以来，这里就成了战略焦点。其中硫黄岛作为敌人增援航空兵南下的落脚点尤为突出。从6月15日到8月5日，“乔克”克拉克麾下拥有埃塞克斯级航母“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的第58.1特混大队向小笠原群岛一连发动了5轮大规模的航母打击。美军舰载机一次又一次杀回来，把机场、弹药库、高射炮、油库和地面设施碾为齑粉。它们在岛屿上空击落了接近100架日机，在地面上还摧毁了100架，向港口内的日本舰船发动了俯冲轰炸，对海岸外的渔船进行了扫射，还用鱼雷攻击了海上的日本船队。虽然舰队的普通官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斯普鲁恩斯将军一直在全力争取直接登陆硫黄岛，反复多次的航母空袭也提供了关于岛上日本守军情况的有效情报。

克拉克后来说他“一直将这些岛屿视为我的私有财产”，他的航空兵官兵也把这些岛昵称为“乔克岛”。一个月前回到埃尼威托克后，他们就搞了个假想的地产投资公司，还发了股票，所谓“乔克岛发展有限公司”，推广他们的业务，也就是购置并开发“小笠原群岛的专属地块”。认筹的“股东”还拿到了画得花花绿绿的股票持证，写明其所有者拥有“硫黄岛、父岛列岛、母岛列岛、婿岛列岛各处精选地块——距离东京市区仅500英里”。作为这家假想公司的“老板”，克拉克在每一张股票上亲笔签了名。一号股票被发给了米彻尔将军。这些股票很快就成

了“有价证券”，在整个太平洋战区甚至远达华盛顿来回交易（有时候甚至得花真钱）。

现在，第38特混舰队再度出海，全舰队兵分两路。三支大队向南，空袭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的各处目标，一支大队（拉尔夫·戴维森指挥的第38.4大队）则北上再度前往小笠原群岛。在三天的空袭中，戴维森的飞行员们在群岛上空飞行了633个架次，战果是击落或在地上摧毁46架日机，并击沉6艘舰船。^[39]在发给哈尔西和米彻尔的战报中，戴维森写道：“乔克岛发展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机场和工业用地成交量大增后销售再创新高。”^[40]

戴维森的航母舰队在战斗中仅仅损失了5架飞机。其中一架被击落的TBM“复仇者”的飞行员是乔治·H.W.布什中尉，也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位。他的飞机在父岛上空被高炮火力击中损毁。布什跳伞落海后被潜艇“长须鲸号”救起——但是他的2名机组成员，以及其他6名被击落飞机上的空勤人员被岛上日军抓获、拷打并处死。其中4名俘虏甚至被日本人办了个吃人仪式，吃掉了一部分。这一可怕的事件以及对战争罪犯的判决被收录在了詹姆斯·布拉德利2003年出版的《飞行小子》（*Flyboys*）一书中。

8月24日，哈尔西和他的幕僚班子搭乘“新泽西号”离开珍珠港。哈尔西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团队，接近200名官兵，达到了舰员人数的10%。这艘4.5万吨战列舰的上层建筑不得不施以大范围改造才能用作舰队的指挥中心。舰长舰桥下方的两层甲板被用作了“司令部区域”，包括一间装备了最先进通信设备和雷达设备的通信室，左右两侧配有走廊的专用司令部舰桥，司令部官兵的卧室，以及一间被扩建了一倍，用作会议中心的空荡荡的军官餐厅。^[41]舰上的这一区域比斯普鲁恩斯那艘小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同类区域大得多。新改建的军官餐厅和士兵食堂按海军的标准算得上是奢华了。情报官卡尔·索尔伯格上尉回忆道，餐厅里供应的伙食质量令这些低阶军官惊喜不已，在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有新鲜的牛排和猪排，凉拌沙拉，不仅每晚都有冰激凌，每

周日还有‘烘烤阿拉斯加’冰激凌蛋糕”。[\[42\]](#)

来到第38特混舰队之前，哈尔西想要先前往马努斯岛会见麦克阿瑟手下的海军司令和航空兵司令。在从珍珠港出发的10天航程中，“新泽西号”和三艘护航的驱逐舰每天都要进行防空炮术训练，炮手们会向战列舰载水上飞机拖曳的靶标开火。“新泽西号”上的16英寸巨炮也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令第3舰队的通信官们满意的是，巨炮射击时的强烈震动并不影响他们设备的正常工作，这可是原来那些旗舰普遍面临的难题。“米克”卡尼组织通信室人员进行了一系列高压演习，也就是所谓的“模拟战场问题”演练。[\[43\]](#)此时，哈尔西及其旗舰和第38特混舰队相距数千英里之遥，米彻尔仍然负责航母部队的战术指挥——但是哈尔西还是频繁通过“新泽西号”塔状无线电天线向他发出指令。即便是在旗舰尚未加入舰队的时候，哈尔西就已经明显表现出他将会比前任更多地插手指挥。

对于如何打赢这场太平洋战争，哈尔西和他的“阴谋诡计部”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毫不犹豫地提出要对现有计划做大幅度修改。在接掌舰队之前的过渡期里，哈尔西提出“僵局”行动基本不必要。在他看来，远在赤道的加罗林群岛和帕劳群岛作为进攻目标应该是首先被绕过的，他提议将原本用于在这些岛屿登陆的部队移交给麦克阿瑟，用于加快对菲律宾的进攻。[\[44\]](#)作为回应，尼米兹下令越过一个不能带来大幅跃进的主要目标（帕劳群岛中的巴伯尔达奥布岛）并同意考虑越过加罗林群岛的雅浦岛——但是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认定，对帕劳群岛西部〔佩里硫岛（又译佩莱利乌岛）和安加尔岛（又译昂奥尔岛）〕的进攻将要按计划进行。哈尔西的幕僚们还提出要对太平洋潜艇部队的运用方式做重要变更，将其优先攻击目标从日本商船和油轮改为日军军舰。这一招遭到了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查尔斯·A.洛克伍德将军的坚决反对。

在珍珠港，人们普遍觉得哈尔西和他的第3舰队在修改打赢太平洋战争的基本蓝图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8月中旬，尼米兹的副参谋长福里斯特·谢尔曼找到“米克”卡尼，两人一起向哈尔西发出了一份

直言不讳的电报。第3舰队的任务是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不要去考虑战略计划问题，”卡尼回忆道，“这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职责，而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还要接受金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导。这必定不是舰队战场指挥官的任务。我们必须十分十分明确，十分十分坚决地理解这一点。”^[45]然而，即便是在海上，哈尔西还是一直沉湎于索尔伯格上尉所说的“他对指手画脚的爱好”，常常用无线电向尼米兹提出鲁莽的提议——大部分当然都被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拒绝了。^[46]这一段时间里，尼米兹还多次委婉地批评他越权或者未能执行上级命令。^[47]公正地说，从第5舰队向第3舰队的切换，起步并不稳。

9月8日，“新泽西号”在加罗林群岛以北加入第38特混舰队。哈尔西和几位高级幕僚搭乘高架缆索来到米彻尔的旗舰“列克星敦号”。根据第3舰队战时日志记载，“新泽西号”的舰员们“看到四星上将从海上滑过去都很兴奋”。^[48]在“列克星敦号”上，他们开了很长时间的会，优化了空袭菲律宾的作战计划。

美军航母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空袭雅浦、帕劳和棉兰老岛，结果发现日军在这一地区的空中力量弱得令人意外。在许多目标上空，舰载机飞行员们遇到的抵抗十分轻微，甚至于无。他们在机场上炸开弹坑，摧毁建筑、物资堆栈和防御设施；他们对在港内能找到的任何敌人船舶和小艇肆意攻击。9月6日至8日，三支特混大队全军杀进帕劳群岛，一连发动三天空袭，飞行员们报告称“对佩里硫、安加尔、埃塞布斯和巴伯尔达奥布各岛上的地面设施、弹药和补给物资堆栈、无线电台、兵营、建筑和仓库造成了大量损毁”。^[49]

9月9日，舰队西移攻击棉兰老岛，第38特混舰队预计将会遇到更激烈的反击，但是日军的抵抗依然微弱而零星。攻击机群仅遇到了数架防空战斗机，并很快将其全部击落。舰载机飞行员们宣称在地面毁伤了大约60架日机。他们还达沃湾和萨兰加尼湾中的船舶和小艇进行了轰炸

和扫射，返航后宣称有大约40艘船只被击沉或击中起火。美军在这一系列空袭中只损失了12架飞机——8架被高炮击落，4架因事故损失。有一架F6F战斗机在低空飞越一艘内河驳船时损失。当时这架飞机用.50机枪的燃烧弹扫射，引爆了驳船上藏着的弹药，巨大的爆炸将飞机一同吞没。

航母上，在返航后与航空情报官进行的情况总结上，飞行员们抱怨说他们找不到足够有价值的目标。在空袭时和空袭后的航拍照片中，棉兰老岛上的许多机场看起来都被废弃了，地面设施不仅简陋，而且数量很少。第3舰队的战时日志将此归功于肯尼将军第5航空队的B-24轰炸机先前对这个岛屿的轰炸：“有迹象显示，第5航空队已经彻底摧毁了棉兰老的日军设施，对这一地区的航母空袭并不完全必要。”^[50]

现在，航母及其护航舰艇向东驶出了海平线，去和一队舰队油轮会合。各舰要通过过顶的输油管获取燃油，并且收取信件。哈尔西和米彻尔通过低频短距无线电进行了会商，他们一致认为再继续空袭棉兰老就是浪费时间。哈尔西司令部里的情报分析员大胆地推测日本航空兵可能已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9月9日发表的一份战略评估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日本舰队可能会向美国舰队发动自杀式的海上“万岁冲锋”。分析者推测，日本首脑甚至有可能主动寻求彻底毁灭其自己的舰队，他的逻辑是：“日方认为，比起在我们即将登陆其本土时被打败，还不如让舰队早点被打败，这样可以从旧帝国的废墟上救回更多东西。”^[51]这是个不同凡响的见解——日本海军高层中有些人已经认定战败不可避免，并开始尝试迫使东京政府尽早投降。这个设想固然不正确，但是敌人在菲律宾南部令人震惊的微弱抵抗实在过于奇怪而难以理解，这令哪怕是荒诞不经的设想也需要被认真考虑。

哈尔西叫停了对棉兰老的空袭，率领大部分舰队北上至菲律宾中部，在那里，他们将打击莱特、宿务、内格罗斯等岛上的日军目标。

（戴维森的第38.4特混大队留在东边数百英里外的帕劳水域，为即将到来的佩里硫、安加尔岛两栖登陆提供空中支援。）第3舰队的航空情报

分析员认真考虑了一个更大胆的招数——出动舰载机突袭马尼拉及日军在吕宋岛中部的巨大机场网络。哈尔西还想要摧毁马尼拉附近巨大的燃油储存库，他相信此举会给途经此地的日本军舰带去巨大的麻烦。[\[52\]](#)

彻夜高速北上之后，三支特混大队在9月12日拂晓时抵达莱特湾外海。此时海面平静，微风轻拂。晨光初露时，军舰甲板上的水兵们在西北方海平线上看到了萨马岛的青山。8块飞行甲板上放飞了超过3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它们向西飞去，在爬升过程中逐步结成巨大的多层次V字队形。飞越莱特岛上空时，机群仍在爬高，发动机巨大的声响惊醒了一名1942年从日本人手里逃脱后一直困在此地的美军士兵。“我激动得浑身打战，我三年都没这么乐过，”他后来写道，“耶！我猜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菲律宾村民和游击队员向攻击机群拼命欢呼：“人们重新拉出美国国旗，一边挥舞一边喊道：‘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这是他们此刻的心声，也是他们此生最渴望的事情。”[\[53\]](#)

“大黄蜂号”舰载机大队长哈尔·比尔第一批飞临宿务机场上空，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从高处往下看，数十架日本飞机停放在滑行道和停机坪旁。地面扬起了烟尘，能看到有人在飞机之间跑来跑去。看来日本人正匆匆赶往他们的战斗机。F6F“地狱猫”从机场上空低飞而过，向停放着的和正在滑行未及起飞的敌机扫射过去。驾驶着一架SB2C“地狱潜鸟”轰炸机的比尔压低机头进入俯冲，瞄准了跑道尽头。此时两架日军零战正并排准备起飞。比尔把瞄准点对准了两架日机中间，投下了所有炸弹，包括一枚1 000磅炸弹和两枚250磅炸弹：“炸弹就在那两架战斗机离开地面时落在了它们中间。长机歪到了右边，栽进树林炸成一团火球，另一架飞机则直接在跑道尽头爆炸。”[\[54\]](#)

“列克星敦号”上第16战斗机中队的一位新手F6F飞行员比尔·戴维斯那天上午在宿务岛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击落记录。他从一架零战上方俯冲而下，零战向左压坡度急转，他立刻将目标套进了瞄准镜，扣动了扳机。一个短点射足以将这架零战撕碎。“我发现有人在无线电里尖叫，”戴维斯回忆道，“我听了一阵，但它却停了。之后我意识到那是我

在叫。我在向零式机开火时，就下意识地使出最大肺活量叫了起来。这尖叫来自我的脑海深处，来自我大脑里最原始的那部分。”^[55]

在这天的第二次空袭中，戴维斯在宿务城附近一座岛屿上的燃油精炼厂上空低空飞行。他随意地朝着一片建筑群的中央开了火。他以为几发.50口径子弹没法给这片错综复杂的油管、高塔和管道带来多少伤害，结果爆炸把他的飞机掀了起来，他吓了一跳，本能地转弯拉起，盘旋着飞回高空。“我看到整个精炼厂都烧了起来。精炼厂变成巨大的火球时，爆炸也吞没了整个岛屿。”

回到“列克星敦号”后，戴维斯跟别人讲了他干的事情。一个同僚就拉下了脸。“那个精炼厂是德士古原油公司的，”他说，“我还指着这个厂能留到战后呢。我有德士古的股票。”^[56]

对于参战的美军飞行员来说，9月12日的空袭就是“宿务烧烤节”，当天美军出动了1200架次飞机，这是自从2个月前的“马里亚纳猎火鸡”以来最为一边倒的一场空中屠杀。

日军航空兵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奥宫正武已命令大约150架零式战斗机从吕宋出发飞往棉兰老，支援那里在前一个星期的空袭中被炸得支离破碎的航空兵基地。这些飞机此刻正在南下途中经停宿务，当大群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东方海平线上时，它们大部分都停在地面上。空袭开始时，奥宫恰好坐在一架运输机上来到宿务岛上空。飞行员压坡度急转弯躲避杀过来的“地狱猫”，这就让奥宫得以自上而下从“鸟类视角”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俯冲轰炸机凌空而下，战斗机尖啸着在机场上空飞来飞去，曳光弹从机翼机枪里射出来，打进了停放着的零战里。仅仅几分钟，宿务岛上便已一片混乱。美军飞行员的攻击格外准确，从燃烧的零战里腾起的浓烟和烈焰让我想到了火葬场……是我们的火葬场。”^[57]按奥宫的说法，他本想构建起战斗机的防线，以击退敌军对菲律宾的进攻，但这段时间里第3舰队的空袭沉重打击了这种努力。

即便是剔除掉飞行员上报战绩中的水分，第3舰队的航空情报官还

是给出了在空中击落75架、地面摧毁123架敌机的空袭战果统计。还有至少5艘船只被击沉，另7艘被击伤。遭到扫射后起火或沉没的舢板和小艇更是不计其数，至少有四五十条。机场的地面建筑要么被夷平，要么遭到破坏。航母及其护航舰摆开了阵势，准备迎击来自菲律宾日军机场的空中反击，但是出现在雷达屏幕上的敌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全都很快掉头离去，不敢前来挑战舰队上空盘旋的“地狱猫”防空战斗机。9月14日，哈尔西向尼米兹报告：“敌人毫无主动性的态度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空中没有遇到抵抗，遇到的高炮也很弱……没有舰船可以去击沉……这一区域的大门已然敞开。”[\[58\]](#)

有一架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是“大黄蜂号”上的托马斯·C.蒂勒少尉，他的“地狱猫”在莱特湾上空被击中，遭到重创。蒂勒成功在水面上迫降，并爬上了他的充气救生筏。当地菲律宾人划着一条带两侧支架的小船把他带到了岸上。这些人对他很不错，给他饭吃，给他地方住，还找到了当地亲美军的游击队，后者设法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海岸外的美军舰队。于是，“威奇塔号”巡洋舰上的一架水上飞机飞来接回了蒂勒，把他带回“大黄蜂号”，在那里，他向“乔克”克拉克将军做了报告。

莱特岛当地人向蒂勒讲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报。他们说莱特岛没有日军部队，除了一些荒地和长草的跑道外也没有航空兵基地。相邻的宿务岛上敌人守军只有大约1.5万人。美军的情报估算严重失准。如果能快速发起进攻的话，那么美军登陆莱特岛时所遇到的抵抗将会极其微弱甚至没有。于是，克拉克把蒂勒带来的情报呈报给了哈尔西和米彻尔。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哈尔西一直劝说尼米兹取消中间的作战行动，以加快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进攻。现在他想到了一个更大胆的提议。或许一旦进攻部队准备就绪，麦克阿瑟就可以越过棉兰老，直接进攻莱特岛。卡尼和第3舰队的其他幕僚也都同意。但是哈尔西仍然在犹豫，他坐在“新泽西号”舰桥的一个角落里反复斟酌。尼米兹拒绝了他此前的大部分提议，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份提议，不仅不是我的职责，

它还会推翻诸多成熟的计划，甚至还会惊动罗斯福先生和丘吉尔先生”。^[59]最后，他还是决定提上去。于是，一封急电被发给尼米兹，抄送给麦克阿瑟和金。哈尔西再次提出取消即将开始的雅浦岛和帕劳群岛登陆战的方案，因为这些岛屿“带给我们的歼敌机会无法值回时间的拖延和‘僵局’行动所耗费的精力”。用于这些行动的部队应当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立刻以轻微的代价，不需要任何过渡的行动”，夺取莱特岛。^[60]

收到此信，尼米兹暂停了对雅浦岛的登陆作战，他告诉金，如果麦克阿瑟也有此意的话，他愿意支持尽早在莱特岛登陆。但他同时也坚持主张美军部队必须拿下帕劳群岛南部诸岛。此时，开往佩里硫岛和安加爾岛的进攻舰队已经在航渡途中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决定让这些部队“按计划开进”。^[61]在当天晚些时候单独发给金的一份有线电报中，尼米兹写道，拥有这些岛屿“当然至关重要，而且也不可能像哈尔西130230号文件设想的那样快地重新拿出计划，把用于进攻和占领帕劳的部队用于他处”。^[62]不过——尼米兹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可能性——如果麦克阿瑟拒绝了加快莱特岛作战的方案，“那就可以在10月中旬使用雅浦岛进攻部队拿下硫黄岛……我正在制订这一方向的计划，一旦需要随时可用。这个思路或许能实现，或许不能实现，但现在将其呈报出来，以便你充分了解各种可能性”。^[63]

佩里硫之战格外血腥，但事后看来，这或许是不必要的。硫黄岛之战更为血腥，但如果能早些打，赶在日本人来得及向岛上派出援军并挖掘出地下防御工事网络之前进攻，或许就不会那样惨烈。如果尼米兹当时能同意像哈尔西提议的那样取消佩里硫的登陆战，并授权使用这批部队在10月向硫黄岛发动突袭，那么这两个决定会挽救数千美军的性命。

此时麦克阿瑟正搭乘着莫罗泰岛进攻舰队中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在海上航行。由于无线电静默要求，他无法立刻答复。但是能够加快进攻菲律宾的前景令他“欢欣鼓舞”，美军刚一拿下莫罗泰岛的滩头，他就

立刻飞回他设在荷兰迪亚的司令部，拟好了同意哈尔西提议的回答：“我已经准备好立刻启动执行‘国王二号’[莱特岛]，任务日期是10月20日。”[\[6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刻正随同罗斯福一起，与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在魁北克开会。9月15日晚，麦克阿瑟的电文被送到了这里，当时他们正和英国同行一起吃饭。告假后，四位参谋长离开餐厅，来到旁边的会议室商议此事。没人反对。既然哈尔西、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全都同意，他们觉得那也就没什么好考虑的了。收到麦克阿瑟的有线电报90分钟后，一份新的命令便已在发回太平洋的路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麦克阿瑟执行莱特岛作战，任务日期为10月20日.....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应当安排必要的协作.....要将你们的计划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65\]](#)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领导层已经找到了办法来防止自己不知不觉中陷入现有计划和作战的惯性之中。从理念上，他们随时准备好并愿意抛弃原有计划，采纳新计划，以迅速行动，把环境的变动利用起来。要实现这样的理念，就需要从指挥体系的顶层不断向下施压，因为大型组织总是有一种抵抗甚至阻挠突然转向的倾向。横越太平洋的战争是历史上最大、最复杂的多军种两栖作战。作战计划的重大调整需要对地理上分布遥远的各个部队做出一系列较低层级的调动。事后看来，能够而且常常能在最后一刻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委实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在一夜之间就决定越过棉兰老，直接在1944年10月攻打莱特，便是所有这些调整中最富戏剧性，最具深远影响的一次。“阴谋诡计部”为自己赢得了庆贺的权利，这种庆贺记载于9月14日的战时日志中：“第3舰队的建议被采纳，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加快了3个月。”[\[66\]](#)这也在次年一月的国情咨文中为罗斯福赢得了一个可以拿出来吹牛的资本，他对国会如此说道：“仅仅24小时之内，我们就达成了一项涉及两个战区的陆军和海军部队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加快了菲律宾的收复和最终的胜利——这个变化也拯救了那些原本会葬身于现已被遥遥甩在我方战线后方的岛屿上的生命。”[\[67\]](#)

但是尼米兹拒绝了哈尔西关于取消佩里硫岛登陆作战的急切请求。这是帕劳群岛南端一座常年烈日暴晒，满是红树林沼泽和石灰岩的荒芜岛屿。日军在此区域最重要的机场就建在这个岛上，不过机场上的大部分地面设施已经在美军登陆前的空中轰炸和舰炮炮击中被摧毁。对此，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解释是，用于攻打佩里硫的进攻部队要么已经出海，要么几乎已经子弹上膛，这看起来更像是个有些牵强的借口。尼米兹不是那种会在关乎军人生死的决策上受到军种或战区间竞争影响的人，但若完整了解这段历史，下面的事实便不能不提。用于攻占佩里硫的主力部队是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打出威名的传奇性的第1陆战师。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与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曾为了这个师的归属而爆发过激烈争论。若按照哈尔西的提议，这个师就要被交给麦克阿瑟。若没有佩里硫作战，那么尼米兹的战区在1945年之前便不再有重大的两栖登陆作战了，这样，他就必须把他大批精锐的两栖舰队、登陆舰艇和作战部队交给麦克阿瑟用于菲律宾战役。

尼米兹将军其实比太平洋上的其他任何主要指挥官都更富有敏捷的思路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曾经多次进行大胆的越岛机动并取得了胜利——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冬季的“燧发枪”行动，当时他顶着海军和地面部队指挥官的反对强行要求越过马绍尔群岛最东边的几个环礁。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支持他坚持拿下佩里硫的决定。即便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这种尼米兹最铁杆的拥趸，也对此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尼米兹直到临终前都坚持认为佩里硫登陆战是必须打的——就像斯普鲁恩斯从来不肯承认1943年11月攻打塔拉瓦是不必要的一样。然而无论是佩里硫还是塔拉瓦，时间和经验都将证明，越过它们也不会给美军在更大范围内的进攻进度带来损失。

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似乎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公理——只要美军指挥官们围绕是否越过某个岛屿进行思虑和争论，最后又决定把它打下来，那么他们的决定在事后看来都是悲剧性的错误。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错误，无论对历史学者还是对他们自己，因为那些葬身沙滩上的人永远无法复活，而没有人愿意听说这些年轻人竟然是为了一个错误而死。

[1] De Seversky,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American Mercury*, February 1942, Vol.54, pp.135—54.

[2] Mitscher to Captain Luis De Florez, quoted in Taylor,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pp.188—89.

[3] 1磅≈0.45千克。——编者注

[4] MacWhorter and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70.

[5] Commander James C.Shaw, USN, “Fast Carrier Operations, 1941—1945,” in the introduction to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7, Aleutians, Gilberts, and Marshalls, p.xxxii.

[6]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7] Arleigh Burke, oral history, p.5, RG—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4, NARA.

[8] “七联靴”是格林童话中的靴子，可以让穿上它的人“跑一步顶七步”。——译者注

[9]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95.

[10] Hugh Melrose account, in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196.

[11] J.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13, 1945, in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21.

[12] 有两位战争通讯员指出斯普鲁恩斯很像罗杰斯。“Our Unsung Admiral,” by Frank D.Morris,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p.48; Fletcher Pratt“, *Spruance: Picture of the Admiral*,”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1946, p.144.

[1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185.

[14] *Ibid.*, p.212.

[15] *Ibid.*, p.258.

[16]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17]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269.

[18]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838.

[19] “Our Unsung Admiral,” by Frank D.Morris,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p.17.

[20]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839.

[21] Moore to his wife on July 1, 1944, quoted in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47.

[22] Spruance to E.M.Eller, July 22, 1966,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MS Collection 12, Box 2,Folder 7.

[23]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29.

[2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2.

[25] Comments on E.B.Potter's book, Spruance Papers, NHHC Archives, Collection 707, Box 3, p.9.

[26] 比如，1944年9月的一次广播就提到了“哈尔西中将的第3舰队”“斯普鲁恩斯上将的第5舰队”“金凯德中将的第7舰队”。“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September 20,1944,” p.3, NARA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Digest: Japanese Radio Broadcasts, Box 22.

[27] Spruance to Potter, December 1, 1944, pp.2—3, Spruance Papers, NHHC Archives, Collection 707, Box 3.

[2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notes for chapters 1—4, p.453.

[29] Trumbull, “All Out with Halse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6, 1942, p.1.

[30] “Halsey Predicts Victory This Yea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43.

[31] 英语中的谚语，意指自取其辱。——译者注

[32] Halsey to Capt.Gene Markey, January 24, 1945, Halsey Papers, LCMD.

[33] “Interview with Admiral C.J.Moore,” by John T.Mason, November 28, 1966, p.4, Papers of Raymond Spruance, Series 188, Box 3, NHHC Archive.

[3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9.

[35]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238.

[36]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27.

[37] Ibid., pp.327—28.

[38] 小笠原群岛（婿岛列岛、父岛列岛、母岛列岛）和火山列岛（硫黄岛及其邻岛）在地理上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但美军指挥官经常把它们都称为小笠原群岛，本书有时也遵循这个约定俗成的用法。

[39]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2, 1944, in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30;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55, entry for September 3, 1944.

[40] CTG 38.4 to Com3rdFlt, CTF 38, September 3,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26.

[41]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24, 1944.

[42]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23.

[43]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31, 1944.

[44] Ibid., entries for June 18 & July 7, 1944; NARA, RG 38,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30.

[45]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3.

[46]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p.22—23.

- [47] Nimitz—Halsey letters, August—December 1944, in Halsey Papers/LCMD.
- [48]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11, 1944.
- [49] Ibid., September 8, 1944.
- [50] Ibid., September 9, 1944.
- [51] Ibid.
- [52] COM3RDFLT to CTF 38, September 9,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1.
- [53] St.John, *Leyte Calling*, p.168.
- [54]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32.
- [55]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226—27.
- [56] Ibid., p.228.
- [57]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in, *Zero!*, pp.242—43.
- [58] COM3RDFLT to CINCPAC, September 1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229—30.
- [59]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0.
- [60] COM3RDFLT to CINCPAC, CINCSWPA, COMINCH, Message 130300, September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61]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etc., September 13,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3.
- [62] CINCPAC to COMINCH, Sept 1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6.
- [63] Ibid.
- [64] Barbey, *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227; and MacArthur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September 15, 1944, RG—4, MacArthur correspondence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65]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Nimitz, MacArthur, Info Halsey, September 15,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57.
- [66] Third Fleet War Diary, September 14, 1944.
- [67] "Message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5, FDR Library.

第三章

“老种子”，也就是第1陆战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出的名——两年
前，他们登上、守住了这个岛屿，并让这座岛名扬四海。此刻他们正驻
扎在帕武武岛，位于瓜岛以西30英里处一个面积约50平方英里^[1]，散布
着恶臭丛林的岛屿。自从最近参加新不列颠岛的格洛斯特角登陆战之
后，他们就被送到这里休整和训练。

1944年9月时，这个师里大约有1/3是经历过瓜岛之战的老兵，他们
对1943年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度过的天堂般日子念念不忘，想念那里舒
适的气候和热情的女士们，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回去。其他
人，包括瓜岛和格洛斯特角两战之间加入的人和刚刚从本土送来的新
兵，听着老兵的故事，咒骂自己运气不好，因为他们没有被送到好地
方，而来到了这个被上帝遗弃的荒岛。

这些“老种子”从第一天踏上帕武武岛的木制小码头时，就骂骂咧咧
个不停。这里的生活环境近乎蛮荒。岛内的“主要道路”不过是一条泥泞
小道，通向一处被整齐排列的高大椰子树环绕的空地，这是一个被废弃
的英国椰子种植园的最后遗迹。这些人就被告知在此地扎营。在灌木丛
下面搜寻了一圈，他们发现自己的帐篷、吊床、毯子都堆在地上，被雨
淋湿，满是泥污。这里已经有两年半没人来收获果实了，地面上覆盖着
一层层掉下来腐烂的椰子和棕榈叶。清理营地就是个见鬼的重体力活
儿。堆积如山的垃圾散发着恶臭，而且随着垃圾被翻开，这股恶臭愈加
浓烈。施工的时候，腐烂的椰子会炸裂开来，臭水溅人一身。开挖地面
时，人们才发现地面下有许多大老鼠的洞穴。为了把这些讨厌的小动物
赶走，陆战队员们动用了火焰喷射器。带着火苗的老鼠顿时到处乱窜，

空气中顷刻充满了老鼠皮毛烧焦的酸臭和腐败椰子的腥臭。

他们急着想开始训练，但在此之前，陆战队员们知道自己先要花上几个星期在闷热潮湿的天气里做些建筑活儿。他们要挖出排水沟和厕所，建造穿过红树林沼泽的木板人行道，拿着大砍刀砍伐灌木，以拓宽旧道路。许多时候地面过于松软潮湿，无法承载卡车的重量，于是他们用手推车运来碾碎的珊瑚礁，铺到路基上。这里每天下午都会下一场短暂的热带暴雨，就像闹钟那样准时。既然岛上也没有洗澡设施，那陆战队员们便指望这样的暴雨来打肥皂洗个澡，洗去他们的疲劳了。不过他们得快，要在雨停之前把肥皂沫冲干净。

没有合适的食堂，他们就吃放在斯特诺加热罐里烧热的C型口粮。他们住在六人一间的金字塔形帐篷里，帐篷里放上用空弹药箱和汽油做成的简易火把照明。每天晚上，大批陆地蟹都会爬进帐篷和人们一起睡觉，陆战队员们很快便学会了每天早上穿靴子之前先把这些蓝黑色的小甲壳类动物晃出来。一个列兵回忆道，每隔几天“我们对这些脏家伙的忍受力就到了极限，我们会把它们从箱子底下、水兵袋和吊床里赶出来，用棍子、刺刀、铲子什么的把它们弄死。之后把它们铲到一起埋掉，不然湿热的空气中立刻就会充满让人受不了的臭味”。[\[2\]](#)

虽然时间紧张，地理条件不利，装备不足，他们还是在帕武武岛竭尽所能地进行训练。他们每天早晨起来做操，环岛跑步3英里。清理出一块步枪射程的射击场后，他们开始练习精确射击并提高野战武器的使用水平，包括勃朗宁自动步枪（BAR）、卡宾枪、汤姆森冲锋枪、“巴祖卡”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以及新装备的60mm便携式迫击炮。岛屿很小，布满了浓密的低矮灌木，基本找不到运动空间，而连队级别的野战训练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岛上有1.5万名陆战队员，超过100个连；纵队行进的部队常常撞到一起，这时候一支纵队只好让到一边，让另一个纵队过去。起初，这个师基本没有登陆艇，更没有履带式登陆车（LVT）。于是他们紧急向周围岛屿求援，借用任何类型的登陆工具，包括陆军的轮式两栖卡车（DUKW）和普通的希金斯登陆艇

（LCVP）。之后小规模的两栖训练便开始了。部队以连为单位，在帕武武岛的一处滩头进行实弹登陆演习。步枪班首先登陆，机枪手、火箭筒手和迫击炮班紧随其后。士官们吼叫着要士兵们赶紧上岸，到椰子林里找掩护：“离开这该死的海滩，越快越好，然后向内陆冲。鬼子会用手里的任何东西向海滩开火，所以你们往内陆跑得越快，就越能活下来。”^[3]

8月28日，第1陆战师乘坐登陆艇来到帕武武旁的锚地，登上了靠泊在那里的运输船和坦克登陆舰。在向西穿越南太平洋的两个星期航程里，陆战队员们写信、打牌、阅读书刊，或者重新打包他们的武器，好打发时间。他们把步枪拆解开，涂上润滑油，重新组装起来；磨快他们的卡巴牌军刀；在“巴祖卡”和火焰喷射器上涂上迷彩。“我喜欢倚着栏杆，看着海豚在船的尾流里嬉戏，看着飞鱼在浪尖上滑翔，”第5陆战团3营K连的一位迫击炮手R.V.伯尔金回忆道，“我们全程都在走‘之’字形航线，每隔15分钟左右就会改变一次航向。”^[4]战士们居住的下甲板格外闷热，下有散发着热气的船只引擎，上有赤道烈日的炙烤，但是海军的船员们还是一直在控制到甲板上透风的陆战队员的数量。

和往常一样，低阶官兵们要到出海踏上航程之后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听说佩里硫是目的地后，他们耸了耸肩。没人听说过这个地方，不过也无所谓——他们打仗打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看起来差不多，分不清谁是谁的热带岛屿上作战，一个接着一个。每艘船都得到了一个泡沫塑料制作的岛屿的比例模型，军官们拿着教鞭向各排介绍了岛上的地形特征和地标。佩里硫平坦的南半部是机场，两条跑道和一条滑行道组成了一个“4”字形，旁边建有宽大的柏油停机坪。登陆滩头在其西南海岸，分为“白一”滩和“白二”滩，还有“橙一”“橙二”“橙三”滩。岛屿北部主要是覆盖着稀疏灌木的石灰岩山。第1陆战师将要在D日建立滩头阵地，D+1日拿下机场并将岛屿一分为二，在D+2和D+3日席卷北部山区。计划就是这样的。

第1陆战师的师长是威廉·H.拉佩图斯少将，瓜岛战役时他是副师长

（师长是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率领一部分部队打下了“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北面的图拉吉岛。拉佩图斯确信佩里硫之战将会是一场血腥却短暂的战斗，就像之前在中太平洋上登陆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慕尔一样。他预计登陆前的大规模轰炸和炮击将会消灭众多日本守军，摧毁他们的工事，甚至迫使幸存者放弃抵抗。如果他没猜错的话，敌人步兵将会发动自杀式的“万岁冲锋”，陆战队员们就可以用步枪和机枪火力将他们放倒。开往帕劳群岛的途中，拉佩图斯豪情万丈，他告诉下级，希望有人能把守岛日军指挥官的武士刀带来给他。

美国陆军第81步兵师（“野猫师”）也在开往佩里硫，他们将停留在海岸外的运输船上担任预备队。全盘指挥“僵局”行动的是第3两栖军军长罗伊·S.盖格少将，一个月前他刚从霍兰·史密斯手中接过这一职务。盖格将决定是否需要将增援部队送上佩里硫，如果不需要，这些部队就会被投向西南方数英里外较小一些的安加尔岛。拉佩图斯不希望陆军出现在佩里硫，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他告诉乘坐在他指挥舰上的战争通讯员：“这将是一次短期战斗，一次会有些艰难的‘快动作’，持续4天，最多5天。”^[5]

9月14日，也就是D—1日晚上，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早早上床了。但大部分人都没怎么睡。在这种拥挤闷热的地方，睡个好觉从来都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何况许多人还过度紧张，肾上腺素过度分泌，连眼睛都闭不上。凌晨3点，士官们穿过住舱，把陆战队员们从吊床上摇醒。大家起床开始D日的例行洗漱——刮胡子、洗脸，最重要的是蹲个厕所。官兵们排着长队洗脸或洗头，水壶里装满水，带上三天的野战口粮，穿上了战斗服——这是一款绿色的粗布制服，胸袋外缝有黑色的陆战队标识。船员们送来了传统的“死刑犯早餐”，牛排和鸡蛋，但是许多陆战队员没有食欲，一口也没吃。他们把私人物品塞进帆布水手袋子里，打成U形包袱，交了上去。机枪对海面进行了试射。一罐罐黑色和绿色的皮肤迷彩色被发了下来，人们把它们抹在自己的脸上和手上。

在破晓前的夜色中，他们来到了甲板上，听着舰炮射击时的轰鸣，看着北方海平线上闪起的火光。炮弹带着沉重的啸叫声从海面上掠过，飞向远方，但远方的闪光并不总能和这些声音节奏一致。随着船只开向岛屿，爆炸愈加明亮，声音越来越响，爆炸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名水兵还联想起了“落基山脉的夏日暴雨”。^[6]随着东方曙光初露，晴朗的蓝天渐渐显现了出来，目力所及之处万里无云——但是佩里硫岛却已被浓烟烈火笼罩，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紫色轮廓，其中一端稍稍隆起。在浓密的烟雾中间和上方是几乎持续不断的橙色爆炸和带着黄色烟雾的粉红色闪光。现在起，每个人都能看见岛上被炸碎的椰子树和岛屿中部高地上象牙色的尖削山岭。“波特兰号”巡洋舰上一位炮术军官用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了那座石灰岩山岭，他觉得它如同一扇开了一条缝的钢门，每一次炮击，就像是门被砰的一声关上。他让舰上的8英寸舰炮拿这座“钢门”练练手，向它打了几发炮弹，却无法摧毁目标。他说：“你就是把整个匹兹堡的钢铁全部砸上去，也打不掉它。”^[7]

和其他两栖战部队先前多次经历过的一样，陆战队员们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即便距离战列舰和巡洋舰尚有半英里之遥，人们彼此说话都得大声吼，否则声音就会被巨炮雷鸣般的炮声所掩盖。第1陆战师此前进行过两次两栖登陆战——瓜岛和新不列颠岛——两次登陆时都没有遇到抵抗。这次会是第三次吗？他们已经听了足够多关于塔拉瓦、塞班和关岛登陆战的事情，知道表面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佩里硫岛上的敌人怎样才能在如此凶猛的炮击下幸存。在登陆前的几个小时里，海军舰炮向岛上发射了1 400吨弹药。这幅毁天灭地的景象自然令战士们情绪激昂。有人说：“你根本想象不出还有东西能活下来，所以我们开始感觉良好了。”^[8]另一个人想知道“我们到那里时，岛还在不在”。^[9]

在一艘运载着第1陆战团部队的坦克登陆舰上，扩音器里传来命令声：“现在所有陆战队员前往下船点！”^[10]人们立刻背上背包，摸摸看武器是不是宽松地挎在正确的地方。他们排成一列走下楼梯，来到坦克

甲板上，这是一处灯光刺眼的封闭空间，挤满了两栖车。两栖车的发动机启动后，发出刺耳的轰鸣声，蓝色的废气立刻在舱内喷涌出来，令人窒息。陆战队员们爬上指定的两栖车，在座位上坐好。他们被废气熏得睁不开眼，但呼吸却是躲不掉的，有人开始恶心想吐。“豆大的汗珠从我们脸上流下，我们的夹克也都湿透了，紧贴在身上，”第1陆战团3营K连连长乔治·P.亨特上尉回忆道，“虽然大风扇在我们头上转，废气还是向我们涌来。我的手心开始发热出汗。”^[11]亨特甚至怀疑他的人会不会还没见到敌人就被毒死。但是接下来，登陆舰蚌壳式的艏门打开了，钢质跳板伸出去，放下来，第一排两栖车猛地前倾，开动了起来。它们开上跳板，开到海中，乘客们终于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坦克登陆舰排成一长排，艏门打开，跳板像长长的钢舌头一样伸入海中。挤满了人的两栖车随着波浪起伏，等候着向海滩进发的信号。海浪从车辆侧壁上方涌进来，把人们浇透。很快，数百辆两栖车开始在出发线后方绕圈子。没有风，空气中蓝色的废气越来越浓。海军的巡逻艇在登陆车艇中间忙碌穿梭，艇员们忙着设置浮标，通过大喇叭喊出指示。战列舰们则继续向岛屿开火，炮口下的海水被吹起一道道大浪。在一轮接一轮的齐射声中，车艇上的陆战队员们仍然要吼着说话才能听得见。早晨8时30分，按时间计划，第一轮出击的命令下达了。

两栖车的驾驶员加足油门，车身前冲，骑到了浪尖上，发动机喷出扇形水雾。其他车上的陆战队员们挥舞着拳头大声鼓励这些第一批离开出发线的战友，不过发动机和舰炮的轰鸣遮蔽了他们的声音。舰炮射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火箭弹从人们头上呼啸而过。重炮射击的声音如同击打着天堂之门，而火箭弹从头上掠过时那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开过。驾驶员换挡时，变速箱开始剧烈地震动，连车体都摇晃了起来。这些两栖车逐渐开到了7节的最高航速，开始全速前进。人们从车体前部看过去，小小的佩里硫岛完全被浓烟和烟尘所吞没——他们常会瞥见F6F“地狱猫”战斗机在海滩上空低空盘旋，喷射出橙色的曳光弹，或者舰载俯冲轰炸机从头顶上方直冲而下，把炸弹扔在看不见的目标上。

当两栖车靠近礁盘，人们发现日军开始反击了。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落在两栖车周围，掀起令人终生难忘的巨大水柱，这些水柱截住了上午的阳光，瞬间把它变成了七色彩虹。敌人看不见这些两栖车，他们只能从烟幕后面盲射。被击中的车辆并不多，但是这些炮火却证明敌人还活着，战斗力几乎完好无损。海滩此时仍然躲在浓烟烈火之后。“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从海底爆发，”20岁的二等兵尤金·B.斯莱奇回忆道，“我们不是在开向岛屿，而是被卷入了一个燃烧的深渊。”^[12]

接近礁盘时，履带式登陆车队慢了下来。它们颠簸着，履带撞上珊瑚礁时车头会猛地扬起，车身摇晃着从珊瑚礁顶上缓缓碾过。车里的陆战队员们被抛了起来。他们没法继续坐着了，不然尾椎骨就会被椅子撞断，于是他们只好蹲下来，互相搀扶保持平衡：“我们抓牢，摇晃，嘴里咒骂着。”^[13]许多履带式登陆车上都装有75mm轻型榴弹炮，它们开始向海滩还击，当然也一样是盲射。进入礁盘后，这里海水很浅，显出一片绿色，水底的沙滩从车体舷外清晰可见。眼前的一片迷乱之中渐渐现出了被掀翻、炸碎的椰子树的影子。此时，银盘般的太阳高挂穹苍，无情炙烤着大地。

当第一批两栖车爬上橙滩海岸时，舰炮炮击给地面带来的震动开始向内陆推移。两栖车履带压上了沙滩，发动机开始加速，车辆向海滩开了一段后停下来。车辆的尾门“砰”的一声放下，士官们吼道：“我们走！”于是陆战队员们纷纷从车体后部涌出，然后掉头向海滩前方冲去。机枪和步枪火力不停地从看不见的树林深处射来，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从人们耳边“嗖嗖”地飞过。敌人的重武器也在开火——他们也有直瞄火炮和野战炮。不少第一批登陆的陆战队员在开阔的海滩上战死。其他人纷纷冲进椰子树林寻找最近的掩护——躲在树后，躲进弹坑，或者就地卧倒。高悬在这些人头顶上的是已被熏黑和炸得支离破碎的椰子树，他们眼睛和嘴里进了沙子，鼻子里满是硝烟的气味。这块地方已经被弹坑、倒下的椰子树干、四处散落的大块泥土搞得乱七八糟。凌乱不堪的地形地貌不仅掩护了向前推进的陆战队员，也掩护了日军狙

击手。

军官和士官们吼叫着要战士们前进，他们必须离开滩头，为后续批次的两栖车和登陆艇让出位置。于是他们剪开铁丝网障碍，在隐蔽处之间跳跃前进。许多人被敌人狙击手打倒。在椰子林的深处有日军的机枪阵地、木头射击掩体和长长的反坦克壕沟。面对这些，陆战队员们只能全力冲刺，发动正面突击，“就像一群印第安人那样吼叫”——美国版的“万岁冲锋”。[\[14\]](#)

佩里硫岛, 1944年9月—10月



亨特的连在白滩北端登陆，那里有一座岩石海角伸入海中大约200码^[15]。日军在海角南面的岩壁上建造了坚固的碉堡和巧妙隐蔽的暗堡。一门布置在无法通行的射击阵地上的47mm反坦克炮一连击毁了几辆还没有来得及抵达海滩的两栖车。K连的陆战队员们发现自己正身处冰雹般的直射火力之下，没有任何藏身之处可找。他们只能拼命挖掘散

兵坑，但这里的地面是坚硬的珊瑚礁。从半晌午开始，天气就越来越热，现在已经让人受不了了，所有人都是汗流浹背。日军迫击炮渐渐找准了射程，陆战队的伤员数量便激增起来。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海滩上，看上去根本来不及运走。呼叫医疗兵的喊声此起彼伏。但担架手们自己也被日军的狙击火力放倒。亨特上尉记录道：“伤员们打着绷带、血肉模糊、残缺不全，恐怖极了，人们只能咬紧牙关，强忍着伤痛，痛苦地呻吟和挣扎着。有人要么四肢伸开，要么身体扭曲，要么绝望地等候死亡。还有些人的肠子都流了出来，甚至被整个开膛剖腹。”

烟雾手榴弹令他们在致命火力之下稍得喘息。亨特的陆战队员们把几枚烟雾手榴弹投掷到岩壁下方，遮住了日本炮手的视线，令其只能隔着白烟盲目开火。随后他们派出一个班绕到后方封锁碉堡的后门。这时一名手持肩射火箭筒的陆战队员打出了幸运的一击：火箭弹贴着一门47mm反坦克炮的炮口钻进了碉堡的射击口。黑烟立刻从石壁上的射孔里涌了出来。岩壁里传来了日本人身上起火时的惨叫声，三名敌兵从后门冲了出来，守在这里的那个班立刻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到上午10点，美军三个步兵团已经在2500码的一长串海滩上了岸。《生活》杂志的一名画家兼战争通讯员汤姆·利跟随第二批登陆部队登上了橙滩。此时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仍然和一个小时前第一轮登陆时一样密集。海滩和浅水里满是燃烧的或是动弹不得的两栖车，陆战队员们脸朝下卧倒在海滩上，“就像老鼠一样蜷缩着”。利躲进了一个弹坑，迫击炮弹在附近沙滩上爆炸时他就会把头低下来。回望大海方向，他看见陆战队员们踏浪前行，步枪举在头上，身边不断溅起白色的水花。他看见几个人被打死：“有一个人看起来被炸得粉身碎骨，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和一条腿飞到了空中，太可怕了。”^[16]

利没有把他的画板带到岛上，但是眼前这一幕定格在了他的脑海里，终生难以磨灭。后来他为《生活》杂志创作了几幅素描或油画，包括一幅题为《代价》的震撼人心的画作，画面描绘了一位遭受致命伤的陆战队员临死前在海滩上蹒跚前行的场景。他的左半边脸已经血肉模

糊，“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发疯似的向前走时，一只胳膊仅存的碎肉如同棍子一般垂了下来。还算完好的另半边脸上露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绝望无助的忍受神情。他倒在我身后，在白色的沙滩上染出了一片红色”。[\[17\]](#)发表这幅画作几个月后，抱怨声和退订单洪水般涌向《生活》杂志。有人指责利在画作中夸大事实，对此他愤怒地反驳说，他画的正是自己看到的真实场面，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在海滩旁的一片椰子林里，利看到了一个被指定为临时野战医院的大弹坑。医疗兵们每四人抬着一副担架不断来到这里，把担架在地上排成一排。血浆瓶被挂在炸断的树桩上。医疗兵们忙着给伤员注射吗啡，打止血带。一位牧师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圣经。“看得出，他被伤员们的痛苦和死亡深深地触动了，”利写道，“他看起来非常孤独，只有上帝与他同在，他俯下身来陪伴这些远离家乡、筋疲力尽的人。医疗兵们在死者灰暗的脸庞上盖上披风、衬衫、布块或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把他们抬到海滩上的一处防水棚下排成一排，等候掩埋。”[\[18\]](#)

现在，美军在岛屿西南侧海岸上夺下了一块2英里长，平均纵深约500码的滩头阵地。排雷组挖出了那些没有爆炸的日本炮弹。人们带着成卷的电话线，随意铺设在海滩旁被炸弹翻开的地面和烧焦的灌木丛上。到处散布着战斗留下的痕迹，一堆堆被丢弃的背包、头盔、步枪、箱子、衣服和橡胶救生圈。日本人挖掘的一条长长的反坦克壕沟现在成了第1陆战师的指挥所。第5陆战团及其各营的指挥所也设在附近。D日一整天，这些区域都持续遭到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一个营指挥所（5团3营）被炮弹直接命中，营长和几名参谋受伤。

师长仍然在努力勾勒岛上战事的准确图景。无线电员联系不上最前方的部队，无休止的炮击毁坏了野战电话系统，传令兵们不得不在暴露地形上跑来跑去，许多人或死或伤。拉佩图斯将军投入了他的预备队营，然后告诉幕僚们，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当战报传来，他的幕僚们统计出D日当天全师的伤亡是1 111人，至少209人战死。[\[19\]](#)

夜幕降临后，海岸外的军舰打出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和信号弹，保持对交战区域的不间断照明。在鬼魅般橙色和黄色光芒的照耀下，大地笼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宛如异境。黑影摇曳舞动，被炸倒的树木留下的歪歪扭扭的树桩戳在地面上。这一切令外海军舰上的一名水兵联想起了“月球表面”或者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战场上的无人地带”。^[20]日本人一刻也没有消停，一会儿用火炮和迫击炮来一阵炮击，一会儿又派出渗透人员或小部队发动进攻，持续不断，直到天亮。K连坚守着滩头北翼的岩石海角，手指放在扳机上，仔细听着一切可能预兆着新一轮进攻的声响：“吼叫声、沙沙声、含糊不清的人语，抑或是脚踏在石头上的声音。”^[21]一旦发现这样的响声，陆战队员们即便看不见也会投几枚手榴弹过去。佩里硫岛上的日军士兵们没有草率发动“万岁冲锋”涌上来，而是利用隐蔽处向前跃进。他们打得很精明，如果攻守角色对调，陆战队也会采取和他们差不多的进攻战术。“日本鬼子们在岩石中间时隐时现，”亨特回忆道，“我能看见他们扁平的棕色头盔。有时候我们很难把他们和自己人区分开来，他们行动太快了。”^[22]看不见的狙击手从高大椰子树的顶上射击，打中了那些低着头，自以为已经脱离敌人火力射界的陆战队员。一整晚，敌人从三个方向不停地袭来，K连的官兵们一刻也不得休息或喘息。“数不尽的爆炸、呼啸的子弹、在头顶上呼呼响或者砸在石头上的弹片、沙哑的吼叫声，以及尖声大叫的日本人，使战斗成了惨烈的混战。”^[23]

16日破晓前一个小时，地面摸上去仍然在发热，温度大约为27摄氏度。机场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当太阳升起后，雾气很快消散，热浪滚滚而起，地面的景物都被扭曲。这天，阴凉处的气温达到了40摄氏度，但对于佩里硫岛上的绝大部分陆战队员来说，就连这种阴凉都是难以企及的奢侈。空气湿热而无风。汗水从人们脸上流下来，在迷彩涂料上留下一道道沟痕。灰色的珊瑚沙粘在汗水和油彩涂料上，令他们看上去仿佛戴了一层象牙色的面纱。

大部分陆战队员登陆时都会带上两壶饮用水。到第二天时，水壶基

本都空了，就算没空也所剩无几。一个排在机场边缘的一个大坑底部找到了一汪浑浊得像牛奶一样的水，里面全是沙子，但人们太渴了，顾不得这么多，先喝再说。7点刚过，几辆卡车把装在5加仑^[24]水桶里的水送到了前线，人们纷纷把手中的搪瓷杯伸进去舀水喝。这些水颜色有些发红，闻起来有一股燃油味，水面上还漂着蓝莹莹的油花。R.V.伯尔金回忆道：“人们喝一口就把它吐了出来，有些人把它喝了下去，几分钟后就会呕吐。有些人甚至一上午都忍着不喝水。”^[25]他们后来才知道，储备的淡水是被装在55加仑油桶里运上运输船的，有些油桶没有清洗干净。

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穿越机场，到达佩里硫岛的东部海岸。当他们准备前进时，机场正北面一座陡峭的岩壁出现在了他们眼前，有人将这座令人畏惧的石山称为“血鼻岭”。自从前一天登陆以来，日军就一直从这座山上向美军倾泻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有人说自己能“感觉到”高大山顶上那些看不见的敌兵的眼神，这令他们感到无助。

10点刚过几分钟，出击信号来了。陆战队员们纷纷站起身，向机场中央冲去。他们就像训练时要求的那样分散开来，彼此保持8到10英尺间隔。他们全都低着头，跑得很快。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但他们不会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知道静止的目标更容易被打中。爆炸把大块的泥土掀起来抛向空中。冲刺时，弹片和炸飞起来的珊瑚碎块如雨点般落在人们身上。硝烟和灰尘钻进了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里。伯尔金下士回忆道：“所有的东西都向我们打来——迫击炮、大炮、机枪和步枪。你能听见身边满是弹片和子弹的‘嗖嗖’声和‘啾啾’声。我们就像早餐桌上的虫子那样无遮无拦，我不停地喊：‘快跑！别停下！’”^[26]

斯莱奇看到自己周围不断有人倒下。烟雾遮住了他的一部分视野，这令他深感庆幸。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在摇晃，耳边满是嗡嗡声。巨大的爆炸声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多：

我感觉自己飘浮在某个虚幻的风暴中央。日本人的子弹打在地上噼啪作响，曳光弹从我腰部两侧飞过。这些致命的轻武器火力在爆炸的炮弹面前就显得不起眼了。爆炸和横飞的弹片撕裂了空气。成块的珊瑚礁被炸飞，砸在我的脸上和手上，钢铁弹片砸在坚硬的石头上，如同冰雹落在城市的街道上一般。炮弹四处爆炸，就像巨大的鞭炮一样……我们冲得越远，情况越糟糕。巨大的声响和嗡嗡声就如同铁钳一般钳住了我的耳朵。我咬紧牙关，振作起来，做好了随时被打倒的准备。看起来我们没有人能冲过去。[27]

机场就是个被炸平了的垃圾堆放场，四处堆放着一百多架被熏黑的日军飞机的残骸。所有建筑都被炸毁，但是成堆的废墟和混凝土墙的残垣断壁仍然掩护了敌人。无论计划是什么样的，陆战队员们在接近这些位置时都不得不停下来寻找掩护。一停下来，他们便体会到了炎热天气的可怕。他们的战斗服完全被汗水浸透，靴子里也满是汗水。有几个人还中了暑。他们的脸庞干枯而发红，如同身处严寒一样浑身颤抖着。斯莱奇躺下来，一只一只地抬起脚：“汗水实际上是从每一只鞋子里泼出来的。”[28]

5个小时的机场血战之后，第5陆战团的第一梯队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了东部海岸。他们背靠海滩，在红树林沼泽中构建了一个半圆形阵地，准备迎接接下来一整夜躲不掉的炮击、步兵进攻和渗透。

到9月16日，也就是D+1日下午，橙滩已然是一副海运物资堆放场的模样。滩头管理人员已经接管了这里，大批物资、装备、车辆通过浮桥源源不断来到岸上。[29]指示上岸物资堆放地点的指示牌也被钉在了地上。橙滩的不少地方挤满了板条箱和车辆，只有走路才进得去。战死的陆战队员被排列在海滩上，眼下掩埋组只能摘下他们的“狗牌”（身份识别牌），把他们埋葬在长长的壕沟中。数百具日本人的尸体大部分都暴尸荒野。他们的口袋和其他财物都被搜了个遍，所有值钱或者有趣的纪念品都被拿走了。一位陆战队员回忆道：“裸露的肚子上流着红色

的血。那些还在身上的胳膊和腿奇怪地扭曲着……他们的眼球干瘪，陷进了眼眶里。”^[30]他们的皮肤开始变成褐色，苍蝇在身上飞来飞去。死者发出的恶臭很快变得比酷热更加可怕，陆战队员们急忙要来了推土机，好尽快掩埋死者。

拉佩图斯将军原本想在D日就上岸，但是他在训练事故中受了伤，脚上打着绷带，要拄拐杖才能走路。于是幕僚们劝他多等一天。D+1日，他来到岸上，接管了位于橙滩的师指挥所。他的情绪很好。第5陆战团已经拿下了机场，这是佩里硫唯一真正的战略资产，而且他们在机场中部的防线也已连成一体。拉佩图斯确信最艰难的战斗已经过去了，便电告盖格（他正坐镇外海的指挥舰上）自己不需要预备队了。于是盖格将军放出第81步兵师前往附近的安加尔岛登陆。拉佩图斯的建议和盖格的决定事后都将遭到严格的审查和批评。

战斗第三天，觉得胜利在望的拉佩图斯命令第1陆战团拿下机场北面的高地，也就是被他们称为“血鼻岭”的石灰岩山。在佩里硫的旧地图上，这里被标记为“乌穆尔布罗格山”。进攻路线只有一条狭窄的石质山谷，他们称之为“马蹄盆地”。从机场出发前往马蹄盆地需要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小径两旁满是混凝土炮楼和碉堡的废墟。陆战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推进，掩护自己的侧翼，进攻日军机枪手和狙击手藏身的碉堡残骸。这是一件缓慢而血腥的工作。高温和潮湿一刻也没放过这些人，他们常常要停下来等待运水车把5加仑的水罐送到前线来。障碍物和废墟被清理到一旁，好让坦克开上来。利看到了这个场景，他将这条路描述为“一条堆满了日本手推车、砸碎的弹药箱、生锈的铁丝和散落的装备的小道。各种伪装的陷阱令我们无法触碰其中的任何物件……日本鬼子的尸体就躺在他们被打死的地方，在两个碉堡里，我看到有些尸体只剩下了红色的碎肉，散落在被血染红的混凝土碎块和碎裂的原本中”。^[31]

到这一天日终时，第1陆战团的前出巡逻队已经抵达了马蹄盆地的底部。他们并不喜欢这里的样子。布满岩石的谷底，每一寸地方都被能

够相互支援的日军火力点或射击孔所覆盖。有些高居悬崖之上的火力点至少还看得见，但许多其他火力点则藏身于低矮的灌木丛之中。这样一座堡垒该怎样打？若要攀爬石壁前往某一个日军火力点，陆战队员们就会暴露于另一个火力点的致命打击之下。马蹄盆地只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一整条嵌在极其精巧的碉堡体系中如迷宫般难走的小道。穿过马蹄盆地，是一个接一个尖削的山岭。这些崎岖的地形先前长满密林，从航空侦察照片上看似乎是一些平缓的圆形山包。然而轰炸和炮击却把这里险恶的地形地貌暴露了出来：被硝烟熏得斑驳不堪的山岭、丘陵、山尖、山谷、急流峡谷和陷坑。陆战队在打开地图制订作战计划时，给每一处地形都命了名。马蹄盆地被东边的“沃尔特岭”和西边的“五姐妹山”，以及北面的“五兄弟山”所俯瞰。与马蹄盆地平行的还有另一个山谷，被称为“野猫盆地”，山谷的尽头是一处被命名为“中国长城”的陡峭悬崖——翻过这个悬崖，是一处布满巨石的通道，称为死亡谷。整个战场只有大约1平方英里——但是对于在其中战斗的人们而言，这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仿佛有一整个行星那么大，是一个无穷无尽、不可征服的喀斯特迷宫。

岛上的日本守军兵力达1.1万人，抽调自关东军的第十四师团。其指挥官是中川州男大佐，他是个满身勋章的“明星”指挥官，指挥这个师团的第二联队。当年早些时候马绍尔群岛突然陷落之后，这支部队便乘船从中国东北来到此地。东京方面并不指望佩里硫守军能够生还，也就没有制订撤离幸存者的计划。他们希望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在这座小岛上让敌人付出尽可能沉重的代价，然后战至最后一人。

5月上岛之后，这些日军便开始不知疲倦地升级和扩大佩里硫的地下防御工事。中川大佐是“蜂巢”防御战术的领军人物，这一战术的要旨是在地下挖掘碉堡和隧道。日军预见到敌人将会获得绝对海空优势，并把所有地表阵地化为废墟，这位大佐便把其大部分部队留在山峦深处的洞穴里作为预备队。他的意图是，让美国人送上门来，在岛屿内部的高

地上一决高下。这一“纵深防御”理念将使日军得以坚守更长时间，让进攻一方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佩里硫比太平洋战争中的任何其他战场都更适合上述战术。岛屿的中央是一片山岭，其下是千百万年地质变化形成的巨大“蜂巢”状洞穴群。象牙色的岩石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泥土，刚好够生长出足以遮蔽洞穴入口和射击孔的稀疏植被——但是石质地面却无法挖掘，这意味着进攻方将很难在地上挖出散兵坑隐蔽自己。得此天赐，日本人又继续扩大和改良。到1944年9月美军登陆前夕，中川的大部分守军都已栖身于连接着超过500个天然和人工洞穴的地下迷宫之中。有些洞穴入口处装有和斜坡齐平的钢门，藏在伪装网或植被之下难以发现。有些洞穴很小，人们需要四肢触地爬着才能进来，而最大的地下洞穴却足以一次容纳一千人。坑道体系内装有木质楼梯、电灯、电话线、仓库、通风井、隔层楼板、食堂和烹饪设备、医院、指挥所和嵌入式碉堡。淡水存储在水箱里，足以对付长期围攻。坑道网络长达数英里，中川可以把他的增援部队从山体的一处调动到另一处，即便距离超过半英里，也不会有一寸路途暴露在敌人火力面前。在岩石深处，气温凉爽舒适，守军因而得以免受外面火炉般的炙烤之苦。

守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中川拥有75mm火炮、81mm迫击炮、141mm重型迫击炮、.50口径机枪、高平两用炮、火箭发射器和藏在洞穴深处的各种充足弹药。许多时候，洞穴入口本身就是居高临下的射击阵地。重型火炮装在轨道上，可以通过地下通道在阵地间转移。弹药可以通过一台精巧的升降机和轨道车从弹药库里运出来。在大型洞穴的入口处，日军工兵在隧道侧壁炸开了很深的防炮洞，当洞口遭到敌人炮击时，部队便可隐蔽在此。日军还布置了隐蔽的通道和射击阵地，即便山洞被敌人攻下，日军依旧可以凭此威胁对手。

9月初，佩里硫开始遭到美军第3舰队舰载机和陆军航空队B-24轰炸机的反复猛烈轰炸。轰炸机夷平了地面上的几乎所有设施，包括机场的所有附属建筑。在9月6日美军的战斗机清场中，飞行员们发现“空中没

有飞机，找不到舰船，高炮也很弱，地面上也看不到几架能用的飞机”。^[32]数十架日机被摧毁，其中许多毁于地面。航母舰载机用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反复攻击机场和滩头工事。9月12日，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出现在附近的海面上，开始向岛上倾泻高爆炸弹。炮击摧毁了登陆滩头尤其是机场周围大部分残余的建筑和碉堡。持续不断的打击逐渐烧毁或者清除掉了岛屿中央山区的灌木林，出乎预料的陡峭岩石地貌开始显现出来，珊瑚石锥和石柱组成了高大的峭壁，若非战时，这或许还会是美丽的风景。有一部分日军火炮开炮还击，但是并不多。

在设于一条山脊之下的指挥所里，中川大佐和北方另一座岛屿科洛岛上的日军指挥部还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的指挥所很舒服、好用，建造得也很好。这座大山洞里装有精心制作的木质楼层和楼梯，一个冷藏库，中川和其他高级军官还有用隔板隔出来的舒适的卧房。指挥所配有办公桌、会议桌、文件柜、地图墙和通信设施。在这深藏地下的巢穴里，军舰巨炮炮击带来的震动显得遥远而模糊。轰炸和炮击造成的伤亡微乎其微，他们的大部分兵力都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准备在自己选择的地方，也就是高地上，迎击敌人。

第1陆战团的4个营向马蹄盆地发动了第一轮进攻。地形将他们的进攻限制在了一处大约只有1 000码宽的地段上，路线两侧都是高大山岭，还处于高处敌人火力的覆盖之下。陆战队员们在这块布满岩石的走廊里行动时往往需要攀登和爬行。他们不断遭到来自各个方向、不同类型和口径武器的攻击——步枪、机枪、手榴弹、火箭弹、迫击炮以及野战炮。他们的挖掘工具完全挖不动这里的岩石地面，因此无法挖坑隐蔽。看不见的敌人从各处射击，一旦陆战队员还击，他们就会退入地下通道网络，再换个地方继续打。迫击炮打来的弹雨会从地面上掀起大大小小的珊瑚礁碎块，令炮弹的破片杀伤效果大增。而美军的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则在巨石和石堆的阻拦下无法前进。

团长“大胸哥”刘易斯·伯维尔·普勒上校想要去占领高地，一次占领

一个山头，即便付出沉重伤亡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但是，如果守不住，那么即使拿下这些高地也没什么意义。9月20日，埃弗里特·P.波普上尉指挥的一个连（1营B连）攻占了马蹄谷边缘154高地的山顶，结果发现自己暴露在了更高处日军阵地压倒性的交叉火力之下。这支部队只能卧倒在地面上，撑到夜幕降临，但是天黑后，日军步兵又发动了一轮接一轮的凶猛反击。这个连不光要用步枪、机枪、手榴弹来守卫阵地，甚至还要用上刺刀、匕首、石头，甚至是拳头。他们的人数锐减，伤员激增，弹药也不多了。拂晓时，他们还坚守在山顶上，但还能作战的只剩下了8个人。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撤退，上级也只能同意。但是这个连还要把伤员撤下去，这着实困难，他们后来用绳子把伤员从山头上吊放了下去，战死的人则只能丢弃在原地。他们的尸体还要在热带的高温下暴晒两个星期，之后才能被运到海滩附近的墓地中埋葬。波普连队的悲惨遭遇只是个开头，随着美军深入日军袋形阵地，这样的战斗还会更多。

那些在太平洋多个岛屿战场上打过仗的陆战队员，一致认为佩里疏是最艰苦的。无情的赤道烈日照射在草木不生、月球表面般的象牙色珊瑚岩上，温度常常超过43摄氏度。在前线待了3天后，官兵们都成了半人半鬼的模样：嘴唇干裂，头发蓬乱，珊瑚沙粘在胡子拉碴的脸上。汗水流进原本已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的眼睛里。无烟火药爆炸时的酸苦怪味刺激着他们的鼻子和喉咙。由于成天爬山，他们的手掌破了皮，伤痕累累。无处不在的臭味令人躲无可躲：腐烂的尸体，变质的口粮，还有粪便。没有埋葬的尸体上滋生出大群蓝绿色的大苍蝇，烦扰着活着的人。每天傍晚都会突然来一场大暴雨，有时候是在晚上。无休止的火炮和迫击炮轰击更是无处可躲，即便是没有被直接炸死炸伤的人，也会在反复的震动中耗尽体力和精力。有时候火炮的轰鸣声会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拂晓，想睡个囫圇觉都难——不过真正筋疲力尽的人即便是在155mm榴弹炮的炮口下也一样睡得着。斯莱奇排里的另一个人斯特林·梅斯说，这种炮声“就像是在你的双耳之间放了一条地铁隧道一样”。[\[33\]](#)当炮声停下时，陆战队员们能听见夜色中传来日军伤兵和濒死者的哀号。他们呼

喊着妈妈——无论哪个国家的人，临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在岛屿南部的低海拔地区，后方梯队的工兵和后勤部队已经开始努力把佩里硫改造成为前进作战基地了。三个海军工程营（绰号“海蜂”）在D+3日上了岸。他们用浮箱搭建了一个精巧的1/4英里长的栈桥，使得车辆可以直接开出坦克登陆舰，越过礁盘开上橙滩。到D+4日，机场和宿营区便已挤满了卡车和推土机。很快，海滩旁的椰子林里便建起了帐篷营地。“海蜂”们接到命令，要把主跑道延长到6 500英尺并升级路面质量，以便起降B-24轰炸机。^[34]推土机把日本飞机的残骸推到跑道外，卡车运走建筑废墟，运来砸碎的珊瑚礁，用来制作混凝土。乌穆尔布罗格山上的日本火炮和迫击炮仍打得到机场北部，因此工兵们不得不在炮火下工作，有时候旧的弹坑还没有填好，炮弹又飞来在跑道上炸开了新的弹坑。爆炸和来来往往的重型机械掀起了漫天尘土，工兵们不得不戴上面罩，免得被呛住。“在北面，血鼻岭的那一边，我能看见橙红色的火光，听见战斗的声响，就像连续不断的雷声一样，”“海蜂”上尉查尔斯·S.麦坎德利斯说，“那景象宛如地狱。”^[35]

9月19日，一支海军陆战队的F4U“海盗”中队来到机场，开始支援地面作战，轰炸附近山脊上的日军阵地。它们会投掷500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投弹高度往往非常低。这或许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短的轰炸航程。这些“海盗”刚一起飞就立刻右转，低空飞越山上的敌人阵地，投完弹药后再次右转降落。轰炸过程通常持续不超过两分钟，飞行员甚至懒得收回起落架。

普通炸弹看起来对日军的地下阵地没什么作用，但凝固汽油弹就好得多，它至少可以烧掉残余的植被，把日军的火力点暴露出来。冻状汽油燃烧剂有时会从入口流进敌人洞穴，迫使日军后撤到他们地下坑道网络的更深处。

拉佩图斯将军没能搞清楚他的师所面对的全部敌情，他向盖格将军发出了不合时宜的乐观战报：美军现在牢牢控制了登陆海滩、东部海滩、东边的“龙虾钳”半岛，以及机场。第5陆战团各部正沿着岛屿西侧

道路推进，遇到的抵抗轻微而零散。第7陆战团已经横扫岛屿南端，正在系统地猎杀留在这里的日军散兵。岛上日军余部绝大部分收缩进了日渐缩小的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拉佩图斯和他的师幕僚班子认为，再来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能拿下这里。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保持进攻动能，拉佩图斯要普勒上校“赶快”动起来打破僵局。普勒是个因好斗而出名的勇将，他根本不需要劝，直接把这些要求传达给了各个连长，还把他第1陆战团团部的一部分人手派到了前线。这个团向马蹄谷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步兵跟在坦克后面，还有炮兵弹幕射击支援，却一次接一次在惨重伤亡后被打退。在佩里硫之战的最初8天里，这个团伤亡了1 749人，进攻部队伤亡率达到56%，其中第1营伤亡高达71%。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之后，战果却乏善可陈，几乎未能向敌人据守的恶劣地形区前进一步。

9月21日盖格将军首次登上佩里硫岛，眼前的情况让他警觉了起来。拉佩图斯和他的师指挥部人员显露出了疲劳和动摇的迹象，但他们却不打算承认自己需要新的战术。在马蹄盆地底部的第1陆战团指挥所，许多指挥官看起来在体力、情绪和精神上都已接近崩溃，脸上透着憔悴和惊恐。普勒上校不怎么说话，显得有些紧张。他和他的幕僚们除了请求继续增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之外，也找不出别的办法。盖格得出结论，第1陆战团的使命已经完成，这个团的损失过于沉重，应当撤离前线。他决定投入一部分预备队——陆军第81步兵师的一个团级战斗队。拉佩图斯立刻跳起来反对，但盖格主意已定，不容更改。他命令普勒的陆战队员们准备登船撤离，并要求那支陆军团登陆佩里硫。

9月21日，尤金·斯莱奇的K连（5团3营）沿西部道路行军时，遇到了从道路对侧走来的第1陆战团的纵队。斯莱奇立刻看出那个团已人数锐减。“第1陆战团原来的一个连看起来像是排，”他写道，“排看起来像班。”^[36]和斯莱奇同在一个队列里的斯特林·梅斯也有同感。这是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团，只要看一眼他们的脸，就足以知道佩里硫比自己部队此前到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可怕。那些从马蹄谷下来的弟兄也看着他

们，“眼睛却盯着远方……他们看起来很可怕，汗水在破烂的军服上留下白色的盐渍，脸上胡子拉碴，被硝烟熏得黑一块白一块，浑身血迹，憔悴疲惫”。意识到自己的团可能会前往同一座山，梅斯忽然觉得，他们或许瞧见了“未来的自己”。[\[37\]](#)

《生活》杂志的战地画家汤姆·利画了一幅肖像，描绘了前线血战后刚刚回到橙滩附近宿营地的一位陆战队员。“战争疲劳症”这个术语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军事医学的词典，而利笔下的这个人恰好表现出了其症状。他看起来憔悴、疲惫而恐惧，瞳孔扩大，嘴巴张开，两眼无神。这是一幅令人伤心欲绝的悲惨肖像，堪比爱德华·蒙克绘于1893年的油画《呐喊》。利这幅画作名为《2 000码的凝视》，发表于1945年6月号的《生活》杂志，至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或许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艺术作品之一。

佩里硫岛D日之后第8天，“僵局”行动愈加名副其实了。日军击退了向其山岭中的“口袋”发动的每一次协同进攻。而由于占据着高地，他们又能够以一阵阵的迫击炮和炮兵火力袭扰机场，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海军巡逻队还发现，敌人援军利用驳船和小艇不断在岛屿北岸上岛。于是，师长坚持要拿下佩里硫北部，这意味着要强行通过西部道路，顶着炮兵和狙击手的火力拿下这里。于是，一个陆军团和一个陆战团开始沿着道路试探进攻。在一处被称为“狙击手老巢”的地段，乌穆尔布罗格山的陡峭悬崖一直延伸到海边，将美军部队挤压到一处狭窄的通道中，其一侧是红树林沼泽，另一侧则是敌人占据的高地。敌人狙击手从右边的山坡上开火，左边则是沼泽，数十名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阵亡于此。道路上都布设了地雷，由绊索和其他设计精妙的机关触发。这些障碍不可避免地拖慢了一切进攻的速度，但是控制西部道路是绝对必要的，拉佩图斯对部队的催促一刻也没停过。有鉴于马蹄盆地的血腥僵持，他希望能找到一条从北方进入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的更有利途径。

9月23日，陆军第321团级战斗队从加莱科鲁村南边的出发阵地向山脊线发动了全面进攻。在外海战舰上舰炮火力的密切支援下，士兵们一

开始取得了不错的进展。[\[38\]](#)利用灌木丛的掩护，他们向内陆突破了大约1 200码的距离，清除了多个山洞和碉堡，消灭了大约30名日军，拿下的地盘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次突然进攻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这一部分日军防线上没有太多的兵力。然而，入夜后，日军还是发动了凶猛的反击，到9月24日日中时，攻过来的美军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口吞得太多了。他们的战线已经推进到了山区深处，从海滩过来，需要穿越布满碎石的崎岖道路的补给线变得长而不可靠。弹药、淡水和口粮必须由人力搬运，穿过半英里长上爬陡坡下穿险谷的路线才能送到部队手中。日军的反攻很凶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也丝毫未减。伤员要躺在担架上抬出去。在这样的地形上抬担架，可以想见伤员们遭受的痛苦，而且许多担架手也被敌人狙击手放倒。美军不敢把伤员留在身后交给敌人，否则他们一定会被虐杀。[\[39\]](#)

一如往常，入夜后日本人又来了，要么单枪匹马，要么三五成群。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任何一点声响都会显得很大。亨特上尉记述了在佩里疏岛上那些压力大到几乎要把人神经绷断的夜晚：“当一个人躺在洞穴里紧张地盯着眼前的黑暗，听着、闻着、等着、期待着，身边只有自己呼吸的声音，这样的寂静就会变得令人发疯，无生命的物体或许会慢慢站起来变成活物，静止的东西会动起来，微风摇动树叶的声音或许会变成有人在爬行的响动，战友可能会被当成敌人，敌人也会被当成友军。除非能有极其强韧的神经，否则那些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东西就足以令人疑神疑鬼。”[\[40\]](#)有人真的发疯了，开始大喊大叫。这些人立刻被从前线拉了出来，因为不能保持安静的人会危及他的队友。执行夜间渗透任务的日军穿着帆布做的分趾踏板鞋，不会发出声响，他们用匕首、军刀或刺刀无声无息地发起攻击。伯尔金下士说，有天晚上，一个日本兵溜进了一座山顶上的一处射击阵地，勒住了他班里一名陆战队员的脖子。这个人立刻惊醒过来，把手指插进了日本兵的眼窝，把他扔下了悬崖。“我听见那个鬼子坠落途中一直在叫，从眼睛被插的那一秒直到他落到山下，”伯尔金写道，“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凄厉的叫

声。”[\[41\]](#)

如同两个月前在塞班岛时一样，未埋葬的腐烂尸体上长出了黑压压的泛着金属光泽的蓝绿色大苍蝇。虽然这些东西更喜欢爬而不是飞，但空中仍然满是震耳的嗡嗡声。它们吃被丢弃的食物残渣，更恐怖的是，吃血和尸体；它们爬进人们的饭盒，飞到口粮罐里。它们懒而顽固，用手挥都挥不走，要用摇晃和拍打才能把它们从勺子和叉子上赶走。有了太平洋上其他屠杀场的经验，美国人已经预料到了这些飞虫的问题。于是农业部的专家乘飞机来到此地，在全岛展开灭蝇行动。海岸外运输船队的船舱里运载着数百桶“滴滴涕”农药，他们要把这些化学物质和柴油混合在一起，在全岛喷洒，尤其是要喷到尸体上。有超过300个消杀小组背着装有混合液的水罐，把它们喷洒在尸体、死水塘，以及“厨房、食堂和厕所”周围。[\[42\]](#)装在卡车上的喷雾器喷洒了海滩周围的大部分区域。消杀组甚至还找到了在山区战场上喷洒杀虫剂的方法。一架TBM“复仇者”装上了汽油驱动的空中的喷雾器，还装了一台飞机加油泵，用来把杀虫剂从机腹油箱里泵出来。这套系统一分钟能喷洒大约100加仑。这样，杀虫剂就被喷洒到了整个乌穆尔布罗格山区，对敌人和己方阵地进行无差别消杀，覆盖所有的活人和死人。这些努力明显减少了苍蝇的数量——但是想要消灭干净还是做不到。[\[43\]](#)

到10月第一周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前线官兵的忍耐都接近了极限。这三个星期对他们来说就如同三个月，甚至三年那般漫长。斯莱奇回忆中的佩里硫就像是“一个恐怖的阴暗世界，随着战斗一拖再拖，伤亡与日俱增，想要离开似乎越来越不可能。时间已没有意义，生命也没有意义。激烈的搏斗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野兽”。[\[44\]](#)麦坎德利斯上尉将佩里硫形容为但丁眼中的地狱，许多在那里服役并战斗过的人也如此认为。但另一个更相似的场景是在J.R.R.托尔金的作品《指环王》中。就如同魔多的“黑暗之地”一样，这里的战场是一片邪恶，充满恶臭的废土——毫无生机，雾气缭绕，被高不可攀的尖削山岭所环绕。一支狡诈的半兽人军队深藏地下，他们能经由无处不在的地下坑道和洞穴网络在大

山下面穿行。在对手看来，这些人和托尔金笔下的半兽人一样残忍，毫无人性。即便是这片邪恶地域的名字，乌穆尔布罗格，也像是来自中土世界的地图——就像托尔金小说中的中土之战一样，这场战争也必须要

把敌人全部杀光才能赢得胜利。

登陆日当天，斯莱奇目睹过他连里一个老兵“战场劫掠”了一个死去的日本兵，掏走了他身上的值钱物品和纪念品，那时他还感到不齿。但是很快，他和第1陆战师的其他新兵就对更可怕的场面视若无睹。战场的大部分地方都无法在岩石地面上挖掘坟墓，因此尸体要在高温下停留数个星期，持续腐烂。它们膨胀、变黑，然后像烂果子那样裂开。斯莱奇的部队用大家都熟悉的尸体做路标，来标识防区周围的道路。“看着尸体一步步腐烂的过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从刚刚战死，到膨胀，到腐烂生蛆，到露出白骨——就像有一台生物的时钟在指示着一去不返的时间。”^[45]斯莱奇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陆战队员向一具碎裂而且积满雨水的日本兵头骨里扔石头来打发时间，“就像小孩子向家后面某条道路的台阶上扔鹅卵石一样随意；他的举动毫无刻意的恶意”。^[46]

美军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把己方的尸体从战场拖回来，埋葬到海滩附近。但这并不总能立刻做到。于是虐待敌人的尸体便成了双方都无法否认的恶行。斯莱奇记得他们曾经发现一具陆战队员的遗骸，尸体早已四分五裂：头和手被砍下来，生殖器被割下来塞进了嘴里。“我的情绪立刻变得异常愤怒，对日本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憎恨，”他写道，“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对他们抱有一丝怜悯或同情，无论何时何地。”^[47]那个时候日本牙医常常用黄金来填补缺牙，因此不少敌兵都镶有金牙。于是有些美国人就会从敌人尸体上“收获”这些值钱东西。斯莱奇就见到过一个陆战队员为了从一名日本伤兵嘴里拿金牙，用卡巴牌军刀把他的嘴活活割开：

由于日本人在不停地踢他的脚反抗，他的刀从牙齿上滑开，落进了受害者的嘴里。这个陆战队员一边咒骂着，一边把他的两颊割

到了耳朵，用脚踩住他的下颌，又要去拔金牙。鲜血从那个兵的嘴里喷涌而出，他发出痛苦的叫声，拼命反抗。我喊道：“别这么折磨他了。”但没有人理我。另一个陆战队员冲了过去，把一颗子弹打进了敌兵的脑袋，终结了他的痛苦。而这个浑蛋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自顾自地拔他的值钱货。[\[48\]](#)

虐待和摧残敌人尸体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在那种混乱的环境下，在无止境的暴行中间，人们很难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去指责他们。那些想要阻止战友恶行的士兵也自有办法。例如，他可以向战场纪律部门举报，或者告诉对方这么做会被逮捕并受到惩罚，或者以防止腐尸烂肉臭味扩散为理由。他可以警告对方，从日本人尸体上拔牙可能会染上危险的细菌。最后，他还可以指出，这么做会令他自己永远被家里人视为怪物。斯莱奇排里的另一个陆战队员一度随身带着一只日本人的手。他把它包裹在蜡纸里，装在背包中，想要在离开岛屿时带回家。斯莱奇和其他几个人都不同意。他们告诉这个人，军官会把他送上法庭的。这只手会把全船熏臭，让人心里发毛。最后，这个人还是不情不愿地扔掉了他的这件纪念品。“战争毁了我的朋友，”斯莱奇评价道，“他现在是个二十世纪的野蛮人，即便举止礼貌，他也还是野蛮人。令我颤抖的是，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也会变成这样。”[\[49\]](#)

后知后觉的拉佩图斯终于意识到他期待的“激烈而短暂”的战斗落空了。这个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堡垒体系，与地形精妙结合，其设计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给进攻方制造伤亡。敌人庞大的洞穴与隧道体系经历了数年的苦心经营，还得到了坑道工兵和排雷工兵的支援。现在，美军需要耐心和新的战术。战斗的最后阶段将会是痛苦的消耗战。进攻的进展很慢，而且断断续续，地盘只能一码一码地去夺取。美军出动装甲车辆开到山脊线上，向日军阵地还击。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所有日军火炮和射击阵地的位置，并清除所有残余的植被。最终美军绘制出了整个战场的地图，包括最细微的地方，涵盖了每一处被探知的敌人火力点位置。一天的进展只能以五码或十码来计。或许陆战

队应该把一门重炮拖到某一处新拿下的海角上，用钢缆索具将其固定住，之后这门新拉来的大炮就能对高山上那些麻烦的山洞入口或射击孔进行直射。155mm榴弹炮的威力足以一块一块地把山头啃掉——借助这些重武器的力量，他们开始逐步炸毁日军山洞的入口。

10月12日，师指挥部宣布战役的“突击阶段”结束。这份声明令仍在山区和敌人交战的部队嘘声一片。日本人还远远没有被打败，他们还保留着足够的战斗力，而美国人仍然在不停地死去。一名陆战队员说道：“师指挥部的某些人应该到这里来，告诉那些该死的鬼子，突击阶段结束了。”^[50]但是必须承认，残余的日军已经躲进了他们越来越小的袋形阵地，对于防线之外也难以再构成威胁。佩里硫南部的平坦地带作为前进作战基地已经开始运转。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从这座机场起飞，前去支援对菲律宾的进攻，货轮也开始定期向这个岛上运送补给物资。到10月第二周的时候，日军的“口袋”已经收缩到了一片400码×800码的区域内，未受伤的日军士兵只剩下1 000人多一点。有些人半开玩笑地提议，陆战队应该在这块地区周围架上带刺铁丝网，插上一块“战俘营”的牌子。美军飞机在战场周围投下了传单，日语专家也开始通过大喇叭向日军劝降。然而应者寥寥。中川的司令部一定在山洞某处有一台印刷机，因为他们也印制了自己的传单回应美军，写给“可怜的不要命的扬基娃们”。这份传单用半通不通的日式英语告诉美国人，他们之所以被送到佩里硫来，是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需要用太平洋上的一场胜利来奠定竞选连任的胜局。他们指责美国人的战争手段卑鄙，发誓日军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传单原文如下，连同错误拼写和不当用词一并奉上：

大骗子卢斯福（Rousevelt），他明显为了总统竞选，出于他的政治野心，像对待机器人一样不仅驱使着可怜的尼米特（Nimmit），还驱使着马卡瑟（Maccasir）。就像这里，真可怜。一定会牺牲掉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的劝降信。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向那些注定要在几天后被完全毁灭的人投降。告诉你们，对

于你们毫无人性的进攻方式，你们的神会让日本军队向你们发动更多的报复性打击。再说一次，对于你们毫无人性，与军人精神相悖的进攻，你们将会得到一场极其严厉的打击。我们指的是残酷的打击。——日军[\[51\]](#)

陆战队被逐步撤出了前线，代之以陆军第81步兵师（“野猫师”）。10月15日，当他们最终收到撤回帕武武的命令时，佩里硫只剩下最后一个第5陆战团还在岛上。他们乘坐卡车前往岛屿北端，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个新的宿营地。他们把旧的军服和作战靴埋入地下，领了新的，小小享受了一把淋浴、帐篷，还有舒适的匡西特板棚房食堂里的热饭热菜。几天后，他们排队走下海滩，登上登陆艇，前往等候在近旁的运输船。佩里硫之战让三个陆战团丧失了战斗力，他们不得不花上许多时间，吸纳大量的补充兵重建队伍。

几天后，盖格将岛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野猫师”师长保罗·J.米勒陆军少将。第1陆战师在战役中伤亡6 786人，其中超过1 300人战死。许多生还者都会长期生活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之下，虽然这个名词当时尚未出现。哈尔西将军发出了一封电报，向他们的努力和牺牲致敬：“谨以第3舰队全体向你们致敬。上铤高峰，下平山洞，消灭11 000名贼眉鼠眼的敌人，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干得极其漂亮。”[\[52\]](#)

在太平洋的众多战场上——最严重的是在塞班——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同的战术理念带来了严重的摩擦。盖格和拉佩图斯想要在把岛屿移交给陆军之前消灭日军的抵抗，可是没做到，深感遗憾。但是实际上，即使是在交给陆军之后，他们也是又进行了7个星期的艰苦战斗才把敌人从他们的山洞里挖出来。在乌穆尔布罗格恶劣地形上最后阶段的战斗中，“野猫师”展现了缓慢推进的围攻战术的好处。他们需要一条更宽、质量更高的道路通往马蹄盆地，以便把坦克、卡车、装甲推土机和重炮送到前线，于是便修了一条。他们让日军阵地不间断处于重炮炮击和空中轰炸之下，每天都要扔上去数吨的凝固汽油弹。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

沙袋掩体以掩护步兵。这些沙袋在海滩装满沙子，然后用两栖车或其他装甲车辆送到前线。最后，陆军工兵甚至建设了一条空中滑道，其外观和功能都很像早期的滑雪场缆车，用于把沙袋从滩头直接运到山上。这些沙袋墙不断前推，越来越接近日军的射击阵地，有时候士兵们甚至会用棍子把沙袋顶在自己前方向前爬。美军逐渐封闭了日军洞口和火力点。对此，日军报以一贯的高超技术、精明和坚定。即便“野猫师”占领了日军头上的山峰和山脊线，日军仍可能坚守着山体的内部。美军有时会听见自己下方的石头下面传来日本人的声音，或者闻到日本人做饭时的香气从看不到的通风口飘出来。被火炮轰塌的山洞口可能会从内部被炸开，随后一队日军士兵就会爬出来，从美军意料不到的方向发动进攻。由于夜间经常遭到小股部队袭击，于是陆军工兵便架起了泛光灯，保证战场如同白昼。沙袋堡垒向日军袋形阵地的中央不可阻挡地推进。美军还建了一条管道，柴油从海滩泵进去，直接倾泻到山洞口。“得益于一套接力泵和装在管道口上的喷嘴，我们达到了花园水龙带的喷射效果。白磷手榴弹则被用来引燃附着在喷洒区岩壁上和岩缝里的燃油。”[\[53\]](#)

1944年11月24日，中川大佐向科洛岛上的师团指挥所发出了最后的无线电报告。他烧掉了联队旗。此时他手头剩余的人数已不足百人；他们要组成小规模渗透组，发动最后一轮夜袭。中川似乎是搞了个仪式自杀了，但是没有任何亲见此事的人能活下来告诉人们真相。美军也没有注意到日军的最后攻击——实际上小股日军的袭击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而大几十个与主力失散的日军士兵还要在山洞里一直居住到战争结束之后。1947年3月，对日作战胜利足足18个月后，一群由一名中尉指挥的33名掉队日军还在这里被人发现并被劝降。

佩里硫之战在美国国内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只有一部分简短报道出现在了报纸的最后几版上。这几个星期里，从欧洲战场传来的消息更加轰动并令人振奋：盟军解放了巴黎，正横扫法国，向德国推进。在太平洋方面，人们对于麦克阿瑟向菲律宾的推进更感兴趣。而帕劳群岛，即

便按照太平洋上的标准，也是个遥远而且不知名的地方，人们搞不清这场战斗和其他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岛屿作战有什么区别。在这场全球战事中，佩里硫之战从规模上看也不算特别大。但这却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一种新的战役形态，它预示了太平洋上即将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发生在硫黄岛和冲绳岛上更著名的岛屿战役。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从伤亡比例来看，佩里硫是太平洋战争中代价最为惨痛的战役。在上岛参战的2.8万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官兵中，伤亡人数接近40%，包括大约1800人战死，8000人受伤。日军的1.1万名守军则基本全军覆没。就算是在一向对美军有利的杀伤人数对比方面——当然要考虑日本人不肯投降的因素——双方的伤亡比例也接近1：1。

中川利用他的地下坑道网络有效抵消了美军在舰炮火力和制空权方面的优势。他的部队基本避免了战术上徒劳无益的“万岁冲锋”，而是精心利用地形，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战场上与敌交战。这些战术将在1945年日本近海各岛屿的战斗中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出现。

从此，美军士兵开始把自己的敌人视为毫无人性的恶毒的虐待狂，欲将其连根拔起、彻底消灭而后快。但同时，这种发自内心的憎恨中也夹杂着敬慕，敬慕他们的坚韧、精明、忍耐，以及在面对注定的失败和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毫不动摇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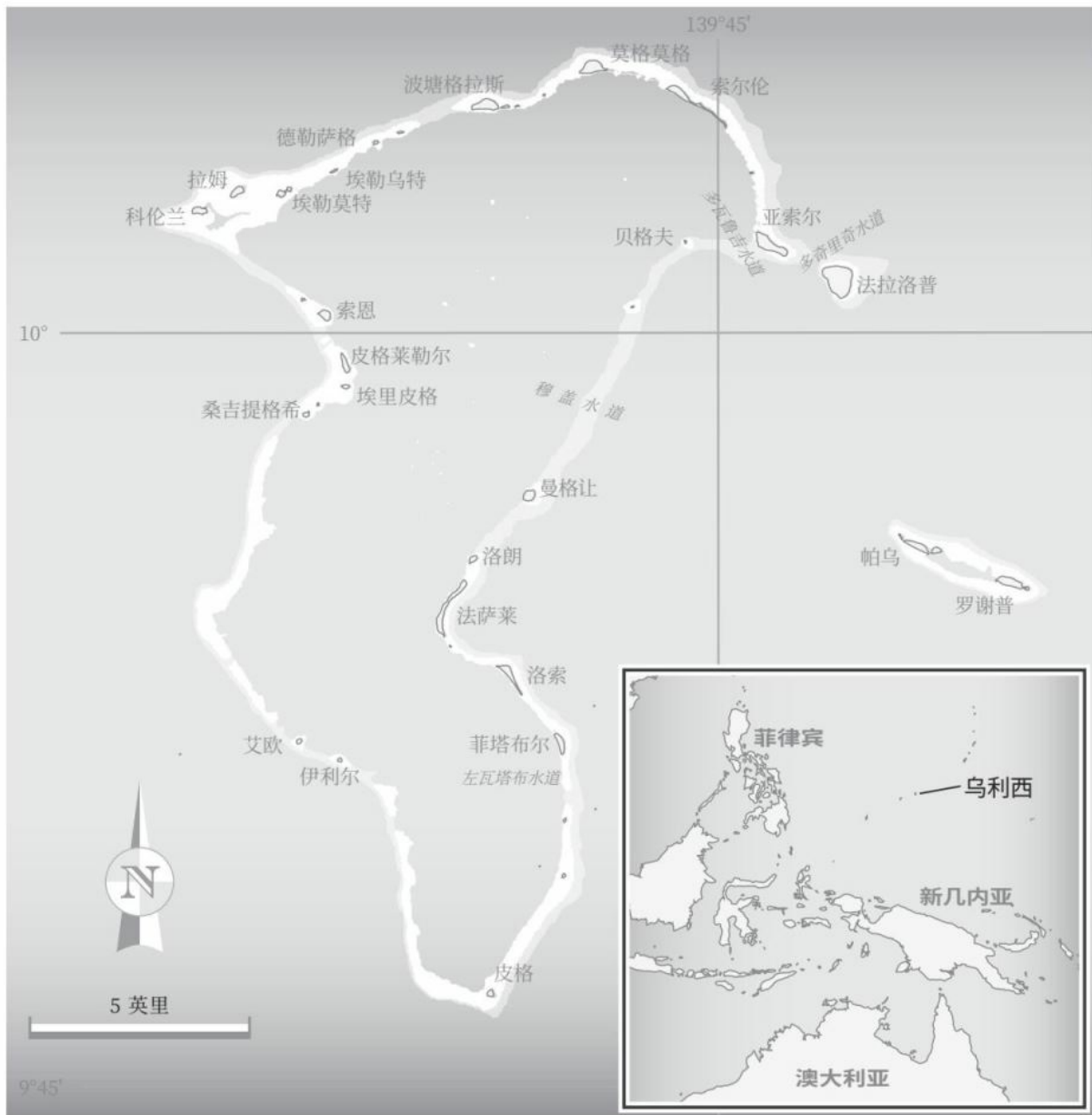
“僵局”行动的第三个目标（在佩里硫和安加尔岛之后）是佩里硫东北345英里之外的乌利西环礁。这座长满椰子树的长方形沙洲环礁几乎正好位于关岛和帕劳群岛的正中间，能够被用作新的舰队锚地。乌利西的潟湖面积达209平方英里，足以容纳整个第3舰队及其机动后勤支援舰队。一旦拿下乌利西，此前6个月里一直扮演相似角色的埃尼威托克环礁就将降格为连接珍珠港和马里亚纳群岛的中转站。

日本人在几个月前就放弃了乌利西，因此美国人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这座大环礁。9月21日，扫雷艇扫清了潟湖的主要入口并设置了浮标，陆军“野猫师”的一支侦察小分队登上了一座大一些的外围岛礁。他们受

到了羞怯的波利尼西亚原住民的欢迎，这些人知道这些陌生人是日本人的敌人后便站到了他们这一边。这支前进分队立刻在环礁上四散开来，他们乘坐橡皮艇在岛礁之间跃进。他们找到了一些日军丢弃的设备，但没见到敌军。根据第81师的报告，他们只找到“两个日本人，都是死的”。[\[54\]](#)到9月23日日落时，乌利西被宣布占领。

乌利西原住民的首领是一个成天醉醺醺的善良酋长，名叫“乌格王”。就和华盛顿的美国“大酋长”一样，乌格也因为脊髓灰质炎落下了残疾。于是他的下属用椰子树干和苇叶编织了一个宽大的轿子，抬着他走路。乌利西人散布在六七个小岛上简陋的原住民村落中，住在用劈开的椰子树干搭建的漂亮的棚屋里，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席子，高大而倾斜的屋顶上覆盖着露兜树叶。男人和男孩们系着缠腰布，女人和女孩们则穿着草裙，所有人都会在头发上戴花儿，身上涂油。400多年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最早发现了这些乌利西人，18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开始来到这里。从那时起，当地人中就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化：来自传教士的教义和行为规范逐渐和他们自己的古代传说和宗教传统相融合。到1944年，他们仍然沿袭着祖先数千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潟湖中打鱼和在小块土地上种植芋头。他们乘坐手工制作的有舷外托架的独木舟航行和打鱼——在浪花中划桨，或者升起用席子做成的三角帆，“如同一群海鸥在潟湖美丽的蓝色水面上掠过一样”快速航行。[\[55\]](#)

乌利西环礁



一名海军民事官劝说乌格王把他所有的臣民搬迁到环礁南部的一个岛上，作为回报，占领军将在战争期间为他们提供粮食、医疗服务和其他需要的物资。犹豫了一番后，乌格同意了。美军还建立了巡逻线，不允许自己人未经允许接近原住民居住区：“事实证明，这些步骤有效防止了我们的部队侵扰原住民。”[\[56\]](#)

时间很紧。第3舰队在9月底就要来此停泊，根据新的在10月进行莱特岛作战的时间计划，他们没有时间返回埃尼威托克。于是，第51工程营的第一梯队刚一下船就开始分成两班，12小时一班连轴转，日夜不息。海滩管理组设置了上陆区和物资堆栈。栈桥也很快建好了，他们把浮箱装满沙子和珊瑚礁，然后沉入海底，锚定于此。短短三天里，工兵们卸载了超过3 000吨各种补给物资，包括淡水、口粮、燃油、医疗物资和弹药，还有大约300辆车辆，包括卡车、推土机和半履带车。他们用汽油机带动的锯子砍倒椰子树。树桩和树根被用炸药炸掉，垃圾则被运到了机场跑道和道路两旁清理出来的地方。卡车把砸碎的珊瑚礁运来倒进混凝土搅拌机。一队喷吐着废气的柴油推土机开始在法拉洛普岛原有的日军飞机跑道上施工，延长、拓宽，铺设路面。一套预制的钢质油罐组通过5条管道连接到了一个加油码头上，一块海滩突然变成了混凝土水上飞机坡道，椰子林中突然矗立起一座空中交通管制塔，机场外围也出现了用珊瑚礁做的滑行道、停机坪和停车场。一座名叫莫格莫格的岛被指定为舰队的休闲娱乐区，这里很快就会建起一系列棒球场、篮球场、烤肉炉、露天剧场和数个食堂。勤务和后勤船队将不得不自己从埃尼威托克开过来，航程超过1 500英里。这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航程，因为勤务船在海上的航速不会超过12节或14节，驳船和干船坞更是只能以6节的速度拖行。

10月1日拂晓前，两支航母特混大队鱼贯驶入潟湖，在北部锚地下锚：这是博根将军的第38.2大队（包括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和谢尔曼将军的第38.3大队。这大约是第38特混舰队的一半兵力，一支由60艘涂着蓝灰色迷彩、装有高大桅杆的钢铁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在它们的巨大体形面前，一旁的小岛都相形见绌。这天早晨，“海蜂”部队的麦坎德利斯上尉起床走到了海滩上：“我走出椰子树林，向潟湖看过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满是战舰——大小不一，各种类型。航母、战列舰、巡洋舰、油轮、驱逐舰，10条或12条潜艇，等等，全都平静地停在锚地里。他们是在夜间溜进来的。我不知道它们怎样才能如此安静地开进来，之后我就意识到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乌利西了。这是个

巨大的掩蔽场所，强大而庞大的美国特混舰队将会在此集结。”[\[57\]](#)

舰队计划在锚地里进行为期数天的休整和补充，但这没能实现。10月2日，就在舰队开进乌利西的第二天，即便是在潟湖的封闭水域里，海况也开始恶化，物资装载变得很难。气压骤降，舰队气象专家发出警告，台风将至。就和中太平洋的其他环礁一样，低矮的岛屿无法在风暴面前为舰队提供太多的保护。哈尔西将军只好不情不愿地率领舰队回到海上抵御风暴。10月3日，两支特混大队开始在滔天巨浪和速度高达50节的狂风下左摇右晃。10月4日早，他们通过穆盖水道重回环礁时，才发现风暴把65艘希金斯登陆艇和14艘机械化登陆艇（LCM）抛到了岸上，大部分都已无法修复。但是时间不等人，舰队必须重返大海，发动新一轮航母空袭，以支援即将开始的莱特岛登陆作战。第3舰队还有许多答应过的事情等着去做。[\[58\]](#)

10月6日下午，两支特混大队重新回到了海上，跟在台风后面向北驶去。他们将在海上和第38特混舰队其余部分会合，之后开往日本和台湾岛之间的琉球群岛，空袭冲绳岛和邻近其他岛屿上的目标。这支舰队拥有17艘航母，军舰总计100余艘，水兵将近10万人，它将比自从1942年4月杜立德（又译杜立特）空袭以来的任何其他盟军舰艇（除了潜艇）都更接近日本本土。

这段1 300英里的航程艰难而充满混乱，狂风肆虐，巨浪埋艚。[\[59\]](#)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舱里，卡尼和参谋军官们将这场台风命名为“零号特混舰队”。既然它在特混舰队前方北上，那么就可以压制日本航空兵的活动，并让敌人的远程巡逻机都停在家里，很有益处。10月7日，第38特混舰队的四个大队在塞班岛以西375英里处会合，开始了一天漫长而麻烦不断的海上加油。军舰在海上发狂般地纵摇和横摇，绿色的海水涌到甲板上，连许多老水兵都晕了船。第3舰队日志记载道：“舰队的操舰技术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9：15，加油结束，除了几艘大舰还没有完成加油定额之外，其余舰艇都加足了油。”[\[60\]](#)

10月9日午夜，舰队开到最高航速，向冲绳彻夜冲刺。一整夜，军舰咆哮着前进，但雷达屏幕上没有出现敌人巡逻机的踪影，日本人确实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来。卡尼评论道：“我们打了冲绳那帮小子一个彻底的措手不及，因为我知道在他们的观念里没人会在这种天气下出海。我们突然杀来，给他们全力一击。”^[61]10月10日拂晓时，舰队抵达位于冲绳东北的预定起飞点，转向迎风航向，开始让飞机起飞。最初的扫荡战斗机群发现空中没几架敌机，地面上倒是停放着许多。在冲绳最大的读谷机场，攻击机群扫射了停放着的飞机，把大约12架敌机打成了火球。之后是四个轮次的轰炸机，更多的护航战斗机也挂载了炸弹和火箭弹，它们攻击了整个琉球群岛所有的机场、军营、弹药库、燃油库和防御设施。在这天的最后一轮空袭中，飞行员们只得对已经在此前的空袭中熊熊燃烧的目标再次下手了。大火吞没了冲绳县首府那霸市中心的古城，杀死了大约600名平民，把城区的4/5化为灰烬。大火毁灭了古代琉球王国遗留的许多艺术品、建筑和文化遗产。直至今日，冲绳的老年人仍然记得那场灾难发生的日期：10月10日。

这一天，米彻尔的航空兵部队总共向冲绳和其他邻近岛屿出击了1396架次。美军损失了21架飞机，但大部分被击落的飞行人员都被救生潜艇救回。^[62]

第38特混舰队接着向南转向台湾。日军侦察机彻夜跟踪美军直至天亮。当遭遇执行防空巡逻任务的美军战斗机时，这些无处不在的日军巡逻机就会转弯逃走，常常是躲进云里。^[63]但是很明显，它们随时追踪着第38特混舰队的位置，这样，在接下来的空袭台湾之战中达成突袭的可能性看起来不太大。驱逐舰的燃油已经不足——这是高速机动带来的必然后果——于是10月11日，舰队仍在南下途中，驱逐舰们就从包括“新泽西号”在内的战列舰的油槽里吸足了燃油。为了做出假动作迷惑台湾日军，哈尔西命令出动61架飞机对吕宋岛北部阿帕里机场上空进行战斗机扫荡。但是这一招数未能奏效——雷达屏幕显示，许多日本侦察机从台湾起飞，进行扇形搜索飞行。飞行员们现在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

才能来到台湾上空了，日本人已经严阵以待。哈尔西此时才意识到他不该先空袭冲绳，而应该把自己的第一场空袭指向台湾才对。

10月11日日落后，第38特混舰队再次加油，之后舰队转向北偏西航向，开始高速夜间冲刺。10月12日曙光初露时，台湾岛东部白雪覆盖的山顶已经出现在了西边。当太阳从东方海平线上探出头来时，第一批执行扫荡任务的战斗机群已经在空中了。出击的“地狱猫”超过200架，机群越过连绵的群山，来到目标所在地，岛屿西部平原的庞大机场网络上空。降低到云层之下，这些格鲁曼战斗机的飞行员发现大约有40架日军战斗机在2.5万英尺高度盘旋。此时即便是最没经验的“地狱猫”飞行员也完全不惧怕日本零式战斗机了，尤其是在这个高度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所有日军防空战斗机要么被击落，要么遁入云层。

当地日军航空兵指挥官，第二航空舰队司令福留繁将军在他位于台湾南部高雄航空兵基地的司令部大楼上目睹了这场空战。他先是伸长了脖子观察高空中的那些黑点，此时他无法区分美军和日军的飞机。当有飞机开始起火坠落时，他以为那都是“地狱猫”，于是认为他的飞行员们占得了上风。他拍着手兴高采烈地大喊：“干得好！干得好！大获全胜！”但片刻之后，他就发现所有坠落的飞机都是日军的，他的心一沉：“我们的战斗机去挑战严密的敌机编队，不过是以卵击石。”^[64]当海岸雷达捕捉到来袭的美军舰载机群时，福留繁集结了他所有可用的战斗机（总共约230架）。但到了这一天结束时，其中大约一半都被击落了。在随之而来的空袭中，岛上的主要航空兵基地都被严重损毁，许多飞机都被摧毁在了地面上。福留繁自己的司令部大楼也被炸成了废墟。在早晨最初的战斗机扫荡之后，他明智地命令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司令部全员躲进地下掩蔽所，因而无人伤亡。

统计了这一天的损失后，福留繁总结出自己在台湾可用的飞机已经不足150架了。但是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司令部还管辖着琉球群岛和九州岛上的航空兵基地，他在那些地方还有大约400架飞机，何况还能向东京求援。问题是，他应该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统统砸向台湾外海的美军舰

队，还是保存力量来日再战更好些？1944年6月接任这一职务时，福留繁就发现自己的大部分飞行人员“仍处于训练阶段”。^[65]现在四个月过去了，情况也没多少改善，除了最精锐的飞行员之外，他对其他人都不抱指望。率领轰炸机和鱼雷机队的都是些老兵，但这些部队里大部分飞行人员都没有越洋飞行的经验，也从来没有在海上攻击过敌舰。为了保护自己，第3舰队拉起了“地狱猫”战斗机组成的防空屏障和高炮火网，他对于这些人突破这套防空体系的概率并不看好。

联合舰队司令丰田副武大将此时恰好在台湾视察。离开时他告诉自己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一旦发现美军在西太平洋再次发动全力进攻，就命令航空兵投入战斗。当10月10日美军舰载机空袭冲绳时，草鹿便命令所有部队进入警戒状态。丰田觉得，“大决战”已经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定就在台湾他的临时前进指挥所里指挥这场战斗。这样福留繁就被架空了。

正如日军高层所见，他们这时候别无选择。美军航母对台湾的空袭可能预示着对这个岛屿的进攻即将到来，下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也可能发生在南方的菲律宾。无论如何，大战将至。由于后勤状况日益恶化，以及对敌方的意图缺乏了解，日军现在不得不快速行动起来，以确保自己能有机会倾力与敌一战，至于胜利，则是遥不可及的了。日本人失去主动权已久，现在他们只能再次被迫跟着敌人的指挥棒转圈圈。东京时间10月12日上午9时45分，草鹿将军下达命令，启动“捷-1号”和“捷-2号”作战，也就是日本海军针对敌方进攻菲律宾或台湾岛而制定的预案。

有鉴于自己航空兵部队糟糕的训练水平，福留繁下令：“组织大量鱼雷机和轰炸机，在我方能出动的最强战斗机部队的护航下接近目标，以大编队发动同时攻击。”换言之，日军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将不会像训练时那样编队飞行，也不打算按事先训练的方式进攻。它们只是径直飞向第3舰队，以庞大的机群一拥而上，期待单纯依靠数量压倒敌方的防御。福留繁后来解释道：“我们现在还能指望发动这类大机群进攻，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66]

“米克”卡尼在“新泽西号”的雷达屏幕上紧盯着来袭的攻击机群。这是个巨大的回波信号，大约有75到100架飞机。防空巡逻战斗机被引导前往截击。当“地狱猫”飞行员们看到敌机编队时，“他们开始报告看到一大堆各种各样不同的飞机。换言之，这不是一支机型严整、组织合理的战术机群，而基本上是一群五花八门的空中乌合之众飞了过来，什么鬼东西都有”。^[67]卡尼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怀疑这种乱七八糟的空袭机群是不是意味着日本的航空兵已经油尽灯枯。大部分来袭飞机被战斗机击落，还有许多毁于高炮，也有些敌机溜走了，逃回了台湾。但是天黑后，小群敌机又来了，它们几乎持续不断，贴着浪尖溜了过来。^[68]第3舰队情报部门的索尔伯格上尉看见曳光弹的红色火光照亮了一架又一架敌机：“就在我们面前，它们一架接一架拖着火焰侧翻过去，在黑色的烟团和水柱中炸成巨大的火球。”^[69]

第38特混舰队最终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只有一艘驱逐舰例外。“普利特切特号”被友军高炮火力击中，受到轻伤。在当晚向美军舰队发动进攻的大约100架日机中，只有25架安全返回台湾。飞行员乐观但错误地报告称本方击沉了2艘美舰，包括1艘航母，另外还击伤了2艘。^[70]

但是美军在台湾的任务还没完成。10月13日清晨6时14分，东方露出鱼肚白，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向岛上的机场和其他设施放出了当天四支大规模战斗机扫荡——空袭机群中的第一支。在台湾东部的大部分区域，攻击机群遭遇了云底只有2 000英尺高的乌云遮盖着下方，浓雾笼罩着大地。轰炸机飞行员们被告知要轰炸一切可能被敌军利用的东西——跑道、机库、码头、军营、仓库、储油罐、船只——实际上他们还打击了岛上的基础设施，包括桥梁、铁路终点、电厂、一座水坝，甚至一座制糖厂。^[71]“埃塞克斯号”第15战斗机中队的一名“地狱猫”飞行员肯特·李穿过云层后，发现一大群日本零式战斗机正等在那里呢。接

着便是一场大混战，美日两军的飞机都在云层中穿进穿出。打跑空中的对手之后，这些“地狱猫”又接着扫射了地面目标。李回忆道：“我们的任务是摧毁机场上一切能动的东西——罐车、卡车、人员、飞机。我们就是这么干的。”^[72]

“列克星敦号”第16战斗机中队的比尔·戴维斯从1.2万英尺高度冲下来，发现一架零式战斗机正高速向自己迎面冲来。戴维斯知道自己应该转弯脱离，因为零战上20mm航炮的威力足以击落他的F6F“地狱猫”，但年轻人血气方刚，他驾机笔直地冲了过去，即便零战的炮口开始像舞厅频闪灯那样闪光也不退缩。“最终，”他写道，“一段仿佛无穷无尽的时间之后，我轻微拉起机头，所有六挺机枪火力全开。我立刻看到零战上掉下来一大块东西。他继续向前飞了片刻，随即从我的左翼下滑落并爆炸。”^[73]戴维斯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在返回“列克星敦号”时，F6F飞机上还嵌着许多日本飞机的碎片，包括“一块五平方英尺^[74]的零式机机翼插在〔他的〕机翼上”。^[75]

当天，美军出动了947架次飞机，45架飞机毁于战斗与事故，这个损失已经不可忽视了。很明显，日军连夜调来了增援航空兵，但是这些新来飞行员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美军飞行人员还发现了许多任务地图上没有标出，在前一天也被忽视了的机场。第38.3特混大队的飞行员们报告称在自己的任务区域里发现了15座机场，但任务简报告告诉他们的是只有4座。^[76]

不出所料，就在日落前，当最后一批防空巡逻战斗机降落到航母甲板上时，空中反击到来了。日落时（傍晚6时26分），雷达显示低空敌机正从多个方向同时飞来。“地狱猫”机群赶在最后一抹日光消失在西边之前击落了几架来袭敌机，但是更多低空飞行的双引擎鱼雷机却在夜幕降临后纷至沓来。领队日机投下了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为后续飞机指示进攻航线。“敌人看起来相当坚定，只要找到我们，就一定会来，”第38.3特混大队战斗日志如此记载道，“我们的防区来了大约四五十架敌

机，从海平面上的炮火判断，其他特混大队也没逃掉。”[\[77\]](#)

在各艘旗舰上，航空兵参谋们很失望，他们觉得飞行员们显然是在台湾岛上留下了许多可以使用的机场。但实际上，这最后一批攻击机中的大部分都是直接从九州岛飞来的。这是些三菱G4M“一式陆上攻击机”（盟军绰号“贝蒂”），它们已多次证明自己是有效的夜间鱼雷轰炸机。这些飞机来自日军精锐的陆海军混合航空兵部队，即所谓“T打击部队”。其长机飞行员中有不少都是日军中仅存的最富有经验、最技术纯熟的人。仍在台湾临时前进指挥所中指挥作战的丰田大将亲自命令T部队投入战斗，期望他们能给美军舰队以重创。

对于第38特混舰队的水兵们来说，这是战争中最惊险刺激的一夜。空袭一连数个小时毫不停歇。闪着绿色荧光的鱼雷航迹从特混大队轮形阵的中央穿过，与自己的目标仅仅是擦肩而过。高炮要直到敌机到达投雷位置时才能将它们击落。“列克星敦号”机库里的一名军官回忆了天刚黑时的场景：“地狱之门打开了。舰队的每一门高炮都在开火。从机库甲板打开的侧门望去，我看到到处都是日本飞机。”[\[78\]](#)他听到大大小小的火炮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海面 and 天空被曳光弹和高炮炮弹的爆炸所照亮，敌机被撕碎，燃烧着坠入大海。

四架G4M攻击机突破到了第38.4特混大队的中央，攻击了“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其中两架飞机在投雷之前便燃烧坠落，但另外两架成功投下了鱼雷，“富兰克林号”的舰员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击中纯属奇迹。一枚鱼雷仅仅由于舰长命令动力机组全速倒退才从舰首外掠过，另一枚则从军舰底下穿过，在舰员们目力可及的距离上沉入海底。其中一架G4M低空掠过“富兰克林号”的飞行甲板，在试图逃离时被击落；另一架被高炮火力命中起火，那个飞行员瞄准了军舰的舰岛，想要自杀撞击。但他没能瞄准，只是撞中了飞行甲板旁的高炮走廊。燃烧的残骸从甲板上滑过，带着惯性落进了对侧的大海里。

当晚只有一艘美军军舰被击中。一架G4M在天黑后不久攻击了麦凯恩将军的第38.1特混大队，用鱼雷瞄准了“黄蜂号”航母。鱼雷和目标擦

身而过，但仍然继续前行，击中了重巡洋舰“堪培拉号”，引发了高及桅顶的火柱。爆炸在巡洋舰舰首处，装甲带下方炸开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巨大口子，4 500吨海水涌进了舰体，淹没了轮机舱和锅炉舱，炸死了23名舰员。工程师判断“堪培拉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靠自身动力开走了。

哈尔西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是应该命令“堪培拉号”舰员弃舰，将这艘残损的军舰自沉，还是把它拖出战区？他就算是选择了更保守的第一种选项也无可指摘。第3舰队赔得起一艘巡洋舰，而若要把它拖到安全海域则会把其他军舰暴露于危险之下。但是哈尔西很固执，他决定拯救它。他命令巡洋舰“威奇塔号”前去拖曳“堪培拉号”。很快这两艘舰都动了起来，但航速只有令人心焦的4节。开往乌利西的航程长达1 300英里，撤退的舰只将会在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处于来自三个方向超过100座机场的日军飞机的昼夜空袭之下。

为了压制必然紧随而至的日军空袭，哈尔西下令在10月14日早晨向台湾再发动一轮战斗机扫荡。第4特混大队则被派去空袭吕宋岛北部沿岸的日军机场，这不仅是自卫，也为麦克阿瑟加了一把火。坐镇珍珠港司令部的尼米兹从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调集陆基航空兵部队，投入对台湾、吕宋和琉球群岛的作战。陆军航空队也从中国大陆的机场起飞100架B-29轰炸机，空袭了台湾高雄的机场群。

一支由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组成的，被笑称为“第1残废分队”的舰队被派去护卫受损的“堪培拉号”撤离。一支以轻型航母“考彭斯号”和“卡伯特号”为核心的特混大队则被指派为其提供近距离空中掩护。10月14日一整个白天，日军飞机都对这支新建立的“残废分队”紧追不舍。为受损巡洋舰护航的舰艇则不停躲避日军的空投鱼雷，并迎战前来扫射的敌机。[\[79\]](#)

站在操舰角度看，拖曳被海水淹没的“堪培拉号”绝非易事。“威奇塔号”先用1.125英寸直径的铅淬火高强度拖曳钢缆拖上了前者，随后又缠绕上了马尼拉缆索、防撞设备和防摩擦设备，以免猛然拉扯导致钢缆

断裂或从绞盘上被扯落。两艘舰都在风浪中危险地扭动，常常几近相撞，或者有舰员被绳索绊倒在甲板上受伤。到10月14日早上，受损的战舰已经把舰首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东南方），并踏上了航程。拖曳着部分进水的巡洋舰的救援大队成了敌人眼中的肥肉。暴雨区和低垂的云层成了日军飞机的帮凶，令其得以隐藏自身，躲避巡逻的“地狱猫”。敌机在雷达无法探测到的低空从多个方向同时杀来。领队机再一次投下带着降落伞的照明弹，为后续跟进的飞机指示航线。和此前两天一样，日军航空兵再次遭到惨重损失，但是面对日机的数量优势，美军仍有被压垮的危险。围绕着蹒跚而行的“威奇塔号”和“堪培拉号”两舰，以四倍于其的航速环绕前进的护航舰船打出了密集的高射炮火，保护着两艘几乎无法动弹的巡洋舰。[\[80\]](#)

10月14日傍晚时分，这天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晚6时45分，新型轻巡洋舰“休斯敦号”遭到日军鱼雷沉重一击，舰体中部中雷，轮机舱被海水淹没，全舰断电，军舰看起来几乎要断裂了。据一名舰员说，军舰的主甲板没入了水里，“浪头都有14英尺高”。[\[81\]](#)由于它向右严重倾斜，舰长下令弃舰，驱逐舰开始捞救落水的舰员。但是一个小时后，舰长又改变了主意，召集舰员返回舰上，呼叫拖曳。[\[82\]](#)

东边数百英里之外，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舰桥上，哈尔西正在甲板上踱步、抽烟，他在想自己的决定是否真的正确。这一天的空袭远比预计的更凶猛，而现在他已经有两艘巡洋舰被打残，被拖着走了。自从1942年所罗门群岛战役以来，美国海军还没有遭受过如此重创。无线电情报（标识为“绝”，意即“绝密”）已经证实，日军的增援航空兵部队正涌入台湾。每隔15分钟左右，哈尔西就要检视一次地图桌上代表救援大队的钉子，确认这支舰队还在挪动。他后来写道，“休斯敦号”的受伤“令我担心这次救援的努力会让完好的舰艇步残舰后尘”。[\[83\]](#)

没人会因为哈尔西做出“自沉然后快走”的保守决定而责怪他——那样的决定意味着把两艘残舰送下海底，让未受损的舰艇离开这一海域。但是“阴谋诡计部”一直监听着东京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听到的内容令

他们很恼火。日本人向国内外宣布，他们驻扎在台湾的航空兵部队已经歼灭美军舰队。新闻播音员显然信以为真，用狂喜的语调宣称，日军飞机已经击沉了8艘到11艘美军航空母舰。10月15日早上，这笔子虚乌有的账单上又加上了新的条目，东京广播电台骄傲地宣布，已有至少 **17艘**美军航母被送下海底。播音员还断言，美军已有36艘军舰被击沉，另有17艘“大破”。^[84]广播中播放了返航日军飞行员接受采访时生动的“第一手讲述”。“军事专家”还做了绘声绘色的评论。他们宣称的夸张战果据说还有其他证据佐证——例如美军航母在这一区域空袭强度的减弱，许多逃生者坐在救生筏上的“事实”，尼米兹的司令部对这次战斗结果的缄口不语，以及中国基地出发的B-29在台湾上空的出现（这被解读为这一区域美军的绝望之举）。一名“专家”说道，在台湾外海的巨大胜利证明，“日本在这一区域仍握有不容置疑的优势.....过去几天的战斗显示了一个事实，敌人越接近日本自身以及我们可怕的防御圈，其损失就会越重大”。^[85]东京广播电台报称马克·米彻尔中将的旗舰已被击沉，因此“美国特混舰队的司令官此时很可能已经与众多手下将士一起，在大海的坟墓里长眠”。^[86]

哈尔西本人也被羞辱了一番。《每日新闻》的报道翻出了哈尔西以往夸下的海口和要向日本人复仇的说法。一名头版评论员说道，他舰队的沉没是“上帝对人面兽心、妄想统治世界的扬基佬的惩罚”。^[87]从无线电里听说东京上野动物园的管理员在猴子馆里给自己准备了一个笼子，哈尔西都笑坏了。“鬼子们要从树上摔下来了，”他对幕僚们如此说道，“长着尾巴也没用。”^[88]

返航的日本飞行员为什么会报出夸张到令人发笑的战果？T部队的飞行人员是在10月13日的夜色中发动的攻击，此时他们无法近距离观察战果。明显命中的鱼雷会以两倍乃至三倍的数量被报上去，这即便在白天也是个问题，夜间更是通病。十几名飞行员可能看到同一个“火柱”，并将其记为一次鱼雷命中。飞入高射炮火的旋涡之中，飞行员们会被五颜六色的曳光弹暂时致盲。而许多日军飞机被击落在美军特混舰队的舰

艇之间，沉没之前漂在水面上燃烧，这些火光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军舰在燃烧。当地的航空兵指挥官则对这些报告不加甄别，直接上报，并一路报给了东京帝国大本营。福留繁战后写道：“渴望着见到火光的飞行人员很容易夸大他们的成绩。夜间攻击战果被夸大是屡见不鲜的。”^[89]

这些广播中最令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感兴趣的是日本人提到的“肃清残敌”作战。东京广播电台报道称，日军舰队正在追击败退的美国舰队残部，意图在其到达安全海域前将其击沉：“日本航空兵，正在水面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攻击注定被消灭的敌特混舰队……敌残存舰艇现已注定全部葬身太平洋底。”^[90]这些胡言乱语不过是宣传而已。但是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对自己播报的事情信心十足。不仅如此，来自珍珠港的新的绝密情报证实，一支水面舰队正准备通过丰后水道进入公海，追击并消灭第3舰队的一切残余。

这就让哈尔西的幕僚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机会利用敌人这种被误导出来的乐观。关于被打残的“堪培拉号”，卡尼说道：“依我看，它就是个干苍蝇，是个不错的漂浮诱饵^[91]。”^[92]于是他和舰队作战参谋拉尔夫·威尔逊上校拿出了一套计划，交给了哈尔西。这些受损的军舰将被作为诱饵。如果运气好的话，美军航母或许能给追杀来的日本海军舰队设下圈套，赶在麦克阿瑟的部队登上莱特岛滩头之前就赢得一场大胜。哈尔西对此十分赞赏，于是一系列新的命令通过“新泽西号”高大的无线电桅杆发往舰队。第38.2和38.3特混大队将布置在受损军舰以东100英里处，这个距离足够远，不会被台湾和冲绳的日军侦察机找到，但也足够近，足以伏击闯进作战范围的日本舰队。第3舰队其余部分则退往安全距离外，开始接受油轮的加油。哈尔西把他的计划提交给了尼米兹，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随即命令这一区域所有可用的巡逻机搜索敌人舰队：“怀疑敌人水面舰队已离开本土水域，前来追击蓝军[美军]撤离台湾的残损军舰。扩大搜索范围……要覆盖敌人通过丰后水道前往大致位置的可能路线。”^[93]哈尔西也让麦克阿瑟知道了他正准备迎击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主力，鉴于这种可能性，“所有对菲律宾的空袭都被撤

回，等候进一步的消息”。^[94]哈尔西要“威奇塔号”上的杜博斯将军发出一系列假的遇险信号。“第1残废分队”现在有了一个更拿得出手的绰号：“第1诱饵分队”。

即便没有一刻不停杀过来的一批批敌机，拯救两艘严重进水、瘫痪在海上的巡洋舰也是个不小的挑战。“第1诱饵分队”的官兵们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被牺牲掉的。看着树懒一般慢慢爬行的拖曳舰只，分队中的一名舰长说：“现在我知道鱼钩上的蚯蚓是什么感觉了。”^[95]对于拖曳舰而言，要缓解重达1.6万吨的大家伙在巨浪上摇摆扭动带来的冲击，就需要舰员们精通“旧时代的结索技术”，包括使用结构复杂的挂钩和鹬鹩钩。^[96]这项工作很危险，有几个舰员都受了重伤。巡洋舰“波士顿号”最初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开始拖曳“休斯敦号”的，即便是站在“波士顿号”的舰尾，也看不见被拖着的“休斯敦号”。10月15日，远洋拖轮“波尼号”加入了这支大队，接手了拖曳“休斯敦号”的任务。令救援大队的舰员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天白天和夜晚居然都没有日军飞机前来骚扰。但是16日，他们的运气用完了，中午时分，一支由107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机群杀了过来。

“卡伯特号”和“考彭斯号”上的F6F防空巡逻机群击落了大约50架敌机，但仍然有一些敌机突破了防线。其中一架飞机瞄准“休斯敦号”的舰尾投下了一枚航空鱼雷。这枚鱼雷钻进了军舰的尾流，几乎在两个舵柱的正中间爆炸，把水上飞机库的舱门像瓶盖那样抛到了空中，20名水兵被掀飞到了海里。机库里的航空汽油罐被点燃了，舰尾燃起了大火。在空袭过程中及其之后，拖轮“波尼号”始终拖曳着“休斯敦号”，拖缆始终没有松劲。“休斯敦号”的舰长选择继续拯救军舰。这艘1.2万吨的军舰涌进了大约6 300吨海水，但仍然在向乌利西挣扎前进。大部分舰员都被转移走了，只留下大约100人在舰上。它的舰体已经深深没入水中，吃水深达32英尺，向右倾斜8°。^[97]军舰的横摇十分严重，舷侧梁端几乎触到了海面，甲板上涌上了青绿色的海水。

丰田大将起初已经命令一支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在志摩清英

中将在指挥下从濑户内海出发，猎杀美军残舰。但最后，日本海军高层还是认清了真相。10月14日上午，日军侦察机搜索了台湾东部和南部的洋面，确认其周围仍有许多完好无损的美军舰艇。不仅如此，当天美军舰载机向吕宋发动的猛烈空袭也证明美军舰队大部一定并未受损。意识到可能有陷阱，丰田召回了志摩舰队，要他们前往冲绳以北的奄美大岛加油，10月18日再次出海，参加即将开始的防守菲律宾的“捷-1号”作战。

四天的“台湾空战”到此落下帷幕。根据福留繁的统计数据，他的台湾基地损失了329架飞机。其中179架前往攻击美军舰队未能返航，其余都是在地面上或者台湾上空被摧毁的。在岛上的主要航空兵基地高雄基地，只剩下一座建筑依然立在那里，只剩下一架飞机完好无损。此外，九州、冲绳和吕宋还有至少200架飞机被摧毁，这样日军在10月10日至17日累计损失的飞机超过了500架。自从6个星期前哈尔西的第3舰队出击以来，日军在这一区域已经损失了大约1 200架飞机。

在紧张的十日航行之后，“堪培拉号”“休斯敦号”及其救援大队最终于10月27日上午蹒跚开进了乌利西环礁。两艘巡洋舰都将回到美国本土全面修理，并在战争结束后重回海军。

台湾空战结束一天之后，麦克阿瑟登陆舰队的第二梯队来到了莱特岛外海。10月17日拂晓，苏禄灯塔（位于莱特湾入口处）上的瞭望哨用无线电发出了一份观察报告：一队扫雷舰正进入海峡。这份报告在大约一个小时后被送到丰田大将手中，他立即向所有部队发出了“捷-1号”作战警报。于是，分散在从日本本土到马来亚之间数千英里轴线上的日本舰队各部，都急忙开始准备出海。

“捷号”作战计划是在绝望之中制订出来的，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即便是最悲观的计划制订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竟会在美军登陆舰队到来之前损失如此之多的航空兵力。尽管如此，补充的飞机和飞行人员还是开始从日本本土和中国大陆涌入菲律宾。但是有鉴于他们的同僚刚刚遭到屠杀，这些人在面对美军舰载机飞行员的时候能有多少机会？虽然日

本海军的将领们无论对下属还是对自己都不敢承认这一现实，但他们都知道，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大规模海战已然迫在眉睫。他们将在没有有效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因此将会输掉——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真正的使命并不是要取得完胜，而是要光荣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1] 1平方英里≈2.6平方千米。——编者注

[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32.

[3] *Ibid.*, pp.35—36.

[4]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20.

[5]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6] Mason, “We Will Stand By You,” p.216.

[7]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8] *Ibid.*

[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8.

[10] Hunt, *Coral Comes High*, p.36.

[11] *Ibid.*, p.37.

[1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56.

[13]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76.

[14] Hunt, *Coral Comes High*, p.71.

[15] 1码≈0.9米。——编者注

[16]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77.

[17] *Ibid.*, pp.177—78.

[18] *Ibid.*, p.182.

[19] Gayle, *Bloody Beaches*, p.13.

[20] Mason, “We Will Stand By You,” p.221.

[21] Hunt, *Coral Comes High*, p.137.

[22] *Ibid.*, p.124.

[23] *Ibid.*, p.103.

[24] 1美制加仑≈3.8升。——编者注

- [25]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32.
- [26] Ibid., p.133.
- [27]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79.
- [28] Ibid., p.80.
- [29]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86.
- [30]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64.
- [31] Lea and Greeley, *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p.189.
- [32] CTF 38 to COM3RDFLT Info CINCPAC, Sept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27.
- [3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92.
- [34]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5, 1944.
- [35]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p.164, 166.
- [36]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03.
- [37]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103.
- [38] War Diary, September 22,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79.
- [39]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29,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 [40] Hunt, *Coral Comes High*, p.91.
- [41] Burgin and Marvel, *Islands of the Damned*, p.152.
- [42]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113,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 [43]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89.
- [4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21.
- [45] Ibid., p.143.
- [46] Ibid., p.123.
- [47] Ibid., p.148.
- [48] Ibid., p.120.
- [49] Ibid., pp.152—53.
- [50] Ibid., p.150.
- [51] "CTF 57 to CINCPAC Info CTG 57.14,"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CINCPAC Gray

Book, Vol.5, p.2282.

[52] Donigan, “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

[53]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111,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54] Ibid., p.24.

[55] Wees, *King—Doctor of Ulithi*, p.36.

[56] “Operation Report, 81st Infantry Division, Capture of Ulithi Atoll,” April 13, 1945, pp.28—29,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93, FDR Library.

[57]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p.170—71.

[58]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2, 1944, CINCPAC Gray Book, October 5, 1944, Book 5, p.2093;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5, 1944.

[59]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7, 1944.

[60]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8, 1944.

[61]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92.

[62] COM3RDFLT to CINCPAC, etc., October 13,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39.

[63]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1, 1944.

[64]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46.

[6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IJN.

[66]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38.

[67]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98.

[68]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2, 1944.

[69]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58.

[70]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2, 194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13, 1944,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470.

[71]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3, 1944;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3, 1944.

[72] Kent Lee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27.

[7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250.

- [74] 1平方英尺≈929平方厘米。——编者注
- [75] Ibid., p.252.
- [76] War Diary, October 12,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97.
- [77]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3, 1944.
- [78]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257.
- [79]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4, 1944.
- [80] Task Group 38.3 Diary, October 14, 1944.
- [81] William Ransom account in Kuehn et al., *Eyewitness Pacific Theater*, p.203.
- [82] “Running Estimate,” October 14, 1944 (Oahu date),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099.
- [8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7.
- [84]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5, 1944, p.2.
- [85] Ibid., October 14, 1944, p.2.
- [86]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4, 1944, cited in memo dated October 20, 1944, p.1.
- [87]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7, 1944, p.2.
- [8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06.
- [89]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52.
- [9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5, 1944, p.7, and October 16, 1944, p.2.
- [91] 美国人的钓鱼方法：把干苍蝇丢在水面上漂着，好把鱼群引诱过来。——译者注
- [92] Carney, oral history, p.399.
- [93] CINCPAC to COMFAIRWING, October 15,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0.
- [94]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5, 1944.
- [95] Captain *Inglis of the Birmingham*,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WII*, Vol.12, *Leyte*, p.103.
- [96]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Vol.12, *Leyte*, p.96.
- [97] Third Fleet Diary, October 17, 1944.

第四章

1944年的整个夏季，东京炎热、尘土漫天，人们心怀不满。城市曾经最繁华的商业区此时已变得破败、灰暗，几乎被废弃。后来成为日本极受欢迎的小说家的竹山道雄回忆道：“熏风吹过城市，屋顶上蒙着尘土。即便是在涩谷周围，整排的商店都关了门，马路也挖开了，看不到什么人，只有各处的食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龙。”^[1]

粮食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担忧。饥荒暂时还没有到来，但普通市民已经开始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找到足够的吃的了。人们可以从邻居们的脸上看出这一点：许多日本人正越来越消瘦。竹山还记得他学校的校长每过一个星期都要明显瘦一些，看上去几乎变了一个人。“他的下巴变窄了，脖子缩了回去，真可怜。他头发花白，眼睛深深陷入眼眶，皮肤上的皱纹越来越多，看起来总是像个旧的雕花面具。”^[2]人们很容易疲劳，也没有力气去应对每一天的劳作，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每天为了获取食物而需要付出的努力却开始压倒其他一切。有一份资料估计，每个日本家庭平均每天要花上5个小时来购买食物或者排队领取口粮。商店一整个星期都关着门，只有偶尔配给的口粮到货时才开门——东西卖完就又关门了。那些排了几个小时队的人常常空手而归。在战前的日本，乞丐本已基本绝迹，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即便是穿着光鲜的人也会向其他市民乞求给自己一点吃的。把食物端上家庭的餐桌，这需要消耗女人们不少时间和精力——而这些女人都会少吃东西，好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尽量多吃些，这就让她们更没有力气去费劲在商店和口粮领取点前排队了。

城市里的居民们想要去乡下直接从农夫那里买粮食。但是通勤的火

车在战时激增的运量重压之下已经喘不过气了，于是这趟旅途便成了痛苦的挣扎。火车站看上去就像是难民营。人们要等几个小时才能挤上车，可能还要向车站人员行贿才能买到票。上了车，他们发现自己挤进了人堆。挤断肋骨已不足为奇，有几次甚至有婴儿被闷死的事情被广为报道。车厢破旧肮脏，椅套都被扯掉、撕开，头顶扶手上的拉环早已不知去向，窗户破了，地板也被弄坏了。早已超载的火车冲过车站，不敢停车，怕月台上等待许久的人拼命也要挤上车。

当一个城里人经受了这重重考验来到乡下，一幅田园风光便会出现面前，山坡和种着水稻的梯田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安静的小村庄旁。这片宁静祥和的景象，和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激烈战争完全联想不到一起。但是，这个人转眼就会发现乡民粗鲁而贪婪。他们会漫天要价，还要求买家对他们毕恭毕敬。之后他们只能回到火车站月台上，再一次像狗一样挤回城里。

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以白米作为主要粮食，但现在他们即便出高价也不一定买得到了。战时的口粮米掺入了碎挂面、麦粒、黄豆，或者甘薯，随着战争久拖不决，这些低等级替代品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3]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这些像是大米的混合物，人们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用油翻炒，做成一种备受鄙视的食品，称为“糠”。新鲜的肉和鱼已经从口粮配给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豆腐、蔬菜和沙丁鱼做的被称为“煮干”的很脆的小鱼干。为了给饭桌上添加些花样，人们会往锅里放入当天能从市场上找到的任何东西——茄子、鲜萝卜、萝卜干、豆芽、南瓜、竹笋，以及菊花叶子，哪怕数量很少，有一点也是好的。新鲜鸡蛋几乎绝了迹，于是人们只能用粉末状的“上海蛋”和水打在一起，做成像是鸡蛋但不好吃的糊糊。火腿被换成了一种所谓的“鲸鱼火腿”，面包师批发不到面粉，便只能用豆泥制作一种像是面包的替代品。这样，日本流行的用白面包和火腿做成的午餐三明治，便成了既没有面包也不含火腿的冒牌货。

随着口粮供应质量和数量的下降，黑市对普通日本人的生计变得越

发重要。到战争的最后一年，“黑先生”占日本全国零售量的份额可能达到了一半。1944年中期，黑市价格和官方定价的差异大幅度扩大，几乎所有类型食物的黑市价都达到官方定价的10倍以上。1944年3月，大米的黑市价是官方定价的14倍，到1944年11月则达到44倍。^[4]某些稀罕物的价格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人们甚至怀疑身边还有没有人吃得起。1944年7月下旬，东京西红柿的价格达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57钱（合0.57日元），桃子的价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25日元。^[5]火箭般飙升的物价不可避免地激化了阶层矛盾。有钱或者有关系的日本人明显比他们的穷邻居吃得更好。一个人脸上和身上赘肉的多少足以衡量他所享有的特权，或者说是腐败。当时住在京都的74岁老人田村常次郎在日记中抱怨道：“那些富人可以拿着钱为所欲为，他们买光了下层人的货品和粮食，再拿回到黑市上去卖……这是个大鱼吃小鱼的时代。”^[6]

在这个警察国家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民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也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公开抱怨。实际上，他们都表现出一副支持战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自从这个国家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来，大部分日本民众已经逐渐习惯了战争，视其为一种自然的长期状态。许多人并不觉得征服并奴役其他民族有什么奇怪或者不妥的，听到军队在海外战斗胜利的消息，他们还会热血沸腾。但是到1944年夏末，他们开始意识到太平洋战争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随着盟军向西越过太平洋，任何看得懂地图的人都能看出日本的地盘在日益缩水。整个岛屿的日本守军一次又一次全部“玉碎”而亡。这和在战争中的中国截然不同。这是一场与想要占领日本并解除其武装的对手进行的全面战争，这个敌人有力量而且有意愿来做到这一点——想要避免彻底毁灭，唯一的希望是乞求征服者的怜悯。老百姓意识到真相之后，失败主义的情绪便蔓延开来。这种情绪的蔓延在1944年7月出现了一个拐点，当时塞班岛丢失，东条英机首相下台。

普通民众开始私下里或者在个人日记里尖锐地质疑官方报道的可信度。为了将真相与宣传区分开来，人们不可避免地陷于流言之中。警察

部门花费了很大力气，想要压制流言的传播，但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是徒劳的，因为老百姓现在有无数的理由来担心自己的安全和国家的未来。人们还是不太敢公然蔑视政府，但是消极抵抗的迹象却越来越多。普通民众越来越多地抱怨官员的腐败和黑市的贪婪，他们在法定的民防和防空演习中对地方官员嗤之以鼻，敷衍了事。拖拉、旷工、偷懒和装病的情况在工作场所和强制的社区活动中已经屡见不鲜。根据日本工业杂志《钻石》的统计，日本军火工厂的每日缺勤率在1943年时为10%，1944年增加到了15%。^[7]违法行为、故意破坏和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许多日本人都发觉社会中不再有基本的礼貌，道德开始滑坡，诚实也越发罕见，对此人们予以谴责。人们参加半强制性的爱国集会、游行、送别出征新兵活动时的热情已不复当年。一名阵亡军人的母亲拒绝参拜为国战死者灵魂所在的靖国神社。她说：“那些失去宝贝孩子的人来到靖国神社，被逼着像乞丐那样蹲在白沙池里，还要不停地点头，我永远不会去那种蠢地方。”^[8]

从7月起接替东条担任日本首相的小矶国昭，私下里表达了对日本民众士气低落的担心。他的内阁开始讨论是否应该放松新闻审查，以求恢复政府日益降低的可信度。于是在一番锣鼓喧天之下，内阁情报委员会宣布要在报界和广播媒体中推行“言论自由”和“开启民智”政策。^[9]1944年10月13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解读说，这项新政策将会“开辟人民公开表达想法的通道……人们不再需要低声秘密地交流观点了”。坦诚而真实的战争报道将有助于提升日本人民的士气，让他们“感到幸福和快乐”。^[10]

就在第二天，传来了子虚乌有的台湾海域大捷的第一份报道。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一个媒体联络官手里拿着一瓶清酒冲进媒体室。“这是一枚鱼雷，”他叫着，用手里的瓶子比画着，像是一枚航空鱼雷高速冲进了一艘美国军舰的舰体，“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来啦！这就是神风！神风！”^[11]他说战报还在陆续发来，但是返航的日本飞行员的说法都是一致的——他们赢得了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开战以来最大的胜利。他

打开了瓶子，让记者和军官们举杯共饮。

第二天早上，《朝日新闻》头条报道了“史上罕见的巨大战果”。报纸上说美国人损失了50万吨军舰，2.6万名水兵战死。[\[12\]](#)东京民居密集的大街小巷都回荡着NHK新闻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日本人估计的战果上涨了一整天，到下午3点，帝国大本营最终宣布，日本战机击沉了10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还击伤了3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11艘型号不明的其他军舰。[\[13\]](#)

就连没接受过教育的平民都看得出这些战果不正常，但是官方自己却似乎深信不疑，这些报道还引用了参战日本飞行员的证词作为佐证。据他们的说法，台湾之战将会是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胜利——甚至比东乡大将在对马击败俄国舰队那次还要大，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歼灭性海战胜利。无线电通讯员被派出去做街头采访，了解日本民众的观点。每过几个小时，就会有新的官方声明发出来，带来新的令人振奋的详细消息。报纸纷纷加印“号外”，民众则在各处报亭前排长队等待。小矶首相打着官腔说，这次伟大的胜利验证了此前已经公开讨论了超过一年的“诱敌深入”战略。德国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代表阿道夫·希特勒发来了贺电。昭和天皇也宣布设立一个公共节日来庆祝这次“辉煌的胜利”，并说要为全国每个家庭发放一份特殊口粮“以示庆祝”。日本人现在可以重拾战争初期的那种兴奋情绪了——就像1942年春季的时光又回来了，那时候每个星期都会传来一两次令人激动的捷报。[\[14\]](#)

就在第一份台湾捷报发回后不到24个小时，军队高层就意识到这一战果被极度夸大了（这还是客气的说法）。真相要到战争结束后才会揭晓——只有两艘美军战舰被鱼雷击中，而且还没有沉没，但10月14日的空中侦察报告却足以证实第3舰队大部完好。福留繁说，他到这一天结束时就知道“对敌伤害轻微，我确信对菲律宾的大规模进攻很快就会到来”。[\[15\]](#)宇垣缠将军在日记中评论道：“有些情况下为了鼓舞士气，夸大战果可能是必需的，但那些战斗指挥岗位上的人一定不能用夸大所取

得的战绩来自欺欺人。”^[16]10月18日，在帝国大本营，海军的计划制订者向陆军同僚公开承认，日本舰队不太可能在下一次与美国人的激烈海战中幸存（遑论取胜）——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打下去，好让联合舰队“死得光荣”。^[17]

然而在面对日本公众时，覆水已然难收。政府和新闻媒体既然已经发布了胜利的报道，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咬死不改。裕仁天皇已经批准发布捷报，这位现人神签发的公报可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不仅如此，关于万民痛恨的美国舰队被消灭的假消息也满足了全国上下对随便什么好消息的发自内心的渴望。所有人——军队领袖、记者、编辑，以及普罗大众——都迫切想要相信这些好消息是真的。到这个时候，这些新闻至少还能缓解一下日本人潜在后果严重的巨大心理压力，并缓和关于民众士气情况的担忧。站在战后的视角回头看，一名负责采访帝国大本营的记者总结道：“没有人故意说谎，这只是一种急性焦虑的表现，每个人都渴望着有好事发生。”^[18]

10月20日，小矶在日比谷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集会，这是一座建在东京市中心日比谷公园内的土红色十层大楼。会场上人山人海，参加集会的可能超过10万人，他们挤满了公园和附近的街道。大家挥舞着拳头，把帽子抛向空中以示庆祝。首相的讲话通过无线电进行了现场直播。他发表了对美国军队的长篇控诉，说美国战机轰炸和扫射日本平民，在战场上凌虐日军尸体；他指责美国抛弃了所有文明作战的伪装，“只是野兽般的凶手，不是人……神必然惩罚他们，给予他们毁灭性一击”。^[19]

小矶国昭的内阁成立刚刚三个月。小矶先前曾是朝鲜总督，秃头，有一副猫科动物似的威武面孔，正是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貌令他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称号。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率军打过仗，自然就没有战败的污点。由于已经离开东京两年，他也没有卷入政治阴谋和派系争斗，正是这些争斗导致了其前任东条英机在7月的下台。这些高层政治人物之所以选择小矶来担任首相，并非因为他是个格外值得期待的领导人，而仅仅是由于其他所有的候选人都有人反对而已。他的首相职位不

过是来自一种脆弱的共同认可，他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小矶于1938年退出了现役，没有资格担任陆军大臣，因而基本被排除在军事战略的讨论之外。后来，小矶坚称自己在任的9个月时间里，别人甚至都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军事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20]

把东条赶走并不能纠正日本战时政府的根本性缺陷。日本明治宪法的形式和具体条款表面上看仍然有效，但是议会党派却已被架空，实权落入了一部分军阀和官僚的个人和部门手中。陆海两军的领导人互不信任，其战略也常常背道而驰。内阁和各类相关人士可以开会交流观点，却没有一个人拥有在整个政府内推行统一政策的权威。在东条时代，最高决策主体是所谓的“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小矶继任后，这个会议被解散，代之以一个被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Supreme War Direction Council，缩写为SWDC）的六人小组，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以及陆海两军各自的总参谋长。此后，以及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中，这个内阁决策委员会被称为“六巨头”——虽然具体人员会有变更，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出的。

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变必须经过这六个人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这还要以得到参议院、皇室成员以及天皇本人的支持为前提。一如既往，决议要经过一番拖沓冗长而痛苦的“根回”才能达成，所谓“根回”意即深挖根源，寻找共识。一旦各方意见形成死结，便什么事都做不了。遇到这种情况，陆军和海军常常就会沿着自己的路线行动，而为了面子，他们又都会做出一副已经在总体战略各方面进行过协调的样子。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曾经当过首相，此时已回到政府担任海军大臣兼小矶政府的副总理，他说这个委员会即使进行投票也无法打破僵局。“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他在战后对审讯者如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就某一问题取得一致，就不会团结行动。”^[21]如果达不成共识，那惯性就会压倒一切。无论原先的方向如何，日本都会继续走下去。

43岁的昭和天皇裕仁，他本人长期支持东条，反对其他人想要赶他下台的努力。东条的首相生涯临近完结时，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

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批评裕仁，说他正在让国家滑向失控。天皇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重大，这是宪法中白纸黑字写明了的，但即使是对那些明明知道他并不是神的人，裕仁也有着无形的巨大权威。他对这场战争及其带来的痛苦所要担负的责任也一直是后世学者和历史学家激烈争论的议题。1941年12月之前，裕仁反对让国家滑向战争，他希望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保持稳定。他还要求打压和严惩军队中那些头脑发热的“下克上”分子。但他的要求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不具有强制力，只有在内阁偶尔陷入僵局后寻求“圣裁”时例外。1944年7月最终同意让东条英机下台后，他便开始推动新政府做好准备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但他也没有提出要和盟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以寻求停战。他相信若想要得到外交谈判的成熟时机，日本就必须首先赢得一次对美国的压倒性胜利，这或许就会发生在即将到来的菲律宾战役中。在他战后的“独白”中，裕仁说自己曾希望把日本残余的所有军事力量全都投入守卫莱特岛的作战之中：“然后，等美国人栽了跟头，我们就能够寻找妥协的空间了。”[\[22\]](#)

日本政府中没人敢讨论投降，就连要日本放弃1941年之前占领的海外领土的协议和解也不敢提。盟军至少得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同意坐到谈判桌旁。不过，日本的统治者们仍然知道在战争的最后交涉中外交手段必定会发挥作用，而且外相重光葵也在从几个方面同时推动这件事。日本开始通过驻欧洲中立国家的大使馆试探求和，包括瑞典、葡萄牙和瑞士。为了从中国脱身，重光葵的使节也已接触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提出只要蒋介石与盟国断绝关系，请求“善意中立”，就可以让日本军队撤出中国。这样的提议自然是没有下文，这一部分是由于日本政府选择的中间人根本不受蒋介石待见，同时也因为中国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太平洋上正一步步迈向失败。[\[23\]](#)

通过外交手段“收场”的关键计划是让苏联政府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一从来都不特别现实的计划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就已讨论许久，现在重光希望借此获得想要的结果。他手下的驻莫斯科大

使开始与克里姆林宫对话，他们提出的方案是由日本出面安排苏联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等欧洲东线战场重归和平，莫斯科再来斡旋调停太平洋战争。然而这套方案在1944年9月呈交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面前时，却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想法在苏德战争此前的任何其他时候提出来，都会收获好得多的效果——可现在却太晚了，盟军已经开始从东西两线向德国推进，这样的提议自然也只能无果而终。当日本人提出要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946年春季到期后续约时，莫洛托夫回答说此事不急，时间成熟后再议。重光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约瑟夫·斯大林已经向罗斯福透露他将会在击败德国后立即将部队调来进攻日本，或许他将会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就此做出承诺。日本的外交人员还一直徒劳地指望斯大林能帮助他们实现停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周苏联突然对日宣战。

实际上，日本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他们为外交停战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政府内外所有的领导人物都知道这一点。赶走东条只是外交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已，但若是在1944年秋季把国家方针突然转向求和，军队中那些强硬派会激烈反抗。宪兵一直监视着内阁首脑和其他领导人，防止他们暗中推动和平谈判。东条虽然已经失去了权力，但他仍能对国家安全机器继续施加影响，许多人怀疑这个被废黜的领导人还在准备政变。统治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国家会因此重回20世纪30年代那种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武装暴动和定点暗杀层出不穷的状况。而内战看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根据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军的说法，日本政府拿子虚乌有的胜利出来大肆庆祝的习惯令其反受其害，因为日本公众在思想上从来就没有准备过去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哪怕只是提出早一点儿结束战争，人民都不会理解。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战局的真相，日本人民之间可能会爆发内战……依我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宿命就是把这场极不明智的战争打到底，直到末日。”^[24]

小矶的公开言论从一开始就在走他前任的老路。他的腔调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他的内阁自然也就没有想要探索停战选项的样子。这位新

首相宣布，战争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新阶段，日本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以极度的狂热抵抗敌人。就在新政府上台的那一个星期，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将美国人称为“野兽”、“屠夫”和“魔鬼”的说法。美国《生活》杂志刊登过一幅照片，画面上是一个美国女子正在欣赏一个当作战场纪念品捡回来的日军头骨，这张照片也被日本媒体广为转载。据日媒报道，美国把监狱里的罪犯全都放了出来填充军队。“我们只能感到震惊和不齿，”NHK的广播评论员在1944年8月评论道，“美国人不会像普通的勇敢战士那样战斗，除非利用这些罪犯的野蛮。这证明他们只是一群野兽。”^[25]在1944年9月8日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小矶警告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敌人在我们国土上登陆的可能性。”^[26]他的内政大臣宣布了一份计划，要对全国的平民进行徒手格斗训练。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要加入国土防卫军：只要海上来的凶恶强盗把他们肮脏的靴子踏上日本的神圣海岸，他们就要用自制武器和竹枪进行抵抗。

随着美军拿下马里亚纳群岛，其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已近在眼前，于是日本政府下令采取新的民防措施。1944年8月16日，国土交通大臣宣布实施一系列举措以“应对空袭、舰炮炮击和其他形式的攻击所导致的交通中断”，其中包括“医疗急救、应急物品发放、巡逻、人员撤离、预防瘟疫、供水、清除瓦砾，以及紧急恢复正常运转”。^[27]成排的房屋和建筑被拆除，以在城区留出防火通道。学生们被召集去制作称为“气球炸弹”的堪称“奇幻”的武器，这种武器能上升到平流层，顺风飘行5 000英里，越过北太平洋，随机攻击美国本土。各种讲话、报纸文章和无线电广播中都满是宗教和神话的内容。小矶是个虔诚的神道教信徒，他刚刚上任就公开参拜了伊势神宫，喊出了一句新的民族口号：“众神之主必将重拾对国家的责任。”^[28]这一意图不明的说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神示：当至高危机来临时，昭和天皇将会召集古代众神回来保卫国家。

美军的下一轮主要进攻无论落在菲律宾、台湾岛，还是琉球群岛，都会严重危及日本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和其他自然资源区的经济生命

线。这将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崩溃，同时使其舰队无法行动，使得日本诸岛上的守军无法得到海上支援。日本政府两年多以来不停的欺骗宣传将会被戳破。与此同时，日本唯一真正的盟国显然正在输掉欧洲战争。任何一个对全球战事有基本了解的日本人都知道，自己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把很大的赌注下在了纳粹德国能够赢得战争之上。如果眼下的趋势维持下去，那么赌桌上成堆的筹码都会被一扫而空。

到当时为止，日本人打了很多败仗，但日本人虽已开始挨饿，却还不至于饥荒。到了1944年秋季，其粮食状况看起来已经到了大幅恶化的边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日本本土尚未遭到猛烈轰炸，但其国内稻米产量仍然下降了超过10%。粮食进口明显下滑，而且随着日本商船队在美军空中力量和潜艇的绞杀下日渐减少，这种下滑还将愈演愈烈。1944年7月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几乎每一类食物的产量都在下滑，“1944年的国民生活标准相较上一年将有较大缩水”。[\[29\]](#)恶劣的天气也是一小部分原因，1944年的稻米收成受到了持续强降水的威胁。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在1945年时可能出现灾难性的锐减，这是由可以预见的船舶损失、能源危机，以及空中轰炸导致的道路和铁路运输崩溃共同造成的。

挨饿是一回事，饥荒是另一回事。日本领导人所担心的饥荒，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并危及其统治基础。日本民众之所以支持在海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国内可以有更高的生活标准。但是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生活却日益艰难，而且这种穷困还遥遥无期。在对美开战前，年轻的陆军军官们曾威胁要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以缓解日本民众遭受的贫困，这在1936年几乎酿成了政变。而现在，统治高层中有人指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也是由饿着的肚子和对外战争的灾难性失败导致的。于是，直到1945年8月投降，控制国内的紧张态势都一直是日本制定政策时的一项主要考虑因素——无论是民生、政治、外交，还是战略政策。

1944年9月，裕仁审阅并批准了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计划代号“捷”，取中文“胜利”之意。“捷号”计划分为四个方案，分别基于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的四种可能性。“捷-1号”计划到“捷-4号”计划分别应对美军向一条地理弧线上四个不同区域发动两栖进攻的可能性，从南到北依次是菲律宾，台湾和琉球，本州岛，以及北海道岛。然而从一开始，日本的计划制订者就认为下一场大规模作战最可能指向菲律宾，并且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制订“捷-1号”计划。他们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受到麦克阿瑟那著名的关于重返菲律宾的公开发誓的影响。[\[30\]](#)

“捷-1号”计划体现了日本海军一贯的诸多作战特点。其计划十分复杂，将部队大范围分散，从多个方向接敌。这依赖于各分舰队之间精确的时间协同，因而很容易被打乱。日本先前的许多战役计划都包含了佯攻、诱饵，以及其他欺骗行动：与此相似，“捷-1号”唯一真正的成功希望也在于战场欺骗。栗田健男将军的“第一游击部队”拥有联合舰队的大部分水面作战力量，他们将从文莱启程北上。通过菲律宾群岛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时，其舰队的一部分将在西村祥治将军指挥下转向东南，主力仍将跟随栗田向北航行。这两支分舰队将分别通过两条不同的水道穿越菲律宾群岛，南边的苏里高海峡和北边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同时，小泽治三郎将军麾下拥有日本全部剩余航母的“第一机动部队”，将从濑户内海出发，从北边加入战场，以图将哈尔西第3舰队的主力诱离滩头。如果一切如愿，则栗田和西村两支纵队将会冲出海峡，以钳形机动攻击麦克阿瑟的登陆舰队。日军知道，这支舰队将搭载大约10万名敌军，并有数百艘满载着武器、装备以及支援登陆所需物资的货船。日军计划的关键在于让栗田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与已展开登陆行动的两栖舰队实现近距离战斗。

这是个庞大而恢宏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所有高级将领都知道的那样，“捷号”计划实际上是由燃油供应紧张和舰队补给困难所导致的机动性和作战半径的限制所决定的。燃油供应地远在南方的文莱和苏门答腊的油田区域——而船厂和维修设施则位于日本本土列岛，同样需要由

本土提供的还有保持舰队战斗力所必需的各种补给物资、武器、弹药和后备人员。日本人已不可能再将足够数量的燃油运回本土以满足舰队的迫切需求，而且随着美军潜艇和飞机不断猎杀并击沉这个国家本已所剩无几的油轮，这种短缺还将雪上加霜。因此，舰队的大部分力量不得不停泊在遥远南方的锚地中，以靠近帝国的原油产地。但是小泽的航母部队却无法同行，他们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20日）中几乎失去了全部的飞机和受过训练的舰载机飞行人员，需要接收新的补充飞行队并进行训练。由于日本此时飞行员训练和飞机工厂的糟糕状况，他需要让航母在日本海域停留一段时间，可能至少需要三四个月。

既然这些舰队之间不得不相隔数千英里，栗田便从小泽的指挥下脱离出来，受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直接指挥，后者不久前刚把自己的司令部从停泊在东京湾的一艘指挥舰上搬迁到横滨市庆应义塾大学日吉校区中的一座地堡里。小泽和栗田将会通过由日吉发出的长程无线电各自接受命令。这种将日军舰队主力分散布置的做法远远称不上理想，但考虑到糟糕的后勤状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如果日军能有机会向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发动全力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将主要依靠水面舰艇部队和陆基航空兵，因为没人会太指望小泽已经残废的航空母舰部队或者是已遭严重削弱的日本潜艇部队。“捷号”计划的主要难题在于，要将分散在各处的日军海空力量开到指定位置参战。为此，12艘舰队油轮被指派去为栗田舰队加油。这些加油船原本计划在10月进行海上补给训练，但是随后又被取消了。现在剩下来的每一艘油轮都十分珍贵，对燃油状况的管理经不起什么差错了。现在就连栗田舰队在战斗结束后是否还有足够的燃油安全返航都保证不了。无论美军何时发动新一轮进攻，小泽对战役的贡献都将取决于其舰载航空兵的状况。没人指望日军航母部队能与其对手一较高下，小泽也知道自己将会再一次被痛打，而给对手的报复则会微乎其微。鉴于这一悲观前景，日军决定，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母机动部队将在此战中被用于诱敌，其任务是为栗田拉开一道通往登陆舰队的缺口。小泽也愿意担任这一卑微的任务。“诱饵，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去充当诱饵，”他说，“主要

任务就是全部牺牲。用十分虚弱的航空兵发动进攻，而目的就是要牺牲掉所有的飞机和军舰。”[\[31\]](#)

7月的政治风波之后，日本陆海两军的领导人都表示今后要密切配合。然而迟至10月的第三周，当麦克阿瑟的进攻舰队已经启程开往莱特时，两个军种依然是各拿各的剧本。陆军将领们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派遣部队前往增援莱特岛。有些人想要继续加强陆军在吕宋岛的力量，即便这意味着要把莱特岛拱手让给美国人。

10月18日，在东京的军官俱乐部里，四名将领（陆军省和海军省各一人，两军总参谋部各一人）聚在一起，想要敲定防守菲律宾的联合战略。评估了“捷-1号”计划之后，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将军在最后时刻提出了反对。佐藤承认日本民众正“哭求”舰队与敌决战，但他坚持最高司令官必须保持“冷静”，不应该草率迎合公众的想法。他说，如果联合舰队现在出战，就很可能遭到毁灭性失败。还不如把小泽的舰艇留在港里，这样它们至少还能发挥一些威慑作用，防止敌人靠近本土。不仅如此，佐藤还指出，舰队仅仅是开到战场就需要烧掉大量宝贵的燃油。此时，六艘油轮组成的船队已经准备好开向南方，船上运载着6万吨燃油。日本战时经济的运转也需要这些燃油。佐藤问自己的海军同行：“联合舰队现在出去打仗能得到什么？还不如那6万吨燃油来得重要。”[\[32\]](#)

一席话令屋里的所有人，包括佐藤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他毫无遮掩地点破了日本的尴尬处境。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的荣耀，现在已经比不上六艘油轮及其运载的燃油了。连一位陆军的将领都看得出，舰队的衰微预示着失败。“这是我体验过的最伤心的感觉。”佐藤写道。

海军军令部的中泽佑少将哭了出来，他代表海军回答了佐藤的问题。他首先感谢了陆军将领的善意，但是“现在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希望能得到一处葬身之地”。由于燃油短缺以及敌人对制空权的掌握愈加牢固，“捷号”计划便成了让舰队“光荣地死去”的“最后机会”。中泽总结

道：“这是海军最诚挚的愿望。”^[33]

一阵哽咽之后，佐藤也泪流满面，他同意让这6万吨燃油作为送给海军的“临别礼物”。散会时，外面街道上响起了空袭警报，于是他在心中默祝“联合舰队能有一个英勇的终结”。^[34]

这貌似动人的情景之下，隐藏着一个常常为西方莱特湾战役史所忽略的事实。“捷号”计划实质上是日本海军的“万岁冲锋”。它未言明目的是保证日本舰队能在战争结束之前再最后好好打一仗。联合舰队参谋部的高田利种少将说：“国内已经有人开始问，海军在南洋败了一场又一场，比如马里亚纳和比亚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35]日本的水面舰艇部队自前一年所罗门群岛战役结束后就一直无所事事。军容严整的战列舰队从足足两年前的瓜岛海战以来就完全没打过仗。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甚至从没有在主炮射程内见过任何一艘敌舰。日本斥巨资在吴和长崎建造了这对大家伙，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舰，日本人对它们打赢战争的能力寄予了厚望。但它们在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港口度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出海作战需要大量燃油。于是两舰便双双成了舰队司令及其参谋部豪华的水上司令部。它们的无所事事、未曾一战已经在舰队各层次中引发了抱怨，这两艘舰也因此被戏称为“大和饭店”和“武藏饭店”。若让这两艘巨舰在锚地终此一生，其18英寸主炮连一次向敌舰开火的机会都没有，那将是不可容忍的耻辱。指挥这两艘战列舰的栗田将军在菲律宾战役打响前夕向他手下的军官们问道：“如果国家灭亡而舰队却保持完整，这难道不是耻辱吗？”^[36]

在战后审讯中，日本海军领导人承认他们根本没真正指望能守住菲律宾，他们预期自己将遭到毁灭性损失，甚至全灭。但他们仍然选择无论如何都要打这一仗，因为他们认定保留舰队来日再战已经没有意义。无论美军能否拿下菲律宾以及何时拿下菲律宾，他们都必然会掐断连接日本及其原油产地的海运线。高田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舰队能留存下来，通往南洋的海运线也会被完全切断，这样舰队如果回到日本本土，就不会再有燃油补给；如果它留在南洋水域，就无法得到弹药和武

器的补充”。别无选择之下，日本人决定“赌一把”，他们知道，“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整个舰队”。^[37]栗田将军说，他已经准备好损失自己一半的军舰，以换取“毁伤你们在莱特湾中所有舰船的一半”。他还补充说，即便做到了这一点，也无法阻止麦克阿瑟登陆，而仅仅是“将登陆推迟两三天……因此这就是个有限的目标，将某一场登陆推迟两三天。对于后续的登陆我们便无能为力了”。^[38]至于小泽，他已经成了空架子的航空母舰将被用作引诱哈尔西的诱饵，“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39]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台湾外海航空作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是在10月15日，当时哈尔西正向东回撤，受损的“堪培拉号”和“休斯敦号”也在缓慢撤退。这天，吕宋岛上的第二十六航空队司令有马正文少将摘掉了军衔徽章，爬进一架三菱G4M轰炸机的座舱，向敌人舰队发动了一次单程自杀撞击攻击。他的飞机攻击“富兰克林号”航母未成被毁，也可能是坠海，反正是没能返回基地。但是东京却报道说这位“军神”有马将军主动俯冲撞击了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并将其击沉。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称，这次事件预示了政府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自杀攻击。当太平洋空战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拉开时，日军飞机就会由自愿在爆炸的火球中献身的人驾驶，变成致命的导弹。

“神风”一词此时还没有和自杀飞机扯上关系——它指的仍然是7个世纪前摧毁了蒙古来袭舰队的那次神话般的天降台风。不过，日本人所说的“必中武器”和“肉弹”战术的执行人已经被称为特攻部队。这种特攻作战将不仅有飞行员和飞机参加，同时还有其他专门制造的自杀武器，包括快艇、背着氧气瓶的水鬼、人操火箭，以及小型潜艇。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史学著作总是倾向于忽略这种有组织的自杀战术在日本乃至日军中引发的争议。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对此都是强烈反对的，认为此举误解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有些海军军官将这一想法和日

本陆军中盛行的不理智的“死亡崇拜”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在海军中不应有一席之地。老航空兵们还记得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空战胜利，“神风”攻击在其眼中实质上无异于未战先败。其实日本飞行员一直都在俯冲撞击盟军舰船，或者撞落盟军轰炸机——但在1944年秋季之前，这些攻击都是偶然和随机的，常常只是在飞机受损无法返航时出现。著名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在第一次被部队指挥官命令执行自杀任务时震惊了。“我顿如五雷轰顶，”他回忆道，“他在说什么？我心中一团乱麻。脑中泛起厌恶感，令我感到寒冷、沮丧。”^[40]坂井说，一名飞行员必须做好战死的准备，但这并不包括“肆意挥霍人的生命”。^[41]

战后，日军领导人遭到了严厉指控。他们被指控出于不当目的而引诱数千年轻人进行飞行训练。控方提出，在1944年初，军方就开始秘密计划把大部分新飞行员训练成“神风”特攻队员，并把此事掩盖到受训者无法退出时才告诉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一直充满着各种禁忌（至今也是一样）。历史记录残缺不全——尤其是关于谁知道什么事以及何时知道的这种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有相当多的证据能被用来进行指控。在“神风”队员招募计划的初期，任何文字中都不允许提及自杀战术，命令只能口头下达。曾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少尉的神津直次当时自愿加入人操鱼雷计划，却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杀武器。他和同行的新兵仅仅被告知必须要“愿意执行危险的任务”以及“愿意使用一种特别武器”。战后回看，屋久总结道：“今天，我知道他们骗了我们！发自内心地知道。”^[42]

在战后的审讯中，日本海军有些高级军官诡称“神风”战术最初是由一线作战部队提出并实施的。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猪口力平大佐称，这个想法是由驻菲律宾基地的航空部队自发提出的，“纯粹是那个基地自己的策略”。^[43]面对“神风”作战计划是在麦克阿瑟登陆莱特岛之前由东京方面制订的证据，猪口仍然狡辩道：“这种东西只能是由基层发起，你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从来都没有下过执行‘神风’战术的命令……‘神风’的想法最初是为了应对当地的情况，并非大本营下发的全局政

策。”^[44]但记录显示，这些声明都是假的。无独有偶，丰田大将也告诉审讯自己的美国人，最初的“神风”空袭是“决定将第二〔航空〕舰队派往莱特湾带来的意外结果”。^[45]他将这一主意归于菲律宾当地的航空兵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说：“如果地面部队正在采取这样的拼死打法，那我们也必须跟上，让所谓的特攻部队亮相。”^[46]这也是错误的：在莱特湾战役之前很久，丰田的联合舰队参谋部就开始讨论和筹划自杀作战。小泽的供词也同样左右摇摆。起先他坚称“我第一次听说‘神风攻击’是在栗田舰队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时”。面对相反的证据，他又突然回忆起1944年6月时“这个方案就被提交给了丰田。丰田说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用这种战术太早了”。^[47]

实际上，“神风”作战早在首次亮相太平洋战场之前一年多，就已经在被研究、讨论和规划了。当时担任航母舰长的城英一郎大佐曾任裕仁天皇的海军顾问和驻华盛顿大使馆海军武官，他在1943年6月内部传阅的一份计划中就提出要建立一支“特攻部队”。^[48]1944年3月，下台之前的东条英机批准了建立志愿自杀部队的初步计划。于是及川古志郎大将（1944年底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开始推动这一战术在整个海军航空兵中落实。^[49]自从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之后，日本的报纸和新闻广播中便充满了“必胜武器”和“肉弹精神”的宣传。10月6日，就在第一支自杀飞行队于菲律宾成立的几个星期前，一名日本海军将领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海军航空兵很快就会开始采取“肉弹”战术，以“撞毁敌机或敌舰”。他期望这样的攻击能扭转战争态势：“这种战争方法，我确信，一定不会失败。相反，它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的——它只会越来越强大。”^[50]

1944年秋，一系列特制的自杀武器已经开始量产。其中包括一款人操火箭“樱花”，这种武器由大型飞机投放，之后以接近声速的速度向敌舰冲击。一种被称为“回天”的单人自杀潜艇，由大型母艇放出，驾驶员随后驾驶它，如同一枚鱼雷一样冲入敌舰的舰体。一种被称为“震洋”的

小型木质快艇，可以携载2吨重的战斗部，以50节的高速冲入敌人舰队中央。“伏龙”，背着氧气瓶的潜水员带着炸弹在水下设伏，并直接把炸弹安放到美军舰船底部。还有其他一些，包括从山顶起飞的滑翔机，还有不免让人联想到今日现实的爆炸背心。这些武器和载具，打起仗来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差。但是日军在这些计划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却戳破了他们关于“神风”时代是1944年10月时由基层官兵自发掀起的谎言。

日本和西方的有些学者声称，这种“神风”现象只是外在表现，其背后是日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包括武士道、神道教、佛教禅宗，以及自杀雪耻的传统。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神风”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强加在懵懂无知、手足无措的人们身上的，是日本式的荒谬异端。其实这两派观点都能找到一些事实根据。神道教和佛教都主张自我只是虚幻，因此死亡并不可怕。神道教中的一众神明则围绕在天皇周围，据说每个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战死是一种自我净化，能够燃烧和洗刷前半生积累的尘埃和腐物，只留下战死者一尘不染的灵魂，与天皇的圣灵合为一体。禅宗和其他佛教流派的信徒都持有一种良善的教义，其基础是认为生与死实际上是同一的。所谓冥想就是要超脱自我。根据陆军军官兼知名作家杉本五郎的说法：“自我超脱与自我毁灭绝对不是互不相关的。恰恰相反，人们会认识到它们是一回事。”^[51]一位佛学学者将“神风”战术和禅宗的真谛联系到了一起：“特攻部队的精神源于抛开自我，让灵魂重生，这种精神来源于历史的传承。自古以来禅宗就将这种思想转变称为大彻大悟。”^[52]

自杀，一直都被视为武士荣耀和忠诚的理想象征。自杀可以洗雪脸面的丢失，这也是日本史诗“四十七浪人”故事的中心思想。在已经必败无疑的1944年后期，整个国家都将面临脸面无存的窘境。而这些进行自杀作战的“神风”飞行员，日本年轻人中的骄傲，则可以被视为老一套的用来为国家挽回部分颜面的祭品。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所说的“幽谷”时代拉开了序幕，一

个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持极端民族主义态度的政府消灭了所有的不同意见，垄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在此黑暗的环境下，学术骗子们被鼓励捏造一些半神话的历史，以满足军国主义日程表中重要内政和外交事项的要求。在几个世纪的日本历史中，武士统治了国家及其人民。尤甚于中世纪欧洲或者其他封建社会的是，精英武士阶层统治并且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日本人认为武士理想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样板，把日本变成由武士组成的优秀民族——好让国家获得国际霸权，就像武士们在普通日本人面前拥有无可挑战的权力一样。但武士道一直是一种精英化、阶级属性明显的信条，不一定适合全民普及。于是在变革过程中，它也进行了不明显却重大的变动。古代佩刀武士的武士道，强调的是对地方封建领主的狂热忠诚——不是对天皇，在明治朝之前，天皇不过是个模糊而无足轻重的偶像而已。武士道意味着坚忍、自律，以个人担当而自豪；它强调在长期训练和实战中精通搏击；它崇尚为履行使命而牺牲自己，丝毫不惧怕死亡；它还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粗茶淡饭，无欲则刚，不追求舒适、美味和奢华。武士们“视生如死”，这与佛教的观点相一致；武士们要将死亡视为一种宿命的常态，而不要依恋原本只是虚幻的生命。耻辱和蒙羞需要用自杀来弥补——当一个武士自杀时，他要用短刀切腹。

但传统的武士道并没有要求在取胜无望时也不能撤退或者投降，过去的武士只要在作战时尽职尽责，便不会因走投无路而投降名誉受损。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日本的武士们世代都在学习中国的这一军事经典：“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未败者，胜之转机也。”^[53]自杀战术在过去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自从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日本陆军的文化和条令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步兵操典被改写，其对“战斗精神”重要性的强调超过了诸如技术和机械力量等因素，上刺刀的大规模“万岁冲锋”也被视为近距离作战中的首选战术。“不可投降”的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付诸文字，并在1928年修订版的作战手册中升级为绝对禁止投降。日本陆军及其宣传机器原先并没有明确宣扬自杀战术，但自从1932年在

上海及周围爆发战争开始，关于“人体炸弹”和“肉弹”的报道就频频见诸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期，这又演变成了为战败而亡的人大唱赞歌，以“玉碎”来称颂他们。有一首叫《海行兮》的歌地位直逼日本国歌，歌词中没怎么提及胜败问题，反而对为国而死大加赞颂：

海行水渍尸，

山行草生尸。

吾为君亡，

死而无憾。[\[54\]](#)

在广播中和爱国集会上反复播放这首歌，会给日本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海行兮》及其所含的精神古已有之。但实际上其歌词只能上溯至18世纪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本身并不知名，而谱成歌曲则是1937年的事。大张旗鼓地宣扬战死——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结束——还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新现象，就像“决不投降”信条、大规模自杀攻击，以及帝国主义武士道中的优秀民族理念一样。这些思想和武士传统完全沾不上边。明治时代之前日本武士只和日本人打仗，没有机会产生民族沙文主义，也不会想要去征服外国。若有人对他说他和其他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他大概只会头晕。传统武士道赞美谦逊的态度以及了解并尊重敌人的美德，却不会宣扬愚蠢的好战，也不会指望上天来保佑胜利。但是古代武士信条中的这些元素并不能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军政府的目标，于是它们都从历史、教育和公众言论中被剔除了。

1944年，自杀飞机战术有一个简单实用的理由：日本新手飞行员技术不好，无法使用传统的轰炸或施放鱼雷的办法来打击敌人舰队。派出去攻击近岸美军军舰的日本机群遭到了灾难性损失，敌人的舰载机却铺满了菲律宾的天空，无人能与争锋。日军仅仅在10月就损失了近1 000架飞机，而飞往菲律宾航空兵基地的补充飞行员都仅仅掌握最基础的技

术。那些匆匆学完缩水了的训练课程，被派往前线部队的飞行学员都只有短短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记录。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射击和导航训练。如果这些新飞行员无论如何都会死在座舱里，那么自杀战术或许是打退敌人的唯一现实希望。

负责为“神风”战术训练新飞行员的猪口大佐说，这其实是个精神问题——反复灌输去执行这种任务的意愿。从战术角度看，他说：“飞行员有基础技术就足够了，不需要特别的训练。”相较于俯冲轰炸、鱼雷攻击或者空中格斗，驾驶飞机向敌舰俯冲是个相对简单的机动样式，哪怕只有最基础飞行技术的飞行员也足以驾驭。因此，猪口说，使用“只经过短期训练和具有最少飞行经验”的飞行员是可能的”。^[55]不仅如此，当修订后的“捷号”计划被分发给这一区域的各级指挥官时，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日本人还指望击退麦克阿瑟的登陆，他们的航空兵就必须至少消灭一部分美军舰队。他们面临着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打出战果的沉重压力。

“神风”特攻队于1944年10月20日成立，就在同一天（严格说来是同一个小时），麦克阿瑟将军跟在两栖进攻部队后面涉水上岸。推动“神风”成军这一重大进展的催化剂是大西泷治郎中将，他刚刚于10月19日从日本飞来接管第一航空舰队。大西面相凶恶——大饼脸，板寸头，体型如同运动员一般匀称而结实。他是个令人惧怕的人，同僚们都知道他会突然发脾气；作为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他常因为向同僚和其他人动粗而被训斥——尤其是在酒后。他出生在神户附近兵库县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操着一口圆唇音很重的关西口音。和他后来的好友兼导师山本五十六一样，大西在军旅生涯的初期也投身于海军航空事业。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探索期之后，他就在一系列重要的航空兵岗位上任职，包括在岸上和海上。此人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成立和1941年12月在6 000英里战线上成功发动空中闪击战贡献良多。大西也反对对美开战的决定（和山本一样），但他还是参与制订了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并亲自指挥了曾在开战第一周屠灭驻菲律宾美国航空兵的驻台湾各航空队。

当1943年第一次见到自杀战术的提案时，大西坚决反对这一想法，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对这种“异端邪说”持反对态度。^[56]毫无疑问，大西个人对这一话题充满厌恶，就在两年半前，他的第一支航空兵队伍还赢得了诸多大捷，荣誉满身。但是他在1944年10月掌管第一航空舰队时，不得不直面他这支新部队的严峻现实。菲律宾的各个航空兵基地只有大约50架飞机还能飞。援军当然很快就会从中国战场和日本本土涌来，但敌人舰队却已经杀到了家门口。除了少数几个老手之外，他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传统的轰炸战术已无意义，大部分派去执行此类任务的飞机都回不来。

10月19日抵达马尼拉当晚，大西就乘坐一辆黑色帕卡德商务车前往吕宋岛上的主要航空兵综合基地——马巴拉卡特机场，也就是美国人所称的克拉克机场。由于美军战斗机有时候会扫射道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天黑后开两个小时的车过去。但另一方面，夜间开车同样危险，因为抗日游击队有时也会在路边发动袭击。即便是在美军尚未登陆菲律宾的此刻，日本人想必也已经有了自己正在失去这个群岛的觉悟。

抵达马巴拉卡特后，他在一条满是弹坑的跑道和一排破旧飞机旁的一顶指挥帐篷里找到了当地第二〇一飞行队的参谋部，由于地勤人员的努力，这些飞机还勉强能上天。用的零部件都是从堆放在机场边缘的废弃飞机上拆下来的。那里的参谋军官和飞行队长都被召集到镇上的司令部楼里。根据在场一名飞行军官的回忆，大西的讲话简明扼要，语气平淡，直奔事实：“依我看，只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孱弱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那就是用挂载250千克炸弹的零式战斗机组成自杀攻击部队，每一架飞机都要撞中一艘航母。你们怎么看？”^[57]

起先无人答话，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慌乱。但是也没人反对。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战术问题是，怎样让零式战斗机当好人力制导导弹。飞行员及其长官们都同意自杀机应该从1.8万英尺左右的高空接近敌人舰队。被美军雷达发现后，飞行员就要快速下降到二三百英尺的超低空，以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同时他们还要投放“窗户”——铝箔条——

以欺骗敌方的雷达手。最后向目标冲刺时，飞行员将要压低机头，以45°角俯冲撞击。^[58]

散会后，各飞行队聚集在一起再次讨论。不久，各飞行队长一个接一个跑回来说，他们的飞行员一致同意：就这么干。许多人都受到了刚刚战死的基地司令官有马将军的榜样的鼓舞，他在5天前牺牲了自己。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得知了整个日本海军都将冒着全灭的危险向莱特湾冲锋。大家都很坚决，甚至是狂热。一名飞行员伤感地评论道：“这个时候，这看起来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了。”^[59]众人认为新部队的指挥官最好是一位科班毕业的人。参谋和指挥官们讨论了一番之后，决定让关行男大尉担任这一职务。接到通知后，关大尉毫不犹豫地答道：“务请让我来干！”^[60]

新组建的自杀机航空队仅有26架零式战斗机，分成四个队。其中三队以马巴拉卡特为基地，第四个队驻南边的宿务岛。其中一半飞机将用于护航和观察，其余则负责撞击敌舰。这样，第一支“神风”部队将只有13架飞机实际用于自杀撞击。司令部将这支部队用汉字命名为“神风”，日语发音“kamikaze”，这支部队便被称为“神风特攻队”，不过此时这个称呼还没有流传开来，那是以后的事。^[61]

日军指挥高层对这13架自杀机寄予厚望。有人甚至觉得它们可能会全部撞中目标，或许会击沉多达13艘美军航空母舰，如此毁灭性一击将足以击退对菲律宾迫在眉睫的进攻。因此，日军期待这支小小的新“神风”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较量中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这第一次有组织地使用自杀机的战术还有另一面，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神风”计划也是一场同时针对日本作战部队和民众的公关和宣传行动的核心。10月21日，大西将军主持了一场伤感的送别仪式，他向即将启程的自杀机飞行员挥手告别，飞行员们立正，然后举杯饮下最后一杯壮行酒。他们齐唱《海行兮》，向将军敬礼，然后爬进座舱。第二天，这样的仪式又举行了一次。参加仪式的还有一组战争通讯

员、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毫无疑问，新的“神风”战术将会在日本国内广为人知。这一公关措施的目的和前一周虚报台湾大捷其实如出一辙。这些都是旨在激发各航空队本身自信心的宣传措施。这时的日本航空队已经开始绝望，因为怎么做都无法挑战美军的空中优势——如猪口所言：“没有什么比确信敌人具有优势更能摧毁士气的了。”^[62]

这种宣传也面向国内阵线。眼见日本民众日益显露出对战争的疲倦，东京政府想要给大众的情绪打一剂强心针。年轻战士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场面或许能刺激人民努力工作，付出更多牺牲，掀起为了国家渡过危机而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战争的高潮。日本的新闻媒体此时已经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不久前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后，有马将军被奉为“军神”，政府要求人民以他为榜样，为战争做出更大的努力。许多社论中还有一个未言明的论调，那就是老百姓要为他们作战部队付出的牺牲而感到羞愧，必须要工作更努力，吃得更少，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有马的同僚野村吉三郎将军则在无线电广播中要求日本工人“在生产战线上以‘肉弹’精神进攻”。^[63]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神风”也是针对敌人的宣传战。这是日本的思维方式，或许能称之为日本太平洋战争“理论”的集大成者——这是一条逻辑线索，隐藏在他们1941年12月毫不理智地决定进攻美国背后，他们在如此决定时清楚美国的工业实力比日本强十倍。日本人所特有的“战斗精神”——常被称为“大和魂”——被用于解释为什么日本从未被征服，也从来没有输掉过战争。战后，日本陆军的河边虎四郎将军告诉前来审讯的美国人：“我想要解释一些很艰深的东西，你们或许无法理解。日本人直到最后都相信可以凭借精神力量和你们一决高下……我们相信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念能抵消你们的科技优势。”^[64]

这是一种宗教信条，根植于日本天皇的神性，以及（通过他根植于）日本的民族性之中。如果说美国人在1944年还要继续打下去，继续要求无条件投降，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种精神对日本人的支配性影响。但他们怎么可能理解？美国佬都是些混血杂种，他们无可救

药地腐化堕落，追逐私利，没有任何真正的团结精神和统一目标。如果他们不能像日本那样决意打到最后，那么其巨大的物质财富、工业基础以及技术天赋都将毫无意义。“神风”选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的最后几周内诞生不是偶然的，此时罗斯福总统和杜威州长正针锋相对，美国政治中的矛盾和冲突正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宇垣将军表达的观点十分典型，他在10月21日的日记中如此评论刚刚出现的“神风”部队：

啊，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我们无惧百万敌军和千艘航母，因为我们全军共有此魂……如果一亿国民现在以此精神进行生产和自卫，则帝国可高枕无忧。据说美国人现在都为总统大选而疯狂，杜威还稍有领先。我敢说他们比不上我们，因为他们的战争目的和国家政策都是出于私欲。[\[65\]](#)

在接下来的最后9个月战争中，主导日本的战略意图就是：向美国人展示自己“大和魂”的全部威力和怒火。一个愿意把它的年轻人全都变成制导导弹的国家，也一定会全民战至最后一人——一个愿意如此死战到底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如果日本人把赌注叫得足够高，美国就会退缩。美国的领导人受选民掣肘，没有打到亡国灭种的勇气。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可能已经输掉了，军国主义政府的高官们在私下里、内心里已经越来越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打败仗和投降之间，失去海外占领地和看着国土被匪军践踏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人工制导导弹从来不是为了胜利而采用的，而只是为了避免彻底毁灭的恐怖。即便官方宣传不承认，为神圣的日本列岛进行的战斗也已开始，而“神风”正是它的第一道防线。

[\[1\]](#) Michio Takeyama essay in Minear, ed., *The Scars of War*, p.35.

[\[2\]](#) Ibid.

[\[3\]](#)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31.

[\[4\]](#) Ibid., p.94.

- [5] Kiyoshi Kiyosawa diary, July 24, 1944,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2.
- [6] Tsunejiro Tamura diary, January 16,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113.
- [7]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96.
- [8] 匿名女性的评论, 记载于清泽冽1944年7月22日的日记中。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0.
- [9] Taetora Ogata,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Information, September 1944, quoted in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24.
- [1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3, 1944,” p.3.
- [11]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8.
- [12] Kiyoshi Kiyosawa diary, October 20, 1944,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67.
- [13]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16, 1944, p.1.
- [14] Ibid., October 17, 1944, p.3, and October 18, 1944, p.1.
- [15] Fukudome, “The Air Battle Of Taiwa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54.
- [16]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1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74.
- [17] 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 [18]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8.
- [19]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20, 1944,” p.7.
- [20]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76.
- [2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 [22] Hirohito “Soliloquy,” translation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92.
- [23]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78.
-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 [25]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25, 1944,” p.2.
- [26] Premier Kuniaki Koiso, in speech to Diet, September 8, 1944;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6.
- [27]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9, 1944,” p.5.

[28] *Chibu Nihon Shinbun*, July 26, 1944, quoted in Kiyoshi Kiyosawa diary, same date,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33.

[29] Report entitled “Current Conditions of the Empire’s Strength,” dated July 1944, quoted in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31.

[30] 例如，见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栗田健男（第47号）、野村吉三郎（第429号）和小泽治三郎（第227号）的审讯。栗田：“我们曾相信麦克阿瑟将军会从南方来到〔菲律宾〕。”野村：“你们的一位将军曾多次谈到他将夺回菲律宾……因此，我们认为你们一定会去那里。”小泽：“最初的‘捷号’计划非常全面，菲律宾是要防御的。”而且“美国的入侵可能发生在10月中旬的某个时候”。

[3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32] Verbatim [sic].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33] Kenryo Sat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p.7—9,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Series 1, Box 16.

[34] Ibid.

[3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attached successively to the Staf of the Third Fleet, the Combined Fleet, and the Naval General Staf.

[36] Ito and Pineau,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p.125—26.

[3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3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3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另外见松田千秋少将的审讯录，*Interrogation of Rear Admiral Chiaki Matsuda*, IJN, Nav No.69, USSBS No.345：“我当时的看法是，这个行动计划终究不足以阻止你们前进；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计划。我认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交战，相信我会在这次行动中死亡。”

[40] Sakai, with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21.

[41] Ibid., p.220.

[42] Naoji Kozu,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15.

[4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44] Ibid.

[4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5, USSBS No.378, Admiral Soemu Toyoda.

[46] Ibid.

[4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

[48]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25.

[49]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36.

[5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6, 1944,” p.2.

[51] Goro Sugimoto,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123.

[52] Dr.Reiho Masunaga in *Chugai Nippon*, May—June 1945, quoted in Victoria, *Zen at War*, p.139.

[53] *Thirty—Six Strategies* cited in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91.

[54]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61.

[5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56]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5.

[57]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

[5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59] Hastings, *Retribution*, pp.166—67.

[60]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11.

[61] 英语中的“神风”一词“kamikaze”最初可能是盟军翻译错了。但无论如何，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盟军始终笼罩于“kamikaze”的阴影之下，这个词后来也就被广为接受，包括日本。见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p.59–60, footnote。——作者注

[62] Ibid., p.27.

[63] 1944年10月15日下午4时30分东京广播电台的讲话，见“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October 15, 1944, p.3.

[6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8, Lieutenant General Torashirō Kawabe, November 30, 1945.

[65]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1,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85.

第五章

莱特岛登陆的规模不如四个月前的诺曼底登陆，但舰队需要跨越的洋面却辽阔得多。从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北部的主要登船港口荷兰迪亚到莱特湾的登陆滩头，距离足足有1 300英里。而且，登陆舰队拥有超过700艘舰船，荷兰迪亚容纳不了这么多——因此很大一部分部队是从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中的马努斯岛出发的，那里还要再往东500英里。这支庞大舰队的各个部分将在航渡途中会合，此时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了。舰队中的数百艘登陆艇是从太平洋舰队借来的，这是另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从1943年起，两个战区就一直在共用这些专用舰艇及其人员。在进行了超过两年的两栖作战之后，美军已是轻车熟路。赤道南北大大小小差不多30次登陆战的磨炼已经让他们的两栖作战技艺炉火纯青。部队在最后一刻匆忙做好战斗准备，分发主要作战计划，并匆忙加油和补给，各个部门疯狂忙碌，以保障舰队按时出海——所有这一切，对于成千上万名参加过这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战争的老兵来说，也都习以为常了。

一名驾机在上空巡逻的“甘比尔湾号”航母飞行员称此为“我见过的最庞大的大军。舰船一直延伸到海平线上”。^[1]各个半自主行动的特混舰队组成轮形阵航行，航速不超过9节或10节，这样即使是最慢的舰船也能跟上——突击运输舰、普通运输船、登陆舰、巡逻艇、扫雷舰、弹药船、油轮，以及各种其他勤务船只，组成了巴洛克式的宏伟队形。运输船上运载了17.4万部队。每一型登陆舰艇都有一个以字母“L”[意即“登陆”(Landing)]开头的缩写代号——LST(坦克登陆舰)、LSD(登陆艇母舰)、LCI(步兵登陆艇)、LCT(坦克登陆艇)等

等，还有其他五六种。驱逐舰在队形中穿行，如同灵般优雅，又如同牧羊犬般机警。当日军在1942年占领菲律宾时，这些舰艇十中有九还没有造出来。实际上，其中许多都是刚刚来到太平洋，舰员也都刚刚完成训练，还没打过仗。

战后，有记者问第7舰队司令托马斯·金凯德中将是怎样协调这数百艘舰船行动的。“我基本上不是靠自己的手指头来指挥的，”他答道，“这是个组织问题，仅此而已。”^[2]宏大复杂的时间表是通过每一艘船需要在莱特湾出现的时间倒推确定的。最慢的船只要最先出发，有些早在10月4日就出海了，此时连行动计划都没有制订完成。随后，众多舰艇从其原先所在的相隔数百乃至数千英里的港口渐次启程。由于航行距离遥远，舰队要在航行途中加油，舰队油轮将在事先确定的时间和地点等着它们。

麦克阿瑟喜欢开玩笑说“我有三张‘老K’”——他的陆海空三大指挥官，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恰巧都是K。金凯德（Kinkaid）率领常被俗称为“麦克阿瑟海军”的第7舰队。陆军航空队乔治·C.肯尼（Kenney）中将从1942年7月起就一直担任西南太平洋战区航空兵司令。参加莱特岛作战的主要地面部队，第6集团军，由陆军中将沃尔特·克鲁格（Krueger）指挥。登陆第一阶段的空中掩护支援由第3舰队负责。哈尔西（斯普鲁恩斯也是一样）虽然要优先执行联合作战任务，但他仍归属尼米兹的指挥系统。参联会没有尝试就统一指挥问题做出决定，而仅仅是要求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安排进行互相支援和协同作战”。^[3]

经历了西太平洋上一连串空前的不间断航母空袭之后，第3舰队及其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兵们太需要回港长时间休息了。所有的舰载机大队都明显出现了飞行员疲劳的情况，其代价便是愈加频繁的飞行事故。航空医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可怕综合征带来的负面效果——飞行员们脸上出现了憔悴和沮丧的神情，他们神经脆弱，体重迅速下降。哈尔西在8月刚刚接管舰队，但许多官兵却已经在海上待了10个月，中间仅仅在中

太平洋那些偏远的环礁上有过短暂休整。即便是哈尔西也累了，正如“米克”卡尼注意到的那样。舰队现在需要回到乌利西潟湖的锚地中，安静地停泊一长时间，休息整补。然而，对菲律宾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第3舰队的快速航母还要在其中领衔主演。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头一次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斗机的掩护半径之外持续作战。在莱特岛上，美军想要拿下塔克洛班机场并抓紧升级改造，这样它就可以尽快接收肯尼的截击机。但在此之前，打退日本空中反击的活儿绝大部分还得交给哈尔西的航空兵来干。当10月21日哈尔西问麦克阿瑟第38特混舰队估计何时能够返回乌利西时，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坚决地答道：“这次行动的基本方案就是要仰赖第3舰队的全力支援，这是我第一次到我自己陆基空中掩护范围之外作战……我认为你掩护此次作战的任务十分关键，至为重要。”^[4]

关于接下来的作战，一个迫在眉睫的“肯定不确定”的问题是日军空中抵抗的规模和纵深。另一个问题是日本舰队是否会前来反击登陆。的确，哈尔西最近一段时间的横冲直撞揭示了日军航空兵力量的薄弱——但敌人在菲律宾有数百座机场和备降跑道，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这里可以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本土快速获得增援。莱特岛作战和此前太平洋上所有两栖登陆的不同之处在于，敌人能够依赖其纵深，并分散配置其增援航空兵。在悲观的情况下，美军将会发现自己陷入漫长而无休止的空中战役之中，需要反复迎战从南边、西边和北边杀来的一批又一批敌机。此时飞行员疲劳症已经十分严重，而这样的前景更是航母部队的噩梦。哈尔西或许会后悔地想到，莱特进攻战役正是在他的大胆建议之下花了两个月推动的。他自己挖的坑，现在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填。

关于敌人舰队，密码破译情报和侦察报告已经准确判断出栗田和日军水面战舰停泊在新加坡附近的林加水道，小泽和航母则位于濑户内海。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第3舰队和珍珠港，主流的观点是日本海军不会出来应战。但是持不同观点者仍然存在，而且大家都认为发生大规模舰队作战至少是有可能的。如果栗田要率领水面战舰前来挑战美军，那

他们就必须从切开菲律宾中部岛屿屏障的两个海峡之一通过——莱特岛南部的苏里高海峡，或者是萨马岛北部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否则就要从棉兰老岛南部或者更远的吕宋岛北部海岸绕道。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到了，但是为了赶上10月20日的任务期限，第3舰队和第7舰队的司令和计划制订人员并未就各自辖区内应对意外情况的具体计划沟通一致。

金凯德的第7舰队绝对不是赤手空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敌人进攻，他们都能基本做到自保。岸轰和火力支援大队拥有6艘老式慢速战列舰——其中有些还在珍珠港被击伤过——以及数量充足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这支舰队被编为第77.2特混大队，由此前参加过多次两栖作战的老将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指挥。金凯德的舰队中还有16艘小型护航航母，其舰载机主要用于轰炸和扫射登陆滩头的地面目标，并在两栖舰队上空进行防空掩护。它们被编为第77.4特混大队，由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指挥。他这支小型慢速航母舰队及其护航驱逐舰被分为三个分队，其无线电呼号将会名垂青史：“塔菲1”、“塔菲2”，以及“塔菲3”。

第3舰队参谋长“米克”卡尼回忆说，哈尔西一直向他手下的所有人反复灌输一个原则：“如果能找到机会打一场大仗，那就让它变成现实，你们要始终把这作为首要目的……他的意图就是我们冲进去，和他们一决雌雄，只要找到敌人就干一仗，不管遇到的是谁。他本人对我们的指示，以及我们关于战斗的所有讨论的结果，都让这一点深深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5]

10月17日，舰队的先遣分队搭载着美国陆军游骑兵突击队登上了把守着海湾入口的三个小岛。游骑兵们迅速打垮了日本守军，随后架设起导航灯以协助两栖船队。扫雷舰费了不少力气，找到并扫除了大约200枚漂雷和混合雷，开辟了一条通往登陆海滩的宽阔通道。“水下爆破组”（UDT）的精锐蛙人们——他们是今天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前身——潜入水中寻找水下障碍物，却没找到。10月19日拂晓前，奥尔登多夫将军的火力支援舰队鱼贯进入海湾，大炮直指海滩，36小时的炮击

就此拉开序幕。日军岸炮进行了还击，也打中美舰几炮。但它们在开火时暴露了自己的位置，结果被美军舰队的优势炮火悉数打哑。

10月20日，无月之夜，运输船和两栖舰队如同幽灵船一般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进海湾，运动到各自的指定位置。奥尔登多夫将军的炮击编队仍在继续向海滩倾泻死亡和毁灭。早晨6点，当新一天的太阳跃出东方海平线时，炮火的数量和密度都令其宛如雷霆。

从巡洋舰“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观看这幅场景，麦克阿瑟毫不讳言自己被震撼到了。炮火把海岸线翻了个底朝天，连莱特岛的海岸地貌都为之改变。巨大的炮弹带着货运列车般的巨大啸声直奔海岸而去，在天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红色弧线。火箭弹亮白色的烟尾久久不散，在天空中刻印出栅栏格子花纹。一团团浓烟从海滩以及远处的山上升起。一位目击者从海岸外的运输船上用双筒望远镜观看了一艘驱逐舰用5英寸舰炮向一处高大海角上一座日本地堡瞄准齐射的场景。“地堡如同核桃壳子一般被砸开。当第二轮齐射命中时，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想要从里面爬出来。就这样了。曾经精心建造的堡垒现在不过是山坡上的一道白色疤痕而已。”^[6]舰炮停止射击后仅仅几秒钟，舰载机便飞越海岸线，倾泻下炸弹、火箭弹和.50口径曳光弹，此种场面在这个上午无数次重演。在连续不断的猛轰之下，海岸已经从视野里消失了。这天上午几乎没有风，无法把潮湿空气中的一层层黄色和棕褐色浓烟吹散。即便是在奥尔登多夫战舰后方远处的运输船上，人们也不得不吼叫着说话才能被听见。他们的卡其色军服在胸膛上震颤，人们都能感受到五脏六腑深处受到的剧烈撼动。远处山上的爆炸发出一种极富穿透力和共振的声音：砰，砰，砰。南边和西边的整个地平线已经成了一条闪烁的光环。

上午10点，第一批登陆艇准时向海岸进发。炮击强度又提高了一个台阶。天空、地面，以及船只的甲板，都如同琴弦一般震颤起来。海岸外的一名观察员在日志中记录：“你无法区分出一次一次的爆炸，那就是一片轰鸣。”^[7]在车辆人员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艇的前方是一群安装了火箭发射器的登陆艇，它们不停地开火——火箭弹嗖嗖地尖啸着飞出去

——这些致命的小火箭纷纷落在海滩和树林边缘。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军的时间拿捏和协同已经到了十分精熟的地步，进攻部队的官兵只要从登陆艇的船舷上面探出头来，就一定会看到一幅任何人都终生难忘的景象。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几秒钟后，毁灭性的弹幕便突然向内陆跃进半英里，就如同暴雨扫过北美洲的大平原一样，落在登陆海滩前方，使两栖部队得以安全上岸。

进攻部队跃出登陆艇，冲向海滩，随即要么在沙地上卧倒，要么躲进炮弹爆炸留下的弹坑中。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自己并未遭到敌人火力的攻击。燃烧和破碎的椰子树林中还有几个孤零零的日军狙击手，各处残存的碉堡里也会响起一些零散的机枪射击声，但是日军的抵抗仍很轻微。岛上的大部分敌军似乎已被撤回西边的山区。美军第一梯队迅速向内陆推进，扩大地盘，并为后续批次的登陆艇腾出空间。不到一个小时，进攻部队就拿下了一块各位置纵深基本都达到1 000英尺的滩头阵地。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妨碍了他们的推进，那与其说是敌人的抵抗，还不如说是湿滑的地面。

数以万计的部队——总共有4个师——跟在他们后面上陆，海岸线很快就变成了不断膨胀的补给站。车辆在土路上行驶，板条箱成排堆放在一起，有人站在上面走来走去。在内陆更远处，步兵们在挖掘散兵坑和战壕。这里部队如此密集，散兵坑都直接连到了一起。许多人都把从登陆艇上带出来的救生衣当作枕头，把棕榈树叶放在散兵坑上方挡雨。第3两栖军的战地日志称：“部队大约向内陆推进了1 000码至1 400码。抵抗相当轻微。除了有些地方敌人挖掘了战壕并用迫击炮开火之外，大部分地段上部队都在持续推进。登陆海滩上伤亡轻微。没有敌人活动的迹象。”^[8]由于未遇到敌人有组织的抵抗，北部地段的部队继续向北进击，很快占领了岛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塔克洛班机场，这个机场位于岛屿东北沿岸的同名城镇附近。

在“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麦克阿瑟举着他的双筒望远镜，从漫长弧形海岸南端杜拉格村旁边的白滩，一路扫视到北边塔克洛班附近的红

滩。在“纳什维尔号”和登陆滩头中间有太多的船只，他实际上很难看到海滩全貌。他时常放下望远镜，给他的玉米芯烟斗点火，和派驻他旗舰的战争通讯员亲切交谈。他兴致勃勃地给通讯员们讲起他第一次来到塔克洛班时的故事，那时候他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新来军官。

下午1点刚过几分钟，麦克阿瑟走下楼梯，来到他的登陆艇上。他身后跟着司令部里的几个主要人员，他的航空兵司令肯尼将军，以及几位他最喜欢的战争通讯员。登陆艇到另一艘运输船旁停下来，接上了塞尔吉奥·奥斯敏纳，他是曼努埃尔·奎松之后继任的菲律宾总统，还有卡洛斯·P.罗慕洛准将，他是驻美国众议院的菲律宾属地代表。登陆艇开向红滩途中，麦克阿瑟笔直地坐在靠近艇尾的座椅上。他拍着萨瑟兰的膝盖说道：“你能相信吗，迪克，我们回来了！”^[9]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眼前的场景恍如梦境。这话他又向罗慕洛说了一遍。他握着两位菲律宾朋友的手：“好吧，我们来了！”罗慕洛记得他们都这么说了：“所有人都把这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用不同的语气，好像这是表达最深刻感情的最新方式一样。在我们听来这绝不啰唆。它听着就像是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者是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讲话一样。我们永远也听不够。”^[10]

艇长操纵着登陆艇砰的一声轻轻靠上了岸，放下了跳板。他们距离海岸还有50码。两名通信部门的摄影师走下跳板涉水上岸，以便把这一场景拍摄下来。萨瑟兰扶着麦克阿瑟的胳膊，反复念叨着“我们来了！”——麦克阿瑟也回应道：“是的，你能相信吗，我们来了。”^[11]这一行人耐心地等着摄影师架设好照相机。之后，麦克阿瑟戴着飞行员太阳镜和他镶有金穗纹饰的野战帽，走下齐膝深的水里，开始涉水上岸。奥斯敏纳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之后是同行的其他人。拍下这一场面的照片将会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

麦克阿瑟踩着浪花走到堆满补给物资的海滩上，无烟火药和棕榈树燃烧的气味填满了他的鼻子，他快步迈向陆地。受命保护他的一个连急忙快步上前，因为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一度似乎想要径直走到树林

边缘去，而那里可能还有残余的日本狙击手。随后他改变了主意，回头再次和奥斯敏纳握手。“总统先生，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奥斯敏纳此时已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12]消瘦憔悴的菲律宾老百姓纷纷围了过来，许多人挥舞着在日本占领的那些年里小心藏着的美国国旗。他们满脸喜悦地欢迎美国军人，高声喊着：“可爱的美国人！”

另一个通信小组正在准备一套无线电广播设备并架设广播天线。麦克阿瑟和奥斯敏纳并肩坐在一根倒在地上的棕榈树干上。旁边的一棵树上并排飘动着美国和菲律宾联邦的旗帜。不久，通信队告诉他们，广播已经准备好了。

片刻之后，麦克阿瑟拿起了一支手持麦克风。当他说话时，天空飘起了细雨。这次广播在美国国内进行了现场直播，当时这还是个稀罕事；它也通过移动天线向全菲律宾进行直播，虽然看起来没几个菲律宾人能听到这最初的广播。

麦克阿瑟还是老样子，用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我”指代了他指挥下的部队。“菲律宾人民，”他宣布道，“我回来了！蒙全能的主的恩宠，我们的部队再次站在了菲律宾的土地上。”他还号召菲律宾人民起来反抗，打击敌人，而且“向我靠拢！”。^[13]

这番讲话惹得他手下不少官兵直翻白眼，在他们眼里这又是个麦克阿瑟式的牛皮。你是回来了，难道我们没回来吗？不过这次演讲对菲律宾人的振奋作用完全毋庸置疑。即便他们未能通过广播收听讲话，大部分人也很快就会通过传单或者口耳相传获悉此事。第二天，在塔克洛班市政府的台阶上，麦克阿瑟会给奥斯敏纳总统主持一场更正式的仪式——象征着将国家主权交还菲律宾。问题是他并没有就这份声明与掌握着菲律宾联邦主权的美国国务院和内政部澄清沟通。麦克阿瑟这是在擅自制定美国的亚洲外交政策——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10月20日晚，栗田麾下强大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纵队开进了

婆罗洲北部的文莱湾。两艘油轮正在那里等着他们，所有军舰都要从它们身上喝个饱。第二天下午，来自全舰队各舰的摩托艇把舰长和高级军官送到了栗田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上。在那里，他们得知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刚刚发来最终的“捷号”作战命令，并听取了任务简报。他们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军官们被这一计划激怒了，有些人壮着胆子发出质问。如果情况真如上峰相信的那般绝望，那么总司令本人不该亲自前来率领大家参战吗？为什么丰田大将会躲在横滨安全的地下掩体里？如果这次出击是海军的“万岁冲锋”，那么进攻目标不该是美国的战列舰和航母，而不是莱特湾里的运输船吗？大家都受过严格的夜战训练，为什么还要在白天进攻？

栗田最后站了起来，简短回答了这些质疑。突袭运输船队最有希望重创敌人的进攻部队，他说。这可能是打一场全军尽出的舰队决战的最后机会，现在不打，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要么现在，要么就再也不会有。不仅如此，他说，命令就是命令。于是，军官们起立，一齐高呼“万岁！”之后喝下一杯清酒，各自回舰。[\[14\]](#)

10月22日早上8点，拥有31艘军舰的栗田舰队从文莱出发，向北开往巴拉望岛。研究了海图并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他决定让自己的舰队走中路，穿过巴拉望水道，然后是锡布延海和圣贝纳迪诺海峡。比栗田晚7个小时出发的是以西村为首的“C分遣队”舰队，他们将抄近路走南线，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苏禄海、苏里高海峡进入莱特湾。在北方远处，志摩将军的“第二游击部队”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启程南下，他接到的命令很模糊，只是要他跟随西村穿越苏里高海峡。早在10月20日下午，小泽的光杆航母舰队就已经把船锚从濑户内海海底的淤泥里拉了起来，正在出海，准备前往丰后水道的集合点。到10月22日夜幕降临时，参加“捷号”计划的所有舰队全都动了起来。[\[15\]](#)

战斗打响前，美军有44艘潜艇在海上作战，其中许多被特地布置在能够截击和观察开往菲律宾东部水域的日本海军部队的位置上。有超过12艘潜艇奉命观察和警戒莱特湾周边海域。菲律宾中部的岛群组成了一

道屏障，这里复杂的岛屿地形将任何想要穿越这道屏障的大吃水舰船都限制在了为数不多的航线上。美军潜艇就部署在各个航线的瓶颈上：巴拉巴克海峡、民都洛海峡、贝尔德岛海峡、巴拉望水道，以及吕宋岛西部海面。在研究了海图并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栗田和他的参谋们选择穿越巴拉望水道，这是巴拉望岛西北沿岸和“危险水域”之间一条可航行的走廊，后者是南海中一片缺乏海图的海域，那里满是浅滩、礁石和暗礁，四百年以来一直都是海船的坟墓。栗田和他的参谋们知道他们选择的路线可能会把自己带进美国潜艇的瞄准镜，但是由于接到死命令，以及受到紧张燃油状况的制约，他们也别无选择。[\[16\]](#)

10月22日至23日午夜，两艘美军小鲨鱼级潜艇正守候在巴拉望岛西南端。“海鲫号”（Darter，艇长戴维·麦克林托克）和“鲛鱼号”（Dace，艇长布莱登·克拉格特）正浮在水面上，肩并肩，相距只有200英尺。凌晨1时16分，“海鲫号”的SJ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回波信号。信号位于东南方，距离大约17英里。起初雷达手觉得这一定是云团，但是很快又冒出来许多信号，在屏幕上共同运动。它们只可能是向北直奔巴拉望水道而来的重型战舰。于是麦克林托克拿着手持喇叭，隔着水面向“鲛鱼号”的舰桥喊话：“我们雷达发现目标。上！”[\[17\]](#)于是两艘潜艇四台引擎全开，以19节速度水上航行，想要在敌舰队前方抢占截击阵位。

莱特湾海战, 1944年10月23日—26日



在夜幕的掩护下，两艘潜艇用无线电发出了日军舰队北上穿越巴拉望水道的报告，并正确估计出舰队拥有至少三艘战列舰。[\[18\]](#)远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蒂将军收到了“海鲫号”的第一份电报，他立刻将其转发给哈尔西和其他指挥官。在随后“海鲫号”发出的每一封敌情报告中，日军纵队的舰艇数量都在增加。在下潜之前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麦克林托克报称：“至少11艘舰，航向航速不变。”[\[19\]](#)

“海鲫号”的航迹推算部门起初推测敌舰队的航速是22节，因此对自己占得攻击阵位的机会持悲观态度。但随着距离缩短，美军发现舰队的航速实际上不超过18节。而且它们将被挤进狭窄水道，其防御性的之字形航行也会受到限制。“我们现在抓住他们了！”“海鲫号”的日志中记载道。[\[20\]](#)当巴拉望岛绿树覆盖的山峰隐约出现在东方微露的晨光中时，两艘美国潜艇潜入了水下。

日本舰队中的大舰排成两路纵队齐头并进，几艘驱逐舰位于纵队两侧。左侧纵队由“爱宕号”领头。“海鲫号”运动到了能够攻击这一纵队的位置上，“鲛鱼号”则继续向东北方航行了几英里，准备伏击右侧纵队。两艘艇的艇员们都已各就各位。

在“海鲫号”的指挥塔里，麦克林托克中校眼睛紧贴着潜望镜，抓住两边的把手转动着方向。在镜头中，敌人军舰从雾气中显出形来，宛如教堂塔楼一般的灰色阴影以均匀间隔排成两列。“海鲫号”几乎就在左侧纵队的正前方。麦克林托克眼看着“爱宕号”向他开过来，直到它在瞄准镜里变得如此巨大，圆形的视场已经容不下它的全长。早晨6时32分，他在“不可能射失”的980码距离上射出了艇首鱼雷管中的6枚鱼雷，随后向左急转，向第二艘舰“高雄号”巡洋舰射出了艇尾的4枚鱼雷。

“爱宕号”的瞭望哨直到鱼雷快要命中时才发现其航迹。这艘旗舰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它的右舷爆发出4根燃烧着火焰的水柱。数百名舰员可能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当场丧命。它的舰首开始下沉，舰体向右严重倾斜。从“海鲫号”的潜望镜中，麦克林托克看见巨大的橘黄色火焰

上方腾起滚滚黑烟，中雷巡洋舰的上层建筑完全藏进了一团团的烟雾背后。他还看见日本水兵在甲板上集合准备弃舰。

在“爱宕号”的舰桥上，栗田立刻就意识到自己的旗舰完了。他没有丝毫犹豫。他告诉舰长：“该走了。”^[21]之后他脱掉鞋子，跳进海里，然后向最近的驱逐舰“岸波号”游过去。按栗田自己的说法，他是第一个离舰的。

大约一分钟后，“高雄号”的舰尾附近挨了两枚鱼雷。爆炸摧毁了两根传动轴，海水淹没了锅炉舱，使它瘫痪在水面上。舰员们急忙展开了损害管制，纵队其余各舰则接替了它的阵位并从它身旁开过。

整个日军舰队此时大幅度右转，以避开看不见的敌人潜艇。但是巴拉望岛海岸就在他们右侧不远处，没有多少空间可供他们规避机动。“爱宕号”被击沉后，指挥权暂时移交给了“大和号”上的宇垣缠将军。随后两个纵队开始加速，并坚决转回40°的主航线上。但这又把他们直接送到了“鲛鱼号”的瞄准镜前。克拉格特中校看着右侧纵队向自己驶来。“鲛鱼号”的鱼雷所剩不多，所以他不得不精心选择目标。他决定放过头两艘舰不予攻击，他的命令被载入了史册：“让它们过去——它们只是重巡洋舰。”^[22]但他把纵队的第三艘舰误当成了金刚级战列舰：实际上它还是一艘重巡洋舰，“摩耶号”。当敌舰在1 800码距离上完全暴露出侧舷时，他齐射出了6枚鱼雷。

几分钟后，“鲛鱼号”的艇员们听到四声确定无误是鱼雷命中的声音，几秒钟后又传来一次震动巨大而且恐怖的爆炸声，声呐员甚至怀疑是不是“海底被炸开了”。之后他们听到一艘大舰解体的声音，铆钉一个接着一个崩落了下来。克拉格特称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23]他正确地判断出这是“摩耶号”的弹药库被引爆了。这艘军舰变成了一座冲天的水柱和火球，残骸碎片向各个方向飞出去，不断下落，持续了大半分钟。宇垣将军在“大和号”的舰桥上悲伤地看着这一幕，他看见“摩耶号”最后的位置上升起黄色的浓烟，“烟雾散尽后便已空无一物”。^[24]

其余大舰不敢停下脚步，继续匆匆向北。但护航的驱逐舰却在这一片海域四处投掷深水炸弹，把两艘潜艇压在水下数个小时。日本驱逐舰还捞救起了数百名“爱宕号”和“摩耶号”的幸存者。栗田将军奋力游过覆满原油的黏糊糊的海面，来到“岸波号”旁，人们把他拉上甲板，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还有一双白色运动鞋（他原来的鞋子已经扔掉了）。回望“爱宕号”最后所在的位置，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这艘舰——它在19分钟里沉入了海底。栗田向宇垣发出信号，表示自己想要来“大和号”，把它当作自己的新旗舰。但他和他的参谋部还要再等9个小时才能到达这艘战列舰上，因为此时所有幸存舰艇都必须迅速驶离巴拉望水道。

现在“爱宕号”和“摩耶号”完了，“高雄号”遭到重创但仍能低速航行，因此它奉命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返回新加坡。（它后来被判为无法修复，再未参战。）如此，莱特湾战役的这场开局之战让栗田31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失去了5艘舰。

“海鲫号”和“鲛鱼号”试图溜过去截击撤退中的“高雄号”，但是“海鲫号”却重重撞上了一处海图上未标明的暗礁，不得不放弃追杀。美国人想尽办法，想把它拖出来，却未能奏效。“鲛鱼号”只好接上“海鲫号”的所有艇员，返回弗里曼特尔，搁浅的潜艇则只能用炸药炸毁控制室和指挥塔后遗弃。时至今日，“海鲫号”锈迹斑斑的残骸仍然静躺在巴拉望岛旁一块礁石上，既作为航标，也吸引着无数游客。

麦克林托克和克拉格特发出的无线电敌情报告或许比他们对栗田舰队的攻击更具有价值，因为这是第一条确凿无疑的消息，表明日本海军意图迎击进攻莱特岛的美军。另一方面，“爱宕号”的沉没导致55岁的栗田跳进了海里，不得不游泳逃生。他整个中路舰队的参谋部也是如此。随后他们要在驱逐舰局促的舰桥上待9个小时——其间军舰还要时时规避幽灵般时隐时现的潜艇踪迹，随时做好被鱼雷击中的准备——直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登上“大和号”。《孙子兵法》有云：“佚而劳之。”战后接受美国审讯人员的询问时，骄傲的他不肯承认这段经历令他筋疲力尽，心灰意冷。但他私下里还是向同僚们坦白，身体上的疲

劳、缺乏睡眠以及高度紧张，妨碍了他在后来战斗中的发挥。

哈尔西将军曾经觉得日军舰队大概不会来迎击对莱特岛的进攻，但到了10月23日日终时，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一天，侦察报告越来越多，绝密无线电监听情报也有线索显示敌人会做出“激烈反应”。“海鲫号”和“鲛鱼号”发现一支大规模水面舰队正开往米沙鄢航道，随后“犁头鲛号”潜艇拍发的报告显示，同一支舰队出现在了民都洛海峡入口附近。还没有人看到过日本航空母舰，但尼米兹的司令部发来警告，有迹象显示小泽将军的第一机动部队已经从濑户内海出发，可能从北方开过来。（这些估测情报的依据是无线电通信量分析，以及监听到的讨论让舰队油轮开往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某处会合点的零散信息。）

夜晚，哈尔西三支航母特混大队中最北端的第38.3大队被低空飞行的日本夜间巡逻机盯上了，这些飞机可能来自吕宋岛上的机场。各个战斗机中队度过了一个紧张而且不敢合眼的夜晚，他们要随时准备在暗夜中起飞迎击敌机夜袭。夜袭并未到来，但无处不在的夜间侦察机似乎预示着第二天上午会有大规模空袭，事实确实如此。

哈尔西原本希望能有一个短暂的喘息，这样他就能让航母特混大队轮流返回乌利西休息整补。他已经让第1特混大队（麦凯恩）回到东面800英里以外的乌利西环礁，还想要在第二天把第4特混大队（戴维森）也派回去。但现在没法儿再休息了。哈尔西命令麦凯恩停止休整，加油待命，并召集其他三支航母大队向吕宋岛南部和圣贝纳迪诺海峡靠拢，保持锅炉高强度运转，随时准备开出最高航速。24日曙光初露时，第38特混舰队放出了一支大规模的“武装侦察”机群。两架飞机一组，一架“地狱猫”和一架“地狱潜鸟”，每一组负责10°扇区“切馅饼”，侦察距离300英里。爬升到高空后，它们排成一条巨大的弧线向各自方向散开，其侦察范围从西南到西北，覆盖米沙鄢海、锡布延海、民都洛海峡，以及菲律宾中部岛群的各处海域、海峡、海湾和峡湾。还有12架“地狱猫”被派出去担任“中继飞机”，在特混舰队以西100英里处高空盘旋，为

搜索扇区最西端及其附近的飞机充当无线电中继。一旦遭到攻击，这些飞机还能迎击从西边来的敌人空袭，保护特混舰队。

上午，天高气爽，高空中有少量卷云，1 500英尺高处有一层薄薄的碎积云。从8 000英尺的高度，侦察员在各个方向上都能看到近100英里之外。在他们的下方，一幅壮美的热带风景画展现在眼前：蔚蓝的浅海，白沙浅滩，还有覆盖着丛林的高山岛屿，反复出现。宽阔的白色沙滩逐渐变成了浓密的椰子树林，树林从靠近岸边的浅绿色变成了陆地深处的深绿色，之后陡峭的山坡拔地而起，棕褐色山峰和黑色火山锥高至六七千英尺，火山锥上还带着满是裂纹、时时冒烟的火山口。由于深度、海底质地和光照角度的不同，各处海水的颜色深浅不一，浅蓝色的波纹沿着海岸向远处延伸，散布着珊瑚礁的浅滩向海中伸出数英里。在岛屿之间的海峡里，海水逐渐变深，颜色也越来越暗。在早晨太阳的照耀下，整个大海一片波光粼粼。舰载机飞行员们可以熟练地将眼前的地标及海峡与座舱里的海图相互对照。他们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在菲律宾上空飞了不知道多少次，对这里的地形已然烂熟于胸——他们知道在这复杂岛群有限的几条可通行航道中该去哪里去寻找日本军舰。

早晨7时46分，“勇猛号”一架SB2C的飞行员在接近民都洛岛时发现机载雷达的屏幕上出现了一簇回波信号。信号位于岛屿南方约10英里处。他向信号的位置转了过去，很快便看到了一串相互平行的航行尾迹，这是大舰队正在行动的第一个迹象。又过了一分钟，他就能目测出舰队的组成了：13艘驱逐舰，8艘巡洋舰，以及4艘战列舰。这份敌情报告于早晨8时10分送到了“新泽西号”上。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于是守在指挥舱的超高频无线电旁，等着进一步确认消息。消息很快便来了——“卡伯特号”的一名飞行员报告：“我看见了，是大舰。”两分钟后，“勇猛号”第18轰炸中队队长的声音出现在了频道里，响亮而且清晰：“4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航向东，位于民都洛岛南角外。”[\[25\]](#)

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栗田的中路舰队，该舰队正绕过民都洛岛南

角，准备进入塔布拉斯海峡。栗田的舰队比之前经过“海鲫号”和“鲛鱼号”把守的航道时要缩水了一些，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依然令人生畏。根据位置和航向判断，栗田应该是想要强行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北面杀进莱特湾。正当哈尔西准备下令向栗田发动空袭时，另一份敌情报告又送到了他手上，这次是来自南方200英里外的“企业号”侦察机组，位置是在内格罗斯岛西南的苏禄海上：一支7艘水面战舰组成的纵队，包含2艘战列舰。这正是西村的南路舰队。根据其位置和东北航向很容易得出结论，该舰队正开往苏里高海峡。

发出敌情报告后，“企业号”的飞机请求友邻侦察机编队支援，准备向南路舰队发动进攻。这些飞机爬高到1.2万英尺，这是SB2C俯冲轰炸机转入俯冲的理想高度。两艘日军战列舰上的14英寸主炮扬起到最高射角，射出的对空弹炸出壮观的巨大火球。这一幕令美军飞行员惊叹不已，但这些炮弹炸点都太远，无一能伤及美机。“地狱猫”先俯冲下去，在2 000英尺高度射出5英寸航空火箭弹，然后改出俯冲扫射敌舰。“地狱潜鸟”跟在后方，以70°俯冲角凌空而下，投下500磅炸弹。有几枚炸弹近失“山城号”，在舷外近处爆炸，一枚近失弹导致战列舰右舷舰体轻微凹陷，成吨的海水从裂隙处涌进舰体内，令其向右倾斜。这艘旗舰高大的宝塔形上层建筑也遭到F6F的火箭弹和机枪射击，大约20名舰员战死。“扶桑号”战列舰被两枚炸弹命中。第一弹命中2号主炮塔附近，在下方两层甲板处爆炸；另一弹命中舰尾附近，击穿装甲甲板，在军官起居室内爆炸。一个航空燃油罐被引燃，烧起熊熊大火，吞没了停放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扶桑号”一度看起来像是没救了，但是舰员们还是控制住了损伤，令这艘军舰继续在编队中维持原有阵位。驱逐舰“时雨号”也被一枚500磅炸弹击中，不过炸弹在它前主炮塔上弹开，落进军舰一旁的海里才爆炸。

在这一轮短暂而激烈的空袭中，西村将军在“山城号”的舰桥上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一名舰员后来回忆道：“他泰然自若，没有一丝不安。他已经毫不畏惧，有了钢铁般的神经。这样一位指挥官令下属们心中镇

定，充满勇气。”^[26]他的舰队已经流了第一滴血，但是没有一艘舰被迫返航，所有军舰都留在纵队里，速度也没有下降。

判断出日军南路舰队规模较小，足以交给金凯德去对付之后，哈尔西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其中路舰队。他越过第38特混舰队司令米彻尔，直接通过低功率的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用他自己的声音下达了命令：“进攻，再说一次，进攻！祝好运！”^[27]这就是哈尔西吸引眼球的手段，他给这次战斗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他绕开了其内敛谦让的前任建立的一整套指挥系统，选了一句整个舰队都认得出来是他的话下达了命令：大家都记得，在两年前的圣克鲁兹海战中，他曾下达一条振奋人心的命令：“攻击，再说一次，攻击！”

就在此时——上午8时27分——第38特混舰队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批来袭飞机，它们是从吕宋岛各个机场方向飞来的。不出所料，美军航母现在一整个上午都要去对付敌人的空袭了。结果，只有博根将军的第2特混大队设法放飞了一支攻击机群：来自“勇猛号”和“卡伯特号”航母的45架俯冲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

攻击机群指挥官比尔·埃利斯率队飞了一条稍显绕路的航线，从宿务岛绕了一圈（美军认为岛上的日军航空基地可能得到了增援），然后向南转向塔布拉斯海峡。飞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美国人在晴空之下看到了他们的猎物。从空中，他们能看到整个舰队——锡布延海上空的能见度始终极佳——但每个飞行人员的目光都被两艘超级战列舰吸引住了，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舰，它们正在同心圆阵形的中央高速前进，周围是小几号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附近没有日本飞机的影子，因此美军飞行员在上空花了些时间稍事盘旋，精心准备他们的进攻。装有鱼雷的TBM“复仇者”将从目标舰首两侧进行“钳形”进攻，SB2C“地狱潜鸟”的俯冲轰炸将与其同时展开。战争初期，美军曾经费很大力气想让这些进攻彼此协调，到1944年，他们已经学会让进攻分秒不差了。

在日本军舰上，号手们吹响了战斗警报，人们匆匆奔向战位。日本人对没有空中掩护骂骂咧咧，但至少他们的军舰新加装了几十门高射炮。“大和号”和“武藏号”各自装有大约150门高射炮，两艘舰上的所有高炮每分钟共能射出1.2万发炮弹。小一些的战列舰上装有大约120门高炮，巡洋舰90门，驱逐舰30门到40门。在林加水道时，他们还特别强化训练，提高射击准确度和射击速度。日本人还为两艘超级战列舰的18.1英寸主炮专门设计了新型三式对空弹，这是一种蜂窝状的对空霰弹。当美军飞机降低高度开始进入攻击航线时，栗田向各舰发电：“敌机来袭，天佑诸君努力奋战。”^[28]

比尔·埃利斯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战列舰巨大的主炮抬高至最大仰角。当SB2C和“地狱猫”转入俯冲时，这些巨型舰炮开火了。高射炮弹五颜六色，埃利斯回忆道：“弹道带着粉红色，白色曳光弹带着紫色，还有漫天的白磷弹，一发炮弹爆炸后会迸出大量银色的弹丸。”^[29]“地狱潜鸟”背朝太阳从东方发起俯冲，以近乎垂直的角度俯冲而下，穿过高炮弹幕，随着日舰的规避动作一同转弯，将轰炸瞄准镜紧紧套在目标上，在大约2 000英尺的高度上投下1 000磅炸弹。“大和号”和“武藏号”都一度被近失弹掀起的水幕所遮蔽。“武藏号”的1号主炮塔被命中一弹，但这座装甲厚实的炮塔几乎未受损伤，只是掉了一块圆形的漆。近失弹似乎轻微震松了舰体钢板的连接处，导致突然进水，但是当水雾散尽后，大家才发现“武藏号”仍在继续前进，速度也没有下降。

“复仇者”机群开足马力，加速从1.5万英尺高空下降到海面上方200英尺高度，改平时速度已经达到300节。“复仇者”就以这样的高速，从两侧同时扑向“武藏号”。“我看到那该死的宝塔，”鱼雷机分队指挥官说道，“但最令我难忘的是这艘舰的尺寸。它这么长，你不可能射不中。”^[30]在900码距离上，TBM机群投下鱼雷，随即转弯脱离。“武藏号”立即机动规避，两条鱼雷航迹擦着它的舰首掠过，但第三枚鱼雷却正中其舰体右舷中部，掀起了200英尺高的白色水柱。爆炸的剧烈震动

把数百名舰员震倒在地。军舰向右轻微倾斜，但通过对侧注水，它又很快恢复了平衡。

当美机掉头东返后，“武藏号”报告自己仍能维持24节航速。它和姊妹舰“大和号”在设计时就要求能够承受最多超过20枚鱼雷的打击，一枚只是小意思。不过“复仇者”机群还命中重巡洋舰“妙高号”一雷，这次打击就严重得多；它不得不退出队形，返回文莱湾。

回到美国特混舰队这一边。在空中盘旋的防空巡逻“地狱猫”从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对付日本飞机。日军从吕宋岛各个机场接连放出了三批飞机，每一批都有五六十架，这些攻击都落在第3舰队最北边的航母部队，谢尔曼将军的第3特混大队头上。在整个上午一连串一边倒的空中格斗中，防御一方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其他地方也都需要这些“地狱猫”——要护卫出击的攻击机群飞往日本舰队，还要在敌人机场上空执行扫荡任务——而来袭的敌人机群却无穷无尽，前仆后继，而且十分危险。哪怕只有一架敌机溜过战斗机的拦截，它都有可能幸运地给某艘航母来上一下子，而美军舰队距离任何己方港口都很遥远。“这一天，敌机一大早就来了，很晚才走。”谢尔曼的战时日志如此写道。[\[31\]](#)

“埃塞克斯号”第15航空大队队长戴维·麦克坎贝尔正在准备为一支出击的攻击机群护航时，他的中队被命紧急起飞。麦克坎贝尔从待命室里冲出来，爬上他的F6F“地狱猫”，这架飞机此时正挂在弹射器上加油。当油管被摘下来时，他的油箱刚刚加到一半，麦克坎贝尔就这样从甲板上弹射起飞了。他没有盘旋等候中队里其他人跟上来，而是直接机头向西开始爬升。另外7架F6F跟着他爬升到了1.4万英尺高度上，通过“行进间会合”逐步编成飞行队形。不久，他们就看到了自己的对手，一支由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组成的混合机群，总数大约有50架，在稍低的高度上迎头飞来。麦克坎贝尔用无线电喊出了“发现敌人”的呼号“TallyHo!”之后继续爬高，僚机飞行员罗伊·拉辛也跟他一起爬升到1.8万英尺。他们准备向敌机发动俯冲攻击，但此时日机

却转入了经典的防御机动：拉弗伯雷圈，各机首尾相接以环形航线飞行，每架飞机都可以掩护前方的友机。

麦克坎贝尔和拉辛耐心地等待着，在敌机的环形阵上方2 000英尺处盘旋，“我们认为有些飞机容易飞出这个拉弗伯雷圈，那时我们就能动手了”。^[32]他们等了差不多一整个小时。两个人等着的时候甚至在座舱里抽起了烟。偶尔会有一架日本飞机不明智地离开队形或者想要爬高，“这样问题就简单了，找到一个空子，把它们打下来，然后把俯冲获得的速度重新转化为高度，再等下一个空子”。^[33]最后，当日军飞机转向西边脱离战场时，它们的环形队形解体了。“地狱猫”机群趁势掩杀过去，不断击落敌机。由于怕遗漏战果，麦克坎贝尔就拿铅笔在仪表盘上做记号：“我数到5就画个横线，就这样一直记下去。”^[34]当拉辛打完了子弹，麦克坎贝尔的燃油指针奔向0，他们便掉头返航了。麦克坎贝尔的仪表盘上被铅笔记了11笔。他刚刚降落在“埃塞克斯号”上时，发动机就熄火了，甲板人员不得不推着他的飞机停放到拦阻网前方。

被问及这次出击怎么样时，麦克坎贝尔“几乎不好意思开口”。他确定自己击落了9架，最多可能是11架。根据他飞机上照相枪的记录，他的战绩被定为击落9架，从而创下了单次出击击落数量的纪录。那7名和他一同出击的“埃塞克斯号”“地狱猫”飞行员总共取得了击落24架的战绩。由于这次令人难忘的出击，麦克坎贝尔荣膺荣誉勋章。

但敌机还在不断飞来，一个上午没停过。马尼拉以北的机场网络（曾经属于美国）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航空兵基地的大量增援，简直成了航空兵的聚宝盆。日本人肯定不知道南边还有两支航母特混大队存在，因为这一天所有的攻击压力都落在了吕宋岛东边海岸外“泰德”谢尔曼将军的四艘航母身上——大型航母“埃塞克斯号”（他的旗舰）和“列克星敦号”，以及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和“兰利号”。谢尔曼担心日军可能最终会单纯凭借数量优势压垮他已经超负荷的防空战斗机群。

半晌午时，早晨原本晴朗的天气变成了短时大风和暴雨。海面上的低能见度成了捉摸不定的恶作剧者，对双方都是个不可控因素。在上午9点后不久那场混乱的空中搏斗之后，6架幸存的日军飞机屡次冲进低垂的云层，甩开美军防空战斗机。这些漏网之鱼逃不过雷达的监视，但F6F的飞行员们却无法向看不见的目标开火。入侵者就在附近，在特混舰队上方低空盘旋，其威胁无处不在。这是一场令人提心吊胆的飞行战争，运气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眷顾任意一方。舵手们操纵着舰艇开进每一片经过此地的暴雨区，这里可以像隐蔽飞机一样隐藏他们的军舰。只要一有敌机从云缝中出现，高射炮手们就会射出恐怖的密集炮火，落下的炮弹壳如同钢铁暴雨一般让大海沸腾起来。

上午9时49分，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的运气用尽了。它正转向迎风方向，准备回收飞机，这时一架D4Y“彗星”（盟军绰号“朱蒂”）俯冲轰炸机从头顶的云层中单枪匹马杀了下来，这架飞机已经进入高速俯冲状态，其航线已经完全对准了军舰中线。舰长威廉·H.布莱克立即下令向左急转，但来不及了。250千克炸弹如同导弹一般从1 500英尺空中落下，正中军舰正中央。它击穿了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在二层甲板的面包房和相邻的洗衣间里爆炸，炸死了里面的人。[\[35\]](#)

布莱克一开始还满怀希望。“我并不太担心，”他说，“我想那是一枚小炸弹，我们很快就可以修复损伤。”[\[36\]](#)但是机库甲板后部的一处火灾点燃了从一架被毁的TBM“复仇者”机上漏出的汽油。救火队和损管队已经就位，舰长则操纵“普林斯顿号”转向，让风从左前方吹来，好把火焰控制在军舰后部。主消防水管很快失去了水压，救火队员无法在大火中保护这些水管。地狱般的烈火又吞没了机库甲板上的5架TBM“复仇者”，一架接着一架，它们的油箱被点燃了。上午10时10分，弹药库里的所有鱼雷被全部引爆。巨大的爆炸把前后两台升降机都炸出了升降机井，滚滚黑烟顿时从机库后部和飞行甲板上升腾起来。舰岛和飞行员待命室的通风扇里也开始喷出浓烟。不戴防毒面具和氧气瓶的人已经进不了机库了。数百名舰员挤上楼梯，爬到飞行甲板上，他们的脸和衣服都

被烟熏得漆黑。他们纷纷赶到飞行甲板前端，接着来到左侧高炮走廊上，以躲避来自机库的高温、火焰和浓烟。

“普林斯顿号”开始侧面迎风，随波逐流，看上去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舰长下令，除了损管队以外所有人员撤离。它忠诚的护航舰——轻巡洋舰“伯明翰号”和驱逐舰“莫里森号”、“埃尔文号”——靠了上来，开始接运离舰人员。“伯明翰号”的消防龙头隔着军舰，以高抛物线把水和灭火泡沫喷向“普林斯顿号”的火灾位置——“伯明翰号”的救火队也组织了几十名勇敢的志愿者登上“普林斯顿号”，加入拯救军舰的搏斗中。“埃尔文号”和“普林斯顿号”舰首对着舰首，开始直接从它的飞行甲板上接运人员。重伤员从一艘舰被抛掷到另一艘舰上等候着的双手中，这种抛掷需要视两舰甲板的起伏准确把握时机。其他人则顺着绳索滑到海中，再游到“莫里森号”和“埃尔文号”旁，通过吊绳网爬上去。然而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有几十人不幸溺亡。“莫里森号”的上层建筑还一度卡在了“普林斯顿号”侧舷伸出的烟囱中间，被困住无法脱身。“普林斯顿号”的一次油气爆炸把一辆飞机牵引车炸飞了出去——这辆车翻滚着撞到“莫里森号”的舰桥，之后落在这艘驱逐舰的艏楼甲板上。后来，舰长冷冷地表示他在海军生涯中从来没想到过竟会看到这种事。

布莱克仍然留在“普林斯顿号”的舰桥上，热得受不了时，他便来到旁边的露天走廊上。约翰·霍斯金斯和他在一起。霍斯金斯是作为布莱克的继任舰长来到舰上准备候任的。布莱克告诉霍斯金斯，自己有个严重的担忧。机库后部下方的弹药整备室里还有一车100磅航空炸弹，这个舱室此时正被烈火炙烤。炸弹会爆炸吗？此事无法确定，但是布莱克分析，如果炸弹会被烧炸，那它们在先前的爆炸中就已经炸过了。他仍然希望扑灭大火，拯救军舰。

正午到下午1点期间，情况看起来有所好转。火焰再次被逼退到军舰后部，几艘护航舰也在一直支援灭火。但是到了1点半，舰队开始时不时发现潜艇的声呐接触信号，空袭警报也响了起来，所有舰艇受命离开此地，机动规避。在此后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普林斯顿号”失去

了护航舰的消防水龙支援。当友舰返回时，风速增加到了20节，大火已经重燃。“伯明翰号”靠泊到“普林斯顿号”的迎风一侧（左侧），用系泊缆绳把两舰固定到一起。巡洋舰的消防水龙头再次开始扑救航母上的大火，“普林斯顿号”上躺着伤员的担架也被小心翼翼地运送过来。“伯明翰号”的甲板上此时挤满了人，有救火队员、操作水管的水兵、医护人员、高射炮手，以及指挥各项操作的军官。

这就是下午3时23分的情况。就在这时，“普林斯顿号”上整備完成的炸弹像布莱克担心的那样，爆炸了。根据战损报告记录，这场巨大的爆炸是由于“400枚100磅通用炸弹被大批同时引爆……炸掉了120号肋骨后部的整个舰尾及其上层建筑”。^[37]“普林斯顿号”的舰尾部分整个消失了。残骸和钢铁碎块，有些还很大，被炸飞到了高处又落了下来。尸体和残肢断臂像下雨般落到各个方向。“我看到了这次爆炸，还记得看见10具或者15具尸体飞到了空中。”驱逐舰“波特菲尔德号”上一名水兵约翰·希恩回忆道。有些碎块甚至飞过了驱逐舰“卡森·扬号”，落到了更远的海里。“我们想去看看那里还有没有幸存者，但找不到。我猜他们都被炸碎了。”^[38]

后来在与《克利夫兰老实人报》的一名记者谈及此事时，布莱克有些哽咽。“它既突然又恐怖，那爆炸，”他说，“那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糟糕的声音，我没法向你描述。”^[39]

碎片就像死神的镰刀一样横扫“伯明翰号”暴露的前甲板，其舰员死伤达229人。根据该舰战时日志记载：“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死者、垂死者和伤员铺满了甲板，许多人已经血肉模糊，令人恐惧。”一名幸存的军官回忆道：“鲜血顺着排水道流了出来。”许多舰员严重烧伤，看起来很难生还，甚至都不愿再活下去。有些人拒绝了医疗救治，要医护人员去救治其他存活概率更高的战友。一名士官对“伯明翰号”的副舰长说：“不要为我浪费吗啡了，指挥官，对我头上来一枪吧。”^[40]

爆炸时，李·罗宾逊正在下甲板上，逃过一劫。之后整整两天，他不眠不休地救助受伤的战友。“说到这事我都忍不住想哭，”几十年后，他在一盘口述历史录音带中说，“这么多人一下就死了，鲜血都从甲板两边流了出去。我们不得不在甲板上撒上沙子，以免滑倒。”他和未受伤的战友们一连几天在舰上的洗衣房里为伤员洗出干净的绷带。罗宾逊回忆“伯明翰号”上的病房时说：“我们没人会独自去那儿。我们都是两人结伴，因为那里的景象太可怕了，到了那里我们就必然会看到。”^[41]

炸弹库爆炸时，布莱克舰长和霍斯金斯正在“普林斯顿号”的飞行甲板上。布莱克在爆炸中只受了一些表皮伤，霍斯金斯的一条腿却被碎片击中，膝盖以下几乎全被炸飞了。他要布莱克去照顾其他伤员。当舰长几分钟后回来时，他发现霍斯金斯自己用刀切除了残余的碎肉，给自己截了肢，还自己做了包扎止血。布莱克意识到自己坚持拯救“普林斯顿号”的做法已经带来了可怕的代价，下令弃舰。下午4时40分，他最后一个滑下绳索离舰。

栗田被告知，他穿越菲律宾中部航道时可以期待空中掩护，但是他和他的人长达三天的整场战役中总共只见过五六架日本飞机。他向菲律宾航空兵指挥官反复明语发电，却无人答复。福留将军在战后接受审讯时承认，他“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我认定，给栗田舰队最好的保护，是集中我所有的航空兵力进攻你们守在海峡外的特混舰队”。^[42]

10月24日，中路舰队被美军舰载轰炸机和鱼雷机追打了一整个下午。舰员们一边用手头仅有的能对抗这种猛攻的武器——他们的高射炮——进行还击，一边在锡布延海中前进。他们知道随着与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攻击只会愈加猛烈。第38特混舰队向栗田放出了259架次飞机，这些飞机来自至少7艘不同的航母：“勇猛号”、“埃塞克斯号”、“列克星敦号”、“富兰克林号”、“企业号”、“圣贾辛托号”和“贝劳伍德号”。在这场“锡布延海海战”中，美军只损失了18架飞机，考虑到日舰射出的巨量高射炮火，这个损失实在不算大。

正午刚过，第二批攻击机就杀到了：来自“勇猛号”的大约100架挂着炸弹的F6F和挂载鱼雷的TBM。“复仇者”再次命中“武藏号”，将3枚（也可能是4枚）鱼雷打进它的左侧；与此同时，充当俯冲轰炸机的“地狱猫”也命中这艘舰两枚炸弹。一枚炸弹打哑了1号主炮塔，另一枚炸弹钻进它左边外侧轮机舱，摧毁了锅炉管道并迫使舰上一台锅炉熄火。失去了四个螺旋桨中的一个，再加上左舷防雷突出部被炸开一个口子，“武藏号”的航速已无法再超过22节。以这个速度行驶时，其左侧的舰首浪大得有些不自然，这是其水线下方的鱼雷损伤导致的。栗田把舰队其余各舰的速度也降了下来，好让受伤的超级战舰能够留在编队里，但是较慢的速度却令其在俯冲轰炸机尤其是鱼雷轰炸机面前更易遭到攻击。

第三轮空袭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来自“埃塞克斯号”和“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再次攻击了“武藏号”，将两枚炸弹扔在3号主炮塔附近，并又将4枚鱼雷射进其右舷。炸弹大量杀伤了舰上的高射炮手和其他暴露在外的的人员，鱼雷则切断了一条关键的电缆，并导致轮机舱大范围进水。爆炸的冲击令这艘巨舰从头到尾猛烈摇晃起来：水兵们摔倒在地，倾泻而下的海水把死者和伤员沿着排水口冲到了海里。在下甲板上，医务室挤满了严重出血和烧伤的人，于是担架只能被放在相邻走廊的舱壁旁。问题是，炸弹的爆炸令舰体的这一部分充满了有毒气体，医务人员和伤员还必须紧急疏散。由于人员死伤，军舰关键部位进水，以及接连不断的空袭，损管队竭尽全力却已力不从心。当舰上装有液压泵的舱室被海水淹没或者被炸弹毁伤后，军舰就变得越来越难保持平衡了。当“列克星敦号”和“埃塞克斯号”的飞机在下午1时50分消失在东方海平线上时，“武藏号”已经显著左倾，吃水也比空袭到来之前深了13英尺。它舰体内灌满了海水，无法再跟上中路舰队其余各舰，于是掉了队，只有一艘重巡洋舰“利根号”留下来护卫它。

下午2时55分，当最后一批攻击机接近中路舰队时，“企业号”和“富兰克林号”上的飞行人员看见“武藏号”拖着长长的油污，航速只剩下大约8节。攻击机在安全的高空兜着圈子，就连战列舰18英寸主炮蜂窝霰

弹型的三式对空弹也够不着它们。鱼雷机飞行员耐心地等待着，计划着他们的攻击：他们将要全部瞄准军舰的左舷，也就是它倾斜的方向。

“武藏号”脱离了其余友舰（只有“利根号”伴随左右），灌满海水，蹒跚跛行，舰首下沉，这艘巨型战列舰已经成了人常说的“活靶子”。幸存的舰员们额头上扎着膏药旗，仍在拼命死战。他们在战死或者垂死战友的身旁继续操纵着残余的高射炮。18.1英寸主炮用三式弹在天空中打满了五颜六色的爆炸烟团。美军机组人员能感受到这些巨型武器爆炸时的冲击波。“即便距离很远，我也能感觉到它们每次射击时的炮口爆风。我发誓每次这些巨大的冲击波撞到我们时，我的机翼都简直要被折断。”^[43]第13鱼雷机中队的一名“复仇者”飞行员杰克·劳顿如此回忆道。这些高射炮弹都染上了各种鲜亮的颜色，以帮助日本炮手观察弹着点和纠正瞄准点。齐射弹幕的爆炸摇晃着他们的飞机，飞行员们却有了一种在天上花园中穿行的神奇感觉。“有些爆炸是蓝色的，有些是红色的，有些是粉红色的，还有一些是黄色的。”劳顿说。第13鱼雷机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鲍勃·弗雷利则想起了“我老家密歇根州阿德里安市莱纳维县广场七月四日庆典上的景象和声响”。^[44]

鱼雷机飞行员开足马力，下滑到浪尖高度，节流阀一推到底，空速指针都指到了仪表盘上的红色危险区。面对高射炮时最好的自卫手段就是速度。劳顿感觉他的飞机“随着每一发炮弹的每一次冲击而摇晃和抖动。”红色的曳光弹向着他的风挡玻璃迎面扑来。他驾驶着他的格鲁曼飞机左躲右闪，以规避其航线上掀起的水柱，因为“撞上这些水柱无异于撞山”。^[45]日舰的主副炮一齐向TBM机群航线上的海面开火，掀起200英尺高的彩色水柱。日军从太平洋战争之初便采用了这种打法——在低飞鱼雷机的航路上打出弹着水柱，以图将飞机击落或者至少迫使其偏离攻击航线。在600码距离上投雷后，劳顿一个急转弯，从“武藏号”的舰首前脱身而去。弗雷利也投下了鱼雷，但是“当进行规避机动以脱离这艘军舰的炮火时，一枚曳光弹打中了我的油管。燃油喷满了我的风挡”。弗雷利驾机在附近的岛屿旁迫降，和两名机组成员一起上了

岸。他们被友方菲律宾人接了回去，几个星期后获救。[\[46\]](#)

“武藏号”行动愈加迟缓，最后瘫痪在了海面上，成了一个死靶子。TBM机群至少命中它7枚鱼雷，全部打在脆弱的左舷上。与此同时，SB2C和“地狱猫”机群协调一致的俯冲攻击也上场了，它们在军舰上投下了穿甲炸弹，从头炸到尾。一枚500磅炸弹击中了军舰的上层建筑，摧毁了舰桥，另一枚炸弹命中塔楼下方，燃起大火。这些打击杀死了舰上的许多高级军官。舰长猪口敏平少将右肩受伤，但仍能行走。他和副舰长一起在下层的指挥舰桥里建起了新的指挥所，但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办法来拯救军舰。它已经通体燃起大火，左倾愈加严重，海浪也已涌上了舰首。至少有一枚鱼雷（也可能有两枚）穿过先前的攻击在外层保护船壳上留下的破洞，在内层船壳上爆炸，致使4号轮机舱被海水淹没。根据副舰长的说法：“上层接连不断的炸弹破坏令我们无暇顾及排水，因此已不可能阻止进水。”[\[47\]](#)

中路舰队其余各舰已经开到了“武藏号”前方30英里处，即将进入圣贝纳迪诺海峡西口。栗田又发出了几封紧急电报请求空中掩护，或者请求空袭第38特混舰队，但他没有收到任何正面答复。[\[48\]](#)经历前一天早晨巴拉望水道的惨剧之后，他和参谋们都很担心在海峡咽喉处可能会再次遭潜艇伏击，受到重创。他们从文莱出发时有15艘驱逐舰可用作护航，但现在只剩下11艘。舰队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中佐预言，中路舰队在天黑之前还要再击退三次大规模空袭，他警告栗田，不要在难以机动规避的狭窄水域被美军抓到。天黑后再强行穿越海峡将会更安全一些。他提出他们可以临时向西退避。他预计，这有意的耽搁可以为友军争取更多时间去空袭美军航母。这还可以成为一种假动作，令敌人误以为中路舰队正在撤退。

显然，“大和号”舰桥上的许多人都赞同大谷的分析。他们一边咒骂不知所终的日本航空兵，一边挖苦司令部的那些人。一名后来采访了多名军官的日本记者讲述了“栗田舰队每个人的愤怒与苦恼……在舰队里的这些人看来，他们的军舰就是送去给敌人训练打靶的”。[\[49\]](#)当天下

午，联合舰队通过无线电发来了一份警报。敌人潜艇可能在圣贝纳迪诺海峡出没，因此：“要警惕。”这份电文又引得舰桥上一片嘘声，这真是“无理而气人”。^[50]中路舰队已经被潜艇击沉了两艘巡洋舰，而且在过去的48个小时里都在对付敌人潜望镜的观察。难道司令部的那帮蠢货以为他们会不警惕吗？

下午3时30分，栗田下令舰队转向180°。又过了30分钟，他才将此告知司令部。理由是“敌机数量众多，反复来袭”。栗田如此告诉丰田，他会暂停推进，好让陆基航空兵有时间去重击美军航母。“如果我们继续现有航向，就会遭到难以计数的损失，却无望胜利完成任务。”^[51]他说他向西撤退只是“暂时的，稍后将重返战场”。^[52]

舰队西撤一小时后，他们回到了能目视看见被击伤的“武藏号”的地方。日军原本预计还要遭到几轮猛烈空袭，因此没有敌机来袭，让他们感到很惊喜。一架侦察机在舰队上空高处盘旋观察，舰队的西撤显然已被发现，但是下午4时20分之后便再没有敌机出现了。

下午5时15分，在没有收到丰田对他上一封电报的回电的情况下，栗田做出了决定。他的使命还在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另一边。“好吧，”他简洁地说，“我们回去。”^[53]他的命令显然令参谋部中的一部分人感到意外和错愕。但命令已下。“大和号”和编队中的护航舰进行了两次直角转弯，航向恢复向东。他们现在已经比计划中的时间落后了六七个小时，这意味着日军无法向莱特湾里两栖舰队发动协调一致的“钳形攻击”，除非西村的南路舰队同样延误。

拥堵的无线电通信导致了联合舰队总部回电的延误。（这个问题在美军一侧同样严重。）最终在晚上7时15分，栗田收到了丰田的消息。这是一条不容辩解的指令，带着半宗教的腔调，这条第372号作战命令的原文是：“天佑我军，全军突击。”^[54]这条命令还有一个言外之意，只有日本人才能读懂。这条命令是联合舰队参谋长高田利种起草，交给丰田大将签名发出的。高田后来告诉美国审讯人员，这条命令有一层所

有日本军官都懂的含义，就是“撤退也不能控制或减轻损害，因此即便舰队全灭也要前进。我发出这条命令时就是这种感觉；因此我敢说，第二舰队没有因可能遭受的损失而受到任何形式的限制”。[\[55\]](#)

栗田接到的命令是毁灭他自己和他的舰队，同时争取给美军舰队一定打击作为回敬。日本海军力量能否幸存完全不应该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例如，他不应该去考虑他的驱逐舰会不会耗尽燃油而在美军的反击面前无法自保。他率领的是海军的“万岁冲锋”，目的是让帝国海军虽败犹荣。

这一声惊雷传到时，栗田已经掉头开往海峡超过一个小时了。根据伊藤正德的回忆，这份命令在“大和号”的舰桥上受到“一片嘲笑”。栗田的参谋们嘲笑那些高级将领的妄自尊大，他们远远躲在家里安全的地下掩体中，发出这种“无视敌人攻击”的命令。从这些讲述上看，当时舰桥上的普遍反应是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甚至有些想造反。一名军官回忆道：“让我们去打仗。就是神也无法在岸上指挥海战。”另一个人将丰田的命令解释为：“我军必死，全军突击！”[\[56\]](#)

向东回航后，中路舰队从冒着烟、倾斜着且正在下沉的“武藏号”残骸南面几英里处经过。作为世界上装甲最厚重的两艘军舰之一，它能够承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它确实承受了——超过20枚炸弹命中上部，大约19枚或20枚鱼雷命中水线以下，其中15枚打在左舷。历史上从没有哪艘战舰遭受过这种打击还能幸存下来。在“大和号”的舰桥上，双筒望远镜把这幅场面拉到了宇垣将军的眼前——这艘7.2万吨的巨舰向左严重倾斜，塔楼式的上层建筑被炸弹炸毁、熏黑，一股黑烟升腾到数千英尺高的空中。它修长优雅的舰首被水淹没，前主炮前方的露天甲板都没入了水中，海水拍打着舰首的金色菊花纹章。此时已经夕阳西下，斜照过来的阳光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拖出长长的阴影，令这幕景象更显悲凉。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武藏号”“凄惨的处境目不忍睹”。[\[57\]](#)

“武藏号”的命运对“大和号”来说是个不祥之兆。这两艘姊妹舰用同

一套方案建造，都号称永不沉没。日本为了它们的设计和建造倾注了巨量的资金、人力、原材料，以及工程专业资源。海军省的一名军官曾做过评估，这两艘超级战列舰耗用的成本，足够日本海军制造2 000架最先进的战斗机，并训练出最顶尖的飞行员来驾驶它们。^[58]此外，这个项目还需要对用来建造两艘巨舰的长崎（“武藏号”）和吴港（“大和号”）的两座船坞进行大规模扩建。舰上的2 700名舰员也都是精英，他们从舰长到最基层的水兵，都是从日本海军各个军衔层级中表现最优异的人中精选出来的。它们是舰队中的孪生王者，其象征意义远比作为一种武器的实际价值更重要。这两艘舰都被用作联合舰队总司令的旗舰，宇垣缠就曾先后在两艘舰上给已故的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做过参谋长。凭他的专业眼光，宇垣不用听完整的汇报就知道“武藏号”的右舷几乎所有能用来“放水”的舱室都已经放满水，这样也就没什么办法能纠正它的倾斜了。他仔细查看着垂死的“武藏号”，情况很明显——如果那艘舰会沉，那么他脚下的这艘也是一样。

宇垣通过灯光信号发出了命令：如果无望开到科隆湾，猪口将军应当努力开到附近的任意港口。如果还做不到，就应该让军舰在最近的岛屿冲滩搁浅。实际上宇垣并不真的指望“武藏号”能幸存。他在日记里写道，它已“为了‘大和号’牺牲了自己”。他还说自己预计“大和号”将来有一天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因此我最终下定决心，要毫无保留地和我的军舰共存亡，我决定让‘大和号’成为我的葬身之地。”^[59]

“武藏号”的左倾愈加严重，人们不得不扶住舱壁才站得住。在舰桥上，猪口告诉他的副舰长加藤宪吉大佐，他决意与舰共存亡。他给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将军写了一张便条，说自己寄如此厚望于大舰巨炮的威力是错误的，还承认了海军航空兵的优势地位。他把便条交给加藤，并命令这位更年轻的军官去逃生。接下来便是所有人都已司空见惯的一幕：天皇“御影”被从礼堂里摘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小艇上。那面20英尺长，10英尺宽的巨大的旭日旗，伴着一名号手吹出的日本国歌《君之代》被从旗杆上降下，收了起来。

与此同时，其他舰员还在疯狂地想要阻止军舰愈加严重的倾斜。所有能动的东西都被拖到了军舰右侧，甚至包括伤员和尸体。但他们的努力全部都是徒劳。晚上7点半，“武藏号”的倾斜角超过了30°，超过了它维持平衡的极限，巨舰轰然翻倒。当军舰倒扣过来时，有几十个人翻过右舷栏杆爬到了军舰长满藤壶的船底和龙骨上。还有些人掉进了第38特混舰队的鱼雷在这天早些时候炸开的大洞里。“武藏号”的舰首沉入了水下，舰尾则抬离了水面，海水如瀑布般从四个巨大的螺旋桨上流了下来。军舰下沉时水兵们纷纷逃了出来，他们攀爬在栏杆和甲板的物件上，有些人在主甲板倾斜到近乎垂直时掉了下去，还有些人跳过舰尾栏杆，掉在螺旋桨上，被弹到了一旁。当海水最终快要淹没舰尾时，一个巨大的旋涡将周围的碎片和水里的人都卷了进去。那些穿着救生衣的人还能再次浮出海面，但许多人刚刚喘过一口气就被这无法抗拒的吸力再次拖了进去，之后再次浮出来——如此往复，仿佛是死去战友的鬼魂抓住了他们的脚踝。游得离沉没的巨舰越远，生还的机会越大。有不少人最后活了下来，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但许多其他人却丢掉了性命，和他们心爱的“武藏号”一起堕入深渊，沉入锡布延海3 000英尺深的海底。

指挥舱占据了“新泽西号”上层建筑中的整整一层甲板，那里拥挤、繁忙，而且吵闹。空气中弥漫着烟味。空中飞行员们的无线电语音通话都会通过大喇叭直接传到屋里。来自诸多不同来源的新的数据不断流入第3舰队这一拥挤的指挥中枢里。“阴谋诡计部”的任务就是消化这一切。

情况时时都在变化而且极其复杂。两支独立的敌特混舰队正在菲律宾中部的岛屿屏障中穿行，其各自的目标显然是苏里高海峡和圣贝纳迪诺海峡。这种分进合击是日军的常用战术，哈尔西在1942年的几次海战中就见识过。不需要多强的分析能力就能看出，敌人意图强行穿越这两个海峡，向莱特湾里的两栖舰队发动钳形攻击。

这天下午对日军中路舰队的最后一轮大规模空袭结束后，飞行员们带回了过于乐观的报告。返航的飞行员们相信自己已经摧毁了两艘“大和级”战列舰，以及两艘小一些的“长门级”或者“金刚级”战列舰，他们还声称自己的鱼雷和炸弹消灭了两三艘重巡洋舰。不仅如此，侦察机还发现日军中路舰队残部正在向西航行。或许他们已经放弃作战，逃离以自保。无论如何，哈尔西都认为栗田幸存的军舰已遭彻底打击，“不再对金凯德构成严重威胁了”。^[60]即便这支中路舰队设法通过了海峡，“它的战斗力也已遭到重创，无法决胜”。^[61]

各方面的零散情报都显示，日军正倾尽全力，前来迎战美军对莱特岛的进攻。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他们的航空母舰呢？华盛顿和珍珠港的情报部门一致认为至少在10月中旬时小泽的航母部队还在日本海域。在过去的两天里，据破译的绝密无线电情报推测，小泽已经驶离日本，此时正在吕宋岛以北的菲律宾海某处。可以判断，他正从北面开过来，他的到达时机将与敌另两路特混舰队协调一致。哈尔西和关键幕僚们开始警惕起来，小泽很可能在舰队和吕宋岛机场群之间实施“穿梭轰炸”战术。因此他们决心要在日军航母加入战斗之前找到它们并展开空袭。

这天一大早，哈尔西就命令米彻尔向北放出加强兵力的空中搜索。但无线电频道上如此拥挤，这道指示直到上午11时30分才送到“列克星敦号”的指挥舰桥上。而此时，第38特混舰队正忙于应对来自吕宋岛的一轮轮空袭。因此，侦察机直到下午2时5分才起飞升空，两个小时后，仍未找到小泽。

当侦察机还在天上飞的时候，下午3时12分，哈尔西发布了一条内部命令，这条命令注定要在第二天的战事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条命令的分类是“作战计划”，内容是此时在各航母大队中担任护航舰的6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将组成第34特混舰队，由战列舰队司令李中将指挥”。^[62]这支舰队的目标将是“在远距离上与敌决战”。^[63]这份电文的收件人是第3舰队司令的所有直接下级，并抄送给尼米兹和金。哈尔西打算把它作为“预备消息”，或者说是预警性命令，

如果发生水面交战的概率增加，这道命令就将被执行。为了落实这一点，他后来又亲口通过舰船间无线电通话通知下属：“如果敌人〔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出击，我将命令第34特混舰队集合。”^[64]

哈尔西后来坚称他的第一封电报不是发给他自己第3舰队以外的任何人的。但是既然美国海军所有指挥官都能监听到那份无线电报，而且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份密码，那么其他人看到这份电文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大家也常常这么干。第7舰队的通信组就把哈尔西的电文打印了出来，交给了“瓦萨奇号”上的金凯德将军。但哈尔西后来通过近距离无线电通话做的澄清却没有发给金凯德（也不可能发送给他），也没有发给尼米兹或者金。考虑到军事文件用语应有的准确性，“将组成”（will be formed）这种表述就十分模糊，尤其是在没有第二份消息做澄清的情况下。这个表述完全可以被解读为立刻行动，也就是说哈尔西在命令他的下级立刻组建新的特混舰队，准备参加计划中的战斗。他用表示将来时态的“will”也可能仅仅是考虑到这些军舰分属于相距遥远的三个航母特混大队，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集结到李将军处。金凯德就是这么理解哈尔西的命令的，珍珠港和华盛顿也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下午4时40分，飞往北方的一架侦察机发来了消息。在吕宋岛东北海岸恩加诺角外190英里处发现一支大规模敌航母舰队：航速15节，航向210°。^[65]那只能是小泽，他要来了。考虑到时间已晚，美军此时的距离还不足以向小泽发动进攻。

在“新泽西号”的指挥舱里，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研究海图，分析了形势。三支敌海军舰队正从三个不同方向朝莱特湾集中（或者是意图在此集中）。值得注意的是，或者说是哈尔西和他的团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支舰队都以“不慌不忙”的约15节航速开进，远低于其最佳巡航速度。第3舰队作战报告中对此写道：“这表明他们预先设定好了地点和时间。其动向意味着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协同计划正在实施。10月25日将是联合作战的最早日期。”^[66]南路舰队正开往莱特南方的苏里高海峡，它相对较弱，可以安全地交给金凯德去对付。中路舰队遭到第38特

混舰队航空大队一整天的凶猛打击，看起来正在撤退。而新发现的北路舰队是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敌特混舰队。它是生力军，毫发无损，攻击力完整。小泽可能意图对美军舰队做穿梭轰炸，就是说他的轰炸机将在拂晓时空袭第38特混舰队，之后飞往吕宋加油装弹，继而再次发动空袭，随后返回航母。

在空战中获胜，这对哈尔西来说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到了这个阶段，美军舰载航空兵已经拥有了相当显著的优势——但他想要的是全歼北路舰队，先用多轮空袭将它打残，再用他的水面战舰结果它。为确保全灭敌人，他需要先缩短距离。和哈尔西最亲密的“努美阿帮”的几名军官建议全舰队北上，[\[67\]](#)这些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开始就一直在哈尔西手下干。于是哈尔西把他的手指放在海图上，指着报告中小泽舰队的位置，对卡尼说：“我们要去这里。米克，让他们向北。”[\[68\]](#)

10月24日晚8时22分，“新泽西号”通过无线电命博根和戴维森加大马力，以25节航速跟随谢尔曼的第3大队一同北上。被大火吞没，被舰员放弃的“普林斯顿号”被命令击沉，其护航舰队中的一艘舰将齐射鱼雷执行这一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三支航母大队的所有舰艇都要北上，包括那些原本将要转入第34特混舰队，留下来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的快速战列舰和其他水面战舰。整个舰队，总共65艘舰艇，将要加入这场向北的冲刺。至于栗田那支被大大削弱的中路舰队，如果它真的重新集合起来穿过海峡，那就交给金凯德第7舰队的大炮和护航航母去对付吧。

哈尔西告诉金凯德，他正“带着三支大队向北航行，在拂晓时攻击敌航母舰队”。[\[69\]](#)这份电文有太多东西没说清楚，而致命的误解恰好出现在它没有说明的地方。哈尔西完全没有提到第34特混舰队的事。他也没有告诉他的战友，第四支航母特混大队此前已被派往东边，距离太远，无法提供直接支援。金凯德没有想到一个致命的事实：第3舰队没有任何一部分被留下来守卫（哪怕只是监视）圣贝纳迪诺海峡。

下达了命令之后，哈尔西回到他的舱室，躺到了床上。他累坏了，过去的48小时里他都没睡。他需要合一会儿眼，现在恰好有空。

此时，在哈尔西的情报部门和整个第3舰队的各个指挥舰桥上，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哈尔西的舰队相当强大，他一艘舰也不留下来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决定看起来很奇怪，甚至令人费解。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当哈尔西选择的作战计划开始付诸行动时，新的侦察报告动摇了“栗田舰队已撤退”的前提。博根将军第2特混大队中的轻型航母“独立号”配有一支夜航中队。他们向圣贝纳迪诺海峡的西口派出了几架夜间侦察机。他们发回的有些报告显得混乱而彼此矛盾，但是汇总在一起则指向一个结论：日军中路舰队正在高速东进。6时35分，敌舰纵队被发现位于先前位置以北约6英里处，航向似乎为东北方。“独立号”的另一架飞机报称敌舰队位于布里亚斯岛附近，比前一次被发现的位置向东北移动了25英里。之后又收到一份报告，日舰位于布里亚斯岛和马斯巴特群岛之间，这意味着栗田已经转向东，以24节速度全速前进。如果栗田以这个速度航行，他舰队的状况一定比先前预计的更好。最后，消息传来，标示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导航灯亮了。

博根将军打开了无线电步话机直接找到“独立号”舰长，后者告诉他，日军舰队正在向东北方高速航行。他们很快就会到达圣贝纳迪诺海峡西侧入口，那里的导航灯已经亮了起来。博根随后直接联系上了“新泽西号”，和他通话的是指挥舱里一位不知名的军官。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出来后，博根提议让第34特混舰队和1支航母大队（他自己的）留下来负责守卫海峡。然而那个人用“相当不耐烦的语气”打断了他，说：“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70]

博根说，后来“我觉得哈尔西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71]他对于李的战列舰没能和栗田的战列舰碰上面感到遗憾，他相信这场战斗美军将会手到擒来。“这将意味着日本海军力量就在那里终结，彻底终结，”博

根总结道，“这真是太郁闷了。”^[72]

李将军也是这么想的。他试图联系“新泽西号”，先是用灯光信号，接着又用舰船间无线电通话系统。他询问第3舰队司令是否留意到最新的侦察报告，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收到。”^[73]和博根一样，他也觉得自己能做的到此为止了。

第4大队司令拉尔夫·戴维森对他的参谋长詹姆斯·拉塞尔说：“吉姆，我们正在给莱特湾里的那些运输船玩一个要命的阴谋诡计。”拉塞尔同意他的说法，问戴维森是否要联系米彻尔将军，提出不同的作战路线。戴维森拒绝了，他说：“他的信息肯定比我们多。”^[74]

在“列克星敦号”上，第38特混舰队的幕僚们询问哈尔西是否已经直接接手航母的战术指挥，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自从8月以来，米彻尔将军已越来越适应这种冷板凳了。他明显很累了，精神和体力皆然，自从1944年开年以来他就一直在海上作战；此时，哈尔西那一伙人无论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了。米彻尔此时已经上床了，他的参谋长阿利·伯克把脑袋伸进了将军的住舱里。他想要用无线电联系“新泽西号”，警告他们北路舰队只是个诱饵。“我想你是对的，”米彻尔答道，“但我并不确定。我想我们不该打扰哈尔西将军。他够忙的了。他脑子里面事情太多了。”^[75]

不久后，伯克又拉着第38特混舰队作战参谋吉姆·弗拉特利一起回来了。他们摇醒了米彻尔，告诉他新的发现，也就是圣贝纳迪诺海峡中的导航灯亮起的消息。米彻尔问道：“哈尔西收到那报告了吗？”弗拉特利承认他收到了。米彻尔说，这样的话就犯不着去揣测舰队老大的意思了：“如果他需要我的建议，他会来问的。”

第3舰队情报部门的几位军官相信北面的航母舰队是个诱饵，并且担心哈尔西会一口吞下它。北上的决定在做出之前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舰队情报官迈克·奇克“愤怒地”和道格·莫尔顿争辩了起来，后者是舰队的航空作战参谋，是哈尔西核心圈子里的老人。奇克少见地扯开了

嗓门，说他**知道**栗田正在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但莫尔顿不为所动。

奇克败下阵来，不过他的两名下级劝他把他的方案沿指挥链提交给“米克”卡尼。卡尼说如果奇克想要喊醒哈尔西，去提交他的方案，他（卡尼自己）不会阻拦。但是，卡尼说，他怀疑哈尔西不会被奇克的分析说动，他还补充说，哈尔西“在过去48小时里都没怎么睡了”。[\[76\]](#)奇克自然不会去喊醒将军，事情就这样了。

哈尔西和他的核心圈子已经决定不再重蹈斯普鲁恩斯在当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中的覆辙，他们相信斯普鲁恩斯当时犯了错误，拒绝让第38特混舰队（当时叫第58特混舰队）向西追击小泽。换言之，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日本航母赶尽杀绝，彻底消灭，他们愿意押上大赌注来实现那个目标。根据“米克”卡尼在战争结束20年后接受采访时的说法：

哈尔西和莫尔顿尤其强烈地拥护一个观点，而且早先就已表达过这个观点：如果日军舰队失去了他们的战术航空力量，那么无论他们未来如何计划，这支舰队都永远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确信他们已无法再为其补充力量了。

如此讨论之后，当晚我们在哈尔西的旗舰上下定了决心，首要目标将是敌航母航空兵。实际上——好吧，我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执念。[\[77\]](#)

摧毁日军航母是哈尔西的“执念”。这个判断来自与他长期共事而且忠诚于他的参谋长，“阴谋诡计部”的大管家，后来爬到海军顶层（海军作战部长，1953—1954）的人。卡尼的坦白无论对哈尔西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当年犯错的铁证，但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晚第3舰队的战术决策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哈尔西和他的团队看起来已经感受到了长期身心俱疲的影响。指挥舱里的许多人刚从最近一轮流感中康复。在此前六个星期几乎毫无停顿

的航母作战中，他们根本都没有休息过。

但疲劳和感冒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自从哈尔西在8月从斯普鲁恩斯手里接过舰队指挥权以来，他们的基本操作流程出现了一系列混乱、草率和冲动的行为。第3舰队司令部比第5舰队司令部大得多，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效率也低得多。新的各个部门并不能如斯普鲁恩斯的司令部那样拿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他们更喜欢靠频繁向舰队发通知来打仗。但通信常常延误，消息模棱两可，或者在最后一刻被取消。航母特混大队指挥官常常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这位新舰队司令毛手毛脚的习惯就连珍珠港也很头疼。尼米兹常常训斥哈尔西越权，或者未能准时、明确地发出报告。在10月上旬发生一次这样的错误时，哈尔西乞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原谅：“我为我的糊涂深感抱歉。我向你保证我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执行很差。”^[78]

哈尔西习惯于依赖那些从南太平洋司令部就一直跟着他的军官，这些人他都很熟，即便他们都没有最近的航母作战经验。根据航母将领、未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拉福德将军的说法，哈尔西“要么被关于航母航空作战的馊主意所拖累，要么固执己见，后者可能更糟”。^[79]舰队中常常有与此相似的观点，即便在哈尔西海军生涯中最具争议的阶段到来之前也是如此。米彻尔的幕僚克拉克·雷诺兹评价哈尔西并没有如同斯普鲁恩斯那样“获得专业方面的诚挚尊敬”，尽管他作为一名领袖获得了“真心爱戴”。^[80]罗兰·斯穆特说他就是个“彻底、十足的笨蛋……但如果他说‘我们一起下地狱去吧’，你还是会跟他一起去”。^[81]

在南方300英里以外的莱特湾中，第7舰队正在准备迎战和打退即将穿越苏里高海峡杀过来的西村的南路舰队。金凯德向炮击和火力支援大队司令奥尔登多夫将军发电：“敌人今夜可到达莱特湾。做好夜战的万全之备。”^[82]

奥尔登多夫的舰队包含了美国海军的大部分老式战列舰以及支援的

巡洋舰和驱逐舰，包括5艘曾在日军袭击珍珠港时被击伤的战列舰。这5艘幸存老舰中的2艘，“西弗吉尼亚号”和“加利福尼亚号”，曾经挨过日本的航空鱼雷，沉入了港口的海底。经过拼命抢救，它们浮起来并完成了修复。在珍珠港的船坞里，它们从头到脚都进行了重建，装备了最新型的火炮、火力控制和雷达系统。就连舰员都是新的：尤其是“西弗吉尼亚号”，全靠训练有素的新兵操纵，其大部分人在6月上舰之前都没有出过海。根据这艘舰的作战报告：“只有12名水兵此前有过出海经验。两名炮塔军官此前从未出过海，三号炮塔军官来自潜艇部队，四号来自小艇部队。然而，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这些人通过了严格的试航期，以一个战斗整体的面貌加入了舰队。”[\[83\]](#)

奥尔登多夫将这些复活的战列舰在苏里高海峡北口处排成一路纵队。在其侧翼，南方2英里处，巡洋舰分队将沿对角线航行，这样就在敌舰的预期行进路线上构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重炮阵。这是直接而且传统的战术安排，用的是传承了几个世纪的“战列线”海战理念。奥尔登多夫把他的驱逐舰布置在南方更远处的海峡内，命令它们紧靠海岸；它们将隐蔽在帕纳翁岛和迪纳加特岛沿岸高山和峭壁构成的雷达阴影区中。当时机到来时，他们将向冲进海峡的日军南路舰队发起鱼雷攻击。

奥尔登多夫还用上了第7舰队的全部45艘PT鱼雷艇。他将这些小艇部署在海峡南部和入口西侧。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早期警戒哨。用无线电发出敌情报告后，它们就将自由行动，争取进行鱼雷攻击。[\[84\]](#)

奥尔登多夫舰队的“钢铁总重”比西村多几倍，看起来完胜对手绰绰有余。日军南路舰队在苏里高海峡中将遭遇一场漫长、致命的夜间鱼雷痛击。如果能闯到海峡尽头，日军战舰还将面对6艘战列舰和8艘巡洋舰的密集舰炮火力。奥尔登多夫的大舰将沿东西轴线列阵，而西村的纵队必须向北接敌。这意味着盟军舰队将有机会抢占日本舰队的“T字横头”位——这样，它们就能用全部侧舷火力轰击敌舰，而敌舰只能用前部炮塔还击。这是一种古老而备受尊崇的战术理念，可以追溯到大炮第一次装到战舰上时。这样，作战的布局令奥尔登多夫原本已是压倒性的

火力优势更加如虎添翼。

美军知道自己手中的牌比对手大，对胜利胸有成竹。但是美军对来袭日军舰队的组成仍有些不确定，奥尔登多夫战舰装载的炮弹种类也让人略有担心。空中侦察报告对日军纵队中战列舰的数量并未达成一致：有些报告说有两艘，但至少有一名飞行员说他看到了四艘。即便是四艘，美军也还是握有优势，只不过没那么大而已。登陆莱特岛之前，火力支援大队装载的大部分炮弹都是适合岸轰的高爆弹，因此他们储备的穿甲弹数量相对有限。只要战斗别拖得太久，这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奥尔登多夫并不想试运气。为了节约穿甲弹，他要求各战列舰在敌人进入1.7万英尺到2万英尺之间的中等距离前不要开火，“在这样的距离上，他们的命中率和打击威力都会很高”。^[85]

在做最后的准备时，金凯德将军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一次微妙的协商。通常情况下奥尔登多夫的战斗群里包括了巡洋舰“纳什维尔号”。但是“纳什维尔号”从荷兰迪亚启程时就一直搭载着麦克阿瑟将军，此时仍然是他的指挥舰。自从登陆以来，他每天都要上岸一回，但晚上都要回到舰上。现在，岸上的情况已经好到足够让麦克阿瑟把他的司令部迁移到莱特岛上了；实际上他原本已经计划第二天就来落实此事。金凯德希望把“纳什维尔号”派到苏里高去，舰上的官兵当然也热切地想要参战。但麦克阿瑟还在舰上，他也想去参加这场大冒险。他对金凯德说：“无论怎么说我都应该出席这样一场关键战斗。不仅如此，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一场大规模海战，我很想看一次。”^[86]可是金凯德实在找不到理由让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冒险参加海战。他向麦克阿瑟提供了另一艘不参战的军舰作为指挥舰，之后又请他到自己的指挥舰“瓦萨奇号”上来。在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两份邀请之后，金凯德干脆把“纳什维尔号”从作战序列中抽了出来，扔到塔克洛班锚地了事。

日落前，奥尔登多夫的军舰到达了阵位。战列舰和巡洋舰弹出了水上飞机，要它们去莱特岛的机场降落，以清空其炮塔的射界。战列舰在下午6时30分编成纵队。一个小时后，舰队做好了战斗准备，进入“一级

戒备状态”。[\[87\]](#)

在莱特湾，所有的眼睛、耳朵、大脑以及心跳都朝向了南方，朝向即将打响的苏里高海峡之战。第7舰队中无人发觉哈尔西已经把他庞大的舰队悉数带到了北方，而让圣贝纳迪诺海峡大门洞开，就连一艘负责警戒的驱逐舰都没有。准备在南边伏击西村之时，金凯德也即将遭到来自北面的突袭，直到天亮几分钟后栗田的巨炮开火，他才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

[\[1\]](#) Edward J.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and notes, p.5.

[\[2\]](#) Thomas C.Kinkaid, oral history, p.301.

[\[3\]](#) “Joint Chiefs of Staf to MacArthur, Nimitz,” October 3, 1944, #2255, in CINCPAC Gray Book,Book 5, p.2378.

[\[4\]](#) “MacArthur to COM3RDFLT,” October 21, 1944, #2240,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89.

[\[5\]](#) Carney, oral history, pp.396—97.

[\[6\]](#)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20.

[\[7\]](#) Log of Captain Ray Tarbuck, U.S.Navy, entry for October 19, 1944, 0958, quoted in Barbey,*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p.245.

[\[8\]](#) Entry for 1400; Third Amphibious Force War Diary, October 20, 1944, p.6, in NARA, RG 38,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177.

[\[9\]](#) Dickinson, “MacArthur Fulfills Pledge to Return,” in Stenbuck, ed., *Typewriter Battalion.Dramatic Frontline Dispatches from World War II*, p.239.

[\[10\]](#) Romulo, *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 p.90.

[\[11\]](#) Ibid., p.91.

[\[12\]](#) Ibid., p.92.

[\[13\]](#) Boquet,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p.100.

[\[1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15\]](#) 日本参战序列中各部队的名称比较混乱。栗田的原第二舰队现在被命名为第一游击部队，又进一步分为A分遣队（栗田）和C分遣队（西村），但有一些日方资料也分别称其为第一

和第二伴攻部队。小泽的航母舰队原本是第一机动部队，现在日本人称其为“本队”。志摩的舰队被命名为第二游击部队，但其原先被称为第五舰队，有些资料就采用了他们先前的称呼。本书根据大部分西方史料的习惯，将分别称之为南路舰队（西村），中路舰队（栗田），和北路舰队（小泽），有些时候会仅以指挥官的名字指代。志摩的10艘舰将简称为“志摩舰队”。——作者注

[16]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ao Kurita.

[17] USS *Darter* (SS—227) War Patrol Report No.4, November 5, 194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18] “Running Estimate” entry dated October 22,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06.

[19]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77.

[20] USS *Darter* (SS—227) War Patrol Report No.4, November 5, 194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1] Thomas, *Sea of Thunder*, p.190.

[22] USS *Dace* (SS—247) War Patrol Report No.5,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p.34,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3] USS *Dace* (SS—247) War Patrol Report No.5, November 6, 1944, Enclosure (A), p.37, accessed August 12, 2017, <https://issuu.com/hnsa/docs>.

[2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3,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87.

[25]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99.

[26]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68.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11.

[28] Yoshimura, *Battleship Musashi*, p.159.

[29] Astor, *Wings of Gold*, p.361.

[30]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05.

[31] TG 38.3 War Diary, October 24, 1944.

[32]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33] Woodward,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p.52.

[34] David S.McCampbell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12.

[35] War Damage Report No.62, U.S.S.*Princeton* (CVL—23), Loss in Action Of Luzon, 24 October 1944,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

[36] Peggy Hull Deuell, “Death of Carriers Describ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One,

p.549.

[37] War Damage Report No.62, U.S.S.*Princeton* (CVL—23), Loss in Action Of Luzon, 24 October 1944,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

[38] John Sheehan, oral history, in Petty, ed.,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08.

[39] Peggy Hull Deuell, “Death of Carriers Describ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550.

[40] Excerpts from Birmingham war diary,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181.

[41] Lee Robinson, oral history, in Petty, ed.,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239.

[4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IJN.

[43] Jack Lawton, oral history, in Springer, *Inferno*, p.134.

[44] Robert Freligh, email to author, February 11, 2018.

[45] Jack Lawton, oral history, in Springer, *Inferno*, p.134.

[46] Robert Freligh, email to author, February 11, 2018.

[4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83, USSBS No.407, Captain Kenkichi Kato, IJN (Executive Officer, *Musashi*, when sunk at Leyte Gulf).

[4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49]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6.宇垣赞成向西转向，并在日记中写道：“我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在傍晚前折回一次，以欺骗敌人，这会对明天的战斗更有利。”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0.

[50]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8.

[51] Ibid.

[5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53]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23.

[54] Haruo Tohmatsu, email to H.P.Willmott, December 3, 2003, quoted in Willmott,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p.132.

[5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64, USSBS No.258, Rear Admiral Toshitane Takata, IJN, attached successively to the Staf of the Third Fleet, the Combined Fleet, and the Naval General Staf.

[56]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11.

- [57]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0.
- [58]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06.
- [59]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4,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1.
- [60] Com 3rd Fleet to CINCPAC, 26 October 1944 (251317);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4, “CINCPOA Dispatches, October 1944.”
- [61]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 [62] “大下巴”威利斯·李是老资格的战列舰分队司令，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好几年了。李曾经指挥美军舰队进行瓜岛海战第二阶段（1942年11月14日至15日）的战斗，这是太平洋战争截至此时唯一的一次战列舰舰炮对决。——作者注
- [63] “COM3RDFLEET to ALL TFC’S 3RD FLEET, ALL TGC’S OF TF 38 Info COMINCH,CINCPAC,” Oct 24, 1944, 0612;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2.
- [64]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14.
- [65]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 [66]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3;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 [67] 当时的目击证人索尔伯格指出的在场者有道格·莫尔顿、哈罗德·史塔生和“罗洛”威尔逊，见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17。
- [68]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26.
- [69] COM3RDFLT to CTF 77, etc.(24112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3.
- [70] 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09.
- [71] Ibid.
- [72] Ibid., p.113.
- [73] 根据李将军一位参谋在1950年3月6日写给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信，见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195n34。
- [74] Cutler,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p.208.
- [75] Prados, *Storm Over Leyte*, p.224.
- [76] Thomas, *Sea of Thunder*, p.231.
- [77]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07.
- [78] Halsey to Nimitz, October 6, 1944, LCMD, Halsey Papers, Box 15.

[79]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40.

[80]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258.

[81] Roland Smoot, oral history, quoted in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347.

[82] Commander Task Force 77 to COMINCH, "Preliminary Action Report of Engagements in Leyte Gulf and Off Samar Island on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02335, November 18, 1944, FDR Library,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86, enclosure: Dispatches, p.19.

[83]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Comments by Captain Herbert V. Wiley.

[84] Commander Task Force 77 to COMINCH, "Preliminary Action Report of Engagements in Leyte Gulf and Off Samar Island on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02335, November 18, 1944, FDR Library, FDR Map Room files, Box 186, p.7.

[85] Woodward,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p.89.

[86]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84.

[87]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第六章

10月24日一整个下午，西村的南路舰队都在棉兰老海中坚定地向前行进，航向直指苏里高海峡。在上午与第3舰队侦察机部队短暂而激烈地交战后，舰队已经恢复完好。“山城号”的损伤已被修补好，右倾也被纠正了。

由于空中侦察报告在苏里高海峡入口处出现许多美军PT鱼雷艇，西村决定在把他的两艘战列舰带入苏里高海峡之前先派巡洋舰“最上号”和4艘驱逐舰前出对这一海域进行侦察。晚6时30分，“最上号”侦察队离开战列舰，前进到棉兰老海北部海域进行侦察。侦察队离开后不久，西村收到了丰田的电报，收件人是所有日军指挥官，但实际上是发给栗田看的：“天佑我军，全军突击。”

这一奇怪的电报一定令西村大惑不解，因为他还不知道栗田已经掉头西撤。三个小时后，他才从栗田那里直接获悉，中路舰队延误了，无法在次日上午11点前抵达莱特湾。这个坏消息令西村更加坚毅，他继续以原速度航行，决意按原来的时间计划发动进攻。他一定早就知道自己突破到莱特湾的希望从来都不大，但现在他已能够确定自己将会闯进整个美军舰队的集火攻击之下，而计划中钳形攻击的北半边将不会再帮他吸引敌人了。他按原速度前进的决定也致使志摩将军的“第二游击部队”，这支仅有两艘巡洋舰和数艘驱逐舰的后娘养的小舰队无法跟上西村舰队。落在西村后方45英里处的志摩只是蒙着头向前开，他和西村事先没有做任何协同作战的计划。

由于能活下来向我们讲述苏里高海峡那一夜发生了什么的日本高级军官太少了，历史学家们不得不依赖推理和猜测。没有人知道当他的旗

舰“山城号”闯进一场前途未卜的战斗时，西村心里在想什么。他一定会怀疑自己是否把这支7艘舰的纵队带进了伏击圈。他或许还觉得日军凭借着优秀的夜间水面作战技术而仍然保有一些优势，他们在战前为此进行了巨量的训练，而且在所罗门群岛的几次夜战中展示出了这一点。夜幕掩护下的水面炮战也会消除空袭的威胁。

但是所有这些战术考虑都忽略了西村任务中更加关键的一点：他的舰队无人指望生还。西村知道他率领的是一次海上“万岁冲锋”，他显然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南路舰队是一个诱饵，意在将部分美军舰队吸引到南边，以增加栗田在北边的胜算。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他的小舰队实际上是献给战神的祭品。西村的真实任务是去光荣地毁灭，让大炮轰鸣到最后一刻，纵使战败，也要保住日本海军的荣耀。

这样的安排当然不会白纸黑字写出来，在“捷号”计划或者丰田的后续命令中也不会言明。在战后关于这次战役的叙述中，伊藤正德坚称西方的批评者没能理解这些“〔西村的〕任务背后的特殊环境”。但是幸存军官和舰员们的陈述却证明他们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心知肚明。驱逐舰“满潮号”的舰长田中知生说：“本舰队的全体军官都知道自己执行的是自杀任务，无人期望生还。”^[1]战列舰“扶桑号”的一名作战参谋告诉他手下的水兵，他们将顶着美军舰队的优势炮火冲进塔克洛班锚地，军舰将会冲滩搁浅，这样即便遭到足以导致沉没的战损，也能继续用主炮射击。“我们将要进行一场水上特攻。”他如此告诉手下。^[2]他所谓的“特攻”指的就是单程自杀式攻击。据另一名目击者说，在一次战前布置中，西村将军“强调不仅要做好战斗准备，也要做好精神准备。西村已经准备好赴死。他的态度感染了全体官兵，令他们心甘情愿地随他踏上这场赴死之途”。^[3]

美军的PT鱼雷艇正守候在西村的前进路线旁。39艘艇分成三个艇群，环绕在保和海和苏里高海峡南口周围的岛屿旁。它们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艇上的帕卡德发动机空转着，排出的废气随微风飘散，海浪轻

轻拍打在它们的木质艇壳上。这个夜晚闷热而晴朗。西边的夜空中低垂着一弯月牙，淡黄色的月光洒在碧波粼粼的海面上。

前卫鱼雷艇分队布置在海峡南口60英里外，紧靠着保和岛和甘米银岛。晚10时36分，PT-131号艇在雷达屏幕上发现两个大型回波信号正以20节速度从西边驶来。彼得·加德少尉拿起夜间专用望远镜扫视海平线，很快看到了敌人：双路纵队，4艘驱逐舰打头阵，其后是2艘带有独具特色的宝塔形塔楼的战列舰，最后是“最上号”巡洋舰。

当加德用无线电发出敌情报告时，日军也发现了PT鱼雷艇群，并向这个方向打出了照明弹。照明弹在头顶上点亮，整个战场顿时洒满了强烈的红光。加德的三艘鱼雷艇立刻开足了马力。它们的引擎轰鸣着，艇体跃出了水面，艇尾拖出长长的白色尾迹。“时雨号”驱逐舰的探照灯罩住了它们，舰上的5英寸炮随即开火。以超过30节的速度接近目标时，这些木质小艇的周围掀起了白色的水柱。“我们被探照灯逮住了，”PT-152号艇上的一名艇员说，“我只知道这艇在飞奔，那声音大得难以想象。”^[4]

PT-152号艇的40mm炮组向“时雨号”开火，想要打灭它的探照灯，但未能成功。“时雨号”和日舰纵队中的其他几艘军舰向进攻方迎面转来，减少被弹面并准备躲避鱼雷。鱼雷艇射出鱼雷之后便转弯脱离。所有鱼雷都没有命中——可能还差得很远，因为日军瞭望哨没有看到鱼雷航迹。

在之字形航行、施放烟幕高速脱离时，PT-152号艇的艇尾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艇上的37mm火炮被击毁，炮手当场阵亡，艇后部舱室内燃起大火。PT-130号艇也被击中了，击中它的可能是“山城号”一门副炮射出的6英寸炮弹，但是这枚穿甲弹把艇上的桃花心木艇壳打了个对穿，没有爆炸。在这危急时刻，受损的PT-152号艇眼看就要被“时雨号”追上干掉，但是日军驱逐舰却返回了己方纵队，放弃了追击。日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干。

这时候坏运气来了，加德分队的全部三艘艇都发现自己的无线电坏了。于是PT-130号和PT-131号两艇转向东南方，奔向甘米银岛，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个分队。加德跑到PT-127号艇上，用无线电向海峡另一头的奥尔登多夫将军发出了他的敌情报告和作战报告。现在奥尔登多夫知道西村就在他西南方约90英里处的保和岛以南，接下来的这一整晚他都会不停收到新的对手位置信息。盟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继续以5节航速在海峡中巡航，火炮指向南方，等着敌人自投罗网。

路过利马萨瓦岛时，日军舰队重新编成双纵队，驱逐舰在两翼护卫。德怀特·H.欧文上尉指挥的第12鱼雷艇中队的3艘艇在近距离上看到了它们，先是在雷达屏幕上，继而是目视。当西村来到帕纳翁岛南端附近时，欧文的鱼雷艇冲出岸边的阴影区，发动了进攻。151号和146号两艇顶着周围不断升起的水柱，冲向探照灯，在1 800码距离上射出了鱼雷。鱼雷都不知射到哪儿去了。这两艘艇随即转弯，以之字形航线逃生。在混战中，战列舰“扶桑号”将巡洋舰“最上号”误认为是敌舰并短暂向其开火，但没有造成严重损伤。

日军舰队在帕纳翁岛旁转弯，向北驶入苏里高海峡时，突然陷入了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攻击之中。罗伯特·利森少校指挥的3艘鱼雷艇（PT-134、PT-132和PT-137号艇）向日军纵队中央冲过去，被罩在了一艘战列舰令人目眩的探照灯光中，可能射自“山城号”。它们冲到1 500码的距离上，放出了7枚鱼雷，之后急转弯脱离。它们在“山城号”巨炮和暴风雨般机炮火力的追杀下拼命沿之字形航线逃命。“它的40毫米火炮和14英寸主炮把夜晚照得如同白昼，”一名鱼雷艇员说，他觉得能从这次战斗中生还纯属侥幸，“5英寸炮火也很猛。驱逐舰一定也开火了，到处都是曳光弹、浓烟、爆炸和火焰。”^[5]

当日军炮火追击利森那三艘撤退的鱼雷艇时，另三艘艇从东南方的阴影中杀了出来。PT-523、PT-524和PT-526号艇发现它们目标的轮廓正好被其自己的炮口焰和照明弹映了出来。它们发射了鱼雷，随后迅速逃向苏米伦岛背后寻找掩护。没人知道日军是否看见了这三艘从右舷来的

刺客，因为几乎就在同时，PT-490、PT-491和PT-493号三艇从北边冲出来，展开了几乎是正对头的攻击。这支分队从藏身的暴雨区冲出来，发现自己距离最近的敌人驱逐舰只有700码。敌舰正忙于和另一边的鱼雷艇作战，无暇他顾。于是这三艘艇进行了当晚最大胆的鱼雷攻击，在被敌人的探照灯照亮之前，它们接近到了400码的距离上，射出鱼雷，掉头脱离，白色的水柱就在它们身后炸开。在沿之字形航线向北脱离时，所有三艘艇都被敌人火力击中。PT-493号艇遭到了当晚所有鱼雷艇中最严重的打击：一枚5英寸炮弹命中艇尾，第二弹击中水线下方的艇体，第三弹击中海图室后方，当场炸死2人，炸伤7人。由于无人掌舵，PT-493号艇开始毫无规律地乱跑，甚至差点掉头回到敌人附近，后来一名幸存者抓住了舵轮，才让它直线脱离战场。它逃进了一片路过的暴雨区，但此时这艘艇已经被炸得稀烂，行将沉没，大部分艇员受了伤，动弹不得。幸存者把它开到帕纳翁岛旁，把伤员抬上岸，等着第二天上午自己人前来搭救。

到目前为止，鱼雷艇的攻击对日军来说只是骚扰。它们射出了超过24枚鱼雷，却无一命中。后来人们认为鱼雷艇部队的官兵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鱼雷战术训练。毫无疑问，他们在敌人炮火的攻击下常常是胡乱发射，或者慑于自身毁灭的危险而不敢冲到近距离。他们的有些武器还可能失灵了，有些鱼雷或许实际上命中了目标却没有爆炸。尽管如此，这些鱼雷艇还是完成了它们的首要任务，即在敌人接近时提供早期预警。当日舰迎击这一连串蜂拥而来的“魔鬼艇”时，炮火和照明弹照亮了夜空，在很远之外就能看到。据“西弗吉尼亚号”的日志记载：凌晨2时6分，“看见东南方远处出现照明弹”。2分钟后：“180°正方向观察到炮火。”^[6]在这一路移动的烟火表演中，西村揭开了自己的隐身衣。

但他并没有停下，甚至没有放慢脚步。进入海峡中央后，西村各舰朝着0°正北航向，向等候着的美军舰队疾驰而去。晚11时，月亮落入了海面，夜色伸手不见五指。大海依然平静，只是有时会有一阵暴雨从这片海域扫过，降低了能见度。日军的瞭望哨只能勉强识别出左边帕纳翁

岛和右边迪纳加特岛的轮廓，而完全看不到它们高大、密布森林的山脊线，只是在远处偶尔亮起闪电时才会例外。在北方，熟悉的大熊星座和北斗星低垂在天幕之下。

杰西·科沃德上校的第54驱逐舰中队正从北面快速驶来。科沃德把他的驱逐舰分成两个分队平行前进，意图从两翼包抄日军纵队。双方以高达40节的相对速度彼此接近——科沃德的驱逐舰以20节速度南下，西村则以相同速度向北冲刺——两军在相距5英里时同时目视发现了对方。科沃德的东侧纵队与日军几乎是迎头对进，出现在日军先导舰右前方仅仅10°处。美军接近时施放烟幕，以进一步降低能见度——但眼睛如猫头鹰般锐利的日军瞭望哨仍然能够在迪纳加特岛平坦的轮廓前方辨认出形状独特的驱逐舰烟囱在移动。

日军在远距离上开了火，但他们的第一轮射击毫无准头，弹着水柱距离目标近了2 000码。^[7]由于紧贴着苏里高海峡的海岸线航行，科沃德的舰队藏身于多山岛屿下的“雷达阴影区”。据“时雨号”驱逐舰舰长西野繁中佐说，这一战术达到了目的。备感挫败的日军炮手紧盯着雷达屏幕，“无法区分陆地和敌舰。屏幕上只是一大片回波信号。我们不顾一切地射击，但我觉得那十分无效”。^[8]

美舰没有还击，以免自己的炮口焰成为敌人的瞄准点。科沃德要求他的中队仅使用鱼雷攻击。凌晨3点，他东侧分队的三艘驱逐舰射出了27枚鱼雷，随后在各种口径舰炮的追杀下向左急转脱离。日舰的瞭望哨看到了来袭的鱼雷尾迹和掀起的绿色磷光，日军纵队随即转弯规避。“扶桑号”的14英寸火炮向正在逃离的驱逐舰开火，还对“麦克格万号”取得了跨射，却未能命中。然而几乎同一时刻，“扶桑号”的右舷中部挨了两枚，也可能是三枚鱼雷。它的锅炉舱被海水淹没，舰体向右严重倾斜，并突然丧失了电力。它掉了队。跟在它后方的巡洋舰“最上号”不得不紧急转弯，以免碰撞。

科沃德的另一半驱逐舰——由“蒙森号”和“麦克德莫特号”组成的西侧分队——在接近到八九千码时扇面射出了20枚鱼雷。西村舰队正在转

回正北方的基本航向时，这批鱼雷抵达了目标。结果是灾难性的。三分钟内，日军纵队4艘驱逐舰中的3艘被击中。“山云号”中部被两枚鱼雷同时命中。爆炸还引爆了军舰自己鱼雷管里的两枚鱼雷。几个战斗部的爆炸把它炸成了两半，它短短两分钟内就沉没了。西野中佐回忆说，它沉没时还带着滋滋声，“就像一块巨大的红热铁块插进水里”。^[9]“满潮号”被一枚命中左侧轮机舱的鱼雷打残，瘫在水面上开始下沉，硬是靠着幸存舰员们的英勇奋战才浮在水面上。第三艘“朝云号”前部中雷，整个舰首被撕掉，但舰员们还是设法堵住了破口。^[10]这艘舰只好掉头向南蹒跚而去。

遭到重创的“扶桑号”不能动了。它已是自身难保，“从水线到桅顶，全都被火焰包围”。^[11]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它无力地随波逐流。舰长下令弃舰，于是舰员们开始跳进苏里高海峡温暖的海水里。大约凌晨4点，它终于向右舷翻倒，巨大的上层建筑在海面上砸出了巨大的水花。它的舰首沉入了海面，舰尾从海面上竖起150英尺高，螺旋桨还在旋转，它就这样沉了下去。泄漏出来的燃油在海面上扩散开来，把火焰带到了数百英尺外，吞没了许多正拼命游泳逃生的人。没人知道多少人从沉船上逃了出来，但很少有人海上漂流的几个小时中幸存下来。最终只有10名“扶桑号”成员在战役结束后回到日本。

现在，日军各舰陷入了巨大的混乱。有些人觉得纵队已被鱼雷艇包围。西野中佐一直以为被击中的是旗舰“山城号”而不是“扶桑号”。实际上“山城号”仍在继续以25节航速北上，但西村将军和他的幕僚们并不知道“扶桑号”和三艘驱逐舰已经中雷，整个纵队总吨位中的一半已经沉没或者丧失了战斗力。和旗舰待在一起的只剩下“最上号”。唯一幸存而且还能航行的驱逐舰“时雨号”加快了速度以逃出鱼雷攻击区，但随后它就和舰队其余各舰失去了联系。西野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任何一艘友舰，于是他转向南“去看看‘山城号’怎么样了，可能的话去接收命令，然后转回来继续北上”。^[12]

此时，在海峡北端，奥尔登多夫战列舰和巡洋舰上的雷达捕捉到了

接近的日舰。他们能零零星星监听到一些日军低功率无线电通话。瞭望哨能看到远处的照明弹和炮火，听见远方爆炸的隆隆声。奥尔登多夫将军看见一艘敌舰的探照灯光束扫过海平线，他形容这像是“黑夜中挥舞着的一支盲人的拐杖，尽管我们看不见它指向哪里”。^[13]“山云号”爆炸时，火光在海峡顶端都能清楚地看见——几秒钟后，雷达屏幕上的那个“亮点”也消失了。

炮手们已经锁定了目标，做好了射击准备，但遵照奥尔登多夫先前的指示，他们没有开火。要先让最北边的驱逐舰群——第56驱逐舰中队——向敌人发动攻击。凌晨3时34分，奥尔登多夫命令驱逐舰前出攻击，“拿下那些大家伙”。^[14]

率领这最后一轮驱逐舰进攻的是坐镇“纽康姆号”的罗兰·斯穆特上校。他的第56驱逐舰中队各舰被分成3个分队，每队3艘弗莱彻级，排成纵队——分别攻击西村的左翼、右翼和正前方。它们沿着海峡以25节航速直扑而来。由于意识到奥尔登多夫的重炮即将开火，最好在重炮打响时让他的驱逐舰躲开火线，因此中路纵队指挥官电令各舰：“要快。在鱼雷旁守着。”^[15]当距离接近到6 000码时，各纵队都转向用侧舷对敌，射出了鱼雷——每艘舰5枚，共计45枚。之后它们继续以最高速度开向海峡边缘，并用烟囱施放大量烟幕，脱离射击区域。

当斯穆特的最后一枚鱼雷从发射管钻入海中时，北方海平线上的大炮响了。右翼巡洋舰上的6英寸和8英寸炮率先开火，战列舰的14英寸和16英寸主炮齐射紧随其后。红色的曳光弹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缓慢地在天上飞过。这些巨大的炮弹在飞向目标的12英里航程中似乎是慢悠悠地挂在空中。斯穆特上校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象。夜空中曳光弹的弧线宛如亮着灯光的列车从山头上一列列开过”。^[16]

凌晨3时53分，“西弗吉尼亚号”的首轮齐射落地。枪炮官打开送话器喊道：“首轮达阵”。赫伯特·V.威利上校用望远镜观察目标，看见目标在第二轮齐射落地时爆炸开来。^[17]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目标正是西村

的旗舰“山城号”，这艘日军战列舰很快遭到了至少12艘美军巡洋舰和战列舰的集中射击。“丹佛号”的战报写道：“几乎从3时50分开始射击时起，敌舰在我舰瞭望哨眼里便成了一团团爆炸的火球。”^[18]

“山城号”坚定地向这场风暴迎面而去。在随后的7分钟里，整个盟军舰队所有的舰炮都向这一艘舰集中射击。水柱在它左右近旁垂直升起。厚重的装甲甲板遭到了雨点般穿甲弹的洗礼。伤员被送到军官餐厅里，安放在桌子上，然而一枚直接命中的炮弹炸毁了这个舱室，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医护人员。即便在内部通信全部中断，炮塔炮手和舰桥失去联系之后，他们仍然在用主炮和副炮喷射弹雨，在美军驱逐舰和右翼巡洋舰周围掀起水柱。^[19]由于没有火控雷达，“山城号”的射击精度远逊于对手，但还是有几发炮弹落在盟军巡洋舰近旁，令他们心惊肉跳。一轮齐射落在澳大利亚巡洋舰“什罗普郡号”远处，第二轮近了一些，第三轮就从头上飞过，在远侧溅起巨大水花。“凤凰城号”和奥尔登多夫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周围也炸开了水柱。于是将军命令巡洋舰纵队加速进行机动规避。

在“山城号”后方1/4英里处的“最上号”上，一名舰员回忆道，炮弹来袭时的尖啸声“可怕而令人恐惧，它们从左边飞到右边”。当第一轮齐射跨射此舰时，“黑暗中突然出现一堵高大的白色水墙”。^[20]6英寸和8英寸的炮弹落在舰体上方，击毁了一座炮塔，并让海水淹没了轮机舱。舰长下令右转以让侧舷对敌。“最上号”向着海峡前方炮口闪光的大致位置射出了4枚鱼雷。但这些鱼雷都被设为高速模式，因而降低了射程。

转弯时，“最上号”的主炮指向了3艘撤退中的美军驱逐舰，“达利号”、“哈金斯号”和“巴奇号”。于是它打出了一轮侧舷齐射。“达利号”舰长惊恐地看到红色曳光弹直奔他的军舰而来：齐射几乎就要打中目标了。“它绝对是冲我而来，感觉就像是站在棒球场中央等着用手套接住飞来的球一样，”这位舰长后来评论道，“万幸，这轮齐射从头上飞了过去，落在二三百码外。”^[21]

“山城号”的右舷又挨了2枚鱼雷，可能来自驱逐舰“纽康姆号”和“拜尼恩号”。这使得它的中雷总数达到4枚。军舰开始向左倾斜，航速锐减到6节。全舰燃起大火，宝塔形的桅楼如同一支火炬。但是仰仗上层建筑高处舰桥装甲的保护，西村和他的参谋们还活着。他告诉参谋长：“向本队司令发报。我们继续向莱特前进，直至玉碎。”^[22]

“最上号”的右转弯一直没有停下来，直到它转向南方，远离敌人的炮火而去。在舰桥上，军官们爆发了争论。有人想要继续向南沿海峡脱离，认输；其他人则决心死战到底。舰长最后被强硬派说服，下令让军舰返回战场。然而还没等他们开始转弯，“波特兰号”巡洋舰射出的两枚8英寸炮弹便直接命中“最上号”舰桥，终结了这场争论。由于无人操舵，无人下令，军舰一度原向航行。最后幸存的舰员爬上了舷梯，发现舰桥里已经满是尸体。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舰上的炮术长接管了全舰。“最上号”还在不断被炮弹击中，已经无法再战了。新舰长决定向南航行，以求保住军舰。

与“山城号”失去联系已久的“时雨号”也遭到了6英寸和8英寸炮弹的跨射。接连不断的近失弹令这艘轻型军舰剧烈摇晃起来；西野中佐说近处的爆炸甚至会把舰体抛出水面一米有余。“我遭到了可怕的炮击，”他说，“近失弹这么多，连罗盘都被震坏了。近失弹的冲击让军舰不停摇晃，无线电也坏了。”^[23]失去了无线电联络，西野无从知晓自己应该前进还是撤退。他转向东，希望来到“山城号”的灯光信号距离内，却完全找不到它和“最上号”的影子，甚至都不知道它们是否还浮在水面上。关于“最上号”，“时雨号”的军官们意见各不相同。有些人相信“时雨号”是南路舰队最后的幸存者。炮术长还问他们的使命是否就是“仅仅像狗一样死去”。凌晨3时15分，西野判定“山城号”和“最上号”可能已经完蛋了，因此“在没有收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决定向南撤退”。^[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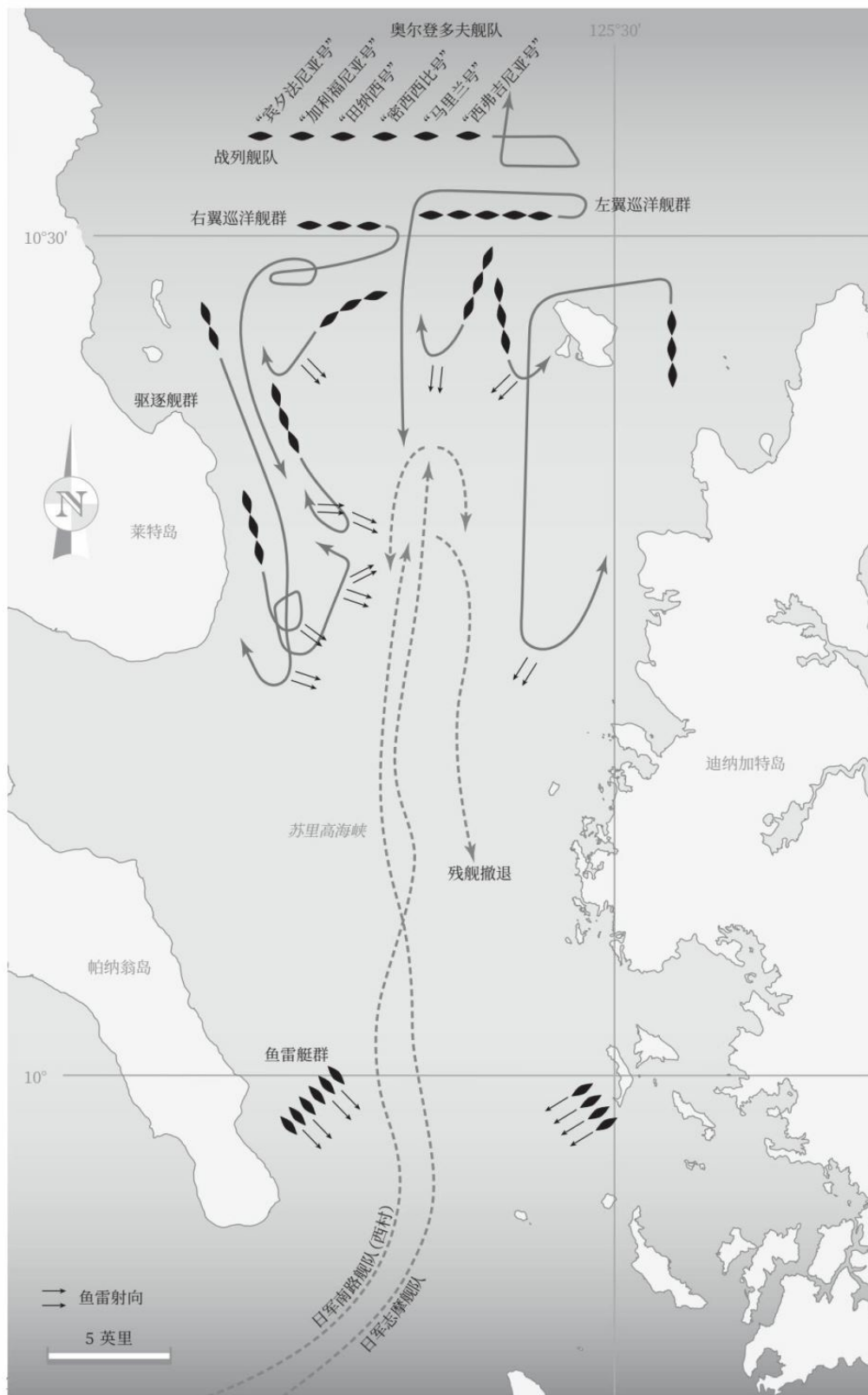
一艘美军驱逐舰“格兰特号”没能离开射击区，于是发现自己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猛烈射击。“山城号”从大约3英里外把炮弹砸在它周围。但是最严重的炮击来自友军，也就是右翼的巡洋舰纵队。“格兰特

号”被命中了大约20枚炮弹，大部分可能来自巡洋舰“丹佛号”。舰上有34人战死，94人负伤。右翼巡洋舰部队指挥官拉塞尔·S.伯基将军打开无线电，警告说有一艘友军驱逐舰正瘫痪在水上，并遭到友军攻击。凌晨4时9分，奥尔登多夫向全舰队发出警告：“‘格兰特号’中弹，瘫痪在水上。所有军舰都要格外小心。”[\[25\]](#)

美军舰队遵从指示，炮声停了下来，海峡顿时陷入了诡异的宁静。随着美军战列舰向北转向以躲避“最上号”的鱼雷，停火又延长了片刻。

尽管西村勇敢地要求继续向敌人冲锋，但是遭受重创、燃起大火的“山城号”还是在盟军停火后不久转向了南边。可能西村是想去和志摩会合，或许想要安全撤离：没人知道到底什么情况，他和舰桥上的其他军官都没能活下来告诉我们答案。不知什么原因，技术人员设法把“山城号”的航速恢复到12节，但这也不过是加大了舰体破口处的进水而已。凌晨4时19分，它开始向左翻覆，西村的参谋长下令弃舰。之后它便翻倒在了海面上，巨大的宝塔形建筑落在了水上。它舰尾向下，迅速下沉，卷走了几乎所有舰员，仅有少数人幸存。

苏里高海峡夜战, 1944年10月25日



此时，在南面，能见度下降了。暴雨区扫过棉兰老海和海峡南段。志摩的小舰队在恶劣天气下以25节速度冲刺，结果差点撞上帕纳翁岛。当这座岛高大的山脊线突然从雾中出现时，舰队才在最后一刻紧急转向躲了过去。^[26]当志摩舰队紧急转弯时，PT-137号鱼雷艇向驱逐舰“大潮号”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从目标舰底穿过，继续向前，击中了3 000码外吃水更深的巡洋舰“阿武隈号”。这是整场战役中美军鱼雷艇唯一命中目标的一雷。遭到重创的“阿武隈号”掉了队，以10节速度蹒跚前进。

进入苏里高海峡后，志摩舰队在黑夜中以28节航速北进，瞭望哨远远看见了正在下沉的“扶桑号”。浓烟和雨雾带来了糟糕的能见度，志摩舰队的人误以为自己见到了两艘燃烧的战列舰，而不是一艘。这可能是由于“扶桑号”的舰首被从舰体上撕下，还浮在水上，也可能是因为瞭望哨将大片起火的燃油当成了第二艘舰。无论如何，这些新来者没有停顿，继续在苏里高海峡中高速前进。

凌晨4时22分，志摩的纵队右转，开始发射鱼雷。鱼雷以49节的高速冲了出去。正当旗舰“那智号”的鱼雷射出之时，舰上的瞭望哨看见了“最上号”。在他们看来，这艘舰似乎是静止在水上燃烧，但距离接近后，舰桥上的军官意识到这艘舰正在与本舰快速相向而行。“那智号”舰长下令以最大马力倒退，但太晚了，“那智号”一头撞上了“最上号”。后者的操舵室被海水淹没，航速减半。“那智号”也受了重伤，最高航速只剩下了19节。“那智号”随即转向南，舰员开始检查损伤。

这时，在“那智号”的舰桥上，第五舰队鱼雷长森孝吉与志摩商量了起来。考虑到军舰受损，西村舰队几近全灭，以及海上越来越差的能见度，森提出再前进就是自杀。敌人已在前面为他们设下了陷阱。“将军，”他说，“前面敌人肯定正拿着大炮等着我们。”^[27]志摩对此深表同意，他决定今晚就到此为止。他向丰田发电：“本部队已结束进攻，正退出战场，以备再战。”^[28]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称志摩的决定是“整场战役中所有日军指挥官做出的最明智的举动”。^[29]

凌晨5点，当东方露出鱼肚白时，两支日军舰队的残部正沿苏里高海峡蹒跚而行。奥尔登多夫将军把战列舰留在原位，亲率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包括他的旗舰“路易斯维尔号”）南下追击并“扫荡敌残舰”。

由于担心不慎遭到鱼雷攻击，奥尔登多夫小心翼翼地保持着15节航速。此时的海上满是暴雨、雾气，还有燃烧的舰船和燃油升腾起的不散的浓烟，能见度仍然很差。海面上漂浮着泄漏出来的重油，到处都是漂浮着的残骸和尸体。他们在一片狼藉中看见数百名日本水兵，要么泡在水里，要么趴在残骸上。一如往常，几乎所有人都拒绝救援，甚至在美舰开来时要跳海自杀。追击舰队路过漂浮着的残骸，它们是四艘正在下沉的不同的日军舰只，但这些军舰已经“由于周围浓密的油烟和火焰而无法辨识”。^[30]“扶桑号”的一部分还漂在水上，可能是舰首，路过的“路易斯维尔号”向这块残骸打了几轮齐射，将其击沉。

起先，受损的“那智号”、“最上号”和“时雨号”还能维持足够的速度让奥尔登多夫追不上。但是到了卡尼瀚岛附近，一群讨厌的PT鱼雷艇拖慢了它们的速度。仍然带着火而且几乎无法转向的“最上号”和这些小家伙打了起来。它的8英寸炮弹落在鱼雷艇周围，将它们赶走，甚至还直接命中PT-194号艇一弹，炸毁了艇上的三台发动机，炸死一名40mm炮手。奥尔登多夫的巡洋舰在清晨5时29分看见了远处的“最上号”，并在远距离上开火，命中大约10弹。“哥伦比亚号”舰长用望远镜观察目标，报告说它“完全烧起来了，比珍珠港时候的‘亚利桑那号’烧得还厉害”。^[31]志摩将军硬下心来决定继续前进，把“最上号”丢在后面以吸引追兵。“那智号”、“时雨号”和第二游击部队的其余各舰则溜走了，绕过帕纳翁岛转弯逃离。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身陷绝境，“最上号”还是不肯认命。舰上勇猛的工程人员居然让它恢复了12节航速，它也逃进了棉兰老海。

留在苏里高海峡中的最后一艘日舰是遭到重创的驱逐舰“朝云号”，它先前被科沃德的鱼雷炸掉了舰首。它瘫在水面上，前甲板已经沉入水下。舰上仅剩的一座能用的炮塔还在勇敢地向涌过来想要用鱼雷击沉它

的鱼雷艇还击。早晨7点之前，舰长便已下令弃舰，舰员正在爬上救生艇，这时追杀而来的美舰进入了射程。7时4分，“朝云号”遭到了炮击，起先是一艘驱逐舰，几分钟后便是一大群巡洋舰和驱逐舰：总共有10艘美舰参加了对这艘垂死驱逐舰的最后行刑。它的水线被炸开，火焰从每一处舱口冒了出来。“朝云号”翻倒下来，舰首朝下沉入海里。舰桥上还有人向丰田和栗田二位将军发出了诀别电：“我舰遭袭沉没。”^[32]

有人说它唯一可用的炮塔即便在军舰沉没时还在开火。“拜尼恩号”的枪炮官詹姆斯·L.霍洛威三世看到了这个勇敢小斗士的落幕场景：“当我们接近到大约2 000码时，这艘日军驱逐舰已经沉到了波浪起伏的灰色海面之下，舰首朝下，我们从它近旁驶过时，它的螺旋桨还在缓慢地转动。”^[33]逃脱的日军各舰还将遭到美军舰载机的追杀，那艘有九条命的“最上号”最终也在当天傍晚没能扛过空袭的打击。西村南路舰队中唯一幸存的“时雨号”将在10月27日抵达文莱。美军的空中追杀和清剿作战还会再持续一天，最终把志摩一路追进了马尼拉湾。11月5日，他的旗舰“那智号”就在此地被空袭击沉。

但奥尔登多夫的这部分战斗结束了。10月24日早晨7时25分，他收到了第一封命令他北上的急电，这样的急电随后还有多次。位于莱特湾以北的第7舰队护航航母，遭到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强大日军水面舰队的攻击。

圣贝纳迪诺海峡是一条狭窄而危险的航道，栗田的中路舰队不得不排成单纵队队形穿过这里。由于担心再像在巴拉望水道时那样遭到灾难性的潜艇攻击，这支长达13英里的纵队不得不冒死以20节的速度匆匆开过。这里的水流速度高达8节，搁浅的危险很大。但是这天晚上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而且正如哈尔西的夜间侦察机早先注意到的那样，海峡中的浮标和灯塔都已点亮。午夜过后半小时，舰队完好无损地驶入了菲律宾海。他们比预定的时间落后了6个小时，而且对西村的命运仍一无所知。

栗田和他的军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们一直觉得自己会被雷达、夜间侦察机和海峡沿岸的菲律宾瞭望员一路追踪，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敌人潜艇来打扰他们。他们预计自己会遭遇封锁海峡出口的美军战列舰队的密集炮火——正是这样的T字横头伏击刚刚在南方300英里外痛揍了西村。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后来说，如此将会令中路舰队“步履维艰”，如此前景也令“大和号”舰桥上的人们对此“严重关切”。^[34]但是现在，他们安全穿越了海峡，没有任何人挡在他们面前。

在两个小时里，栗田舰队一路向东奔向开阔海面。原来的单路纵队转换成夜间搜索阵形，六路纵队如耙犁一般覆盖了宽近20英里的洋面。日本人并不知道哈尔西去哪儿了，他们仅仅是根据前一天下午美军舰载机飞走的方向猜测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凌晨3点，“大和号”用灯光信号发出指令：航向转为东南，开往莱特湾。在接下来的三小时里，舰队向南一路冲刺，把萨马岛的群山远远留在自己的右手边。^[35]

5时30分，“大和号”收到了志摩将军的报告，“山城号”和“扶桑号”完了，“最上号”起火，所有幸存日军部队正在撤离苏里高海峡。这个坏消息并不太出人意料，却确凿无疑地告诉他们，期待中的钳形攻击泡汤了。即便中路舰队成功前进到莱特湾，它也只能孤军奋战。早晨6时14分，美丽的热带日出送来了新的一天。此时东北风轻拂，海面平静，但是灰色的散碎积云悬在空中，阴沉的暴雨从低空扫过海面。

此时挡在栗田和他目标海域之间的是美第7舰队各护航航母战斗群。这支舰队拥有16艘小型航母和22艘为其护航的驱逐舰和驱护舰。它们被统一编为第77.4特混大队，由托马斯·L.斯普拉格少将指挥。这支大队又进一步分为三支特混编队，“塔菲1”、“塔菲2”和“塔菲3”。其中最北方的编队，“塔菲3”，由绰号“拐子”的克利夫顿·A.F.斯普拉格少将率领。

两位斯普拉格并非亲属。这对海军学院的同学（都是1917届）有着相同的少见姓氏，又一同在第7舰队的同一支小分队里当少将，这真是

个罕见的巧合。

护航航母，“CVE”，是一种小型的辅助舰艇，有时也被戏称为“吉普航母”或者“婴儿平顶”。和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相比，它们的长度只有其一半，吨位只有三分之一。它们长500英尺，排水量约1万吨，只能搭载25 ~ 30架飞机。从海军的观点来看，它们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快速而且廉价地建造下水。它们能够执行的任务有限：为商船队和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支援两栖登陆，以及运送补充飞机越过太平洋。它们太慢：大部分舰只的航速不超过18节，无法伴随第38特混舰队那些大型战斗航母。人们认为这种舰过于脆弱，无法承受航空兵和潜艇的集中攻击，因为它们钢板太薄，极易被炸弹或鱼雷击穿。舰员们戏称“CVE”三个字母指代的是“易燃、易受攻击、可牺牲”（combustible, vulnerable, and expendable），这三条还真的一点都没错。

最初的护航航母就是直接在货船或者油轮的船体上放一块飞行甲板而已，但后来的就是亨利·凯泽在他的华盛顿州温哥华船厂专门建造的了。凯泽建造的各舰（总共104艘护航航母中的55艘）被蔑称为“凯泽的棺材”。第77.4特混大队的16艘护航航母中，13艘都是凯泽造的。

到目前为止，对“塔菲”各编队而言，莱特岛作战波澜不兴。各舰在萨马岛和莱特岛外的阵位已经待了近一个星期。航空大队一直不停地在运输船队上空巡逻，在菲律宾中部进行空中侦察，并攻击海滩上的地面目标。但舰员们却根本见不到敌机。周围有一些潜艇威胁，但没有日本军舰的影子。驱逐舰忠实地执行着护航的任务，在舰队周围猎杀来袭的潜艇，救援被击落的飞行员。“塔菲”编队完全没有打算参加在南边、东边，可能还有北边爆发的海战。因此，这天早上7点前不久，当栗田那些巨型战列舰和巡洋舰宝塔式的桅楼从西北方海平线上探出头来时，他们大惊失色。

敌舰来袭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半个小时前，当时“塔菲3”编队的反潜巡逻机刚刚从飞行甲板上弹射起飞。这时一个短距离低功率无线电频道中传来了日本人的声音。不过大家都认为最近的敌舰还在超过150英

里之外，这个电波可能来自附近的菲律宾岛屿。还有一条无法确证的SG雷达回波似乎显示有些东西正从北边过来，但是这些回波信号还不像是一支舰队。它可能是哈尔西舰队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团云。早晨6时46分，“塔菲3”的瞭望哨看见西北方海平线上远远地出现了一些高炮烟团。这就很奇怪了，“拐子”斯普拉格正准备要他的巡逻机飞行员前去侦察，一名飞行员就在无线电里喊道：“敌水面舰队.....距你们特混大队西北20英里，以20节航速接近。”

由于觉得这可能是“某些毛躁的年轻飞行员”把第3舰队的一部分舰艇错当成了敌人，斯普拉格将军火了。他抬高了嗓门吼道：“空情室，让他去复核他的消息。”

一分钟后，答复来了。“确认是敌舰队，”飞行员说道，“军舰都有宝塔式桅楼。”[\[36\]](#)

斯普拉格和他的军官们难以置信地扫视着西北方海平线。越来越多的高炮烟团让天空一片斑驳。日舰桅顶的暗影出现在了海平线上。最近的敌人已经到了17英里之外，正在快速冲过来。

在近旁“塔菲2”编队护航队中的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上，早餐被令人汗毛倒竖的紧急集合令打断。“我们奔向战位，”水兵小迈克尔·巴克回忆道，“我跑到舰桥向外看，见到海平线上冒出来一些像是牙签的东西，就在海平线上——那是许许多多敌舰。”[\[37\]](#)

虽然情势骤变令人手足无措，但斯普拉格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他用无线电播发了敌情报告，并呼叫邻近“塔菲”编队的空中支援。他命令他的航母转向东迎风航行，加到最大速度。飞行甲板上的所有飞机立即起飞，即便没有挂装反舰弹药也要飞。驱逐舰被要求在撤退的护航航母后方做之字形航行，用烟囱施放烟幕，越多越好，还用上了通常只用于飞机的化学造雾剂。

日本人几乎和美国人一样大吃一惊。他们的瞭望哨只比“塔菲3”编队中的同行早几分钟发现对方，发现距离都是地球曲率所允许的极限。

即便是在美军施放烟幕之前，能见度也不是十分理想。天空中阴云密布，海上有雾。那些陌生舰船的船体都还藏在东南方海平面以下，起初并不太像是航空母舰。“大和号”舰桥上甚至有些人说那肯定是日本船。他们遇到的是小泽将军的北路舰队吗？很快，第二支护航航母战斗群“塔菲2”的桅杆从南方大海边缘探了出来。随着距离的接近，瞭望哨看见有飞机在起飞，护航航母方方正正的轮廓也露出了海平线。它们是航母，而且不是小泽的。但那是何种航母？日本人并不知道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部署了一大批小型辅助航母。“大和号”舰桥上的军官们认定自己一定是撞上了第38特混舰队的某一部分。

无论如何，胜利似乎已经在握。“这真是奇迹，”栗田的参谋长小柳富次说，“想想一支水面舰队竟能抓住一支敌人航母部队！天赐良机，不可放过。”^[38]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赶在美军放飞飞机攻击追击者之前打击并摧毁其飞行甲板。这一战场态势需要他们展开全力追击——可能的话还要机动到上风区，这样敌人逃跑时便无法再收放飞机。栗田下令“全军追击”，意即每一艘日舰都要开出最大速度追击敌人，而无须顾虑舰队巡航队形。早晨6时59分，他下令：“准备水面战。”^[39]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和传统，其他各舰都要等旗舰打响第一炮。于是“大和号”的6英寸副炮率先“发言”，它的两座18英寸前主炮塔紧随其后开了火。

交战距离遥远，“大和号”巨大主炮长长的炮管伸向前方，抬高到23°仰角。在六大团烟火的推动下，六枚穿甲弹冲出炮口，奔向远方的目标。每一枚炮弹都重达3 200磅。飞行25秒之后，也就是距离撞击还有一半时间时，炮弹到达海面以上2万英尺高处的弹道顶点。之后它们开始以每秒约1 500英尺的终极速度向下俯冲——比炮口初速慢了许多，但仍然远远快于声速。因此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弹群来袭时并没有尖啸声。直到“白平原号”航母右舷外突然炸开六根白色水柱时，他们才知道自己要挨打了。这些水柱每一根都有20层楼高，它们不会轰然落下，而是向下风区慢慢消散成一团水雾，直到炮弹落海半分钟后，六团怪兽般巨大的水汽仍然飘浮在巨弹落水处。

“塔菲3”编队中没有一艘舰装有5英寸以上口径的武器，因此在这个距离上美军无法反击：他们只能逃命。但他们也跑不了太快，即便把所有锅炉都烧到顶也不行。战斗群中有些护航航母只能开到17节。斯普拉格后来承认：“我想我们撑不过15分钟。”^[40]

首轮齐射后不到一分钟，“大和号”的第二轮齐射便接踵而至，对“白平原号”形成了近距离跨射。巨大的水墙一度吞没了这艘“婴儿平顶”。它继续前进，看似完好无损，但“大和号”近失弹那毁灭性的冲击波还是重重震伤了这艘轻型军舰。它的铆钉被震松，焊缝被扯开，电力中断，舰内灯光熄灭，无线电收发机都坏了，雷达屏幕也灭了，舰桥上有一张桌子震断了一条腿，倒了下来。

当溅落的海水暴雨般落在“白平原号”的飞行甲板上时，“大和号”的第三轮齐射又到了。用舰长丹尼斯·J.沙利文的话说，这次六枚炮弹落点“近得用显微镜才能分出来”。他还说：“军舰被剧烈地摇晃和扭曲，有些地方的人都被震倒在地，许多零备件也从平时存放的水平架子上落到甲板上。”^[41]一枚炮弹钻进水中，在舰体下方龙骨左边爆炸。根据战后报告，“军舰被扭曲和抬起，第101和146号肋骨左右两侧出现挤压和撕裂伤痕”。^[42]爆炸的冲击波撕裂了水线下的舰体钢板，炸断了舵杆，致使甲板和舱壁扭曲，燃油和航空汽油在全舰各处渗漏出来。在飞行甲板上，一架正准备起飞的野猫式战斗机被震得跳了起来，越过轮挡向前滑去，螺旋桨在前面一架飞机的机翼上狠狠咬了一口。舰上四台锅炉中的两台蒸汽压力突然下降。如果这枚炮弹在水下的炸点再后移几英尺，它就可能会使海水淹没军舰的轮机舱，让“白平原号”瘫在海面上，任由快速接近的敌人处置。

“大和号”打出的一式穿甲弹正是专门设计要在敌舰近处入水冲到目标下方爆炸的。这一枚炮弹正是达到了其设计目的，入水后保持直线弹道，0.4秒后爆炸。虽然它没有直接撞击敌舰，但它的爆炸波却可以冲击炸点上方舰体的薄弱部位。从这个角度看，一式弹的效果类似于水雷或者美军使用的磁性引信鱼雷，它们的设计都是要让战斗部在敌舰正下

方爆炸。罗伯特·伦德格伦在他关于萨马岛海战的精心之作《全世界都想知道》（2014年）中提出，“大和号”的第三轮齐射应当被视为命中“白平原号”。[\[43\]](#)若这一观点能得到公认，“大和号”就会拿下舰炮射击命中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34 587码，接近20英里。

“甘比尔湾号”的舰载机中队长爱德华·J.赫克斯塔布尔正和手下飞行员一起在军官餐厅吃早饭，这时大喇叭里传来紧急集合的厉声警报。他立刻冲向飞行甲板，也没注意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座机，一架TBM“复仇者”，此时还没有装上炸弹或者鱼雷，但航空副舰长看起来急着要他无论如何都先起飞。跳进座舱时，赫克斯塔布尔很疑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驾驶这架无武装的飞机起飞。突然，“我左耳旁传来一声像是步枪射击的声音。我看过去，看到一轮重炮齐射溅落在‘白平原号’旁。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敌人已经这么近了。我要挂上弹射器！”。[\[44\]](#)

赫克斯塔布尔跟在其他几架“复仇者”后面弹射爬升，他们钻进了1200英尺高处一片灰色的云层里。斯普拉格将军在无线电里发出了指令：“立即进攻。”此时，空中的能见度很低，赫克斯塔布尔只能隔着低垂的云雾努力辨认敌人舰队。他看见4艘日本巡洋舰正接近“塔菲3”的左后方，于是决定发动扫射，希望能拖慢其追击。他沿着日舰的航行轴线低空飞行，轮流从每艘舰上空飞过。高炮炮弹的爆炸震动着他的飞机，但他的手指始终压住扳机，将.50口径的曳光弹猛射向敌舰甲板。之后他压坡度转弯，再次低空通场，这一回他打开了格鲁曼飞机狭长的炸弹舱门。他的弹舱里没有鱼雷，但日本人也能看见他打开了舱门，或许模拟一次鱼雷攻击能唬住日本人，让他们做规避机动，好为正在逃命的本方航母争取时间。[\[45\]](#)

其他几十名飞行员也是这么想的。来自多个中队的飞机在日本舰队上空盘旋，从云层中冲出来对栗田舰队进行扫射、轰炸和鱼雷攻击，或者用没有武器的“假通场”来假装进行扫射、轰炸和鱼雷攻击。从“圣洛号”“方肖湾号”“基昆湾号”航母上起飞的防空和反潜巡逻机在战斗初

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命中了日军战列舰“金刚号”，重巡洋舰“羽黑号”、“鸟海号”和“筑摩号”的上部，还有一些近失弹也击伤了敌舰。防空火力很猛，许多美军飞机被高炮击伤，但被击落的飞机却没几架。一名日本舰长抱怨说他的炮手们就算是“弹幕盲射”也不会比这差到哪里去。^[46]7时27分，重巡洋舰“铃谷号”遭到了一群TBM的同时轰炸：一枚炸弹落在左后方近旁，冲击波炸弯了左侧外部螺旋桨轴，令其无法使用。“铃谷号”的最高航速降低到20节，它掉了队，放弃了追击。

少数几架飞机在清晨的行动中早早落回“塔菲3”的航母，当时这些航母正迎着东风航行。但是早晨7时15分，斯普拉格转向南以寻求路过暴雨区的掩护。这就使得“塔菲3”各舰的飞行甲板无法再起降飞机了。南方的“塔菲1”和“塔菲2”编队的友军航母承担了一部分飞机的起降补给，空中还有些飞机飞往附近莱特岛上的塔克洛班机场加油装弹。越来越多的美军飞机聚集在日本舰队周围，它们常常没有合适的武器，但还是想尽办法逼迫敌人转向远离正在逃生的航空母舰。

多雨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了能见度。阳光有时会穿过云层照在战场上，但更多的时候，低垂的云层、暴雨，以及在“吉普航母”后方之字形航行的驱逐舰烟囱里施放的大量黑烟和暗黄色化学烟雾都会遮蔽远方的海平线。大海阴沉，泛着铁灰色，轻浪起伏，带着白色的浪尖。日军瞭望哨总是高估敌舰的尺寸，把驱逐舰误当成巡洋舰，把护航航母当成埃塞克斯级航母。这是一场致命的猫鼠游戏，猎物在烟幕和雨雾之间时隐时现。射击窗口稍纵即逝，日军炮手很难看见他们的弹着点，因此也无法为后续的齐射进行矫正。

在航母后方拉烟的美军驱逐舰遭到了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猛烈射击。染了颜色的水柱把周围打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万花筒：黄色、红色、蓝色、粉色和绿色。一名水兵叫道：“他们用彩色的炮弹打我们！”^[47]在半英里宽度上施放烟幕的驱逐舰“约翰斯顿号”发现自己落在了危险的后卫位置上。它比其他任何美舰都更接近敌人，因此受到了敌人炮手的特别关注。它多次被14英寸和8英寸火炮的齐射跨射。“红色、

绿色、紫色和黄色，若是在其他场合可能会很美丽，”“约翰斯顿号”枪炮官鲍勃·哈根说，“但此刻我才不喜欢这些彩色图案。”^[48]当右侧一支日军巡洋舰编队追击到1.8万码外时，“约翰斯顿号”的5英寸主炮开始还击。

早晨7时16分，斯普拉格命令驱逐舰和驱护舰掉头向敌人发动鱼雷攻击，以求打断他们的追击。“约翰斯顿号”舰长欧内斯特·E.埃文斯中校还没接到命令时就已经在准备这样的攻击了。“准备鱼雷攻击，”他下令，“左满舵。”于是，这艘2 700吨的弗莱彻级驱逐舰转过身来，单枪匹马向追杀而来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发动了正面冲锋。

埃文斯在俄克拉何马州的波尼市出生和长大，具有3/4美国原住民血统。他的母亲是纯血统的切罗基族人，父亲则有一半的克里克族血统。他先是在1926年18岁时作为列兵加入美国海军，次年又获命赴海军学院学习深造，1931年毕业。他14年海军军官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驱逐舰上度过的。埃文斯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准备向海军高层爬的军官，他被认为是稳妥而可靠的执行者。和“塔菲3”编队的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一天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大炮射程内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人舰队进行一场生死搏杀。但是他就站在这里，“约翰斯顿号”也是。“我现在能看见他，”哈根回忆道，“个子不高，胸肌厚实，他站在舰桥上，双手叉在腰后，用他浑厚的声音发出一连串命令。”^[49]

这艘小小的双烟囱舰剧烈倾斜着向敌人急转，随即如同猎犬一般扑了上去。它开出了最高速度，超过30节。随着彩色的水柱在它近旁升起，埃文斯下令调整航向以“追逐弹着点”——就是要朝每一次弹群入水的位置开，以规避敌方炮手的校准。5英寸火炮也进行了还击，打出超过200枚炮弹，随着距离接近，炮弹开始不断命中。7时20分，当“约翰斯顿号”距离领头的日军巡洋舰“熊野号”9 000码时，它齐射出了10枚鱼雷。这些鱼雷发射角彼此相差1°，都被设为低速模式以增加射程。它们呈扇形展开，向敌人扑去，全都“猛烈、笔直，而且运作正常”。随后埃文斯下令向右急转，军舰随即向左大角度倾斜，躲进自己施放的烟幕掩

护之中。由于烟幕的阻挡，舰员们无法看到战果；很久以后，舰上的幸存者才知道他们射出的一枚鱼雷正面击中了“熊野号”，在舰首炸开了一个大口子，迫使它退出队列。“熊野号”不得不蹒跚北撤，舔舐伤口，退出了这场战斗。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约翰斯顿号”向东退却，安全躲进了自己施放的烟幕中。然而7时25分，它短暂地从烟幕中现出了身影，“大和号”的炮手们立即用这艘超级战列舰的主炮和副炮打出了齐射。此时的射程是20 313码，比早先那次“近得用显微镜才能分出来”的“白平原号”近失弹发射时近得多。这一回，“大和号”的炮手们没有射失了：3枚18英寸炮弹命中了“约翰斯顿号”主甲板中部左侧。“就像一只小狗被大卡车碾过一样。”鲍勃·哈根回忆道。^[50]巨大的爆炸把这艘小小的军舰推得向右直晃，炮弹穿入了下甲板，摧毁了左侧轮机舱。锅炉舱里的一台锅炉炸裂，舱室里顿时充满了滚烫的蒸汽，有几个人甚至被活活烫死。

几秒钟后，“大和号”6英寸副炮的一轮齐射命中了“约翰斯顿号”的前部烟囱和舰桥左侧，舰桥里的高级军官们都被抛了起来，撞到舱壁上。哈根的头盔、通话器和望远镜都被从头上和脖子上甩了下来。他坐的小凳子被震碎了，让他摔在了甲板上，伤了膝盖。不过这位枪炮官还算是幸运的：两名站得比较近的人被当场炸死，另两人被弹片打死。埃文斯中校摔倒在哈根旁边几英尺的甲板上，光着上身——他的卡其色衬衫被爆炸的冲击波从身上扯掉了。舰长的头发被烧焦，脸被熏黑，流着血，左手被炸掉了两根手指。他带着伤站了起来，像没事人一样继续下达命令。他自己用一块手帕包扎住被炸断的手指根部。医生来时，埃文斯拒绝了救助，他说：“现在别打扰我。”^[51]

打到这个时候，“约翰斯顿号”和“塔菲3”其余各舰已身处险境。恰在此时，一片暴雨云及时从东边飘来，很快便将军舰笼罩起来。“拐子”斯普拉格将军直接冲了进去，于是在从左后方快速接近的一队日军巡洋舰眼中，他的6艘“婴儿平顶”便仿佛消失了一般。这令处在敌人惊

人准确的舰炮火力下的美军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暴雨区中的能见度降到了几百英尺，但日军仍在继续开火，美军水兵们依然能看到熟悉的、弹着点密集的彩色水柱在自己队形中间炸开。“约翰斯顿号”也在向看不见的敌人还击，他们依靠的仅仅是经过改进的火控雷达——虽然炮手们无法目视确认是否击中目标，但确实有几艘日军巡洋舰在这时被5英寸炮弹击中。

斯普拉格并不觉得自己的胜算有多大。暴雨很快就会飘走，把他的军舰再度暴露出来。敌人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最高速度稳超25节，而他的护航航母只能达到17节。在敌人看不见自己的时间里，斯普拉格把航向转向了西南方。他希望把追击者引向南方，带到莱特湾里奥尔登多夫舰队的那些巨炮面前。他还分析，如果能引诱敌人舰队远离圣贝纳迪诺海峡，那么敌人就将难以逃脱盟军其他海空力量的反击。至于“塔菲3”编队自己，“这场战斗看起来只可能有一种结局——完全毁灭”。[\[52\]](#)

哈尔西65艘舰组成的大舰队一整晚都在向北冲刺，想要在拂晓时伏击小泽。战术指令被发给米彻尔，他令三支航母大队的航向和航速保持些许差异，这样他们就能在晨光初露时抵达最佳起飞位置。所有航母都接到命令，要给它们的攻击机群装好弹加满油，在甲板上排列好，届时无论能不能找到敌人的准确位置，它们都将紧随第一批防空巡逻的F6F战斗机之后起飞。第34特混舰队被集合起来，由“大下巴”李指挥，在三支航母大队前方约10英里处占据前卫阵位。当东方露出第一道微光时，飞机开始从甲板上呼啸而起，升上天空。得到大力增援的搜索机队离开舰队，向从北到东各个方向飞去。由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护航“地狱猫”组成的攻击机群奉命在美军舰队以北约50英里处盘旋，等待找到敌人的确切位置。

在南方300英里外的“瓦萨奇号”上，金凯德将军和他的军官们正在庆祝奥尔登多夫在苏里高海峡中的完胜，并讨论着怎样勇猛地追歼退却的日军南路舰队残部。一名作战参谋提醒金凯德，他们还一直没有收到

关于哈尔西是否留下重型舰艇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明确消息。还是谨慎些，去求证一下比较好。于是凌晨4时12分，金凯德直接询问哈尔西：“询问。第34特混舰队是否在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53]

由于这一整个区域交战的规模极大，美国海军的无线电通信网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金凯德的电报直到6时48分才送到“新泽西号”上，距离发出已经超过了两个半小时。这令哈尔西困惑不已，他称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金凯德收到并误解了我前一天发给我的舰队的预备电文”。^[54]他给出了否定的答复，表示第34特混舰队正和第3舰队的航母一起远在恩加诺角猎杀日本航母舰队。

侦察机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小泽舰队。“埃塞克斯号”战斗空中巡逻队中的一个战斗机小队被临时派往东北方执行侦察任务，就在哈尔西接到金凯德电报后几分钟，这支小队找到了敌人的航空母舰。此时它们正位于第38特混舰队15°方位，距离130英里。小泽正向北航行，显然是在逃跑。但这次和4个月前“马里亚纳猎火鸡”时不同了：现在美军手中全是大牌。距离完全掌握在美军手中，能见度良好，清风从美舰右前方45°吹来，这意味着他们能够一边收放飞机，一边缩短和敌人的距离。第一批攻击机已经升空，正在美军舰队北方盘旋，它们只要飞一小段距离就能到达目标。^[55]

日军仅仅起飞了少得可怜的一小群战斗机保护舰队，迎战一批批飞来的敌机，它们很快被屠戮殆尽。在这天的其余时间里，天空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小泽的战斗机。美军攻击机群可以安全待在日军高炮够不着的高处，像秃鹰一样在敌人舰队上空盘旋，有条不紊。指定的攻击协调人留在高空，组织和指挥进攻，并确保他们不会一窝蜂涌向最大的那艘敌舰。在这一整天的战斗中，美军航母总共向小泽的舰队放出了527架次飞机。

埃德温·约翰·威尔上尉是“富兰克林号”航母上的一名寇蒂斯SB2C轰炸机飞行员。他在1.4万英尺高度压下机头，向轻型航母“瑞凤号”发起了

俯冲。他穿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射炮火，紧紧握住操纵杆，把日舰飞行甲板上的红丸标志保持在轰炸瞄准具中央。高度表的指针飞速旋转着，他在比标准投弹高度略低一些的目标上空600英尺处投下了炸弹。当他拉起俯冲时，他的后座机枪手在机内通话器中大叫着确认本机直接命中。此时，寇蒂斯飞机已经降到了海面上空100英尺低空。威尔驾驶着他的飞机左右闪躲着周围爆炸的高炮炮弹，直接从一艘重型军舰的侧旁飞过，看到了“它宝塔式的桅楼和令人心惊胆战的各种火力”。^[56]

小泽舰队喷吐着美军飞行员所见过的最密集的高射炮火。比尔·戴维斯是“列克星敦号”上一名“地狱猫”飞行员，他俯冲突破了一阵密集得让他看不到下方海面的高炮弹雨。“在1万英尺高的地方是40mm和5英寸炮弹爆炸的黑色烟团……第二轮致命的烟云则是4000英尺高的地方20mm炮弹的爆炸。”^[57]戴维斯知道速度是自己的盟友，于是将节流阀一推到底。拉起俯冲时，他估计自己的速度超过了每小时500英里，比格鲁曼飞机的推荐最大速度快得多。他已经紧贴着海面，一艘日本重巡洋舰正拦在他的面前。它在飞机风挡里迅速变大，他已来不及转弯规避了。于是戴维斯拉起机头，向右狠压坡度急转，从上层建筑和前炮塔之间穿了过去。“我距离舰桥的窗户恐怕只有3英尺，都能看到指挥这艘舰的日本官兵，”他说，“有一位将军穿着白色制服，带着佩剑。其他官兵也都穿白色军服。我此刻时速有530英里，只是瞥见一眼，但这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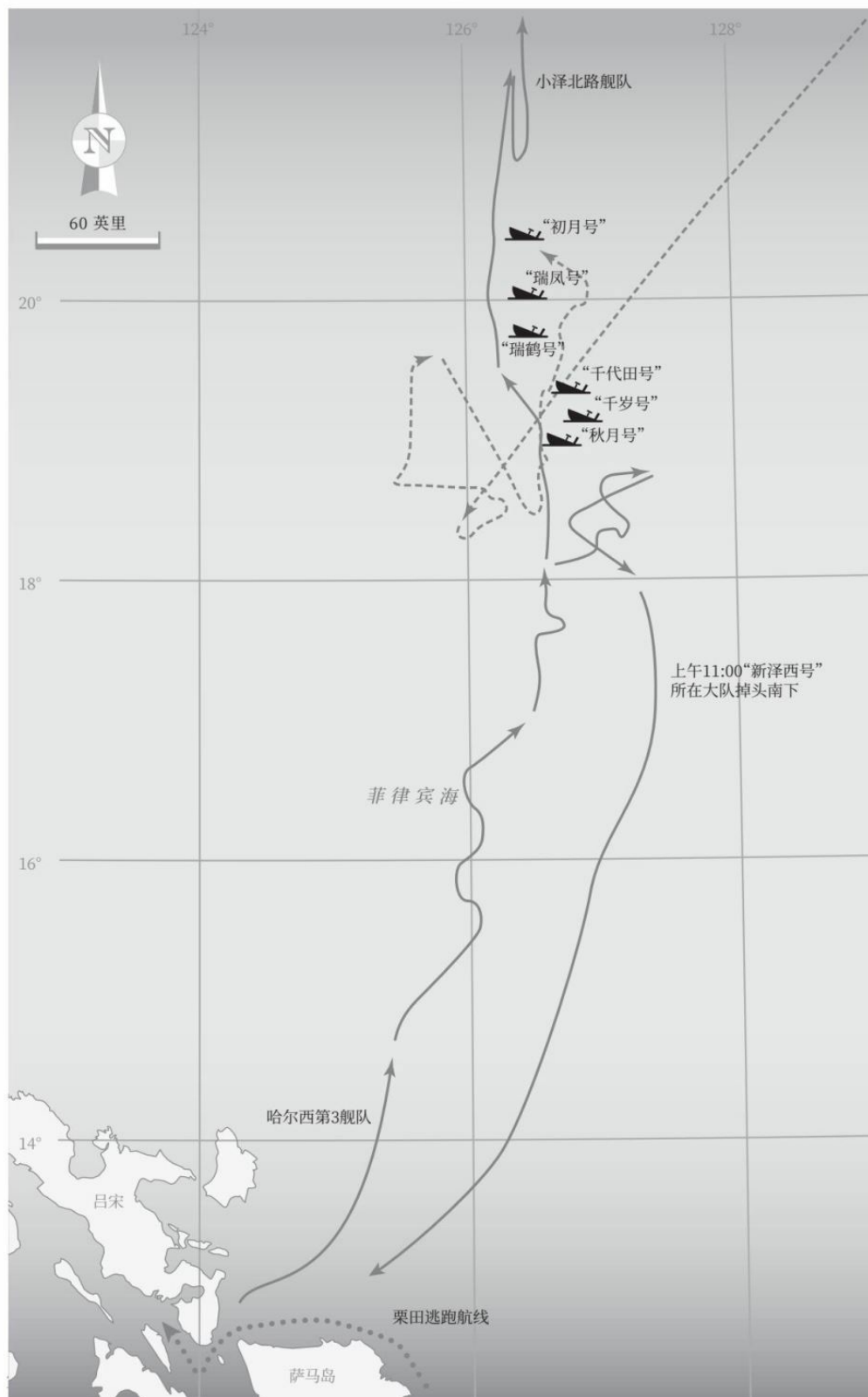
哈尔西的第一轮攻击命中了“千岁号”、“千代田号”、“瑞凤号”和小泽的旗舰“瑞鹤号”，“瑞鹤号”是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6艘航母中唯一幸存至今的，美军特别下定决心要把它送下海底。它在第一轮空袭中遭到重创，小泽不得不把自己的将旗转移到“大淀号”巡洋舰上。^[59]“千岁号”遭到3枚鱼雷和多枚1000磅炸弹重击，大火失去控制，瘫痪在水上，于上午9时37分沉没。^[60]

哈尔西直到上午8时22分才获悉萨马岛外的情况，此时他收到了金

凯德的第一次紧急求救：“CTU77.4.3指挥官〔‘拐子’斯普拉格〕报告，敌战列舰和巡洋舰在其所部后方15英里处，正在向他开火。”[\[61\]](#)

哈尔西后来写道，这个消息“没有让自己警觉起来”，他觉得护航航母足以长时间压制敌人，让奥尔登多夫的重型战舰前来参战。[\[62\]](#)但此语毫无疑问有一股嘴硬的味道。情报官卡尔·索尔伯格记录说哈尔西脸色“苍白”，看起来“相当不耐烦”。[\[63\]](#)不论他觉得“塔菲3”编队胜算几何，哈尔西都必定意识到栗田的突然出现对他早前的决定是否明智提出了质疑。这至少意味着他夸大了前一天他的飞机在锡布延海中的战绩。

“公牛”冲刺! 恩加诺角海战, 1944年10月25日



8分钟后，金凯德的第二次催促又来了，这次直截了当：“莱特湾现在急需快速战列舰。”^[64]哈尔西说他对这一要求感到“惊讶”。按他对作战命令的解读，保护金凯德的舰队不是他的任务，是金凯德自己的任务。然而他还是电告麦凯恩将军，“尽可能发动空袭”。^[65]此时他的第1特混大队还在菲律宾以东海面上加油。

“拐子”斯普拉格此时也直接加入了对话，他向金凯德发出的几封急电，都将“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列为抄送对象。^[66]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违规，哈尔西和尼米兹并不属于斯普拉格所在的指挥链。但是情况紧急，无人提出异议。

半个小时后的9点，金凯德的又一封电报送到了“新泽西号”。第7舰队的老大这次还是重复先前的话，只是语气更加激动：“我情况危殆。快速航母和空袭支援或能阻止敌人摧毁护航航母部队并进入莱特湾。”^[67]但哈尔西相信自己已经竭尽所能。他再次给麦凯恩发电，这次是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去截击栗田。之后他告诉金凯德，麦凯恩已经在路上了。^[68]

22分钟后，金凯德来电，报称敌舰队“显然在夜间穿越了圣贝纳迪诺海峡。请求立刻空袭。并请求重型战舰支援。我的老战列舰弹药不足”。^[69]

最后一句话是个新因素，哈尔西说，“如此惊人，我很难接受”。他想知道金凯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之后他看了时间戳，意识到自己接收金凯德电文的顺序错了。这最后一份电报是金凯德第三个发出，却是第六个被收到的。这还是几乎两个小时前的早晨7时25分发出的。在这两个小时里，“新泽西号”距离萨马岛外的战场又远了40英里。超负荷的无线网络给两支舰队之间的通信带来了灾难。一名密码军官后来解释道，所有电报的发送都遵循以瓦胡岛为中心的“F广播时间表”^[70]，并且不允许发送大量文字，以免“由于其相当缓慢的字词发送速度而给时间

表带来恐怖的负担，因为舰队中的所有军舰都希望收到大部分电报或至少能够收到电报”。^[71]许多发送方不愿受限于这一落后的无线电通信模式，转而发送普通电报并打上“高优先级”标签。这个习惯很快蔓延开来，于是不可避免地拖慢了真正紧急电报的传送速度。

哈尔西答复道：“我正与敌航母部队交战。拥有5艘航母和4艘巡洋舰的38.1特混大队已得令立即前来支援你。”^[72]他还附上了自己的经纬度，以表明催他返航是没有意义的。第3舰队正远在北京400英里以外，即便哈尔西想要救援第7舰队，他也太远了。

金凯德起初的几封电报是“透明”发送的——意即用明语，不加密。这就令它们几乎是坐等着敌人来截获，但也会使它们能够更快通过译码室送到接收人手中。尽管如此，这一次无线电的传送还是耽搁了，不过金凯德告诉一名战友，他用明语发报还有另一个原因——“让电文更具有刺激性，这显然做到了”。^[73]

在“新泽西号”舰桥上至少一名下属的眼里，哈尔西那著名的蛮干心态似乎变弱了。这位将军孤独地坐在皮革窗沿上，压抑而安静。旁人能听到他的自言自语：“到嘴的鸭子，我不想让它飞了。”^[74]

整个太平洋，乃至美国本土所有的军队司令部都实时监听着金凯德和哈尔西的对话。金和尼米兹两位将军被其中的几封电报列为“抄送人”。即便没有，他们通常也能收到所有的电文，因为他们的通信处监听着整个无线电网络。低阶参谋们把每一次更新的经纬度位置都标注在桌面的海图上，好让将军们能直观地看到各支舰队的位置。因此，在珍珠港和华盛顿，哈尔西仅有的两名直接上级都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并随时评价他的一举一动。两个人都很不满意。

先前和后来都是航母特混大队司令的“乔克”克拉克此时正在华盛顿宪法街的海军部里。走进金上将的办公室，他发现这位海军作战部长正在大发雷霆。金“像老虎一样”在地板上踱步，咒骂哈尔西把圣贝纳迪诺海峡丢下不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克拉克回

忆道，“我见他发过很多次脾气，也见过他发大脾气，但这回却是能写进故事书里的。他走过来走过去，极尽恶语骂着哈尔西，连空气都凝固了。”^[75]

同时，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也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步。据他的参谋长助理伯纳德·奥斯汀说，这很稀奇，因为“尼米兹将军不是那种喜欢踱步的人。他会冷静地面对许多问题，对于头脑里正在据实应对的困难不动声色。但是这一次，他也走过来走过去。因此我意识到这意味着这位五星上将正处于最严重的忧虑之中”。^[76]

尼米兹后来说，这段时间里他大多待在马卡拉帕山上居所后面的马蹄铁赛场^[77]里。“我如坐针毡，却不能表现出来。于是我回到宿舍去拿马蹄铁，告诉我的幕僚，‘如果有消息，就送到那里给我’。这场日本舰队彻底覆灭之战中的大部分电报，我都是在马蹄铁赛场里收到的。”^[78]这毫无疑问是可信的，但根据几位尼米兹幕僚的说法，在哈尔西北上恩加诺角的关键的几个小时里，尼米兹都待在司令部里。他不停地按铃把奥斯汀叫到办公室，每次都问他有没有电报能够显示哈尔西是否留下重型战舰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奥斯汀梳理了所有电文，却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建议尼米兹将军干脆向哈尔西求证海峡是否有人防守。但尼米兹没有这么做，他说“他不想发出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战场负责人对其部队战术运用的电文”。^[79]

这段时间里，尼米兹办公室的里里外外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幕僚，包括福里斯特·谢尔曼和杜鲁门·赫丁。当金凯德报告说“塔菲3”编队遭到攻击时，他们再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尼米兹是否应该询问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

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开战三年来，尼米兹从来没有通过索要信息或者催促舰队司令采取行动而插手过某一场战役。他常常很想去这么做，或者被幕僚们怂恿这么做——包括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1942年下半年瓜岛周围的几次海战，最近一次是在当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但

尼米兹每次都忍住没有干扰他的舰队司令，他选择相信他们的战术判断。

珍珠港方面没有收到哈尔西发给金凯德的关于战列舰已随同第3舰队北上的电报。因此这个问题被谢尔曼、赫丁和奥斯汀第三次提给总司令。何不干脆向哈尔西询问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最后尼米兹终于同意了。

这份简短的电文由谢尔曼或者奥斯汀编写——说法不一——经由尼米兹批准发出：“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80]金和金凯德也作为“告知”收件人一并发送。

这份电文嗖的一声通过气压输送管送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地下室里的编码室，密码无线电通信史上最著名的乌龙事件便拉开了序幕。给外发电文加密时的标准做法是在正文的首尾添加几个无意义的词句。这些废话被称为“填凑部分”（padding），目的是迷惑敌人的密码破译人员。“填凑部分”和正文之间会插进两个无意义的字母，接收方的通信官要先把这些废话去掉再交给接收人。由于认为短电文更易于破解，因此人们也常重复正文中的一部分文字，仅仅是为了让电文更长些。于是，此番发出的电文便成了这样：

火鸡跃入水中GG发件人CINCPAC [尼米兹] 主送第3舰队司令
[哈尔西] 告知COMINCH [金] 第7舰队司令 [金凯德] X第三十四特
混舰队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RR全世界都想知道。^[81]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新泽西号”高大的无线电塔收到了电文的一笔一画。在下方的解码室里，一名电报打字员在一小截纸带上打了解码后的电文。一般情况下通信人员会把正文抄下来，作为正式电文。但是当电报很急时，就像这次一样，他们也会直接把填凑部分撕下来，把解码后的纸带原样送到指挥室。通信官查尔斯·福克斯上尉看出来前一段填凑部分是废话，便撕掉了它，但最后几个字却让他犯了难。虽然它们

与前文之间隔了两个看似无意义的字母，但谁也不敢保证这“RR”不会是某一段电文错乱的遗留。在情况难以判定或模棱两可时，若无法确定一段语词到底是填凑部分还是电报正文，那么标准的做法就是把它留在纸带上，交给接收人自己去判断。[\[82\]](#)

福克斯把解码纸带交给一名下级，后者把它放进文件盒，塞进气压输送管，它又一次嗖的一声被送到了三层甲板上的指挥室里。一名通信官把它从管道里取出来，看这是尼米兹发的，便直接交给了哈尔西，他扫了一眼，读出了一股挖苦的味道：“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全世界都想知道？”

哈尔西爆发了。好几个人都说他脸色涨成了紫红色，把帽子摔在甲板上，把电文揉成一团，扔在地下还踩了一脚。还有人说他眼中噙满了泪水，哀伤地抱怨着，快要哭出了声。“我震惊了，如同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他后来写道。[\[83\]](#)他咆哮道：“切斯特怎么能给我发出这种浑蛋电报？”[\[84\]](#)

这位四星上将在第3舰队司令部众目睽睽之下崩溃的场面令“米克”卡尼警觉了起来，他迅速来到哈尔西面前：“别这样！你在搞什么鬼东西？振作起来！”[\[85\]](#)

哈尔西冲出了舰桥，回到他的卧室里，卡尼也紧跟其后钻了进去。两人关了门，在里面单独交流了近一个小时。在这一段时间里，第3舰队仍在继续高速北上，向着小泽已遭重创的舰队开去，却离萨马岛外急如星火的战场越来越远。

据查尔斯·福克斯说，这份电报被反复解译了好几次，那句似是而非的“全世界都想知道”很快被纠正了。[\[86\]](#)考虑到这句话的重要性，这个乌龙和纠正的结果要立刻让哈尔西知道。于是在他最初的震惊后不久，哈尔西就知道自己误解了电文的那最后一句——此时他不是还和卡尼待在舱内，就是刚刚回到指挥室。哈尔西和卡尼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那一个小时的促膝长谈谈了些什么，但是作为老海军，他们应当能够

理解“现在何处，重复，现在何处”这句只是个编码习惯，并非想要在电报中表达什么强硬口气。哈尔西很熟悉尼米兹，知道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不会恶语伤人，这次当然也不会。“我被这封看起来很无礼的电文激怒了，”他后来如此告诉一位历史学家，“当怒气平息下来之后，我便开始思考，我意识到是哪里搞错了。我还意识到尼米兹将军不可能给我发这样一封电报。”^[87]因此可以想见，最初的误解没有持续太久。^[88]

还有一点因常被忽视而值得重点说明。即便不考虑那条不恰当的填凑部分，无论这条电文如何平淡无奇，尼米兹的询问也会令哈尔西老脸丢尽，颜面扫地。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此前从未在战役过程中插过手。即便把“第34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理解为一个简单的询问而不是一种催促，这也暗含着责备哈尔西没能清晰无误地上报自己动向的意味。如果尼米兹都没能理解哈尔西先前的电报，那么又怎么能指望金凯德做得到呢？实际上，尼米兹肯定是在责怪哈尔西放任日军溜进来袭击了第7舰队。把这封电报同时发给了金和金凯德，更是加重了这种指责的分量。

在这种环境下，尼米兹的电报根本就不是询问。那是命令，只是礼貌地用询问的语气说了出来。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不再怀疑第34特混舰队的位置，他很容易就能判断出它和第3舰队其余兵力一同北上了。哈尔西的旗舰“新泽西号”本身就是第34特混舰队的一员。换言之，哈尔西在哪里，第34特混舰队就在哪里——这位将军在发给金凯德的几封电报中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比如“我正带三支大队向北行进”，还有“我正与敌航母部队交战”。哈尔西不会把他的战列舰丢在没有空中掩护的地方，但他也说得明白，所有三支航母大队都北上了，因此，战列舰肯定也跟着去了。更直接地说，大家都知道栗田已经溜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深入了足以炮击第7舰队的地方。既然第34特混舰队没有留在那里拦截栗田，那也就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它肯定是到北边去了。战争结束许多年后，尼米兹告诉自己的传记作家：“我很清楚第34特混舰队在哪儿。”^[89]

上午11点前，哈尔西和卡尼带着坚毅的表情回到了指挥室。卡尼开始起草命令。第34特混舰队将要掉转航向，以最高速度南下救援第7舰队。一支航母大队，博根的第2大队，将一同南下，其余两支航母大队将留下来消灭日军北路舰队。当这些巨舰开始转向时，他们距离最近的小泽舰队残舰只有42海里，几乎就要在海平线上看到它们了。这真是太扫兴了。哈尔西后来写道：“我向我自从军校学员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机会挥手道别。”^[90]但尼米兹要求他必须如此。他告诉金凯德：“我正带领第38.2特混大队和6艘快速战列舰开往莱特湾。”^[91]但他也补充道，自己预计无法在次日上午8点前到达。

“尾追难追”，这是老海军们的格言——这天上午在萨马岛外的追击战正是如此。栗田中路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比“塔菲3”编队的那些护航航母大约快10节，但斯普拉格灵活地指挥舰队机动，改变航向，将追击者置于尾后，并完美利用了烟幕和多雨的天气。他让他的6艘“婴儿平顶”在暴雨中躲了20分钟，其间他转向南，继而转向西南。日军根本无法像斯普拉格最害怕的那样抄他的近道截杀他，只能跟在他后面转弯，追击距离拉长了许多。栗田松散的梯队队形也不断被空袭阻碍，这些飞机有些来自“塔菲3”编队自己，有些则来自南方相邻的其他“塔菲”编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塔菲3”编队中护航的小“铁皮罐头”们——几艘驱逐舰和驱护舰——打了一场激烈而拼命的后卫作战，迫使日舰反复躲避鱼雷，为航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早晨7时50分，“霍埃尔号”、“赫尔曼号”和“雷蒙德号”以最大航速向右急转，向敌人冲锋。驱逐舰开到了30节航速，螺旋桨拍击着海水，舰尾下沉，舰首上扬，直冲敌人的核心力量战列舰而去。遭到重创的“约翰斯顿号”靠着应急操舵，也努力跟在进攻的驱逐舰后面，用它的5英寸主炮向最近的日本巡洋舰开火。日军也开到了近30节航速，因此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当打头阵的驱逐舰“霍埃尔号”与敌人距离接近到1.8万码以内时，舰上的鱼雷兵们做好了发射的准备。他们把鱼雷调到中等速

度。一半鱼雷管对准了迎面开来的战列舰，另一半则瞄准了右舷的巡洋舰。“霍埃尔号”在9 000码距离上射出了鱼雷，随后向右急转脱离。[\[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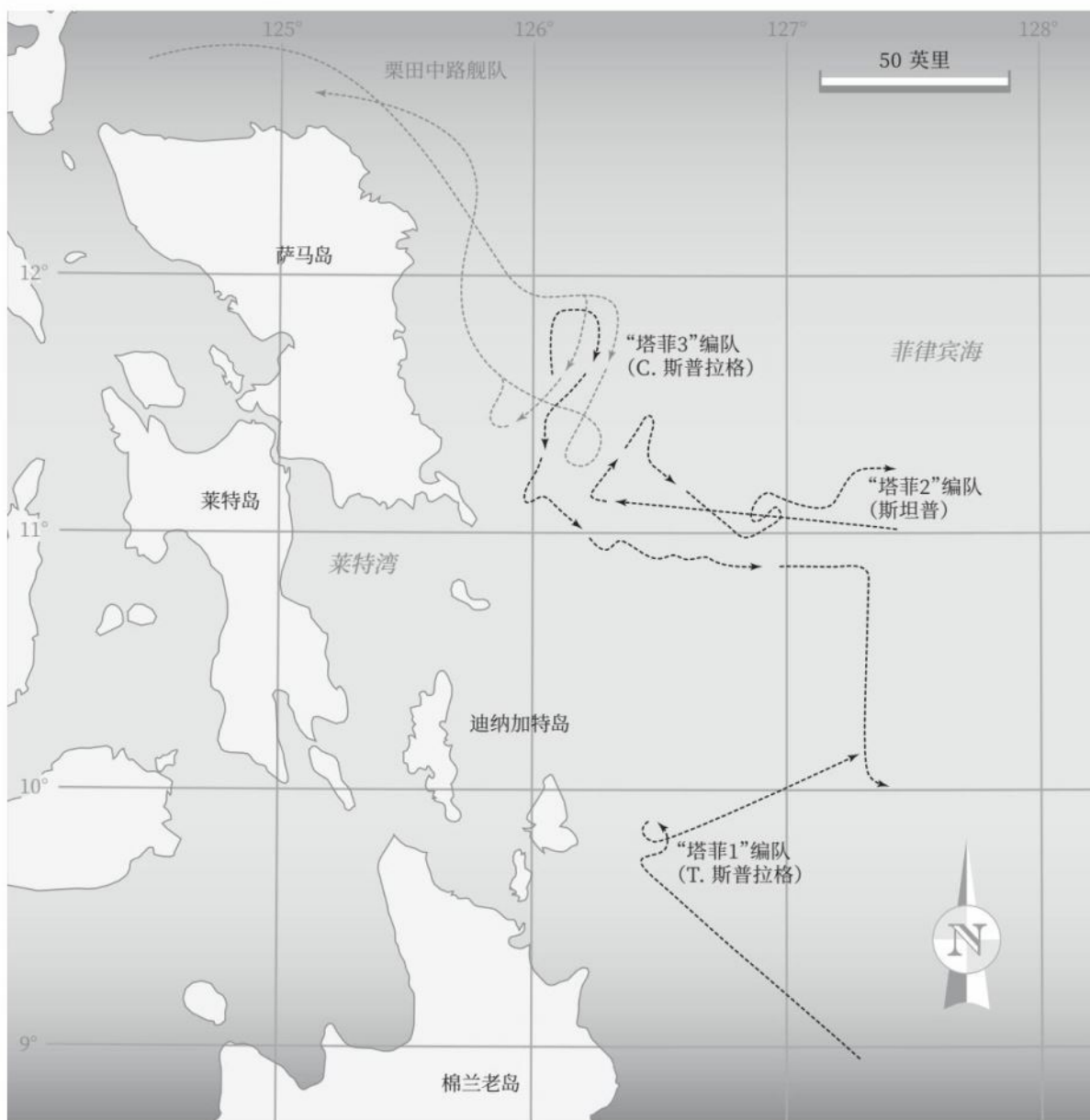
日军让这些勇敢的小驱逐舰付出了代价。当“霍埃尔号”的侧舷暴露在敌人面前时，一阵弹雨砸进了它的左侧，炸毁了舰桥。舵手和几名军官被当场炸死，所有的语音无线电通信也都中断了。它的后部锅炉舱和后轮机被直接命中，左侧发动机被炸毁。一枚命中舰尾的炮弹导致船舵卡住，使得“霍埃尔号”只能原地转圈。舰员们迅速转为应急人工操舵，才保持住了航向，脱离敌人。[\[93\]](#)

与此同时，“霍埃尔号”的鱼雷呈扇面向北扑去。7时54分，“大和号”上的瞭望哨指着左前方袭来的鱼雷航迹大叫了起来，这艘巨大的战列舰随即向左急转以躲避危险。但这么一来，它便转向了北方，离自己的敌人越来越远。4枚鱼雷航迹在它右舷，航向大致平行，左舷还有2枚。“大和号”的航速是26节，和鱼雷差不多，于是它被鱼雷夹在了这一航向上，直到它们耗尽燃料沉入海底。宇垣将军记录道，“大和号”被迫向北航行了大约10分钟，“但我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小时。等到航迹消失后，我们才最终得以向右转弯，然后开足马力继续追击”。[\[94\]](#)

“霍埃尔号”的鱼雷管里还有几枚待发的鱼雷，但是鱼雷兵们却在弹雨中死伤惨重。于是一名前部鱼雷管的军官跑到后面，接管起那里的鱼雷管，用目视瞄准，向从左后方6 000码外靠过来的日军重巡洋舰纵队射出了5枚鱼雷。“打完10枚鱼雷，我们认定，现在是时候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一名“霍埃尔号”的幸存舰员说。[\[95\]](#)但是由于一台发动机被毁，它的航速下降到了17节。现在，敌人战列舰从右后方驶来，巡洋舰则从左后方步步紧逼，“霍埃尔号”已经无可选择。它左右摇摆着“追逐弹着点”，但是猛烈的炮火先是落在它的左右两侧前方，接着便砸在两旁。“霍埃尔号”很快便浑身中弹，千疮百孔。鱼雷舱、信号舰桥、救护所和两门20mm高射炮都被炸掉了。其左舷水线上下多处中弹，致使下部舱室很快被水淹没，舰体严重左倾，大火失去了控制。舰桥上传来弃舰的命令，传令兵们被派往舰体下部各处，把弃舰令传达给战位上的水

兵们。人们于是咳嗽着爬上了梯子，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他们从尸体和濒死的战友身上跌跌撞撞地走过，然后跳进海里。即便舰尾已经没入水中，“霍埃尔号”的前部炮塔仍在勇敢地开火射击，于是一名传令兵被派过去告诉炮手们停止射击，到安全的地方去。[\[96\]](#)8时55分，“霍埃尔号”翻倒在水面上，舰尾朝下。它的舰首高高抬起，之后带着300名舰员中的253人渐渐沉入大海。

萨马岛海战, 1944年10月25日



幸存者们在水中挣扎着，攀附到浮筒救生网上，并尽其所能地照顾好伤员。日军舰队从手枪射程距离上经过，却无人向水中的人射击。美军水兵们抬起头，和经过的军舰上从栏杆后静静看着自己的日军水兵四目相对。四艘战列舰从旁边经过，还有八艘巡洋舰。巨舰一艘接着一艘，全都悬挂着红白相间的旭日军旗。宇垣将军从“大和号”的舰桥上看

着下方的“霍埃尔号”逃生者们，他想知道：“他们对我们追击舰队的雄姿有何感想？”^[97]美军水兵们确实被巨大的“大和号”和它高耸的灰色宝塔形桅楼震撼到了。有个人叫道：“我的上帝，看那个！”当一架美军战斗机穿出云层，扫射经过的舰队时，他们更是惊呆了。“我们离军舰特别近，都能听到.50口径子弹打在坚硬的木甲板上，”“霍埃尔号”幸存者格伦·帕金说，“日本人用差不多所有的轻武器还击。那架F6F冲下来，进行了扫射又回到云中，前后不超过30秒。我的上帝，这太好看了——还是在前排佳座。”^[98]

此时，“塔菲3”编队的航空母舰已经开出了暴雨区，向西南偏南方向逃离。斯普拉格的旗舰“方肖湾号”行驶在队形最前方，“白平原号”和“加里宁湾号”跟在后面，“圣洛号”在右，“基昆湾号”和“甘比尔湾号”居左。

4艘日军巡洋舰——“筑摩号”、“鸟海号”、“羽黑号”和“利根号”——正稳步接近“塔菲3”的左后方。这些强大军舰的最高航速超过了30节。随着这场追击战进入第二个小时，它们已经将距离缩短到了1.4万码，各航母常常被6英寸和8英寸炮弹跨射。这些脆弱的小舰在近距离爆炸的冲击下剧烈摇动——舰员们摔倒在地，电气系统短路，舰体钢板间撕开裂缝。“方肖湾号”被直接命中4弹，或许是它的轻型结构救了它，因为至少有两枚穿甲弹在多层甲板和多个舱壁上打了个对穿，在舰外爆炸。

驱逐舰依旧在队尾以之字形航行，全力施放烟幕。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上的小迈克尔·巴克回忆道：“我们一直不停地右满舵，左满舵，右满舵，左满舵，炮弹不断落在我们周围。”^[99]随着追兵的步步紧逼，华丽的彩色水柱愈加靠近“弗兰克斯号”。在一次落点很近的炮击中，巴克甚至爬到了会议桌底下，卧倒抱头。他想知道敌人怎么会溜到离美军舰队这么近的地方却没有被巡逻飞机发现：“我不敢相信会在这么近的距离上看到这些军舰。我都能看见其中一艘舰上的旗帜，它太近了。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距离我们这么近，我们的将军们却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在看其他地方，他们却从后面过来

了。”[\[100\]](#)

斯普拉格一次又一次被高速杀来的追兵逼着转弯，渐渐将航向转向西南，最终几乎转向正西，直朝着萨马岛绿色的群山奔去。漫长的航程打乱了美舰的队形，让这六艘航母大致形成一路纵队。其中“加里宁湾号”和“甘比尔湾号”被姊妹舰们甩在最后，格外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的炮口前。它们同时也在用5英寸“豌豆枪”向最近的日本巡洋舰还击，这些巡洋舰已经来到了它们左舷外。“加里宁湾号”被命中超过12次，以及数量或许两倍于此的毁坏性近失弹；它的舰长觉得此舰没有被追上摧毁简直是个奇迹。

落在最后的“甘比尔湾号”情况最为严重。在大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这艘航母依靠“追逐弹着点”战术，未被直接命中。但在8时20分，它左舷中部水线处遭到重重一击。成吨的海水涌进舰体，淹没了左前部的轮机舱。失去一台引擎之后，它的航速跌到了11节。此时日军已经撵上了它的脚后跟，它逃不掉了。舰长沃尔特·V.R.菲韦格上校告诉斯普拉格将军自己的军舰要掉队了。日军巡洋舰很快追了上来，开始在近距离向它倾泻弹雨。与此同时，战列舰“大和号”和“金刚号”也从尾后测准了距离，用大口径主炮向不幸的“甘比尔湾号”展开雨点般的齐射。

刚刚领教过“大和号”18英寸巨炮怒火的“约翰斯顿号”，此时仍在低速前进。它的舵机被毁，无法修复，因此只能靠4名强壮的水兵人工操舵（就和古代一样），这些人每10分钟就要轮一班。埃文斯起先用电话下达转向命令，但他很快就不得不离开已被摧毁的舰桥，跑到舰尾，直接吼叫着向下面的舵手发令。舰上的火控系统已经失灵，因此各炮只能“各自为战”，但“约翰斯顿号”仍在竭尽所能地坚持战斗。

8时10分，它从浓密的烟幕中开出来，发现姊妹舰“赫尔曼号”正处于将与自己相撞的航线上高速行驶，距离只有200码。两边的舰长都下达了“全引擎倒退”的命令，虽然“约翰斯顿号”只有一台引擎可用。站在“约翰斯顿号”艉部深水炸弹导轨旁的鲍勃·迪尔被晃倒在地：“我们的舰尾深深沉入水中，海水都漫上了后甲板。”[\[101\]](#)“赫尔曼号”的两台引

擎开足马力倒退，完全停了下来，随后以15节速度反向脱离。这样，这两艘姊妹舰才算是以仅仅10英尺的距离擦肩而过。两边的舰员同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埃文斯用他仅有的一台可用引擎前进，避开“赫尔曼号”，继续战斗。[\[102\]](#)

8时20分，“金刚号”从“约翰斯顿号”左边的烟幕里现出身来，距离7000码。美军向日军巨舰打出了大约40枚5英寸炮弹，并观察到几枚炮弹击中了宝塔形的上层建筑。“这根本起不了什么决定性作用，就像是用纸卷打钢盔一样。”哈根承认道。当“金刚号”的14英寸炮转向“约翰斯顿号”并开始还击时，美舰再次躲进了自己施放的烟幕中寻求掩护。10分钟后，烟幕消散，“甘比尔湾号”出现在了前方几英里外。它瘫痪在水面上，正在遭受一艘日本巡洋舰的猛烈射击，可能是“筑摩号”。哈根回忆道：“埃文斯中校向我下达了我听到过的最英勇的命令。‘向那艘巡洋舰开火，哈根，’他说，‘把它的火力从“甘比尔湾号”引到我们这边来。’”[\[103\]](#)

“约翰斯顿号”现在和巡洋舰“矢矧号”交上了火，并被命中了几枚6英寸炮弹，受损。敌方一支5艘驱逐舰组成的纵队从另一边接近过来，显然是要开往已被打残的“甘比尔湾号”。此时，“约翰斯顿号”是附近仅有的一艘美军驱逐舰，因此它向所有敌舰轮流开火，将火炮逐一指向进入射程的日舰。此时的“约翰斯顿号”一侧遭5英寸炮弹轰击，另一侧遭8英寸炮弹重击。它的前部炮塔哑火了，舰体处处带火，40mm炮弹整备器被火焰吞没，高射炮弹被灼烧至爆炸。轮机舱里充满浓烟，把舰员们赶到主甲板上，那里已经被鲜血染红，到处躺着战友的尸体。

南边2英里处，“甘比尔湾号”已经成了一艘废船，它瘫痪在水上，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倾覆。它机库甲板上一架“复仇者”爆炸了，火焰引燃了泄漏出来的航空汽油。黑烟立即从下甲板升腾起来，迫使人们爬上梯子来到飞行甲板上。一次爆炸把升降机从机井里炸飞了出来。暴风雨般的炮弹撕扯着军舰，把它开膛破肚，炸死了几十名舰员。许多炮弹从左侧打进右侧出来，把军舰打个对穿，因此有些日舰换上了装有瞬发引

信的高爆弹，它们会在命中舰体的瞬间爆炸。上午8时45分，舰长下令将所有密码本和其他保密材料扔进海里，之后要求舰员离舰。9点后不久，“甘比尔湾号”侧翻，很快沉没。它成了唯一一艘被舰炮摧毁的美军航空母舰。

随后，日军驱逐舰向“约翰斯顿号”靠过来，向这具燃烧的残骸倾泻弹雨。但残骸上唯一一门依然能用的炮塔仍不屈不挠地还击。上午9时45分，在三个小时残酷的战斗之后，埃文斯中校传令弃舰。当幸存者们跳入海中或者攀爬到救生筏上时，敌驱逐舰开到了近距离，向“约翰斯顿号”射击，直到它消失在波涛之中。

奥野匡是日本驱逐舰上一名25岁的水兵，他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水面上的人浮浮沉沉，半裸的舰员们拥挤着爬上救生艇，划着桨逃离。我们近到能够看见他们没刮干净的胡子和胳膊上的文身。我们的一名机炮手冲动地扣动了扳机。他一定是被对敌人的仇恨冲昏了头。但来自舰桥的一个响亮声音制止了他：‘不要向逃生人员射击！停止射击，停！’”^[104]美军幸存者们证实日军确实停了火，还有一个人看见一名日军舰长向沉没的“约翰斯顿号”举手敬礼。

打到这个时候，栗田舰队的队形已经几乎完全散了架。战场上满是低云、暴雨和施放的烟幕，能见度仍然很差。日舰之间彼此无法目视联系，而由于技术故障和关键人员伤亡，日军指挥官想要保持无线电联系也很难。日军各舰航速不同，为追击不同目标而开往不同的方向，躲避鱼雷，迎击空袭，这一切使得日军舰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失去了统一的目标。他们对“塔菲3”编队剩余的5艘护航航母已不再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尾随追击你们的军舰，而它们都在之字形航行，很难缩短距离，”栗田后来说，“而且，由于你们驱逐舰的鱼雷攻击，各主要舰艇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105]日军瞭望哨很难识别出正在追击的敌舰类型，他们觉得那是些30节航速的埃塞克斯级航母，这样即便追一整天，他们还是会在舰炮的射程之外。小柳参谋长判断“追击战将会成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我们将无法打出决定性一击。而以最高速度航行，

我们的燃料消耗速度将值得警惕”。[\[106\]](#)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栗田将军向麾下各舰发出信号，停止追击，随同自己转向北。

“拐子”斯普拉格对“方肖湾号”没有被追上干掉感到意外，他开始期待他的舰队能有一部分逃出生天。8时15分，在敌人的追杀下逃了一个小时后，他向军需官说：“上帝，我想我们或许还有机会。”之后当“甘比尔湾号”被追上并被舰炮击沉后，这个前景又暗淡了下来。当日军的大炮最终沉寂下来，敌人转而向北航行时，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方肖湾号”上一名信号兵故作慌张地喊道：“见鬼，小子们，他们跑了！”[\[107\]](#)

大西将军知道，直到这天上午，他新的神风自杀部队还一事无成。从10月21日起，一连三天，关行男大尉每天都率队从吕宋岛的马巴拉卡特机场起飞，但这些战机每一回都找不到合适的舰队目标，然后丢人现眼地飞回基地。24日，机场上空浓云密布，飞机甚至都没有起飞。驾驶“神风”侦察机的飞行员技术熟练，可以让他们在云层中飞行，但是大部分被指派的自杀飞行员都只有最基本的飞行技术，大西不希望他们因事故而白白损失或者不知去向。最好还是等到天气晴好，这样他们至少还会有一次撞击的机会。

自从战争爆发之初起，一个一个的日本飞行员就一直在自发地把自己的飞机变成人操导弹。进攻之初，莱特湾里的盟军舰队就遭到过几次这种“非官方”的自杀攻击。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0月21日英国皇家海军巡洋舰“澳大利亚号”遭受的撞击，当时，一架单枪匹马的爱知D3A1轰炸机从军舰右前方掠海高度飞来，然后突然压坡度撞向军舰的上层建筑，机枪也在近距离上猛烈扫射。飞机撞上了“澳大利亚号”主桅杆瞭望台下方的位置，炸成一团橘黄色的火球。燃烧的航空汽油涌入上层建筑内部，破片横扫舰桥，舰上一众高级军官非死即伤。舰长腹部被击中，迅速被送往急救所，在那里痛苦地死去。大火最终得到了控制，“澳大利亚号”也仅仅受了轻伤，但是这次攻击却让盟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假如日军有组织地大规模运用空中自杀战术，他们将会遇到些什么。

第一次成规模的自杀攻击落在三支护航航母编队中最南边的托马斯·斯普拉格的“塔菲1”编队身上，此时正是萨马岛追击战最激烈的阶段。当时“塔菲1”的航空母舰正转向迎风航向放飞飞机——飞机将飞向北面去攻击栗田舰队——这时4架日军零式战斗机从云层中出现，向“桑提号”和“苏万尼号”俯冲下来。一架飞机撞中了“桑提号”飞行甲板的后升降机前部，炸弹穿入机库甲板爆炸。舰员们控制住了大火，但是不幸的“桑提号”此时却又被日本潜艇伊-56射出的一枚鱼雷击中。在一片混乱之下，“桑提号”的军官们都以为军舰是被舰上损管队丢弃到海里的一枚深水炸弹炸伤的，直到一个月后军舰被送进干船坞修理，美国人才意识到它是被一枚日本鱼雷击中的。同时，它的几艘姊妹舰近旁也有近失弹落下，这可能是自杀飞行员未能命中，栽进了附近的海里。“苏万尼号”在24分钟的时间里被两架“神风”机撞中，其中第二架飞机把机库炸成一片废墟，令“苏万尼号”在这天的一整个下午都无法再收放飞机。

三个小时后，当栗田中路舰队放弃追击向北转向后不久，又一轮“神风”到来了。似乎是“拐子”斯普拉格的编队这一早上经受的磨难还不够，这一次致命打击直接落在了“塔菲3”编队身上。舰员们此时刚刚解除高级战备状态，正在庆幸自己意料之外的死里逃生，雷达屏幕忽然显示许多敌机正从北面飞来。上午10时40分，6架日机出现在舰尾，天空顿时被高炮炮弹填满。两架飞机撞击了“加里宁湾号”，炸成了一团烈焰：爆炸和火焰造成5名舰员死亡，50人受伤。另一架飞机瞄准了“方肖湾号”，却被高炮火力击毁，坠落在军舰侧旁。“白平原号”的炮手同样在极近距离上摧毁了一架敌机，但是敌机炸弹却在很近距离上爆炸，许多人被落在飞行甲板上的破片击伤。一架零战擦着“基昆湾号”的舰桥飞过，撞在它的左前方高炮走廊上，瞬间燃起大火，但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大部分被命中的航母，其损管队都努力控制住了火势，军舰至少能

够依靠自身动力脱离战场，只有一艘例外。它就是上午10时53分被撞中的“圣洛号”。一架零式战斗机急转弯躲过“白平原号”射出的高炮火墙，飞到了“圣洛号”舰首上方，随即在飞行甲板上直接压机头，撞中了军舰正中央。机上的250千克炸弹在机库中爆炸，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吞没了弹药库中存放整备妥当的炸弹和鱼雷。接着，这艘轻量化结构的军舰被一连串爆炸撕扯得七零八落，开始向左倾斜。虽然“圣洛号”的两台引擎还能正常工作，但舰长还是关闭了引擎，下令弃舰，舰员随即开始从侧面跳入水中。随后，向左严重倾斜的军舰突然正过来，然后开始向右翻滚。上午11时25分，它翻倒在海面上，沉入海中。刚刚和栗田那些战列舰、巡洋舰英勇战斗过的护航舰艇赶紧靠了过来，救援幸存者。大部分舰员，800人中的754人，被救了上来。

这次进攻由关行男大尉率领，他是被大西将军亲自任命，率领吕宋岛马巴拉卡特基地第一支“神风”自杀机部队的。观察机队由西泽广义飞曹长率领，他是日本海军中最负盛名的零战王牌之一。西泽带回了令人振奋的战报：关大尉的四架自杀机命中了目标，击沉一艘航母和一艘轻巡洋舰，击伤了另一艘航母。这个消息立刻通过无线电发给东京，随即写入公报发布了出去。

日本的公报第一次没有夸大战果。战场上没有巡洋舰，但是关行男的飞机命中了三艘航母，而不是两艘，一艘被摧毁，另两艘也遭到重创，不得不撤回后方基地进行大修。

这一小群新手自杀机飞行员的攻击，成了刚刚落幕的大海战的尾声，也是一个凶兆，预示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双方都对此战的教训牢记于心：如果日军飞行员愿意用性命来确保命中盟军军舰，他们就能要盟军的命。

哈尔西所部各舰彻夜向南疾进，但还是来得太晚，未能抓住撤退的栗田。这位将军和他的幕僚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敌人舰队冲进莱特湾的消息，金凯德发来的电报还一度自相矛盾。一连串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无

线电战报飞到了“新泽西号”的指挥舱。“汤米”斯普拉格先是说“情况好些了”，但是45分钟后他又说“敌水面舰队继续攻击护航航母”。[\[108\]](#)当最终确定栗田已经放弃进攻时，哈尔西决定以最高速度赶往圣贝纳迪诺海峡入口，以期在这个必经之道截住他。他重新编组了部队，让速度最快的战舰超前行动。追击部队包括他自己的旗舰“新泽西号”和姊妹舰“艾奥瓦号”（又译“衣阿华号”），以及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他们开到30节航速，将航向指向圣贝纳迪诺海峡。他们在凌晨1点后不久抵达目的地，但是栗田却抢先一步来到这里，并在两个小时前安全抵达海峡另一端。落入美军舰炮射程的只有一艘掉队的日舰，就是身负重伤的驱逐舰“野分号”。这艘残舰太小，根本不值得动用“新泽西号”的16英寸巨炮，于是哈尔西派出一艘驱逐舰赶过去结果了它。这是整场战役中第3舰队司令部唯一目睹的战斗。强大的“新泽西号”向北追击了300英里，继而掉头，又向南追击300英里。属于它的战役便这么结束了，它的大炮依然是冷的。“老鼠在猫赶来之前就躲回了洞里，”卡尼悔恨地总结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它溜过去时赶紧抓住它的尾巴。”[\[109\]](#)

此时，在恩加诺角外，第3舰队留下来的两支航母特混大队（38.3和38.4大队）仍在不停地向撤退的小泽舰队残部放出攻击机群。4艘日军航母被他们送下海底，包括“瑞鹤号”，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日军航母中的第6艘，也是最后一艘。本着友好竞争的精神，美军各航空兵单位都给予这艘舰格外关注，都想要拿到对它“致命一击”的荣誉。弗雷德里克·C.谢尔曼将军回忆称，从他第38.3特混大队飞行甲板上起飞的第三攻击波“最后终结了‘瑞鹤号’，直接命中9枚1 000磅和2 000磅炸弹”。在此之前，它已经被命中了估计有7枚航空鱼雷。这具燃烧的躯壳严重左倾，然后在下午2时14分翻倒，舰首朝下沉入海面。在远处观察的目标协调员称这是“十分壮观的场面”。[\[110\]](#)

当天下午，劳伦斯·T.杜博斯少将率领的一支巡洋舰——驱逐舰分队被派出去用舰炮击沉敌人残舰。杜博斯的军舰追上了“千代田号”，用舰炮一直打到它沉没为止。上空盘旋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把战报转发回特

混舰队：“17时1分击沉轻型航母一艘——4艘全部击沉，无一逃脱。”^[111]三个小时后，这支舰队又击沉了驱逐舰“初月号”。然而夜幕降临后，杜博斯却被召了回去，两支航母大队转向南，次日他们将继续跟随哈尔西行动。

现在，所有残存的日军舰艇都飞速撤退了。舰载机一路追杀撤退的敌军，追到棉兰老海、苏禄海和锡布延海。“塔菲”编队的护航航母也放出飞机追击西村和志摩两支舰队最后的败逃战舰，最终在25日下午结果了“最上号”。丧失部分动力的“阿武隈号”巡洋舰已经无法有效机动，被美国陆军B-24“解放者”轰炸机群投下的密集的500磅炸弹弹雨命中，最终在内格罗斯岛附近沉没。10月26日一整天，栗田舰队在撤退途中遭到了美军飞机的反复攻击，许多舰艇都再次遭到打击，包括“长门号”、“榛名号”、“熊野号”和“大和号”。其巡洋舰“能代号”于上午11时37分在塔布拉斯海峡沉没。西村的南路舰队中，仅有“时雨号”一艘舰幸存，它孤零零地回到文莱湾，其舰长也成了这支舰队唯一生还的指挥官。小泽舰队中的巡洋舰“多摩号”撤退时在吕宋岛东北方被美军潜艇“仿石鲈号”击沉。志摩将军丢下了受伤的友舰，才算是乘坐“那智号”逃出了苏里高海峡——但它后来还是在马尼拉湾遭到第38特混舰队舰载机的攻击并被击沉。舰载机扫射了水面上的幸存者，807名舰员丧生。

若按照历史学家设定的标志战役结束的时间界限，有些这种后续的扫荡作战已经不再属于莱特湾海战了。然而即便有此限制，这场大规模的较量也已经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战了。参战军舰近300艘，总吨位约300万吨。参战舰队载有20万人，比得上一个中等城市了。双方总共损失了34艘舰船，超过500架飞机，超过1.6万人伤亡。这场战役还囊括了每一种能想到的海战形式，每一类型军舰——航母空袭，水面战舰之间的舰炮和鱼雷对决，潜艇攻击，鱼雷艇蜂群式攻击，以及自杀式空袭。战役中，苏里高海峡打出了历史上最后一次“战列线对战”，萨马岛外海的“铁皮罐头”们打出了大卫对抗巨人歌利亚式的以少胜多之战，再

就是“神风”之战正式开场。这场持续了四天的“战役”实际上是由广泛分散在10万平方英里洋面上的多次相对独立的战斗组成的。其中四场战斗的规模大到可单独成为一场大战，它们分别是：锡布延海海战，苏里高海峡海战，恩加诺角海战，以及萨马岛海战。实际上莱特湾内并没有发生海战（空袭除外），因此这整场会战的名称并不恰当。美国海军起初称其为“第二次菲律宾海海战”，早期有些历史学者也用了这个称谓。但是麦克阿瑟更喜欢称其为“莱特湾海战”，因为这强调了他的滩头阵地是敌人分进合击的汇聚点，于是这个名称便流传了下来。（其实“菲律宾海战”的名称比上述两个称谓都要合适，但这个问题早就尘埃落定了，不必再纠结。）

这场战役宣告了太平洋海战的终结。鉴于旧日本海军在战役之前已经十分虚弱，他们在莱特湾的损失可谓是毁灭性的：4艘航母，3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日军飞机的损失在战役前数周里原本就十分惨重了，但日军又努力丢掉了差不多500架。清点损失的官兵人数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数字最终超过了1.2万人。日本舰队的残部挣扎着逃走了，但他们再也不会大规模出击了。交战双方都已预见到，随着美军在菲律宾站稳了脚跟，日军的南北海运线将不再畅通，这意味着日军幸存的重型战舰将由于燃油耗尽而动弹不得。小泽将军说，舰队的幸存者“完全成了摆设……水面舰艇再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有一些特殊舰艇除外”。[\[112\]](#)日本舰载航空队的少许残余力量都被部署到了陆地机场，剩下的飞行员和飞机大部分都被用作了“神风特攻队”。

盟军方面也有损失。美军损失了1艘轻型航母（“普林斯顿号”），2艘护航航母（“甘比尔湾号”和“圣洛号”），2艘驱逐舰和1艘驱护舰。其他许多军舰也受损严重，不得不送回马努斯、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大修。美军有1 500人战死或失踪，两倍于此的人受伤。相对于这场胜利的规模，这些损失倒不算过分，却也让胜利者备感苦涩。第3舰队和第7舰队之间的往来电报中也可以听出一种指责的意味。萨马岛外那场战斗近乎溃败，后来的海空救援行动又乱成一团，导致这次行动中“塔菲3”编队

的超过1 000名幸存者从日军舰队离开起在海里泡了几乎两天。由于误报位置，最初的救援行动覆盖区域过于偏南。迟至10月26日，一队步兵登陆艇才捞起700名“甘比尔湾号”的幸存者，之后又在次日上午找到了“约翰斯顿号”、“罗伯茨号”和“霍埃尔号”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他们的许多战友此时已经死于溺水、太阳暴晒或者鲨鱼之口。“约翰斯顿号”舰长埃文斯中校也在这由于救援长时间延误而阵亡的人员之中，他后来被迫授荣誉勋章。

胜利一方在获胜之初也是一副沮丧、痛苦和筋疲力尽的模样。赶到圣贝纳迪诺海峡却发现栗田已经逃走之后，哈尔西用无线电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海军已经被第3和第7舰队打败、赶走和粉碎了。”^[113]这虽是事实不假，却也不过是为了安抚疮疤而故意逞强罢了。10月26日午夜刚过，这位第3舰队司令就起草了一封长达480词的言辞激烈的电报为自己辩护，阐述了他率领整个舰队北上的决定并进行了辩解，这天上午，他把电报发给了金、尼米兹、麦克阿瑟和金凯德。他的慷慨陈词中有一些语句只能解释为极度精神疲劳和情绪过载的产物。“死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直到敌人水面舰队和航母发动协同攻击是幼稚的。”哈尔西写道。栗田的中路舰队已经于10月24日在锡布延海被他的航母舰载机空袭“打残”，而且“损伤严重，因此它不再对金凯德构成严重威胁”。至于退出恩加诺角的战斗，哈尔西抱怨道，自己失去了全歼敌人北路航母舰队的“黄金机会”。^[114]

这是哈尔西第一次对他在莱特湾的决定做事后解释。后来他将坚定不移地一直解释下去，直到1959年去世为止。对于在三天恶战之后匆匆写就的电文中的一些不当用词确实不应过于苛责。但是“幼稚”（childish）一词看起来尤为不妥，哈尔西的同僚们对此也议论纷纷。用战列舰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绝对不是“死守”，更不是“幼稚”，反而是主动和果断的表现。至于栗田舰队已在锡布延海被打残，无法威胁金凯德的想法，则已经被那天上午萨马岛外的战斗击得粉碎。失去“黄金机会”之说立场也不正确，它违背了美国海军“团队先于个人”的理

念，也意味着哈尔西有一种麦克阿瑟式的沽名钓誉。

作为历史上最近、最大，也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场海战，莱特湾海战的研究已经成了体系。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者自然各持看法，但创造性的新贡献却也年复一年层出不穷，围绕各项争议的激烈辩论更是从未停止过。哈尔西和栗田的两项争议性决定尤其如此——前者在10月24日夜带领他的整个舰队北上，后者则在10月25日上午放弃了进攻。关于这次战役的第一部重要史书的作者C.范·伍德沃德判断，“莱特湾这两次重大失误理应归因于一个美国急性子和日本的哈姆雷特”。[\[115\]](#)站在美国人的角度看，栗田掉头撤退的决定冥冥中弥补了哈尔西未能掩护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错误。就像代数方程中常见的那样，负负得正。

在上午9时25分放弃追击护航航母之后，栗田召集下属各舰重新编成轮形阵。此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时能见度仍然很低，无线电通信也时断时续，无休无止的空袭还不断落在中路舰队头上。舰队重新整队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在这期间，新的敌情报告和截获的无线电通信如潮水般涌来，加剧了这一片混乱。不停有报告说北方有另一支美军特混舰队，这令日本人觉得自己被包围了，但其实那个方向上并没有敌军出现。11时20分，栗田将航向转向西南，一度想要冲进莱特湾。半个小时后，瞭望哨报告说南面观察到一艘“宾夕法尼亚级”战列舰的桅杆和另外4艘只露出上层建筑的军舰，估计距离约39千米。这不可能是奥尔登多夫，他此时还在莱特湾南部，附近也没有其他任何战列舰——显然，这又是一次“幽灵船”事件。（栗田从“大和号”派出了一架水上飞机前去侦察，但显然被击落了。）下午1时13分，栗田再次改变主意，掉头向北，这一次他想要沿萨马岛海岸前进，希望找到另一支美军航母大队，他们是根据截获的金凯德的明语通信判断出那支舰队的存在的。于是中路舰队向北航行了几个小时，途中迎击了几轮美军空袭。栗田预计自己将在两个小时内接触敌特混舰队，但是桅顶的瞭望哨看遍了四周的海平线，都没有见到敌舰的影子。至此，他对燃料存量的担忧愈加深重。他

的燃料很快就将不足以回到科隆湾，甚至不足以机动规避美军空袭。如果还想撤就要趁现在，否则就永远别想了。晚6时30分，天色渐暗，他决定结束战斗，开往圣贝纳迪诺海峡。

栗田接到的命令很直接，没有任何不清楚之处：他要冲进莱特湾，攻击美军运输船队和滩头阵地。他被明确告知，即便冒着全灭的危险也要前进。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不这么做？这位将军及其部下给出的各种解释和辩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混乱和自相矛盾。他说他觉得对自己舰队的空袭愈加猛烈而有效，而且“在莱特湾的狭窄水域里我无法利用军舰所具有的机动性优势，而在能够发挥机动性优势的开阔水域，我在同样的攻击之下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16]他的通信组截获了美军呼叫空中支援的通话，因此他预计空袭将会更多更猛烈。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得到返航所需的足够燃油：“因此，燃油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考虑，是基础性的考虑。”^[117]栗田还补充说自己相信大部分美军两栖舰队可能已经离开海湾，“因此我考虑进入莱特湾也就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118]“大和号”还收到了一条奇怪的报告，称苏禄灯塔以北113英里处有一支美军特混舰队。栗田认为这是第3舰队的另一支航母大队，因此觉得最好是向这个目标前进，赶在对手向自己发动空袭之前将其置于自己的炮口之下。

西方关于此次战役的历史研究大多依赖战后对栗田及其高级参谋军官的审讯。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会同美国海军一起，审遍日军最高级将领，向他们仔细询问在莱特湾和其他战役中所做的历次主要决定。其结果对历史学者而言是无价之宝。然而，不难想见，并非所有的日本将领在面对审讯时都一样痛快。只要提到敏感或者可能对其不利的话题，闪躲、误导和直接说谎就是可以预期的了。这些高傲的人自然不乐意在征服者面前自曝家丑。1945年11月，在与栗田进行了长期的审问之后，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官形容这位将军“有某种程度的戒心，只用最简短的语句作答……有时候他回忆中关于诸如时间、航行位置之类的细节看起来并不准确”。^[119]

被要求解释他10月25日北上的决定时，他变得稍稍积极了一些。他给出了几项原因，但有些却相互矛盾。当被问及他向北转向是否为了躲避毁灭性空袭时，他答道：“这不是毁灭的问题，那并不重要。问题是在海湾里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在舰载机和岸基飞机的猛烈空袭之下，我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我自己做出决定，觉得最好北上和小泽将军会合。”但是和小泽会合从来都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主意，栗田很快又推翻了自己的话：“我主要的目的并非和小泽将军会合，而是北上找到敌人。如果我到了这里〔指海图上大约北纬13°20'位置〕还没有找到敌人，那我还会继续北上搜索敌人，并在夜晚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回去。”栗田的意思似乎是说，他想要随时将圣贝纳迪诺海峡的撤退之门保持在触手可及之处，但只有在最终未能找到敌人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撤退。但他还补充了一条解释，表明他一直想要在当晚撤离，因为“我若不在夜间进入海峡，第二天对我而言便是绝望的，那时我将会处于陆基飞机和〔哈尔西的〕舰队的攻击之下”。[\[120\]](#)

如果将中路舰队参谋长（小柳富次）和作战参谋（大谷藤之助）的审讯报告，以及宇垣将军的日记放在一起考察，就能将一连串不同寻常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解释这次向北转向的决定。小柳一个人就逐个列出了多达6条原因。（第一，他们追不上“塔菲3”的航母；第二，他们落后原定与西村协同进攻的时间计划太多；第三，他们根据金凯德的明语通信判断自己将遭到猛烈空袭；第四，他们不想在局促水域内遭到猛烈空袭；第五，他们想和北面的哈尔西舰队来一场决战；第六，他们燃油不足了。）[\[121\]](#)这是一幅碎片拼凑而成的场景，人们在巨大压力和多个相互影响因素的驱使下做出了决定。小柳和大谷都证实，北上的决定得到了参谋部的一致支持。宇垣则在日记中评论道：“在同一个舰桥上，我为他们缺乏战斗精神和策略而恼怒。”但是宇垣也相信北方的美军幽灵航母舰队是确实存在的，他甚至记录称自己看到了20°方位上“海平线之外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其实那个位置上并没有这样的航母舰队，因此宇垣记录的这个“幽灵舰队”只不过增加了这天上午“大和号”指挥舰桥上

的混乱和迷惑感而已。[\[122\]](#)

完整的真相或许永远都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很清楚：栗田太累了。自从三天前离开文莱起，他就完全没有睡过觉。他的旗舰“爱宕号”在巴拉望水道从下方被击沉，迫使这位55岁的中将跳海并游泳逃生。他的军舰遭到了一支舰队在海上所遭受过的有史以来最为持久的空袭，却完全没有本方空中掩护。面对美国人、记者和其他外人，栗田不愿承认疲劳在他停止进攻和撤退的决定中起过作用。但是在和同僚的私下谈话中，他就坦白多了。他告诉老资格的驱逐舰长原为一：“我犯这个错误，纯粹是因为身体疲劳。”[\[123\]](#)他的参谋们一定也很疲劳，因为他们和长官一起历尽磨难，而且没有反对这个决定。

栗田已经把一场压倒性胜利抓在了自己手中，却又让它从指缝中溜走。这一可怕的指挥失误根本不是事后列出的那些理由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的。有些人直接指责栗田胆怯，其他许多人虽未明说，却也是这个意思。起码可以确定，他确实已无心再战。“捷号”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舰队的反对。在文莱的指挥官会议上，反对声便已四起。攻击莱特湾内运输船和运兵船的计划冒犯了许多日军军官的敏感神经，他们长期以来的训练令其相信，军舰就是用来对付军舰的。其他一些人则责怪丰田将军只会下达命令，却没来亲自领军作战。当他们顶着无休止的空袭穿过锡布延海，上级承诺给他们的空中掩护却不见踪影时，“大和号”舰桥上的军官们便以近乎叛变的口吻咒骂着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愚蠢和呆板。栗田从战场上掉头撤退不是一次，而是两次，24日那次是暂时撤退，25日则是彻底撤退——在第一次撤退时，他的有些参谋军官便希望干脆就此退出战斗。而且，常常被人忽略的一点是，其他几位日军司令长官也曾不合时宜地撤退。小泽在10月24日下午一度向北返航，当时他的北路舰队刚刚被哈尔西的侦察机发现，后来还是应联合舰队司令部从日吉的地堡内发来的电报要求才继续南下的。志摩将军的舰队在草草齐射了一轮鱼雷之后，也在10月25日早晨匆匆逃出苏里高海峡。他电告丰田，他的撤退只是暂时的，但是美军飞机却一路追击他到马尼拉湾。颇

具武士精神的西村祥治比其他几位舰队司令更忠实地执行了他的海上“万岁冲锋”任务。但即便如此，他南路舰队的每一艘舰在意识到战斗已经输掉之后也都掉转了航向，至少是试图掉转航向。连西村自己的旗舰“山城号”也在试图独闯盟军舰队火力网失败之后，在最后一刻掉转了船头。

实际上，日军舰队里的官兵们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捷号”计划，因为它不具有切实的成功希望。他们明白，编写这份计划的参谋军官们根本没有真的指望他们能打赢，而只是想最后光荣地打一仗，保住日本海军的荣光。他们被要求奉上仍然强大的联合舰队作为祭品。但是日本海军在此方面和日本陆军是不一样的：它的文化、训练和传统中，都没有这种没有头脑的万岁冲锋的先例。海军航空兵虽然最终还是采纳了“神风”战术，却也是遭到各级官兵的反对而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才采取。这种战术会牺牲一些飞机和缺乏常规战术所需飞行技能和作战技能的新手飞行员。但是天皇的军舰都是些大件资产，最先进的武器，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国家象征，耗费巨额资金才建造起来并使用了几十年。人们从来没想过仅仅是为了虚无的荣誉就要把它们牺牲掉。

纵观日本海军的整个历史，他们总是想要打赢的。胜利才是首要目标，“光荣的死”只是一种附带的道德观而已。如果一艘军舰的宿命是在战场上沉没，那么人们希望它奋战到最后一刻。如果一个士兵的宿命是在战场上战死，那么人们希望他能心甘情愿地赴死，他的灵魂将在靖国神社永久安息。但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目标是胜利。然而此时，1944年10月，这个以胜利为名的“捷号”计划却颠倒了二者的优先顺序，堪称讽刺。东京的将军们已经预见到，一旦美军控制了菲律宾，舰队的燃油供应问题将会成为不治之症。一旦如此，舰队就会动弹不得，静坐在锚地里等待战争结束，或者在敌人雨点般的炸弹袭击中沉入港内。“捷号”计划的首要目的在于避免这种耻辱的结局，确保日本海军死得轰轰烈烈而不是悄无声息。如果还有可能打赢，那就更好了，不过无论双方实力多么悬殊，这场仗都必须打。

还有一点常常被研究莱特湾海战的西方史学者所忽视，这一部分是由于东京方面的作战命令和后续电报中的“言外之意”会在翻译成英语时丢掉，另一部分则是由于日本军官在战后接受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对此话题讳莫如深。但是真相仍然藏身于当时的一些资料和战后的当事人讲述中，吸引着历史学者们。栗田在文莱召集他的下属指挥官开会时说道：“你们全体必须记住，世上会有奇迹发生。”^[124]小柳在战后撰文指出，舰队要被迫航行几乎1 000英里才能到达战场，其间要穿越敌人潜艇出没的水域，以及被敌人飞机统治的天空。“这完全是一套绝望、鲁莽而且前所未见的计划，无视战争的基本规则，”他总结道，“我无法不把它理解为给栗田舰队的自杀命令。”^[125]

要解释栗田的含糊其词和撤退，与其说他是懦夫，不如说他的士气已经荡然无存。他和他的同僚军官比一般平民百姓更清楚，战争已经输掉了，高层只是想用成堆的谎言来掩盖这一事实而已。官兵们固然不能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此事，但沉重的失败情绪已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当这滑稽的“捷号”计划名称本身就暗示了整个国家的失败情绪时，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哈尔西至死不承认他在1944年10月24日夜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是错误的。无论对任何人，他都说他唯一的错误是在小泽的航母舰队几乎就要进入他大炮射程之内时掉头离去。卡尼和第3舰队司令部都站在他这边，但是显然所有航母大队和特混舰队司令都确信他们的指挥官错了，他们的议论很快传到了关岛、乌利西、马努斯、珍珠港，以及华盛顿。不仅如此，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即使是在“阴谋诡计部”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即将接掌一支特混大队的阿瑟·拉福德少将，刚刚来到太平洋前线就于11月17日前往“新泽西号”报到。他想找他的老朋友，海军学院同学“米克”卡尼聊聊最近的战事。“令我惊讶的是，”拉福德说，“一向多话的米克变得躲躲闪闪，哈尔西将军和他司令部里的其他几个人也是这样。这给我留下了明确的印象：他们不想谈论10月的那些日子。我明显

感到所有人都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但对于其原因却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126\]](#)

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常常只是由于运气不好，哈尔西错过了此前太平洋战争中所有的航母对决。1942年5月，他的“企业号”特混舰队由于被派往北面掩护杜立德对东京的空袭而未能赶上珊瑚海海战。次月他又患上皮肤病，被尼米兹勒令住院，因此错过了中途岛海战。（他信任的替补队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接过哈尔西的指挥棒，赢得了这场不朽的胜利。）1942年8月瓜岛登陆时，哈尔西还没有来到南太平洋，因而也就错过了当月晚些时候东所罗门海战中的航母会战。1942年10月的圣克鲁兹群岛海战发生时，他在新喀里多尼亚南太平洋战区的陆地司令部里。随后就是20个月的平静期，日军航母一直没有出现。当它们最终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海战中再次出战时，指挥第5舰队迎战的又是斯普鲁恩斯。

在南太平洋时，哈尔西被人戏称为“大笔刷子”（rough brush）——这个词本意指的是画家用画笔大笔猛扫，而非精雕细刻。他对精妙的战术安排不感兴趣，只是把部队集中起来砸向敌人，剩下的就交给运气了。他更著名的绰号“公牛”也是这个意思。自从1944年8月接掌第3舰队以来，他的夙愿就是摧毁敌人的航母特混舰队——并非只是迎战，或者击败，而是全歼它们，消灭干净，把所有残余的日军航母，连同所有的飞机和护航舰一起烧掉，打沉。他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尊奉霍拉肖·纳尔逊传统的混战派海军将领，纳尔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英格兰的敌人身上赢得了数次这种歼灭性胜利。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引用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的训示：“如果一个舰长率舰靠上敌舰，那他错也错不到哪儿去。”哈尔西还说：“如果说有什么海战理念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最好的防御是猛烈的进攻。”[\[127\]](#)

他的朋友斯普鲁恩斯在四个月前的马里亚纳海战中放跑了大部分日军舰队。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在6月18日夜间想要西进迎敌，以便在次日早晨到达攻击机群起飞位置。但斯普鲁恩斯由于担心敌人会

向塞班岛滩头发动决死突击而拒绝了。这一保守的决定遭到了海军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棕鞋族”（航空兵军官）的抨击，他们指责“黑鞋族”（非航空兵军官）斯普鲁恩斯根本不懂现代舰载航空兵的能力。这时候，哈尔西正在珍珠港准备接掌舰队。他和他的幕僚天天被航空兵们唠叨，他们求哈尔西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在第5舰队中职务和“米克”卡尼相同的“卡尔”穆尔相信哈尔西“正是那最初几天里围坐在一起指责斯普鲁恩斯的一群人中的一员。我想他的脑海里会冒出一个想法，他绝对不愿把他自己放到那样的位置上……现在我没有证据，我想卡尼会否认。而且哈尔西事后当然也会想方设法否认。但事实就是如此”。[\[128\]](#)

和往常一样，尼米兹放手让他的前线指挥官根据战场环境自由运用其部队。他的作战计划要求哈尔西“掩护和支援莱特湾—苏里高作战”。但同时作战计划又特别提出：“如果消灭大股敌军舰队的机会出现或者可以争取，则歼敌就是首要任务。”[\[129\]](#)如此，这两句话之间就出现了关键的模棱两可之意。日军的战场策略中常常出现欺骗、佯攻和引诱。在此前的几场海战中，包括马里亚纳海战之前的全部四场航母对决，日军都是兵分多路，分进合击。如果多支“大股敌军舰队”从不同方向开过来，正如莱特湾出现的这样，该怎么办？此时应该冲出去追击敌人，消灭敌舰队一部，还是严守对第7舰队和滩头阵地的“掩护和支援”？这只能由哈尔西来判断。

“消灭大股敌军舰队”这句话也是老生常谈了：自从1943年11月攻打吉尔伯特群岛的“电流”行动以来，历次两栖作战的战斗命令中都有类似的指示。毕竟，命令就是命令，而且将摧毁敌舰队视为“首要任务”的要求似乎也为哈尔西的进攻心态提供了理由。面临着堪比四个月前的马里亚纳海战的两难处境，哈尔西的本能就是将命令中的优先顺序对调。斯普鲁恩斯拒绝冒险让滩头遭到敌人决死突击，即便这意味着放跑敌人航母。哈尔西则拒绝放跑敌人航母，而宁愿冒险让滩头遭到敌人决死突击。

当小泽的北路舰队出现在恩加诺角外海时，哈尔西面临着一场赌注

巨大的赌博。总的来说，他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留在原地，可以兵分两路，也可以带全军北上歼敌。他放弃了第一个选项，没有把他的全部舰队留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这没问题：他想要在敌人航母和吕宋岛机场建立联系并对自己“穿梭轰炸”之前击沉它们。但是他拒绝第二个选项（留下第34特混舰队守卫圣贝纳迪诺海峡），选择第三个选项（带着所有舰艇北上，让海峡门户洞开）的理由却显然无法说服任何人，只有区区几个参与决策的死忠派除外。第3舰队战报给出的理由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其中称，率领整个舰队北上“保持了蓝军〔指美军〕攻击舰队的完整性，最能够出其不意并消灭敌航母舰队”。^[130]说这个决定保持了“舰队的完整性”固然没错，这使得舰队一直都集中在一起，成为一个不拆分的整体，但这只是对这个决定的复述，而没有进行解释或论证。这只是文字游戏掩饰的车轱辘话而已。舰队集中使用原本是马汉理论的正统，在哈尔西这一代将领的军校时代是至高无上的。但到了1944年，无线电、雷达以及航空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集中舰队的旧规则已经像帆船那样过时了。

没有任何硬性要求迫使哈尔西集中他全部65艘舰去对付北面只有19艘军舰的日本航母舰队，但是守卫海峡却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他完全没有必要二选一，因为他的实力足以同时对付栗田和小泽还绰绰有余。他的战报将北路舰队称为“强大的新威胁”，值得第3舰队全力应对。它刚刚加入战场，尚未遭到打击，而中路舰队却已经在空袭中遭受了惨重损失。但是，日军航母部队已经由于失去了最顶尖的飞行员而大为削弱，这一因素即便在莱特湾海战之前就已经在美军航空兵和情报圈里广为人知。“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军的舰载航空兵已经很少，”杜鲁门·赫丁说，他之前是第58特混舰队参谋长，此时在尼米兹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供职，“实际上已经不值一提……我们任何一支航母特混大队都能制服他们。”^[131]赫丁的判断得到了当时和战后诸多其他权威人士的证实。

关于中路舰队，哈尔西认为它“已经遭到重创，不再可能获得决定

性胜利.....由于鱼雷打击、炸弹打击、上层建筑损毁、火灾和人员伤亡，其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132\]](#)但是这个结论仅仅是基于当天第38特混舰队参加锡布延海空袭并返航的飞行员们的报告。三年的战争早已表明，这种声明基本上都是夸大的，常常夸大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各特混大队司令都对哈尔西居然敢对这种报告的准确性下那么大的赌注感到惊奇，尤其是在巡逻机后来确认中路舰队已再次开往圣贝纳迪诺海峡，而且海峡中的导航灯都已点亮的情况下。关于这一点，哈尔西亲自执笔为自己辩护，或者也可能用的是文书的打字机。他觉得率领他的整个庞大舰队北上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宁愿冒险让栗田的战列舰找到莱特湾中的运输船：

日本鬼子的顽固人所共知，第3舰队司令也已意识到敌中路舰队穿过圣贝纳迪诺海峡进攻莱特湾内船队的可能性，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但第3舰队司令确信中路舰队已经遭到重创，不再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最后，计算显示，第3舰队能够及时赶回来，扭转敌中路舰队所可能获得的任何优势。.....这是个艰难的决定，做出决定之后，第3舰队司令也一直密切关注那里的情况，直到他收到敌中路舰队在第7舰队护航航母编队的英勇奋战下放弃进攻的消息为止。[\[133\]](#)

毫不意外地，麦克阿瑟将军看待此事的观点截然不同。没人知道他是否看过第3舰队战报中的字句，但他对这一场景的想法是这样的：

如果海军掩护部队放过任何一支强大的日军舰队闯进莱特湾，整个菲律宾进攻作战都将被置于岌岌可危之境.....这将是灾难性的一幕.....如果敌人进入了莱特湾，他们强大的舰炮将会消灭海域中任何一艘鸡蛋壳般脆弱的运输船，摧毁滩头上那些急需的补给物资。海滩上数以千计的美军士兵将会被包围，并被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敌人火力压在地上，陷入绝境。这样，其结果将不仅仅是补充

援军的时间表被彻底推翻，就连进攻能否获胜都难以预期。……现在我别无可为，只能巩固阵地，坚守防线，静待即将到来的海战的结局。[\[134\]](#)

如果栗田再坚决一些，这样一场灾难或许就会完完全全成为现实。但其长远后果却未必如麦克阿瑟预言的这般严重——鉴于日军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的实力，怎么看美军的进攻都是很难失败的。但若真的如此，恶劣影响还是会一路传回华盛顿。太平洋上的每一个记者都会盯着这件事，麦克阿瑟的审查机构也会让他们把话都说出来。即便有新闻审查，这些事实还是会迅速扩散到全国的报社里，各种报道也会在总统竞选最为胶着的最后两个星期里爆发出来——在这场竞选中，挑战者已经开始批评当权者将太平洋战场一分为二的做法。在国会山，关于太平洋上指挥不统一的负面声音已经层出不穷，立法者们也将会为此安排听证。哈尔西和海军将理所应当为这场灾难担责。麦克阿瑟一直想要统一指挥太平洋战场，而其运输船队差点遭到屠杀必然会成为头号论据。参联会也将不得不在公众的强烈关注之下重新审视这一永远也吵不完的话题。

哈尔西将自己与金凯德之间的误会归结于不恰当的指挥架构，当时只是私下说，战后便是公开说。战役之后一个星期，他给尼米兹写了一封称呼他为“我亲爱的切斯特”的私信，信中说：“我们不能用一支海军的观点来评判两位彼此独立的战场舰队指挥官。在海战中协调永远替代不了指挥，让第7舰队与太平洋舰队联合作战却又相互分离，独立行动，这就一定会导致混乱，甚至是灾难。”[\[135\]](#)

尼米兹对这些说法不置可否，至少没人见过他的答复。但人们可以想见他是什么看法。哈尔西在10月24日所犯的各种错误都无法直接归咎于指挥架构问题。哈尔西在18个月的南太平洋战区司令任期里常常和麦克阿瑟斗来斗去，他肯定知道太平洋战场统一指挥所面临的障碍。情况和1942年4月金和马歇尔议定“双战区”指挥系统的时候如出一辙。如果

将麦克阿瑟置于任何一位海军将领的麾下，他就会辞职，反之，海军将领们也不愿从属于麦克阿瑟，觉得他不够格去指挥太平洋舰队。这一双重指挥体系或许并不理想，也会浪费资源，但它却平稳运行了两年半，而且看上去仍然可以为陆海军之间的僵局提供一个“最不坏”的解决方案。哈尔西是四星上将，高级指挥官，这意味着他背负着关照海军军种利益，能够长袖善舞，妥善处理与其他军种和战区的竞争关系，并且不犯政治错误的期望。然而当哈尔西在莱特湾所犯的高层错误曝光时——他几乎毁掉了将太平洋舰队交给美国海军来掌管的社会共识，而太平洋舰队正是海军自己皇冠上的钻石。

当然，这样的危机最终并未出现，栗田的撤退使这场灾难得以避免。第7舰队中自然有一些对哈尔西不满的声音，就连第3舰队中也有——但这些牢骚很快就被对盟军这次历史性胜利的大张旗鼓的庆贺淹没了。10月26日，麦克阿瑟发布了一份胜利公报。福莱斯特部长决意让海军也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上占得一席之地，于是他公开了哈尔西这天早些时候的电报，就是宣称日军舰队已经被“第3和第7舰队打败、赶走和粉碎了”的那一封。[\[136\]](#)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大声宣读了哈尔西的电报，于是这份电报第二天便出现在了数百份美国报纸上。在美国人民眼中，哈尔西的形象比以往更加高大了。

没人想在这种时候搞出一点负面舆论来破坏这一片大好的氛围。金凯德删除了他战报中所有直接批评哈尔西的内容。当尼米兹的一位下属起草了一份对哈尔西的决定持批评态度的报告时，尼米兹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淡化此事”。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当周的一次会议上，几位军官贬损了哈尔西的表现，麦克阿瑟打断了他们：“够了。别烦公牛了。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位得力的海上战将。”[\[137\]](#)

许多人觉得哈尔西之所以能保住自己的职位，是因为他的声望和人气对海军很有价值。尼米兹和金的通信，及其后来的访谈和著作中都找不到关于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迄今所知，福莱斯特部长、莱希上将和参联会的任何其他人都没说过这种话。然而，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莱

特湾海战及其后一段时间恰逢福莱斯特大力改善海军的公共关系之时。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哈尔西猛打猛冲的个性和他“杀死更多的日本鬼”的口号在各种媒体文章和新闻短片中广为流传。在1945年2月华盛顿的一次媒体会上，哈尔西夸口说第3舰队从“野蛮猿人”手里夺取了对海洋的控制。他还说：“我们打下他们的飞机，把他们烧死，淹死。烧死他们和淹死他们一样痛快。”[\[138\]](#)

哈尔西在他的同僚和上级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口碑，这些人对1942年时的灾难和急迫态势至今记忆犹新。在那个时候，哈尔西的无所畏惧和振奋人心的领导力看似鲁莽，却赢得了成功。他为自己赢得了犯错的权利。解除他的指挥权只会引起人们对莱特湾几近灾难的关注，海军并不希望如此。而且，谁能取代他呢？具有必需的年资并且能够胜任这一职务的四星上将除了他也没别人了。米彻尔固然可以提拔上来，但他此时急需长时间休息，而且接替他的人（约翰·麦凯恩）还没有完全上手。金和尼米兹显然讨论过解除哈尔西职务的可能性，至少是一度讨论过，但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两套班子轮换的指挥体系，也就是哈尔西和斯普鲁恩斯每隔几个月轮流上岗的做法，将会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而且，最终得到第五颗将星的还是哈尔西（而不是斯普鲁恩斯）。

关于莱特湾海战指挥的争议到了战后烽烟再起，再次成了一个漫长而且扯不清的话题。哈尔西永远没法让自己承认日本人是故意把他引诱到北边，而小泽北路舰队的航空母舰不过是个诱饵而已。在美国人找到“捷号”计划的原文并翻译出来，甚至小泽、栗田、丰田和其他人在战后向美军审讯人员供述了全部真相之后，哈尔西依旧自顾自地抵赖。小泽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日军航母的角色是被严格限制的：“诱饵，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的主要考虑就是引诱你们的舰队向北，我们已准备好遭到全歼。”[\[139\]](#)在取得这一重要发现超过6年后，哈尔西仍然表示自己不明白小泽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没能好好打一仗。在一篇刊登在《海军学院学报》的文章中，他写道：“这次战斗中的一件怪

事是，空战一直没能打起来。我们的攻击机看到敌人航母的甲板上只有区区几架飞机，空中也只有15架。”[\[140\]](#)

在他辉煌海军生涯的后期，适当的谦逊会对哈尔西大有益处。他是个海军五星上将，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四位海军五星上将之一，这个职位令他直到临终前都得以享受现役待遇，发全薪，拥有专用办公室，享受住宅津贴，配有专车和司机。他还靠着出售回忆录和巡回演讲而发了财。在公司董事会的职务又让他挣了一大笔钱。20世纪50年代，“公牛”哈尔西俨然成了一个拥趸无数的大明星，常常在电视上露脸。他原本应当对历史学者们的结论泰然处之。即便承认在莱特湾所犯的错误，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实际上，这甚至可能会令他的传奇更加高尚而不是受损。他大可把他曾私下承认过的事情公开说出来——他觉得更应该让斯普鲁恩斯来指挥莱特湾海战，他自己则去指挥马里亚纳海战。[\[141\]](#)然而，直到1959年离世，这位骄傲的老五星上将仍然在徒劳地对抗历史学界的定论。

战争期间，他一直拿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当朋友。然而，1950年，莫里森在一次向海军军官的讲话中，称哈尔西弃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的决定是个“大错”。哈尔西通过小道消息听说了此事，怒气冲冲地给莫里森写信对质。于是这位历史学者同意以后再也不用“大错”这个词了，但观点仍然不变。他告诉哈尔西，在此后的演讲中，他会把这个词换成“误判”。由于对这个答复不满意，这位将军便将莫里森称为“高水平的马后炮”。[\[142\]](#)

之后一切便平静了下来，直到1958年，当时莫里森的美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系列著作的第12卷《莱特湾》出版面世。书中，莫里森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论，称哈尔西落入了日本人引诱他北上的陷阱，他正是萨马岛海战几近惨败的主要责任人。愤怒的老将军想要召集他的第3舰队旧部发起反击。“我的想法是狠狠收拾这个狗娘养的，找他的麻烦，”他在写给“阴谋诡计部”一名下属的信中写道，“我想要你们和我一起。”[\[143\]](#)有人答应了哈尔西，但是“米克”卡尼（他后来晋升到了海军

的最高职务，海军作战部长）却给这个计划泼了一盆冷水。卡尼警告道，莫里森的声望是无法撼动的，“你们的攻击无论多么公正，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你们更可能反受其害”。^[144]他建议哈尔西不如发表一份反驳海军历史处的声明完事。

这位老将军显然采纳了自己前参谋长的建议。但是几个月后，他的黑名单上又多出了一个顶级历史学者。海军学院教授E.B.波特请求哈尔西阅读他即将面世的新书的书稿。哈尔西不喜欢书中关于莱特湾海战的讲述，于是恼怒甚至充满威胁地答复道：“我不打算让严重歪曲我的想法的表述写进一本准备用来教育学员的书，我不想找你麻烦。”^[145]

在哈尔西最后的年月里，“公牛”这个绰号已广为流传。哈尔西并不太喜欢这个绰号，即便这是1942年时被爱戴他的媒体安在他头上的。但他在努美阿司令部和第3舰队司令部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不喜欢。麦克阿瑟肯定也不知道，因为他凡提到哈尔西必用这个绰号，甚至当面这么称呼他。哈尔西将军也听之任之，可能是由于麦克阿瑟的称呼中满怀尊敬和爱戴。然而现在，晚年的哈尔西却拒绝回应这个“虚假而夸大其词”的绰号。^[146]他告诉一个朋友：“只有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才会称我为‘公牛’。”^[147]

哈尔西拒绝这个绰号并不令人意外。这个绰号显然有两面含义，而且这一点愈加明显。人们尊重公牛是因为其体量、力量和勇猛，而不是因为它的战术敏锐性。公牛顽固、不讲理、莽撞。它行动时不顾及周围，狂怒而猛烈，“就像等待进入斗牛场的公牛”。其他猛兽在狭小的空间里都会施展不开，但它不同，它是全世界所有瓷器店主最害怕的动物。所有哺乳动物都会在地上排便，唯独公牛粪便（bullshit）在美国俚语里有一席之地，意指“废话、说谎或者自吹自擂”。

公牛冲向斗牛士的斗篷，却没有看到他手中的长剑。公牛看见一片红色，便挺起牛角冲了上去，自信能够轻松干掉这个不起眼的对手。但最终，往往是公牛血淋淋的尸体被拖出斗牛场，斗牛士则在万众欢呼之

下昂首离开。

-
- [1] Tomoo Tanaka quoted in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47.
- [2] Yasuo Kato quoted in *Ibid.*, p.47.
- [3] Shigeru Nishino quoted in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16.
- [4] Bob Clarkin quoted in Sears, “Wooden Boats at War: Surigao Strait,” *World War II Magazine*, Vol.28, Issue No.5, February 2014.
- [5] “Lone PT Attacked Japanese Fleet,”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44.
- [6]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
- [7] Bates,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2.
- [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 [9]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58.
- [10] Bates,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8.
- [11] *Ibid.*, p.395.
- [1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Nav 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 [13]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85.
- [14] *Ibid.*, p.186.
- [15] *Ibid.*, p.188.
- [16] Smoot quoted in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Leyte*, p.228.
- [17]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Serial 0538, November 1, 1944.Comments by Captain Herbert V.Wiley.
- [18]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enver*,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0].
- [19] James L.Holloway 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24, No.5, October 2010.

- [20]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194.
- [21]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aly*,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4].
- [22]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12.
- [2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No.79, USSBS No.390, Commander Shigeru Nishino, IJN, November 18, 1945.
- [24] Ibid.
- [25] Action Report, USS *West Virginia*, “Action in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s 25 October 1944.”
- [26] Bates,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October 1944*, 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329.
- [27] Prados, *Storm Over Leyte*, p.25.
- [28]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27.
- [2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40.
- [30] Comments by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Denver*, “Battle Experienc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2,” U.S.Navy Department, March 1, 1945, p.[78—20].
- [31] Tully,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p.239.
- [32]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38.
- [33] James L.Holloway 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24, No.5, October 2010.
- [3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41, USSBS No.170, Commander Tonosuke Otani, IJN, Operations Officer on the Staf of C—in—C Second Fleet.
- [35]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9.
- [36]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p.40.
- [37]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p.154—55.
- [38]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7.
- [39] *Yamato* action report,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21.
- [40]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p.40.
- [41] *White Plains* (CVE—66) action report,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29.
- [42] Ibid., p.31.

[43] Ibid., p.35.

[44] 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p.7.

[45] Ibid., p.9.

[46] Captain Sugiura of the *Haguro*, quoted in 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57.

[4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253.

[48] Robert C.Hagen,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and Got It,”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accessed August 14, 2018, http://www.bosamar.com/pages/hagen_story.

[49] Ibid.

[50] 哈根认为他的军舰是被“金刚级”战列舰14英寸炮的齐射击中的。大部分著作都支持这一观点，将这一组命中算给了“金刚号”。但是罗伯特·伦德格伦根据自己对日军战报的分析，以及“大和号”日志中关于其在7时25分给予一艘巡洋舰致命一击的记录，令人信服地提出，是“大和号”打出了这一轮齐射。（Lundgren, *The World Wonder’d*, pp.69–74.）1944年时，美军尚不知道“大和号”装有18英寸炮，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种武器存在。如果哈根知道，他或许会觉得碾过这只小狗的不是大卡车，而是火车。——作者注

[51] Ibid.

[52]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p.40.

[53] CTF 77 to COM3RDFLT, October 24,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54]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55]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entry.

[56] Weil quoted in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48.

[57]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p.275—76.

[58] Ibid., p.276.

[5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36, USSBS No.150, Captain Toshikazu Ohmae, IJN.

[60]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entry.

[61] CTF 77 to COM3RDFLT, CTF 3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62]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63] Solberg, *Decision and Dissent*, p.152.

[64] CTF 77 to COM3RDFLT, CTF 3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65] COM3RDFLT to CTG 38.1, in Ibid.

[6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p.2246—47.

[67] CTF 77 to COM3rdFLT, in *Ibid.*, p.2247.

[68] COM3rdFLT to CTG 38.1 info ALL TFC'S AND TGC'S 3rd Fleet, CTF 77, Com7thF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7.

[69] CTF 77 to COM3RDFL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46.

[70] F广播时间表（Fox Broadcast schedule），一种接收方无须反馈的无线电发送模式。——译者注

[71]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p.2—3.

[72] COM3RDFLT to CTF 77,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73] James Fife,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2, No.452, p.400.根据哈尔西1952年5月发表在《海军学院学报》上的文章，金凯德在10点用明语发出无线电：“李在哪里。派李过来。”这一绝望的恳求被频繁引用，但在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灰皮书中没有出现这条信息，而且由于哈尔西的文章对其他电文也有措辞上的变动，因此这条电文应该不是一字不差的还原。

[74] Lieutenant John Marshall quoted in Wukovits, *Admiral "Bull" Halsey*, p.196.

[75] Joseph J.Clark, oral history, p.501.

[76] 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4.

[77] 掷马蹄铁比赛是西方军队中流行的一种游戏，比赛双方把特制的马蹄铁投掷到指定距离外的桩子上，与套圈类似，马蹄铁套住桩子更多的一方为胜。——译者注

[78] Chester W.Nimitz, "Some Thoughts to Live By."

[79] 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3.

[80]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COMINCH, CTF 77,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奥斯汀称电文是他口述给一名文书军士的，赫丁则表示他看到谢尔曼亲笔写下此电文。Bernard Austin, oral history, p.514;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p.97—98.

[81] Potter and Nimitz, eds., *The Great Sea War*, pp.389—90n.

[82]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3.福克斯的上级军官伦纳德·道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确认了细节。Leonard J.Dow, RADM, U.S.Navy (ret.) to E.B.Potter, January 6, 1959."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8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20.

[84] Drury and Clavin, *Halsey's Typhoon*, p.49.

- [85] Thomas, *Sea of Thunder*, p.300.
- [86] Charles M.Fox Jr., oral history, March 17, 1970, in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p.4.
- [87] Halsey to E.B.Potter, December 12,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Halsey Papers.
- [88] 在哈尔西的回忆录中，他声称自己“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知道真相”。他指的可能是他直到12月下旬尼米兹访问舰队时，才得到对方关于自己无意冒犯的亲口保证。Halsey and Bryant,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20.——作者注
- [89] Potter, *Nimitz*, p.593.（尼米兹对作者所说的话引自其第20章的出处注释。）
- [90] Potter, *Bull Halsey*, p.304.
- [91] COM3RDFLT to CTF 77 Info COM7THFLT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 [92]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 [93] Commanding officer, U.S.S.*Hoel*, “Combined Action Report and Report of Loss of U.S.S.Hoel(DD 533) on 25 October, 1944.”
- [94]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3.
- [95]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 [96] Ibid.
- [97]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495.
- [98] Report by Glenn H.Parki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 <http://ussjohnston—hoel.com/6253.html>.
- [99]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155.
- [100] Ibid., p.156.
- [101] Robert M.Deal, personal account, USS *Johnston* Veterans Association pamphlet, p.70.
- [102] “Action Report—surface engagement of Samar, P.I., 25 October 1944,” USS *Johnston*, DD557/A16—3, Serial 04, November 14, 1944, submitted by “Senior Surviving Officer.”
- [103] Robert C.Hagen,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and Got It.”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 [104] Tadashi Okuno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published in Gibney, ed., *Senso*, pp.136—37.
- [10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06]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68.

[107] Sprague,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p.40.

[108] CTF 77 to COM3RDFLT, etc., 250146 and 250231,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0.

[10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09.

[110]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October 25, 1944.

[111] Ibid.

[11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113]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October 25, 1944 (25122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114] COM3RDFLT to CINCPAC, 26 October 1944 (251317).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4, “CINCPOA Dispatches, October 1944.”

[115] C.Vann Woodward quoted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232.

[116]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17] Ibid.

[118] Ibid.

[119] Interrogator’s notes in Ibid.

[120]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 USSBS No.47, Vice Admiral Takeo Kurita.

[12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35, USSBS No.149, Rear Admiral Tomiji Koyanagi, IJN.

[122] Ibid; Nav No.41, USSBS No.170, Commander Tonosuke Otani, IJN; Matome Ugaki diary, October 25, 1944, Ugaki, *Fading Victory*, pp.496—97.

[123] Hara,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56.

[124]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p.100.

[125] Koyanagi,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377.

[126] 拉福德后来在1953—1957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0.

- [1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28.
- [128] Charles J.Moore, oral history, p.1032.
- [129]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2, *Leyte*, p.58.
- [130]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5;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 [131]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1.
- [132] Third Fleet action report, Serial 0088, October 23—26, 1944, pp.4—5, Halsey Papers, Box 35, "Action Reports, Third Fleet, October 23—26, 1944," LCMD.
- [133] Ibid.
- [134]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p.227—28.
- [135] Halsey to Nimitz, November 4, 1944, LCMD, Halsey Papers, Box 15.
- [136]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October 25, 1944 (25122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 [137] Merrill, *A Sailor's Admiral*, p.169.
- [138] "Admiral Halsey Reports," British Pathé newsreel archive, URN: 74239, Film ID: 2121.
- [139]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55, USSBS No.227, Vice Admiral Jisaburo Ozawa, IJN.
- [140] Halsey,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May 1952, Vol.78/5/591.
- [141] "Statement to the author, April 9, 1953," in Taylor,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p.265.
- [142] Letters between Halsey and Morison, and Halsey and Ralph E.Wilson, January—February 1951,in Halsey Papers, "Correspondence Files."
- [143] Halsey to officers, November 14,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 [144] Carney to Halsey, November 14, 1958, "Leyte,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1958—1959," Halsey Papers.
- [145] Halsey to Prof.E.B.Potter, July 27, 1959,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Halsey's comments,"Halsey Papers.
- [146] Halsey and Bryant, *Admiral Halsey's Story*, Author's Foreword, p.1.
- [147] Halsey to Charlie Belknap, March 24, 1949, Halsey Papers, Box 7.

第七章

在战后美国海军学会发表的一篇获奖论文中，J.C.小威利上校提出，日本是被一系列“推进式”和“累积式”相结合的联合战略击败的。其中的“推进式”指的是一路西进的两栖进攻，这一连串战斗和登陆作战让盟军部队一步步逼近了日本。它体现在地图上那些代表陆海军部队进占地盘的小箭头上。这更适合传统的以时间为顺序的讲述方法。这样即便是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或教育的门外汉也能凭本能理解这一点。对于那些一直在报纸上关注战争进展或者读过第一阶段战争历史的人而言，这一系列战役组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完整**历史。

根据威利的说法，累积式作战策略截然不同，它并不包括攻占地盘和大规模激战，而是一种“积累不易察觉的微小战果，积小胜为大胜，直到未知的某一时刻，这大量精心策划的战斗将改变战局”。^[1]其基本逻辑是，“千刀杀一人”。在太平洋上，正是这种累积式作战逐步蚕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其中一个例子是宣传战，或曰“心理战”，其针对的是遭到日本侵略的各国人民，日本民众，日军官兵，最终就连东京的高层决策圈也会受到影响。另一项累积式作战是战略轰炸。从1944年11月开始，美军对日本的核心工业区展开了持续的空中轰炸，以图重创其主要的战争工业。最终，这种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城市。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军还运用其空中和海上力量（尤其是潜艇）打击了日本与海外占领区之间的航运线，这样的作战行动逐步卡住了日军战争潜力的咽喉。到1945年，除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路进攻大军“推进式”占领了许多地盘之外，日本的经济也已财竭力尽，濒于崩溃。

和其他工业国家相比，日本无法实现原材料自给，和二战其他主要参战国相比更是如此。日本本土的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原油、铁矿石、铝土矿和其他重要矿藏的储量几近于零，只有少量木材和低等级煤炭。自从明治时代开始寻求成为亚洲的领头羊之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旨便是确保能够稳定可靠地获取这些必不可少的资源。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贸易足以满足需要，保护和维系此类贸易的需求便主导了日本的外交。然而到了30年代，日本进入了所谓“幽谷”时期，军国主义者把持了国家，他们决意夺占海外原材料产地并实施殖民统治，以向自己的工业经济和战争机器输入这些必需的物质。

1931年日本侵占了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其钢铁厂由此得到了稳定的铁矿石和无烟煤供应。但日本的原油、橡胶、铝土矿、铜、锌，以及其他钢铁和有色金属的进口却仍然要完全依赖东南亚的美国和欧洲殖民地，别无可选。日本最重要的物资供应国——美国、英国和荷兰——一致反对纳粹德国，即便如此，东京还是在1940年9月和柏林、罗马方面共同组成了轴心国，这一鲁莽的决定直接引发了对日本的贸易制裁。1940年之前，美国供应了日本74%的废旧金属进口，93%的铜进口，最关键的是还供应了大约80%的原油进口。1940年，罗斯福政府开始针对上述物资和其他一些物资实施对日禁运，而且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和严格程度还在不断增加。到1941年8月时，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原油阀门被彻底关闭了。日本没有其他的石油来源，不得不开始消耗原本就十分有限而且还越来越少的国内储备。当东条内阁走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不归路时，石油危机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加严重。

开战之初，日本人将解决资源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向南方的盟国殖民地发动闪电进攻上。到1942年4月，也就是袭击珍珠港之后仅仅4个月，侵略者已经开始利用马来亚、东印度、菲律宾和其他各地的丰富资源了。最重要的是，日本占领了曾经分别是荷兰、英国殖民地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这里拥有当地产量最大的油田和石油精炼厂。

但是还有一个毋庸置疑的难题：抢来的油田距离日本本土还很远。

这些维系日本经济的血液需要流过一条长达3 000英里的漫长而脆弱的海上大动脉。一旦这条动脉受损，日本的战争机器就会迅速失血，如此，战败就将不可避免。东京对这一威胁心知肚明，即便在这个国家鲁莽地踏进无法打赢的战争之前就知道，但是它的统治集团却自我麻醉式地相信自己能守住海运线足够长的时间，直至获得胜利。可即便如此，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时间并不充裕。日本的商船队已经拼了老命，使用率几近于100%。1938年末时，日本商船队中只有0.3%的船只处于空闲状态，作为对比，同期英国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是3%和10%。^[2]需要船运的地方很多，除了进口原材料，向海外的部队、舰队和基地输送补给也需要船运。不仅如此，日本国土中可耕地只占3%，需要进口粮食以避免饥荒。即便是对于日本国内的运输系统而言，船运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国家的铁路系统总的来说承载能力不强，无法重载，其大部分工业贸易都是经由近岸船只在港口之间进行的。

20世纪30年代后期大力造船之后，日本商船队（主要由吨位500吨以上的钢质船舶组成）的总吨位增长到了大约600万吨。其中约410万吨被陆海两军征用，只有190万吨作为民用和工业用途。^[3]内阁计划委员会坚持认为，要维持日本经济正常运转，至少要有300万吨船舶作为民用，但陆海两军却拒绝让出所需的船只。日本政府预计战争第一年的船只损失将在80万到110万吨之间，随后两年的每年损失将降至70万～80万吨。战时新建船只预期能够弥补这些损失，至少是部分弥补。实际上日本战时的造船成果十分惊人，每年新下水的货船从1941年的23.8万吨增长到1944年的160万吨。但是被击沉的数量却远远高于预期，战争期间日本每年的船舶吨位净减都十分严重。^[4]

日本陆军和海军毫不重视彼此间的协作，和民间船运的协作就更是无从谈起。军用运输船运载着部队、武器和补给物资前往海外基地，之后装一些压舱物（等于是空船）就回来了。实际上若能把这些船只派到附近的港口，装上一些物资再返程，船运效率就会大大提升。但日本政府却没有这样的控制权来要求相互竞争的陆海两军如此配合。

如果说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容易受到航空兵和潜艇的攻击，那么它的城市和工业区在战略空袭面前则是毫无防备。日本的工业基地都是新兴的，仅仅用了三四十年就从零起步建设了起来。官方和资本联手协作，创立了一套以军工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经济，其中最优先发展的是钢铁、造船、汽车、飞机、坦克和机床制造业。其成果十分惊人，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就在袭击珍珠港一年之前的1940年，日本重工业产值在12年时间里增长了5倍。日本经济总量的17%都被用于军工生产，作为对比，美国经济中的军工占比只有2.6%。^[5]1941年之后，军工生产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迅速增长，到1944年时已接近50%。到了这一阶段，日本的民众已经多多少少陷入了贫困，其经济中剩余的非军工份额只剩下了农业和食品生产。如此，其战争工业便不再有增长空间，经济体系中所有的剩余空间都已被挤占干净。战争期间，日本工厂的开工率近乎100%，只有其生产线由于必需原材料短缺而不得不停下来时例外。况且，工业依赖于大量技艺精熟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补充的。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大型工厂中，它们的物资供应相对落后。例如，维持整个日本经济所需的大部分钢铁生产都集中在6所主要钢铁厂中，盟军对它们的位置一清二楚。这样，只要对钢铁厂本身或者为其服务的运输设施进行少数几次有效的轰炸，日本的钢铁供应就会被切断。由于没有后备产能可供应急，这种轰炸的影响将很快蔓延至整个日本经济中。

因此，显而易见，从海上和空中对日本的商船和战争工业进行打击将会对日本的战争能力造成釜底抽薪的影响，甚至予以致命打击。但是在这样一场宏大而且复杂的战争中，盟军怎样才能平衡彼此矛盾的各项任务之间的优先级？太平洋战争各个阶段的任务实际上都受到“推进式”和“累积式”之争（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的话）的影响。地面战场和海上战场的盟军指挥官都会本能地优先考虑眼前的战术问题，而对针对敌人经济的长远“累积式”作战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美国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都将“丸”——日本的商船与货轮——视为次要目标，或者只是“安慰奖”。战区指挥官们倾向于将航空兵投入眼前的焦点战场，对于

向远在天边的敌人本土进行的没有明确目标的战略轰炸，他们同样怀疑其价值。潜艇的角色和任务则很杂乱，常常缺乏明确的战略依据：直到1943年后期，它们才得以专心投入消灭日本商船的作战。

1944年8月，当哈尔西将军接掌第3舰队时，他和他的“阴谋诡计部”就提出要对太平洋舰队潜艇的运用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他们将此称为“动物园计划”。“米克”卡尼和“罗洛”威尔逊制定了具体细节。他们将菲律宾、台湾岛、琉球群岛周边海域划分为24个区域，各用一种动物名称命名（所以叫“动物园”）。潜艇狼群将被部署在每个区域里的航线上，奉命在一场大规模海战之后拦截并击沉日军军舰。卡尼后来解释道：无论预计中的海战的结果如何，日军舰队在战斗之后总要“退出战场加油并返回基地，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闯进我方潜艇在其撤退路线上布下的天罗地网”。^[6]

在1944年9月28日写给尼米兹的一封信里——此时距离莱特湾海战打响不足一个月——哈尔西提出了“动物园”方案。他首先承认了击沉敌人商船的价值，同时却提出，“当敌人舰队出击时，太平洋上的所有武器都要拿来对付他们”。^[7]哈尔西提出要把潜艇部队交由自己直接指挥，至少在即将到来的海上大秀之前如此安排，这样他们将能够更好地与第3舰队协同作战。

在对此提案“深思熟虑”之后，尼米兹拒绝了。在10月8日发出的一封信写给“亲爱的比尔”的信中，他委婉地反驳了他的这位好友。只要机会出现，潜艇就应当攻击敌人军舰，他说，但它们的首要任务将始终是破坏商船。尼米兹和他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查尔斯·A.洛克伍德中将将继续对这些潜艇进行直接战术指挥。他要哈尔西“接受我的决定，因为这是对所有相关因素充分考虑之后的结果，其所依据的情报比你能获得的更加丰富，而且其背后是我更为广泛的职责”。^[8]

然而讽刺的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尼米兹在一项关于新型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相似争议中却站到了另一边。这些轰炸机正在被

大批部署至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上，下个月就要开始对日本进行轰炸了。这种巨型波音飞机的重量和航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能够携带1万磅有效载荷，作战半径远达1 600英里。以阿诺德将军为首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众将领决意要将所有“超级堡垒”轰炸机全部用于对日本战略轰炸作战。但是两位战区指挥官却对这些新型轰炸机的用途另有想法，关于如何将这大家伙用于战术目的的想法也层出不穷。尼米兹的司令部对它们远程侦察、搜索救援，以及在濑户内海布雷的能力很感兴趣。麦克阿瑟则希望把所有的B-29都派到他的西南太平洋战区，他警告乔治·马歇尔，“将这些未经实战检验的飞机一开始就部署到马里亚纳群岛，会使得它们在第一次参战时就处于最困难的条件之下”。^[9]

但是“福将”阿诺德没有搭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他成功说服参联会的其他成员创建了一个新的独立航空兵部队，第20航空队，专司对日本本土列岛进行战略轰炸。和其他任何航空兵部队不同，第20航空队将由参联会从华盛顿直接指挥。作战命令将由阿诺德作为各位参谋长的“代表”下达至部队。航空队将下辖两个轰炸机司令部，第20和第21轰炸机司令部，其基地分别设在中印战区和马里亚纳群岛。虽然第21轰炸机司令部设在尼米兹的战区里，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对它却完全没有指挥权，只有紧急情况下除外。阿诺德将军坚持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指挥架构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确保“超级堡垒”轰炸机专注于执行其首要任务，打击日本的工业目标。

尼米兹获悉此事后很不高兴。绰号“负鼠”的海伍德·S.汉塞尔准将是马里亚纳群岛第一支B-29部队的指挥官，他在1944年10月5日拜访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尼米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这种安排十分反对……这是对指挥体系的一种破坏。”但是既然参联会已经如此决定了，他也无可奈何，他保证会尽最大努力支援汉塞尔：“我将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你所有的帮助和协同。衷心祝你成功。”^[10]

没有记录能显示尼米兹是否注意到他拒绝哈尔西的“动物园计划”和这件事其实是一回事，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三天后拒绝了这一计划。尼

米兹没有把潜艇部队交给哈尔西，以确保他们能执行切断日本海运线的“累积式”任务。参联会也没有把B-29部队交给尼米兹，以确保他们能执行轰炸日本本土的“累积式”任务。

除了个别特殊情况之外，潜艇部队一直都游离于公众的视线之外。媒体对他们的报道非常少，战争初期尤为如此。潜艇部队“沉默军种”的称号不是白来的：潜艇战士们天生嘴严，即便是在海军其他部门的战友们面前也是如此。他们在珍珠港的基地看起来很神秘，甚至有些诡异。流线型的低矮潜艇通体漆黑，隐藏在东部海湾中手指般细长的堤道之后，从外面只能看见一丛丛伸出来的指挥塔外壳。在堤道背后的海军造船厂里，坐落着一座平凡无奇的三层混凝土办公楼。只有一块低调的门牌说明了这里的身份：“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部”（ComSubPac）。

1943年2月7日小鲨鱼级潜艇“刺鲅号”返回珍珠港，这可以算是少有的几次例外之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有些人决定要让潜艇部队在公众面前露露脸了。“刺鲅号”在护航舰艇的护卫下驶入了港口水道，潜望镜筒上刷头朝上绑着一支扫帚和一条长长的飘带，飘带上写着“打死挂太阳旗的浑蛋”。数百人拥挤在码头旁，其中有战争通讯员、摄影师、新闻电影摄制组。当“刺鲅号”靠上泊位时，军乐队奏起了音乐。随即一个人都戴着金穗徽章的高级军官代表团通过跳板登上了潜艇，后面跟着一组已经获准拍照和采访艇员的记者。那些习惯于保密的“刺鲅号”水兵见到这一幕，一个个目瞪口呆。有人在日记里兴高采烈地写道：“我在后发动机舱里拍了一张照片。那是要登上《时代》杂志的。”^[11]

这次突如其来的公共宣传是由于“刺鲅号”刚刚结束并引起了轰动的第三次战斗巡逻，这艘潜艇在此次巡逻中击沉了5艘船，总吨位达3.2万吨。（前文提到的扫帚象征着“扫清敌人”。）在古怪而富有进攻精神的艇长“大舌头”达德利·W.莫顿的指挥下，“刺鲅号”证明了潜艇可以承担先前被认为不可承受的风险，昼间可以长时间停留在水面上，夜间可以在水面上发动攻击而毫发无损，即便在面对日本护航舰艇时也是如此。

莫顿和他信赖的副艇长理查德·奥凯恩一起，探索出了一套新的接近并攻击目标的流程。奥凯恩被指定为“副接敌官”，在整个鱼雷攻击过程中负责所有的潜望镜观察事务，这样莫顿就被解放出来，得以思考其他所有地方来的信息并做出决策。“刺鲅号”此番战斗巡逻中最光彩照人的一击是在新几内亚的韦瓦克港，它在那里以一次前所未见的鱼雷攻击“一剑封喉”，打跑了一艘冲过来的日本驱逐舰。当被问及在紧张战斗中有什么感受时，莫顿答道：“你说我为什么要派奥凯恩看着它〔敌人驱逐舰〕呢？他是我认识的最勇敢的人。”[\[12\]](#)

莫顿是个高大壮硕，天不怕地不怕，有些狂妄的肯塔基州人，口音也是那里的口音，他会穿着一件不怎么雅观的红色浴袍在艇上走来走去，时常心血来潮，和措手不及的艇员们来一场摔跤。他常常会在巡逻报告中写一些和潜艇工作基本没关系的小提议。他对敌人的态度可谓残暴无情。莫顿似乎是将击沉所有还浮着的日本舰船视为他自己的使命，屠杀日本水手时也没什么负罪感。他属于在和平年代的海军中完全混不下去的那类人——但是在战时的压力之下，他海盗式的作风和敢于冒险的战术使他成了明星。

“刺鲅号”的第三次巡逻只有24天，是有记录可查的最短的潜艇战斗巡逻之一（不过原因很简单，它打完了鱼雷，只能返航）。潜艇战斗巡逻的间隔通常为两个星期，其间所有艇员——军官和水兵都一样——都会在夏威夷皇家大酒店和怀基基海滩的女王酒店享受一段奢华的休息与娱乐。不过既然这次“刺鲅号”那么快就回来了，洛克伍德将军决定让他们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

潜艇则从头到尾进行了一番大修。它被送进干船坞，船底的寄生生物被刮除，重新油漆了一遍；艇体内部被彻底打扫干净，装满补给物资，填入新的鱼雷。它的4英寸甲板炮被挪到了前部甲板上，后部甲板加装了第三门20mm机炮。所有美军潜艇都进行了改装，加强了甲板炮的火力，因为经验已经证明“上浮击沉”战术战果颇丰。

2月17日，艇员们再度上艇，一个代表团也来到码头送行，“刺鲅

号”已经做好了再度出海的准备。它的引擎开始空转，水兵们解开缆索，把它抛掷到码头上。潜艇以半节航速缓缓驶入水道，发动机排出的蓝色废气环绕在艇体周围。在一名引水员的协助下，它驶出了拥挤的港区，在中午前不久穿过了珍珠港狭长的入口水道。

“刺鲅号”的第四次巡逻将进入美国潜艇从未到过的水域——东海和黄海，距离中国和朝鲜海岸很近。莫顿主动申请这个任务，洛克伍德便给了他。莫顿对这片水域很熟悉，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时曾到过那里。这里有全世界最繁忙的一些航线，包括青岛、大连、黄河入海口和下关海峡（濑户内海的西部入口，两侧分别是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航线。莫顿告诉奥凯恩和艇员们，“刺鲅号”这次将要去往一片“处女地”，他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巡逻中“杀个痛快”。^[13]

潜艇日复一日地在阴冷的灰色海面上颠簸穿行。除了每日例行的下潜训练之外，它一直在海面上航行，从没有遇到过一艘巡逻艇或者一架巡逻机。“刺鲅号”在中途岛短暂停留加油，在那里，它运上了一箱子改进版莫洛托夫燃烧弹，这是守岛陆战队送的礼物。（他们认为一旦和敌人的舢板或者其他小艇近距离遭遇，这些武器就会派上用场。）进入三月第一个星期之后，它把航速降到了单引擎驱动的水平以节约燃油。

3月10日上午，高位观察的潜望镜看到了九州岛南方屋久岛上崎岖的绿色山峦。“南西诸岛”中的许多其他岛屿也纷纷映入眼帘，其中有些岛上的火山或其他地标清楚地标明了自己的身份。11日夜，“刺鲅号”驶过了穿越“南西诸岛”的主要水道吐噶喇海峡。第二天破晓前，它做好战斗准备，进入了东海，也就是指定的巡逻海域。

在随后的几天里，“刺鲅号”白天潜在水下，沿着台湾岛和九州岛之间的航运线猎杀高价值目标。这一海域满是“小鱼”——小渔船、中式帆船以及500吨以下的拖网渔船，这些船常常在夜间亮着灯，以表明自己不是军用船只。艇长和副艇长轮流值守潜望镜，并时不时为某个目标是否值得用一枚鱼雷而争论一番。3月13日，他们向一艘大型拖网渔船射出了艇上24枚鱼雷中的第一枚。但是鱼雷却从目标尾部驶过，未能命

中。莫顿可不想再浪费一枚鱼雷，他预计在北方会有更大的猎物等着自己，想把弹药留到那里。在接下来的4天里，“刺鲀号”从数百只舢板近旁经过，艇员们于是将这片海域戏称为“舢板窝”。3月17日，巡逻报告中写道，“刺鲀号”“很难躲开所有的中式帆船和拖网渔船而不被看到”。[\[14\]](#)

它继续向北，来到了交通繁忙的黄海水域——这是太平洋岸边的浅水海区，三面分别被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环绕。持续的北风将来自北极圈的寒流带到了这里，夜间在指挥塔上执勤瞭望的人都要裹上厚厚的羊毛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他们能在月光下看到自己呼出的雾气，要不停地跺脚拍手取暖，他们的皮肤和脸被吹得泛红、皴裂，执勤不了多长时间就需要由其他艇员接替。

莫顿战前就在这片水域执行过任务，研究过海图和情报。他预计可以在青岛、大连和长崎、下关之间的航线上找到大量的目标，他的判断是对的。从3月19日到25日，在5天的愉快猎杀中，“刺鲀号”击沉了5艘2000吨以上的货船。新型的铝末混合炸药战斗部具有可怕的能量：他们看到有几个目标被命中时爆炸解体。碎片被炸飞到空中数百英尺高，残余的船体常常不到两分钟便会沉没。他们常常能看见幸存者趴在残骸上。由于水温只有零上几度，这些幸存者很难活下来。但是莫顿已经决心不留下任何目击者去“告发我们”。[\[15\]](#)3月21日，在山东半岛外击沉货轮“日通丸”之后，莫顿下令：浮上水面，甲板炮就位。他指挥潜艇撞翻了一只救生艇，把艇上的幸存者们掀翻到了海里，随后一门20mm炮迅速打死了水里的人。“刺鲀号”的一名水兵在日记中写道：“‘日通丸’连同它所有的货物和船员就此沉底了，其他鬼子海军不久后也将统统如此。”[\[16\]](#)

“刺鲀号”在黄海打出的所有鱼雷中有约1/3没能正常生效。这是太平洋战争头两年中的常见问题——美国鱼雷要么偏离航线，要么从目标下方穿过，要么命中敌人船体但不爆炸，或者提前爆炸，或者沉入水中，甚至转一圈回来冲向母艇。3月25日拂晓，部分由于莫顿对鱼雷失灵感

到失望，“刺鲎号”浮上水面，用艇上的4英寸甲板炮干掉了一艘小型货轮。莫顿很喜欢如此使用他的甲板炮，它们当然比鱼雷可靠得多：但大家都觉得这种武器对于1 500吨的潜艇来说有点太大了，而且它的炮口暴风也会给潜艇的上层结构带来重创。一名水兵记得看见过一块甲板在火炮射击时被震了下来。但无论如何，这门炮还是把那艘2 500吨的货轮彻底打成了碎片，直到它沉入海面。“刺鲎号”的有些艇员还跑去嘲笑那些趴在船只残骸上的幸存的日本水手，朝他们喊“So Solly !”。[\[17\]](#)
[\[18\]](#)

“刺鲎号”的巡逻报告描述了这场战斗：“从来没人见过一艘潜艇于曙光初露时，在平静的海面上和清爽的天气中，用3门20mm炮和1门4英寸炮打一场水面战，从没见过.....真的很精彩。”[\[19\]](#)

此时东方已经天光放亮，“刺鲎号”继续航行，又摧毁了一艘货轮和几艘小一些的船只。随后“刺鲎号”加速退向南边并潜入水下，跟踪了一艘7 000吨的海军辅助船，向它射出了3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命中了船首附近，重创目标但没有当场击沉。[\[20\]](#)莫顿也没有将它计入击沉记录，但战后调查显示，这艘船确实在向北逃走后沉没了。

“刺鲎号”的横冲直撞给东京敲响了警钟。日本大本营认定是有美军的潜艇狼群正在黄海活动。于是巡逻艇纷纷开往最近有船只被击沉的位置，侦察机也开始在上空往来巡逻。莫顿虽然强硬，却不是不要命的牛仔。奥凯恩就发出了理性的声音，说这次巡逻本身就很危险，要谨慎行事。黄海实际上是覆盖着海水的大陆架，太浅，无法进行深潜规避机动，而深潜规避机动正是潜艇对抗深水炸弹攻击的最佳自卫手段。莫顿将这一海域称为“小水潭”，他的巡逻报告写道：“我们不得不小心控制下潜角度，防止扎进海底。”[\[21\]](#)随处可见的舢板和中式帆船中，有些可能是军用巡逻船，能看见有些船上装有大型的雷达阵列和无线电天线，普通渔船上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上浮攻击的战术在有条件实施时十分有效，而且迄今一直都很有效——但是任何一艘看似无害的拖网渔船，说不定都装有一门藏在油布下的甲板炮，而只消一枚中口径炮弹直接命

中，可能就足以摧毁一艘潜艇。

一枚故障或者哑火的鱼雷射出去后常常只会暴露潜艇的位置。3月25日早些时候，“刺鲅号”击沉了几艘敌船，到了下午，一艘日本驱逐舰直冲着它开了过来。此时双方舰首朝向的角度对“刺鲅号”比较有利，它完全可以机动到有利位置上向对手发动一次理想的鱼雷攻击。它左舷还剩下两枚鱼雷。两个月前在韦瓦克，它曾经以一次大胆的“一剑封喉”鱼雷攻击打中了敌人一艘驱逐舰。这一回，莫顿和奥凯恩一致同意安全第一。“刺鲅号”快速下潜至150英尺深度以规避深水炸弹。驱逐舰很快开到了深弹射程之外，显然没有发现这里还有艘潜艇。据巡逻报告记载，“刺鲅号”“没敢用仅有的两枚鱼雷挑战这个家伙，根据最近的经验，这些鱼雷可能会提前爆炸。我们不得不躲进壳里溜走，这很有辱尊严”。[\[22\]](#)

次日，进一步往南行驶的“刺鲅号”向一艘装载着煤炭，可能正开往九州炼钢厂的4 000吨的货轮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击中了船体中部，货轮在一声雷鸣般的巨响中爆炸了，掀起的煤灰变成了一朵蘑菇云，令空气几分钟内都无法呼吸。“刺鲅号”继续向南航行，溜到通往南方区域的主航线上，3月28日，它向一艘货轮放出了最后一枚鱼雷。那艘货轮两分钟内就沉没了。

所有鱼雷打光后，莫顿命令“刺鲅号”浮出水面。它再度杀回“舢板窝”，用甲板炮在小船面前耀武扬威。3月27日上午，“刺鲅号”击沉了一艘装有大型雷达天线的拖网渔船，莫顿怀疑那是一艘日军巡逻艇。果不其然，当敌船开始下沉时，船上的三门甲板炮露了出来。潜艇上的20mm机炮已炮管过热，水兵们不得不把成桶的海水泼上去降温。一名艇员发现炮身已经滚烫到水一浇到炮管上就会蒸发掉。一支潜水员组成的“突击队”登上正在下沉的敌船残骸寻找敌人文件，却空手而归。最后，他们用几枚中途岛上海军陆战队送的莫洛托夫燃烧弹结果了这条船。

当晚，“刺鲅号”退往吐噶喇海峡，艇员们在收听东京广播电台时听

见有发言人宣称没有美国潜艇胆敢接近日本水域，都乐了。

“刺鲅号”的第四次战斗巡逻再次大获全胜。在黄海上的19天里，这艘常常在水面航行的潜艇击沉了9艘轮船、1艘拖网渔船和2条捕鱼舢板。它深入了日本人先前认为安全的水域，充分利用了突袭的优势。莫顿称自己击沉了8艘轮船，上级就给他记录了8艘战绩，直到战后统计时，他的战绩才增加到9艘，这就令此次出击成了单次击沉敌船数量最多的一次潜艇战斗巡逻。在黄海上的这次大打出手令莫顿坐稳了太平洋潜艇部队MVP（最有价值选手）的位置。

尽管“刺鲅号”拿到了一张可怕的成绩单，但艇上至少有6枚鱼雷失灵，占艇上鱼雷总数的1/4。3月24日，它由于鱼雷故障放跑了一艘大型油轮，这尤其令人恼火。莫顿向这个高价值目标射出了4枚鱼雷，却居然无一奏效。两枚提前爆炸，第三枚被那两次不合时宜的爆炸炸得偏离了航向，第四枚则开始“海豚跳”——时而深潜，时而浮出水面，像一道正弦波——然后偏离航线狂奔而去。莫顿就这个问题向洛克伍德将军大发牢骚，洛克伍德对他的话毫不怀疑。到1943年夏季，他确信Mk14蒸汽鱼雷是不合格的武器，并为了这个问题在华盛顿找了不少麻烦。6月24日，他获得尼米兹的许可，拆下了所有鱼雷上的磁性起爆器，等候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同一周，洛克伍德告诉金上将，鱼雷故障可能致使他的太平洋潜艇部队在头18个月战争中的战果下降了至少50%。

海军军械局对此的反应慢到令人愤慨，也令问题雪上加霜，正是军械局设计和制造了Mk14鱼雷。这种武器在战前根本就没有好好测试过，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经费不足的原因。设在罗得岛州纽波特的海军鱼雷站里，某些有分量的军官和工程师看起来是把所有关于这种武器的抱怨视作针对自己个人的了，他们坚持认为所有的故障都要归因于操作不当，以及珍珠港和潜艇自身对鱼雷维护不佳。面对如此答复，潜艇官兵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巡逻时更加“宝贝”这些武器，只在最佳状况下发射。许多潜艇甚至开始关闭鱼雷管保护盖，直到发射前片刻才打开保护盖把鱼雷装进去，这样鱼雷就不会过早暴露在含盐的海水中。

但是故障依旧。故障的原因很多，而且一个原因可能会掩盖其他原因，这就令它们更难以被找到和纠正。许多故障都和“磁性”起爆器相关，这一装置的作用是通过探测目标船的磁场来引爆鱼雷战斗部。这项技术在当时十分先进，是战前美国最高机密武器计划的产物之一。其设计目的是应对当时在大部分重型战舰上常见的舰体“突出部”。（“突出部”是在舰体水线上下凸出来的双层船壳，当传统鱼雷在其表面爆炸时，它就可以保护内层船壳。）它的思路是让鱼雷冲到舰船下方，直接在龙骨下爆炸。这样爆炸的力量就会直接向上打击敌船无防护的底部，对目标的损害将会严重得多。但是这种磁性引信在战斗中常常失效，这就导致哑弹或者提前爆炸的比例很高。最终人们发现，设计人员忽略了世界不同区域磁场的变化，这一技术还需要根据经纬度进行微调才能使用。

人们还发现，Mk14鱼雷的实际航行深度会比设置深度深10英尺或11英尺。这个问题不难纠正，却直到1942年6月才最终被发现，此时已经开战6个月，超过800枚这样的鱼雷在战斗中被发射了出去。不仅如此，尽管抱怨不断，但这个问题却不是由军械局发现的——是洛克伍德本人亲自发现的，当时他是西澳大利亚潜艇部队司令，他在乔治王湾里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结果显示，这种武器航行时平均比设置深度深11英尺。起初军械局坚称洛克伍德的测试未经授权，结果不准确。直到两个月后，金上将在军械局的“屁股下烧了一把火”，他们才（根据在纽波特进行的测试）承认Mk14鱼雷确实航行偏深，其机械装置在战前测试不足。

然而，第三个问题却被其他缺陷遮蔽了超过一年。Mk14鱼雷的触发引信，也就是磁性引信的传统版本，其撞针过于脆弱，常常在撞击时破碎，无法引爆战斗部。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洛克伍德命令拆除大部分潜艇上鱼雷的磁性引信才被发现。当时很快就有报告称鱼雷以理想的90°角直接撞上目标船的船体，结果却弹开了，没有爆炸。最惨痛的一次是在1943年7月24日，当时丹·达斯皮特艇长指挥的潜艇“黑鲔鱼号”在帕劳群岛西部攻击了一艘日本货轮。“黑鲔鱼号”在近距离几近完美的条

件下连续发射了11枚鱼雷。达斯皮特通过潜望镜观察战果，谁知这些鱼雷竟然一枚接一枚地命中敌船，随后沉没不见。其中一枚鱼雷从船体上弹开，像鱼儿咬了钩一般跃出海面，接着又像鱼儿脱了钩一样掉进水里消失了。此时艇上只剩下了一枚鱼雷，达斯皮特放弃了击沉目标的努力，他要把这最后一枚鱼雷带回珍珠港仔细检查。

洛克伍德一年前在澳大利亚做测试时就干了军械局的活儿，现在他故技重演，在珍珠港做了一系列测试。触发引信故障的原因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把撞针换成更坚固的铝合金材质就行了。“此事最终打垮了鱼雷官僚们，”当时在潜艇部队担任军官的爱德华·比奇说，“他们现在终于愿意承认，在实验室里多消耗几枚鱼雷，比在更重要的实战中浪费掉它们要好得多。”^[23]

1943年9月，太平洋潜艇部队被告知Mk14鱼雷最终“修好了”，累计统计数字也显示，在随后几个月里鱼雷的实战表现越来越好。然而，关于鱼雷失灵的报告却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消失过。最恐怖的失灵现象是“环航”，一旦鱼雷的舵面被卡住，它就会全副武装掉过头来向发射自己的潜艇扑过去。有几艘美军潜艇就体验了这种可怕的故障，靠深潜或者在水面上剧烈机动才擦着边躲过一劫。明确知道的就有两艘潜艇这样被自己的鱼雷摧毁，这是因为艇员中有人幸存下来说出了真相。可以想见，还有其他潜艇也同样由此被击沉，只是无人幸存而已，对此，后人只能猜测。

西屋公司的下一代Mk18电动鱼雷恰好在此时的1943年秋季进入部队，这种鱼雷不会拖出易被发现的气泡或废气尾流。这一新型武器也被送到纽波特的海军鱼雷站进行试验和测试——然而一名潜艇部队军官却发现，“纽波特这伙人”不肯配合。设计并制造了Mk14鱼雷的纽波特鱼雷站的工程师们将西屋公司的这一新产品视作来抢饭碗的，十分仇视。戈特岛（纽波特港口中的一个小岛，是鱼雷站的所在地）被“非我发明综合征”^[24]控制了。在纽波特监督这些试验的“黑鲛号”潜艇军官们对自己得到的对待备感失望。“说他们蓄意破坏可能太重了，”“黑鲛号”副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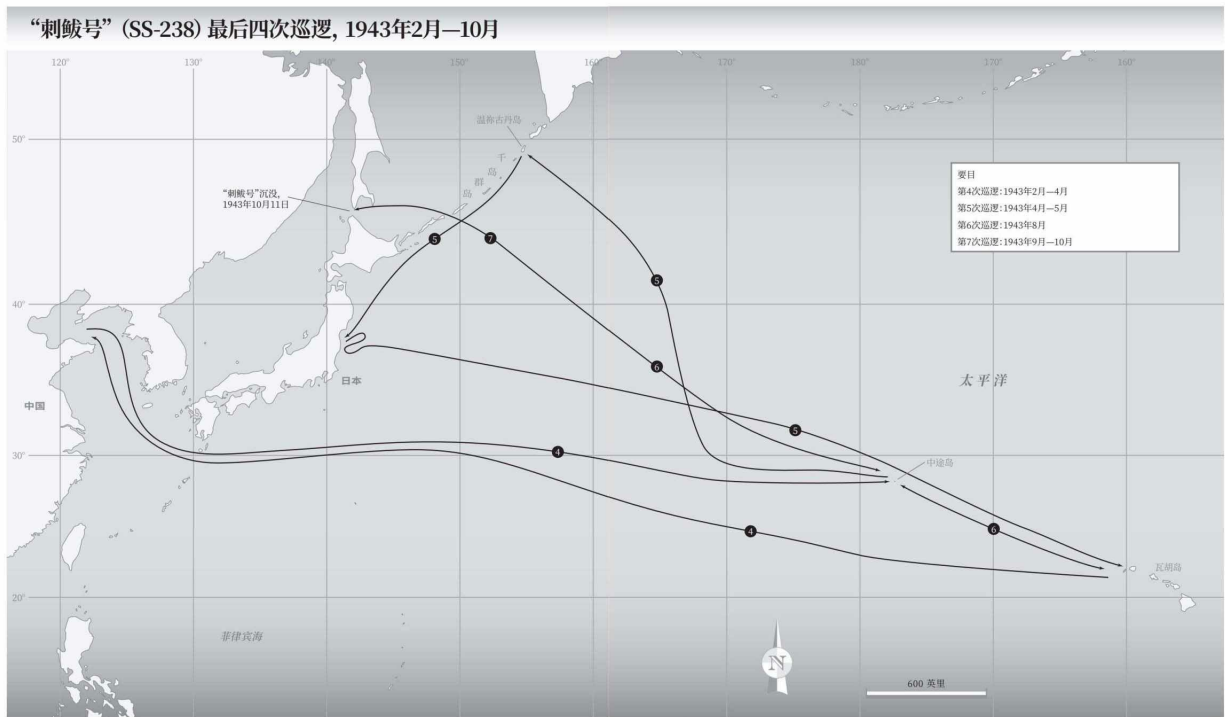
长伊莱·赖克如是说，“但他们确实一点忙都不肯帮。”^[25]赖克在珍珠港告诉洛克伍德的副手：“我觉得这些人根本没有战争意识。”^[26]

1943年5月21日，“刺鲅号”结束了第五次战斗巡逻后返回，此番它去到了高纬度上冰天雪地的日本千岛群岛。它击沉了3艘敌船，考虑到这次任务的实际情况，这个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莫顿告诉洛克伍德，如果鱼雷都能正常工作的话，自己原本可以击沉6艘。“刺鲅号”此时已经急需大修，于是它奉命返回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雷岛，也就是这艘艇18个月前诞生的地方。迪克·奥凯恩晋升了，现在他要去指挥自己的潜艇，一艘白鱼级潜艇，名为“刺尾鱼号”。这艘潜艇此时尚未建成，它也是在马雷岛建造的，只要从“刺鲅号”的泊位沿着河边走一小段路就到了。“刺尾鱼号”将于1943年8月下水，奥凯恩和骨干艇员们将监督它最后阶段的建造和舾装。与此同时，“刺鲅号”基本相当于重建了，当它在1943年7月启程开往珍珠港时，其外观已经完全变了样。莫顿带领着几位新的军官和大部分都是新人的艇员登上了“刺鲅号”。当它在7月21日驶入纳帕河时，艇长和自己的好友、老搭档副艇长挥手道别。这是二人的最后一面。

莫顿这一次想要带领“刺鲅号”前往日本海，这片海域位于日本和亚洲大陆日占区之间，几乎完全被陆地包围。洛克伍德答应了自己这位明星艇长的请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太平洋水下战争的“最后一程”；这是唯一一处美军潜艇尚未渗入的重要海域。这里满是往来于日本本土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船只。但由于地形封闭，日本人此前还没有在这里采取什么特别的反潜措施。如果说黄海是美国潜艇的“处女地”，那么日本海简直就是日本不容侵犯的圣地。

出入日本海只有三条通道：位于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本州岛和北海道岛之间的津轻海峡，以及北海道和库页岛之间的拉彼鲁兹海峡（又称为宗谷海峡）。这三处水道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咽喉要地。所有水道都布设了水雷，有岸炮把守，并且有反潜巡逻艇和巡逻机密集巡

逻辑。闯入这里很危险，逃出更难——一旦日本人发现日本海中有敌人潜艇，他们在几个出口处的反潜措施就会加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之后，洛克伍德和莫顿一致认为拉彼鲁兹海峡是进出日本海的最好选择。



1943年8月14日,“刺鲀号”开进了拉彼鲁兹海峡。它趁着夜色以大约18节航速从水面开了进去。日本雷达发现了它,一座灯塔向它打出了身份识别信号,但它无法应答,因为不知道口令。但是还没等日本人做出反应,它就溜了过去,如同鬼影一般消失在了日本海上。

和预期的一样,这片海域中满是高价值船只,莫顿兴奋地准备再一次大展拳脚。但是它的鱼雷坑了它。在8月15日到22日之间的一个星期里,“刺鲀号”找到并攻击了12艘货轮,却经常碰到哑弹、航线过深、提前爆炸以及偏航失踪的问题。莫顿于是决定尽快返回珍珠港,要求上级重视此问题。在这次半途而废的短暂巡逻的报告中,莫顿引用了历史上一句著名的海军口号,这是由美国内战时的海军将领戴维·法拉格特喊出来的:“该死的鱼雷!”放在此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

8月28日,得到洛克伍德返回基地的许可之后,“刺鲀号”浮上水面,向一艘日本舢板的前方开火令其停航。但日本船没有停,于是“刺鲀号”用甲板炮把它打成了碎片。6名日本渔民投降,被带上艇当了俘虏。这些人都得到了干净的干衣服和一杯白兰地,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们被关押在后部鱼雷舱里,睡在甲板上的垫子上。“刺

鲛号”艇员和这些俘虏的关系还不错，甚至可以说很友好。俘虏们给艇员们展示了自己的厨艺，还自告奋勇承担了日常清扫工作。[\[27\]](#)

回到珍珠港，“刺鲛号”迅速进行了物资补充。莫顿想要立刻重返日本海，洛克伍德同意了。另一艘潜艇“锯鳐号”将与它同行。“刺鲛号”此次装上了新型Mk18鱼雷。9月10日，两艘潜艇开向了大海。

当天早晨，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的一次有记录的新闻简报会上，莫顿花了不少时间，大方地接受了采访。在通讯稿中，他乐观而无拘无束的性格跃然纸上。上午11时50分，他结束了采访，解释说自己的艇下午1点就要出发了。莫顿向记者们保证，下一次战斗巡逻结束后，自己将会再次坐下来接受采访——“等他回来后，”记者在通讯稿末尾写道，“我们就会听到更多关于‘刺鲛号’的冒险故事了。”[\[28\]](#)

然而，马什·莫顿再也没有回到珍珠港，“刺鲛号”后来的故事也不会再有人知道了。它的第七次战斗出航成了最后一次，如潜艇兵们所言，它将要“永远巡航”。

借助日方资料和专业人员的估测，我们可以重现“刺鲛号”最后一次战斗巡逻的部分情况。当天下午，它和“锯鳐号”结伴离开了珍珠港。两天后，它开进中途岛加满燃油，随后继续航行7天，回到了拉彼鲁兹海峡。“刺鲛号”再一次趁夜（可能还是在水面上）通过了这里，“锯鳐号”两天后也随之进入。莫顿说过，他想要前往日本海南部海盆猎杀船只，也就是在下关海峡的西部入口，濑户内海的西大门附近。10月5日，东京的日本同盟通讯社报道，一艘“汽船”当天被美国潜艇击沉，544人遇难。而这一水域里只有一艘美军潜艇，那就是“刺鲛号”。同盟社没有说明这艘船是军用还是民用，也没有说清死掉的这些人是军人还是平民。战后发现的记录显示，被击沉的是8 000吨级的客轮“昆仑丸”，它已被日本陆军征用为运兵船。它的沉没促使日本人取消了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夜间航渡。

战后的分析显示，“刺鲛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又摧毁了另3艘1 000

吨以上的敌船。它们被击沉的地点在当天只有“刺鲅号”能够到达。

“锯鳐号”在10月9日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离开了日本海，比“刺鲅号”的预定返回日期早了两天。它的艇长发现日军的反潜措施大大加强了；“锯鳐号”遭到了多艘巡逻艇和一架飞机的追杀。它下潜到200英尺深度，一连潜伏了数个小时，仅仅依靠回声测距来控制深度。日军投下了几枚炸弹和深水炸弹，但距离潜艇都很远。它在下潜状态下穿过了海峡，次日上午安全脱险。

两天后的夜里，“刺鲅号”遭到了北海道岛北端岸炮的射击，可能为一枚近失弹所伤。它快速下潜，但还是没来得及躲过一架在附近盘旋的大凑航空队的水上飞机，这架飞机向“刺鲅号”所在位置投下了3枚深水炸弹。巡逻艇（可能就是追杀“锯鳐号”的同一批）随即涌进海峡，四处投掷深水炸弹。日军舰艇未能用声呐锁定“刺鲅号”的位置，但它们还是在这一区域停留了4个小时。拉彼鲁兹海峡中的这一片水域深度很浅，无法深潜。随后，一片长达3英里的巨大油污证明“刺鲅号”最终沉入了水面下213英尺的海底。2008年，人们才找到并辨认出了“刺鲅号”的残骸。

美国人在战争结束之前一直对“刺鲅号”被摧毁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它可能是在拉彼鲁兹海峡中被深水炸弹炸毁的，但也可能是毁于事故、水雷，或者一枚出故障的鱼雷。1943年11月9日，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宣布这艘艇“超期未归，判定为损失”。这个消息在美军潜艇部队中引发了一阵哀伤。莫顿是潜艇部队中最受人崇拜的艇长，他的战友们一直想要仿效他勇猛的打法。他们这时候会不会把“刺鲅号”的损失视为一种警示，认为他实际上是太鲁莽了？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却不能忽略。而且，大家都知道潜艇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任何一艘艇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损失掉，无论它采用了何种战术。从此，洛克伍德叫停了所有向日本海渗透的行动，这个方向上的进攻作战直到战争末期才恢复。

随着统计数据经过战后的分析而不断增长和修订，莫顿和“刺鲅号”已然接近了美军潜艇部队排行榜的顶端。他战时的战绩是击沉敌船

17艘，战后这一数字增长到20艘，更新的评估认为可能高达24艘。虽然在战争中半道而亡，而且饱受鱼雷故障的困扰（这一故障在他死后大大减轻），莫顿仍然能够位居击沉敌船数量排行榜的次席，以及单次战斗巡逻战绩排行榜的次席。或许莫顿的领导能力还带来一项更大的贡献，他原先的副艇长迪克·奥凯恩正是那个后来在两个排行榜上都超越了莫顿的人。

1943年秋，美国人的潜艇运用思路发生了转变。此前，洛克伍德和澳大利亚的潜艇部队将领们让许多舰队潜艇在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环礁周围海域巡逻，这些都是日本海军最大的海外舰队锚地。它们能对敌人大规模的海军行动提供宝贵的目视侦察和预警，还能在敌舰进出环礁时抓住机会发动攻击。潜艇部队同样还被部署在所罗门群岛和南太平洋以支援哈尔西和麦克阿瑟在这一地区的进攻作战。此外和往常一样，潜艇们还被用于各种各样的特殊任务，比如侦察、捞救坠海飞行员，以及向菲律宾偷运代理人和情报。而在1943年10月到12月间，更多的潜艇开始被派去攻击西太平洋上的日本海运线，包括“刺鲀号”探索出来的海域：东海和黄海。到这个时候，美军潜艇每个月都能击沉超过10万吨日本船舶。

拉尔夫·克里斯蒂将军的西澳大利亚司令部驻地在弗里曼特尔，他们投入了全部力量来寻找和击沉往来于婆罗洲和特鲁克之间的日本油轮。这条航线上的许多油轮都有双层船壳，很难被击沉，但它们又比军舰缓慢，更易于被击中。好在新铝末混合炸药战斗部具有巨大的能量，而油轮也常常满载着相对容易挥发的未经提炼的原油，这就使它们很容易遭受毁灭性的二次爆炸和大火。在194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从弗里曼特尔出发的美军潜艇将12艘油轮送下海底，这足以打断日本的补给线，并令东京开始严重担忧他们的舰队会由于缺油而无法行动。

1944年，美军潜艇的吨位战战绩达到了巅峰。它们击沉商船（不含军舰）的吨位翻了一倍还不止，从1943年的120万吨增加到1944年的250

万吨。^[29]随着新型白鱼级潜艇服役，太平洋潜艇部队的规模从1943年2月的47艘增长到1944年6月时的超过100艘。于是，洛克伍德和他的团队开始试验狼群战术，将3到6艘艇交由一名指挥官指挥。这些潜艇装备了更好的声呐、雷达、光学和通信系统，配有更强大的甲板炮，鱼雷也最终达到了设计性能。Mk14鱼雷被新型Mk18鱼雷取代，这种鱼雷在纠正了一些缺陷后成了致命的武器。更年轻、更勇猛的新一代艇长学着马什·莫顿的样子，战斗巡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水上航行。他们被派到更远的地方，前往亚洲大陆和日本沿海，在敌人最繁忙的航运线上大开杀戒。夜晚，他们会使用大为改进的SJ雷达，锁定猎物的位置、航速和航向，之后发动四台引擎，以常常接近20节的最大速度冲向攻击位置。珍珠港的密码破译部门破译了日本的航运密码，这样就能准确预判日本商船队的位置和航线。这一宝贵的绝密数据被用于选择巡逻位置，也常常通过远程无线电发送给已经出海的潜艇。

1944年1月，迪克·奥凯恩和他的新型白鱼级潜艇“刺尾鱼号”完成了从马雷岛到珍珠港的处女航。在奥凯恩的指挥下，这艘致命的“刺尾鱼号”在9个月的战斗生涯中登上了美军潜艇部队击沉总吨位排行榜的榜首，甚至超越了莫顿在“刺鲀号”上创造的纪录。根据陆海军联合评估委员会（JANAC）战后得出的结论，它摧毁了24艘敌船。而它的艇长和艇员则坚持认为实际总击沉数更高，可能多达33艘。无论如何，“刺尾鱼号”在“沉默军种”二战单艇击沉总吨位排行榜上位列前三是毫无疑问的。

奥凯恩本人看起来也想要为马什·莫顿之死和随同“刺鲀号”一同葬身拉彼鲁兹海峡的80条人命复仇。他作为“刺鲀号”副艇长进行的三次战斗巡逻已经让他成了这种事情的行家里手。和莫顿一样，奥凯恩也是夜间水面攻击的拥护者。他认为紧急下潜只是最后的手段，仅限于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夜间在水面上作战可以为自己赋予更高的能见度，不仅能用SJ雷达，还能派遣视力发达的年轻水兵带着高倍率望远镜爬到潜望镜筒的顶上去。每次作战前，奥凯恩都会先把成功的概率算清楚，如果他

觉得没问题，就会发动大胆、勇猛的进攻。“刺尾鱼号”一次又一次甩开日本驱逐舰，潜入敌人运输船队队形内，常常能用一轮齐射击沉多艘敌船。

“刺尾鱼号”的第一次战斗巡逻是在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水域，它在暴雨中花了两天时间追踪一支大型船队，击沉了三艘大船。两天后的夜里，它的雷达捕捉到了另一支向北航行的船队，在两天的猫和老鼠游戏中，“刺尾鱼号”又击沉了两个高价值目标，包括一艘大型海军油轮“越前丸”。在此次亮眼的战斗巡逻之后，“刺尾鱼号”在第5舰队航母首次空袭特鲁克（1944年2月17—18日的“冰雹”作战）时担任了救生潜艇，它在这次行动中救回了7名空勤人员，比参与此次行动的其他任何潜艇都要多，出了名。它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巡逻是在东海——奥凯恩对这片水域很熟悉，他一年前就随“刺鲃号”在这里巡逻过——“刺尾鱼号”在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单艇狼群。1944年6月24日夜，在距离长崎不远的地方，它伏击了一支由6艘大型货轮组成，有军舰护航的纵队，呈扇面齐射了6枚鱼雷。奥凯恩相信并宣称有两枚鱼雷找到了准头，击沉了两艘船。然而根据战后统计，这轮齐射击沉了4艘大型货轮，总吨位达1.6万吨。6雷齐射击沉4艘船，这就是二战中最致命的一次潜艇齐射了。1944年8月，“刺尾鱼号”再续辉煌，在日本本土主岛本州岛以南大胆地闯进船只最为密集的沿岸海域横冲直撞，又摧毁了至少两艘大型商船，总吨位11 500吨。

这一年，还有其他一些杰出的潜艇和艇长名留青史。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斯莱德·卡特尔，美国海军学院1935届的前橄榄球明星，他是个马什·莫顿式的敢冒险的大胆艇长。他进行了4次战绩彪炳的巡逻，其高峰是1944年6月在吕宋海峡的一番战斗，卡特尔的潜艇“海马号”击沉了总吨位达7.2万吨的19艘敌船。到战争结束时，他和马什·莫顿并列击沉数排行榜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奥凯恩）。萨姆·迪利作为“鲐鱼号”艇长进行了6次战斗巡逻，击沉了16艘日本船只，总吨位54 002吨。“鲐鱼号”对战争最著名的贡献发生在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之前不久。它在苏禄海南部的塔威塔威锚地里追踪日本舰队主力，在3天时间里击沉

了3艘驱逐舰。鲁本·威泰克是“松鲷号”艇长，小切斯特·尼米兹是他的三副；在菲律宾周围和南海的4次巡逻中，“松鲷号”击沉了总吨位60 846吨的15艘船。吉恩·弗拉基，“石首鱼号”艇长，在吕宋海峡和东海取得了少见的7次战斗巡逻记录，击沉了总吨位96 628吨的17艘船。“石首鱼号”在1945年7月有一次耀眼的表现，它运送一组突击队员在当时还是日占区的库页岛上登陆，炸毁了一列火车。这是太平洋战争中唯一一次此类作战，也是盟军在日本本土岛屿上的唯一一次地面作战。

但是太平洋上的吨位战依赖的并不仅仅是美国潜艇部队的这些尖子选手。在这场“千刀杀一人”的战事中，每一小刀都有价值。大部分艇长和潜艇都在战绩榜的下方，但即便是那些名字大多已被遗忘的中等水平选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日本来说，残余的那些宝贵油轮到底是被“刺鲅号”、“刺尾鱼号”或“海马号”这样的超级明星击沉，还是被默默无闻的诸如（此处随机选几个）“鳕鱼号”、“王鱼号”或“巴伯罗鱼号”这样的普通潜艇送下海底，并没有什么区别。1944年，处于战斗巡逻状态的美军潜艇数量翻了一番，从1943年6月时的平均24艘增加到1944年6月时的48艘。^[30]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里，有人说人们可以踩着美国潜艇的潜望镜从日本走到新加坡。最终发挥作用的，是他们所有努力所取得的总成果。

1944年后期，美军潜艇每个月都能击沉超过25万吨日本商船。击沉吨位的高峰出现在1944年10月，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麦克阿瑟的重返菲律宾之战和莱特湾大海战。这个月，海面下的掠食者们摧毁了328 843吨日本商船，其中包括103 903吨油轮。^[31]此后，每月的击沉总吨位开始下降，但这仅仅是因为目标开始相对变少了。在最繁忙航运线上巡逻的美军潜艇发现海面上满是之前被击沉的船只留下的油污、碎片和残骸。许多艇长开始把更多注意力转向击沉中式帆船和装有甲板炮的拖网渔船。

“刺尾鱼号”的最后一次巡逻始于1944年9月的最后一周，这次它来到了台湾海峡。这次巡逻恰逢哈尔西第3舰队的航空母舰空袭此地，以

及莱特湾海战的开局。在两天的时间里，奥凯恩艇长追踪了向南航行的志摩舰队（它后来参加了苏里高海峡之战）。遭到志摩一艘巡洋舰上8英寸炮的轰击后，“刺尾鱼号”紧急下潜以保护自己。奥凯恩的目视侦察报告发到了珍珠港，随后又转发给了哈尔西和金凯德。10月23日，“刺尾鱼号”截击了一支向北航行的船队，船队有三艘油轮，两翼有两艘货轮，有驱逐舰严密护航。避开驱逐舰之后，奥凯恩指挥潜艇机动到了船队中间，准备发动近距离夜间鱼雷攻击，他只用了一轮近距离鱼雷齐射就击沉了全部三艘油轮。大爆炸一度照亮了“刺尾鱼号”，其余的货轮便直接转向潜艇，似乎想要撞击它。奥凯恩下令“紧急全速前进”，潜艇猛地向前一冲，横在了从两侧靠过来的两艘船的前方。两艘日本船却发现由于同时朝一个位置驶去，快要撞上了；它们真的撞上了，片刻之后，两艘船双双被“刺尾鱼号”尾部发射管的鱼雷齐射击中了。两次大爆炸炸毁了它们。“刺尾鱼号”甚至都用不着下潜。它在短短10分钟时间里摧毁了5个高价值目标，这是战争中最令人称奇的一击。

奥凯恩此时还有12枚鱼雷，他还想把它们用起来。10月24日，当莱特湾海战在南方激烈进行的时候，“刺尾鱼号”的SJ雷达再次捕获了一支北上的船队。这是个大船队，可能有多达10艘船，还有护航舰。接下来便又是一场屠杀：奥凯恩指挥“刺尾鱼号”接近过去，六雷齐射。两枚鱼雷命中了两个不同的目标，敌船迅速双双沉没。接着艇尾鱼雷管又射出四枚鱼雷，命中了一艘油轮，油轮带着伤逃走了。此时一艘驱逐舰突然出现在“刺尾鱼号”左侧，奥凯恩赶紧下潜脱离了战场，在深水处静默。随后，他又指挥潜艇浮上水面，追踪受损的敌船。“刺尾鱼号”现在还有两枚鱼雷来做这件事。奥凯恩站在舰桥上，命令两个舰首鱼雷管装填鱼雷，潜艇向几乎动弹不得，还在燃烧的油轮驶去。第一枚鱼雷工作正常，径直命中目标船首附近，又一道火柱冲天而起。这可能足以结果它了，但是“刺尾鱼号”还剩一枚鱼雷，奥凯恩决定靠上去，打出这一雷，给出致命一击。

这确实是致命一击，却不是美国人想的那个样子。这最后一枚鱼雷刚刚射出去，就开始一阵一阵地海豚跳，向左转弯。它长长的尾迹泛着

泡沫，闪着磷光，转了一个大圈直奔“刺尾鱼号”而来。奥凯恩见状向下方舱盖里大吼道：“紧急全速前进”，以及“右满舵”，但来不及了。鱼雷的舵卡住了，抑或是舵机失灵；不管原因如何，它此时正直冲“刺尾鱼号”正中间而来，目标点就在奥凯恩和其他8个人所在的舰桥正下方。随着潜艇引擎突然加大马力，它向前猛冲，开始以鱼尾机动摆脱直扑而来的鱼雷航迹，但是鱼雷还是命中并爆炸开来，撕开了后部鱼雷舱附近的艇体。后部舱室立刻被海水淹没，艇尾下沉，艇首抬出了水面。奥凯恩向指挥塔内吼叫着要他们关闭舱门，但是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海水淹没了舰桥和舱盖，奥凯恩和其他几个人被甩进了海里，“刺尾鱼号”无助地翻滚起来，艇尾向下，艇首直指天空。此时对留在艇上的那80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刺尾鱼号”能多在海面上坚持一段时间，好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不过倘若是这种情况，他们可以预料到，自己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就只能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度过了。

游在海面上的几个人——包括奥凯恩和另外9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刚刚从指挥塔舱盖里逃出来——眼睁睁看着潜艇滑入海面下。它一直下沉到约180英尺处才停下来。前部鱼雷舱里有大约30个人还活着，他们设法锁住了舱盖。这些人烧掉了所有的保密文件，却让空气中满是烟雾，令他们的处境更加绝望。总共有13个人分成4组，设法通过前部逃生窗口逃出潜艇，借助被称为“莫姆森肺”的简易呼吸装置浮到海面上。其中8个人在上浮过程中或是浮出水面后死去，可能是由于减压病（所谓“潜水员病”）。他们在海面上漂浮了一整夜后，一艘日本驱逐舰捞起了10名“刺尾鱼号”艇员，包括奥凯恩。^[32]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们就是战俘了，在本州岛的几个战俘营里调来调去。只有4个人活到了战争结束。奥凯恩活了下来，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1932年，空中力量的先驱、退役陆军航空兵军官比利·米切尔就呼吁开发一型航程5 000英里，载弹量10 000磅，实用升限35 000英尺的重型轰炸机。在那个时候，这个主意看起来过于超前和异想天开了，就像

儒勒·凡尔纳或者H.G.威尔斯小说里幻想的机器那样。但是航空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到1940年，在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之时，航空工程师们相信，制造一种超重型、超远程、气密增压的轰炸机已经是可行的了。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成功说服国会从纳税人的口袋里再多掏一些钱出来，资助这种波音公司设计的航程和载荷都是B-17“飞行堡垒”两倍的新型轰炸机。30亿美元（1940年币值）砸下去之后，B-29“超级堡垒”诞生了。

该计划的支持者对当时的政治风向很敏锐，因此没有将这种飞机宣传为战略轰炸武器。这种超重型或说超远程轰炸机（英语缩写为“VHB”或者“VLR”，两个缩写常常混用）是战前孤立主义者重视的“半球防御”战略的基石。B-29具有可怕的航程，能够监视大西洋航线，发现任何接近的敌人船队（预想是德国人的）。这种飞机将在大洋中央赢得无可挑战的空中霸权，在敌人进攻部队在北美或南美大陆获得第一个立足点之前予以拦截并将其击退。如果纳粹真的在南美洲夺取了一块滩头阵地，B-29就可以从佛罗里达州或加勒比海的基地出发打击敌人。这样，这种巨型飞机就会成为“美洲堡垒”的看门狗和警犬。据说如此。

1941年，当全球大战的阴影铺满世界时，美国战争部要求波音公司加快研发进度，在测试和优化工作全部完成前就将这种新型轰炸机投产。1941年5月，波音接到了首批250架飞机订单，此时距离珍珠港之战还有6个多月。一年后，波音已经得到了交付1 644架飞机的订单，而此时这种飞机甚至一架都没有上过天。[\[33\]](#)波音为B-29的制造投入了两座大型工厂，华盛顿州的兰顿工厂和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工厂。其他多家顶尖的航空工业公司也加入为其提供零部件或者发动机的行列，包括贝尔、费舍尔、马丁和莱特公司。当这型飞机还只有几架验证机的时候，陆军航空队就为了它们未来的交付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型指挥部和行政组织。招募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在B-17和B-26飞机上训练，其中大部分人在小轰炸机上完成训练之前都没有飞过（甚至没见过）“超级堡垒”。

1943年2月，一架B-29早期原型机在试飞中坠毁，夷平了西雅图市郊的一座肉类加工厂，整个项目中最优秀的试飞机组和工程师连同地面上的21名平民死于非命。但是项目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当第一架B-29在1943年7月交付时，飞机还有许多小毛病，即便此时全国各地的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马力生产，飞机的设计还是接受了数千项改动。

它比此前所有批量生产过的飞机都大得多。飞机全长99英尺，翼展140英尺。空机重量7.45万磅，但是战斗载荷时的起飞重量通常至少有12万磅，超过14万磅则是家常便饭。将这架“超级堡垒”抬离地面所需的巨大推力来自四台2 200马力的莱特R-3350星型发动机。

第一次见到这架新飞机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目瞪口呆。那修长的机身，庞大的有机玻璃花房式机头，巨大的机翼和襟翼，以及耸立着的三层楼高的机尾，都让他们赞叹不已。靠着前三点式起落架，飞机骄傲地站立在柏油停机坪上。用平头铆钉连接起来的铝合金机身如同抛光过的白银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部分新手都是在B-17上训练的，大家觉得那已经是很大很重的轰炸机了。而“超级堡垒”在所有方面都要大得多，重量更达到了B-17的两倍。飞行人员们知道自己的性命有赖于那四台强大的十八缸引擎，还有桨叶尖端距离远达16英尺，如同独木舟一般大小的螺旋桨。

爬进机舱后，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这架新飞机了。两个宽敞的机舱通过炸弹舱上方的一条爬行管道连接到一起，这让全部11名机组人员都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舱室可以加热，还是气密加压的。即便是在外部温度只有零下70摄氏度的3万英尺高空，他们仍然可以舒舒服服地穿着衬衫坐在座位上。巡航时，他们不用戴氧气面罩，还能自由地抽烟。腰部和尾部机枪手坐在气泡形有机玻璃窗内，视野良好，他们坐在这里就可以通过电动遥控系统同时控制多个.50口径机枪塔。发动机的噪声被挡在外面，这很令大家满意，机枪也不会像无气密的B-17上那样就在耳朵旁边炸响。置于圆锥形有机玻璃机头前部的驾驶舱，在各个方向上的视野都很好，尤其是上方和下方。正副飞行员会有一种几乎飘浮在长长

机身前方空中的奇怪感觉，有人说驾驶“超级堡垒”就像是“坐在门前走廊上带着房子飞起来”。[\[34\]](#)

为了克服重力把70吨重的飞机送上天空，重压之下的莱特R-3350引擎很容易过热、漏油、汽缸盖飞脱、阀门落入汽缸，以及把熔化的碎片甩到高度易燃的镁合金曲轴箱里。在数百架B-29已经走下组装线之后，原先的空气冷却装置却还要重新制造。燃烧的发动机会拖出一道烟火，就像流星穿过大气层一样——但这个流星却是连接在飞机机翼上的，随时可能引燃机翼自身的铝质蒙皮和大梁。因此，一台状况不佳的发动机最好在起火之前迅速关掉。这是通过让螺旋桨“顺桨”实现的。一套从座舱里控制的液压系统可以旋转四片桨叶的迎风角，也就是“回桨”，直至它们停下来并反转，让发动机停转为止。如果机组反应迟缓，或者回桨失灵，螺旋桨就会开始“风车转”，这就会带来巨大的阻力：几分钟内它们就会把桨轴烧断，从引擎上飞出去，有时会重重撞在机翼上。

如果一台故障引擎能恰当关闭，那么其余三台还足以把B-29带回家，即使距离远也没问题。但是这样一来，那三台正常工作的引擎就会比原先消耗更多的燃油，这样，把原本用于故障引擎的燃油从油箱和油路里重新分配给其他引擎就至关重要了。这可能需要对所有燃油储备进行复杂的重新调配。这种操作的容错空间很小，任何一点差错都会带来灾难。

即便是最有经验的B-17飞行员，在试飞B-29之前也需要接受几个星期的课堂教学。每一阶段的学习都要认真关注一长串知识点。起飞滑跑距离很长，超过一英里，然后引擎就会吼叫着使足力气，把这台巨大的机器抬离地面。然而一旦升空，B-29就会灵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我飞过的最大、最重、最强有力的飞机，”一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如此回忆他第一次驾驶B-29飞行时的情况，“然而它的反应非常棒，控制手感柔和而精确。”[\[35\]](#)它还很快，其地面速度[\[36\]](#)很容易就能超过每小时300英里。它的速度、航行高度和位置合理的.50机枪塔令这款飞机的绰号名副其实：“超级堡垒”将会是个砸不烂的硬核桃，对敌人

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说都是如此。

部队急需B-29投入现役，这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见的措施。战争部在飞机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情况下就签发了超过1 000架的采购订单，打算等它们上天后再进行必要的改进。设计—测试—制造全流程的速度被加快到和平时期的差不多两倍。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浪费很大，却是唯一能让B-29在1944年春季参战的方法，坚持这样做的除了罗斯福总统之外还有许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B-29的服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全国动员方式的缩影。在所有方面，领导者都会把效率、节约、安全，甚至是谨慎置之脑后，而一切以速度为先。

第一批B-29在踏上飞往亚洲的漫长航程之前，都要由机组驾驶，飞往威奇塔市波音工厂旁边的一座机场，在这里进行数百项改进。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将这次行动称为“堪萨斯之战”，或曰“堪萨斯闪电战”。其实美国各地的多处航空兵基地也都建起了改装中心，或所谓“改装厂”。新手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把他们新拿到手的B-29飞到这些中心进行改装。这样的飞行自身也成了训练课程的一部分，在进行越洋部署之前为新手们提供一些积累飞行时长的机会。然而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甚至在许多飞机已经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军方还下令进行数百项新的改进。这种情况下，改装和维修“套件”就会连同必需的零部件和工程师一起空运到远在埃及或者印度的国外机场上去。螺旋桨回桨系统、火控系统、电子系统，最重要的是麻烦不断的莱特发动机，都进行了改装。美军在开罗和卡拉奇建立了两个最大的海外B-29改装中心。即便是在中国和后来的马里亚纳群岛基地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作战之后，那些地面机械设备还常常被用来纠正“超级堡垒”的原始设计缺陷，而非仅仅用于例行维护。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领柯蒂斯·E.李梅发现他的飞行人员不得不在飞实战任务时做一些测试项目。这项工作困难而且危险，因为B-29“有的bug〔毛病〕和史密森尼学会昆虫馆里的bug〔虫子〕一样多。无论他们揪出这些bug的速度多快，都会有新的bug从引擎罩底下爬出来”。[\[37\]](#)

当同盟国首脑在埃及开罗开会时（1943年11月的“六分仪”会议），

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保证，将会有数百架B-29进驻中国，并向日本本土列岛发动持续轰炸。蒋介石之前总在抱怨盟军对中国的支援不够，并威胁要和日本议和（但并未明言）。罗斯福常常告诉他的军队领导人，从中国机场出发轰炸日本将会激发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而无论是B-17还是B-24，其航程都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因此从一开始，将B-29部署到中缅印战区的做法就是一场政治赌博，意在安抚中国国民党政府，令其继续打下去。此次行动被赋予代号“马特洪山”（matterhorn）。

然而，“马特洪山”行动从一开始就饱受后勤困难的拖累。这些发动机不太好使的新B-29飞机都是由新训练出来的飞行人员驾驶飞往战区的。他们的环球之旅从佛罗里达州的莫里森机场开始，经由加勒比海、巴西、阿森松岛（位于大西洋中部）、利比亚、开罗、巴格达、卡拉奇，以及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通过一连串加油站接力飞行。一路上，莱特引擎常常过热，导致坠机或者迫降。当几十架飞机飞抵开罗和卡拉奇时，人们发现当地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3摄氏度，致使发动机在起飞时就会出故障，于是，美国人不得不从本土派出工程师飞过去重做莱特引擎的风冷机构。

1944年4月，B-29机群开始抵达位于克勒格布尔的固定后方基地。它们将从这里出发，前往四川成都的前进机场。途中要经过极其艰险的“驼峰航线”，飞越世界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超级堡垒”要从常人难以踏足的锯齿状山峰和陡峭峡谷上空飞过，剧烈的乱流和突然出现的下沉气流会让飞机剧烈颠簸，此外还时常会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狂风，能见度也会降至零。机组人员偶尔能透过晴朗的空域看见航线以北仅仅150英里处的珠穆朗玛峰顶。

这段1 200英里航程的终点是成都以南四座新建造的机场之一，此时其修建工作尚未完成。超过25万名中国农民被召集起来，几乎完全靠人拉肩扛建起了这些长度将近2.5千米的跑道。新闻影片拍下了这大群的劳工，许多人光着脚，戴着圆锥形的毡帽，用篮子和独轮车搬运沙土和碎石。八九岁的男孩子们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碎石。工人们挑着麻

袋，把石头从附近的河边挑到基地。这些石头被密集放置在跑道的地基下，之后在上方铺上碎石和泥土，再用50人才拖得动的巨大石碾压实。当一架飞来的B-29进入降落航线时，工地上就会响起响亮的号声，工人们纷纷涌到跑道旁边。飞机落地后，人群又会散去，继续干活。

最初的“马特洪山”计划考虑在成都部署两支B-29作战联队（各15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飞机毛病不断，以及经由印度进行补给成本过于高昂，美军不得不把规模缩小为一支轰炸联队。第20轰炸机司令部原本要自己解决后勤问题，也就是要自己把所需的零部件、补给物资、炸弹和航空燃油从印度运来。为此，这个司令部得到了一队C-109运油机和C-87运输机。此外，“超级堡垒”自己有时也会客串当运输机，这时候机上的机枪和其他装备就会被拆下来，炸弹舱里装上油罐。但仅仅是需要运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燃油和物资的重量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马特洪山”行动期间每飞一架次轰炸任务，就需要运输机到印度往来飞行12架次。每8桶从克勒格布尔运往成都的航空燃油中，就有7桶会在往来运输的飞行中消耗掉。情况很快便显而易见：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不可能自行解决燃油和补给的需求，现有的空运司令部需要来补足缺额。但这意味着要挤占中国军队、美国驻华地面部队和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本已捉襟见肘的燃料和其他物资。

1944年6月5日，B-29首次在战场亮相，当时98架飞机从克勒格布尔起飞，轰炸了1000英里外日占曼谷的铁路终点站。此次空袭向目标投下了368吨炸弹，这一结果令人振奋。10天后，“超级堡垒”首次造访日本本土。当参加“征粮者”行动的美军两栖部队冲上塞班岛滩头时，50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本九州岛八幡市的钢铁厂。这是1942年4月杜立德空袭之后日本本土首次遭遇轰炸，因而登上了美国、中国、日本的头版头条。马歇尔将军发布了一份战报，宣布这次行动开启了对日本本土的“新的进攻形式”。蒋介石当局兴高采烈。而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在公开宣传中隐瞒了八幡遭到轰炸的事实，谎称日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了几十架轰炸机。然而和前一次一样，敌人作战飞机在日本本土上空的出现在公众中引发了恐慌。至于这次空袭只造成了轻微破坏，反而不

重要了。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马特洪山”项目的B-29轰炸了整个亚洲战场各处的敌人目标：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炼焦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华北的炼钢厂和港口设施，上海的码头和仓库，台湾的航空兵基地，香港的船运，以及缅甸的铁路和仓库。最后，第20轰炸机司令部向九州的工业目标又发动了8次空袭。然而，每次出击之前都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补充燃油、炸弹和其他物资。轰炸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战斗损失则很惨重。从成都起飞的B-29将能够飞到1 500英里外的九州，却够不着东京和本州岛上的其他高价值目标。若要全面展开对日战略轰炸，他们就需要在中国东部建立新的机场。但是中国沿海的港口已尽数落入敌手，这意味着从印度出发的货运航线要向东延伸得更远。不仅如此，没人敢指望中国东部的机场能顶住日本陆军的进攻，后者此时正在执行“一号”作战，在大陆上快速推进，占领区迅速扩张。实际上，“一号”作战已经威胁到了成都和昆明周围的盟军航空兵基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醋性子乔”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认为，需要50个受过训练的中国步兵师才能保证这些机场的安全。但是没人相信（包括史迪威自己）蒋介石能拿出如此多的部队。

出于这种种原因，“马特洪山”作战从未实现自己的承诺。从一开始，罗斯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团结，并为对日决战保留发掘中国巨大人力的可能性。到1944年中期，事情开始明朗化，后勤和安全已经成了“马特洪山”计划无法克服的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一项更好的选择浮现了出来：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在当年6月至8月夺取了这里。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的地形适合建造大型的B-29飞行基地，对敌人的地面进攻免疫，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可以通过海运而非空运进行补给。这里已经将东京纳入了1 500英里的作战半径之内。1944年7月，参联会敲定，驻马里亚纳群岛的新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将获得新“超级堡垒”分配和物资供应的优先权，当年11月之后，再没有新的B-29飞到印度或者中国。1945年1月，“马特洪山”计划终结。

回头看这场在中国走的弯路时，李梅总结道：“这没起作用。没人能让它起作用。它的后勤基础完全不行……这种作战方式只是个幻想，就像是来自《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国那样。”[\[38\]](#)

然而，马里亚纳群岛面临的困难同样令人生畏。燃油和补给物资当然可以从海路运来，但这条海上生命线格外漫长——从旧金山湾开过来要航行5 800英里——B-29机队还不得不和其他数百支盟军部队争夺有限的船运和其他资源。满载的轰炸机将从那些尚未开工建设的基地起飞，而在那些岛上，敌人的残余部队仍然在山区坚持战斗。从塞班、提尼安抑或（尤其是）关岛出发，日本的目标基本都在B-29极限作战半径的边缘。经验相对不足的机组将要飞越超过3 000英里没有任何指示物的洋面，一部分还要在夜间飞行，往来全程会持续15小时甚至更久。世界上没有一种战斗机拥有足以执行这种任务的航程，盟军在更接近日本的地方也没有别的机场可用：因此，B-29的所有任务都是没有护航的。尽管被称为“超级堡垒”，这种飞机的结构其实相当轻（这是出于节约重量的目的），而且在空中时被弹面非常大。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有些计划制订者已经提出警告，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的损失可能高到无法承受。

阿诺德点名要求“负鼠”汉塞尔担任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首任司令。汉塞尔原先是阿诺德在华盛顿的作战计划部门的一个处长，表现出色，最近又当过第20航空队参谋长。（当汉塞尔夫人被问及其夫君“负鼠”的绰号来由时，她说因为他长得像。从照片上看，她说得还蛮有道理。）和大部分美国陆军航空队一线指挥官一样，汉塞尔不算太老（41岁），本人也是个飞行老手。他坐在座舱左边的机长座位上，亲自驾驶第一架B-29飞到了塞班。他的飞机被称为“约尔廷的约西号”，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附近）的马瑟机场出发，经由檀香山、夸贾林三级跳，于1944年10月12日在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降落。成群的地勤人员拥挤在跑道旁，他们大部分人从未亲眼见过“超级堡垒”。一名目击者回忆道，当“约尔廷的约西号”飞过来时，“欢声雷动，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飞过去……所有人都兴奋地手舞足蹈”。[\[39\]](#)

然而，汉塞尔发现塞班岛上的情况令人失望。计划要求岛上建设两条8 500英尺长的平行跑道，以及80个硬化停机坪（沿滑行道铺设的停机区）。但他发现那里只有一条7 000英尺长的跑道，而且只有一部分铺设了硬化道面，另一条平行的跑道才刚刚把地面清理出来，铺好路基，道面铺设还完全没有开始。硬化停机坪只建成40个，当第73轰炸联队的B-29机群在当月晚些时候飞来时，它们只能两架飞机挤在一个停机坪上。航空燃油还只能存储在停放在附近停车场的油罐挂车里。按计划，这个基地将在当年年底前接收180架飞机和1.2万人，但是这里还没有军营，没有办公楼，也没有仓库。当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先头梯队到达时，他们不得不住进机场周围的帐篷群里。即便是汉塞尔将军也是住在一处可以俯瞰东方海面的悬崖上的帆布帐篷里。食堂是用匡西特板棚房搭建的，即便是将军们也得“排队打饭”。“我没有车间，也没有设施，只有帐篷，”汉塞尔后来回忆道，“我有一个炸弹堆栈，一座停车场，燃油也有储备，但是其余一切都是我见过的最难受的一团乱麻。”[\[40\]](#)

这一延误并非由于不努力。伊斯利机场上的推土机从6月24日起就开始轰鸣，此时岛上仍在激战，日军防线就在北方1英里之外。航空工程营已经是24小时轮班施工，在夜间用泛光灯照明，有时还会招来炮轰和狙击手的射击。瓢泼大雨会把尚未铺设硬化道面的跑道和停机坪化成一汪泥潭。岛上有着用不完的珊瑚礁，碾成粉末后可以做成高品质的混凝土，用来制造沥青。但是珊瑚矿区和机场之间的道路都很狭窄，许多地方都没有铺设路面；道路常常发生交通堵塞，或者被热带暴雨淹掉。铺设跑道和勤务区需要数千吨珊瑚粉末——但是首先要对道路进行拓宽、升级和路面铺设，这同样需要数千吨珊瑚粉末。

面对必需装备和零部件的严重短缺，汉塞尔向国内大声疾呼，要求提供后勤支持。当一艘运载着关键货物的船开进拥挤混乱的关岛港时，海军港务管理员说：“我只给你24小时，让这艘见鬼的船离开这里。”[\[41\]](#)于是在匆忙的卸货过程中，这些货物都被堆放在丛林边缘的一

块空地上，暴露在暴雨、湿热天气，以及自己人的偷扒摸抢之下。大部分都丢失或者损坏到无法使用的地步了。面对可能导致轰炸任务延误的物资短缺，一路通往后方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货运线路被开辟了出来。于是，B-29再一次担负起了把自己所需物资运往战区的任务。这又是一条“驼峰”航线，只不过这个“驼峰”是跨越了94个经度的地球表面的弧线。

汉塞尔到达后的几个星期里，平均每天都有3到5架“超级堡垒”飞到塞班岛。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由新训练出来的机组人员自己从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训练和改装中心飞来的。他们沿用了汉塞尔和他的“约尔廷的约西号”的航线：先飞越群山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马瑟机场；继而跨越东太平洋飞到檀香山的约翰·罗杰斯机场，这里原本是座民用机场；之后跨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到达中太平洋的夸贾林环礁，这时他们的日历要向前翻一天；最后飞行1 500英里抵达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绝大部分年轻飞行人员都不熟悉这样的远程越洋飞行。这是对他们海上导航技术的一次实战检验，其自身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训练课程。在云上飞行时，领航员需要透过浓云的缝隙观察波光粼粼的蓝色海面。他有时候可能会看见一块珊瑚礁或者沙质浅滩，此时他就会努力把这些地标和桌子上的海图做对比。夜晚，领航员要用六分仪观察星星，以此来确定飞机的位置，就像古代的航海家那样。大部分时候他要依靠航位推测法，小心翼翼地随时记录飞机的空速和罗盘方向，再加上风速校正，直到他能够收到远程无线电导航系统或者无线导航塔的信号为止。

一个典型的B-29机组由11人组成，年龄从19岁到30岁不等。在许多飞机上，机长兼最年长的机组成员是一位25岁的中尉，他应该是在约18个月前在一架单引擎教练机上学会飞行的。即便他们很年轻，身体处于最佳状况，也无法逃脱高空长途飞行带来的疲劳。在15小时的飞行之后，一名飞行员在家信中写道：“我的腿和后背都僵住了，到现在还有这种感觉！我们拂晓时就起飞了，天黑几个小时后才落地。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轰炸目标花不了多少时间，飞往目标和返回基地的航程

才是考验，让人受不了。”^[42]

随着新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涌入塞班岛，汉塞尔决定，需要进行更多的编队飞行、集结、通信、导航和精确轰炸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他觉得没有什么训练能比向相对较弱的敌人阵地进行实战更好了。10月27日，汉塞尔亲自率队向曾经令人生畏的特鲁克环礁进行了战术轰炸，目标是杜布隆岛上的日本潜艇锚地。（美国陆军航空队禁止将军们飞战斗任务，这是汉塞尔最后一次被允许率队出击，这令他十分失望。）后来他们又对特鲁克进行了三次训练作战，对硫黄岛进行了两次。空袭中投下了数百吨炸弹。对于地面上挨炸的人来说，若他们知道这仅仅是训练，恐怕难免觉得惊讶和沮丧。

10月30日，一架专门改装执行远程照相侦察任务的“超级堡垒”，型号为F-13，抵达了塞班。好运来了挡不住，就在第二天拂晓，东京及其周边区域出现了难得的晴好天气。拉尔夫·D.斯蒂克利上尉提出要立即飞一趟照相侦察，希望把这次少见的有利天气利用起来，汉塞尔同意了。这架名为“东京玫瑰号”（真是讽刺）的孤零零的F-13，在日本首都上空3.2万英尺高处飞过，机上4台照相机不停地拍照。斯蒂克利在东京、东京湾、横滨上空缓缓地沿“8”字航线飞行，随后向西飞过富士山，前往东海地区以及名古屋地区的核心工业区。这是自从两年半之前杜立德空袭之后第一架突破到东京空域的盟军飞机。日本陆军的战斗机群起拦截，但是令防空司令部无地自容的是，他们根本无法追上这架飞得又高又快的入侵者。在3万英尺以上的高度，日军的中岛Ki-44战斗机（盟军绰号“东条”）再要爬高就会导致地面速度骤降，于是“东京玫瑰号”安然无恙，全身而退。高炮部队进行了一场炫目的烟火秀，但炮弹的炸点既不够高，也没有准头。

在不多见的晴朗天气中飞行了14小时之后，F-13带着数千张摄有东京和名古屋地区主要工业设施和航空工厂的航拍底片降落在塞班岛上。一个设在匡西特板棚房里的照片冲印组没日没夜地工作了几几天，冲印出了7 000张高清晰度照片。这些照片成了后来任务计划的基础。斯蒂克

利的探路之旅对整个战略轰炸事业的价值难以估量。[\[43\]](#)

当时，选择目标依靠的都是近期德国上空空战的经验。计划人员相信，对日轰炸战役的第一步应当是赢得日本上空的制空权。这意味着要从根源上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轰炸其航空工业，包括日本主要的发动机工厂和飞机组装中心。在战前的许多年里，盟国的驻日武官和情报分析人员一点点地积累起关于这一机密产业的数据。日本的航空工业由少数几个大企业统治：三菱、中岛、川西、爱知，以及立川。它们的大部分大工厂都位于东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户周围。例如，盟军知道东京郊区的武藏野就有一家重要的中岛工厂。名古屋的三菱联合体据说是世界第二大的飞机制造厂。其他许多此类工厂的大致位置，盟军也都知道。“东京玫瑰号”拍摄的照片恰好填补了空白，使得分析人员能够确定高优先级目标的位置和大小。

1944年11月时的战术条令倾向于大规模高空精确轰炸。任务要在白天执行，最好是晴朗天气，这样投弹手们就能通过轰炸瞄准具瞄准目标。雷达瞄准只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应急之举，仅用于浓云密布时。低空夜间轰炸还不是个可用选项。汉塞尔想要在首次轰炸日本时出动至少100架“超级堡垒”。在出现足以目视轰炸的晴朗天气前，他不愿把这些飞机派出去。在有利天气下发动大规模空袭将充分利用突袭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他也决定要在11月底前发动对东京的首次空袭，因此时间并不宽裕。11月18日，塞班岛的B-29飞机、弹药和飞行人员数量都足够执行这样的任务了，但是当天日本上空天气阴沉，这样的天气持续了一个星期。每天晚上机组人员都要参加任务前的简报会，结果每次都被告知按兵不动。这对人的神经真是挑战。“我们来聊聊制造紧张的人，”一名年轻的机组人员在日记中写道，“你可以强装镇定，但任何人如果说自己不害怕，那他说的一定不是事实！”[\[44\]](#)

11月24日感恩节这天，云开了。飞行人员在凌晨三点就起床了。当东方破晓之时，排成长龙的“超级堡垒”机群已经在滑行道上给发动机预热了。出于公众宣传的目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带来了代表美国各主要

报刊和无线电台的24名战争通讯员。当第73轰炸联队指挥官兼本次任务的领队“罗西”埃米特·奥唐纳尔准将爬进他的座舱时，电影摄制组启动了摄影机，闪光灯也闪烁了起来。奥唐纳尔的飞机“无畏多蒂号”率先起飞，在他身后，其他110架“超级堡垒”以30秒间隔依次升空。它们向东爬升，在女巫湾上空向左转，踏上北上的漫长航程。每架飞机都装载到了极限起飞重量，14万磅。（莱特公司的工程师建议将起飞重量限制在12万磅，他们的要求过严了。）飞行人员在忙于爬升至高空并在行进中集合队形之时，还要小心盯着他们的发动机。起火和其他机械故障迫使17架飞机折返。其余94架飞机则直奔主要目标，位于东京西部吉祥寺的中岛飞机公司武藏野工厂。

日本人知道“超级堡垒”在塞班岛的集结。他们早就预见到了此次空袭，并采取各种措施，做好了准备。自从6月以来，从中国基地出发的B-29已经8次空袭九州，他们对这种大型轰炸机及其性能并不陌生。在几个星期前拦截“东京玫瑰号”失败之后，日本战斗机进行了改进，提高了爬升速度和实用升限。日本人给飞机装上了更宽的螺旋桨叶，发动机也做了调整，以便在稀薄空气中提供更大的推力。最激进的措施——也最有日本风格——是建立了空对空撞击部队。这支部队的战斗机拆除了所有的机枪、弹药和装甲板。这令它们在更高的高度也能表现良好，但显然就无法向敌人射击了。这些飞行员，也可以视为神风队员，都练习了高空撞击机动，目标是“超级堡垒”脆弱的尾部。

日本的海岸雷达站发现来袭的机群之后，日军125架战斗机起飞迎战。其中有10架日本陆军第四十七“震天”航空队的中岛Ki-44“钟馗”机，它们全部用于对敌轰炸机进行撞击。

抓住高空飞行的“超级堡垒”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事。来袭机群在2.7万英尺到3.2万英尺高度之间进入日本空域，大部分防空战斗机都要花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爬升到这一高度。这天的急流很剧烈，每小时150英里的顺风使得B-29的地面速度超过了每小时400英里。气流打乱了轰炸机的队形，让精确轰炸成了空中楼阁。薄薄的云毯令中岛工厂变得模

糊不清。只有24架飞机向武藏野投下了炸弹，而且几乎全部落在中岛工厂的围栏之外。64架飞机攻击了预定的第二目标，东京港。^[45]

第四十七“震天”航空队的三田义雄三飞曹用一次壮观的撞击获得了当天唯一一个击落战绩。他从后上方接近一支B-29编队，这位勇敢的武士做了一个剧烈的俯冲滚转，驾驶他的中岛飞机撞上了萨姆·瓦格纳中尉驾驶的A-26号飞机尾部。三田的飞机炸成了一团火球，拖着长长的浓烟坠向地面。A-26号机还在飞，但是撞击撕掉了它的垂直安定面和左侧升降舵。瓦格纳试图转向返航，但是飞机却撑不住了。它在距离东京湾约20英里处坠毁，机组无人生还。

对于其他的“超级堡垒”而言，向塞班岛的返航也是一种漫长的煎熬。低垂的云层覆盖了日本南方海域，遮住了各处地标，当夜幕降临时，返航机群还在伊斯利机场以北几个小时航程处。此时跑道只有一些火堆能用以标记，一旦有事故堵塞了跑道，许多B-29可能就要迫降了。好在91架飞机安全着陆，给任务画下了一个成功的句号。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后来复盘此次战斗时，汉塞尔承认11月24日的东京之战过于冒险，几近鲁莽。轰炸没有取得多少成果，武藏野损伤轻微，东京港区甚至没有被直接击中。他觉得幸运的是只损失了3架飞机。（两架坠入本州岛以南洋面，救生潜艇搜索了此地，但一无所获。）汉塞尔害怕失败，他后来写道：“但是我十分担心这种作战状况会损害和危及我正在推进的对日本列岛的独立作战。”^[46]换言之，汉塞尔背负着压力，他要展示从马里亚纳群岛出发轰炸东京的可行性——这样才能让质疑者闭嘴，并且巩固第20航空队的独立性。人们认为，只要这些“超级堡垒”能够兑现轰炸日本工业核心区的承诺，“福将”阿诺德就能顶住将这些飞机用于其他目的的压力。

本州岛南部海域，有12艘执行救生任务的美军潜艇。其中之一

是“射水鱼号”，这是一艘白鱼级潜艇，艇长是约瑟夫·E.恩莱特少校。它巡逻的这片水域被官兵们私下称为“猎场”（Hit Parade），其他潜艇（包括“刺尾鱼号”）已在这里找到过大量进出东京湾的日本船只。11月24日晚间一架B-29在这里的海面上迫降后，“射水鱼号”赶来搜索了三天，却没有找到任何飞机、救生筏或者残骸，恩莱特最后发电向珍珠港报告，“这里的海况不适合水上迫降，轰炸机可能已经坠毁并迅速沉没了”。[\[47\]](#)

11月27日，太平洋潜艇司令部来电，48小时内不会再有B-29飞临日本上空。这意味着“射水鱼号”和其他救生潜艇可以松绑，继续去猎杀敌船了。恩莱特指挥他的潜艇来到本州岛近岸，白天潜航，时常把潜望镜升到高位进行观察。富士山巨大的火山口常常从潜望镜圆形视野中的十字瞄准线下飘过，但是恩莱特却没见到任何有价值的船只，只有一些拖网渔船和其他小艇，他觉得这些小船“太小，不值得用鱼雷”。[\[48\]](#)

恩莱特在南达科他州迈诺特市出生、长大，美国海军学院1933届毕业生。战争早些时候他曾任“鲛鱼号”潜艇艇长，但在1943年秋季那次49天的令人失望的巡逻之后，恩莱特认定自己不是指挥潜艇的料，请求洛克伍德放过他。[\[49\]](#)

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一直在中途岛潜艇基地做一些岸上工作。到了1944年8月，他又急着想要出去试试身手了，于是洛克伍德给了恩莱特一件最难得的礼物：第二次担任潜艇艇长的机会。因此，他比太平洋上其他普通的潜艇艇长更渴望获得战绩。然而出巡至今，他仍然两手空空。“射水鱼号”上的那24枚Mk18电动鱼雷都还躺在原处，一枚未射。

11月27日晚8时48分，“射水鱼号”的SJ雷达发现24 700码外有一个目标，真方位28°。[\[50\]](#)于是一名瞭望哨爬上潜望镜平台，举起望远镜观察北方海平面。当时的环境很适合目视搜索：天气晴朗，轻风徐徐，几近满月。恩莱特起先觉得这个目标是个岛屿，但是雷达扫描结果很快显示，它正在向自己靠近，瞭望哨随即报告：“海平面上有一个暗影，位

于右前方2点^[51]。”^[52]

恩莱特很快认出了望远镜中海平线上的那个暗淡的“目标点”。对比目视测距和雷达测距的结果，他判断出这是个大家伙，可能是油轮，这可是最高优先级的目标。

“射水鱼号”继续停留在水面上向西航行，想要绕到目标背向月光的方向。首次发现目标大约一个小时候，一名瞭望哨向下面大吼说，目标的矩形轮廓从远距离上看很像是一艘航空母舰。恩莱特起先将信将疑，但是观察了一会儿后，他信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目标的外形愈加明显，航母巨大的舰岛和烟囱从平坦的船体上部伸出来。目标的基准航向是210°，航速20节。^[53]

这艘神秘的航空母舰是“信浓号”，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在“大和级”战列舰原三号舰的舰体上改建出来的大家伙。这艘舰建于东京湾里横须贺海军基地的船厂，10月8日下水，8天前刚刚服役。自从当年6月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丢掉了三艘航母之后，这艘舰上的舰员和3000名船厂工人便开始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七天，加班加点。日军的航母突击舰队曾经令人望而生畏，而这艘新造的巨舰则承载着日本复苏这支舰队的最后也是唯一的希望。

“信浓号”的目的地是吴港，它要在那里完成舾装并搭载舰载机。舰长阿部俊雄大佐一直对军舰出海前的准备情况忧心忡忡。在完全不合情理的时限要求之下，许多工作都被简化了。许多重要的内部设施都还没有完工或者未经检验，包括水密门、抽水泵、消防水管以及通风管道。阿部此前就警告过上级，这艘舰和舰员们都还没有做好出海的准备，即便只是沿着海岸航行一夜也不行。但是上级指挥部却无动于衷，这一周的B-29空袭过后就更是如此了。他们不得不假定这艘大型航母已经被敌人发现并拍了照，而高空飞行的敌人轰炸机随时可能回来轰炸船厂。因此，东京的将领们驳回了阿部关于推迟出海的请求，要求“信浓号”必须

不迟于11月28日出海。

就和准姊妹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一样，这艘舰在施工期间也受到了极其严格的保密。在横须贺的海滨地带，日本人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来保护这项工程不被人看见。6号码头周围竖起了高耸的波纹板围栏，“信浓号”就在其中建造。数千名船厂工人被拘禁在基地内，施工期间从不允许外出。任何工人甚至只要提到这艘舰的名字，就会遭到宪兵逮捕、关押、审讯和拷打。

它真的很大：长872英尺，舷宽119英尺，满载排水量71 890吨。就和那两艘超级战列舰一样，“信浓号”装有四台巨大的蒸汽轮机，可以向螺旋桨输出15万马力，使其最高航速达到27节。它的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都设有装甲，设计能够抵御1 000磅炸弹的攻击。舰岛位于右舷中部，尺寸相当于一栋办公楼。舰岛内整合了巨大的烟囱，烟囱向舷外大角度倾斜，让这艘舰的造型显得有些奇特。“信浓号”装有数百门高射炮，比任何其他航母都要多。“当我站在铺设完成的飞行甲板尾部，站在舰首的人看上去只有小豆那么大，”横须贺的一名船厂工人大岛盛业回忆道，“我记得自己兴奋地大喊大叫。‘信浓号’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54]如果这里的“大”指的是吨位，那么大岛所言完全正确——在美国第一艘福莱斯特级航母于10年后的1954年下水之前，世界上没有比“信浓号”更大的航母了。

根据命令，“信浓号”在11月28日日落后不久在三艘驱逐舰的伴随下离开了东京湾。舰上有2 475人，包括由2 175名官兵组成的舰员组，以及大约300名船厂工人。舰上没有飞机，机库里装着50枚“樱花”自杀弹，这种武器设计用来由飞机投射。还有6艘“震洋”自杀快艇。这些自杀艇将要送到吴港沿岸，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送到冲绳。

和上级商议后，阿部大佐设计了一条绕路远离海岸的航线。这会稍稍简化一些导航工作，也是为了避开已知有美国潜艇出没的海域。航程的第一阶段，航母和驱逐舰将会向正南方开往远海。次日凌晨破晓前它们将要转向西边，向濑户内海高速冲刺。最后阶段会是在白天，舰队得

不到任何空中掩护，不过阿部什么都做不了，东京方面根本没有给他选择的余地。他相信自己选择的是在当时环境下最安全的路线。“信浓号”和护航舰在洒满月光的平静海面上破浪而行，航速20节，走之字形航线以规避敌人潜艇。

美国海军的识别手册上，没有任何一艘船的轮廓能匹配得上眼前的“信浓号”。恩莱特和他的军官们认为这艘陌生的敌舰肯定是“飞鹰级”或者“大凤级”航母。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猎物的吨位竟然会是埃塞克斯级舰队航母的两倍。盟军阵营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关于这艘舰存在的蛛丝马迹。

三艘护航驱逐舰出现在了雷达屏幕上。距离缩短后，“射水鱼号”潜望镜平台上的人已经隐约能够见到它们了。恩莱特觉得在目标的背后可能还有第四艘护航舰，当然实际上并没有。

想要在水面上接近有四艘驱逐舰（哪怕只是三艘）护航的敌人航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这样明亮的月光下。恩莱特绝对不可能这么做。他相信这种尝试“实际上就是自杀”。^[55]但是下潜会让“射水鱼号”的速度下降大半，无法机动到攻击位置。情况并不理想。恩莱特选择转向南，在“信浓号”前方大约9英里处与其几乎平行航行，并加速到19节。他需要一些运气。敌舰航速20节，比“射水鱼号”略快一点。一旦距离接近到三四英里，潜艇就必须下潜，否则就要冒被发现的风险。射击窗口转瞬即逝，而且如果“信浓号”及其护航舰没有在之字形航行时转向“射水鱼号”，这个射击窗口甚至根本不会到来。

恩莱特用无线电拍发了敌情报告。或许还有别的潜艇可以被引导到能截击这艘未知航母的位置上，抑或是哈尔西的第3舰队能来对付它。他没有放弃“射水鱼号”自身的机会，但对此并不乐观：“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保持最大水面航速，与敌人平行航行，并祈祷那艘航母转向我们。”^[56]

“信浓号”上，雷达探测器捕捉到了“射水鱼号”水面搜索雷达的电波。其频率和脉冲速率显示那是美国人，但是“信浓号”上的雷达技师无法确定其方位。“射水鱼号”发出敌情报告的无线电信号也被“信浓号”监听到了——但是，方位还是不知道。阿部大佐意识到附近至少有一艘敌人潜艇，却不知道其位置。当周的一份敌情报告称，一队美国潜艇在5天前一同离开了关岛，数量可能多达7艘。将种种信息汇集在一起，阿部认定美军的潜艇狼群正在跟踪自己的座舰。他将此信息传达给了他的瞭望哨们——航母的飞行甲板和上层建筑周围共布置了25名瞭望哨——要他们搜索水面上的潜艇踪迹。

晚上10时45分，一名眼尖的瞭望哨报称“舰首右侧发现不明物体”。想靠目视发现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用“信浓号”上最先进的光学设备也不行。5英里之外涂成黑色的低矮潜艇，即便是在白天也很难被看到。地球的曲率遮住了大部分艇体，只有舰桥顶部会露出海平面。不仅如此，它还在“信浓号”的几乎正前方平行航行，这就使它的轮廓更小了。几十双日本人的眼睛都看向了西南方远处海平面上那个暗影，“信浓号”的航海官认为那可能只是一艘“小船”。

日军驱逐舰“矶风号”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离开了编队。它以超过30节的航速向“射水鱼号”奔来，身后留下泛着泡沫和荧光的长长尾迹。

在“射水鱼号”舰桥上，恩莱特看着从自己艇尾方向冲来的敌人驱逐舰。他正确地判断出那是一艘“阳炎级”驱逐舰——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驱逐舰之一，最高航速可超过35节。他命令瞭望哨从平台上下来，全员离开舰桥。他看了看表，此时是晚上10时50分。他举起望远镜朝向冲过来的驱逐舰，注意到它“愈加接近‘射水鱼号’，越来越大。好家伙，速度真够快的！”。^[57]恩莱特正要钻进舱门下令紧急下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矶风号”掉头走了，回到了“信浓号”右侧原先的阵位上。于是“射水鱼号”继续保持原有航向，并留在水面上。

是阿部要“矶风号”回到阵位上的。他仍然认为“信浓号”正在被敌人的潜艇狼群跟踪，他担心南方那个身份不明的目标就是故意要诱出他的

一艘护航舰。“它是个诱饵，我敢肯定。”他如此告诉舰桥上的其他军官。他下令向东转向，远离了“射水鱼号”。^[58]舰队航速超过20节，阿部知道自己甩开那个鬼影毫无问题。

恩莱特觉得自己已经把机会丢掉了，但他仍然让“射水鱼号”以最大速度破浪而行，航向与“信浓号”编队的基准航向大致平行。日舰的航速比“射水鱼号”至少快1节，这样除非它们转回西边，否则“射水鱼号”难有机会进入攻击位置。恩莱特舰长用手抚摸着胸前的玫瑰经念珠，默默祈祷敌人会如此转弯。

晚11时40分，祈祷生效了。“看起来大之字形转弯转到我们这个方向了。”潜艇日志记录道。^[59]“信浓号”向右急转，航向转向西边，从“射水鱼号”艇尾越过。如果它接下来的左转时机凑巧，那么这艘巨型航母就可能直接撞进潜艇的射击范围。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各方都保持航线不变。“信浓号”和它的三艘护航舰渐渐越过了“射水鱼号”的艇尾，从潜艇左后方来到了它的右后方。这是一场奇怪的捕猎，猎手位于猎物前方数英里处。“射水鱼号”径直向南方数英里外的某个位置驶去——如果恩莱特没猜错，“信浓号”和“射水鱼号”的航迹会在那里交会。

在潜艇的舰桥上，瞭望哨手中的夜间望远镜紧盯着远方的庞然大物，它高大的舰岛和倾斜的烟囱从艇尾的海平面上高高耸起。“射水鱼号”在月光粼粼的海面上向南疾驰，艇首剧烈起伏着，四台发动机开足了马力，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它修长的艇体。带着泡沫的海水从艇首两侧飞溅而出，溅到了瞭望哨的脸上。恩莱特现在还需要一些运气的眷顾，他一直在抚摸他的玫瑰经念珠。

凌晨2时56分，他的祈祷又灵验了。“信浓号”及其护航舰又转弯了，这次是向左，稳稳地开向东南方向，径直冲“射水鱼号”的驾驶室而来。这艘世界上最新最大的航空母舰正把自己像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物一般送到“射水鱼号”面前。日志记录道：“距离迅速缩短，我们就在其前

方。”[\[60\]](#)

“信浓号”左转8分钟后，双方距离缩短到1.2万码，恩莱特命令“射水鱼号”下潜。瞭望哨首先跳进指挥塔，艇长紧随其后，下潜警报响彻全艇（“啊呜——嘎”的声音）；一名水兵猛拉拉绳，关上了舱盖，手轮转6圈锁紧。“射水鱼号”下潜到60英尺深度。恩莱特升起了夜间专用的2号潜望镜，指向了目标。他把十字瞄准线压在了“信浓号”上，低声自言自语道：“来啊，亲爱的，别跑。”[\[61\]](#)

潜艇向西潜行，悄悄机动到一处理想的射击位置上：航母正侧面1000码至2000码之间，此时“信浓号”将以最大的被弹面暴露在“射水鱼号”的鱼雷面前。恩莱特几次升起夜间潜望镜快速查看，确定目标的航向和速度。目标跟踪组则把他的估算结果输入鱼雷数据解算仪（TDC）中，据此设定可能的攻击偏角。被动听音定向仪证实了艇长从潜望镜中观察的结果。他告诉前部鱼雷组，准备六雷齐射。鱼雷航行深度被设为10英尺，为可能的潜航过深风险留下余量。

恩莱特再次升起夜间潜望镜，紧紧抓住潜望镜把手。“信浓号”在圆形镜头中越来越大，它被月光照亮的上层建筑和特有的倾斜烟囱清楚地展现在恩莱特面前。它确实和识别手册中的任何一艘船都不一样。或许这是艘被彻底重建了的老航母？他抓起铅笔在一张草稿纸上画出了敌舰的草图。随后恩莱特看见舰桥上闪过一道光，这显然来自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他转动夜间潜望镜，直到找到那艘驱逐舰，并紧张地发现它正直接朝着“射水鱼号”高速驶来。

恩莱特现在面临着海军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如果“射水鱼号”被发现了，他就需要紧急下潜并躲避深水炸弹攻击。但是这样一来他就会脱离攻击位置，直到“信浓号”安全脱离射程为止。但看起来潜望镜不太可能被发现。于是恩莱特问他的声呐员：那艘驱逐舰在用声呐测距吗？没有，他答道——没有砰砰声。然而由于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问题，所以恩莱特想要确认这个答案。“斯坎伦，”他喊道，“看着我，告

诉我那艘驱逐舰有没有砰砰声。”^[62]斯坎伦检查了所有可能的频率，之后转向恩莱特，重复了他的答案：没有。

艇长指挥潜艇又下潜了几英尺，艇底深度达到62英尺。如果驱逐舰从头顶直接开过（这看起来很有可能），那么它的舰底就会从“射水鱼号”顶部潜望镜支架上方10英尺处开过。恩莱特现在不敢再升潜望镜了，他和几个紧张到冒汗的指挥塔人员只能静听着敌舰开过来。被动听音定向仪证实它正直冲潜艇而来。军舰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之后就是螺旋桨的呼呼声。这些有节奏的声音越来越大。“它就像火车头一样从头上经过，”恩莱特写道，“整个潜艇被震得摇晃不已。”^[63]然后它就开过去了，声音开始变小。日军没有投下深水炸弹，显然，他们对潜伏在自己舰底下方的潜艇一无所知。

恩莱特再次升起了夜间潜望镜，将十字线瞄准了月光下“信浓号”灰色的巨大舰岛。“瞄准！偏角，”他喊道，“预备……一号鱼雷发射！”^[64]

艇首传来一阵低沉的咝咝声，当第一枚鱼雷从发射管中射出时，潜艇在反推力的作用下向后退去。在潜望镜里，恩莱特看见鱼雷的航迹直奔目标而去，“快速，直航，一切正常。”8秒钟后：“二号鱼雷发射。”于是又一股压缩空气喷射了出去，“射水鱼号”“如同被鲸鱼撞上了一样猛地一震”。^[65]之后，第三枚和第四枚鱼雷又以8秒间隔射了出去。航迹跟踪组立刻启动了工作，“射水鱼号”则在第五和第六枚鱼雷冲出发射管时再次震动起来。

6枚鱼雷以150°扇面射出，这意味着4枚瞄准点指向“信浓号”，1枚瞄准舰首前方，1枚瞄准舰尾后方。这是战斗条令对攻击大型高价值目标的要求——目的是留出一些余量，即便TDC数据解算错误时也能确保至少有一枚鱼雷命中。但这一次“射水鱼号”几乎不可能射失。它就在长达872英尺的航母的正侧方，距离对于鱼雷攻击而言很近：1 400码。就像是对谷仓的宽阔侧墙射击一样。

鱼雷向目标冲去，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指挥塔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恩莱特将潜望镜的圆形视场始终对准“信浓号”。当第一枚鱼雷的倒计时到0时，他担心自己一定是射偏了，或者那是一枚哑弹。但随后，“我通过镜片看到目标舰尾附近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之后水中传来了第一枚鱼雷命中的声响。然后‘射水鱼号’便感受到了680磅铝末混合炸药爆炸的冲击波”。[\[66\]](#)恩莱特欢呼起来，他用潜望镜继续观察了8秒，看到了第二个火球，位于第一个火球前方50码处。

恩莱特旋转潜望镜，看见一艘驱逐舰正向“射水鱼号”转来。他拍了拍潜望镜轴上的把手，下令降下潜望镜，压载水舱进水，规避深水炸弹。随着海水涌进压载水舱，艇首加重，甲板向前倾斜，潜艇在重力作用下潜向更深处。随着潜艇前部重量越来越大，水翼面开始发挥作用，使潜艇以更陡峭的角度下潜。“射水鱼号”一路下潜到400英尺以下才停下来。

深水炸弹如约而至：刺耳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但距离并不十分近。恩莱特估计最近的爆炸都在300码之外。日本人看起来是在胡乱投弹。15分钟散乱随机的“撒胡椒面”之后，他们放弃了反击。潜艇的声呐监听着驱逐舰向西南方向离开。

在随后的一连三个小时里，“射水鱼号”都在水下深处潜行，缓慢而无声。通过航位推算法回到他觉得目标沉没的位置后，恩莱特指挥潜艇回到潜望镜深度。此时已是早晨6时10分。他升起潜望镜，扫视四周的海平线，却发现大海上空无一物。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海面轻风徐徐。“射水鱼号”再次潜入水下，停留了一整天，直到下午5时22分才再次浮出水面，向珍珠港发回了令人兴奋的消息：它用鱼雷击中了一艘敌人航空母舰。[\[67\]](#)

自从前一晚11点起，阿部大佐就确信“信浓号”遭到了敌人潜艇狼群的跟踪。藏身水下的捕食者可能四处皆是，可能出现在任何方向，或者

是所有方向。他认定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保持比较快的速度，并且以不规则的之字形航行。就在“射水鱼号”的鱼雷撞上他座舰的右舷之时，他正准备下令再次向右转弯。

第一击落在舰尾前方，水线以下大约10英尺处，激起了一道橘红色的火柱。接着，三次命中接踵而至，又是三支火柱冲天而起，每一次的位置都在上一次的前方。爆炸导致三层甲板的舱室被淹，包括3间锅炉舱，几十名在铺位上睡觉的水兵死于非命。燃油管路起火，一个油槽也裂开了。损管组赶紧抓起水龙头灭火，但是仍无法阻止火焰蔓延到邻近区域。数百个担架被抬到了救护所，医务人员很快就忙不过来了。命中后仅仅几分钟，“信浓号”就向右倾斜了10°。

和它的准姊妹舰“大和号”“武藏号”一样，这艘超级航母建造时也要能够承受鱼雷的打击。一个月前，在锡布延海，“武藏号”承受了几乎20枚鱼雷才告沉没。阿部对“信浓号”如此快地向右倾斜有些吃惊，但他觉得这种倾斜可以通过对侧注水来纠正，而且他自信只要不再遭到打击，就能让军舰继续浮在海面上。由于担心想象中的潜艇狼群，这位舰长与轮机舱通了电话，告诉技术人员，他需要每一节可达到的航速来离开潜艇出没的区域。于是“信浓号”和驱逐舰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前，航速不减。

在舰体下部中雷区域周围的过道里，水密门、管道和通风口发出可怕的尖锐嘶鸣。这是压缩的空气从防水密封处挤出时发出的声音，而将空气挤出的，正是从舰体四处破口处无可阻挡地涌入的成吨海水。“我们干活的时候能听到金属板在至少100吨的压力之下嘎吱作响，”一名舰员回忆道，“铆钉开始晃动，看起来随时可能从洞里迸出来。”^[68]海水从水密门密封垫的破口处喷射而出。管道和通风管也炸裂开了。“信浓号”强大的机组驱动着巨舰以超过20节的航速前进，却间接地把数千吨太平洋的海水吸入了右侧舰体。即便在左侧突出部充入3 000吨海水之后，“信浓号”的右倾仍在不断加剧。当倾斜达到15°时，水兵们已经不得不扶着右舷的舱壁才能站立了。

阿部大佐仍然在扩音器里安抚人心。他告诉舰员们军舰没有翻覆的危险，但同时也要求水泵组竭尽全力纠正倾斜。

“信浓号”的航速逐步跌落到了10节。进水和大火无可阻遏地蔓延开来，水泵站即将失守。数百名奉命坚守岗位的官兵被困在卡死的舱门和变形的舱壁之后，一旦海水涌入他们的舱室，他们必死无疑。阿部大佐到这时才意识到“信浓号”要拼死求生了，他向横滨发出了求救信号，随即指挥遭受重创的军舰掉头向北，想要在最近的岛屿上搁浅。

东方海平线上升起了第一缕曙光，月亮也已西斜。受伤的航母向北蹒跚而去，三艘驱逐舰紧紧护卫在它身旁。它巨大的上层建筑和烟囱如同醉汉一般向右歪斜着，滚滚浓烟紧随其后，随风飘去。早晨7点，它的轮机由于蒸汽不足而停机。“信浓号”瘫痪在了海面上，在海浪的冲击下，舰体每横摇一次，右倾都会加重一点。阿部命令两艘驱逐舰“浜风号”和“矶风号”前来拖曳这艘6.5万吨的航母，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番努力以钢缆断裂告终。

阿部迟迟不肯下达弃舰令，数百名舰员为此付出了性命。从舰底淹没区域逃出来的人涌上了机库甲板和飞行甲板。纪律即将崩溃，至少在舰上部分区域是如此。水兵们慌成一团，没有命令就跳进了海里。9时30分，“信浓号”缓慢而无可阻挡地向右翻倒。海水涌入了飞行甲板上的主升降机井，把水兵们冲倒在地，抛进了机库。当烟囱没入水中，海面上的几十人都被吞进了它黑洞洞的大口。当阿部最后下令弃舰时，许多舰员已经跳进了海里，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为时已晚。在这艘翻倒的大海兽周围半英里范围内，到处都是攀爬在残骸上等待护航驱逐舰救援的逃生者。

阿部大佐已无意苟活，一众军官僚友也决意与他同死。他们沿着严重倾斜的飞行甲板爬到舰首，他们知道这里将会是军舰最后沉入大海的地方。当舰尾没入水中，军舰又开始回转，恢复了左右两侧的平衡。它的舰首完全抬离海面，高高扬起，飞行甲板已近乎垂直。当海水从舰尾涌入时，“信浓号”这个姿势保持了一段时间，似乎纹丝不动。而舰体内

部却传来了爆炸声，空气挤出时的咝咝声，以及重型设备和大块残骸松动后沿着舰体轴线坠落时的碰撞声。它缓缓沉入水中，直到海水最后吞没了它金色的十六瓣菊花纹章。阿部和其他1 400名舰员一同沉入了深渊。

“信浓号”的处女航到此落下了帷幕。

12月15日，“射水鱼号”回到了关岛，乔·恩莱特却遭遇了对他击沉战果的一片质疑之声。海军情报部门完全不知道这艘舰的存在，他对目标上层建筑和倾斜烟囱的描述和日军舰队中已知的任何一艘航母都对不上号。11月28日，太平洋监听站截获了一条日本电报并很快破译了出来：“信浓沉没。”美军没有这一名称的日舰的记录，但“信浓”是本州岛东北方一条主要河流的名称。根据日本海军固定的舰艇命名传统，这个名称意味着目标可能是一艘巡洋舰。基于此，洛克伍德倾向于认定“射水鱼号”击沉的是一艘级别不明的重巡洋舰，可能是彻底重建的老舰。

但是恩莱特确定自己击沉了一艘航母，并且拿出了那张他在通过潜望镜观察“信浓号”时画的铅笔草图来佐证观点。珍珠港的分析人员不得不表示同意：这张详细的草图画的确实是一艘航母。与此同时，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有人指出，“信浓”也是日本长野地区一个古国名，这意味着它也可能是一艘航母的名称。这样，洛克伍德便认定“射水鱼号”击沉的是一艘2.8万吨的“飞鹰级”航母。^[69]

直到战后，整个真相才浮出水面。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证明，“射水鱼号”击沉了一艘6.5万吨的航空母舰，这令它成了单次巡逻击沉吨位最高的潜艇。为人谦逊的恩莱特总是强调他只是运气好，瞎猫碰到死耗子，让之字形航行的“信浓号”撞进了自己的射击窗口。这固然是没错的，命运把胜利交给了“射水鱼号”。但是恩莱特也确实把手中的牌打得完美无瑕，为此，他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1] Wylie, “Reflections 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2]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pp.32—33.

- [3]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p.2.
- [4] USSB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p.11;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 p.176, Table C—G9.
- [5] USSB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p.13.
- [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386.
- [7] Halsey to Nimitz, September 28, 1944, Halsey Papers.
- [8] Nimitz to Halsey, October 8, 1944, Halsey Papers.
- [9] MacArthur radiogram to Marshall, February 2, 1944, p.1; RG—4, Records of Headquarters, U.S.Army Forces Pacific (USAFPAC), 1942—1947,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10]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p.173.
- [11] John W.Clary, “Wartime Diary,” accessed January 3, 2018, http://www.warfish.com/gaz_clary.html.
- [12] Beach, *Submarine!*, p.59.
- [13]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Pearl Harbor.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 [14] “U.S.S.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17, 1943, *U.S.S.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69.
- [15]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Pearl Harbor.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 [16] John W.Clary MoMM1c, “Wartime Diary.”
- [17] 日本人发音不准, “Sorry”（对不起）都会被读成“Solly”。——译者注
- [18] “U.S.S.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25, 1943, *U.S.S.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75.
- [19] Ibid.
- [20]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Pearl Harbor.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 [21]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 Pearl Harbor, and *Wahoo* patrol report, March 22, 1943.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22] “U.S.S.Wahoo, Report of Fourth War Patrol,” entry for March 25, 1943, *U.S.S.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76.

[23] Beach, “Culpable Negligence,” in Sears, *Eyewitness to World WarII* (first published December 1980 in *American Heritage*), p.74.

[24] “非我发明综合征” (“not invented here” syndrome), 指的是一个组织对非自身原创的外来事物持抵制态度的现象。——译者注

[25] Blair, *Silent Victory*, p.402.

[26] *Ibid.*, p.403.

[27] “U.S.S.Wahoo, Report of War Patrol Number Six,” Item (O): “Health and Habitability,” *U.S.S.Wahoo* (SS—238), *American Submarine Patrol Reports*, p.138.

[28] “Recorded interview, Commander Dudley W.Morton,” September 9, 1943, SubPac headquarters,Pearl Harbor.NARA, RG 38: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Interviews and Statements, Box 20.

[29]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p.114.

[30] CINCPAC to COMINCH, 7 November 1944, “Operations in Pacific Ocean Areas, June 1944:Part VI, Pacific Fleet Submarines,” p.18, Map Room Files, USN Action Reports, Box 183, FDR Library.

[31] USSBS,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p.114.

[32]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December 10, 1945.

[33] Tillman, *Whirlwind*, p.34.

[34] Phillips Jr., *Rain of Fire*, p.17.

[35] Sweeney, *War’s End*, p.56.

[36] 地面速度：航空术语，指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与其相对的是“空速”，即飞机相对于气流的速度。——译者注

[37]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21.

[38] *Ibid.*, p.322.

[39] Craven and Cate, 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5, p.546.

[40] Hansell quoted in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96.

[41]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A Memoir*, p.175.

[42] Letter written by Charles L.Phillips Jr., quoted in Phillips Jr., *Rain of Fire*, p.32.

[43] November 4, 1944 entry,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25.

[44] Marshall Chester diary, November 18—26, 1944, in Brawley, Dixon,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28.

[45]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1 labeled “Gen.Spaatz,” entry dated November 23,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149.

[46] Hansell quoted in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01.

[47] Submarine Division 102, “First Endorsement to CO *Archerfish* Conf.Ltr.SS311/16—3, Serial 013—44 dated December 15, 1944,” p.1, Item 3, appended to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December 15, 1944.NARA, RG 38: U.S.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1941—1945.

[48]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6, 1944, p.7.

[49] 人们会记得，就在5个星期前，“鲛鱼号”在另一名艇长的指挥下，在巴拉望水道伏击了栗田将军的中路舰队，打响了莱特湾海战第一枪。——作者注

[50] “真方位”是航海术语，指以地球北极点方向为0°，顺时针计算方位。与此相对的是“磁方位”，以北磁极为0°。——译者注

[51] 这里的“点”是航海术语，将360°圆周进行32等分，1“点”相当于方位11.25°。——译者注

[52] Enright and Ryan, *Sea Assault*, p.46.

[53]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8, 1944, p.8.

[54] Oshima Morinar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49.

[55] Enright, *Sea Assault*, p.95.

[56] Ibid.

[57] Ibid., p.103.

[58] Ibid., p.114.

[59]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8, 1944, p.9.

[60]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9, 1944, p.9.

[61] Enright, *Sea Assault*, p.178.

[62] Ibid., p.183.

[63] Ibid., p.184.

[64] Ibid., p.185.

[65] Ibid.

[66] Ibid., pp.186—87.

[67] USS...*Archerfish*, “Report of Fifth War Patrol,” SS311/16—3, Serial 013—44, December 15, 1944, enclosure (A), entry for November 29, 1944, p.10.

[68] Enright, *Sea Assault*, p.201.

[69] Ibid., pp.245—46.

第八章

莱特岛周围的海面上满是大海战之后美日两军沉舰留下的碎块和残骸。苏里高海峡沿岸的沙滩上满是油污。尸体随着潮汐被冲到岸边——大部分是日本人。美军第7舰队一名军官发现这整个区域弥漫着“腐尸烂肉的臭味”。^[1]根据萨马岛上一名和当地抗日游击队协同行动的美军情报官的说法，在栗田舰队和“塔菲”编队海战之后的几天里，海滩上可以找到许多“财宝”。一箱箱口粮漂到了岸上，里面有饼干、奶酪、果酱、脱水土豆、午餐肉、香烟，还有咖啡。衣服和床垫都被当地菲律宾人拿走了。还有一本被水浸透的简装版《乱世佳人》小说被摊在太阳下面晒干。一桶桶汽油被拿走藏了起来。^[2]有一具无头尸体被冲上海滩，可能是日本人：当地人把他架在一堆木头上火化了。

莱特湾的封闭水域里挤满了金凯德运输船队和两栖舰队的约650艘船，它们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把物资卸载到登陆滩头的工作需要许多个星期。海面变得污浊不堪，它变成了这座超过10万人的水上城市的露天污水沟。“海湾里的水发绿，满是许许多多船上的屎和尿。”一名水兵在家信中如此写道。^[3]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日军空袭，舰队施放了灰色、棕色、黄色的化学烟雾。登陆艇尾部的架子上放上了发烟罐，运输船的上风位置布放了发烟浮标，装在大型舰船上的贝斯莱尔油雾发生器能够一次施放出可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面积烟雾。^[4]每到薄暮或破晓的空袭高危时间，整个海湾都会笼罩上一层薄纱。

莱特岛的东部海岸很适合两栖部队的后勤补给。长长的白色沙滩向大海延伸不远，就突然变成适宜航行的深水区，入口水道处也没有珊瑚礁阻碍。大型船只、坦克登陆艇和坦克登陆舰能够面朝海滩，通过跳板

或浮桥栈道直接卸载物资。登陆舰艇上的吉普车、卡车和坦克可以直接开到岸上。塔克洛班附近海岸航拍的照片中能够看到几十艘这种大型两栖舰艇，船头挤在海滩上，跳板如同舌头一样从打开的蚌壳式艏门中伸出来。锚泊在海岸外的运输船和海滩之间的水面上，数百条小艇拖着白色的尾流来来往往。在A日之后的2个月时间里，金凯德的两栖舰队平均每天都会向那些海滩卸载1.1万吨的武器、弹药、补给、车辆，以及各种物资。[\[5\]](#)

但是拼了老命的卸载却也让登陆区域的物资堆成了一团乱麻。在1944年10月时，这已经是个老问题了。和以往一样，两栖舰队指挥官责怪登陆海滩人手不足，而地面部队指挥官则说他们的部队都在岸上打仗（这也不无道理）。海滩旁边的平坦野地很快就成了拥挤的物资堆栈，覆盖了许多平方英里的地面。物资大致堆放成格子状，成堆的板条箱、油桶和停放的车辆之间是土质道路。大批的军用物资就这么暴露在敌人的空袭面前，许多物资在战役第一周就被毁掉了。例如，10月25日傍晚，一架日军轰炸机就击中了一个含有4 500个汽油桶的堆栈，大火直到24小时后还在烧。但是更严重的毁坏来自没完没了、瓢泼而下的季风雨，雨水把大大小小的道路变成了泥潭，向涨水的棕色河流拉出一道道冲沟。艾克尔伯格将军形容塔克洛班以南的沿岸区域是“沼泽和泥坑，别无其他”。[\[6\]](#)

美国陆军航空队第308轰炸联队的一支地面分队正在塔克洛班机场上施工，他们快马加鞭，想要尽快把这里建成一座大型航空兵基地。但是环境对他们很不利。地面松软而湿滑，美军的推土和平整能力远不足以对付这一大片泥潭。卡车沿跑道全线倾倒土方和碎石，但是附近找不到珊瑚矿，因此也就没有制造混凝土和沥青所需的合适材料。舰载机常常在这里紧急降落，迫使建筑队伍离开跑道。勇敢的人们会举着旗帜和火把站在跑道旁，标示出飞机要规避的重要位置。坠机几乎是家常便饭。这时候推土机就会把残骸推到机场旁边。大雨和敌人的空袭常常会打断施工，就和在莱特岛的其他地方一样。马斯顿钢板被送到岸上，铺

设在跑道表面，但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钢板下方的松软泥土常常会让紧密排列的钢板滑动开。位于南方的杜拉格、巴育、布里和圣巴勃罗的机场也受到相似问题的困扰。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直到1944年12月才开始大规模使用莱特基地，而此时菲律宾的战事已经转移到了民都洛和吕宋。

莱特岛之战的最初几天，美军占领的地盘比预期的更大，遭受的伤亡比担心的更少。美国第6集团军由出生在德国的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他们在岛屿的东部沿岸平原上部署了4个齐装满员的师。大海战之后，他们的海上后勤线也已安全。土路从低处一路攀升到高耸崎岖的细长山脊地带，山脊线大致沿南北方向延伸，覆盖着浓密森林的山峦向上隆起，顶峰高达4 000英尺。尽管天气阴晴不定，日军也在俯瞰各处的高地上占据了坚固的阵地，但坦克和重型装备可以开上这样的道路。在岛屿北端附近，东部的莱特谷和西边的奥尔莫克谷经由2号高速公路连接到一起，这是一条陡峭而曲折的道路。它沿着岛屿西海岸向南延伸到奥尔莫克港和更南边的拜拜镇，又在这里转向内陆，从高山上越过岛屿中部，最终止于东部海岸的阿布约港。

第6集团军起先向内陆稳步推进，日军则边打边撤。前进巡逻队越过岛屿中央的山腰地带，没有遇到敌人的严重抵抗就拿下了拜拜镇。富兰克林·C.赛伯特少将指挥的第10军肃清了莱特谷北部，开始沿着圣华尼科海峡海岸向北推进。24日，第8骑兵团的部队乘坐登陆艇越过海峡，在萨马岛上的拉巴斯登陆，从这里他们可以防止日军乘坐小艇向海峡发动袭击。牢固控制了水道之后，美军现在可以通过沿岸海路运输部队和物资了。

11月7日，美军第24师的部队在岛屿北部沿岸卡里加拉湾西侧突击上岸。从卡里加拉南下的道路陡峭、曲折，而且常常遭到暴雨侵袭。向南边的高地推进时，美军遇到了日军设在一座森林密布的马蹄形山上的坚固防线，于是这里成了美军口中的“断颈岭”。精锐的日军第一师团在这里构筑了用原木铺设的战壕和火力点网络，并藏身其中。这里的战斗

愈加艰难而激烈，美军在此地驻足不前了近两个星期。

直到麦克阿瑟登陆前夕，日本陆军的指挥官们还在为迎击美军进攻的战略争论不休。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伯爵元帅统管着整个南太平洋和大部分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6个月前的1944年4月，他把他的司令部从新加坡搬迁到了马尼拉。他点名要山下奉文中将来负责菲律宾的防守，山下奉文由于在1942年初率军打下了马来亚和新加坡而声名鹊起。10月初，山下来到马尼拉，此时距离美军登陆莱特岛只有两个星期了，他却发现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日军并没有确定的应对之策。菲律宾的日军指挥官预计美军会在10月1日左右登陆，但地点却不知道。南方的棉兰老岛显然是个可能的登陆地点，莱特岛也是——但是美军大胆直接进攻吕宋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他们面临着和1941年12月时的麦克阿瑟相同的困境——庞大的岛群为拥有海空优势的进攻方提供了数百个可能的进攻入口。

关于应对战略，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使马尼拉的日军司令部四分五裂。有些人认为空中优势才是唯一有效的防御，他们想要把陆军的所有人力和资源用来建造和升级机场。1944年8月底之前，日本陆军确实将其大部分力量都用来建造和升级这一区域的机场，尤其是吕宋区域。大范围的分散部署是这一战略的基石，即把飞机分散布置到众多位于偏远和森林地带的小型土质机场网络里。但是另一派指挥官想要倾其全力，在最可能遭到登陆的海滩修筑固定工事，或者在地形有利于防守的高地上建造坚固支撑点。这又是两派观点之争，一名高级军官将其总结为“滩头歼敌”和“诱敌深入”之争。^[7]

然而在1944年10月中旬，更加急迫的问题是，日本陆军是否应当将主力保留在北方的主岛吕宋岛？是否应该尝试运送大部队去迎击进攻莱特的敌人？当10月18日美军战舰首次炮击莱特岛滩头，特种部队占领莱特湾入口处的小岛时，这个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山下将军想要在莱特岛打一场规模有限的迟滞作战。他反对从吕宋抽调大量部队，觉得其中许

多部队会在海上损失掉。美军航空兵和潜艇对运兵船的攻击已经令南太平洋日军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是其他一些人则相信了日本海军关于10月12日至15日在台湾外海重创美国第3舰队的说法。接下来海军又报称在莱特湾海战中再获大捷，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寺内元帅坚持要增援莱特，他要求山下必须执行命令。山下对这一他认为是灾难性的决策大为光火，但还是命令从棉兰老、吕宋和米沙鄢群岛的其他岛上大规模抽调部队，通过奥尔莫克湾的“后门”运往莱特岛。^[8]

美军在莱特岛登陆时，岛上大约有4.3万名日军，是美军情报部门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左右。在战役期间，日军还想方设法向岛上送来了3.4万名援军。他们从马尼拉派出了9支大规模的增援船队，还有数不清的小部队从棉兰老和米沙鄢群岛乘坐小艇或驳船上岛。大约1万名日军在前往莱特岛途中由于运输船遇袭而损失。许多到达莱特岛的人也因此失去了装备和重武器，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上岸后能发挥的作用。然而，一流实力的第一师团在战役第一周来到岛上，还是大大提振了日军的信心和士气。“我们曾满怀希望地讨论在11月16日进入塔克洛班。”师团参谋长友近（Tomochika）将军如此说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活捉麦克阿瑟的事情，美国人若想把他赎回去，就要“美国军队全部投降”。^[9]

日军早期的计划打算将第一师团部署在卡里加拉周围，第二十六师团放在南方几英里外的伽罗。补给线将以奥尔莫克为起点，通过海运沿海岸延伸。然而11月1日，位于奥尔莫克的莱特岛日军司令部获悉，美军部队已经穿越其登陆滩头前方那片难以通行的区域，越过卡里加拉一线。美军从岛屿东部海岸最初登陆地点发起的地面装甲突击令日本人大惊失色。许多大队规模的部队被消灭殆尽，守岛司令部发现自己甚至连和一线部队保持联系都很困难。于是日本陆军被迫退往卡里加拉西南边的山区，那里的地形更有利于防守。但是这一机动却导致他们失去了与海岸的联系，从而难以维系由奥尔莫克延伸过来的陆上补给线，致使后勤问题恶化。

莱特湾大海战之后，大获全胜的美国海军第3舰队也已筋疲力尽。自从10月上旬以来，飞行员们几乎整天都在飞作战任务。舰载机大队指挥官警告称严重的战斗疲劳综合征正在官兵中蔓延。“黄蜂号”上的一名航空医官判断，这艘航母上的131名空勤人员中，只有30人还适合继续每天飞任务。^[10]各舰上的大部分舰员也都有两三个月没体会过脚踩在土地上的感觉了。哈尔西想要把他的舰队拉回乌利西环礁，在接下来的“热足”行动之前短暂休整——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对日本本土发动航母空袭，暂定在11月的第三周进行。哈尔西在向所有指挥官发出那份夸口说日本海军已经被“打败、赶走和粉碎”的电报之后4分钟，他就向金凯德发电：“关于下一步作战计划，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前所未见的连续16天战斗之后，快速航母部队需要补给，舰载机大队也已很疲劳。”^[11]

但是金凯德，或许还包括麦克阿瑟，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建议，他们希望第38特混舰队一直待在战区，直到陆军第5航空队做好准备接管莱特岛滩头的空防为止。金凯德报告了他的护航航母部队在萨马岛海战中所遭受打击的详情。它们的状况已经无法保持对运输船队和滩头的空中掩护：“护航航母部队在飞机防空巡逻方面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它们可能很快就无法再作战了。”陆军飞机也还无法承担空中掩护之责，因为塔克洛班和杜拉格机场以其现状还无法接收它们。此时此刻，哈尔西至少还要留下一支航母大队“支援和掩护莱特湾区域，或许还要保护护航航母部队”。^[12]

有些事大家都明白，金凯德无须点破：哈尔西必须弥补自己最近所犯的错误。既然让“塔菲”编队遭到栗田突袭的责任得由第3舰队的老大来承担，那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来补足空中力量的缺口。在随后的几天里，哈尔西再次急切请求离开战场休整，但金凯德坚持要求继续提供空中掩护。疲惫不堪的不仅仅是空勤人员：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也感受到了长时间海上作战带来的压力。后来他承认：“我累了，身心俱疲。我们都一样。”^[13]

后来在10月26日，哈尔西直接向麦克阿瑟提出了请求：“打了17天之后，快速航母部队实际上已经用完了炸弹、鱼雷和补给，飞行员们都很疲劳。我无法再提供任何大范围的直接空中支援了。你的岸基航空兵何时才能接管目标上空的空防？哈尔西。”[\[14\]](#)

尼米兹在他珍珠港的司令部里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局势的进展。他知道第3舰队已经绷到了极限，但海军已经答应过要为支援莱特岛作战提供航母空中掩护。萨马岛外海几近灾难的战斗则进一步加大了他投下的赌注。关于跨军种和跨战区协作的问题，如果太平洋方面自己解决不了，那就只能踢给参联会。更糟糕的是，美国国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士和媒体已经将矛头对准了太平洋上的双战区指挥体系。杜威州长已经在参选总统时提出了此事，而大选就在两个星期之后。如果太平洋方面出现重大纰漏，麦克阿瑟那些强有力的后台就会坚持要求把整个战役交由他来全权指挥。

海军高层一向远离政治，正如他们的职业准则所要求的那样。但是尼米兹、金和莱希都在华盛顿工作多年，对这个城市的套路了然于心。太平洋的统一指挥问题是政治斗争的焦点。这个威胁是现实存在的。他们必须把现有的双战区指挥模式用好。

尼米兹截收到哈尔西向麦克阿瑟发出的再三请求（文件号261235）之后，迅速着手干预。哈尔西将补给不足作为自己返回乌利西的一项重要理由，尼米兹不相信。他向他的这位舰队司令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质疑，电报也同时抄送给了金和太平洋舰队后勤司令威廉·L.卡尔霍恩中将：“我不理解你261235号文件中关于补给的說法。请报告你舰队中各类作战舰艇上干货补给的大致可维持天数，并列出因数量不足而影响作战行动的关键物资类型。”[\[15\]](#)关于为莱特湾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以其不容置疑的命令要求哈尔西留在战位上，这份电报也抄送给了金凯德和麦克阿瑟：“我的8—44号作战计划仍然有效。掩护和支援西南太平洋部队，直到我发出新的指示为止。”[\[16\]](#)

哈尔西只好闭嘴，安排他的各个航母特混大队轮流返回乌利西环礁“轮休”。第38.1（麦凯恩）和38.3（谢尔曼）这两支大队退回乌利西休息和补充，其余两支大队——38.2（博根）和38.4（戴维森）大队——则留在萨马岛外海为莱特湾提供空中掩护。然而10月30日，刚刚在乌利西锚地停泊了两天的谢尔曼特混大队又被哈尔西紧急召了回去。日本人发动了凶猛到出人意料的空袭。吕宋的机场得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本土的飞机增援。不仅如此，大规模的自杀性空袭也带来了持久且令人胆寒的新威胁。“神风”的时代到来了。

博根的旗舰“勇猛号”在10月29日被击中。下午，一支美军空袭机群轰炸和扫射了马尼拉北面的日军机场。几架“神风”机显然尾随着返航的美军飞机找到了航母。其中一架飞机从浓云中俯冲而下，撞中了“勇猛号”右舷的40mm炮组。航母的战斗力未严重受损，但是这一击还是炸死6人，击伤10人。

第二天下午，戴维森的大队遭到了一大群“神风”机的攻击，这次美国人付出了高得多的代价。戴维森将军的参谋长吉姆·拉塞尔在“富兰克林号”的指挥舰桥上目睹了这次攻击。5架敌机躲过了战斗空中巡逻队的截杀，向特混大队的核心区发起了俯冲：“我们一下子就意识到，他们正从很远的地方歪歪斜斜地发动自杀式俯冲。”^[17]每一艘军舰上的每一门高射炮都开了火。“企业号”的炮手们打断了一架来袭敌机的机翼，令其坠入距离军舰仅有30英尺的海面上。“圣贾辛托号”的炮手也打掉了一架，拯救了他们的母舰。“贝劳伍德号”的炮手击落了一架“神风”机，却未能击落第二架——那架飞机撞中军舰后部，穿过飞行甲板，在机库里引发了毁灭性的火灾。第五架飞机命中了“富兰克林号”，正中飞行甲板中央。飞机在3号升降机前方砸了一个40英尺宽的洞，在升降机井中爆炸。舰员们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才控制住火势。

人员损失很惨重：“贝劳伍德号”上92人战死，“富兰克林号”上54人死亡。“贝劳伍德号”上有12架飞机被焚毁或者损伤至无法修复的地步，“富兰克林号”上则有33架这样的飞机。它们被抛弃了。

根据拉塞尔的说法，“富兰克林号”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居然被完整找到了。“你知道，”他说，“虽然爆炸了，但那家伙的尸体还能认出来。他的丝绸飞行服把他包裹起来，至少你还能看得出那是个人。当然，他已经不成人样了。”[\[18\]](#)

日本的国营新闻媒体报道称，莱特湾中又迎来了一次辉煌胜利。据报道，日本帝国海军埋头苦干，“一遍又一遍地加强训练”。它耐心地等候美国人越过辽阔的太平洋，到那时他们将会遭遇补给线过长之不利局面。最终，美国舰队冒失地闯进了台湾岛和菲律宾强大的日本航空兵基地的飞行范围，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接连遭到两次大败。NHK广播电台的一名评论员向听众保证，战争结束已为时不远：

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美国人已经输掉了战争。日本军队已经在莱特岛及其周围占有了彻底的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而强大的日本增援部队正在发动进攻。所有日本人在未来作战中所要做的就是向敌人展示出他们的不屈精神，敌人便会心惊胆寒，不战而败。当然，这些西方人不会理解这种强大的东方力量。[\[19\]](#)

报道特别宣传了10月25日下午萨马岛外的“神风”攻击。日本人此前曾或明或暗地听说过所谓“特攻部队”和“肉弹”——但是从此时起直到战争结束，“神风”是日本报纸和广播中最重要的报道对象。有人估计，关于自杀飞行员的报道占据了这一时期东京所有报纸大约一半的版面。虽然涉及陆海两军矛盾的说法都禁止刊登，但所有明白弦外之音的人都能看出来，两个军种在竞相宣传自己的“特攻”。[\[20\]](#)海军是先行者，还在10月15日牺牲了有马将军——陆军仅仅5天之后就跟上了趟，大张旗鼓地在茨城县的鉾田飞行训练基地创建了“伴田部队”。帝国大本营指示这些新的自杀部队去“破坏敌登陆部队在海上的增援和补给（包括摧毁锚地附近的运输船），以及摧毁敌人航母打击特混舰队（包括支援登陆作战的海军舰艇）”。[\[21\]](#)

“神风”在战术和宣传两个方面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军国主义政府对于民众日渐消沉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国内战争报道可信度越来越多的质疑感到警觉。必须想办法重树人们对最终胜利的信念。这些自杀航空兵和其他新玩意儿——诸如“樱花”“回天”，以及越洋气球炸弹——实际上和同一时期纳粹宣传的“神奇武器”如出一辙。在一定程度上，所有这些都是宣传手段，旨在重振轴心国政府愈加低落的可信度，并巩固他们的权力。在日本，当权者常常能用耻辱感撬动社会思想，“神风”更是被塑造成了普通民众的榜样。在10月下旬报道对第38特混舰队的自杀攻击时，《每日新闻》的编辑写道：“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学习这些年轻人的高贵精神。”^[22]小矶首相则要求军工领域的工人们“学习特攻队勇士的榜样，在生产领域展示出尤胜于此的必胜精神”。^[23]

“神风”部队在陆海两军中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并正规化。整支整支的航空队被改编为特攻部队，还得到了或文艺或神秘的夸张命名。数以百计的飞机和飞行人员在1944年11月被派往菲律宾去执行特攻任务，即便大量自杀机如此在战斗中损失掉，“神风”部队依旧在迅速扩大。200架陆军飞机飞往莱特岛西边的内格罗斯岛，加入那里富永恭次中将的第四航空军。在日本的训练基地，整个班级的飞行学员——有些人刚刚掌握最基础的飞行技术——被纳入新组建的“神风”部队。许多人奉命直接飞往菲律宾，他们几周甚至是几天后就要发动进攻。那些刚刚招进来，还没有开始初级飞行训练的学员被告知，他们将从一开始就作为“神风”队员进行训练。这样日军就建立了一套训练体系，确保到1945年春季时将会有大量自杀飞行员可用。

福留中将起先反对大西关于让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的两支航空舰队大规模使用自杀战术的提议，他的第二航空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仍然在执行常规任务。然而，10月25日关行男大尉那次出击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这令福留印象深刻，而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传统的空中战术已经失效。次日，10月26日，两支航空舰队合并，福留繁任总司令，大西泷治郎担任他的参谋长。从那一天起，福留说：“‘神风’或曰特攻飞机将成

为我这支航空部队的核心。”^[24]和其他高级将领一样，他本人并不愿意让这些年轻人去送死，尤其是在东京方面传来昭和天皇对关大尉进攻一事的反应之后。裕仁问海军军令部总长：“必须要如此极端吗？当然他们做得非常好。”^[25]大西将军将这位现人神的询问解读为批评，并深受困扰。但是他和福留都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行办法了。

下级官兵中也有一些违抗的人。老资格的飞行队长藤田怡与藏少佐被要求选出12名飞行员来执行自杀任务。“我不干，”他告诉上级，“你要想去干，我没意见，你自己去挑飞行员。”之后他就回到宿舍躺在了床上。藤田战后说：“仗打到这个时候，我确信高层是疯了。最后这个战斗机队还是执行这个任务了，再也没听说过有关他们的消息。”^[26]有些飞行员被吓坏了，却不敢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对。一名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大学生回忆说，听说他的训练班级被指定执行“神风”作战时，心里“翻江倒海”。但他不敢说，即便对同学也不敢。“我们无法分享彼此的疑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大学。如果我表达了担心，我的大学就会蒙羞。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27]

然而根据一些逸事提供的证据，日本大部分飞行人员不仅愿意，甚至急于作为“神风”队员献出生命。招募志愿人员时，应募者一致同意是很常见的。一名飞行队长回忆说，他的人围绕着他，拉着他的胳膊，哭喊着说：“让我去！请让我去！我！”他还厉声对这些人说：“每个人都想去，你不能这么自私！”^[28]根据航空兵指挥官猪口力平的说法，那些被指定执行后续“神风”任务的飞行员在每一次任务之前都热情满满地想要参加。“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去？”他们问道，或者是：“我还要等多久？”^[29]

“神风”队员已然成了一个特殊人群。他们被视为“脱离凡俗的神祇”，受到那些军衔、经验和技能都远高于他们的同僚的善待和尊敬。在等候执行特攻任务的时候，他们有独立的宿舍可以住，通常都是基地里最好、最干净的房间，伙食也是按照高级军官的标准供应。常规航空

兵人员和其他部队的战友会送他们昂贵的礼物。本土的民间团体，包括初中生，会带着仰慕之情给他们写信，还会附上礼包一起寄来。战争通讯员和摄影师四处寻找他们，进行采访和拍照。到处都有盛宴款待，少见的珍馐美味被端放在他们面前，还有艺伎在一旁载歌载舞，以娱其心。军衔高低在他们面前不值一提。猪口中佐有一次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岛机场与“神风”飞行员进行了交流。一个飞行员指出，在日本神道教的英灵殿，也就是靖国神社里，战死者灵魂的座次应当按照来到此地的时间来排序，而不是按照军衔。

“那样我就会排在你前面，中佐，”他说，“因为你在亲自上阵之前还要派出去许多飞行员。”

“话说，”另一个人说道，“他到靖国神社报到时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让他当司务长管伙食！”

这番答复引来一阵哄笑。

猪口接了茬儿，他哀求下属们：“你们就不能给我个好点的差使吗？”

“好吧，”有人答道，“可以当勤杂官。”笑声更大了。[\[30\]](#)

新的“神风”飞行员在抵达菲律宾时只接受了7天的入门培训，包括课堂教学和基础飞行练习。典型的出击队形通常是一个小编队，由4架到6架飞机组成，其中有一两架是护航——观测机。（护航机由技术更好且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他们不会发动攻击。其任务是把“神风”机带到目标上空，观察战果，并且安全返回基地。）他们会采取两种接敌和攻击方式：一是高空，一是低空。前者，飞机在2.5万英尺或者更高的高度上接近敌舰队。接近到相距40英里时，飞机会投下大量的“窗户”——铝箔条——以干扰美军的雷达系统。当无处不在的F6F“地狱猫”蜂拥而至，护航机就会以花哨的防御机动把它们诱开，“神风”机则俯冲加速并寻找云层掩护，争取接近到能向美军舰队发动攻击的距离。低空接敌时，飞机在二三十英尺的掠海高度飞行。由于地球曲率和海面

杂波干扰的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通常在大约10英里外就无法探知这些低空来袭的敌机。接近到距离敌舰队五六英里时，低空飞行的“神风”机会突然拉起，爬高到约2000英尺。如果那里有云，它们就会躲进其中，寻找目标。[\[31\]](#)

最后的攻击阶段——高空和低空模式都一样——“神风”队员们被要求像俯冲轰炸机那样大角度冲向目标。他们要瞄准目标的上层甲板。进攻时俯冲角越大，他们的穿透力就越大。攻击航空母舰时，他们会瞄准飞行甲板上的一台升降机井。日本人相信这样撞进机库的机会最大，引发二次火灾和爆炸的概率也最高。（至少炸掉一台升降机可以阻断航母的飞机起落。）“神风”队员们还被告知，如果无法向飞行甲板发动大角度撞击，就要瞄准航母的岛形上层建筑，以期打死其高级军官，摧毁航母的神经中枢。[\[32\]](#)

11月的第一天，一批接一批的自杀飞机落在了莱特湾中金凯德将军第7舰队的头上。进攻从上午晚些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许多军舰靠着剧烈的机动才侥幸未被直接击中。高射炮摧毁了可能有20架敌机。有一架攻击机斜向撞上了驱逐舰“阿曼号”的主烟囱。大约下午1时30分，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了一小队来袭的敌机，它们正从高空高速俯冲，而空中却没有美军战斗机能去拦截。当一架爱知俯冲轰炸机破云而出时，驱逐舰“阿布纳·里德号”开始剧烈机动，舰上的40mm和20mm高射炮猛烈开火，人们看见来袭敌机的左翼被打了下来，但敌机残骸仍然靠惯性撞上了驱逐舰的右舷中部。

“阿布纳·里德号”的前部舰体燃起了大火，深水炸弹架和鱼雷发射管也面临被大火吞没的危险。水兵们匆忙赶在深水炸弹和鱼雷被烧炸之前把它们丢进海里或者发射出去。在被击中的驱逐舰近旁航行的驱逐舰“克拉克斯顿号”上，一名目击者惊异地看到一个不知名的鱼雷兵径直冲进火里操作鱼雷管。“电力显然已经被切断了，于是，他整个人都在火中，人工把鱼雷发射管转向右舷，用一把锤子人工射出了全部五枚鱼雷。”[\[33\]](#)这一壮举使得军舰免遭自身鱼雷之害，但是大火很快蔓延到弹

药库和临时弹药架，引发了一连串灾难性的大爆炸。当“阿布纳·里德号”的舰员开始弃舰，“克拉克斯顿号”靠了上去以捞救幸存者。然而就在此刻，另一架“神风”自杀机以近乎垂直的航线冲了下来。它差一点就击中了“克拉克斯顿号”，但是机上的炸弹却在军舰侧旁的海面爆炸，炸死5人，导致军舰下部舰体进水。尽管如此，“克拉克斯顿号”还是救起了187名“阿布纳·里德号”的幸存者。

一整个下午，一批接一批的“神风”机不断来到莱特湾，它们俯冲下来，往往落在让人心惊胆战的近处。当天傍晚，第三艘驱逐舰“安德森号”被直接命中。金凯德不得不让6艘军舰返回马努斯的干船坞去维修。

这天，莱特岛的登陆滩头仿佛成了众矢之的。美国陆军第5航空队一架巡逻机报称一支强大的日本特混舰队出现在棉兰老海，向东航行。这可能意味着第二次莱特湾海战，只是这一回盟军在此区域中的海军力量弱了很多。哈尔西对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十分怀疑，却也不敢怠慢，派出一支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舰队前去守卫苏里高海峡。^[34]（但第二天上午，事情就清楚了，这份侦察报告有误。）与此同时，日军空袭无休止地落在登陆海滩上。来袭敌机从低空飞来，借助周围的高山隐蔽自己的行踪。它们轰炸扫射了补给物资堆栈，已经上岸的坦克登陆舰，塔克洛班的机场，以及设在沿岸一群帐篷和棚屋里的尚未建成的各种指挥所。陆军第5航空队第308攻击联队的P-38“闪电”战斗机从10月27日起进驻塔克洛班参战，但是由于“机场环境恶劣”，其数量还不多。^[35]美国陆军航空队还有许多战斗机在地面上被毁，有一次空袭一下子就击毁了27架飞机。在11月的第一周里，日军向莱特岛滩头发动的常规空袭（非“神风”）摧毁了2 000吨汽油和1 700吨弹药。^[36]

金凯德实在没办法了。11月1日当天晚上，他向麦克阿瑟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说莱特湾的情况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敌人航空兵力的复苏令人警觉。他们对滩头的空袭显然未受阻碍，这可能会卡住陆军的后勤生命线，而且“神风”自杀机向海岸外舰队的攻击也是个愈加可怕的噩梦。他警告说，由于迟迟未能在塔克洛班和杜拉格进驻强大的陆军航空队兵

力，整个战役可能面临失败。[\[37\]](#)

与此同时，第7舰队的司令再次提出了为莱特湾上空提供更多舰载机支援的请求。哈尔西则答复说，他更愿意从源头上打击敌人的空中威胁，他要轰炸吕宋岛上的日本机场群。11月5日和6日，第38特混舰队的飞机重创了马尼拉北面的敌人各大航空兵基地，同时攻击了马尼拉湾里的舰船，被它们击沉的舰船之中包括“那智号”重巡洋舰，从苏里高海峡夜战中幸存的志摩将军的旗舰。然而，5日这一天，有几支“神风”机和护航机组成的小编队尾随返航的美军飞机找到了萨马岛以东的特混舰队。遭遇巡逻的美军战斗机时，日军飞机会迅速脱离战斗，之后寻找云层掩护，潜入特混舰队外围。下午1时39分，七八架敌机突破到了第38.3特混大队中央。其中大部分在向位于轮形阵中央的航母俯冲时被近距离高炮火力击落。一架飞机坠落在“提康德罗加号”右舷30英尺外，在海面上炸成一团火球。另一架飞机坚定地穿过高炮火墙，撞上了“列克星敦号”的信号舰桥。大火立刻在岛形上层建筑内蔓延开来，吞没了舰桥，摧毁了大部分通信设备和雷达设备。航母的飞机起落未受影响，但伤亡却十分惨重——42死126伤。伤者中包括了舰上很大一部分火炮部门和通信组人员，许多人都受到了严重的烧伤。“列克星敦号”只好返回乌利西维修，要在那里停泊17天。6日，它为战死者举行了海葬，葬礼期间，舰上的军旗（连同第38.3大队的军旗一起）降了半旗。[\[38\]](#)

“神风”在美国舰队的官兵中间引起了恐惧、害怕、仇恨以及（相当多的）关注。他们似乎确信了原本犹豫不定的一个想法，即日本人和自己不是一个“物种”——他们极端狂热，热衷于赴死，毫无人性。人们对怪异的、非人性的“他者”的这种印象激起了许多不着调的流言——他们穿着白绿相间的教袍，或者戴着黑色头巾，或者被镣铐锁在座舱里。有人称他们为“绿黄蜂”。他们引发了一种新的恐怖。一名驱逐舰水兵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一个邪恶的野兽驾驶着飞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直冲我而来，机翼上6挺机枪火力全开。看起来他就是冲我而来的。”[\[39\]](#)《时代》杂志的通讯员鲍勃·谢

罗德注意到太平洋上的美国水兵们谈论的几乎全部都是“神风”，再无其他。“没什么比看着一个人连人带飞机撞向敌人更令人敬畏的了，”施罗德写道，“没人想得到日本人能把中世纪式的宗教狂热和飞机这样的现代化机器结合到一起。”[\[40\]](#)

其他一些人的观点则有些“冷血”。此时人在美国本土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立刻就意识到，自杀攻击是日本对日益衰弱的航空兵力量的“十分理想而且经济”的运用方式，在战争结束前盟军将会始终面临其威胁。[\[41\]](#)吉米·萨奇是个传奇的战斗机飞行员，此时任第38特混舰队作战参谋，他认为“神风”是一种“远远领先于时代”的武器。一名决意自杀俯冲的飞行员能够在最后一分钟调整航线以命中目标，就像是人工制导导弹一样。“神风”飞行员对航空母舰尤为致命，因为他可以瞄准航母暴露的舰桥撞上去，或者想办法穿进机库，在那里，爆炸和火焰可以引燃燃油、爆炸物，以及其他可燃物。“那实际上就是一枚制导导弹，而此时我们还完全没有制导导弹这种东西，”萨奇说，“它由人脑、人眼和人手制导，因此比制导导弹更好，他可以观察情况，理解信息，改变航线，规避打击，命中目标。”[\[42\]](#)

在整个第38特混舰队中，渴望得到更多战斗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样的主张已经酝酿了数月，现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本海军大部分已经被击沉，美军舰队对传统舰载轰炸机的需求不再那么大了。“棕鞋族”们想要对标准舰载机大队的编成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增加“地狱猫”和F4U“海盗”。“在这种战争中，”盖里·博根在一份直接发给尼米兹和金的言辞激烈的电报中说，“[SB2C‘地狱潜鸟’]使飞机运作复杂化，而且占用了本可用于无价的舰载战斗机的宝贵空间。”他还补充说，训练体系也不是问题，因为现有的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还有那些在训的，可以直接转换到战斗机上。博根说他知道飞机的数量足够，可以立刻调到西太平洋来：“我们先前做的准备工作是为了打击敌人的力量来源，现在是时候出手了。”[\[43\]](#)

这份电报公然违背了通信规则，而且其语气近乎叛乱。博根当然知

道，一位特混大队指挥官不应该直接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电，遑论海军作战部长。尼米兹批评博根“不恰当地越级向上发电”，要求他把他的观点重新提交给哈尔西。^[44]但是这唇枪舌剑的往来电文却也凸显了舰队对这一需求的紧迫感。实际上航母部队的指挥官们几个月来都在要求得到更多的战斗机，而“神风”威胁的突如其来仅仅是加剧了这种短缺。

海军高层已经在竭尽所能地将更多的“地狱猫”及其飞行员送往太平洋，但是他们也担心这会打乱未来的计划。如果他们在1944年后期加速将新组建的F6F中队部署到太平洋，那就会面临1945年时战斗机不足的风险，而那时舰队需要保持齐装满员，以执行进攻硫黄岛、冲绳岛乃至日本本土的计划。“棕鞋族”们则认为轰炸机飞行员可以直接坐进战斗机的座舱。他们或许不能一夜之间变成战斗机王牌——但是在太平洋当前的情况下，即便是水平一般的F6F飞行员也比SB2C飞行员更有价值。博根坚持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只要两个小时的适应飞行就够了。

不仅如此，F6F“地狱猫”本身就是不错的轰炸机，即便它原本并非为此而设计。它的动力足以挂载一枚1 000磅炸弹，而且能在大角度俯冲时保持稳定。装备火箭弹时，它就常常如此行事，攻击地面目标的精确度比俯冲轰炸更高。“这就是那种难得一见的事情，你可以白得好处而无须代价，”萨奇说，“你投下炸弹，然后就得到了一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45]萨奇还想让航母也带上陆战队飞行员和他们的F4U“海盗”，他们最近刚刚开始从护航航母上起飞支援两栖作战。如果他们在小型的“吉普航母”上都能学会降落，那么在飞行甲板大得多的埃塞克斯级航母上降落也不会有问题。

尼米兹和金逐步接受了这些来自一线航空兵的坚决要求。他们此前已经把标准舰载机大队的编制从18架鱼雷机、36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改成了18架鱼雷机、24架轰炸机，“战斗机能装多少装多少”。^[46]11月29日，金再度批准了新的埃塞克斯级航母舰载机编成：73架“地狱猫”，15架“地狱潜鸟”和15架“复仇者”。然而，落实这些变动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舰载战斗机的需求量很大，但供应却很紧张。^[47]尼

米兹告诉哈尔西，他想要在关岛保留一批后备F6F飞机，但是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被哈尔西恳切的答复说服了：“急切地请你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时间很紧张，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了……自杀攻击若不加以应对，那么对我们的航母和你未来的作战都是个严重威胁。我们需要更多的战斗机来对付它，而现在要么少派一些战斗机到目标上空去，要么补充战斗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48]第二天尼米兹就改变了决定，把现有的整个后备战斗机群全部立刻交给第38特混舰队。但他仍然对1945年初可能出现的舰载战斗机短缺忧心忡忡。

在舰队里，航空兵参谋们发明了创造性的新战术来对付“神风”的威胁。第38特混舰队的4支特混大队被整编为3支，这样每支大队都能确保力量充足。队形中央的航母越多，上空的防空战斗机就越多；这还意味着更强大的护航舰队以及更集中的高炮火力。美军设计了一套被称为“驼鹿陷阱”的防御措施来对付日军出动“神风”编队尾随返航美军飞机攻击航母的战术。两艘驱逐舰（“看门狗”）被布置在距离航母特混舰队约60英里处，位于舰队和空袭目标之间的直线航线上。美军空袭机群返航时先飞往这些“看门狗”，在其上空环绕360°之后再返回航母。防空战斗机（“汤姆猫”）在驱逐舰上空巡逻，在返航机群兜圈子时靠上去检查，一旦发现日机便将其击落。这一过程被称为“灭虱”。^[49]美军飞行员被告知不要进入驱逐舰之间的区域，这样的区域被称为“开放狩猎区”。任何出现在这一区域的雷达信号都会被认为是敌人，并立即加以攻击。驱逐舰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神风”机进行早期雷达预警，低空的战斗空中巡逻队（所谓“杰克”）则会被引导前往截击。“我们告诉飞行员们，如果他们返航时没有在哨舰上空‘灭虱’，就很可能挨打，”萨奇说，“保证那片区域没有敌人就行了。如果有敌机攻过来，就像它们常干的那样，我们提前很久就能发现。这招就是这么奏效的。”^[50]

除了这些防御战术，他们还发明了一套进攻战术，被称为“大蓝毯”的空袭体系。在空袭日，航母部队会派出大编队的F6F“地狱猫”在吕

宋岛的敌人机场群上空巡逻，轮流值班，全天不断，这样就能直接在敌人各个基地上空保持压制。任何试图起飞或降落的敌机都会被击落。萨奇安排了三个班次的飞机来轮流执勤，各班次的起飞和降落时间都经过精心安排，以保障“大蓝毯”不出漏洞，“我们取得了相当惊人的飞机摧毁战绩，有些在空中，但大部分是在地面上”。[\[51\]](#)

新战术起初似乎取得了成功。11月19日，美军向吕宋岛发动的一轮空袭几乎未遇抵抗。当最后一批攻击机群返回特混舰队时，美机在距离特混舰队大约70英里处的哨舰外围拦截并击落了大约20架敌机，对手无一突破防御圈。

退往东方加油5天之后，第2和第3两支特混大队再次在破晓前高速冲向吕宋岛，在日出后不久放出了攻击机群。午后几分钟，第2特混大队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敌机的身影。此时6000英尺的空中有一层碎云，这为来袭敌机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中午12时52分，一群零式战斗机从云底冲出，向“勇猛号”、“卡伯特号”和“汉考克号”俯冲过来。其中一架飞机撞上了倒霉的“勇猛号”的左舷高炮平台，炸死10名舰员，炸伤6人。“勇猛号”损伤严重，但还扛得住，航速不减，继续前进。然而6分钟后，另一架零战从舰尾方向冲来，机枪喷吐着火舌，撞上了飞行甲板左侧。飞机残骸一路滑到了舰首，而炸弹却击穿了飞行甲板，在机库里爆炸。哈尔西将军在近旁的“新泽西号”上目睹了这次攻击，他写道：“[‘勇猛号’]在地狱里走了一遭。被击中后没过多久，它就被火焰包围；汽油燃烧的火焰从它的侧旁喷出；爆炸震撼着舰体；滚滚黑烟升腾到数千英尺高处，吞没了舰首的一切。”[\[52\]](#)“勇猛号”上有69人战死，17架飞机被毁。这艘骄傲却不幸的军舰再一次被迫退出战场，返回珍珠港维修。

第2特混大队遭到这场可怕的攻击时，第3特混大队的雷达屏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敌机，它们从东南方55英里外飞来。许多敌机遭到了战斗空中巡逻队的拦截，但还是有一些飞机逃进了云层。这些来袭者在特混大队周围和美军战斗机玩了大约20分钟的猫鼠游戏，随后开始高速下滑，

向目标冲去。谢尔曼将军的旗舰“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座40mm高炮向一架飞过来的D4Y“彗星”（盟军绰号“朱蒂”）轰炸机开火，命中了其左翼翼根。军舰的战时日志记载道：“这虽然没能阻止他，但至少令其向左偏航，因而未能击中排满了加好油、装好弹的飞机的飞行甲板后部。他撞在2号升降机前方飞行甲板中部距离左侧边缘15英尺处，炸成一团浓烟烈焰，看上去十分糟糕，实际情况却要好一些。”^[53]爆炸在飞行甲板上撕开了一个直径大约16英尺的口子，引发了大火，吞没了将军的住舱（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但是它造成的实际损伤和伤亡比“勇猛号”轻微不少。“埃塞克斯号”没有停顿，继续奋战，甚至还接收了11架无家可归的“勇猛号”的战斗机。

第二天，哈尔西向尼米兹拍发了一份电报，警告说菲律宾的空战局势已十分危急。日本人已经设法将他们的飞机大范围疏散到吕宋岛上的众多小型土质机场上，并且用植物枝叶和伪装网进行了妥善的伪装。单架飞机常常会隐蔽在距离跑道数英里之处，再利用暗夜的掩护或推或拉到跑道上。增援的飞机和飞行员源源不断地从日本和台湾岛飞来。第3舰队摧毁了数百架敌机，但仍然在挨打。许多航母遭到重创，包括“卡伯特号”、“勇猛号”、“列克星敦号”、“富兰克林号”，以及“贝劳伍德号”。还有许多军舰也遭到攻击，只是损失没那么重，但威胁却无处不在。莱特岛陆地机场建设的拖延，加之致命的自杀战术的出现，难免导致进攻民都洛和吕宋的计划被推迟。

与此同时，第7舰队也在莱特湾里遭到了打击。11月27日中午前后，T.D.鲁多克少将率领的一支由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特混舰队正试图从一艘1.4万吨的油轮上加油。上午10时50分，雷达显示大约30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从北面和东面飞来。它们的高度各不相同，有些刚好在碎云云底之上，还有一些是掠海飞行。舰队上空有几架陆军的P-38战斗机在巡逻，但它们不足以拦截所有的来袭敌机。靠在油轮旁的“西弗吉尼亚号”立刻松脱了加油管并脱离开来。5英寸高射炮低沉的轰鸣声开始接连响起，天空中顿时布满了棕黑色的烟团。

11时25分，三架“神风”自杀机冲向了轮形阵中央的战列舰。一架敌机落在“西弗吉尼亚号”近旁。两架同时冲向“科罗拉多号”，其中一架命中了该舰左舷的5英寸副炮组。19名舰员战死，72人受伤，但战列舰损伤轻微。另一架飞机瞄准了巡洋舰“圣路易斯号”，并冲进了其舰尾的机库。飞机油箱里的汽油引发了大火，军舰拖出了大股浓烟，这似乎在随后的战斗中引来了更多的“神风”自杀机。四架自杀机在冲向“圣路易斯号”时被击落，另一架撞上了其左舷水线上方。

根据巡洋舰“蒙彼利埃号”一位海军上士詹姆斯·J.费伊的日记，敌机似乎是从所有方向同时扑了过来。上午11时25分，战斗达到了高潮，“鬼子飞机落在我们四周，空中满是鬼子的机枪子弹。鬼子的飞机和炸弹在我们四周遍地开花。我们的有些军舰被自杀机、炸弹和机枪火力击中了”。[\[54\]](#)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里，40mm和20mm高射炮一直在开火，中间几乎没有停过。落下的高射炮弹和抛出的弹壳如同瓢泼而下的暴雨一般把海面打得水花四溅。“蒙彼利埃号”从头到尾都落下了被击毁的日本飞机的碎片，费伊的许多战友都因此受了伤。三架“神风”机在近距离上被打掉，其中一架飞机的残骸从海面上弹起来，撞上了军舰左舷的一座40mm高炮。几名舰员因四散的碎片和燃烧的汽油受了伤。费伊看到有一位炮长一直在向耳麦大吼大叫，却没有留意到耳麦的线路已经被弹片切断。“看起来就像是下了一场飞机碎片雨。它们落在军舰各处。不少人被鬼子飞机的大块残骸砸到。”[\[55\]](#)

这一切又在转瞬间平静了下来。下午2时10分，最后的敌机或逃走，或被击落。特混舰队周围的海面上漂满了飞机的残骸和燃烧着的汽油。“蒙彼利埃号”上无人死亡，但有11人受伤，其中有几人伤势严重。军舰上到处散落着日本飞机的残骸和飞行员血淋淋的尸体碎块。军舰的救生艇已经被击碎，救生艇吊索垂了下来，钢质吊柱也被炸弯。甲板上，空弹壳仍然滚烫，无法触碰。费伊战位周围的甲板上满是“血、肠子、脑子、舌头、头皮、心脏、胳膊之类的东西，都是鬼子飞行员的”。在水龙头被弄上来清洗甲板之前，一群人开始从这一堆恐怖的血

肉中寻找纪念品。一个陆战队员从敌人飞行员尸体的手指上摘下了一枚戒指，一个水兵捡走了一块头皮。“我们炮座上一个人拿来了一根鬼子的肋骨，把它洗干净，”费伊写道，“他说他姐妹想要一块鬼子尸体。一个得克萨斯州来的家伙拿了一块膝盖骨，他想要把它保存在从急救所搞来的酒精里。”[\[56\]](#)

第二天战事稍得喘息，但是29日又是漫长的一天。空袭断断续续，电喇叭响个不停，把水兵们召回战位。太阳刚刚下山，雷达屏幕上就出现了许多“亮点”。一架“神风”机如离弦之箭般从云底穿出，冲向“丹佛号”，却被暴风雨般的高炮火力所阻。于是它大坡度转弯脱离，爬升回到云层中。其他几架飞机在云层中时隐时现，一边躲避高炮射击一边寻找目标。有一架飞机做出了一连串杂技般的飞行动作，简直就是在嘲弄美国人，之后它以最大马力转入了俯冲，直扑战列舰“马里兰号”。这艘战列舰已经来不及改变航向了，炮手们也未能把这架快如火箭的飞机揍下来。它撞中了“马里兰号”舰楼，落在两座16英寸前主炮塔正中间。“你再也不会看见这样的危险动作了，”在近旁的“蒙彼利埃号”上看到了这次进攻的费伊写道，“这种事一辈子只能有一次。对于这些自杀飞行员来说，这绝对是高光时刻，他们就是来赴死的。”[\[57\]](#)

这架“神风”机俯冲时的速度可能超过了每小时500英里，这个速度令其具有了可怕的穿透力。它的炸弹击穿了“马里兰号”两层厚重的装甲甲板，爆炸覆盖了从26号到52号肋骨之间三层甲板上的大面积区域。被击中区域满是浓烟，逼退了损管队。31人被炸死，30人受伤。原有的救护所被火焰包围，于是美军在低阶军官和士官食堂里建立了临时救护所。他们隔开一部分舱室，确认战死的人就会被抬到那里的床铺上，他们将在稍后进行海葬。根据“马里兰号”巡航日志记载，舰员们的士气跌落到了谷底：“可怕的高温，连续不断的空袭，紧张的生活和最近的灾难性打击令许多人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舰员们得知“马里兰号”要返回珍珠港进行大范围修理时都“高兴坏了”。[\[58\]](#)

11月底，对陆海空三方面的战斗情况进行了评估之后，金凯德将军得出结论，计划中对民都洛（12月5日）和吕宋（12月20日）的进攻已不可能实现。11月30日，金凯德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长篇备忘录，要求“取消”对民都洛和吕宋的进攻。（注意，他说的不是“推迟”。）他写道，在肯尼将军的第5航空队夺取制空权之前尝试在这些岛屿登陆，“将会导致战争史上罕见的灾难”。[\[59\]](#)

金凯德要他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的联络官阿瑟·麦科勒姆少校作为特使去找麦克阿瑟。他要麦科勒姆向麦克阿瑟转达，考虑到当前菲律宾美国海空力量的状况，战役必须无限期推迟。人们觉得麦科勒姆和麦克阿瑟的私交不错，他们的昵称都是“麦克”，两人还为此开过玩笑。

麦科勒姆可能是联想到了古代给亚美尼亚国王报告坏消息的信使的下场，他答复道：“好吧，将军，我觉得你要我干的事情真是要人命。我是指你派我去那里。”[\[60\]](#)

金凯德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可以去往那里，或许能和他面对面交流而不会被带偏到陆海军关系或其他大问题上的人。见鬼，你就过去，见到将军，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麦科勒姆觉得这个任务是“使在下级身上的卑鄙手段”，但他还是上了岸，来到了塔克洛班附近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

莱特岛登陆后的几个星期里，狂暴的季风雨横扫了岛屿东部的沿岸平原。自从A日以来，累计降水量已经达到25英寸。每小时70英里的狂风将树木连根拔起，把帐篷和棚屋吹到了九霄云外。工兵们挖掘了很深的排水沟，以控制无边的洪水，并在泥泞的步道上铺设了木板。计划要求建设有9 000张床位的临时野战医院，但是由于恶劣的道路状况，医院的建设工作被耽搁了。（缺口由停泊在塔克洛班海岸旁的第7舰队医疗船弥补。）整个区域都喷洒了DDT（滴滴涕）农药，但是这片潮湿肥沃的土地还是滋生了无数蚊虫——“每天晚上，”艾克尔伯格将军记录道，“我们都要在成团的蚊虫中爬上床。”[\[61\]](#)

日军的空袭常常指向设施相对完备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第6集团军司令部建筑群。11月3日，麦克阿瑟正在司令部办公室里，一架日军飞机低空飞来扫射了这栋楼。一枚.50口径子弹在他脑袋后面的墙上打了一个洞。其他人涌进房间时，看见麦克阿瑟正咧着嘴向他们笑，指着子弹洞说：“我还没死！”此事登上了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份战报，第二天就成了美国本土的头条新闻。[\[62\]](#)

麦科勒姆到达此地转达金凯德的消息时，麦克阿瑟的反应不出所料。“你听我说，麦克，”他说道，“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该死的海军将军们保证过他们会一直支援我，现在你来告诉我这个。”他还骂海军将领们是在“耍赖”。

“将军，”麦科勒姆答道，“事情不是这样。我是说，老天，是肯尼将军在对你耍赖。他应该要把这周围那些该死的机场建起来的。”

对此麦克阿瑟答道：“是的，我知道是这样。”

麦克阿瑟把迪克·萨瑟兰召到了办公室。“麦科勒姆来这里告诉我，那些天杀的海军将领不再支援我们了。”据麦科勒姆的观察，这位西南太平洋战区参谋长随时准备着给麦克阿瑟的盛怒火上浇油。对话仍在继续，麦克阿瑟低沉有力地说不同意。麦科勒姆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再三阐述实际情况的艰难。莱特的地面作战比预期的更加漫长，日军仍在通过西部海岸登陆援军，“神风”也成了第6集团军海上补给线的浩劫。哈尔西将军同样有这些忧虑，他也亲口这么说过。

最后麦克阿瑟让步了。“随你怎么告诉[金凯德]，我不在乎，但是你回去，跟他说我同意了，”他说，“我不喜欢这样，但我也理解，就这样吧。”[\[63\]](#)

随着美军地面部队深入莱特岛上难以通行的“科迪勒拉山”[\[64\]](#)，也就是多山的内地，其后勤愈加困难。通向内陆的道路常常被冲毁，或者要从密林中穿过。战斗在美军称之为“断颈岭”的高地处止步不前。这道山岭上的堑壕阵地由日本第一师团精选出来的精锐部队防守，他们不久

前还是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刚刚乘船来此。一连几天，战线一步也未能推进。部队在陡峭的山路上负重前行，有时候靴子都会脱落在烂泥里。在水稻田里，水常常漫到人的腰部。11月5日，另一支美军部队拿下了利蒙镇，越过这里便是一条直通奥尔莫克湾的山谷，但是这个方向上的后续进展却为糟糕的后勤状况所阻滞。

由于急着打破血腥的僵局，以及担心日军援军通过岛屿西海岸继续上岛，克鲁格将军劝说麦克阿瑟同意放出他的预备队。他现在在岛上有超过12万部队，想要在奥尔莫克谷地中发动一场大规模钳形攻势，打垮日军。最终，断颈岭的日军阵地被美军双叉包围所突破：美军一个营穿越丛林，绕到1525高地东边，另一个营乘坐18辆履带式登陆车，走海路在2号高速公路向南转弯的地方附近登陆。这一机动令当地日军陷入了无法立足的困境：深陷丛林深处，通往西海岸的补给线被切断。

美军后来才意识到，敌人已经决心不惜代价也要向岛上增援。麦克阿瑟和他的指挥官们起初将莱特之战视为一场过渡性战役，只是通向吕宋岛的垫脚石。他们原本以为开进奥尔莫克港的一队队运输船是为了撤走日军部队，而不是运入新锐部队。但是，马尼拉的日军司令部已经决心要打赢莱特之战，直到1944年12月的第一周都不停地向岛上投入增援部队。“到11月底，”麦克阿瑟写道，“尽管航运途中和战斗损失都很大，莱特岛上的敌人还是比10月底多了成千上万人。”^[65]

日军通向奥尔莫克湾的海上补给引发了卡莫特斯海上一连串激烈的海空战斗。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瓜岛战役的重演，交战双方都想要孤立岛上的敌军，并控制岛屿周围的海运线。11月3日至9日，有几支大规模的运兵船队和货轮船队在驱逐舰的护航下从马尼拉湾出发，在菲律宾岛群之间的海域航行了600英里，在奥尔莫克湾卸下了超过整整两个师团的兵力。美军航母舰载机赶来向这些船队发动了攻击，击沉了超过12艘日本船只，从莫罗泰岛机场起飞的第5航空队的B-24和B-25轰炸机在11月8日也击沉了两艘大型运兵船。但日本人的运输仍然在继续。由于马尼拉湾已经遭到持续空袭，日本人判定已经没有必要把这些船留待日

后使用了。如果不立刻把它们派出去，它们基本上也会在锚地被击沉。

11月11日，一支大规模增援船队在奥尔莫克湾靠岸，卸下了第二十六师团的大部分兵力。当这个师团的重武器和补给物资仍在卸载之时，一批美军舰载机扑了过来，击沉了4艘大型运输船和4艘驱逐舰。第38.3特混大队的日志记录道：“当第38特混舰队开始系统地消灭这支船队时，日本鬼子就倒霉了。”^[66]根据日方资料，这个师团登陆时的伤亡很小，但是只带了步枪和10个基数的弹药。^[67]

12月的第一周，第7舰队的驱逐舰部队开出苏里高海峡，再向北穿过卡尼高海峡，扫荡莱特岛西海岸。这一轮海上攻击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美舰在卡尼高海峡里布设了大量水雷，在空中巡逻不断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扫除这些水雷。12月2日傍晚时，一支3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混编队在约翰·C.扎姆中校的率领下离开莱特湾，高速绕过莱特岛南部，在午夜前不久抵达奥尔莫克湾。此时一支日本船队正在向码头卸载部队和物资。扎姆那三艘“铁皮罐头”的出现完全出乎日军意料，它们向日本船只和码头区域倾泻出5英寸弹雨，射出了鱼雷。美军一名驱逐舰水兵回忆道：“战斗刚一爆发，夜空就被一出大型烟火秀照亮。这场烟火秀来自射往各个方向的红色和绿色照明弹，熊熊燃烧并炸成五颜六色的火球的船只和岸上建筑，还有许多火炮向我们射击时的闪光。这简直是地狱！”^[68]驱逐舰摧毁了两艘敌船，把岸上物资堆栈中宝贵的军用物资变成了一堆垃圾。0时22分，驱逐舰“库珀号”被一枚鱼雷命中，炸成了两半；它迅速沉没，191人死亡。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其余两艘驱逐舰迅速离开了战场，未能停留下来捞救幸存者。3架执行“黑猫”任务^[69]的PBY水上飞机降落在奥尔莫克湾，捞起了几十名“库珀号”的幸存者。其中一架飞机设法塞进了多达56名幸存者后才飞起来，此外还有机上的9名乘员——这是PBY飞机再未超越或追上的纪录。^[70]

莱特岛之战, 1944年10月—12月



最终肃清了断颈岭—基莱岭区域之后，第10军开始沿着奥尔莫克走廊无可阻挡地推进。第32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并肩打垮了精心布设的日军防线。精锐的日军第一师团残部进行了拼死而卓越的战斗，但他们却无法抵挡美军强大而猛烈的持续地面进攻。在步兵和坦克发动进攻前，是持续、猛烈而精准的迫击炮和火炮炮击。美军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

手榴弹攻击日军的火力点和堡垒。美军以第11空降师为先锋，在第32步兵师部分部队的支援下向西推进，越过了岛屿中部的艰难地形。与此同时，铁钳的南半边从拜拜镇出发北上。这一路打击令日军措手不及。日军侦察部队曾向铃木将军保证，从东部海岸杜拉格通向这一地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已无法通行。日军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地区的敌军竟能如此轻易地从海上获得补给。

在奥尔莫克附近的日军司令部里，基本的指挥和控制正在瓦解。和一线部队的联系先是时断时续，然后彻底断了。当日军各部队只能勉强维持防御阵地时，却还有一道道命令发来要求进攻。12月6日，第一师团的一名参谋军官报告说这个师团已经“濒临崩溃”。^[71]一条日本的无线电广播令指挥部的参谋格外恼火，这条广播预告说莱特岛上即将取得辉煌胜利。马尼拉和东京的报社需要窜改前线的电文才能让新闻获得发布许可。“敌人此时已转入防御，”一份这样的战报宣称，“我们的援军正和主力部队协同向卡里加拉西部推进。他们和美第24师进行了战斗。11月7日，我军一部运用合围战术迅速冲过困难地形，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给予其重击。在我军重压之下，敌人只能溃逃。”^[72]

12月6日薄暮时分，在莱特湾的主要登陆滩头附近，圣巴勃罗机场周围的美军作战部队和工兵惊异地看见一队运输机以中等高度从他们头上飞过，白色的降落伞开始像花儿一样在飞机后方绽放开来。顿时警报声大作，高射炮、地炮、机枪和轻武器火力纷纷射向天空。这是一次胆大包天的伞兵进攻，参加作战的是驻扎在吕宋岛的空中突击旅的约400名“高千穗”部队伞兵。日军从空中用步枪还击，接近地面时就投掷手榴弹。当敌人伞兵落地时，有几名“海蜂”部队的工兵正在洗澡，他们“吓了一跳，光着屁股就去拿枪”。^[73]激烈的交火一直持续到深夜。几个班的袭击者在停放着的飞机和燃油堆栈上安放了炸药，随后整个战场都被火光照亮。战斗持续了三天。第11空降师在“海蜂”和各种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在12月9日夺回了机场。这场进攻给美军带来了不少损失，但还是失败了。

莱特岛的战斗终于进入了尾声。然而胜利还要等到岛上日军的增援和补给被彻底切断后才会到来。这就需要关闭敌人通往莱特岛的“后门”，奥尔莫克港。12月7日，第77步兵师在安德鲁·D.布鲁斯少将的指挥下，在奥尔莫克以南4英里处的德斯波西托突击上陆。这次两栖突袭具有此前所有登陆战的基本要素，比如在塞班岛、关岛或者莱特岛东岸的登陆，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登陆战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布鲁斯师的两个团安全上岸，并在日军发动反击之前挖掘好了防御阵地。

日军航空兵来得太晚，没能阻碍美军的登陆，但他们对阿瑟·D.斯特鲁布尔将军的两栖舰队造成了沉重打击。“神风”机撞中了驱逐舰“马汉号”和高速运输舰“沃德号”。两艘舰都遭到了严重损伤，不得不抛弃并击沉。在通过卡尼高海峡和苏里高海峡退往莱特湾的漫长航程中，这支船队遭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空袭。运输船“利德尔号”的舰桥遭到重击，船上大部分高级军官战死，但该船仍然设法依靠自身动力继续航行。[\[74\]](#)

新登陆的部队承受着严重的伤亡，向北进攻，于12月10日一路杀进了奥尔莫克。第7师则从拜拜镇出发，打垮了日军零散但顽强的抵抗，向北推进。当美国人拿下奥尔莫克湾和港口设施后，日军从马尼拉发出的最后一支大型运输船队不得不转而沿海岸向北，前往30英里外的圣伊西德罗。美军空袭击沉了5艘大型运输船。大约有两个大队的日军登上了海岸，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提前到达那里的美军部队包围并打垮。

12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莱特岛上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虽然崎岖的高地上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菲律宾之战的主战场已经推进到了西边：同日，美军在民都洛岛登陆。“敌人作战很英勇，”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写道，“但是他们无法抵挡我们的三路进攻。他们的部队被分割成孤立的小块，要么在小包围圈中困兽犹斗，要么被打散在山区中。”[\[75\]](#)

哈尔西和他的航母指挥官们一直要求在乌利西至少停留10天，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3R”——休息（Rest）、维修（Repair）和补充（Replenishment）。12月1日，第38特混舰队的三支大队在乌利西潟湖底部的沙地上下了锚。^[76]此时勤务和后勤舰队已经从埃尼威托克完全搬迁至此，因此锚地比往常更加拥挤。在舰队和亚索尔、法拉洛普、波塘格拉斯、索尔伦以及莫格莫格这些小岛之间的水面上，各种小艇和驳船来来往往。通过望远镜，人们偶尔可以瞥见只穿着缠腰带的原住民渔民，坐在手工制作的带舷外支架的独木舟上，从蔚蓝色的潟湖上滑过。

这一周，一位航空摄影师拍下了一张“杀人犯大街”的照片——第38特混舰队的一长列航母停泊在锚地中。每艘舰都披着蓝灰相间的“炫目迷彩”。它们的周围是大群巡洋舰、战列舰和驱逐舰——在北方远处，还有数不清的后勤舰队的勤务船只。这是一支前所未见的庞大舰队，其规模之大，就连珍珠港都从未同时停泊过如此多的军舰。

美国人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对舰队的位置进行保密。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利西”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允许出现在媒体上的。舰队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所有要发出的电报都会空运到东北方400英里外的关岛，再从那里发出。但日本人不傻，他们知道美军舰队已经把乌利西当作了新的母港。11月20日，几条“回天”——单人自杀潜艇——在环礁以北由一艘大型母艇放出。至少有两条这种难以发现的小艇通过次要入口水道潜入潟湖。11月20日拂晓时，一条“回天”撞上了油轮“密西西纳瓦号”。这艘装载着数万吨航空汽油、柴油、重油的油轮顿时炸成了一团烈焰。拖船赶来用消防水管向燃烧的残骸喷水灭火，但无济于事。上午10点，它带着60名船员一起翻沉海底。^[77]美军驱逐舰在锚地各处投下了深水炸弹，至少有一条“回天”被击沉。

从这天起直至战争结束，美军在乌利西从未感到过安全。谢尔曼将军回忆道：“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这里根本谈不上休息，我们觉得还是待在大海上更安全些。”^[78]

即便如此，舰队在乌利西的休整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舰队的每艘舰上每晚都会播放一部新电影。一艘驱逐舰被指定为“电影交换舰”，舰上装着数百部电影，数千卷胶片，根据事先公布的电影排期表在舰队中巡回收发影片。^[79]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轻歌舞剧从一艘舰演到另一艘舰，同一个剧目艺人们常常每天要演上四五遍。哈尔西将军特别喜欢艾迪·皮博迪，喜欢他表演的《班卓琴之王》和《都是海军兄弟》。在潟湖北端风景如画的莫格莫格岛上，“海蜂”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起了一处舰队休闲区。步道从码头延伸到陆地，通向一片野餐区、网球场、排球场、拳击台、棒球场、带天棚的舞台、烧烤炉，以及啤酒花园。对于数以千计疲于战斗和航海的军人来说，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第一次有机会找到脚踏实地的感觉。水兵们每人可以领到两听啤酒，但是总有人会千方百计骗来更多。军官们则可以到莫格莫格的军官俱乐部里享用成箱的烈性酒，俱乐部设在岛上僻静角落里一处原住民建造的独木舟棚子中。有人回忆道：“这就是杀猪宴。”^[80]据第3舰队战争日志记载，在194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莫格莫格“每天都要挤进去1万到1.5万名水兵和500到1 000名军官”。^[81]每天傍晚，当壮丽的热带晚霞照亮西边的天空时，满载官兵的小艇都会离开码头，缓缓开回舰队锚地。

12月11日，舰队穿过穆盖水道，再度大规模出击，他们将要再次空袭吕宋岛，支援麦克阿瑟对民都洛的进攻。哈尔西回忆，从14日开始，“我们倾全力连续空袭了三天”。^[82]“大蓝毯”再次铺到了吕宋岛上空，大队的F6F机群牢牢监控着超过90座已知或疑似的敌人机场。飞行员返回后宣称在空中击落敌机62架，另在地面摧毁208架。“驼鹿陷阱”和其他一些防御措施似乎也起了作用，因为没有敌机接近到距离特混舰队20英里以内的地方。12月14日这天首批出击的机群遇到了迎头飞来的11架日军飞机，并“在吕宋岛东部海岸附近将其全部击落”。^[83]

在金凯德的坚持下推迟了10天的民都洛岛登陆，需要深入吕宋岛机场日军航空兵能够轻易抵达的水域。美军认为民都洛的日军地面部队不会给自己的登陆部队带来太大麻烦，但是航渡过程却十分危险，两栖运

输船队必须立即撤出。登陆船队由斯特鲁布尔少将指挥，他的船队一个星期前刚刚在奥尔莫克湾作战中挨过打。12月13日下午2时57分，在内格罗斯岛和棉兰老岛之间的海峡里，斯特鲁布尔的旗舰“纳什维尔号”遭到了“神风”机的重击。将军没受伤，但是“纳什维尔号”却不得不返航。于是斯特鲁布尔把他的将旗转移到了驱逐舰“达谢尔号”上。12月15日，美军地面部队在民都洛岛登陆，很快打垮了岛上的少量日本守军。

美军拿下民都洛岛上的两个小型机场后，整个菲律宾战役局势骤变，因为这使得邻近的马尼拉及其周边区域进入了肯尼将军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攻击范围。占领民都洛使得莱特岛成了战略后方。18日，山下将军通过无线电联系铃木将军，建议不要再向莱特岛增派部队和补给物资。山下担心，这座岛上的战斗会消耗掉菲律宾日军的大部分力量，从而危及即将到来的吕宋岛之战。12月的最后一周，美军认真统计了岛上日军尸体的数量，认为有60 809名日军死在莱特，只有434人被俘。^[84]美国第6集团军的损失为只有2 888人阵亡，9 858人受伤。

随后，第38特混舰队退往东面，与后勤船队会合加油，加完油再回来向吕宋进行第二轮空袭。12月17日早晨，吕宋以东大约500英里处，舰队见到了他们信赖的海上后勤支援大队，随即开始早已驾轻就熟的加油操作。和平时一样，驱逐舰的燃油存量尤其低，许多驱逐舰靠到战列舰和航母身旁，从它们巨大的油槽中汲取燃油。但是海浪越来越大，风速从20节增加到了30节，小型舰艇的纵摇和横摇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对于这些重量很轻的“铁皮罐头”而言，燃油也扮演着压舱物的角色，因此那些燃油量最低的驱逐舰自然就会不稳定。这一问题还由于桅顶和上层建筑上方加装了新型雷达和通信设备而雪上加霜，它们进一步提高了军舰的重心位置。一名军官回忆道，通过大舰加油时，那些没有压舱物的驱逐舰“像野马一样跳跃挣扎”。^[85]它们在恶劣海况下时常与邻近的大个子友舰撞在一起，冲击力会损坏驱逐舰的上层建筑，把一些装备从固定位置上扯下来。油管会断裂，把棕色的重油如同瀑布一般喷洒到驱

驱逐舰甲板上和两舰之间的海里。在17日那个狂风暴雨肆虐的上午，哈尔西将军从他的指挥舰桥上看着驱逐舰“斯潘思号”尝试通过他的旗舰“新泽西号”加油。刚刚加上6 000加仑燃油，油管就断了，“斯潘思号”被迫转向离开。[\[86\]](#)

此时，气压计指针一降再降，风向已经转为南风，海浪越来越大。一缕缕卷积云从高空快速飘过，太阳也蒙上了一道光晕，这是不祥之兆。舰队的气象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热带扰动”正在东南方500英里外形成，正以12节至15节的速度北上——但他们还不打算将其视为热带风暴，台风就更谈不上。不管怎样，他们都相当自信地认为它将会遇上一道冷锋面，之后转向东北方。但是许多老资格的水手却不敢如此确信。此时毕竟是台风季，而且舰队正位于被称为“台风区”的核心区域附近。美国海军此时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远程气象侦察飞行，因此只能依靠来自各种飞机、舰船和潜艇的零散气象报告。这种情况下，要判断一个“扰动”是否会发展成完整规模的热带风暴或者是台风，那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对风暴运动路线的预测也是如此。在舰队各舰的舰桥上，军官们都盯着海图和仪表。有些人在翻鲍迪奇所著的老书《美国实践航海学》。下午，风速和海况都在继续恶化。此时作为观察员待在“提康德罗加号”上的拉福德将军判断：“我们正向它开去。”航母舰长表示同意，并下令做好应对台风的准备。[\[87\]](#)整个舰队中其他许多人，包括所有特混大队司令和许多高年资的舰长，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转向南边。但这样会使第38特混舰队无法按计划两天后到达向吕宋放飞攻击机群的位置，而且哈尔西已经决心要坚守对麦克阿瑟的承诺。考虑到他的气象学家预测这场风暴（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将会向右转而不是向左转，将军便让舰队保持西北航向。“哈尔西认为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坚守那个承诺，而不是在情况真的完全发展成有威胁的台风之前就撤退，”“米克”卡尼后来解释道，“我们就这么做了。”这位参谋长强调，上司最后一锤定音：“这是他的决定，没有人想要反对。”[\[88\]](#)

大海起伏而阴郁。天空中的颜色十分古怪，疾走的暗紫色飞云下方是一片暗铜色光芒。狂风吹得海面上浪花飞腾。舰队日志记载，下午2时37分，“海况愈加恶劣，风速此时已经达到40节，风向20°”。哈尔西推迟了加油计划，加油会合时间改为次日早晨6点，地点在西北方200英里处。许多舰艇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保持阵位了，哈尔西也批准了麦凯恩将军关于把特混舰队航速从17节降低到15节，并停止之字形机动的请求。^[89]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进一步恶化。天气预报员修改了之前的预报。原先的“热带扰动”已经成了气旋性风暴，正在发展为台风，其移动方向也开始偏西。来自一艘飞机支援舰的报告称，风暴距离舰队只有200英里了。按卡尼的说法，这场风暴似乎是在追着他们跑，就像是“有了自己的智慧一样”。^[90]哈尔西于是命令航向转向南，并更改了次日早晨的加油地点。即便到了这时，他仍然希望能在拂晓时加油，并按照之前的承诺，带领航母在19日抵达发动空袭的位置。

拂晓时风速暴增到了50节，气压计指针像石头一般向下坠。甲板上的水兵们要抓紧把手，低下头，才能顶住那一片片飞溅而起的海水。在海平线远处，海水变得灰暗而沸腾。从大型军舰上层建筑的高处看下来，能看见一排排高大到令人害怕的浪头从北方排山倒海一般袭来。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如此狂暴的海况之下，哈尔西仍然电告舰队转向北，航向60°，航速10节，开始加油。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加油已是不可能的了，于是舰队再度转向南。

日出后一小时，天光已经放亮，却看不到太阳。能见度很差，海浪如同大山一般，狂风愈加猛烈——风速达到了60节，之后又达到70节。第38特混舰队北翼“黄蜂号”航母的PPI雷达显示屏上显示，乱云密布的圆形台风眼从北方仅仅35英里外经过。^[91]哈尔西和他的指挥班子再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了：舰队已经进入了台风的“危险半圆”^[92]，而且除了在风浪之间疾驰，期待运气眷顾之外，别无可为。早晨8时18分，哈尔西电告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他要取消次日向吕宋的空袭了。^[93]

风暴愈加强大而残暴。海浪越来越大，波峰之间的距离也变得更长。在每一轮浪涛的峰顶处，狂风呼啸，暴雨和飞溅的海浪如同猎枪打出的铁砂那样猛烈地砸在人们身上。在波谷之中，刺耳的呼啸声和风浪没那么难以承受，但是白色的海水却涌上甲板，从排水孔里倾泻而下。哈尔西和麦凯恩的命令都是发出不久便撤回，所有舰长都很快意识到，他们已经指望不上任何人了，必须自己想尽办法来拯救自己的军舰。上午11时49分，哈尔西通过短波电台指示麦凯恩“走最容易通行的路线，让风从左后方吹来”。^[94]但是那些小号的军舰，尤其是驱逐舰，此时只能挣扎自救，航向早就顾不上了。

海上能见度持续下降，直到大部分舰船都完全看不见相邻的友舰，除了狂风巨浪，碰撞的危险也骤然凸显。有时候另一艘军舰会突然从浪涛中出现，之后又转向消失。风速愈加狂暴，最终超过了100节。气压计读数跌破了27英寸。哈尔西告诉尼米兹，他的舰队正挣扎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飞云疾走，暴雨如注，风速70节，风向西北偏西……台风愈加猛烈”。^[95]

那些燃油不足而缺乏压舱物的驱逐舰尤为艰难。它们无论怎样控制引擎和操舵都无法保持航向，只能在巨浪和波谷之间随波逐流。中午前后，风暴达到了高峰，风速达到120节，海浪的波峰和波谷之间的高差达到差不多80英尺。^[96]据“杜威号”舰长的说法，雨雾之密集，使得舰桥上的人甚至看不到舰首。如果有人暴露其中，“那感觉就像是数千枚钢针刺向脸和手”，而且这些“钢针”“就如同沙尘暴一般把许多处金属表面上的油漆都刮掉了”。这些小舰一次又一次几乎被打翻。在操舵室里，人们紧紧抓着把手，双脚悬空，直至军舰自己回正，脚才落到甲板上。一名水兵惊恐地发现自己站立在一根平时应当是垂直的立柱上。他松开手掌，对战友们叫道：“看，能松手了！”在一次角度格外大的横倾中，倾角指示仪的指针指到了顶（最大刻度是73°），“杜威号”舰桥的右侧甚至浸入了水中，舀起青绿色的海水。“我们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船能从这样的横摇中复原，”舰长说，“但这艘船做到了！”^[97]

大型军舰对风暴的承受力要更好一些，但即便是艾奥瓦级战列舰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这种滔天巨浪中也很难高枕无忧。“米克”卡尼一度担心“新泽西号”难以幸存。“当军舰侧倾过去时，可怕的倾斜角实在是难以形容，那就快要达到它稳定倾角的极限了。军舰会横摇到一个角度，然后维持在那里，直到开始回正。”^[98]即便是在“新泽西号”指挥舰桥这样的高处，卡尼也要抬起头才能看见迎面而来的浪尖。在2.7万吨的埃塞克斯级航母“提康德罗加号”上，阿瑟·拉福德在指挥舰桥的走廊上恐惧地看着袭来的风暴。当巨浪涌来，“提康德罗加号”向右倾斜时，他甚至产生了一种伸出手就能触碰到海水的错觉。“提康德罗加号”的姊妹舰“汉考克号”，其水线上方近60英尺处的飞行甲板上居然积了成吨的青绿色海水。^[99]

独立级轻型航母的舷宽比大型航母窄得多，在台风中的横摇更加剧烈。在“蒙特雷号”上，停放在飞行甲板上的4架F6F“地狱猫”松脱开来，滑进了海里，它们还带走了左舷的救生网和降落信号官平台。随着风力加大，舰长命令所有人员离开飞行甲板寻找掩蔽。然而真正的危险在下方的机库甲板上，那里的飞机被甩来甩去，固定飞机的缆绳几乎就要绷断了。地勤人员赶紧跑过去加固，并再多捆绑一道缆绳，但是当横倾角超过34°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也快要站不住了。上午9点之后不久，一架“地狱猫”战斗机突然挣脱了绳索，变成了5吨重可燃烧的攻城槌。它立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东撞西碰，撞毁了通风管道、电路缆线、水泵，以及其他飞机。虽然这架飞机已经放空了燃油，但其油箱和引擎管路内残留的燃油还是烧了起来。很快，一场爆炸就撕开了机库侧壁。又有几架飞机松脱开来，让这一团混乱成倍恶化。燃烧的黑烟通过破裂的通风管道涌入下层甲板的密闭空间，轮机舱里的舰员们不得不撤离，直到带上便携式呼吸设备才得以返回。

“蒙特雷号”的姊妹舰“考彭斯号”和“圣贾辛托号”上的情况也差不多。飞机挣脱固定缆绳，或者把甲板上的固定栓扯出来，之后撞上旁边的飞机，把它们也撞到松脱，接着又在机库里左冲右撞，留下一堆堆残

骸。根据“圣贾辛托号”风暴之后的报告，“备用引擎、螺旋桨、牵引车和其他重型设备都成堆地在左舷和右舷之间来回猛撞，使那些无保护、不结实的进气口和通风管严重受损。维修组和支援人员英勇地尝试逐一固定那些失控的破坏性重物，最终他们在16时获得了成功，但在此之前还是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电气起火和燃油起火”。[\[100\]](#)

当“蒙特雷号”舰员撤离轮机舱后，舰长被迫关闭轮机。于是航母瘫痪在水面上，任由如山巨浪肆虐。所有可能燃烧的东西都被扔掉了，包括弹药整备库里的弹药。人们赶忙把消防水管拉进机库，把水龙喷向起火点，片刻延迟之后，喷淋系统最后也恢复运转。军舰最终获救，但2/3的机库被彻底烧毁。在“圣贾辛托号”上，火灾不久就被扑灭，但是大量松脱的残骸导致无法派人步行进入机库。舰长在报告中写道：

对于没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来说，各种巨大的声响让机库变得异常可怖，有飞机碰撞和撕裂的声音，通风管道薄弱的金属板落地和撕开的声音，重物在左右两侧来回滑动的声音，甲板上海水涌动的声音，还有大团蒸汽从封闭机库空间里破裂的排气管道喷出的声音。然而，尽管环境令人恐惧，机库甲板上的人们还是排成长队，从上面摇摇晃晃地来到甲板上，来到来回滑动的成堆碎片中间，冒着几乎必定非死即残的危险，成功固定住了它们，将损坏控制到最低。[\[101\]](#)

当风暴到达高潮时，狂风尖啸着裹起暴雨和海水，世界一片天昏地暗。能见度只剩下三四十英尺。军舰顶部的人已然分不清天空和大海，甚至分不清上和下，只有脚下甲板的剧烈摇晃让他们还能感觉到自己身处无边的大海之上。船长出身的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曾经描述过19世纪时在同一海域遭遇到的台风的磨难：“它猛地一歪，让人感到一种恐怖的无望感；它像是一头扎入虚空那般往前栽倒，却仿佛每次都撞在墙上……在某些时刻，迎面而来的强烈气流，如同汇聚于某一点的实体力量，要把它吸入隧道，将它整个掀离水面。有那么一瞬，它船首朝天，

从头到尾震动起来。之后它又会翻滚下来，就像掉回沸腾的大锅里一样。”[\[102\]](#)

当法拉格特级驱逐舰的横摇超过 45° 时，其发动机就会无法吸到润滑油并停机。[\[103\]](#)失去航速，舵面也会失效，当陷入巨浪之间的谷底时，它们动弹不得，就像是被打败的摔跤手。无线电桅杆、雷达天线、探照灯、救生艇、吊艇柱，以及深弹投放架都被风浪卷走。弹药库厚重的钢质顶盖也被扯了下来。“赫尔号”舰长詹姆斯·A.马克斯少校甚至担心自己军舰的烟囱会被从甲板上连根拔起。当100节的狂风扫过军舰时，“操舵室甲板上的一名尉官被从左侧完全吹飞了起来，撞到舱室的右上方”。[\[104\]](#)最终，经历了“令人屏住呼吸的无穷时间”之后，军舰自行回正了过来。在“杜威号”上，固定烟囱的缆绳和固定栓被拉松，烟囱真的倒了下来，耷拉在军舰右半边。然而这却降低了军舰的重心，减少了迎风面积，因此尽管看上去是场灾难，但这可能反而挽救了“杜威号”。它的舰长说：“变化几乎立刻就能感觉到，军舰的航行状况改善了。”[\[105\]](#)

在“阿勒万号”上，轮机舱的风扇坏了，舱室里的温度立刻飙升到80摄氏度，迫使所有人员撤离那里。舱底也开始积水，水面深达甲板以上数英尺。大约上午11点前后，“阿勒万号”瘫痪了，侧舷几乎没入水面。失去引擎，它无法摆脱困境——然而，舰长设法用舰体做帆，调整舰尾朝向，令舰尾迎风以缓解舰体承受的压力。这使得军舰的侧倾角恢复到“只有” 60° ，它就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坚持漂浮在水面上，直至台风离去。[\[106\]](#)

“赫尔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正午之前不久，它被拍翻，向右倾倒，横倾角达到了大约 80° ，并无力复原。海水淹没了操舵室，涌进了烟囱。这样的冲击是不可能回正的。马克斯少校爬出舰桥左侧，游了出来。穿着木棉救生衣，他回过身，最后看了一眼正在被海水吞没的“赫尔号”。“不久后，我感受到了锅炉在水下爆炸的震动……在那之后，我

便竭尽全力，以求在砸向我们的如山巨浪中活下来。”[\[107\]](#)相似的命运还落在了驱逐舰“斯潘思号”和“莫纳汉号”身上。

当晚风浪平复之后，哈尔西指示麦凯恩组织一支搜救队，沿舰队途经路线北上。正在舔伤口的第38特混舰队其余兵力，则要转向西北，争取再次向吕宋发动空袭。但是天气依旧恶劣，巨浪仍旧从北面涌来。12月21日中午，哈尔西取消了空袭，命令全舰队撤回乌利西。[\[108\]](#)

搜救队努力工作了72个小时。各舰散开成宽大的搜索线，驱逐舰在侧翼护卫，夜间会打开探照灯搜索前方海面。舰队日志记载：“搜索期间，数不清的空救生筏、软木救生衣以及漂浮的残骸出现在眼前，我们会检查那些地方是否有人。”[\[109\]](#)他们听到了许多口哨声。救生筏也被抛进军舰的尾流里。12月21日，驱逐舰“塔伯勒号”（其自身也在风暴中遭到重创）发现了一个坐着10名“斯潘思号”幸存者的救生筏。“塔伯勒号”的舰长指挥军舰机动到救生筏的上风方向，让风把军舰缓缓推向那些逃生者，这样军舰的舰体还能为游泳的人遮挡一些风浪。军舰的背风面放下了两个大型吊货网，系着长长绳索的救生圈被抛给了水里的人。“塔伯勒号”自身的几名舰员也系上救生绳，穿上木棉救生衣跳入水中，游过去救援，把幸存者拖到吊货网中。[\[110\]](#)“塔伯勒号”就这样捞回来总共55名“斯潘思号”和“赫尔号”的幸存者。

这场台风要了790个美国人的性命。三艘驱逐舰彻底损失，另有 multiple 艘遭到重创。风暴之后的搜索救回了93名逃生人员。死亡率最高的是“莫纳汉号”的舰员，只有6人幸存。146架舰载机被毁或者被吹下海，其中大部分都是轻型航母的舰载机。“蒙特雷号”、“考彭斯号”和“圣贾辛托号”遭到重创，需要大修。[\[111\]](#)

圣诞节前一天上午，“新泽西号”驶入了乌利西，小心翼翼开到它指定的泊位上。一长串重型舰艇也通过穆盖水道开了进来，包括几十艘航空母舰，直到“杀人犯大街”再次填满了北侧锚地。

尼米兹将军此时已经飞到乌利西，按原定计划来此和哈尔西以及第

3舰队司令部开会。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最近刚刚晋升为新设军衔五星上将，或曰“舰队上将”，他在下午1时50分登上了“新泽西号”。美国海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艘军舰的主桅杆上升起了五星将旗。简单寒暄之后，将军们在指挥部会堂落座，复盘最近的作战，并制订后续的作战计划。

在旗舰上，哈尔西的餐厅里举行了平安夜晚餐。尼米兹一行人从珍珠港带来了一棵装有饰品的圣诞树。舰队战争日志记载，此举“为这个场合带来了圣诞气氛”。^[112]不过哈尔西后来承认，这个节日没法让他感到享受，因为这已经是“一连第四个远离家乡的圣诞节了，四个只有海水和沙滩，没有雪和冬青树的圣诞节”。^[113]虽然哈尔西当时和后来都不肯承认，但他肯定知道自己要承担舰队刚刚遭受沉重打击的重大责任。他的下属们后来比对了各自的记录和意见，许多人都认为哈尔西错在没能在12月17日下午还来得及躲开风暴。航母派的“棕鞋族”向来在批评时直言不讳。盖里·博根将军“觉得这简直纯属顽固和愚蠢”。^[114]以待命状态待在“大黄蜂号”上的“乔克”克拉克持相似观点，阿瑟·拉福德也一样。谢尔曼做证说，12月17日海面和天空的样子已是台风即将到来的确证。

哈尔西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他决心要信守给麦克阿瑟的承诺。这个动机固然可敬，但结果却并非空袭吕宋，而是舰队惨遭台风暴虐。两个月内第二次出娄子，尼米兹不得不怀疑哈尔西究竟能否胜任他所担任的极其重要的职务。根据尼米兹的高级幕僚杜鲁门·赫丁的说法（他曾在第58特混舰队中任米彻尔的参谋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很难理解把特混舰队径直带进台风危险半圆区的做法……他对此深感焦虑和担忧，因为这反映了你的航海能力。而做一个好水手是军官们常常引以为荣的事情”。^[115]赫丁还从小道消息听说，金上将也暴怒了，他“为了此事简直要把海军部给拆了”。^[116]

圣诞节这一天，尼米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新泽西号”上度过，开了

数不清的会议。当天下午，他和哈尔西一同会见了媒体，并拒绝回答任何关于此次台风的问题。但是尼米兹下令组建一个调查庭来彻查损失三艘驱逐舰的事情。哈尔西在12月28日接受了听证。^[117]

调查庭的正式报告在1945年1月发布，哈尔西未能避开风暴，要承担“主要责任”，报告责备他“在战争行动的压力之下判断失误”。虽然调查庭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惩罚措施，但其判决足够严厉，足以解除哈尔西的指挥职务。斯普鲁恩斯原本就要于当月晚些时候返回担任第5舰队司令，提前几个星期将他召回并非难事。但是私下交流之后，尼米兹和金决定不这么做。杜鲁门·赫丁和许多其他人都认为，是哈尔西在媒体和公众中的人气保住了他的指挥岗位，“因为哈尔西是个国家英雄，战争期间你不能这么做”。^[118]

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还走出了不同凡响的一步，撰写了一篇长而详尽的题为《台风受损的教训》的备忘录，并就此向整个舰队发表了讲话。尼米兹写道，在过去的年月里，无线电发明之前，海军舰队在遭遇风暴时是无法保持队形完整和统一指挥的。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舰长都会成为自己的主人，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拯救他的船，而不管舰队指挥官意愿如何。到1944年，情况已有所不同，一个舰队指挥官即便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也能够继续发布命令，而且他们确实会这么做。这在漫长的人类航海史上还是个相对新出现的情况，在此情况下，“高级指挥官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替麾下最小的舰艇和最没有经验的舰长着想”。他绝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或者以为小舰船能够“像他自己的大舰那样承受风浪”。本着同样的精神，每一位舰长都有责任尽职挽救他自己的军舰，当面临“致命危险”时，他必须自行决定是否离开队形。不仅如此，采取此类措施时一定不能犹豫，因为“对于一个水手而言，没什么比因为担心事后发现不必要而犹豫不决更危险的了。几千年来，人们依靠的都是与此相反的逻辑平安航海的”。^[119]

^[1] Evans, Wartime Sea Stories, p.94.

- [2] St.John, Leyte Calling, p.195.
- [3]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December 4, 1944,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156.
- [4] Commander Third Amphibious Force, CTF 79, "Report of Leyte Operation," November 13, 1944, enclosure (E).5.1944, p.4.
- [5] Commander Third Amphibious Force, CTF 79, "Report of Leyte Operation," November 13, 1944, p.4.
- [6]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0.
- [7]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6.
- [8]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 [9]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13.
- [10] Third Fleet War Diary, October 28, 1944.
- [11] COM3RDFLT to CTF 77, Info etc.(25123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6.
- [12] CTF 77 to COM3RDFLT, Info etc.(26031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58.
- [1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4.
- [14] COM3RDFLT to CINCSOWESPAC, Info etc.(26123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5.
- [15] CINCPAC to COM3RDFLT, Info COMINCH, COMSERVPAC (261812), CINC 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5.
- [16] Ibid.
- [17] James S.Russell, oral history, p.44.
- [18] Ibid.
- [19] Radio Tokyo broadcast, October 26, 1944, in Tolischus, Through Japanese Eyes, p.157.
- [20] 清泽冽1944年11月14日的日记: "陆海军竞相宣布成立特攻部队。"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281.
- [21] Imperial Japanese Navy Directive No.482, 29 October 1944.NARA, RG 38: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Box 42.
- [22] *Mainichi Shinbun*, November 1, 1944, quoted in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p.97.

- [23] Koiso quoted i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p.300.
-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 [25]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58.
- [26] Lieutenant Commander Iyozo Fujit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243.
- [27] Naoji Kozu,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15.
- [28]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p.296.
- [29]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1.
- [30] Ibid., p.72.
- [3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15, USSBS No.503, Vice Admiral Shigeru Fukudome.
- [3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12, USSBS No.62, Captain Rikibei Inoguchi;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73.
- [33] Report of Captain Charlie Nelson, USNR, accessed February 16, 2018, <http://destroyerhistory.org/fletcherclass>.
- [34]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 1944, p.1.
- [35] Third Fleet War Diary, October 27, 1944, p.44.
- [36] Krueg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p.350.
- [37] CTF 77 to CINCSWPA, November 1, 1944, RS—4,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 1944, p.2.
- [38]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5, p.8;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944, p.5.
- [39]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November 24, 1944,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139.
- [40]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90.
- [41]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44.
- [42] John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65.
- [43] COM2NDCARTASKFORPAC to COMINCH, etc., October 23, 1944, in CINC PAC Gray Book, Book 5, p.2391.
- [44] Ibid.
- [45]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45.
- [4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223.

[47] Nimitz to Halsey, October 22, 1944, Halsey Papers, Box 15;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29, 1944, p.27.

[48] “COM3RDFLT to CINCPAC Info, etc.,” November 28,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92.

[49]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7.

[50] John Thach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66.

[51] Ibid., p.268.

[52]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2.

[53]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25, 1944, pp.31—32.

[54] James J.Fahey diary, November 27, 1944, in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229.

[55] Ibid.

[56] Ibid., p.230.

[57] Ibid., p.234.

[58] U.S.S.*Maryland* Cruise Book, U.S.Navy Library, Washington Navy Yard, Washington, DC, pp.31—32.

[59] Memorandum to MacArthur, “Our Present Situation—Leyte Gulf, Mindoro, Lingayen Gulf,” November 30, 1944, RS—4,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60] Arthur H.McCollum, oral history, Vol.1, pp.527—29.

[61]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0.

[62] Press Release, General Headquarter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November 3, 1944.

[63] Arthur H.McCollum, oral history, Vol.1, pp.527—29.

[64] 科迪勒拉山是美洲西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译者注

[6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32.

[66]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11, 1944, p.16.

[67]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20.

[68] Eugene George Anderson, “Nightmare in Ormoc Bay,” *Sea Combat* magazine, accessed October 14, 2018, <http://www.dd—692.com/nightmare.htm>.

[69] “黑猫”专指由PBY水上飞机执行的夜间巡逻与攻击任务。——译者注

[7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40.

[71] General Yoshiharu Tomochika, “The True Facts of the Leyte Operation,” John Toland Papers, Box 12, FDR Library, p.25.

[72] Ibid., p.21.

[73] Huie, *From Omaha to Okinawa*, p.211.

[74] CTF 77 to CINCSWPA, Dec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298.

[7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33.

[7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 1944, p.2.

[77] Naval Debriefing, December 12, 1944: Captain Philip G.Beck, U.S.Naval Reserve, USS *Mississinewa*, NARA RG 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1942—1946, Box 2, p.2; Task Group 38.3 War Diary, November 20, p.27.

[78]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72.

[79] Third Fleet War Diary, November 14, 1944, p.14.

[80] Steven Jurika Jr.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51.

[81]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1, 1944, p.9.

[82]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36.

[83]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4—16, 194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9.

[8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39.

[85] J.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24, 1945, in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39.

[8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7, 1944, p.17.

[87]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2.

[8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8.

[89]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7, 1944, p.23.

[9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7.

[91]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13.

[92] 危险半圆是指台风中风浪更大，危险程度更高的半圆区；其对侧半圆风浪稍小，称为“可航半圆”。——译者注

[93]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8, 1944, p.27.

[94] Ibid., p.30.

[95] Ibid., p.31;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p.13.

[96]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8, 1944, p.31.

[97]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5.

[9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p.418.

[99]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4.

[10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82.

[101] Ibid.

[102] Joseph Conrad, "Typhoon,"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7,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142/>.

[103] Olson, *Tales from a Tin Can*, pp.226—27.

[104]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105] Ibid., p.75.

[106]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36.

[107]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73.

[108]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0, 1944, p.37.

[109]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19, 1944, p.36.

[110] CINCPAC Re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During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44," June 25, 1945, Annex B, "The December Typhoon," p.85.

[111] COM3RDFLT to CINCPAC, December 19,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62;Ibid., p.13.

[112]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4, 1944, p.41.

[113]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41.

[114] Gerald F.Bogan, oral history, p.126.

[115]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3.

[116] Ibid., p.105.

[\[117\]](#) Third Fleet War Diary, December 28, 1944, p.42.

[\[118\]](#)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4.

[\[119\]](#) Nimitz, "Pacific Fleet Confidential Letter 14CL—45," February 13, 1945, "Damage in Typhoon,Lessons of," CINCPAC File A2—11 L11—1.

第九章

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上已经胜利在望，他们的思虑也开始转向战后世界和军人复员的压力。许多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忧海外作战的人和“家里人”之间的“心理鸿沟”。在老兵们中间，痛苦感和被排斥感十分普遍。他们的抱怨很复杂，有时候自相矛盾，也不太清晰——但是总的来说，老兵们感觉自己被周围的人抛弃了。他们的怒火常常会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出来，把周围人吓了一跳。任何关于罢工的事情都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一名水兵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就抱怨说“我极其讨厌工会里的魔鬼和高薪工人”。^[1]关于贪腐、暴利、囤积居奇和黑市欺诈的流言传进了他们的耳朵。他们对华盛顿那些政客歇斯底里的吵闹怒目而视，这些人整天争来斗去的都是些军人们即便在和平时也也觉得毫无意义的事情。散兵坑里的大头兵们有时甚至觉得，如果能让美国的城市被敌人轰炸一顿就最好了，这样或许能给后方百姓一些震动，让他们认清战争的现实。^[2]

军人们清楚国内的经济在迅速繁荣——那里有许多钱可以挣，许多地方可以花钱，许多单身女人，以及（对男人而言）十分有利的性别比例。他们不能忍受民众关于诸如配给制、高房租、新闻管制、拼车、排长队、过于拥挤的火车，或者是肉价之类“鸡毛蒜皮”的抱怨。他们认为战争将会把国家吃干抹净，和平之后就会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贫困中去，许多专业经济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的。等他们回到美国国内冷冰冰的资本主义怀抱中时，所有那些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挣大钱”机会早就消失了。他们抱着如此悲观的看法，而且笃信不疑。

大部分人以为，已经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生活了三年的老百姓都会知

道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报纸读得比较多的平民可能确实比普通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军人更了解全球军事战略的复杂性。他或许能说出在国外各战区作战的盟军部队取得的详细进展和统计数字，但是一个从没打过仗的老百姓绝对不会真正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肤浅的言谈又只会激怒这些老兵。“说，说，说，他们只会说，”一名美国大兵如此评论他在国内碰到的多话的老百姓，“他们关于战争的说法不是很愚蠢，就是无关紧要。”^[3]一个母亲来到老兵医院探望受伤的儿子并开始讨论战争时，儿子没好气地问道：“你是从报纸上看来的吧？”^[4]军人们在听到广播员用第一人称“我们”来指代在海外作战的美军部队时，都会报之以不屑。他们对所谓“后方战线”的说法嗤之以鼻，那说的就好像靠回收废旧金属和“胜利菜园”^[5]就能把和平的国家变成战场一样！工厂墙上的海报告诉工人们要把自己当成“生产战线上的士兵”。士兵？笑话！就是那种8小时轮班，还有丰厚薪水的士兵吗！在这些所谓的“后方战线”上，军人们都能看到爱国宣传画和俗不可耐的战争债券推销广告。每次看到美国国旗被用于商业宣传，他们都会无奈地摇摇头。当给军人们放映战争电影，星条旗搭配着激昂的管弦乐缓缓展开时，他们有时甚至会嘀咕着嘲讽道：“哈哈，摇旗子了！”^[6]他们嘲讽的不是国旗本身，他们还是很尊敬国旗的，他们嘲讽的是好莱坞和麦迪逊大街的那些恶心套路。1944年下半年，一名陆战队军官如此评价他的部队：“他们已经忘记了打一场光荣的战争带给人的巨大幻觉，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或许曾经被阅兵场面、万众欢呼和金色绶带所鼓舞，但现在他们知道打仗其实是个脏活儿，曾经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荣光早已不复存在。”^[7]

但是对于曾在大萧条的年份里痛苦挣扎的民众而言，新的繁荣确实令人兴奋。1944年，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1.2%——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也可能后无来者。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到1944年实际增长了约60%。^[8]这份收益也广泛分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实际上，社会底层的收入规模增幅是最高的。战争带来的繁荣完成了罗斯福新政想要做的事

情——增加美国最穷人群的财富，包括黑人、拉丁裔，以及贫困的农村白人。1944年，美国有1 900万各个种族的女性离家工作，其中大约200万人在军需工厂工作。工资暴涨的时候，遇上了口粮配给以及汽车和大型家电等一部分贵重商品的禁售。其结果便是前所未有的储蓄额和几乎增至5倍的家庭财富。存在银行或者投资战争债券的个人存款总额从1940年的85亿美元增长到1944年的398亿美元。^[9]

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卓有成效的价格和薪资管控措施有效控制了战时通货膨胀，因此即便政府鼓励战时节约，但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还是提高了。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三周年这天，梅西百货公司迎来了公司历史上单日销售额最高的一日。某些奢侈品和消费品的短缺并没有影响顾客的购物热情。“人们想要花钱，”一名店长说，“他们不是买衣服，就是买家具，或者买其他一些东西。”^[10]在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看来：“人类战争史上，牺牲被人挂在嘴边的次数从未如此之多，实际付出的牺牲却从未如此之少。”^[11]

批评家则说，这些“后方战线”的美国人虽然富裕了，却变得更加吝啬、冷漠、缺乏体谅。大约400万个家庭，共900万人，收拾起行李在国内跨区域迁徙，以追逐战争带来的工作机会。火车和城际大巴被坐在过道里行李箱上的旅客挤得满满当当。“黄牛”们在车站游荡，出售高价车票。到处都能看见年轻的军人妻子，怀抱婴儿，拉着小孩，倔强地跟随着她们的丈夫走过一站又一站。许多人迁居到了西海岸，好寻找一处更靠近太平洋战场的住处。太平洋舰船上的水兵们随时可能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被送到圣迭戈或者旧金山，然后放三天假。如果他们想和家人团聚，那他的家庭最好就住在附近。然而，加利福尼亚州有数百万新来的移民——这个淘金州的人口在战争期间增长了超过1/3—房子始终不够住。旧金山的一名市政官员报告说：“许多家庭睡在车库里，他们把床垫铺在水泥地上，一张床上能睡三个、四个，甚至五个人。”^[12]

玛乔丽·卡特赖特的丈夫是一名水兵，二人在男人随麦克阿瑟的第7舰队出海前一个星期结了婚。她陪丈夫一起来到了他所在军舰的母港旧

金山，承诺要在这里等他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离开西弗吉尼亚州的边界。“我孤身一人，住在一个不熟悉，也不认识什么人的城市，就像一个婴儿一般。我感到孤单无助。”她在一间公寓里找到了一个有家具的房间，在标准石油公司找到了一份穿孔机操作员的工作。“那时候我学会了针织，我花了许多时间给我的丈夫织袜子，收听广播里的战争新闻，”她多年后回忆道，“战争期间我一个人住了4年，那是我经历过的最痛苦，最孤独的几年。现在回头看，我都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许多后来再也做不到的事情。许多夜晚，我都独守空房，孤独而泣。”^[13]

在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里，1941—1945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会引发住宅建设的爆发。但是为了引导人力和资源进入军工行业，联邦政府刻意压制了住宅建设。1941年，美国住宅建设投资为62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43年暴跌至20亿美元，到1944年也仅仅恢复至22亿美元。^[14]战时新建造的房屋根本不够应付那些找不到地方住的新来者，于是房东们便狮子大开口。位于密歇根州伊普西兰蒂的福特公司威楼密工厂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之一，但工厂周围却几乎完全找不到住房。于是工人大军要么每天乘坐公交车往返底特律，要么住在公路两旁脏兮兮的拖车营地。密歇根州的荒地里于是搭建起了一片片柏油纸棚子组成的棚户区。在现有的住宅里，屋主靠着出租空房间大发横财。古典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住房变成了拥挤的宿舍，床铺都是按小时出租的。两三个人轮流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所谓“睡热铺”——他们的睡觉时间和在工厂里的排班是对应的。

数以千计的工人要在午夜从工厂下班，这令休闲和娱乐行业发现通宵营业还是蛮有利可图的。于是酒吧开始彻夜开门，甚至在凌晨两三点也挤满了人。夜店外的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三流艺人担纲的“中班”节目会在午夜到拂晓时段上演。人们甚至凌晨3点都能找到地方打保龄球。电影院每天24小时一部接一部地放电影，而且场场爆满。无处可去的工人们会买一张午夜场的电影票，然后在座位上睡一觉。父母会把孩

子安顿在电影院，去工厂上班，再回来接走。记者马克斯·勒纳描述了战时纽约的通宵电影院：“这里狭长、拥挤、臭气熏天，有个壮汉在里面巡逻，确保没人在里面杀人、放火、捣乱和强暴。不在这种通宵影院看一次电影，你都不算真正看过电影。”^[15]

大规模的移民把美国各个不同的族群、阶层和种族统统塞进拥挤的城市，他们突然发现彼此要开始朝夕相处了。军工行业根据政府要求进行了整合。战争还加快了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方和中西部工业区大规模迁徙的进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黑人收拾行李离开家园。高薪工作的承诺也吸引了数十万白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去学着过不熟悉的新生活。

在1943年炎热的夏季，种族暴力如同流行病般席卷了多个美国城市。其中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骚乱发生在底特律，那里的人口从1940年到1943年膨胀了几乎一倍。此事最初的爆发点是1942年2月在一处波兰裔美国人社区旁边建设了公共住房项目“旅行者之家”。支持和反对这个项目的两支游行队伍爆发了冲突，国民警卫队随即赶来，保护黑人居民入住新开放的住房。这起冲突最终平息了下来。但是在1943年6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当底特律河上的贝尔岛公园发生种族械斗的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傍晚时，数千名居民要通过这座公园所在的岛屿上的桥梁回家，于是，原先几十个人的群殴演变成了黑人对白人的大混战。流言和挑衅言论迅速在城市里口耳相传，蔓延开来。数千名年轻的黑人 and 白人来到底特律城区，四处找麻烦。斗殴、破坏、放火和劫掠很快扩散，持续了一整夜，直至第二天，白人暴徒只要警察没看见就随意挑衅、殴打乃至杀害黑人。一名报社摄影师拍下了一个暴徒把一个黑人从有轨电车里拖出来当街殴打的画面。许多白人也不明不白地落到黑人暴乱者手中，遭到相似待遇。底特律警察局逮捕了几个白人，枪杀了几十个黑人。据报道，警察在黑人社区宣布了非正式宵禁，并处决了许多宵禁时间还在户外的年轻黑人。

三天的暴乱之后，联邦军队来到城市，恢复了秩序，但这座城市却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事后，一个16岁的白人男孩还拿自己干过的事情出来炫耀：“车里有我们200个人。我们杀了他们8个人。我看见刀子刺穿他们的喉咙，子弹打穿他们的脑袋。我们把装有黑人的车子掀翻。你真该看到这个场景。这真有意思。”[\[16\]](#)

同月，洛杉矶查韦斯谷（今天道奇体育场附近）的墨西哥裔美国社区也爆发了暴乱。这场骚乱始于附近海军预备役训练中心的水兵和当地那些穿着“灯笼裤”、戴着宽边帽的拉丁裔年轻人之间逐渐升级的矛盾。这些“穿灯笼裤的”对数以千计涌入他们“西语地区”的军人十分憎恶。街头冲突很常见。1942年，洛杉矶的报纸，尤其是赫斯特的两份当地日报开始攻击这些“穿灯笼裤的”，用很刺耳的词语说他们打架斗殴、偷窃、强奸，好逸恶劳，逃避兵役，而且抽大麻。1943年6月4日——中途岛战役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一则流言在当地的陆海军基地里流传开来。说是一伙“穿灯笼裤的”打了一名水兵，然后逃进了当地一所电影院。于是手持棒球棍的水兵们一车一车地涌进查韦斯谷，他们冲进电影院，强迫放映员打开灯，然后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只要见到有人穿灯笼裤就拖到大街上。一顿老拳自然少不了，裤子还给扒掉。洛杉矶警察局和海军岸上巡逻队袖手旁观，大部分情况下并不加以干预。暴乱第二天，又有一群水兵和陆战队员从圣迭戈过来，他们的攻击目标扩大到了所有拉丁裔年轻男子，而不论他有没有穿灯笼裤。骚乱蔓延到了洛杉矶城区和东部。赫斯特的报纸谴责了对墨西哥裔美国社区的暴力行径。“许多人被打伤，许多是无辜的人，许多是这种墨西哥小孩，”18岁的暴动目击者唐·麦克法登说，“我看到一群军人拦下一辆有轨电车，他们看见里面有个穿灯笼裤的，就上去了。他逃不掉，结果被打到昏迷不醒。还有个坐有轨电车的人也挨了打，仅仅因为他凑巧是个墨西哥人。这都是我亲眼所见。”[\[17\]](#)一名不赞成此举的军人说：“我看不出我们这些士兵和那些殴打势单力孤的非雅利安人的纳粹冲锋队有什么区别。”[\[18\]](#)

在美国南方，当联邦的反种族隔离法令和当地的吉姆·克劳法发生

冲突时，暴乱便在多个城市里爆发——最可耻的是在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和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市，当莫比尔当地的一家船厂提拔了12名黑人工人，博蒙特的一处非裔美国人居住区被火烧光，两地便爆发了野蛮的暴力事件。在佐治亚州的斯图尔特营，白人军警和黑人军警之间居然打起了枪战，1人被打死，4人受伤。在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阿瑟港，种族冲突逐步升级成暴乱。这种非法暴力行为也席卷了美国北方和中西部的城市，包括费城、印第安纳波利斯、圣路易斯、巴尔的摩，以及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1943年8月，在纽约的哈莱姆，一名警官打死了一位黑人士兵，暴乱便开始了。

1944年总统大选的要紧时刻，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的处境很不妙。他面临的挑战即便是在和平时期也令人生畏。他既要保持共和党基本选民的团结，又要从已经帮助罗斯福连赢三届的新政支持者中撬出一块墙角来。此时共和党内部分正由于内外政策观点不一而出现裂痕。许多共和党人仍然坚持他们彻底推翻新政的决心——但是新政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保护和金融改革法案，却是大众不愿意撤销的。共和党的一些高层官员，例如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之流，仍在坚持他们和战前时代如出一辙的孤立主义思路，希望美国不要参与战后条约和多边组织。但是这种孤立主义早已在1941年12月7日名誉扫地，绝大部分美国人现在更希望参与国际事务，以阻止下一次世界大战。对罗斯福的憎恨是将共和党人团结起来的黏合剂，但是杜威在竞选纲领中传达出了“我也一样”的信息，承诺保持大部分新政改革措施，同时保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伤亡代价打赢战争。杜威想要攻击执政党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忽略了敌人来袭的迹象，但是此举将会暴露美军在战前就已破译日本外交电码的秘密。马歇尔将军劝他收手，警告说如果走漏消息让日本人停用旧密码，美国就无法获得这些情报了。杜威也听说了关于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这很准确），并且考虑在竞选中利用此事，但最终还是觉得这种攻击可能反而会激起大众对现任总统的同情，从而对自己不利。他后来只是模糊地提到罗斯福政府中那个“疲惫的老年人”，这方面若更过火一些，可能反而会降低他自己的胜算。

选战最耀眼（也可以说是最丢脸）的一幕是9月23日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酒店发表的演说。这次活动由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赞助。罗斯福坐在舞厅内侧的一个长条形讲台上，两边是大约20名兄弟会的头面人物，包括（紧挨着坐在他左边的）爱尔兰出生的兄弟会主席，丹尼尔·J.托宾。总统面前放着许多无线麦克风，演讲向全世界听众进行了无线电直播。这次演讲后来被称为“法拉讲话”，这是一次铁杆支持者大聚会，也是罗斯福漫长政治生涯中最愤怒、最刻薄，也最毫不避讳的一场谩骂。提到杜威试图把他自己的政党和该党长期以来反对公共劳工法案的历史撇清关系的时候，他说：“我们都在马戏团里见过很多精彩的表演，但从来没人见过大象能翻跟头还不会摔得四脚朝天的。”（此时，托宾笑得几乎要从凳子上摔下去了。）总统还反驳了反对者关于他未能让国家做好战争准备的指责——回顾1941年之前共和党反对军事开支的种种行径，他说：“我怀疑连戈培尔都不会这么阻挠我们。”杜威和其他共和党领袖最近发表演说，指责罗斯福的政策扩大和加深了大萧条。总统故意瞪大了眼睛，装出一副对这一路攻击难以置信的样子。“有一句有些伤感的老话要送给他们——‘绝对不要对一屋子吊死鬼说绳子’，”他慢条斯理地说，“同样道理，假如我是共和党领袖，我在对许多听众讲话时，在整个词典里最不愿意用到的一个词就是‘萧条’。”

当晚，大家在斯塔特勒酒店的舞厅里开怀畅饮。兄弟会成员们一次又一次跳着脚并挥舞着拳头疯狂欢呼。有人用汤勺敲击银盘子，还有一个人每次当罗斯福指责对手时，就要摔碎一个酒杯来配合气氛。一个应邀参会的战争消息办公室记者甚至担心这伙人会趁着酒劲出去闹事。

总统的最后一轮抨击，也是令听众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涉及一则关于他当年夏天乘军舰前往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时的谣言——总统的宠物狗“法拉”被意外丢在了阿留申群岛上，于是海军从西雅图派出一艘驱逐舰专门去把狗接了回来。这个传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大的总统随行团队怎么可能忘了一条狗？他们怎么可能回到西雅图才发现狗不见了？为什么派驱逐舰而不派飞机？但是反对罗斯福的媒体依然在一遍遍重复这个故事，而且谣言还越传越离谱，驱逐舰升级成了巡洋舰，后来

又是战列舰，还说这场子虚乌有的救援行动花费了2 000万美元。一个星期之后，莱希上将不得不站出来否认了这则传言，才把它赶出了报纸头版。但是罗斯福知道，自己的对头们玩过火了，他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罗斯福板起了脸，停了下来，让听众们放声大笑完了之后，向那些土包子打出了沉重一击。“这些共和党领袖并不满足于攻击我，或者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们，”他对兄弟会如此说，“不，他们不满足于此，现在他们还攻击我的小狗，法拉。”

好吧，当然，我不在乎攻击，我的家人也不在乎，但法拉在乎啊。你们知道，法拉是条苏格兰犬，作为苏格兰来客，它一听说国会内外的共和党小说家们编了个故事，说我把它丢在了阿留申群岛，还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它找回来——花了纳税人200万，300万，或者800万，还有2 000万美元——它的苏格兰灵魂就愤怒了。它再也不是原先的那条狗了。我早就习惯听到对我本人的恶毒诽谤了——就像那个老掉牙的无稽之谈，说我宣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想我有权利去在乎，去抗议对我的狗的诽谤。

这个国家很爱狗，这样的攻击自然能致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人后来总结说，这场竞赛的双方就是“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山羊”。[\[19\]](#)

晚宴在晚上10时30分散场，两位倒霉的年轻海军上尉恰好路过舞厅外的门廊。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群醉醺醺而且气势汹汹的兄弟会成员围住了，这些人想要知道这两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站在罗斯福这边还是杜威那边的。23岁的伦道夫·小迪金斯上尉是个参加过中途岛战役的老兵，他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20\]](#)于是就打起来了。据迪金斯说，兄弟会想要知道海外的军人们如何看待工会，并且指责这两个军官“不忠于军队，不忠于我们的统帅”。[\[21\]](#)双方一顿混战。根据有些报道的说法，迪金斯一拳头把兄弟会的帮主丹尼尔·J.托宾打翻在地，随后

被两名暴徒从背后抱住，第三个暴徒猛揍他的脸，“眼睛被打肿得很厉害，伤口缝了好几针”。^[22]酒店的行李员赶来拉开了双方。酒店经理则喊来了海军岸上巡逻队，他们最终平息了纷争。据说迪金斯被拉走时，有个兄弟会成员告诉他，被他打翻的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好友，以后有他受的。

这场“斯塔特勒之战”被反罗斯福的媒体抓住大做文章。兄弟会指责这些报道纯属诽谤，意在抹黑劳工组织，他们还向华盛顿寄去了一百多封请愿信，说是那两个军官先动的手。

“法拉讲话”之后，选战双方的辩论变得愈加恶毒。杜威的竞选搭档，俄亥俄州州长约翰·W.布里克，指责工会和大城市的政府机器被“缺乏信仰的共产主义力量”所影响。杜威则说罗斯福“对白劳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白劳德是美国共产党的领袖。^[23]但是此时的民意已经倾向于现任总统，这样的攻击便不免有些垂死挣扎的味道。盟军正在各条战线上大步推进，轴心国一败涂地，罗斯福也通过显得很辛劳的竞选巡游路线消除了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11月7日，罗斯福赢得了53.4%的普选票，在选举人票中更是以432：99大获全胜。

和平已经在望，“松一口气”的感觉也逐渐占据了美国民众的思想。军事工业的规模开始缩小。诸如罐头食品和肉类这类物资的配给制也逐渐放松。战争部和海军部发了数百份准备取消采购的通知。数百亿原本已经获得国会批准的资金被保留了下来，准备归还给财政部。1944年6月，军需工业雇用的工人总数已经在6个月时间里减少了大约100万人。报纸上满是复杂采购合同期限放宽的新闻，法律纠纷随之而来，涉及的都是合同取消费用，用于工厂改建的低息融资，加快折旧以降低税负，以及投资意向之类的细节问题。吉普车和其他剩余军用物资被卖到了民用市场上。电冰箱和其他大型家用电器的销售广告也从1941年以来首次再度出现。美国铸币厂恢复出产铜币了。灯火管制先是在一些主要城市被放宽，随后便全部取消了。新征募的军人回了家。人们又开始穿起正装参加百老汇的剧目首映和其他此类活动了。赛马场恢复营业，下注窗

口收到了多得前所未见的钱。罢工又开始危及关键产业了，因为工会领袖们觉得这样的停工不再会妨害战争。

在美国经济从顶到底的各个阶层，大部分人都认为战争的结束将会让大家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中。这种现象甚至还得到了一个专有名词：“萧条精神病”。在战争的高峰期，整个美国经济雇用了5 500万名平民工人，此外还有1 200万人穿上了军装。而战后，武装部队的复员和军工合同的取消将会同时到来。两相叠加，其冲击将会导致失去多达2 000万个就业岗位。陆海两军的巨量富余人员要由现有经济体系吸收掉，但又不能影响现有的市场供需。许多经济学家都警告说战后的失业危机将不可避免。新政的支持者们要求恢复大规模的公共资金就业计划。工商业领袖则希望联邦政府能够补贴向民用工业“转产”所需的成本。

结束战争的时机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变量。德国预期将在1945年初崩溃，而陆海军的将领们却坦言对于降伏日本还需要多久心中无数。根据一个经济学家团体的说法，如果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举白旗投降，“美国就会发现自己基本没有为对付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做好准备”。^[24]一名战争通讯员写道，太平洋战争如果突然提前结束，那将会是“一场和平的珍珠港事件”。^[25]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不考虑人命的损失——可以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太平洋战争能在纳粹德国败亡后再拖延几个月。甚至在普通民众中也能听到这样的观点。曾在肯塔基州一所军需工厂里工作的佩姬·特里回忆说，自己听到一名工友说她希望战争“等到她攒够买电冰箱的钱再结束。一个老人于是用一把伞打了她的头，说：‘你竟敢这么说！’”。^[26]

1944年11月，就在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之后，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警告说后方战线上的美国民众放松得太早了。农业的歉收使得恢复口粮配给的呼声再起。有人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国民服役法案”，旨在授权联邦政府征召平民劳工和对军事工业锁定劳动力，不过未能获得国会批准。被称为“突出部战役”的德军反击戳破了美国人关于欧洲战事提前结

束的幻想。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罗斯福写信，警告不要指望“西线敌军全面投降”。^[27]这封信很快被发布给了媒体。1945年1月，马歇尔和金给总统写了一封联名信，警告说陆海两军都面临着人员短缺，请求再征召90万人以替换那些“伤亡和患上战争疲劳症的人”。^[28]史汀生对于官兵们逐渐低落的士气愈加警觉。如果战争拖延的时间超过预期，军人们会不会纷纷要求回家？于是他劝说总统在后方战线上再兴节俭之风，哪怕这些措施大部分只是象征性的也可以。

1945年1月3日，联邦政府下令关闭所有赛马场和赛狗场。官方的理由是减轻道路和大规模交通系统的负担。但是如一些政府官员在无正式记载的场合所说，这项政策真正的目的是防止那些在战争中挣到了钱的老百姓把这些钱挥霍在赌博中。次月，酒吧和夜店又被要求午夜停业。这次，表面理由是节约电力和燃油，但此举实际上是“因为政府感觉民众缺乏‘战争紧迫感’而采取的措施”。^[29]

到1945年初，海外的军人和国内的民众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真心厌倦了战争，渴望回到正常的和平生活中。报纸专栏作家罗伯特·M.约德尔盼着有一天，“尽可以要那几千个鼓舞士气的志愿者和职责解说人别来烦我们。你可以把胜利菜园挖掉，把芜菁扔在街区监督员的脸上”。^[30]与此相似，第1陆战师的一名下士也只想要“回到老家的妻子那里，重操我开邮车的旧业，没有人打扰”。^[31]对于数百万思乡的军人来说，那种简单、平凡、平淡的生活就是天堂了，只要没人给他们下命令或者想要杀掉他们就行。当他们梦回家乡的时候，那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福祉都变得令人魂牵梦萦——私人生活，休息，街角小店的一杯咖啡，公园里散步，和姑娘们在一起，推孩子荡秋千，安全感，软床垫，还有睡个好觉。但是无论对那些“后方的家伙”怎样羡慕和嫉妒，这些军人都已学会比一般民众更加爱国并做出奉献。他们会幻想自己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将要迎娶的妻子，将要居住的房子，将要抚养的孩子。“我曾经认识过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说他期望的就是60分的生活，”士兵埃利奥特·约翰逊说，“可以期望回到自己的漂亮女孩旁边，

梦想得到孩子和工作。这绝对足够让人撑下去了。”^[32]玛乔丽·卡特赖特也是同样的想法，她空闲的时间都在做有关战后生活的白日梦：她的丈夫将会从太平洋上回来，离开海军。他们会盖一座两层砖头小楼，有太大的门厅，宽宽的楼梯，能装下五个孩子的卧室：“我就喜欢那样的房子，那个计划在我的脑子里重复了一年又一年。”^[33]

1944年年初，美国海军有27 500架飞机在役，比1940年时多了10倍。随着格鲁曼、道格拉斯、马丁和寇蒂斯公司的飞机生产线在当年3月到6月间达到产能峰值，海军的新飞机库存急速膨胀，几乎就要严重过剩，管理不过来了。1944财年中，海军得到了2.4万架新作战飞机，比之前三年的总和还要多。^[34]这是个高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参战国若遇到这种事怕是高兴还来不及。但是美国海军将领们却真真切切地面临着这个不大不小的抉择：产量越来越多，库存却过度臃肿，怎么办？2月，金上将签发了一份命令，将海军在役飞机的上限设定为3.8万架，并且固执地拒绝放宽。^[35]于是生产线的产量从1944年夏季开始锐减——但不允许彻底停产。为了保留这一关键战略性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经验，人们认为必须让它们保持低速运转。时任分管航空的副海军作战部长的麦凯恩将军提出了一份计划，要求只把最新型的飞机送到一线作战，老一些的飞机则送回美国本土用于训练和其他目的。1944年9月，美国海军采纳了一项更激进的计划——将数千架老旧的飞机直接扔掉，包括那些已经部署到太平洋的飞机，好为新飞机腾地方。各级指挥官都收到了指示：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把旧飞机处理掉。

作为1944年和1945年美国工业实力达到何种程度的一种体现，接下来的大规模飞机弃用比上千页的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如果一架飞机需要小修，它就会被拖出停机坪丢掉，闪闪发光的新飞机会飞来接替它的位置。数百架飞机飞到太平洋偏远海岛的机场，停放在空地上，然后就不要了。许多这样的飞机“坟场”后来都成了美军轰炸机投弹训练的靶场。拆解的飞机用推土机推成堆，再把坦克开上去压扁。轻微损伤的舰

载机被推出飞行甲板，扔进海里，新的补充飞机会从护航航母上飞来。此时正是战争的高潮，美军这边大规模丢弃完好可用的作战飞机时，日本人却苦于飞机产量远远达不到目标，他们要费尽力气才能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转。

大规模的飞行员训练就完全是另一种挑战了，海军从来不打算引入民营企业参与此事。托尔斯将军和他的棕鞋族同僚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并为建立训练司令部打好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飞行员数量就可以迅速增加。事实正是如此：1941年，美国海军向3 112名新飞行员授予了“金翼”徽章，1942年是10 869人，1943年是20 842人，1944年是21 067人。这种现象级的增长并不是靠降低训练标准换来的。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44年的新手飞行员来到一线中队时，平均飞行时长达到了600小时，其中200小时是在他们被指派驾驶的在役机型上飞的，部队里的老兵们还让他们获得了比前一代飞行员更高的技巧和战备水平。这一成就是通过扩建美国海军设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主要训练综合体，以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12座海军航空站实现的。这些新建航空站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墨西哥湾旁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南部的灌木林平原上，其规模堪比彭萨科拉。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林登·B.约翰逊在幕后推动政府向他的主要竞选赞助商，休斯敦的布朗&鲁特建筑公司授予了一份最初金额为2 400万美元的成本加固费用的建筑合同来建设这一基地。而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建设费用最终膨胀到1亿美元。^[36]这一大规模项目也间接令约翰逊的政治生涯平步青云，使他来到了更高的官僚层级上。

最初，美国海军的大部分飞行学员都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生。但是随着欧洲战云密布，新的人员招募通道被打开了。1939年的海军飞行预备法案要求训练6 000名新飞行员，1940年的补充法案将目标提高到为海军和陆战队训练1.5万名各种机型的飞行员。征募者被送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带着训练手册在课堂和四方院子里设立了招募点。海军起初想要工科学生，不过后来即使是文学专业的也没问题，只要这

个人健康状况良好，视力不低于1.0，未婚无子女，身高在5英尺4英寸到6英尺2英寸之间，读完至少4个学期的课程就行。（后来海军也开始接受条件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视力检测和健康检查就地进行。那些入围的新手将会接受数学相关的智力测试和精神科医生的仔细询问。如果通过，他们就会拿到一封介绍信，前往被称为“E基地”的小型农用机场，坐进单引擎单翼小飞机，进行为期30天的基础训练。

“E”的意思是淘汰（Elimination），而这正是关键。这些帆布蒙皮的小飞机被一位学员形容为“装着小发动机的风筝”。坐在它的驾驶舱里，学员们要么表现出自己的飞行天赋，要么被淘汰。塞缪尔·海因斯在得克萨斯州的登顿进行了淘汰训练，那是一座和周围农田几乎融为一体的草地机场，机场上有一个小机库，一所邮局，一根带有风向袋的杆子，周围围着栅栏。羊群常常出现在跑道上，机场本身也兼做牧场。当小飞机滑出机库进入机场时，飞行员还要操作飞机转一转，把羊群从跑道上赶走才行。

大部分飞行员很快就能掌控飞机，能够自信地把飞机飞得很好。其他人则被刷掉了，教官判断这些人无法值回山姆大叔为训练他们而花费的钱。

通过E基地训练的人将进入预备飞行学校，在那里他们将进行为期数月的基础训练和课堂学习。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根据计划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大学和学院里——最大的学校位于北卡罗来纳、艾奥瓦、佐治亚州的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里。但是没人会把这些预备飞行学员视为普通大学生。他们都要穿上军装，剃成板寸头。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水兵二等兵，身处海军军衔体系的最底层。被淘汰的人会被送往舰队成为普通的白帽子水兵，用拖把擦军舰。海军集体宿舍被改造成学员们的兵营，他们睡在上下铺上，私人物品存放在脚旁的柜子里。训练营里的纪律很严格，士官长每天早晨6点会把他们从床上喊起来，做早操，进行队列训练和长跑。无论他们去哪里——食堂、教室、训练场、游泳池——都要排好队。第一天来到游泳池时，所有人都被要求爬

到跳水台顶上再跳下去。一名学员解释说自己完全不会游泳，军官答道：“我没问你会不会游泳，我要你跳下去，你会不会游，我们看得出来。”^[37]

晚上，士官们会要他们去打扫兵营，直至所有地方都一尘不染。他们要刷洗“甲板”（就是地板），直到像新拿出来的餐盘一样干净。罗伯特·史密斯回忆自己在打扫厕所时，盯着他的士官长吼道：“把你的胳膊伸下去擦茅坑底下——把这里擦干净之后，回去把擦过的再擦一遍！”^[38]

他们大约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课堂里，在那里他们要修完航空工程学、数学、物理学、通信、导航以及气象学课程。大部分课程都少不了死记硬背，而且还要常常考试以检查他们的掌握程度。他们要学会使用旗语和莫尔斯电码通信，要能达到每分钟接收13个词的水平。借助照片、剪影轮廓，以及玩具一般的小飞机模型，他们要学会辨认全球各参战国所有的飞机型号。他们还要学习航空发动机的基本原理，了解空气是怎样流过一架飞机的控制翼面的。据哈尔·比尔估计，预备飞行学校把相当于大学里一整年的课程压缩到了4个月，他称此为“残酷的磨炼”。^[39]许多有志成为海军飞行员的年轻人都在这些课堂里翻了船，未及参加初级飞行训练就被淘汰出局。

彭萨科拉位于佛罗里达半岛最西端顶部，是一座优雅的古典西班牙风格的小城，满载着一批批新飞行学员的大巴穿过宽阔的石头大门驶入基地。它们从一座座优美办公小楼之间的大道上开过，道路两旁整整齐齐排列着覆盖着苔藓的橡树。在基地西侧平坦的荒地上是超过12座大大小小的机场，机场两边排满了漂亮的红砖机库。整个白天，空中都满是低空飞行的飞机，晚上也常常如此。死人的事故并不少见，机库的墙壁旁堆放着空的松木棺材。在战争高峰时期，彭萨科拉平均每天都有一次坠机事故。飞机会在起飞时掉高度，坠毁在跑道尽头，还会空中相撞。学员们可能死于过度小心导致的失速坠机，也可能死于飞得过于大胆——例如在树梢高度飞行，结果撞上电线。人们找到飞行员尸体的时

候，医疗官会在他飞行服的袖子和袖口上系好绳子，解释是这样的：“这是为了防止他从飞行服里滑出来……遗体像凝胶那样柔若无骨，会滑出来的。”[\[40\]](#)

美国海军的初级教练机是波音-斯蒂尔曼N2S，一种使用开放式座舱，用明黄色帆布做蒙皮的双翼飞机。这种飞机的绰号更有名：“黄祸”。机上一前一后设有两个座舱。教官坐在前座，通过一套被称为“通话软管”的单工通话线路向后座的学员说话。在空中，教官会演示各种基本机动动作——失速、改出、滚转、滑翔、爬升和俯冲。之后他会让学员控制飞机，自己则通过通话软管向他吼叫。马特·波尔茨记得他第一次接管操纵杆时教官对他吼道：“你爬升太慢了。机头低一点。别水平转弯。你想让我们陷入螺旋吗？你的控制太匆忙了。你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41\]](#)机上设备根本不允许学员回答教官的话，他根本没法提问或者做解释。

斯蒂尔曼教练机是一台容许犯错的机器，很容易飞，却也足够灵活，能够做出飞行员在驾驶战斗机时需要做的各种基本机动，包括翻筋斗、爬升半滚倒转、桶滚、殷麦曼滚转、破S，还有“落叶飘”。学员们要绕着地面上的两座输电塔，保持在仅仅500英尺高度飞8字形航线，练习精确转弯。这能教会飞行员怎样压大坡度而又不掉高度，这对任何飞行员来说都是一项关键性技术。他们还要学习怎样在强侧风中降落。如此种种，一轮接一轮地飞行。在飞了10次到20次之后，学员们就会获准第一次放单飞。这是人人都永生难忘的一个里程碑。

拉塞尔·贝克是个18岁的巴尔的摩人（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别人告诉他开飞机就像开汽车。贝克从来没开过汽车，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担心教官会因此小看他，甚至可能会把他淘汰掉。后来，他摇摇晃晃地飞了一次斯蒂尔曼飞机，教官对他说要轻轻控制操纵杆。“贝克，”他说，“这就像是抚摸姑娘的胸部那样。你得温柔。”贝克也不敢承认他从来没有摸过女性的胸部。[\[42\]](#)

几个星期过去后，飞行学员的队伍明显缩水了。有些人觉得飞行不适合自己的，于是请求换到其他军官训练课程中去。还有一些人死于坠机。许多人被教官淘汰了。被淘汰者会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常常连和同学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候说再见是一件尴尬的事，有人回忆道：“这对我们来说都很尴尬。”[\[43\]](#)

通过初级飞行训练的人会进入中级训练，他们会改为驾驶更先进的教练机。北美SNJ“得州佬”和伏尔梯SNV“振荡器”都是下单翼封闭式座舱飞机，外形和性能与现役飞机相差无几。和“黄祸”相比，它们对飞行员的要求更高，也更具危险性。“高速时候会发生各种事情，”比尔·戴维斯说，“而且所有事情发生得更快，容错空间更小。”[\[44\]](#)在这些中级教练机上，学员们会学习基础的轰炸战术、狗斗和射击。他们会向另一架飞机拖曳的条状靶标射击。他们会在一种叫作空战模拟器的设备上适应空中格斗，塞缪尔·海因斯形容这种设备就像“游乐场里的摇摇车”。该设备是一个面向一块电影银幕的模拟座舱，银幕上会放映攻击敌机的电影片段。学员晃动操纵杆，银幕上的飞机就会动。只要学员在有一架飞机进入十字线时扣动扳机，旁边铃声就会响起表示“击中”。对于海因斯来说，这使得“把人从天上打下来这种事看起来成了一场拼技巧的无害游戏，就像你在弹子房里消磨时间时玩的那样，还能赢一个丘比娃娃”。[\[45\]](#)

学员们会在地面上一台被称为“林克模拟器”的早期飞行模拟设备上首次接触仪表飞行。他们会爬进那个“铁处女”[\[46\]](#)，一个设计用来模拟飞机座舱的压抑幽闭的封闭舱室。学员们头上的盖子会关上。他面前有一套模拟控制系统和一套模拟飞机仪表的显示器。教官会通过通话软管告诉他按指定的航线和高度飞行，而学员表现如何，则要通过一台能打印出一页页数据的原始计算机来评判。自然，那些在此前的训练飞行中表现出色的飞行员有时会在静止不动的林克模拟器上晕头转向，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实际飞行时的“感觉”。但是精通单凭仪表飞行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海军飞行员迟早都会在夜间或者能见度为零的天气下

飞行。他们要学会相信仪表——空速、高度、罗盘、高度指示器，以及水平仪。他们还要学会如何“波束飞行”——就是根据导航雷达信号飞往指定方向。之后，他们会进行“蒙眼飞行”来检验技术：教练机的座舱周围会蒙上帆布，这样飞行员就看不见外面，不得不单独依靠仪表来驾驶飞机。许多人都感到这种训练太恐怖了。史密斯说他第一次飞这种练习时就像是“试着在杆顶上放一个沙滩球”。[\[47\]](#)

在近一年的努力学习之后，学员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金翼徽章。他们在彭萨科拉基地的一个四方院子里列队，一名将军过来，亲自把徽章别在每个人笔挺的白衬衫上。从这一刻起，他们就以少尉军衔加入了现役。现在他们完全可以自称为海军航空兵了。这是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并不是他们训练的终点。1944年，新拿到金翼徽章的飞行员们在被分配到前线部队之前，还要在高级航母训练大队（ACTG）再飞三四百个小时。其中许多人被派到位于迈阿密西北部的奥帕洛卡机场，“热带骄阳下一片满是沙地、灌木丛和响尾蛇的地方”。[\[48\]](#)他们在这里飞的都是现役机型——“地狱猫”“地狱潜鸟”“海盗”——和他们将来上战场时要驾驶的机型别无二致。这也是他们头一次和新近从舰队回来的老飞行员们一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编队飞行、射击、轰炸、夜间飞行，以及海上导航。飞行员们会向位于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中心深处的三合板靶标投掷烟幕弹来练习俯冲轰炸技术。这些人还被告知，不到紧急情况下不要使用无线电——“别出声儿！”——他们还要学习掌握详尽的手势信号，这样就可以在座舱之间通过目视通信。

大部分高级航母训练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都是参加过太平洋航母对决的老手。他们很清楚这些新兵蛋子来到舰队后将会面临的磨难和挑战。汉密尔顿·麦克沃特是个著名的“地狱猫”王牌，他回到美国，在已经编制完成、正在全员训练的第12舰载机大队中指挥战斗机中队。“我们飞啊飞啊飞啊，”他如此说，“如果我的学员没有掌握要领，我们就会接着飞。掌握了之后，我们还会继续飞——在返回机场的途中还常常会练习编队战术、空对空和空对地射击，有时会有仪表飞行和夜间飞行，

当然，还少不了狗斗和咬尾追逐的练习。”[\[49\]](#)

第12舰载机大队在俄勒冈州沿岸的阿斯托里亚海军航空站驻扎了几个星期。大部分早晨，飞机起飞时都是在“零零”环境之下：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浓雾。他们在白茫茫的雾气中爬升，紧盯着前方飞机排气口发出的淡蓝色火焰。到了4 000英尺高处，天空豁然开朗，头上是万里晴空，下方则是一片雪白如羊毛一般的云毯。这种飞行之艰难，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急白头发，而且真的有人头发变白了。但是正如麦克沃特不厌其烦地向年轻人灌输的那样，这种飞行是他们将会在太平洋战区实际遇到的。早上，航母特混舰队时常会被不透光的浓雾包围，飞行员可能一连几天都不得不依靠仪表和导航台飞行，因为风挡玻璃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下午飞行时，他可能不得不在薄暮中降落，眼睛四处寻找昏暗的飞行甲板，油量指针则已经几乎回到零。他还可能需要在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时飞行，可能需要驾驶着被击伤的飞机寻找返航的路，甚至本人也可能受了伤，鲜血直流。而这里的训练将会让飞行员们获得面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挑战时所需要的技术和本能。

年轻的飞行员们常常违规，不过有时却会得到队长的默许。“贴头皮”——紧贴地面飞行——是被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在人口密集区域。但许多飞行员根本无视这条禁令，尤其是在战时。从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起飞的海军飞机常常超低空飞到邻近的国王牧场上空驱赶牛群，地面上的牛仔们只能向他们挥舞拳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贴头皮”的飞行员们会从10英尺到15英尺高的超低空沿着海岸或者高速公路的中心线飞行，有时甚至会把骑摩托车的人挤到路边。这些新手飞行员很快学会了那些老家伙的业余生活方式——后半夜在当地的酒吧和夜店里喝得酩酊大醉。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詹姆斯·W. 韦尔农的高级训练是在位于新泽西州海岸最南端附近的怀尔德伍德海军航空站进行的。那段时期他不是在空中飞行，就是在附近的海岸小镇里鬼混，镇上满是“夸张的醉酒狂欢，弥漫着烟味的俱乐部，胡聊乱扯，群魔乱舞，对姑娘们的骚扰，脏兮兮的旅馆房间，下半夜空荡荡的街道，宿醉，以及对染上性病

的担忧.....一定是有一些激素的刺激和从众的心理让我们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如此丢人现眼”。[\[50\]](#)他和他的飞行员战友通常在每天6点的起床号之前只睡三四个小时，只有从座舱面罩中呼吸纯氧才能缓解那一阵阵的头痛。

性病对高级飞行训练中队的影响尤其大。医疗管理部门发布影片规劝军人们注意性行为的安全性。比尔·戴维斯尤其喜欢一部名叫“病菌横飞，管住自己”的影片。在这部片子里，医生告诉一名水兵他患上了性病。“我肯定是在一个公共厕所里得上的。”水兵说。“在那地方约会真是见了鬼。”医生答道。[\[51\]](#)

1945年初，当胜利已经在望之时，训练中队的许多年轻飞行员都迫不及待想要参战。他们担心和平可能突然到来，剥夺他们参加空中战斗的机会。老兵们则对他们说，连续三四个星期每天不间断的飞行战斗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如此积极了；飞行疲劳综合征是真实而且普遍存在的。飞行是一份活儿，得出力。飞机座舱不是什么好地方，要么太热，要么太冷。一个人被迫在那里坐几个小时，会越发感到局促和不适。飞行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精神压力就成了大问题。时常在死亡边缘游走，也侵蚀着飞行员们的神经。但即便如此，那些最为厌倦的飞行员还是偶尔会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想要飞行。塞缪尔·海因斯在一次薄暮飞行训练时体会到了这样的感觉，当时他下方的地面已经被夜色笼罩：“这架飞机仿佛吸收并保留了阳光和晚霞。我的周围一片光明，但是脚下的大地似乎已经死去，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我心中立刻充满了一种生存感。我永远不会死，我要永远飞下去。”[\[52\]](#)

1945年元旦这天，第3舰队再次出海，他们离开了乌利西环礁向北开去。这次的任务还是老一套——向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岛群发动新一轮舰载机空袭，这次是要支援麦克阿瑟计划中1月9日在吕宋岛的登陆。他们的目标是切断从日本到战区的空中增援通道，孤立林加延湾的登陆

滩头。同时照相侦察机还会在冲绳岛拍摄数千张高角度或者斜侧角度的照片，用来为即将在3个月内打响的冲绳登陆战制订计划。

1月3日和4日两天，恶劣天气使得台湾岛上空能见度很差，因此麦凯恩将军取消了对台湾大约一半的空袭。返回的飞行员们将其描述为自己所飞过的最恶劣的天气。“埃塞克斯号”上的一名航空情报官威廉·A.贝尓上尉称“险恶的乌云从700英尺堆积到1万英尺高空，到处都是暴雨，海面是一片青灰色，狂风怒号”。^[53]作战损失很惨重，第38特混舰队仅仅1月7日一天就损失了28架飞机。但是飞行员们仍在坚持作战，对台湾、吕宋和澎湖列岛的机场进行扫射和轰炸。^[54]

在南方的林加延湾，麦克阿瑟的炮击和扫雷舰队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神风攻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也一遍又一遍要求哈尔西压制这些威胁。航空照片揭示了这些致命攻击的来源：日军不遗余力地隐蔽他们的飞机，把它们藏在枝叶和灌木丛下面，停放在机场数英里之外。1月7日、8日、9日对于航母部队来说漫长而忙碌，飞行员们每天最多要飞四趟，大胆地以树梢高度在吕宋岛中部和北部进行搜索和扫射。

自从在8月掌管第3舰队以来，哈尔西一直希望向菲律宾西边的南海发动一场航母空袭。他期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南部海岸和中南半岛沿岸的诸多港口中寻获大批高价值目标。自从1941年12月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马来亚外海被日军空袭击沉后，还没有哪艘盟军军舰敢于闯进这片海域，潜艇除外。1944年10月和11月，哈尔西两次请求允许自己进入南海，但是尼米兹和金认为这太危险了。（哈尔西说：“我的上级恐怕是在怀疑我对于那里有丰富目标的判断。”^[55]他说对了。）现在哈尔西再次提出请求。他特别想要摧毁日军那两艘老式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据信这两艘舰正停泊在中南半岛的金兰湾里。尼米兹终于同意了。

几天后的1月9日，就在麦克阿瑟的部队登陆吕宋岛当天，第38特混舰队穿过了台湾南边的巴士海峡。这条航线令这支庞大舰队来到了距离

日军在台湾南部的主要航空兵基地富山机场只有80英里的近处。与此同时，一支由30艘舰队油轮，以及护航航母、驱逐舰和弹药船组成的后勤船队穿过了巴林塘海峡，这是吕宋岛和台湾岛之间的岛链中仅有的另一条可通行的水道。两支舰队都未被敌人察觉。当1月10日的太阳从海平线上升起时，美国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已经出现在了南海的中央，这是一片四周全部被敌人海军和航空兵基地包围的水域。哈尔西后来写道，舰队的处境“极度艰险”，因为日军飞机可以从任意方向前来进攻，或者几个方向同时进攻。第38特混舰队的实力足以自保，但哈尔西不得不为脆弱的后勤船队的安全操心。但另一方面，从这个位置上，美军航母部队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动强有力的空袭，打击那些在最近三年来始终无法触及的目标。

加满油之后，舰队开始向中南半岛沿岸彻夜疾驰。哈尔西向航空兵们发出了一条电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让他们去死。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哈尔西。”^[56]第二天一早，超过1 000架舰载机向金兰湾和西贡之间的目标投下了炸弹。他们把机场碾为齑粉，摧毁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炸断桥梁，把货运列车打翻在地，轰炸了码头、仓库和油库，并把停泊在锚地里的敌人舰船送下海底。一支编有11艘货船的无护航船队在越南头顿（圣雅克角）海岸附近的开阔水域被逮个正着，全数击沉。日军未能起飞战斗机拦截美军机群，高炮火力也弱到可以忽略，这一区域的日军显然完全措手不及。航拍照片展示了沿岸地带一片毁灭的图景——贝尔上尉在日记中写道：“目力所及之处全是火焰和冒烟的船只。被击沉船只的桅杆和上层建筑矗立在平静的海面上。还有一些船只侧躺在海面上一动不动。”^[57]“伊势号”和“日向号”已经在两个星期前离开此地到新加坡去了，但是这一天的战果已经足够好，哈尔西对此并不太介意。当地的自由法国人员后来报告说，空袭击沉了41艘船，总吨位12.7万吨，击伤了28艘船，7万吨，而且把整个海岸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58]

此时正值东北季风的高峰期，天气急转直下。天空浓云密布，大

海也变得恶浪滔天，北风呼啸而来。自从三个星期前的台风事件之后，哈尔西和他的团队对此小心了起来。特混舰队在撤离中南半岛时，航速下降到了16节，以防止再遭台风损伤。驱逐舰的燃油已经不足，必须在接下来空袭中国沿海日军之前加满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加油却十分危险。在舰队油轮侧旁，驱逐舰就像跷跷板一般忽上忽下。它们的舰首高高扬起，前部三四十英尺长的舰底伸出海面——之后又重重地跌入波谷。螺旋桨都露了出来，掀起成片的水花。青绿色的海水涌上它们的甲板，又从排水口里倾泻而出。浑身湿透的舰员们就像骑牛大赛选手那样摇来晃去。眼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拉福德将军庆幸自己是在一艘27500吨的舰队航母上。贝尔上尉从“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看去，发现那些小舰横摇幅度很大，“它们的桅杆看起来就像狂风中的小树，几乎就要插进狂暴的海水里”。[\[59\]](#)

加油持续了1月13日一整天，一直到14日上午才结束，6艘舰队油轮被吸得干干净净，整个第38特混舰队各舰的燃油量也至少加到了60%。

第二天，舰队向香港、广州、海南、厦门，以及再次向台湾发动了空袭。在香港上空，他们遭遇了最为猛烈的高射炮火，各种颜色的高炮烟团在3000英尺到1.5万英尺之间组成三层绵密的弹幕，就连许多老飞行员也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有一个飞行员形容这里的高炮“密集到难以置信”。[\[60\]](#)但是对于攻击一方而言，这又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他们摧毁了数万吨船舶，向广州、九龙和昂船洲的沿岸设施、干船坞、码头、燃油精炼厂投下了炸弹。返航的飞行员声称他们在台湾摧毁或打翻了10列火车。但是这一天的飞机损失也很严重——30架毁于战斗，31架毁于事故。有几架昏了头的“地狱猫”错误地轰炸和扫射了澳门的地面目标，这里当时还是中立国葡萄牙统治的。葡萄牙政府向华盛顿提出了愤怒的抗议，美国国务院则拿出了一份正式的道歉，这事也就了结了。[\[61\]](#)

1月18日，天气仿佛铁了心要把特混舰队在南海里掀个底朝天。一片低压区正穿过吕宋海峡而来，海况等级开始升高。哈尔西并不想让第

3舰队在这种环境下穿越这处狭窄局促的水域。他觉得可以通过菲律宾群岛内部的水道——民都洛海峡、苏禄海、棉兰老海和苏里高海峡——退往东边。这意味着他们要高速穿越狭窄水道，两个月前莱特湾海战时西村的南路舰队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各个特混大队都必须采用特殊而且不熟悉的航行队形，触礁搁浅的危险也很大。这一行动很可能被日军发现，虽然这一区域的日军航空兵已经大为削弱，但“神风”的威胁依然不可忽略。当哈尔西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尼米兹时，总司令立刻否决了它，他指示舰队继续留在南海，等天气好了再走。^[62]1月20日，舰队开出了巴林塘海峡。哈尔西的这次南海大冒险历时11天，舰队总航程达到3800英里。

麦克阿瑟的部队顺利登上了吕宋岛，并向南面的马尼拉推进。但是日军对林加延湾内美军两栖舰队的空袭却无休无止，和往常一样，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想要第3舰队为他提供更多的直接空中支援。1月21日又是漫长的一天，美军向已经熟悉了的台湾和琉球群岛的目标再度发动空袭，但是日军航空兵向舰队发动了一轮接一轮的猛烈反击。日军飞机藏在密布的浓云之中，显然是尾随上午空袭后返航的美军飞机而来，一旦遇到巡逻的“地狱猫”机群便躲入云中。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大批敌机从云底冲了出来。一架飞机命中“兰利号”航母一枚小型炸弹，一架自杀机命中了驱逐舰“马多克斯号”，炸死4名舰员。“汉考克号”航母受了重伤，它自己的一架飞机在挂弹降落时炸弹被引爆，炸死了48名水兵。两架“神风”自杀机沉重打击了埃塞克斯级航母“提康德罗加号”（CV-14）。它的信号舰桥被摧毁，飞行甲板无法使用，机库也被大火吞没。^[63]140名舰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不少高级军官。大火烧毁了36架飞机，超过其总载机量的三分之一。贝尔上尉从邻近的“埃塞克斯号”上看着这座漂浮的地狱，他在日记中写道：“‘神风’是太平洋上最重大的事件，但国内却没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少数几架飞机和一小群疯狂的小人物，鬼子就能把我们所有能拿来参战的水面舰艇全部重创或击沉……‘神风’让日本人找到了战争中最有效的秘密武器。这肯定是最令

人胆寒，令人畏惧的。”^[64]

第3舰队的任务完成了，至少这一轮任务完成了。它已经在海上接连航行了28天，航程超过1.2万英里。它的舰载机摧毁了30万吨日本船舶。1月25日，特混舰队回到了乌利西的“大谷仓”里。此时的潟湖锚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第3舰队和第7舰队主力都来到了此地。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也在这里，按计划，他将在第二天接管第3舰队。当晚，斯普鲁恩斯带领一众随行高级幕僚造访了“新泽西号”，拜会了哈尔西。这两位四星上将在哈尔西的指挥舱里单独待了超过一个小时。他们聊的内容则无人知晓。

1月26日午夜，指挥权由哈尔西移交给斯普鲁恩斯。第3舰队变更为第5舰队，第38特混舰队也再次改编为第58特混舰队。米彻尔将军接替麦凯恩，重回第58特混舰队司令岗位。哈尔西则飞回珍珠港，接着又回到美国本土。他早就该休长假了。

^[1]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September 16, 1944,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74.

^[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66.

^[3] Willard Waller, “Why Veterans Are Bitter,” *American Mercury*, August 1945, p.147.3

^[4] Ibid.

^[5] “胜利菜园”是指战时英美两国发动市民在自家院子里种植蔬菜以弥补食物不足的举措。——译者注

^[6] 此事为沃尔特·R.埃文斯日后所述。他还描述了“维斯塔尔号”修理船上的船友对“好莱坞式造作”的态度。Evans, *Wartime Sea Stories*, p.38.

^[7] Hunt, *Coral Comes High*, p.21.

^[8] 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F, “National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F 1—5.以时价来算，1940年是997亿美元，1944年增至2 101亿美元；以1958年的价格来算，1940年是2 272亿美元，1944年增至3 613亿美元。

^[9] 后一个数字按1940年的标准来算为316.6亿美元。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F 540—551, “National Saving, by Major Saver Groups, in Current Prices, 1897 to 1945.”

- [10] Blum, *V Was For Victory*, p.98.
- [11] John Kenneth Galbraith,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323.
- [12] Winkler, *Home Front U.S.A.*, p.45.
- [13] Marjorie Cartwrigh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p.190—91.
- [14] U.S.Commerce Department,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N1—29, “Value of New Private and Public Construction Put in Place: 1915 to 1970.”
- [15] Lerner, *Public Journal*, pp.28—29.
- [16] Baime,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p.247.
- [17] Don McFadden,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48.
- [18] Perret,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p.315.
- [19] Reid, *The Brazen Age*, p.8.
- [20] “Navy Officer Says Teamsters Hit Him,”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44, p.15.
- [21] Ibid.
- [22] “Dickins v.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Etc., 171 F.2d 21 (D.C.Cir.1948),” October 18, 1948,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District of Columbia Circuit.
- [23] Blum, *V Was For Victory*, p.297.
- [24] The “Mead Report” quoted in Cooke,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p.300.
- [25] Perret, *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p.399.
- [26] Peggy Terry,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12.
- [27] Eisenhower to FDR, March 31, 1945, FDR Library.
- [28] King/Marshall letter to FDR, January 1945, excerpted in “Letters on the Pressing Manpower Proble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45.
- [29] “Curfew Used to Teach ‘War Awareness’ Lesso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p.67.
- [30] Yoder, *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 p.115.
- [31] Hunt, *Coral Comes High*, p.21.
- [32] Elliot Johnson account,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198.
- [33] Marjorie Cartwright account,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p.190—91.
- [34] U.S.Navy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1944, Secretary of the Navy James Forrest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p.15, Hopkins Papers, Group 24, FDR Library.

[35] Reynolds, *The Fast Carriers*, p.324.

[36] Delaney, “Corpus Christi: University of the Air,” *Naval History* 27, no.3, June 2013, p.37.

[37]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42.

[38] Smyth, *Sea Stories*, p.39.

[39]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26.

[40]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72.

[41] Portz, “Aviation Training and Expansion,” *Naval Aviation News*, July—August 1990, p.24.

[42] Baker, *Growing Up*, p.216.

[43]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61.

[44] *Ibid.*, p.67.

[45]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69.

[46] 铁处女，传说中欧洲中世纪的一种刑具，受刑者会被关进一个类似棺材的铁柜子。
——译者注

[47] Smyth, *Sea Stories*, p.48.

[48]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9.

[49] MacWhorter and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134.

[50] Vernon, *Hostile Sky*, p.99.

[51] Davis, *Sinking the Rising Sun*, p.44.

[52]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60.

[53] Lieutenant William A.Bell, “Under the Nips’ Nose,” pp.12—13.

[54]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7, 1945, p.8.

[55]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95.

[56]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11, 1945, p.11.

[57] William A.Bell Diary, January 12, 1945, p.7.

[5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198.

[59] Lieutenant William A.Bell, “Under the Nips’ Nose,” p.24.

[60] *Ibid.*, p.23.

[61]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279;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196.

[62] Third Fleet War Diary, January 19, 1945, p.18.

[\[63\]](#) Ibid., p.21.

[\[64\]](#) William A.Bell Diary, January 21, 1945, pp.17—18.

第十章

林加延湾，吕宋岛西北海岸的一处马蹄形缺口，在1941年12月时为攻打过来的日军提供了主要入口。三年零三个星期后，历史再度重演，但规模却要大得多。太平洋上出现过的规模最大，由超过800艘军舰和运输船组成的进攻舰队，从1945年1月6日开始抵达林加延湾。这支舰队的任务是运送美国第6集团军在林加延湾南部海滩登陆。“塞拉日”，也就是指定的登陆日，定为1月9日。

每当有新的船只进入海湾，它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锚地，沿着浮标标示出的水道，开到指定的“泊位”上。海岸线周围地形起伏多山。在东侧，丛林密布的暗绿色山岭逐步升高，直到在卡加延周围变成崎岖的绿色山峰。军舰和运输船上的舰员们都很紧张，这很容易理解：舰队太过庞大，峡湾太过狭小，无法进行高速规避机动。大部分舰船在整个战役期间都不得不错泊在那里，过于密集又静止不动。来袭的日军飞机可以躲进多山的海岸地貌留下的雷达盲区里隐蔽接近。雷达员们紧紧盯着显示屏，脸都快要贴了上去，高射炮手们警惕地扫视着各处，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舰载机则在上空盘旋。发烟器产生的化学烟雾飘浮在海湾上空，仿佛连风都吹不走。

这次，美军在战争中头一回遇到了可怕的“震洋”自杀快艇。这些木质小艇从林加延湾西侧沿岸开出来，向舰队高速冲去。1月6日夜间，几艘美军船只和登陆艇遭到了重创，从那以后，美军20mm机关炮的炮手们都会时刻握住扳机，向所有能辨认得出的东西开火。从傍晚到清晨，海岸线都会被照明弹和探照灯照亮。日军甚至派出人员游泳进行自杀攻击，他们躲在漂浮的残骸后面接近目标，想要把爆炸物安放在美军舰船的船体上。还有一些人则伪装成菲律宾渔民，坐在当地人的独木舟上，

满载着炸药接近舰队。有一艘运输船的侧舷就被这样的攻击炸开了一个大洞，炸死了几名船员。

在从莱特湾出发开往林加延湾的一个星期的航程中，盟军进攻舰队遭到了空前猛烈的神风攻击。当杰西·奥尔登多夫中将的火力支援大队鱼贯穿过班乃岛以西的狭窄近岸水道时，凶猛的攻击落到了他们头上，对美军的考验就此开始了。1月4日下午5时12分，一架单枪匹马的横须贺厂P1Y“银河”轰炸机（盟军绰号“弗兰斯”）突然穿出云底，撞进了护航航母“欧曼尼湾号”的甲板。它的进攻如此突然，美军毫无防备，甚至连高射炮手都来不及开火。两枚炸弹击穿了这艘“吉普航母”脆弱的钢质飞行甲板，在机库里爆炸开来。大火立刻失去了控制，吞没了炸弹和鱼雷库，引发了殉爆。这艘小航母被炸成了碎片，93名舰员阵亡。幸存者们跳进了海里，被护航的驱逐舰救起。燃烧的残骸则被丢弃在民都洛海峡中。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日军在菲律宾的航空兵已是强弩之末。指挥部设在马巴拉卡特的第二〇一航空队只剩下大约40架还能飞的飞机。在整个菲律宾，剩余的日本飞机可能也不超过200架。在12月的最后一周，日本帝国大本营做出决定，不再向菲律宾增援空中力量。菲律宾群岛北边的飞行航线再也用不着了。自从莱特湾海战以来，每10架从台湾岛或者日本飞往菲律宾的日军飞机中，就有大约3架或毁于事故，或被第3舰队的舰载机击落。^[1]现在，根据东京的命令，所有剩余的飞机都要起飞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航空兵基地内的剩余人员将要退往山区和日本陆军部队会合。二〇一航空队的高级军官们将要利用暗夜的掩护乘飞机撤回台湾。其中最后一条命令是秘密传达的，以免打击留守人员的士气。

吕宋岛上的日军机场几乎每天都有美军轰炸机和扫射地面的战斗机前来光顾。日军飞机除非停放在远离机场处并用伪装网和灌木枝叶妥善隐蔽，否则都会被很快摧毁。那些没有经验的年轻自杀机飞行员被告知，他们的飞机一旦拖出隐蔽处并推到起飞位置，就要迅速起飞，并赶

在美军战斗机前来截击之前爬升到高空。只有技术较好而且运气上佳的人才能抵达敌人舰队，能撞中敌舰的更是少之又少。但是日军从来都不缺自愿飞自杀任务的人。在飞行员比能飞的飞机还多的克拉克机场，年轻人们围着他们的航空队长，请求让自己起飞作战。1月5日晚，基地里只剩下13架第二天还能出击的飞机，于是13名飞行员被选中执行任务。失望的落选飞行员便在地面上四处寻找坏飞机，然后“恳求机械师把这些破飞机上状态最好的部件拼凑成随便什么能飞的东西”。^[2]经过地面人员一整夜的努力，又有5架飞机被修复到能够飞行的程度。

破晓时，机场旁举行了简单的送行仪式。飞行员从铺着白色台布的桌子上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在战友们向自己敬礼告别后爬进座舱，最后一次起飞升空。

临近中午时，当奥尔登多夫麾下拥有164艘舰艇的对岸炮击大队在林加延湾外占领阵位时，“神风”机群从东边蜂拥而出。奥尔登多夫的旗舰，珍珠港的幸存者“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被撞中右舷主桅杆附近位置，炸死了32人，炸伤数十人。一枚高速落下的炸弹击中了乔治·韦勒少将的旗舰“新墨西哥号”战列舰的舰桥左侧，炸出了巨大的火球。30人被炸死，其中包括舰长罗伯特·W.弗莱明上校，以及两位贵宾——英国陆军的赫伯特·拉姆斯登中将，以及《时代》杂志通讯员威廉·亨利·奇克林。太平洋上军衔最高的英军将领，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此时也作为观察员搭乘在“新墨西哥号”上，好在他侥幸生还。下午稍晚时候，一架“神风”自杀机独自突破了暴风雨般的防空火网，撞击了巡洋舰“路易斯维尔号”。机上的两枚炸弹爆炸开来，在2号炮塔和操舵室周围引发了严重火灾。第4巡洋舰分队指挥官西奥多·E.钱德勒将军被严重烧伤，次日离世。舰员们发现了那架“神风”机飞行员一丝不挂的无头尸体，直接把他从侧舷扔到了海里。

在林加延湾首轮两栖登陆之前的5天里，“神风”自杀机命中或近失损伤了30艘盟军舰船。3艘被摧毁，14艘遭到重创，13艘轻伤。突击运输舰“多恩号”上的一名目击者描述了眼看着军舰带着垮塌的上层建筑

和“被熏黑和撕碎的曾经是炮塔的东西”从眼前经过的“奇特景象”。^[3]搭乘在巡洋舰“博伊斯号”上的麦克阿瑟将军亲眼看到了几次可能轻松把他干掉的攻击。他不要命地拒绝了所有请他到下方寻找掩护的提议，站在后甲板的水上飞机滑道上一边观看战斗，一边若无其事地抽他的烟斗。在回忆录中，他描述了这“猛烈的防空弹幕，每艘舰都打出了震耳欲聋的高炮齐射”。^[4]

1月7日，应金凯德和麦克阿瑟的紧急要求，哈尔西在吕宋岛上空再度铺上了“大蓝毯”。舰载机飞行员返回母舰时宣称他们在地面上至少摧毁了75架日军飞机。令人宽慰的是，第二天，“神风”机的威胁真的大大缓解了。

吕宋登陆战役中的美军指挥体系和莱特岛战役时基本相同。克鲁格将军继续指挥第6集团军，下辖两个各编有两个师的军——伊尼斯·P.斯威夫特少将的第1军（下辖第6师和第43师），以及奥斯卡·W.格里斯伍德中将的第14军（下辖第37师和第40师）。第5个师，第25师，则待在海岸外的船上担任“海上预备队”。金凯德将军的第7舰队将封锁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并保护漫长的海上后勤线。肯尼将军继续指挥第5航空队和第13航空队。一旦地面部队拿下克拉克机场和吕宋岛上的其他机场，他的陆军航空队战斗机和轰炸机就会飞来此地驻扎。第8集团军仍由艾克尔伯格将军指挥，他们将采取欺敌措施，争取让日军误以为盟军的主要登陆行动将在吕宋岛南部。“S日”当天，克鲁格的四个主攻师将在林加延湾湾底20英里宽的滩头正面登陆，之后向内陆推进，夺占吕宋岛中部平原。左翼的第1军将把日军主力围困在卡加延山区，同时第14军将南下直取马尼拉。之后，第8集团军将出动一支部队在岛屿南部海岸登陆。第6和第8两个集团军将以钳形运动合围马尼拉和马尼拉湾。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日军地面部队主力就将被孤立 in 岛屿多山的北部，与菲律宾首都及南部的其他日本陆军部队断绝联系。

登陆前夜，炮击舰队上演了一出华丽的烟火秀，用密集的舰炮弹雨洗扫滩头。驱逐舰“霍沃思号”上的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在写给妻子的

信中描述了那些以长长的高弧度弹道飞向岸边的炮弹：“你知道吗？你看过去的时候，它们仿佛飞得很慢。它们就像缓缓坠落的星星那样飘过天空。我们射击的目标在7英里外，中间是一层层浓密的烟云。我站在舰桥侧面，眼看着那些红色的火球消失在云层中，接着再次出现。目标太远了，炮弹落地时我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点红色闪光。”^[5]炮火被引向整个林加延湾海岸线上所有疑似是日军沿岸阵地的地方，尤其是马蹄形海湾湾底处预定的登陆滩头上，也就是林加延、达古潘、马比老以及圣法比安几个小镇周围。敌人的岸炮火力几乎没有还击，南部登陆滩头附近的日军更是一弹未发。拂晓时，在林加延镇里，美军发现一群菲律宾老百姓打着美国国旗聚集成群。用望远镜看到这一情景后，奥尔登多夫立即命令舰炮火力远离这一区域。

当突击部队爬下吊绳网，来到登陆艇中时，天气平和，微风徐徐，空中有碎云，海湾的封闭水域内波浪不兴。南十字座就高挂在登陆滩头上方，但那里却被低垂的雾霭所笼罩。登陆艇在运输船集结区里兜圈子，或者引擎空转，它们在等候发起登陆的信号。有几艘“震洋”快艇从西侧海岸拼命冲出来，但要么被摧毁，要么被驱离，无一能够扑向目标。

上午9时30分，第一批登陆部队出发。超过1 000艘登陆艇向海滩开去，它们长长的尾流在海上画出一条条平行的白色线条。到9时40分就有近2万部队上了岸，到中午时，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8万人。他们沿着海湾南端林加延、达古潘、马比老三个镇子旁一条12英里宽的滩头登上了海岸。海滩宽阔而且连成一片，大到足以容纳整整两个军（共有四个步兵师）以及巨量的重型装备、车辆、武器，还有按计划将在几个小时内到达的补给物资。登陆几乎未遇到抵抗，菲律宾当地人兴高采烈地和士兵们握手、亲吻。日军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海湾东部沿岸，也就是三年前本间雅晴将军部队登陆的地方。在美军战线右翼，第40师完全没有遇到敌人：没有炮兵，没有迫击炮，没有轻武器火力，也见不到日本人。前出巡逻队找到了几个碉堡和暗堡，并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但是

见不到一个敌兵。这个师向内陆进发，在林加延夺取了一条可用的飞机跑道。

在东翼，第6师在曼加尔丹附近的“蓝一”“蓝二”滩登陆，第43师在圣法比安附近的“白一”“白二”“白三”滩登陆。他们遭到了圣法比安背后高处日军远程炮兵和迫击炮火力的零星射击。这种火力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骚扰，它们既不够猛烈，也不够准确，无法造成重大伤亡，但还是迫使美军把物资卸载的地点向海岸西边迁移了一些。伤亡只有寥寥数人，其中有一个士兵还是被发狂的水牛踩死的。[\[6\]](#)

麦克阿瑟将军在中午时上了岸，身后跟着一群幕僚、战争通讯员和摄影师。他乘坐的驳船开向滩头中央，工兵们已经在那里用一对下锚固定的浮舟搭建了一座通向沙滩的临时码头。舵手原本想操船靠到码头上，但是麦克阿瑟却示意他离开码头。他转而从一处水深及膝的地方下船，涉水上了岸。这种仪式简直成了他的招牌动作。和在莱特岛和民都洛岛时一样，这一次他的举动又被摄影师拍摄了下来。麦克阿瑟还是戴着他为人们所熟悉的元帅帽和飞行员墨镜，挺直身躯，迈着坚定的步伐，即便有一架零式战斗机出现在头顶低空。他满意地看着那架敌机被高射炮火组成的“火墙”摧毁。[\[7\]](#)

在滩头东北面第1军的防区里，第43师的前出巡逻队遭到了来自达莫提斯和圣费尔南多两个镇子上方山区和山岭上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的猛烈轰击。斯威夫特将军的第1军司令部立刻命令这个师向内陆推进，夺占这些草甸高地。一个团受命肃清正东方的470高地，另一个团则要夺取马比老镇上方的山脊线。其余各部则沿着海岸道路交替掩护推进。一整个下午，日军野战炮和迫击炮都在不停地给美军带来伤亡，但是地面上步兵的抵抗却十分零散。到1月9日日落时，美军的滩头阵地已经沿着海岸向圣贾辛托和宾岱镇扩展了4英里。

登陆第二天和第三天，第43师沿着圣法比安和达莫提斯东面的谷底道路以及通向北方罗萨里奥和卡巴鲁安山的山脊线发动了试探性进攻。在这一区域，进攻方在通向山区的道路各处都遭到了日军愈加猛烈的抵

抗。情报已经显示，岛上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将军在卡加延山高处的旅游胜地，距海岸约20英里的碧瑶建立了指挥部。山区的道路均处于坚固的堑壕阵地，巧妙伪装的火力点和岩洞，以及雷区的防御之下。美军用重炮、舰炮和空袭还击日军，却无法把日军赶出去，除非他们向那些危险的高地发动协同进攻。美军不会这么做。麦克阿瑟的首要目标马尼拉位于另一个方向上。根据这位上司的剧本，主攻方向是南方，指向吕宋中部平原的中央，以及菲律宾首都。因此，克鲁格将军只会增强左翼的防守，并希望日军不会从东北面的山区发动装甲反击。

到登陆第三天结束时，第6集团军的滩头阵地已经有20英里宽，纵深5英里至7英里，占据了海湾的整个南岸。人数相当于15个陆军师的美军上了岛，沿30英里长的防线布阵。林加延湾原本平静的海滩已经被改造成了从海到岸的中转站，物资吞吐能力不逊于一座大型港口。坦克登陆舰直接开上海滩，打开蚌壳式舰首舱门，以工业化的速度卸载大件货物。满载的卡车、牵引车和吉普车沿着浮桥栈道直接开上岸。滩头成了一座满是成堆的板条箱、油桶、停放的车辆、帐篷区以及围着沙袋的高炮阵地的迷宫。暴脾气的海军滩头管理员拿着大喇叭吼叫个没完。在拿下马尼拉湾并使其向盟军船只开放之前，林加延是美军唯一可以掌控的海港。

林加延湾曾经蔚蓝色的天然海水已经被800艘舰船产生的越来越多的垃圾所污染。海面 and 海岸上满是垃圾和废物。停泊着的运输船之间漂浮着腐烂的尸体，几乎全部都是日本人。每隔一段时间，专用垃圾清理驳船就会把这些废物和敌人的尸体捞起来，堆到海滩上一把火烧掉。

第14军防区的内陆深处是一片草木繁盛的湿地，其间溪流纵横交错，还点缀着老百姓的鱼塘。这种潮湿地形给后勤和工程建设都带来了困难。在林加延镇周围，巨大的沙丘令轮式车辆无法通行，于是推土机被派过来清理出一条通路。这一地区的大部分桥梁都被毁掉了——被敌人毁掉，被友方的菲律宾游击队毁掉，以及被美军的轰炸和炮击毁掉。于是一队队士兵只能把步枪举过头顶涉水过河。两栖卡车被拿来当作货

船，在那些水深无法涉渡的河流中穿梭。工兵们在水深较大的渡口用原木造桥，只要结构合理，它们就能承受数以千计的人员、卡车和坦克的重量。达莫提斯—罗萨里奥之间20英里长的铁路线被扒掉，路基则改造成了供重型装备通行的高速公路。D+3日，前出巡逻队抵达阿格诺河，这是美国陆军前进路线上的第一道天堑。工兵们迅速在河上架起了两座承重35吨的组合式钢结构桥。

通向马尼拉的路线要从吕宋岛中部平原正中央穿过，这是一片平坦、肥沃的地区，满是稻田、牧场和甘蔗田，以及密布的河道和灌溉渠。这片平原两侧都是山脉，南北长约120英里，宽30英里至50英里，是菲律宾最富饶的农业产区之一，平原上点缀着大种植园，有集市的小村庄，村庄里的石头教堂俯瞰着西班牙风格的露天广场。这里拥有整个菲律宾最好的道路网，包括一条双车道的碎石柏油高级公路，公路每隔一英里左右就会与东西向的砾石道路交叉，还有两条铁路干线。这完全是一片祥和的田园风光，各种深浅不一的绿色交织在一起：白茅草地和低洼的稻田，蜿蜒的河床，两侧是一片片榴槿和山竹树丛，高出来的河堤上搭建有覆盖着暗褐色裴帕桐树叶的小棚子；黑色的水牛在草地上徜徉，有些水牛的背上还栖息着白鹭；盖着铁皮波纹板房顶的竹子搭建的小屋旁，挂着木槿花和叶子花做的花环。

起初，日军在乡村平原地带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炮兵和配备轻武器的小部队向美军侦察小分队开火，随即向南方或东方撤退，躲进山区。这些临时射击阵地设在灌溉沟渠内或者种植园建筑群里，用沙袋做了强化。双方的交火短暂而且断断续续，他们仅仅是拖慢了美军进攻的节奏而已。克鲁格将军急于让第6集团军只以一条较宽的阵线保持推进，他开始对格里斯伍德第14军向首都猛打猛冲的步伐担忧起来。这意味着斯威夫特的第1军必须要跟上格里斯伍德的推进速度——但这很难，因为第14军的路线上并没有多少日军反抗，而斯威夫特还担负着把日军重兵集团困在东北部山区，守卫集团军左翼的任务。第14军的第37师沿着林加延—巴延邦道路疾进，根本没遇到敌人，只有一群欢呼雀跃的菲律宾百姓。该军的第40师则沿着西侧约10英里外平行的13号高速

公路向南高歌猛进。而第1军的推进则遭到达莫提斯—罗萨里奥公路沿线日军的顽强抵抗，在这里，第43师的工兵们还要在敌人密集的炮击下费力清理道路和建造桥梁——在卡巴鲁安山区，第6师遭遇了从一处高大海角上坚固支撑点里的日军射来的猛烈火力。眼见日军向他过度拉长的战线发动反攻的风险越来越大，克鲁格投入了他的预备队，第25师（欠一个团），来增援第43师。

麦克阿瑟在林加延湾的达古潘设立了他最初的指挥所，但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前线附近。他坐着吉普车从长长的行军队列旁开过，士兵们看见这个戴着元帅帽和飞行员墨镜的熟悉身影时，一下子都还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美军并未就固定的进攻时间表达成一致，但麦克阿瑟急于拿下马尼拉，越早越好，这部分是由于他担心被日军关押在城内集中营里的美军战俘和当地人身处险境。他怀疑克鲁格对日军反击的威胁担忧过度了。1月12日，在仍然停泊于林加延湾内的“博伊斯号”巡洋舰上举行的高级指挥官会议上，麦克阿瑟要求他的第6集团军司令加快向马尼拉推进的速度。如果第14军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它就该推进得再快些。他向克鲁格咆哮道：“你的伤亡在哪儿？他们在哪儿？”^[8] 麦克阿瑟还坚持要求尽快占领日本人称为马巴拉卡特的大型航空兵基地——美国人仍然称其为克拉克机场——这样第5航空队就能开始在吕宋岛上起降重型轰炸机了。但是克鲁格仍然担心日军会从东北山区发动装甲反击，他坚持说“我认为向马尼拉草率推进会〔让第14军〕遭遇敌人的反攻，而且一定会使补给跟不上——这是个大问题，毕竟所有的桥都被毁掉了”。^[9]

日军山下将军的处境也很不妙。美军潜艇和飞机的封锁线有效切断了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联系，因此他无法再指望更多的补给或者增援了。他已经预料到麦克阿瑟会在林加延湾登陆，只是没料到登陆来得如此之快。山下曾经不情不愿地被迫把他最好的部队海运到莱特岛上去送死。但他此时麾下的部队数量仍然可观——吕宋岛上有大约27万名日军

部队和其他军事人员——不过他的部队却分散得很广，而且处于陆军和海军的双头交叉指挥之下，难以集中力量。吕宋岛上的大部分日军地面部队都被用来防守三处相距遥远的山区，无法机动。由于缺乏车辆、铁路车皮和燃料，日军的交通线很难发挥作用——菲律宾游击队对道路、车辆和铁路的破袭行动更令日军雪上加霜。大部分日军部队陷入半孤立状态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小部队在乡间游荡，在丛林里渔猎，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之下，山下不得不采取静态防御策略。他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延缓美军向日本本土碾轧的势头。而无论他怎么做，吕宋岛迟早都要落入敌手，这一点他心知肚明。

最大的一支日军兵团，“尚武集团”，拥有15.2万人，部署在林加延湾东北面的卡加延山区。山下将军从海拔5 000英尺的度假胜地碧瑶的指挥部里直接指挥这个兵团。第二个兵团占据了马尼拉北面的克拉克机场，并以部分兵力防守巴丹与科雷吉多尔。第三支兵团，兵力约8万人，在马尼拉东边的山区掘壕固守。还有一些小股部队散布在外围区域。山下拒绝了在阿格诺河以西的平原上反击麦克阿瑟部队的提议，他认为进攻部队会被美军的优势炮兵和空中力量粉碎。相反，他用部队封锁了所有可能通往卡加延山区的道路。其他地方的指挥官则被告知在高地上建立防御阵地，以期“牵制吕宋岛美军部队主力，摧毁其作战力量，同时做好长期自给自足、独立抗战的准备”。

这样，通往马尼拉的道路就敞开了，而且山下也没打算防守这座城市及马尼拉湾。他指示部队将储存在马尼拉沿海区域的6.5万到7万吨补给物资搬运到山区的隐蔽所去，这样就可以用这些物资来保障那里的日军部队。待搬运工作完成后，剩余的守军就要撤离马尼拉，退往城市东边更易于防守的高地上。日军的计划就是如此。

战役第二周，当美军第1军向南面和东面推进时，地形始终对防守一方有利。日军将火炮布置在山岭侧面的洞穴里，阵位都经过了精心选择，令攻过来的敌军深陷多方交叉火力之下。在城镇和路口，日军挖掘

浅坑并构筑沙袋掩体，以保护他们的机枪和反坦克炮。在有些地方，他们会把中型坦克的车体半埋起来，露出炮塔，成为固定火炮火力点。日军打起仗来还是一如既往地顽强，美军只有经过恶战才能拿下这些阵地。美军第25师在圣曼努埃尔村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日军第七战车联队在那里发动了一连串装甲反击。美军血战了两个星期才最终拿下了这里，肃清了残余敌军。

麦克阿瑟把他的指挥所搬迁到了马尼拉以北约75英里处打拉市附近圣米格尔的一座制糖厂里。从这个靠近前线的指挥所里，他继续不断给他的前线指挥官施压，要他们加快战役节奏。1月17日，他命令克鲁格进攻克拉克机场，克鲁格把命令转达给了格里斯伍德将军，他的第14军有充足的兵力用来在1月23日到达并跨过班班河。但是就在第二天，格里斯伍德的部队在斯托尔滕贝格堡以北撞上了日军的坚固防线，在这里，高大巍峨的阿拉亚特山（一座死火山）俯瞰着东面的平原。大西泷治郎将军曾经亲自监督手下在克拉克机场周围建立一系列同心圆防线。他的部队在这里挖掘了战壕和反坦克壕沟，从飞机残骸里把机枪拆下来，重新布置在火力点中；这些人还构筑了多个坚固支撑点来控制延伸向西边山脚下的3号高速公路。^[10]1月27日，美第37师发动步坦协同攻击，砸穿了日军防线，占领了航空兵基地，同时第40师则在斯托尔滕贝格堡北面和西面的艰难地形中拿下了日军的碉堡和坑道阵地。撤走的日军丢下了大量补给物资和武器弹药。在1月29日签发的一份公报中，麦克阿瑟列举了他的战利品，包括“200台全新的飞机引擎，许多无线电收发设备，大量各种装备，足够几个月使用的弹药、粮食和装备，以及超过4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11]

菲律宾游击队提醒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人员，在马尼拉以北约60英里处的甲万那端有一个战俘营。那里的铁丝网里关押着数百名美军战俘。从航拍照片上看，这里的守卫力量很薄弱。于是麦克阿瑟下令采取救援行动。这一任务被指派给了陆军第6游骑兵营。一支来自阿拉莫的侦察队被派去执行这次长达14英里的长途奔袭任务，他们带着轻武器——步

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手榴弹——奉命在丛林中隐蔽前进。战俘营的守卫已经跑掉了，俘虏们实际上无人看管，但是营地附近另外驻扎有数百名日军。1月30日晚8时，侦察兵们向日军营地发动突袭，很快击毙了超过200名敌人，自身只有两名游骑兵战死，一人受伤。

甲万那端战俘营里的许多俘虏们都觉得自己要被日本人杀掉了，此刻，突如其来的解放令他们震惊，甚至都忘记了欢呼。现在他们要在开阔地上步行近10英里撤退，许多病弱难行的俘虏被放进了水牛拖着的牛车。1月31日，游骑兵们和512名被解救的战俘回到了美军防线。脱离险境的俘虏们被安置在设于一所菲律宾学校里的第1骑兵师野战医院加以照顾。当医生、护士和战争通讯员们想要和他们交谈时，他们许多人都显得有些胆怯、害羞和惊恐。他们在这里尽情吃喝，体重恢复得很快，但是从身体到精神的全面康复却都需要时间。

在南面，艾克尔伯格将军第8集团军的部队也加入了战斗。1月29日，一支被编为第11军的两栖部队在苏比克湾北部三描礼士海滩登陆。登陆没有遇到抵抗，无论在海滩还是向内陆推进初期皆如此。到了7号高速公路的之字形拐弯处，日军终于拦下了这一路新杀过来的美军。血战几天之后，敌人被剿灭，道路也恢复了通行。第11军通过这个路口涌了进来，夺取了马尼拉湾北部区域，确保了前往巴丹半岛的道路畅通无阻。与此同时，在马尼拉南部，第11空降师的两个团出人意料地在纳苏格布着陆，赶在日军炸桥之前夺取了一座战略意义重大的桥梁。第三个团，第511伞兵团，在塔阿尔湖北岸的大雅台山伞降。就这样，第11空降师夺取了马尼拉湾南部，开始穿过首都南郊向北推进。这支部队起初只遇到了日军象征性的抵抗，直至2月3日攻抵伊姆斯镇。在这里，一支数量不多但意志坚定的日军依托一座石质建筑打了一整天，直到最终一名美军中士爬上屋顶，将汽油倒入房中，再用一枚白磷手榴弹将其引燃。大部分日军都死了，那些试图逃离建筑的人刚一出来就被击毙了。

在北边，麦克阿瑟仍在反复催促克鲁格要快，快，快。他长长的吉普车队常常出现在主战线前方，载着他前往前卫阵地面见师、团指挥

官。1月30日在圣费尔南多和卡伦匹特之间的道路上造访了第37师之后，麦克阿瑟发电向他的第6集团军司令抱怨说部队“显然缺乏动力和主动精神”。^[12]他预计尽早进攻马尼拉将会令城内日军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日本人将会宣布菲律宾首都为不设防城市——就像他，麦克阿瑟，在1941年12月做的那样。他担心被日军关押在圣托马斯大学、比利彼得监狱和洛斯巴诺斯的数千名盟国俘虏以及侨民的命运。12月时，在狭长的巴拉望岛上的一个战俘营里，日本人逼迫150名快要饿死的俘虏跳下壕沟，然后活埋了他们。不难想见，麦克阿瑟急切地想要阻止此类惨剧再次发生。这并不是什么抽象的问题，他本人就知道马尼拉城内外关押着许多盟国军民。在打拉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里，迪克·萨瑟兰将军让战争通讯员们都清楚他和他首长在此事上的立场。根据一份未记录入册的史料，萨瑟兰痛斥克鲁格过于小心，他还说：“如果让我来指挥第6集团军，我们现在已经在马尼拉了。”^[13]

克拉克机场和斯托尔滕贝格堡落入美军手中后，美第14军开始集中兵力向菲律宾首都推进。担任预备队的维恩·D.马奇少将指挥下的第1骑兵师在林加延湾登陆，向南来到一线参战，成为第14军两路南下突击兵团之一。1月30日上午，麦克阿瑟将军造访了马奇将军设在金巴的指挥所，说他期待第1骑兵师能够快速推进：“到马尼拉去，绕过鬼子，把他们打跑，但你要去马尼拉。”在大量吉普车、卡车、坦克甚至是拖车的保障下，整个师沿着5号高速公路疾驰而下。竞争激发了他们的斗志。马奇一心想要赶在鲍勃·贝特勒少将的第37步兵师前面，后者正沿着西侧的3号高速公路向同一座城市赶来。

零星日军部队仍在沿途伏击美军，还有一些美军士兵被敌人狙击手打倒。推进纵队常常停下来卧倒，坐在暴露的吉普车里的人会下车在路旁的灌木丛里寻找掩护，坦克步兵合成分队则被派往前方去消灭敌人或将其击退。大大小小的河流也拖慢了行军纵队的速度。许多桥梁被炸毁了，即便偶尔还能见到一座桥，美军也不得不派出排爆专家仔细检查，确认没有布设爆炸物。当小股日军向路过的美军车队射击时，美军

会以猛烈的火力打回去——步枪、机枪和轻型火炮，常常直接在车上开火。《生活》杂志通讯员卡尔·迈登斯在报道中写道：“我们车队里每个人都用手中所有的武器向敌人火力全开，把他们消灭掉。我们一边向道路两侧开火，一边继续推进。”^[14]在许多地方，进攻纵队会驶离高速公路主路，在土路上前进，或者在牧场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侦察兵们会为重型车辆寻找能够涉渡的“渡口”，长长的吉普车、卡车和拖车车队会从这里穿过，混浊的河水会没过它们的车轴，有时甚至会漫到引擎盖上。渡过安加特河时，水太深，大部分轮式车辆无法通过。美军采取“列车”方式解决了问题：用能够渡河的坦克充当“火车头”，后面拖着一长串卡车和吉普车从河里开过去。不过这些车辆过河后得停放一个小时，在太阳下晒干发动机。

吕宋岛：麦克阿瑟向马尼拉的进军，1945年1月—3月



穿过村庄时，美军受到了大群菲律宾本地人热烈的欢迎。光着脚丫子的小孩子们跟在吉普车和卡车的旁边跑，兴高采烈地挥着双手。大人们则把帽子举过头顶，高兴地挥舞着。房屋和公共建筑顶上都升起了美国国旗。菲律宾游击队则打着美国和菲律宾的旗帜列队受阅。比尔·邓恩回忆道，在小城巴利瓦格，第1骑兵师遇到了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他们挤满了街道，呼喊，歌唱，在我们的纵队旁跳舞，对仍然存

在的危险视而不见，直到道路上水泄不通为止。在城中心，我们的吉普车被彻底围住了，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们刚停，女人和小孩们就向我们抛来鲜花，还挤过来和我们握手。队伍里每一辆车都是如此”。^[15]民众向美军送来了水果、鱼、鸡蛋和烤山药。两位菲律宾年轻人爬上了教堂的尖顶，用石头敲响了那里的大钟。马奇将军的“飞行纵队”完全动弹不得了，直到当地警察和部队设法让民众离开了街道，美军才得以继续前进。

考虑到城内近100万人口的卫生和饮水问题，美军指挥官采取措施，控制了马尼拉的供水系统。第14军受命夺取城市北郊那些重要的水库、水坝和高架水渠——诺瓦里切斯水坝、马里基纳水坝、巴拉拉的滤水设备，以及圣胡安水库。美军指挥官同样打算夺取主要的电力设施，包括帕西格河中普罗维瑟岛上的蒸汽发电厂。

2月3日，第1骑兵师抵达了图拉汗河北岸的诺瓦里切斯。一个先头中队赶在日军爆破之前抵达了河上的主要桥梁并跨了过去。在激烈的交火中，一名海军上尉兼排爆专家冲到桥下切断了导火索。这一英勇举动挽救了桥梁，为美军赢得了至少一天的时间。渡过河流之后，这个师遇到的抵抗便十分轻微了。当天下午稍晚时候，骑兵们在与3号高速公路交会的路口与第37师会师。2月4日，两个师并肩扑向马尼拉市界。

美军三个营开过去包围了圣托马斯大学，这座被围墙围起来的校园现在已经成了关押着大约4 000名西方平民的集中营，被称为“巴丹天使”而广为人知的美国陆军的护士们也在其中。一辆谢尔曼坦克撞开了校园大门，一个步兵营随即冲了进去。日军林俊雄中佐手下的守卫们并不打算和美军死战。打了几枪之后，林中佐发出信号，表示愿意释放大部分在押人员。于是超过3 000名面容憔悴却兴高采烈的西方平民开始从学校大门走出来。但林还是命令剩余221名俘虏集中到校园中央的一座大楼里，他要把这些人当作人质，来交换自己人的生存。由于担心日军屠杀囚犯，美军指挥官同意停火并进行谈判。林同意释放囚犯，作为交换，美军要保证他的人安全到达日军防线。于是太平洋战争中仅见的

一幕出现了：林带着他的看守们直接在数千名虎视眈眈的美军注视之下走出大楼，从大学正门逃离。那些刚刚解放的平民俘虏向这些列队行进的日本人恶语相加。“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一边大声挖苦他们，一边跟着他们穿过营房——女人们的声音尤其刺耳——直到日本人走出校园，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为止。”^[16]但是协议还是得到了遵守。双方都没有开枪，林的人获准向南走去，他们将去那里和日本地面部队主力会合。离开时，所有日军官兵都向美军敬礼或鞠躬。^[17]

当天下午稍晚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来到了圣托马斯。大群心怀感激、泪流满面的人立刻围住了他。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他向认识的人打了招呼。有些小孩子在集中营里度过了三年，已经不记得战前的生活了。“有一个人抱住我，头靠在我的胸前失声大哭，”麦克阿瑟回忆道，“这是个终生难忘的美妙时刻——不是作为杀人者，而是作为救人者。”^[18]俘虏们讲述的事情坚定了麦克阿瑟加快解放各集中营的决心。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分配给俘虏们的食物锐减，许多人已经濒临饿死。CBS无线电台的通讯员比尔·邓恩说，如果解救者30天后再到，“其结果可能就会是彻底的悲剧”。^[19]

当美军部队向马尼拉北部的建筑密集区推进时，城市上空腾起了滚滚浓烟。撤退的日军在城市北部的商贸区点燃了上百处大火。由于缺乏理想的引火工具，他们的点火方式就如同二流的纵火犯一般，用的是火药、火柴以及装在5加仑油桶里的汽油。整个城区被火焰吞没。城市西边海湾旁是住满居民的敦洛区，那里密集的灰泥房屋是木质结构，如同火毯一般一点就着。第14军在报告中写道：“烟尘浓密，燃烧的建筑向外散发着高温热浪，我们一步也前进不得。”^[20]悲惨的难民们沿着主要道路向北走来，从相向而行的美军士兵身旁经过：年轻的妈妈怀抱着婴儿；整个家庭拖家带口，把财产堆放在马车上；小孩子沿路向美军士兵索要吃的和香烟。还有趁火打劫的人忙于从燃尽的废墟和被主人抛弃的房子里劫掠一切有点价值的东西。

格里斯伍德将军派出第5骑兵团第2中队前去夺取奎松桥，这是帕西格河上的最后一座桥梁，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然而在奎松大街和阿兹卡拉伽路的岔路口，古老的比利彼得监狱和远东大学的高大楼宇之间，美军陷入了猛烈的机枪和反坦克炮火力之下。突击中队被来自多个方向的致命交叉火力压制，这些火力来自大学建筑高层的窗户、街道南面的一处沙袋掩体，以及一处临时的街垒，这个街垒由四辆拴在一起的废弃卡车组成，由钉入路面的钢质栅栏保护。美军迅速撤了回去，准备带上援军再来。与此同时，第1骑兵师的其他部队沿着帕西格河北岸肃清了东面的街道和街区，占领了马拉干鄢宫。

在敦洛区，前进的巡逻队看到了一幅平民遭屠杀的悲惨景象。医疗队的霍伯特·D.梅森发现一家香烟厂的地板上横卧着49具尸体，其中有许多是女性，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孩子。他们的双手都被反绑。许多人都是被刺刀或者武士刀杀死的。[\[21\]](#)在相邻的戴帕克贮木场，美军士兵找到了115具遇害平民的遗体。小孩甚至是婴儿都被砍了头。在一份提交给战争罪法官的呈堂证供中，戴维·V.宾克利少校描述了他看到的一个场面，似乎是一个妈妈试图保护她的两个孩子：“一位妇女面朝下，双臂各抱住一个孩子。她被军刀类型的武器砍杀。一个孩子被劈掉了一部分脑袋。”[\[22\]](#)

当美军部队接近马尼拉时，那些伪装成普通马尼拉市民而在城区自由出没的菲律宾游击队员揭竿而起。他们伏击日军部队，破坏装备，炸毁卡车和铁路车厢，切断电话线，并把宝贵的情报递送给打过来的美军，包括日军碉堡、军械库和雷区的位置。游击队开始大胆地直接从马尼拉向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电告情报，甚至常常用英文明语。日本人能截获这些无线电通信，却很少能找到他们的位置。在中国、马来亚和其他占领区，日军奉行“三光政策”，会将被怀疑支持游击队或敌军的整个村庄屠杀殆尽。在超过三年的时间里，菲律宾日军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们对无辜民众的暴虐和残忍。现在，面对即将战败的耻辱，眼看着普通菲律宾人逐渐显露出兴奋的情绪，一系列前所未见的兽行便随之而起。

在马尼拉北部的袋形区域里，零星而断断续续的交火仍在持续，机枪射击的嗒嗒声随处可闻。但是到了2月6日，事情就明朗了。日军只是在进行迟滞作战，以掩护他们渡河南撤。美军的步坦协同分队费了很大力气，逐个街区甚至逐屋肃清残敌。当天下午，美军再攻奎松桥，这次他们得到了坦克和重炮的支援。但是日军边打边撤退，过桥后将其引爆。这导致第1骑兵师停住了脚步。现在帕西格河上已经没有桥了，他们无法让卡车和坦克直接过河。推进不得不暂停，等候新的计划制订出来。

与此同时，比利彼得监狱里的一千名盟军战俘被救了出来，其中许多人都是1942年在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被俘的军人。俘虏们走出这群建筑时，麦克阿瑟来了。“这群备受折磨的人骨瘦如柴，当我从他们的队伍旁缓缓走过时，周围的每个人开口都有气无力，声若游丝。他们说，‘你回来了’，‘你做到了’，或者是‘上帝保佑你’。我无言以对。‘我来得有些迟了，但我还是来了。’”[\[23\]](#)

在南面，第11空降师夺取了尼科尔斯机场，正在向马尼拉南区挺进。马尼拉已经被来自南北两面的优势兵力包围，两个方向的进攻者都已经攻入了市界，仅仅遭遇了零星抵抗。第14军已经冲进了马尼拉，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赶在盟军战俘和被囚平民为日军所害之前救出他们，同时夺取城市的供水系统。该军的两个师以相当不错的速度和效率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突然拿下了帕西格河以北的整个城区之后，格里斯伍德将军一时判断不清河对岸还有多少敌军，或者他们是否想要决一死战。在此情况未明之时，麦克阿瑟将军决定宣布胜利。仍然远在马尼拉以北的圣米格尔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签发了一份声明，暗示马尼拉之战已进入收尾阶段：“我军正迅速肃清马尼拉之敌。我们的各路大军……已经进入城内并包围了日本守军。他们即将彻底毁灭。”[\[24\]](#)第二天，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收复马尼拉的捷报。麦克阿瑟的幕僚们已经开始计划在市中心举行胜利阅兵了。然而实际上，未来还将有一个月的苦战等着他们。

这一草率的声明令下属前线指挥官恼火不已。这已经不是麦克阿瑟的宣传工作第一次抢跑了。格里斯伍德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麦克阿瑟是个“媒体疯子”。艾克尔伯格稍微委婉一些，说这份声明“不妥”。这些人还面临着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最激烈的巷战，他们不喜欢被告知自己仅仅是在“肃清残敌”。[\[25\]](#)

马尼拉是一座对比感强烈的城市，融合了古老和现代，富裕与贫穷，壮美和破败，亚洲和欧洲。许多人认为这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这是一座大学城，拥有超过12座世俗大学和天主教大学。城内多座现代化医院提供了当时亚洲最好的医疗服务。日军入侵之前，这里曾是银行业中心和贸易中心，各大顶级跨国公司都在这里设立了主要办事处。这里有宽阔的街道，绿草如茵的公园，顶级的酒店，宏伟的公共建筑，宽敞的露天广场，还有许多尖顶的哥特式教堂。马尼拉带着西班牙式的风格，拥有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式的优雅和壮美。

第14军占领了帕西格河北岸那些高大的写字楼和居民楼，随即在高层和屋顶上建立了观察所。格里斯伍德的指挥所设在一座被部分焚毁的酒店8楼，向南一览无余。天际线上，浓烟不散，遮天蔽日。城市在燃烧，南面和北面都一样。大火在蔓延，炙烤着死去士兵和平民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人肉被烤焦的气味。夜晚，各色教堂的穹顶和尖顶被一丛丛火焰罩上了一层鬼魅般的古铜色亮光。日军的防御阵地把首都的几座主要政府建筑围在其中，包括立法会、财政部、农业部、市政厅、邮政总局、马尼拉警察局，以及城市供水区建筑。这些巨大的新古典派建筑用钢筋、砖石和混凝土建造，设计要求能够抵御大地震。日本人把它们改造成了堡垒，门窗都用沙袋堵上，火炮和迫击炮就架设在屋顶。

通过望远镜观察了这些防御设施后，格里斯伍德将军得出结论，他的部队面临着漫长而残酷的战斗。和往常一样，日本人会血战到底，挽救城市难如登天。如果麦克阿瑟还想要不流血拿下城市，那纯属痴心妄想。“他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事实，随着他们系统地破坏这座城市，

每晚天空都被烧成红色，”格里斯伍德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也不知道敌人的步枪、机枪、迫击炮和炮兵火力正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依我看，鬼子会死守帕西格河以南的部分马尼拉城区，直到全部战死。”[\[26\]](#)

帕西格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河流，而是连接内湖和马尼拉湾的一处平静河口。它的河床很深很宽，是城市中央的一个“裂口”，“河面”常常位于城市地面20英尺以下。先前有6座桥横跨帕西格河，但全被日本人毁掉了。第14军将不得不乘舟渡河。这是又一场两栖登陆，只不过是在亚洲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

山下将军已经从北方山区遥远的指挥部里发出命令，要求日军在将成堆的补给物资和弹药全部摧毁或搬走后撤出马尼拉。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无线电通信不畅、时间紧张、多头指挥、军种竞争等等，这些指示并未得到执行。当地的交通状况严重恶化，导致能够搬到山区的物资少之又少。日军马尼拉守备司令岩渊三次海军少将于是提前启动了预案，摧毁所有可能资敌的设施，包括码头、仓库、工厂、储油罐和发电站。城市的港区凿沉了不少废船，以免美国船只靠泊。甲米地海军基地所有的建筑和设施都被烧毁或炸掉。2月3日的一份命令特别指出，破坏时要小心，如果可能的话要尽量保密，“这样这些举动就不会惊扰民众，或者被敌人用作反宣传的口实”。[\[27\]](#)此后，日军的各种报道都将爆炸和大火归咎于美军的飞机和炮火，抑或是菲律宾游击队。

司令部设在马尼拉东面山区蒙塔尔万的横山静雄中将是山下的下属。但是他要求自己的手下坚守马尼拉：“他们必须拿起武器，为从瓜达尔卡纳尔以来战死的无数战友报仇，而且必须拦住万恶的敌人向北推进的计划……我们必须相信神力，直至最后一刻。”[\[28\]](#)山下可能都不知道横山会下达与自己的意图完全相悖的命令，还有迹象显示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菲律宾首都还留有日军。但是当菲律宾伪总统何塞·P.劳雷尔请求山下像1941年麦克阿瑟那样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时，山下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会有损于日本军队的“武德”。[\[29\]](#)

至于海军的岩渊将军，他看起来压根就没想过要离开马尼拉，而无论命令如何。他曾是“雾岛号”战列舰舰长，两年多前这艘战列舰在瓜岛海战中被击沉时正是在他的指挥下。他有些僚友觉得他在那场战斗后活下来是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这或许就能解释这位海军将领为什么会决意率部死守，直至被敌人淹没了。若能在马尼拉之战中“玉碎”，便可洗雪他的耻辱，或者向美国人索回代价，或者二者兼有。他手下的马尼拉海军守备队拥有四个大队的海军基地部队，四个暂编步兵大队，以及一批杂七杂八的陆海军部队，总共有大约1.6万作战人员。岩渊似乎是以还有设施需要摧毁为理由逗留在马尼拉市内，等到美国人来了，那就想撤退都撤不掉了。逗留期间，他监督了帕西格河南岸老城区中心坚固支撑点的建设。街道上布设了路障和钢质拒马，废墟下方的路面上埋设了地雷和诡雷。河南岸用砖石构建的古城令人畏惧，这里又被称为“王城”，日军在此密密麻麻地建造了地道、碉堡和炮兵阵地。日军将会逐个街区、逐个建筑甚至逐个房间地死守此地；不会有撤离，不会有投降，也不打算生还。

第一支渡过帕西格河的美军巡逻队遭遇了日军从古城巨大石墙背后打来的密集的迫击炮和轻武器火力。因此格里斯伍德决定让他的第14军进行侧翼机动，在更靠东的地方渡河。2月7日拂晓，第148步兵团的两个营在马拉干鄢宫和圣米格尔啤酒公司之间的地段渡过帕西格河。他们发动正面进攻，占领了日军坚固设防的南岸护坡。击退了日军的凶猛反击之后，美军在河南岸站稳了脚跟。随着更多部队渡河，他们开始迅速扩大地盘。第1骑兵师的部队紧随其后。他们计划向南进攻，打到原本安静祥和的潘达肯和帕科居民区，然后向西攻打“王城”。

与此同时，第129步兵团一部进攻了帕西格河中间的普罗维瑟岛，这里是马尼拉最大发电厂的所在地。一支日本守军已经将厂区改造成了堡垒。接下来便是3天血战，双方在电厂昏暗的内部展开了逐屋争夺。285名美军在战斗中伤亡，其中包括35人战死，10人失踪。电厂的汽轮机在战斗中被彻底毁坏，这样马尼拉的大部分城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都不会有电了。

2月8日，潘达肯和帕科燃烧的街道上爆发了激战。这一区域里的日军边打边退，撤入了帕科火车站，一座建于1915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宏伟建筑。^[30]美军第148步兵团封闭了火车站周围的包围圈。三个日军精锐中队则在车站精心构筑了防御工事。机枪阵地、反坦克炮和重型迫击炮都得到了沙袋掩体的保护。碉堡控制了所有街道入口的杀伤区。美军野战炮一寸一寸地摧毁着这座壮美的老建筑，而日军也在不断恢复实力，他们的增援部队会步行溜过美军防线进入车站。美军B连的一个排在火车站以北约100码处被压制在宽阔的大街上。两名列兵，“奇科”克莱托·罗德里戈斯和小约翰·N.里斯，迎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冲了上去，在距离车站约60码的一处房屋里找到了隐蔽处，随即二人交替掩护，推进到距离最近的碉堡30码之内。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战斗中，二人打得很好，杀死了大约35名日军，打伤了更多。眼见弹药不足，他们便边打边撤，回到了美军防线。里斯不幸被日军机枪点射击中身亡。当天深夜，他们的营向火车站发动总攻，消灭了周围所有残余敌军。美军认可了两名士兵的杰出表现，罗德里戈斯和里斯双双荣膺国会荣誉勋章。

当美军部队转向西边，朝“王城”推进时，他们遭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激烈的几场巷战。他们途中遇到的每一栋建筑，每一处半垮塌的废墟，都需要进行搜索和肃清残敌。他们碰到了各种难啃的防御设施，包括用钉入路面的钢筋加强的路障，翻倒的卡车和汽车，成堆装满碎砖石的油桶，一圈圈带刺铁丝网，以及反坦克、反步兵地雷。混凝土碉堡把守着通向这些障碍物的通道。日军还在楼宇的屋顶和高层布设了狙击手。美军步兵们以各种小分队战术向前推进，摧毁这些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美军探出了每一枚地雷的位置并标绘在地图上，之后用谢尔曼坦克或者半履带车拖着铁链把它们扫出来。轻型迫击炮发射烟幕弹遮蔽敌人的视野。当步兵班冲上去，在近距离内用手榴弹、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攻击碉堡时，机枪会为他们提供火力压制。当一支小队进入一栋房屋或楼宇时，他们会首先冲上屋顶和顶层，再沿着楼梯向下仔细搜索每一间房间。如果房间里可能有敌人，他们就会先投掷手榴弹开路，或者向屋内喷火，把敌人活活烧死。若要进入房屋，他们会在墙壁上炸开洞

而不是走门。如果敌人的抵抗过于激烈，他们就会撤出来，然后用火炮和爆破器材将整个建筑炸垮。

战至2月12日，日军最后6个主力大队（4个海军大队，2个陆军大队）被挤压进了一处大约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这片区域北临帕西格河，一边从卢纳、帕科市场和帕科河向东，另一边从波洛俱乐部延伸向南面的海湾。此时，位于麦金利堡和尼科尔斯机场之间的日军防线在美第8集团军的持续重压之下业已崩溃，当地残余的日军被分割在孤立的包围圈内。“我们奔赴马尼拉的途中满是毁灭和混乱，”第11空降师的爱德华·弗拉纳根写道，“在通往马尼拉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两旁，房屋和商店都被美日双方的炮火击碎。铁皮屋顶的房子就像是被巨大的开罐器划过一般，而那些原本奢华的豪宅也只剩下焦黑的烟囱和一堆废墟。”^[31]

然而，马尼拉战役中最艰难的战斗还没有到来。敌人的防御圈中还有几座马尼拉市的主要政府建筑，其钢筋混凝土外墙只有用最重型的花炮才能轰开，所有的门窗阳台都被用沙袋封上，火力点封锁住了所有的道路。这些建筑周围是宽阔的广场、公园和街道——这意味着进攻的美军步兵不得不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冲过开阔地才能接近建筑。每一座建筑周围都守着一圈隐蔽良好、可以相互支援的暗堡。建筑物内部的走廊、楼梯和房间都被堵上了沙袋和各种家具，只在顶上留出几英尺的空间，以便向攻过来的对手投掷手榴弹。这些坚固支撑点共同组成了西班牙古城的日军防线的外围阵地。

为了保全城市，包括其建筑和居民，麦克阿瑟严格禁止空袭马尼拉。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限制使用重炮；在战役初期，美军重炮仅限于执行反炮兵任务和“向已知的敌人坚固据点进行目视射击”。^[32]但是敌人令人生畏的防御令美军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别无选择。随着伤亡率越来越高，他们不得不回到早已烂熟的老路上，一发现敌人火力，就把整栋楼轰平。当步兵在市中心迎着日军坚固的防御推进时，持续的重炮轰击夷平了整片整片的街区。难民从受到攻击的区域涌出，穿过美军防线，拼命想要去往安全地带。

有些大型建筑可以孤立和绕过，但另一些大楼则必须彻底摧毁，才能让美军部队安全通过。它们遭到了105mm和155mm榴弹炮的炮击，直至被一点点夷为平地。第148步兵团的团长告诉记者：“我看不到保住马尼拉那些著名建筑的希望。这是一场全面的炮战，你知道这对城市意味着什么。”^[33]坦克开到极近的距离上，用它们的火炮进一步摧残这座城市。迫击炮弹如雨点般砸向建筑的外墙和下方的拱廊商业街。最终，这些高大建筑物的结构完全被毁，屋顶坍塌。步兵班随后通过墙上的洞进入楼内（不能走门，那里会有步枪、机枪和诡雷守卫），杀死所有残余的敌军士兵。

帕西格河北岸的花旗银行大楼被用作炮兵观察所。军官们拿着望远镜在这里观察他们炮弹的落点，并且与地面和空中观察机上的观察员对话。他们把城市地图摆放在桌子上，把坐标发送给炮手们。在6楼的一间套房里，记者们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吃着小点心，喝着冰啤酒。看着老城区中心毁灭的场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断摇头。马尼拉的主要地标在大毁灭中一栋接一栋地坍塌。日本人将菲律宾本地人驱赶到战略性建筑的墙外，可能是希望拿他们当作人质。但美军的炮火并没有回避他们。被称为“长汤姆”的155mm重炮，能够把95磅重的炮弹发射到最远9英里外。通讯员约翰·多斯·帕索斯被这种武器射击时的巨大冲击波震撼了，即便是在数百码外：“每次‘长汤姆’射击时，那感觉就像是头上挨了一记棒球棍。”^[34]无线电播音员比尔·邓恩认定自己的耳膜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他写道，从那一天之后，他就“越来越听不见了”。^[35]

2月16日，在哈里森公园和拉萨尔大学附近的黎刹纪念棒球场爆发了激战。美军火炮在右外场附近的外墙上炸开了一个口子。谢尔曼坦克随即开进了已经杂草丛生的外场，第5和第12骑兵团的步兵们猫着腰，紧随着坦克向前推进。三四个装备精良的日军中队在本垒和一垒线后方构筑了支撑点、塹壕和交通壕。所有的门窗都堵上了沙袋，墙上也开出了射击孔。攻方部队跟随坦克攻进了内场，用迫击炮和“巴祖卡”火箭筒射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至所有的日军都被击毙为止。

日军接到命令，要阻止难民涌向美军防线。于是日本兵们彻底摧毁了所有可能载人渡过帕西格河或进入海湾的大小船艇。古城的全部四座拱门都设置了岗哨。当马尼拉之战进入尾声，日本兵们开始抓捕全城的平民。首当其冲的是成年男子和十一二岁以上的男孩。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和侨民被当作人质来对付美军空袭。这一野蛮举动倒也达到了效果，因为麦克阿瑟始终拒绝用飞机轰炸马尼拉。然而最后，长时间的大规模炮击却也干了那些原本要由轰炸机来干的事情。没人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死于马尼拉之战中，但这个数字一定是巨大的——可能超过10万人。有些人葬身于他们的居所、藏身地，以及监狱的废墟之下，但更多的人则在一场恶劣程度在20世纪位居前列的兽行中被日本兵杀害——同样，数字已无法统计。

大规模屠杀的命令被手写下来发给了日军部队。随着美军越过帕西格河，日军对“游击队”的抓捕和处决愈加随心所欲。战场上缴获的文件证明了这场大规模的“处理”。一名日军士兵的日记被翻译了出来，并呈送到战后的审判庭上，其中记载了如下文字：

1945年2月7日：今晚处理掉了150名游击队员，我本人刺死了10人。

2月8日：看守1 184名今天新抓来的游击队员。

2月9日：今晚烧死了1 000名游击队员。

2月10日：看守大约1 660名游击队员。

2月13日：敌人坦克出现在万岁桥[琼斯桥]附近。我们的攻击准备业已完成。我现在负责守卫游击队集中营。我执勤时有10个游击队员想要逃跑，结果被全部刺死。16:00，所有游击队员都被烧死。[\[36\]](#)

2月13日，岩渊将军指示他的部队杀死日军防线内的所有平民：“连

女人和儿童都已经成了游击队员……除了日本军人、日本平民和特别建设队外，战场上的所有人都要杀掉。”^[37]两天后，一支马尼拉海军守备队下达了更详细的指示，他们还关注了节约人力和弹药的问题。日军应该把待杀掉的平民集中驱赶到房屋或大楼里，随后将它们烧掉或者炸掉。这会使处理尸体的“麻烦事”不那么棘手。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应该被扔进河里”。^[38]

2月11日到15日，腥风血雨愈加凶暴。大规模的屠杀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劫掠、纵火、强暴、酷刑和肢解，在教堂、大学、旅馆和医院里，暴行无处不在。城中的西班牙裔和拉美裔精英们境遇格外悲惨，在这座国际大都市中心居住和工作的各国侨民也是一样。有些家庭被杀尽。屠杀队向所有曾经穿过警服或军服的人，以及曾向西方囚徒或战俘表示过同情的人痛下杀手。

马尼拉许多最著名的宗教、医疗和教育设施成了战争罪行的发生地。教士、修女和其他基督教神职人员被杀死在他们的教堂里、圣坛上。数百平民被驱赶到圣托马斯街和卢纳将军街交叉口的大教堂里，成群醉醺醺的日本兵在走廊和教堂的长椅间横冲直撞，用刺刀刺杀无辜平民，把年轻女人和女孩从哭天抢地的家人旁强拉出来，拖到附近的小教堂里施暴。根据弗朗西斯·J.科斯格雷夫神父的证词，在拉萨尔学院的一处讲堂里，20个日本兵冲进来，“开始用刺刀捅刺我们所有人，男人、女人、儿童都一样”。死者和伤者在台阶下方堆成一堆，其中还有只有两岁大的幼儿。一位妇女的乳房还被割掉了。日本人离开了一个小时，能听见他们在外面的院子里喝酒。后来他们回来了，“向悲惨的受害者狂笑，极尽侮辱”。科斯格雷夫被捅了两刀，血流不止，但还是爬到濒死者身旁，做临终祷告。他还特别肯定地指出，有些受害者“还在祈祷上帝原谅那些害死自己的人”。^[39]

沃尔特·方克尔是菲律宾大学的一位教授，当他们夫妇和另外6个人被关进一所房间，里面又被灌入汽油时，他吻别了妻子。妻子被一枚手榴弹当场炸死，“我由衷庆幸深爱的妻子没有遭受烈火灼烧之苦”。^[40]

日本人离开后，方克尔博士和屋里的另一个人设法逃了出来。在圣保罗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卡耶塔诺·巴拉奥纳试图在一伙日本兵开始捅刺里面的所有人时保护家人。一个日本兵把一个男婴从母亲怀里抢过来抛向空中。“另一个日本人拿着上好的刺刀过来，刺中了婴儿腹部的正中央。”巴拉奥纳说。他惊恐地看见那个婴儿没有立刻死去：“我能看见那个婴儿的手臂还在摆动。”[\[41\]](#)

在菲律宾总医院，大约7 000名平民被赶入病房和走廊充当人质。晚上，喝醉了的日本兵挤进人群，用手电筒照亮人脸，并把年轻的女人和女孩拖出来强暴。甚至直到医院遭到了美军火炮和坦克的攻击，墙壁开始在施暴者和受害者身旁坍塌时，暴行仍未停止。在圣保罗学院，日军把男人和女人区分开来。女性在刺刀的逼迫下穿过街道，来到杜威大街的湾景酒店。她们瑟瑟发抖，抽泣着，相互搀扶着，被迫走上楼梯，来到三楼。她们每15人至20人被赶进一间客房，坐在地上，一待就是几天，没有食物和水。日本海军的人一次次闯进房间，检视每个女子，被选中的人就被拖到酒店其他地方强暴。于是女人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看起来貌不惊人，或者遮蔽自己的脸。“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名受害者回忆道，“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哭，想要躲进床垫和帘子下面。”[\[42\]](#)

马尼拉的德国人作为轴心国的公民，在三年的占领期间并未受到打扰。当美军逼近时，许多人都在埃尔米塔区的德国俱乐部避难。但是如果这些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籍可以保护自己免遭日军侵害，那他们就错了。2月10日，一个分队的日本兵冲进俱乐部。里面的人义正词严地说自己是盟友。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还站出来请求放过，或许她觉得孩子可以消解入侵者的兽欲。但是一个日军用刺刀捅穿了婴儿，刺进妈妈的身体。其他人则开始把年轻女人从家人身旁拉出来，撕扯她们的衣服，把她们拖走。俱乐部随后被放了火，人群恐慌地涌向大门，却发现大门已经从外面被锁住了。

在伊萨克·佩拉尔街的红十字总会，大门向所有国籍的难民敞开，

并承诺提供庇护和医疗。楼里的每一处走廊、房间和楼梯，地上都坐满了难民。2月10日，一队日本人来了，要求看被收容者名单，对红十字会依照国际法提供庇护的解释毫不理睬。当天晚些时候，大群日本兵涌了过来，从前门和后门同时进入楼内，用子弹、匕首、军刀和刺刀肆意杀人。一名站出来要和指挥官对话的注册护士被当场杀死。一个妈妈想要挽救她被刺刀刺穿腹部的幼小女儿。“我努力想要把她的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43]婴儿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日本军队逐渐升级的恶行中可以看出一种熟悉的模式。起先，在美军进城前，他们也很残暴，但还算是纪律严明。小队日军会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进入一户人家或者营业场所，要求了解里面所有人的名字和年龄，并把这些信息记录在小本子上。一两天后他们可能会回来，解释说他们在奉命搜查游击队和禁运品。士兵们可能会把在橱柜或抽屉里找到的值钱东西装进口袋，但不会伤害屋里的人。第三次他们可能就要抄家了，还会厚颜无耻地公然劫掠。搜查过程中女人会遭到猥亵，男人和大一点的男孩可能会被绑走。第四次来就是强奸了。当美军进了城，远处的炮声已隆隆可闻时，日本人变得愈加满怀仇恨和恣意妄为。男人和女人被分开，轮奸也更加常见。到了战役尾声，当美军接近日军防线，炮弹如雨点般落下时，暴行便更加疯狂和骇人听闻。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强奸和杀害女性，还一定会残害她们，割下她们的乳房，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然后点火烧死。幸存者还报告有人奸尸。有时这些杀人者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恶，可能会把罪行所在的房屋或大楼烧掉。到最后阶段，美军已经很近了，这些日本人反而更愿意展示他们的恶行——例如把平民们遍体鳞伤的无头尸体挂在路灯柱上。

马尼拉大屠杀揭示了日本军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最变态的部分。这是“决不投降”原则显而易见的阴暗面，揭示了日本人在所谓“玉碎”光环下极其邪恶的内核。岩渊部队的官兵们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们还被直接命令要处死防线内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而下达命令的军官们的权威是神圣不容置疑的。许多人还被告知要用刺刀，或者把受害者

活活烧死，以节约弹药。在这样的噩梦之下，备受恐惧和憎恨煎熬的日本兵变得狂暴，放纵自己犯下了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野蛮罪行。

横山将军从他设在蒙塔尔万的振武集团司令部里要求岩渊将军趁还来得及赶紧突围。但是仗打到这个份上，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岩渊6个大队的残部已经遭到了四面包围，不得不在雨点般的大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之下躲进他们的碉堡、楼宇和隧道内。美军第37步兵师从北面逼来，第1骑兵师从东面打来，南面则是第11空降师。几乎所有残余的日军火炮都哑了火，要么是因为火炮本身被摧毁或缴获，要么是因为弹药耗尽。在2月15日的一次无线电通信中，岩渊将军向横山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司令部不能动……很明显，我们一旦移动，就会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掘壕固守，就能再坚持一个星期。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坚守所有的阵地，用一切手段重创敌人。固定阵地是我们强大的优势，如果我们动了，就会弱化。因此，我们将尽可能持久地坚守，然后用所有力量发动决死冲锋。给您添麻烦了，感激不尽。[\[44\]](#)

随后岩渊向碧瑶的司令部发电：

由于预计通信可能中断，我特此向您发电。我对属下部队的众多伤亡和由于我的无能而未能尽职深感羞愧。战士们都已在战斗中竭尽所能。我们很高兴，感谢有机会在圣战中为国尽忠。现在，残存的部队仍将勇敢地与敌战斗。“天皇陛下万岁！”我们已决心战至最后一人。[\[45\]](#)

仍有大约2 000名日军在古城高大围墙后的预设阵地中设防。这座西班牙人建于16世纪后期的高大石头筑垒周长大约2.5英里，高25英

尺，厚度从10英尺到20英尺不等。这里的城墙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墙很相似，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常见的那种——但在太平洋的岛群中就是独一无二的了。城墙原本有护城河环绕，但护城河早已干涸，而且被改造成了城市公园和9洞高尔夫球场。四座拱门全都构筑了坚固的沙袋掩体，日军在这里架设了机枪和反坦克炮。日本人在这些古老的砖石构造上挖出了火炮掩体和隧道，并与其他防御设施连接到了一起。

在这些围墙内是数千名快要饿死的平民人质，许多人都被塞进了河床下的古代地牢，另一些人则被当着攻城美军的面吊在了外墙上。美军有大喇叭广播劝降，观察机还投下了传单，但无人响应。2月23日上午，第14军做好了进攻“王城”的准备，显然，美军将不得不正面强攻这座堡垒，并与守军血战到底。

格里斯伍德再次请求空袭，再次被驳回。看起来麦克阿瑟仍然指望日本人会良心发现，保留下他挚爱的老城区。然而，美军再次拖来大量重炮，干了原本应该轰炸机干的事情。2月23日早晨7点半，超过100门105mm和155mm榴弹炮打出了太平洋战争中前所未见的密集弹幕。有些火炮被布置在约300码距离的近处，以低伸弹道射击。在一小时内，美军火炮和坦克打出了总共7 896枚高爆弹。^[46]整个“王城”被遮蔽在了一片浓烟烈火和尘土之中，就像是皮纳图博火山在马尼拉市中心爆发了一样。《纽约时报》通讯员乔治·琼斯描述了“巨大的黑色烟柱，如雨点般落下的碎片和弹片。空中满是烟尘，古城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了。透过浓重烟幕唯一可见的只有炮弹爆炸时的闪光”。^[47]

在圣地亚哥城堡的地下室里，日军奉命屠杀了所有仍留在地牢里的囚犯。许多人被用匕首、军刀、刺刀和子弹杀害。大一些的监牢里满是几天没吃没喝的囚犯，日本兵把汽油通过牢笼灌了进去，然后点燃。据后来找到的一名日本海军大尉的日记记载，岩渊将军要求他最后残存的部队在战斗结束前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如果我们子弹用尽，就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用军刀劈倒敌人；如果军刀折断了，就用牙咬断他们的喉咙，杀死他们。”^[48]

上午8点半，炮击结束，烟尘散去，大片老城区已经化为堆积如山的废墟。第145和129步兵团的部队联手发动进攻，士兵们爬上废墟，向对面的街道开火，然后冲了过去。装甲推土机开了进来，为谢尔曼坦克清理出一条通道。大约100艘冲锋舟冲下帕西格河的泥滩，渡河来到对岸。炮兵火力在河流和城墙之间的砖石护坡上炸出一级级“台阶”，让部队得以爬上护堤。美军以排为单位，向前投掷烟雾手榴弹以遮蔽敌人视线，然后以纵队从城墙的缺口处冲了进去。[\[49\]](#)

当进攻部队来到堡垒中央迷宫般的狭窄街巷中时，机枪和步枪射击的声音像爆豆般响了起来。士兵们再次祭出了曾在东边城区施展过的巷战战术。他们控制着节奏，关注点在于减少自己的伤亡，而不是迅速获胜。

农业部大楼野战司令部里的岩渊和他的主要幕僚，据信在2月26日拂晓前自杀身亡。

有些敌军仍然据守在圣地亚哥城堡下方的地下室和地道里。于是美军用大量炸药封住了这些地下通道的入口，接着向地道内灌入汽油，扔进去白磷手榴弹，将其内部化为窑炉。

直到最后，麦克阿瑟看来都不愿相信发生在马尼拉的惨剧。2月7日至19日，他待在打拉的司令部里，只来首都短暂地看了看。即便在目睹了北部城区的灾难，并面对着河南岸已无可置疑的烈焰和毁灭之后，他仍然在向同僚传达乐观的态度。他不允许他的媒体部门在几乎每天一次的公报中描述这场战斗和屠杀的全貌，这或许是由于他先前过早宣布的胜利令他陷入尴尬之中。在逼迫他的前线指挥官加速占领城市的时候，麦克阿瑟却忽略了日军已在老城区坚固设防的迹象。

当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最终在2月23日进入已成废墟的首都时，他的装甲车队来到了他战前在马尼拉饭店的住处。这座曾经壮美的地标建筑已经被大火吞噬，大片外墙已经坍塌，露出了残缺不全的高层客房。在冲锋枪手的伴随下，麦克阿瑟走上满是废墟的楼梯，来到了自己

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他发现这里被火烧过，堆满垃圾。门厅里还躺着一个日军大佐的尸体。他的财产无一幸存。他那规模庞大的军事史藏书全部丢光了。日本前天皇送给他父亲的一对古董花瓶也碎了一地。“这真不是个愉快的时刻，”麦克阿瑟回忆道，“我深爱的家毁了，这令我痛苦万分。”^[50]

四天后，正式的庆典在马拉干鄢宫举行。一众穿着卡其色军服的美国陆军军官，还有菲律宾立法委员和战争通讯员，来到了宏伟的会客大厅，那里有精美的木雕，波斯挂毯，以及水晶吊灯。菲律宾联邦政府在这里正式恢复了战前的全部权力。站在一排麦克风后面的麦克阿瑟将军历数了三年来为了收复菲律宾而遭受的“痛苦、挣扎和牺牲”。他愤怒地指责日本人没有像他在1941年时那样退出马尼拉，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敌人不会这么做，大部分我想保留的东西都被他们的困兽犹斗不必要地毁掉了——但是在这些灰烬中，他们未来的可耻命运也确定无疑了。”^[51]又演讲了差不多一分钟，将军最终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了。还没说到事先准备好的总结，麦克阿瑟就把讲坛让给了奥斯敏纳总统。在新闻纪录片中，人们看见他站在总统身后，用手帕擦拭着脸上的泪水。^[52]

再也没人提胜利阅兵的事儿了，因为大半个马尼拉都完了。站在帕西格河南岸的城西区举目四望，损毁建筑的外墙和堆积如小山一般的焦黑废墟一直延伸到天际线上。原先在大道旁整齐排列的大树如今只剩下了乌黑、扭曲的树桩。大部分地标性建筑都消失了，路标牌也不复存在，就算是土生土长的马尼拉人在这座原本熟悉的城市的废墟中也会迷路。废墟中满是未及掩埋的尸体——已经在太阳的暴晒下发黑、膨胀，五官已无从辨认，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无穷的远方，嘴巴张开，显出几分狰狞。在大屠杀之处，平民的尸体堆成小山——男人、女人、儿童，都未能逃过，肿胀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死于枪击、刀刺或砍头。空气中充满了腐尸烂肉的臭味，只有到上风方向的城市边界之外才躲得掉。

难民们住在废墟之中和临时搭建的贫民窟里。人们用从废墟中能找

到的任何东西搭成简陋的棚屋——木板、管子、砖块、毯子，以及马口铁波纹板。盗贼们在烧毁的楼宇和被主人遗弃的房屋之间游荡。美国陆军的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则向人们分发蒸馏水、食物、衣服、毯子和其他物资。受伤的平民在草草搭建的野战医院里接受救治。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岌岌可危：城市的供水地虽然已经拿下，但交战城区里的主要供水和排水管道却已被摧毁。在接下来超过一年的时间里，大部分城区是肯定不会有自来水了，路边阴沟也成了露天的臭水沟。卖淫团伙甚至在日军最后几个防御阵地被消灭之前就出来做生意了。街上的流浪儿和美国兵打招呼，替他们的大姐姐报出“肉价”。但是即便在这肮脏的废土上，在满目的疮痍和绝望之中，许多菲律宾人还是在街道上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他们口中高喊着：“Mabuhay！”（“活下去！”）[\[53\]](#)

马尼拉湾也成了屠场，满是漂浮的尸体和沉没船只留下的大片油污。这里至少有50艘各种类型、大小的沉船，包括半沉在泥滩上的惨遭开膛破肚的货轮，还有几艘日军大型战舰宝塔形的桅顶从海面上伸出。这里的码头已经被轰炸了6个月，来袭者既有哈尔西第3舰队的舰载机，也有从南方基地起飞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在马尼拉南面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了。日本人特地拆毁或者烧掉了所有空袭后还没有被毁的东西。他们有意在码头上凿沉了几艘货轮，以令这些码头无法使用。根据美国海军救援部队的记录，在一处重要的泊位上，三条被凿沉的小型船只叠放在一起，这样这些堆起来的钢铁残骸就只能分多次拖走，更加耗时。清理港口和恢复海港营运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但必须迅速完成，因为马尼拉将成为进攻冲绳岛和九州岛的主要前进基地之一。

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失去马尼拉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在历史厚重的老城区中心，重建已经全无可能——他们只能把废墟清理掉，然后从平地上重新建设一座新城市。这个国家的许多文化遗产已经不复存在：建筑、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几个世纪的历史。即便只是政府官方文件的缺失也是个影响深远的大问题，因为这会动摇这个国家战后

重建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马尼拉，这座美丽而重要的城市，曾是这个正在崭露头角的亚洲国家最为重要的财富。它曾是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失去马尼拉，对于菲律宾人民恢复经济和成功独立的期望是个沉重的打击。

卡洛斯·P.罗慕洛将军是美国众议院的列席代表，代表菲律宾。1942年4月日本人悬赏要他的人头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了妻子和四个孩子。现在，他回到了位于埃尔米塔区的故居，发现这里已经成了灰烬，无人居住。他在房屋地基的边缘看到了一具严重腐败的被刺刀刺死的尸体。他认出这是他的隔壁邻居。在被毁的街区走了一圈，罗慕洛遇到了不少熟人。他很高兴这些人都还活着，但是没人知道他家人的去向，只知道他们都逃离了首都。罗慕洛查看了横卧在街道上的尸体，惊恐地发现自己能够辨认出其中的许多人：“这些都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看见他们饱受折磨的尸体就堆在马尼拉的街道上，他们的头发被剃光，手被反绑在背后，刺刀一次又一次刺穿他们的身体。这个无声无息盯着我的女孩，她年轻的胸膛被刺刀刺成了筛子，她是我儿子的学校同学。”^[54]（一个星期后，罗慕洛终于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团圆了，他们都活了下来，毫发无损。）

甚至当城中还在激战之时，一群群律师、摄影师、速记员、翻译和医生就开始收集战争罪行记录和目击证据，进行这项痛苦的工作。他们采访目击者，记录下宣过誓的证词，审讯俘虏，检查幸存者，摄影师拍摄了屠杀现场的照片，缴获的日本文件也交给盟军的笔译和口译组翻译出来。有时候作恶者会试图用火掩盖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在太多地方实施了太多暴行，盟军的证据都收集不过来。盟军找到的文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暴行。于是收集文件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证明“马尼拉大屠杀及其恐怖行为并非那些被逼到墙角的狂暴守军的个人行为，而是日军高层制订的有为之的冷血计划”。^[55]（此说最终未能完全证实，但山下仍然被绞死了。）

若非如此——假如日本人没有施暴，将平民安全释放——那么他们

在马尼拉的决死战斗可能还会受到敌人的些许尊敬。毕竟美国人自己也有不愿投降的传统和意识——面对墨西哥人死战到底的阿拉莫守军，“绝不弃船”的詹姆斯·劳伦斯，以及（刚刚发生的）阿登战役中被围困在巴斯托涅的安东尼·麦考利夫将军，他对德军的劝降只回复了一个字：“滚！”但是这种故意的强奸、折磨，以及对无辜人员的屠杀却让他们的战斗全无荣誉可言。即便是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全世界也没人会赞同日本人在马尼拉的所作所为，只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硬派除外。

日本明治天皇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是日本官方对军人道德提出的要求。这是日本帝国的两大支柱性文件之一（另一份文件是1890年的《教育敕谕》）。说这两份明治时代的文件在二战时期的日本仍然被奉若圣典是不为过的，而且《军人敕谕》也是日本军人所有权威的唯一基础。所有穿军服的人都必须对此倒背如流。其中常常被西方史料引用的最著名的语句是：“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面的文字，见于《军人敕谕》第三章：

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是皆非谓武勇。为军人者。当善明义理。锻炼胆力。曲尽思虑以谋事。小敌不侮。大敌不惧。但求尽己之武职。此则所谓大勇者也。故尚武勇者。待人接物。常能温和。博得人类之敬爱。好勇无谋。动辄肆威。势必至招人之忌。而使人畏之如豺狼也。……以上为军人不可须臾忽者也。[\[56\]](#)

在随后的四十年里，日本陆海军确实没有片刻忽视此敕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纪律性和骑士精神达到了西方军队的水准，甚至常常超过西方人。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时，日本在对待俄国战俘方面可谓典范——国际红十字会的观察员证实了这一事实。然而从那之后，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日本的军事文化急转直下，滑向了野蛮和暴虐，其原因至今仍为学者们所争论不休。到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队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谴责，二战结束

前，这种趋势仍在持续恶化。

于是，明治天皇的警告一语成谶。马尼拉的岩渊部队就像丢掉一大堆鸿毛一样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就此也放下了重于泰山的责任。他们忘记了《敕谕》里说的真“武勇”，不辨是非，放纵自己如同野兽般向手无寸铁的无辜者施暴。最后，正如裕仁天皇的祖父预言的那样，世人痛恨之，视其如豺狼。正如一名幸存的马尼拉暴行亲历者事后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疯狗一样。他们不是人——他们是禽兽。”[\[57\]](#)

过了马尼拉湾向西，巴丹半岛的绿色群山赫然耸立，此外还有科雷吉多尔岛低矮的灰色轮廓。美第11军受命收复这些太平洋美军心中的圣地。2月15日，他们踏上了通往巴丹半岛的征途。两支强大的纵队沿着半岛两岸向南进攻，很快打垮了这里的少量日军。一个星期内，他们就拿下了巴丹。在坚固设防的科雷吉多尔岛，一支6 000人的日本守军顶着如雨点般落下的舰炮炮弹和航空炸弹坚守此地。美军第503空降步兵团降落在岛屿西部高地被称作“顶层”的山峰上，与从岛屿东岸马林塔隧道口附近登陆的两栖部队会合。守军则以典型的方式拼死战斗，打到最后一人，他们在退往“大石头”内部深处时炸毁了隧道。2月28日，美军宣布占领这座岛屿，但是仍有数百名死不投降或者掉队的日军有待猎杀。

3月2日，麦克阿瑟召集了一众曾在1942年3月和他一起离开科雷吉多尔的军官。出于传统，他们乘坐一队崭新的海军PT鱼雷艇渡过马尼拉湾。在记者和纪录片摄制组的陪同下，他们攀爬岩石，在“顶层”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升旗仪式。第503空降步兵团的琼斯上校向麦克阿瑟敬礼：“长官，我把科雷吉多尔堡垒交给你了。”

吕宋是一个多山的大岛，想要完全征服这里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首都以北150英里外碧瑶山区的司令部里，山下将军告诉日本媒体记者们，吕宋之战仍然“仅仅处于战斗最初阶段”。他说美国人已经伤亡了

7万人。（到此时美军实际伤亡人数约为2.2万。）麦克阿瑟还没能抓住他岛上部队的主力。“我们的战略仍然是引诱美军登陆部队进入吕宋中部平原和马尼拉地区，之后从多处侧翼血洗他们，”山下如此告诉日本记者，“因此，吕宋之战正完全按我们的计划进行。”[\[58\]](#)

这是标准的宣传口径，但毫无疑问，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宾其他地方的日军主力仍然规模庞大。山下奉文没有重犯1941—1942年麦克阿瑟的战略错误，当时防守一方在易攻难守的平原地带展开作战，又没有及时做好城市围困战的准备。在那次战役中，美菲联军在日军登陆林加延湾后不到四个月就被迫在巴丹投降。三年后，双方攻守易位，山下的“尚武集团”主力在吕宋岛的北部山区坚守了超过8个月，直至日本在1945年8月投降。

克鲁格的第6集团军向北面和东面同时发动了三路进攻——第1军进攻卡加延山谷和山下在碧瑶的藏身之所，第11军进攻马尼拉东面的马德雷山脉，第14军进攻岛屿东南诸省。日本守军残余各阵地遭受的压力一刻也没有缓解。美军充分利用了他们在空中力量、炮兵、坦克、机动性、野战工兵和后勤方面的优势。菲律宾游击队也提供了关于日军位置、数量、装备，甚至是作战计划方面的宝贵情报。山下逐渐与他在岛屿其他地方的下属失去了联系。战至5月23日，美第25师突破了巴勒特山口的战略瓶颈，涌入卡加延山谷。

在这几个月里，麦克阿瑟未经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就下令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两栖登陆，以收复南面的各个岛屿。2月28日，第8集团军一部在巴拉望岛登陆，迅速将日军赶入无法通行的山区。随后于4月17日在棉兰老登陆，之后又在班乃、宿务、内格罗斯和南方其他小岛进行了小规模登陆。美军伤亡轻微，日军基本都撤退到了山区，然后在一无补给二无支援的情况下等死。幸存的日军部队四散在乡间，三五成群，像林木工人那样四处游荡，一点点地因饥饿或热带疾病而毙命。当地游击队猎杀掉队的日军，常常会把他们折磨致死，并摧残他们的尸体。这些日军的纪律也崩溃了。士兵们转而杀死军官，然后为争夺食物而搏斗，

甚至为此杀人并吃人的尸体。西原孝磨回忆说，自己一名即将死于疾病的战友，请他吃掉自己臀部的肌肉以多活几天。快要饿死的西原说自己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但我的眼睛却控制不住地盯着他屁股上的肉”。^[59]

一个名叫小岛清文的年轻海军军官一直努力让他由于饥饿而不断缩水的小分队在吕宋山区中不要走散。他和他的手下开始像害怕菲律宾人和美国人那样害怕日本战友。“瘦弱的掉队者成了强壮者的猎物。这太可怕了。我们被包围了，只能穿着破衣烂衫在丛林里兜圈子寻找吃的。与敌人作战成了我们最次要的事情。”^[60] 小岛最后提出了向美国人投降的异端想法。起先这个主意被他的人大声喝止，但他们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弱，到最后，幸存者终于接受了这种曾经不可想象的耻辱。8个人设法躲过了凶猛的菲律宾游击队，长途跋涉来到了美军防线，在那里他们成了俘虏，有烟抽，还有罐头口粮可以吃。

见到俘虏自己的人，小岛为他们的种族和血统之多感到震惊：“他们的头发有金色、银色、黑色、棕色和红色。眼睛有蓝色、绿色、棕色、黑色。皮肤则是白色、黑色还有各种其他颜色。我震惊了。我意识到我们是在和全世界的人们作战。同时我还想到，美国是个多么有趣的国家啊，那么多不同人种，却穿着同一套制服来打仗。”^[61]

6月28日，麦克阿瑟宣布“吕宋战役的主要阶段”结束，他说美军已经占领了所有的平原、城镇，以及岛上的所有战略隘口：“拥有40 420平方英里面积、800万人口的吕宋全岛，现在解放了。”^[62] 吕宋之战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陆军第一场以军级兵力作战，并能在辽阔地域中机动的战役。换言之，吕宋战役比太平洋战争的任何其他战役都更像欧洲的战争。这是太平洋上最大规模的地面战役，只有冲绳战役可与之相提并论。从某些角度来看，麦克阿瑟关于优先攻打吕宋的主张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尤其是，他提出这里的地形易攻难守，以及当地游击队作为侦察兵、间谍、破坏者和游击战士具有重大价值。这都是正确的。

最终，日军丢掉了他们在吕宋的大部分部队，只剩下象征性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20万日军葬身吕宋，只有9 000人在1945年东京彻底投降前被俘。战争结束后，只有大约4万名曾在岛上打过仗的日军能返回故土。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日本陆军在菲律宾总共死了368 700人。^[63]美军歼灭了9个日本陆军精锐师团，并将另外6个打到无力再战。这场战役直接或间接令日军损失了超过3 000架飞机，并迫使日本人将“神风”自杀战术作为了此后直到战争结束的主要航空兵战术。美军的战斗伤亡大约为4.7万人，其中10 380人战死——但若是加上非战斗伤亡，尤其是疾病所致的伤亡，这个数字就会增加到90 400人。

^[1] 猪口力平估计损失率为30%，见Rikihei Inoguchi, *The Divine Wind*, p.87。

^[2] *Ibid.*, p.88.

^[3]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53.

^[4]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0.

^[5]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January 15, 1945,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204.

^[6] Marsden, *Attack Transport*, p.155.

^[7]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1.

^[8] Herman, Douglas MacArthur: *American Warrior*, p.570.

^[9] Krueg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p.228.

^[10]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p.30—31.

^[11] GHQ, SWPA, Communique No.1027, January 29, 1945, quoted in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p.270.

^[12] Smith, *United States Army in WWII, The War in the Pacific*, p.219.

^[13]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279.

^[14] Carl Mydans,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Two*, p.607.

^[15]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293.

^[16] Robin Prising quoted in Scott, *Rampage*, p.188.

[17] Carl Mydans,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Two*, p.616.

[18]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7.

[19] Bill Dunn’s CBS Radio Broadcast, February 4, 1945, quoted in Scott, *Rampage*, p.170.

[20] Scott, *Rampage*, p.198.

[21] Sworn Affidavit of Hobert D.Mason of the 112th Medical Battalion,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2] Sworn affidavit, Major David V.Binkley, U.S.Army,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8.

[24] Borneman, *MacArthur At War*, p.467.

[25]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176.

[26] Scott, *Rampage*, p.205.

[27]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Battle of Manila, First Phase,” p.12.

[28] “Directions Concerning Combat by Shimbu Group Headquarters,” in “Documents and Orders Captured in the Field,” accessed October 11, 2018, <http://battleofmanila.org>.

[29]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p.1,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0]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15.

[31] Scott, *Rampage*, p.248.

[32] H.O.Eaton Jr., “Assault Tactics Employ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33] Scott, *Rampage*, p.317.

[34] *Ibid.*, p.350.

[35]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13.

[36] Captured diary, unknown soldier of Ninth Shipping Engineer Regiment, Japanese Army,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37] Ibid., p.4.

[38] Ibid., p.3.

[39] Sworn affidavits of Father Francis J. Cosgrave and Major David V. Binkley, U.S. Army Forces,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in Ibid.

[40] Sworn affidavit, Dr. Walter K. Funkel,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U.S. 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41] Scott, *Rampage*, p.25.

[42] Ibid., p.263.

[43] Ibid., p.309.

[44] Admiral Sanji Iwabuchi to Shimbu Group headquarters,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p.18—19.

[45] Admiral Sanji Iwabuchi to C—in—C, Southwest Area Fleet at Baguio, Japanese Monograph 114, "Philippine Area Naval Operations, Part IV," January—August 1945, p.18.

[46] McEnery, *The XIV Corps Battle for Manila, February 1945*, p.98.

[47] "Intramuros a City of Utter Horror," George E. Jon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p.25.

[48] Quoted in Friend, *The Blue—Eyed Enemy*, p.205.

[49] H.O. Eaton Jr., "Assault Tactics Employ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50]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47.

[51] Ibid., p.252.

[52] Ibid., pp.251—52, and newsreel footage, "Ceremony at Malacañang Palace," February 27, 1945, accessed July 20, 2018, http://www.criticalpast.com/video/65675037789_Sergio—Osmena_General—MacArthur_Commonwealth—Government_legislature.

[53]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50.

[54] Romulo, *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 p.223.

[55] "Report on Destruction of Manila and Japanese Atrocities, February 1945," p.1, U.S. Army Forces, Southwest Pacific Area,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Bonner Fellers Papers, Box 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56] “Imperial Rescript to Soldiers and Sailors (1882),” p.227, in Allinson,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57] Scott, *Rampage*, p.265.

[58]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March 9, 1945, p.2.

[59] Takamaro Nishihar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157.

[60] Kiyofumi Kojim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76.

[61] *Ibid.*, p.378.

[6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63] Reported in 1964 by the Jap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cited b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73.

第十一章

1944年6月，就在美军突击登陆塞班岛的两天前，硫黄岛日军迎来了一位新的司令官。栗林忠道中将身材壮实，中等个头，53岁，留着两撇仁丹胡子。他是日本陆军的明星军官之一，无论是作为前线指挥还是作战参谋，他的表现都很杰出。1928—1929年在华盛顿任大使馆武官时，操一口流利英语的他游历了美国大部分区域。在1938—1939年日本与苏联之间秘而不宣的战争中，他在中国东北的诺门坎指挥一个骑兵联队。1941年之后，他又在广州担任日本华南派遣军的参谋长。前不久，他被调往东京指挥皇宫近卫军，这是个富于声望的岗位，他也由此得以直接面见天皇。此番他的新任务是指挥第一〇九师团和小笠原兵团，包括小笠原群岛上的全部守军。启程离开东京之前，东条英机首相曾指示栗林“要像阿图岛那样”。^[1]这相当于自杀性命令：栗林必须死守岛屿，战至最后一人。

硫黄岛是一个8平方英里的荒岛，覆盖着含硫火山灰，灰蒙蒙的荆棘，以及岩石峭壁。它是火山列岛一众荒芜小岛中最大的一个，火山列岛则是小笠原群岛的组成部分。这座状似猪排的岛屿几乎就在塞班岛和东京之间的航线上，南距塞班岛625海里，北距东京660海里。其大部分海岸线都是陡峭的滩涂——但是覆盖海滩的不是沙子，而是火山岩屑，无法承受重型车辆。俯瞰全岛的折钵山高550英尺，位于岛屿南端。折钵山北面的平地上有2座可用的飞机场，元山1号和2号机场。第3座机场，即3号机场，正在施工之中。再向北，岛屿宽度变大，地形也变为越来越高的石质阶地，沟壑纵横，一直延伸至一处海拔350英尺的半球形岩石山峰，那里被称为元山高地。整个岛屿的地下满是硫黄，蒸气从地表裂隙处喷出，把地热和地下气体带出地面。这是一处昏黑、蛮荒、

乌烟瘴气之所，却是当地唯一一座地形适合修建足以容纳B-29这类重型轰炸机的机场的岛屿。这使得硫黄岛顿时价值倍增，栗林决定把他的指挥部建在这里，而不是北面168英里外人口更多也更加舒适的父岛。

刚一抵达，栗林将军就拿起一根木头拐杖，背着水壶，开始步行环游全岛。在1号机场南端旁边的海滩内陆一侧，他卧倒在地，用他的木拐杖瞄准，仿佛拿着的是一支步枪。他要他的副官堀江义孝少佐从不同方向朝他走过来。栗林随后就在小本子上画下了他的瞄准线。到达后仅仅两个小时，他就准确知道了该如何布置他的部队和构筑防御设施。由于预见到美军将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这位将军完全没有指望将敌人的两栖部队歼灭于水际滩头。他将会把部队和火炮集中在内陆的岩石高地中。他的人马将深藏于山洞、坑道和地下堡垒之中，通过数不清的射击孔、碉堡和在山岩中凿出的工事向敌人开火。折钵山将被改造成一座堡垒，一支独立的作战支队将防守此地。他的部队主力将部署在北面两条横贯全岛的坚固筑垒防线上——一条位于1号和2号机场之间，第二条紧挨着2号机场北侧。元山高地顶部将是“蜂巢阵地”——硫黄岛的超级堡垒。

当年夏季，美军攻击这个岛屿的频率和力度都在增加。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在7个星期里5次空袭此地。B-24轰炸机进驻塞班岛之后，开始对硫黄岛例行“送牛奶”，到1944年末，这种例行轰炸最终发展为每天一趟。试图从本土向硫黄岛运输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的货轮和运兵船遭到了美国潜艇的截杀。7月，一支美军巡洋舰——驱逐舰混合编队出现在岛旁，8英寸和5英寸的舰炮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岛上。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帐篷被撕碎，司令部大楼和兵营被炸平。“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反击，”一名飞机在地面被毁的零战飞行员回忆道，“人们尖叫，咒骂，吼叫，他们挥舞着拳头发誓要报仇，他们许多人倒在了地面上，他们的威胁溶解在泛着泡沫的鲜血里，从喉咙的破口里喷涌而出。”^[2]

栗林是岛上的最高指挥官不假，但是陆海两军各自住在不同的营地

里，军种间的政治问题也还是一如既往地难缠。海军指挥官厚着脸皮，不停地向栗林索要更多的食物、水和其他物资。随着援军不断抵达，守军规模日益膨胀，物资短缺也愈加严重。栗林在1944年6月到达时，岛上有6000名军人；9个月后盟军登陆时，守军的数量已接近最初的4倍。最严重的问题是水。挖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含盐含硫：士兵们称其为“妖水”或者“死水”。[3]可以用蓄水池来收集雨水，但这远远满足不了两万人的需要。口渴的人们会直接从地上的水坑里喝水，结果导致伤寒和痢疾的大暴发。饮水被严格地定量供应。淡水被装在瓶子里，从父岛用木质驳船运来，空瓶子还得运回去重新装水。栗林给他的下属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用一杯水就刮了胡子、洗了脸、刷了牙。[4]

岛上的海军军官在其东京的上级的支持下，主张进行“水际滩头防御”战略。他们想要在1号机场周围建立由250个到300个碉堡组成的防线，希望在滩头击退美军登陆部队。海军将会把所需的建材和武器从日本用船运来，包括水泥、钢筋、炸药、机枪和弹药。水际防御方案和栗林更倾向的纵深防御战略背道而驰，但是栗林太需要这些建材和武器了，因此他没有立刻向他的海军战友下达硬性要求。在10月的一次指挥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日本守军只有地面部队。他们将要与敌人陆海空联合部队对阵。以滩头为基础的战略将会令防御部队暴露在美国压倒性的海军舰炮和航空炸弹火力之下，很快就会被消灭。[5]但是海军一方仍不为所动。海军为岛上提供建筑物资是以守卫机场为条件的。如果不防守机场，海军就不会从日本运送物资过来。

堀江少佐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海军运上岛的物资，一半拿去建造海军想要的滩头碉堡，其余则分配给栗林的高地筑垒。考虑到有一半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栗林将军同意了。

栗林带来了一队军事工程师和地雷工兵来监督他的挖掘工作。硫黄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凝灰岩”，一种由火山灰积压而成的多孔透水的岩石，很容易用铲子和铁锹挖掘。挖掘施工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轮班

倒。他们每天可以掘进3英尺，如果有炸药的话，进度还能快一倍。挖出来的灰土和碎块会装在帆布袋里运上地面。这完全是个苦活儿。施工人员越往岛屿深处挖，就越强烈地受到地热和硫黄蒸气的折磨。他们光着膀子，只穿着缠腰带，踩着胶底分趾拖鞋，每次下去挖掘都坚持不了10分钟就要回到地面呼吸新鲜空气，休息一会儿。“我们的手上满是水疱，肩膀僵硬，在地热中气喘吁吁，”一名陆军二等兵回忆道，“我们的喉咙渴得发疼，但是却没有水可以喝。”^[6]

到1944年秋，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一套复杂的隧道、台阶和碉堡体系已经在岩石内部初见雏形。那些天然的大山洞可以一次性容纳多达500人。日军在里面接了电灯和通风系统，以改善居住的舒适性。裸露的岩壁被刷上了石灰。各个指挥所之间通过无线电或地下电话线相互联系。最终，大约1 500座地下掩体经由16英里长的走道连接到了一起，出入口广泛分布在上方的开阔地上。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城里，人们可以找到医院、宿舍、食堂，以及满是最先进技术的通信中心。岛上海军的主要指挥部，被称为南部诸岛地堡，位于地面以下90英尺处。在地面上，海军的劳工队沿着机场周围建造了数百座半球形混凝土碉堡。碉堡周围堆上了沙子，这既是为了隐蔽，也是为了减缓舰炮炮击的冲击力。众多狭小射击阵地的射界在登陆滩头上相互交叉重叠。反坦克壕沟和步兵堑壕纵横交错。海军工兵们还从飞机残骸上拆下零部件来升级跑道沿途的筑垒设施。机翼、炸弹舱、机身尾段都被用作建筑材料。残损的机身被半埋入地下，然后覆盖上石头和沙袋，用作临时碉堡。一名军官在检视了这些工程后伸出了大拇指：“干得漂亮。这些飞机为国家效力了两次。”^[7]

为减少吃饭的嘴，栗林将军命令将硫黄岛上的所有平民撤回日本。从7月3日到14日，一千名住在岛上的老百姓回到了日本本土。所有16岁到40岁没有家属要供养的男子都被征召入伍。当栗林发现他的高级军官们一直在司令部转悠，想要找行政管理的工作做时，他命令他们“离总部越远越好，投入前线指挥中去”。有些人不喜欢这种无休止的体力

活，在背后抱怨将军：“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挖洞的。”^[8]栗林忠道素来手下无情，他立刻清除了这些反对派和牢骚满腹的家伙。他撤了多名高级军官的职务，包括他自己的参谋长，一名旅团长，以及两名大队长，然后把年轻军官提拔起来担任他们的职务，或者从本土要人前来接替。

有些人说栗林是个暴君，但他却又对下级的切身福利表现出了真诚的关心。每当有本土来的访客带来食物或蔬菜做礼物，他都会下令把它们分给手下。他还是个重家庭的人，很宠溺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栗林会给他们单独写信，常常会关心他们国内生活的细枝末节，并提醒孩子们要分担家务。他预见到了日本遭到轰炸可能带来的灾难，并提出警告。1944年9月12日，他在写给妻子吉井的信中说：“每当我想到东京遭到轰炸后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一片被烧尽的沙漠，遍地尸体——我就会拼命去阻止他们来空袭东京。”两个月后，当“超级堡垒”机群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基地起飞作战时，栗林和他的官兵们能够看见这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从自己头顶高处飞过，前往日本。但是守军却完全无法阻挡它们，因为它们在高炮的射程之外。“在这场战争中，像我这样在前线等死的人是无所谓了，”他在12月8日给吉井的信中写道，“但每念及即便是你、国内的女人和孩子们都满怀危在旦夕之感，便难以忍受。无论如何，躲到乡下去，活下来。”^[9]

1945年1月，栗林和他的军官们认为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只剩下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可能还没有这么久。按计划，他们还要在机场地下深处挖一条长隧道连接元山高地和折钵山，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挖它了。硫黄岛与日本之间的海运线已经不再安全了，甚至就连操持小舟在硫黄岛和父岛之间往来也十分危险。栗林宣布收回先前和海军达成的妥协，下令停止机场周围碉堡的施工，集中所有人力物力，优先完成元山高地的筑垒工事。他要求花更大力气来伪装地下碉堡和火炮射击阵地的入口，并且提升了训练标准，重点练习狙击技术、夜间渗透攻击，以及反坦克战术。^[10]

在发给东京的电报中，栗林要求获得更多的武器、弹药和补给物资，提出要把这些物资空运到岛上来。他还想要征用小船甚至是渔船来把淡水和补给品从父岛运来。但是到了2月，随着岛上守军超过2.2万人，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急转直下。地下碉堡闷热、拥挤、肮脏。虽然增加了一些通风扇，但是地下的温度常常超过60摄氏度，硫黄蒸气也令呼吸极度困难。岛上没有足够的厕所，那些腹泻难忍之人只能就地解决。而隧道入口处的露天便池里则滋生出成片的大苍蝇。为了在美军无休止的空袭下保护补给物资，守军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搬到隧道和碉堡里去。于是地下的过道里堆放起了一排排装满淡水、燃油、煤油和柴油的55加仑圆桶。人们在这些圆桶上铺上薄褥子或者毯子，然后睡在上面。无处不在的苍蝇、蚂蚁、虱子和蟑螂让人们伤透了脑筋。密不透风的地下洞穴里满是汗臭。一名士兵在日记中写道：“进入防空洞，就像是在船舱里一样。有人烧火做饭，令这里变得闷热，温度很高，人在这里待久了就难免头疼。”[\[11\]](#)

就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日本守军的隐蔽工作令关岛和珍珠港的美军情报分析人员大吃一惊。硫黄岛已经被轰炸、扫射、炮击了8个月；它被海岸外的军舰炮击过，被附近马里亚纳群岛的B-24和B-29轰炸过，航母特混舰队更是造访此地12次。岛屿柔软的火山灰上被炸出了一个叠着一个的弹坑。光是B-24轰炸机，就已一连轰炸了此地70天，投下数千吨炸弹。但在此期间，硫黄岛的地下堡垒和炮兵掩体反而变得愈加坚固和密集。轰炸和炮击对岛上的防御几乎没起到什么影响，也没有拖慢守军施工的进度。美军飞机和潜艇对硫黄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拍摄了照片，制作了数千张从各个角度看的高清照片。照片显示，日军已经离开了他们暴露的兵营和宿营区，搬到了地下。每日的飞机侦察证实，岛上显然已经没有了任何建筑和帐篷，从空中也很难见到部队的踪迹。第26陆战团的托马斯·菲尔兹上尉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不在硫黄岛上了，他们在硫黄岛下。”[\[12\]](#)

到了美军进攻前夕，硫黄岛已经做好了迎敌准备。折钵山和元山高

地被改造成了天然堡垒。岩石中架设了各种武器，从安放在下沉式阵地中的大型海岸炮，到迫击炮、轻型火炮、反坦克炮和机枪。迫击炮管和火箭发射器被隐藏在可以快速开关的钢质或混凝土盖子下面。守军中枪法最好的人都得到了狙击步枪，他们被布置在视野最开阔，能够俯瞰海滩和机场的洞口处。碉堡的入口处都放上了成箱的手榴弹。从海滩通往梯形地带和机场的小道都埋设了反步兵地雷，大路和开阔地上则布设了足以摧毁或阻止坦克、推土机和卡车的重型反车辆地雷。岛上储存的粮食足够守军吃两个月。虽然栗林将军遭到了同僚们的激烈反对，但他最终还是把他的意愿灌输给了守军，所有的下属指挥官都被洗了脑，将按他的计划行事。他们不会在开阔地上发动大规模反击。万岁冲锋被严格禁止。日军将会用炮兵和迫击炮火力覆盖滩头上处于最脆弱时刻的进攻部队，但他们不会拼尽全力守卫机场。

栗林将军并不指望他的人能打赢硫黄岛之战。他们的目的是打一场迟滞作战，战至最后一人，给美军造成最大的伤亡。在敌人进攻的几天前，栗林在他位于西北岸岩滩附近的地下指挥所里写下了6条“敢斗之誓”。这些誓词被油印出来，发给岛上的每一支部队，每一名士兵都要熟记和背诵。它们被张贴在碉堡的墙壁上，贴在大炮的炮管上，整洁地抄写在小本子上，以及写在纸上叠放在士兵的口袋里：

1. 我等将全力死守本岛。
2. 我等将身负炸药飞身上前，粉碎敌战车。
3. 我等将冲入敌阵，杀尽敌人。
4. 我等须每发必中，每击必歼敌。
5. 我等若不毙敌十人，死不瞑目。
6. 我等纵使只剩最后一人，也须游击扰敌。 [\[13\]](#)

1945年2月16日，当美军登陆舰队云集海岸外时，无线电兵秋草鹤

次正待在下方机场旁的瞭望地堡里。通过3英尺宽的射击口向外看去，他看见排成同心圆队形的军舰包围了岛屿，延伸到海平线外：“那就像是海上升起了一群山峰。”^[14]当远处的战列舰开火时，他先是看到闪光，之后才听见轰鸣声。一股热风从射击口扑到他的脸上，火药味随即飘进鼻孔。第一批炮弹落地时掀起了大块的土石。大地在颤抖，碉堡的墙壁如同纸糊的一般摇来晃去。第1工兵混成旅团的高桥俊治军曹被吓呆了：“岛上如同发生了大地震，火光冲天。黑烟笼罩了岛屿，弹片带着尖啸声四处横飞。树干直径有一米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那声音震耳欲聋，就像两百个霹雳同时炸响。即便是在30米深的地下，我的身体也被抛离了地面。这真是人间地狱。”^[15]

当第58特混舰队于1945年2月10日离开乌利西时，大约一半的飞行员都是刚刚被分配到舰队的新手。许多打完了整个菲律宾战役的老飞行员都因急需休息而轮休去了。新人们训练水平很高，飞行日志上平均有600个小时的“握杆时间”，但是他们的技术还没有经过空战的检验。

当舰队在轻浪微风中向北航行时，流言开始四起。所有人都猜得到自己这是要去打另一场大规模登陆，他们都见过锚泊在乌利西潟湖里的大批运兵船和两栖舰艇，因而确定无疑。2月15日，所有舰上都宣布了爆炸性的消息：第58特混舰队正开往东京，他们将要空袭那里的航空兵基地和飞机制造厂，随后转向南面支援对硫黄岛的两栖登陆。自从近3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还没有哪一支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尝试过攻击日本本土。攻击敌人的首都将会捅马蜂窝：很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日本战斗机前来迎击，高炮火力也会很猛。一名年轻的“地狱猫”飞行员先是鼓掌，接着停下来问他的队友：“我的上帝，我怎么会拍手？”^[16]

当舰队向北进入高纬度海域，天气开始变得潮湿、寒冷，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洗刷着甲板，落在舰桥和操舵室的有机玻璃窗户上。军舰时高时低，左摇右晃，在冬季的灰色海面上穿行。斯普鲁恩斯将军称之为“我能想到的最该死、最烂的天气”。^[17]所有在甲板上执勤的水兵都领到了厚重的羊毛大衣、帽子和手套。但是恶劣的天气也有一个好处：

特混舰队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日本近岸水域。敌人的巡逻机停在了地面上，即使起飞也无法透过浓云看到开过来的舰队。雷达操作员的眼睛紧盯着显示屏，但是没有敌机接近。美军的无线电室一直在不断监听NHK广播电台和东京广播电台，它们也一直在按节目单正常播放。

空袭前夕，米彻尔将军向所有舰载机大队发出了一份备忘录：“第58特混舰队的大部分战斗机飞行员都将第一次在东京上空参加空战。如果飞行员能够记住这些要领并保持冷静，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不要过于激动。要记住你的飞机在所有方面都比日本人的优秀。比起你对他的害怕，他可能更害怕你。”米彻尔强调了保持编队队形的重要性，他们要克服脱离编队追击个别日军飞机的本能反应。在低空尤其如此，那里的容错空间更小，零战也可以发挥它们在小半径急转弯方面的优势。“发现第一架敌机时，要克服你的第一反应，不可冲动行事，”米彻尔写道，“如果你是僚机，那就跟紧你的长机，绝对不要离开它。”[\[18\]](#)

夜里，飞行员们在待命室集合。他们舒服地坐在皮质扶手椅上，听取他们中队长和航空情报官的任务简报。目标选择人员在东京城内和周边找到了24座机场和飞机工厂，并向各个中队分配了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在优先级最高的目标中有两座重要的飞机工厂：位于东京以西的多摩的一座立川飞机发动机工厂，以及东京南面的东京湾旁边大田的一座中岛飞机总装厂，第20航空队的B-29机群在过去10个星期里一直试图摧毁它们，但未能成功。

奔赴日本海岸线途中的最后一夜，天气依然糟糕透顶。舰队航速从25节下降到20节，但这仍然是一趟艰难的旅程。舰艇摇摆得很厉害，伸缩接头在应力作用下嘎吱作响。在“伦道夫号”航母上，第12战斗机中队的年轻少尉们躺在床铺上彻夜难眠。他们盯着天花板，努力想要在大战之前尽量睡一会儿。一根铁链拍打在“伦道夫号”的舰体上，发出可怕的声响。有人后来回忆道：“我最后肯定是睡着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被惊雷般的‘全体人员，各就各位’的命令惊醒。我们训练了两年，就为了这一天。”[\[19\]](#)

2月16日拂晓，特混舰队位于本州岛海岸外60英里，东京西南大约125英里处。冰冷的北风以30节速度刮来。大雨冲刷着航母的飞行甲板。在刺骨的寒冷中，雨水夹杂着雪花。能见度降到了零。^[20]地勤人员裹着羊毛外套和围巾，举着红色和绿色的手电筒，带着飞行员穿过排列在甲板上的机群。当F字旗升起时，点火管开始打火，发动机转了起来；它们喘振着，回火，然后发出了熟悉的轰鸣声。一名军官从“约克城号”舰桥侧旁的走廊上目睹了这一幕，感觉这简直如同“最底层地狱的全景——黑暗，寒冷，喧闹。发动机的轰鸣震撼着军舰。淡蓝色的火光从排气管喷出来，倒映在湿滑的甲板上，直到螺旋桨把甲板上的水坑吹干为止”。^[21]

第58特混舰队的17艘航母上起飞了1 100架舰载机。它们在暗灰色的夜幕中向北爬升，每个飞行员都很努力地紧盯着前方飞机排气管处的淡蓝色火光。第12战斗机中队的麦克沃特上尉回忆道：“我在冰冷的风中关上了座舱盖，当雨雪落在我的飞机上沙沙作响时，我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就在下方几百英尺处，泛着白色浪尖的怒涛显出一片铁灰色——真冷啊。”^[22]在1.4万英尺高度，“伦道夫号”的47架“地狱猫”突然冲出了云层，来到了晴空下。他们下方是一片羊毛般的灰色云毯，延伸到四面八方的天际线处。他们看不见日本的其他地面，只能看见左侧约70英里外富士山那覆盖着白雪的圆形火山口。这成了一处有价值的导航参照物。

当他们接近日本海岸线时，云层出现了裂隙。通过云缝，他们第一次看见了敌人的国土——白雪皑皑的山峦，稻田，以及一片片黑色的屋顶房瓦。麦克沃特发现左上方有一架日军零战。他将起飞前关于保持队形的告诫抛之脑后，向左急压坡度追了上去。敌机显然不急于交战，它转弯向云层俯冲。但是零式战斗机的结构轻，俯冲速度无法与“地狱猫”比肩，麦克沃特迅速追上了猎物。他打出一串长点射，打进了那架零战的发动机和机翼。令它拖着烟火消失在了云层中。

东京南部天气太差，无法飞行，于是大部分进攻中队都转向了备选

目标。战机从云缝中俯冲而下，轰炸了城市北面和东面的机场。“地狱猫”机群用5英寸高速空地火箭弹向机库、机械车间和停放着的飞机进行了齐射。之后它们压坡度绕回来，再次进行低空扫射。数百架日军飞机已经升空，但许多飞机并不怎么想来参战，只是在云层间飞入飞出，躲避追杀。显然，它们起飞只是为了避免被摧毁在地面上。

在海岸外，能见度依然很差，返航的飞行员不得不借助各自母舰的YE/ZB无线导航台回到舰队。在浓密的云层中下降时，他们的眼睛只能盯着座舱里的仪表板，许多年轻的新手都在暗暗感激自己在林克模拟器和在教练机上“蒙布飞行”所花出去的大量时间。第58特混舰队的指挥官原本预计会遭到惨重的损失，但是2月16日这天只有36架飞机未归。有些返航的飞机遭到了重创。有一架格鲁曼“地狱猫”左翼被打掉了10英尺长的一段，但还是设法完美地降落了下来。在“伦道夫号”上，水兵们挤到一架重伤的“地狱猫”旁，对它遭到的打击惊叹不已。他们在一侧机翼上数出了54个弹孔，而且“机身看上去就像是被当成了靶子，鬼子的靶子”。[\[23\]](#)

2月17日曙光初露时，天气比前一天只是略有改善，大雨时断时续，云底高300英尺到700英尺不等。斯普鲁恩斯批准进行早间战斗机扫荡，但是他也告诉米彻尔，他预计战况可能依旧不利，“如果当天的初始作战效果不佳，我们就撤回去支援硫黄岛的登陆”。[\[24\]](#)

东京上空的天气比前一天要好，日军的防空部队也做好了准备。排成大型多层“V字形”编队的第12航空大队被大约12架日本战斗机盯上了。大队长查理·克罗姆林中校要求他的战斗机保持队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护送“地狱潜鸟”和“复仇者”前往其首要目标，多摩的立川工厂。俯冲轰炸机命中了该厂区50枚500磅炸弹，“地狱猫”则又奉上42枚航空火箭弹。工厂核心区的各个设施都化为了翻滚的烈焰。SB2C飞行员约翰·莫里斯少尉改出俯冲后从树梢高度脱离，这看起来比爬升到高射炮火更密集的高度更安全些。他低空飞越东京湾，“时左时右，忽高忽低。我们扫射了任何恰好出现在我们航线上的船只，但是不会离开航线

去寻找目标”。[\[25\]](#)他随后安全返回了“伦道夫号”。

在东京东北方的鸿池机场，12架三菱G4M轰炸机翼尖挨着翼尖排列在起飞线上。鸿池机场是一座“樱花”（人操自杀弹）训练中心，这些轰炸机都是挂载和投放这些小型火箭动力自杀机的母机。这些G4M都加满了油，它们原本计划在当天上午进行训练飞行。一个中队的“海盗”来此进行了低空扫射，用.50口径燃烧弹覆盖了停放着的飞机。所有12架三菱轰炸机都被摧毁在了地面上。一名日本飞行学员回忆道：“火焰吞没了一切。所有东西都是先发出蓝灰色火光，一秒钟后又变成橙黄色。如果场面不是这么可怕，我可能会说那很美丽。”[\[26\]](#)

上午11点，斯普鲁恩斯终止了行动。他要米彻尔回收所有飞机，撤回去支援硫黄岛登陆。当天下午4点，特混舰队已高速南下。

虽然天气带来了麻烦，但空袭东京仍然是一场大胜。第5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们击落了大约100架日军飞机，在地面另外摧毁了150架。多座重要的机场设施和航空站点化为冒烟的废墟。舰载轰炸机让立川工厂停了产，摧毁了大田中岛飞机总装厂大约60%的建筑。第58特混舰队在战斗中损失了60架舰载机，事故损失28架，但是航母和护航舰艇毫发无损。这场空袭被正在与美国陆军航空队激辩的海军当作了首要证据。海军提出，俯冲轰炸、低空扫射和火箭弹攻击能够比“超级堡垒”的高空精确轰炸更可靠地命中地面目标。立川和中岛工厂的下场看来是证实了他们的主张。米彻尔称这场两天的空袭为“航母航空兵在战争中最大的胜利”[\[27\]](#)时，想的可能就是这场军种之争。此后，第58（第38）特混舰队将会一次又一次杀回来，轰炸东京和日本其他地方，其频率和猛烈程度将越来越高，直至战争结束。

参加2月16日至17日空袭的战斗机飞行员中，有超过一半此前都没有空战经验。但他们的表现却很像是老手。米彻尔的战报总结道：“对于海军飞行训练机构及其训练方式，怎样称赞都不为过。”[\[28\]](#)

就在舰载机空袭东京的当天，炮击舰队抵达了硫黄岛外海，用排山倒海般的高爆弹淹没了这座岛屿。从舰队上只能看见折钵山的峰顶，岛屿的其他部分都被浓烟烈火所包围，一无可见。炮弹划过抛物线弹道飞向岛屿，弹道根据火炮的口径和军舰距离海岸的距离有高有低。而接连不断的爆炸汇集成了一整片难以区分出炸点的轰响。扶在军舰栏杆上观看的人们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震撼了。阵阵热风把他们的衬衫吹得从胸前飘了起来。一队B-24滑翔着飞了过来，泛着金属光泽的亮点拉出斜线，从它们打开的炸弹舱里落下来。一连串爆炸随即在岛屿中央延伸开来，翻腾的烟尘中闪出橙黄色的火光。^[29]曾经目睹过塔拉瓦、夸贾林和塞班岛登陆战的战争通讯员鲍勃·谢罗德称这“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同类场面还要吓人”。^[30]

第53特混舰队那些搭载着第4和第5陆战师的运兵船于D日午夜后抵达。扫雷艇已经清理出通向滩头的航道，水下爆破组的蛙人们也绘制了海底的地形图，并炸掉了那里所有用来阻止登陆艇靠岸的障碍物。和其他此类作战一样，突击部队能够坐在前排观赏登陆前轰炸和炮击的高潮一幕。对于第5陆战师的罗纳德·D.托马斯中尉来说，“看起来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存活。俯冲轰炸机铺满了天空，当它们俯冲时，地面宛如掀起一阵沙暴”。^[31]

登陆舰队搭载着11.1万部队，包括7.5万登陆部队（几乎全都是海军陆战队）和另外3.6万名陆军守备部队。运输船和登陆舰还运载了9.8万吨补给物资。许多小型登陆载具，例如履带式登陆车和轮式两栖卡车，在珍珠港就提前装满了口粮、弹药、燃油和其他物资。之前借给麦克阿瑟用于吕宋岛登陆战的第7舰队水面战舰，现在又不得不匆匆北上，以及时赶上硫黄岛之战。举个例子，“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林加延湾一连待了35天后，刚刚在2月16日回到乌利西环礁，随后在24小时内完成了加油装弹。这艘可敬的老战列舰在珍珠港之战后起死回生，披挂上阵，一连50个小时以最大速度冲刺了900英里，在D日（2月19日）上午10点半抵达岛旁，此时登陆战已经开始了一个半小时。在随后的连续11

天里，它为部队提供了炮兵压制射击和应召火力支援，直到所有16英寸炮弹打光为止。

舰炮轰击看似吓人，但实际上却远远没有达到海军陆战队想要的标准。在分配作战任务时，哈里·施密特少将申请在登陆前进行至少连续10天的炮击。他的主张得到了特纳将军司令部的海军舰炮火力协调官唐纳德·M.韦勒中校的支持，此人曾系统研究过塔拉瓦、塞班、佩里硫战役中舰炮火力的效果。韦勒提出，瞄准精度和威力固然重要，但是对岸轰击的持续时间也是个同等关键的因素。没有什么比向岸上防御阵地进行日复一日、一刻不停的重炮轰击效果更好了。但是由于后勤上不可行，施密特的请求还是被特纳拒绝了；美国海军从未尝试过如此长时间的炮击。经过几轮争辩和讨价还价，斯普鲁恩斯将军裁定，D日之前将对岛屿进行三天炮击。对于这一决定，他的解释是，炮击时间过长会令固定阵位上的舰队遭受潜艇和飞机反击的危险，同时海上弹药补给也有困难。绰号“疯子”的霍兰·史密斯中将是太平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最高指挥官，他后来在战后回忆录中感叹道：“我们不得不像马贩子一样讨价还价，在无可替代的人命和能够补充的弹药之间左右权衡。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沮丧过。”^[32]

美军的指挥系统和先前在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作战时几无二致。斯普鲁恩斯仍然是海上的总司令，负责整个第5舰队，米彻尔则是第58特混舰队司令。特纳将军指挥两栖远征舰队，他从16个月前的塔拉瓦战役以来就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和以往一样，他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向陆战队的地面指挥官下达命令。史密斯指挥远征军，包括第3、第4和第5海军陆战师，以及将在拿下岛屿后上陆的陆军守备队。但是史密斯没有像此前战役中那样直接指挥第5两栖军，这个任务交给了施密特将军。这一安排相当于在原本经过检验而且行之有效的指挥体系中生生插入一个新的层级，许多前线基层指挥官对此都颇有疑虑。实际上即便施密特干的是和史密斯在此前战斗中一样的工作，史密斯也仍然是施密特和特纳之间的润滑剂。史密斯62岁了，即将强制退出

一线，硫黄岛将是他的最后一战。作为唯一有实打实的成绩表明能够和暴躁的“凯利”特纳有效协作的陆战队高级将领，他的任务是待在特纳的指挥舰“埃尔多拉多号”上，代表陆战队的主张，争取陆战队的利益，而施密特则要上岸负责地面战斗。

特纳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他是美军中最顶尖的两栖战专家——因此也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了——但他并不总是能和其他人愉快地合作。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特纳每晚都喝得酩酊大醉——即便在海上执勤时也是如此，这是违规的。“特纳将军很难不喝酒，”斯普鲁恩斯的总司令秘书查尔斯·F.巴伯说，“但他有个神奇的能力：晚上睡得香，早上精神好……斯普鲁恩斯站在他这边，很重视他。”^[33]

第4和第5陆战师将在岛屿东南海岸登陆。第4陆战师登陆后将直接向内陆推进，夺占两座机场中较大的元山1号机场，之后转向北，攻打2号机场。第5陆战师将打过相对狭窄而平坦的岛屿“颈部”，之后转向南，孤立并攻占折钵山。一旦火山落入美军之手，第5陆战师就将沿岛屿西岸北上，与第4陆战师共同组成一条横穿全岛的连贯阵线。第3陆战师将留在海岸外的运输船上担任海上预备队，但是施密特和史密斯预计这个师到战斗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就可能获令上陆，插入战线的中央。之后三个陆战师就会组成一条战线向北平推，打垮日军在元山高地的防御。

没人指望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漫步。美军已经做好了在硫黄岛流血的准备。在D日前一个星期的一场媒体发布会上，特纳将军告诉通讯员们：“硫黄岛和当今世界其他那些坚固堡垒一样防守严密。”^[34] 另一名将领觉得即便是攻打直布罗陀也会比这容易一些。史密斯将军预计他的进攻部队将会至少有1.5万人伤亡。舰队也已经把4艘坦克登陆舰改造为浮动的医疗中转中心，伤员会先送到这里进行评估和救治，之后再送往医院船“撒玛利亚号”或“慰藉号”。医院船会把伤员送回到塞班岛和关岛，那里新建的陆军和海军医院有5 000张床位。一旦硫黄岛机场可用，道格拉斯“空中霸王”“空中救护车”就会飞来把最危重的伤员运往马

里亚纳群岛，甚至直接送到瓦胡岛。

在运输船上，第一批陆战队员沿着吊绳网爬到了希金斯登陆艇和履带式登陆车中。平底登陆艇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每个人都要算准下脚时间，在登陆艇位于最高位置时下去。许多陆战队员来了个“粗暴下船”，一脚踏空，摔倒在艇底。^[35]爬起来之后，他们在长凳上坐下来，大家挤得很紧，为其他爬下吊绳网的人留出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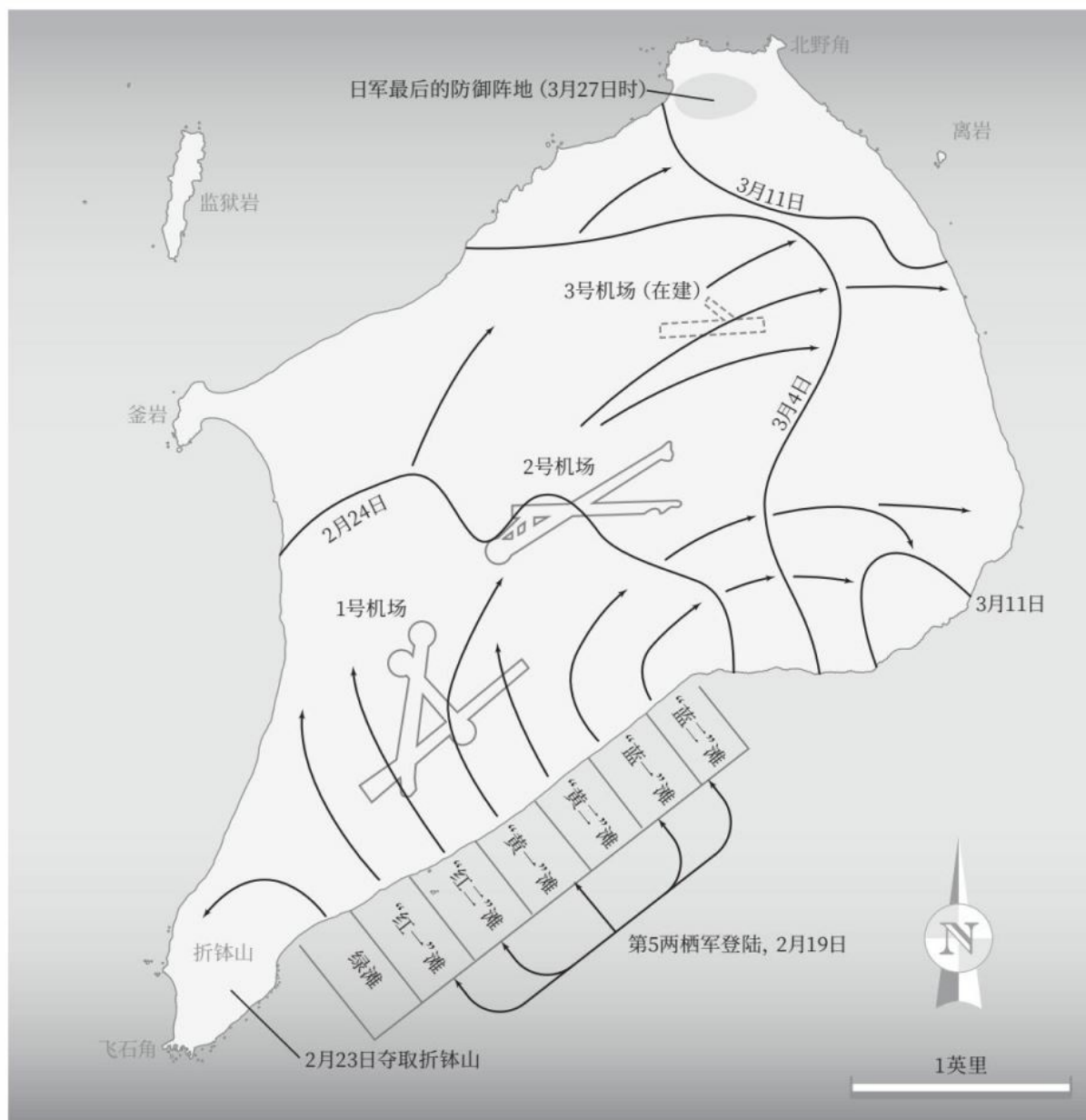
状况好得不能再好了。轻风从西北方吹来，海面自从三天前特混舰队先头分队抵达以来一直都很平静。舰炮炮击达到了高潮，战列舰的16英寸炮弹从头上飞过，声音就像是货运列车从隧道中穿过一般。日军至少有几门岸炮还击了过来，因为当第一批登陆艇在卸载线后方编波时，运输船队形中时不时会腾起几支白色水柱。上午8时40分，随着一声号响，操艇手们加足马力，向海滩长距离冲刺。登陆艇随着海浪时起时伏，因此在那些扶着运输船栏杆的人看来，这些登陆艇时而完全消失在海面下，时而又冒出来。这一趟航程不好走。人们拼命不让自己晕船，他们的尾椎骨重重撞在木质长凳上，粗布军服湿透了，眼睛也被飞溅进来的寒冷海水刺得生疼。路过正在开炮的军舰时，他们能感觉到巨型舰炮发出的冲击波。当托马斯中尉的登陆艇经过“田纳西号”战列舰时，他发现每次舰炮开火时，炮口下方的海面都会被吹出一个凹坑，之后又会流平。^[36]

当登陆艇接近硫黄岛时，暗褐色的陡峭海滩出现在了前方。在海滩的最高处能看到一排日军飞机的残骸，那就是1号机场的最南端。进击的登陆艇队形中突然冒出许多白色水柱，这是日军迫击炮开火的结果。陆战队员们听见了日军机枪的嗒嗒声，以及大口径火炮发出的更低沉的声音。有两队F4U“海盗”战斗机在海滩上方低空飞行，扫射阶梯状海滩上的碉堡。这些飞机来自从“埃塞克斯号”航母上起飞的海军陆战队第124和213战斗机中队——许多大头兵还是第一次看见陆战队的飞机。他们从南北两个方向相向接近，在相撞前的最后一刻分别向东边和西边转弯脱离——这是种炫目的特技动作。一名陆战队对空协调员回忆道，这

种动作“精彩有余，但效果欠佳”。[\[37\]](#)一架“海盗”被高炮直接命中，炸成一团火球，坠毁在海里。

靠近海滩时，舵手们努力不让小小的平底登陆艇横转过来。6英尺高的海浪把登陆艇抛起来，又狠狠摔下，撞在船底的沙滩上。登陆跳板砰的一声放下来，陆战队员们向陡峭的滩头跋涉而去。他们走得很艰难。他们脚下的“沙滩”实际上是柔软的火山岩屑，一脚踩上去，岩屑会漫到脚背。在坡度较大的地段，他们发现自己甚至会跌跌撞撞地向下滑。第4陆战师的一名步枪手说这就像是“跑在松垮的咖啡渣上面”。[\[38\]](#)

硫黄岛之战, 1945年2月—3月



起初，登陆滩头的情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滩头上的部队指挥官发回了令人振奋的无线电报告：“只有轻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海滩抵抗轻微……只有零星的迫击炮火力。”^[39]海滩上升起彩色信号弹，表示登陆已成功，第二批和第三批登陆艇也紧随第一批之后开了上去。在登陆滩头南端的绿滩和红滩，突击部队推平了敌人的明碉暗堡，向内陆推进

了300码，损失轻微。有人推测可能是舰炮炮击和空中支援起了作用，霍兰·史密斯猜测日本人“被我们舰炮火力的巨大爆炸震晕了”。^[40]在硫磺岛之战的最初90分钟里，陆战队已有8个营上岸，包括两个坦克营和来自两个炮兵营的部分兵力。

当天上午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北翼的陡峭崎岖地段，位于“蓝二”滩上，陆战队员们称这片区域为“采石场”。这里的山谷和岩石地面看上去足以经受1 000磅炸弹和大口径舰炮的直接命中。这一地段被大量钢筋混凝土进行了加固，所有可能的通道都被机枪火力封锁。从登陆的那一刻起，第25陆战团3营就陷入了绵密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之下。他们越过第一层台地时遭遇了来自内陆和南侧日军碉堡的交叉火力。营长贾斯蒂斯·M.钱伯斯中校觉得，日本人仿佛在从所有方向朝他们开火：“你拿起一支烟，飞过的子弹就能把它点着。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41]“采石场”是美军转换整条战线推进方向的枢轴，因此第25陆战团的任务十分关键，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承受伤亡，坚持战斗。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上午11点，日军的迫击炮和炮兵火力突然变得密集了。他们的火炮已经提前瞄准了登陆海滩，弹着点位于海浪线和最高一层台地之间，美军部队正集中暴露在这片区域中。海军特混舰队和支援飞机竭尽所能，想要打哑这些火力，但是折钵山和元山高地上的日军火炮阵地隐蔽得很好，即便飞到其正上方也无法发现。谢尔曼坦克从第三批和第四批登陆的机械化登陆舰里挣扎着爬上海滩，却成了日本炮兵口中的肥肉。跟在钱伯斯第3营后方登陆蓝滩的陆战队员们刚一下登陆艇就被机枪扫倒。密集的迫击炮火也落在折钵山以北的红滩上，当天上午这里的进攻原本还比较顺利。陆战队员们卧倒在柔软的火山岩屑上，用他们的铲子、头盔甚至是徒手挖掘掩体，但是岩屑缺乏黏合力，他们的散兵坑纷纷向内塌陷下来。“见鬼！”有人叫道，“这就像是在一桶面粉里挖坑。”^[42]

到中午时分，登陆滩头已经如同垃圾场一般。站在海岸外约两英里的“埃尔多拉多号”上用望远镜望去，霍兰·史密斯将军形容那里的场景

就像是“被狂风摧残过的一排板棚房”。^[43]坦克和两栖车要么爬不上海滩的陡坡，要么陷在浅水区；要么被炮弹直接命中，要么压上了地雷；要么落入了反坦克陷阱，要么甩脱了履带。还有些被困在其他被毁、受困和燃烧的车辆中间无处可去。拥挤的海滩上到处散落着尸体和残骸，坦克只能直接从战死的陆战队员身上碾过去。成堆的残骸给后续开来的登陆艇带来了危险。操艇手们在燃烧的残骸之间寻找没有障碍的沙滩，有不少登陆艇在海浪中横转过来。浮桥无法锚定，变得很不稳定，随着冲上沙滩的海浪来回摇晃，要么撞到艇上，要么从背后撞上涉水上岸的陆战队员。然而，滩头的陆战队急需更多的人手、坦克、火炮、弹药和补给，特纳将军也别无选择，只能不停地派遣更多登陆艇尝试靠岸。

美军整排整排的部队被困在黛色的火山岩屑上动弹不得。迫击炮弹的啸叫和爆炸震耳欲聋，人们不得不吼叫着说话才能让别人听见。那些站起身来转移位置的人都要冒着被来自顶层台地的步机枪火力打倒的危险。但是留在草草挖掘的散兵坑里的人也可能被无休无止的迫击炮弹直接命中。日本人使用了一种巨大的320mm“栓式迫击炮”，可以将675磅重的炮弹打到1 440码外。陆战队员们称它为“飞行垃圾桶”或者“呼啸的基督”。他们抬起头就能够看到这个黑色的丑家伙以高抛弹道落下来。有一名军官回忆道：“我会在眼前竖起一根手指，如果它向左或向右移动，我就知道它不会落在我旁边。但如果我的手指能遮住它超过半秒钟，我就知道我有麻烦了。”^[44]

医疗兵们在暴露的地段上跑来跑去，救助伤员，但是对于那些被迫击炮弹片重伤的人来说，医疗兵即使来了也无能为力。他们的肌肉被扯开撕碎，肢体被打断，面部血肉模糊，伤口里满是无处不在的火山岩屑。医疗兵们拿着吗啡针，给伤员们打止血带，包扎伤口，静脉注射止血针，并把伤员们拖到有掩护的地方。但是他们蹲在伤员旁边时，自己也常常被炮弹或狙击手打中。在红滩上，一名身负重伤的陆战队员跌跌撞撞地试图穿过冰雹般的炮弹和机枪弹雨，返回海滩，他双目失明，双手都被炸飞了。一位医疗兵立刻跳起来冲过开阔地，拉着这位伤员前往

急救所。在硫黄岛上，许多医疗兵都为这种无私的行动付出了代价。在第4陆战师中，医疗兵的伤亡率高达38%。

海岸外，大小舰船跟随泛着白色浪尖的波涛起伏摇摆，高级指挥官们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问题。情况很不妙。后来的登陆批次比早先的批次遭受了更严重的伤亡。海滩上有许多伤员在等着被撤回舰队。海岸外的战舰和天上盘旋的舰载机已经竭尽全力，想要找到并摧毁日军的迫击炮和火炮，但奈何敌人藏身于深沟高垒之中。只有直接命中才能打哑它们，有时候甚至连直接命中都不管用。舰载机向看得见的敌人阵地投下凝固汽油弹，希望能够消灭日本炮手或者把他们逼入地下，但是迫击炮弹雨仍在不断落下，每一次爆炸都会把沙尘、碎片和尸体掀飞到半空中。赶在天黑前将更多的部队和坦克送上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人都担心日军的大规模夜袭。因此海滩上的陆战队员们必须尽快向内陆推进，为后续登陆批次腾出空间，即便这意味着惨重的伤亡。

夜幕降临时，已有4万名美军上了岸。他们控制了岛上10%的地盘，从元山1号机场东北角到南面第5陆战师将折钵山以北的地峡切断之处。日本人依旧控制着南北两面的高地，从高处的观察点俯瞰着美军。一整夜，战场都被海岸外战舰打出的照明弹照得雪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每晚都会如此。战役期间，美军每晚都会消耗平均1 000枚照明弹。陆战队认为正是这种鬼魅般的灼目光芒阻止了日军小股部队的渗透。一名驱逐舰水兵在家信中描述了这一诡异景象：“看照明弹从白云中落下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们会在云中点亮，令云彩发出白雪般的光芒，然后缓缓穿过一层层云，最后穿出云底，照亮整个岛屿。”^[45]

第一夜，无人合眼，瞭望哨瞪大了眼睛寻找着任何可能是敌人的迹象。晚上有些凉，甚至是冷——这提醒人们此时是冬季，而且他们已经身处远离热带的北方。但是没有夜袭发生。到拂晓时，美军指挥官开始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精明狡诈的步兵战术家。他们不会在开阔地上发动大规模反击，这样的反击在美军的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援面前难成威胁。守军将始终藏身地下，看不见也打不着，他们将令进攻一方为每一

寸土地付出代价。

在南面，第28陆战团抬头就能看到“热岩”——这是他们给折钵山起的名字——这座火山四面陡峭，表面铺满棕色的火山灰，没有植被，山上的硫黄蒸气出口喷吐着恶臭。这个团的团长是哈里·B.利弗西奇上校，他接到的命令是孤立这座小火山，炸塌那里的洞穴和碉堡，扫清守军，并占领山顶。山脚周围的平地上环绕着70座覆盖着沙土的混凝土碉堡，这些阵地由厚地兼彦大佐指挥的硫黄岛南部防区部队把守。在开始攀登折钵山之前，美军必须将这些山脚下的堡垒拔除。它们不可能以迂回战术来进攻，只能靠步兵正面强攻才能拿下。

D+1日早晨，在寒冷的细雨之下，野战炮、舰炮以及舰载轰炸机向折钵山发起了规模巨大的联合轰击，这座火山甚至一度全部为烈火和烟尘所遮蔽。上午8点半，预定的“进攻发起时刻”，炮击和轰炸突然停止。陆战队员们猫着腰向前扑去，在岩石、弹坑、岩石之间跃进。2营在左，3营在右，一齐冲向日军的机枪和47mm反坦克炮，许多人中弹倒下。这一天，2营伤亡最为惨重。他们进攻路线的最后200码是在平坦的火山灰上，几乎完全没有隐蔽。他们投出烟雾手榴弹遮住敌人的视线，随后便直接冲向敌人的射击阵地。E连的列兵唐纳德·J.鲁尔用身体压住日军的手榴弹，用生命掩护了排里的其他战友。为了表彰这种极致的牺牲精神，他被迫授荣誉勋章。

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的彭德尔顿军营，陆战队员们学习并演练了整套作战体系。他们耐心、一丝不苟地进行操练，专心地打磨每一处细节：重型舰炮开火，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坦克和75mm半履带自行火炮推进到近距离射程内，投掷烟雾手榴弹遮蔽日本人的视线，向射击口投入白磷手榴弹和炸药，用火焰喷射器向后门喷射，用刺刀、匕首甚至是拳头近身肉搏。若地形使得坦克无法向日军防御设施推进，他们就会把37mm炮推到前方阵位，从那里用它们一点点地砸开混凝土建筑——打死、震晕，或者用其他方式压制守军，这样步兵班就能够冲上去完成

任务。日军的碉堡一个接一个变成坟墓。装甲推土机会开上来，将成堆的泥土堆上去，这样日本人便无法再次进入其中。

战役第三天，天气阴沉，狂风大作，间或来一阵大雨。虽然恶劣的地形阻止了坦克的前进，但3营还是在战线中央发动了进攻。在左翼，2营则在努力肃清后方区域，日军的狙击手和零星步兵仍在那里时有出现。战至当日日落时，第28陆战团已经包围了折钵山并打哑了山脚周围绝大部分敌人火力点。该团主任参谋罗伯特·H.威廉斯中校说，第28团跨过了折钵山山脚下的敌人防线后，敌人很快便偃旗息鼓。他告诉第5陆战师师长凯勒·E.洛基少将：“我们估计在那里打死了大概800个鬼子，但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找到100具尸体。我们确定炸毁了50个山洞。”[\[46\]](#)

美军控制了山脚，日军厚地大佐现在要尝试突围了。他命令残余的有组织的部队争取冲到北方防线。几乎所有的日军都在来到开阔地时被打倒，但还是有大约25人穿过美军防线，来到日军主力部队所在的元山高地。栗林对于折钵山部队没能坚守更长时间深感失望。他问参谋们：“我能想到一号机场会落入敌手。但是折钵山怎么能只守了3天就陷落了呢？”[\[47\]](#)

第四天，海军陆战队拿下了山头。和前一天一样，这天上午天气阴沉，下着小雨——战斗的开局也和前一天一样，大规模的海空火力猛烈击打着折钵山，直到整座山头被烟火淹没为止。两支侦察巡逻队沿着陡峭而危险的东坡在弹坑之间摸索前进。一支40人的巡逻队紧随其后，在10点过后几分钟到达了山顶。他们只遇到了零星抵抗。有少量日本人从隧道和洞穴里冒出来，还有一名军官挥舞着武士刀冲了过来，他们很快都被干掉了。陆战队员们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封闭了所有能找到的洞口。许多日本人自杀了，要么把手榴弹贴在胸口引爆，要么把步枪的枪口插进嘴里，用脚趾扣动扳机。折钵山山体內的有些坑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因为那里堆满了日军的尸骸。

站在山顶向北望去，机场、登陆滩头、海岸外的特混舰队一览无

余。他们的陆战队战友们正在两座机场之间的平坦地形上与敌人激战。在战役的最初四天，日本人占据着这座具有战术价值的观察点。现在双方角色互换了，美国人得到了折钵山，插旗为证。2营E连从瓦砾中抽出一段10英尺长的铅管用作旗杆——它本来一头连着蓄水池，一头连着山顶下方的一座碉堡。上午10时20分，他们升起了营旗。北面战场以及海岸外舰船上的瞭望员顿时一片欢腾。罗纳德·托马斯中尉回忆道：“每个人都欢呼起来，我想有些人还哭了。”^[48]第5师副师长利奥·赫姆利准将称其为“我一生难忘的最伟大的场面之一……整个岛上，目力所及之处一片欢声雷动”。^[49]

海军部长吉姆·福莱斯特也是搭乘特纳将军的旗舰“埃尔多拉多号”的观战团成员之一。福莱斯特中等身高，身材瘦削，翘鼻子，宽嘴巴，沙褐色的头发向后梳起，在头顶上分到两边。他是个热情的人，充满进取心，以前当过华尔街债券销售员，现在是最深得罗斯福总统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内阁顾问之一。部长选择在D+4日这天上午来到岸上，简短视察红滩。他戴着钢盔，穿着没有标识的普通绿色军服，在霍兰·史密斯将军和一个陆战排的伴随下来到前线。当那面小国旗插上南部山峰的顶部时，他们一行人刚刚从一艘希金斯登陆艇上下来。福莱斯特对史密斯说道：“霍兰，折钵山上升起的这面旗帜意味着海军陆战队还能存续500年。”^[50]

这位海军部长一直在推动尼米兹战区的宣传公关工作。他会直接插手新闻审核流程，并且要求将军们保证连夜向国内的新闻编辑部发送新闻稿复印件和照片。在这一趟太平洋之旅中，福莱斯特常常提醒海军和陆战队的将军们，不久之后就会爆发关于军种合并和重组的惨烈政治斗争，海军陆战队在战后能否存在还未可知。如此，福莱斯特这关于“500年”的说法便有了适时的意味和弦外之音：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将会有助于海军陆战队在战后的国防体系中争取独立权。

史密斯将军在战后回忆录中描述，福莱斯特行走于登陆艇、坦克和两栖车的残骸之间，在敌人的炮弹和迫击炮弹呼啸着投下来的时候，和

极为惊讶的陆战队员们握手。史密斯写道，在他们所站立之处的100码之内有20个人或死或伤——“但是部长看上去对危险完全不屑一顾”。^[51]或许福莱斯特之所以能若无其事，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和将军的描述并不一样。在当天的日记中，福莱斯特只是这样写的：“海滩当天上午吃了几枚炮弹，但并不严重，虽然我们到达的一个小时前，一阵炮弹造成了一些伤亡。”^[52]

三个小时后，更著名的第二次升旗行动到来了。第28陆战团的一支后续巡逻队把一面更大的国旗带到了折钵山山顶。随队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就在现场，拍下了这一幕。当6名陆战队员抬起旗杆，国旗在风中飘扬之时，罗森塔尔连取景窗都没有看就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他把未冲洗的胶卷送到了关岛，一名美联社的图片编辑把它冲印出来，送回美国。这张匆忙拍摄的照片意外成了经典之作，也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最具象征性的画面，没有之一。这张照片通过电话铜缆传送到了全美国各地的新闻编辑部，同时登上了数百份报纸的头版和杂志封面。罗森塔尔也因此荣获普利策奖。这次升旗行动成了美国推销战争债券的主题展示，照片上6人中幸存下来的3个人也被召回美国，进行公关宣传。这一幕还被做成铜像，安放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陆战队战争纪念馆前。

第28陆战团报告，在折钵山的战斗中有510人伤亡，若再加上D日的损失，这个团在5天里总共伤亡了895人。更糟的是，除了这个团，同期那些在北侧作战的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美国国内，许多人都觉得罗森塔尔照片中的升旗场面肯定意味着一场胜利战役的辉煌高潮。实际上，拿下折钵山只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大战的第一阶段。元山高地的战斗最终要让美军付出比折钵山多20倍的人命。D+6日（2月25日），第28陆战团被调入第5两栖军的预备队，开始向北移动，以加入正在岛屿中央血战的兄弟部队。

施密特将军把他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设在了刚刚拿下的折钵山北

侧。距离前线仅仅半英里的这一整片地区已经渐渐变成了后勤基地的模样。过去几天的恶劣天气变成了风平浪静，美军得以开始卸货。即使敌人的炮弹和迫击炮弹依旧不断飞过来，但后方梯队还是在这里建起了补给堆栈、集装箱区、后备发动机库、燃油堆栈、指挥帐篷，以及野战医院。推土机升级了岛上的路网，清理分队也把主干道上的残骸拖走。第31海军工程营的“海蜂”们在元山1号机场上忙活，他们清除了跑道和停机坪上的地雷，还把混凝土搅拌机和重型建筑装备拉上了岸。施密特告诉一位记者，再激战5天就可以消灭硫黄岛上顽抗的敌人：“我上周说过这需要10天，我还没有改变主意。”^[53]

主要战线现在推进到了元山2号机场，这里的海拔比1号机场略高些。跑道和滑行道上堆满了飞机残骸，日军步兵将它们用作了现成的临时碉堡。陆战队呼叫舰炮、地面重炮以及航空兵来轰炸这些阵地，随后越过开阔地，发动步坦协同进攻。元山高地的黛色穹隆形石山在北方巍然耸立。要拿下这里，就要攀上一系列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令人生畏的防御设施的阶梯状火山岩台地。霍兰·史密斯形容这里是“大纵深的筑垒地带，从岛屿的一侧海岸延伸到另一侧海岸，有许多可以相互支援的碉堡，其中不少几乎埋在地下”。^[54]这里的地形没有太多侧翼攻击的空间，因此陆战队员们别无选择，只能正面强攻。约瑟夫·L.斯图尔特中校称之为“乏味的挤压战”。^[55]另一名军官用了一个人人都想得到的橄榄球比喻：“你冲不到底线，胜负全看抢断。”^[56]

施密特招来了他手头所有的海上预备队：格雷夫斯·B.厄斯金少将指挥的第3陆战师（欠1个团）。这支老部队被插进战线中央，第5师在左，第4师在右——他们领受了最艰难的任务：向北直接推进，穿过元山村的废墟和未完工的3号机场，冲到元山高地中央的台地上。施密特命令第5两栖军50%的炮兵火力集中到这一区域，其余50%均分给第4师和第5师的侧翼。D+5日，也就是折钵山插旗的次日，三个师并肩前行，再度开始向北进攻。

美军对守军拥有3：1的兵力优势，10：1的炮兵火力优势（包括舰

炮），并且完全控制了天空。但是栗林天才的地下防御设施有效抵消了这些优势。美军坦克常常跟不上来，至少在进攻初期如此，因为所有通往台地高层的道路都密集布设了地雷，并挖上了坦克陷阱。步兵们沿着道路用轻武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向前进攻。在战线中央，第3师在向整个太平洋上最坚固的筑垒地域进攻时伤亡惨重。

对于前线的大头兵而言，战场上横飞的弹雨是躲不开的。机枪的嗒嗒声和火炮及迫击炮的轰鸣从来没消停过。他们低着头，知道高地上的日军狙击手一直在通过枪上的瞄准镜观察。日军甚至会用更大型的武器来进行狙击，尤其是他们的47mm反坦克炮，其射击精度足以击中数百码外的一个人。有这么多重武器在开火，士兵们对于步枪的射击也就听天由命了，即便子弹从他们近旁飞过也无动于衷。第24陆战团I连的威廉·凯查姆上尉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都被击中了，但是包扎了伤口之后，他仍然和他的连队一起留在前线。他嘲笑道：“他们打了我12枪，只有两枪擦破我点皮。”[\[57\]](#)

大兵们渐渐像痛恨敌人一样痛恨这座岛屿。硫黄岛令人“毛骨悚然”，第4陆战师的泰德·艾伦比回忆道：“那简直就像是月球的一部分掉到了地球上。”[\[58\]](#)陆战队员们要在地面挖坑，躲避无穷无尽的敌人炮火，结果却释放出了难闻的硫黄蒸气。硫黄味和腐尸烂肉烧焦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恶臭弥漫全岛，无处可逃。他们想要睡觉时，又会有地蟹从坑底的岩屑里钻出来，在他们身上爬。风和爆炸会扬起细小的火山灰，钻进人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嘴里。地面摸上去发热，挖得越深就越热。埃尔顿·施罗德把他的罐装口粮埋进他散兵坑底部的地面下。半个小时后再挖出来，“就有热腾腾的C型口粮可以吃了。这是我在这座破岛上唯一能找到的好处”。[\[59\]](#)

大约8万部队挤在不足8平方英里的小岛上，硫黄岛堪称历史上人员密度最大的战场之一。再加上双方的火力强度，这就成了可怕的屠场。前线固然最惨烈，但是硫黄岛的后方地域也不是真正的后方。每一名战士都能够指引重炮和迫击炮向岛上的任何位置开火，因此，岛上的所有

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前线。滚雷般的弹幕犁扫着滩头、散兵坑和指挥所。偶有减弱，也极其短暂。陆战队员们不情愿地承认，敌人有着要命的技术。“日本人是优秀的炮兵，”斯图尔特上校说，“他们每次开火都会有人被击中。”这里没有安全地域，没有后方地域，而且——对于美国人而言——还没有什么天然掩体。施密特将军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位于折钵山北边不远处，是一片被沙袋包围着的帐篷群。据施密特的作战参谋爱德华·克雷格上校的说法，指挥帐篷在整场战役中都会时不时遭到重炮轰击。沙袋掩体越垒越高，但炮击的震动仍然很恐怖。克雷格回忆道，当炮击到来时，“我们就在小小的指挥帐篷里摆出三人纵深防守的姿势，趴在地上，一直保持到炮击结束”。^[60]在北面半英里外的第4陆战师指挥所，巨大的320mm栓式迫击炮弹四处落地，天空变成了怪异的红色，细小的尘土弥散在空气中。陆战队的榴弹炮和海岸外的战舰展开了反炮兵压制，但对日军似乎毫无影响，他们重武器轰击的强度一点也没有减弱。

第5两栖军司令部与各个师部和前线之间通过无线电或传令兵保持联系。来自团级和连级指挥官的意见也对施密特将军及其指挥部的战术决策发挥了作用。军部和师部的许多军官和士官都被派到前线去接替那些伤亡人员，承担起了战斗任务。伤员们被救护吉普车或者是人力担架送往南边，卡车、坦克和推土机则向北开去。岛上布满了地雷，威胁无处不在。陆战队员们都学会了在道路上踩着车辆留下的车轮印行走。大型的反坦克雷埋得很深，因此扫雷组并不总能找到它们。但是一旦有坦克或其他重型车辆压上去，它们就会爆炸。施罗德就亲眼看到一辆在2号机场南边扩展道路的卡特彼勒DS重型推土机遭遇了这种事。“发生了可怕的大爆炸，那辆DS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我赶紧寻找掩护。那辆推土机的零件像雨点一样落得到处都是。有些零件至少重1 000磅。司机落在离我大约10码处，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61]

在战役最初5天里，美国海军陆战队平均每天伤亡超过1 200人。海滩和机场周围的平坦地带布满了尸体。直接命中的炮弹会留下弹坑，有

些弹坑里散落着10到12名陆战队员的尸块。鲍勃·谢罗德写道，在红滩上方的一层层台地上，“我在太平洋战争中还没见过这样残缺不全的尸体。许多人被拦腰截断，胳膊和腿飞到了50英尺外。一处沙滩上，在离我最近的尸堆远处，我看见一条肠子拖了15英尺长”。^[62]军官和士官的伤亡率更高。枪炮军士约翰·巴斯隆曾在瓜岛战役中因表现英勇而荣获荣誉勋章，是蜚声全美的陆战队员，他也在D日当天率队冲往元山1号机场时战死。

装甲推土机挖出了长长的壕沟，用作坟墓。“我们用推土铲一次埋葬50人，”随军牧师盖奇·霍塔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天主教徒，还是什么，所以我们说的都是通用的祷告词：‘我们把你交还给大地，由全能的主庇佑。’”^[63]

军舰在海岸外巡游，驱逐舰和炮艇紧靠着海岸，巡洋舰和战列舰则远一些。前线的陆战队协调官可以通过直达军舰枪炮长的开放式无线网络呼叫精准的舰炮火力轰击任何目标。问题是舰炮常常单独依靠雷达引导来射击，炮手们只要把坐标参数输入火控系统就行了。在硫黄岛敌我双方阵地犬牙交错的环境下，舰炮射击的效果并不总是很好。尽管如此，根据特纳将军的战报，这次战役中舰炮应召射击任务的次数仍然是“前所未有”的。口径从16英寸到5英寸的高爆弹像雨点般落在元山台地的各处目标上。小型炮艇——用登陆艇装上火箭炮、轻型迫击炮和20mm火炮改造而来——在岛屿西北部海岸巡逻，以火力袭扰敌人阵地。它们还会阻止敌人沿海岸移动，并拦截试图从北面的父岛或其他岛屿前来登陆的小艇。

在驱逐舰“霍沃思号”上，岸上一名陆战队军官的声音从舰上的大喇叭中广播出来，这样舰上的所有人都可以按要求行动。但由于岛屿常常被浓烟和尘土遮蔽，舰员们难得看到他们的5英寸火炮齐射命中目标。当喇叭里的声音确认“霍沃思号”打中了指定目标时，文书军士詹姆斯·奥维尔·雷恩斯就会感到骄傲：“看，那些杂种在跑！”然后，“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的射击非常棒。效果特别好”。雷恩斯举起望远镜，试

图了解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烟尘散尽后，他看见一辆谢尔曼坦克迎着重机枪火力向前推进，一个步兵班则猫着腰跟在后面。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雷恩斯说他得知“霍沃思号”的火炮命中敌人后十分兴奋。“我能消灭他们一些人做出贡献，我很开心，虽然我觉得你和我都为此做出了牺牲。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能打死他们让我格外开心。我只希望离得足够近，能看到我们的炮弹落地时他们的尸体和尸体碎块飞上天。”但另一方面，雷恩斯也承认，他更愿意在相对安全的“霍沃思号”上观看战斗：“你总不能用绞盘把我拉到岸上去。”^[64]

日军航空兵对硫黄岛登陆的反应相当弱，这既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也是由于第58特混舰队对东京机场的空袭压制。很少有日本作战飞机出现在岛屿上空，即使有，大部分也会被在上空巡逻的美军舰载战斗机迅速击落。这段时间只出现过一次成规模的“神风”攻击。2月21日（D+2日）黄昏，大约50架双引擎三菱G4M轰炸机在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攻击了硫黄岛外海的舰队。“萨拉托加号”航母被3架飞机撞中，舰上123人战死，192人受伤，不得不回珍珠港去修理。护航航母“俾斯麦海号”被一架自杀机撞中尾部，在机库里引发了致命的二次爆炸。舰上的大火失去了控制，它侧翻在海面上，带着218名官兵沉入海底。另一艘护航航母“隆加角号”打掉了4架“神风”飞机，只受到轻伤。还有一艘货船和一艘坦克登陆舰被击中，遭到重创。

岛上的美军地面部队从来不缺近距离空中支援。有三个军种的飞机来为他们进行轰炸、侦察和扫射——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陆军航空队。有时候，硫黄岛上空飞机的密度如此之大，简直快要撞上了。每一个小时，都会有一队又一队格鲁曼、沃特和寇蒂斯轰炸机映着阳光飞过来。俯冲轰炸机以70°俯冲角冲下来，向敌人战线后方看不见的目标投下炸弹，掀起冲天火光和滚滚烟尘。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用.50口径机枪的曳光弹扫过日军的火炮掩体，或者在2 000英尺高度上发射5英寸火箭弹。飞行牛仔们的表演很精彩，陆战队员们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扫射、轰炸和火箭攻击的效果都不理想，原因和影响舰炮射击效果的一样。大

部分弹药打在岛上坚固的山洞和下沉式火炮阵地上毫无效果，飞行员们还要小心翼翼地防止误伤本方部队——双方战线如此之近，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舰载机还是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比如为炮兵做空中校射，阻止日军在开阔地上运动。但是硫黄岛的战场环境对地面部队和航空兵之间的配合程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而美军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积累更多经验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陆战队的对空协调官韦尔农·E.梅基上校在2月24日上岸，他在折钵山北侧的第5两栖军司令部建立了他的通信帐篷。他最终成了硫黄岛上的实际空中指挥官。梅基尝试了一种新的对空协调系统，前线的对空联络官可以叫来飞机空袭仅仅300码外的日军阵地。陆战队的战场观察员搭乘在TBM“复仇者”飞机的后座上，他可以通过开放的无线电频道和地面上的炮兵营联系。日军的防空火力大部分时候都很弱，但有时会突然在意料之外的时间和地点打出来。在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中，防空火力击落美机26架，重创9架。

3月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第15战斗机大队——包括一队P-51“野马”和P-61“黑寡妇”——入驻1号机场。这些陆军飞行员没有接受过对地近距离支援的训练，但他们都是高水平的飞行员，而且对飞行都有着“野心勃勃”的态度，他们乐意尝试梅基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事。P-51战斗机的动力足以挂载和投掷1 000磅炸弹，这对硫黄岛北部岩石高地上那些砂岩浮石的打击效果比500磅炸弹大得多。这些“野马”以45°下滑角接近目标，与战线平行飞行，以降低误伤陆战队的风险。装有延时引信的半吨重的炸弹被投进岩石的裂隙或干脆砸进石头中，爆炸的威力大大增加。梅基说，有几次战例令人印象深刻，P-51投下的炸弹“把整个峭壁的侧面炸进了海里，把敌人的山洞、隧道全都暴露在了舰队的直射火力面前”。[\[65\]](#)

和营团级指挥官交流时，梅基强调1 000磅炸弹会给他们的部队带来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弹着点大幅偏向美军战线一侧时。根据经验，他提出投弹安全距离的码数要和炸弹重量的磅数相同，也就是说，1

000磅炸弹应当用于攻击距离本方陆战队不低于1 000码的目标：“一枚落在你们前方两三百码的1 000磅炸弹可不是玩具。”但是正在岛屿东北岸的岩洞筑垒地域艰苦血战的第4陆战师，则想要让“野马”去攻击直面其战线的敌人阵地。一名营长告诉梅基：“好吧，你就算打到我们，也不会比我们现在挨的打更重。”通过直达飞机座舱的无线电，陆战队员们可以在炸弹投下前一刻寻找掩护。“所以我过去以后就按他们说的进行了空袭，”梅基说，“我们震得很多人牙根发疼，包括我自己。但除了鬼子外，我们没有伤到任何人。”^[66]

施密特将军关于十日取胜的预言过于乐观了。3月4日星期天——开战整整两个星期——主要战斗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陆战队拿下了硫黄岛2/3的部分，包括全部3座机场，并打垮了栗林在元山高地外围的防线。第5两栖军已有1.3万人伤亡，包括3 000人战死。打得最惨的部队失去了指挥官、军官和士官，之后接替他们的人也伤亡殆尽。在战线东部的关键战场，第4陆战师最终越过了被他们称为“斗兽场”的峭壁包围的海湾。西面的第5陆战师向尼基岭和362B高地推进，遇到了沿岸岩石峭壁上日军的顽强抵抗。在中央地段，第3陆战师向沟壑纵横的高地展开了惨烈的进攻，在令人焦心的9天里只推进了3 000码。“元山蜂巢”那阴暗、可怕的轮廓就在他们前方。这一交战地域面积只有约1平方英里，却有着一千个各式各样的山洞或隧道入口，其下则是极其复杂的地下迷宫。

在南面机场周围的平坦地带，后方梯队正把这里逐步建成一座先进的作战基地。滩头的物资卸载已经十分顺利，除了偶尔遭到一阵远程迫击炮或火炮的炮击外，不再有其他任何阻碍。折钵山布满弹坑的山坡上建起了墓地，一排排白色的十字架越来越长。第133海军工程营的“海蜂”们建起了6套海水蒸馏系统。这些高能耗的机器能把海水变成可饮用的净化水，再装进5加仑的水桶送到前线。到3月6日，这些蒸馏器已经足以每天为岛上的每位陆战队员供应3壶饮用水了。与此同时，在日军

的洞穴和碉堡里，淡水的存储量却在快速下降，人们已经开始难以忍受干渴的煎熬。

3月4日，“超级堡垒”轰炸机“蒂娜力量号”（隶属于第9轰炸机大队第1中队）在元山1号机场（美军已将其命名为南机场）紧急降落。这架轰炸机在轰炸日本的任务中受了重伤，若没有硫黄岛上的这条跑道，它就只能在海里迫降了。当它停止滑行并关闭了4台引擎时，大约200名陆战队员和“海蜂”们立刻围了上去。摄影师和电影摄制组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架巨大银色轰炸机的到来是这场战役中一个令人难忘的里程碑，对岛上美军的士气也是个不失时机的鼓舞。它展现了这场岛屿血战的更宏大的目标——在能够轻易轰炸东京的距离上夺取一个航空兵基地。一个月后，第7战斗机司令部的P-51“野马”开始加入向北飞去的B-29编队，为它们的轰炸任务提供战斗机护航。3月16日，一个中队的海军B-24（海军称之为PB4Y）巡逻轰炸机也将开始从硫黄岛起飞作战。当北面一英里半之外还在激战之时，南机场已经开始显出一副忙碌的大型航空基地的样子了。

在第5两栖军司令部召开了一场指挥会议后，施密特命令全部三个师在大规模炮击之后全线恢复进攻。3月5日，最筋疲力尽，损失最为惨重的部队被撤回后方集结地域短暂休整，并将补充兵补入那些死伤严重的营。3月6日拂晓前，当炮火准备打响时，这些部队回到了前线。这是整场战役中最猛烈的炮击，所有能用的榴弹炮在海岸外巨舰重炮的支援下进行了长时间的猛轰。根据各炮兵营的报告，这一天的弹药消耗为2500枚155mm“长汤姆”炮弹，外加2万枚75mm和105mm炮弹。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以及各色炮艇还发射了22500枚舰炮炮弹。目标坐标被设在美军战线前方至少200码处，但还是有很多炮弹危险地落在陆战队员们近旁，有些偏离弹甚至直接落在他们的防线上。飞机也参与了进来，在精准的时间点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一如往常，不熟悉的人会怀疑没有人或者活物能够在这凶猛的打击中幸存下来；同样一如往常的是，他们错了。

炮击停止后，突击梯队向敌人的防线扑了上去。在地形允许的地方，谢尔曼坦克会行驶在步兵前方。日军立刻打来了致命的步机枪弹雨；他们的抵抗看上去和先前一样顽强。凶猛的弹雨从碉堡和山洞的入口处喷射出来，以侧射火力覆盖了正在推进的陆战队员。白磷弹落在他们周围，迫使他们卧倒在地并挖掘掩体。先前没有发现的日军新火力点也从不同角度开火。由于这一地区沟壑纵横，坦克在许多地方无法推进，步兵不得不独自上前。步坦协同进攻的冲击力很快便消解于无形，但是陆战队员们没有退缩，激烈的战斗又持续打了一整天。为了打破僵局，前线部队的指挥官呼叫炮火轰击距离己方阵地仅仅100码的敌人阵地。不少洞穴被炸塌，有些碉堡被用火焰喷射器和炸药拿下，几十名日军被打死。但是守军极少暴露在开阔地上进攻。他们就如栗林将军教导的那样，紧紧依托自己的防御工事和堡垒，通过地下通道网络四处机动。

战至3月6日日终时，陆战队在沿岸的起伏地带推进了大约250码，但在大部分地段，其进展不超过50码。在地形最恶劣的战线上，陆战队员们可能只前进了30码——但毕竟总算是有了些进展。突破深度的差异令双方都暴露出了侧翼，形成了突出部，这样美军就有机会向原先无法触达的日军火力点发动侧翼进攻，甚至是从上向下进攻。装甲推土机在难行地段上清理出通路，这样坦克和装有75mm炮的半履带车就能伴随步兵前进了。但是要挖掘出新的供坦克通行的道路并扫清地雷，则尚需时间和耐心，而且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在敌人的火力之下进行。第4陆战师师长克利夫顿·B.凯茨将军估计高级军官们已经产生了听天由命的感受。“好吧，我们会一直揍他们，”他告诉鲍勃·谢罗德，“他们不可能永远撑下去。我们会不停地压迫他们，直到把他们压垮。不要放弃。”[\[67\]](#)

3月7日，施密特将军要各个炮兵营节约炮弹，在前一天早上的烟火秀之后，弹药的存量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他命令第5陆战师转向内陆进攻，夺占能够俯瞰海边和北野角周围那一圈可怕防御设施的高

地。但是正当第27陆战团准备冲出去的时候，一顿毁灭性的迫击炮弹雨从天而降。2营E连被迫击炮弹直接覆盖，35人或死或伤。这一区域的进攻从一开始就陷于停滞，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在东边的第4师战区，战线后方还有大量的后卫肃清任务要执行，在“斗兽场”和“土耳其门把手”地区，新的日军士兵仿佛黑魔法一般变了出来。这个师的状况糟透了。由于大量军官和士官阵亡，指挥能力大幅跌落。士兵们已经出现了战争疲劳综合征的症状。这个师的连排一级已经出现了补充兵难以协同作战的问题。一份报告指出，“疲劳和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的后果已经十分清楚地体现在了部队的战斗方式上”，报告估计第4师的作战效率已经只剩下D日时的40%。

在“斗兽场”北面，崎岖的岩石山岭和密布低矮灌木的山谷相互交错。第25陆战团继续向内陆进逼，逐步将千田贞季少将指挥的第二混成旅团包围进了一个不断缩小的封闭口袋阵里。眼见日军可能发动突围，甚至是大规模的万岁冲锋，陆战队拉起了成卷的带刺铁丝网，在其间布设了数以百计的反步兵地雷。他们架起各种类型和各种口径的武器，封锁日军进攻的必经之地，他们的轻型榴弹炮和轻型迫击炮也都瞄准了防线前方的无人地带。

在第3陆战师的战区，向362C高地的推进依然缓慢，这是一处具有特殊战术价值的海角，是高地顶部防御链条的关键一环。唯一一条通往此地的道路需要经过硫黄岛上最为起伏崎岖的地形，日军也已筑好了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这里的景致并不美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硫黄味。脚下的地面很热——热到躺上去都会感到难受，再挖个散兵坑就更难受了。然而推进到这一屠杀场的士兵们又不得不挖掘散兵坑，来躲避敌人的机枪、掷弹筒以及反坦克炮。由于没法指望把碾压性的装甲力量开到这崎岖难行的地形上来，这个师不得不拿出老办法，步兵正面强攻。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还从来没打过夜间进攻。他们的条令里没有这条，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厄斯金将军最近一段时间

来一直认为一个营规模的夜间渗透进攻能够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厄斯金向施密特将军提出了申请，并获准在3月8日破晓前发动这样的进攻。第一步，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组悄无声息地快速渗透至日军防线后方约500码处。得益于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他们在守敌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炸掉了许多碉堡和洞口。许多日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打死，有些还死于刺刀之下。破晓时，陆战队员们向这一区域打出了烟幕弹，遮住了所有人的视线。第9陆战团3营承担了拿下362C高地的任务，他们起初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但是烟幕不仅迷惑了敌人，也迷惑了美军自己。到早晨6点左右，K连的军官们郁闷地发现他们占领的是331高地，不是362C高地，后者还在北面250码远处。这距离不算近，需要越过一处暴露在日军步机枪火力之下的山头。于是，激烈的战斗打了一整天，两个陆战连在此地伤亡惨重。然而，负责率领此次进攻的贝姆上校决定向预定的正确目标继续推进。这是一场血战，打了一整个上午和半个下午，到日落时，这个营最终还是在362C高地顶峰周围建立了防线。

同日，一样是在破晓前，千田将军被围困的部队展开了突围行动。他们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万岁冲锋，而是在猛烈的迫击炮、火箭炮和火炮射击之后，明智地沿着整条战线发动了一连串小部队渗透进攻。这些人利用暗夜的掩护，巧妙利用复杂地形悄悄摸了上来。但是第4师的陆战队员们早已做好了防御准备。他们的轻型榴弹炮向日军进攻部队倾泻弹雨，许多来袭者踏响了地雷或者在试图剪断铁丝网障碍时被击毙。大约12名日军渗透到第23陆战团2营的指挥所，但很快都被消灭。第二天早晨，战场上倒卧着650具日军尸体。大曲觉中尉是战役中日军仅有的几名幸存者之一，据他的说法，“土耳其门把手”和“斗兽场”周围地区成了堆尸场：“我见到没有四肢的尸体，数不清的腿、胳膊、手，还有内脏散落在岩石上。”[\[68\]](#)

这是地上人和地底人之间的对决，一支住在地面上的军队和穴居人军队的对决。硫黄岛上有许多日军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没有见过太阳。他们听到坦克在头顶上轰鸣，甚至在烈火灼身之前还能听到火

焰喷射时的气流声。一名日军指挥官报告说，美军“毁灭了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像杀灭害虫一般打仗”。^[69]当美军陆战队占领了他们地堡的上方，日军有时会引爆炸药，把自己和敌人一同送上西天。这令人心惊胆战地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地道式”进攻，或者是美国内战中对彼得斯堡的围攻。埃尔顿·施罗德就亲眼看到仁志村北边的小山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看见许多尸体就像破布娃娃一样被抛到空中。”^[70]在这次大爆炸中，有43名陆战队员非死即伤。

在硫黄岛之战的头21天里，医护人员平均每天要处理1 000名伤亡人员。到D+33日，已有总共17 677名伤员被撤到海岸外的医院船或者马里亚纳群岛的医院里。^[71]所有人都有理由为医护人员的杰出努力而骄傲，无论是战场上的医护兵，还是在前线急救所、野战医院、海岸外的医院船以及塞班岛和关岛上的医院里工作的人。医护兵和担架手在战场上有求必应，不知疲倦，在敌人的枪口前跑来跑去。医疗兵们顶着被近旁爆炸的炮弹和从头顶飞过的子弹击中的风险，蹲在受伤的陆战队员身旁，打开身上的“三单元”急救包，拿出皮下注射器，用吗啡针缓解伤员的痛苦和减轻炮弹震荡症；把磺胺粉直接撒在伤口上消毒；用止血钳、缝合线、绷带和止血带为伤员止血。如果伤员失血过多，他就会接受静脉血浆注射——这是能降低失血性休克致死率的救命药。血浆瓶被举在手里，或者挂在倒插在地里的步枪枪托上。伤员如果幸运的话，就会有四名担架手迅速赶来，把他送回营里的急救所，一名医疗兵会在那里检查他的伤口并重新包扎。在附近火炮射击的轰鸣声中，他可能会被打一针青霉素以避免感染。一名穿着普通军装和戴着钢盔的牧师会过来，为他们带来安慰、圣水、祈祷，或者是临终祷告。

担架会被放在救护吉普车的后座上，或者是半履带车和两栖车上，送到岛上的某处野战医院里。道路颠簸，伤员们会很痛苦，血浆瓶则挂在架子上摇来晃去。硫黄岛上的野战医院都位于战线后方不远处的主要道路旁，大部分设在南机场近旁的低洼地或护坡上——那是一片低矮而

不显眼的环绕着沙袋的暗绿色帐篷。伤员们被抬进厚重的双层遮光布帘，来到被用作接收病房的长条形帐篷里，他们的担架被安放在可折叠的胶合板手术台上。医生和医护兵会在每个担架夹着的牌子上做标记。原先简单的血浆瓶会被换成一整套静脉输血设备。血衣会被剪开，伤口会被清理，即将进行手术的伤员会被擦洗干净，刮去汗毛。这里十分闷热，尤其是在夜晚，帐篷必须封闭严实，以免漏出灯光。空气无法流通，血和杀菌剂的气味还有烟味都无处不在。即便如此，按照20世纪中叶的医疗标准，这些野战医院的设备可谓极其精良——可能是世界上出现过的最为先进的军用野战医院。医院里挤满了手术台、X光机、氧气面罩和氧气罐、用于存放血清的冰箱、发电机、制冰机，以及一堆堆由美国民众捐献，装在冰袋里送到岛上来的血液。比较危重的伤员会直接送进手术室，在那里，各个专业的外科医生会立刻行动起来。医生们都认为最严重的伤是“腹腔伤”——指人的胃、肠或者其他关键脏器被子弹击穿。受损器官要取出来切除损毁部分，再放回伤员的腹腔。这种伤员需要进行复杂的长时间外科手术，耗时常常多达四五个小时，后面还要进行大范围的术后护理。即便如此，仍有大约一半的伤员会在手术后死去，死因常常是脓毒或感染。这时候，人们就会在死者脸上盖上一块布，把他抬到外面的地面上，准备送往墓地。

超过9 000名受伤的陆战队员被从海路撤出硫黄岛。他们的担架会放在经过特殊改造的希金斯登陆艇或者履带式登陆车里，然后送往被改造成海上伤员分类中心的四艘坦克登陆舰之一。每艘艇上都会有一名医护兵负责在转运途中照顾伤员。这趟航程往往很艰难，船艇会随着海浪上下起伏，海水还会从侧舷飞溅入艇内。挂着的血浆瓶会在架子上摇来晃去，有些伤员还会晕船，这就令其状况雪上加霜。那些在转运途中死去的人会被送回海滩，埋葬在墓地中。

更危重的伤员会被送到离海岸更远的运输船，或者是专用医院船“撒玛利亚号”和“慰藉号”上，这些船会把伤员送回关岛和塞班岛。它们的侧舷绘有巨大的红十字，船体四周画有一条绿色色带——和战时的其他船只显然不同的是，它们在夜晚从来都是灯火通明。担架被放在挂

着吊钩的平板上送上船，然后迅速抬到被用作接收病房的一间宽敞大厅里。护理病房会产生巨量的医疗垃圾——沾血的绷带和毛巾，空的血浆瓶，被撕成布条的衣服，用过的石膏模具和夹板——清扫人员在房间里来来去去，把所有需要扔掉的东西收起来扔掉。水兵们用拖把擦洗染上血的甲板，时不时停下来把被染红的水拧到桶里。

无论如何，大部分受伤的陆战队员仍然勇敢而乐观。一名被炸掉一条腿的军人对“慰藉号”上的一位医生说道：“大夫，我想只要有足够的血浆，我就没事了。”医生答道：“孩子，我们的血浆够所有人用。”^[72]许多人觉得自己伤得不重，他们会要求医生和护士去照料其他那些受伤更重的人。有些人会为自己先前因伤痛而叫喊道歉，因为打扰了这里的安静。还有些人会开玩笑。有个失去了右臂的人说道：“好吧，不管怎样，反正我现在是不用去写信了。”^[73]那些面色惨白、人事不省的陆战队员输血后就会苏醒过来。他们的脸色恢复红润，人也恢复了意识。有些伤员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尽了职，而且从战争中活下来了。

从3月4日起，“空中霸王”救护飞机开始飞来，每天从硫黄岛南机场接走大约200名伤员。到3月21日，也就是D+30日，总共有2 393名待救治伤员被空运离开岛屿。^[74]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1/4个世纪里，战地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前一场战争中，每100名被送到美国野战医院的伤员中会有8人死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数字降到了4%以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医学界权威将此归功于更好的战场急救，快速撤退伤员（包括空运），以及经过血型匹配的全血的广泛使用。^[75]但是，尽管医护人员在硫黄岛战役中表现出色，从岛上撤出来的伤员死亡率仍然接近8%。换言之，硫黄岛的伤员死亡率比二战所有其他战场高一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步兵部队大致相当。

这一差异背后的原因在于硫黄岛之战的残酷性。无休止的迫击炮炮

击会将人体真正意义上地炸成两半，造成了高比例的极度危重伤员。他们的伤口常常会沾上岛上细小的火山灰，很难清洗。一艘运输船上的医生说：“诺曼底登陆时我就在这艘船上，那时只有5%的伤员需要动大手术；在这里，我发誓我确信这个比例是90%。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伤。”^[76]和太平洋上其他的岛屿战役不同，这场屠杀几乎毫不停顿地持续到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参加这场最艰难战斗的部队因而遭到了可怕的伤亡。军官和士官的伤亡比例如此之高，以至于一整个连队常常不得不交给年轻的中尉来指挥，大头兵则成了排长。第26陆战团2营的军官伤亡率达到108%。他们在战斗中从后备部队里抽调了14名军官送到前线，去接替那些死伤的人，而在这14名补充军官中，又有10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伤亡。^[77]第28陆战团1营B连先后失去了8名连长。第24陆战团3营I连在D日登陆时有133名步枪手，当他们在35天后离开该岛时，这些人中只剩下9个人没受伤。

在战役的收尾阶段，日军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明显削弱。3月11日，美军防线最后一次遭到猛烈炮击。但是对于向岛屿北岸推进的前锋部队而言，战斗却一如既往地痛苦和代价惨重。这里的地形很恶劣，巨石滩、岩体和深谷交错，大部分地方坦克无法通行。硫黄蒸气笼罩着凶险破碎的地面。带着火焰喷射器的步兵班逐个敲掉敌人的碉堡，他们冲到极近的距离，将火焰喷入碉堡内部，再用炸药解决战斗。岛屿的北岸是一个重要的心理目标，3月9日，美军终于实现了突破，当时第21陆战团一支6人前进巡逻队从北岸的峭壁爬下，来到海边。他们装满了一壶海水，把它呈给了厄斯金将军，上面写着：“供查看，不可饮用。”^[78]

到3月9日日落时，厄斯金的部队已经控制了硫黄岛东北角一段800码长的连续海岸线。这样就把残余的日军部队分割进了两个口袋，分别位于岛屿的东北和西北海岸。东边的突出部由第4师包围，千田将军的反击惨败之后，第4师巩固了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西北边北野角的崎岖海岸地带，美军的前景则艰难得多，栗林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此

地深处的地下堡垒中。这个坚固据点防守严密，有利地形使其无法被直接攻击。对此地的舰炮炮击和空袭已经持续了数天，但是看起来没什么效果。栗林预计北野角及其南面的岩石峭壁和山谷将会是硫黄岛日军最后的有组织抵抗之地，他也是这么安排的。这里的洞口和射击阵地都布置在陡峭的岩壁高处，控制着200英尺宽的岩石山谷。其中或许还有3000名日军存活，而且战斗状况良好。

坚守在山洞和碉堡里的守军基本不会因无休止的猛烈炮击和空中轰炸而伤亡。但是巨大的轰鸣和爆炸的冲击却不断敲打着他们的神经，许多人已经陷入紧张性木僵状态。他们的地下城也愈加恶臭和难以忍受。他们没法掩埋尸体，只好把死者放在地面上，陪在自己周围。那种恶臭无法言表，里面烤箱般的高温和通风不畅更令情况雪上加霜。更何况他们的饮用水也处于短缺状态，到了战役第四周最后一个储水箱耗尽时，这已经成了致命问题。人们无休止地谈起水，谈起日本老家的山泉和小溪。山洞地面上的任何一点水渍都会立刻被干渴的士兵们吮吸一尽。他们还会舔舐侧壁上的水汽，有人甚至开始喝自己的尿液。第二十独立炮兵大队的一名士兵说：“我想我永远也忘不掉夜晚隧道地面上积聚的雨水有多么甜，我们紧紧趴在地上，只为了喝上一口。”^[79]

栗林将军的防弹指挥所设在北野角离岸约300码，地下约75英尺深处。指挥地堡很宽敞，天花板高9英尺，很大，足以容纳一张会议桌，一些办公桌，以及通信设备。穿过一条不长的狭窄隧道，就是他的私人卧室，一间不大的石洞，有一个吊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整个地下网络处处装有电灯。这座地下城布满了隧道迷宫，有许多不同的道路通向地面上的世界，还有许多隧道通往有人驻守的碉堡，那些碉堡里架设有机枪和其他轻武器。在正上方的岩石里，嵌着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碉堡，长150英尺，宽70英尺，屋顶厚达10英尺。

当美军炸掉一个个山洞和隧道时，这些外围据点一个接一个发回了诀别电。许多基层部队宣称要对敌人发动最后的万岁冲锋，但是栗林坚决要求他们守在阵地里，打光最后一颗子弹。他说，“每个人都想要死

个痛快”，但岛上每个日本军人的职责是尽量活得久一些，“重创敌人”。[\[80\]](#)

美军架起了大喇叭，开始用日语劝降，包括直接针对栗林忠道本人的劝降。但日军不为所动，只以子弹回应。厄斯金将军第3师的幕僚们放了两名日军战俘回到其防线，给第一四五步兵联队指挥官带去了一封信。这两个信使最终回到了美军防线，报告说栗林将军还活着，但无意投降。

3月16日，在发往东京的诀别电中，栗林写道：“鄙人所部的卓绝战斗惊天地泣鬼神。”他的部队“面对物质优势超乎想象之敌的陆海空进攻时装备不足，近乎赤手空拳”。[\[81\]](#)这样的说法犯了日本的大忌，这封电报在东京报纸上登出来时面目全非。“装备不足，近乎赤手空拳”这样的字句被改掉了。最后一句被改成了栗林发誓展开最后的进攻，“并与全体官兵衷心祝愿天皇陛下万寿无疆”。[\[82\]](#)

硫黄岛和东京的无线电联系开始变得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堀江少佐在他父岛的岗位上，试图将一份电报转发给栗林，告知他已经被晋升为陆军大将，但无人知道他是否收到了这封电报。3月21日的一份电文告诉堀江，残余部队已经5天没吃没喝了。3月23日，父岛收到了来自硫黄岛的最后消息，内容很简单：“致父岛的全体官兵，永别了。”[\[83\]](#)

3月26日拂晓前，大约300名日军从山洞里出来，沿着岛屿西岸蹑手蹑脚地摸向折钵山。他们的出现让在南机场附近平和湾露营的美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兵人员猝不及防。在近三个小时的交战后，日军全部被击毙。而美军由于对这场拂晓前的突袭毫无防备，也有170人伤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对此写道：“这次攻击不是万岁冲锋，而像是一场经过精心筹划，旨在造成最大限度混乱和破坏的行动。”[\[84\]](#)

没人见到栗林是怎么死的，他的尸体也始终未能找到。有些日方资料认为这位将军率领了最后的进攻并战死，另一些资料则认为他在离开地堡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美军搜遍了平和湾的日军尸体，但是所有人

的军衔都被摘掉了，也没有人携带任何文件。

陆战队从1945年3月14日便开始撤离此地。他们分成梯队离开岛屿，最先离开的是第4师，随后是第5师和第3师。留守硫黄岛的任务交给了陆军的第147步兵团，他们在3月20日来到这里。3月26日，陆军接管了这座岛屿，当时差不多刚好是突袭平和湾的日军被消灭的时候。

可以确定，没有一个美国兵不愿意离开硫黄岛。一名“海蜂”发誓说他绝不会从岛上拿走任何纪念品：“我只想忘掉这里带给我的一切记忆。”^[85]当然，对于许多人而言，这个岛屿是无法忘记的。

胜利一方为了这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岛上的陆战队和海军遭受了24 053人的伤亡，也就是说每3名上岛人员中就有1人非死即伤，其中有6 140人死亡。而日军方面，除了数百人被俘之外，其余守军无一生还，大约有2.2万人。若将双方的死伤人员累计对比，则栗林的部队给敌人造成了比自身更多的伤亡。考虑到进攻方在许多方面都占有优势，这就不能不说是个惨重的失败了。他的地下军团直到最后一刻仍然保持着组织性、纪律性，让美军陆战队为每一寸土地付出代价。然而，在塔拉瓦、罗伊-那慕尔、塞班和佩里硫的血战之后，即便日本人还心存某些侥幸，他们也深知敌人能够拿下他们想要的任何太平洋岛屿，无论其防御如何坚固，抵抗多么顽强。即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陆战队员们也坚信自己一定能赢，从不怀疑。罗伯特·E.盖勒中校回忆道，在瓜达尔卡纳尔，他们常常会问：“我们能不能守住？”但是在硫黄岛，“问题就简单了：‘我们何时能拿下？’”。^[86]

在战争的余下5个月里，美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在硫黄岛紧急降落2 251架次。占领了这个几乎就在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航线上的落脚点，美军就能有效增加“超级堡垒”轰炸机的作战距离和有效载荷。它还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4月，以硫黄岛为基地的P-51中队将开始为轰炸日本的B-29机群提供战斗机护航。大约两万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勤人员在岛上至少紧急降落过一次，若没有这座岛，其中很多人可能就消失在大海上了。一名B-29飞行员说出了所有航空同僚的心

声：“无论何时，只要我落在这座岛上，我就会感谢上帝赐予我那些为了这座岛而战斗的人。”^[87]

硫黄岛的惨重伤亡触动了美国公众的神经，掀起了一阵指责和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早先曾在塔拉瓦和塞班血战中指挥远征军的霍兰·史密斯，当时就被斥为“屠夫”，“冷血的杀人凶手”，还有“肆意挥霍人命”。^[88]现在，更多这样的恶言恶语再度砸向他和整个海军陆战队。信件如雪片般飞向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则又提出了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个岛值得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吗？能不能用更少的伤亡拿下它呢？

当时正在指挥吕宋战役的麦克阿瑟没有放过这个机会。2月26日，陆战队登陆硫黄岛一周之后，麦克阿瑟的部队完全收复了科雷吉多尔岛。约6 000名日本守军几乎被全歼，美军的代价只有675人伤亡。西南太平洋战区在一份公报中骄傲地写道：“这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岛屿堡垒，由装备精良、头脑狂热的敌人防守得密不透风……我们通过突袭，巧妙的战略战术，战斗技能，以及与海空支援力量的完美协同，在短短12天里就将其拿了下来。”^[89]大家都看得出他在暗指什么。麦克阿瑟其实是想说，只要有更好的指挥，就能以更少的伤亡打赢硫黄岛战役。这些话在当时的环境下格外刺耳，因为太平洋美军的两支进攻矛头很快就要合兵一处。而麦克阿瑟正在觊觎太平洋战场最高指挥官的宝座，他在美国的后台很快就会推动此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他位于加州海岸中部圣西米恩的山顶别墅里拿起电话，向《旧金山观察家报》的主编口述了一份关于硫黄岛的社论。2月27日，这份社论就出现在了《观察家报》的头版：“美军进攻部队为这个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可能过于沉重了……直白地说，我们的整个太平洋作战需要的只是一位战略家。”赫斯特随即点出了麦克阿瑟，因为“他拯救了他手下人的性命”。^[90]

当天下午，大约100名休假的海军陆战队员鱼贯走进第三大街和市

场街交会处赫斯特大厦的《观察家报》新闻编辑部。一名吓坏了的工作人员报了警，但是几分钟后他又打电话撤销了报警，说不需要派警察了。这些陆战队员很冷静，遵纪守法。他们没有威胁工作人员或者破坏工作场所，他们只是想要见到这位编辑，向他解释说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海军陆战队最终还是在民心的审判庭上打赢了官司。曾在哈得孙河谷当过独家报道记者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已经强令海军和陆战队采取更友善的媒体政策。到1945年2月，他的努力已经结出了硕果。数十名战争通讯员从硫黄岛发回了报道，他们的文章在48小时之内就能传回本土。大批的头版报道保证了公众对这场战役的高关注度，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敌人地下堡垒带来的前所未见的战术难题。“福将”阿诺德和一众其他陆军航空队将领公开强调了夺取硫黄岛对于支援B-29轰炸作战的绝对必要性。乔·罗森塔尔那张折钵山升旗的振奋人心的照片，其作用也堪比百万行新闻报道。

麦克阿瑟的含沙射影总的来说是不公平的。攻取硫黄岛之战并没有什么战术选择的余地，而且栗林忠道的战斗准备十分卓越。麦克阿瑟纵有毋庸置疑的战场指挥天赋，却也从未遇到过硫黄岛这样的挑战，何况他也没想出什么别的办法。曾经在菲律宾给麦克阿瑟当过手下，后来又指挥了战争中最大规模地面作战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曾在1952年以当选总统的身份简短造访硫黄岛。当他走下飞机，举目四望，他对当年海军陆战队能在这座岛上登陆超过6万人感到震惊。把这座荒芜的小岛和“拥有大片开阔地的诺曼底”做了对比之后，艾森豪威尔说他很难想象在如此局促的地方会有如此规模的战役：“这令他很难理解。”^[91]

^[1]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8.

^[2]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35.

^[3]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6.

[4]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p.78.

[5]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p.63.

[6] Private Shuji Ishii quoted in Kakehashi,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6.

[7]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30.

[8]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68.

[9] Letters quoted in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93.

[10]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Box 6, p.78.

[11] Japanese soldier's diary, entry dated February 18, 1945, in Dixon, Brawley, and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p.140.

[12] Fields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31.

[13]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39.

[14] Tsuruji Akikuisa quoted in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11.

[15] Toshiharu Takahashi quoted in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p.101—2.

[16]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30.

[17] Buell, *The Quiet Warrior*, p.356.

[18] "Air Combat Notes for Pilots," Enclosure (C)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Operations of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pp.2—3.

[19] Roy W. Bruce quoted in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35.

[20] "Areological Summary for Action Report," Enclosure (G)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21] J. Bryan III diary, February 16,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

[22] McWhorter, *The First Hellcat Ace*, p.152.

[23]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52.

[24] Fifth Fleet War Diary, February 17, 1945, p.2.

[25] Ensign John Morris quoted in Bruce and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p.51.

[26]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180.

[27] "Air Combat Notes for Pilots," Enclosure (C) of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p.3.

[28] Action Report,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February 10 to March 1, 1945, Serial 0045, March 13, 1945, p.25.

[29] William W.Buchanan, oral history, pp.78—79.

[30]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69.

[31] Lieutenant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Quantico, Virginia.

[32]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14.

[33]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p.18,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34]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54.

[35]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5, U.S.Marine Corps Archive,Quantico, Virginia.

[36] Lieutenant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37] Vernon E.Megee, oral history, p.34.

[38] Corporal Edward Hartman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12.

[3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70.

[40]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24.

[41] Lieutenant Colonel Justice M.Chambers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14.

[4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76.

[43] Smith, *Coral and Brass*, p.225.

[44]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22.

[45]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February 22, 1945,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238.

[46]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2.

[47]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Series 1: *The Rising Sun*, Box 6.

[48] Lieutenant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 2718, p.18, U.S.Marine Corps Archive.

[49] Leo D.Hermle, oral history, p.86.

[50]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27.

- [51] Ibid., p.228.
- [52] Forrestal diary, February 23, 1945, in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30.
- [53]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2.
- [54]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0.
- [55] Joseph L.Stewart, oral history, pp.39—40.
- [56] John Lardner, “D—Day, Iwo Jima,” *New Yorker*, March 17, 1945, p.48.
- [5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6.
- [58] Ted Allenby,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181.
- [59]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 [60] Edward A.Craig, oral history, p.142.
- [61]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9, U.S.Marine Corps Archive.
- [6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2.
- [63] Bradley, *Flags of Our Fathers*, p.268.
- [64] James Orvill Raines to Ray Ellen Raines, February 22, 1945, in Raines and McBride, eds., *Good Night Officially*, pp.239—40.
- [65] Vernon E.Megee, oral history, p.37.
- [66] Ibid., p.46.
- [6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95.
- [68] King and Ryan, *A Tomb Called Iwo Jima*, p.131.
- [69]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56.
- [70]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p.16, U.S.Marine Corps Archive.
- [71]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med P—SOS1,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p.95.
- [72]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7.
- [73] Ibid., p.219.
- [74]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p.101.
- [75] Griffin, *Out of Carnage*, p.13.
- [76]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88.
- [77] Ibid., p.213.
- [7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238.

- [79]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165.
- [80]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Box 6, p.93.
- [81] Kakehashi and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p.xviii.
- [82] Ibid., p.xx.
- [83] Major Yoshitaka Hori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wo Jima," John Toland Papers, Box 6, p.99.
- [84] Bartley, *Iwo Jima: Amphibious Epic*, p.192.
- [85] Miller, *Its' Tomorrow Out Here*, p.180.
- [86] Galer quoted in Alexander, *Closing In*, p.49.
- [87] Alexander, *Closing In*, p.49.
- [88] Smith and Finch, *Coral and Brass*, p.15.
- [8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35.
- [90] Quoted in *San Bernardino Sun*, Vol.51, February 28, 1945, p.1.
- [91] William W.Buchanan, oral history, p.79.

第十二章

在关岛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指挥所——这是位于岛屿北部悬崖上的一组简陋的匡西特板棚房——“负鼠”汉塞尔和他的团队沮丧到了极点。他们作战的所有方面都感受到了部队初创阶段的问题，并愈加痛苦，包括维护、训练、补给、住房，以及机场建设。即便新的B-29飞机和机组人员还在不断飞来马里亚纳群岛，汉塞尔的部队仍然难以向日本派出更大规模的轰炸机群。“折返率”越来越高——这个词指的是由于引擎故障或其他技术问题而被迫返航的飞机比例——高达21%。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出击就是第一次，那是在1944年11月24日，当时111架B-29起飞，94架飞抵日本空域。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三个月内再未达到过。

在美军攻占硫黄岛之前，从那里起飞的日军战斗机时常会从低空飞过来对马里亚纳群岛的机场展开轰炸和扫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44年11月27日，当时15架零式战斗机从硫黄岛起飞，躲在塞班岛雷达的探测盲区之下，以掠海高度南下，之后毫无预警地突然飞临伊斯利机场上空。这些零式机实现了彻底的突袭，扫射了停机坪上的B-29，摧毁3架，另击伤8架。汉塞尔将军目睹了这场大胆的袭击，还差点命丧其中。当时他正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一架零战从他们头上轰鸣而过，向他的车扫射。汉塞尔和他的司机立刻拐到一旁，躲进了灌木丛里。那个日军飞行员耗尽弹药后，放下起落架降落在了伊斯利机场的主跑道上。令汉塞尔大吃一惊的是，那个飞行员居然跳出座舱，拿着手枪和美军士兵来了一场枪战，结果自然是很快被击毙。

这样的攻击后来还发生过几次，“超级堡垒”损毁数量也在攀升，直到“福将”阿诺德将军要求提升岛屿的防空能力：“我们B-29对日本本土

的空袭肯定会招来疯狂的拼死反击。”^[1]于是美军安排了新的战斗机巡逻计划，B-24轰炸机也反复轰炸了硫黄岛的机场。在塞班岛北角建起了探照灯和微波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岛屿北面还布置了几艘驱逐舰用作雷达哨舰。这些措施起到了作用，但是直到1945年2月海军陆战队进攻硫黄岛，这个威胁才彻底解决。

要在距离美国本土近6 000英里的几个岛屿上，为1 000架“超级堡垒”轰炸机建设机场和地面支援设施，这可是个重活儿。每一支轰炸联队都需要两条平行的跑道，各长8 500英尺，宽200英尺，还要有相邻配套的停机坪、滑行道和维护区。这意味着要对大面积的地面进行改良和铺设路面，而推土机和蒸汽挖掘机还必须等到岛上一些基础设施建成后才能上岛动工。机场的建设并非唯一优先的项目，马里亚纳群岛同时还要为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作战迅速集结海军和地面部队。关岛和塞班岛还需要电力、供水系统、卫生设施、住房和现代化的海港。在使机场工地和港口及珊瑚岩矿场相连的高级道路建成之前，机场建设工程很难取得突破。在马里亚纳群岛第一个可起降B-29的伊斯利机场，所有的武器整備、加油、飞机维护都是在拥挤的停机坪上，在热带的酷热和暴雨之下露天进行的。工具和零备件都放在户外的补给堆栈里，装进板条箱堆在地面上，上面盖着防雨布。一队C-54运输机每周两次把零备件从加利福尼亚州运过来。技师们在泛光灯下或者把小手电筒咬在嘴里，昼夜轮班工作。他们还在不断熟悉这种巨型波音飞机的诸多复杂系统，尤其是它那难伺候的2 200马力莱特“双旋风”发动机。他们常常要在一架“超级堡垒”即将出发进行15小时的轰炸飞行之前，连夜拆装发动机。

起初，每支新到达马里亚纳的B-29轰炸联队都不得不从同一条跑道起飞作战。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里可以起飞的B-29数量十分有限，当后续飞机还在地面上时，先头飞机就只能在天上空耗燃油。完成任务返回时，飞机的油箱已经快要干了，此时机组人员又面临着另一个危险的瓶颈。机场上空可能会有二十多架B-29在盘旋，等候降落。这种状况需要飞机携带大量备用燃料，也意味着飞机的载弹量更少，这样投在日本的

炸弹总量就会下降。“福将”阿诺德和他的幕僚们仔细查看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这让他们很不满意。汉塞尔和他的部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山姆大叔在B-29项目上的巨额投资是要追求回报的。

从11月首次空袭到1944年底，第21轰炸机司令部总共向日本本土发动了10次空袭。他们轰炸了东京、横滨、滨松、沼津以及名古屋的飞机工厂和城市设施。并不是每次轰炸都能收到良好效果。从3万英尺高空扔下去的炸弹常常无法击中瞄准的飞机工厂，而是落进附近的居民区。11月29日的空袭就在东京的神田区和日本桥区引发了灾难性的大火，烧死大约100名平民，烧毁房屋约2 500座。1944年12月7日，东京西南高度工业化的东海区遭到了里氏8.1级大地震和海啸的袭击。这场自然灾害致使1 223人死亡，摧毁了几乎3万间房屋。三菱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名古屋港口东面一座大型飞机组装中心遭到重创。正当三菱公司竭力想要恢复并启动生产线时，大规模的B-29空袭又在12月13日、18日和22日三度光临此地。这几天天气晴朗，轰炸比往日更加精准。厂区内有一座组装车间和七座附属建筑被摧毁。这次打击令三菱和日本政府决心关闭了此处的生产线，转而试图将组装工作分散到多个地下厂区和城市外围厂区。与此同时，美军还在名古屋投下了传单，以打击日本人的战意。传单上问：“地震之后，接下来想要我们给你们什么？”^[2]

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斥巨资开发能在高空进行精确轰炸的技术——最有名的是广为人知的“诺顿”轰炸瞄准具，其支持者称其能帮助美国打赢战争。“超级堡垒”也被认为是能够在敌国领土3万英尺上空把炸弹“投到一个腌菜桶里”的武器。在欧洲，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开始进行夜间区域轰炸和燃烧弹攻击，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信徒们还坚守着他们关于精确轰炸的信念，而B-17“飞行堡垒”轰炸机在高空轰炸德国工业目标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当第20航空队在参联会的支持下建立之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也是使用精确轰炸技术去摧毁“日本的战争机器”，首要的目标便是其航空工业。

但是晴朗天气在日本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冬季的几个里，本州岛

海岸常常笼罩在阴云之下。即便是太平洋上最好的天气预报员也无法报出目标上空何时会是晴天。负责侦察的B-29可以先飞出去侦察气象，但是就在轰炸机编队从马里亚纳群岛飞到日本的七八个小时时间里，天气就可能天翻地覆。向北飞行的B-29编队可能还没有飞过海岸线，其队形就会被狂风吹散。在日本上空，飞行员们还会遇到“喷流”，这是轰炸德国时从未出现过的因素。在早期的轰炸任务中，B-29都是在高空飞行，那里的风速通常会超过每小时100英里，有时还会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超级堡垒”轰炸机顺风飞行，这样它们的地面速度就会达到每小时500英里。投弹手不得不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纠正如此狂风带来的弹道偏差。

在德国上空，B-17轰炸机群通常都有战斗机保护。但是在1945年4月美军P-51战斗机能够从硫磺岛起飞加入空袭之前，轰炸日本的B-29都是没有护航的。这样一来，执行昼间轰炸任务就需要飞机携带大量的汽油和武器——爬升到高空和编队飞行都需要消耗汽油，迎战日军战斗机则需要更多的武器。燃油、机枪和弹药很重，这就需要在其他方面减轻重量，予以补偿。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开始参战的头三个月里，每架飞机平均载弹3吨——“超级堡垒”的拥趸们多年来可是一直宣称它能装载10吨炸弹，而实际载弹量连这个数字的1/3都达不到。有人已经在讨论夜间雷达轰炸的事情了，这一技术将能够带来更高的投弹精度和更高的载弹量，但是雷达轰炸的发展却很慢。一部分原因是最新型雷达轰炸瞄准具APQ-7迟迟未得到广泛采用——直到1944年底，第21轰炸机司令部只有第315这一支联队得到了这款装备。

日军战斗机给无护航的B-29带来的麻烦远比美国陆军航空队计划人员预期的更多。B-29的任务模式是固定的——轰炸机在白天一次次以同样的高度（3万英尺）飞到同一片区域（东京和名古屋）上空。日本陆海军的战斗机指挥部很快就发现了这一规律，并且调整了战术，以应对空袭。他们的海岸雷达一旦发现来袭机群，战斗机就会在高空集结。日军常常能组织超过200架战斗机升空，迎战来袭的50架至75架无护航的B-29。日本关东地区的防空主要由横须贺附近的厚木基地集中负责。四

国岛上的松山基地还成立了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这支航空队由曾经策划了珍珠港袭击的著名海军航空兵指挥官源田实筹建。日本南部的防空由宇垣缠海军中将负责组织，他是重新组建的第五航空舰队的指挥官，这是日本此时最大的海军航空兵机队，司令部设在南九州的鹿屋航空兵基地。日本海军剩余的所有最好的战斗机和最老练的飞行员都集中在这些基地。^[3]

日军负责本土防空的航空队是一锅大杂烩，各种机型都有，既有许多老式的零战，也有不少高空性能优越得多的新设计。三菱A7M“烈风”是零战的后继者，其爬升率可与“地狱猫”和“野马”比肩，其实用升限达到4万英尺。这型飞机的盟军绰号是“山姆”。川西N1K2—J“紫电改”由早先一型水上战斗机发展而来，它速度快，马力和机动性好，而且结构坚固，火力几乎达到零战标准型的两倍。美军在菲律宾和台湾岛上空见识过不少“紫电改”，并赋予其识别代号“乔治”，但是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型新战机的性能。J2M“雷电”是一型动力强劲的三菱截击机，其设计目标正是拿下美军重型轰炸机。它的海平面最大速度超过每小时400英里，机上装有4门20mm航炮，足以击落B-29。盟军称其为“杰克”。“山姆”、“乔治”和“杰克”都是强有力的机型，需要技术娴熟的飞行员来驾驭，而这样的飞行员在日军航空兵中已所剩无几。赤松贞明中尉就是日军最后的几位空战王牌之一，他常年醉醺醺的，在厚木附近的一家妓院里长住。“他常常开着一辆破汽车赶往航空基地，”他的一名战友后来回忆道，“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还拿着酒瓶往嘴里灌，他开起车来就像个鬼。警报声还没停下来，他就从车上跳下来，跳进他已经被机械师发动起来的战斗机。舱盖刚刚关上，他就飞起来了。”^[4]赤松在中国和日本上空总共有8 000个小时的飞行纪录，最终击落战绩为27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从战争中活了下来，活到1980年，终年70岁。

对于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B-29机群来说，1945年1月是整个战争中最要人命的一个月。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用“刺激”来形容日军战斗机的拦

截作战。敌机向他们发动迎面攻击，侧面掠袭，炮口喷吐着火舌，对“超级堡垒”的.50口径机枪塔似乎不屑一顾。日军飞行员如果无法用枪炮击落一架B-29，有时他们就会转而采取自杀性的撞击。约翰·恰尔迪在一架B-29的机身侧面气泡形窗口处操作一挺.50机枪，他击落过几架试图攻击他B-29的日军战斗机。他目睹了自己中队的许多友机被击落。“那时我们和另一架飞机并排飞行，那架飞机被击中了，开始下坠。我看到了它最顶上大型气泡窗口里‘理发椅子’上的炮手，他就在我们的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我们挥手告别。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根本够不着他。这当然会让你大受震动。”^[5]

“超级堡垒”只要主要控制翼面没有被打掉，至少还有两台引擎能工作，就有机会返回基地。但是当一架受伤的“超级堡垒”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时，太平洋的巨大空间便开始施展它的淫威。在硫黄岛落入美军手里之前，日本海岸外1 400英里的范围内没有安全的跑道可供“超级堡垒”降落。缺乏经验的机组人员会在浓云上、黑暗中发生导航错误，因而不得不耗费更多燃油才能返回正确航线。几乎每次任务中都会有B-29坠海，或者是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们正准备控制飞机在水上迫降，但是能够被救回来的逃生机组比例很低。在巨大的蓝色海洋上搜索一个小小的橡胶救生筏，这无异于海底捞针，尤其是在天气不完全晴好的时候。执行海空搜救任务的海军水上飞机航程和续航时间都不足，无法全面搜索距离基地如此遥远的水域。日本南边有救生潜艇，但除非飞机能在晴朗天气下迫降至指定坐标位置，否则潜艇找到被击落机组的机会也很渺茫。受伤的“超级堡垒”纵使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回到马里亚纳群岛，它也可能坠毁在跑道上，摔成几块，燃起大火。

1945年1月，平均每次轰炸日本的任务都会有四五架B-29无法返航，平均损失率为5.7%。被打得最惨的中队遭到了堪称灾难性的损失。第873轰炸中队的17架B-29损失了10架，被击落的99名机组人员中有80人死亡。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规定飞行人员要执行35次作战任务。但官兵们自己会算这笔账。如果每次任务的损失率高达5%，那么他们平均

可以活过不超过20次任务。更糟糕的是，B-29的训练体系尚不足以训练出数量足以保障例行人员轮换的新机组，这就意味着他们飞行35次可能还不够。如果损失率无法下降，那么所有B-29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就可以认为自己会一直飞到死了。“我们都在撞大运，”恰尔迪说，“有一定数量的飞机肯定是要损失掉的。我们只能赌我们的飞机不在其中。”^[6]

士气愈加消沉。B-29的机组人员们为无法实现自己背负的巨大期望而忧心忡忡。轰炸准确率始终令人失望，这部分是因为日本冬季糟糕透顶的天气。他们的损失很惨重，而且看起来情况还会恶化。汉塞尔告诉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飞行人员们压力太大了，航空部队指挥官和医生都报告出现了飞行疲劳症的症状。一名B-29飞行员对战争通讯员说：“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但代价也很高昂。我们失去了很多好伙伴，尤其是像大队长和中队长这样的关键人员。”^[7]

在执行任务的间隙，飞行人员们几乎无所事事。许多人就这么躺在帆布折叠床上睡觉，或是盯着他们匡西特板棚房天花板上的弧形钢架。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睡饱了觉，他们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即便对于这些身体条件处于巅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往返日本的战斗飞行中所消耗的精力也需要四五天才能补上。在任务前的夜晚，许多人完全睡不着。他们躺在那里，忧心地想自己第二天能不能活下来。

到1945年1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者和分析人员对于继续对日昼间精确轰炸的疑虑与日俱增。在对日本航空制造业目标发动了超过10次轰炸之后，只有名古屋的三菱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其中还有12月地震的部分功劳。对中岛、立川和川西生产中心的轰炸收效甚微。位于东京武藏野的一座中岛发动机工厂已经被汉塞尔的B-29机群造访了5次，但仍大部完好。“福将”阿诺德和他的司令部计划人员想要在轰炸机挂载的标准高爆“铁炸弹”中混入一些燃烧弹。有些人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战术变革，想要向日本城市发动全面的火攻——把整个城市烧成灰烬，而不再区分具体目标。这样的任务能在夜间进行，日军战斗机的威胁也会随之减弱。

汉塞尔反对转为火攻，他坚持认为精确轰炸战术仍然可以在实战中改良：“我确信这一点。”^[8]他觉得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些耐心。磨炼技术、建造机场和支援设施，以及从美国本土搞来更多的B-29和飞行人员，这些都需要时间。

在中缅印战场，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业已解散，不再发起行动。此前位于中国和印度的所有B-29轰炸机都要被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总指挥也接到命令，要把司令部搬迁到关岛。寇蒂斯·李梅少将先前在欧洲战区时是汉塞尔的下属，但随后晋升了上来，此时已经是汉塞尔的上级了。阿诺德决定让李梅直接负责指挥第21轰炸机司令部，汉塞尔则要担任李梅的副指挥。汉塞尔本是阿诺德的红人之一，这位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做出这一决定也属忍痛，并强调自己并未失去对汉塞尔的信心。只是由于战术调整已是大势所趋，而汉塞尔显然不愿转向大规模火攻战术，因此不得不撤销他的职务。

失望的汉塞尔只好收起他的骄傲，表示说自己对李梅充满信心，但他也婉拒了留下来担任二把手的任命，觉得李梅“并不需要一个副手来掣肘……我自己也不乐意当个傀儡”。^[9]随后汉塞尔飞回美国，接管了B-29的训练工作。李梅首先飞到印度的克勒格布尔交出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随后在1月18日回到关岛承担起新组建的第20航空队的指挥之责。

日本老百姓对这些B-29十分好奇、着迷，甚至是仰慕。无论何时，只要这些遥远的银色十字形飞机出现在头顶上，他们就会涌到街上，伸长了脖子盯着天空。“刚刚开始轰炸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惊喜和好奇的感觉，”东京一名记者写道，“甚至有一点冒险感，还有一点得意，因为虽然只是平民，但我们一样可以分担战争的危险。”^[10]警察和民防长官向围观人群大呼小叫，但是许多人还是过于激动，不愿退回防空洞。他们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或许有些讽刺的是，老百姓都在讨

论这些“可敬的访客”，甚至把“超级堡垒”称为“B桑”（“B先生”）。东京有个人用望远镜观察了一支“壮观的”B-29编队，然后向邻居的孩子们讲述它们的设计细节和作战细节，让孩子们赞叹不已。^[11]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竹山道雄这样描述在1月的一天傍晚飞临首都上空的一支“超级堡垒”编队：“它们通体闪着紫色的光芒，从云中飘然而出，排成常见的队形，太漂亮了。在冬天，它们的后面拖着尾迹，如同水母拖着透明的白色触须。”^[12]

这些空袭给日本政府的宣传部门带来了大难题。千百万人目睹轰炸机的到来，瞒是瞒不住了。新闻报道便只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间左右挣扎——既要蔑视空袭，说它们徒劳无功，又要激发民众的怒气。于是报纸一方面对轰炸机带来的损伤轻描淡写，一方面又夸大了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数量。“B-29的送葬之路”，1945年1月1日《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如此写道。报道说自从五个星期前美军开始空袭关东地区以来，已有550架这种大型轰炸机化为火焰坠落了下来。^[13]

（截至此时的实际击落数还不到50。）空袭带来的损失常常被形容为“轻微”，但是却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新闻中还常常确认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

其他一些报道则旨在刺激民众，激起他们复仇的欲望，并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战争而劳动。《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炸弹落在东京正中央才能惊醒日本人。”^[14]还有报道说美军轰炸机瞄准的是医院和学校。1945年1月14日，B-29扔下的一枚高爆弹落在伊势丰受神宫附近，这是日本神道教最受崇敬的神殿之一。神宫并非轰炸目标，也没有受损，但是《朝日新闻》还是暴怒地指责“敌人残暴的野蛮行径”和“真正的恶魔本性”。一篇新闻头条叫嚣道：“诅咒你们！从现在起，等着瞧！”^[15]

自从差不多三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东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新闻报道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有何差别。从火车和公交车的窗户

向外看，他们能看见倒塌的住宅和建筑，以及燃烧的废墟。其间满是各种瓷器、衣服和榻榻米的垫子。人们仔细检查废墟，挖出他们的床铺、鞋子和锅碗瓢盆。难民们把他们仅剩的所有家当挑在肩上，或者向邻居兜售：火盆、书、篮子、褥子，还有蓝白相间的瓷罐。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政府法令而无家可归，拆迁队为了留出城市防火通道而拆掉了整个街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那些被从家里赶出来的家庭三五成群站在路边，悲伤地看着苦力们把他们的家拆成碎片。”[\[16\]](#)

1945年1月27日，72架B-29由于浓云未能找到主要目标，于是将炸弹投在了东京市中心，炸弹落在了银座区周六逛街购物的人群中，几百人被炸死。在那些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市民中间，政府所谓的“战斗精神”引发了一阵冷嘲热讽。一个叫清泽冽的人在日记中评论道：“日本人的精神催生的想法是，在看见B-29时，他们可以用竹枪或者柔道去对付。”[\[17\]](#)

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其结果令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空袭是摧毁日本民众士气的“最重要原因”。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影响力——无论是海外的军事失利，还是本土的口粮标准降低——敌机在日本天空的出现，让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取胜，并且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对日本城市的战略轰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为日本在盟军登陆之前便投降做出了贡献”。[\[18\]](#)不仅如此，面临空袭时，日本人会更多责怪他们的领导人，而非敌人。“这个时候，日本的地理隔绝以及数百年来文化隔绝成为不利因素了，”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作者写道，“闭关锁国给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带来的狭隘性，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遭到攻击，其本土坚不可摧。而B-29则粗暴地把他们从安全的幻梦中唤醒了。”[\[19\]](#)

毁灭性的大火自古以来都是日本城市的心腹之患。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的火灾，这场灾难在东京和横滨摧毁了70万栋建筑，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破

坏力接近那场地震的灾难还发生过几次。和日本的其他所有大城市一样，东京也极度易燃。商务楼和工厂周围密布着居民区。那些房屋都是用木头、纸板和薄石灰墙建成，屋顶上覆盖着草席。许多房屋还在用煤油灯和纸灯笼照明，人们在炭火盆上做饭。燃气通过埋藏深度浅且易受损伤的管道送到千家万户，供电也是通过低垂的电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的消防队就显得人手不足，装备低劣了，他们还是在僵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出任务的。战争爆发后，最强壮和最年轻的消防员被抽走，消防队更是雪上加霜。1945年时，大部分仍然在岗的消防员都是老年人，他们的状态早已不在巅峰，其数量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突发灾情。

当B-29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上空时，当局便开始加倍关注民防了。市民们被要求发誓“遵守命令，抛开私念，防空时相互扶助”。[\[20\]](#)所有人都被要求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遇到火星乱飞或碎物落下时，要用衣服裹住头脸以防受伤。每个家庭都必须准备一个装满沙子的铁桶，一架梯子，两把铲子，几桶水，拖把，还有湿毯子。社区会组织大家挖掘隐蔽壕沟，在后院里挖防空洞。检查和演习随时都会突然到来，哪怕是午夜。上野动物园的管理方要求把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猛兽尽量无痛地杀死，以免它们在空袭摧毁笼子后跑到东京街上伤人。学生们会在操场上进行防空演习。小孩子们则跟着老师唱歌和打拍子来学习防空流程：

空袭，空袭，空袭来啦！红的，红的，燃烧弹来啦！

快跑，快跑，拿毯子和沙子！

空袭，空袭，空袭来啦！黑的，黑的，炸弹来啦！

捂住耳朵！闭上眼睛！[\[21\]](#)

这样的演习和检查日益频繁而扰民，民众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这时候许多人饭都吃不饱，如此例行民防措施只会徒耗人们的体力。一位筋

疲力尽的女性说道：“拎着水桶往山上跑，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愚蠢打仗方式。”^[22]每隔三四个晚上，空袭警报就会把他们从床垫上拖出来，扔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这些防空洞都是老百姓用铁锹和铲子自己挖的，狭窄而且简陋，常常没有灯，也没有地方坐。只要下雨，必定被淹。虚警过于稀松平常，于是当警报和木头梆子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用枕头盖住头，随它去。当空袭的威胁日益严重时，麻木和抵触反而愈加常见。

1943年末，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让非战斗人员和非关键岗位工人撤离城市。大规模的人员疏散可以部分化解空袭的危险，这同时也是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一种手段，并且能够减轻从农村收集粮食的负担。这一行动起初只是公共服务部门发布消息，鼓励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身体虚弱的人——任何无法为战争直接做出贡献的人都可归入此类——搬到乡下的亲戚家住。根据日本内阁1943年12月一份官方声明的说法，“撤离的市民并非仅是从城市撤退和疏散”，而是“会为我们的战斗力做出有益的贡献”。^[23]那些在军工厂或者其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则不允许离开，除非工厂整体搬迁，这种时候工人就将被迫和雇主、同事一同迁移。一列列特别“疏散列车”从东京开出来，里面满载着面色阴郁的市民，他们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带在身旁，其余所有家当则丢在了原地。

从1943年初，儿童就开始根据自愿原则撤离城市，但是到1943年12月时，日本教育省还是开始向城市的学校和父母施压，要求他们把所有小学生送到乡下去。1944年6月30日，美军已经登上塞班岛，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已经从全国最大的12座城市强制疏散了35万名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乡村的小旅馆里，会议厅里，庙里，以及被废弃的旅游景区里。^[24]11月，B-29的空袭开始了，这时整所整所的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乘上喷绘着旭日旗的火车离开城市，孩子们的父母则在月台上挥手道别。到达目的地之后，孩子们会住进拥挤的宿舍，每天24小时在集体生活和工作安排中度过。分配给他们的口粮常常不够吃，孩子们也越来越

消瘦，营养不良。一位随同他的学生们一起从东京来到长野的老师回忆道：“孩子们打开午饭饭盒的盖子，看见里面只装了一半时唉声叹气，真可怜。”^[25]为补充饭食的不足，他们被派出去采集食物，其中许多都只是勉强能入口而已：蕨类植物的种子和根茎，没长熟的蒲公英，竹笋、蜂斗菜、柿子、卷耳、蒿草，还有水芹。他们会捕捉青蛙和蛇，把它们剥皮烤熟，还会在当地的小溪里捕捞淡水虾、鲤鱼和泥鳅。他们还吃蚂蚱、麻雀、蜗牛和油炒甲虫。根据日本厚生省报告，到战争结束时，这些疏散出来的儿童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只有1 000卡路里，远低于最低饮食需求。^[26]

孩子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严格规定好的，包括课堂学习和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学生们穿着军服，跟在老师后面列队行进。那些低“军衔”的孩子要向高级别的孩子敬礼，而所有人都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态度、个人担当以及是否听话而晋升或者降级。他们要参加为出征军人和“神风”队员举行的欢送仪式，给海外军人写信和寄送“慰问包”，以及迎接运送回国的战死军人骨灰。

随着战争的进行，疏散走的孩子们花在课堂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为战争服务的时间则越来越多。1944年9月，小矶国昭首相宣布了全民动员令：“值此危难之秋，我们的国家不允许有一个闲人或者旁观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军人。”^[27]日本政府发布的一份法令规定，在工厂工作“可视同于教育”，到了1945年，那些饱受人手不足困扰的工厂厂长便要求童工们延长工作时间。最小只有8岁的小孩子都被送进军工厂做工。还有一些小孩则作为农业劳动力，被派去帮忙收割庄稼。在森林里，大批小孩出去采集松果，想要提炼松油以转化出航空燃油，但这是不可能的。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340万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许多人每天的正常上课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28]“学校里没多少课了，”当时被疏散到茨城县的6年级小学生佐藤秀夫后来回忆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操场的角落挖掘一条反坦克壕。”这是一项重活儿，尤其是对于那些力气小，拖不动多少土的小孩子而言。“我们花

了三天时间才挖出了一个深度够让老师跳进去的散兵坑，坑的深度刚刚超过头顶。我们被分成组来做这项工作，每个组都负责完成自己的任务。”[\[29\]](#)

在与世隔绝的乡下，孩子们只能知道那些教育省想要让他们知道的事情。教师们则受到监控，不能有任何失败主义的迹象。1944年底，日本又发布了一份新的“国防总动员令”，旨在确保“致力于教育使命的人拥有坚定的胜利信念，并努力激发战斗精神”。[\[30\]](#)疏散出去的孩子们被要求每天记日记，这既是为了练习写作，也是为了记录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日记要交给老师，而老师的打分依据不仅包括一般的语法、措辞、字迹以及文风，还包括其情感表达是否诚挚、热情。中根美穗子当时还是个9岁的小女孩，1945年，她所在的小学整体从东京搬迁到了富山县。她常常会表达出全心全意热爱学习，提升自己，并让老师喜欢自己的心情。在日记里，她保证自己会是个“好孩子”，或者是“更好的孩子”，并且要竭尽全力“成为一个优秀公民”。美穗子热情满满，无论是捡柴火，进行行军训练，采集蒿草，送别新兵，唱军歌，还是迎接战死者的魂灵，都是如此：“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真心感激他们。”她还记录了自己对敌人的可以想见的仇恨：“痛恨，痛恨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多可恨啊！我就是这么想的。”美穗子从未抱怨过她少得可怜的口粮，即便是里面长了象鼻虫也没有抱怨，而且日记里常常写她的午饭和晚饭“真好吃”。当她被提升为班长时，她十分在乎这一神圣使命：“这样，我就更想当好孩子了，想拿出班长应有的样子。”[\[31\]](#)

由于与生俱来的天真、轻信、适应性，孩子们反而会在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已经幡然醒悟时仍然保持着对战争的热情。他们并不期望吃得好，因为他们根本记不起那些没有饥饿的时光。他们不介意在军工厂当童工，因为这让他们感觉很了不起，而且还能免于沉闷的课堂学习。为战争制造武器令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重要性。收集松果送去炼制航空燃油令他们觉得头上飞过的日军战机之所以能升空，自己也是出了力的。而那些在气球炸弹工厂做工的孩子则听说了关于自己的制品飞过半半个地

球去惩罚邪恶美帝的神奇故事。他们很喜欢这种壮观的战争，喜欢唱歌和列队行军，喜欢被拉去踩踏和撕碎美英两国的旗帜，喜欢每月一次朗读《教育敕谕》，喜欢每天早上做集体早操，他们裸露着上身（女孩也一样），唱着：“消灭美英！一二三四！消灭美英！一二三四！”^[32]他们是最后一批仍然相信电台里播放的大捷消息的人。

“我是在战时出生的，”半个世纪后，佐藤秀夫在一份口述历史录音中解释道，“男孩子们喜欢打仗。战争是他们游戏的主题……这简直就成了一种运动。这和小皮孩子们玩的游戏没什么区别，只是规模大一些。”当他的班级被疏散到茨城县的时候他只有11岁。他们被送到一座常常遭到美军舰载机空袭的机场上工作。每次当“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来袭时，秀夫和他的同学们都在操练，他们会笔直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以证明自己的勇敢，直到坚持不下去为止：

如果你看着它飞来，就能在最后一刻滚到一旁躲开。飞机飞得很低，机翼上装着炮，它们速度很快，直冲你飞来，但这也需要时间。如果它们瞄准的是你，你会知道的。你能看见火球飞来，之后才能听见声音。你会学会根据经验判断火球飞来的角度。入射角45°的火球最危险。那时候你会本能地闭眼。他们常常把这称为扫射，但那不是机枪，那是机关炮，20毫米的，它们的每一枚炮弹都会爆炸。那可不像电影里，你只能看见一小团一小团的烟。在稻田里，泥土都被打得飞起来了，那火球会把水稻连根拔起，还会爆炸，“轰轰轰！轰轰！”。

一旦知道它们没有打中你，你就会站起来开始跑。它们飞得很低，飞行员有时候会打开座舱盖，把头伸出来——美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看着我们。我甚至会向他们挥手。这种事我经历了不下十次。^[33]

根据小矶首相“武装一亿人”的国家政策，疏散出去的孩子们都要训练徒手格斗，好让他们也能在即将到来的本土决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那个被疏散到富山县的9岁女孩中根美穗子用她一贯的热情描述了这种“精神训练”：“那十分十分有趣。”她的班级用长枪、木剑和模拟手榴弹进行训练。这些操练和他们的正常文体活动穿插进行，比如闪避球，背人跑，唱军歌，以及捉迷藏。训练时孩子们只穿着内衣，头上扎着画有旭日徽的绑扎带。在“投手榴弹课”里，他们会投掷小球去砸大球，老师说大球代表着敌人的脑袋。之后又是木剑训练：“我们向左砍，向右砍。”当美穗子练习用竹枪突刺时，老师会吼叫：“扎他们！扎他们！”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这太有趣了。我很累，但我知道了即使是我一个人也能消灭很多敌人。”^[34]

收复8个月之后，关岛已经成了20万美军官兵，2.4万原住居民，以及不知道多少（可能有数千人）藏身灌木丛的日军散兵游勇的家。1945年2月和3月，在建的主要工程项目清单已经在关岛指挥官的战争日志中用小字号密密麻麻记了6页。^[35]第5海军工程旅的“海蜂”们一直在拓宽和延长道路，安装足以支撑一座美国大城市的供电、供水和卫生设施。阿普拉港新建成了多条浮箱栈桥，防波堤，以及一条3 900英尺长的堤道，每月的吞吐量已经达到了265艘货船——是战前吞吐量的10倍。新建成的四车道柏油高速公路从苏迈延伸至阿加尼亚，现在是岛上道路网的核心。1.6万原住居民（大部分是查莫罗人）住在岛屿西海岸的三个难民营里。民政部门想要尽快让他们回到自己原先的农田和村庄里，但是在此之前还有许多重建工作要做，而且流窜的日本散兵对外围区域的安全仍然构成威胁。

关岛被称为“太平洋超市”，这个绰号名副其实。战争通讯员厄尼·派尔如此描述他在奥罗特半岛看到的半圆形屋顶的巨大仓库：“你在这里可以找到K型口粮、木材和炸弹，它们的数量足够养活一座城市，建造一座城市，或者炸掉一座城市。”^[36]

关岛上的大部分美军官兵都很闲，只是等着参加接下来的战役，美

军费了不少心思来让这些人有事可干。例如在1945年3月，64支军人棒球队打了256场比赛，50支篮球队打了220场比赛。他们顺利地建立起了球队联盟，有专业的裁判，各种颜色的球衣，巨大的木质比分牌，以及为观众准备的露天看台。每晚都会有400处大银幕在放映电影，一个晚上的观众人数估计能有8万人。还有一份《岛屿司令部每日新闻报》会分发给超过10万人。军队广播服务处（AFRS）一个呼号为WXTI的电台每天播音九个半小时。两名前中量级拳王格奥尔基·艾布拉姆斯和弗雷德·阿波斯托利来到关岛举行了一系列拳击表演赛，吸引了大约3万名观众。美国劳军联合组织在任何时候都有十多个乐团在岛上巡演，其中火爆剧目《疯女孩》在3月12日到30日之间每天都要上演两场。有四片海滩被专门开辟成了海滨浴场，还布置了更衣帐篷和救生员，平均每天有4 000名泳客前来光顾。棒球大联盟的球星从美国本土飞来，在4万名军人面前打了4场表演赛。根据红十字会前线总会的记录，“我们制订了计划，要为岛上的女军人建设和运营一座8床位的美容院，还要建设四五座保龄球场以满足军人们的需要”。^[37]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1月，尼米兹将军批准了扩建关岛B-29轰炸机基地的计划。工程在关岛北部崎岖的高地上的两座大型机场展开，它们分别是北部机场和西北机场，各有两条跑道和满足两支轰炸联队所需的地面设施。到2月第一周，北部机场的一条跑道投入使用，第314轰炸联队的180架“超级堡垒”进驻这里。第二条跑道的地面已经清理干净并完成了部分地面平整工作，但是路面只铺设了50%。西北机场还未投入使用，但是推土机、蒸汽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以及压路机已经来到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起来。

战争通讯员约翰·多斯·帕索斯在这个月来到关岛，走访了一处运动场大小的珊瑚矿场。在那里，蒸汽挖掘机不停地把碾碎的珊瑚礁倒进翻斗卡车里。工人们都戴着面具，以阻挡机械设备扬起的白色粉尘。有个人告诉多斯·帕索斯：“他们以前装满一辆卡车需要40秒，现在只要20秒。”^[38]一眼望不到头的卡车队伍通过一条崎岖的道路开到苏迈—阿加

尼亚高速公路上，向北开4英里，之后再开过一段盘山公路，来到西北机场那些“泥泞的台地”上。多斯·帕索斯和司机来到这里时天刚黑，但是他们发现工程仍在全速推进。卡车直接把满载的碎石块倾倒在跑道的地基上，推土机立刻过来把它们推平。“铲土机、平路机、压路机，还有各种我们叫不出名字的机器，有序地跟在它们后面。工人们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肌肤沾满了白色的尘土，在泛光灯的照耀之下显得一片雪白。”[\[39\]](#)

尼米兹将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李梅将军的第20航空队之间经常为了物资和人力的分配而唇枪舌剑。由于李梅不归尼米兹管，他们的官司常常要打到参联会去。李梅的观点是，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目的就是用B-29轰炸机空袭日本，因此所有的建设和开发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海军则反驳说马里亚纳群岛也是1945年即将进行的大规模两栖进攻的前进基地。所有资源都供不应求，各方费了老大力气讨价还价，结果谁都不满意。春季，热带暴雨从天而降——仅3月就有16个雨天，岛上降水量达到6.5英寸，给机场工地上的建筑人员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40\]](#)当岛屿司令部将两个航空工程营从西北机场建筑工地调往其他“优先级更高”的项目时，立刻有人向华盛顿提出了抗议。

李梅对他在关岛南部和沿岸看到的那些奢侈的休闲设施和娱乐设施大为光火。“他们为岛屿指挥官修建了网球场，还修建了舰队休闲中心，陆战队疗养中心，岛屿间勤务船只的码头，建了世界上所有无关紧要的该死玩意儿，唯独忽略了他们拿下这些岛的最初目的。”他还挖苦说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得到合适的指挥部之前，岛上可能还需要一个“旱冰场”。[\[41\]](#)

到达后不久，李梅获邀前往尼米兹在方特高地上的住处共进晚餐，这是一处能够俯瞰阿普拉港的小山。这栋漂亮的白色小楼里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带落地窗的门厅，还有一间适合将领聚会和接待贵宾的餐厅。[\[42\]](#)这地方景致不错，周围种满了花和当地的灌木，还修建了一个掷马蹄铁赛场，专供尼米兹休闲使用。参加晚宴的还有关岛上陆军、

海军、陆战队的许多其他高级军官。“我走了进去，看到树枝形吊灯亮着，所有的灯都打开了，餐桌上铺着白色台布，银餐具闪闪发光，凡此种种，”李梅在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都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大家举杯共饮。”^[43]桌上摆着高杯鸡尾酒和点心，“就像在华盛顿大使馆里的待遇那样”。晚餐很丰盛，有例汤、鱼、烤牛肉、甜点，饭后还有咖啡、白兰地和雪茄。^[44]

李梅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他回请海军将领们到他的营地来吃饭，大家在匡西特板棚房食堂里站成一排吃罐头口粮。此举解决了问题：“最后他们搞来了我们需要的设施。”^[45]

感受到来自参联会的沉重压力之后，尼米兹采取措施，加快了B-29基地的建设进度。他应“福将”阿诺德的请求，将新的航空工程营运上了岛，即便他们的重装备暂时还落在后面。^[46]这样“海蜂”们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装备交给航空兵，其他项目的优先级也需要相应调整。船运能力是关键瓶颈，包括装货码头的停泊时间这类看似平凡的因素都是问题。3月28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下令“严格限制”出于其他目的而开进马里亚纳群岛的船运，以为第20航空队所需的物资留出运力。货物的分配规则也由此转变为“最大限度保障‘超级堡垒’所需要的弹药和其他物资”。^[47]这一命令引起了各个地方海军和陆战队的反对。在华盛顿，金的副作战部长理查德·S.爱德华兹将军觉得阿诺德将军“想要从华盛顿操控〔第20航空队的〕所有事情，直到把他在前线的人搞得一团乱，然后再指望战区指挥官冲出来拯救局面”。^[48]

美军发现整体地形比较平坦的提尼安岛能够容纳多达8条B-29跑道，而不是攻占该岛之前计划中的4条，这多少补偿了一些建设进度缓慢带来的沮丧。于是6个海军工程旅甩开膀子，把长长的珊瑚岭挖掉了差不多一半，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平整地面，同时也是为了开采其中的岩石。提尼安岛的北部机场建成了4条可用的跑道，于是这个基地比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他任何基地都更早完工并交付使用。1945年1月，美军决

定同时进行提尼安岛西部机场的开发工作，这将使得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占领的三个岛屿中最小的提尼安岛能够容纳足足两支轰炸联队。1945年3月22日，西部机场的第一条跑道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勘测人员发现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也能够继续扩建，令其两条8 500英尺长的平行跑道能够容纳第73轰炸联队的4支大队。

3月初，李梅将军坐稳了他的指挥职位，但他一点也不开心，他对此毫不掩饰。高空精确轰炸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选定的11座最高空袭优先级的日本飞机工厂中，没有一座被摧毁（虽然有几座厂的产量显著下降）。美军向位于武藏野的中岛发动机工厂发动了8次空袭，但是最新的侦察照片却显示这座工业综合体仅仅遭受了4%的损伤。由于技术问题，包括发动机故障和导航问题，第20航空队一直没能向日本上空派出足够数量的飞机。此时马里亚纳群岛上已经有了350架B-29，但是平均每次出击能飞到日本上空的飞机只有130架。[\[49\]](#)

令李梅恼火的是，美国的报纸一直给人以B-29正在对日本施加巨大打击的印象。这并不一定是美国陆军航空队新闻官的责任，他们的新闻公报都很符合事实。美国的报界看起来是想迎合读者，展示他们渴望看到的内容——“超级堡垒”正在让“天火”从日本的一头烧到另一头。1945年3月6日，李梅将军对他的公共关系主任圣克莱尔·麦凯尔韦少校说：“我们这帮人现在人气太旺了，但该死的轰炸战果却跟不上。”[\[50\]](#)

自从1月上任以来，李梅就考虑要彻底改变战术：高投弹密度的夜间低空火攻。这种战术要在夜间派B-29飞往目标上空，在5 000英尺至7 000英尺的高度上投弹轰炸，这个高度远低于它们2.5万英尺至3万英尺的典型作战高度，如此投弹就可以免受高空喷流的影响，发动机也无须承受长时间爬升带来的沉重负荷。由此节约下来的燃油量将用来携带更多的炸弹——载弹量将达到6吨至8吨，而此前平均只有三四吨。轰炸方式是将集束凝固汽油燃烧弹投放在大面积区域里，这样轰炸精度也就无关紧要了。此外，日军防空战斗机在夜间也没那么危险。鉴于B-29在空

中将不会遇到太多抵抗，机上所有的.50口径机枪和弹药都可以移除。这样可以节约重量，而且“至少我们的人不会打到自己人”。^[51]李梅分析，由于这一战术出人意料，美军应当可以全身而退。

李梅是个天生的自我驱动者，他后来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低空火攻是他的主意。但实际上，华盛顿美国陆军航空队总部的计划人员此前已经表现出了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的浓厚兴趣，并且思考过出动“超级堡垒”进行夜间低空轰炸的潜在优势。作为参联会成员的阿诺德将军已经下令，要对日本的多个中心城市发动一系列“全力尽出”的B-29空袭。（“全力尽出”空袭指的是把每一架维护人员认为可以飞行的飞机全都派出去。）自从B-29开始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作战以来，这里第一次存储了足够执行五六次“全力尽出”空袭的燃烧弹。第73轰炸联队已经接受了大量的夜间作战训练，包括夜间使用雷达进行轰炸。美军在犹他州的达格威试验场建立了一座模拟的“日本村镇”，使用了日本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进行轰炸试验时，美军混合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和镁燃烧弹，结果迅速将模拟村镇烧成白地。大家知道日本的城市比德国城市更易于被火攻摧毁，因为日本城市的人口密度更高，而且密集建造的木质房屋也更容易起火。

火攻的主力是M69型凝固汽油子炸弹，它们被裹在装有弹翼的500磅E46圆柱形集束炸弹中。几乎所有这种炸弹都是在位于新泽西州松林荒地里的秘密工厂制造的，工厂地点在大西洋城靠内陆15英里处。每一枚M69子弹药或者“小炸弹”实际上是把一个装满胶冻状汽油的棉布袋子装入一个铅管内。每一枚E46燃烧弹都集中了38枚M69，通过一个由定时引信炸开的束带捆绑到一起。集束炸弹将设定在距离地面2 000英尺处炸开，每一枚子炸弹后面都拖着3英尺长的棉布飘带，确保它们散落在直径约1 000英尺的区域内。一旦触地，第二个引信就会引爆，此时一块发射药就会把一团团起火的凝固汽油溅射到半径约100英尺的区域里。这些半液体汽油滴无论沾到哪里——墙壁、屋顶、人体皮肤——都会附着在那里，以超过500摄氏度的高温燃烧8分钟到10分钟，足以引燃

所有日本城市中心那些挤成一团的，由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建筑区。

在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爆发之初，美国的领袖们坚决反对从空中对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1939年9月，当欧洲陷入战火时，罗斯福总统曾呼吁所有交战国不要“从空中轰炸人口密集区域或者未设防的城市”。^[52]即便是陆军航空队的将领们，也坚持反对对城市的“无差别轰炸”。1940年，“福将”阿诺德发誓：“航空队的战略是对军事目标进行高空精确轰炸。对城市使用燃烧弹与我国仅攻击军事目标的政策是相悖的。”^[53]现在，持续了5年的全球性灾难和轴心国的暴行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日本和德国首先向无辜民众发动了空中攻击——日本轰炸了上海、南京、重庆和其他中国城市，德国则轰炸了鹿特丹、伦敦、考文垂和许多其他英国城市。1940年德国空军的“闪电战”促使英国寻求报复，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司令部当年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恐怖轰炸的高峰是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夜间对德累斯顿市的燃烧弹空袭，此战中估计有3.5万德国平民被烧死。由于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军事价值，此战在美国报界甚至是英国众议院都引发了一阵批评之声。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道：“盟国航空兵指挥官终于做出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的大型人口中心进行有意识的恐怖轰炸，作为一种加快希特勒灭亡的残酷冒险。”^[54]但是史汀生部长否认了美联社的报道，他判定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是有军事必要性的。他说：“我们的政策从来都不是向城市居民进行恐怖轰炸……我们的努力仍然局限于攻击敌人的军事目标。”^[55]

即便是到了现在，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的尾声阶段，美国的领袖们仍然不愿承认自己放弃了反对恐怖轰炸的政策。因此，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必须要找到一个说得通的军事上的借口。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目标选择人员解释说，日本的许多工业生产是在居民区里进行的，那些小型“供应商”或者“屋檐下”工场组成的家庭手工业会为大厂提供零部件。它们据说是大规模火攻轰炸的真正目标。然而就在首次大规模火攻东京之前仅仅三个星期的火烧德累斯顿之战后，盟军受到的道德谴责依

旧严重。既然这在德国会招来如此的反对，那么在日本也是一样。后来，李梅承认是日本的战争罪行为这样的轰炸提供了一些正义性，至少对他的心理上是个安慰：“我并不希望如此，但我也不会特别顾虑火攻造成的民众伤亡。我不会让这一点影响我的任何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如何对待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地方俘虏的美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军人。”^[56]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在全世界面前曝光之后仅仅两个星期，火攻轰炸就拉开了序幕，这并非巧合。

新战术也很危险。在德国上空5 000英尺处进行轰炸将会招来毁灭性的战斗机攻击和密集的高射炮火——如李梅所说，“像这样的低空编队将会被德国空军打到骨折”。^[57]但是他愿意赌一把，赌日军夜间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和数量都不足以在暗夜中击落B-29，其高射炮也将会凌乱而无效，尤其是在突袭的影响下。一般认为，与德国相比，日本的雷达指挥的高炮原始而且不准确。但这只是个未经验证的设想；还没有B-29在日本上空8 000英尺以下的高度执行过任务，仅有的在这个高度的轰炸还是当初对九州岛八幡市钢铁厂的轰炸。防卫东京、名古屋、大阪的高炮数量更多，而且可能更先进。美军还知道，日本人已经训练了至少两支夜间战斗机中队。如果李梅赌错了，那么代价将会是飞机和机组人员的灾难性损失。

根据新闻官麦凯尔韦少校的说法，有多个轰炸联队的高炮专家都警告李梅他是在走向灾难。他们告诉李梅，东京的高射炮部队能够像在射击游戏里打胶合板鸭子那样把低飞的轰炸机打下来。即便是地面上的日军机枪也有可能打中飞机。有个人还预言说每10架“超级堡垒”中会丢掉7架。“如果你是对的，”李梅答道，“那若我们低空飞进去，就剩不下多少飞机了。”^[58]李梅是历史上最杀人如麻的杀手之一，但他“发自内心地不情愿”把他的飞行人员送上绝路。他更想要亲自率领此次任务，但是华盛顿已经禁止他这个级别的军官飞越敌占区。在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损失机组人员已经够糟的了，如果由于地面指挥人员的错误战术决定而损失他们，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你才真正理解这一点。”^[59]

如果任务失败，李梅很可能会被解除指挥权，还会被降回他的永久军衔，他或许就要以一个小小的上校军衔结束他的陆军航空队生涯了。

然而，关键在于，李梅赢得了他的联队长们的支持，他们是在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三个轰炸联队中驾驶领队长机的准将——“罗西”埃米特·奥唐纳尔、托马斯·S.鲍尔，以及约翰·H.戴维斯。这三位准将立刻看出了这一任务方案的优越性。狂暴的喷流会远高于他们，5 000英尺高度上的风速不过25节到30节，因此投弹飘移的问题便不复存在。能力最强的老手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包括联队长）将驾驶领队的“探路者”飞机，他们将会用投下的燃烧弹在地面画出一个燃烧的“X”形以标示目标。最初的燃烧区就会成为瞄准点。对于后面的飞机而言，导航就是小菜一碟了。日本海岸线两侧的陆地和海洋在机载雷达屏幕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因此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机组也能毫无问题地找到东京湾，而无须考虑能见度如何。之后，他们只要“朝着我们给出的方向，行驶一段时间，把燃烧弹投下去就行了”。[\[60\]](#)

在B-29的轰炸作战中，这还是第一次无须考虑天气因素。如李梅所说：“我们可以说忘了天气吧。我们已经证明，即便是最菜的雷达操作员也能让我们根据陆海分割线飞到东京。如果我们派一些老手在前面飞，他们就会找到目标，然后点火。若真的能让大火烧起来，后来的人就能看见火光，并向那里投弹。”[\[61\]](#)

被选中的轰炸目标是东京的下町区，这里位于隅田川流域，是东京地势低洼的地区，以房屋密集的工人居住区为主。在选择目标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人员参考了特勤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绘制的地图，图中给东京的35个区都绘制了易燃等级。特勤局的评判标准是建筑的密度和材质，他们甚至还收集了战前日本保险公司为火灾险进行的风险评估。之所以选择下町区作为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因为这里比日本首都的任何其他部分都更加易燃。[\[62\]](#)

出击前一天，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们在群岛各地机场上拥挤的匡西特

板棚房里听取了任务简报。出于保密原因，事先没人知道会采用这个新战术。当作战参谋介绍了详情后，人群顿时安静下来。一名上校告诉他的飞行员们：“我们把教科书扔了吧。这次我们不飞编队了。”^[63]他们要挂载多得多的炸弹，却要把.50机枪和机枪手都留在地上。根据塞班岛上第498轰炸大队一名飞行员的回忆，他们听说要在夜间空袭东京的消息后，人群中“一片死寂”。但是当简报官告诉他们要在5 000英尺到7 0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东京市中心时，“机组人群中响起一片嘘声”。^[64]和以往的任务相比，此番他们距离地面要近5英里。

根据联队长的指示，作战参谋们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采用如此的新战术，以及为什么新战术预计能够成功。突然性所带来的战术优势有利于美国人，这将令他们得以完成此次飞行任务而损失不会过重。然而并非所有飞行人员都听得进去这些话。晚上回到宿舍后，有人预言说所有出击的飞机中会损失至少三分之一。带着这种其实算是乐观的想法，他们钻进被窝，想要安安稳稳地睡一觉再说。

第二天下午，在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的机组人员乘坐罩着帆布车篷的卡车来到停机坪上的飞机旁。这些人登上飞机，开始仔细检查各项设备和功能。机械师转动着巨大的螺旋桨叶，冲洗掉漏出的润滑油。第一架飞机的预定起飞时间到来的30分钟前，莱特“双旋风”发动机开始点火。它们喘振、启动、发出轰响，然后如雷鸣般回火，喷出大团的废气。之后，飞机的舱门、舱盖和炸弹舱猛地关上，领队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滑行道。螺旋桨卷起的尘土飞进了地面人员和跑道两旁众多围观者的眼中，口中，鼻中。这么多大型发动机同时发出轰鸣，令天空和大地都开始颤抖。一名围观者联想起了“印第安纳波利斯500英里车赛”。^[65]陆军与陆战队士兵们围坐在跑道旁的石头上，就像是在看一场户外音乐会。

傍晚6时15分，夕阳已经低垂，指挥塔上方升起一颗绿色信号弹，

领队的“超级堡垒”开始起飞滑跑。飞行员把4个节流阀推到了最前方，松开了踩住刹车的脚。他调整了方向舵踏板，以保持飞机沿着跑道中心线加速。之后他紧紧握住操纵杆，收住襟翼，好让飞机加速更快。一段时间之后，飞机的速度已经快到无法停下了，此时它要么起飞升空，要么坠毁，不可回头。当时速达到160英里时，前轮会抬起，后轮也会渐渐离开沥青跑道。此时副驾驶会拨动起落架开关，支柱和机轮就会向上完全收入起落架舱。第一架飞机刚刚升空，第二架飞机就开始了滑跑。如此往复了超过一个小时。

飞出海岸线之后，飞行员会轻微压低机头以加速，之后缓缓放出襟翼。这种重型飞机贴着海面掠过，螺旋桨在海上吹出4条清晰可见的白色尾流。接下来飞机就开始爬升了，但很缓慢。参加3月9日这次出击的大部分B-29都达到了起飞重量的极限，14万磅——相当于70吨[\[66\]](#)。

首批起飞的是驻关岛北部机场第314轰炸联队第19大队和20大队的飞机。40分钟后，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的领队机也开始起飞滑跑。从关岛第一架飞机到塞班岛的最后一架飞机，整个起飞过程耗时足足2小时45分钟。最后，当天色刚刚黑透之时，334架“超级堡垒”已然升空，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航程。[\[67\]](#)

既然不用编队飞行，那也就无所谓集结了。每个飞行员只要向北爬升到指定高度，再按预定方向飞就行了。在飞往日本的7个小时航程中，他们遭遇了一些浓云和乱流，但是这些都远不足以带来危险。在海洋上空5 000英尺至7 000英尺高度飞行时，飞机的发动机保持在低功率状态就可以了。机组人员们小心翼翼地透过舷窗和气泡形观察窗在暗夜中搜索是否有飞机过于接近的迹象。有一名飞行员回忆说，他在透过花房式的机头驾驶舱全方位扫视天空时总有如履薄冰之感，在四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担心着另一架B-29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相撞的概率看起来非常高。真可怕。”[\[68\]](#)

在打头阵的“探路者”飞机上，雷达手趴在他们的APQ-13雷达显示

屏上，紧盯着越来越近的本州岛南部海岸线。即便是在一片漆黑中，海岸线也会很清楚地显示在绿色的雷达屏幕上：房总半岛，野岛崎，以及东京湾海岸线凹进去形成的巨大缺口。当“探路者”飞临陆地上空时，他们转向正北，飞过东京湾中央，隅田川入海口，以及码头。天空中云比预期的少，目标上空云量只有约10%～30%，因此领队机的投弹手毫无困难地找到了他们的瞄准点。

接下来的轰炸航线要求他们把节流阀一推到底，同时小角度俯冲以提高速度，这样才能干扰高射炮手的瞄准和追击而来的战斗机的攻击机动路线。飞机的发动机提高扭矩，速度飙升到300节。炸弹舱门随即打开。雷达手紧盯着屏幕，通过耳机和投弹手不断交流。午夜后一刻钟，首批M47炸弹全部投了下去。它们在距离地面100英尺时炸开，迸发出燃烧的白色镁条。火焰组成了一个巨大而耀眼的X形，标示出了大约10平方英里的目标区。一名领队长机用无线电向关岛报告：“目视轰炸目标。大火可见。高炮弱，未见敌战斗机。”[\[69\]](#)

当后续飞机来到野岛崎上空时，东京大火的粉红色火光已经出现在了北方的地平线上。当“丁字尺12号”轰炸机飞过隅田川入海口时，小查尔斯·L.菲利普斯上尉看见一片飞舞着的火烧云，映照着下方鬼魅般的橙红色火光。在一片火毯中，能看到一条条暗线纵横交错，那是城市的街道。菲利普斯和他的机组能够闻到烟味，甚至是人肉被烧焦的甜丝丝的怪味。“我们这些坐在前乘员舱里的人真的能看到门框窗框的碎片被气流吹上天。”[\[70\]](#)

当“丁字尺12号”飞入火烧云时，飞机突然被甩向上方。在强劲的上升热气流的推动下，飞机在4分钟内升高了超过6 000英尺。菲利普斯把全部4台发动机的节流阀都收到空转，但“丁字尺12号”仍然在上升，“像风暴中的一片树叶”。[\[71\]](#)菲利普斯称这是“我在超过7 000小时的飞行经历中见识过的最狂暴的飞行，最可怕的乱流。机翼似乎马上就要从我们的B-29上被扯掉了”。[\[72\]](#)

被卷入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上升气流的飞机，除了顺势爬高之外再无其他选择。有一位飞行员想要下降，让飞机保持在指定的高度上，但这却意味着要在上升气流中陡降，相对空速会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推荐最大“标定速度”。有不少B-29被掀翻，底朝天，机组人员靠着安全带才没有撞到脑袋，脚下的仪器设备也松动了。如果被掀翻的飞机处于上升气流中，他们就应当飞一个倒筋斗然后改出俯冲。有一位飞行员报告说他的空速超过了每小时450英里——波音公司的工程师们认为这一速度会要了B-29的命——他们坠落到东京湾上空仅仅200英尺的高度才恢复了对飞机的控制。[\[73\]](#)

“丁字尺12号”轰炸机投下了全部M69集束燃烧弹。飞机瞬间减轻了6吨重量，被气流向上抛的速度更快了，高度表指针像疯了一样转起圈来。菲利普斯和他的副驾驶没有系肩带。上升到1.4万英尺高度时，上升气流突然消失，飞机又猛地转入了俯冲。两名飞行员都从座椅上飘了起来，就像零重力空间中的宇航员那样。“我们都紧紧抓住，保命要紧，”菲利普斯写道，“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秒钟。之后我们落回座位上，重新控制住了飞机。进行了一次大坡度左转之后，我们转向了太平洋方向，返程的方向。”[\[74\]](#)

早在第一批飞机抵达前大约一个小时，日本的海岸雷达站就第一次侦测到了来袭的空袭机群，空袭警报随之响起。民防人员立刻走街串巷，用木头梆子通知市民们各就各位。起初，许多人不愿离开他们的床和家，觉得这只不过又是一次虚警罢了。但是当第一批“探路者”B-29来到城市上空，以比往日低得多的高度飞过时，它们引擎的轰鸣声把人们吸引到了街道上。抬起头，他们看见了这些巨大的银色轰炸机，机腹倒映着下方橙色、粉红色和紫色的火光。它们的高度只有此前空袭的1/5到1/4。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这些飞机似乎触手可及，它们看起来真大。”[\[75\]](#)探照灯很快照了上来，高炮炮弹爆炸的火光也出现在了飞机上方。有人看见了M69燃烧弹，它们翻滚摇摆着坠落下来，长长的棉布飘

带在后面飞舞。

当晚，东京刮起了干燥的大风，因此最初的火灾很快蔓延开来。根据东京消防总局的记录，“探路者”投下首批炸弹30分钟后，火势“就完全失去了控制，我们完全无能为力”。^[76]消防队立刻投入了战斗，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却只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新到达的“超级堡垒”还在继续雨点般投下凝固汽油燃烧弹。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包围了木头和纸板建造的密集居民区，从西北方的浅草区到东北方的本所区，从东南面的深川区到西南边的日本桥区——大火如同风暴一般横扫而来，从一座房屋烧到另一座房屋，从一面墙、一处屋顶烧到另一面墙、另一处屋顶，越过狭窄的鹅卵石巷，吞噬了沿途所有可燃的油料，之后变得愈加猛烈。这里的作坊和小型工厂里堆满了可燃的黄油、润滑油和汽油，它们很快就像挨了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一堵堵火墙沿着屋顶和街道肆虐开来，把人们烧死在街道上，或者吞没他们的房屋，甚至不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日本内务省出版的一本防空手册提出，“对付燃烧弹攻击时，第一分钟是最关键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本手册却要市民们留下来救火，而不是赶紧逃离。他们要“向你附近的可燃物泼水，以防止火灾发生后蔓延过来”。^[77]但在如此规模的灾难面前，这样的措施完全无济于事。他们唯一的存活希望就是逃离，而且在选择逃跑方向时运气足够好。

幸存者们后来说，他们陷入了一片突如其来，持续不断的混响之中，噪声如此之大，他们不得不大声吼叫才能让别人听到。大火伴随着爆裂、呼啸、滋滋声，以及巨大的咆哮声。火星、未燃尽的木块以及着火的各种东西被旋风卷起，落在人们的头上和背上。周围的温度飙升，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如同一个巨大烤箱的门在面前打开。大火辐射出的红外光波烤干了所有能照到的地方，引燃了火焰尚未触达的可燃物。他们脚下的沥青路面变得黏稠、起泡，直至完全熔化。这时候人的本能都是盲目地向远离高温的地方跑，但活下来的往往是做出理智选择的人——跑向最宽阔的街道，或者游泳池、河流，抑或是某个公园。长峰武

当时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他的父亲意识到狂风是从西边吹来的，并由此知道了火将会从那个方向扑向他们。于是他带领一家人来到了隅田公园，算定了大火会绕开这里。就这样，他们活下来了。其他人涌进了学校，这里通常也是灾难庇护所——但这一选择却要了许多市民的命。

船户和代当时是个小学六年级学生，靠她父亲在浅草开设的玩具店生活。空袭到来时她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跑到了大街上。他们顺风跑到了砂町，但是大火仿佛同时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她父亲领着一家人跑向当地一座公园，却发现他们的道路被大群从另一边涌过狭窄人行桥的人堵得死死的。被迫折返后，他们只能盲目地瞎跑，在这样的大灾难之下，他们一家人不可避免地失散了。“风和火都变得很大”，船户说道：

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碎块朝我们砸下来。太可怕了。火星四处乱飞。电线闪着火苗落了下来。妈妈背着小弟弟，被风吹得站立不稳，摔倒在路旁。爸爸跟着跳了过去。“你没事吧？”他叫道。这时候义明喊道：“爸爸！”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救爸爸还是想和他在一起，但他们立刻就消失在了火焰和黑烟之中。[\[78\]](#)

大久保美智子当时只有12岁，她还带着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后者一定是在逃离火灾时与家人走散了。美智子拉着小女孩的手说：“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于是她们手拉着手跑了起来。她抬起头，看见一枚燃烧弹正落向她们，“火焰喷射而出，发出刺耳的声响”。小女孩的手从她手中滑脱了。她回过身去，看见了几个被火焰吞没的人：“小女孩棉头巾的一块残片飘到了空中。”几十年后，美智子在回忆此事时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她柔软的小手握在我手中的感觉，就像一片枫叶。”[\[79\]](#)

数千人涌向运河或者隅田川。在狭窄的老桥上，无数人同时从两端涌来，想要去往对岸，结果谁都动弹不得，被困在迅速蔓延的大火前。火墙吞没了他们，耗尽了空气中的所有氧气，把这些人全部送下了地狱。他们拼命想要呼吸，但空气已经变得滚烫，于是他们开始窒息、咯血，然后陷入痉挛。许多人跳下了桥，在水里寻得了片刻解脱，但是其他跳桥的人很快就会砸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挤下水里淹死。幸存者们回忆说，水里挤满了晃动的人头。“这是一幅地狱般的狂暴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消防队员加世勇回忆道，“人们都跳进运河，想要逃离地狱。”^[80]在小而浅的运河里，河水被全部蒸发，死者堆积如山。

浅草观音寺是日本最大、最著名的寺庙之一，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火灾中，即便周遭的建筑都被烧成平地，这里依旧安然无恙。此时，数千人涌进了寺庙及其宽敞的大殿，希望寻得庇护。成群的人涌了进来，直到把这里堵得严严实实。更多的人还在不断到来，想要挤进门廊，但里面的人则想方设法把他们挡在外面。当大火逼近庙宇时，火星和余烬开始落在巨大木门外恐慌的人群身上。从B-29上扔下来的凝固汽油燃烧弹不断从庙宇上方飞过，有些直接落在了寺庙的屋顶瓦片上。于是这座宏伟的木制建筑也烧了起来。火势迅速蔓延。燃烧的大梁从房顶掉落到被困庙中的人们的头上。想要挤进寺庙的大群人和想要冲出去的恐慌的人群迎头撞在了一起。当空气愈加灼热之时，许多人死于拥挤和踩踏，和寺庙一起被烧成灰烬。

隅田电话交换中心是东京的六大电话交换台之一，这里的规定要求操作人员坚守岗位灭火。操作交换机的都是些年轻女孩子，大部分还是青春期的少女。她们都受过训练，用潮湿的拖把和装在桶里的沙子和水灭火，保护设备。当B-29机群从头顶吼叫着飞过，大火吞没了周围的居民区时，操作员们仍在坚守岗位。女孩子们拿着水桶，从浴室甚至是厨房的烧水壶里接水。此时，交换中心的周围竖起了一排粗壮的电话线杆作为支撑，防止大楼在被炸弹击中时倒塌。但是大火烧着了这些木杆，并蔓延到了墙上。由于没有接到撤离命令，工作人员觉得自己必须留在

原地全力灭火。“当所有东西都着了火时，还是没有接到撤出办公室的命令，”维护工小林弘泰后来回忆道，“没有命令要你走，你就必须在岗位上坚守到死！事情就是这样。”^[81]夜班主管最后还是发出了撤离大楼的命令，但是对于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说，这已经太晚了。只有4名交换机操作员幸免于难，31人葬身火海。大部分死者都只有15岁到18岁。小林是仅有的几位逃出电话交换中心的员工之一。后来，他的老板要他解释为什么逃跑。“但是当他们来查看的时候，发现就连公共电话的硬币盒子都完全熔化了。他们就明白了。”^[82]

在火灾区域的中央，也有一些人仅凭运气活了下来。他们找到了一条能迅速逃走的路线，而且逃向了迎风方向。他们都找到了一片开阔区域，那里只要有一条沟渠或者一栋混凝土建筑，或者是高耸铁路路基下的一条安全过道，就足以保护他们免受高温和烈火之害。他们趴在地上，那里的氧气仍然足够呼吸，而且这也能让他们在高温的烘烤下撑到火焰熄灭。六年级的船户和代在一所学校后面的沟渠里找到了藏身之所。他的妹妹一直在哭：“好热，好热！”^[83]但她们聪明地一直趴在地上，就这么活了下来。有个小男孩躺在一条宽阔马路旁的阴沟里活了下来，路边就是大火。数百人逃进了两国火车站宽阔的铁路调度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开阔地，周围都是些无法燃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筱田友子是一位家庭主妇，她在匆忙跑过押上站时，别人要她待在那里别动。“那里又闷又热，我把脸紧紧贴在地上。地面附近的空气还算凉爽干净。”^[84]友子和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过了一夜。拂晓前后，她站了起来，陌生人却倒在了地下。“我晃了晃他，但他却死了。他们说，他死于大火带来的浓烟和高温。”^[85]土仓秀三是工厂工人，他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爬到了双叶学校的屋顶上。当火焰逼近时，余烬和燃烧的残骸落在他们的头上，孩子们哭闹着要回家。土仓则打开了屋顶的储水箱，舀出水浇在孩子身上，还浇灭了自己衣服上的火。然后他把两个小孩轮流泡到水里。“在接下来的90分钟左右时间里，我们一直如此反复。空气太热了，当我把孩子浸到水里又捞回到屋顶上时，他们衣服上

的水几乎立刻就蒸发干了。”土仓和他的孩子幸存了下来，没受什么伤。[\[86\]](#)

如此猛烈而范围广阔的大火，燃尽的速度也比较快。到3月10日拂晓，大部分火焰都已熄灭。火灾区域满是浓烟，呛得幸存者睁不开眼。人们可怜兮兮地拖着脚步，在街道上穿行。他们的皮肤被烧伤起泡，满面污垢，衣服被烧得褴褛不堪，眼睛红肿。有些人蹲在地上却不肯坐下，因为地面仍然有些烫人。城市成了一片闷燃的废土——堆满了灰烬和废墟，其间散布着一些被熏黑、损毁的混凝土墙壁、砖石烟囱，以及钢质护栏。这令那些中老年人回忆起了1923年的灾难。幸存者走向他们的家，或者说家曾经所在的地皮，但是有些居民区被彻底夷平，地标都已不知去向，他们也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们看到了城市远方的景观，那些前一天还根本看不见的遥远建筑。

当局随即开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清点、收拢和掩埋死者的工作。尸体被像积木那样摞起来。它们被烧得如同焦炭一般，大小只有生前的四分之三，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男人和女人的尸体无法区分，那些小号的尸体都是些孩子，死在父母的身旁。它们要么被就地焚烧，要么装上卡车集中掩埋，要么送到城市郊区集中火化。穿过屠场回家的路上，筱田友子看到地上有一双黑色的劳保手套。但是驻足仔细一看，她才发现那是人的手。她从一辆消防车旁走过，原本红色的车身此时已被熏黑；同样被熏黑的救火队员全都被烧死在车里。小川寿美回忆，隅田公园已经成了坟场，“一排排都是坟堆。人们挖出大坑，把煤油倒在尸体上进行火化”。[\[87\]](#)清冈美智子当时21岁，住在浅草，她当时靠在一堆仍在闷燃的尸堆上取暖。她说：“我能看见一只手臂，还有很多人的鼻孔。但那时候我已经麻木了。那气味仿佛永远沾在我身上，挥之不去。”[\[88\]](#)

当局打开了各处被用作庇护所的学校和其他建筑的门，结果只找到了成百上千的死者。在双叶学校旁的一个游泳池里，人们跳进水里以躲避高温和烈火。“那情景太可怕了，”一名目击者回忆道，“我们估计有超过1 000人挤进了水池。我们刚刚到那里时，水池里完全挤满了人。

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只有大人和小孩的遗体。”^[89]

根据东京警视厅的统计，这次空袭造成8.8万人死亡，4.1万人受伤，几乎100万人无家可归。大约26.7万栋房屋被彻底烧毁。16平方英里的城区化为灰烬。^[90]根据日本政府后来修正的数据，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还有些资料则估计人数高达12.5万。实际数据已无人知晓，这部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一城区的大部分官方户籍记录，部分由于军警人员不愿去清点遗体的准确数量。战后，一名东京官员告诉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审讯人员：“那情景太可怕，我已无法描述。空袭后我应该去做调查，但我没去，因为我不想看到那可怕的场景。”^[91]3月9日和10日火攻东京之战杀死的人数似乎超过了落在广岛或者长崎的原子弹，至少当场死亡的人数是如此。如果死亡人数的最高估算值属实，那么空袭东京当场杀死的人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加起来还要多。这是战争中最具灾难性的空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皆如此。此战的死亡人数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要多。

日本媒体隐瞒了灾难的规模。头版新闻都在强调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安然无恙。头条则指责美国进行“盲目轰炸”或者“屠杀式轰炸”。社论说面对着敌人愈演愈烈的暴行，相信日本人民的斗志将会被激起。

《朝日新闻》向读者保证：“我们为本土决战进行的军力积累不会被敌人这样的攻击所打断。相反，这将会激发我们的斗志，以及消灭敌人的决心。”^[92]

在关岛的指挥所棚子里，李梅在地板上踱着步，等候着前线的消息。大部分幕僚都睡了，但李梅却没睡。他一边抽雪茄，一边喝可口可乐。他告诉麦凯尔韦少校他睡不着：“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93]

关岛时间凌晨2点前不久，第一份“炸弹已投下”的电报发了回来。消息令人鼓舞，飞机损失看起来要比预期的少。七个小时后，第一架返

航的B-29落地，飞行人员报出了他们的结论：“东京就像松树林那样着了火。”^[94]任务领队鲍尔将军返航时带回了正在蔓延的大火的照片。一艘位于本州岛南部海岸足足150英里外的美军潜艇报告说海平线上升起了浓烟。三架B-29照相侦察机在3月10日中午飞到东京上空，在晴空下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当天深夜，空袭后的照片被送到了关岛的作战控制室，摊放在电灯下方的桌子上。照片显示，沿着隅田川两岸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损毁区域，覆盖大约16平方英里的城区。李梅叼着雪茄，脸上“毫无表情”，趴在桌子上，指着照片中的损毁区。“这里全毁了。”他说。他的手指顺着灰白色的带状地带滑动着：“这里毁了——这里——这里——这里。”^[95]在起飞的334架“超级堡垒”中，只有14架未能返回。损失率4.2%，低于此前任务的累计平均值。鉴于李梅和他的飞行人员担心损失会骤增，320架飞机安全返回的结果也算是一个惊喜了，这证明了李梅关于日方将会措手不及的理论是正确的。（战后，美国人才知道日本战斗机在狂暴的上升热气流中无法控制；它们甚至无法接近B-29，更不用说攻击了。）机组人员士气高涨，尤其是在他们看到航空照片显示敌国首都的1/5化为灰烬之后。这些照片被放大，标上箭头和注释，钉在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办公室和任务简报室里的公告栏上。

李梅急于赶在日本人拿出对策之前立刻再来一次闪电攻击。他想要他的飞机在返航当天，也就是3月10日夜晩前去空袭名古屋，但这是不可能的。奔赴名古屋的第一批飞机在3月11日下午升空，此时距离空袭东京的最后一批B-29返航刚刚过去30个小时。空袭名古屋又是一次“全力尽出”的任务：313架B-29起飞，286架抵达目标。战术和两晚之前在东京时如出一辙。攻击者投下了1 790吨燃烧弹，略少于东京的投弹量。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风速较低，建筑密度较低，消防队的反应也更有效——名古屋没有遭受东京那样的大灾难。数以百计的起火点未能汇聚成一整片大火场，它们烧毁了“仅仅”2平方英里的城区。但是，只要别按前一次东京的标准，名古屋的大火也堪称毁灭性灾难。城市多处最重要的工业目标受损或完全被毁。

48小时内连飞了两次15小时的任务，查尔斯·菲利普斯自打受训飞行以来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疲惫过。“两个晚上之前我们就见识过了这种大火，”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因此看到像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陷入火海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次和上回一样令人敬畏。和上次一样，我们低下头，数着被我们抹平的一个个街区。城市成了地狱。浓烟翻滚而来，我们坐在飞机里都能闻到名古屋燃烧的气味。”^[96]

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也是3月13日的火攻目标。204架“超级堡垒”飞到城市上空，从低空投下2 240吨燃烧弹。浓云遮盖了城市，但这并不影响雷达轰炸的精确度，此番轰炸比先前“更加密集，更加集中”。^[97]大阪城区9平方英里的区域被烧成白地。被摧毁的重要目标中包括了大阪兵工厂，日本陆军1/5的火炮炮弹便产自这里。大阪上空的上升热气流比四个晚上之前的东京更加凶猛。有一位飞行员形容说：“巨大的蘑菇状浓密黑烟几秒钟内就升腾到5 000英尺的空中。”第313联队有一架B-29名为“颠倒号”，这个名称真是名副其实，它被风暴掀了个底朝天，机组人员都被倒挂在肩带上。^[98]它向下俯冲了1万英尺——几乎栽到了地面上——飞行员才重新控制住了飞机并返航，最终安全回到基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务只损失了2架B-29，另有13架受损。

3月16日夜，307架B-29轰炸了神户，一座大型港口和工业中心，日本第六大城市。2 300吨燃烧弹烧掉了3平方英里的城市。日军战斗机的反击比此前几次空袭都更猛烈，但这些截击机也无力发动有效攻击，只有3架B-29未归。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闪电”空袭，是19日夜再袭名古屋。290架“超级堡垒”向这座城市扔下了2 000吨炸弹。机群向更小的一片区域更密集地投下了燃烧弹和高爆弹。马里亚纳群岛弹药库里剩余的几乎所有燃烧弹全都装到了飞机上。空袭又摧毁了名古屋3平方英里的城区，击伤或摧毁了诸如名古屋兵工厂、货运码头、爱知飞机发动机工厂之类的多处高优先级目标。

1945年3月的“闪电”火攻空袭到此便暂时告一段落。参加战斗的所有人——机组人员、后方参谋和地勤人员——都累坏了。必须要暂停一阵子了，否则技术事故就会成为大问题。不仅如此，马里亚纳群岛储存的所有燃烧弹在五次空袭中用得一干二净，补充弹药还要从海路运来。这段时间里，B-29机队不得不回到拿通用的“铁炸弹”进行传统轰炸的老路上。4月中旬之前是不可能恢复对日本城市进行火攻了。在这一间隙里，B-29机群还被强行要求去支援“冰山”行动，即冲绳登陆战。

在10天时间里发动的5次“全力尽出”燃烧弹轰炸中，B-29机群总共出击1 595架次，向日本投下了近1万吨炸弹。空袭在4座日本大城市中烧毁了32平方英里的城区。首次用燃烧弹夜袭东京时，美军出动了334架飞机，这几乎是此前空袭飞机数量的2倍。几乎在一夜之间，第20航空队的攻击能力就从50架飞机的级别骤增至300架。机群来回一趟要3 000英里，还要在仅仅1英里的高度飞越日本防空最严密的空域，而美军的累计飞机损失率只有1.3%，空勤人员损失率0.9%。在5月至6月间，火攻日本的作战还将以更大的规模重启，损失率还将持续下降。

燃烧弹空袭的大获成功，维护并巩固了第20航空队在参联会直接掌控下的独立地位。B-29未来将会执行一些战术任务——最主要的是轰炸九州岛的机场以支援即将到来的冲绳战役——但是李梅现在有了充分的信心，坚持自己应当获准去继续完成抹平日本城市的使命。他计划把他的空勤人员和飞机压榨到极限。他告诉华盛顿的上级，自己的部队到1945年8月时将能够每月出击超过6 000架次。数年后，他觉得如果当时海军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支援，保证他的B-29能够以最大力度不间断地空袭日本，这个国家可能等不到1945年8月就会投降：“我想这或许是有可能的。”[\[99\]](#)

18个月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鼓励人们从东京和其他城市疏散。现在这一行动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了。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除了离开城市，他们别无选择，其他许多人出于对灾难再临的担心，也加入了撤离的人流。从1945年1月到8月，东京的人口减少了超过一半。到战争结束时，

日本全国离开城市（如果还能称其为城市的话）的逃难市民可能超过1000万人。在城市的工厂中，经理们千方百计阻止工人旷工。东京消防总队给出了确信无疑的意见：首都在这样的空袭面前毫无防御能力。日本人关于必须坚守岗位并救火的原则被抛弃了，无论市民还是当局皆如此。他们现在意识到，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逃，空袭警报一响就赶紧逃。

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支武装车队载着裕仁天皇开过了皇宫的护城河，天皇视察了被烧毁的“下城区”的废墟。新闻报道中也不得不很直白地承认，空袭造成的损失“不轻微”或者“相当大”。^[100]但是日本政府到处都有眼线，大部分日本市民都清楚要闭嘴。“看起来还不算太坏”，在左邻右舍和陌生人之间，只有这样说才安全。^[101]

^[1] Arnold signed Marshall COMGENAAFPOA to Richardson for Harmon Info CINCPOA, December 7, 1944,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44.

^[2] “Those Who Witnessed Series—How Civilians Viewed the War,” NHK television documentary, accessed January 4,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JH2UzYrLw>; Okumiya, Horikoshi, and Caiden, *Zero!*, p.257.

^[3] “War History of the 5th Air Fleet,” February 10, 1945, to August 19, 1945, Library of Congress, Japanese Monograph Series, No.86.

^[4]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64.

^[5] John Ciardi,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p.201—2.

^[6] *Ibid.*, p.201.

^[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152.

^[8] Hansell,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p.217.

^[9] *Ibid.*, p.215.

^[10] Matsuo Kato quoted in *Time—Life Books, Japan at War*, p.157.

^[11]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00.

^[12] Michio Takeyama essay in Minear, ed., *The Scars of War*, p.62.

^[13] Kiyoshi Kiyosawa diary, January 2, 1945,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0.

^[14] “Let There Be a People of 100 Million Heroes,” *Mainichi Shinbun*, January 2, 1945, quoted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0.

[15] *Asahi Shinbun* headlines on January 15 & 16, 1945, quoted in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07.

[16]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43.

[17] Kiyoshi Kiyosawa diary, March 29, 1945, Kiyosawa, *A Diary of Darkness*, p.339.

[18]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

[19] *Ibid.*, p.26.

[20]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58.

[21] Quo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37.

[22] Quoted in *Time—Life Books*, *Japan at War*, p.44.

[23] Statement, Cabinet Board of Information, December 22, 1943, quoted in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73n1.

[24]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62;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6, 1944, p.2.

[25] Havens, *Valley of Darkness*, p.165.

[26]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22.

[27] Koiso address to Japanese National Diet, quoted in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September 8, 1944, p.4.

[28]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173.

[29] Hideo S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36.

[30]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October 4, 1944 memo cited in broadcast of October 11, 1944, p.3.

[31] Mihoko Nakane, diary entries, April—June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p.268—305.

[32] Naokata Sasak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68.

[33] Hideo S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37.

[34] Mihoko Nakane diary, June 17,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289.

[35]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summary, pp.5—9,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36] Pyle, *Last Chapter*, p.19.

[37] Welfare Office Monthly Report, pp.2—6, in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38] Dos Passos, *Tour of Duty*, p.73.

[39] Ibid.

[40] War Diary, Guam Island Commander, March 1945, p.4, NARA, RG—38: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Box 53.

[41]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p.340—42

[42] Truman J.Hedding, oral history, p.108; Lamar, “I Saw Stars,” p.12.

[43]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10.

[44]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42.

[45] Ibid., pp.341—42.

[46] Message 221837, Arnold (signed Marshall) to Richardson, Harmon, and Nimitz, December 22, 1944,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5, p.2471.

[47] CINCPOA PEARL to COMGENPOA, COMGENAAFPOA, DEPCOM 20THAF, etc., March 28,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08.

[48] Edwards to King, November 14, 1944;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1, labeled “General Spaatz.”

[49] Straubel, *Air Force Diary*, p.450.

[50]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77.

[51]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49.

[52] Selden, “A Forgotten Holocaust,” *Asia—Pacific Journal*, Vol.5, Issue 5, May 2, 2007.

[53] Ralph, “Improvised Destruction,” *War in History*, Vol.13, No.4, October 2006, p.498.

[54] Tanaka, *Tanaka, and Young, 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p.81.

[55] Park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 Short History*, p.170.

[56]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25.

[57] Ibid., p.122.

[58]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85.

[59]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12.

[60] Ibid., pp.351—52.

[61] Ibid., p.349.

[62] Fedman and Karacas, “A Cartographic Fade to Black,”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 , Issue 3, July 2012, pp.306—28.

[63]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75.

[64] Phillips, *Rain of Fire*, p.37.

[65] Pyle, *Last Chapter*, p.29.

[66] 这里的“吨”指的应该是美国人常用的“美吨”或称为“短吨”，一吨相当于907千克。——译者注

[67]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122.

[68]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8.

[69]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2.

[70]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1.

[71] Ibid., p.42.

[72] Ibid., p.37.

[73]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20.

[74]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4.

[75]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76]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11.

[77]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p.196—97.

[78] Kazuyo Fun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46.

[79] Michiko Okubo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p.207—8.

[80] Isamu Kase quoted in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81] Hiroyasu Kobayash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51.

[82] Ibid., p.352.

[83] Kazuyo Funato,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47.

[84] Tomoko Shinod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5.

[85] Ibid.

[86]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41.

[87] Sumi Ogaw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4.

[88] “Deadly WWII U.S.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89]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43.

- [90]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95.
- [91]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37.
- [92] *Asahi Shinbun* quoted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40—42.
- [93]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0.
- [94]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78.
- [95] McKelway and Gopnik, *Reporting at Wit's End*, p.194.
- [96] Phillips, *Rain of Fire*, p.45.
- [97]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54.
- [98]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54.
- [99]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68.
- [100]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23.
- [101] Naruo Shira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206.

第十三章

在硫黄岛的任务完成后，第58特混舰队回到乌利西锚地短暂休息、维修和补给。庞大的舰队把潟湖北部锚地停得满满当当。夜晚，尽管战时要灯火管制，但据目击者说，停泊的军舰上仍然能看到许多灯火。在巨大潟湖周围的岛屿上，露天剧场每晚都要放映电影。随着战线北移，所有人都打心底里厌倦了灯火管制，灯火管制也日益名存实亡。

3月11日，日落后大概1个小时，“乔克”克拉克将军站在他旗舰“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上，听到头上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抬起头，他看见了一架绿色的双引擎轰炸机，机翼上绘着红丸机徽。它迅速向停泊在1/4英里外的另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伦道夫号”俯冲过去。这架自杀机撞中了“伦道夫号”右后方飞行甲板下部，在飞行甲板上炸开了一个直径40英尺的大洞，并在机械车间和机库后部引发了大火。27名舰员被炸死，14架飞机被毁。半个小时后，第二架日军飞机撞上了附近的索尔伦岛并爆炸，炸伤了14人，一些地面设施受损。那个日本飞行员可能是把灯火通明的岛屿误当成停泊的军舰了。^[1]

这两架攻击机是从超过1 600英里外的日本九州岛一路飞来的，日本第五航空舰队将此次自杀攻击任务命名为“丹号”作战。当天上午，24架横须贺厂P1Y“银河”轰炸机（盟军绰号“弗朗西斯”）从鹿屋海军航空基地的主跑道上起飞。其中10架飞机由于引擎故障被迫折返或者在其他岛屿上迫降。还有几架飞机在远航途中失踪。下午6时52分，在飞了9个小时之后，领队飞行员电告鹿屋基地，报称幸存飞机达成对乌利西环礁的彻底突袭。第五航空舰队的参谋们对这一报告做出了过于乐观的评估，认为美军肯定有11艘航母被击中。^[2]实际上，被击中的只有1艘“伦

道夫号”。

这次超远程进攻彰显了“神风”自杀战术所特有的优势：无须留返航燃油，作战半径有效提高了一倍。克拉克将军称此次攻击“胆大包天，很日本”。[\[3\]](#)

三天后，第58特混舰队再次出海。大规模的舰队出航花费了大半天时间，5支半独立的航母特混大队每次一支，鱼贯穿越穆盖水道。他们穿过一片热带锋面向北航行，在恶劣海况和浓云的掩护之下颠簸前进。这些特混大队的指挥官是海军航空兵将领“乔克”克拉克、拉尔夫·戴维森、“泰德”谢尔曼，以及阿瑟·拉福德；小一些的第五支大队（58.5大队）专司夜间作战，由马特·加德纳少将指挥。第58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彻尔搭乘在谢尔曼第58.3特混大队中的“邦克山号”航母上。他们的任务是打击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南部的日军航空兵基地，以图削弱日军航空兵对两个星期后打响的“冰山”行动，也就是登陆冲绳之战的反击。

3月17日至18日夜间，美军接近九州岛南岸时，日军侦察机在特混舰队周围投下了照明弹。“企业号”的夜间战斗机击落了两架侦察机，但是雷达却显示，美军舰队外围还有更多侦察机出没。此番，美军便不再有突袭的战术优势了。[\[4\]](#)

日军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宇垣缠将军，坐镇鹿屋基地的司令部，掌控着各方面的目视报告和雷达侦察报告。远程侦察机确认美军舰队主力在3月15日离开了乌利西。3月17日日落后，夜间巡逻机接触了美军舰队的先头部队。宇垣心知肚明：猛烈的空袭3月18日早晨就会落在他的机场上。

两个星期前，东京帝国大本营的陆海两军分部定下了保守使用本土航空兵力的政策。最好和最有经验的飞行队都要留到登陆舰队接近日本海岸之时再出击。仅仅“航母空袭”到来时是不会动用他们的。即便美军舰载机出现在本土上空，日军飞行员和飞机也应当尽最大可能避免接

战，“应避免主动作战，以保存实力”。^[5]换言之，日军航空兵将会保存自己，来日再战，即便任由其机场遭到肆意空袭也在所不惜：“原则上，不要为战略要点的防空投入反战斗机作战，除非条件格外有利或者迫不得已。”^[6]

但是宇垣从来不接受这种任人宰割、安于自守的策略。他预计美军战斗机的扫荡会严密压制日本南部的航空兵基地，令其无法飞往外海侦察，也就无从知晓登陆进攻是否会到来。当第58特混舰队向九州岛东面的起飞点航行时，宇垣担心美军的航母空袭“会没完没了，我们即便想要保存实力也保不住。我没法坐等着看〔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因此，宇垣利用他个人的权威做出了决定，第五航空舰队“全力以赴”发动反击。^[7]

3月18日拂晓前，在九州岛南端以外90英里处，美军航母放飞了130架“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这第一批战斗机扫荡部队在空中未遇到对手，飞行员在地面上也没见到什么飞机，于是只好扫射一些地面设施了事。大约40分钟后，轰炸机群来了，里面有60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由40架战斗机护航。当天下午，第二轮空袭深入内陆，攻击了九州北部的机场。飞行员们返航时宣布在空中击落102架敌机，在地面毁伤275架敌机。^[8]

海岸外的美军特混舰队发现自己身处低垂的浓云之下，云底就悬在飞行甲板上方仅仅500英尺处。这在战术上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日军飞机可以借此躲避巡逻战斗机，在高射炮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突然穿出云层冲下来。“企业号”的前部升降机吃了一枚重磅炸弹，“勇猛号”也受了轻伤，一架G4M轰炸机落在其近旁的水面上。下午3点刚过几分钟，“约克城号”航母（第58.4大队拉福德将军的旗舰）的通信舰桥右侧也被击中。所有三艘航母都控制住了损伤，但是面对如此决心坚定而且技术娴熟到出人意料的常规轰炸（非“神风”攻击），舰员们心里直发毛，这看起来意味着日本人为战争的高潮而保留了一些最优秀且最有经验的飞行员。

第二天上午，这一想法就得到了证实。当时一支大规模攻击机群起飞扑向停泊在濑户内海的吴港和广岛港的日军军舰。攻击机群此番打得十分艰难。在四国岛北岸的松山机场上空，两个中队的“地狱猫”战斗机从后方和上方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伏击，来者是精锐的第三四三航空队，他们驾驶的都是高速而动力强劲的川西N1K2—J“紫电改”战斗机。1945年3月19日在松山上空的格斗中被击落的美军飞机数量不明，但日军宣布自己击落了超过12架美机。余下的美军飞机还将在吴港上空遭到进一步的沉重打击，那里的高射炮火十分猛烈。SB2C和F6F投下炸弹，命中了多艘日军军舰，但无一击沉。这天，美军损失了60架飞机。

与此同时，一支日军攻击机群也迎头飞向美军特混舰队，在四国岛南岸外不远处找到了目标。2 000英尺高度上的断云再次令敌攻击机得以甩脱美军战斗空中巡逻机，米彻尔形容这一情况“对敌人堪称完美……雷达再次无法应对”。^[9]大批熟练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俯冲到戴维森将军第58.2特混大队中央的大型航母上空。早晨7时10分，“黄蜂号”遭到沉重一击，炸弹穿透3层甲板之后爆炸，炸死了差不多100名舰员。几分钟后，一架横须贺D4Y“彗星”俯冲轰炸机在“富兰克林号”正上方大约1 000码处穿出云底，赶在美军炮手来得及反应之前投下了两枚250千克炸弹。致命的落弹穿透了“富兰克林号”的飞行甲板，穿入了舰体深处。结果是灾难性的。“大本”^[10]遭受了太平洋战争中所有其他未沉航母都没有遇到过的严重爆炸和火灾。数百人被当场炸死，有些人甚至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航母遭袭就命丧黄泉。

攻击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舰桥上的舰长莱斯利·格雷斯上校都没有见到那架敌机和它投下的炸弹。“富兰克林号”当时正在放飞飞机。停机位上的炸弹和已经装填好的机枪弹被爆炸引燃，并发生了连续爆炸。有几架F6F“地狱猫”挂装了“小蒂姆”火箭弹，它们也被点着，从损毁的飞机上发射了出去。根据副舰长乔·泰勒中校的说法：“火箭弹呼啸着，有些射向右舷，有的射向左舷，还有些沿着飞行甲板飞去。这些武器从近旁呼啸而过，是一个人有幸得见的最恐怖的场景。有些火箭弹直飞了

出去，有些则跌跌撞撞从一端飞到另一端。每次有一枚火箭射出，前方的救火队员就会本能地卧倒在地。”^[11]救火队员们不得不寻找掩护，这就妨碍了他们灭火的努力。

在特混舰队的其他舰上，旁观者们举起望远镜看向了爆炸的航母。旗舰在至少15英里外的拉福德将军，注意到了蘑菇云和他所见过的单艘军舰升起的最大的烟团。“我们无法相信遭受如此劫难的船上还有人能活下来，”他说，“我心里已经在对我的同学戴维森将军和我那身为‘富兰克林号’舰长的朋友莱斯利·格雷森上校告别了。”^[12]在12英里外的“约克城号”上，舰桥上的一名军官数出了9次巨大爆炸。一名战友说：“就这样了，兄弟！我们可以和‘大本’说再见了。”^[13]

但是格雷森舰长选择拯救自己的军舰。巡洋舰“圣菲号”靠到侧舷，接走了许多幸存的舰员，包括戴维森将军和他的幕僚班子。（他把将旗迁移到了“汉考克号”上。）救火队奋战了四个小时，直到上午11点，火势才被控制到能让巡洋舰“匹兹堡号”开过来拖曳“富兰克林号”的程度。很快，这艘被打得不像样的航母就开始以3节航速向南航行了。^[14]次日凌晨3点，在昼夜不休的拯救之下，“大本”恢复了动力，能够用它自身的蒸汽开出20节航速了。斯普鲁恩斯让这艘舰返回乌利西，继而去往珍珠港，再进行1.2万英里的远航开回纽约，用的都是它自身的动力。

在它沿途的每个港口，人们都向它行注目礼。“富兰克林号”已经成了废墟，到处都被熏黑、破烂不堪，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它飞行甲板上有一些无法辨认形状的焦黑的钢块，那是它舰载机的最后痕迹。（火焰如此猛烈，飞机的残骸都熔化进了舰体，甩都甩不掉。）“富兰克林号”的伤亡清单中有807人死亡，超过487人负伤，几乎是其舰员总数的一半。正如切斯特·尼米兹后来总结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甚至在历史上，没有其他哪艘受到如此重创的船还能浮在水面上。”^[15]

在日本南部外海的两天空袭中，第58特混舰队攻击了日本的机场、

港口和战舰，在空中和地面摧毁了大约400架敌机，但是自身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6艘航母被击中受伤，其中3艘（“企业号”、“黄蜂号”和“富兰克林号”）需要回到后方基地进行大修。3月20日，米彻尔决定撤出这一区域，不再进行第三天的空袭。受损军舰在强大护航兵力掩护下被送回乌利西，其余军舰则在冲绳岛东南150英里海面上与勤务中队会合，加油装弹。第58特混舰队是无法休息的。即将于4月1日开始的“冰山”作战，即登陆冲绳之战，还需要舰载机大队的支援。^[16]

太平洋上每一场登陆战的规模都比前一场更大，这已经成了一个铁律。冲绳之战是战争中最后一次两栖作战，因此，它的规模也超过了先前任何一次登陆。地面部队拥有来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18.3万战斗部队，此外还有12万勤务部队和工兵部队。运输和后勤舰队拥有超过1200艘船。这还不包括第58特混舰队和英国太平洋舰队的大约200艘军舰，它们将为作战提供空中掩护。冲绳岛距离旧金山6100英里，距离硫黄岛850英里，距离马尼拉920英里，距离关岛和乌利西均为约1400英里——但距离日本本土只有330英里。盟军部队将在一条长到前所未有的补给线末端，在处于敌人不间断空袭之下的水域中，一连作战几乎三个月。“赖着不走的舰队”（水兵们这样称呼舰队）每个月都要烧掉600万桶燃油。所有这些都要经由商用油轮和舰队油轮送到战区。

出于保密原因，只有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才知道到底有多少船只参加作战。中下层官兵只能靠猜，他们试着数清海平面上的船只，但这就像在晴朗的夜空数星星一样根本不可能。

从1945年3月23日，也就是登陆的一个星期之前起，第5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就开始时常出现在冲绳上空。它们在这里进行轰炸和扫射，照相侦察，以及战斗空中巡逻。透过浓云的缝隙，“约克城号”一架TBM“复仇者”飞机的机组人员看见了“一座迷人的小岛，有起伏的山峦，绵密的森林，沿着山坡向下，则是如方格被子一般褐色和绿色交织的农田地块”。^[17]这座岛屿的经济主要局限于渔业和农业，主要的作物

包括甘蔗、稻米、甘薯、甜菜、大麦和卷心菜。岛屿的中央平原和相当一部分山坡上满是甘蔗田、梯田和水稻田。只有山顶还保留着浓密的森林，长满了榲树和常绿的松树。岛上的道路都是些土路，宽度足够马车通行。不起眼的小村庄散布四处，覆盖着茅草屋顶的石头房子紧紧挨在一起。朝西的山坡上点缀着形如七弦琴或者锁眼的石头墓碑，其中许多显然被纳入了日军的筑垒体系。

冲绳岛长约60英里，宽3英里到15英里不等，面积约480平方英里。岛屿北半部地形崎岖，森林密布，人口稀疏。战前大约80%的人口住在岛南1/3的面积上，那霸和首里两座城市都位于这一区域。第58特混舰队的飞机攻击了读谷、嘉手纳、浦添、那霸的岛上主要机场，所有的跑道都被炸得坑坑洼洼，日军看起来已经放弃了对这里的防御和修复。机场上几乎见不到日军飞机，除了残骸。1944年10月，第3舰队的航母空袭毁灭了那霸市，城区大部分被烧毁，居民也流落各地。在岛屿最南端地区，地形崎岖，遍布着断崖、高山、深谷、峭壁和天然岩洞。在南侧海岸，陡峭的悬崖紧挨着岩石海滩。岛上仅有一条铺平的公路，就是连接那霸和首里的双车道高速路。

美军航母的飞行人员来此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冲绳是个人口大岛，他们知道这一点，1940年时岛上人口80万人——但是现在，当他们从飞机向下看时，却几乎见不到人。尼米兹的情报分析人员估计岛上日军为6.5万人。实际数字接近10万——但是从空中难以确定碉堡和火炮阵地的位置。[\[18\]](#)然而在岛屿南部首里周围的群山上空反复盘旋之后，目光锐利的飞行员们还是逐步辨别出了一条由严密伪装的堡垒组成的横跨东西海岸的绵亘防线。3月25日，米彻尔电告里奇蒙·特纳中将：“从照片上看，整座冲绳岛似乎布满了洞穴、隧道和火炮阵地，尤其是道路沿线。能看到坦克和装甲车辆出入山洞。这里会很难打。”[\[19\]](#)

虽然说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但是岛民们在文化、血统、语言上和日本人都一样。总体来说，冲绳人比他们的北方邻居个子更矮，脸也更圆一些。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岛屿一直是琉球王国的国王所在地，其

统治区域覆盖整个琉球群岛。年轻的冲绳人会在学校里学习日语，而且说得很流利，但是老人和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居民还是只会说冲绳话。日本兵们总是把当地人视为下等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要求数十万冲绳人撤往台湾岛和日本本土，数万日军则在这几年里陆续来到岛上，因此1945年时冲绳的总人口为45万至50万人，其中10万人是日本军队或者受日军指挥的当地民兵。

所谓“南西诸岛”从琉球绵延至台湾，长达800英里。作为其中最大、最重要的岛屿，冲绳正处于战略十字路口上。这里距离台湾岛、中国大陆和九州岛的距离都差不多，飞机从此地出发，可以轻易覆盖这些地方。若落入盟军手中，这座岛屿就可以成为进攻日本的后勤中转站，同时岛上还有大量土地适合建设大型机场和港口。这里的机场能够让盟军航空兵控制东海上空。岛屿本身也将会被用作重要的作战基地和进攻九州的跳板。

美军部队由第5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将军统一指挥，他一直主张进攻冲绳，并说服了尼米兹和金。特纳将军指挥运输船队和联合远征军。他麾下的舰队被统称为第51特混舰队，包括旧式战列舰，护航航母，执行护卫任务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数百艘突击运输舰，数千艘登陆舰艇，扫雷舰，医院船，和数不清的其他辅助舰船。作为美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两栖战专家，他自从1942年瓜岛战役以来率领了一次又一次的两栖战，“恐怖特纳”是少不了的。但是这位将军已经身心俱疲，脾气也比之前更大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特纳每晚都要喝得酩酊大醉，这可是明文禁止的。斯普鲁恩斯、尼米兹和金都知道他泡酒坛子的事，但是大家都认为他会比其他任何人都干得更好，也就随他去了。

登陆部队被编组为第10集团军。由美国陆军的小西蒙·B.巴克纳尔中将整体指挥。这支部队的主力是陆军第24军，包括三个步兵师（第7师、第77师和第96师），由约翰·R.霍奇少将指挥；以及第3两栖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6师，由罗伊·S.盖格少将指挥。另外还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一个师被留作海上预备队。英国太平洋舰队被编为第57特

混舰队，负责掩护冲绳和台湾之间的南方海域。这支舰队编有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以及15艘护航舰艇，规模和实力相当于美军一支航母特混大队。其指挥官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直接向斯普鲁恩斯将军汇报。由于英军舰队的海上加油和补给能力未臻成熟，它还需要严重依赖美军的后勤支援。

冲绳岛周围的海域水深通常不超过100英寻^[20]，很容易布雷。岛屿附近水域被布设了超过1 000枚锚雷或漂雷，正是这一威胁导致了1945年3月26日驱逐舰“哈利根号”在那霸以西水域的突然沉没。到“L日”[也就是计划登陆日期4月1日，称之为“Love Day”（“爱日”），缩写“L日”]之前，美军扫雷舰已经清扫了冲绳周围的25万平方英里海域，包括岛屿近处浅水区的6个主要雷场。由于需要近岸作业，这些扫雷舰理论上很容易受到岸炮的攻击——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日军没有向它们开火，这可能是为了避免暴露其海岸炮的位置。扫雷舰完成任务后，会布设无线电浮标，以标示出安全通道。

3月26日，也就是L-5日，第77步兵师的3个营在冲绳岛南部西侧15英里外的庆良间列岛登陆。由500名左右日军组成的小规模守备部队很快被打垮。这个小岛群的多山岛屿并没有适合修建机场的地方，但是其最大的岛屿（渡嘉敷岛）和西边5个小岛之间形成了一块南北延伸的半封闭内部水域。此处“庆良间锚地”足以容纳大约75艘吃水二三十英寻的大型船只，它将被用作舰队的前进锚地。其狭窄的入口处将布置防御，以免敌人潜艇进入。主要锚地西侧是一片适合用作水上飞机基地的区域，在这里，只要不是最恶劣的海况，长长的卷浪都不会妨碍水上飞机的起飞和降落。3月27日，几十艘辅助船和修理船开始在此锚地下锚。在这处距离冲绳登陆滩头只有数英里的防风浪水域里，一支浮动的后勤舰队将能在漫长的战役期间为前线部队提供燃料和弹药补给。一支救援和维修大队将在这一距离冲绳不到一小时航程的前进阵位上为舰队提供应急舰船维修。庆良间登陆战还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美军在这里缴获了350艘还没有来得及扑向美军舰队的“震洋”胶合板自杀快艇。

3月31日，另一支部队在冲绳以西仅仅8英里处的神山岛登陆。这令美军的155mm火炮可以直接攻击冲绳岛的目标。

在登陆前的这整整一周时间里，日军从南九州和台湾的航空兵基地向美军舰队发动了接连不断的空袭。盟军的情报人员和航空分析人员试图判断出日军残余空中威胁的规模和恢复能力。他们的意见极不一致，对日本本土作战飞机数量的估算差异很大，少至约2 000架，多则约5 000架。从九州到冲绳的单程飞行距离不足400英里，空中威胁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盟军阵营中无人敢说知道日军到底有多少老手飞行员还活着而且能升空，但3月18日至19日的空战已经证明至少还有一批这样的人存在。当第58特混舰队在3月19日退出那场战斗时，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首次成规模地使用被称为“樱花”的人操自杀弹向敌人发动进攻。19架G4M轰炸机从鹿屋基地起飞，每架飞机都挂载了一枚火箭推进的“樱花”弹，自杀弹座舱里坐着一名飞行员。轰炸机要把它们带到距离美军舰队40英里之内的地方，“樱花”将从机身下投下，向美舰发起撞击。但是美军舰队的雷达捕捉到了这支日军机群，“地狱猫”战斗机赶来截击，它们在日军还没来得及发射“樱花”的时候，就在舰队的60英里外将G4M轰炸机全数击落。每一枚“樱花”重量超过2吨，这一沉重负担令轰炸机变得缓慢而笨拙，因此很容易击落。日军此前还从未认真考虑过“樱花”的这一“阿喀琉斯之踵”——笨重、超载的母机很容易在抵达发射距离之前被拦截击落。

3月26日午夜刚过，驱逐舰“金伯利号”遭到了两架爱知D3A俯冲轰炸机的撞击。舰上的高炮击落了一架飞机，但另一架撞中了它的尾炮塔基座，炸死炸伤超过50名舰员。这艘舰在庆良间锚地简单修补之后，返回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维修。第二天，“神风”自杀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一整天的空袭，命中了美军战列舰“内华达号”和“田纳西号”，轻巡洋舰“比洛克西号”，还有其他几艘驱逐舰、运输船、扫雷舰和布雷舰。3月31日，登陆前一天，斯普鲁恩斯将军长期以来的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遭到一架中岛Ki-43（盟军绰号“奥斯卡”）战斗机的攻击。俯冲而来的日机在撞上军舰左后方之前一瞬间投下了炸弹，炸弹击

穿了冷凝器舱和食堂，在军舰的油槽旁爆炸。该舰在庆良间简单修补后奉命回国维修。斯普鲁恩斯把将旗转移到了战列舰“新墨西哥号”上，这艘舰对“神风”攻击也不陌生。根据他的副官查尔斯·巴伯上尉的说法，斯普鲁恩斯展现出了标志性的超然态度：“他只是对于在登陆之前失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及自己无法在这艘舰上观察战斗而十分失望，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他有任何反应。”[\[21\]](#)

L日前的72小时里，海军炮击大队将高爆炸弹倾泻在岛屿西岸的渡知具海湾沿岸的登陆滩头上，位于那霸以北11英里处。和以往的两栖登陆一样，火力支援任务中出力最大的还是那些“德高望重”的“OBB”——“老式战列舰”——其中有不少在珍珠港之战中失去了战斗力，后来又被捞起重建。这些老舰太慢，无法和航母特混舰队协同作战，但它们打出的重拳却一点也不含糊。这些老舰由莫顿·L.德约少将指挥，他的火力支援大队还有9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和117艘加装了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的步兵登陆艇（LCI）。在登陆前的最后24小时里，德约的舰队向冲绳岛上的各个目标发射了3 800吨舰炮炮弹。炮击日夜不停，全面彻底，无休无止，有时并没有瞄准任何特定目标，而只是随机选择一块区域进行炮轰。一个驱逐舰水兵想知道为什么要整夜进行这种凌乱的炮击，别人告诉他：“这是要让日本人睡不着。”[\[22\]](#)那些在岸上承受如此巨量弹幕的人，称其为“钢铁台风”。

事后看来，大部分炮击都浪费了。冲绳南部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炮火夷平。登陆海滩内陆的机场即便已经被日军放弃，而且早已无法使用，也还是被炸成了月球表面——新弹坑落在旧弹坑上，一层叠着一层。

突击部队被告知要做好在登陆海滩上遭到凶猛反击的准备。根据第10集团军的作战预案，日军在登陆区布置了一个坚固设防的联队，而且敌援军很快就会抵达。美军第一批登陆编队将会遭到猛烈的火炮、机枪和迫击炮打击。在海滩的高潮位线上方矗立着一座6英尺高的防波堤，进攻部队不得不用木梯子爬上去。通过这道障碍之后，他们就要向着拥

有“猛烈机枪火力”的碉堡和有掩护的堑壕冲锋了。[\[23\]](#)冲绳岛的“爱日”，恰好又是复活节和愚人节，美军预计这将会是个伤心的日子。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被告知要做好在海滩上伤亡80%到85%的准备。[\[24\]](#)

一支独立的火力大队和进攻师（第2陆战师）奉命绕到岛屿东南海岸，这是一次伪装“大游行”——他们将进行模拟登陆，以引诱日军将援军派往岛屿此处。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最逼真的此类佯动，只有在太平洋战区运输船和登陆舰艇空前充裕的此时才做得到。日军指挥官显然中了计，他们后来报告称自己在那一片海岸击退了一支大规模登陆部队。

4月1日拂晓前，登陆兵们从床铺上起来，开始了他们熟悉的D日流程——收拾背包、卡宾枪、弹药、饭盒和其他装具，给枪支抹油，磨刺刀，排队排到船头，以及狼吞虎咽地吃下他们传统的“死刑犯早餐”提供的牛排煎蛋。每一支部队都混合着新兵蛋子和百战老兵，这一点陆军和陆战队都一样。几乎所有士官都打过至少一场两栖登陆战，许多人更是打过两次或者更多。他们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并把他们的知识经验分享给了新兵们。巨舰大炮开始向海滩后方的区域猛轰，包括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即便是老兵们也被如此宏大的炮击惊到了。尽管见识过先前的作战，他们还是怀疑是否有活物能从如此凶猛的火力之下幸存。他们看着四周绵延至海平线以外的几乎无穷无尽的船只，感到不可思议。一名陆战队员说道：“我们舰队的巨大规模令我信心十足。”[\[25\]](#)

这一天风和日丽，天上有一些云彩，轻微东北风，海面平静。气温约24摄氏度。那些在热带高温和南太平洋雨季里打过仗的军人很欢迎这种凉爽的天气。乘坐运兵船从乌利西开来的途中，天文爱好者们能看到南十字星座一晚接一晚地沉向南方海平面，直到最终消失。（南十字星座被绘在了第1陆战师的肩章上。）登陆部队领到了羊毛衬里的拉链野战夹克，这种战斗服在所罗门群岛和帕劳群岛根本用不上。

当岛屿的东方露出第一道曙光时，突击部队沿着吊绳网来到了下方

等候着的希金斯登陆艇上，每个人都紧挨着相邻战友在条凳上落座。艇员们操纵着满载的登陆艇来到海上进攻发起线附近水域，引擎空转，排出的废气在海上飘荡。登陆艇紧紧趴在海面上，海浪扑打着侧舷上缘，时不时还灌入艇内。舰载机在上空盘旋。战役的巨大规模和芭蕾舞般的复杂性令登陆部队官兵惊叹不已。

上午8时30分，指挥艇上升起信号旗，第一批登陆艇的舵手打开了油门。登陆艇们越过战列舰和巡洋舰，彼此间保持着100英尺的横向间隔，沿着前方登陆艇的尾流稳步开进了笔直、狭窄的航道。打头阵的是炮艇，它们一边前进一边用火箭弹和3英寸舰首炮开火。紧随其后的是引导艇，艇上飘着彩旗，以标示不同的登陆滩头。它们长长的白色尾流彼此完全平行，就像梳子的梳齿一般。一名观察员发现第一批登陆部队“带着一股中世纪战争的色彩和宏伟感，看不到边的部队打着旗帜向前推进。在早晨宁谧的阳光下，这真是一幕令人难忘的景象”。^[26]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站在“田纳西号”的甲板上看着这一幕，他形容40mm曳光弹“就像一团团白色火球，看起来似乎就要落在登陆艇中间了，但它们低伸的弹道还是令其飞到了海滩上”。^[27]

沿着7.5英里宽的海滩，美军划分了16个不同的突击登陆区。两栖舰队和滩头之间有一些大型珊瑚暗礁，但是登陆时间赶上了高潮位，暗礁影响大为削弱，而且水下爆破组已经在珊瑚礁中间清理出了可通行的航道。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后，突击部队便立起了大幅彩旗以标志各个登陆区。陆战队的登陆区在比沙河口以北，陆军则在河口以南。

“冰山”行动: 冲绳之战, 1945年4月—6月



即便在第一批登陆艇靠岸前，艇员和突击部队官兵就发现他们遭到的敌人火力攻击很微弱。时不时会有一股白色水柱溅起，表明有一发迫击炮或者是火炮的炮弹落下来——但是和先前的两栖登陆相比，这些炮弹数量更少，落点也更稀疏。只有一挺日军机枪嗒嗒作响，它很快就被海岸外军舰上的重炮打掉了。还有一股迫击炮火力，美军发现其射击阵地位于比沙河口附近，于是很快也将其打哑。第一批登陆艇上都携带了木梯子，准备用来攀爬将会在海滩尽头遇到的防波堤。但是登陆艇靠岸后，陆军和陆战队士兵们却发现防波堤远比之前说的要低矮——大部分地方不超过3英尺——而且舰炮轰击已经将其大部分夷平。突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敌人的轻武器和远程炮兵火力，但是并没有遭遇反击。渡知具湾一片平静。登陆基本未遇抵抗。

当第二批部队登陆时，官兵们干脆挺着腰板大步走上海滩，都懒得猫腰。在河口北侧的黄滩，第1陆战师的各个进攻营向内陆推进时都端着上了膛的枪，却完全没有遇到敌人火力。他们在船上听任务简报时得知这里会有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但实际上却连一点影子都没见到。第一批部队登陆一个小时后，已有1.6万名美军登上了冲绳岛并向前推进，只遇到微弱而零星的抵抗。这些区域大部分都被放弃。日军甚至在读谷和嘉手纳两个关键的机场都一仗没有打就放弃了，到中午时，两个机场双双落入美军手中。

登陆部队都为他们意料之外的死刑缓期感激不尽。登陆一小时后，第7步兵师的一名士兵评论道：“我已经活得比我预想的要长了。”^[28]第1陆战师的尤金·斯莱奇称这是“战争中最大的惊喜”。^[29]随同第6陆战师登陆的《纽约客》战争通讯员约翰·拉德纳形容这次登陆就像是“抓捕持枪歹徒的警察勇猛地冲进一间房屋，却突然发现那里只不过是闹鬼而已”。^[30]登陆一个小时后，突击部队已经开始轻手轻脚地从登陆艇上下来，跳过海浪以免海水灌进靴子了，他们在海滩上游逛，就像是周末远足一样。团级和师级指挥梯队比计划中的时间提前上岸，在海滩建起了临时指挥所。推土机已经开始推平海滩最上面的沙堆，以清理出通向内

陆机场和补给堆栈的道路。在急救所，医护兵们蹲在地上谈天说地，他们根本无事可做。美军在沿岸的渔民棚子里找到了几个冲绳本地人。他们向美军深鞠躬，并把冲绳本地人的文身露出来，解释说：“不是日本。”他们不是日本人，也希望美国人知道这一点。

到“爱日”日落时，登陆部队已经占据了长度超过8英里的滩头，向内陆推进的最远距离达到3英里，并且拿下了2座机场。5万美军已经上岸。伤亡之少令人欣慰——28人死亡，104人受伤，27人失踪。[\[31\]](#)

在渡知具南面12英里外的绿色山顶上，日军牛岛满中将和一群参谋正看着美军部队上岸。这些人抽着烟，说着话，轮流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这场两栖登陆的全景。见到密集的舰炮炮弹落在海滩上方基本被弃守的区域里，他们露出了一丝笑意，因为这浪费了敌人如此之多的弹药。但仅仅是登陆部队的数量和战役规模便足以令人敬畏和警觉了。有人觉得这“就像是大海本身吼叫着扑了上来”。[\[32\]](#)

在硫黄岛和佩里硫，日军选择了纵深防御策略，将主力部队集中于滩头后方高耸的岩石山区，并藏身于地下深处，以躲避美军的优势空中力量和海岸外的舰炮火力。守军计划放任敌人登陆，并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地区耐心等待美国人自投罗网。然而和硫黄岛、佩里硫不同的是，冲绳岛的日军要等敌人推进到内陆深处预设的主要陆地交战区后才让他们自己的重炮投入战斗。日军会保存弹药，把火炮隐蔽在山洞口或者伪装网下，他们打算先节约弹药，直到能够最有效发挥威力时再开火。

牛岛的战役计划充满了争议。围绕这一计划，参谋军官和部队指挥官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和台湾、东京的更高指挥层级的意愿也进行了抗争，直到不久前的1944年底，该计划才付诸实施。早先的作战计划强调空中防御，依靠坚固而物资充足的机场和从邻近的九州岛不断飞来的飞机进行防御。在1944年的头10个月里，冲绳岛的军事建设项目一直聚焦于扩建和升级岛上的机场。冲绳和邻近的小岛上一度有18个不

同的机场在同时开工。帝国大本营甚至将冲绳视为60英里长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日军高层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概念中的明显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套岛屿机场网络怎样才能美军无穷无尽的陆海空三路毁灭性力量面前保住自己？他们在攻占自己看中的岛屿时还从来没有失手过，而且其实力还在越来越壮大、强悍，每过一个月都会变得更加技术精熟。美军航母特混舰队将会掌握机场上空的制空权。而低平的地形不可能顶住优势地面部队的进攻，尤其是在他们还能得到海岸外压倒性的舰炮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投入大量人力和物资来升级机场，只会提高它们对盟军的价值，机场将不可避免地落入盟军手中并被掉过头来对付日本。牛岛将军的一名计划人员总结道：“我们的地面部队汗流浹背、累死累活地建设机场，就像是要把它们当成礼物送给敌人一样。”[\[33\]](#)

岛上的日军地面部队统一纳入第三十二军麾下，由牛岛指挥，其复杂的指挥地堡设在首里要塞的地下，该要塞是那霸东面山坡上一座古代的石头城堡。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二十四、第六十二步兵师团，第四十四独立混成旅团，第二十七战车联队，第五炮兵司令部。第三十二军司令部还直辖诸多独立的精锐炮兵、迫击炮、高炮和反坦克炮专业部队。在那霸以南的小禄半岛还驻有约9 000名海军基地部队；他们原本和第三十二军彼此独立，但按照事先达成的共识，从4月1日美军登陆起，他们便转由牛岛统一指挥。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部队和人员，岛上日军正规部队的总兵力达到了大约7.6万人。此外还有一些冲绳本地民兵和应征入伍人员，其中有些人接受了作战训练，其他人则只是劳动力，他们使得岛上穿军服的人总数达到约10万人。

1944年末，随着盟军的实力增长，冲绳遭到进攻的可能性与日俱增，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开始谋求将作战计划推倒重来。高级作战参谋八原博通大佐认为，第三十二军的实力无法让其守住海滩、平原，以及东京方面想要的各个机场。他更想在易于防守的冲绳岛南部山区打一场消耗战。参谋长长勇少将支持八原的观点，他把提案提交给

了牛岛。牛岛力排众议批准了这一方案。1944年11月26日，即便没有经过帝国大本营的批准，修订后的作战计划还是被发了下去。此举近乎抗命，但是此时冲绳岛守军的各级官兵早已有了犯上之意。无论是在一线士兵中还是在牛岛指挥地堡的高级参谋军官中，人们都能听到对东京上峰的怒斥，说他们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只知道害怕美军飞机和潜艇，根本不敢亲自到冲绳岛上来察看情况。有个军官讽刺道，他们或许没有理由来，因为那霸的红灯区已经被美军舰载机空袭烧毁了。^[34]

于是大部分可用的劳动力和物资都被投向了冲绳南部。那里，在那霸东面的崎岖乡间，日军设计了一套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和挖掘计划，构筑一套包括相互连接的隧道、碉堡、暗堡、战壕、坦克陷阱、炮兵阵地以及狙击手阵地的庞大体系。工事组成一条绵亘防线，横贯全岛，从一边海岸延伸至另一边，穿过高山、深谷、悬崖等令人生畏的地貌。这一地区布满了天然石灰岩洞穴，日军扩大了洞穴，并用隧道将其连接到一起，这样几乎整个第三十二军都能够带着武器、弹药、补给和淡水箱躲进地下城中，躲过轰炸、扫射，以及哪怕是海岸外美军战列舰上最大口径舰炮的炮击。这一天然堡垒的核心是首里，古代琉球国王的王宫所在地，这里的古代石头城堡和城墙矗立在岩石峭壁之上，俯瞰着被炸毁城镇的废墟。牛岛将军地下指挥所的入口位于城堡附近一座山岭的反斜面上。首里周围的三个方向上布置了同心圆状的坚固防御工事，工事位于高地上，射界覆盖所有可能接近的道路，彼此之间通过有掩蔽的交通壕和隧道相连。这里是太平洋上的凡尔登。

每一支日军部队都要负责挖掘和构筑自己的防线。前线的士兵们清楚这是自己能否从密集的海空火力下生还的关键，都拼尽全力投入这一累人的劳作中。第三十二军司令部的口号是“深沟高垒必胜”。^[35]和硫黄岛上一样，日军缺乏机械化挖掘设备和炸药，因此部队不得不用锹和铲来干活儿。他们还缺乏水泥或者制作水泥的装备，因此隧道不得不用原松木加固。大部分原木都是在冲绳北部的森林里砍伐的，通过本地人的小船沿着海岸运到南边。第五炮兵司令部的重炮被集中部署在防线中

央附近，这样火炮可以向任何激战之处射击。火炮射击阵地都得到了良好的伪装，而且轮式的大炮可以退入山洞，通过隧道移动到别的射击阵地上，以减少其暴露在反制火力下的时间。冲绳岛上的炮兵是日本陆军中最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炮兵。

冲绳岛为数众多的平民是个令人挠头的因素。战争期间，冲绳县政府先是鼓励，后来又强迫冲绳人大规模向台湾岛和日本本土疏散。但这些举措在冲绳人中并不受欢迎，甚至遭到抵制，尤其是在1944年8月装载着数百名撤离人员的船只在开往九州途中被击沉之后。1945年3月，日军下令将大部分尚存的冲绳民众撤往岛屿北部，但这一举措也受到抵制。于是，长勇将军在《冲绳新报》上发文，警告说所有民众都必须加入民兵，服从军队的命令。一旦遭到进攻，每个民众在自己战死前都要努力消灭10个敌军。他还说所有妇女和儿童都要“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免成为作战的障碍”，因为“不能为了保护民众生命而输掉战斗”。^[36]数百名还在读初中和高中的男生和女生被动员起来加入学生军，担任通信员、厨师、劳工或者护士。针对当地人的总动员令在1945年元旦下达。所有年龄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冲绳男性居民都被直接征入当地“自卫军”。大部分人从此再未见过家人。

在战役打响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日本军队和政府还在努力将不参战的居民迁移到冲绳北部。但是许多民众被当局关于任何落入美军手中的人都会被虐杀的宣传吓住了。当3月的最后一周美军舰队出现在冲绳外海时，大约30万民众仍然留在岛屿南半边，许多人拼命想要躲在日军防线背后。这里的粮食根本不够他们吃，因此即便在战火燃烧到这里之前，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也已迫在眉睫。

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日本陆海两军的高参们终于拍板确定了在琉球群岛和东海运用航空兵的策略。海军飞机将攻击敌人军舰，陆军飞机则要去打运输船队。两个军种都会同时发动常规轰炸和“神风”攻击，但是“重点将放在组建和运用特攻力量上”。^[37]飞行学员们将迅速完成训练计划，直接派往一线攻击机部队，在那里，他们将被要求自愿加

入“神风”特攻队。当地地面部队在冲绳陷入漫长的消耗战时，盟军舰队将不得不在这一海域停留数个星期，这时就可以向其反复发动空袭。日本最后的希望是，削弱敌人“在舰船、飞机和人力上的优势，阻挠他们建立前进基地，打击敌人的士气，由此大大拖延对日本的最后攻击”。[\[38\]](#)

这大部分任务都要由司令部设在南九州鹿屋航空兵基地的第五航空舰队来完成。这支“舰队”其实是各种不同类型海军航空兵部队的集合体，包括多个机型，散布在九州岛和四国岛的20余个航空兵基地上。第五航空舰队拥有大约600架飞机，其中大约400架属于“神风”特攻队。在B-29和美军航母舰载机的持续威胁之下，鹿屋和其他航空兵基地的人员都在费力将修理车间、弹药库和燃油储备搬入地下掩体和隧道。跑道周围的场地上都在进行各种挖掘作业。和在冲绳一样，大部分挖掘工作都要靠铲子和铁锹，就连飞行员也要来帮忙。小型机场被伪装成简单的乡间土路。废弃的兵营和机库则留在那里，用作诱饵来吸引美军轰炸机。至于第五航空舰队的飞机，“重点在于对飞机进行彻底的疏散、保护和伪装，以及建造假飞机和护坡掩体”。[\[39\]](#)

在私人日记里，宇垣常常透露出对其航空兵部队糟糕状况的失望。他缺少飞行员、飞机和燃油，甚至连在日本南部水域保持充分的每日空中巡逻都不够。坠机和其他事故损失多得令人痛心，他不得不出于天气和其他原因取消了许多训练任务。他的第五航空舰队在航空燃油分配上具有优先权，但是日本此时已经运不进来多少油了，捉襟见肘的燃油分配已经开始影响作战。2月27日，有人向宇垣介绍了从松树根中提炼生物燃料的方法：日本的学生们已经被派到全国的森林里去大量收集松果、松根和针叶。这一做法很有创意，但没什么用，提炼一小时飞行所需的燃油需要耗费超过1 000个工时。设在跑道旁边一座兵营里的鹿屋基地司令部被认为过于容易遭到空袭，因此2月28日，宇垣和他的司令部搬入了一处地下碉堡。甚至有人讨论要把飞机送到朝鲜和中国东北，以免它们在地面上被摧毁。第五航空舰队3月17日的日志反映了参谋们对前景的极度悲观：“在攻击敌特混舰队时，我方航空部队精选出来的

这些力量立刻就会损失掉。”[\[40\]](#)

南九州春来早，在基地周围树林和野地里短暂漫步令宇垣恢复了精神。在平静的下午，他会拿上霰弹枪，独自去爬山，捕猎当地特有的绿雉鸡。一次外出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大自然在数日里展现出的伟力足以耻笑不起眼的小小人世，而我们还在为战争和敌特混舰队之类的琐事而庸人自扰。”[\[41\]](#)

3月18日至19日的战斗中，日军常规俯冲轰炸飞行队的表现出人意料地好。然而和往常一样，他们严重夸大了对战果的评估。3月21日，在鹿屋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之后，日军宣布美军损失了5艘航母、2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42\]](#)这份报告被放在报纸头条上，以一贯的欣喜若狂的口吻大吹大擂。而挂载“樱花”人操自杀弹的G4M轰炸机编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则被封锁。第五航空舰队的分析人员得出结论，除非日军能够首先暂时在目标上方夺取空中优势，否则这样的攻击将不可能再次上演。考虑到日军航空兵的状况，唯一可能取得成功的方法是单纯依靠数量压垮美军的防空体系，这意味着要一次起飞数百架飞机，期望至少有几架能够突破战斗机和高炮的防线并命中目标。

3月25日，当美军进攻部队开始在冲绳外海集结之时，位于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了启动“天号”作战的指令。这一计划要求出动所有力量向美军舰队发动大规模自杀攻击和轰炸。然而在不久前美军航母空袭日本时，日军损失惨重，需要时间来调集部队。于是新的“神风”飞行队和飞机飞往鹿屋和其他机场，准备发动第一轮全力出击的“菊水”攻击。在调集航空兵和海军部队耗费了一些时间之后，日军选定4月6日开战。这一天，冲绳的日本陆军将向美军防线发动反击，日本海军最后残余的水面战舰（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也将从濑户内海出击，发动海上万岁冲锋。数百名“自杀军神”将从九州各个机场起飞，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消灭冲绳外海的敌舰”。[\[43\]](#)在日记里，宇垣将军承认自己为派出如此多的飞行员去送死感到痛苦和内疚，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追随那

些年轻男孩而去。我乐见我极易落泪的脆弱心灵已来到这个阶段”。[\[44\]](#)

第58特混舰队一直在冲绳岛东南近海巡游，为岸上的地面部队和岛屿另一侧的两栖舰队昼夜提供空中掩护。事情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航空兵和舰员都一样。狂风和巨浪对飞行作业的影响很大。4月4日上午，天气阴沉，海上起了浓雾，“约克城号”的一名军官记录道，航母“一整晚就像烈马那样颠簸摇动。我这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不得不用一只手扶着洗脸池；当我在走出舱室的时候，一半的路程是爬过去的，另一半则是冲过去的”。[\[45\]](#)前一晚，由于能见度太差，战列舰“新泽西号”撞上了屏护驱逐舰“弗兰克斯号”。两舰的大小和体量实在悬殊，战列舰只受了一些轻微的擦伤，而“弗兰克斯号”的整个左舷一侧都被开膛破肚，舰长也受了重伤。[\[46\]](#)这段时间里敌人的空袭少之又少，斯普鲁恩斯将此归功于两周前对九州的空袭。各航母大队一连执行了3天的飞行作战，第4天，他们退往东南方一定距离之外，和油轮及补给船会合去了。

4月6日，天气微凉，风大，海上波浪起伏。阿瑟·拉福德的第58.2特混大队正在加油和补给，因此谢尔曼的第58.3大队和克拉克的第58.1大队是前线仅有的两支特混大队。破晓的一个小时后，冲绳以北美军驱逐舰上的雷达发现有敌机从北面飞来。日军攻击机群的先导机撒下巨量“窗户”——铝箔条——以干扰美军的雷达系统，但是此番空袭规模太大，根本藏无可藏。米彻尔向所有航母下令，把全部轰炸机留在机库里，把飞行甲板腾出来供战斗机使用。更多“地狱猫”和“海盗”战斗机升空，以增援战斗空中巡逻队，其余飞机则被导向指定方向进行截击。引导战斗机的无线电频道上顿时热闹了起来。美军战斗机杀入日军机群，在这一整天大战的首轮交锋中便将至少60架飞机变成了火焰。但是此番“菊水一号”攻击规模太大——大约700架飞机，其中超过一半是“神风”机——还是有超过200架日机突破了战斗机的拦截，向美军舰队扑去。

这一整天从早到晚，它们一批批地冲过来，最凶猛的空袭在下午到来。“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一艘运输船上的一名基层军官回忆道，“它们或单枪匹马，或两两成对，或三五成群，下滑、俯冲、垂直冲下，有些还栽进了水里……看上去它们一刻也没停下来过。”^[47] 克拉克将军称敌人一拥而上的攻击“实在太强大了”。^[48] 天空布满了高射炮弹爆炸的烟团，曳光弹从薄暮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一道道红色和黄色的光芒。在许多舰船上，战斗机引导官和战斗机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通话被通过船上的大喇叭广播了出来，这让船员们有一种正在收听田径比赛现场直播的奇妙感觉。《时代》和《生活》杂志通讯员鲍勃·谢罗德在特纳将军的指挥船“埃尔多拉多号”上亲眼见到一架日军飞机冲向渡知具滩头外海的一艘坦克登陆舰。“可怕的‘嗒嗒嗒’的弹雨从两英里内的每一艘舰船上喷向那架飞机，”他写道，“那个鬼子在距离目标300英尺时着了火，翻滚起来，落进了浅水中。”^[49]

到这一天结束时，26艘美军舰船被“神风”机击中。6艘沉没，包括2艘胜利轮，1艘扫雷舰，1艘坦克登陆舰，以及2艘驱逐舰“布什号”和“科尔霍恩号”。其他船只也遭到重创，伤亡惨重，有些还被编队内友邻的高射炮火误击。但关键是，这些驱逐哨舰和其他外围屏护舰艇的牺牲掩护了位于第58特混舰队队形中央的航空母舰。有几艘航母遭到了令人神经崩溃的撞击近失，但没有一艘被直接击中受损。舰载机大队与驱逐哨舰上的战斗机引导官密切配合，在这一天中击落了超过200架飞机。“埃塞克斯号”舰载机大队击落了65架飞机，几乎打破了单艘航母的单日击落纪录。^[50]

这天一大早，一艘在丰后水道（九州岛和四国岛之间的海峡）外巡逻的美军潜艇发现一队日军战舰正在出海。这是“大和号”战列舰带着1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的护航队，它们是日本舰队最后一点还能出海的残余力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大和号”舰队一直处于美军不间断的空中监视之下，B-29和美军舰载机对吴港南部锚地的舰船进行侦察和拍照，并跟踪它们进入濑户内海，因此它们突然出现在海上并不令

人意外。4月7日破晓前，美军从庆良间列岛起飞数架PBM水上飞机，北上前去跟踪敌舰队。上午8时23分，来自“埃塞克斯号”航母的搜索机发现“大和号”舰队出现在北纬30°44′，东经129°10′，航速12节，航向300°。舰队已经绕过了九州岛南端，正向西偏西北方向航行，似乎是要开往朝鲜。[\[51\]](#)

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和特纳都判断出日军这是想要躲避侦察和拦截。“大和号”和它的护航舰队想要绕道东海，再返回来从西边摸向美军舰队。斯普鲁恩斯立刻组织起一支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在德约将军指挥下前去拦截。但是米彻尔和第58特混舰队的航空兵们想要用舰载机来解决“大和号”，而且他们的飞机能更快抵达那里。他们距离目标238英里，飞过去不超过90分钟。此时谢尔曼的第58.3大队已经赶回来与另两支大队会合，因此美军的空中打击力量绰绰有余。从上午10时18分开始，三支航母特混大队放飞了由386架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包括180架战斗机、75架俯冲轰炸机和131架鱼雷机。“乔克”克拉克告诉他的“复仇者”飞行员们，他期望他们能击沉这艘据说是“不沉”的“大和号”，因为他们的鱼雷能够砸开这艘强大战列舰的舰体，“让海水灌进去”。[\[52\]](#)

“大和号”及其9艘护航舰上的官兵们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他们的任务就是一次海上“万岁冲锋”，一次没有明确战术目标的无意义的自杀冲击。由于没有空中掩护，他们将只能靠自己的高射炮去对付一批接一批的美军飞机。和早前的“捷号”计划，也就是日军为莱特湾海战制订的计划一样，舰队被要求去自我毁灭以维护荣誉。但和前一次海战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突袭美军舰队的希望。有一名高级军官评论道，这“甚至不是一次‘神风’攻击，‘神风’攻击至少还有机会干掉一个有价值的目标”。[\[53\]](#)

和“捷号”计划一样，这次作战也是由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大将从他

在日吉的指挥地堡里发出的命令。和前次一样，丰田此番选择不亲自率军出击，此举令“大和号”舰桥上的悲观论者们几乎就要起来造反了。丰田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中将飞往吴港去兜售这次计划。接替栗田健男担任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伊藤整一中将坚决反对这次自杀性任务，而且他毫不犹豫地表了态。这种单程出击是对军舰、燃油、弹药，以及本土防御所急需的受过训练人员的无意义的牺牲。巡洋舰“矢矧号”舰长原为一称其“荒谬透顶……如以卵击石”。^[54]草鹿则反驳说这次计划是一次“诱饵作战”，其真实目的是在从九州各机场出发的数百架“神风”机攻击敌舰队时分散美军航空母舰的注意力。但草鹿也承认，大本营急于避免“大和号”在港口里迎来终战的耻辱。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事情很明显了，无论草鹿的语气如何委婉，这次自杀任务都不是请求，而是命令。

出海前一晚，“大和号”全体舰员都领到了大量清酒，各个分队自行组织，开怀畅饮。副舰长通过舰上的大喇叭喊道：“神风‘大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神风！”^[55]在第一礼堂里，有贺幸作大佐站在一群大尉和少尉中间，举起一大瓶清酒直接灌进嘴里。在“狂歌劲舞”的人群中，空酒瓶在脚下的甲板上乱滚，无数只手放肆地伸过来拍舰长的光头，有的人甚至还用力揍一下。副舰长则干脆脱光了上衣和其他军官比赛相扑。^[56]

第二天，当舰员们还在对付宿醉后的头痛，给家人写诀别信时，“大和号”将德山油库里的重油搜刮一尽。食堂里所有剩余的香烟和其他好东西都被免费分发给了舰员们。下午6点，“大和号”全员在前甲板上集合。战列舰上升起了第二舰队的将旗。当夜幕降临时，巡洋舰“矢矧号”引领整个编队驶入了丰后水道。各舰排成纵队沿着九州岛海岸以12节航速南下。在愈加浓重的暮色中，舰员们看到岸边的樱花已经开始绽放。军官们小口吮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烈酒。高射炮手则只能在战位上就着绿茶吃饭团了。甲板上，水兵们在磨快刺刀，收集步兵武器，准备发给舰员们，一旦他们成功让军舰在冲绳岛上冲滩搁浅，并加入岛上的地面部队，这些东西就有用了。

深夜，一弯新月从东方升起，随后，当舰队绕过九州岛南端后不久，东方迎来了拂晓的第一束阳光。鹿儿岛的绿色群山逐渐消失在了军舰尾流的远方。此时人们还能看见有些日军战斗机在上空巡逻，但是它们很快就返回九州岛的基地了。“大和号”舰桥上的一名雷达官吉田满少尉郁闷地写道：“看不到一架护航飞机了，此后也一架都看不到了。我们被抛弃了。”^[57]

“大和号”的无线电监听员截获了一些无线电通信，有些就是英语明文，报告了日军舰队的位置和航向。和预期的一样，他们被丰后水道外的敌潜艇盯上了。PBM水上飞机在“大和号”上空高处兜着圈子，跟踪其去向。它们小心翼翼地飞在日军高射炮的射程之外。军舰的某座主炮塔偶尔也会打一轮齐射，空中会出现高炮爆炸的烟团，但那常常出现在美军飞机的下方和后面。

午后12时20分，第一批来袭的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了“大和号”的雷达屏幕上。战列舰上的领航员吼道：“前方出现超过100架敌机！”^[58]警报立刻通过灯光信号发给了舰队中的其他各舰。10分钟后，瞭望哨看见了第一群黑点，它们位于高空，在“大和号”巨大的460mm主炮防空弹的射程之外。

美军控制着时间，他们在日军舰队上空逆时针绕圈子，等待后续中队跟上来，就如同一群在腐尸上空盘旋的秃鹫。高空中的能见度并不好。透过3 000英尺到5 000英尺高度上的碎云向下看，哈里·D.琼斯少尉——他是“大黄蜂号”第17鱼雷中队的一名“复仇者”飞行员——完全看不到敌人舰队。后来，他通过一处云缝看见了“大和号”。琼斯觉得这艘超级战列舰看起来就像是“帝国大厦在破浪而行。它真大”。^[59]

美机燃油足够，而且没有敌机前来打扰，因此攻击机群的指挥官得以有条不紊地安排进攻。“地狱猫”和“海盗”将向“大和号”俯冲，投掷小号的炸弹，随后扫射甲板；SB2C寇蒂斯俯冲轰炸机将紧随其后，投掷1 000磅炸弹；“复仇者”机群则要算准时间，与俯冲轰炸机同时进攻，发

动鱼雷攻击。大部分鱼雷都要瞄准巨大战列舰的左舷，希望令其朝这个方向翻覆。

当第一轮攻击陆续展开时，“大和号”的高炮开火了，打出五颜六色的爆炸烟团。炮火很猛烈，但不够精准，美军飞机继续俯冲而下。“约克城号”一名“地狱猫”飞行员想道：“老天，他们根本穿不过那些弹幕！这是谋杀！”^[60]但是攻击机群还是保持着速度，飞过了爆炸烟团。率领“邦克山号”鱼雷中队的钱德勒·W.斯文森少校最担心撞上其他友机的危险：“我们的飞机要从各个方向在目标上空交会。这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必须避免撞上我们自己的飞机。飞机太多了，机动空间又那么少。我们没有相撞，这真令人惊讶。”^[61]

日舰以27节航速破浪而行。“大和号”剧烈机动着，“地狱潜鸟”投下的炸弹落在近旁，军舰周围顿时掀起一片“水柱森林”。高塔般的白色水柱把海水如瀑布般猛烈地泼在甲板上，把人们冲倒在地，甚至把设备从缆索上扯下来。四枚重磅炸弹接连命中，打哑了高射炮，把残骸和尸体掀飞到空中。战斗机俯冲下来，用.50口径机枪火力扫射军舰的上层建筑，击中了舰桥，打死数人。“大和号”舰尾燃起大火，后方拖出了一股黑烟。吉田看到“鱼雷的银色航迹”从多个方向朝本舰汇聚而来。^[62]有贺大佐灵活地指挥他的军舰，迎着鱼雷航迹转去，躲过了多枚鱼雷，但“大和号”无法躲开所有鱼雷。三枚鱼雷接连命中其左舷中部，随后第四枚又击中了后部。每一次命中，巨舰都会颤抖一次，然后开始向左倾斜。

在“大和号”的左边，驱逐舰“浜风号”被多枚炸弹击中，掉了队。它从舰尾开始下沉，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在了水面上，“只留下一圈翻卷的白色泡沫”。^[63]巡洋舰“矢矧号”消失在了了一片水幕之中，战斗机低飞扫射了这艘舰，舰长原为一回忆道：“它们把子弹和螺旋桨气流打在我们身上，随后从桅顶高度脱离。”眼见TBM机群穿过猛烈的高炮弹雨扑过来，他想：“敌人的飞行员一定很勇敢。”^[64]一枚鱼雷击中了该舰的右

舷轮机舱，炸死了轮机班，炸掉了它的螺旋桨。舰体上还挨了六七枚炸弹。8 000吨的“矢矧号”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打击。它变成了一具燃烧、倾斜的残骸，无法再机动躲避后续的攻击波。驱逐舰“矶风号”从后方靠近，显然是要接走受创的“矢矧号”的幸存者，但是它也吃了一两枚炸弹，燃起大火，动弹不得。“凉月号”也被击中，受了重伤，但还是幸存了下来，挣扎着回到长崎近旁的海军基地佐世保港。

通过对侧注水，“大和号”的左倾被纠正了，但是大火依然在舰体后部蔓延。救火队和损管队在攻击中死伤惨重，因此火势已经无法控制，当第二批美军飞机来到舰队上空时，火情仍在继续恶化。在舰桥上，当担架队员把遍布弹孔的尸体抬起来运走时，伊藤中就将就安静地站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由于大火、伤亡和战损，舰桥对多个部门和战位的指挥和控制已经开始被切断。

在首轮空袭大约40分钟后的第二次攻击波中，“大和号”的左舷又被命中了五六枚鱼雷，右舷至少中了一枚鱼雷。还有一枚鱼雷在舰尾爆炸，摧毁了它的舵柱，令其失去操舵能力。SB2C俯冲轰炸机把重磅穿甲炸弹如雨点般投在巨舰的上甲板上，低空飞行的“地狱猫”和“海盗”则如蜂群般飞来，扫射它残存的高射炮组。吉田记得当时“不停地爆炸，闪光刺目，声如雷鸣，巨大的冲击波十分猛烈”。^[65]驱逐舰“朝霜号”和“霞号”遭到重创，即使不沉也得被自己人凿沉。瘫痪的“矢矧号”又吃了四枚鱼雷和七八枚炸弹。原为一舰长前后看去，判定他这艘舰快要不行了。鱼雷在舰体上爆炸时掀起高大的白色水柱。炸弹把碎片和尸体炸飞到空中。钢质甲板上的铆钉开始迸射，舰桥也在他脚下晃动。“我们濒死的军舰随爆炸而震动，”原为一写道，“爆炸最终停了下来，但是倾斜还在加剧，海浪冲刷着甲板上的鲜血，残缺的尸体滚进了海里。”^[66]

“大和号”低伏在水面上，它的下部舰体被海水淹没，左倾增加到了18°。上层建筑已经成了废墟——被炸垮、熏黑，还在燃烧。有些舰员开始恐慌。舰长来到大喇叭旁下令：“所有人起来修补军舰！”但是损管

队已经伤亡惨重，舰桥上也很难和舰底下层岗位保持联系了。大火和进水使得舰员无法修补左舷受损的舱室。而水泵和阀门的损坏又使舰员们无法向“大和号”右侧的放水舱室进行对称注水。副舰长告诉舰长：“无望纠正倾斜！”^[67]

意识到军舰倾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有贺舰长犹豫再三，冷血地做出了放水淹没右舷轮机舱和锅炉舱的决定。警报声立刻响起，右舷下层的电话也疯狂响起，通知舰员撤离，但是时间并不够这些人离开。所谓“黑帮”，也就是数百名负责维护军舰轮机的官兵被困在舱室里，淹死在战位上。吉田少尉说：“这对于一连数天在酷热高温和震耳欲聋的噪声下辛苦工作的他们而言，是个不近人情的结局。”^[68]

当“约克城号”的舰载机大队在下午1时45分抵达时，“大和号”的倾斜已经肉眼可见，速度也降到了10节以下。舰上的防空炮火已被先前的攻击打残，只有少量武器还能打响，而且也不可能再从弹药库里把弹药送上来了。美军此番仍然有充足的时间来计划和组织进攻，因此“复仇者”的鱼雷攻击都算好了时间，和“地狱潜鸟”以及“地狱猫”的俯冲轰炸和扫射同时进行。舰桥上的日本军官看着这一切，绝望地仰慕着他们对手的熟练和勇敢。当多枚鱼雷再次撕开战列舰破损的舰体，有贺舰长大吼道：“大家稳住！大家稳住！”^[69]但是舰上的广播系统已经失灵，因此只有周围的人还能听见他的话。“大和号”的倾斜增加到了35°，接着又到45°，右舷舳部露出了水面，把无装甲保护的薄弱舰底交给了最后一批挂着鱼雷的“复仇者”。

“大和号”的最后出击, 1945年4月6日—7日



军舰已经动力全失，舰长开始准备下令弃舰了。由于失去了内部通信系统，下甲板上的许多人可能从未收到撤离战位的命令。伊藤将军向幸存的参谋军官们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住舱里。此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在后方一英里外，俯冲轰炸机向着动弹不得的“矢矧号”冲了下来。

原为一咬着牙咕哝道：“好吧，你们这些美国鬼子，你们赢了！”^[70]下午2时6分，他大声向舰员们下令弃舰。他跳进海里时，F6F“地狱猫”机群吼叫着从头顶飞过。原为一被沉船的旋涡卷了进去，但是他的救生马甲又把他拉回到了水面上，之后他和另外几个满身油污的幸存者一起紧贴在残骸上。

“大和号”仍在侧倾，甲板侧舷几乎触到了水面。此时正值中午，但浓烟遮天蔽日，宛若黄昏。吉田少尉牢牢抓住舰桥上的结构，他后来记录了这可怖的场景留给他的印象：“地平线似乎出现在了一个疯狂的高角度上。当受损军舰的倾斜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80°时，黑色的海浪拍过来，打在了我们身上。”向后看，他看到了30英尺长的巨大“旭日”战旗没入海里。一名年轻水兵紧紧抓住旗杆底部，显然是想与舰同沉。舰体深处传来了机器设备滑落时的隆隆声、震动和撞击声。在舰桥上，有贺大佐把自己绑在罗盘箱上。领航员和他的助手也把自己绑在一起，“当军舰翻覆时，他们只是瞪着涌来的海浪”。^[71]伊藤将军的参谋长吼叫着要那些年轻军官逃生，有些年轻人离舰时有些犹豫，他就过去揍他们，把他们抛进海里。当海浪冲到舰桥甲板上时，许多人没抓住，也落到了水里。

吉田在黏稠的原油中游泳挣扎。当巨舰开始下沉时，周围的海面上形成了巨大的旋涡，吉田也被吸了进去。在水面以下，他看到了一道闪光以及“巨大的火柱冲向昏暗的天空”。^[72]“大和号”的主炮弹药库被引爆了。吉田被抛出了水面，之后又被拖了下去，然后再次浮上来，发现自己周围满是残骸碎片和与自己一样游在水上的人。

“大和号”升起的烟云直径超过1 000英尺，迅速升腾到2万英尺的高空。连在125英里外的鹿儿岛上都能看见这场爆炸。当烟云升起时，“大和号”已然不复存在。舰上只有23名军官和246名士兵幸存；巨舰带着近3 000条人命一同沉入深渊。剩余的三艘未受损的日军驱逐舰来到幸存者中间，把他们捞了上来。

超过4 000名日军水兵在这场基本只是象征性的战斗中丧命。美军赢得了胜利，代价只有区区10架飞机和12名飞行人员。

放出攻击机群后，第58特混舰队遭到了大约100架“神风”自杀机的攻击。大部分自杀机都被击落，但是有一架飞机撞中了战列舰“马里兰号”——这是“战斗玛丽”在战争中第二次遭此劫难——另一架日机从低云中穿出，撞中了“汉考克号”航母的飞行甲板。火灾在45分钟之内就被控制住了，“汉考克号”也因而得以在本舰舰载机返航时予以接收。但是这次攻击造成了舰员64人死亡，71人受伤。大部分伤亡人员都被困在下甲板，被烧死、炸飞，或者被致命的浓烟熏死。

根据巴克纳尔将军下达的进攻计划，第3两栖军的海军陆战队将要横穿冲绳岛，将岛屿一分为二并控制东部海岸，之后向北转，占领并肃清岛屿中部和北部。他们还将发动两栖进攻，占领本部半岛外的小岛伊江岛。无论有什么样的敌人守得多山、密林的冲绳岛北端，他们都将被封锁并孤立起来。与此同时，陆军第24军各师将向南面令人生畏的山峦进军，攻占冲绳县首府那霸及其港口，打垮首里山周围的敌人坚固防线。整场战役预计耗时45天到60天。

由于没有日军设防，陆战队在战役的最初几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迅速进展。在L+1日（即登陆次日）下午，前进巡逻队越过岛屿，抵达了冲绳东海岸。此举将岛屿一分为二，将冲绳北部的日军部队与南部主力隔绝开来。“老种子”第1陆战师，以及截至当时人数最多且最新的陆战师即第6陆战师的3个团，分别沿着东西两岸的道路向东北方被称为“石川颈”的狭窄地峡推进。沿途遇到的抵抗可以忽略，差不多根本没有抵抗。此次行动的高潮十分辉煌，场面壮美。根据第5陆战团的斯特林·梅斯的回忆：“碧蓝的大海波涛起伏，纯净的沙滩像水晶那样洁白，被主人抛弃的冲绳骏马在水边尽情地奔跑。”^[73]越过沙丘望向内陆，他们看到了一片平静的麦田、甘蔗园、牧场，以及狭窄土路和汨汨作响的小溪之间的一片片水稻田。起伏的山坡被改造成了可以耕种的梯田，其间点

缀着古代的墓碑。春天的野花正在盛开，山顶覆盖着浓密的松树林，散发着甜美的芬芳。每走半英里左右，陆战队员们就会穿过一座由几栋小房子组成的小村庄，那里，屋顶覆盖着茅草的石头小屋紧紧挨在一起。二等兵尤金·斯莱奇写道，冲绳“美如一幅田园风景画”。^[74]

冲绳的大部分平民要么随日军迁移到了岛屿南边，要么被撤回日本。美军在道路上或村镇中会不时遇到一群老百姓。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些老头子；在登陆部队占领的区域里几乎见不到几个年轻男性冲绳人。大部分人看起来都是穷苦的农民或雇农，穿着粗麻布裤子和普通的棉布袍子；许多人都光着脚，身上脏兮兮的，所有人看起来都营养不良。年长的人都很害怕。他们九十度深鞠躬，畏畏缩缩，好像一副马上要挨打的样子。倒是那些小孩子，面对美国兵们热情的笑容，很快就不怕了。他们瞪大了双眼，伸着手，跑过来接受征服者给予的救助——糖果、口香糖和C型口粮。“孩子们几乎全都很机灵，面露喜色，”斯莱奇写道，“他们长着圆脸，黑眼睛。小男孩们通常剃成板寸头，小女孩则把黑得发亮的头发剪成那个时代日本小孩常见的齐耳短发。我们都很喜欢这些小孩。”^[75]眼见小孩子们以惊人的轻松和美国兵们混熟了，大人们也放下了他们的担忧。和日军宣传人员说的恰恰相反，这些入侵者并非食人兽或者魔鬼。冲绳老百姓居然没有遭到强暴、折磨、摧残和杀害。实际上美国人反而为这些平民送来了粮食，而且打算等到安全时候尽快把他们送回家里和村里。“爱日”48小时后，岛上的难民已经开始对排成纵队路过的美军吉普车和坦克招手或者敬礼，大兵们也能伸手去摸路过小孩的脑袋了。

对于陆战队员们来说，冲绳战役的第一个月只是一段平静的插曲。他们能听见南方远处的隆隆炮声，但眼下那都是陆军的事情。有些新来的“补充”陆战队员会责怪老兵，说他们讲的太平洋岛屿作战如何如何恐怖的事情肯定都是在虚张声势。每晚扎营的时候，他们都会像训练时那样挖掘散兵坑，并设置防御阵地。迫击炮手们把武器架设在他们觉得夜间渗透攻击的日军最可能经过的地方。冲绳岛上的土壤都是些松软的黏

土，他们的铁锹和折叠铲挖起来很容易。相较于佩里硫岛上的珊瑚岩地面，这里轻松的挖掘工作让他们感到幸运。夜晚很凉，大兵们都对自己的羊毛衬里野战夹克很满意。

炮排和迫击炮排使用当地的骡马来驮运他们的武器和弹药。还有人看见陆战队员不用马鞍就直接骑在这些骡马上。有些人会脱掉军服在小溪里洗澡。根据与第6陆战师同行的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记录，有“几十个脏兮兮，胡子也不刮的陆战队员”在一栋被摧毁房屋的废墟里找到了几件粉红色和蓝色的日本和服，于是他们洗军服的时候就会穿上这些和服。^[76]还有个人把捡来的小白山羊当成了宠物。一名18岁的陆战队员告诉鲍勃·谢罗德，他希望能尽快遇到敌军，因为“我扛弹药扛烦了”。^[77]

与此同时，在南边，陆军已经陷入激战。从渡知县滩头向南试探性进攻时，约翰·霍奇将军的第24军在那霸以北的多山地区遇到了坚固设防的日军阵地。第96步兵师在一处被称为嘉数高地的地形上被日军的火炮、迫击炮和步兵的顽强反击所阻。4月4日至8日的四天恶战之后，第24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1 500人。美军被迫挖掘战壕，战况面临演变为久拖不决的血腥僵局的危险。首里防线巨大的天然堡垒就在面前，但是那里无法迂回，甚至无法接近，只有冲过一段被完成预瞄的火炮和迫击炮覆盖的暴露地形才能到达。这使得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打过仗的人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似曾相识感。日本人选择的战场对他们很有利，而且防御计划也很高明。他们不再发动损失巨大而效果不佳的万岁冲锋。和此前的战斗相比，他们的步兵进攻与火炮、迫击炮炮击的协同要完善得多。他们巧妙利用了反斜面上的阵地和防御工事，使其火炮免遭美军炮兵和坦克的攻击。他们的炮手在使用弹药时远比供应更充足的美军吝啬，但是他们打出的每一枚炮弹都能起到作用。

第三十二军的作战参谋八原大佐早就预想要打一场消耗战，让美国人流尽鲜血，并为本土的战友们争取时间强化防御。但是牛岛将军的上级却不断逼迫他全力发动反击，以夺回读谷和嘉手纳两座机场。东京的

帝国大本营和台湾的第十方面军不停地发来电报，催促他将登陆敌军赶回海滩。联合舰队参谋长草鹿将军也给第三十二军的同行长勇将军发电，要求把两座机场从美军手里抢回来。^[78]4月2日，当梅津美治郎将军向天皇报告时，裕仁对失去冲绳可能带来的公众反响表达了担忧，他问：“陆军为什么不反击？”^[79]

由于担心牛岛将军声望受损，长勇将军坚持认为第三十二军必须发动一场反击。八原称这一提议“完全不负责”，他警告说，日军部队只要一离开防御工事就会立刻被消灭。但是来自东京和台湾方面的压力是无法忽略的，指挥地堡里主张发动一场进攻的氛围也很浓烈。听取长勇和八原针锋相对的见解后，牛岛批准了在4月12日夜间发动突袭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第62师团和第24师团中抽调部队，组成一个旅团，他们将在天黑后冲出防线，突破嘉数高地下方的美军防御阵地。

4月12日午夜，反攻开始。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包括拼死的白刃格斗，日军撤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两晚，日军再度打来。美军确实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是却顶住了进攻，把日本人打了回去。这些战斗看起来支持了八原大佐的观点——无论夜间渗透攻击有多少好处，只要日军部队离开他们的洞穴和堑壕，美军在炮兵和火力上的优势就会给他们带来不可承受的损失。4月13日上午，牛岛将军取消了行动，但是进攻的冲动是深入日本军队骨髓的，在这场战役中，长勇和八原的争论将在后来复燃。

在4月6日的“神风”大空袭后，美军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的飞机储备已经耗尽，他们已无力再发动一次如此规模的攻击，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但是这一结论过于乐观了。日军正准备向盟军舰队砸过去数千架飞机。4月6日只是十次“菊水特攻”的第一次——在这些大规模空袭的间隙，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几乎每天都要发动小规模攻击。参加空袭的日军飞机既包括杂七杂八、多年未见的过时机型，也有很多最新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常规的俯冲轰炸和鱼雷攻击，与“神风”攻击甚至是火箭驱

动的“樱花”人操自杀弹联合出手。冲绳战役期间，来袭日军飞机最终总共超过了3 700架次，击中了超过200艘盟军舰船，超过4 900名海军官兵死于非命。

日军航空兵指挥官们相信4月6日的空袭给盟军舰队带来了沉重打击。宇垣将军在日记中记载，一架侦察机数出了150根烟柱，“因此冲绳周边海域已变成屠宰场”。通过监听美军战斗机引导通信，日军对于能令敌军飞行人员“手忙脚乱”感到满意。4月6日，宇垣的结论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摧毁了4艘航母”。^[80]经过了充分评估，包括听取了冲绳岛上第三十二军的观察报告之后，帝国大本营最终估算有35艘美舰被击中，其中22艘被击沉。^[81]这一夸张的战果统计令日军高层相信，大规模的自杀攻击具有打垮打散敌人舰队的潜力，甚至有可能迫使美军放弃冲绳。4月9日，丰田将军下令从全日本的航空兵基地抽调航空兵部队增援九州各机场，准备进行“菊水二号”作战。

对于在冲绳岛东北方60平方英里防御区内作战的第58特混舰队来说，每日的例行工作已经令人筋疲力尽了。舰队在海上已经待了近一个月而未得喘息，还要不停地击退令人汗毛倒竖的空袭和“神风”攻击。舰队中超过1/3的航空母舰都在这些攻击中受创，还常常伴随着惨重的人员伤亡。噩梦般的战斗昼夜难分。各级官兵的精神压力已经成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军必须让军舰轮流退出战场，返回关岛、乌利西，或者莱特湾——部分是为了维修、保养和补给，但也是为了让舰员们能有短暂的休息。舰队的医师发出警告，飞行员疲劳症的症状已经很普遍。第58.1特混大队指挥官“乔克”克拉克的幕僚们出于对他精神健康的考虑，在夜间不再用电报来打扰他的休息，而是等到他早晨沐浴完，匆匆吃完早饭后再统一告诉他。^[82]陆战队的战斗机早在4月8日就进驻了读谷机场，但是出于种种原因，陆基航空兵部队还要等到战役很靠后的阶段才能承担起保护岛屿和舰队的重要职责。“赖着不走的舰队”不得不继续待在这里，变得名副其实。

随着战役的进行，美国人也在每日空战这所无情的学校里学到了重

要的教训。日军不停地尝试新战术，防御一方也不得不相应调整。当敌人侦察机从非常高的空中飞来时，美军就会在3.5万英尺高空采取“高空战斗空中巡逻”。“地狱猫”和“海盗”的飞行员在这种极高的高空中盘旋时，座舱冷得像冰窖，呼吸也要依靠机上的氧气瓶和呼吸面罩。此时保持阵位需要相当优秀的飞行技巧，在那个高度上西风的风速常常超过150节。在冲绳，雷达简直如同上天的礼物——比此前的战役更重要——但是当时的雷达系统尚无法确保对来袭敌机的高度做出准确估算，而且随着距离缩短，它们也常常会丢失目标。

作为应对，美军在岛屿和舰队巡逻区外围的16个“站点”布置了雷达哨驱逐舰。最繁忙的哨站上会有两艘驱逐舰进行巡逻，另外还有两艘到四艘两栖炮艇负责提供防空火力支援。它们会对敌人的飞机和潜艇保持不间断的雷达搜索、声呐搜索和目视搜索。白天，哨上空会有强大的防空巡逻战斗机队盘旋。驱逐哨舰本身就配备了战斗机引导官，来引导空中盘旋的战斗机作战。战斗机引导官和防空巡逻战斗机队之间满是术语和代号的对话要通过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Inter-Fighter Director, IFD）进行，舰队所有舰艇上的大喇叭也都会对此现场直播。这令军舰上的官兵得以在看到空中的来袭敌机之前就跟踪它们的动向。“战斗机引导网络一度成了我们的救世主和消遣，”冲绳外海一艘战列舰上的一名高炮指挥官说，“它让我们根据来袭敌机的动向做好自卫准备，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当然很吸引人。”^[83]

没有任何一位海军将领愿意公开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哨舰并不仅仅是一种提供早期预警的雷达“绊索”。它们还是诱饵，意在吸引走一部分来袭敌机。驱逐舰和炮艇（支援登陆艇和步兵登陆艇）比南面那些大型战舰以及滩头附近满载的运兵船和运输舰价值更低。它们损失得起，舰员们也都知道这一点。在漫长的战役中，这些哨舰始终在“神风”的狂啸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哨上空防空巡逻时断时续，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或者是日落之后。和舰载战斗机不同，自杀机飞行员根本不用担心在暗夜返回基地的问题。因此，这些小小的哨舰常常只有舵手和高射

炮能保护自己。而且即便头上有一支强大的防空巡逻战斗机队来拦截日军的空袭，舰上的雷达也很难分清敌我。“神风”机任何时候都可能从空中肉搏战中摆脱出来，突然冲向下方的军舰。当一艘哨舰被超过一架俯冲下来的飞机同时瞄上时，火控官就必须分散火力，其射击准确度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渐渐地，驱逐哨舰的舰长们凭经验学会了以更有效的机动来对付空袭。他们做任何动作时都要开到最大航速，以提高军舰的敏捷性。他们变换航向，用侧舷面对俯冲下来的敌机，这样就可以用最猛烈的高炮火力向目标开火。哨舰一旦被命中——或者哪怕只是遭受一次有损伤的近失——就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航速和机动性。舰上有一门或多门高炮可能会被打哑——武器本身失去战斗力或者炮手伤亡——这会令其在后续的“神风”机面前更加脆弱。这一问题在4月16日1号雷达哨站“拉菲号”驱逐舰的遭遇中得到了灾难性的体现，当时这艘2 200吨的驱逐舰在80分钟里遭到了22架日军飞机的进攻。“拉菲号”被4枚炸弹和6架自杀机击中，舰上32人战死，71人受伤，几乎占舰员的1/3。

在4月6日到6月22日，日军发动了10次“菊水特攻”，其攻击机单纯依靠庞大的数量令盟军防空力量不堪重荷。敌机有时会在距离目标五六英里的高炮有效射程外盘旋，然后同时从多个方向扑过来，迫使一个个高射炮组在攻击机蜂拥而至时失去统一指挥，零散射击。在整个冲绳战役中，有15艘雷达哨舰被击沉，50艘受创，几乎每三艘在哨站执勤过的军舰中就有一艘被击中。单单雷达哨舰（不包含舰队其余部分）的人员伤亡就达到1 348人死，1 586人伤。[\[84\]](#)

特纳将军给尼米兹将军送去了28张被“神风”重创的哨舰的照片。这一张张照片上都是横遭暴虐的驱逐舰和炮艇，它们的甲板上被撕开大洞，上层建筑垮塌、烧黑，炮塔歪到一边，熔化的钢铁低垂到海面上。在说明信中，特纳写道：“这些会让你理解小伙子们在经历些什么。他们能把船开回来就是个奇迹；但他们仍然很积极，想方设法让他们的船留在这里而不是被送回后方。士气看起来很高，即便是在那些知道自己

是在为我们整个舰队挡刀的雷达哨舰上也是如此，他们愿意按此方针打下去。”[\[85\]](#)

米彻尔一次又一次派遣各航母特混大队北上空袭九州的日军机场。他们轰炸跑道，击落防空战斗机，并扫射任何能找到的停放着的飞机。但是美军一直未能从源头上掐灭日军的空中威胁；他们无法做到像在吕宋岛时那样直接把“大蓝毯”铺到九州岛上空。九州太大，机场太多，太过分散，防空力量也远比吕宋更加令人生畏。而且宇垣的第五航空舰队还能把飞机分散部署到附近的四国岛和本州岛南部。在关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里，尼米兹利用自己的临时指挥权叫来了第20航空队的支援，于是在1945年4月至5月间，数百架B-29在17个不同的日子里飞来向九州和四国岛的机场投下了高爆“铁炸弹”。但是这些空袭从来没能让第五航空舰队消停下来，鹿屋及其周边许多机场仍然是“神风”的老巢。日军飞机被分散停放，藏身在伪装网下或灌木丛中，并在黎明前夜色的掩护下推到起飞位置。那些拿着简单工具和设备的劳工队伍很快就能填平跑道上的弹坑，他们手中有的只是些手推车、篮子、铲子和手推式压路辊。美军舰载机和“超级堡垒”会投下延时起爆炸弹，其引信设为美军飞机离开几个小时后爆炸——但是无论这些炸弹炸死多少工人，日本从来都不会缺乏劳动力来弥补这些损失。

这些行动从来都不受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将领们欢迎，他们反对让B-29从其正在进行的对日本城市和航空工厂的战略轰炸任务中分身。但是当李梅将军向尼米兹抱怨时，这位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坚定地告诉他，当下的轰炸必须继续。官司沿着美军指挥层级一路打到了参联会，但参联会也支持尼米兹，李梅便再无话可说。“超级堡垒”对九州和四国机场的空袭从4月8日一直持续到5月11日，出击了超过1 600架次，才从这一勉为其难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在回忆录中，李梅声称这次任务是可耻的，而且并不值得：“B-29不是一种战术轰炸机，也没打算起到这个作用。无论我们怎样收拾这些小机场，也不可能把‘神风’的威胁降到零。或多或少，它总会存在。”[\[86\]](#)

在冲绳岛西边，拥挤的那霸沿岸水域和渡知具滩头，海面上漂满了残骸和垃圾。运输船和两栖舰队的船员们警惕地搜索着自杀快艇、“侏儒”潜艇，甚至是背着炸药背带的蛙人。在4月9日破晓前驱逐舰“查尔斯·J.巴杰尔号”被快艇投放的水雷炸中之后，每艘舰船上都布置了手持手电筒和汤姆森冲锋枪的哨兵。为做到万无一失，他们会向所有漂到射程内的残骸开火。舰队通过应召舰炮火力，以及在首里和那霸以北战场上彻夜发射照明弹来支援第10集团军。每天晚上，从薄暮到清晨，美日两军防线之间的“无人区”都被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岸上部队很感激这样的支援，认为此举降低了敌人夜间渗透进攻的威胁。

只要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的通话中报告有敌机接近警戒线，军舰上就会响起警报，一名号手会通过大喇叭广播系统吹号，然后所有舰员各就各位。舰长会宣布进入“Z状态”，意即要求把所有水密门和舱盖锁上。德约将军第54特混舰队的炮击军舰则会组成防空轮形阵，就像过去美国西部的大篷车防御阵一样。化学烟雾发生器开始喷吐浓密的蓝灰色烟幕，烟幕随海风逐渐扩大，但看起来一直紧贴在海面上。炮手和火控官们扫视着天空，听着无线电里战斗机引导官和战斗机飞行员们之间的通话。每艘舰“射击线”上的炮手们操纵着从5英寸到20毫米不等的高炮，炮管指向天空，眼睛也紧紧盯着那里。

这一时期最致命、使用最广泛的高射炮是中等射程的40mm博福斯炮，这种炮发射2磅重的炮弹，炮口初速每秒2 890英尺，单管炮理论射速每分钟160发，其弹道低伸，有效射程可接近2英里。博福斯高炮可以在超过1英里外击中一架大角度俯冲而来的“神风”机，其40mm炮弹将会把敌机撕碎——扯断机翼，撕开机身，打碎风挡和座舱，把螺旋桨打飞。飞机上最重、最坚固的部分，发动机和机身，即便飞机其他部分都被打掉，也还是会继续前冲一段距离才坠入海里。“爱达荷号”上的一名高炮指挥官罗伯特·华莱士上尉如此评论博福斯高炮：“即便只有一门四联装40炮的炮手知道该怎么做，就没有‘神风’机能冲过来。”[\[87\]](#)

大型5英寸 / 38倍径炮的真实潜力要到VT（可变定时）引信装备部

队后才被展露出来，这种引信又被称为“感应引信”或“近炸引信”，它相当于在炮弹上安装一台小型短距离多普勒雷达。这套技术令人赞叹地解决了在接近敌机这种快速移动的小型目标时引爆炮弹的难题，不会再让炮弹在其下方或后方爆炸。^[88]对于旁观者而言，5英寸VT引信炮弹的成功使用会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画面。如果目标是一架轰炸机，那么炮弹常常会引爆飞机挂载的炸弹。这时敌机不会燃起大火坠入海面，而是直接凌空爆炸，除了一团黑烟外什么都不剩。

4月12日，天高气爽，能见度几乎无限，宇垣将军下令发动“菊水二号”作战，参战部队包括185架“神风”自杀机以及150架战斗机和45架鱼雷机。上午11点后不久，行动开始，129架飞机从九州南部机场起飞。2个小时后，位于1号雷达哨站（代号“棺材角”）的2艘驱逐舰和4艘步兵支援登陆艇（炮艇）上的雷达显示屏亮了，30架爱知俯冲轰炸机向驱逐舰“普尔蒂号”和“卡辛·杨号”扑下来。两艘驱逐舰立刻拉起了一道防空火墙，大约12架飞机应声起火，坠入附近的海中。在随后的混战中，两艘驱逐舰和一艘炮艇被击中，遭到重创。“普尔蒂号”舰长在战斗报告中写道：“对于被派往雷达哨站执勤的驱逐舰水兵而言，即便有持久而光辉的职业前景也不会太令人期待。这个岗位极其危险，非常令人劳累，让人很不痛快。”^[89]

下午稍晚时候，在冲绳岛西方被称为“神风峡谷”的水域，德约将军的第54特混舰队遭到了一群飞机的突击。下午1时26分，联合战斗机引导网络中传来呼叫：“Exbrook！ Exbrook！ [全体舰艇注意！]”指挥官说：“闪光灯红，指挥灯绿。[向视野里一切逼近的飞机开火。]”^[90]三架鱼雷机从浪尖高度快速飞近，越过护航舰艇，直奔队形中央的战列舰而来。一架敌机被40mm炮弹击中，撞上了驱逐舰“杰拉斯号”左侧，炸成一团火球，驱逐舰上29人丧命。战列舰“田纳西号”则遭到5架飞机的攻击，它们穿过“杰拉斯号”的浓烟低空飞来，一架接一架被“田纳西号”和“爱达荷号”40mm和20mm炮的交叉火力击中，坠入海中。几分钟后，又一架日机冲下来，向“田纳西号”发动了时间计算精准的下滑攻

击，结果却在军舰正上方被击落。左前方出现的一架爱知俯冲轰炸机径直冲向军舰的上层建筑。它撞中了一座40mm四联高炮，炸死了所有炮手，燃烧的汽油流遍了甲板。飞机挂载的250磅炸弹穿透了甲板，在尉官住宿区爆炸。“田纳西号”战列舰上有23人战死，106人受伤，其中几十人严重烧伤。

两架中岛九七式舰攻鱼雷机现在开始向“爱达荷号”的左后方发动进攻。一枚5英寸VT引信炮弹引爆了第一架中岛鱼雷机携带的炸弹，飞机被炸得渣都不剩，甚至没见到有成块的残骸或碎片落入海里。第二架九七式舰攻还在继续飞来，并一度躲进了被摧毁同伴留下的烟团中。最终，一门20mm炮在极近的距离上阻止了这架飞机，可能距离“爱达荷号”左后方只有20英尺。机上炸弹被引爆，把残骸和弹片抛向甲板，导致舰上的8个防雷突出部隔舱进水，12人受伤。华莱士上尉站在“爱达荷号”上层建筑前部的岗位上，觉得那架飞机一定命中了军舰。他发现，“一枚离你如此近的炸弹爆炸时并不会像电影上那样发出隆隆声，而是发出一种爆裂声，就像闪电”。[\[91\]](#)

战斗接二连三，一直持续到傍晚。这天第58特混舰队没有一艘舰被击中或者受到近失弹损伤[\[92\]](#)，其战斗机飞行员称击落的战绩为151架。[\[93\]](#)

在舰队遭到这场前所未有的空袭之后，第二天上午，一条灾难性的消息从华盛顿的福莱斯特海军部长处发出，通过“ALNAV”电报——发往全体海军的电报——发到了每一艘舰船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去世了。他在佐治亚州温泉镇死于脑出血。战列舰“田纳西号”还在舔舐前一天被“神风”自杀机命中留下的伤口时，舰上的大喇叭响了：“注意！全体舰员注意！罗斯福总统去世了。重复，我们的最高统帅，罗斯福总统，去世了。”[\[94\]](#)

这条消息引发了一片震惊、悲伤，以及对未来战争走向的忧虑。年

轻人从记事起，罗斯福就一直是美国总统。渡知具外海一艘突击运输舰上的一名水兵回忆道：“我们没人说话，甚至没人抬头互相看彼此。我们散去了，似乎是本能地找地方一个人待着。许多人都在祈祷，许多人掩面而泣。”^[95]《纽约客》通讯员约翰·拉德纳正在冲绳岛上一个陆战队的团级指挥所里，这时电话里传来了这个消息。拉德纳看到许多陆战队员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还有些人震惊到一言不发，做起事来如同在梦游……我从未见过哪条消息能有这样的效果”。^[96]

约翰·A.罗斯福是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第六个孩子，也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是“大黄蜂号”上的一名后勤军官。“乔克”克拉克将军来到罗斯福上尉的住舱，把消息告诉了他。克拉克说可以送罗斯福回国参加父亲的葬礼，但是上尉谢绝了，他说：“我该待的地方在这儿。”^[97]

根据福莱斯特部长的命令，4月15日星期天，所有军舰都要举行特别纪念仪式。按照典型的流程，全体舰员默哀五分钟，然后排枪齐射三响，为老总统送别。

哈里·杜鲁门从1933年起就一直是罗斯福的第三副总统。许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CBS广播电台驻马尼拉麦克阿瑟司令部的通讯员威廉·邓恩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记不住现任副总统的名字。听到罗斯福的死讯，“我似乎被打上了标签，成了连这个大国的掌舵人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家播音员！”。^[98]尤金·斯莱奇记录说，他和陆战队的战友对杜鲁门“感到好奇，有一点担忧”：“我们当然不希望白宫里的什么人来把战争不必要地延长哪怕只有一天。”^[99]

与此相反，日军第三十二军指挥地堡里的气氛却是一片欢腾。据八原大佐回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确信这场战争我们赢定了！”^[100]有些人牵强附会地说，肯定是4月12日冲绳的地面进攻和大规模“菊水特攻”促使罗斯福中风而死。一份散发给岛上美军部队的日本传单宣称，每10艘美军航空母舰中有7艘或沉或伤，舰队伤亡15万人。“不仅是前任总统，任何人听说这一毁灭性的重创后都会因过度忧虑而死。吓死你们

前领袖的可怕损失将会让你们成为这个岛上的孤儿。日本的特攻部队将会击沉你们所有的舰船，连最后一艘驱逐舰都不放过。你们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目睹这一切成为现实。”^[101]

当天，罗斯福的死讯传遍了全世界，东京也宣布了重大的政治变动。小矶首相及其大部分内阁成员被罢免。77岁的退役海军大将，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被任命为新任首相。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巨头”也被换掉了五个，唯一留下来的是主和派领袖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宇垣将军在日记中或许语带讽刺地写道，最近的大规模“神风”攻击和冲绳岛上的地面进攻“就这么推翻了内阁，坑死了罗斯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反应”。^[102]

^[1]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13; USS *Randolph*, CV—15, “Action Report, Attack by Enemy Plane at Ulithi, 11—12 March 1945,” CV—15 A6—3 Serial: 004; Fifth Fleet War Diary, March 11, 1945, p.10; CO *Randolph* to Com5thFlt, March 14,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793.

^[2]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1, 1945, p.18.

^[3]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p.213—14.

^[4]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5] Combined Fleet Telegram Order No.564—B, reproduced in Ugaki, *Fading Victory*, p.553.

^[6]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dated March 1, 1945, p.157,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7]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8, 1945, p.23; Ugaki, *Fading Victory*, p.527.

^[8]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9] Ibid.

^[10] “富兰克林号”全称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号”，昵称“大本”。——译者注

^[11] Commander Joe Taylor, Executive Officer, “Narrative of Action 19 March 1945,” Enclosure C, USS *Franklin* (CV—13) Action Report, Serial 00212, 11 April 1945, FDR Library Map Room, Box 191.

- [12] Radford and Jurika,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46.
- [13] J.Bryan III diary, March 19,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78.
- [14] Commander Fifth Fleet War Diary, March 19, 1945, p.18.
- [15] Potter and Nimitz, *The Great Sea War*, p.449.
- [16] COM5THFLT to CINCPAC, March 2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797.
- [17] J.Bryan III diary, April 2,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05.
- [18] Dyer,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1078.
- [19] CTF 58 to CTF 51, March 25,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01.
- [20] 1英寻≈1.8米。——编者注
- [21] Charles F.Barber, oral history, p.6,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 [22]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U.S.Naval Institute, 1988, p.192.
- [2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23.
- [2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79.
- [25] Ibid., p.185.
- [26] Dyer,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p.1094.
- [2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149.
- [28]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Ryukyus: The U.S.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p.11.
- [29]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87.
- [30]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 [31] CTF 51 [Turner] to COM5THFLT [Spruance], April 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p.2810—11.
- [32]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xi.
- [33] Ibid., p.8.
- [34] Ibid., p.46.
- [35]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12.
- [36] *Okinawa Shinpo*, January 27, 1945, quo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3.

[37]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March 1, 1945, p.143.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38] “Outline of Army and Navy Operations,” January 19, 1945,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39] IGHQ Navy Directive No.510, dated March 1, 1945, p.157, NARA, RG 38, Imperial Gen.HQ Navy Directives, in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 Related Documents,” Vol.2, No.316, Box 42.

[40]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17, 1945, p.22.

[41] Matome Ugaki diary, March 2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p.559—60.

[42]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March 22, 1945, p.28.

[43] Ibid., entry dated April 4, 1945, p.42.

[44] Matome Ugaki diary, March 1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50.

[45] J.Bryan III diary, April 4,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10.

[46] Michael Bak Jr., oral history, pp.193—94.

[47] Walker, *Ninety Day Wonder*, pp.109—10.

[48]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24.

[49]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92.

[50]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51] CTF 58 to ATFC5THFLT Info CINCPAC, April 7,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green pages, p.2823.

[52]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3.

[53] Admiral Keizo Komura, commander of the fleet’s destroyer squadron, quoted in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61.

[5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62.

[55] Yoshida and Minear,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p.8.

[56] Ibid., p.24.

[57]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82.

[58]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4.

[59] Astor, *Wings of Gold*, p.402.

[60] J.Bryan III diary, April 7,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18.

- [61] Astor, *Wings of Gold*, p.405.
- [62]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5.
- [63] Ibid.
- [6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78.
- [65]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86.
- [66]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80.
- [67]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92.
- [68] Ibid., p.488.
- [69] Ibid., p.492.
- [70]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282.
- [71] Yoshida, "The Sinking of the *Yamato*," p.494.
- [72] Yoshida and Minear, *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 p.118.
- [73]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35.
- [74]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197.
- [75] Ibid., pp.192—93.
- [76] Pyle, *Last Chapter*, p.89.
- [77] Sherrod, *On to Westward*, p.285.
- [78] Reported in Admiral Ugaki's diary on April 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71.
- [79]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1.
- [80] Matome Ugaki diary, Friday, April 6,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p.572—73.
- [81]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April 6, 1945, pp.45—46.
- [82]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27.
- [83]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36.
- [84] Appendix 1, "Ships Damaged or Sunk on Radar Picket Duty,"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p.351—53.
- [85]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p.35—36.
- [86] LeMay and Kantor, *Mission with LeMay*, p.372.
- [87]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9.
- [88] Rowland and Boyd, *U.S. Navy Bureau of Ordnance in World War II*, Bureau of Ordnanc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Washington, DC, 1953, pp.270—74.

[89] USS *Purdy* Serial 024 Action Report 20 April 1945, p.28,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34.

[90]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38.

[91] Ibid., p.40.

[92] 前文中提到的被击中的老式战列舰属于炮击大队，不属于第58特混舰队。——译者注

[93]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p.12.

[94]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231.

[95] Ibid.

[96]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97]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5.

[9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19.

[99]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01.

[100]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45.

[101]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51.

[102] Matome Ugaki diary, Friday, April 13,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84.

第十四章

巴克纳尔将军决心要打破那霸—首里—与那原防线前的僵局，便批准了恢复地面进攻的计划。三个陆军师——由西到东依次是第7师、第96师、第27师——将并肩全线推进，目标是夺占嘉数高地、西原高地和知念半岛。4月19日破晓，美军的炮兵和舰炮进行了战役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第10集团军的炮兵在40分钟时间里向日军防线射出了1.9万枚炮弹，6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也向指定目标倾泻了大量高爆弹。陆战队和海军的舰载机也用炸弹和火箭弹加入了这场大合唱。这一幕场景对所有旁观者都充满了吸引力，但是炮击大部分只是听个响。日军部队安全地躲在他们的山洞和碉堡内，得到了天然石灰岩的有力保护，一旦炮击停止，他们就会立刻重回地面。第24军炮兵司令约瑟夫·希茨准将判断，每100枚落到他们防线上的炮弹，炸死的日军不会超过1个。[\[1\]](#)

美第27师出动30辆谢尔曼坦克在步兵掩护下向嘉数高地发动进攻。当坦克来到山坡的陡峭处时，日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突然开火，美军顿时陷入致命的火力之下。有几辆坦克被日军47mm反坦克炮命中瘫痪。当炮击停止，数百名日军步兵号叫着从山上冲下来。他们逐退美军步兵，再用手榴弹和22磅炸药包攻击坦克。22辆谢尔曼坦克被摧毁，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坦克单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在西边，第7步兵师被事先瞄准了山脚下的日军火炮和迫击炮压制在了开阔地上。第96师向位于日军第六十二师团防区中央的知念—西原山脊发动进攻。他们的两个先头排抵达了山脊，却被更高处日军射来的炮火压制在地，动弹不得，只能在惨重伤亡后撤退。在4月19日的进攻中，美军未能拿下区域中任何一处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山头，几乎被赶回了进攻发起线，反而付出了

720人伤亡或失踪的代价。

如此，巴克纳尔和他的手下人开始意识到，前方有一场漫长、艰苦而血腥的战斗在等着他们。敌人的筑垒防线设防严密，而且横跨岛屿两侧海岸。地形决定了这里没有可供包抄或机动的空间，而且许多地段过于陡峭崎岖，坦克无法通行。根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记载，这里的地形“完全没有机动空间；那里满是方块形的小山头，深洞，圆形黏土山，平缓的绿色山谷，崎岖的光秃秃的珊瑚岭，遍布四处的小土墩，以及从大山中延伸下来的狭窄的深谷和陡峭的手指形山岭”。^[2]对于美军来说，制空权和优势火力是有价值的，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陆军面临的困境和陆战队在硫黄岛上时相似，只是规模大了许多。美军将不得不依靠蛮力，沿着某些在整个太平洋上都属最为艰难的地形仰攻。

4月19日的进攻失败后，双方在整条战线上又进行了5天的激烈地面战。经历了痛苦体验的美军步兵也在逐步学习着如何进攻令人生畏的日军工事。他们绘制了精确到每一块巨石、每一个洞穴、每一座碉堡的战场地图，找到日军火力点之间的盲区或曰“死角”。随后步兵会紧密跟随炮击弹幕运动，前进巡逻队会设法趁日军躲避炮火时渗透到这些盲区中。如果步兵班能够包抄地堡或山洞入口，或者爬到它们顶上，日本守军便无法看见他们。他们一离开安全位置就会被消灭掉。这是一项缓慢、血腥、危险的工作，需要使用火焰喷射器、手榴弹、炸药包、轻武器、刺刀，甚至是匕首和拳头。巴克纳尔将军将这些战术称为“喷灯和手钻”打法，日军则称其为“骑兵冲锋”或“骑马”攻击法。

在冲绳岛上，舰炮和空中火力支援价值重大，但它们从来无法替代步兵部队的勇敢、主动性和坚毅。到最后还是不得不由陆军和陆战队士兵们把敌人从地下挖出来消灭掉，别无他法。他们鲜有侧翼机动的机会。在首里高地周围的局促地形上，人员密集的战线上被塞进去一个又一个的营——平均每600码前线就有1 000人——打败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正面突击。他们或许能短暂攻占山顶表面阵地，但很快就会被来自南面远处的敌人猛烈炮击或者优势兵力的日军步兵反击打回去。这样的事

情在硫黄岛上一再发生：双方反复进行攻击和反击，高地常常多次易手，有时会多达十几次。战场上美日两军的死者紧挨着躺在一起。曾经枝繁叶茂的地方，所有枝叶都被炸掉或者烧光，两军防线之间的地带成了弹痕累累、草木不生的荒原。重炮炮弹和迫击炮弹不停地落下，震撼着堑壕和散兵坑的侧壁。夜晚，日军的渗透攻击成了噩梦。士兵们精神崩溃后成为“精神病例”并被迫撤出前线的情况比先前任何一处太平洋战场都要多。战争通讯员约翰·拉德纳见到一个士兵被两名医护兵搀扶着离开前线。他没有受伤，但是瞪大了眼睛，不停地叫道：“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他们会干掉你们所有人！”^[3]

在冲绳西北角海岸伸出的本部半岛上，第6陆战师逐步打击并消灭了两个大队的日军。在半岛中央林木茂密而又地形崎岖的高地上，艰苦的战斗在所难免，即便在陆战队控制了半岛之后，他们也还要花很长时间来肃清残敌。第77步兵师的三个团在伊江岛上登陆，这是本部半岛西端海外的一座小岛。空中侦察未能判断出岛上日军的实力，于是陆军部队在一处他们称之为“血岭”的地形上陷入了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他们还要耗费5天时间才能消灭伊江岛上的抵抗。美军有258人战死，879人受伤，而所有4 700名日本守军则几乎被全部击毙。

伊江岛上的恶战还要了厄尼·派尔的性命，他是一位广受喜爱的著名战争通讯员，大兵们说他是“士兵之友”。^[4]先前在非洲、意大利、北欧和太平洋的战斗中，派尔常常冒着巨大的危险，和战场上的士兵们共同行军，共同生活。伊江岛之战原本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地任务，他甚至已经在一架返回美国的C-54运输机上拿到了一个座位。4月18日，派尔和一名营长一起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前往前线。当车子在一处十字路口减速时，一挺日军机枪开火了。这挺机枪隐蔽在路边几英尺外的一片浓密灌木丛中。司机和乘客立刻跳下车，躲进道路对侧的一条沟渠中。机枪第一次射击时没有人中弹，但是派尔犯了个错误，他把头伸出来想要查看情况。结果一颗子弹紧挨着钢盔下缘击中了他的左侧太阳穴，派尔当场死亡。后来，士兵们在此地竖起了一块木牌

子：“在这里，第77步兵师失去了一位兄弟，厄尼·派尔，1945年4月18日。”^[5]

4月30日，巴克纳尔将军命令海军陆战队加入首里防线中段和西段的战斗。5月1日，陆战队开始南下，他们坐在卡车上经过大片的帐篷城市，补给堆栈，以及筑路工地，那里的推土机和运土设备正在重塑地貌。在道路另一边向北行进的是第27步兵师的血战老兵们，第1陆战师此番正是要去接管他们的防线。“悲伤的神色揭示了他们的经历，”尤金·斯莱奇写道，“他们筋疲力尽，灰头土脸，形容可怖，眼神空洞，神情紧张。自从佩里硫以来我再未见过这种面容。”一名路过的陆军士兵告诉斯莱奇要做什么样的期待：“那里是地狱，陆战队。”^[6]

随着距离前线越来越近，炮声越来越响，高低起伏的田园风光也变成了坑坑洼洼的灰暗废土。在山岭的高处，炮弹炸碎、崩飞了外面的土石，露出了里面象牙色的珊瑚岩。威廉·曼彻斯特下士站在一处山顶向前看，觉得这幕场景看起来“很丑陋，但也有些似曾相识，我后来意识到，那很像是1914—1918年战争的照片。我想，凡尔登和帕斯尚尔一定就是这个样子。两支大军，面对面蹲在泥泞和烟尘之中纠缠在一起，痛苦到令人难以想象。这里没有地方可以迂回，东边是太平洋，西边就是东海”。^[7]

在首里要塞深处的日军第三十二军指挥地堡里，美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炸弹只不过是一种烦扰而已。爆炸声已经衰减大半，就像是在很远处一样，不会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地堡仍然在颤抖和摇晃，烟气有时也会从通风管飘进来，让所有人匆忙拿起防毒面具。4月29日，长勇将军召集参谋部和各师团长开会。长勇想要再发动一次反击，但规模要比4月12日半途而废的那次大上许多倍。和此前一样，八原大佐持另一派观点；他想要继续采取已经令美军失血三个星期的防御消耗战术。八原注意到敌人向首里的推进已经被控制在了每天前进100米的节奏上。让日

军部队离开安全的工事，暴露在敌人炮兵、舰炮和航空兵强大的联合火力之下，是“鲁莽的，而且注定会失败”。^[8]但是长勇夺回主动权的愿望却得到了各个师团长和前线指挥官的共鸣，他们认为八原的防御战术必然导致最终的失败。

听取了所有下属的意见后，牛岛将军决定发动进攻。进攻时间计划在5月4日。最终下达的命令中要求各部“展示团结的力量。每个军人必须消灭至少一个美国鬼子”。^[9]

进攻战以整个战役中日军最猛烈的迫击炮和重炮射击开场，在最初三个小时内就消耗了1.3万发炮弹。突击小分队溜出洞穴，试图渗透到美军防线后方。日军第二十七战车联队也派出了他们的轻型和中型坦克，想要对美军第24军战线中央第7师和第77师的接合部附近发动进攻。日军两栖进攻部队也在那霸和与那原南面的海滩登船。起初，攻击进展令人振奋。第三十二联队夺占了前田村以东的一处高地，第二十二联队推进到翁长村以北的一处山岭，将两支美军机枪组赶出了阵地。美军第184团的三个连被包抄、孤立在他们称之为“烟囱悬崖”和“轮盘赌台”的两处岩石山顶上。然而到了中午，日军的冲击动能逐渐耗尽。美军的反炮兵火力和空袭摧毁了超过50门日军火炮，其余大部分火炮被拖回山洞隐蔽起来。有些日军坦克迷了路，被迫折返；其余则被美军火炮或飞机打瘫、摧毁。东西两侧的两栖反登陆均告失败，大部分登陆艇被摧毁，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上岸，日军损失了500到800名官兵和几乎全部登陆艇。

到5月5日日终时，牛岛承认进攻失败，并令所有进攻部队“回归原位”。此战，日军损失了至少6 000名官兵，第二十七战车联队只剩下6辆中型坦克。日军炮兵大队也损失了众多火炮，消耗了大量库存弹药。在首里要塞，牛岛遇到八原大佐时声泪俱下，说他是错的，并保证在冲绳岛的后续战役中坚持防御消耗战术。然而，如八原大佐所说：“5月4日惨败留下的深刻创伤，哪怕用神药也无法医治。”^[10]日军从上到下顿时弥漫起了一股绝望感。

5月4日，美军的两个师伤亡335人，5月5日又伤亡了379人。但是战线两侧的力量平衡却被打破了，美军立刻行动了起来，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巴克纳尔将军告诉他的军长和师长们，他希望再花两个星期时间突破至首里。第1陆战团进攻了60高地，这是日军防线最西端的一处主要地块。5月6日至9日，双方展开了激战，山头易手两次，陆战队员们才最终巩固了对这个山头的占领。在他们的左边，第5陆战团以坦克和步兵协同杀入阿波茶镇（Awacha）以南的复杂地形。陆军第7师第184步兵团向我谢高地和圆锥形山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并在5月7日至8日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迅速进展。在美军防线中部，第77师沿着5号公路推进，打垮了沿途日军在每个山头 and 山脊上的疯狂抵抗。到5月11日，美第10集团军已经控制了前田、高知、阿波茶一线，后方通往渡知具的补给线也已安全。然而首里要塞那令人生畏的高大堡垒仍然矗立在南方，想要拿下它，还需要更多艰苦的战斗。

4月14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宣布，对冲绳外海盟军舰队的空袭已经击沉击伤敌舰326艘。其中“完全确定”击沉的包括6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34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根据官方战报，真实的数字应该更高——但是出于小心谨慎的考虑，以防忙中出错，未确认的战果暂未发布，以待“进一步确认”。^[11]一周后，东京广播电台报道说，敌人带到冲绳来的1 400艘船已经损失了一半，其中400艘被击沉，人员伤亡不少于80万人！报道中称，这一可怕的损失已经令美军“堕入混乱与痛苦的深渊”。^[12]

这些报道令东京先前吹过的那些牛皮相形见绌。宇垣的副司令横井俊之将军后来解释道，九州的航空兵指挥官受到来自下级的压力，这些下级想让指挥官们确认这些明显夸张的战果。当横井对一份这样的报告提出怀疑时，一名“神风”特攻队指挥官对他说：“若如此低估我们取得的战果，那我就没有理由要我的人去死。如果司令部不充分认可这些战绩，我就将切腹以示反对以及谢罪。”^[13]

尽管如此，东京的指挥层看起来真的相信“神风”战术或许能打赢冲绳之战。日本海军军令部估计美军舰队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现在的胜率是五五开”。[\[14\]](#)帝国大本营下令继续发动“菊水特攻”，以期将对手一击出局。时间是关键，自杀机部队必须赶在美军两栖舰队卸下大部分货物并退往乌利西或莱特岛之前发动进攻。补充飞机和飞行员将从本州岛源源不断南下，来到第五航空舰队位于九州的前进基地。[\[15\]](#)

在鹿屋基地，神风队员们住在基地中最好的兵营里。他们的宿舍就在汨汨流过的小溪旁，小溪上游是青翠的竹林和长满野花的草地。在随时可能赴死的阴影中生活，他们会在这片田园美景中漫步。他们会写信，写诗。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礼物，包括清酒、烈酒，和在饥馑之中艰难节约出来的食物。村民们会送来鸡蛋、鸡、猪，甚至是牛，将其宰杀，供神风队员们在最后的日子里享用。当地勤皇队的年轻女孩子们负责为他们洗衣、做饭、整理家务。这些“勤皇少女”成了这些神风队员的情感寄托——看起来是很纯洁的那种——她们将队员们称为“哥哥”，自己则是“妹妹”。出击前，女孩子们会彻夜工作，给自杀机装饰上樱花，在座舱里放上布娃娃或者折纸人偶。她们会参加起飞线上的送行仪式，流着泪向出发的飞机挥舞樱树枝或太阳旗。她们会收集飞行员们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附在感谢信里寄到他们家里。

“神风”特攻队在初期从来不缺志愿者。但是到了1945年春，航空兵指挥官发现新来自杀机飞行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许多人都是在无法拒绝的环境下被“要求”志愿参加的。根据一名海军参谋军官的说法：“鼓励‘志愿参加’变成了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自愿，可以想见，环境上的这种变化会导致所涉人员态度的变化。”他还补充说，许多新来者“显然是被环境所扰〔而做出的决定〕”。[\[16\]](#)在水户市的陆军训练基地里，有一整个班的飞行学员被指挥官要求志愿执行自杀任务。“我都不记得要我向前迈一步，”一名学员后来说，“就像是一股狂风从队列后方呼啸而来，把每个人都向前吹了一步，那简直是完全整齐的一步走。”[\[17\]](#)

1945年时的神风队员中大约有一半是从各个年级的大学生中拉来的。许多人都具有开放式的思维，接受过国外思想的影响，包括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这令他们在军队训练营中很不招军官和士官们待见。许多年轻学员被单独拎出来特别对待，包括毒打——这令他们对军官，以及对把控着国家命运的独裁政府充满鄙视和憎恨。从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中看，这些未来的神风队员中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十分仰慕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其他一些人则持有激进主义、乌托邦、和平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

例如，林忠男（音）就是从京都大学被拉出来的。在他的文字中，林从不认可战争目标和帝国主义政府；他甚至认为日本的失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当的。但他仍然决意为国而死：“时局固然危殆。但于我，日本毁灭理所应当……历史的必然让我们的人民遭此危难。为了保卫这片我们所热爱的土地上的人民，我们挺身而出。”^[18]林忠男死于战争结束前3个星期，时年24岁。

佐佐木八郎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他相信受资本主义荼毒的日本毫无指望，而即将到来的战败将会为革命带来机会。这位博学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在1945年4月14日冲绳外海的一次自杀任务中战死，时年22岁。他身后留下了一套规模庞大的个人藏书，涵盖历史、科学、哲学、经济，还有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19]

林一藏来自九州岛的福冈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最后一次出击时还带着一本《圣经》、一本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和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会把您的照片放在胸前，”他在从鹿屋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一定会击沉一艘敌舰。当您从广播中听到我们胜利击沉他们军舰时，请记住有一艘敌舰是我撞的。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妈妈在看着我，为我祈祷。”^[20]林少尉，22岁，死于1945年4月12日的“菊水二号”作战中。

有些人并不想去送死。随着战争的进行，或明或暗的反抗也越来越

多。横井将军回忆说，队员们的态度“从待宰羔羊的绝望到公开挑战他们的上级军官，各种都有”。^[21]在最后出击前一晚，神风队会组织狂欢酒宴，大家纵情畅饮清酒，还会打砸家具。一名目击者讲述了这样的一幕场景：“那地方变成了骚乱。有些人用军刀打破悬挂着的电灯泡。有些人搬起椅子砸破窗户，撕白色的桌布。空中回荡着军歌和咒骂的声音。有些人发狂怒吼，另一些人则大声哭泣。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晚。”^[22]起飞后，有些桀骜不驯的飞行员会低空飞过他们上级军官的宿舍，像是要撞击或者扫射他们的样子。但只要他们接下来执行了使命，那这些违抗都是可以原谅的。

到冲绳战役后期，“神风”机越来越多地掉头返回基地降落。飞行员们会报告说遭遇发动机故障，或者说是无法找到敌舰。其他一些人则在九州和冲绳之间某个小岛附近海面迫降，希望能逃到岸上撑到战争结束。有些飞行员会在计划出发前一晚溜过起飞线破坏飞机。他们可能只是打开油箱盖子，假装燃油不足，然后以此为借口返航。有一名飞行员（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一连9次返回基地后，被行刑队枪决。另一次，一名“神风”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在鹿儿岛他家附近的一处铁路路基上，似乎是想死得离家近一点。

九州南部已到了鲜花盛开的时节。每天下午宇垣将军都会花几个小时到他鹿屋司令部周围的山上和乡间打野鸡。4月13日，他发现麦苗已经“很高了”，大树也“绿得生机勃勃”。^[23]樱花已至全盛花期，当地老百姓也在空地上种下了土豆和蔬菜，将军很高兴看到这些新种下的庄稼茁壮成长。他看到麦苗已经“完全长起来了，麦穗全都如同枪尖一样指向天空，就像是要号召整个国家拿起武器”。^[24]4月21日，春季捕猎季节结束，宇垣收起了他的捕猎执照和猎枪。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并不指望能活到秋季捕猎季到来之时。^[25]

九州的各个机场几乎每天都会遭到B-29机群和美军舰载机的空袭。“地狱猫”和“海盗”从机场上低空飞过，扫射停放着的飞机和地面人

员。“超级堡垒”则从高空投下成群的1 000磅高爆炸弹，落在跑道中央。有些炸弹会立刻爆炸，其他一些——装有延时引信——则会钻到沥青下面蛰伏起来。鹿屋机场的主跑道插满了标示尚未起爆的延时炸弹位置的小红旗。宇垣将军觉得它们“相当麻烦……它们无法被当作哑弹立刻处理掉，有些炸弹的延时引信设置会长达72小时”。[\[26\]](#)

在鹿儿岛湾的知览机场，勤皇少女们被派去修复跑道。她们把泥土和石子铲进弹坑，直到手掌磨出血泡，腰也伸不直。5月初的一天，空袭警报声打断了她们的工作，于是她们跑进了跑道旁边的堑壕里。一队F6F“地狱猫”从低空飞过机场，扫射停放的飞机和地面设施。“这些美国人飞得这么低，你可以看见他们粉红色的脸和蓝眼睛，以及方形白边的老大的护目镜，”鸟滨玲子说，“我们不愿承认，但我们确实佩服他们的自信，竟敢飞得这么低。我到现在都不确定他们到底是十分勇敢，还是只不过看不起我们，觉得没什么好怕的。”[\[27\]](#)

在“神风”进攻日的早晨，地面人员、当地司令部参谋以及勤皇少女们都会参加在起飞线上举行的哀伤的送行仪式。飞行员们戴着白色围巾和旭日头带，被称赞是“神鹰一去不复返”。有些人为了这一刻已经把体毛全部刮掉。他们和部队指挥官最后一次共举酒杯一饮而尽，之后爬进已经被女孩子们打扫一净并装饰一新的座舱，启动发动机，滑行到跑道上。他们一架接一架地起飞，随后转向南面飞行两个小时，扑向冲绳外海的敌舰队。他们从九州南部的稻田、麦地和小山上低空飞过。“我们会跑出来，挥舞旗子或者只是挥手，”一名当地女人回忆道，“有一架飞机，可能是领队的，会低飞摇晃机翼向我们致意。我们大哭不止。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我们拼命挥手，直到他们消失，然后会为他们祈祷。”[\[28\]](#)

对于冲绳岛外海战舰上的盟军水兵们而言，白天黑夜都是在令人神经麻木的敌机来袭和虚假警报之间无限循环。只要“神风”来袭，刺耳的鸣笛警报就会响起，把所有人召唤到战位上。烟雾发生器会放出不透光的化学烟雾，5英寸高炮开始接连发出低沉的射击声（砰！砰！

砰！），黑色的高炮烟团立刻布满了天空。当高炮以低射角开火时，炮弹对邻近的友舰也会造成不小的威胁。在整个冲绳战役期间，友舰高炮的误伤造成了多达几百人的伤亡。高射炮群没完没了的轰鸣令水兵们身心俱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无论那些5英寸、40毫米、20毫米高炮的炮手打出多少炮弹，庆良间列岛的军火船上总是会有足够的炮弹等着他们去打——因此他们尽可以不停地开火，完全不用考虑节约。在渡知具滩头旁，高射炮火的密度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名目击者记得自己看到一艘战列舰夜间遭到空袭，舰上高炮射出炽烈的曳光弹，汇成一条连续不断的火的溪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炮弹和曳光弹从一个地方射出来……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锥形，这个锥形还会四处移动。然后你就能看到一架飞机在锥形顶角处起火，掉下来，而锥形还在继续移动。这真壮观。”^[29]

被炸毁、烧焦、打成残废的舰船挤满了庆良间列岛的维修锚地，美国人将这里戏称为“破船湾”。“凯利”特纳早先关于夺占这片岛群的决定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如果舰队没能在距离冲绳如此之近的地方拿下这样一片受岛群保护的水域，许多受损船只将不得不自沉。但有了这个基地，修理船和浮船坞就足以处理一些小规模的维修，损伤更严重的舰船也可以在这里先行修补，再用自身动力开往乌利西甚至是珍珠港。从4月6日到6月22日，超过200艘盟军舰艇和支援船只被“神风”自杀机或常规轰炸机命中，或者被近失弹击伤——但只有36艘被击沉或自沉。

战斗的久拖不决令海军水兵们难堪重荷，但第5舰队的总司令仍然和往日一样坚韧而镇定。早在登陆部队踏上冲绳之前的3月31日，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就由于一架“神风”机的撞击而被赶出了他的第一艘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他的第二艘旗舰，老式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在4月至5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和空袭搏斗。尽管如此，这位身材颇长，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的四星上将却依旧军容严整。和往常一样，他每天都要在军舰艏楼上步行数个小时锻炼身体，即便“新墨西哥号”上的火炮彻夜轰鸣，他也一样睡得很香。第5舰队的航海医生戴维·威尔卡茨回

忆过1945年4月底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站在后甲板上，看到一群日军飞机从西北方扑来。有一架“神风”机单枪匹马向“新墨西哥号”发动大角度撞击。其他军官立刻躲进屋里寻找掩护，只有斯普鲁恩斯继续待在栏杆旁用望远镜看着冲过来的飞机，连腰都没弯一下。40mm高炮最终摧毁了那架自杀机，它“炸成几块掉进了海里，距离‘新墨西哥号’真的只有几英尺远”。

威尔卡茨医生壮着胆子过去批评总司令不该如此不必要地暴露自己。斯普鲁恩斯答道：“如果你是个好的长老会信徒，你就会知道，除非该轮到你死，否则不会有危险。”^[30]

一如往日，外围雷达哨站上的驱逐舰和炮艇在战斗中的遭遇最为惨烈。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连续执勤三四天后，舰员们就会显示出极度疲劳的迹象。他们昼夜待在战位上，吃厨房做好送上来的三明治、煮熟的鸡蛋，喝咖啡。“压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步兵支援登陆艇的艇长回忆道，“我们身上又破又脏，散发着臭味，眼睛血红。舰上一团乱，到处都是空弹壳。我的脸上被燃烧的火药颗粒烧出了麻子，因为有一门厄利孔高炮就在距离我战位只有3码的地方开火。我们祈祷能有坏天气，这大概是唯一能放慢来袭日军飞机的事情了。”^[31]另一艘炮艇上的一名水手写道，所有舰员都到了“崩溃边缘”。大家的精神都十分脆弱，舰上的战友们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脸红脖子粗。当有人把一个大扳手丢在甲板上时，“我就像是被高压电打到了那样跳了起来”。^[32]

1945年5月3日，10号雷达哨站打了一场这种典型的死战。此时正值夕阳西下，完成战斗空中巡逻的“地狱猫”和“海盗”刚刚返回母舰。驱逐舰“阿伦·沃德号”和“利特尔号”和伴随的4艘炮艇遭到了大约50架日军飞机的进攻。“阿伦·沃德号”被7架“神风”自杀机撞中，严重进水，几乎沉没，军舰的下甲板也被大火吞没。45名舰员战死，49人受伤。^[33]经过漫长而英勇的救火和救援，这艘遭到重创的驱逐舰被拖到了庆良间列岛。与此同时，“利特尔号”遭到了至少18架自杀机的攻击，并被4架飞

机撞中，其中1架飞机几乎垂直地撞在军舰的后部鱼雷发射管处。巨大的冲击力打断了“利特尔号”的龙骨，两分钟内它的主甲板就淹了水。一名爬到甲板上的舰员被眼前地狱般的场景震撼了：“军官们无声地在甲板上快速走动，把灰色的毯子盖在仍然带着体温、正在流血的尸体上……从许多意义上看，死者都是我们中间最幸运的人。他们既不用弃舰，也不用回忆。”^[34]被第一架“神风”命中仅仅12分钟后，“利特尔号”就消失了。30名舰员死亡，79人受伤。

第58特混舰队在冲绳以东占据了阵位，并在大约6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持续巡航。米彻尔将军原本期望至迟到4月底时能够从为两栖舰队和岛屿提供空中掩护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如果能早些更好——但是陆军和陆战队的航空兵部队要到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时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这种延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冲绳岛上机场的建设由于地面松软湿滑而落后于计划中的进度，这一情况由于5月春季降雨的到来而雪上加霜。和在莱特岛时一样，岛上缺乏足够的珊瑚岩来铺设机场。日本人建造的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粗糙而泥泞，在夜间，还要靠在跑道两旁挖掘的火坑里点燃汽油和煤油来标示出跑道。飞行员和地面人员就住在帐篷里，从天而降的高炮弹片可以轻易把它们撕碎。

5月24日晚，日军向读谷机场发动了一场大胆的突击队奇袭。5架日军轰炸机突然从低空飞来，放下起落架，想要在机场降落。其中4架在着陆前就被击落了，剩下那架成功降落并滑行到停机坪旁停了下来。12名日军突击队员从机舱里涌出，四散到停放的美军飞机中，用手榴弹和炸药包进行破坏。9架美军飞机被炸毁，另有20多架受伤。守卫机场的陆战队员开始疯狂射击，甚至相互对射，许多人被友军火力误击而死亡。日军还炸毁了一处油库，烧掉了7万加仑航空燃油。交火持续了一整夜，直至黎明后最后一名日军突击队员被击毙为止。基地中的一名陆战队航空兵军官罗纳德·D.萨尔蒙上校说这一幕“相当可怕……我在所有战争中见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晚”。^[35]

虽然第58特混舰队多次派遣单个特混大队分兵北上去空袭九州，但

其主力却始终被牢牢钉在冲绳滩头，机动性受到巨大限制。他们每天的行动是可以预见的，而可预见就意味着危险。米彻尔抱怨说他的特混舰队已经成了“日本航空兵的高速死靶子”。^[36]大部分晚上，小群敌人巡逻机都会飞来跟踪美军舰队，投下照明弹，有时还会直接投射炸弹或鱼雷。美军会用雷达跟踪这些来袭者，并引导夜间战斗机前往截击。白天会有大规模的空袭，时间常常是在中午前后。大部分日机都会被执行战斗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斗机拦截并常常在距离特混大队中央至少30英里处被击落，但是少量飞机突破外围防线向航母发动俯冲也不是稀罕事。这对军舰舰员们而言就是最令人紧张的时刻了。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没人能预料到何时会有一架飞机逃过暴风雨般的高射炮火撞向军舰。下甲板上的人们对此类空袭尤为紧张——原因很简单，下甲板的人员伤亡率要高得多，因为他们很容易被大火围困或被浓烟熏死。

这一沉闷的循环看似永无止境。人们有时也会来点幽默减减压。在一连数天可怕的防空作战之后，“乔克”克拉克将军向他的特混大队发电：“看《希伯来书》第13章第8段。”于是在整个大队的所有舰上，人们打开《圣经》，大声读了出来：“耶稣基督^[37]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38]

人们变得越发易怒和暴躁。舰队里有个公开的秘密，许多水兵会从机库甲板的弹药库里偷高酒精度的“鱼雷汁”来喝。所有舰员都被要求在脸上和手臂上涂抹一种油腻的白亮亮的防晒霜，但是许多人讨厌这种感觉和防晒霜的气味。补充中队的年轻飞行员们现在体会到了什么是飞行员疲劳症，航空医生则警告说必须尽快替换这些人，否则操作事故就会激增。大喇叭里传出的命令和发言要求所有人保持警惕，这样才能活下来。在一艘航母上，有人在一个战斗机中队待命室的黑板上潦草地写了一行字：“保持警惕——别忘了军舰上那些瑟瑟发抖的可怜战友！”^[39]另一艘航母上，一份当日计划中写道：“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作战疲劳而艰难，但不要因此而丢掉我们的判断力。”所有舰员都被要求“谨防不当之词脱口而出，这不仅会贬低你，还会让你失去战友之谊……臭脾气就

和臭垃圾一样，应该被砸碎丢进海里”。[\[40\]](#)

1945年5月11日上午，米彻尔将军的旗舰“邦克山号”成了一场可怕程度极为罕见的“神风”攻击的牺牲品。两架三菱零式战斗机利用特混舰队上空的低云，在炮手们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穿出浓密的云层。第一架飞机以小角度俯冲，扑向航母右后方，撞在了3号升降机后部的飞行甲板上，栽进一个中队34架加满了油的“地狱猫”中间。在撞击前一瞬间，飞机投下了挂载的550磅炸弹，炸弹撕开三层甲板，穿出舰体，在右舷旁爆炸。第二架飞机以近乎垂直的俯冲撞下来，速度可能超过500节，击穿了舰岛底部的飞行甲板。在这些灾难性打击之下，“邦克山号”自己的弹药和燃油被点着了，巨大的二次爆炸引发了最为惨烈的破坏。数百名舰员没有任何逃生机会，当场丧命——炸死、烧死或者窒息而死。还有数百人被逼出飞行甲板，退到舷外通道和高炮走廊上等候救援，或者干脆自发跳进海里。军舰燃起大火，一股浓烟升腾到1 000英尺高处。搭乘在邻近的“企业号”上的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描述了这艘燃烧的航母：

军舰的整个后部都陷入了无法控制的烈火中。它看起来很像新闻短片里燃烧的油井，只是更凶猛——因为这火烧的是高度提炼后的汽油和未发射的弹药。大股翻滚的黑烟从舰尾升起，猛烈地喷吐着橙红色的火舌。耀眼的白色亮光不停地从中闪现，那是燃烧的飞机或炮位上整備完成的弹药被引爆了。每过几分钟，整团的浓烟就会被大片的火焰遮蔽，那是又有一架飞机的油箱爆炸了，或者是又一摊从下方机库甲板破损的燃油管线里漏出的汽油触碰了火舌。

在超过一小时的时间里，烈火完全没有减弱的迹象。当数十万加仑的水和化学灭火剂喷射上去之后，它们或许略微平缓了一点，但随着受伤的舰体内发生更多的爆炸，它们反而更加贪婪地向舰体前部蔓延而去。[\[41\]](#)

死者中有第58特混舰队司令部的3名军官和10名水兵。^[42]米彻尔将军本人也失去了许多舰载机大队和舰员中的好友。当天下午3点，他和60名幸存的幕僚一起离开了仍在燃烧的“邦克山号”，转移到“企业号”上。当米彻尔来到舰上时，亚当斯写道：“他看起来又累又老，简直要发疯了。他轮廓鲜明的脸更显得饱经风霜——就像是河川侵蚀过的尘暴旱区一样——但他的双眼却闪耀着复仇的火焰。”^[43]

经历了8个小时的灭火和抢修之后，“邦克山号”变成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就和它的姊妹舰“富兰克林号”六个星期前一样。舰上有389人死亡，264人受伤。死者和伤者的比例高得反常，这只能归因于当时的情况——当敌机撞击时，这些人都在下甲板上，他们还没来得及爬上梯子就死于浓烟。挖开这艘航母的第84战斗机中队的待命室时，救援队在入口处发现22名飞行员的尸体堆在了一起。舱室里充满了浓烟时，他们都想从这里逃出去。

但是“邦克山号”的轮机舱和发电机却大部完好，因此它还能以近20节的速度退往乌利西环礁。5月12日，“邦克山号”为超过300名舰员举行了海葬。这艘破破烂烂的航母在乌利西做了简单修补，随后靠自身的动力横跨太平洋。三个月后战争结束时，它正在皮吉特湾的布雷默顿海军造船厂进行维修。

三天后，米彻尔的新旗舰“企业号”又被一架“神风”自杀机撞中，这位将军不得不再次更换旗舰，这次是“伦道夫号”——它也不是“神风”攻击的生客了。米彻尔对他的作战参谋詹姆斯·弗拉特利说：“吉米，告诉我的特混大队指挥官们，如果鬼子再这么搞下去，我头上马上就要长头发了。”^[44]

“邦克山号”的悲剧发生一天后，斯普鲁恩斯将军的旗舰“新墨西哥号”也中了招。当时这艘战列舰刚刚在庆良间列岛补充完弹药，正在返回渡知县湾。这天天气凉爽，风平浪静。下午5点，两架低飞的日军飞机从舰尾“太阳方向”飞了过来。一枚5英寸炮弹直接命中了日军长机，

它在“新墨西哥号”左后方大约1/4英里处坠入海面。第二架飞机在高射炮火中穿行，绕了一圈，撞上了军舰右侧前桅后部。机上的炸弹在高炮甲板上爆炸，飞机的残骸则冲进了烟道，在烟囱的薄壁上撕开了一个30英尺的口子。爆炸使得舰上的航空汽油罐开裂，大火立刻吞没了上层建筑。已经装填完毕的40mm和20mm高炮的炮弹从炮位护栏处掉落，滚进了烟囱并开始爆炸。但是损管队在不到60秒的时间里就打开了水龙头，很快就控制住了火势。所有火焰都在一小时内被扑灭。

起初人们找不到斯普鲁恩斯将军了，他的幕僚们担心他会不会死了。参谋长阿瑟·C.戴维斯少将和副官查尔斯·F.巴伯一起冲出食堂甲板，匆匆赶到指挥舰桥上。但斯普鲁恩斯没在那里。最后他们在二层甲板上找到了他，当时他正拿着消防水管和其他舰员一起救火呢。他毫发无伤，而且跟没事人一样。巴伯上尉回忆道：“斯普鲁恩斯将军，就像他常常做的那样，总是会从容不迫地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完。”^[45]被命中一小时后，“新墨西哥号”的损伤便已被控制住，他告诉幕僚们，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一次更换旗舰：“我相信我们可以留在战位上，完成修复，然后继续。”^[46]

“新墨西哥号”遭受了177人的伤亡，其中55人战死。炸弹在烟囱上炸开了一个“大得可怕的洞”，但是军舰航行未受影响。^[47]第二天上午，斯普鲁恩斯给他的前参谋长“卡尔”穆尔写信道：“高炮开火时我正准备到舰桥去，于是我就走向二层甲板的掩蔽处，没走多远我们就被击中了，从我所在的地方通往舰桥的两条路刚巧都被飞机和炸弹打到了，所以我没有走过去实属万幸。”和平时一样，这位第5舰队司令的评论中毫无感情色彩：“自杀飞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我们绝不能低估。我不相信那些没在它们作战范围内待过的人能体会到它对舰攻击的潜力。”^[48]

1945年5月8日传来了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冲绳外海的战舰

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最猛烈最持久的舰炮炮击来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事件。然而战壕里的大头兵们对于欧洲胜利日只不过是耸耸肩，苦笑一下而已。这一事件和他们眼下的艰难处境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欧洲胜利日意味着可以把部队和飞机从欧洲调过来，那倒是不错的事。但若是说这应该庆祝，那他们就只能报以怒目了。如一名在冲绳苦战的陆战队员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消息“没有改变我们战线的位置，泥土的质地，天空的颜色，也没有改变我们每个人斗篷里装的弹药数量”。另一个人也说：“纳粹德国和在月亮上也没什么区别。”^[49]

3天后的5月11日，第10集团军以两个不同军种的军再次发动协同进攻——西边是第3两栖军，包括第1陆战师和第6陆战师；东边是第24军，包括第77步兵师和第96步兵师，还有第7师留作预备队。在左右两翼的远端，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将会沿着海岸向南推进，同时对首里要塞周围的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强大压力。此举演变成了冲绳岛乃至太平洋所有岛屿上最为激烈和拼命的地面作战。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向着那些貌不惊人的山头和高地上的日军坚固防御阵地攻了上去，这些山原本没有名字，美军在绘制地图时临时给它们取了名：巧克力山、平顶山、墓碑高地、圆锥形山、瓦纳高地、瓦纳谷地、甜面包山。六个星期前，它们还是些绿植覆盖的平静优美的地方，有起伏的山峦和密布的梯田，还能看见美丽的蓝色大海。但是现在，这里已是一片荒原，没有植被，到处都是浑身烂泥的尸体。

对阵双方你来我往，互相进攻，在山坡上仰攻下冲，在坦克陷阱和雷区中血战，在机枪火舌前冲锋，山头几度易手，直到日美两军的尸体堆满地面，交相枕藉。每一轮新的进攻都以划破天际的火炮与迫击炮弹幕射击开场，此时谢尔曼坦克引擎空转，舱盖打开，驾驶员等候着前进的信号。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手们都受领了“射击任务”，包括标有目标坐标和射程的卡片，还有关于应该射击多少炮弹、何种炮弹以及射击多久的指示。步兵们则领取弹药，把水壶装满水，把用不上的装备丢下来，然后跳进散兵坑和堑壕，低下头，等着军官或士官发出前进的号

令。炮击逐渐达到了高潮，海岸外的舰炮也以其巨大的火力和野战炮兵一同唱响了大合唱，这时，除了分不出炸点的连续轰鸣，人们什么都听不见。最后，迫击炮射出白磷弹，在敌人的视线前拉起一道烟幕。随着信号发出，坦克发动机轰的一声咬上离合器，履带开始在泥土中前行，步兵们则站起来猫着腰向前走，前后左右各保持5步间距。他们的目的地是日军火力点之间的盲区，在那里，他们可以从侧翼攻击敌人的碉堡和山洞口。隔着烟幕，敌人的机枪和步枪“嗒嗒嗒”“砰、砰”地响着，子弹从士兵们耳边嗖嗖地飞过。还有迫击炮弹落在他们中间。士兵们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赌平均概率，或生或死，听天由命。当烟幕浓厚时，日军的“南部式”轻机枪会快速进行两三点射以节约子弹，“嗒嗒……嗒嗒嗒……嗒嗒”。但是一旦烟幕散去，日军机枪手能够看见目标，他们就会紧紧扣住扳机，扫射整个射界。如果左右两边有人倒下，他的战友会继续前进。“你会看到这一幕，但是你要继续前进，”一名陆战队员回忆道，“你不会停下来，因为他已经死了。”[\[50\]](#)

侧翼包抄的机会几乎没有，地面进攻只能迎头打上去。每一次向前推进都会招来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从看似坚不可摧的阵地上射来的猛烈火力。在5月15日对瓦纳谷地发动的一场进攻中，日军47mm反坦克炮当场摧毁了数辆谢尔曼坦克，其余坦克只能折返。在这样的防御面前，既然连坦克都无法取得进展，那还能指望步兵们有什么斩获呢？有时候，他们甚至对取得半点进展都不抱希望。机枪射击的嗒嗒声和步枪的砰砰声从来没有减弱过，此外还有火炮和迫击炮低沉的轰鸣，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如此大量的钢铁在空中横飞，任何形式的进攻看上去都只能是自杀。但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却很直接，压力也很大：他们必须摧垮日本守军的防御，而且必须要快。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硬冲敌人防线。经过代价惨重的反复试错，他们渐渐摸索出了新战术。战术创新常常是由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官们发明的，这些人突然意识到了怎样才能拿下一处敌人阵地，并且就地动手。日军对反斜面阵地的运用精明而有效，美军却可以用精确而准时的迫击炮火来对付。美军的迫击炮手们一点一点地、断断续续地找到了窍门。迫击炮弹能够越过山顶，直接落在

堑壕和洞口中。如果能掐准炮击和地面佯攻之间的时间，那么迫击炮弹就能卡在日军士兵从地下掩体内钻出来准备迎击美军时命中目标。许多日军被打死，其余人则会撤退，这样美军步兵班就有机会施展“喷灯和手钻”打法了，而其余敌人此时仍在地下，对外面一无所知，从而陷入被动。

从5月21日起，一连10天的大暴雨将战场化为了无边无际的泥潭。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躲在雨衣下，浑身湿透，十分痛苦。散兵坑进了水，他们不得不用头盔把水舀出来。人们不得不试着把弹药箱摆放在被水灌满的战壕底部充当木地板。他们手上和指头上的皮肤起皱而发白。他们的脚从来都干不了，还长了疮，一碰就淌水——当他们把靴子脱掉时，会发现湿袜子上沾了许多一小团一小团的死肉。他们读家信时都得抓紧时间，不然墨水就会被雨水化开冲掉。他们打开口粮罐头时，可以接满雨水，把吃的变成汤，不过是冷的。吉普车和卡车的车轴陷入泥泞，动弹不得，就连坦克和履带车都无法前进。弹药、补给物资和5加仑水桶不得不由人顶着瓢泼大雨，蹚过齐膝深的泥潭，穿过日军炮火覆盖的地段送到前线来。

在从不停歇的暴雨中，能见度有时会降到只有10英尺。美军偶尔会瞥见他们的敌人——壮实的小个子士兵，穿着褐色军服，戴着宽边钢盔，在满是弹坑的地段迅速而高效地移动。无人区通宵都被美军用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照得雪亮。美军时时刻刻都在提防日军步兵的夜袭，无论是小股部队的隐蔽渗透还是连级规模日军高呼着“日本万岁！”的刺刀冲锋。美军知道日军会穿戴着缴获的美军钢盔和军服，大摇大摆地走进美军防线，然后突然开火。在冲绳，敌人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扑过来。他们会来自日军防线——这自然无须多言——还会经由地下隧道或被越过的阵地从侧翼或者后方出现。只要空中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美国大兵们就会警惕地抬头望去，因为他们都被告知要留意观察敌人的伞兵。

战场上尸横遍野，腐尸烂肉散发出的令人反胃的恶臭弥漫在空气

中，躲无可躲。除非让丧葬组暴露在敌人的致命火力之下，否则就不可能把尸体拖走。如果把尸体就地掩埋，那么迫击炮和火炮炮弹爆炸的巨大冲击会将其从地下翻出来，炸成肉块撒到战场上。而这些暴尸荒野的尸体又会被反复炸得粉身碎骨，除了红色的血迹留在泥土中，其余什么都不剩。这里的卫生问题比太平洋其他任何战场都更严重。威廉·曼彻斯特就发现：“如果你把超过25万人在一条战线上放三个星期，却没有处理排泄物的设施，那你就要遇到大麻烦了。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巨大的粪池中作战和睡觉。”^[51]粪便中长满了又大又肥的白色蛆虫。如果有人摔倒再站起来，他就会看到蛆爬满了他的裤子和子弹带，或者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有个陆战队员会用一柄匕首的刀背把它们刮下来。对于尤金·斯莱奇而言，这些蛆几乎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被迫在战争的腐尸中翻来滚去，这几乎超过了我们所能忍受的极限。”^[52]七个月前在佩里硫，他原本认定自己和陆战队的战友们遇到的已经是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战场环境了。但是现在：“我度日如年，有时甚至想还是死了更好些。我们处在战争终极恐怖的深渊底下。在佩里硫乌穆尔布罗格袋形阵地周围的战斗中，我曾因为人命如草芥而感到沮丧。但是在首里要塞前的泥泞和暴雨之中，我们甚至已身处蛆虫和腐尸的包围之中。人们挣扎、战斗、流血，环境则如此恶劣，我觉得我们是被扔进了地狱的粪坑中。”^[53]

在战线西端，第6陆战师在他们称之为“甜面包山”，日本人称为“安里五十二高地”的地形上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是一座由珊瑚岩和火山灰构成的山岭，大约300码长，100英尺高，其两侧另有两座山头拱卫，分别是半月山和马蹄山，三座山头呈箭头形。这里陡峭的悬崖被挖空，里面布满了隧道和射击孔。这里的地形使得日军总是能够对所有接近路线形成多重交叉火力覆盖。双方都明白此处是整个防线的关键环节：如果美军突破此地，前方便是开阔大道，可以包抄与合围首里要塞。日军指挥官们从他们在首里的观察所可以直接看到这里的战斗，每次美军发动新一轮进攻，他们就会向这里投入大量援军。美军用火炮、火箭弹、凝

固汽油弹、烟幕弹和舰炮弹幕对甜面包山狂轰滥炸。一连10天，第6陆战师不停地派出坦克和步兵，向这个防御体系发动进攻。陆战队员们一次又一次短暂攻上甜面包山顶，但结果却都被日军猛烈的炮击和步兵冲锋打回来。最终，在5月26日，美军占领此地后击退了日军的多次猛烈反击，守住了这里。

八原大佐相信，如果日本炮兵能拥有更多的弹药储备，他们或许就能无限期挡住美军陆战队的进攻。事实上，这些守军“十分坚定，他们的战斗如此勇猛，以至于安里五十二之战比预期中持久得多。即便在安里五十二落入敌手之后，我们的部队仍然在令人难以置信地坚持战斗”。[\[54\]](#)

当日军防线的东西两端向后弯曲时，战场上的僵局也开始逐渐被打破，美国陆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们开始沿海岸推进。这次双路合围有可能会孤立日军防线中央的主要防御支撑点。在甜面包山拿下日军侧翼后，陆战队员们打通了越过安里川的南部海岸公路，进入了被孤立的那霸城。从这里，陆战队通往国场山区的门户已经洞开，接下来便可直通首里防御体系。在东边，第96师攻占了海拔比与那原周围海岸平原高出476英尺的圆锥形山东侧，这样，日军俯瞰中城湾的阵地也就守不住了。于是日军开始战术撤退，他们后退了大约半英里，进入紧靠着首里北侧的一条新防线。

牛岛将军现在相信他的部队无法再坚守已经守了一个月的横跨岛屿的防线了。防线的东西两翼已经在敌人连续不断的猛攻之下塌陷。整个日军防线被向后击退了大约半英里，牛岛也没有步兵预备队可以来填补损失了。他的部队仍然防守着首里周围的同心圆形堡垒防线，但是美军已经准备好从两个方向发动压倒性的夹击。正如八原大佐后来所写：“整体上，战况看似稳定，但实际上，从5月28日之后就已经如同晚期肺结核病人一般。或许看起来一切正常，但胸腔却已经空了。”[\[55\]](#)

在5月下旬的暴雨中，日军第三十二军的指挥地堡变得格外恶臭而难以忍受。地堡内进水严重，“扫帚乱漂”，所有人都要动起手来把床和

家具垫高。[\[56\]](#)美军火炮看起来已经锁定了他们的洞口，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炮弹落在洞口周围，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离开地堡都是件危险的事。在最近一次发给东京的无线电报中，牛岛将军告诉大本营，他的阵地即将被攻破。他还请求向海岸外的美军舰队再发动一轮“神风”进攻，以求让美军地面部队觉得他们的弹药和补给可能会耗尽。大本营要牛岛继续坚守防线，守得越久越好，并且拖延战斗，为本土争取准备防御的时间。

此前提出过正确主张的八原大佐又拿出了向冲绳岛南端喜屋武半岛撤退的战术方案，那里美军坦克无法通行的巨石堆中已经备妥了地下阵地。南撤无法改变冲绳之战的结局——第三十二军将要被消灭，所有日军指挥官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或许能拖延战斗，并让美军付出更高的伤亡代价。这一想法遭到了几位师团长和旅团长的反对。第六十二师团参谋长提出，数千人已在防守首里时死去，他们的战友想要死在同一个地方。坑道里还有数千名伤员，他们也只能被丢下。冲绳地方官员则担心首里地区民众的命运，许多人将会试图跟随军队南下，他们将会陷入双方的交叉火网或者落入敌手。

听取了各方不同的主张后，牛岛决定南撤。“我们还保有一部分战斗力，”他说，“而且我们还得到了岛民的大力支持。有了这些，我们将要在最南边的山区战斗，打到最后一寸土地，最后一人。”[\[57\]](#)

日军指挥官使出了各种瞒天过海之术来隐蔽他们的撤退企图。一部分被选定的前线部队要向美军防线发动“表演性”进攻，同时军队主力则要趁夜离开阵地南下，乘车或步行。日军第六十二师团在5月24日至25日夜间撤退，其后卫部队同时向美军第77步兵师发动了猛烈进攻。日军第二十四师团在三天后的夜晚撤退，第四十四独立混成旅团在5月31日撤退。每一名撤退的士兵都带上了尽可能多的弹药和补给，每人约130磅。大部分伤员都被丢在了后面，许多人喝下掺了氰化钾的牛奶而死。

5月27日，第三十二军的最高指挥人员分批走出首里地堡，离开了他们的指挥山洞。牛岛将军一个人摸黑走下了石头台阶。他的参谋军官

们想要跟上他，结果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沿途到处都是日军士兵和冲绳平民的尸体，其中许多已经在野外腐烂多时。军官们爬上一辆卡车的后厢，沿着黑暗的道路开去。卡车没有开车灯，从撤退的日军士兵和大群难民组成的长长纵队旁驶过。

直到日军部队主力逃到喜屋武半岛的新防御阵地后，美军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恶劣的天气帮助了日军，雨、雾和低垂的云层即便是在白天也会遮蔽他们的行踪。透过云缝，美军飞行员偶尔能瞥见大群日本人向南走去，但他们觉得这些全都是平民。对于那些在仿佛坚不可摧的首里要塞前苦战的美军指挥官而言，日军主动放弃这一价值重大的堡垒是难以置信的。即便是美方军、师级指挥部的情报部门也判断日军计划在这些高地上死战到底。

美军的铁钳现在终于在业已被削弱的首里防御阵地上合拢了。战斗漫长而痛苦，即便面对的只是留下来掩护第三十二军撤退的已经消耗殆尽的日军后卫部队，也是如此。倾盆大雨令能见度降到了10英尺。车辆无法爬上被冲毁的道路，因而无法开上山顶，这样补给就十分困难。于是美军飞机从低空飞来，向被火焰和浓烟标记出来的地区空投补给和弹药。最终，5月29日，第1陆战师的先头部队开进了首里要塞——或者说是要塞那古代石头城墙的废墟——第77师一部则拿下了旁边的首里城。留作牺牲品的日军后卫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战至最后一人。

5月27日午夜，哈尔西将军回来接替斯普鲁恩斯掌管了舰队。第二天，麦凯恩接替米彻尔指挥快速航母突击舰队。第5舰队改编为第3舰队，第58特混舰队也再次变成第38特混舰队。此时“新泽西号”正在改装，因此哈尔西和他的“阴谋诡计部”此次登上了其姊妹舰，战列舰“密苏里号”。

指挥交接比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其从未被公开过的原因，乃是尼米兹和金希望他们的“首发阵容”斯普鲁恩斯、米彻尔和特纳能在接下来11月的“奥林匹克”九州岛登陆战中担任指挥。为了保持5个月一次的轮换

频率，就有必要让哈尔西和麦凯恩提前回来。[\[58\]](#)

此时，第38特混舰队仍要继续掩护冲绳外海的两栖舰队，其飞机也要在岛上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陆地上正在激战，“神风”攻击的规模已经缩小，频率也降低了，但威胁仍不容忽视。经历了两个多月以来一天没停过的激烈战斗后，各个航母大队已是师老兵疲。其中一个大队，“泰德”谢尔曼将军的第38.3大队被派回莱特湾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补充。阿瑟·拉福德的第38.4特混大队被派往北面，向九州机场再次发动战斗机扫荡。“乔克”克拉克的第38.1大队（哈尔西的新旗舰就在这个大队的内层防卫圈中作战）则要空袭近处的冲绳岛，并为岛上提供战斗空中巡逻。

6月1日，舰队南方的帕劳群岛附近海域显露出了台风正在生成的一丝迹象。关岛的气象中心收集并汇总了来自舰船、潜艇和远程巡逻机的气象报告，跟踪着正在北上的“热带扰动”。这些报告很零散，常常互相矛盾，其汇总后的图景也很混乱。但是6月4日，中途岛战役3周年之际，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报告：一场大号台风正径直扑向冲绳岛以东第3舰队的所在地。

和往常一样，风暴的行进路线无法准确预测，但没人会忘记前一年12月的那场灾难。于是飞机被召回航母，降到机库甲板，用双股和三股钢缆固定起来。驱逐舰则匆匆加满了油。和幕僚及气象人员商议了之后，哈尔西选择令他的两支特混大队转向110°的东南偏东航向，预计这样可以令舰队远离风暴，同时和冲绳之间的距离也不会太远。但是随后的报告则说风暴的路线更加偏北，移动速度也比先前预想的更快。此时，气压计读数开始下降，天象也变得复杂。哈尔西命令舰队航向转向西北。他的想法是横越风暴前方，从其预计路线外围风力较弱的西半边通过。但是台风仿佛自己有了心眼，故意奔着第3舰队而来。那些6个月前就在舰队里的人觉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不祥之兆。

克拉克的第38.1大队最惨。6月5日一早，他旗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显示屏探测到了一个紧密的圆形“台风眼”正直奔自己而来，这是大威

力台风的特有标志。^[59]在巨浪中，“大黄蜂号”摇晃得如同驱逐舰一般，小些的舰艇则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凌晨4时20分，克拉克通过短距离步话机联系麦凯恩，请求允许向南转，这样他的舰船就能赶在台风到来之前逃走。麦凯恩把请示转给了哈尔西，因而延迟了20分钟答复。在这段时间里，克拉克命令所有舰船尽最大努力转舵迎向海浪。凌晨4时40分，当“大黄蜂号”的指挥舰桥收到麦凯恩的确认答复时，已经来不及了。克拉克的舰队已经被牢牢卷入了呼啸的狂风之中。

当东方海平线上露出第一道紫色光芒时，一座“水山”撞上了“大黄蜂号”的舰首。“老天！”副舰长罗伊·L.约翰逊说，“那一定有十座房子那么高，当全部的冲击力落在飞行甲板上时，所有东西都被带走了。飞行甲板的边缘塌了，所有天线都不见了，全部的侧舷走廊和有些飞机掉进了海里。我们处境艰难。”^[60]

风情逐渐缓解之后，事情就很清楚了：整个特混大队都遭到了重击。没有舰船沉没，但是几乎每艘舰船都报告遭到重创，包括第38.1大队的全部4艘航母。“大黄蜂号”和“本宁顿号”的飞行甲板前部拐角折了下来，就像是书页上为了标记而折的角那样。重巡洋舰“匹兹堡号”大约100英尺的舰首从舰上被整个撕下。“匹兹堡号”的姊妹舰“巴尔的摩号”——正是这艘舰前一年把罗斯福送到了夏威夷——也遭到重击，但它仍然留在舰队里，后来在干船坞中进行了维修。飞机方面，总共有233架飞机掉出舷外，36架损坏到无法维修而被抛弃，另有23架受损严重。6人被卷入大海，另有4人受重伤。

台风过后，哈尔西下令再次空袭九州。“大黄蜂号”已经不像是能放出飞机的样子了，但是克拉克决心试试。一架F4U“海盗”战斗机试图在缩短了飞行甲板上滑跑起飞，结果一头栽进海里，带着飞行员沉了下去。这是因为折起来的飞行甲板导致了过大的紊流。舰员们点着喷灯，想要把飞行甲板的损坏部分尽可能切割掉，但是忙了一天一夜，施工队只切除了一小部分损坏的钢质结构。在克拉克的怂恿下——虽然他不是舰长——“大黄蜂号”设法从舰尾放出飞机。埃塞克斯级航母从来没试过

这种引人注目的杂耍般的把戏。舰上的轮机开始倒转，军舰开始迎风“倒退”。工程人员为此把轮机开到了超负荷状态。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大黄蜂号”成功用这种方法坚持收放飞机，从舰尾放出飞机，从受损的舰首回收飞机。

6月10日，肯尼将军的陆军第5航空队做好了完全承担起冲绳防空工作的准备，第3舰队终于可以被解脱出来，撤回莱特湾去进行急需的维修、补给和休整了。舰队已经筋疲力尽，而台风带来的创伤又令其雪上加霜。旗舰“约克城号”在圣彼得罗湾下锚后，拉福德将军一头栽到床铺上，一连睡了几乎24个小时。^[61]谢尔曼将军的第38.3特混大队已经在海上停留了79天，其中52天都在作战——这创造了美国海军的新纪录。^[62]

6个月内两次误入台风，哈尔西知道他的指挥权已经悬于一线。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他告诉尼米兹，天气预报烂透了。他们把关于风暴位置和路线的报告全都标绘在了地图上：“早先对风暴位置的估算覆盖了3.4万平方英里。而且预报还严重延迟。”^[63]美国海军为此在“新墨西哥号”的军官餐厅里组织了一个调查庭。主席是约翰·胡佛将军，前一年12月那次台风后判定责任在哈尔西的调查庭主席也是这位目光锐利的老水手。特混大队指挥官克拉克和拉福德在做证时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未来的参联会主席拉福德认为：“此番哈尔西将军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疏忽不可原谅。”他提出，哈尔西和麦凯恩两人在国内待了很久，刚刚回到舰队，他们过于骄傲，没有听取更有经验的下级的建议。拉福德知道天气预报不靠谱，但他认为即便只是靠基本的航海技术也应当让两位将军做出更好的选择：“我很难理解[哈尔西]为什么硬要让所有三支特混大队待在一起，独立行动的大队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别管我们，我的大队就能逃出风暴。”^[64]

调查庭建议“认真考虑”解除哈尔西和麦凯恩两位将军的指挥权，把他们打发到其他岗位上。最终裁决则交给了上级。金似乎确实认真考虑了解除两位将军指挥权的事，而且福莱斯特部长也说会支持他的决定。

不过最后，他们决定留下哈尔西，但把麦凯恩召回华盛顿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副局长。（后来还没等调离麦凯恩，战争就结束了，这位将军在到任新岗位之前就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这一次，很可能是哈尔西的国民英雄身份拯救了他的指挥权。在1945年的整个夏季，他的照片和他喋喋不休的演讲都是美国媒体上的重头戏。在调查庭提交结论的当周，哈尔西奸笑的面孔就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头像上方是他的标志性口号：“杀死日本鬼，杀死日本鬼，杀死更多的日本鬼。”^[65]

当美第10集团军在岛上追击日军时，持续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拖了他们的后腿。即便是坦克和履带车辆也会陷入褐色的泥潭中，许多车辆都不得不被抛弃。补给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部分依靠将补给物资直接送到美军控制的海滩，部分依靠空投。塞缪尔·海因斯飞了几十次空中补给，在他的翼下“是一个曾经和平的古代世界的废墟——小块的田地和石头老城墙，古树的虬枝下遍布小道，原来是房子的地方只剩下一堆石头，所有一切就在我的机翼下方，所有一切都清晰可见，即便在雨中也是如此”。^[66]

南下的道路成了露天停尸房，到处可见死去的日本人和冲绳人。美军步兵要下手清理，把尸体拖到路边，好为卡车和坦克清出一条通路来。第6陆战师的托马斯·麦金尼回忆了他看到的情景，那些尸体显然是努力想要跟随撤退的军队向南爬的日军伤兵：“我们发现，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多少，数百人吧，伸着胳膊和腿，躺在那里，很明显他们曾经努力爬行。他们的残肢仍然打着绷带，却沾满了泥土和其他东西。他们就这么爬，很努力，他们决心要向前，却死在了路上。”^[67]

日军第三十二军将会在横跨喜屋武半岛的防线上建立最后的立足点，这是冲绳岛最南端，是由崎岖台地和珊瑚岩峭壁组成的伸向大海的一条“舌头”。日军的主要防线穿过与座岳和八重濑岳两座山岭。冲绳战

场的这最后一角占地约11平方英里。

日军从首里的撤退非常顺畅。美军发现日军动向时，已经来不及利用撤退的纵队暴露在外的机会来消灭他们了。尽管如此，第三十二军还是遭到了严重削弱，其向喜屋武的撤退顶多将最终的失败推迟两三个星期而已。6月4日，在汇总了来自各个师团和联队指挥官的报告之后，总部参谋们得出结论，全军残余的兵力大约为3万人，而两个星期前是4万人。日军在首里防线的后卫作战中失去了一些最精锐的老部队。残余规模最大的有组织部队是还有1.2万名官兵的第二十四师团。但是由于重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物资的损失，其战斗效能已经大幅下降。

6月6日，四个美军师（两个陆军师，两个陆战师）沿着八重濑岳和与座岳悬崖向日军主要支撑点发动了试探性进攻。野战炮炸掉那些伸出地面的珊瑚岩，为第713装甲喷火营的喷火坦克清理通道，后者则将火焰喷进周围天然石灰岩洞的洞口。美军在地形稍好的防线东段取得了快速进展，在6月11日夜夺取了被称为“95高地”的一处地块。日军只做了零星抵抗，而且大部分没有组织，但是仍将会有许多美军在冲绳战役的最后阶段丢掉性命。随着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封闭了敌人日渐缩小的袋形阵地外的包围圈，班规模的小股日军发动了夜间渗透攻击和万岁冲锋。山上的狙击手也要了许多人的命，而当美军在山间快速推进时，友军迫击炮和火炮造成的伤亡也与日俱增。最惨的是“老种子”第1陆战师，他们在6月11日到6月18日一周时间内伤亡了1 150人。

冲绳南部：最后阶段作战，1945年4月—6月



美军在冲绳岛比在太平洋任何其他战场上都更努力地劝说敌人放下武器。劝降对象既包括日本军人，也包括冲绳平民。飞机在日军防线上投下了数十万份传单，其中仅6月12日一天就投下3万份。第10集团军的心理战部门出版了一份日语日报。吉普车、卡车和巡逻艇上都架设了大喇叭，由日裔“美二代”们拿着劝降信朗读播放。电池供电的袖珍收音机

还被挂在降落伞上投了下去，这样日军在山洞里也可以听到美军的广播。和早前相比，这些传单和劝降信写得更好，更聪明，而且更贴合日本人特有的风俗和思维方式。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几个中心思想上：军事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日本军政府腐败无能，日本人必须团结起来，拯救自己的国家，使之免于彻底的毁灭。^[68]“投降”一词被格外小心地予以回避，改为邀请日本军人“起来反抗，加入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这是走出绝望困境的最好方法”。他们告诉日军士兵，他打得很勇敢，但是现在他已经“竭尽所能，战争结束后还需要他”。^[69]

这样的劝降比此前太平洋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在战役最后阶段的喜屋武半岛战斗中，数千名日军士兵双手举过头顶走出了山洞。最令人惊讶的是，整个编制单位的日军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有序指挥下举起了双手——这在传统日本观点看来匪夷所思。这样就形成了滚雪球之势——走进美军防线的日本人越多，想要效仿他们的人也就越多。许多勇敢的日裔“美二代”自愿独自走下洞穴，和敌人士兵面对面说话——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孩子都被关在美国本土的营地。有些被俘日军甚至愿意返回山洞和地堡帮助劝说自己的前战友投降，他们知道这些人藏在哪里。冲绳战役中总共有约1.1万名日军成为俘虏，包括超过7000名日本正规军士兵。为了容纳这源源不断的人流，美军的战俘营也越修越大。一名美军中尉惊叹道：“你需要一辆吉普车才能从战俘营的一侧来到另一侧”。^[70]

数万名冲绳平民因害怕据说如同魔鬼一般的敌人而跟随日本军队南撤。岛屿南部交战区域附近可能有多达10万平民——平均算来，战场上每有1名日本兵，就会有超过3名平民。太平洋战争中还从来没有哪个主要战场上有如此之多的老百姓，或许只有马尼拉除外。日军常常把老百姓赶出山洞，赶到开阔地上，暴露在轰炸之下。日军抢走他们的食物，逼迫当妈妈的冲绳人带着哭闹的婴儿离开洞穴，要么就让她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否则他们就会直接下手杀害婴儿。数不清的成人和孩子死在地炮和舰炮的炮击以及空中轰炸之下，或者死在机枪、火焰喷射器和其他

步兵武器的交叉火力之中。日军已经下令，只要逮到没有说日语的平民，就要将其当作间谍处死。许多当地老人不会说日语，因此而遭受戕害。一名冲绳人说日本军队把老百姓当成随时可以牺牲掉的炮灰，“就像象棋里的小卒子”。^[71]

美军部队向南前进时，遇到了道路另一边迎面而来的难民长龙——悲惨的人潮，他们绝望、饥饿、肮脏，女人背着孩子，打成捆的衣服或其他财产挑在肩上。不少人嚼着甜菜根。有些人受了伤，手脚并用向前爬。当时16岁的冲绳学生宫城喜久子回忆了那一幕惨剧：“数万人像蚂蚁那样向前爬。他们都是老百姓。老爷爷，老奶奶，背着孩子的妈妈，浑身泥土，迈着碎步向前跑。孩子若是受了伤，就会被丢在路边，扔掉不要了。那些小孩认出我们是学生，就会喊着‘Nei, nei !’——那是冲绳话‘姐姐’的意思，想要我们抱起他们。太可怜了。我至今都时常想起他们的哭声。”^[72]

许多冲绳老百姓在接近美军防御阵地时被打死。美军哨兵们都接到命令要向他们开枪，尤其是在夜间，这种时候人很难分清来者是军人还是平民。火光和照明弹照亮了朝北走向美军防线的人群。有些时候日本军队甚至会驱赶着冲绳老百姓在自己前面走，拿他们当肉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杀戮，美军向全岛各处投放了传单，传单上用图画和简单的日语、冲绳语写道：“远离飞机！远离道路！不要靠近弹药库！远离军队阵地！哪怕你只是偶然忽略了上述某个警告，下场都可能会很惨。”^[73]第6陆战师的诺里斯·布彻尔回忆说，许多日军士兵穿成平民的样子，甚至化装成女人，混在成群的平民中溜过防线。“很不幸，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打死他们。许多可怜的冲绳人就这样被打死了。他们是战争的牺牲品。不得不这么做，我们也很难受，但我们也要保自己的命。”^[74]第7步兵师的二等兵约翰·加西亚在夜间看到一个黑影穿过一片田地走来，于是开了枪。天亮后，他走过去，发现“那里躺着一个女人，背上绑着婴儿。子弹打穿了她，从婴儿背后穿了出来。这至今仍然困扰着我，阴魂不散。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杀人犯。你在黑暗中只能看见一个

人影弯着腰。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个士兵还是老百姓”。^[75]但是第6陆战师的查尔斯·米勒却说他的许多陆战队战友会多少有些随意地射杀冲绳老百姓。“这些人会说：‘来了个斜眼睛的，砰砰……又来了个斜眼睛的猪，砰砰！’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76]

而与此同时，许多美军士兵也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救援平民。路易斯·托马斯中尉是美国海军医疗队的一名军官，他驻扎在冲绳北部的名户镇附近。他的医院有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防守。道路上拉起了警戒线。一天夜里，火光中有一大群平民沿着道路走过来。这时一名陆战队哨兵在步话机中呼叫：“不要开火。那是平民。”随后他爬出沙包掩体，跑进了黑暗中。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护卫着一群老人、女人和儿童。“我想不会有人记录了他的举动，但是如果我们有权授予他金质奖章的话，我们会这么做的，”托马斯中尉回忆道，“那时候，我们都鼓起了掌，欢呼起来，我们对他说他是个伟大的陆战队员。”^[77]

日军第三十二军最后的指挥洞穴里挤满了士兵和难民，即便是牛岛将军自己也没有私人空间了。参谋军官们不得不在仅余的少量床铺上轮流睡觉，要么就在脏兮兮的过道上席地而眠。石灰岩洞穴内部又臭又潮，水滴从钟乳石上一滴滴地落到地上。各个山洞中有数百名和部队失散的掉队士兵。许多人神经紧张，两眼空洞，漫无目的地在山洞中晃荡，自言自语。美军飞机在其头顶的山岭上投下凝固汽油弹，上层洞穴中的人纷纷死于烟熏火烧。海岸外的巡逻艇不停地向洞口开炮，直到它们开始一点点地崩塌。一名日本兵回忆道：“当大型炸弹和炮弹在摩文仁悬崖上爆炸时，我们的整个山洞就如同地震那样晃动了起来。”^[78]

牛岛将军的最后几天是一个人在一张小写字桌旁度过的，他读书，借着烛光写嘉奖信，有时还会拿起纸扇给自己扇风。隔壁山洞里的长勇将军则一边拿着大烟斗吸烟，一边读书。6月18日星期一，牛岛将军向他的所有指挥官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他感谢他“挚爱的军人们”尽了职。从此往后，所有人都要听从本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长勇将军在电文

后还加了一句附言：“勿受被俘之辱，汝等可永生。”^[79]残余的散兵游勇被告知要争取渗透出美军防线，到岛屿北部去，那里的山区还有日军小股部队在进行游击战。

日军指挥官能听到海岸外巡逻艇上大喇叭播放的要冲绳老百姓投降的劝降广播。有些死硬的军官对此不屑一顾，说“美国人成天胡说八道”。^[80]但是能看到许多平民甚至是军人向海岸外的巡逻艇游过去。6月18日，日军司令部收到了巴克纳尔将军直接写给牛岛将军的劝降信：“阁下麾下的部队打得很英勇，很好，你们的步兵战术已经获得了你们对手的尊敬……比如我，您是一名长期钻研和实践步兵作战的将军……因此我相信，您和我一样明白，岛上所有抵抗的日军不出几天就要毁灭了。”^[81]这封信引来了一阵大笑，牛岛讥讽道：“敌人让我当上步兵作战专家了。”^[82]

三天后，牛岛向东京发出了诀别电。之后他邀请所有的参谋参加最后的宴会。剩下的所有清酒和烈酒都开了瓶，大家共饮告别酒。之后，牛岛和长勇离开山洞，坐在一处俯瞰东海的悬崖顶上。牛岛穿着全套的军服，长勇将军则穿着白色和服。6月22日凌晨4时10分，他们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腹部，下属军官们立刻举起武士刀砍掉了他们的脑袋。

根据大田昌秀的回忆，美军后来找到了牛岛将军的坟墓。大田看到墓碑上插着一把美式军刀，还用英文涂满了脏话。^[83]

南部沿岸的山洞里还留有大约1.5万名日军，要把他们彻底扫除还需要不少时间。小股日军还将一直打到7月，但是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冲绳岛上也不再有了“前线”。所有山洞都用火焰喷射器全面扫荡了一遍，再用炸药炸塌；数千名日军和平民被埋葬其中。在有组织的抵抗结束后的最后八天战斗中，估计有8 975名日军士兵被打死，数千名日本人投降。其余许多人自杀身亡。

16岁的冲绳学生宫城喜久子在一个山洞里躲藏了超过两个星期。6月17日，山洞被炸了，可能是美军手榴弹炸的。喜久子没有受伤，但她

的许多同学都受伤而死：

我闻到了血腥味。我立刻意识到：“他们被击中了！”我们生活在黑暗中，什么都要靠闻。我在下面听到我同学的声音：“我一条腿没了！”“我的手没了！”在老师的要求下，我来到了一片血海之中。护士、士兵、学生，要么当场死掉，要么身受重伤，其中有一人我的朋友胜子，她的大腿根受了伤。我蒙了。洞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旁边有一个高年级学生正拼命想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我不行了，”她小声说，“所以请先照顾其他人吧。”随后她就停止了呼吸。[\[84\]](#)

喜久子和其他几位没有受伤的女孩子设法逃出了山洞。她们爬下悬崖，来到一处布满礁石的海滩上。她们已经严重脱水，头发爬满了虱子，指甲磨秃了，身上长满跳蚤，浑身都是泥污。这些人浑身发痒，而且几乎就快饿死了。她和其他女孩子相互保证：“如果我不能动了，或者你不能动，我就给你氰化物。”她们每人都留着一枚手榴弹，“就像留着护身符一样”。[\[85\]](#)

在海滩上，他们遇到了好几万人，这一大群人当中既有日本士兵，也有冲绳老百姓。美军巡逻艇就在海岸外，日裔美军广播员用大喇叭高声劝降：“那些会游泳的，游过来！我们会救你们的。不会游泳的，走到港川去！白天走，晚上不要动。我们有吃的，我们会帮助你们！”

但是女孩子们不信这些声音。“自打我们还是小孩子起，我们就只被教育着要恨他们，”喜久子说，“他们会扒光女孩子的衣服，为所欲为，再用坦克压过去。我们真的信了……我们没有搭理那声音，而是继续游荡。我们只是太害怕被扒光了。女孩子最怕的就是这个，不是吗？”[\[86\]](#)她震惊地看到一个日本兵举起双手涉水走下海里，另一个日本兵举枪打中了他的后背。

四天后，她被俘虏了。她失去了意识，醒来时在恍惚中看到一个小

国兵用枪戳她，示意她站起来。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被杀死或者被侵犯，但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其他老百姓都得到了美军医疗人员的照顾。他们的伤口都打上了绷带，还注射了生理盐水。“在那一刻之前，我印象中的美国人都是魔鬼和恶魔。我愣住了。我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87]

回到渡知具湾周围的集结区和休息营地时，这些打得筋疲力尽的美国大兵都认不出那里了。挖土队、施工队和建设队已经令此地面目一新。这座640平方英里的岛屿将被用作历史上最大规模两栖作战的前进基地，该行动便是即将对九州岛发动的登陆战（“奥林匹克”行动），战役计划发起日是1945年11月1日。第8航空队的B-24、B-17轰炸机和陆军战斗机已经从遥远的欧洲来到此地。在登陆滩头附近的读谷机场，一条7 000英尺长的跑道已经在6月17日投入使用。筑路单位将修建1 400英里新铺设的道路，包括两条纵贯岛屿南北的四车道高速公路，还有其他几条横跨全岛的公路。为了替代被摧毁的桥梁，满足过河之需，工兵们使用了英国人发明的“贝利桥”，也就是活动便桥——一种可折叠的预制钢桁架桥。各个主要机场和补给中心周围的道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卡车、吉普车、拖车和马车。美军不得不派一部分士兵来指挥交通。在嘉手纳机场附近，交通如此拥堵，以至于美军还在其中一个主要十字路口处建设了环岛。数十辆推土机铲平了整座山头，填平了沟壑与河床。冲绳的港口新建了不少栈桥、码头，还用清淤驳船进行了扩建。到6月时，这里单月卸载的货物量已经超过了和平时期纽约港的水平。一份海军基建项目的官方史料给出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统计数字：“到1945年底，冲绳的海军设施占地2万英亩^[88]，其中建有4 180英尺长的码头，71.2万平方英尺的室内通用存储空间，1 177.8万平方英尺露天存放区，19.3万立方英尺冷库，还有可以存储882万加仑航空汽油、3万桶柴油、5万桶原油以及1.3万平方英尺弹药的堆栈。飞机修理车间占地32.41万平方英尺，普通修理车间占地9.1万平方英尺。医院面积达到

33.8万平方英尺，住房面积475.5万平方英尺。”^[89]一位“海蜂”工兵说得更加直白：“我们在冲绳的工程量相当于从原始森林上建起一整个罗得岛。”^[90]

离前线越远，人们越能感受到军种之间深深的矛盾——从无伤大雅的互相取笑，到带着恶意的指责，到对骂，再到群殴。无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会教冲绳小孩跑到陆军营地外喊：“麦克阿瑟将军吃屎！”（他们骗小孩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给我一根烟”。）^[91]唯独“海蜂”部队得到了所有其他姊妹军种的喜爱和尊敬。约翰·沃林格中士和另一名陆战队员有一次到一个“海蜂”营地去看能不能蹭一块肥皂。到了那里后，他们意外找到了一个专业的鞋匠。沃林格把自己的靴子给那人看了看，靴子的鞋跟处有一枚钉子露出来了。“他看了下鞋跟，说‘把另一只也给我’。于是他把两个鞋跟都拆下来，换上了新的。他后来问我们吃过了没，我们说反正回到炮位上的时候饿不死，他说：‘跟我来。’他把我们带到了军士长食堂，请我们吃了一顿难以置信的炸牡蛎，这是有些‘海蜂’主动从礁石上搞来的。”^[92]

无论从哪方面看，冲绳战役都是太平洋上最可怕的一战，没有之一。美军的伤亡（包括海、陆、空）是太平洋上所有两栖战中最高的一——48 881人伤亡，其中12 520人死亡或失踪，36 361人负伤。第10集团军有7 613人战死，约3.1万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巴克纳尔将军，他在6月18日被敌人的火炮袭击打死，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死于敌人火力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此外还有2.6万名军人被列为“非战斗伤亡”，其中不仅包括那些患病者，还包括由于“战斗神经症”或“疲劳症”而退出前线的人。^[93]正如一名美军分析人员发现的那样：“冲绳战役的特殊之处在于，即便它充分使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动化武器，如坦克、飞机、无线电和卡车，但此战仍然表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所特有的僵持特征和无数死伤。”^[94]美军坦克确实抵消了山洞给日军防御带来的一些优势，但是它们在首里防线上最坚固的堡垒前也一筹莫展，美军所能依靠的只有勇敢、主动、不屈不挠的步兵部队，他们甘愿迎着猛烈炮

火冲锋，在肉搏距离上和敌人决一死战。

美国海军遭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沉重的打击：368艘舰船受创，36艘沉没，包括15艘两栖舰船和12艘驱逐舰。海军有4 907名官兵战死，大部分死于“神风”攻击。海军在冲绳战役中的死亡人数超过了陆军和陆战队——当然地面战的总死亡人数还是超过海军的。

日军地面部队与美军的数量比为1：2，在炮兵、舰炮和空中力量方面更是远远逊于对手。但是牛岛将军的部队还是坚守了近12个星期，给敌人造成了严重伤亡。虽然承受着来自东京和台湾方面关于发动愚蠢反击的持续压力，但日军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原先坚决的寸土不让的防御计划。最后，他们如愿全军覆没，接近9万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战死，1.1万人被俘。

被卷入战争血肉磨坊的冲绳人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他们死在交叉火力之中，死在炸弹和炮弹之下，无论是意外中弹还是被蓄意杀死；还有许多人病饿而死。和近一年前塞班岛上的情况一样，日本宣传部门警告说任何落入美军之手的老百姓都会比死还惨——同样和塞班岛一样，许多被吓住的平民选择结束自己和所爱之人的生命。由于许多人葬身洞穴之中，无法找到尸体，因此民众的死亡人数只能估算。根据冲绳县政府的数据，9.4万冲绳平民死于战火，其中59 939人死于1945年6月日本军队撤离首里之后。[\[95\]](#)

对于胜利一方来说，占领冲绳带来了巨大的战略优势。这座岛屿距离九州南部的预定登陆海滩不足400英里，为即将到来的登陆日本之战提供了一个集结区和跳板。它还为美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提供了很容易就能飞临日本的基地，并为舰队和两栖部队提供了能够遮风挡雨的锚地。斯普鲁恩斯将军在一年前提出应当占领冲绳时就已经预见到了所有这些优势。对于日本人而言，失去冲绳只是确证了其领导人早已知道的事实——战争已经输了，他们的敌人有能力也有意愿进攻并征服日本本土。

- [1]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94.
- [2]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87.
- [3] Lardner,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New Yorker*, May 19, 1945, p.32.
- [4] Leckie, *Okinawa*, p.125.
- [5] Appleman,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163.
- [6]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05.
- [7] Manchester, *Goodbye, Darkness*, p.360.
- [8]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83.
- [9] Appleman et al.,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286.
- [10]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42.
- [11] "Tokyo, Domei, in English, to China and South Seas,"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pril 14, 1945, p.1.
- [12] "Tokyo, Domei, in English, to America,"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pril 20, 1945, p.2.
- [13] Toshiyuki Yokoi, "Kamikazes in the Okinawa Campaig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69.
- [14]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9,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78.
- [15] 5th Air Fleet War Diary (Japanese Monograph No.86), entry dated April 18, 1945, p.59.
- [16] Inoguchi et al., *The Divine Wind*, p.141.
- [17] Iwao Fukagawa quoted in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214.
- [18] Ohnuki—Tierney, *Kamikaze Diaries*, p.88.
- [19] *Ibid.*, p.69.
- [20] *Ibid.*, p.175.
- [21] Toshiyuki Yokoi, "Kamikazes in the Okinawa Campaign," in Evans,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p.468.
- [22] Letter from Takeo Kasuga to Shozo Umezawa, June 21, 1945, quoted in Ohnuki—Tierney, *Kamikaze Diaries*, p.10.
- [23]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13,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84.
- [24] *Ibid.*, p.595.
- [25]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2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594.
- [26] Matome Ugaki diary, April 29,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600.

- [27] Reiko Torihama quoted in Sheftall, *Blossoms in the Wind*, p.287.
- [28] Shigeko Arak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20.
- [29] Chief Ship's Clerk (W—2) C.S.King, oral history,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82.
- [30] Dr.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p.6, Manuscript Item 297,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 [31] H.D.Chickering, commanding officer of LCS(L) 51,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346.
- [32] Charles Thomas, crewman on the LCS(L) 35, quoted in Rielly, *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p.10.
- [33] "CO USS *Aaron Ward* comments," in Secre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4: "Battle Experience: Radar Pickets and Methods of Combating Suicide Attacks Of Okinawa, March—May 1945," July 20, 1945, p.81—41.
- [34] Fenoglio, Y3C, "This I Remember," accessed April 21, 2019, <https://dd803.org/crew/stories—from—the—crew/melvin—fenoglio—account>.
- [35] Ronald D.Salmon, oral history, p.110; John C.Munn, oral history, p.81.
- [36]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9.
- [37] 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在口语中的另一层含义是表示愤怒、烦恼或惊讶, 可理解为“我的天哪! ”。——编者注
- [38] Ibid., p.417.
- [39] Pyle, *Last Chapter*, p.83.
- [40] J.Bryan III diary, April 11, 1945, Bryan, *Aircraft Carrier*, p.121.
- [41] Phelps Adams, "Attack on Carrier *Bunker Hill*," *New York Sun*, June 28, 1945, article reprint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2, p.757.
- [42] Commander Task Force 58 to CINCPAC, Report of Operations of Task Force 58 in support of landings at Okinawa, 14 March Through 28 May, 1945, A16—3 Serial: 00222, 18 June 1945, p.14.
- [43] Phelps Adams, "Attack on Carrier *Bunker Hill*," *New York Sun*, June 28, 1945; article reprinted in *Reporting World War II*, Part 2, p.759.
- [44] Marc Mitscher quoted in Reynolds,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p.417.
- [45]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p.2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 [46] Dr.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p.8, Manuscript Item 29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47] “大得可怕的洞”是威尔卡茨医生的描述。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p.8, Manuscript Item 297, 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48] Letter, Raymond Spruance to Charles J.Moore, May 13, 1945, NHHC Archives, Raymond Spruance Papers, Coll/707, Box 1.

[4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293;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23.

[50] Bill Pierce quoted in James Holland, “The Battle for Okinawa: One Marine’s Story,” *BBC History Magazine* and *BBC World Histories Magazine*, accessed May 2, 2019, <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second—world—war/the—battle—foR-okinawA-one—marines—story/>.

[51] William Manchester,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All,”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87.

[52]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78.

[53] *Ibid.*, p.253.

[54]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59.

[55] *Ibid.*, p.67.

[56] *Ibid.*, p.83.

[57] Ushijima quo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2.

[58] 尼米兹说：“我认为，在‘奥林匹克’行动中，如果把需要精心计划的两栖作战阶段交给斯普鲁恩斯，而让哈尔西来负责进攻性的掩护行动，这对国家是最有利的。……这样一来，两人都将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工作。” CINCPAC to COMINCH, Message 0226, April 5, 1945,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8.金的回复是：“我同意你的观点，登陆指挥应该交给第5舰队的斯普鲁恩斯与特纳这对搭档。” Message 1921, April 9, 1945, in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9.

[59]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ne 4, 1945, p.7.

[60] Roy L.Johnson account,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p.245—46.

[61]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0.

[62]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308.

[63]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ne 4, 1945, p.7.

[64]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0.

[65] *Time* magazine, July 23, 1945.

[6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36.

[67] Thomas McKinney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86.

[68] “Japanese Radio Plan,” pp.1—2, “Weekly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pril 28, 1945.”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ary to Commander Chief, U.S.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nner Fellers Papers.

[69] Appendix, “Inducement to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Combined Chiefs of Staf, Anglo—American Outline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 Reference A, CCS—539 Series,p.10,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nner Fellers Papers.

[70] Frank B.Gibney’s commentary in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99.

[71] Masahide Ota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61.

[72] Kikuko Miyag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p.357—58.

[73] The leaflet is reproduced in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illustrations insert after p.70.

[74] Norris Buchter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67.

[75] John Garcia, oral history, Terkel, ed., “*The Good War*,” p.23.

[76] Charles Miller quoted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73.

[77] Lewis Thomas account in Shenk, ed., *Authors at Sea*, pp.241—42.

[78]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35.

[79] Ibid., p.137.

[80] Ibid., p.136.

[81] Quoted in Appleman, et al., *Okinawa: The Last Battle*, p.463.

[82] Yahara, *The Battle for Okinawa*, p.136.

[83] Masahide Ot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69.

[84] Kikuko Miyagi,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58.

[85] Ibid., p.360.

[86] Ibid.

[87] Ibid., p.362.

[88] 1英亩≈4 047平方米。——编者注

[89] *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p.410, Department of the Navy,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90] Huie, *From Omaha to Okinawa*, p.214.

[91]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09.

[92]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93]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282.

[94] Huber,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June 1945*, p.122.

[95]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62.

第十五章

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初几个星期里，白宫的记者室里总是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了人民。哈里·S.杜鲁门就是人民。”这位显得多余的中西部人虽然可以站立，但他看起来却比坐在轮椅上的前任还要矮小。他在担任自己的新角色时显得有些尴尬而不自然。当一群人“向老大打招呼”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回应什么样的礼仪，也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敬礼？立正手放两边？和打招呼的人握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三种动作都用上了。一名记者被指派去写一份关于新总统的“有特色的报道”，结果他告诉自己的编辑：“这个人的特色就是完全没有特色。他就是个凡人百姓。你可以在公共汽车或电车上碰见他，在杂货店冷饮柜台遇到他坐在你旁边。像他这样的人得有几百万。”^[1]

杜鲁门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天早晨很早就来到了白宫，等着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来向他做个晨报。但肯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事，也找不着他们。新总统等了超过一个小时，“都有些不耐烦了”，一个手忙脚乱的秘书这才把白宫参谋长莱希海军上将和白宫高级军事顾问威尔逊·布朗海军中将带了进来。这二位收拾起简报文稿匆匆赶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新总统坐在罗斯福留下的桃花心木桌子后面，桌上仍然摆放着前总统留下的小东西。

立正站好的两位海军将领，开始赶在参联会开会前介绍最近的事项。杜鲁门打断了他们：“看在上帝的分上，坐下来！你们这样让我很紧张！到有光的地方来，我才能看清楚你们。”于是莱希和布朗拉过椅子坐了下来。杜鲁门看着他们的脸，布朗回忆道：“他一点也没有意识

到我们也在观察他。”^[2]

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和随后11点规模更大的参联会会面中，大家很痛苦地发现杜鲁门跟不上趟。他并不清楚战争的进度，无论是欧洲还是太平洋都一样，而且对最近开始和苏联进行的地缘战略博弈也是一无所知。这位新总统很敬业，他读最高机密的报告和备忘录会一直读到眼皮打架。他在日记里称自己在“大白监牢”（他给白宫起的绰号）里度过了漫长的“忙碌的日子”。^[3]他常常会对自己不够了解现状讳莫如深，即便在和贴身顾问、军队参谋长私下开会时也是如此。有人注意到杜鲁门不愿意问问题，担心这会暴露他的无知，即便在他显然需要更多信息时也是如此。当有人提出行动路线时，杜鲁门常常答复说他已经在考虑这么干了，似乎是不愿让人觉得他只是在照别人说的做。

历史学家认为，杜鲁门逐渐适应了总司令的岗位，而且最终表现得并非仅仅是称职而已。但是在1945年的春夏之际，他的痛苦却与日俱增——而他在这最初几个星期里必须面对的那些决策，恰恰是他整个总统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

在日记中，比尔·莱希表达了他对于“[杜鲁门]必须承担的战争与和平之重担”的担忧。据莱希儿子回忆，这位海军上将私下里觉得新上司是个“二等选手”。他一直习惯于把想法告诉罗斯福，知道这位总统才是“队长”，而且罗斯福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同意或拒绝他的提议。但是杜鲁门还不具备面对他的顾问时所需要的自信心和独立性。莱希对其他顾问说，杜鲁门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的，这意味着所有向总统提建议的人都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必须绝对确保自己的提议是正确的。^[4]

在他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录中，莱希丝毫不觉得自己对新总统相对无知的状况应该负一定责任或是应该为此受到批评。这样一位睿智而且判断力卓越的华盛顿政治家居然如此缺乏自省，颇为令人吃惊。且不论他知不知道罗斯福总统的身体每况愈下，莱希在前总统在世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伴随在他左右，他当然足够清楚杜鲁门随时都有可能坐

上总司令之位。莱希是白宫参谋长，参联会主席，他有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副总统也能准确了解战况吗？这事他不干，谁来干？在组织良好的政府中，这都是基本的流程，出现这样的重大缺陷，他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莱希对杜鲁门说，自己和罗斯福私交很好，他的死去令自己很“悲伤”。他想要离开海军，也不再担任白宫参谋长之职。但是即便不考虑别的，单纯为了工作的连续性，杜鲁门也需要他，于是杜鲁门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把战争事务的方方面面扛起来”。在杜鲁门保证将会沿用罗斯福留下的决策流程之后，莱希同意在岗位上至少再多干几个月。^[5]结果他这一干就是4年，一直到杜鲁门第一个任期结束。

即便此时已到战争末期，太平洋方面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对日本的陆地进攻是否必要？抑或是用严密的封锁和空中轰炸就能逼降日本？盟军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沿岸登陆？他们是否仍然需要苏联参战或者想要苏联参战？日本决策层中的“议和派”实力到底如何？有没有办法强化他们？前总统罗斯福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是否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裕仁天皇是否具备足以结束战争的权力和影响力？——若他具备，盟军是否可以表示允许他保留皇位？这些问题都极其复杂，没有明确的结论。军事计划的制订工作通常都要考虑更高层的国际政策问题。打败日本仅仅是最临近的问题。之后还要在战后的亚洲建立新秩序，这就绕不开苏联对领土的渴求，中国国内革命，和英、法、荷前殖民地地位等问题。

在5月1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会议中，吉姆·福莱斯特对两位同僚说，现在是时候“对我们在远东的政治目标进行彻底的研究了”。鉴于斯大林不久前在东欧政治独立问题上的看法，他们对苏联在远东的渴望有所警觉也就不难理解了。福莱斯特问：“我们是否想要制衡其影响？制衡点应该在中国还是日本？”如果选择后者，那么美国必须拿出一份计划来重建日本的经济能力和区域地位。在随后的会议中，美国内阁探讨了关于朝鲜、中南半岛（越南）以及中国东北和香港的未来地位

的问题。福莱斯特的日记里关于这些讨论的章节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还是第一次直面这些问题。在5月29日的另一次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会议上，三位部长还讨论了杜鲁门总统是否应该发表一次讲话，澄清“无条件投降”的含义，或许还要处理战后日本皇室地位的问题。结果三方一致同意搁置这些问题，因为“此时不适合〔总统〕做此声明”。^[6]

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都认同一点：登陆日本是不必要的，应当避免。他们强调，海空封锁的效果日积月累，一定能够实质上切断日本所有残余的海上运输。一旦失去这最后一点石油、原材料和粮食进口，日本经济就会停转，人民就会挨饿。与此同时，空中轰炸的毁灭性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数百架新服役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正从美国飞往战区，第8航空队的数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正从欧洲移师此地，第3舰队也正准备冲进敌人水域，展开6周的猛烈打击，这将会是对日本城市、港口和公路铁路网发动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舰载机空袭。

当这些沉重的打击见效时，有人就提出应当出兵登陆亚洲大陆。驻华美国陆军司令阿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写道：“在沿岸建立一个滩头阵地自然会鼓舞中国人，使他们加倍努力和我们取得陆上的联系，由此打通交通线。”^[7]尼米兹和斯普鲁恩斯支持夺取上海东南方的舟山群岛，以及长江入海口南侧附近的宁波半岛。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桥头堡，打通一条通向中国重庆政府的交通线，如果时间充裕（尼米兹一名顶级计划人员语），就将“建设更多的机场，把日本炸服”。^[8]这一“长汤姆”作战提案一度得到了参联会的支持，并将发动日期暂定为1945年8月。

麦克阿瑟则主张尽早直接进攻日本。他说在中国沿海蜻蜓点水地打几仗只是浪费时间、生命和物资。他还说，单靠封锁和轰炸无法击败日本——他举了日本的盟友德国的例子，德国人在自己的城市被炸成废墟后都不肯投降。“日本最强大的军事部门是他们的陆军，只有击败他们，才能确保我们的胜利。这一点只有使用大规模地面部队才能做到……和德国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击败日本陆军。为了这个目标，我

们的战略必须要创造路径和手段，以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让敌我双方的地面部队决一雌雄。”^[9]麦克阿瑟从他在马尼拉的司令部里告诉马歇尔，他用太平洋上现有的部队能够拿下九州。如果必须进攻本州岛并攻占东京，他就需要来自欧洲和美国本土的援军。^[10]

“没落”行动，正如其代号所示，旨在于最终击败德国之后的18个月内征服日本并实现和平。华盛顿的参联会计划部门曾拿出过一个早期版本，在1945年2月马耳他的阿尔戈会议上呈交给罗斯福和丘吉尔。“没落”计划包含两个阶段：一是1945年后期在南九州的登陆战（代号“奥林匹克”），其后是1946年春季向本州岛的进攻（代号“冠冕”）。这两场两栖进攻，尤其是“冠冕”作战，都会令前一年的诺曼底登陆相形见绌。“没落”行动将需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两个战区所有部队、所有军兵种联合作战，同时还需要英国和其他盟国军队的支援。向九州发动的进攻将由克鲁格将军久经沙场的第6集团军负责，他们是打过菲律宾战役的老手。他的部队将辖有两支陆军加强军，以及由三个陆战师组成的第三个军；他们将同时在九州岛东部海岸的宫崎、南部的有明湾，以及西海岸的串木野登陆。决定性的第二阶段“冠冕”作战将指向人口密集而且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关东平原。艾克尔伯格将军的第8集团军将担任此次进攻的前锋，其部队将在相模湾北端的滩头登陆。将有不少于25个师参加“冠冕”进攻，此外还会根据需要更多增援部队投入作战。假如向东京发动的压倒性钳形攻势没能让日本投降，盟军就将占领其首都——然后以此为中心向所有方向展开进攻，一个府一个县地扫清有组织的抵抗，直到整个国家认输并臣服为止。

按照1945年3月下旬参联会敲定的第一版时间计划，“奥林匹克”登陆战将在1945年12月1日打响，“冠冕”登陆将在1946年3月1日发动。根据尼米兹的建议，考虑到冬季风暴给舰队带来的危险，“奥林匹克”行动的计划发动日期将提前到1945年11月1日。^[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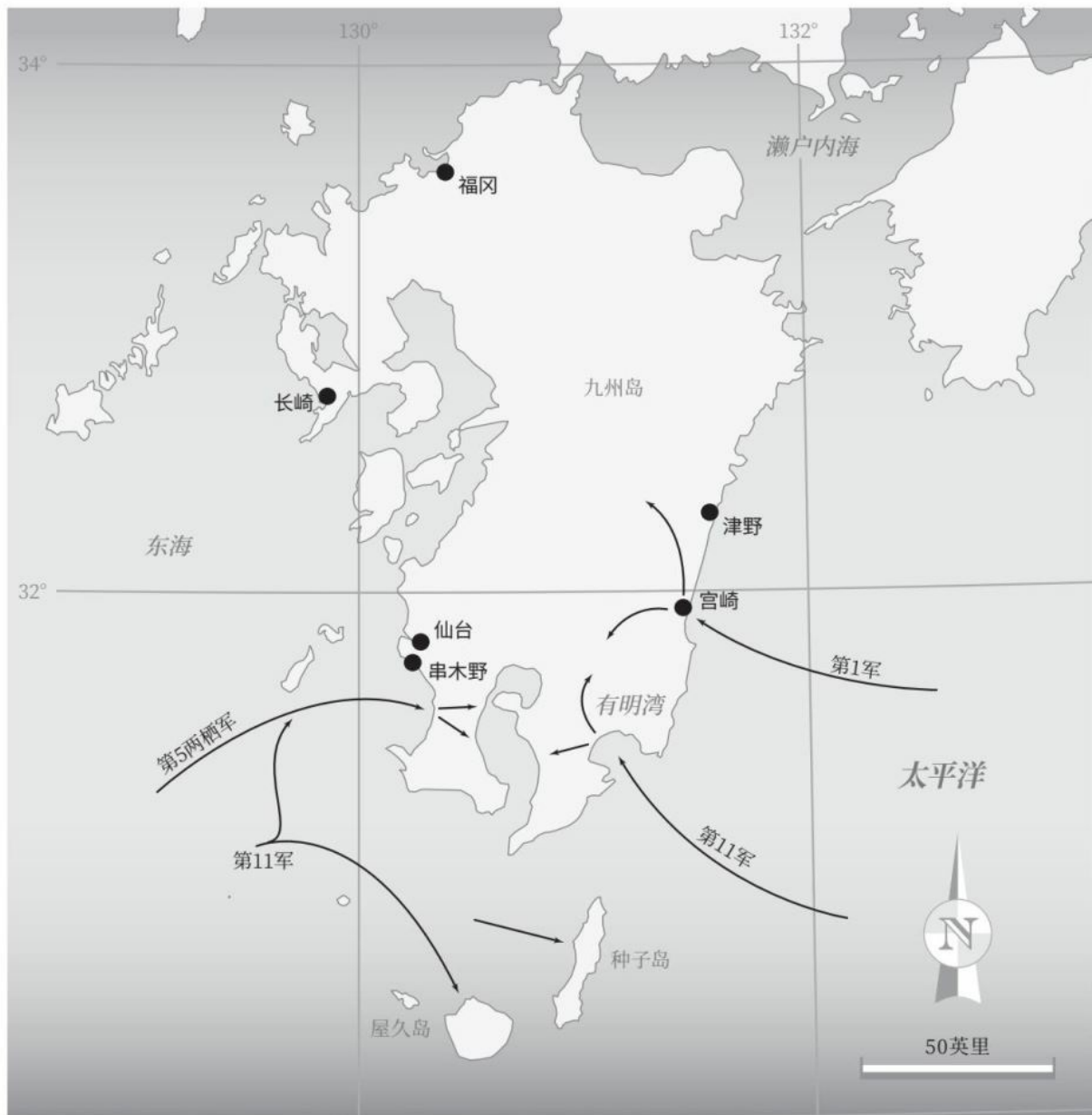
此时，参联会还有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没能解决，那就是统一指挥问题。和所有的两栖作战一样，“没落”行动同样需要空中、地面、

海上三方面力量持续而复杂的协作。但在1945年春季，太平洋上各军种之间的内讧和争斗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两位战区总司令之间的个人沟通在热天里也令人脊背发凉。4月，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在马尼拉和关岛的司令部，结果两人都婉拒了。^[12]尼米兹战区的最高陆军指挥官理查德森将军请求前往菲律宾和麦克阿瑟开会。但尼米兹未予批准，理由是他想要先解决好眼下的谈判。^[13]一个星期后，尼米兹屈尊飞往马尼拉，听人介绍了麦克阿瑟关于“没落”行动的计划草案。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提出要接管冲绳岛和琉球群岛的其他岛屿，以及太平洋上的所有陆基航空兵。尼米兹不干了。他随即飞回关岛，要他的幕僚们拿出一份海军自己的“没落”行动两栖作战阶段的计划，只在必要时向麦克阿瑟“征求意见”。^[14]

尼米兹在他关岛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挂了一张麦克阿瑟的大幅相片。访客理所当然地觉得这是为了表示敬意。但当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问他为什么要挂这张照片时，尼米兹笑着答道：“莱顿，我跟你说了。我这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变成浑蛋。”^[15]

4月13日，人称“麦克阿瑟右手”的萨瑟兰将军来到关岛，提出对太平洋战场指挥结构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方案。他说，跨军种的战区指挥官制度已经显示出是一种不适用的“陈规陋习”。麦克阿瑟想要指挥整个太平洋上所有的陆军部队，包括尼米兹控制的那些岛屿上的守军。而尼米兹可以接管第7舰队，这支舰队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归属麦克阿瑟管辖。每个军种都要承担自己下辖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职责，而无论部队位于何处。萨瑟兰还补充说，冲绳战役之后，“就不能再有陆军部队放在海军将领辖下了”。^[16]

计划中的九州登陆战役“奥林匹克”，计划发起日期：1945年11月1日



麦克阿瑟的提案意味着陆海两军的“友好分手”，但这需要进行复杂的行政改组，会在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战役的筹备阶段消耗参谋人员的大量精力。此事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才能定夺。正如莱希后来说的那样，“太平洋战场的指挥问题是那种就算做出一连串‘协议’也安稳不下来的事情”。[\[17\]](#)参联会判断这是避免陆海两军公开决裂的唯一途径，于是

下达了必要的指示。麦克阿瑟领到了新头衔“太平洋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缩写为“COMAFAC”。在一份发给麦克阿瑟的“严禁外传”的电报中，乔治·马歇尔将军提到，关于陆海两军的分歧“国内出现了大量最为不利的谣言和非议”，他要求新任COMAFAC“做最大努力压制下级中的这种致命议论，我在这里也会下重手做同样的事”。^[18]

然而未等这个问题解决，“没落”行动的指挥关系又引发了一场新的口角。尼米兹想要保持他的部队自从1943年11月“电流”作战以来一直沿用的指挥模式：进攻部队在海军指挥下登陆，地面部队指挥官在建立岸上指挥所之后再接管指挥权。^[19]麦克阿瑟不仅对此一口回绝，甚至拒绝讨论，坚持要把此事提交参联会裁决。海军还提议，在开赴登陆滩头的过程中和登陆的最初阶段，由海军负责“陆海军所有宣传事务”，麦克阿瑟对这一提议格外愤怒。^[20]

在华盛顿，此事似乎陷入了僵局。马歇尔直白地告诉金，他俩对于“没落”行动的指挥结构“观点显然完全不同”，他坚称参联会应该立刻选择“一位对此次战役承担首要责任的指挥官”。^[21]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自明。如果下一次参联会会议上无法就此达成一致，那就必须提交美国总统裁决。随着太平洋上的两路进攻大军逐渐向日本会合，再保持两个战区指挥官平起平坐就越来越难了。麦克阿瑟的资历比尼米兹老，他的公众人气和声望也无可媲美。罗斯福当年是个彻头彻尾的海军人，而现在的杜鲁门则是个陆军老兵。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弱点之后，金退让了。于是参联会下达命令，指定麦克阿瑟承担“没落”行动的“主要责任”，但为了保全海军颜面，尼米兹或者其指定的舰队指挥官将在战役的两栖登陆阶段拥有较大的自主行动权，甚至是独立行动权。^[22]原计划在中国大陆沿海登陆的“长汤姆”方案被取消。

1945年4月接掌日本首相大权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男爵是个77岁的老头子，耳朵听不清，还常常在开会时打瞌睡。他早就从海军退役

了，此前干了近10年的侍从长，和裕仁天皇的私交很好。在1936年被挫败的“二二六”政变中，他被子弹击中，差点死掉。铃木和天皇二人私下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新政府必须找到办法结束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接受盟国苛刻的条件。他们同意，一旦时机成熟，天皇就将发布“诏书”以结束战争。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对军队造反、刺杀甚至内战的风险心知肚明。如果政府被推翻，那么和盟国和谈的机会就将丧失，日本也将万劫不复。从某种意义上说，议和派关于结束战争的密谋必须保密足够久才能成功。铃木在上一次刺杀事件中险些丧命，因此对这一点更有切肤之痛。正如理查德·B.弗兰克在他研究太平洋战争结束过程的著作《没落》一书中所写：“掌控日本命运的这一小群人对于来自内部的致命威胁的意识，是理解其动机的钥匙。”^[23]

重组后的日本内阁代表了整合各派势力的一次尝试，而这各派势力在围绕战争与议和的根本方针上却正陷于僵局之中。暗地里推进议和的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坐海军大臣之位。陆军大将阿南惟几则是作为陆军大臣入场，他的入场是为了安抚东条英机和其他陆军中占主导地位的“统制派”强硬分子。前联合舰队总司令丰田副武此时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在此任上他将会和阿南惟几及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一起组成主张“坚持战斗”的强硬派核心圈子。前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他先得到了许诺，可以自由推进让日本在一年内退出战争的计划，之后他才接受了这一任命。

日本政府的主要决策部门仍然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巨头”，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所有这些人。但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刚刚进行了一项新的改革：参会人仅限于上述六人，不允许顾问人员和较低级别的军官在场。“六巨头”将举行密室会议，再加上木户幸一侯爵（内大臣）和天皇本人，总共八人参会。正是这八个人将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几个星期里通过激烈争议而达成共识——可能还有另外10人到15人也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

达成共识是他们的唯一目标，在此之前，他们什么事都做不了。为了形容这一集体决策的痛苦过程，日本人用了一个古代园丁的术语——“根回”。意思是把一棵成年大树的所有树根全部从土里挖出来，以移植到其他地方。每一条树根都要从地面下挖出来。这是一项极易出错、必须小心处理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一旦出错，树说不定就死了。“根回”这个词解释了为什么像米内光政海军大将这样令人敬畏的政治家、前首相，从1944年加入政府以来一直领导着秘密议和派，却无法向自己的同僚直白地表达主张。即便在纳粹德国战败，日本显然也注定失败的情况下，米内发现，“对于我而言，我想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样，还是很难向任何人提起结束战争的话题”。即便是对铃木，他也只能“抽象”地说：“我想我们这样是持续不了多久的。”^[24]

正是这样的制度缺陷导致日本在1941年做出了发动战争的不理智决定，如今又使其无法做出结束战争的理智决定。东京并没有真正的责任中心，权力被拆分，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军事部门和政治机构中。陆军和海军的领导人实际上只是橡皮图章，他们完全可以被军衔更低的年轻军官操控、罢黜、替换，甚至刺杀。从战争突然转向议和，需要得到广大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的服从，包括两大军种的中层军官们。而根深蒂固的意见分歧和长期以来的叛乱威胁，解释了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所称的“从政府最高层承认失败到最终投降之间长得反常的时间”。^[25]

根据米内的建议，铃木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秘书长准备一份关于日本整体经济和战略处境的调研报告。这份名为《国家资源调研，1945年6月1日—10日》的机密报告在6月6日提交。其结论一反常态地直白扼要——不仅仅战败不可避免，而且国家经济正走向崩溃，日本领导人也正在失去人民的信任。统计数据展示了船运的损失，生产的下滑，原油储备耗尽，铁路运输中断，粮食供应日益恶化。由于冲绳即将失守，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海上航线将遭到严重威胁，整个工业体系都将陷入停顿。消费品短缺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粮食状况将在1945年底到达危急状态，“国家部分偏远地区将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关于军事状况，所有

剩余的作战飞机都将被用作“神风”自杀机，但是关键的航空汽油短缺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而且，即便自杀飞机和自杀潜艇能设法击沉美军进攻舰队的1/4，“也很难通过海上歼敌来挫败美军的进攻计划”。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美军舰队和航空兵的压倒性力量，而且还警告说“派往西欧战场的约60个师中，一半左右会被调过来对付日本”。[\[26\]](#)

“六巨头”中三名强硬派之一的丰田海军大将后来告诉美军审讯人员，这些统计数字证明日本的战争潜力正在持续锐减。然而，他说，屋子里没人有勇气提出日本要根据盟国的条款接受失败。“在那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们任何一个成员都很难提出我们应当求和，”丰田如是说，“因此决议就成了必须做些什么让战争持续下去。”[\[27\]](#)既然有那么多根须要一根接一根地从地下挖出来，那自然就需要更多的时间。被夹在寻求和平与坚持战争两股力量之间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选择了两边一起发力。会议一致同意采取首鼠两端的“基本政策”。陆海两军将动员力量，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本土防御作战。外务省则将请求苏联出面作为中介，组织日本和盟国之间的和平谈判。6月8日，裕仁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他在内阁达成一致后通常都会批准其决议。

“决号”作战，也就是日军击退盟军本土登陆的作战计划，在铃木政府上台的当周面世。其要义在于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国家剩余的所有军事和经济资源来应对进攻。“决号”计划要求进行大规模的部队组建，主要是新建陆军师团和动员预备役陆军师团；将部队部署到最有可能成为登陆地点的区域；在预计的登陆海滩后方建造海岸防御设施；以及向盟军舰队发动规模空前的“神风”突击。这份计划正确地预料到进攻将在1945年阳历年底前到来。日本人也准确判断出第一轮登陆将落在南九州，1946年春季还将有更大规模的进攻落在关东平原和大东京地区。

在不久前的1945年1月，日本国内只有11个完整的陆军师团。4月至5月美军部队拿下冲绳大部之时，日本陆军开始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调回部队，并在本土新建师团和召集预备役师团。到1945年7月，通过两个阶段的动员，日本本土已经部署了30个一线战斗师团，24个海岸防御师

团，23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战车师团，7个战车旅团，3个步兵旅团。[\[28\]](#)与此同时，日军部队被集结到预计将会承受盟军下一轮突击的九州岛上。到7月底，岛上已经有15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独立战车旅团，和2支海岸防御部队，总兵力超过80万人。由于军火短缺和生产下滑，这些部队并非全都拥有合适的武器和装备。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能抵御轰炸和炮击的山洞和地堡内存储弹药，日军还是估计一旦战役持续超过数周，九州许多日军一线部队的弹药就会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东京方面还付出很大努力来组建、武装和训练民兵。所有15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和17岁至40岁之间的女性都被编入了这些地方战斗团体，其官方统计人数最高达到2 500万人。许多人手中的武器只有长矛或是能用作武器的家用品。每个民兵都被要求在战死之前消灭至少一个入侵的强盗。这样的备战有一个新的全国口号：“一亿玉碎。”[\[29\]](#)

1945年6月上旬之后，日军航空兵就基本放弃了对美军空袭的抵抗，转而把他们残余的飞机保存起来，用于最后的决战。7月，日本本土列岛各处存储了大约9 000架飞机，显然这所有的飞机都是要拿去当作“神风”机撞向美军进攻舰队的，包括教练机在内。日本的航空工业被要求在9月底前再拿出2 500架飞机来用于此目的。飞行员的训练被简化到了最低程度，许多未来的“神风”飞行员除了起飞和做些基础的空中机动之外什么都不会。鉴于航空汽油储备耗尽，大部分人都将待在地上，坐等着最后一次起飞出击的到来。

美军对日军机场的轰炸和战斗机扫射一直没停，大量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但是美军也没别的办法来对付“神风”的威胁了。有不少在地面上被摧毁的“敌机”实际上只是胶合板做的假目标，真飞机都被分散藏了起来。美军的炸弹可以把跑道炸得坑坑洼洼，但是“神风”自杀机只要能起飞就行——它们完全没打算返航和降落——因此它们只要有一些最简陋的土质跑道就够用了，这些跑道修复起来又快又便宜。在攻击九州岛

外的进攻舰队时，“神风”特攻队将拥有两项在冲绳战役中不具备的战术优势。首先，飞行距离很短；其次，攻击机可以从整个岛屿各个不同的机场起飞，这意味着它们将能够从不同方向同时飞向进攻舰队。此外，日本海军还将投入大量资源制造自杀潜艇和自杀快艇，以及能够从山顶起飞的自杀滑翔机。计划目标是摧毁美军进攻舰队的1/4。即便未能达到这一预期（这几乎是肯定的），“神风”攻击也确实有望在九州外海让盟军比在冲绳外海时失血更多。

虽然日军已经开始向九州投入大量增援部队，但他们不能认为盟军第一轮进攻一定不会落在本州岛的东京附近，以及本州岛北部或四国岛这种更远的地方。“决号”作战也制定了应急预案，以调动部队去迎战可能从任何地方上岸的登陆部队。一旦需要，日军就会通过沿岸的海路和铁路输送部队，但是考虑到日本的运输系统正持续受到打击，再加上迫在眉睫的燃料危机带来的大量困难，地面部队的机动将会受到很大限制。如果必要，增援部队将步行越野行军，就像武士时代那样。按照日本大本营的估算，一旦美军越过九州岛直接在关东平原登陆，日军将要花费65天才能将援军从九州岛调集到名古屋，之后再花10天送他们上战场。如果这些援军要耗费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参加战斗，那他们能否及时赶到并救援首都也就很值得怀疑了。[\[30\]](#)

情况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央的司令部与外围区域可能会完全失去联络。由于预见到基本的指挥控制体系被摧毁的情况，日本陆军被重新编组为半自主的区域指挥架构——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军分别负责日本的北部、中部和南部。文职政府体系也去中央化，县级政府获得了更高的地方自主权，这样他们就能对付食物短缺和交通中断带来的地方性危机了。日本此时正滑向灾难——B-29的空袭日益猛烈，海上交通线基本瘫痪（即便是濑户内海和日本海也受到严重影响），供电网络濒临崩溃，燃油储备耗尽，饥荒已近在眼前——鉴于此，谁也不知道日本是否还能打一场集中指挥的本土防御战。

铃木政府的第二条“路线”，争取和谈，由东乡和外务省负责协调。

他们犹疑不定地通过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和私人关系，以及通过天主教会做出了和平的试探。盟国的情报机构跟踪并报告了这些行踪诡秘的探子的举动，并正确地判断出他们没有得到日本政府充分而确定的支持。^[31]他们还计划在中国停战，请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充当中介，和盟国进行更为广泛的和谈，结果自然也是无疾而终。

莫斯科一直是东京方面外交工作的焦点。日本愿意放弃在40年前日俄战争中赢得的大部分（或许是所有）土地和商业特权。作为交换，它希望能从西伯利亚获得原油和其他急需的原材料，并保持自己作为东亚一个独立“缓冲国家”的地位，以平衡苏联和英美势力之间的利益。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包括其中的强硬派）的支持下，日本政府正式提请克里姆林宫协助安排停战，并与盟国议和。这些请求同时通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和苏联驻东京大使提交了出去。日本人请求苏联人允许一个外交特使前往莫斯科——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他从1941年起就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苏联人听到了日本人的哀求，他们没有给出令人振奋的答复，但也没有立刻回绝。斯大林的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似乎是抽不出身来解决此事。他根本见不着人，会面被推迟，改期，然后再推迟。莫洛托夫请日本大使佐藤尚武拿出一份更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来。他告诉佐藤，待他和斯大林从德国波茨坦的同盟国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上回来后，苏联就会答复日本的请求。日本人不知道，也没想到苏联人已经确定要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斯大林已经确定，苏联对日本发动进攻的日期是德国战败后三个月。苏联领导人拖着日本人没完没了的外交往来又不给结论，目的就是争取时间，把部队从欧洲调过来。6月至7月间，苏联的部队、坦克、大炮被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运往东方，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这一富有斯大林特色的举动的要点在于，他的国家要加入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以求以轻微代价获取胜利。

在6月18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裕仁给出了他站在议和派一边的最明确的信号，他说：“我要的是结束战争的可行计划，不要受现有

政策拖累，你们抓紧研究，落地执行。”^[32]他想要知道近卫公爵赴莫斯科的时间。近卫后来告诉美国审讯人员，他得到了“天皇暗地里的直接指示，要不惜代价取得和平，即使条件严苛”。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秘书长的回忆，铃木和东乡都同意，如果克里姆林宫拒绝协调议和，他们就会直接向美国求和。^[33]

然而，除了向苏联发出态度含糊的求援外，东京各派势力尚未达成任何共识。军部不想再忍受任何和谈的路线。日本政府的公开政策是死战到底，其外交活动则是严格保密的。铃木首相的公开言论仍是一如既往地坚定和充满斗志。关于投降的想法都是过街老鼠，即便议和派人士都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日本统治层中有些人私下里已经意识到日本将被迫放弃其所有海外占领区，但其他人还指望能保住这个国家几十年前就吞下的土地，包括朝鲜和台湾岛。军方高层愿意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回军队，甚至急于这样做——但他们想要在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撤离部队，而不是在缴械投降后被遣送回来。至于不打一仗就让盟国占领军登上日本国土的想法，任何日本领导人都觉得这种耻辱的方案只会招来刺客的眉心一枪。即便到了这个时候，1945年夏季，日本的统治者们都还没能充分意识到他们已不可能把时钟拨回到1941年，或者是1937年、1931年，甚至是1905年。他们想要停战，但还没准备好面对彻底失败的残酷现实。

对于在西太平洋巡弋的美军潜艇来说，1945年春季是个淡季。随便什么类型的日本船只都已所剩无几。“想要闯回本土的满载物资的肥肉船队不见了，”美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查尔斯·洛克伍德中将写道，“那些堆满了军火，敌军都挤到栏杆上的从敌人本土南下的巨型运输船也消失了。”^[34]击沉战绩大跳水。4月，19艘潜艇使出浑身解数也仅仅击沉了总吨位66 352吨的18艘敌人货轮，以及13 651吨的10艘军舰。到了5月，战绩又下跌到30 194吨的15艘商船和4 484吨的5艘军舰。^[35]仅存的少量目标大多出现在法伊夫将军的苏比克湾司令部的辖

区内——包括爪哇海、暹罗湾和中南半岛近岸。美军潜艇开始越来越多地猎杀这些水域中无处不在的破旧的小型拖网渔船、帆船和舢板。其中大部分装载的是大米、谷物、水产、咖啡、糖和盐等不受管制的物资，船员也常常是中国人、泰国人，或马来亚本地人。但他们是在前往日占区的港口进行沿岸贸易，这就足够宣判其死刑了。在1945年7月马来亚东部沿岸的一次巡逻中，潜艇“鲑鱼号”用甲板炮击沉了63艘小艇。大部分时候，艇长威廉·哈泽德会在开火前向船员发出警告，允许他们离开船只，坐上救生筏和救生艇，但也不是每次都如此。

眼见单靠破交巡航已难有斩获，潜艇部队便开始投入密切配合盟军其他部队的新任务中。在硫黄岛和冲绳岛战役期间，潜艇部队成了多面手——在日本沿岸侦察，击沉敌人哨艇，对“神风”攻击进行早期预警。他们侦察敌人雷场并在海图上标绘出来，同时自己也在敌人航运的必经之路上布雷。^[36]潜艇的技术在此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到1945年春季，美军潜艇装备了新的声呐和雷达系统，这令它们成为更加致命的猎手，新型无线电收发设备使得它们即便在下潜状态时也能收发信息。洛克伍德和李梅两人的办公室在关岛上相邻，他二人为了提高被击落“超级堡垒”机组人员的救援成功率而进行了协作。到1945年2月，每次B-29出击时，其航线沿途都会直接部署至少4艘潜艇。这些艇员自称为“救援联盟”。虽然救援流程的改进速度从来无法令洛克伍德和李梅满意，但总归是在不断改进。到6月，“救援联盟”的潜艇艇员们已经能够用无线电和在上空巡逻的“小飞象”——海军的搜索救援飞机——直接配合了。^[37]

日本最后一条还算畅通的海运线位于日本海上，是日本本土和朝鲜、中国东北这些关键占领区之间的“后门”。自从1943年9月莫顿的“刺鲅号”在此地被摧毁之后，一直还没有美军潜艇试图进入这片四周大部封闭的边缘海。在此期间，日军升级并强化了其三个主要出入航道的反潜防御。海域北部狭窄的拉彼鲁兹海峡和津轻海峡有飞机和小型舰艇进行密集巡逻，还有岸炮把守。九州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宽40英里，但

是有一股强大的暖流常年穿过海峡向北流动，这是全世界雷场最为密集的水道之一。洛克伍德对新的调频声呐系统很感兴趣，这种技术有可能帮助潜艇穿过对马海峡的雷障，到1945年，它已经足够成熟，看起来值得拿出来冒冒险了。在夏威夷外海的模拟雷场进行了几轮测试之后，洛克伍德把这个想法兜售给了金和尼米兹。这次行动被称为“吵闹”计划。

1945年6月4日，一支9艘潜艇组成的“狼群”溜进了对马海峡。它们编成三组，每组三艘艇，以略有不同的航线穿过四层雷障。各艇保持在150英尺以下的深度，声呐设备向上“观察”漂雷的位置。当各艇闪躲着调频声呐显示屏上那些鬼影般的暗淡图案，在钢质雷索的森林中穿行时，每一秒钟都如同一分钟那么长，一分钟则如同一个小时。“飞鱼号”在水下潜航了16小时，几乎达到了蓄电池电量的极限，艇员们则在氧气不足的局促艇体内喘着粗气，汗流浹背。[\[38\]](#)一根雷索从“黑鲔鱼号”侧旁擦过，发出的声响所有艇员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会把水雷拉下来，将潜艇炸成碎片吗？一名水兵在日记中记录道，“黑鲔鱼号”上的艇员紧张到了“一枚硬币掉在甲板上，都会让所有人吓得跳到天花板上”。[\[39\]](#)

所有9艘潜艇全都安全进入“裕仁的私人澡盆”中，开始了三个星期的大肆猎杀，总共击沉了54 784吨的28艘船只。[\[40\]](#)此时日本的战时经济已濒临崩溃，承担不起这些船只损失。6月19日，“北梭鱼号”在富山湾被日军护卫舰“冲绳号”和一队小型巡逻艇击沉。其余8艘艇则安然无恙，冲刺穿过拉彼鲁兹海峡，离开这片封闭海域。两年前，“刺鲅号”正是在这北方的海峡里迎来了末日。它们的战术是所有潜艇集中在一起水面航行，用甲板炮击退任何前来拦截的日本驱逐舰或巡逻机。但是6月24日，一场适时降临的浓雾遮蔽了它们的高速水面冲刺，令其没有遇到任何敌人。随后它们直接开返珍珠港，7月4日抵达。大家为“北梭鱼号”及其艇员默哀，但是28艘的击沉战果还是可以接受的。洛克伍德还想再来几次，不过“吵闹”计划的战绩已是太平洋潜艇部队在战争期间的巅峰了。

为了支援进攻冲绳之战而在九州上空飞了数以百计的战术任务之后，李梅的B-29机群又恢复了对日本城市和工业的战略轰炸。规模愈加庞大的“超级堡垒”空中舰队又杀了回来，向大东京和名古屋地区的飞机工厂，以及大阪、川崎、神户和横滨残余的工业区再次发动空袭。面对着原材料的短缺和毁灭性的空袭，日本人基本放弃了补充飞机损失的指望。对城市中心区的无差别火攻再度到来，而且愈演愈烈。4月13日，东京西北部遭到327架携带混装燃烧弹和500磅通用炸弹的“超级堡垒”的攻击。这次市民们知道了应该逃离而不是留在原地救火，因此伤亡人数比3月9日至10日大空袭那次要少，但是轰炸对城区的打击却别无二致：11平方英里的城市被烧成白地。两天后，又一场大规模空袭攻击了东京南面的川崎市，摧毁了大部分市区。此时东京已经大部分被烧毁，但是“超级堡垒”还将数次攻击日本的首都。5月24日，500架轰炸机在白天轰炸了东京南部和中部的城区。两天后的夜里，5月24日轰炸的余火尚未燃尽，又一次大规模空袭便再度向东京皇宫外围银座和日比谷的高级商业区和居住区投下了3 252吨M-77炸弹。

经过7次大规模燃烧弹的轰炸之后，东京已经没什么可炸的了。这座大城市的一半面积，大约57平方英里的地方化为了灰烬。城市人口锐减了大约50%，无家可归的难民还将继续离开城市，直至战争结束。

3月底，第313轰炸联队开始向日本港口和内河航道空中布雷，这场战役被名副其实地称为“饥饿”作战。李梅起初十分反对执行这一新任务，觉得这又要耽搁他主要的战略轰炸计划——然而空中布雷最终被证明是B-29最富成果的运用方式。在最初一个星期的行动中，轰炸机向九州岛和本州岛之间的下关海峡投放了数百枚水雷。雨点般的水雷突然落在这一航运要道上，让日本人大吃一惊，他们根本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美军投下了多种水雷——音响水雷、磁性水雷、压发水雷——并使其下沉到不同的深度。日本的扫雷舰艇不堪重负，它们缺乏足够的设备和技能，只能找到其中一小部分水雷。有些水雷还安装了巧妙的智能起爆装置，包括延时器和计数器，等到指定数量的船只通过之后才会起爆。压发水雷的战斗部由经过船只引起的流动水压引爆，扫雷器完全无

法探知，日本人称其“不可扫除”。[\[41\]](#)

4月至5月间，第313联队的“超级堡垒”在濑户内海的所有主要水道，吴港—广岛锚地，佐世保军港，东京、名古屋、神户和大阪的港口，丰后水道，以及日本西部的各个主要港口都布了雷。日军扫雷舰艇在下关海峡的扫雷工作初见成效时，一批批的B-29又飞来向这里雨点般投下数千枚新的水雷。这一攻势有效封锁了濑户内海西侧这一关键通道。在愈加深重的绝望之下，日本商船的船长们试图强行冲过雷场，并祈祷自己好运。结果许多船只就这么消失在了巨大的白色水柱中。

“饥饿”行动最终向日本海域布设了超过1.2万枚水雷。虽然这一行动的时间跨度仅限于太平洋战争的最后5个月，但它总共击沉或打残了125万吨船舶，占整个战争中日本船只损失的9.3%。布雷任务通常在夜间进行，飞行区域也没有强大的高射炮部队保护。因此在1 529架次布雷飞行中，只有15架B-29未归，损失率低于1%。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人员总结认为，这一致命的行动应当更早启动，权重也应该更大：“在针对敌人航运的所有作战形式中，布雷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是最经济的。”[\[42\]](#)

随着增援飞机从中国和美国不断飞来，第20航空队也在快速壮大。到7月，它已拥有5支联队，超过1 000架B-29，总人数8.3万人（包括飞行机组、管理人员和地勤保障部队）。第58轰炸联队在第20轰炸机司令部解散后从中国和印度飞来，在提尼安岛西部机场重新开张。新成立的第315轰炸联队从新建成的关岛西北机场起飞作战。由于装备了新型AN/APQ-7“鹰”雷达系统，第315联队的“超级堡垒”针对日本最大的石油精炼厂、储油设施和输油管道进行了一系列精确打击。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机组人员单单依靠雷达就能够以致命的精度击中目标，即便在密不透光的云层上也可以。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六个星期里，“全力尽出”的对日空袭每周都要进行两三次，每次出动的都是由六七百架“超级堡垒”组成的巨大轰炸机群。飞行员查尔斯·菲利普斯如此记述战争末期的这些轰炸任务：“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城市并把它夷为平地，无论是好天

气还是坏天气，无论是目视投弹还是用雷达。”[\[43\]](#)

地面的保障和维护体系也大幅改善。曾经麻烦不断的莱特R-3350发动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从250小时增加到750小时。折返率降到10%以下。P-51“野马”战斗机也从新占领的硫黄岛基地起飞，加入向北驶去的B-29机群中。它们能轻易屠灭爬上来迎击来袭机群的日军战斗机，双方的累计空战交换比达到了约8：1。自从6月中旬之后，美军机组人员就很难再看到日军截击机了。B-29每次任务的损失率降到了1%以下。到战争结束时，李梅骄傲地宣称，从统计数字上看，在日本上空飞一趟轰炸任务比在国内飞一趟训练还要安全。

7月1日，第3舰队再次出海，保持无线电静默，向北开往日本。这支舰队拥有105艘舰艇，包括17艘航母和8艘战列舰，编成三支特混大队。这支舰队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支海上打击力量都要强大。它的任务是攻击日本本土列岛，向本州岛和北海道的沿海地区发动空袭，打击当地的城市、工厂、码头，以及航运和运输设施。它还将攻击日本北方那些远在B-29作战范围外的“处女地”。此番它力争彻底消灭东京湾和濑户内海各处锚地里的日本舰队残余。哈尔西将军和他的舰队将要在海上停留数周，依靠在预定时间和坐标前来会合的后勤船只和油轮来加油装弹，然后一次次杀回来，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火力空袭日本本土列岛。

7月10日拂晓前，舰队开到了东京东南方170英里外的起飞点。第一轮战斗机扫荡令日军完全措手不及。在大东京地区上空这漫长而激烈的一整天空行动中，美军舰载机向工业设施、码头、桥梁、电站和机场投下了454吨炸弹，射出了1 648枚火箭弹。没有日军战斗机起飞迎击，倒是高射炮火击落了10架美军飞机，另有5架飞机毁于事故。[\[44\]](#)

退回到浩渺的太平洋上之后，舰队向北疾驰，接着原路返回，突然出现在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南部，这里还从来没有吃到过敌人的炸弹。舰载机横扫了这一区域的诸多港口，向锚泊的船只投下了炸弹、射出了

火箭，返回的飞行员们宣称摧毁24艘船只，击伤无数。他们还摧毁了翼尖挨着翼尖停放在日本北端机场上的飞机，击毁了许多弹药库、大楼、无线电台、工厂和仓库。还有一部分飞机攻击了铁路设施，破坏了编组站，炸毁桥梁，将火车头和车厢碾为齑粉。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由一套跨越海峡的火车轮渡体系相连。舰载机飞行员们击沉了4艘火车渡轮，还有几艘中弹后被迫搁浅。光这一天的作战就使得从北海道运往本州岛的煤炭量下降了50%。^[45]这天的天气不适合飞行，多雨，多云，能见度差，许多空袭都被取消；但是第38特混舰队还是设法在日落之前完成了871架次出击。^[46]据拉福德将军的说法：“实际上没有遇到空中抵抗。”^[47]

7月15日迎来了战争中的又一个里程碑：舰队第一次炮击敌国本土。拂晓时，一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开到一座大型炼钢厂所在的釜石市近海，向炼钢厂开火。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印第安纳号”“马萨诸塞号”打出的16英寸炮弹将铸造厂和高炉化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天，另一支水面舰队炮击了北海道室兰市的日本钢铁公司和轮西冶铁厂。“密苏里号”战列舰也加入了炮击室兰的战斗编队，这令哈尔西得以坐到“前排佳座”来观赏这场“壮观的大戏”。^[48]大火还蔓延到邻近的钏路市，烧毁了大约20个街区。根据“米克”卡尼的说法，他们完全没见到敌人的飞机，岸炮零星的还击也软弱无力。对此，他的结论是，日本肯定快要完蛋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战列舰开到沿岸任何能炮击他们的地方，他们也无力做出有效的抵抗。因此很明显，我们打或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49]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日军的海岸侦察已近似于无。美军潜艇和舰载机击沉了他们的大部分海岸哨戒舰艇。他们的巡逻机和飞行员也所剩无几。“他们一派出飞机来侦察舰队，我们就把他打下来，”“贝劳伍德号”第31战斗机中队的“地狱猫”飞行员阿瑟·R.霍金斯回忆道，“第二天他们又会再来。他们把他派出来，如果他回不去，他们就知道舰队在这里。”^[50]美军发现自己即便在日本海岸外目力可及之处行动都不会受

到打击，便不再费力隐蔽行踪了。“已经没什么可打的了，”霍金斯说，“天上根本没有敌机。我们就改为轰炸，飞过去后投下炸弹，然后在周围盘旋，扫射地面上的人。”^[51]

7月16日，第38特混舰队退向东边，和加油船及后勤大队会合。这支庞大的舰队靠在舰队油轮侧旁，“喝”下了379 157桶燃油。同时还有6369吨弹药和1 635吨补给物资从仓储船送进了舰队的弹药库和贮藏室。整个补给过程只用了大约18个小时。拉福德将军称此为“公海上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后勤壮举”。^[52]此言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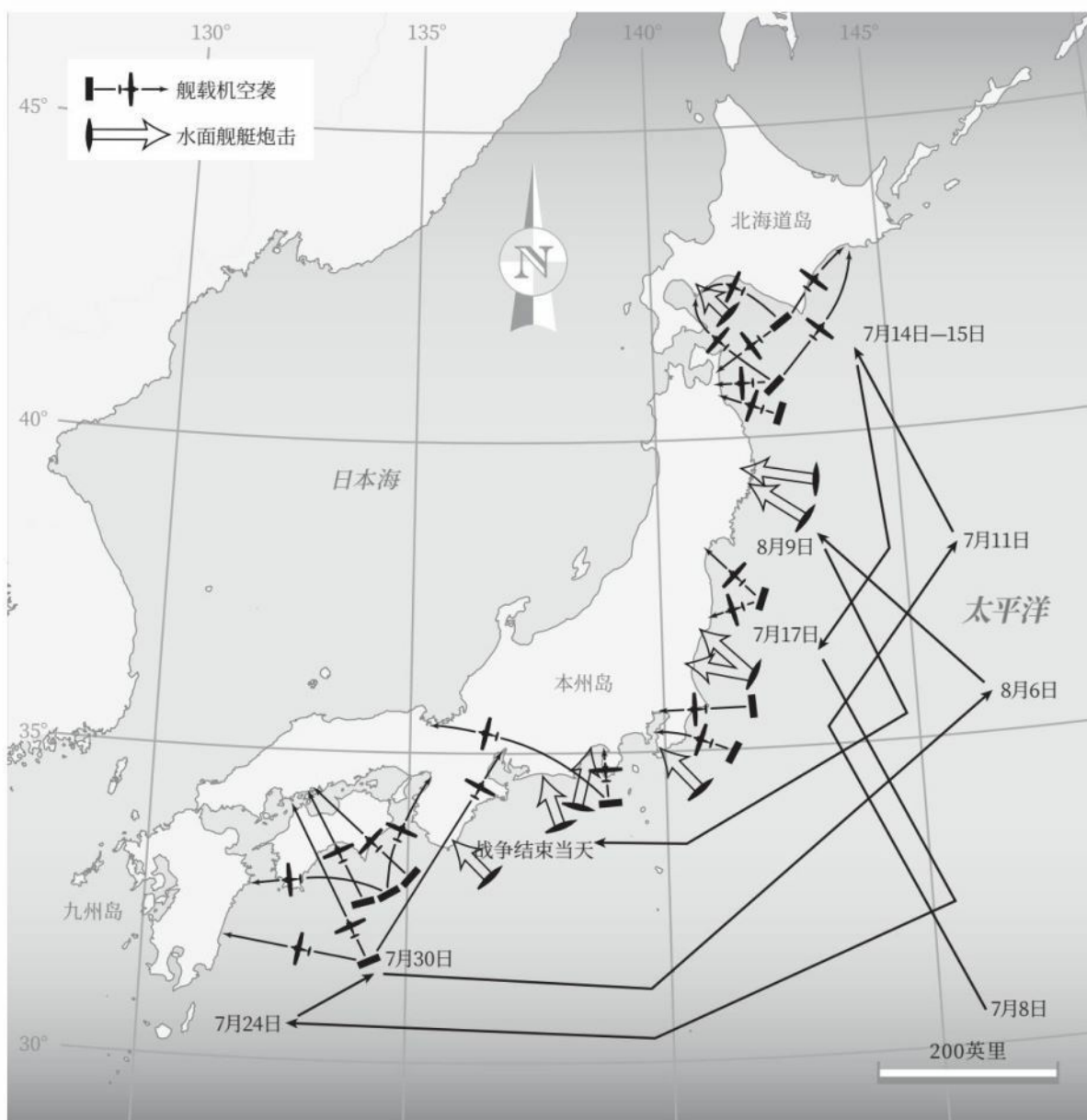
7月17日，第38特混舰队杀回本州岛，舰载机突袭了东京湾和横须贺军港。它们蜂拥扑向锚泊在海湾内的战列舰“长门号”。在战争爆发和珍珠港遇袭之时，这艘战列舰曾是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旗舰，但此时它已沦为一具焦黑、冒烟、倾斜的残骸。其他美军飞机轰炸扫射了整个区域里的各个机场，将未来的“神风”机摧毁在地面上。战列舰和巡洋舰开到海岸近旁，炮击了水户—日立地区。英国海军中将伯纳德·罗林斯麾下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加入之后，美英两军的庞大舰队集体向濑户内海东半部的各个主要港口发动了协同进攻。他们还对锚泊在吴港外的日本舰队残余舰艇给予了格外的关注。

日本海军此时已经瘫痪，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但是盟军航空兵们决心算清这笔拖了44个月的旧账。舰队每一间待命室的小黑板上都用粉笔写着“牢记珍珠港”。“随你怎么说，”“米克”卡尼说，“这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心声，珍珠港之耻永远不会消弭，除非他们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非他们被彻底消灭。”^[53]在7月26日的决定性打击中，舰载机摧毁了锚地中的24艘日军军舰，有效清除了日本海军的最后残余。“到当天傍晚日落时，”哈尔西写道，“日本海军已不复存在。”^[54]

在这些最后的行动中，哈尔西常常向那些被派到第3舰队中的战争通讯员提到他的老生常谈，威胁说日本人想要和平就要接受复仇。被问及日本投降的条件时，他说裕仁要“为冒充神灵付出代价”。^[55]他发誓

要拿到天皇的那匹白马作为战利品。在接受《科利尔》杂志采访时，哈尔西说日本“不适合留在文明世界中”，他还提出要为每一个死于战俘营的美国战俘处死一个日本军官。^[56]7月23日，他的金句“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和他的面孔一起出现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57]禁止轰炸东京皇宫的禁令让哈尔西很愤怒。据卡尼说，这位第3舰队司令根本不想理会关于裕仁在战后可能对盟国有用这种“娘娘腔的主意”：“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抓到他，抓到这个头号鬼子，把他干掉。”^[58]

第3舰队对日攻击作战, 1945年7月—8月



哈尔西的好斗言论令美国媒体很受用，但是却与盟军的主要宣传思路相悖并对其构成了威胁。哈尔西回到太平洋一周后，战争消息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提出警告：

日本人的士气正不断下滑，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就会达到足以使战争结束的程度。其中首要的可控因素是他们承受的军

事压力，但是有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盟军想要：

a. 屠杀、折磨或奴役日本人民；

b. 摧毁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天皇和相关的价值观。[\[59\]](#)

一整个夏天，哈尔西自己的舰载机也向日本投下了千百万份传单。这些文字想要让日本人看到，不远的前方就是战争结束后那和平、繁荣的未来。“美国不想伤害你和你的家人，”一张这样的传单写道，“美国不想要你们的国家。美国想要的只是终结侵略和世界和平。”[\[60\]](#)

在国务院、军队和战争消息办公室的协同努力之下，美国人最终研究出了一整套对日“心理战”策略。战争消息办公室在关岛设立了传单制作部门，拥有数百名工人，配备印刷机，规模相当于一份大报。新鲜出炉的传单被装进500磅炸弹的弹壳里，它们会在地面上空4 000英尺处弹开。这样，一枚传单“炸弹”就能覆盖整个城市。根据战争消息办公室的估算，战争的最后三个月里，美军在日本投放了6 300万份传单。[\[61\]](#)

所有传单围绕的都是几条中心思想：日本的军事失败不可避免，军国主义政府邪恶、虚伪、自私，和平将会令日本人民过得更好。盟军所有宣传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完全不要提到天皇，所有的指责都指向“军阀”。日本的主要盟友纳粹德国已经彻底失败。现在日本已是孤军奋战，将要承受盟国的全部军事压力。这样的一份传单便很有代表性：“日本正面临着危局，盟国的所有力量都将用来对付它，它不觉得孤单吗？”[\[62\]](#)这些传单常常会饰以日本人喜欢的图案，比如富士山或者盛开的樱花。早期传单上印的语句过于僵硬而官方——“曲高和寡，难有实效”，一名分析人员如此评价。[\[63\]](#)但是在日裔“美二代”和其他语言专家也来参与解决这一问题之后，其文字就变得愈加流畅而易懂了。有些时候日本战俘也会协助起草或编辑文字。战争消息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写道，所有宣传文稿都在重复三个核心思想——“我们来了，我

们要赢了，而且从长远看我们赢了对所有人都会更好”。[\[64\]](#)

除了传单，美军还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建起了10万瓦特功率的短波无线电发射机，后来又用设在塞班岛北部海岸的5万瓦特无干扰信道无线电塔进行信号放大。战争消息办公室的广播都是反复播出，常常是在重复传单上的信息。战后研究显示，听到这些广播的日本人极少。最有效的广播宣传都是直接针对日本领导层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6月至7月间的“扎卡利亚斯广播”。

埃利斯·扎卡利亚斯是美国海军一名情报官，20世纪20年代曾在日本留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和太平洋舰队情报负责人埃德温·莱顿，以及中途岛大捷前在珍珠港领导密码破译团队的约瑟夫·罗奇福特是好友兼同僚。扎卡利亚斯相信东京的统治集团或许很难直接提出停战。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改广播内容的方案，盟军或可至少先澄清“无条件投降”原则的含义。在一连数个星期的讨论之后，一批广播稿获得了国务院、战争消息办公室和参联会的批准。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当天，扎卡利亚斯进行了第一次无线电播音。此后他每周广播一次，直到8月第一周最后一次播出，总共播放了14次。每次广播时扎卡利亚斯都会反复强调“无条件投降”指的只是“终结对抗的形式”，并不意味着要征服或奴役日本。他还引用了同盟国的其他声明，例如《大西洋宪章》和《开罗宣言》，这些文件都保证要施行普世人权和民族自决原则。扎卡利亚斯说，日本已经来到了一个岔路口，这个国家面临着二选一的选择：“一边是日本的彻底毁灭，之后是被支配的和平。另一边则是在《大西洋宪章》规定的权益之下无条件投降。”[\[65\]](#)

扎卡利亚斯的第四次广播获得了日本政府官方发言人井上勇博士的直接回应。回应来自东京的短波无线电广播。其答复文字生硬、晦涩、含糊不清，但语气谦逊，而且没有拒绝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日本将准备商讨和平条款，”井上说，“假若能对无条件投降原则进行些许调整的话。”[\[66\]](#)

物理学家们早在40年前就知道原子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试验显示金属铀的一种罕见同位素铀-235具有高度“易裂变”的特性，也就是说这种物质的中子能够穿透原子核的正电荷屏障，这一过程将释放出“自由”能量。核裂变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廉价、无限的电能来源。但是这项重大发现也带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前景——在某种自然界不具备的条件下，一定质量的纯铀-235能够在人为控制下触发链式反应，瞬间爆发出大量能量，爆炸当量可以达到2万吨TNT（梯恩梯）。非专业人员想方设法去理解这些物理学家说的是什么意思，大部分人出于本能对此表示怀疑。但是这一领域的领军科学家之间存在一个重要共识。他们警告说，原子能“超级炸弹”的理论基础是没问题的，造出这种武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都可以克服，如果给予充足的资金、专家和工业规模的工程能力，那么或许几年就能造出来。

对于人类而言，自然是别去触碰这种可怕的力量更为安全，但是没人敢指望阿道夫·希特勒也认同这一点。各国认为德国具有制造出原子弹所需的科技能力，而且盟军情报部门警告说，纳粹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以获取所需的材料了。在进犯过程中，德国人控制了挪威的一座“重水”工厂，并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属刚果开掘铀矿。如果让希特勒获得了核武器，那么盟国是没有有效对抗手段的；即便纳粹独裁者的军队在常规军事方面被打得一败涂地，他也可以凭借核武器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全世界。唯一的防卫措施就是拥有同样的可怕武器，获得可靠的对等反击能力。

1941年美国参战时，英国在这一被其称为“合金管”的领域内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丘吉尔和罗斯福二人同意联合两国的力量，在美国本土开展此项工作。1942年12月28日，罗斯福签署命令，启动工业化制造原子弹的整个系统。曾监督五角大楼建设工程的陆军工程师莱斯利·R.格罗夫斯上校被指派负责这一机密项目。这一项目被赋予了AAA级的第一

优先级，这令格罗夫斯有权要求得到资金、资源和人员，而无须向任何人说明其用途。如果需要写这个项目的名称——比如填表什么的——格罗夫斯要他的职员们写上“曼哈顿工程区”，这是个小把戏，因为这个项目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设在曼哈顿所在的纽约。

为了给这个“曼哈顿工程”提供资金，史汀生和马歇尔起先用的都是各种传统武器研发项目的名义。但是到了需要在田纳西和华盛顿州建立庞大而昂贵的同位素分离工厂的时候，战争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意识到他们要获得国会的同意。于是二人来到国会山，拜会了参众两院的领袖。史汀生模糊不清地讲了几句他自己也不怎么懂的深奥科学原理——不过他说国会议员们也是一样不明白，所以谈细节有何意义呢？战争部需要6亿美元，现在就要，而且不久后还要更多。出于保密，拨款的详细用途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告诉国会的各位议员。根据马歇尔的回忆，史汀生对这些立法委员说，他们要“相信我们的话，给我们这笔额外的钱是至关重要的，同等至关重要是，关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字都不能说”。^[67]简言之，他们想为一个详情一片空白的项目讨到一张金额任意填写的签名支票，而且要到了。曼哈顿项目的总成本最终达到了20亿美元。

伯克利的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主持着这个项目的研究中心，这座中心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一处戒备森严的偏远建筑群中，聚集了大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被夹在岩石峡谷之间，西靠赫梅斯山脉，东边远处是桑格雷-德克里。通往这里的道路没有铺设路面，在春天雨季会很泥泞，有大量吉普车和军用卡车通行其上。研发工作是在技术区进行的，这是一片被围栏包围的办公楼和实验楼建筑群，大约有4个城市街区那么大面积。其外围是居住区，一片由预制构件盖起来的千篇一律的住房、洗衣房、食堂、学校和电影院。洛斯阿拉莫斯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不断扩大，高峰时人口达到5 800人——这个小山村里满是倔强而积极的天才，其中有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包括各个领域中的一些顶尖人物。虽然戒备森严——铁丝

网、瞭望塔、检查站、拴着皮带的警犬、步枪上了刺刀的士兵——但洛斯阿拉莫斯却是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区，孕妇们推着婴儿车在人行道上漫步，一群群小孩在白色的护墙板旁晃动。这里的许多居民都来自欧洲，为了逃避第三帝国的虎狼之师而来到此地，因此他们出现在这里对纳粹来说有一层报应的意味。

开发人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将铀的两种主要同位素分开，获得高纯度的“临界质量”铀-235同位素，这种同位素更轻，也更为稀有。从一开始就没人能准确说出临界质量是多少。估计的范围低至1磅左右，高至200磅上下。如果最终的数字落在这一估算范围的低端，那么原子弹或许就是可行的；而如果落在高端，那它所需的工业工程资源可能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承受的了，至少在预估的战争持续时间内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曼哈顿工程是在对失败的可能性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铀-235这种物质从来不会以纯净物的形态出现，除非是在亚微观的数量级上。有几种可能的浓缩手段：前三个选项是汽化、化学反应和热辐射。第四种可能方式的发现则是一项重大突破，这种方式是将铀-238转化为钚，这是一种全新而且极易裂变的元素，可以更容易地从其余铀中分离出来。然而无论用哪种方法，想达到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武器级浓度都绝非易事，没有捷径可走。上述所有浓缩方法都需要巨量的工业工程资源。

拿到美国纳税人给的金额无限的支票之后，项目总监决定同时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于是，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建起了一座占地5.6万英亩的巨大的铀浓缩工厂。选址于此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偏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耗能巨大的“铀同位素分离器”能够从附近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获取电能。钚项目建在华盛顿州里奇兰附近的汉福德机器制造厂里。这里位于哥伦比亚河西北方一处偏僻的灌木区，可以从河里获得充足的水以冷却反应器。这里的建筑规模即使按照曼哈顿工程的标准来看也很庞大，汉福德厂区内建起了超过1 200座建筑。在建筑阶段，这一秘密营地里有超过6万人，使得里奇兰成了美国人口第四大市。[\[68\]](#)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把两块裂变物质几乎瞬间融到一起，达到足以启动可持续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两块物质必须以极高速度融为一体，否则未等它们充分融合，链式反应就会开始，这样爆炸威力就会小得多，甚至没有威力。装有裂变物质的起爆机构必须装在小到能够由飞机装载和投掷的金属箱体里。最初的方案是用常规炸药以“双枪”的形式把分成两半的亚临界物质打到一起。但是1944年7月，科学家们发现钚很容易自发启动裂变，这样简单的枪式起爆机构只会引发微弱的“滋滋”声而非威力全开的核爆。解决方案是使用一套复杂的透镜系统制造一圈向心对称聚爆冲击波。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延误，有些被派到此处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对解决这一问题绝望了。得益于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理论贡献和俄罗斯出生的化学家格奥尔基·奇斯佳科夫斯基的工程实践，经过反复尝试，一套实用的聚爆式引爆装置最终在1945年春准备就绪。

到此时，足够质量的武器级裂变物质铀和钚最终在橡树岭和汉福德造了出来。奥本海默和他的团队确信到当年年中时能够拿出三枚炸弹来——一枚铀弹和两枚钚弹。由于聚爆装置存在失败风险，他们计划在1945年7月对第一枚钚弹进行试验。（由于对铀弹上简单的枪式起爆装置能够按设计启动充满信心，他们觉得它已不再需要更多试验。）因此，在命运的安排下，最初的原子弹将在德国战败之后和日本战败之前诞生。

在继任总统之前，杜鲁门就听说过曼哈顿工程这回事。1943年，他还是代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被称为“杜鲁门委员会”）来调查军事工业中的浪费和腐败问题，他们曾要求提供关于田纳西和华盛顿那些在建神秘工厂的信息。史汀生部长拒绝了他，只说这是一项最高机密的武器项目，涉及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杜鲁门也就识大体地同意不再深问。当副总统的时候也没人对他说起这事，这遵循了该项目中严格执行的“非必要不告知”的限制原则。1945年4月，他第一天当上总统就听取了史汀生的口头报告，得知了这个秘密行动正在制造“一种具有几乎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新型炸弹”。当天下午晚些时

候，杜鲁门从詹姆斯·F.贝尔纳斯那里了解到了更多情况，这位贝尔纳斯原来是负责战争动员的专员，不久后将被任命为国务卿。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于这种威力或许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的炸弹的设计草图感到“大惑不解”。^[69]4月25日，他听取了史汀生和格罗夫斯（此后他被晋升为少将）关于此事的正式详细报告，他们还总统提出的许多相关问题逐一作答。

原子武器和原子能及其在战时、战后的运用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获得相关的建议，杜鲁门组织了一个由政界、工业界和科学界的高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这个临时拼凑的团队有个名副其实的名称，叫“临时委员会”。当然未来会组建更正规的机构来负责此事，但在眼下，保密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在已经了解此事的人员中选出一个小组来。史汀生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贝尔纳斯也是成员之一；其他人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卡尔·康普顿、拉尔夫·巴德（福莱斯特的副海军部长），以及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委员会下辖的科学顾问团是其子机构，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恩里科·费米都为其成员。

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场白中，史汀生要求委员们从大局上思考摆在面前的问题：“这一领域到目前的进展都是战争的需要带动的，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一项目的应用范围将会远远超过当前这场战争，这是很重要的。”^[70]1945年5月31日和6月1日，委员会连续开了两天会，并一致同意应当使用这种新型炸弹来对付日本，“越快越好”。^[71]正式提交给总统的建议稿还要再等几天，但是会议纪要体现了大家的共同观点：“我们不能向日本人发出任何预警，我们不应打击人口密集区，但是我们应当争取给尽可能多的居民带来沉重的精神打击。”科南特博士提出：“最理想的目标是一座重要的军工厂，其中有大量的工人，周围满是工人住房。”^[72]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目标选择工作被交给了“目标选择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格罗夫斯将军和曼哈顿工程的若干科学家。

1945年5月至8月间美国领导人的重大政治决策之纠结在这个国家的

历史上是少有的。单纯的军事战略与更高层次上的外交政策问题融合到了一起；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在内的所有人考虑的事情都转向了战后新秩序。美国总统的幕僚们整天整天地就雅尔塔协定与斯大林斗法，探讨德国的占领和重建问题，法国的夏尔·戴高乐的政治主张，再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他们刚刚开始考虑亚洲的前途问题，包括前日占区的地位，英国殖民地的命运，中国革命，盟军占领之下日本的未来，以及一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东京命令日本海外占领军放下武器，他们是否会照做？会不会即便在日本本土屈服之后，盟军也还是要打上一仗来消灭他们？主要决策都面临着时间和局势的压力。这些事务都由一小群文官和军官来操持，其人数不为人知。他们都已在沉重工作的负担下挣扎多年。有时候，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总统的人长期觉得身心俱疲，压力巨大。那些影响深远的决策都是“在外面”制定的，也就是在德国波茨坦的盟国首脑会议上。他们这位初任总统的总司令还没有为自己的新岗位做好准备，工作经历也不够长，达不到其前任那样的专业性、自信心和手腕。

在考虑是否允许裕仁保留皇位的问题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分成了两派。曾在战前担任最后一任驻东京大使，现在担任副国务卿的约瑟夫·C.格鲁支持美国的主流民意，就是要让日本天皇作为战犯受审。他的公开言论满是鹰派的调子，他对广播听众说，和日本商谈投降条款等同于“给杀人犯宽限时间，用人命去商谈背叛”。^[73]格鲁厌倦了可能将盟国拖入漫长谈判的外交往来。但是私下里，他也认为裕仁必须在战争最后阶段发挥一定作用，因为只有他拥有要求所有本土和海外日军放下武器的权力。格鲁告诉一名记者朋友，昭和天皇发布的敕谕“是可以利用的，这或许可以挽救数万名我方战士的生命”。^[74]

在发布《波茨坦公告》之前的讨论中，大部分美国领导层人士（包括杜鲁门）都倾向于告诉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不会危及其皇室。在6月的参联会和内阁会议上，大家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把天皇留作伙伴或傀儡是符合美国和盟国利益的。但是这样一份声明却总是在具体用词方面

引发争执。所有人都不愿为破坏他们前总司令的无条件投降原则承担责任。为了避免突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在美国和盟国的公开声明中删除了所有提及天皇及其皇室的部分。这一状况直到1945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才有所改变，此时广岛和长崎已经落下了原子弹，而日本尚未最终投降。美国直到这时才明确保证不会去触碰裕仁。最后，正如格鲁沮丧地说的那样，美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然后投下了原子弹并接受了有条件投降”。[\[75\]](#)

6月1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和总统开会时，史汀生、福莱斯特两位部长和参联会的四巨头陈述了他们的总体对日战略。对日本本土列岛的封锁已经开始，而且还会加强，因此大家可以指望日本在登陆九州之前投降，或至少在次年春天登陆本州岛之前投降。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围绕11月1日登陆战进行的计划制订和后勤筹备工作都必须立刻着手准备。马歇尔提出，“奥林匹克”作战“对于绞杀战略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收紧海空封锁，同时为在关东平原展开的决定性的“冠冕”登陆战提供一个后勤支点。金上将站在海军的立场上，也认同当前继续全方位推进“奥林匹克”和“冠冕”作战的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是，他相信“依靠海空力量就足以打败日本，登陆是不必要的”。[\[76\]](#)莱希也提出登陆日本既不必要也不可取，但是他并不反对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制订计划。最后，杜鲁门批准了“没落”计划，并签署命令，从欧洲和美国本土调集所需的部队。

那年夏天最纠结的问题之一是，是否还想要苏联参与远东战事。罗斯福总统当年花了很大力气才让斯大林承诺加入对日作战；在1943年至1944年间，这或许是与莫斯科的外交中优先级最高的事项。但是到了1945年6月，东西两方阵营将在未来几十年里长期全球对峙的前景已经明朗，美国阵营中的许多人开始质疑是否需要甚至是否想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参战固然更容易迫使日本投降，但这也会让红军占领很多战略性区域，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在东亚出现一大块苏联的地盘可能会大大增强苏联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力。麦克阿瑟后来宣称，他在获悉苏

联已与美国达成对日作战协议之后“感到震惊”：“依我看来，我们不需要让苏联在1945年加入战争。”^[77]金和艾森豪威尔也各自建议总统不要允许或邀请苏联参战。^[78]新任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早先倾向于请求苏联参战，但现在他不这么想了。鉴于苏联人在东欧的表现，贝尔纳斯不相信他们；他认为现在也不需要苏联人了，因为觉得原子弹足以迫使日本迅速投降。^[79]贝尔纳斯的助手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最终击败日本要尽快，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就会投降，这样苏联就无法深度介入这场屠杀和获得对东亚指手画脚的地位。”^[80]

杜鲁门对于波茨坦之行并不满意，他不太想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参联会和内阁一致认为总统必须到场。于是杜鲁门乘坐火车从华盛顿来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在那里登上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进行八天的跨越大西洋之旅。在火车上，他给妻子写信说“这一趟旅行让我蓝到发紫^[81]”。^[82]他的随行人员以莱希上将和贝尔纳斯国务卿为首，还有一大群军队助手和政府助手。（贝尔纳斯设法把他的竞争对手亨利·史汀生赶下了船，史汀生后来乘飞机前往欧洲，在波茨坦和大部队会合。）7月15日，“奥古斯塔号”抵达安特卫普。杜鲁门一行人乘坐一支40辆车组成的车队前往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座机场，之后飞过疮痍满目的德国废墟，前往柏林南边的波茨坦，一座普鲁士时代的古城。

波茨坦会议主要讨论在当年早些时候的雅尔塔会议中悬而未决的欧洲问题，包括德国—波兰—苏联的边界问题，德国的战争赔款和分区占领问题，以及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是否占有主权的问题。而关于对日本最后打击，以及主导战后亚洲局势的相关安排，只在主要议程之间见缝插针地讨论，大部分是巨头们的非正式会商。丘吉尔也来到了波茨坦，但是在会议的第二个星期，他却被换成了新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后者的工党在1939年以来英国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大获全胜。

波茨坦是在苏联占领区内，会议自然就是斯大林做东。正式会谈在塞西林霍夫宫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举行，这里曾是王公的住所。与会各方

的达官贵人们住在附近巴贝斯伯格镇的一些豪宅里，而这些豪宅的主人则被枪逼着赶了出去。杜鲁门一行人住进了国王大街上一座被粉刷成白色的三层小楼里，美国人称这里为“小白宫”。小楼里到处都安装了窃听器，服务人员中也有几个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

斯大林比其他人晚来一天。7月17日中午，他提前来到“小白宫”会见了杜鲁门。两位领袖热情地握住双手，相互咧嘴大笑。斯大林介绍了他的政府正在和中国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他们打算为即将开始的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军的进攻商定条款。杜鲁门对此不置可否，这一姿态或许令斯大林感到失望；这位苏联领导人原本期望美国总统能向苏联发出参加远东战事的正式请求，给他一个撕毁与日本之间中立条约的借口。但是杜鲁门和他的政府并没有打算满足斯大林的愿望，因为此时已经很明显，他们对苏联介入战争的后果感到担忧。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了美国态度的新变化，并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一张便条上提到了此事：“已经相当明显，美国目前并不希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83\]](#)

美国人为“三位一体”行动，也就是第一次核试验选择的地点是洛斯阿拉莫斯以南200英里外，新墨西哥州沙漠深处的一片荒原。核弹将被放置在一座100英尺高的铁塔顶上引爆，其坐标位置被命名为“零区”。铁塔的6英里外建有一座用粗大原木垒砌而成并覆盖着厚土的指挥地堡，试验人员的营地则在10英里外。试验被安排在1945年7月16日拂晓进行。

当时针指向“零点”，沙漠中黑暗而寒冷。铁塔近旁探照灯的光束撕开了低垂的云层。在营地南边一座沙坡上的观察所里，科学家、记者和访客们喝着从热水瓶里倒出来的咖啡，不停地跺脚取暖。他们互相传递着两个双筒望远镜，轮流观察远处被照得雪亮的铁塔。一名陆军中士走进来，借着手电筒的光宣读了要求：当两分钟倒计时开始时，观察人员要卧倒在地面上，脸不要朝向铁塔。爆炸之后，他们可以转过头来看铁

塔上方的云层，但是不要直接凝视火球，以防伤害眼睛。对于那些不要命也要看爆炸的人，上面发了黑玻璃，要求这些人把黑玻璃挡在面前观看。他们都要穿上长衣长裤以保护皮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中，一瓶瓶防晒霜被发了下去，人们把它抹在自己暴露的脸上和手上。他们要保持卧倒姿势，直到冲击波过去：“像这样低伏在地面上可以降低爆炸带来的危险，飞石、玻璃和其他东西可以从爆炸点直接飞到你们这里。”^[84]所有汽车的窗户都要打开。

到了能安全站起来的时候，会有警报提示。那时所有无须留在这里执行任务的人都要立刻返回营地，登上等候在那里的大巴。这一区域将要疏散人员，直至完成辐射测量。

在曼哈顿工程初期，物理学家们曾仔细考虑爆炸规模可能会远超他们计算结果的危险。有人担心巨大的爆炸可能会引燃地球大气中的氮气，甚至可能会毁灭这个星球。当然后来的计算似乎推翻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当晚在沙坡上观察所里的恩里科·费米还是玩了一手黑色幽默。他提议下注赌这枚核弹引燃大气的可能性，以及如果真的引燃大气，被毁灭的是新墨西哥州还是整个世界。他的同事很可能答道，无论结果如何，赢的钱谁都拿不走。

在指挥地堡里，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带领着一个大约20人组成的技术组和通信组。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挤满了电子设备和无线电台。他们对当晚的天气忧心忡忡。云层中时而会出现一道闪电，天气预报称南方有阵雨。一个气象小组和正在头上盘旋的装有特殊设备的B-29气象侦察机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如果风力过大而且风向不对，那么致命的辐射尘就有向东飘浮300英里落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风险。但是在破晓前一小时，他们确定气象条件没问题。

在距离试爆还有20分钟时，“零区”升起了第一枚红色警告信号弹，之后还有数枚这样的信号弹将要升空。此时留在铁塔周围的所有人都乘上吉普车离开此地，开往地堡。无线电中有一个僵硬的声音在报时。在地堡里，人们趴在各自的仪表板上。气氛十分紧张，时间仿佛凝滞了。

科南特博士说他“从来没想到一秒钟会这么长”。^[85]奥本海默没有说话，甚至似乎连呼吸都没有；他透过地堡那暗到几乎不透光的蓝色窗户凝视着外面，手扶着一根木桩，以支撑自己的身体。还差10秒试爆时，一枚绿色信号弹升起，随后穿过“零区”上空的云层缓缓落下。这最后的10秒钟如同永远那么长。无论他们怎么看待作为武器的这枚炸弹，这些科学家都已把数年光阴投入它的制造中，为此赌上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声誉；他们还说服了山姆大叔把纳税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拿来为此付账。有个见到这一幕的人评论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或是有无信仰，“都可以肯定地说，在场的大部分人都在祈祷，比以往任何一次祈祷都更努力”。^[86]

凌晨5时30分，秒针指到了0，大喇叭里传来声音：“开始。”起初是一个刺眼的白色光点，几乎转瞬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直径半英里的小太阳，如同照相机的闪光灯那样明亮，连黎明前的黑暗都被巨大的光芒驱赶得无影无踪。转眼间，地平线以内的整个沙漠都被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大部分光芒被吸回到爆炸的旋涡之中，至少在观察者眼中是如此的。随后，巨大的火球升入天空，仿佛液化了一般，变成了翻滚的霓虹，金色、绿色、橙色、蓝色、灰色和紫色，幻化成了迷人的万花筒。火球垂直延伸，变成了一根烟火交错的巨柱，穿透云层，升腾到1万英尺、2万英尺、3万英尺高空。烟柱顶上出现了一片蘑菇云，其高度后来估算达到了4.1万英尺，而蘑菇云的根部仍然是一片汹涌翻腾的烟尘，如同镁光般明亮，但是更加多彩。方圆40英里内的新墨西哥荒原被笼罩在蓝紫色的光芒之下，所有山丘、沙坡和沟壑都被照得纤毫毕现。

在地堡、观察所和营地里，人们都站了起来，像小孩子那样互相拥抱，拍打后背，握手，大声欢呼，大笑着手舞足蹈。奥本海默脸上的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聚爆式钚弹起爆装置的设计者奇斯佳科夫斯基博士终于证明了自己的设计行之有效，他高兴地一把搂住奥本海默，发出了胜利的吼叫。有人对格罗夫斯将军说：“结束了。”格罗夫斯答道：“是的，等我们把两枚炸弹扔到日本之后。”^[87]

在沙坡上，绝大部分观看者在等候冲击波抵达时都将要他们卧倒的告诫抛诸脑后。爆炸45秒后，眼前幻境般的世界仍然保持着寂静——他们能感到热量扑面而来，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最后，声音还是来了，那是一种连续、可怖、粗重的轰鸣，伴随着一阵狂暴的热风，脚下的大地也在颤抖。大地的回声融合成了一阵阵逐渐变响继而衰弱的声波，持续了很久才告消失。有人觉得和他们亲眼看到的壮观视觉效果相比，这冲击波并不算强，甚至有点虎头蛇尾。这固然没错，但其原因仅仅是他们距离“零区”太远了而已。

发出最初的胜利欢呼之后，观看者们很快平静下来，开始思考。欧内斯特·O.劳伦斯记得自己“带着敬畏招呼所有人安静下来”。^[88]对于奇斯佳科夫斯基来说，核爆炸是“最接近人们所能想象的审判日的事情。我确信，在世界终结之时——地球存在的最后一毫秒——最后一个人将会看到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一幕”。^[89]当他们乘车离开试验场时，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探出了头。菲利普·莫里森发现太阳照在脸上的热感和此前爆炸时如出一辙。他说，这天早上“我们有两次日出”。^[90]

远在北边的圣菲市，西边的银城市，还有南边的埃尔帕索市，都能看见核爆的闪光。在“零区”北面175英里外的阿尔伯克基，早起的市民们停下了脚步，想要知道南方地平线上的那道闪光到底是什么。根据当地报纸的一篇报道，就连城中一名失明女童都喊了出来：“那是什么？”^[91]为了平息这些难以回答的询问，格罗夫斯安排附近阿拉莫戈多航空兵基地的指挥官发布一份声明，称基地的一座弹药库发生了爆炸。^[92]

核试验次日，几个勇者回到“三位一体”基地去观察爆炸的影响。他们携带的用来测量放射性的便携式盖革计数器狂叫不止，他们干脆将其关掉。为限制在辐射中暴露的时间，他们采取了一种“十分钟原则”：每个人只能进入基地一次，只能停留十分钟。在距离“零区”一英里处，沙漠中的灌木被烧焦并倒向远离爆点一侧；离得更近的植物则被完全烧

掉。原先铁塔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直径1 200英尺的浅坑，坑底有一堆碎屑。地面变得平整而光滑，其中能看到一些发绿的线条：沙子都被变成了玻璃。

弹坑中央的地面上有一片淡淡的锈红色。观察人员判断这是汽化后的氧化亚铁凝华后和沙子中的硅熔合在一起所致——换言之，这是原先承载“三位一体”炸弹的那座10层高铁塔的最后遗迹。

当天晚些时候，核试验成功的第一份报告在当地时间晚7点半被送抵波茨坦。战争部一名助理向史汀生发去电报：“今早进行了试验。尚未得出结论，但结果看起来很理想，已经超出了预期。”^[93]史汀生随后走到“小白宫”，把消息告诉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二人闻讯大喜。含义模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后，又有几份电报接踵而至，也都写得模棱两可。7月21日，出自格罗夫斯之手的长篇详细报告经由信使送达。爆炸威力相当于1.5万吨至2万吨TNT炸药，位于此前预计的威力范围的上限处。格罗夫斯曾经夸口说五角大楼（他的前一个作品）对空袭免疫，现在他收回了自己的话。

史汀生把报告全文读给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这位战争部长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极度兴奋，只要见到我，就一遍一遍地和我说这事”。^[94]丘吉尔也发现第二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时，杜鲁门表现出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兴奋，“以最坚定而果断的方式与苏联人对峙，向苏联人提出了一些他们绝对做不到的要求，还说美国完全反对他们”。^[95]

和顾问们讨论之后，杜鲁门决定让斯大林知道“三位一体”试验的事情，虽然只能用最笼统的方式。7月24日晚上，他找到这位苏联领袖，（通过翻译）对他说美国已经开发出了一种“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新武器”。斯大林看上去不为所动，只是平静地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杜鲁门搞不清对方是否领会了他所说事情的重要性。他并不知道，也没想过苏联间谍早已成功渗透进了曼哈顿工程，苏联人早已对原

子弹一事了如指掌。

美国的情报破译人员早已破译了日本政府与驻各国首都外交官之间的通信密码。这种通信内容的代号为“魔术”（MAGIC），对它们的总结和分析被写成绝密的报告，发给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高官。因此，美国领导人完全知道东京想要说服苏联政府充当中介来找盟国和谈。日本外交大臣东乡茂德和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之间急切的电报往来都在美国人面前现场直播，而且很值得一读。东乡发给佐藤的“极度紧急”电报的内容显示了他的绝望感。7月11日，他要求大使“十万火急”地拜访克里姆林宫。次日，东乡又要佐藤向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转达，“天皇陛下”本人希望“尽快恢复和平”。^[96]在这些截获内容的批注中，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写道，这是第一次有确凿证据表明，是裕仁在推动这些发往莫斯科的外交请求。

佐藤在外交部门服务年限较长，比东乡资历更深，而且他自己原来也当过外交大臣（1937年）。因此他不会完全服从现任外交大臣，而是毫不犹豫地直白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些最后时刻绝望之举的重要意见。佐藤告诉东乡，要他去提的这种模糊不清的请求是从来不可能说动克里姆林宫的。苏联人“极其实际”，任何缺乏明确可实施路径或者盟军确实可接受条款的提案都不可能说动他们。“如果大日本帝国真的有必要结束战争，”7月12日他如此对外交大臣说，“我们必须首先统一思想来做这件事。”^[97]日方从未明文表示过要这样做，东乡只能根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达成的三心二意的共识来做事。任何包含了具体和平条款的提案都会令决策团队分裂，并导致铃木政府倒台。

在他后来发给东京的电报中，佐藤劝政府认识到战争已经输了，这意味着日本“别无选择，只剩下无条件投降或以近似于此的形式投降”。他判断，唯一可以和盟军谈的条件就是“保留我们的国体”，也就是说保证让裕仁留在皇位上。^[98]但东乡却只是反复重申此前的指示，即请求克里姆林宫协助安排议和。他写道，此时确实急需和平，但是“另一方面，现在国内很难立刻确定可实施的和平条款”。^[99]佐藤能够读懂其中

的言外之意：政府内部的分裂无望化解，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憎恨任何类似无条件投降的字眼。东乡的双手是被束缚住的，佐藤也一样。

当波茨坦会议进行到第二周时，美国人面临着如何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急迫决策。“没落”行动的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计划进攻日期是11月1日。情报显示，九州岛上的日军兵力正在增长。美国人开始讨厌让苏联人加入战争，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让这位红色盟友置身事外，而且苏联红军最迟到8月中旬就能做好进攻中国东北的准备。根据格罗夫斯将军的报告，两枚原子弹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做好向日本投掷的准备。还有些人从道德角度反对在不明确加以警告的情况下便使用这种武器，反对用城市来取代军事目标作为轰炸对象。曼哈顿工程的各部门科学家都提交了请愿书。海军部次长兼临时委员会成员拉尔夫·巴德倾向于提前进行警告。他给史汀生写信道：“这一考虑主要是出于美国作为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以及我们人民的公平竞争精神。”[\[100\]](#)

然而，临时委员会及其下级委员会，以及政府内阁的主流想法始终是应当将原子弹用于对付日本。他们考虑过进行一次力量展示或者警告，但最终否决了这个提议，主要是由于这看起来不可能让日本投降。科学顾问团（奥本海默、科南特、劳伦斯和费米）承认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的结论是：“我们无法拿出任何足以结束战争的技术展示；除了直接用于军事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可接受的选项。”[\[101\]](#)

目标选择委员会已经拿出了列有四座城市的最终目标列表：广岛、长崎、小仓，以及新潟。之所以选择这四座城市，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常规轰炸夷平，这样就能最充分、最清晰地展现原子弹的威力。早先的列表上列入了京都，但是史汀生把它划掉了。原因是这座日本古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迹都是独一无二的，史汀生担心摧毁这里会引起后世日本人的仇恨。（这位战争部长不得不两次把京都从名单上划掉：很明显，格罗夫斯真的很想轰炸这座城市。）广岛和小仓是重要的军事基地、仓库、兵工厂所在地；长崎和新潟则仅仅是作为重要的航运和工业

中心而入选。在发给第20航空队的命令中，这四座城市被排除在轰炸目标之外——让它们远离李梅的火攻，留下来，别碰，保持完整，这样就能让原子弹把它们一击摧毁。虽然此时雷达瞄准已经足够可靠，但原子弹还是会在晴朗天气下投掷，这样就能从空中看到核爆炸并进行拍照：“由于四座城市相距甚远……即便天气各不相同，这四个目标也很可能至少有一个天气晴朗。”[\[102\]](#)

同盟国原则上同意要向日本发出最后的警告。在纳粹德国的废墟中，从波茨坦，签发这份公告，将会赋予这份最后通牒以象征意义——让日本人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盟友了，他们自己很快也将是相同的命运。但是公告的具体文字还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争论才能敲定。在此前的几份文件，包括《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以及（一个月前在旧金山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中，同盟国已经将他们的战争目标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设想和盘托出。现在问题来了：是否应该重申并进一步阐明它们？盟国应当将占领日本的意图表达达到何种程度？美国阵营中的几位领军人物，包括史汀生和格鲁，倾向于承诺将现有的天皇帝制作为日本新宪法的基础。他们分析认为，这样的承诺或许能加强东京议和派的力量，甚至可能让天皇直接做出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说，盟国需要裕仁来强制要求日军投降并作为听话的代理人。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反对任何可能偏离无条件投降原则的承诺，他还认为这有可能被日本人视作盟国对其无能为力的信号。

7月17日，当“三方声明”的文稿在盟国政府之间审阅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华盛顿发出电报，提交了一份建议稿。原有文稿中写道，日本人民将会自行选择政府，这就“可能包括以现有皇室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如果这样一个新政府能让全世界完全相信其永不发动侵略的话”。而按照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即参联会的“智囊”的建议，参谋长们推荐完全删除这一句。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关于“现有皇室”的内容可能会被误解为想要裕仁让位于他的儿子；其次，这一提案表明盟国有意维持日本的“天皇崇拜”体系，因而会打击“日本的进步势

力”。^[103]这两条分析都不怎么有说服力。第一个反对意见只要澄清用词即可解决，无须全部删除；第二个意见则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日本的进步势力”无力影响其投降决策。尽管如此，关于删除此句的提议还是得到了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的顾问们的认可，而且显然没有什么争议。莱希和马歇尔看起来都是毫无疑问地支持删除，虽然二人此前都倾向于明确天皇的战后地位。

7月24日，史汀生最后一次想要把保留日本政体的条款重新写进去。据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写的日记，史汀生见到了杜鲁门，“告诉他，我认为向日本人承诺保留其帝制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把这一点写入正式警告很有必要，或许这正是能让他们接受公告的因素”。^[104]杜鲁门以实际操作方面的理由拒绝了他，解释说公告文稿已经发给蒋介石签字了。史汀生也就作罢了，不过他还是建议杜鲁门做好准备，在开始和日本政府进行直接会谈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他们做出口头保证。

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在起草和下发执行核攻击任务的命令。驻提尼安岛的一支特殊的B-29航空大队已经接受专门训练以投放原子弹，他们已经做好了执行任务的准备。超级武器的各个部件已经通过空运和海运送到了马里亚纳群岛。最近刚刚被任命为太平洋美国陆军航空队战略航空兵总司令的卡尔·斯帕茨将军此时正在华盛顿。7月25日，他来到战争部报到，和马歇尔离开时代理陆军参谋长职责的托马斯·H.汉迪将军进行了商议。斯帕茨接到了关于投掷两枚原子弹的口头命令，但他告诉汉迪，他需要得到写有命令的“一张纸”。于是汉迪起草并签发了一道命令，指示第20航空队“在1945年8月3日之后，一旦天气允许进行目视轰炸，就要向以下目标之一投掷第一枚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而且“一旦完成整備”，就要向同一份列表中的城市投掷另一枚炸弹。^[105]最后一句命令还补充道，这一指示是在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的“指导和批准下”发出的。这是唯一一份要求用核武器攻击日本的书面命令。

同一天（7月25日）在波茨坦的“小白宫”，杜鲁门独自面见了他的

战争部长——如果总统的日记可信的话，那么他对史汀生的口头指示和华盛顿刚刚发出的命令并不一致：

我告诉战争部长史汀生先生，使用的时候要以军事单位或陆海军队作为目标，而不要打击妇女和儿童。虽然日本人野蛮、狂暴、残忍而且疯狂，但我们是为全世界争取福利的领导者，不能把这种可怕的炸弹扔在日本的旧都或新都上〔指京都和东京〕。

他和我观点一致。打击将会选择纯军事目标，而且我们会发出警告声明，要求日本鬼子投降保命。我确信他们不会投降，但我们应该给他们这个机会。[\[106\]](#)

但是汉迪在史汀生授权下写出的命令，却白纸黑字写着他已经得到了来自波茨坦的指示。此命令基于临时委员会及其下属子机构的建议，并得到了内阁和总统的批准。一旦炸弹准备就绪而且天气条件允许，就要把它们投向目标委员会选出的四座日本城市。这份命令中没有提到提前警告，军事目标，或者是要避开妇女儿童这些事。选择这些城市并不是因为它们军事属性，轰炸时的瞄准点也没有特别选定那里的军事目标。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符合目标委员会指定的三个条件——这些城市“城区面积较大，直径超过3英里”，“能够被一场爆炸有效打击”，以及“8月之前不大可能挨炸”。[\[107\]](#)

这样，杜鲁门7月25日的日记中就存有一个难以解释的谜团。或许他突然感到恐慌，于是小心翼翼地想要化解。他或许感觉到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会探究他背后的想法，于是想要把自己包装成完全良善之人。若如此，这天的日记就只是惺惺作态，只能让人感觉这篇日记没有反映杜鲁门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著名的座右铭——“责任在我”——就摆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办公桌上的显眼位置。第一枚原子弹在日本第七大城市的中心炸响之后，这位“不推卸责任”的总司令将会把广岛称为“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如果能说圣迭戈是美国海军的重要基地的话，那

这么说倒也没错。在195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杜鲁门承担了决定使用原子弹的责任——然而即便到了十年之后他已退休的此时，他也没有承认有意选择了城市作为目标。关于1945年7月25日汉迪将军签发的指示，杜鲁门写道：“这一命令发出后，首次向一个军事目标使用原子弹的车轮便启动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还告诉史汀生这道命令将一直有效，除非我对他说日本接受了我们的最后通牒。”[\[108\]](#)

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三国政府向全世界媒体发布了《波茨坦公告》。公告要求日本武装部队立刻无条件投降，并警告说如果拒绝投降，日本本土将会“全部残毁”：“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109\]](#)日本不可再踏上对外扩张之路。军国主义的影响要彻底且永久地拔除。战犯将被送上国际法庭受审。日本需放弃所有海外占领区，日本的主权将永久局限于本土列岛。其海外军队需放下武器，并允许和平回国。盟军将会占领“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的地方，直至确保“穷兵黩武主义”被赶出政府并解除日本的武装为止。允许日本恢复其工业，其经济也将被国际贸易所接纳。和日本政府散布的宣传相反，公告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而且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

7月27日拂晓后不久，东京方面就通过旧金山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收到了这份公告。当这份“三方声明”被译成日语并在各省、厅中传阅时，日本的领导人死盯着一个事实：签署这份公告的有美、英、中三国领袖，唯独没有斯大林。他们便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一丝机会上。他们知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在波茨坦，和英美两国正密切接触，但是苏联却没有出现在这份最后通牒之上。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愿意插进来行调停之事？

东乡外相立刻行动起来，防止公告被草率回绝。他直接面见天皇，说这份声明“留下了进一步探究落地条款的空间”，以及“我们计划通过苏联了解这些落地条款”。[\[110\]](#)在当天上午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紧急会

商中，东乡对同僚们说，这份公告可以被解读为对先前要求的软化，或许预示着一种保留颜面的“有条件”投降。虽然文中没有提及日本皇室，但其所言“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却给予了保留天皇的希望。他还警告说，立刻回绝这份公告或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东乡提出，在他的外交部门试探出苏联人的态度之前，不要对此做出任何官方回应。后续的讨论勉强达成了共识。在等待苏联人回应日本先前的请求期间，日本政府将不对《波茨坦公告》做出表态。报纸也都得到指示，不要张扬此事。

第二天，也就是7月28日下午4点，年迈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并进行了无线电广播。想要说清楚“六巨头”两派商议出的临时政策绝非易事。铃木无法说出和莫斯科方面交涉的事情，因为这是保密的；他也不能表达出这份公告提供和谈机会的意思，因为强硬派会起来造反的。在一种看起来很随意的表达中，他告诉媒体，政府想要“默杀”《波茨坦公告》。这个词同时也可以被翻译为“忽略”、“拒绝”或者是“视而不见”。这一次，“默杀”一词的实际含义或许是在接受和拒绝最后通牒之间走钢丝——换言之，“无可奉告”。

若铃木的意图确实如此，那他就太不成功了。这个词在日语中本就含义模糊，何况还要翻译成英文？在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予以反对的情况下，日本媒体就报道说首相以蔑视的态度拒绝了公告。29日，《读卖新闻》的头版大标题是“荒谬的日本投降条件”。^[111]此时，铃木已经来不及收回他的话了。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随后的讨论中，三名强硬派一直认为政府对《波茨坦公告》持摇摆态度是不可接受的。议和派的东乡和米内则主张无须再多说，但首相还是同意发表一份澄清说明。在次日上午的媒体会上，铃木说：“我想这次的联合声明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重大价值。我们只能忽略它。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把战争打到底。”^[112]

起初美国的翻译人员还在为“默杀”一词大惑不解，争论它可能暗含的意思或者重点。但是这第二份声明给出的信号就清晰得多。杜鲁门本

人对此的解读一针见血：“他们要我们去死，就是这个意思。”^[113]华盛顿的日本问题专家注意到铃木小心翼翼地避免立刻回绝最后通牒。他们理解他这话是说给军队中那些潜在的叛乱者听的，而不是回应发出最后通牒的各国政府。在随后的几天里，无线电监听人员截获的日本军方电文和外交电文显示，东京有些人已经准备要依照《波茨坦公告》投降了。但这些情报碎片仅仅是确证了美国领导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日本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死扣，死硬的“顽抗到底”派仍然足够强势，足以打断任何议和之举。

一份来自“小白宫”的绝密电报指示格罗夫斯将军在1945年8月2日之后发动第一次核轰炸，这天是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天。杜鲁门希望第一枚核武器扔出去时自己不在岗位上，而是在海上。^[114]就在这一周，对日本本土的常规轰炸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地面的破坏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欧洲的任何地方——实际上，超过了整个战争史上的其他地方。在日本那些大城市的中央，若有人举目四望，那么他的视野中除了灰烬和堆积如山的废墟，以及少量被熏黑的烟囱和矗立在各处的钢架之外将再无他物。战争中最大一次空袭出现在1945年8月1日，当时853架B-29向整个日本西部的各个城市和航道投下了6 486吨燃烧弹、精确投掷的炸弹和空投水雷。这一天，日本民众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10万人。

如果战争再持续下去，这种常规轰炸的规模和力度将会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新高度。美英两军各种类型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从欧洲调来；与此同时，新的飞机也正从美国的飞机工厂源源涌出，刚刚完成训练的机组人员正驾驶着它们来到附近冲绳岛新建成的机场上。在1945年5月至8月轰炸作战的高峰时，平均每月都有34 402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被投到日本。^[115]根据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福将”阿诺德的说法，到1945年9月，单月投下的炸弹总数将达到10万吨，随后还将逐月持续增加。到1946年初，如果日本还在战斗，那么美国陆军航空队就将有80支作战大队参加对日进攻，轰炸机总数将达到4 000架。1946年1

月，他们将向日本投下17万吨炸弹，一个月的投弹量就将超过整个太平洋战争中实际投向这个国家的炸弹总数。到计划在关东平原发动“冠冕”登陆作战的1946年3月，单月投弹量将超过20万吨。[\[116\]](#)毁灭之雨将会从天而降，使这个国家的国内交通设施彻底崩溃，经济不再运转，并导致大规模的城市饥荒。“再有6个月，日本就将被打回黑暗时代，”寇蒂斯·李梅如是说，“无论如何都会是这样。”[\[117\]](#)

在战争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第20航空队开始发动一种新的毁灭性的心理战。“超级堡垒”机群开始“在开火前打招呼”——向即将轰炸的城市投下传单，警告市民撤离，一两天后再回来将其炸毁。例如，7月27日，日本收到《波茨坦公告》的当天，美军向11座日本城市投下了6万张警告传单。其中6座城市在第二天挨了炸。8月1日，美军故技重演；8月4日，第三次。每次警告的效果都很好。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想要阻止这种警告，但消息还是会口耳相传，不胫而走，恐慌就会在落下载单的城市里蔓延开来。整个城市的人都想要逃往乡村，于是难民们挤满了道路和火车。军工厂由于没有工人而瘫痪。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总结认为，“开火前警告”传单是“最令人赞叹的心理战行动之一”。[\[118\]](#)它们彰显了日本军队及其航空兵的无力，让千千万万普通日本人确信失败已不可避免。战略轰炸调查组认为，大约一半的日本人要么见到过传单，要么从别人口中听说了传单中的消息。

与此同时，这些警告被许多日本人当作体谅和同情的表示。长冈市的一名妇女说是传单救了她的命。她说，她自己的政府从来不肯把关于这座城市已被列入目标的致命信息发布出来，但是“我相信美国人是诚实的好人，让我们提前知道即将到来的空袭”。她逃离了这里。三天后，长冈市遭到了火攻。秋田的一名工厂工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不是强盗，”他指着头上那些驾驶着银色巨型轰炸机的人说，“他们提醒我们了，要我们撤离。”[\[119\]](#)

[\[1\]](#) Smith, Thank You, Mr.President, p.218.

- [2] Brown, "Aide to Four President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1955, Vol.6, Issue 2.
- [3] Truman diary, June 1, 1945.
- [4] William D. Leahy diary, April 12, 1945, William D. Leahy Papers, LCMD;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283.
- [5] Leahy, *I Was There*, p.347.
- [6] Forrestal diary, entries dated May 1, 12, & 29,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52—66.
- [7] Wedemeyer to Marshall, May 1,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20.
- [8] Truman J. Hedding, oral history, p.109.
- [9] Statement Released to the Press, SWPA Headquarters, February 16, 1944; RG—4, Reel 612,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10] MacArthur to Marshall, April 21, 1945, #1920,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12.
- [11] CINCPAC to COMINCH, #0230, April 5,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073.
- [12] Messages between Nimitz and MacArthur, April 7—8,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p.3077—78.
- [13]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April 10, 1945, Richardson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 [14] Nimitz to King, May 17, 1945,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29.
- [15] Layton, "*And I Was There*," p.484.
- [16] Nimitz to King, April 13, #2346,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03.
- [17] Leahy, *I Was There*, p.370.
- [18] Marshall to MacArthur, April 4, 1945, War Department #63196; RG—30, Reel 1007, radio file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19] Nimitz to MacArthur, May 26, 1945, #0552,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3233.
- [20] MacArthur to Nimitz, May 25, 1945, #1102, CINCPAC Gray Book, Book 6, pp.3141—42.
- [21] Marshall to King, memorandum dated May 22, 1945, NARA, RG 38, "CNO Zero—Zero Files," Box 60, Folder 20.
- [22]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 [23] Frank, *Downfall*, p.98.
- [24]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25]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5.

[26] Ibid., p.20.

[27]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5, USSBS No.378, Admiral Soemu Toyoda.

[28]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Vol.1, p.402.

[29] Shillon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p.82.

[30]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Vol.1, p.403.

[31] 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当时正作为OSS（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代表外派到瑞士伯尔尼，并间接接触了日本政府的代表。其中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在1993年解密。参见“OSS Memoranda for the President, January–Jul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7,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参联会主席莱希亲自过问此事时，杜勒斯表示对这类接触毫不知情。Leahy, *I Was There*, p.384。——作者注

[32]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64.

[33]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13.

[34] Lockwood and Adamson, *Hellcats of the Sea*, p.40.

[35] Joint ArmyN At CITT—avyssessmenommee (JANAC) scores cited in Lockwood, *Sink 'Em All*, pp.274—75, 285—86.

[36] James Fife,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452, Vol.2, p.415.

[37] Lockwood, *Sink 'Em All*, pp.249—50.

[38] Russell,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p.103.

[39] Smith, “Payback: Nine American Subs Avenge a Legend’s Death,” *World War II Magazine*, 10/24/2016, accessed August 22, 2018, <http://www.historynet.com/uss—wahoo—vengeance.html>.

[40] Blair, *Silent Victory*, p.863.

[41] Ostrander, “Chaos at Shimonosek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2, June 1947, p.652.

[42] USSBS, *The Offensive Mine Laying Campaign Against Japan*, p.2.

[43] Phillips, *Rain of Fire*, p.99.

[44]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ly 10, 1945.

[45]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p.312.

[46] Third Fleet War Diary, July 14, 1945.

- [47]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2.
- [48]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57.
- [4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42.
- [50] Arthur R.Hawkins account, in Wooldridge, ed., *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p.273.
- [51] Ibid.
- [52]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2.
- [53]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65.
- [54] Sherman, *Combat Command*, p.312.
- [55] "Halsey Ridicules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Times*, June 4, 1945.
- [56] Wukovits, *Admiral "Bull" Halsey*, p.232.
- [57] *Time* magazine, Vol.46, No.4, July 23, 1945.
- [58]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43—44.
- [59]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ureau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 Special Report No.5, "Current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Tensions in Japan," June 1, 1945, p.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ox 3, "Reports on Japan, 1945."
- [60] Leaflet 36J6, Leaflet File No.2, Box 2, 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Archives.
- [61] Williams, "Paths to Peace: The Information War in the Pacific, 1945," p.4,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IA, accessed November 4,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
- [62] Leaflet entitled "What Can Be Done Against Overwhelming Odds?," Leaflet File No.2, Box 2, 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Archives.
- [63] "The Reaction of Japanese to Psychological Warfare," p.6, Annex 26, Report of SWPA Headquarters,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Leaflets," RG—4, MacArthur Archives.
- [64] Davis and Price, *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 p.20.
- [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2, 740.00119 PW/7—2245: Telegram No.1243,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2, 1945.
- [66] Zacharias, *Secret Missions*, p.358.
- [67] Interview with George C.Marshall, by Forrest C.Pogue Jr., February 11, 1957,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Collections.
- [68] Smyth,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p.146.

- [69] Truman, *Year of Decisions*, pp.10—11.
- [70] “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Thursday, 31 Ma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 2018,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bomb.
- [71]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51.
- [72] “Notes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Meeting,” Thursday, 31 May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 2018,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whistlestop/study_collections/bomb.
- [73] “Address Before the Cleveland Public Affairs Council,” February 5, 1943, in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398.
- [74] Joseph C.Grew to Randall Gould, ed.,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April 14, 1945, in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420.
- [75] Grew, *Turbulent Era*, Vol.2, p.1424.
- [76]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598.
- [77]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61.
- [78] King and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p.598; Forrestal diary, entry dated July 28, 1945, and additional references to a 1947 conversation with Eisenhower, undated,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78.
- [79]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210.
- [80] Walter Brown diary quoted in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58.
- [81] 英文中“蓝”意指“郁闷”，“蓝到发紫”相当于“郁闷得想哭”。——译者注
- [82]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30.
- [83] Churchill to Eden, July 23, 1945, meeting “minute,” in Alperovitz and Tree,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p.271.
- [84] Trinity Test observer instructions quoted in Laurence, *Dawn Over Zero*, p.7.
- [85]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p.136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2.
- [86] Brigadier General Thomas F.Farrell quoted in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Stimson), 18 July 1945, p.13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 [87]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
- [88]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Encl.4, “Thoughts by E.O.Lawrence,” p.136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89] Kistiakowsky quoted in Laurence, *Dawn Over Zero*, p.10.

[90]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

[91] H.D.Smyth,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Appendix 6: War Department Release on New Mexico Test, July 16, 1945, p.250.

[92] No.1305, Commanding General, Manhattan District Project (Groves)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8 July 1945, Encl.3, p.136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93] No.1303, Acting Chairman of the Interim Committee (Harrison) to the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16 July 194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2.

[94] Stimson diary, July 21,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23, 2018, www.doug-long.com/stimson8.htm.

[95] Stimson diary, July 22,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22—23.

[96] MAGIC Diplomatic Summaries Nos.1204 & 1205, July 12—13,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78—79.

[97] MAGIC Diplomatic Summary No.1206, July 14,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82.

[98] MAGIC Diplomatic Summaries Nos.1208 & 1212, July 16—20,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82—84.

[99] MAGIC Diplomatic Intercept No.1225, August 2,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87.

[100] Ralph Bard, “Memorandum on the Use of S—1 Bomb,” June 17,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09.

[101] The Scientific Panel, Interim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 on the Immediat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June 1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01.

[102] Memorandum for General Arnold, July 24, 1945, Document B18,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8.

[103] Joint Chiefs of Staf,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uly 17, 1945, Document B17,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57.

[104] Henry L.Stimson diary, July 24, 1945, Stof et al., eds., *The Manhattan Project*, p.214.

[105] U.S.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77,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TS Manhattan Project File '42 to '46, Folder 5B, “Directives,Memos, Etc.to and from C/S, S/W, etc.”

- [106] Truman diary, June 25, 1945.
- [107] Memorandum from Major J.A.Derry and Dr.N.F.Ramsey to General L.R.Groves, May 10—11, 1945, accessed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atomicheritage.org/key—documents/target—committee—recommendations>.
- [108] Truman, *Year of Decision*, p.421.
- [109] Document A45,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July 2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26.
- [110]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66.
- [111] *Yomiuri Shinbun* headline quoted in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67.
- [112] Suzuki quoted in *Yomiuri Shinbun* account,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p.167—68.
- [113] Ferrell, *Harry S.Truman*, p.215.
- [114] Sourced to assistant naval aide George Elsey: Adams, *Witness to Power*, p.298.
- [115] LeMay and Yenne, *Superfortress*, pp.159—60.
- [116] Arnold to Marshall, Joint Chiefs of Staff, June 17, 1945, RG—30, Reel 1007,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 [117] LeMay quoted in Caidin, *A Torch to the Enemy*, p.157.
- [118]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32.
- [119] Ibid.

第十六章

塞班岛南面的提尼安岛原本是一座宁静的热带岛屿，现在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兵基地。其39平方英里面积中近一半都被铺上路面成为机场，以容纳B-29轰炸机和各型战斗机。岛上的北部机场和西部机场建有8条专供“超级堡垒”使用的巨大跑道，每条都有几乎2英里长，宽度相当于10车道高速公路。这些跑道通过11英里长的滑行道与起飞前等候区、停机坪以及燃油堆栈连接到一起。长长的珊瑚岭大部分被铲平以提供巨量路面铺设和沥青制作所需的珊瑚岩。目击者回忆称，从空中往下看，提尼安岛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甲板停满了轰炸机”。^[1]还有一些人联想到了曼哈顿，两座岛屿面积相当，同样都铺满了路面。和曼哈顿一样，提尼安岛的道路也呈网格状。岛上两条主要南北向道路分别被称为“百老汇”和“第八大街”；东西向的交叉道路有“华尔街”、“42街”和“110街”。岛屿中央一块未开发的牲畜保护区被称为“中央公园”。

在第八大街和125街的交叉口，靠近被单独划出来的北部机场北端部分，有一座岗亭，这里就是第509混合大队的大门，这是一支神秘而隐秘的B-29部队，它的一切都由两层铁丝网和巡逻的武装哨兵严密把守。第509大队是能够独立运作的，意味着有自己的地勤、后勤、通信、安保和行政管理机构。它和自己名义上隶属的第313轰炸联队完全不打任何交道。大红色和黑色的指示牌警告称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营区。即便是第313联队的指挥官詹姆斯·戴维斯准将也不知道这些表面上属于自己辖下的神秘的“超级堡垒”是干什么的。戴维斯想要来大队地盘看看，结果被枪指着赶了回去。

第509混合大队唯一的任务就是投掷原子弹。大队长是小保罗·W.蒂

贝茨，一位29岁的中校。蒂贝茨被赋予了实际上是无限量的资源来完成他的任务。他有权要求得到物资、装备或者他看中的任何人，他组建队伍时从其他航空大队调走了整个的B-29中队而无须给出任何解释。1944年12月，第509大队在美国犹他州的文多弗陆军机场开张——这座基地阴冷、干旱，位于犹他州盐场和内华达州边境之间。所有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都被告知绝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其所做之事，不可走漏半点风声。任何问太多问题的人，哪怕是核心团队成员，也要被送走。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循“非必要不告知”原则，但是飞行员和投弹手被告知，他们必须进行训练，以投掷一枚9 000磅重的“特殊炸弹”，出于保密，他们称其为“小玩意儿”。[\[2\]](#)

投掷新型炸弹时，飞机按要求得在爆炸时飞离炸点至少8英里。它将会有40秒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机动。这需要进行155°大坡度急转弯，同时飞行员还要大角度俯冲以加速。对日本战斗机的防空战术进行分析后，蒂贝茨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拆除飞机上的大部分武器，依靠速度和高度来躲避拦截。第509混合大队还必须监督对B-29飞机进行的大改造，因为新型炸弹无法装入这型飞机的标准弹舱。在文多弗，这支大队使用“南瓜炸弹”进行训练——它的尺寸、重量和弹道特性都模拟了分别被称为“小男孩”和“胖子”的铀弹和钚弹。训练飞行时，B-29会瞄准画在地面上的300英尺直径的圆圈投下哑弹，随后进行规避机动。

“三位一体”核试验刚刚完成，两枚原子弹的主要部件就被运到提尼安岛。装着“小男孩”炸弹中枪式起爆机构和一半铀——235核心部件的板条箱被空运到旧金山，装上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这艘军舰平安无事地在7月26日抵达提尼安岛的一处码头。板条箱随即被送到第509大队营区的一座组装厂，厂里的操作人员都是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和技师。铀弹的其余部分被分装在两个箱子里，搭乘一架C-54运输机飞过了太平洋。8月1日，原子弹的所有部件都来到了提尼安岛，准备组装。

卸下神秘货物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启程前往莱特湾。但它此行却在7月30日戛然而止。当天，这艘巡洋舰被日本潜艇伊-58发射的两

枚鱼雷命中，在12分钟内沉没。它的求救信号无人收到，而且直到三天后才有人发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不见了。等到救援船只到达沉船现场，第四天已经过去了。军舰沉没时，舰上的1 200名舰员中有约900人弃舰逃离，但是放下来的救生艇却没几艘，于是人们只能在海中游泳或攀爬在残骸上。在这四天的煎熬中，大约600人死于暴晒、脱水、盐水中毒、溺水或者鲨鱼之口，只有317人获救。“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这艘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将军的前第5舰队旗舰，是美军在二战中损失的最后一艘主要作战舰艇。

虽然自从1944年那些初探的日子以来，B-29空袭作战已经愈加安全了，但起飞时坠机的情况还是会时常出现。飞机在起飞时满载燃油，比整个航程中的任何其他时刻都更重。第20航空队各个机场的跑道尽头都有不少烧尽的坠毁B-29的空壳。8月4日，就在轰炸广岛任务的两天前，整个马里亚纳群岛的各个机场上总共有4架B-29在起飞时坠毁。这种事故表明，在载机安全升空之前绝对不能提前整備原子弹。这意味着原子弹组装小组要随同机组人员升空。

蒂贝茨将亲自驾驶投掷铀弹的B-29。45—MO号B-29飞机有个更知名的名称：“伊诺拉·盖伊号”——蒂贝茨用自己母亲伊诺拉·盖伊·蒂贝茨的名字给这架飞机命了名。第509大队另两架“超级堡垒”将作为观测机伴随“伊诺拉·盖伊号”同行，并将投下各种测量设备。还有三架同型机将在前方飞行，侦察目标上空的气象条件。

8月6日子夜时分，一间严密把守的匡西特板棚房里进行了任务简报，牧师还做了祈祷。“伊诺拉·盖伊号”和其他飞机的机组人员随后乘上覆盖着帆布、架着条凳的卡车开往机场。经过沿途诸多检查点后，机组人员来到了停机坪，看到了出人意料的一幕。“伊诺拉·盖伊号”被数百人围得水泄不通——有贵宾、地勤人员、士兵，还有一个庞大的媒体代表团。巨大的飞机被拍摄电影用的弧光灯照得雪亮。一处小平台上架设起了摄影机，闪光灯闪个不停。观者不由得联想起百老汇的公演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首映式。

蒂贝茨和机组人员在他们的飞机前拍了一张正式的合影。凌晨2时20分，蒂贝茨说：“好了，我们开始干活吧。”机组爬上了飞机，再次向围观人群挥挥手，接着关上了舱盖。启动引擎之前，蒂贝茨透过座舱左侧座位旁的舷窗向摄影机咧嘴一笑，最后一次挥手致意。舷窗下是用黑体字蜡印的他母亲的名字：伊诺拉·盖伊。

当巨大的引擎点着了火，人们纷纷向后退去。长长的螺旋桨开始旋转，引擎轰鸣起来。飞机滑行到A跑道和B跑道的边缘。“伊诺拉·盖伊号”关闭着航行灯，在2时45分开始起飞滑跑。由于带着5吨重的原子弹并满载燃油，这架轰炸机需要跑完几乎整条跑道才能离地升空。仪器载机“大艺术家号”在两分钟后从B跑道起飞，再过两分钟后升空的则是第二架观测机“必要之恶号”。三架飞机随后转向北，开始爬升。

“伊诺拉·盖伊号”安全升空后，总军械师“迪克”威廉·S.帕森斯海军上校爬回炸弹舱，着手进行整备“小男孩”的复杂操作。这枚武器长10英尺，直径2.5英尺，重9 800磅。帕森斯把炸药插进枪式起爆设备中。几个小时后他还要回来接通起爆线路。

凌晨5时45分，机组看到了硫黄岛，折钵山在朝阳下清晰可见。“大艺术家号”加入了编队，距离“伊诺拉·盖伊号”的右翼仅仅30英尺；“必要之恶号”则来到领队机的左侧。从硫黄岛向北飞了两个小时后，三架飞机开始缓慢爬升至9 000英尺高度。几名无事可做的组员在路上睡了几个小时。

三架气象侦察机“同花顺号”、“加比特III号”和“满堂红号”已经提前起飞，在轰炸机前方飞行，侦察广岛和备选目标小仓及长崎上空的天气。“伊诺拉·盖伊号”的无线电员收到了在广岛上空盘旋的“同花顺号”发来的加密电报：“全空域云量少于3/10。建议：轰炸首选目标。”于是机组人员穿上他们的高炮夹克，背上了降落伞。蒂贝茨给座舱增压，“伊诺拉·盖伊号”继续缓缓爬高，最终在32 700英尺高空转为平飞。飞机在上午8时50分飞过四国岛南部海岸。空中没有日本战斗机，也见不到高射炮火。

帕森斯上校和他的助手回到炸弹舱，完成他们的炸弹整備检查工作。他们取下了保险，把尾管拧进去，接通起爆电路，并在这些机构外安上装甲护板。“小男孩”现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拆下脚手架并收好，离开了炸弹舱。他们不会再过来了。

蒂贝茨和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透过“伊诺拉·盖伊号”的花房式机头看着下方熟悉的海岸线轮廓和濑户内海的岛屿。这是个天清气朗的早晨，空中只有零星的碎云。他们直接从龙虾形状的江田岛上空飞过，这里是日本海军兵学校所在地。吴港的港口和城市从他们右侧下方滑过。在前方，广岛人口稠密的扇形三角洲出现在了视野中。这是一座宽阔且平坦的城市，位于太田川分叉的潮汐河口上，一侧临濑户内海，其余三面被青翠的山岭所包围。蒂贝茨以磁罗经航向272°进入了最后的投弹航线。透过一道云缝，他和副驾驶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瞄准点——中岛北侧横跨太田川的巨大T形相生桥。此时，“伊诺拉·盖伊号”和僚机正在31 600英尺的高空，距离下方的城市几乎有6英里远。（广岛当地时间）上午8时5分，领航员喊道：“10分钟后投弹。”

8时14分，距离投弹还有1分钟时，蒂贝茨下令：“戴墨镜。”于是所有机组人员都戴上了焊有深色偏光镜片的保护风镜。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检查了诺顿轰炸瞄准具，确认瞄准点“入镜”，这意味着飞机正直直飞向目标。此时，两架观测机也收到了无线电预警信号。8时15分，“伊诺拉·盖伊号”打开弹舱门，挂着“小男孩”的挂钩缩回槽内。费雷比告诉蒂贝茨，“投弹完毕”——其实飞行员已经知道了，因为飞机一下子轻了5吨，突然升了上去。蒂贝茨随即向右压坡度转弯。

“伊诺拉·盖伊号”右翼“大艺术家号”的飞行员查尔斯·斯威尼看到这枚10英尺长的圆柱体从投弹机上落了下去。他想：“木已成舟了。那上面也没有绳子或钢缆。无论它起不起效，我们都拉不回来了。”^[3]“小男孩”轻轻摇晃或者说“海豚跳”了一下，随后就像一枚导弹那样沿着航向稳步飞去。它的弹道相对陡峭，很快就从视野里消失了。它将要下落43秒，到达相生桥上空1 800英尺处的起爆点。

“大艺术家号”投下了仪器盒子，它们可以收集测量数据并通过无线电传回飞机。随后斯威尼向左大坡度急转，他的B-29随之进入了155°俯冲转弯，他和第509大队的其他飞行员已经为这个动作训练了9个月。“伊诺拉·盖伊号”向右进行了相似的转弯。文多弗基地的试验已经表明“超级堡垒”能够承受这样的转弯而不会有结构损坏的风险。^[4]

转弯时，蒂贝茨和斯威尼二人都小心翼翼地盯着他们的仪表。戴着焊有偏光镜的风镜看仪表盘实在不容易，他二人都快要把额头贴上去。了。“大艺术家号”正在飞离爆心的途中，机舱内突然充满了炫目的银蓝色光芒，斯威尼发现他前方的天空变成了一片耀眼的亮白色。他本能地闭上眼，但仍能感到满眼光亮。同时，他发觉自己嘴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像是铅。（这是伽马射线产生的臭氧。）在此时距离爆心15英里的“必要之恶号”上，一名机组人员发现机舱里明亮至极，戴着墨镜也能看清他袖珍《圣经》里的小字。

这时候蒂贝茨也注意到了闪光和口中的金属味。“我看到了光亮，”他后来说，“我还尝到了它。是的，我能尝到。那味道就像铅。这种感觉就落在我的牙齿上。你们看，这就是辐射。因此我尝到铅味时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它爆炸了。”^[5]他的副驾驶罗伯特·路易斯从座椅上回头向后看。他立刻一边拍着蒂贝茨的肩膀一边大叫：“快看那儿！快看那儿！快看那儿！”路易斯后来在任务日志中写道：“我的天，我们干了什么？”^[6]

大约一分钟后，第一次冲击扫过了“伊诺拉·盖伊号”。飞机的铝蒙皮开始出现明显而猛烈的扭曲，就像是外面有人挥舞着巨大的铁锤敲打机身一样。飞机被猛地一推，颤抖起来，好在还没有散架。蒂贝茨估计这一击的力量相当于2.5G。第一次冲击过后，第二次冲击接踵而至，这次的力量就小得多了——这是第一次冲击碰到地面之后向上反弹而形成的回波。

这些飞行人员没见过“三位一体”核试验，因此当飞机向爆心转弯拍

照时，他们对自己所见到的场景毫无准备。“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操作员阿贝·斯皮策中士觉得这看起来就像是“太阳从空中掉下来，落在了地上”。^[7]这一幕令人敬畏而恐惧，一个火球带着无数紫色和琥珀色阴影冉冉升起，四周是大团翻腾的烟尘和燃烧的气体。巨大烟柱的顶端形成了一朵灰色的蘑菇云。烟柱已经升到比飞机更高处，因此飞行人员要抬起头才能看到蘑菇云。除了水面上几条长码头的外端之外，从空中看不到广岛市的任何部分。城市北面和西面的绿色山岭在灾难面前岿然不动，但浓密的烟尘之毯沿着蜿蜒的河谷向内陆铺开。“在下方你只能看见翻滚的黑色烟团，”蒂贝茨说，“我没去想底下的地面上发生了什么——你不能想这个。不是我下令要扔这枚炸弹的，我只是在执行任务。”^[8]

“伊诺拉·盖伊号”和“大艺术家号”环绕广岛三圈，以螺旋形航线逐步降低高度，机组人员们则一直盯着下方难以言表的灾难，目瞪口呆。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没人说话。仪器载机上的高速摄影机拍下了数百张照片，摄影技师报告说照片拍得非常好。帕森斯上校则向提尼安岛发回加密电报，报告称核爆成功，B-29正在返回基地。

乔·斯提伯里克是“伊诺拉·盖伊号”上的一名机组成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漫长的返程中，机上所有人都几乎一言不发。“我被惊呆了，”他说，“我猜是因为那种五味杂陈的感受难以言表吧。我们都处于震惊之中。我们所有人想得最多的大概是这东西会结束战争，我们努力让自己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9]

一整个夏天，广岛城中都是流言四起。据说美国人给这座城市准备了某种可怕的命运。否则为什么这一区域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摧毁了，包括吴港、岩国以及德山，唯独广岛完好无损？8月5日至6日的夜间，城中两次响起防空警报，有人乖乖爬起来躲进防空洞，但其他许多人则在警报声中继续睡觉。

这天一早，海岸雷达网侦测到了“伊诺拉·盖伊号”前方的气象侦察机B-29。于是日本人拉响了防空警报，把城中居民召到了掩体内。早上8点，警报解除。空袭志愿队人员，包括许多学龄儿童，都解除了任务。

夏天还没有过去，这是一个晴朗、炎热的早晨，空中只有一朵云彩。道路上挤满了早高峰的人群，有人步行，有人骑着自行车，有人乘坐黄包车、马车、汽车，还有有轨电车。当“伊诺拉·盖伊号”和两架观测机从南面嗡嗡飞来时，从地面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目击者看到高空中展开了若干降落伞，那是“大艺术家号”投下的仪器盒子。

上午8时16分，“小男孩”在距离地面1 870英尺的高度，与瞄准点水平距离仅550英尺处爆炸了。爆炸造成的核链式反应，使核爆区中央的温度高达100万摄氏度，引燃了周围直径近1千米的空气。火球吞没了市中心，地面上约两万人当场蒸发。高温和电离辐射令距离火球表面1千米之内的所有人当场死亡，要么死于灼烧，要么五脏六腑被震碎。更远处，以爆心为圆心，呈同心圆状扩散的伽马射线、中子辐射、光灼伤、冲击波和火焰风暴将人们卷入其中。最初的冲击波从爆心处以超声速向外冲出，速度达到每小时约984英里。有轨电车从轨道上被吹下来，像玩具一样翻倒在一旁。人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扯掉了。2.3千米之内几乎所有的木质建筑都被夷平，半径3.2千米处的此类建筑则被摧毁一半。后来，调查人员发现爆心内圈半径里留下许多人的影子。他们都化为了气体，但其身体在路面或附近的墙上留下了淡淡的轮廓。

和头上B-29中的机组人员一样，地面上幸存的目击者也记得爆炸时的闪光和口中的臭氧味道。蜂谷道彦医生当时正待在家里，他的起居室突然充满了刺眼的白光。就在他的房子倒塌前一瞬，这位医生还在好奇是不是有人在他窗户外面点燃了镁光灯。松重美人当时是《广岛日报》的摄影师，他记得出现了一道“明亮的闪光，满眼雪白，就像我们原来拍照时使用的镁光灯那样”。^[10]约翰尼斯·西梅斯是德国耶稣会神父，也是东京基督教大学的现代哲学教授，他从首都被疏散出来，来到广岛

郊区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当时他正坐在他简陋的卧室里，距离爆心约1英里，突然，屋里充满了“炫目的光芒，就像是摄影时候使用的镁光灯，我还感到了一股热浪”。[\[11\]](#)

片刻之后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巨响，天花板和墙壁突然塌了下来，堕入深渊之感包围了每一个人。蜂谷医生的屋子里充满了烟尘。他只能看到一根木柱歪倒在旁，之后又看见屋顶塌陷了下来。他原来穿着内衣，但是闪光之后，他转眼就变得一丝不挂了，虽然他都没有注意到衣服被撕掉。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这位医生起初以为是一枚常规炸弹直接落在了他的房子上。他向妻子大叫道：“这是个500吨炸弹！”[\[12\]](#)

那些身处户外的人被掀飞到了空中。山冈美智子是个15岁的女孩子，当时正在前往她工作的电话局途中。原子弹爆炸时，她正抬头观看空中的飞机。“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感觉到，”她几年后回忆道，“这很难形容。我直接昏过去了。我记得我的身体飞到了空中。可能是冲击波导致的吧，但我不知道自己飞出去多远。”[\[13\]](#)碎玻璃和木头碎块扎进了她的肉里。田冈英子是一位21岁的母亲，正抱着她的男婴坐在一辆开往市中心的有轨电车上，车里突然充满了“奇怪的气味和声音”。她低下头，看见一块碎玻璃划破了她孩子的脑袋，孩子流了许多血，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起来也不疼。他还带着一脸血向妈妈笑。[\[14\]](#)中村初代也是个年轻的母亲，她疯狂地想要把她的孩子们从家里的废墟中挖出来。她5岁的女儿痛得大叫。“现在没时间管疼不疼了。”她一边答道，一边把女儿拉了出来。她身上有几处划伤和青肿，不过没受其他伤。[\[15\]](#)北山双叶是一位33岁的妇女，在防火障拆除队工作，她被埋在了一座她正在拆除的房屋的废墟下。从废墟中挣脱之后，她发现自己正在流血。她的头发上落了一些还在燃烧的木块，碎玻璃扎进肉里。她找到一条毛巾，于是拿过来擦去脸上的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我发现我脸上的皮肤也被毛巾擦了下来。哦！我的手和胳膊上的皮肤也脱落了。我右手从胳膊肘到指尖的整块皮肤都脱落了，奇怪地挂在那里。我左手的皮肤也落了下来，五根手指，就像手套一样。”[\[16\]](#)

浓烟和尘埃笼罩在城市上空，遮天蔽日，白昼如夜。中村的女儿在和妈妈逃离家的废墟时一直问个不停：“天怎么黑了？我们家怎么塌了？发生了什么？”^[17]大批难民——悲惨而痛苦的人组成的人潮——在大火前四散奔逃，远离爆心，或者涌向河堤。他们一瘸一拐，张着胳膊；许多人的大部分皮肤都已剥落，要张着胳膊才能避免和身体摩擦时的剧痛。许多人都是赤身裸体，而且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还光着脚，他们的鞋子陷入了燃烧的沥青路面，被扯掉了。他们的脸都可怕地烧黑、肿胀，头发被烧焦并蜷曲起来。那些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呼喊着想路过的人，请求帮忙给点水喝。到处都能听见哀伤的呻吟：“水，水，水！”^[18]

醒过来后，山冈意识到她被严重烧伤了。“我的衣服都烧掉了，皮肤也是。我的衣服成了破布。我的头发原本都扎了辫子，但现在就像是狮子鬃毛一样。有些人还有一口气，努力想把肠子塞回肚子里；有人腿被拧断了；有人没有头；还有人的脸被烧黑、肿胀，都不成人形了。”^[19]松重美人带着他的照相机来到了街上，想为他的报社拍几张照片，但刚一出门，他就发现自己面对这一幕幕可怕的景象实在无法按下快门。“人们的尸体都肿胀了起来，”他说，“他们的皮肤被烧掉，一条条挂了下来。他们的脸都被熏黑。我把手放在了照相机上，但是地狱般的鬼魅之景让我无法按下快门。”^[20]

大火蔓延开来，越烧越旺，汇聚成了快速移动的火焰风暴。风暴快速横扫被摧毁的城区，烧光地上的残骸，吞没了奔逃的人群。从这个角度上说，广岛核爆的后效和早先对东京等其他城市的火攻十分相似。许多原本可能生还的人由于吸入过多的尘土和浓烟而死。火焰激发了如同龙卷风一般的强大风暴，把一块块屋顶、房门、榻榻米和各种其他碎块卷走。人肉烧焦的恶臭弥漫全城。根据松重的记录，“人体脂肪被灼烧时会起泡而且噼啪作响。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烤人肉”。^[21]

本能驱使着人们奔向桥和河岸，要么清洗伤口，要么找水喝。他们

跑下河堤上的石头台阶，来到狭窄、泥泞的河岸上，却看到了庞大到难以置信的难民人潮。就和那些遭到火攻的城市一样，河流成了乱葬岗。受伤严重的北山双叶径直来到附近的鹤见桥上，但是她低头向水里看了一眼就被吓了回来。“数以百计的人在河里挣扎。我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面孔浮肿而苍白，头发乱作一团，都举着手痛苦地呻吟着，跳进水里。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也想要跳下去，因为浑身灼痛。但是我不会游泳，只好忍住了。”^[22]这一决定或许救了她的命。许多人从桥上跳下去，砸在其他人的头上，或者从河岸旁推开漂浮的尸体，涉水来到河中。广岛是一片冲积平原，河流都是潮汐河口：这里的水都是咸水，不可饮用。那些喝了水的人都会吐出来，呕吐物里还掺杂着血。

爆炸两个小时后，黑雨从天而降：雨滴反常地又大又重，大小如同玻璃弹子一般，颜色乌黑，质地黏稠。这是由于水滴在凝结时吸收了升腾的灰土和尘埃。这些黑色的雨滴很大，落在难民身上时会砸得人生疼，还会在人皮肤上留下洗不掉的黑色斑点。黑雨很冷，有些被雨淋到的人开始颤抖。幸存者们将来会知道，这些不祥的雨滴都含有放射性。

住在城中的人能看见闪光，却并未注意到爆炸声。而住在远处郊区的人则先是看见了闪光，随后又听见了轰隆的爆炸声。广岛的日本人将闪光读作“pika”，将巨大的响声读作“don”。这样核爆炸就被他们称为“pikadon”，意即闪爆。^[23]

在长野的耶稣会修道院里，神父们竭尽所能地救助那些沿着河谷从城市中走出来的伤员。他们的教堂和图书馆被用作了临时救护所，但是这些救护所很快就挤满了伤员，再也容不下更多人了。于是神父们把榻榻米搬出来放在草地上继续救人。有一个神父在担任神职人员之前学过医科，于是他便指导其他人进行基础的急救。但是修道院里的绷带和药品很快用完了。于是他们尽可能地清洗伤口，然后抹上食用油，充作油膏。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神父们获悉有两位耶稣会教士在城里的教会办

公室受了重伤。二人正临时在元安川中的浅野公园避难（这里距离广岛古城遗址和第二总军司令部都很近）。于是西梅斯神父和其他几位同僚拿起两副担架就进城去了。在迎面而来的难民人潮中逆流而行十分困难。接近市中心时，灾难愈加触目惊心。“原来城市所在的地方，”西梅斯后来说，“现在成了一片巨大的烧尽的废墟。”受伤的人们向他们呼喊。神父们尽了全力，带上了一个受伤的孤儿同行，但他们无法帮助所有人，因而不得不对无数哀求充耳不闻。浅野公园内的场面十分恐怖。数万市民席地而居，火焰风暴将大树连根拔起，横挡在道路上，因此只能从似乎数不尽的惨不忍睹的成人和孩子中间穿过才能走进公园。救援队最后找到了他们的神父同僚，把他们放到担架上。第二天上午他们才回到长野。这一来一回用了12个小时。

浅野公园旁的红十字会医院已经部分坍塌而且被火焰包围，但是幸存的医生和护士仍然在努力工作，他们的医疗大厅里住进了大约1万名伤情严重的烧伤者或其他伤员。医生们对那些最严重的烧伤者已经无能为力，哪怕只是想脱下他们的衣服，皮肤也会跟着被撕下来。辐射伤害的迹象在8月6日就已显现；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这还将愈加明显。受害者的皮肤、牙龈、眼睛都在流血；他们咯血或者便血，头发一丛丛地脱落下来。医院里的许多伤员除了给伤口涂上一点碘酒之外再未得到更多救治。有个人在医院里当面问一位医生，为什么医疗人员对浅野公园里那巨大的人群不闻不问。医生答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施救，尽可能挽救性命。那些重伤者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会死，我们不能被他们拖累。”^[24]

广岛的幸存者们已然分不清白天与黑夜。8月6日几乎一整天，城市的天空都是黑的，直到傍晚才放亮。大部分时钟和手表都被毁了。蜂谷医生还记得他无从知晓到底是白天还是夜晚。“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我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一瞬，或许会持续到时间尽头。”他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无所知，因此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美国人用某种办法在整个城市里喷洒了看不见的油雾，然后

将它点燃了？7日早晨，天终于晴了，广岛市民们第一次看见这片丑陋的废墟，而这正是他们的城市原先矗立的地方。到处都有一些钢筋混凝土残墙或者钢架结构还立在地面上。东面和北面的青山，以及南面的濑户内海，仿佛比以往更近，也更清晰了。城市被夷平，视野便开阔了：“房屋都消失后，广岛显得那么小。”^[25]

幸存者中没有几个人表达出愤怒之意。消极的认命感主宰了人们的情绪。许多人耸耸肩，说道：“Shikata Ga Nai [仕方がない]。”^[26]这句话在战时的日本很常见：“没办法。”灾难已然发生，而且无法阻止。有人活下来了，有人死了，战争还要打下去，直到那些掌权者喊停为止。

杜鲁门是在乘坐“奥古斯塔号”横越大西洋时收到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正坐在水兵食堂条桌旁的条凳上，和舰员们肩挨着肩，端着不锈钢托盘吃午饭。一名军事顾问找到他，递给他一份从华盛顿发来的高优先级电报。电报告诉他，第一枚特殊炸弹已经在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投掷到了广岛，效果看起来比新墨西哥州的试验更好。杜鲁门笑了，他和顾问握了握手，说道：“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27]十分钟后，第二份报告送来了，这次直接来自史汀生部长，报告估算爆炸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杜鲁门站了起来，向食堂里的人群大声读出了消息。水兵们围成一圈，鼓掌欢呼起来。总统随后又来到军官餐厅，向舰上的军官们再次宣读了战果，他们也一样鼓起掌来。里格登上尉说人们欢呼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有望更快结束”。^[28]

按照事先的安排，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美国已经将世界第一枚原子弹投在了“日本陆军的重要基地”广岛。^[29]杜鲁门简短会见了随行的媒体通讯员，但是除了正式声明中的内容外，他也没法告诉对方更多东西了。他随后向电影摄制组宣读了声明的一部分内容。纪录片是在“奥古斯塔号”的“指挥台”上总统的套房里录制的。总统穿着浅褐色的

夏季制服，打着红色领带，坐在一张办公桌旁，面对摄影机，后面的圆形舷窗清晰可见。“那是一枚原子弹，”他说，“它利用的是宇宙间最基本的能量。这股力量是太阳的能量之源，它被用在了给远东带来战争的人身上。”他解释说，美国在英国的协助下，集合了这个项目所需的最顶尖的科学家，建设了巨大的工业设施，花费超过20亿美元。他说，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详情将由战争部发布。至于日本人，《波茨坦公告》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来避免这一可怕的命运，但是东京的领导人粗暴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因此，“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款，他们就等着地球上从未见过的毁灭之雨从天而降吧”。[\[30\]](#)

在东京，广岛灾难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了过来。上午8点半，爆炸约15分钟后，吴港海军造船厂报告说相邻城市遭到了“一枚破坏力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的打击。[\[31\]](#)一个半小时后，广岛80英里外的一处航空兵基地报告称，“一枚巨大的特殊类型强力炸弹，看起来像是镁弹”，在爆炸时发出炫目的闪光，冲击波夷平了2英里半径内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帝国大本营没有收到来自广岛第二总军司令部的任何消息；那里的所有无线电和有线通信线路都断了。上午11时20分，广岛城外8英里处的一个无线电通讯员设法通过电话向东京的同盟社转发了一份口述报告。他说广岛已经被仅仅一两架B-29投下的一枚或数枚炸弹完全摧毁。[\[32\]](#)

日本军队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起初对美国能否造出这样一种武器表示了怀疑。丰田海军大将对日本自己失败的核计划有完整的了解，他判断即便敌人凑够了制造一枚炸弹所需的材料，他们可能也仅仅造出了一枚而已。即便不止一枚，也顶多只有两三枚，因此它们不足以从空中摧毁整个国家。（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对的。）民防当局行动起来，压制造成恐慌的流言，并谎称所有躲在地下防弹掩体内的广岛人都毫发无损。[\[33\]](#)

第二天天亮前，东京的新闻审查人员撤下了杜鲁门总统关于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声明，议和派也行动起来，推进投降事宜。外交大臣东乡这天上午来到皇宫面见天皇。裕仁宣布，战争必须要结束，他要东乡把他渴望立刻停战的意愿转达给首相。当天下午和天皇会商后，木户侯爵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此十分关切，问了许多问题。但是在当天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强硬派还在拖延时间，说是在调查清楚广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不应该采取任何措施。阿南惟几说，军队的技术顾问对于原子弹是否存在将信将疑，但他们还是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前往广岛了解情况。在新组建的“原子弹应对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技术委员会代表们说，他们怀疑美国人能否造出这样一枚炸弹，认为即便他们造出来了，也无法把这种不稳定的装置运过太平洋。他们认为攻击广岛的是一种“带有特殊装置的新型炸弹，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媒体只被允许说广岛遭到了一种新型武器的攻击，在8日之前，日本的报纸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原子弹的事情。

8月7日上午，由7名军官和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飞到了广岛。调查组中包括了日本的顶尖核科学家仁科芳雄，正是他领导了这个国家半途而废的原子弹计划。在被摧毁的城市上空盘旋时，仁科说他一看便知“除了原子弹，没有别的武器能造成如此破坏”。^[34]他的盖革计数器确证了这一点。当飞机在机场停下来时，他们见到的一名官员本人就是原子弹威力的生动例子。这个人受到了闪光灼伤，但是他当时正侧脸对着爆心，因此他的半边脸被完全烧伤，另半边则完好无损。他告诉调查人员：“所有暴露的东西都被烧了，但是只要有掩蔽，哪怕只是轻微的掩蔽，也可以免于烧伤。因此不能说没有对付的办法。”^[35]第二天，调查组向帝国大本营提交了报告，结论是，攻击广岛的毫无疑问是一枚原子弹。^[36]

在东京，8月8日，铃木首相召集“六巨头”再次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却被告知有些人因忙于其他工作而无法参加。这样，首枚原子弹爆炸后的整整48小时就这么被浪费了，日本的政策连做出调整的可能性都

没有，因为决策委员会凑不足人数。但日本政府还是再次向莫斯科发出了急切的恳求。他们仍然没能发现苏联正在为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做准备。东乡给佐藤大使发电报，询问苏联人是否有做出答复的迹象。几个小时后，佐藤回电，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终于同意在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5点接待他。

根据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整个首都此时都处于翘首以盼的状态中，期待着苏联那边能传来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或许能让日本通过外交途径退出战争，从而得救。[\[37\]](#)

佐藤应约准点来到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办公室。这位日本大使刚开始他的礼节性问候，莫洛托夫就打断了他，请他坐下，说自己有一份正式声明想要宣读。莫洛托夫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宣读苏联的对日宣战公告，时不时停顿一会儿，以便翻译。他说他的政府是在应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政府之请求而行事，这些国家邀请苏联加入《波茨坦公告》。（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此举是为了“令和平更快到来，使人民免于承受进一步的牺牲和痛苦，并让日本人有机会避免像德国那样由于拒绝无条件投降而遭受危险和毁灭”。[\[38\]](#)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从第二天，即1945年8月9日起，视为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莫洛托夫没有就取消苏日中立条约一事给出任何解释或者理由，这一条约原定于次年到期。

出于礼节，佐藤感谢了莫洛托夫为缔造和平而倾注的努力。这位大使拿到了文件的一份复印件，并被请出了大门。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即将到来的战争行动开始时间应当以哪个时区为准。佐藤或许觉得莫洛托夫指的是莫斯科时间8月9日——第二天早晨。但是实际上这个时间是苏联人精心算计过的。莫斯科的5点是外贝加尔时区的11点。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边界上，此时已是午夜，一个小时后就是1945年8月9日了。到那一小时，到那一分钟，苏联战机就会起飞，苏联坦克就会开始滚滚向前。

过去的几个月间，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苏联已经准备好要进行堪

称历史上规模最庞大、最具压倒性的地面进攻。部队集结地域就在边境线后方，高级前线指挥官也隐姓埋名，穿着低级军官的军服来到战区。随着13.6万节铁路车皮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来回往复，大批部队、坦克、野战炮和其他军用物资被运到了远东。自从三个月前德国投降以来，这一战区苏联红军的实力已经增长了超过一倍，达到大约89个师。^[39]日本情报部门却未能察觉到这大规模战役准备和部队调动的任何迹象。

苏联人的计划是，在长达2 600英里的战线上，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同时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三路进攻。为此，苏军新成立了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由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一指挥，他将依靠一套完整的指挥班子指挥整场战役。西路进攻由外贝加尔方面军负责，R.Y.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麾下的红军部队将穿越艰难险阻的戈壁沙漠和阿尔泰山区，迅速突破至中国东北腹地的沈阳。东路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将在K.A.梅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下越过小兴安岭，攻占长春，随后杀入朝鲜北部。远东第二方面军将从北面向中国东北进攻，支援两翼的进攻部队。参加此次作战的红军总兵力约150万人，超过该地区日军兵力一倍有余——而且苏军都是机械化部队。红军在欧洲东线血战多年并赢得胜利，此时其实力和作战效能都处于巅峰状态——各个层级老兵众多，装备精良，而且指挥能力卓越。正如一名美国军事分析人员所写的那样：“苏军的作战计划和战争中其他时候一样别出心裁。出色地执行这些计划令其在两个星期内便赢得了胜利。”^[40]

虽然苏军的作战计划被称为“中国东北战略进攻战役”，但它也包含了占领朝鲜、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辅助作战计划。进攻千岛群岛的两栖登陆作战直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次日才开始，红军部队还将迅速占领岛链的其余部分，其进攻作战将持续至1945年9月2日苏联代表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还指示红军拿出攻占北海道岛的备用计划。假如日本再晚投降哪怕只是几个星期，其本土最北端的岛屿就要在“铁幕”另一边待上45年了。

当东京方面获悉莫斯科宣战时，苏联红军已经杀进了中国东北。8月9日拂晓时，日本的陆军省和帝国大本营中已经挤满了睡眼惺忪的军官。许多人已经预料到苏联会来进攻，但是没几个人能想到苏联会在击败德国后这么快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一个月前发布的一份参谋部研究报告还估计说苏联人最早要到1946年2月才能在东亚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据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回忆，这次突然袭击“真的到来时，给大家沉重一击”。^[41]在帝国大本营，高级将领们讨论了苏联如果同意恢复中立并协助外交停战的话，可能会开出怎样的价码，并且商量从亚洲大陆撤回所有日军部队。许多人主张，如果苏联真的开价的话，日本应该接受——这显示出日本高层其实知道自己在这一区域的力量是多么虚弱。

收到来自中国东北的战报之后，事情便很快清楚了，红军以庞大的装甲机械化纵队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动了进攻。这支碾碎过德国国防军的军队现在把自己全部的怒火砸向了业已消耗殆尽的关东军。日本士兵带着一贯的坚韧和勇敢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无法与对手相提并论：兵力、坦克、空中力量、后勤，以及机动性。数十万日本士兵被苏军俘虏，许多人直到战争结束后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多年，充当劳力。

铃木首相召来了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问道：“关东军能击退苏军吗？”

池田答道：“关东军毫无希望。”这支曾经精锐的兵团已经把它最好的部队、装备和军火调去增援台湾岛、日本本土和太平洋其他战场。现在它只是曾经那支关东军的“一具空壳”。

听罢，铃木长叹一口气。“关东军那么弱了吗？”他问道，“那就没戏了。”

“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池田说。

铃木对此答道：“完全正确。”^[42]

斯大林在1945年8月进攻日本的举动是一连串翻云覆雨的新回合，这些事件始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中立条约。这一密约终结于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突然入侵。莫斯科以类似的方式，在1945年6月至8月间一直在和东京玩外交哑剧，为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打掩护。苏联直到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前整一个小时才把宣战书发给日本，这可以看成是1941年日本背信弃义偷袭珍珠港的间接报应了，偷袭珍珠港也是在外交谈判的掩护下筹划和准备的。

在东京看来，苏联进攻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危局还只是问题的一半，而且还不一定是更重要的一半。议和派可是把外交停战的所有鸡蛋都装在了这一个篮子里。莫斯科的突然宣战浇灭了他们最后一点通过和平谈判保留一部分日本主权的希望。现在，日本投降的时机将会直接影响到苏联在战后对日占领中的地位。池田纯久在和铃木首相谈话时表达过他的观点：“最终决断越是拖延，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恶劣。”他的意思是，日本此时面对着如此困境：自己越晚认识到投降的必要性，苏联要求参与统治日本的危险就越大。比起向西方势力投降，日本政府中的许多人更担心苏联影响力的增长。

外交大臣东乡召集了外务省的高级幕僚，说自己将要提议立刻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还要附上单方面声明，和平“不应给皇室地位造成任何影响”。^[43]和铃木及米内会面后，东乡此举提前获得了他们的支持。米内对海军部的一位同僚说，对广岛的轰炸和苏联参战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它们创造了一场或可用来打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僵局的危机，也为军方提供了一个接受战败而保全颜面的台阶。^[44]

当苏军的进攻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在提尼安岛第509混合大队营区起飞线旁的一个煤渣砖仓库里，第二枚原子弹正在进行作战准备。“胖子”是一枚大个头的炸弹，名副其实。弹体中部短而肥，外形就像个鸡蛋——或者如任务指挥官查尔斯·斯威尼所说，像个超大号的挂壁球。这枚炸弹重量超过5吨，外壳漆成明黄色，弹头上漆有两行缩写字

母：“FM1”和“JANCFU”。意思分别是“Fat Man 1”（胖子1号）和“Joint Army-Navy-Civilian Foul-up”（陆海军民联合惹祸）。

技师和科学家们在操作11磅重的钚核心时小心翼翼。这东西看似普通，摸起来却热乎乎的，如同活物一般。在仓库里，一块块的钚被放进指定的匣子里。聚爆装置中装有5 300磅重的B炸药，也就是“巴拉托炸药”——这令“胖子”即便不考虑核装药，也是上过飞机的最大的炸弹之一。安装弹上的透镜系统是个精细活儿，专家们为此花费了很多时间。核弹装置组装完成后，钢板用螺栓锁上，外面的插孔插上了绿色安全栓。

8月8日下午，“胖子”被放在手推车上，由三个人推出了没有窗户但装有空调的绿色煤渣砖仓库。他们用螺栓把尾翼固定到炸弹尾部，然后把它推到一处特制的混凝土装弹槽中。投弹机“博克之车号”就停放在装弹槽上方，炸弹舱门打开。人们极其小心地把炸弹抬升到飞机内部装好。空间刚刚好。

起初蒂贝茨打算继续率领这第二次核轰炸任务编队，并亲自驾驶投弹机，就像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一样。但是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他后来决定不去了，把任务交给了斯威尼。有些人对他的这一决定感到吃惊。斯威尼来自马萨诸塞州北昆西市，是一名25岁的陆军少校，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极具天赋的飞行员，可能是第509混合大队中仅次于蒂贝茨本人的第二优秀的飞行员。（加入第509大队之前，斯威尼曾被指派教寇蒂斯·李梅将军驾驶B-29。）他在三天前的广岛任务中驾驶的是担任仪器载机的“大艺术家号”。然而斯威尼没有在德国上空飞过，实战飞行经验也有限。

这次任务的首要目标是小仓，这是位于九州岛最北端的一座古城和工业城市，面对着下关海峡。第二目标是长崎，九州岛西海岸的一座大型港口和造船中心。

这三架飞机的大部分机组人员都飞过广岛那次任务。有些人后来说，他们对于还要投第二枚原子弹感到吃惊。他们都希望一枚原子弹就

足以结束战争。“大艺术家号”的无线电员阿贝·斯皮策记录了他的失望之感：“没必要再执行更多任务，投放更多炸弹，造成更多恐惧和更多死亡了。上帝啊，连傻子都会这么认为。”^[45]

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是完美无瑕的。与之相比，长崎这一趟出击从一开始就饱受各种混乱和错误困扰，几乎导致任务失败。那句厚脸皮的JANCFU（陆海军民联合惹祸）实在是预言得太准了。炸弹本身的技术问题，投弹机的供油系统故障，会合失败，糟糕的天气，混乱不堪的无线电通信，几乎撞机，还有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上空同样恶劣的能见度。斯威尼不佳的决断能力以及本次任务主武器官不清不白的指挥关系令这些问题雪上加霜。在“博克之车号”长达19小时的远航中，不少机组成员多次觉得自己要完蛋了，觉得他们的飞机要在海上坠毁或迫降了——提尼安岛上的指挥官们则搞不清投弹机是不是已经连同其珍贵的载运物彻底消失了。最后“博克之车号”还是靠在冲绳紧急迫降才幸免于难，那时候它的发动机已经开始冒烟，飞机还差点撞毁了一排停放着的B-24。其中许多事情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世。在真相公布后，参战人员之间随即在媒体上进行了尖刻的相互指责，包括蒂贝茨和斯威尼。

斯威尼平时驾驶的飞机是“大艺术家号”，广岛任务中他就是驾驶这架飞机担任仪器载机的。他原本要从这架飞机上投掷“胖子”，“博克之车号”担任仪器载机。但是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把仪器仪表从一架飞机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上，给地勤人员带来很大负担。因此，他们最终决定让斯威尼和他的机组直接驾驶“博克之车号”担任投弹机，弗雷德里克·C.博克和他的机组则改飞“大艺术家号”。《纽约时报》杂志通讯员威廉·劳伦斯被指派乘坐仪器载机参加此次行动，却没人告诉他这一调整，于是他在后来广为阅读的报道中称是“大艺术家号”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这一错误在战后还被许多历史著作延续下来。

麻烦在“博克之车号”起飞离地之前就开始了。8月9日凌晨2时15分，当机组进行起飞前逐项例行检查时，一名航空工程师发现一个油泵

不工作了。这需要更换一个新的螺线管，大概要耗费几个小时，任务也不得不推迟。按照蒂贝茨的意见，预备燃油主要是用作压舱物，用来平衡炸弹的重量。他觉得这个油泵并非必不可少。根据斯威尼的说法，蒂贝茨要他自己做决定，于是他说他们要出发了。[\[46\]](#)坏掉的油泵意味着这次任务可用的燃油更少，因此要相应有所调整。

凌晨3时40分，“博克之车号”滑行到起飞线上，此时北方的天气并不好。午夜刚过，暴雨区就开始扫过那里，北方海平线上时不时还能看到闪电的光芒。航线沿途尽是暴雨天气。“博克之车号”此时重量为77吨，比波音公司建议的最大起飞重量高出30%。当四台引擎的转速都压到2 600 rpm（每分钟转数）时，斯威尼放下襟翼，向前推动节流阀，松开了刹车。超重的飞机需要进行长距离的起飞滑跑，要把跑道的几乎每一寸沥青路面都用上，这架带着强大炸弹的超重飞机直到距离海岸的岩石峭壁仅仅200英尺时才离地升空。斯威尼保持飞机平飞，以增加速度和升力，之后才开始缓慢、长时间地向高空爬升。

他们在1.7万英尺高度向北飞行时，天上看不到几颗星星，机舱外的气温是零下30摄氏度。在飞往九州南面的集合点的漫长航程中，飞机颠簸得令人想要呕吐。在“大艺术家号”上，劳伦斯看到旋转的螺旋桨周围形成一片不可思议的蓝色等离子火光，“就好像我们坐在蓝色火光的战车上，乘着旋风在空中前行”。当他开口询问此事时，博克上校解释说这叫“圣爱尔摩火”[\[47\]](#)。5点刚过几分钟，飞机右舷海平线上一道紫色的光芒宣告了黎明的到来。爬升到3万英尺的集合高度时，飞机下方布满了棉花团一般的云层。“在那个高度上，下面的大海和上面的天空仿佛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球体，”劳伦斯写道，“我就在这片苍穹之中，坐在巨大的白色云山之巅。”[\[48\]](#)在“博克之车号”上，“胖子”并不需要像前一次的“小男孩”那样进行精细的安装操作。钚弹的聚爆透镜系统过于复杂，必须在炸弹挂装到飞机上之前装配好。因此，海军的弗雷德里克·L.阿什沃思上校，本次任务的主武器官，只要爬进“博克之车号”的弹舱，把绿色安全栓摘掉，把红色的起爆插头插进去就行。这样，武器就做好

战斗准备了。为了保险，弹上装有不少于8个引信，能通过无线电、雷达、高度、触地等各种方式引爆。然而，虽然在提尼安岛进行了那么多仔细的准备，错漏还是出现了。7点左右，阿什沃思和他的助手发现一个本应关闭的红灯在闪烁，而且还越闪越快。他们一时间陷入了恐慌，觉得这炸弹可能马上就要在飞机上爆炸了，这对“博克之车号”和机组人员来说可不是好事。在肾上腺素的驱动下，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打开炸弹的设计蓝图研究其电路。随后他们拆开炸弹外壳，检查各项开关。怪事出现了：虽然地面技师小心翼翼，但还是有两个开关位置错了。于是他们重设了开关，警告灯便熄灭了。两个人重新装上外壳，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只字不提，直到几十年后才说出来。[\[49\]](#)

早上7时45分，“博克之车号”抵达了屋久岛上空的集合点。此时的飞行高度是3万英尺，他们已经在空中飞了5个小时。几分钟内，“大艺术家号”就来到了投弹机的右翼位置。但是照相飞机“大丑闻号”却不见踪影。20分钟过去了，两架飞机在盘旋时消耗了不少燃油。在那个高度的稀薄空气中，燃油消耗率很高，每小时要烧掉500加仑。低下头，他们从云缝中瞥见了屋久岛——这是一座圆形的岛屿，苍翠而起伏，有陡峭的高山和深谷。这时，斯威尼做出了一个有争议的决定——继续等。又过了25分钟，失踪的飞机还是杳无音信。后来人们才知道“大丑闻号”是飞错到3.9万英尺的高度上了。

最终，在空耗了45分钟的燃油之后，斯威尼决定往北转向，飞往此次任务的首选目标——小仓。此时太阳已经完全升出了海平线。“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从南到北飞过了整个九州岛，飞过了日本几座最大的“神风”基地。两架飞机保持着无线电静默，但是那架行踪不明的照相飞机的飞行员却呼叫了提尼安岛。根据各方面的说法，他问：“斯威尼放弃了吗？”还有：“‘博克之车号’坠毁了吗？”这些询问本就容易引起误解，提尼安岛收到的无线电信号偏偏又残缺不全，于是这就成了“‘博克之车号’坠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提尼安岛上的指挥官觉得飞机和炸弹可能已经葬送在海上了。

当两架“超级堡垒”飞临小仓时，这座城市却被笼罩在云雾之中。透过树脂玻璃机头向下看，机组能找到某些地标——但是指定的瞄准点小仓兵工厂却看不见。附近的八幡市燃烧着大火，那里前一天刚刚被常规轰炸过，褐色的浓烟飘到了小仓上空。此外，当地炼钢厂的焦炉也工作起来，施放出了不少烟雾——这也是一种防空措施，目的是降低空中的能见度。^[50]“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抵达后不久，城市的高炮向它们开了火。起初高射炮弹的爆炸高度偏低，但当两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度盘旋时，高炮的炸点也在逐步升高。第509混合大队接到的命令是目视轰炸，也就是说投弹手要先用他的诺顿轰炸瞄准具确认瞄准点，然后再投下炸弹。斯威尼一连三次调整机头，三次进入投弹航线。但每次投弹手都说他看不见瞄准点。而高射炮的弹幕却逐渐升高，越来越近。

斯威尼和博克爬高到3.1万英尺，继而是3.2万英尺。无线电员在当地战斗机司令部使用的频率上监听到了日语说话，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遇到不愿碰上的家伙。机组人员紧张地看着燃油指针——他们知道可用的燃油比指针显示的更少。两架飞机的机舱里气氛紧张了起来。据机组人员们后来的叙述，许多人觉得这次任务可能会失败，或许两架飞机都要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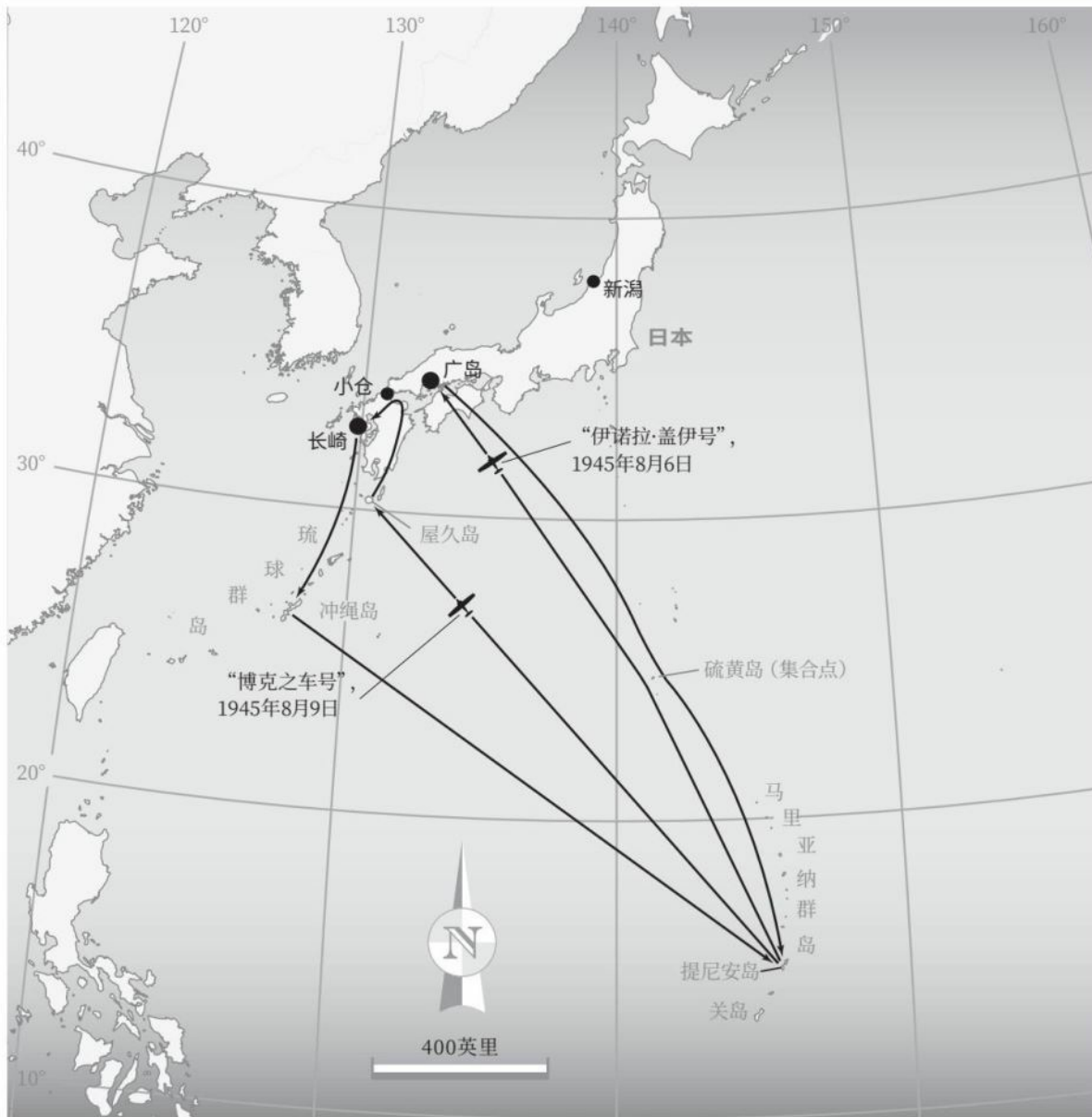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似乎没人为这种情况做过明确的预案。虽然日本上空能见度不良的情况并不少见，但他们无权进行雷达轰炸。考虑到原子弹轰炸并不需要那么高的准确度，这种过分的要求实在有些说不通。

在小仓上空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后，斯威尼决定转向第二目标。他压坡度转向南，要求领航员给出长崎的方向。据阿什沃思的说法，“博克之车号”和“大艺术家号”在转弯时差点就撞上了。接着，斯威尼的胳膊肘又不小心碰到了座舱里的一个按钮，把通话器从机内通话切换到了命令发送上。这样，一道原本应该发给本机组的例行询问便向外发送了出去，无线电静默也就被打破了。失踪的那架照相飞机“大丑闻号”的飞行员收到了这份无线电，他立刻回复道：“查克？是你吗，查克？你到底

在哪儿？”^[51]斯威尼没有答复，他知道日本人肯定也在监听这一泄露出去的通话。他还知道“博克之车号”的燃油根本不够去和失踪的飞机会合。

飞往长崎的100英里航程只用了20分钟。上午11时50分，“博克之车号”来到了这座城市的上空，比计划的投弹时间晚了超过两个小时。飞机已经在空中飞了超过8个小时，剩余的燃油快要不够返航了。低头看下去，斯威尼和他的副驾驶失望地看到长崎也是阴云笼罩，“6 000英尺到8 000英尺高度上的云量达到80%~90%”。^[52]飞机的燃油只够飞一次投弹航线了，但投弹手还是看不见瞄准点，也就是三菱炼钢厂和兵工厂。无奈之中，斯威尼说他要临机决断，下令进行雷达投弹。否则就要把炸弹扔到海里去了。但是当“博克之车号”进入投弹航线时，投弹手突然大叫说他目视锁定目标了：“我找到了！我找到了！”45秒后，“胖子”从“博克之车号”的弹舱里直落而下，斯威尼随即向右大坡度转弯脱离。“大艺术家号”紧随其后。

投放原子弹任务, 1945年8月



就和三天前在广岛时一样，一阵炫目的银色光芒再次充满了两架飞机的内部，天空都变成了白色。两道冲击波接连撞在飞机上，比在广岛时更加猛烈，令飞机嘎吱作响地摇晃起来。有一名机组人员说，他觉得“博克之车号”就快被撕碎了。

向下望去，他们看见一个紫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光球破云而出，就像一个气泡在水面上炸开。从“大艺术家号”的一个窗口向外看的威廉·劳

伦斯被震蒙了。光球变成了一根扶摇直上的棕灰色烟柱，“我们眼看着它直冲云霄，就像是一颗流星从大地上升起而不是从外太空落下，它在穿过白云升上天空时变得更加活跃。它不再是一阵烟，或者尘埃，甚至不是火云，它是一个活物，一个新物种，就在我们眼前不可思议地诞生了”。^[53]当烟柱升到比两架飞机更高处时，其顶端变成了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下面，长崎市已经消失在了一片密不透光的烟雾、尘土和火焰之中。从脚下的有机玻璃板俯望过去，斯威尼说：“我们只能看见一团浓厚、污浊的褐色烟毯，间或能看见一片火光。”^[54]

两架飞机在炸点周围盘旋，一张接一张地拍下照片。当蘑菇云的顶盖向外展开时，“博克之车号”似乎离得太近，马上就要被烟云吞没了。一名机组人员叫道：“蘑菇云朝我们来了！”^[55]于是斯威尼第二次向右急转，远离了核爆。在令人屏住呼吸的几分钟里，机组人员们惊恐地看着直扑自己的蘑菇云。“博克之车号”脱离了危险，但是这次机动却进一步耗费了本已浪费不起的燃油。

“胖子”在浦上河谷上空大约1 800英尺处炸响，下方是长崎市北部一片挤满了传统日式木质住宅的密集居民区，建有一座天主教堂、小学和大学，还有两座三菱工厂。炸点位于预定的瞄准点西北方3/4英里处，但还是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里刚好是南面的三菱炼钢军工厂，以及北面的三菱——浦上弹药厂的正中间，爆炸把两座工厂全部夷为平地。

由于当地的新闻媒体还没有报道原子弹轰炸广岛的事情，许多居民还想不到一两架B-29竟能够摧毁一座城市。当两架飞机从北方高空比翼飞来时，不少人根本没拿空袭警报当回事，都还站在原地看着从头上飞过的轰炸机。和在广岛时一样，爆炸时出现了一个照亮天宇的炫目光球，所有距离爆心大约半英里之内的户外的人都当场蒸发。长崎原样重现了三天前广岛的恐怖场面。当时躲藏起来逃过一劫的人随后发现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地狱景象，太阳消失不见，大火四处蔓延，整个地面已是

面目全非。一如广岛，烟尘遮天蔽日，全城满是可怕的红色光芒。“零区”周边区域大部分都是日本传统的小型木质建筑，它们几乎被完全夷平、蒸发或烧毁。在无边无际的残垣断壁之中，到处都是扭曲、熏黑的波纹板和钢架。那些位于爆心下方的房屋被直接压进了地下，瓦片和泥土、废墟熔在了一起。在距离“零区”半英里的长崎医学院，校园里所有的木质建筑都被炸平，里面的所有人都死于非命。而在混凝土建筑里，墙壁则提供了不错的保护，每10个人中有6个人能活下来，虽然其中许多人还是受了重伤。一名从防空洞走向学校的少女向同行的同学喊道：“我们进防空洞时那里不是有房子吗？”^[56]

伤员躺满了道路，被困在废墟中，有些人蹒跚跛行，有些人在地上爬行，有些人甚至几乎一丝不挂——冲击波扯掉了他们的衣服——许多人无法动弹，乞求周围人给点水。有些人被烧伤到脸部完全无法辨认，带血的毛发和皮肤从身上一条条地垂下来；有人的伤口过深，连骨头都从绽开的皮肉里露了出来；他们张开双臂，以避免烧伤和刮伤的皮肤相互触碰引发剧痛。“零区”南面道路上奔逃的难民令一位目击者联想起了“蚂蚁大军”。^[57]和广岛那次一样，幸存者们本能地逃向河流——这次是浦上河。数以千计的人挤到河边，跳进水里，想要缓解伤痛或者喝水。很快，河流就变成了漂浮的尸堆，退潮时大量尸体都被冲到了港口和海里。

核爆后大约一小时，与广岛相同的可怕雨水落了下来——黏稠、发黑的奇怪雨滴砸下来，它们又大又重，落在淋雨的人身上，把人砸得生疼。黑雨令许多幸存者相信审判日已经降临。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地狱。

“胖子”的落点距离日本最大、最著名的基督教堂浦上天主堂只有半英里。这座宏伟的石头建筑几乎被完全夷平，只剩下几堵残墙和两座钟楼之一还矗立在废墟中。周围的居住区被一扫而空。自从四个世纪前第一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日本起，长崎周围的海岸区域就一直是日本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从1700年左右开始，浦上河谷就是这

个规模不大但百折不挠的宗教社群的中心，他们从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中生存下来，往往通过暗中信教的形式躲过劫难。估计大约有1万名日本基督徒死于核爆，或不久后伤重而死。有些日本人注意到长崎的諏访神社未受核爆损伤，和基督教会的毁灭形成天壤之别，认为这是天佑所致。他们觉得古神道教的神祇比外来的神更厉害。

和坐落在冲积平原上的广岛不同，长崎城区被山岭所分隔。起伏的地形遮蔽了外围城区，使其免遭原子弹的毁灭性打击。浦上河谷西边一座陡峭的山岭吸收了大部分冲击波和辐射，让长崎其余城区大部分免受其害。山岭面向“零区”的一面化为焦土，大部分建筑和植被都被烧毁了，令其看上去如同“初秋早至”（一名目击者语）。[58]但在山岭的另一面，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另一个世界，草木依旧青翠，大部分建筑看上去完好无损。

勘测人员收集了两处核爆地点的数据之后，很快就知道长崎的这枚炸弹威力更大。“胖子”的爆炸当量比“小男孩”大30%，浦上河谷的碗状地形进一步加剧了爆炸的威力。第二枚原子弹对于与爆心距离相同的相似建筑造成了严重得多的破坏。[59]

和广岛一样，准确的伤亡数字很难算清楚。据信有4万至7.5万长崎居民在8月9日或其后不久死去，另有7万人在1945年底前死亡。

两架燃油不足的B-29已没希望飞回提尼安岛了。最近的己方机场位于冲绳，飞行距离460英里。斯威尼相信他的燃油已不够飞到那里，但他将要努力用尽最后的每一加仑燃油，飞出尽可能远的距离。此时“博克之车号”的高度是3万英尺，他有足够的高度可以拿来交换。斯威尼将引擎转速从平常的2 000 rpm巡航转速降到1 800 rpm，随后又降到1 600 rpm，这已经低于发动机的设计指标了。如此低的转速会让引擎承受大量的应力，可能造成损坏。但是如果“博克之车号”在抵达冲绳前就耗尽燃油，那发动机完好也就没有意义了。考虑到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海

上迫降，阿什沃思上校要机组全都穿上救生衣。

在冲绳北面60英里处，油量指针已经逼近0，无线电员开始尝试呼叫读谷机场的指挥塔台。但是无人回应。他试了所有可能的频道，仍然无回应。斯威尼于是发出了“求救”呼叫。他进一步降低了发动机功率，飞机实际上已经是在滑翔了。当机场出现在前方时，斯威尼能看到有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在盘旋降落。空中有很多飞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塔台对他毫无回应。“博克之车号”没有燃油去飞复杂的降落航线了。斯威尼想要直接对准跑道一端来一次没有退路的滑翔降落。但是机场知道他要来吗？“联系上随便哪个该死的冲绳塔台！”斯威尼向无线电员吼道。他自己则继续发出呼救信号。随后他告诉机组，从头上的舱盖向外发射信号弹。一个机组人员问他应该发射哪个颜色的信号弹。“把我们机上所有该死的信号弹全都打出去！”^[60]

于是副驾驶打开舱盖，射出了8枚信号弹。每一枚信号弹本身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告诉塔台“博克之车号”起火、燃油耗尽、机上有伤员等。但这一回，所有信号弹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吸引机场的注意，在这方面他们成功了。当“博克之车号”最后飞临跑道时，所有其他飞机都让了路。右侧外发动机喘振着，噼啪作响，停了下来。斯威尼说：“我此时就像脱轨的列车车厢一样直冲了出去。”^[61]他保持着空速不降，瞄准了跑道正中央。“博克之车号”重重地落在跑道上，向上弹了25英尺，接着跌回地面。左侧外发动机也熄火了。他的空速过快，达到每小时约140英里。飞机开始向左偏航，飞向一处停满了B-24轰炸机的停机坪。斯威尼随即开始反转螺旋桨——这种功能只有第509混合大队的飞机具备——以进行紧急刹车。“博克之车号”重新对准了跑道中心线，最终停了下来。当飞机开到滑行道上时，第三台发动机也停转了。斯威尼关闭了第四台发动机，踩住了刹车。他瘫在座位上，筋疲力尽。剩下的滑行就交给拖车了。此时“博克之车号”的油箱里只剩下7加仑燃油了。

第8航空队指挥官詹姆斯·杜立德将军目睹了这次狂暴的降落。他一

度确信这架飞机要坠毁了。后来斯威尼向指挥官报告，解释了他此次任务的内容。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的重大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正是轰炸日本的首尾。1942年4月第一次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是杜立德率领的，斯威尼则刚刚扔下能够标志战争结束的那枚炸弹。

在食堂里饱餐一顿之后，“博克之车号”的机组重新登上已经加满燃油的飞机。他们还要再飞行5个小时，返回提尼安岛。晚上10点半，飞机降落在了提尼安岛北部机场的A跑道上。这次任务持续了19个小时。机场上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媒体，也没有任何庆祝。斯威尼被蒂贝茨和李梅抓去盘问了一番，他们认为他的一些决定糟糕透顶，几乎毁掉了任务。他们也围绕是否应该把他送上调查庭而进行了争论。但最后，他们决定不管了。至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长崎的轰炸成功了，他们也乐得保持这个状况。那些让“博克之车号”几乎毁灭的可怕细节直到几十年后才公布出来。

东京方面，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当天上午的一次长会中，“六巨头”发现自己分成了早已习以为常的3：3两派，相持不下。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三个强硬派也认为战争必须要结束了，他们“原则上”同意外交大臣东乡关于向盟国求和的提案。但他们还是坚持要附带几个条件。阿南将军发誓说，他和陆军决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他指出，日本可能会进入无政府状态，甚至有内战的危险，这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威胁。和往常一样，他得到了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的支持。

上午11点半，他们还在讨论之时，收到了长崎被另一枚原子弹攻击的消息。但是这一坏消息并未解决会议的僵局。

三个小时纠缠不清的争论之后，两派在以“单条件”还是“四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所有六个人都同意盟国必须保证保留天皇和皇室。议和派的东乡、铃木和米内主张这应该是唯一的条件，他们警告说，任何更多要求都无异于拒绝《波茨坦公告》，战争就会持续下去，直至日本毁灭。但是强硬派还坚持提出另外三项条件。首

先，日本领土上不能有外国占领军；其次，海外的日军部队应当在他们自己军官的指挥下撤回本土并复员；最后，战犯要由日本自己来审理。

在当天下午的内阁全员紧急会议上，米内大将直言不讳道，日本已绝无可能击退盟军向日本本土的进攻。阿南则反驳说，陆军有信心在盟军突击登陆时给予其重大杀伤，这样一击应当至少能带来更有利的和平条件。阿南还补充道：“我们将以‘一亿玉碎’摆脱绝境。”^[62]几位文官大臣指出了陆海交通、燃油储备、经济和农业方面的糟糕状况，强调已不可能再打下去了。掌管司法的内务大臣警告说，如果让公众知道正在进行和平谈判，社会秩序可能会崩溃。到当晚8点，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外的所有大臣都申明了自己的意见。6人支持东乡的“单条件”回应，4人举手支持强硬派的“四条件”回应，其余的人要么持中间立场，要么保证支持首相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这种僵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日本人已经在按照习惯使用“根回”的方法（刨根问底，寻找共识）了。在这关键的一天里，最重要的讨论都发生在各位大臣之间的一对一商谈，以及皇宫中。铃木首相和木户侯爵均多次单独入宫觐见裕仁，让他随时了解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的讨论进展。几位“重臣”（这类人都是“高级政治家”，包括所有日本前首相）前来面见木户。和木户关系很好的前外相重光葵从乡下老家被召回来，准备接替东乡的位置。整个下午，几位皇室成员也积极活动了起来。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起初支持“四条件”回应方案，但他逐渐被议和派的分析所说服，到这一天结束时，他已坚定地站在“单条件”回应这一边了。^[63]

第二梯队的文官们和内阁中的议和派一起在幕后运作，策划将投降的决定交由“圣裁”。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请“六巨头”在一份同意进宫举行正式御前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迫水似乎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的强硬派相信，他们只要把观点呈给裕仁就可以达到目的。假如他们担心圣意会直接打破僵局，他们就会拒绝签字，这会议也就开不起来了。

午夜前不久，这场历史性的深夜会议在皇宫地下室一处拥挤闷热的

防空洞里举行。所有与会人员都穿着正装，或者穿军服并戴白手套，坐在电灯下的木椅上。天皇穿着军服，面向他们而坐。他的背后是一面镀金屏风。迫水大声朗读了《波茨坦公告》。两套备选的回答文稿——议和派的“单条件”接受文稿和强硬派的“四条件”接受文稿——被分发给了所有参会人员。

东乡首先发言。他话说得很重，重申了从这天一早就一直坚持的主张。他说，除了以保留天皇地位为仅有的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再无其他现实道路。再增加一连串条件无异于直接拒绝盟国的条款。那样的话谈判还没有开始就会结束，日本就只能在彻底毁灭或者（更加颜面无存的）接受完全无条件投降这两种灾难之间选择了。阿南则愤怒地咆哮道，日本陆军还没有被击败，在本土作战中能够获得相当大的战术优势。应当允许陆军去击退入侵者；打完了这一仗，政府就有资本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条件。米内轻声细语地支持了东乡的观点。两个军种的参谋长梅津和丰田则说他们赞同阿南，虽然看上去两人都没有阿南那样的信心。木户侯爵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男爵都站在“单条件”接受公告这一边。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直到屋里所有人都发了言。铃木没有表态，或许是因为他想要让自己成为调停人，而且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凌晨两点，年事已高的首相站起身来，面向他的同僚。“诸君，”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几个小时而没有达成决议，而且也看不到形成共识的希望。诸君都很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连一分钟都浪费不起。”接着他转向天皇。“因此，我提议，乞陛下圣断，将圣谕作为本次会议的决议。”[\[64\]](#)

此举既不合宪法，也无先例可循，强硬派对此震惊不已。裕仁极少亲自出手打破其内阁的僵局。他上一次如此违规用权是在1936年2月陆军军官叛乱期间。这个时候阿南一伙人本可以流程不合规为由提出反对，在天皇发声之前强制休会。但是此举会在现人神的天皇面前有忤逆之嫌。这还会致使政府垮台，从而加剧眼前的国家危机。可能此刻他们

都惊呆了，说不出话来，也可能正如有些人猜测的那样，强硬派实际上也希望天皇裁决投降，因为他们也知道再无其他可行的选项了，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天皇的明确圣裁才能让他们那些难以掌控的下级守规矩。

整理了一下情绪之后，裕仁低声开口了。“我同意外交大臣提出的第一种方案。”他说。他对于陆海军如此众多忠勇将士的牺牲和日本人民在空中轰炸之下遭受的苦难深感痛心。但是若不接受盟国条款，则唯有国家毁灭一途，还将让整个亚洲和世界遭受更多苦难。对于陆军提出的本土决战，天皇则直接说他对他的军队指挥官已丧失信心，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计划和实际表现之间总是有天壤之别”。^[65]裕仁说，到了这个时候，要“忍所难忍”——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明治天皇的裁决中也有此语，当时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修改第一次中日战争^[66]后的和平协定。他祖父此语恰合此刻日本的痛苦境地。日本不得不再一次为了国家生存而忍受颜面扫地之耻。

随后铃木说：“圣裁已下，这就是本次会议的结论。”^[67]裕仁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无人反对。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所有人都在“单条件”文书上签了字，包括阿南、梅津和丰田。随后铃木召集全体内阁举行另一场紧急会议，大臣们一致正式批准了这一决议。东乡的外务省开始起草正式的乞降照会，并准备经由欧洲中立国首都伯尔尼和斯德哥尔摩转交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东京时间早上7点，这份文件被发了出去。照会中写道，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68]

一整晚没睡的阿南惟几将军回到了位于市谷的具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的陆军部大厦。他命令各处室主任和幕僚上午9点前来听取指示。会上，他以低沉、严肃的声音公布了天皇的决定。讨价还价的文件已经发给了盟国，他说，根据对方的反馈，陆军要么打下去，要么以保存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震惊的消息引来了一片怒斥。一名年轻军官跳着脚问：“陆军大臣真的想过要投降吗？”阿南用他的短柄手杖敲着桌子答道，在这样的危机下，陆军必须保持团结和守纪，“事实就

是和平之事已决，我无话可说。但你们这帮家伙要是心存不满，想要推翻此决定，那就踩着我的尸体过去”。^[69]最后这句话阿南绝不只是口头说说，屋里的每个人都看懂了这一点。

收到《波茨坦公告》之时，裕仁就盘算着他必须牺牲掉陆军和海军以保住其国体的核心（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在未来的战后世界中，这一国体将被剥夺其传统的军队“外壳”。留下来的将是一个更纯粹的以神道教国家和天皇万世一系为基础的宗教政权模式。在战后的叙述中，天皇解释说 he 曾经担心伊势和热田两座神宫的安全。如果有进攻部队在伊势湾登陆并占领了这两处圣地，敌人就将控制天皇的神权之柄——存放在神宫内的三件神器——若如此，“就很难继续保留国家政体”。^[70]或许正是这一宗教信仰令裕仁和其他皇族要人警醒起来。如果只有牺牲军队才能保护自古以来的神道教传统，那也只能如此了。按照天皇的“圣裁”，陆军和海军不仅将被解除武装，遣散回家，还将被连根拔除。其领导人将被押上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可能将被关押或绞死。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最令陆军领导人愤怒的是，天皇直白地说他不再相信他们的承诺了。梅津将军绝望地对河边虎四郎将军说：“很久以前，天皇就对军队的作战结果彻底失望了。他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信任。”^[71]河边在一篇很长的日记中表示，这一奇耻大辱令他深感痛心，他却也承认天皇的批评是“真实写照”。日本陆军确实毫无希望击退即将到来的对本土的进攻，而陆军的将军们却拒绝面对日本的绝望处境。河边写道：“我被这样的感觉所包围：‘我不愿意投降，不愿意承认我失败了，哪怕是面对死亡。’我正是带着这种感觉指导了这场战争中最后的作战。”^[72]

备感内疚的河边虎四郎保证，将尽其所能说服日本陆军上上下下接受天皇的决定。但谁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守住纪律。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五天里，东京的政治局势一直处于爆炸的边缘。陆军甚至海军的中级军官们跳起来想要阻挠和谈，为他们的全军造反和叛乱创造基础。鹰鸽

两派争相通过国内甚至是国际新闻媒体发布观点。外务省官方安排同盟社的无线电台播发一次国际广播声明（英语），题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73]暴怒的陆军军官们随后就想要夺占同盟社的短波广播设备。8月10日晚，陆军省以阿南的名义发出了鼓舞士气的布告，号召部队“毅然决然将护持神州之圣战战斗到底。纵食草啖泥，潜伏野处，断然作战，深信死中有生”。^[74]私下里，阿南告诉海外各地的陆军司令部，和平谈判已在进行，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部队必须“即便可能全军覆没”也要坚持战斗。^[75]

密谋者们开列了一份名单。凡是公认支持议和派的内阁官员都要抓捕或刺杀。投降实在是个刀头舔血的事情。有人讨论要占领皇宫，宣布戒严，甚至可能会对天皇进行“保护性监管”。外交大臣东乡的官邸大门前被人扔了一枚炸弹。但议和派显然知道结束战争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迫水久常准备了一份天皇诏书的文稿，呈给天皇盖印，木户则在安排一场史无前例的广播，由天皇宣布终战。然而，直到8月11日日终时，盟国政府方面还是杳无音信。如果这唯一的条件被盟国拒绝，那么日本就要打到自己彻底毁灭为止。对于神经紧绷的那几天，外交官加濑俊一后来写道：“连秒针的嘀嗒声都像是在讲述这个行将毁灭的帝国悬而未定的命运。”^[76]

日本的照会通过多条途径被送到了华盛顿。首先，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截获并破译了东京和伯尔尼之间的电报，然后沿着指挥体系送交了上去。日本外务省在同盟社安排发送的短波无线电消息在8月10日凌晨被传递到华盛顿。（这一消息成了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头版头条，抵消了阿南发给陆军的好战声明传达出的恶劣印象。）当天下午稍晚时候，美国国务院通过驻瑞士大使馆收到了正式的消息。

这个时候，史汀生部长正在驱车前往机场，他马上要登上飞机，飞往纽约郊外的阿迪朗达克湖区，去享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夏日休假。

当消息传来，汽车赶紧掉头把他送回了战争部。史汀生回忆道，当他读到日本请求保证天皇地位的词句时，“很奇怪，这正是我担心可能会带来麻烦的一点”。^[77]他在日记里写道，美国国内要求惩罚天皇的政治呼声此时已经危及不流血战胜日本的希望了。居明显多数的美国人想要裕仁为他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根据盖洛普在1945年5月进行的一项调研，33%的美国人想要处死天皇，11%的人说应该把他关起来，还有9%的人说应该把他流放出境。史汀生说，这样的观点在更高层级的政府圈子里也有市场，“这些人对日本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日本天皇》”。^[78]

杜鲁门把他的各军种总司令、国务卿、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召集到了白宫。9点，所有人都赶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各方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三个星期前在波茨坦争论时的翻版。国务卿贝尔纳斯担心接受这份声明意味着放弃“无条件投降”的最终目标：“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愿意比在波茨坦时做更多让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参战。”他向杜鲁门警告了此事的政治后果。他说，接受日本的条件将意味着“把总统架在火上烤”。^[79]

莱希和史汀生一看到日本的条件就准备要接受了。莱希说，保留天皇只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而付出的一个小代价。“我不是同情小裕仁，但是我确信有必要利用他来保证日本真正投降。”^[80]史汀生对此表示同意，他还说时间对盟国不利，因为苏联在亚洲的地盘每一小时都在扩大。史汀生说，红军的进攻决定了美国人在这最后一轮博弈中要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因为“赶在苏联人有资格提出关于占领和托管日本本土的任何实质性声索之前，确保日本本土在我们手里，是十分重要的”。^[81]苏联人在中国北部边境占领的地盘越大，他们对后续亚洲事务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苏联人对朝鲜的关注也愈加令人担忧，甚至有人开始谈论要派遣一支美军两栖部队在仁川登陆。苏联已经公开要求在对日占领中分一杯羹，可能会采用多国分区占领的方式，就像在德国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亚洲的未来就取决于东京和华盛顿化解僵局的最快

速度。

吉姆·福莱斯特突然想到的办法解决了问题。盟国完全不必明确接受或拒绝日本的条件，他说，盟国可以直接给个“确认声明”，展示他们视天皇为从属地位的姿态即可。这样一份声明可以对日本的条件不作答，但含蓄地向日本人保证把裕仁留在皇位上。^[82]这一建议被采纳了。贝尔纳斯的答复文件里有这么一段关键的话：“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至于未来日本政府的组织形式，它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组建。^[83]“最高统帅”一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强调执行对日占领的将是一名军官，而非同盟国的联合组织。就在当天，杜鲁门总统确认了那个所有人都期盼了数月的决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担任日本占领军的盟军最高指挥官（SCAP）。

史汀生和福莱斯特建议在和谈期间暂停轰炸。史汀生说美国民众对原子弹的“忧虑和误解与日俱增”。杜鲁门同意下令暂停原子弹轰炸——反正第三枚核武器也要等到这个月下旬才能准备好——但是他决定让常规轰炸作战“以现有的频度”继续实施，直到日本最终投降。^[84]

由于东京鸽派安排的短波无线电广播，全世界现在都知道日本已经求和了。当内阁和各军种司令簇拥在总统周围时，白宫大门外挤满了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传来了一片欢呼声和汽车喇叭声。广播新闻中都在报道全美各个城市举行的群众庆祝活动。在整个太平洋上，军人们拿起武器朝天开枪。盟军军舰拉响了汽笛，打出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和高射炮弹。在冲绳岛旁的渡知具锚地，庆贺时打到天上的高射炮弹太多了，甚至有几名水兵因此丧命。^[85]陆战队飞行员萨姆·海因斯还记得那是个“歇斯底里、令人惊恐的夜晚，战争的情绪被荡涤一空”。^[86]岸上的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纷纷躲进了散兵坑或者战壕。当地海军基地指挥官向舰队发出指令：“收到此电文后，所有出于庆贺目的发射对空

武器的行为应予停止。”^[87]

第3舰队此时正位于日本北部外海，攻击这整个区域的各处目标。在“约克城号”上，舰长通过大喇叭宣读了这一消息，“黑暗的飞行甲板上传来一阵欢呼，那里满是正在排布飞机的舰员”。^[88]在“密苏里号”上，哈尔西和他的幕僚们正在观看花样游泳明星埃斯特·威廉姆斯主演的彩色音乐剧。一名通信官从后面走过来，在卡尼和哈尔西的耳边轻声说出了这一消息。哈尔西挥手要他退下，说：“我们先看电影。”^[89]由于没有收到停止攻击作战的命令，这支强大的舰队继续向南开往东京，8月12日他们将按计划在那里再次发动大规模空袭。

贝尔纳斯的答复通过设在旧金山的一个商业广播电台播放给了东京。8月12日拂晓前，东京收到了消息。东乡一大早就赶到他在外务省的办公室，和副手们仔细商议了此事。他们都认为这份答复并不理想，但也不是最差的。天皇将成为占领军的下级伙伴。经过对其中语句颇有些费力的解读，这份文件可以被理解为不会对裕仁及其家族进行逮捕、罢免或其他伤害之举的保证。翻译们还淡化了贝尔纳斯文件中的刺激性语句，将原文中的“须听从”软化成了日语中的“在其制约之下”。

在东京的各处权力中心——帝国大本营、各省及皇宫——日本领导人仔细研读了这份答复并围绕其含义和好处进行了争论。8月12日是漫长而混乱的一天。有些原本坚定站在议和派阵营的人开始心生疑虑和动摇。被重新起用的前首相平沼骐一郎认为，接受美国的条款将会导致国体丧失。他不喜欢日本政府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来决定这一规定，他认为这是在诱导进行“旨在颠覆君主制政府的破坏性活动”。^[90]简言之，在12日上午，东乡在“六巨头”中仅有的可靠盟友，铃木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都被这些反对意见动摇了。在当天上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随后的内阁全体会议中，熟悉的僵局再次出现。有些大臣想要让美国人“阐明”关于天皇的条款。东乡则反对说任何这样的回应

都有导致和谈崩溃的危险，这样日本就完了。他还暗示，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向华盛顿再发一份拖延时间的说明。

从8月10日首次求和到8月15日最终投降这段时间里，日本报纸的调门一直摇摆不定。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款一事已经用英语播发给了海外听众，但是NHK电台的国内广播上却还没有出现同样的报道。而阿南惟几在求和后仅仅一个小时就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战斗到底的布告，却成了8月10日至11日日本报纸和广播报道的主角。

市谷的陆军省成了一座火山。少壮派的军官们已经在公开谈论政变，酝酿造反了。叛乱者们制订了计划，要控制皇宫近卫军，封锁皇宫大院，还要逮捕或刺杀内阁中的鸽派，实行军管，占领外务省，并控制广播电台。与此同时，海外的陆军指挥官也源源不断发来电报，不让投降。中国派遣军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将军说他难以想象他这支没打过败仗的军队竟要向手下败将中国军队投降。^[91]陆军中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还试图发表一份高级将领们联合签名的声明，要求在所有战线上加强战斗。内阁情报委员会出于对这些阴谋的警惕，拦下了这些文件，没让它们发到媒体上。

陆军大臣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把叛乱计划抛给了阿南、梅津和河边，以及其他陆军高级将领。这些领导人听完后支吾搪塞，不置可否。这种暧昧的回应令叛乱头子们对于将来得到高层的支持产生了期待，并继续行动下去。阿南紧抓着最后一根稻草，询问外相是否还有希望重新让苏联政府作为中介帮日本和盟国接触。（此时红军发动进攻已经有3天，攻入了中国东北纵深地带。）河边将军对这些密谋者毫无好感，认为“这个时间点上瞎胡闹，坏处比好处多得多”。^[92]他明显还在因为知道天皇对陆军失去信任而感到茫然。

铃木首相对一位下属说，由于苏联红军的快速挺进，他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如果我们错过了今天，那么苏联人拿下的就不只是中国东北、朝鲜、库页岛南部，他们还会拿下北海道。这会摧毁日本的基础。

我们只要接触上美国，就必须停止战争。”^[93]

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大将出人意料地向天皇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警告说，接受贝尔纳斯声明中提出的投降条款，“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这么说很不妥，但是这意味着我们的帝国将沦为附庸，这是我们不可接受的”。^[94]

以这种方式直接向天皇进言是一种严重僭越的行为，放在平时，他们的官场生涯就完了。但是早先裕仁为了把他的意愿施加给政府，已经连更重要的礼节都丢掉了。暴怒的米内把丰田拖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两位参谋长到底是真的决心阻止投降，抑或仅仅是“做做样子”，就像长谷川毅提出的那样，只是为了“安抚激进派军官的不满”。^[95]梅津和丰田的信中明确提出“我们随后将会和政府达成完全一致之意见，再来请求圣裁”。^[96]这最后一句话表明他们将会遵守天皇的最后指示，无论内容如何。

而天皇心意已决。他在8月9日就拿定了主意，现在只想让太平洋战争的这最后一出戏尽快落幕。在皇宫里的一连串私下会面中，他告诉木户、铃木、东乡、重臣、皇子以及统治层的其他人，他认为贝尔纳斯的条款是可接受的，他不想再进一步谈判了。

但是内阁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另一个“圣裁”必不可少。统治层都知晓了天皇的意见之后，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便极大了。政府任何时候都可能垮台，一旦如此，投降便不可能了。如果阿南辞职（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那么陆军就可以拒绝提名新的陆军大臣，这样也就无法再组建内阁。而在天皇下达停战诏书之前，全体内阁大臣的联名复签是必不可少的。而哪怕只有一名大臣拒绝在文件上签字，政府接下来都要集体辞职。换言之，仅有天皇一个人决定投降是不够的，还必须是整个政府，包括陆军，全都站在天皇这一边才行。而直到8月13日夜幕降临时，这一点似乎还遥不可及。

除了议和派与天皇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再无其他能够挽救投降可

能性的办法了。日本人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贝尔纳斯正式的声明。（他们是从新闻广播里听到消息的，但是正式方案还要等到8月14日上午才能经由瑞士公使馆送到外务省。）但是两名参谋长却拒绝签字授权首相召开御前会议。这就形成了一个流程上的障碍。最后，在14日上午，铃木说服天皇以自己的权力直接召集开会，从而解决了问题。

通过这些方式，内阁全体会议最终于上午10时在皇宫召开，他们又挤进了狭窄的地下防空洞。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到10时50分，天皇才走进屋里就座。他穿着军服，戴着白手套。铃木首相站起身，概述了支持和反对贝尔纳斯声明的各方主张，并告诉天皇，虽然经过长时间努力，但内阁未能取得共识。铃木随后请三名强硬派总结他们的观点。梅津、阿南和丰田各自做了简单说明。他们想要让美国人就天皇地位问题给出更为明确的保证，如果被拒绝，就打到底。接下来，铃木直接请求天皇来决定。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裕仁第二次决定性地介入了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崩溃的决策体系。和三天前相比，他这天上午的表态更加坚定、直接、一针见血。天皇直接回应了三名强硬派。“在我看来，没有其他观点支撑你们的立场，”他说，“我来解释下我的观点。我希望你们都能同意。我的意见还是那天晚上和你们说的。美国人的答复在我看来可以接受。”^[97]贝尔纳斯的声明为延续他的帝制做出了足够的保证。这时候几位大臣已经哭出来了。裕仁指示各位军队领导人要竭尽全力维持官兵的纪律，然后要内阁起草停战诏书，还说他愿意亲自在广播中宣读。天皇讲完，铃木起身，为内阁未能达成共识而致歉。

没有人公开反对。内阁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决定上签了字——包括阿南、梅津和丰田——内阁书记处便开始起草诏书。这天的一整个下午都在字斟句酌，围绕诏书的用词形成共识。外务省以东乡的名义向瑞士和瑞典拍发了一份说明，希望能转发给盟国政府。日本愿意以贝尔纳斯的声明为基础接受《波茨坦公告》。

这一整天，军队中的叛乱分子都在市谷的陆军省门廊大厅和地下室

里准备起事。即便在天皇做出了决定之后，他们还在继续策划军事暴动。没人采取措施抓捕他们，密谋者们便公开游说甚至是威胁军队的将领们。最近刚刚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次长的大西泷治郎中将是潜在叛乱者中军衔最高的一个。他试图说服同僚，投降是不可想象的，但徒劳无功。他陈述主张的时候总是声泪俱下，他说唯一保持荣誉的办法就是大规模使用自杀战术。他找了米内，结果被骂了回来；找梅津，梅津没给他任何希望；又去找阿南，阿南个人对大西表示了同情，但拒绝加入。大西直接游说了军队和政府中的所有领导人物，甚至还有皇室的几位皇子。

天皇做出最终决定一个小时后，叛乱军官们试图伪造一份从帝国大本营发往海外各部队的命令，号召大家向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发动新一轮进攻。忠于梅津大将的人设法赶在假消息通过商用广播电台发出去之前将其拦截了下来。这真是万幸，如果发出去了，盟国很可能会产生误解。

梅津心硬如铁，动用权威来强化纪律。他喊出了一句口号来说服军队放下武器：“尊皇不败。”^[98]但阿南却似乎动摇了。他和陆军上上下下都在交流，给一些人留下了他可能想要加入密谋的印象。如果叛乱想要有机会成功，那就必须得到首都主要地方部队司令部“东部军”的支持。但是除非陆军省直接命令他们这么做，否则东部军不可能支持正在筹划中的叛乱。这样的命令必须是书面命令，而且要由阿南本人签名。但是阿南并不愿意在一封和天皇的明确旨意相违背的文件上签字，何况他已经在其他一些同意投降的文件上签了字。

日本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晚发生的叛乱行为称为“独走事件”。陆军省军官、叛乱头子畑中健二和椎崎二郎率领一个大队的叛军闯进了皇宫。畑中和椎崎厚颜无耻地欺骗第二皇宫近卫联队的指挥官，说最高指挥官已经下令封锁皇宫对外的一切联系。守军相信更大范围的叛乱已经开始，于是同意遵从他们的要求，等候东部军到来。但是近卫师团长森赳中将发觉情况不对劲，拒绝加入密谋，结果被冷血地当场打

死。叛军以森赳将军之名伪造了一份命令，还盖上了其办公室的印章。这份命令指示近卫部队占领皇宫，切断宫内与护城河外的一切联系，并且“保护”天皇免遭可能的威胁。

在皇宫内，皇室速记员写下了停战诏书的最后一笔，盖上了天皇的印玺，这样就成了正式文件。午夜前不久，裕仁走进了皇宫下方的一个隔音地堡，NHK的一组技术人员已经在那里架设好了录音设备。天皇对着麦克风宣读了停战诏书。这段录音长4分45秒，同日向海外播发的英文译本也仅有652个词。这样只录一遍就够了。技术人员把录音存入两张黑胶唱片，这些唱片现场就制作出来，放进了皇宫地下的保险柜。

在皇宫近卫部队的支持下，叛乱头子占领了皇宫，切断了电话线。听说东部军正在赶来之后，近卫军关上宫门，切断了进出皇宫院墙的所有行车道和步行道。叛军搜查了皇宫的地下迷宫，挺着刺刀逮捕并审讯了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想要找掌玺大臣木户侯爵，但没找到。他们也没能找到留声机唱片。由于防空需要灯火管制，所有灯光全都熄灭，搜查者只能靠手电筒。搜查组并不了解地下迷宫中通道和地下室的布局，也很难看懂标记各个房间位置的古文字。

与此同时，其他同谋者也在东京和横滨四处出击。年老的铃木首相9年前就从一场刺杀中侥幸生还，这次他在刺客到来前的片刻得到告警，从后门溜了出去，躲进了隔壁房屋。感到挫败的闯入者用机枪扫射了他的办公室，并把它付之一炬。叛军来到阿南的官邸，想要说服这位陆军大臣加入他们的叛乱。阿南拒绝了，但叛军用不着把他杀掉，他本来就准备按老规矩剖腹自杀。平沼骐一郎男爵的家也被闯入，就和铃木一样，他也在叛军到来前不久逃走了。其他人占领了重要的无线电台，想要赶在天皇的投降录音向全国播发之前截住它。

当黎明到来时，畑中和椎崎意识到他们其实无路可走。没有一名陆军将领前来支持这场叛乱。就连最热烈支持战斗到底的大西将军，也放弃了这条路线，准备用武士的方式结束生命。东部军司令田中静一将军决定平息这场叛乱。一整个装备精良的师团包围了皇宫大院，堵住了

护城河上的桥梁。筋疲力尽的叛乱者在人数和能力上都比不了对手，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赌博失败了。早上8点，叛军投降。畑中请求允许他通过无线电进行10分钟的广播，但被拒绝了。他和椎崎没有被逮捕，或许是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会自我了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这二人绕着东京散发了一些解释他们所行之事及其原因的传单。就在天皇的广播即将播发之际，二人举枪自杀。

没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叛乱只能夭折。阿南和梅津只要有一个人支持，他们或许就能说服田中加入。如果这三人全都支持叛乱，他们恐怕就不会失败了。但是日军指挥体系最高层的军官们选择了遵从皇命，他们也已经开始在下级部队中维持纪律。无论即将面临怎样的审判和艰难的战败，他们认为保持国家的完整性还是必不可少的。

军国主义狂人们想把整个国家拖入让所有人都死光的最后决战中——全民玉碎——就像许多日军士兵在数不清的太平洋岛屿上那样。但是日本人民并不想打这一仗。文官大臣、皇室、皇宫、重臣以及天皇本人也不想。最后，即便是军队最高领导层也不想。在随后的几天里，从宣布投降占领军到达之间，东京和全国各地的军队基地里时不时有叛乱发生，常常是一群中级军官占领公共设施，或者散发传单说天皇的广播是伪造的。但是没有任何高级军官或文官加入推翻天皇“圣裁”的尝试中。

当天晚上7点，一名NHK播音员提醒所有日本人，次日中午要守在收音机旁：“明天，8月15日中午，将有重要广播。这将是前所未有的广播，一亿听众必须认真严肃收听，不得有误。”^[99]后来的公告还说这次广播将会有“天皇陛下的玉音”。^[100]为确保所有人都能听到，那些通常会断电的社区也都被供上了电。为迎接这次重要广播，从14日晚10点起，所有的音乐节目都停播了，直到放完天皇的录音后才恢复。

当叛军还在垂死挣扎时，那两张黑胶唱片之一被送到了NHK，日本

的国立广播公司。在预定的广播时间之前一个小时，唱片被送到了广播工程师手中。东部军的部队控制了NHK总部周围的街道。密谋叛乱者和当局都知道，一旦天皇的声音通过电波发出去，一切就都无可挽回，任何叛乱都不再可能成功。

8月15日上午，整个日本的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接下来的广播会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听说外国皇室常常会在广播中讲话，但这种事在日本还没见过。很少有日本人听说过“裕仁”这个名字，他们只知道君主是“天皇”。他们连想象这位现人神的“玉音”怕是都办不到。关于银行将不再接受取款的流言四处传播，于是有些地区出现了小规模挤兑。有人怀疑战争结束在即，但其他许多人觉得广播的目的可能是对苏联宣战。或许天皇想要勉励臣民战斗到底吧。天刚亮，空袭警报就几乎一刻不停地响了起来，一批接一批的美军舰载机出现在了东京上空——哈尔西的第3舰队发动了战争中规模堪称空前的空袭。“和往常一样，我们无从知晓真相，”竹山道雄回忆道，“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看见、听见的狭小半径内的事情。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流言蜚语来揣测和总结。尽管如此，我们从报纸上能看出，肯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101\]](#)

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一个村子可能只有一台收音机，因此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到户外某处——一条街上，小公园里，学校操场。在城市里，社区组织把收音机接到大喇叭上。亲朋好友纷纷聚集在家中。许多工人都下工回了家，好和家人一起收听广播。在工厂、写字楼、学校、兵营里，日本人纷纷聚集在收音机旁，恭恭敬敬的，神情严肃，低着头，帽子拿在手中。还有些人怯生生地跪在地上说：“让我们也听听吧。”NHK的广播寂静无声，只是偶尔会有一个庄重的声音响起来，确认特别广播将在中午开始。

中午11时59分，空袭警报喧响了一阵，止住了。听众们屏住了呼吸，街上鸦雀无声。许多地方都只能听见夏蝉的高歌，人们纷纷伸长了脖子，侧耳倾听。在东京的NHK演播室里，一名技师把唱针放到了唱片

上，随后站到一旁，低下头。

电波中响起了声音。声音不大，有些尖锐而颤抖。许多人都觉得在滋滋的静电声中很难听清。“兹告尔等臣民”，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朕已飭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102\]](#)

他说的是古语，古代日本宫廷使用的一种晦涩语言。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日本人都觉得演讲很难听懂，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更是一头雾水。一名年轻的海军大尉，未来索尼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觉得演讲的语言很难理解。但他一听到声音就知道那是天皇，“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理解每一字的含义，但天皇说的大意我们明白了。我们之前非常紧张，现在松了一口气”。[\[103\]](#)对于海军航空兵军官前田武而言，“仿佛连蝉都停止了鸣叫”。[\[104\]](#)天皇继续讲道：

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105\]](#)

有人讽刺称，“而战局并未好转”一语实在是有些轻描淡写了。此前一版文稿更准确，说的是“战局每况愈下”。[\[106\]](#)陆军省坚持用词不能这么重。8月14日下午，内阁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一点。即便是在战败前的挣扎中，陆军还是一心想着给自己保存一点颜面。[\[107\]](#)在盟国，当这次讲话的译稿见报时，许多人都被这让人觉得倨傲甚至挑衅的语气激怒了。裕仁居然说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是纯粹且正义的，是“希求帝国

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且“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在天皇的这篇讲话中，他投降的决定变成了一种克制而无私的高尚姿态。

讲话结束，许多日本人目瞪口呆，潸然泪下。他们向邻居深鞠躬，然后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有些人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那些对古日文了解比较多的人会把演讲翻译给邻居们听。在私下的议论、交谈和日记里，许多日本人都表达了对天皇感受的深切担忧。他们觉得天皇如此悲痛和焦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许多人都被清楚可见的“陛下的感情”感动了。[\[108\]](#)海军维护官宫下八郎吃不下饭，说不出话，工作也无法集中精神。他就这么恍恍惚惚地过了一天。还有人爆发出愤怒之情。有个人说他和邻居感受到了“战败之耻”——更有甚者，他们还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当亡国奴之耻”。[\[109\]](#)有个被疏散到乡下的小学五年级孩童犯了个错，他告诉同学们：“战争现在结束了，我们能回家了。”其他几个男孩子冲上去揍了他一顿，吼道：“你个叛徒！我们发誓在这里拼尽全力，直至胜利那一天！”[\[110\]](#)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父母对于自己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而愤怒不已。如果结束战争如此容易，如果天皇拥有权力直接将战争叫停，那他为何不早点这样做？“皇帝老儿，”有个人说，“就为了这个，我的儿子们都白死了，死得像狗一样。”[\[111\]](#)

广岛的蜂谷道彦医生一连忙碌了9天来照顾核爆的伤者。听了天皇的广播后，他诊疗大厅里的许多伤员都很愤怒。他们吼道：“我们怎么能输掉战争！……现在只有懦夫才会放弃！……我宁死不降！……我们受这么多罪都是图的什么？……逝者死不瞑目！”蜂谷医生发现许多在核爆后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人现在都想要继续打下去，就好像他们都忘了身上的严重烧伤和丧失至亲之痛，除非整个国家投入最后的决战。“‘投降’这个词带来的震动，比我们城市被炸带来的冲击还要严重，”这位医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想得越多，就越发难受和痛苦。”[\[112\]](#)

但是天皇已经表达了他的意愿，而且不会有人反对他。民众的大部分怒火都转向了政府和军队领袖。有人批评那些劝说天皇投降的领导人，另一些人则责骂同一群领导人鲁莽地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性的战争。许多人都很害怕，觉得会被胜利的盟国奴役。他们摇着头，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自语：“我们输了。”这是个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事实。他们瞪大了眼睛互相询问：“现在我们输了，接下来会怎样？”^[113]没人知道答案，但是最坏的结果并不难想象，对于那些了解日本军队在中国、马来亚、菲律宾和其他各处所作所为的人来说尤为如此。但还是有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空袭总算是不会再来了。他们也不用拿着菜刀和竹枪去迎战前来登陆的野蛮军团了。或许政府会重新开放浴室，他们就能去把身上的泥垢洗干净。在8月15日晚，尽管只是和平后的第一夜，防空管制就取消了，天黑后可以开电灯了。人们也终于能把窗户上的遮光罩取下来了。住在东京的文员吉泽久子想知道邻居们怎样看待这个重大的消息，她的结论是，“他们脸上明白无误的笑意回答了一切”。^[114]

在军事基地里，纪律已经完全崩溃了。士兵们拒绝听从命令。年轻的狂热分子赌咒说：“我们要取下天皇身边乱臣贼子的项上人头！”^[115]那些派驻海外的人急切地想要回家，去保护他们的家人免遭占领军侵害；他们计划着一回到日本本土就逃离军队。那些肉体上饱受军官们虐待的小兵开始找机会报仇。一个曾经表现出失败主义情绪的士兵回忆道：“我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欢呼起来。一个军官来揍我，我揍了回去。”^[116]栃木县一所军队医院里的一位护士看到好几个军官在被自己人痛揍时呼喊道：“原谅我，原谅我！”^[117]

冷静下来之后，日本军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有义务去自杀。许多人不喜欢“其他那么多人献出生命之后我却战败回家”的想法。他们不敢指望受到乡邻甚至是家人的热情欢迎，因为他们将会“背负战败之耻”。^[118]驻扎在筑前航空兵基地的“神风”飞行员土田翔治，还指望着在天皇广播的当天飞他的最后任务。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感受到失败的命运带来的幻灭。当地人看我们的眼神里似乎带着些什么，实际上那

是因为我们背上了失败的耻辱。”[\[119\]](#)在东京的帝国大本营里，军官们分成了几派，有人认为应该遵从命令投降，有人要上山打游击，还有人认为应该自杀。许多人想要打下去，或者自裁，但是一名年轻的中尉说：“死是很容易的事情。想想如何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活下去，那才是折磨和痛苦……在黑暗时代活下去并把我们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绝非易事。但如果没人这么做，日本人民真正觉醒的时代就不会到来。”[\[120\]](#)有些原本已经对活过战争不抱希望的人现在兴高采烈地意识到他们已然获得重生。天皇的演讲明确解除了他们对国家战败的责任，并且召集他们去努力工作，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拒绝投降是对圣意的不敬，也是对天皇权威的冒犯。诏书里已经对此有了明确要求，这和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也是符合的：“英雄豪杰，每因重私情之信义，而遭杀身之祸，以致遗臭万年者，亦复不少。可不戒哉？”[\[121\]](#)

最后，日军从上到下绝大部分官兵都选择了活下去，例外之人少得令人吃惊。“我想过要自杀，却下不去手，”南九州的一名士兵后来承认，“我发过誓要‘打击美国鬼子，七生报国’。但我还是选择了继续活下去。”[\[122\]](#)

阿南将军便是那少数例外之一。他没有收听裕仁的广播；8月15日凌晨，他用武士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彻底摆脱了羞辱。他一晚没睡，和来访友人一起喝清酒，拒绝为正在皇宫中推进的叛乱分子提供任何支持。拂晓，这位浑身汗透的陆军大将遵循日本传统提笔写下了“绝命诗”，只有寥寥数笔：

皇恩无极，吾欲何言。[\[123\]](#)

之后，他手持一把短刀刺进自己的腹部，一直刺到刀柄处，刺穿了五脏六腑，左右搅动。刀刃割破了降主动脉，导致腹腔内大出血。他缓

慢而痛苦地死去——按照日本传统观点，这是可敬的。

第二天夜里，大西将军重演了这血腥的仪式，用刀刺进自己的肚子，连肠子都流了出来。他自杀时许多军官过来看他，但他拒绝让他们帮助自己解脱痛苦。足足过了15个小时，他才失血而死。这位最好战的强硬派躺在自己的血泊之中，要那些前来看望他的年轻军官必须遵从皇命，按天皇的指示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在镇压8月14日至15日的叛乱时扮演了关键角色的田中静一将军，在8月24日，也就是美国占领军第一支先遣队踏上日本国土的前一天举枪自尽。阿南的前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在9月12日举枪自杀，他的夫人惠子也在一天后随夫而去。

人称“小墨索里尼”的东条英机，也就是把日本拖入灾难性战争的那个人，在1945年9月11日自杀未遂。当前来抓捕这个战犯的美军敲他的前门时，东条从二楼窗户看到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逃之后，他回到书房，向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他的伤势很重，但并不致命。前来抓他的美军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外科医生给他缝合了伤口，由于他失血过多，还进行了输血。这次失败的自杀被东条的国人认为是他可恨的政治生涯中最可耻的一幕。他被救了回来，最后被判犯有战争罪，在1948年被绞死。

在九州的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里，宇垣缠将军起初拒绝相信天皇已经决定投降的“可恶消息”。但接到从日吉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指挥地堡打来的电话后，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他在日记里写道，东京的领导人们“不过是一群自私的弱者，他们不会认真替这个国家的未来考虑，而只知寻求眼下的好处”。^[124]8月15日早晨，他奉命暂缓对敌舰队的攻击。中午，第五航空舰队司令部全体人员立正收听天皇的广播。宇垣没法把所有词句都听懂，但足以知道战争结束了。“我从未如此惶恐。作为一名备受天皇信赖的军官，我竟然有这么痛苦的一天。我从未自觉如

此羞耻。唉！”[\[125\]](#)

自从来到九州担任指挥官以来，宇垣已经派数千名年轻的“神风”飞行员前去送死。现在他决心要追随他们而去了。他把个人日记——足足15本字迹工整的皮革本子——交托给了他的1912届海军兵学校校友会妥善保管。

宇垣缠的日记《战藻录》至今仍是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最重要的文献记录之一。它的时间跨度覆盖了整个太平洋战争，从袭击珍珠港之前几个星期写起，然后是珊瑚海、中途岛、瓜岛一系列血战，直到1943年4月山本在飞机上被击落身亡，这段时间里宇垣一直是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参谋长。1944年，宇垣指挥日本海军最重要的战列舰战队，包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参加了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1945年，他又担任第五航空舰队司令，指挥了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神风”攻击。在这全部过程中，宇垣把他的个人想法写进了日记里。

宇垣决意要赶在正式的停战命令从东京发下来之前驾机出击，于是立刻行动了起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已决意，纵使魂归天国也要为国效力。”战败后，日本将面临长期的苦难，他期待所有日本人能够“比以往更加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传统精神，全力以赴地复兴这个国家，最终报此败之仇”。[\[126\]](#)

下午4点，和司令部的参谋们饮下最后一杯壮行酒之后，宇垣将军驱车来到不远处的大分机场。那里，11架D4Y“彗星”俯冲轰炸机已经排列在了起飞线上，22名机组人员已列队站好。所有人头上都系着旭日绑扎带。命令是五机出击，但所有飞行人员都想要参加任务。

宇垣问：“你们都跟我走吗？”

他们举起右手齐声喊道：“是，长官！”

宇垣摘掉了自己的军衔。他穿着绿色军服，戴着白手套，佩带着山本五十六送给他的短刀。在登上飞机之前，宇垣正对着照相机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看起来平静而坚决，脸上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他爬上了领队机的机翼，坐进后座。原本应当坐在这一位置的无线电员兼领航员求他让自己也坐进去。宇垣同意了，于是这个年轻人挤进了将军膝盖前的空间里。

11架飞机滑行到起飞线，人们看见宇垣戴着白手套的手从座舱里向外挥动。飞机起飞后向南飞去，其中三架飞机后来返航降落，机组成员报称“引擎故障”。

晚7时24分，宇垣的飞机向基地发出无线电呼叫。攻击机群即将撞击冲绳海岸外“傲慢的美军舰队”。此后便杳无音信。^[127]

据美国海军的报告，一小群敌机试图向冲绳岸外伊江岛旁锚泊着的运输船发动俯冲攻击。它们全部被高射炮火击落，没有美军舰船被击中受损。次日上午，一艘坦克登陆舰（LST-926）的舰员们在岛旁的浅水里发现了日本飞机的残骸。他们把残骸里的尸体拖出来，掩埋在岸上。

在九州的第五航空舰队军营，宇垣的个人物品收拾得整整齐齐，这是要送到他家人手中的。人们发现了一张手写便条，似乎是这天早些时候写的：“大梦已了，吾将升天。”^[128]

^[1] Phillip Morrison quoted in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p.681.

^[2]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49.

^[3] Sweeney, *War's End*, Foreword, p.i.

^[4] Groves, *Now It Can Be Told*, p.318.

^[5] Julian Ryall, “Hiroshima Bomber Tasted Lead After Nuclear Blast, Rediscovered Enola Gay Recordings Reveal,” *The Telegraph* (UK), August 6, 2018.

^[6]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4; Interview with crew of Enola Gay, October 1962, Unknown Collections: 509th Composite Group, <https://www.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oral—histories/atomic-bombers>.

^[7] Merle and Spitzer, *We Dropped the A—Bomb*, Introduction, p.1.

^[8] Kelly, 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330.

^[9] Stiborik quoted in Patricia Benoit, “From Czechoslovakia to Life in Central Texas,” *Temple*

Daily Telegram, August 23, 2015.

[10] Yoshido Matsushige,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91.

[11] “Chapter 25—Eyewitness Account,”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by Father John A.Siemes,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http://avalon.law.yale.edu>.

[12]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2.

[13] Michiko Yamaok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85.

[14] Eiko Taoka, “Testimony of Hatchobori Streetcar Survivors,” The Atomic Archive,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Hibakusha/Hatchobori.shtml>.

[15] Hersey, *Hiroshima*, p.19.

[16] Futaba Kitayama quoted in Robert Guillain,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August 1980.

[17] Hersey, *Hiroshima*, p.19.

[18] Ibid., p.31.

[19] Michiko Yamaoka,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85.

[20] Yoshido Matsushige, oral history,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392.

[21] Ibid., p.393.

[22] Futaba Kitayama quoted in Robert Guillain,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August 1980.

[23] Frank, *Downfall*, p.265.

[24] Hersey, *Hiroshima*, p.50.

[25]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8.

[26] Hersey, *Hiroshima*, p.89.

[27] Lieutenant William M.Rigdon, USN, “Log: President’s Trip to the Berlin Conference,” August 6,1945, p.50, Leahy, *I Was There*, pp.432—33.

[28] Ibid.

[29] Truman’s Statement on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30.

[30] Ibid.

[31]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84.

[32]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The Day Man Lost*, p.270.

[33] Frank, *Downfall*, p.269.

- [34]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6.
- [35] Frank, *Downfall*, p.270.
- [36]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 *The Day Man Lost*, p.293.
- [37] USSBS Interrogation No.609, Hisatsune Sakomizu, December 11, 1945, Kort,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61.
- [38] “Soviet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 August 8, 1945,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 <http://avalon.law.yale.edu/wwii/s4.asp>.
- [39] Lieutenant Colonel David M.Glantz,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pp.1—2, Leavenworth Paper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S.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February 1983.
- [40] Glantz, *August Storm*, p.xiv.
- [41] Document G9,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2608:Lieutenant General Torashirō Kawabe, November 21,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82.
- [42] Document G7,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4479: Statement of Sumihisa Ikeda, December 23,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79.
- [4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197.
- [44]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01.
- [45] Merle and Spitzer, *We Dropped the A—Bomb*, p.123.
- [46] Sweeney, *War’s End*, p.204; Paul Tibbets, oral history, accessed November 7, 2018, <https://www.manhattanprojectvoices.org/oral—histories/general—paul—tibbets>.
- [47] “圣爱尔摩火”（St.Elmo’s fire），指尖锐物体在强电荷大气中运动时产生的发光现象。——译者注
- [48] William L.Laurence,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 [49] 根据埃伦·布拉德伯里的说法，“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没有记载在任何官方史料中，但阿什沃思向我发誓真的发生过这些事”，见Bradbury and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4, 2015.
- [50] Alex Wellerstein, “Nagasaki: The Last Bomb,” *New Yorker*, August 7, 2015.
- [51] Sweeney, *War’s End*, p.215.
- [52] *Ibid.*, p.216.

[53] William L. Laurence,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54] Sweeney, *War's End*, p.219.

[55] Bradbury and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56] William L. Leary and Michie Hattori Bernstein, "Eyewitness to the Nagasaki Atomic Bomb," *World War II* magazine, July/August 2005, <http://www.historynet.com/michie—hattori—eyewitness—to—the—nagasaki-atomic-bomb-blast.htm>.

[57] Shizuko Nagae eyewitness account, as told to her daughter, Masako Waba, "A Survivor's Harrowing Account of Nagasaki Bombing," *CBC News*, May 26, 2016, <https://www.cbc.ca/news/world/nagasaki—atomic-bomb-survivor-transcript-1.3601606>.

[58]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p.11, Report by the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June 29, 1946,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MED/med_chp9.shtml.

[59] "The 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p.11.

[60] Sweeney, *War's End*, p.225.

[61] Ibid.

[62]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53.

[63] Document D14, diary entries of Marquis Koichi Kido,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7.

[64] 此处为加濑俊一的转述。在迫水久常向战略轰炸调查组提供的说法中，铃木的措辞略有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34;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8.

[65] Document E1, Emperor Hirohito's Surrender Decision,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23.

[66]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译者注

[67]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9.

[68] Document 41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wiss Chargé (Grässli), Washington, August 11, 1945,"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6, p.627.

[69] Document G11, Miscellaneous Statements of Japanese Officials, Document No.50025A, Lieutenant Colonel Masahiko Takeshita, June 11, 1949,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8—84.

[70] Emperor's "Monologue," quoted in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125.

[71]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01.

[72] Torashirō Kawabe diary,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13.

[73]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17.

[74] Document D9, Army Minister Korechika Anami Broadcast: “Instruction to the Troops,” August 10,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0.

[75] Document D10, Army General Staf Telegram, August 11,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01.

[7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40.

[77] Stimson diary, August 10, 1945, quoted in Alperovitz and Tree, *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 p.489.

[78] Stimson diary, August 10, 1945, quoted in Janssens, ‘What Future for Japan?’: U.S.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Postwar Era, 1942—1945, p.318.

[79]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0.

[80] Leahy, *I Was There*, p.434.

[81]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0.

[82] Forrestal diary, August 10,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83.

[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Vol.6, pp.631—32.

[84] Forrestal diary, August 10,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p.83—84.

[85] James J.Fahey diary, August 10, 1945,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375.

[8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4.

[87]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54.

[8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4.

[8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447.

[90]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p.243—44.

[91] Documents C—17, C—18, C—19, Magic Diplomatic Intercept Numbers 1236—1238, August 13—15,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289—90.

[92]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8.

[93] *Ibid.*, p.237.

[94] Document D12, Toyoda and Umezu Report to the Emperor, August 12,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02—3.

[95]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p.229.

[96] Document D12, Toyoda and Umezu Report to the Emperor, August 12,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p.302—3.

[97] USSBS,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p.9.

[98] Wray et al., *Bridging the Atomic Divide*, p.159.

[99]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4, 1945, pp.2—3.

[100]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5.

[101] Takeyama and Minear, eds., *The Scars of War*, p.50.

[102]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Released in Digital Form,”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 2015（内附1945年8月15日刊于此报的天皇停战诏书的英译文）。

[103] Morita, Reingold, and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p.34.

[104] Takeshi Maeda account in Werneth, ed., *Beyond Pearl Harbor*, p.126.

[105]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106]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56.

[107] 日本停战诏书中文译本全文如下，供读者参考：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作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軫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译者注

[108]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7.

[109] Ibid., p.179.

[110] Iwamoto Akir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58.

- [111] Irokawa, *The Age of Hirohito*, p.35.
- [112] Dr.Michihiro Hachiya diary, August 15, 1945, in Hachiya and Wells, *Hiroshima Diary*, p.83.
- [113]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79.
- [114] Hisako Yoskizawa diary, August 15, 1945, Yamashita, ed., *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p.217.
- [115] Sadao Mogam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56.
- [116] Haruyoshi Kagaw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50.
- [117] Michi Fukuda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Gibney, ed., *Senso*, p.42.
- [118]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p.187.
- [119] Ibid., p.186.
- [120] Ibid., p.184.
- [121]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End Speech.”
- [122] Hideo Yamaguch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73.
- [123] “Digest of Japanese Broadcasts,” August 15, 1945, p.16.
- [124] Matome Ugaki diary, August 11, 1945, Ugaki, *Fading Victory*, p.659.
- [125] Ibid., p.664.
- [126] Ibid.
- [127] Ugaki, *Fading Victory*, p.666.
- [128] Ibid.

尾声

于我而言，将生活建立在混乱、痛苦和死亡之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看见世界正渐渐变得蛮荒；我听见雷鸣隆隆而来，总有一天会将我们毁灭。我能感受到千百万人沉陷于痛苦之中。但是，当我仰望天空，我却能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好，眼下的暴行终将结束，和平和宁静将重回人间。

——安妮·弗兰克，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

8月14日晚，白宫媒体团被请进了椭圆形办公室。杜鲁门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身后站着他的内阁部长、军种司令以及助理们。他们脸上的笑容说明了一切。总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日本政府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记者们听罢立刻赶回编辑部，片刻之后，新闻就发了出去。很快，白宫大门外就挤满了兴高采烈的人群。莱希上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城市中闹哄哄地庆祝了起来，所有汽车都按响了喇叭，大群欢呼的人在街上游逛，连交通都堵住了。收音机里满是从洛杉矶到波士顿的各个城市进行庆祝的新闻，所有城市都在庆祝战争的结束，街上人潮汹涌，吵闹而拥挤。”莱希并不喜欢这样。他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做出冷静、深思熟虑、持重的反应。“但是老百姓觉得闹腾一点很好，民主社会的大部分人必须有自己的庆祝方式。”^[1]

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庆祝方式，在整个美国的各个城市，庆祝持续了这一整个夏夜，直至天明。大群人冲到公共广场上，兴高采烈地挥舞着双手，到处找人拍照，无论军人还是平民，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

人，所有人都抛开所有拘束，纵情痛饮。在城市的商务区，空中飘满了从高层窗户抛下的纸屑——权当彩色纸带——和从厕所拿出来滚落成飘带的卷筒纸。警察也不管了，随他们闹吧，只要别玩过头，不伤人和不毁坏财物就行。酒瓶在陌生人手中传来传去。汽车被人群堵得死死的，只能一寸一寸往前挤，人们爬到车顶和引擎盖上，把这些路过的车辆即兴变成了游行花车。在纽约，6万人涌向时代广场，百老汇和第七大街之间那些高楼的电子显示牌上都打出了字样：“鬼子投降了！”人群中，一名水兵拥吻了一名护士，这一幕被《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拍下，成了这场胜利大游行的象征。哈尔·比尔，一名在太平洋上飞了三年俯冲轰炸机的海军上尉，发现自己被大群兴奋的纽约人包围，因为他穿着军服，所以人们“拍他、拉他、吻他，向他欢呼”。一名妇人递给他一瓶啤酒，在他耳边叫道：“战争结束了，我儿子还活着！”比尔和同行的一位军官干脆在曼哈顿混了一整晚，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反正没人找他们要酒钱。^[2]

一名洛杉矶市民还记得：“大家的庆祝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在街上跳舞，所有店铺都休了业，所有人都去庆贺了。有些街道被完全堵死了。汽车就算没有完全停下来，速度也和蜗牛差不多。”^[3]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一位妇女回忆道：“我们居住的酒店算是瘫痪了。没有客房服务员，没有电话接听员。所有人都在外面街上乱跑。一片混乱，彻底乱套。许多人一边喝酒一边东游西逛。”^[4]从外地来到圣迭戈的帕特丽夏·利沃莫尔在逛街时遇上了庆祝的人群：“圣迭戈市区霍顿广场上的每个女孩都被亲了，被推进广场喷泉里。我被推进去差不多有十次。”利沃莫尔和她的朋友们住在匹克威克酒店里。当地酒馆的库存都卖光了，酒店的侍应生就把手里的几瓶酒拿出来高价售卖。她们用安全套装满水，从她们位于酒店高层的房间窗户里向下方的人群扔去。“我们只能用这个，”她解释说，“我们找不到气球。”^[5]

夏威夷的战时岁月大部分都是在戒严中度过的，此刻，没人再去理会灯火管制要求了，檀香山的酒吧也开始彻夜营业。大群“白帽子”在酒

店街上庆祝。人群开始将海滩上的一卷卷带刺铁丝网拖走。有人爬上阿罗哈塔，开始往下扯伪装网。宪兵、海岸巡逻队、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员则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加入狂欢。

在旧金山市区，对日胜利日的庆祝则演变成了悲剧。天黑后，酩酊大醉的市民与军人在市场街同警察打了起来。暴徒们砸碎了面向街道的窗户，掀翻汽车，围殴无辜的过路市民。30辆电车被砸瘫或砸毁。根据旧金山市政史料记载，“从第六大街到第三大街，都有窗户被砸碎。警察和海岸巡逻队无力阻止也未予阻止。打碎玻璃的声音响亮而持续不断，就像爆竹爆炸一样。没有玻璃爆裂声的时间不超过连续5分钟”。^[6]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警察在抛来的砖块和酒瓶面前撤退了。两个小时后，得到宪兵和海岸巡逻队增援的警察卷土重来，他们排成一排，挥舞着警棍沿市场街前进。大部分暴徒从街道两侧四散逃走。留在原地的人被一顿暴打，逮捕，扔进警车。此次骚乱导致11人死亡，大约1 000人受伤。^[7]当地报纸称此事为“胜利骚乱”，这是旧金山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事件。但是此事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国家级媒体的头版上，很快就被遗忘了。

在日本南部的海面上，第3舰队在8月15日早晨6时14分收到了尼米兹发来的停火命令——他们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因此从日期上比美国本土早了一天。这天上午破晓前，第38特混舰队已经放出数百架战机前往空袭东京——第一批飞机已经飞临日本首都上空，投下炸弹，打出火箭弹。美军飞行人员发现日军战斗机的抵抗出人意料地猛烈，他们称其为“自从冲绳战役以来最顽强的空中抵抗”。^[8]7架美军飞机在对日胜利日这天上午的空战中被击落，另有2架毁于事故。其余飞机则平安返航。11点，机群全部降落到了母舰上。

正午时分，“密苏里号”汽笛和警报齐鸣一分钟。主桅上升起了战旗和四星上将将旗。哈尔西下令向全军发出信号：“干得漂亮！”他要求各航母把攻击机收回机库，好把飞行甲板腾出来供防空战斗机使用。战斗空中巡逻队得到了加强。哈尔西并不确信这和平是可靠的——即便日本

政府真心想要投降，也会有一万种原因让抗命的飞行员前来发动“神风”攻击。在引起全舰队会心大笑的指示中，他命令“地狱猫”和“海盗”飞行员“找到并干掉所有的敌侦察机——别太狠毒，要友好点”。^[9]

哈尔西的警觉理所应当。仅仅20分钟后，雷达显示屏上就出现了来袭敌机。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战斗空中巡逻队和驱逐哨舰击落了8架日军战机。最后，在对日胜利日下午2时45分，第3舰队的战争落下了帷幕：此后，舰队的火炮再未怒吼过。

已经是盟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将军一点时间都没有耽搁就开始施展自己的权力。他在马尼拉的指挥部开始从多个频道直接向东京广播，就通信联络、解除武装、释放盟军战俘、正式投降安排，以及接下来占领军到达等事宜做出了指示。他还要日本安排一名得到天皇授权的“称职代表”飞来马尼拉协商上述事宜。

没人敢说日本陆海军的官兵们一定会遵从天皇的投降诏令。因此，第一支占领军部队可能要依靠武力才能进入日本——即便没那么严重，他们也可能发现某些关键设施被毁坏或者变成杀人陷阱。部队必须为各种意外情况做好准备，但他们同时也要尽快涌入那个被击败的国家，及时达到必需的部队规模。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运输将由所有军种合力完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陆军航空兵，来自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两个战区。占领日本所需的地面部队此时还散布在冲绳、马里亚纳群岛和菲律宾，他们正在那些地方准备登陆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仍然位于日本外海的第3舰队被指派开进并占领东京湾，包括横须贺军港。由于时间紧张，横须贺登陆部队只能由已经随同舰队出海的陆战队和水兵组成。由于不知道岸上设施的情况，他们必须带上电工、木工、管子工、警察、医生、翻译，还有——如“米克”卡尼所说——“文明社区每日生活所需的所有基础用品，这是军事当局要求的”。^[10]

第11空降师将从8月26日起经由大规模空运飞抵东京西南边的厚木航空兵基地。陆军空运司令部计划每天向厚木飞300架C-54运输机，这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空运——但这些大型四引擎飞机将要在——一座已经被

猛烈轰炸了几个月的基地降落，大部分地面设施都已化为废墟。因此后勤面临着严峻挑战。伞兵们将要飞去的那个机场，从对日胜利日起成了军事叛乱的温床。裕仁的广播刚刚结束，厚木基地的日本飞行人员便发誓要爬上飞机，向美军舰队发动自杀攻击。试图恢复纪律的军官都挨了揍。“航空基地自身就是骚乱来源，”坂井三郎回忆道，“许多飞行员喝得大醉，狂吼怒骂。”^[11]与此同时，在首都，叛军占领了市中心附近的上野山和爱宕山，要求其余部队也加入他们的叛乱。^[12]皇宫外的广场上发生了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自杀。米内大将十分担心军纪崩溃，害怕日本陷入混乱。他最后通过说服天皇的弟弟高松宫亲王亲访厚木基地，平息了那里的叛乱。米内组织附近横须贺的海军基地部队前往占领厚木基地，还拆掉了那里飞机的螺旋桨。米内后来说：“在我漫长的海军大臣生涯中，我可能从未像那个月14日到23日前后这段时间里那样担忧过。”^[13]

然而，在同一个星期，事态也在变得明朗：日本政府，包括军队高层，是诚心要投降的。东京和马尼拉之间的往来电报简洁、明快、谦恭。日本人已经准备好听从麦克阿瑟的指示，他们常常请求美方明确具体要求，这就证明他们将会全力以赴配合工作。8月17日，在那次更为著名的投降广播之后，裕仁又签发了第二份诏书，直接命令武装部队“克体朕意”以及“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14]就在当天，东久迩稔彦亲王被任命为临时首相，他宣布“在任何方面违背天皇陛下旨意的言行都是不允许的”。^[15]皇室成员们纷纷作为裕仁的个人代表被派往亚洲各地的基地和司令部，确保所有海外日军放下武器。当东京请求为运送这些特使的飞机提供保护时，麦克阿瑟很快应允。^[16]

遵从麦克阿瑟的指示，8月19日，一支日本议和代表团飞到了马尼拉。为首的是河边将军，梅津美治郎在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的次长。双方在马尼拉市政厅举行了正式非军事会议。美国方面就解除战机和战舰的武装，弹药和武器的安全保管，盟军战俘的释放，导航灯塔和浮标的

设立，以及雷场清除等事项给出了详细指示。^[17]日本方面请求允许他们自己来集合部队并解除其武装，尤其是在东京地区。他们说，情况存在不稳定因素——但是只要给予一些时间，他们就能制服那些不听话的狂热分子。美国人的态度很坚决，但也愿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同意将登陆横须贺与在厚木空降的时间推迟48小时。一名与会的日本人說，他对胜利方的姿态印象深刻，发现这些人虽然严厉，却也公平，“既不傲慢，也无轻蔑”。^[18]

8月27日，第3舰队大部在相模湾下锚，这是本州岛沿岸东京湾西南面一处三面被陆地环抱的浅水海湾。入湾舰队中有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但没有航空母舰，它们都被留在外海，在那里它们既能提供空中掩护，遭受反击的威胁也小一些。“密苏里号”靠泊在三浦半岛旁，位于海滨的历史名城镰仓附近。西边40英里以外，富士山隐约可见。日落时，从舰队的高处看去，太阳正对着富士山的背后，落日就如同坠入了那巨大的圆锥形火山口里。哈尔西将军和“阴谋诡计部”的其他成员纷纷涌上“密苏里号”的指挥舰桥走廊，观看这令人惊叹的壮丽美景，还让舰上的摄影师来把它拍摄下来。^[19]近旁的战列舰“爱达荷号”上的一名军官说，太阳从视野中消失之后，富士山“放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红色光芒，就像日本海军军旗那样。我们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20]

第二天拂晓，一队扫雷艇开始在东京湾入口处执行危险的扫雷任务。在港口的日本引水员的协助下，他们在海图上绘制出了安全航道，并用浮标标了出来。他们在海湾西南一角清理出了一块锚地，包括横须贺与横滨的沿海区域以及通往东京的河流的入海口处。“密苏里号”停泊在距离横须贺海岸约4英里，水深10英寻处，伴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就停泊在它周围。附近还有另外三艘战列舰，包括现在已经是尼米兹将军旗舰的“南达科他号”，他前一天刚从关岛飞来。

从这里，美国人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处尽是日本的地盘。这种感觉令人兴奋，却也令人紧张。有人觉得投降是个陷阱，觉得日本人想要背信弃义，发动进攻。因此舰队保持着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舰员各就

各位，舰炮指向海岸。

对于各个舰载机大队而言，和平初至的那几天和战时一样忙碌。8月16日到9月2日期间，第38特混舰队的飞行员们总共起飞了7 726架次，比战时任何相同长度的时间段飞得都要多。^[21]舰载机向盟军战俘营投下了传单，要俘虏们留在营地内，等候盟军人员前来。“快要结束了，”一张这种传单上写道，“不要灰心。我们惦记着你们呢。我们正在实施能最快接到你们的方案。”^[22]装着食物、衣物、药物和香烟的救援包挂在降落伞上扔了下来。在东京湾，有些战俘已经跑到海边，向美国巡逻舰艇喊叫，打信号。尼米兹于是授权展开救援。小艇开进河口，沿河而上，搭载了东京附近战俘营里的俘虏。位于横滨外海一处人工岛上的臭名昭著的大森8号战俘营在8月29日被完全解放。到这一天结束时，超过700名盟军俘虏已被接回锚泊在海湾里的医院船“仁爱号”。这些饿得半死的人吃饭时狼吞虎咽，体重也飞速增长，常常每天能增重四五磅。

8月30日，第4陆战团战斗群在横须贺上岸。他们保持着全副武装，做好了战斗准备，却没有遇到任何敌人，也没见到日本人耍花招的迹象。在一间仓库里，他们发现了一句刷在墙上的英文标语：“三敬美国海军和陆军！”^[23]这个基地基本上已经被废弃，留守的几个日本兵只想着不要招惹麻烦。到夜幕降临时，已有1万陆战队和海军人员安全上岸。日军基地指挥官户冢道太郎海军中将对他们彬彬有礼，百依百顺。^[24]户冢中将以深鞠躬向“米克”卡尼投降，卡尼被看到的景象弄蒙了，甚至有些警觉：“街上的小孩子都向我们比V字手势。你怎么看？”他发现日本人的友好态度“比阴郁或抵抗还令人恐慌……这真诡异”。^[25]

在横须贺，轰炸留下的毁坏痕迹随处可见，许多设施已是污水横流。一名陆战队军官回忆道：“他们显然已经放弃了；兵营的地面已有几个月未打扫，地上的灰土有半英寸到一英寸厚。设施的状况糟透了。

我们每天都得清理粪池，用木车和超大号的桶运走粪便，那些桶还是漏的。街上、兵营、食堂里满是大群大群的苍蝇，我们花了几个月才修好排污系统，把这个地方清理干净。人员的健康状况令我忧心忡忡。”^[26]当天下午稍晚时候，哈尔西将军来到岸上，发现军官俱乐部里“体形和胆子都大得出奇的老鼠到处乱跑”。^[27]横须贺兵营里的床铺对美国人来说太短了，于是舰队赶紧送来了折叠床和吊床。“海蜂”们立刻投入了工作，修建厨房和食堂，修复电网和电话网，重新铺设道路，在机场跑道上抹了一层层沥青。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还将建造起礼拜堂、冷库、棒球场、体育馆、自来水厂以及热水浴室。

8月28日，第11空降师的先头部队乘坐首批C-54运输机在厚木基地降落，空运行动拉开序幕。他们受到了热情欢迎，日方人员又是敬礼又是握手，还有人护送他们来到原先神风队员居住的兵营，这里已经被打扫干净，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食堂里还有热饭供应。到8月30日，已有超过300架C-54“空中霸王”运输机在冲绳和厚木之间往来穿梭，每一趟的航程是980英里。它们以每小时20架的频率在厚木降落，每3分钟1架。第38特混舰队的舰载机为它们提供全程战斗机护航。

盟军部队进入东京地区, 1945年8月



8月30日，麦克阿瑟来了。这天天高气爽，整个本州岛南部沿岸能见度良好。在乘坐他的C-54“巴丹号”专机从冲绳飞来的5个小时航程中，麦克阿瑟一会儿在走道里踱步，一会儿到驾驶舱里看看。当富士山出现在座舱风挡玻璃前方100余英里之外时，他便坐在右侧飞行员席不动了，直至航程结束。“巴丹号”从三浦半岛中部飞过，飞得很低，透过

舷窗可以看到镰仓的巨大铜佛像。之后飞机在东京湾绕了个大圈，锚泊中的第3舰队清晰可见。飞机下降了高度，飞过青翠的旱田和水田。跨过机场围墙时，麦克阿瑟和他的飞行员能够看见被炸毁的机库和地面设施的废墟，还有被拆掉了螺旋桨的日本飞机。“巴丹号”在下午2点准时落地，跟随引导吉普滑行到一处停机区，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群军官、士兵和战争通讯员。

下飞机前，麦克阿瑟要机上的所有军官把佩枪卸下来丢在飞机上。这些武器没用，他说，因为“方圆十英里之内有15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师团。如果他们真想干些什么事，我们的这些玩具枪也起不了什么作用”。^[28]在他担任日本占领军司令的6年里，麦克阿瑟始终没有带过佩枪。麦克阿瑟的航空兵司令肯尼将军说，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一姿态是心理上的神来之笔，因为“看见我们赤手空拳走在他们的国土上，看见我们对这7 000万人口的战败国中存在的危险全然无惧，鬼子们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已经确凿无疑地输了”。^[29]

日本人凑到了大约50辆不同牌子、颜色、年份的小汽车和大巴，其中许多被改装成烧木炭驱动。这支五花八门的车队将把麦克阿瑟和他的团队送到横滨市区的新大酒店，为他们开路的是一辆启动时回火声响亮的破旧红色消防车。CBS的通讯员比尔·邓恩觉得似乎“这些破破烂烂、嘎吱作响，靠烧木炭驱动的汽车中，没有哪辆”像是能开完这18英里的样子。^[30]麦克阿瑟爬进那辆林肯牌大轿车的后座，车队开上了满是弹坑的道路，穿过精心照料的水田和一排排小木屋。数千名端着枪的日军在道路两旁列队立定，每两米站一人，组成“举枪致敬”的队形，面朝路外，背对道路。美国人了解到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仪式。有些农夫会好奇地抬起头来看着路过的汽车，有些人甚至会挥挥手，但大部分人还是继续埋头干活。

来到横滨市郊，美国人从地面上看到了他们空中轰炸的效果。成片的瓦砾中夹杂着一堆堆废墟，只剩下石头砌成的烟囱和混凝土办公楼的

残垣断壁还矗立其中。他们看见贫苦的老百姓在废墟中寻找能吃的东西。许多人都住在木头、管子和波纹板临时搭建的棚子和窝棚里。横滨市区状况好一些，但也成了一座鬼城。“店铺的窗户都钉上了木板，遮光罩摘掉了，许多人行道也废弃了，”考特尼·惠特尼回忆道，“穿过空荡荡的街道，我们被送到了新大酒店，我们要在那里待到麦克阿瑟正式进驻东京为止。”^[31]

麦克阿瑟的车开到了酒店大门前，酒店经理和工作人员已经在大堂前的台阶上迎接他们了。他们看起来都因为能接待这些人而由衷地开心，就像这是什么莫大的荣耀一样。经理向他们深鞠躬，伸出手引路，并护送着麦克阿瑟进入电梯，来到他的房间。这是酒店最好的房间，里面的家具陈设有些老旧，但房间很干净。一个小时后，将军回到餐厅，享受了一顿牛排晚餐。他的助手担心饭里被下毒，但麦克阿瑟沉着地答道，“没人能永生”，接着就把肉塞进嘴里。^[32]酒店经理后来感谢麦克阿瑟的信任，还说这是他和工作人员的“无上光荣”。^[33]

餐厅里挤满了盟军军官和战争通讯员，他们正从厚木陆续赶来。尽管如此，厨房总有办法拿出足够多的食物给他们吃。最后牛排吃完了，菜单上只剩下了油煎鱼。为了展示幕僚军官们的善意，麦克阿瑟要求他们吃鱼，即使不合胃口也要吃，因为“这无疑是他们唯一能拿出来给我们的食物了”。^[34]

后来，麦克阿瑟在酒店大堂重新见到了乔纳森·M.温赖特将军，他在1942年3月被留在科雷吉多尔岛担任指挥官，并于当年5月率领岛上守军向日本人投降。温赖特被关在中国东北的一座战俘营里，和包括1942年2月率领新加坡守军投降的英国将军A.E.珀西瓦尔在内的其他高级军官关在一起。两位将军全都饿得皮包骨头，他们的样子大大激怒了盟军。在整个战争期间，温赖特都担心他在科雷吉多尔岛的投降会令他蒙羞——确实，有一段时间麦克阿瑟曾向他的下属抱怨温赖特没能打到底。但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麦克阿瑟拥抱了他的老下级，说：“怎

么会？吉姆，你的老部队还是你的，就等着你来要了。”[\[35\]](#)

8月31日和9月1日，下起了瓢泼大雨。麦克阿瑟和他的幕僚班子搬到了设在海关大楼内的临时指挥部，那是距离酒店三个街区，靠近横滨海边的一座大型石头建筑。飞往厚木的空运一刻也没停，占领军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这个国家。到9月2日，美军哨兵们已经在酒店周围的路口和海滨搭建起了检查站和岗亭。第11空降师的部队向东京市郊挺进，但是在多摩川南岸止住了脚步，他们能看见日军部队就驻扎在河对岸。日本当局请求麦克阿瑟将美国人进入首都的时间推迟一个星期，好让他们有时间解除当地部队的武装，麦克阿瑟同意了。[\[36\]](#)

与此同时，军队的高官和记者们还在不断飞往厚木。由于缺乏车辆，他们不得不拼车，这种时候，军衔的高低尊卑就发挥作用了，高级军官可以直接坐进等候着的小汽车。在从厚木到横滨酒店的18英里道路旁，几十辆坏掉的小汽车和烧木炭的大巴丢在沿途。等得久了，有时会有公交车前来接运滞留的乘客，而美国陆海军的将军们即便坐在这些拥挤车辆过道里的行李箱上也要尽力保持体面。乘坐这样一辆公交车时，有人看见苏联将军库兹马·杰列维扬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藏在衬衣袖子里和行李箱里的配发给他的伏特加。[\[37\]](#)

8月31日飞到厚木的罗伯特·C.理查德森将军说：“道路很糟，全部坑坑洼洼而且很窄。道路穿过种满庄稼的绿色乡野和几座村庄，一切都极其简陋而贫困。这些糟糕道路两侧的人都脏兮兮的——无论男女。”[\[38\]](#)他发现横滨是“一座死城——没有生命，没有商店，也没有动静——只是偶尔会有手推车或电车开过”。[\[39\]](#)

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将在第3舰队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这艘舰是由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命名的，用的是他老家的州名。这艘4.5万吨战列舰上的舰员们用水磨石把甲板打磨得连灰色防火漆下方的柚木都露了出来，所有铜件都被擦得像镜子那样亮，所有沾着油渍和生锈的地方都重新刷了漆。仪式的计划制订严格遵循海军礼仪和外交礼仪，精确到了

分钟。仪式将在右侧上甲板上举行，这里位于一座16英寸前主炮塔高大的钢质炮座旁的一小块三角形露台上。所有出席者都被指定了站立位置，并标记在了甲板上。访客和战争通讯员上舰后，护送的水兵们会引导他们来到指定的位置上。^[40]

9月2日这天，天气反常地寒冷，空中阴云密布。早上7点过后不久，盟国的高级将领和签字代表便开始陆续上舰。驱逐舰靠上“密苏里号”的左舷，访客随即通过舷梯来到战列舰上。舰上的乐队演奏了几个盟国的国歌。当尼米兹上将上舰后，军舰的桅顶降下了哈尔西的四星将旗，升起了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温赖特将军从未见过这种艾奥瓦级战列舰，张着嘴愣愣地看着那高大的上层建筑。“我真是无法相信会有那么大的东西，装那么多大炮，”他后来写道，“上面的火炮就像是一只巨大刺猬伸出的刺。”^[41]

麦克阿瑟一行人乘坐驱逐舰“布坎南号”来到了“密苏里号”上。这位盟军最高指挥官沿着右前方的舷梯上舰，在那里得到了尼米兹和哈尔西的迎接。他登上“密苏里号”后，桅顶升起了第二面三角形的五星将旗，高度和尼米兹的将旗相同。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海军礼仪规定，一艘军舰任何时候都只能升起一面将旗——以舰上的最高将领为准。但这本来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天，而且没人想要去冒犯麦克阿瑟那些幕僚敏感的内心。

尼米兹和哈尔西陪同麦克阿瑟来到哈尔西的住舱，三人在那里私聊了片刻。“米克”卡尼发现麦克阿瑟对哈尔西很熟悉，很友善，称他为“公牛”，对尼米兹则有些冷淡，显得更正式。^[42]麦克阿瑟躲进哈尔西的私人卫生间待了一会。“土佬”罗兹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见他在里面干呕，问他要不要我去请个医生来。他说他一会儿就好了。”^[43]几分钟后，他走到了能够俯瞰上甲板的阳台上。摄影记者们看见了他，向他打招呼，要他向自己这边看。麦克阿瑟摆了个姿势说：“好的，孩子们，拍这里。”^[44]

报道这场仪式的媒体人员数量极多，共有来自全世界的225名通讯员和75名摄影师参加，其中还包括了日本同盟社的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军舰右舷栏杆外临时搭建了一个媒体平台，那里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为了抢到更好的位置，不守规矩的新闻人员争先恐后地往前挤，甚至相互推搡起来。一名苏联报社的记者想要直接站到即将代表苏联签字的杰列维扬科将军身后。人家要他离开，他不干，说是有来自莫斯科的特别指示。于是斯图尔特·S.莫里上校找来两个强壮的水兵，抓着他的两只胳膊，把他往上拖了两层甲板，来到他的指定位置上。一些美国军官和外国高官被这一幕小插曲逗笑了，包括杰列维扬科将军，他哈哈大笑道：“好，好，好。”[\[45\]](#)

出席者各就各位后，一名通讯员注意到，在这块小小的露天甲板上站着的美军陆海军上将和中将比二战之前就任的所有上将和中将都要多。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的众多顶级人物都来了，包括特纳、麦凯恩、洛克伍德、拉福德、博根、托尔斯、两个谢尔曼、两个斯普拉格——但是没有斯普鲁恩斯和米彻尔，尼米兹要他们远离此地，防止此时有自杀机杀出来，把太平洋舰队的高级将领一锅端干净。代表海军陆战队的是盖格中将和两名准将。代表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是背靠巨大16英寸炮塔列队站立的卡其色方阵，站在前排的有克鲁格、艾克尔伯格、肯尼、斯帕茨、史迪威和理查德森一众陆军将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和消瘦憔悴的前战俘温赖特、珀西瓦尔站在一起，他们将在麦克阿瑟签字时直接站在他身后。胖墩墩的C.E.L.赫尔弗里赫将军身着白衣，代表荷兰签字；穿橄榄绿军服配黑色肩带的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签字；留着板刷胡子，头戴直筒高帽的雅克·勒克莱尔将军代表法国签字；代表英国签字的则是英国海军上将布鲁斯·弗雷泽爵士，他穿着像是小学生夏季校服的军常服，白色短衣短裤，白鞋子，白袜子提至膝盖处。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也出席了仪式。

在甲板中央摆放着一张从“密苏里号”水兵食堂里搬出来的桌子，铺着一块普通的绿呢桌布。桌上放着两份投降文件，以及几支黑色钢笔。

日本代表团由11名军政官员组成，为首的是代表帝国大本营的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以及在投降第二天才回到外务省（接替东乡）的外交大臣重光葵。他们的名字在日本国内是保密的，以防有人来刺杀他们。来到横滨码头后，他们穿过几道美军检查站，随后登上美军驱逐舰“兰斯多恩号”。在开往美军舰队中央的漫长航程中，舰员们和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接着日本代表团转乘一艘摩托快艇前往“密苏里号”。靠近巨舰，他们抬起头，看见一排排美国水兵在栏杆旁列队，一言不发地低眼看着他们。在一排端着枪的陆战队员的凝视下，日本人一个接一个登上了战列舰右舷的舷梯。梅津大将和其他日本军官向对方敬礼，但美国人没有回礼。外相重光葵许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炸弹袭击中丢掉了一条腿，他走路时要靠木头假肢，拄着拐杖。攀爬摇晃的舷梯对他来说漫长而缓慢，但是这个蹒跚的老者并没有获得舰员的同情。一名美军说他能听到“他在‘密苏里号’侧旁挣扎着向上爬的时候假肢触碰在每一级舷梯台阶上的声音”，还有一位战争通讯员留意到美国人“幸灾乐祸地”看着重光葵艰难向上爬。[\[46\]](#)

在露天甲板上，11名日本代表自行排成三列，立正等候。重光葵拄着拐杖站在代表团前方，他穿着传统的外交正装——黑色长礼服，条纹西裤，戴着白手套，头戴丝质高筒帽。梅津大将站在他左边，穿着一身橄榄绿军服，胸前挂着金穗和一排绶带。两人都低垂着双眼。重光的一名助理加濑俊一抬起头，看见每一处甲板、炮塔和栏杆旁的每一寸都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水兵们甚至爬到了“密苏里号”桅杆的平台和缆绳上。加濑在战列舰的烟囱上看到了一排排小小的旭日旗，每一面旗子都代表一架被这艘舰的高射炮摧毁的日军飞机。在舰长舱室侧壁上的显眼位置挂着一面玻璃镜框，里面是一面31星美国国旗，92年前，马修·佩里准将的“黑船”锚泊在这同一片水域时，飘扬着的就是这样的旗帜。

照相机快门咔嚓响个不停，但无人说话。日本人站在那里等待了仅仅四分钟，但这点时间却如同永远那么久。“千万只眼睛像千万支带火的利箭以疾风骤雨之势射向我们，”加濑写道，“我感到它们的锋芒深深

刺入体内，引起一阵肉体的剧痛。我从未意识到灼灼目光竟能带来这般痛楚。”[\[47\]](#)

时间很快到了9点，“密苏里号”的枪炮官双手拢在嘴边喊道：“全体立正！”麦克阿瑟走到甲板上，身后跟着尼米兹和哈尔西。三人快步走到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后面。他们都穿着卡其色军常服，没有打领带。一名战争通讯员发现麦克阿瑟的制服居然有些破旧：“裤脚磨破了，扣子扣到喉咙口的衬衫明显是旧的。他的胸前满是绶带和勋章，还有绣着五颗银星的领章，这都显示出这套军服的主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大头兵。”[\[48\]](#)这一身朴素的旧卡其色衬衫在身后一排穿着各种颜色整洁军服的盟国代表前十分显眼。

麦克阿瑟走到一排麦克风前。短暂停顿之后，他用缓慢而洪亮的语调开始讲话：

主要参战国的代表们，我们今日齐聚于此，缔结一项令和平得以恢复的庄严协定。不同理念与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世界战场上决出了胜负，所以我们无须再来讨论和争辩。我们在此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广大的人民，所以我们并非怀着猜疑、恶意以及仇恨的精神前来相见，而是要求我们胜败双方都更有尊严，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的，使我们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履行在此正式承担的职责。[\[49\]](#)

这位最高指挥官的词句很清晰，但他显然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他在读他自己准备的手稿时，双手都在激动地颤抖。[\[50\]](#)麦克阿瑟随后指着桌上的文件说道：“日本帝国政府和日本帝国军部的代表现在可以来签字了。”

一片沉寂中，重光拖着跛脚走上来，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加濑就站在他身旁。这位外相摘下帽子和手套放在桌上。随后发生了一个短暂

的意外，他看完两份投降协议，却不知道应该在哪里签字。重光的英语很流利，似乎没有理由出现这样的耽搁。哈尔西怀疑他是在拖时间，他甚至有一股冲动，想要上去打日本外相一记耳光，朝他吼道：“签，见鬼！签！”但他忍住了。^[51]最后麦克阿瑟转向萨瑟兰，甩出一句：“萨瑟兰，告诉他在哪儿签。”^[52]

萨瑟兰指向日本外相名字上方的横线。重光看了一眼加濑，后者看了看表，说现在是9时4分。于是日本外相挥了几笔，用汉字签下了他的名字，署上了时间。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重光站起身，回到位置上，接着梅津大将快步上前，眼光躲避着麦克阿瑟和其他所有盟军将领。他没有坐下来。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笔，趴在桌子上签了字，随后迅速走回位置立正，双眼依旧低垂。有目击者看到站在梅津身后的一名日本军官眼里流出了泪水。

麦克阿瑟示意温赖特和珀西瓦尔上前，然后自己在桌旁就座。他从口袋里掏出6支钢笔，放在桌子上。他写下了几个字母，随即放下笔，转向温赖特，把笔送给了他，接着又拿起另一支笔签了几个字母，随后把笔送给了珀西瓦尔。他用剩下四支笔签完了名字，这些笔后来会被他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国内的不同友人。一名记者发现，麦克阿瑟在签名的时候，手都激动得发抖。^[53]

接着，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签字。他看起来也一样紧张和激动，他后来对一个朋友说：“我激动得发抖，抖得厉害，几乎写不出我的名字。”^[54]

盟国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签下了名字：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以及新西兰。

最后，麦克阿瑟回到麦克风旁说道：“现在，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祷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当麦克阿瑟和其他盟军高级将领回到哈尔西的舱室享用咖啡和桂皮

卷时，重光外相和加濑俊一走上前去查看投降文件的日文版。他们发现一位签字代表，加拿大的L.穆尔·科斯格雷夫签错了行，后面三位盟国代表也都跟着科斯格雷夫向下签错了一行，这样他们的签名和印在签字栏上的名字就对不上了。重光和加濑查看文件时，萨瑟兰将军和其他几位美军军官围了过去。最后，萨瑟兰坐下来，拿起一支笔，把印上去的盟国代表名字划掉，在签错位置的名字下方重新写上正确的名字。萨瑟兰后来说，这么一改，这份文件就有瑕疵了，但是他觉得“终归没几个人会看到它，因为它很可能被埋藏在最机密的档案柜子里的最深处”。[\[55\]](#)

当日本人走下舷梯，来到等候在那里的摩托艇上时，南方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当嗡嗡声逐渐变成雷鸣般的轰响时，他们抬起头。100架B-29排成相等间距的队形，在云底之下，从他们头上低空隆隆飞过。接着又飞来一支450架舰载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那是来自第38特混舰队的“地狱猫”和“海盗”。舰载机从东边飞来，航线与B-29机群垂直相交，然后继续飞过横滨和东京。舰载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到400英尺，几乎就在桅顶高度，比“超级堡垒”飞得更低。

空中分列式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太响了，“密苏里号”甲板上的人不得不提高音量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米克”卡尼称其为“一场精彩的表演，太过瘾了”，还说那大规模的空中分列式“肯定会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止步不前”。[\[56\]](#)

盟军涌入了这个被打败的国家，指定了14个主要占领区，覆盖了从南方的九州岛到北方的北海道岛，包括所有城市和工业区，所有陆海军基地，所有重要的战略性水道和沿岸港口。在大部分占领区，都会由先锋先行空运抵达，占领一处能够稳定起降货运飞机的机场，再和附近的港口建立联系，这样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就能从海路过来。“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三天后，第1骑兵师和第11军的重装甲前进巡逻队开进了东京，占领了主要道路和桥梁，准备迎接9月8日占领军主力的到来。到1945年9月底，美国第8集团军已有总共232 379人进入日本中部和北

部，包括整个大东京地区和关东平原，同时美国第6集团军也开始向本州岛南部余下的大阪—京都—神户地区和四国岛进行空运。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在大阪湾入口处的和歌山上岸，两天后在京都正式投入运作。第2陆战师和第5陆战师分别在九州岛的佐世保和长崎登陆，随后在地面上推进，占领了日本南部这座大岛上所有的港口和城市。在对日占领的高峰期，进驻日本的盟军部队将超过70万人。[\[57\]](#)

在许多偏远地区，占领军只有一点象征性的兵力，假使日军中那些不听话的极端分子决定一战，这些占领军很快就会被消灭。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提交的一份报告称，对日占领“虽然有备而来，但仍是一场军事大赌博”。[\[58\]](#)美国人赌天皇的意志和权威能够在精神上降住日本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这场豪赌收获了奇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甚至没人向盟国占领军开过一枪。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之突然、之彻底，令人猝不及防。就在三四个星期前，日本人还在准备用竹枪和菜刀迎战入侵者。现在他们却如同对待贵宾般对新来者报以鞠躬和笑脸。

美国陆军中士理查德·伦纳德于9月11日在和歌山上岸。他的排是乘坐希金斯登陆艇突击上陆的。涉水上岸时，他们的枪都上了膛，但是手无寸铁的日本老百姓却带着热情的笑容欢迎了他们，小贩还向他们兜售小饰物和纪念品。来自巡洋舰“蒙彼利埃号”的水兵詹姆斯·费伊第二天在神户附近上岸，他和同一艘舰上的几名战友步行探索了这片区域。日本人好奇地看着他们，但是并无惧怕或敌对之意。一排挖甘薯的妇女被这些美国水兵奇怪的身高逗乐了——在她们眼里美国人太高了。“我们和她们一起笑了起来，”费伊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很愉快。他们很友好。”[\[59\]](#)

占领军和日本人都接到警告，互相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两边似乎都没几个人搭理这条禁令。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子邀请费伊和另一名水兵到自己家里做客，见见他的家人。费伊如此描述这一次拜访：“他们的家很漂亮。我看得出他们都是好人。一间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漂亮的大桌

子和一台收音机。他们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的画像。对他们而言，他就是神。离开时我们握了手，挥手道别。”作为经历了许多次海上恶战和“神风”攻击的老兵，费伊惊讶地发现这些普通日本人都那么诚实而勤奋，“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别无二致”。^[60]伦纳德中士对此表示赞同。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说“普通日本人也和你我一样不会去想‘统治世界’那样的事情。他只是普通的木偶，参加战争只是因为别人要他这么做，而且别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61]战争中，伦纳德恨透了日本人，恨他们所有人，但是现在，他发现这种感觉已如同半梦半醒时的梦境一般渐渐消散：

我本来是个生性多疑之人，但是我应该去恨谁？我在火车启动前卖给一个男孩一包烟，他为了把烟钱交给我，追着我的火车窗户跑了50码，我能恨他吗？有个老者请我们到他家里共进晚餐，还把传家宝送给我们做纪念品，我能恨他吗？在大街上跑过来抱住我的孩子们，我能恨他们吗？难道恨那个有一天晚上绕了几英里远路送我回家的日本卡车司机？或者是那个跑过来把她唯一的布娃娃送给我做礼物的（大约4岁的）小女孩？我的答案是，我做不到。^[62]

日本人也是一样，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天性良善而礼貌后，他们也长舒了一口气。那些要接收占领军第一批先头部队的社区原本都很害怕。老百姓仍然受到战时宣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海外的日本军队都干了些什么——觉得自己将会遭到虐待、劫掠、屠杀和强暴。^[63]许多妇女和女孩子都逃到了遥远的山村。另一些女性则躲在屋里，藏起来，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往脸上抹煤灰，把自己扮丑。有人甚至身携利刃，随时准备割脉自杀。当美军士兵第一次出现在东京以北的宫城县时，一群被疏散的小学生躲在自己的宿舍里，从窗户纸上的洞里向外看。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不会是人类。“我们觉得，‘他们肯定长着角！’”有人回忆道，“我们都想象着会看到头上长着角的凶恶魔鬼。

当然，我们失望了。他们根本没长角。”^[64]有些小男孩跑了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拿着巧克力棒回来了。

日本人注意到了美国人的小善举。在电车里，美国人常常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孕妇和老人，这种习惯在日本还不太常见。他们发现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更加随和，军官和士官们不会殴打下级。美国大兵们天生喜欢小孩子，孩子们很快发现向这些新来者要东西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说：“Gibu me candy”（给我糖），或者“Gibu me chocolate”（给我巧克力）^[65]。^[66]一名日本妇女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一名调查员：“下雨时，美国的汽车会尽力避免把泥水溅到路人身上，我很感激。”^[67]一个在东京的狭窄街道上拉车的人被一辆迎面开来的美军卡车堵住了。“他们把卡车停了下来，把我的小车抬到了卡车另一边，”这个人讲述道，“他们笑着和我说再见，然后走了。我泪流满面。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不是吗？说来可笑，当我再次拉起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68]

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将会被要求供养占领军。在日军侵占的外国土地上，向被占区的老百姓征粮是标准做法。但是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加之预计占领军会来大吃特吃，大规模的饥荒看起来就要不可避免了。投降后，农业省和经济委员会的官员们发出警告，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将远远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冬天的最低需要。但是8月18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宣布，占领军将自行解决给养问题。^[69]实际上，占领军还会常常拿出粮食来给当地百姓解危救难，其中许多都是出于善心的非官方行为或专门的慈善行为。在横须贺军港，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人就给当地百姓送来了“20卡车的面粉、燕麦片、罐头食品和大米”，第二天，又有11辆装着“医疗物资、毯子、茶叶和其他东西”的卡车开了过来。^[70]在东京南边的一座陆军兵营，铁丝网围栏上出现了几张饥饿的小脸。老规矩，士兵们把吃的拿给了这些小孩。消息不胫而走，更多的人跑了过来，到最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妇女和儿童在兵营大门口排成长队，士兵们则把罐装C型口粮装在粗麻袋里送出来，他们的指

挥官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在东京的一个社区，美国人向市民分发固体酒精，但是这种便携式烹煮罐的功能和用途却遭遇了语言障碍。拿到东西的人打开罐子，把这些燃料倒进嘴里，一阵恶心之后吐出来，说美国人想要毒死他们。这一说法很快不攻自破，有个认识一点英语的街坊发现罐子上原本就写着“poison”（有毒）。最后，一个日裔美籍妇女化解了误会。“他们看着我把火柴伸向罐子时都一脸敬畏！”她说，“这里燃料很紧缺，当人们知道怎么用固体酒精的时候，他们都很感激能得到它。”^[71]

占领军也不总是彬彬有礼，遵纪守法。深仇宿怨很难消退干净。占领军中的很多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都是参加过太平洋上残酷岛屿作战的老兵。有些人觉得以前的敌人表现出的善意十分古怪而且令人不安，因而拒绝信任。获救战俘的悲惨状况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占领军军人在日本也犯下了不少罪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杀人。但是这些罪行却很难统计，因为占领当局不允许报纸报道这些事情，也未保留其内部军法审判的详情。（对日占领的史料对此很少予以关注，美国档案中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为了减少性犯罪，日本政府甚至建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下层社会女性到横须贺和其他基地附近的妓院里充当妓女。美国当局也认可了这种设施，甚至还允许军医去为这些女性检查身体（他们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也做过这种工作）。^[72]

看到日本女人和占领军官兵出双入对，许多日本人都极为愤慨。他们把这些涂着亮红色口红，穿着尼龙丝袜和高跟鞋，常常和美国军人一同坐在吉普和卡车上的日本女孩称为“青楼女子”。在被占领之初那艰难困苦的几年里，她们吃得、过得显然比其他日本人都要好。

据艾克尔伯格将军说，他的第8集团军部队只遭到过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位于横滨和东京之间的山田，一群联防队员不让未执勤的美军进入。两个美军还被绑起来揍了一顿。艾克尔伯格下令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装甲车辆组成战斗队形，在山田的街上巡逻了几个小时”。

肇事者也被抓起来扔进了监牢。^[73]

但是这种事无论在占领军还是日本人眼里都被视为偶然而非常态。总的来说，日本人欣然接受了战败，而且尽可能从中获益。日本政府原有各部门都还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监督之下继续运转。日本军队也接受了占领军的管理，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和怨恨。军官们心甘情愿地配合让自己的部队复员的工作，并销毁残余的飞机、弹药和枪炮。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日本海军的原为一大佐回忆说，当他在9月23日把九州岛的一处自杀快艇基地移交给一名美国海军上校时，“这名美国上校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征服者，这令我感到吃惊”。^[74]例外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同一天在近旁的长崎港，一艘日本海防舰的舰长“以粗暴和挑衅的态度”对待一支美国海军代表团。这件事被报上去之后，这名闹事者被逮捕，赶出了日本海军，这表明当局已经决意要加强双方的配合。^[75]对日占领的初始阶段，一切都如此顺利，于是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之后不到一个月，麦克阿瑟将军便宣布盟国军队在日本的数量将于1946年7月下降至20万人。^[76]

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敌人良善而且值得尊敬之后，日本人在感到惊讶和轻松的同时，另一种感觉也油然而生。普通日本人突然开始意识到他们被自己的领导人骗得有多么彻底。战时的宣传言犹在耳——他们很难忘掉——但现在看来，那简直是愚不可及。《波茨坦公告》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这个国家必须彻底清除“穷兵黩武主义”。^[77]无论他们的战后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日本人民都会自己来满足这一条件。战时的那些军政府领导人遭到了广泛的鄙视。这种态度甚至在投降之前便已扩散开来，只不过畏于镇压而从未公开表达出来而已。现在，它们都浮出了水面——那是对战争以及把日本拖入战争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而源于本能的深刻憎恨。“我恨军人，”畑中繁雄说，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另一个人种。军人们会在特殊场合穿上礼服，但脑子里充满幼稚的想法，思维简单。”^[78]随着日军士兵从

海外回来，许多普通老百姓第一次知道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争罪行。一个年轻女孩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冷漠地谈论着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笑嘻嘻地聊他们强奸过的女人的数量。她为自己原先支持战争的想法感到恐慌：“现在我受不了这样想了。”^[79]正如寺崎英成的妻子格温观察的那样，“现在，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日本人不仅意识到了军国主义者是多么疯狂，也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无知才会信任这伙人。幻灭感令他们痛彻骨髓”。^[80]

回顾这场刚刚输掉的战争，日本领导人也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哀叹。被人问及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时，米内大将答道：“坦白地说，我觉得开战便是转折点。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毫无胜算……我至今仍然认为，鉴于当时的局势，我国的战争实力，那样的计划并不合适。”^[81]1945年秋季，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许多日本领导人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1941年12月，他们进攻美国和盟国的致命决定是基于一系列错误的假设而做出的。他们以为战争可以速胜，从而避免让美国的经济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持久消耗战。他们还以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英国和苏联将在德国的铁蹄下臣服；以为连接日本和马来群岛石油产地的海运线能够免遭潜艇攻击和空袭；以为美国海军舰队主力将会闯入西太平洋，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中被歼灭，让日本海军重现在1905年对马海战中取得的大捷。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有神圣天皇的指引，有千古诸神的庇佑，肩负着统治亚洲的神圣使命。由于对美国文化和民主的浅薄思维定式，日本人错估了对手的血性和勇气。他们觉得美国人不愿意在地球另一端打一场持久、血腥的战争。觉得自己的敌人被优越的生活变得软弱而颓废，毫无希望地沉迷于灯红酒绿。美国是个大杂烩，移民国家，缺乏凝聚力，没有高尚的追求，被种族、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内斗拖累得虚弱无比。美国女人都有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会施加政治影响，抵制把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派到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去

打仗。美国经济体量虽大，实力虽强，但若无法进行战争动员，那也没有意义，而且寡头资本家也不会愿意去改造他们原本利润丰厚的产业。袭击珍珠港就是为了打击美国民众的士气，面对如此灾难，资本家们的反应将会是迫使华盛顿求和。“我们以为我们能轻松搞定他们，”一名日本高级将领后来承认道，“一个如此深陷物质享受，一心追求欢愉的种族，在精神上是堕落的。”^[82]

如果这些假设都没错，日本就会打赢太平洋战争，或许今天已经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了。哪怕只有一部分假设正确，日本或许也不至于沦落到为了保持主权完整而痛苦挣扎的地步，甚至还可能保留一部分海外占领区。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假设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米内大将和其他人参透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本的战败甚至在1941年12月便已可清楚预见。更糟的是，有些默许发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的人，也在一开始就预见到甚至预言它会失败。这样看来，太平洋战争其实是东京政治失败的产物——这种灾难性的失败，是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当日本武士阶级的精英第一次想要让他们封闭而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他们就知道自己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油和其他日本本土缺乏的自然资源。对外贸易满足了这种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和美国、英国、荷兰及其在亚洲的控制区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1940年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一基本经济环境，却还是选择和欧洲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它们不仅不是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而且还已经（或者即将）和向日本出口这些物资的国家开战，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致命打击。换言之，东京选择了和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敌，却和对自己固有的物资短缺毫无益处的国家结盟，从而导致了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在原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被贸易封锁切断后，日本政府又错上加错，向在东南亚实力虚弱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潜在工业军事实力至少是日本十倍

的国家（美国）发动进攻。

明治宪法为陆军和海军赋予了特权，将他们放在可以直接向天皇进言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天皇则拥有指挥武装部队的广泛权力。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天皇的权力已经被诸多法律先例一再削弱。（如果有一个比裕仁更强势的人在位，或许能把国家之船带入安全水域，但我们对此只能是猜测。）两大军种不仅主导着自己的资金预算和政策，其霸权甚至还伸向了国家的民政事务。不得到陆军和海军的共同认可，便不能组建内阁，也不能任命首相，这种认可还能随时撤回，导致政府垮台。但日本却没有能够解决两大军种之间争议的机制，而且除非陆海两军观点一致，否则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核心权力层的决策被达成共识的需要所左右，而两大军种自己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时最容易达成共识。日本政府的这一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变得代价更为高昂，陆海两军的内部竞争变得愈加激烈，他们都想要在经费和关键原材料的争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样，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也受制于军种之间争夺预算的目的。

几十年来，日本海军一直把美国当作他们制订计划时的“假想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找美国打一仗或是预计会与美国开战，而是因为这样对他们争夺预算有好处。海军制订“南进”攻取东印度群岛的战争计划，其主要原因是有这样一套计划才有理由建设一支大规模舰队。当1940年和1941年遭遇危机时，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在太平洋上开战，但他们却不能这么说，怕陆军会把对预算和原材料的控制权抢走。不过，大将们并不一定是海军中最重要的决策者。措施和决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军令部或海军省中那些中层军官精英的摆布，而这些人鲁莽地想要把日本拖入战争。这些年轻的鹰派中佐和大佐会编造各种估算和统计结果来支持发动战争的提案，并迫使他们的上级对其信以为真。那些逻辑合理的反对意见则会被吼回去。当负责战争动员的海军少将警告说日本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对美开战时，一名大佐哭求道：“这样的估算会让我们打不成仗的！”^[83]不知何

故，海军将领们无法承受那些不守规矩的惹事下级“近乎威胁的施压”。^[84]他们被裹挟在了宿命论、一厢情愿和狂热好战交织而成的潮流之中。“许多人从最开始就知道，向盎格鲁-撒克逊人开战是非常不明智的，”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如是说，“但情势就这么发展了下去，他们身不由己地滑向了战争。”^[85]福留繁将军后来觉得，决定开战的整个过程“十分奇怪”。他回忆道：“当我们面对面私聊的时候，我们[海军领导层]全都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当我们开会时，结论却总是一步步地指向战争。”^[86]

在反对对美开战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总是反复向他的同僚强调这一点。他警告说，日本没有任何希望征服并控制美国，但美国征服并控制日本却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赌徒，山本意识到此举的风险收益比是十分不划算的。1941年之前，日本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向全亚洲的鲸吞蚕食面前守住了自己的独立和政治自主权。而选择对美开战时，日本人却押上了这最宝贵的财富——独立和自主——去赌那可疑的未来收益，即征服和统治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战争以日本人的海空两栖闪击战拉开了序幕，他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里的美国战列舰队，歼灭了菲律宾的美军航空兵和马来亚的英军航空兵，击沉了两艘在海上做足了战斗准备的英国战列舰，席卷了属于美国的威克岛和关岛，在爪哇海消灭了盟国舰队，将英国人赶出了中国香港和缅甸，将麦克阿瑟的部队围困在了巴丹半岛，在新加坡俘虏了7.5万英军，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下了炸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似乎佐证了把日本带入战争的那些假设，让反对者闭了嘴，却也让尽早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失去了可能。日本人证明了自己是远比西方人原先想象中更强大的敌人，但是进攻之初的惊人胜利更多还是因为盟军在当地的力量弱于日军。在日本国内，这些早期胜利被大肆宣扬，但是随后战局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逆转却被小心掩盖了起来，公众无法得知，实际上除了军事高层圈子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这些事。在1942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日本的海军航空兵遭到了惨重打击而且再未真正恢复；舰船

损失严重而且无法弥补，日本陆军也在瓜岛上丢掉了差不多3万人。日本海军的作战行动常常缺乏弹性而且可预测，美军也发现他们缺乏适应性并开始加以利用。许多一线军官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但是僵硬的指挥习惯已经令日本海军深陷其中。三个世纪前，著名的日本兵法家宫本武藏就指出要善于应变，他称其为“山海相易”。

“山海相易”的含义是，不要反复做同样的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对敌人使出招数时，如果第一次使用未奏效，那么再试几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彻底改变你的战术，改弦易辙。如果还不奏效，那就继续想别的办法。

因此兵法讲究“敌如山则我如海，敌如海则我如山”。这需要深思熟虑。[\[87\]](#)

到1942年底，美国经济的工业—军事实力已经体现在了战场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从所罗门群岛开始，沿着岛链向西北方推进，在1944年2月越过了日军在当地最强大的堡垒拉包尔。据一名日本情报官估算，进攻盟军跳过了17座日占岛屿，将16万日军丢在了自己后方。没有一个被越过的岛屿上的守军能够完全撤回来，因此只能把他们留在岛上自生自灭，后面的战争中他们也就发挥不出作用了，其中大约1/4的人后来死于饥饿或热带疾病。[\[88\]](#)日本人对于这种越岛战略无计可施，对此恨之入骨，却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在北边同步展开的，沿着中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向西推进的另一路进攻则更具决定性。美国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至20日）中的胜利使日本航母航空兵遭遇不可逆转的彻底失败，而对塞班岛和关岛的占领则为新服役的B-29“超级堡垒”提供了足以打击东京和关东平原的机场。1944年6月至7月间的这些战局已经决定了日本最终的战略失败，而无论后续战役战况如何。

如果太平洋战争是一场高手之间的棋局，那就不必下到最后。一旦

胜负已定，任何一个高手都会觉得没必要再下下去了。一旦预见到他的“王”很快就会被吃掉，日方棋手就应该弃子认输，和对手握手言欢了。但这是战争，不是下棋，而且日本的情况使其直到败局已定的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去议和。这样，在1945年8月棋局结束之前，还有150万日本军民如同牲口一般成为祭品。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亡的这150万人，占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89\]](#)

然而，即便在这最后一年的战争中，日本军队仍然展现出了十足的勇气和胆量，时不时还会打出漂亮仗来。日本陆军已经基本不再向纪律严明、武器精良而且工事坚固的盟军部队发动代价高昂的大规模刺刀冲锋。尤其是在佩里硫、硫黄岛和冲绳岛上，日本陆军充分发扬了其天才的地下防御工事或曰“蜂巢阵地”的优势，大大抵消了美军在炮火和空中力量上的优势。日本海军也造出了一批新型战斗机，这些飞机在其残存的精锐王牌飞行员手中足以匹敌美军的“地狱猫”、“海盗”和“闪电”——只不过这种飞行员的数量已经不足以逆转战争大势。带着胜利者的洒脱，盟军航空专家还乐于承认日本川西公司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水上侦察机。“神风”自杀攻击为日本所特有，也只有在那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但是从战术上说，这些自杀机更像是未来的武器，它让日本人得以提前用上了制导导弹，而此时任何其他参战国都还没有这种武器，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战败后，日本人筋疲力尽，厌倦了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未来普遍充满忧虑。民众固然不用再担心政府来镇压自己了，但是另一方面，战后的生活和战时并无太大差别。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让日本骤然繁荣，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奇迹”。此时，腐败问题随处可见，陆海军军官会把大量军用物资偷出来，拿到黑市上去卖。当回国军人从各地港口涌入日本时，大批在1944年至1945年间离开城市的难民也掀起了回城潮——这样的难民大约有1 000万人，或者说每7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回流到被炸毁的城市。“我们每天的生活

充满了艰辛和无法预知的危险，”竹山道雄在1945年秋季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找不到方向。过一天算一天，挣多少吃多少，这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90]

对战争的记忆已经淡去，一种沉默和遗忘的文化在战后的日本扎下了根。1947年，一名日本记者称，1942年就如同30年前那般遥远。^[91]在城市中，废墟被装在大车里拖走，灰烬上建起了新的高楼大厦，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整个社区都曾被烧成平地。然而，家家户户都把小房间或者壁龛布置成了小祭台，家人们在这里怀念自己死去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小祭台上摆放着照片和海外寄来的信件，烧着香，还有一个木质骨灰盒——如果他们能收到骨灰的话。但这些都是极为私密的行为。井上仁志表示，他不想去回忆那些可恨的陈年旧事。他无疑说出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太平洋战争老兵的心声。当他从脑海中搜寻这些回忆时，井上更愿意自己一个人静静沉思。他觉得这些回忆不应该公之于众，不该成为集体共有的记忆，当然也不应该公开讨论或者在学校里教给学生：“我们谁能没有些不愿回忆的事情呢？或多或少都有吧。我们不想让别人来揭我们的旧伤疤。”^[92]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住在东京的一位老人说他一直在努力忘掉战争，但可怕的回忆还是会不时浮出脑海——当他在银座漫步时，“我看到某个地方后突然会想，‘轰炸时我就躲在这堵墙旁边’”。^[93]

关于这场战争，大部分日本人都只记得是日本遭遇了一场悲剧，却不记得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蓄意发起了这场巨大的恶行。关于战争责任和自我反思的话题通常是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许多日本人觉得，战争罪的事情已经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织的东京审判、终战条约以及重组日本政权清算过了。战后的审判法庭已经对甲、乙、丙三级战犯定了罪，日本人便相信罪犯们已经受到了正义的惩罚，普罗大众也就不再有什么战争责任了。时至今日，当论及战争责任及其带来的灾难时，许多日本人仍然倾向于拿战后的审判来回应，强调官方行为、政府声明或者条约条款。在日本公众看来，这个国家的动机是好的，日本军队犯下的

战争罪行固然可恶，但并不甚于其他国家的罪行，而且日本的战败是有价值的牺牲，因为它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中解放出来。有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宣称日本是别无选择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打破盟国的“包围”，事关国家存亡。1945年8月，当天皇的“玉音”通过广播传开时，整个国家突然做出了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的180°大转弯。那些曾经支持战时政府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把自己的旧作藏进了档案柜，或者付之一炬，一切重新开始。那些原本在课堂上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老师现在宣布：“从此往后是民主的时代了。”^[94]老师会要求学生打开课本，把会惹麻烦的书页撕掉或者用墨水涂掉。能在这些原本必须顶礼膜拜的教科书上乱涂乱画，这可是个新鲜事，许多小孩子都兴高采烈。^[95]原本要拿去造飞机的杜拉铝（一种硬质铝合金）现在被批发到了黑市上，卖给工厂重新做成消费品。过去说铸剑为犁，现在是铸三菱零战为簸箕和锅碗瓢盆。^[96]

在占领期间，麦克阿瑟的诸多政策强化乃至激发了日本人普遍存在的遗忘症。按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日本公共部门未对战争历史遗迹做任何系统性的保留——没有纪念物，教科书里不提此事，也没有国家博物馆。把裕仁留在皇位上作为国家象征和尊崇对象（如果说不再是崇拜的话）的决定，带来了一种连续感。赦免天皇，看起来只是为了方便占领和在亚洲建立对抗苏联的堡垒所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批评天皇在战后的日本是被严格禁止的——被称为“菊禁”（chrysanthemum taboo，菊タブー）——日本的上层民意也认可他只是被军国主义者阴谋控制了橡皮图章而已。他治下的日本年号继续被称为“昭和”，直至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为止。

此时，距离马修·佩里准将的“黑船”开进东京湾，强迫不情愿的日本人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仅仅过去了92年。92年，不足一个世纪，长寿的人活过这么久也不稀奇。1945年，年纪最大的日本人还能记得自己儿时以德川幕府治下的生活，那时候统治国家的还是武士，他们身穿漆甲，用武士刀和长矛作战。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经历了历史性的剧

变。他们一往无前地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他们的陆海军成了在全世界都令人生畏的力量，并令一些原本领先的西方国家遭受了耻辱的失败。在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下，他们出动大批军队和舰队，横行亚洲和太平洋，给整个区域带来苦难，使他们在邻国眼中变得可耻。噩梦以日本的彻底战败而告终。未来将会如何？躲在白头鹰的翼下，日本如何才能振兴？1945年时无人知道这一点，或许真正的答案还要再等92年才能揭晓。

从阿留申到新几内亚，从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到菲律宾的绿色丛林，在一处又一处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所罗门、吉尔伯特、阿德默勒蒂、马绍尔、俾斯麦、帕劳、东印度、马里亚纳、琉球、小笠原群岛，以及火山列岛——登陆滩头都是一片狼藉。锈迹斑斑、满身弹孔的登陆车艇被丢在浅水中或半埋在沙地上，任由海水冲刷。往内陆走几步，在树林边上，断裂、熏黑、炸碎的棕榈树干倒在地上，如同火柴棍般散落一地。在被摧毁的火炮阵地和碉堡里，钢筋歪歪斜斜地扭曲着，上面耷拉着破碎的混凝土预制板。废弃的散兵坑和暗堡成了老鼠、蛇和蜥蜴的家园。军人们丢弃的杂物散落在灌木丛下，堆在沟底：有口粮罐，用过的纸箱，血浆瓶，弹药箱，背包，水壶，担架，铲子，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东西——其中有些会被清洁人员扫走，有些被当作纪念品捡走，有些被当地人拿走，还有一些则会被时光逐渐掩埋，就像古代的化石那样。

在天气炎热、草木繁茂的南太平洋岛群上，密林很快会宣示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不到一年，藤蔓就会爬满那些锈迹斑斑的推土机、坦克、大炮。最终，绿色植物将彻底吞没这些战争遗迹。损毁飞机的残骸散落在被废弃的跑道旁——有斜倒在地的，有底朝天的，有机翼和尾翼被拆下来的，乱作一团，油漆和机徽在日光的照射下逐渐褪色。在众多潟湖和锚地中，人们能看到数百艘生了锈，漏了油，满身盐渍的船壳：有运输船、油轮、辅助船，以及设计时候就没打算用太久的移动干船

坞，它们在二手市场上不值什么钱。这些废船中有些会被拖回去拆卖，废旧金属再利用；有些会被拖到大洋上自沉；其他的就这么遗弃在锚地里。马绍尔群岛的有些这种破船还被当作核武器试验的靶标。

许多岛上都有军人墓地——长长几排整齐的白色十字架，间或还能看到大卫之星。有些十字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头盔或其他纪念物，充当标记。在那些大规模的战场上，死者送来得太多太快，掩埋组来不及处理，这样死者有时就会被集中埋进大公墓里，这是推土机草草挖出的长沟，只插着一个大墓碑，写着埋葬日期。战死者的“狗牌”都会被取下，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每个死者的位置会被记下来。大部分埋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军人后来都会依照他们直系亲属的意愿而迁葬到另一处最终的安息之地：要么是海外的某处永久性军人公墓，要么是美国国内的国家公墓，要么是死者家乡的私人墓地。在全世界的279 867名阵亡美军中，171 539人的家属要求将其遗骨迁回美国。^[97]其余大部分也都进行了迁葬，至少迁葬了一次，有时是两次，迁移到国外的永久性大型墓园中。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其他所有军事领域的行动一样，这些迁葬工作的规模也很大。这项工作交给了美国陆军军需办公室的墓地登记处（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缩写GRS），其在高峰时雇用了1.8万军民。挖开战场坟墓时，墓地登记处的工人们都戴着面具和覆盖到胳膊肘的厚重的橡胶手套或皮革手套。他们会使用锅铲式的大铲子，把遗体从土里铲出来，翻到打开的帆布裹尸袋里，然后拉上袋子的拉链，用绳子将其拖到地面上。人们发现这套做法最为高效，而且最能保证士气，因为这样可以让迁葬组的工人们“不会沾到腐肉和液化的遗骸”。^[98]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人都会把当天的衣服烧掉，第二天再换一套新制服。在冲绳，美军墓园非常大，标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此常常需要打开多个墓园才能找到某一个人。根据墓地登记处的资料，有一次，他们“打开了84个墓地，只为了找一个不知道埋葬位置的人”。^[99]如此，迁葬组的许多人都患上后来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综合征，也就不让人感

到意外了。

据权威资料，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死者总数为111 606人，包括31 157名美国海军官兵。其中大部分人都长眠于“戴维·琼斯的柜子”^[100]里，迁葬组无法触及，永恒的蓝色大海就是他们的墓地。^[101]

活着的人自然一心想着回家，越快越好。他们的家人也一样盼着他们回来。在华盛顿，白宫大门外每天早上都有人示威，要求把自己的丈夫、儿子、父亲送回来。信件也如雪片般飞向国会。有些美国人想要立刻停止征兵——但是其他一些人，包括那些仍然穿着军装的人，则游说政府扩大和平时期的征兵规模，这样替换的部队就可以派往海外，让那些老兵尽快回家。^[102]眼见战后的种种威胁——苏联、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各种问题——正在东亚逐步显现，美国军队领导人提出警告，不要草率撤出亚洲，以防破坏这一区域的稳定。但是那些平民出身的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归自己的生活中去。正如太平洋上一名基层海军军官所言：“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应该立即回家，而且应该比其他人都更早回家，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不准我们这样做。”^[103]

关于退伍的优先顺序，美军是有硬性规定的。那些“点数”最高的军人将被第一批运回去。“点数”是根据多个不同变量计算出来的，包括年龄、服役时间、海外服役时间、参战天数，以及所获荣誉的数量和类型。已婚军人会增加一些点数，如果是当了爸爸的，那么每个孩子也都会有一些点数。塞缪尔·海因斯写道，那是个“足够理想的体系，没人抱怨。我们只要算自己的分数，排出离开的顺序，然后等着就行了”。^[104]但是这样一来，第一批回国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是那些更年长、更富有经验的老兵，包括许多士官。他们的突然离开使得战斗部队在各个层级上都失去了领导核心和作战经验。野战部队和特混舰队指挥官不愿让他们最富经验的老将就这么走掉，因此想方设法钻空子把他们留下来。规则允许各地指挥官出于军事需要而对某些关键人员的退伍进

行“冻结”。但这种冻结很不受欢迎，还在华盛顿引发了抗议。于是金上将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这种做法。1945年9月，他向所有海军舰船和基地发出了一份命令：“所有指挥官应当立即重新考虑所有达到退伍点数却基于‘军事需要’而被留下来的人的情况。如继续留用这些人，应当只基于对‘军事需要’一词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解读。”[\[105\]](#)

在太平洋上指挥一支航母特混大队的拉福德将军担心仓促的复员可能会给美国军队留下“一地鸡毛”，这一情况可能会被苏联所利用。在华盛顿，海军部长吉姆·福莱斯特警告杜鲁门总统，如果继续以这种不管不顾的速度复员军队，“那么陆军和海军都将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人员来维持其有效运行”。[\[106\]](#) 乔治·C.马歇尔将军对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不叫复员，这叫溃散。”[\[107\]](#)

即便是那些达到足够点数的人也没法确保很快回家。大部分官兵还不得不继续等候，有时要等几个星期，才能在东行的船上得到一张铺位。华盛顿原本预计在德国崩溃后，太平洋战争还将再持续9个月，而日本的突然投降令他们的复员计划变成一团乱麻。许多军队复员所需的船运资源都被投向了大西洋。虽有数百架道格拉斯C-54和C-47运输机在东京、关岛、冲绳、吕宋、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飞例行航班，但那些座位要留给将军们、战争通讯员、有关系的下级军官，以及重要的平民。在太平洋各处，中转兵营里挤满了无所事事的军人。在横须贺，一座飞机库里架设了800张吊床，人们排成长队领取被单、枕头和毯子。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就混住在这个又大又空旷的地方，直到命令下来让他们登船离开为止。在码头上，懊恼的人们即使没有接到命令，也想方设法要溜到一艘船上，有些人还成功了。据一名陆战队军官说，这种开小差的人大部分不会被追究，只是“随他们去”。[\[108\]](#)

在大复员的一片混乱中，腐败也油然而生。查尔斯·麦坎德利斯是一名“海蜂”军官，在马尼拉，一名文书长对他说，还有100个人在等自己的复员文件，因此麦坎德利斯需要等待。“我问他，给他100美元行不行。他说，给150美元，第二天就能拿到命令，我可以次日上午再

来。”于是麦坎德利斯付了贿款，拿到了需要的文件。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向运输指挥部的一个人付了100美元，在一艘离开的船上得到了铺位。[\[109\]](#)

在—项被称为“魔毯”的行动中，战争海运管理处匆忙改造了546艘自由轮和胜利轮，以接运回国的老兵。[\[110\]](#)污水横流的不透气货舱里架起了木质上下铺，最高能达到9层。那些回国的军舰，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坦克登陆舰，都被拿来充作临时运兵船。航空母舰把舰载机转移到岸上，在机库里装了上下铺。每艘回国的军舰都带上了人——有些装数百人，还有的则装数千人。旧金山是太平洋老兵回国时走得最多的港口，在那里，渡船拉响雾号，消防艇把水枪大角度射向天空，市民们从金门大桥的步行通道向下欢呼。在码头旁的栈道上，老兵们列队走下舷梯，迎接他们的或许会有一支铜管乐队，可能还有一群自愿前来、笑靥如花的海军同盟会女士端着咖啡和曲奇等在那里。这样的接待令所有人心存感激，但是那些家在落基山脉以东的人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由于东向运力不足，他们还走不掉。兵营、航空基地、民用机场和火车站挤满了等候座位、无所事事的军人。美国海军警告军人家属不要前往加利福尼亚迎接他们返回的儿子或丈夫，因为“西海岸港口的住宿极度紧张”。[\[111\]](#)有人想要给东部的家里打电话，但是在1945年，打通这样一个横跨大陆的电话绝非易事，这需要投一大把硬币，还要和交换机操作员商议半天。

圣迭戈的中转兵营里气氛忧伤，一名陆战队员形容这就像是“打完了比赛的更衣室，输掉比赛的那种”。[\[112\]](#)人们要和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了数年的战友告别。“道别时心中感慨万千，这大多并非伤感或激动，”陆战队员约翰·沃林格说，“‘1945年活着回家’，我们做到了，几乎难以相信。”[\[113\]](#)

把这大批复员军人跨越整个美国运往东部，令铁路的客运能力难堪重负。过时的火车从旧车场里拖出来临时启用，包括那些烧煤的火车头

和从旧西部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木质车厢。离开旧金山的军人会先搭乘南太平洋公司的一艘巨大的火车渡轮，跨过海湾来到奥克兰。在附近的奥克兰终点站，覆盖着国旗的棺材会被吊索从货轮上吊起，安放到美国陆军运输部队的“停尸房”铁路车厢上。^[114]这些停尸车厢将被挂在一部分客运列车的后面，而这些客车将要送那些活着的老兵回家。

横跨美洲大陆的旅行漫长而艰辛。每一列火车都塞满了人，军人和百姓要么坐在过道的行李箱上，要么躺在头顶的行李架上。从旧金山到芝加哥，火车要走三天。一路上小孩哭闹个没完，灯光时明时暗，洗浴室污浊不堪。车厢里不透气，臭不可闻，而若是打开窗，一名水兵回忆道：“就会随风吹进来许多煤烟、煤灰、小石头和鸟毛。”^[115]运兵专列配有炉子、厨具和食品，但是储备的食物常常会吃完而无补充，这时候人们只能饿着肚子。在沿途的火车站，他们会涌下车，伸伸胳膊拉拉腿，再买个热狗或者三明治垫垫肚子，但是只要他们走到月台上，就会有一名军官告诉他们，列车开动之前赶不回来的人，“都会被视为擅离职守，送上军事法庭”。^[116]

打赢战争回到祖国之后，这些老兵对军队当局越来越不耐烦了。在许多列车上，纪律开始崩溃。路易斯·奥金克罗斯是个海军上尉，未来当了小说家。他被安排负责一列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开往纽约市的列车。这列火车被偷偷带上来很多酒。奥金克罗斯上尉坚持要在车厢里巡查，没收这些违禁品，直到他被几名士官长礼貌地警告，“如果再坚持搜查列车，那么我的脑袋被酒瓶砸开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明智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纪律就交给他们去管了。在这趟跨越大陆的旅程的剩余时间里，奥金克罗斯一直待在自己的客舱里，读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列车来到美国东部后，许多老兵越发按捺不住回家的渴望。但是如果他们不先拿到正式的退伍许可，就会被判为擅离职守而面临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每个人都想回家，”“乔克”克拉克将军写道，“我们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得到允许就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海军的规章没用

了。”一名被控为逃兵的年轻水兵对克拉克说：“我想看我妈妈。”^[117]为了避免逃兵现象过快蔓延，海军费了很大力气在体育馆和公共会堂建立了临时区域复员中心。有些水兵会被请求延长服役。所有人都在此被告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或称《军人重新安置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好处。那些退伍的人都收到了证明文件和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或汽车票。

第一批回国老兵在1945年夏季就从欧洲回来了，等待他们的是欢迎演说、彩旗飘飘、铜管乐队和欢庆游行。在美国西海岸，第一批回国军人也受到了相似的热烈欢迎。但是大部分太平洋战争老兵回国时已是1945年秋季或1946年春，此时，热情已经散去。美国人民急于忘记战争，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也再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些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战时管制措施正在民意和政治压力之下崩溃。工会要求涨工资，并在大部分基础产业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包括汽车业、炼钢业、煤炭业和铁路业。老兵们回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而没有遇到预期中的战后经济萧条，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许多人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工人大军中去。他们受不了工作场所的政治和内斗。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无聊至极，没有他们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统一目标。他们找不到原来在前线部队中那种不可或缺的战友情谊。老兵们发现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战争中形成的兄弟关系，即便是他们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和孩子也不行。如第1陆战师的列兵尤金·斯莱奇所说：“所有的美好生活和奢华消费，似乎都无法替代战斗中产生的友谊。”^[118]

许多年轻的老兵重新回到大学，或者参加职业训练课程，但是还有一些人会依靠政府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的“52—20计划”发放的生活津贴来过日子。山姆大叔每周会给每个老兵发放20美元，发一年，以帮助他们在复员后过渡到正常的社会中。为了解老兵们的情况，这些人每周都必须前往失业保障处报到，说说他们找工作的进展。许多年轻老兵安于在“52—20俱乐部”里吃满一年补贴，他们在邻近的酒吧里靠打牌和掷色子消磨时光，“用尽一切办法来遗忘过去”。^[119]第6陆战师的老兵乔治·尼兰每晚都和一帮老兵出去喝酒。有一天，他喝到早晨才回

家，他的父亲，波士顿的一名消防员，拦住了他。“听好了，你小子，”老尼兰对小尼兰说，“你要么去工作，要么去上学，这里不许你再回来了。”^[120]于是尼兰搬了出去，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第6陆战师的另一个老兵比尔·皮尔斯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它和其他几个流浪骑手一起环游全国。他的父母都责备他“游手好闲了一年”，但皮尔斯最后还是靠政府的资助回到了学校。他觉得这是“陆战队战士的又一次可怕经历，坐在那里学习英文、诗歌、商业、数学……我快要疯了”。^[121]

幽默作家鲍勃·约德尔发现女人们已经习惯自己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能够养活自己了，这很可能会颠覆两性之间的关系。看到一群女性技工在一辆汽车上工作，约德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学到的汽车结构知识已经超过了她们丈夫佯称了解的程度。”他开玩笑说：“留给男人们的或许只剩下一些轻微的脑力劳动了。成年男性会勇敢面对这种前景的。反正我们太帅了，不需要工作。”^[122]玩笑归玩笑，困境却真实存在，许多夫妇在战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谢莉·哈克特之前一个人生活，靠在一间滚珠轴承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难如丈夫期待的那样去适应家庭妇女的角色。“我记得怎样换汽车轮胎，也能自己照看汽车引擎，但他却要我回到家里，好像我是疯了才觉得自己会做这些事。”^[123]

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团体鼓励女人们放弃工作，把它们还给退伍回来的老兵。有些人便老老实实在地离开了，因为她们愿意甚至急于回到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去。另一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却被赶走或者降了级。社会团体和各种广告都在竭力描述完美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声称厨房里满是能节约时间的现代化工具，而机器可以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繁重乏味的家务劳动。当丈夫从前线回来，说要看杂志和电影时，妻子应该听话照办。家庭必须是他的港湾，必须是他说了算。“战争结束后，风尚大变，”弗兰基·库珀如是说，她原先在一家轧钢厂里当起重机操作员，“人们都觉得你应该有女人的样子。我们丢掉了工装裤和格子

衬衫，戴起鸟羽头饰，穿上荷叶边衣服和高跟鞋。这都是杂志和报纸上宣传的，要让女人回到家里的‘正确位置’去。现在就回去，忘了你学会的东西，像个女人。回家，做你的面包，带你的孩子。忘了你曾将他们送进幼儿园，自己则穿起了长裤。”^[124]戴莉·哈恩的丈夫是个陆军航空兵中士，她曾经为他们的战后生活幻想出一幅详尽的画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她从《好管家》杂志的文章里看来的。在她的幻想中，她和丈夫住在城郊一座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我每天早晨7点起床，为丈夫做好早餐，而且在脑子里计划好当天的家务。11点半我会熨烫衣服，下午两点清扫厨房的地板，这天结束时，晚餐就会放在桌子上，而我将穿着晚礼服，拿着马提尼酒在门口迎接我的夫君”。但是哈恩嫁的并非《好管家》里描述的那种人。他更像是乡村音乐里唱的那种人。“我嫁了个醉鬼、赌棍，他还喜欢给我看他手帕上的口红印——那不是我的口红。于是我就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怎样才能当那见鬼的美国主妇？”^[125]当过起重机操作员的弗兰基·库珀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离了婚。之后她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工作中，当起了小学老师。“我已经不再是嫁给他时的那个人了，”她解释说，“我意识到我成长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不再除了父亲家和丈夫家便无处可去了……如果我变回他娶我时的那个小女孩，我丈夫将会很高兴——一个恋家的小女人，只会待在农场里，厨房里，只会滤牛奶。但我不再是那个人了。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变回去，但没用。后来我突然审视了自己，我说，不。不，你不必这么做。你不必回到你来的地方。”^[126]正如无数社会历史学家发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许多夫妻在1942年至1943年年轻男子即将登船远赴战场时仓促结了婚，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再度团聚后，他们带着羞怯和忧惧审视着彼此。如果运气好，他们或许会发现两人刚好脾气相投，于是过上了长久而美满的生活。其他许多人则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离了婚。后面这种情况导致离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6年，每1 000人中就有4.3对男女离婚或取消婚约——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最高纪录，在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再未达到过。[\[127\]](#)

对于“战斗神经官能症”或曰“战斗应激反应”的症状，医学界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式。医生们只能忧伤地承认，他们的医疗手册和医院都无法提供这种“精神外科手术”服务。而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压力也使得患者羞于谈论此种病症。许多老兵并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帮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和所为。他们也不知道折磨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称其为“战争的魔鬼”。詹姆斯·科弗特如此评论他的哥哥：“他和他的朋友们有许多我作为十三岁少年无法理解的感觉。在那个年龄，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在战争中的那种经历。”[\[128\]](#)许多老兵都受到持续而痛苦的焦虑感折磨，并饱受噩梦和失眠的困扰。他们竭力不让自己回想战斗中那些残忍的见闻和气味。但往事却总是突然浮现在眼前，无论是在梦乡抑或是清醒时，响声或亮光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东西掉在地上，汽车回火的声音，或者有飞机从头上飞过。痛苦的记忆如同装在时间包袱里一样，会突然闯入眼前的生活中。闪回的片段可能会让战斗中最可怕那一刻的景象和声音陡然再现，也可能让难言的悲哀和伤痛猝然涌上心头，那来自丢下好友的悲恸，甚至是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忽然惊醒，心跳加速，衣衫被汗水浸透。退伍的水兵会抱怨说屋子太安静，无法入眠，他们已经习惯于舰船引擎那心跳般的低鸣。正如一名海军老兵所说：“太安静了，我没法睡觉。我听不见、感觉不到柴油电力机组的震颤。这怎么让人睡得着。”[\[129\]](#)他们还很难信任别人，即便待在好友或爱人的身旁，也会感到一种巨大而难以慰藉的孤独。他们有时会控制不住地颤抖和流泪，忍受着身体上的肌肉紧张，这种紧张有时还会变成持久性的肉体痛苦和疲惫。他们发现在面对复杂工作时很难集中精力。许多人还感到很难和其他人沟通，因而选择独处。他们会回避那些可能勾起可怕回忆的情景，常常无法忍受人群。许多人发觉自己很难规划未来，或者做出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变得和自己的妻子、家人格格不入，还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小孩子般的不健康的过度精神依赖。他们会突然失控，毫无节制

地向妻子和孩子发脾气。他们感到没有意义和空虚，对未来抱有无法克服的绝望感，还无法找到快乐的感觉，即便是那些原先会令他们开心的事情也不行。有些人会想到自杀，还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玛乔丽·卡特赖特，那个在旧金山度过了战争岁月，等着她的水兵丈夫从海军回来的西弗吉尼亚女人，发现很难再和她嫁的年轻男人融洽相处了。“我的丈夫从海军回来后，就很难适应老百姓的生活了。他面对不了。参军时他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是个逍遥乐观的人，回来时却充满幻灭感，十分痛苦。医生说他经历了太多悲剧。”他在南太平洋瓜岛周围的几场海战中打过仗。他的军舰被击沉，舰上的许多战友都死了。卡特赖特回忆道：“他回家后会做可怕的噩梦。这令他在夜晚难以入睡。他说：‘每次闭上眼，都能看见我的兄弟们死在我周围。’他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被打掉脑袋，倒在他胳膊上。”^[130]他开始酗酒。“我丈夫无法控制他的感受，所以他呆坐着喝酒，忧虑不安。男人们之间当然会相互诉说他们的战争经历，但他觉得不能对我说，我理解不了，我也觉得我理解不了他，因为我没有他那种经历。”医生们想要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去，但他拒绝了。7年后，他们离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卡特赖特说，“和他在一起帮不了他，也改变不了他。我意识到我不得不为自己做些什么，因为我做什么都拯救不了我丈夫。”^[131]

大约有90万非裔美国人穿上了军装。回家时，他们充满了自信，期待着拥有完整的权利和公民待遇。但是对于其中许多人而言，脱下军装意味着要重回参军前那不牢靠的地位中。在有拥军传统的美国南方，参加过军的黑人对种族压迫制度形成了格外明显的挑战。和所有士兵一样，他们受过训练，站姿笔挺，昂首挺胸，姿势和仪态就如同在阅兵场上一样。许多人都受过近身格斗和操作武器的高级训练。他们毕竟是男人，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一个自己会被其他成年人称为“孩子”的地方，在那里，昂着头的黑人会被说成是“傲慢”。在美国南方的某些乡村地区，私刑和其他非法暴力行为还很普遍，其针对的正是那些曾经穿着军装为国

效力的黑人。在1945年至1946年几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白人暴徒或警官会绑架、殴打、鞭打甚至杀害那些黑人老兵，按亚拉巴马州某人的说法，这些人“不许盼望或要求对他们出国之前的状况做任何改变”。[\[132\]](#)即便是在表面上更加开明的美国北方，黑人老兵也普遍没有获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保障的全部权益。主流的大学不愿意接纳他们，至少不愿接纳太多，而原有的黑人大学的扩建速度也无法满足突然暴增的入学申请。支出给黑人老兵的住房贷款也少得可怜。

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战争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机会令美国南方的人大批涌向北方、中西部和西海岸。在所有地区，黑人都在向城市搬迁——把耕地交给了机械化农业，自己则进城寻找高薪工作——这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分布就从农村为主转变为城市为主。到1945年，黑人占据了军工业全部工作岗位的8%，这一比例与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很接近了。战争中有70万非裔美国人仍然留在南方，战后，他们还会继续外流。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有约33.9万黑人迁移到这个国家的西半部。洛杉矶和奥克兰这样的地方都建起了大型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西比尔·路易斯从她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萨帕尔帕搬迁到洛杉矶，在道格拉斯飞机工厂里当铆工。她回忆道：“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想黑人不会得到他们现在的地位。战争和国防工作让黑人有机会去做他们此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望值也变了。钱会让人产生这种改变。你能感觉到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生活方式了。”[\[133\]](#)如果没有打仗，路易斯觉得她会在俄克拉何马乡下当个小学老师，“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离开我的小镇，发现还有别的生活方式”。[\[134\]](#)

由于达不到退伍所需要的点数，数十万美国年轻人被困在了太平洋上。许多人要在热带的骄阳下度过他们的一连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圣诞节了。这年12月，宾·克罗斯比的民谣《我要回家过圣诞》在军队广播服

务处里无限循环——但是此时，歌中忧郁的歌词比往常更像是在讽刺他们的困境：“如果是在梦里该多好。”现在没有那么多义务要承担了，人们的工作开始转为和平时期的节奏，完成指定任务就行，不再额外努力。纪律性让位给了愤世嫉俗。一种冷漠感在宿营地和兵营里蔓延开来。人们靠打牌和晒日光浴来消磨时间。酒在黑市上畅行无阻，许多都是黑酒厂私酿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攒了多少退伍点数，还差多少点就能拿到回家的票。打赢了战争后，军人们被告知他们现在必须要“打赢和平”。但是正如一名海军上尉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没人想理睬这见鬼的‘打赢和平’。我们只想回家”。[\[135\]](#)

飞行员们每天还得飞例行巡逻任务。有些人被派去向仍然由日军占领的岛屿投放传单，或者奉命在这样的岛上降落，接受日本守军的投降。飞行事故没有战时那么多了，但其频率仍然令人忧虑。那些在日本投降后死于坠机的人尤其令所有人感到遗憾。曾经在空战中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勇猛的飞行员们，现在对于在危险天气下飞行牢骚满腹，还会向他们的指挥官发泄怒气。对于俯冲轰炸机老飞行员塞缪尔·海因斯而言，夜晚在东海上空的风暴中飞行令他感到了一种和战时经历截然不同的新的恐惧。身陷如此危境令他暴怒不已。战争已经赢了，“还要我独自在闪电和黑暗中半瞎着飞行”，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毫无意义的夜间训练”。[\[136\]](#)

第3两栖军的5万名陆战队员，包括第1陆战师和第6陆战师的大部分部队，被派往中国东北执行所谓“围攻”计划。他们的任务是稳定当地局势，监督日军投降，解除其武装，并遣送日本军队和其他外国人回国。众多从恐怖的佩里硫和冲绳血战中活下来的陆战队员现在又被卷入了这项行动，直到1946年春季才得以返回美国。他们第3陆战师的弟兄们留在关岛，必要时可以担任预备队。为了打发空闲时间，关岛上的军官们组织了志愿“学校”，任何在某一领域有特殊知识或者一技之长的陆战队员都可以来给其他战友授课，包括木工活、地质学、汽车维修、拉丁文、水彩画和几十种其他课程。少校和上校们也会坐下来听列兵和下士

讲课。有个陆战队员曾在纽约学过水上芭蕾。这个师手中刚好还有一大堆炸药没用完。于是他们用炸药在海岸礁岩上炸出一个大池子，再配上灯光和音乐，让200个陆战队员在里面排成队形游泳表演。“这个师就这样完全而彻底地忙起来了，”罗伯特·E.霍加博姆上校如是说，“我们绝对没有遇到在其他一些部队出现过的问题……这种‘让我们回家，让我们离开这里’的心态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师，因为我们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137\]](#)

对于大部分年轻的老兵来说，眼下还不是反思战争及其意义，或者是琢磨这段经历如何塑造自己的时候。这只是一场磨难，一场对他们人生规划讨厌的打扰，放在他们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之间的一道坎。历史和命运把这场战争放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之路上，因此他们——而不是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得不去打这一仗，而且要打赢。战争期间，他们的生活一心只为了未来，为了回归和平，为了让自己回国，那时真正的生活才会开始。他们站在了正确的一边，而且因为打败了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但展望未来，他们却不敢太过乐观。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世界未来还将再打几次这样的战争。大部分人对于用原子弹对付日本拍手称快，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思考原子武器的影响时，他们又开始为人类文明的前景担忧起来。诺曼·梅勒是个陆军中士，刚刚开始写小说，他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分享了他的想法：“还会有另一场战争的，不是二十年内，就是五十年内，如果有一半的人类活下来，那么再下一场战争又会如何呢？——我相信，为了生存，未来世界上的城市都会建在地下一英里深处。”[\[138\]](#)即便是最乐观的人对未来也不敢有太多的期待。道格拉斯·爱德华·里奇是一名海军上尉，他说战争的结束带来了“恢复和平的满足感——总的来说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不完美，但可接受，开心一下也没错”。[\[139\]](#)

遗忘是一种美德，记忆也是。老兵们坚持要纪念那些献出生命的人并且向他们致敬——但这只是个例外，在1945年和1946年，他们并不怎么想谈论战争的事情，老百姓也不怎么想听。他们的精力都聚焦在了未

来，而非过去。本·布拉德利在太平洋战争中曾于驱逐舰上服役，后来成为《华盛顿邮报》的主编，他在文章中写道，战后的时代精神没有为战时回忆留下什么空间。“1946年时，谁在乎你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围坐在一起谈论共同参与的战争，我觉得这样的人很烦。”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考的深入，他才逐渐开始理解战争的经历怎样塑造了他和他这一代人。“今天听来这可能是陈词滥调，但是那些年里你真的参与到了远远超越个人生活的事情当中——以后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让你和你所处的时代如此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了。”^[140]当年37岁的海军军官詹姆斯·米切纳曾在南太平洋的后方基地服役，他是个特例。早在1945年秋，他便在思考“太平洋上的重要经历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当他开始动笔撰写后来以《南太平洋的故事》之名出版的小说时，米切纳知道他们这些老兵在1946年甚至是1947年对这样一本书不会有兴趣，也不会有出版社看好这本书的市场。但是再过三四年，当他们关于无聊、想家、恐怖、痛苦和哀伤的记忆开始淡化，老兵们就会带着好奇和兴趣去回看他们共同的这段经历。“显然，几乎无须多言，我认为如果你命令一代年轻人全都去爬珠穆朗玛峰，你就能期待这次爬山成为他们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当他们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们会骂娘，咒骂要他们爬山的人，但是几年后，当他们回看这段经历时，他们就会将其视为了不起的冒险，并拿起书来重新体验这段经历。”^[141]

1945年12月是“魔毯”行动的高峰期。在整个太平洋的各处港口和潟湖里，水兵们都在忙着修补船只，希望它们足以开出海并返回本土。官兵们挤上了任何一艘能带他们回家的船只。当护航航母“方肖湾号”在当年秋季回国时，它带上了几千名只能睡在机库甲板吊床上的陆军和陆战队军人。航母上第10混合中队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基本上都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飞机都被送到岸上，好为乘客们腾地方了。和陆军、陆战队士兵一样，他们也在飞行甲板上东游西逛，打牌，掷色子，读书，或者晒太阳。夜晚，军舰会打开航行灯，他们对这种和平时期的标准做法仍然感到不熟悉和紧张。每天训练时，高射炮手们会像表演哑剧一样模拟装弹，用火炮瞄准，但不会射击实弹。军舰上拥挤而难受，

但没人抱怨。他们是在回家，这就够了。

有天傍晚，第10混合中队的中队长小爱德华·J.赫克斯塔布尔看到太阳西沉到军舰的尾流之中，“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日落场面之一，带着紫色的光芒，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紫光，而天空中的深色色调则和亚利桑那的日落一模一样”。但是，“方肖湾号”上的其他老兵则鲜有人注意到这一幕景色。他们见过上千次太平洋上的日落，这样的景色已经不再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了。如果他们还在看海平线，那一定是向前看，向东看，那里是家的方向。第10混合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和赫克斯塔布尔一起站在飞行甲板上，他对赫克斯塔布尔说：“你知道的，上校，那帮家伙还不明白，这将会是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段经历。”^[142]

^[1] William D. Leahy diary, August 14, 1945, Leahy Papers, LCMD.

^[2] Buell, *Dauntless Helldivers*, p.307.

^[3] Sylvia Summers, oral history, Richardson and Stillwell, *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p.98.

^[4] Barbara De Nik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13.

^[5] Patricia Livermore, oral history,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12.

^[6] Stanton Delaplane, “Victory Rio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ader*, p.198.

^[7] Carl Nolte, “The Dark Side of V—J D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15, 2005.

^[8] Third Fleet War Diary, August 15, 1945;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9]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72.

^[10]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49.

^[11] Sakai, Caidin, and Saito, *Samurai!*, p.269.

^[12]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262;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13]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14] Imperial Rescript of August 17,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334.

[15] “Speech of Prince Higashi—Kuni to the Japanese People Upon Becoming Premier,” August 17, 1945, accessed June 4, 2019, <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1945—08—17c.html>.

[16] “Exchange of Messages Between General MacArthur and Japanese General Headquarters on Manila Meeting,” August 15—19, 194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ccessed June 7, 2019, <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1945—08—15b.html>.

[17] “General MacArthur’s Instructions to Japanese on Occupation Landings,” reprinted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45.

[18]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67.

[19]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451.

[20] Wallace,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p.55.

[21]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2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Leaflets,” Box 2.

[23] Wheeler, *Dragon in the Dust*, p.xxiv.

[24] Roland Smoot, oral history, p.192.

[25]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52—53.

[26] John C. Munn, oral history, p.86.

[27]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280.

[28]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575.

[29] Ibid.

[30]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351.

[31] Courtney Whitney, “Lifting Up a Beaten People,” *Life* magazine, August 22, 1955, p.90.

[32] Courtney Whitney’s recollections, quoted in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1.

[33]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447.

[34] Whelton Rhoades diary, August 30,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48.

[35]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2.

[36] CINCPAC to CNO,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Ocean Areas, August 1945,” Serial: 034296, December 10, 1945.

[37] Whelton Rhoades diary, August 31,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0.

- [38]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August 31, 1945.
- [39] Ibid.
- [40] Stuart S. Murray, oral history, "A Harried Host in the *Missouri*," in Mason, ed., *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p.350.
- [41] Jonathan M. Wainwright, *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 pp.279—80.
- [42]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p.472—73.
- [43] Whelton Rhoades diary, September 2,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2.
- [44]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No.539, Vol.1, pp.472—73.
- [45] Stuart S. Murray oral history, "A Harried Host in the *Missouri*," in Mason, ed., *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p.355.
- [46] Lamar, "I Saw Stars," p.22; Manchester, *American Caesar*, p.451.
- [47]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p.7.
- [48] Dunn, *Pacific Microphone*, pp.360—61.
- [49] MacArthur, *Reminiscences*, p.275.
- [50] 哈尔西和理查德森都注意到麦克阿瑟的双手在发抖。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523; Robert C. Richardson Jr. diary, September 2, 1945.
- [51] Halsey, *Admiral Halsey's Story*, p.524.
- [52] Kenney, *General Kenney Reports*, p.577.
- [53] Associated Press, "Tokyo Aides Weep as General Signs," September 2, 1945.
- [54] Lilly, *Nimitz at Ease*, p.303.
- [55] Whelton Rhoades diary, September 2, 1945, Rhoades, *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 p.454.
- [56] Robert Bostwick Carney, oral history, CCOH Naval History Project, Vol.1, No.539, p.472.
- [57]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p.32—45.
- [58]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p.452.
- [59] James J. Fahey diary, October 22, 1945, Fahey, *Pacific War Diary, 1942—1945*, p.400.
- [60] Ibid.
- [61] Richard Leonard to Arlene Bahr, November 3, 1945, in Carroll, ed., *War Letters*, p.318.
- [62] Ibid., pp.318—19.

[63] 例如，1945年底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一份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日本人原本以为自己会“遭到虐待和奴役，要接受暴政的统治，忍饥挨饿，卑躬屈膝”。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55n7.

[64] Naokata Sasak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469.

[65] 日本孩子把give读成gibu。——译者注

[66] Radike, *Across the Dark Islands*, p.258.

[67]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p.155.

[68] Ibid.

[69]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23.

[70] Ibid., p.49.

[71] Terasaki, *Bridge to the Sun*, p.200.

[72] Charles F.Barber, Interview by Evelyn M.Cherpak, March 1, 1996, U.S.Naval War College Archives.

[73] Eichelberger and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p.255.

[74] Hara, Saito, and Pineau, *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Foreword, p.x.

[75]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9.

[76]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1 Supplement, p.47.

[77] Document A45,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July 26, 1945, in Kort,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p.227.

[78] Shigeo Hatanaka,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27.

[79] Junko Ozaki letter to the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75.

[80] Terasaki, *Bridge to the Sun*, p.233.

[81]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76, USSBS No.379, Admiral Mitsumasa Yonai, IJN.

[82] Chihaya Masataka quoted in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92.

[83]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89.

[84] Ibid.

[85] USSBS,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 Nav No.90, USSBS No.429, Admiral Kichisaburo Nomura, IJN.

[86]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p.292.

[87] “Fire Scroll,” *Book of Five Spheres*, quoted in Cleary,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p.84.

[88] Eizo Hori, statistics cited in 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148.

[89]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在1937年至1945年的亚太地区战争中，有310万日本人丧生，包括230万军人和80万平民。在后者中，估计有50万人死于日本国内，30万人死于海外。Auer, ed.,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p.242.

[90] Michio Takeyama quoted in Takeyama and Minear, eds., *The Scars of War*, p.68.

[91] Goldstein and Dillon, eds., *The Pacific War Papers*, p.67.

[92] Hitoshi Inoue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80.

[93] Uichiro Kawachi, oral history, in Cook and Cook, eds., *Japan at War*, p.214.

[94] Kazuo Ikezaki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301.

[95] Fusako Kawamura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279.

[96] Yukio Hashimoto letter to *Asahi Shinbun*, in Gibney, ed., *Senso*, p.181.

[97] Murrie and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Summer 2015.

[98] Steere, *The 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p.405.

[99] *Ibid.*, p.426.

[100] 传说有个叫戴维·琼斯的酒吧主会把喝醉、赖账的人装进橱柜扔进海里，因此水手用“戴维·琼斯的柜子”来指代“长眠海底”。——译者注

[101] 大多数由于非战斗原因而在海上丧生的人，包括因事故和疾病去世之人，也被葬于海上。美国海军报告称，在全球范围内，二战中共有25 664人在非战斗期间死亡。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NHHC) website, accessed August 4, 2019, <https://www.history.navy.mil/research/library/online—reading—room/title—list—alphabetically/u/us—navy—personnel—in—world—waR-ii—service—and—casualty—statistics.html>.

[102] 例如，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军人诺曼·梅勒写道：“我很支持任何能缩短战争时间、让我早点回家的事情，但这往往与更基本的古老原则相悖。举例来说，我希望和平时期的征兵能通过，因为如果不通过，复员的过程可能会痛苦而缓慢。” Letter to Beatrice Mailer, August 8, 1945,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pp.51—52.

[103] Lee, *To the War*, p.163.

[104]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7.

[105] Radford, *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p.70.

[106] James Forrestal diary, October 16, 1945, Millis,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 p.102.

[107]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17.

[108] John C.Munn, oral history, p.91.

[109] McCandless, *A Flash of Green*, p.219.

[110] Morison,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p.13.

[111] “Plan of the Day,” Sunday, September 2, 1945, USS *Missouri*, p.2, “Notes,” accessed May 21,2019, http://www.bb63vets.com/docs/DOC_6.pdf.

[112]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66.

[113]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c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114] Murrie and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Summer 2015.

[115] Beaver, *Sailor from Oklahoma*, p.226.

[116]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ca.com/ww2_johann_memoirs/index.htm.

[117] Clark and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p.245.

[118] Sledge, *With the Old Breed*, p.266.

[119] Mace and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p.327.

[120] George Niland, oral history,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189.

[121] William Pierce, oral history, in Lacey, *Stay Of the Skyline*, p.193.

[122] Yoder, *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 pp.108, 112.

[123] Shirley Hacket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31.

[124] Frankie Cooper,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49.

[125] Dellie Hahne,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8.

[126] Frankie Cooper,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49.

[127] Randal S.Olson, “144 Years of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One Chart,” June 15, 2015, accessed June 2, 2019, www.randalolson.com.Data from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CHS).

[128] James Cover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3.

[129] Marshall Ralph Doak, *My Years in the Navy*, <http://www.historycentral.com/Navy/Doak>.

[130] Marjorie Cartwright,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26.

[131] Ibid., p.228.

[132] Caro, *Master of the Senate*, p.196.

[133] Sybil Lewis, oral history, in Harris, Mitchell, and Schechter, eds., *The Homefront*, p.251.

[134] Ibid., p.252.

[135] Lee, *To the War*, p.164.

[136] Hynes, *Flights of Passage*, p.255.

[137] Robert E.Hogaboom, oral history, Marine Corps Project, No.813, Vol.1, p.235.

[138] Norman Mailer to Beatrice Mailer, August 8, 1945,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in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pp.51—52.

[139] Leach, *Now Hear This*, p.175.

[140] Ben Bradlee, "A Return,"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6.

[141] Michener, *The World Is My Home*, p.265.

[142] Edward J.Huxtable, commanding officer, Composite Squadron Ten, 1943—1945, "Some Recollections," pp.27—28, Huxtable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参考文献

档案馆藏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of the Marine Corps,

Quantico, Virginia (USMC Archives)

Fifth Amphibious Corps files Elton N.Shrode,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Coll.3736

Holland M.Smith Collection Ronald D.Thomas, unpublished written account, PC No.2718

Arthur Vandegrift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Palo Alto, California

Bonner Fellers Papers Edward J.Huxtable, “Composite Squadron Ten, Recollections and Notes”

William Neufeld Papers, 1942– 1960

Robert Charlwood Richardson Jr.Papers U.S.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Psychological Warfare Division Files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Washington, DC (LCMD)

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Jr.Papers Ernest J.King Papers William

D.Leahy Papers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John Henry Towers Papers

MacArthur Memorial Archives, Norfolk, Virginia

LeGrande A.Diller, oral history, recorded September 26, 1982

Papers of Lieutenant General Richard K.Sutherland (RG- 30)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Private Correspondence, 1848– 1964

Radio Message files, 1941– 1951

Records of Headquarters, U.S.Army Forces Pacific (USAFPAC), 1942–
1947 (RG- 4)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 Maryland (NARA)

Digests of Japanese Radio Broadcasts Office Files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CNO Zero- Zero Files”)

Records of Japanese Navy and Related Documents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Engineers, Manhattan Engineer District (RG- 77)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75– 2006 (RG-38)

World War II Action and Operational Reports World War II Oral Histories and Interviews World War II War Diaries

Naval Historical Collection,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Charles F.Barber,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

Thomas B.Buell Collection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David Willcutts, “Reminiscences of Admiral Spruance”

World War II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Project (“Bates Reports”)

**Operational Archives Branch,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Archives,
Washington, DC (NHHHC)**

Japanese Monographs (U.S.Army, Far East Command,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amuel Eliot Morison Papers Raymond A.Spruance Papers Richmond
K.Turner Papers

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FDR Day by Day,” White House Daily Log FDR Safe Files Stephen
T.Early Papers Harry L.Hopkins Papers Motion Pictures Collection The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 1933– 1945

Press Conferences of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1933– 1945

John Toland Papers, 1949– 1991

White House Map Room Papers, 1941– 1945

口述史

**The Columbia Center for Oral History (CCOH),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John J.Ballentine Robert Blake Joseph J.Clark Edward A.Craig Donald
Duncan Graves B.Erskine James Fife Leo D.Hermle Harry W.Hill Robert
E.Hogaboom John Hoover Louis R.Jones Thomas C.Kinkaid John
C.McQueen William W.Buchanan Robert Bostwick Carney Vernon E.Megee

Charles J.Moore John C.Munn Ralph C.Parker Dewitt Peck James S.Russell
Ronald D.Salmon Joseph L.Stewart Edward W.Snedeker Felix B.Stump
Henry Williams

**Oral History Program, U.S.Naval Institute, Annapolis,
Maryland, 1969– 2005**

George W.Anderson Jr.

Bernard L.Austin Paul H.Backus Michael Bak Jr.

Hanson W.Baldwin Bernhard H.Bieri Gerald F.Bogan Roger L.Bond
Thomas B.Buell Arleigh A.Burke Slade D.Cutter James H.Doolittle Thomas
H.Dyer Harry D.Felt Noel Gayler Truman J.Hedding Stephen Jurika Jr.

Cecil S.King Jr.

Edwin T.Layton Fitzhugh Lee Kent L.Lee David McCampbell Arthur
H.McCollum John L.McCrea George H.Miller Henry L.Miller Catherine
Freeman Nimitz et al., Recollections of Fleet Admiral Chester W.Nimitz
James D.Ramage Herbert D.Riley Joseph J.Rochefort William J.Se bald
Roland N.Smoot Arthur D.Struble Ray Tarbuck John S.Thach

政府出版物，军方出版物，官方历史，未出版的日记，
演讲，信件

Alexander, Joseph H.Closing in: Marines in the Seizure of Iwo
Jima.History and Museums Appleman, Roy Edgar.Okinawa: The Last
Battle.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48.

Bartley, Whitman S.Iwo Jima: Amphibious Epic.Historical Branch, G- 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1954.

Bates, Richard W.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October 1944: Strategical

and Tactical Analysis.Vol.5.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U.S.Naval War College Battle Evaluation Group Report, prepared for Bureau of Naval Personnel, 1958.

Bell, William A.Diary, December 1944 to January 1945.

Bell, William A. "Under the Nips' Nos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oyd, William B., and Buford Rowland.U.S.Navy Bureau of Ordnance in World War II.

Bureau of Ordnance, Department of the Navy, Washington, DC, 1953.

Carter, Worrall Reed.Beans, Bullets, and Black Oil: The Story of Fleet Logistics Afloat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Clary, John W. "Wartime Diary." Accessed January 3, 2018.http://www.warfish.com/gaz_clary.html.

Commander in Chief, U.S.Pacific Fleet. "CINCPAC Grey Book: Running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for the Pacific War."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ashington, DC.

Craven, Wesley Frank, and James Lea Cate, eds.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5.The Pacific: Matterhorn to Nagasaki: June 1944 to August 1945.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Davis, Elmer, and Byron Price.War Information and Censorship.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1944.

Deal, Robert M.Personal account.USS Johnston Veterans Association pamphlet.

Donigan, Henry J.Peleliu: The Forgotten Battle.Marine Corps Gazette,

September 1994.

Accessed October 19, 2017.<https://www.sofmag.com/fury-in-the-pacific-battle-of-peleliu-battle-of-angaur-world-war-ii/>.

Dyer, George C. *The Amphibians Came to Conquer: The Story of Admiral Richmond Kelly Turner*. Washington: U.S. Dept. of the Navy, U.S. Govt. Print. Off., 1972.

Fenoglio, Melvin. "This I Remember." Accessed April 21, 2019.<https://dd803.org/crew/stories-from-the-crew/melvin-fenoglio-account>.

Gayle, Gordon D. *Bloody Beaches: The Marines at Peleliu*. Diane Publishing, 1996.

Genda, Minoru. "Tactical Planning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March 7, 1969.

Glantz, David M.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eavenworth Papers,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1983.

Green, Maurice Fred. Report by Lieutenant Maurice Fred Green, Survivor of the Hoel.

Accessed October 2017.<http://ussjohnston-hoel.com/6199.html>.

Hansell, Haywood S. *The Strategic Air War Against Germany and Japan: A Memoir*.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U.S. Air Force, 1986.

Hayes, Grace P.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Against Japan*. Historical Section,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3.

Heimdahl, William C., and Edward J. Marolda, eds. *Guide to United States Naval Administrative Historie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Naval

History Division, Dept. of the Navy, 1976.

Japanese Defense of Cities as Exemplified by the Battle of Manila, A Report by XIV Corps.

Published by A.C.of S., G- 2, Headquarters Sixth Army, July 1, 1945.

Joint Army Navy Assessment Committee (JANAC).Japanese Naval and Merchant Shipping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All Causes.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Koda, Yoji, Vice Admiral, JMSDF (ret.). “Doctrine and Strategy of IJN.” Lecture with slides delivered at the U.S.Naval War College, January 6, 2011.

Matloff, Maurice, and Edwin 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1–1942.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of the Army,1953– 59.

McDaniel, J.T., ed.U.S.S.Tang (SS- 306): American 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

Riverdale, GA: Riverdale Books, 2005.

—.U.S.S.Wahoo (SS- 238): American Submarine War Patrol Reports.Riverdale, GA: Riverdale Books, 2005.

McEnery, Kevin T.The XIV Corps Battle for Manila, February 1945.U.S.Army, Fort Leavenworth, KS, 1993.

Nelson, Charlie. “Report of Captain Charlie Nelson, USNR.” <http://destroyerhistory.org/fletcherclass>.

Parker, Frederick D.A Priceless Advantage: U.S.Navy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and the Battles of Coral Sea, Midway, and the Aleutians.Series IV: World War II, Vol.5, 2017.Center for Cryptologic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ashington.

Price, Byron. A Report on the Office of Censorship.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5.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The Campaigns of MacArthur in the Pacific. U.S. Army General Staff of G.H.Q., 1966.

Rigdon, William. "Log of the President's Trip to the Berlin Conference," July 6 to August 7, 1945.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1945.

Ryukyus: The U.S. 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14.

Sato, Kenryo. "Dai Toa War Memoi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John Toland Papers, FDR Library, Hyde Park, New York.

Schwartz, Joseph L. Experiences in Battle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Navy.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1953.

Shaw, Nalty, et al. 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Central Pacific Drive. Historical Branch, G-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 Marine Corps, 1958.

Smith, Robert Ross. Triumph in the Philippines.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63.

Smyth, H.D.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Steere, Edward. The 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Q.M.C. Historical Studies No. 21. Washington: Historical Section, Office of the Quartermaster General, General Printing Office, 1951.

Stimson, Henry L. Henry Lewis Stimson Diaries.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rmy, Far East Command.5th Air Fleet Operations, February–August 1945.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86.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publish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rch 14, 1962.

U.S.Army, Far East Command.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A Graphic Pres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Naval Organization and List of Combatant and Non- Combatant Vessels Lost or Damaged in the War.Japanese Operational Monograph Series, No.116.Tokyo: Military History Section, Special Staff,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1952.

U.S.Civilian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Industrial Mobilization for War: History of the War Production Board and Predecessor Agencies, 1940–1945.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75.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U.S.Govt.Print.Off., 1960.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Building the Navy's Bases in World War II: History of the Bureau of Yards and Docks and the Civil Engineer Corps, 1940– 1946.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Department of the Navy.Secret Information Bulletin No.24: "Battle Experience: Radar Pickets and Methods of Combating Suicide Attacks Off Okinawa, March–May 1945," July 20, 1945.

U.S.Department of War.Basic Field Manual: Regulations for Correspondents Accompanying U.S.Army Forces in the Field.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2.

U.S.Office of Naval Operations.U.S.Naval Aviation in the Pacific.Washington: U.S.Govt.Print.Off., 1947.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Air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Washington: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Military Analysis Division, 1947.

—The Campaigns of the Pacific War.Washington: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Pacific), Naval Analysis Division, 1946.

—Effects of Air Attack on Japanese Urban Economy (Summary Report).1947.

—Effects of Atomic Bombs on Hiroshima & Nagasaki.1946.

—The Effects of Bombing on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in Japan.1947.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1947.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s War Economy.1946.

—Effects of the Incendiary Bomb Attacks on Japan (a Report on Eight Cities).1947.

—Interrogations of Japanese Officials.2 vols.1947.

—Japanese Air Power.1946.

—Japanese Merchant Shipping.1946.

—Japanese War Production Industries.1946.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1946.

—The Offensive Mine Laying Campaign Against Japan.1946.

—A Report on Physical Damage in Japan (Summary Report).1947.

—.The Strategic Air Operations of Very Heavy Bombardment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Twentieth Air Force).1947.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1946.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Transportation, 1941– 45.1947.

Vollinger, John. “The World War II Memoirs of John Vollinger.”
http://www.janesoceanica.com/ww2_johann_memoirs.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Marshall, Chief of Staff, General of the Army H.H.Arnold, Commanding General, Army Air Forces [and]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Commander- in- Chief, United States Fleet and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47.

Wolfson Collection of Decorative and Propaganda Arts.The Wolfsonian Library, Miami Beach, Florida.

图书

Adams, Henry Hitch.Witness to Power: The Life of Fleet Admiral William D.Leah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Agawa, Hiroyuki.The Reluctant Admiral: Yamamoto and the Imperial Navy.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9.

Albion, Robert G.Makers of Naval Policy, 1798– 1947.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Allinson, Gary D., ed.The Columbia Guide to Modern Japanese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perovitz, Gar, and Sanho Tree.The Decision to Use the Atomic Bomb.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6.

Arnold, Henry Harley.Global Mission.1st ed.New York: Harper, 1949.

Asada, Sadao.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Astor, Gerald.Wings of Gold: The U.S.Naval Air Campaign in World War II.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4.

Auer, James E., ed.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Who Was Responsible?

Yomiuri Shinbunsha, 2010.

Badgley, John.Frigate Men: Life on Coast Guard Frigate U.S.S.Bisbee, PF- 46, During World War II.New Vintage Press, 2007.

Baime, A.J.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FDR, Detroit, and an Epic Quest to Arm an America at War.Mariner Book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5.

Baker, Russell.Growing Up.Congdon & Weed, 1982.

Barbey, Daniel E.MacArthur's Amphibious Navy: Seventh Amphibious Force Operations, 1943– 1945.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1.

Beach, Edward L.Submarine! Pocket Star Books, 2004.

Beaver, Floyd.Sailor from Oklahoma: One Man's Two- Ocean War.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Becton, F.J., et al.The Ship That Would Not Die.Pictorial Histories Publ.Co., 1993.

Belote, James H., and William M.Belote.Titans of the Seas: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arrier Task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Benedict, Ruth.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54.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Black, Conrad.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Blaik, Earl H. *The Red Blaik Story*. Arlington House, 1974.

Blair, Clay. *Silent Victory: The U.S. Submarine War Against Japan*. 1st ed.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5.

Blum, John Morton. *V 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Harcourt Brace, 1977.

Boquet, Yves.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Springer, 2017.

Borneman, Walter R. *MacArthur at War: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Back Bay Books, 2017.

Bradlee, Benjamin C. *A Good Life: Newspapering and Other Adventures*. Simon & Schuster, 1995.

Bradley, James. *Flags of Our Fathers: Heroes of Iwo Jima*. Bantam, 2000.

—. *Flyboys: A True Story of Courage*. Little, Brown, 2006.

Bridgland, Tony. *Waves of Hate: Naval Atrocit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eo Cooper, 2002.

Brinkley, David. *Washington Goes to War: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ity and a N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8.

Bruce, Roy W., and Charles R. Leonard. *Crommelin's Thunderbirds: Air Group 12*

Strikes the Heart of Japan.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Bruning, John R.Ship Strike Pacific.Zenith Press, 2005.

Bryan, J.III.Aircraft Carrier.Ballantine Books, 1954.

Budiansky, Stephen.Battle of Wits: The Complete Story of Codebreaking in World War II.Free Press, 2000.

Buell, Harold L.Dauntless Helldivers: A Dive- bomber Pilot's Epic Story of the Carrier Battles.New York: Orion, 1991.

Buell, Thomas B.Master of Sea Power: A Biography of Fleet Admiral Ernest J.King.

Little, Brown, 1980.

—.The Quiet Warrior: A Biography of Admiral Raymond A.Spruance.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7.

Buhite, Russell D., and David W.Levy, eds.FDR's Fireside Chats.Penguin Books, 1992.

Burgin, R.V., and Bill Marvel.Islands of the Damned: A Marine at War in the Pacific.

NAL Caliber, 2011.

Burlingame, Roger.Don't Let Them Scare You: The Life and Times of Elmer Davis.

Greenwood Press, 1974.

Burns, James MacGregor.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Buruma, Ian.Inventing Japan, 1853– 1964.Modern Library, 2003.

Byrnes, James F.Speaking Frankly.Greenwood Press, 1974.

Caidin, Martin. *A Torch to the Enemy: The Fire Raid on Tokyo*. Bantam Books, 1992.

Calhoun, C. Raymond. *Tin Can Sailor: Life Aboard the USS Sterett, 1939– 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Calvert, James F. *Silent Running: My Years on a World War II Attack Submarine*. Castle, 2008.

Caro, Robert A. *Master of the Senate: 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 Vol. 3. Random House, 2003.

Carroll, Andrew, ed. *War Letters: Extraordinary Correspondence from American Wars*.

Scribner, 2001.

Casey, Robert J. *Battle Below*. Bobbs- Merrill, 1945.

—. *Torpedo Junction*. London: Jarrolds, 1944.

Childs, Marquis W. *I Write from Washington*. Harper, 1942.

Clark, J.J., and Clark G. Reynolds. *Carrier Admiral*. New York: D. McKay, 1967.

Cleary, Thomas. *The Japanese Art of Wa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Strategy*. Boston: Shambhala Classics, 2005.

Coffey, Thomas M. *Hap: The Story of the U.S. Air Force and the Man Who Built It, General Henry H. “Hap” Arnold*. Viking Press, 1982.

Coletta, Paolo E. *Admiral Marc A. Mitscher and U.S. Naval Aviation: Bald Eagle*. Edwin Mellen Press, 1997.

Colman, Penny. *Rosie the Riveter: Women Working on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Crown Publishers, 1995.

Conant, Jenet. *Tuxedo Park: A Wall Street Tycoon and the Secret Palace of Science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 Thorndike, 2002.

Conrad, Joseph, and Cedric Thomas Watts. *Typhoon and Other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ok, Haruko Taya, and Theodore F. Cook, eds. *Japan at War: An Oral History*. The New Press, 1992.

Cooke, Alistair.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1942*.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Cooper, Page. *Navy Nurse*. 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McGraw- Hill, 1946.

Crew, Thomas E. *Combat Loaded: Across the Pacific on the USS Tate*.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7.

Current, Richard Nelson.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Cutler, Thomas J. *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23– 26 October, 1944*.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 Political Life*. Viking, 2017.
—.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 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son, Joel R. *The Unsinkable Fleet: The Politics of U.S. Navy Expansion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Davis, Kenneth S. *FDR: The War President, 1940– 1943: A History*. Random House, 2000.

Davis, Robert T. *The U.S. Army and the Media in the 20th Century*. Combat Studies Inst. Press, 2009.

Davis, William E. *Sinking the Rising Sun: Dog Fighting & Dive Bombing in World War II: A Navy Fighter Pilot's Story*. Zenith Press, 2007.

Deacon, Richard. *Kempei Tai: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 Then and Now*.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82.

DeRose, James F. *Unrestricted Warfare: How a New Breed of Officers Led the Submarine Force to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Castle Books, 2006.

Dixon, Chris, Sean Brawley, and Beatrice Trefalt, eds. *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Fighting Word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ABC-CLIO, 2009.

Dos Passos, John. *Tour of Duty*. Greenwood Press, 1974.

Dower, John W. *Cultures of War: Pearl Harbor, Hiroshima, 9–11, Iraq*. W.W. Norton, 2010.

—.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W. Norton, 1993.

—.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Pantheon Books, 1986.

Drea, Edward J.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Essays 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Driscoll, Joseph. *Pacific Victory 1945*. Lippincott, 1944

Drury, Bob, and Thomas Clavin. *Halsey's Typhoon: The True Story of a Fighting Admiral, an Epic Storm, and an Untold Rescu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7.

Dull, Paul S. *A Battle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941–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8.

Dunn, William J. *Pacific Microphone*. Texas A & M Univ. Press, 1988.

Edgerton, Robert B. *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W.W.

Norton, 1997.

Eichelberger, Robert L., and Milton MacKaye. *Our Jungle Road to Tokyo*. The Viking Press, 1950.

Eisenhower, Dwight D. *Crusade in Europe*. The Easton Press, 2001.

Eisenhower, Dwight D. *The Eisenhower Diaries*, ed. Robert Hugh Ferrell. The Easton Press, 1989.

Ellis, John. *World War II, a Statistical Survey: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ant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5.

Elphick, Peter. *Liberty: The Ships That Won the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Enright, Joseph F., and James W. Ryan. *Sea Assault: The Sinking of Japan's Secret Supership*.

St. Martin's Paperbacks, 2000.

Evans, David, and Mark Peattie. *Kaigun: Strategy, Tactics, and Technology i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1887– 1941*.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Evans, David C., ed. *The Japanese Navy in World War II: In the Words of Former Japanese Naval Officer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3.

Evans, Hugh E. *The Hidden Campaign: FDR's Health and the 1944 Election*. Routledge, 2016.

Evans, Walter R. *Wartime Sea Stories: Life Aboard Ships, 1942–1945*. IUniverse, 2006.

Ewing, Steve. *Thach Weave: The Life of Jimmie Thach*.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Fahey, James J. *Pacific War Diary, 1942– 1945*. Houghton, 1963.

Feifer, George. *Tennozan: The Battle of Okinawa and the Atomic Bomb*. Ticknor & Fields, 1992.

Feis, Herbert. *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W.W. Norton, 1970.

Ferrell, Robert H. *Harry S. Truman*. CQ Press, 2003.

—. *Harry S. Truman and the Bomb: A Documentary History*. High Plains Pub. Co., 1996.

Fisher, Clayton E. *Hooked: Tales & Adventures of a Tailhook Warrior*. Denver, CO: Outskirts, 2009.

Forrestal, James.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Walter Millis. The Viking Press, 1951.

Frank, Richard B. *Downfall: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Empire*. Penguin Books, 2001.

Friend, Theodore. *The Blue- Eyed Enemy: Japan Against the West in Java and Luzon, 1942– 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Fujitani, Takashi, et al.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 Pacific War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Fussell, Paul. *Wartime: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adbois, Robert O. *Hellcat Tales: A U.S. Navy Fighter Pilot in World*

War II. Merriam Press, 2011.

Galantin, I.J. *Take Her Deep! A Submarine Against Japan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Garvey, John. *San Francisco in World War II*. Arcadia Pub., 2007.

Giangreco, D.M. *Hell to Pay: Operation Downfall and the Invasion of Japan, 1945–47*.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7.

Gibney, Frank, ed. *Senso: The Japanese Remember the Pacific War*. Armonk, NY: M.E. Sharpe, 1995.

Gilbert, Alton. *A Leader Born: The Life of Admiral John Sidney McCain, Pacific Carrier Commander*.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06.

Gluck, Carol.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Gluck, Carol, and Stephen R. Graubard, eds. *Showa: The Japan of Hirohito*. W.W. Norton, 1992.

Glusman, John A. *Conduct Under Fire: Four American Doctors and Their Fight for Life as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1941–1945*. Penguin Books, 2006.

Goldstein, Donald M., and Kathryn V. Dillon. *The Pacific War Papers: Japanese Documents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6.

Goodwin, Doris Kearns. *No Ordinary Tim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 Simon & Schuster, 1994.

Grew, Joseph C. *Turbulent Era: A Diplomatic Record of Forty Years*:

1904– 1945.Ayer Co.Pub., 1952.

Grider, George, and Lydel Sims.War Fish.Ballantine Books, 1973.

Griffin, Alexander R.Out of Carnage.Howell, Soskin, 1945.

Groves, Leslie Richard.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Harper & Row, 1962.

Hachiya, Michihiko, and Warner Wells.Hiroshima Diary: The Journal of a Japanese Physician, August 6– September 30, 1945: Fifty Years Later.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Halsey, William F., and J.Bryan III.Admiral Halsey's Story.Whittlesey House, 1947.

Hammel, Eric, ed.Aces Against Japan: The American Aces Speak.Pocket Books, 1992.

Hara, Tameichi, Fred Saito, and Roger Pineau.Japanese Destroyer Captain: Pearl Harbor, Guadalcanal, Midway— The Great Naval Battles As Seen Through Japanese Eye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Harper, John A.Paddles! The Foibles and Finesse of One World War II Landing Signal Officer.Schiffer Publishing, 2000.

Harries, Meirion, and Susie Harries.Soldiers of the Su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Random House, 1991.

Harris, Brayton.Admiral Nimitz: The Commander of the Pacific Ocean Theater.Palgrave Macmillan, 2012.

Harris, Mark Jonathan, Franklin D.Mitchell, and Steven J.Schechter, eds.The Homefront: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Putnam, 1984.

Hasegawa, Tsuyoshi.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ssett, William D. Off the Record with F.D.R., 1942– 1945.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2001.

Hastings, Max. Retribution: The Battle for Japan, 1944– 45. Vintage, 2009.

Havens, Thomas R.H. Valley of Darkness: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World War Two.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Healy, George W., and Turner Catledge. A Lifetime on Deadline: Self-Portrait of a Southern Journalist. Pelican, 1976.

Henderson, Bruce B. Down to the Sea: An Epic Story of Naval Disaster and Heroism in World War II. HarperCollins, 2008.

Herman, Arthur. Douglas MacArthur: American Warrior. Random House, 2017.

Hersey, John. Hiroshima. Pendulum Press, 1978.

Higa, Tomiko. The Girl with the White Flag. Dell Pub., 1991.

Hoehling, A.A. The Fighting Liberty Ships: A Memoi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Holmes, W.J. Double-Edged Secrets: U.S. Naval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During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9.

Hoopes, Townsend, and Douglas Brinkley. Driven Patri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Forrestal.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0.

Hornfischer, James D. The Last Stand of the Tin Can Sailors. Bantam

Books, 2005.

—. *The Fleet at Flood Tide: America at Total War in the Pacific, 1944–1945*. Bantam Books, 2017.

Hoyt, Edwin Palmer. *How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imitz and his Admirals*.

Weybright and Talley, 1970.

Huber, Thomas M. *Japan's Battle of Okinawa, April– June 1945*.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Hughes, Thomas Alexander. *Admiral Bill Halsey: A Naval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uie, William Bradford. *Can Do! The Story of the Seabees*. E.P.Dutton, 1944.

—. *From Omaha to Okinawa: The Story of the Seabees*. E.P.Dutton & Company, Inc., 1945.

Hull, McAllister H., et al. *Rider of the Pale Horse: A Memoir of Los Alamos and Beyond*.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5.

Hunt, George P. *Coral Comes High*. Harper, 1946.

Hynes, Samuel L. *Flights of Passage: Reflections of a World War II Aviato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Inoguchi, Rikihei, and Tadashi Nakajima. *The Divine Wind: Japan's Kamikaze Force in World War II*. Translated by Roger Pineau.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Irokawa, Daikichi. *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 The Free Press, 1995.

Ito, Masanori.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trans. Roger Pineau. Jove, 1986.

Jackson, Robert H. *That Man: An Insider's Portrai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ckson, Steve. *Lucky Lady: The World War II Heroics of the USS Santa Fe and Franklin*.

Carroll & Graf Pub., 2004.

James, Dorris Clayton. *The Years of MacArthur*. Vol.1, 1880– 1941; Vol.2, 1941– 1945.

Houghton Mifflin, 1970.

Janssens, Ruud. “What Future for Japan?” : U.S. 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Postwar Era, 1942– 1945. Rodopi, 1995.

Jeffries, John W.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Ivan R. Dee, 1998.

Jernigan, Emory J. *Tin Can Man*. Vandamere Press, 1993.

Johnston, Stanley. *Queen of the Flat- Tops: The U.S.S. Lexington and the Coral Sea Battle*.

E.P. Dutton, 1942.

Joseph, Alvin M. *The Long and the Short and the Tall: The Story of a Marine Combat Unit in the Pacific*. Burford Books, 2000.

Kakehashi, Kumiko, and Giles Murray. *So Sad to Fall in Battle: An Account of War Based on General Tadamichi Kuribayashi's Letters from Iwo Jima*. Translated by Giles Murray. 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Books, 2007.

Kase, Toshikazu. *Journey to the Missour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Kawahara, Toshiaki.Hirohito and His Times: A Japanese Perspective.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0.

Keene, Donald.So Lovely a Country Will Never Perish: Wartime Diaries of Japanese Write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Keith, Don.Undersea Warrior: The World War II Story of “Mush” Morton and the USS Wahoo.Dutton Caliber, 2012.

Kelly, Cynthia C., ed.The Manhattan Project: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in the Words of Its Creators, Eyewitnesses, and Historians.Black Dog & Leventhal, 2017.

Kennedy, David M.The American People in World War II: Freedom from Fear, Part Tw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Kenney, George C.General Kenney Report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r.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9.

Kershaw, Alex.Escape from the Deep: The Epic Story of a Legendary Submarine and Her Courageous Crew.Da Capo, 2009.

Kido, Kōichi.The Diary of Marquis Kido, 1931– 45: Selected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4.

King, Dan.The Last Zero Fighter: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WWII Japanese Naval Pilots.

Pacific Press, 2016.

King, Dan, and Linda Ryan.A Tomb Called Iwo Jima: Firsthand Accounts from Japanese Survivors.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King, Ernest J., and Walter Muir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A Naval Record*. W.W.Norton, 1952.

Kiyosawa, Kiyoshi. *A Diary of Darkness: The Wartime Diary of Kiyosawa Kiyoshi*. Translated by Eugene Soviak and Kamiyama Tami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Kort, Michael, ed. *The Columbia Guide to Hiroshima and the Bomb*.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Krueger, Walt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The Story of Sixth Army in World War II*.

Battery Classics, 1989.

Kuehn, John T., et al. *Eyewitness Pacific Theater: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Atomic Bombs*. Sterling, 2008.

Lacey, Laura Homan. *Stay off the Skyline: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6th Marine Division*.

Potomac Books, 2007.

Lane, Frederic Chapin. *Ships for Victory: A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under the U.S. Maritime Commission in World War II*.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01.

Laurence, William L. *Dawn Over Zero: The Story of the Atomic Bomb*. Greenwood Press, 1972.

Lawson, Robert. *U.S. Navy Dive and Torpedo Bombers of World War II*. Zenith Press, 2001.

Lawson, Robert, and Barrett Tillman. *U.S. Navy Air Combat, 1939–46*. Osceola, WI: MBI Publishing, 2000.

Layton, Edwin T., with Roger Pineau and John Costello. "And I Was There" : Pearl Harbor and Midway— Breaking the Secrets.William Morrow, 1985.

Lea, Tom, and Brendan M.Greeley.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Tom Lea's World War II.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2008.

Leach, Douglas Edward.Now Hear This: The Memoir of a Junior Naval Officer in the Great Pacific War.Kent, OH: Kent State Univ.Press, 1987.

Leahy, William D.I Was There.Whittlesey, 1950.

Leary, William M.MacArthur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A Reader.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Leckie, Robert.Okinawa: The Last Battle of World War II.Penguin, 1996.Lee, Clark.They Call It the Pacific: An Eye- Witness Story of Our War Against Japan From Bataan to the Solomons.Viking Press, 1943.

Lee, Robert Edson.To the War.Alfred A.Knopf, 1968.

LeMay, Curtis E., and MacKinlay Kantor.Mission with LeMay.Doubleday, 1965.

LeMay, Curtis E., and Bill Yenne.Superfortress: The Boeing B- 29 and American Airpower power in World War II.Westholme Publishing, 2007

Lerner, Max.Public Journal: Marginal Notes on Wartime America.Viking Press, 1945.

Lilly, Capt.Michael A., USN (Ret).Nimitz at Ease.Stairway Press, 2019.

Lingeman, Richard.Don't You Know There's a War On? The American Home Front, 1941– 45.G.P.Putnam's Sons, 1970.

Litoff, Judy Barrett, and David C.Smith, eds.American Women in a World at War: Contemporary Accounts from World War II.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7.

—. *Since You Went Away: World War II Letters from American Women on the Home Fro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Lockwood, Charles A. *Sink 'Em All*. Bantam Books, 1951.

Lockwood, Charles A., and Hans Christian Adamson. *Hellcats of the Sea: Operation Barney and the Mission to the Sea of Japan*. Chilton Co., 1955.

Lotchin, Roger W. *The Bad City in the Good War: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Oakland and San Dieg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2003.

Lott, Arnold S. *Brave Ship, Brave Men*.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4.

Lucas, Jim Griffing. *Combat Correspondent*.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4.

Lundgren, Robert. *The World Wonder'd: What Really Happened off Samar*. Nimble Books, 2014.

Luvaas, Jay, ed. *Dear Miss Em: General Eichelberger's War in the Pacific, 1942–1945*.

Greenwood Press, 1972.

MacArthur, Douglas. *Reminiscences*. 1st ed. McGraw-Hill, 1964.

Mace, Sterling, and Nick Allen. *Battleground Pacific: A Marine Rifleman's Combat Odyssey in K/3/5*. St. Martin's Griffin, 2013.

McWhorter, Hamilton, and Jay A. Stout. *The First Hellcat Ace*. Pacifica Military History, 2000.

Mahan, A.T., and Allan F. Westcott. *Mahan on Naval Warfare: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 of Rear Admiral Alfred T. Mahan*. Dover Publications, 1999.

Mair, Michael.Kaiten: Japan's Secret Manned Suicide Submarine and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It Sank in WWII.Penguin Group US, 2015.

Manchester, William Raymond.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 1964.

Little, Brown, 1978.

—.Goodbye, Darkness: A Memoir of the Pacific War.Little, Brown, 1980.

Marsden, Lawrence A.Attack Transport: The Story of the U.S.S.Doye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46.

Marshall, George Catlett.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ed.Larry I.Bland and Sharon R.Stevens.Johns Hopkins Univ.Press, 2003.

Mason, John T., ed.The Pacific War Remembered: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6.

Mason, Theodore C.Battleship Sailor.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A Sailor's War.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 “We Will Stand by You” : Serving in the Pawnee, 1942– 1945.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McCandless, Charles S.A Flash of Green: Memories of World War II.Authors Press,2019.

McCrea, John L., et al.Captain McCrea's War: The World War II Memoir of Franklin D.

Roosevelt's Naval Aide and USS Iowa's First Commanding Officer.Skyhorse Publishing, 2016.

McCullough, David.Truman.Simon & Schuster, 1992.

McIntire, Vice- Admiral Ross T.White House Physician.G.P.Putnam's Sons, 1946.

McKelway, St.Clair, and Adam Gopnik.Reporting at Wit's End: Tales from The New Yorker.Bloomsbury USA, 2010.

Meijer, Hendrik.Arthur Vandenberg: The Man in the Middle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Melton, Buckner F.Sea Cobra: Admiral Halsey's Task Force and the Great Pacific Typhoon.Lyons Press, 2007.

Mencken, H.L., and Marion Elizabeth Rodgers.The Impossible H.L.Mencken: A Selection of His Best Newspaper Stories.Doubleday, 1991.

Mendenhall, Corwin.Submarine Diar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Merrill, James M.A Sailor's Admiral: A Biography of William F.Halsey.1st American ed.Crowell, 1976.

Michener, James A.The World Is My Home.Random House, 1992.

Miller, Edward S.War Plan Orange: The U.S.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 1945.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Miller, Max.It's Tomorrow Out Here.Whittlesey House, 1945.

Miller, Merle, and Abe Spitzer.We Dropped the A- Bomb.T.Y.Crowell Co., 1946.

Monroe- Jones, Edward, and Michael Green.The Silent Service in World War II: The Story of the U.S.Navy Submarine Force in the Words of the Men Who Lived It.Casemate, 2012.

Morison, Samuel Elio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7. *Aleutians, Gilberts and Marshalls, June 1942– April 1944*; Vol.8. *New Guinea and the Marianas, 1944*; Vol.12. *Leyte, June 1944– January 1945*; Vol.13. *The Liber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1944– 1945*; Vol.14. *Victory in the Pacific*; Vol.15. *Supplement and General Index*. Little, Brown, 1947– 1962.

Morita, Akio, Edwin M. Reingold, and Mitsuko Shimomura. *Made in Japan: Akio Morita and Sony*. Dutton Books, 1986.

Morris, Ivan.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Tragic Heroe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82.

Newcomb, Richard F. *Iwo Jima*.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Naitō, Hatsuho. *Thunder Gods: The Kamikaze Pilots Tell Their Story*. Dell Pub., 1990.

Nitobe, Inazo. *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 1969.

O'Donnell, Patrick K, ed. *Into the Rising Sun: In Their Own Words, World War II's Pacific Veterans*. Free Press, 2010.

Ohnuki-Tierney, Emiko. *Kamikaze Diaries: Reflections of Japanese Student Soldi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O'Kane, Richard H. *Clear the Bridge!: The War Patrols of the U.S.S. Tang*.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7.

—. *Wahoo: The Patrols of America's Most Famous World War II Submarine*. Novato, CA: Presidio Press, 1987.

Okumiya, Masatake, Jiro Horikoshi, and Martin Caidin. *Zero!* E.P. Dutton, 1956.

Oliver, Douglas L. *Oceania: The Native Cultures of Austral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Univ.of Hawaii Press, 1989.

Olson, Michael Keith.Tales from a Tin Can: The USS Dale from Pearl Harbor to Tokyo Bay.St.Paul: Zenith Press, 2007.

Overy, Richard James.Why the Allies Won.Random House, 1995.

The Pacific War Research Society.The Day Man Lost: Hiroshima, 6 August 1945.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2.

—.Japan's Longest Day.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3.

Parker, Robert Alexander Clarke.The Second World War: A Short History.W.Ross MacDonald School Resource Services Library, 2011.

Perret, Geoffrey.Days of Sadness, Years of Triumph: The American People, 1939– 1945.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erry, Glen C.H. “Dear Bart” : Washington Views of World War II.Greenwood Press,1982.

Perry, Mark.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America: The Making of Douglas MacArthur.

Basic Books, 2014.

Petty, Bruce M., ed.Voices from the Pacific War: Bluejackets Remember.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4.

Phillips, Charles L.Rain of Fire: B- 29s over Japan, 1945.Paragon Agency, 2002.

Potter, E.B.Bull Halse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Nimitz.Naval Institute Press, 1976.

Potter, E.B., and Chester W.Nimitz.The Great Sea War: The Story of Naval Action in World War II.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0.

Prados, John.Storm over Leyte: The Philippine Invas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Navy.New American Library, 2016.

Pyle, Ernie.Last Chapter.Henry Holt, 1946.

Radford, Arthur William, and Stephen Jurika.From Pearl Harbor to Vietnam: The Memoirs of Admiral Arthur W.Rad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

Radike, Floyd W.Across the Dark Islands: The War in the Pacific.Presidio Press/Ballantine, 2003.

Raines, James Orvill, and William M.McBride.Good Night Officially: The Pacific War Letters of a Destroyer Sailor: The Letters of Yeoman James Orvill Raines.Westview, 1994.

Reid, David.The Brazen Age: New York City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Politics, Art, and Bohemia.Pantheon Books, 2016.

Reilly, Michael F., and William J.Slocum.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Simon & Schuster, 1947.

Reischauer, E.O.The Japanese.Charles E.Tuttle Co., 1977.

Reporting World War II.Part One: American Journalism 1938– 1944; Part Two: American Journalism 1944– 1946.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5.

Reynolds, Clark G.Admiral John H.Towers: Struggle for Naval Air Supremacy.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2.

—.The Fast Carriers: The Forging of an Air Navy.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5.

—.On the Warpath in the Pacific: Admiral Jocko Clark and the Fast Carriers.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Rhoades, Weldon E.Flying MacArthur to Victory.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7.

Rhodes, Richard.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Simon & Schuster, 1987.

Richardson, K.D., and Paul Stillwell.Reflections of Pearl Harbor: An Oral History of December 7, 1941.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5.

Rielly, Robin L.Kamikazes, Corsairs and Picket Ships: Okinawa 1945.Casemate, 2010.

Rigdon, William McKinley.White House Sailor.Doubleday, 1962.

Ritchie, Donald A.Reporting from Washington: The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Press Corp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binson, C.Snelling.200,000 Miles Aboard the Destroyer Cotton.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eder, George H.The Censored War: American Visual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gers, Paul P.The Good Years: MacArthur and Sutherland.Praeger, 1990.

Romulo, Carlos P.I See the Philippines Rise.AMS Press, 1975.

Rosenau, James N.The Roosevelt Treasury.1st e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1.

Rosenman, Samuel Irving.Working with Roosevelt.Harper, 1952.

Ruhe, William J. *War in the Boats: My World War II Submarine Battles*. Brassey's, 2005.

Russell, Dale. *Hell Above, Deep Water Below*. Tillamook, OR: Bayocean Enterprises, 1995.

Russell, Ronald W. *No Right to W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Veterans of the Battle of Midway*. New York: iUniverse, Inc., 2006.

Rynn, Midori Yamanouchi., and Joseph L. Quinn. *Listen to the Voices from the Sea: Writings of the Fallen Japanese Students*.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0.

Sakai, Saburo, with Martin Caidin and Fred Saito. *Samurai!* E.P. Dutton, 1956.

Sakaida, Henry.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ces, 1937–45*. Osprey Aerospace, 1998.

Sawyer, L.A., and W.H. Mitchell. *The Liberty Ships: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y Type Cargo Ships Constr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loyds of London Press, 1985.

Schaller, Michael. *Douglas MacArthur: The Far Eastern Gener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chratz, Paul R. *Submarine Commander: A Story of World War II and Korea*. Pocket Books, 1990.

Schultz, Robert, and James Shell. *We Were Pirates: A Torpedoman's Pacific Wa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9.

Scott, James. *Rampage: MacArthur, Yamashita, and the Battle of Manila*. W.W. Norton, 2018.

—. *The War Below: The Story of Three Submarines That Battled Japan*. Simon & Schuster, 2014.

Sears, David. *At War with the Wind: The Epic Struggle with Japan's World War II Suicide Bombers*. Citadel, 2009.

Sears, Stephen W. *Eyewitness to World War II: The Best of American Heritage*. Houghton Mifflin, 1991.

Sheftall, Mordecai G. *Blossoms in the Wind: Human Legacies of the Kamikaze*. NAL Caliber, 2006.

Shenk, Robert, ed. *Authors at Sea: Modern American Writers Remember Their Naval Service*.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Sherman, Frederick C. *Combat Command: The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Pacific War*. Dutton, 1950.

Sherrod, Robert. *On to Westward: War in the Central Pacific*.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5.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Harper & Brothers, 1948.

Shillony, Ben-Ami.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Wartime Jap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kulski, Janusz. *The Battleship Yamato*.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Sledge, E.B. *With the Old Breed: At Peleliu and Okinawa*. Presidio Press, 1990.

Sloan, Bill. *Brotherhood of Heroes: The Marines at Peleliu, 1944: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the Pacific War*. Simon & Schuster, 2006.

—. *The Ultimate Battle: Okinawa 1945—The Last Epic Struggle of World War II*.

Simon & Schuster, 2009.

Smith, Holland M., and Percy Finch. *Coral and Brass*. Scribner, 1949.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 White House Notebook. Harper & Brothers, 1946.

Smith, Peter C. Kamikaze: To Die for the Emperor. Pen & Sword Aviation, 2014.

Smith, Rex Alan, and Gerald A. Meehl. Pacific War Stories: In the Words of Those Who Survived. Abbeville Press, 2011.

Smyth, Robert T. Sea Stories. iUniverse, 2004.

Solberg, Carl. Decision and Dissent: With Halsey at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Sommers, Sam. Combat Carriers and My Brushes with History: World War II, 1939–1946. Montgomery, AL: Black Belt, 1997.

Spector, Ronald H.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 Free Press, 1984.

Springer, Joseph A. Inferno: The Epic Life and Death Struggle of the USS Franklin in World War II. Voyageur Press, 2011.

Stafford, Edward Peary. The Big E: The Story of the USS Enterprise. Random House, 1962.

Starr, Kevin. Embattled Dreams: California in War and Peace, 194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tenbuck, Jack, ed. Typewriter Battalion: Dramatic Frontline Dispatches from World War II. W. Morrow, 1995.

Sterling, Forest. Wake of the Wahoo. Riverside, CA: R.A. Cline Publishing, 1999.

Stillwell, Paul, ed. Air Raid, Pearl Harbor! Recollections of a Day of Infamy.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1.

—.Carrier War: Aviation Art of World War II.Barnes & Noble, 2007.

Stimson, Henry L., and 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Harper & Brothers, 1947.

St.John, John F.Leyte Calling.The Vanguard Press, 1945.

Stoff, Michael B., et al.The Manhattan Project: A Docu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Atomic Age.McGraw- Hill, 2000.

Stoler, Mark A.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Strategy in World War II.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Straubel, James H.Air Force Diary: 111 Stories from the Official Service Journal of the USAAF.Simon & Schuster, 1947.

Sturma, Michael.Surface and Destroy: The Submarine Gun War in the Pacific.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2.

Summers, Robert E., ed.Wartime Censorship of Press and Radio.H.W.Wilson Co., 1942.

Sweeney, Charles W.War's En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Last Atomic Mission.

Avon Books, 1997.

Takeyama, Michio.The Scars of War: Tokyo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Writings of Takeyama Michio, ed.Richard H.Minear.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Tamayama, Kazuo, and John Nunneley.Tales by Japanese Soldiers.Cassell, 2001.

Tanaka, Toshiyuki, Yuki Tanaka, and Marilyn Blatt Young.Bombing Civilians: A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New Press, 2010.

Tanaka, Yuki. *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 Routledge, 2019.

Taylor, Theodore. *The Magnificent Mitsch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Terasaki, Gwen. *Bridge to the Sun*. Rock Creek Books, 2009.

Terkel, Studs, ed. *“The Good War” :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New Press, 1984.

Thomas, Evan. *Sea of Thunder: Four Commanders and the Last Great Naval Campaign, 1941– 1945*. The Easton Press, 2008.

Tillman, Barrett. *Whirlwind: The Air War Against Japan, 1942– 1945*. Simon & Schuster, 2011.

Time- Life Books. *Japan at War / World War II*. Time- Life Books, 1980.

Toland, John.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 1945*. Random House, 1970.

Tolischus, Otto David. *Through Japanese Eyes*. Reynal & Hitchcock, 1945.

Townsend, Hoppes, and Douglas Brinkley. *Driven Patri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Forrestal*. Knopf, 1994.

Truman, Harry S. *Year of Decisions*. Doubleday, 1955.

Tully, Anthony P. *Battle of Surigao Strai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Tully, Grace. *F.D.R.: My Bos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9.

Tuohy, Bill. *The Bravest Man: Richard O’Kane and the Amazing Submarine Adventures of the USS Tang*. Sutton, 2001.

Ugaki, Matome. *Fading Victory: The Diary of Admiral Matome Ugaki*,

1941– 1945. Translated by Masataka Chihay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1.

Vernon, James W. *Hostile Sky: A Hellcat Flyer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Veronico, Nick. *World War II Shipyards by the Bay*. Arcadia, 2007.

Victoria, Brian Daizen. *Zen at War*. Weatherhill, 1997.

Wainwright, Jonathan M. *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 Doubleday, 1946.

Walker, Lewis Midgley. *Ninety Day Wonder*. Harlo Press, 1989.

Wallace, Robert F. *From Dam Neck to Okinawa: A Memoir of Antiaircraft Training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01.

Wees, Marshall Paul, and Francis Beauchesne Thornton. *King- Doctor of Ulithi: The True Story of the Wartime Experiences of Marshall Paul Wees*. Macmillan, 1952.

Weinberg, Gerhard L.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Weller, George, and Anthony Weller, ed. *First into Nagasaki: The Censored Eyewitness Dispatches on Post- Atomic Japan and Its Prisoners of War*. Three Rivers Press, 2007.

—. *Weller's War: A Legendary Foreign Correspondent's Saga of World War II on Five Continents*. Three Rivers Press, 2010.

Werneth, Ron, ed. *Beyond Pearl Harbor: The Untold Stories of Japan's Naval Airmen*.

Atglen, PA: Schiffer Pub., 2008.

Wheeler, Post. *Dragon in the Dust*. Marcel Rodd Co., 1946.

White, Graham J.FDR and the Press.Univ.of Chicago Press, 1979.

Whitney, Courtney.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Greenwood Press, 1977.

Willmott, H.P.The Battle of Leyte Gulf: The Last Fleet Ac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Winkler, Allan M.Home Front U.S.A.: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Arlington Heights, IL: Harlan Davidson, 1986.

Woodward, C.Vann.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Ballantine Books, 1957.

Wooldridge, E.T., ed.Carrier Warfare in the Pacific: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1993.

Wray, Harry, et al.Bridging the Atomic Divide: Debating Japan– US Attitudes on Hiroshima and Nagasaki.Lexington Books, 2019.

Wukovits, John F.Admiral “Bull” Halsey: The Life and Wars of the Navy’s Most Controversial Commander.Palgrave Macmillan, 2010.

Yahara, Hiromichi.The Battle for Okinawa.John Wiley & Sons, 1995.

Yamashita, Samuel Hideo.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 ed.Leaves from an Autumn of Emergencies: Selections from the Wartime Diaries of Ordinary Japanese.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Yoder, Robert M.There’s No Front like Home.Hardpress Publishing, 2012.

Yokota, Yutaka.Suicide Submarine! Ballantine Books, 1962.

Yoshida, Mitsuru, and Richard H.Minear.Requiem for Battleship Yamato.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9.

Yoshimura, Akira. *Battleship Musashi: The Making and Sinking of the World's Biggest Battleship*. Translated by Vincent Murphy.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9.

—. *Zero Fighte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6.

Zacharias, Ellis M. *Secret Missions: The Story of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Zich, Arthur, and the Editors of Time- Life Books. *The Rising Sun*. Alexandria, VA: Time- Life Books, 1977.

文章

Anderson, George. "Nightmare in Ormoc Bay." *Sea Combat*. Accessed October 14, 2018. <http://www.dd-692.com/nightmare.htm>.

Associated Press, "Deadly WWII U.S. firebombing raids on Japanese cities largely ignored."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5/03/10>.

—. "Tokyo Aides Weep as General Signs." September 2, 1945.

Bennett, Henry Stanley. "The Impact of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n the Civilians of Okinawa."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6, February 1946.

Benoit, Patricia. "From Czechoslovakia to Life in Central Texas." *Temple Daily Telegram*, August 23, 2015.

Bradbury, Ellen, and Sandra Blakeslee. "The Harrowing Story of the Nagasaki Bombing Miss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ugust 4, 2015.

Ben Bradlee. "A Return." *The New Yorker*, October 2, 2006.

Brown, Wilson. "Aide to Four President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1955.

Cosgrove, Ben. "V- J Day, 1945: A Nation Lets Loose." *Life*, August 1, 2014.

Davis, Captain H.F.D. "Building Major Combatant Ships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1, May 1947.

Delaney, Norman C. "Corpus Christi, University of the Air." *Naval History*, Vol.27, No.3, June 2013.

Delaplane, Stanton. "Victory Riot." In Hogan, William, and William German, eds.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Reader. McGraw- Hill Book Co., 1962.

De Seversky, Alexander P. "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The American Mercury*, Vol.54, February 1942.

"Dewey Refuses to Say Directly That Roosevelt Withheld Pacific Supplies." *The Courier- Journal* (Louisville, KY), September 15, 1944.

Eckelmeyer, Edward H.Jr. "The Story of the Self- Sealing Tank."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Eller, Ernest M. "Swords into Plowshares: Some of Fleet Admiral Nimitz's Contributions to Peace."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6.

Ewing, William H. "Nimitz: Reflections on Pearl Harbor." Fredericksburg, TX: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Fedman, David, and Cary Karacas, "A Cartographic Fade to Black: Mapping the Destruction of Urba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38, Issue 3, July 2012.

“General MacArthur’s Instructions to Japanese on Occupation Landings.” Reprinted 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3, 1945.

Goldsmith, Raymond W. “The Power of Victory: Munitions Output in World War II.”

Military Affairs, 10, No.1, Spring 1946.

Guillain, Robert. “I Thought My Last Hour Had Come.” The Atlantic, August 1980.

Hagen, Robert C., as told to Sidney Shalett. “We Asked for the Jap Fleet– and Got It.”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6, 1945.

Halsey, Ashley Jr. “The CVL’s Success Story.”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8, April 1946.

Halsey, William F.Jr. “The Battle for Leyte Gulf.”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5/591, May 1952.

Hammer, Captain D.Harry. “Organized Confusion: Building the Base.”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0, April 1947.

Heinl, R.D.Jr. “Naval Gunfire: Scourge of the Beache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Herbig, Katherine L. “American Strategic Deception in the Pacific: 1942– 1944.” In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ed.Michael I.Handel, 260– 300.London: Cass, 1987.

Hessler, William H. “The Carrier Task Force in World War I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1, No.513, November 1945.

Holland, James. “The Battle for Okinawa: One Marine’s Story.” BBC History Magazine and BBC World Histories Magazine.Accessed May 2,

2019.<https://www.historyextra.com/period/second-world-war/the-battle-for-okinawa-one-marines-story/>.

Holloway, James L.III. "Second Salvo at Surigao Strait." *Naval History*, Vol.24, No.5, October 2010.

Hunt, Richard C.Drum. "Typhoons in the North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9, May 1946.

Jones, George E. "Intramuros a City of Utter Horro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1945.

Lamar, H.Arthur. "I Saw Stars." Fredericksburg, TX: The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1985.

Lardner, John. "D- Day, Iwo Jima." *The New Yorker*, March 17, 1945.

—. "Suicides and Bushwhackers." *The New Yorker*, May 19, 1945.

Laurence, William L. "Atomic Bombing of Nagasaki Told by Flight Memb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9, 1945.

Leary, William L., and Michie Hattori Bernstein. "Eyewitness to the Nagasaki Atomic Bomb." *World War II*, July/August 2005.

Liebling, A.J. "The A.P.Surrender." *The New Yorker*, May 12, 1945.

Mailer, Norman. "In the Ring: Life and Letters." *The New Yorker*, October 6, 2008.

Manchester, William. "The Bloodiest Battle of All."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87.

"Master Recording of Hirohito's War- End Speech Released in Digital Form." *The Japan Times*, August 1, 2015.(Include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urrender rescript as it appeared in the newspaper on August 15, 1945.)

McCarten, John. "General MacArthur: Fact and Legend." *The American*

Mercury, Vol.58, No.241, January 1944.

Morris, Frank D. "Our Unsung Admiral." Collier's Weekly, January 1, 1944.

Murrie, James I., and Naomi Jeffery Petersen. "Last Train Home." American History, February 2018.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Railroad History, Spring– Summer 2015.

Mydans, Carl. "My God, It's Carl Mydans!" Life, February 19, 1945.

Nimitz, Chester W. "Some Thoughts to Live By." The Admiral Nimitz Foundation, Fredericksburg, TX, 1971.

Nolte, Carl. "The Dark Side of V- J D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ust 15, 2005.

Ostrander, Colin. "Chaos at Shimonoseki."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3, No.532, June 1947.

Petillo, Carol M. "Douglas MacArthur and Manuel Quezon: A Note on an Imperial Bon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8, No.1, Feb.1979.

Portz, Matthew H. "Aviation Training and Expansion." Naval Aviation News, July– August 1990.

—. "Why Primary Flight Training?"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0, No.496, June 1944.

Pratt, Fletcher. "Spruance: Picture of the Admiral." Harper's Magazine, August 1946.

Price, Bryon. "Governmental Censorship in War- Tim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6, No.5, October 1942.

Ralph, William W. "Improvised Destruction: Arnold, LeMay, and the Firebombing of Japan." War in History, Vol.13, No.4, October 2006.

Ryall, Julian. "Hiroshima Bomber Tasted Lead After Nuclear Blast, Rediscovered Enola Gay Recordings Reveal." The Telegraph (UK), August 6, 2018.

Say, Harold Bradley. "They Pioneered a Channel to Tokyo."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1, No.513, November 1945.

Sears, David. "Wooden Boats at War: Surigao Strait." World War II, Vol.28, issue No.5, February 2014.

Selden, Mark. "A Forgotten Holocaust: U.S.Bombing Strategy, the Destruction of Japanese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from World War II to Iraq." Asia- Pacific Journal, Vol.5, No.5, May 2, 2007.

Siemes, John A. "Eyewitness Account, Hiroshima, August 6, 1945," by Avalon Project, Yale Law School, Lillian Goldman Law Library.<http://avalon.law.yale.edu>.

Smith, Merriman. "Thank You, Mr.President!" Life, August 19, 1946.

Smith, Steven Trent. "Payback: Nine American Subs Avenge a Legend's Death." World War II Magazine, October 24, 2016.

Sprague, Rear Admiral C.A.F., U.S.N. "The Japs Had Us on the Ropes." The American Magazine, Vol.139, No.4, April 1945.

Taoka, Eiko. "Testimony of Hatchobori Streetcar Survivors." The Atomic Archive.
<http://www.atomicarchive.com/Docs/Hibakusha/Hatchobori.shtml>.

Trumbull, Robert. "All Out with Halse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6, 1942.

Vandenberg, Arthur. "Why I Am for MacArthur." Collier's Weekly, February 12, 1944.

Vogel, Bertram. "Japan's Homeland Aerial Defense."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4, No.540, February 1948.

Waba, Masako. "A Survivor's Harrowing Account of Nagasaki Bombing." CBC News, May 26, 2016.<https://www.cbc.ca/news/world/nagasaki-atomic-bomb-survivortranscript-1.3601606>.

Waller, Willard. "Why Veterans Are Bitter." *The American Mercury*, August 1945. Wellerstein, Alex. "Nagasaki: The Last Bomb." *The New Yorker*, August 7, 2015.

Whitney, Courtney. "Lifting Up a Beaten People." *Life*, August 22, 1955, p.90.

Williams, Josette H. "Paths to Peace: The Information War in the Pacific, 1945."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 CIA. Accessed November 4, 2018.<https://www.cia.gov/library>.

Williams, R.E. "You Can't Beat 'Em If You Can't Sink 'Em."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2, No.517, March 1946.

Wylie, J.C. "Reflections on the War in the Pacific."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Vol.78, No.4, May 19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 （美）伊恩·托尔著；谭星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12

（太平洋战争三部曲）

书名原文：Twilight of the Gods: Wa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1944-1945

ISBN 978-7-5217-3560-4

I.①诸... II.①伊... ②谭... III.①太平洋战争IV.① 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190944号

Copyright © 2020 by Ian W.Toll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著者：[美] 伊恩·托尔

译者：谭星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754千字

版次：2021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20-4241

书号：ISBN 978-7-5217-3560-4

审图号：GS（2021）5774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